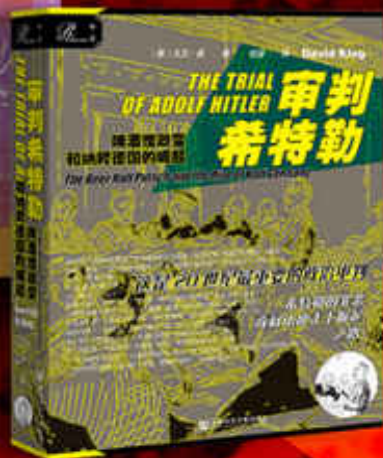




第三帝国的兴衰史

多个角度了解不一样的第三帝国

(全7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总目录

- [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
-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 [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
-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
-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R 家·恩
THORN BIRD

第一帝国

的

ACHT TAGE IM MAI

最后

Die letzte Woche des
Dritten Reiches

八天

〔德〕福尔克·乌尔里希
(Volker Ulrich) / 著

何昕 / 译

「零点时刻」
无处可逃

第1名
2020年6月
非虚构作品
排行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福尔克尔·乌尔里希 (Volker Ulrich)

1953年生，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专栏作家、电视媒体人，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曾担任《汉堡周刊》「政治书目」栏目主编，是《时代》周报旗下的知名作家和《时代周报·历史篇》的联合出版人。已出版《焦虑的强国：1871~1914，德意志帝国兴亡史》《希特勒传：跃升年代》等经典作品。

何昕

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曾求学于慕尼黑，旅居柏林数年，现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



图书策划人



视觉传达匠



联合创立



第三帝国的

最后

八天

〔德〕福尔克·乌尔里希
(Volker Ullrich) / 著

何昕 / 译

这位前《时代》周报编辑的报道充满故事性和感染力，他向我们展示了亲历者的证言，对痛苦、困惑、恐惧的回忆，战后仍然存在的偏见，以及被压抑的负罪感。

——《吕贝克新闻报》

（……）视角切换很有启发性。读者哪怕已经相当熟悉这段被书写过许多遍的历史，也总是能不断读到新的、之前不了解的细节或插曲。

——《世界报》，里夏德·克默林（Richard Kämmerlings）



- [前言](#)
- [序幕：1945年4月30日](#)
- [1945年5月1日](#)
- [1945年5月2日](#)
- [1945年5月3日](#)
- [1945年5月4日](#)
- [1945年5月5日](#)
- [1945年5月6日](#)
- [1945年5月7日](#)
- [1945年5月8日](#)
- [后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人名索引](#)

前言

1945年5月7日，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Erich Kästner）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惊慌失措地在街道上穿行。历史课间的短暂间歇让他们紧张。那些‘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之间的空隙刺激着他们的神经。”^[2]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已经过去的”和“尚未到来的”之间的阶段。旧的秩序，即纳粹统治已经瓦解；新的秩序，即占领军的接管政府尚未建立。对于亲身经历了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死亡与5月7日至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之间那些日子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命中深刻的转折点，即经常提到的所谓“零点时刻”。^[3]时间仿佛陷入停滞。5月7日，一位柏林市民记录道：“没有报纸、没有日历、没有时刻和截止日期，太奇怪了”，“无尽的时间像水一样流淌，而指针只是那些穿着陌生制服的男人们”。^[4]这种生活在“无人时刻”的感觉给1945年5月初的这几天赋予了独特的印记。^[5]

这几天充满了戏剧性。“爆炸新闻一个接着一个！大事件接踵而至！”5月5日，一位德国黑森州劳巴赫镇的司法检察官在日记中记录道。“柏林被苏联人征服了！汉堡落入英国人手中！（……）在意大利和西奥地利的德军已经投降。今天上午，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军也正式投降。全线溃败。”^[6]

整个溃败过程太过突然、速度太快，以至于当时的观察家们不得不努力调整以跟上事态的发展。剧烈的动荡使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产生一种幻觉和不真实感。5月7日，符腾堡自由党人莱因霍尔德·迈

耶（Reinhold Maier）写道：“人们一直都摸不着头脑，并需要不断确认，这一切并不是一场梦。”^[7]

造成混乱的原因在于，在走向灭亡的“第三帝国”的不同地区，战争的结束进程存在差异，人们对此的感知也不尽相同。^[8]一方面，在被攻占的德国西部地区，许多地方视盟军为解放者，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却弥漫着对苏联人的恐惧。原因既在于煽动了多年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也在于德军在对抗苏联的歼灭战争中所犯的罪行传播甚广。因此，尽管西线许多士兵或多或少地准备好向英美人投降，但东线的军队对苏联红军的奋力抵抗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5月3日，汉堡没有抵抗就投降了，而在要塞城市布雷斯劳的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6日。当被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重启政治生活时，德国对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占领仍在持续，一直到5月初。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直到5月5日布拉格起义后，德军的占领才得以终结。

虽然在许多德国人的主观认知中，时间似乎已停滞不前，但在街上一切都处于移动状态之中。庞大的人群在路上。集中营囚犯的“死亡行军”队伍、返回的国防军部队、大批难民、战俘、被解放的强制劳工和因轰炸被迫背井离乡的返乡人交会在一起。盟军的观察员称之为一次实实在在的民族大迁徙。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

（Ivone Kirkpatrick）回忆说：“这看上去像是有人捅了一个巨大的蚁丘。”^[9]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于生动重现这整个混乱而矛盾的事件。

这八天的插曲离不开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领导的弗伦斯堡政府。希特勒亲自任命这位海军元帅为继任者。其主要职责是在希特勒自杀后将战争延长整整一周。他的部分投降策略，即一边继续对苏联作战，一边对西边的盟国投降，不仅成功使尽可能多的平民和士兵逃往英美阵线，而且在反希特勒阵营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这一策

略是如何实施的？采取了哪些步骤？其中又存在哪些幻想？这些将构成本书的主线。

昙花一现的邓尼茨政府也很有启示意义，因为无论在人事还是执政章程方面，这个政府都与纳粹政权保持着可怕的延续性，并且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所犯罪行承担责任的自觉。这一点不仅反映了整个纳粹精英层的态度，也反映了大部分德国民众的态度。

不过，作为德意志国政权中最后残余的邓尼茨政府，在那八天中只占据了很小的篇幅。本书将把目光越过被包围的弗伦斯堡，聚焦在更多其他地方，以形成一幅涵盖政治、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与其发展态势的多样化全景图。以下相关主题都不会被省略：最后的几场战役、死亡行军、战争结束时的自杀浪潮、德国占领军持续散布的恐怖、与外国士兵的初次相遇、柏林大规模强奸案、战俘的命运、集中营的囚犯和“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早期对德国人的“野蛮”驱逐、废墟中的日常生活以及摸索中的新开始——其中有一些人借此在战后平步青云。

本书将讲到的事件，起因可以追溯到过去，后果则影响着未来。因此，在叙述上将越过这八天的时间界限，有些往前，有些往后。此外，还需要对那些进入历史视野的人物际遇及其发展进行仔细刻画。人物刻画和带有历史深度的特写镜头将交替出现，笔者希望，借此能形成一幅整体画卷，让读者对“第三帝国”末日毁灭与占领军进驻前的这段历史剧变成立体而生动的印象。

本书将透过大量的日记、信件和回忆，让亲历者自己发声。其中，日记是最必不可少的资料，因为它是对经历战争结束这一重大转折的最直接表达。^[10]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各种矛盾对立的情绪和感觉，这也正是1945年5月初这段日子的特点：一边弥漫着末日情绪，一边则准备重新出发。

[1] 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德国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 Erich Kästner: Notabene 45. Ein Tagebuch, München 1989, S. 130 (v. 7. 5. 1945)。这本于1961年首次出版的书是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修订的版本。参见Sven Hanuschek对埃里希·凯斯特纳的介绍: Das Blaue Buch. Geheimes Kriegstagebuch 1941-1945. Hrsg. von Sven Hanuschek in Zusammenarbeit mit Ulrich von Bülow und Silke Becker, Zürich 2018, S. 25-31。

[3] 关于“零点时刻”，参见Volker Depkat对政治家自传的研究: Lebenswelten und Zeitenwenden. Deutsche Politiker und die Erfahrungen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2007, S. 189-196。

[4] Eine Frau in Berlin. Tagebuchaufzeichnungen vom 20. April bis 22. Juni 1945, Frankfurt/M. 2003, S. 154 (v. 7. 5. 1945)，作者不详。

[5] 关于“无人时刻”，参见Harald Jähner: Wolfszeit.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1945-1955, Berlin 2019, S. 20。

[6] Friedrich Kellner: “Vernebelt, verdunkelt sind alle Hirne”. Tagebücher 1939-1945. Hrsg. von Sascha Feuchert/Robert Martin Scott Kellner/Erwin Leibfried/Jörg Riecke/Markus Roth, Bd. 2, Göttingen 2011, S. 930 (v. 5. 5. 1945)。

[7] Reinhold Maier: Ende und Wende. Briefe u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1944-1946, Wuppertal 2004, S. 232 (v. 7. 5. 1945)。

[8] 参见Richard Bessel: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London 2009, S. 134 f.。

[9] Ivone Kirkpatrick: Im inneren Kreis. Erinnerungen eines Diplomaten, Berlin 1964, S. 167。参见Jähner: Wolfszeit, S. 61 ff.。

[10] 参见Stefan-Ludwig Hoffmann: Besiegte, Besatzer, Beobachter. Das Kriegsende im Tagebuch, in Daniel Fulda/Dagmar Herzog/Stefan-Ludwig Hoffmann/Till van Rahden (Hrsg.) : Demokratie im Schatten der Gewalt. Geschichten des Privaten im deutschen Nachkrieg, Göttingen 2010, S. 25-55; Susanne zur Nieden: Alltag im Ausnahmezustand. Frauentagebücher im zerstörten Deutschland, Berlin 1993.

序幕：1945年4月30日

1945年4月30日凌晨，一条毁灭性的消息传到老帝国总理府地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报告，在瓦尔特·温克（Walter Wenck）将军带领下进军柏林的第十二集团军在波茨坦西南的施维洛湖（Schwielow-See）停住了脚步。这意味着，自4月25日以来被苏军围困的首都获得解围的最后希望消失了。直到此刻，阿道夫·希特勒终于决定接受其动荡生涯中一再受到的威胁：终结生命。^[1]

还在凌晨时分，希特勒就开始与身边人作别，其中包括新帝国总理府战地医院的医务人员。这是恩斯特·君特·申克（Ernst Günther Schenk）医生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希特勒，他表示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冷静”。站在他面前的男人不再是过去那个精力充沛的“元首”：“他应该是穿着一件灰色的外衣，左胸佩戴镶有金边的国徽和铁十字勋章，下身穿一条黑色长裤；而在这套衣服里的人以难以想象的程度蜷缩着。我低头看到他弯着脊背，从耸出的肩胛骨中几乎是痛苦地抬起头。”^[2]希特勒与所有人握手，并感谢他们所作的贡献。他宣布，他将了断自己的生命，并解除其他人的效忠誓言。他让他们寻求英美同盟的庇护，以免落入苏联人之手。

凌晨5点，老总理府再次遭到苏联炮兵的不断炮击。一小时后，希特勒把政府区最后的防线“大本营”的指挥官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叫到地堡，询问总理府还能支撑多久。这位党卫队旅队长回

答，最多一两天。与此同时，苏联人占领了蒂尔加滕公园的大部分区域，并已经在距总理府仅400米的波茨坦广场上战斗。必须抓紧时间了。

快到中午12点时，赫尔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离开位于本德勒大街（Bendlerstraße）的指挥所，来到元首的地堡进行最后一次战况汇报，他几天前刚被希特勒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他所描绘的景象比此前蒙克汇报的更加悲观：由于弹药供应不足，空中也无法再进行补给，柏林的战斗很有可能在4月30日晚就结束。希特勒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尽管他仍然坚决拒绝投降，但是在和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商量后，他允许柏林守卫军在所有储备耗尽后分成小组，加入尚在西线作战的部队。魏德林返回本德勒大街后，收到了最后一条书面“元首令”^[3]。

在对战况进行讨论后，纳粹党办公室主任兼“元首秘书”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叫来希特勒个人副官、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奥托·君舍（Otto Günsche），告知他元首将于当天下午与刚结婚的伊娃·布劳恩（Eva Braun）结束生命。元首要求将尸体火化。君舍须准备足够的汽油。很快，希特勒也亲自要求他的副官允诺严格执行该命令。他不希望自己的遗体被带到莫斯科示众。显然，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遭遇浮现在眼前：他和情人克拉拉·贝塔西（Claretta Petacci）于4月27日在科莫湖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并于一天后枪决。两人的尸体于4月29日上午被运往米兰，倒挂在洛雷托广场（Piazzala Loreto）的一个加油站。这位意大利“元首”的遭遇于4月29日晚传到地堡，想必这让希特勒更加坚决地不让他和妻子的尸体留下任何痕迹。

君舍随即开始为火化作准备。他给希特勒私人司机兼机动车负责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去电，指示他准备十个汽油罐，

并将它们放在通往总理府花园的地堡紧急出口。[4]

下午1点至2点间，希特勒在秘书特劳德·琼格（Traudl Junge）和盖尔达·克里斯蒂安（Gerda Christian）以及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陪同下吃了最后一餐。与前几周一样，他们之间的对话都是日常话题；没有人谈及即将来临的终结时刻。特劳德·琼格在1947年写的回忆录（直到2002年才出版）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一场“在轻松愉悦与沉着冷静外壳下的死亡宴席”。[5]希特勒多年的伴侣伊娃·布劳恩没有参加。她于1945年3月从慕尼黑回到柏林，并很早就决定与希特勒共赴黄泉。为了感谢她的无条件忠诚，希特勒于4月28日至29日的凌晨与其结婚。在之前口授的“私人遗嘱”中，他“决定娶那个女孩为妻，她怀着长久以来忠贞的情谊，毅然自愿回到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为的是与我命运与共”。[6]

对希特勒来说，是时候与他身边的追随者告别了。他将挂在地堡办公室书桌上方的安东·格拉夫（Anton Graff）[7]所绘的腓特烈大帝肖像遗赠给了他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Hans Baur）。“我的将军们出卖了我，我的士兵们无心作战，而我也无能为力了！”希特勒又说，他知道“明天（……）将有数百万人咒骂他”，但命运无法从头再来。[8]他建议跟了他十年的勤务员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加入逃往西方的队伍。林格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现在苟且偷生是为了谁？”希特勒回答道：“为了下一个人！”[9]

下午3点15分左右，希特勒最心腹的官员聚集在地堡走廊：马丁·鲍曼、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外交部联络官瓦尔特·赫维尔（Walther Hewel）、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国防军首席副官威廉·布格道夫（Wilhelm Burgdorf）以及秘书琼格、克里斯蒂安和营养师曼扎利。希特勒在妻子的陪伴下出现。琼格回忆道：“他非常缓慢地走出房间，弓着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甚，他和所有人握手。”“我感受到他右手的温暖，他望向我，但眼中没有我。他似乎离我很远。他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听不到。

（……）当伊娃·布劳恩走向我时，魔力才有所消散。她笑着拥抱我。她说：‘请试着逃出去，也许您能够成功。然后向巴伐利亚问好。’”[\[10\]](#)

随后，玛格达·戈培尔出现，她请求君舍准许其与希特勒再次交谈。她也已决定与丈夫一同自杀，并把六个孩子一并带走。她在4月28日给第一段婚姻中所生的儿子哈罗德·匡特（Harald Quandt）的告别信中写道，他们已经在地堡待了六天，为的是“给自己的纳粹人生唯一可能的、有尊严的结局”，“在元首和纳粹之后的世界是不值得居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着孩子一同离开。把他们留下太可惜了，我要自己给他们以救赎，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她向元首宣誓“至死的忠诚”，并且她认为，她和丈夫可以与元首同归于尽，是“我们从来不敢奢求的命运恩典”。[\[11\]](#)显然，玛格达·戈培尔此刻有些动摇，因为她试图说服希特勒再作一次逃离柏林的尝试。希特勒明显对这最后一刻的干扰感到愤怒，拒绝了她的建议。[\[12\]](#)

大约十分钟后，也就是下午3点30分刚过，勤务员林格打开通往希特勒书房的门，朝里瞥了一眼，然后向鲍曼报告：“帝国领袖先生，完成了！”两人进入房间，看到了如下场景：从观察者角度看，希特勒坐在沙发左侧，他的头略微向前垂下。他的右太阳穴上有一个十芬尼硬币大小的弹孔，鲜血顺着脸颊流下。墙壁和沙发上都有喷溅的血渍。地板上已经形成了盘子大小的一摊血。手枪从垂悬的右臂滑落，静静地躺在希特勒的右脚边。伊娃·布劳恩蜷起双腿坐在沙发的右侧。其尸体散发出的苦杏仁味表明是服用了氰化物胶囊中毒。[\[13\]](#)

君舍副官走进储藏间，冲在那儿等候的人们喊道：“元首已死！”戈培尔、克雷布斯、布格道夫，以及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

斯曼（Artur Axmann）和帝国保安局局长、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翰·拉滕胡伯（Johann Rattenhuber）进入希特勒办公室前厅。此时，林格和身后跟着的两名党卫队军官抬着希特勒的尸体走出来。尸体被包裹在毯子中，只露出穿着黑色裤子的小腿、黑色的袜子和一双浅口鞋。希特勒和妻子的尸体被人沿着楼梯向上抬到总理府花园，并在距离地堡出口约3~4米的地方被放下。鲍曼再次上前，掀开盖在希特勒脸上的毯子，并沉默了片刻。

与此同时，数枚炮弹从总理府上空坠落。在停火间歇，君舍、肯普卡和林格冲出去，将此前准备好的汽油统统浇在尸体上。起初汽油总点不燃，因为大火产生的强风总是将火柴吹灭。最终，林格在纸上引火，并将其扔向尸体。明亮的火焰瞬间升起。聚集在出口处的人再次举起手臂向希特勒敬礼，然后迅速退回地堡。4月30日晚，在君舍的命令下，希特勒夫妇的遗体被希特勒护卫队的两名官兵埋葬在总理府花园的洼地中。[\[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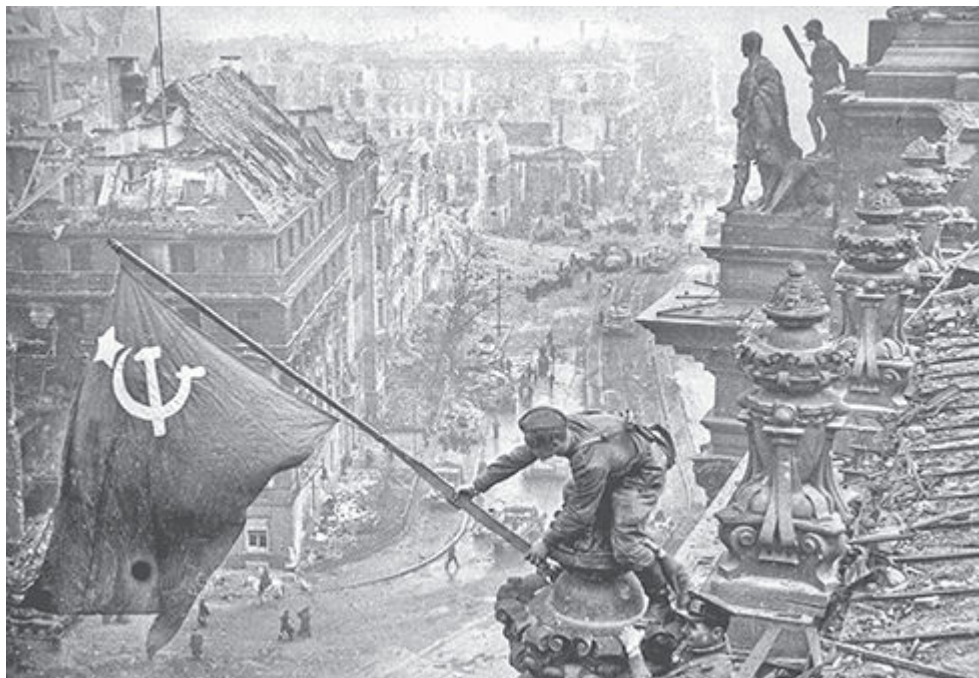
*

在希特勒为自杀作最后准备的同时，苏军正准备进攻国会大厦。国王广场上的这座宏伟的新巴洛克式建筑在1884年至1894年间由法兰克福建筑师保罗·瓦洛特（Paul Wallot）设计建造，它在苏联指挥官眼中是可恨的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实际象征。苏联人认为1933年2月27日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的幕后黑手正是纳粹党，正是这一事件成为残酷迫害德国各地共产党人的借口，而随后于2月28日出台的《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15\]](#)更是奠定了纳粹恐怖统治的基石。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国会大厦被选为柏林最后一战中最重要的攻击目标，而不是与之仅百米之遥的希特勒最后的避难所总理府地堡。最迟至5月1日，即国际工人阶级斗争日，这座瓦洛特设计的大楼就必须被攻占下来。

4月29日，苏联突击部队已经攻占了施普雷河上的莫特克桥，并占领了附近的帝国内政部。4月30日凌晨，攻占国会大厦的战斗打响了。^[16]但是，战斗的难度远远超出了预期。一支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队，再加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成员组成的参差不齐的防御部队将这座建筑变成了一座堡垒。他们把所有窗户和门堵得密不透风，只留下必要的射击孔，并布好了地雷。机关枪掩体和灌满水的坑道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壁垒。苏军的第一次进攻遭到德军猛烈反击。为了支援步兵，苏联将更多的突击炮和坦克经由莫特克桥运往国王广场。但是，早上和下午早些时候的两次袭击均损失惨重。于是，苏联指挥官决定将原本安排在18点的最后一次袭击改到天黑时分。这次，苏联士兵成功抵达国会大厦的台阶下，并冲破了入口大门。在大楼内，血腥的肉搏战开始了。一面是红军战士依靠冲锋枪和手榴弹沿着楼梯往上冲，一面是德国守军往下撤入底层和地窖。

22点40分左右，由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米宁（Michail Petrowitsch Minin）率领的一支苏联部队到达国会大厦屋顶。他们有一块红布，但没有旗杆。于是士兵捡起一根管子，将红布固定在上面，把这面即兴制作的旗帜插在一尊半毁的女性形象雕塑上。^[17]但是，占领国会大厦的战斗并没有就此结束。德国人继续顽强抵抗。直到5月2日下午，最后的部队才投降。

当5月2日上午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Jewgeni Chaldej）进入大楼并用相机重新拍摄下实际发生在30小时之前的事件时，双方仍然在战斗：画面中两名红军士兵表现出第一次将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悬挂在国会大厦屋顶上的样子。这张著名的照片成为一幅“圣像”，因为它象征着苏联军队击败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这幅照片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几个月后，哈尔杰伊不得不处理掉其中一名举着旗杆的士兵右手腕上的第二只手表，这样就不会让人联想到它可能是被掠夺的物品，因为手表是苏联征服者们喜爱的战利品。^[18]



苏联红军在柏林国会大厦上举起红旗。这个画面是苏联摄影师叶夫根尼·哈尔杰伊于1945年5月2日补拍的。（©Khaldei/Voller Ernst/akg-images, Berlin）

在随后的几天，国会大厦成为“真正的朝圣目的地”。^[19]参观者们不断拥入。许多红军士兵在墙上写下口号或刻上文字，以表达胜利者的喜悦。^[20]如今，人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西里尔字母的涂鸦。

*

1945年4月30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争史部门秘书玛丽安·弗伊森格（Marianne Feuersenger）在她的随身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看到一些美国汽车。它们在街头巡逻。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和平氛围。”^[21]美军占领慕尼黑的时间正好是希勒特和妻子在柏林自杀的时间，这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个在一战中还默默无闻的二等兵，正是从1919年起在这座巴伐利亚大都市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魏玛共和国灭亡后，这里高涨的反革命氛围为这个野心勃勃的煽动者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提供了理想的土壤。1920年代初，“国家社会

主义”^[22]运动在此迅速活跃起来，而巴伐利亚警察和司法机构对此十分宽容。为表示感谢，后来成为“元首”和帝国总理的希特勒在1935年8月授予慕尼黑“运动首都”的尊号。在进驻时，美军士兵举着刻有“运动首都慕尼黑”字样的铭牌，将这个曾经的攻击对象变成了一种战利品。这幅图景的意义几乎等同于叶夫根尼·哈尔杰伊拍摄的在柏林国会大厦升起红旗的照片。^[23]

1945年4月的最后几天，美国人已经征服了纳粹党大本营纽伦堡，并迅速进军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美军飞机向该城市投下传单，呼吁“慕尼黑的男人和女人”不要对前进的部队作出任何反抗：“帮助理性获胜符合您的利益，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将领导权从狂热分子手中夺走！鼓起勇气，行动起来！”^[24]

但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巴伐利亚大区领袖保罗·吉斯勒（Paul Giesler）和他的追随者从未想过直接缴械投降。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地守住这座其实大部分区域已然是废墟的城市。吉斯勒下令炸毁伊萨尔河（Isar）上的主要桥梁，此项命令只是最后时刻众多毫无意义的摧毁令之一，最终被受托执行的工兵营中的一名军官成功阻止。



1945年4月30日，美国士兵在进军中拿着慕尼黑的城市铭牌作为战利品。
(Scherl/Süddeutsche Zeitung Photo, München)

1945年4月，慕尼黑及周边地区几支反对希特勒的力量联手组成了“巴伐利亚自由行动 (Freiheitsaktion Bayern)” 抵抗组织，他们此刻决心行动起来。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保守、爱国的巴伐利亚男性。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逮捕纳粹高级官员，并将慕尼黑和平移交给美国人。4月27日到28日凌晨，在第七军区口译团负责人鲁普雷希特·葛恩格罗斯 (Rupprecht Gerngroß) 上尉带领下，军官们发动了起义。这场运动的代号为“猎鸡行动 (Fasanenjagd)”，“金鸡”即是影射那些身穿镶有金边的制服的可恶的纳粹高官。这些起义者首次尝试就成功冲入慕尼黑市政厅，并占领了两个广播站——位于弗赖曼区 (Freimann) 的国防军广播站和位于伊斯曼宁区 (Ismaning) 的广播发射总台。

当慕尼黑大区的广播听众在4月28日凌晨听到“巴伐利亚自由行动夺得政权”的消息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起义者在一份“十

点纲领”中承诺“铲除纳粹的血腥统治”，“它违反了道德和伦理法则，每一位正直的德国人都应当疾恶如仇”。此外，他们还呼吁消除军国主义，恢复法治国家和人的尊严，并建立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让“每个人凭借自身的能力而获得应有的地位”。[\[25\]](#)

但是，葛恩格罗斯和他的同伴们误判了局势。慕尼黑民众没有立刻响应起义的呼吁，而是更多地持观望态度。巴伐利亚州帝国总督弗朗茨·冯·埃普骑士（Franz Ritter von Epp）拒绝了起义者参与投降谈判并一同组建过渡政府的要求。最关键的是，逮捕大区领袖吉斯勒的行动失败了。经过短暂的混乱，当权者们采取了对策。吉斯勒在4月28日上午散发的传单《致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民众书》中写道：

“慕尼黑的所有阵地都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站在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边，（……）葛恩格罗斯将难逃惩罚。骚乱即将过去。”

[\[26\]](#)起义确实在几小时后就被镇压。葛恩格罗斯逃过一劫，但他的许多同伴在州中央部大楼（Zentralministerium）的院子里被枪杀，其中就有国防军联络官君特·卡拉乔拉-德尔布吕克（Günther Caracciola-Delbrück），他也是冯·埃普骑士的亲信。

南巴伐利亚的许多乡镇在“巴伐利亚自由行动”的呼吁下掀起了反对当地纳粹官员的起义，却受到忠于希特勒的狂热分子和党卫队的血腥镇压，造成50多人丧生。其中最可怕的罪行发生在采矿小镇彭茨贝格（Penzberg）。4月28日至29日凌晨，包括来自社会民主党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缩写为SPD）的前市长在内的16名男女被残忍射杀。[\[27\]](#)

在美军4月30日上午进驻慕尼黑之前，吉斯勒就已逃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据说几天后他在那里开枪自杀。美军的行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只有少数党卫队部队和人民冲锋队进行了抵抗。下午4点过后不久，慕尼黑副市长卡尔·菲德勒（Karl Fiedler）将市政

厅移交给了美军第七军的一名少校，本人则悄悄逃跑了。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将军在日令中写道：“盟军远征军全体祝贺第七军夺取纳粹残暴统治的发源地——慕尼黑。”[\[28\]](#)

大批慕尼黑民众在美军到来时夹道欢迎。19岁的慕尼黑纳粹分子沃尔夫希尔德·冯·柯尼希（Wolfhilde von König）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们进驻这座城市是我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奇怪的事”，“还没等第一批美国人出现在我们的街道，白旗就挨个儿在公寓悬挂出来。还有人挥舞毛巾。这些慕尼黑黑人还能更没有尊严吗？”[\[29\]](#)恩斯特·兰根多夫（Ernst Langendorf）是一名移居美国的德裔新闻记者，作为下士曾在一个美国宣传机构任职。他回忆起当时到达位于市中心的玛利亚广场后几百人迅速挤上来的场景：“他们满怀兴趣地看着我们的车辆，还有些人摸着我们的制服并称赞面料质量，女孩们搂着我们的脖子，禁止结交的命令彻底无效了。四处弥漫着愉快的气氛，我到哪儿都能听到：终于结束了；我们现在可以安然入睡了；再也没有飞机飞过了。”[\[30\]](#)

*

1945年4月30日，即美国士兵解放达豪（Dachau）集中营的第二天，囚犯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Edgar Kupfer-Koberwitz）在病患营的床上注意到：“整个集中营内飘扬着来自被关押者所在的各种国家的旗帜——这些旗子究竟从哪里来的？（……）像往常一样，许多囚犯走上营地大街，但他们不用再蹑手蹑脚地走路，而是走得更自由、更自在（……），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因为我们处于美国人的保护之下——我相信，‘美国人’这个词在我们的余生中将始终带有金色的光环。”[\[31\]](#)

达豪集中营建立于1933年3月，并且很快就成了不受约束的国家恐怖统治的代名词。它是党卫队领导下的一切暴力形式的实验室，其实实验结果在随后的几年推行至其他集中营。关于集中营情况的传闻不脛而走，其起到的威慑效果正合当局者的心意。“亲爱的上帝，我宁愿成为哑巴，也别让我去达豪！”成为“第三帝国”时期的流行语。

[32]正因如此，相比于4月11日被解放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和三天后被解放的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rsen）集中营，达豪集中营的解放更加能象征纳粹恐怖统治体系的终结，正如在德国国会大厦上升起红旗象征着希特勒德国被最终击败。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达豪集中营的状况急剧恶化。不断有新的囚犯从撤离的东欧集中营被运送至此地，使这里人满为患。原本就短缺的食物进一步削减，卫生条件更是惨不忍睹。许多囚犯感染上了斑疹热。从1944年12月至解放当天，就有14000多人丧生。一位集中营的前文员在1945年底开始的达豪审判中说，“这些囚犯个个精疲力竭、营养不良，身上长满了虱子，就像苍蝇一样死去（……）”，“尸体就躺在活着的囚犯之间、躺在路上（……），有些就这么躺着直到腐烂”。[33]

4月下半月，从远处已经能听到枪声，美军飞机开始在该区域低空出现，局势的紧张感一触即发。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党卫队即将从营地撤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烧掉了无数文件。囚犯们的心情在希望获得解放和惧怕最后一刻沦为大屠杀牺牲品之间剧烈波动着。

4月26日，劳动指令不再响起。囚犯被叫到广场集合。临近傍晚，共有6887名营地囚犯被迫分成三支队伍长途行进，由全副武装的党卫队士兵带上猎犬看守。行进途中还有来自其他营地的队伍不断加入，最终大约有10000人向南行进到巴特特尔茨（Bad Tölz）。沿途城镇的居民见到这支可怜的行进队伍，一部分冷眼旁观，也有一部分感到害

怕和恐惧。这是他们第一次目睹纳粹政权的罪行。有些民众出于同情想给疲惫的囚犯们一些面包或饮料，却往往遭到党卫队士兵的阻止。5月2日早晨，在瓦基兴（Waakirchen）附近的森林露营后，囚犯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哨兵队伍失踪了。在这次死亡行军中死于路边或被枪杀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字，估计在1000人和1500人之间。[\[34\]](#)

而仍留在集中营的32000多名囚犯，其中4000多人在病患营，要更早一些迎来解放的时刻。临近4月29日中午，在费利克斯·斯帕克斯（Felix Sparks）中校的带领下，第45步兵师（雷鸟师）第157步兵团的士兵抵达集中营的巨大的营地。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时刻：“外面突然传来喊叫声和脚步声，‘美国人来了，美国人来到营地了，是的，是的，他们在集合广场！’大家都动了起来。病人离开病床，快痊愈的人和工作人员跑到营房间的通道，人们跳出窗户，爬过木板墙。每个人都跑到集合广场。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尖叫声和欢呼声。这是喜悦的尖叫。人们不停地跑啊跑啊。病人们因激动而容光焕发：‘他们来了，我们自由了，自由了！’”[\[35\]](#)

在美军抵达营地之前，他们遇到了一辆停在一旁的货车，里面载有2000名囚犯的尸体，这些人是在从布痕瓦尔德到达豪的运输途中饿死或渴死的。当美军随后看到数百具尸体四散在营地时，受到的震惊更是无以复加。“但丁描述的地狱在达豪这座真实的地狱面前都显得苍白（……）”，斯帕克斯中校这样描述道。“第一连队中的一些士兵，甚至是身经百战的老兵都激动到了极点。有些人哭了，有些人则陷入狂怒。”[\[36\]](#)在这种愤怒的情绪下，美军射杀了一些擒住的党卫队士兵。斯帕克斯坚决干预才阻止了杀戮的继续。[\[37\]](#)到傍晚，局势基本平复。在国际被囚禁者救助会的协助下，美军开始救助病人。但是即使在解放后，仍然每天都有原来的囚犯死亡。埃德加·库普费尔-科贝维兹，这位达豪集中营的记录者幸存下来。他在5月2日的最后一

篇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必须走出营地，从外面看看营地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把这些手稿，这本日记，这本关于达豪的书和其他书面材料当着美国人的面拿出来，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这些根本不是在这里写的。” [38]

*

4月30日下午6点35分，德国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上将在位于普伦（Plön）的海军总部收到一封来自马丁·鲍曼的电报：“海军元帅先生，元首任命您取代此前的帝国元帅戈林，成为他的继任者。正式的任命书尚在路上。您应当立刻采取一切措施应对当前的局势。” [39]鲍曼隐瞒了此时希特勒已经死了三个小时的事实；他在电报中有意这样表述，让邓尼茨相信这位独裁者还活着。

希特勒在4月28日至29日凌晨口述的“政治遗嘱”中确实将邓尼茨定为继任者和国家首脑，但头衔并不是“元首和帝国总理”，而是“帝国总统”，这个头衔自兴登堡（Hindenburg）1934年8月去世后就被希特勒废除了。他还在邓尼茨身边安排了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为帝国总理，任命他的秘书鲍曼担任新设立的“党务部长”一职。当天夜里，希特勒下令将遗嘱分三份带出柏林。一份给邓尼茨，一份给新任陆军元帅费迪南德·舍纳尔（Ferdinand Schörner），第三份送往慕尼黑纳粹党总部。但是没有一份成功送达。 [40]

在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邓尼茨表示他没有想到会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他从未暗示过把我当作他的接班人（……），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会接到这一任务。” [41]但希特勒的决定并不令人惊讶。1939年9月1日战争刚开始时，希特勒曾在国会大厦的演讲中表示，如果他去世，将由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接任，但是自从盟军战机和轰炸机联队夺得欧洲大陆制空权以来，戈林的地位就大幅下降。这位帝国元帅在希特勒1945年4月20日最后一次

生日会后成为第一个逃往南德的亲信，这被视作一种懦夫的行为。三天后，戈林从上萨尔茨堡山发来电报询问继任安排是否应该生效，因为希特勒已明显失去“采取行动的自由”。这一行为令他完全失宠。希特勒认为这是一种不忠，命令将戈林软禁并剥夺其所有职务。[\[42\]](#)

纳粹政权二号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也失去了希特勒的青睐。4月28日晚上，总理府地堡获得消息，称这位党卫队首领试图通过瑞典外交官兼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与艾森豪威尔进行谈判，表示德国武装力量愿意向西方盟国投降。希特勒收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就连这个要求所有党卫队士兵宣誓“我们的荣耀即忠诚”的希姆莱现在也背叛了他，并且表现得仿佛就是他的继任者。在遗嘱中，希特勒将希姆莱和戈林清除出党，并剥夺所有国家职务，理由是他们与敌人秘密谈判并试图夺取政权，对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希姆莱的内政部部长一职由慕尼黑大区领袖保罗·吉斯勒接任，布雷斯劳大区领袖卡尔·汉克（Karl Hanke）被任命为党卫队领袖和警察总长。[\[43\]](#)

4月30日上午，鲍曼告知邓尼茨，“根据敌军广播消息”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西方盟国转达投降计划，“元首”要求对所有叛徒采取“迅速和强硬”的行动。邓尼茨随后于下午3点左右前往希姆莱驻扎的吕贝克警察营房，并与这位党卫队首领谈话。但是希姆莱声称路透社关于他和贝纳多特的谈判消息是狡猾的杜撰，邓尼茨暂时接受了这一解释。[\[44\]](#)

戈林和希姆莱不再在希特勒继任者的考虑之列，而邓尼茨是希特勒唯一能百分百信任的高级军官。1943年1月，希特勒任命他接替埃里希·雷德尔（Erich Raeder）担任海军总司令，而这位海军上将则以无条件的忠诚感谢他的支持。甚至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前，他也毫不掩饰对“元首”的无条件崇拜：他在元首身上看到了“强大的人格魅

力、非凡的才智和行动力、普遍的认可以及喷薄而出且极具启发性的力量”。^[45]和对待众多陆军指挥官不同，希特勒十分尊重邓尼茨，总称呼他为“海军元帅先生”，并且几乎不干涉海军事务。

直到1945年春，邓尼茨仍相信开发使用敌方雷达无法找到的新型潜艇会给海军作战带来转折点。4月7日，他狂热地鼓动海军军官们要坚持到底：“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无论周围情况如何，我们都必须履行军事职责，这使我们像磐石一样坚挺，坚毅而忠实地屹立不倒。不这么做的人是懦夫。必须将这样的人吊起来，并绑上标语：‘这是个叛徒！’”三天后，他向海军指挥官们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他们按照元首的命令作战到“最后一刻”：“之后再论成败。”^[46]即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邓尼茨也派出海军士兵参加柏林的必败之战。

4月15日，希特勒发布一项命令，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西方盟军和红军在德国中部会合并将第三帝国一分为二的情形：邓尼茨将军在“北部地区”、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在“南部地区”担任最高指挥。希特勒自己则很早就决定留在柏林，而不是听身边人的建议逃往上萨尔茨堡山。他要将最后一战导演为“英雄的毁灭”，就应当留在废墟的沙漠，而不是躲在僻静的阿尔卑斯田园中。

4月21日下午，柏林正遭到苏联大炮射击时，希特勒与邓尼茨进行了最后的谈话。4月22日上午，邓尼茨在参谋的陪同下离开首都往西北方向进发。队伍行进缓慢，因为街道被返回的国防军部队和难民迁徙队伍阻塞。他们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到达目的地：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这里有几处营地已经为新的部队腾出了位置。^[47]通过海军移动无线电部队，“北部地区”所有指挥所之间以及与柏林的通信得以保持畅通。后来的苏尔坎普^[48]出版商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就曾服务于该部队。1995年，即战争结束50年后，他回忆

道：“战争最后几天的关键消息是从我们的发射器发出的。我当时只有20岁，拥有一等兵军衔，曾在海军前线担任三年的无线电操作兵，当时接到的任务是使用以前从未用过的新代码开展无线电工作，对邓尼茨收到或发出的无线电消息进行解密或加密。”他服务的无线电站也是4月30日傍晚第一个接收鲍曼关于任命邓尼茨为希特勒继任者的消息的电站。[\[49\]](#)

邓尼茨将军从震惊中平复后，当晚就召见了那天下午刚刚在吕贝克会过面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们的密谈在午夜进行。这位党卫队头目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出现，似乎在显示他的权力。邓尼茨在回忆中表示，他当时“偷偷在文件下藏了一支上膛的枪”以防万一。他把鲍曼的电文拿给希姆莱看，并观察他的面部变化：“那张脸露出（……）极大的惊讶，甚至是惊恐。他身上的希望似乎已经破灭。他的脸色苍白。他站起来，弯下腰说：‘请让我成为您国家的二号人物。’”[\[50\]](#)邓尼茨对此提议持明显的回避态度。希姆莱仍然掌控着大批的党卫队和警察，因此不能排除他不承认鲍曼的电报并宣布自己为继任者的可能性。因此对邓尼茨来说，获得国防军的支持非常重要。4月30日深夜，他指示他的副官瓦尔特·吕德-诺伊拉特（Walter Lüdde-Neurath）第二天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召来普伦。[\[51\]](#)直到一天结束，这一切最终走向如何，仍不明朗。

[\[1\]](#) 参见福尔克尔·乌尔里希的另一本书：Adolf Hitler. Bd. 2: Die Jahre des Untergangs 1939-1945, Frankfurt/M. 2018, S. 656 ff.; Joachim Fest: 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 2002, S. 128 ff.; 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Legenden und Dokumente, München/Berlin 1995, S. 201 ff.。

[\[2\]](#) Ernst Günther Schenck: Patient Hitler. Eine medizin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9, S. 400.

[3] 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205–209。

[4] 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210–213; Henrik Eberle/Matthias 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Geheimdossier des NKWD für Josef W. Stalin, zusammengestellt aufgrund der Verhörprotokolle des Persönlichen Adjutanten Hitlers, Otto Günsche, und des Kammerdieners Heinz Linge, Moskau 1948/49, Bergisch Gladbach 2005, S. 444 f.。

[5] Traudl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Hitlers Sekretärin erzählt ihr Leben, München 2002, S. 205.

[6] 复制本收录于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192。

[7] 安东·格拉夫（1736~1813），瑞士肖像画家。

[8] Hans Baur: Ich flog Mächtige der Erde, Kempten (Allgäu) 1956, S. 275 f.

[9] Heinz Linge: Bis zum Untergang. Als Chef des Persönlichen Dienstes bei Hitler. Hrsg. von Werner Maser, München 1982, S. 286 f.; 另参见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46 f.。

[10]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06.

[11] 收录于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1945. Die letzten Aufzeichnungen, Hamburg 1977, S. 549 f.。这封信由女飞行员、希特勒仰慕者Hanna Reitsch于4月28日带出柏林，辗转交给哈罗德·匡特，后者彼时沦为英军战俘，身在北非。参见Joachim Scholtyseck: Der Aufstieg der Quandts. Eine deutsche Unternehmerdynastie, München 2011, S. 252.

[12] 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221 f.。

[13] 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230–270 (mit einem Abgleich aller Zeugenaussagen); 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47 f.。

[14] 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288–332; 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48 f.。

[15] 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后，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签署了《国会纵火案法令》。该法令被认为是德国过渡到纳粹党一党专权的关键历史事件之一。

[16] 参见 Antony Beevor: Berlin 1945. Das Ende, München 2002, S. 387–389, 398 f.; Tony Le Tissier: Chronik der Schlacht um Berlin, in Bengt von zur Mühlen (Hrsg.):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Berlin–Kleinmachnow 1994, S. 79–86。

[17] 参见Jörg Müllner: Wie Russlands Fahne 1945 auf den Reichstag kam, in Die Welt v. 18. 1. 2008。

[18] 参见Jewgeni Chaldej: Der bedeutende Augenblick. Hrsg. von Ernst Volland und Heinz Krimmer, Leipzig 2008。

[19] 出自战地记者的记录Konstantin Simonow: Kriegstagebuch 1941–1945, Berlin–Ost o. J.; 援引自Peter Gosztony (Hrsg.): 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1970, S. 389。

[20] 参见1945年5月9日一名苏军少校写给其姐妹的信：“墙上留有许多光荣士兵和军官用粉笔、煤炭和铅笔写下的文字。例如‘斯大林格勒人到此一游——签名’、‘一名来自斯摩棱斯克的苏联士兵来过这里——签名’、‘我们在国会大厦。一切正常。Ivan Petrow, 1945年5月9日’。” Elke Scherstjanoi (Hrsg.): Rotarmisten schreiben aus Deutschland. Briefe von der Front (1945) und historische Analysen, München 2004, S. 172。

[21] Marianne Feuersenger: Im Vorzimmer der Macht. Aufzeichnungen aus dem Wehrmachtführungsstab und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0–1945, München 1999, S. 271。

[22] 国家社会主义 (Nationalsozialismus)，也译作“民族社会主义”，简称“纳粹” (Nazi)。

[23] 收录于Winfried Nerdinger (Hrsg.):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des NS-Dokumentationszentrums München, München 2015, S. 298。

[24] 复制本Winfried Nerdinger (Hrsg.) :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des NS-Dokumentationszentrums München, München 2015, S. 301. 参见David Clay Large: Hitlers München. 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 München 1998, S. 431 f.; Wolfgang Görl: Als die Amerikaner München befrei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4. 4. 2015。

[25] 纲领复制本收录在Nerdinger (Hrsg.) :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S. 297. 关于“巴伐利亚自由运动”，参见Veronika Diem的研究: Die Freiheitsaktion Bayern. Ein Aufstand in der Endphase des NS-Regimes, Kallmünz 2013. Klaus-Dietmar Henke对“准备不足的、非常业余的起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95, S. 854-857 (引文见S. 854)。

[26] 传单复制本参见Nerdinger (Hrsg.) :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S. 296。

[27]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859 f.; Frederick Taylor: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Die Besetzung und Entnazifizierung Deutschlands 1944-1946, Berlin 2011, S. 137-141。

[28] 援引自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34。

[29] Sven Keller (Hrsg.) : Kriegstagebuch einer jungen Nationalsozialistin. Die Aufzeichnungen Wolfhilde von Königs 1939-1946, Berlin-Boston 2015, S. 213 (v. 30. 4. 1945)。

[30] 援引自Wolfgang Görl: Als die Amerikaner München befreite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4. 4. 2005. 战后，兰根多夫作为新闻官负责首批报纸许可证的签发，并积极参与创办《南德意志报》。参见Knud von Harbou: Als Deutschland seine Seele retten wollt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in den Gründerjahren nach 1945, München 2015, S. 24 f.。

[31] Edgar Kupfer-Koberwitz: Dachauer Tagebücher. Die Aufzeichnungen des Häftlings 24814, München 1997, S. 451 f., 452 f.

[32] Ludwig Eiber: Gewalt im KZ Dachau. Vom Anfang eines Terrorsystems, in Andreas Wirsching (Hrsg.): Das Jahr 1933.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 und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Göttingen 2009, S. 169–181 (hier S. 178).

[33] 参见Gabriele Hammerstein: Das Kriegsende in Dachau, in Bernd-A. Rusinek (Hrsg.): Kriegsende 1945. Verbrechen, Katastrophen, Befreiungen in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2004, S. 27–45 (引文参见 S. 28); Wolfgang Benz/Barbara Distel (Hrsg.): Der Ort des Terrors.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d. 2, München 2005, S. 268–271; Nikolaus Wachsmann: KL. Di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München 2015, S. 682–684;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862–931。

[34]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05–913; Benz/Distel (Hrsg.): Der Ort des Terrors, Bd. 2, S. 269 f.; Daniel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Das letzte Kapitel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mords, Reinbek bei Hamburg 2011, S. 334–337。

[35] Kupfer-Koberwitz: Dachauer Tagebücher, S. 444.

[36] 援引自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17 f.。

[37] 参见Hammerstein: Das Kriegsende in Dachau, S. 41 f.;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19–922; Keith Lowe: Der wilde Kontinent. Europa in den Jahren der Anarchie 1943–1950, Stuttgart 2014, S. 113 f.。更多这些事件的细节可参考关于Felix Sparks的传记: Alex Kershaw: Der Befreier. Die Geschichte eines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2014, S. 309–345。

[38] Kupfer-Koberwitz: Dachauer Tagebücher, S. 459.

[39] 收录于Percy Ernst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München

1982, S. 419; Walter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 3. wesentlich erweiterte Aufl., Göttingen 1964, S. 130。

[40] 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52, 654。

[41] Karl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Frankfurt/M.-Bonn 1963, S. 434。1956年9月30日, 即邓尼茨在柏林施潘道战俘监狱服刑的最后一天, 一起服刑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否认他于4月27日最后一次在地堡与希特勒见面时, 曾建议让邓尼茨成为元首的继任者; 他表示, 他只是积极评价了邓尼茨在“北部地区”的活动。Albert Speer: Spandauer Tagebücher, Berlin-München 2002, S. 445 (v. 30. 9. 1956)。但是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表示 (S. 434), 他的任命最初是施佩尔提议的。

[42] 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40 f.。

[43] 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48 f., 652 f.。

[44]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42 f.;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33。

[45] 援引自Reimer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Die deutsche Kapitulation 1945, Stuttgart 1966, S. 103。1945年6月17日, 邓尼茨在巴特蒙多夫的审讯中也曾表示: “希特勒是一个出众的人物。” Wassili S. Christoforow u. a. (Hrsg.): Verhört. Die Befragungen deutscher Generale und Offiziere durch die sowjetischen Geheimdienste 1945-1952, Berlin-Boston 2015, S. 66。

[46] Heinrich Schwendemann: “Deutsche Menschen vor der Vernichtung durch den Bolschewismus zu retten.” Das Programm der Regierung Dönitz und der Beginn einer Legendenbildung, in Jörg Hillmann/John Zimmermann (Hrsg.): Kriegsende 1945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2002, S. 9-33 (引文见S. 9)。

[47]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29 f.。

[48] 苏尔坎普 (Suhrkamp) 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出版社之一, 成立于1950年。

[49] Hans Sarkowicz (Hrsg.) : “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Erinnerungen an den 8. Mai 1945, Frankfurt/M.-Leipzig 1995, S. 112
f.

[50]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36。另参见Lüdde-
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89 f.; Marlis G.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Düsseldorf-Wien 1967, S. 88 f.。

[51] 参见Kriegstagebuch des Führungsstabes Nord (A) , 30. 4.
1945; Percy Ernst Schramm (Hrsg.) :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Bd. IV, 2, Herrsching 1982, S. 1468 (künftig zit.
KTB-OKW) 。

1945年5月1日

希特勒死后，柏林战况之激烈丝毫未减。“5月1日的晨曦已来临（……）”，汉斯·里弗欧尔（Hans Refior）上校回忆道，当时他正和战友们在本德勒街区筑设防御工事。“从清晨到深夜，枪声响彻全城，手榴弹四处乱飞，机关枪在房屋废墟和残骸中扫射，此起彼伏的枪声成为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的可怕伴奏。”^[1]

深夜3点50分，汉斯·克雷布斯将军在特奥多尔·冯·杜福文（Theodor von Dufving）上校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现身位于舒伦堡环路（Schulenburggring）2号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这里已经被苏联第八近卫军团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Wassili Tschuikow）上将占领。克雷布斯郑重宣布：“您是第一个被告知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愿离开我们并自杀的外国人。”崔可夫表现得对这个惊人的消息不为所动：“我们已经知道了。”克雷布斯随即宣读了戈培尔致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信。这封信证实了希特勒于4月30日下午3点30分结束了生命，并在遗嘱中将政府权力移交给海军上将邓尼茨、戈培尔和鲍曼。作为新任德国总理，戈培尔被授权与苏联领导层取得联系，以推动在战争中遭受最大损失的两大势力间的谈判。^[2]

克雷布斯此番任务是戈培尔自1943年秋天以来就一直想要推行的，即尝试与斯大林达成单独的谅解协议，从而使德国以较小的损失结束战争，但试图说服希特勒无果。^[3]戈培尔推测，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是强扭的盟友关系，他们的利益冲突不断激化，苏联领导人可能

倾向于脱离反希特勒同盟。戈培尔相信，如果说在“元首”死后仍然存在出路的话，那就是与苏联进行协商。4月3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妻子的尸体被焚烧并草草掩埋后，戈培尔和鲍曼以及克雷布斯、布格道夫、魏德林、海军中将汉斯-埃里希·沃斯（Hans-Erich Voss）、赫维尔公使和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等军方人士在希特勒地堡的办公室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会议决定委派克雷布斯参谋长主导谈判，原因是作为莫斯科军事委员会的前成员，他会俄语。

过了很长时间才接通了崔可夫指挥所的电话，并敲定了谈判人前往苏方的时间和地点。^[4]戈培尔在储藏间紧张地踱步。根据阿图尔·阿克斯曼的观察，“过去这里不允许抽烟，但现在他点燃了一支又一支”，“有时候，他会哼起打仗时期最爱的曲子”。^[5]其他陪同人员则依靠咖啡、烈酒和长谈来消磨等候的时间，他们讨论是自杀还是干脆冲出地堡。自希特勒死后，他的魔力似乎消散了。特劳德·琼格回忆说，那些连“元首”最后的命令都绝对执行的总督，突然“重新变回了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人”。^[6]

午夜刚过，克雷布斯、杜福文和一名翻译穿过柏林的废墟，踏上艰难的谈判之路。在约定的检查站，他们被红军士兵包围，并经过多个据点后被带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7]在回忆录中，这位苏联元帅描述了他当时接见德方谈判人的心情：“第三帝国的领导人现在居然相信我们的记忆如此短暂，已经将数百万的死者以及更多的寡妇和孤儿抛于脑后了吗？还有那些绞刑架和火葬场，以及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许许多多的死亡集中营？”^[8]

在宣读完戈培尔的信后，克雷布斯将他的谈判授权书以及希特勒的遗嘱副本连同新一届德国政府成员的名单交给了苏联人。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立场呈现了明显的对立：受戈培尔之托，克雷布斯表示首先应立即停火，这样一来希特勒任命的以邓尼茨为首的新一届内阁

成员就可以在柏林开会商讨局势。第二步才是和苏联就德国武装部队的投降进行谈判。

崔可夫将军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想争取时间，以便在苏联及其盟国之间挑拨离间。他毫不迟疑地表示，既不考虑停火也不会进行单独的谈判，只接受无条件投降，并且德国同时要向美国和英国投降。^[9]

在谈判间歇，崔可夫致电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Schukow）元帅，向他告知这一事态。朱可夫派他的副手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Wassili Sokolowski）将军前往位于舒伦堡环路的指挥所，并于凌晨5点5分发电报到莫斯科，告知斯大林克雷布斯将军带来的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10]不久后，他和在莫斯科乡间别墅的斯大林取得电话联系。这位统治者从熟睡中被吵醒，显然心情不太好。据说他对这个消息的评价是：“这个无赖完了！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生擒他。”他再次明确提醒朱可夫，除无条件投降外，与克雷布斯或其他德国使节不进行其他任何谈判。^[11]

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两名德国谈判代表未获得授权。由于会谈无法继续进行，5月1日早上双方达成一致，让冯·杜福文上校和翻译返回总理府，以便向戈培尔就谈判情况作临时汇报。一位苏联少校和他们同去。途中，他们被党卫队士兵开枪射击，这名少校严重受伤。杜福文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总理府地堡，带回了苏联方面坚持要求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戈培尔喊道，他“绝不、绝不”同意。^[12]

下午1点和2点间，克雷布斯在经历了12小时的谈判马拉松后也返回了，确认他的任务完全失败。戈培尔再次震怒：“我不会在我还担任德国总理的几个小时里在一份投降书上签字。”^[13]而对于那些不愿意追随戈培尔一家自杀的人来说，是时候准备冲出地堡了。

*

5月1日深夜1点22分，当克雷布斯将军已启程前往崔可夫指挥所时，邓尼茨海军上将向总理府发送了一份无线电报。他设想希特勒还活着，并再一次在电报中强烈地表白了他坚定不移的效忠之心：“我的元首，我对您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愿意尽一切努力将您解救出柏林。但是，如果命运迫使我作为您选中的继任者领导德意志帝国，那么我将让这场战争作为独一无二的德意志人民英雄之战收场。”^[14]这封电报是由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起草的。^[15]这位装备部长在4月23日飞往围困中的柏林见了希特勒最后一面后，也退到了“北部地区”。当4月30日晚鲍曼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指定邓尼茨为继任者的消息到达普伦时，他也在场。当时，施佩尔还不知道希特勒在遗嘱中罢免了他的装备部长一职，并任命他的老竞争对手卡尔-奥托·绍尔（Karl-Otto Saur）取代他——这是对他这位“元首”原本的爱将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拒绝执行焦土命令的惩罚。^[16]

上午10点53分，当克雷布斯将军还在与崔可夫谈判时，位于普伦的海军司令部收到了鲍曼的第二封电报：“遗嘱生效了。我会尽快来找您。在此之前，我认为不要将它公开。”^[17]其中同样没有明确提到希特勒已经死了。不过从“遗嘱生效”的表述可以得出结论，他已不在人世。但是，鲍曼没有告知邓尼茨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显然，此时他已经确信与苏联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他准备通过某种方式前往普伦，以便在邓尼茨的内阁中担任新设立的“党务部长”一职。戈培尔明确表示他将留在柏林并在此结束生命，而鲍曼则决心自救并继续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18]

在克雷布斯将军和苏联的单独谈判彻底失败后，戈培尔认为再也没有理由继续玩鲍曼的捉迷藏游戏了。在下午2点46分从总理府发出且于下午3点18分到达普伦的第三封电报中，他终于向邓尼茨道出了所有

事情：“元首于昨天下午3点30分离世。根据4月29日的遗嘱您被任命为帝国总统，戈培尔部长担任帝国总理，全国领袖鲍曼担任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ß-Inquart）部长担任帝国外交部部长。根据元首的命令，这份遗嘱被带出柏林，一份给您，一份给陆军元帅舍纳尔，还有一份留给公众。鲍曼正试着今天去您那儿说明情况。向军队和公众公开消息的形式和时机由您决定。” [19].

现在，邓尼茨确认希特勒已死，不用再受忠诚使命的束缚，因此他拒绝接受对于其身边同事的人事安排。他要求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将戈培尔的电报妥善锁好。同时，他下令如果鲍曼和戈培尔现身普伦，要将他们逮捕。邓尼茨和施佩尔的回忆录都提到了这件事。 [20].

早在4月30日，邓尼茨就已经在考虑任命谁为他的外交部部长。他的第一选择是康斯坦丁·冯·牛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牛赖特曾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两届总统政府以及直到1938年的希特勒政府中担任该职务。但是电话无法联系上牛赖特，因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他已经与妻子和女婿，即外交部前国务秘书汉斯-乔治·冯·麦肯森（Hans-Georg von Mackensen）隐居在弗拉尔贝格（Vorarlberg）的僻静狩猎小屋。他们于5月6日被一支法国军队逮捕。牛赖特的妻子抱怨说，“一群矮小的非洲士兵”包围了房子，他们俩只有一刻钟的时间去换衣服和收拾背囊。“分别是痛苦的，但我们表现得很勇敢。我们决不让这些恶棍看到软弱的样子！” [21].

由于未能联络上这位前外交部部长，邓尼茨命人询问他的继任者，当时也在普伦附近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打听牛赖特的下落。里宾特洛甫不知道希特勒在遗嘱中并未将其考虑在内，改而任命驻荷兰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为新任外交部部长。他坚持要求与海军上将单独谈话。谈话于5月1日深夜进行。和希姆莱一样，里宾特洛甫也主动请缨，但邓尼茨婉拒了他。

据说邓尼茨曾说：“我觉得他太蠢了。”^[22]他决定将外交部部长一职交给同样退到“北部地区”的鲁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自1932年帕彭（Franz von Papen）的“男爵内阁（Kabinett der Barone）”以来，无论政府如何更迭，科洛希克一直担任财政部部长，希特勒也在遗嘱中作出了同样的安排。在邓尼茨看来，他是一名政治色彩不那么强的专业型人才，可以较容易地和敌方建立联系。他知道依靠外交部部长的职位“并非能取胜”，“但他需要一个可以为他未来的决策提供政治建议的人”。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后于5月2日宣布接受这一职位。^[23]

最初，邓尼茨还考虑调换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一职。时任总参谋长威廉·凯特尔因对希特勒卑躬屈膝的态度而被叫作“走狗凯特尔”，邓尼茨打算让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取代其位，后者于1944年3月被希特勒免职。但是，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表示如果这样做，他将不再担任作战局局长一职，于是邓尼茨决定保留国防军领导层不变。^[24]

让所有前线部队立即无条件投降对邓尼茨来说也不在考虑范围内。他眼中的主要任务在于继续东线的战斗，以便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和难民从红军手中解救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希望尽快结束西线的作战。但他不打算让所有武装部队集体无条件投降，而是让各个军团依次投降。^[25]邓尼茨在5月1日晚对德国民众的广播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一意图，这次讲话中他首次公布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

从晚上9点到晚上10点25分，汉堡帝国广播电台及其弗伦斯堡和不来梅分台分三次播报了一条重要消息，其中穿插播放了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歌剧《唐豪瑟》《莱茵的黄金》《诸神的黄昏》以及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第七交响曲的选段。

然后音乐戛然而止，鼓声响起，广播内传来播报员激动的声音：“据元首总部消息，今天下午，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总理府指挥所为了德国，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4月30日，元首任命邓尼茨海军上将为继任者。”^[26]广播消息不仅对德国民众隐瞒了希特勒死亡的时间，还隐瞒了他死亡的真实情况，目的是掩盖这位独裁者以自杀逃避责任的事实。

邓尼茨在接下来的宣言中重申了这一虚假消息。他的讲话在语气和文字上依然是狂热的忠诚宣言，即使在战争的最后几周，这位希特勒崇拜者也仍然煽动海军士兵们奋战到底。“德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国防军士兵们！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倒下了。德国人民深感悲伤和敬佩。他很早就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和危险，并献身于这场斗争。经过不懈的战斗，坚定不移地走完人生道路后，他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英勇牺牲。他的一生都在为德国服务。他与布尔什维克洪流的战斗影响了欧洲和整个文化圈。”^[27]

邓尼茨不仅采用了希特勒“英勇战死”的说法，还毫不迟疑地采纳了戈培尔政治宣传的一项核心内容，即将德国对苏联的歼灭战争粉饰成为了欧洲和整个文明而进行的奋战。他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幽灵”解释他为什么不愿立即结束战争：“我的首要任务是使德国人民免遭正在逼近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毁灭。我们继续军事战斗仅为此目的。如果英美两国阻碍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与他们继续战斗。这些英美人不是为了自己的人民继续战斗，而只是为了在欧洲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样一来，延续西线战事的责任就被转嫁给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如戈培尔试图通过与苏联领导人达成单独协议而分化反希特勒联盟的做法，邓尼茨的战略显然也是利用同盟国之间的对立，从而避免无条件投降。

邓尼茨还不忘将在这场有预谋的战争犯罪中无谓牺牲的士兵和平民英雄化：“德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勇斗争以及在家乡的奉献都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他承诺将尽其所能为“勇敢的男女老少”“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最后，他祈求上帝的保佑：“我们尽己所能，在遭受了如此多的痛苦和牺牲之后，主将不会离开我们。”

邓尼茨演讲完，广播播放了《德意志之歌》以及纳粹党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 Wessel-Lied*）第二段。广播沉默了三分钟，随后播放哀乐，其中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整个节目在5月2日凌晨结束，结束语是：“我们向德国和国外的听众，向海陆空作战的士兵致以德意志问候：希特勒万岁^[28]。”^[29]

在5月1日向国防军发表的日令中，邓尼茨重申了他在电台演说中的话。他将“继续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直到将战斗部队和成千上万的德国东部家庭从奴役和毁灭中解救出来”。如果英美两国加以阻拦，他也会和他们继续交战。作为新任国家首脑和国防军最高司令官，邓尼茨继续要求军队“无条件投入”。作为继任者，他将“毫不迟疑地”继续履行对“元首”的效忠誓言。^[30]

1945年3月，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和他的同事从柏林的德国乌发电影制片厂（Ufa）逃到蒂罗尔齐勒河谷的迈尔霍芬（Mayrhofen im Tiroler Zillertal）。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邓尼茨发表的日令对他和周围人的影响：新任国家首脑只是“权宜之计”。“他希望击退布尔什维克的浪潮，但对其他盟军则是不得已才应战。转动手摇风琴的人已经变了。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会开玩笑地说‘邓尼茨万岁！’新的国家首脑期待部队继续履行对元首的誓言，也期望他们对他这位继任者效忠。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这很难实现。自敌军入侵以来（1944年6月起），西部已经有300万人和150名将军被俘虏。剩下的逃亡者和流浪者也将很快被捕。誓言变得孤立无援。”^[31]

被拘禁在伦敦附近特伦特公园（Trent Park）的德国将领也有着类似的反应：邓尼茨就是一个“傻瓜”，一个“骗子”，他的内阁不过是“一日政府”。他的讲话听起来像“小希特勒在说话”。“一个拥有正常感官的理智的人”怎么会如此胡言乱语！他明知道希特勒是怎么对待军队将领的，却竟然将这个独裁者描述成“最纯洁的天使”。尽管邓尼茨不再掌握任何权柄，但他还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喊‘邓尼茨万岁’了？”这个人“根本无权领导国家并发表讲话”。[\[32\]](#)

柏林记者、希特勒反对者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于1945年2月逃往奥格斯堡（Augsburg）附近的施瓦本小村叶廷根（Jettingen）以寻求避难处，在那里她关注了这条广播。根据她的记录，邓尼茨的讲话“相当弱”。“我多年以来不断祈祷并且强烈盼望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了。可是呢？当德意志之歌响起时，过了这么多年我再次感慨万千。这是多愁善感吗？”[\[33\]](#)

根据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的回忆，他在听到电台广播后也陷入了一种惆怅的情绪。深夜，当他将六周前希特勒刚送给他的附有个人赠言的40岁生日礼物——一幅希特勒肖像——放在他位于普伦的邓尼茨军营宿舍的床头柜上时，他“失声痛哭”：“我与希特勒的关系结束了，魔咒被打破，他的魔法消失了。（……）我沉沉地睡去了”。[\[34\]](#)但是，施佩尔与他曾经敬佩的“元首”的关系绝没有结束。相反，他现在下决心要继续他1945年春季以来所作的努力，即掩饰自己作为希特勒最有权势的爱将的身份以及参与纳粹大规模犯罪的行径。[\[35\]](#)

1940年12月离开德国的前美国驻柏林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接到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时身在旧金山，那里自4月24日以来正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他评论道，邓尼茨的声明是一以贯之的：

“整个希特勒政权、整个希特勒传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现在这些谎言也随着他死亡了。他的继任者同样沉浸在谎言中，正如他所做的那样。” [36].

和夏伊勒一样，逃亡到加利福尼亚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 [37]. 也对邓尼茨所说的希特勒死亡版本表示怀疑。他在5月1日表示：“像英雄一样抗争布尔什维克而死（……），整件事听起来多么可疑和不确定”，“最有可能的”是希特勒自杀。 [38]. 托马斯·曼非常赞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 [39]. 1940年春出版的《论德国之双重性格》（*Germany: Jekyll and Hyde*）中提到的观点，在那本书中，希特勒就已经被描写成“典型的潜在自杀者”。 [40].

*

戈培尔在告知邓尼茨希特勒的死亡消息后——这或许可以说是他作为帝国总理的最后一件公务——就着手为最后一幕作准备。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位宣传部部长与独裁者一道绞尽脑汁，力图把“第三帝国”的末日导演成英雄式的谢幕而使后代铭记。两个人都视腓特烈大帝为榜样。就和这位普鲁士国王在七年战争中坚持抵抗力量占明显优势的反普鲁士联盟一样，他永不投降——最终甚至可能扭转局面。

“我对元首说，我们应当雄心勃勃，当150年后的德国再出现类似的大危机时，我们的子孙会把我们视作抗争到底的英雄榜样，元首完全赞同我的说法。” [41].

1945年4月29日发行的最后一期《坦克熊——大柏林区保卫者报》（*Panzerbär, Kampfblatt für die Verteidiger Groß-Berlins*）将其形容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斗争”。 [42]. 戈培尔多次提到，他将和希特勒一起留在柏林，如果没有其他出路，他将带着家人一起共赴死亡。在他于4月29日晚向秘书特劳德·琼格口授的“元首政治遗嘱

附录”中，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希特勒的命令，即“如果国防军溃败，则离开帝国首都柏林，并加入由他任命的帝国政府领导层”。如果他“在最艰难的时刻弃元首不顾”，在余生中他将“以不光彩的背叛者和卑鄙小人的形象示人”：“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候，背叛的氛围笼罩着元首，这时至少要有有些人无条件地并且至死都站在他这一边。” [43]

5月1日下午仅剩几个小时了。戈培尔应该是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4月10日突然中断的日记——作为给后世的遗书。据说他将手稿交给了他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Werner Naumann），后者由希特勒任命为接替戈培尔的宣传部部长，并命令其从柏林撤离。但在逃离地堡的混乱过程中，这些手稿丢失了。 [44]

当约瑟夫·戈培尔下达最后的命令时，玛格达·戈培尔正准备结束她六个孩子的生命，即五个四岁到十二岁的女儿和一个九岁的儿子，这些孩子于4月22日被她带到地堡。留在总理府地堡的人尝试说服玛格达放过孩子们，但都被她拒绝了，她的丈夫则鼓励她这样做。他对阿图尔·阿克斯曼说：“我和妻子一致决定让孩子们与我们共同赴死。我们不希望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是如何被国际报纸歪曲报道的。” [45]

下午晚些时候，电话员罗胡斯·米施（Rochus Misch）目睹了玛格达·戈培尔把孩子们送往死亡之路的过程。她给所有孩子穿上了同样长度的白色睡衣，并说话安抚他们。只有最大的孩子，12岁的赫尔加似乎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因为她在哭。 [46]接着，这位母亲把党卫队卫生部主治医生的副官赫尔穆特·昆茨（Helmut Kunz）叫来地堡，告诉他已作好决定。几天前昆茨允诺为她的弑子计划提供协助。此时，这位医生还想劝她把孩子带到新总理府的战时医院，让红十字会

加以保护。但是，这位“一日总理”戈培尔上前用粗暴的口吻加以回绝：“不行，他们可是戈培尔的孩子！”[\[47\]](#)

玛格达·戈培尔在地堡房间的前厅里递给昆茨一个装有吗啡的注射器。5月7日，在接受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施密尔舒（SMERSCH）”的第一次讯问时，昆茨说，“然后我们进入孩子们的房间”。“孩子们已经躺在床上，但是还没有睡着。戈培尔夫人对他们说：‘孩子们，别害怕，医生现在会给你们打针，所有孩子和士兵现在都要打的。’说完这些话她便离开了房间。”昆茨给每个孩子注射了吗啡。整个过程持续了八到十分钟。他印象中当时是晚上8点40分。然后他离开房间，和戈培尔夫人一起等待孩子们入睡。

根据昆茨5月7日的第一次审讯记录，玛格达·戈培尔约十分钟后在他的陪同下回到了孩子们的房间，并往每个人口中放入碾碎的氰化钾胶囊。在5月19日的第二次审问中，他修正了自己说法：玛格达·戈培尔要求他向孩子们投药，但他拒绝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这么做。因此，玛格达·戈培尔命人叫来了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路德维希·施图姆菲格（Ludwig Strumpfegger）。显然他接下了给孩子们下毒这个令人悲伤的任务。[\[48\]](#)

行动完成后，玛格达·戈培尔和昆茨进入地堡，约瑟夫·戈培尔已经在那里不耐烦地等待多时。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首批红军士兵很可能在一小时内抵达总理府。他要求副官君特·史瓦格曼（Günther Schwägermann）承诺将他和妻子的尸体火化——这位希特勒的首席宣传家甚至连死亡也要模仿他尊崇的偶像。接着，戈培尔向那些即将撤离这个恐怖之地的同僚告别。他对特劳德·琼格挤出一个扭曲的笑容，“也许您能渡过难关”，并叮嘱机长鲍尔，如果他能见到邓尼茨，请转告后者，“我们不仅懂得如何存活和战斗，也懂得如何死亡”。[\[49\]](#)

“游戏结束了 (Les jeux sont faits)”，这是戈培尔在解雇电话员罗胡斯·米施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米施回忆说，他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他立即将所有插头从电话设备上拔出：“我真的是把它们拔了出来，我用力地拉扯电线，两只手同时各抓住一根电线。左一根、右一根、左一根、右一根。我是多么地迫不及待。一个插头我都没忘（……），控制台上堆满了混作一团的电线。结束了。完了。” [50]

关于戈培尔夫妇的自杀方式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根据休·特雷弗·罗珀 (Hugh Trevor Roper) 1947年出版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 (*Hitlers letzte Tage*) 一书中的描述——该书主要是基于戈培尔副官史瓦格曼的陈述——这对夫妇爬上楼梯到了地堡出口，在总理府花园被一名党卫队军官开枪射杀。 [51] 但是，希特勒的勤务员海因茨·林格和副官奥托·君特被囚禁在苏联时曾作证说，戈培尔和他的妻子是在地堡中用枪自杀的。 [52] 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有出入，因为苏联验尸官在1945年5月7日至9日进行尸检时发现，戈培尔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口中含有碾碎的氰化钾胶囊碎片。 [53] 因此，他们是服毒自杀的。可能的情况是，为了保险起见，戈培尔指示党卫队士兵在他们服下毒药后再给他和妻子补一枪。因为，调查人员在尸体头部附近发现了两把被火药熏黑的沃尔特手枪。 [54]

差不多同时，玛格达·戈培尔和前夫实业家赫伯特·匡特的儿子哈罗德·匡特在利比亚港口城市班加西被英军所俘，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得知了母亲、继父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的死讯。他对此作何反应已不得而知，不过，他可能还在战俘时期就已经摆脱了对继父的心理依赖。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战后吸纳一些身负罪行的前纳粹成员进入他的家族企业，其中包括戈培尔的亲密同事维尔纳·璘曼，后者于1950年代初曾试图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加入北威州的自由民主党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缩写为FDP)。 [55]

*

“尝试突围”，这是马丁·鲍曼5月1日晚写入日程本的最后一项内容。^[56]当戈培尔夫妇在为自杀作准备时，其余的人则预备着逃跑。几乎所有人都想着一件事：如何在最后一个小时逃出地堡并安全穿越苏联防线。希特勒的贴身工作人员销毁了他们的身份证件，从而避免在被捕时暴露身份。有些人还从他们的制服上取下了等级徽章。他们像野战军一样装备了手枪和钢盔，等待着夜幕降临。^[57]

作战指挥官威廉·蒙克制订了逃生计划：将人员分成多组，每隔几分钟从新总理府地下室出来，穿过威廉广场（Wilhelmplatz）到达恺撒霍夫（Kaiserhof）地铁站 [今天的莫伦街（Mohrenstraße）站]，并从那里沿着地下轨道悄悄穿越苏联防线向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站行进。在那里他们应该与蒙克的残余部队碰头，然后尝试穿过施普雷河（Spree）到达什切青火车站（Stettiner Bahnhof）^[58]，之后再从那里离开柏林往西北方向撤离，以便找到仍在战斗的德国部队。^[59]

晚上10点刚过，由蒙克带领的第一小组离开。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副官君舍、大使赫维尔、海军中将沃斯、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和琼格、鲍曼的秘书艾瑟·克鲁格（Else Krüger）和营养师曼扎利。第三小组由前线经验丰富的维尔纳·瑙曼带领，包括鲍曼、希特勒的随身医生施图姆菲格和机长鲍尔。陆续离开地堡的还有希特勒的随从林格、司机肯普卡、戈培尔的副官史瓦格曼、帝国安全局局长拉滕胡伯以及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60]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以及党卫队元首随待部队（SS-Begleitkommando）指挥官弗朗茨·舍德勒（Franz Schädle）不在逃跑队伍中。他们宁愿自杀，显然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突围能成功。

事实证明逃跑计划确实是行不通的。黑暗的地铁隧道成为无数受伤的人、士兵和平民的避难所，逃亡队伍到了这里便迅速走散。当第一批人安全抵达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后，下一步的行进将会变得相当危险。因为那里激战仍在持续。到处都是战火，任何动静都逃不过苏联狙击手的视线。在这个炼狱中，逃亡队伍最后只剩几人，最终每个人都只能尝试自救。两年后，特劳德·琼格在记忆尚新的时候回忆道：“我们在地下、燃烧的房屋、陌生的黑暗街道间匍匐前进了数小时”，“我们在某个废弃的地下室歇脚，只睡了几个小时。然后继续赶路，直到苏联的坦克挡住了去路。（……）黑夜就这样过去，早晨安静了下来。枪声停了下来。（……）最终我们到了一家酿酒厂的老酒窖（……），这是最后一站”。[\[61\]](#)

只有肯普卡、瑙曼、施瓦格、阿克斯曼、特劳德·琼格、盖尔达·克里斯蒂安等少数人成功逃脱了。康斯坦茨·曼扎利不知所踪。大多数人被苏联人所俘虏，包括鲍尔、林格、君舍、沃斯、拉滕胡伯和米施。另外，赫维尔、鲍曼、施图姆菲格等人为了避免被俘选择了自杀。直到1972年12月，人们才在莱尔特火车站（Lehrter Bahnhof）原址发现了希特勒的秘书和他的私人医生的遗骸。两个人都吞下了氰化物胶囊。鲍曼的尸骨于1999年4月在巴伐利亚被火化，骨灰散落在波罗的海。[\[62\]](#)



1945年5月初，苏联士兵在沃斯街（Voßstraße）的新总理府大理石走廊内。
（Sammlung Berliner Verlag/Archiv/akg-images, Berlin）

*

1945年5月1日，代明（Demmin）的一位老师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自由之死，当生命的意义变得疯狂。”^[63]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着令人悲伤的事件——它在东德时期是禁忌话题，近些年来才进入德国人的集体记忆。没有哪个地方像代明这样在1945年5月初有如此多的人选择自杀。这座位于德国北部前波美拉尼亚地区佩内河畔

（Peene）的汉萨同盟城市直到战争结束前不久还未受空袭破坏。尽管防空警报不断地将15000名居民驱赶到地下室避难，但轰炸机总是越过城市上空，飞往什切青、安克拉姆（Anklam）或柏林才投下它们搭载的致命武器。不过，自1945年1月以来，总是有源源不断的逃难人群从后波美拉尼亚地区和东西普鲁士来到这座城市。许多私人公寓和公共建筑都挤满了难民，他们在逃往西部的艰苦旅程中在此地暂时停留。

1945年4月底，随着苏联红军的逼近，那些信誓旦旦鼓吹“最终胜利”的纳粹党和国家官员率先逃跑。驻扎在代明及其周围的国防军部

队从未想过响应“英雄的毁灭”口号。他们炸毁了佩内河及其支流特雷贝尔河（Trebel）及托伦斯河（Tollense）上的桥梁后逃离了这座城市。这给那些留下来的人带来了致命的后果：通往西部的逃生路线被切断；没有及时离开的居民和数以百计的难民困在此地。在恐惧的紧张气氛中，他们等待着苏联军队的到来。

恐惧是有缘由的。许多人从士兵口中得知党卫队和国防军在占领苏联领土时所犯下的罪行。德军在1941年6月22日发起的“巴巴罗萨行动（Unternehmen Barbarossa）”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希特勒和他顺从的将军们的意愿而发动的歼灭战，旨在歼灭和奴役平民。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成千上万的苏联战俘被饿死。从1941年到1944年，近100万列宁格勒居民在围困中丧生。苏联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作为所谓的“东方劳工”被抓到“第三帝国”进行强制劳动。自1943年以来，德国人在东线撤退过程中采取“焦土（verbrannte Erde）”政策，即摧毁一切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整个地区沦为“死亡之地”。[\[64\]](#)

1944年10月，苏联红军在东普鲁士首次越过边界。在前进过程中，他们到处可见德军疯狂进行破坏的痕迹。几乎每个红军士兵都曾在战争中为失去家庭成员而哀伤。对法西斯入侵者的仇恨和对复仇的宣传鼓动，使苏军士兵犯下了第一波暴力罪行。涅梅尔斯多夫

（Nemmersdorf）这个名字成为不祥的代名词。当时重新夺回此地的德军士兵看见了大屠杀的痕迹，众多平民成了牺牲品，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妇女。[\[65\]](#)

戈培尔将这类事情用于大规模的战争宣传。根据他的指示，尸体的照片被发布在周报和其他报纸上。根据他10月26日的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德国民众意识到，“如果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占领了德意志帝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66\]](#)1944年10月底，国防军还能成功将红军推回边界，但他们已无力抵抗苏军1945年1月12日开始的大规模

进攻。在短短的三周内，苏军就向西推进了500公里，解放了被占领和吞并的波兰领土，并夺下了德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现在，他们变本加厉地继续他们在第一次入侵东普鲁士时开始做的事情。国防军和党卫队对苏联发动无情的歼灭战的报应落到了德国平民身上。1月30日，一名来自乌克兰西部蒂拉斯波尔（Tiraspol）的士兵在寄回家的信中写道：“德国母亲应该诅咒生下儿子的那一天！要让德国妇女感受到战争的恐怖！让他们也尝一尝其他民族遭受的痛苦。”^[67]这种复仇意志在那些没有及时开进西部的士兵身上尤其强烈。关于苏军暴行的报道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被困在代明的人们充满恐惧地等待着第一批红军士兵的出现。

4月30日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早晨，远处传来一阵枪声，坦克逼近的声响越来越清晰。代明的居民和难民躲在地下室避难。女人用烟灰抹脸，戴上破旧的头巾，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没有吸引力。一些勇敢的市民在窗户上悬挂了白色的床单和毛巾——这是放弃抵抗的标志。上午，两支苏联坦克大队先遣队抵达城市南边的郊区。由于桥梁被炸毁，作战部队无法按计划迅速向西面的罗斯托克（Rostock）方向进军。中午时分，坦克和其他车辆进驻老城区。两次短暂的交火后，当天下午代明被苏军完全占领。在这之前，就已经有21名市民自杀。

5月1日凌晨，真正的噩梦开始了。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弗洛里安·胡贝尔（Florian Huber）在谈到代明事件时写道：“坦克、装甲运输车、防空炮、卡车，大量的军事装备把这座城市变成了动荡不安的军营”，“成百上千的士兵停下了他们行军的脚步，四处搜刮手表、珠宝、杜松子酒、女人，寻欢作乐（……）。带着即将战胜纳粹的喜悦，5月1日充满了狂欢的气氛。那天晚上，代明的许多房屋被烧毁”。^[68]紧密相邻的木框架结构房屋给火焰提供了充足的燃烧条件。大火肆虐了很多天。最后，老城区的大部分区域被毁。

更糟糕的是，人们对四处抢劫、喝得醉醺醺的红军士兵充满了恐惧。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被强奸，无数居民被杀，房屋被抢。随后的大规模自杀是战争最后阶段任何其他德国城市都没有过的。集体恐慌以及集体歇斯底里似乎席卷了人群，往往是一家人一起自杀。让我们再看一下弗洛里安·胡贝尔的记录：“死者中有婴儿和儿童、学生和青少年、青年男女、已婚夫妇、处于最好年华的人，还有退休的人和老年人。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他们中有数百名来自波美拉尼亚地区、东西普鲁士和其他地区的难民，也有来自代明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死者中有工人和雇员、公务员和工匠、医生和药剂师、家庭主妇、寡妇和战争寡妇、商人和警官、院长和会计师、退休者和老师（……）。代明的自杀者就是德国小镇社会的缩影。”
[\[69\]](#)

有条件的人选择服毒或开枪自杀。有些人则是割腕或上吊。大多数都是溺水身亡。妇女们在背包里装满石头，在孩子的手腕上拴上绳子，和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后沉入水中。几周后，仍然有大量尸体漂浮在佩内河及支流上。

关于自杀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公墓园丁的女儿于5月6日开始进行记录的一本简易的死者簿上列出了612人的名字，其中有400多人是自杀。根据1945年11月代明地方议会的报告，总共有700起自杀事件，当时的目击者甚至说自杀人数超过1000。谨慎估计应该在500人和1000人之间。[\[70\]](#)在代明的墓地有一块碑纪念着这些死者，上面写着那位教师日记上的文字：“自由之死，当生命的意义变得疯狂。”

代明的集体自杀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战争结束时的混乱局面也引发了一股自杀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自杀流行病”。[\[71\]](#)迫使人们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原因不仅仅是对红军的恐惧、害怕胜利者复仇的恐惧。不仅纳粹高级领导人和上层军官，很多

普通的德国人也醉心于元首神话，将纳粹政权的纲领内化于心，对他们来说，没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生活简直难以想象。在他们看来，自杀是注定失败时以及自己和家人前途无望时的唯一出路。早在1945年3月，党卫队安全部门的秘密报告就提到过：“很多人倾向于结束生命。到处对毒药、手枪和其他终止生命的手段需求都很大。必将到来的灾难让人彻底绝望，人们对自杀的情况已司空见惯。”^[72]战争即将结束对许多人来说并非一种目前生活方式和秩序的崩溃，而是将人们置于世界末日的氛围之中。除了集体层面的意义丧失，家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也是驱使人们自杀的动机。那些不得不离开家人的东部地区难民自杀率特别高。西部地区的自杀人数也有所增加，但远没有东部那么惊人，那里混杂了失去亲人的绝望和悲伤以及广泛的恐苏情绪。

*

“到达柏林时，由于浓烟笼罩，我们几乎无法在废墟中找到路”，这是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945年5月1日在离开十二年后回到当时仍然被围困的帝国首都时的第一印象。^[73]乌布利希是一个由十人组成的莫斯科共产党高层团体的首领，该团体就是所谓的“乌布利希小组（Gruppe Ulbricht）”，他们的任务是为苏联占领军提供协助。柏林对这个51岁的受过木匠训练的德国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地方。从1929年到1932年，他曾担任柏林—勃兰登堡区域德共领导人的秘书，因此他熟悉这里的工人运动情况。1933年后，他离开德国，经巴黎和布拉格移居莫斯科。1938年1月底，当他到达苏联首都时，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前往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也没能逃过迫害。1932年到1933年，在德共政治局九名成员或候选人中，有五人被杀害，两人自然死亡，只有两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74]的恐怖清洗中幸免于难：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党主席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75]

要成功躲过所有的清洗浪潮，需要有特别的才能，很显然乌布利希在这方面能力突出。他深谙官僚之道，从未表现任何强烈的情感，完全顺应斯大林的政治主张，并按照后者的政策方向变化而变化。

“乌布利希小组”成员沃尔夫冈·莱昂哈特（Wolfgang Leonhard）这样形容乌布利希：“他有一种狡猾的农民本能，使他能够预见苏联在政治路线上的风向变化。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执行苏联的命令，哪怕有时需要狡猾、严厉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志。”^[76]正是这些特征使瓦尔特·乌布利希在苏联占领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重建战后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自1943年7月库尔斯克（Kursk）坦克战溃败后，德军被迫转入防守，红军获得了主动权，在莫斯科流亡的德国共产党也开始为战争的结束作准备。1944年2月，在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安东·阿克曼（Anton Ackermann）领导下，德共领导层成立“政治问题工作委员会”，旨在打好战后德国的发展基础。讨论的结果反映在1944年10月的《战斗民主行动纲领》（*Aktionsprogramm der kämpfenden Demokratie*）中。其中的“立即行动纲领”要求：“逮捕纳粹谋杀者和战犯，审判他们对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彻底清除整个国家机构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法西斯成分”，“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采取措施弥补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苏联人民造成的战争破坏”和“大力发展真正的民主，以保障所有民族人民的公民自由，不论其出身、阶级、种族或宗教（……）”。^[77]

然而，德共流亡领导人不能自由作出决策。他们必须顺应苏联当局的利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前秘书长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ff）担任中间人的角色，此人自1943年12月以来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信息部（国外局）负责人。斯大林的指导方针很明确，他判断，纳粹失败后德国将被长期占领。他认为，在红军占领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既不可能也不可行。相反，反法西斯的任务首

先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1848年革命的延续和圆满。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尚未打算分裂德国或建立一个苏联监护下的单独国家。他想确立在整个德国的影响力，因此一开始不急于对社会主义接管德国东部地区公开表态，以免刺激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西方盟友。^[78]

在纲领性工作推进的同时，德共领导层已经在谋划返回德国后的人事安排。1944年7月，威廉·皮克以“红军即将抵达德国领土”为契机，建议季米特洛夫派遣“更多的干部到该国组织反希特勒斗争”。^[79]8月，皮克受季米特洛夫之托列了一份待选同志名单。为了让这些人为德国任务作好准备，德共领导层专门组织了培训课程，每次培训25名至30名党员，让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为未来党的总路线作好准备。^[80]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Konferenz von Jalta）确定将德国划分为不同占领区后，关于任用共产党干部的想法就变成了具体现实。他们将被分为几个小组前往占领区，接受红军的政治管理。明确的是，他们只应为占领区当局提供辅助职能。直到第二阶段他们才进行“扩展任务”，主要是重建德国共产党。^[81]因此，德共在1945年4月初通过行动纲领时一开始就提道：“在德国占领区活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完全按照占领当局的意见行动，在群众中工作时设法坚决执行占领当局的以德国人民利益为本的命令和指示。”^[82]

4月中旬，30名被选中的干部被分配给三支苏联军队的司令部，分别是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83]在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下组成一支十人先锋队，接应正在向柏林挺进的朱可夫元帅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这个队伍里的多名成员后来在民主德国身居要职，其中有卡尔·马隆（Karl Maron），他是莫斯科《自由德国报》（*Freies Deutschland*）编辑，后来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核

心党刊《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副总编、民主德国内政部部长。奥托·温策尔（Otto Winzer）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后来担任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的个人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理查德·吉普特纳（Richard Gyptner），同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了很长时间，后来担任民主德国外交部部门主管和多国大使。汉斯·马勒（Hans Mahle），“自由德国”电台副总编，1945年夏天起担任柏林广播电台的第一任总监，担任苏占区/民主德国所有广播电台的总监直到他1951年秋倒台。弗里茨·艾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自由德国”广播电台雇员，后来担任《时代剧院》（*Theater der Zeit*）杂志主编、柏林人民剧院（Volksbühne）首席戏剧顾问。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是24岁的沃尔夫冈（弗拉基米尔）·莱昂哈特，他毕业于共产国际学校，为“自由德国”电台广播员。1949年，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经南斯拉夫逃往联邦德国。他于1955年出版的《革命抛弃了它的孩子们》（*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一书是对“乌布利希小组”及民主德国诞生史的重要见证。[\[84\]](#)

4月25日，季米特洛夫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谈。会议再次提醒德国共产党人，他们的工作必须按照红军政治总部的指示进行。他们可以提建议，但不能独立制订计划。他们要协助执行“主要宣传路线”：

“打破红军想要消灭和奴役德国人民的传闻”。希特勒已经完了，并被彻底摧毁，德国人民能够活下来，但必须学会和平地融入民族大家庭。[\[85\]](#)

关于他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沃尔夫冈·莱昂哈特描述道：“乌布利希看起来一点也不激动或高兴，至少他没有表现出来。他对我们说话的口吻，就仿佛这么多年过去了，重回德国是最自然的事情一样。”[\[86\]](#)小组的每位成员都获得了1000卢布，以便在莫斯科购买必需品，以及2000德国马克用于在德国最初的花销。4月29日晚，威廉·皮克在“卢克斯”酒店（Hotel “Lux”）举行了一场小型欢送

会，这家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酒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据点，在“大清洗”时期，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几乎每晚都会将逮捕的居民送到卢比扬卡大楼的地下室。

第二天早晨6点，“乌布利希小组”在卢克斯酒店旁边的小巷集合，然后乘坐大巴被带到莫斯科机场。一架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已经在那里等候。在明斯克附近短暂停留后，这架飞机于午后降落在卡劳（Calau）附近的临时机场，即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以东约70公里处。这群人在那里被一名苏联军官接走，并护送到他们的夜间营地。5月1日上午，他们乘坐汽车向西行驶，经过屈斯特林（Küstrin）[今天的科斯琴（Kostrzyn）]和施劳弗高地（Seelower Höhen）战场——那里两周前还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当时朱可夫的军队尚未突破柏林城外的最后一条德军防线。最终，车队停在柏林以东约30公里处的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附近的小镇布鲁赫缪勒（Bruchmühle）。加拉舍夫（Galadshew）中将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就位于此地。“乌布利希小组”住进了布赫霍尔策街（Buchholzer Straße）8号的三层楼房，即所谓的“柱屋（Säulenhaus）”。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然后搬到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区（Friedrichsfelde）的柏林王子大街（Prinzenallee）80号[今天的爱因贝克街（Einbeckerstraße）41号]。[\[87\]](#)

5月1日晚，乌布利希从第一个落脚点返回柏林。他简要描述了当时的情势，并宣布了未来几天的计划：“我们的任务将是在柏林建立德国自治机构。我们将前往柏林各个地区，从反法西斯民主力量中寻找适合组建新一届德国政府的人。”[\[88\]](#)

可能很多人以为5月1日将是“德国和苏联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友谊日”，但是根据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Theo Findahl）的记

录，他本人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氛：“到了晚上，年轻的士兵在胜利与酒精的混合作用下游荡在波德比尔斯基大街（Podbielskiallee）上，大声叫嚷着搜寻‘年轻女性’。”[\[89\]](#)

*

同一天晚上，在斯德哥尔摩聚集了一群自称为“小国际（Kleine Internationale）”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与瑞典的同志共同庆祝工人运动日。在数百名参与者中，有一位年轻的德国移民，31岁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年12月他出生于吕贝克，原名是赫伯特·弗拉姆（Herbert Frahm）。他16岁时就已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党派对布吕宁政府持姑息态度而毅然于1931年10月离开社民党，转而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SAP）——一个松散的左派组织。1933年4月，他使用维利·勃兰特这个名字乘坐渔船逃往丹麦，并从那里继续逃往挪威首都奥斯陆。他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挪威语。除了承担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组织的新闻工作，他还为挪威工人运动报纸撰写了许多文章，向大众介绍希特勒德国的最新情况。1940年4月，德国国防军进攻挪威后，勃兰特不得不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流亡经历对他影响很大。在挪威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氛围下，他摆脱了早年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位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变成了一名务实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学习过程是促成他战后事业腾飞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即担任柏林社会民主党主席一职，1969年最终成为联邦德国总理。[\[90\]](#)

当天晚上庆祝活动即将结束时，维利·勃兰特冲上讲台宣读了一项决议：“我们，社会主义流亡者，感谢瑞典工人运动和瑞典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款待。我们要感谢瑞典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的帮助。”他还在讲话时，收到了一条代表处发来的消息，他便立刻告知与会者：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希特勒用自杀逃避了责任。”他最后说道：“我们的方向截然相反。”[\[91\]](#)

直到1945年11月，维利·勃兰特才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挪威《工人日报》（*Arbeiderbladet*）派他去报道纽伦堡对战犯的审判。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观察审判过程，还在这个被摧毁的国家进行了多次旅行。返回奥斯陆后，他在1946年夏天出版的一本书中总结了自己的印象，该书的书名为《罪犯和其他德国人》（*Forbryttere og andre tyskere*）。在1960年代的竞选活动中，反对他的右翼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保守阵营把标题变成了“德国人和其他罪犯”，并将这本书的内容解释成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指责这个移民者想让德国人集体对纳粹的罪行负责。勃兰特正好利用这一指责反驳了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勋爵的观点，表明也存在“不一样的德国”，不应该给所有德国人都贴上罪犯的标签。[\[92\]](#)

“昨天寒冷多雨，但是今天就是春天。一个特别的春天，不是某个普通的春天，而是和平来临的春天。天啊，多么美妙！”当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在1945年5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这些句子时，和平虽然尚未来临，但是可以预见战争即将结束。林格伦当时37岁，与丈夫和两个孩子生活在斯德哥尔摩，在瑞典通讯社信件审查部门工作。她当时只出版过一些短篇小说，但已经为女儿卡琳创造了长袜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的形象，并开始撰写故事。该书于1945年底出版，使作者名声大噪。

5月1日晚，在维利·勃兰特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小组讲话时，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正坐在汉堡帝国广播前听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她写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希特勒死了。希特勒死了。墨索里尼也死了。希特勒死在他的首都，死在首都废墟中，死在他的国家

的废墟和瓦砾中（……）。繁华已尽（Sic transit gloria mundi）！”[\[93\]](#)

[\[1\]](#) Hans Refior: Mein Berliner Tagebuch 1945, in von zur Mühlen (Hrsg.):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32.

[\[2\]](#) Marschall Wassilij Tschuikow: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1966, S. 184 f.; 参见Ulrich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Die letzten Tage im Führerbunker, Göttingen 1998, S. 48 f. (该书认为希特勒死亡时间为15点50分)。

[\[3\]](#) 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445, 550 f.。

[\[4\]](#) 参见Refior: Mein Berliner Tagebuch 1945, S. 132; Rochus Misch: Der letzte Zeuge. “Ich war Hitlers Telefonist, Kurier und Leibwächter”, Zürich und München 2008, S. 225 f.。

[\[5\]](#) Arthur Axmann: 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 in Stern v. 2. 5. 1965; 援引自Gosztony (Hrsg.): 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S. 350.

[\[6\]](#)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08.

[\[7\]](#) 参见Theodor von Dufving的描述: Die Kapitulationsverhandlungen vom 30. April bis zum 2. Mai 1945, in von zur Mühlen (Hrsg.):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68 f.。

[\[8\]](#) Tschuikow: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83.

[\[9\]](#) 关于谈判的详细描述参见Tschuikow: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85-214.

[\[10\]](#) 收录于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63. 参见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46 f.。

[11] Georgi K. 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tuttgart 1969, S. 604 f.

[12] Dufving: Die Kapitulationsverhandlungen, in von zur Mühlen (Hrsg.):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73–175.

[13] Axmann: 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 in Stern vom 2. 5. 1965; 援引自Gosztony: 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S. 363.

[14] 收录于KTB-OKW, Bd. IV, 2, S. 1469;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19。无线电报于3点27分发出。

[15] 施佩尔手稿复制本见Heinrich Brelo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Rainer Zimmer): Die Akte Speer. Spuren eines Kriegsverbrechers, Berlin 2006, S. 319。

[16] 关于施佩尔含糊不定的角色定位, 参见Magnus Brechtken: Albert Speer. Eine deutsche Karriere, München 2017, S. 276–280; 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15–619。

[17] 收录于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0;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0。这封电报于7点40分从柏林发出。

[18]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95; Jochen von Lang: Der Sekretär. Martin Bormann: Der Mann, der Hitler beherrschte, Stuttgart 1977, S. 336。

[19] 收录于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0;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0。

[20] 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4; Albert Speer: Erinnerungen, Frankfurt/M.-Berlin 1993, S. 490。

[21] Lars Lüdicke: Constantin von Neurath.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Paderborn 2014, S. 558。

[22]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07; 另参见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82。

[23]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Tübingen und Stuttgart, 3. Aufl., 1952, S. 366; 另参见其所著回忆录: Memoiren, Stuttgart 1977, S. 242 f.。

[24] 参见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89;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S. 374。

[25]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53-60;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72 f.; Herbert Kraus: Karl Dönitz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in Hans-Erich Volkmann (Hrsg.):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Zürich 1995, S. 1-23 (此处见S. 11)。

[26] Friedrich Karl Engel: 1. Mai 1945: 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 in Funkgeschichte, 41. Jg. (2018); als PDF-Datei, S. 1 f.

[27] 收录于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2 (后面的引文亦出自此处)。

[28] “希特勒万岁 (Heil Hitler)” 是纳粹德国时期的敬礼方式。

[29] Engel: 1. Mai 1945. 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 PDF-Datei, S. 1.

[30] 收录于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133。凯特尔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国防军无法宣誓就职，因此建议采用该表述。参见Walter Görlitz (Hrsg.):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Verbrecher oder Offizier?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des Chefs OKW, Göttingen-Berlin-Frankfurt/M. 1961, S. 372。

[31] Kästner: Notabene 45, S. 105 (v. 2. 5. 1945)。较短的版本参见Das Blaue Buch, S. 192 (v. 2. 5. 1945)。

[32] Sönke Neitzel: Abgehört. Deutsche Generäle in bri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 1942-1945, Berlin 2005, Dok. 78, S. 205-

210 (Bericht vom 1./2. 5. 1945) .

[33] Ursula von 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Peter Hartl, München 1992, S. 319 (v. 1. 5. 1945) 。卡尔多夫在随身日记本上的记录很简洁：“希特勒死了。太令人激动了！尖叫。” Ursula von 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Peter Hartl, München 1992, S. 320, Anm. 3。

[34] Speer: Erinnerungen, S. 491; 类似的描述可参见Gitta Sereny: Albert Speer. Das Ringen mit der Wahrheit und das deutsche Trauma, München 1995, S. 627。

[35] 参见Brechtken: Albert Speer, S. 295 ff.; Volker Ullrich: Zum Dank ein Bild vom Führer, in DIE ZEIT v. 16. 5. 2016。

[36] William L. Shirer: Berliner Tagebuch. Das Ende 1944-45. Hrsg. von Jürgen Schebera, Leipzig 1994, S. 67 (v. 1. 5. 1945) .

[37]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代表作有《魔山》《布登勃洛克一家》等。

[38] Thomas Mann: 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Hrsg. von Inge Jens, Frankfurt/M. 1986, S. 197 (v. 1. und 2. 5. 1945) .

[39]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1907~1999），德国记者、作家，主要从事近代德国历史研究。

[40] Sebastian Haffner: Germany: Jekyll & Hyde. 1939-Deutschland von innen betrachtet, Berlin 1996, S. 21。另参见Thomas Mann: Tagebücher 1940-1943. Hrsg. von Peter de Mendelssohn, Frankfurt/M. 1982, S. 76 (v. 15. 5. 1940)：“认真读完S. Haffner（化名？）的英文书Germany: Jekyll and Hyde，写得太棒了。”

[41] Joseph Goebbels: Die Tagebücher. Hrsg. von Elke Fröhlich, T. II, Bd. 15, München 1995, S. 383 (v. 28. 2. 1945)。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08-610以及文章Seine letzte Rolle, in DIE ZEIT v. 4. 10. 2018。

[42] 复制本收录于von zur Mühlen (Hrsg.) : 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50。

[43] Hugh R. Trevor Roper: Hitlers letzte Tage, Frankfurt/M.-Berlin 1995, S. 181 f. (1947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参见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04。

[44] 参见Fest: Der Untergang, S. 168。

[45] Axmann: Das Ende im Führerbunker, in Stern v. 2. 5. 1965; 援引自Gosztony (Hrsg.) : 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S. 350 f.。

[46] 参见Misch: Der letzte Zeuge, S. 227。

[47] 此处及下段均可参见1945年5月7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SMERSCH第4侦查队的审讯记录。另可参见Lew A. Besymenski: Das Ende der Familie Goebbels, in DIE ZEIT v. 16. 8. 1968; 有节选部分收录于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76-79。

[48] 1945年5月19日审讯记录; Besymenski: Das Ende der Familie Goebbels, in DIE ZEIT v. 16. 8. 1968; 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79 f.。

[49]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12; Baur: Ich flog Mächtige der Erde, S. 282。

[50] Misch: Der letzte Zeuge, S. 232。

[51] 参见Trevor Roper: Hitlers letzte Tage, S. 203。

[52] 参见Eberle/Uhl (Hrsg.) : Das Buch Hitler, S. 455。也可参见老帝国总理府机械专家约翰内斯·亨彻尔的回忆; Misch: Der letzte Zeuge, S. 233。

[53] 1945年5月7日至8日尸检报告; 收录于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106-131 (此处见S. 116, 121)。

[54] 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141。

[55] 参见Scholtyseck: Der Aufstieg der Quandts, S. 252 f., 770。关于“瑙曼的圈子”，参见Norbert Frei: 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96, S. 361 ff.。

[56] Lew Besymenski: Die letzten Notizen von Martin Bormann. Ein Dokument und sein Verfasser, Stuttgart 1974, S. 272.

[57] 参见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10 f., 212。

[58] 今天的柏林北火车站 (Berlin Nordbahnhof)。——编者注

[59] 参见Trevor-Roper: Hitlers letzte Tage, S. 203 f.; 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54。

[60] 逃亡队伍组成情况可参见以下文献，部分描述存在差异：Trevor-Roper: Hitlers letzte Tage, S. 204;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13; 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854; Lang: Der Sekretär, S. 339。

[61] Junge: Bis zur letzten Stunde, S. 213.

[62] 参见Lang: Der Sekretär, S. 402 ff.; Volker Koop: Martin Bormann. Hitlers Vollstrecker, Wien-Köln-Weimar 2012, S. 314-316。

[63] Florian Huber: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Der Untergang der kleinen Leute, Berlin, 4. Aufl., 2015, S. 139。下段引文也参见此书S. 9-77。

[64] 参见Hannes Heer/Klaus Naumann (Hrsg.): 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 Hamburg 1995。

[65] 参见Bernhard Fisch: Nemmersdorf, Oktober 1944. 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 1997。

[66]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4, S. 110 (v. 26. 10. 1944)。

[67] 引自Werner Zeidler: Kriegsende im Osten. Die Rolle der Roten Armee und die Bevölkerung Deutschlands östlich der Oder und Neiße 1944/45, München 1996, S. 138。关于红军进军德国后的行为还可参见 Catherine Merridale: Iwans Krieg. Die Rote Armee 1939–1945, Frankfurt/M. 2006, S. 329–351; Normann N. 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1945 bis 1949, Berlin 1997, S. 94–98。

[68] Huber: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S. 51.

[69] Huber: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S. 59 f.。

[70] 参见Huber: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S. 136–138。

[71] 此处及下段引文参见Christian Goeschel: Selbstmord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2011, S. 241–255; Richard J. Evans: Das Dritte Reich, Bd. III: Krieg, München 2008, S. 907–915。

[72] Heinz Boberach (Hrsg.):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Herrrsching 1984, Bd. 17, S. 6737.

[73] 此为1945年5月17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对威廉·皮克说的话; Gerhard Keiderling (Hrsg.):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April bis Juni 1945. Von den Vorbereitungen im Sommer 1944 bis zur Wiedergründung der KPD im Juni 1945.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93, Dok. 64, S. 348。

[74] 内务人民委员部（缩写为NKVD）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重要的政治警察机构，也是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实行机关。

[75] 亦可参见Mario Frank: Walter Ulbricht. Eine deutsche Biografie, Berlin 2001, S. 137 ff.。

[76] Wolfgang Leonhard: Mai 1945: Erinnerungen eines Mitglieds der “Gruppe Ulbricht”, in Christine Krauss/Daniel

Küchenmeister (Hrsg.) : Das Jahr 1945. Brüche und Kontinuitäten, Berlin 1995, S. 50.

[77]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6, S. 130-134 (hier S. 131 f.) 。也见此书S. 26-28; 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74 f. 。

[78] 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77; Wilfried Loth: Stalins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 Berlin 1994, S. 20 ff. 。

[79]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1, S. 121.

[80] 参见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1, S. 29; 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76。

[81]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14, S. 182; 也见此书S. 30 f., 42; 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78。

[82]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31, S. 260-265 (hier S. 260) 。

[83] 参见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31, Dok. 34, S. 273 f. 。

[84] 参见Wolfgang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Köln 1987, S. 297-301;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S. 727-732。

[85]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36, S. 277 f.

[86]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292.

[87] 参见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01-305。也见同一位作者所著的Im Dienste Walter Ulbrichts, in Gustav Trampe (Hrsg.) : Die Stunde Null. Erinnerungen an Kriegsende und Neuanfang, Stuttgart 1995, S. 272 f.;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S. 39 f.; 以及收录在同一本文集的Richard Gyptner: Am 1. Mai 1945 nach Bruchmühle, S. 699 f.。

[88]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08.

[89] Theo 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1933-1945, Hamburg 1946, S. 180, 182.

[90] 参见Peter Merseburger: Willy Brandt 1913-1992. Visionär und Realist, Stuttgart-München 2002, S. 57-221。

[91] Willy Brandt: Erinnerungen, Berlin-Frankfurt/M. 1989, S. 139 f.; 而在维利·勃兰特的另一部作品中, 表述稍有改变: Links und frei. Mein Weg 1930-1950, Hamburg 1982, S. 375。

[92] Willy Brandt: Verbrecher und andere Deutsche. Ein Bericht aus Deutschland 1946. Bearbeitet von Einhart Lorenz, Bonn 2007 (特别是编者的引言S. 7-33)。

[93] Astrid Lindgren: Die Menschheit hat den Verstand verloren. Tagebücher 1939-1945, Berlin 2015, S. 444 f. (v. 1. 5. 1945) 也见此书 S. 5-16 Antje Rávic Strubel所写的前言部分。

1945年5月2日

5月2日凌晨0点50分和1点50分之间，柏林马苏亨大街（Masurenallee）的大德意志广播（Großdeutsche Rundfunk）在节目的最后这样播报：“我们向所有德国人问好，并纪念陆地、海洋和天空那勇敢的德意志军人之魂。元首死了，帝国永生。”^[1]对于大部分德国民众来说，希特勒的死亡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人们更倾向于无动于衷。“听到这个消息，也就耸了下肩而已”，17岁的克里斯蒂安·冯·克罗克夫伯爵（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如此写道，他当时在丹麦作战，经历了战争的结束。^[2]总参谋部军官盖尔德·施慕克勒（Gerd Schmückle）——后来他在1960年代末成为联邦德国国防军司令以及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在蒂罗尔（Tirol）的一个乡下旅馆听到了这条广播消息。他回忆道，“那种感受并不比听到旅馆老板进门说，有一只家畜在圈里死了更难过”，“只有一名年轻的士兵跳起来举起右手喊道：‘元首万岁！’其他人都继续喝着汤，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3]

元首神话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后又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但他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迅速跌下神坛。和他一同失去吸引力的还有纳粹主义。魔法解除了，魔力消散了。“这里的人们对希特勒究竟活着还是死了漠不关心，尽管他是曾被众人奉为神且深受爱戴的元首。他已失去威望。”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在5月2日如此写道，并补充说：“几百万人因他而丧生——现在他的死不会让百万人伤心。这个想千年永存的帝国瞬间灰飞烟灭。”^[4]

记者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 (Ruth Andreas-Friedrich) ——在战争中曾作为柏林抵抗组织成员帮助被当权者迫害的人，她在她的熟人圈里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希特勒死了！而我们，我们的反应好像此事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好像这件事只是发生在世界上于我们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吗？什么都没变！我们在战争最后几天的地狱中忘记了希特勒先生。第三帝国像幽灵一样消散了。” [5]

音乐家和作家卡拉·霍克 (Karla Höcker) 在她的《1945年柏林笔记》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5*) 中记录了她5月2日晚在柏林的一处防空洞中所经历的事件：当防空洞的人群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时，街区监察员 (Blockwart) 出现了，并用“一种冷静得奇怪的腔调”通知说：“据说元首死了。”“好吧，那挺好”，一位女士说，而她得到的回复是“稀稀拉拉的笑声”。 [6]

5月2日，汉堡-巴姆贝克区 (Hamburg-Barmbek) 一名在社民党家庭长大的18岁女学生在上学路上也注意到不同寻常的场景：“奇怪，没有人哭泣，最多看起来有点难过，这可是那位备受尊崇和爱戴的元首，那个被白痴们奉为神明的人死了啊 (……)，这就是发誓会为元首献出一切的人民！”不过，在她所在的女子学校大家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校长在礼堂里念完悼词后，命人奏起了《德意志之歌》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一些学生哭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些可都是些有天赋的聪明人啊！！太可笑了！” [7]

希特勒之死是在特伦特公园被俘的将军们5月2日那一天的主要谈话内容。他们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多数人同意，“元首”是一个对德国人民具有“伟大功绩”的人，是一位“历史人物”，“只有之后的历史才能完全公正地评价他”。但是，他却以一种悲剧的方式失败了，因为他的周围都是些“能力欠缺的罪人”。另一些人（显然是少

数)的洞察力在这段时间有所进步,他们认为自己所服务的体系“违反了一切道德法则”:“我们一直想不明白,我们竟然追随了这么一个不安分子。”^[8]

1944年6月初盟军开始进攻后,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9]上尉离开了巴黎军事指挥部,并于9月1日以“预备役军官(Führerreserve)”的身份在休假期间回到汉诺威附近的基希霍斯特(Kirchhorst),他1945年5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电台宣布了希特勒去世的消息。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像墨索里尼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是作为木偶被其他人、其他势力操控。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10]的炸弹没有夺走他的生命,但是夺走了他的光环;人们可以听出这样的论调。”^[11]

随着希特勒的死亡,不少人因为感到战争即将结束而松了口气。当时在东京的德国大使馆担任广播电台专员的外交官埃尔温·维克特(Erwin Wickert)回忆起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时说:“现在上面再也没有想要继续战争的人了,也不用因为违抗命令而受惩罚。我不愿称这种感觉为快乐,但这是一种罕见的、不同寻常的轻松感。”^[12]

对于到最后一刻都坚信“奇迹武器”和“最终胜利”的元首狂热支持者们来说,希特勒死亡的消息是一种强烈的冲击。《汉堡报》总编辑赫尔曼·奥克拉斯(Hermann Okraß)在5月2日发表的名为《告别希特勒》(*Abschied von Hitler*)的讣告中对这些人写道:“一个伟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想为自己的人民谋求最好的”,因此也受到他们的“热爱”。阿道夫·希特勒集“最美好的美德、最热烈的愿望、最崇高的向往、人民的全部美好意愿”于一身。因此,可以“放心地请世界历史对他作出评判”。^[13]

失去心爱的“元首”的悲伤常常与自怜混杂在一起。26岁的日耳曼学学生萝赫·沃尔布(Lore Walb)在5月2日写道:“他现在得到了

安宁，这对他来说绝对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呢？我们被抛弃了，被交给所有人摆布，我们穷尽一生也无法重建这场战争所摧毁的一切。”最初，希特勒想实施他的“积极思想”，内政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好事”，但是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中以及作为最高军事首领却彻底失败了：“人民现在必须赎罪。如果爸爸也能经历这些该多好！”^[14]汉堡一位同龄的商务办事员在同一天说：“我们的元首向我们许诺了很多，现在他实现了以往德国统治者们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即他留下了一个完全被摧毁的德国（……），让数百万人丧生，简而言之，最终造成了可怕的混乱。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必须再次为一切后果负责。”^[15]

这些抱怨反映了希特勒的许多前追随者在获悉其死亡消息后的矛盾情绪。多年来对他的忠诚信任现在变成了失望和愤怒；或者转变为冷嘲热讽，比如19岁的埃里卡·阿斯姆斯（Erika Assmus），这位年轻姑娘来自波罗的海乌泽多姆岛（Usedom）上的海滨浴场阿尔贝克（Ahlbeck），曾经是积极的希特勒青年团少女队的一个小组负责人。5月2日她与家人一起逃往维斯马（Wismar）。最初，她因寄托在希特勒身上的希望破灭了而感到悲痛，接着则是冷静地算账：“公司破产了。它的创始人逃脱了，并且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不是这样玩的！那不是营业的根本原则！哀悼直接变成了冷嘲热讽，它是被背叛者和无望者们的宣泄方式。”^[16]在后来的联邦德国，埃里卡·阿斯姆斯以卡罗拉·斯特恩（Carola Stern）为笔名成为德国最有名的左派自由主义时事评论家。

16岁的希特勒青年洛塔尔·罗伊威（Lothar Loewe）和许多其他同龄人一样，是柏林人民冲锋队的最后一批成员。当他在马苏亨大街听到大德意志广播报道的希特勒在地堡丧生的消息时，只感到内心的空虚和手足无措：“怎么办？我在想。现在谁将统治德国？没有了希特勒，我们这些希特勒青年将怎么办？”^[17]后来在联邦德国，作为

德国电视一台驻华盛顿、莫斯科和东柏林的通讯员，洛塔尔·罗伊威成了最著名的电视新闻记者之一。

来自上黑森州劳巴赫小镇的司法监察官弗里德里希·凯尔纳（Friedrich Kellner）是少数很早就预感到灾祸到来的希特勒反对者之一，他曾提醒同胞们不要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希特勒及其集团。数以百万计的纳粹党员都对这场灾难负有责任。凯尔纳在1933年之前是社民党党员，他在二战爆发时就开始记日记。他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碰巧听到的或朋友告诉他的消息，最后记了十本。对纳粹新闻宣传的批判性阅读使他能够看穿宣传中的谎言，并对该政权的犯罪本质作出准确判断。在听到希特勒逝世的消息时，他评论说：“这一最邪恶的政治制度，这个独特的元首国家，迎来了罪有应得的结局。历史将永远地证实，德国人民无法主动摆脱纳粹的枷锁。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胜利对于摧毁纳粹的妄想和征服世界计划是必不可少的。”^[18]

威廉·夏伊勒在5月2日也作出过类似的总结：“这场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并接近失败的战争将以一场彻底的胜利结束。墨索里尼被挂在米兰广场上。希特勒死了，毫无疑问是自我了断。（……）随着这两个发动且领导战争的人的死亡，几乎攻占并摧毁我们整个世界、比人类历史上任何运动都带来了更多痛苦的法西斯主义也将被送往坟墓。”^[19]

*

5月2日夜里，位于柏林的第79苏联卫队师无线站收到一封俄语的电报。“注意！注意！这里是德国第56坦克军团。我们请求停火。我们将派谈判代表于柏林时间凌晨0点50分前往波茨坦桥。识别标记：白旗。请回复。”不久后苏方回复：“了解！了解！我们将把您的请求转告指挥官！”^[20]瓦西里·崔可夫上将随即命令在指定的路段停止战斗，并任命一名参谋部军官和一名口译人员负责接待谈判代表。他

再次给出严格的指示，只允许进行无条件投降的谈判，并且在要求德国人立即投降方面不得作出丝毫退让。

与此同时，德方也终于认清这一现实，即在帝国首都继续斗争已毫无意义，并且除了投降别无选择。5月1日晚11点左右，德军第56坦克军团司令、柏林最后一名战斗指挥官赫尔穆特·魏德林将军在他位于本德勒街区的指挥所里召集了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负责人。据一名目击者称，当魏德林宣布希特勒去世的消息并说明投降的必要性时，“这些男人发出了一阵呻吟”。即使那些早已知道或预感到战争即将结束的人，也被现实击溃，“对他们所有人来说，世界崩溃了”。[\[21\]](#)

最终，所有指挥官都同意魏德林的决定。前一天陪同克雷布斯将军执行任务的特奥多尔·冯·杜福文接下了投降谈判的任务。在一名口译和一名拿着白旗的士兵的陪同下，他前往约定好的会面地点。与前一天相比，这次谈判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苏联代表谢姆琴科（Semtschenko）上校表示，他的上级授权他接受德方投降。他允诺德国人“有尊严的条件”：军官可以佩带“小的随身武器”（军刀或匕首，但不能佩带手枪），并且允许随身携带尽可能多的手提行李。此外，苏方承诺“保护平民并照顾伤员”。至于柏林投降的时间，杜福文指出，几乎所有的通信连接都已被摧毁，通信人员必须前去通知仍在战斗的部队，这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因此停火的开始时间定为上午6点。凌晨3点左右，杜福文回到本德勒大本营，并向聚集在此的同事通报了谈判的结果。[\[22\]](#)

魏德林及其参谋部在凌晨5点30分至6点离开本德勒大本营，成为战俘。他被带到位于舒伦堡环路2号滕珀尔霍夫的崔可夫总部。他保证，他已经下令停止战斗；但由于通信不畅，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命令已传达至仍在战斗的所有部队。应崔可夫的要求，魏德林于上午7点50

分发布正式的书面命令：“1945年4月30日，元首自我了结了生命，抛弃了宣誓效忠于他的我们。你们在元首的命令下仍然坚持认为必须为柏林而战，尽管重型武器、弹药紧缺，尽管总体局势使这场战斗显得毫无意义。你们继续战斗的每个小时都会延长柏林平民和伤者强烈的痛苦。现在仍在为柏林而战的所有人都是在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与苏联军队最高指挥部达成一致后，我要求你们立即停止战斗。”
[23].

年轻的德裔苏联政治委员、当时仅20岁的史蒂芬·德恩贝格（Stefan Doernberg）在他的便携式打字机上打下了上述命令。德恩贝格于1935年随犹太父母移居苏联；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自愿加入红军，并在投降谈判中担任翻译（他在后来的民主德国成为知名历史学家）。[24]魏德林带着一份投降令的副本乘车前往位于特雷普托-科佩尼克区（Treptow-Köpenick）的约翰尼斯塔尔（Johannisthal）的一间录音室。他在那里录下了投降令，接着通过车辆扬声器在柏林大街小巷播放。[25].

尽管如此，5月2日当天战斗仍在几个核心区域持续进行。特别是党卫队仍然誓死激烈抵抗。下午5点左右，全面停火终于实现。到处都聚集着被击败的国防军残余部队，他们开始长途跋涉前往战俘营。苏联口译员叶琳娜·雷热夫斯卡娅（Jelena Rzhevskaya）观察到“许多士兵仍戴着已经毫无意义的钢盔”，“他们筋疲力尽地走着，被出卖了，脸庞发黑，情绪低落。一些人垂头丧气，另一些人则松了口气，而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是同样沮丧和冷漠”。[26]魏德林将军在5月8日与另外12名国防军和党卫队成员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直到1952年2月接受审判。他被判处25年监禁。1955年11月，他死于卢比扬卡医院；据称死因是心力衰竭。[27].

慢慢地，柏林市民带着恐惧不安的神情从地窖中走出来——他们整天躲藏在拥挤的地下，没有电灯、煤气或水。在他们面前呈现的是一幅恐怖的画面：天空乌云密布，到处能看到残留的炮火，建筑的外墙纷纷坍塌。被毁的房屋废墟堆积成山，中间夹着士兵的尸体，既有苏联人的也有德国人的。中弹的坦克、倒下的大炮、烧毁的有轨电车表明了之前战斗的激烈。马的尸体也随处可见，马肉便成为颇受柏林人欢迎的一道菜。

记者玛格丽特·博韦里（Margret Boveri）没有像她的同事乌拉·苏拉·冯·卡尔多夫那样逃到德国南部，而是留在她位于夏洛滕堡区（Charlottenburg）温特街（Wundstraße）的公寓耐心等待。她在5月2日早上听说有人在分发马肉。“我（……）跑过去，发现在人行道上有半匹还残留体温的马，人们拿着刀和斧子围着它割肉。我掏出大水果刀，抢占了一个位子，也割了一块肉。这并不容易。我拿到四分之一的肺和一块后腿肉，马皮仍留在上面，当我把刀拔出时血溅了出来。” [\[28\]](#)

在柏林重获和平的最初几天，对商店和食品摊的洗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舒尔泰斯啤酒厂（Schultheiß-Brauerei）情况尤其混乱，因为德国国防军在那里有大量储备。一名学生在一年后回忆说，“男人、女人和孩子拿着黄油、人造黄油、罐头食品、肥皂、饼干、面包、巧克力、糖果、水果卷糖、酒和许多其他东西从地堡（啤酒厂）走出来”，“抢劫如此肆无忌惮，以致苏联士兵不得不向空中开枪”。 [\[29\]](#)

备受吹捧的“人民共同体”自始至终都只是宣传理想而非现实，如今已荡然无存。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只忙着为自己和家人获取生活必需品。“人们互相攻击，殴打对方，抢夺贴身物品，将能碰到的东西都据为己有。” [\[30\]](#)

躲在地下室的人们重获自由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那不同寻常的、极度的寂静。炮火的隆隆声和机关枪的轰鸣声已经停止，也不再有空袭。“难以置信。再也没有警报声响起，也不会再有炸弹落下，人们将渐渐重新习惯脱下衣服后再上床睡觉”，柏林市民玛塔·米伦多夫（Marta Mierendorff）在5月2日高兴地写道。她很惊讶地发现人们已经开始清除人行道上的瓦砾了。“很明显，大家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31]



1945年5月2日柏林战斗结束后，柏林市民正从一匹马的尸体上分肉。
(Berliner Verlag/Archiv/dpa/ZB/Picture-Alliance,
Frankfurt/Main)

在柏林，5月2日对于红军士兵来说是一个庆祝日。“这是巨大的胜利。人们在一个大型方尖碑旁自发地庆祝。坦克淹没在鲜花和红旗的海洋中（……）”，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Wassili Grossmann）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所有人都在跳舞、唱歌和欢笑。彩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冲锋枪、步枪和手枪射出欢乐的子弹。” [32]像现在这

样，他“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睡觉了——像个死人一样”，苏军少尉尼古拉·贝罗夫（Nikolai Below）在给他怀孕的妻子利迪娅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之后是否还会再有激烈的战斗，但我觉得应该没有了。在柏林，一切都结束了。”贝罗夫没有活着看到战争的结束。5月4日，他被派往易北河畔的伯格（Burg）执行任务，于第二天战死。[\[33\]](#)

*

5月2日早上，在魏德林将军签署投降令的同时，“乌布利希小组”成员在苏联政治军官的陪同下，乘坐多辆汽车驶向柏林。他们见到的景象令人震惊：“火灾、废墟、穿着破烂衣服四处游荡的饥饿人群。不知所措的德国士兵们，似乎并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红军士兵们则唱歌、欢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红军的监视下，成群结队的妇女开始清洁工作。人们排着队耐心地站在水泵前，为的是接上一桶水。每个人看上去都非常困倦、饥饿、筋疲力尽，或者可以说是支离破碎。”[\[34\]](#)房屋的窗户上悬挂着白旗，原来的工人社区也悬挂着红旗。许多柏林人戴着白色或红色的袖章，有些人甚至同时戴着两种。

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老弗里德里希菲尔德街（Alt-Friedrichsfelde）1~3号的苏维埃中央司令部。参与柏林战斗的市区指挥官尼古拉·贝沙林（Nikolai Bersarin）大将亲切地问候了这些来自莫斯科的德国使节，并给他们下了第一道指令。对苏联方面来说，恢复公共秩序是头等大事。要清除街道上的瓦砾和军事装备，处理掉人和马的尸体，确保水、电和气的供应，商店和企业要重新开业。“请您帮助恢复正常生活。请帮助红军。这也是在帮助您的同胞”，贝沙林解释说。[\[35\]](#)

“乌布利希小组”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帮助重建柏林的21个市政管理机构并成立市政府。成员以两人为一组，要探访分配给他们的市

区，并按照苏联占领国的意思制定人事政策路线。沃尔夫冈·莱昂哈特陪同瓦尔特·乌布利希来到新克尔恩区（Neukölln），在那里有一座半毁的公寓楼，一群在希特勒独裁统治迫害中幸存的老共产党员聚集其中。莱昂哈特在他的《革命抛弃了它的孩子们》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问候场面：“突然有几个人跳了起来，喊着‘乌布利希’。很快他就被围住了。这些同志的脸上映出惊喜和喜悦。与之相对的，乌布利希仍保持严肃和客观的样子。他向他们打招呼——在我看来他的问候相当冷静——介绍我是他的同事。两分钟后讨论继续，但改由乌布利希主持（……），他提问的方式虽不像警察审问那样，但也与我的期待大相径庭——那并不是一位移居国外者十二年后与多年生活在希特勒恐怖统治下且幸存下来的同志们重逢时应有的说话语气。最终，他介绍了当前的政治‘路线’，并以不允许反驳的语气和不允许质疑的方式，表明党的政策将由他，而不是柏林共产党（……）决定。”[\[36\]](#)

5月2日晚上，该小组在布鲁赫缪勒的“柱屋”再次碰头。他们互相交流经验；乌布利希随后就行政区部门组成作出指示：在工人阶级区，应任命社会民主党人为市长；在资产阶级区，包括威尔默斯多夫（Wilmerdorf）、夏洛滕堡、采伦多夫（Zehlendorf），则应任命“资产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最好拥有博士学位。食品、经济、社会和交通部门负责人则还是由社民党人担任，乌布利希认为“他们对地区政治有所了解”。共产党人应当占少数，但要担任第一副市长（Erster Stellvertretender Bürgermeister），以及人事、教育和公安部门负责人。“很明显：一切得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握一切”，乌布利希对任命安排作出精辟总结。[\[37\]](#)在5月的最初十天里，根据这一模式着手建立以共产党为主导的政府便成为主要目标。

从一开始，乌布利希就与柏林红军总政治部（PUR）负责人加拉德肖（Galadshew）将军及其副手谢罗夫（Serow）上将合作密切。他是

苏联占领区代表们最重要的联系人。并且由于他能保障忠诚、高效地执行斯大林方针，因此，如果事关任命要职，他的建议通常能够得到采纳。仅两周后，他就向在莫斯科的党主席威廉·皮克报告：“现在柏林各区的指挥官如遇到复杂的问题，都会通过电话与我们联系，请求指派一位可以帮忙理清这些问题，并正确组建行政部门的专业指导。通过一开始就将所有精力集中到各行政区，我们已经结识了足够多的干部，以便为中央行政机构、警察以及其他必要的一切提出我们的建议。”^[38]

在攻占柏林的最初几天，红军士兵也是暴行不断，尤其是强奸妇女。但是，乌布利希断然拒绝了柏林共产党人的要求，避免开诚布公地对这一隐晦的话题表态。是的，他反而明确反对因强奸而怀孕的妇女堕胎。^[39]乌布利希对曾留在“第三帝国”并在那里进行非法抵抗的共产党人深表不信任。在他看来，他们仍然没有摆脱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符号和口号，仍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与斯大林的立场背道而驰。“我们必须作出解释，大多数同志存在宗派主义的倾向”，乌布利希在5月中旬给威廉·皮克的信中写道。“有些同志仅靠眨眨眼来执行我们的政策，有些同志出发点是好的，但后来他们竟使用‘红色阵线’的口号，还有一些（……）谈论着苏联势力，诸如此类。我们已在同志队伍中大力反对错误观念，但总有不断重复旧错误的新同志出现。”^[40]

乌布利希完全依靠在苏联流亡过的受过训练的干部，这些人对斯大林命令的服从已成为第二天性。在他眼中，这是严格执行苏联占领国意志的唯一保证。^[41]这些莫斯科密使对红军占领柏林后大部分城区组建的“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同样持不信任态度。这是由坚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自发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协调最初的清理工作，分配生活住所，以及重启营业和供应设施。乌布利希对这些从基层发起的独立行动深表怀疑，在与苏联总部密切协商后，他竭尽

所能地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早在5月5日，他就向季米特洛夫汇报：“我们关闭了这些挂着铭牌的办公室，并向同志们明确指出，现在必须集中所有力量在市政部门的工作上。”^[42]

除了市区管理工作，“乌布利希小组”还负责为新的柏林市政府寻找合适的候选人。这里的关键也是要赢得社民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拥护，同时打出“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旗号，而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掌握实权。社民党人、前工会秘书约瑟夫·奥洛普（Josef Orlopp）第一个同意加入新一届市议会。乌布利希成功说服前帝国部长、著名的中央党政治家安德烈亚斯·赫尔姆斯（Andreas Hermes）接管食品部门的工作。后者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行动而于1945年1月被判处死刑，但他幸运地逃过一劫。后来他成为苏占区基民盟的联合创始人，并在移居联邦德国后在那里的基民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乌布利希在给谢罗夫大将的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他与赫尔姆斯合作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希特勒政权的罪行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他将支持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清洗运动（……）。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系统地、耐心地影响赫尔姆斯博士，不惜一切代价巩固他与苏联的友谊。”^[43]

随着外科医生、夏里特医院院长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担任卫生部门负责人，建筑师汉斯·沙朗（Hans Scharoun）担任基建部门负责人，市政班子成功纳入了两名“资产阶级”知名人物。新市长一职由时年68岁的无党派土木工程师阿图尔·维尔纳（Arthur Werner）接任，但他其实并没有担任这类高级职务的履历，而这正合乌布利希和苏联总部的意思。因为真正的工作是由他的副手卡尔·马龙负责的，市政管理工作的指挥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威廉·皮克的儿子阿图尔·皮克（Arthur Pieck）担任人事部门负责人，奥托·温策尔担任公共教育部门负责人，这样共产党人

又占据了两个关键职位。5月19日，在苏军城市警备司令官贝沙林的见证下，新一届市政府正式就职。[\[44\]](#)

几周后的6月10日，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呼吁重建本党。“乌布利希小组”的任务就此结束。在两个月时间内，他们为苏联占领区的共产党统治打下了基础。

*

5月1日至2日夜间，威廉大街政府区的激烈战斗仍在持续。第二天早上，这里终于停火。前几天不断受到苏联大炮射击的总理府上空如今也陷入一片死寂。少数没有尝试突围而留在地堡的人员颤抖着等待第一批红军士兵的到达。

早上9点左右，一直维持着机组运转的地堡首席技术员约翰内斯·亨彻尔（Johannes Hentschel）听到了苏联人的声音。声音的来源并非男人，而是一群身穿制服的红军医疗队女队员。领队立即用德语问亨彻尔：“希特勒在哪里？”他已经死了，这名土木工程师如实说，并描述了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花园里火化的情形。随后对方的兴趣迅速转移到传说中的“元首”情人和她的衣柜上：“她的衣服在哪里？”亨彻尔多年后回忆说：“我终于明白了这些苏联女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胜利者可以进行掠夺。经过漫长而激烈的战斗，这些女战士一心只想要体面的平民服装（……）。我松了一口气，看来没有那么可怕，接着我把她们带到了伊娃·布劳恩的更衣室。”[\[45\]](#)

当天，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第三突击队的士兵占领了帝国总理府；先锋部队在地下墓穴中搜寻可能埋藏的炸药。紧随其后的是军事间谍防御部门施密尔舒的一支队伍。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希特勒的遗体并对其进行辨认。虽然克雷布斯将军已在5月1日晚上与崔可夫上将的谈判中汇报了希特勒已自杀的情况，魏德林将军也在5月2日上午再次

明确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苏联方面仍然持怀疑态度：如果这条消息有诈，希特勒得以逃脱，该怎么办？这一假设对施密尔舒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他们承受来自莫斯科的巨大压力，《真理报》（*Prawda*）已经宣称希特勒之死的消息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诡计。[\[46\]](#)

下午，由伊万·克利缅科（Iwan Klimenko）中校领导的施密尔舒小组开始了搜查工作。在初步检查了地下迷宫后，他们来到总理府花园。“无数的炮弹将地面炸裂，树木被毁。我们踩在烧焦的树枝上，在被烟熏黑的草坪上走动。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碎砖瓦砾。”担任口译员的叶琳娜·雷热夫斯卡娅报道说。[\[47\]](#)

下午5点左右，防卫军官在地堡入口附近发现了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烧焦一半的尸体。显然，史瓦格曼副官没能找到足够的汽油把尸体烧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防卫军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迪斯（Alexander Wadis）中将在报告中写道：“该男子的尸体身型矮小，右脚半弯曲地（内翻足）安在一个烧焦的金属假肢上；尸体上盖着烧焦的纳粹制服，上面镶着金色的纳粹徽章。在该女子的烧焦尸体上发现一个金色烟盒，尸体上有金色的纳粹党徽章和一根烧焦的金胸针。”[\[48\]](#)5月3日，总理府地堡中还发现了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五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就像两天前临死时那样，他们穿着睡袍躺在床上。

被捕的海军中将沃斯、总理府厨师威廉·兰格（Wilhelm Lange）以及车库守卫卡尔·施耐德（Karl Schneider）被传唤来辨认尸体。三人都证实，可怕的尸体是宣传部部长及其家人。沃斯表示，希特勒在自杀前三天还将金色徽章授予玛格达·戈培尔。[\[49\]](#)

但是，希特勒在哪里？沃斯也被问到了这一点，他说，在他试图逃跑时从希特勒的副官那里听到这位独裁者自杀了，尸体在帝国总理府的花园里被焚毁。5月3日晚上，在一个已经干涸的消防水池里，人

们在众多尸体中发现有一具与希特勒有些相似。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该男子穿着修补后的袜子，故应该不会是这位独裁者的尸体。[\[50\]](#)于是，寻找尸体仍在继续。叶琳娜·雷热夫斯卡娅表示，“我们一次次地探测废弃的地堡，一米都不放过”，“到处都是翻倒的桌子，碎裂的打字机，脚下踩到的玻璃叮当作响、纸张发出沙沙声。我们搜索着各个房间和长长的走廊。我们摸索着走过受损的混凝土墙和过道里的水坑。空气潮湿且压抑，风扇不再运转。让人呼吸困难”。[\[51\]](#)

5月4日，克利缅科的手下从距地堡紧急出口几米远的弹坑中拉出两具烧焦到无法辨认的尸体，一具男尸和一具女尸。不过由于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它们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的尸体，这些遗骸再次被埋了起来。但是第二天，克利缅科感到担忧，于是命令防守部队的一名排长阿列克谢·帕纳索夫（Alexej Panassow）中尉再次挖出这两具尸体。它们被包裹在毯子里，放在两个弹药箱中被送往位于柏林布赫地区（Buch）的第496号野战外科医院。[\[52\]](#)

与此同时，在海军中将沃斯之后，苏联侦察指挥官还逮捕了魏德林将军和希特勒的首席飞行员汉斯·鲍尔，并就纳粹高官的下落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审讯。5月5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施密尔舒指挥官特鲁索夫（Trussow）少将向军事情报负责人费奥多尔·库兹涅佐夫（Fjodor Kusnezow）将军提交了一份总结报告。后者立即将报告呈交给斯大林。内容清楚表明希特勒已经自杀，并曾下令将其遗体火化。[\[53\]](#)

在5月7日至9日，法医在福斯特·尤西福维奇·舒卡拉夫斯基（Faust Jossifowitsch Schkarawski）上校的要求下首先对戈培尔夫妇及其六个孩子的遗体进行了尸检。死因均确定为“氰化物中毒”。在疑似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尸体的口腔中也发现了安瓿瓶碎片，死因也被确认为氰化钾中毒。[\[54\]](#)但这一发现与克雷布斯将军和魏德林

将军说希特勒是用枪自杀的说法有出入。进一步的研究十分必要，这时被发现的牙齿残骸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给希特勒做过两次声带手术的夏里特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卡尔·冯·艾肯（Carl von Eicken）教授口中，调查人员得知了曾给这位独裁者进行治疗的牙医的名字：雨果·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教授。但是调查人员没能找到他，因为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他就逃到了上萨尔茨堡山。不过5月9日他们找到了布拉施克的助理凯特·海瑟曼（Käthe Heusermann）。她按照记忆描述了希特勒假牙的特征——布拉施克已将X光片随身带走。她的描述与发现的牙齿部位情况一致。牙科技师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也证实了发现的树脂牙桥属于伊娃·布劳恩。这些重要的证据表明，被发现的遗体残骸确实属于希特勒和他的妻子。[\[55\]](#)

5月13日，调查人员终于找到一名目击者，他能够说出4月30日下午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发生的事：帝国安全局党卫队分队长哈里·门格斯豪森（Harry Mengershausen）从他的岗亭观察到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的尸体是如何被运送到外面，并被汽油浸泡和点燃的。在审问中他能够指出烧焦尸体的埋葬地点。[\[56\]](#)再也没有理由对希特勒之死，以及尸体已被焚毁的事实提出质疑。

直到1945年5月底，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防卫长官亚历山大·瓦迪斯中将才将调查结果汇报给情报部门负责人拉夫伦蒂·贝里贾（Lavrenti Berija）。[\[57\]](#)但斯大林仍然保持怀疑。5月26日，在与美国特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会谈时，他猜测希特勒可能与鲍曼一起逃离了柏林，并躲藏在某个地方。必须竭尽所能找到他。也许他乘坐潜水艇逃到了日本。[\[58\]](#)朱可夫元帅在6月9日于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无法断言希特勒的下落。他有可能在最后一刻逃出柏林，然后去了西班牙。[\[59\]](#)即使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

上，斯大林也顽固地认为希特勒还活着。苏联的所有后续调查都没有发现他的遗体，也没有证明其死亡的直接证据。[\[60\]](#)这位苏联统治者真的相信自己的版本吗？还是故意误导西方盟友？

苏联的这场猜谜游戏如往常一样又持续了一段时间。1945年秋天，希特勒的勤务员林格、个人副官君舍、首席飞行员鲍尔和电话员米施被转移到卢比扬卡，并在那里受到了密集审问。1946年初，“内务人民委员会（NKWD）”领导层决定成立一个代号为“神话（Mythos）”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迄今为止找到的所有关于希特勒自杀的信息是否属实。1946年5月，参与调查的人员与被捕者一起前往柏林现场再次进行检查。他们在地堡中仔细检查了希特勒书房沙发上残留的血迹，在对总理府花园进行重新挖掘时发现了两块男性头骨碎片，其中一部分明显有子弹打穿的痕迹。现在可以确切地证实希特勒亲信们反复说过的证词：这位独裁者开枪自杀。他很可能同时还咬碎了氰化物胶囊。[\[61\]](#)

经过法医检查后，戈培尔一家的尸体以及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的尸体残余被装在木箱中，然后草草掩埋在柏林布赫地区。但是它们再次被挖了出来，并随施密尔舒部队辗转多站：菲诺（Finow）、拉特诺（Rathenow）、施滕达尔（Stendal），最后在1946年2月埋在了马格德堡（Magdeburg）的一块军事用地中。它们在这里躺了二十多年。但是，当1970年春季马格德堡的苏联驻军即将撤离，这块地皮将移交给民主德国的局势已定时，克格勃负责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在给党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schnev）的一封信中建议：“应挖出遗骸，将其最终焚毁”。[\[62\]](#)1970年4月4日，克格勃军官打开墓穴，确认了木箱和里面剩下的东西。总结报告中说：“残骸被点燃的木柴堆烧毁。残骸被完全烧掉，与煤块一起粉碎成灰烬后倒入河中。”[\[63\]](#)

*

1945年5月2日晚，英国广播公司发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早在4月29日，德国陆军C集团军就已在意大利北部投降，现在才公布于众。大约有60万人放下武器。这是二战末期的第一次局部投降，也是希特勒在世时唯一的投降——尽管他对此一无所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中断了正在召开的下议院会议，并将这一事件称为历史性时刻。在华盛顿，战争部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在日记中写道，意大利战斗的壮丽结束树立了“了不起的榜样”，希望不久后能迎来德国的全面投降。^[64]

在德国陆军C集团军投降之前，作战双方曾秘密进行数月的复杂谈判。起决定性作用的发起人是希姆莱的前任参谋长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自1943年9月以来，他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党卫队和警察最高领导人”；自1944年7月起，他还担任意大利的“德国国防军全权代表”，这意味着除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外，后方的陆军部队也由他控制。由此，沃尔夫被提升至与西南总司令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同等重要的职位。他是对意大利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的主谋之一，成千上万的平民也在其中丧生，因此他应该预料到了战后会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他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尝试就C集团军的局部投降与盟国进行谈判，应当是希望借此从绞刑架上逃过一劫。的确，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他作为证人而不是被告出庭。^[65]

在意大利和瑞士中间人——主要是卢塞恩情报官马克斯·威贝尔（Max Waibel）——的帮助下，他成功地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缩写为OSS）驻伯尔尼办事处主任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建立了联系。^[66]在同意接见沃尔夫之前，杜勒斯要求他释放两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费鲁乔·帕里（Ferruccio Parri）和安东尼奥·乌斯米亚尼（Antonio Usmiani）

以表诚意。在这两人从党卫队监狱被释放并被送到瑞士后，沃尔夫于1945年3月8日在苏黎世与杜勒斯和他的同事格罗·冯·舒尔策-盖维尼茨（Gero von Schultze-Gaevernitz）首次会面。从一开始，这位党卫队将军就表示他并非受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任命而来。杜勒斯再次明确强调，只有德国人承认无条件投降原则，继续谈判才有意义。沃尔夫宣布自己已准备好，并承诺将说服仍在犹豫不决的凯塞林总司令。

这位党卫队将军显然给杜勒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报告说：他是位绅士，属于党卫队中的温和派。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它会迅速结束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多诺万向华盛顿提出该建议，这为杜勒斯的继续试探开了绿灯，该行动代号为“日出（Sunrise）”。^[67]

紧接着，美军少将莱曼·兰尼兹尔（Lyman Lemnitzer），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副参谋长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和盟军总部情报局局长、英军少将泰伦斯·艾尔瑞（Terence Airey）前往瑞士。3月19日，沃尔夫和杜勒斯在马焦雷湖（Lago Maggiore）畔的阿斯科纳（Ascona）与他们举行了严格保密的会议。这是二战中盟军和德军第一次在谈判桌前会面。杜勒斯报告说，沃尔夫没有试图“讨价还价”，而是表示自己将因为此举“立住或倒下”。沃尔夫借助地图向与会者介绍了他对在他指挥下结束战争的具体细节的设想。^[68]看起来，德军在意大利战场的最终投降即将到来，但随后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3月11日，凯塞林被希特勒从意大利召回，并被任命为西部战场总司令。他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冯·维汀霍夫-舍尔（Heinrich von Vietinghoff-Scheel）大将直到3月底才抵达意大利，而他对投降计划的态度尚不明朗。此外，柏林的党卫队领导层也知悉了沃尔夫的瑞士之行。4月17日，正在柏林北部霍恩利琴（Hohenlychen）党卫队战地

医院的希姆莱召见了沃尔夫，并在帝国安全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也在场的情况下责备其单独行动。显然，沃尔夫努力地说服了这位党卫队首领，表明他与杜勒斯接触的目的绝非让C集团军投降。[\[69\]](#)

4月18日，沃尔夫直接面见希特勒。这位独裁者谴责了他的自作主张，并且一如既往地拒绝任何投降的想法。不过，他允许沃尔夫继续与杜勒斯对话，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在盟军阵营中撒下不和的种子。“再过两个月，”他解释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苏联人之间就会决裂，然后我将与先接近我的一方结盟，无论哪一方对我来说都一样。”[\[70\]](#)

实际上，在瑞士举行的秘密会谈并没有导致盟军内部分裂，但是引发了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严重的信任危机。斯大林嗅到美英与德国人密谋的味道，他在4月3日的电报中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强烈抗议，谴责西方背着他与战争对手进行谈判：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止了西线作战，同时却继续全力对付苏联。罗斯福对该指控显然感到愤怒，他试图平息对方疑虑：没有进行直接谈判，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些不具约束力的谈话，它们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由于华盛顿和伦敦非常担心斯大林的强硬反应，于是决定中断在瑞士的试探。罗斯福4月12日突然去世后，丘吉尔和他的继任者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达成一致，为避免与苏联关系复杂化，禁止杜勒斯与德国谈判代表进一步接触。[\[71\]](#)

其间，沃尔夫获得新任西南总司令冯·维汀霍夫对C集团提前投降计划的支持。4月23日，他们作出了最终决定：沃尔夫和维克多·冯·史威尼茨（Viktor von Schweinitz）中校（作为维汀霍夫的全权代表）出发前往卢塞恩（Luzern）。杜勒斯最初拒绝与他们会面，因为华盛顿禁止他们之间进一步接触。但是，在瑞士调解人威贝尔告诉

他，这些德国特使已为驻意大利德军的投降获得全面授权后，杜勒斯向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求助，解除了4月20日颁布的接触禁令。4月27日传来消息称，德国谈判代表冯·史威尼茨和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奥尔根·维纳（Eugen Wenner，作为沃尔夫的授权代表）将到访卡塞塔（Caserta）的盟军总部。第二天，他们二人飞往意大利南部，并于4月29日与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将军共同签署了投降书。两名苏联总参谋部军官也出席了签字仪式。[\[72\]](#)

“仪式开始前，桌子上有经过精心摆放的墨水罐和钢笔”，格罗·冯·舒尔茨-盖维尼茨回忆道。“一些记者盯上了这些笔，因为它们可能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纪念品。但是当另一位纪念品搜集者，即一名负责本次会晤仪式礼宾工作的年轻苏联军官，将自己的钢笔递给德国人签字时，他们显然很失望。（……）摩根将军宣布仪式结束时是14点17分。德国人被带出房间，灯光熄灭。突然陷入一片漆黑和沉闷，仿佛演出结束后的舞台。”[\[73\]](#)

根据投降文件第1条，德国西南总司令宣布已准备好“无条件移交在其指挥或控制下的所有陆、海、空军”，并将“这些武装部队无条件移交给地中海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第2条责成西南总司令于5月2日中午12点（西欧时间）停止“陆、海、空的所有敌对行动”，并为此采取必要步骤。[\[74\]](#)但是，德国方面仍然有人反对投降。蒂罗尔州大区领袖弗朗兹·霍弗（Franz Hofer）撤回了他的许可，并在电话中将沃尔夫和维汀霍夫的行动告知了凯塞林——希特勒在最后一次官方行动中任命这位陆军元帅为整个“南部地区”所有德国部队的总司令，其中也包括C集团军。凯塞林得到消息后颇感愤怒，于4月30日免除了维汀霍夫及其参谋长汉斯·罗提格（Hans Röttiger）的职务，任命弗里德里希·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将军和约翰·韦策尔（Johann Wetzel）中将为继任者。然而，后者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后，也不得不承认，驻意大利军队进一步抵抗是没有希望的。随着希

特勒5月1日晚去世的消息传出，他们感到无须再效忠，也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在5月1日到2日夜间持续几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中，沃尔夫终于成功地说服凯塞林同意C集团军的投降。^[75]

5月2日，在给海军元帅邓尼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电传中，凯塞林揽下了在意大利停火的责任，虽然这一行动是在他并不知情且未经他批准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表示，他很清楚这可能会给“整个德国战线带来最严重的冲击”。但另一方面，这将使在西部的军团局部投降成为可能，“同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力度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能进一步加强”。^[76]这正好呼应了5月1日晚邓尼茨的电台演说和向国防军传达的日令：应尽快停止与西方的战斗，同时继续推进“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斗”。虽然海军元帅最初担心此举可能影响到其他战线的纪律，但他还是批准了维汀霍夫自作主张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这与他结束战争的计划相适应。^[77]

*

5月2日上午10点30分，邓尼茨召唤新任外交部部长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刚任命的总理府负责人保罗·魏格纳（Paul Wegener）、威悉河—埃姆斯河地区（Weser-Ems）大区领袖和北德最高国防专员，到他的临时政府所在地普伦兵营进行详细的讨论。他们浏览了一遍整个战场局势。相连的战线已不复存在。由国防军占据的地区在不断缩小。东普鲁士的库尔兰半岛（Kurland）和维斯瓦河（Weichsel）河口处的狭窄沿海地带仍在德国人手中。在库尔兰还有一个军团在坚守；但已经可以看到结局了，因为弹药和燃料供应已被截断。“崩溃的到来就像倒塌时发出的沉闷的隆隆声。但是工作和服务仍在继续。地堡仍在搭建，仿佛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名驻扎在温道（Windau）的士兵在日记中写道。^[78]在前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已完全解散。靠南的布塞将军麾

下第9军和温克将军率领的第12军残余部队正尝试突出重围，越过易北河向西突破。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尚未被占领，但英军已经在劳恩堡（Lauenburg）的易北河上修建了桥头堡，准备向北进军。

在意大利北部，C集团军已经投降。这使与其北部相接的、舒尔茨将军带领的G集团军也坚持不住了。奥地利大部分地区，即“东马克”，由伦杜利克（Rendulic）将军领导的南方集团军进行防守。由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仍坚守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而勒尔（Löhr）大将在巴尔干地区的E集团军则全面撤退。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德军占领，还有若干海外据点，例如比斯开湾、敦刻尔克和海峡群岛的一些港口。[\[79\]](#)

“军事形势令人绝望”，邓尼茨的私人副官瓦尔特·吕德-诺伊拉特在会议纪要里写道。海军元帅一如既往地拒绝“全面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就会突然将数百万德国士兵和平民移交苏联人”。因此，目标必须是“只向西方投降”。但是，鉴于盟国之间的政治协议，他们无法“由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官方渠道”达成，因此必须设法“通过局部行动，例如以军团为单位行动”，为这一计划铺平道路。在东部，应“用尽一切手段”继续战斗，以便“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歼灭战中拯救尽可能多的德国人”。[\[80\]](#)因此，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开始遵循继续战斗的命令，以使强大的陆军力量能够撤回到英美势力范围。另一方面，西北总司令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元帅被指示施行“拖延”战术，以尽可能争取时间与英军进行谈判。[\[81\]](#)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在当天对德国公众发表了广播讲话。讲话一开始就提到了“铁幕”，它随着红军的进军不断逼近，“在铁幕之后，摆脱全世界的目光，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的人们将面临毁

灭”。^[82]在这里，这位新任外交部部长引用的是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5年2月的《帝国》（*Das Reich*）周报社论中回击雅尔塔会议时用到的提法：如果德国投降，苏联占领的领土前将“立即降下铁幕，在幕后将开始民族大屠杀”。^[83]1945年5月12日，在国防军无条件投降仅几天后，丘吉尔在一封致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也采用了该关键词：“在他们的前线，一幅铁幕已经降下。我们不知道背后会发生什么。”^[84]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对于党卫队和国防军在波兰和苏联被占领土，以及在希腊、巴尔干、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所犯下的罪行只字未提。相反，他不吝辞藻地将德国人描绘成战争的真正受害者：“在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中，我们德国人最深刻地体验到战争在其毁灭一切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城市被摧毁了；在德累斯顿和纽伦堡、科隆和拜罗伊特以及其他享誉世界的德意志精神文明城市里，我们的文物古迹都成了废墟；我们的大教堂成了炸弹的牺牲品；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被战火吞噬，而几百万德国男子和青少年在前线阵亡。”和邓尼茨5月1日的讲话一样，科洛希克也竭力强调“欧洲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前景：“只有当布尔什维克浪潮不在欧洲泛滥时，世界才能安定下来。四年来，通过无与伦比的英勇斗争，德国耗尽最后的力量形成欧洲堡垒，同时也为世界抵抗赤潮的侵袭。如果没有腹背受敌，我们就能保护欧洲免受布尔什维克的侵扰。”^[85]这简直就是未加掩饰地邀请西方国家改变立场，和被击败的德国一起对抗苏联。

5月2日下午，普伦得到消息，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的第21军已从劳恩堡附近的桥头堡发起进攻，并已突进至吕贝克。同时，在其南边的美军部队越过易北河到达维斯马（Wismar）附近的波罗的海，途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根据当天下午4点的战局会议纪要，“至此，德国人从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地区逃到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大门已经关闭”。^[86]邓尼茨及其顾问从

中得出两条结论：一方面，他们决定将总部迁至弗伦斯堡，因为英军坦克从吕贝克到达普伦只需不到一小时；另一方面，应执行上午讨论过的计划，即就西北地区的部分投降与蒙哥马利开始谈判。邓尼茨任命其海军司令一职的继任者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大将为谈判代表。

晚上9点左右，邓尼茨在北上途中与弗里德堡在勒文绍尔高架桥（Levensauer Hochbrücke）上会合——它坐落于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Kaiser-Wilhelm-Kanal）上——并作出了与蒙哥马利进行谈判的指示：“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德国士兵和欧洲人民免受布尔什维克化和奴隶化的毒害。因此，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应撤回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势力范围。保护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人们免于屠杀和饥饿。为该地区提供医疗用品。保护大片区域免遭轰炸破坏。此外，要努力找到办法，防止中欧和北欧陷入进一步混乱。” [87]

5月3日晚，邓尼茨、科洛希克和吕德-诺伊拉特乘坐他们的梅赛德斯装甲轿车抵达弗伦斯堡。他们入住由“帕特里亚号（Patria）”客轮改造而成的住所。第二天，他们搬进弗伦斯堡-米尔维克（Flensburg-Mürwik）海军学校大楼，它将作为他们的新总部。海军上校沃尔夫冈·吕特（Wolfgang Lüth）为此急忙准备了应急物资。 [88]这里一直作为政府总部所在地直到邓尼茨内阁5月23日被捕。

*

5月2日上午，在巴伐利亚-奥地利边境作战的美军第44步兵师坦克防御部队司令官、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弗雷德·施耐克特（Fred Schneikert）惊讶地遇到一名骑着自行车靠近的德国人，他自称马格努斯·布劳恩（Magnus Braun），并表示V2火箭的发明者在上约赫山（Oberjoch）上，他希望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该名男子被带到位于蒂罗尔州罗伊特（Reutte）的美军战斗情报中心（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 缩写为CIC) 总部。经过短暂审讯后, 查尔斯·斯图尔特 (Charles Stewart) 中尉签发了通行证, 并命这位使节回去, 将山上的人带过来。[89]

1945年4月, 佩内明德陆军试验所 (Heeres-versuchsanstalt Peenemünde) 的火箭研究小组转移到上阿默高 (Oberammergau) 地区, 该小组由沃尔特·多恩贝格尔 (Walter Dornberger) 和韦恩赫尔·冯·布劳恩 (Wernher von Braun) 二人领导。在战争的最后几天, 他们在上约赫山的体育酒店“英格堡 (Ingeburg)”中度过了舒适的时光。5月1日晚, 他们从广播中听到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多恩贝格尔和冯·布劳恩决定投靠美国人, 因为他们相信美军会对他们的专业技术很感兴趣。布劳恩的兄弟马格努斯受托为特派员, 因为他的英语说的最好。当马格努斯下午2点左右返回时, 他们收拾行装, 沿着山路开车下山。美国士兵陪同他们前往罗伊特的一栋别墅, 斯图尔特中尉在那里接待了他们, 并让他们吃了顿便饭。第二天早上, 他们面见了媒体。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对受到的友好接待感到非常惊喜, 于是他举着石膏绷带这一姿势拍下了纪念照——几周前他在一次车祸中摔折了肩膀和手臂。

冯·布劳恩于1950年在美国的一次采访中说, 他不认为美国人会“像对待战犯一样对待他”。“是的, 那完全合乎逻辑。V2只有我们有, 他们没有。他们当然想知道关于它的一切。”[90]这位德国火箭设计师自愿将相关信息提供给美国人。从一开始, 冯·布劳恩就完美地扮演着非政治科学家的角色, 他不希望与纳粹及其大规模犯罪扯上任何关系。但他绝非像公众和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干净。

韦恩赫尔·冯·布劳恩于1912年出生于波森省的威尔希兹 (Wirnitz), 在波美拉尼亚地区的一个德意志贵族家庭长大。[91]他的父亲, 骑士封地拥有者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 (Magnus

Freiherr von Braun），曾担任帝国总理弗朗兹·冯·帕彭“男爵内阁”的农业部部长——帕彭作为希特勒的前任决定性地推动了魏玛共和国的毁灭。韦恩赫尔从小就对与火箭技术有关的一切很感兴趣。1930年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之前，他就加入了太空飞船协会，在那里与其他年轻的研究者一起开始尝试制作由汽油和液态氧助推的小型火箭。1932年，才20岁的他就加入了陆军武器局的导弹计划。实验最初在柏林以南的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试验场进行，从1936年开始转移到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Usedom）上的佩内明德。



火箭专家韦恩赫尔·冯·布劳恩（打着石膏绷带）和佩内明德陆军试验所所长沃尔特·多恩贝格尔（前排左侧）于1945年5月2日投靠美国人。（akg-images, Berlin）

这位才华横溢的技术员和管理者晋升迅速。1937年5月，他成为佩内明德陆军试验所（HVA）的技术总监。同年，他申请加入纳粹党。1940年，他还加入了党卫队。三年后，希姆莱将他提拔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研制远程弹道导弹。1942年10月，对付同盟国的“报复武器”A4火箭——后来以V2著称——首次测试成功。1943年7月，布劳恩和他的直属上级、HVA负责人沃尔特·多恩贝格尔拜访了元首的“狼穴（Wolfschanze）”总部，希特勒对新式“奇迹武器”的潜能非常期待，并授予31岁的布劳恩教授头衔——1950年代的冯·布劳恩仍然很高兴别人这么称呼他。

1943年8月17日至18日夜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佩内明德，破坏力度相当之大。之后，批量生产线被迫转移到哈茨山南部的隧道——诺德豪森附近的科恩施泰因（Kohnstein bei Nordhausen）。在这里，米特堡-朵拉集中营（KZ Mittelbau-Dora）的囚犯不得不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安装V2火箭。冯·布劳恩多次访问这座化名为“米特尔维克（Mittelwerk）”的工厂，还参加过有关使用奴隶工人的会议。如果说他在1945年之后表示自己对这些人所遭受的残酷对待一无所知，那纯粹是出于自保。

据保守估计，在米特堡-朵拉营地中有16000名至20000名囚犯死亡。这里大约制造了6000枚V2火箭，其中一半以上被发射，大部分射向了伦敦和港口城市安特卫普。V2在英国使将近3000人丧生，比利时的受害者人数也不低于这个数字。[\[92\]](#)

但是，美国人对雄心勃勃的佩内明德导弹计划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并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利用专业知识为未来关键的军事技术作

准备。火箭专家不是他们唯一想要抓住的专业人才。早在1944年7月盟军登陆诺曼底后，美军高级司令部就成立了所谓的“目标部队”（Target Forces），即规模较小的独立作战单位，其任务是搜寻重要目标，将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并带回美国。1945年3月底跨过莱茵河以及占领德国西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之后，他们便开始了狩猎行动。这一行动的代号为“阴天（Overcast）”。美国人还从被临时占领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带走了许多专家——这些地区本应属于苏联占领区——这样苏联人就无法获得他们的技能和知识了。到1952年，在“阴天”行动和1946年3月的扩大行动“回形针（Paperclip）”之中，美国一共“进口”了642名德国和奥地利专家。[\[93\]](#)

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他的团队在1945年9月就抵达了得克萨斯州的布利斯堡（Fort Bliss）。“我的国家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一次，我想站在胜利者一边”，他宣布道。[\[94\]](#)他毫不费力地改变了立场。在1950年代，他在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的美国导弹中心担任技术总监。1960年，他晋升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首席专家。在他的领导下，为阿波罗登月计划所使用的巨型土星5号运载火箭被研制出来。随着1969年7月20日美国人首次登月成功，冯·布劳恩声名鹊起。他作为杰出的火箭设计师的声誉和拥有的太空旅行之父的美名在他1973年去世后很久——即在1990年代具有批判眼光的历史学家开始审查他早期在纳粹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才逐渐破灭。

*

“冰冷彻骨的严寒，覆盖在田野和屋顶的积雪，雪停不下来。再加上持续的供电不足，生活越发艰难。不过，获救的感觉还是占据了主导。”1945年5月2日早上，维克多·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 在下贝恩巴赫 (Unterbernbach) 的一间小阁楼中写道。他和妻子在这里暂住了下来。^[95]纳粹上台后，这位出生于1881年的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曼语言文学教授和他所有犹太同事一样，被迫离开职位，并一步步地与社会隔离。1940年5月，他和妻子不得不交出在德累斯顿-德茨申的房子，并搬入“犹太人之家”，在那里他们和其他受难的同胞一起度过了战争岁月，每天都在希望与恐惧之间交替，不停地担忧受到袭击或被驱逐。克伦佩雷尔能幸存下来只有一个原因：他在1906年与非犹太人钢琴家伊娃·施莱默 (Eva Schlemmer) 结婚，属于未被驱逐的所谓“异族通婚”群体。即使在极度窘迫的情况下，他的妻子也站在他身边，正是她冒着风险定期将他的日记移送到她的一位住在皮尔纳 (Pirna) 的医生朋友那里，这些日记都保存在一个手提箱内而未被发现。直到1995年，这些日记才得以出版。这些记录比任何文件都更有说服力地再现了1933年至1945年间德国犹太人的命运——从权利被剥夺、被社会孤立到遭受驱逐和种族灭绝。^[96]

1945年2月13日至14日，此前一直幸免于难的德累斯顿遭到盟军轰炸，城市损毁严重。大约25000人因此丧生。对于克伦佩雷尔一家来说，这一灾难意味着有机会获救。他们决定在混乱中逃离。他把黄色六角星标从外套上取下，然后开始了真正的冒险之旅，最终他们于4月12日抵达巴伐利亚州艾夏赫 (Aichach) 附近的村庄下贝恩巴赫。在逃亡途中，这对夫妻目睹了人们如何与长期以来一直信奉的纳粹主义以及“元首”划清界限的。“最终胜利的乐观情绪”几乎“完全沉默下去”，到处都可以听到叹息声——“美国人快点来就好了！”，维克多·克伦佩雷尔4月初在慕尼黑中途停留时写道。在普法芬霍芬 (Pfaffenhofen)，人们也不再以“希特勒万岁”的口号打招呼。“所有人都重新说着以前慕尼黑人也说的‘你好’和‘再见’。”^[97]

1945年4月底，在美国人还未到达时，最先收留并照料克伦佩雷尔一家的下贝恩巴赫村长和当地农民领袖弗拉门斯贝克（Flamensbeck）就命人移除了悬挂在办公大楼山墙上的纳粹十字标志。这一现象在正走向灭亡的“第三帝国”中十分普遍。希特勒的肖像从办公室和私人公寓中消失了，各个版本的《我的奋斗》从书柜上被清走，纳粹制服、党徽和十字旗被烧毁。“风能把外套翻转到什么程度，人能够信任别人到什么程度？”维克多·克伦佩雷尔在5月1日质问道。“现在，这里的每个人都‘自始至终’是党的敌人。但如果他们真的一直是的话……”几天后，他写道，他“越来越困惑”于希特勒是如何做到只手遮天的：“现在大家有时表现得好像希特勒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天主教、非巴伐利亚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比如弗拉门斯贝克就是这样。”^[98]可是，正如克伦佩雷尔回忆的那样，慕尼黑恰恰是纳粹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希特勒就是在这里取得了他的首次胜利。

5月2日下午，克伦佩雷尔走到距离下贝恩巴赫4公里的屈巴赫（Kühbach）买东西。在教堂广场，他第一次遇到美国人——他们应该是一支美国维修队：“黑色，更确切地说，棕色皮肤的黑人士兵穿着无法讲清楚的灰、绿、土色外套和裤子，头上都戴着钢盔忙碌着，村里的孩子们紧挨他们站着，或者索性挤在他们中间。后来我还看到几个穿着深色皮夹克的金发士兵，佩带着左轮手枪，步枪（……）被皮带绑着，挎在肩上。”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告诉他，士兵们把商店搬空了，但除此之外表现得“相当得体”。“黑人也一样？”克伦佩雷尔问道。“‘他们比其他人更友好’，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两名与他交谈的老年妇女也证实了这一印象。“关于这些敌人残暴的传言不过是‘谣言’，是‘玩笑’。”克伦佩雷尔评论道：“这是怎样的公众启蒙啊！”^[99]

与美国人首次相遇时的类似经历还有很多。^[100]戈培尔所宣传的恐怖场景，例如西方的“犹太财阀”也意图歼灭德国人民，显然在许

多德国人中并未奏效。就算有谁轻信了戈培尔的宣传，也会很快受到现实的教导。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目睹了1945年4月底美国军队进驻施瓦本村庄叶廷根的场景，她写道：“美国士兵很友好。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时地隔着栅栏张望。我们喜欢与他们聊天（……），他们随身带着巧克力，我们用蹩脚的英语尽可能客观地谈论政治。” [\[101\]](#)

[\[1\]](#) Engel: 1. Mai 1945: 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 PDF-Datei, S. 1.

[\[2\]](#)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Der deutschen Grenze entgegen,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250.

[\[3\]](#) Gerd Schmückle: Mitgegangen, mitgefangen...,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57.

[\[4\]](#) 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S. 320 (v. 2. 5. 1945).

[\[5\]](#) Ruth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Ein deutsches Tagebuch, München 1962, S. 188 f. (v. 2. 5. 1945).

[\[6\]](#) Karla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5, Berlin 1966, S. 23 (v. 1. 5. 1945).

[\[7\]](#) Heinrich Breloer (Hrsg.): Mein Tagebuch. Geschichten vom überleben 1939-1947, Köln 1984, S. 182.

[\[8\]](#) Neitzel (Hrsg.): Abgehört, Dok. 79, S. 210-212 (v. 2. 5. 1945), Dok. 72, S. 195 (v. 10.-13. 4. 1945), Dok. 73, S. 197 (v. 16.-18. 4. 1945).

[\[9\]](#) 恩斯特·荣格尔（1895~1998），德国小说家，曾在二战中担任德国国防军上尉。

[\[10\]](#) 施陶芬贝格（1907~1944），纳粹德国陆军上校，1944年7月20日秘密刺杀希特勒行动的主要执行人之一。

[11] Ernst Jünger: Die Hütte im Weinberg. Sämtliche Werke, Bd. 3, Stuttgart 1979, S. 421 (v. 1. 5. 1945) .

[12] Sarkowicz (Hrsg.) : “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 S. 79.

[13] Hamburger Zeitung v. 2. 5. 1945; wieder abgedr. in DIE ZEIT v. 23. 4. 2015.

[14] Lore Walb: Ich, die Alte-ich, die Junge. Konfrontation mit meinen Tagebüchern 1933-1945, Berlin 1997, S. 338.

[15] Breloer (Hrsg.) : Mein Tagebuch, S. 213 (v. 2. 5. 1945) .

[16] Carola Stern: In den Netzen der Erinnerung. Lebensgeschichten zweier Mensch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 S. 237; 亦可参见Dem Führer die Treue halten? , in Trampe (Hrsg.) : Die Stunde Null, S. 261。

[17] Lothar Loewe: Der Kampf um Berlin, in Trampe (Hrsg.) : Die Stunde Null, S. 47. 15岁的Johanna Ruf在1945年4月27日和其他“德国少女联盟”成员在新帝国总理府野战医院协助护士工作，她在5月2日写道：“在这一刻让我们感动的是，我们还能再次提及元首，人们不能把这记下来。” Johanna Ruf: Eine Backpfeife für den kleinen Goebbels. Berlin im Tagebuch einer 15-Jährigen.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Hrsg. Von Wieland Giebel, Berlin 2017, S. 29。

[18] Kellner: Tagebücher 1939-1945, Bd. 2, S. 930 (v. 1. 5. 1945) .

[19] Shirer: Berliner Tagebuch. Das Ende 1944-45, S. 71 (v. 2. 5. 1945) .

[20] Tschuikow: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219.

[21] Refior: Mein Berliner Tagebuch 1945, in von zur Mühlen (Hrsg.) :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35.

[22] Dufving: Die Kapitulationsverhandlungen vom 30. April bis 2. Mai 1945, in von zur Mühlen (Hrsg.) : Der Toten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177–181.

[23] 1945年5月2日命令书的复制本参见Olaf Groehler: 1945. Die Neue Reichskanzlei. Das Ende, Berlin 1995, S. 72。另参见Tschuikow: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226 f.。

[24] 参见Stefan Doernberg: Befreiung 1945. Ein Augenzeugenbericht, Berlin-Ost 1975, S. 62–64。

[25] 参见Von zur Mühlen (Hrsg.) : 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254。

[26] Stefan Doernberg (Hrsg.) :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Jelena Rshewskaja erinnert sich an ihren Einsatz im Mai 1945 in Berlin, Berlin 2005, S. 51.

[27] 参见Von zur Mühlen (Hrsg.) : 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S. 250 f., 255–277。

[28] Margret 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Berlin 1945, München-Zürich 1985, S. 97 f. (v. 1.-3. 5. 1945) .

[29] Berliner Schulaufsätze aus dem Jahr 1946. Ausgewählt und eingeleitet von Annett Gröschner, Berlin 1996, S. 244.

[30] Berliner Schulaufsätze aus dem Jahr 1946. Ausgewählt und eingeleitet von Annett Gröschner, Berlin 1996, S. 164。参见18岁的柏林办公室职员Brigitte Eickedie的日记：“人们都疯了，就像鬣狗一样厮打，没人有所顾忌，他们打人，已经不能称作人了。” Barbara Felsmann/Annett Gröschner/Grischa Meyer (Hrsg.) : Backfisch im Bombenkrieg. Notizen in Steno, Berlin 2013, S. 269 (v. 2. 5. 1945) ;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S. 24 (v. 2. 5. 1945) : “人们被占有欲控制，市侩得毫无顾忌。”

[31] Angela Martin/Claudia Schoppmann: “Ich fürchte die Menschen mehr als die Bomben.” Aus den Tagebüchern dreier Berliner Frauen 1938–1946, Berlin 1996; 引自<http://www.berliner->

geschichtswerkstatt.de/news-reader/items/tagebuchaufzeichnungen-vom-1-april-bis-zum-9-mai-1945.html。

[32] 援引自Antony Beevor: Ein Schriftsteller im Krieg. Wassili Grossman und die Rote Armee 1941–1945, München 2007, S. 417。

[33] Merridale: Iwans Krieg, S. 363 f.

[34]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09.

[35] Fritz Erpenbeck: Am Anfang war das Chaos, in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S. 640.

[36]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10, 311 f.

[37] 参见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15–317; Leonhard: Im Dienste Walter Ulbrichts, in Trampe (Hrsg.) : Die Stunde Null, S. 276。

[38] Walter Ulbricht an Wilhelm Pieck, 17. 5. 1945;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64, S. 348–351 (hier S. 349) 。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86 f.。

[39] 参见1945年5月20日柏林共产党第二届高层会议纪要;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69, S. 362; 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56 f.;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31 f.; 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52 f., 157。

[40] Walter Ulbricht an Wilhelm Pieck, 17. 5. 1945;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64, S. 349。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95。

[41] 参见Andreas Petersen: Die Moskauer. Wie das Stalintrauma die DDR prägte, Frankfurt/M. 2019, S. 29 f.; 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95 f.。

[42] Walter Ulbricht an Georgi Dimitroff, 9. 5. 1945;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51, S. 319-
321 (此处见S. 320)。

[43] Walter Ulbricht an Generaloberst Serow, 6. 5. 1945;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Dok. 47, S. 298-
301 (此处见S. 300)。

[44] 参见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S. 335-
337; Keiderling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S. 57-68;
Frank: Walter Ulbricht, S. 189-191。

[45] James P. O’ Donnell/Uwe Bahnsen: Die Katakombe. Das Ende in
der Reichskanzlei, Stuttgart 1975, S. 376 f.

[46] 参见Beevor: Berlin 1945, S. 424。

[47] Rshewskaja: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S. 47 f.

[48] 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94.

[49] 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95-98。

[50] 参见Frank: Walter Ulbricht, S. 98 f.。

[51] Rshewskaja: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S. 66 f.

[52] 参见排长Panassow中尉1945年5月54日的报告; Lew Besymenski: Der
Tod des Adolf Hitl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Moskauer Archiven,
Hamburg 1968, S. 17 f.; 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100 f.;
Eberle/Uhl (Hrsg.) : Das Buch Hitler, S. 464。

[53] 参见Völklein (Hrsg.) : Der Tod Hitlers, S. 54-56;
Eberle/Uhl (Hrsg.) : Das Buch Hitler, S. 463。

[54] 尸检调查记录收录于Besymenski: Der Tod des Adolf Hitler, S.
321-351; 相关片段亦可见 Völklein (Hrsg.) : Hitlers Tod, S. 106-131;
参见Eberle/Uhl (Hrsg.) : Das Buch Hitler, S. 131-140, 1965年10月
Faust Schkarawski写给Lew Besymenski的信。

[55] 凯特·海瑟曼后来于1956年4月27日的表态和弗里茨·埃希特曼于1954年7月10日的表态，参见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373-378; 更多内容参见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25, 139, 154; Rshewskaja: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S. 116-123, 其中错误地提到希特勒假牙X光照片在总理府被发现 (S. 123)。

[56] 参见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01-103; Rshewskaja: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S. 105-107。

[57] 参见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40-144; 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66 f.。

[58] 斯大林秘书Pawlow于1945年5月26日的记录;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60。

[59]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394; vgl. 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08.

[60]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395 f.; vgl.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61 f.

[61] 参见Eberle/Uhl (Hrsg.): Das Buch Hitler, S. 468-477;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62-175。

[62] Juri Andropow于1970年3月13日写给Leonid Breschnew的信;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92 f.。

[63] Völklein (Hrsg.): Hitlers Tod, S. 194 f.; 参见Sven Felix Kellerhoff: Warum Hitler und Eva Braun zehn Mal begraben wurden, in Die Welt v. 29. 4. 2016。

[64] Bradley F. Smith/Elena 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Köln 1981, S. 255 f.

[65] 参见Kerstin von 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Verschwörung des Schweigens": Die Akte Karl Wolff, Paderborn 2010, S. 10, 24-39。参见Biographie Jochen von Lang: Der Adjutant. Karl Wolff: Der Mann zwischen Hitler und Himmler, München-Berlin 1985。

[66] 参见Max Waibel: 1945. Kapitulation in Norditalien. Originalbericht des Vermittlers, Basel 1981, S. 27-45.

[67] 参见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S. 64-66;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127-131; Allen Dulles/Gero von Gaevernitz: Unternehmen "Sunrise".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s Kriegsendes in Italien, Düsseldorf-Wien 1967, S. 113-126.

[68]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148 f.; 参见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S. 67 f.。

[69] 参见Lang: Der Adjutant, S. 279 f.; 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S. 68 f.。

[70]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201; 参见Lang: Der Adjutant, S. 280-282; Dulles/von Gaevernitz: Unternehmen "Sunrise", S. 208-211.

[71]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75 f.; 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S. 71 f.;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676;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160-171, 183-190; Winston S. Churchill: Der Zweite Weltkrieg, Frankfurt/M. 2003, S. 1049-1052.

[72]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77 f.; Holger Afflerbach: Die Kunst der Niederlage. Eine Geschichte der Kapitulation, München 2013, S. 238 f.;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226-238.

[73] Dulles/von Gaevernitz: Unternehmen "Sunrise", S. 251.

[74] 投降书文本见KTB-OKW, Bd. IV, 2, S. 1663 f.。

[75]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78 f.; Lingen: SS und Secret Service, S. 75-77; Smith/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S. 245-255; Albert Kesselring: 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 Bonn 1953, S. 418-420.

[76] Gerhard Förster/Richard Lakowski (Hrsg.) : 1945. Das Jahr der endgültigen Niederlage der faschistischen Wehrmacht, Berlin-Ost 1975, Dok. 188, S. 364 f.

[77]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1;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88。

[78] Wilhelm Neumanns 1945年5月1日日记;
<https://www.moz.de/landkreise/oder-spreewald/frankfurt-oder/artikel9/dg/0/1/1109539/>。

[79] 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0 f.;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14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70 f.。

[80] 1945年5月2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1。

[81] KTB-OKW, Bd. IV, 2, S. 1470 (v. 2. 5. 1945)。

[82] 收录于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5 f. (此处见S. 135)。

[83] Joseph Goebbels: Das Jahr 2000, in Das Reich v. 25. 2. 1945.

[84] 参见Volker Ullrich: Eiserner Vorhang. Wie die NS-Propaganda Churchills Schlagwort prägte, in ZEIT-Geschichte H. 5 (2019), S. 33; Rainer Blasius: Politisches Schlagwort. Nicht Churchill prägte den Begriff “Eiserner Vorhan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 19. 2. 2015; 亦参见Churchill: Der Zweite Weltkrieg, S. 1079。

[85]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6.

[86] 1945年5月2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3。

[87] KTB-OKW, Bd. IV, 2, S. 1471 (v. 2. 5. 1945)。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5 f.;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1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73 f.。

[88]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3 f.。

[89] 参见Michael J. Neufeld: Wernher von Braun. Visionär des Weltraums, Ingenieur des Krieges, München 2009, S. 241 f.。

[90] 参见Michael J. Neufeld: Wernher von Braun. Visionär des Weltraums, Ingenieur des Krieges, München 2009, S. 242.。

[91] 除Neufeld: Wernher von Braun外, 还可参见传记作品Rainer Eisfeld: Mondsüchtig. Wernher von Braun und die Geburt der Raumfahrt aus dem Geist der Barbarei, Reinbek bei Hamburg 1996. Zusammenfassend Jens-Christian Wagner: Ingenieur und Blender, in ZEIT-Geschichte H. 3 (2019), S. 78 f.。

[92] 参见Eisfeld: Mondsüchtig, S. 153.。

[93]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742-776; Tom Bower: Verschwörung Paperclip. NS-Wissenschaftler im Dienst der Siegermächte, München 1987, S. 87 ff.。

[94] Eisfeld: Mondsüchtig, S. 157.。

[95] Victor Klemperer: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42-1945. Hrsg. von Walter Nowojski unter Mitarbeit von Hadwig Klemperer, Berlin 1995, S. 761 (v. 2. 5. 1945) .

[96] 参见Volker Ullrich: Victor Klemperer: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33-1945, in Markus Roth/Sascha Feuchert (Hrsg.) : Holocaust Zeugnis Literatur. 20 Werke wieder gelesen, Göttingen 2018, S. 211-222.。

[97]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42-1945, S. 724, 727 (v. April 1945) .

[98]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42-1945, S. 758 (v. 28. 4. 1945) , 761 (v. 1. 5. 1945) , 768 (v. 5. 5. 1945) .

[99] Klemperer: Tagebücher 1942–1945, S. 762 (v. 2. 5. 1945)。

[100] 更多案例参见Hermann Glaser: 1945. Ein Lesebuch, Frankfurt/M. 1995, S. 62 f.。

[101] 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1945, S. 317 (v. 28. 4. 1945)。

1945年5月3日

1945年5月3日上午，位于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邓尼茨指挥总部气氛紧张不安。前一天夜里传来消息，称英军正在加速进攻德国北部。海军元帅邓尼茨担心他们很快就会到达弗伦斯堡，并不假思索地擒住他和同事。为此，他在凌晨4点发出指示，要求“用尽一切办法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卫威廉皇帝运河这一最后防线，以确保政府的移动和行动自由”。^[1]不过警报在当天就解除了。盟军显然还没有占领弗伦斯堡这块飞地的打算，只要邓尼茨政府愿意就德军投降一事与他们谈判。

邓尼茨派遣冯·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提出整个德国北部地区部分投降的条件，接着他叫来了负责仍属于德军占领区的行政和军事指挥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国务部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和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奥尔德维希·冯·纳茨默（Oldwig von Natzmer）中将从布拉格乘飞机赶来。弗兰克是来自卡尔斯巴德（Karlsbad）的政客，是生于苏台德地区的讲德语的居民，在所谓的“捷克剩余地区（Rest-Tschechei）”被攻占后，于1939年3月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的国务秘书。他同时担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党卫队高级长官和警察局局长。在1942年5月底帝国安全局局长和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副总督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被成功刺杀后，弗兰克伙同盖世太保及党卫队对捷克人民进行疯狂报复。利迪策村（Lidice）成为恐怖的代名词：总共196名男性居民全部被枪杀，妇女被遣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KZ Ravensbrück），98

名儿童中的大多数在切尔姆诺（Chelmno）被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2\]](#)

帝国总督约瑟夫·特博文（Josef Terboven）和国防军司令弗朗茨·博姆（Franz Böhme）从挪威赶来。出生于奥地利的博姆曾在1941年担任塞尔维亚的全权指挥官，发起过众多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犹太男性以及辛提人和罗姆人（Sinti und Roma）[\[3\]](#)。[\[4\]](#)特博文早期就加入了纳粹党，二战前是埃森地区的大区领袖和莱茵省省长，在德军占领挪威后于1940年4月被任命为帝国总督。他始终掌握实权直到战争结束，而总理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只是德国占领者手中的傀儡。特博文十分热衷于对挪威的经济剥削，对待挪威人民的任何抵抗也毫不手软。[\[5\]](#)

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和格奥尔格·林德曼（Georg Lindemann）上校从哥本哈根赶来。贝斯特是来自黑森州的法学博士，1933年之后事业平步青云，后来成为继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之后党卫队以及纳粹恐怖机器的第三号人物。在与海德里希闹翻后，他于1940年在法国担任军事指挥官，之后于1942年11月担任德国在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与挪威的特博文不同，贝斯特走的是温和路线。他试图将对占领区镇压的严酷程度降到最低，力图使丹麦成为纳粹统治下理想的欧洲新秩序典范。自1943年以来，丹麦人民开始抵抗，罢工和破坏活动的数量增加，贝斯特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方针，但没有完全遵照希特勒的要求，即对德国士兵的每一次袭击都必须以残酷的“反恐”手段来反击。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位帝国全权代表主要忙于为从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拥入丹麦的数万名难民安置临时住所。[\[6\]](#)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从荷兰乘坐快艇抵达，因为与德国北部的陆路交通已经中断。这位高中教师的儿子和法律专家曾在1938年3月与奥地利的“合并”中发挥了推动作用。在他1939年10月起担任“东马

克”地区帝国代理人以及波兰占领区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副手期间，也就是1940年5月他被希特勒任命为荷兰占领区帝国总督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进一步迫害行动。他是一个高效的幕后主使者，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一切抵抗，确保荷兰的犹太人被顺利驱逐到集中营，并命令将数十万男女派往德国从事强制劳动。希特勒在遗嘱中任命其为外交部部长的的事实表明，此人肆无忌惮的执政方式完全符合独裁者的意图。[\[7\]](#)

5月3日的会谈是根据所谈论的区域分开举行的，除邓尼茨外，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魏格纳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人凯特尔和约德尔出席了会议，施佩尔和希姆莱也参与了个别会议。上午9点30分，首先被提上议程的是“波希米亚问题”。国务部长法兰克报告称，这个帝国保护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夕”。长期来看，“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能保住”。为了平息局势，应该宣布布拉格为“开放城市”。法兰克还建议与捷克的资产阶级圈子建立联系，这些人更希望看到自己的祖国被美国人解放，而不是苏联人。应当试着与他们一起，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议接受中央集团军群投降，请求他占领这个国家。邓尼茨和科洛希克都不相信该行动能成功，因为他们认为盟国早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达成了一致。不过他们还是委派法兰克勘察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派遣德国和捷克代表去见艾森豪威尔。

另一个问题，即邓尼茨政府是否该逃往保护国，从而避免被英国人抓捕，让上一个问题的争论气氛缓和了些。凯特尔、约德尔和希姆莱表示赞同，冯·纳茨默中将也保证中央陆军还能再防守两周。但是，邓尼茨拒绝了，因为他不能在国外统治这个国家，而且波希米亚的政治状况非常不稳定。[\[8\]](#)

上午11点开始讨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情况。特博文表示挪威目前的政治局势是“有利的”，因为“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从“德国即将到来的溃败和即将结束的战争”中顺利脱身。关于丹麦，贝斯特的论调也是一样。在丹麦虽然“有激烈的争取自由运动”，但不会发生起义。就军事局势而言，两位武装部队指挥官博姆和林德曼都很乐观。他们表示，部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没有动摇。据说林德曼甚至叫嚣道：“海军元帅先生，请您来北石勒苏益格，我们将封锁关卡，在那里打上最后一场光荣的战役。”但是，科洛希克和贝斯特都反对在最后一战中寻求“英雄的毁灭”。贝斯特认为，这将激起丹麦抵抗军的大规模起义运动，许多德国难民将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去。邓尼茨对这两个被占领区的指令如下：“保持平静与秩序，因为内部动荡只会给我们带来不利。要表现得强大而充满活力，但要准备在个别情况下作出让步。”^[9]

下午3点30分，“荷兰问题”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赛斯-英夸特在4月就开始与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接触，寻求食品供应以改善荷兰人民灾难性的饥饿问题。^[10]他报告称谈判“进展令人满意”，“因为各方都希望一个有秩序的过渡”。然而，这位帝国总督对能否局部投降持怀疑态度，因为盟国互相之间必须要求德国全面投降的承诺看起来依然有约束力。尽管如此，他们仍将继续试探。邓尼茨指示赛斯-英夸特在停战协议缔结前仍履行“战斗任务”，但不要炸毁堤坝，以免破坏和淹没整个地区。“体面的过渡将是我们的小小筹码。”^[11]但赛斯-英夸特无法再执行此命令了，由于天气恶劣，他的船无法离开港口。在试图通过陆路前往荷兰时，他于5月7日在汉堡被英国军警逮捕。^[12]

5月3日晚，在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海军学校还发生了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尽管它无疾而终。希姆莱令人惊讶地伙同帝国国外保安局局长、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向邓尼茨

建议，让德国在挪威占领区的部队向瑞典政府投降。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做盟军的俘虏，而是逃往瑞典，在那里被关押拘留。事实上，施伦堡已经和瑞典政客有过接触。但邓尼茨对该行动的意义表示怀疑：

“在完全无能为力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企图‘绕过’盟国，让德国在挪威占领区的军队不是向他们，而是向一个中立国家投降！”不过，在科洛希克的建议下，他同意施伦堡继续对瑞典进行试探，但不授予他谈判缔结权。施伦堡的任务没有结果，因为事态发展很快就超出了计划。[\[13\]](#)

同样在5月3日，弗伦斯堡电台播出了阿尔伯特·施佩尔的讲话，讲话的重要内容早在他4月21日访问汉堡大区领袖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时就被记录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希特勒死后的一种安慰剂。施佩尔在回忆录中说，他讲话的目的是使德国人民从麻木中走出来，鼓励他们全力以赴地将重建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他所说的话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个意图。讲话一开始就散发的具有民族和国家主义倾向的基调丝毫不逊色于邓尼茨和科洛希克在5月1日和2日的讲话：“从未有一个文化民族受到如此重创，从未有国家像我们这样遭受如此大的战争破坏和损失，也从未有一个民族具有如此巨大的毅力、韧性和信念来忍受战争的苦难。”这些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被载入正义的历史而受人景仰”。

施佩尔也从未对德国人带给欧洲人民的深重苦难表示遗憾。对此他应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肆无忌惮地消耗资源来扩大武器生产，从而延长了战争。他反而呼吁盟国宽容以待，不要阻碍德国人的重建意志：“现在全都要看对手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给予德国人民与其作为虽然被击败但是英勇战斗的敌人相匹配的荣誉和机会，这样他们也能以仁慈和高尚的形象被载入史册。”最后，施佩尔以他曾经敬佩的“元首”风格呼唤“天意”降临，希望德国人命运能够好转。[\[14\]](#)

他的讲话在盟军听来，仿佛从前的那个纳粹恶魔仍然存活在邓尼茨政府中。

*

5月3日，汉堡的战役结束了。电台整天都在广播有关英军即将和平进驻的消息。大幅海报通知人们，从下午1点开始全面禁止外出活动，仅电力、天然气和自来水厂员工除外。^[15]下午，这座汉萨同盟城市陷入一片死寂。所有的交通都停了，商店全部关闭。除了驻守在十字路口和桥梁上的汉堡警察，街道空无一人。

直到1945年4月中旬，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座城市将不战而降。相反，自1944年秋天起，这里开始搭建内外防御圈。人们挖建战壕，并用石头和铁梁搭建防坦克屏障。1945年2月19日，在没有通暖气的汉堡市政厅宴会厅内，面对党内高官、经济领袖和政府要员，大区领袖卡尔·考夫曼宣布，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汉堡将成为“要塞（Festung）”，必须抵抗到最后一刻。^[16]

考夫曼是这座汉萨同盟城市最有权势的人。这位克雷费尔德（Krefeld）洗衣店老板的儿子出生于1900年，是纳粹党中老一批近卫军成员。1929年5月，希特勒任命这个当时年仅28岁的莱茵兰人为“红色”汉堡的大区领袖。1933年，他晋升为帝国总督（Reichsstatthalter），负责在汉堡市执行严格的纳粹政策。与他相比，由纳粹任命的市长卡尔·文森特·克罗格曼（Carl Vincent Krogmann）仅作为资产阶级的门面发挥有限的作用。1936年，考夫曼被正式任命为州政府首脑，自战争开始以来还担任帝国国防专员一职。^[17]一方面，这位坚定的纳粹党人到了战争最后几个月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会忠实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也非常现实地意识到把汉堡作为“要塞”抗争到最后将导致这座城市的彻底覆灭。到1945年春天，这座易北河上的大都市已经遭受了200多次空袭，其中最

严重的要数1943年7月25日至8月3日，英美轰炸机将汉堡大片地区夷为废墟。据保守估计，有34000人在“火攻”中丧生。数以万计的人逃离了这座城市。^[18]1945年初，仍有约100万人居住在汉堡，其中许多人住在地下室或紧急避难所。尽管官方呼吁坚持到底，但社会上的情绪已经达到了冰点。“现在，汤米^[19]快来做个了结吧，以便我们能够再次过上有理有序的生活”，这样的言论四处可以听到，无论是哪个阶级。^[20]

在上述背景下，考夫曼开始想办法不让汉堡陷入军事上毫无意义的“最后战斗”。此外，他肯定还有如下的考量：鉴于纳粹统治即将结束，他可以把自己打造成汉堡市的“拯救者”，以这种方式减少他在过去十二年里的负面影响。首先，他获得了艾尔温·沃尔茨（Alwin Wolz）少将的支持，也是在他的推动下沃尔茨于4月2日被任命为该市作战指挥官。一天后，这位汉堡大区领袖同西北陆军总司令恩斯特·布施一同前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最后一次与希特勒会面。关于他们之间的谈话的情况，只有一份考夫曼的事后记录可供参考，鲍曼、凯特尔、约德尔、邓尼茨和希姆莱也在场。如果他的记录属实，那么当时谈话的气氛应该降到了冰点。当布施问到西北陆军是否可以获得更多防御支持时，希特勒非常粗暴地拒绝了。所有的储备力量都必须用于温克新组建的军队，它将在决定性的柏林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考夫曼接着表示，鉴于当前战争局势，他不认为汉堡应该防御。这个城市仍然有68万妇女和儿童。要疏散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从东部拥入的难民已经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负担沉重。这份记录最后提到，希特勒“严厉地”拒绝了他的反对意见，并坚持要求无条件执行他的“设防令”。^[21]考夫曼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公然地反对过这位独裁者，还有待商榷。但是，很可能这次与“元首”的会面，让他意识到“元首”已经看不清现实了，从而坚定了他不加抵抗地将汉堡交给英国的决心。

4月20日，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生日当天，蒙哥马利的第7装甲师在刘易斯·莱恩（Lewis O. Lyne）少将的带领下挺进汉堡的南部郊区。

“现在我们正面临最后的灾难（……）”，英语语言文学家埃米尔·沃尔夫（Emil Wolff）的妻子玛蒂尔达·沃尔夫-门克伯格（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给孩子们写信道：“你们根本无法想象最近这几天！灾祸在不断逼近，到处持续弥漫着紧张和骚动的气息，成百上千的谣言满天飞，只能守在广播旁不错过任何一条新消息，预警和警报从早到晚不断交替出现（……）。”^[22]

英国炮兵从汉堡的前沿阵地哈尔堡区（Harburg）开始进行炮击。凤凰工厂也遭到炮击，这里自1944年底以来搭建了一家野战医院。工厂负责人阿尔伯特·舍费尔（Albert Schäfer）和医生赫尔曼·布尔夏德（Hermann Burchard）教授决定前往英国军营要求停火。作战指挥官沃尔茨批准了这一行动，并给他们二人配备了参谋部的奥托·冯·劳恩（Otto von Laun）少尉作为翻译陪同，他是著名国际律师鲁道夫·冯·劳恩（Rudolf von Laun）的儿子。4月29日晚，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他们得到了第7装甲师情报官托马斯·马丁·林赛

（Thomas Martin Lindsay）上尉的接待。他答应保护哈尔堡的医院，但提出交换条件：其中一位谈判者要将装甲师指挥官莱恩少将的信转交给汉堡的作战指挥官，莱恩在信中“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要求汉堡投降，并要求对方派出一位军官作为全权代表。^[23]

4月30日中午，沃尔茨收到了要求投降的信。他立即与大区领袖考夫曼商谈。双方都同意没有更多时间可以浪费了。在给邓尼茨的电报中，考夫曼表明了要把汉堡拱手交给英国人的意图，但遭到了海军上将的断然拒绝：必须以坚定的姿态对抗西方、捍卫易北河要塞，汉堡市可以在“关系到我们人民的命运之战”中作出“最大的贡献”。

^[24]但是考夫曼和沃尔茨决心独立采取行动。5月1日晚，两名来自沃尔茨指挥部的谈判代表彼得·安德拉（Peter Andrae）少校和格哈德

• 林克（Gerhard Link）上尉驱车前往第7装甲师总部，并将作战指挥官的信交给莱恩少将，信中同意“讨论移交汉堡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25]莱恩设定了24小时的期限，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5月2日晚，两名代表返回后将谈判结果告知了沃尔茨。他随后命令撤出驻守在汉堡南部的陆军和党卫队武装部队。

汉堡市民对城市的命运仍然忐忑不安。不过5月2日下午，一份《汉堡日报》（*Hamburger Zeitung*）特刊被张贴在鹅市广场（Gänsemarkt）的商店橱窗中，内容是考夫曼致汉堡市民的号召，里面宣布汉堡市即将投降：“那些不愿辜负荣誉的士兵可以到本市以外继续战斗。但是在清楚了解现状后，本着对汉堡市负责的想法，我的内心和良知要求我必须保护本市的妇女和儿童免遭无意义的和不负责的毁灭。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有信心将这一决定的评判权交给历史和你们。”^[26]这份号召原本应该直到第二天英军进驻前一刻才公布。现已无法查证是谁提前发布的。这一消息很快在这座汉萨之城传播开来。一位汉堡市民记录道：“鹅市广场（……）充满了愉悦的气氛。人们互相拥抱，许多人哭了出来。”^[27]

邓尼茨海军上将最初对考夫曼的自作主张表示抗议。但是，当蒙哥马利的军队突破易北河阵地向吕贝克进军后，他也不得不在5月2日下午承认汉堡的抵抗毫无意义，并同意了不战而降。当天晚上，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凯特尔和西北陆军总司令布施也发出了相应的命令。^[28]

也是在当晚，卡尔·考夫曼在面向民众的广播讲话中宣布汉堡为“开放城市”：“敌人明天占领汉堡之时，将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要求你们在这一刻保有尊严和纪律。”考夫曼在负责汉堡行政工作方面的副手——国务秘书格奥尔格·阿伦斯（Georg Ahrens）因为在无数个轰炸夜晚用广播传递沉稳的声音，被汉堡市民称呼为“颧

草叔叔（Onkel Baldrian）”^[29]。在广播的结束语中，他依然用他独具一格的声音说道：“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的大区领袖对汉堡市民的决定命运的讲话。”^[30]

玛蒂尔达·沃尔夫-门克伯格写道：“考夫曼的讲话十分激动、真诚、简单和礼貌，就像他一直以来对待汉堡市民那样。”^[31]考夫曼把自己塑造成负责任的政治家形象，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城市变得更好，这一策略似乎奏效了。在战后流传着从希特勒的追随者转变为其疯狂毁灭计划的反叛者的“良心大区领袖传奇”，同时也为另一个传说奠定了基础：汉堡是独裁统治时期野蛮纳粹党人中的“相对理性之岛”。^[32]

5月2日晚9点刚过，指挥官沃尔茨在安德拉少校、林克上尉和前市长威廉·布尔夏德-莫茨（Wilhelm Burchard-Motz）的陪同下出发前往前线。英军第131步兵旅指挥官约翰·M. K. 斯普林（John M. K. Spurling）护送这些密使前往莱恩少将的指挥所。当被询问是否获得无条件投降的授权时，沃尔茨表示肯定，并允诺将颁布5月3日禁止外出的命令，以及清除在通往汉堡的道路上和易北河大桥上埋下的地雷和炸弹。但是，投降书直到5月3日中午时分才在位于吕讷堡附近黑克林根（Häcklingen bei Lüneburg）的英国陆军第二集团军总部正式签署。由弗里德堡将军领导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谈判代表团从弗伦斯堡赶来，在沃尔茨的陪同下前往签署地点。之后沃尔茨才回到汉堡，恰好赶在了英国人占领城市之前。^[33]

英军于下午4点后不久进驻汉堡。第7装甲师的士兵分成三队穿过易北河大桥，并于下午6点前到达市政厅广场。6点25分，沃尔茨和布尔夏德-莫茨在市政厅大门前与斯普林旅长及参谋部的其他军官会面，并将汉堡市移交英军。然后，他们陪同英国军官进入皇帝大厅，考夫曼大区领袖和克罗格曼市长在那里接待了他们。^[34]

直到第二天，大多数汉堡市民才注意到新主人的出现。玛蒂尔达·沃尔夫-门克伯格在几乎没有受到损坏的温特胡德（Winterhude）别墅区中观察到，“突然间英国士兵簇拥而来，像蚂蚁一样在街道穿行”，“接着出现了大量的汽车、装甲车、坦克和摩托车，他们很快在这里安家，四处都竖立起巨大的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军队邮局、裁缝、撤离中心（Leave Center）等。很多好奇的人整天站在阳台观察下面发生的事情。我们正忙着将差不多6年里我们在地下室里积攒的所有东西拿出来”。[\[35\]](#)

已经到了5月4日晚7点，汉堡广播电台在罗滕鲍姆大道（Rothenbaumchaussee）完好无损的广播站用英德双语播报，成为全德第一个恢复广播的电台：“这里是汉堡广播，盟军政府的电台。”[\[36\]](#)



1945年5月3日汉堡市政厅前：作战指挥官艾尔温·沃尔茨将汉堡市交给英军的斯普林旅长（系白色腰带）。（bpk-Bildagentur, Berlin）

同样是5月4日，佐丹诺（Giordano）一家从他们位于汉堡阿尔斯特多夫区（Alsterdorf）的地下室爬了出来，他们在那里躲藏了近三个月。1945年2月初，犹太出身的母亲莉莉与一名意大利音乐家“异族通婚”，当局要求她前往格林德霍夫（Grindelhof）的原塔木德-妥拉学校（Talmud-Tora-Schule）所在地，她将从那里被驱逐、带走。她的一个儿子，出生于1923年的拉尔夫·佐丹诺（Ralph Giordano）在《一名幸存者的回忆》（*Erinnerungen eines Davongekommenen*）一书中描述了解放的时刻：“当我走近母亲时，我看到了躲藏在昏暗隐秘处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她的头发变白了，黑色的光彩只停留在几缕发丝上。但是，当我在蓝天下看到埃贡（兄弟）时，我才哭了出来——他的棕色头发也有部分变成了银色。”[\[37\]](#)。

在佐丹诺一家重见自由之光的那天，英国人逮捕了大区领袖考夫曼。他一直被拘留到1948年10月，之后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这位希特勒在汉堡的代理人曾无情地压迫政治反对派，并对成千上万汉堡犹太人的驱逐负有责任，但却从未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上。1950年代末，他以高层经理的身份加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并成为一家化工厂合伙人。直到1969年12月去世时，他在这座汉萨同盟城市始终是一名富有的、受到很多人尊重的市民。[\[38\]](#)。

*

当沃尔茨少将在吕讷堡附近的黑克林根签署汉堡市投降书时，吕贝克湾正发生着二战期间最严重的船难之一，上千名集中营囚犯在战争的最后一刻丧生。这场悲剧的主角名字叫“开普艾柯纳号（Cap Arcona）”。这艘由汉堡—南美蒸汽轮船公司生产的旗舰于1927年在汉堡的布洛姆福斯造船厂（Blohm & Voss）启用，战前曾用作豪华游轮行驶于汉堡和里约热内卢之间，1940年作为德国海军的住宅船停靠到了哥腾哈芬（现称格丁尼亚港，Gdynia）。1945年春，这艘快船与

其他众多船只一样被用来运送德国东部难民和受伤的士兵前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丹麦。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开普艾柯纳号”引擎发生了故障。自4月14日起，它就一直抛锚停靠在诺伊施塔特市（Neustadt）附近的吕贝克湾。[\[39\]](#)

1945年4月中旬，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对尚未解放的集中营的指挥官下令，不要让任何囚犯活着落到敌人手中，要及时地清理集中营。[\[40\]](#)自1940年以来，在汉堡-诺因加默区（Neuengamme）的某个砖厂原址上建成了一座大型集中营，并与广布的附属营连接成网络。4月20日开始对这个中心营地进行清理。汉堡大区领袖卡尔·考夫曼和北海党卫队及警察头目格奥尔格·海宁·冯·巴斯维茨-贝尔伯爵（Georg-Henning Graf von Bassewitz-Behr）负责此事。他们这么做同时也是为了确保逼近的英军不会目睹他们在汉堡附近犯下的罪行。由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容纳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囚犯，考夫曼建议将他们安置在船上。作为负责航运的帝国代理人，他从吕贝克湾征用了三艘船：除“开普艾柯纳号”外，还有“蒂尔贝克号（Thielbek）”和“雅典号（Athen）”货船。[\[41\]](#)

从4月21日至26日，共有9000多名囚犯乘货车、卡车甚至步行被带往吕贝克。他们在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诺因加默集中营管理人克里斯托弗·格里希（Christoph Gehrig）的指挥下被押到船上。我们不确定党卫队的意图。他们是想通过船只自行下沉还是由英军飞机击沉来处理这些囚犯？[\[42\]](#)抑或是希姆莱想把它当作与西方单独和平谈判的筹码？还是说党卫队领导人在这几天的混乱中尚未就“游动中的集中营”的命运作出决定？

“开普艾柯纳号”船长海因里希·贝尔特拉姆（Heinrich Bertram）最初拒绝接受囚犯上船。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格里希威胁说要在现场射杀他，于是他屈服了。[\[43\]](#)4月28日，“开普艾柯纳号”

上已经有6500名囚犯。船上的恶劣状况无法描述。幸存者之一鲁迪·古格尔（Rudi Goguel）回忆说“几乎没有食物和水”。“到处都是奄奄一息的囚犯。尸体开始堆积在甲板上，每天有三十人至五十人死亡。到最后，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病人的处境尤其糟糕：他们被关在船舱中，没有药或绷带，几乎得不到像样的救助。没有人清理积压的粪便，整艘船都散发着一股恶臭。”^[44]由于“开普艾柯纳号”拥挤不堪，党卫队命令将2000名囚犯押到“雅典号”上。5月2日，“蒂尔贝克号”被牵引到吕贝克湾并停靠在“开普艾柯纳号”附近，共收容了2800名囚犯。

基尔湾和吕贝克湾集中的船只没有逃过盟军的空中侦察。英军领导人担心邓尼茨政府与剩余部队会迁往挪威并在那里继续战斗。因此，英军决定消灭德国舰队的残余势力。瑞士红十字会关于这些船只上有上千名集中营囚犯的消息没有及时传递出去。^[45]

5月3日下午2点30分左右，英国战斗轰炸机袭击了“开普艾柯纳号”和“蒂尔贝克号”。两艘船都遭受多次袭击并迅速起火。船上的场景令人恐惧。演员、共产主义者埃尔温·格绍内克（Erwin Geschonneck）自1933年以来被关押在多个集中营，最后一次就在诺因加默。他后来在民主德国加入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并饰演过众多电影角色。他亲身经历了“开普艾柯纳号”被袭击的瞬间：“一声轰隆巨响，然后爆炸物四散。几枚炸弹落在船体中部。我冲到通道，那里弥漫着烟雾，受伤的人尖叫着，不安的囚犯跑上楼梯，惊慌失措。大家从四面八方拥上楼梯，近乎疯狂的人们因为害怕而都想挤到上层甲板。有些人被撞倒在地，被后面的人踩踏。掩体区都是苏联人，他们没法再上去了。下面病患区的600名患者也被阻隔开来。”^[46]

“蒂尔贝克号”在几分钟内就沉没了，“开普艾柯纳号”则是逐渐被烧毁并侧翻。囚犯们几乎没有活下来的机会。少数完好的救生艇

都被船上的党卫队、海军士兵和船员占用了。救生圈也只提供给船员。大约有6600名囚犯被烧死，或者在尝试游到岸边的过程中死去——要么在寒冷的波罗的海淹死，要么被枪杀。只有大约450人得以从地狱中逃脱出来，其中包括埃尔温·格绍内克，他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他往回游向了“开普艾柯纳号”的残骸，并与其他一些囚犯一起耐心等待着海岸落入英国人之手，然后被摩托艇运回诺伊施塔特。[\[47\]](#)几周后，尸体才被冲到吕贝克湾的海滩上。

*

“我们开始慢慢地以幽默的态度接受被凌辱的事实，一种绞刑架上的幽默。”当5月3日，一位30岁出头的柏林女性在日记里写下这一观察时，“进行凌辱”——苏联红军入侵后对妇女实施的大规模强奸——的事态已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这位女性也遭到多次强奸，她把无法说出的话说了出来：“凌辱是什么？当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单词时（……），我感到脊椎发冷。现在我已经可以思考它了，甚至用冰冷的手写下来，我对着自己说话，以便习惯这声音。它听起来像是最后和最外在的声音，但事实并非如此。”[\[48\]](#)

《一个在柏林的女人》（*Eine Frau in Berlin*）这本日记的情况非常特别。1945年4月20日至6月22日，日记的主人抽空记录下了她当时所经历的炸弹袭击、强奸和食物短缺的情形。1945年7月，她开始将三本手写稿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后来，她把121页密密麻麻的手稿转交给了她的一位作家朋友库尔特·W. 马雷克（Kurt W. Marek），后者因1949年用笔名C. W. 策拉姆（C. W. Ceram）出版的考古学畅销书《神祇、陵墓与学者》（*Götter, Gräber und Gelehrte*）而广为人知。马雷克说服她出版这本日记。但是，出于可理解的原因，她坚持要求保持匿名。《一个在柏林的女人》于1954年首次在美国出版，随后的德文版在1959年由日内瓦的一家小型出版社发行。尽管该书在美国和英国大

受好评，它却在德国读者中遇冷。显然，公开谈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多年以来这都是人们不想触碰的禁忌。[\[49\]](#)

情况在2003年春天发生了改变，当时爱希博恩出版社（Eichborn Verlag）推出了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出版的“不一样的图书馆”系列，其中就有《一个在柏林的女人》新版本。该书成为当季最成功的畅销书之一，并获得评论家一致称赞，认为这是对苏联占领期间德国妇女遭受暴力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导演马克斯·法贝尔布克（Max Färberböck）于2008年将这本书搬上了银幕，由妮娜·霍斯（Nina Hoss）担任主角。

《南德意志报》编辑延斯·比斯基（Jens Bisky）在2003年9月的揭露结束了公众对作者身份的持续猜测，当时她已去世两年。这位“匿名作家”叫玛塔·希勒斯（Marta Hillers），于1911年出生在克雷菲尔德。她在1925年到1930年上中学，之后多次出国旅行，目的地包括苏联。在此过程中，她学会了一点俄语，这使她在柏林被占领期间受益。从1934年夏天开始，她作为自由记者为《柏林本地指南》（*Berliner Lokalanzeiger*）和其他报纸杂志供稿。自1941年4月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她一直活跃在纳粹教师协会主办的学生杂志《一起帮忙！》（*Hilf-mit!*），主要负责指导“讲故事比赛”，并为《德国教育者》（*Der Deutsche Erzieher*）杂志撰写文章。她显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纳粹主义者，但她充当了纳粹国家的“小小宣传家”，鼓舞德国年轻人为战争服务。[\[50\]](#)在日记中，她更多地掩饰了这个角色，比如当她这样问自己：“我自己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无论如何，我都处在其中，呼吸着包围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空气，即使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51\]](#)

随着“匿名作家”身份的暴露，突然有人怀疑这本书是否真的如出版商所称，是真实的时代记录。作者在誊抄原始笔记时，是否对文

本进行了超乎想象的润色？她，或者为第一版撰写后记的库尔特·马雷克，是否在发表之前重新编辑了文字？这些问题当时引起了热烈讨论，但最终由于马雷克的夫人作为遗产管理人拒绝公开原稿而不了了之。[\[52\]](#)

最后，爱希博恩出版社委托作家瓦尔特·肯博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进行调查。作为一名勤奋的日记收集者和出版人，他似乎很适合完成这项任务。他在2004年1月的鉴定报告中证实，玛塔·希勒斯的原始日记以及1945年夏天完成的誊清稿都是真实的。但是，肯博夫斯基并没有回答关键问题：原始文本究竟经过了哪些加工？日记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53\]](#)

肯博夫斯基留下的空缺被历史学家尤利娅·冯·萨尔（Yuliya von Saal）2019年发表在《当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n für Zeitgeschichte*）的一篇论文所填补。判断的依据是玛塔·希勒斯的个人遗物——马雷克夫妇的儿子在2016年将其捐献给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结果是：玛塔·希勒斯非常仔细地将她的手写笔记转录为打字稿。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小，通常只是在修辞上进行了细微调整。与之相比，作者在1950年代出版的图书版本则比原稿丰富了近一倍。此外，作者本人对原始日记进行了大幅的文学改编和补充：人物全部匿名化，想法、观察和感受被重新表述，经历被重新诠释，故事场景加入了大量虚构的戏剧元素。此外，所有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亲纳粹态度的段落均被删除。因此，这本书不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而是日记形式的报告文学。[\[54\]](#)尽管如此，《一个在柏林的女人》仍然是重要的历史见证，因为它关于强奸的核心内容与原手稿是一致的。[\[55\]](#)

随着1945年4月27日苏联士兵的出现，作者体会到不受保护的滋味。她以一种相当简洁且冷峻的口吻描述她的遭遇：“麻木。不是恶心，只是冷。脊椎冻结了，后脑勺一阵冰冷的晕眩。我感到自己深深

地滑落下去，经过了枕头和地板。跌落在地面上——就是这样。”
[56]在经过几次强奸后，她得出结论：“让一只狼过来，从而把其他狼从我身边赶走。越高级的军官越好。司令、将军都行。我的才智和一点点外语知识有什么用呢？” [57]有一名少校阻止了其他士兵强奸玛塔·希勒斯，还给她提供食物。强奸和卖淫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能说少校强奸了我。我相信，只要我说一句冰冷的话，他就再也不会来了。因此，我自愿为他服务。” [58]

作者对占领者的看法并没有摆脱刻板印象。但她避免对“苏联人”整体进行评判。在描写实施抢劫和强奸的士兵群像之外，也出现了个人的名字和故事——佩特卡、阿纳托尔和安德烈。“我和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我将最恶心的人和可以忍受的人区分开，对这群人进行分类，形成对他们的印象。” [59]

德国男人的帮助是指望不上的。他们大多数胆小怕事，躲在女性身后。“一种集体的失望感正在女性中间悄然形成。由男性统治、称颂男性力量的纳粹世界摇摇欲坠，同样幻灭的还有‘男人’的神话。” [60]一位在排队打水的妇女讲述了一名苏联士兵拉拽她时，她的邻居对她喊的话：“‘您赶快跟着去吧，您妨害了我们所有人！’这就是西方走向衰亡的小小注脚。” [61]当她给1945年6月底从前线回来的男朋友看她的记录时，他的反应是不理解，并默默地离开了她。他的做法预示了1950年代的整体氛围——对女性所遭受的无力感以及暴力的集体沉默。

*

玛塔·希勒斯的记录是她寻求内心安定、自我确证的一种途径。这些文字帮助她应对自我认知的冲击。同时她也明白，她描绘了反映集体命运的个人苦难，这正是她的日记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和战后的最初日子里，柏林数以万计的妇女成为性侵犯的

受害者。记者埃里希·库比（Erich Kuby）在《1945年在柏林的苏联人》（*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一书中估计，大柏林地区百分之八十的强奸发生在4月24日至5月3日。^[62]尽管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帅曾告诫部队要保持纪律并集中精力执行军事任务，但占领柏林期间还是发生了肆无忌惮的性暴力行为。^[63]在战斗仍在进行的同时，红军士兵闯入地窖和公寓强奸妇女，而且常常是轮奸，并且当着丈夫、孩子和邻居的面，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儿童都未能幸免。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在5月6日写道：“我们的胜利者军队纵情而贪婪地冲向了柏林妇女（……）。男人们说：‘他们侵犯了我们的女儿，强奸了我们的女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对话。”^[64]

苏联士兵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在柏林之战中遭受的巨大损失进一步刺激了报仇的决心。当他们看到许多德国人尽管饱受战争之苦，却仍享受着繁荣的日子的时候，也产生了仇恨和愤怒。“为什么这些日子过得这么好的人要向我们进攻？”一些苏联士兵问道。

1945年4月底，一名苏联军官被安顿在柏林附近扬斯菲尔德（Jahnsfelde）的一名铁路工人的公寓时感到惊讶：“储藏间里装满了自熏火腿、水果罐头和草莓酱。我们越深入德国，就越为到处可见的富足而恼怒（……）。我很乐意把拳头打到这些码得整整齐齐的瓶瓶罐罐上。”^[65]

这些暴力行为常常受到酒精的催化。埃里希·库比认为：“红军士兵为胜利而陶醉，为西方文明而陶醉，事实上，他们也喝醉了。（……）醉酒与暴力行为之间通常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失控状态下，（在多年没有假期、没有女人之后）苏联士兵做了他们贪求的事情，但他们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苏联的荣光，也不是为了羞辱德国。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做了这件事。”^[66]

通过占有他们的女人来羞辱战败者也是诱因之一；还有德国人持久的优越感，即使被打败也有不少德国人在占领者面前仍然如此表现。在过去十多年里，政府的反苏宣传塑造了一种原始的“亚洲低等人”的种族主义形象，其影响仍在持续。

不过，苏联士兵绝不是全都在欺凌柏林妇女。除了关于大规模暴力的报道，还有很多他们慷慨大方以及乐于助人的事迹在流传。希特勒青年团的洛塔尔·罗伊威在被捕后，收到了一位较年长的苏联士兵的炊具，里面装满了牛肉汤，还有一个汤匙：“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苏联人。这次相遇、这种具有人情味的举动使我永生难忘。”^[67]尤其在孩子面前，红军士兵经常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由于（……）宣传，我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当一名苏联警官出现在我们的庭院，请求我们保持理性并且这样做什么都不会发生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柏林普伦茨劳贝格的一名女士几个月后回忆道。“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给他们糖和巧克力（……）之后，我们的孩子还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不少食物和点心。”^[68]

另一方面，认为柏林妇女完全束手就擒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她们想出了一系列计策来避免被强奸或再次被强奸。因此她们整天藏在阁楼里，穿上脏衣服，用烟灰把脸涂黑，假装有传染病，或者像玛塔·希勒斯那样找个苏联庇护者。女人们尝试用轻率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抗这一可怕的经历。在拜访朋友或在商店前排队时，她们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的方式来讨论这个话题。^[69]聊天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多久一次？”玛格丽特·博韦里没有遭到强奸，但从她的朋友们那里得知了她们的遭遇。她在5月6日写道：“人们现在说的话太奇怪了。就算是纯洁无辜的埃尔斯贝斯，尽管她有丈夫和两个成年儿子，她也暂时放下了一部分矜持。当然有很多可笑的地方。”^[70]

尽管强奸在大柏林地区尤其频繁，但苏占区的许多城镇也没有幸免。总共有多少女性沦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已无法查证。据估计，这一数字可高达200万。^[71]虽然苏联当局采取了更严厉的举措来管控士兵并惩处肇事者，但强奸还是没有停止。最后，军政府从1947年开始命令军队驻扎在营地，并远离德国居民，以期解决这一问题。^[72]对德国共产党和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缩写为SED）领导层来说，战争结束时的大规模强奸一直是一种负担。害怕苏联人的日子已深深地嵌入集体记忆，使共产党推行的路线很难获得支持。“三年之后，仍是这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73]在1948年10月的“工作日志”中写道，“工人们害怕得颤抖，处处能感受到由柏林被占领后的抢劫和强奸所引起的恐慌。在工人区，人们曾极为喜悦地等待着解放者，他们伸出了双臂，但迎来的却是暴力，上至七十岁、下到十二岁的人都不能幸免，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的（……）。”^[74]而且，德国共产党或者统一社会党当权者无法在不冒犯占领军的前提下公开触及这个话题。在整个民主德国的历史中，这仍然是一个不可触碰的禁忌。^[75]

强奸不局限于红军占领地区。盟军士兵进驻时也犯下了强奸妇女的暴行，而且人数远远超过长期以来的设想。^[76]法国一摩洛哥部队尤其血腥暴力，在占领初期，他们强奸了许多妇女，特别是在斯图加特地区。^[77]而美国和英国士兵也并非传闻中那样总是表现得很正派和守纪律。但是，从规模上看，西部地区的暴行远不及苏占区。其原因在于，美国人和英国人之前在德占区没有遭受德国人的恐怖对待，他们的战争伤亡也远少于苏联。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和英国士兵常常不需要使用武力。他们靠钱、香烟和巧克力就能吸引不少德国女性自愿献身。^[78]尽管最初明令禁止他们往来，但一些美国兵和德国“小姐（Fräuleins）”之间迅速发展出固定的性关系，很多后来还结了婚。

*

5月3日上午，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团抵达位于吕讷堡附近黑克林根的迈尔斯·C. 邓普西（Miles C. Dempsey）将军的军营。代表团成员包括海军大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艾博哈德·金泽尔（Eberhard Kinzel）将军、海军少将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和约兴·弗里德（Jochen Friedel）少将。他们从那里被带到附近的提梅罗山（Timeloberg），那里驻扎着蒙哥马利元帅下令兴建的帐篷村，他的露营车成了它的中心。这位英国陆军总司令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见面时的场景：“他们被带到我的露营车旁，正好站在了英国国旗下，旗帜骄傲地随风飘扬。我先让他们等了几分钟，然后走出露营车，向他们走去。他们都站在国旗下，所有人把手举在帽子旁敬礼。那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德国人来投降了——战争结束了。”
[79]蒙哥马利没有提到，在他出现之前，就已经用一根木棍标记出德国谈判代表站立的确切位置——这一隐晦的做法让德国人感到“失去尊严”。[80]

首先，冯·弗里德堡宣读了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凯特尔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包括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在内的德国西北部武装部队投降的决议。蒙哥马利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他不能接受投降的部队仍在与红军作战。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必须向苏维埃高级司令部投降。不过他缓和了一下，表示不会将个别高举双手前往英军战线投降的东线德国士兵赶走。冯·弗里德堡提出反对意见，他担心没有德国士兵会自愿被苏联人俘虏，因为他们害怕被送往西伯利亚进行强迫劳动。蒙哥马利冷言以对：“德国人在挑起战争前就应该考虑到这些，特别是在1941年6月袭击苏联人之前。” [81]

蒙哥马利还拒绝就梅克伦堡地区的难民命运进行谈判，因为在维斯马与德米兹（Dömitz）之间的前线以东的地区不再属于他的管辖范

围，所有相关问题必须与苏联当局讨论。谈判似乎走到了死胡同，接着蒙哥马利向德方提出条件：“你们是否准备好将所有的德军交给我在西部和北部两翼的军队，其中包括在荷兰、弗里斯兰、弗里西亚群岛和赫尔戈兰岛以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丹麦的部队？”为了进一步强调他的要求，他借助地图阐明了整个西线的战况，让德方认识到任何反抗都毫无希望。最高统帅部谈判代表要求时间考虑。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在其中一个帐篷里用餐。一位英国军官报告说：“吃饭时，冯·弗里德堡的泪水顺着脸庞流下来，几乎没人说话。” [82]

晚饭后，蒙哥马利发出最后通牒：指定地区的所有德军必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武装部队的军事装备不得销毁，必须原封不动地移交英国。如果德国人拒绝他的要求，战斗将会继续。冯·弗里德堡表示，他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权限，必须先回到弗伦斯堡报告。那天晚上，他和弗里德少校启程返回。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泽尔将军留在原地。蒙哥马利设定第二天下午为最终期限。 [83]

[1] 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3。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4; KTB-OKW, Bd. IV, 2, S. 1471: 对战斗指挥官Schleswig下达的立刻将所有力量转移至威廉皇帝运河的命令于11点20分发出，但是询问后得到的消息却是“重型武器及部分手持武器和装甲武器已经不够用”。

[2] 参见René Küpper: Karl Hermann Frank (1896-1946). Politische Biographie eines sudetendeutschen Nationalsozialisten, München 2010, S. 129 ff., 268 ff.。

[3] 辛提人和罗姆人分别指生活在西欧、中欧以及东欧、东南欧的少数民族，是对“吉卜赛人”和“茨冈人”的非歧视性种族称呼。和犹太人一样，他们在纳粹德国时期亦遭受种族灭绝政策的迫害。

[4] 参见Walter Manoschek: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ä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ünchen 1993, S. 12, 55 ff.。

[5] 参见Robert Bohn: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Neuordn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München 2000, S. 79 ff., 423 ff.。

[6] 参见Ulrich Herbert: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S. 323–398。

[7] 参见Johannes Koll: Arthur Seyß-Inquart und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1940–1945), Wien u. a. 2015, S. 37 ff., 69 ff, 321 ff, 383 ff., 411 ff.。

[8] 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3 f.; 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7;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76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90 f.。

[9] 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4;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78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79; Herbert: Best, S. 400。

[10] 参见Koll: Seyß-Inquart und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1940–1945), S. 556–565。

[11] 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4 f.; 参见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78;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76。

[12] 参见Koll: Arthur Seyß-Inquart und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1940–1945), S. 572 f.。

[13]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8 f.; 参见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5 f.; 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79 f.。

[14] 1945年5月3日施佩尔讲话文本; 收录于Breloer: Die Akte Speer, S. 322–325; 参见Speer: Erinnerungen, S. 478, 497; Brechtken: Albert

Speer, S. 290。

[15] 1945年5月3日公告复制本; Ortwin Pelc in Zusammenarbeit mit Christiane Zwick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Eine Stadt erinnert sich, Hamburg 2005, S. 164。

[16] 参见Zusammenarbeit mit Christiane Zwick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Eine Stadt erinnert sich, Hamburg 2005, S. 18-20; Uwe Bahnsen/Kerstin 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Hamburg und die Stunde Null, Hamburg 2004, S. 16-20。

[17] 参见Frank Bajohr: Hamburgs “Führer”.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des Hamburger NSDAP-Gauleiters Karl Kaufmann (1900-1969), in ders./Joachim Szodrzynski (Hrsg.) : Hamburg in der NS-Zeit. Ergebnisse neuerer Forschungen, Hamburg 1995, S. 59-91。

[18] 参见Ursula Büttner: “Gomorrha” und die Folgen. Der Bombenkrieg,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Hrsg.) : Hamburg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2005, S. 613-632。

[19] 指英美人。

[20] Joachim Szodrzynski: Die “Heimatfront” zwischen Stalingrad und Kriegsende, Ursula Büttner: “Gomorrha” und die Folgen. Der Bombenkrieg, 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Hrsg.) : Hamburg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2005, S. 633-682 (此处见S. 673)。

[21] Aufzeichnung Karl Kaufmanns: Die Kapitulation von Hamburg, Juni 1946; 收录于Manfred Asendorf: 1945. Besiegt und befreit, Hamburg 1995, S. 19; 参见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31 f.。

[22] 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Briefe einer Mutter an ihre fernen Kinder in den Jahren 1940-1946, Hamburg 1980, S. 151 (v. 20. 4. 1945)。

[23] 1945年4月29日信件复制本见Pelc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S. 94。与英国人的首次接触参见Mathilde Wolff-Mönckeberg: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Briefe einer Mutter an ihre fernen Kinder in den Jahren 1940-1946, Hamburg 1980, S. 34-36;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73-84。

[24] 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36 f., 129.

[25]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92.

[26] 1945年5月2日的呼吁复制本见Pelc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S. 46。

[27] 援引自Szodrzynski: Die “Heimatfront” zwischen Stalingrad und Kriegsende, S. 677。

[28] 参见Pelc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S. 41;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102 f.。

[29] 颠草的根茎可用作镇静剂。

[30] 大区领袖卡尔·考夫曼对汉堡市民的讲话，由汉堡帝国广播于1945年5月3日播出（3分59秒）；NDR-Mediathek。

[31] Wolff-Mönckeberg: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S. 160 (v. 6. 5. 1945) .

[32] 参见Bajohr: Hamburgs “Führer”, S. 59-61。

[33] 参见Pelc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S. 41 f.;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104-109。

[34] 参见Pelc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S. 46 f.;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110 f.。

[35] Wolff-Mönckeberg: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S. 161 (v. 6. 5. 1945) .

[36] Hans-Ulrich Wagner: Radio Hamburg: Der erste Send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NDR-Mediathek, 21. 1. 2014.

[37] Ralph Giordano: Erinnerungen eines Davongekommenen. Die Autobiographie, Köln 2007, S. 244.

[38] 参见Bajohr: Hamburgs “Führer”, S. 84。

[39] 参见Günther Schwarberg: Angriffsziel Cap Arcona, Göttingen 1998, S. 42-47; Bahnsen/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S. 118。

[40] 参见Wachsmann: KL, S. 667。

[41] 参见Detlef Garbe: Eine Stadt und ihr KZ. Die Hansestadt Hamburg und ihr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in: Jahrbuch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2018, Hamburg 2019, S. 12-31 (hier S. 26-28)。关于诺因加默集中营参见Hermann Kaienburg: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1938-1945, Bonn 1997。

[42] Wilhelm Lange支持该观点: Cap Arcona. Das tragische Ende einiger Konzentrationslager-Evakuierungen im Raum der Stadt Neustadt in Holstein, Eutin-Neustadt 2005; 亦可参见Neueste Erkenntnisse zur Bombardierung der KZ-Schiffe in der Neustädter Bucht am 3. Mai 1945: Vorgeschichte, Verlauf, Verantwortlichkeiten, in Detlef Garbe/Carmen Lange (Hrsg.): Häftlinge zwischen Befreiung und Vernichtung. Die Auflösung des KZ Neuengamme und seiner Außenlager durch die SS im Frühjahr 1945, Bremen 2005, S. 217-229 (此处见S. 226)。

[43] 参见Schwarberg: Angriffsziel Cap Arcona, S. 56 f.; Rudi Goguel: “Cap Arcona”. Report über den Untergang der Häftlingsflotte in der Lübecker Bucht am 3. Mai 1945, Frankfurt/M. 1972, S. 26 f.。

[44] Goguel: “Cap Arcona”, S. 29 f.

[45] 参见Lange: Neueste Erkenntnisse zur Bombardierung der KZ-Schiffe in der Neustädter Bucht, S. 225。

[46] Erwin Geschonneck: Der Untergang der “Cap Arcona”,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128–133 (此处见S. 130 f.)。参见Schwarberg: Angriffsziel Cap Arcona, S. 86 f.。

[47] Geschonneck: Der Untergang der “Cap Arcona”,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131–133。参见Garbe: Eine Stadt und ihr KZ, S. 29; Schwarberg: Angriffsziel Cap Arcona, S. 89 ff.。

[48]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37 (v. 3. 5. 1945), 73 (v. 1. 5. 1945)。

[49] 详细可参见Yuliya von Saal的文本记录: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Geschichte eines Bestsellers,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g. 67 (2019), S. 343–376 (此处见S. 344, 351–359)。

[50] 参见Jens Bisky: Wenn Jungen Weltgeschichte spielen, haben Mädchen stumme Rollen. Wer war die Anonyma in Berlin? Fragen, Fakten und Fiktionen—Anmerkungen zu einem großen Bucherfolg dieses Sommers,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4. 9. 2003; Matthias Sträßner: “Erzähl mir vom Krieg!” Ruth Andreas-Friedrich, Ursula von Kardorff, Margret Boveri und Anonyma: Wie vier Journalistinnen ihre Berliner Tagebücher schrieben, Würzburg 2014, S. 153–188 (此处见S. 173)。

[51]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87 (v. 11. 5. 1945)。

[52] 参见Volker Ullrich: Authentisch? Vielleicht, vielleicht auch nicht. Wie der Versuch scheiterte, Einblick in das Original-Tagebuch der “Anonyma” aus dem Jahr 1945 zu nehmen, in DIE ZEIT v. 9. 10. 2003; Götz Aly: Ein Fall für Historiker. Offene Fragen um das Buch “Eine Frau in Berlin”,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18./19. 10. 2003。

[53] 参见Volker Ullrich: Die Zweifel bleiben. Walter Kempowskis Gutachten zum Buch der Anonyma, in DIE ZEIT v. 22. 1. 2004; Gustav

Seibt: Kieselsteine zählen. Walter Kempowskis Gutachten zum Tagebuch der Anonyma,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v. 21. 1. 2004.

[54] Yuliya von Saal: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368–376; 参见Volker Ullrich: Was von der Anonyma bleibt. 对Marta Hillers日记的质疑一直存在。现在有部分得到证实, 见DIE ZEIT v. 4. 7. 2019。此外, 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和卡拉·霍克的“Berliner Aufzeichnungen”也面临类似情况; 参见Volker Ullrich: Geschönt und darum nicht mehr authentisch, in DIE ZEIT v. 3. 7. 1992; Hoffmann: Besiegte, Besatzer, Beobachter. Das Kriegsende im Tagebuch, in Fulda u. a. (Hrsg.): Demokratie im Schatten der Gewalt, S. 31–33。

[55] 参见Yuliya von Saal: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376。

[56]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74 (v. 1. 5. 1945)。

[57]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75 (v. 1. 5. 1945)。

[58]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30 f. (v. 3. 5. 1945)。

[59]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89 (v. 29. 4. 1945, 回顾)。

[60]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51 (v. 26. 4. 1945)。

[61]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87 (v. 29. 4. 1945, 回顾)。

[62] Erich Kuby: 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Rastatt 1965, S. 313。参见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检察官1945年5月2日致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无目的(且原因不明)地射杀德国人、到处抢劫和强奸德国妇女的情况基本上得到控制, 但根据最高指挥部总部和前线军事委员会的指令, 仍有部分此类事件出现。” Scherstjanoi (Hrsg.): Rotarmisten schreiben aus Deutschland, S. 166。

[63] 参见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00 f.。

[64]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89 f. (v. 6. 5. 1945)。关于强奸成为柏林市民日常谈话内容, 参见Jens Bisky: Berlin. Biographie einer großen Stadt, Berlin 2019, S. 636 f.。

[65] 两处引文均出自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02。

[66] Kuby: 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S. 317.

[67] Loewe: Der Kampf um Berlin,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51.

[68] Berliner Schulaufsätze aus dem Jahr 1946, S. 90.

[69] 参见Ingrid Schmidt-Harzbach: Eine Woche im April. Berlin 1945. Vergewaltigung als Massenschicksal, in Helke Sander/Barbara John (Hrsg.): 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 München 1992, S. 25-27, 40 f.。

[70] 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S. 119 (v. 6. 5. 1945)。

[71] 参见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69 f.。

[72] 参见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08-125。

[73]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

[74] Bertolt Brecht: Arbeitsjournal 1941-1955, Bd. 2, Frankfurt/M. 1973, S. 850.

[75] 参见Naimark: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S. 170 f.。

[76] 参见Miriam Gebhardt: Als die Soldaten kamen. Die Vergewaltigung deutscher Frau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München 2015。作者根据估算(S. 32-38)得出结论, 1944年至1945年间共有约86万名强奸受害者, 其中算得19万、5万和4.5万分别是由美军、法军和英军施暴造成。由于西方盟军施暴数字显著多于此前的统计结果, 苏军强奸造成的受害者人数相应明显减少。关于计算问题, 参见Klaus-Dieter Henke: Rechenfehler und Ungereimtheiten,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 18. 5. 2015。

[77] 参见Taylor: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S. 200–203; Thomas Faltn: Drei furchtbare Tage, in Stuttgarter Zeitung v. 18. 4. 2015.

[78] 参见Herfried Münkler的个案研究: Machtzerfall.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hessischen Kreisstadt Friedberg, Berlin 1985, S. 238 f.。在1945年5月初坐车去往奥格斯堡的路上, 美军少尉Melvin L. Lasky, 后来《Der Monat》杂志出版人, 观察到如下现象: “德国女孩在路上抽的烟很明显来自美国。司机心知肚明地笑道: ‘一包烟、一个号……’。” Melvin L. Lasky: Und alles war still. Deutsches Tagebuch 1945, Berlin 2014, S. 208 (v. 4. 5. 1945)。慕尼黑枢机主教Michael Faulhaber在1945年5月7日气愤地说: “有些女人和女孩的行为令人羞耻。让别人送她们巧克力。”
<https://www.faulhabert-edition.de/dokument.html?idno=092651945-05-07T01&-collid=1945#1945-05-07>。

[79] Marschall Montgomery: Memoiren, München 1958, S. 376.

[80]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5。

[81] Montgomery: Memoiren, S. 376.

[82] Montgomery: Memoiren, S. 377 f.。

[83] 参见Montgomery: Memoiren, S. 378 f.;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8。

1945年5月4日

1945年5月4日上午9点，在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海军学校举行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前天晚上返回的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详细汇报了他与蒙哥马利的谈判情况。出席会议的有邓尼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凯特尔、约德尔及其副官赫尔曼·布鲁德穆勒

(Hermann Bruder Müller) 中校。与会者基本都同意将荷兰和丹麦划入投降范围。会议记录指出，那里的德国军队再也无法支撑更长时间，“顽固的抵抗”只会导致“声望进一步下降以及沉重的政治负担”。^[1]只有约德尔大将反对：他还不愿意将“荷兰这张王牌”拱手相让。^[2]邓尼茨则担忧将德国舰队交付出去将无法继续运送难民和部队穿越波罗的海。冯·弗里德堡打消了他的忧虑，表示蒙哥马利向他保证回程运输可以继续。^[3]

关于将所有军事装备原封不动交付的要求则激发了更长时间的讨论。凯特尔和约德尔认为这一要求有违“德国武器的尊严”，并建议立即销毁。但是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抗议道：这将违反投降协议的精神，并会导致蒙哥马利取消整个协议并采取报复行动。邓尼茨采纳了这一观点，命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示指挥官们将所有武器移交敌人，不得销毁。命令基本得到了执行。唯一的例外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的一些潜艇于5月4日至5日夜间自行沉没。^[4]

会议记录记载了5月4日的商讨结果：“海军元帅批准了投降条件的签署，并要求善待战俘并且以有尊严的方式投降。”同时，冯·弗

里德堡受命在与蒙哥马利达成协议后，前往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兰斯（Reims）的总部，“目的是磋商向西方的进一步局部投降的议题”。^[5]

与此同时，蒙哥马利正在准备签字仪式。他确信德国人会接受他的要求，并在提梅罗山架起一个巨大的军用帐篷。“帐篷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一张铺着羊毛毯的带有支架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个墨水瓶和一支在任何商店花两便士就能买到的普通钢笔。”^[6]下午5点，蒙哥马利举行新闻发布会并邀请记者出席签字仪式。

下午6点左右，当新闻发布会还在进行时，从弗伦斯堡而来的两名德方谈判代表抵达那里。蒙哥马利请冯·弗里德堡进入他的露营车，并确定他已被授权无条件接受所设定的条件。在士兵、战争通讯员和摄影师的好奇注视下，四名德国军官被带到帐篷里。蒙哥马利进来时，他们站了起来。“德国人感到紧张，这可以理解，其中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是当我看着他时，他又把香烟收了回来。”这位英国陆军元帅回忆道。

蒙哥马利没有说太多开场白就宣读了包含七个要点的投降文件，并要求德国代表团的四名成员在文件上签字。最后，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仪式于下午6点30分结束。5月5日早上8点，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弗里斯兰群岛）、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丹麦停火。^[7]国防军报告称：“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命令下，近六年的光荣战斗宣布停火，因为对抗西方势力的战争已经失去了意义，只会造成德国人献出宝贵的生命（……）。然而，对苏联的抵抗仍将继续，以使尽可能多的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维克的恐怖袭击。”^[8]

5月4日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德国在西北欧投降的消息。在荷兰和丹麦，人们自发地举行欢庆集会。在哥本哈根，以非法身份成立的抵抗军成员以蓝白红袖章公开露面。5月5日上午，帝国全权代表

维尔纳·贝斯特向丹麦外交大臣请求保护。起初他能够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待在自己的住处；5月21日，他遭到逮捕并被送往哥本哈根城堡监狱。1948年9月，哥本哈根市法院判处他死刑。在上诉后，他被判处五年监禁，其中有四年被视作已服刑。丹麦国内对这一判决爆发了激烈的抗议，丹麦司法大臣因此不得不将该案提交丹麦最高法院重新审理。该法院在1950年3月判决贝斯特有期徒刑十二年。在仅仅一年半后的1951年8月，他就被释放，并被遣返联邦德国。[\[9\]](#)

随着“北部地区”的投降，又陆续发生了局部投降。随着5月2日意大利军队的投降，邻近的G集团军和E（东南）集团军也难以坚持。因此就在当天，陆军元帅凯塞林也请求就这两个军团的投降达成协议，但海军上将邓尼茨仅授予了他签订G集团军停战协议的权限，该军队正在波希米亚森林和因河（Inn）之间与雅各布·L. 德弗斯（Jacob L. Devers）将军的美国第6军团对峙。凯塞林任命第1集团军步兵上将赫尔曼·弗奇（Hermann Foertsch）为谈判代表。与美国人的谈判于5月4日在萨尔茨堡进行。5月5日，费奇在慕尼黑附近的哈尔（Haar）签署了G集团军的投降书；停火于5月6日下午2点正式生效。[\[10\]](#)

不仅是整个集团军，单独的军队和师团都试图逃到美国和英国的战线后面去，以免沦为苏联人的俘虏。例如，温克将军领导的第12集团军以及布塞将军领导的第9集团军残余，这些军团被敌军步步紧逼并困在易北河的东岸，与正在迫近的苏联人继续作战。5月3日，温克将军的密使、装甲部队将军马克西米利安·冯·埃德尔斯海姆帝国男爵（Maximilian Reichsfreiherr von Edelsheim）乘坐水陆两用车越过易北河，向西岸的美国第9军团第102步兵师提出投降。尽管美国人出于对苏联的义务拒绝接受正式投降，但在5月4日于施滕达尔市政厅举行的投降谈判中，他们同意将西岸的第12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中举起双手或白旗的个别士兵收为战俘。

在唐格明德（Tangermünde）附近的易北河岸上演着恐怖的场景。美军第102步兵师的记录员报道说，“乱作一团的部队怀着共同的且近乎迷信的恐惧等待着苏联人的到来”，“他们推搡着来到河边，恳求渡河，他们跳入河里，扑向任何一个能浮在水面的物体（……），用浮木、匆忙组装的木筏、橡胶轮胎、洗澡盆和木板渡过河流”。一位驻扎在第102步兵师的美联社记者观察到：“党卫队装甲部队的人——曾经是德国的精英——乘应急木筏划着桨过河。他们有时也会游泳，于是就把挂着勋章的军服抛在一边。成千上万的士兵蜂拥一团逃向东岸，他们比被击败的军队还要糟糕。这是一群被恐惧支配的人，他们害怕苏联人，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11]

*

5月4日，在夺下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后，美军第3步兵师和第1空降师^[12]部队迅速向贝希特斯加登挺进，紧随其后的还有由雅克-菲利普·勒克莱尔（Jacques-Philippe Leclerc）将军率领的一支法国装甲师。前一天，该地区纳粹党领导人伯恩哈德·斯特雷德尔（Bernhard Stredele）在和县长卡尔·特奥多尔·雅各布（Karl Theodor Jacob）交接职务后逃跑了。雅各布高举白旗靠近美国人，提出贝希特斯加登不战而降。几个小时后，卡尔·桑德罗克（Karl Sandrock）市长正式移交该市。^[13]

但是，美军的真正目标不是这座田园诗般的山区城镇，而是希特勒的住所，它坐落在比此地高出几百米的上萨尔茨堡山上。5月4日下午，美军第3步兵师的一支先头部队抵达这座山庄（Berghof）。几乎同一时间到达的还有法国装甲师士兵，其中包括演员让·迦本（Jean Gabin），他是德国好莱坞影星玛琳·迪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14]的爱人。上萨尔茨堡山的党卫队司令官伯恩哈德·法兰克

(Bernhard Frank) 也及时逃走了，逃走之前他命令士兵放火将这座十天前曾遭空袭的希特勒宅邸烧成灰烬。[\[15\]](#)

希特勒自1928年秋租下了这栋名为“瓦亨费尔德别墅 (Haus Wachenfeld)”的房子，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他将其买了下来，并在1935年至1936年将其改造成气派的山庄。时任纳粹党副手鲁道夫·赫斯 (Rudolf Heß) 的办公室主任马丁·鲍曼从中帮了不少忙。尚在建造过程中，他就已经着手购买希特勒庄园周围的土地，并对那些不想自愿放弃地产的人施以高压。鲍曼使原来的农庄被新的建筑物所取代：一座供党卫队成员入驻的营房，一座示范性农庄，一个可以在夏季和冬季为素食主义者希特勒提供新鲜水果和蔬菜的温室，一间位于莫斯拉讷靠普夫山头 (Mooslahnerkopf) 的小茶室，而花费最多的项目则是位于鹰巢 (Kehlstein) 山顶、比山庄高出800米的第二间大型茶室。

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希特勒的追随者仍然可以自由前往上萨尔茨堡山朝圣，并可以近距离看到他们的偶像。但在1936年之后，上萨尔茨堡山成为“元首禁区”；只有持特别证件者方可进入。[\[16\]](#)

这个山庄对希特勒来说一直有两个功能：一是作为可防止私生活被窥探的藏身之所，二是充当柏林总理府之外的第二处政府核心办公场所。在这里，他接待外国客人，策划宏大的计划，作出重大决策，例如1940年7月入侵苏联的决定。在这里，他召集一批手下和亲信，一个效忠于己的圈子，它扮演着家庭替代品的角色。能否进入该群体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在纳粹党内所担任职务的级别，而是希特勒对其人的好感程度。这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知道如何与他的情人伊娃·布劳恩融洽相处，以及接受她在山庄扮演的“女主人”角色。这大概可以解

释为什么希特勒的建筑师、后来的装备部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能享有如此恩宠。

战争期间，当山庄成为元首司令部所在地，同时国防军总司令在那里作或短或长的停留的时候，它的职能发生了变化。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希特勒预想到上萨尔茨堡山很可能成为盟军轰炸机的目标。于是这里开始紧急修建防空保护设施。直到1943年圣诞节，施工的第一阶段已完成：在山庄地下修建了130米长的隧道，里面有为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安排的独立起居室和卧室，为工作人员安排的公共休息室，一间厨房，物资充足的储藏室，还有存放艺术品、文件和书籍的仓库。然而，直到战争结束前不久，上萨尔茨堡山的上空还没有落下过一颗炸弹。

但是1945年4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动用359兰开斯特轰炸机袭击了此地。英军直到现在才采取行动和听到的一个传闻有关，即希特勒打算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仍保有实力的国防军和党卫队撤退到山上，目的是在这里给盟军最后一击。尽管关于这个巨大“高山堡垒”的传言并不真实，但它仍对盟军总部产生着影响。他们认为通过对上萨尔茨堡山进行大规模袭击，就能切断希特勒的撤退空间，并摧毁最后一战的核心要塞。[\[17\]](#)

英国轰炸机完成了整个任务。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就在几天前刚刚乘坐最后几班飞机之一逃离了柏林，她回忆道，“山庄遭受了重创”。“墙壁虽然还在，只有一面被打破了，但铁皮屋顶被炸得粉碎。门窗都没了。房子的地板上覆盖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损坏了。所有的附属建筑都被摧毁，小路被覆盖，树木被夷平。再也看不到绿色了，那里的景象就像一片不毛之地。”[\[18\]](#)戈林和鲍曼的房子、党卫队营房以及温室都被完全摧毁了。只有鹰巢等少数建筑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

一天后，希特勒长年以来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抵达了山庄。他的任务是销毁独裁者的所有私人文件。4月25日至26日夜里，他从柏林的加图（Gatow）机场飞往慕尼黑，先去清理了希特勒位于摄政王大街（Prinzregentenstraße）的私人公寓里的保险箱。之后，他带着两个手提箱驱车前往上萨尔茨堡，清空了希特勒书房里没有损坏的钢柜，并在山庄的露台上烧毁了所有文件。克里斯塔·施罗德说：“绍布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进行焚毁工作是一幅令人绝望画面。”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从火焰中救出了几份资料，其中有一套希特勒画的建筑图纸。[\[20\]](#)

在4月25日空袭发生后，“元首禁区”的管理部门解散。数千名被迫进行大规模建筑工作的强制劳工被释放，他们努力回到自己的祖国。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包括党卫队都逃走了。以前被严格封锁的禁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一些掠夺者也嗅到了这个机会。“山上乱成一团”，在上萨尔茨堡山负责建设工程管理的约瑟夫·盖斯（Josef Geiß）说。“民众蜂拥而至，有些甚至带上马车来这里扫荡。人们惊讶地看着堆成山的食品和满仓库的衣服、鞋子、餐具、洗涤剂，并将其据为己有。艺术品被烧毁或抢走。在鲍曼的储藏室中，成堆的黄油、糖、面粉和其他物资漫过了脚踝。”[\[21\]](#)掠夺者中有当地供应商和工匠，他们知道不会有人来算账了，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受到的损失。

5月1日，当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在山庄传开时，那里的秩序彻底瓦解了。克里斯塔·施罗德注意到，曾经顺从的工作人员在那天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好像他们现在是新主人一样。任何人都不会放过搜罗有用的东西的机会以便逃走。留下来的刑警试图消除伊娃·布劳恩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印有她名字首字母组合图案的瓷器被砸碎，她的衣服在露台上被烧毁。[\[22\]](#)

5月4日下午，美国士兵率先抵达上萨尔茨堡，同行的人中有记者李·米勒（Lee Miller）。时年38岁的她曾是著名摄影师曼·雷（Man Ray）的学生，从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到“第三帝国”结束一直跟随着盟军部队。她拍摄的解放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照片被世界熟知。5月1日，就在独裁者去世的消息公布于众的当天，她正在希特勒位于慕尼黑的私人公寓里，和她的同事、《时代生活》（*Time Life*）杂志摄影师大卫·E. 舍尔曼（David E. Scherman）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李·米勒赤身裸体地躺在希特勒的浴缸里，身旁放着“元首”肖像——这场黑色幽默式的表演只能用“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来解释。^[23]

李·米勒在上萨尔茨堡拍下了山庄的残骸，她将对这个场景的印象写进了一篇刊登在《时尚》（*Vogue*）杂志的报道中：“尽管该地区遭到了严重炸毁，房屋就像煮熟的鸡蛋壳一样被碾碎，山坡被轰炸得坑坑洼洼，但希特勒的房子仍然屹立，屋顶略微歪斜，同时党卫队所放的作为最后的礼炮的大火，从窗户蔓延出来。我爬过被炸毁的山丘和隔壁戈林房子的废墟，看到一支空旗杆，上面曾经悬挂着纳粹的最后一面旗帜，飘扬在这座堡垒之上。撤走的党卫队把中间的十字标志取了下来，只留下一块红色的布。”^[24]

第二天早晨，李·米勒再次回到上萨尔茨堡，并考察了地下隧道，美国和法国士兵此时也正在那里寻找纪念物件。“成箱的镶有鹰、十字标志和首字母缩写A. H.^[25]的银器和衣物落入收藏爱好者之手。没有藏书签、题词或个人痕迹的书籍都被扔掉了。这就像一场狂野的聚会，在这里香槟酒的瓶塞弹到旗杆上发出声响，而我们头顶上的房屋正在倒塌。”她有预判性地补充道：“没有一件物品留下来，以便能建造一个关于这个大战犯的博物馆，它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未来人们只能看到某个据说是曾经被希特勒使用过的纸巾环或黄瓜专用

叉。”^[26]她的观点对于持续至今的关于希特勒崇拜的研究都很有预见性。

5月8日，托马斯·曼的长子克劳斯·曼（Klaus Mann）也绕道去了上萨尔茨堡。^[27]他在1942年12月加入美国军队，在终于入籍后，他于1944年1月初随部队抵达卡萨布兰卡。他被分配到心理战部门，主要任务是撰写传单呼吁德国士兵自愿投降，以支援盟军进军意大利。1945年2月，他被调任到罗马，就职于军报《星条旗报》（*The Stars and Stripes*）的编辑部。5月初，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希特勒的讣告，可以算是关于这位反人类罪犯的最富有见地的文章之一。^[28]他向父亲讲述了探访上萨尔茨堡的经历：“‘山庄’在两天时间里被我们的士兵——美国兵和法国兵——洗劫一空；这注定是一场极其放纵的抢劫和胜利狂欢（……）。我们发现，军警在守卫着这座著名的乡村庄园，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此前的空袭已使这里遭到极大的毁坏，在这之后掠夺者们又将这里扫荡一空。裂开的墙壁和烧焦的横梁，深深的弹坑里都是瓦砾和灰尘，破损的家具、碎片和污垢到处都是，成了一片废墟。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29]



1945年5月1日，美国记者李·米勒在希特勒位于慕尼黑摄政王大街的私人公寓的浴缸里摆拍，由摄影师大卫·E. 舍尔曼拍摄。（©Lee Miller Archives, England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www.leemiller.co.uk）

直到1949年春天，德国人都不被允许进入以前的“元首禁区”。禁令解除后，上萨尔茨堡的废墟成了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之一。到1951年夏天，已经有136560名游客来过此地。记者尤尔根·内文·杜·蒙（Jürgen Neven du Mont）引用了一名导游对于山庄大厅里的壁炉每天都在变小这一现象的评论：“许多人都想从元首的火焰中取一部分带回家。”他的这篇题为《上萨尔茨堡的宣传室》（*Propagandazelle Obersalzberg*）的报道刊登在《慕尼黑画报》（*Münchner Illustrierten*）上，引起巨大反响。1951年11月1日，美占区首领满足了巴伐利亚州政府的意愿，归还上萨尔茨堡的土地使用

权，但条件是该处的众多建筑物，包括希特勒、戈林和鲍曼的住所要被完全拆除。1952年4月30日，即希特勒自杀七年后，山庄废墟被炸毁。[\[30\]](#)

*

联邦德国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1965年写回忆录时对他的秘书安妮莉丝·波平加（Anneliese Poppinga）说：“战争结束时，我的梦想是再次成为科隆市长。”[\[31\]](#)这个梦想在1945年5月4日实现了：科隆的美国驻军司令约翰·K. 帕特森（John K. Patterson）让当时已经69岁的莱茵兰出身的阿登纳再次担任市长一职，此前他曾从1917年到希特勒上台之前担任此职，并且成绩斐然。1933年3月，纳粹罢免了这位颇受欢迎的市长和德国中央党政治家，他们将其视作可恶的“魏玛体系”的代言人，并对他发起了正式的职务犯罪刑事诉讼。即使判决对阿登纳有利，此后他也一直被雪藏，并始终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之下。这位退休者搬回到他位于勒恩多夫（Rhöndorf）的住所里，并试图尽可能不受干扰地熬过战争。1944年8月23日，他还是被逮捕了，理由并不是怀疑其参与了7月20日的政变，而是因为他被牵扯进希姆莱在希特勒被暗杀未果后下令展开的“网格行动（Aktion Gitter）”中，这一行动逮捕了众多原魏玛共和国各政党的政治人物。阿登纳被送到在科隆博览会场地所建的集中营，在一次冒险逃生后再次被捕，被关进位于布劳韦勒（Brauweiler）的盖世太保监狱。幸运的是，他得以于1944年11月底被释放。阿登纳和妻子格西（Gussie）以及五名逃出来的法国战俘在位于勒恩多夫房子的防空洞中经历了美军1945年3月7日跨越雷马根（Remagen）未受损坏的桥之后在中莱茵地区的最后几场战役。[\[32\]](#)

早在1945年3月16日，两名美国占领军军官就找到了他，以帕特森长官的名义请求他再次出任科隆市长。在美国人列出的在1933年和

1945年之间没有作出妥协并且有资格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德国人“白名单”上，康拉德·阿登纳的名字排在最前列。但是阿登纳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他的三个儿子，他们仍效力于国防军，如果父亲返回原职，他们可能会遭到报复。亚琛市长弗朗茨·奥本霍夫（Franz Oppenhoff）的遭遇也令人害怕，他在几天后被“狼人运动（Werwolf-Bewegung）”——一个由狂热的年轻纳粹分子组成的游击队性质的组织——所杀害。因此阿登纳最初提议仅作为“顾问”留在幕后，帕特森接受了这一建议。^[33]

阿登纳对他第一次返回科隆的记忆依然鲜活：“莱茵河上的桥梁被炸毁，街道上的碎石堆了几米高。被炸弹、枪弹摧毁的建筑物废墟高高堆起。被毁的教堂（……），被褻渎的科隆大教堂，莱茵河上的美丽桥梁也成了高耸的废墟，毁坏的房屋汇成一片没有尽头的大海，这一切让科隆这座城市变得阴森恐怖。”^[34]

阿登纳怀疑，这座仅存32000人的城市（战前是760000人）能否重建。但是，在帕特森5月3日与其进行重要会谈后，他宣布绝对会接任市长一职，但保留随时可以离职的权利。一天后，阿登纳正式履职。

他从一开始就不仅仅重视家乡城市的管理，还考虑到整个德国的未来发展。根据对局势的现实评估，他认为苏联将按照自身意愿对占领区进行管理，因此必须暂时接受德国的分裂。他在1945年7月初写道：“我怀着越来越多的担忧关注着德国局势的发展。苏联正在拉下铁幕。”^[35]阿登纳由此得出结论，西部的三个占领区应合在一起，并努力寻求与西欧，特别是与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密联系。这里已能看出他之后作为联邦德国总理所坚定实施的外交政策的大致轮廓。



俯瞰被摧毁的科隆市，科隆大教堂也在视野中。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3月初美军刚刚进驻时。（ullstein bild/dpa Picture-Alliance, Frankfurt/Main）

尽管阿登纳时不时向亲信抱怨美国军政府的无能，但双方很快建立了信任的合作关系。但在美国人于1945年6月21日从科隆撤军，英国人接管指挥权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自8月初以来，工党开始统治英国，与该党亲近的英国占领军对这位立场偏保守的莱茵天主教徒和前中央党政治家充满了不信任。^[36]1945年9月底便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因为英国军政府要求阿登纳砍掉他于1933年前命人在科隆周围的绿化带上所种的树，以便为居民提供燃料。市长拒绝了，并反过来要求英国人交出没收的储备煤。

10月6日，北莱茵省军事指挥官约翰·巴拉克拉夫（John Barracclough）准将召见了阿登纳，用无礼的方式通知要罢免他：尽管他知道身为市长必须面对哪些困难，但他没有使用必要的力量来维修

建筑物和清除瓦砾，因此“未能履行对科隆居民的职责”。^[37]阿登纳对被罢免的事情怨恨了很久。但是后来证明，这次冲突对他的职业生涯是件好事。因为在对他的政治活动禁令解除后，他能够将精力集中在新成立的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缩写为CDU）的工作上。勒恩多夫成为这一党派发展的起点。党内有人打趣说，他们是去“莱茵河畔的上萨尔茨堡”。^[38]早在1946年春天，他就已经成为英国占领区的基民盟主席，这是通往重要政治舞台的踏板。1948年9月初，他成为议会理事会主席，负责起草即将成立的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最终，1949年9月15日，他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在73岁的年纪以比半数多一票的结果（包含他自己的一票）当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

即使在柏林投降后的两天，也到处都能看到此前战斗过的痕迹。丹麦记者雅各布·克罗尼卡（Jacob Kronika）在1945年5月4日记录道：“街道上到处都是烧毁的汽车、坦克、摩托车、枪支之类的残骸（……）。”“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时间去埋葬这些尸体。不过一切都在进行中。苏联人只管自己的牺牲者。德国人必须自己埋葬死者。”^[39]苏联占领军发出的第一批命令被张贴了出来：从晚上10点至早上8点对平民实行宵禁。收音机、照相机和武器都必须上缴。此外，柏林人还被要求参加清理工作。5月4日清晨，在柏林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有上千人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柱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开始清理瓦砾，填平因手榴弹和炸弹袭击造成的弹坑。希特勒曾于1939年4月20日50岁生日之际在这里举办过大型军事表演，现在红军的胜利阅兵式也将在这里举行。^[40]

大城市居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弄到食物。人们到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大多数商店仍然关门，或已经被洗劫一空。仍然没有电力、天

然气和水供应。仅有的几台水泵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每个人都耐心地站着，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动。到达水管前并将清水倾泻到桶中的那一刻，总有种受洗的感觉，这一刻真是美好。”[\[41\]](#)提着装满水的桶踏着铺满瓦砾和碎石的路回去，对于女性而言，比如新闻记者玛格丽特·博韦里，是一件麻烦的苦差事：“每天从远处提回来四到六桶水，然后还要上许多台阶，真是非常耗时。”[\[42\]](#)

为了煮熟少得可怜的食物，还需要燃料。人们在废墟中搜寻木材；破碎的门和窗框被搜寻出来，并被费力地弄成小块。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这样描述这项不同寻常的工作：“我们像苦力一样忙活着。点火、收集木材、砍柴、清扫瓦砾。清扫、不停地清扫。”[\[43\]](#)

无数公寓都被摧毁或严重损坏。许多柏林人住在临时住所中，住在空间极小的地下室、掩体或园圃小屋中。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住处。雅各布·克罗尼卡观察到：“无数人露宿在蒂尔加滕公园，周围到处都是损坏的战争物资。”[\[44\]](#)

即使那些有瓦遮头的人也不能免受侵扰。实际上，个人庇护所已不存在。红军士兵随时可能侵入。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在5月4日抱怨道：“时不时有苏联人来访。”“他们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环顾四周，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装进口袋里。他们四处看，视线穿过我们，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他们有时会说‘Uhri’、‘Uhri’[\[45\]](#)。还有‘烈酒’和‘自行车’。”自行车尤其受欢迎。“我们的自行车消失不见了。墓地后面有一条柏油路。胜利者们在那里学习骑自行车。像孩子一样。坚持、努力，就算骨折了也毫不在意。”[\[46\]](#)

偷盗和抢劫的不止苏联士兵。在混乱、崩溃的社会中，确定规则和秩序的法律已然失效，许多德国人也肆无忌惮地抢夺别人的财产。

“财产的概念已荡然无存，”玛塔·希勒斯说，“每个人都偷东西，因为每个人都被偷了，每个人都需要一切东西。”^[47]在许多其他大城市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1945年后恢复参议员职务的不来梅自由派政治家特奥多尔·斯皮塔（Theodor Spitta）说：“那些想要重建自己被毁掉的住宅的人们肆无忌惮的样子真令人惊讶，他们从其他房子取走了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砖瓦、门窗、木材，等等。”^[48]

公共交通尚未恢复正常。没有电车，没有公共汽车，没有地铁，没有火车。所有的路程都必须步行。柏林及其他被摧毁城市中的人们始终在路上，他们在废墟中踏出了路。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描述了他从达勒姆（Dahlem）走到蒂尔加滕的旅程^[49]：“我们没有其他前行的办法，除了用腿。”^[50]

5月4日，演员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第三帝国”时期在赫尔曼·戈林的庇护下担任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决定去见1936年与之结婚的女演员玛丽安·霍普（Marianne Hoppe）。他与音乐家朋友卡拉·霍克从夏洛滕堡出发，朝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方向行进。他的同伴说：“这是一条奇怪的路，可怕而美丽。”“可怕的是战争留下的混乱的痕迹，展览厅和铁路桥周围的废墟，还有死人。美丽的是那风，是我们可以自由走动，是活动所带来的轻松与轻快的感觉。顺便说一句，格伦德根斯戴着顶硬挺的帽子，身穿大衣，戴着山羊皮手套，打扮得非常像上流社会的人物。我惊讶地问他是否真的想这样走过去，他只说：‘穿其他的都有失体面！’”^[51]

除争夺食物，生存的不安全感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外，令当时的人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可靠信息的缺乏。当时仍然没有报纸，没有电话，没有邮局，很多人也听不到广播。“人们想象过多少次、想象过多少幅纳粹的终结时的画面，而现在人们坐在那里，和世界切断了一

切联系的可能性，没有广播、没有报纸——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可以亲耳听到今天的新闻该多好啊！”埃里克·雷格（Erik Reger）在5月2日写道。这位作家因其1931年出版的关于莱茵工业大亨的小说《管制下的联盟》（*Union der festen Hand*）而出名，并于1943年8月与妻子搬到柏林以南15公里、人口为2500人的小镇马洛（Mahlow）。回顾1945年5月初的日子，这位后来的柏林《每日明镜》（*Tagesspiegel*）联合创始人兼总编辑表示，“在这些日子里与重要的世界历史相隔绝”的经历让他可能再也“无法从中恢复过来”。^[52]玛格丽特·博韦里的感受也是如此：“我们仍然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留在柏林，为的是在事件的中心亲身经历这一切。”她在5月6日这样倾诉自己的失望之情。^[53]

但许多德国人正忙于应付紧迫的日常生活问题，以至于他们不能或不想去关注那些在自己狭窄视野之外发生的事情。民主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在吕讷堡荒地上的蒙斯特营地（Munsterlager）作为战俘经历了战争的终结。他回忆说，相比关注“重大事件”，他更关心“如何饱餐一顿或找到能遮风挡雨的住处”。“得知希特勒自杀或德国投降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54]

由于真实的消息无从知晓或者人们只听到只言片语，因此各种谣言满天飞。“谣言。我们以它为食。”玛塔·希勒斯写道。^[55]特别是水泵前排队的人群成为消息的集散地，真实的、半真半假的以及虚假的信息混杂在一起。在水泵前排了几个小时队之后，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的一位熟人告诉她听到的消息：“正当我们在‘往返通勤’中将八桶水搬回家时，他眉飞色舞地说‘有消息！’他在家中激动地公布了这个大新闻：希特勒死在了总理府，并且戈培尔夫妇毒死了自己和孩子。希姆莱还在布雷斯劳战斗，埃普则在慕尼黑发动了政变。”^[56]

直到1945年5月15日，柏林才发行了第一份报纸——由苏联占领国许可的《每日评论》（*Tägliche Rundschau*），头版刊登了斯大林的公告。两天后，卡拉·霍克在自己的公寓里再次用上了自来水——“真是像童话一般！”6月8日，电也通了：“我们像孩子一样，不停地打开又关闭电源，期待着夜晚的来临。人们不再在黑暗中摸索，而是在交谈时可以看到彼此！”交通也慢慢恢复正常。“行人在少数几个车站前聚集在一起（……），通常需要等待几个小时。但是一些城区的情况已经比夏洛滕堡好多了。”[\[57\]](#)。

*

在康拉德·阿登纳恢复科隆市长职务的那一天，一位日后也会成为联邦总理的年轻军官正在比利时的英军战俘营中，他就是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五月的最初几天，他在随身日志中写道：“许多人发现他们从来都不是纳粹分子：有些人是出于机会主义，但也有人感到自己对德国人民承受的灾难负有共同责任。”[\[58\]](#)。赫尔穆特·施密特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施密特出生于1918年12月，父亲是汉堡的一位老师，1937年从利希特瓦克中学（Lichtwarkschule）毕业后，他自愿加入国防军。1937年11月，他在不来梅韦格萨克（Vegesack）的防空（高射炮）炮兵部队开始服役。他在回忆起这两年服役期时说：“感谢上帝，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唯一正派的集体。”[\[59\]](#)。一直到战争结束及战后，施密特都对国防军积极认同，同时自称未受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

施密特表示，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回顾往昔时坦白说，一方面，他对纳粹主义持拒绝态度，并预料到“战争的结局会很糟糕”，另一方面，他毫不怀疑自己“作为德国士兵”所应尽的义务。[\[60\]](#)他在多大程度上对纳粹持拒绝态度，以及他是否很早就相信希特勒德国的失败，是很难查证的。他的上级证实他

尽管在战争过程中一再表现得有些傲慢自大，但其“纳粹主义的姿态是无可争议的”。[\[61\]](#)

在升为预备役少尉后，施密特于1940年秋被派往柏林克尼斯贝克街（Knesebeckstraße）加入高射炮司令的教学视察四队，然后从那里被临时派往位于施道尔普明德（Stolpmünde）的高射炮炮兵二校担任讲师。这把他推到了前线：“但我感到羞耻，与大多数柏林街道上的士兵不同，我的制服上没有佩戴任何勇敢勋章，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我对在柏林默默无闻地打笔仗很不满意，于是我申请调往战斗部队。”[\[62\]](#)

1941年8月底，时机来了：施密特乘坐JU52运输机飞往东线的北部陆军。作为排长，他指挥一支轻型空军高射炮部队，参加第1装甲师的战斗，并协助包围列宁格勒。根据希特勒的意愿，他们不是要夺取这座位于涅瓦河畔的城市，而是要围困至弹尽粮绝。到1944年1月，当红军终于能够冲破封锁线时，已经有近100万人成为这场恶意灭绝行动的受害者。[\[63\]](#)

施密特的部队也参与了10月初开始对莫斯科的进攻，两个月后战斗在苏联首都门前一败涂地。红军发动的进攻迫使德军撤退。原本计划在短短几个月内打败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失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转折点。在战俘营期间，施密特总结了他在东线作战的经历，关于1941年年末他写道：“对元首的个人信任首次瓦解了。”[\[64\]](#)但是这也说明了他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在过去几年中对希特勒充满信任，至少在批判纳粹主义时会将元首个人从中择出来。

1942年1月，施密特在前线的任务结束了。这位23岁的年轻人在4月1日升为中尉，回到之前服役的位于柏林克尼斯贝克街的部队，再次负责制定针对轻型高射炮的操作和射击方案。1943年7月柏林遭到炸弹袭击后，施密特的部队搬到了贝尔瑙（Bernau）。1944年9月，施密特

被指派参加7月20日在人民法院举行的针对谋反者的审判会。这个令人反感的场面对这位年轻军官来说是一次关键的经历，他在2010年与历史学家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的一次对话中说，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纳粹是罪犯，并补充道：“太晚了。”^[65]

几周后，施密特被指控“削弱军事实力”——因为他对赫尔曼·戈林发表了无礼的言论。他善解人意的上司海诺·冯·兰茨奥（Heino von Rantzau）中将把他转移到西线，调查后来也无疾而终。1945年1月，当施密特到达艾弗尔山（Eifel）执行第二次前线任务，指挥一个防空炮兵中队时，阿登战役（Ardennenoffensive）失败。这场战役是希特勒为扭转局面而作出的最后尝试。德军开始后撤。1945年3月底，炮兵中队被美军彻底击垮；残余人员试图分成小组绕开美军阵线，回到自己的家乡。施密特和两名战友用了整整三周向北行进了500公里，直到4月24日在索尔陶（Soltau）附近的森林睡觉时被英国士兵惊醒并抓获。^[66]

最初，英军怀疑他是附近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看守，该集中营几天前被英国人解放。在怀疑解除后，施密特被转移到布鲁日（Brügge）附近的亚贝克营地（Jabbeke），此地仅关押被俘的德国军官。在被俘的最初几天和几周里，他在笔记中试图阐明自己的处境。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自己所承担的“军事职责”被希特勒及其亲信所滥用。^[67]他几十年来一直抵制一种观点，即认为他曾为国防军这种犯下最严重战争罪的组织服务，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东欧地区就不可能被德国人攻占从而犯下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1990年代仍然会对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国防军展览反应强烈。^[68]

对施密特来说，囚禁绝不是浪费时间。尤其是战俘营中的年轻军官，他们感到有很多需要追赶的，充满了求知的渴望。他们组织“定

期的讲座活动”。施密特完成了会计课程，还重温了英语知识。“我是英语说得最好的人之一，除了那些早就说得很好的。”他不无自豪地强调。^[69]更重要的是与52岁的汉斯·博能坎普（Hans Bohnenkamp）中校的相识，这是他知识分子和政治生涯的重大事件。多年后他回忆说，他要感谢这位原教育学教授最先给他带来的“关于民主、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正面的基本思想”。因此，“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对他来说成了“几乎顺理成章”的事。^[70]

在施密特被俘之初，他没想到这么快就会被释放——“我（……）心里已作好被关五年的准备。”^[71]后来他成为1945年8月23日首批获释的人之一。一周后，他回到了家乡。年底，他开始在重新开放的汉堡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并于1946年3月加入社民党。施密特战后职业生涯的腾飞终于开始了。

*

和其他在英军战俘营中的囚犯一样，施密特也不得不忍受饥饿，等他回家时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但与美军战俘营的条件相比，他的情况相对好一些。1945年春，随着盟军占领莱茵兰以及包围鲁尔区并将其瓜分，落入英美军队手中的国防军士兵人数激增。在5月8日投降后，更是一下子增加了数十万的战俘，到1945年年中，仅美军关押的战俘总数就增长到340万。如此庞大的数量让美军始料未及。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原计划，即将战俘运送到西欧，主要是法国北部战俘营进行看管，而决定将这些人暂时安置在“战俘临时围场（Prisoner of War Temporary Enclosures）”中。在1945年4月至6月，莱茵河沿线建立了20个战俘营，绵延超过300公里，这些营地以“莱茵草地营（Rhein Wiesenlager）”之名以及其背后令人悲伤的事实而为人们所知。^[72]

自愿被美军俘虏的德国士兵预想的是胜利者会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对待他们。但是他们想错了。莱茵河谷的战俘营通常位于村庄或小镇边缘地带，一般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开放耕地。邻近的农场或工厂通常用作行政办公场所、厨房或病房。每个战俘营都被划分为十至二十个营地，或“笼子”，每个营地都关押着五千至一万名囚犯。只有极少数人——妇女、将军、病重的人——拥有固定住所；大部分人只能住在帐篷里，或在地面上挖洞甚至露宿野外。1945年春天的气候整体上温暖而晴朗；只在4月底、5月初有暴雨，把营地变成了泥泞的沙漠。“数千双脚疲惫无力、吧嗒吧嗒地穿过被泡软的田野，黏稠的泥土四溅开来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73]

在5月最开始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即使之后粮食供应逐渐得到改善，分配的口粮也不足以基本缓解饥饿。一名来自臭名昭著的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战俘营的囚犯说：“饥饿是把人变成动物的一种恶魔手段。人们曾经关心十字勋章和奖牌，而现在都只关心面包皮。” [74]在这样的条件下，曾经的同志友谊和团结协助都化为乌有。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着想。盗窃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当地富有同情心的妇女把食物扔过篱笆，就会出现大家为争抢食物而互相殴打这样令人作呕的场景。

莱茵草地营由美军第106步兵师专门负责。由于人手不足，美军无法有效地进行看管，于是营地内部的管理工作被交给了德国囚犯。这群做着营地警察工作的人享受着一些特权，尤其是得到了更好的照顾，也因此招致了其他人的仇恨。

卫生条件从一开始就一言难尽。供水不足，没有厕所，或只有十分简陋的厕所。大多数囚犯刚来的时候就处于虚弱和情绪低落的状态。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和医疗设施不足，疾病迅速传播开来。此外，对持续受到屈辱和看不到头的囚禁的担忧，让那些精神稳

定的囚犯也陷入了暴怒情绪。“连续六周的泥泞、雨水和寒冷；连续六周的屈辱和匮乏；连续六周我们都是一个任人摆布、没有功能的团块中的某个无名且空洞的原子，只是靠铁丝网围起来的正方形狭窄空间才聚集在一起，其效果达到了。”一名囚犯这样指出，并补充说：“对身心的折磨每天都在加剧。”^[75]

战争结束后仅两周，美军开始释放那些政治上没有疑点的囚犯。1945年6月，第一处战俘营关闭。然而，由于法国政府要求交出一大批德国战俘，释放不得不中断。这些战俘将被用作重建国家的强制劳工。美国人则借此减轻了莱茵草地营的负担。直到7月10日，其余战俘营均已移交法国人。而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事先接管了一些美国占领区的战俘营。到9月底，法国和英国手中的营地也悉数关闭。只有巴特克罗伊茨纳赫战俘营直到1948年仍被用作从法国返回的战俘的中转营地。

莱茵草地营的一百万名战俘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去，到今天仍然有争议。加拿大时事评论员詹姆斯·巴克（James Bacque）在1989年发表的轰动一时的《计划死亡》（*Der geplante Tod*）一书中写道，美国人故意让成千上万的人丧生。^[76]但这一说法已被专业历史学家反驳，认为言过其实。不能说这是大规模灭绝行动，甚至别有用心的策划。根据可靠估算，美军战俘营的死亡人数大约在8000至40000之间。^[77]与苏联战俘营的死亡率相比，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而且，莱茵草地营的德国战俘命运更是无法与德军关押的苏联战俘命运相提并论。到战争结束时，有570万红军士兵落入德军手中，其中超过300万人丧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故意饿死的。历史学家乌尔里希·赫伯特（Ulrich Herbert）公正地评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犯下的除屠杀犹太人外最严重和最可怕的罪行”。^[78]虽然美国占领军对待战俘的方式有时并不符合战争法，但他们绝没有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意图。



1945年4月，位于雷马根附近辛齐希的莱茵草地营上的德国战俘。（akg-images, Berlin）

*

1945年5月4日下午，美国第7军团的沃尔特·斯坦因（Walter Stein）少尉在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德国警察的陪同下来到施利尔湖畔（Schliersee）诺伊豪斯（Neuhaus）的“贝尔格弗里登别墅（Haus Bergfrieden）”，惊讶地撞见了正在那里悠闲喝咖啡的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总督。这位令人生畏的“波兰屠夫”未加抵抗就被逮捕了。在纽伦堡服刑期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希特勒将近25年的征途结束了。”[\[79\]](#)

实际上，他的征途在1919年就开始了，这位时年19岁的法学院学生在慕尼黑加入了主张民族主义的图勒协会（Thule-Gesellschaft），并参与“埃普”志愿军镇压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他当时作为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缩写为

DAP) 党员——该党后来发展出了纳粹党——在1920年1月的一次集会上第一次亲眼见到希特勒，并为其演讲的感染力所着迷：“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源自灵魂，并触及了我们的灵魂。”^[80]作为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政变的参与者，弗兰克属于“老斗士 (Alter Kämpfer)” 圈子。弗兰克与希特勒有着密切的信任关系，他在1933年之前作为希特勒私人法律顾问为其出席了诸多诉讼。在希特勒“夺权”后，弗兰克成为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以及负责统筹各州司法的帝国专员。此外，从1934年到“第三帝国”末期，他还担任不涉及具体领域的帝国部长。

1939年10月，希特勒任命这位党内法学家为尚未并入帝国的波兰西部的总督。弗兰克在位于克拉科夫 (Krakau) 的瓦维尔山 (Wawel) 上的办事处，也就是波兰国王的古老城堡里建立了一个恐怖政权，令迄今为止所有已知的德国在占领区的统治方式都黯然失色。“弗兰克的举止就像个狂妄自大的君主”，前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 (Ulrich von Hassell) 在1939年12月底写道。^[81]

从第一天起，这位直接听命于希特勒的总督就发布了许多命令，目的只有一个：无所顾忌地榨干该国的资源，把波兰人压迫为受奴役的民族，并剥夺任何反抗的可能性。他在1940年1月宣布：“我与波兰人的关系就像蚂蚁与蚜虫的关系。”^[82]尤其是落在德国人统治下的170万犹太人遭受了肆无忌惮的恐怖对待。1941年12月12日，希特勒在帝国与省党部领导人大会上为屠杀欧洲犹太人开了绿灯，弗兰克在四天后对总督府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和你们开诚布公地说，必须解决犹太人 (……)。先生们，我必须请您收起所有同情心。无论何时何地遇见犹太人，都必须消灭他们。”^[83]“莱因哈德行动 (Aktion Reinhardt)” 中涉及的三处灭绝营——贝尔泽克 (Belzec)、索比堡 (Sobibor)、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都位于总督府辖区内。

1942年在这里被杀害的人比在作为种族灭绝代名词的奥斯威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的还要多。[\[84\]](#)

汉斯·弗兰克肆无忌惮地搜刮艺术珍品和其他财产。在追求奢华和无耻敛财方面，他和妻子布里吉特完全可以与腐败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相提并论。[\[85\]](#)当红军1944年8月占领总督府的三分之二时，他就已经命人将掠夺的财产转移走。他本人于1945年1月17日，即苏联军队占领克拉科夫的前一天逃离了瓦维尔山。他的逃亡路线经过布雷斯劳前往上西里西亚的塞乔（Seichau），到达曼弗雷德·冯·里希霍芬伯爵（Graf Manfred von Richthofen）的城堡，然后在1月23日从那里出发前往上巴伐利亚。尽管弗兰克的统治区已不复存在，但他在施里尔湖畔的诺伊豪斯建立了“波兰总督府分部”。在这里，在“贝尔格弗里登别墅”中，他还收集了许多掠夺来的画作，其中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伦勃朗和鲁本斯的作品。[\[86\]](#)当美国士兵5月4日抓到他们时，他们没收了这些艺术品。在将其押送入狱时，他受到美军彩虹师的虐待。对于这些美国士兵来说，达豪集中营的恐怖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他们便将恐惧和怒气发泄到这位囚犯身上。弗兰克曾多次尝试自杀并于5月20日被带到卢森堡公国的巴特蒙多夫（Bad Mondorf）[\[87\]](#)，在那里他与其他纳粹高官一起被拘禁，直到1945年8月底被转移到纽伦堡司法宫的监狱。[\[88\]](#)

*

“下午2点——警报——美国人！”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在1945年5月4日写道。“一支美国前线部队接管了旅馆，并把我們保护起来。我们解放了！”[\[89\]](#)许士尼格和妻子以及年幼的女儿属于一个由来自17个国家的137名囚犯组成的“特殊囚犯”团体，希姆莱命人在4月的最初几周将他们从各个集中营带到达豪集中营。这名党卫队头目这样做的意图并不明确。看来他认为可以

把这些名人当作人质，从而在与西方达成单独协议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90]这些外国囚犯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如法国前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彼得·丘吉尔（Peter Churchill）上尉，据称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子；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工西吉斯蒙德·佩恩·贝斯特（Sigismund Payne Best），他因被怀疑发起1939年11月8日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暗杀希特勒行动而被党卫队逮捕；意大利将军桑特·加里波第（Sante Garibaldi）及其参谋部军官；荷兰前战争部长扬尼斯·约翰内斯·科尼利斯·范·迪克（Jannes Johannes Cornelis van Dijk）；希腊陆军元帅亚历山德罗斯·帕帕戈斯（Alexandros Papagos）及其参谋部高官；匈牙利前总理米克洛什·卡拉伊（Miklós Kállay）；匈牙利临时国家元首之子小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ós Horthy Jr.）。

被拘禁的德国名人包括工业家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和其妻子，他们于1933年离开德国，在德国占领法国后被捕；前帝国经济部长兼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和前陆军总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Franz Halder），他们都是因为与1944年7月20日未遂的暗杀行动有关而被捕；天主教中央党政治家、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和内阁国务秘书赫尔曼·彭德（Hermann Pünder，他于1945年10月接替阿登纳成为科隆市长）；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牧师，他自1938年以来作为希特勒的“私人囚犯”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之后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此外，还有36名所谓的“受株连的战俘”，其中大部分是7月20日之后被捕的，包括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和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91]的亲人。^[92]

4月27日晚，必须将这些“特殊囚犯”运送走。凌晨2点左右，五辆大巴车往南行驶。没有一名囚犯知道要去向哪里，以及他们将迎来

怎样的命运。赫尔曼·彭德在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内心的矛盾：“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仍然笼罩一切：获得解放还是一——在最后一刻——‘被清算’？”^[93]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海军上将、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将军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牧师已于4月9日在弗洛森堡（Flossenbürg）集中营被处决的消息，以及被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的希特勒暗杀者格奥尔格·埃尔瑟（Georg Elser）也在同一天遭受了同样的命运的消息在囚犯中传开。

负责押送这些囚犯的是一支由55名精锐组成的党卫队小分队，由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埃德加·施蒂勒（Edgar Stiller）领导。第一站是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特别营地。^[94]仅仅两天后他们就已爬到布伦纳（Brenner）山口。队伍离起点越远，党卫队士兵就变得越紧张，而囚犯面对他们就越有信心。“对党卫队的恐惧和尊敬像阳光下的雪一样融化掉了（……）”歌舞表演艺人伊莎·维梅伦（Isa Vermehren）回忆说，在她的弟弟埃里希·维梅伦（Erich Vermehren）——一名在伊斯坦布尔的守军特工于1944年投降英国后，她和家人作为“受株连的战俘”被逮捕。“党卫队在这段时间显然失去了脚下支撑的土地。当人们对他们的恐惧消失，他们也就失去了权力意识，很明显，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和镇定力。他们整天躲在幕后，遇到人时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假装这里的所有事情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计划的实施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不断推进。”^[95]显然，这些党卫队士兵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名人囚犯。他们似乎没有接到明确的命令。赫尔曼·彭德观察到：“我们好几次看到他们站在一起窃窃私语，检查并交换电报和名单。”^[96]

4月29日，队伍抵达南蒂罗尔（Südtirol）普斯特山谷（Pustertal）的尼德多夫村（Niederdorf）。大多数党卫队士兵离开了，声称是去寻找临时住处，但实际上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囚犯们仍

留在大巴车上。在经过数小时的煎熬等待之后，他们决定自行前往村庄，留下来的几名警卫也没有加以阻止。显然他们已无心恋战。^[97] 在一阵混乱中，波吉斯拉夫·冯·博宁（Bogislaw von Bonin）上校主动出击。因为未遵守“元首命令”，这位前陆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首领和他的两位同僚在希特勒的授意下被捕并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在村庄里，他趁人不注意时与位于博岑（Bozen）的C集团军总参谋长汉斯·勒廷格（Hans Röttiger）将军通上了电话。后者答应立即派遣一队由维查德·冯·阿尔文斯莱本（Wichard von Alvensleben）上尉带领的士兵前往营救。4月30日下午，在一个旅店的大厅里，冯·博宁上校在押运指挥官施蒂勒在场的情况下宣布这些囚犯此后将受国防军保护。^[98] 5月1日，这群囚犯被转移到坐落在海拔1500米处的“布拉耶斯湖（Pragser Wildsee）”运动酒店。而党卫队警卫队在此之前就已经逃走了。

5月4日是这些“特殊囚犯”的最终解放日，这一天，他们眼前的场景与此前完全不同：“无数大大小小的军用车辆驶入宾馆的庭院，它们全都被漆成绿色，并且上面配有盟军星标。酒店入口处和大厅里挤满了士兵，他们是来自美国第五军团的先遣部队（……）。”伊莎·维梅伦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这些美国大兵随意的举止。“士兵们懒散地站在或躺在椅子上，腿翘在面前的桌子上，或者伸得很远，他们的手都深深地插在口袋里，有些人嘴里叼着烟，很多人的唯一动作则是下颌在嚼口香糖时缓慢地上下移动。”^[99]

从党卫队的暴力中获救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仅仅两天后，一名美国将军通知这些囚犯说，他奉命要将他们带往意大利南部。他们乘坐40辆吉普车穿过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路到达维罗纳。已有五架飞机在那里等候，目的是将他们带往那不勒斯。从那里他们再被带到卡普里岛，隶属于国际囚犯联合会的德国成员被安置在那里的天堂酒店（Hotel Paradiso），并接受详细问询。又过了四

周，伊莎·维梅伦才得以返回家乡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法兰克福的这十四天，是我们归乡途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过去的十二年里遮挡在这个国家之前厚重的帷幕似乎终于被拉开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也终于暴露出来了。”^[100]

[1] 1945年5月4日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6。

[2] KTB-OKW, Bd. IV, 2, S. 1472 (v. 4. 5. 1945) .

[3] 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49 f.;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5。

[4] 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50 f.;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66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84 f.。

[5] 1945年5月4日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6 f.。

[6] Montgomery: Memoiren, S. 380.

[7] Montgomery: Memoiren, S. 380 f.。英语版本投降书复制本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9。德语译本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38, 也见于KTBOKW, Bd. IV, 2, S. 1670 f.。

[8] KTB-OKW, Bd. IV, 2, S. 1278 (v. 5. 5. 1945) .

[9] 参见Herbert: Best, S. 408, 429-434。

[10] 参见KTB-OKW, Bd. IV, 2, S. 1674 f.; Kesselring: 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 S. 420 f.;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34 f.;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36 f.。

[11] 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679-683 (引文见S. 682 f.)。距离易北河不远的Klietznick村的一位居民在1945年5月4日写道：“士兵不断地经过这里。为了穿过易北河最终到达美国人那里，他

们取走所需的物资。他们把谷仓的墙和门做成木筏。不择手段地自救。”1945年5月4日Ruth Bodensieck日记；

<https://www.volksstimme.de/nachrichten/lokal/genthin/1472844Aufdem-Weinberg-wird-die-weisse-Fahne-gehisst.html>。

[12] 此处原文疑有误，应为第101空降师。——编者注

[13] 参见Albert A. Feiber: Der lange Schatten Adolf Hitlers. Der Obersalzberg 1945–2005, in Volker Dahm/Albert A. Feiber/Hartmut Mehringer/Horst Möller (Hrsg.): Die tödliche Utopie. Bilder, Texte, Dokumente. Daten zum Dritten Reich, 6. Aufl., Berlin 2011, S. 672; Florian M. Beierl: Hitlers Berg. Licht ins Dunkel der Geschichte. Geschichte des Obersalzbergs und seiner geheimen Bunkeranlagen, 4. Aufl., Berchtesgaden 2015, S. 142.

[14] 其更广为人知的中文译名为马琳·黛德丽。——编者注

[15] 参见Ulrich Chaussy: Nachbar Hitler. Führerkult und Heimatzerstörung am Obersalzberg, Berlin 1995, S. 163; Beierl: Hitlers Berg, S. 142; Feiber: Der lange Schatten Adolf Hitlers, S. 672。关于让·迦本，参见Karin 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Der Traum von der neuen Frau, München 2011, S. 411。

[16] 亦可参见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M. 2013, S. 673–704; ders.: Adolf Hitler, Bd. 2, S. 484–499; Heike Görtemaker: Hitlers Hofstaat. Der innere Kreis im Dritten Reich und danach, München 2019, S. 156 ff.。

[17]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37–943; Hellmut Schöner (Hrsg.): Die verhinderte Alpenfestung. Das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m Raum Berchtesgaden–Bad Reichenhall–Salzburg, Berchtesgaden 1996, S. 5–75; Dwight D. 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Amsterdam 1948, S. 457 f.。

[18] Christa Schroeder: Er war mein Chef. Aus dem Nachlass der Sekretärin von Adolf Hitler, 3. Aufl., München 1985, S. 212.

[19] 参见Beierl: Hitlers Berg, S. 123-129; Feiber: Der lange Schatten Adolf Hitlers, S. 663。参见Karl Koller: Der letzte Monat. 14. April bis 27. Mai 1945. Tagebuchaufzeichnungen des ehemaligen Chefs des Generalstabs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Esslingen-München 1985, S. 85 (v. 25. 4. 1945): “根据法兰克（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上萨尔茨堡司令官）的表述，上萨尔茨堡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戈林的房子完全没了。元首的房子被炸掉一半，鲍曼的房子也被摧毁了。”

[20] Schroeder: Er war mein Chef, S. 213.

[21] Josef Geiß: Obersalzberg. Die Geschichte eines Berges von Judith Platter bis heute, 20. Aufl., Berchtesgaden 2016, S. 158。参见Feiber: Der lange Schatten Adolf Hitlers, S. 676 f.; Chaussy: Nachbar Hitler, S. 162。

[22] 参见Schroeder: Er war mein Chef, S. 214-216。

[23] 参见Lee Miller: Krieg. Mit den Alliierten in Europa 1944-1945. Reportagen und Fotos. Hrsg. von Antony Penrose, Berlin 2013, S. 229-233 (mit dem Foto auf S. 232)。参见Elisabeth Bronfen/Daniel Kampa (Hrsg.): Eine Amerikanerin in Hitlers Badewanne. Drei Frauen berichten über den Krieg: Margaret BourkeWhite, Lee Miller und Martha Gellhorn, Hamburg 2015, S. 132, 297 f.。

[24] Miller: Krieg, S. 246.

[25] A.H. 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26] Miller: Krieg, S. 247 f.。

[27] 参见Klaus Mann: Tagebücher 1944 bis 1949. Hrsg. von Joachim Heimannsberg, Peter Laemmle und Wilfried F. Schoeller, München 1991, S. 82 (v. 8. 5. 1945)。

[28] Klaus Mann: Hitler ist tot, 收录在他本人所著的Auf verlorenem Posten. Aufsätze, Reden, Kritiken 1942-1949. Hrsg. von Uwe Naumann und Michael Töteberg, Reinbek bei Hamburg 1994, S. 211-215。上文描述的情况也可参见Uwe Naumann (Hrsg.): “Ruhe gibt es nicht bis zum

Schluss.” Klaus Mann (1906–1949). Bilder und Dokumen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9, S. 272–294.

[29] Klaus Mann an Thomas Mann, 16. 5. 1945, in Klaus Mann: 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M. 1963, S. 429.

[30] 参见Feiber: Der lange Schatten Adolf Hitlers, S. 679 f., 699 f. (引文见S. 680); Chaussy: Nachbar Hitler, S. 167, 171–174.

[31] Anneliese Poppinga: Meine Erinnerungen an Konrad Adenauer, Stuttgart 1970, S. 253.

[32] 参见Hans-Peter Schwarz: Adenauer, Bd. 1: Der Aufstieg 1876–1952, München 1994, S. 343–424, 以及Hans Peter Mensing (Bearb.) 详细的文档集Adenauer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1.

[33] 参见Schwarz: Adenauer, Bd. 1, S. 428–434。关于Oppenhoffs的谋杀, 参见Taylor: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S. 73–75, 79–87。

[34] Konrad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1965, S. 21。参见Stephen Spender关于被摧毁的科隆的生动报道: Deutschland in Ruinen. Ein Bericht, Heidelberg 1995, S. 36–39。在第71–73页有一张阿登纳的肖像: “他看起来十分年轻, 像一位成功、礼貌的男性一样沉静、自信。” (S. 71)

[35] Konrad Adenauer an Hans Rörig, 5. 7. 1945; zit. nach Schwarz: Adenauer, Bd. 1, S. 447.

[36] 参见Konrad Adenauer an Hans Rörig, 5. 7. 1945; zit. nach Schwarz: Adenauer, Bd. 1, S. 430, 442–444, 472。

[37] Adenauer: Erinnerungen 1945–1953, S. 34–37; 参见Schwarz: Adenauer, Bd. 1, S. 469–471。

[38] Schwarz: Adenauer, Bd. 1, S. 477.

[39] Jacob Kronika: Der Untergang Berlins, Flensburg–Hamburg 1946, S. 188 (v. 4. 5. 1945)。参见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S.

184 (v. 3. 5. 1945)：“苏联人一直拒绝碰德国人的尸体，但却忙着处理自己的尸体，用干净的墓地、红星和其他奖章、鲜花以及巨大的铭牌加以装饰。”

[40] 参见Hans Mahle的回忆，见Krauss/Küchenmeister (Hrsg.)：Das Jahr 1945, S. 65-77 (此处见S. 70)；Kronika: Der Untergang Berlins, S. 200 (v. 10. 5. 1945)。

[41]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S. 31 (v. 7. 5. 1945)。

[42] 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S. 107 (v. 4. 5. 1945)。参见Felsmann u. a. (Hrsg.)：Backfisch im Bombenkrieg, S. 272 (v. 6. 5. 1945)：“打水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43]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89 (v. 4. 5. 1945)。

[44] Kronika: Der Untergang Berlins, S. 189 (v. 4. 5. 1945)。

[45] 此处应指手表，钟表的德语为Uhr。

[46]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89 (v. 4. 5. 1945)。参见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S. 118 (v. 6. 5. 1945)：“大部分苏联人还不会骑自行车，路上有各种奇怪的练车行为，而很多自行车已经完全或部分损坏了。”

[47]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97 (v. 14. 5. 1945)。参见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S. 194 (v. 11. 5. 1945)：“还没等苏联人从房子里出来，就已经有德国人等着抢夺能碰到的所有东西。”

[48] Ursula Büttner/Angelika Voß-Louis (Hrsg.)：Neuanfang auf Trümmern. Die Tagebücher des Bremer Bürgermeisters Theodor Spitta 1945-1947, München 1992, S. 100 (v. 2. 5. 1945)。参见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S. 140 (v. 27. 5. 1945)：“所有权意识已经完全消失了。”

[49] 蒂尔加滕区靠近柏林市中心，达勒姆区则位于柏林西南郊区，两地相距大约8.7公里。——编者注

[50] 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S. 187 (v. 6. 5. 1945) .

[51]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S. 29 (v. 4. 5. 1945) .

[52] Erik Reger: Zeit des überlebens. Tagebuch April bis Juni 1945, Berlin 2014, S. 76 (v. 2. 5. 1945) , 102 (v. 20. 5. 1945) .

[53] 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S. 117 (v. 6. 5. 1945) 。参见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S. 26 (v. 3. 5. 1945) : “客观看来, 我们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戈培尔在哪里, 戈林在哪里? 邓尼茨从哪里 ‘下达命令’ ? 在柏林投降的究竟是谁? 我们什么都没听说。”

[54] Fritz Klein: Drinnen und draußen. Ein Historiker in der DDR. Erinnerungen, Frankfurt/M. 2000, S. 97.

[55]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25 (v. 2. 5. 1945) .

[56]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88 (v. 2. 5. 1945) .

[57] Höcker: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S. 32 f. (v. 15. 5. 1945) , 36 f. (v. 17. 5. 1945) , 40 (v. 8. 6. 1945) , 41 (v. 28. 6. 1945) 。参见Boveri: Tage des überlebens, S. 135 (v. 12. 5. 1945) : “进展过快, 令人惊讶 (.....) 在 Friedenau的一些街道已经通了水和电; 四条电车线路的部分路段已经重新运营 (.....) 。”

[58] 出自赫尔穆特·施密特在1945年5月3日的随身日志; 援引自Hartmut 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Vernunft und Leidenschaft, München 2003, S. 166.

[59] Helmut Schmidt u. a.: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Berlin 1992, S. 214.

[60] Helmut Schmidt u. a.: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Berlin 1992, S. 219.

[61] Sabine Pamperrien: Helmut Schmidt und der Scheißkrieg. Die Biographie 1918–1945, München–Zürich 2014, S. 247 f.; 参见Helmut

Schmidt u. a.: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Berlin 1992, S. 161, 221, 261.

[62] Schmidt u. a.: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S. 221.

[63] 参见Jörg Ganzenmüller: Das belagerte Leningrad 1941–1944, 2. Aufl., Paderborn 2007, S. 32 ff., 64 ff.。

[64] 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S. 105; 参见Pamperrien: Helmut Schmidt und der Scheißkrieg, S. 219.

[65] Helmut Schmidt/Fritz Stern: Unser Jahrhundert. Ein Gespräch, München 2010, S. 79.

[66] 参见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S. 152–159; Pamperrien: Helmut Schmidt und der Scheißkrieg, S. 259–267。

[67] 参见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S. 159 f., 166。

[68] 参见与策展人Hannes Heer的圆桌对话纪要：“我们以为，我们能保持正派。” in DIE ZEIT v. 3. 3. 1995。

[69] Taschenkalender v. 1. 7. 1945; 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S. 163.

[70] Schmidt u. a.: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S. 234.

[71] Taschenkalender v. 12. 5. 1945; Soell: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S. 161.

[72] 亦可参见Rüdiger Overmans: “Ein untergeordneter Eintrag im Leidensbuch der jüngeren Geschichte” ? Die Rheinwiesenerlager 1945, in Volksmann (Hrsg.):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S. 259–291; ders.: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Hrsg.):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 10/2, München 2008, S. 417–421; Lowe: Der wilde Kontinent, S. 149–152。关于雷马根集中营, 参见Winfried Becker: Die Brücke und die Gefangenenlager von Remagen. über die Interdependenz

eines Massenschicksals im Jahre 1945, in ders. (Hrsg.) : Die Kapitulation von 1945 und der Neubeginn in Deutschland, Köln-Wien 1987, S. 44-71。

[73] Hansheinrich Thomas/Hans Hofmeister: Das war Wickrathberg. Erinnerungen aus den Kriegsgefangenenlagern des Rheinlands, Minden 1950, S. 15; 援引自Overmans: Die Rheinwiesenlager 1945, S. 264。

[74] Marzell Oberneder: Wir waren in Kreuznach. Eindrücke und Bilder aus den Kriegsgefangenenlagern Kreuznach und St. Avold, Straubing 1954, S. 102; 援引自Overmans: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Kriegsgefangenen, S. 420。

[75] Fritz von Hellweg: Rheinwiesen 1945, Wuppertal 1951, S. 81; 援引自Overmans: Die Rheinwiesenlager 1945, S. 272。

[76] 参见James Bacque: Der geplante To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gern 1945-1946. Erweiterte Ausgabe, Frankfurt/M.-Berlin 1994。

[77] 参见Arthur L. Smith: Die “vermißte Million”. Zum Schicksal deutscher Kriegsgefangen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2, S. 86。雷马根到1945年4月底接纳了169036名战俘，预计死亡人数达到1200人。参见Becker: Die Brücke und die Gefangenenlager von Remagen, S. 56, 70。

[78] 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S. 445。

[79]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München 1953, S. 428。亦可参见Dieter Schenk: Hans Frank. Hitlers Kronjurist und Generalgouverneur, Frankfurt/M. 2006, 此处见S. 370 f.。

[80]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S. 39 f.; 参见Schenk: Hans Frank, S. 48。

[81] Ulrich von Hassell: Vom andern Deutschland. Aus den nachgelassenen Tagebüchern 1938-1944, Frankfurt/M. 1964, S. 99 (v. 25. 12. 1939) .

[82] 援引自Schenk, Hans Frank, S. 158。

[83] 援引自Schenk, Hans Frank, S. 232 f. 。

[84] 参见Stephan Lehnstaedt: Der Kern des Holocaust. Bełżec, Sobibór, Treblinka und die Aktion Reinhardt. München 2017。

[85] 参见Schenk: Hans Frank, S. 243-253。

[86] 参见Schenk: Hans Frank, S. 360-369。

[87] 也称作蒙多夫莱班 (Mondorf-les-Bains)。——编者注

[88] 参见Schenk: Hans Frank, S. 372 f. 。

[89] Kurt von Schuschnigg: Ein Requiem in Rot-Weiß-Rot, Zürich 1946, S. 503.

[90]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875。

[91] 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 (1884~1945): 德国律师、政治家, 曾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 企图推翻希特勒纳粹统治, 后被纳粹以叛国罪处死。

[92]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875; Benz/Distel (Hrsg.): Der Ort des Terrors, Bd. 2, S.268 f., 353 f.; Hans Otto Eglau: Fritz Thyssen. Hitlers Gönner und Geisel, Berlin 2003, S. 259 f.; Christopher Kopper: Hjalmar Schacht. 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gstem Bankier, München-Wien 2006, S. 353。

[93] Hermann Pünder: Von Preußen nach Europa. Lebens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68, S. 175.

[94] 参见Benz/Distel (Hrsg.) : Der Ort des Terrors, Bd. 2, S. 353 f.。

[95] Isa Vermehren: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Ein Bericht (10. 2. 44 bis 29. 6. 45), Hamburg 1948, S. 181 f.

[96] Pünder: Von Preußen nach Europa, S. 176.

[97] 参见Vermehren: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S. 187.。

[98] 参见Vermehren: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S. 187-189; Eglau: Fritz Thyssen, S. 261 f.。

[99] Vermehren: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S. 205.

[100] Vermehren: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S. 230.。

1945年5月5日

5月5日，邓尼茨召见了他最亲近的同事，外交部部长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和希特勒的前军备部长施佩尔。最重要的议程是：“讨论政府和内阁组建问题。”^[1]最初，这位海军元帅有些犹豫不决，鉴于有限的行动范围，他不确定正式组建政府是否仍有意义。但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说服了他这样做的必要性。他认为，只能通过填补部门空缺来处理当今的紧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减轻难民的苦难、保障民众的粮食供应以及重新启动交通和经济活动。因此，最终决定成立一个由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领导的“帝国临时政府（Geschäftsführende Reichsregierung）”。但是，科洛希克拒绝了邓尼茨想要授予他的帝国总理头衔。他称自己为“首席部长”。为了强调新政府的临时性，部长们未经过正式任命，只是受命承担“事务的领导工作”。^[2]

在挑选部长时，应当只将专业能力作为决定性因素。但是实际上，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任用的人基本上都是1945年4月底逃往“北部地区”的部长和国务秘书，其中还包括一些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人。他本人除了担任帝国外交部部长，还兼任自1932年以来一直担任的财政部部长一职。他身边有两位国务秘书：曾担任德国总理府秘书长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钦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担任过国务秘书的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以及古斯塔夫·阿道夫·斯特恩格拉赫特·冯·莫伊兰德（Gustav Adolf Steengracht von Moyland），他在1943

年3月底接任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外交部国务秘书的职位。魏茨泽克的职业生涯要归功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后者于1936年带魏茨泽克一同到伦敦大使馆工作，并在1938年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长后，将魏茨泽克招至外交部担任使馆秘书。[\[3\]](#)

威廉·施图卡特（Wilhelm Stuckart）承担德国内政和文化部部长的职责。这位法学博士曾作为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的国务秘书，是制定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和之后的一系列相关法令的主要参与者。他起草了《关于奥地利和德国重新统一法》（Gesetz zur Wiedervereinigung Österreichs mit dem Deutschen Reich）以及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帝国保护国的法令。1942年1月20日，他参加了万湖会议，在该会议上，帝国安全部部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以及当局高层代表在“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上达成了一致。弗里克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希姆莱自1943年8月起接任内政部长后，施图卡特继续以冷酷的管理者身份充当其得力助手，并被提升至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4\]](#)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任命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承担帝国粮食、农业和林业部长的职责，其职业生涯同样不光彩。这位农学硕士自1933年10月起担任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Walter Darré）的国务秘书。他在该岗位上主要推动了1941年春季施行的冷酷的“饥饿计划”，导致苏联德占区3000万平民的死亡。当时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你知道，在德国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我这样始终按照元首的旨意行事。”[\[5\]](#)在1942年5月达雷告假后，巴克最初成为其临时继任者，之后在1944年4月正式接管部长一职。希特勒在他的遗嘱中也任命其继续担任该职。[\[6\]](#)

协助巴克在邓尼茨内阁中国务秘书工作的是汉斯-约阿希姆·里克（Hans-Joachim Riecke）——他也是一位农学硕士，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作为戈林东部经济参谋部粮食和农业部门负责人，他也参与了对苏联德占区进行经济剥削的残酷计划。在达雷卸任后，他成为级别在巴克之下的帝国粮食和农业部国务秘书。他在弗伦斯堡继任该职务的事实表明，以前的关系仍然发挥很大作用。[7]

即使是时年75岁、被科洛希克任命为帝国交通部部长以及邮政部部长的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多普穆勒（Julius Heinrich Dorpmüller）也绝非1945年后总被人赞誉的那样，是与政治不相关的专业人士。这位帝国铁路的总指挥在1933年3月向铁路工人发出呼吁，宣布无条件隶属“国家政府”，他于1938年2月被希特勒任命为交通部部长。但是直到三年后，他才加入纳粹党。在战争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满足国防军对德国铁路日益增长的要求。他对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往东部灭绝营负有责任。其国务秘书阿尔伯特·甘岑穆勒（Albert Ganzenmüller）更是如此。党卫队全国副指挥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在1942年8月13日的一封信中感谢其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我非常高兴地从您那儿得知，14天以来每天都有一列载有5000名被选中民族的成员的火车驶往特雷布林卡，用这种方式我们能够大大加快这样的人口流动。”[8]

继续担任帝国劳动部部长并兼任社会部长职责的弗朗茨·泽尔特（Franz Seldte）政治上也并不干净。他在1914年自愿参军，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Somme-Schlacht）中失去了一只手臂，1918年12月他成立了“钢盔前线士兵联盟（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作为该组织的主席他极力反对魏玛共和国。1929年，他和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缩写为DNVP）主席、传媒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以及纳粹党主席阿道夫·希特勒共同参与反对“杨格计划（Young-

Plan) ”^[9]的运动，1931年10月参与反民主右派“哈尔茨堡前线 (Harzburger Front) ”的集会活动。在为使希特勒1933年1月登上总理宝座的权谋诡计中，泽尔特与弗朗兹·冯·帕彭以及胡根贝格一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回报，他得以作为帝国劳动部长进入希特勒的“民族集中内阁 (Regierung der nationalen Konzentration) ”。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担任该职务。最近研究表明，他领导的劳动部比之前人们所以为的更多地参与了纳粹政权及其犯罪活动，主要罪行是在欧洲的德占区招募强制劳工。^[10]

阿尔伯特·施佩尔也在“帝国临时政府”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事。这位希特勒曾经的爱将早在4月30日就来到邓尼茨的总部，考虑到为战后的职业生涯铺路，他选择从此一直留在海军元帅的身边。施佩尔承担的是帝国经济和生产部长的职能。几天后，他就离开了共同的办公区“帕特里亚号”驳船，搬到了几公里外的格吕克斯堡水上城堡 (Wasserschloss Glücksburg)，这是梅克伦堡公爵提供给他，此举凸显了施佩尔的特别地位。他把那里安排得很方便——他的副官曼弗雷德·冯·波瑟 (Manfred von Poser) 和卡尔·克利维尔 (Karl Cliever) 以及秘书安妮玛丽·肯普夫 (Annemarie Kempf) 和伊迪丝·马圭拉 (Edith Maguira) 也陪同他在那里。每天早上，施佩尔都驱车前往弗伦斯堡参加内阁会议。^[11]

经济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是奥托·奥伦多夫 (Otto Ohlendorf)。邓尼茨内阁成员应该几乎都不清楚，这位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从一开始就参与了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的“巴巴罗萨”行动，他在苏联南部领导的D特别行动队造成了至少9万人被杀害。因此，他是罪行最严重的战犯之一。^[12]除担任帝国安全部领导，负责“帝国消息”秘密舆论报告外，奥伦多夫还从1943年起担任由瓦尔特·冯克 (Walther Funk) 领导的经济部的司长和副国务秘书，主要负责制定战后经济规

划。在施佩尔看来，这一经历显然令他有资格在弗伦斯堡担任新职务。

奥伦多夫并没有仅仅以经济专家的视角来分享经验，他还向邓尼茨提议，可以将与他一同迁到“北部地区”的那部分职位作为基础来建立一个新的德国情报部门。根据行政令，几天后设立的“情报办公室”主要负责获取和评估来自国内外的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及出版和传播政府的声明及命令。与其他人力严重不足的部门相比，“情报办公室”的配置十分充足，由59名官员和军官以及大约170名士官、士兵和工作人员组成。这意味着“帝国临时政府”的工作人员主要由来自帝国安全局的情报人员组成。[\[13\]](#)

这绝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相反，原先掌权的纳粹精英仍然延续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盟军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把弗伦斯堡的“帝国临时政府”当作真正的谈判对象。

*

1945年5月5日早晨，捷克广播电台主持人用一个混合了捷克语和德语的奇怪句子开启当天的节目：“Je sechs hodin”（现在是六点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主持人只说捷克语。他故意无视了德国台长的指示，即所有节目应继续用两种语言播放。旨在结束德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统治的布拉格起义（Prager Aufstand）由此开始。[\[14\]](#)

自1944年夏天以来，随着希特勒德国的军事败局开始显现，捷克人民的抵抗运动不断加剧。游击队对铁路线和其他重要设施的袭击不断增加。国务秘书卡尔·赫尔曼·法兰克（Karl Hermann Frank），同时也是保护国高阶党卫队领袖兼警察部长，对此进行了强力镇压，企图通过杀鸡儆猴的惩罚和大规模的恐吓行动来阻止捷克人民的起

义。法兰克在1945年4月8日呼吁：“任何意在挑起内部动荡的企图（……）都将被扼杀在萌芽中。”“在保护国之中充满了和平与秩序，领导层坚强有力，我们的神经和意志如钢铁般坚固，我们不会失去或放弃任何东西，决不。”^[15]

但是法兰克未能如愿，1945年4月底，暴乱几乎充斥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全境。红军对柏林的包围以及西线盟军迅速进军，表明了战争即将结束。4月30日晚，国务部长法兰克在布拉格广播电台面向“捷克同胞”发表讲话：捷克人民被敌方电台和传单等“各种手段的诡计”所诱使，“在背后偷袭战斗中的帝国”。响应这些口号将导致混乱和内战。法兰克再次警告不要臆测占领者的弱点：“德军武器已装载完毕，那些破坏者将被精准消灭。”^[16]但是法兰克对保护国的爆炸性局势没有抱任何幻想。在5月3日绕道前往弗伦斯堡时，他本人表示，保护国正处于“革命前夕”，“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坚持下去”。^[17]5月4日至5日夜里，他返回布拉格。他的预言实现得比他本人预期的还要快。

5月5日的早间广播令布拉格市民振奋不已，人们纷纷拥上街头。他们拆掉了木板和标志上的德文标志，并在公共建筑上悬挂捷克斯洛伐克的旗帜。在政府部门，捷克雇员取得了领导权并逮捕了德国上司。同时，示威者团体纷纷缴了德国士兵和平民的械。午间，广播大楼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中午12点33分，主持人再次来到麦克风前并大声呼救：“所有人快来捷克广播电台！这里有捷克人被枪杀！快点来！来助我们一臂之力！”^[18]这是武装起义的信号。下午6点多，布拉格广播电台落入起义者手中，而捷克国民委员会（Tschechischer Nationalrat）——一个由多个抵抗团体于1945年2月底联合在一起的组织——向公众发布了宣言：从今天起，国民委员会将作为“捷克人民革命运动的代表”接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职务；保护国不再存在。^[19]夜里11点，布拉格人民被动员起来在整座城市设立路

障，以抵御德军可能的反击。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到5月6日破晓时分，在起义者控制地区已经搭建了约1600处路障。[\[20\]](#)

驻扎在布拉格的党卫队和国防军对此次暴动颇感惊讶。起初，他们仅仅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武装党卫队司令、地区总队长卡尔·弗里德里希·冯·皮克勒-伯格豪斯伯爵

(Carl Friedrich Graf von Pückler-Burghauss)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用尽一切武力手段镇压叛乱。5月5日晚，他就向中央陆军总司令费迪南德·舍纳尔元帅的总部发送电文，要求炸毁历史悠久的布拉格市中心：“许多燃烧弹。必须烧毁整个巢穴。”[\[21\]](#)

5月6日早晨，武装党卫队战斗部队开始向布拉格郊区进军，其中就有1944年6月在法国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村庄犯下大屠杀罪行的第4装甲掷弹兵团。他们在前进过程中犯下了许多暴行，例如将平民赶到他们面前做肉盾。同时，德军飞机投下传单，要求布拉格市民“在战斗、破坏和毫无意义的流血牺牲，和宁静、秩序、维护福祉直到建立新的秩序”之间作选择。[\[22\]](#)

布拉格起义的消息直到5月6日上午10点才传到弗伦斯堡。邓尼茨立即命令中央陆军“尽可能快地向西移动，以解救尽可能多的德国士兵。”[\[23\]](#)前一天，舍纳尔元帅还在告诫他的士兵，“在我们帝国最困难的日子里，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害怕胆怯”，“我们的纪律和手中的武器是我们体面而勇敢地度过这场战争的保证”。[\[24\]](#)现在他赶紧执行收到的紧急撤军命令。为此，通往布拉格的交通必须保持畅通，这也是舍纳尔敦促正在进军捷克首都的党卫队加紧步伐的原因。通往内城的街道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起义者的处境变得危险。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巴顿将军的美军第3集团军上，该部队于5月6日占领了距离布拉格仅大约100公里的西波希米亚城市皮尔森(Pilsen)。起义者们不知道的是，美国与苏联领导人已就分界线达成协议，将其设定在距

离捷克首都70公里的地方，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准备严格遵守这一协议。^[25]



1945年5月5日至6日夜里，布拉格起义期间搭建的众多路障之一。
(IMAGNO/Votava/dpa Picture-Alliance, Frankfurt/Main)

但是起义者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援助。1944年11月，德国人组建了一支由苏联志愿军组成的部队，指挥官是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j Wlassow）中将，因此该部队也叫弗拉索夫军队，原本应该支持国防军对抗苏联。1945年4月中旬，弗拉索夫第1师共2万人在谢尔盖·库兹米奇·本雅琴科（Sergei Kusmitsch Bunjatschenko）将军的率领下转移至保护国。5月6日，该师临阵倒戈，转而支持起义者的战斗。当时的传单上写道：“我们作为苏联士兵，为捍卫俄罗斯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一步的束缚，不能在捷克人民的这场斗争中袖手旁观。”^[26]本雅琴科将军的动机是完全利己的。他认为，通过支持起义，他和他的士兵将有机会不被红军俘虏。显

然，他最初也没有料到美国人会停止他们在波希米亚西部前进的步伐，并将解放布拉格的任务交给苏联军队。5月6日中午，本雅琴科的部队分成三列，驾着坦克和大炮进驻了这座城市。他们成功阻拦了武装党卫队的袭击，并将其从若干城区赶了出去。

弗拉索夫军队的干预在捷克国民委员会引发了争议。该委员会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苏联和斯大林的叛徒。只是情况紧急，他们才最终同意接受援助，但是他们却于5月7日早上在布拉格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弗拉索夫将军针对德国武装部队的行动”是“其部队自己的事务”，捷克国民委员会“与其没有任何政治协商”。^[27]本雅琴科将军非常生气，当他当晚听到美军停止向布拉格进军的消息时，他命令师团向西部撤退，在布拉格只留下了几百名士兵支持捷克人继续战斗。

5月8日早晨，布拉格的战斗仍在继续。上午11点左右，国防军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全权代表鲁道夫·图森（Rudolf Toussaint）将军与捷克国民委员会代表开始停战谈判。经过艰难的谈判，下午4点协议达成，规定了包括武装党卫队和警察在内的所有德国武装部队从布拉格及其周边地区撤出的条件。协议还规定，德国的妇女和儿童“如果不跟随部队离开布拉格”，那么应交由国际红十字会保护。^[28]5月8日至9日的晚上，国务部长法兰克携家人离开住所切宁宫（Palais Czernin），后成为美国战俘。1945年8月初，他被移送至布拉格，1946年5月，根据审判结果他被绞死在布拉格潘克拉（Pankrác）监狱的庭院中。^[29]

5月9日上午，红军进驻这座已获得解放的城市。“街头充满着欢欣鼓舞的气氛。人们欢呼高歌。数百只手举起挥舞。（……）每当巨大的装甲车到达时，人群都会欢腾起来”，一位布拉格市民在日记中

记录了这一瞬间。[\[30\]](#)这与1939年3月15日德国国防军进驻捷克首都的反应大不相同。

在5月8日午夜宣布全面无条件投降后，大部分中央陆军士兵被苏联俘虏。到最后一刻都要求部队有铁一般纪律的最后一位陆军总司令舍纳尔元帅乘坐一架费斯勒鹤式轻型联络观测机逃向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几天后，他向美国人自首。他们把他交给了苏联。1952年2月，他被莫斯科最高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但于1954年12月获释。[\[31\]](#)

本雅琴科将军的命运更糟糕。他也被美国人移交给苏联人，然后被带往莫斯科。1946年8月初，他与弗拉索夫将军以及“苏联解放军”的其他七名指挥官一起被处决。200名受伤的弗拉索夫军队士兵在布拉格落入红军手中后被当场处决。[\[32\]](#)

*

留在布拉格的德国人的噩梦开始了。在被德国占领的六年中累积的仇恨引发了血腥的复仇，无论是有罪者还是无辜者，一律难逃此劫。出生于1922年的彼得·德梅兹（Peter Demetz）在布拉格长大，后来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之一。他回想起当时恐怖的日子：“一位老妇人被扔出窗外，一名参加德国乐团巡回演出的音乐家在街上被打死，因为他不会说捷克语；有些人即使不是盖世太保也被吊死，被汽油浇并像火把一样被点燃；愤怒的暴民闯入医院寻找容易伤害的对象（……）；德国人被赶到布拉格的电影院、学校、运动场、车库等许多地方，然后一起被运到附近的中转营地；截至6月，大约有3万人被驱逐出城。‘革命卫队（Revolutionsgarden）’——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市民也称其为‘强盗卫队（Räubergarden）’，二者缩写均为RG——没有区分与占领者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人’和世代在布拉格生活的德国人。”[\[33\]](#)

布拉格发生的事，在1945年5月至7月期间也在原保护区和苏台德地区继续着。捷克士兵、革命卫队和平民四处猎捕德国人，暴力、谋杀和抢劫已成为例行日常。该国政治人物则进一步刺激了激烈的复仇情绪。例如，从英国流亡回来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在苏联军队进驻布拉格三天后宣布：“在这场战争中，德意志民族不再是人，作为人他们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在我们眼中这个民族是一个巨大的人类怪物（……）。我们必须清算共和国中的德国问题。”^[34]尽管并非所有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但现在他们都要为占领军的罪行负责。贝奈斯在接下来几周内发布的法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可能除掉大部分的德国居民。这在战胜国举办的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就已成真。“野蛮驱逐”阶段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它不像名字所描述的那样是完全自发的行为。因为驱逐者通常是根据命令或至少在捷克国家机关的默许下采取行动的。^[35]

5月30日的“布尔诺死亡行军（Brünner Todesmarsch）”标志了其中的一个可悲的高潮：伴随着众多爱看热闹的捷克人的掌声和教堂钟声，大约有26000名德国人，其中大部分为妇女、儿童和老年男性，在基督圣体节那天被迫离开这座城市。在前往奥地利边境的过程中，数百人精疲力竭而死。^[36]在1945年5月至7月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波驱逐浪潮中，共约80万苏台德德国人被驱逐。7月3日，摩拉维亚地区委员会的理事会就可以确定南摩拉维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清除了德国人”。7月10日，身为社会民主党员的副总理兹德涅克·费林格（Zdeněk Fierlinger）在布拉格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说：“像利特梅里茨（Leitmeritz）、奥西格（Aussig）这样的城市，更不用说布尔诺（Brünn）、伊格劳（Iglau）和兹耐姆（Znaim）（……）已重新变成捷克的了。”^[37]中、东欧的驱逐德国人行动持续多年，但再也没有出现比德国占领刚刚结束时更严重的暴行。

1945年5月5日，欧洲盟军总司令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用多种语言向在德国的外国人，即所谓的“流离失所者”发表讲话：“不要离开您所在的区域。请您等待安排。您可以和同国籍的同胞组成小组，并选出代表与盟军代表处谈判。”^[38]

“流离失所者”是欧洲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缩写为SHAEF）在1944年1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首次对“出于战争原因而离开祖国，想要回国或寻找新的家乡，但没有帮助无法做到”的所有“平民”的统称。^[39]这个定义涵盖了来自各国的平民工人和战俘以及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外国囚犯。到战争结束时，共有约1100万这样的“流离失所者”，其中630万人位于西部三大占领区。^[40]

最大的群体即所谓的“外籍工人”，主要为来自波兰和苏联的年轻人，他们在战争期间被强行带到“大德意志帝国”。到1944年9月，外籍劳工人数已增加至760万，其中包括570万平民工人和近200万战俘。在工业和农业劳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国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后，凭借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力，纳粹领导层才得以使战争又延续了超过两年。^[41]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大规模的强迫劳动已成为德国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较大的城市都形成了营地和住宿网络，每位居民都可以看到“外籍工人”被迫去工作或解除炸弹威胁。遭受最恶劣对待的是波兰人和从苏联运送来的“东方工人”。他们不得不遵守特别法令，从而受到了广泛的歧视和社会监控，其中包括佩戴“P”或“Ost”^[42]特殊标记徽章，被关在铁丝网包围的封闭营房中，以及与德国女性存在亲密关系要被处以死刑等。^[43]

时间越临近战争结束，“外籍工人”中的动乱就越明显，也越容易受到强烈的镇压。来自之前欧洲德占区的数百万劳动奴隶有充分的

理由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报复，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激起德国民众的担忧。纳粹当局动用一系列暴力手段对此作出反应。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鲁尔区所有较大城市中有数百名外国人，大多数是“东方工人”，成为盖世太保谋杀令的受害者。^[44]

正如预期的那样，盟军进驻后发生了许多报复行为。美国人总结道：“被强制运送而来的苏联人对德国统治者复仇的愿望最为强烈。”^[45]通常，这些强制劳动者并非毫无选择地报复，而是专门针对曾粗暴对待他们的上司，即工头、营地主管，以及鲁尔区的采矿工长。除针对个人的暴力外，还有抢劫和盗窃。“在德国人手里遭受饥饿和殴打的（外籍）工人在获得解放后不由自主地马上进行掠夺”，1945年4月初，美国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道中写道。^[46]不少流离失所者结成帮派，在营地附近四处游荡，寻找弥补多年苦难的补偿品。美国第9军团的一份报告称：“流离失所者从一个农场跑到另一个农场，有的一组仅几个人，有的能达到三四十人，他们要求交出农产品、衣物，有时甚至是珠宝和其他私人物品。”^[47]桑德博斯特尔（Sandborstel）战俘营在1945年4月底获得解放后，其附近的布雷默弗德（Bremervörde）居民开始面对骚动不安的日子。“市里是怎样的场景！”一位亲历者描述5月3日的情景。“街道上几乎被坦克和士兵堵得水泄不通。与此同时，那些外国人挨个在被摧毁的房屋中进行搜刮和抢劫。”^[48]

尤其在1945年5月初几天里这些流离失所者所犯的罪行在德国公众的认知中有很影响。他们反社会、不受约束的“乌合之众”形象深入人心，而这一行为与纳粹统治下对这些强制劳工的歧视直接相关。在许多德国人心里，关于流离失所者暴动的报道显然不是那么令人不快，因为这样反而可以平息他们残忍对待“东方工人”和苏联战俘所产生的内疚感。从总体上看，流离失所者的犯罪率并不比战后急

剧上升的德国人犯罪率高很多。不过，不管哪里发生犯罪，大家都首先怀疑这些流离失所者。[\[49\]](#)

1945年4月中旬，同盟国决定在解放流离失所者后尽快将他们“遣返”原籍国。当盟军还在进军的路上时，没落的“第三帝国”已陷入普遍混乱，这时已经有西部的强制劳工自发踏上回国之路。《伦敦新闻纪事》(*London News Chronicle*) 4月初报道：“人们可以看到流浪者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有时是十几人一起，所有家当都装在一辆手推车里。有些人穿得像乞丐，有些则穿着破旧的军装组成了十几人的部队。”[\[50\]](#)5月3日，挪威记者西奥·芬达尔在柏林观察到：“外籍劳工排着长长的队步行离开柏林，他们用手推车装着所有物品，插在上面的小小的丹麦、法国、荷兰、比利时国旗欢快地随风飘扬。向西！向西！”[\[51\]](#)

艾森豪威尔5月5日的广播目的在于遏制这些混乱的自发回国行为。大批的流离失所者被安置在所谓的“集合中心”。它们往往是以前的军营、战俘营或强制劳动营地。也有一些被充公的德国人公寓和房屋，而这往往引起原主人的愤怒。1945年5月在埃姆斯兰

(Emsland)的小城哈伦(Haren)，所有居民被要求必须搬出房屋，然后让原波兰的强制劳工和战俘搬进去，但这样的事件只占少数。[\[52\]](#)由于西部三大军事占领区的行政部门负担过重，营地的住宿和照料工作便交由国际援助组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UNRRA)”负责。

盟军占领区的流离失所者所处的境况差异很大。曾经从事农业生产的强制劳工通常比他们曾在军备工厂劳动的难友的状况更好，而后者生活也比获得解放的集中营囚犯好得多。盟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为数以百万计的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并持续改善他们的健康条件。

[\[53\]](#)军事当局在遣返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5月至9月，每天有

33000人从西部三大占领区被送回自己的祖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了约500万人，到了秋天只剩下120万人。^[54]来自西欧的流离失所者产生的问题最少，因为他们都希望尽快回家。而来自波兰的强制劳工尤其抵触回国，原因要么是他们对新的社会主义政权，要么是他们的家乡位于已被苏联吞并的波兰东部。^[55]

遣返苏联的流离失所者也困难重重。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西方盟国与苏联达成一致，即应将所有苏联国民集合在单独的营地，然后遣返苏联，而且根据1945年4月所执行的规定，“可以无视他们的个人意愿”。^[56]到1945年10月1日，共有410万苏联公民被送回；185万来自红军的作战地区，225万由西方盟国移交苏联当局——在很多情况下违背了他们的个人意愿并且动用了武力。因为不少的苏联流离失所者被怀疑曾与纳粹合作。首当其冲的是曾站在德军一方与苏军作战的“志愿者”以及弗拉索夫军队士兵。也有红军士兵被怀疑是“叛徒”，仅仅因为他们曾自愿被俘虏。那些不得不为纳粹战争经济生产军事装备的苏联强制劳工也同样遭遇了不信任。

回国后将面临报复的消息很快传开。于是对强制遣返的抵制情绪更加强了。1945年9月初，在一处位于曼海姆的营地有600名来自乌克兰的流离失所者拒绝被运回苏联。在美国军官同意推迟四天遣返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观察员这样记录道：“所有相关人员都对这个短暂的缓冲期喜出望外，他们亲吻军官和善后救济总署成员的靴子，祈祷着，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感激和喜悦。”^[57]

1946年1月，在原达豪集中营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那里的两个营地被用来安置苏联流离失所者。美国士兵费尽心力劝说囚犯登上一列等候中的火车却徒劳无功。当他们最终冲进营房并使用催泪瓦斯时，许多流离失所者试图自杀。一名美军士兵在军队报纸《星条旗报》上写道：“我们冲进去后发现，在营房里的不是人，他们是动物。美国

士兵迅速剪断了大部分拴在横梁上的人的绳子。那些仍有意识的人用俄语向我们大喊，首先指着士兵的枪支，然后指着自已，恳求我们开枪杀死他们。” [58]



1945年5月初，柏林被解放者占领后，苏联强制劳工欢迎他们的到来。
(akg-images, Berlin)

对一部分返回苏联的人来说，磨难尚未结束。他们最初被关押在“过滤营”中，并受到密集的审查。被发现曾与敌人合作的人被送往劳改营或监狱。那些未受惩罚的人也屡屡遭受歧视。在纳粹德国的非自愿居留被长久地视为污点，他们也被看作二等公民。直到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如何对待“东方工人”成为一个公共问题。莫斯科人权组织“纪念（Memorial）”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大量的采访，原来的强制劳工第一次有机会对所谓的污点进行澄清。 [59] 这一情况又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下的红绿联盟政府 [60] 推动几十年来冷血的德国工业界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以对强制劳工进行个人补偿。 [61]

*

一小部分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则面临着特别的挑战。在后来的西部占领区，只有50000名至75000名犹太人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在获得解放时，许多人已虚弱不堪，且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们失去亲人，无家可归，比其他人更需要帮助和关怀。但是，盟军政府最初对原犹太集中营囚犯的特殊情况缺乏了解。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群体对待，而是不得不与其他非犹太流离失所者挤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中，这勾起了他们在集中营的痛苦回忆。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在1945年夏天受美国外交部门的委托视察美军占领区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他在8月24日给哈里·S. 杜鲁门总统的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关键的判断：“我们似乎像纳粹一样对待犹太人，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不消灭他们。他们被大批地安置在集中营中，这次不是由党卫队，而是由我们的军队看守。我们不禁要问，目睹这一点的德国人是否会猜测，我们在继续执行纳粹政策或至少欢迎纳粹政策。” [62]

该报告迅速改变了当局的想法。于是由犹太人自主管理的纯粹犹太人营地立即建立起来；每天的食物配给显著增加，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也优先获得了住房。杜鲁门在1945年8月31日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中说：“您将赞同我的看法，即我们对目前生活在我们管辖区域曾遭受暴政迫害的人们负有特殊责任（……）。除了我们以何种方式对待留在德国的幸存者，没有更好的机会来证明这一点。” [63]

在德国人中，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群体受到了进一步关注，但是对犹太人的拒绝仍然存在。当时14岁的露丝·克吕格（Ruth Klüger）在经历了泰雷辛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以及格罗斯-罗森（Groß-Rosen）集中营的附属营克里斯蒂安施塔特（Christianstadt）后幸存下来，并在巴伐利亚州的施特劳宾（Straubing）找到了住所。她后来在美国成为一名知名的文

学研究和作家，几十年后她回忆道：“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被压抑到潜意识中去了，但它依然蠢蠢欲动，就像在高级炖锅里面的炖菜，关了炉灶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在沸腾，并保持一定的温度。还能有其他可能吗？幸存者仅依靠自身的存在回忆着逝去的事和那些罪行。” [\[64\]](#)

1946年，随着犹太人不断从东欧拥入，其人数急剧上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与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反犹暴动有关，以1946年7月发生在波兰的凯尔采（Kielce）大屠杀为最高潮。到1946年11月，共有来自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的111139名犹太人在美军占领区寻求庇护。虽然他们并不符合最初定义，但也被赋予了流离失所者的身份。历史学家安吉利卡·克尼格塞德（Angelika Königseder）和朱莉安·韦策尔（Juliane Wetzel）认为：“这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即犹太人悲剧的罪魁祸首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成了最大、最安全的犹太难民避难所。这些人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等待着出境。” [\[65\]](#)

对于绝大多数东欧的犹太幸存者来说，德国的流离失所者难民营只是一个临时居住地；他们想移民到巴勒斯坦，并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移民的梦想不能很快实现。因为英国政府担心犹太移民的增加会激化其托管地内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为此推行了严格的限制性政策。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后，流离失所者难民营对此欢欣鼓舞，他们的等待终于结束了。1949年1月，在美国占领区的48个难民营中仍有64000多名犹太人，而到了11月，9个难民营中只剩下15000名。犹太流离失所者营地逐渐关闭，最后一处难民营，即位于上巴伐利亚的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营地于1957年2月关闭。 [\[66\]](#)

1945年5月5日中午时分，在阿尔伯特·J.科西耶克（Albert J. Kosiek）中士的指挥下，首批美军装甲侦察车抵达上奥地利州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党卫队在几天前离开营地，将看守任务交给了维也纳消防警察和人民冲锋队队员，他们并未抵抗就自行解除了武装。当美国巡逻队开进集合广场时，囚犯们爆发出欢呼声。“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激动”，编号为127371号的囚犯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说。“人们跑向坦克。我也跑了。但是我太虚弱，已经没有力气跑回来了。我是用四肢爬着回来的。”^[67]

毛特豪森集中营是西蒙·维森塔尔辗转多个集中营的痛苦之旅的最后一站。他于1908年出生在加利西亚东部城市布恰奇（Butschatsch），当时该城市仍属于哈布斯堡王国，但1919年后落入波兰手中。他的父亲是制糖业代表，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高中毕业后，维森塔尔在布拉格学习建筑。之后他搬到了伦贝格 [Lemberg，也称利沃夫（Lwiv）]，在那里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1941年6月底，德军进军伦贝格时，仍有16万至17万犹太人居住在此。战争结束时，只有3400人幸存下来，其中就包括西蒙·维森塔尔，而这就像奇迹一般。他在德国入侵几天后就被捕，并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东部铁路的一家火车修理厂。1943年9月，他设法逃离亚诺夫斯卡（Janowska）强制劳动营。之后他躲藏起来，直到1944年6月再次被捕，并乘坐离开伦贝格的最后几班火车之一被运往西部。^[68]

在普瓦舒夫（Plaszow）、格罗斯-罗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番辗转过后，维森塔尔于1945年2月中旬被运往毛特豪森。与达豪一样，由于东部集中营被疏散，这里的住宿人满为患。每周供给的食物越来越差，死亡率高得惊人。^[69]维森塔尔因脚冻伤而不得不在医务室待了两个半月，命悬一线。“每天早晨都有一名看守站在营房门口大声询问前天晚上有多少囚犯‘翘辫子了’”，维森塔尔的传记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和记者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对死亡和解放之间的

紧张赛跑这样描写道。“由于担心传染病和营房里的恶臭，看守们一般不会亲自进去。‘苏联人营房’的囚犯每天能得到一碗快要溢出来的被称作‘汤’的浑浊液体。”^[70]即使解放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因监禁所引发的后果而死。

西蒙·维森塔尔奇迹般地迅速康复了。起死回生后，他前往林茨（Linz）——希特勒度过青年时期的一座多瑙河畔城市。解放后仅几周，维森塔尔就开始着手一项毕生坚持的工作：找到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分子，并将他们送上法庭。1945年5月底，他向位于毛特豪森的“美军营地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提及了近150名纳粹罪犯的八页名单。之后，他为美军行政当局采访犹太幸存者。他从他们口中获得的有关犯罪者和犯罪地点的信息构成了“文献中心（Dokumentationszentrum）”的基础。他在1947年于林茨成立了该中心，之后转移到了维也纳。维森塔尔偶然获悉，与他于1936年成婚的妻子西拉持假护照在索林根（Solingen）强制劳动，也幸存了下来。他们二人在1945年底重聚，并共同制作了一份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亲戚名单，上面一共有89个名字。^[71]

维森塔尔在搜寻纳粹罪证时取得了一些惊人成果。早在1953年，他就告知以色列当局，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隐姓埋名地生活在阿根廷。七年后，艾希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摩萨德（Mossad）情报局特工逮捕，之后被带到以色列，于1962年6月初在耶路撒冷被审判并处决。维森塔尔因参与该行动而闻名。他在1963年找到的知名罪犯包括奥地利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卡尔·约瑟夫·西尔贝鲍尔（Karl Josef Silberbauer），后者于194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逮捕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及其家人。战争结束后，他返回维也纳，在1950年代再度进入警察队伍。针对他的诉讼在1964年戛然而止，这不过是维森塔尔经历过的众多失望中的一次。1967年，他设法找到了逃往巴西圣保罗的特雷布林卡灭绝

营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施坦格尔被引渡到联邦德国，并于1970年12月在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法院的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仅仅六个月以后他在监狱中身亡。^[72]

西蒙·维森塔尔的工作并非没有争议。他被那些很早就想和与纳粹有关的过去划清界限的人蔑称为“纳粹猎人”。诚然，他有时会采用有问题的方式，而且自己常常表现得大惊小怪。但这并不能削弱他的伟大功绩。如果没有他的勇气和毅力，将有更多的纳粹战犯在1945年后逃脱应有的惩罚。正如其传记作家汤姆·塞格夫总结的那样：

“他的一生都在缅怀死者，并与否认他们死亡的人斗争——正如他本人与死亡斗争并且使生命变得圣洁一样。”^[73]

^[1] 1945年5月5日的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9。

^[2]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83 f.;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67 f.。关于“帝国临时政府”的组建亦可参见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42-159。

^[3] 参见Eckart Conze/Norbert Frei/Peter Hayes/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S. 153 f.。

^[4] 参见Hans-Christian Jasch: Staatssekretär Wilhelm Stuckart und die Judenpolitik. Der Mythos von der sauberen Verwaltung, München 2012。

^[5] 援引自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72。

^[6] 参见Götz Aly/Susanne Heim: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Auschwitz und die deutschen Pläne für eine neue europäische Ordnung, Hamburg 1991, S. 366-374; Joachim Lehmann: Herbert Backe-Technokrat und Agrarideologe, in Ronald Smelser/Enrico

Syring/Rainer Zitelmann (Hrsg.) : Die braune Elite II. 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Darmstadt 1993, S. 1-12.

[7] 参见Wigbert Benz: Hans-Joachim Riecke. NS-Staatssekretär. Vom Hunger planer vor, zum “Welternährer” nach 1945, Berlin 2014.

[8] Heiner Lichtenstein: Mit der Reichsbahn in den Tod. Massentransporte in den Holocaust 1941 bis 1945, Köln 1985, S. 48 (S. 32之后为文本复制本)。参见Alfred Gottwaldt: Dorpmüllers Reichsbahn. Die Ära des Reichsverkehrsministers Julius Dorpmüller 1920-1945, Freiburg 2009。

[9] 由美国外交官欧文·D. 杨格 (Owen D. Young) 提出的计划, 借以要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偿还赔款。

[10] 参见Alexander Nützenadel (Hrsg.) : Das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waltung- Politik-Verbrechen, Göttingen 2017。

[11] 参见Sereny: Albert Speer, S. 632; Brechtken: Albert Speer, S. 289。

[12] 参见Andrej 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Die Einsatzgruppe D in der südlichen Sowjetunion 1941-1943, Hamburg 2003。

[13] 参见Stephan Linck: <Festung Nord> und <Alpenfestung>. Das Ende des NS-Sicherheitsapparates, in Gerhard Paul/Klaus-Michael Mallmann (Hrsg.) : 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 “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 Darmstadt 2000, S. 569-597 (此处见S. 588)。

[14] 参见Stanislav 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Die Geschichte eines Aufstands, Göttingen 2009, S. 153; Rudolf 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Die frühen Folgen von Jalta, Zürich-Osnabrück 1985, S. 62。

[15] Küpper: Karl Hermann Frank, S. 376-380 (Zitat, S. 380)。参见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95-97。

[16] Küpper: Karl Hermann Frank, S. 381; 参见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144。

[17] 1945年5月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3; 参见上段引文资料来源的S. 96。

[18] 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153-159 (Zitat S. 153); 参见 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62 f.。

[19] 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169.

[20] 参见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188-192。

[21] 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67.

[22] 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68; 参见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195-200。

[23] 1945年5月6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1。

[24] Roland Kaltenecker: Schörner. 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 Biographie, München-Berlin 1994, S. 297.

[25] 参见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79。

[26] 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215.

[27] 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232; 参见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75 f.。

[28] 参见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81-83; Kokoška: Prag am Mai 1945, S. 287-293。

[29] 参见Küpper: Karl Hermann Frank, S. 396-402。

[30] 援引自Kokoška: Prag im Mai 1945, S. 297 f.。

[31] 参见Peter Steinkamp: Generalfeldmarschall Ferdinand Schörner, in Gerd R. Ueberschär (Hrsg.): Hitlers militärische

Elite, Bd. 2: Vom Kriegsbeginn bis zum Weltkriegsende, Darmstadt 1998, S. 236-255 (此处见S. 238)。

[32] 参见Ströbinger: Poker um Prag, S. 94 f.。

[33] Peter Demetz: Mein Prag. Erinnerungen 1939 bis 1945, Wien 2007, S. 373 f.。关于布拉格起义期间在布拉格的德国公民的遭遇及后来的命运, 参见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 Hrsg.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 Flüchtlinge und Kriegsbeschädigte, Bd. IV: 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Teilbd. 1, Berlin 1957, S. 60-64, 以及die Erlebnisberichte in Teilbd. 2, S. 107-206; 更多信息参见Lowe: Der wilde Kontinent, S. 165-169。

[34] 援引自Mathias Beer: Flucht und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Voraussetzungen, Verlauf, Folgen, München 2011, S. 80。

[35] 参见R. M. Douglas: “Ordnungsgemäße überführung”. 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2012, S. 124 f.。

[36] 参见Emilia Hrabovec: Vertreibung und Abschub. Deutsche in Mähren 1945-1947, Frankfurt/M. 1995, S. 96-101; Douglas: “Ordnungsgemäße überführung”, S. 129-131。

[37] Hrabovec: Vertreibung und Abschub, S. 115 f. (引文见S. 116)。

[38] 援引自Ulrich Herbert: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ä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Bonn 1985, S. 341。

[39] 援引自Wolfgang 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Die Displaced Persons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51, Göttingen 1985, S. 16。

[40] 参见Wolfgang 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Die Displaced Persons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51,

Göttingen 1985, S. 42。

[41] 参见Ulrich Herbert: Geschichte der Ausländerpolitik in Deutschland. Saisonarbeiter, Zwangsarbeiter, Gastarbeiter, Flüchtlinge, München 2001, S. 146 f.。

[42] P是Polen (波兰) 的缩写, Ost指东方。

[43] 参见Herbert: Fremdarbeiter, S. 154-157。

[44] 参见Herbert: Fremdarbeiter, S. 336-340; Andreas Heusler: Die Eskalation des Terrors. Gewalt gegen ausländische Zwangsarbeiter in der Endphas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Cord Arendes/Edgar Wolfrum/Jörg Zedler (Hrsg.): Terror nach innen. Verbrech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Göttingen 2006, S. 172-182。

[45] 援引自Herbert: Fremdarbeiter, S. 342。关于强制劳工的报复行动, 参见Lowe: Der wilde Kontinent, S. 129-134。

[46] 援引自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39。

[47] 援引自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47。亦可参见来自汉诺威Mellendorf一所学校校长的记录: “来到这个国家的欧洲各民族的大批囚犯现在变成了可怕的威胁。他们恐吓着德国和德国人民, 自认为是主人(.....)他们整天抢劫掠夺, 而且因为他们持有武器, 我们没法自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天天地继续着罪恶的行径。” Mellendorfer Kriegstagebuch. Aufgezeichnet von Ewald Niedermeyer, Hannover 1996, S. 59 (v. 3. 5. 1945)。

[48] Werner Borgsen/Klaus Volland: Stalag X B Sandborstel. Zur Geschichte eines Kriegsgefangenen- und KZ-Auffanglagers in Norddeutschland 1939-1945, Bremen 1991, S. 218。关于不来梅的情况, 参见特奥多尔·斯皮塔的日记; Büttner/Voß-Louis (Hrsg.): Neuanfang auf Trümmern, S. 98 (v. 30. 4. 1945): “外国工人们的掠夺行为越来越多,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有组织的。”

[49] 参见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48-50; Herbert: Fremdarbeiter, S. 342-344; Michael Pegel: Fremdarbeiter, Displaced Persons, Heimatlose Ausländer. Konstanten eines Randgruppenschicksals nach 1945, Münster 1997, S. 76 f.。

[50] 援引自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37 f.。

[51] 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S. 185 (v. 3. 5. 1945)。亦可参见Kronika: Der Untergang Berlins, S. 192 (v. 6. 5. 1945): “外国强制劳工排着长长的队伍穿过蒂尔加滕大街。他们想要回家! 长途跋涉没有让他们退却。”

[52] 参见Bettina Greiner: Warten auf das wirkliche Leben, in ZEIT-Geschichte H. 1 (2015), S. 42-47。关于强取豪夺的行为, 参见Ulrich Müller: Fremde in der Nachkriegszeit. Displaced Persons-zwangsverschleppte Personen-in Stuttgart und Württemberg-Baden 1945-1951, Stuttgart 1990, S. 19-39。

[53] 参见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42-46; Herbert: Fremdarbeiter, S. 342。

[54] 参见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82-84。

[55] 参见Patrick Wagner: Displaced Persons in Hamburg. Stationen einer halbherzigen Integration 1945 bis 1958, Hamburg 1997, S. 21。

[56] 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126 f.

[57] 援引自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132。参见Bernd Bonwetsch: Sowjetische Zwangsarbeiter vor und nach 1945. Ein doppelter Leidensweg, in Jahrbücher für die Geschichte Osteuropas, Jg. 41 (1993), S. 533-546 (此处见S. 538 f.); Herbert: Fremdarbeiter, S. 344 f.; ders.: Geschichte der Ausländerpolitik in Deutschland, S. 182 f.。

[58] 援引自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S. 134。

[59] 参见Bonwetsch: Sowjetische Zwangsarbeiter vor und nach 1945, S. 540–543; Memorial Moskau/Heinrich Böll-Stiftung (Hrsg.): Für immer gezeichnet. Die Geschichte der Ostarbeiter in Briefen, Erinnerungen und Interviews, Berlin 2019。

[60] 即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政府。

[61] 参见Edgar Wolfrum: Rot-Grün an der Macht. Deutschland 1998–2005, München 2013, S. 603–607。

[62] 参见Angelika Königseder/Juliane Wetzel: Lebensmut im Wartesaal. Die jüdischen DPs (Displaced Person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94, S. 18–31, 35–37 (引文见S. 37)。

[63] 援引自Angelika Königseder/Juliane Wetzel: Lebensmut im Wartesaal. Die jüdischen DPs (Displaced Person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94, S. 41。

[64] Ruth Klüger: weiter leben. Eine Jugend, München 2010, S. 196。

[65] Königseder/Wetzel: Lebensmut im Wartesaal, S. 47。上文描述的情况, 也可参见Ruth Klüger: weiter leben. Eine Jugend, München 2010, S. 47–53。

[66] 参见Ruth Klüger: weiter leben. Eine Jugend, München 2010, S. 56 f., 148–154, 169–172。

[67] Tom Segev: Simon Wiesenthal. Di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S. 83。参见Wolfgang Benz/Barbara Distel (Hrsg.): Der Ort des Terrors.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d. 4, München 2006, S. 322 f.。

[68] 参见Segev: Simon Wiesenthal, S. 43–80。

[69] 参见Benz/Distel (Hrsg.) : Der Ort des Terrors, Bd. 4, S. 314 f., 324。

[70] Segev: Simon Wiesenthal, S. 83.

[71] Segev: Simon Wiesenthal, S. 85-95。

[72] Segev: Simon Wiesenthal, S. 123-129, 213-219, 248-262。

[73] Segev: Simon Wiesenthal, S. 21。

1945年5月6日

1945年5月6日早上，艾博哈德·金泽尔将军到达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汇报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谈判情况。金泽尔隶属于海军上将汉斯-费迪南德·冯·弗里德堡的小型谈判代表团，该代表团受命在与蒙哥马利结束谈判后，于5月4日前往位于兰斯的盟军总部，商讨向美军武装力量部分投降一事。^[1]当天，艾森豪威尔获悉德方代表团即将到访。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就局部投降事宜开展进一步谈判。前文已提到，1945年3月至4月进行的关于德国陆军C集团军在意大利投降的秘密谈话已经引发了反希特勒联盟的危机，令斯大林对西方盟国的意图产生不信任。^[2]“如果让人产生盟军意图接受德国西部武装队伍局部投降的印象，我认为，这可能会招致严重的误解”，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说。“那样的话，我们将陷入尴尬的境地，而苏联人将有充分理由和权利指责我们的不忠行为。”^[3]

为此，艾森豪威尔紧急向苏联领导人发送了一份电报，通报德方谈判代表即将到访的消息，并允诺他只会同意全面投降，仅西部国防军的局部投降绝对不在考虑范围内。同时，他要求派一名红军军官来他的指挥部代表苏联参加投降谈判。苏联最高指挥部随后任命驻法国军事负责人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帕罗夫（Iwan Alexejewitsch Susloparow）将军为谈判代表。^[4]

艾森豪威尔任命其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和军事防御总长、英军将领肯尼思·W. D. 斯特朗

(Kenneth W.D. Strong) 主导谈判。他本人不愿与德方谈判代表直接接触。他4月12日在哥达 (Gotha) 附近第一次参观了一处被解放的集中营，即属于布痕瓦尔德附属营的奥尔德鲁夫 (Ohrdruf) 集中营，从那以后，他对德国人的憎恶情绪愈加强烈：“当我第一次目睹纳粹无可争辩的非人道行为，以及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最基本的戒律时，我无法描述这种感受 (……)。再没有什么能比那种场景更令我震惊。” [5].

5月5日下午，当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将军抵达艾森豪威尔位于兰斯一所学校 (今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中学) 大楼的指挥部时，他感到气氛发生了改变。比德尔·史密斯准备了一张地图，上面标出了美军和德军军队的位置。此外，他还用红色大箭头标记了美军计划进行的两次行动，以此向德国人展示令他们绝望的军事局势。他直截了当地对冯·弗里德堡提出了所有战区应立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德军应保持原地不动并放下武器。船舶、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应完好无损地移交。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确保这些规定被遵守，否则盟军将采取惩罚措施。冯·弗里德堡声称，他未获得同意所有前线部队全面投降的授权。他必须与邓尼茨联系，以获得新的指示。 [6].

金泽尔将军于5月6日上午9点传达了海军上将的信息，这激起了弗伦斯堡上层的愤怒。邓尼茨、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凯特尔、约德尔和内阁负责人、纳粹党大区领袖魏格纳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条件“不能接受”，原因是“东部的军队不能移交苏联人”。而且，这些条件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东线的任何士兵都不会服从放下武器、原地不动的命令。”另一方面，根据会议记录，邓尼茨及其顾问都清楚，“军事局势令人绝望，西部军队面临着遭受敌军炸弹袭击的危险，军事行动可能带来更多损失，而且就连完整的军队也将在短时间内遭遇溃败，这些事实迫使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因此，

他们决定再次尝试“向艾森豪威尔开诚布公地阐明为什么全面投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立即向西方投降”。^[7]

这项任务交给了约德尔大将，他是全面投降的坚定反对者。在与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协商后，邓尼茨对他作出以下指示：“请再次尝试解释我们想向美国武装部队局部投降的理由。如果您和弗里德堡一样在艾森豪威尔那里碰壁了，那么请您就全面投降提出以下要求：为其设置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是停止战斗，但德军仍然可以移动。第二个时间点则是停止移动。请尽力拉长两个时间点之间的间隔。”^[8]邓尼茨企图通过这种不寻常的分阶段投降方式争取时间，以便尽可能多的士兵和难民能够逃到西部的美军战线后方去。按照这一指示，约德尔获得了签署所有战线全面投降书的授权，但在此之前他必须通过电报征求邓尼茨的书面同意。

5月6日下午，约德尔飞往兰斯并于下午5点30分抵达。他也未能成功地促使美国人改变主意。比德尔·史密斯在一开始就重申单方面停止在西部的战斗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向所有盟友投降”是唯一选择。约德尔于是提出，不能只由他本人签署全面投降书，而应由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共同签署。但他们要到5月8日才能到达兰斯，并且通知所有部队还需要48小时，这样一来全面停火要到5月10日才能生效。

美国人很清楚德方谈判人员正在努力争取时间。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约德尔的提议，并发出立刻签署投降书的最后通牒。约德尔有半小时的考虑时间。艾森豪威尔威胁说，如果他拒绝，那么轰炸战争将重新开始，美军战线将“拒收所有从东部过来的德国人”。^[9]不过美国人还是同意给德方在签署投降书和投降正式生效之间宽限两天的时间。

5月6日晚9时45分，约德尔向凯特尔发送了一封电报：“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求我们今天签字；否则，盟军战线也将对那些试图单独投降的人关闭，所有谈判将中断。要么陷入混乱局面，要么签字，我看不到其他出路。请即刻通过无线电确认我是否有权签署投降书。接着投降便可生效。敌对行动将在德国夏令时1945年5月9日0点停止。”^[10]这条消息直到午夜之后才到达弗伦斯堡。

*

5月6日下午，邓尼茨决定将一项早就作好的决定付于实施：他免除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所有职务。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内政部长兼预备队司令官因私自接触西方盟国而失去了希特勒的青睐，因而未出现在其遗嘱中。他最初希望在邓尼茨政府中扮演“二号人物”。邓尼茨最初先拖住他以作缓兵之计。只要希姆莱仍掌握着警察和党卫队权力，就不适合完全与其划清界限。^[11]当邓尼茨5月2日至3日夜里将总部迁至弗伦斯堡时，希姆莱也随行北上，并带了一群集中营党卫队高级领导人，其中就包括原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ß）。在他于1946年至1947年间临刑前在波兰监狱撰写的回忆录中，霍斯表示，在5月3日、4日与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最后会面时，他看起来“容光焕发，心情很好”。^[12]希姆莱似乎确实认为他和他的党卫队部队在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中将继续作为“秩序的构成要素”而不可或缺。^[13]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内阁会议上，并表现得非常自信。尽管邓尼茨没有让其在“帝国临时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但他还是在5月4日同意了以下对希姆莱地位的模糊表述：“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仍保有对武装党卫队的领导权，同时他将作为德国警察总监负责维护和平和秩序。”^[14]

邓尼茨可能很快注意到这样对希姆莱太过包容，第二天他就提出了一种更为冷淡的说辞：“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为海军

元帅服务。”希姆莱不同意这个版本，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协助海军元帅维持和平与秩序”，但也未得到当事人的同意。[\[15\]](#)

然而，希姆莱的地位每况愈下。在北部的局部投降生效以及“帝国临时政府”成立后，邓尼茨认为不再需要有所顾忌了。5月6日下午5点，他召见希姆莱，告知将免除其内政部长、预备队司令官和警察总监的职务，“他与现任政府之间的一切关系均被解除”。[\[16\]](#)

凯特尔受邓尼茨之托要求希姆莱以后不得造访海军元帅的总部。[\[17\]](#)希姆莱在消失前说：“他感到自己绝对不会被发现，并躲起来等待着事态的迅速发展。”[\[18\]](#)

5月11日，希姆莱带着伪造的士兵证离开弗伦斯堡地区，佯称是“海因里希·希青格（Heinrich Hitzinger）”中士。同行的人中有他参谋部的成员，其中包括他的副官、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维尔纳·格罗特曼（Werner Grothmann）和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茨·马赫（Heinz Macher）。几天后，这群人在弗里德里希斯科格

（Friedrichskoog）附近乘坐一艘渔船越过易北河。很显然，希姆莱打算先躲到哈茨山中，然后再去往阿尔卑斯山。但是5月21日，他、格罗特曼和马赫在布雷默弗德（Bremervörde）附近的一个检查站被捕，并被带到吕讷堡附近的英国部队审讯营。希姆莱向这里的值班队长坦白了他的身份。起初，审讯人员不敢相信这个穿着破旧平民衣服的不起眼的男人竟是“第三帝国”领导层中他们最想抓到的战犯之一。希姆莱被带到吕讷堡英国陆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在5月23日的全面医学检查中，医生在他的嘴中发现了一个物体的蓝色顶端，但是在医生想要清除这个不明物体之前，他就咬下了氰化物胶囊，用和希特勒、戈培尔和鲍曼同样的方式逃避了自己的罪责。[\[19\]](#)

1945年5月6日，美军第5步兵师第2团的士兵正行军经过位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城市瓦勒恩 [Wallern, 捷克语为沃拉里 (Volary)]。在一个工厂棚屋里，他们发现了118名处于恶劣状况的犹太妇女。负责将这些妇女转移到野战医院的医疗队军官亚伦·S. 卡汉 (Aaron S. Cahan) 少校四天后报告说：“我对这些人的第一印象是极度震惊的；我从来没想到一个人会遭受如此践踏，在如此营养不良和瘦弱的情况下还能生存下来 (……)。我以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群老人，我当时判断她们的年龄在50岁和60岁之间。当我问其中一个女孩多大时，她回答说17岁，而在我看来她至少50岁，我对此感到惊讶和震惊。”
[\[20\]](#)

这些犹太妇女是三周前离开黑尔姆布雷希茨 (Helmbrechts) 集中营的死亡行军队伍中的幸存者。黑尔姆布雷希茨是弗洛森堡集中营的一个附属营，位于上弗兰肯小镇霍夫 (Hof) 西南约15公里处，修建于1944年夏天。在1945年2月，那里关押了大约600名主要来自波兰和苏联的女囚犯，她们每天都被迫为诺伊迈耶 (Neumeyer) 军械厂工作12个小时。1945年3月6日，共621名犹太妇女来到黑尔姆布雷希茨集中营。她们已经经历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附属营地的两次残酷的疏散行军，在到达时非常虚弱。许多人身患痢疾和冻伤。她们被囚禁在两个严格分开的营房中，遭遇比非犹太人不幸得多。她们没有任何医疗护理，食物通常是用半升水稀释的汤。她们不再被要求去工作，而看守们没有停止对她们作为人类的最后尊严进行践踏。在黑尔姆布雷希茨度过的五个星期中，她们中共有44人死亡。[\[21\]](#)

4月13日，当美国先遣队距离营地仅50公里时，营地指挥官、党卫队二级小队长阿洛伊斯·弗朗茨·德尔 (Alois Franz Dörr) 决定清空黑尔姆布雷希茨。一共1171名女囚犯，其中包括580名犹太妇女，不得不在下午开始行进。只有非犹太囚犯事先获得了一些食物、衣服和毯子。三支武装党卫队和看守拿着木棍随队前行。许多犹太妇女虚弱

得几乎站不起来，必须由同行者搀扶。在最初的几天里，看守射杀了所有无法跟上队伍的人。他们狠狠地殴打剩下的人，敦促她们继续前进。

行进的目的地显然还不明确。这支队伍最初向东南方向行进，经过萨勒河畔施瓦岑巴赫（Schwarzenbach an der Saale）和诺伊豪森（Neuhausen）。行进开始的第二天下午，一名党卫队领导层派来的信使前来向德尔传达希姆莱的指令：“今后不允许再开枪，因为与美国人的谈判已经开始了，不应干扰。”^[22]然而情况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每名看守仍然可以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对待囚犯而不必担心受到制裁。

在诺伊豪森，德尔得知美军距此只有15公里了。他命令摧毁集中营档案并在夜晚继续行军。在匆忙离开的混乱中，有50名非犹太女囚犯设法逃走了；一些女看守也趁机逃跑。4月17日，队伍抵达茨沃道 [Zwodau, 今天的捷克斯瓦特瓦 (Svateva)] 妇女集中营。对于非犹太人而言，行军在此结束。而犹太妇女不得不在德尔的指挥下继续前进。^[23]路线由此转为向南，穿过1938年被吞并的苏台德地区。丹尼尔·戈德哈根 (Daniel Goldhagen) 在他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一书中写道，“简直无法想象这些妇女赤脚穿过冰冷的街道时的痛苦”。这本书在1996年引发了关于“普通德国人”参与大屠杀的激烈辩论。“一个接着一个的痛苦步伐，一天接着一天沉重折磨。对这些妇女来说，既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结束的迹象。每一步都需要她们使出所有力量，她们已对消瘦和患病感到麻木。每天早晨，她们都在饥饿不堪中醒来，双脚肿胀溃烂，四肢僵硬，伤口无法愈合。她们明白等待她们的是一整天的行进，那些折磨她们的人不会给她们休息的机会。当晚上终于来临，她们可能会得到一点儿食物，然后陷入发烧、痛苦的半睡眠状态，到了第二天又循环这种惊恐。这就是‘正常’的一天。”^[24]

行进者们整天都没有进食；她们常常不得不露宿街头。许多人在夜间因再也无力支撑而死去。那些病得太重或太虚弱而无法前进的妇女被装上马车。队伍就这样穿过波希米亚森林山区，直到5月3日下午到达瓦勒恩（沃拉里）。在那里，德尔决定留下无法走路的妇女，与其余的人一起前往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接壤的小镇普拉哈提茨 [Prachatitz, 今天捷克的普拉哈季采 (Prachatice)]。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终于在此处被释放。德尔和他的同伙躲了起来。这名指挥官于1969年3月在霍夫刑事陪审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在1979年得到赦免。 [25]

在这些4月19日离开茨沃道 [26] 集中营的625名犹太女囚中，至少有278人死亡。129人在行进中死亡，或在夜晚死于饥寒交迫。另有49人因无法继续前进或试图逃跑被看守杀害。还有许多人死因不明。 [27]

*

黑尔姆布雷希茨的死亡行军只是纳粹统治血腥结尾中的众多事件之一，其受害者不仅包括犹太人，还有来自各国的强制劳工、战俘和政治犯——苏联人、波兰人、捷克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德国人。 [28] 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周，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像行走的骷髅一样，拖着身体穿过乡间小路，穿越村庄。1945年初，在714000名集中营囚犯中，估计至少有25万，即三分之一以上在死亡行军中丧生。 [29]

要了解这些恐怖事件，必须先了解走向覆亡的纳粹政权当时所处的混乱局面。在1945年1月红军逼近之前，对东部大型集中营的疏散，包括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施图特霍夫 (Stutthof)，就已经显示慌忙仓促的特点。囚犯们不得不在没有足够食物和衣物的情况下于严寒中开始行进。在最初的几天里就有许多人死亡。难民队伍和返回的

国防军部队堵塞了街道，在混乱的大环境下，看守们除掉囚犯的意愿日趋强烈。1月31日至2月1日夜间，在帕尔姆尼肯（Palmnicken）小镇的波罗的海海滩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屠杀：大约3000名囚犯被党卫队枪杀，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及其附属营地的犹太妇女。这些尸体在几天后还在海滩上被海水冲刷着。[\[30\]](#)

另一方面，“旧帝国（Altreich）”[\[31\]](#)内的集中营根本没有准备好接纳成千上万虚弱不堪的囚犯。这些囚犯被运往的营地往往比原营地的条件更糟糕。到了1945年4月，当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弗洛森堡、诺因加默、拉文斯布吕克和其他难民营开始清空时，这些囚犯的身体状况比其他囚犯还要差得多。他们在死亡行军中存活下来的机会更加渺茫。

在战争末期的管理混乱中，既没有明确的命令指示应该如何途中对待囚犯，也不清楚应将他们带往何处。结果导致许多行进队伍在不断缩小的尚未被占领的区域毫无目的地被来回驱逐，而看守们自行决定是否射杀那些无法前进的囚犯。生死不仅取决于看守的人员组成，还取决于囚犯们经过的地区是否马上有美国、英国或苏联的军队抵达。

死亡行军就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就连许多农村居民也在他们的家门口目睹了大屠杀，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瘦弱的可怜人被看守殴打和枪杀。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大部分是女性）深受触动，他们试图给囚犯提供水或食物。还有一些勇敢的人协助囚犯趁看守不备时成功脱逃。但是与支持相比，更普遍的反应是不作为和自保。许多人对苦难的行进队伍冷眼旁观，有些人感到害怕，不仅害怕那些血腥镇压打算提供帮助的人的党卫队士兵，也害怕那些囚犯，似乎这些虚弱的人会变成“反社会人格者”“人民害虫”，甚至会实施危险犯罪。[\[32\]](#)

普通德国人参与杀戮的情况也并不少见。1945年4月初，在策勒县（Celle）发生了一起令人尤其震惊的事件。诺恩加默附属营的数百名囚犯在该市火车站遭到炸弹袭击时成功逃离了火车，躲藏在附近的森林中。第二天夜晚，押送部队看守、冲锋队士兵、军营士兵、当地警察、人民冲锋队成员以及一个包括14岁至16岁的希特勒青年在内的平民团体加入了搜捕队伍。至少有170名囚犯被杀。[\[33\]](#)



4月28日，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去往巴特特尔茨的死亡行军路上经过施塔恩贝格。该照片为秘密拍摄。（Benno Gantner/akg-images, Berlin）

战争快结束时，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一座小镇加尔德莱根（Gardelegen）也发生了可怕的事情。4月13日，来自米特堡-朵拉集中营两处附属营的1100名死亡行军中的幸存者抵达此处。他们被关在一个偏僻的野外谷仓里；之后这里着火了。任何试图逃离的人都被机

关枪射杀。这场屠杀的主要责任不在党卫队司令部，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逃跑了，而在于狂热的纳粹地区领导人格哈特·蒂勒

（Gerhard Thiele）。他担心美国人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进驻这座小镇，届时这些囚犯将会报仇。关于囚犯暴行的谣言被别有用心地四处传播，加剧了人们的普遍恐慌。在这种气氛下，蒂勒毫不费力地从平民中招募到帮凶进行屠杀，他们主要是人民冲锋队成员。美军在进驻后于4月15日检查这个犯罪现场时，发现了约1000具烧焦的尸体。[\[34\]](#)

策勒和加尔德莱根的大屠杀表明，死亡行军期间针对集中营囚犯的屠杀并非“上面”的安排，由中央管控，而更多是“下面”未经协调推动的动态进程，其中党卫队看守、地方纳粹党官员、警察、人民冲锋队、希特勒青年团以及普通平民构成了犯罪共同体，这深刻体现了脱缰的权力病毒在何种程度上占据了德国社会。

*

“5月6日，上午。一种治愈的安静气氛。”14岁的布雷斯劳学生、人民冲锋队成员霍斯特·格来斯（Horst Gleiss）在日记中写道。“面色苍白的人们从黑暗的地下室爬出，5月的空气充盈着他们的肺。大家的意见一致：这场嗜血的战争现在必须结束。如果我们在布雷斯劳继续作战，那么谁也别想活下去。”[\[35\]](#)自当天上午开始，这座西里西亚的首府确实已经停火了。两名德国军官和一名口译人员穿过无人区到达苏联阵地，提出投降请求。5月6日晚6点左右，最后一位要塞指挥官赫尔曼·尼霍夫（Hermann Niehoff）将军在该市南部郊区的“科洛尼亚别墅（Villa Colonia）”签署了投降文件。接着弗拉基米尔·A. 格鲁兹多夫斯基（Wladimir A. Gluzdowski）将军邀请其共进晚餐。“蜡烛照亮着堆成山的冷盘、鱼肉、肉馅饼、开胃小吃拼

盘，当然到处都有伏特加酒瓶。胜利者想庆祝自己的胜利。我被要求表现得听话点。”尼霍夫回忆道。[\[36\]](#)

1944年秋，希特勒宣布布雷斯劳为“要塞”，这意味着不允许这座城市投降，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防御。[\[37\]](#)当时那里还没有面临直接的威胁。苏联红军还在距此地300公里处的波兰中部，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布雷斯劳还没有遭受过英美轰炸机的袭击。但是1945年1月12日，苏联在整个东线进行了令人畏惧的长期冬季攻势。几天后，红军就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出人意料的迅速突进引发了难民大规模逃亡。德国东部数十万人试图在寒冷的温度下驾车或步行逃往西部或波罗的海港口。每天也都有大批难民抵达布雷斯劳。

1月19日，下西里西亚大区领袖和帝国国防专员卡尔·汉克（Karl Hanke）下达了撤离命令，但对这座人口将近100万的城市进行有秩序的人口疏散为时已晚。当时，难民和返回的军队已经阻塞了街道，而帝国铁路火车远远无法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人潮。“人们简直变得惊慌失措”，牧师保罗·佩克特（Paul Peikert）在日记中写道。“火车站全天拥挤不堪，几乎无法从人群穿过。所有人都挤向火车，但车厢只能承载极为有限的逃亡者，大多数人不得留下来再尝试一次。”[\[38\]](#)

1月20日，汉克通过喇叭下令妇女和儿童徒步离开城市：“可以携带小型手提行李。有小孩的妇女负责看管酒精炉；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组织（NS-Volkswohlfahrt，简称NSV）负责搭建烹饪台和牛奶分发点。”[\[39\]](#)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数十万人离开城市，加入难民徒步队伍。伊丽莎白·埃尔布里希（Elisabeth Erbrich）背着一个装着必需品的双肩背包，穿着一双结实的靴子，还拿着一个装满了接下来几天所需食物的袋子，也踏上了逃难之旅：“难民们就像荒漠里的商队那样行进着，手推车和婴儿车上放着他们最后的财物，还有汽

车和马车（……）在白得发光的雪地里。数十万人在路上，其中还有从奥得河左岸村庄跋涉而来的队伍，他们已经走了好几天了。由于极度寒冷的天气和不停歇的脚步，车上死了很多人，他们不得被抛在路边，因为那坚硬而冰冻的土地无法容纳这些尸体。” [40].

正如他1月22日在动员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大区领袖汉克从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打算“最大限度地”捍卫布雷斯劳“要塞”。 [41].他带着当天前来拜访的朋友、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参观了由建筑师卡尔·戈特哈德·朗汉斯（Carl Gotthard Langhans）建造的、最近刚刚翻新的老总督府。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汉克当时高呼“苏联人永远也得不到它，我宁愿将其烧毁！”。 [42].

1月24日，戈培尔在与所有东部地区的大区领袖通完电话后写道：“他们中间给人留下最好印象的是汉克。他的表态坚定而自信。他向我陈述了保卫布雷斯劳的临时计划。他告诉我，他在柏林学校和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对他现在工作面临的紧急状况非常有用，这令我动容。他表现了非凡的毅力（……）。汉克决心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捍卫布雷斯劳。” [43].

在接下来几天，戈培尔又多次表扬了这位前帝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国务秘书。1月28日，汉克因布雷斯劳副市长沃尔夫冈·施皮尔哈根（Wolfgang Spielhagen）有准备逃亡的嫌疑而命令一名人民冲锋队员将其枪杀，并派人张贴海报对此事加以宣传，获得了宣传部部长的完全赞同，希特勒也认可了这一处决。“在一个备受威胁的要塞，”他说，“不能按照法条行事，而是必须作出适当和必要的行动。” [44].

2月15日，对这座城市的包围圈形成了，里面仍然有大约20万平民，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强制劳工、战俘和集中营囚犯。“要塞”的驻军最初由汉斯·冯·阿尔芬（Hans von Ahlfen）将军指挥，自3月5日起由尼霍夫将军指挥。驻军共有45000名士兵，由武装党卫队、国防

军后备部队、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组成。他们的对手是格鲁兹多夫斯基将军的第6军团，有13万骁勇善战的士兵。^[45]他们从南部发动进攻，越过郊区，于2月24日抵达距市中心仅4公里的兴登堡广场。但随后的进攻陷入停滞。德军奋力抵抗，最后演变成激烈的巷战，其残忍程度令人联想到斯大林格勒战役。^[46]

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废墟。守卫者的行动比苏联的炮火更具破坏性。他们放火烧毁建筑物并炸毁废墟，以确保有空旷的射击场。他们大肆在教堂和其他历史建筑内设立指挥所、炮台和弹药库，令这些场所成为苏军低空战斗机的目标。

最为典型的破坏工事是在市中心建设一条飞机跑道，目的是在甘道（Gandau）机场落入苏军之手时确保空中供应。长1.3公里、宽300米的大学建筑群区被夷为平地，其中包括国家档案馆和两座教堂。约3000人——其中不仅有强制劳工，还有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布雷斯劳平民——成为苏联大炮和低空轰炸机的受害者。“我们像兔子一样睡觉：睁大眼睛。等待死亡。”一名工人在3月21日写道。“舰载机射击飞机跑道。又有很多人死亡（……）。每当炸弹在附近落下，妇女们都会尖叫。”^[47]

3月3日，汉克通过大德意志广播向德国人喊话。他呼吁他们效仿布雷斯劳，赶往“为胜利而战”的前线。最后他承诺：“我们在布雷斯劳要塞发誓，坚守对帝国和元首的信念不动摇，即使最困难的日子来临也不动摇，只要我们还有一丁点力量就会继续战斗。”^[48]戈培尔表示，这个讲话“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并表现了“令人敬佩的尊严和政治道德水平”。“如果我们东部的所有大区领袖都像汉克那样工作，那么我们的事业将会比实际情况更好。汉克是我们东部大区领袖中的杰出人物。”希特勒也听了他的讲话，如戈培尔所记，他对汉克的工作给予了“最高的赞扬”。^[49]

3月7日，汉克和尼霍夫要求布雷斯劳的所有居民必须履行工作义务，这项规定适用于10岁以上的男孩和12岁以上的女孩。任何不遵守要求并且在3月11日之前仍未获得工作证的人应移交临时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就像离开岗位的士兵应以逃兵之罪被处死，同样的惩罚也适用于逃避在要塞工作的人。”^[50]几百名士兵、平民和强制劳工因“逃工”、“抢劫”或“破坏罪”被军事法庭通过快速程序判处死刑。为起到威慑效果，被执行死刑者的名单在唯一一份继续发行的日报《布雷斯劳要塞前线报》（*Frontzeitung der Festung Breslau*）上被公开。^[51]

3月底，苏联指挥官首次威胁将大规模轰炸布雷斯劳，如果“要塞”不放弃抵抗。但是尼霍夫将军拒绝投降。汉克在电话中向他的前任上司戈培尔保证，他还能“在较长时间内守住布雷斯劳”。^[52]在4月1日和2日这两个复活节庆祝日，苏联空军投下了数千枚炸弹，整个老城区陷入火海。“从皇帝桥能看到整座燃烧的布雷斯劳城，那恐怖景象令人难以忘怀”，佩克特牧师写道。“火焰从大教堂的穹顶冒出来；大教堂的整个屋顶变成火海，圣米迦勒教堂、沙丘教堂、圣文生教堂、圣亚德伯教堂、圣摩里西斯教堂、圣伯尔纳定教堂、圣多福教堂以及这些教堂之间的街道全都在燃烧（……）。复活节周一晚上和夜里陷入火海的布雷斯劳真是一幅令人悲伤的画面，这座美丽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覆灭了。”^[53]

红军在4月中旬占领了甘道机场，并一路挺进至老城区的西部边缘。尽管部分平民对毫无意义的无休止战斗越来越感到绝望和愤怒，但汉克和尼霍夫都没有想过放弃。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的日令中，这位要塞指挥官宣誓对元首神话效忠：“我们越坚决抵抗，我们对他的信心就会越强。因为阿道夫·希特勒站在勇敢的人一边，他的力量将成为我们抵抗力量的来源。”^[54]阿尔伯特·施佩尔表扬汉克作为“布雷斯劳的捍卫者所取得的成就”：“您所做出的榜样

（……）在今后对整个民族来说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在德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55]戈培尔和希特勒也是同样的看法。独裁者授予汉克金质德意志勋章这一很高的荣誉，并在4月29日的遗嘱中将他任命为希姆莱的继任者，即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总监。^[56]

即使希特勒死亡和柏林投降的消息传出，布雷斯劳的战斗仍在继续。5月4日，《布雷斯劳要塞前线报》宣布：“就连最愚钝的人也能意识到，伊万们^[57]向我们射出的每颗炮弹和投下的每枚炸弹都清楚地表明，对付像布尔什维主义这样的暴虐敌人，唯一的口号是：‘战斗，团结一致！’”^[58]

同一天中午，两大信仰派别的代表拜访尼霍夫将军，敦促其停止战斗。恩斯特·霍尼希（Ernst Hornig）牧师说，平民百姓的伤亡数量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激增。每天仍有数百人丧生，面对毫无出路的局势，许多人出于绝望而被迫自杀。人们对党和军事领导层的信心降到了零点。他质问这位要塞指挥官：“在这种情况下，您能在上帝面前承诺继续保卫这座城市吗？”尼霍夫敷衍教派代表们说：“您的忧虑正是我的忧虑。”^[59]不过他已经秘密地决定准备投降谈判。5月5日下午，他打电话召集手下军官到他位于大学图书馆地下室的指挥所进行“最后集合”并宣布：“希特勒死了，柏林沦陷了，同盟国已在德国核心地带携手。这意味着继续为布雷斯劳而战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再出现牺牲者就是犯罪了。我决定停止战斗，并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向敌人移交城市和军队。最后一颗子弹已射完——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职责：正如法律命令的那样。”^[60]

大区领袖汉克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所有试图逃跑的人，但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英勇战死”。5月6日夜里，他乘坐费斯勒鸫式轻型联络观测机逃了出来，起飞的跑道正是他下令耗费巨资建成的。关于他后来的命运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他可能在逃离苏台德地区时被

捷克民兵抓住并杀害。^[61]尼霍夫将军因战争罪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随后减刑至25年监禁。1955年，他回到了联邦德国。他与他的前任汉斯·冯·阿尔芬共同出版了《布雷斯劳之战》（*So kämpfte Breslau*）一书，在里面颂扬了在这座奥得河畔城市进行毫无意义的战斗的人和牺牲者。^[62]至少有6千名德国士兵和8千名苏联士兵丧生。平民受害者人数要多得多，死亡人数估计在1万和8万之间。^[63]



布雷斯劳作为德国坚守到最后的城市之一，在1945年5月6日才投降。从市政厅鸟瞰被摧毁的内城。（akg-images, Berlin）

布雷斯劳投降仅两天后，波兰行政官员先遣队即抵达，目的是对这座下西里西亚首府提出的要求进行记录。根据波茨坦会议决议，将波兰版图“向西推移”是对苏联占领其东部省份的补偿，而布雷斯劳——现在被称为弗罗茨瓦夫（Wrocław）——由波兰政府管理。从1945年到1947年，这里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德国人被有组织地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是从苏联吞并的东部省份“被遣返”的波兰人。1945年12月底仅有33297名波兰人登记在册，而德国人的登记人数为其五倍多；但在9个月后，这一比例已被逆转：有152898名波兰人，德国

人仅为28274名。1947年3月，弗罗茨瓦夫共有214310名居民：196814名波兰人和17496名德国人。[\[64\]](#)

和布拉格一样，留下的德国人也深刻地经历了由波兰在德国占领期间所累积的仇恨导致的报复。他们常常被刚来的波兰人胁迫离开房子或公寓；他们不得不戴上带有字母“N”的白色臂章[\[65\]](#)，遭到团伙的袭击时得不到任何保护，或不得不登上封闭的货车被运往西部。

[\[66\]](#)作家雨果·哈通（Hugo Hartung）于1940年作为首席戏剧顾问来到布雷斯劳的城市剧院，在包围期间加入了人民冲锋队，他在1945年7月最初几天的日记里记录下了这场戏剧般的动荡：“另一群人朝我们冲来，推着手推车和婴儿车，拖着疲倦的步伐，可怜，队伍长得没有尽头：来自伦贝格省的波兰人。这座城市对他们来说还不是家，不过于我们而言也不再是家了。沉默的一群群人像命运未知的木偶一样彼此擦身而过。”[\[67\]](#)

*

当布拉格或布雷斯劳仍在战斗时，其他地方已经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活。1945年5月6日，130名社会民主党人聚集在汉诺威警察总部的会议室，决定重新成立当地的社民党组织。提议者是当时49岁的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他于1895年10月13日出生于西普鲁士小镇库尔姆（Culm），父亲是商人。他在当地上了中学，在一战开始后志愿参军。在一次右臂严重受伤后，他被陆军开除。从那时起，他致力于研究法律和国民经济学，并以论文《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观念而斗争》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1月，在德意志帝国尚未灭亡时，他加入了社民党。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20年，当时担任斯图加特党机关刊物《施瓦本起床号》（*Schwäbische Tagwacht*）编辑。他于1924年成为符腾堡州议会议员，1930年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纳粹党团恨之入骨，因为他在1932年2月23日的一次备受关注的演讲中，称整

个纳粹宣传是“对人们内心中的卑鄙的持续呼唤”。他抨击戈培尔说：“如果必须承认纳粹主义的某一点，那就是它首次在德国政治中成功地彻底唤醒了人类的愚蠢。”

纳粹党人没有忘记这些话。1933年7月，舒马赫被捕；随后，他辗转各个集中营遭受了将近十年的苦难，直到1943年春天，他以病重之躯从达豪集中营被释放。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他与妹妹在汉诺威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两年。1944年7月20日，当局采取“网格”行动猎捕原魏玛共和国各党派议员和干部，舒马赫再次被关押了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诺因加默集中营度过。[\[68\]](#)

1945年4月10日，美军进驻这座几乎被摧毁的城市。仅仅九天后，舒马赫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就决定重建社会民主党。在5月6日当地党组织成立大会上，舒马赫被选为主席。受到集中营痛苦监禁的影响，他以“我们不绝望！”为口号发表了纲领性演讲，总结了他在纳粹统治十二年中积累的经验，并描绘了关于民主的新蓝图。这次演讲当之无愧地被视作“战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份文件”。[\[69\]](#)因此，接下来将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舒马赫在讲话中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我们用来研究事实的方法”，于是他引用了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话：“说出事实（Aussprechen, was ist）。”首先，他分析了导致德国历史走向纳粹主义的灾难性发展脉络。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认为“将重工业和军备业乃至金融资本整体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力量结为同盟”应对此承担责任。

“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由此滋生，这使“崇拜暴力”成为一项原则，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通过否认1918年的失败，反动势力为新的战争埋下了种子。顺着这条线，舒马赫将纳粹主义者诠释为“大资本的奴仆”，其统治必然导致人民彻底的“道德崩坏和

地位下降”。在此处，舒马赫提及了他1932年2月在魏玛共和国国会大厦发表的讲话。但是，他当时针对希特勒掌权的后果发出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注意。

舒马赫强烈反对德国人集体有罪的指责。“特别是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是纳粹主义的真正反对者，我们与之作战却沦为受害者，这一切都‘归功于’将我们与别人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只是鄙视那些“太多”的“愚蠢的希特勒追随者，其实不过是权力和成功的崇拜者”。这些人事后表示对政权的罪行“一无所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也许他们并不了解一切，但他们知道得足够多了。至少他们对集中营的了解程度令他们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恰恰是这套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同样，他们也乐于接受战争期间他们的儿子、父亲和丈夫从被占领的领土上抢走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他们亲眼见到犹太人被蹂躏、抢劫和驱逐的残酷画面。他们不仅保持沉默，而且如果德国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可以给他们带来宁静，甚至还有微小的好处的话，那就更好了。”“相当一部分人民是纳粹血腥统治的同谋”，这一点是无法被抹杀的，只能靠“今后不能再让不受控制以及无法控制的政权统治德国这种正直的洞见”来减轻罪责。

舒马赫坚决地呼吁，向那些帮助纳粹掌权的“幕后者”追究责任，包括“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为邪恶的德国人冯·帕彭”。对这类人的惩罚比“抓捕许多因偶然原因或被迫加入的纳粹党员”更为重要。关于如何处理前“党内同志”的问题，舒马赫仍然持明确立场：社民党不应“为政治上已无家可归的纳粹分子提供任何庇护”。

舒马赫在演讲中专门用一个单独的段落来阐述未来与共产党的关系。两党在1933年前曾发生激烈争执，在此之后双方应该团结起来，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拒绝组建“统一工人党”的想法。其主要论点是，“共产党与其中的一个胜利国关系紧密，因而它与作

为国家的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我们不能也不希望成为任何国外帝国利益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此同时，舒马赫建议将1933年以前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团体召回。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在于成为“吸引所有碎片的磁石”：“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只有在多政党体系中才拥有未来。”

由于社民党是“德国唯一一个坚决遵守正确的民主与和平路线的政党”，因此舒马赫呼吁社民党在战后应扮演领导角色。最后他激情洋溢地说：“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为了实现和平、自由与社会主义三位一体，我们将努力与全世界的先锋力量合作（……）。在这一任务面前，我们绝不气馁。如果我们在这一精神指引下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民，那么我们也将造福全人类！”^[70]

1945年2月底，时年25岁的安妮玛莉·兰格（Annemarie Renger）为了躲避炸弹袭击，带着她的小儿子从柏林逃到了位于吕讷堡荒地西部边缘的菲瑟尔赫韦德（Visselhövede）小镇。当她在《汉诺威信使报》（*Hannoverscher Kurier*）上读到舒马赫演讲摘录时，她感到十分振奋。“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国家的人民将挣脱麻木和绝望，开始自己解决问题（……）。这位库尔特·舒马赫先生在汉诺威重新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我就是在社民党家庭中长大的，因此我也想到那里去工作！”^[71]

在咨询了她曾担任工人体育运动（Arbeiter-sportbewegung）领导人的父亲的意见后，她给舒马赫写了封信，询问她是否可以被他任用。汉诺威方面很快发来了邀请。“站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又高又瘦弱”，她回忆起与舒马赫的第一次会面。“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十分具有穿透力。我从没想过他是这样的。他当时还没过50岁生日，但看起来要老得多。（……）他当即问我是否能速记并以完美的熟练程度使用打字机；他说他的要求很高。我自信地回

答，我非常棒，而且我还在速记协会中获过奖。”^[72]1945年10月15日，安妮玛莉·兰格成为舒马赫的私人秘书，这也是她政治生涯的跳板：她后来成为社民党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家之一，在1972年至1990年间先后担任德国联邦议院副主席及主席。

5月6日，舒马赫发表主旨演讲，成为汉诺威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并同时宣布了英美两个占领区的领导权。他比其他人更早抓住了机会，从而无须等待军政府批准成立政党，就使汉诺威作为社民党重新出发的起点。在短短几个月内，舒马赫就在传统上属“红色”的林登（Linden）城区内的雅各布大街（Jacobstraße）10号设立了“舒马赫博士办公室”，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和智库”。^[73]

1945年7月底，舒马赫在比勒费尔德告诉党内老友、前普鲁士内政大臣卡尔·泽韦林（Carl Severing）：“尽管有许多障碍，但我们组建了一个相当大的政党，并已就事务性工作和人员安排与不伦瑞克、汉堡、符腾堡、巴登、黑森和黑森-拿骚的同志达成一致。”^[74]8月20日，英美占领区19个重新成立的地方党组织中有14个表示支持舒马赫，并授权他筹备联合会议。^[75]

1945年8月28日，舒马赫发出10月初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党代会的邀请。随邀请函一起发出的还有“政治指导方针”，用以协助党干部制定政策、开展讨论。指导方针从一开始就指出，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的，它为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和经济解放而斗争，为反对暴力和奴役的权利与自由而斗争。”同时，舒马赫强调德国人享有“在自己的国家实行民族自决（……）的权利”。因此，社民党是“所有分裂势力最尖锐、最严厉的敌人”。这里埋下了与其未来主要竞争对手、之后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冲突的种子，后者致力于推动联邦德国与西方的联系，不惜以德国分裂为代价。舒马赫再次明确表示，尽管他不希望“一个反

共主义者，甚至反苏势力成为政治领袖”，但他坚决拒绝与共产党组成一个“统一党”，因为德国共产党与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目标是“不可分割”的。[\[76\]](#)

10月5日至6日，社民党伦敦流亡理事会的三名代表——埃里希·奥伦豪尔（Erich Ollenhauer）、弗里茨·海涅（Fritz Heine）和艾尔温·肖特勒（Erwin Schoettle）乘坐英国军用飞机出席了在汉诺威附近文尼希森（Wennigsen）举行的会议。看到到处都是废墟的场景，他们感到十分震惊。“从海岸飞往德国的途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到处都是可怕战争的痕迹”，艾尔温·肖特勒说。“当我们飞过奥斯纳布吕克上空时，席卷整片土地的恐怖画面向我们展开。在临近傍晚的阳光下，一片空旷的废墟，空荡荡的窗洞是那么阴森黑暗，向我们预示着在汉诺威将要直面的一切：被摧毁的德国城市是二战结束时的一种常态。”[\[77\]](#)舒马赫与这几位伦敦移民很快就所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奥伦豪尔被舒马赫的卡里斯马式个人魅力所折服，并愿意服从其领导。他在返回伦敦时报告说：“这个党正在被一支真正重要的力量重新带向正途。”[\[78\]](#)

从苏联占领区来的代表反应则不同。1945年6月，由奥托·格罗特沃尔（Otto Grotewohl）、马克斯·费希纳（Max Fechner）和埃里希·格尼夫克（Erich Gniffke）领导的一群前柏林社民党人在苏占区成立了社民党“中央委员会”，该组织提倡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的统一，原则上支持与德国共产党合并。但这与舒马赫的意图背道而驰，他在会议期间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反对柏林代表占主导地位，拒绝德国共产党与社民党的合并宣传：“我们不能让社民党及其支持者依附于某个单独占领区提出的条件和前提。”[\[79\]](#)因此，格罗特沃尔同意，只要“帝国统一”尚未恢复，柏林的“中央委员会”将只负责领导社民党在苏占区的工作，而舒马赫则在西部三个占领区担任“政治代表”。舒马赫在致卡尔·泽韦林的一封信中总结了会议最重要的成

果：“实际上，因柏林同志的主张而可能引起的政治危险已经解除了。” [80]

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对格罗特沃尔和“中央委员会”不断施压，要求与他们合并，柏林社民党对此的反对声也愈加强烈。1946年3月31日，柏林市西部的三大占领区中超过82%的人投票反对强制合并。14天后，在柏林苏占区的海军上将剧院（Admiralspalast）举行“统一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SED）”。

几周后的5月9日，来自西部三大占领区的代表再次出席在汉诺威举行的党代会，几乎一致选举库尔特·舒马赫为社民党第一任党主席。至此，他无可争议地跃升为党魁。他在会议最后自信地宣布：“社会民主党将成为德国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德国将一事无成，而欧洲将成为动荡和腐朽的根源。” [81]

*

1945年5月6日，弗朗西谢克·斯基比恩斯基（Franciszek Skibiński）上校率领波兰第1装甲师部队进驻弗里斯兰城市耶弗尔（Jever）。该师于1942年在苏格兰组建，是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它曾参与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并与英国和加拿大部队一同穿过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赴威悉河—埃姆斯河地区作战。当英军迅速向易北河进发时，这支波兰军队转而向北进军，占领了耶弗尔和威廉港（Wilhelmshaven）。“经过的村庄和地区竖起了白旗。大批获释的战俘和强制劳工在街上欢呼。德国平民一脸惊恐（……）”，斯基比恩斯基说。“在耶弗尔的一家酒店，也就是我们部队总部所在地，已经飘动着一面巨大的波兰国旗。”县长、市长和酒店老板在入口处迎接上校。据说斯基比恩斯基威胁这些绅士说：

“如果这座城市里有人想向波兰士兵扔棍子或向波兰军营扔石头，那么你们三个人将被绞死，而这座城市将灰飞烟灭。” [82].

三天前的5月3日下午，在耶弗尔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超过2000人聚集在城里最大的老集市广场上，大声抗议这座城市在最后一刻仍要抗击盟军的命令。想要安抚人群的指挥官赫尔曼·奥特

(Hermann Ott) 被人从讲台上轰了下来。弗里斯兰地区纳粹党负责人汉斯·弗吕格尔 (Hans Flügel) 随后到达，也没能让情况得到改善。他要求坚持抗击的口号被骚乱声淹没。有人喊道：“绞死！把这些纳粹分子挂到路灯上去！”两名男子抓住弗吕格尔，夺走了他手中的枪。一些勇敢的市民在城堡塔楼上悬挂起白旗。他们当晚被一支海军陆战队逮捕，并于5月4日被带到威廉港。他们幸运地活了下来，主要是因为不久后德国西北部的局部投降的消息就公布于众了。

耶弗尔的许多居民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所做的事情，他们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名亲历者回忆说：“起初我们很害怕波兰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指摘。” [83]. 波兰军队于5月20日和21日就离开耶弗尔和威廉港。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随后赶到。

[1] 参见1945年5月4日的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27.

[2] 参见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81 f. .

[3] Dwight D. 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Amsterdam 1948, S. 485.

[4] 参见Henke: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S. 966.

[5] 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S. 469.

[6] 参见Walter Bedell Smith: Eisenhower' s Six Great Decisions,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56, S. 204 f.;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95 f.。

[7] 1945年5月6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0 f.。

[8]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54.

[9] Alfred Jodl关于1945年5月6日与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谈话的记录; KTB-OKW, Bd. IV, 2, S. 1479-1481。参见Bedell Smith: Eisenhower' s Six Great Decisions, S. 205 f.; 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S. 487 f.。

[10] KTB-OKW, Bd. IV, 2, S. 1481 f.; 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2 (v. 6. 5. 1945) .

[11]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65。参见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32。

[12] Rudolf Höß: Kommandant in Auschwitz. Autobi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Martin Broszat, 4. Aufl., München 1978, S. 148。参见Wachsmann: KL, S. 672 f.。

[13]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90。

[14] 援引自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65; 参见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43。

[15]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65;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144; Michael Wildt: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S. 733 f.。

[16] 1945年5月6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1 f.。

[17] 参见Görlitz (Hrsg.) :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S. 375。1945年5月7日, 凯特尔简明扼要地宣布: “党卫队帝国领袖的全部职责均已失

效。”援引自John Zimmermann: Die Eroberung und Besetz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Hrsg.): Das Deutsche Reich im Zweiten Weltkrieg, Bd. 10/1, München 2008, S. 481。

[18]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91.

[19] 参见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München 2008, S. 7-9, 756 f.。

[20] 援引自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312。参见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München 2008, S. 291 ff.;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Ganz gewö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 Berlin 1996, S. 388 ff.。

[21] 参见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S. 401-404;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292 f.。

[22]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302。上文描述的情况也可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296-301; 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S. 404-409 (S. 408也有一幅黑尔姆布雷希茨死亡行进地图)。

[23] 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303 f.。

[24] 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S. 411。关于戈德哈根引起的辩论, 参见Volker Ullrich: Eine produktive Provokation: Die Rolle der Medien in der Goldhagen-Kontroverse, in Martin Sabrow/Ralph Jessen/Klaus Große Kracht (Hrsg.): 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 Große Kontroversen nach 1945, München 2003, S. 152-170。

[25] 参见Peter Engelbrecht: Der Krieg ist aus. Frühjahr 1945 in Oberfranken, Weißenstadt 2015, S. 84。

[26] 此处原文误将捷克小城茨沃道 (Zwodau) 拼写成德国萨克森州的市镇茨沃豪 (Zwochau), 已更正。——编者注

[27] 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305-313 (数据见S. 312 f.)。

[28] 这是Daniel Blatman与Daniel Goldhagen的主要分歧, 后者认为死亡行进是针对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计划的最后一步, 并将狂热的“毁灭式”反犹主义视为助推因素。参见Goldhagen: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S. 417-436;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313-319。

[29] 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11 f.。

[30] 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196-202; Benedikt Erenz: Apokalypse in Ostpreußen, in DIE ZEIT v. 1. 3. 2007。

[31] 一般指1938年扩张前的纳粹德国领土。

[32] 关于“普通德国人”的反应, 参见Wachsmann: KL, S. 676 f.; Katrin Greiser: Die Todesmärsche von Buchenwald. Räumung, Befreiung und Spuren der Erinnerung, Göttingen 2008; S. 257-277; Martin C. Winter: Gewalt und Erinnerung im ländlichen Raum.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und die Todesmärsche, Berlin 2018, bes. S. 154-199。

[33] 参见Bernhard Strebel: Celle April 1945 revisited, Bielefeld 2008, S. 52-123; ders.: Celle, 5. April 1945, in DIE ZEIT v. 23. 4. 2009; 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435-443。

[34] 参见Blatman: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S. 499-568。

[35] Horst G. W.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Dokumentarchronik vom Totenkampf und Untergang einer deutschen Stadt und Festung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Wedel 1988, Bd. 5, S. 326。

[36] Horst G. W.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Dokumentarchronik vom Totenkampf und Untergang einer deutschen Stadt und Festung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Wedel 1988, Bd. 5, S. 433。

[37] 亦可参见Gregor Thum: Die fremde Stadt. Breslau 1945, Berlin 2003, S. 18-30 (此处见S. 19); Norman Davies/Roger 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Breslau-Wrocław-Vratislava. Die Geschichte einer mitteleuropäischen Stadt, München 2002, S. 29-60.

[38] Paul Peikert: “Festung Breslau” in den Berichten eines Pfarrers, 22. Januar bis 6. Mai 1945. Hrsg. von Karol Jonca und Alfred Konieczny, Berlin 1970, S. 26.

[39]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1, S. 204.

[40] 援引自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32。

[41] 援引自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33。

[42] Speer: Erinnerungen, S. 430.

[43]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209 (v. 24. 1. 1945) .

[44]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274 (v. 30. 1. 1945) ;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267 f. (v. 30. 1. 1945) 。

[45] 参见Thum: Die fremde Stadt, S. 21; 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37。

[46] 参见Gregor Thum: Stalingrad an der Oder, in DIE ZEIT v. 3. 3. 2005; 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46。

[47]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3, S. 651; 参见 Thum: Die fremde Stadt, S. 24; 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49。

[48] Völkischer Beobachter v. 4. 3. 1945;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3, S. 128 f.

[49]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416 (v. 4. 3. 1945) , 421 (v. 5. 3. 1945) .

[50] Schlesische Tageszeitung. Frontzeitung der Festung Breslau v. 7. 3. 1945;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3, S. 230.

[51] 参见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48; Thum: Die fremde Stadt, S. 25.

[52]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640 (v. 30. 3. 1945) .

[53] Peikert: “Festung Breslau” in den Berichten eines Pfarrers, S. 284.

[54] Schlesische Tageszeitung. Frontzeitung der Festung Breslau v. 20. 4. 1945;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4, S. 864.

[55] 阿尔伯特·施佩尔于1945年4月14日写给卡尔·汉克的信；收录于 Breloer: Die Akte Speer, S. 315。

[56] 参见Hitlers politisches Testament v. 29. 4. 1945;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191。关于授予汉克勋章，可参见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15, S. 692 f. (v. 9. 4. 1945) 。

[57] 指代苏联人。

[58] Schlesische Tageszeitung. Frontzeitung der Festung Breslau v. 4. 5. 1945;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5, S. 156.

[59]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5, S. 181 f.; 亦可参见布雷斯劳最后一位城市牧师的报告Joachim Konrad: Das Ende von Breslau,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g. 4 (1956) , S. 387-390。

[60] Gleiss: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Bd. 5, S. 233.

[61] 参见Thum: Die fremde Stadt, S. 30, 533 (Anm.31) 。

[62] Hans von Ahlfen/Hermann Niehoff: So kämpfte Breslau. Verteidigung und Untergang von Schlesien, München 1959.

[63] 参见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59。

[64] 参见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519。

[65] “N”是“Niemiec”的缩写，意为“外来人”，是对德国人的蔑称。

[66] 参见Davies/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S. 519-527。

[67] Hugo Hartung: Schlesien 1944/45. Aufzeichnungen und Tagebücher, München 1956, S. 131.

[68] 参见Peter Merseburger: Der schwierige Deutsche. Kurt Schumach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95, S. 11-193 (引文见S. 119 f.)。

[69] Albrecht Kaden: Einheit oder Freiheit. Die Wiedergründung der SPD 1945/46, Hannover 1964, S. 17.

[70] 舒马赫于1945年5月6日的讲话，收录于Willy 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Reden-Schriften-Korrespondenzen 1945-1952, Berlin-Bonn 1985, S. 203-236。总结性的论述可见Kaden: Einheit und Freiheit, S. 17-21; Kristina Meyer: Die SPD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1945-1990, Göttingen 2015, S. 32-34。

[71] Annemarie Renger: Die Trümmer in den Köpfen der Menschen,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225-233 (引文见S. 233)。亦可参见Annemarie Renger: Ein politisches Leben. 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93, S. 65-69。

[72] Renger: Ein politisches Leben, S. 70 f.

[73] Meyer: Die SPD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1945-1990, S. 35.

[74] 库尔特·舒马赫于1945年7月25日致卡尔·泽韦林的信; 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S. 241。

[75] 参见Kaden: Einheit oder Freiheit, S. 69; Kurt Klotzbach: 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Programmatik, praktische Poli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45 bis 1965, Berlin-Bonn 1982, S. 43.

[76] “Politische Richtlinien der SPD in ihrem Verhältnis zu anderen politischen Faktoren”, 收录于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S. 256-286。总结性的论述可见Kaden: Einheit oder Freiheit, S. 70-74。

[77] 援引自Brigitte Seebacher-Brandt: 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 1984, S. 287。

[78] 援引自Brigitte Seebacher-Brandt: 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 1984, S. 291。

[79] 舒马赫于1945年10月5日、6日在Wennigsen和Hannover的“纲领性声明”。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S. 301-319 (此处见S. 318)。

[80] 库尔特·舒马赫于1945年10月12日致卡尔·泽韦林的信; 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S. 320。

[81] 舒马赫的主报告“Aufgaben und Ziel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Albrecht (Hrsg.): Kurt Schumacher, S. 387-418 (此处见 S. 418)。关于社民党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的发展情况, 参见Kaden: Einheit oder Freiheit, S. 233-280; Klotzbach: 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S. 73-81。

[82] 亦可参见Hartmut Peters: Das Kriegsende in Jever 1945 und der Massenprotest gegen die Verteidigung der Stadt; <https://www.groeschlerhaus.eu/das-kriegsende-in-jever-1945-und-der-massenprotest-gegen-die-verteigungder-stadt/>。

[83] 亦可参见Hartmut Peters: Das Kriegsende in Jever 1945 und der Massenprotest gegen die Verteidigung der Stadt; <https://www.groeschlerhaus.eu/das-kriegsende-in-jever-1945-und-der-massenprotest-gegen-die-verteigungder-stadt/>。

1945年5月7日

1945年5月7日，午夜0点15分，约德尔大将从艾森豪威尔总部发来的电报抵达弗伦斯堡，请求授权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海军元帅邓尼茨立即召集其最亲近的同事讨论局势。他们一致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是“绝对敲诈”。尤其是他威胁的话，即“如果遭到拒绝，将把他战线以东的所有德国人移交苏联人”引发了众怒。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很清楚，在前一天还表示反对全面投降的约德尔，一定是出于其他“重要原因”才别无选择。毕竟将截止日期定为5月9日凌晨0点01分，已经获得了48小时的时限用来“大规模营救东部的军队”。凌晨1点左右，邓尼茨向约德尔发送电报，授权他宣布无条件投降。^[1]

与此同时，在兰斯的签字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大楼二层的地图室，用以捕捉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已就绪。凌晨2点41分，约德尔在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和威廉·奥克塞纽斯（Wilhelm Oxenius）少校的陪同下签署了投降文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军远征军签字，伊凡·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代表苏联最高指挥部签字，法军少将弗朗索瓦·塞维兹（François Sevez）为见证人。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观察到，德国人按照标准军事礼仪坐在那里，“面部表情僵硬”。但是他不记得桌旁的盟军军官们在漫长的战斗结束后曾流露任何兴高采烈的神情。这更像是“一个庄严的感恩时刻。”^[2]约德尔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呼吁胜利方实行从宽处理。随着他签下名字，国防军和德国人民以“宽容和耻辱”的方式被移交给了对方：“双方在这场战争中所承担和遭受的也许比世界上任何民

族都要多。在这一刻，我只能请求胜利者对失败方宽容以待。”^[3]随后，约德尔和他的两位同伴被带到艾森豪威尔那里，此前后者一直避免与邓尼茨政府的代表会面。这位盟军远征军总司令询问德国人是否理解了文件的所有要点，是否准备尽其所能认真执行这些条款。德国人给出肯定答复，向他敬礼，然后离开了房间。^[4]

该文件第1条宣布“陆、海、空三军所有武装力量”同时对盟军最高指挥官以及苏维埃最高司令部“无条件投降”。第2条规定德军最高指挥部承诺立即向其控制下的武装部队发出命令，要求其于中欧时间5月8日23点01分（即德国夏令时5月9日凌晨00点01分）停止战斗并原地待命。^[5]直到10点55分，邓尼茨政府才收到投降书全文。他们通过无线电和电话将消息传至国防军部队。此外，海军元帅派遣信使飞往各集团军指挥部，意在向指挥官们解释作出全面投降决定的必要性，并敦促他们忠诚执行。^[6]

中午12点45分，“帝国临时政府”首席部长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在广播中公布了所有部队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说这是德国历史上的“悲剧时刻”：“经过近六年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德军输给了对手具有压倒性的力量。继续战争仅仅意味着毫无意义的流血和无用的破坏。作为对我们人民的未来负有责任心的政府，必须从一切躯体以及物质力量的崩溃中吸取教训，并请求敌人停止敌对行动。”毫无疑问，未来的日子会很艰难，所有德国人都被要求作出重大牺牲。但是，人们不应该陷入绝望以及听天由命。在此，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恳请大家拥有“人民共同体的思想”，人们可以在战时“前线战斗的兄弟情，互助以解燃眉之急的邻里情”中找到它“最美好的诠释”。

在这里，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一方面采用了纳粹典型的宣传模式，另一方面，他首次与前暴力政权划清了界限：“我们必须使

法律成为人民生活的基础（……），我们也必须出于内心的信念尊重以及承认法律是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基础。我们应对缔结的条约神圣以待，我们的民族应隶属于欧洲民族大家庭，作为其中一员，我们应贡献一切人道主义、道德和物质力量来治愈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创伤。” [7]



1945年5月7日夜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在盟军位于兰斯的总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左起：威廉·奥克塞纽斯少将、约德尔、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akg-images, Berlin）

约德尔于下午4点返回，并汇报了在兰斯的谈判情况。他再次抱怨了“艾森豪威尔毫不妥协的生硬态度”。他说，艾森豪威尔不仅威胁美军将坚决拒绝接收国防军部队，从而将其移交给红军，而且还宣布将轰炸仍未被占领的石勒苏益格地区的城市，理由是三天前对蒙哥马利的局部投降对美国空军无效。在弗伦斯堡进行详细讨论后，结果是，除了无条件全面投降，没有其他选择。“别无他法。” [8]

*

1945年5月7日上午，刚刚担任卑尔根-贝尔森副营长的英军中尉阿诺德·霍威尔（Arnold Horwell）迎来一位意外的访客。一名身穿美军制服、戴着头盔、穿着作战靴的女性走进他的办公室，并自称“迪特里希上尉”。她听说姐姐莉塞尔在卑尔根-贝尔森，希望能获得允许与姐姐见面。霍威尔在惊讶之余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谁：著名的好莱坞女星玛琳·迪特里希。[\[9\]](#)

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三周前才被英军解放。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有如此多的囚犯死于疾病和折磨。仅在1945年3月，平均每45000名囚犯中就有18168人丧生，其中就有安妮和玛戈特·弗兰克（Anne und Margot Frank）姐妹，她们是在1944年10月底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被运送来的。在党卫队司令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1945年4月15日移交营地时，英军目睹了可怕的景象：超过13000具尸体散布在整个营地；解放后仍有数千人丧生。[\[10\]](#)

玛琳·迪特里希当时作为慰军艺人为美国将军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利（Omar Nelson Bradley）在慕尼黑的部队工作。前一天她刚刚被告知，有位名叫伊丽莎白·威尔（Elisabeth Will）[\[11\]](#)的女士向卑尔根-贝尔森的英国占领军报告称是她的姐姐。迪特里希已经整整六年没有收到莉塞尔的消息了，她猜测纳粹将莉塞尔送到集中营，作为对其妹妹为美军服务这一行为的惩罚。5月7日早晨，迪特里希乘坐布莱德利的飞机前往吕讷堡荒地的法斯贝格（Fassberg）军用机场，然后换乘吉普车驶向距离该地30公里的卑尔根-贝尔森。但是，当霍威尔把伊丽莎白·威尔叫过来并指出她绝非受害者时，迪特里希感到十分困惑。其原因在于，她和她的丈夫乔治·威尔（Georg Will）在战争期间经营过一家部队电影院，以供国防军士兵以及在集中营值班的党卫队娱乐和放松。



1945年4月15日，解放后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英国士兵的监视下，原看守和德国平民在掩埋尸体。（akg-images, Berlin）

这一发现令玛琳·迪特里希感到震惊。她的担心，即这种尴尬的亲戚关系可能会给她在对抗希特勒德国时无可指摘的表现蒙上阴影，并非杞人忧天。尽管她答应了姐姐将来会给予其物质援助，但她提出了相应的条件：伊丽莎白·威尔必须确保尽可能地低调行事，不能接受采访，简而言之，即否认自己是玛琳·迪特里希的姐姐。^[12]

玛琳·迪特里希（原名玛丽·玛格达琳·迪特里希，Marie Magdalene Dietrich）于1901年12月出生于柏林舍嫩贝格区

（Schöneberg），与大她两岁的姐姐伊丽莎白一起在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她的父亲路易斯·埃里希·奥托·迪特里希（Louis Erich Otto Dietrich）是一名警官，母亲约瑟芬（Josephine）是一名珠宝商的女儿，其父亲在菩提树下大街（Unten den Linden）经营着一家高级手表和珠宝店。从一开始，两姐妹就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伊丽莎白个子小，微胖，害羞而内向；玛琳则迷人而有趣，年轻时就招男孩喜欢。在父亲1908年去世后，她们的母亲与普鲁士军官爱德华·冯·洛施（Eduard von Losch）结婚，后者因在战争中受伤于1916年6月去世。这位寡妇对女儿们的教育非常严格，她十分注重像勤劳、荣誉和纪律这些所谓的“普鲁士美德”。姐姐会对此顺从，玛琳在日记中称其为“可怕的道德哈巴狗”，而身为妹妹的她则早就尝试反抗。

在进入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区的维多利亚露易丝学校（Victoria-Luisen-Schule）上学后（玛琳在1918年就辍学了），两姐妹就走上截然不同的路：伊丽莎白开始接受师范教育，玛琳则在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梦想破灭后，开始混迹于柏林文化圈。她积攒了最初的舞台表演经验，还在无声电影中饰演配角。在拍摄电影《爱情的悲剧》时，她邂逅了制作经理鲁道夫·席贝尔（Rudolf Sieber），两人于1923年5月结婚。1924年12月，他们唯一的女儿玛丽亚出生。[\[13\]](#)

1929年，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选中这位新生代女演员，让她在根据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改编的电影《蓝天使》中饰演萝拉。这个轻佻妩媚的女性角色简直是为她量身定制。她展露的锋芒甚至盖过了片中的主演，即著名演员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并由此为成为国际巨星奠定基础。在柏林“荣耀（Gloria）”电影宫首映后，她随即跟随约瑟夫·冯·斯登堡前往美国。她和派拉蒙（Paramount）电影公司签了一份七年的高薪合同。在她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摩洛哥》（1930）中，她的搭档是加里·库珀（Gary Cooper）。斯登堡与她接连拍了好几部电影，包括《上海快车》（1932）、《金发维纳斯》（1932）、《放荡的女皇》（1934）和《魔鬼是女人》（1935）。柏林女孩幸运地转型为好莱坞女神。[\[14\]](#)

然而，她的姐姐伊丽莎白的生活则黯淡得多。1926年，她与剧院经理乔治·威尔结婚。为了他，她放弃了老师的工作；他们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于1928年6月出生，从此她完全投入家庭。虽然她的丈夫是纳粹党员，但是自1933年起被禁止工作，因为他曾与犹太作曲家弗里德里希·霍兰德（Friedrich Hollaender）一起经营“廷格尔-坦格尔（Tingel-Tangel）”剧院。1936年8月，乔治·威尔写信给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负责人汉斯·辛克尔（Hans Hinkel），请其帮助自己“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在新闻界或是剧院都可以”。他还特别强调，他始终全力支持“国家事业”，例如，他在1919年以“高地志愿军（Freikorps Oberland）”成员的身份参与过慕尼黑和上西里西亚的“解放运动”。^[15]

这时，戈培尔还没有放弃让玛琳·迪特里希重返德国的希望。1936年4月，他观看了玛琳与加里·库珀合作的第二部电影《欲念》，并在日记中写道，这两人都是“真正的好演员（……），尤其是迪特里希，可惜德国不再拥有她了”。^[16]他在1937年2月观看了由玛琳·迪特里希和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共同主演的美国早期彩色电影《乐园思凡》后，认为这部电影虽然“很愚蠢并且在胡说八道”，但他仍然觉得“迪特里希演得很棒”。^[17]

为了努力让这位好莱坞明星“返回帝国”，戈培尔还拉拢了她的姐夫。尽管来自柏林的呼唤均告无用，因为玛琳·迪特里希于1937年3月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但乔治·威尔获得了回报：宣传部委托这名失业的歌舞导演管理部队训练区的三家电影院，它们分别位于勒恩山中的维尔德弗莱肯（Wildflecken in der Rhön）、法灵博斯特尔附近的欧尔布克（Oerbke bei Fallingbostal）以及卑尔根-贝尔森。他在维尔德弗莱肯和欧尔布克的电影院担任总经理；在可容纳近2000人的卑尔根-贝尔森部队大型电影院，他则亲自承担管理工作。二战爆发前，他的妻子和儿子就已来投奔他。一家人搬进了电影院楼上的宽敞公

寓。伊丽莎白·威尔在战争期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距她只有两公里远的恐怖集中营对她来说并不是秘密。[\[18\]](#)

1939年6月，玛琳·迪特里希获得美国国籍。几周后，电影《碧血烟花》开始拍摄，她在其中扮演沙龙女歌手芙兰琪（Frenchy）一角，延续了她在1920年代后期饰演过的角色。她所演唱的歌曲《幕后智囊团》（*The Boys in the Back Room*）几乎与《蓝天使》中的《我从头到脚为爱而生》（*Ich bin von Kopf bis Fuß auf Liebe eingestellt*）一样受欢迎。欧洲战场似乎很遥远，但是由于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也被卷入战争。玛琳·迪特里希前往全国各地，帮助推行战争债券。她与其他明星一起在“好莱坞食堂”为士兵做饭，到医院探望伤员。最终，她决定积极参加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我对希特勒引发的战争负有共同责任。我想帮助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她在1979年公开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

迪特里希向美国联合服务组织（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简称USO）提出慰问海外军队的申请。1944年4月，她得偿所愿。她身着制服，以上尉的身份飞往阿尔及尔。她为那里的美国士兵举办了她的第一场音乐会。很快她的一首保留曲目诞生了：《莉莉玛莲》（*Lili Marleen*），它在德军和盟军中都广受欢迎。她随盟军继续前进，从北非前往直意大利。1944年6月初，即盟军登陆诺曼底几天前，她与美国士兵一起进驻罗马。在1944年8月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采访时，她说道，罗马人看到在吉普车上的她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定觉得美国人很棒。我们带给他们自由、面包，甚至电影明星。”[\[20\]](#)

在纽约短暂停留后，玛琳·迪特里希于1944年9月开始了她的第二次美国联合服务组织巡回演出。从巴黎开始，她加入了乔治·S. 巴顿（George S. Patton）将军正在行进的部队。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战

役，即希特勒对试图扭转局面作出的最后一次尝试中，她和一支美军部队遭到包围，险些成为俘虏。

在越过德国—比利时边界后，她与德国人的首次相遇完全不像她之前所担心的那样。她回忆说：“我们到达德国，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威胁，没有任何让人感到害怕的事情。”“街上的人们特别想和我拥抱，他们希望我能帮忙让美国人喜欢他们，他们都非常友好。”^[21]4月中旬，她跟随美军穿越德国南部前往波希米亚。在皮尔森，美军和苏军士兵一起庆祝胜利，这是玛琳·迪特里希第一次在红军士兵面前唱歌。几天后，即5月初，她在慕尼黑收到了那个住在卑尔根-贝尔森自称是她姐姐的女人的消息。^[22]



1945年春，“好莱坞女神”玛琳·迪特里希和美国士兵在德国。（picture alliance/Keystone/akg-images, Berlin）

“谢谢你特意过来”，伊丽莎白·威尔在于卑尔根-贝尔森与妹妹重逢的两个星期后给她写信，并补充道：“我也坚信你会找到妈妈

的。”^[23]约瑟芬·冯·洛施确实在柏林幸存了下来。1945年9月，玛琳·迪特里希乘军用飞机前往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她的母亲在那里迎接她。她几乎完全认不出这座离开了十五年的城市，“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被炸毁，动物园火车站、陶恩齐恩大街、约阿希姆塔勒大街——一切都成为废墟（……）”，她在给丈夫鲁道夫·席贝尔的信中写道。尽管自身绯闻不断，但她仍与他保持婚姻关系。她母亲住的房子被烧毁了。“阳台掉了下来，妈妈一直在废墟中搜寻，在上面（……）按照我的脸打造的青铜面具没有受损！然后她坐着哭了很长时间。”^[24]玛琳·迪特里希每天为美国士兵表演两次。1945年10月，她回到巴黎。约瑟芬·冯·洛施于1945年11月初去世，享年仅63岁。

1945年11月，玛琳·迪特里希再次在卑尔根-贝尔森作中途停留，显然她秘密安排了第二次见面。像政权中的许多随波逐流者一样，乔治·威尔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改变立场，承诺为占领者效力。他被允许继续经营电影院，主要为英军提供娱乐。1950年租约到期后，他在汉诺威开了一家“大都会电影院”。他把妻子留在卑尔根-贝尔森。她在那里过着僻静的日子，但没有物质上的困难，因为玛琳将从德国获得的唱片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给了姐姐，并一次又一次地慷慨解囊。作为回报，伊丽莎白遵守协议：身为著名女星的姐姐，她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25]

战后，玛琳·迪特里希又拍了几部电影，包括1948年比利·怀德执导的《柏林艳史》，她在其中扮演一名风情万种且拥有不光彩过去的夜总会歌手。1953年，她开始了作为歌手的第二职业，最初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撒哈拉酒店和伦敦的巴黎咖啡厅。不久，她开始了全球巡回演出。在1960年的欧洲巡演时，她也设定了德国站。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热情的欢迎。在许多德国人眼中，这位勇敢的反纳粹斗士被

视为“祖国的叛徒”。在美国，她于1947年获得了“自由勋章”，这是平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26\]](#)

玛琳偶尔邀请她的姐姐参加她的客座演出，然后秘密地与之会面。1973年5月7日，即两姐妹第一次在卑尔根-贝尔森会面的28年后，伊丽莎白·威尔因房屋火灾去世。[\[27\]](#)

玛琳·迪特里希比她的姐姐多活了近二十年。1961年，她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大片《纽伦堡大审判》。合作演员斯潘塞·特雷西（Spencer Tracy）在片中扮演法官丹·海伍德（Dan Haywood），她饰演一位国防军将军的遗孀。这位国防军成员被美军当作战犯吊死，这个角色和1945年后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声称对纳粹的大规模罪行一无所知。1975年9月，她在悉尼的舞台上摔倒，股骨颈骨折，不得不结束其歌手生涯。她就此完全隐退，直到1992年5月6日去世前，她都住在位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蒙田大道的公寓中。演员兼导演马克西米利安·谢尔（Maximilian Schell）于1982年秋天在那里采访她时，问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只回答：“没有。”[\[28\]](#)

*

就在同一天，德国在荷兰占领区的总督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在汉堡被捕，数千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Dam）。5月7日这天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因为期待已久的解放者加拿大第1军团的士兵终于要在中午时分到来。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人群耐心地等待着。突然，下午3点左右，广场上响起了枪声。德国海军士兵在一栋建筑物的二楼设置了防御工事，并有目的地向人群开枪。人们惊慌失措地试图逃跑，或者趴在地面上。“这是阿姆斯特丹人在最终获得解放，并且不再害怕那些可恶占领者之前的最后一出悲剧”，历史学家和记者芭芭拉·博伊斯（Barbara Beuys）在记录德国占领时期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时写道。“22名阿姆斯特丹市民用自己的生命为水坝广场

的庆祝日付出了代价。有60人受了伤。人们惊恐地离开市中心逃回家中。” [29]

这一悲剧开始于1940年5月10日早上，那一天德国国防军士兵越过荷兰边境。荷兰政府使民众误以为希特勒会尊重该国的中立立场。因此，当他们不得不和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一样与东部的好战邻国交战时，他们的反应更为惊慌失措。5月13日，威廉明娜（Wilhelmina）女王和大臣们逃往伦敦；5月15日，荷兰投降。当天，德军便挺进阿姆斯特丹。5月26日，帝国总督赛斯-英夸特抵达海牙，接管了该国政府的最高权力。起初，他似乎奉行“温和政策”。阿姆斯特丹的历史老师亨德里克·扬·斯梅丁（Hendrik Jan Smeding）在6月5日的日记中如释重负地写道：“我们从一个噩梦中稍微醒来：暂时还没有对犹太人的迫害；没有大搜捕；没有在大学里进行清洗。” [30]

战争开始时，140000名荷兰犹太人中有近80000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中包括近7000名德国犹太移民。他们中就有弗兰克一家四口——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他的妻子伊迪丝（Edith）以及两个女儿玛戈特和安妮，他们于1933年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来到阿姆斯特丹，住在位于城市南郊的梅尔韦德广场（Merwedeplein）37号公寓。和其他阿姆斯特丹市民的感觉一样，对他们来说，德国占领下的生活起初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但螺丝在不断地被拧紧。为奥兰治王室举办的集会不再被容忍，电影审查制度被引入，除安东·阿德里亚·穆塞特（Anton Adriaan Mussert）领导的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简称NSB）外，所有其他政党都被禁止。1940年10月，共约25000名阿姆斯特丹公务人员——从门房到教授——都必须提交一份“雅利安人声明”。随后，犹太官员和雇员遭到解雇。

1941年1月，赛斯-英夸特命令所有“拥有全部或部分犹太血统的人”必须进行登记。这是要进一步统计犹太人口的情况并对其进行社

会隔离。咖啡馆、饭店和旅馆很快挂出“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标语。同时，荷兰纳粹暴徒开始在阿姆斯特丹街头殴打犹太人。如果他们遇到反抗，高级党卫队领袖和警察局长汉斯·阿尔宾·劳特（Hanns Albin Rauter）就以此为借口进一步拧紧暴力的螺丝。1941年2月22日至23日，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突袭中共有400多名犹太男性在大搜捕行动中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2月25日，为声援被迫害者，阿姆斯特丹市民让公共交通工具瘫痪，数万抗议者强烈反对占领者的苛政。抗议活动很快遭到了报复：四名共产党工人和一个非法小团体的十五名成员在斯海弗宁恩（Scheveningen）附近的沙丘中被枪杀。1941年3月12日，赛斯-英夸特在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宣布：“无论在哪里遇到犹太人，我们都要击倒他们，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将承担后果。”^[31]

反犹太政策开始逐步收紧。犹太人被禁止进入酒吧、电影院、剧院和游泳池，他们被要求交出收音机，犹太医生和律师不再被允许接待“雅利安血统”的病人和顾客，并且不再允许犹太儿童上公立学校。对于12岁的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姐姐玛戈特来说，这意味着自1941年10月起，她们每天都必须长途跋涉去上新成立的犹太女子学校。自1942年5月3日起，即德国强制要求犹太人佩戴特殊标志的八个月后，荷兰所有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佩戴上面印有“Jood”^[32]字样的黄色六芒星。自5月以来转为地下发行的《誓言报》（*Het Parool*）谴责了这一无耻行径：这不仅是“对犹太人的侮辱，也是给整个荷兰人民一记耳光”。^[33]

1942年6月12日，安妮·弗兰克在梅尔韦德广场37号庆祝自己的13岁生日。她的父亲送给她一本套着方格图案布制封皮且带有按扣的日记本作为礼物。“我希望，我能够向你吐露迄今为止没能向任何人吐露的一切，希望你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这是日记里的第一句话。^[34]八天后，她自我批评地写道：“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未来

不会有谁对一名13岁女学生的自白感兴趣。”^[35]她错了！这本一直记录到1944年8月1日，直到被捕前不久才停笔的日记，成了记录纳粹统治欧洲时期犹太人命运的最杰出、最动人的证词，而作者本人因而举世闻名。

1942年4月中旬，阿道夫·艾希曼在阿姆斯特丹逗留期间通知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简称ZjA）负责人费迪南德·奥斯·德·芬滕（Ferdinand aus der Fünten），从夏天开始要把犹太人驱逐到“东部”的灭绝营。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在筹备该项行动时，主要依据市政当局于1941年1月完成的统计数据。1942年7月5日，首批赴德国投入“义务劳动”的通知下达。在同一天，玛戈特·弗兰克就收到了要求去中央办公室登记的通知。这最终促使奥托·弗兰克与家人躲藏到他筹备了很久的藏身之处中，即位于王子运河大街（Prinsengracht）263号他原来办公楼的后排房屋。接下来几天，赫尔曼（Hermann）和奥古斯特·范·佩尔斯（Auguste van Pels）夫妇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Peter），牙医弗里茨·普费弗（Fritz Pfeffer）也躲了进来。在完成了这次充满危险的搬家后，安妮·弗兰克在7月8日记录道：“发生了太多事情，仿佛整个世界突然颠倒过来。”^[36]

7月14日到15日的夜里，第一列驱逐犹太人的列车离开主火车站。在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中转营短暂停留后，这些犹太人继续运往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到1942年底，已经有40000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被“运往东部”。躲在王子运河大街的八个人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不敢想象。1942年10月9日，安妮·弗兰克写道：“除了悲伤和令人消沉的消息，别无其他。”“我们的犹太朋友们很快被一群群地逮捕。盖世太保对待这些人毫不留情。他们坐着牲畜车被运到韦斯特博克。”父亲的前雇员梅普·吉斯（Miep Gies）冒着生命危险给躲在房子里这几个人提供食物，她这样描述集中营里的可怕状况：“人们几

乎吃不到任何东西，更别提喝的了（……）。如果荷兰的情况就已经如此糟糕，那波兰会怎样呢？我们猜测，大多数人将被杀害。英国广播提到了使用毒气杀人，也许这是最快让人死去的办法。” [37]

在大搜捕任务中，警察和党卫队得到“亨内基部队（Kolonne Henneicke）”的支持，这是一支由威廉·克里斯蒂安·亨内基（Willem Christiaan Henneicke）率领的、由54名荷兰内奸组成的队伍，负责追踪躲在家中或地下室的犹太人。仅在1943年3月和4月，该组织就抓到了将近6000名受害者，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按人头奖励7.50荷兰盾。1943年10月初，占领者正式宣布阿姆斯特丹已经“没有犹太人”。虽然搜捕躲藏起来的犹太人的工作仍在继续，但有组织的大规模搜捕行动已经结束。 [38]

躲藏中的弗兰克一家和其他几位受难同胞一直忍耐着，并且害怕被发现。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消息让他们燃起了希望。“后排房子里的大家都感到振奋”，安妮·弗兰克写道。“期待已久的解放，说了太多次的解放，过于美好且童话般的、但似乎无法实现的解放真的来临了吗？今年，1944年，会给我们送来胜利吗？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希望令我们生机勃勃，给我们勇气，使我们重新强大。” [39]

仅仅八周后，即1944年8月4日，由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卡尔·约瑟夫·西尔贝鲍尔率领的四人搜查队闯入王子运河大街的后排房屋，逮捕了躲藏在此处的八个人。不知道究竟是谁泄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梅普·吉斯不久后来到了空荡荡的公寓，拿走了一些散落在地板上的文件，其中就有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被捕的八人先被运往位于韦特林尚斯街（Weteringschans）的拘留所，四天后被带到韦斯特博克。9月3日，最后一趟运输车离开该中转营。在近1000人中——有498名成年男性、422名成年女性和79名儿童，其中包括伊迪丝和奥托·弗兰克、

他们的两个女儿、范·佩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以及弗里茨·普费弗。9月5日，火车抵达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

安妮和玛戈特·弗兰克于10月底因疏散命令被运往卑尔根-贝尔森。她们没能在那里灾难性的生存条件中幸存。她们的母亲伊迪丝于1945年1月6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去世。赫尔曼·范·佩尔斯于1944年10月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死。他的妻子奥古斯特从奥斯威辛经卑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被运往泰雷辛施塔特集中营。她的确切死亡日期不得而知。彼得·范·佩尔斯跟随死亡行军到达毛特豪森，他于1945年5月5日，即美国人解放该集中营的当天去世。弗里茨·普费弗于1944年12月20日在诺因加默集中营逝世。奥托·弗兰克在奥斯威辛活了下来，是八人中唯一的幸存者。1945年6月3日，他回到阿姆斯特丹。梅普·吉斯将日记交给他时说：“这是您女儿安妮留给您的遗物”。[\[40\]](#)

1944年9月5日，即运囚车从韦斯特博克抵达奥斯威辛的那一天，在荷兰历史书中被称为“疯狂的星期二”。在前一天，帝国总督赛斯-英夸特宣布阿姆斯特丹进入紧急状态。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南部的盟军正在迅速前进。“解放部队已经越过边界！”《誓言报》的传单标题写道。“布雷达、蒂尔堡、罗森达尔和马斯特里赫特已经解放了！光荣的德国国防军被击败并逃跑。”[\[41\]](#)

9月4日晚，几千名占领军仓皇逃离荷兰首都，其中包括许多担心同胞报仇的荷兰卖国者。9月5日，阿姆斯特丹市民纷纷拥上街头。到处都是橙色，商店橱窗中摆放着威廉明娜女王的照片。但人们高涨的热情很快就被无尽的失望浇灭了。因为解放者没有来。1937年移民到阿姆斯特丹并在整个德国占领时期都居住在此的画家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于9月6日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英国人没有

来。”^[42]国防军尚未被击败。英国伞兵部队占领阿纳姆（Arnhem）的几座战略意义重大的桥梁的行动以惨败告终。

“疯狂的星期二”之后几天，占领者很快返回，德国警察重新在街上巡逻。对于阿姆斯特丹人民来说，整个战争时期最艰难的阶段开始了。德军以任意逮捕和公开射杀俘虏的方式残忍镇压一切抵抗行动。1944年9月，荷兰铁路工人举行全国范围内的罢工以支持盟军进攻，总督赛斯-英夸特决定实施禁运惩罚。几乎没有任何食物被运送到阿姆斯特丹。在1944年至1945年的严冬，民众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到了春天，当希特勒德国的溃败已经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占领势力的恐怖统治再次升级。为了报复3月初对党卫队最高领导人汉斯·阿尔宾·劳特的袭击，共有263名荷兰人被杀害。^[43]

1945年4月，前线战场逐渐逼近。4月12日，加拿大士兵解放了韦斯特博克集中营。威廉明娜女王于5月3日抵达海牙。两天后，德国在欧洲西北部的部分投降生效。5月6日，德国驻荷兰国防军总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将军在瓦赫宁根（Wageningen）签署了投降文件。德国的统治终于结束了。“喝了半杯苦艾酒。夜里十二点半上床，两点半我们还没有睡着，我们大声地聊着天！我们被允许这样做。喜悦、幸福、感激，我们活了下来。”18岁的年轻犹太女孩卡里·乌尔莱希（Carry Ulreich）这样写道；她与父母和姐姐在鹿特丹的一个躲藏处幸存下来。^[44]

在阿姆斯特丹，人们仍在等待加拿大人的到来，因而德国海军得以于5月7日在水坝广场进行上文提到的屠杀。不过，5月8日时机到了：加拿大锡福斯高地兵团（Seaforth Highlanders of Canada）的士兵们在热情的欢迎下向荷兰首都进军。当天，在汉堡被英军逮捕的赛斯-英夸特乘军机被带到荷兰，在亨格洛（Hengelo）机场被移交加拿大宪兵部队。^[45]他在纽伦堡被判处绞刑。

[1] 1945年5月7日的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2。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55。

[2] Bedell Smith: Eisenhower' s Six Great Decisions, S. 210.

[3] 援引自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00。

[4] 参见Harry C. Butcher: Drei Jahre mit Eisenhower, Bern 1946, S. 829; 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S. 488。

[5] 1945年5月7日的投降书文本收录于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144 f.; KTB-OKW, Bd. IV, 2, S. 1676 f.。

[6]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70。

[7] 科洛希克于1945年5月7日的讲话；收录于Lüdde-Neurath: Die Regierung Dönitz, S. 152 f.; 亦可见Schwerin von Krosigk: Memoiren, S. 247 f.。

[8] 1945年5月7日的备忘录；Schramm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3.。

[9] 亦可参见Heinrich 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Marlene Dietrich und ihre verleugnete Schwester, Hamburg 2017, S. 9 ff.; ders.: Im Schatten des Blauen Engels, in DIE ZEIT v. 27. 9. 2017。

[10] 参见Wachsmann: KL, S. 651-653, 668。

[11] 莉塞尔 (Liesel) 是伊丽莎白 (Elisabeth) 的昵称。

[12]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9, 14-18, 214 f.。

[13] 参见Karin 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Der Traum von der neuen Frau, München 2011, S. 9-13, 38-85 (Zitat S. 52) ; 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19-42, 49-56; Eva Gesine Baur: Einsame Klasse. Das Leben der Marlene Dietrich, München 2017, S. 7-67。

[14] 参见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S. 183 ff.; Baur: Einsame Klasse, S. 110 ff.。

[15]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57-64, 110-118 (引文见S. 116)。

[16] Goebbels: Tagebücher, T. I, Bd. 3/II, München 2001, S. 55 (v. 2. 4. 1936)。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Bd. 2/III, S. 341 (v. 21. 12. 1933): “接着见了希特勒。《上海快车》。玛琳·迪特里希有点东西。”

[17] 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Bd. 2/III, , Bd. 3/II, S. 393 (v. 25. 2. 1937)。

[18]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132, 135-139, 153-159。

[19] Marlene Dietrich: Nehmt nur mein Leben... Reflexionen, München 1979, S. 143.

[20] 《纽约先驱论坛报》1944年8月13日对玛琳·迪特里希的采访; 援引自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S. 400。上文和下文描述的内容参见Marlene Dietrich: Nehmt nur mein Leben... Reflexionen, München 1979, S. 380-409; Baur: Einsame Klasse, S. 254-296。

[21] Dietrich: Nehmt nur mein Leben..., S. 171.

[22]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201; Baur: Einsame Klasse, S. 304 f.。

[23] 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216.

[24] 玛琳·迪特里希于1945年9月27日写给鲁道夫·席贝尔的信; 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S. 412;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226; Baur: Einsame Klasse, S. 309 f.。

[25]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245-256。

[26] 参见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S. 424-429, 482-488, 496-500; Baur: Einsame Klasse, S. 360 ff., 389 ff.。

[27]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285-292, 357-361。

[28] 参见Thies: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S. 369。上文描述的内容亦可参见Wieland: Dietrich & Riefenstahl, S. 503 f., 529-543; Baur: Einsame Klasse, S. 404 f., 472-474。

[29] 亦可参见Barbara 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Amsterdam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40-1945, München 2012, hier S. 350。

[30] 援引自Barbara 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Amsterdam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40-1945, München 2012, hier S. 103。

[31] 参见Barbara 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Amsterdam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40-1945, München 2012, hier S. 109-150 (引文见 S. 149)。

[32] 荷兰语“犹太人”。

[33] 参见Barbara 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Amsterdam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40-1945, München 2012, hier S. 152-191 (引文见 S. 191)。

[34] Anne Frank: Tagebuch. Fassung von Otto H. Frank und Mirjam Pressler, Frankfurt/M. 1991, S. 11 (v. 12. 6. 1942)。亦可参见 Melissa Müller: Das Mädchen Anne Frank. Die Biographie, Frankfurt/M. 2013, S. 213 f.; Matthias Heyl: Anne Frank, Reinbek bei Hamburg 2002, S. 52。

[35] Anne Frank: Tagebuch, S. 18 (v. 20. 6. 1942)。

[36] Anne Frank: Tagebuch, S. 32 (v. 8. 7. 1942)。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192-198; Heyl: Anne Frank, S. 60-66; Müller: Das Mädchen Anne Frank, S. 244-248。

[37] Anne Frank: Tagebuch, S. 64 (v. 9. 10. 1942)。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204-207, 227-236。

[38] 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255, 285 f.。

[39] Anne Frank: Tagebuch, S. 291 f. (v. 6. 6. 1944)。

[40] 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302 f., 313 f.; Heyl: *Anne Frank*, S. 111-115, 118-123, 126-131 (引文见S. 131); Müller: *Das Mädchen Anne Frank*, S. 345-348, 358-361, 364-378, 380-383。

[41] 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304 f.; 参见Heyl: *Anne Frank*, S. 124 f.。

[42] Max Beckmann: *Tagebücher 1940-1950*. Zusammengestellt von Mathilde Q. Beckmann. Hrsg. von Erhard Göpel, München-Wien 1979, S. 97 (v. 6. 9. 1944)。

[43] 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305-312, 316-342。

[44] Carry Ulreich: *Nachts träum ich vom Frieden. Tagebuch 1941 bis 1945*, Berlin 2018, S. 286 (v. 6. 5. 1945)。

[45] 参见Koll: *Arthur Seyß-Inquart und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1940-1945)*, S. 574。上文描述的内容参见Beuys: *Leben mit dem Feind*, S. 344-352。

1945年5月8日

当艾森豪威尔收到苏军副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Alexei Antonow）的抗议电报时，兰斯投降书上的墨水还没干：苏联最高统帅部拒绝承认签字，因为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交付的投降书文本与之前受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政府委托由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äische Beratungskommission，英文简称EAC）所编写的文本不符。艾森豪威尔急忙向其保证，他“一丝不苟地履行了义务”，没有单独签署停战协定。而且，苏联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也出席了兰斯会议，并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1\]](#)

但斯大林坚持要求在被红军占领的首都柏林重新举行仪式。苏联蒙受了最大的战争损失，因此他认为，应当由德国国防军三军最高代表在同盟国高层代表的见证下进行投降，这样才是公正的。艾森豪威尔最初同意亲自参加，但在他的参谋部成员以及丘吉尔的反对下只得作罢，理由是：德国人已经在兰斯无条件投降了，而在柏林重新举行仪式实际上是苏联人的事情，不过是出于斯大林对个人声望的需求。[\[2\]](#)

西方盟国派出英国空军元帅亚瑟·泰德（Arthur Tedder）、美国将军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以及法国武装部队代表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德方代表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代表海军）和汉斯-于尔根·施通普

夫（Hans-Jürgen Stumpff）大将，后者代表受伤的空军总司令罗伯特·冯·格莱姆骑士（Robert Ritter von Greim）——希特勒在1945年4月26日还曾任命格莱姆为赫尔曼·戈林的继任者。5月8日中午，代表团乘坐三架英国运输机降落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由朱可夫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三支仪仗队在机场欢迎盟友。一支军乐团演奏国歌。当美国人和英国人迈步检阅仪仗队时，德国人则在降落后被立即带到等候的车辆中，然后前往位于柏林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朱可夫元帅总部。苏联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观察到：“凯特尔身着长大衣，戴着一顶高大的将军帽走在前面（……）。他故意避免向左或向右看，只是迈着大步往前走。” [3]

朱可夫匆忙命人布置卡尔斯霍斯特先锋学校的食堂大厅，为仪式作好准备。红军士兵征收到了家具、地毯、玻璃杯、餐具和鲜花。通往该地的路上，瓦砾已被清除，并插上了用于装饰的旗帜。[4]后来接任乌布利希担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秘书长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也在其中积极帮忙。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在监狱服刑近十年，在红军到来后于1945年4月27日从勃兰登堡-戈登

（Brandenburg-Görden）监狱释放，并来到柏林。5月4日，他来到兰兹贝格街（Landsberger Straße）37号，这里是他未来的第一任妻子夏洛特·尚努埃尔（Charlotte Schanuel）警官的公寓。在加入“乌布利希小组”之前，他就接下了给兰兹贝格街装饰胜利国国旗的任务。多年后，他自豪地回忆自己在短时间内就找到或命人缝制出足够的旗帜，使车队能够在旗帜的海洋中驶入卡尔斯霍斯特。[5]

德国代表团被安置在先锋队营旁的一栋小别墅里。原定于下午2点开始的签字仪式被推迟。不仅是因为胜利国代表一直为座位顺序和签字安排争论不休，而且他们在几小时内也无法就投降文本达成一致。西方盟国第一次感受到与苏联伙伴谈判的艰难，而这只是个开始。最

终，获得通过的文本与5月7日的投降文件仅略有不同。“苏联军队最高统帅部”改成“红军最高统帅部”，并且在第6条中明确规定，仅以英文版和俄文版为准。^[6]

在等待期间，德国人有自助冷餐可用。时不时会出现一位好奇的记者拍照。当凯特尔对在他对面的一位苏联军官表示，他在乘车经过柏林时对其破坏程度感到震惊，他得到以下答复：“陆军元帅先生，当几千座苏联城镇和村庄在您的指挥下被夷为平地，我们有几百万同胞丧命于废墟之中，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孩子，您难道不感到震惊吗？”^[7]

晚上11点45分，朱可夫请盟军总司令部代表泰德、斯帕茨和拉特尔·德·塔西尼进入他紧邻食堂大厅的书房，与他们讨论最终细节。在投降书生效的午夜0点，他们进入大厅，在一张长桌旁就座，座位后面挂着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国旗。几十位苏联将军，一些盟军高级军官，许多传令兵和一百多名记者和摄影师聚集在现场。朱可夫用简短的几句话宣布会议开幕，并命令德国代表团入场。现场变得很安静。当侧门打开，凯特尔和紧随其后的弗里德堡、施通普夫进入房间时，只能听到相机的快门声。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站得笔直，并短暂地举起手中的元帅杖以示问好。现场有不少人和美国海军副官哈里·C.布彻（Harry C. Butcher）的感受一样，觉得凯特尔的亮相“傲慢且充满挑衅”。他眼中的这名陆军元帅似乎是“普鲁士的化身”。^[8]而朱可夫则有着不同印象：“不，这不再是那个高傲的凯特尔了，不再是那个接受战败了的法国投降的人。尽管他现在试图保持镇定，但他看上去非常沮丧。”^[9]

德国人被要求在离门不远的一张桌子旁就坐。接着，朱可夫询问凯特尔，他是否已经阅读了投降文件，以及是否获得签字授权。凯特尔的回答是肯定的，并表示应将文件递给他。但是朱可夫命令德国

代表团来到主席团桌旁。这位苏联元帅回忆说：“凯特尔很不友好地朝主席团看了一眼，然后很快站了起来，他垂着眼皮，慢慢地拿起桌旁的元帅杖，然后迟疑地走向我们的桌子。他的单片眼镜掉落下来，在绳子上晃动，他的脸上布满了红斑。”^[10]这位陆军元帅在一张椅子的边缘处坐下，将帽子和元帅杖放在一边，摘下手套，将单片眼镜架在左眼前，在摄影师们的闪光灯汇成的“雷暴”中，他共签署了五份投降文件。时钟此时显示为午夜0点16分。凯特尔返回座位后，冯·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在其后签下了名字。接着朱可夫和泰德作为盟军代表签字，斯帕茨和拉特尔·德·塔西尼作为证人签字。凌晨0点43分，仪式结束，朱可夫请德国代表团离开大厅。凯特尔、冯·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站起来，鞠躬，然后离开，他们参谋部的军官紧随其后。^[11]

“突然间，充满整个大厅的紧张氛围消失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观察到。“它飞走了，好像刚刚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现在全从胸口呼出去了。一种如释重负和筋疲力尽的感觉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12]朱可夫以苏联最高指挥部的名义向在场的人致以胜利的祝贺。苏军和盟军军官互相握手。在随后的宴会上，人们为战友情而庆祝，并承诺要进一步加深反希特勒联盟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这一愿望随着冷战的开始很快就化为泡影。但是5月9日的凌晨还是充满了罕见的和睦。伏特加和香槟供应不断，在众人快乐情绪的感染下，朱可夫还在木地板上跳了一支俄罗斯民间舞蹈。^[13]



按照斯大林意愿再次举行的签字仪式：1945年5月9日凌晨刚过，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无条件投降书。（AKG/ullstein bild, Berlin）

在小别墅过夜的德国代表团也没有被遗忘。朱可夫的首席军需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一餐，甚至还为饭菜过于简单而道歉。凯特尔在纽伦堡监狱中回忆说：“我不得不回答道，我们不习惯如此的奢华和如此丰盛的宴席（……）。”“最后还有冷冻的新鲜草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显然，是一家柏林美食餐厅提供的这顿晚饭，因为连酒也是德国产的。”^[14]5月9日早上，德国人从滕珀尔霍夫直接飞回弗伦斯堡，于上午10点左右着陆。

*

在此期间，邓尼茨召集了他的顾问们讨论以下问题：在国防军全部投降后，政府再继续下去是否还有意义，现在是否全体内阁成员辞职的正确时机。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坚定地支持辞职：在投降后，邓

尼茨结束战争的任务已完成。除了弗伦斯堡飞地，整个帝国的领土都被战胜国所占领，政府事实上已不具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因此，及时“有尊严地离开”是必要的。[\[15\]](#)

显然，施佩尔相信，美国人将不得不因其对德国军备工业的了解而拉拢他。果然几天后的5月15日，第一批美国人到达格吕克斯堡城堡，对其进行了详细询问。施佩尔十分合作地作出了答复，这里他所展现的这种面貌在未来不只会使原先的战争对手们印象深刻，即作为摆脱了政治色彩的技术专家，他声称自己只是暂时屈服于希特勒魔鬼般的蛊惑技巧，但在战争快结束时勇敢地违抗了其摧毁令。[\[16\]](#)

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则是最支持继续任职的人：帝国总统和“帝国临时政府”是“帝国主权和帝国统一的实际体现”。全面无条件投降是国防军的事；德国这个国家并没有停止存在。即使行为自由受到限制，邓尼茨也应该继续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此外，政府在这一困难时刻有义务与人民共担命运，决不能推卸责任。海军元帅对此表示赞同。5月8日的会议记录记下了这次讨论的结果：“辞职是一项不可撤销的决定，因此绝不能过早作出。”[\[17\]](#)

中午12点30分，邓尼茨在弗伦斯堡广播台的麦克风前对他的决定作出如下解释：“随着德国被占领，权力落到占领国手中。我和我组建的政府是否还可以积极运作，将取决于他们。如果我的工作对我们的祖国有益，那么我将继续任职，除非德国人民有任命其他人作为国家元首的意愿，或者占领国使我无法继续任职。”邓尼茨保证说，他愿意接受这一职位仅仅出于“对德国的热爱和职责”，而且只要他还保有作为帝国“最高代表”的“尊严”，他就将继续就任。[\[18\]](#)实际上，盟国已给予邓尼茨政府15天的宽限期。

*

邓尼茨政府情报部门报告说，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全面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令人非常惊讶”。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不继续与红军作战。尤其是难民的反应最为强烈，他们紧紧抓住的最后一线希望——西方盟国将联合德国军队对抗苏联——已经消失了。东部领土“永远地丢失了”。^[19]

5月8日晚上8点，国防军总司令在广播中宣布：“从5月9日凌晨0点起，在所有战区中，所有国防军部队以及所有武装组织及个人对敌人的敌对行动都必须停止。任何形式的破坏，或者损毁武器、弹药、飞机、装备、器械，损坏或沉没船舶等行为，都与最高统帅部同意并签署的投降条件相违背，因此为了德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予以阻止。”^[20]与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最终战役于5月9日停止。在库兰和东普鲁士分别有18万和15万士兵被苏联俘虏。^[21]在此之前，他们还违背投降书规定，摧毁了很大一部分军事装备。“米歇尔斯瓦尔德（Michelswalde）的情况很疯狂。一辆车挨着另一辆车，都是客车和卡车。坦克和越野车接连被炸毁（……），各种装备摆得到处都是。大量马匹和其他牲畜四散。一切就像1940年在敦刻尔克看到的场景那样。”一名乘坐最后几班穿越波罗的海的轮船之一并成功脱逃的列兵在5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22]一天后，驻扎在“大西洋要塞”洛里昂（Lorient）、圣纳泽尔（Saint-Nazaire）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德国守备部队投降。洛里昂的要塞指挥官在广播中说：“我和我勇敢顽强、未被征服的部队将要撤离。我们怀念那历经磨难的家乡。德国万岁。”^[23]

邓尼茨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推迟全面投降，通过一系列的局部投降来争取时间，以使尽可能多的平民和士兵逃到美英战线。由于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德国的提议，并坚持要求所有前线比他们所期待的时间更早地进行无条件投降，因此海军元帅的计划遭到挫败。不过他还是取得了部分成功：在5月的第一周，东线共有185万名士兵成功从红

军手中逃离。5月8日后，共149万名士兵沦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战俘。这意味着东部前线部队中有一半以上撤离到西方盟军战线。^[24]

在5月9日的最后一份报告中，国防军总司令用虚假的激昂措辞遣散了战败者们：“自午夜开始，所有战线一律停火。在海军元帅的命令下，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这宣告将近六年的光荣斗争结束了。我们赢得过伟大的胜利，但也迎来了惨重的失败。最终，德国国防军光荣地败给了比它强大太多的力量（……）。在前方和后方作战的士兵的出色表现终将在以后的历史评判中获得赞赏。”^[25]5月9日，邓尼茨在弗伦斯堡向军官发表的讲话也是同一论调：“我们不用感到羞愧。在这六年中，德国国防军在战斗中以及德国人民在忍耐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历史和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我们士兵的荣誉上没有沾上任何污点。”^[26]那是一个“传奇”诞生的时刻，一个关于所谓“干净的国防军”的传奇。这个传奇竟有着惊人的生命力，直到汉堡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于1995年和2001年策划的两个关于国防军的展览最终使其破灭。

*

1945年5月8日中午，美国第80步兵师其中一个军团的团长拉尔夫·E. 皮尔逊（Ralph E. Pearson）少校带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载着一支步兵队的卡车离开了上奥地利州小镇施瓦嫩施塔特（Schwanenstadt）。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地区的阿尔陶塞（Altaussee）。前一天，他收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奥地利军官令人震惊的消息，称那里的盐矿中藏有价值不菲的艺术品。经过四小时车程，下午3点30分，皮尔逊和他的手下抵达阿尔陶塞。小镇里仍然挤满了德国士兵，但是没有人想要进行抵抗。首先，皮尔逊罢免了旧市长，任命了新市长。然后他驱车前往盐矿。矿物学家赫尔曼·米歇尔（Hermann Michel）已经在那里等

候，他将这位美国少校带到已经封锁起来的隧道入口，并向他解释说，这后面藏有希特勒下令从整个欧洲掠夺来的艺术品。皮尔逊在返回前，命人将入口封锁好，并命令米歇尔向他提供所有能找到的档案和文件。[\[27\]](#)

希特勒搜集到的这些艺术品到达阿尔陶塞之前，经历了很长一段路。1938年4月8日，即与奥地利“合并”仅几周后，这位独裁者访问了林茨，并在那里首次提出了改造“家乡城市”的构想。该计划的核心在于建造一座大型“元首博物馆”，收集的作品不单单出自德国，而是出自全欧洲著名画家之手。1938年5月，希特勒在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很多时间用于参观罗马和佛罗伦萨的博物馆。参观乌菲兹美术馆的经历尤其刺激他产生了建造林茨博物馆的计划。[\[28\]](#)

他委托德累斯顿油画画廊馆长、国际著名博物馆专家汉斯·波瑟（Hans Posse）负责建造该博物馆。该决定令德累斯顿的纳粹高层颇感惊讶，因为波瑟涉嫌提倡“堕落艺术”而被解雇，但在希特勒1938年6月访问德累斯顿油画画廊后，按照这位独裁者的愿望，他被聘回。一年后，希特勒在山庄召见了波瑟，并设计出他的计划：林茨博物馆应该“仅收藏各个时期中最好的作品”，甚至要超过维也纳的艺术收藏。1939年6月26日，元首宣布任命波瑟为“林茨特别任务”项目的负责人。所有党政机关和办事机构都有义务“支持其完成任务。”[\[29\]](#)

这位希特勒的特派员得到了申请几乎没有上限的资金的资格以用来购买画作。而他不仅购买，还命人没收。所谓的“元首保留权”为这一行为提供了依据。它授予希特勒个人决定如何使用被没收的艺术品的特权。这项任意处置权在与奥地利“合并”后的1938年6月首次被起草出来，与被没收的犹太人艺术藏品有关。1940年10月，“元首保留权”扩展到整个帝国领土，1940年11月进一步扩展到被占领和待占领的领土。[\[30\]](#)于是，波瑟得以在从整个欧洲抢夺来的艺术品中精心

挑选出尤其适合林茨画廊的作品。1941年12月和1942年4月，他命人将相册递交给希特勒，其中展示了迄今为止在“林茨特别任务”项目中获得的画作，数量将近一千张。在上奥地利州的克雷姆斯明斯特（Kremsmünster）本笃会修道院中，一个中央仓库被命令修建出来，用于存放未来的“元首博物馆”的艺术品。[\[31\]](#)

1942年12月7日，波瑟死于舌癌。希特勒为他举行了国葬；宣传部长戈培尔致悼词。这是公众第一次了解到计划中的林茨画廊项目。1943年2月，希特勒任命威斯巴登拿骚州立博物馆油画馆负责人赫尔曼·沃斯（Hermann Voss）为接任者。沃斯与他最重要的同事、德累斯顿艺术品商人希尔德布兰特·古里特（Hildebrand Gurlitt）一起，继续搜集掠夺来的艺术品，同时也专注于对已有藏品进行登记。[\[32\]](#)

随着对帝国的空袭越来越频繁，希特勒十分忧心他的艺术品的安全。尤其是在克雷姆斯明斯特修道院的仓库中，艺术品都存放在地面部分，这在他看来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1943年12月，在“林茨特别任务”中负责艺术品存放的专员戈特弗里德·雷默（Gottfried Reimer）建议将阿尔陶塞盐矿作为新的藏品存放地。希特勒同意了这一建议，在搭建好储藏室后，第一批藏品于1944年5月抵达。用于林茨博物馆的艺术品陆续被运送到那里，其中包括扬·维米尔的《绘画艺术》和《天文学家》等顶级画作。但是，阿尔陶塞也存放了一些不属于希特勒藏品的作品，例如米开朗琪罗的《布鲁日圣母》和扬·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33\]](#)

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个月里，希特勒常常在建筑师新帝国大厦地下室里的林茨市巨大模型前一连坐上数小时——它是由赫尔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于1945年2月初搭建的——可见希特勒最中意的这个项目对他而言多么重要。[\[34\]](#)同时，他的周围弥漫着末日的氛围。狂热的党内分子、上多瑙区大区领袖奥古斯特·埃格鲁伯

(August Eigruber) 决意追随希特勒。如果毁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应尽可能地将其导演成一出令人印象深刻、声势浩大的谢幕。对埃格鲁伯而言，这意味着盐矿中的艺术品不能落入同盟国手中，必须将其销毁。1945年4月10日，他将8枚单个重量为500公斤的炸弹装在木箱中运往盐矿，表面贴着写有“内有大理石，请勿翻倒”字样的标签。

4月13日，曾去过阿尔陶塞的鲍曼私人顾问赫尔穆特·冯·胡梅尔(Helmut von Hummel) 获悉了埃格鲁伯的计划。他向盐矿负责人埃默里希·佩希米勒(Emmerich Pöchmüller) 以及当地负责艺术品的专家、维也纳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赫伯特·塞伯尔(Herbert Seiberl) 和柏林首席艺术品修复师卡尔·西伯(Karl Sieber) 通报了该情况。他们一起考虑如何劝阻埃格鲁伯放弃他的可怕决定。胡梅尔给他的上司鲍曼致电，强烈请求他向希特勒报告这一情况并想办法获得“元首决定”。柏林方面很快回复：希特勒否决了销毁艺术品的计划。当敌人靠近时，只允许在入口引爆炸弹将路封死。^[35]

尽管这位独裁者充满了破坏的狂热，但他仍想为后代保留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在1945年4月29日的私人遗嘱中他解释说，他收藏这些画作“并非出于私人目的”，而是始终只是为了在林茨建造画廊：“这一遗愿能得到实现，是我最衷心的希望。”^[36]5月1日，希特勒死后的第二天，赫尔穆特·冯·胡梅尔寄给修复师西伯一封信，信中重申了希特勒的决定：“在过去一周里，元首对于重新询问的决定仍然是，在上多瑙山区藏匿的艺术品不应落入敌人之手，但也不应最终将其销毁。应该采取预防措施，使这些艺术品尽可能长时间地不被任何敌人发现。”^[37]但是，埃格鲁伯从未考虑遵守元首的这一最终愿望。他在矿山入口处安排了一名配备冲锋枪和手榴弹的军事看守。有传言说，到了5月3日或4日，爆破小组将到达这里将炸弹引爆。

然而这时，矿工们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并不关心拯救那些艺术品，而是关心他们的饭碗。因为炸弹引爆肯定会毁坏大部分隧道。5月3日，矿山监督奥托·霍格勒（Otto Högler）在当日工作开始前向工人通报了矿山面临的威胁。当时就有不少人自愿报名，表示愿意看管装有炸弹的木箱，并在紧急情况下将其运出矿山。一位名叫阿洛伊斯·劳施达施尔（Alois Rauschdaschl）的盐矿工人想到可以联系帝国安全局负责人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和包括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在内的许多纳粹分子一样，他也正在阿尔陶塞地区徘徊。卡尔滕布伦纳为矿工清除炸弹的工作开了绿灯，并在午夜时分给埃格鲁伯的打电话并严厉责备了他，令他哑口无言。5月4日早上，炸弹从隧道中被移出并被掩埋在森林中。之后，矿井的入口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被炸毁。[\[38\]](#)

5月11日，即皮尔逊少校命人保护盐矿的三天后，他寻求“文物保护队（Monuments Men）”——一个1943年由美军成立的专门保护艺术品的部门——代表的援助。在此期间，媒体也听到风声，于是有关传说中的艺术宝藏的消息便传遍世界。5月13日，罗伯特·K.波西（Robert K. Posey）上尉来到萨尔茨卡默古特，并详细听取了皮尔逊的报告。截至5月27日，被炸毁的入口已经清理完毕，于是波西上尉和他的助手们得以检查矿井内部，并确证艺术品未受损坏。6月17日，第一批载有贵重货物的卡车离开阿尔陶塞。美国人将慕尼黑的政府大楼和“元首行馆（Führerbau）”定为“中央收藏点”。这两栋建筑基本没有损坏。直到年底运返工作终于完成。“文物保护队”的四名成员和100多名德国工作人员忙于为藏品照相、编目，并查找原物主。这些艺术品的归还持续了几十年，到今天仍没有全部完成。[\[39\]](#)

*

1945年5月8日午夜前夕，德国在挪威占领区的帝国总督约瑟夫·特博文自杀。前天晚上，海军元帅邓尼茨撤销了他的职位，并宣布其所在部门解散。[\[40\]](#)



“文物保护队”的一名代表（制服上标有“N”字样）和德国专家正在观察从阿尔陶塞盐矿找到的《根特祭坛画》碎片。（Pictures From History/akg-images, Berlin）

5月3日，在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会议上，特博文还表示挪威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依然稳定，并反对他所在统治区的德军投降。他与挪威和丹麦的武装部队指挥官弗朗茨·博姆和格奥尔格·林德曼意见一致，要求进行“最后一次体面的战斗”。但这并没有得到邓尼茨及其顾问的赞同。[\[41\]](#)

5月5日，德国北部、荷兰和丹麦的局部投降生效。当天，特博文回到奥斯陆。在同僚面前他仍然展现着强者的形象：必须将挪威作为与西方盟国谈判筹码的时间尽量拉长。现在最重要的是，继续严守纪律地工作，不能展现任何软弱的迹象。然而随着5月7日被解除职务，

他不再有威望。他致电他的行政处处长汉斯-莱因哈德·科赫（Hans-Reinhard Koch），和他进行关于帝国总督工作的交接，并委托他将工作交由国防军司令博姆将军处理。在他的官邸，即位于奥斯陆大门前的斯考古姆王储宫（Kronprinzenpalais Skaugum）中，特博文销毁了文件，然后躲到他的私人房间。此前，他曾命令警卫队主管将足够多的炸药运往花园内的小型地堡中。夜里11点后，他去往那里。不到半小时即传来猛烈的爆炸声。这位曾经令人生畏的帝国总督把自己炸死了。[\[42\]](#)

5月9日，挪威解放。曾作为军官在奥斯陆亲历了战争结束的奥地利作家海米托·冯·多德勒尔（Heimito von Doderer）写道：“所有的钟都在响，成千上万的旗帜在摇曳，街上到处都是人。”[\[43\]](#)在同一天，德国人所扶持的伪政府总理维德孔·吉斯林被捕，他的名字已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他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45年10月24日在奥斯陆的阿克斯胡斯城堡（Festung Akershus）被处决。

维利·勃兰特属于5月10日从瑞典回到奥斯陆的第一批人。他在为瑞典媒体报道挪威获得解放的消息。此时在挪威尚有约35万德国士兵；遣返这些人只能逐步进行。这位德国移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一些原占领军连续几周仍在命令上用“希特勒万岁”的口号签字，并且他们的“举止行为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44\]](#)

*

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最令人快乐的信号（……）”，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精疲力竭、穷困潦倒，但没有屈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们体会到情绪最为高涨的瞬间。”[\[45\]](#)5月8日，人们在伦敦街头跳舞、歌唱，庆祝这一欧洲“胜利日（Victory Day）”直到深夜。当天下午3点，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他宣布对德国的战争结束，但与此同时，他提醒同胞

们作好继续牺牲的准备：“我们可以短暂地享受快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即将面临的艰难任务和辛苦。日本，阴险、贪婪的日本尚未被击败。”讲话以呼吁结束：“大不列颠向前进！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46]

丘吉尔从唐宁街来到下议院。“温斯顿走进来，有点害羞，脸上有些红晕，但带着男孩般的微笑。议员们都跳了起来，致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议员和前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写道。^[47]丘吉尔重读了他的广播讲话，但随后把手稿放到一边，他用动人的语言感谢议会对他在五年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犯了错，但是议会证明了其自身作为国家机构的力量，并在这场最艰难、最广泛的战争中尽可能地维护了所有民主的主张。”^[48]

晚上，无数人聚集在白金汉宫前，向出现在阳台上的国王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欢呼。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在位于白厅大道（Whitehall）的卫生部大楼阳台上为数以万计的伦敦人作即席演讲。当丘吉尔问到，“我们曾经心灰意冷吗（Were we ever downhearted）？”，人群纷纷回答“不”，然后是一阵笑声——这表现了一种轻松感，因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49]

在纽约也出现了类似的庆祝场面。“我站在时代广场，纽约时报大楼上的霓虹灯文字把德国人全面投降的消息传递给密集的人群”，埃尔斯贝丝·魏希曼（Elsbeth Weichmann）回忆说——她于1933年与后来成为汉堡市市长的丈夫赫伯特流亡法国，并在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后逃往美国。“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我几乎听不清这些声音。我颤抖着膝盖找了间附近的咖啡厅坐下。这种紧张感让人们确信，从今天起，世界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可能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多年的渴望，如今终于变得可能了（……）。晚上下

班后，我们跑到百老汇大街的喧闹人群中，将躁动的情绪化为欢呼和醉意。” [50].

在5月8日的广播演说中，哈里·S. 杜鲁门总统怀念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的前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是他将美国带进战争并赢得胜利。杜鲁门一方面对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也对“为消灭希特勒集团及其邪恶同盟所付出的可怕代价”感到痛苦。这位美国总统还提醒他的同胞，胜利仅实现了一半：“西方解放了，但远东仍然深受日本人狡诈暴政的折磨。只有当最后一支日本师团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战斗任务才算完成。” [51]. 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简明扼要地写道：“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总统于早上6点在收音机中发表演讲。我一边听，一边观察鲜花盛开的加州花园。” [52].

在巴黎，胜利的喜悦也无法抑制，尽管人们已经在1944年8月庆祝过巴黎解放日。“整个国家的人都怀着极大的热情交流着解脱和解放的感觉，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景象啊”，工程师费迪南·皮卡（Ferdinand Picard）观察到。“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融入这片欢乐的海洋，并且郊区的人潮也不断汹涌而来（……）。整个民族都在这一天分享这份喜悦，这真是一幅动人的画面。” [53].

在莫斯科，电台在5月9日才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这里的人们也聚集在一起欢庆战争的结束。在这场战争中，苏联遭受了最多的痛苦，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斯大林在他的广播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然后他总结说：“伟大的卫国战争以我们的全面胜利结束。欧洲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和平发展时期已经开始。” [54].

年轻的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后来担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间谍部门负责人——与他的父母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参加了夜间集会。“在庆祝‘胜利

纪念日’的礼炮声中，我们的感觉与成千上万欢呼的人们一样，在我们被驱逐出德国十一年里，他们的祖国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55]在美国大使馆前也聚集了一大群人，大部分是年轻人。正如外交官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所述，这些人“以一种实实在在的狂喜来表达他们友好的感情”。^[56]游行者们当时有谁会想到，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和美国便处于激烈的敌对关系之中？

“这是六年来我们首个没有黑暗的夜晚，”恩斯特·荣格尔在5月8日写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在这一天，从纽约到莫斯科，所有同盟国首都都在张灯结彩以庆祝胜利，而战败者则坐在地窖深处，遮住了脸。”^[57]

^[1] 参见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03 f.; Karl-Heinz Janßen: Der 8. Mai 1945. Die deutsche Kapitulation in Karlshorst, in ders.: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Deutsche Geschichte 1871-1945, Bremen 2003, S. 485-492 (此处见S. 487)。

^[2] 参见Eisenhower: Kreuzzug in Europa, S. 489;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06 f.。

^[3] Konstantin Simonow: Kriegstagebücher, Bd. 2: 1942-1945, Berlin-Ost 1979; 援引自Walter Kempowski: Das Echolot. Abgesang ' 45. Ein kollektives Tagebuch, München 2005, S. 439。参见Görlitz (Hrsg.):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S. 376。

^[4] 参见Janßen: Der 8. Mai 1945, S. 488。

^[5] Martin Sabrow, Erich Honecker. Das Leben davor 1912-1945, München 2016, S. 441。上文描述的内容参见Janßen: Der 8. Mai 1945, S. 425-432。

^[6] 参见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07 f.。投降书文本v. 8. 5. 1945 in 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207 f.; KTB-OKW, Bd. IV, 2, S. 1679 f.。

[7] 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11.

[8] 援引自Kempowski: Das Echolot. Abgesang' 45, S. 446 f.。亦可参见美军上校Oppenheimer的报告：“当传唤德国全权代表时，凯特尔神色僵硬，带着冷峻的愤怒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僵硬紧绷，戴着手套的右手举着他的元帅杖。他的脸和身体上没有一块肌肉敢动。”援引自Klaus Bergmann/Gerhard Schneider (Hrsg.): 1945. Ein Lesebuch, Hannover 1985, S. 93。

[9] 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12.

[10] 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13。

[11] 参见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13; Janßen: Der 8. Mai 1945, S. 486。

[12]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442。

[13] 参见Schukow: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 613 f.。

[14] Görlitz (Hrsg.):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S. 378.

[15]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77 f.; 参见 Speer: Erinnerungen, S. 499。

[16] 参见Breloer: Die Akte Speer, S. 329-336; Brechtken: Albert Speer, S. 295 f.。

[17] 1945年5月8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5; 上文描述的内容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63;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78。

[18] 1945年5月8日的邓尼茨讲话; 收录于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57 f.。

[19]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13.

[20] KTB-OKW, Bd. IV, 2, S. 1484 f.

[21] 参见KTB-OKW, Bd. IV, 2, S. 1495; Gerd R. Ueberschär/Rolf-Dieter Müller: 1945. Das Ende des Krieges, Darmstadt 2005, S. 112。

[22] Wilhelm Wintgen于1945年5月9日的日记；
<https://aulemettmanner.de/index.php/erzaehlungen-von-frueher/110-tagebuch-eines-mettmanner-soldaten>。

[23]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30 f.

[24]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61 f.。

[25] KTB-OKW, Bd. IV, 2, S. 1281 f.;
Ueberschär/Müller (Hrsg.): 1945. Das Ende des Krieges, S. 112 f.。
邓尼茨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些话基本是正确的。”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58。

[26] 海军元帅邓尼茨在1945年5月9日对军官的讲话；收录于
Förster/Lakowski (Hrsg.): 1945, Dok. 208, S. 382-388（此处见S. 387）。

[27] 参见Ernst 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Die Kunstsammlung Adolf Hitler. Aufbau, Vernichtungsplan, Rettung. Ein Thriller der Kulturgeschichte, Wien 1989, S. 141-143。

[28] 参见Birgit 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Hitler und der NS-Kunstraub, Darmstadt 2014, S. 39-45; dies.: Geniewahn: Hitler und die Kunst, Wien-Köln-Weimar 2009, S. 221-228。

[29] 参见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49-55, 81-83（引文见S. 82, 83）；dies.: Geniewahn, S. 228-235; 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14-18。

[30] 参见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16-18; dies.: Geniewahn, S. 238 f.; 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19 f.。

[31] 参见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18-221, 230-232。

[32] 参见Goebbels: Tagebücher, T. II, Bd. 6, S. 430 f. (v. 12. 12. 1941)；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35 f., 239 f.; 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61-64; Meike Hoffmann/Nicola Kuhn: Hitlers Kunsthändler. Hildebrand Gurlitt 1895-1956. Di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6, S. 213 ff.。

[33] 参见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37, 248–253; 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79–89。

[34] 参见Ullrich: Adolf Hitler, Bd. 2, S. 604–606。

[35] 参见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99–102; 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56; Konrad Kramar: Mission Michelangelo. Wie die Bergleute in Altaussee Hitlers Raubkunst vor der Vernichtung retteten, St. Pölten–Salzburg–Wien 2013, S. 99–117。

[36] Joachimsthaler: Hitlers Ende, S. 192。

[37] 文本复制本收录于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115。

[38] 参见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114–130; Kramar: Mission Michelangelo, S. 120–147; 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57; Peter Black: Ernst Kaltenbrunner. Vasall Himmlers: Eine SS-Karriere, Paderborn 1991, S. 276 f.。

[39] 参见Kubin: Sonderauftrag Linz, S. 146–160; Schwarz: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S. 272–279。

[40] 亦可参见Bohn: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S. 1–3。

[41] 参见Bohn: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S. 97。

[42] 参见Bohn: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S. 3。

[43] Heimito von Doderer: Tangenten.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1940–1950, München 1964;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45, S. 353。

[44] Brandt: Erinnerungen, S. 141; 也参见同一作者所著的Links und frei, S. 381 f.。

[45] Churchill: Der Zweite Weltkrieg, S. 1074。

[46] Winston S. Churchill: Reden in Zeiten des Kriegs. Ausgewählt, eingeleitet und erläutert von Klaus Körner, Hamburg–Wien

2002, S. 281–283 (此处见S. 283)。参见Lindgren: Tagebücher 1939–1945, S. 448 (v. 8. 5. 1945): “对于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 他是以何等的活力向大英帝国宣布这一消息! 他以一个充满力量的男人的方式发声, 响亮、清晰,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他。”

[47] Harold Nicolson: Diaries and Letters 1930–1964, London 1968;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325。

[48] Churchill: Reden in Zeiten des Krieges, S. 283.

[49] 参见“英国女子空军辅助团(WAAF)”工作人员Joan Widham的表述;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322–324 (此处见S. 324); 更多相关内容可见Janßen: Der 8. Mai 1945, S. 491。

[50] Elsbeth Weichmann: Zuflucht. Jahre des Exils, München 1983;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313 f.。

[51] 哈里·杜鲁门于1945年5月8日的广播讲话; 主要收录于Shirer: Berliner Tagebuch. Das Ende 1944–45, S. 80 f.。

[52] 援引自Werner Hecht: Brecht Chronik 1898–1956, Frankfurt/M. 1997, S. 754。托马斯·曼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喝着法国香槟庆祝胜利日。听着杜鲁门和丘吉尔的讲话。” Th. Mann: 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S. 202 (v. 8. 5. 1945)。

[53]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315 f.。

[54] 斯大林于1945年5月9日面向公众的讲话; 收录于Herbert Michaelis/Ernst Schraepler (Hrsg.):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Bd. XXIII, Berlin o. J., S. 258 f.。

[55] Markus Wolf: Sozialismus stand nicht auf der Tagesordnung,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281–290 (此处见S. 281)。

[56] George F. Kennan: Memoiren eines Diplomaten, Stuttgart 1968; 援引自Kempowski: Echolot. Abgesang ' 45, S. 334。

[57] Jünger: Die Hütte im Weinberg, Sämtliche Werke, Bd. 3, S. 434 (v. 8. 5. 1945) .

后记

1945年5月10日，即德军无条件投降的两天后，托马斯·曼在遥远的加州对他的德国听众说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说：“不仅是对胜利者而言，对德国来说也如此——在这一刻恶龙被捕获，这个名叫纳粹主义的粗野而病态的怪物奄奄一息，德国至少摆脱了被称为希特勒国家的诅咒。如果它能自我解放就好了，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早些时候，或者晚一些，赶在最后一刻；如果它能在钟声和贝多芬的音乐中庆祝自己的解放、庆祝重归人性就好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希特勒主义的终结同时意味着德国的彻底崩溃——毫无疑问，如果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这是最值得期待的结局。”^[1]

我们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理想没有实现：解放一定是来自外界的，因为德国人无法聚集力量自我解放。尽管对纳粹党及其领导层的批评越来越多，但直到“第三帝国”濒临失败，军队和人民仍然保有令人惊讶的坚持到底的决心。而且元首神话还没有完全失去凝聚力，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为何这位独裁者到最后仍然能对其周围施加诱导性的影响。大势已去之时，许多人仍然寄希望于“奇迹武器”和“最终胜利”，或希冀反希特勒联盟解体。

绝大多数德国人，包括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都没有将1945年5月8日看作解放日，而是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哥廷根历史学家齐格弗里德·A. 凯勒（Siegfried A. Kaehler）于5月中旬写道：“与这场可怕的崩塌相比，1918年发生的令我们遭受沉重打击的灾难是多么‘无

害’，我们还以为不会有比那更难以承受的了。”^[2]后来在阿登纳、路德维希·艾哈德和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内阁担任政府发言人的卡尔-君特·哈泽（Karl-Günther Hase）少校回忆起自己1945年5月9日在莫斯科监狱时的感想：“那主要是一种对德意志帝国全面覆灭的沉重悲痛，（……）无疑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日耳曼的终结’降临了，除此之外我再也看不到其他。”^[3]

躲避在施瓦本叶廷根村的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也有类似的感觉。“这就是失败”，当兰斯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出后，这位记者在5月7日写道。“他们应该不假思索地以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也就是说，实际上根本什么也不用说。一切，一切都肯定比希特勒更好。但是解放？罕见的词汇。”^[4]

后来成为联邦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海德堡郊区的汉德舒斯海姆（Handschuhsheim）经历了战争的结束，他和他的妻子爱丽·豪斯-克纳普（Elly Heuss-Knapp）于1943年秋从频受炸弹袭击的柏林逃到此地。他在5月9日的笔记中称投降是“德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日子之一”。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与1918年中央党政治家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洗清了将军们在这场“邪恶交易”中的罪责不同，这次军方的约德尔和凯特尔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因此“背后一剑”之说^[5]不会重现了。^[6]4年后，联邦议会通过《基本法》之际，豪斯提到了1945年5月8日并表示，这一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最悲剧和最成问题的历史悖论”，而且将其定性为“既是解放也是毁灭”。^[7]此后又过了四十年，时任联邦总统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波恩联邦议院会场大厅内就战争结束4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时，表达了明确立场：“5月8日是解放的一天。它使我们所有人摆脱了纳粹暴政的非人道体制。”^[8]

1945年春，一小群希特勒反对者感受到了解放，如果他们在1944年7月20日的恐怖报复中幸免于难的话。被驱逐到“第三帝国”的数百万战俘和强制劳工也感觉获得了解放。尤其感觉获得解放的是那些集中营囚犯，尽管大多数人已经没有力气来表达他们的喜悦了。

在许多德国人的记忆中，各种矛盾的感觉混杂在一起：对失去爱人、失去家园、住所被毁感到悲痛；对死里逃生感到庆幸；为战争和无数个轰炸之夜终于结束而松了口气；对能够饱睡一觉感到幸福；对胜利者复仇和前途未卜的担忧；理想主义多次遭到滥用、信仰无数次崩塌后产生的空虚感。“所有的信仰、所有的牺牲都化为徒劳”，学生萝赫·沃尔布在5月8日控诉道。“希特勒上台后的六年是空前的繁荣，又过了六年：覆灭。而这些人还在叫嚣着‘千年帝国’。”^[9]

但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感受：面对纳粹主义的罪行感到羞耻和悔恨。在纽约流亡的作家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奇（Alfred Kantorowicz）确信这一罪行超过了到此时为止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一切已经过去了”，他在5月8日到9日夜里写道。“但毕竟是十二年。十二年来累积了上千年的罪行。”^[10]在投降后的最初几天和几周内，广播和报纸详细地报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暴行。不仅是胜利者，失败者也对被揭露的内容感到震惊，这些多年以来被成功压制下来的内幕终于公布于众。“如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集中营的暴行消息，这是我们应该承受的”，汉堡的玛蒂尔达·沃尔夫-门克伯格写道。“我们所有人都应对恐怖罪行负责，任何人都不应忽视它们。”^[11]

但是，极少有德国人愿意直面这些恐怖图景并承认自己有罪。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了令人恐惧的麻木，他们熟练地、条件反射般地把目光移开，正如广播编辑斯蒂芬·赫姆林（Stephan Hermlin）——他后来成为民主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举办的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主题纪录片放映会上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放映设备的昏暗灯光下，我看到他们大多数人在电影开始后就转过脸去，直到结束一直保持这样的姿态。”^[12]这种拒绝的态度也体现在人们单调的声明中：“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美国《生活》（*Life*）杂志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在1945年春天如此频繁地听到类似的话，以至于它听起来像是“一首德国民歌”。^[13]其实所有人都知道些什么，尽管全部的犯罪真相在5月8日之后才被揭露出来。

这种不思悔改的另一面体现在对各个占领区胜利国代表们的顺从上，那甚至是一种卑躬屈膝的热情。“今天，人们挥舞着占领国的三面旗帜，就像1933年在白色圆形场地上挥舞着带有黑色十字标志的红色‘旗帜’一样：像农奴一样低三下四，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如何从新形势中获益了！”作家兼艺术评论家威廉·豪森斯坦（Wilhelm Hausenstein）在投降后的第一天就在巴伐利亚州的图辛（Tutzing）作出了上述评价。^[14]不少盟军观察家带着复杂的情感关注着这种意想不到的顺服意愿。1945年5月初，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德国西南部记录道：“目前，占领区居民的态度很友好，甚至是令人不适的友好。”^[15]

1945年5月10日，克劳斯·曼在摄影师约翰·图克斯伯里（John Tewksbury）的陪同下抵达慕尼黑，他期待看到这座伊萨尔河畔的大都市是如何经受住战争的。城市的受破坏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这里曾经被视为德国最美丽的城市，这座欧洲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如今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墓地。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市中心，没有一座建筑物还耸立着。只剩下堆积的瓦砾（……）。我很难在曾经熟悉的街道找到方向。这就像一场噩梦。”^[16]他父母在波辛格大街

（Poschingerstraße）1号的房子也没有幸免。他从一名居住在三楼阳台、被炸弹炸伤的打字员以及邻居们那里得知一个惊人的消息，即这

栋别墅在1933年后被党卫队“生命之泉（Lebensborn）”机构临时征用：党卫队在那里选择合适的妇女生产“雅利安人”的后代。“是的，我们可怜、残破、被亵渎的房子！”他在5月16日给父亲的一封长信中这样写道，并急切地劝父亲不要返回德国：“这些城市将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才能重建好。这个可悲、可怕的国家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持续身体和道德上的残废和畸形。” [17].



1945年5月10日，克劳斯·曼造访了其父母位于波辛格大街1号的被破坏了一半的房子。照片由美国摄影师约翰·图克斯伯里拍摄。（Münchner

*

国防军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邓尼茨政府的结束。它被允许再延续两个星期。不过，它实际上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权力，确切地说是将权力让渡给了美军少将洛威尔·W. 鲁克斯（Lowell W. Rooks）和英军准将爱德华·J. 福尔德（Edward J. Foord）领导下的“盟军监督委员会”。5月12日，他们两人带着专家参谋团抵达弗伦斯堡-米尔维克，并占领了“帕特里亚号”驳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德方忠实履行投降条款。5月17日，由特鲁斯科夫（Truskow）少将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也加入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队伍。[\[18\]](#)

尽管事实上已形同虚设，但邓尼茨和他的同事们仍继续忙于政府事务，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每天早上10点，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召集内阁在由教室改造的会议室里开会。在施佩尔看来，这位“首席部长”似乎在弥补“第三帝国”时期耽搁的事情。因为自1938年2月以来，希特勒就再也没有开过内阁会议。[\[19\]](#)各位部长和国务秘书都勤奋地产出会议记录和备忘录，盟军监督委员会成员似乎对此感兴趣，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意义。[\[20\]](#)“帝国临时政府”似乎在一个幽灵般的虚假世界中存在着。

5月13日，鲁克斯少将通知邓尼茨来“帕特里亚号”上进行第一次谈话。他代表盟军最高指挥部通知邓尼茨，陆军元帅凯特尔已被免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的职务，并被视为战俘。约德尔上校被临时任命为他的继任者。[\[21\]](#)对于实际的权力所在，邓尼茨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尽管海军元帅在5月8日的广播讲话中曾承诺，他不会在职位上多停留一秒，除非依旧能保有尊严，但他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不自愿辞

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投降后，他也要努力“保住分配给他的职位，直到举行选举或盟军强行撤职为止”。^[22]

即使在投降后，弗伦斯堡政府也既不愿也不能与刚过去的历史明确地拉开距离。虽然在5月8日，德国国防军废除了纳粹礼，重新引入原有的军礼，但在盟军监督委员会的明确命令下，他们才将帝国战旗从政府大楼上取下，并禁止悬挂十字旗。5月12日，邓尼茨拒绝将“元首画像”从办公室取走。才两天后，为防万一，他决定取下与占领国代表举行会议的房间里的元首画像。^[23]海军元帅尤其坚决地主张军方有权继续佩戴勋章和荣誉标志：德国士兵应该为“国防军和人民在战争期间所作的贡献感到骄傲”。^[24]他在5月18日还拒绝批准盟军取下主权国徽的要求：“对手的战术是逐步拧紧针对我们的螺钉，直到遇到阻力为止。我们越早施加这种阻力，就越有可能维持德国残留的特定地位。如果对方无视我们提出的抗议，仍要求取下国徽，那么最高统帅部将迫于压力行动，以此保全颜面。”^[25]

从“帝国临时政府”在5月9日的一次原则性“政府问题辩论”中得出的结论也可以看出，它是如何试图保留与希特勒政权间的连续性的：“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的基础是由纳粹主义创建的人民共同体。”在5月15日的内阁会议记录中进一步强调：“由纳粹主义创建的真正的人民共同体必须保留；像1933年以前的那种多政党的疯狂局面不应卷土重来。”^[26]基于西方模式的议会民主超出了邓尼茨政府的想象。在这方面，邓尼茨政府也不代表新的开始，而是德国历史上前民主和反民主的悠久思想传统的末端，这种传统在希特勒和纳粹主义身上得到极致发挥。^[27]

5月11日、16日，内阁讨论了关于集中营暴行的报告。即使在由纳粹高级官员组成的圈子中，如前所述，其中有些人直接参与了恐怖和灭绝行动，他们也声称对这些罪行一无所知。他们达成一致，向盟军

监督委员会明确表示：“德国武装部队和德国人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且遵照规定应与之保持距离”。^[28]在5月16日写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中，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硬着头皮解释道：“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离，在这些集中营中发生的一切都被严格保密。即使是重要的领导人也无法了解集中营的实际情况。”^[29]

盟军这边起初似乎还不确定如何与邓尼茨政府打交道。特别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初倾向于暂时保留其作为中央行政当局中的地位，由盟军监督。他在5月14日的信中对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的担忧作出回应：“必须有某个权威机构来发布德国人愿意遵守的命令（……）。您是想用一根棍子来指挥这个战败的民族，还是想把手直接伸向一群惊慌失措的蚂蚁？”^[30]但是，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反对丘吉尔的想法。他们希望一旦投降条约的军事协议得到履行，就尽快撤除“帝国临时政府”。苏联媒体尤其加强了对“邓尼茨集团”的攻击力度。5月20日的《真理报》刊文：“被击败的德国军国主义者正在适应新的环境，并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逃避责任，同时在国内保持重要的政治地位，妄图通过分裂盟军阵营来继续施展其政治阴谋。”^[31]

5月17日，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来到弗伦斯堡。他的任务是核查邓尼茨作为国家元首的合法性。海军元帅无法出具任命文件，只能交出4月30日和5月1日的三封众所周知的电报。在谈话中，墨菲毫不掩饰他对这些文件的价值的怀疑。他的反应让“帝国临时政府”成员更加确信，撤职只是时间问题。^[32]

随后，墨菲的确直接建议终止邓尼茨政府的工作。此外他强调，海军元帅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并没有表示遗憾。艾森豪威尔在与红军最高司令部取得联系并获得他们的同意后，于5月19日命令英国第21集

团军逮捕邓尼茨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成员并扣留了他们的档案。[\[33\]](#)

5月22日下午，邓尼茨收到命令，要求其于第二天上午9点45分与约德尔和冯·弗里德堡一起到盟军监督委员会那里。海军元帅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命令他的副官：“收拾箱子！”德国人准时到达“帕特里亚号”驳船。这次没有人在舷梯旁迎接他们；等待他们的是大批的记者。代表团在船上的酒吧里等待了几分钟，之后鲁克斯少将、福尔德准将和特鲁斯科夫少将进入房间。鲁克斯开门见山地解释说，他已收到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要求逮捕“帝国临时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成员。从此刻起，他们便成为战俘。当被问及是否还要作出回应时，邓尼茨回答说，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34\]](#)

如果说“帕特里亚号”上的谈判还以较为体面的方式进行，那么俘虏在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海军学校的“帝国临时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其他成员的方式则显得不那么和平了。英军坦克、步兵和宪兵包围了政府大楼。士兵们拿着冲锋枪突然闯进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每天早上10点召开内阁会议的会场，并喊道：“举起手来！”在他们身上的文件和贵重物品被取走后，被捕人员被带到院子里的新闻摄影师面前，双手交叉在后颈部。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在从“帕特里亚号”返回时目睹了这一现场，随后不久就服毒自杀了。[\[35\]](#)

5月23日上午，英国人包围了格吕克斯堡城堡并逮捕了阿尔伯特·施佩尔。他与邓尼茨政府的其他成员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人一起被带到弗伦斯堡警察总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全面搜身。英国人很明显在寻找毒药瓶，以防还有被捕者自杀。[\[36\]](#)下午早些时候，囚犯们被卡车运送到机场。两架将他们运往卢森堡的货运飞机已经等候在那里。当天，他们被转移到巴特蒙多夫，该地被盟军选为纳粹政权和高级军官主要代表的集中关押点。



1945年5月23日，英国士兵终止了邓尼茨政府的工作。（从左至右：阿尔伯特·施佩尔、卡尔·邓尼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ünchen/Archiv Heinrich Hoffmann/bpk-Bildagentur, Berlin）

*

施佩尔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到达关押点的场景：“我们在巴特蒙多夫皇宫酒店（Palace-Hotel）的一幢大楼前停下来，然后被带到大厅。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戈林与其他第三帝国的前任领导人在外面走来走去：部长、陆军元帅、纳粹党领导人、国务秘书和将军。最后像谷壳散落在风中一样四散各地的人们再次聚集在这里，真是一幅幽灵般的景象。”[\[37\]](#)

盟军无疑将赫尔曼·戈林视为最重要的囚犯，希特勒曾经将其指定为他的继任者，但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因所谓的“叛国罪”而驱逐了他。这位帝国元帅于5月8日在上巴伐利亚向美军第7军团第36步兵师自首，三天后被带到奥格斯堡向国际新闻界公开此事。克劳斯·曼也

是此次密切关注他的人之一。他在为《星条旗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这名纳粹运动的资深斗士和领导人绝不像某些记者形容的那样，是个半疯的小丑。”“他狡猾、不知悔改并且精于算计。他以出色的自律能力成功地适应了环境的变化。他努力地——而且非常巧妙地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并赢得可以给予他恩赐的人的同情。他展现了一个文明人的形象：宽容而温和，刻意避免显得有失身份和过于顺从。”^[38]5月21日，戈林被带到巴特蒙多夫。

与戈林不同，其他在巴特蒙多夫被关押的纳粹高层曾试图通过假身份躲藏起来。在希特勒4月29日的遗嘱中被任命为德意志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简称DAF）首領和帝国内阁成员的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于5月15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幢山间小屋中被美军第101空降师部队逮捕。在躲藏时他化名为“恩斯特·迪斯特迈尔博士（Dr. Ernst Distelmeyer）”。与纳粹党财务主管弗朗茨·克萨弗·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相反，他可以清楚地被辨识出来。被捕后，这名狂热的“元首”党派追随者叫嚣道：“生活对我而言已无任何意义。你们可以折磨我、殴打我、刺死我。但是我永远不会质疑希特勒的所作所为。”^[39]

同样落入第101空降师成员手中的还有5月22日被捕的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Julius Streicher），他是具有煽动性的反犹报纸《冲锋队》（*Der Stürmer*）的出版人。当听说希特勒去世的消息后，这名原弗兰肯地区的大区领袖化名“约瑟夫·塞勒（Joseph Seiler）”隐退到奥地利魏德灵（Waidring）的一处山庄。他留着白色的络腮胡子，自称业余画家。在一次例行问询中，负责审讯的美国军官半开玩笑地说：“你看起来像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于是这名“弗兰肯首領”立即放弃了伪装并承认：“是的，就是我。”^[40]当埃里希·凯斯特纳得知莱伊和施特莱谢尔被捕的场景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就像面具出租屋。或者黑帮电影。尊严的丧失已经失去底线了。” [41]

希特勒多年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最后几位落入盟军手中的纳粹高级代表之一。试图在邓尼茨政府中获得职位失败后，他逃往汉堡，并化名“约翰·里斯（Johann Riese）”在汉堡施吕特街（Schlüterstraße）14号租了一间房子。他以其1933年以前作为起泡酒和烈酒代理商的身份恢复了原有的业务联系。但是，他的一位葡萄酒商人朋友的儿子向英国人透露了其藏身之处。6月14日，里宾特洛甫被英国宪兵逮捕。为了确定他的身份，英国人作了特别安排：他们在豪华酒店“四季（Vierjahreszeiten）”中安排了一场与他妹妹英格伯格的会面。之后所有疑虑都消除了，里宾特洛甫立即被送往巴特蒙多夫。 [42]

巴特蒙多夫的审讯营代号为“Ashcan”（美式英语中“垃圾桶”的意思）。此地严格与公众隔离。皇宫酒店四周环绕着五米高的铁丝网，上面挂有织物带和伪装网。瞭望楼上站着配有机枪的守卫。为了排除自杀企图，被拘禁者必须上缴剃须刀、领带、背带和其他器具。在进食时只允许使用汤匙。房间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带草垫的军用木板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每天的饮食不超过1550卡路里——不过当时普通的德国平民也摄入不到更多。囚犯可以互相交谈。他们可以在公园里自由走动，并在酒店的露台上享受日光浴。一个由阿列克谢·波塔舒夫（Alexei Potaschew）上校率领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团于1945年6月获得审讯囚犯的许可，当他们亲眼见到这些纳粹名人时十分惊讶：“他们看上去都很好，像来疗养的客人一样晒得黝黑。” [43] 戈林在刚来的时候被认为严重依赖吗啡替代品双氢可待因（Paracodin），在巴特蒙多夫关押期间逐渐摆脱了对药物的依赖，身体恢复到良好状态。根据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的回忆，戈林

“就像块吸铁石（……），时刻准备着接受采访，分享奇闻逸事和分发纪念品”。[\[44\]](#)

在52名被拘留者中迅速形成了多个小团体。凯特尔、约德尔、凯塞林等人组成了军人团体，法兰克、莱伊以及图林根大区领袖、希特勒的“劳动力调配全权代表”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等人组成了“老斗士”团体。对这两个团体敬而远之的是“官僚们”和外交官——施图卡特、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斯特恩格拉赫特·冯·莫伊兰德以及希特勒帝国总理府负责人汉斯·海因里希·兰马斯。[\[45\]](#)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被所有团体排除在外。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就餐。当他进入餐厅时，其他人将自己的椅子拉到一起。[\[46\]](#)

在邓尼茨和戈林之间上演着对于优先顺序的荒唐争夺。帝国元帅仍然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指定继任者，而邓尼茨则坚持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国家元首。“在沉默中，”阿尔伯特·施佩尔说，“新的国家元首和被罢免的继任者为谁理应在巴特蒙多夫与世隔绝的皇宫酒店中享有优先权、谁应坐在第一张餐桌的主座上以及谁是我们这个组织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而剑拔弩张，无法达成一致。很快，双方避免在门口见面；在餐厅，他们两人分别坐在两张不同餐桌的主座上。”[\[47\]](#)

1945年6月，苏联代表团在美国军官的监督下进行审讯，但没有一个被审讯者愿意承认参与了该政权的犯罪行为。戈林解释说：“如果在前线和被占领国家确实有个别士兵实施了暴行，那么我向您保证，国家领导层、总参谋部、政府和党内人士中没有任何人批准过此类行径。”[\[48\]](#)凯特尔则不知羞耻地将处心积虑策划的对苏联的袭击称作“预防性战争”。像几乎所有军人一样，他表示自己不过是命令的接收者，企图以此逃避责任：他“从没有作出过任何决定，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而是“仅仅执行了元首的命令”。[\[49\]](#)



1945年夏，被逮捕的纳粹精英们在巴特蒙多夫皇宫酒店的台阶上合影（第一排中间：赫尔曼·戈林）。（Battmann/Getty Images）

1945年8月初，美国人揭开了关于巴特蒙多夫的秘密，国际媒体纷至沓来。被拘禁者不得不在酒店楼梯上拍照；这张照片在美国报纸上配以“1945毕业年”的说明发表。^[50]托马斯·曼长女埃里卡·曼（Erika Mann）和她的弟弟克劳斯一样是美国通讯员，她是唯一拜访过这“52巨头”的女性。她在写给母亲卡蒂娅（Katia）的信中说：“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可怕的冒险了”，“戈林、帕彭、罗森堡（Rosenberg）、施特莱谢尔、莱伊——世界上所有恐怖人物（包括凯特尔、邓尼茨、约德尔等）都被关在一座由宾馆改造的监狱里，居住在里面的囚犯让那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疯人院”。^[51]她的报道刊登在8月13日《伦敦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头版，里面描述了她的主要印象：“事实上，整个团体都在做着同一件事。他们都在写东西，努力地刻画着他们准备在那一天要扮演的角色。”^[52]

那一天指的是这些非自愿的疗养客人出庭的日期。自1945年8月中旬以来，巴特蒙多夫的囚犯们陆续被转移到纽伦堡司法宫，那里是对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的地方。阿尔伯特·施佩尔在来到皇宫酒店的几周后就被转移到凡尔赛，然后又被安置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克兰斯伯格城堡（Schloss Kramsberg），那里主要审问纳粹政权中的重要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其中还包括韦恩赫尔·冯·布劳恩。[\[53\]](#)

邓尼茨阵营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在纽伦堡被判处死刑。海军元帅本人被判处十年监禁。施佩尔被从宽判处二十年监禁。他展现了一副改过自新的样子，总体上承认自己负有责任，但拒绝承认参与过任何大规模犯罪。[\[54\]](#)什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在1949年4月的“威廉大街审判（Wilhelmstraßen-Prozess）”中被判十年监禁，但在1951年1月就从兰兹贝格战犯监狱获释。威廉·施图卡特也在“威廉大街审判”中被起诉，但考虑到他在1945年5月被捕后已服刑三年十个月零二十天，因此在宣判后他便获得自由。

尤利乌斯·多普穆勒在邓尼茨政府成员被捕前就乘飞机被带到巴黎附近的勒谢奈（Le Chesnay）。据说他受命在美军占领区重建帝国铁路运营部。回到马伦特（Malente）后，他于1945年7月5日死于癌症。弗朗茨·塞尔特本应在纽伦堡被起诉，但是在能够对他提起诉讼前，他就已经于1947年4月1日在菲尔特（Fürth）去世。赫伯特·巴克作为营养问题专家于5月15日飞往兰斯的盟军总部，但在那里被捕。1947年4月6日，他在纽伦堡监狱上吊自杀。奥托·奥伦多夫在1946年1月的纽伦堡主要诉讼程序中自愿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因其作为D特别行动队头目袭击苏联的罪行于1948年4月10日被判处绞刑。[\[55\]](#)

*

当盟军在1945年春天攻占德国时，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他们来到了一个似乎并没有纳粹主义的国家。“没有人是纳粹。没有人曾

经是（……）”，美国战争通讯员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写道，她不禁惊讶地怀疑纳粹政权是如何做到将这场战争持续足足五年半的，如果真的没有人追随它的话。“我们带着迷惑不解和鄙夷的神情站在那里，毫不友善地听着这些故事，完全不带尊重。整个民族都在逃避责任，并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场面。” [56]

同样迷惑不解的还有国内的希特勒反对者们，他们亲眼看见那些原政权的支持者们如何迅速地改变自己的信仰。“哦，现在没有人希望曾‘参与其中’；没有人会在四字字谜中对这个党的缩写认真对待；这些人物春风得意……真令人作呕。”作家威廉·豪森斯坦在1945年5月6日写道。 [57]

战争刚结束，人们对免除罪责证明，即所谓的“洗洁证（Persilschein）”的需求陡增。柏林一个抵抗组织的成员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他们一群群地过来，要求去除纳粹身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借口。突然间，每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想要救助至少两公斤面包或十磅土豆的犹太人。每个人都收听过外国电台。每个人都帮助过受迫害的人。这些事后自称为行善者的人常常既骄傲又谦逊地补充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品行证明书成为此刻的主宰。” [58]

摆脱纳粹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展开。一夜之间，所有统治符号和标志都消失了。“这些天来，一股圣象破坏浪潮正席卷整个德国”，记者玛塔·希勒斯在投降一周后观察到。 [59] 1945年8月，原纳粹党重要堡垒贡岑豪森（Gunzenhausen）的新任县长在“第三帝国”结束后的首份月度报告中写道：“尽管战争刚结束几个月，但几乎没有关于纳粹主义的任何言论，就算有，也是负面意义上的。在那些原本供奉着纳粹国家标志的家庭中，已经再也见不到任何纳粹主义的痕迹。” [60]

希特勒神话完全被颠覆了。曾经受人崇拜的“元首”现在被称为没有地位的人，是人类的恶魔，人们无法抵抗其魔鬼般的诱惑力。因此，也没有必要为自己参与纳粹主义作出说明。如果有人要为罪行负责，那就是希特勒，就是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集团——而自己与之无关，也不想再与其纠缠。曾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尤金·科根（Eugen Kogon）在1945年底写了《党卫队之国》（*Der SS-Staat*）一书，该书是对集中营世界的首次描写，其中作出了如下令人沮丧的总结：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良知的声音还没有觉醒；没有人愿意再听到纳粹暴行。“关于集中营的报道顶多是让人感到震惊或难以置信；它们几乎不会激起人们的理解，更不用说激发他们的感情了。”^[61]

越来越多的战败者将自己视为真正的受害者，认为他们在轰炸战或逃亡和驱逐中遭受了可怕的痛苦，而如今还要遭受盟军的不公正的严厉对待。“德国人认真地相信——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着想，是不谋而合——他们的苦难超出了一切想象”，埃里卡·曼在1946年春发表的关于“德国状况”的报告中写道。^[62]她的弟弟克劳斯早在1945年5月就对许多同胞们的自满、自怜和无知感到非常恼火：“似乎他们只会抱怨自己所处的困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遭受如此大的痛苦。‘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些？’他们睁着蓝眼睛用天真而无辜的语气问道。‘我们难道不是一直遵守法律的勤劳公民吗？’”^[63]

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给被征服和被占领领土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痛苦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同情了。与之相对的是，他们以近乎顽强的勤奋忙于清理废墟和重建工作。1945年底，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64]在德国南部的旅途中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像蚂蚁一样在一个瓦砾堆里来回奔跑，兴奋地并且像工作狂一样奔走在废墟之间”。^[65]

两年半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66]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那时是她自1933年被迫离开后第一次踏上这个国家的土地。她遇到的人“普遍缺乏感觉”，“一种明显的冷酷感”，有时“用廉价的感伤加以掩盖”，她察觉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长期存在的、有时甚至残酷的对承认现实发生的事并作出补偿的拒绝所表现的最明显的外部特征”：“当我们看到这些德国人如何忙碌地在他们千年历史的废墟中跌跌撞撞地穿行，面对被摧毁的象征物只能耸耸肩膀，或者当有人令他们回想起在世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时，他们是如何怨恨这个人的，我们就会认识到，忙碌已成为他们抵御现实的主要武器。”^[67]

西部占领区及后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有利于人们进一步逃离历史。在后来形成的第二个德国——民主德国中，官方所表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人们不再需要反思自己也曾是纳粹主义的一分子。“失去哀悼的能力（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这是亚历山大（Alexander Mitscherlich）和玛格丽特·米彻里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在1967年出版的书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正是这种压抑的过程。^[68]这种无能在两个德国都存在，尽管表现有所不同。

*

1945年5月初，希特勒自1933年1月30日掌权所开始进行的一切都结束了。“希特勒的十二年执政足以使一个大国由盛转衰；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竟不知从何说起。”挪威驻柏林记者西奥·芬达尔在5月9日总结道。^[69]这个战败国遭遇的军事打击如此彻底，经济损失如此巨大，所犯下的罪行史无前例，以至于当时有不少观察家质疑，这个国家是否还有未来。

然而，1945年5月8日不仅意味着结束，也标志着开始。除了筋疲力尽和痛苦，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也提高了，甚至散发对于重新出发的

异常欢快情绪。自由民主党政客希尔德加德·哈姆-布吕歇尔

(Hildegard Hamm-Brücher) 回忆说，她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能够继续活下去意味着什么”。^[70]在地狱中存活下来的幸福感释放着无法想象的能量。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纳粹并保持住了体面和人格尊严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的。“那十二年终于过去了。某种新的东西开始了(……)”，露丝·安德里亚斯-弗里德里希写道。“每一步都是新的开始。一举一动都承载着创建基础的价值和分量。‘着手做，快行动’是我们的口号。”^[71]

对这位记者和她的志同道合者们来说，忙碌的清理工作并不是为了不久前的过去，而是正相反，是出于帮助建立自由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愿望。在“第三帝国”的舆论宣传下成长的年轻前线士兵和预备役的炮兵并没有像盟军所担心的那样变成狂热的地下战士，变成所谓的“狼人”。在经历彻底幻灭的震惊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冥顽不化，而是将1945年之前养成的奉献精神与对西方生活方式无比开放的心态结合起来了。^[72]

尽管在艰辛的日常生活中，单单为了活下去就要耗费所有精力，但是经历了十二年的同化和精神贫瘠后，人们强烈地渴望文化。先前被关闭的书籍、杂志、图片和唱片世界打开了。拥入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的是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的公众，这一现象空前绝后。在满目疮痍、自以为是和失去哀悼的能力之外，标志着新开始的嫩芽也出土了。但是，直到民主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引导下重新扎根于德国西部的民众之间还需要一段时间。只有亲眼看见这种破坏——包括物质和道德上——的严重程度，才能理解1945年5月8日所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难以想象，以及今天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稳定、自由与和平的国度是何等的成就。也许现在正是回想起这些的时候。

[1] Thomas Mann: An die gesittete Welt.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im Exil, Frankfurt/M. 1980, S. 616.

[2] Siegfried A. Kaehler an Martin Kaehler, 19. 5. 1945; Siegfried A. Kaehler: Briefe 1900–1963. Hrsg. von Walter Bußmann und Günther Grünthal unter Mitwirkung von Joachim Stemmler, Boppard am Rhein 1993, S. 299.

[3] Karl-Günther von Hase: Düstere Gedanken im Moskauer Gefängnis, in Trampe (Hrsg.): Die Stunde Null, S. 147–151 (此处见S. 148)。

[4] 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1945, S. 324 (v. 7. 5. 1945)。

[5]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言论，认为德国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是革命所致。

[6] Theodor Heuss: Das Ende, in ders.: Aufzeichnungen 1945–1947, Tübingen 1966; 援引自Peter Merseburger: Theodor Heuss. Der Bürger als Präsident, München 2012, S. 364。参见Heinrich Krone: Tagebücher, 1. Bd.: 1945–1961. Bearbeitet von Hans-Otto Kleinmann, Düsseldorf 1995, S. 8 (v. 9. 5. 1945): “将军们的名字写在停战文件上。不像1918年那样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签字。闯祸的人应当负起责任，这样就不会再有所谓的‘背后一剑’之说了。”

[7] 援引自Merseburger: Theodor Heuss, S. 367 f.。

[8] 援引自Gunter Hofmann: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Ein deutsches Leben, München 2010, S. 188。关于联邦德国对1945年5月8日的定性，可参见Sebastian Ullrich: Wir sind, was wir erinnern. Es hat lange gedauert, bis sich ein selbstkritischer Umgang mit der Vergangenheit durchsetzen konnte, in ZEIT-Geschichte, H. 1 (2005), S. 27–34。

[9] Walb: Ich, die Alte-ich, die Junge, S. 345 (v. 8. 5. 1945)。参见Keller (Hrsg.): Kriegstagebuch einer jungen

Nationalsozialistin, S. 211 (v. 29. 4. 1945): “一切真的都结束了, 我们相信的一切, 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所有的牺牲都是徒劳的。我无法相信。”

[10] Alfred Kantorowicz: Deutsches Tagebuch, 1. Teil, Berlin 1978, S. 80 (v. 8./9. 5. 1945).

[11] Wolff-Mönckeberg: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S. 171 (v. 1. 6. 1945).

[12] Stephan Hermlin: Bestimmungsorte, Berlin 1985, S. 46.

[13] Margaret Bourke-White: Deutschland-April 1945. “Dear Fatherland Rest Quietly”, München 1979, S. 90.

[14] Wilhelm Hausenstein: Licht unter dem Horizont. Tagebücher von 1942 bis 1946, München 1967, S. 348 (v. 9. 5. 1945).

[15] George Orwell: Now Germany Faces Hunger, in Manchester Evening News v. 4. 5. 1945; 援引自Hoffmann: Besiegte, Besatzer, Beobachter. Das Kriegsende im Tagebuch, in Fulda u. a. (Hrsg.): Demokratie im Schatten der Gewalt, S. 46.

[16] Klaus Mann: Es gibt keine Heimkehr, in ders.: Auf verlorenem Posten, S. 224-230 (此处见S. 227)。参见Wilhelm Hoegner: Der schwierige Außenseiter. Erinnerungen eines Abgeordneten, Emigrant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München 1959, S. 190 f.: “在我看来, 与慕尼黑相比, 庞贝古城简直可以说是很好地被保存下来了。”

[17] Tilman Lahme/Holger Pils/Kerstin Klein (Hrsg.): Die Briefe der Manns. Ein Familienporträt, Frankfurt/M. 2016, S. 308-314 (Zitate S. 309, 314)。参见Naumann: Klaus Mann (1906-1949), S. 300 f. (包括由约翰·图克斯伯里拍摄的位于波辛格大街的别墅的照片)。

[18]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06; 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87; Steinert: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239.

[19] 参见Speer: Erinnerungen, S. 500。

[20]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89 f.; Speer: Erinnerungen, S. 500: “我们撰写的回忆录陷入虚空, 我们假装工作, 试图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无足轻重。”

[21] 鲁克斯和邓尼茨1945年5月13日秘密谈话的档案记录; Förster/Lakowski (Hrsg.): 1945, Dok. 217, S. 400-402 (hier S. 400)。参见1945年5月13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43 f.; Görlitz (Hrsg.):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S. 379 f.。

[22]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63.

[23] 参见KTB-OKW, Bd. IV, 2, S. 1484; 1945年5月10日、12日和14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7 f., 440 f., 445。

[24] 1945年5月15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46.

[25] 海军元帅邓尼茨1945年5月18日的档案记录; Förster/Lakowski (Hrsg.): 1945, Dok. 224, S. 411-413 (此处见S. 412)。

[26] 1945年5月9日和15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6, 446。

[27] 主要参见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2 Bände, München 2000。

[28] 1945年5月11日和16日的备忘录; Schramm (Hrsg.): Die Niederlage 1945, S. 439, 447。参见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58: “我们问自己, 如何能逃脱这些曾经在德国发生的事情。”

[29] Schwerin von Krosigk an Eisenhower, 16. 5. 1945; Förster/Lakowski (Hrsg.): 1945, Dok. 222, S. 408 f. (此处见S. 409)。

[30] 援引自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93。参见Marlies Steinert: Die alliierte Entscheidung zur Verhaftung der

Regierung Dönitz,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 (1986), S. 85–99 (此处见S. 89)。

[31] 援引自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195。

[32]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07, 112; Schwerin von Krosigk: Memoiren, S. 251。

[33]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200; Steinert: Die alliierte Entscheidung zur Verhaftung der Regierung Dönitz, S. 92 f.。

[34]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13 (S. 161处也记录了鲁克斯解释的原话); Dönitz: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S. 465。

[35] 参见Lüdde-Neurath: Regierung Dönitz, S. 114, 115 f.; Schwerin von Krosigk: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S. 379。

[36] 参见Speer: Erinnerungen, S. 502; Sereny: Albert Speer, S. 640 f.。和施佩尔一起被逮捕并送往弗伦斯堡警察署的还有希特勒的医生Karl Brandt, 他是纳粹“安乐死”灭绝计划的主要组织者。参见Ulf Schmidt: Hitlers Arzt Karl Brandt. Medizin und Mach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2009, S. 514。

[37] Speer: Erinnerungen, S. 503。

[38] Klaus Mann: Göring wirbt um Mitgefühl, in ders.: Auf verlorenem Posten, S. 221–224 (此处见S. 222)。参见Kl. Mann: Der Wendepunkt, S. 438; ders.: Tagebücher 1944–1949, S. 83 (v. 11. 5. 1945)。

[39] Ronald Smelser: Robert Ley. Hitlers Mann an der “Arbeitsfront”. Eine Biographie, Paderborn 1989, S. 286。

[40] Daniel Roos: Julius Streicher und “Der Stürmer” 1923–1945, Paderborn 2014, S. 467。参见Richard Overly: Verhöre. Die NS-Elite in den Händen der Alliierten, München-Berlin 2001, S. 41。

[41] Kästner: Notabene 45, S. 148 (v. 24. 5. 1945)。参见Das Blaue Buch, S. 213 (v. 24. 5. 1945): “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面具租赁机构一样。甚至比那些毫无尊严的吹牛皮者还要没有尊严。”

[42] 参见Hamburg-Journal. Sendung v. 14. 6. 2015; Conze u. a.: Das Amt, S. 332; Theo Sommer: 1945. Die Biographie eines Jahres,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S. 83。

[43] NKWD全权代表1945年6月25日的报告; Christoforow u. a. (Hrsg.): Verhört, S. 48-57 (此处见S. 51)。关于巴特蒙多夫的生活条件, 参见Overy: Verhöre, S. 65-67; Conze u. a.: Das Amt, S. 332 f.; Kirkpatrick: Im inneren Kreis, S. 171 f.; Philipp Schnee: Hotel der Kriegsverbrecher, in Der Spiegel v. 28. 10. 2009。

[44] Schwerin von Krosigk: Memoiren, S. 257。

[45] 参见Conze u. a.: Das Amt, S. 333; Mark Mazower: Hitlers Imperium. Europa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9, S. 486。

[46] 参见Roos: Julius Streicher und “Der Stürmer”, S. 471。

[47] Speer: Erinnerungen, S. 504。

[48] 戈林1945年6月17日的审讯记录; Christoforow u. a. (Hrsg.): Verhört, S. 78-95 (此处见S. 91)。即使在1945年6月与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的对话中, 戈林也“没有表现出对纳粹罪行的任何悔意或承认参与”。Im inneren Kreis, S. 174。

[49] 凯特尔1945年5月17日的审讯记录; Christoforow u. a. (Hrsg.): Verhört, S. 95-121 (此处见S. 97, 103)。

[50] 参见Mazower: Hitlers Imperium, S. 487。

[51] 埃里卡·曼于1945年8月22日致信卡蒂娅·曼; Lahme u. a. (Hrsg.): Die Briefe der Manns, S. 322-324 (此处见S. 323)。参见Uwe Naumann (Hrsg.): Die Kinder der Manns. Ein Familienalbum,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S. 200 f.。

[52] Erika Mann: Wer das Schwert nimmt..., in dies.: Blitze überm Ozean. Aufsätze, Reden, Reportagen. Hrsg. von Irmela von der Lühe und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0, S. 343-355 (此处见S. 346)。

[53] 参见Speer: Erinnerungen, S. 504-507。

[54] 参见Volker Ullrich: Speers Erfindung, in DIE ZEIT v. 4. 5. 2005; Brechtken: Albert Speer, S. 299-310。

[55] 参见Hansen: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S. 200 f.; Angrick: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S. 716-719。

[56] 援引自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Hrsg.): Europa in Ruinen.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n Jahren 1944-1948, München 1995, S. 87 f.。美军心理战部门的Saul K. Padover在被占领的“第三帝国”开展审讯时也有同样的印象：“我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月（.....），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纳粹分子。每个人都是纳粹的敌人。所有人都反对希特勒。他们始终反对希特勒。” Saul K. Padover: Lügendetektor. Vernehmungen im besiegten Deutschland 1944/45, Frankfurt/M. 1999, S. 46。

[57] Hausenstein: Licht unter dem Horizont, S. 347 (v. 6. 5. 1945)。参见Kellner: Tagebücher 1939-1945, Bd. 2, S. 932 (v. 6. 5. 1945)：“现在当然没有人希望自己曾是真正的纳粹分子。每个人都回避责任。”

[58]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94 (v. 17. 5. 1945)。

[59]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S. 199 (v. 15. 5. 1945)。

[60] 援引自Ian Kershaw: Der Hitler-Mythos. Führerkult und Volksmeinung, Stuttgart 1999, S. 274。参见Klemperer: Tagebücher 1942-1945, S. 773 (v. 11. 5. 1945)：“第三帝国已经被遗忘了”；Kardorff: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S. 326 (v. 16. 5. 1945, Anm. 2)：“战争结束了，纳粹就像《圣经·诗篇》第73章所描述的情景一样，被冲走，毁灭，消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兴趣了。”

[61] Eugen Kogo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München 1974, S. 393。参见Padover: Lügendetektor, S. 86: “所有的罪过都转嫁给了元首，人们自己无须承担任何道德责任。”

[62] Erika Mann: Deutsche Zustände, in dies.: Blitze überm Ozean, S. 377-382 (此处见S. 378)。

[63] Klaus Mann: Unsere Aufgabe in Deutschland, in ders.: Auf verlorenem Posten, S. 216-221 (此处见S. 217)。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描述，参见Mellendorf学校校长的生动记录Ewald Niedermeyer: Mellendorfer Kriegstagebuch, S. 59 (v. 3. 5. 1945): “我们不抱任何希望地踏上了殉难之路”；S. 63 (v. 20. 5. 1945): “我们现在被交付给了我们的敌人，恐怕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64]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1878~1957)，德国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

[65] 援引自Enzensberger (Hrsg.): Europa in Ruinen, S. 188。

[66] 汉娜·阿伦特 (1906~1975)，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哲学家，原籍德国。

[67] Hannah Arendt: Besuch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3, S. 25, 35.

[68] Alexander u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1967.

[69] Findahl: Letzter Akt-Berlin 1939-1945, S. 190 (v. 9. 5. 1945)。

[70] Sarkowicz (Hrsg.): “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S. 173.

[71] Andreas-Friedrich: Schauplatz Berlin, S. 196 (v. 2. 6. 1945)，203 (v. 22. 6. 1945)。

[72] 参见Norbert Frei: Große Gefühle. Das Kriegsende war eine Zeit voll widerstreitender Emotionen, in ZEIT-Geschichte H.

1 (2015), S. 16-23 (此处见S. 23)。

参考文献

已出版的原始资料

Albrecht, Willy (Hrsg.) : Kurt Schumacher. Reden-Schriften-Korrespondenzen 1945-1952, Berlin-Bonn 1985.

Bergmann, Klaus/Gerhard Schneider (Hrsg.) : 1945. Ein Lesebuch, Hannover 1985.

Berliner Schulaufsätze aus dem Jahr 1946. Hrsg. vom Prenzlauer Berg Museum des Kulturstadtes Berlin Prenzlauer Berg. Ausgewählt und eingeleitet von Annett Gröschner, Berlin 1996.

Besymenski, Lew: Der Tod des Adolf Hitler. Unbekannte Dokumente aus den Moskauer Archiven, Hamburg 1968.

Besymenski, Lew: Die letzten Notizen von Martin Bormann. Ein Dokument und sein Verfasser, Stuttgart 1974.

Boberach, Heinz (Hrsg.) :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Die geheimen Lageberichte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Bd.17, Herrsching 1984.

Brandt, Willy: Verbrecher und andere Deutsche. Ein Bericht aus Deutschland 1946. Bearbeitet von Einhart Lorenz, Bonn 2007.

Breloer, Heinrich in Zusammenarbeit mit Rainer Zimmer: Die Akte Speer. Spuren eines Kriegsverbrechers, Berlin 2006.

Bronfen, Elisabeth/Daniel Kampa (Hrsg.) : Eine Amerikanerin in Hitlers Badewanne. Drei Frauen berichten über den Krieg: Margaret Bourke-White, Lee Miller und Martha Gellhorn, Hamburg 2015.

Christoforow, Wassili S./Wladimir G.Makarow/Matthias Uhl (Hrsg.) : Verhört. Die Befragungen deutschen Generale und Offiziere durch die sowjetischen Geheimdienste 1945-1952, Berlin-Boston 2015.

Churchill, Winston S. : Reden in Zeiten des Kriegs. Ausgewählt, eingeleitet und erläutert von Klaus Körner, Hamburg-Wien 2002.

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 Hrsg.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 Flüchtlinge und Kriegsbeschädigte, Bd. IV: 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aus der Tschechoslowakei, 2 Teilbde., Berlin 1957.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Hrsg.) : Europa in Ruinen. Augenzeugenberichte aus den Jahren 1944-1948, München 1995.

Förster, Gerhard/Richard Lakowski (Hrsg.) : 1945. Das Jahr der endgültigen Niederlage der faschistischen Wehrmacht. Dokumente, Berlin-Ost 1975.

Gleiss, Horst G.W. : Breslauer Apokalypse 1945. Dokumentarchronik vom Totenkampf und Untergang einer deutschen Stadt und Festung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Bde.1-5, Wedel 1986-88.

Gosztony, Peter (Hrsg.) : Der Kampf um Berlin 1945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1970.

Groehler, Olaf: Das Tagebuch Europa 1945. Die Neue Reichskanzlei. Das Ende, Berlin 1995.

Hirschfeld, Gerhard/Irina Reinz (Hrsg.) : Besiegt und befreit. Stimmen vom Kriegsende 1945, Gerlingen 1995.

Keiderling, Gerhard (Hrsg.) : «Gruppe Ulbricht» in Berlin April bis Juni 1945. Von den Vorbereitungen im Sommer 1944 bis zur Wiedergründung der KPD im Juni 1945.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93.

Mann, Erika: Blitze überm Ozean. Aufsätze, Reden, Reportagen. Hrsg. von Irmela von der Lühe und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0.

Mann, Klaus: Auf verlorenem Posten. Aufsätze, Reden, Kritiken 1942-1949. Hrsg. von Uwe Naumann und Michael Töteberg, Reinbek bei Hamburg 1994.

Mann, Thomas: Reden an die gesittete Welt.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im Exil, Frankfurt/M. 1980.

Mensching, Hans Peter (Bearbeiter) : Adenauer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91.

Miller, Lee: Krieg. Mit den Alliierten in Europa 1944-1945. Reportagen und Fotos. Hrsg. von Antony Penrose, Berlin 2013.

Neitzel, Sönke: Abgehört. Deutsche Generäle in bri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 1942-1945, Berlin 2005.

Padover, Saul K. : Lügendetektor. Vernehmungen im besiegten Deutschland 1944/45, Frankfurt/M. 1999.

Ruhl, Klaus-Jörg (Hrsg.) : Deutschland 1945. Alltag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in Berichten, Dokumenten und Bildern, Darmstadt und Neuwied 1984.

Schäfer, Hans Dieter: Berlin im Zweiten Weltkrieg. Der Untergang der Reichshauptstadt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München-Zürich 1985.

Scherstjanoi, Elke (Hrsg.) : Rotarmisten schreiben aus Deutschland. Briefe von der Front (1945) und historische Analysen, München 2004.

Schramm, Percy Ernst (Hrsg.) :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 Bd. IV: 1. Januar 1944-22. Mai 1945, Herrsching 1982.

Schramm, Percy Ernst (Hrsg.) : Die Niederlage 1945.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München 2. Aufl. 1985.

Von zur Mühlen, Bengt (Hrsg.) : Der Todeskampf der Reichshauptstadt, Berlin 1994.

Völklein, Ulrich (Hrsg.) : Hitlers Tod. Die letzten Tage im Führerbunker, Göttingen 1999.

日记、书信、回忆录

Adenauer, Konrad: Erinnerungen 1945–1953, Stuttgart 1965.

Ahlfen, Hans/Hermann Niehoff: So kämpfte Breslau. Verteidigung und Untergang von Schlesien, München 1959.

Andreas-Friedrich, Ruth: Schauplatz Berlin. Ein deutsches Tagebuch, München 1962.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Tagebuchaufzeichnungen vom 20. April bis 22. Juni 1945, Frankfurt/M. 2003.

Arendt, Hannah: Besuch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3.

Baur, Hans: Ich flog Mächtige der Erde, Kempten (Allgäu) 1956.

Beckmann, Max: Tagebücher 1940–1945. Zusammengestellt von Mathilde Q. Beckmann. Hrsg. von Erhard Göpel, München–Wien 1979.

Bedell Smith, Walter: Eisenhower' s Six Great Decisions,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56.

Bourke-White, Margaret: Deutschland April 1945. «Dear Fatherland Rest Quietly», München 1979.

Bovery, Margret: Tage des Überlebens. Berlin 1945, München 1985.

Brandt, Willy: Links und frei. Mein Weg 1930-1950, Hamburg 1982.

Brandt, Willy: Erinnerungen, Berlin 1989.

Brecht, Bertolt: Arbeitsjournal 1941-1955, Bd. 2, Frankfurt/M. 1973.

Breloer, Heinrich (Hrsg.) : Mein Tagebuch. Geschichten vom Überleben 1939-1947, Köln 1984.

Büttner, Ursula/Angelika Voß-Louis (Hrsg.) : Neuanfang auf Trümmern. Die Tagebücher des Bremer Bürgermeisters Theodor Spitta 1945-1947, München 1992.

Butscher, Harry C. : Drei Jahre mit Eisenhower, Bern 1946.

Chaldej, Jewgeni: Der bedeutende Augenblick. Hrsg. von Ernst Volland und Heinz Krimmer, Leipzig 2008.

Churchill, Winston: Der Zweite Weltkrieg, Frankfurt/M. 2003.

Demetz, Peter: Mein Prag. Erinnerungen 1939 bis 1945, Wien 2007.

Dietrich, Marlene: Nehmt nur mein Leben... Reflexionen, München 1979.

Dönitz, Karl: Zehn Jahre und zwanzig Tage, Frankfurt/M.-Bonn 1963.

Doernberg, Stefan: Befreiung 1945. Ein Augenzeugenbericht, Berlin-Ost 1975.

Doernberg, Stefan (Hrsg.) : Hitlers Ende ohne Mythos. Jelena Rshewskaja erinnert sich an ihren Einsatz im Mai 1945 in Berlin, Berlin 2005.

Dulles, Allen/Gero von Gaevernitz: Unternehmen «Sunrise». Die geheime Geschichte des Kriegsendes in Italien, Düsseldorf-Wien 1967.

Eberle, Henrik/Matthias Uhl (Hrsg.) : Das Buch Hitler. Geheimdossier des NKWD für Josef W. Stalin, zusammengestellt aufgrund der Verhörprotokolle des Persönlichen Adjutanten Hitlers, Otto Günsche, und des Kammerdieners Heinz Linge, Moskau 1948/49, Bergisch Gladbach 2005.

Eisenhower, Dwight D. : Kreuzzug in Europa, Amsterdam 1948.

Felsmann, Barbara/Annett Gröschner/Grischa Meyer (Hrsg.) : Backfisch im Bombenkrieg. Notizen in Steno,

Berlin 2013.

Feuersenger, Marianne: Im Vorzimmer der Macht. Aufzeichnungen aus dem Wehrmachtführungsstab und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0–1945, München 4. Aufl. 2001.

Findahl, Theo: Letzter Akt–Berlin 1938–1945, Hamburg 1946.

Frank, Anne: Tagebuch. Fassung von Otto H. Frank und Mirjam Pressler, Frankfurt/M. 1991.

Frank, Hans: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München 1953.

Gelfand, Wladimir: Deutschland–Tagebuch 1945–1946. Aufzeichnungen eines Rotarmisten. Ausgewählt und kommentiert von Elke Scherstjanoi, Berlin 2005.

Giordano, Ralph: Erinnerungen eines Davongekommenen, Köln 2007.

Goebbels, Josef: Die Tagebücher. Hrsg von Elke Fröhlich, Teil II, Bd.15, München 1995.

Görlitz, Walter (Hrsg.) :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Verbrecher oder Offizier?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des Chefs OKW, Göttingen 1961.

Goguel, Rudi: «Cap Arcona». Report über den Untergang der Häftlingsflotte in der Lübecker Bucht am 3. Mai 1945, Frankfurt/M. 1972.

Hartung, Hugo: Schlesien 1944/45. Aufzeichnungen und Tagebücher, München 1956.

Hausenstein, Wilhelm: Licht unter dem Horizont. Tagebücher von 1942 bis 1946, München 1967.

Hermlin, Stephan: Bestimmungsorte, Berlin 1985.

Heuss, Theodor: Erzieher zur Demokratie. Briefe 1945–1949. Hrsg. und bearbeitet von Ernst Wolfgang Becker, München 2007.

Höcker, Karla: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5, Berlin 1966.

Höß, Rudolf: Kommandant in Auschwitz. Autobiographische Aufzeichnungen. Hrsg. von Martin Broszat, München 4. Aufl. 1978.

Junge, Traudl: Bis zur letzten Stunde. Hitlers Sekretärin erzählt ihr Leben. Unter Mitarbeit von Melissa Müller, München 2002.

Kaehler, Siegfried A.: Briefe 1900–1963. Hrsg. von Walter Bußmann und Günther Grünthal, Boppard am Rhein 1993.

Kantorowicz, Alfred: Deutsches Tagebuch, 1. Teil, Berlin 1978.

Kardorff, Ursula von: Berliner Aufzeichnungen 1942 bis 1945. Neu hrsg. und kommentiert von Peter Hard, München 1992.

Kästner, Erich: Notabene 45. Ein Tagebuch, München 1993.

Kästner, Erich: Das blaue Buch. Geheimes Kriegstagebuch 1941-1945. Hrsg. von Sven Hanuschek in Zusammenarbeit mit Ulrich von Bülow und Silke Becker, Zürich 2018.

Keller, Sven (Hrsg.) : Kriegstagebuch einer jungen Nationalsozialistin. Die Aufzeichnungen Wolfhilde von Königs 1939-1946, Berlin-Boston 2015.

Kellner, Friedrich; «Vernebelt, verdunkelt sind alle Hirne». Tagebücher 1939-1945. Hrsg. von Sascha Feuchert, Robert Martin Scott Kellner, Erwin Leibfried, Jörg Riecke und Markus Roth, Bd.2, Göttingen 2011.

Kempowski, Walter: Das Echolot. Abgesang' 45. Ein kollektives Tagebuch, München 2005.

Kesselring, Albert: 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 Bonn 1953.

Kirkpatrick, Ivone: Im inneren Kreis. Erinnerungen eines Diplomaten, Berlin 1964.

Klein, Fritz: Drinnen und draußen. Ein Historiker in der DDR, Frankfurt/M. 2000.

Klemperer, Victor: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Tagebücher 1942–1945. Hrsg. von Walter Nowojski unter Mitarbeit von Hadwig Klemperer, Berlin 1995.

Klüger, Ruth: weiter leben. Eine Jugend, München 17. Aufl. 2010.

Koller, Karl: Der letzte Monat. 14. April bis 27. Mai 1945. Tagebuchaufzeichnungen des ehemaligen Chefs des Generalstabs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Esslingen–München 1985.

Krauss, Christine/Daniel Küchenmeister (Hrsg.) : Das Jahr 1945. Brüche und Kontinuitäten, Berlin 1995.

Krone, Heinrich: Tagebücher, Bd.1: 1945–1961. Bearbeitet von Hans-Otto Kleinmann, Düsseldorf 1995.

Kronika, Jacob: Der Untergang Berlins, Flensburg–Hamburg 1946.

Kupfer-Koberwitz, Edgar: Dachauer Tagebücher. Die Aufzeichnungen des Häftlings 24814, München 1997.

Lahme, Tilmann/Holger Pils/Kerstin Klein (Hrsg.) : Die Briefe der Manns. Ein Familienporträt, Frankfurt/M. 2016.

Lasky, Melvin J.: Und alles war still. Deutsches Tagebuch 1945, Berlin 2014.

Leonhard, Wolfgang: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Köln 1987.

Lindgren, Astrid: Die Menschheit hat den Verstand verloren. Tagebücher 1939–1945, Berlin 2015.

Linge, Heinz: Bis zum Untergang. Als Chef des Persönlichen Dienstes bei Hitler. Hrsg. von Werner Maser, München 1982.

Maier, Reinhold: Ende und Wende. Briefe und Tagebuchaufzeichnungen 1944–1946, Wuppertal 2004.

Mann, Klaus: 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Frankfurt/M. 1963.

Mann, Klaus: Tagebücher 1944–1949. Hrsg. von Joachim Heimannsberg, Peter Laemmle und Wilfried F. Schoeller, München 1991.

Mann, Thomas: Tagebücher 1944–1. 4. 1946. Hrsg. von Inge Jens, Frankfurt/M. 1986.

Martin, Angela/Claudia Schoppmann: «Ich fürchte die Menschen mehr als die Bomben». Aus den Tagebüchern dreier Berliner Frauen 1938–1946, Berlin 1996.

Mellendorfer Kriegstagebuch 1942–1949. Aufgezeichnet von Ewald Niedermeyer, Hannover 1996.

Memorial Moskau/Heinrich Böll-Stiftung (Hrsg.) : Für immer gezeichnet. Die Geschichte der Ostarbeiter in Briefen, Erinnerungen und Interviews, Berlin 2019.

Misch, Rochus: Der letzte Zeuge. «Ich war Hitlers Telefonist, Kurier und Leibwächter», unter Mitarbeit von Sandra Zarrinbal und Burkhard Nachtigall, Zürich-München 2008.

Montgomery, Marschall: Memoiren, München 1958.

Peikert, Paul: «Festung Breslau» in den Berichten eines Pfarrers, 22. Januar bis 6. Mai 1945. Hrsg. von Karol Jonca und Alfred Konieczny, Berlin 1970.

Poppinga, Anneliese: Mein Erinnerungen an Konrad Adenauer, Stuttgart 1970.

Pünder, Hermann: Von Preußen nach Europa. Lebens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68.

Reger, Erik: Zeit des Überlebens. Tagebuch April bis Juni 1945. Hrsg.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Andreas Petersen, Berlin 2014.

Renger, Annemarie: Ein politisches Leben. Erinnerungen, Stuttgart 1993.

Ruf, Johanna: Eine Backpfeife für den kleinen Goebbels. Berlin 1945 im Tagebuch einer 15-Jährigen. Die letzten und die ersten Tage. Hrsg. von Wieland Giebel, Berlin 2017.

Sarkowicz, Hans (Hrsg.) : «Als der Krieg zu Ende war». Erinnerungen an den 8. Mai 1945, Frankfurt/M.-Leipzig 1995.

Schmidt, Helmut u. a. : Kindheit und Jugend unter Hitler, Berlin 1992.

Schroeder, Christa: Er war mein Chef. Aus dem Nachlass der Sekretärin von Adolf Hitler. Hrsg. von Anton Joachimsthaler, München-Wien 3. Aufl. 1985.

Schukow, Georgi K. :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Stuttgart 1969.

Schuschnigg, Kurt von: Ein Requiem in Rot-Weiß-Rot. Aufzeichnungen des Häftlings Dr. Auster, Zürich 1946.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Menschenbilder unseres Jahrhunderts, Tübingen-Stuttgart 1952.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Memoiren, Stuttgart 1977.

Shirer, William L. : Berliner Tagebuch. Das Ende. 1944-45. Hrsg. von Jürgen Schebera, Leipzig 1994.

Speer, Albert: Erinnerungen. Mit einem Essay von Jochen Thies, Frankfurt/M.-Berlin 1993.

Speer, Albert: Spandauer Tagebücher. Mit einem Vorwort von Joachim Fest, Berlin-München 2002.

Spender, Stephen: Deutschland in Ruinen. Ein Bericht, Heidelberg 1995.

Stern, Carola: In den Netzen der Erinnerung. Lebensgeschichten zweier Mensch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86.

Trampe, Gustav (Hrsg.) : Die Stunde Null. Erinnerungen an Kriegsende und Neuanfang, Stuttgart 1995.

Tschuikow: Marschall Wassilij: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1966.

Ulreich, Carry: Nachts träum ich vom Frieden. Tagebuch 1941 bis 1945, Berlin 2018.

Vermehren, Isa: Reise durch den letzten Akt. Ein Bericht (10.2.44 bis 29.6.45) , Hamburg 1948.

Waibel, Max: 1945. Kapitulation in Norditalien. Originalbericht des Vermittlers, Basel 1981.

Walb, Lore: Ich, die Alte-Ich, die Junge. Konfrontation mit meinen Tagebüchern 1933–1945, Berlin 1997.

Wolff-Mönckeberg, Mathilde: Briefe, die sie nicht erreichten. Briefe einer Mutter an ihre fernen Kinder in den Jahren 1940–1946, Hamburg 1980.

文献

Afflerbach, Holger: Die Kunst der Niederlage. Eine Geschichte der Kapitulation, München 2013.

Aly, Götz/Susanne Heim: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Auschwitz und die deutschen Pläne für eine neue europäische Ordnung, Hamburg 1991.

Angrick, Andrej: Besatzungspolitik und Massenmord. Die Einsatzgruppe D in der südlichen Sowjetunion 1941-1943, Hamburg 2003.

Asendorf, Manfred: 1945. Hamburg besiegt und befreit. Hrsg. von der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Hamburg 1995.

Bacque, James: Der geplante To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gern. Erweiterte Ausgabe, Frankfurt/M.-Berlin 1994.

Bahnsen, Uwe/Kerstin von Stürmer: Die Stadt, die leben wollte. Hamburg und die Stunde Null, Hamburg 2004.

Bajohr, Frank: Hamburgs«Führer». Zur Person und Tätigkeit des Hamburger NS-DAP-Gauleiters Karl Kaufmann (1900-1969), in: ders./Joachim Szodrzynski (Hrsg.): Hamburg in der NS-Zeit. Ergebnisse neuerer Forschungen, Hamburg 1995, S.59-91.

Baur, Eva Gesine: Einsame Klasse. Das Leben der Marlene Dietrich, München 2017.

Becker, Winfried: Die Brücke und die Gefangenenlager von Remagen. Über die Interdependenz eines Massenschicksals im Jahre 1945, in: ders. (Hrsg.): Die Kapitulation von 1945 und der Neubeginn in Deutschland, Köln-Wien 1987, S.44-71.

Beer, Mathias: Flucht und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Voraussetzungen, Verlauf, Folgen, München 2011.

Beevor, Antony: Berlin 1945. Das Ende, München 2002.

Beevor, Antony: Ein Schriftsteller im Krieg. Wassili Grossman und die Rote Armee 1941–1945, München 2005.

Beierl, Florian M.: Hitlers Berg. Licht ins Dunkel der Geschichte des Obersalzbergs und seiner geheimen Bunkeranlagen, Berchtesgaden 4. Aufl. 2015.

Benz, Wigbert: Hans-Joachim Riecke. NS-Staatssekretär. Vom «Hungerplaner» vor zum «Welternährer» nach 1945, Berlin 2014.

Benz, Wolfgang/Barbara Distel (Hrsg.) : Der Ort des Terrors.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Bd. 2, Bd. 4, Bd. 6, München 2005/2006/2007.

Bessel, Richard: Germany 1945. From War to Peace, London 2009.

Beuys, Barbara: Leben mit dem Feind. Amsterdam unter deutscher Besatzung 1940–1945, München 2012.

Bisky, Jens: Berlin. Biographie einer großen Stadt, Berlin 2019.

Black, Peter: Ernst Kaltenbrunner. Vasall Himmlers: Eine SS-Karriere, Paderborn 1991.

Blatman, Daniel: Die Todesmärsche 1944/45. Das letzte Kapitel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Massenmords, Reinbek bei Hamburg 2011.

Bohn, Robert: Reichskommissariat Norweg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Neuordnung» und Kriegswirtschaft, München 2000.

Bonwetsch, Bernd: Sowjetische Zwangsarbeiter vor und nach 1945. Ein doppelter Leidensweg, in: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Jg. 41 (1993) , S. 533–546.

Borgsen, Werner/Klaus Volland: Stalag XB Sandborstel. Zur Geschichte eines Kriegsgefangenen- und KZ-Auffanglagers in Norddeutschland 1939–1945, Bremen 1991.

Bower, Tom: Verschwörung Paperclip. NS-Wissenschaftler im Dienst der Siegermächte, München 1987.

Brechtken, Magnus: Albert Speer. Eine deutsche Karriere, München 2017.

Chaussy, Ulrich/Christoph Püschner: Nachbar Hitler. Führerkult und Heimatzerstörung am Obersalzberg, Berlin 1995.

Conze, Eckart/Norbert Frei/Peter Hayes/Moshe Zimmermann: Das Amt und die Vergangenheit. Deutsche Diplomat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2010.

Dahm, Volker/Albert A. Feiber/Hartmut Mehringer/Horst Möller (Hrsg.) : Die tödliche Utopie. Bilder, Texte, Dokumente. Daten zum Dritten Reich, München-Berlin, 6. Aufl. 2011.

Davies, Norman/Roger Moorhouse: Die Blume Europas. Breslau-Wrocław-Vratislava. Die Geschichte einer mitteleuropäischen Stadt, München 2002.

Depkat, Volker: Lebenswelten und Zeitenwenden. Deutsche Politiker und die Erfahrungen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2007.

Diem, Veronika: Die Freiheitsaktion Bayern. Ein Aufstand in der Endphase des NS-Regimes, Kallmünz 2013.

Donnell, James P.O./Uwe Bahnsen: Die Katakombe. Das Ende der Reichskanzlei, Stuttgart 1975.

Douglas, R. M. : «Ordnungsgemäße Überführung». Die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2012.

Eglau, Hans Otto: Fritz Thyssen. Hitlers Gönner und Geisel, Berlin 2003.

Eisfeld, Rainer: Mondsüchtig. Wernher von Braun und die Geburt der Raumfahrt aus dem Geist der Barbarei, Reinbek bei Hamburg 1996.

Engel, Friedrich Karl: 1.Mai 1945: Hitlers Tod in Rundfunksendungen, in: Funkgeschichte, 41.Jg. (2018) ; PDF-Datei, 5.3.2019.

Engelbrecht, Peter: Der Krieg ist aus. Frühjahr 1945 in Oberfranken, Weißenstadt 2015.

Evans, Richard J.: Das Dritte Reich, Bd.III: Krieg, München 2009.

Fest, Joachim: Der Untergang. 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 2002.

Fisch, Bernhard: Nemmersdorf, Oktober 1944. 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 1997.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Hrsg.) : Hamburg im «Dritten Reich», Göttingen 2005.

Frank, Mario: Walter Ulbricht. 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Berlin 2001.

Frei, Norbert/Johannes Schmitz: Journalismus im Dritten Reich, München 1989.

Frei, Norbert: 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ä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München 1996.

Frei, Norbert: 1945 und wir. Das Dritte Reich im Bewusstsein der Deutschen, München 2005.

Ganzenmüller, Jörg: Das belagerte Leningrad 1941-1944, Paderborn 2. Aufl. 2007.

 Garbe, Detlef/Carmen Lange (Hrsg.) : Häftlinge zwischen Vernichtung und Befreiung. Die Auflösung des KZ Neuengamme und seiner Außenlager durch die SS im Frühjahr 1945, Bremen 2005.

 Garbe, Detlef: Eine Stadt und ihr KZ. Die Hansestadt Hamburg und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in: Zeitgeschichte in Hamburg 2018, Hamburg 2019, S.12-31.

 Gebhardt, Miriam: Als die Soldaten kamen. Die Vergewaltigung deutscher Frau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München 2015.

 Geiß, Josef: Obersalzberg. Die Geschichte eines Berges von Judith Platter bis heute, Berchtesgaden 20. Aufl. 2016.

 Glaser, Hermann: 1945. Ein Lesebuch, Frankfurt/M. 1995.

 Goeschel, Christian: Selbstmord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2011.

 Goldhagen, Daniel Jonah: 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 Ganz gewö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 Berlin 1996.

 Görtemaker, Heike B. : Ein deutsches Leben. Die Geschichte der Margret Boveri, München 2005.

Görtemaker, Heike B.: Hitlers Hofstaat. Der innere Kreis im Dritten Reich und danach, München 2019.

Gottwaldt, Alfred: Dorpmüllers Reichsbahn. Die Ära des Reichsverkehrsministers Julius Dorpmüller 1920–1945, Freiburg 2009.

Greiser, Katrin: Die Todesmärsche von Buchenwald. Räumung, Befreiung und Spuren der Erinnerung, Göttingen 2008.

Hammerstein, Gabriele: Das Kriegsende in Dachau, in: Bernd-A. Rusinek (Hrsg.) : Kriegsende 1945, Göttingen 2004, S. 27–53.

Hansen, Reimer: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 Die deutsche Kapitulation 1945, Stuttgart 1966.

Harbou, Knud: Als Deutschland seine Seele retten wollte.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in den Gründerjahren nach 1945, München 2015.

Heer, Hannes/Klaus Naumann (Hrsg.) : Vernichtungskrieg. 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1944, Hamburg 1995.

Henke, Klaus-Dietmar: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95.

Herbert, Ulrich: Fremdarbeiter. Politik und Praxis des «Ausländer-Einsatzes» in der Kriegswirtschaft des Dritten Reiches, Berlin-Bonn 1985.

Herbert, Ulrich: Best. Biographische Studien über Radikalismus, Weltanschauung und Vernunft 1903–1989, Bonn 1996.

Herbert, Ulrich: Geschichte der Ausländerpolitik in Deutschland. Saisonarbeiter, Zwangsarbeiter, Gastarbeiter, Flüchtlinge, München 2001.

Herbert, Ulrich: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2014.

Herbert, Ulrich/Axel Schildt (Hrsg.) : Kriegsende in Europa. Vom Beginn des deutschen Machtverfalls bis zur Stabilisierung der Nachkriegsordnung 1944–1948, Essen 1998.

Heusler, Andreas: Die Eskalation des Terrors. Gewalt gegen ausländische Zwangsarbeiter in der Endphas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Cord Arendes/Edgar Wolfrum/Jörg Zedler (Hrsg.) : Terror nach innen. Verbrechen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Göttingen 2006, S.172–182.

Heyl, Matthias: Anne Frank, Reinbek bei Hamburg 2002.

Hoffmann, Stefan-Ludwig: Besiegte, Besatzer, Beobachter. Das Kriegsende im Tagebuch, in: Daniel Fulda/Dagmar Herzog/Stefan-Ludwig Hoffmann/Till van Rhaden (Hrsg.) : Demokratie im Schatten der Gewalt. Geschichten des Privaten im deutschen Nachkrieg, Göttingen 2010, S.25–55.

Hofmann, Gunter: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Ein deutsches Leben, München 2010.

Hrabovec, Emilia: Vertreibung und Abschub. Deutsche in Mähren 1945–1947, Frankfurt/M. 1995.

Huber, Florian: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Der Untergang der kleinen Leute, Berlin 4. Aufl. 2015.

Jacobmeyer, Wolfgang: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Die Displaced Persons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51, Göttingen 1985.

Jacobmeyer, Wolfgang: Ortlos am Ende des Grauens: <Displaced Persons> in der Nachkriegszeit, in: Klaus J. Bade (Hrsg.) : Deutsche im Ausland–Fremde in Deutschland. Migrat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München 1992, S. 367–373.

Jähner, Harald: Wolfszeit.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1945–1955, Berlin 2019.

Janßen, Karl. Heinz: Der 8. Mai 1945–Die deutsche Kapitulation in Karlshorst, in: ders.: Und morgen die ganze Welt... Deutsche Geschichte 1871–1945, Bremen 2003, S. 485–492.

Jasch, Hans-Christian: Staatssekretär Wilhelm Stuckart und die Judenpolitik. Der Mythos von der sauberen Verwaltung, München 2012.

Joachimsthaler, Anton: Hitlers Ende. Legenden und Dokumente, München–Berlin 1995.

Kaden, Albrecht: Einheit oder Freiheit. Die Wiedergründung der SPD 1945/46, Hannover 1964.

Kaienburg, Hermann: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Neuengamme 1938–1945, Bonn 1997.

Kaltenegger, Roland: Schörner. 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 Biographie, München–Berlin 1994.

Kershaw, Alex: Der Befreier. Die Geschichte eines amerikanischen Solda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2012.

Kershaw, Ian: Der Hitler-Mythos. Führerkult und Volksmeinung, Stuttgart, 2. Aufl. 1999.

Kershaw, Ian: Das Ende. Kampf bis in den Untergang. NS-Deutschland 1944/55, München 2011.

Klotzbach, Kurt: Der Weg zur Staatspartei. Programmatik, praktische Politik und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45 bis 1965, Berlin–Bonn 1982.

Königseder, Angelika/Juliane Wetzel: Lebensmut im Wartesaal. Die jüdischen DPs (Displaced Person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94.

Kogon, Eugen: Der SS-Staat. Das System der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München 1974.

Kokoška, Stanislav: Prag im Mai 1945. Die Geschichte eines Aufstandes, Göttingen 2009.

Koll, Johannes: Arthur Seyß-Inquart und die deutsche Besatzungspolitik in den Niederlanden (1940–1945) , Wien-Köln-Weimar 2015.

Konrad, Joachim: Das Ende von Breslau,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g.4 (1956) , S.387–390.

Koop, Volker: Martin Bormann. Hitlers Vollstrecker, Wien-Köln-Weimar 2012.

Kopper, Christopher: Hjalmar Schacht. 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ächtigstem Bankier, München-Wien 2006.

Kossert, Andreas: Kalte Heimat.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Vertriebenen nach 1945, München 2008.

Kramar, Konrad: Mission Michelangelo. Wie die Bergleute von Altaussee Hitlers Raubkunst vor der Vernichtung bewahrten, St.Pölten-Salzburg-Wien 2013.

Kubin, Ernst: Sonderauftrag Linz. Die Kunstsammlung Adolf Hitler. Aufbau, Vernichtungsplan, Rettung. Ein Thriller der Kulturgeschichte, Wien 1989.

Kuby, Erich: Die Russen in Berlin 1945, Rastatt 1965.

Küpper, René: Karl Hermann Frank (1898–1946) . Politische Biographie eines sudetendeutschen Nationalsozialisten, München 2010.

Lang, Jochen von: Der Sekretär. Martin Bormann: Der Mann, der Hitler beherrschte. Unter Mitarbeit von Claus Sibyll, Stuttgart 1977.

Lang, Jochen von: Der Adjutant. Karl Wolff: Der Mann zwischen Hitler und Himmler. Unter Mitarbeit von Claus Sybill, München–Berlin 1985.

Large, David Clay: Hitlers München. Aufstieg und Fall der Hauptstadt der Bewegung, München 1998.

Lehnstaedt, Stephan: Der Kern des Holocaust. Belzec, Sobibór, Treblinka und die Aktion Reinhardt, München 2017.

Lichtenstein, Heiner: Mit der Reichsbahn in den Tod. Massentransporte in den Holocaust 1941 bis 1945, Köln 1985.

Linck, Stephan: <Festung Nord> und <Alpenfestung>. Das Ende des NS-Sicherheitsapparates, in: Gerhard Paul/Michael Mallmann (Hrsg.) : Die Gestapo im Zweiten Weltkrieg. <Heimatfront> und besetztes Europa, Darmstadt 2000, S. 569–595.

Lingen, Kerstin von: SS und Secret Service. «Verschwörung des Schweigens»: Die Akte Karl Wolff, Paderborn 2010.

Longerich, Peter: Heinrich Himmler. Biographie, München 2008.

Loth, Wilfried: Stalins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 Berlin 1994.

Loth, Wilfried: 8. Mai 1945: Der Zusammenbruch des Dritten Reiches, in: Dirk Blasius/Wilfried Loth (Hrsg.) : Tage deutscher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Göttingen 2006, S. 75–91.

Lowe, Keith: Der wilde Kontinent. Europa in den Jahren der Anarchie 1943–1950, Stuttgart 2014.

Lüdde-Neurath, Walter: Regierung Dönitz.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 Göttingen 3. Aufl. 1964.

Lüdicke, Lars: Constantin von Neurath.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Paderborn 2014.

Manoschek, Walter: «Serbien ist judenfrei». Militärische Besatzungspolitik und Judenvernichtung in Serbien 1941/42, München 1993.

Mazower, Mark: Hitlers Imperium. Europa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2009.

Merridale, Catherine: Iwans Krieg. Die Rote Armee 1939–1945, Frankfurt/M. 2006.

Merseburger, Peter: Der schwierige Deutsche. Kurt Schumach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1995.

Merseburger, Peter: Willy Brandt 1913–1992. Visionär und Realist, Stuttgart–München 2002.

Merseburger, Peter: Theodor Heuss. Der Bürger als Präsident. Biographie, München 2012.

Meyer, Kristina: Die SPD und die NS-Vergangenheit 1945-1990, Göttingen 2015.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Hrsg.) :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Bd.10: Der Zusammenbruch des Deutschen Reiches 1945. Erster Halbbd.: Die militärische Niederwerfung der Wehrmacht; Zweiter Halbbd.: Die Folg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München 2008.

Mitscherlich, Alexander und Margarete: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1967.

Müller, Melissa: Das Mädchen Anne Frank. Die Biographie, Frankfurt/M. 2012.

Müller, Ulrich: Fremde in der Nachkriegszeit. Displaced Persons-zwangsverschleppte Personen-in Stuttgart und Württemberg-Baden 1945-1951, Stuttgart 1990.

Münkler, Herfried: Machtzerfall. Die letzten Tage des Dritten Reiches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hessischen Kreisstadt Friedberg, Berlin 1985.

Naimark, Norman N. : Die Russen in Deutschland. Die 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1945 bis 1949, Berlin 1997.

Naumann, Uwe (Hrsg.) : «Ruhe gibt es nicht bis zum Schluss». Klaus Mann (1906-1949) . Bilder und Dokument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9.

Naumann, Uwe (Hrsg.) : Die Kinder der Manns. Ein Familienalbum,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Nerdinger, Winfried (Hrsg.) : Münc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Katalog des NS-Dokumentationszentrums in München, München 2015.

Neufeld, Michael J. : Wernher von Braun. Visionär des Weltraums, Ingenieur des Krieges, München 2009.

Nieden, Susanne zur: Alltag im Ausnahmezustand. Frauentagebücher im zerstörten Deutschland 1943 bis 1945, Berlin 1993.

Nützenadel, Alexander (Hrsg.) : Das Reichsarbeitsministerium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waltung-Politik-Verbrechen, Göttingen 2017.

Overmans, Rüdiger: «Ein ungeordneter Eintrag im Leidens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 Die Rheinwiesenerlager 1945, in: Hans-Erich Volkmann (Hrsg.) :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Zürich 1995, S.259-291.

Overy, Richard: Verhöre. Die NS-Elite in den Händen der Alliierten, München-Berlin 2001.

Pamperrien, Sabine: Helmut Schmidt und der Scheißkrieg. Die Biografie 1918 bis 1945, München-Zürich 2014.

Pegel, Michael: Fremdarbeiter, Displaced Persons, Heimatlose Ausländer. Konstanten eines Randgruppenschicksals nach 1945, Münster 1997.

Pelc, Ortwin in Zusammenarbeit mit Christiane Zwick (Hrsg.) : Kriegsende in Hamburg. Eine Stadt erinnert sich, Hamburg 2005.

Petersen, Andreas: Die Moskauer. Wie das Stalintrauma die DDR prägte, Frankfurt/M. 2019.

Roos, Daniel: Julius Streicher und«Der Stürmer» 1923-1945, Paderborn 2014.

Rusinek, Bernd-A. : Kriegsende 1945. Verbrechen, Katastrophen, Befreiungen in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 Göttingen 2004.

Saal, Yuliya von: Anonyma: «Eine Frau in Berlin». Geschichte eines Bestsellers, in: Vierteljahr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g. 67 (2019) , S. 343-376.

Sabrow, Martin: Erich Honecker. Das Leben davor 1912-1945, München 2016.

Sander, Helge/Barbara John (Hrsg.) : 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 München 1992.

Schenck, Ernst Günther: Patient Hitler. Eine medizinische Biographie, Düsseldorf 1989.

Schenk, Dieter: Hans Frank. Hitlers Kronjurist und Generalgouverneur, Frankfurt/M. 2006.

Schmidt, Ulf: Hitlers Arzt Karl Brandt. Medizin und Macht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2009.

Schöner, Hellmut (Hrsg.) : Die verhinderte Alpenfestung. Das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im Raum Berchtesgaden-Bad Reichenhall-Salzburg, Berchtesgaden 1996.

Scholtyssek, Joachim: Der Aufstieg der Quandts. Eine deutsche Unternehmerdynastie, München 2011.

Schwarberg, Günther: Angriffsziel Cap Arcona, Göttingen 1998.

Schwarz, Birgit: Geniewahn: Hitler und die Kunst, Wien-Köln-Weimar 2009.

Schwarz, Birgit: Auf Befehl des Führers. Hitler und der Kunstraub, Darmstadt 2014.

Schwarz, Hans-Peter: Adenauer, Bd.1: Der Aufstieg 1876-1952, München 1994.

Schwendemann, Heinrich: «Deutsche Menschen vor der Vernichtung durch den Bolschewismus zu retten». Das Programm der Regierung Dönitz und der Beginn einer Legendenbildung, in: Jörg Hillmann/John Zimmermann (Hrsg.) : Kriegsende 1945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2002, S.9-33.

Seebacher-Brandt, Brigitte: Ollenhauer. Biedermann und Patriot, Berlin 1984.

Segev, Tom: Simon Wiesenthal. Die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Sereny, Gitta: Albert Speer. Das Ringen mit der Wahrheit und das deutsche Trauma, München 1995.

Smelser, Ronald: Robert Ley. Hitlers Mann an der «Arbeitsfront». Eine Biographie, Paderborn 1989.

Smelser, Ronald/Enrico Syring/Rainer Zitelmann (Hrsg.) : Die braune Elite II.21 weitere biographische Skizzen, Darmstadt 1993.

Smith, Arthur L.: Die «vermisste Million». Zum Schicksal deutscher Kriegsgefangener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1992.

Smith, Bradley F./Elena Agarossi: «Unternehmen Sonnenaufgang», Köln 1981.

Sommer, Theo: 1945. Die Biographie eines Jahres,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Soell, Hartmut: Helmut Schmidt 1918-1969. Vernunft und Leidenschaft, München 2003.

Stargardt, Nicholas: Der Deutsche Krieg 1939-1945, Frankfurt/M. 2015.

Steinert, Marlis G.: Die 23 Tage der Regierung Dönitz, Düsseldorf-Wien 1967.

Steinert, Marlis G.: Die alliierte Entscheidung zur Verhaftung der Regierung Dönitz,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2 (1986) , S.85-99.

Sträßner, Matthias: «Erzähl mir vom Krieg! ». Wie 4 Journalistinnen 1945 ihre Berliner Tagebücher schreiben. Ruth Andreas-Friedrich, Ursula von Kardorff, Margret Boveri und Anonyma, Würzburg 2014.

Strebel, Bernhard: Celle April 1945 revisited, Bielefeld 2008.

Ströbinger, Rudolf: Poker um Prag. Die frühen Folgen von Jalta, Zürich-Osnabrück 1985.

Taylor, Frederick: Zwischen Krieg und Frieden. Die Besetzung und Entnazifizierung Deutschlands 1944-1946, Berlin 2011.

Thies Heinrich: Fesche Lola, brave Liesel. Marlene Dietrich und ihre verleugnete Schwester, Hamburg 2017.

Thum, Gregor: Die fremde Stadt. Breslau 1945, Berlin 2003.

Trevor-Roper, Hugh R.: Hitlers letzte Tage, Frankfurt/M. - Berlin 1995.

Ueberschär, Gerd R. (Hrsg.) : Hitlers militärische Elite. Bd. 2: Vom Kriegsbeginn bis zum Weltkriegsende, Darmstadt 1998.

Ueberschär, Gerd R./Rolf-Dieter Müller: 1945. Das Ende des Krieges, Darmstadt 2005.

Ullrich, Sebastian: Der Weimar-Komplex. Das Scheitern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und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frühen Bundesrepublik, Göttingen 2009.

Ullrich, Volker: Adolf Hitler, B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Bd. 2: Die Jahre des Untergangs 1939–1945, Frankfurt/M. 2013/18.

Ullrich, Volker: Victor Klemperer: Ich will Zeugnis ablegen bis zum letzten, in: Markus Roth/Sascha Feuchert (Hrsg.) : HolocaustZeugnisLiteratur. 20 Werke wieder gelesen, Göttingen 2018, S. 211–222.

Volkman, Hans-Erich (Hrsg.) :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Eine perspektivische Rückschau, München–Zürich 1995.

Wachsmann, Nikolaus: KL. Di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München 2015.

Wagner, Patrick: Displaced Persons in Hamburg. Stationen einer halbherzigen Integration 1945 bis 1948, Hamburg 1997.

Wieland, Karin: Dietrich & Riefenstahl. Der Traum von der neuen Frau, München 2011.

Wildt, Michael: Generation des Unbedingten. Das Führungskorps des Reichsicherheitshauptamtes, Hamburg 2002.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2 Bde., München 2000.

Winter, Martin C.: Gewalt und Erinnerung im ländlichen Raum. Die deutsche Bevölkerung und die Todesmärsche, Berlin 2018.

Zeidler, Werner: Kriegsende im Osten. Die Rolle der Roten Armee und die Bevölkerung Deutschlands östlich der Oder und Neiße 1944/45, München 1996.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C. H. Beck出版社总编德特勒夫·费尔肯博士（Dr. Detlef Felken）。是他有了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并始终友好地关注着手稿的整个诞生过程。我还要感谢仔细审校本书的亚历山大·高勒先生（Alexander Goller），以及负责协调整个过程直到本书付梓的雅娜·罗施女士（Janna Rösch）。

我还要感谢米雅姆·齐默女士（Mirjam Zimmer）、克斯汀·威廉斯博士（Dr. Kerstin Wilhelms）和他们来自《时代》文献部门的同事，以及汉堡当代史研究中心的桃乐茜·玛特卡女士（Dorothee Mateika）和克莉丝汀·里默尔女士（Christine Riemer）。他们热心地帮助我实现写成这本书的愿望。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古德伦（Gudrun）和我们的儿子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没有和他们之间的富有启发性的谈话，没有他们的批评性建议，这本书也不会写出来。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于2004年去世的母亲。她勇敢地带着五个儿子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月和战后的最初几年。当1942年至1943年柏林遭遇频繁的轰炸时，她带着她的孩子们搬到了吕讷堡荒原的一个村庄。当时我不到两岁，不记得战争结束的情形。但是有一次经历让我难以忘怀：在1947年或1948年的某一天，一支英军巡逻队开车经过村

庄，士兵们扔了些糖果给我们这些在路边的小孩。它们的味道太妙了！

福尔克尔·乌尔里希

汉堡，2019年11月

人名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

Ackermann, Anton 54

Adenauer, Auguste (Gussie) 129

Adenauer, Konrad 128-131, 136, 145, 235

Ahlfen, Hans von 185, 188

Ahrens, Georg 103

Airey, Terence 81

Alexander, Harold 81 f.

Alvensleben, Wichard von 147

Andrae, Peter 102, 104

Andreas-Friedrich, Ruth 62, 113, 133, 135, 249, 252

Andropow, Juri 79

Antonow, Alexei 216

Arendt, Hannah 251

Assmus, Erika (Ps. Carola Stern) 64

Axmann, Artur 19, 34, 44, 47 f.

Backe, Herbert 150 f., 248

Bacque, James 142

Barraclough, John 131

Bassewitz-Behr, Georg Henning Graf von 107

Baur, Hans 17, 45, 47 f., 77 f.

Beckmann, Max 214

Beethoven, Ludwig van 41, 234

Below, Lidija 70

Below, Nikolai 70

Beneš, Edvard 159

Berija, Lawrenti 78

Bernadotte Graf von Wisborg, Folke 29 f.

Bersarin, Nikolai 70, 74

Bertram, Heinrich 107

Best, Sigismund Payne 145

Best, Werner 95, 97, 121

Beuys, Barbara 210

Bisky, Jens 110

Blaschke, Hugo 77

Blaskowitz, Johannes 215

Blum, Léon 145

Böhme, Franz 95, 97, 228 f.

Bohnenkamp, Hans 139

Bonhoeffer, Dietrich 146

Bonin, Bogislaw von 147

Bormann, Martin 16, 18 f., 28–30, 32–34, 36 f., 47, 49,
78, 101, 123, 125, 128, 176, 226

Bourke-White, Margaret 237

Boveri, Margret 68, 115, 133, 135

Boyer, Charles 205

Bradley, Omar Nelson 203

Brandt, Willy 58–60, 144, 230

Braun, Eva 16–19, 75–79, 124, 126

Braun, Magnus von (Bruder) 88

Braun, Magnus von (Vater) 89

Braun, Wernher von 88–91, 248

Brecht, Bertolt 108, 115, 232

Breschnew, Leonid 79

Brudermüller, Hermann 119

Brüning, Heinrich 59, 145

Bunjatschenko, Sergei Kusmitsch 157 f.

Burchard, Hermann 102

Burchard–Motz, Wilhelm 104

Burgdorf, Wilhelm 18 f., 34, 47

Busch, Ernst 85, 101, 103

Busse, Theodor 84, 122

Butcher, Harry C. 218

Cahan, Aaron S. 176

Canaris, Wilhelm 146

Caracciola-Delbrück, Günther 24

Ceram, C.W. (d. i. Kurt W. Marek) 109

Chaldej, Jewgeni 21 f.

Christian, Gerda 17, 48

Churchill, Peter 145

Churchill, Winston 79, 82, 86, 145, 216, 230 f., 241

Cliever, Karl 152

Cooper, Gary 205

Dante Alighieri 28

Darré, Walter 150 f.

Demetz, Peter 159

Dempsey, Miles C. 116

Devers, Jacob L. 121

Dietrich, Josephine 204 *siehe* Losch, Josephine von

Dietrich, Elisabeth (Liesel) *siehe* Will, Elisabeth

Dietrich, Louis Erich Otto 204

Dietrich, Marlene 123, 202-209

Dijk, Jannes Johannes Cornelis van 145

Dimitroff, Georgi 55, 57, 73

Döblin, Alfred 251

Doderer, Heimito von 230

Dönitz, Karl 12 f., 28–33, 35–43, 45, 83–87, 94, 96–99,
101–103, 108, 119–121, 149 f., 152, 156, 172–175, 199 f.,
221–223, 228, 238–243, 245–248

Donovan, William 80

Doernberg, Stefan 67

Dornberger, Walter 88–90

Dorpmüller, Julius Heinrich 151, 248

Dörr, Alois Franz 177–179

Dufving, Theodor von 33–36, 66

Dulles, Allen 80–82

Echtmann, Fritz 77

Edelsheim, Maximilian Reichsfreiherr von 122

Eden, Anthony 241

Eichmann, Adolf 170, 212, 227

Eicken, Carl von 77

Eigruber, August 226 f.

Eisenhower, Dwight D. 25, 88, 96 f., 120, 156, 160, 163, 167, 171–174, 199 f., 202, 216, 223, 241 f.

Elser, Georg 146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110

Epp, Franz Ritter von 24, 135, 143

Erbrich, Elisabeth 184

Erpenbeck, Fritz 56 f.

Erzberger, Matthias 235

Eyck, Jan van 226

Färberböck, Max 110

Fechner, Max 196

Feuersenger, Marianne 22

Fiedler, Karl 25

Fierlinger, Zdeněk 160

Findahl, Theo 58, 134, 163, 252

Flügel, Hans 197

Foertsch, Hermann 121

Foord, Edward J. 238, 242

Frahm, Herbert 58 *siehe* Brandt, Willy

Frank, Anne 170, 202, 210–214

Frank, Bernhard 123

Frank, Brigitte 144

Frank, Edith 210, 213 f.

Frank, Hans 96, 142–144

Frank, Karl Hermann 94, 153

Frank, Margot 202, 210–212, 214

Frank, Otto 210, 212–214

Frick, Wilhelm 150

Friedeburg, Hans-Georg von 87, 94, 104, 116 f., 119 f.,
171–173, 199, 201, 216–218, 220, 242

Friedel, Jochen 116, 118

Friedrich der Große 17, 43

Funk, Walther 152

Fünten, Ferdinand aus der 212

Gabin, Jean 123

Galadshew, Generalleutnant 58, 71

Ganzenmüller, Albert 151

Garibaldi, Sante 145

Geiß, Josef 125

Gellhorn, Martha 249

Gerngroß, Rupprecht 24

Geschonneck, Erwin 108 f.

Gies, Miep 213 f.

Giesler, Hermann 226

Giesler, Paul 23–25, 30

Giordano, Egon 106

Giordano, Lilly 105

Giordano, Ralph 106

Gleiss, Horst 183

Gluzdowskij, Wladimir A. 183, 185

Gniffke, Erich 196

Goebbels, Joseph 18 f., 29, 33-37, 40, 43-47, 50, 75-77, 79, 86, 93, 135, 176, 184-187, 191, 205, 225

Goebbels, Magda 18, 44-47, 75-77, 79

Goguel, Rudi 107

Goldhagen, Daniel 178

Goerdeler, Carl Friedrich 145

Göring, Hermann 28-30, 125 f., 128, 134, 138, 144, 150, 217, 243 f., 246 f.

Graff, Anton 17

Greim, Robert Ritter von 217

Grossman, Wassili 69

Grotewohl, Otto 196

Grothmann, Werner 176

Gründgens, Gustaf 134

Günsche, Otto 16-19, 46-48, 78

Gurlitt, Hildebrand 225

Gyptner, Richard 56

Haffner, Sebastian 43

Halder, Franz 145

Hanke, Karl 30, 183–188

Harrison, Earl G. 166

Hartung, Hugo 190

Hase, Karl-Günther 235

Hassell, Ulrich von 143

Hausenstein, Wilhelm 237, 249

Heine, Fritz 195

Henneicke, Willem Christiaan 213

Hentschel, Johannes 74

Herbert, Ulrich 142

Hermes, Andreas 73

Hermlin, Stephan 236

Heß, Rudolf 123

Heusermann, Käthe 77

Heuss, Theodor 235

Heuss-Knapp, Elly 235

Hewel, Walther 18, 34, 47, 49

Heydrich, Reinhard 94 f., 150

Higgins, Marguerite 162

Hillers, Marta (Ps. Anonyma) 110–112, 114, 133, 135, 249

Himmler, Heinrich 29 f., 32, 38, 79–81, 89, 95 f., 98, 101, 107, 129, 135, 145, 150, 174–177, 187, 250

Hinkel, Hans 205

Hitler, Adolf 11–13, 15–26, 28–47, 49 f., 53–55, 57, 59–66, 71, 73–81, 83, 88–90, 92 f., 95 f., 98, 100 f., 104, 106, 114, 123–129, 132, 135–138, 143, 145–147, 149–153, 169, 171, 174, 176, 178, 182 f., 185–188, 192, 204, 206 f., 210, 215, 217, 220 f., 224–227, 230 f., 234–236, 239 f., 244–246, 249–251

Höcker, Karla 62, 134 f.

Hofer, Franz 83

Högler, Otto 227

Hollaender, Friedrich 205

Honecker, Erich 217

Hopkins, Harry 78

Hoppe, Marianne 134

Hornig, Ernst 188

Horthy Jr., Miklós 145

Horwell, Arnold 202 f.

Hoss, Nina 111

Höß, Rudolf 175

Huber, Florian 51 f.

Hugenberg, Alfred 151

Hummel, Helmut von 226 f.

Jacob, Karl Theodor 122

Jannings, Emil 205

Jodl, Alfred 32, 39, 96, 101, 119, 172–174, 199–202,
235, 239, 242 f., 246–248

Junge, Traudl 17 f., 34, 43, 45, 47 f.

Jünger, Ernst 62, 233

Kaehler, Siegfried A. 235

Kállay, Miklós 145

Kaltenbrunner, Ernst 81, 227

Kantorowicz, Alfred 236

Kardorff, Ursula von 42, 61, 68, 93, 235

Kästner, Erich 11, 41, 245

Kaufmann, Karl 98, 100–104, 106 f., 190

Keitel, Wilhelm 15, 32, 39, 96, 101, 103, 117, 119, 172, 174 f., 216–220, 235, 239, 246–248

Kellner, Friedrich 64 f.

Kempf, Annemarie 152

Kempka, Erich 17, 19, 47 f.

Kempowski, Walter 111

Kennan, George F. 232

Kesselring, Albert 31, 80 f., 83 f., 121, 246

Kinzel, Eberhard 116, 171

Kirkpatrick, Ivone 12

Klein, Fritz 135

Klemperer, Victor 91–93

Klimenko, Iwan 75 f.

Klüger, Ruth 167

Koch, Hans–Reinhard 229

Kogon, Eugen 250

König, Wolfhilde von 25

Königseder, Angelika 167

Kosiek, Albert J. 168

Kramer, Josef 202

Krebs, Hans 16, 18 f., 33–37, 47, 66, 75, 77

Kritzinger, Friedrich Wilhelm 149

Krockow, Christian Graf von 61

Krogmann, Carl Vincent 100, 104

Kronika, Jacob 132 f.

Krüger, Else 47

Kuby, Erich 113

Kunz, Helmut 44 f.

Kupfer-Koberwitz, Edgar 26–28

Kusnezow, Fjodor 77

Lammers, Hans Heinrich 149, 246

Lange, Wilhelm 76

Langendorf, Ernst 25

Langhans, Carl Gotthard 184

Lassalle, Ferdinand 191

Lattre de Tassigny, Jean de 216, 218, 220

Laun, Otto von 102

Laun, Rudolf von 102

Leclerc, Jacques-Philippe 122

Lemnitzer, Lyman 81

Leonardo da Vinci 144

Leonhard, Wolfgang 54, 57, 71

Ley, Robert 244-247

Lindemann, Georg 95, 97, 228

Lindgren, Astrid 60

Lindgren, Karin 60

Lindsay, Thomas Martin 102

Linge, Heinz 17-19, 46-48, 78

Link, Gerhard 102, 104

Löhr, Alexander 85

Losch, Eduard von 204

Losch, Josephine von 204, 208

Loewe, Lothar 64, 114

Lüdde-Neurath, Walter 32, 37, 85, 87

Ludendorff, Erich 143

Lüth, Wolfgang 87

Lyne, Lewis O. 101 f., 104

Macher, Heinz 176

Mackensen, Hans-Georg von 38

Maguira, Edith 152

Mahle, Hans 56

Maier, Reinhold 12

Mann, Erika 247, 250

Mann, Heinrich 204

Mann, Katia 247

Mann, Klaus 127, 237 f., 244, 247, 250

Mann, Thomas 43, 127, 234, 247

Manstein, Erich von 39

Manziarly, Constanze 17 f., 47 f.

Marek, Kurt W. (Ps. C. W. Ceram) 109–111

Maron, Karl 56, 74

Mengershausen, Harry 78

Michel, Hermann 224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226

Mierendorff, Marta 69

Miller, Lee 126 f.

Minin, Michail Petrowitsch 20

Misch, Rochus 44–46, 49, 78

Mitscherlich, Alexander 251

Mitscherlich, Margarete 251

Mohnke, Wilhelm 16, 47

Montgomery, Bernard Law 86 f. 94, 101, 103, 116–120, 171,

202

Morgan, William 82 f.

Murphy, Robert 241

Mussert, Anton Adriaan 210

Mussolini, Benito 16, 60, 63, 65

Natzmer, Oldwig von 94, 96

Naumann, Werner 44, 46-48

Neurath, Konstantin Freiherr von 38, 94

Nicolson, Harold 231

Niehoff, Hermann 183, 185-188

Niemöller, Martin 145

Ohlendorf, Otto 152, 248

Okraß, Hermann 63

Ollenhauer, Erich 195

Oppenhoff, Franz 129

Orlopp, Josef 73

Orwell, George 237

Oster, Hans 146

Ott, Hermann 197

Oxenius, Wilhelm 199, 201

Panassow, Alexej 76

Papagos, Alexandros 145

Papen, Franz von 38, 89, 151, 192, 247

Parri, Ferruccio 80

Patterson, John K. 128–130

Patton, George S. 156, 207

Pearson, Ralph E. 224, 228

Peikert, Paul 184, 187

Pels, Auguste van 212, 214

Pels, Hermann van 214

Pels, Peter van 214

Petacci, Claretta 16

Pfeffer, Fritz 212, 214

Picard, Ferdinand 232

Pieck, Arthur 74

Pieck, Wilhelm 54–57, 72, 74

Pöchmüller, Emmerich 226

Poppinga, Anneliese 128

Poser, Manfred von 152

Posey, Robert K. 228

Posse, Hans 224 f.

Potaschew, Alexei 246

Pückler-Burghauss, Carl Friedrich Graf von 155

Pünder, Hermann 145 f.

Quandt, Harald 18, 46

Quandt, Herbert 46

Quisling, Vidkun 95, 230

Rantzau, Heino von 138

Rattenhuber, Johann 19, 47 f.

Rauschdaschl, Alois 227

Rauter, Hanns Albin 211, 215

Ray, Man 126

Refior, Hans 33

Reger, Erik 134

Reimer, Gottfried 226

Rembrandt van Rijn 144

Rendulic, Lothar 85

Renger, Annemarie 193 f.

Ribbentrop, Ingeborg von 245

Ribbentrop, Joachim von 38, 150, 245

Richthofen, Manfred Freiherr von 144

Riecke, Hans-Joachim 150

Rooks, Lowell W. 238 f., 242

Roosevelt, Franklin D. 82, 172, 231

Röttiger, Hans 83, 147

Rshewskaja, Jelena 67, 75 f.

Rubens, Peter Paul 144

Saal, Yuliya von 111

Sandrock, Karl 123

Sauckel, Fritz 246

Sauerbruch, Ferdinand 73

Saur, Karl-Otto 36

Schacht, Hjalmar 145

Schädle, Franz 47

Schäfer, Albert 102

Schanuel, Charlotte 217

Scharoun, Hans 74

Schaub, Julius 125

Schell, Maximilian 209

Schellenberg, Walter 98

Schenck, Ernst Günther 15

Scherman, David E. 126 f.

Schlemmer, Eva 92

Schmidt, Helmut 136-139

Schmückle, Gerd 61

Schneider, Karl 76

Schneikert, Fred 88

Schörner, Ferdinand 29, 37, 85, 156, 158

Schoettle, Erwin 195

Schroeder, Christa 125 f.

Schröder, Gerhard 166

Schukow, Georgi 35, 56, 58, 78, 113, 217–220

Schultze-Gaevernitz, Gero von 80, 83

Schulz, Friedrich 83, 85

Schumacher, Kurt 190–196

Schuschnigg, Kurt 144 f.

Schwägermann, Günther 45–48, 75

Schwarz, Franz Xaver 244

Schweinitz, Viktor von 82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38, 84–87, 96–98, 119, 149–151, 172 f., 175, 200 f., 221, 239, 241 f., 246, 248

Segev, Tom 169 f.

Seiberl, Herbert 226

Seldte, Franz 151, 248

Semtschenko, Oberst 66

Serow, Generaloberst 71, 73

Severing, Carl 194, 196

Seyß-Inquart, Arthur 37 f., 95, 97 f., 209–211, 214 f.

Shirer, William L. 42 f., 65

Sieber, Karl 226 f.

Sieber, Maria 204

Sieber, Rudolf 204, 208

Silberbauer, Karl Josef 170, 213

Simonow, Konstantin 217, 220

Skibiński, Franciszek 197

Smith, Walter Bedell 97, 172 f., 199, 216

Sokolowski, Wassili 35, 217

Spaatz, Carl 216, 218, 220

Sparks, Felix 27 f.

Speer, Albert 36, 38, 42, 96, 98 f., 124, 149, 152, 184, 187, 221, 239, 242 f., 246, 248

Speer, Margarete 124

Spielhagen, Wolfgang 185

Spitta, Theodor 133

Spurling, John M.K. 104 f.

Stalin, Josef 33, 35, 54 f., 57, 72, 77 f., 82, 113,
135, 157, 161, 171, 185, 216, 219, 232

Stangl, Franz 170

Stauffenberg, Claus Schenk Graf von 63, 145

Steenbracht von Moyland, Gustav Adolf 149, 246

Stein, Walter 142

Stern, Fritz 137

Sternberg, Josef von 204 f.

Stewart, Charles 88

Stiller, Edgar 146 f.

Stimson, Henry Lewis 79

Stredele, Bernhard 122

Streicher, Julius 244-247

Strong, Kenneth W.D. 172

Stuckart, Wilhelm 150, 246, 248

Stumpff, Hans-Jürgen 217 f., 220

Stumpfeffer, Ludwig 45, 47, 49

Susloparow, Iwan 172, 199, 216

Tedder, Arthur 216, 218, 220

Terboven, Josef 95, 97, 228 f.

Tewksbury, John 237 f.

Thiele, Gerhard 182

Thyssen, Fritz 145

Toussaint, Rudolf 157

Tracy, Spencer 209

Trevor Roper, Hugh 46

Truman, Harry S. 82, 86, 166 f., 231

Truskow, Generalmajor 239, 242

Trussow, Generalmajor 77

Tschuikow, Wassilij 33-37, 65-67, 75

Ulbricht, Walter 53 f., 56-58, 70-74, 217

Ulreich, Carry 215

Unselde, Siegfried 31

Usmiani, Antonio 80

Vansittart, Lord Robert Gilbert 60

Vermeer, Jan 226

Vermehren, Erich 146

Vermehren, Isa 146 f.

Vietinghoff-Scheel, Heinrich von 81-84

Voss, Hans-Erich 34, 47 f.

Voss, Hermann 225

Wadis, Alexander 75 f.

Wagner, Gerhard 116, 118

Wagner, Richard 39

Waibel, Max 80, 82

Walb, Lore 63, 236

Wallot, Paul 20

Wegener, Paul 84, 96, 172

Weichmann, Elsbeth 231

Weichmann, Herbert 231

Weidling, Helmuth 16, 34, 66 f., 70, 75, 77

Weizsäcker, Ernst von 150

Weizsäcker, Richard von 235

Wenck, Walter 15, 84, 101, 122

Wenner, Eugen 82

Werner, Arthur 74

Wessel, Horst 41, 62

Wetzel, Johann 83

Wetzel, Juliane 167

Wickert, Erwin 63

Wiesenthal, Cyla 170

Wiesenthal, Simon 168–170

Wilder, Billy 208

Wilhelmina, Königin 210, 214 f.

Will, Elisabeth (Liesel) 202–204, 206, 208 f.

Will, Georg 203, 205, 208

Will, Hans-Georg 205

Winzer, Otto 56, 74

Wlassow, Andrej 157 f., 164

Wolf, Markus 232

Wolff, Emil 101

Wolff, Karl 80–83, 151

Wolff-Mönckeberg, Mathilde 101, 104, 236

Wolz, Alwin 100, 102, 104–106

Young, Owen D. 1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著；何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4

ISBN 978-7-5201-9572-0

I. ①第… II. ①福…②何…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史料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07272号

第三帝国的最后八天

著者/〔德〕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

译者/何昕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责任印制/王京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702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14 字数: 237千字

版次/2022年4月第1版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95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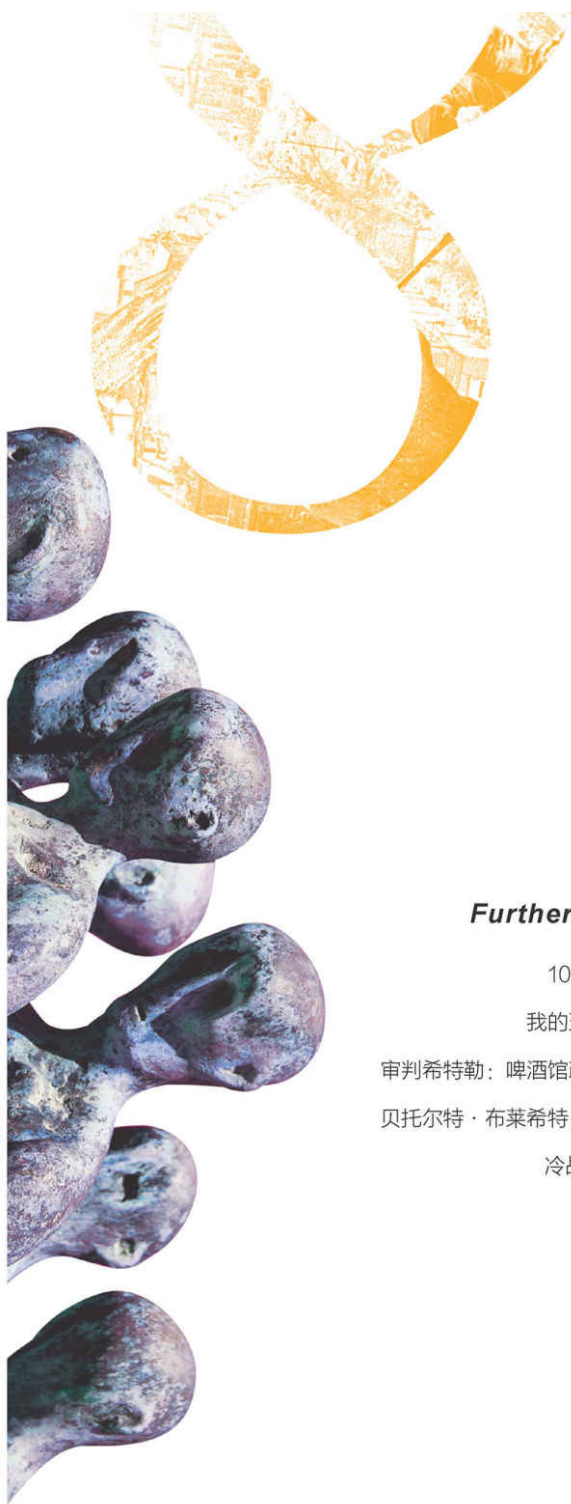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21-1610号

审图号/GS (2022) 1550号

定价/78.00元

读者服务电话: 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100 个物品中的德国历史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与纳粹德国的崛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冷战的终结：1985-1991



010-59367109
Telephone



010-59367109



但和平尚未来临 战争即将结束

这是一本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实作品，却极为出色地渲染了当时的社会气氛。

——《时代》周报推荐语
(2020年6月非虚构作品排行榜第1名)

他那特写镜头般精确的观察赋予笔尖巨大的生命力，确凿的信息来源和对萦绕不散的末世情绪的充分捕捉更强化了这一点。

——《南德意志报》，迪特马·苏斯 (Dietmar Süß)

考虑到主题的沉重性，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奇怪，但乌尔里希确实写出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它在那段日子过去75年后无情地告诉晚生的人们，政治妄想和道德沦丧、暴力和战争会把社会带往何处。

——《法兰克福汇报》，威廉·冯·施特恩布格
(Wilhelm von Sternburg)

这本书犹如一卷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连环画，接连展现了二战结束时的真实场景，历史学家乌尔里希在其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事实（……）它所揭示的一切与我们当下忧心的事物息息相关。

——德国电视一台“新鲜出版”栏目，丹尼斯·舍克 (Denis Scheck)

第三帝国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了。希特勒已死，但是战争还未结束。一切看起来陷入停滞，却又处于令人屏息的暗动中。

元首的继任者邓尼茨逃到弗伦斯堡之后，盟军继续大步前进。柏林放弃挣扎，C集团军群在意大利投降。火箭专家韦恩赫尔·冯·布劳恩被逮捕，好莱坞女星玛琳·迪特里希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寻找自己的姐姐。自杀像瘟疫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强奸事件大规模发生。最后的死亡行军、疯狂的驱逐、避人耳目的纳粹高官、被解放的集中营……正如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945年5月7日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往昔不再”和“未来未至”之间的时间夹缝里。著名记者、传记作家福尔克尔·乌尔里希以天为单位描写了这个没有尽头的“零点时刻”，用无数证人证言的历史马赛克拼接出一幅全景图，将我们带到一个充满戏剧性和希望，也充满暴力和恐惧的世界。

索·恩
THORN BIRD



ISBN 978-7-5201-9572-0



9 787520 195720 >

地 平 线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

定价: 78.00元

R
索·恩
STUDEN BIRL

贝托尔 特· 布莱希 特

BERTOLT BRECHT

德意志帝国
[1898-1918]
魏玛共和国
[1918-1933]
法西斯德国
[1933-1945/47]
德国的后果
[1945/47-1956]

Bertolt Brecht
-
Lebenskunst
in
finsternen
Zeiten

Biografie

〔德〕雅恩·克诺普夫 著

黄河清

译

昏暗时代的
生活艺术

君特·奥斯特
Günter Ott
《奥格斯堡新闻报》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2年9月15日
这部传记……真应成为典范的特质

by
Jan Knop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雅恩·克诺普夫 (Jan Knopf) / 作者简介

生于 1944 年，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文学教授，布莱希特研究所主任。除关于约翰·彼得·黑贝尔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著作外，克诺普夫还是《布莱希特手册》的主编与《布莱希特全集》(GBA) 的编者。

黄河清 / 译者简介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德语系。译有《德国神话与传说》《从现象学到语言哲学》和《歌德全集》美学卷《艺术与古代文化》。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R
索·恩
STILLEN BIRD

贝托尔 特· 布莱希 特

BERTOLT BRECHT

德意志帝国
[1898-1918]
魏玛共和国
[1918-1933]
法西斯德国
[1933-1945/47]
德国的后果
[1945/47-1956]

Bertolt Brecht
-
Lebenskunst
in
finsternen
Zeiten

Biografie

〔德〕雅恩·克诺普夫 著

黄河清

译

昏暗时代的
生活艺术

君特·奥登特
Günter Ott
《奥格斯堡汇报》
Augsburg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2年9月25日
这部传记……具有成为典范的特质

by
Jan Knopf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前言](#)
- [德意志帝国（1898~1918）](#)
-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 [法西斯德国（1933~1945/47）](#)
- [德国的后果（1945/47~1956）](#)
- [后记](#)
- [注释](#)
- [作品索引](#)
- [人名索引](#)
- [概要索引](#)

前言

恒久的我是部神话

原创者：无关紧要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48部戏剧（莎士比亚37部），2300余篇诗歌（歌德3000余篇，但歌德更为长寿），约200部短篇小说（托马斯·曼32部，当然其中多数篇幅都比布莱希特的作品要长）以及3部长篇小说。但是作为艺术家，布莱希特却不仅仅属于“诗人”这个范畴。他还完成了众多文艺理论性、批判性、政治性和哲学性著作，数量达数卷之多，此外他还担任了4部电影的编剧和副导演，其中的两部——《库勒·旺贝》（*Kuhle Wampe*）^[1]和《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都是永恒的经典，并为多部电影构思了脚本。

自始至终，布莱希特的目的便是超越艺术的界限，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发掘艺术新的多样性。他的歌剧冲破了传统体裁的限制，在他的戏剧中也融合了叙事性因素和音乐成分。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也把新的媒介技术引入艺术之中。作为艺术家，他是博学多能的，尝试了先锋美学所有新的可能性，并坚持了一生。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战后他已为数不多的人生岁月中，布莱希特都是德国最伟大、最成功的戏剧导演之一，布莱希特和他的终生挚友——作曲家、舞

台设计卡斯帕尔·内尔（Caspar Neher）—共同将新的戏剧风格向全世界传播。

作为拥有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家，布莱希特终生对政治保有敏感，即便在今天这也是极具挑战的。布莱希特认为自己是不同时代主题的中间人，他一生经历了5种德国不同的社会体制（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独裁、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了躲避自己的同胞而流亡了15年（侥幸逃过了流亡过程中的迫害）。为了自己的作品，他必须同当时的政治昏暗进行艰难的斗争，并且还要适应那些与其美学相矛盾的“机构”—布莱希特这样称呼所有公开自己艺术的机会（戏剧、电影、广播、报纸等），他为此煞费苦心。

那些被使用者享受—或者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被“吞食”—的艺术作品，在使用中才找到了自己真实的位置，并使它们原本的生产者遭到遗忘。早在1929年，布莱希特就提到了“作者的消失”，即作者具有被引用的特点：引文是“最重要的风格特点。流传性广。‘引经据典之处’便意味着艺术。在社会意义上这也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原创者无关紧要，他消失了，并通过这种形式使自身得以贯彻。谁达到了这一点，即被改写，在个体性上被疏离，谁就与世长存”。布莱希特确切想表达的，在（必要的）语言困惑中得到了展示：虽然还在谈论“自我”，但“自我”正悖谬地被排挤。这里涉及的并非“作者之死”，而是将作者置于多样性的传递关系中，尽可能地详述了作者能为“自我”达到的，或者已经达到的地位和意义。布莱希特早在1920年代就将曾经的市民阶层^[2]个体，这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改称为“受到不同力量冲击的多样体”。

布莱希特的生平和作品构建了一种20世纪上半叶市民批判性艺术家生存状况的范式，在那个时期，德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最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随后侵袭了整个世界以及这

个世界的本性。布莱希特犹如这个时代细心的史书编纂者，同时，由于他以诗歌、歌曲、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和戏剧的方式记录了这部年代史，所以它能一如既往地给世人提供欢愉：布莱希特的年代史经受了那个“昏暗的年代”的考验，并且仍将经受未来时代——但愿它不会再度昏暗——的考验。

[1] 又名《世界在谁手中？》或《旺贝坑》。（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不再说明。）

[2] “bürger”在德语中按词根理解，最初指堡民，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引申为市民，再是有产者、资产阶级，以及现代国家里的国民和公民。本书中的“市民”大抵指18~19世纪以降的黑格尔政治理论中处于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市民阶层。

德意志帝国（1898～1918）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来自黑色的森林

神话：出身

《家庭修身集》（*Hauspostille*）中有首诗名为《可怜的B.B.》（*Vom armen B.B.*），它最初记载于布莱希特笔记本中的日期为1922年4月26日，当然与日后《家庭修身集》中的版本有所区别。布莱希特很早便开始在诗歌创作中风格化自己的生平，《可怜的B.B.》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出生于奥格斯堡（Augsburg）埂上街（auf dem Rain）7号，全名欧根·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Eugen Berthold Friedrich Brecht），大家都叫他欧根。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Berthold Friedrich Brecht, 1869～1939）和娘家姓布雷岑的威廉明妮·弗里德里克·索菲（Wilhelmine Friederike Sophie geborene Brezing, 1871～1920）1897年5月15日结为夫妇，结婚前一天他们就搬入了日后布莱希特出生的那所房子。布莱希特后来描写的母亲带自己来到这座沥青的城市，其实与事实相左，而且奥格斯堡当时也并非后文诗节中所幻想的那幅景象。但“黑色的森林”是成功的，人们立即将其等同于“黑森林”，这也有相关的地理因素。布莱希特的父亲祖籍阿赫恩（Achern），父母是印刷工人施特凡·贝特霍尔德·布莱希特（Stephan Berthold Brecht）及娘家姓乌尔茨勒的卡洛琳娜（Karoline geborene Wurzler）。如果不斤斤计较，可以勉强说阿赫

恩位于黑森林旁（几乎不在黑森林范围内），因而不至于有诗中所谓的“寒冷”。

阿赫恩也借《有失体面的老妇人》（*Die unwürdige Greisin*）成为永恒的图像，故事是孙儿在缅怀他的祖母。这位老妇人在丈夫辞世后，不愿再做主妇，如奴仆般被剥削，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对于那些习惯了自己奶奶做些粗活的孩子，当然会认为这样是“有失体面”的。这个故事与事实更加不相符。卡洛琳娜·乌尔茨勒逝于1919年12月19日，同年布莱希特还为她的80岁大寿创作了即兴诗，诗中所描写的市场旁的房屋至今仍是当地保留下来的最老建筑。卡洛琳娜·乌尔茨勒比丈夫多活了九年，在这段岁月里，她仍同此前一样屈从于夫权。叔父卡尔·布莱希特（Karl Brecht）在卡洛琳娜死后继承了她的田产，他根本不理解布莱希特的杜撰：布莱希特“为何要虚构《有失体面的老妇人》这样一个故事，故事中的祖母74岁便已过世，所有叙述从头至尾都是捏造的”，这对卡尔来说极为“费解”。这也意味着“黑色的森林”最终也同“黑森林”无关。在布莱希特的诗中，他指的茂密且由此而阴冷的森林，所以也可以存在于别处。

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来自黑色的森林。

母亲把我带至城市，

当我仍躺在母腹中。

森林的寒冷

至死都存于我体内。

例如在阿拉斯加。四个男人—吉米·马赫尼、杰克、比尔（译名“储蓄罐比尔”）和乔（译名“阿拉斯加之狼”）—在严酷的条件下

砍伐森林，为的是在天堂之城马哈哥尼（Mahagonny）寻找天降鸿福的机会，却事与愿违。

比尔！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光？
七个冬天，
极度严寒，
我们一同
砍伐树木，
把钱给我吧。

吉米徒劳地乞求朋友将他从马哈哥尼城的法庭赎回，这里会判处那些无法支付债务的人死刑。同虚构人物“可怜的B.B.”不同，森林的寒冷没有把他们从阿拉斯加带入沥青的城市。“茨威利斯”侵袭了这些人，这是某种病症，使人目无亲友，只知狂放不羁和毫无节制地尽情享受，而且丧失了对曾经别样生活的回忆。

“茨威利斯（Civilis）”（也作Zivilis）是布莱希特的新造词，它是由“文明（Zivilisation）”、“梅毒（Syphilis）”和“城市（City）”（美语中指大城市）合成的，意指大都市人无法逃避的一种疾病。虽然马哈哥尼最初并非被设想为不宜居住的巨型城邦，但是最终也遭遇了“茨威利斯”的侵袭。因为飓风行进的路径避开了这座城市，之后，“你可以（du darfst es）”准则统治着这里，它意味着：一切都只能用金钱来换取。“物质文明”在德语中本来就是“精神文化”的对立面，它标志了新一代人的出现，他们不识传统，互相传染性病，沉溺在布莱希特经常悲叹的“爱的衰亡”中。“爱的衰亡”源于大城市中人类的异化，城市阻碍了人道的交流和人

性的共存。竞争主导了生活，使人再无怜悯之心，就像《马哈哥尼城的兴衰》（*Aufstieg a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简称《马哈哥尼》）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已经充斥了人间。在母亲携子来到沥青的城市之前，森林的寒冷已根植于儿子心中。

索菲·布雷岑生于拜德瓦德森（Bad Waldsee）附近的罗斯堡（Roßberg），通过姐姐阿玛利亚（Amalia）一家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在布雷岑一家迁居至弗林根（Pfullingen）之后，阿玛利亚嫁给了这里的赫尔曼·莱特尔（Hermann Reitter）。在早年的多次拜访中索菲就认识了赫尔曼，并可能暗恋过他。赫尔曼就职于奥格斯堡的汉德造纸厂（Papierfabrik Haindl），布莱希特的父亲也在这里工作，两人交好，弗里德里希·布莱希特从而得以邂逅了这家人的妻妹，最终这位天主教徒迎娶了新教徒索菲，并和她孕育了“艾勤（Aigihn）”

（欧根的奥格斯堡方言），欧根按照新教教义受洗并被抚养长大。索菲早年就患有癌症，因而即便尚不至抑郁，也一生怀有一份伤感，布莱希特或许也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份情愫，少年的布莱希特曾在诗中写道：“家母年近五十/其间三十载她都徘徊在死亡边缘。”

2010年发现的一本布莱希特日记揭示了索菲1888~1910年间的状况，家庭琐事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索菲·布雷岑记录的大多是一些通俗或者陈腐的文章和小诗。这些也只是粗拙地尝试创作，她毫无抗争地屈从了自己英年罹病的命运。母亲负责儿子的教育一直至1910年，疾病还没有为此增添太大障碍—所以，布莱希特坚持创作的年少信念或许从母亲那里得到过激励。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是为了面对母亲的抑郁而产生的替代性行为，是从她压迫状态的逃离，也许只是臆想，至少这一时期没有布莱希特的自我陈述能佐证这个观点。父亲也并未激发布莱希特的创作：他在汉德纸业事业有成，从伙计升迁至商务部主管，还用很多同自己身份相关的社

会责任来丰富生活（例如他是业余男声合唱团的成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名情妇，活得似乎裘马轻狂。

让我们再次回到森林。在马哈哥尼，寒冷象征着艰苦的工作，在阿拉斯加人迹罕至的自然中也要采伐森林，这说明伐木工为“茨威利斯”在全世界的传播卖力。寒冷象征着自然的本源，四个男人用共同的汗水缔结了人性、和善与友谊，寒冷是这一关系的基石。自然完全被毁灭，新的人类形象随之出现，这很早便是布莱希特作品的中心主题，他日后把这类人称为“橡胶人”。在1916年《唐纳德要塞铁道部队之歌》（*Lied von der Eisenbahntruppe von Fort Donald*）中，伊利湖^[1]铁路的筑路工人沿着水流登上高处，“直至森林中永恒和清冷之地”。当降雨来到，他们周遭的森林变成了湖泊，筑路工人们也最终悲惨地溺亡在湖中。1919年的民谣中，人物的命运改善无几，墨西哥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的部下砍下胳膊粗的树枝生火，一夜狂饮之后，他们被同样的大树枝围困，窒息而死：“渐渐的，森林/微风中，艳阳下，悄无声息/数周便吞噬了草原。”草原是科尔特斯部下的牛群所需的食料，也是他们纵情狂欢的场地。此处，自然成功地抵御了人类的侵占。

在《巴尔的一生》（*Lebenslauf des Mannes Baal*，简称《巴尔》）中，布莱希特更是纲领性地描述了自然的衰亡，这比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演出提纲早了数十年。剧中的一场风势大作，似乎也有自己的数学逻辑，面对如此景象，埃卡特（Ekart）确信：“自然会越来越具有数学特性，今天这里已经有一个铁棚子，明天那里又一个铁建筑。大城市把四肢伸到了古老的自然之上（而且各部件是可以互换的）。这些外壳之间的风是可被丈量的。”巴尔用如下的言语支持了朋友的观点：“我们是能看到这片平地的最后的人。49年后，你可以把森林这个词划掉。人们不再需要木头。人类也会渐渐消失。但是，但是，就我们有生之年而言，当巨型城市拔地而起时，你

会神志混乱，没有高耸的建筑，你看到的会是老鼠。”此处，自然在“茨威利斯”的扩散面前毫无机会；而且这一过程并不可逆，最终趋向覆灭。

由此便可以理解，布莱希特为何修改了《可怜的B. B.》的初稿，他把“一定是那些森林/却存留于我心中”改为了“森林的寒冷/至死都存于我体内”。第一稿中还未使用“寒冷”这一隐喻。《家庭修身集》的版本中，从森林的寒冷这一概念发展出一种生命纲领。即使可怜的B. B.流落在沥青之城，但是和马哈哥尼的伐木工不同，他没有放弃对自己出身的记忆，虽然他必须学会同“茨威利斯”症共存，但拒绝屈从于此。必须忍受当前的阻力，同时也为改革作准备。虽然面对一个昏暗的时代，但有批判力的现实主义者仍会抵抗。

自从我看到太阳的光芒

生活：小市民到中产阶级

当欧根出生时——那是一次家庭分娩——威廉帝国正在稳固霸权，极力谋取尚未被瓜分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有荷兰、西班牙和比利时，早已划分了蛋糕，开始毫无顾忌地奴役甚至屠杀原住民，榨取当地的自然资源。法国总理茹费理（Jules Ferry）1882年在公开讲话里明确指出，殖民主义首先关乎经济利益。他认为，“母国社会（Muttergesellschaft）”的急速发展要求开辟新市场，攫取廉价劳动力，由于本国人口膨胀，需要以牺牲殖民地人民为代价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此外，还可以有效地向外部转嫁国内矛盾。

德国的孩子们在游戏中就开始学习，征服陌生国家、屠杀原住民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家园是多么的荣耀。所以，德意志皇帝在其“匈人讲演”（Hunnenrede）中呼吁不要宽恕（所谓的）敌人，也不会引起任何误解。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皇帝在不来梅哈芬

(Bremenhaven) 为远征军践行，军队远赴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中国这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卫国者也把自己称作义和拳，远征军的目标是歼灭这支起义军。类似的语言几十年后似乎还会再次出现：远征一保卫祖国德意志。威廉皇帝用带有语法错误的语言解释道：“不要同情他们！不要接受战俘！谁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死在你们手中！一千年前匈人在伊尔贡国王（König Etzel）的领导下声名大振，直到今天，这个名誉在历史记载中依然强盛。同样的，你们可以让德国在中国也获得同样的荣耀，让中国人永远不敢窥视德国！”在这样的语调中，洪堡兄弟宣扬的德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再无立锥之地，威廉皇帝尤其在青年教育中大肆鼓吹这样的标语，他不愿在学校中再看到任何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孩子，只需要富有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德国人。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出版于1901年，描写了汉诺（Hanno）在学校的军训经历—普鲁士军训被引入吕贝克中学。小说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军训的非人性和精神愚化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展现。欧根便成长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

布莱希特出生时，父亲还是汉德纸业的一名小职员。他诞生的房屋目前已是布莱希特博物馆，承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当时，房子位于奥格斯堡下城小手工业者聚居区，门前有许多莱希河（Lech）水渠潺潺流过的河水，一座小木桥在渠上伸向房门。底层一房子最大的房间内—是一个制作锉刀的作坊，它多少掩盖了屋外沟渠的流水声。那些用钝了的锉刀在这里经过特殊锤子的加工而重新变得锋利。按照布莱希特一家居住于此的时间长度可以推算，布莱希特在胎儿和出生后近7个月的时间内都生活在楼下的噪音中。

埂上街7号的小房子当时居住了11个人。制作锉刀的工匠一家在底层生活和劳动，二层是布莱希特一家和两个经营服装贸易的女商人。顶层还有两间卧室，住了另一位制作锉刀的工匠和一个裱糊匠。尽管噪音严重、空间压抑，人们还是保持了市民阶层诸如此类的雅致的室

内布置：丝绒沙发，钩织的靠巾，画有山水或者鹿鸣的廉价油画，餐具柜上还摆放着家庭成员的照片，壁毯上印有箴言“有才能的人总能有所成就”。

对布莱希特一家来说，父亲雇主的作用不可低估。汉德纸业不仅使贝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还令他在工厂的事业平步青云，这也为日后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建构了物质基础。1901年1月1日，布莱希特的父亲被任命为代理人，这一职务还负责监理和看管汉德的房产。由于管理者必须居住于此，布莱希特一家1900年迁入了汉德纸业位于布莱希街（Bleichstraße）2号的宿舍。此前的一年，布氏一家租住了一间体面的寓所，布莱希特的弟弟瓦尔特（Walter）便出生于此。

父亲1917年5月1日又被擢升为商务部主管并且收入再次显著提高，即使如此，布氏一家仍一直居住于汉德的宿舍。汉德还成就了弟弟瓦尔特的职业选择，瓦尔特多年在这里从事工程师的工作，直至1931年获得达姆斯达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造纸工艺学的教席。欧根也和汉德不无关系，他小学时就被允许聆听甚至弹奏企业的管风琴。出于感谢，布莱希特把诗作《管风琴》（*Die Orgel*）呈献给这里的主人，“献给克莱门斯·汉德先生（Klemens Haindl）”，这是1915年的事情。除此之外，他早年就形成了对纸的特殊情感，这反映在他用过的笔记本和便条本中，本子中的纸张必须精美、透亮，由最好的材料制成。

布氏一家居住的二层有两套寓所，共六个房间，包括四间卧室、一间只用于庆祝重要节日的大厅、一间大起居室，还有一间带浴缸的洗衣间和一间厨房。此外还有带有单独入口的阁楼，阁楼里有一个房间和一个狭窄的休息区。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布氏一家生活得

已经十分优越，以至于欧根是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中长大，可他的周边却被无产者氛围环绕，这也使他接触到了诸多社会弊端。

我支配我的心脏

心脏神经官能症：假警报

人们一直认为，布莱希特患有先天的心脏神经官能症，这对他的诗歌作品影响很深。《10号日记》（*Tagbuch No. 10*）的内容和保拉·班霍策尔（Paula Banholzer）1919年的讲述都证实了心脏疾病的存在。1913年5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夜里，剧烈搏动之后，心脏开始十分急而轻地悸动……我很害怕，那是极度的恐惧。漫长的夜毫无尽头。”但由器质性心脏病引起的恐惧既不可以从精神病学角度解释，也不能断定为神经性的。其实病因和症状被颠倒了，因为，心脏神经官能症应有神经官能性诱因，或者说是心理诱因（对心肌梗死的恐惧），而布莱希特所感受到的恐惧是由肌体心脏疾患引起的。原始资料也支持急性器质性疾病这一结论。

回顾人生时，布莱希特至少强调过三次，他的心脏病是在学校进行体育运动时患上的。大多数的心脏病发作都记录在1913年5~7月间的日记里。为此他来到巴特施泰本（Bad Steben）疗养，在这里他接受了浴疗和“钢水”（一种含铁的矿泉水）治疗，而不是精神病学的医治（1913年7月14日至8月15日）。疗养虽然有效果，但没有根治。1916年10月再次出现了心脏病发的状况，此后保拉·班霍策尔又描述了1919年四五月间布莱希特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保拉用砬法对此加以治疗，效果竟然一根据保拉所写一很好，从此之后无论是书信还是日记中再没有出现关于心脏问题的任何记录，只有给赫尔伯特·耶林（Herbert Jhering, 1922年10月）和阿诺尔特·布罗嫩（Arnolt Bronnen, 1923年1月12日）的两封信属于例外，但这两封信写得太过轻率和戏谑，不能作为心脏神经官能症的凭证。

布莱希特在1916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当时刚好年满18岁——“我支配我的心脏。我宣布对我的心脏实施戒严”，这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但之后他又写道：“活着，是多么美好。”这使人联想到乌尔里希·冯·胡腾（Ulrich von Hutten）的著名格言（活着，是一种乐趣），虽然它次日就被撤回，但完全不能凭借这则记录推断布莱希特患有神经官能症：“不。活着，毫无意义。今夜我又心绞痛发作，甚至为魔鬼这次一流的杰作而震惊。今天我又在进行哲学思考……”布莱希特把病痛归因于魔鬼，并在克服病痛的夜晚之后——略带自嘲地——再次转向哲学，这或许更证实了，他已经决定同器质性疾病作斗争，绝不屈服于此。无法证实他的行为和思想，包括写作，像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受到无法控制的或者未知力量的驱使。布氏对死于心脏休克的恐惧很难借助神经官能症进行解释；因为心脏收缩（快速、不规则的心跳）会引发身体憋闷和恐惧，这些症状随着对心脏病发作的克服也会消失。布莱希特的所有看法都指向这个方向。这一话题也被搁置了。

您也许会笑：是《圣经》

写作灵感：好素材

既然父母没有培养布莱希特的文学造诣，就必须从祖父母们那里探寻原因，他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父母喜欢在长假期间把孩子们送到阿赫恩，据弟弟瓦尔特回忆，那里就像是“第二个故乡”。在那里孩子们可以自由活动，在漫游中了解周围的环境，比如黑森林。那段时间——指的是1906~1913年间的几年中——假期旅行对孩子们来说不只是远游和探索，而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奢侈。布氏一家从没有面临食品短缺或饥饿的威胁，即使1916~1918年间也没有，饥荒在那几年夺去了60万德国人的生命；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必须在生存的绝对最低限上勉强度日，还有一大批人由于潮湿的居住环

境，要面临风湿病和结核病的折磨，他们中的大多数丧失了劳动能力。多年以后，布莱希特结识了玛格丽特·施德芬（Margarete Steffin），才接触到工人阶级所特有的疾病。虽然布莱希特在工人聚集的城区长大，但儿童和少年时代对此却毫不知情。由此只能推断，他自小没有机会了解社会的疾苦。

几乎可以确信，外祖母弗里德里克·布雷岑对布莱希特进行了新教教育。1900年，布雷岑一家就定居于奥格斯堡，次年便入住了布莱希特家对面布莱希街7号的房子。老妇人经常给年幼的布莱希特朗读圣经或者讲述圣经故事，这与其说是出于对宗教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对其丰富内容的兴趣，但这些圣经知识却对布莱希特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布莱希特又在赤足教堂（Barfüßerkirche）接受了保尔·德策尔（Paul Detzer）教长和克劳泽尔（Krausser）牧师的坚信礼课程和其他宗教课程。现在已无从知晓布莱希特当年去做礼拜的频繁程度，但可以推断，他每个星期天都同母亲一起去教堂。

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和其他孩子在被迫参加宗教活动时的行为不同，布莱希特会认真地听，或许还会同大家一起吟唱。德策尔的一部分布道是有打印稿的，所以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布莱希特青年时期采用了其中哪些主题、语言和思想，布氏学生时期的很多诗歌也都与圣经或者宗教题材有关，但他使用了多少赞美诗的曲调已无从考证。1920年《伟大的感恩圣歌》（*Großen Dankchoral*）就是对赞美诗的讽刺性模仿，后来的《希特勒圣歌》（*Hitler-Chorälen*）也延续了这种手法。1916年10月20日，布莱希特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读圣经……它是那样不可比拟的美、坚定，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恶之书。其恶至极，甚至读它的人也会变得恶和冷酷，明晓生活并非不公，而是公正的；生活并非惬意，而是可怖的。……相信这些便是一种恶；但是，圣经或许也相信这些，它满纸阴谋诡计，却又如此真实。”

由此可见，下文的故事也并非戏谈。1928年9月，布莱希特接受《女士》（*Die Dame*）杂志的采访，对方询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布氏回答：“您也许会笑：是《圣经》。”答案本身已经暗指了读者会有的惊异反应，因为1928年人们期待从一名公认的共产主义者嘴里听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次采访大约半年以前，布莱希特已经证实，圣经对他来说并无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层面上的意义。《莱比锡新报》（*Neue Leipziger Zeitung*）进行采访时提出的众多问题之一便是“最喜爱的书”：“如果我说是《圣经》，那么这不是为了引入瞩目，也不是故作风雅。我是叙事文学作家，所以我爱《圣经》、《堂吉诃德》和《好兵帅克》。”《圣经》——尤其是《旧约》——故事精彩、人物饱满、引人入胜，布莱希特一生都深受这一特点的影响，被其语言深深吸引，特别是路德的翻译，它既观察学习了民间语言，又不随波逐流。

我必须坚持创作

《10号日记》：形式和风格的练习

1980年代时《10号日记》才被发现。这是一本黑色A5封皮的活页小册子，共53页，除了第53页的背面以外全部写满了字。日记的时间跨度为1913年5月13日至12月25日，详细记录了这期间的重要事件、思想和各项活动，更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最后一项在日记中的比重尤为突出——它包含了80首诗，各种小故事，戏剧草稿以及笔记。布莱希特的其他私人日记中都鲜有与工作相关的部分，或者缺失多页，所以《10号日记》可以说是能展现布氏青年时代工作方式的唯一文献。虽然序数词“10号”不能表明这之前有9本日记或者这之后有更多的日记，但也不能妄断这是唯一的一本；因为布莱希特本人在文章中也提到过其他日记。

《10号日记》首要记录了诗人的逐渐成长，日记中简练地写道：“我必须坚持创作。”成长也伴随着诗人惊人的自我反思和清晰的认识指向。当15岁的布莱希特同母亲到达拜仁州巴特施泰本进行疗养时，他记下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宁静的下午。鸡在啼鸣，两点半的钟声在回响。我们开始精细条理地描述将会在巴特施泰本发生的一切。”他还用诙谐的口吻决定了这些记录会采用何种形式。此外，所有的练习都目的清晰。例如，如果日记中写道“下面我要尝试写一首十四行诗”，这之后就是一首名为《暴徒》（*Die Gewaltigen*）的十四行诗，技巧纯熟地遵循了十四行诗的经典格式。或者还写道：“要尝试谣曲。我还没有掌握这一文体。”这样的自我批评经常出现，说明布莱希特会时常反思，并同自己的作品保持距离。8月17日布莱希特记录了他的“第一次失败。不假思索地把一首名为《节日》（*Feiertag*）的诗仓促寄给了《青年》（*Jugend*）[慕尼黑当代文学与艺术杂志]，自然没有收到回音”。9月10日是自我鉴定：“我看清了：这几乎毫无意义。我所有的诗作都是情感涂鸦。毫无格式、风格和思想。我必须转变。小而精的诗。”

但日记中的诗和各类散文、戏剧的草稿其实并非“情感涂鸦”，而是恰恰相反。尤为特别的是，布莱希特——在他当时的年纪或许是显而易见的一在诗歌中并非像通常那样抒发个人情感，或者寻求主观表达。他选取的一律是历史或者时事素材，还有一部分虚构或者神话题材，将之连接成韵，从而练习写作技巧。引人注意的还有，布莱希特很早就受到赞赏，5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同学鲁道夫·哈特曼（*Rudolf Hartmann*）对布莱希特说的话：“你是一名出色的讽刺作家。”《10号日记》确实包含了讽刺类文学作品，大概是同学尤里乌斯·宾根（*Julius Bingen*）的讽刺性传记（*Biographiesatire*），很成功，某种程度上也十分辛辣，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宾根先生的内心是一枚军功章，这是他凭借罕见的一板一眼赢得的。宾根为内在的依靠提供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它的骨架和容器。”

他似乎觉得我蠢

作者：出版人

布莱希特这一时期尝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未果），频频遭到拒绝，他或许正是因此而在1913年夏末创办了学生杂志《收获》（*Die Ernte*），以便拥有自己的出版机构。有关《收获》一当时还名为《白日》（*Der Tag*）一的首次记载出现在1913年8月20日：“然后在格威尔那里，我们谈了报纸《白日》的事情。他要1马克的稿酬，我来负责报纸的编辑、设计、胶版印刷和销售。利润25芬尼。他似乎觉得我蠢。”做杂志还有另一个原因：赚钱。显然，布莱希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他的文学创作当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珍宝，它虽然不能带来收益，但是应该贴近民众，让作者声名斐然。弗里茨·格威尔（Fritz Gehweyer）没有写多少稿件，主要负责组织的工作。每一期都精心制作，花费不菲。主色调类似青春艺术风格的多色编织插图，十分引人入胜。内容上布莱希特也要求颇高：“只有形式和内容都完美的诗、小说、人生经历和其他稿件才能刊登。”

但并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履行了这一要求，即使布莱希特自己也只有最初几篇习作值得一提，虽然并非诗歌意义上的佳作，但这些作品颇具一些美学和选题上的小闪光点。马克斯·霍恩内斯特尔（Max Hohenester）一后来的杂志编辑和出版人，或许还有一些文学天赋。其他的人，像路德维希·鲍尔（Ludwig Bauer）、瓦尔特·格鲁斯（Walter Groos）和弗兰茨·克罗尔（Franz Kroher）之类，后来都选择了市民职业，与艺术再无关系。布莱希特必须自己完成所有的事—除了版画印刷之外，例如他要完成文字印刷，格威尔的父母在奥格斯堡内城有一家纺织品店，布莱希特被允准使用这里的胶版印刷机。办杂志所必需的纸张很有可能是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得到的。布莱希特

不仅成功地鼓励了《收获》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文学创作，还一直保持了自己作为编辑和出版人的权威。

在《10号日记》（还有日后的很多日记）中可以显而易见地发现，当布莱希特独自一人时他会极为无聊。他的惯用语是：“永远的一成不变！”同他人一起工作的急切渴望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十分明了。布莱希特爱好交际和共同创造，而不是洪堡口中“孤独与自由”的传统研学。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布莱希特需要被人环绕着才能写作，或者才能口述，由其他人执笔。学生时期，布莱希特就代表了“作者兼出版人”——这是日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表述——这一类型，他利用了所有技术和手段，组织创作过程，集体创作作品，著作权实则已经退居次席。日记中很多不同文风的习作和文章节选后来都归于其他人名下，从中可以推断，布莱希特为了不过分突出自己的核心地位，会让协作者抄袭自己的文章。

《收获》第1期发行于1913年8月末，最后一期即第7期发行于1914年2月；第5期大概没有出版，但是有一份试行本。各类不同的文学体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首先是诗歌，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人物介绍[比如关于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笑话、讽刺作品、谜语，还有一篇法语的短篇小说或者关于辅音堆叠的语言学研究（格鲁斯作）以及图画描写，第6期还有一部完整的戏剧——独幕剧《圣经》，布莱希特的第一部戏剧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探戈舞》（*Der Tango*）一文是一篇讽刺“德意志性（Deutschtum）”的文章，开篇讲道：“德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自古便是自由的。当自由受到威胁时，他们总会反击。他们总是胜利者，战胜过法国，战胜过意大利。德国人曾拥有最伟大的学者、哲学家和诗人，呈现自己的风俗和礼仪。但是德国人总是在外国人面前低人一等，必须接受他人的风俗，比如法国的，还有意大利的。”美国教会了德国人探戈舞，舞蹈本来是不体面的：“试想拿破仑、恺

撒或者耶稣基督在跳舞。或者想象易普生在跳探戈。”所以署名为“E. 布莱希特”的文章作者建议：“摒除那些陌生的风俗，它只会让我们德国人出丑。德国人，你们想想：牛可做之事，朱庇特^[2]未必可做（Quod licet bovi non licet Jovi）。”但布莱希特无法显著扩大协作团队，杂志在朋友和同学中一直反响平平，加之赚钱的希望也落空了，因此，他渐渐失去了继续出版《收获》杂志的兴趣。

年少时褪色的信中写着，我们一夜无眠

布莱希特派：绝非纵酒宴乐

或许是从《收获》的协作者中渐渐聚结了后来所谓的“布莱希特派（Brecht-Clique）”。布莱希特1915年9月20日致信格威尔，信中授予他“荣誉成员”，之后布莱希特派便组建起来。大家在奥格斯堡的一个小酒馆里相聚：“我念了抑扬格的独白，霍恩内斯特尔讲了话，我们一同读了《哈姆雷特》中的一场，还谈论了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3]。”除此之外，布莱希特派的成员还有小提琴手约翰·哈勒尔（Johann Harrer），他是个籍籍无名之人；在路德维希·普莱斯特（Ludwig Prestel）和鲁道夫·普莱斯特（Rudolf Prestel）两人中，路德的钢琴技艺精湛，布莱希特同他的关系也更为亲密，但不久也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道扬镳（路德指责布莱希特逃避兵役）；还有鲁道夫·哈特曼—布莱希特儿时的伙伴，他的木偶剧可谓布莱希特第一部导演的作品，当时布莱希特宣称自己是“导演和剧院经理”；此外还有早年的玩伴格奥尔格·范策特（Georg Pfanzelt），他比布莱希特年长许多，布莱希特叫他奥格（Orge），并把《家庭修身集》和《巴尔的一生》都献给了他，奥格还是布莱希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最著名的是《奥格之歌》（*Orges Gesang*），这是一首以厕所为主题的诗，厕所是最受欢迎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心满意足/屋顶繁星闪烁，屋底一片污秽”；年长一岁的

卡斯帕尔·内尔，布莱希特叫他卡斯（Cas），他1911年留级到布莱希特的班里，后来成为画家和舞台设计；还有比布莱希特小两岁的奥托·穆勒莱塞特（Otto Müllereisert），也被叫作海盖（Heigei）、海尔盖（Heilgei）或者海（Hei），他也与布莱希特同班，日后在慕尼黑学医，就职于柏林的夏里特医院（Charité）；还有同样小两岁的汉斯·奥托·缪斯特尔（Hans Otto Münsterer），他出身贵族家庭，衣着优雅，因而经常被布莱希特戏称为“缪斯特尔先生”[见《缪斯特尔先生之歌》（*Lied an Herrn Münsterer*）]，所以也没有绰号。

这个朋友圈保持了惊人的持续性。布莱希特和奥格是终生的挚友，尽管这些朋友中唯有奥格出身平民家庭（他的父亲是车间主任），很早就离开学校成了行政公务员。根据瓦尔特·布莱希特回忆，奥格辛辣的诙谐幽默和粗鲁放荡对欧根影响很大，这在布莱希特早期作品中也有所展现，但这些作品本是不宜示人的。这位友人虽然年长许多，但不失幽默，满脑子奇思妙想，好像叛逆的魔鬼墨菲斯托^[4]踱足穿行于此——布莱希特几乎找不到更好的同伴了。范策特还在音乐上天赋异禀；布莱希特主要同他和路德维希·普莱斯特一起搞音乐，写了很多新歌。即使在慕尼黑和柏林时期，奥格也是布莱希特工作上重要的交谈伙伴和作品的鉴赏评论者，后来奥格在1934年流亡至斯文堡（Svendborg），布莱希特在美国一再向他提供帮助。战后布莱希特在1949年9月同路德·贝尔劳（Ruth Berlau）重回故里，他和奥格又在奥格斯堡重聚。布莱希特最终的也是最独特的诗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奥格的愿望单》（*Orges Wunschliste*）。

当时也不能预见，布莱希特和卡斯帕尔·内尔的同学情谊演变成了一生的创作共同体，在整个舞台和戏剧世界掀起了一场革命。1915~1918年内尔必须在前线服战时兵役，布莱希特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危。布莱希特把《死兵的传说》（*Die Legende vom toten Soldaten*）献给克里斯蒂安·格鲁贝斯（Christian Grumbeis），这

个人物同内尔的出生日期相同。1917年4月内尔在佛兰德（Flandern）战役中负伤，必须返回奥格斯堡疗伤，更加重要的是治疗心理创伤，以便在8月重新返回战场。内尔共经历了32次殊死战斗，能幸存下来几乎是个奇迹。布莱希特在信中极为关切地劝说“受伤的士兵”卡斯，不要再让自己被判定为健康状况适合入伍，不要再和那些“绝望而可笑地甩着腿的男人”为伍。这些在语言上都与诗歌中死兵的故事具有明显的形似性。1917年在内尔重返战场之前，布莱希特很可能已写了《死兵的传说》，也很可能把这份对彻底毁灭的告诫寄给了战火中的朋友；如果是这样，《死兵的传说》的创作日期可以追溯至1918年春，这一推测的依据是《死兵的传说》的第一节，其中提到了战争的“第四个春天”，因而推断为1918年。这首诗首次出版是在《夜半鼓声》（*Trommeln in der Nacht*, 1922）的附录中，此句却改为了“第五个春天”。这样的时间变换是因为这首诗在戏剧情节中出现的时间是1919年。

汉斯·奥托·缪斯特尔是青春友谊长存的另一个例子。根据缪斯特尔的陈述，他于1917年加入布莱希特派，是早期很多诗歌及歌谣的合著者，但他没有要求署名。早期诗歌的一大部分布莱希特并没有付诸笔端，而是借由他的笔录才得以流传下来。缪斯特尔和布莱希特的私人关系维持到1924年布氏离开慕尼黑。缪斯特尔在慕尼黑学习医学，后来成为州防疫所的病毒学家和皮肤病学家，但他一直对布莱希特的作品很感兴趣，直至《爱德华》（*Eduard*）彩排时都会亲自到剧院观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缪斯特尔还前往柏林探望布莱希特，并参与了柏林剧团的彩排。这是1950年的事情。之后两人仍有书信往来，相约共度1955年末至1956年初的冬季，但计划并没有得到实施。缪斯特尔1963年还写了《1917~1922年间的回忆和谈话》（*Erinnerungen und Gespräche aus den Jahren 1917 bis 1922*），是记录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如若当时的诗歌，几个密友夜间一或许是深夜一穿过奥格斯堡的街巷，伴着吉他唱和，给居民带来些纷扰（“踉跄走过地狱的岩浆/贝尔特·布莱希特手持他的灯笼”），这同样是诗，如同《巡塔》

（*Turmwacht*）借用小说中的素材一样。大家经常于夏日聚在莱希河畔游泳，当然也追求年轻姑娘，这都已经太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没有文字描述这些，只知道这样的聚会都伴随着音乐和诗的创作。弟弟瓦尔特跟当时的大部分市民阶层一样，会弹奏钢琴，而哥哥布莱希特却选择了吉他，是个“吉他动物”^[5]，这是因为吉他携带方便。但是自然不会纵酒宴乐和彻夜狂欢，因为不仅父母会为此担心，那个时候的老师也都认为自己是教育者，并会为此担心。孩子和青少年晚上要待在家中，夜里要上床睡觉，再无别的去处。

首日，他呼唤/战斗吧，德意志钢铁之师

战争诗：约稿

1914年8月4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同意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提供战争贷款。社民党（SPD）占有近35%的席位，是最强大的议会党团，本可以采取反战的和平措施，却对这一决议投了赞成票。早在8月1日德国就开始了战争动员。社民党主席胡戈·哈泽

（Hugo Haase）还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说：“我们在危险的时刻不能抛弃自己的祖国。”自《反社会主义法》（1890）颁布以来，社民党一直被谴责是“无祖国的党派”，这次他们选择了支持威廉二世皇帝及其政府，支持——虽然没有公开认可——帝国的战争目标。赞同提供战争贷款是社民党对其基本纲领和原则史无前例的背叛。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为了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奋斗到最后，并一再提醒她的政党，他们有能力阻止这场战争。对于这次的赞成票，她讽刺地评论道：“自阶级斗争的历史以来，自政治性党派存在以来，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像社民党一样，在50年的不断进步之后，在赢得了最

高等级的权力地位之后，在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之后，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作为政治因素的作用在24小时之内化为乌有。”卢森堡得出结论：“1914年8月4日，德国的社会民主退出了政治舞台，同时社会主义国际^[6]一并瓦解了。”卢森堡的结论有着现实根据，因为自19世纪以来，由于各国的民族主义政策、工业化进程和资本主义（提示词：帝国主义）在全球的输出，各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社民党原本有责任认清这一点。

但在德国，高涨的狂妄自大情绪迅速蔓延，让人不禁担心会出现最严酷的后果。8月1日，在众人齐唱《胜者的桂冠万岁》（*Heil Dir im Siegerkranz*）之后，帝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维克（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发表演说，狂妄昭彰：“你们用歌声为吾皇欢呼。是的，无论是谁，有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效忠于皇帝，并为此可以放弃财产，甚至生命。皇帝被迫让他的子民经受枪林弹雨。如果我们必须面临这场战争，那么我确信，所有青年男子都时刻准备为了德国的疆土和荣耀血洒疆场。我们深信，上帝会指引千军万马走向胜利，就像曾经多次赋予我们的一样。如果在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上帝能免除这场战争，我们会万分感谢。如若不能，在神的指引下，为了皇帝和祖国，战斗！”

沙文主义的崛起同一名全心投入文学创作的少年有何关系？战争伊始的气氛如何？政府为战争进行了怎样的煽动性宣传？布莱希特在作品中对此有何反应？通过对一篇散文和一首诗的简单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首场大战役一周之后，16岁的布莱希特在发行量巨大的《奥格斯堡新报》（*Augsburger Neuesten Nachrichten*）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时间是1914年8月8日，这个时候出现的宣传标语诸如“让你们的心同上帝一起跳动，把你们的拳头挥向敌人”，而且人们会聚集在教堂，在《我众感恩上帝》伴奏下为即将到来的屠杀进行祈祷。

这篇文章是一篇散文，名为《巡塔》，描述了两个奥格斯堡的中学生——也就是作者和他的同窗——在午夜登上奥格斯堡的派尔拉赫塔（Perlachturm）^[7]进行“巡空”，即侦察敌机并及时发出警报。事实上，同一家报纸两天前曾刊登过文章：“鉴于有出现敌机的新闻，有必要针对突发性事件采取更高级的防范措施，应当雇用高塔守卫员，在战争时期用望远镜进行高空侦察，如若可见任何敌机便发出警报。”此外还得到证实，布莱希特文中名为卡斯帕尔·多伊森鲍尔（Kasper Deutschenbaur）的人物是奥格斯堡的市议员，负责军事动员工作。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布莱希特的文章讲述的是一次真实事件，所以，布莱希特的出版生涯——如果将《收获》除外——是以记者身份开始的。

但这是一篇完全虚构的散文。文章本身就包含一些提示。当布莱希特描写“两个极为可疑的人物”午夜12点蹑手蹑脚地登上塔顶，“昏暗的云（遮掩）了天上的月亮”，还在括号里添加了评注，“宛如我在小说里读到过的”。午夜时分已然类似恐怖故事，为什么敌机会正好在午夜出现，而不是在白天？评注清晰地说明，“昏暗的云”是出自某一小说的表达，绝非对应现实。深夜巡空的诱惑力顺应了这个年纪的青少年的要求，他们想打破日常生活的桎梏。

除此之外，由于宣战和初期的军事行动当时只针对俄国（始自8月1日）和法国（始自8月3日），所以敌机只可能是法国或者俄国的。布莱希特提到发现敌机的城市是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和慕尼黑，所以这些飞机显然来自俄国。俄国飞机，或者驻扎得更近的法国飞机是绝不可能飞抵奥格斯堡的。由于最远航程有400公里（飞机还必须要返航），另外奥格斯堡也并非军事要地，所以在1914年8月这里完全没有被轰炸的可能性（自1917年开始或许将有所转变）。

这类事件尤为棘手，原因是自从引擎飞机问世以来（莱特兄弟1903年12月试飞成功），率先从英国开始，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飞机恐惧症。新的第三维度突然出现了，它此前完全被保留给自然，现在也因战争目的而被利用起来。1908年（德国是1909年）H. G. 威尔斯（H. G. Wells）发表了未来科幻小说《空中的战争》（*The War in the Air*），之后也涌现了很多场景相似的同类型作品，这一自然是在军方的支持下一引发了民众极为歇斯底里的反应。1914年在战争爆发前，英国就因为有人在海岸目击了德国的齐柏林飞艇^[8]，而经历了一次集体性恐慌。

在德国，民众对空袭的恐惧也被利用，以煽动战争情绪，布莱希特的文章就是这一阴谋诡计的见证。1914年8月7日和8日，军方的宣传工具策动了一次心理动员，他们借由覆盖全境的传媒运动，在整个德国宣传所谓的空战已经迫在眉睫，并添枝加叶地渲染可怖的后果。布莱希特的文章正是同一系列的作品，所以也不排除受委托所作的可能性；这篇文章以他的同学为目标群体，号召他们作为未成年人也要积极参加到战争中去，分享全国一片好战的狂热。

仍存有疑问的是，布莱希特是如何得以创作这篇文章的。他所描述的“巡塔”很有可能从未发生过，而且仅仅两天前同一家报纸才刊登文章呼吁这类行动，他应该无法作出如此快速的回应。但可以确认的是，巡空作为一项安排是预先规划好的，并且也得到了彻底的完成。实科高级中学1914年的年鉴记录了这一切。根据记录，为战争，包括为巡空而进行的宣传运动当年成功结束。就布莱希特而言，结论只可能是他必须动用一切手段，甚至利用普遍的战争气氛，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布莱希特同时在文章中也植入了许多虚构的信号，借以同此事保持距离。

同《巡塔》联系在一起的名字还有威廉·布鲁斯特勒（Wilhelm Brüstle）。根据布鲁斯特勒自己的陈述，他通过《巡塔》一文发现了布莱希特这位作家。布鲁斯特勒负责《奥格斯堡新报》的副刊《叙事者》（*Der Erzähler*），它并非布莱希特在上面发表（表面上）纪实性稿件的《新报》。在《奥格斯堡新报》和《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之后，《叙事者》是布莱希特发表文章的第三份刊物，但布鲁斯特勒却是布莱希特文学天赋的发现者与支持者，他刊印了布莱希特的诗—《青岛士兵》

（*Tsingtausoldat*，出版于1915年8月15日）和《唐纳德要塞铁道部队之歌》（出版于1916年7月13日）。这些诗作在当时不允许在任何地方的报纸上出版，除非在副刊中，即遵循箴言：那些无法公开言说之物，可掩藏于文学外衣之下。这两首诗都可归为士兵诗系列，其中的主人公都在失守的岗哨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死亡。这一系列诗作从《旗手》（*Fähnrich*）开始到《死兵的传说》形成了一个暂时的高潮。

另一首更复杂的讽刺性诗歌是《皇帝。剪影》（*Der Kaiser. Silhouette*），于1915年1月27日（皇帝的誕生日）发表于《奥格斯堡新报》，诗的第一节为：

陡峭。忠诚。不屈。骄傲。正直。

伊曼努尔·康德之邦的皇帝。

为最崇高的宝藏而艰苦战斗：和平。

他是和平时期的斗士和兵卒。

违背整个世界，

维护这个国家的和平。

背负最沉重的负担。

第一行诗句尽可能做到不抒情，也没有去挥洒狂热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这一句表面上看只是定语的排列，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形本应使用逗号。句号用来标示句子，所以这里其实是5个省略句，说话者通过长的停顿来强调它们，诗句的静态从而也被着重强调。说话者记录的并不是鲜活的个人，而是他的立像，好似威廉二世在形成自己的风格。除此之外，这个立像和题目中的“剪影”也相互对立，因为细巧的剪影并不适合肩负千斤重担。类似的还有诗歌中“Lands”（国家）和“Kants”（康德）的韵脚。已经可以证实，布莱希特这一时期对康德不只是道听途说，至少已经读过一部分《纯粹理性批判》（布氏曾在自己《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衬页上作诗一首），因此完全可以假定他知晓这样的韵脚能将哪些事物统一起来。更棘手的是，“Land”和“Kant”都采用了第二格的屈折变化，因而韵听起来尖锐，甚至带有讽刺性。诗歌附和了当时普遍的夸张修辞方式，为不平常之物披上了平常的外衣，因而并不突兀，尤其适宜出版。

我不时躺在船中做梦

凝望高空

战争与饿殍：被无视

1915年8月7日与26日，布莱希特从奥地利布雷根茨地区给马克斯·霍恩内斯特尔写了两张明信片，从中可以得知，我们的年轻人并不关心血流成河的战争。布莱希特和弗里茨·格威尔驻足山野，他们在“禁止通行的小路”上散步，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一样，“清醒着、沉默着”寻找夜与自然的孤独，以守护“底希特瑞提斯（Dichteritis）”。这是布莱希特的新造词。让人联想起医学词汇，并把其中的词根“写作（Dichten）”理解为传染性的感染或癖好，使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除了那篇被约稿的报刊文章，政治，甚至战争既没有出现在信件中，也没有出现在札记和日记里。因为这些无法令

度假者们兴奋起来，他们关心的只有写作和如何将其公之于众。下面的几行文字是写给霍恩内斯特尔的，个中含义已毋庸赘述。

我不时躺在船中做梦，凝望高空—我纵身跃入天空，在扭曲盘结的巷子和牧场的上空，愚蠢猴子的脸惊奇而直瞪瞪地看向上方，我们飞越这一切并远去。

孤独中的漫游者无视残酷的现实，当格威尔一家为战争中的牺牲者悲痛不已时，这种漠然仍在持续。格奥尔格·格威尔1915年4月24日长眠沙场，接着是弗兰茨，1918年7月17日，而这些也无法阻止弗里茨报名参军，他不幸地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也倒下了。弗里茨本可以轻松躲避兵役的，因为当时规定，家中的第三个儿子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虽然布莱希特1915年曾作诗《士兵之墓》（*Soldatengrab*），但他那个时期的作品同真实人物没有任何关系。弗里茨·格威尔作为布莱希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没有得到他在文学作品中的祭奠；他的死甚至也没有被布莱希特记录在日记里。与此相反，奥格斯堡的公众却十分赞赏格威尔家的牺牲精神，视其为榜样，并为三兄弟立了纪念碑，他们的离去使整个家族再无后人。如今纪念碑还矗立在奥格斯堡的西公墓中供人唏嘘观瞻，告诫后人反思当时无谓的献身精神。

好似腓立比皇帝肥硕的宫廷小丑

中学：人的基本类型

尽管文学作品并非作者生平的真实写照，但《逃亡者对话》（*Flüchtlingsgespräche*, 1940）中，齐佛尔（Ziffel）对自己生活的描述贴切而诙谐地展现了布莱希特的学校生活是何等景象。齐佛尔详细描述道：“我知道，我们学校的优点经常受到质疑，它了不起的原则不被认同，也不被赞赏。这项原则便是让年轻人在最柔弱的年纪直面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直接扔进一个肮脏的小池塘里：游，不然就啃烂泥。老师的任务是代表孩子们将来会在生

活中遇到的各类人的基本类型。在这里人们每天有4~6小时的机会，学习那些粗俗、恶劣、不公之事。对这样的课程来说，再高的学费都不足为过，但这些竟然都是免费的，完全由国家资助。年轻人在学校遇到的都是难以忘却的非人形象，这些人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由于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和长年的经验，他们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学生。而学生要学习将来能飞黄腾达所必需的一切，这同时也是能在学校游刃有余所需要的。其实无非是贪赃枉法、滥竽充数、报复他人的同时让自己安然无恙，快速掌握那些陈词滥调、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进而时刻准备向居高位者出卖同伴，诸如此类。”

虽然引文的讽刺口吻比较夸张，但如若对比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描写，可以看出它还是很贴切地还原了当时的普遍风气。布莱希特的学习生涯被各类教学计划良好地记录下来，但这些材料几乎都言之无物，布氏的求学轨迹似乎只是沿着最平淡无奇的轨道行进；他的成绩也只是平平。布莱希特在奥格斯堡上了3所学校，从1904年9月1日起，起先在巴福塞尔区上了两年公立学校（仅距布氏在布莱希街的房子1公里），1905年他转校至本市另一所公立学校，1908年起在奥格斯堡皇家实科高级中学（das Königliche Realgymnasium Augsburg）学习，1917年毕业，拿到“战时高中毕业证（Notabitur）”：中学生应当尽可能多地服兵役。

学生时期有两则著名的趣闻，显示了布氏日后的反叛精神以及独特的对寻常事物的反向运用。9年级时，他的朋友马克斯·霍恩内斯特尔把试卷上的错误刮掉，并找老师申诉，想骗取较好的成绩。老师把纸对向光亮，轻易识破了这个骗局。布莱希特观察了此事，自己拿出红笔，勾出本来完全正确的地方，并找老师申诉这是判卷失误。老师不想丢脸，就把分数提高了。这是发生于1912年的事情。

第二件事发生在1916年，几乎让欧根失去了文凭。当时要求学生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z）的名句“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9]为题写一篇作文，这自然是希望大家面临世界大战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宣扬为国捐躯的甜美与光荣。1916年，技术装备战开始，报纸上满篇皆是倒在了“荣誉之地”的男人的讣告，他们的年纪也越来越小。布莱希特在自己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句格言的价值无非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的宣传工具。生离死别总是艰难的，无论是病榻前还是疆场上。只有没头脑的人才会如此自负，只要这生死攸关之际还远离自己，他们就把这一切说成穿越暗黑之门的轻身一跃。如果死神的枯槁逼近自己，他们就把盾牌背在肩上落荒而逃，好似腓立比皇帝肥硕的宫廷小丑，^[10]正是这个小丑想出了题中的这个句子。”这篇文章是在拉丁语课上写的，布莱希特一生都因这门课程受益匪浅。同路德版《圣经》一样，拉丁语以及句法结构都对布氏诗歌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经典的拉丁语文学作品，比如伟大的作家贺拉斯，还有卢克莱修（Lukrez）、奥维德（Ovid）、维吉尔（Vergil）、西塞罗（Cicero）、塔西陀（Tacitus）和李维（Livius），他们像一条红线贯穿了布莱希特所有的作品，成为他清晰并极具挑战性语言的范本。

文章中的这些语句是奥托·穆勒莱塞特记录下来的，他也是布莱希特派的成员之一。这些语句的文风同当时布氏所作的诗歌有很多相似性，例如《唐纳德要塞铁道部队之歌》、《邦尼·麦克·索尔的婚嫁》（*Bonnie Mac Sorel freite*）和《劳苦之歌》（*Das Beschwerdelied*），这些诗都脱离了之前普遍遵循的模式，转而走向了反叛甚至挑衅的风格。

你们往高处爬

最高也只能爬到一个女人身上

你们脱掉她的衣服，她脱下你们的衣服：

你们为这样的消磨时间而掏腰包。

生活是美的

如果你更美：

你无法从生活中脱身

因为它是脏的。

穆勒莱塞特时常凭记忆引用这首诗，这说明布莱希特的表达色彩强烈，深深印刻在了同伴们的脑海里。另外，有两件事对布莱希特是有益的：人们不使用这样的语言，这在当时的教育方式中——即便不会受到惩罚——也至少是没有教养的，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更容易记住。

事件最终结局如下：副校长和拉丁语老师格布哈德（Gebhard）对此事反映强烈，将之交至教师委员会裁夺。若非宗教课教师罗穆阿尔德·绍尔（Romuald Sauer）居间调解（他与布氏一家结交甚好），教师委员会便会提出勒令退学。这件事也按惯例计入了档案，所有的成绩都被下调了，这应该是布莱希特得到过的最差的一张成绩单。但他有勇气在正式的课堂作业中写出如此的句子，也是其自信心的证明，虽然还没有人发觉他出版作品的讽刺性特点，但布莱希特从这些作品的出版中获得了新的信心。他从此同沙文主义的虚假割席而坐，事实证明，布莱希特1916年初便完全停止为报纸创作美化战争的文章。1914年9月28日，最后一封《奥格斯堡战时书信》（*Augsburger Kriegsbrief*）刊登在《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最后一首《士兵之墓》1916年2月20日刊登在同一家报纸——同之前所有报刊稿件一样，署名贝特霍尔德·欧根（Berthold Eugen）。1916年7月16日，《唐纳德要塞铁道部队之歌》登载《奥格斯堡新报》，署名贝尔特·布莱希特

（Bert Brecht），这是布莱希特第一次在公众媒体上公开自己的身份。

春意升腾。天空无耻地冷笑

母亲：双重道德

1913年，布莱希特几乎忘记了母亲在9月8日的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妈妈的生日。起先我什么都忘了”，后来给母亲买了拉尔夫·沃尔多·川恩（Ralph Waldo Trine）的灵修读物《身心合一》（*In Harmonie mit dem Unendlichen*, 1897, 德文版, 1904）。川恩是美国“新思维运动（Neugeist-Bewegung）”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观点也流传甚广：不可见的灵在可见的、物质的世界里也会显现。灵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而且会同个体相适应，引导其根据心灵由内而外地构建自己的世界，达到身心合一。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作为一战后几乎改变了半个世界的人——对这本书大为推崇，认为它是“积极思考”的范例，并且分发给其他大实业家（他们也需要用其为自己的剥削手段辩护）。

欧根的母亲接受这个礼物时难掩诧异，而且她会在书中读到人应当对自身患病的命运负责，因为，川恩的座右铭就是“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其原因都在你自身”（她或许已听闻过此类说法，因为这本书流传数百万册，其中的观点已经成了流行语）。布莱希特母亲的癌症逐渐恶化，此时送这份礼物显得颇有嘲弄之意——或者至少是欠考虑的，对于已经15岁的人来说这似乎也是不应被原谅的。也许这本拙劣作品的副标题——一本心灵的生命之书——对母亲来说就很陌生，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布莱希特对川恩有过丝毫兴趣，而且从索菲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单纯的母亲对川恩也是一无所知。当布莱希特察觉到母亲拒绝的态度之后，曾写到，很庆幸没有把自己的诗作（一本没有流

传下来的诗集)当作礼物送出。母亲也许会对这本诗集更陌生,因为布莱希特的诗作中没有任何同个人生活相关的内容。

布莱希特的母亲在七年后去世,布氏写道:“我的母亲卒于5月1日。春意升腾。天空无耻地冷笑。”只字不提悲伤,似乎甚至不被触动,除此之外:天空也没有表示哀悼,事不关己,姿态伤人。布莱希特的反应与之也相差无几。5月2日他的朋友们都聚在布莱希特家中。弟弟瓦尔特回忆此事时,表达了对这群粗野无理的年轻人的谴责:

“母亲去世的次日夜晚,他邀请他的朋友们到阁楼来,而且和平日里同样的嘈杂。谁知晓这些朋友是怎样看待他拒绝一切情感表达的怪异行为,谁知晓他为何在悲伤中做这些。我们同样居住在这间房子的人,都因伤痛而沉默。”父亲对阁楼上吵嚷的聚会并没有十分气愤,但5月3日母亲还未下葬,布莱希特便要去奥格斯堡交易所礼堂听阿图尔·库彻尔(Artur Kutscher)的报告,这意味着布莱希特公开表示不愿为母亲服丧,父亲因此事而大为光火。同时,布莱希特也必须权衡利弊,要么遵循市民传统,静寄哀思;要么遵循自己的偏好,即使这会让家族声名狼藉。

库彻尔对布莱希特的文学生涯意义重大,因为布氏通过库彻尔在大学开授的戏剧研讨课同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建立了联系,而约斯特正是库彻尔最钟爱的作家。由于工作需要,布莱希特同约斯特在1920年仍保持联系。因此,5月2日的聚会不为别的,正是布莱希特派针对库彻尔的报告,商讨在这期间和之后的计划,这样的演讲在奥格斯堡绝非等闲之事。

布莱希特不遵循市民礼节(葬礼通常以人们酩酊大醉结束,这项除外),对其鲜有重视,他之后的行为就是很好的例证。5月5日,布莱希特前往慕尼黑,陪同卡斯帕尔·内尔找房子。对母亲葬礼的评论他也使用了第三人称,在语言上保持了距离:“那只是一具白骨,人

们把它包裹在床单里。在黄土掩埋她之前，他就起程了。如此显而易见之事为何要观看？”记录对道德只字未提，在一个否认道德标准的社会，布莱希特早在1918年就在《巴尔》中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戏剧性的刻画。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不参加母亲的葬礼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家庭的虚伪。瓦尔特和范妮·布莱希特（Fanny Brecht）——阿赫恩的堂妹，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掩盖此事。布氏一家一直用尽所有方法维护婚姻的完美、家庭的和睦。但后来出现了洛克尔“小姐”

（»Fräulein« Röcker）。迄今为止的记录中洛克尔小姐的声名都完美无瑕。1910年1月，由于布莱希特的母亲生病需要照料，22岁的她来到布莱希特家，并开始作为女管家掌管家中事务。据范妮·布莱希特回忆，玛丽·洛克尔（Marie Röcker）不仅教授孩子们英语和法语，还操持家务，她的厨艺能每天像变戏法一样做出满桌佳肴，而且还能完成一些家里的简单维修工作，并且悉心照料布莱希特的母亲。

可以确认的是，当玛丽·洛克尔搬入布氏一家，布莱希特就腾出自己的房间搬到了阁楼。这个当时才12岁的男孩对此十分乐意，因为这样他就能躲开家里平日的忙忙碌碌，而且能够一至少部分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安排生活。洛克尔曾返回乌尔姆（Ulm），但是1914年又回到奥格斯堡，可自然不是在布莱希街。布莱希特的父亲和洛克尔的关系一直保持着。1917和1918年她在纽伦堡和乌尔茨堡（Würzburg）工作，1918年6月10日才又回到布氏一家操持家政。没有资料记载布莱希特的母亲如何接受了洛克尔的再次到来，但她此时已经十分虚弱，无法再追查自己丈夫的越轨行为。由此，布莱希特为何还要认真对待亲人们为失去妻子和母亲而表现出来的伤痛？为何还要为自己披上沉痛的外衣？这样的事件能证实的无非是虚伪，掩盖在道德论调中的虚伪。欧根有一本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教义与箴言》（*Lehren und Sprüche*, 1912年版），书上被他画出的句子中就有：

“所有的装腔作势中，道貌岸然是最卑劣的。”母亲在1920年5月1日过世后，玛丽·洛克尔依然居住在布氏一家的房子里，直至布莱希特的父亲去世（1939年5月20日）。对外洛克尔小姐仍然扮演着女管家，但私底下却担任了妻子的角色。《夜半鼓声》首演时，她还同老布莱希特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是在慕尼黑，1922年9月29日。

布莱希特偏爱对事物直呼其名，并有意挑衅，这也有其生平背景。1918年2月，在《殉难者的长篇大论》（*Auslassungen eines Märtyrers*）中，布莱希特就嘲弄了虚伪做作和矫饰伪行，手法极为巧妙，只有仔细研读才能辨识其含义。能引用的只有前两个诗节和第五诗节。

1

我在顶层房间玩桌球

这里，洗过的衣物悬挂晾干，在尿尿

我母亲每日里说：当一个成年人如此

真是绝望

2

其他人看到湿衣服不会这样想，

这样说已经是病态，

色情读物作者才会这样

但直言不讳令我感到腻烦

我对母亲说：衣服这样，我又能做什么！

5

如果同这些武器斗争，你只能离开，咽下你的气愤

抽支烟，直至你平息下来

如果不允许昌言无忌

他们不应该把授道手册中刊印任何的真实

诗歌初看是浅显的语言批评，是习惯上对孩子们提出的“不许这样说话！”的要求。但事件更为尖锐，因为这里有人蓄意寻找脏字，而且使用在完全没有必要之处——不用“滴水”，而用“尿尿”。因此，有理由怀疑，正如诗歌中的“母亲”所假定的，存在一种（病态的）癖好。而且更加棘手的是，“pisst”同“ist”押韵，而“ist”是“sein”^[11]的一种词形上的屈折变化，所以抒情主体的控诉也就有了哲学意义。这里涉及的是中肯的语言批判，并以此决定真实是否有价值，是否应该一如授道手册所要求的一昌言无忌。根据诗歌的逻辑，现实的语言简直必然是色情文学的语言，而色情文学就字面意义而言即是“淫荡的写作”。如此一来，诗学，同圣经和授道手册被矛盾地统一起来。

虽然类似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但这样的诗并非布莱希特如何对待母亲的真实写照，而是记录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家庭生活中，虚伪都已经是家常便饭，青年人虽然能够认识并洞察这一切，但必须忍受。这些表现了青年布莱希特的警惕性，而这种警惕性针对的并非他周遭的时代弊病。

因为我没有时间，先生

兵役：戏剧教授的时间

获得“战时高中毕业证”的难度较小，为了毕业，布莱希特1917年3月一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报名参加战地服务。他必须在5月为服兵役进行身体检查，在给弟弟瓦尔特的信中，布莱希特这样描述自己

的表现：他很“冰冷”地向中校先生说：“很抱歉，我本很乐意为您效劳，先生，但是这对我来说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时间。”尽管如此，他仍必须完成相应的服务，起先是在军营的文书室，后来是园艺工作。同弟弟瓦尔特不同，他只是有条件地参加了这些工作，因为布莱希特更乐意忙于读书和写作。在夏日，他来到特格尔恩湖

(Tegernsee) 湖畔的别墅，在那里为商务顾问^[12]康拉德·科普 (Conrad Kopp) 担任家庭教师。“家庭教师”这一说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布莱希特只为这家的儿子教授了很少量的课程——他自己把这叫作“艰难地灌输”知识，其余时间他都在尽情地游泳、划船、散步以及阅读叔本华，与此同时当然还在创作自己的诗歌，比如那些大多有关女友保拉·班霍策尔 (1901~1989) 的诗。布莱希特称她为“碧 (Bi)”，甜蜜中带着苦涩的女人 (die Bittersüße)：年轻的姑娘们不爱我们，F调浪漫曲的女听众和保拉！虽然战争进入了惨绝人寰的最终阶段，但布莱希特关心的只是保拉要或者不要的问题，还给她写了一些含沙射影的诗。“甜蜜中带着苦涩的女人”这一名字就点明了两人关系的矛盾性；这里布莱希特引用了萨福 (Sappho)^[13]的诗，女诗人用这一词语概括性地形容爱情：“情欲一再折磨着我/消融了我的肢体，凝固了血液/甜蜜中带着苦涩。不可控制。一头野兽。”布莱希特应该从保罗·克洛岱尔 (Paul Claudel) 的《交换》 (*Der Tausch*) 中得知了这个概念，这部戏剧是有关伴侣交换的，布莱希特向日后的情人 [保拉、海达·库恩 (Hedda Kuhn)、玛丽安娜·佐夫 (Marianne Zoff)] 都赠送了此书——显然是拐弯抹角地为了他自己1919年末至1920年初开始的乱交寻求文学上的支持。在慕尼黑的一间旅店房间内，野兽出现了，以布莱希特的形象在保拉半梦半醒之间“突袭”了她——一如保拉自己所写，并向其证实——碧直至高龄都深信这一点——自己在性事上“极度笨拙”。这大约是1918年6月的事情。之前布莱希特成功地通过他乐于进行的长谈阔论，使五名情敌同意不再纠缠碧。

1917年9月末，布莱希特在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街（Maximilianstraße）卡斯帕尔·内尔的姨妈那里租了一间房，以便10月攻读医学系。布莱希特自己制订了每周至少24课时的计划，这份雄心虽然令人惊叹，但从始至终都只是一纸空文。虽然布莱希特日后仍不时卖弄自己的医学知识，但他早就决定，选择慕尼黑作为自己作家生涯的起点。他只是客居慕尼黑，仍然把自己在奥格斯堡的阁楼看作根据地，而且时常返回探望。他在慕尼黑的新女朋友也经常被带回奥格斯堡：海达·库恩。

开始医学学业其实是一种策略。既然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布莱希特希望能借助医学学习逃避服兵役。因为一据官方说法——“存在对军医和医疗服务人员的巨大需求”，所以最高陆军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tung, OHL）展现了对医学大学生的“特殊兴趣”：“因此，医学专业得到了民事和军事官员的广泛支持。”这一说法出现在1917年6月1日的《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但布莱希特在本该学医的时间里坐在了阿图尔·库彻尔传奇般的讨论课上，库彻尔习惯自称“戏剧教授”。布莱希特期望在课堂上遇到日后文学上的工作伙伴。库彻尔的课极具特色，它研究当代文学，并喜欢把原作者请来课堂。例如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便曾于1917年秋前来朗读戏剧《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片段。1915年时布莱希特就购置了《韦德金德之书》（*Wedekindbuch*, 1914），并在书中画线标注了大量的语句，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的崇敬之情。

首先出现的却是一位女性，上文提到的海达·库恩，她确实是在攻读医学专业，但也去听库彻尔的课，布莱希特立即对其展开了追求，渐渐赢得了芳心。布莱希特在1920年2~3月间第一次到访柏林，海达为她在弗兰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那里找到了住处。海达在布莱希特1920年的《诗篇》（*Psalmen*）中以“He”的名字出现，但

此作并没有美化她，而是把她描绘成一个水性杨花的妓女，他，也就是诗中的抒情主体，“直至她死去的16个月后”，仍想把她当情人一样占有。

海达·库恩十分自信，也十分自立，因而她从不屈从于布莱希特的要求，而是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与布莱希特在诗中对她的描绘并不相符。但是布莱希特最特殊的诗集或许要归功于她，其中的散文诗借用了《圣经》中的《诗篇》卷，但同其又有云泥之别，诗歌用宏伟壮丽的图像赞颂了爱情和性。布莱希特总可以将本质上平庸的事物同宇宙般宏大的维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同时并不涉及任何超验的领域：“我知道：我爱得太多了。我填满了太多的身体，消耗了太多橙色的天空。我应该被灭绝。”诗句将性爱场面同橙色的天空联系起来，这样的天空颜色在日落时分确实会偶尔出现，抒情主体还把与女人的关系等同于与天空的关系，而且它都像消费品一样是要索要报酬的，这些抒情主体皆无法支付。对他来说只剩下死亡，这正是他乐意忍受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自然图像，其中多数出自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并把自然界的生长视同为性能力。

还有那士兵，就像他曾学过的/踢腿走正步

入伍合格：背后一刀^[14]

1918年1月14日，布莱希特必须为服兵役再次进行体检。他决心已定，要尽一切努力不去前线，方法之一就是提出自己所患有的心脏病当时还没有痊愈。布氏的父亲也支持他，并提交了申请书。布莱希特很可能因此“作为能长期在卫戍部队服役的卫生兵”被征召入伍，没有刻不容缓地被送往战场。与此同时，他形式上继续在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München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作为医学学生注册学习，并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5月初，布氏的父亲

再次向“奥格斯堡征兵委员会民事主席”提出申请，希望在学校授课期间准予休假；这次申请也得到了批准。第三次申请在夏季，但遭到了驳回。布莱希特必须自1918年10月1日起开始服兵役，这意味着首先要参加8周的军训。布莱希特给海达·库恩写了一条简短的消息：“请您把这页纸交给我的朋友赛茨。我不能来了。我将在周二被埋葬。贝尔特·布莱希特。”阿道夫·赛茨（Adolf Seitz）是布莱希特儿时就认识的朋友；为何单单要通知他，原因已经无从知晓。布莱希特幸运地被免除了军训，或许是因为他父亲在城市里善于经营各类关系。布莱希特被分派到奥格斯堡的预备役野战医院D科室，担任患性病士兵的“伤员看护”。

布莱希特由此再次接触到了社会的双重道德，这里大多数患者都是“风流艳遇”的牺牲品，或者是由于前线的妓院，甚至战争中由于性饥饿而进行的同性性行为。在D病区，一切都不容掩饰，社会的真实面目显露出来，也为布莱希特提供了充足的进行嘲讽的理由：他创造了诗歌《D病区公子之歌》（*Lied an die Kavaliere der Station D*）：“啊，爱情的火焰燃烧着你们/当你们年轻、热情如火之时/你们同妓女云雨/这就是他的方式。”据汉斯·奥托·缪斯特尔回忆，本诗共3~4节，采用了叠句的韵式：“啊，女人们，我的天呀！/爱情是邪恶的，但更邪恶的是淋病的灼伤！”描写性爱场景的语言也血腥得引人侧目，在《青年和处女或大调禁欲谣曲》（*Der Jüngling und die Jungfrau oder Keuschheitsballade in Dur*）中也运用了这样的语言，“把她放在楼梯上/一同击打”，直白的口语表达将女性定义为妓女，将其确定为两性中的下等人：性交也是不平等两者之间的交易。同时布莱希特也机敏地影射了此类所谓无伤大体的过失，虽然会产生不良后果，但犯错时人们缺乏过错意识。通常情况下，女性是这类“不损失名誉的过失”的受害者，18世纪，女性发生婚外性行为还会以“淫乱”的罪名受到迫害，但军官引诱平民之女却不会面临任何法律制裁[参见伦茨（Lenz）的戏剧《士兵们》（*Die Soldaten*）]。

但这里显然是这些风流军人成了受害者，因为他们听命于患性病女人的摆布。“茨威利斯”进行反击，布莱希特也掉转矛头，对那些风流军官发泄着指责。

作为卫生兵，布莱希特一定是享受了某些“特权”，因为他从来没有穿过正规的军装，而且也不用遵循军队纪律。与此正相反，他在医院趾高气扬地穿着黄色的低帮鞋、高腰裤和毛衣，称呼他的上级一预备役高级军医拉夫医生（Dr. Raff）—“同事先生”，而这位“同事先生”也毫无异议地容许布莱希特的行为。布莱希特还让父亲的侍女送交需要完成的病员汇报，对此，拉夫先生也曾向老布莱希特提意见，但或许并不十分认真，布莱希特也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但见证者称，他们十分惊异布莱希特何来勇气完成如此“不可能”的举动。1919年2月9日布莱希特被正式解职，他剪下来的“证明”上评价其服役期间的表现为“优秀”。

凭借《死兵的传说》，布莱希特阴暗的反战诗崭露头角，也获得了长久的名誉，这首诗符合他对战争的设想，但这无论是1917年还是1918年，都并非他在前线的经历，而是受到挚友卡斯帕尔·内尔的触发。布莱希特不间断地给内尔寄去信件，在信中恳求内尔要不惜一切地去脱离前线兵役。因此，布莱希特对朋友的呼唤也极为独特。他享受着奥格斯堡的田园风光，战争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因为涉及朋友而存在：“争取吧，让你下个星期就能回来！这能行的。我已经到处询问了。这一定能行。在前线一年真的是太多了。你要大吵大嚷一次。……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的美好：蓝色的、美丽的、炽热的太阳！天空！夜晚！茉莉花如此芬芳！在菩提树的树梢上，大熊星座在闪烁摇晃！去莱希河游泳！森林！林荫大道！我的房间，夜晚！你不想坐在我的沙发上吗？我想给我的吉他调音！冰激凌店！灯笼！甜蜜中带着苦涩的女人（现在我完全占有她的。如果“那事”有什么后果，我该

怎么办？捣蛋鬼，给我回信吧，把相关的事告诉我！快点儿！）还有艺术：我的戏剧！歌！故事！”这是1918年7月初。

此时德国人已经完全输掉了战争。8月8日标志着德国国防军“黑色的一天”，他们在索姆河全线受挫，再无力抵御敌军。最高陆军统帅部（OHL）“第一军务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其实位列兴登堡（Hindenburg）之后，但一定程度上是作为独裁者在实施统治——不愿在公众面前承认失败，因而开始采取逃避策略。一方面，继续宣传要坚持战斗——鲁登道夫提出把剩下的所有逃避责任的人都送往前线，另一方面，秘密同德皇顾问谈判，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在德国实现民主（议会君主制）。布莱希特显然洞悉此事，他如此评论《死兵的传说》的创作过程：“在战争期间为死去的士兵抒写了谣曲。1918年春，帝国将军鲁登道夫最后一次在整个德国挨门逐户地搜寻人力资源。无论17岁还是50岁，都被套上制服，送往前线。‘kv’一词本意为‘入伍合格’，如今，它令数百万的家庭无比恐惧。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他们甚至要把死者从坟墓中挖出来服兵役。”

鲁登道夫散播谣言，能够争取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做出（对德国有利的）和平方案，在此背景下，9月30日，德皇下令实施议会制。威廉皇帝宣布：“我希望，德国人民决定比以往更积极地为祖国的命运而奋斗。因此，这也是我的意志，那些人民所信赖的能人志士们，要大规模地参与到政府的权利与义务中。”威廉皇帝并不知晓，他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这应该是对议会制——至少在德国——的最大欺骗，最为阴险，后果也最严重。他没有看穿鲁登道夫的阴谋，鲁登道夫放弃自己已经无法再维持的权力，企图推卸所有责任，让新成立的政府承担战争的严酷后果。

在这一政治事件中隐藏了日后“背后一刀”论调的内核，对德国的政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也为纳粹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因。由于宣传坚持作战所产生的影响，民众会有如此印象：德国的军队仍坚守在敌国境内，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因而把战争失败和“凡尔赛耻辱的和平”的责任都推给了新议会政府，尤其是社会民主人士。1919年11月8日，兴登堡面对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把军事溃败一方面归结为秘密而有计划的“海陆两军的解体”，另一方面，引用一位英国军官的话，德国军队遭遇了“背后一击”的暗算——即采取停战措施的政治家。

人民代表会议（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组织成立临时政府，当12月10日接待返回柏林的野战部队时，艾伯特说“没有敌人能够战胜你们”，如此的言语证实了这位社会民主人士对当时的战事所知之少。德意志不可战胜的神话，在200多万阵亡的德国士兵、近300万的重伤员和数十万饿死的平民面前，在整个国家被战争洗劫后的一片废墟面前，无一字是真。但没有人意识到这样的谎言，因为战争结束了，其他的问题随之出现。1921年，普鲁士储君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米·鲁登道夫（Emil Ludendorff）共同发表了荒诞的通告《胜利触手可得——前线溃败的真实鉴定》（*Der Sieg war zum Greifen nahe. Authentische Zeugnisse zum Frontzusammenbruch*）。1925年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兴登堡成为国家总统。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死兵的传说》的震撼力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布莱希特如同高坐在陆军最高统帅部正中，记录了高层的罪行，这是在整个德国历史上至今从未出现过的罪行。整首诗充斥着冷嘲热讽，不仅从根本上针对战争的罪人，而且也针对所有参与战争的人，或者所有无作为、忍受谎言而不抗议的人，所有继

续沉浸在国家沙文主义之中而自鸣得意的人。根据威廉帝国时期的官方语言，要给在战场一“荣誉之地”一上的死者特别的庄严与隆重，被击倒的人因而被称为“阵亡者”，须赋予“英雄”头衔，从而给这场屠杀添加了传统上威严、牺牲、庄重、光辉的色彩。与此相反，布莱希特的诗却以看似荒诞的夸张手法，描绘了战犯们头脑中真实的想法。他们随意决定同胞的生死，仿佛是在处置一件无关紧要的玩具，这从“骑士”或者“刀剑”等语言的运用就显而易见。由于魏玛共和国其实是旧帝国的延续，并没有对这个旧垃圾场进行整理，布莱希特《死兵的传说》作为保守派和反动派坚固的障碍，时到今日依然能引人敬畏。

布莱希特亲自为本诗编曲，它同时也可谓是布莱希特一生的“事业之诗”，因为本诗以自身独特的方式陪伴了布莱希特一生，并帮助他获得了德国历史上无法磨灭的地位。首先，这首诗为布莱希特赢得了德国卡巴莱^[15]戏剧史上稳固的位置，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舞台的“热门”之一。之后，1923年希特勒首次政变，纳粹即把布莱希特的名字写在了“攫取政权”之后要逮捕之人的名单上，而且排在显赫的第五名，对此这部谣曲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同年，《柏林地方报》（*Berliner Lokalanzeiger*）的“巴伐利亚国家报媒体讯”

（Pressenotiz der bayer. Staatszeitung）Nr. 30 v. 6. 2. 23批判柏林的德意志剧院“不知礼节，因为在他们的期刊里发表了布莱希特的《死兵的传说》”。1932年9月2日，慕尼黑警察局在回复柏林警察总局询问的密函中暗指《死兵的传说》：“事由：共产主义运动”，“B. 的文章在道德上水平极低，作者借此攫取大量利益。”1935年，纳粹又借由本诗取消了布莱希特的国籍。“内务部6月8日的指示”中还写道：“他拙劣的作品诋毁德国前线的战士，可见其思想之低劣。”1950年代，此诗又被作用于抵制西德重新武装的运动中。

这谎言如此完美，这如何能不存在？

神正论：唯物主义

很早就得以证实，布莱希特拥有坚定而毫无争议地代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其作品《神之颂》（*Hymne an Gott*）终结了所有在意识形态层面关于布莱希特世界观的讨论。1917年布氏一与《失望者的天空》（*Der Himmel der Enttäuschten*）（影射尼采）同一时期一创作了此诗，当时他年仅19岁，正值战争弥漫的年代，同时，表现主义虽然被战争遏制了影响，也占据了文学舞台。这首颂歌是对基督教之神的清算，没有同尼采一样否定其存在，而是出于很多值得注意的原因立足于神本身。

1

在昏暗的深谷里，饥饿者已逝。

而你向他们展示着面包，任由他们死去。

你庄严地高坐，却无人可见

在恒久的命运之上，闪耀而残忍。

2

你让年轻人和安乐者死去

而那些渴望死去的人，你却不允……

那些腐朽的人中，很多

信仰你，并在深信中死去。

3

一些年，你让贫困者贫困

因为他们的渴念比天空还要美丽

可怜在你的光芒到来之前，他们已死去，

他们安详地死去，并立即腐烂。

4

很多人说，你并不存在，这样更好。

但这谎言如此完美，这如何能不存在？

许多人都赖你而生，无法以别的方式死去——

告诉我，你不存在——它的反面又是什么？

这首颂歌是献给神的，庆祝神的，并把神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诗歌（当然只是看似）讨论了神正论的问题，为神辩护，万能慈悲的神面对人间的悲苦，诗中的社会问题几乎不具有时间特性，而是普遍性的。当饥饿的人在“昏暗的深谷里”死去，神却端坐在高空，得以永生，无人可见但闪耀光辉（同“昏暗”相对）。另一组对立出现在“闪耀”和“残忍”之间：基督教之神作为善和仁慈的象征，却是自负而冷漠的，因而也不会去履行基督教思想和神行的许诺。

这一矛盾在接着的诗节中得到了扩展和激化，强调了人对神的信仰和现实中无结果的死亡之间的矛盾（“腐朽”“腐烂”）。第二和第三诗节间接地说明，超验的诺言不会得到兑现。渴念比天空还要美丽，神到来得太迟，无法拯救逝者。第四诗节并非就神是否存在的原则性问题提出讨论，而是引用了传言，根据传言，神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抒情主体的语言表达值得注意，诗句以转折强烈的“但”开始（试比较第一诗节中的转折），两次轻蔑地称神为无名的“这”

[单音节词“Gott（神）”也能符合本诗的韵律]。这表明：抒情主体在语言上坚决同个体化的神保持距离——神只是不可确定的、无人称的“这”，但同时为其存在而辩护。其原因不是超验的，而是在经验之内的。在这个世界上，神是无法不承认的欺骗性事物，还有很多人靠其生存：教师、牧师、国王、战士或者总统，等等。

提出关于形而上的神是否存在的问题是错误的，因此抒情主体最终又（幽默地）将这一问题交还给神本身。结论是：这并非信仰的问题，诗中也没有任何地方谈及信仰；也不是虚无主义的问题——对青年布莱希特来说，虚无主义因尼采而得到了依据；而是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要求之间的矛盾。按照布莱希特虚无主义的观点，德国人只有“非信仰（Unglaube）”的概念，其变体是“脱离了神的信仰（Glaube ohne Gott）”（应一直如此），无信仰的人因而也成了信徒。对神的问题完全无兴趣并非毫无意义，而是意味着至少没有提出错误的问题。布莱希特和他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巴尔甘（Bargan）一样，都对神的问题不感兴趣。

这些言语出自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位唯物主义者。诗文中的论述正好体现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唯物主义的批判，这场批判本应以“虚无主义讨论”彻底结束[“虚无主义讨论”发生于1845~1846年，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中得到了概括总结]。这无关超验的神[也无关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谓的“超越一切范畴的无家可归”]；这是费尔巴哈和其他思想家要将神作为一缕轻烟驱逐出现实世界。这一问题更应该是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还是其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怎样在社会现实中被击败，以及怎样在物质上也被击败。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极端唯物主义有显著区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但意识到，而且承认了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物质基础，因为，不论它如何蔑视人类，这一物质基础的存在既不能由于道德原因也不能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被否定。论据也极易援引：基督教和他们的神在物质形态上存在于教堂、教会机构、财富以及与财富息息相关的政治权力中。这在战争年代更加蔑视人类，因为在战争年

代，各方面都在要求庇佑自己的祖国。基督教的精神存在于法典和道德观念中，存在于折磨孩子们的教师的头脑中，也存在于宗教斗争中，导致了不计其数的各种牺牲。是否存在形而上的神，这在最终面临物质权力时，已经完全无关紧要。

但青年布莱希特同尼采不同，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没有出于这一观点而决定同基督教决裂，而是选择利用它，或者在需要的时候令其物尽其用，并且暴露其弱点。20世纪，除了信奉基督教的诗人之外，没有其他现代诗人像布莱希特一样，令西方基督教传统在其作品中扮演了如此支柱性的角色。但布莱希特用唯物主义重新阐释或者颠覆了基督教的精神。《三毛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的整体情节也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相呼应，只是这里的告密者是妓女珍妮

（Jenny），而她告密检举的是个强盗；这同渎神无关。神作为神或者作为个体并不存在，也对人类漠不关心，但神也并非否定、亵渎和嘲讽的对象。在这一点上，布莱希特同托马斯·曼不同。曼的写作采用传统的模式，意欲证明这一模式如今依然有效；而布莱希特采用这一模式，是为了展现它失去了任何有效性，因为早已出现新的形势。而新的形势扬弃了这一模式，即按照黑格尔的思想方法，否定、保存和提升，也就是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

衣裙下你们皆是裸露的

巴尔：剥夺个体主义的权力

大学阶段最初的几个学期，布莱希特不断往返于奥格斯堡和慕尼黑。1918年3月30日，受到库彻尔戏剧讨论课的激发，布莱希特在慕尼黑室内剧院（Münchener Kammerspiele）观看了汉斯·约斯特的《孤独者——一场人类的覆灭》（*Der Einsame. Ein Menschenuntergang*，简称《孤独者》），这是首轮演出的第一场。布莱希特曾向卡斯帕尔·内尔透露，“我想写一部关于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

的戏剧，他是15世纪布列塔尼地区（Bretagne）的谋杀者、街头强盗和吟游诗人”，这一计划在观看这出戏之后更加具体化。除了维庸之外，布莱希特还可能提及了兰波（Rimbaud）、魏尔伦（Verlaine），还有韦德金德，他们都像维庸一样，写作和生活的方式皆违背当时社会的规范，为布莱希特提供了现代诗人的原型。在约斯特的戏剧中，布莱希特找到了可以借之进行情节建构的人物图谱，还有可以构思不同布局的素材。约斯特的戏剧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其中某些部分的性描写（酒馆情景）对那个时代来说极为直白——讲述了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葛拉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 1801~1836）的生与死。平庸的社会并不认可葛拉伯的才华，迫使其一再遁入孤独，而孤独又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前提。他短暂的一生，生命的覆灭，是葛拉伯为其创作的超前性付出的代价。四周之后，剧本的打字稿就完成了，布莱希特还让汉德工厂的女秘书抄录了一遍。

1918年夏季学期，布莱希特选修了“当代文学文学性批判实践练习”（Praktische Übungen in literarischer Kritik über die Literatur der Gegenwart），阿图尔·库彻尔的这一教学活动标题极为繁琐。课程主要处理1918年初出版的通俗小说《安布罗斯·玛利亚·巴尔》（*Ambros Maria Baal*），它的作者是奥地利表现主义作家安德利亚斯·托姆（Andreas Thom），小说由于其“色情”和“不道德”内容在当时引发了轰动。托姆的巴尔生活富足，但无所事事又自私自利，他是个唯美主义者，但又是懦夫和罪犯，托姆还同自己的仆人弗兰茨保持着同性关系，弗兰茨崇拜、爱慕着托姆，并陪伴他始终。在小说中，布莱希特找到了所需的材料，用以建构自己的巴尔形象，揭露社会的双重道德标准，树起了非道德的旗帜。这不仅在批判托姆，托姆笔下可憎的人物形象是对社会道德堕落的痛斥，也是在批判约斯特，约氏的唯美主义要求阻止了直接的批判。库彻尔在课上指摘托姆色情文学的粗制滥造，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急功近利的目的。他还认为国家应该没收滚滚流入这个卑鄙之人口袋的薪酬，以实施惩

罚。虽然库彻尔有过这样道德上具有侮辱性的言辞，但1918年夏，布莱希特还是给了他新版的《巴尔》，望给予批评意见；这份评论结果定是不如人意，因为布莱希特对“死鬼库彻尔”反应激烈：“他给我写了关于《巴尔》的评定，呸，他是我遇到过的最肤浅的家伙。”

布莱希特开始寻找新的鉴定者，或许是由于《孤独者》，他猛然想到了汉斯·约斯特。约斯特生于1890年，借该剧实现了作为舞台编剧的突破—尽管（或由于）他的成名作中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情绪—跻身为德国当时重要的戏剧家和表现主义者。除这部年少成名的作品外，约斯特的文学作品可谓乏善可陈，他日后沦为希特勒豢养的诗匠，同威尔·维斯佩尔（Will Vesper）一样写出了最令人作呕的希特勒颂诗。布莱希特试图在知名者中站稳脚跟，成就自己的事业，尽管他必然在美学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保留，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去推销自己。布莱希特给约斯特寄去了1919年版本的《巴尔》，其中已经大幅删减了这部戏和《孤独者》的关联之处。为此，布氏1920年7月9日还前往施坦恩贝格湖（Starnberger See），约斯特在这里的上阿曼斯豪森（Oberallmannshausen）有一处居所。起初约斯特并没有对寄来的剧本有所回应，布莱希特在1920年1月中旬的信中挟恨写道：“关于《巴尔》您没有给我回信，我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如果您说《巴尔》和我今后若有兴致所写的一切都是糟粕，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您一言不发，那么我认为，您希望我受到应得的羞辱。请原谅我冒昧来信，天正在下雨。”当布莱希特在慕尼黑建立起关系纽带之后，他才最终放弃了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但对表现主义的评价，他早在1918年6月写下第一版《巴尔》之后就直接表明了：“表现主义是可怕的。所有对美丽圆润的或者健壮有力的身体的感觉都枯萎了。精神全线战胜了生命力。那些神秘的、深邃的、肺癆般的、虚夸的、狂喜的都膨胀开来，一切都散发着蒜臭味。我会被驱逐出这个高贵者、理想者和思想者的天堂，这些斯特林丘和韦德银德们^[16]。”

关于“巴尔”名字的由来有诸多的可能性。《旧约》中众神之一的巴尔和托姆的《巴尔》都可能是命名的原由，另外，“巴尔”在表现主义作品中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参见保罗·蔡希 (Paul Zech) 1914年的《巴尔的牺牲》 (*Baalsopfer*)，或者格奥尔格·海因姆 (Georg Heym) 1911年的《神之城》 (*Gott der Stadt*)]；而且黑贝尔 (Hebbel) 的《朱迪斯和霍洛弗纳斯》 (*Judith und Holofernes*, 1849) 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另外，还曾有一名嗜酒的诗人，名为约翰·巴尔 (Johann Baal)，他经常混迹于奥格斯堡老城的各个酒馆，朗诵诗歌或者喧哗吵闹。虽然父亲担忧儿子会受到不良影响，曾对此发表过看法，布莱希特还是在1917年底或者1918年初与他相识，但这位巴尔3月又消失得杳无踪影。布莱希特在早期作品中多次使用关于自己家乡的人或事 (最广义上) 的素材，因此，这位真实的巴尔在作品的命名上至少起了部分的作用。

问题是，布莱希特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作为了笔下反英雄 (Anti-Held) 的范例。两者显然存在着某些联系，但他们都流于表面，特别是布莱希特和巴尔不同，布氏已经开始在社会生活中立足，对巴尔沉陷其中的孤独更是深恶痛绝。但布氏确实把自己带入到戏剧中，《人就是人》 (*Mann ist Mann*) 或者《家庭修身集》中的含义也被提前到此处，他让巴尔朗诵的诗歌便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1918年第一版中的《妓女伊芙琳·茹的传说》 (*Die Legende der Dirne Evlyn Roe*)、《巴尔之歌》 (*Baals Lied*)、《伟大巴尔的赞美诗》 (*Der Choral vom großen Baal*)、《夜空云朵之歌》 (*Das Lied von der Wolke der Nacht*)、《林中之死》 (*Tod im Wald*)，等等，以至于这部戏可以被称为歌舞剧。除此之外，巴尔的在市民观念中的堕落也是由卡巴莱场景表现的，为此布莱希特还特意安排了一名女歌手演唱这一段曲目。从《巴尔》开始，布莱希特就离开了传统戏剧，他在娱乐工业中寻找观众，剧中卡巴莱的自指性 (Selbstreferenz) 和蒙太奇场景都在实验新的戏剧技巧。

布莱希特这一时期感兴趣的题材究竟是什么？此时经历的不但是德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蔑视人性的时期，但剧中并没有对此有任何反映。相反，它给人的印象是威廉二世晚期最美好安乐生活的轻快，和对最新表现主义文学的享受 [例如奥古斯特·斯特拉姆 (August Stramm) 的作品]，戏剧开端的夜宴场景就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点。1926年3月，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 (Hugo von Hofmannsthal) 在约瑟夫城 (Josefstadt) 的维也纳剧场 (Wiener Theater) 把该剧搬上舞台，正是他明确指出了本剧的时事指向性在哪里，而且恰恰是在霍夫曼斯塔尔为本剧添加的序幕《新戏剧》 (*Das Theater des Neuen*) 中。此处，霍夫曼斯塔尔将该剧理解为时代在表达从个体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愿望：“我甚至可以宣称，大家12年来经历的一切欧洲的灾祸，全然都是欧洲个体主义在用一种繁琐的方式为自己的厌世概念自掘坟墓。”

这种论断虽并不完全正确，却精妙概括了一战的影响：市民个体主义彻底瓦解，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此幻灭。个体主义和范例式的行为与痛楚为市民文学提供了蓝本，而凡尔登 (Verdun) 和阿拉斯 (Arras) ^[17] 让市民文学在真正意义上终结了。那些杀人机器没有经过良知天平的衡量就被投入使用，机器将人类屠杀或者撕扯成残废，这让一切的道德标准都失去了效力 (如果曾存在过人性的道德标准的话)。

布莱希特的《巴尔》再次令这样的个体主义恰如其分地得到了展现。此剧首先借助巴尔退出上流社会，而后通过他同女性的关系和巴尔最终的死展现了越来越深的孤立，而这种孤立无法一像约斯特笔下的葛拉伯 (Grabbe) 那样一令巴尔获得提升或者督促他进行更高级的创作 (剧中的巴尔其实一直无所事事)。此剧以只关注自己、不与社会往来的人及其绝对的“爱无力 (Liebesunfähigkeit)” 为主题，并借此说明，无法对自主自治的个体主义提出社会性要求。而这一矛盾

毫无出路。留在城市中意味着要遵循城市的法则，失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而逃离（回）到自然之中同样不可行。当巴尔最终行将就木，他逃入丛林之中，也就是伐木工最终将“茨威利斯”覆盖性地引入世间之地。他们永久而彻底地消除了某一个体自然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期的表现主义将个体主义视为重新觉醒，而此处它却只是虚幻。而新的人类呢？只不过是生涩的、脱离真实的幻影。

1918年还有了第一部重要诗集——《贝尔特·布莱希特和朋友们的吉他伴奏歌》（*Lieder zur Klampfe von Bert Brecht und seinen Freunden*）。诗集的题名便是纲领，布莱希特派的纲领，他们认可了布莱希特居首位的作用，并共同致力于诗歌的传播；因为这些诗——例如其中的经典作品《巴尔之歌》、《小歌》（*Kleines Lied*）和《少年和少女》（*Der Jüngling und die Jungfrau*）——在1988年第一次作为诗集出版之前便已广为人知，而这仅靠布莱希特一人的传诵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1922年，同龄诗人、慕尼黑室内剧院剧评家兼导演奥托·扎雷克（Otto Zarek）在《德意志戏剧报》（*Blätter des Deutschen Theaters*）中毫无保留地称赞了布莱希特的诗：“贝尔特·布莱希特是拜仁州人。这位如今年仅24岁的诗人，其作品创作于一座处于昏睡中的小镇，它梦着回忆，外围被工厂环绕，距离慕尼黑不到一小时之遥，出于对自己啤酒和报业的保护，这里没有引进慕尼黑啤酒和《慕尼黑新报》（*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更不用说慕尼黑的艺术理念。在奥格斯堡，贝尔特·布莱希特创作了自己的吉他曲，找到了魔鬼般闪烁的旋律，即使没有出版社愿意将这样伟大节奏的音符公之于众，这样的曲调也会深入人心，并长久留存其中。这里，一个小时之外，远离刽子手和韦德金德的城市，蓬勃生长了原始的力量。”事实上，这些诗歌不追随任何文学流派，而是通过其坚毅的品质证明了自己。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布莱希特的编排，但在流传中，它们音乐的力量征服了众多的人，成了无名的诗歌财富。

报馆区的浴血奋战，或者，

一个男人的自我辩白

被出卖的革命：系扣的靴子

布莱希特1919年开始创作戏剧《夜半鼓声》，《死兵的传说》在其中更名为《死兵的谣曲》（*Ballade von toten Soldaten*），配有杜撰的献词：“纪念步兵克里斯蒂安·古鲁贝斯（Christian Grumbeis），生于1897年4月11日，1918年复活节前一周在卡拉辛（Karasin，俄国南部）辞世。愿他安息！他坚持了下来。”献词意喻讽刺，再次指出了战争的无意义，也讽刺了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基督教委婉语，克里斯蒂安的名字和复活节前一周都绝无异议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同基督受难有松散的联想，但这里展现的却是惨绝人寰的屠杀。战争中“坚持下来”的宣传造就了将要面临的死亡，而在复活节应有的（肉体的）重生再也无有时日。

帝国的本质其实仍在延续，一战结束后，即刻发生了1918年的11月革命，进而是1919年1月对斯巴达克团起义的血腥镇压，新的共和国在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都巩固了旧帝国的本质。此剧的故事发生于革命风起云涌的1919年1月8日至12日的某一天夜晚（很可能是11日到12日的夜间），在这部被誉为革命戏剧的剧作中，革命其实仅仅在背景声音中出现，而矛盾主要是围绕生意展开，更确切地说是围绕巴里克一家的篮子工厂和工厂的继承问题展开。

安娜·巴里克（Anna Balicke）是资产阶级的女儿，父亲拥有一家工厂，她同士兵安德里亚斯·克拉克勒尔（Andreas Kragler）已经订婚，但克拉克勒尔在奔赴战场后一去不回。这期间，父亲提拔伙计穆尔克（Murk），她同穆尔克发生关系，并怀有身孕。父母催促两人订婚、举行婚礼，以便理顺未来的关系。订婚的队伍在前去祖国咖啡

馆的途中，克拉克勒尔突然出现，要求未婚妻回到自己身边，但无果而终。他被打发走，心灰意冷，在小酒馆里遇到了要前往战斗激烈的报馆区参加革命的人群，并加入了他们。在去报馆区的途中，克拉克勒尔遇到了寻找他的安娜，安娜并不爱穆尔克。克拉克勒尔随即选择了安娜和那张“白色的、宽大的床”，拒绝参加革命。

克拉克勒尔由于被拒绝而极度失望，他因此临时决定参加斯巴达克同盟^[18]，这样的举动绝非基于革命性。小酒馆里聚集的人群中没有一名工人（1919年的版本亦是如此），而是由一群酒鬼和两个妓女组成，依靠这些人是无法进行革命的，剧本因而也没有对其进行人物刻画。与之相对，确凿而真实的事物则是篮子工厂。战争期间，巴里克一家靠制作装载弹药的筐子而发了大财，所以父亲甚至不明是非地说：“战争是我们的幸运”，穆尔克也参与了这些生意，他用“系扣的靴子”的意象残酷地描述这一切：“必要有一双钉有钉子的靴子，和一张不会抬起张望的脸。”尸横遍野的路是尚武思想对战争的理解，这也被父亲巴里克称为“平和的工作”，但“无秩序、贪婪和对人类尊严野蛮的剥夺”一指的正是那些为了贯彻更人道的新社会秩序而作出的努力——阻碍了这样的工作。令资产阶级有些许畏惧的仅仅只有这一点，但他们仍指望能有一些像他们一样值得尊敬的人来击溃那些乌合之众。他们甚至准备用婴儿车来替代弹药筐，因为下一次战争仍需要弹药补给。大发战争财的人能够在接下来的通货膨胀中继续自己的掠夺，将新诞生的共和国引向毁灭（那时他们将又会大赚一笔）。那些像克拉克勒尔一样真正为战争出头的人，被宣告已故去，被排挤，因为他们影响了美好的图景。安娜的不离不弃让克拉克勒尔意识到了机遇，选择同她一起继承工厂：“我的身体在贫困潦倒中腐朽，而你们的理念飞向天堂？你们是喝醉了吧？”剧中没有任何政治上左倾的或者革命性的口号，也没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唯一有的是低俗小说中常见的感伤的爱情故事，稍显杂乱无章。

简要回顾一下德国的革命，这历史上最奇特的革命也以奇特的方式结束。那些领导革命的人，原本要应对已经失势的暴力强权，但他们最终背叛了自己的民族，维护了军队的权力。首先，新的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失职，他自10月3日起（自上而下的革命后）领导议会政府〔其中便有社会民主党首脑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向美国总统提交了同鲁登道夫一起商谈的停战协定，但在德皇不退位的条件下威尔逊不愿接受这个申请。因此，战争虽然继续，但鲁登道夫10月26日遭免职后，马克斯·冯·巴登不得不剥夺几乎整个最高陆军统帅部的职权和所有帝国上将的职位。马克斯·冯·巴登还由于患流感不仅错过了协约国占领佛兰德（10月26~30日），也错过了基尔的海员起义（10月30日），海员拒绝出海抵抗英国海军。在今天的历史课本里，拒绝出海仍然被记录为“哗变”，即海员的犯罪行为。

谢德曼11月9日宣告共和国成立之后，马克斯·冯·巴登将他的职位交给继任者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最强大政党德国社民党的领袖。由于德皇被迫逊位，艾伯特翌日便同从社民党分裂出的左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组建了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相当于一种过渡时期的政府，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行使职权。1918年11月10日，艾伯特同鲁登道夫的继任者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协定，保留最高陆军统帅部，并为“维护秩序”组建自由军团。自由军团一律由曾经在前线服役的士兵组成，保卫君主政体，镇压革命，1918年12月起还被派遣镇压左翼势力，因为艾伯特要尽一切之能事破坏苏维埃共和国（他甚至为此考虑复辟君主制）。1919年1月的斯巴达克团起义构成了整个事件的高潮，起义由1月5日占领柏林的报馆区开始。1月8日，艾伯特命令诺斯克（Noske），由自由军团武力镇压起义，1月12日起义被血腥镇压。魏玛共和国期间，军事化的帝国时代仍长时间地遗留了印记。在创作

《图伊小说》（*Tuiroman*）时，布莱希特曾这样描述艾伯特的行为：“他置身于革命的尖端，就像软木塞塞住了酒瓶。”

鉴于这样的事实，《夜半鼓声》中克拉克勒尔的决定只能被视为现实而极为理智的。为什么要为了一种思想（剧中的革命仅仅停留于此）而献身？为什么不确保自己在肉店的份额？克拉克勒尔在剧末将其定义为唯一的真实。矛盾在于，这部戏剧由布莱希特所作，而且作者明显偏袒剧中的主人公，而他又绝非英雄式的人物。《死兵的传说》具有证实效力。酒贩子格鲁布（Glubb）伴着队伍向报馆区行进，阴郁地演唱《死兵的传说》，歌曲被等同于革命，革命因而被阐释为农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杀戮的继续。它们在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关联。克拉克勒尔被“埋葬”于非洲，作为“幽灵”返回故乡，又要奔赴另一场战争——这次是革命。戏剧既没有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也没有从稳固的市民阶层身上期待社会的变更甚至改良。布莱希特总结历史，但没有展望未来，就像剧中的爱情故事，它本是戏剧的主题，却最终单调乏味。

布莱希特在集会中的所见所闻，例如奥格斯堡的独立社民党，都被记录下来，作为日后文学创作的材料。后来在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布莱希特还得到机会出任某类文化部长，这当然不是什么正式的职业。十年之后，布氏写道：“我每日案牍劳形……但我同绝大多数士兵几乎没有区别，他们自然厌倦了战争，但无法进行政治性的思考。”日后，布氏更加坚定地同其保持距离：“那时我在奥格斯堡野战医院当士兵顾问，这只是出于几个朋友的极力劝说，原因是他们对此感兴趣。我们所有人都因缺乏政治信仰而痛苦，我因为原本就缺乏热忱之心而尤为突出。”

1919年，布莱希特创作这出剧本时，根本对革命不屑一顾。同时代的文化对革命也抱有相似的态度。1922年12月20日，该剧在柏林上

演，更名为另类的双标题《夜半鼓声或者安娜，士兵的新娘》

（*Trommeln in der Nacht oder Anna, die Soldatenbraut*）。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演出评论中将其与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的《人群》（*Masse Mensch*）和阿诺尔特·布隆内（Arnolt Bronnen）的《弑父》（*Vatermord*）相比较：“它们是必需的，因而是优秀的。一幕接一幕，谋杀的红光闪耀在舞台。这虽然不是太阳，但它比旧世界的纸灯笼要好得多。前进吧，少年们！”对革命只字未提。

戏剧还另有尾声部分。1953年整理出版《早期剧本》（*Erste Stücke*）时，布莱希特尝试掩盖《夜半鼓声》中所有反对革命的特征。在1953年版本的序言中〔苏尔坎普出版社（Verlag Suhrkamp）认为这份序言有欠恰当，所以它其实在这部两卷本图书的第二次印刷时才得以刊载其中，因此序言的日期也更换为1954年3月〕，布莱希特强调，他没有“令观众改变对革命的看法，像主人公克拉克勒尔一样将革命视为浪漫的。当时我尚不会使用间离效应^[19]”。他原本想删除这部戏剧，但由于它是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予以收录。对于他1953年作出的细小改变，布莱希特解释道：“士兵和小市民克拉克勒尔这一角色，我不可以改动。他相对赞同的态度也必须保留。相对于那些因为浪漫或颜面而革命的人，无产者更能理解那些维护自己利益的小市民，无论他们是最可怜的人还是敌人。”除了一些隐晦的表达，这些改动与剧作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关联。文本中没有一句话能够证实，克拉克勒尔把革命看作浪漫。克拉克勒尔的“浪漫”仅与他在非洲的经历有关，只要他还把自己看作是被排挤的人，这段经历就能暂时确保他的身份。再者，克拉克勒尔不是小市民，而是一位（至少是潜在的）资产阶级；作为安娜·巴里克的未婚夫，他是巴里克家工厂的唯一继承人，而这个事实在战争开始前与安娜订婚时就已经遥遥在望了。

布莱希特以“尚不会使用间离效应”的论断来描述本剧亦不贴切。事实正巧相反，因为“喜剧结局（Happy End）”便是间离的极致。在决定与自己“不贞”的新娘结合之后，克拉克勒尔将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解释为一出“平常的戏剧”：“这些不过是舞台和纸月亮（革命的象征），后面是肉案，只有它才是真实具体的。”然后克拉克勒尔四处跑动，把鼓从河里捞出，“在上面敲打”，他似乎为还在进行的戏剧思考一个标题：“半甘堕落的情人还是爱情的力量，报馆区的浴血奋战或者一个男人的自我辩白……”之后他向观众怒吼：“你们不要看得如此醉心！”“把鼓扔向月亮，月亮不过是盏灯笼，鼓和月亮掉落在没有水的河里。”接着，男人和女人默默走向床边，背景中“高，遥远，苍白，粗野的叫声”响起：柏林报馆区的革命——那枚肉案。布莱希特当时并非不会使用间离手法，他只是缺乏对这一概念的明确理解。

布莱希特最终借《图伊小说》来描写帝国末期和魏玛共和国初期（图伊确切指什么，将会在后文中补述；这里只能说：他们意愿虽好，但由于唯心主义而一事无成，只为最差的解决方式作了贡献）。小说中德国以支玛国（Chima）的形式出现，国内的政治家也披上了支玛国的衣装。“支玛国革命”（Die Chimesische Revolution）一段这样开端：“支玛，中土之国，不曾被描画在任何地图上，深陷于37个民族的战争中达四年之久，此时，政府愕然发现国家出现了气馁的迹象。在敌国战斗的军队开始屈服，国内的民众也开始聚结举事叛乱，很早之前，幸存者就已经只能用纸来埋葬死者，割野草假以果腹。这个政府统治着最驯服的民众，他们的反叛也是温良的，是出于对秩序的偏爱。”之后，布莱希特描写了首都“革命党”（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他们侥幸找到了一位王子（马克斯·冯·巴登）代他们接管革命。但此时“不幸”发生了：王子想表现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把国王流放到了荒漠，到边界外的亲王封地上劈柴。这是“革命党首脑”没有想到的，他们要拯救自己敬爱的王朝。王子如此羞辱国

王不能被宽恕，所以王子痛苦地辞去了职位，“不幸的人”必须自己“担任领导工作”：“一个叫魏魏（Wei-wei）的炉工，一个叫史眉（Schi-meh）的印刷工和一个名叫诺克（Nauk）的下级军官”（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

这些简单的人把自己塑造成图伊们，和妻子一起搬进了王国的办公厅，他们惊异地望着门前广场上欢呼的人群，人们正为了“与自己同类的人能安坐于宫廷”而兴高采烈。魏魏身材矮小，隔着胸墙无法看到他，所以三人中“最英气的”史眉发表了讲话，为首的一句便是：“没有皇帝我们支玛人也能够幸福！”这句话引发了对共和国震天的掌声与欢呼声。史眉“完全六神无主”地回到房间，面对外面的呼声，魏魏和女人们不知所措地看着史眉：“他面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我宣布了成立共和国。’‘什么？’炉工嚷道。‘这是一个误会’，史眉为自己辩护说，他避免直视同僚的眼睛。史眉的妻子放下茶杯，站了起来，给了他一记耳光。”史眉不应该夺取神授的权力，所以他晚上被禁止出现在阳台。魏魏让人在阳台放置了脚凳，这样广场上的人也能看见他了。由于艾伯特，秩序变得高于一切，人们陷入了“真正意义上对秩序的迷醉中”。“就这样，思想的统治以庄严的方式开始了，并持续了14年。”

[1] 北美五大湖之一。

[2] 罗马神话中统治神界和凡间的众神之王，对应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3] 查拉图斯特拉是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的创始人。此处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4] 又译梅菲斯特。

[5] 参见布莱希特创作的诗歌《小夜曲》（*Serenade*）。

[6] 即第二国际。

[7] 奥格斯堡老城区建筑，在10世纪时作为瞭望塔而被修建。

[8] 一系列硬式飞船的总称，20世纪初期由德国飞船设计家费迪南德·冯·齐柏林（Ferdinand von Zeppelin）设计，用途覆盖民用和军用两个领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为兴盛。

[9] 拉丁语，意为“为祖国捐躯甜美而光荣”。

[10] 讽刺贺拉斯应募参加了共和派军队，并被委任为军团指挥。公元前42年共和派军队被击败，他逃回了意大利。

[11] “ist”是“sein”的第三人称单数变位，同时，“sein”还有“存在”之意。

[12] Kommerzienrat，德国1919年之前巨商和工业家的荣誉称号。

[13] 公元前7世纪希腊女诗人，著有许多情诗、婚歌、颂神诗、铭辞等。在她的诗作中，情欲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14] Dolchstoßlegend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论调，认为德国的战败是由于“后方的背叛”，即革命所致。

[15] Kabarett，一种由诙谐的歌舞和幽默的对话、模仿等艺术手段构成的，大多以政治和时事为内容的讽刺性舞台小品。

[16] 布莱希特在这里窜改了瑞典戏剧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和德国戏剧家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名字，用以讽刺表演主义。

[17] 凡尔登战役和阿拉斯地道战是德国在一战中损失最大的两场战事。

[18] 一战使德国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容克地主和垄断资本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但德国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革命政党。社民党在一战期间因对战争和暴力革命的态度不统一而一分为三，其中的左派即斯巴达克团，建于1916年，领导人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17年4月，斯巴达克团作为一个派别加入中间派的独立社民党，后于1918年11月改组为斯巴达克同盟，12月正式建立德国共产党。

[19] 布莱希特常将“Verfremdung”和“effect”组成一个短语“Verfremdungseffekt”，中文意为“疏远效果”，也可译作“陌生化效果”。该理论是布氏为推行“非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新型戏剧，而在戏剧结构、舞台结构和表演方法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并非为了粗糙的现实

来自吉姆拉茨霍芬的犹太男婴：斯巴达克斯

1918年6月，布莱希特和碧（Bi）— 葆拉·班霍策尔一同前往施坦恩贝格湖（Starnberger See），并在此逗留数日，他在此间给内尔写信：“这三天她像公爵夫人一样难以相处，然后便是可恶的担惊受怕，因为她的经期停止了……我希望你能为我祈祷；因为面对一个孩子我将手足无措。”同年8月，布莱希特还像一切都安然无事一般，同弗里茨·格威尔一起在巴伐利亚森林（Bayerischer Wald）夜游，但最晚在年底已经明了，布莱希特的第一个子嗣正要来到这个世界。先前所预言的手足无措没有真的出现，布莱希特立即就承认了自己的孩子，而且—根据葆拉的描述—承担起全部责任，前去拜望葆拉的父亲并提出婚约。葆拉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对他来说，布莱希特目前一无所有，将来也会一事无成，这样的人难以担负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因此，父亲未经女儿同意便作出了决断，这样的安排对上层社会人家的女儿并不陌生。怀有身孕的碧被送往吉姆拉茨霍芬

（Kimratshofen），这是上阿尔高（Oberallgäu）的小村庄，这里有一名助产士名叫瓦尔布加·弗里克（Walburga Frick），与碧的姐姐布兰卡（Blanka）相熟。布莱希特将碧送至此处，并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因为碧的父亲拒绝支付。

保拉·班霍策尔还讲述过这样的趣闻：为了节省公共交通费，布莱希特在隆冬之际曾冒着风雪徒步6小时从肯普滕走到吉姆拉茨霍芬，这位可怜的人到达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暖和过来。为了这样的探望——自然没有再次在暴风雪中，布莱希特每3~4周都会前来，1919年7月30日，孩子分娩时他也在场，之后便兴高采烈地回到奥格斯堡和朋友庆祝。他提前宣布了孩子的出世：“我们的孩子可能首先看到的是农舍昏暗的灯光，听到山羊咩咩的叫声和母牛深沉的哞哞声，就像伯利恒（Bethlehem）的那个犹太男婴，只是当年的男婴是神之子，而他是我的儿子。”

男孩取名弗兰克（Frank），以纪念韦德金德，这自然是早就商定好的。其他的名字来自布莱希特的朋友奥托·穆勒莱塞特和弟弟瓦尔特。保拉是天主教徒，所以弗兰克也同样是，1919年8月2日在吉姆拉茨霍芬为孩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吉姆拉茨霍芬的施瓦宾（Schwabing）”^[1]，祖父母自然未曾出席，但有美食让人大快朵颐，当日也有美酒可以开怀畅饮。即使在饥荒时节，上流市民阶层显然也完全有能力准备丰盛的食材和美酒。回顾往事之时，碧猜测布莱希特可能从这次宴会中获得了独幕剧《婚礼》（*Die Hochzeit*）的灵感。这样的猜测十分符合实际，因为这次洗礼保留下来的照片展现了市民们盛装出席宴会的场景：布莱希特穿西装，系着领带，庄重地坐在桌旁，内尔身着军装位于一旁。弗兰克出生后，保拉自然要照料数周，之后碧就以“正派”好姑娘的身姿回到奥格斯堡，时常前往慕尼黑，以便能在布莱希特的近旁。

布莱希特用尽一切方法希望能把弗兰克带回祖辈的家庭——慕尼黑时期和柏林时期，布莱希特都没有放弃奥格斯堡的居所——这样方便他自己照料儿子。1921年5月15日的日记中，布氏记载了同父亲和玛丽·洛克尔的争执：她一直挑拨，反对布莱希特照顾儿子，“每次我同父亲谈话，她总是跑进来，使我不得不面对她的嘴脸。在父亲那里我听

到的都是她的论调。”祖辈拒绝承认弗兰克，并希望将其交予他人照料，这位女管家也处处阻拦给予弗兰克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庭。

有关洛克尔“小姐”的事情，还有一出闹剧。据记载，1926年6月，汉德纸业的职员和工人向企业所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恣意谩骂”，对他放荡不羁的生活也妄加评论，同时指摘其“道德风尚上同样堕落的父亲”，要求他即刻离职。这一事件是瓦尔特·布莱希特1984年回忆时所说，用以证明自己的父亲在汉德纸业声名斐然，即使在“困难时期”企业所有人也会支持他。但瓦尔特·布莱希特没有问询事件的始末，以及职工们因何理由提出了这一批判。1926年的布莱希特声名狼藉，这点毋庸置疑。但涉及布莱希特父亲的，只有他同洛克尔“小姐”的非婚姻关系。他们住在汉德纸业的员工宿舍里，左邻右舍都是自己的下属，儿子又过着浪荡子的生活，这一切不可能不被人注意。但汉德的持有人仍旧选择支持他们的部门经理；因为如若解聘，这定将在奥格斯堡掀起一阵风波。老布莱希特在汉德的工作显然让他的老板十分满意；而这就足够了。

洗礼上的照片给了我们机会来讨论下布莱希特的衣着。人们一向认为，在创作《巴尔》期间，即1918~1922年，布莱希特一直保持着同巴尔一样的着装和行为方式。但此间保留下来的所有照片中，布莱希特的形象都是中等身高，十分消瘦，大多蓄着短发，面容瘦削而温和，同内尔指导的《巴尔》剧照相比，不存在丝毫相似之处。除此之外，演员及日后的纳粹党党员鲁道夫·菲劳（Rudolf Fernau）还在1972年出版的回忆录《作为歌的初始》（*Als Lied begann's*）中兜售这样的传言：布莱希特的慕尼黑岁月，确切地说是1923年11月排练《巴尔》时，菲劳当时饰演剧中角色约翰纳斯（Johannes），布氏“出入穿着精致的手工皮夹克，夹克领口剪裁很宽，从而让人看起来稍高一些”，下装是人工压皱的灯芯绒裤子，“11月里，泛灰的秋

裤”时常探出头来。此外，菲劳还说布莱希特会戴着蓝色的印章戒指，他的镍眼镜事实上由白金制成。

但这一时期的照片中，布莱希特都身着符合市民习俗的衣服，没有一次真的穿着皮夹克。虽然布莱希特有身穿皮大衣的艺术照，但这些照片从头至尾都是被安排的，同布氏的日常穿着毫无关系。直到1926年鲁道夫·施里希特尔（Rudolf Schlichter）所作的布莱希特画像中，才出现了上文提到的皮夹克〔可同1928年布莱希特在斯太尔车（Steyr）前的著名照片相对比〕。这件皮夹克较瘦，而且非常短（只到肚脐的下方稍许），没有领子，给人一种十分寒酸的印象。布莱希特还习惯将这件夹克同白衬衫和深色领带一起搭配；而皮大衣是自1928年开始才有的，很可能只是为了拍照。没有任何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所谓的印章戒指；不过照片中布莱希特的手大部分情况下都插在裤兜里。

就衣着而言，布莱希特的标志是他的气球状鸭舌帽，顶部类似贝雷帽，布氏在外游玩和运动时都很喜欢戴着这样的帽子，这不能证实他对无产阶级有任何倾向，因为这种帽子和工人制服没有丝毫关系。在1920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这种帽子越来越受欢迎，特别适合在户外（为了面部遮阳）或者驾驶敞篷车时使用。其他情况下布莱希特会戴绅士礼帽，正式场合或者拍照时他会穿西装、白衬衣，戴领带。还有极少的部分照片是布料西装上衣或者休闲上装。没有任何衣物是经昂贵价格定制的无产阶级风格，二战之后的情形也是一样，这一时期所谓布莱希特用昂贵的特别定制裁定工人制服的说法亦不过是传言。曼弗雷德·维克维特（Manfred Wekwerth）是布氏这一时期最紧密的工作伙伴之一，据其回忆，由国家歌剧院的裁缝定制的服装是作为额外收入提供给布莱希特的，1950年代的钛镍合金眼镜其实是廉价的角边眼镜。

不同的人对布莱希特的装束描述也不尽相同，例如格奥尔格·格罗兹（George Grosz）就这样说道：布莱希特总是戴“一条很薄的皮领带，当然没有油污”，“跟其他人的马甲不同，他令人给马甲加工了织料的袖子，他衣服的剪裁偏重美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比如棉质垫肩和小脚裤”，它们仅仅在欧洲有美式的效果，而在美国，这种装束早已过时。要不是那引人注目的“僧侣般的脸”，布莱希特看起来有些像“苏俄人民委员会的汽车司机”。但可以断言的是，布莱希特的形象仍是比较传统的，即使在有两个骷髅头的挑衅性照片中，他仍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

布莱希特对1920年代流行时尚的看法记载于他的笔记《论男士风尚》（*Über die Herrenmode*）中，其中的记录可以证实，布莱希特自己日常出入的着装是经过考虑的，他还洞悉了时装设计的趋势：“当我们经过一间男士时装店，看到橱窗里悬挂的服装，它们大多都如此拙劣，以至于人们立即知道：是美学插手了衣服的制作……它们只是为橱窗生产的衣服，当被买走穿在身上的时候，衣服才显示了真实的、卑鄙的特性。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衣服不是为残酷的现实而裁制的……服装厂唯利是图，它们不懂人类解剖学，所以也不需要知道人时不时会弯曲膝盖，因而制作裤子的时候也不用注意这些，每条稍经世事的裤子都以最快的速度突起了另一个‘外用膝盖’。”

布莱希特时常衣衫破旧，这必定与他糟糕的居住环境有关，由于缺乏资金，他从未真正习惯慕尼黑的生活。例如，1920年1月28日，他在给保拉·班霍策尔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碧，我的房间如此的冰冷，我几乎不能用我冻僵的手指写字了。今天夜里我梦到了你，我现在已经无从记忆，但那一定是美好的。”他的柏林生活也没有很大的改观。

1919年1月15日，所谓的战时紧急学期开始，布莱希特在这个学期只选修了一门讲座课，其他时间都是空闲。他必须赚钱，为此还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比如希望从一本小说上赚到1000马克，但这些计划都落空了。

布氏还努力寻找关系。斯蒂芬妮咖啡馆（*Café Stephanie*）—慕尼黑所谓的艺术家聚集地，位于阿玛利亚大街（*Amalienstraße*）和特蕾莎大街（*Theresienstraße*）的拐角处，布莱希特几乎不能或者只能很局限地支付这里的消费，布氏应该就是在这家咖啡馆从演员阿诺尔德·马勒（*Arnold Marlé*）那里获得了建议：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生于1884年，1907年凭借对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作品《巴哈拉的拉比》（*Rabbi von Bacharach*）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早已成为一名作家，并同戏剧界关系良好。福伊希特万格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名为《托马斯·温特》（*Thomas Wendt*），这部小说的雏形是一部戏剧，因而后来又添加了副标题《一部戏剧小说》（*Ein dramatischer Roman*）。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德国1918年被血腥镇压的“一月罢工”。

大概在1919年2月，福伊希特万格接待了一位年轻人的拜访，他习惯上把福伊希特万格称为“博士先生”，并呈上一部自己的戏剧作品希望予以评鉴。福伊希特万格回忆：“所谓的德国革命刚爆发不久，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来到我慕尼黑的住所，他消瘦，胡子拉碴，衣衫破旧。他在墙边来回走动，说着施瓦本方言，写了一个剧本，名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个青年人一再强调，为了能借此赚到钱，他独自一人完成了全部创作。他还有许多更好的作品，比如《巴尔》。福伊希特万格对《斯巴达克斯》（*Spartakus*）评价良好，这部新创作的戏剧当时还保留了这个标题，后来受到福伊希特万格妻子的启发更名为《夜半鼓声》。《夜半鼓声》的打字稿险些给福伊希特万格带来厄运，当自由军团来福伊希特万格家搜查共产主义宣传材料的

时候，他们正巧发现了布莱希特的文章。如若不是这些杀手中有一名曾听说过福伊希特万格，并向他进行了相关询问，这部剧作很可能被当作福伊希特万格当时正在创作的作品。士兵们最终撤退，但仍一再强调，他们对一名“共产主义猪猡”进行了简短的审判。

1919年1月的大选中，由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领导的独立社民党遭遇了惨重的失利，1919年2月21日，在辞去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后不久，艾斯纳被自由军团谋杀。社民党3月组织了议会政府，而他们下属的左翼独立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按照苏联的模式走上了苏维埃共和国的道路，在4月9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组建了红军（Rote Armee），进而将社民党政府驱赶到了班贝格（Bamberg）。由于敌人逐步逼近，形势表明，苏维埃共和国毫无机会，温和派诗人、中央议会成员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尝试同政府谈判。而政府却派遣自由军团前往镇压，到5月3日，红军已经遭到了残酷歼灭。托勒获刑5年监禁，同样隶属中央议会的诗人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被判15年监禁。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反动派借托勒和米萨姆事件煽动挑唆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因为托勒和米萨姆都是犹太人，而且都隶属于革命政府，所以反动派就策划了“犹太布尔什维主义（jüdische Bolschewismus）”的概念，这一概念在魏玛共和国被大肆宣传。布莱希特应该也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同福伊希特万格一样，布莱希特同革命事件一直保持距离。汹涌的革命也没有让奥格斯堡能够偏安一隅，1919年4月，奥格斯堡也进入了革命时期，但三个星期过后就草草结束。布莱希特对革命事件十分感兴趣，他参加了党派集会，同独立社民党的追随者或者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格奥尔格·普莱姆（Georg Prem）高谈阔论。在奥格斯堡的苏维埃共和国期间，普莱姆担任警察指挥官，他的妻子莉莉（Lilly）同布莱希特自1916年以来便相识，莉莉在革命时期也发表了火热的革命演说。但布莱希特对这些也并非慎重行事，同独立社民党相比，他把

自己称为“独立的独立者（unabhängiger Unabhängiger）”或者“和平布尔什维主义者（pazifistischer Bolschewist）”。在奥格斯堡的革命失利之后，布氏把普莱姆夫妇藏匿在自己的阁楼之中两天，但这也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是因为普莱姆夫人美丽动人，令我们的这位年轻人甚是倾心，自然也是找一切机会能够与之接近。格奥尔格·普莱姆随后被捕，1920年3月4日被所谓的人民法庭宣判监禁，这些布莱希特都并未注意。4月中旬，当奥格斯堡被反革命军队占领时，布莱希特在给碧的书信中写道：“此外，我完全成了布尔什维主义者。我当然是反对任何的暴力，在这里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也能尽一分力量。现在正组织一切形式的反抗，但如果你们听说奥格斯堡没有斗争和流血，那么你可以确信，是我一矗立于不为人见的后方一为之作出了贡献。”

带着血迹斑斑的空空双手

我们冷笑着来到你们的天堂

欧洲的陷落：马克思之死

布莱希特对政治和对所谓祖国的兴趣一直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不具批判性意识，同一时期产生的作品可证明这一点。1920年1月，关于爱国主义他曾发表这样的意见：“在某些国家，奴才们平日里只能像猪猡一样尿在裤子里，在这些地方，十分有必要把厕所当神庙一样供奉。接受这个国家如同接受屎尿一样必要。但爱这个国家则并不是必要的。”

1920年9月12日的日记证实了布莱希特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异议，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记中的“布尔什维主义”一词大多用于贬义。1920年9月12日，政治学、经济学学者阿尔冯斯·戈特施密特（Alfons Goldschmidt）在奥格斯堡作了题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体制》（*Die*

Wirtschaftsorganisation in Sowjet-Rußland) 的报告，布莱希特参加了报告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并不惧怕如今着实笼罩在那里的混乱，但对当地正在着实建设的秩序，我却心生畏惧。我现在十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普遍兵役，食品定额分配，行政舞弊，任人唯亲。除此之外，最有利的情況不过是：均衡，形式划一，妥协。有水果要心存感激，为汽车要一再请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布莱希特完成了作品《红军士兵之歌》（*Der Gesang des Soldaten der roten Armee*）。在很多年后由伊丽莎白·霍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主编的作品集中，这首诗没有再被列入《家庭修身集》，原因是《红军士兵之歌》可能会引起混淆，且有政治歧视之嫌。《红军士兵之歌》被普遍认为创作于1919年1月，当时布莱希特还在盖普勒（Gabler）的小酒馆里朗诵过它（缪斯特尔如此回忆）。1925年，《红军士兵之歌》首次发表于《艺术报》（*Das Kunstblatt*）的4月号，《艺术报》是很有影响力、发行量很高的刊物（这次发表在题目上略有改动，“士兵”使用了复数：*Gesang der Soldaten*）。诗歌位于突出的位置，即《艺术报》的第100期，本期还包含对第一期内容的回顾。刊物以布莱希特的诗作和俄国人伊利亚·埃伦堡（Ilja Ehrenburg）的讽刺作品《欧洲覆灭的历史》（*Die Geschichte von Europas Untergang*）展望未来，主编保罗·韦斯特海姆（Paul Westheim）明确指出，他的报纸“不服务于任何主义，或者任何流派”。埃伦堡认为欧洲的没落始自1927年，而且是源自美国所策划的狡诈阴谋。这篇文章是埃伦堡小说《信任D. E.》（*Trust D. E.*）中的节选，在《艺术报》中同布莱希特的文章前后相连，两者内容上的关联性也由此更加突出。这显然是韦斯特海姆的设计，因为埃伦堡在其三卷本的自传中没有提及相关事宜，布莱希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指出是他作出的安排。布莱希特诗歌的一些节选已经表露出其对苏联革命结果的预测，这同埃伦堡对欧洲1927年覆灭的预测十分类似。

1

因为我们的国家破碎
太阳黯淡无光
它把我们呕吐在黑暗的道路
和冰冷的公路上。

2

春天，雪水洗涤了军队
他们是红色夏天的孩子！
十月，雪落在他们身上
而他们的心在一月的寒风中冻僵。

3

这些年自由一词
众口纷纭，冰在这里碎裂了。
我们看到许多獠着虎牙的人
追随着红色的、野蛮的旗帜。

4

带着风雨中僵硬的身躯
带着在冰冻中伤残的心
带着血迹斑斑的空空双手
我们冷笑着来到你们的天堂。

诗歌的内容明显—即使并非十分正确—同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有关，即苏联一战之后所谓的经济体制（1918~1921），这是列宁制定的政策，但他把责任都推卸到战争上。布尔什维克们1921年引入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概念，借以掩盖强制集体化和粮食种植不充足等错误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引发了饥荒，大批难民逃亡西欧，而且成为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艺术报》中埃伦堡和布莱希特文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显著。埃伦堡从苏联的角度出发，讽刺美国的病态，这种病态正是欧洲覆灭的原由；而布莱希特只是揭露了所谓希望的荒谬。无论是埃伦堡还是布莱希特的文章，都没有（马克思预言的）天堂；因为，埃伦堡在他的文章中模仿尼采写道：“马克思已死。”

埃伦堡或许是世界文坛上最多变的人物之一，他的政治态度几乎代表了所有可能的激进观点，1921年“战时共产主义”之前他先逃亡至巴黎，后因受到法国的驱逐又流亡柏林。在柏林，埃伦堡同作家，尤其是造型艺术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在布莱希特的生平中，他首次出现于1928年12月21日，当时二人同时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德俄诗人晚会，并各自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1927年，布莱希特将《红军士兵之歌》收录进他的《家庭修身集》中的第一章“祈祷行（Bittgang）”中。同“祈祷行”天主教宗教原型不同，诗的主题是毁灭与死亡。不可避免的是，在对其诗选的评论中，布莱希特遭到了共产主义一方的严厉谴责。例如，亚历山大·阿布什（Alexander Abusch）就写道：《红军士兵之歌》是布莱希特“混乱感情失去节制”的证明，作者未经许可就把“资本主义的破坏手段”转嫁于红军和苏联革命之上，诗作显然在抵制布尔什维主义。1927年，布莱希特就已经—虽然名不副实—被视为共产主义者或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所以布氏不能放任这样的攻讦。据称，1928年布莱希特因此曾向阿布什解释，《红军士兵之歌》并非针对苏俄红军，

而是仅仅针对拜仁红军。由于阿布什信任了布莱希特，布氏再次被归属于共产主义者一方。这一谎言再次证实，布莱希特在政治上还完全没有坚定的态度，他意欲保护自己开放的政治立场；在1927年第一版和阿布什的批驳之后，《家庭修身集》第二版中仍收录了《红军士兵之歌》。此外，在政治立场的问题上，布莱希特早在1920年8月24日便以明确阐述过的座右铭也证实了他的摇摆态度：“我一再忘却我的观念，总不能下决心把它背下来。”

眼睛需要头脑

图伊主义：已经实现了

根据最新的《杜登词典》（*Duden*），“图伊主义（Tuismus）”源于“拉丁语‘tu（你）’和‘ismus（主义）’”，是“利他主义（Altruismus）”的旧称。自1931年以来，布莱希特向德国人呈现了这一意义得到彻底变更的词语，用以借此概括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早期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论证模式。图伊主义和图伊（支持图伊主义的人）都是新造词，布莱希特从“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e）”这个词中拼凑了它，他把词的各个部分颠倒顺序成为“Tellect-Uell-In”，又把每一音节的首字母组合成了缩写词“图伊（TUI）”。而图伊们支持的学说必然要形成德国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主义（Ismus）”：图伊主义。

图伊的德语翻译是“脑力杂工（Kopflanger）”，这也是布莱希特的新造词。《杜登词典》并不承认这个词，它的构造如同“手艺杂工（Handlanger）”。“脑力杂工”出租他的头脑，也就是他的思想才能，就像“手艺杂工”出租他们的体力工作技能一样，而且两者都是最底层、最无足轻重的。“杂工”还有其他的贬义释义，他可以被雇佣，成为非法或者卑下行为的帮凶，做幕后操纵者不屑为之的准备工作。“脑力杂工”用他们的头脑，或者他们的思考能力做同样的事

情。他把自己的脑力出租给委托人，为他们提供维持统治所需的想法。“手艺杂工”通常不了解他的工作的目的，同样，“脑力杂工”也不知晓他的想法造成了怎样的灾祸，他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到真的为时已晚时才迟迟发觉。

布莱希特为图伊提供的另一个德语翻译是“马屁精（Speichellecker）”^[2]，其字面意义就绝非“美味”之物。它的同义词是“阿谀奉承者”，显然只具有贬义。“马屁精”描绘了为人部下的某类人，他们把屈服包装成了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阿谀奉承创造了新奇的、独特的、深有感悟的措辞：它在塑造。他们当中那些‘卓越的艺术家’灵活多面，总让人耳目一新。他们揣摩（煞费苦心也值得），伟大的‘Go-teh（歌德）’怎样颂扬‘O-leh（拿破仑）’：欲扬先抑。这样的赞颂有很高的价值，同时极富创造性，它给赞颂披上了谴责的外衣。它谴责军队统帅太过英勇，这可能会让他丧失自己的队伍。战争伊始，图伊们就满怀敬畏和同情感谢自己的皇帝，感谢他牺牲自己和平君主的盛名，满足一个民族想发动战争的愿望。”

令图伊们备感棘手的是，西里西亚杀人魔卡尔·登科（Karl Denke）1870~1924年的案件被布莱希特深入剖析，直指战时和战后的饥荒时期。这一古怪的想法要归功于布莱希特的尖刻，由于布氏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都不愿面对政治时局的严峻性，布莱希特只有以尖刻来应对他们如此这般的做法。“西里西亚哈尔曼”^[3]的暴行1924年末被审判。他杀人之后，把尸体加工成肉、鞋带、背带等，还有一部分肉腌制之后，卖与他人或者供自己食用。据媒体透露，他的每顿饭食肉不低于2磅。以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4]为蓝本，布莱希特也“谦逊”地建议，如何能使登科成为德意志战争的典范。斯威夫特曾提出，穷人家的孩子总归过量，应该把他们中的一部分用一两年时间喂肥，然后屠宰并把肉卖给富人。这样所有的人就都得到

了帮助：富人得到了鲜嫩的烤肉，而穷人得到了金钱，而且不再需要喂饱这么多嗷嗷待哺之口。

布莱希特采取的方式更具思想性。布氏赋予登科唯心主义哲学家费希特（Fichte）的名字：约翰·戈特利普（Johann Gottlieb）。面对1916年冬的数十万饿殍，约翰·戈特利普思索后有了宏伟的发现：

“在医院里举目可见的对人的呵护，由此到战争与杀戮，两者之间的跨度同将人屠杀并食用相比真的有云泥之别吗？……无论如何，事实是，一个单独的人面对极为不利的情况，以微小规模完成的，正是恐怖的世界大战的构想：这个人便是登科。他识破了整件事的意义。他人在撕碎与破坏，而登科在建造，这需要他既天真又勇敢的性情。这段时间，数千人在痛苦的饥饿中煎熬，原因是他们的养育者在边境战斗并倒下，就在此时，这些养育者成千上万地囤积——正处于可被食用的状态，准备好去哺育这些忍饥挨饿的人！”布莱希特构思他的

《图伊小说》时正值1931年，此时还不能想象，法西斯们在集中营和某些前线战场的行径已远远超越了布莱希特的“建议”。

图伊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卡尔·登科因此也获得了德国最伟大唯心主义者的名号，图伊主义从而被归入了“德意志悲苦（deutsche Misere）”的传统。在歌德之后，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只能绞尽脑汁地建造远离世事的思想高塔，脱离社会现实，与此不同，图伊们认为自己应该十足地投身政治，成为现实主义的思想者，他们唯愿和善，致力于人道的社会秩序。在布莱希特看来，他们的错误在于仅仅通过强大的思想来保障形势的改善，面对荒蛮四起却孤注一掷地挽救文化，认为这些文化措施能引起社会必要的变革：“思考意味着改变”，布莱希特确实也这样写道。而如今，“转变思想”成了神奇之语。只是：如果有人如此依赖思想的力量，他便会忽视主导性的社会情况，如若要摒除其暴力行为，必须改变物质基础，而且这只能通过物质力量实现，即使这一物质力量并不一定是暴力性的。

“Gewalt”^[5]在德语中有宽泛的意义图谱。即使它可以表示和平权力，有如《基本法》的开篇两句“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通过人民选举及公民投票并由借助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行使之”，其中也仍然包含了物质层面的意义。它涉及的不是空洞的“转化为现实的思想”，而是如果有人违抗，必要时要以物质手段贯彻物质力量。

典型的图伊主义思路是这样的：“在有头脑之前，就已经存在思想了。思想需要被人提出，所以需要头脑。为了顺应这一必要性，头脑应运而生。”这样的语句不仅讽刺了柏拉图的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根据柏拉图的观点，理念（Idee）为第一性，现象（Erscheinung）为第二性，其假象（Schein）包含于言辞（Wort）之中；同时也讽刺了德国唯心主义，尽管黑格尔有许多进步性，布莱希特还是将其归为唯心主义派别，黑格尔把所有的物质现实都视为人类意识的产物。如今，所有的构成主义（Konstruktivismus），无论它们的名称是什么，都仍承袭了这一传统，如今我们这个星球被蓄意变为废铜烂铁，面对如此愈演愈烈的情况，它们真是贻笑大方。布莱希特公开批判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批典型的图伊：历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解释为威廉二世的个人欲望；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把本质的存在回归到主体和个人，把人类的生命确定为“向死而生”[“叶安（Je-an）一小说里图伊中最杰出的人物一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除衰退外不会发展，除走向坟墓外没有其他进步……出生伊始，孩子的唯一行为就是渐渐死去”]；还有医学家亨利·凡·德·费尔德（Henry van der Velde），他虽然描写了性交几乎所有的体位，但仍然一同康德一样一视性交为婚姻的附属品（“他描写的体位中很多只有细节上的微小差别，因而给人迂腐的印象，而且其中不少过于费力。但这本书与轻浮轻佻之情相去甚远，针对的仅仅是严肃的读者。”）；甚至一这份名单不再一一列举一还有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他因希特勒的言辞拙劣

而怒气冲冲，但对这些言辞表达的内容却充耳不闻：“图伊们嘲笑无知的希特勒，嘲笑他的生平，嘲笑他《我如何完成》（*Wie ich es schaftete*^[6]）一书中的53000个言辞错误。/但他在外界却不断取胜。”

布莱希特的描写断然蔑视图伊主义，使对唯心主义的误解几乎不再可能。《图伊小说》的修订版包括了人类几乎所有的思想活动领域：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哲学、医学、社会学（行为主义）、文艺学，甚至还有时尚和广告。对图伊主义意识形态的讽刺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这些手段必须直击要害：借助对内部逻辑的坚持或夸张，使其逻辑性在自创的体系中得以完整地实现：“人们在地球上能感受某种秩序，例如肺部的构造只能适应真实存在的空气，大脑也严格以生物能够承受的速度运转，警察不容置疑要追捕侵占他人财产的家伙，因此显然存在一种秩序，没有它一切无从所适，一切濒临崩溃，所以这一秩序必然在创世之前业已存在。而物质只是完成了这个计划。”

布莱希特的讽刺将物质关系颠倒为唯心主义观念，从而突出其荒谬。根据唯心主义观念，自然现象以人类需求为导向，就像社会关系要遵循人类的观念。这必然导致如下结论，良好的协调和一致只可能归功于前定的理想秩序，其先验性（无从证实，却不可否认）是必要的前提。在这一体系中，先结果后开花自然也能得到证实，雨水自地向天倒流。

娱乐从不低落于

思想水准之下

世间最自由的宪法：机械体验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血腥镇压了斯巴达克团的一月起义，后来布莱希特曾说：“普遍认为，这些天在支玛国开始了一个时代，它被称为思想统治的时代，即图伊们的伟大时代。”“民族平等权力党”（社民党）发生了悲剧，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遇害，布莱希特明确将两人归为“非图伊者”，并把图伊们的统治日期从本事件发生算起。这是1919年1月15日：“身为陆军部长，士官诺克完全解除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武装。由于出身低微，在帝国时期诺克的战争才能遭到荒废；在血腥镇压人民的过程中，他的这项才能最终得以证明，并且也消除了他自己对统治者的偏见：他们并非由于某人出身下等而不愿任用其残害百姓。”布莱希特继续写道，人民代表会议委任胡戈·普鲁伊斯（Hugo Preuß）^[7]——隶属自由派的德国民主党（DDP）的创始人之一——起草新共和国的宪法。“这将是世间最自由的世界。”它也确实如此——在图伊主义的基础上。

萨乌普罗（Sa-u-pröh）——在布氏笔下代表胡戈·普鲁伊斯——开始在咖啡馆为未来宪法毫无体系地搜集条款，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其他场所可供使用。萨乌普罗首先想到的是：“创作者、发明家、艺术家的思想工作和权利，享有（genießt）国家的保护及照顾。”（第185条）政府为萨乌普罗提供的仆从“疑惑”地询问，这里的“享有”是否应该使用复数“genießen”，而非单数“genießt”，因为“必须被保护的”是“众多事物”。此时，由于其他客人抱怨萨乌普罗廉价雪茄的烟雾缭绕，二人只得离开，这一“错误”也被原状保留在了“宪法之中”。在街上，萨乌普罗发觉客人们的申诉合理，便立刻想到了下一个条款，并在仆从的脊背上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在不伤及其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每一名支玛国人都有义务按照多数人利益的要求来发挥自己的智力及体力。”萨乌普罗对这一天的自己心满意足，第163条也表明，没有人有权“以饥饿削弱自己，或者长期逗留在潮湿的地下室中而损害自己的健康”。

次日，一个戴面具的男人引领萨乌普罗及其内弟与仆从穿过地下通道来到国会大厦的一间大厅，随后消失。这间大厅里藏着许多装满手榴弹的箱子，整个上午，萨乌普罗三人只能用这些箱子搭建的写字台来打发时间。然后萨乌普罗口授：“每一名支玛国人都有权通过言语、文字、印刷品或者其他一切方式自由表达观点……在《基本法》的范围之内。”另：“不实行审查制度。”（第118条）仆从提出，还有许多人没有自己的居所，由此又引出一个条款：“每人都有权购买房屋。”（第111条）下一条是：“艺术、科学及其学说皆享有自由。”此时他注视着国王加冕礼赞的巨幅油画，问道，关于自由是否有所遗漏，他的内弟表示没有；萨乌普罗大怒，表示“必须彻底结束一切占有者的特权”：“国会享有最高的权力。”（第1条与第5条）同时：“议员代表整个民族。他们只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受任何委托的束缚。”（第21条）萨乌普罗又仔细阐明，这里的委托指“选民的委托”。这样的场景在《图伊小说》中兴致勃勃地继续下去。

我们由此还可以洞悉布莱希特的讽刺原则：世间最自由的宪法所承诺的自由是思想自由，由于所有人只服从自己的良知，而不受任何委托的束缚，所以任何人一旦担任了相应的职位，都可以为所欲为。而早已得到证实的是，尽管有许多基督教的律法，良知是政坛人物所提供的最不可靠之物，这样的宪法也为所有的不公大开通路。

但布莱希特的童年已经展示，无视社会的疾苦是何等容易。19世纪的剥削者不愿面对被剥削者及其非人的遭遇，因为这些都在质疑他们富足的生活。市民阶层的出发点显然是只有自己和贵族才代表人类，与之相对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作数，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就清晰地刻画了这一点。

布莱希特在战后才开始追踪一战造成的后果。但此时布氏的身份仍是富足家庭的儿子和市民，他还没有像日后作品中的圣约翰娜

(heilige Johanna) 一样深入到工人之间，而是与图伊们结伴，批判其意识形态，揭露残酷的社会现实。但对布莱希特个人来说，还要在图伊们的圈子里成为受到认可的诗人，特别是还要赚钱。对于后者布氏更加忧心，也更为积极，因为他决定不仅要成为诗人，而且要养育众多子嗣。

对布莱希特来说，一战带来了影响深刻的后果，它被称为“机械体验 (Apparaterlebnis)”。在作于1929年前后的文章中，布莱希特新造了这个词。他说，机械已经取代了人的位置，人本应是“体验”的前提，而现在却不复存在。布氏描述了技术装备战中的战争体验，其中人是战争机器的执行者同时也是牺牲品。布莱希特还讽刺并批判了“突出个人机械体验”的“美感文学 (Schöne literatur)”，他指的可能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 的成名作《西线无战事》 (*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9)，一定还有他在其他方面都十分欣赏的阿诺尔德·茨威格 (Arnold Zweig) 的作品《军士葛里沙之争》 (*Der Streit um den Sergeanten Grischa*, 1928)，布莱希特在给这部小说写的书评中就已经表明了上述观点。布氏强调了其中的矛盾：刻画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屠杀的文学不可能是美的，战争机器消灭个体，它不可能以个体的人

(Persönlichkeit) 为出发点进行描写，将人置于中心位置，却是这样做的：“体验过一战的作者中，那些最成功的后来体验到了百万的销量。他们描写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非人的世界是何等可怖。……他们看到战争否定人，因此拒绝战争。但战争曾如此真实，而人却早已泯灭。”

资本主义创造了同其意识形态完全矛盾的社会现实，一战中“人力资源”被毫无人性地集体化，这同市民阶层个体主义和个人的自由决断 (无需征求个人意见) 完全背道而驰。青年戈特弗里德·本恩 (Gottfried Benn) 1912年的组诗《停尸间》 (*Morgue*) 便是令人信

服的证明。威廉二世皇帝曾召唤的英雄主义个体，他们如今只是紫菀和老鼠的容器^[8]（“女孩曾长期躺在芦苇中，她的嘴/看起来被老鼠啃过”）。或者尸体还被肢解成块（“绿色的牙齿，脸上的脓包/招致了眼周炎症”）。“分娩的神秘”也被简化为“一块肉的出现”（“最终他来了：小并泛着蓝色/全身涂抹着屎尿”）。

战争之前，本恩所表达的“诗意”（而不再是美），以及当中其他仍不为人知的意味一部分自然主义文学已经发现了少许端倪——在一战之中和之后不仅渗透到日常观念之中，而且还必定同当时社会的生产关系产生联系。个体被强制分离成各个部分，不可分割的个体（Individuum）成了可分割的个体（Dividuum），乔治·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将其理解为“物化（Verdinglichung）”，自1975年以来，表现主义研究用“自我分离（Ich-Dissoziation）”描述这一现象。卢卡奇的出发点是生产流程的合理化（由美国引入了流水线生产方式），它把产品拆分为各个独立的部件。根据卢卡奇的观点，“生产客体的分割”导致了“主体的分割”：“人既不是客体，其行为也并非生产过程的本质承担者，他只是作为机械化的零件嵌入机械系统，而这一系统完全独立地运行，人只能无意志地顺应它的法则。”

工人的“成就”因此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被机械地客体化，即物化。由于工作——并非生产本身——不再具有创造客体的特点，工人无法借由他的产品或者工作形成自我理解，也不能与工作构建认同感。物化的作用在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创作于1933~1936年）中得到展现，而且它没有被局限于工作过程之中。卓别林用扳手拧一切看起来像螺丝的东西（比如：工人或者女性雇员衣服上的纽扣），当离开工厂后，在街上他仍像在机器边上——一样的继续活动手和臂膀，而且自己毫无察觉。卓别林借此展现了一幅简

单而迫切的图景，工人们被物化，他们作为人被分裂，已经不再适宜进行阶级斗争。

布氏早期对戏剧《加尔盖》（*Galgei*）—《人就是人》的前身的构思（1920年以来）已经显露了与这一主题的关系。1920年7月6日，布莱希特在日记中记载：“公元元年……市民约瑟夫·加尔盖落入奸人之手，他们打伤了他，剥夺了他的名字。”布莱希特对大城市的思考也趋于这一方向，大城市犹如“热带丛林”，其中无名的斗争现代而又神秘，事关生死。在所有行业中，人被集体化，社会关系愈加复杂，个体的人无法把握也无法洞悉这一现状，因此一对知识分子亦然—必然需要新的工作方式，这些都证实了布莱希特早年对社会内在联系的认识，新的社会关系要求新的行为、新的思想，同时还有新的写作方式。

这还意味着将要长期在矛盾中生活和工作。一方面，布莱希特必须在戏剧界还有文化工业中成为一名“人物”，另一方面，要实现前者，他必须彻底质疑自己是否仍是（传统的）个体主义定义下的个体，此外还须时刻意识到，个人产品成了商品，而商品的制造以集体化的工作方式—工作分配和主体分割—为前提。1920年代，市民阶层仍将文学理解为“个性的表达”—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虚假复苏—这已经不合时宜，对创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至今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

对自己的生活，布莱希特也不循规蹈矩。他一方面以惊人的自信坚持个体性，另一方面又同时在作品中不断否定个体性；1921年，布莱希特写道：“愿万物为我所有，乃至支配动物世界，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我只能存在一次。”

像交际花一样翘起腿

流动的戏台：茨威利斯

巴伐利亚州内战期间，为了给自由军团输送足够的人员，许多大学关闭，还有一个原因是无法保障正常的课堂教学。布莱希特利用这一时期沉浸于旧时的消遣中，即流连于奥格斯堡的普莱瑞尔节（Plärrer）。这一奥格斯堡的民间节日每年举行两次，因“Plärr”（等同于“叫喊”）或“Plärre”（等同于“木质喇叭”）而得名。布莱希特会独自前往，或者在中学时期与其他布莱希特派成员一同参加。同慕尼黑的十月节不同，普莱瑞尔节于整个战争时期都在举行，这不仅说明了这一民间节日在显然有些与世隔绝的奥格斯堡的受欢迎程度，而且也说明奥格斯堡的状况优于其他的城市。1918年8月，布莱希特在给汉斯·奥托·缪斯特尔的信中写道：“这里有普莱瑞尔节。海盗船使我几乎筋疲力尽。当美的夏日如此醉人，我几乎已不能工作了！”1919年5月，由于慕尼黑大学停课而无所事事，布莱希特和卡斯帕尔·内尔晚上同姑娘们一起在普莱瑞尔节里闲荡。内尔曾记录：姑娘们“和贝尔特比赛荡秋千”。那“美得难以置信，满满是身体的温暖、柔软与活力”。

年轻但已经成年的知识分子闲游游艺场享乐，这除了身体上的愉快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事实也确实如此。首先是街头说唱，这是街头艺人歌唱式的吟诵，由手摇风琴或者吉他伴奏。招牌上描写的是一些轰动性事件、谋杀故事、火灾或者其他灾害，目的是为了“提升道德修养”，这些在音乐中转换为简单的语言描述。布莱希特有关死兵的恐怖诗歌便是根据这一集市娱乐活动的模式写成的。这一模式日后仍活跃于布氏的整体创作中。除此之外还有布氏所谓的“黑人音乐”，1919年，在德国首次可以听到来自美国的爵士乐和流行乐。

1919年1月，根据《凡尔赛条约》，莱茵河西岸开始由协约国占领（1919年6月28日），法国殖民地军队也从凯尔行进至科隆，这被德国

的反动、军事和民族主义团体视为最大的耻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85000名占领军中有25000名黑人士兵，对于上述势力来说，这意味着“高贵”的德国人要听任“下等人”的摆布。1920年，一些官方机构和法定媒体开始了种族主义的煽动性宣传，他们攻击殖民地军队是文明欧洲中心“蛮族的污点”，贬低黑人是血腥的野蛮人，是被过盛性冲动支配的“黑仔”，他们追求德国女性，在种族上污染德意志民族。“黑人音乐”也顺带遭到贬低：从这样昏暗的人物那里不会产生任何值得德国人聆听的音乐。但这一时期哪里可以演奏黑人音乐呢？那就是奥格斯堡的普莱瑞尔节。布莱希特派和布莱希特本人在这里都收获了新的音乐灵感，而且立即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

据缪斯特尔描述，1919年8月，在布莱希特和他的朋友中间爆发了绝对的“黑人音乐狂热”。缪斯特尔提到的诗没有流传下来。被保留下来的只有《茨威利斯之歌》（Civilis-Song），诗中一名黑人在烟花之地登场，用煽动的方式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们的丛林是绿色

我们的环形村庄在干涸

啊哦！啊哦！

曾有油

滴入我们的肚脐。

.....

一天来了卖酒的商人

还有传教士。

.....

一个伶俐的胖黑鬼匆忙喝下了

商人的酒，传教士的血。

白人可以在黑鬼身上拉屎，是的！

但黑鬼可以，可以吃掉它

鼠辈。

茨威利斯也侵袭了“黑鬼”，毁灭了他们的传统，用基督教、烈酒和白人女性的肉体毒害他们：“白人给我们注射了茨威利斯—茨威利斯—文明（Civilis-Civilis-Civilisation）的细菌！”在音乐上和艺术上，布莱希特派都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派，但这些只能在当时的年市^[9]游艺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些新的歌曲在这里被当作稀奇古怪的热闹，可以被人们容忍，但也暂时仅限于此。不假时日，爵士乐就征服了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

普莱瑞尔节在慕尼黑的分支是十月节；说“分支”也言之有据，因为当十月节第一次举行时（1810年10月），普莱瑞尔节已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喜剧演员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 1882年生人）有可能确实在十月节表演过，表演通过夸张的模仿讽刺其他戏剧，布莱希特应该在1919年或者更早就结识了瓦伦丁，因为布氏创作于1919年秋的独幕剧就带有瓦伦丁的特点，意为向其致敬。布莱希特肯定加入了瓦伦丁的艺术家团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卖艺人团体。有一张表现十月节表演的著名照片保留了下来，照片拍摄于1920年的十月节或者卡里瓦利卡巴莱剧（Kabarett Charivari）期间，自11月16日起，这一表演也在日耳曼尼亚酒店（Hotel Germania）举行。“卡里瓦利”指吵闹低俗的表演或者刺耳的噪音音乐，这样的称谓有可能符合布莱希特和瓦伦丁的作曲风格。团体的其他成员站在台前，为所谓的表演叫卖。布莱希特演奏笛子，瓦伦丁吹大号，一位不知名的小丑敲定音鼓，莉泽·卡尔施达特（Liesl Karlstadt）—瓦伦丁艺术上的伴侣—摇铃铛。首先表演的是莉莉·维斯—维斯（Lilly Wiesi-Wiesi，

巴伐利亚方言中指阴道），“欧洲曾呈现的最伟大的女性”。她之后大耳朵塔菲特先生（Herr Tafit）登场，“在12岁零16个月的时候，他来到斯里兰卡一名那不勒斯鞋匠那里做学徒，四十余年的学徒期中，他因懒惰、调皮、马虎而出名，这也给了他的师傅不停扯他耳朵的机会……除了两只耳朵之外，他身材完全正常，这不是幻觉，也不是骗局，绝对真实”。最后表演的是瓦乌先生（Mister Wau Wa），他能喝盐酸，吞下硬煤和钉子，随便掰弯铁棍。表演到高潮时他还被一辆敞篷梅赛德斯卡布里奥轧过，车上还坐着5个人，根据图像显示其中包括布莱希特。

在卖艺的戏台上演讽刺剧，挥霍时间的方式中没有比这更低级的了，可水准已经无法再降低了，不是吗？演出的名字和台词显然出自卡尔·瓦伦丁，而不是布莱希特，所有的一切都愚蠢而荒唐。但布莱希特确实在场，来弘扬“民族艺术”，给观众带来一阵惬意，或者也讥讽他们，对于这些布氏都乐此不疲。1918年3月，布莱希特致信内尔，劝说他来跳舞：“据我所知，米开朗基罗曾组织假面游行和跳芭蕾舞。”但布氏为何不为维斯—维斯做广告呢？

一战前后，将（真实的和虚假的）异常事物展示出来是年市上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暹罗的双胞胎、侏儒、巨人、胳膊超长的男人、没有下肢的女人、上身布满文身几乎全裸的女人，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们低俗的好奇心。尤为令人发指的是所谓的“民族展”，它由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于1875年发明。哈根贝克在他的展览场地—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动物园里，把异域民族当作动物展览。瓦伦丁和布莱希特嘲讽了这一有悖常情的举动，所以他们除了找乐子之外也为社会批判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看到那些为“民族展”所绘制的宣传画，便不难认识到，它们为右翼激进派和纳粹的种族主义煽动性宣传提供了样板。

在卖艺戏台的这些经历还为布莱希特日后自己的戏剧提供了创作灵感。年市上的观众偏爱这些恢诡谲怪之事，却没有意识到，他们面对的这些畸形事物其实是心理与社会畸形的投影。布莱希特创造性地利用了这些因素。1924年在慕尼黑室内剧院上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Eduard II. von England*，简称《爱德华》）时，布莱希特在带有街头艺人表演风格的连续场景中展现了“最后一只蜥蜴”——这是布氏对英格兰国王的称谓。1929年他又在教育剧中加入了小丑的场景，其中饰演施密特先生（Herr Schmitt）——一名市民和个体主义者——的小丑像塔菲特先生一样，有一对巨大的耳朵。1931年在柏林上演了《人就是人》，布莱希特利用面具、铁丝衣架和巨大的手掌模型把战士们变成了“特别庞大的怪物”。在该剧中盖里·盖伊（Galy Gay）最终沦为战斗的机器，这一幕中盖里·盖伊脚踩高跷，四肢巨大，牙齿间还插着一柄大刀。如果说《爱德华》一剧还算收敛，小丑场景则颠覆了整个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室内音乐节，柏林的国家剧院上演的《人就是人》也因为过于嘈杂，没有一次演出可以在毫无中断的情况下进行到底，这部戏剧也在上演5场后被取消演出。这次演出也为布莱希特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活动的尾声作了铺垫。

1923年布莱希特与卡尔·瓦伦丁再度合作了电影短篇《理发店里的怪事》（*Mysterien eines Frisiersalons*），据1923年3月4日《电影》（*Der Film*）杂志的报道，布莱希特为这部电影编写了剧本。共同参与的还有布兰迪娜·艾宾格（Blandine Ebinger）、埃里希·恩格尔（Erich Engel）、卡尔·瓦伦丁和莉泽·卡尔施达特。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和文字资料没有得到保存。这部时长半小时的电影没有完整故事情节，更像是一系列荒诞笑话的串联。理发店用所有剪发的手法虐待一名顾客，由瓦伦丁饰演的理发师甚至切下了他的头，然后又尝试再装上去。电影虽然艺术性不高，但是颇有乐趣地使用了许多技术手段，这是布莱希特在1920年代唯一得以实施的电影设计，但并不成功。

再次说一下海盗船游戏。在1920年的《诗篇》（*Psalmen*）中，布莱希特将这一年市上的娱乐活动作为性隐喻使用：“我曾听说，由于情爱会脸红脖子粗。这我不喜欢。但玩海盗船，我听说，也会脸红脖子粗。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人们必须像交际花一样翘起腿，好像整个人挂在膝盖上。膝盖是如此醒目。”曾有一段时间，布氏几乎使整个宇宙都具有了性特征，甚至把“亲爱的上帝”也包括在内，能在夜晚23点海盗船关闭之后继续不受打扰地摇摆；他显然已经整日都随之摇动了。这些高级的玩笑，还有《诗篇》采用了圣经原型的事实，在表现主义诗歌的历史背景下，是对上帝主题的过分讽刺。《诗篇》中女性角色荷（海达·库恩）和碧（保拉·班霍策尔）并非作为历史人物出场，而是分别代表女性的善（碧）恶（荷）两极，在这个充斥着性内涵的伪圣经世界中，抒情主体像猪一样在泥塘里滚打、嚎叫。此处有这样一句：“无论你们所寻何人：绝非是我。”

人们能理解的故事，都讲述不佳

散文的突破：优秀的叙事性

1919年末，布莱希特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巴尔甘的弃舍—海盗故事》（*Bargan läßt es sein. Eine Flibustiergeschichte*）。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现在只能猜测，从同时期作品《夜半鼓声》中可以推测到某些端倪。克拉克勒尔十分幸运，他的未婚妻仍然爱着他，所以他放弃了革命，投身社会，但当时的社会世风日下，前景堪忧。他未来的妻子由于堕胎失败，将要生下一个“杂种”，但如果克拉克勒尔不愿再看到系扣靴子下被践踏的世界，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布莱希特对战后时期的期待甚少，他顺应普遍现实，不是为了放弃，而是为了在这样的现实中熬过去，为自己找到反抗的道路。这样的道路通往未来，那个尚无人知晓的未来。1920年初，德国开始大肆赞颂世界末日。

小说《巴尔甘的弃舍》1921年9月出版于慕尼黑的左翼自由主义杂志《新水星》（*Neuer Merkur*），这是一本跨区域发行的杂志。1921年11月，当布莱希特第二次前往柏林时曾断定：“我将会收获很多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都知道《新水星》里的小说，对其也有所谈论，他们都会帮助我的。”这些人有赫尔曼·卡萨克（Hermann Kasack）、克拉邦德（Klabund）、弗兰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Heinrich Eduard Jacob）和阿诺尔特·布隆内（Arnolt Bronnen）。《海盗故事》[海盗（Seeräuber），源自荷兰语海盗“Freibeuter”]在《新水星》中位于三篇关于罗马的文章之间—托马索·加拉拉蒂·斯考蒂（Tommaso Gallarati Scotti）的《但丁与意大利》（*Dante und Italien*），阿尔冯斯·帕奎特（Alfons Paquet）关于罗马的报道和汉斯·戴恩哈尔特（Hans Deinhardt）对《神曲》第31章的翻译，以及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农民战争与千禧年主义》（*Bauernkrieg und Chiliasmus*）。这期杂志整体是为纪念但丁去世600周年而作。在如此庄重的文章中出现一则海盗故事，起初让人捉摸不透；但重要的是：之前默默无闻的布莱希特也跻身名流。

坦言之，布莱希特的《海盗故事》讲述了一段混乱的同性恋关系，叙事冷静而疏远，好像这是一件尤为平常的事。海盗团伙中智勇双全、犹如神一般的头领突然毫无顾忌地爱上了自己的敌人柯罗策（Croze），并为他放弃一切：他的地位，他的成就，他的同伴，他的权力，最终还有他自己，他最终同爱人共赴亡途。1872年，《德国刑法典》第175条规定严禁同性恋（直至1994年），违者将予以惩罚，但1919年同性恋不再是文学中的禁忌话题，特别是布莱希特的最重要的文学楷模之一弗兰克·韦德金德在1890~1891年的《春之觉醒》（*Frühlings Erwachen*）中已经开诚布公地谈及了德国文学中的这一主题[小汉斯和恩斯特之间的爱，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rr）在首演的评论中把这一对儿称为“对手淫乐此不疲的家伙”]。但同

性恋的核心内容并非未成年人之间的性欲望，与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Die Verwirrungen des Zöglings Törleß*, 1906）和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的《在轮下》（*Unterm Rad*, 1906）不同，他们会保持冷静；也不是像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Tod in Venedig*, 1913）那样（大多数是悲剧性的），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更不是“柔弱”“女性化”的人物（文雅的艺术家的），没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满足于升华。无论哪种类型，同性恋都是爱的一种形式，这样的爱“不愿说出自己的名字”，即人们不能直接、公开地谈论它。但所有这些都适用于布莱希特的故事。

柯罗策是个令人生厌的人物。他是只“肥癞皮狗”，“皮厚”，身上挂着“黏液和腐烂的鱼”，他耷拉着耳朵，如果他像“巨兽张开喉咙”一样张开嘴，可以看到嘴里溃烂的牙根，另外他还足部畸形，整个一副魔鬼的形象。跟他相比，巴尔甘是“神一般”的领袖，他对待自己的同伙像对待“一群孩子”，“他利用星辰导航的能力也如有神助”。虽然柯罗策显而易见地在破坏海盗们的劫掠行动，将数十名海盗引入了死亡陷阱，但当巴尔甘和柯罗策被幸存的海盗团成员擒住时，巴尔甘仍然认为怀疑柯罗策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当海盗团最后一次努力让“直至厄瓜多尔地区都远近闻名的海盗船长”恢复职位时，巴尔甘把船交给了第一人称叙事者，理由十分简单：“我爱里面那个人”，那个“贪吃的坏孩子”柯罗策，他现在困在猴子笼里。最终，巴尔甘自愿同他的爱人一起被遗弃在一条小船上，默默无言但坚定不移地同他一起划向消亡。

令人惊异的并非题目本身，还有第一人称叙事者展开故事的方式与手法。他是海盗的一员，起初还自称“我们”，后来除非被（不情愿地）牵扯进来，他都保持一副傲慢而疏远的观察者形象，用最稀松平常的口吻还原小说中充斥着丑陋现象，同时对其给予了极为挑衅

的讽刺。例如：在袭击智利一座城市之后，海盗们成群结队地“满足”城中的妇女，为了不给海盗们带来危险，“巴尔甘让人把女人们捆成一堆，从木屋完全清晰可见的地方，我们中有几人开始强暴她们，不顾一切交战性（Gefechtsverkehr）常规。木头里的甲虫会有这样的印象，她们像小牛犊一样突然离开安全的木栏，像羔羊一样被屠宰，颤抖而无助，一个接着一个，十个接着十个。”作者应该已经将“不顾一切性交（Geschlechtsverkehr）常规”的误读考虑在内了，因为试读的结果表明，很多读者至少联想到了其中隐含的意义，另一部分只看到了误读的内容。这一双重含义也暗示了布莱希特日后创作中的延续性主题，即爱情消逝必然导致的两性斗争。

在通行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中，叙事者追述自己的故事，任意安排要讲述的事件，但布莱希特的小说与此不同，第一人称叙事者介绍他直接观察到的事件，同时又不参与其中，仿佛这些事件是刚刚才发生的。叙事者在篇末的反思中才得出结论，巴尔甘原来真的放弃了一切。而对于再现的故事，其中的大部分叙事者（起初）完全不理解。因此，有别于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他没有控制材料，而是材料控制了他。

这样的叙事者被日后的文艺学称为“介绍性叙事者（vermittelder Erzähler）”，布莱希特在这里率先使用了新的文学技法，他早年的散文大多呈现这一特点。这属于“麦克风报道（Mikroreportage）”的技术革命。1929年，赫尔曼·卡萨克（Hermann Kasack）在与电台节目周刊《广播》（*Die Sendung*）同名的文章中引入了这一概念，根据卡萨克的论述，这种形式最早于1925年出现在柏林，当时“人们放弃了演播间的麦克风播音，带着麦克风来到了户外”，来转播赛马比赛。其中的收益是什么？是不可估量的庞大听众数量，用卡萨克的话来说，“公众”成为某一事件的共同见证人，而事件的结局一同新闻不同——是不可预知的。卡萨克认为如

此产生的效果是：“每一位电台听众—如果麦克风报道得当—都成了观众。”1950年代，特别是1954年的足球世界杯，大多数听众都是以这种方式经历着伯尔尼草坪上的赛事，直至电视直播取代了这种方式。古代曾有概念“听读（Lesen hören）”，随着“麦克风报道”又诞生了“听看（Sehen hören）”。

在没有技术媒介的情况下，如果这种方式在文学中获得成功，那么—与科技发展相适应—文学将赢得新的平台，为幻想提供了空间，也为共同经历的体验提供了可能性。布莱希特后来（1931）称其为文学的“技术化（Technifizierung）”。1921年末，柏林的文学圈子对巴尔甘的故事“有所谈及”也不无原因，即使当时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仍未命名。他们意识到，即使这个故事（表面上看）发生在异域他国，布莱希特仍给文学带来了新的、未知的，同时又富有挑战性的色调。虽然布莱希特1922年末传奇般地获得了克莱斯特文学奖（Kleist-Preis），而且受到了赫尔伯特·耶林（Herbert Jhering）的赏识，但《巴尔甘的弃舍》仍标志着布莱希特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突破，而且地点是在决定着当代文学走向的柏林。

但这还并非全部。这个混乱的海盗故事还叠加了宗教层面的意义，这需要对文本进行二次阅读。毋庸置疑，“圣玛丽的跛足”影射了魔鬼，巴尔甘—用原文的语言—“征服天空”，也同基督殉难十分类似，柯罗策就是他背上身的有血有肉的十字架。另外，当神面对海盗们对妇女做出的残暴行径，他“把脸转向一侧，打量巴西的收成”。同样，神一般的巴尔甘面对魔鬼的蛊惑只能闭上眼睛，无计可施。《神之颂》中是通过抒情主体，而此处是神本身放弃了神正论的疑问：全能而仁慈的主，为何会对世间肆虐的不幸、伤痛、灾祸、不公和压迫袖手旁观？神只是不再对其投以目光，将其弃舍。

这篇小说第一次出版在纪念但丁的期刊中，就这点而言，它也援引了但丁，因为《神曲》也是重回伊甸园的故事（虽然对此没有详加叙述）。刊物中布洛赫的文章也可能与此相关。文章有关千禧年主义，即可能存在的乌托邦，布洛赫指出，在向前迈进的路上，哲学家把共产主义视为向乌托邦的过渡阶段。那么对于同一本期刊中满怀希望的未来规划，布莱希特的小说间接地给出了根本性的拒绝。

当蓝色的晚风唤醒圣父

世界观：已废除

即使不能从文学作品中推测作者的观点，也有足够多的言论可以推断，布莱希特对形而上的问题毫无兴趣。在1929~1930年的故事《科尔纳先生与上帝是否存在的疑问》（*Herr Keuner und die Frage, ob es einen Gott gibt*）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人问科尔纳先生，是否存在上帝。科尔纳先生说：我建议你思考一下，你的行为会否因为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改变。如果不会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如果会改变，那么我至少可以这样帮助你：我告诉你，你早已作出了决定，你需要上帝。”他主张，不要信任任何一种世界观、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尊神明和任何一份自以为拥有的权力，因为它们为所有的不公和不人道开脱、辩护。《神之颂》中业已明确，反抗“天经地义”的官方信仰至少同为公正的社会而奋斗同样困难。当巴尔甘舍弃一切，只能得出结论：“在错误中不会有正确的人生。”（西奥多·W.阿多诺）他注定爱上胖子柯罗策的“德行”，这本身便是极为不道德的。

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中写道：“事物本身是什么，我不知晓，也不需要知晓，因为对我来说，事物绝不会同它的表象有所不同。”同《科尔纳先生》类似，康德的这句话也从根本上放弃了对“本质真实”的询问：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问题。事实其实已经得到当代天体物理学的证明，但是这个本源性问题是进而成为形而上学，还是不再提出类似的疑问，或者不再需要答案，这些都并没有得到回答，它被排挤到了其他领域，脱离了人类一切的筹算和洞察力（但是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因此，有必要再次讨论神的问题。应该承认，必须面对的现实呈现了完全脱离人类思考能力的维度与复杂性—无论如何，这本身也是人类研究可以展示的一项成果。

1934年的《易经》（*Buch der Wendungen*）^[10]中有言“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其间布莱希特清楚明确地说明了他的考虑：“墨子说：由经验而得来的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触发这些经验的事件之间的联系不尽相同。通过组合各种判断而得出的观念，无法准确地概括那些归纳出它们的事件。当过多的经验被组合在一起，由此还原到事件便会愈加困难。世界形成了图像，但图像无法把握整个世界。如果判断的目的是掌握事物，那么，更应该将判断与经验相联系，而不是与其他判断。墨子反对形成完整的世界图像。”对布莱希特来说，其中的世界图像（Weltbild）一词已经令人生疑，因为它意为确实存在世界，并可以为其描绘图像，好似“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日心说代表人物哥白尼或者伽利略之后已经错乱了时代；“观（Comtemplatio）”^[11]本来是托勒密学说的一部分。因此，“世界观”的概念对布莱希特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

我断膝破骨，与之偷欢

报道：奥格斯堡最美丽的女人

早在1917年，布莱希特便曾走入奥格斯堡城市剧院外墙的夹室里，想为自己作为德国未来的戏剧诗人树立纪念像。这里原本树立的是席勒的站像。布莱希特第一次步入这间剧院是1911年3月22日，当日上演席勒的《瓦伦斯坦》（*Wallenstein*），布氏觉得这个夜晚漫长而

无聊。1915年，布氏在学校的一篇作文中称《瓦伦斯坦的营地》（*Wallensteins Lager*）^[12]是“十月节卖烈性黑啤酒的柜台”，这让老师十分头疼，其中也没有丝毫对戏剧的热情，但这不妨碍布氏从1919年10月至1921年1月定期为城市剧院的演出撰写剧评。这些剧评发表于报纸《民族意志》（*Volkswille*）上，奥格斯堡发行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民族意志》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独立社民党新创办的一家报纸，政治上支持在德国按照苏俄模式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但布氏的剧评显然同独立社民党的政策毫无关联，他从艺术的角度直面剧本和演出，批评也不留情面。1920年10月23日，在关于《强盗》（*Die Räuber*）的剧评中，布莱希特就明确表示了自己对演出舞台设计的态度，按照当时普遍的做法，舞台设计不过是从道具堆中不假思索地组合起一些破烂：“就舞台装饰而言，大家似乎都愿意降低到简陋戏台的水平。纸板森林、画出来的房梁，老旧的沙发、晚霞……都摇摇欲坠。我抗议向我们的青少年们如此传播席勒的作品。”

不久之前，布莱希特由于对笑剧^[13]《旧日海德堡》（*Alt-Heidelberg*）的评论而被禁止进入剧院，他在剧评的首句就评价这部剧是堆废话，但禁令对于他这样一位剧评写作者来说是无法忍受的。除此之外，布氏在剧院的行为也令人侧目，他在不合适的时段放声大笑，或者愤懑呼喊而令人反感，再或者就是在演出进行期间在座位间来回走动，让观众们不得不起身站立。1921年9月，布氏这样评论黑贝尔的《犹滴》（*Judith*）：“十分明确，《犹滴》似乎是要学路德维希·安岑格鲁伯尔（Ludwig Anzengruber）的‘第四诫’。我们的剧评并没有疯癫，这是我们德国古典戏剧全部剧目中最差劲、最荒谬的一部。那头认为露露（Lulu）是辱骂女性的蠢猪现在又热衷于犹滴。”这为布氏招来了是非。饰演犹滴的女演员薇拉·玛利亚·艾伯乐（Vera Maira Eberle）认为布莱希特在辱骂自己，因为她曾在《奥格斯堡评论》（*Augsburger Rundschau*）中贬低韦德金德的《潘多拉

的盒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 1902）：这部剧讲述了妓女露露起伏跌宕的一生，她射杀自己的丈夫，未满刑期就被从监狱里救出，和自己的追求者在巴黎过着奢靡的生活，在伦敦身名俱败，最终被开膛手杰克刺死；这样的题材不适合性情敏感的人。艾伯乐因此提出了诽谤的控诉，经过两轮审理程序，布莱希特被判罚金150马克或者监禁15天。

事前，1920年11月，布莱希特就在一封公开信中回应了城市剧院“全体人员”对其剧评的批判。这次批判的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保存，但可以得知，它控诉了剧评严苛的指摘——不仅限于布莱希特所写的一并要求，剧评应该只限于报道事实。布莱希特明确指出：“艺术的利益高于艺术家的利益。”他也谦逊地承认，某些表达可以作出些“妥协”：“废话应该改成空话。”就“报道事实”而言，他的态度更加坚决：“让剧评局限于报道事实的要求无能又无耻，治疗咳嗽的手段不是堵上病人的嘴。”奥格斯堡的这出闹剧让人们事前领略了戈培尔1936年11月26日颁布艺术评论禁令的滋味。日后由强权压迫艺术及其（必要的）艺术评论，此时奥格斯堡人却自愿提出。戈培尔的禁令中规定：“到目前为止，艺术评论是对‘评论’这一概念的彻底扭曲，它受到了犹太民族过分的影响，成了艺术审判。从今以后，只有艺术报道；评论家由艺术编辑代替。艺术报道应寡评价，多介绍，多称颂。”

1919~1920年演出期间，奥地利女中音歌手玛丽安娜·佐夫（*Marianne Zoff*, 1893年生人）受到奥格斯堡城市剧院的聘请。她由慕尼黑前来，在慕尼黑同商贾、发行商奥斯卡·卡米卢斯·莱希特（*Oskar Camillus Recht*）同居，这段感情也同布莱希特有牵连。1919年9月28日，佐夫第一次在奥格斯堡登台，在乔治·比才（*George Bizet*）的《卡门》中饰演吉卜赛少女梅赛德斯。一个月之后，她替代性地饰演主角卡门，但没有坚持下来。剧评讲道：“女演员无法提升

戏剧的悲剧特点，冷漠而僵硬……演唱上，特别在低音区域，无法同强有力的交响乐伴奏相协调。在音乐表现力上，她在第二幕尤为失败……”1919年9月至1921年5月，佐夫专场在威斯巴登（Wiesbaden）上演，她在18次不同的音乐演出中共演唱了57次。这在当时并不算多，佐夫饰演的几乎全是配角，而且那些著名的剧目，如莫扎特的《唐璜》（*Don Giovanni*）、贝多芬的《费德里奥》（*Fidelio*）、韦伯的《自由射手》（*Freischütz*）、瓦格纳的《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和威尔第的《阿伊达》（*Aida*），她都没有出演。1920年12月28日，佐夫得到了饰演主角的机会，即洪佩尔丁克（Humperdinck）的《汉泽尔与格蕾泰尔》（*Hänsel und Gretel*），有评价说：“佐夫小姐饰演的汉泽尔在苍白地模仿男童，如果在中音区和低音区还算差强人意的话，歌唱和音准则都不稳定。”由此可以清晰得知，玛丽安娜·佐夫的事业并非得益于她的歌唱艺术。

大概在1920年12月的一次演出之后，很可能是《汉泽尔与格蕾泰尔》失败的首演之后，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个子男人来到这位女中音的衣帽间，赞扬了她的音色和表演。虽然佐夫几次三番要求他离开，他还是自顾坐下，表达了希望与佐夫建立情人关系的愿望。这位奥地利女人十分迷人，肤色较深，眼睛几乎是黑色的，而且像帝国在一战后逐渐普及的那样，作为一名自由支配生活的独立而自信的女性，她赢得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自然拥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由于事业发展不顺，又要满足一些风雅的需求，慕尼黑的情人卡米卢斯·莱希特便扮演了重要角色。佐夫一眼便不难看出，布莱希特在这方面什么也无法提供。后来，佐夫这样描述这个小个子男人：“布莱希特十分邋遢，衣冠不整，抽劣质的香烟；秋裤偶尔也会露出来，他也不在意；嘴角有口水干了的棕色痕迹，他的舌头因为舔润钢笔而有淡紫色的斑点，头发也油腻腻的。”在接受这位情人之前，佐夫很是费力地对付他的邋遢。如果问她是怎样做到的，答案很简单：她帮他清洗，首先是耳朵，然后是脖子，等等，具体细节现在不得而知。这些习惯布莱希特

并不觉得异样，并乞求她，可能是当佐夫碰到他一些私密部位时：
“一半就够了，求你了，一半就够了。”

直至1950年代，在（小）市民家庭，特别是男性，卫生都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夏日大多也会穿的）长内裤经常被当睡裤穿，除此之外还当居家裤穿，三天之后肯定会臭味熏天。女性的内衣情况也无明显改善。家里几乎没有淋浴；淋浴在当时还是军队、监狱和寄宿学校特有的。浴盆准备起来也颇费功夫，要在炉子上架起的巨大铁盆上烧水，然后倒入锌制的盆里，因此一般不会只供一人使用，原则上每周仅洗一次澡。除此之外，当时还没有洗衣机，抽水马桶也是极少数特例。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一位漂亮女人在完全可以找其他情人的情况下选择布莱希特呢？按佐夫自己的话说，是由于他“惊人的音乐才华和精湛的吉他演奏”，还有“哑哑的磁性声音”让她背上一阵战栗。再一次，是艺术家的特质起了决定性作用。

卫生问题只是这对新晋爱侣的麻烦之一。更严重的问题是，当布莱希特走进这位美丽女人生活的时候，莱希特已经是佐夫同床共枕的未婚夫——而且显然爱干净一些，这段时间布莱希特仍能偶尔溜进佐夫的房间。原因显而易见。布莱希特已经是一位父亲，而且也不会离开孩子的母亲，他生活贫困而放荡，除了艺术和偶尔的浪漫对佐夫毫无帮助；而莱希特却能慷慨地给他的爱人提供富足的生活，虽然目前状况有所改变，这仍是佐夫所不愿放弃的。

佐夫同布莱希特暧昧的整个期间，甚至在1922年11月3日两人结婚以后，她都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周旋，还试图接近第三个男人，比如在她短暂的威斯巴登演出时期。威斯巴登的剧院经理卡尔·哈格曼（Carl Hagemann）聘请佐夫饰演莫扎特《女人心》（*Così fan tutte*）中的多拉贝拉（Dorabella）。相对其唱功，奥格斯堡的戏剧评论更赞赏佐夫的外貌，如果所言属实，那么这位威斯巴登的剧院经

理应该更多的是贪恋佐夫的美腿，而不是聆听她的歌声。事实上，佐夫在威斯巴登也没有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哈格曼1921年12月没有再延长合同，佐夫也因此回到慕尼黑。布莱希特的信件可以较清晰地证实，哈格曼曾试图接近佐夫，但这件事情后续如何，已不得而知，也无足轻重。

布莱希特自己骄傲地宣称，他征服了“奥格斯堡最美丽的女人”。关于佐夫的演唱，布莱希特从无微词，相反，1921年3月16日，布氏在日记中写道：“她的表演很动人，安静而优雅，她浅吟低唱，如百灵一般。”这是《女人心》首演的当天。日记简短收尾：“我安静地独自回家。”此句使人猜测颇多。没有庆祝首演的聚会吗？为什么是安静的而不是欢欣鼓舞的？哪个剧院不庆祝首演呢？而且爱侣来观看演出却独自一人踱步回家也是闻所未闻。一名女歌手刚刚演出成功，却不坚持与她热恋的情人共同庆祝，这着实难以想象。原因只可能是：布莱希特提前回家，是回避他要作某种决定的尴尬场面，独自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布莱希特反感处理个人事务和怯懦地解决感情问题，而是选择逃避，这在他的一生中时有发生。

两个人

乱交：莱希特与布莱希特

同玛丽安娜·佐夫相识之后，布莱希特的生活中上演了低劣的爱情闹剧。事情发生在1921~1922年间，分别在1921年3~5月和1922年11月达到高潮。因为保拉·班霍策尔完全“无所事事”，她来回往返于慕尼黑和奥格斯堡之间，继续自己同布莱希特的关系。1921年春，玛丽安娜怀了布莱希特的孩子，但又断绝不了与莱希特的关系，莱希特一再要求结婚，并且一如既往地向她提供金钱。佐夫在布莱希特和莱希特之间的摇摆引发了两个男人之间的一布莱希特日记中可以查阅

到的一言语相向，甚至还有大打出手之势，据称布莱希特还购置了一把手枪，以便在紧要关头击倒情敌。

1921年5月7日，玛丽安娜流产失去了孩子。莱希特维护自己的权利，禁止布莱希特到医院看望情人，对此布氏如此评论：“没人需要我！但是莱希特能整夜看护玛丽安娜。那些美好的精神都从玛丽安娜·佐夫身上消失了，事情从闲逛开始，以实验室里婴儿的尸骨结束。”布莱希特失望地认为，玛丽安娜早已计划好打掉这个孩子，他的言辞也因此愤恨而伤人：“这就是她要的！其他的都是咖啡厅音乐和舞台灯光下的惺惺作态。这就是她原本想要的！这个婊子玩弄浪漫的手段是我所见过的最赤裸裸的骗局。这个怀孕的婊子就这样把孩子打掉了！这口破锅，所有男人的脏水都能流进来，我竟然曾想过把它放在我的房间里！”

几天之后布莱希特又和碧在一起，发现她如此“美好与可爱”。碧显然对布莱希特同玛丽安娜·佐夫的关系一无所知。布氏整年给玛丽安娜写了无数的情书，因为他知道玛丽安娜还没下决心放弃那个富有的情人；而且哈格曼也至少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布莱希特打算“像牛一样”努力工作，建议玛丽安娜学着独立，试着接触文学。1921年9月，碧再次怀了布莱希特的孩子，这个消息布氏一个半月之后才知晓，因为消息没有传到他那里（他在奥格斯堡，所以寄到柏林的信件都无法收到）。在返回柏林的路上，布莱希特少不了到威斯巴登看望玛丽安娜，留宿她家，与她同床。在收到碧怀孕的消息之后，布莱希特多次竭力申明自己只爱碧，但同时在给奥托·穆勒莱塞特和卡斯帕尔·内尔的信中写道：“魔鬼真是在我这里扎了营。”他还想在柏林与海达·库恩重温旧情。但海达此时正与夏里特医院的医生恩斯特·沃尔海姆（Ernst Wollheim）相恋，布莱希特毫无机会。几天之后，布莱希特收到消息，碧“自己有办法”，但这是怎样的办法现已无从知晓。

布莱希特给玛丽安娜的信又继续像洪水一般涌去，1922年4月末之后，玛丽安娜又回到了布莱希特的怀抱。同年夏天，玛丽安娜在照顾碧的儿子弗兰克时再次怀孕。碧仍然不知晓两人的关系，而且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真挚的爱人”那里收到汇款，因为布莱希特认为有责任照料自己孩子的母亲。她1922年1月的一封给“亲爱的、亲爱的、最亲爱的、深爱的贝尔特”的信被保留下来，信中碧在附言里写道：“你给我这么多钱，我很惊愕。这些钱你或许更需要。但我不敢把它还给你。”

1922年初秋，事情有了些改变，据班霍策尔和佐夫回忆，莱希特先生来到奥格斯堡拜访班霍策尔“小姐”，并介绍自己是玛丽安娜·佐夫的未婚夫：“请您谅解我的绝望，她怀了布莱希特的孩子，这小子如此狂妄，他对此事的态度竟然是：‘让他们成长吧，小布莱希特们。’”碧抓着一旁沙发的扶手才能保持平衡，“……但是，但是，我已经和他订婚！……”莱希特紧张地来回走动，喋喋不休地说：“我和玛丽安娜订婚了！是的，订婚了！订婚了！必须做些什么，而且立刻。”他们随即决定前往柏林，通知玛丽安娜在火车站等候，然后两人，指玛丽安娜和碧，一起找布莱希特谈话，要求他承担责任。

在慕尼黑的一间咖啡馆，大家点了茶。玛丽安娜盛气凌人地叱责布莱希特，而他只是在茶杯里搅拌着：“你在想些什么？你怎么能承诺她婚姻呢？你这个半疯半傻的家伙。总是找新的女人，从每一个女人那里都不要第二个孩子，每个人一个孩子，这还挺有趣，哈！”布莱希特只是默默地继续搅拌着茶杯，碧喊道：“你到底要娶哪一个？”布莱希特继续搅拌着，愤愤地说：“两个都要。”玛丽安娜厉声责骂：“你剃了胡子像头猪，也像个大气包。当我们急需用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抽弗吉尼亚雪茄。它只会让你口臭。别把我拖进你的泥潭，别躺在摇椅里喝酒了。你清楚地知道，我很痛苦。大丈夫也能说谎，满口谎话，为什么不呢？这只会让其他的人可怜。还可以把谎话

编得自己都相信，这也是艺术，肯定的，是艺术。这不是事实嘛，谁在夏天能说谎？在如此赤日炎炎之时？你，贝尔特·布莱希特可以。”两个女人气愤地扬长而去，布莱希特喃喃自语：“我肯定可以自由活动，随意吐痰，一个人睡，无所顾忌了。”他站起身，踱步出门。

玛丽安娜一有先见之明—提醒碧在回奥格斯堡的途中要当心，布莱希特会藏在火车里，随后现身。事实亦如此。他站在碧所乘车厢前的走廊，做手势让她出来。碧没有听从他的指挥，布莱希特就索性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我们要仔细想想，哦碧，要做些什么，别这么荒唐。”碧不抬眼看他，其他的乘客倒是越来越注意他。布莱希特毫不在意别人，声音更大了：“别傻了，根本没理由这样!!!来!”碧动也不动。在奥格斯堡火车站，布莱希特直接抓住她的手不松开，把她拽进一家咖啡馆，喋喋不休地解释道：“你知道的，碧，你是我最真挚的爱。任何女人都无法同你相提并论，只有跟你一起我才会幸福。”（同样的话他也在给玛丽安娜·佐夫的信中写过。）听着这些话，碧感动地望着布莱希特，他紧追不舍：“但由于这个糟糕的事情，最亲爱的碧请不要生气，我被迫要娶玛丽安娜。我只爱你，与玛丽安娜在一起和与你在一起的生活完全不同。你轻吐一口气便能给黯然的污水带去金色，在我们的床榻上升腾着沉醉的美好，你脖颈的线条，你声音的色泽，你的歌唱久久萦绕心间。和玛丽安娜的婚姻只是因为孩子，我仅仅因此才愿意同她完婚。一旦孩子出生，玛丽安娜必须同意离婚，这样我就可以立即同你结婚。”

布莱希特真的同玛丽安娜草拟了一份协议，协议中玛丽安娜也表明，一旦孩子出世便同意离婚。碧欢天喜地地收到了这份措辞优美的协议，并谨慎保存。1922年11月3日，布莱希特与玛丽安娜·佐夫完婚，但布莱希特告知碧的结婚时间是11月6日，因为布氏向碧许诺，9日回到奥格斯堡和她的身边，这意味着布氏和玛丽安娜只有3天的蜜月

期，但借助这个小骗局，布氏将其延长了3天。碧日后由一名律师处获悉，这样的协议有违道德伦理，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1923年3月12日，汉内（Hanne）来到这个世界，而这段婚姻持续到1927年才结束。

之前布莱希特就几经努力，让玛丽安娜不再堕胎。但玛丽安娜在第一次怀孕期间就提出过条件，只愿意诞下婚生子。布莱希特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当他从柏林苦苦哀求，无论如何要留住“汉内彼得（Hannepeter）”（为女孩和男孩分别斟酌的名字）时，玛丽安娜十分怀疑。针对奥斯卡·卡米卢斯·莱希特，布莱希特曾构思过《爱猪马尔库斯的冒险故事》（*Historie vom verliebten Schwein Malchus*），在如今的情景中，他又写了《杀婴女犯玛丽·法拉尔》（*Von der Kindesmörderin Marie Farrar*），同《冒险故事》一同被收入了《家庭修身集》。而法拉尔同美国蜚声世界的女高音歌手吉拉尔汀·法拉尔（Geraldine Farrar, 1882~1967）有关，法拉尔在德国还有柏林皇家歌剧院演出过多次，凭借对卡门的诠释而闻名。法拉尔同玛丽安娜·佐夫类型相似，二人都借由最挚爱的角色卡门来定义自己。

诗中布莱希特暗指流产等同于杀婴，下面几句诗中尤为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呼唤：“你们在洁净的产床上生产/称你们孕育生命的母腹是‘恩赐’/你们不能诅咒那些流产的弱者/因为她们罪孽沉重，她们苦难艰辛。”玛丽安娜属于得到“恩赐”的一类，所以就更没有堕胎的理由。这首诗到底对汉内健康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影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流产与杀婴的比照以特有的方式展示了布莱希特对孩子的态度，碧和玛丽安娜都曾记下布莱希特的话：“让他们成长吧，小布莱希特们！”它的含义不容误解。

布莱希特的目的绝非玩弄女性；这些有所“结果”的性生活绝不能推断布氏只在乎性满足。布莱希特并非阿多尼斯（Adonis）^[14]般

的美少年，但几经证实，他深得多名女性钟爱，那么他一定是一名很好的情人。更重要的是，布莱希特为何在保拉·班霍策尔之后要同时与多名女性保持性关系，而且向每一位女性许诺，她是他唯一所爱，而且还会为她们有别的男人而醋意大发，这需要一份可信的答案。

最晚到20世纪初，随着电影的发展，性已经成为大众消费品，它不再局限于伴侣之间，而是可以在烟花之地以各种形式购买，这引发了新的好色贪欲。青年布莱希特知晓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自1917/1918年起）的“启蒙电影”，最晚到1921年，布氏也了解了首都柏林的寻欢之所，且最晚在1919年他也已然熟悉了哈森巷（Hasengasse）—奥格斯堡近郊的妓院。即使他没有步入过这些场所，对那些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去探查一番也是常有之事。独幕剧《暗中光》（*Lux in tenebris*）中，布莱希特还把哈森巷作为舞台背景详细描写。大城市中的肤浅和人的聚集不仅结束了自主的个体性，使“他治（*Fremdbestimmung*）”成为日常体验，而且还摧毁了家庭，阻碍了人与人的亲近，这些都是布莱希特早期作品的主题，特别是1919年的独幕剧《婚礼》（*Hochzeit*）中，婚姻从婚礼庆典开始就宣告了破碎。

在文学作品中，布莱希特以美学的方式使读者体验社会弊端，展示那些舛讹百出的认识和观念，但他不能把这些弊端和缺陷都当作无足轻重或者头脑短路后的畸形产物。他必须适应这些现象，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承认这些是业已存在的不可逆之物，另一方面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掌控它们。机械生产的工作分工可以积极利用，它把人与人组织起来，并且形成新的一同样进行工作分工的一机构。爱情被定义为共同的生产，将产生“第三类事物”，这其中也包括性，性是创造的自然力和享乐的泉源，布莱希特认识并承认这一点，进而保护它。但这并非将婚姻排除在外，毕竟，布莱希特经历过两次婚姻，还努力缔结过一次未果的婚姻（与保拉·班霍策尔）。一夫一妻制自始便是不

可取的，因为它要求对人的占用权，这样的权力或者转化为无人性的异化，或者成为被利用的机会，以脱离规范的制约或基督教腐朽的道德标准。忠贞也毫无价值，即使布莱希特—不比天生的小布尔乔亚—时常要求他人对自己忠贞，自己却时常不以此为行为准则，这应该发生在较优越的市民阶层中，特别是布莱希特还有那样一位父亲做榜样。

还有关于布莱希特同性恋的问题。他1917~1918年寄往前线给卡斯帕尔·内尔的信尤为忧心满怀，见证了布氏对这位朋友深深的爱。布莱希特自己还提供了他们同性间交往的证据，1920年7月16日，布莱希特同卡斯一起在波森霍芬（Possenhofen）：“和朋友在一起比同姑娘一起好多了。”这里总结了两人共同度过的一个下午，在湖中、森林里和游船上游乐，诗歌《湖与河中的欢游》（*Vom Schwimmen in Seen und Flüssen*）便取材于此。但卡斯和贝尔特之间的爱无关乎性，可能也不掺杂情欲，是青春期男孩之间或者男人之间经常有的感情。在上述信件中，布莱希特主要是担心内尔的安危，担心他错过自己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能在奥格斯堡肆意享受的生活，这封信见证了他们的爱，但不能作为同性恋的证据。

而日记中的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布氏同好友而非女友出游，没有了性诱惑，可以无拘无束地享受大自然中的谈天说地。内尔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1920年5月5日，内尔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位没有提到名字的熟人：“他看起来像同（homosex）……人们在很多方面，在他的每一个动作中都能察觉到。我根本不懂同性恋，也完全不能报以同感。”一开始内尔甚至不愿将这个�拼写完整。这篇日记不是耍心计，更多也只是对所描述之事有嗤之以鼻的嫌疑，因此，关于布莱希特同性恋的嫌疑已可以一笔勾销。

布莱希特的尾韵是最棒的！

艺术商品：消费

《巴尔》的第一稿创作于1918年，在里面的夜宴场景中，现代社会的新特点得到了集中体现，它们有：新文学突破传统的限制，由巴尔所代表，也由奥古斯特·斯特拉姆所代表；围绕表现主义刊物《风暴》（*Der Sturm*）形成了语言破坏者的团体；然后是特本头巾帽（*Turbanhut*）^[15]的新时尚，由梅耶公司（*Firma Meyer*，奥格斯堡）和女士们代表；对当时股市的认识，由鲍曼公司（*Firma Baumann & Co.*）和男士们代表。文学创作者也成了标签：海涅代表“小轻狂”，伏尔泰和韦德金德代表“魔鬼性”，巴尔是“欧洲文学伟大弥赛亚的先驱”，布莱希特是——即便没有直说——弥赛亚本身。

1920年8月31日，布莱希特在日记中记录道：“我或许应该把《鲁特圣经》^[16]扔了，大大地印在旧报纸上，或者用加粗字体印在废纸上，这些纸三四年就分解了，在人们把它烂熟于心之后，这些文集就变成了垃圾。上面可能写着一些奇特的事情，比如：‘请吃欧特家牌（*Oetker*）面包粉！’或者‘现在就来耶稣这里吧’，或者‘布莱希特的尾韵是最棒的！’”《鲁特圣经》是一部歌集，可能是布莱希特对《贝尔特·布莱希特和朋友们的吉他伴奏歌》（*Lieder zur Klampfe von Bert Brecht und seinen Freunden*）的扩充，成集于1919年，可是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是其中的一些笔记足以展现布莱希特对其抒情作品的完全不同态度。市民阶层习惯上珍视价格高昂、印刷精美的诗集[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集甚至是手写的，因为他已经太熟悉每一个机械的铅字]，但布莱希特不同，他偏爱廉价的纸，因为它在完成它最重要的任务之后能很快破损掉：诗句要记在脑子里。相比将镶着金边的诗集保存在书架里——可能从未读过——这是更高的要求。

熟记诗文最保险的办法是为之谱曲，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诗不应是高雅的词汇精选，若要亘古流传，它还要将诗句像广告语一样送进欣赏者的耳朵，对此，布莱希特1929年就明确解释过，作者作为版权人应该消失。布氏1925年写道：“我没有欲念让我的思想永存，但我希望它们都能够被吃光、被转化、被用尽。”

此处也谈及了20世纪文学新定义中最重要的一点：文学成了商品，而且木已成舟。上文引用的关于诗歌的观点出自一位刚满20岁的青年人，他认识到，在工业化的大众社会里，文学必须改革，应该言时代之所言，而不是像一缕青烟一样消散。20世纪，现代派提倡的观念转变具有决定性作用。1909年，马克斯·莱恩哈特（Max Reinhardt）将歌德的《浮士德》搬上柏林的戏剧舞台，引发了轰动。莱恩哈特版《浮士德》的剧评这样讲道：首要的并非作品的原创者，而是那些给作品穿上新的、与时代相适应外衣的人，他们把作品呈现给时代品味，即消费者。1900年，欧特家博士的面包粉盒子上画上了一位面颊丰满红润的厚嘴唇小姑娘，这样的广告牌在每一家正规的食品店里都能看见。1918年，形态各异的赛洛缇（Sarotti）小黑人一石膏、铜，牌子上，小旗子上——让柏林的一家巧克力公司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一广告人物甚至超越了产品，使赛洛缇成为精品糕点的代名词。

布莱希特从在美国的经历中学习到，新的商品世界为了掩饰其利欲，必须在每一方面都附庸风雅，披上市民阶层的伪装，但本质上毫无改善——这些材料后来被他用于创作《乔·弗莱施哈克》（*Jae Fleischhacker*）和另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丹·德鲁》（*Dan Drew*）。作为语言艺术家，布莱希特首先看到了茨威利斯对语言的影响，他很早就以这种新的语言模式为范本，但不是为了模仿，而是通过运用它揭露其中的谬误。

他们马上会了解，

因为他们不懂生活！

丛林之中：布尔什维主义

慕尼黑对布莱希特来说只是一个中转站，从这里他能以柏林为导向，最终在大都市立足。慕尼黑，湍流的伊萨尔河，圣女教堂，绘画陈列馆，英国花园，室内剧，还有卡尔·瓦伦丁、弗兰克·韦德金德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即使布莱希特和他的朋友们在1919年大学停课期间挥霍了大把的时间，即使布莱希特的大部分慕尼黑时间其实都在奥格斯堡度过，其中还点缀着多次柏林之旅，慕尼黑的生活仍然是丰富多彩的。

布莱希特的创作能力也大幅提升。除了已经谈论过的戏剧《巴尔》和《夜半鼓声》一两部都被不断地重写和修改，1919年还有5部独幕剧问世，而且5部都是历久弥新之作。此外，布莱希特在1919~1922年间还写了不下35个故事，其中的4个是电影故事，还有几篇—除《巴尔甘的弃舍》之外—比如《加瓦迈耶》（*Javameier*）或者1921年的《船上的故事》（*Geschichte auf einem Schiff*）都是德国散文中尚未被发现的沧海遗珠。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250余首诗，单这一项就足以让布莱希特成为德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伟大诗匠。创作之余，他还为报纸《民族意志》撰写剧评，从事记者工作，并且辛勤地写了大量的书信与日记。

最重要的还是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同行，内尔1922年6~7月间也证实，这些关系像雨后春笋般生长。首先是奥托·扎雷克，他1918年创作了戏剧《卡尔五世》（*Karl V.*），任慕尼黑室内剧院的文艺评论家，这座剧院也是剧作者们的首选剧院。1921年12月，两人在柏林时（布莱希特的第二次柏林之旅），布莱希特通过扎雷克结识了阿诺尔

特·布隆内（Arnolt Bronnen）。布隆内对布莱希特《感伤之歌》（*Sentimentales Lied*）的演唱大为赞赏，他在回忆中写道：“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身体里搏动着这个时代的心灵。他（布隆内）兴奋得像小学生一样：爱，世间伟大的爱赐予我这样一位朋友。”

阿诺尔德·汉斯·布隆奈尔（Arnold Hans Bronner，生于1895年）1915年创作了戏剧《弑父》（*Der Vatermord*），此剧的剧本在1920年以阿诺尔特·布隆内的艺名成书出版，1922年5月首演，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剧中布隆内描写了自己酗酒的父亲费迪南德，父亲是名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他时常殴打妻子和儿子，为此儿子也进行了报复。本剧的轰动性在于，他同时涉及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又对腐朽的威廉二世时代进行了清算，旧社会的陋习仍然在新的共和国持续不断地产生影响。贝特霍尔德·菲尔特（Berthold Viertel）在柏林的青年舞台（Junge Bühne）执导本剧首演，演出引发了一场闹剧，但正值此时，剧评家赫尔伯特·耶林挺身而出，对本剧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认为这是“戏剧才华的爆发”，并断言作者将前程似锦。耶林日后也致力于青年戏剧文学的发展，短时间后，他也为布莱希特带来了成功的机遇。

布隆内则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形象，短发，因脱发有两个深深的额角，蓄着大鬃须，左眼上夹着一副昂贵的单片眼镜，这也是他的标志，他总是身着合身的西装，配白衬衫和深色领带。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写作内容，他都与布莱希特大相径庭。但是两人却决定共同创立一间文学公司，要借此征服柏林。由于布隆内的名字阿诺尔特（Arnolt）有别于日常的写法（Arnold），所以布莱希特决定不再用他名字的缩写贝尔特，而是与布隆内相呼应，从此时开始使用贝托尔特（Bertolt）。当然这样的书写方式一开始仍然有些先后不一致，即使至今仍没有得到彻底的坚持，但贝托尔特后来也成了正式名称。1924年，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与耶林的论战中称两人是

“表现主义的法佐尔特（Fasolt），当布莱希特和布隆内一起出现时，可能连瓦格纳的一个头韵都写不出来”。法佐尔特是瓦格纳的歌剧《莱茵的黄金》中的人物，他与兄弟法弗纳（Fafner）都是巨人，两人争夺矮人阿尔贝里希（Alberich）交出的尼伯龙根宝藏和受诅咒的指环。法弗纳杀死了法佐尔特，贪婪地攫取了一切。克劳斯这是恶意为中伤，认为与弑父类似，应该会出现弑兄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由于人们在背后议论布隆内的同性恋倾向，布莱希特一直同其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布莱希特又乐意同这样一位高雅绅士一起奚落、挖苦公众和剧院，毕竟布隆内要知名得多。

布莱希特在柏林尝试执导布隆内的《弑父》，但以惨败告终。1922年3月排练期间，布莱希特的执导方式就在演员中引发了越来越大的冲突：“莫里茨·泽勒尔（Moriz Seeler，青年舞台的剧院经理）租下动物园旁的新剧院，并为1922年4月2日的首演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就在当天，海因里希·格奥尔格（Heinrich George）的喊声淹没了导演的声音。”当阿格内斯·施特劳普（Agnes Straub）“在泣不成声的大哭中”崩溃，汉斯·海因里希·冯·托多尔斯基（Hans Heinrich von Twardowski）也同样自感不能胜任而退出时，布莱希特放弃了导演的工作。布氏“几乎像胜利一样”向布隆内宣布了此事：“恭喜你。用这样一群人本也不可能成事。”布莱希特同布隆内共同创作的“20万马克电影”——《亚松森漂流记》（*Robinsonade auf Assuncion*），最初也找不到出品人。1922年3月19日，布莱希特同布隆内一起在新民族剧院（Neues Volkstheater）观看保罗·古尔科（Paul Gurk）的《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巧遇赫尔伯特·耶林，布隆内介绍两人认识。由于克莱斯特协会（Kleist-Gesellschaft）顾忌多数派选举办法只会选出平庸之才，所以克莱斯特文学奖每年由不同的“代理人（Vertrauensmann）”颁布。耶林当日向两人透露自己是1922年的克莱斯特奖代理人。布隆内“立即指向布莱希特：‘那么，您的领奖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耶林要求拜读布莱希特的《夜半鼓声》，该剧应该于9月29日在慕尼黑室内剧院首演。当耶林最终拿到剧本，这位剧评家在最后时刻决定从柏林前往慕尼黑观看首演，这对布莱希特无疑是天降幸事。没有耶林热情的评价，布莱希特或许没有那么容易有所作为。耶林写道：“24岁的作家贝尔特·布莱希特一夜之间改变了德国文学的面貌。贝尔特·布莱希特赋予了这个时代新的声音，新的曲调，新的图景。”这篇评论登载于1922年10月5日的《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上，这份报纸当时发行量超过5万，副刊尤为著名。

既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必然会授予所赞赏的作者克莱斯特奖。10月17日，耶林“因某一特定原因”向布莱希特索要生平资料，并告知这位候选人，柏林将会爆发“布莱希特热”。布莱希特立即回复了一篇简短的自传，而且表明“布莱希特热只是基于一些误解，就像随即便会到来的‘布莱希特萧条’一样”。1922年11月13日，耶林在《柏林交易所信使报》中公布，由于《夜半鼓声》、《巴尔》和《丛林之中》等优秀作品，将克莱斯特文学奖授予布莱希特，获奖理由是：“布莱希特描绘了人对他人的影响，因此一方面避免了空泛无物的抒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局限于某一孤立的特征。布莱希特单单从舞台体验中获取思想背景和观点。”在布氏并不偏爱的慕尼黑，他却找到了这样一位文艺评论家可以尽其所能地支持他、宣扬他；从1922~1932年，以及后来从1946年直到布莱希特辞世，耶林都始终如此。

《夜半鼓声》首演的当夜，还有布莱希特另一出剧目也第一次登台：《红色葡萄干》（*Die rote Zibitze*）。“Zibitze”在德国南部指葡萄干，在本剧中指红色的嘴还有格鲁布（Glubb）的酒馆，戏剧第四幕就发生在这间酒馆里。这场午夜歌舞剧在很多方面都别具特色。剧名《红色葡萄干》也再次影射了革命的象征，这样类似恶作剧之夜的演出让文艺评论家们毫无头绪（同作者相比，他们把《夜半鼓声》看得更加严肃）。首先是以《异常房东》（*Der Abnormitätenwirt*）为

题目的歌曲、诗和舞蹈表演。马克斯·施莱克（Max Schreck）饰演格鲁布，他从帷幕后一间狭小的浴室中把藏在那里的人拽到舞台上：库特·达德尔度（Kuddel Daddeldu）^[17]，别名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Joachim Ringelnatz）；无赖，别名瓦勒斯卡·格尔特（Valeska Gert）；鲁莽吉他（Klumpfenbenke），别名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nke”源于德国北方方言熊心豹胆（bärenkühn）]；瞎母牛，别名路德维希·哈尔特（Ludwig Hardt）；罗蕾莱（Lore Ley），别名莉泽·卡尔施达特（Liesl Karlstadt）；抽弗吉尼亚雪茄的人，别名库尔特·霍维茨（Kurt Horwitz）。之后又按照出场顺序，依托机械动作把他们再次带回小室之中，并拉上帷幕。克拉邦德也参加了表演，他在接下来的两场演出中暂代布莱希特的角色。演出几乎没有有什么异常，面对座无虚席的剧院，演出的第一部分还有些无聊。中场休息之后是卡尔·瓦伦丁愚蠢的高脚自行车表演（绕场三周），最后是瓦伦丁的滑稽短剧《圣诞夜》（*Weihnachtsabend*），共同表演的还有作者卡尔施达特和约瑟夫·艾希海姆（Josef Eichheim）。上述所有内容混合了十月节和文学卡巴莱剧的形式，带有瓦伦丁的风格，之前在严肃的剧院还从未出现过。布莱希特借此讽刺地模仿了自己的作品，还有一流艺术家能为此登台献技，这再次表明，布氏早期便公开告别了市民主义的美学，用戏谑的态度对待一切。

慕尼黑还有更多可功成名就之处。由于同福伊希特万格的关系，以及同导演埃里希·恩格尔一起创作电影提纲，甚至文艺评论家雅各布·盖斯（Jacob Geis）也和耶林相熟，布莱希特在1922年10月获得了慕尼黑室内剧院首席戏剧顾问和导演的职位。1923年1月，布氏又同电影公司—慕尼黑艺术制作公司（Kupro）签署了年度合同，担任艺术顾问和导演；电影《理发店里的怪事》便是同这家公司合作拍摄的。后来，通过恩格尔和盖斯的介绍，布莱希特成功地将1922年初完成的剧本《丛林之中》[后更名为《都市丛林》（*Im Dickicht der Städte*）]在慕尼黑王宫剧院（Residenztheater München）首次搬上

舞台。这本身就是一次特殊的成就，因为《丛林之中》是布莱希特最难以理解的作品之一，至今仍让众多阐释者徒劳无功。它以毫无掩饰的方式，讨论了观念是否可以被买卖的核心问题。一名善良的美国人，剧中是租书铺的职员，恪守自己的观念，并因此走向灭亡。布莱希特之后曾说，观点并非在于坚守，它更应该像金钱一样支付出去。

全剧充满活力而又滑稽，是一部关于观念与世界观的笑剧，它提出的问题是：当所有的事实都与之相违背时，是否还应该对这些观念信守不渝。信念永不动摇，这也是一个人道德坚定的表征。对此，布莱希特一笑了之。但剧院观众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们大声喧哗、吹口哨、叫喊，甚至投掷烟幕弹；1923年5月8日的首演必须因此中止，抽吸烟雾后才能看到台上的演员。纳粹党人约瑟夫·施托尔岑（Josef Stolzing）在1923年5月12日的《民族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中承认“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毫无半点头绪”。托马斯·曼也表示完全不懂。只有耶林一如既往地推荐本剧，还有《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第56期署名为H. E. 的评论者说道：本剧的反对者认为它应该作为愚人闹剧遭到唾弃，但这样的质疑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观众如此激动的反应是突然爆发的示威，证明慕尼黑的思想界不会被武力镇压，也不会日复一日的污水中窒息。在这一刻，对珍贵事物的崇敬抵消了数年来的鄙俗和无用”。虽然该剧由埃里希·恩格尔执导，由卡斯帕尔·内尔负责舞台设计，计划在同年6月演出13场，但由于“观众反对”，《丛林之中》演出六场后即被取消。雅各布·盖斯任王宫剧院的艺术秘书，也因此丢了工作：株连之祸。

但盖斯没有因此动摇。鉴于《丛林之中》的首演，他在《慕尼黑国家舞台戏剧报》（*Theater Zeitung der staatlichen Bühnen Münchens*, 1923/Nr. 164~167）中写到，在柏林，由于人们不知道布莱希特的风格，便给他贴上了“类似毕希纳（Büchner）”的标签，这

样的标签或许他永远也无法摆脱。但盖斯错了，因为这一标签甚至都没有流传开来。盖斯继续说：“我们只知道一点，即便如我们这般谦逊：这个贝尔特·布莱希特是个人物。就我看来，他是一个属于这里也属于那里的人。但他在这里，他咄咄逼人地在这里，只有那些对伟大才华的宽宥才能容忍和允许他的存在。”

他细致雕镂、色彩柔和的语言艺术中

精选的室内乐

美食：托马斯·曼与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与托马斯·曼之间的第一轮论战可以追溯到1920年，当时曼第一次来到奥格斯堡，举行他尚未完成的小说《魔山》

（*Zauberberg*）的朗诵会。同曼之间的矛盾伴随了布莱希特一生，这在布莱希特研究领域时常被认定为“仇视”。其实，这是布莱希特针对当时德国文学享誉盛名的大作家进行的目标明确的挑战。两人第一次一间接的一相遇发生在1920年4月22日奥格斯堡的股票交易大厅，布莱希特受独立社民党报纸《民族意志》委托，撰写托马斯·曼朗诵会的评论，这篇文章发表于4月26日。

布莱希特的评论似乎初看是在努力理解作者和他的文章，把朗诵会的缺憾归结为场馆过大和报告厅拙劣的音响效果，进而归罪于主办方没有考虑到报告人的思想，只寄希望于有“出色的”听众。人们几乎不能，或者很吃力才能听到托马斯·曼的声音。布莱希特字里行间的意已经十分明晰，这样的大众化读者不适宜托马斯·曼，曼的作品——虽然布氏没有这样写，但可想而知——并非大型的歌剧，而是“精选的室内乐”，以其“细致雕镂、色彩柔和的语言艺术”见长，因此，“由于这种风格和拖延，作家无法”实现应有的效果。这是反

证，因为如果善于驾驭语言，即使是交易大厅也能余音绕梁。布莱希特的评价显然是一种侮辱。

此处已经暗示，两人此后矛盾的中心应该是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曼生于1875年，并否认这一差异，但布莱希特坚决强调：“他的观点是，他那代人和我这代人之间的区别是微不足道的。对此我只能说，如果某日‘轿车’和‘汽车’出现争执，依我之见，一定是轿车认为两者差别微不足道。”托马斯·曼提及这一话题时，正值《丛林之中》首演。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评论布莱希特：曼将布莱希特归于布隆内一类，认为布隆内的成名作《弑父》是以一种“新自然主义（Neo-Naturalismus）”的形式呈现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年轻的贝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中也激荡、充斥着同样的内容”。曼这样评价《丛林之中》，“在艺术品行和思想境界上”相对于《夜半鼓声》都有所退步。“慕尼黑民众的守旧主义”在首演过程中爆发了混乱，这些（民族主义的）乌合之众所抗议的，被托马斯·曼称为“布尔什维主义艺术”，这也是布莱希特首次得到类似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托马斯·曼将布莱希特的戏剧贴上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标签，还有使用这一概念本身。因为1920年代初期，德国[即使是德国共产党（KPD）]还完全不存在“布尔什维主义艺术”这种概念，但大概自1919年1月始，或许已经出现了反布尔什维主义联盟，他们还经营了一项反布尔什维主义基金，以此来支付自由军团的费用。自由军团镇压了德国革命，特别是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府和柏林的斯巴达克团起义。托马斯·曼采用了一这对布莱希特意义深远—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概念来确切评价布莱希特的创作，虽然《丛林之中》和托马斯·曼本人都对共产主义鲜有涉及。甚至前文中提到的纳粹评论家约瑟夫·施托尔岑也并未在其剧评中涉及布尔什维主义或者类似词汇。

如此轻率地评价布莱希特，是蓄意还是有欠考虑，如今已经无从解释。但一年以后，1924年3月18日《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

（*Leben Eduards des Zweiten von England*，简称《爱德华》）首演，恰巧此时，托马斯·曼评判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充斥着“刻意的讨巧，用表现主义的特点展现下等人的无赖”，还有“对无产阶级的崇拜”。曼的鉴定与汉斯·布劳恩（Hanns Braun）^[18]或者罗达—罗达（Roda—Roda）^[19]的评论大相径庭，对此人们不禁疑问，曼是否去对了演出，因为本剧少得可怜的民众场景中——这还要感谢街头艺人的唱奏模式——也无从感知到“对无产阶级的崇拜”。

1922年，《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圣诞节版次刊登了一场之前不为人知的论战。以《旧人与新人》（*Die Alten und die Jungen*）为题，讨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归属，报纸用整版的篇幅展现了两代人的冲突，托马斯·曼《论德意志共和国》（*Von deutscher Republik*）的前言和布莱希特的意见都刊登于此。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也有机会发言，他赞同曼的观点，战争之前，老一代人早已为“新的言语矫治（*neue Sprachbehandlung*）”开辟了道路，“给后世数代人提供了许多发展机会”，霍尔茨认为青年人当中还没有任何人能令他感到被超越。相反，布莱希特轻松而嘲讽地回应道：“也许某些人已经注意到，对于刺猬和缝纫机之间的关系，要说出让大家满意的答案，不是件易事。（在我们这样的人看来，与大家已知的数量相比，属于老一代的人要更多。）但他们与我们之间并非敌对关系。时间在碾磨他们，碾磨这些还为戏剧和文学教皇而写作的诗坛巨匠（他们不过殷勤地相互交换享用美食的回忆）。”布莱希特总结说，他们关心的并非戏剧，这一切只不过是“争夺美食”而进行的投票。这份甚为狂妄的见解还令人注意到另外一点，布莱希特已经较早地在柏林举足轻重的报纸（发行量超过25万，每天出版两次）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公开发表强硬的观点：市民文学有的只是美丽的话语，此外都空洞无物，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

您就做这样说……

怪异的德语：唯物主义转向

1920年代，当布莱希特勾画自己激进的美学时，偏爱使用怪异甚至错误的德语。《都市丛林》中，施林克（Schlink）有一名来自中国的抄写员桂墨迪（Moti Gui），作为抄写员他本应该更通晓文墨，但当施林克想买下租书铺职员加尔加（Garga）关于侦探小说的意见时（据当时的普遍观点，这些都不是好书），墨迪却透露：“您就做这样说：这是一本糟糕的书？”墨迪评论道：“您有一些观点，会这样，原因是您不懂生活！”如果墨迪也像加尔加一样出卖观点而获得金钱的话，他也不会有好下场。但加尔加始终不明白，为何自己与施林克之间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

如果继续找寻蹩脚德语的痕迹，知名的还有为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音乐所作的诗句，布莱希特沙哑的演唱已经让这些诗句像耳虫一样钻进脑子：“对，只做一个计划/只做一束耀眼的光/再做第二个计划/这两个都不去做。”《人类奋斗不足之歌》（*Lied von der Unzulänglichkeit menschlichen Strebens*）中BB先生的德语更为拙劣：“这个人完全不好/因此你要打他的帽子/如果你打了他的帽子/他或许会变好。”

按照格律的要求，如果某处缺少一个音节，古典作家喜欢在诗句中加入一些情绪符号，比如“哦”或者“哎哟”或者“哈”，虽然它们除了使格律完整外没有其他必要性：“在我的胸中，唉，住着两个灵魂。”^[20]即使没有受制于某种格律，布莱希特也不畏惧使用这类叹词：“哦，开始的乐趣！”有一些与布莱希特同时代的诗人，在市民阶层的文学接受中曾享有并仍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同样对语言使用要求苛刻，可以作为比较的对象。

首先，布莱希特1926年对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颇有微词，当诗中出现神——这时常确有其事，“里尔克的表达绝对是同性恋的。如若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将再也不会读这首诗而不发出诡异的冷笑，哪怕只是一行”。布莱希特想到的例子或许是著名诗歌《秋日》（*Herbsttag*）的篇首几句：“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田野。”

还有在诗歌艺术中自称大师的施特凡·格奥尔格，其1890年的著名诗作《园林之中》（*Im Park*），作者不仅让抒情主体——一位诗人沉浸在精致的美景之中，还有其他没有详尽介绍的学徒纵情欢乐、嬉戏玩闹。诗人显然不能参加这次狂欢，因为他必须同“他的精神”对话，这座艺术园林中的鸟儿显然不知惧怕，慢慢靠近他：

看到欢愉之日的苏醒
感受轻柔之音的炽热迷醉
感伤身躯与身躯的缠绕。
诗人细听着诱惑的曲调。
但今天彼人之曲无法触动他
因为他正与他团团思绪对话：
他的石笔^[21]不再游走。

这首诗采用的是三节诗行，要求三个相同的韵词，与韵脚“nahen”和“sahen”（看到）谐韵的是“umfahen”（缠绕），这种构词大体与“umfangen”或者“umfassen”同义，指“围绕，拥抱”。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诗《致尽善尽美》（*An die Vollendung*）的最后一句虽然也使用了“umfahen”一词，但历史上这

也只在南德的德语区出现，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1928年出版时，这一用词显得十分古旧，而且矫揉造作。

格奥尔格认为，20世纪只有那些被认为是混合词的动词才能确保较高的语言水准。如果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诗人之所以不能参加狂欢，是因为他必须从事诗歌创作，即使“石笔”无法书写。而且“石笔”一在“身躯的缠绕”的上下文中一可以有多重理解，所以对于“较高水准的语言”即使不尴尬，也至少有些异样。不仅是笔无法书写，而且由于性能力的缺陷也无法有欢愉之举。当然有理由认为，里尔克没有想到神在放屁，格奥尔格也没有想到性的双关意义，但是这不是说他们对语言没有灵敏感觉，而只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词汇选择可能会与更真实的事物发生关联。里尔克和格奥尔格将现实排除在外，但现实还是会通过文学接受进入到这个看似封闭的体系里。这个体系要运转，必须严格隔离所有外界现实，置身于时空之外，并且只准许信徒们进入。如若这个体系之内哪怕说出一个现实的词语，这个世界也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

与之相反，布莱希特漫不经心地使用语言，却不惧幽默和矛盾，他的语言以日常用语为导向，但又不被其束缚。路德也曾言：采万民之言，而又非人云亦云。同样，那些熟悉的、在人们头脑中固定的，或者似乎思想上已经永远曲高和寡的，布莱希特毕生用看似幼稚的手段，将现实性带入其中。如此才出现了许多概念，如“Tui”（图伊），“Thaeter”（指“新戏剧”），“Misuk”（指“革命音乐”），还有一些习语被赋予了双关意义收录在他的《易经》中。除此之外，如果可行，布氏还对一些严肃的文本进行了非严肃的阐释，而且效果是一旦记住这些“偏颇之见”，就几乎或者根本不可能再摆脱它们。

施林克的抄写员用日常用语中的“tun”（做）连接动词不定式，布莱希特这样不仅刻画了人物的语言水平，而且拥有这样的语言水平的人还作为评论员面对敌方，这本身也不失幽默。借此，布莱希特更是将“物质的说”和“精神的说”对立统一起来：“您就做这样说（Sie tun einfach sagen）”或者“您别做自己陷进来！（Tun Sie sich doch nicht so hineinreiten!）”。语言上，“tun”是多余的，它表示桂墨迪对加尔加发出警告，而加尔加拒绝卖掉自己的观点，但拒绝会产生严酷的后果，这在戏剧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展现。布莱希特给看似只在精神层面进行的斗争印上了物质的烙印，一方面模仿了日常粗话，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其美学上的新意义。剧本在语言上也表明——也是这部晦涩戏剧的核心——谁坚守自己的观点，就会遭到真实棍棒的责打：“您进行了形而上的斗争，却留下一个屠户的肉案。”

我见你们被自身粗野地缠绕

本能统治者爱德华：

同福伊希特万格的合作

根据同室内剧院的合同，布氏应执导一部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剧院经理奥托·法肯伯格（Otto Falckenberg）原本属意《麦克白》；但布莱希特还没有勇气挑战莎士比亚的作品。因此，布氏与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达成共识，改编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这项工作从1923年夏延续至1924年2月。同英格兰当时普遍的状况一样，马洛的戏剧（1592）也以无韵诗的形式写成。即使改编给人以忠实于原著的印象，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还是进行了相当大的改动。这首先需要“文雅的语言”。由于对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来说，“常用的五步格律太过油滑”，两人因此省略了抑音，更加突出戏剧矛盾，同时又避免了语

言的繁复。当布莱希特追忆这些诗句时，称这是形式上的“逆流而上”。文雅的语言首先在结尾部分是必须的，因为作者同马洛不同，并非要塑造“爱德华二世令人扼腕的死亡”，而是要强调其向超凡境界与神性的升华：“诗句的语言使人物的英雄气概更容易得到感知。”当大修道院院长要求他一被英格兰上层贵族所囚一最终放弃王冠，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的爱德华从不屈从，他放下王冠只为在豪言壮语之后立即再次戴上它：“潮涨潮落啊，你要停在一侧。停下！月亮和所有的季节。”原因是：“我无法取下它，我的头发也会随之而去/它已经同王冠连生在一起。”爱德华直言不讳地引用了《约书亚记》10：12，其中上帝命令道：“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雅仑谷！”^[22]爱德华视王冠为自己的一部分。之后，爱德华继续得到提升，当他被转移到伦敦的监狱，更确切地说是伦敦的阴沟，在这里他没有悲叹受苦（如马洛笔下的爱德华），而是“像安泰俄斯一样从威斯敏斯特的土地中”汲取力量，他立足糟粕却写下诗篇，“因为春天将会来到”，爱德华在“污水”中强健了自己的四肢。只有当他被诱骗离开阴沟，丧失了脚下的土地，他才最终被杀害。

布莱希特的神话特色十分强烈，他不仅将笔下人物同上帝类比（也同耶稣受难类比），还援引了安泰俄斯的神话，赋予了爱德华新的维度。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的儿子，只要他保持与大地母亲的接触，便不可战胜，因为他可以从他的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与安泰俄斯战斗，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力量，最后把他扼死。无论是基督教的因素还是神话因素，布莱希特都从对“传奇男子”的阅读中找到关联，这些人是美国模式的“自我造就者（Self-Made-Men）”，无论商人还是黑帮，他们的结局皆如出一辙。

布克·怀特 (Bouck White) 虚构的自传《丹尼尔·德鲁之书—美国股市操纵者的生平与思想》 (*Das Buch des Daniel Drew. Leben und Meinungen eines amerikanischen Börsenmannes*) 1910年首次出版, 1922年由汉斯·海因茨·埃韦斯 (Hans Heinz Ewers) 译为德语。布莱希特想将其改编为戏剧 (参见未完成的《丹·德鲁》), 来揭露这个时代商业上的尔虞我诈。德鲁为之提供了最好的素材。德鲁确信: “上帝账目精细, 是一名优秀的商人。我相信祂的账簿。” 虽然德鲁绝不信守“付出, 才会有收获”的圣言, 但这完全不妨碍他抓住上帝的某句话并把自己抬高到同样的高度。他责骂自己的同事是“猪猡”, 因为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财富交付上帝, 德鲁还援引了基督教早期的人物亚拿尼亚 (Ananias) 和妻子撒非喇 (Saphira) 的故事, 以证实上帝一眼看穿了这些人的诡计, 他们无法逃脱公正的惩罚。亚拿尼亚和妻子撒非喇欺骗了同胞的钱财, 因而被上帝信手处决。当然怀特的读者, 无论是美国的还是德国的, 都不可能知道这个冷僻的信徒故事, 但这还是为他自己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提供了历史背景, 而且同时——即使语言表达匮乏拙劣——制造了有教养的假象。

在这样的书中, 无耻的作者和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同样无耻的人物, 他们所塑造的伟大英雄形象只不过是借来的, 同现实完全脱节。这里人们不禁要问, 作者是在讽刺吗? 因为看不到讽刺。直至今日, 怀特的英雄故事已发行数版, 事实说明, 股市交易虽然无人能懂, 但关于它的文学俗套作品却总能找到读者。亨利·福特 (Henry Ford) 的畅销书《我的生活与工作》 (*My Life and Work*, 1922), 也沉浸在与之类似的夸张语言中, 1923年登陆美国市场: 再次收益颇丰。

过度和狂妄傲慢的个体性使德鲁与爱德华类似, 这位国王因此自我膨胀, 要求继续挽留自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地位, 并因此走向灭亡。该剧文雅的风格嘲弄了残酷的现实, 揭露了爱德华要求的僭

越，同时也将其合适地表达了出来：无法得到现实的承载。布莱希特通过爱德华预先表现了希特勒的人物形象，希特勒虽然在历史上晚于爱德华数百年，但同爱德华一样再次提出了对整个世界无尽的统治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是“本能统治者（Triebherrscher）”。1926年，布莱希特在笔记中追述这部戏剧：“我在《爱德华》中着手刻画了一头阴暗的巨兽，它像是有地震前的预感，嗅到了威胁每一个生灵的巨大灾难的第一浪。我展现了他原始、无望的举措，以及他以古喻今的孤独中可悲的结局。后辈们可以看出，在我有生的岁月里出现了‘最后一只蜥蜴’，它感知到大洪水的到来。”大洪水暴发，它没有冲走那只蜥蜴，却毁灭了半个世界，带来了数百万的亡灵。

关于《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还有几个戏剧上的轶事，但其可信性也是真假参半，因为它们有多个不同的而且无从查证的版本。谣传有如下内容：布莱希特成功地使已经赫赫有名的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帮助自己实现目的，并同时也向其展示，谁才是德国文坛未来的主宰者。慕尼黑的文学圈时常在斯蒂芬妮咖啡馆相聚，在这里布莱希特时常勃然大怒，不仅辱骂周围的人，而且还自吹自擂，夸耀同年长数年的“博士”先生相交甚好，而且还可以利用他锻造自己的事业。此外，布莱希特确实在慕尼黑大获成功。有人向福伊希特万格告密，说布莱希特四处散布自己同福伊希特万格的友谊不过是走向高处的跳板，他是在利用福伊希特万格，而且福氏扛鼎之作对他来说也完全无关紧要。当福伊希特万格就此事质问他年轻的朋友一两人自始至终以“您”互相尊称，布氏全盘承认，而福伊希特万格却十分大度，并不在意。为什么？因为与两人是否相互欣赏这样无谓的争执相比，共同的文学计划更为重要。

如今已无法查证福伊希特万格在两人首次的共同规划中担负哪些部分。奥地利—匈牙利导演、文艺评论家伯恩哈德·赖希（Bernhard Reich）在苏联和德国都曾工作过，而且同拉脱维亚戏剧教育家阿西娅

• 拉齐丝 (Asja Lacis) 结婚。赖希追踪了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在剧本《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上的工作，他确信：福伊希特万格虽然由于其对人和人生的认知——赖希列举了“暴饮暴食、酗酒、纵欲和虚荣”——为戏剧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剧本的语言令人震惊，它形成了异常残酷而清晰、异常摇摆的图像，这样的语言通过‘陌生’的措辞打破习惯，使埋在句子中的词汇意义、概念凸显出来，这是布莱希特的语言。……在思想天马行空时，在最冒险的精神挥洒中，仍然有能力保持现实而冷静的目光，从而不致跌入无形、无关——这是布莱希特对创造性合作的高价值‘投资’。”

但是，如果相信传说，两人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一再有非常大声的争吵，福伊希特万格此时甚至必须向玛塔女士寻求仲裁。由于布莱希特在慕尼黑没有符合要求的住处，所以工作必须在福伊希特万格家完成。福伊希特万格生活富足，在施瓦宾最好的地段——乔治大街，近莱奥波德公园 (Leopoldpark) ——有一所大房子，其中的工作室被布莱希特占据，他不断地抽烟，整个房间烟雾缭绕，以至几乎看不清人。这样的家庭自然不能缺少女仆，而她成了两人争执的目击者，他们互相辱骂，布莱希特还不断地喊“该死”。某天晚上争执异常激烈，女仆跑去玛塔·福伊希特万格 (Marta Feuchtwanger) 那里，哽咽地说，两人正要置对方于死地。当玛塔在烟雾里最终把这两只好斗的公鸡分开时，布莱希特仍然勃然大怒，扬言博士简直一窍不通，他将来自己收拾烂摊子吧。玛塔劝解无果，布莱希特悻悻离开，还唱着刻薄的歌。后来才证实，是一个逗号引发了这次争吵。布莱希特深夜归来，福伊希特万格早已入睡，布氏站在窗下，向外大喊：博士说的有道理，直至把整条街的人吵醒。

另外，对作品的署名权也有纷争。福伊希特万格原本同意完全放弃署名，后来又有顾虑。布莱希特请赫尔伯特·耶林共同参加讨论，最终相互妥协：布莱希特署名作者，但是在题名页背面注明：“本剧

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共同创作。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924年在基彭霍伊尔出版社（Kiepenheuer）发行的第一版《爱德华》便是如此。但1927年的《加尔各答，5月4日》（*Kalkutta, 4. Mai*）却截然相反。福伊希特万格署名为作者，布莱希特在背面标注为合作者。所达成的妥协既是对布莱希特语言功底的认可，布氏的才华已经凭借《夜半鼓声》一举成名，同样也是福伊希特万格对青年同行的慷慨举动，福氏已经名满天下，因此不存在对布莱希特嫉贤妒能，这同时也验证了布氏的优秀。这样的反复也说明，布莱希特一正如许多人所证实过的一十分注重自己的权威，他提出的要求，即便不完全合理，也不能或不愿遭到驳回。

1924年3月18日，《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首演时发生了状况。剧评家汉斯·布劳恩写道：“霍默卡（Homolka）先生，一位年轻而又有天赋的演员，差一点儿就毁了这场演出……此处以及在对王位继承者爱德华的角色分配上，导演都严重失职，以至于最后一幕本来就令人困倦，现在更是沦落到荒诞的边缘。”布劳恩不可能知道，霍默卡完全醉酒。他也不会知道，布莱希特执导本剧，把小爱德华的角色暂时分配给了拉脱维亚的阿西娅·拉齐丝，她出场时应该严词斥责莫蒂默（Mortimer）^[23]。“凶手！”虽然布莱希特之前就表示这里一定要说得“严厉、尖锐”，但缘于口音，拉齐丝的台词还是听起来像结结巴巴的“该死！”这在观众当中引发了哄笑，而且使演出的整个结局都饱受质疑。霍默卡的酒醉是因为：布莱希特知晓霍默卡酗酒的习惯，要求他在排练之前和之间都戒酒。霍默卡自然也恪守这项义务，因此，布莱希特要在演出之后一注意是之后一奖励他一瓶上好的科涅克白兰地，而且把酒带到了剧院。但布氏显然没有想到要藏好这瓶酒，霍默卡不知如何在中场休息时就拿到了它，而且在长期忍受戒酒的饥渴后一饮而尽。

演出在观众的疑惑中结束，工作人员起先在剧院的酒吧相聚，然后一起去福伊希特万格夫妇家，霍默卡也准时到达。库尔特·霍维茨回忆：“霍默卡出现在门口，站立在那里片刻，希望有人来迎接他，应该还在幻想自己是多么的大放异彩。布莱希特只是稍微转身过去，两眼发光地说：‘他要为演出失利负责！’我们也都疏远霍默卡，他因此脸色苍白，瞬间酒醒了，没过多久便匆匆离去。”

还有惯例的戏剧尾声部分：按照固定程序要举行“末日氛围餐（Untergangsstimmungsmahl）”。用玛塔·福伊希特万格的话来说，“人们吃饭，是为了喝酒；人们喝酒，是为了吃饭”。当气氛达到了某一点一首演后的夜里也是如此——“放浪的朦胧天色”开始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相应的行为。人们三三两两地躺在地上，抓起身边最近的女伴，不温不火地拥抱她，进入“欲望时刻（Wolluststunde）”，大家进行知性的交谈，内容原则上是死亡和人类末日，即大家仍要无条件享受的日子。布莱希特回忆，这样的活动他并没有积极参与，更多的只是远观，其间时常发生一些尴尬——除了抱头痛哭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此时大家会要求他朗诵谣曲，以便或多或少地驱解尴尬的气氛。

舞台设计师卡斯帕尔·内尔还坚持为这场闹剧加演一场。他狂饮数瓶白葡萄酒后酩酊大醉，开始针对阿诺尔特·布隆内，表示对其已经忍无可忍，必须有所行动。内尔声称布隆内曾对布莱希特恶言诋毁，拿着半满的酒瓶径直向他走去，意欲砸向布隆内的头部，玛塔·福伊希特万格及时挡下了这个被高举的武器，瓶中酒洒了一地。这还不够：隔壁房间还有一名美丽的金发女士脱光了衣服等待着内尔；内尔对此毫无兴致，粗鲁地拒绝了她。这位被鄙弃的女士于是推攘拉扯，开启了闹剧的最后一轮，玛塔最后还在角落里找到了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他蜷缩成一团，不省人事。就这样，《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大获成功。

关于这部戏剧的另一出轶事要推后一段时间。布莱希特1924年9月迁居柏林，虽然首演存在疑问，但布莱希特仍很快成功地说服莱奥波德·耶斯纳（Leopold Jessner）——柏林国家剧院的经理，不仅将《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加入到演出计划，而且由布莱希特担任导演。但事情很快开始四处碰壁。布莱希特坚持演员们——包括维尔纳·克劳斯（Werner Krauß，饰演莫蒂默）、埃尔文·法贝尔（Erwin Faber，饰演爱德华）、阿格内斯·施特劳普（Agnes Straub，饰演安娜）、鲁道夫·费纳（Rudolf Fernau，饰演肯特）等——采用他们所不熟悉的新的表演方式。因此总是发生争吵和互相攻讦，以至于耶斯纳认为有必要将福伊希特万格召来柏林，福氏此时正同太太在加尔达湖（Gardasee）度假。演员们完全不可能同布氏进行有效的合作，福伊希特万格成了拯救演出的最后希望。福氏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火速赶到柏林，他一踏进剧院的大门就听到了争吵声。剧院的一名演员上前来，十分笃定地说：“这位布莱希特先生简直是在人们头上跳舞。或许您能对付得了他。”当福氏打开观众席的门，一声愤怒的“该死”就冲入耳畔，这声音他并不陌生。他立即认出了布莱希特，布氏一旁占着支支吾吾的剧院导演尤根·菲林（Jürgen Fehling），菲林应该督查排练，现在已经完全绝望。布莱希特立即转向福伊希特万格，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意见：“这根本不可能，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那么，这完全是颠覆我们的理解。”福氏尝试从中斡旋，他建议布莱希特：“您一定要一再说‘该死’吗？您或许可以说：这太程式化了。”福氏立即明白了布莱希特与国家剧院传统表演方式之间的矛盾。布莱希特似乎让步了，喃喃道：“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如果您觉得如此重要的话。”

但是排练几乎还没有继续，布莱希特就突然从黑暗中大喊：“这又太风格化了！”虽然布氏声音十分激动，但所有参加演出的人——当然菲林除外——都狂笑不止，但这显然也不能阻止菲林脸色灰白地走向他们，严词喝道：“布莱希特先生、福伊希特万格先生，如果要

国两位伟大的作家赶出剧院，这会使我很难，但我别无选择。请您二位离开。”但耶斯纳毕竟没有取消演出，而是将导演的工作转交给了菲林，并在1924年12月4日成功排练完成。评论界将这次演出鉴定为“一次杰出的行动”，即使阿尔弗雷德·凯尔的评价更具思想性地履行了义务：“那些不停打哈欠的人/才知道我的痛苦/评论太短/一次登场，又一次登场。胶着。毫无发展。几乎四个小时。谁要是没睡着，一定早不耐烦了。”

但这并非这场闹剧的全部。在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被严令离开剧场之前，他们还到更衣间探访了维尔纳·克劳斯，并向其保证，他的表演无与伦比。福伊希特万格赞扬克劳斯：“您的贡献卓越，只是拉丁语诗句的重音还有待改进。”克劳斯对此并无丝毫起疑，并理智地问道：“那么您一定要告诉我正确的重音是怎样，我想说得正确。”福伊希特万格把莫蒂默对特洛伊战争的讲述朗诵了一遍，“Quad erat demonstrandum”^[24]，然后和布莱希特一起离开了剧院。在路上，布莱希特问福氏，为何让可怜的克劳斯模仿错误的重音。福氏回答：“如果所有的都有错，那么拉丁语也应该说错。”两位作者显然对演出意见统一，统一之处还在于，他们都没有去参加首演，而是去看了好莱坞影星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的默片《扎扎》（*Zsa Zsa/Zaza*）。为了确保不引起注意，他们在自己的剧目第二次演出时才去观看，但最终两人还是收到了禁入令。

我的名字便是品牌，谁使用这个品牌

必须要付费

为合同而讨价还价：柏林的出版社

多次的柏林之旅是布莱希特为最终于1924年9月1日迁居柏林所作的准备，他自己将其理解为征服柏林（同布隆内一起），但这并不绝

对和彻底，因为直至流亡布氏既没有放弃他的奥格斯堡住所，也没有忽视任何一个在那里〔或者在湖边，大多数情况是阿默尔湖

(Ammersee) [25].] 消暑避夏的机会。第一次柏林之旅发生于1920年1月21日至3月14日。对柏林的印象，布氏断断续续在给雅各布·盖斯和卡斯帕尔·内尔的信中有过描述：“剧院是绝妙的：它们引人入胜的热情与活力甚至造成了小小的肾结石。我爱柏林，但是责任有限 [26].” 还有：“柏林是件美妙的事，你不能偷500马克来这里吗？……但是到处都充满了庸俗和无聊，但这是一种怎样的气派啊，孩子！” 在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一次化装舞会上，布莱希特假扮成僧侣，邀请一位裹着棕色缠腰布的“非洲女子”跳舞，从中也诞生了一段单方面的爱慕，而且单恋的是布莱希特一方，因为“曼海姆小姐”——布莱希特对她的称呼，名唤多拉 (Dora) ——还愿意回应布氏的一他日后还一再鸿雁传情——山盟海誓；这些多拉起先完全不予理会。

1920年3月13日，右翼激进分子沃尔夫冈·卡普 (Wolfgang Kuff) 与国家防卫军司令瓦尔特·冯·吕特维兹 (Walther von Lüttwitz) ——冯·吕特维兹已经因镇压斯巴达克团起义立下战功——发动政变，将艾伯特政府驱逐出柏林。这也让布莱希特立即动身离开，他自称是回慕尼黑查看一切是否妥当，其实是去找卡尔·瓦伦丁享乐。柏林一直处于内战的边缘，但布氏对政治动荡不以为意；他毫不迟疑地回到乡下，误以为那里会安全一些。

布莱希特的第二次柏林之旅从1921年11月7日延续到1922年4月26日。本次旅程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必要的关系，以便日后以作家的身份在这座大都市立足。目标首先是出版社，这同时也意味着能结识一些同行，赫尔曼·卡萨克便是其中之一，布莱希特第一次前往柏林时，曾于1920年3月为了《巴尔》的出版通过海达·库恩联系过此人。卡萨克是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审稿人，在《家庭修身集》的事宜上是布莱

希特的合作者。卡萨克多次邀请布莱希特前往波茨坦，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的总部位于那里，布氏在这里也结识了很多熟人，他用惯有的居高临下描述这些人：“他们都是好人。乐于助人，无足轻重，细致入微，有点儿消瘦。”通过克拉邦德，布莱希特还同埃里希赖斯出版社（Erich Reiß Verlag）建立了出版关系。这是一份总合同，对此布莱希特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在慕尼黑同三脸谱出版社（Drei Masken Verlag）的合作也已有眉目。布莱希特曾如此记录自己典型的谈判方式：“我手脚并用。首先是出版社的事情。赖斯报价750马克，基彭霍伊尔800马克，它们都想要剧本的舞台营销权。我已经同赖斯签了合同，但又把合同要了回来，给卡萨克看。然后我必须和三脸谱谈一下。我突然想到应该向他们要1000马克，月薪，有效期一年。基彭霍伊尔那里我同样抬高到1000马克。如此一来的结果是，基彭霍伊尔将下面几个剧本的营销权让给了三脸谱，三脸谱摇摆不定，出价最高500马克。我因而没有上交加尔加的剧本，坚持1000马克的报价。在我舌干唇焦的苦心劝说之后，他们最终同意了。”这是1922年1月的事情。

这样每个月都有预先支付的款项，现在这些钱愈加必要，因为布莱希特没有收入，而且也早已放弃了学业——他从没有真正意义上开始过。布氏的父亲虽然仍一如既往地资助他，在布莱希特学无所成的前提下仍然慷慨解囊，但还远远不够（布莱希特还必须为弗兰克支付抚养费），而且他还必须证明，自己作为一名作家是可以独立度日的。布莱希特的讲述中清晰可见的是，他不是以求助者的身份面对出版社，他懂得为自己的市场价值谈判，而且为自己估值较高。正如前文中所说，《巴尔甘的弃舍》激起了出版社的兴趣。

布莱希特如何获得自己的文学品牌，这在他为《家庭修身集》进行的博弈中有所记载，对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特别是对赫尔曼·卡萨克来说，几乎都到了忍无可忍的边缘。1922年初便有了整部集子的目

录，目录说明全书到第四章已经基本完成，只待印刷。虽然基彭霍伊尔每月支付商定的1000马克，但布莱希特迟迟没有交稿。1923年1月，卡萨克到慕尼黑拜访布莱希特，以通读修改《谣曲集》（《家庭修身集》当时的名字），但布莱希特拒绝交出打字稿，卡萨克只能两手空空地愤然返回柏林，而且同时必须向他的出版商澄清，应该如旧每月给布莱希特支付报酬。《夜半鼓声》1922年9月29日的首演大获成功之后，布莱希特品牌的价值更是水涨船高，所以出版社也只能咬牙忍耐。

这样的博弈在1923年愈演愈烈。在去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途中，基彭霍伊尔1月底前往慕尼黑拜访布莱希特（和内尔），就出版社期待的其他几部作品进行谈判，但最终没有结果。卡萨克必须对目前的境况作出解释，因为基彭霍伊尔不愿再等下去了。卡萨克写道：“布莱希特犯了一个错误，或者说他简直不知羞耻。我愿他一切顺利，拿到钱又没有回报，这样像定期支付退休金一样的事不可能持续下去……如果布莱希特其他作品还要好些周后才能交付，那么这些预支给他的款项会逐渐达到一个数额，乃至他应得的报酬都无法平衡。”但出版社仍不愿放弃这位作者，因为布莱希特许诺了很多后续作品，例如《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和对萨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öf）的小说《戈斯塔·贝尔林》（*Gösta Berling*）的戏剧改编。但《家庭修身集》布氏一直没有交稿，与出版社的合作计划中只有《爱德华》最终成书，1924年夏由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发行。《戈斯塔·贝尔林》的改编也只完成了序幕部分，发表于《艺术报》，其他便只有一些草稿（它们也定格在了草稿的状态）。

下一轮博弈的日期是1924年6月。布莱希特再次前往柏林，卡萨克想利用这次机会审阅处于创作过程中的作品，即《家庭修身集》和《戈斯塔·贝尔林》。卡萨克就诗集的进展情况向出版商汇报：“布莱希特周六再次来到我处，他已经把返回慕尼黑的日期推迟了数天，

以便今天下午和晚上能最终完成《家庭修身集》的余下部分。我们一起重写一些原本不如人意的诗句，还努力给这部作品增加一些有趣的变化。”根据这段说法，卡萨克是伊丽莎白·霍普特曼之外，诗集的另一位合著者。另外，我们还发现一册布莱希特的《巴尔》（波茨坦：基彭霍伊尔出版社，1922）可以证实这种合著关系，这本书包含了布莱希特手书的题献：“给亲爱的赫尔曼·卡萨克/贝尔特布莱希特/1922年冬。”其中还记载了两人共同创作的诗歌《林中之死》

（*Tod im Wald*），这首诗也被用在了《巴尔》之中。卡萨克和布莱希特两人都为《家庭修身集》的出版作出了许多十分重要的改动，而且无法清楚地分辨某个改动是出自谁的手笔。

不管怎样，卡萨克—卡斯帕尔·内尔也来了，共同商定卷册的装帧—认为诗集1924年便可出版。但布莱希特再次把打字稿带回了慕尼黑，经多次催促也没有交返。8月，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心灰意冷，中止了付款，自身也陷入了财政危机，由于地租马克（Rentenmark）^[27]的发放（自1923年11月起），出版社几乎破产，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卡萨克1925年4月转去电台工作，并最终于9月份彻底离开了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布莱希特因此也认为自己摆脱了一切责任，开始重新寻找下一个金主。6月，他向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报告消息：“月薪550马克。真是惊人。我同乌尔斯坦出版社（Ullstein）签订了合同。一次伟大的胜利！”

虽然布莱希特1925年10月将《家庭修身集》递呈给了古斯塔夫·基彭霍伊尔（Gustav Kiepenheuer），基彭霍伊尔也立即命人排版—结果便是《修身集平装书》（*Taschen-postille*），但乌尔斯坦集团坚持自己新获得的权利，以至于基彭霍伊尔只能制作25册私人印刷稿，由布莱希特为自己订制。《家庭修身集》最终在1927年由隶属于乌尔斯坦集团的廊柱出版社（Propyläen-Verlag）发行；并随后出版了第二版（修订版）。这部包含50首诗歌的诗集，题目也引人注目：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家庭修身集》（*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布莱希特在书名中加入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这一第二格具有双重意义：这些诗由布莱希特创作，而且是关于布莱希特的。这便继续了他1926年在《人就是人》的舞台上开始使用的手法，将自己的名字同作品交织在一起，使其再也无法从作品中剔除。

关于《家庭修身集》还有一个传说。布莱希特让伊丽莎白·霍普特曼散布如下消息：“基彭霍伊尔出版社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资本反对印刷《死兵的传说》，这首诗本应收录在《修身集平装书》中，而且已经排版。正因如此，同基彭霍伊尔的合同才宣告作废。廊柱出版社（乌尔斯坦）接纳了布莱希特，接纳了这位被越来越多的出版社认为政治上有失偏颇的作家。”这里无一字属实，而且乌尔斯坦出版社十分守旧，布莱希特也并不十分适合这里。乌尔斯坦的作家包括薇姬·鲍姆（Vicki Baum）、本诺·莱芬博格（Benno Reifenberg）和弗兰茨·布莱伊（Franz Blei）等。1928年，布莱希特又重回基彭霍伊尔，同年10月出版了《三毛钱歌剧之歌》（*Die Songs der Dreigroschenoper*）（无乐谱）单行本，至1929年，该书销量达5万册。1930年开始，基彭霍伊尔还出版了布莱希特创办的杂志《尝试》（*Versuche*）。基彭霍伊尔继续同布莱希特合作，并且一同苦心经营，这一事实已然不言自明。当纳粹攫取政权后，由于旗下的左翼作家，例如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等，基彭霍伊尔出版社成了第一批遭到迫害的出版机构。75%的出版物惨遭销毁。对此，德国书业贸易协会（Börsenverein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号召抵制，因此出版社还能以十分简化的方式持续运行。新的总编辑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后辗转阿姆斯特丹，在当地的阿尔勒特德朗格出版社（Verlag Allert de Lange）继续自己的工作，早在1933年时布莱希特便因《三毛钱小说》受聘为该

出版社的作家。1944年帝国文学院（Reichsschrifttumskammer）彻底肃清了这家出版社。

人们在这里几乎不能生存，在这个贫民区，白雪皑皑

卡巴莱：失败了

再次回到布莱希特第二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柏林之旅。除了上文提到的接洽出版社事宜取得成功之外，布莱希特还同阿诺尔特·布隆内建立了友谊（自1921年12月）。布莱希特另一件或许可称得上成功的事是卡巴莱剧团的“疯狂舞台（Wilde Bühne）”。其中的介绍人又是奥托·扎雷克，按照布莱希特的说法，扎雷克把他“拖到”赫斯特贝格那里，塞给他一份“6天的合同（500马克）”，这对一名新手来说是一大笔钱；因为通货膨胀1922年6月才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女演员特鲁德·赫斯特贝格（Trude Hesterberg）因默片电影而知名，在康德大街12号西部剧院（Theater des Westens）的地下室里组织了“疯狂舞台”，并很快享誉全城。布莱希特的登台大概是在1922年1月中旬，虽然合同规定6天，但仍是唯一的一次。他演唱了士兵歌曲，第一首歌在观众中反应平平，第二首歌在演唱中戛然而止，布氏悄然离开了自己的凳子，去取在舞台的暗处存放的歌词，然后开始用沙哑的嗓音演唱《死兵的传说》的第一节，并且接着演唱后面的段落。观众们对此很气愤，“这样的和平主义曲调令人作呕，大家叫喊，谩骂，威胁表演者，当最终一只香槟酒杯飞过布莱希特的太阳穴时，赫斯特贝格迅速拉上了帷幕”。作家瓦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是“疯狂舞台”的常客，他此时站到帷幕前，借用歌德在《随军征法记》（*Campagne in Frankreich*）中的语句劝告观众：“女士们，先生们，适才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但不是对诗人，而是对您们！终有一日您要自夸，今天曾来到这里！”歌德的原文是指1792年9月20日的炮击

瓦尔密（Valmy），这是法国革命军第一次阻击了反法同盟的军队；歌德曾目睹了这场战役。

梅林的话似乎证实了这位自称柏林征服者的年轻人一次决定性的成功，关于布莱希特在“疯狂舞台”的登台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但事实并非如此。柏林“疯狂舞台”的观众当时已经比肩继踵，自然也吸引了一些保守派人士，他们认为有必要更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不道德的行径；毕竟原来在德国还从未出现这样的表演，至少在公开场合还没有。据赫斯特贝格回忆，当晚观众席中坐着几名看似从乡下来的富农，他们认为布莱希特的表现庸俗，对其他歌曲的思想内容也很反感。布莱希特之前大致只在私人场合一十分成功地一演唱过，因而面对观众时有些不自信，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显然这才是他没有再出演卡巴莱剧的原因，之后布氏歌词的演出都安排了专业人士，比如1927年10月弗里茨·考特纳（Fritz Kortner）在乌发（Ufa）[\[28\]](#)电影院的演出。

布莱希特在柏林的生活也粒米束薪。1921年12月，布莱希特在给玛丽安娜·佐夫的信中写道：“我的玛丽安娜，我正在读你的信，这里很冷，几乎不能思考了。人们在这里几乎不能生存，在这个贫民区，白雪皑皑。我还必须弄清楚这个技巧，这持续了如此之久！我一直在想你，当我四处走时，当我冻僵时，当我买煤油时，当我口授时——我都不能在纸上写字！我们怎么才能在一起呢？我这里不能接待任何女士，姐妹或者新娘也不行（或许你会为此而高兴？），房子又冷又小。有张乱七八糟的床，很窄，铁质的，这里的人也很坏！或许我更应该去威斯巴登，但是明天我还要继续打听一下，事业上还是毫无生气，我期待不多，必须利用所有的一切。”

你们或许从中察觉，酒精多么无害……

在蓝鸟：俄国民族艺术的后果

在“疯狂舞台”登台后的几天，布莱希特在笔记本中记录道：“我突然尿血。但仍然试图放纵地生活，同克拉邦德、海达和布隆内去了蓝鸟（Blauer Vogel），但我的下半身还是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我孤独地在我冰灵的洞穴里躺了两天，然后海达和布隆内来了。”时事评论家弗兰克·华绍尔从布莱希特的第一次柏林之行就开始照顾他，这次也带他去了夏里特医院，在恩斯特·沃尔海姆医生—海达·库恩的未婚夫—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病房并得到治疗。检查结果显示，布莱希特患有严重的肾炎。原因是营养不良，糟糕的过于寒冷的居住环境，还有酒精；酒原则上比饭食更容易搞到，而且更廉价。

布莱希特在日记中提到经常同朋友一起去蓝鸟，这也再现了新的、引人注意的社会关系。1921年秋，蓝鸟创办于舍嫩贝格（Schöneberg）的一家后院电影院中，是一座当时享誉整个欧洲的德—俄小型舞台剧院，十分成功，其奢华、丰富多彩和混乱众所周知，被称作“俄国小戏剧盒子”。“蓝”在俄语中意为“深蓝、浪漫、深刻”，稍许描述了这里的戏剧纲领。在蓝鸟会聚的是逃离“战时共产主义”的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被流放的，因而思念着故土。虽然政治肃清运动波及了250万俄国人，但蓝鸟的戏剧纲领是非政治性的，它是浪漫的、感伤的。这一时期蓝鸟的观众有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Wladimir Majakowski）、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chklowski）、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还有造型艺术家伊凡·蒲宁（Ivan Puni）、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witsch）、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当然还有德国伟大的艺术家，例如格奥尔格·格罗兹、鲁道夫·施里希特尔（Rudolf Schilichter）、库尔特·图索斯基（Kurt Tucholsky）、阿尔弗雷德·波尔加（Alfred Polgar）、奥斯卡尔·比（Oskar Bie）、尤里乌斯·迈耶—格拉夫（Julius Meier-Graefe）以及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蓝鸟的舞台很小，但是色彩绚丽。《世界舞

台》（*Weltbühne*）的主编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Siegfried Jacobsohn）如痴如醉地谈论这里：“蓝鸟是一个让人不断深陷其中的梦，可以忘记丑陋的、令人意气消沉的、令人麻痹的、无聊的灰色现世。”这听起来似乎同布莱希特的美学信条大相径庭。

蓝鸟按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wski）的思想上演剧目，俄国特色中充斥着伤感的歌、诱人的舞蹈、讽刺性的模仿还有喧闹的劣等演出，但这些都鲜有人提及，俄国的灵魂、德国的立足点和绚丽夺目的色彩，这样的混合体让这个剧院脱颖而出。人们在这里畅饮最廉价的伏特加。在未完成的《加尔盖》（《人就是人》的前身）中，布莱希特也将这出卡巴莱剧同酒精联系起来，其中一名妇女说：他“噘着嘴，好像在蓝鸟喝了自己的白兰地一样”。

布莱希特在第二次柏林之旅时就时常出入这个艺术家圈子，很可能在第一次前往柏林时就结识了他们，在《加尔盖》（创作于1921年）中提及蓝鸟就证实了这一点，从这些事实中对布莱希特的创作兴趣可见一斑。布莱希特礼赞艺术和生命，对娱乐而非政治感兴趣。此处还要强调一点，蓝鸟戏剧同布莱希特此时勾勒的美学纲领并不符合。布莱希特的电影构思证实，他这一时期更热衷于卡尔·瓦伦丁的小型舞台表演，一直在寻找街头素材（*Boulevard-Stoff*），对此蓝鸟并非一个不恰当的选择，相反，布莱希特后来热衷拳击手氛围（*Boxermilieu*），蓝鸟也为之营造了对应物，这些内容在更高雅艺术家的圈子里是遭到鄙夷的。布氏必定是蓝鸟的第一批顾客，因为蓝鸟从1921年秋才开始出现。

那酒精呢？如果从布莱希特的作品推断其作者，青年布莱希特一定是个较严重的嗜酒者。巴尔的酒瘾推动了故事情节，《小歌》赞颂了酒精的无害，诗歌《褪色的青春信函》（*Aus verblichenen Jugendbriefen*）描写了通宵狂饮的夜：“腹中还有棕色的雪利酒/臂

弯里还有那个小妞/她昨晚折磨我们一夜。/田野间每个人/进入朝霞色的苍穹/一艘巨大的船。”在性事上，布莱希特的日记说明他并非像巴尔一样是个浪荡子，玷污女性，所有性爱领域的语言描写与其说记录了真实经历，更应该说是语言上的发泄。在酒的问题上也是相似的，几乎没有人知晓布莱希特习惯饮酒（即使是那些铺张的宴席，布莱希特也几乎只是个看客，而非其间推杯换盏的那个人）。但从1922年疾病的侵袭可以推断，这位爱交友的年轻父亲长期生活窘困，因此饮食中喝酒多于吃饭。可以认为，1922年1月时布氏的肾脏损伤极大，只有以后戒酒或者只喝啤酒才能康复。许多事实也说明，布莱希特在这次惨痛的患病后也确实这样做了，随后的年月中再无饮酒的记载。饮料单上只有茶和啤酒。他在玛格丽特·施德芬（Margarete Steffin）逝世后喝了一杯威士忌，立即又出现了肾疼痛的情况，这也使布氏意识到：“死对一切都无益。”

这样的商品并非新品，因为它必须赢利

柏林聚宝盆：火山口上的舞蹈

在立足于柏林之前，布莱希特在1920年代初期还曾到访这座大都市7次。柏林，1870年帝国建立后成为首都，在1900年前后其居民数量仍不足300万，在威廉二世时代结束之后，尽管遭到了战争毁灭性的破坏，仍然在短短几年间幻化成为一座巨型城邦，规模不可估量，而且由于动荡的政治局势成了世界最自由的城市。一战刚刚结束，在革命的风潮中，歌舞剧、卡巴莱剧、游艺演出都在柏林破土而出，火山口上的舞蹈开始了。

伊利亚·埃伦堡在通货膨胀时期曾这样描写对德国的印象：“德国人像是生活在等候室中，没有人知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店主每天都在改动价格牌，马克在贬值。选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上成群结队的外国人熙熙攘攘，他们用极低的价

钱买到这个曾经辉煌帝国的残留。而在贫穷的城区，面包房却在遭到抢占。一切看似面临崩溃，但工厂的烟囱仍然浓烟滚滚，银行的职员还在兢兢业业地记下那些天文数字，妓女们涂脂抹粉……爵士歌曲声音刺耳。我还能记得两则标题：‘只有香蕉’和‘明天是世界末日’。但世界显然还不急于走向灭亡。”末日之歌这样写道：

5月30日是世界末日。

我们时日不久，我们时日不久。

5月30日是世界末日。

我们时日不久，我们时日不久。

但没人知道，在哪一年，

这真神奇。

我们或许时日不多，

为此，我们干杯痛饮。

埃伦堡是柏林的30万（还有一些资料认为是近50万）俄国人中的一员，直至1923~1924年间，苏联一直处于歉收、饥荒和腥风血雨的国内战争中，这些人因此离开了苏联，在柏林寻找立足之地。俄国人偏爱的城区是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柏林人把这里重新命名为“夏洛腾格勒（Charlottengrad）”，开往瀚蓝湖（Halensee）的公车从此以后也被称为“俄国人秋千”。这些流亡者以西柏林为核心，使选帝侯大街〔柏林人称库达姆大街（Kudamm）〕成为柏林的新市中心：“如果在西柏林散步，那么人们眼前闪烁的全是与俄国相关的通知、陈列柜、海报和广告：我们说俄语，罗迪娜书店，梅德韦杰夫餐厅，莫斯科咖啡馆。报刊亭也迅速传播开了俄语报纸和杂志。一场非暴力占领！但德国人不以为然，他们对此已然习惯。”这是1923年，正值通货膨胀。

与俄国人同时到来的还有数万波兰人和数千名辛提人（Sinti）和罗姆人（Roma）——辛提人和罗姆人被作为“茨冈人”^[29]遭到种族迫害，这些人之外，许多人也同样因为本国的灾难逃到这座大都市。除此之外，数千名年轻女性也来到柏林，毫无经验，毫无引导，“满心期待着幸福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降临到她们身上”，就像在火车站迎接这些入境者的柏林基督教会福民事业（Das Diakonische Werk Berlin）章程中错误记载的那样。可是这样的“幸福”要么是某个低级娱乐场所的裸舞，要么是卖淫，卖淫在战后甚至还更加畸形，在造币厂一带（亚历山大广场附近）还有专门的孕妇区，严格按照妊娠的月份划分。在市民和小市民的居室里，性成熟的女性也为了金钱向嫖客提供性服务。她们的男人都倒在了“荣誉之地”，但饥饿不识得任何荣誉。伊利亚·埃伦堡曾讲述，他与同为作家的弗拉基米尔·林迪（Wladimir Lidin）走在街上，警察局规定的时间之后，所有的酒店都停业了，一名皮条客把他们转弯抹角地带到一个典型的中产人士家中。“我们被呈上香槟酒—汽水同酒混合。然后家里两位女儿穿着风骚女子的化妆服饰跳舞。……母亲则充满期待地看着两位外国客人，或许他们觉得两个女儿够吸引人，能让钱汨汨而来——当然是美元……‘这就是生活！’这位正派的母亲感叹道，‘这就是世界末日。’”通货膨胀期间，嫖客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有美国人，用手中坚挺的货币，他们能在柏林找到各种价格低廉的乐子，而且也毫无节制地利用这样的机会。

克劳斯·曼（Klaus Mann）回忆：“‘看看我吧！’德国资本家们大叫着，在绝望中仍然夸夸其谈。‘我是巴别塔，是罪人，是城市中的怪物。’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a）^[30]加在一起及不上这里一半堕落，一切都杂乱无章。柏林的夜生活，年轻人啊年轻人，在全世界都不曾见过！我们曾经拥有一支军队；如今我们有的是极端的反常！恶习，还是恶习！无尽的选择！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统

治者们！这大家一定曾见过！”套话“全世界都不曾见过”影射了柏林十分成功的同名歌舞剧。歌曲的第一段为：

起先女人们身着短裙，露着腿，腿常常是弯的

接着，把腿藏起来后，她们穿无袖装来回走动。

人们可以看到酥胸袒露，惊愕地叫着：“现在，现在，现在！”

之后她们露着背，又把胸前扣子扣起。

她们为我们的笑话哈哈大笑，给我们展示所有的美丽。

只有她们用来坐的部位，全世界都不曾见过。

这出歌舞剧在柏林轻歌剧院（Komische Oper）^[31]上演，由詹姆斯·克莱恩（James Klein）执导，宣传这部歌舞剧的语言虽然有误，但无人能及：“柏林独一无二的、最成功的歌舞剧。夏季折扣价！”但是女人们用来坐的部位，当时在柏林随处可以见到。

1923年末，克劳斯·曼见到了裸舞界的标志性人物安妮塔·倍波尔（Anita Berber），她在“白鼠（Weiße Maus）”登台，这是一所介于卡巴莱和夜店之间的娱乐场所，也提供文体娱乐活动，这在1920年代初便已出现。倍波尔并不卖身，至少在“白鼠”里没有，而是展现自己的舞蹈技艺，优雅、妩媚，有非凡的身体协调性和迷人的柔软与灵活，演出半裸或者全裸。当时还爆发了公开的讨论：她的舞蹈是艺术呈现还是有悖道德风尚？但这些最终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当安妮塔·倍波尔跳舞时，总会全场爆满，人们甚至愿意为她牺牲最后一毛钱。在柏林她从未受到困扰，因为警察局长也是她的座上宾。布莱希特从未得见这位新兴艺术的明星，因为她演出的场所对布氏来说价格不菲。当布氏最终有可能负担得起“白鼠”的消费时，安妮塔·倍波尔已经离世，她1928年11月死于结核病，享年29岁。但两人之间仍有间接的关系。

1919年，布莱希特创作独幕剧《暗中光》（*Lux in tenebris*），剧本讨论了当时的热点话题，即以宣传教育的伪装来推销色情表演，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取消了官方审查，这种行径因而成为可能（魏玛共和国日后又辗转再次实施审查制度，1920年5月12日的《电影法》和1926年12月18日的《保护青少年免遭色情文学影响法》）。独幕剧的题目源自电影《将有光》（*Es werde Licht*, 1917~1918），由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导演。在1919年11月的文章《戏剧生活》（*Aus dem Theaterleben*）中，布莱希特对此类电影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果电影之后仍被允许播放如此的秽行，将很快不会再有人走进剧院。在电影人享受共和国自由的欣欣向荣之时，他们也发觉了自己对这些可怜女子的同情，以及自身的义务，要向共和国澄清事实：电影拍摄的是性教育。这样的商品并非新品，因为它必须赢利。只是那些恰巧没有同妓院交好的警察禁止了这种启蒙。现在他们赚到了大笔的钱，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启蒙，阵亡者的命运虽然令人惋惜，却愈发光辉。”布莱希特激动的原因并非出于道德的考量，社会中根本无人关心道德，道德对布氏来说也不存在，他忧心的是戏剧，戏剧面临这样的竞争，长此以往恐将不敌，如若这般，将必定要采用极端的手段。素材唾手可得。1918~1922年，安妮塔·倍波尔同理查德·奥斯瓦尔德合作了4部电影，它们皆服务于这一题材，其中包括《一个迷失女人的日记》（*Das Tagbuch einer Verlorenen*, 1918）和《神秘故事》（*Unheimliche Geschichten*, 1919）。可以推断，布莱希特了解这些电影，进而也知晓倍波尔其人。

一座相当了得的都市

美元太阳：蓬勃发展的柏林

1920年代，柏林成为德国现代化大都市蓬勃发展的先驱。通货膨胀使物品和财产的实际价值严重注水，因而进一步引发了对工人史无

前例的剥削，他们几乎是在无偿工作，因为在他们的指缝间，货币的价值瞬间化为乌有。通货膨胀使工作艰辛的中产阶级破产，他们很快大量投入纳粹的怀抱，作为失去社会地位的阶级，成了纳粹暴力统治的基础。推出地租马克之后，由于1924年美国的借款〔道威斯计划（Dawes-Plan）〕，德国的土地上升起了“美元太阳”，柏林成为欧洲现代都市的中心，人口流动性高，充满活力。虽然新建的工厂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但由于从美国引进了新的技术，这些岗位的数量也受到了极大限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这是政治交易，也是为发展付出的代价（至今依旧如此）。

由于便利的地理位置，柏林建造了纵贯欧洲东西南北的交通纽带，成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坐落于中心的坦佩尔霍夫机场（Flughafen Tempelhof），1926年放射般地起飞了众多国际航班，可以到达欧洲各个重要城市。流水线技术提高了摩托车和汽车的产量，因而推动了高速公路的建设，这当时还被当作赛道使用〔例如1921年9月开放的阿瓦斯（AVUS）赛道〕。如果要成为这个大世界的一员，私家车已成了地位的象征，布莱希特虽然众所周知生活窘迫，但1926年也用尽一切手段，设法搞到了一辆汽车。

市内铁路、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线路和马车线路得到大规模扩建。1920年代中期，柏林已经拥有50万余台电话，每天有近150种日报出版，其中还有20家为了保持实效性而每日发行两期。《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布莱希特也偶尔在此发表文章—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由于轰动性报道和相应的插图，达到了近200万的发行量。

对柏林的市民来说，大众媒体和新科技迅速成了生活必需品。如若想留在这座城市，必须服从这些机构，任其摆布。在1920年代的柏林，人们每日都可以体验到布莱希特所称的“可分割个体

（Dividualisierung）”的主题；看清这一现实自然也是必须的。布莱希特想要也需要大都市的体验，这座“冰冷的城市”，其中的“丛林”为未来戏剧提供了舞台。除此之外，布氏还立即意识到，如果他真的要触动大量受众，必须进入这些“机构”，对此，布莱希特将其理解为一切媒体：报纸和杂志，电台，电影，唱片，当然还有剧院，布氏想使剧院同样实现面向大众的传播，面向例如体育馆中观看拳击比赛的观众，拳击当时是竞技体育中最热门类别，观众趋之若鹜。

1926~1928年，布莱希特反思了当时戏剧和拳击运动间的联系，关于对戏剧和理想受众的设想，布莱希特也作出了间接但确切的阐释。布氏写道：“我反对将体育作为文化财富看待，因为我知道社会对文化财富的所有行径，体育遭受同样的待遇太过可惜。我支持体育，因为/而且只要它是冒险的（不健康）、未教化的（不具备主流社会特色）和以自我为目的的。”还有：“我们戏剧观众的堕落导致，无论是剧团还是观众都无法设想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在体育馆，自人们买到入场券的一刻起，大家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且当人们坐到观众席上，设想中的事情便会照样出现在眼前：受过训练的人，满怀坚定的责任感，同时也得到大家的信任，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于自身的乐趣，用最适宜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特殊才能。对此，古老的戏剧如今颜面尽失。”

戏剧，根据布莱希特的观点，应该是冒险的、未教化的和以自我为目的的，应该主要为了制造欢乐—而且是为所有的人，无论是制造者还是受众。这同传递讯息的戏剧[皮斯卡托尔（Piscator）的戏剧]和传递世界观的戏剧背道而驰，也同遵循古典的市民美学、使用传统技法的戏剧大相径庭。以自我为目的当然不是信奉“L’art pour l’art”（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艺术和艺术享受辩护，没有肮脏的伎俩，同时也不会顾忌风俗惯例，不会去刻意制造庄严隆重的效果。马克斯·施麦林（Max Schmeling）回忆了另一点，它不仅适用于

拳击，而且恰恰是一名艺术家的观点：弗里茨·考特纳。考特纳教育这位疑惑的拳击手，拳击的意义何在：“在拳击台上发生的一切，映射了生活，冷酷残忍，令人愤然，你们向对方挥出拳头，我们同样也为了生存而激烈地斗争。在戏剧舞台上，我们也表现着同样的斗争。但对我们来说那只是戏剧……对你们来说却事关生死……你们的鲜血不是道具……不是，马克斯，拳击绝非体育！它是生命之争，被浓缩在12个回合里。”这段话的目的是瓦解艺术与生活的分离；拳击是真实的戏剧，是达尔文主义！如果戏剧不能废除这一割裂，至少必须参与其中。至少应该做个样子，才好对其表示鄙夷。“一部期间不应该爆发笑声的戏剧，才是可笑的戏剧。缺少幽默感的人是可笑的。”

本人讲述，贝尔特·布莱希特执笔

生命访谈：拳击手作为同事

布莱希特又踏上了新的、非比寻常的道路；因为他的确成功地同一名拳击手建立了友谊，并将自己的艺术带到了他的圈子里。此人是次重量级拳手保罗·萨姆森—廓尔纳（Paul Samson-Körner），他曾环游世界比赛，在美国成名，1922年返回柏林之后，在一次非冠军赛中爆冷击倒了重量级明星拳手汉斯·布赖滕施特莱特（Hans Breitensträter），并在1924年的一次冠军赛中重复了这一壮举。因此，萨姆森—廓尔纳作为德国重量级拳王长达一年。1925年，布赖滕施特莱特按积分获胜，赢回了这一头衔。廓尔纳是知名的防守反击型拳手，即使处于劣势仍总能给观众留下好印象，而且虽然他身体不敌对方，但不畏惧同重量级拳手角逐。1924年2月，布莱希特结识了萨姆森—廓尔纳，同其交好，称廓尔纳为“同事”，因此也分享着他的光环。两人也的确有具体的合作计划，即《拳击手萨姆森—廓尔纳的一生—本人讲述，贝尔特·布莱希特执笔》（*Lebenslauf des Boxers Samson-Körner. Erzählt von ihm selber, aufgeschrieben von*

Bert Brecht, 1926), 所谓的“生命访谈 (Bio-Interview)”是日后 (1930) 布莱希特的俄国朋友塞尔盖·特雷特雅科夫 (Sergej Tretjakow) 对这一全新体裁的称谓。但布莱希特仍然是这一体裁的发明者, 布氏明白, 一个拳击手丰富多彩的一生, 曾征战半个地球, 比写自己的恋爱故事要有趣得多。此外, “生命访谈”这一形式的作品在德国文学史上尚未曾出现。

“生命访谈”是指作家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 造成他属于这里的假象。作家像这个领域的专家一样, 写下自己从未经历的事情, 而且这些是他很可能将来也不会经历到的。这样就通过作家的手笔产生了这样一件艺术作品, 受访者的经历和陈述为之提供保障, 成为一种新形式的记录文献, 亲历者并不直接发言, 但他的陈述已经过美学塑造的雕琢。这一转述的真实性当然存在争议, 却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艺术作品。

《拳击手萨姆森—廓尔纳的一生》可惜未能完成, 但其中的片段发表在体育杂志《竞技场》 (*Arena*) 中。对布莱希特来说, 这并非一本典型的文学杂志, 但却是极适宜布氏目的的喉舌刊物, 受众广泛。

《拳击手萨姆森—廓尔纳的一生》是一部讽刺性作品, 清晰展现了布莱希特的文风。其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 (在这部虚构作品中的萨姆森—廓尔纳本人) 出生两次, 在美国摩门教区域的一个小镇和德国萨克森州的茨维考 (Zwickau)。关于这不统一的出生地有言道: “我可以暗示为什么我出生在那里: 因为没有任何一条铁路线通过美国犹他州的比弗郡 (Beaver)。您可以娶12位妻子, 但如果您要参观我的出生地, 也只能步行前往。”这不是一个粗浅的玩笑, 而是间接提示, 萨姆森—廓尔纳被德国拳击界和官方媒体剥夺了冠军的荣誉。廓尔纳1922年返回柏林前, 曾在美国同杰克·邓普希 (Jack Dempsey) 和乔治斯·卡彭泰尔 (Georges Carpentier) 一两位美国拳击史上的传奇人物一竞技, 言辞不慎, 对德国的拳击运动发表过不利言论, 廓尔纳

也立即受到攻讦。即使他在同布赖滕施特莱特的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德国拳击界也不愿默默忍受如此痛击，断然宣称参孙

（Samson，廓尔纳的艺名，《圣经·旧约》中的人物，拥有天赐的极大力气）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布莱希特文风果敢，萨姆森—廓尔纳本人或许也不甚能认出这是他的一生，但仍同意出版。

1927年10月29~30日是一个周末，萨姆森—廓尔纳和布莱希特在“柏林体育媒体之夜”（Nacht der Berliner Sportpresse）大获成功，这一活动以体育、电影和戏剧的“三和弦”为标志，在动物园旁的乌发电影院举行，门票在数周前就抢购一空。当晚进行了轻量级的德国大师赛〔弗里茨·恩泽尔（Fritz Ensel）对阵保罗·切尔森

（Paul Czirson），前者在第3回合击倒了对手〕，之后举行了老对手萨姆森—廓尔纳和布赖滕施特莱特之间的3回合表演赛，再者是艺术和文学的加演节目。伟大的女芭蕾舞者瓦勒斯卡·格尔特（Valeska Gert）表演了动作怪诞的舞蹈《拳击》（*Boxen*）。接下来，弗里茨·考特纳朗诵了布莱希特《拳击手萨姆森—廓尔纳的一生》中的选段，深受观众好评。片段描写了可怜的廓尔纳16岁便在威尔士的加迪夫

（Cardiff）经历了人生第一场拳击比赛，因为不了解对手而遭到惨烈打击，但因此也在海员之家结识了13岁的女伴，而且赢得了她的同情。她爱怜地吻着他眼睛上“拳头大的肿块”，慢慢扶他站起来。参孙如此评论：“女人是独特的。”考特纳朗诵的第二篇选段是《中量级比赛12位世界冠军之纪念牌》〔*Gedenktafel für zwölf Weltmeister im Mitteltgewicht*，此处由于尚未结束，“纪念牌”改为了“光荣榜（Ehrentafel）”〕，媒体评价，考特纳“懂得如何将枯燥的奖项列举塑造得颇具感染力”。活动最终放映了美国电影，影片讲述了1926年费城的传奇之战，由吉恩·腾尼（Gene Tunney）对阵杰克·邓普希，10万观众观看。电影在观众中引发了极大的热情，并随后在柏林的其他影院放映。

这次活动也反映了布莱希特真正活跃的圈子（绝非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布氏的受众人群。一场拳击大师赛，2165名观众并不算多——这场比赛的原本举办地柏林体育馆可以容纳万余名观众——但2165对文学朗诵来说却是个巨大的数字。布莱希特借此接触到的观众，大多数并非文学消费者，但他们从此了解了文学的无所不能。布莱希特努力脱离传统的文学圈子，直面那些作家们尚未接触过的受众。

虽然萨姆森—廓尔纳1927年在一次失利后退出了职业拳击领域，但布莱希特仍同其保持了多年的友谊。乌发电影院的活动也证实了廓尔纳依旧深受人们欢迎。1927年夏还有一件独特的事发生，讽刺文学杂志《UHU》^[32]为布莱希特的一次“工作会议”拍摄照片，照片配有以下文字：“要从照片中看出工作方式如何，完成这样的摄影作品不易。也许有朝一日，人们能发明出可以通过摄影记录的工作方式，但至今，工作和被拍照仍很难融为一体。我虽然几乎一切工作都同他人共同完成，但还是让摄影师在高朋满座之时前来，纵然我们当时并非在工作。对照片上的不自然状态我深表歉意，因为我们决定破例表现出，好似知道正有人为我们拍照一样。”

照片拍摄于施比谢恩街（Spichernstraße）16号的阁楼内，照片上的参与者（从左到右）有：萨姆森—廓尔纳坐在钢琴旁，好似在弹琴；布莱希特在小型书架前，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赫尔曼·森勒弗洛恩德（Hermann Seelenfreund），萨姆森—廓尔纳的经纪人，坐在沙发上，戴着拳击手套；赫尔曼·博尔夏特（Hermann Borchardt），作家，坐在森勒弗洛恩德一旁，半靠在墙上；汉内斯·曲佩尔

（Hannes Küpper）坐在另一个沙发上，沙发在房间的右角落，靠着（空白的）墙壁；还有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坐在摇椅上，看似在打字机上打字。所有的人都衣着整齐，无可指摘，先生们着深色西装配领带或者领花，霍普特曼着优雅连衣裙。

照片和评论当然荒谬透顶。虽然据称布莱希特当时只穿工作服出门，并渐渐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但这张照片和评论清晰地展示了布氏这一时期在公开场合的形象，这是空前的挑战和对市民阶层艺术家的嘲弄。首先，照片上的萨姆森—廓尔纳会弹奏钢琴，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质疑；但可见音乐是布莱希特工作的一部分。布莱希特双手插在裤子口袋，表明他是这个团队的“精神大脑”，将具体的书写工作委托给霍普特曼。书架是半空的，微小，还有一部分内容是报纸和杂志，这说明布莱希特并非主要从书中获得灵感，而正派的作家原则上都被大量的书籍包围。有着好听姓名^[33]的拳击经纪人戴着拳击手套，说明布氏的作品带有攻击性。作家博尔夏特百无聊赖，没有参与到共同工作中。曲佩尔创作的体育诗歌毫无名气，1926年布莱希特对400名参赛诗人评价不佳，把奖项颁给了根本没有申请的曲佩尔，曲佩尔也借此有了在文学史中崭露头角的机会，照片中曲佩尔疑惑地看着运动员萨姆森—廓尔纳。这一系列人物以霍普特曼结束，摇椅不甚适合工作，霍普特曼也没有在工作。毕竟萨姆森—廓尔纳评价道：“这个布莱希特，一个了不起的小伙子。”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光之城柏林：布莱希特已立足于此

“柏林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光电街区。威廉二世时代的建筑消失了，被电吸收、装扮、占据。这座城市像是腐蚀性的强酸，一切日新月异，双目因过分的紧张而疲劳。”费尔南德·雷格尔（Fernand Léger）^[34]1927年由巴黎到达柏林，他当时同今日的游客在东京或者首尔的印象惊人的相似，巨型城市在夜间失去了一切物质的因素，似乎在夜空中悬浮着的众多广告牌构建了超文本，遮盖整座城市。

柏林因这些创新而自豪，因此，从1928年10月13~16日，举办了“柏林之光”节。这是154个经济联合会提出的创意，他们期望借此实

现富丽与繁荣（结果表明这项计划卓有成效），并同时呈现一个作为现代化光辉都市的柏林。本次节庆的标语是“光引人来（Licht lockt Leute）”。这也确实因市民的广泛参与而成了宏伟壮丽的民间节日。长期和临时的霓虹广告、橱窗照明、公共建筑的楼体照明、国会大厦的穹顶、勃兰登堡门上的双轮战车、御林广场以及柏林其他的标志，都足够吸引广大民众的注意。购物街以炫目的光影表演吸引顾客，有光球、光电彩车，彩车巡礼穿越柏林的大小街道，或者在运河上巡游，飞机照亮了柏林的夜空，灯带无数，以及等等。简言之，这是柏林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大众狂欢之一，是一场色彩的交响乐，人们将其看作1920年代艺术和文化的顶点。布莱希特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

作曲家马克斯·布亭（Max Butting）是艺术总监，布亭委派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为节日创作歌曲，10月13日节日开幕，歌词准时首次刊登于柏林的报纸《速度》（*Tempo*）上。词作者没有点明，但编辑部的评论指向布莱希特。事实上，确实是布莱希特而非四处宣传的魏尔为歌曲写作了歌词。歌词同音乐一起迅速风靡一时，时至今日（绝对并非出于怀旧）仍在卡巴莱舞台上得到保留，而且许多人可以凭记忆哼唱。布莱希特所有的作品集中都没有收录这首歌，因为遗作中也只能找到以《我们准备了太多》（*Wir haben zu viel parat*）为开头的断篇，这部未完成的诗作只有一部分被编入了歌词。音乐学家尼尔斯·葛洛施（Nils Grosch）研究了布亭和魏尔同维也纳环球出版社（Wiener Universal-Edition）的书信往来，确认了布莱希特是词作者的事实。歌词内容为：

那么，如果去散步

日光已足够，

但要参观城市柏林，

太阳已无法满足。

这并非僻静之地，
这城市何其了得。
为了能看清所有
还是需要些许瓦特。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这座城市又是什么？
来打开灯
为了能够看清这一切，
来打开灯
无需言语。
我们都想一睹，
这是否会盛事一件：
柏林之光。[\[35\]](#)

这首歌，同海因茨·梯森（Heinz Tiessen）和马克斯·布亭的其他三首歌一起，被庞大的军乐队作为军乐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演奏，时而又伴有演唱，而且音量振聋发聩，即使在封闭的房间，似乎还是要震破听众们的鼓膜。布莱希特的歌词是实用诗（Gebrauchslyrik）[\[36\]](#)，而且毫无逻辑，这经常出现在较好的广告短文中。诗歌以“Und”开篇，试图建立一个并不存在的逻辑关系。表示转折的“Doch”悬在空中，因为对为何用日光不足以看清柏林的解释毫无意义。“ziemlich”并非形容词，而是其比较形式之一，本身没有意义，但暗指不可估量和无与伦比，要把这些都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需要较高的艺术能力。“瓦特（Watt）”作为电力单位，在当时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柏林方言有元音的屈折变化，因此疑问词（wat）同

瓦特同音，而两者内容上的联系其实也不存在，但再次细想似乎又存在，因为它提出问题“瓦特是什么？”这首歌词空洞无意义，内容无关紧要又过于简单，这样的歌词大量涌入人们的耳朵，标示了布莱希特和魏尔在魏玛共和国受喜爱程度的里程碑。

环球出版社已经购进了总谱的版权，但其发行商埃米尔·赫茨卡（Emil Hertzka）认为，制作街头音乐有失作曲家的身份。9月份，赫茨卡通知布亨：在向“军乐专家”咨询过歌曲的相关情况之后，他决定不再负责销售上述音乐作品，并退回了版权。之后《马哈哥尼》歌剧的一小部分歌曲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这再次证明，在所谓的“严肃”音乐界，当时要在语言和音乐上适应时代、坚持创新是多么困难。马克斯·布亨的回应引人注目，文字有可能出自布莱希特：“我们德国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们对很难理解或者根本不理解的事物充满了不可磨灭的敬意，但反之，对那些容易理解的却毫不尊敬。我们走进教堂或者音乐会，体面却无聊，但感觉自身对此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必须以这种方式提高修养后才能回家……但如果我们得到娱乐，那么将深信，这样的艺术作品肯定还没有达到有品质的艺术应该达到的水准。”

新的光影艺术自然也包括电影，为此，布莱希特1921年便创作了电影《牙买加酒吧的奥秘》（*Das Mysterium der Jamaika-Bar*）的脚本大纲和《塔中三人》（*Drei im Turm*）的分镜头剧本，但均没有成功。电影院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大量观众，与此相联系又形成了新的大众化的歇斯底里，被纳粹所利用，纳粹将传统戏剧的美学原则和（大多是错误的）电影梦幻世界转嫁到政治中 [瓦尔特·本雅明的关键词“政治的美学化（*Ästhetisierung der Politik*）”]。1931年，查理·卓别林到访柏林，火车站疯狂的欢迎人群甚至阻断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的交通，逼近到这位明星身边，扯掉了他西装上的纽扣，以至于卓别林在阿德隆酒店（Hotel Adlon）差点儿掉了裤子（对卓别林此次

的柏林之旅，新闻周报有相关记载）。但在市民阶层，电影还是遭受摒弃。托马斯·曼1928年将电影定义为“带音乐佐料的视觉享受”，对其只能有条件地接受，即如果电影将其乏味荒谬和感伤情怀“嵌入生活的真实、现实的确切中，虚构的细节能够完成场景模仿”，如此一来，“人性”便可以战胜“这一事物整体上原始的非真实性”。

柏林黑社会的庞大众所周知，他们像商人或者银行家一样享受到尊重。警察局长都被邀请参加“黑帮舞会”，就像布朗去参加尖刀麦基^[37]的婚礼，偷盗、窝赃和诈骗都明目张胆，还从事卖淫和大量的可卡因贸易。安妮塔·倍波尔公开吸食可卡因，这表明一切于她而言都再无关痛痒，如果用布莱希特巴尔甘故事中的话来说，她也舍弃一切，不再为未来忧心。这个倍波尔成了通货膨胀时期的标志性人物。由于可卡因和柏林押韵，因此很快形成了贴切的俗语：“夜晚！陶恩沁恩（Tauentzien）^[38]！可卡因！这就是柏林！”

1920年，美国的“迪勒女孩（Tiller-Girls）”^[39]来到柏林，也带来了新的歌舞。几名舞者身穿相同的紧身套装，发型相同，戴相同的帽子，从而对她们无法进行个体上的区别。除此之外，女孩们的舞蹈动作形式相同、机械化、毫无特征，给人以被物化为机器零件的印象，或者她们只是舞台的人物造型，是物质化的装饰。工厂的生产过程，即流水线技术，被搬上了舞台，还被作为艺术而受到崇拜。

布莱希特不需要虚构素材和人物，这些都充斥在柏林的夜晚，包括：《巴尔甘的弃舍》中的弃舍主题，《人就是人》中个体化的消亡或者将鲜活的人重新组装成血肉制成的战斗机器，《三毛钱歌剧》和《马哈哥尼》中的妓女和黑帮氛围以及贪腐，《屠宰场的圣约翰娜》（*Heiligen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简称《圣约翰娜》）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所有这些在柏林层出叠见。对像布莱希特这样细心的观察者来说，材料俯拾皆是。反之，布莱希特作品引

发的轰动也不过是普遍虚伪的表现。柏林的夜晚，那些不轨之徒大敛横财，而这在戏剧舞台上却被嗤之以鼻。

通过阿诺尔特·布隆内，布莱希特1923年8月结识了海伦娜·魏格尔，之后时常流连于她的住处，不久布莱希特便第三次做了父亲。1924年9月初，布莱希特搬入魏格尔家，此时她已经快要临盆。魏格尔生于1900年，奥地利人，1922年6月迁居柏林，在莱奥波德·耶斯纳领导的柏林国家剧院做女演员。魏格尔的演艺事业1918年在摩拉维亚（Mähren）开始，她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当时做群众演员和合唱歌手，之后前往法兰克福的新剧院（Das Neue Theater），1921年在法兰克福剧场（Frankfurter Schauspielhaus）工作。维也纳人民剧院（Wiener Volksbühne）的导演阿图尔·伦特（Arthur Rundt）在一次试镜时发现了魏格尔与生俱来的表演才华，对此，魏格尔的丹麦女友卡瑞·米夏埃利斯（Karin Michaelis）于1919年5月26日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中有所描述：“在这个丑陋笨拙的19岁少女的喉咙里，包含了领悟善与恶的所有魔力，所有禽鸟的幽咽和悲鸣，一切水流的潺潺声，彩虹所有的色彩，爱恋的狂喜和欢腾——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包含在内。如此这般的音色让野兽变成温顺安静的绵羊，让冰冻的植物再次繁茂，让天上的星辰为之震颤。”伦特曾对魏格尔说，她不需要任何的表演课程，因为她是“史上曾诞生过的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之一。

魏格尔居住于施比谢恩街16号的工作室，三年后，这里成为前一节曾描述过的照片的拍摄场地。房子对两人来说已经过于狭小（顶层阁楼），而且必须通过狭而陡的楼梯才能到达，因而布莱希特提议让这位年轻的母亲搬离此处——空间真的不够三个人，而且带孩子上楼梯也太过困难；1924年11月3日，两人共同的儿子施特凡（Stefan）出世。海伦娜·魏格尔1925年1月搬入了巴贝尔斯贝格街（Babelsberger Straße）25号的房子，这是花费不菲而执意购得的居所。或许手段并

非完全正直，但布莱希特很快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空间，并且开始利用魏格尔在柏林先于他拥有的各种有益关系。

这次搬迁经过了详实的准备，因为正如前文曾描述过的，《丛林》同年在德意志剧院由埃里希·恩格尔执导上演，《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也在国家剧院演出。《丛林》的排演布莱希特可以自己负责，因为他自1924年9月起（至1925年7月）在德意志剧院担任戏剧顾问职务；并借此继续了同恩格尔的合作，合作在《理发店里的怪事》时业已开始。埃里希·恩格尔是汉堡人，1891年生人，同样在1924年由慕尼黑迁居柏林，在德意志剧院工作。

随着《爱德华》的排演，耶林和凯尔之间的评论家之争也开始了，布隆内的《卡塔隆战役》（*Katalanische Schlacht*）1924年11月首演后，也被卷入了纷争，以至于“法佐尔特”成了青年（先锋派）德国文学的原型。公开的论战内容如下：耶林高度赞扬年轻人（也包括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的作品，而凯尔的谴责不仅针对作家，还首先指向了自己的同事。耶林的褒奖和凯尔的严厉批评伴随了布莱希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所有戏剧。面对凯尔的评价，布莱希特也多次以讽刺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布莱希特同基彭霍伊尔建立合同联系后，1925年1月1日，由于布氏的坚持，伊丽莎白·霍普特曼负责审稿人的职务，并在布莱希特的工作室担任私人助理。霍普特曼生于1897年，父亲是乡村医生，母亲是美国人。1918年她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在德国和波兰边境旁的波美拉尼亚（Pommern）担任家庭教师长达四年。1922年前往柏林攻读大学。由于没有得到家庭经济支持，霍普特曼做些女秘书的工作，起先在一位建筑师手下，而后是作家赫尔曼·格奥尔格·舍费尔（Hermann Georg Scheffauer）。1924年，霍普特曼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布莱希特，布氏立即发现了她的文学才华，并寻求合作，虽然这样的工作关

系在她成为布氏的情人之后也有起有伏，但仍持续至魏玛共和国末期。追忆往事时，霍普特曼一再强调，她所得报酬丰厚，布莱希特1925年圣诞节将带有题献的《人就是人》的手稿（前身是《加尔盖》）送给她，因此，所谓“整年不计报酬”为布莱希特工作的说法只是玩笑，由于学术界经常断章取义，她也乐意如此公开地自我解嘲。另外，霍普特曼还独立赚钱度日，主要通过翻译工作，以便不完全依赖布莱希特。

一个平和的男人能随意

采纳两至三种其他观点

人就是人：消费批判

霍普特曼手稿总结了到那时为止《人就是人》的已有资料，献词还有第二部分：“这是一部难以完成的剧作，单单将20磅纸的手稿整合起来就是艰苦的工作。”困难首先在于将印度的异域环境同现时的经济新情况结合起来，霍普特曼借吉卜林（Kipling）^[40]的作品向布莱希特介绍了印度的风貌。解决方案是大象贸易。大象增强了印度特色，也服务于基尔科阿（Kilkoa）的军营气氛，贸易有了经济关系的双方，即买方和卖方，而产品一仿造大象一即商品。盖里·盖伊

（Galy Gay）扮演卖主，一旦他确信有买主，那么商品是不是真品已经不再重要了：“我毫不怀疑，它会被卖掉。”以及，“大象就是大象，尤其是它被卖出的时候”。由于英军的三个士兵在印度走失了一名战友，而此人不可或缺，事件的结局是，盖里·盖伊被证明有欺诈罪，要实行枪决。当盖里·盖伊被定罪时，他否认了自己的身份，在（看似）被枪决之前便倒地不醒，醒来后便全然乐意接受士兵吉普（Jip）的新身份，即丢失了自己的个体性。但这只是本场景的一个方面，布莱希特将霍普特曼手稿中的这一场景明确称为“喜剧

（Lustspiel）”，是由于此处的两个男人在一张地图下变身成了一头

大象，向观众们展现了一副（就结局而言只是看似）粗笨的场景，这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喜剧或者格吕菲乌斯（Gryphius）的巴洛克喜剧，其中人会模仿墙壁、树木、狮子，等等。如果用露骨的方式说，可以认为观众们受到了愚弄，因为在杜塞尔多夫和达姆斯达特（Darmstadt）的首演上（1926年9月25日），观众们相应报以“冰冷的沉默”或者“嘘声”。这样荒唐的意义在于悍戾的反自然主义，用莫可名状的荒谬揭露社会现实，而且恰恰是粗笨的荒谬。而现实一或者在格吕菲乌斯喜剧中被嘲笑的悲剧体裁（对专制主义等级制度国家的展现）一实际上要比人们曾相信的和愿意相信的更粗笨、更可笑。

尾声部分和幕间插曲还有幼象登场，使这个场景得到了辅助，目的无非是将亨利·福特模式的资本主义新经济规则进行美学应用，这一模式贯穿了20世纪，替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剥削。产品成了商品，必须找到销路，它是否适用或者是否真的被需要已经无所谓。如果找到买主，一切都能被卖掉；而寻找买家，是广告或者其他花样迭出伎俩的任务。消费是生产的本源推动力，因此必须保证其持续性。

布莱希特可谓利用插曲《幼象或每个看法的可被证实性》（*Das Elefantenkalb oder Die Beweisbarkeit jeglicher Behauptung*）添加了另一层面，四个莽汉一现在也包括假扮吉普的盖里·盖伊一上演他们的荒唐戏剧，这本身便是戏中戏一面对戏剧中的观众（剧中那些普通的士兵），也面对真实的观众。盖里·盖伊扮演（假的）幼象，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而母亲以杰西·马奥尼（Jesse Mahoney）的形象出现，波利·贝克（Polly Baker）扮演的香蕉树是法官，尤利亚·雪莱（Uria Shelley）^[41]扮演的月亮是起诉人。其他的细节不再赘述。重要的是，波利将这般假象，即一切都是虚假、不真实、浸透了谎言的事物，胡吹为真正的戏剧。其混乱的论证影射了布莱希特在《图伊小说》中嘲笑的逻辑经验主义及其思维游戏。或者用卡尔·瓦伦丁的话来说：“没有镜片的眼镜好过没有眼镜”，《人就是人》中

波利的眼镜也没有镜片，尤利亚回答道：“总比什么都没有好。”这也是对前文话语的间接引用。

布莱希特深挖民族戏剧的百宝箱，笔下的戏剧并非严肃的讽刺剧，而是最佳的荒诞剧（当时还没有这一剧种）。这一点波利的大放厥词也可以证实，他鼓吹自己的戏剧演员是世上最好的：“大家请求，此处不要射杀钢琴师，他展现了自己的最好水平。如果谁没有立即理解剧情，不需要绞尽脑汁，剧情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您只想看些有意义的东西，那您可以去小便池。”此处，并非一定要联想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1960年的电影《射杀钢琴师》

（*Tirez sur Le pianiste*）才能猜出这意想不到的关联；毕竟，无意义被解释出了意义，对此也无需反复思考。布莱希特以后的文章或剧作中一例如《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一用讽刺挖苦的表述所表现的，此处已经提前出现。1920年代上半，布莱希特已经发现了当时福特主义（Fordismus）市场法则的荒诞和费解，并为此找到了舞台上新的表现手法，能在预示未来的同时带来娱乐效果。

卡斯帕尔·内尔为达姆斯达特的首演发明了半高的帷幕，后称“布莱希特帷幕（Brecht-Gardine）”，但事实上应该是“内尔帷幕”，并借此对舞台进行了革新。剧中，布莱希特一至少通过（歌）台词一也现身，宣扬自己是未来德国舞台的品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先生断言：人就是人。/这点尽人皆知，都会宣称。/……人们接近他/持续、不知厌倦地要求他/放走自己的那条鱼。”布莱希特将自己塑造成时代的发言人，彻底打破了习惯上的戏剧传统。凭借《丛林》和《人就是人》，布莱希特和内尔为文学带来了新的现代标志。

《人就是人》中，流水线上异化的工作被直接投射到人身上：人可以一像汽车一样一随意组装或者改装，他不再是不可分割的个体，而是可分割的个体。布氏剧作的图景一同日后教育剧（Lehrstück）^[42]中的小丑场景一样一虽然露骨（这在审美上极具效果），但是也诙谐幽

默，而且同私下谣传的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关系，却很可能与批判正在兴起的纳粹主义相关，纳粹为一体化和不假思索效忠一党专制的民族同盟者树起了旗帜。

此处还能引出布莱希特与托马斯·曼的其他分歧，分歧的内容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题材以及“灵魂性（Seelisch）”。“灵魂性”是个体主义的一部分，曼十分珍视，即使在大众化和科技化的威胁下仍不愿放弃。1926年，在两人（公开）争论达到高潮时，布莱希特记录道：“我遴选出曼，因为在那些虚伪、自负、无用书籍的布尔乔亚制造者中，他是最成功的类型。”布莱希特知晓，如果曼回应挑战，曼的伟大也可以衬托其对手的伟大。而托马斯·曼恰恰给这位年轻的挑衅者提供了这样的帮助。1926年8月，克劳斯·曼在《UHU》杂志发表了题为《新家长》（*Die neuen Eltern*）的文章，同时还有托马斯·曼同威廉·伊曼努尔·聚斯金德（Wilhelm Emanuel Süskind）谈话的札记。聚斯金德是文学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和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43]的父亲，克劳斯和埃里卡·曼（Erika Mann）青年时代的朋友，以这样的身份，自然尽力调停。聚斯金德向托马斯·曼断言，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已经渐渐消减，弑父的一代（参见有关布隆内的一节）已经过去；相反，托马斯·曼用“准确的声调”阐明，如今的时代，“与活力相比，更重要的是秀美”。

无论曼对何事表示反对，应该是布尔什维主义挑起了争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憎恨一切“灵魂性”，而这对曼来说是最重要的。布莱希特在《日记》（*Das Tage-Buch*, 1926年8月）中立即予以回复，而且用的是巴伐利亚方言和自负狂妄的口气。他威胁“新孩子”，如果他们“要成为安静、精致的人……像爹爹们一样（他们的房子里，一言以蔽之，都是些醉汉）”，就是“为有争议的弑父之罪又添加了毫无争议的杀子之名。不过是为了保持年轻”。

布莱希特写在这篇论战性文章前的箴言也别有用心，而且是断章取义。聚斯金德在谈话开始时便说：“我们并非单独交谈，克劳斯·曼也在。”这是为了表明克劳斯·曼是这场对话的听众。但单独来看，也可能有这样的意义：需要克劳斯·曼的（良好）才智，以便父亲不会胡言乱语。“我只谈论自己”，这是布莱希特文章的另一箴言，托马斯·曼在同聚斯金德的谈话中也说过这句话，用以暗示他不会使用别人的观点，只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谈论问题。但如果望文生义，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是托马斯·曼只谈论自己，对别人不感兴趣。

托马斯·曼不会逆来顺受，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blatt*, 1926年10月）中予以回应：自己在“谈话中明显言辞不慎……布莱希特太过警觉，不让他写讽刺文学太难为他了”。曼还修改了几处论点，但仍不十分高明。此外，对于布尔什维主义者仇恨灵魂与情感的观点，他没有改变意见，而且还提到了瑞内·弗勒普—穆勒（René-Fülöp-Müller）。穆勒1926年曾出版《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与脸面—苏维埃俄国文化生活的展示与批判》（*Geist und Gesicht des Bolschewismus. Darstellung und Kritik des Kulturellen Lebens in Sowjet-Russland*），定会对此事有所了解。如果借用布莱希特的美食用语，这件事对他来说真是“酒到渠成”^[44]。因为托马斯·曼不仅赞同他有警觉性，而且承认自己在谈话中用词不当，这样间接帮布莱希特证实了托马斯·曼的避世性格；原因是曼的传世金句显然都以书面的形式存在于他家孤独的写字台上，而绝非面对媒体时。布莱希特在回应中直言不讳地嘲讽道：“在《柏林日报》中，托马斯·曼探讨了我在《日记》中一些随性的评论，并强调，他在《UHU》中所说的话，其实并没有说，但是确实是那个意思。”

在同样关于两代人差异和冲突的文章《父子与UHU》（*Wenn der Vater mit dem Sohne mit dem Uhu*）中，布莱希特将这一时期已经遭

到遗忘的小说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Friedrich Spielhagen, 1829~1911）称作“托马斯的父亲”，认为他对于年青一代——托马斯·曼的一代——而言是革命者，布氏借以又为弑父和杀子的辩论开辟了新的战场。布氏为何单单选择了施皮尔哈根，可能在于施皮尔哈根与曼的小说篇幅都超过了常规水平 [托马斯·曼的发行商萨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曾要求删减《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长度，所幸作者没有采纳]，而且施皮尔哈根同曼一样，因其自由主义态度而闻名，这样的态度对布莱希特来说过于冷淡。对此，托马斯·曼公开回应，这次是在《柏林日报》（25万份发行量），也有利于提高布莱希特的知名度：“我无法控制布莱希特，因为我从未读过施皮尔哈根的哪怕一行文字，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的散文对我来说完全无法阅读，虽然当今的青年也无法阅读《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öger*）或者《魔山》，但我认为，仍没有达到当时那样的程度。”

指控当今的青年人没有能力阅读这些书籍，理解自然更谈不上，这显然是一种目标明确的侮辱。不禁要问，曼是否自身有些许不情愿同那些从根本上无法阅读的古人分离开来。无论如何，布莱希特关于曼最尖刻的言论都没有出版，但1926年10月10日《柏林日报》中的文章《陌生人》（*Die Unbekannten*）间接作了回应：“托马斯·曼对我说，他没有读过施皮尔哈根。但我却读过托马斯·曼。我认为，如果托马斯·曼读过施皮尔哈根的作品，他会反对施皮尔哈根的风格，或许还会（因为施皮尔哈根同他相比较是个革命者）反对托马斯·曼，我反对印刷曼的（以及其他一些）书籍。……我坦然承认，为了阻止某些书籍的出版，我简直愿意牺牲金钱。”

我八只鞋都深陷在《资本论》里

我现在必须精确地了解

马克思：市场法则无法理解

1926年是所谓布莱希特“投身马克思主义”的一年。同一时期，布莱希特正为《芝加哥的乔·弗莱施哈克》（*Jae Fleischhacker in Chikago*，简称《乔·弗莱施哈克》）搜集资料，“人类迁居大城市”是布莱希特跨体裁的综合计划，戏剧以这一背景下的新兴资本主义为主题。据伊丽莎白·霍普特曼记载，布莱希特和她搜寻了专业文献，拜访了专家，例如在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奥古斯特·森格尔博士（Dr. August Singer），而且布莱希特开始阅读国民经济学。根据霍普特曼1926年10月的日记记录，这些内容的阅读量在不断增加，日记中写道：“《人就是人》首演之后，布莱希特搞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并命人做出列表，哪些基础文献应该首先研习。不久之后，他从旅途中写来信件：‘我八只鞋都深陷在《资本论》里，我现在必须精确地了解。’”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产生兴趣恰恰是因为《人就是人》，显然还有首演引起的反响，这并非偶然；因为该剧关注当下的经济状况，而且最迟从此以后，布莱希特被看作——虽然他本人对此知之甚少——一名共产主义者。可想而知，布氏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他所处的社会现实。

当追述布莱希特生平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1926年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最迟1927年）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早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写作了四部戏剧和一部歌剧”，但对“政治常识”却一无所知。一次“工作意外”竟起了推动作用，布莱希特因“某一特定戏剧……需要以小麦贸易为背景”，因而必须了解相关知识：“无论是几个著名的经济学作家还是商人，还有一位毕生在芝加哥交易所工作的经纪人（森格尔）——我从柏林到维也纳拜访他，都没有能给我充分解释小麦交易的过程。我感觉这些程序简直是无法解释的，即从理性的角度无法理解，因而便是非理性的。粮食在世界上如何分布，也完全不可捉摸。……写作戏剧的计划无法付诸实践，作为替代，我开始读马克思……”由于这一联系，布莱希特确实谈及了“研习马克思主义”。

以上记录是布莱希特投身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据，它写于1935年在莫斯科举行的面向工人的布莱希特作品朗诵会。显而易见，布莱希特希望以坚定的、经受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出现。但如果对列举的数据进行核实，便会出现疑点。布氏已经写过四部戏剧（这又是哪些呢）和一部歌剧，早已是一位知名作家，这即便不在1929年，最早也在1928年下半，因为歌剧只可能指《三毛钱歌剧》。而计划中的小麦剧目应指未完成的《芝加哥的乔·弗莱施哈克》，对此布莱希特1924~1926年进行了断断续续的零星写作。这意味着，论据本身就使1926年在年份上出现了疑点。最初为《屠宰场的圣约翰娜》设定的背景也是小麦交易，如果将计划中的戏剧理解为《圣约翰娜》，事情也没有明朗；如果这样，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研习最早则开始于1929年，同霍普特曼的记录相矛盾。因此，对于1935年的文章，结论只能是：由于陈述数据的不准确甚至错误，本文不过是程式化地表示友好，不具证明力。

布莱希特1920年代晚期的其他言论也支持这一结论，它们多数都没有提及马克思（只出现3次）。1926年春夏之交，《布莱希特全集》（GBA）为《人就是人》筹划序言，再一次明确地同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戏剧扯上关系。布莱希特写道：他刚刚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Staat und Revolution*），然后是《资本论》，就此明白，“我，哲学上，立足何处”。“我不想说，我反对这些书籍，这似乎大错特错。我只是认为，在这样的矛盾境地中，我安适如常。这里矛盾激烈，这已经是一种观点，以我之见，艺术在这一（十分珍贵的）过渡时期不允许承受更多。”这一记录又使阅读《资本论》的日期存疑，因为它意味着事情在1925年或者1926年初已经发生，而且之前已经阅读了列宁的作品。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不能说明造成了世界观的更迭，相反，布莱希特对这两本书抱观望态度。与常规的标点规则不同（布莱希特本来也偏爱不遵守此类规则），布莱希特在“哲学上”前后都加了逗号，另外，《资本论》使用了斜体书写，说明这里并非

指其根本原理，而是一些调查和研究，它们卓有成效，而且对过渡时期十分有利。马克思主义此时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布莱希特在1930~1931年仍希望，资本主义能通过极端的一在布氏看来革命性的一革新自行走向终结。

布莱希特在关于本恩的一篇文章里（1929年前后）也附带提及了马克思，除此之外，大约写于1928年的摘记也可能较为重要，根据摘记内容，在阅读《资本论》之后，布氏重新理解了自己的戏剧：马克思是“本人剧作的唯一观众”。其原因在于，对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布氏的剧作可以作为观念形成的原材料，最终他还补充道：“我所有的观点同我所有的金钱一样寡薄，对观点，我的态度同我对金钱的态度一致：人拥有它们是为了散播出去，而非持有。”此处清晰可见，布莱希特是在嘲弄“观点”（就像嘲弄意见与世界观），因此，整篇摘记无非是另一个典型的布氏幽默。

霍普特曼的手记自然不容怀疑，但它的重要性却有待推敲。单1926年7月的笔记便已说明，布莱希特在10月份对国民经济颇感兴趣，如今又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兴致勃勃，原因是要为《人就是人》创作续篇，而且以资本主义投机交易为背景。布莱希特首要的兴趣点在于资本主义市场以及对市场的批判，而并非一个社会主义解决方案。1925年8月，弟弟瓦尔特前往美国拜访亲戚，布莱希特当时只知晓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关于小麦投机的几部小说，因而请求瓦尔特：“一个小愿望，你可不可以买所有能弄到的关于小麦交易、小麦投机的书（英语的）；长篇小说（诺里斯的除外）、戏剧、短篇小说、小品文章、科普类作品。这将对目前正在写作的一部戏剧十分有帮助。我觉得，你必须委托一个图书商，或者在纽约通过有相关知识的人在图书馆打听，然后再买确定下来的东西（当然算我账上）。”

在《芝加哥的乔·弗莱施哈克》以及剧中其他零散片段中，布莱希特塑造了一名垄断购买商（Corner），从事行情涨落的投机，但这只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小麦、煤、油、天然气）才有可能成功。剧作的经济情节全面记录了垄断购买的过程，布莱希特也在《屠宰场的圣约翰娜》的商品交换中套用了同样的模式，但从资本主义角度看，莫勒（Mauler）选择肉类进行垄断购买是本剧的一个失误，因为消费者在困顿中可以放弃食用肉类，例如1980年（亨特兄弟）对于银的卖方垄断就失败了（必定会失败），因为面对高昂的价格，已无人问津。因此后果是售价猛跌，投机者破产。肉制品对布莱希特来说是收益的隐喻，以这种方式，布氏可谓“真实”地展示了交易市场上残酷的血腥图像。交易所本身不会展示这些图像，而且正因为保持了这样的假象，好似一切才都显得顺理成章（如今依旧如此，但几乎每天都受到反驳）。

垄断投机购买于19世纪末在美国出现，但由于一些原因而不为人所了解。文学上，弗兰克·诺里斯首先在其长篇小说《深渊》（*The Pit*, 1903）中进行了相关描写，也为布莱希特剧中的经济情节构建了最重要的基础。主人公杰德温（Jadwin）是一个小经纪人，经人游说他同意在芝加哥交易所进行小麦投机。同莫勒一样，杰德温同华尔街的总部有联系，总部追踪市场动态，因而知道应该如何进行相应的投资。故事的出发点是小麦市场行情萧条，市场上小麦产品数量增多，因此价格相应下降。在对小麦没有需求的情况下，杰德温持续购买小麦，因而有人继续向市场投放小麦，小麦价格逐渐降至谷底，再无人对小麦有购入兴趣（不再有小麦购买契约），这一时期垄断购买的投机者必须清楚地认出，此时他需要即速买入。这样看起来似乎十分荒唐，但投机者以最低的价格买入了市场上所有的小麦，将它们置于角落（Corner）。顿时市场产品量放空，需求出现。由于投机者掌握了所有的商品，可以随意向市场供货，他只卖出部分商品，而且可以随意决定价格。同时，投机者必须注意，这样的手段需要保持市场的支

付能力。如果他过度刺激市场—例如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整个市场就会崩溃，就像1929年10月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布莱希特创作本剧时已经清楚地认清了它的严重后果。

所有生活必需的食品都是私人财产，它的存在必须找到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的买家。并非短缺，而是盈余，造成人们失业，失去房屋，挨饿，甚至死去。在堆满的粮仓旁有人饿死；而销毁食品则意味着破坏价格。这样的现象如今在海地或者多米尼加共和国仍然可以看到。当海地的人民在忍饥挨饿，同一个岛屿上的邻国，游人却纵情嬉闹玩乐，这也是《圣约翰娜》的主题之一。

诺里斯的主人公杰德温最终被挤垮，因为他没有想到，风调雨顺的气候在这一年赠予人们第二次小麦丰收。这时，杰德温坐在他毫无价值的粮食上，万念俱灰。诺里斯在一场激烈的交易中津津有味地描写了杰德温的失败，而且绝不亚于《荷马史诗》中对战争场面的再现。诺里斯第一次为一完全看不见的一过程找到了合适的图景，他让仅仅可能存在的小麦在交易大厅掀起巨浪，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下，杰德温像赫克托耳（Hektor）^[45]的尸体一样，被拖过交易所。

垄断购买只是投机的一种不常见方式，它不再区分常见的熊市投机者和牛市投机者，两者是布莱希特在《芝加哥的乔·弗莱施哈克》中已经熟练使用的术语。熊市投机者在经济低落时赢利，他们（似乎只）服从客观的市场状况。价格高时，他们卖出，同时压低价格；此时大量买入价格较低的商品，然后以较高的价格卖出，随后再压低价格，如此循环往复。赢利主要在于商品价格高低之间的差额。如果价格持续走低，“熊”就会退出市场。而“牛”指行情上升的投机者，他们主要通过人为抬高价格赚取利润，从而使高额的价格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牛市投机者原则上会导致他人的损失或破产，他们比熊市投机者更具攻击性。

面对挑战，需要用（诗性）语言表达现行的市场法则，布氏对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并非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待阶级斗争，他采用了反讽的手法，这也反映了布氏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托马斯·曼的分歧已经说明，1920年代布氏断言，曼同里尔克、格奥尔格和韦费尔（Werfel）都是没落的布尔乔亚的代表人物，“只追求纯美学价值，本身就带有太多阶级斗争的趋势”。布莱希特笔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将“这三人的文学作品视作阶级斗争的宣言”，绝对无法理解它们。“本性自然的人，他们纯净双目中羊群的影像有很大价值，宛如享受沉浸自己音色中的歌手在歌唱。”布莱希特戏谑地假定，为艺术而艺术，可以再造早已丧失的自然和安居于此的人，只要艺术能够消除社会与人性的异化，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因素。但布氏还申明，这并非自然；而是有关羊群的主人，或者“那些由于内心的过度忙碌而放弃羊群的人”。

以上是说给诗歌大赛400名投稿者的话。1927年2月，《文学世界》（*Literarische Welt*）举办了本次比赛，并邀请布莱希特担任评委。这也说明，我们的青年作家已经在当代文学界站稳脚跟，而且不仅作为一名戏剧家，同时也作为一名诗人。投稿者提交了“近500首诗”，但既不美也无用。他们都是布尔乔亚的后裔，还从来无法“应对任何现实”，即使“受到有益的嘲笑……也无法从他们的感伤、虚伪和遁世中，或者从上文提到的那几位榜样人物的影响下”被解救出来：“他们又是那群内向、精细、耽于幻想的人，是生命殆尽的布尔乔亚多愁善感的一撮，我不想同他们有任何关系！”除此之外：即使布莱希特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主要还是指现实主义，他虚构的马克思主义者体验阶级斗争之所，以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斗争绝不曾发生也绝不会发生之地：布尔乔亚的诗歌中。布莱希特享有单独决定权，恰如耶林之于1922年的克莱斯特文学奖，布氏没有把奖项授予任何一名投稿人，而是颁给了拍摄于施比谢恩街的工作照中百无聊赖坐在一旁的汉内斯·曲佩尔，曲佩尔写了一首关于自行车手迈克·

纳马拉（Mac Namara）的诗《嘿！嘿！铁人！》（*He! He! The Iron Man!*）。受到布莱希特的挑衅，比赛的结果自然在市民媒体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拭去痕迹！

现实：谈论

根据1950~1970年传统上对布莱希特的理解，1926~1930年是布氏的“肤浅马克思主义”时期，他尚未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同时对新客观主义的立场也发生了摇摆。诗集《城市居民读本》（*Aus dem Lesebuch für Städtbewohner*, 1930）给自私、冰冷和非人性的行为下了最后通牒，可想而知，这部诗集可以理解为，甚至假设为，布莱希特自身不安全感的体现——虽然他在城市中居住的时间不长。布氏在诗作中否认了人的个体性，甚至批判了对个体的扼杀 [参见1930年的《措施》（*Die Maßnahme*）]。以《城市居民读本》的第一首诗歌为例，一切都了然纸上。它创作于1926年，但在这部诗集中才首次出版，而其他诗作都曾分别在报纸上发表过。

在火车站与你的同伴告别

扣紧夹克上每个纽扣，清晨你走入这座城市

为自己找个寄居之所，当你的同伴在门边叩响：

不要，不要开门

而是

拭去痕迹！

如果在汉堡或者其他城市遇到父母

陌生地从他们身旁走过，折入街角，不要相认

那顶他们赠你的礼帽，拉低它盖住脸庞

不要，不要露出你的脸

而是

拭去痕迹！

.....

忧心，如果你想到死亡

不会立有墓碑，透露你的安息之所

而是用清晰的文字告发你

用死去的年份证明你有罪

再一次：

拭去痕迹！

一名无名的抒情主体在对“你”说话。这可能是面向读者，给予其建议或者大城市的生活指南。“你”也可能是不同虚构的场景中无名的城市居民，或者某一个不确定的人。但可以确定，诗歌以一种交流结构为基础，其中一方同另一方交谈，执意劝说其有必要打破以往的人道主义习俗。如果猜测抒情主体是作者本身，他建议否认父母，行为无情而自私，可以因此推断作者对大城市生活的设想是完全非人性的，这样的想法要求人们放弃任何道德的考量，接受客观境况。

但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诗歌还没有结束，它还有作为单独一节的结束句，本句否认了前文中的交谈局面：“我被如是告知。”这一句说明：读者读错了。开始似乎是抒情主体一即使总在一提出要求，那么最后一句说明，抒情主体事实上才是交谈对象“你”，他从某人处得到建议，虽然这些要求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但被动态的使用表明，建议提出者完全陌生或者无名。

诗歌最后一句重新定义了说话者和聆听者的关系，因此，真实的读者必须第二次阅读诗歌，以便可以正确地认知新的对话局面。这些行为指南的约束力也出现了改变，它不再是说话者观点的再现，而可能是来自更高层次的无名者。在《城市居民读本》中，随后的几首诗歌（直至第七首）都在最终节否认了前文构建的对话局面：“你曾听到有人说”，“我们如此同父辈说”，“我曾听一女子如是说”，等等。读者因此至少要阅读诗歌两次，而诗歌原文的文本部分成了引言，引言并非重复抒情主体的观点，而是转述大城市的生活经验，显然熟知大城市生活之人形成了此类经验，并认为它们对此处的生存不可或缺。

诗集结尾的第十首诗再次否定了前文中的对话局面，而且这次否定的是整部诗集：

如果我同你交谈

冰冷而宽泛

用最干枯的辞藻

也不看你

（我装作没有辨认出你

面对你的特性和困苦）

但我只是

如同现实本身在言语

（现实冷静，不会被你的特性收买已厌烦你的困苦）

你看似对此还没有认清。

如果有人认为前文诗歌中是人类的声音在提出建议，告诉人们在冰冷无名的大城市中如何能坚持下去，那么现在他才了解，抒情主体此处让现实本身说话，这意味着读者必须再次阅读（或者聆听）所有的诗歌，才能锁定真实的说话者。唱片仅播放一次还远远不够，或者说：布莱希特的这部诗集是为唱片所设计的，而且将唱片这一媒介写入诗歌中，并因此精巧地实现了“新技术的应用”（而非“技术化”），而且恰恰是在最不适宜的体裁中：诗歌。

当然，现实不会自己说话；这里使用了一种语言上的隐喻，它不再要求代表某种意见或观点，而是通过抒情主体协助，使得现实—更确切地说—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第一节表明，现实似乎不再能辨认出任何个体性（特性与困苦），在第二节中，反而是城市居民不愿承认现实—这可能有双重意义。要么城市居民对认清现实没有兴趣，要么他不愿承认已经认清了现实，只是表现的像没有认清一样。城市居民在既定状况中痛苦不堪，却不愿认清自己的悲哀，因此弊端缺欠得以保留，得以持续。1933年初，纳粹就利用《城市居民读本》中列举的非人性手段，合法攫取了政权。

布莱希特的诗学中，现实自己说话的隐喻，意味着布氏从艺术中消隐，那些在他自身之外、在社会及其关系之中可遇可及的，才是他作品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布氏同托马斯·曼有云泥之别，借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说法，托马斯·曼把那些“完全背弃自己的艺术家”称为“无用的奴才”。而布莱希特则相反，使自己和《城市居民读本》的抒情主体都成为时代的媒介，通过他们现实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按照托马斯·曼的观点，布莱希特便成了“无用的奴才”[奴才（Knecht）还同布莱希特（Brecht）押韵]。这也解释了当发生重大社会变迁时，布氏作品和语言的不断变化。作为青少年，布氏（如前文所述，巧妙地）参与到一战最初的喧闹中；当他发现了社会和人民在战后的病态，他写出了《巴尔》；当

看到众人期待中的政治变革迟迟未至，他创作了第一部政治剧《夜半鼓声》；在《人就是人》中，他又以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为主题。

“生命访谈”，将科技媒介融入诗歌，或者游戏式地对待自身品牌（纯属虚构，完全没有将自身带入其中），这些新的体裁，只有同市民阶层的艺术理念彻底决裂才有可能实现。艺术作品面向现实之门被打开了，它将经受长久的变革，后果也永无止境。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作品，不仅可以通过媒介传播，而且必须成为商品。面对现实，艺术家既无法建立媒介机构（电台、电影、剧院、唱片），也无法支配它们，同时还要面对艺术必须使用这些媒介的迫切性，布莱希特在两者之间构建了无法消除的纽带。如若错误理解这一事实，必然会错误理解布莱希特独特的美学，它完成了贺拉斯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46]，即艺术品比青铜更坚固，将会永恒，而且面对变革和历史进程，它们不断给予艺术新的定义，但又不断对其形成挑战。

我或许是您的同伴

但我绝非您的戏剧顾问

布莱希特—皮斯卡托尔：叙事剧之争

埃尔文·皮斯卡托尔（Erwin Piscator）是柏林人民舞台的首席导演，自1924年起，他提出的戏剧革新在公众中影响广泛，但布莱希特此时显然对此几乎并不知情—至少没有现有的证据能证明相反的结论。皮斯卡托尔不仅借技术革新宣称自己创立了“记录型戏剧

（dokumentarisches Theater）”，而且他的“叙事剧（episches Theater）”也引领了早应开始的戏剧革命。最晚在其执导阿尔冯斯·帕奎特的《旗帜》（*Fahnen*, 1924）时，皮斯卡托尔便力争使这一戏剧革新归自己所有，并断言：他曾有机会“发展一种导演方式，这种

方式几年之后才被另一方（指布莱希特）所公布”。他还追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话，德布林一但1929年才一提出的标语口号是：“脱离书本，却看不到如今叙事文学作家清晰的出路，因为这条路通往一个一新的舞台。”皮斯卡托尔五年之前就提早上演了这一场景。

巴奎特的戏剧副标题为《一部叙事戏剧》（*Ein episches Drama*），这充分表示，作者将1880年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起义，并非作为戏剧剧情，而是作为连环画场景处理，因而“停留在小说与戏剧的中间阶段”。皮斯卡托尔强调，这绝非过失，巴奎特才应该是第一位“踏入小说与戏剧的中间地带”的人。剧中对于工人领袖的背叛和行刑，相比采用令人感同身受的剧情表演，更多地通过叙事（以及相应地添加插图）的方式加以展现。莱奥·拉尼阿（Leo Lania）将其评价为一部“戏剧小说”。皮斯卡托尔嗣后进一步阐述道，通过排演这部“观赏剧（Schau-stück）”，“教育剧”应运而生（此处他也早于布莱希特多年占用了这一概念）。但皮斯卡托尔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同布氏迥异，他的“教育剧”指宽大的投影屏、开场白中对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画以及说明文字的投影，即铺张使用现代科技，在巴奎特《海啸》（*Sturmflut*）的演出中，舞台背景完全由电影替代，放映俄国革命中的宏大场面。所有这些皆被媒体和观众追捧为“柏林的舞台盛事”。

当皮斯卡托尔同人民舞台的所有人出现分歧时，布莱希特才在“政治剧”事件上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值埃姆·韦尔克（Ehm Welk）的《圣地风暴》（*Gewitter über Gottland*）1927年3月27日首演之际，人民舞台的理事会突然认为，他们的首席导演呈现的并非“纯正的艺术”，而只有“纯粹的倾向性”。埃姆·韦尔克来自西波美拉尼亚地区（Vorpommern），如今被誉为故土作家（Heimatschriftsteller）^[47]，《圣地风暴》“由于其艺术价值”

而被购得演出权，但在皮斯卡托尔执导后，经历了“带有政治倾向的改编和扩充，而且缺少内在关联性”。并且“作品中分化出的单一政治宣传”显然未经理事会的“知晓和同意”。

布莱希特利用这一时机，公开表达了对同时期戏剧的批判。在1927年3月31日的《柏林交易所信使报》中，布氏公开谴责“纯正的艺术”是“懒汉和愚人”的美学，其代表人物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具有明确的倾向性，“倾向于愚民、压制思想、令青年人变得浅薄”，因此组成了“强大的政党”。皮斯卡托尔执导的演出成为这般“艺术强权意志的见证”，因为演出受到了“倾向性”的干扰，这才是“领导人民舞台的先生们”唯一应该“扫地出门”的。

再一次，布氏由于其激荡的感情和幽默而令人钦佩，这也显然甚合报社心意。布莱希特是这一时期炙手可热的作家，他还参与一些偶像类的调查，例如他会为什么笑，对嫉妒的看法如何，等等，而且其颇具性情的回答也具有很高的娱乐价值。在对同时代艺术事件的述评中，布氏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同时，除了肤浅而颇有局限性的赞扬外，布莱希特避免赞同皮斯卡托尔的创新属于政治性、革命性戏剧，原因不言自明。

因此，当皮斯卡托尔邀请布莱希特加入自己的剧院时，布莱希特选择同其保持距离。皮斯卡托尔剧院坐落于诺伦多尔夫广场

(Nollcendorfplatz) 旁，1927年9月3日以恩斯特·托勒尔 (Ernst Toller) 的《喔唷，我们活着》 (*Hoppla, wir leben!*) 开幕。通过蒂拉·杜里奥克斯 (Tilla Durieux)、约翰内斯·R. 贝歇尔

(Johannes R. Becher)、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瓦尔特·梅林等人的介绍，皮斯卡托尔筹集了相应的资金，由于布莱希特曾帮助皮斯卡托尔反抗人民舞台的理事会，因此皮斯卡托尔视布氏为菲利克斯·加斯巴拉 (Felix Gasbarra) 之外的另一位战友，加斯巴拉已经被宣布

为这一集体的领导者。1927年8月，布莱希特致信皮斯卡托尔：“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加斯巴拉在文学上的领导，也许在政治上可以。我或许是您的同伴，但我绝非您的戏剧顾问。”皮斯卡托尔自然不仅有政治规划，而且他追求的艺术服务于某一理念，按照他的理解，这一理念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所有的通用概念”。布莱希特拒绝之后附上了一则狂妄的意见：“我向您建议，您应该将剧院的文学特质转变为政治特质，建立一个‘红色娱乐部（Roter Klub）’，并将剧院命名为R. K. T.（红色俱乐部剧院，Rotes Klubtheater）。起初俱乐部应利用剧院，对外仅用于实现政治目的，而且只接受上文中提到的人作为会员（当然还有耶林、格罗兹、施里希特尔、魏尔、施坦贝格等人）。但日后，而且越快越好，必须接纳观众加入。俱乐部将能够确实起到政治作用，分发政治传单，等等。再然后，而且只有此时，才能在剧院召开集会。”布莱希特为自己保留了剧团的“文学特质”，只是鼓励皮斯卡托尔或多或少从事一些丰富宣传工作的政治事业，而并非政治剧。

对皮斯卡托尔的革新，外界褒贬不一，但在布莱希特看来，其革新主要在于科技创新，例如将电影作为舞台背景，这些技术创新给舞台表演带来了政治内容，但并不一定能丰富其艺术性。对此，皮斯卡托尔日后（1929）这样表述，“我舞台的新形式，‘技术化’，电影的引入，独立表演框架的形成等，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这些是不可想象的”，但对布莱希特而言却并非如此。

电影和戏剧无法构建一个统一的美学整体，两者只可能是个矛盾体，互相干涉对方，并因此被迫展现自己的不足。电影必须停留在平面，虽然内容广泛，但只能显得美、具有装饰性，而且一在政治意义上并不深刻（表现发展趋势）。而戏剧由于自身无法实现科技化，因而面对大量技术革新，结果只能呆板、不灵活、做作，与科技媒介相对比，只能记录自己（表面上的）落后性，此外，戏剧也没有考虑

到受特定媒体制约的接受方式。如果有人想从电影中看到些什么，必须服从电影预先规定的感知模式，因此电影倾向于占据观众的感知力，所以会不断打扰观众的视线；如果为观众上演戏剧，他便能够相对自由，放飞想象力。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戏剧并非使用电影的艺术功能，而是将其作为媒介来传送政治内容。还要说明，布莱希特借此宣称《巴尔》，即1929年的“戏剧传记”，是他“对叙事剧”的第一次尝试，因此，从根本上对立的双方早已默然就位。

即使一再有传言认为布莱希特曾或多或少积极参与皮斯卡托尔团队的工作，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此事，而且即使是皮斯卡托尔的新剧院开幕，布莱希特也没有离开他心爱的奥格斯堡。布莱希特想将其改造为俱乐部的规划也只停留在想象中，据团队成员记载，皮斯卡托尔领导力充沛，使其他人都降格成了龙套角色，这也是皮斯卡托尔的剧团仅维持了一年的原因之一。面对如此缺乏合作的局面，布莱希特基本不可能加入其中。1927年末，当皮斯卡托尔忙于《帅克》

（*Schwejk*）的排练，布莱希特从奥尔登堡（Oldenburg）来信，对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诗作的翻译事宜表示拒绝，辛克莱的戏剧《唱歌的无赖》（*Singende Galgenvögel*）1928年3月即将出版。同时，布莱希特表示两人最好只保持书信联系，并且在结束句说道：“有些人总是在理论上作好了参与实际工作的准备，但实践中却声称，自己不关心理论（而且是他们自己的理论！），我希望，您不要把我归于此类。”这句话对正在进行的《帅克》只字不提，《帅克》在1928年1月23日的首演上大获成功，而且信件在上述引文之前也没有任何部分表示参与了《帅克》的工作，无论是文本还是排演。

时至今日，《帅克》仍然被看作皮斯卡托尔和布莱希特合作的商业作品。这又是为何呢？原因首先在于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在流亡美国期间准备自己的《帅克》剧本时，曾声称，他1927年曾为皮斯卡托尔（独自）创作了剧本，这是“从小说中析出的纯粹蒙太奇剪辑”

（1943年6月24日）。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皮斯卡托尔在《帅克》的排演上同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和汉斯·莱曼（Hans Reimann）订立了合同，由两人负责改编剧本。虽然这一版的改编证实了皮斯卡托尔“最糟糕的担心”，最终只不过是“伪滑稽的年轻军官笑剧”，但皮斯卡托尔仍只删减了最严重的鄙陋，并没有全盘否决。

据皮斯卡托尔回忆，负责修改的有莱奥·拉尼阿、菲利克斯·加斯巴拉、格奥尔格·格罗兹、布莱希特和他本人，但汉斯·莱曼也有参加。工作并没有在柏林展开，而是在新勃兰登堡

（Neubrandenburg）附近的酒店里，大家还在愉快的氛围里慢跑、射击、跟随教练做体操等，这显然完全符合布莱希特对集体工作的设想。虽然皮斯卡托尔所回忆的好似布莱希特曾积极参与工作，但他的描述也不得不承认，布氏的参与只能算作旁观者。布氏驱车前来，几乎不在这里过夜，他“站在外面，透过开着的窗户，带着莫名的冷笑”，注视人们艰辛工作的狼狈，并且细致地对“弯道”高谈阔论，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帅克行军前往布德维斯（Budweis）〕。这听起来并不像在说布氏的工作卓有成效。

其他证据也不具备说服力。1928年演出现存的两部文本稿—其中的改编剧本只提到了马克斯·布罗德和汉斯·莱曼—出自1932~1936年，此时皮斯卡托尔尝试挖掘布莱希特对电影《帅克》的兴趣。两部稿本由不知名者打印在俄国纸张上，布莱希特还手书了出处按语：他在一部稿本上书写了著者名，其中也包括他的名字；在另一部上写了“为皮斯卡托尔剧院所作《帅克》”，好像剧本完全是由他一人改编。只有另一方—可能是皮斯卡托尔本人—将打字稿交予布莱希特，稿本也可能出现在布莱希特处以及他的遗物中，因此这排除了布氏是剧本著者的可能性，但不能排除他是合著者之一。由于1927~1928年演出的剧本手稿没有得到保存，所以也无从进行进一步的查证。但布

莱希特支持皮斯卡托尔同人民舞台决裂，并参与皮斯卡托尔剧院《帅克》编排工作的推论是不可能成立的。

问题是，皮斯卡托尔为何要在其1929年所著的《政治剧》（*Das politische Theater*）中如此费力地宣称布莱希特属于自己的剧团？为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事实是，尽管意义重大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皮斯卡托尔“政治记录剧”的计划仍然搁浅了，原因并不是其艺术上和技术上的革新，而在于他的党派政治倾向一目标明确要促进共产主义宣传，戏剧手段也是服从这一目标：“戏剧需要，属于戏剧之物。这便是戏剧的影响作用。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宣传武器。”

对此，1929年皮斯卡托尔剧院第二次演出时表现得尤为清晰。此时，剧团创作的第一部戏剧—瓦尔特·梅林的《柏林商人》

（*Kaufmann von Berlin*）—惨遭上演失利。戏剧题目便已说明，它参照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模式，只不过故事发生在柏林通货膨胀时期。戏剧的中心人物是一名东犹太人，借军火生意在通过膨胀期间发了大财，但最终这个骗子也被人所骗。“资本主义的赞同者，最终也因资本主义而走向灭亡。”戏剧要展现的是，剥削者，无论他出于何种种族或宗教，一方面（起先）是灾难性社会关系的“受益者”，之后也同样会因此被毁灭掉：“我们在剧中只将社会的阶级问题提出以供讨论”，但对此，剧中无产者的戏份又过少。1929年9月，这样的观点在政治上过于天真。所以，皮斯卡托尔因此腹背受敌也不足为奇：他一方面被骂作反犹分子，另一方面又被诬蔑为“犹太人的走狗”，最终还在德意志民族性上遭到质疑，只有预期要实现的政治上的匕首投枪作用无人提及。政治剧即使不能促进，也要宣传、宣称共产主义，这样的尝试全线溃败。

原因在于，皮斯卡托尔剧院只注重现时并因此终结了历史：

“（通过科技）整个人类开始了现时化。往昔意识形态（中世纪、巴洛克、毕德迈耶，甚至石器时代，它从例如火地群岛到我们的时代都鲜活地存留着）的残余，在极速消融。每个人的生活都被提升至1930年的高度。”但皮斯卡托尔借此塑造了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一种历史进程客观的必要性，而这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图像同时在相互转化，其现时性只能在舞台上，而非在社会现实中兑现。

可以认为，皮斯卡托尔1929年著书立说也是出于这一原因：回顾以一切方法对戏剧进行的政治化改革，这在德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且只局限于那五年的时光，这是历史上（所谓的）黄金二十年代，这些年里，虽然受制于众多局限性，但毕竟使热衷政治的戏剧成为可能。为了强调这一重要意义，皮斯卡托尔必须同敌人划清界限，同时还要寻找志同道合者。同时他还要注意，尽管书中充溢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仍不能不顾其艺术水准。

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希特的“叙事剧”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叙事剧”在《乔·弗莱施哈克》中首次出现（1924年上半年），原因是，戏剧中所计划的经济素材不再适用于传统戏剧，如同布莱希特1926年6月以确信无疑的语气所表述的“我们如今的世界完全不再适于戏剧表现”，因此必须有新戏剧到来。1929年，当皮斯卡托尔撰写他的图书时，布莱希特已经开始了实践叙事剧——《人就是人》，以及《马哈哥尼歌唱剧》、《三毛钱歌剧》和一些教育剧，教育剧虽然构成了新的戏剧类型，但仍属于叙事剧。其成功并非由于其政治性，更多是美学原因，或者，如果估计过高，要归功于娱乐工业接受叙事剧成为喜闻乐见的商品，并对其进行了覆盖全境的宣传；但也可能因此丧失了政治启蒙的目的。如果皮斯卡托尔将“叙事剧”写在了阿尔冯斯·帕奎特的《旗帜》上，即把日期预先填写到1924年，那么他便可以把这一戏剧形式的新美学写入他的政治剧，并因此赋予这些戏剧同

布莱希特一样的品质，他甚至可以声称，早于布氏多年已经贯彻了20世纪最先锋的戏剧美学。

但为此必须稍微弄虚作假。皮斯卡托尔的书在1929年版中宣称，帕奎特的戏剧是第一次坚定的尝试，“打破戏剧剧情的构架，在此处添加对故事经过的叙事”，为此他还装模作样地引用了莱奥·拉尼阿1924年6月2日在《维也纳工人报》（*Wiener Arbeiter-Zeitung*）上发表的文章。只是拉尼阿的文章在皮斯卡托尔的书提前一页结束，而且没有标明出处，以至于皮斯卡托尔的其他论述都出自1929年，此时布莱希特的概念早已投放市场。另外，宣称《旗帜》的副标题为《一部叙事戏剧》（*Ein episches Drama*）也是皮斯卡托尔的杜撰。事实上，该剧的副标题是《一部戏剧小说》（*Ein dramatischer Roman*），这在文学史上也颇有传统，可以追溯至18世纪弗里德里希·特劳戈特·哈泽（Friedrich Traugott Hase）的《古斯塔夫·阿尔德曼——一部戏剧小说》（*Gustav Aldermann. Ein dramatischer Roman*, 1779），在这一事件中或许更可能与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小说《托马斯·温特》（*Thomas Wendt*）有关，这部1920年的小说标有同样的副标题。皮斯卡托尔坚决强调布莱希特参与了《帅克》的工作，因为这可以使人认为布莱希特属于他的集体，甚至隶属于他之下，所以也就承认了皮斯卡托尔剧院在1920年代的领导地位。但这根本不可能。

尽管相互欣赏并偶有合作，皮斯卡托尔和布莱希特之间的美学分歧还是巨大的。1928年9月19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BPRS）成立，皮斯卡托尔加入了联盟，但布莱希特没有，而且还蔑视这一组织的成员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占有人”，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其他反对者，还继续说道：“他们不过是市民阶层作家的敌人，他们的代表大会（BPRS成立大会）企图垄断整个无产者的市场一笔之于他们，就像火柴之于克

鲁格。”瑞士人伊瓦·克鲁格（Yvar Kreuger）是欧洲整个火柴市场的垄断者。这些（垄断）占有人“视‘他们的’读者不过为买主”（“只要无产者读书”）。BPRS不过是一家“消费协会”，“一个可憎的小型上层建筑，市民风格和市民品味的装饰品”。同一时期，布莱希特还赞扬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因为他的文学作品“能够表达世界的新景象……恰恰填补了如今马克思主义艺术观造就的漏洞！”

德布林反之也赞成布莱希特的观点，他同样也疏远BPRS，并讥讽皮斯卡托尔及其同仁：“现在他们端坐于无产者的森林中，怪声合唱着《国际歌》，放弃了独立思考。人们还可以回忆皮斯卡托尔早年同样滑稽的场面。他（人民舞台）高尚的观众同样愚笨、古怪、无意识地坐在台下。但他，作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同志，一点一滴地继续构建布尔乔亚的艺术工具，这是他所有的成绩。作为一位艺术家，他是一名市民，而谁如今以及今后很长时间又能不是呢？但观众们来了，鼓掌，他们忧虑，因为皮斯卡托尔偷偷将无产阶级学说混入了诗学，最终人们看透了他，将其丢入垃圾箱。”在1930年，讽刺不可能更毒辣了，这也说明，在艺术家之间没有一座桥梁能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但有一点十分明白：用皮斯卡托尔的共产主义无法进行艺术创作，当然更严重的是，也无法进行政治运动。

于奥格斯堡，阿维尼翁流亡的第五个月

格罗兹、施里希特尔、布莱希特：

艺术家们对时代的诊断，绝望

环顾布莱希特在造型艺术界的朋友，可以证实，布莱希特关心的是当代的社会关系，他不断寻找美学技法，能充分展现社会关系，并同时促进人们提高认识。格奥尔格·格罗兹和鲁道夫·施里希特尔各类的艺术作品都同布莱希特在主题上存在一致性，自1927年起，几人

对时事的看法也异曲同工，这也揭开了布氏作品和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布莱希特同这两位画家相交甚好；两人都曾为布莱希特绘制肖像画，都赏识布莱希特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他们仍分别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这曾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格罗兹曾有一幅素描作品，研究几乎一致认为它画在1918年，同布莱希特《死兵的传说》一样，以“kv”^[48]为主题。作品描绘了一个由5名医生组成的“军医委员会”，一名警察和一名护工，护工手中明显拿着一幅骨架的画像，另外一名医生用听诊器对其检查，并宣布“kv”。图画以《健康祈祷者》（*Die Gesundheitsbeteter*）为题，心理治疗师评价这幅画表现了精神创伤，也就是说，格罗兹必定对被征召入伍有过恐慌和畏惧。

格罗兹的画与布莱希特的诗有惊人的相似，这或许会引起猜测，即布莱希特是受到了格罗兹的启发。但这种猜测已被证实是站不住脚的。当布莱希特因内尔服兵役而写作《死兵的传说》时，格罗兹的画还尚不存在。格罗兹，本名格奥尔格·艾伦弗里德·格罗斯（Georg Ehrenfried Groß），1916年美国化了自己的名字，因为他也曾被迫参与战争大屠杀，因此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感到厌烦，不愿再认同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战争中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必须被送往精神病院。他从未投身政治，对这个畸形、丑陋、令人作呕的世界只能回以愤怒。借用格罗兹自己的语言，他要在作品中表现“那个包围着我的如该死的小蚂蚁般忙碌的世界，表现它的可笑和荒诞”。

虽然格罗兹和布莱希特的作品不存在依存性，但它们的一致性也表明，两人笔下都展现了那个面目全非、扭曲而荒诞的时代，其原因在于，格罗兹和布莱希特都不用美化的或理想化的眼镜观察这个世界，两人作品之间存在一致性不应在他们身上探寻原因，而是这种一致性早已存在，并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得到了实践。

布莱希特结识格罗兹其人可能早在1926年或者1927年初。1927年10月初，布莱希特和鲁道夫·施里希特尔曾从奥格斯堡致信格罗兹，信件亲昵但又颇具讽刺诙谐，还附有两人手书的签名，因而必然以三人较长时间的友谊或者至少是相熟为前提。格罗兹收到了这封信，信件原文如下。

信徒贝托尔特斯·布莱希特与鲁道夫斯·施里希特尔致信教皇格奥尔格一世

教皇陛下：

我们阅读了你的各种教谕，给我辈带来了许多乐趣，同时也观看了教堂礼拜，以便不对您主教的通告囫圇吞枣，并特此代表广大信徒向你表达感谢。我们不能向您隐瞒，教廷的无政府天主教教派在正教教众中引发了形形色色的不快，我们同你一样，憎恨这些教区的成员，他们急躁、平庸而有缺陷，直呼你是蠢材和卡特里派^[49]。为了帮助你，我们给你寄去了十分优美的新式小十四行诗，并向马克思祈祷，你膨胀的政治事业不会剥夺你的缪斯女神，能一如既往地享受纯正的艺术。

我们以使徒的谦恭亲吻你的拖鞋。

红衣主教

鲁道夫斯·施里希特尔

及

贝托尔特斯·布莱希特

于奥格斯堡，阿维尼翁^[50]流亡的第五个月

格奥尔格·格罗兹1927年曾在法国逗留六个月（4~10月），先在马赛，然后是卡西斯小镇（Cassis-sur-Mer）的蓝色海岸（Côte d'Azur），理由是在德国，他这种状况的艺术家已再无机会。格罗兹1922年前往俄国，经历了布尔什维主义专制和苏联完全腐化的经济，

回国后于1923年退出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加入），以后再未参与党派政治。格罗兹对社民党的看法，表现在他的彩色素描《共和思想的胜利》（*Der Sieg des republikanischen Gedankens*）中，这部作品创作于1925年兴登堡4月26日当选德国总统之际。红毯上，诺斯克牵着兴登堡的手臂（“受到诺斯克的欢迎”），艾伯特从背后扶着他（“受到艾伯特的呼唤”），两人引领身着军装、手持拐杖的垂垂老矣的兴登堡走向总统席位，保罗·勒伯（Paul Löbe）立于一侧，向兴登堡深深鞠躬，并将其引向那把扶手椅（“受到勒伯的迎接”）。将本次选举记作魏玛共和国末日，格罗兹并非唯一一人，但他还把此次选举作为社民党的唯一事业，却多少令人有些闻所未闻。同布莱希特一样，格罗兹显然也知道，社民党在镇压共和力量或者在容忍反动势力中有何等的牵连，并逐渐向法西斯化转变，因此从这一方不存在实现革命性解决方案的希望。1927年3月19日，柏林发生了纳粹联合作战兵团同德国共产党的公开巷战，使用了枪炮，造成了双方大量伤亡。

布莱希特何时第一次遇见画家施里希特尔，目前已没有清晰的记载。施里希特尔所作的布莱希特身着短皮夹克的著名图画，根据艺术史领域相关人士的一致意见，出自1926年。既然布莱希特成了模特，自然有充足的时间供两人相识与交流。布莱希特第一次提及施里希特尔的名字，是在他1927年8月初致埃尔文·皮斯卡托尔的介绍信中。布氏可能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已经偶遇过施里希特尔，因为在艺术和文学圈子里深受喜爱的饭店是由施里希特尔的哥哥马克斯经营的，布莱希特也是常客，时常同布隆内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造访，还于那里结识了弗里茨·施坦贝格（Fritz Sternberg）。此外，马克斯·施里希特尔还利用自己的酒馆展出和销售弟弟的画作。

施里希特尔是德国这一时期最古怪、最令人不可捉摸的艺术人物之一，同布莱希特或布隆内完全不相称。据其坦率回忆，他从青年时代就深受性强迫症的困扰，几乎达到了性暴力和幻想各种形式强奸杀

人的边缘，他还喜欢想象将自己的潜在受害人挂在绞刑架下。1928年，在他的个人展上，施里希特尔真的将自己的妻子施比蒂

（Speedy）作为艺术品挂在了画廊的墙壁上，好像她吊死在那里，令来访者一片愕然。他还画了施虐、征服的场景，其中身穿皮靴的女子对一个男人挥动鞭子，用脚踩着他的脖子。同格罗兹一样，施里希特尔也把不道德的行为当作作画的主题，例如两人的性交、被谋杀的妓女、被绞死的模特以及柏林各种夜店和妓院的裸舞。施里希特尔把妓女当作妻子，直至他结识了施比蒂。施比蒂1927年来到柏林，梦想成为模特和女演员，是柏林最时髦的交际花之一，参演了两部情色电影，同丈夫以施虐和受虐的方式纵欲无度，而后被丈夫送去做了娼妓。

施里希特尔还参与了“第一届达达主义国际展览会”，展会由约翰·哈特费尔德（John Heartfield）——他也像格罗兹一样把自己的原名美国化了一以及雷欧·豪斯曼（Raoul Hausmann）和格罗兹组织，从1920年7~8月在柏林画廊（Berliner Galerie）展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奥托·迪克斯（Otto Dix）、汉斯·阿尔普（Hans Arp）、奥托·施马尔豪森（Otto Schmalhausen）、阿尔弗雷德·巴德尔（Alfred Baader）等人的作品。施里希特尔的作品是挂在天花板上的人偶，人偶穿军灰色士兵制服，肩膀上有军官的肩章，脸是猪头面具。有注释为：“要理解这一作品，人们需要每天负重练习12小时，在坦佩尔霍夫区^[51]全副武装行军。”这说明他的人偶是一战的（阵亡）战士。德国共产党的喉舌《红旗》（*Rote Fahne*）在1920年7月21日的评论文章里警告读者，不要观看这样的“变态”内容，并否认这些艺术家可以自称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其中有一些当时还是党员。

施里希特尔是“十一月小组（Novembergruppe）”的成员，小组1918年由各派艺术家建立，因十一月革命而得名，是革命性的亲民团

体。小组的目的是推广、宣传所有的艺术家，造型艺术领域许多流亡的俄国人也加入进来（例如马克·夏卡尔和伊凡·蒲宁，即在蓝鸟聚结的圈子）。1919~1920年，施里希特尔愈加极左，但不以任何政治目的为导向，他1927年取消了所有政治职务，但仍同许多人一样继续进行社会批判。施里希特尔回顾往事时曾写道：“1927年前后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使我内心发生了精神转变和悔改。我离开了之前的活动范围，回归天主教堂。”当时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此前曾投身政治或政党工作，但他们在1927年放弃了，变得宿命或者冷嘲热讽，转换了阵营或者像格奥尔格·格罗兹一样暂时流亡。

那么问题是，如何理解施里希特尔和布莱希特从奥格斯堡写出的这封信，其中施里希特尔对靴子的物恋欲被“弄巧成拙”为了吻拖鞋。首先渎神的罪名不成立，因为使格罗兹受如此指控的素描《闭嘴，继续服从》（*Maul halten und weiter dienen*）在流亡阿维尼翁时才完成，还被用于皮斯卡托尔《帅克》的演出中。书信影射了罗马教廷1309~1377年迁都阿维尼翁，并导致了1378~1417年的教会分裂，这意味着在罗马和阿维尼翁同时都有教皇，而且他们互不承认。信中，格罗兹作为“无政府天主教信徒”，是艺术以及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布莱希特和施里希特尔是他指派在故土（罗马等于柏林）的地方长官，马克思成为天主，从而首要问题成了艺术领域的政治纷争。这也说明，相对于在柏林争取正统领导权的政党共产主义（Parteikommunismus），布莱希特和施里希特尔更赞同格罗兹的无政府主义。在（1929年前后的）檄文中布莱希特曾写道：“在非革命形势中，他（革命知识分子）总是作为激进派出现。至少，只要他不能成功地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或者只要他被迫推翻自己的政党，革命知识分子对每一个政党而言，即使是激进政党，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而正是这一非革命的局面，自1927年即已存在。

三位艺术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表明，纵使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构想和生活形式，但对于正在从事的艺术，评价却是一致的。此外，这封信还表明，布莱希特在皮斯卡托尔的《帅克》之前就遇到了格罗兹，格罗兹坚定地拒绝战后继续回德国工作，同时也驳回了布莱希特请他来柏林剧团的邀约。格罗兹对布莱希特一直较为疏远，不仅无视布氏对美国的评论，而且在自传《小是大非》（*Ein kleines JA und ein großes NEIN*，英文版，1946，德文版，1955）中只为这位朋友保留了可怜的三页纸，这三页纸也同这一时期无关。其后，两人只有因童书《三个士兵》（*Die drei Soldaten*）而再次合作，大概是在1930~1931年。《三个士兵》1932年出版，关于三个讽喻——饥饿、事故和咳嗽，包括14个章节，这三个讽喻使所有容忍战争（这里指一战）杀戮或者否认战争带来苦难的人都丧失了生命。两人其他的合作再无记载。在皮斯卡托尔剧院因《帅克》而合作如果真有其事，也只是流于表面，而且奇特的是，格罗兹在回忆中也只字未提自己曾参与《帅克》的排演。

更古怪的是同施里希特尔的关系。以下资料是经过确认的：1926年3月9日，布莱希特到威廉·赫尔措格（Wilhelm Herzog，一位文艺学家）家做客，并在此遇到了马克斯·赫尔曼—奈瑟（Max Herrmann-Neiße）、凯特·屈尔（Kate Kühl）和施里希特尔。1927年布莱希特同卡罗拉·内尔（Carola Neher，并非卡斯帕尔·内尔的亲戚）等人参加了施里希特尔在哥哥饭店举行的舞会。1927年春，布莱希特时常光顾马克斯·施里希特尔的饭店，鲁道夫也会来到这里。施里希特尔为布莱希特创作的一幅（拿着烟管的）素描的日期也在1927年。在给海伦娜·魏格尔的一张明信片上，卡片上的日期粗写为1927年秋，布莱希特和施里希特尔从陶伯河上游的罗腾堡（Rothenburg）寄来问候，但这其实更可能来自内卡河畔罗滕堡（Rottenburg），施里希特尔1932年隐退于此，布莱希特曾前去探望，但这是1932年才可能发生的事，并且进一步证实，在施里希特尔改信天主教之后，布莱希特仍

然同他保持了友谊。1929年10月8日，布莱希特在施里希特尔家做客，事由不明。1938年初，布莱希特为《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

(*Furcht und Elend des III. Reiches*) 写作《老战士》(*Der alte Kämpfer*) 一场，以1933年11月在卡尔夫(Calw)发生的真实事件为题材。其中一名面包师没有投票给希特勒，因此被在脖子上挂了耻辱牌游街，牌子上写着“我是国家的叛徒，我没有投票”。很可能是施里希特尔向布莱希特讲述了这一事件。同样还可以由此推测，两人在流亡期间仍保持联系。后来，当施里希特尔在主教城市罗滕堡开始绘制一些可怖的田园画[例如参见1938年的《林中早餐》(*Frühstück im Walde*) 或者1937年山脉背景前赤裸上身的信徒肖像画]时，两人来往的痕迹就消失了。如果布莱希特知晓这些画作，它们有可能破坏两人的友谊。

格奥尔格·格罗兹用一幅油画讽刺施里希特尔1929年的转变。施里希特尔跪在一个柴堆上，两臂向上伸，两手握拳，显然在朝拜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 裸露的女人的身体，她自生殖器以上被切下。烟雾升腾，无法辨别这是祭献的烟雾还是施里希特尔正跪在为他堆砌的柴垛上。不能或缺的还有施里希特尔脚上穿的一双较为简单的系扣靴子。桌子上是工人运动的锤子，把手向上立着，在草稿中还写着“马克思”的字样。桌子上方在缤纷的粉色蝴蝶结上挂着镰刀和红色台尔曼^[52]的拳头。这些的前面是一幅画布，施里希特尔之前还在上面画了同样的锤子，但是由一只拳头握着，相反，挂着的红色拳头则够不到桌上的锤子。施里希特尔堕落成“轻歌剧共产主义者(Operettenkommunist)”和尼采的信徒(素描中施里希特尔的坐兜里有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但格罗兹此时对布莱希特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一幅1991年才可以公布的(不为人所知的)漫画诠释了这一点。这幅画可能完成于施里希特尔肖像画之前，1927年末或1928年初，此时格罗兹正在参与《帅

克》的排演工作。画中布莱希特面貌丑陋，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留着胡茬，嘴里叼着香烟，头上戴着过小的鸭舌帽，身穿宽大的大衣，露出布莱希特窄窄的皮领带：这是一幅神像。大衣的两侧都各伸出四只胳膊，上面有用两三笔勾勒出的手指（也可能是燃烧的烟火或者雷管）。右侧最高的胳膊拿着一根鱼竿，锤头和镰刀只用一根细线绑在一起，掉在鱼竿上摇晃。在心脏的部位植入了一台打字机，打字机散发出光芒，兑现了格罗兹回忆中对布莱希特的描写：“他可能在心脏部位有一台精密的电子计数器，而在他腿上则是汽车轮胎的轮毂。”

两条腿很纤细，用虚线画成，给人一种长着毛的感觉，在腿的前面有一名裸女，身高还不及布莱希特的膝盖，清晰地画着阴毛，它恳切地向布莱希特伸出双手，说：“我赤裸地走向你面前。”在布莱希特头顶悬浮着一个巨大的话筒，被一只从画外突进来的手举着。话筒后是乌尔斯坦出版社一同样也只是简单勾勒一张着的大嘴，1927年乌尔斯坦出版了布莱希特的《家庭修身集》，正四处为这位新作家进行宣传。布莱希特像古典时期神的使者赫耳墨斯一样，脚踏带翅膀的滑轮鞋，用速度和无畏将一切压扁。鞋下躺着被踏平的一些人物，其中一个看起来像只毛绒熊玩偶，一旁是评论：“天才留下冒烟的灰烬。”对镰刀和锤头的注释是：“吊杆上成功的诱饵”；而打字机的是：“心中的打字机有致命的威力”，“键盘发出销毁一切的光芒”。最后在大衣的左侧口袋里塞着6个勾勒出来的小人，其中三个被标注了名字，“皮斯（Piss，皮斯卡托尔，布莱希特写作Pis），施坦贝格、施里希特尔”，有评注为：“把一切都塞进口袋。”这幅墨笔素描确实不美，事实上只是草草涂鸦；但赞扬和肯定已经溢于言表，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画中共产主义的标志镰刀锤头，同施里希特尔肖像画中的一样，并非构成通常的象征统一体，而是分别在裸女的头上摇晃。此处共产主义也以变质的形式出现，但出于另一种关联。格罗兹把施里希特尔改信天主教诠释为愤世嫉俗的信仰转变，而

共产主义在布莱希特身上只是诱饵，以此他能吸引一值得注意，是裸露的一女性，而且能获得成功。

施里希特尔不仅皈依了天主教，而且自1929年还同民族主义圈子交往渐密，其中特别是恩斯特·冯·萨罗蒙（Ernst von Salomon）和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阿诺尔特·布隆内在这期间也加入进来。萨罗蒙是一名民族主义者，由于协助刺杀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53]而被判5年监禁，1929年又因在国会大厦纵火被捕，据其自己描述，1930年曾到卡尔夫拜访施里希特尔夫妇。荣格尔自诩1930年代初转变了施里希特尔，与此相反，布莱希特努力劝说自己的朋友远离他那些民族主义的新朋友们，阿诺尔特·布隆内此时也算作其中一员。荣格尔还记载了如下一则趣闻：“布莱希特尝试拉拢施里希特尔信仰共产主义，为此布氏详细地论证恩斯特·荣格尔和他的朋友们所说的一切都是粪土。布莱希特：‘你明白了吗？’施里希特尔：‘是的，但是，我要我的德意志粪土，德意志粪土！’”

荣格尔曾向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透露，他共与布莱希特相遇“大约12次”。其中一次：布莱希特鉴定施里希特尔一幅荣格尔的肖像画，评价是“德国式的媚俗”。其他的碰面应该发生在一个声名不佳的酒馆中——黑猪仔酒馆（Zum Schwarzen Ferkel），它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新威廉路（Neue Wilhelmstraße），有约900种不同的烧酒种类供人们喝到烂醉如泥，据荣格尔所说，出席的还有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布隆内、施坦贝格，也许还有戈特弗里德·本恩。这座酒馆在19世纪末迎来它最辉煌的时期，当时许多艺术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家〔其中包括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时常到访。海纳·穆勒在其自传《没有硝烟的战争》（*Krieg ohne Schlacht*）中记录了荣格尔的这些回忆；但真实性仍值得怀疑，因为黑猪仔酒馆此时并不存在；而同名的艺术家俱乐部也早于1896年解散了。

1930年，布莱希特和荣格尔再次于施里希特尔的工作室相遇，两人因荣格尔正在创作的书籍《世界战争的面貌》（*Das Antlitz des Weltkrieges*, 1930）发生了争执。荣格尔宣称，战争一直存在，相反，施里希特尔的一位朋友——卡尔夫的一名工厂主海因里希·佩罗特（Heinrich Perrot），由于一战的经历断然痛斥所有消灭其他人类的行径，佩罗特感到布莱希特是他的“盟友”：“这两位先生不和，是真实可见的。”荣格尔、布隆内、萨罗蒙、施里希特尔和布莱希特的联系保持到1932年末。据弗里茨·施坦贝格亲眼所见，这些人1932年一同庆祝了新年，并共同为“一个幸福、不流血的合法政变”而举杯。

共庆新年一事不容置疑，但布莱希特是否把祝酒词当真，仅凭施坦贝格的描述无法断定；毕竟，施坦贝格甚至记不起同样参加本次聚会的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姓名。就布莱希特面对荣格尔的表现，佩罗特对其评价已经清晰说明，布氏同民族主义者的交往并不意味着就附和他们的意见。布氏同施里希特尔的友谊显然比之前所了解的更加坚固和紧密，因此也不会反对施里希特尔邀请一些新朋友；特别是这些新朋友中还有布氏的老朋友布隆内。萨罗蒙是否出现也存在疑问，因为根据其传记，萨罗蒙当时应该身处维也纳，但这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为了这次事件特意从维也纳前往柏林（这会使问题更加棘手）。施坦贝格作为见证者，时常不会提及人物姓名，或者会有意隐瞒姓名，因此，如果萨罗蒙不在场，施坦贝格又明确点出他的名字，反而可疑。

布莱希特的反常行为只可能有一种可靠的结论：政治分歧不会阻碍他与人的交往，如果愿意，一个自由主义的态度或许会引起言语上的争辩，但不会导致根本的决裂，而且这还有关（曾经的）朋友们或者朋友的朋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能观察到布氏类似的表现，面对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Gustaf Gründgens），布氏流亡归来后

立即将《屠宰场的圣约翰娜》的首演事宜交给他负责；或者面对恩斯特·冯·萨罗蒙，布氏1956年初建议两人在柏林共同举行对话，萨罗蒙的纳粹往事没有成为与其断绝往来的原由。如果布莱希特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确实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那么他必将因此承担道德上的后果，因为对大多数小市民共产主义者而言，容忍政治对手都被视为背叛，在斯大林时期的莫斯科甚至会被判处死刑。

人啊，驾驶我们飞驰吧！

汽车、科技、性：虚假的自由

布莱希特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技术革新是一项必须接受的挑战。虽然布莱希特1925年已经是3个孩子的父亲，而且没有稳定的收入，根本无法负担一辆汽车的花销，但他最晚也从1925年8月开始，同朋友奥托·穆勒莱塞特一起系统地到驾校学习。9月9日，他就宣告已经“完全”掌握了。1926年5~6月间，布莱希特孤注一掷地努力，尽量少花钱，其实应该是不花钱，搞到一辆车。他让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去多家公司游说，希望能得到一台“广告车”，未果。然后他开始考虑写一部插图小说，但也无人愿意出版。用“威士忌和烟草”加工出来的拳击手小说《声誉》（*Das Renommee*）也没有找到买家，未完成的《拳击手萨姆森—廓尔纳的一生》也没有得到预支的薪酬，因此布莱希特也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最后还有“某个富太太”似乎相信布莱希特愿意向她奉赠一册私人的十四行诗集，可能是情色诗，但也一无所获。

通过奥托·穆勒莱塞特的介绍，布莱希特找到了一辆英国产的戴姆勒车，1921年造，正在维滕堡（Wittenberg）等待检修，但之后被证实无法修复，因此布莱希特向他的朋友索要回购资金，这也是他借来的。事情的结局是，而且一定是，两人为此闹翻，几年无往来。但布莱希特仍未就此放弃。长时期的辗转后，他最终于1926年12月购得

了一辆欧宝（Opel，1926年4月14日生产），同奥托·穆勒莱塞特那台废铁盒子一样，都登记在海伦娜·魏格尔的名下，并驾车游弋了柏林及周边地区。

但在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的自传《耳中火炬》（*Die Fackel im Ohr*, 1980）中有间接的记载，布莱希特显然1927年时（日期并不十分准确）就已经驾驶一辆有折叠篷的斯太尔车（Steyr）四处游逛，而且还开着这辆“令人惊羨”的车出现在皮斯卡托尔排练《帅克》的酒店。但从卡内蒂的愤怒可以看出，科技守旧态度对此的仇视是何等的强烈，而且必须考虑到，卡内蒂1905年生人，还比布莱希特小几岁。当时柏林铺天盖地、迅速蔓延的广告已经让卡内蒂甚为反感。当布莱希特想说服卡内蒂广告也有其益处，因为布氏为斯太尔汽车公司写了广告诗，并因此得到了那辆漂亮的敞篷车时，这打破了卡内蒂可以接受的底线：“这些话对我而言，就好似出自一张魔鬼的嘴。”卡内蒂坚守文学的基本原则：“不是为了报纸而写作，不是为了钱财而写作，人们必须为他写的每一个字负责任。”因为卡内蒂没有作品在市场上销售，所以布莱希特还可以装作不认识他，而且也可以“干瘪、怨恨地”——卡内蒂尖刻的记录——承认自己“为了钱财”写作，从而为自己赚得了一辆车。“我没有一次能看到布莱希特而不表达自己对钱财的鄙视。”这首获奖诗《欢唱的斯太尔车》（*Singende Steyrwagen*）内容如下。

我们来自

一家兵工厂

我们的小弟是

曼利彻尔猎枪

我们的母亲则是

斯太尔的一座矿井。

我们有：

6个气缸和30马力。

我们的体重：

22公担。

我们的轴距达到：

3米。

每一个后轮都独立悬挂，

我们有摆动轴，

在弯道上我们像胶带一样贴地。

我们的发动机：

是有思想的矿石。

人啊，驾驶我们飞驰吧！

我们带你毫无颠簸地行驶

你会相信，

自己躺在水中。

我们带你轻盈地行驶

你会相信，

你用拇指就能把我们按在地上

我们带你无声地行驶

你会相信，

在驾驶自己汽车的影子。

这首颂歌是写给奥地利的斯太尔汽车制造商的，斯太尔主要生产武器和军用车辆，同时也向市场投放了数量可观的敞篷汽车。布莱希特驾驶这样的汽车十分引人注目。诗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布莱希特迅速准确地认识到了新科技给人类及社会共同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诗歌中是汽车在欢唱，而非人类，汽车的便捷灵动也感染了人类，并因此赋予了人类全新的身体感觉。“人啊，驾驶我们飞驰吧！”使人联想到安格鲁斯·西勒修斯（Angelus Silesius）^[54]提醒人类相信世界崩塌了，但本质（神）仍在（“人啊，看透这一切吧”）。布莱希特毫不犹豫地将基督教信条改写为科技信条，并将其与新的信仰相关联（诗歌最后一节，“你会相信”出现了三次，而且都是首句重复），新的信仰通过有思想的矿石已经获得了又一个新的自然：“你会相信，自己躺在水中”，这同布氏早年的诗《湖与河中的欢游》具有相似之处。对此，诗歌还详细描述了虽然是人在开车，但人同时也被车承载。这是一种新的科技辩证法，人一方面支配机器，另一方面又受机器的制约，最迟在机器消亡时，这一点更会得到展现。

得到斯太尔车之前，在1926年前后创作的短篇小说《芭芭拉》（*Barbara*）中，布莱希特就描写了汽车如何会成为累赘或者束缚。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不幸同艾迪（Eddi），一个200磅的多愁善感的人，在库达姆大街喝了几杯鸡尾酒，被倒霉地拖到了芭芭拉—艾迪的女朋友家。但芭芭拉“正同卡巴莱剧团的经理举行十分重要的会谈”，她穿着睡衣接待了“我”和艾迪，反应激烈，立即把他们赶了出去，并对艾迪愚蠢的醋意破口大骂。两人突然又回到了艾迪的克莱斯勒车里，车成了艾迪发泄他性失落的工具，他用越来越高的速度疾驰穿过柏林和古纳森林（Grunewald），同时向自己同车的伙伴讲他关于女人是“拉比兹式墙（Rabitzwände）”（金属丝网薄墙，此处意味过度敏感）的哲学，“我”只能无助地听任艾迪摆布：“由于十分紧

急（时速110公里！），我无法核实艾迪对女人的论断，但在我眼前呼啸而过的一排排松木却显得无比坚固。/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艾迪的悲天悯人还有一只脚，而这只脚现在正踩在油门上。由于无法挪动这只脚，我最多也只能尝试化解他的这份伤痛。”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汽油用尽了或者一与之相应的一艾迪的性冲动缓和了。破晓时分，人们看到两个男人“推着一辆克莱斯勒汽车，其中一个，身材瘦高，对另一个说着自己对他的看法，而另一个胖子浑浑噩噩不成样子，气喘吁吁地推车并时不时发出一阵大笑”。



这是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的早期，汽车迅速被理解为地位的象征和新商品美学的表达，同时也被视为男人的生殖力，广告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宣传：汽车像女人的胴体，男人可以因为对其的占有而自鸣得意（例如卡内蒂对布莱希特的评价），而且男人像（比）爱妻子一样（更）爱汽车，因此可以在汽车上发泄自己的性挫败感或升华了的性压抑。布莱希特为斯太尔创作的广告诗，在创造科技崇拜的同时，也创造了自由的假象，这种新体感虽然由个体感受，却是在超个体领域通过科技得以制造。

但这次还算划算的交易得来的斯太尔车，只维系了不到两年的欢乐。1929年5月，布莱希特原本要前往法国南部的圣西尔（Saint Cyr），同库尔特·魏尔共同创作《幸福的结局》（*Happy End*）的歌曲。迎面而来的汽车要超越前面的货车，布莱希特躲避不及，又要避免掉进一旁5米深的深谷，把自己汽车水箱的中央部位撞到了一棵树上，车停了下来，但因此造成了巨大损伤：“水箱破裂，底盘的前端由于撞击弯成了围绕树的圆环状，但也同时使车没有倾斜或翻倒。人员受伤并不严重。”《UHU》杂志（1929年11月）事后对这起事故进行了报道，并提供了真实—补拍的一图片，这无非是斯太尔公司又一次

新的广告计策：谁开斯太尔车，即使（时速70公里）迎面撞击一棵树，仍能基本毫发无伤。水箱抵挡、缓和了撞击力，车体其他部分会盘绕树木保护车内乘客。

虽然卡内蒂不知道《UHU》中的记录是纯正的杜撰，他还是愤怒地写道：“驾车发生事故之后，他从一个广告策略又想到另一个新的策略，”并评价，“道德是一回事，而事实又是另一回事，他只注重事实，但对我而言，道德才是至高无上的。”但事实是，如果杂志记录属实，布莱希特应该会被发动机组甩出，只剩下一摊肉泥。事实还是，布莱希特也受伤严重，髌骨骨折，无法前往圣西尔，必须被送回柏林，而且较长时间无法工作，这也意味着《马哈哥尼》歌剧会一再拖延。布氏还卓有乐趣地与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和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一同挖空思想出了《富有教育意义的车辆事故》（*Mär des Lehrreichen Auto-Unfalls*）一杂志中的题目，文章使布莱希特又得到了一辆新车与此事相关还有另一个汽车小故事，既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布莱希特对汽车的热情，也能对他的生活安排以及生活艺术管窥一斑。因为一次访问，布莱希特约了《莱比锡新报》的电影评论员汉斯·塔西姆卡（Hans Tasiemka）在他位于施比谢恩街寓所旁的车库见面，因为他的汽车“有些问题”。“会谈在柏林西部一间小车库中开始。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看到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斜戴着小皮帽，跪在一辆小型汽车前（那一定是辆欧宝），十分勤奋地进行技术上的再次核查。发动机盖被撬开，小轮子和螺丝叮叮当当散落一地，他老练地卸下防尘网，修理错综复杂的电路，再次检修汽车的排挡和滚珠轴承。作家贝尔特·布莱希特，这位被油污涂满身的男人，完全不受访客的打扰。他从未想过正在接受采访，首先他的车必须光洁明亮、完美无瑕地停在他面前，然后他才上了四节台阶，走进工作室。”

塔西姆卡显然也同布莱希特一样并不精通汽车，自然也没有看穿这位狂热的汽车爱好者的专业表演，这个复合词^[55]的第二部分其实只同驾驶汽车有关。之后他同样也轻信了布莱希特先生其他的回答，这些都或多或少是捏造杜撰的，完全可以被采访者识破。布莱希特娓娓道来：他在慕尼黑只学过医，目标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的第一部戏剧是《夜半鼓声》，虽然在慕尼黑的室内剧院领到了导演的薪酬，但什么也没有做过，在中学和大学时代从没有写过“一行字”。从《爱德华》开始，写作才突然进入了他的生活，等等。这篇采访刊登于1927年12月6日，就内容的可信性而言，缺乏可靠的陈述。但布莱希特再一次很受欢迎地出现于公众视线中，而且媒体毫不怀疑地坚定支持他。

自作自受

马哈哥尼：剧院中的自我覆灭

再次回到1927年，在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眼中这是充满变革的一年，布莱希特创造了他至此可能最重要的商标。布氏也踏上了逃避之路；不同于格罗兹的流亡，也不同于施里希特尔躲进了新的（其实是旧的）信仰，更不同于布隆内加入了纳粹聚餐会友的团体。布莱希特躲进了乌托邦，一个想象中的地方，这里不反映任何可以实现的理念，只是一个幻影，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幻影。布氏把这个不存在的地方称作“马哈哥尼”，而建立马哈哥尼的人认为它是同大城市相反的设置，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吸引了五大洲的人们，直到这些人最终发现，世上并没有伊甸园。

谁曾想到“马哈哥尼”会成为流行词，它不仅同两件舞台盛事相关，而且成为一切正在消亡或将会消亡之事——首先便是资本主义（只停留在美丽的幻影）——的关键词。这还要感谢一曲不引人注目的非洲“西米舞（Shimmy）”《请来马哈哥纳！》 [*Komm nach*

Mahagonne!，O. A. 阿尔伯茨 (O. A. Alberts) 作词，莱奥波德·克劳斯—艾尔卡 (Leopold Krauss-Elka) 作曲]，它1922年在德国发行，迅速走红，西米舞是一种由狐步舞发展而来的交谊舞，使用爵士乐伴奏，1918年前后由美国引入，通过剧烈摇摆身体而带来新的舞蹈体验。布莱希特在一封给海伦娜·魏格尔的信中 (1923年12月中下旬) 首次突然提到这个概念：“岁末：到马哈哥尼去。”自1924年7月，布莱希特考虑为“玛”，即玛丽安娜·佐夫写作一部马哈哥尼歌剧。第一部分草稿是未完成的《马哈哥尼歌曲》

(*Mahagonny songs*)，创作于1924年上半年，7月中旬时，包括了五首《马哈哥尼之歌》(*Mahagonnygesänge*) 的诗集已经完结：《马哈哥尼之歌第一首》[“到马哈哥尼去……” (Auf nach Mahagonny...)]、《马哈哥尼之歌第二首》[“谁留在马哈哥尼……” (Wer in Mahagonny blieb...)]、《马哈哥尼之歌第三首》[“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 (An einem grauen Vormittag...)]、《阿尔巴马之歌》(*Alabama Song*) 以及《贝拿勒斯之歌》(*Benares Song*)。最后一首《贝拿勒斯之歌》用英语写就，绝大部分由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完成。

西米舞的内容同歌剧有一些相似之处，西米舞也是以逃离平日“痛苦的深渊”为主题，寻找幻想中的非洲，在那里再没有苛税，在那里人们可以完全投入性爱之中。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西米舞的叠句和《马哈哥尼之歌第一首》。布莱希特采用了西米舞中的文字游戏“手、手、手、手、手风琴”，并改为“到马哈哥尼去/船已起航/茨、茨、茨、茨、茨威利斯/我们在那里将会痊愈”。因此，“马哈哥尼”也是城市中茨威利斯疾病的对立面。

1927年3月，布莱希特结识了作曲家库尔特·魏尔。魏尔1921~1923年就读于柏林的普鲁士艺术学院 (die Preußische Akademie)，是意大利钢琴大师、作曲家费卢西奥·布索尼 (Ferruccio Busoni)

的学生。魏尔192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交响乐，成为“十一月小组”的成员，1924~1929年间投身电台工作，为跨区域的节目杂志《德国广播》（*Der deutsche Rundfunk*）撰写节目预告和评论，这项工作也使魏尔和布莱希特走到了一起。

在是否参加1927年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德国室内音乐节（*Die Deutschen Kammermusiktage*，7月15~17日）的问题上，魏尔态度十分犹豫，他正在寻找适宜的短歌剧（*Kurzoper*）^[56]材料，并偶然发现了《家庭修身集》和《马哈哥尼之歌》。1927年3月，魏尔同布莱希特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布氏构思了大型歌剧《到马哈哥尼去！！》（*Auf nach Mahagonny!!*），并且构思了场景草稿。同布莱希特商定后，魏尔4月时把五首诗歌以不同的顺序编排为一部歌唱剧（*Songspiel*）^[57]，将这些诗谱曲成歌，写了乐器间奏、一首序曲和一首尾声，并要求布莱希特创作终曲。歌词如下。

但这整个马哈哥尼只是
因为一切都如此鄙陋
因为不得安宁
毫无和悦
因为没有任何
人们可以依存之物。
马哈哥尼—不曾存在
马哈哥尼—是无形之地
马哈哥尼—不过一个虚构的词语。

尽管歌词异域色彩浓厚，尽管一再强调马哈哥尼是完全虚构的，尽管音乐新颖，但歌唱剧分毫不差地概括了当时社会关系的内核。晚

会包含4部短歌剧：恩斯特·托赫（Ernst Toch）的音乐童话《豌豆公主》（*Die Prinzessin auf der Erbse*），达律斯·米约（Darius Milhaud）的《劫掠欧罗巴》（*L' Enlèvement d' Europe*），保罗·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的滑稽短剧《往返》（*Hin und Zurück*），以及作为第三个节目上演的《马哈哥尼歌唱剧》，时长约30分钟，并很快成了名曲。这首先要归功于魏尔的谱曲，他将管弦乐团（小提琴、单簧管和小号各两个，一个中音萨克斯风，一个长号，一架钢琴以及打击乐组）重新组合，加入了爵士、流行歌曲和“严肃”音乐的元素，形成了新的歌曲风格，并且保持了乐曲的独立性。关于歌剧的主题还要说明几点，因为在节目手册中写道：“所有艺术门类中都有艺术家预告社会艺术的末日，魏尔在新作品中也以此为方向。小型叙事剧《马哈哥尼》从现存社会阶层不可遏制的沉沦中吸取了教训，它面向那些单纯希望在剧院中得到快乐的观众。”这样的表达方式清晰透露了这是布莱希特的手笔。

魏尔一定会收获新的体验。观众从市民到贵族，对剧中妓院、淘金者和（表面上的）亵渎神灵等众多因素坚决报以愤怒和口哨，而演员们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击。布莱希特给他们都装备了能发出颤音的哨子，这令这场闹剧变得更加刺激。纵使观众的愤怒最终只针对词作者，而非曲作者，布莱希特的回应仍然是：观众的态度完全是附庸风雅的假绅士，他本人将再也不会返回巴登—巴登。但正当人们建议把这种颓废派战胜大城市的卡巴莱剧改期到午夜后，这些音乐却像耳虫一样盘踞在大脑里，即使那些反感布莱希特歌词的人也不例外。一部分评论家无疑大多是音乐评论家—都认可了这种新的音乐剧，并追捧魏尔是先锋派音乐名燥一时的人物。

魏尔因此也认识到，布莱希特的文本和他的音乐形成了一种新的、至此未知的共生体，而且对其必须加以扩充。1927年夏，魏尔向环球出版社的发行商埃米尔·赫茨卡告知了自己的计划，即要将《马

哈哥尼歌唱剧》扩充为时间长达整个晚上的歌剧，对此赫茨卡高度怀疑布莱希特是否能够胜任。魏尔回信道：“布莱希特吸引我的，首先是我的音乐和他的文学作品之间强烈的融合，这在巴登—巴登令所有有身份的观赏者叹为观止。其次，我坚定地相信，两个同样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紧密的合作一定可以产生一些全新的东西。毫无疑问，目前会形成一种全新的舞台艺术作品，它面向大得多的全新观众群体，影响会以完全未知的方式不断扩大。”魏尔继续阐述，布莱希特作为戏剧领域最强有力的因素，将会把新的运动引入歌剧之中。“我们将要完成的作品并非着眼于一年后便会变得老旧的现实，而是将以最根本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时代。”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语，虽然最终得以兑现，但当时没有任何人会真正相信。

在1927年10~12月的紧密合作中，歌剧的第一稿诞生了，打字稿12月交予赫茨卡鉴定。这一打字稿包括3幕18场，除了一些改动之外，已经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文学意义上的核心内容，因此这部歌词集可以展现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之前作品的创作历程。魏尔1927年也已开始作曲，或者更确切地说，布莱希特和魏尔在脚本上的合作十分紧密，以至于如果没有音乐上的建议，文本都无法想象，可以说，布莱希特对音乐的贡献和魏尔对文本的贡献同样显著。1930年6月10日的《周一朝晨》（*Der Montag Morgen*）刊登了魏尔的《布莱希特事件》（*Die Affäre Brecht*），魏尔在其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更加详尽地描述了歌剧的创作过程，而且回应了对布莱希特抄袭的指责。有人怀疑布莱希特剽窃了瓦尔特·吉尔布里希特（Walter Gilbricht）的诗歌《一个居民的大城市》（*Die Großstadt mit einem Einwohner*），魏尔对此予以否认。“早在巴登—巴登，布莱希特、魏尔和环球出版社就订立了合同，歌剧的歌词于1927年至1928年的秋冬由布莱希特和魏尔共同合作而完成。”

1927年12月，魏尔自豪地向环球出版社通告，布莱希特和他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扩充潜力巨大的歌剧风格”（1927年12月8日），并不日后寄来了脚本。赫茨卡几乎当即回复，对歌剧的曲目提出异议，它们还不够持续整个晚上并且包含过多“拓荒前的美国西部风貌”。赫茨卡还要求加入“一些积极的人性特征，无论是友谊、爱情或忠诚”，这个要求于1929年在《仙鹤与流云》的二重唱[诗歌《爱情三行诗》（*Terzinen über die Liebe*）]中得到满足，自然并非完全符合赫茨卡的心意。因为这一感人至深的交相和唱以完美爱情为主题，却由嫖客和妓女在发生性关系后，也可以说在发生经济关系后所演唱。

魏尔回信，他同布莱希特历时三个月写作脚本，时刻注意“完成一个尽可能连贯、直线型、易懂的剧情”，其间“不出现片刻的冗长乏味”：“在开篇受人欢迎、展现技巧的咏叹调位置”，使用“一种新型的流行歌曲”替代，音乐“同单纯的剧情歌剧相比扮演了更根本的角色”。除此之外，他还告知布莱希特以后如何继续写作，“只为音乐的需求进行写作，这恰恰是吸引布莱希特之处，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我都根据歌剧舞台的要求进行了审核。这是多年以来的第一部脚本，完全以音乐，甚至是完全以我的音乐为出发点”。魏尔的信落款日期是1927年12月27日。歌剧的最终稿一即音乐最终与脚本文本相调谐，形成完整的作品一没有在1928年内完成，《三毛钱歌剧》要求全心投入，导致了拖延。

第一版印刷稿出现于1929年，题为《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三幕歌剧，布莱希特作词，库尔特·魏尔作曲》（*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 Oper in drei Akten. Text von Brecht. Musik von Kurt Weill*, 维也纳和莱比锡：1929）—原本书名页上创作者的名字只有魏尔，包括3幕21场。重要的是，这一版中的人物都是美国化的名字，因此也更好地表达了戏剧的伪美式氛围。这些人物，其中记

账员叫费蒂（Fatty）而不是威利（Willy）；乔（Joe），叫阿拉斯加沃尔夫乔（Alaskawolfjoe）而非约瑟芬·莱特纳（Joseph Lettner）；贪吃鬼叫杰克（Jack），而不是雅各布·施密特（Jakob Schmidt）；比尔（Bill）叫斯潘尼班克比尔（Sparbüchsenbill），而不是海因里希·摩尔克（Heinrich Merg）；还有保罗·阿克爾曼（Paul Ackermann），此时还叫吉米·马赫尼 [Jim (my) Mahoney]，名字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作为故事的主角，他的名字同城市的名字谐音，他个人的故事同时也代表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故事。在歌剧文本的第二版（维也纳和莱比锡：1929）中，魏尔和布莱希特把人物名称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变，这令人难以理解，因为故事中的美式气氛会因此丧失。这一版仍保持了歌剧的三幕分割，在结构上可以辨认出传统歌剧的模式。

《马哈哥尼》从头至尾都被谱曲，少数几个对话的过场戏除外，在第一版中供导演参考的说明里也有如此安排，但这些，除少数例外，也都有音乐伴奏。同《三毛钱歌剧》相比，《马哈哥尼》更贴近传统歌剧。在作曲技法上，魏尔除了利用《马哈哥尼歌唱剧》中的曲目，还添加了可以构成独立音乐作品的歌曲、宣叙调、哼唱（例如第9场）、由管弦乐伴奏的声乐、纯乐器声部、音乐引文以及舞曲、劳动号子和爵士乐的节奏。其他的技术手段还包括在音乐中和间歇中的旁白、独立的合唱、无伴奏独唱、放慢节奏的技巧以及传统歌剧元素的植入。这些技巧的共同点是放弃花哨的次要内容，剔除一切会对文本产生分散效果的部分，一切以使每一个字得到充分理解为目的。

《马哈哥尼》是一场关于幻灭的剧作。城市最初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对立面，事实上却被证实是一座虚假、无法生存的伊甸园，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会激发人类本性中的充满破坏欲的暴力。马哈哥尼城因而在飓风后被资本主义的商品法则送上了西天，歌剧以极端的方式彻底演绎了这一法则，方法是将社会现

实中只有部分可见或不可见的影响转化为残暴的直接体验。金钱使一切都成为商品，是非不分，更容不下同情与怜悯，它使人类堕落为物品——可以随意对待的物品。如此这般的社会毫无存活下去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马哈哥尼城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第一运行法则下人工的、艺术性的体验模型，虽不足以称为寓言，却仍毫不退让地从中得出教训，并展示了鲜明的图像。文本语言简练平实，剔除了所有的言外之意，很大程度上将情节局限在（残酷的）高潮段落，道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都作了淡出处理，作者采用这些目标明确的手法赋予这一模型必要的冲击力。这也是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案例，结构元素突出了需要被传达的内涵。



阿诺尔特·布隆内在回忆中把马哈哥尼这个名字同纳粹联系起来，即希特勒“愚蠢拙劣的国家形式”。1930年3月9日歌剧在莱比锡首演时，卡斯帕尔·内尔也采用了同样的关联。剧终时，舞台的天幕以程式化的方式展现了熊熊燃烧的城市上空的空袭联队，预示着战争将要到来。并非飓风，而是战争工业致命的机械消灭了资本主义的这种畸形产物，这个强盗社会中已经隐藏了法西斯骤变的种子，随时便会萌发。《马哈哥尼》第一部分聚餐会友的气氛风行，男人们酒肉朋友的友谊，他们之间肤浅的交谈虽然被宣称是“美”的，但事实上只为证实为自我服务，这些都指明了纳粹的准则，例如轻贱人命的凶残。由于马赫尼个人的故事也是整个城市的象征，所以《马哈哥尼》也可以被视为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及其致命后果的样板。

《马哈哥尼》中，除了音乐对舞台上还原剧情有重要作用，舞台设计也成为参与其中的第三类独立艺术，这是布莱希特第一部具有如此特色的戏剧，甚至在歌剧的文本初稿中就写道：当帷幕拉起，背景上是一号投影（卡斯帕尔·内尔）。就这一点而言，“舞台设计

（Bühnenbau）”的概念要比“舞台布景（Bühnenbild）”更为准确，因为它提出了就当时的舞台而言全新的维度，并长期支持这样的观点：舞台所展示的“世界”并非已完成的、预先为人们设定好的世界，而演员并非作为剧情中的人物被投放在这个世界里。事实恰好相反。人是空间中的标尺，不断变换的人物组合才是核心，它产生张力并通过自身在过程中的转变推动剧情前进。

舞台应该讲述过程与故事，那些能够改变自身、他人和世界的人是故事的承载者，舞台还应处于观众的批判性观察之下，观众在演出中应该时刻意识到，舞台上正在进行艺术品的制作过程，而台下接受者的再生产过程也同时进行，观众同时也是见证者，见证艺术品在多种不同类别艺术的互相配合下如何在他们眼前产生。这是戏剧相对于其他共同竞争的艺术形式，例如电影、电视、网络等，始终拥有的优势，而且必须加以充分利用。其结果意味着，能登上舞台的，只有那些真正参与演出的（而非装饰）；而所有参与演出的，必须都是艺术品。为了尽可能地保持参与演出的道具的个体性，制作它们的材料必须保证，即使它们以相同的形式被多倍使用（衣服、凳子等），仍要具有个体特征。内尔偏爱使用的木材、粗糙的麻布、厚纸板和皮革都是例证。内尔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或许是1949年大胆妈妈的有篷马车；这架马车如今在布考（Buckow）花园一处特别为之设立的小房子里，魏格尔的屋子也位于此。因为每次演出都为戏剧开启了一条新的通道，所以内尔的舞台设计使得剧院的道具库已变得多余。

此外，“内尔帷幕”还成为《马哈哥尼》演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在戏剧文本中规定：“要使用小型的白色帷幕代替通常的幕布，从舞台地面算起，帷幕不应高于两米半，穿于铁丝上可以左右拉动。”内尔1923年发明了这种帷幕，起先是为了他执导的《海尔布隆的凯蒂欣》（*Das Kästchen von Heilbronn*），之后用于《丛林之中》的舞台设计和《人就是人》的首演，在《马哈哥尼》中它成了文本的

组成部分。不过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版次中都被取消，因为给定舞台设计的戏剧文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内尔帷幕一毫不夸张地说一是20世纪的一场舞台革命。

内尔帷幕实现了何种效果？整个舞台空间保持开放；帷幕只遮挡了舞台装饰，或者是为了在关闭帷幕后可快速进行布景改动。由此，整个场景被分成两个部分，由于帷幕一般不会被拉到舞台前沿，所以也可以在帷幕前进行表演，而且它还可以被用来投影：将场次预告、题目、简要说明或者直接将关键词形式的台词投在上面。值得注意的还有它的原始性：简单的麻布和铁丝，仅此而已。这也证明，内尔和布莱希特不注重舞台的现代化和科技化，而更多地坚决使用与戏剧相适应的方法，以创造现代戏剧。

另一种二分分割体现在投影的使用上。由于内尔在此也避免使用现代技术，为了排除任何浅显的自然主义，唤起观众的想象力，绝大部分投影都是手绘作品，只包含一些勾勒出来的形象。此外还有留白，即空白的、没有绘画的区域，留给观众自行填满。布莱希特联想到了中国画，其特点是既不拘泥于既定的（画）框，也不将画布涂满，由此产生了一种开放度和广度，并激发观赏者用自己的想象力将其填满。投影一大多是背投影（从后台投射）一会占据整个舞台，其中舞台布景只是一个带有最高两米半（轻，并且可移动）帷幕的特殊区域，从而使舞台产生了分割。以这种方式，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可以同时映射在更大的舞台上，从而使舞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到了延伸和开放。《夜半鼓声》的第一幕，故事以巴里克的家为背景，是私人空间，内尔的投影展现了报馆区同时发生的革命事件，从而在（看似私人的）戏剧中嵌入了时事的政治—地理空间。

最晚从《马哈哥尼》开始，“叙事剧”成为三种各自独立的门类艺术的结合的产物—之后还添加了其他艺术（表演、舞蹈动作设

计、灯光），并且在剧本中落实到了文字层面。因此剧本不再可以仅仅被理解为戏剧文本，而是所有共同参与其中的艺术的重奏，它需要在主题和美学上尽可能详尽地阐释。因此，在歌剧首演之前，魏尔和布莱希特就规定：“卡斯帕尔·内尔的投影插图构成了演出材料的组成部分（它们因此应该同乐谱一起被送上舞台）。画家用自己的手法为戏剧过程进行了插图说明，它们为城市的故事提供了直观的形象，需要在各个场景之中或之间依次投射于屏幕上。”

再回到歌剧本身。“幻灭”是内容主旨所在，这在其选择的体裁“歌剧”上也得到了体现。作者们清楚地保留了“歌剧”的名称，但本剧其实并不符合这一称谓，而是自相矛盾地对其进行了公然的破坏，对传统歌剧进行了音乐上的拆解，分裂出各个可以辨识的部分，也揭露了传统歌剧不过是被使用过的素材。观众已经习惯于通常那些不用悉心享受的歌剧，因此要求看到的自然也是同类的作品，但相反，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这种习惯的自我破坏，以及对其升华了的讽刺和滑稽模仿。同样矛盾的是，《马哈哥尼》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叙事歌剧，同时也发展了新的歌剧风格：“因为本剧所选择的纪事形式只是‘状况的罗列’。……在演出中必须时刻注意，这里正在进行的是闭合的音乐形式（abgeschlossene musikalische Formen）。”魏尔这样表述道。布莱希特在其对歌剧的注解中，将魏尔的所指称作“各元素彻底的分离”，这为剧中的歌曲进入娱乐工业铺平了道路。

就观众的期待而言，还存在与现实的另一层联系：与消费的联系。歌剧曾经并一直被誉为听觉和视觉的盛宴，观众首先期待得到高雅的享受。这样的期待在“歌剧”这一主题中已经得到了非自然的、样板式的对应表达，似乎不需要戏剧文本为两者建立明确的联系。马哈哥尼是一座消费之城，直至覆灭都在不断消费。布莱希特曾写道：“就歌剧的内容而言——其内容即享受。快乐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对

象。既然研究已经是快乐的对象，快乐也应该至少是研究的对象。在当代历史中，它出现的形式是：商品。”首演在戏院引发了魏玛共和国时代最混乱的闹剧之一，这也证实，虽然戏剧不具自然主义特质，但观众仍然感受到了挑战和直接的呼吁。“在这些挑战中，我们看到现实的再现，《马哈哥尼》或许并不十分高雅，甚至它或许还（良心不安地）以此为荣——完完全全是享乐的。”为了在全国宣传这种享受，从1930年4月12日起，柏林广播时刻电台（Berliner Funkstunde）在每日最佳时段（20点）会放送一个小时的《马哈哥尼》选段，由提奥·马克本（Theo Mackeben）指挥，经柏林广播电台管弦乐团重新录制。

另外一点是音乐的技术化，魏尔1929年10月14日在给环球出版社的信中回顾此事时写道：“我的音乐……其工业化并非对音乐不利，而是对它有利，我们不能否认，这种风格形成了新的学派，而且如今半数以上不同流派的青年作曲家都以此为生。”决定这种音乐风格的首先是，它从娱乐音乐和艺术音乐中截取了大量曲调，改变了其用途，而且这种音乐风格从构思上就是为了适合媒体传播，确切地说是唱片和电台传播，自始至终都是为这些媒体设计的。由于广播对音乐的大众性传播以及对“传统音乐会结构的消解”，魏尔在寻找“更广阔的、更新的机会”，并通过简单的素材和朴素的表达方式确保了机会的实现。其“简单性”导致了“音乐性舞台作品的叙事立场，借此也有可能给我们一种纯音乐的、协奏曲形式的形象塑造，同时又不忽视舞台规则”。这种“以听众为导向”的趋势推动了“进军消费工业”，以这种方式，魏尔和布莱希特实现了集体对两人艺术的占有。

1930年6月2日，在柏林报纸《周一朝晨》上，莱比锡戏剧家瓦尔特·吉尔布里希特以《布莱希特新的剽窃事件》（*Neue Plagiatsaffäre um Brecht*）再次向布莱希特发起了剽窃的诘问。由于皮斯卡托尔曾考虑执导他的作品，吉尔布里希特1928年春曾把戏稿

呈送皮斯卡托尔处，因而吉尔布里希特猜测，布莱希特当时在皮斯卡托尔团队中，应该会对剧本内容有所获悉。对于这一猜测，菲利克斯·加斯巴拉6月16日在同一家报纸中予以了驳斥，因为布氏这一时期还不属于这一团体（而且业已证实，他也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个团体）。布莱希特对此的回应极为简洁：“吉尔布里希特是不会被剽窃的。”

您干脆关闭剧院

广播：适宜媒体的熟练行为

布莱希特不仅大量使用唱片、从内部操纵剧院，而且正如前文所说，还时常参加意见调查，例如“您对伦茨^[58]怎么看”，但根据其回答也无法明确判断他要表达的是对春天还是对诗人的意见。或者在面对采访时，布莱希特还会给出一些虚假信息，一再努力增加自己在广播中发言的机会。自1927年末开始，已经可以在广播电台里用对话来活跃媒体节目，因为枯燥的朗读稿件会令听众厌倦。由于审查制度，以及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不允许实时记录真实进行的对话，这一时期广播会谈的所有文稿，当然也包括布莱希特的，都只能被一也被布莱希特本人一很谨慎地视为艺术作品。

可以想象布莱希特如何应对广播媒体。1928年4月15日18~19点，最著名的谈话节目《戏剧的困境—作家、剧院经理和批评家的三方会谈》（*Die Not des Theaters. Ein Dreigespräch zwischen Dichter, Theaterleiter und Kritiker*），在全国范围内由克尼格斯武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电台，部分区域由法兰克福/卡塞尔和斯图加特电台播送。节目嘉宾有阿尔弗雷德·凯尔—布莱希特的批评者和反对者—法兰克福剧场经理理查德·魏谢尔特（Richard Weichert）以及布莱希特。有两份文稿保存下来，但这既不是真实对话的记录，也不是布莱希特为会谈准备的发言稿。（这样的发言稿当时很常见，借此电台可以在会谈开始前就对那些对他们来说棘手的段

落提出指责，并阻止参与者在会谈中表达类似观点。）第一份卷宗里，起先是速记（但没有保存下来），然后是布莱希特对第一次预会谈的记录，第二份卷宗是布莱希特的记录，记录了第二次预会谈中他与魏谢尔特的详细对话，以及三方共同参与的谈话。第一份卷宗可能是为了应对审查，第二份应该是布莱希特为会谈留下的个人存档，可能也以漫无边际的预会谈的速记记录为基础。这意味着两篇文稿并非布莱希特所作，不能被视为作品，因为包含了他人的许多手笔。

尽管如此，从这两部文稿还是可以推断布莱希特在真实会谈中的目的与行为。即使不是教唆观众，布莱希特也属于那种能够通过策略促使观众形成某种意见的人，这次他显然也打算进行这样的尝试。布氏本次的谈话策略是，他代表魏谢尔特两年前发表于1926年10月1日《文学世界》中的文章的观点。布氏同魏谢尔特自1923年相识，当时魏谢尔特的法兰克福剧场在上演《夜半鼓声》。论述应该如此进行：记录的附注清晰地标示了谁向谁说话，魏谢尔特和布莱希特相互交谈（“W对B说”，或反之），两人无视凯尔独自交流，或者对凯尔的言论漠不关心。布莱希特的记录以“预演”为题，其中只有在两人已经交替对话过两次后，才允许凯尔发言，而且两人间使用的是亲密的称谓（“亲爱的经理先生”，“亲爱的布莱希特”）。文中于凯尔在预会谈中发言的地方，只为这个多余的第三者标注了“凯尔博士”。布莱希特显然不关心发言内容，因此也没有记录。

凯尔发言后，布莱希特和魏谢尔特却仍然继续两人之间的交谈，完全不讨论凯尔的见解，这样的策略明显符合布莱希特的心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设定：魏谢尔特应该表现得好像刚从剧院过来（这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节目当天没有演出），并且又一次对观众勃然大怒。而且他还应该装作惧怕媒体，自称必须无奈地对其逢迎（“吻他们的漆皮皮鞋”云云）。这些斥责为布莱希特提供了突破口，他向魏谢尔特建议，终止对戏剧的改善，这是“布莱希特对当代戏剧的宣判”，

布氏进而阐述道：“如果戏剧陷入危机，那么我建议：您干脆关闭剧院。戏剧诚然举足轻重，在公众兴趣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它无法坚守这一位置。那么，您就放弃这一位置。您不要误解我：所有关于戏剧革新的建议都（必然）以观众数量减少为前提，这将，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导致剧院倒闭。但您不必惊慌，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可以在关闭剧院之后立即重新开幕。当然要推出新的剧目。”布莱希特再次采用了经济学家的论述方式，并且按照经济发展趋势提出建议，以人工手段将可以预计的低谷提前，从而为根本性的变革开辟空间。而变革在于应该向那些体育观众敞开剧院，并认真地为他们制造欢乐。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拳击台和竞技场氛围开始逐渐扩展（1927年的《马哈哥尼歌唱剧》、1929年的《教育剧》、1930年的《措施》）。魏谢尔特显然同布莱希特合作，方式是又把球踢还给布氏——至少布莱希特明显希望他这么做——这样凯尔就完全没有机会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意见。

《戏剧的困境》中预先规划好的谈话过程除了符合策略之外，还具有其美学范本：歌德《浮士德》中的《舞台序幕》（*Vorspiel auf dem Theater*）。但在布莱希特身上，发生的几乎是歌德笔下谈判内容的反面；相同的仅仅只有参与对话的三方组合（歌德戏剧中：剧团经理、剧团诗人和丑角）。两者的相异之处简要而言有：在歌德笔下（当然是虚构场景中），剧本还没有开始写作，诗人和经理对如何写作争执不下。但在布莱希特身上，剧作已经完成，虽然成果甚微，但经理和诗人意见统一：必须摒弃这样的戏剧。歌德在剧院中雄心勃勃的精神和祖传的位置，如今都让位于广播电台中布莱希特的现实口吻。如果在歌德的笔下，丑角还能在两种对立的利益间斡旋，布莱希特却只记录下了一个空格。最终歌德承诺观众们，要在“这狭窄的木棚”中照亮“宇宙的全境”，相反，布莱希特却要求“处决”这座“缪斯女神的圣殿”^[59]。这并非纳粹在媒体中高声嘶吼的“将公开

辩论错误地美学化”，而是令人记起，生活艺术同其他艺术相隔并不遥远，而且艺术也可以发生在现实的游戏之中。

但布莱希特本次的策略只能被视作失败，虽然三方会谈是轰动性事件，受到多方关注，甚至被评价为广播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这种形式是全新的，而且为广播设立了新的标杆，因为这样的节目足以娱乐观众，它虽然有各种准备和策略，但毕竟仍是对立观点的正面交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实况直播传送。这些已经足够令这次会谈成为传奇。但本次会谈显然并不十分活跃；有评论称：“明显没有准备充分，因此各方都含糊其词。而且最终评论家凯尔还打断讨论，独自说教，这并非本次会谈的内容。但无论怎样，还是出色的。”

各方立场策略不同，而且皆得到充分展现，这还涉及另一个重要方面：接受。那些大众交流媒介如今已经堕落为消遣机构，布莱希特解释，自己的目的在于使它们再次成为交流机构。布氏对此的思考被概括为“广播理论（Radiotheorie）”，但几乎没有提出相关的要求，只形成了偶然的、零散的记录。“广播教育剧”《林德伯格一家的飞行》（*Flug der Lindberghs*）^[60]尝试使听众成为戏剧的一部分，并能够积极参与共同塑造的剧中人物，这虽然颇有新意，但作为一种要在观众中得以贯彻的新的习作艺术，更多只是幻想。对此布莱希特也有所了解，他明确强调，这样的“职能改变”只在一种国家有可能，即当这样的尝试有益于个人的同时也有益于所有人：“如果脱离只有国家可以组织的实现方式，林德伯格的飞行既没有美学价值也没有革命价值。而恰恰只有当代国家没有兴趣采用它时，它才具有真正的革命性。”引文出自《尝试》第一期中《林德伯格一家的飞行》的注释，文章篇幅两页，在期刊的书名页上被标注为“广播理论”，针对的是1929年在巴登—巴登首演初稿的增订版。

如今一再被问及的问题是，通过电话、网页聊天或者虚拟平行世界的加入，布莱希特设想的听众主动参与节目流程，今天是否已经得以实现。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并非真正的自由交流，不存在同真实人物的联系（或者只有人们脱离媒体的某些特例），而且结果（几乎）皆索然无味。

该剧原本题目仅是《林德伯格》（*Lindbergh*），布莱希特明确称之为“英雄赞歌（Heldenlied）”。这是一次技术上的实验，以此一与现实中的物化相反—实现机器世界的（当然还有与之对立的自然力量的）人格化。机器与自然在其中开口说话，例如布莱希特笔下，纽约城向船只询问林德伯格的情况，然后“苏格兰女皇号”诚实回答；或者雾和暴风雪也加入对话要威吓主人公，因为他们千年来从未见过也不愿相信有人能突然在空中飞行。布莱希特没有采用通常的自然主义声效，而是使用了人类的嗓音作为替代，以便赋予机器或者自然现象以生命，不仅使其不再保留在社会现实中的无名原状，而且暗示了它们有被操控的可能性。

令自然力或者机器开口说话其实是古典主义时期已有的创意。例如歌德在他的《植物变形记》（*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中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只有当人类观察它们潜在的变化，并把观察到的相互联系起来时，自然才会向人类开口；只有当人类臣服于自然之时，他才能统治自然，这正如已经详细阐述过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核心思想。这也意味着，只有当人类提出正确的问题时，自然才会给予相应的回答，而这些问题人类只能从自然中提取，而不能靠自己绞尽脑汁得出。

两年之前的1927年5月，布莱希特和魏尔为埃森市（Essen）构思了歌剧歌舞剧《鲁尔史诗》（*Ruhrepos*），导演、演员卡尔·考贺（Carl Koch）提供了电影和照片创作作为舞台背景。计划已经成熟，

可以签订合同，但右翼极端分子散布传单，要求采取反对鲁尔区“犹太化”的措施，之后，计划由于地区议会的异议而遭取消。在埃森的剧院被犹太人占领之后，据纳粹反人类的论述，不允许再有“两个犹太人……现在将‘伟大的艺术’从柏林带到埃森”。布莱希特被视作“颓废、无价值、变态剧作（《夜半鼓声》、《巴尔》及《人就是人》）的著者，虽然有各种有利于犹太人的宣传，但这些作品没有流传出柏林”；而魏尔则只是“一名拘谨的轻歌剧制作者”。

魏尔和布莱希特早已计划让鲁尔区的机器园区开口说话，而且采用极为幽默的方式，例如起重机“卡尔”获得了这样的建议：“不要像个资本家一样整天抽烟/祈祷，工作！/前挪4米！/再后移4米回来！/立正/把抓手放在你前面的钢轨上！/真听话，小卡尔……/卡尔，来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笑脸！”由于《鲁尔史诗》全部由魏尔谱曲，它更为确切地说其实是《机器之歌》（*Song der Maschine*）的歌词，歌声唤醒机器真正开始了生命。其中“工作（*arbeite*）”[被改为“*arbete*”，进而同“祈祷（*bete*）”押韵]再次展示了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理解。这一时期他还令斯太尔车欢唱，让发动机咆哮，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了寻找艺术化的手段，使机器开口说话并得到理解，使其具备人造物品的特征，又同时受到工人们的支配。如果这些美学尝试登上舞台，将是革命性的。这些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无法从其销售功能中解放出来，关于机器的辩论也总是脱离真实，相比之下，布莱希特的美学尝试更有效。

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

音乐剧：三毛钱主菜

1928年，演员恩斯特·约瑟夫·奥夫里希特（Ernst Josef Aufricht）在父亲的帮助下租下了船坞旁的剧院，并想在自己的生日（8月31日）那天开幕。为此他需要一出合适的戏剧。当奥夫里希特回

忆往事时，好似他自己主动聘请的布莱希特，但其实是布莱希特执意要加入，并且说服新的剧院经理接受自己当时还没有创作完成的剧本。1927年，布莱希特委托伊丽莎白·霍普特曼翻译约翰·盖伊（John Gay）的《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布氏能言善辩，向奥夫里希特讲述了故事情节，引起了奥夫里希特的兴趣。布氏虽然以《乌合之众》（*Gesinde*）为题开始了改编，但这份对奥夫里希特有决定性意义的文本同日后的歌剧版本只有少部分相同，绝大部分是霍普特曼翻译的再现。

布莱希特无论如何要继续同魏尔因《马哈哥尼》而开始的合作，因此，尽管魏尔在巴登—巴登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圈子都不知名，布莱希特还是坚持由这位以无调性音乐踏入乐坛的布索尼弟子来担任作曲。1928年4月，两人同环球出版社（维也纳）为正在创作的作品签订了合同，关于版税分成，合同规定：布莱希特占62.5%，魏尔占25%，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占12.5%。由于时间紧迫，8月初就要开始排练，布莱希特和魏尔5~10月偷溜到滨海的圣西尔（Saint-Cyr-sur-Mer），像创作《马哈哥尼》歌剧时一样，共同写作音乐和文本。6月14日，魏尔致信环球出版社：“目前我以极大的压力在为《乞丐的歌剧》作曲，这给我带来了快乐。由于将会由话剧演员表演，所以歌剧用朗朗上口的曲调写成。我期望6月底能完工，然后《马哈哥尼》也能一气呵成。”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并没有同往，但或许魏尔的妻子洛特·莱妮亚（Lotte Lenja）一同前去，她虽然根本没有名气，但还是为两位创作者担任了珍妮（Jenny）的角色。其他演员包括一些明星，例如哈拉尔德·保尔森 [Harald Paulsen, 饰演麦克西斯（Macheath）]，他由于参演了一些默片并在德意志剧院扮演讽刺模仿角色，成了实至名归的花花公子；还有罗莎·瓦勒蒂 [Rosa Valetti, 饰演皮丘姆夫人（Frau Peachum）]，奥夫里希特如此刻画她的性格，“柏林卡巴莱剧的奇女子，满脸皱纹，音色庸俗，是个口无遮拦之人”；奥夫里希特还聘用了凯特·屈尔 [Kate Kühl, 饰演露

茜（Lucy）]，她是“嗓音深沉具有穿透力的”新型香颂女歌手，曾在自傲咖啡馆^[61]因略带情色特点的表演让罗莎·瓦勒蒂大为赏识。奥夫里希特曾讲述，两位作家从法国南部回来后对演员阵营表示深为触动。

布莱希特和魏尔从法国带回来的并非最终版，但它已经同盖伊的原型（因此也同霍普特曼的翻译稿）有了可观的区别。1928年6月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出版社（Verlag Felix Broch Erben）胶版印刷了舞台手稿，这显然也是排练采用的版本。这一版仍以《无赖歌剧》（*Die Luder-Oper*）为名，并且详细列出了整个参与创作的团队：封面上布莱希特写了原本的题目《乞丐的歌剧》，以及原作者约翰·盖伊 [错误地写成了格雷伊（Gray）] 为独立著者，第二页注明译者是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布莱希特署名“德语改编”，作曲是魏尔。歌剧脚本首次出版时仍然保持了这一体例，直到1931年《尝试》中的版本才将布莱希特列为著者，还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将《无赖歌剧》视为原版的改编，但在初版中已经不再如此。初版题目为《三毛钱歌剧/（乞丐的歌剧）/参照约翰·盖伊英文版的音乐剧，含序幕及8场》 [*Die Dreigroschenoper/ (The Beggar's Opera) / Ein Stück mit Musik in einem Vorspiel und 8 Bildern nach dem/ Englischen des John Gay*]；但此处布莱希特仍被列为改编者，伊丽莎白·霍普特曼是译者。

布莱希特与盖伊的版本之间差异十分显著。例如，同以后的版本相比，结束场更贴近原版，1928年该剧在环球出版社第一次印刷时，虽然“抢银行和开设银行怎么能比……”等知名的语句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一场已包含了一些极新颖的片段，不能再算作原版的翻译。盖伊笔下，除了波莉（Polly）和露茜以外，还有其他四位新娘在争夺麦基（Mac，麦克西斯），剧中有一名乞丐以戏剧作者和舞台领导者的身份构建剧情框架，扮演麦基的演员要求这名乞丐不要绞死他，因为

“歌剧必须有喜剧结局”。乞丐起初还有所反抗，但最后还是屈从了观众的品味，理由是，戏剧如何结束并无所谓，因为正派的人在习俗上同黑帮并没有不同，而且悲剧中的道德并不适宜此处，因为没有人会信守这样的道德。麦基服从了自己的命运，他现在必须结婚，而且是结束曲中诉苦，无法应付向他蜂拥而来的女人们。

舞台上的结局引发了讨论，但作者本人没有登场，他从帷幕后发言，因必须修改结局而受到了侮辱，引用无人关心且在舞台上也无处可寻的“真实”为证，然后愤愤离去。盖伊的版本里布朗（Brown）最终没有出现，但此处是布朗宣布了女王的决定。皮条客、妓女和乞丐一并非随意选择一两两一组开始合唱，不需要对不公不义之事严格执法，因为赤贫者总是要接受最糟糕的结局。

排练时还必须进行一些重大改动，总彩排表明，戏剧过长，必须缩短30分钟。有一些歌曲也被删除：《萨罗蒙之歌》（*Salomon-Song*）过长，《性沉迷谣曲》（*Ballade von der sexuellen Hörigkeit*）太猥琐，吉卜林组曲在此处不合适，而且凯特·屈尔无法胜任露茜的咏叹调，以至于整场必须删除。然后海伦娜·魏格尔抱恙，因此十分引人入胜的另一场也被取消：麦克西斯在妓院里同柯斯达太太 [Frau Coaxter，而科克斯先生（Herr Coax）是改编成《三毛钱小说》时新添加的人物] 为买妓女的内衣而讨价还价。另外卡罗拉·内尔（Carola Neher）无法出演预计的波莉一角，因为她的丈夫，作家克拉邦德病危。爱打扮的哈拉尔德·保尔森在自己的演出服上添加了丑陋的蓝色蝴蝶结，因而激怒了大家，最终布莱希特让步，给保尔森增配了一首出场曲，曲子能表现他的卑鄙行径，使保尔森饰演的麦基在蝴蝶结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尖刀麦基谣》（*Moritat von Mackie Messer*）布莱希特一夜间写成，未进行一字一句的改动；而音乐也出自布莱希特之手（而非魏

尔)的猜测也绝非臆想。同时代的影评家洛特·艾斯纳(Lotte Eisner)回忆:“布莱希特和魏尔在创作《三毛钱歌剧》时,我时常突然到访,布莱希特会用一种不连贯的、刺耳的方式吹奏或者在钢琴上演奏一些音符,着重强调节拍,如此一来魏尔除了为其转调别无他事可做。”布莱希特和魏尔的工作方式最终导致无法清晰地断定哪些部分是出自谁的手笔,对此,导演路德维希·贝格尔(Ludwig Berger)也提供了另一证明。贝格尔1931年11月因《一报还一报》(*Maß für Maß*)的演出同布莱希特合作,他曾写道:“能观赏这些是一种愉悦,如此全神贯注同时又如此放松,如此严肃同时又如此快乐,如此富有音乐性同时又如此庄重,如此具有批判性,如此具有创造性,同时,思想在工作中又如此活跃。……除了他的才华之外,令我欣喜的还有布莱希特对节奏毫无偏差的感知,这在他口授时表现得更明显。”

虽然布莱希特是理性主义的,很少或者完全不相信幸运,但他在起伏跌宕的一生中仍期望能得到幸运的眷顾,因为若非如此便无法渡过难关:“幸运即援助。”事实上《三毛钱歌剧》确实十分幸运。一些场景和歌曲遭取消,排练中的矛盾,完全失败的总彩排,这些事件使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这还不包括最终采用的题目是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在最后一刻提议的。虽然首演在提心吊胆中开始,布莱希特还防备性地给他的演员配备了能发出颤音的哨子,但观众的欢腾从《大炮之歌》(*Kanonensong*)已经开始,至终场而不息。由于观众的一再要求,一些歌曲还必须重复表演。

这是奥夫里希特的说法。莱妮亚则形容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夜晚,成功仅仅源自后期媒体异口同声的追捧。但事实同她的描述相反,有一些评论家对作品完全不赞同。作家、评论家菲利克斯·霍兰德(Felix Hollaender)认为,布莱希特扼杀了“令人欣喜的”盖伊,就像他曾经对马洛的《爱德华》做过的一样,虽然抓住了“时代的韵

律”，“但他缺少强有力的呼吸和内在的节律”。《世界舞台》记者哈里·卡恩（Harry Kahn）的评价更尖锐：整部作品无非是“用优美手段包装的劣等文娱演出”，缩短一半都依然过长。多数评论倾向于不将《三毛钱歌剧》视作对歌剧的讽刺模仿或者对市民阶层的讽刺，而更多强调其与歌舞剧的类似：“沾满血渍的低俗罗曼史、感情夸张的思绪”，这些都是庸俗，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人察觉到社会批判。面对这样的事态——确实有一些给出正面评价的评论家，但完全没有形成声势——不禁令人惊愕，《三毛钱歌剧》取得了如此出众的成就。

无论如何，哨子没有必要，因为这次首演引发了席卷整个柏林的成就。那个时代也同样如此，民怨沸腾，要清算那些社会中营私舞弊的不公现象，观众可以用玩世不恭的消遣和惬意接受这个现实。缺点是，演出的成功使控诉社会疾苦的元素彻底遭到忽视。像柏林的地下世界一样，强盗们受到英雄般的礼赞，而且歌剧还抓住了强盗同腐朽的市民世界的相似性：他们是你我一样的人，但带有邪恶的印记。这些都是可以模仿的。

首演之后，剧中的歌剧便迅速被灌录为唱片用以大众化传播，并且在柏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三毛钱歌剧热”。三毛钱酒吧和花柳之地重新开业；女人们身着妓女一样的打扮，男人们则装扮为嫖客或者黑帮，演绎风流社会。十分明显，这次成功是源于音乐和文本的顺畅结合。作曲家奈德·罗瑞姆（Ned Rorem）曾对此写道：“他的（魏尔的）乐曲像露水一样滋润了布莱希特干瘪的文字……自《唐璜》以来，第一次用令人振奋的音乐刻画了可骇的内容。”音乐杂志《开端》（*Anbruch*）完全致力于新音乐，1929年，恩斯特·布洛赫首次在杂志里以他夸张的风格热情洋溢地开口评论魏尔和布莱希特：“终于突破了那些关于女仆和明信片天空的感伤歌曲，形成了新的民族传说”，音乐完美融合了爵士、香颂、丧礼进行曲等众多元素，“似乎

让酒吧和大教堂之间都没有了差别。朵朵小花从最慵懒的轻歌剧魔法中，从1900年的欲望香颂中，从美国爵士工厂的壮丽中生长出来，动手模仿、示范”。总体上，布洛赫从剧中的“啤酒恶作剧”解释本剧的成功，如果《海盗珍妮之歌》“可以被任意赋予兆示世界末日的含义”，《三毛钱歌剧》就是具有革命的特性。

布莱希特如何评价自己的成功？可以从他给埃尔文·皮斯卡托尔的信中得到展现，当时布莱希特再次回到奥格斯堡，这次回归被推后到了秋季，因为之前他在柏林忙于歌剧的相关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在歌剧成功后一个月（9月底或10月初），面对汨汨涌入的版税，布莱希特写道，《三毛钱歌剧》的成功虽然遂人心愿——但他仍自嘲地补充说——“却仍无法满足观众，这一点同普遍观点相左——当然我不会因此而失望。”布氏继续道：“30岁的人（他自己的年龄）扼杀了革命，也许40岁的人会再次接受它？那些在知识分子中开始的情绪，停止沮丧吧！实际上：失望完全是被枪决的充足理由。那些现实中的革命主义者并没有超越格拉古兄弟（Gracchus，罗马平民派领袖）^[62]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要开始数年的等待了！”但布莱希特没有就此气馁。这封信展示了他的心境，而且这份心境并不是美好的。

在柏林，《三毛钱歌剧》在座无虚席的剧院里演出了数月之久，之后又很快在慕尼黑、莱比锡、布拉格和里加（Riga）的舞台中上演。到1930年为止，共在120多所剧院进行了4000多场演出，并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票房当然也收入颇丰。环球出版社的舞台部主管汉斯·海因斯海默（Hans Heinsheimer）回忆：“当支票慢腾腾地到来，小数点和小数还能写在正确的位置，会计大口抽着他们的香烟，必须在账簿中特意再扩充新的列，才能登记那些千位数和万位数，这里的空间通常只够少得可怜的十位数或者零点几几的数字。”

魏尔和布莱希特还有其他成功的合作，为了扩大听众群体，他们目标明确地为电台广播创作了《柏林弥撒》（*Berliner Requiem*）。魏尔利用了布莱希特现有的诗歌，诗同音乐一起“表达了大城市居民对死亡这一主题的感受”。1928年11~12月，作曲家和词作者遴选诗歌，并且确定顺序，其中《醉女谣曲》（*Ballade vom ertrunkenen Mädchen*）的初稿是献给罗莎·卢森堡的[题目中的“ertrunkenen”还有版本异文作“erschlagenen”（杀死的）]；《伟大的感恩赞歌》（*Großer Dankchoral*）在开始和结尾处分别出现。这一纪念一战结束十周年的反战作品在1929年5月22日由路德维希·罗滕堡（Ludwig Rottenberg）指挥，由西南电台（Südwestfunk）首次播送。之后，法兰克福电台再次播送了《柏林弥撒》，赞扬弥撒曲同大多数广播中的音乐节目相比，尤为适宜电台播放：“电台广播及其全新的影响为新的思想意识提供了前提，而魏尔和布莱希特恰恰从这样的艺术思想出发，因此，所有音乐和诗学上的独立问题都回避这一事实，即除了广播剧之外，新的内容显然在魏尔和布莱希特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形式——语言与音乐的统一。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容易陷入孤立的危险中——被感伤引诱，但现在，这样的危险因共同经历而被断然瓦解，而且从未如此坚决。”因此，布莱希特和魏尔至少可以在交流与媒介的事宜上记上自己的功劳。但效果并不显著；因为时代开始转变，这是怎样的变化？

他为什么吃饭？

音乐教育剧：游戏中的学习

许多历史事件都可以被视作布莱希特更加积极地参加共产主义反抗的原因。第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1929年5月1日。5月1日前，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了德国政治局势的事件。1928年9月28日，普鲁士内务部长阿尔伯特·格策辛斯基（Albert Grzesinski，社民党）取消了针

对希特勒实施的禁止公开政治演说的禁令。希特勒立即作出反应，同年11月16日在柏林体育馆组织了政治性活动，迅速导致了公开的暴力行为和第一批死亡事件。1928年12月13日，柏林警察局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措基伯尔（Karl Friedrich Zörgiebel，同样是社民党）因此实施了对公开政治集会的禁令，1929年5月21日格策辛斯基将这次禁令扩展到整个普鲁士。这一法令在1929年5月1日时仍具有效力。

德国共产党坚持自己传统的五月集会，同时还想借此展示，能被共产党号召到街头的人多于社民党和工会的总和，但实际上事与愿违，这说明共产主义者们高估了自己。措基伯尔不仅坚持集会禁令，而且预防性地调集了13000名警察以阻止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虽然只有几队由50名或最多500名德国共产党集会者组成的队伍向柏林总部行进，警察立即开始驱散卡尔·李卜克内西家前的人群，并在棍棒殴打之外，向集会者射击。至少（数字不统一）33名参与者中枪身亡，约200名受重伤。

布莱希特成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因为他当天在社会学家弗里茨·施坦贝格家做客，施坦贝格的住所极为靠近德国共产党总部，以至于布莱希特透过开着的窗户直接目击了事件的全过程。施坦贝格日后写道：“当布莱希特听到枪声，看到人们中枪倒下，他的脸色是我一生未见过的惨白。我认为，尤其是本次事件愈来愈强烈地把布莱希特推向共产主义者一方。”

但对布莱希特而言，不仅是警察的血腥行为本身，社民党人一如曾镇压斯巴达克团起义一样——更应对本次血腥屠杀负责。他们从未对此表示悔过。恰恰相反。事件之后，在充斥着混乱的国会中，社民党还以警察紧急自卫（警察中无人伤亡）为理由袒护自己的行径。而且措基伯尔还不满足于这种捏造的、政治上完全不充分的解释，宣布了“交通以及灯光禁令”，这意味着外出戒严、门窗遮挡、公共区域

禁止灯光照明并且让装甲车仔细搜寻各个街道，无视私人住宅不受侵犯的条款搜查房屋。还导致了众多人物被捕，其中大多数无法被证实有罪。德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被禁止出版长达7周。

“血色五月”被记入了德国历史，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其单方面的暴力血腥，还有社民党在1929年上半年以暴力开展的同共产党的斗争，均给纳粹提供了活动空间，这对社民党自身而言同样是灾难性的，因为纳粹从五月事件中最终获益。一方面，纳粹党同市民阶层中的右翼分子共同策动了反对杨格计划（Young-Plan，德国战争赔款的新规定）的运动，从而可谓“登上了大雅之堂”，另一方面纳粹冲锋队开始实施街头恐怖，并从1930年起开始壮大，以致最晚自此之后，整个魏玛共和国里再无安定的市民社会一说。

加之1929年10月美国爆发股市崩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极短时间内导致了德国失业率激增。1930年3月，社民党和资产阶级，还有德国人民党（DVP，民族自由主义政党，后期民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的大联合政府（穆勒第二内阁）^[63]瓦解，这被历史编纂学普遍认为是魏玛共和国末期的开端。可以说，最晚至1929年，德国开始了反抗正在兴起的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法西斯明显公然散布反对共和的恐怖政治。

如若要阻止纳粹上台和暴力破坏共和，必须最晚于1929年表明立场。1929年的政党格局清晰表明，只有共产党可以真正成为纳粹的反对者，相反，社民党已经不可能发挥联盟伙伴的作用。如果布莱希特想成为当代社会弊端的调解人，他必须尝试以新的美学手段予以回应。5月20日布氏遭遇那场著名的交通事故，必须休养，结识了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回到阿默尔湖畔的下雄多夫（Unterschondorf），继续《林德伯格》、《教育剧》和《幸福的结

局》的工作，还有《法策尔》（*Fatzer*），布莱希特自1926年夏便开始写作，但仍未完成。

《幸福的结局》是一场艺术上的失利。寄希望于再续《三毛钱歌剧》的辉煌，可以说布氏是委托伊丽莎白·霍普特曼撰写续篇。《幸福的结局》上霍普特曼签署了假名多萝西·雷恩（Dorothy Lane），因而至今也被错误地归为布莱希特的作品，1929年6月，布氏给她建议：“故事主要情节大概如此。环境：救世军^[64]和罪犯的地下酒馆/内容：善与恶的斗争/噱头：善战胜恶。”霍普特曼据此撰写了戏剧，构思为对《三毛钱歌剧》的夸张模仿和嘲弄，情节疯狂、荒诞，对观众的接受力提出了挑战，因为《三毛钱歌剧》实际上已经是对观众的苛求，那些有争议的段落有幸没有影响它受到欢迎，西奥多·W.阿多诺将其誉为伟大艺术作品的最重要特点，但《幸福的结局》却过犹不及，即使其中有一些出色的歌曲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这包括布莱希特和魏尔贡献的《毕尔巴鄂之歌》（*Bilbao-Song*）、《碧海之歌》（*Das Meer ist blau-Song*）以及原本为福伊希特万格的《加尔各答，5月4日》所作的《苏腊巴亚—约翰尼》（*Surabaya-Johnny*）。《幸福的结局》1929年9月2日首演，几乎是传奇的《三毛钱歌剧》上演整一年后，使布莱希特征服市民习俗的努力受到了一次严酷的打击，无疑导致了他的政治化，从1930年开始，布氏积极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但还有些细微差别。

1929年7月，德国室内音乐节在巴登—巴登举行，《林德伯格飞行》和《教育剧》都是布莱希特为此而作。《教育剧》，而且首先是本剧的题目《巴登的赞同教育剧》（*Das Badener Lehrstück vom Einverständnis*），都同《林德伯格一家的飞行》的结局联系紧密，并且在开篇引用了《林》剧的结尾，但故事的内容却是关于“坠落的飞机驾驶员”。法国空军飞行员查理斯·农格塞尔（Charles Nungesser）1927年5月8日首次尝试飞跃大西洋，但从此下落不明，布

莱希特采用这一事件为素材，由保罗·亨德密特担任作曲。两人1927年时因巴登—巴登举办的第一次室内音乐节相识，布莱希特和亨德密特由于共同的兴趣时常相聚，致力于给公共的以及私人的音乐生活带来新的生命力：音乐以及演奏音乐被作为促进联系的工具。与之相应，1929年的巴登—巴登室内音乐节也以座右铭“比听音乐更美好的是做音乐”为主题。同“广播理论”类似，这一座右铭也要求转变一般意义上音乐会观众的职能，鼓励他们共同参与，从而消解音乐会指挥台的孤立地位。“实用音乐（Gebrauchsmusik）”是这里的关键词。

几乎不能相信，“教育剧”也是布莱希特的新造词，布氏1929年不仅将其作为概念或者剧名使用，而且是他为新的戏剧类型所创造的名称，即一种音乐剧，以魏玛共和国时期新音乐的“实用艺术运动（Gebrauchskunstbewegung）”为背景发展而来。以布莱希特的理解，先锋派作曲家亨德密特也可能赞同这种认识，戏剧不应该宣布某一“学说”，而是首先要使那些积极参与角色表演的人谙熟不同的行为方式，这才是教育剧的教育意义。

布莱希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行为主义学说在系统化的运用中，使人类形成了迄今没有意识到的需求，而它的策略是内化消费的需求。政治层面的运作也类似：政策及其政治承诺像宣传商品一样，宣传自己提名的领袖，人民无论如何也必须拥有，而且人民并没有察觉到，正如布莱希特日后在《牛犊进行曲》（*Kälbermarsch*）中所表达的，这是牛犊自己选择了屠夫，情愿被送于刀俎之上，对内化毫无反思，反而日日公开庆贺。戏剧揭露了社会中的这一现象，由此使其得以被认识与控制，这是教育剧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布莱希特坚信，角色扮演以前所未知的方式影响着日常生活，正如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以戏剧为比喻，使用了“扮演角色”“表演空间”“角色冲突”“性格面具”“人物”等概念。利用戏剧角色可以使人们意识到并看透社

会角色，反之，从社会角色扮演中也可以赢得戏剧模式 [英语：patterns，参见布莱希特关于《街头场景》（*Straßenszene*）的文章]。

由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如今“教育”的概念已经没落，会使人立刻想到教导或者较贬义的教条或灌输。曾经在某些时期（参见《伽利略传》），实现对知识的需求以及领悟时的欢乐感觉，都被颂扬为世界的和真实的体验。“教育”如今仍有公布学说、宣布信仰之意，因此，教育剧被等同于对（意识形态上的）信息的介绍，其中几乎或者完全排除了所有美学享受和获得领悟的愉悦。但日臻完善的教育剧，特别是音乐与文本的统一体，却以其反面为目标，而且亨德密特也没有参加过宣扬共产主义学说的活动。

起初《林德伯格飞行》（*Lindberghflug*）颂扬了技术先驱的胜利，而日后广播教育剧版本的《林德伯格一家的飞行》（*Flug der Lindberghs*）则对林德伯格的成功重新作出了解释，即这是同那些建造飞机的人的共同成就。飞行也可能失败，正如农格塞尔事件所证实的，如果飞行员被科技进步的迷醉冲昏了头脑，盲目依靠科技，而忘记了“起程的目的”，也就是忘记了如果进步要具有社会意义，它必须是所有人 [大众，在剧中被称为“人群（die Menge）”] 的进步。

教育剧共进行了三项探讨。第一项表明科技进步只会导致人类受制于科技，而并非通过科技得到解放。第二项表现了在我们的时代，人如何被其他人屠杀。第三项展现了一个小丑节目，其中大小丑施密特先生（Herr Schmitt）可谓“十分强大”，有两名小小丑声称愿意在他悲痛时帮助他，但施密特先生却被剖开和肢解。第三项是最极端的，在巴登—巴登首演时也遭遇了观众气愤甚至略带攻击性的回应。布莱希特的执导加重了效果，施密特先生脚踩高跷，手臂加长，头顶

纸坯制的巨型头颅和大耳朵，被“逼真的锯和逼真的声响”一块块除去四肢，之后血染的断肢出现在大家面前。目击者称，现场爆发了震耳欲聋的噪音，观众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了大厅。提奥·林根（Theo Lingen），施密特先生的扮演者还记得当时的骚乱，这是他一生从未在剧院内遭遇过的。据汉斯·艾斯勒称，一位著名的音乐评论家甚至昏厥过去。

对布莱希特和亨德密特而言，重要的是展现发达的、愈来愈科技化的资本主义如何消除了人的个体性，它将人分割、物化。施密特先生是放大的典型的市民阶层个体，认为所有一切都应该以他为中心。他被分割为各个部分也完全对应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斗争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sein*）中所描述的“主体的分割”，实际上小丑一和小丑二无比卑躬屈膝地帮助施密特先生；他们研究了她的每一处痛苦，只是最终的结果彻底荒诞。施密特先生不再存在，但他几乎仍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甚至那些被锯下来的四肢也被两个小丑放在了他的怀里。戏剧展现的是（巨大的）市民个体的拆解，但他甚至没有察觉到拆解的发生，固执地将这一过程视为“帮助”。个体虽然最终不再存在，但仍继续坚持其个体性。

观众中那些中产阶级的疗养客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受到了挑战，认为出席音乐节观看的竟是自己被分解的过程，因而无法忍受这般血腥的戏剧表现。这是因为，当社会异化的过程愈发趋向极端，革命失败后，犯罪行为会再次公然走上街头（自1927年3月以来），该剧直接面向了魏玛共和国的市民阶层（以及不愿对此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和共和国行将就木的结局。

布莱希特1929年秋再次开始了《法策尔》^[65]的写作，戏剧仍然以个体的覆灭为主题。海纳·穆勒曾宣告这是一部“世纪文本”，手稿篇幅近600页，由瓦砾堆般相互联系甚微的文本片段组成。1929年秋

布氏进入了第四个创作阶段。布莱希特引入了“思想者”的角色，之后将其命名为“科尔纳先生（Herr Keuner）”。科尔纳应该一不知以何种形式一承担剧中所有的评论。很快这个人物就独立出来，第一批《科尔纳先生的故事》（*Geschichten vom Herrn Keuner*）诞生了。“科尔纳”有双重含义，根据奥格斯堡的口音，他的名字应该是凯因纳（Keiner）^[66]，这说明他涉及的并非一不公道地说—一个“血肉之躯”的人物，而是一传统上会写—一种“人物类型（Typus）”。科尔纳代表了辩证的、对话性的中间机构，他质疑既定的状况，挖掘其中的矛盾，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又不时否定答案。同时科尔纳又同希腊语的“coiné”同音，“coiné”表示通用的，观点相同的，但自然不是在意识形态意义上，而是基于自愿的协定。

《科尔纳先生的故事》系列最早的几部中有《目的的奴仆》（*Der Zweckdiener*），以布莱希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刻意引入“唯物主义”主题。本篇《科尔纳先生的故事》是一个讽刺故事，就其自身理解而言，这是布莱希特典型的处理方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将现实颠倒过来：

每天早上我的邻居都打开留声机放音乐。

他为什么放音乐？我听说他要做体操。他为什么做体操？

因为他需要力量，我听说。他要力量来干吗？

因为他必须战胜这个城市里的对手，他说。

为什么他必须要战胜对手？因为他要吃饭，我听说。

当科尔纳先生听说，邻居放音乐是为了做体操，做体操是为了变强壮，变强壮是为了打败对手，打败对手是为了吃饭之后，他问道：为什么他要吃饭？

关于邻居为什么进行各种不同活动的问题，科尔纳先生看似都能对其目的给予理性回答，以至于没有事物是无目的的，或者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最终的问题看似也处于理性一问一答的逻辑中，却使前面所有的都颠三倒四；因为吃饭没有目的可言，它属于人类存在的必要生物前提。因此，（协调的）逻辑和（清楚的）理性相互颠倒。邻居付出努力，只是为了保证自己—原本这是不言而喻的必然事物—（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他的敌人—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拒绝承认这一必然性。还可以反过来论述：问答之间严密的逻辑最终导致了荒诞的理性后果，如果不想使自己降为目的的奴仆，如果想保持个人的自由，那么要将吃饭作为不必要的事物革除。并非所有事都必须要做。

木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的马克思主义^[67].

历史科学：对已知无法认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17年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总结了人类的三大心殇。其一是“宇宙学的”。哥白尼将人类驱逐出了宇宙的中心，用尼采的话来说，进入到了X，进入到未定和不可定之中，人类丧失了自己的神性和被选中的身份，进而也因此失去了至少能分享“绝对真理”的权力。第二是“生物学的”。就这一点而言更加痛楚，人类曾经认为自己是动物的主人，当它们与动物之间的界限消失，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人类只不过属于“气味完全特别”的动物。弗洛伊德自己还添加了第三个（更卑劣的）心殇“心理学的”。人类也不再是自己灵魂的主宰，在“自己的庭院”中也不再权力显赫，因为无意识的欲望统治着这里，也统治着他们。

弗洛伊德还忘记了另一殇，在历史上早于他出现，可以被算作第四个，即“社会性的”，由卡尔·马克思发现。此一殇的基本原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3年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Das Begräbnis*

von Karl Marx) 中如此表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但这些生活必需品无法完全依靠个人获得，因此每一个人为了生存，都必须参与到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并承认这是他基本生存的前提。

达尔文仅指出了人类的生物属性，而马克思则发现，这些生物属性早已附有社会性特征，这意味着，每一个个人，传统上都被称为个体，被定义为无法分割的部分，都隶属于社会现实，是社会现实使个人的生物性存在成为可能。因此也同人类个体性的问题有了根本性联系，对此，马克思如此回答：“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或许是一这是他长久不衰的贡献—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人类活动其中的世界不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一个人类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人类而言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因而看似是自然的。

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城市的设立和扩建、将自然改造为文化的垦殖区，人类已经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最晚在18世纪这个世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消灭了绝大部分自然本源的痕迹。可以参见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的《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1719)，书中的同名主人公流落于孤岛，在三十年里将那个荒芜的岛屿转变为人类的文化园区，将食人族 (星期五) 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或者在歌德的《亲和力》 (*Wahlverwandtschaften*) 中，自然被改造为陆地上的公园；或者是文艺复兴、巴洛克和古典主义时期，法国或者英国侯爵官邸的花园。

马克思反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

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从中马克思得出结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

马克思质疑却从不否认他的前辈，他首先引用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中的名言：“已知事物，正是由于其已知性，而无法被认识。”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以及人类创造的重要改变，最终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批判迄今为止的唯物主义都是客观主义的，只注重主体和（纯直观）客体的僵化对立：“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一论点时常遭到误解，认为其在声称所有的真实都是由主观传递的：“对我们而言，在历史之外别无他物。”当马克思把人类活动（实践）描述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时，他明确强调：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 *generatio aequivoca*（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意味着：宇宙的以及生物的世界永远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客观前提。外部自然——作为“第一自然”——应该存在，因此历史世界之外的事物也存在。但人类可以感知的，必须在历史中获得，而且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的。利用人类创造的工具（例如伽利略的望远镜）可以获取知识，同时——这也是人类研究的永久成果——外部自然的优先地位得以保持，但人类无法掌握它的整体范围及复杂程度，原因是客观界限的存在，例如光速以及与此相关的非同时性

（Ungleichzeitigkeit），这些都永远排除了平行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即使存在，平行世界也永远不会同地球有交集（因此也无关紧要）。由此，最终必须认识到，人类是在自然既定的前提下开始改变世界的，而且改变之巨大造成了除了社会之外不存在其他自然的表象。

众所周知，社会历史世界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而这些变迁是人类所造就的，但它们同时也造就了人类，因为它（在广义上）影响和确定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这样，哲学不仅是世界观，而且必须成为（改变性）实践的理论，所以最初就将所有的乌托邦从可以实现的理想中排除出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n Ideologie*）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是最出色的黑格尔辩证法，但进行了唯物主义运用，并非思想引起现实的变化，而是事物的真实运动在进行自我描绘，并从中得出了理论结果，使积极地参与实践（改变实践）成为可能；但理论[作为现实辩证法（*Realdialektik*）]必须顺应真实的运动，而且认识并认可其条件。因此所有乌托邦式的空想也就被永远搁置了。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再激烈抨击主观和客观的世界观，特别是理想^[68]的实现，相反，他拥护批判、怀疑和历史运动。对此至少有一处证据。在《逃亡者对话》（*Flüchtlingsgespräche*）中齐佛尔（Ziffel）阐述道：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智人只有当盯着绝对的废墟时，才能有所作为。人类必须逼迫自己才能进步。他们只有在紧急时刻才做出正确的事情，而且此时人类通常别无选择。无产者从而获得使命，将人类提升至更高的境界。

卡勒

我一直可以说从直觉上就反对这样的使命。它听起来是恭维，但我不信任此类奉承，您不是吗？我好奇，使命一词意味着什么，我是说在字面意义上。

齐佛尔

它出自拉丁语“mittere”，寄送。

卡勒

我也想象到了。无产者再一次成了戈赫尔达（Geherda）。您想出了一个理想世界，而我们应该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是执行者，您一直是领导者，怎样？我们应该拯救人类，但谁是人类？您是。

这里的“Geherda”是布莱希特的一同许多类似情况一样一新造词，目的是痛斥唯心主义思想。唯心主义认为要达到更美好的世界，就要实现理想。但理想的实现却留下了尸横遍野和瓦砾废墟，就像威廉皇帝承诺要带领德国人民走进辉煌的时代，或者之后的希特勒宣布要建立一个千年帝国，还有宗教那些崇高的教义要求，这些至今也没有变为现实，反而走向了反面。那些曾经或当下应当去实现理想的人，那些戈赫尔达，那些供人差遣的童仆、跑腿、奴才，他们是永远的牺牲者，反之那些自以为是的领袖却逃避了责任。

只有受到现实的教育

我们才能改变现实

教育剧：《说是》和《措施》

通过阿西娅·拉齐丝，布莱希特1929年5月结识了瓦尔特·本雅明（生于1892年），两人从自开始就工作与相关时事进行了多次长谈，

这些谈话虽然颇有争议，但因此成果也更加丰硕。本雅明是一名犹太银行家的儿子，为取得大学执教资格写作了以德国悲苦剧为主题的论文，但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遭拒，本雅明的学术生涯也因此受到阻碍，只能作为自由撰稿人和文学评论家艰难度日。两人的友谊持续至本雅明 1940年9月在逃避纳粹迫害的途中自杀，即使这份友情不是单方面的，本雅明也是被布莱希特所吸引的一方，他参与布氏的各种计划，而且1930年后，开始就布莱希特的作品撰写文章。两人还计划成立“马克思主义俱乐部”，为之确定了长长的名单；俱乐部的宗旨是集合左翼知识分子，扩展其马克思主义研究并实现其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实践应用，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详情。

1931年夏，本雅明在莱拉旺杜（Le Levandou）工作休假，记录了其中的一项实际工作，当时布莱希特还在写作《屠宰场的圣约翰娜》。本雅明如此描写布莱希特：“在我们讨论对德国局势的建议时，他提出一项集体性措施，而且也很奇特。他说如果自己是柏林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话，就会制订一项五天计划，基于这项计划将在五天的期限内清除至少20万柏林人，仅仅是为了可以借此‘牵连出一些人’。……‘如果要实行，那么我知道，至少5万名无产者会参加计划的执行。’”不仅本雅明，“布莱希特研究”随后也只理解了这段话的字面意思，并找到了同《城市居民读本》或者教育剧的所谓联系，因为《读本》和教育剧也同样以可怕的思想游戏为基础。“五天计划”就已经令人惊愕，更不用说“执行委员会”了。这些概念显然影射了苏联，苏联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算起，当时仍在计划时间内），还有苏联的最高立法、规划、调控机构，这些机构自1917年起（至1937年）构成了苏联事实上的权力中心。而且这一执行委员会没过多久确实实施了由布莱希特建议的措施，这件事也以极端的方式清晰地表明了布莱希特对同时期苏联的评价。这是1931年夏。

本雅明不理解布莱希特的笑话，这个笑话同时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清算，在执行者一方有5万名无产者，布氏视其为顺从的走卒。布氏借此也讽刺和嘲弄德国的报道，报道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久便要到来。在苏联的基础上，布氏虚构了一个集体性肃清运动，非政治性的德国无产者（自然）要大量加入其中。布氏不信任这些人，并向他的谈话对象表达了这种不信任。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误解。1930年夏，布莱希特散乱记录了一些语句，这些话可以追溯到同本雅明的谈话。布氏的基本观点是：不以事实为依据、不在事实中不断更正的思考，他都不接受。此处对应了《读本》的纲要，即再现真实。那么本雅明如何理解《城市居民读本》这部诗集呢？他将其理解为流亡的行为指南。当本雅明得到诗作《犹太妓女玛丽·圣德斯》（*Judenhure Marie Sanders*），他认为在叠句（“市郊的肉涨价了”）中隐藏了对革命的召唤。布莱希特十分恼怒地告知本雅明，这里讲的就是价格上涨。在同时代，甚至在知识分子友人中，已经开始产生对布莱希特现实主义纲要的误解，原因是，正如马克思曾说，马克思主义总是被理解为某种哲学或者世界观，却没有被理解为利用现有的集体主义“研究现实”。

由于1929年的剧院混乱，巴登—巴登室内音乐节1930年遭停办，但柏林的新音乐节（Tage der Neuen Musik）取而代之，布莱希特和魏尔可以继续他们的教育剧。这次是1929~1930年创作的《说是的人》（*Jasager*），戏剧的写作使用了小学生也可以理解的台词和音乐，以便于现实转化。集体教育是教育改革的不争目标，也是本次音乐节的主题，因而尤为适宜学校歌剧，因为这样一来教育主题和实用目的（可供学校使用的集体音乐）便结合在了一起。在学校歌剧上演期间，布莱希特仍对《说是的人》不满意，开始进行一项新的计划，而且同样也打算参加1930年的柏林新音乐节——《措施》（*Die Maßnahme*）。

《措施》被布莱希特称为《说是的人》的“具体化”。这里布莱希特要首先感谢奥地利音乐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两人因1927年7月的巴登—巴登室内音乐节相识。虽然艾斯勒的康塔塔（kantata）^[69]当时也有上演，而且布莱希特很可能也听到了，两人在《措施》之前还未有过合作。艾斯勒在1927年前主要致力于宣传领域，即被认为是低价值的“实用音乐”领域，较明确地服务于意识形态。比如，艾斯勒还参与了“红色传声筒（Rotes Sprachrohr）”的工作，这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主义最成功的宣传组织之一。布氏1927~1930年的工作成果表明，他一直疏远如此肤浅的艺术工作，在1920年代甚至还不知其名，更谈不上运用了。布莱希特努力进入市民机构（获得成功），而且是以市民阶层作家的身份，他终生也将自己定位于此。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将《母亲》（*Die Mutter*, 1931~1932）视作其向工人阶级过渡的重要戏剧，回顾往事时，布氏甚至反对将《母亲》同宣传鼓动甚至无产者崇拜联系起来。相反，他强调，《母亲》是“在诗意塑造那个已经成为经典的时代”，并且采用了“德国民族戏剧的表达方式”。其范本是歌德的《格茨》（*Götz*）和毕希纳（Büchner）的《沃伊采克》（*Woyzeck*）。在《措施》上演一年之后，虽然对党派艺术有所反感，但布莱希特还是少量参加了歌舞剧《我们如此满意》（*Wir sind ja sooo zufrieden*）的工作。

1930年初，布氏方开始同汉斯·艾斯勒展开紧密合作，同年5月暂时结束了《措施》第一版的写作。1928年1月，艾斯勒在《红旗》中发表了文章《音乐中的新宗教性》（*Die neue Religiosität in der Musik*），并惊奇地发现，同“市民文学和绘画”相比，作曲家中的左翼革命艺术家人数较少：“在音乐中没有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没有格奥尔格·格罗兹、鲁道夫·施里希特尔，没有贝尔特·布莱希特一样的诗人，或者库尔特·图索斯基（Kurt Tucholsky）一样的记者；在音乐中，即使那些最富才华的人身上，最卑微的小市民性仍不断蔓延。”这是艾斯勒首次公开对布莱希特发出

信号。虽然布氏在此期间也了解了艾斯勒的音乐，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还推荐艾斯勒为《加尔各答，5月4日》作曲，并将《死兵的传说》的谱曲工作委托给了他，但布莱希特仍同其保持距离。

汉斯·艾斯勒1898年生人，父亲是著名哲学家鲁道夫·艾斯勒（Rudolf Eisler），曾撰写《哲学概念与表达词典》（*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und Ausdrücke*, 1900）等著作。汉斯·艾斯勒在新维也纳音乐学院（Das neue Wiener Konservatorium）学习，1923年起师从音乐大师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1925年他的音乐作品获得了维也纳城市艺术奖（Kunstpreis der Stadt Wien），由于艾斯勒把维也纳看作属于市侩庸人的死胡同，同年秋他前往柏林，1926年试图加入德国共产党——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不得而知，同老师勋伯格断交，对此他日后十分悔恨，自1927年开始了共产主义宣传工作，并投身于埃尔文·皮斯卡托尔的人民舞台（例如在1929年9月创作了瓦尔特·梅林《柏林商人》的舞台音乐）。

正如同魏尔的合作一样，布莱希特同艾斯勒的合作也相得益彰。音乐学者汉斯·默斯曼（Hans Mersmann）日后（1931）在杂志《米洛斯》（*Melos*）发表了文章《新音乐及其歌词》（*Die neue Musik und ihre Texte*），他在布莱希特同魏尔以及同艾斯勒的成功合作中发现：“不再是音乐在寻找歌词，而是两者在某一程度上相互指引，只有通过彼此才得以完成，这几乎从未有过。这样就出现了范围无法估量的可能性。”汉斯·艾斯勒关于《措施》创作过程的回忆便证实了其中一种可能的实现：“布莱希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也是一名学习者。布莱希特的天才使他尤其懂得学习，例如，他能在关于他作品的激烈争论中继续创作。半年中，为了创作《措施》，我每天从早9点到下午1点都在他的住处，其间布莱希特在写作，而我在批评他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当场批评属于布莱希特的工作方式，他由此可

以在创作的同时被迫去反思刚刚创作的内容。这同样也属于布莱希特新的集体工作风格，以至于最终哪些部分出自谁的手笔已经无关紧要。艾斯勒继续表述他与布莱希特合作初期感到的惊奇：“换作其他人，要么会把我赶出去，要么会说：‘您听着，这样我没法工作！’但这反而刺激了布莱希特的写作。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辩论，他房间里那些激烈的争执，激励了他。”而由此产生的正是使人心志激昂的杰作。

要领会布莱希特的美学特点及其具有个人特色的共产主义，必须再次深入探究《说是的人》。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将日本能剧（Nô-Stück）《谷行》译为英语（*Taniko*），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又对英语版进行了德语翻译（*Der Wurfins Tal*），布莱希特利用了霍普特曼的翻译，更改了少量的细节，即剔除了其中的神学内容（学校不再同修道院有关，代替朝圣之旅的应该是一次科考之旅）。总体上，日本的故事原型得到了保留，但仍然放弃了最终形而上的结局，这在威利的版本中已经被砍去，并未对此进行翻译，霍普特曼进而更毫无所知。

库尔特·魏尔担任了《说是的人》的谱曲工作，魏尔和布莱希特创作的故事内容为：一名教师要踏入深山进行一次走向“伟大医者”的科考之旅，他明确表示这次旅途是一次“危险的游历”，因此只有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允许参加，旅途的目的是获得药材以及医学真传。一名少年，他的母亲抱恙，为了帮助母亲他无论如何也要同往。虽然已经向其明确说明，原本不可能同意他前往，而且他后来也承认，知道自己可能在途中丧命，男孩还是一起出发了。他在途中病倒，后来到深山一个狭窄的山脊上，已无力翻越，而且他人的帮助也于事无补，因为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才能翻越这道山脊。所谓的“神圣习俗”规定，“人们要询问病者，大家是否应该因为他而返航”，

同时习俗还规定，被问者要同意——也按照习俗——被扔进山谷。故事也正是这样结束的。

剧评中的质疑以及询问小学生们的意见都认为，少年的死毫无意义而且毫无必要，这促使布莱希特改写《说是的人》，并为其添加了《说不的人》（*Neinsager*，两者构成一个整体进行演出）。《说不的人》保留了《说是的人》的绝大部分内容，只是少年最后拒绝对死亡表示同意。而且新版《说是的人》激化了旅行的前提，城市中瘟疫肆虐，科考队必须找到药材抗击瘟疫。当少年这次说是的时候，是牺牲自己而拯救他人。

1935年12月在美国流亡期间，当记者询问库尔特·魏尔他在欧洲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部时，魏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的人》。他曾拒绝参与布莱希特对剧本的修改，甚至拒绝为《说是的人。说不的人》谱写新的乐曲。虽然魏尔没有说明为何单单选择这部戏剧，但缘由仍完全可以推断。布莱希特第二版《说是的人》塑造了典型的矛盾冲突——这在根本上可能只存在悲剧的解决方式——借此将这出短剧改写成了一部古典悲剧。要么少年牺牲自己，要么城里的人死于瘟疫，很可能也包括他的母亲。这是通常的基督教决验法（*Experimentum crucis*），某人在绝望的境地中一人背起沉重的十字架，为了集体而牺牲。魏尔知道这样就破坏了原有的戏剧。而布莱希特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悲剧的必要性完全没有铺垫，因而布莱希特为何修改颇令人费解。他没有理解自己本可以完美的剧作？或者他想向评论界表明自己有妥协的诚意？

相反，库尔特·魏尔诠释了作品的重要内涵，与其成名歌剧相比，他显然更看重这部作品：“我们（给日本原型）增添了‘赞同’的概念，并借此改写了这部剧作：少年如今不再（如原作中）毫无意志地被扔进山谷，而是首先询问了他的意见，通过表示赞同，他

证实了自己学会了为一个集体或者为一个他支持的理念而承担后果。……通过‘赞同’的倾向性，这部教育剧在更高意义上发挥了政治作用，但自然不是党派政治。”其中作为补充的“或者为一个他支持的理念”证实了魏尔在意识形态上的不确定，本剧恰恰并非以理念为主题。社会束缚已经长时期被内化，以至于无法被察觉，而社会束缚的展现需要约束力，即使它没有真的要求与之相关的杀戮的必要性。莱辛（Lessing）的艾米莉亚·迦洛蒂（Emilia Galotti）便因此而死，因为这是悲剧体裁的要求。或者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他的戏剧和侦探小说中也出现了众多死亡，并强调其戏剧艺术的必要性。

《说是的人》的“具体化”意味着，这里讨论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情况，而是将其置于具体情境中，即共产主义运动。运动以共产主义革命在苏联已经取得胜利为前提[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赞歌》（*Lob der U. S. S. R.*）已经清楚明确地展现了其悲惨的境地]，当时正要向中国拓展，同时自然要强调，这里的“具体化”仍较为抽象，剧作只能被理解为模型，而非真实事件的再现。

相反，必须要对《措施》提出疑问，到底以何种共产主义为题（各个不同的版本并没有特意进行区分）。四名宣传员从德国和苏联来到（虚构的）中国，这里笼罩着非人性的剥削压迫。他们来此的任务是筹备革命，因此必须消除自己的身份，成为中国人。在边境前，又有一名年轻同志被任命为第五名宣传员，他表示赞同所有的前提条件以及整个行动计划。他获得了各种不同的任务，却接连失败，因目睹受剥削者及其困苦，他总是本能地去帮助他们，因而导致了无谓的斗争还有（至少）一人的死亡（这是年轻同志所犯的错误）。然后他又拒绝与剥削者同桌就餐，从而暴露了身份，还危及自己以及其他宣传员（的生命安危），还危及了革命工作，这在文本中被明确称为“四重背叛”。尽管如此，宣传工作仍旧（可能）胜利在望，此刻这

位年轻同志又反抗原则，支持立即革命，痛斥（马克思主义）经典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扯下了脸上的面具。在最后的紧急时刻宣传员们才得以逃生，但“距追踪者仅有5分钟”，大家必须意识到，同他一起有被识破、被击毙的危险，这样便扼杀了通往革命的最后一步。他们决定射杀这位年轻的同志，他本人由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以及后果，也表示同意。四名宣传员杀死了他，并将其抛进了石灰窑，破坏了他的容貌。如此，革命最终胜利地前进了。

同《说是的人》一样，《措施》一方面能辨认出日本的能剧模式，另一方面又将时间置于政治语境之中，反映了社会实践及其理论。剧情的结局清晰地表明，《措施》绝非为了展现年轻同志为理念—共产主义理念而牺牲自我，以基督教决验法为根据（同样参见《说是的人》），即个人的牺牲就众人的牺牲而言是可以承受也是可以认同的（基督教的双重词义）；但又完全不同。

年轻同志的同情感使其本能地提供帮助，这同他人的理性行为相冲突，这种同情不无道理，而理性又无非代表了共产主义教条，种种这些在文本中，特别是在艾斯勒的音乐中只是一笔带过。本剧最重要的章节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四次（而且剧本篇幅有限），这里提出了宣传员开展工作的前提：“我们装扮成中国人前往穆克敦^[70]，四男一女，开展宣传，根据经典文献、宣传资料、共产主义基本知识建立中国政党，教育无知者认清现状，唤起受压迫者的阶级意识，给有阶级意识的人带去革命经验。”这一场景虽然只是一个宣叙调^[71]，但在音乐上最具感染力，清晰明了地表现了宣传的宗旨。

故事背景：四名宣传员来到边境的党部，那位年轻同志正同党部领导一起完成艰难的工作。在年轻同志向共产主义“宣誓”之后，宣誓从心而发，要直面贫困，而且还使用了一些惯用的话语（“目睹不公驱使我加入斗争者的队伍。我维护自由。我相信人性。”），也点

明了年轻同志纯粹的理想主义，他首先期待的是帮助，而非委派参加宣传工作。年轻同志询问了六次，是否宣传员们有火车头、拖拉机、种子、弹药，或者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指示了他们要做的事情或者他们是否最终要提供帮助，每一次宣传员们都在合唱中抑扬顿挫地回答：“不。”艾斯勒的音乐铺陈在一问一答间，四名宣传员六次回答“不”（在演出中只有三次）耐人寻味，像斧头一样劈进了接受者的头脑中。

恩斯特·布洛赫在其《希望的原理》（*Prinzip Hoffnung*）中对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出了有趣的解释，从而合理解释了这位年轻同志的行为：“帮助意愿本身的温暖、对蒙难者的爱、对剥削者的恨，这些情感推动了党性，若没有党性，真实的认识和善意的行为都不具有社会可能性。但爱的感觉本身无法被知识照亮，这恰恰会阻断其向帮助行为转变。爱容易满足于自我的优越感，转变看似积极的新自信，如一团迷雾一般。”在这一关系中布洛赫阐述道：

“在没有进行经济学和哲学的理论研究前，现实中的实践不会向前迈进一步。一旦缺少社会主义理论家，就会出现危险，恰恰与现实的关系也要因此付出代价。”

宣传（Agitation）来源于拉丁语“agere”，意为做、行动，由“agitare”构成，表激烈争论、鼓动，也有协商之意。同“政治宣传（Propaganda）”不同，列宁将其理解为积极概念，并定义为“呼吁大众进行某种特定的具体行为，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性直接地参与公共生活”。根据《措施》的文本，它有必要的三步：第一，宣传员对中国的受剥削者进行关于真实现状的宣传教育；因为正如剧中场景所示，他们仍是逆来顺受。第二，如果受压迫者明白自己被剥削的状况，这就创造了前提条件，便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困苦并非天定，而是人为，进而能够辨识责任者所在；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形成（或者才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第三，如果具备阶级意识，则可以培养斗

争的决心，但这还需要具备斗争的实际条件；而《公正》

（*Gerechtigkeit*）和《人原本是什么？》（*Was ist eigentlich ein Mensch?*）两场都表明，实际条件目前尚不具备。

宣传队起初组织工人主动罢工，但这位年轻同志（因有人伤亡）破坏了这次罢工，而后宣传队又设法让工人们利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而年轻同志又出于道德上的反感阻止了这一计划。最终，他一时冲动要求采用激进的行为主义方法，即便经过其他宣传员的深入教育，年轻同志仍在盛怒之中——即在无政府的混乱中——坚持实施这一方式，因此不仅是拿自己和同志们的生命去冒险，更使艰辛创造的革命条件几乎不保。年轻同志没有落实他口中所赞同的，他并非更高级事物（或思想）的牺牲品，而是剧中那个统治虚构中国的野蛮世界的牺牲品，他不充分的道德说教和盲目的行为主义使其面对这个世界时无所适从。

艾斯勒日后（1935）反思，虽然无法用音乐驱赶寒冷和饥饿，但或许“可以告知那些无知的人，谁盗走了他的面包、煤和安身之地，我们的歌曲能够将疲惫之人锻造成斗士”，这也是《措施》的艺术宗旨。1930年12月13~14日夜，《措施》在柏林音乐厅首演，这是柏林最高的音乐殿堂，但戏剧并非通常的鸿篇巨制，而更像反清唱剧（*Anti-Oratorium*），更确切地说是“政治集会”（艾斯勒的概念）。400名工人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扮演检察机关，庞大的人数象征了广大革命群众，音乐厅的中上部建造了拳击台作为舞台台面，并配有管弦乐队乐池，这样演出的参与者便几乎已经占据了半个音乐厅。而且演出还设想使合唱歌手既是表演者，同时也是观众，艾斯勒在演出期间尝试通过打着手势的蹦蹦跳跳，鼓励绝大部分青年工人观众以及一部分“柏林进步知识分子的翘楚”一起合唱。

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我们还注意到音乐的特色以及词作者和曲作者在《措施》的创作过程中的讨论。教育剧从一开始便被构思为清唱剧，艾斯勒赋予其基督教模式，例如开篇便在音乐上引用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来吧，女儿们，同我一起叹息。”这是合唱式的哀歌，表达了基督受难之苦。但音乐与歌词有云泥之别，歌词（轻率地）赞扬了宣传员们顺利的工作，宣传员们激烈的抗议“等一下，我们有话说！我们要报告一名同志的死亡”。但这也没有改变合唱队的悲叹曲调。因此，音乐从开篇便脱离了对社会主义成就颂歌式的赞扬：正如合唱队的歌词所唱到的，成功并非“幸运的”，而是血腥的。荣誉太过草率，因为这令人不禁哀叹的牺牲原本是不必要的。基督教模式代表所有人歌唱基督受难之苦，在它的衬托下，在音乐与歌词的对比中，《措施》示范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这样的行为不应被模仿，而是要警惕。歌词和音乐构建了一个整体，构成了最佳辩证意义上对矛盾的扬弃，因此，本剧较为贴切的分析必须以两者为前提。

汉斯·布格（Hans Bunge）在同艾斯勒的对话中曾转述，布莱希特厌恶能引发激昂感情的音乐，以贝多芬为例。根据他的“旧理论”，贝多芬将“体温计看作鉴定音乐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听过音乐作品之后应该立即测量体温，看体温是保持正常，还是因为激情、火热或者强烈的音乐而有所上升。巴赫即使最热情的音乐也会让人体温保持平定”。艾斯勒称布莱希特的评注“十分聪颖”，而且以歌德作为引证。贝多芬的音乐令歌德遁入了“感情的迷惘”，意思是音乐让歌德情绪激动，“但激动却无从所终。/是为激动而激动”——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平行表达，而且两者都坚决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这种形式的激动使歌德烦躁，可惜医学家还未对音乐的心理学作用进行过研究。

艾斯勒继续讲道，即使布莱希特热爱音乐“清透、避免情感激越”，他也几乎不相信，布氏“听巴赫的音乐体温会一直保持在正常的37度”。相反：“我想起某次当我为他演奏巴赫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激动的言辞——我感觉他的体温应该显著上升了。”还有：“我不愿怀疑我已故的朋友，但我认为，他的体温显著升高，首先是由于感叹巴赫为故事谱曲之伟大。”正如艾斯勒的准确猜测，音乐在布莱希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音乐也传递了感情，对于思想来说情感是基础，它能够触动、激发思想，保持情绪，用欢快的笑声陪伴那些取得的成果。

音乐（可以说作为感情部分）和歌词（作为理性部分）相互协调，肩并肩形成统一的整体，又表现为互相矛盾。开篇的合唱态度疏远且“语言带有分析式的冷静”，但音乐同时又是英雄式的哀叹，所以并不十分显著。布莱希特表示：“通过这样的反作用，开篇褒扬的态度具有了梳理性的特点，梳理也具有了英雄式的特点”，“音乐无法对文本表达具有同感，文本也无法对音乐态度具有同感。”正如歌德《二裂银杏叶》（*Gingo biloba*）提出的问题，叶片是否“是一个有生命之物/在自己体内一分为二”，或者原本是两个物体，但被认作一体，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回答，也不存在能消解所有矛盾的回答。

艾斯勒说巴赫曾为“报道（Bericht）”谱曲，也使人联想起他自1927年开始从事的一项音乐传统，艾斯勒脱离市民音乐，从而也远离他的老师勋伯格，探查音乐与现实的新联系，这类似于皮斯卡托尔之于政治记录剧。艾斯勒反对音乐的享乐功能，反对将音乐视为满足感的替代品，在“振聋发聩和激情澎湃的状态”中自我发泄，“这些在资本主义本源的生活关系中只会愈演愈烈”。《日记》（*Tagebuch*, 1926）1927年7月在巴登—巴登首演，艾斯勒借此讽刺了康塔塔音乐的形式，之后他又借《剪报》（*Zeitungsausschnitte*, 1927）完成了同传统音乐会歌曲的决裂。以文本和音乐蒙太奇的组合方式，艾斯勒还

为结婚通告、时事新闻、日常事件的报道谱曲，从而以音乐的夸张手法讽刺了乏味的琐事，实现了其音乐同社会现实的联系。

*

共产主义者们对《措施》评论的基本内容是：布莱希特和艾斯勒悉力通过革命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桥梁走近我们，对此总体上深表欢迎，但这部戏剧只完成了第一步（也是受人质疑的一步）。玛格丽特·施德芬（Margarete Steffin），当时还不知道一年之后她会遇到这个给她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人，她表示：“可叹，布莱希特对德国共产党完全没有了解的欲望，他对工人阶级的无知也造就了《措施》缺乏条理。如果没有艾斯勒，他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话语虽然严苛，但仍击中要害：布莱希特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知之甚少，而且主要是不能赞同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其不过是理想主义的布道。

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被理解为关涉普遍实践，且深深植根于19世纪，因而即便拥有最好的希望，也难以成为（微观的）20世纪的社会实践理论，除非刻意否认其历史内核。因为一种世界观如果不反映社会现实，便会走向失败，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中的具体运用。在民主德国，以“真实存在”这样的习惯性语言来形容所谓的社会主义，这种语言表达本身便证实了东德在刻意否认对某种理念的宣传，这一理念不过是零散的思想片段，但当权者却用暴力要求民众对其认可。另一种可能性是马克思抨击同时代哲学时曾说过的：“须要‘把哲学搁在一旁’，须要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关于这一点，文献中有大量的材料，当然，哲学家们并不知道……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好似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

教育剧是时代的标志，它展现了市民阶层个体的大众化和权力丧失，表露了市民个体主义的历史终结，它以美学的形式尝试组织新的

群众政治运动，这原本或许能起到反抗纳粹的作用。实用音乐运动和新音乐也以建立新的、积极的集体感为目标。此外，1920年代工人阶级中大量组织齐诵队，同样以重新讨论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为宗旨。这不仅局限于共产主义者，社民党也参与进来，例如，自1926年便有了“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齐诵中心（Sprechchorzentrale des Reichsausschusses für sozialistische Bildungsarbeit）”。至于集体化也显示了不利的一面，它该如何在纳粹统治下发展，如何对《人就是人》的积极结尾提出质疑，则又是另一个问题；但愈发必要的是让个体意识到自己在集体中的作用，并且熟悉这种作用，从而使个体不至于仆从于集体。

可悲啊！永远捉摸不透

人类经济的永恒法则

仅限于知内情者的经济：垄断购买

1931~1932年，《措施》除了在柏林大剧院（Großes Schauspielhaus Berlin）再次演出外（1931年1月18日，全体原班演员），只有一些工人组织曾少量组织过演出，因而也不为公众所熟知，1932年1月该剧在埃尔福特（Erfurt）被纳粹党清扫出了戏剧舞台。这一时期，布莱希特同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共同写作了《屠宰场的圣约翰娜》（1929~1931），这部戏剧同《芝加哥的乔·弗莱施哈克》一样，以垄断购买模式下的经济活动为主题，将其同救世军成员约翰娜·达尔克（Johanna Dark）的命运相联系。约翰娜认识到穷人的卑劣并非他们穷困的原因，反之，穷困才是他们卑劣的原因，因此她认为可以在不变更体制的情况下，直接或者通过改革来帮助穷人。

肉食加工厂厂主莫勒（Mauler）通过在纽约的朋友（华尔街交易所老板）得知了市场变化。因此他起初便知道，由于海关贸易保护，

产品无法继续在国外市场销售，进而国内市场会出现产品过剩的危险，而利用这一信息他可以挤垮竞争的同行，使萧条提前到来。正值这一时刻，约翰娜向莫勒展现了穷人们的困苦，莫勒起先晕倒失去意识，后来满足了约翰娜的请求，大量购进现时已处于价格低谷的肉类，以活跃市场，从而保留了重新开始生产的希望（看似改善了失业者的境况）。当约翰娜同那些破产的饲养者一起出现，请求莫勒，购买他们那些卖不出的肉时，莫勒便买断了他们的牲畜，这样其他肉类加工厂便无法生产，因为市场上没有可购买的肉了。如此一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约翰娜的请求帮助莫勒推进了他的计划。而穷人们的状况自然没有改善，因为莫勒占有了所有的肉类原料，控制了生产，进而破坏了市场（这事实上并不可行，因为，正如前文所讲到的，肉类并非生活必需品）。最终，当莫勒的经理人投机行为愈演愈烈，以至于市场完全崩溃，莫勒才发现，自己可能失败了。

但纽约的朋友们却提醒莫勒，他仍然占有（诈取骗得的）生产资料。由于约翰娜的错误导致了总罢工的失败，莫勒因而又能支配足够数量的工人。总罢工原本有可能阻止他重新开业，但终仍未能成功。由于肉制品过剩，又必须抬高价格，三分之一的工人被裁员，三分之一的肉被烧掉，而且工资也被削减。除此之外其他的竞争者也被挤垮，莫勒垄断了整个肉制品行业，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达到了加剧剥削的新阶段。在布莱希特的遗物中有大量的报纸材料，例如《柏林交易所信使报》的《商业副刊》（发行量4万到6万份），布莱希特在1924~1929年深入了解了垄断购买和纽约交易所的相关情况（此外，为了创作《乔·弗莱施哈克》，还了解了1926年3月初的股市崩盘：“纽约交易所的疯狂事件”），并将这些信息植入到他的剧作中。

布莱希特1935年曾表示，交易所的交易过程“完全非理性”，因而完全无法理解，这样的论断也适用于他剧作中的经济情节。剧中绝望的饲养者（看似）反思经济结构：“可悲啊！永远捉摸不透/人类经

济的永恒法则！”这显然带有讽刺的意味。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如今和将来都是愚蠢而疯狂的，因为其运作的前提是多数人愈加贫困，而且欧洲人在过去五十年里忽视的第三和第四世界的穷苦也会永存，直至整个星球被洗劫。这令所有改善世界的道德呼吁都变得荒谬。

此外，垄断购买这样的投机行为，当时即使对商业知情者来说也是不寻常的贸然之举，诺里斯是对其进行文学表现的第一人。当杰德温买下所有的小麦，他的秘书认为自己的老板完全疯了，如此大量的小麦是完全无法销售的。因此，当科里德（Cridle）及同党被蒙蔽，这并非毫无根据或者离奇；因为他们对莫勒所策划的一切毫无半点了解，这在日后的场景中也得到了证实。布莱希特想借此说明，经济不是命运，为了追求利益，经济可以被人为地操纵，手段是利用资本主义市场提供的机会，以及对不知情者隐瞒关于其情况的必要信息。

在1929年的第一稿中，布莱希特就明确建立了剧本同时事之间的联系。当约翰娜向莫勒展示穷困者的面貌，布莱希特写道，她实现了“改良政策”，还对此评价：“社民党认为，通过援助资本主义可以援助穷人。”事实上，在1927年5月的基尔党代表大会上，社民党已经决定，利用共和制度来贯彻社会主义道路。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发表了纲领性讲话，如果资本主义可以重组，它带来的经济发展可以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原则上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原则来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这一受调控的计划经济在更高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干预的可能性，这无非是唯一有意识地使用强制力的社会组织的干预，即国家的干预。”1927年，与具有批判精神的艺术家（如前文所述）意见相左，社民党认为，共和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阶段，而“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却是宿命论的、机械的，并且受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现在是时机

从这种状态解放出来（党代表大会的官方意见）。这一趋势完全符合布莱希特在《圣约翰娜》笔记中的记录。

如果从联系同时期历史事件的角度观察，戏剧不仅借约翰娜这一人物描述了社民党的没落，展现了一由于那些本应同心协力之人却不断内部斗争—（实则不存在的）“工人阶级”的无能，而且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双方的胜利。其后果意味着：莫勒的胜利影射了法西斯即将来临的胜利，它让整个世界化为一片废墟。圣约翰娜—只有经历过这些之后，约翰娜才成为圣者—在最后一幕中也成了欢乐兜售法西斯的工具。布莱希特1932年在《尝试》中刊印了这一文本，同时也发表了一篇记录性文章，表示对这一时期的革命已不抱希望。

最晚此时已经能够明确判定，《圣约翰娜》和《措施》中强有力的戏剧直观图像具有一再被强调的冲击力，布莱希特以此表达了对德国历史最危险深渊的判断，但这种尝试自然仍没有获得成功。《圣约翰娜》当时毫无机会，其首演和接受被推迟至1959年。《措施》虽然使用了类比手法，但戏剧批判的对象很有可能已经认识到其矛头所向。1932年12月21日，一份匿名的警方报告（柏林国家刑事警察局）写道：“这一合唱作品进行了表面上的伪装；故事发生在所谓的中国。但在内容上，只需要把‘中国’一词替换为‘德国’，整个作品都可以被用于表现德国现实。”本剧明确证实，德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手段”，“教唆其党员从事破坏性活动”。

原本的现实已沦为功能性

社会学实验：

文学的技术化

1930年秋，布莱希特一在他被不断扩张的右翼激进活动逐渐扼杀之前一仍能够坚持另一部戏剧的演出，还由此成为德国最著名的人物（或者还有更多），1929年时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也还没有获得如此的知名度。这部演出的戏剧便是《三毛钱诉讼》

（*Dreigroschenprozeß*），在戏剧中，布莱希特将社会（魏玛共和国）、时代（纳粹统治之前）、司法机构或者其民主法制理念置于一场“社会学实验”中。本次实验在任何作家曾公开对社会公众举行的活动中最为特殊，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仍不甚为人所知，而且布莱希特在记录本次实验的文章《三毛钱诉讼》（1931）中提出了文学“技术化（Technifizierung）”的概念，这一理念至今仍十分超前，因此更谈不上实现了。

在《三毛钱歌剧》大获成功之后，布莱希特在1930年5月21日通过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出版社与奈罗电影公司（Nero-Film AG）签订了合同，合同规定电影1930年8月15日开始拍摄，并拟定由原著作者负责“适宜电影的剧本改编”，而且既包括剧本创作也包括电影的制作。而事实是，布莱希特确实提交了改编作品的脚本《肿块》（*Die Beule*），但改编对电影公司想拍摄的歌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以至于必须怀疑它是原歌剧的改编还是已经成为一部新的作品，而且媒体对这部新作品予以了“富有革命倾向”的评价。此外，布莱希特一尽管被多番催促一仍再三斟酌，因而阻碍了拍摄工作。

虽然电影公司早于8月18日同布莱希特解除了合同，将剧本的改编工作转交莱奥·拉尼阿和日后的拉迪斯劳·瓦伊达（Ladislav Vajda），电影的筹备工作业已全面展开，但布莱希特一直等到9月30日一奈罗电影公司要求其承担损失补偿时一才向柏林一级地方法院起诉。库尔特·魏尔一天后加入。两人要求，必须停止已于9月19日开始的电影拍摄工作，原因是其不符合布莱希特的意见。电影公司期间已经投资80万马克。布莱希特想赢得诉讼的期望起初便不高，相反，他

寄希望于这一巨额款项对法院（同样对公众）而言能成为维护著作权的坚实论据，或者换言之，如果布莱希特能赢得这次诉讼，那么这一实验也会被宣判失败。

当法院11月4日驳回诉讼，布莱希特也实现了其目的。布莱希特立即就这一判决提出上诉，并力争案件能公开讨论，为此他与魏尔在独立电影联盟的早场演出中详细报告了诉讼过程。布莱希特无非是要在实践中检验“当代市民意识的状态”，并证实其完完全全是虚假的，或者一用司法语言表达一公正与司法在魏玛共和国判决中永远无法统一。

德国全部媒体也为布莱希特推波助澜，大肆辩论这一案件，评论褒贬不一。甚至包括一些尖酸恶毒的言论：恰恰是那个从各种原始资料中抄袭了《三毛钱歌剧》的贝尔特·布莱希特，现在以个人权利一被指“自私自利”一和“精神财产”为依据，对此他其实早已表示了“根本上的无原则”：“精神财产是属于小菜园或者类似领域的事物。”

布莱希特最终在《三毛钱诉讼》一文中作出总结，并将其归纳为箴言“矛盾即希望！”意思是：“社会学实验展现了社会矛盾，而并没有消除它们。实施者必须在相互对立的利益斗争中选取自己的态度，选择一个完全主观的、绝对偏颇的立场。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实验同其他各种调查有本质区别，其他的调查都以实施者尽可能客观的、公正的立场为前提。”布莱希特写道，法院在判决上表现了“灵活性”，认同“严酷的现实”，证实了“市民阶层对财产（只为财产占有者辩护）和艺术（两者的“有机”整体必将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的理解在不可遏制地崩坏”。布氏还傲慢地补充道，资本主义由此表明了其绝对的革命潜力，但这样的革命潜力又必定为其自掘坟墓。

电影由乔治·威廉·巴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执导，拍摄了两个版本（法语版和德语版），不仅红极一时，而是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功（被视为1932年的年度最佳电影），至今仍被誉为不朽的经典。布莱希特反而评价其是“可悲的拙劣作品，对歌剧的无耻破坏”，甚至还多次直言其为“糟粕”。布莱希特的评鉴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也无法站住脚，特别是巴布斯特在众多波折中依然采用了布氏脚本的大量内容，对此布莱希特置若罔闻，而且也忽视了那个时代能拥有的最佳明星阵容：鲁道夫·福斯特尔（Rudolf Forster，饰演尖刀麦基）、卡罗拉·内尔（Carola Neher，饰演波莉）、莱茵霍尔德·舒策尔（Reinhold Schünzel，饰演布朗）、弗里茨·拉斯普（Fritz Rasp，饰演皮丘姆）、瓦勒斯卡·格尔特（Valeska Gert，饰演皮丘姆夫人）、洛特·莱妮亚（Lotte Lenja，饰演珍妮）、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歌手和旁白朗诵），等等。

布莱希特的脚本分为四部分，巴布斯特采用了其中的第一部分《波莉·皮丘姆的爱情与婚嫁》（*Liebe und Heirat der Polly Peachum*），而且（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剧情进展。麦基从妓院来到海港旁破旧的老橡树街，见到了波莉（同她的母亲），他跟随着与之眉目传情。当波莉逃走，麦基追了上去。在婚纱前的橱窗玻璃上，波莉看到了麦基的镜像，两人在镜像中组成了一对恋人。然后麦基直接约她们（波莉和她的母亲）来墨鱼酒店，在两两相望中悄无声息地便定下了婚事。麦基通知手下为婚礼置办家具和器皿，在此期间这对恋人在苏活区（Soho）的船上对月而歌（《肿块》中有舞台指令：“一到两个月亮足以。”）。

第一部分以麦基和波莉的婚礼结束，对此巴布斯特主要忠实于歌剧情节，而《肿块》则把婚礼拟定为“社会性事件”，除了老虎布朗和牧师之外，还有150名政要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为第三部分国家储蓄银行“历史性易主”作了铺垫，麦基将以银行经理的身份进入市民

社会。而根据拉尼阿和瓦伊达的电影剧本，与《肿块》类似，婚礼应该在“冯·佐木赛特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Somerset）宫殿的大厅”中举行，但巴布斯特显然认为海港仓库的破旧环境更适合电影表现，而且牧师的出现、牧师在如此环境中的恐慌以及他不断想要溜之大吉的企图，会有效地给观众带来喜剧效果。同脚本一致，波莉在电影里也没有演唱《海盗珍妮之歌》（*Seeräuberjenny*），布莱希特为了表现社会现实放弃了这一歌曲，波莉转而演唱了《芭芭拉之歌》（*Barbara-Song*），作为仓促嫁于麦基的解释。

歌剧在结尾处暗示，开银行比抢劫银行要好得多。巴布斯特遵循脚本的内容，电影中，让波莉在接手麦基的强盗队伍后立即进行了银行的“历史性易主”。布莱希特在脚本中没有对购买银行的所有权作出清晰的铺垫（波莉的钱从哪里来？），巴布斯特则巧妙地利用这一漏洞本身作为理由。波莉发表讲话，强盗团体被任命为监督委员会，画外音（小标题）宣布这一场是观众致辞：“凭借一名恋爱中女人的智慧，事态会呈现给您无法预计的发展趋势。”在波莉空洞的发言中，她承诺自己的机构“历史悠久”，强烈要求“观众的信任”，有良好的贷款信用，而且她表示，浪漫现在结束了，而严肃的生活就此开始。这些安排都恰如其分，无可挑剔。

若没有布莱希特的脚本，电影结局也无法想象。虽然巴布斯特改变了喜剧结局的前提，却同脚本十分协调。布朗由于无法保护加冕典礼的游行队伍，和乞丐一起躲进了麦基的银行，觉得自己已无力回天。麦基却安慰他，并向他保证在自己这里能安然无恙，然后波莉问布朗，他能为银行注资多少？布朗先是愣住，然后想起他还捞取了麦基的保释金（麦基早已逃走），1万英镑。波莉接受了这一数额，旧交情在《大炮之歌》的演唱中得以重温。

皮丘姆由于无法控制释放出去的乞丐，同样出现在银行，但初看上去像是一个失去一切的请愿者，麦基因此对其大为指责。但皮丘姆还没有丧失他的理智，他狡猾地解释自己是伦敦最穷困的人（这是他一贯喋喋不休的诉苦方式），但一系列事实表明，贫穷有何等的威力，恰恰财富面对贫穷才能完成“最大的生意”，即皮丘姆的经验和麦基的财富相结合。麦基问道，穷人何时才有如此大的权力，“他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对此皮丘姆回答道：“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他们。”此时从画外音传来结束曲，这是布莱希特为电影脚本重新创作的：“走向美好的结局/一切都如此和谐/手里有必需的金钱/结局大多都不赖。”所有人都满意微笑，因为他们将如歌曲第二节所说，吃着“穷人们的面包”。然后是一组淡出处理，从画面的暗处出现了乞丐的队伍，然后又渐渐消失在黑暗中。此时唱起：“一些人在黑暗中/而另一些却在光明中/人们能看到那些光明中的人/那些黑暗中的却无法看到。”剧终。

电影的喜剧结局发人深省，因为在警察厅长和乞丐王都一败涂地，麦基在波莉的帮助下得到了稳固的地位之后，一个对所有参与方都有利的结局似乎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可能性。但按照资本主义见利忘义的逻辑，这样的结局不仅合情合理，而且还不幸是必然结果。皮丘姆想到了社会的基本法则：只有当尽可能地重视贫穷时，也就是说：当社会尽可能多的人保持贫穷或者变得贫穷时，财富才能得以维持（这同样也预示了危机时代的到来）。但通过由上而下地实施社会主义或者通过社民党组成民主多数都证明，由富人缩小贫富差距只能是痴人说梦。这在一战之前本有可能实现，正如罗莎·卢森堡所期望的，但在魏玛共和国却绝无可能。

布莱希特在《三毛钱诉讼》中还提出了深刻的诗学思想，他写道：“随着新传播手段的出现，传播的旧形式也不会保持不变。电影观众读小说的方式也会不同。而且写小说的人，他本身也是电影观

众。文学产品的技术化是不可逆的。即使小说家本身不使用这些工具，但工具的运用也会使其想达到相同的效果。”如果消极隔离，任何一种古典形式和技法的采用或建议都会在原则上被排除；如果积极运用，应该将使用仪器的技术手段转化为语言和美学，使这些手段能够完善语言应用的可能性或者实现（自己的）语言表达。

这些具有深刻的影响。如果语言艺术作品要实现时代的高度，就必须自己同样具有这样的高度。早在1927年6月2日，布莱希特就发表了给“亲爱的X先生”的虚拟信件，信中提问：“我们难道不应该摒除美学吗？”他在信中引入了一位社会学家，与弗里茨·施坦贝格类似，这个社会学家是唯一可能赞同布莱希特观点的。“如果我们说，（过时的市民）戏剧已经无法再改善，如果我们要求摒弃这样的戏剧，那么大概只有这位社会学家支持我们。这位社会学家知道，有些情况改良无济于事。他评价的标尺并非区分‘好’与‘坏’，而是区分‘对’与‘错’。如果一部戏剧是‘错’的，他不会因为它‘好’（或者‘美’）而赞颂，他会对‘错’的演出的美学吸引力充耳不闻。只有他知道，什么是错的，他不是一名相对主义者，他遵循更生死攸关的利益，他无意于证明一切，只想找出那唯一值得证明的，他绝不会为一切承担责任，只会为其中的某一项。这位社会学家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人。”

引入“错”与“对”的价值判断可以对古典市民美学予以致命打击，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来一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始于1936年）中一进行了探究，其实在美学中原则上不会使用例如“美”这样的概念，相反，“对”的价值判断却完全可行。无论如何，布莱希特同传统美学的决裂如此深刻，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可能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解。乔治·卢卡奇泛滥使用了“整体性（Totalität）”的概念，要求艺术必须表达全部，著名的“血肉之躯的人”在布莱希特的艺术理解

中也是不可想象的。改变和可变性的范畴，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社会发展并非一定是进步性的），这些自《丛林》（1923）之后便主宰了布莱希特的创作。最迟在1925年的《史蒂文森杂文》（*Glossen zu Stevenson*）中，布莱希特的理论反思已经确认，艺术的技术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是根据最佳视角对语言进行的重新组合，这一趋势也被布莱希特视为德语的英语化。

以电气化/福特式发展和统计学的名义

福特主义，行为主义：规定增长率

布莱希特还得出另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布莱希特意识到，资本主义以福特主义及其哲学或者行为主义学说等形式，急剧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形式、个体性和自我反思的消解。1920年代，美国汽车生产商亨利·福特向欧洲出口了流水线技术，并因此引导了合理化生产革命性的新形式。这使工人的收入提高，能够成为消费者，通过消费又进一步保证了生产。福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发动机。人们做什么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人们拥有什么、享受什么，这自然也对工人们产生了影响，他们愈来愈少地能通过（异化的）工作完成自我定位，不得不为了能参与到消费行为之中而用尽一切手段，以这种方式，很难再用有效的“阶级意识”锻造工人阶级。在大概创作于1927年的诗歌《700名知识分子膜拜油箱》（*700 Intellektuelle beten einen Öltank an*，首次发表于1928年）中，布莱希特把“Fortschritt”中的“t”写作了“d”：“以电气化/福特式发展^[72]和统计学的名义！”事实上，资本主义以福特主义的形式，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持续性改善（以第三和第四世界为代价），原因是作为福特主义基础的“经济增长率”当时确实看似不可估量，在本质上为“黄金二十年”提供了可能性。

以电影为例，布莱希特就“福特式发展”带来的改变作出了详细论述：“现实中，电影需要的是外在情节而非内省的心理学。在这一趋势中，通过将某些特定的需求加入到大众标尺中，资本主义给人以组织良好、自由发展，甚至革命性的印象。但资本主义同时也销毁了大部分的意识形态，它只注重‘外在’情节，瓦解过程中的一切，放弃英雄作为媒介，放弃人作为一切事物的标尺，粉碎市民性小说内省的心理学。……行为主义是一种心理学，它从商品生产的需求出发，利用这些需求影响买家，是一种主动的心理学，完全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行为主义是适应福特主义的新型心理学，原因在于它从时代的高度研究大众行为，借概率推算对其进行预测，从而有目的地——这便是主动的成效——影响或者操纵大众行为，比如商品消费行为。而个人的行为则鉴于其同大众行为相比的次要性而完全无关紧要，行为主义的创立者约翰·B.华生（John B. Watson）1913年在同内省心理学的论战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布莱希特也赞同这一观点。随着大众社会和大众生产的到来，传统的借艺术得以表达的个体性被驱离了中心位置，而仍对此故步自封的艺术也就不合时宜了。

布莱希特虽无法再把文学看作（市民阶层的）自主产物，但同时也为文学和戏剧引入了美学策略，使其能够容纳新的艺术可能性，而且不屈从于娱乐工业，甚至能够提出政治挑战和社会批判。由于布莱希特将艺术（整体）视为新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因此适用于艺术的必然是新认识：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并非个体，而是个体的社会性行为，以及集体的预定规则来决定个体，而且这些由于被充分地内化而显得犹如自然既定一般；并非理想，而是对理想的批判；并非语言上的掩饰或者委婉，而是真实的语言；并非煽动性宣传，而是对煽动性宣传的揭露。就市民艺术而言，也就是说它无意识地佐助了以个体主义掩盖新现实的行为，进而也助长了一些人毫无顾忌地利用恶劣的社会现状来实现自身的目的。

布莱希特还发现了另一种一不成功的一可能性，也就是尽可能抽离法西斯的经济基础，这在《三毛钱诉讼》中也有详细阐述。布莱希特这一时期代表了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革命在1920年代引起了整个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流水线、大众交通、大众传播、大城市，等等），使资本主义本身趋向覆灭。布氏1931年夏曾对瓦尔特·本雅明表示“共产主义并不激进，激进的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大众化的社会危害，也因为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坚守个体性和从属于个体性的一切，而一切工具的急速发展却在终结个体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长期加剧，以至于日益濒临崩溃。布莱希特显然并不知道，这些在最愤世嫉俗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但最终到来的并非社会主义，而是不择手段的纳粹主义。布莱希特早已预计到，虽然意识形态和科技互相排斥，纳粹仍采用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同时投入了所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踏过资本主义的尸体，维持自己的暴力统治。除此之外，希特勒和他的帮凶学会了一切形式的市民阶层意识形态（教堂、学校、司法和宣传等），以及所有古典的、固着于个体主义之上的美学手段，从而消除现实，也消除了对现实的认识，进行希特勒政党的及个人的表演，建立元首崇拜，其疯狂程度如果没有最终“实现”简直无法想象。欧洲进步工业国家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成就，比所有社会主义批判预计的都更加强大。而且还有一点被忽视了，就是所有国家机器都掌握在维护资本主义之人的手中，可以把（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大肆引入大众之中，并且通过令人厌烦的低级文学作品系统性地消除接受者的思考能力。

而且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市民知识分子对时代的真实情况认识和了解的甚少，并因此无法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发起反抗，甚至还会盲目或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借此拯救他们的个体性。在布莱希特的遗物中有戈特弗里德·本恩1931年8月28日在

《世界舞台》的关于《新文学季》（*Die neue literarische Saison*）的文章，其中作者对谢尔盖·特列季雅科夫（Sergej Tretjakow）的报告甚为愤慨。特列季雅科夫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在柏林逗留，并于1931年1月20日以《作家与社会主义村庄》（*Der Schriftsteller und das sozialistische Dorf*）为题作了报告，布莱希特在柏林的俄罗斯宫廷听了这次报告。特列季雅科夫反对“心理学小说”（本恩如此写道），辱骂西欧的“个体习语（Individualidiotismen）”，呼吁形成一种“新的集体文学”，同市民小说的“封建主义”相比，这种文学是唯一与时俱进的。本恩还写道，特列季雅科夫展现的只是“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宣传阶段”，本恩还质疑，如此的一派胡言如何“能在德国找到追随者”（显然报告厅座无虚席）。此外本恩还有一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事支持他〔约翰内斯·R.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但原因自然不同〕，本恩反驳道：“在所有经济体系中，人都是悲剧性的生物体，是分裂的自我，其中的裂痕无法被酥皮蛋糕和毛马甲填满，其中的不协调无法在《国际歌》的节奏中消解，人永远是蒙受苦难的生物体。”为了添加形而上的弦外之音，本恩还宣称：人类“不再是达尔文时代为进化而奋斗的胖猴子，在其本源和基本元素中就注定是形而上的主体，他不是种畜，不是必胜者，而是初原的存在者，悲剧性的存在者，因而相对于动物永远是强大的，是自然的开拓者，”本恩在结尾处写道，“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纪，人类感受到的将不是发展，而依然是上述生存状况，请安心等待它的渐渐临近，某一日，或许在文学季之外，您将会看到它。”

这篇文章本恩也在广播中宣读过，他在这篇不容争辩的文章中强调，市民知识分子由于其理想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信念而无法认识到，集体化和紧随其后的对个体性甚至对个体的消除，是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果，而并非布尔什维帝国主义。大众社会已经不可逆转，但布尔什维帝国主义要求对其重新组织，这被特列季雅科夫誉为具有

时代必要性。无论如何，本恩的人类感受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大屠杀中得到了实现。

一人一理论注定失败

他必须有几个理论，四个，多个！

特列季雅科夫：生物学社会主义

早在1923年，布莱希特就观看过特列季雅科夫的成名作《怒吼吧，中国！》（*Brülle, China!*），戏剧由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Wsewolod Meyerhold）执导，在柏林的莫斯科剧院上演。1931年1月20日，正值上文提到的报告之际，布莱希特结识了这位苏联左翼作家。特列季雅科夫在苏联作家协会中负责国际问题，因此到访德国，由于共产主义作家都不赞同他市民文学（同样在苏联）没落的论调，特列季雅科夫主要同先锋派知识分子交往，具体而言是本雅明、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Bernhard von Brentano）和布莱希特。特列季雅科夫代表一种相对坚定的社会主义路线，在这一点上，至少在苏联，是集体主义的捍卫者，他想在农村通过生产合理化解决农民长期的营养不良问题。

具有典范意义的是布莱希特为他的萨姆森—廓尔纳传记发明的新体裁：“生命访谈。”作家不再将自己定义为作品的创作者，而是社会现实的记录者或者转述者，与此类似，特列季雅科夫在他的小说《田一主》（*Feld-Herren*，创作于1928~1929年，1930年出版）中也完成了对俄罗斯农业的一种工作报告。特列季雅科夫参加生产，关注生产过程，在与专家的对话中学习生产的组织形式和进程，他组织集会，与集会参与者争论，而且体验了集体农庄的日常生活。特列季雅科夫将之称为“实践型描绘（operative Schilderung）”。之后他从这些资料中完成了这部书，书名显然已经说明，在集体农庄中组织起

来的苏联农民确实已经成了他们田地的主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社会主义真的在民主层面上创造一个时代，“生命访谈”这种体裁本也可以创造一个时代；但它如今早已被遗忘。

特列季雅科夫的作品同布莱希特最特殊的一次“改编工作”有关，即戏剧《我想要个孩子》（*Ich will ein Kind haben*）。这一版本由弗莱堡的马克斯赖夏德出版社（Max-Reichard Verlag）出版，年份不详（可能是1931年），书有附注：“授权恩斯特·胡博（Ernst Hube）由俄语翻译。贝尔特·布莱希特改编。”附注未提改编是如何完成的，同样也没有说明恩斯特·胡博的作用。或许是阿西娅·拉齐丝委托胡博翻译，并试图争取由布莱希特来执导这部在苏联还没有上演的剧作。这一定是1929年或1930年的事情，但显然是在布莱希特同这位俄罗斯同事相识之前。虽然演出最终没有成形，但书籍的出版能够证实，即使对胡博的翻译改动较少，布莱希特也一定以某种形式接触到了特列季雅科夫的作品。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认为，这部戏剧有可能成为“第二部《战舰波将金号》” [*Panzerkreuzer Potemkin*, 1925年由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j Eisenstein）导演的传奇电影]，它由特列季雅科夫创作于1925~1926年，当时苏联正在讨论新的《婚姻法》。新婚姻法承认所谓的“野婚”为事实婚姻，即使它不符合法律程序，但由于担忧承认没有结婚证书的婚姻可能导致多妻和不计其数的赡养费控告，还是决定保持传统婚姻。特列季雅科夫的戏剧初看之下似乎是为承认“野婚”作了贡献。

机关工作人员米尔达（Milda）勤奋工作，目标明确，只穿男士服装，完全没有性诱惑力，被人说是匹“马”。米尔达有一个想法，要一个孩子，但同时又不必与某一个男人相互束缚。由于她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且相信工人阶级的未来，所以这个男人自然必须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这样孩子也会像他。米尔达在工人雅各布（Jakob）那里找到了“种马”，但雅各布却对米尔达毫无“胃口”，但当米尔达

违背自己的意愿用仅有的那点魅力追求雅各布时，他拜倒在石榴裙下，成功地孕育了一个孩子。正如所预料的，雅各布要求孩子的抚养权，因而产生了争执甚至殴打，但最终一切归于美好，雅各布得到了新娘，米尔达得到了她出色的宝宝，而且还在孩童展（这一展览在苏联确有其事）上获得了第一名，因为孩子是真正的无产者：“一个苏联男孩，世界为之动容！！！”

在表面上看，剧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庸俗之作，事实上对苏联小市民过时的状况和行为方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故事的发生地是一栋多层的房子，在苏联很有代表性，房子扩建，再加建楼层，从而形成了一栋好房子。这里居住的尽是小市民，他们不停地争吵，徒劳地尝试练习一点儿民主做派，当他们得知米尔达的意图时又对其大加嘲笑，然后又贴在锁眼上想目睹育种的过程。故事中还有另一对男女，“轻浮少女”瓦尔瓦拉（Warwara），她水性杨花，和迷醉剂瘾君子费力林诺夫（Firilinow）也生育了一个孩子，同样在被误读为“牛类展（Rinderausstellung）”的孩童展（Kinderausstellung）上获得了第一名。最晚在此处已经明了：一切都并非严肃的。

整个优生学展览的举办是为了揭露国家育种专家伊凡·弗拉基米诺维奇·米丘林（Iwan Wladimirowitsch Mitschurin），特列季雅科夫因此也在极为危险的领域中创作。在向沙皇俄国推销自己无果后，米丘林在1920年代成为苏联植物学家中的执牛耳者。他首先在新水果品种的培育中取得了成功，使种植区域能够北扩，接着又创立了新的遗传学说，致力于在遗传中剔除偶然因素，并且将外部环境计算在培育植物新的、可遗传的特性之中。当米丘林的学生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Trofim Denissowitsch Lyssenko）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将他和他老师的错误上升为国家政策，给苏联农业造成严重损失后，一切才原形毕露，证实米丘林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甚至不惜伪造。尔后，直到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才解雇了李森科。

特列季雅科夫剧作的情节不难辨认出米丘林的生物学模式：“无产阶级”能够像种族或者基因特点一样遗传，如果避免育种时的意外因素，就能保证新生人类同样也是根正苗红的无产者。1950年，根据根纳迪·费什（Gennadi Fisch）的报道，布莱希特再次利用这一主题创作了以《查加纳克·伯尔司杰夫或者小米的培植》（*Tschaganak Bersijew oder Die Erziehung der Hirse*）为名的康塔塔，由保罗·德绍（Paul Dessau）作曲。作品在题词中引用了米丘林的一句话，而且由于布莱希特在其中将斯大林称为“苏联人民伟大的秋收领导者”，因此，这部康塔塔也被理解为布莱希特向共产主义体系（民主德国和苏联）致敬的作品。但其实这是部讽刺文学，其中的遗传公式和诗歌《农民对公牛的讲话》（*Ansprache eines Bauern an seinen Ochsen*）中“高大的公牛”都是彻底的嘲讽。

无从知晓特列季雅科夫同时代人是否发觉了歌曲中的批判性内容。不幸的是，正统的政党共产主义者不具备必要的幽默感，以认识到其中的讽刺和嘲弄。布莱希特可能在很多方面对这部戏剧尤为感兴趣。生物学上的无产者也明确证实，列宁和继而从1927年开始独裁统治的斯大林，他们的政治已经丧失了社会政治基础，而且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无法前进，贪污腐败一如既往地横行，小市民之间的争执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艺术创新不过是贴了新标签的对布尔乔亚艺术粗糙、低廉的模仿，相反，特列季雅科夫的艺术才代表了富有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与布莱希特志同道合。

1930年，布莱希特命人一没有记载具体是谁一翻译了特列季雅科夫的杂文《物之传记》（*Biographie des Dings*），这篇文章与布莱希特正在构思的长篇小说甚为呼应。特列季雅科夫着重指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吸收并主观化了整个社会现实。”因此，向“古典作家”学习的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作为替代，特列季雅科夫也兑现了文章的标题，把想要说的都集中在流水线的形象中。人站在流水线两

旁，“物”在流水线上传送而过，从而世界不再通过单个的人而被理解，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物，一方是剥削者，一方是大众。布莱希特没有采用流水线的形象，这或许对布氏而言太过技术术语化了，即便如此，他1930年代初对小说的理论思考仍赞同这个观点。

特列季雅科夫1931年在柏林逗留期间，与布莱希特交好，布氏1932年在《库勒·旺贝》（*Kuhle Wampe*）的莫斯科首映时再次遇到了特列季雅科夫，特列季雅科夫对布氏关怀备至，还在苏联写了介绍布莱希特及其作品的文章。1933年秋，海伦娜·魏格尔前往莫斯科进行广播朗诵，但不幸患病必须手术，特列季雅科夫也对魏格尔十分关照。当布莱希特1935年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也得到了特列季雅科夫的陪同。两人保持通信联系直至1937年，特列季雅科夫还一直负责布莱希特作品的俄语翻译。1937年7月，特列季雅科夫作为间谍被逮捕，关押在劳造营并遭到杀害。

当布莱希特得知这位被他称为“伟大、友好师长”的朋友的死讯时，他写作了诗歌《人民不会犯错吗？》（*Ist das Volk unfehlbar?*）。面对判决他的所谓“人民法院”，歌名中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只是被反问道“法律，他无罪吗？”但无论答案如何，这句反问至少提出了质疑。布莱希特的诗歌《给特列季雅科夫的健康建议》（*Rat an Tretjakow, gesund zu werden*）不是针对朋友的精神疾病，而是1929年的一幅漫画，其中特列季雅科夫躺在一张手术桌上。他腹部肿胀严重，头上放着降温包，直到颈部都盖着一张戏剧海报。梅耶荷德作为护士站在他的脚边，垂头丧气。漫画下方写着病人的呻吟：“我想要个孩子……”如此一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我想要个孩子》这部戏剧使得作家陷入了斯大林主义恐怖的魔掌，在斯大林的强权统治逐步加强之后，作家再无可能摆脱其压迫，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这部戏剧的德语版1980年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巴登国家剧院首演，但演出没有得以继续。

世界谁属？

现实研究：工人作为小市民

1930年是《三毛钱诉讼》和《措施》推出的一年。几乎不容置疑，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同汉斯·艾斯勒的友情都推动了布莱希特去关注政治，最终布氏在教育剧中也提出了核心问题，在何种条件下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才有可能发生。德意志民族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对此也完全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在德国既缺乏社会基础，也缺少能够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而且是否存在相应的意识也值得怀疑。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把整个西方世界都拖入了漩涡洪流之中。被载入历史的“黄金二十年代”的欢闹结束了，柏林前所未有的喧嚣夜生活也结束了。1919~1923年的通货膨胀时期还有可能选择继续忽视这个病态的时代，麻木地向前生活，但如今，这种麻木的状态也被政治斗争的混乱打破。最迟在1928年，钢盔团—民族主义类军事组织，德国法西斯的早期组织—在大城市（柏林、汉堡、慕尼黑、汉诺威等）大众集会中公开露面。在“帝国前线士兵大会”（也被称为“钢盔团大会”）上，有数万名反对共和者身着制服出现，人数之后扩大到数十万。国家总统兴登堡自1929年2月成为这一组织的荣誉成员，曾公开表示愿意革除共和与民主，此时也为本次集会发来了贺电。自1930年开始，纳粹开始了街头恐怖行动，例如冲锋队突袭了贝尔瑙（Bernau）的工人集会，造成了多人受伤，而且目睹此事的警察对此竟坐视不管（1930年10月17日）。自1931年，布莱希特没有一出戏剧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演出，整个艺术生活停滞荒废，剧院也无人问津。

1931年掀起了一场如何使戏剧适应电影的严肃讨论，为此引入了“短剧（Kurztheater）”的形式，可以一天内演出多次，从而降低票价，不给观众造成负担。1931年10月5日，汉斯·G. 卢斯蒂希（Hans

G. Lustig) 确实在《柏林晨邮报》(Berliner Morgenpost) 上将观众数量减少归咎于大部头戏剧三小时的时长，忽视了动荡的时代：“我现在马上去趟剧院。”布莱希特自然也在相同位置一日期是10月12日一予以回应，表示自己早已发明了这种形式的“短剧”，他的演员早已不再体验，而必须表演：“演员可以接连两次创造他的角色。”如此一来，教育剧也可以作为（叙事）短剧销售。相关事件发生时，布莱希特总会玩笑似的巧言辞令，以便能拯救他的教育剧于一时。

1920年代末，玛格丽特·施德芬投身于具有部分社会民主色彩、部分共产主义色彩的左翼合唱队（大柏林齐诵队）以及宣传组织（红色传声筒），因而也接触过布莱希特的政治性文章，但她认为这些文章不适于自己的事业。布莱希特也拒绝合作。这位1908年出生的工人的女儿断然认为布莱希特无法引领“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改变”：

“对我们而言，布莱希特‘失效了’（当时特有的表达）。”由于《措施》的首演，布莱希特通过汉斯·艾斯勒注意到了工人合唱队，当时这一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变。汉斯·艾斯勒也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也被上了一课，他的作曲对业余音乐节来说难度过大，起先应该是这些人组成了《措施》首演的管弦乐队。演唱方面则有所不同。1920年代，齐诵队在工人中保障了新的集体感，因此即使教育剧的内容和语言对他们而言十分陌生，仍可以任用这些人参与演唱。对这一作品施德芬也不知该从何处着手，但据记载，在首演后不久的1930年新年夜，她已经在朋友聚会上对《措施》进行了模仿表演，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近一年之后，或许由于海伦娜·魏格尔投身工人运动，担任戏剧和演说教师，在1930年成了德国共产党党员，布莱希特也参与了宣传歌舞剧《我们如此满意》。1931年10月，青年人民舞台的剧团成员相聚于魏格尔处排练。施德芬提早到达，希望能事先见到她当时爱恋的恩斯特·布什。“但这个混蛋再次没有出现。当我们正在排练时，有

一个穿着破旧西装的人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头发剪得极短，而且必须赶紧再次修剪。他没有摘下帽子，只是轻轻碰了它一下，所有人都齐声说：您好，布莱希特。我想，这就是布莱希特？那么，他看起来境况不佳，可能把从《三毛钱歌剧》中赚的钱全花光了。”布莱希特几乎没有参与进来，看似神游，施德芬还没有察觉，他就很快消失了。在其他一些排练中他才立即被施德芬的表演才华所折服，聘任她在《母亲》的首演（1932年1月12日）中饰演女仆。

在魏格尔处排练的是歌舞剧《我们如此满意》，戏剧文本应该由君特·魏森博恩（Günther Weisenborn）、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恩斯特·奥特瓦尔特（Ernst Ottwalt）、埃里希·魏讷特（Erich Weinert）以及布莱希特写作（没有具体的相关记载）。这部戏剧曾设想对中产阶级进行关于其经济贫困原因的宣传教育，从而争取他们组成反抗纳粹的“统一战线”；这已经是第三条，同样毫无希望的道路，但总聊胜于无。歌舞剧1931年11月17日作为青年舞台的特别节目在柏林巴赫大厅（Berliner Bachsaal）面对1200名热情的观众进行了首演。戏剧讲述了一个白铁工的家庭故事，正如《库勒·旺贝》所具体说明的，经济危机把铁工从他的家里驱赶出来，但由于左翼人士的帮助，他又获得了稳定的地位。整部戏剧都有歌曲穿插，歌曲由魏尔和艾斯勒作曲，洛特·莱妮亚、海伦娜·魏格尔以及恩斯特·布什等人演唱，布莱希特也贡献了《冲锋队队员之歌》（*Lied vom SA-Mann*）、《218法条谣曲》（*Ballade zu Paragraph 218*）以及《团结之歌》（*Solidaritätslied*）的歌词；此外戏剧的主要故事情节也很可能出自布莱希特。为了使演出不至于过于严肃，瓦勒斯卡·格尔特还加演了一些荒诞舞蹈，舞蹈讽刺了一名花腔女歌唱家，拿她的标志性动作插科打诨。格尔特在首演中将这段表演重复了三次。之后，该剧还有过一些小规模的演出。

歌舞剧同《库勒·旺贝》（题目起初是《周末—库勒·旺贝》）的工作无缝连接，因而可以推测，可能是电影项目激发了布莱希特参与《我们如此满意》的积极性；两项工作中的某些部分是同时进行的，还有不少演员在歌舞剧和电影中都有出演。虽然斯拉坦·杜多夫（Slatan Dudow）是发起人，但这部电影以及后续一些其他电影项目对外向公众都以“贝尔特·布莱希特的新电影”作为“商标”

（“老”电影自然是《三毛钱歌剧》的电影版）。这位保加利亚导演在柏林学习戏剧学，布莱希特与其在1929年的莫斯科之旅后有更亲近的交往，此人已经为艾斯勒和布莱希特担任了《措施》的导演一职。杜多夫不是党员，但同共产主义电影有限责任公司普罗米修斯（Film-GmbH Prometheus）合作拍摄了纪录片《工人的居住方式》（*Wie der Arbeiter wohnt*, 1930）。影片以“污点没有被清除，而是禁止示人”为主题，因此随即遭到禁映。电影表现了工人恶劣的居住环境，他们因此要么是濒死之人，要么是小市民，是彻底的庸人，在最穷苦的茅舍里还有钩织的盖布、俗气的餐具或者墙上的虔诚箴言。

奥托·吕勒（Otto Rühle）在他《无产阶级文化与风俗史图解》（*Illustrierte 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1930年完成）中对这一事实进行了不讲情面的分析。吕勒属于少数的共产主义者，他没有沉浸于革新或者乌托邦之中，而是努力尽可能准确地领会社会现状。一旦工人有少许可以支配的钱，最好的想法无非是将家居进行小市民式的布置，过上与之相应的生活。有些人甚至还设置了所谓的会客室，只供周日或者重要事宜使用，用库尔特·图索斯基的话来说，这里“堆积了市民时代的所有糟粕”。

杜多夫从这一电影的环境研究中发展出了拍摄无产阶级故事片的愿望，并为此争取到了恩斯特·奥特瓦尔特、汉斯·艾斯勒以及布莱希特的共同参与（同往常一样，艾斯勒不仅负责配乐，也参与了剧本

的创作)。筹备工作最迟于1931年8月着手，稍后便开始了电影的拍摄，但由于普罗米修斯的财务问题不断遭到中断。1932年初，在电影即将完成时，普罗米修斯公司破产了。

由于拉扎尔·韦克斯勒（Lazar Wechsler）及其苏黎世普莱伦斯电影公司（Gesellschaft Praesens-Film）找到了有效的补救措施，瑞士电影业的核心人物保障了这部最重要的无产阶级电影得以继续拍摄。拍摄过程还不断遭到冲锋队的干涉，以至于德国共产党不得不动用了安保力量，以保护原本已仓促进行的拍摄过程。对布莱希特1930年代的作品而言，遭受政治干涉《马哈哥尼》（莱比锡，1930）、审查干预（《库勒·旺贝》，1932）、冲锋队的恐怖威胁（《人就是人》，柏林，1931；《措施》，埃尔福特，1933年2月）已经成了某种特色。法西斯主义在正式攫取政权之前早已形成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暴力强权，而布莱希特这样的艺术家无法不受干预地创作和演出，甚至会被强求作出政治上的拥护。所有方面都早已毫无自由可言。

《库勒·旺贝》的前两章仍表现了无产者的小市民形象，它们标有讽刺性的题目《少了一个失业者》（*Ein Arbeitsloser weniger*）和《青年人最美的生活》（*Das schönste Leben eines jungen Menschen*），这两个标题显然出自布莱希特之手。第一章表现了工人为了一个职位进行的无谓斗争以及家庭的小市民气氛。为了争取就业机会还要比赛谁自行车骑得快，这是失业者之间残酷的竞争。在带着怀疑的目光登上自己的自行车前，年轻的伯尼克（Bönike）安慰自己比其他人更早拿到招聘广告，在快速骑行中取得领先地位。伯尼克的家完全按照吕勒的描写来布置，钩织的花卉图样之间的箴言同样也不可或缺：“请不要抱怨那带来辛劳和工作的早晨，照料自己爱的人是多么的美好。”年轻的伯尼克没有得到工作，当他回到家中吃午饭时，自然立即发生了争吵，在这日复一日无法避免的相同争吵后，同样失业的父亲受到羞辱溜进了附近的酒馆，花掉最后的几毛钱买啤

酒，与其他老顾客可悲地讨论政治。年轻的伯尼克感到自己被所有的家庭成员背叛了（就连妹妹对他也只是敷衍），纵身从窗户跳下：少了一个失业者。自杀之前他还小心翼翼地把腕表摘下，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期间，一块表比人更值钱。

第二章伯尼克一家由于“自身造成的无支付能力”被强令迁出了原本的处所，搬入了位于米格尔湖（Müggelsee）东南部的帐篷区库勒·旺贝（柏林方言，意为冷肚子），又在这里安置了小市民式的家。女儿安妮（Anni）与装配工人弗里茨（Fritz）交往多年，也是弗里茨把伯尼克一家接来库勒·旺贝的，这时安妮怀上了男友的孩子，情理之中要安排两人订婚。订婚典礼布莱希特按照独幕剧《婚礼》描绘，本应是这部影片的核心，也是原本的片名中“周末”所暗示的内容。就怀孕的问题，尚不知情的父亲表示：“要是发生了什么，我就打死你。”在订婚仪式上，小市民们大快朵颐—终于能有钱大吃大喝了，在毫无思想的谈话中醉倒在桌子下。这时响起了军乐进行曲，也表示了这样的活动中隐藏了多少战争性。前两章展现了所有参与者的空洞贫乏，他们缺失相互关心的能力，即人性的异化；而且是在工人氛围中。而且同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的《欢乐的葡萄园》（*Der fröhliche Weinberg*, 1925）类似，这样体面的订婚仪式也以弗里茨解除婚约告终：“结婚决不能考虑，我不想耽误一生。”

第三章的工人运动会主要归功于艾斯勒，宣传小组的红色传声筒在这一章登场，此时（1931~1932）这一组织已经正式被禁。本章尝试对前两章人物的小市民形象进行必要的修正，主要通过一些集体行为，例如与失业者自行车赛不同的公平比赛，或者通过对黑格尔著作津津有味的集体阅读—由于审查制度所以没有选用马克思。同影片的真实部分相反，此处庸俗的革命特色经过理想主义美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工人阶级改革社会关系的无力感。

第四章发生在市内铁路上，参与比赛的运动员们—还有弗里茨和安妮（暗示两人又在新的路途上彼此相遇）—都乘坐这一交通工具返程，途中遇到了各种中产阶级和市侩庸人。两方激烈争辩的核心是高昂的物价（这里指咖啡的价格），以及造成物价上涨的生产过量危机（这里指巴西焚毁咖啡豆），这些都是垄断购买者无人理解的阴险计策，坚决要求维护自己利益的工人自然也无法理解。

德国并不存在具有革命潜力的工人阶级。德国共产党完全错误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与机遇，因而使事态更为严重。虽然德国共产党的党员可以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但他们人数过少。嘉德·格拉纳赫（Gad Granach），演员亚历山大·格拉纳赫（Alexander Granach）之子，在他的回忆录《丧失故土！犹太流亡者的生活》（*Heimatlos! Aus dem Leben eines jüdischen Emigranten*, 2008）中记录，1932年以及1933年初，德国共产党每一名党员每夜都在期待共产党能采取行动，（不存在的）“统一战线”能上台执政；他还写道，在纳粹夺权之后，最先是共产党员立即叛变，他们成群结队地投身冲锋队，因为那里有靴子、衣服和食物。

更为灾难性的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法西斯论纲上升为章程，根据其内容社民党事实上为法西斯推波助澜，这也扼杀了左翼统一战线的所有可能性。斯大林1924年表达了这一思想，并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会议上得到了正式确认。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在大会上将社民党归为反革命势力，但在1932年7月大选前最后一刻他又尝试同社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这早为时晚矣，而且选举结果也证实，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相联合也无法构成议会多数（社民党占21.6%，德国共产党占14.3%—相反，纳粹党占37.3%）。

此外，左翼市民知识分子也参与得过后，他们在1932年大选时才公布了《紧急呼吁！》（*Dringender Appell!*）：“尽管有原则上的

分歧，但如果在最后时刻不能成功地将所有抵抗法西斯的力量团结起来，在德国，我们面临的将是对一切人性和政治自由的扼杀。[1932年]7月31日是最后的机会。一言为定，利用这个机会，最终迈出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一步，这不仅是议会抵抗，也是其他一切形式的抵抗所必须的。我们向每一个有同样坚定信念的人紧急呼吁，帮助我们促成本次选举中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最好要形成共同的候选人名单，至少要共同提名候选人。不仅在政党中，特别是那些大型的工人组织，现在重要的是号召所有能够想到的力量。要注意，不要因为天性中的懒散和内心的怯懦而被沉溺于荒蛮之中。”在呼吁书上署名的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库尔特·希勒（Kurt Hiller）、埃里希·科斯特纳（Erich Kästner）、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等。只可惜，他们晚了至少两年。

再回到《库勒·旺贝》，回到其中的主题曲《团结之歌》。如同从工人的家庭环境转而讨论公开的工人运动，歌曲也同前两章阐释型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出身小市民阶层的工人，其行为后果——即潜在的好战与尚武——无法得到直观表现。如果《库勒·旺贝》的前两章是分析此点，那么《团结之歌》则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了对社会不可遏制状态的理论认识，最终鼓舞了团结起来从事集体活动的勇气。这首歌被精巧地分配于第四章的各个不同场景。首先响起的是歌曲旋律的纯管弦乐主题，在运动比赛期间，工人们唱起了歌曲的副歌，从而建立了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接着，红色传声筒又演唱了歌曲的前两节，在从第三情节向第四情节过渡时——运动员前往城市铁路，合唱队和恩斯特·布什清晰可辨的声音又在画外唱响了歌曲的第三节和第四节。经过改编的副歌提出了最终的问题：“世界是谁的世界？”进而直接过渡到城铁上的政治讨论。最终，当城铁的乘客在桥下消失，歌

曲再次于画外响起，最终留下了疑问：“街道是谁的街道/世界是谁的世界？”

无可置疑，电影中的这首歌曲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号召进行（彻底革命性的）统一行动。市民商业电影中的歌曲通常一开始就与电影形成统一体，提前预演喜剧结局，同时也成为传递信息的号角，与此不同，《团结之歌》逐级上升的结构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也同实用的市民音乐构成对比），而且借助副歌中的切分音避免了像军乐进行曲那样，因均匀的打击节奏产生沉闷、老套之感，使接受者丧失独立意识。

在同阿多诺共同创作的书《电影配乐》（*Komposition für den Film*, 英文版，1947）中，艾斯勒描写了一个场景，其中一名木匠在1914年被命令入伍。他心灰意冷地收拾了自己的小箱子，在妻子和孩子们的陪同下，垂头丧气地走向军营，他步履拖沓，不协调，而且迟疑。“音乐轻声进入，暗藏着军乐的色彩。音乐越响亮，男人们的脚步越轻盈、协调、带有集体的统一性。就连女人和孩子也洋溢起战争精神，甚至士兵们的髭须都开始上扬。音乐渐强，欢庆胜利。在音乐的陶醉下，新入伍的军人走入军营，组成了一支屠杀者的队伍。”歌曲同市民音乐差距显著，但《团结之歌》就因此成了“共产主义之歌”吗？

歌词的主要内容是反思已令人无法容忍的现状，虽然确信共同的行动可能促进强盛发展，但一切至今都杯水车薪。社会弊病只是得到了简要的暗示（“我们一周的工作/已经侵入骨骼”），相反，抽象的自然景象更加突出（“我们看到太阳的光辉/落在街道，落在田野/我们却绝不会认为/这是我们真实的世界”），曲终则着重于提出问题，在经济危机的时代，绝非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歌词印象平和，引人深思，几乎不能被算作具有政治上的左翼倾向，更没

有煽动暴力。这是艾斯勒的音乐，它通过均衡节奏（各节之中）和从爵士低音部引用的切分音（副歌部分）间的强烈对比，形成了敦促和请求的特征。歌曲号召人们采取行动，但除了必须改变世界外，没有提出其他明确的目标。影片中，穿立领衣服的男人提出了刁钻的问题，到底谁将改变世界？对此，回答十分简要，“那些不喜欢它（这个世界）的人”。除此别无其他。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对电影尖刻的评论言之有物，他强调，影片小市民的（工人）父辈一代同共产主义“青年革命先头部队”之间“仇视的”“反革命的”对立，表达了两代人之间不合时宜的冲突（令人联想到表现主义），而青年革命者同青少年叛逆者十分类似，这些叛逆者“在敌对方数量众多的德国电影中，最终都或多或少地甘愿屈服”，正如1933年1月30日^[73]之后出现的情况。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但又走向何方？

共和的覆灭：

不同阵营间的工人之女

由于审查制度和两次禁令，《库勒·旺贝》的发行一再推迟，影片最终于1932年5月中旬在莫斯科首演，杜多夫和布莱希特都出席了首映，布氏还携女友玛格丽特·施德芬一同现身。但电影在苏联彻底失败，因为苏联的工人无法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且电影的气氛对他们而言也过于陌生。自1931年12月21日以来，《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在选帝侯大街的剧院上演，反响卓越，演出达60场，这是布莱希特和魏尔在这座走向没落的大都市最后的成功。《母亲》1932年1月17日在柏林喜剧院（Berliner Komödienhaus）上演，当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随着《母亲》的排演工作的开始，布莱希特同玛格丽特·施德芬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施德芬饰演剧中女仆一角，演出期间，她还在康复诊所住院治疗，每日必须接送往返。布莱希特开始对这名患有肺结核的女子及其共产主义的政治热忱颇感兴趣。玛格丽特·施德芬的父母是奥古斯特和约翰娜·施德芬（August und Johanna Steffin），父亲在建筑工地工作，母亲是缝纫女工。虽然两人如果不辞辛劳，也能为天赋异禀的女儿凑够接受适当教育的钱，但父亲反对高级中学教育，理由恰恰是女孩成为“知识分子”就会失去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无法树立必要的阶级意识——小市民工人阶级。

但玛格丽特还是尽一切努力使自己得到全面的教育，尤其在语言方面。她很早就通过演唱、戏剧和宣传活动投身文化事业，学习演讲。在学校就写作了一些小型戏剧的剧本（也得以上演）和一些短篇小说（其中一篇还获了奖）。根据对邂逅布莱希特的简要描述，说明她对布氏的爱情与外貌或形象无关，这里突出的更多可能是“精神”，也就是说，格丽特（Grete，布莱希特之后对她的称呼）年仅23岁就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很快得到展现的）文学潜力，这不仅体现在一日后被布莱希特培养出的一十四行诗中。

1932年初，布莱希特把她安置在他哈登堡街（Hardenbergstraße）的房子里，布氏在1928年9月就搬来居住（施比谢恩街的工作室留给了伊丽莎白·霍普特曼）。海伦娜·魏格尔1930年4月10日同布莱希特结婚，显然不会为这位情妇和她的传染病而高兴，而且魏格尔还要照顾孩子，1930年10月28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芭芭拉（Barbara）出生。布莱希特一如既往地巧言善辩，他向妻子保证，这绝不是为了把施德芬留在身边，而是帮助她有个住处。1932年5月，他就带施德芬前往莫斯科，因为她会说俄语，而他又需要一名翻译。施德芬从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疗养，布莱希特也为此支付了

大部分费用，由于其共产主义政治倾向，施德芬被从柏林出版社（Berliner Verlag）的会计岗位上开除，所以也没有了收入。

1932年10月，魏格尔带着孩子们迁往柏林周边的新居，同布莱希特也出现了严重的婚姻危机，因为魏格尔害怕疾病传染，而且还因为施德芬怀孕了。虽然施德芬已经堕胎过两次，但她仍决定终止妊娠。关于之前堕胎的经历，她还写作了诗歌：“那里，我的双胞胎/在暗红的血液里静静地游着。/谁看到他们游泳，便知道/爱在做些什么。”施德芬对此的理由是：“即使最伟大的爱情/在我们为面包而忧心时也束手无策。/没有地位的人，要确保自己/也没有孩子。”所以就没有再诞生布莱希特的另一个子嗣，而且她逐步恶化的结核病也很快导致，无论她多么想要孩子，也已然不可能了。

同往常的夏季一样，布莱希特1932年6月中旬前往奥格斯堡，然后到达阿默尔湖畔的下雄多夫，海伦娜·魏格尔和孩子也逗留于此。8月，布莱希特作出了一个怪异的决定，留下了几个令人不解的谜团。正当他手头的几部作品对改善社会状况无望之时，布莱希特8月8日决定购买毗邻城市乌廷（Utting）的一处房产，而且他还没有钱来支付这笔费用，正如施德芬初遇布莱希特时所提出的疑惑，他用《三毛钱歌剧》赚来的大笔钱做了什么？最终布莱希特的父亲承担了购买费用，而且同儿子签订了“债务关系”合同，据此布莱希特必须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

同时，布莱希特在新居开始了对莎士比亚作品《一报还一报》的改编工作，还问汉斯·艾斯勒要不要“看一看格丽特的蓝眼睛”；这说明她也在布莱希特处。在新作一日后的《圆头党和尖头党》（*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köpfe*）中，布莱希特改编了德国当时的历史资料，例如1932年6月14日的紧急命令，将残疾、职工和矿工保险恢复到1927年的标准，失业补助降低了23%，社会救济金也下降了。为了

改善财政状况再次征收了盐税 [剧作的一部手稿还有异名《一报还一报或者盐税》 (*Maß für Maß oder die Salzsteuer*)]，而且备受争议的房租税也被保留，这是布莱希特目前也必须缴纳的。

这一前后不一致如何理解呢？当一切信号都指向没落，布莱希特是在考虑还能在新居较长时间地偏安一隅吗？或者他认为能借此保障自己在德国的财产状况？因为他流亡时期的记录都表明他打算尽可能早地返回德国。但无论如何此时还没有任何线索能证实布莱希特正必须考虑或者确实考虑了流亡。最重要的希望是1932年11月6日的国会选举，此时纳粹党已经流失了200余万张选票（纳粹党占33.1%，社民党占20.4%，德国共产党占16.9%）。现在社民党和共产党确实拥有了多数选票，虽然仅仅是同纳粹党相比。但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仍没有准备好去思考左翼联盟是否有存在的可能，希望也因此破灭了。

但布莱希特仍不放弃，他致力于用一切方法批判希特勒及其政策。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歌曲《元首曾说》 (*Der Führer hat gesagt*)。布莱希特在工人合唱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战斗歌曲能够真切地触及大众，1932年初在维也纳，他面对着6万名体育场观众，合唱了《团结之歌》。以此为出发点，布莱希特和艾斯勒为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 (Deutscher Arbeitersängerbund) 编排了以《进军第三帝国》 (*Der Marsch ins Dritte Reich*) 为题的组曲，并灌录了唱片，希望这燃烧的旋律和揭露真相的歌词至少能成功阻止人们拥护第三帝国。布莱希特的策略是让希特勒及其政党的承诺接受现实的审判。例如，希特勒总把自己装扮成贫穷的工人，却在凯泽霍夫高档酒店 (Kaiserhof, 柏林, 总理府对面) 斥天文巨资打造了“东方奢华”，这在媒体中掀起了狂风巨浪，报纸中还刊登了房间的模式。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虽然布莱希特的政治热忱知名当世，虽然他基本被当作共产主义者对待，但他的政治声誉一直是相对“清白”的。为了能对布莱希特提起法律诉讼（或者更严重的迫害），当局一再进行目的明确的问询取证，但（尚）没有获得确凿的把柄。1932年9月21日，柏林警察局长（柏林国家刑事警察局）对慕尼黑警察总部的询问作出了本月第二次回答：“Br. 这一姓名在本地多次出现于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际工人救济组织也把他记录为共产主义演员和朗诵者。但除此之外尚没有其他确切事实。”9月13日，罪案秘书沃德科（Wodtke）也给予了答复：“在本地档案记录中布莱希特还没有前科。”如果布莱希特不仅仅把他的政治热忱局限在艺术理解和创作上，那么，鉴于柏林警察（尤其在1932年）对可疑人士进行的追踪，他一定会在档案中留下记录，并导致相应的后果。布莱希特在戏剧中反对纳粹采用了另一种语言，天真的柏林警察显然无法以此来判定作家有罪。

但是，布莱希特仍无法长期留在德国，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这样的迹象不断增加，而且他妻子还是犹太人，这完全符合“犹太—布尔什维主义阴谋”的扭曲形象，这是纳粹为了排除异己而编造的概念。首先是海伦娜·魏格尔，她作为歌手和朗诵者在当时的公众中引起了注意，此外魏格尔还饰演了《母亲》的主人公，这是玛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戏剧。高尔基的小说以俄罗斯1905~1907年的革命事件为内容，一位不问世事的母亲在儿子牺牲之后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反抗沙皇的恐怖统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剧1932年1月17日首演，自然被归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范畴（“以镰刀锤头为标志的政党戏剧，红色的，完全是红色的”），由埃米尔·布瑞（Emil Burri）执导，卡斯帕尔·内尔担任舞台设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因此右翼激进派也很难忽视剧中的女主角。而且魏格尔还在工人活动中表演了汉斯·艾斯勒谱曲的《摇篮曲》（*Wiegenlieder*），引人注目。

希特勒夺权之后，布莱希特立即作出了反应，1933年1月初，他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tscharski）商讨了流亡的必要性。2月初，警察禁止了一次活动，海伦娜·魏格尔本应于此演唱《摇篮曲》，她遭到抓捕，但又奇迹般地被释放了。1933年2月12日，布莱希特还组织了左翼作家的聚会〔卢卡奇、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莱昂纳多·弗兰克（Leonard Frank）、奥特瓦尔特、冯·布伦塔诺〕，讲述自己经常“被恐吓信通知，有5名冲锋队队员要来拜访他”。布氏还用寻常调侃的口吻问道，他是否应该因此拥有“一支护卫军”；这影射了党卫军，纳粹的血腥打手部队（自1925年）。显然布莱希特没有丢失他的幽默感。1933年2月15日，埃尔福特警察暴力终止了《措施》的演出，并且宣布活动的组织者的罪名为“筹备叛逆”。

最迟在埃尔福特事件之后，魏格尔和布莱希特首先考虑要把孩子们送到安全地带。施特凡由奥格斯堡的祖父照料，芭芭拉在伊丽莎白·霍普特曼那里找到了容身之所。玛格丽特·施德芬如今情况也十分危险，因而1933年2月16日前往卢加诺（Lugano）附近的阿格拉（Agra）疗养。2月中旬，布莱希特还必须接受疝气手术，这也为流亡的准备增加了困难，布氏至少直至当月23日都在住院治疗，因为当天汉斯·艾斯勒还前去医院探望过。虽然有间接情况证明布氏直至27日仍在住院，但这一可能性已被排除，因为如果这样便引出了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

维兰德·赫茨费尔德（Wieland Herzfelde）曾记录，考虑到突袭已经成为希特勒恐怖统治的每日议程，从1月30日起，他便已经不敢在家中过夜。布莱希特2月27~28日夜也没有在家中度过，彼得·苏尔坎普当时正与布莱希特再次合作，收留了他。

1933年2月27日21时许，国会大厦被熊熊烈火吞没。布莱希特是否对此有所预感？事实是：布莱希特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在日光下坐在写字台边，穿着考究的西装，气定神闲地看着镜头。照片背面手书了当时的地址，以及“1933年2月/箱子都打包好了”。逃亡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在国会纵火案消息传来的几个小时里就可以实施。

谁是纵火案的元凶，这在历史编纂学上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火源有多处，排除了单人作案的可能性，纳粹党有可能自行放火，借随之而来的恐怖统治、血腥暴力和杀戮来保障自己尚不稳固的统治，但德国保守历史学家仍反对这一观点。那么他们应该解释，为什么冲锋队于纵火案当夜在柏林目标明确地逮捕了1500名共产党员，显然事前作好了详尽的准备，如此规模的出击在几个小时的仓促时间里完全无法组织。但当晚，希特勒在公布纵火案消息后确实立即向其实施者一准备好的？一高声叫嚣：“现在再不需要怜悯；阻挡道路的人必须除掉。德意志民族不理解温和宽厚，对每一个共产主义干部都人人得而诛之。共产党代表今晚就必须施以绞刑。共产主义者的一切同盟都必须监禁。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社^[74]也决不能心慈手软。”

布莱希特的行为也使2月27日当晚的意义真相大白。布氏时间上精确协调的逃亡和纳粹的大屠杀同时进行，它确实被精确到了最后一分钟。28日凌晨，当纳粹在整个德国发动一场浩劫，布莱希特和魏格尔正动身前往布拉格。逃亡的组织工作必定早已提前开始，作为离境的原因，布莱希特设法取得了卡尔·克劳斯约他到维也纳讲学的邀请，这至少也需要几天的准备时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这是一次小心策划、蓄意已久的逃亡。

还记得那次可疑的新年聚会吗？恩斯特·冯·萨罗蒙1929年9月1日就曾卖弄，应该策划一起对国会大厦的纵火袭击，破坏一部分建筑，由于没有人员伤亡也不会遭到法律的进一步制裁。萨罗蒙同冲锋

队的高层交往甚密，他可能认识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75]本人。罗姆很想争取萨罗蒙，一再对其许以高官厚禄。在某一时机罗姆还向萨罗蒙透露，到1933年6月底“国内革命”将会胜利结束，而且说这些话的时候纳粹还没有取得执政权。萨罗蒙可能在新年庆祝活动的后期，酒过三巡，走漏了风声。

魏玛共和国的时代结束了，在这期间各个艺术门类都取得了最高成就，包括绘画、音乐、舞台设计、戏剧和文学。除了绘画之外，布莱希特参与了其他所有艺术领域。由于布莱希特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面对百万观众，因此作为散文作家也比其他所有同行更为知名，卡内蒂冗长的讨伐布莱希特的檄文也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在散文领域，他创新的体裁至今还没有得到文艺学的深入研究。他的剧作在德国权威剧院上演，作为导演，他在最出色的舞台，面对最出色演员的反对，贯彻了自己的叙事表演方式，而且即便经历过阻挠，仍实现了国内最权威导演对他的支持。通过教育剧，他创造了音乐剧的新形式，由于一直饱受争议，直至今日都后继无人，因此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凭借《三毛钱歌剧》，魏尔和布莱希特这两位年仅一甚至不满一30岁的世界巨星，创造了音乐剧的特殊形式，历久弥新，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凭借《马哈哥尼》他们实现了歌剧的新形式，在传统歌剧的荒疏中找到了自己的特色，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及。布莱希特的诗歌大多以歌曲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口耳相传，以至于很快忘记了歌曲真正的原创者。旋律和歌词在娱乐工业中成了最好的民族财富，如今所有流行歌星和说唱歌手都不愿放弃他们自己的魏尔和布莱希特。汉斯·艾斯勒的战斗歌曲成为国际上广为传颂的作品，它的时代也即将到来；但其中最能点燃激情的歌曲已经被归结为魏玛共和国的功劳。卡斯帕尔·内尔毫无争议地成为德国最好的舞台设计师，他的舞台样式征服了世界，引领了全新的戏剧体验。

无论如何，布莱希特创作或者参与创作的所有艺术，都超越了美学和社会的既定框架，突出了自己运用的体制和工具。布莱希特和他的同事确实成功地—至少在某一段时期—进入了艺术和娱乐工业领域，并为其输送了新的意义。从技术上看，艺术家们都处于时代的高度，而传统艺术则显得抱残守缺。与此相对，流亡时期和二战之后的剧作（有少数）虽然有超凡的语言水准，但较为传统，与突破机构束缚相比，更多是为其服务；即便这种美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论家已然是过分苛求。

纳粹时代的到来具有不可比拟的决定性影响。战后，布莱希特目睹了柏林的满目疮痍，他曾断言，同剧院的废墟相比，人才和演员的荒芜影响更为深远。破坏剧院只需要几个小时或者几天，而为了摧毁人才和演员，纳粹的刽子手却暴戾恣睢了十五年。更糟糕的是，魏玛共和国的历史被遗忘和封闭。在联邦德国，尤其是1950年代，纳粹的历史被“克服”了，也就是说用暴力排斥了这段历史；而民主德国则认为自己同法西斯毫无干系，因而赞同古典的理想主义模式和丧失批判精神的民族性。由此，在整个德国，现实主义的历史意识遭到了排斥。

布莱希特受到的波及最为严重。由于所有的意识形态思潮都侵袭过他，因此只有那些符合当下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才是有效作品，而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有的创作都被降格为真正美学作品的“门厅”，只为作者日后所谓的成熟文学打开了入口之门。“黄金二十年”的美学光辉，尤其是它的开放性几乎被完全磨灭，传统的艺术和文学概念被保留至今，而且重新流行。这一趋势的影响长远又广泛，原因在于，当代新艺术的制造者被谴责为“披露丑闻的人（muckraker）”，这一概念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在20世纪初发明，用来形容公开批判美国社会弊端的记者和作家，字面翻译应该是淘粪的人、弄脏窝的人或者搅

屎棍。而且无论对各意识形态作何理解，新美学对中产阶级来说太过低俗，对工人以及公职人员又不够无产阶级。事实上，不会有人在起居室里挂格罗兹或者施里希特尔的画，而艾斯勒、魏尔和布莱希特的音乐和文学既粗野又不适于封建剧院建筑的（高贵）氛围。喧嚣散尽，那曾是最好的时代。

选中的并非资质平平的德意志民族

而是犹太民族

并非种族问题：布莱希特和犹太人

为纪念布莱希特诞辰100周年，奥格斯堡发行了一册书，根据其副标题，书中有当代知名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目光：布莱希特》

(*Augenblick: Brecht*, 1998)]。书籍以典范的方式证实，就魏玛共和国和布莱希特而言，还存在哪些漏洞。出版商赫尔穆特·金德勒 (Helmut Kindler) 在此处写道：“大多数人认为，布莱希特是在黄金二十年代的柏林被发现的。这完全不可能，无论是柏林的大剧院，还是与柏林竞争的戏剧之城维也纳的舞台，当时都不敢接近布莱希特。”且不看金德勒似乎只认识这位剧作家，而且维也纳当时完全无法同柏林竞争，布莱希特是被卡尔·克劳斯在1930年代初介绍进奥地利的；克劳斯带着《爱情三行诗》在全欧洲兜售，并坚定地宣布：

“为了《仙鹤与流云》的二重唱……我放弃所有文学家的文学，这些人还误以为自己与他是同时代的人。”

在纳粹攫取政权的历史背景下，还有一个“布莱希特研究”没有注意到的题目，也是另一个历史漏洞，即“布莱希特和犹太人”问题。在上述文集中，恰恰是德国犹太中央委员会时任主席伊格纳茨·布比茨 (Ignatz Bubis) 的话佐证了这一点：“当被问及，如今我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看法如何，我注意到，他同犹太人的关系鲜为人

知。”这应该是说，在布氏作品中没有涉及犹太人问题。布比茨显然并非控诉布莱希特对犹太人问题兴趣不佳，几乎是为其辩护，但布比茨从中得到的印象是，“伟大有时候又是何等的渺小”。但他其实并不了解其中的真相。

布莱希特青年时期由于长期在漫游途中，便自称“永恒的犹太人”。当他第一个儿子弗兰克在农村困苦的环境中诞生，他就将其比作伯利恒的“犹太男婴”。布氏1928年的短篇小说《野兽》（Die Bestie）便以俄罗斯西部和西南部的犹太大屠杀为历史背景，这一事件发生于1903~1906年，施暴者主要是城市下层居民和农民。犹太代表团向各个城市的长官寻求保护，却只有少数几人回应。布莱希特的故事讲述了苏联电影公司要制作一部关于此次大屠杀的电影，为了更加真实，由大屠杀的幸存者饰演电影中求助的犹太人。布莱希特的故事以精巧的方式展现了苏联电影制作者完全腐化的自然主义美学，使得电影中真实的犹太人（在美学上）再次被审判：这也反映了布莱希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看法。

1935年，在《纽伦堡法案》（Nürnberger Gesetze），即“种族法案”颁布之后，禁止“非犹太人”（所谓的“雅利安人”）与犹太德国人结婚或有婚外性行为，否则将受到惩处。布莱希特立即写作了诗歌《犹太妓女玛丽·圣德斯的谣曲》（Ballade von der Judenhure Marie Sanders），是这一创伤主题最深入人心的作品之一。诗歌将纳粹的侮辱、蔑视人性置于中世纪对女巫施以火刑的场景中，更加凸显20世纪德国恐怖统治的倒行逆施。布莱希特可能把这首谣曲写在了一张照片上，照片按照种族观念展现了一名看似像“犹太人”（矮小、大耳朵、高鼻梁的大鼻子）的男子和一名看似像“雅利安人”的女子。这对男女被人驱赶到街上，像牲口一样在颈上挂上牌子游街，上面写着：“我是本地/最下贱的猪猡/我只和犹太人交往！”和“我一个犹太男人/总/只带犹太女人回房！”

布莱希特给人一种不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印象，原因在于他不将犹太人问题认同为道德问题——二战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的道德探讨都是虚伪的，还有就是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根本不理解种族问题。”存在不同的种族，这是事实；而从中区分高等和劣等民族，这纯粹是意识形态问题，因而不值得讨论。基督教西方国家在犹太人身上发展了一部压迫和贬抑的历史，它极端毁灭人性，并被纳粹所利用。布莱希特不参与讨论，理由足够充分。

开始逃亡后，布莱希特立即起草了一份自我访谈，开篇的问题便是：“您是犹太人吗？——不是。——为什么您的书都是黑名单上的非德意志书籍？——纳粹只把一部分德国人看作德国人，而那些在社会问题上同希特勒现实意见相左的，都被他们视为非德意志。同数百万德国人一样，我对社会问题跟希特勒先生有不同意见。”布莱希特没有接受纳粹强加的看问题的角度。

因此布莱希特的作品多为讽刺性文章；因为纳粹的种族仇恨的严肃性在于其现实影响，而非意识形态；而且还要考虑到，犹太人首先是宗教共同体，他们的种族性又何在？布莱希特的文章，论证了纳粹在犹太人问题上最疯狂言论的荒谬性，下文中的诗行出自《德意志讽刺诗》（*Deutsche Satiren*, 1937）：

如果不是犹太人劝阻

英王将会向我们的总理展示他的印度王国，说：

请您自便。

法国内阁太喜爱他的髭须，

早早会向我们的总理，

赠送洛林的矿山。

但犹太人阻止了他们。

在元首告诉我们之前，我们不知道

犹太人是如此一个聪明、强大的民族。

虽然只有寥寥几人，散落在地球的表面

他们似乎仍用他们的天才统治着一切。

他们最轻细的一声口哨

就让英国雄狮躺下摇晃着尾巴

高耸入云的繁华纽约，畏怯他们眉间一蹙远胜于地震

连教皇都对他们唯命是听。

如此情景，整个世界愕然诘问

地球将会发生什么

如果元首为了他伟大的计划

选中的并非资质平平的德意志民族

而是犹太民族。

就这一问题，布莱希特其他的作品是1937~1938年《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Furcht und Elend des III. Reichs*）中的《犹太女人》（*Die jüdische Frau*）和《法律发现》（*Rechtsfindung*）。其中《犹太女人》描写了一名犹太女人想在被自己的“雅利安”丈夫告发前离开他，对布莱希特而言，这看似是一名坚强女子非典型的心理布局，她决定在还有可能的时候，不再被蒙骗，并承担后果。但在同女性朋友电话告别和一次“逃跑演习”时，她脑中却不断勾画着丈夫归家劝说她留下的场景，细致到每一句话。

1953年，在给彼得·苏尔坎普的信中，布莱希特提到了在民主德国再次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乡下开始‘释放’罪犯。但当监狱被强占，有一些特殊的犯人逃出了‘巴士底狱’，比如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曾经的女指挥官额尔纳·朵恩（Erna Dorn），她在市场上发表了煽动性讲话。一些地方出现了对犹太人的袭击，但不多，因为幸存的犹太人也不多。”《逃亡者对话》中曾进道：“‘德意志性意味着要彻底’，无论是给地板打蜡，还是灭绝犹太人。”这个时代开始了。

[1] 慕尼黑北部城区，因聚居了众多文人和艺术家而闻名。

[2] 在德语中“Speichel”指口水、唾液，“Lecker”是动词“lecken”（舔、舐）的名词，指做舔舐动作的人。

[3] 弗里茨·哈尔曼（Fritz Haarmann）是汉诺威的连环杀人犯，1924年被判处死刑。

[4] 17~18世纪的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

[5] 权力、控制、强制力、强权、武力。

[6] 书名中存在一个德语的语法错误，正确形式本应是“schaffte”。

[7] 胡戈·普鲁伊斯（1860~1925），德国政治家、宪法与国家法学者，德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

[8] 本恩的《停尸间》以死亡为主题，描写了其在巴黎的一个停尸间里做医生解剖尸体标本的经历。其在一名溺水少女的尸体中发现了一窝幼鼠，在另一首诗中尸体的牙缝间夹着一支紫菀。

[9] 类似中国的庙会，一年举行一次或多次，有商业集市，也有一些艺术表演活动、旋转木马等。

[10] 这部布莱希特撰述的语录式散文在二战后经学者编辑出版时定名为《墨子/易经》（*Me-Ti, Buch der Wendungen*），因为布莱希特在流亡期间随身带有

一本阿尔弗雷德·弗尔克（Alfred Forke）译的《墨子》，他十分推崇墨子为平民立言的理论倾向，并且语录中作为作者化身的主人公也叫“墨子”。

[11] 拉丁语，指观看、观念等。

[12] 席勒戏剧三部曲《瓦伦斯坦》的第一部分。

[13] 喜剧的一种，以滑稽情节及笑闹场面揭示剧中人物行为的矛盾，也称趣剧、闹剧。

[14] 希腊传说中爱神阿芙洛狄忒所恋的美少年。

[15] 穆斯林的缠头巾。

[16] 鲁特琴（Laute），一种类似琵琶的拨弦乐器。

[17] 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诗中的人物，一名水手。

[18] 20世纪初期德国记者、编辑、剧评家。

[19] 20世纪初期奥地利著名作家、时事评论家。

[20] 出自歌德的《浮士德》。

[21] 用以在岩板或蜡版上书写的石质笔，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用于书写楔形文字。

[22] 根据圣经故事，迦南的基遍人与以色列人订立和约成为盟友。亚摩利人攻打基遍，为帮助盟友，约书亚率军突袭他们。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为获得全胜，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向上帝如此祷告。于是太阳就停在基遍的上空，月亮没有爬上来，大约持续了一天。

[23] 罗杰·莫蒂默与伊丽莎白王后合谋废除并杀害了爱德华二世，在爱德华三世成年之前，他是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

[24] 拉丁语，意为“证明完毕”。

[25] 位于阿尔卑斯山山前，慕尼黑西南。

[26] 原文为“m. b. H. ”，是常用缩写“G. m. b. H. ”（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部分。

[27] 又称地产抵押马克，为抵制通货膨胀而发行，以土地和工业产品为抵押，与美元挂钩。

[28] “Universum Film AG”的缩写，指全球电影股份公司。

[29] 人种名，即英语中的吉卜赛人和法语中的波西米亚人，俄罗斯人称其为茨冈人，他们自称罗姆人，辛提人是罗姆人对已经在欧洲和北美定居的吉卜赛人的称呼。罗姆人原本为流浪民族，不能融入主流文化，在二战中受到纳粹德国的迫害。

[30] 圣经中的两个城市，因为城里的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充斥着罪恶，被上帝毁灭。它们后来成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

[31] 即喜剧歌剧院。

[32] 1920年代在柏林乌尔斯坦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月刊，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份重要定期出版物，本雅明、布莱希特等人都曾为其撰稿。

[33] 指赫尔曼·森勒弗洛恩德的姓氏“Seelenfreund”，意为“灵魂伴侣”。

[34] 20世纪初期法国画家、雕塑家、电影导演。

[35] Und zum Spazierengehen/Genügt das Sonnenlicht, /Doch um die Stadt Berlin zu sehen, /Genügt die Sonne nicht. /Da ist kein lauschiges Plätzchen, /Das ist' ne ziemliche Stadt. /Damit man da alles gut sehen kann/Da braucht man schon einige Watt. /Na wat denn? Na wat denn? /Was ist des für' ne Stadt denn? /Komm mach mal Licht/Damit man sehn kann, ob was das ist, /Komm, mach mal Licht/Und rede nun mal nicht. /Dann wollen wir doch auchmal sehen, /Ob das' ne Sache ist: /Berlin im Licht.

[36] 1920年代诗歌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以布莱希特为代表，即为某种特定目的而作，理智且清醒。

[37] 两人皆为布莱希特《三毛钱歌剧》中的人物，麦基是伦敦最恶名昭彰的罪犯，绰号“尖刀”；布朗是警察厅厅长。

[38] 陶恩沁恩大街，柏林西部的一条主要购物街。

[39] 19世纪末美国最流行的舞蹈团体，最初由约翰·迪勒（John Tiller）创建。

[40]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出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41] 他们三人是《人就是人》中让盖里·盖伊顶替吉普的三名英国士兵。

[42] 教育剧是“教育”与“戏剧”的交集，是将戏剧方法与戏剧元素应用在教学或社会文化活动中，即通过想象与扮演的方式有意识地再现并传递善的人类经验的社会活动。

[43]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畅销书《香水——一个杀手的故事》等。

[44] 原文为“Cognac auf seine Mühle”，这一文字游戏借用了德文短语“Wasser auf j-s Mühle”，表示对某人有利，符合某人意图。

[45]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凡人英雄，特洛伊的统帅，他在同阿喀琉斯的决斗中死去，尸体被绑在战车后拖回到希腊军营。

[46] 原文为拉丁文：Exegi monumentum aere perennius。

[47] 故土作家的作品主要以方言文学为主。

[48] “Kriegsverwendungsfähig”的缩写，入伍合格之意。

[49] 又称清洁派，是一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派别，兴盛于12~13世纪的西欧，被教皇宣布为异端。

[50] 位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1309年罗马教皇克雷芒五世被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掳到阿维尼翁，是为阿维尼翁教廷。后在1378年，乌尔班六世和克雷芒七世分别在罗马和阿维尼翁聚集势力，造成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1417）。百年战争中，法兰西支持阿维尼翁，英格兰和神圣罗马帝国支持罗马。

[51] 柏林守军的训练基地和阅兵区。

[52] 恩斯特·台尔曼 (Ernst Thälmann)，德国共产党主席，被盖世太保杀害。其雕像大多紧握右拳。

[53] 德国作家、实业家、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

[54] 17世纪德国诗人、神学家，其作品具有深刻的宗教色彩。

[55] 指前句中的复合词Autofreak，其中“Auto”指汽车，“Freak”指狂热的爱好者。

[56] 源自意大利。17~18世纪时泛指各种小型歌剧，如滑稽歌剧、民谣歌剧、歌唱剧等。19世纪下半叶后指有对白、歌唱及舞蹈的小型歌剧。在法国，与法国传统喜歌剧（趣歌剧）相近，多为独幕剧；在德、奥，形成了维也纳流派，强调舞蹈特征，尤其是圆舞曲；在英国，接近英式喜歌剧；在美国，则带有爵士风格。一战以后，美国常将其等同于音乐喜剧（音乐剧），现已难以区分。

[57] “Singspiel”是德语音乐戏剧的一种形式，也是歌剧的一种类型，通常情况下以分节歌的形式 [有些像民谣 (folk)] 与合唱歌曲、谣曲和咏叹调交替出现；而“Songspiel”是魏尔在1927年为《马哈哥尼歌唱剧》创造的概念，他在一定程度上对“Singspiel”进行了个人化的更正。

[58] 狂飙突进运动作家雅各布·米哈伊尔·莱茵霍尔德·伦茨 (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 的姓；同时也有春、阳春之意。

[59] 指剧院。

[60] 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Lindbergh)，1927年历史上首次成功完成横跨大西洋的单人不着陆飞行。

[61] “Café Größenwahn”的正式名称为“Café des Westens”（西方咖啡馆），是一战以前艺术家和波希米亚主义者著名的聚集地。

[62] 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政治家，代表公民平等的思想，领导了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改革。

[63] 1928~1930年执政，由社民党人赫尔曼·穆勒 (Hermann Müller) 领导，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第二个大联合政府。

[64] 基督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英国人布斯创立，1878年其仿效军队形式进行整编。

[65] 全称《利己主义者法策尔的堕落》（*Der Untergang des Egoisten Johann Fatzer*）。

[66] “Keiner”在德语中可作代词，表“无人、没有人”之意。

[67] “Murxismus”是借用了“Murks”（粗制滥造之物）一词的文字游戏。

[68] “Ideal”指理想，崇高的目标，愿望，梦想等。

[69] 意译“清唱套曲”，是一种包括独唱、重唱、合唱的声乐套曲，一般包括一个以上的乐章，各乐章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大都有管弦乐伴奏。

[70] 沈阳的满语名称。

[71] 又译朗诵调，是类似朗诵的曲调，宣叙调着重叙事，音乐只是附属性质。

[72] 原文为“Fordschiritt”，是表进步、发展的“Fortschritt”同“Ford”（福特）结合而来的新创词。

[73] 当天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74] “Reichsbanner Schwarz. Rot. Got”黑红金三色国旗，简称“Reichsbanner”，国旗社是旨在护卫共和国民主的政治团体。

[75] 纳粹党早期的高级头目，冲锋队的组织者。

法西斯德国（1933～1945/47）

不残暴无法进行资本主义事业

焚书：

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

“随着事态的发展和其间一些小变故的出现，我在国内的留存成了问题。在本质上，我再也不能深信不疑地投入那些浓烈、动人的情感中。由于无法应对如此强悍的领导力，我感觉自己很多余。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了周围亲近的人，也接受了几次拜访，随后便意识到，如同时而发生在很多民族生活中的那样，一个大时代真的已经开始了，而我这类人却有损这幅大图景。虽然他们答应保护我，特意设立了集中营让我免遭人民怒火的殃及，甚至可以在那里接受种族意义上的再教育，但是我感觉，这样的待遇并不是对我以及我同类人真正的爱。除此之外，我仍希望能继续研究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所以我离开了这个国家，踏上了旅途。”布莱希特遗著中保留了这样的计划，要创作名为《“环”游德国》（*Reisen um Deutschland*）的文章献给每个流亡地。前文引用的应该是他流亡丹麦早期编制的首份札记，作为草稿的剪报源于德国的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机构，但也有很多出自丹麦和瑞士的报纸。这份札记融合了官方报道，其中大多是照片，采纳了许多群众团体的文章，也包括布莱希特自己的创作，这意味着他开始用一种崭新的方式记录一个时代。起先是在《工作笔记》（*Journal*）

中，而后又在《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Kriegsfibel*）中，布莱希特逐渐把这种方式塑造为新的文学体裁。

1933年五月焚书之后，在布莱希特“踏上旅途”的同时，戈特弗里德·本恩在广播中发表了公开讲话，强调要拥护“新国家”，而且斥责自己流亡的同事们是法国里维埃拉海岸的疗养客，一走了之，缺乏面临德国新挑战应有的“牺牲意愿和受难精神”。按照本恩的想法，人们只能“和那些留在德国境内亲身经历这一切的人谈论德国局势”。但“经历者”们太过单纯，轻信了恶人。这些面目可憎的人自诩为新的“德意志种族（deutscher Typus）”，其实内心粗野，令人不屑，在他们攫取政权之前，都不会有人愿意与他们同桌用餐。本恩曾是医生，却竟然建议培育如此这般的“德意志种族”：戈培尔，矮小，足部畸形，完全就是书里描绘的矮子恶人^[1]；戈林，身材短粗，体形肥硕，像个屠夫，没有哪个马戏团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小丑；希特勒，矮小，身材畸形，双下巴，目光咄咄逼人，大嘴，精神癫狂，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者信仰共同体能放任这样的人成为自己的“元首”。

在国会纵火案和随后于5月24日通过的授权法案之后，有批判精神的德国知识分子立即认识到了二者的意义，他们有的逃往法国、瑞士、荷兰或者美国，有的逃往比利时、丹麦或者瑞典，还有一些共产主义者逃向了苏联，但这些人几乎都没有作好长期流亡的准备。市民知识分子则与此不同，他们要么像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一样，远赴美国旅行讲学，不曾再回故乡；要么像托马斯·曼一样，认为事情根本没有如此危险，因为人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有着悠长思想传统的文明国家。

在国会纵火案发生时，托马斯·曼正为纪念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逝世50周年赴美讲学，曼的儿女告诫他，绝不可

按照原计划返回慕尼黑。这样，托马斯·曼不得已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先来到法国渔村滨海的萨纳里（Sanary-sur-Mer），但在这里郁郁寡欢，因为离开了德国他便无法再继续创作。曼的犹太出版商萨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不愿承认反犹太主义的严峻性，因此曾召唤曼回到德国，从而能在这个困难的时期支援德国民众，费舍尔还承诺会即刻出版托马斯·曼写的所有作品。直至1934年10月15日辞世时，费舍尔仍相信，他的出版社不会受到损害。费舍尔的女婿戈特弗里德·拜尔曼（Gottfried Bermann）成了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后来为人们熟知的拜尔曼·费舍尔。为了维护作家的权利，拜尔曼离开德国流亡瑞典，继续经营出版社，日后托马斯·曼的作品才得以有了斯德哥尔摩版本。

对布莱希特来说，权利的维护却收效甚微，作为他经济支柱的出版社——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出版社趁时局之便废除了1929年5月与他签订的“合作合同”（一种形式的总合同），并终止向布莱希特支付每月1000金马克，按照合同条款这项资助本应持续至1936年。作者为此同出版社书信交涉，无果，因为所谓共产主义者的剧本几乎没有上演的机会，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传播途径。1933年4月末，黑森州达姆斯达特剧院取消了《屠宰场的圣约翰娜》的演出合同，这份合同当年1月份才刚刚签订，剧院给出如下理由：“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鉴于贝尔特·布莱希特被视为共产主义思想世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一事实，本剧已经不可能上演。”

焚书的第二天，纳粹党查禁了布莱希特所有的作品，同时被查禁的作家还有：考茨基、凯斯特纳、海因里希·曼、格莱泽（Glaeser）、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Friedrich Wilhelm Förster）、弗洛伊德及其学派、埃米尔·路德维希·库恩（Emil Ludwig Kuhn）、西奥多·沃尔夫（Theodor Wolf）、雷马克（Remarque）、凯尔、图霍夫斯基（Tucholsky）、奥西茨基

（Ossietszky），这只是柏林“活动”当天提到的名字，而且只是查禁大名单的一小部分。现在再谈剧本的上演已是痴心妄想。从此，直至1949年布莱希特的《日历故事》（Kalendergeschichten）出版发行，他的名字和作品在德国消失长达16年。

虽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曾预言，焚书伊始，焚人以终，但1933年5月10日焚书时，没有人彻底意识到它其实兆示着更加严酷后果的到来，这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巨大的（思想上的）空白，而这段空白至今也没有被完全填补。众多的大学城（具体数字是22座，一些大学一如弗莱堡大学一由于降雨取消了焚书）在照相机和记者的注视下，伴随着狂热的喜悦，将它们思想和文化的源泉在柴垛上付之一炬。尤其是人文科学在火舌中损失惨重，而人群的狂啸声却响彻整个德国上空。

柏林的焚书活动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歌剧院广场举行，由全国（几乎）所有电视台实况转播，并配有欢腾、热情的解说，没有人能对其充耳不闻。德国大学生以“抗击非德意志思想斗争委员会”的身份出场，焚毁了那些“不道德和腐化的图书”。活动的口号是“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支持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生活观”。“火的判决”结束了“犹太化的唯理智论时代”，庆祝“德意志革命的突破性胜利”，革命经过周密的准备，快速彻底地肃清了反抗势力，新统治者易如反掌地取得了执法权。戈培尔在柏林高声宣誓，要进行革命，贯彻人民意志，如果看到街头或者人满为患的大学报告厅里，公众群情激昂的拥护和追捧，戈培尔的誓言似乎已经实现。

而遗留的问题是，为何大多数教授和绝大多数大学生，而且首先是出自人文科学领域，能够在短暂的纳粹统治后完全背弃自己的精神历史。1933年5月10日，大学生们像沙箱^[2]中的孩童一样，把精神领域杰出人物的书籍钉在搭建起的“耻辱柱”上。1933年5月27日，马丁

•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在弗莱堡担任校长，并发表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生们在最危急的时刻维护祖国命运的坚定决心，是学校目前的根本所在。……被多次歌颂的学术自由必须被驱逐出德国大学，因为这种自由是非真实的、否定性的。”1933年5月10日标志着德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从此刻起，人文科学退出德国科学舞台至少20年。作家和思想者的民族变成了审判员和刽子手的民族。

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 (Oskar Maria Graf) 2月在维也纳讲学，由于纳粹暴行而无法回到自己挚爱的巴伐利亚。5月12日他在《维也纳工人报》 (*Wiener Arbeiterzeitung*) 上发表文章《烧毁我吧！》 (*Verbrennt mich!*) 回应德国的焚书运动。格拉夫听闻，他的书由于内容里隐含的辛辣的幽默对当权者及其簇拥者来说过于晦涩，不仅没有被焚烧，而且甚至因为他被誉为巴伐利亚故土作家而被推荐：“我不能蒙受这样的羞耻！/根据我毕生的生活和写作，我有权利要求，将我的书赋予柴垛那纯净的火焰吧，不要让它落入褐衫杀军血染的双手和腐朽的头脑中。/你们燃烧德意志精神的作品吧！而精神本身将同你们的耻辱一样永不磨灭！”布莱希特1938年响应了格拉夫的呼吁，创作了讽刺诗歌《焚书》 (*Die Bücherverbrennung*)。

虽然暴君们一再表示文化一文不值，独裁首先驱逐和谋杀的还是艺术家、文人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除非它们能为自己歌功颂德（其中大多不过是纪念碑式的谄媚或者艺术掠夺品）。那么问题是，尽管他们一再保证，艺术、文学、启蒙和批判性思维毫无价值，或者至多不过能对接受者的头脑有细微影响，为何又将艺术视为极度危险的呢？艺术、文学和启蒙思想确实应该揭露统治话语不过是空洞的噪音，同时应该剥夺其统治符号的崇高庄严，并激起反抗吗？

罪行在街头放肆

糟得无法形容

纳粹，不可言说：语言的界限

卡尔·克劳斯赴维也纳讲学的邀请完成了帮助布莱希特夫妇安然过境的任務，克劳斯从而可以取消活动。布莱希特自1925年同克劳斯相识，通过赫尔伯特·耶林，布氏注意到了这位字字珠玑的维也纳评论家。克劳斯辛勤编撰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篇幅已达千页，其中克劳斯利用语言批判拆解了（几乎）所有同时代耸人听闻的报道，证实它们既没有能力运用德语，也没有能力传递理性内容，从而推断出这个世界的腐朽状况。布莱希特的评论并非十分友善：“普遍看来，语言批判仅限于批判那些表达拙劣的评论。”虽然两人保持着善意的距离，相互嘲弄，但这无法阻止克劳斯在看到布莱希特的长处时公开支持布氏的艺术：例如同库尔特·魏尔合作的《马哈哥尼》歌剧中第14场和第18场的表演。在布莱希特流亡维也纳最初的日子里，克劳斯还提供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布莱希特选择这里，原因是海伦娜来自维也纳，而且她的父亲曾居住于此。

此时发生了（对布莱希特也）影响深远的事情。这位字字珠玑的语言评论家丧失了语言能力。克劳斯在1933年1月30日后终止了《火炬》的出版，在1933年10月的第888期补充了一首诗歌作为原由。这期杂志只有4页，包括维也纳建筑师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的讣告和克劳斯的墓前悼辞，以及下文中的诗歌。

人们问道，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保持沉默；

不说，为什么。

那是一片静寂，当地球迸裂。

没有词语能够贴切；

人们在睡梦中言语。

梦想那大笑的太阳。

这都过去了；

之后一切都无所谓了。

当那个时代醒来，语言长眠入睡。

这首诗作的著名在于其是第一个提出疑问的声音：随着纳粹的统治，人性和要求与人性相一致的语言是否仍能够使用？沉默是否会成为必然后果？当克劳斯1934年再次凭借重量级诗歌《第三个瓦尔普吉斯之夜》（*Die Dritte Walpurgisnacht*）重回公众视线时，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语言的困境，克劳斯借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指出，语言有何作用的问题必须有存在的前提：

神啊，谁可以说：不可能更糟了？

现在确实比曾经要糟糕

但只要人们还会说：这是最糟的。

就可能还会更糟；

这还不是最糟的。

那些面对不公仗义执言的人一定还在，而且还能表达自己。在流亡中他们失去了太多，不仅是他们的房子、（无论多寡的）财产，他们失去了曾经交往和共同工作过的所有人：工作岗位、熟人、同事、熟悉的环境、交流，还有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偏好、他们的缺点，以及所有决定了迄今日常生活的事物。他们如今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活动，或许不能理解新的同胞，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人的语言。艺术家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观众。

除此之外还有语言的困境，克劳斯用“没有词语能够贴切”以及“当那个时代醒来，语言长眠入睡”等诗行准确地进行了表达。这不

仅说明，纳粹不仅遏制了语言，语言传播的时代也已结束，不可能用论述来阻止那些刽子手实施自己的计划，这还说明，正如布洛赫1938年在他的反思《纳粹与不可言说》（*Nazi und das Unsägliche*）中表达的，“巨大规模的卑微将它（纳粹）同历史上曾经的负面因素区分开，首先唤起了憎恨和恶心的复杂感受，进而也封住了语言的出口”。克劳斯诗歌的最后一句描述了新独裁者的语言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语言无能，克劳斯直接引用了他们的习语“德国醒来吧！”

（Deutschland erwache!）” [出自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1922年献给希特勒的歌曲《风暴，风暴，风暴》（*Sturm, Sturm, Sturm*）]。面对畸形语言的噪音，所有人都缄默，人性的语言必须隐退。

1933年或1934年初，布莱希特以诗歌《关于火炬888期（1933年10月）十行诗的意义》 [*Über die Bedeutung des zehnzeiligen Gedichtes in der 888. Nummer der Fackel* (Oktober 1933)] 对克劳斯的诗作出了回答，也引入了以诗歌来阐释诗歌的新创意，借此发掘隐藏的含义并予以评论。

当第三帝国建立

善于辞令的他只发出了一个小告示。

在一首十行诗中

他发声仅仅为了控诉

这声音还不足够。

当暴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例子用尽了。

罪恶滔天

痛苦的呼喊却沉默了。

罪行在街头放肆

糟得无法形容。

他被扼住了咽喉

言语也无法吐露。

静寂在蔓延，从远处

它看似是赞同。

暴力似乎

全面获胜。

只有那残缺的身躯

在报道罪犯的蹂躏劫掠

只有荒芜住宅上空的寂静

展现着罪行。

.....

当善于辞令者致歉

他的声音失灵了

沉默走到审判桌前

摘下脸上面纱

承认自己是见证者。

至少在德国，语言问题早已成为实质问题，因为不仅没有词语能够贴切表意，说话者也早已受到牵连。当罪行在街头放肆，情势恶劣

得无法形容。不仅再也无法同屠杀者交谈，他们还会自鸣得意，挺起骄傲的胸膛，公开展现自己的罪行，并要求被赞同。在这一意义上，布莱希特把克劳斯和他的沉默解释为见证，积极把他争取到自己一方。

结果，对布莱希特而言，语言的困境因此得以解决。当暴力危及人类，对人实施身体上的压迫甚至扼杀，此时诗学要么隐退（克劳斯的结论），要么动员一切语言工具，以经受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此外还要考虑到，纳粹用语言建立的谎言大厦无法承受澄清和查明，而且还强使语言和思想实现统一，所以会害怕至少在语言上揭露其用心的每一个声音。这或许于事无补，布莱希特在这两行诗歌中已经有所表达，但如果不隐退，他又该做些什么呢？在《斯文德堡诗集》（*Svendborger Gedichte*）中，布莱希特也表达了未来几年内必然要面对的矛盾：“在昏暗时代/那里也会歌唱吗？/那里也会歌唱/歌唱这昏暗的年代。”

不经意选出一个词

它应该是：我触碰你

十四行诗情书：

直呼其名

1932年12月底，玛格丽特·施德芬在夏里特医院接受了由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主刀的一次风险极高的手术，当时手术的死亡率超过80%。手术进行得顺利，但必须进一步治疗，长期疗养，而且正如先前所预料的，绍尔布鲁赫介绍她去卢加诺附近阿格拉的一家豪华疗养院。疗养以及之前两次手术都需要巨额的花销，由于施德芬没有收入，必须由布莱希特承担，这也成了布莱希

特总生活拮据的原因之一。由于汉斯·艾斯勒同她的情人一样，也喜欢看格丽特的蓝眼睛，所以也为疗养提供了微薄的经济帮助。

施德芬在疗养院遇到的各色人等可以借托马斯·曼的《魔山》来想象。每一餐都用来展示他们最新的收藏品和附庸风雅，谈话内容也乏味枯燥，疗养客大多思想保守甚至反动，所以令人反感、不值一提，此外这一干人还坚持要为德国的新暴力统治者举行“庄严庆典”，相反，格丽特用摩根斯坦（Morgenstern）、科斯特纳、克拉邦德、布什、林格尔纳茨（Ringelnatz）、戴迈尔（Dehmel），当然还有布莱希特的诗歌组织了朗诵会，即使在考究的观众那里都很受欢迎，而且还努力通过戏剧表演来营造一些气氛。

布莱希特用《M. S. 的规则》（*Regel für M. S.*）来鼓励她，劝说她同疾病作斗争：“同疾病作斗争本身就是健康。”他还继续写道：

“你的故事不会断裂，也不会有空白。故事的历史背景是：M. S. 身处阿格拉病态的资产者之间。”事实上，施德芬利用她必须在疗养院度过的三个月继续培养自己的文学技能，写作诗歌和小说。因此便诞生了德国文学史上，继歌德和玛丽安娜·冯·维勒美尔（Marianne von Willemer）被记载于《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的书信往来之后，第二次伟大而重要的诗歌交流，“比迪（Bidi）”和格丽特之间的十四行诗合集，这是对他们爱情故事的改编。这里诞生的伟大文学以伟大经历为基础。

疗养期间，两人要么互通书信，要么布莱希特前来探望，施德芬会在日历上标注“LB”（Lieber Bidi，亲爱的比迪）。两人之间十四行诗的交流可能从施德芬在夏里特医院住院期间便已开始，因为难耐“孤独的时刻”，也就是两人因为旅行或者施德芬的疗养而被迫分开的时间，这一习惯持续至1935或1936年。早在1927年8月，布莱希特就写作了《奥格斯堡十四行诗》（*Augsburger Sonette*），并致信海伦

娜·魏格尔：“如果孤独而百无聊赖”，他会写“情色十四行诗”。现在布莱希特捡起了这一计划，但自然并非所有的诗都属于这一体裁。



1932年底，或者1933年2月，布莱希特写了《第一首十四行诗》（*Das erste Sonett*），并寄给了自己的情人；诗的第四个四行诗节写道：

当我们被分割成你和我
我们的床第立于此与彼
不经意选出一个词
它应该是：我触碰你。

玛格丽特·施德芬同样以十四行诗的形式解释了“词”的具体含义：

我奉献于你，善待你
自从找到面向你的勇气。
那些缺失的，我必须恢复
只要不抽离你对我的爱。
我们当时选出的微薄之词
它让触碰不经意
（让诱惑无法抵御）
月儿是你放逐者的安息之地。

对我而言，那个词是拥抱，是亲吻。

我只有久长地等候你

我吻你的每一封信笺。

我哭泣，当我读到

仅仅你要再来我的身边

我再无所愿，好似安睡在你身旁。

施德芬和布莱希特利用十四行诗挖掘了意大利的文学传统，意大利文学在很多情况下因香艳内容而知名。1920年代初，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的《艳情十四行诗》（*Sonetti lussuriosi*）以私印本的形式流传，布莱希特的《奥格斯堡十四行诗》也充分利用了其内容。在《艳情十四行诗》中，诗人把“*I Modi*”一性交时的各种体位一直接应用在诗歌里。拉斐尔（Raffaell）的一名学生因对教皇支付的酬劳不满，把它画在了梵蒂冈一座大厅的墙上，后来马尔坎托尼奥·莱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将其制成铜版画，从而经受住了时间的侵蚀。此处可以品味一下托马斯·海特彻（Thomas Hettche）的译文：

把手指插进屁墩儿

慢慢慢慢地把淫具戳进我体内

做好你的事：把这条腿高高抬起

不间断地来回抽插。

我的爱人，这比

珍馐美味、玉液琼浆更重要。

你不喜欢小穴，就从后面占有我。

只有说谎者才说不喜欢碰后面。

此处这次，别处下次交媾！

阴道和肛门里我都感到快乐

在同一时刻。

谁因权力而欲火中烧，他在胡言

每一天都徒劳，如果小鸟（啄！啄！啄！）

在交媾之外找到其他事做。

当1982年发现布莱希特遗物中的色情诗，当时还处于分裂的整个德国充溢着震惊，面对启蒙诗人的词汇选择，这显得多么荒谬可笑。弗兰齐斯科·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或者但丁·阿利基耶里（Dante Alighieri）把对情人多娜·劳拉（Donna Laura）和贝雅特丽齐（Beatrice）的感情全部倾注到爱情十四行诗中，布莱希特和施德芬也适度继承了这一传统。布莱希特在《第十二首十四行诗—关于但丁致贝雅特丽齐的诗》（*Zwölftes Sonett. Über die Gedichte des Dante auf die Beatrice*）中直接采用了但丁的形象：“尘封的陵墓上/她躺在里面，他无法跟她做爱/每次他在她道路旁徘徊/她的名字在空气中回荡。”即使一些下流的诗稿也并非放纵，而是将十四行诗升华为世界文学上最高贵的诗歌形式之一。

施德芬的诗虽然解释了“词”的隐含意义，但没有点明，而是隐藏于后来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日期和地点是“楚尔岛，1936年8月”，即《当那位经典作家1935年10月7日周一离去，丹麦在哭泣》（*Als der Klassiker am Montag den siebenten Oktober 1935 es verließ, weinte Dänemark*）。

爱人，你可否读到？

它隐匿了近千年。

1500前后才被发现。

它被发现了！（哥伦布是发现者。）

他的荣誉已经烟消云散。

长久以来人们只谈论那颗鸡蛋。[\[3\]](#)

那里最新的一切都被照耀着光辉。

他们是否能理解一出教育剧呢？

你相信他们能认出你

不顾你的身材称你为伟人？

船即将起航，驶向美国。

我将身影孤独，爱着你。

你一定要给我写信：就像曾经的那样。

我是旧人，我即将到达。

这首诗与布莱希特1935年10月的美国之行有关，当时《母亲》在纽约首演。施德芬已经谙熟诗歌之道，且在这首藏头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每一行诗句的第一个字母从上至下，组成了“Guess Gott Bidi”（你好比迪）。“Grüß Gott”是巴伐利亚的问候语，施德芬将其当作隐含的性愿望使用。“Bidi”是布莱希特的昵称，情人们和孩子们都会如此称呼他。这样孩子气的昵称在艺术家中深受喜爱，其中较著名的是魏尔和莱妮亚的互称，比如称呼魏尔的小青蛙、小烧酒、小尾巴、小葡萄等，还有称呼莱妮亚的小贝壳、小喇叭等。

除了在情书中署上的“g. g.”外，“Grüß Gott”也可以被用于各种场合，而且无人能发现其中是爱人在互诉相思。布莱希特和施德芬

之间也找到了一种方便使用的密码，它还出现于两人后续的信件和往来的十四行诗中。1933年3月16日，布莱希特给施德芬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格丽特：

这是《第三首十四行诗》，它十分拙劣。你读它时一定要拿一支铅笔，填上最后一个韵脚。我来的时候要看你是不是已经填好了。

我很快就来。

……爱你的老怪物！

这首十四行诗内容如下：

当我想到，我们合二为一

不经思索，我使用的词语

表达我们做过的事

是最通俗的，而且十分粗野。

你震惊如初

好似现在才看清我们做过些什么

许多星期，你躺在我身旁

这些词我几乎没有教你第二个。

用这些词我唤回了当时的震惊

那时我刚同你做爱

无法再掩盖更久：

最近一次是你允诺的！

你怎么能适应这些：

形容你曾经行为的词是……

“情色文学（Pornographie）”是一个语言问题，是“市民”的禁忌问题。布莱希特坚持要“直呼其名”，理由如下：因为这些不是人们最初读时“最低俗的（gemeinsten）”，而是“最通俗的（allgemeinsten）”；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词，但为了（表面的）体面却从不使用。这个空缺的词早已被韵律决定，每一个人都能填出，^[4]但并不会说出来。另一个暗示是作为“通俗”同义词的“粗野（vulgär）”。与《第十三首十四行诗》中借用但丁的《俗语论》（*De Vulgari Eloquentia*, 1303~1305）相同，布莱希特这里也强调，但丁划时代地用民族语言代替研究性质的拉丁语，说明已经被视为经典的语言的发展，早已允许使用通俗或者看似下流的词汇。

施德芬的性经历是不幸的。她1926年同办公室职员赫尔伯特·蒂姆科（Herbert Dymke）同居，两人的结婚计划由于经济原因告吹。1931年两人分手，此时她未与布莱希特相识。这段感情是工人阶层最普通的经历之一。性拘束、虚假的羞怯和小市民的道德剥夺了其中任何的性享受。布莱希特懂得自己的责任，其中也包括令施德芬对有关性的词语以及性本身不再抱有畏惧。施德芬的另一首十四行诗证实，她与布莱希特的爱情同反思——也包括文学反思——以及爱的能力有关；毕竟她结识的是位作家，这位作家的创作主题便是市民社会爱情的没落。这反而也意味着，她从布莱希特身上无法期待符合市民观念的两性关系，这里涉及的是学习享受性。在另一首十四行诗的三行诗节中，格丽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你现在来到。我是否爱你

我不知。但能留在你身旁

我每夜期盼

你触碰我，我必会伏下身子

没有羞怯，没有悔意

没有任何其他苏醒着的感受会阻挡我。

如果布莱希特带着小市民的承诺或者嫉妒前来，例如在《第五首十四行诗》中，他努力说服施德芬要对自己忠贞，因为他选择了施德芬，而她的快乐也同自己休戚相关，而施德芬也懂得了拒绝。布莱希特习惯使用一些拼写上的特殊用法，这些词很多都具有双重意义。例如他长期将“Preis”写作“Preiß”，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双重意义；而“assozial”似乎是“asozial”（违反社会惯例的）和“assoziativ”（联合的，结合的）的组合词，“representativ”则看似与“repräsentativ”（代表性的）和“repressiv”（压制的、镇压的）有关，事实却并非如此。布莱希特的遗作表明，他不注重正确的拼写方式。他在给施德芬的信中还一直把十四行诗写作“Sonnet”，与正确的“Sonett”也有一些偏差。施德芬因此提醒过他：

亲爱的比迪：

……我还想为你的修养做些事情：如果你（因为掌握了罕见的法语知识）用法语写十四行诗，你可以写成：S o n n e t à；但目前，它简单朴素的形式是：Sonett。

我时常通读第五、第六和第七首十四行诗，原因是我不能毫无顾虑地接受它？你必须有耐心。

……GG.

这位自信的女性绝不逆来顺受，对于布莱希特的越轨行为，她还击道：

你想象一下：所有你曾拥有过的女人

都来到你床边。

啊呀，极少数现在还心平气和
你认为，不能直视她们任何一个。
但所有人都严肃而沉默。
每一个今夜都想从你那里得到
欢愉。当你同她做完
她退到一侧，指向下一个。
她们贪婪地抚摸你。
你迷失了。她们选择你作乐
同你沉沦于恶的迷醉中
连我也站在队伍里
看自己毫无羞耻地走向你。
你躺着，可怜、病态、苍白。

这首十四行诗标志着施德芬语言上的“突破”，她已经很快能用传统但又洒脱不羁的意象 [此处影射了歌德《罗马哀歌》（*Römische Elegien*）中的普里阿普斯^[5]之歌（Priap-Gedichte）] 提出足够的性要求：“人们说，他的花园/充满芳香的花朵/应该得到充足而欢喜的灌溉。”

格丽特在阿格拉一直逗留至6月初，她可以同布莱希特一起经巴塞爾前往巴黎，并在那里负责德国汽车中心（Der Deutsche Autorendienst, DAD）的管理工作。在巴黎，格丽特期望比迪能选择她，而不是像后来所发生的，同魏格尔和孩子一同远赴丹麦。魏格尔与孩子还有女管家玛利亚·霍尔德（Maria Hold）在老朋友卡瑞·米夏埃利斯那里找到了免费的住处。卡瑞·米夏埃利斯1872年生人，是

丹麦的著名女作家，作品被多次翻译，她在楚尔岛上经营管理度假屋。施特凡在维也纳时就来到父母身边，芭芭拉虽然经历风波，但也在3月16日被带到奥地利，由玛利亚·霍尔德照管，并同女管家一起投奔维也纳的母亲，跟随布莱希特夫妇流亡丹麦。事实上，由于海伦娜·魏格尔考虑离婚，布莱希特同魏格尔和玛格丽特·施德芬都发生了争执，6月20日才随后到来。他选择了自己的家庭。当时，丹麦虽然看似近在咫尺，但对德国的反法西斯者而言几乎是另一个世界，因为只有通过水路才能到达，从敦刻尔克或者安特卫普前往日德兰半岛西岸的埃斯比约（Esbjerg），一次花费高昂的复杂而漫长的旅途，到达后还有200公里的汽车或者火车路程。

尽管如此，布莱希特还是成功地保持了同施德芬的“友好”（他最爱的词语之一）关系，说服她接受自己的决定，并继续合作。施德芬留在了巴黎，并努力为布莱希特保留回巴黎的可能性，但尝试建立德国汽车中心未果，他们曾希望借此为反法西斯作家创立一个论坛，一个批判性的论坛，能为在国外宣传德国的新局面作出贡献，或许还能组织反抗。可在流亡初期，流亡者们意见并不统一，特别是固执的共产主义者拒绝同市民阶层反法西斯者合作。或许这也是德国汽车中心毫无所成的一个原因，布莱希特曾极力告诫格丽特远离共产主义的特疏道路，这条道路对她而言从未被完全排除。而她也安慰自己，布莱希特使其在巴黎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获得了一些社会关系。

姐姐，我们都生来自由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罪戾七行，歌曲集和赞美诗

在施德芬前往巴黎之前，布莱希特就完成了流亡时期的第一部作品，“芭蕾舞剧（ballet chanté）”《罪戾七行》（*Die sieben*

Todsünden der Kleinbürger)。爱德华·詹姆斯 (Edward James)，1907年生人，是英国的百万富豪、艺术收藏家和资助者，他于1931年同奥地利舞者蒂莉·洛施 (Tilly Losch) 结婚，并一直为妻子寻找登台机会。当他在巴黎遇到魏尔时，他看到了这个机会，提出资助魏尔写作一部芭蕾舞剧，其中由蒂莉表演舞蹈，洛特·莱妮亚演唱歌曲。虽然莱妮亚当时已经同魏尔分开，1932年《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在维也纳首演时，她爱上了剧中饰演吉米的男高音奥托·帕泽蒂 (Otto Pasetti)，并与其同居 (魏尔与莱妮亚于1933年9月离婚)。但魏尔十分大度，邀请莱妮亚和她的新爱人来巴黎排练“芭蕾歌剧” (帕泽蒂饰演爱德华一角)。在魏尔的第一人选让·谷克多 (Jean Cocteau) 拒绝之后，布莱希特得到了词作者的职位，从而出乎意料地同魏尔再度合作。

芭蕾舞剧1933年6月7日在香榭丽舍剧院 (Théâtre Champs-Élysées) 首演，剧作的排练和演出也体现了参与者混乱的性生活。布莱希特与玛格丽特·施德芬同居，这还是其中较为正常的，奥托·帕泽蒂没能与自己的新欢同床共枕，洛特疯狂地爱上了美艳绝伦的蒂莉，与其同榻而眠，这种艺术投资的后果是爱德华·詹姆斯无法想象的。库尔特·魏尔对此是否幸灾乐祸已找不到相关记载。此外，蒂莉1934年同詹姆斯离婚，原因是男方为同性恋。

芭蕾舞剧本身受到非议；魏尔立即意识到了动荡时代的机遇 (此事布莱希特相对认识较少)，在《马哈哥尼》模式的基础上构思了现代社会批判舞剧的新形式。主角被分割为经济人安娜一 (Anna I) 和她的艺人安娜二 (Anna II)。安娜一必须保障安娜二获得成功，因而督促她，例如在第二宗罪中，克服自己的骄傲去跳脱衣舞。当她把短裙越撩越高时，才得到了必要的成功；因为她“雪白的臀部”“比一个小工厂还要值钱”。由于完全受到消费的驱使，安娜二无法“违

背”资本主义商品世界通向富足的法律。所有的禁忌都被转向了其反面，直至最终如愿以偿地在美国南部购得了房子。

该剧以组曲的形式展现，穿插了交替的舞蹈和表演场景，这些被媒体评价为重要、独特、大胆甚至冒险。魏尔和布莱希特再次创造了新的体裁，将三种独立的艺术融合在一起：对音乐、舞蹈、文学和商业艺术—安娜为了跟随演出团赚钱而辗转七个城市—进行了反思式和批判式的探讨。艺术在现代娱乐工业中的价值成功地超越了普通商品。这出芭蕾舞剧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同时代的游艺演出来展现艺术的没落，同时批判了其蔑视人性的本质。而资助者詹姆斯同样也自讨苦吃，因为对他而言，人际交往的友善只能以自身的财富为基础，而他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身为铜矿主和铁路工业巨头的父亲的财富，不过是依赖于残酷的剥削。安娜二的情人之一名为爱德华；他十分富有，并且包养了这位美丽的舞女，她最终也令其走向灭亡—自杀。

维利·米岑伯格（Willy Münzenberg）在巴黎组建了流亡出版社“Editions du Carrefour”（Carrefour意为十字路口^[6]），在芭蕾舞剧创作期间，布莱希特同米岑伯格商定，出版一部反法西斯诗集，主要在德国发行。布莱希特在诗集筹备工作开始时已经身处丹麦，他吸收了汉斯·艾斯勒加入，把诗稿寄往巴黎，并提出共同将诗集改编为歌集。艾斯勒同意了，而且玛格丽特·施德芬也在近旁。1933年9月，布莱希特再次前往巴黎，三人一同着手改编工作。

《歌、诗、合唱—附32页乐谱》（*Lieder Gedichte Chöre. Mit 32 Seiten Notenbeilage*）1934年初出版。除了《1933》的章节和结尾的时事诗《哦，德国，苍白的母亲！》（*O Deutschland, bleiche Mutter!*）外，诗集中其他诗歌都出自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政治性的战斗诗篇引发了异议，凭借《死兵的传说》等书写了魏玛时期的历

史。歌集包括三部分和一部讽刺性附录。第一部分《1918~1933》表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原因和条件。在虚假的民主共和国中，普鲁士军国主义在持续，传统上被描写为阶级对立的社会矛盾继续存在，这些都构成了本章的主题。第二部分《1933》以当时德国的统治现状为内容，包括迫害异己、建立多处集中营、政治恐怖和反法西斯斗争。第三部《〈措施〉与〈母亲〉中的歌曲与合唱》

(*Lieder und Chöre aus den Stücken »Die Maßnahme« und »Die Mutter«*) 表现了魏玛时期所谓工人运动的现状，再次呼唤革命的解决方式，并提醒人们重视，仍有可能秘密筹备以趁机推翻统治机构。附录以诗歌《巨型城市纽约消失的荣光》(*Verschollener Ruhm der Riesenstadt New York*) 严厉谴责了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内部空虚，而且历史陈旧。在另一首(未谱曲的)诗歌《诗人之歌》(*Lied der Lyriker*) 中，布莱希特抨击了他的同行无非是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作品帮助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稳固了统治。诗作《哦，德国，苍白的母亲！》以满是血污的苍白母亲表现了德国分裂的、既可怖又可笑的形象。

布莱希特和艾斯勒尝试用诗歌传达对这个非人时代的看法，其中也暗藏了阻止纳粹长期掌权的希望。如果说布莱希特自同艾斯勒合作起就开始使用共产主义词汇，那么这一文风现在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纳粹宣传自觉地把“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当作既定事实，即便不然，马克思主义词汇的使用也有现实原因。马克思—最迟在《共产党宣言》(*Kommunistisches Manifest*, 1844) 中—认识到，资本主义首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彻底变革了社会关系。其次，国际环境使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变得跟不上形势了。世界范围内，即使不在同一时期内，原始国家逐渐消失，由于经济科技化的发展，出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对立。“革命”这一概念(在传统上)单单针对共产主义的政权颠覆，而不用于资本主义的激进变革，但被纳粹阴险地加以利用。《共产党宣

言》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就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下文引用的是布莱希特的诗化版本。

但全部这些并非发生在一两个国家
因为，销售泛滥商品成为不可抑制的需求，
它不断将资本家驱赶过边界，
似疯狂般走向全球。四处大兴土木，
四处安家落户，四处连接着那胶粘的流水线。
全世界都在消费和制造商品。
破坏了本国产业，从最偏远的土地
获得原料，供应他们的工厂。
区域间气候的不同造就了贫苦和乖戾，
热销的商品登上了高耸入云的山尖。
古老的卡木被它们破坏，通关令是：廉价。
一捆捆的印花布在万里长城上打开了缺口。
各民族相互依赖。精神财富也
成为公共财产。科学也让整个世界形成一幅图景
民族文学成了世界文学。

全球化并非20世纪的新发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对全球化进行了观察。在原始国家内部原本不存在社会和经济的矛盾，但全球性贸易带来了全球性剥削，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出现了抢夺者之间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国际矛盾，并开始蔓延至全球。因此，结论表明，（被剥削者无法承受的）国际局势的改变更多地源于剥削

者。所以，共产党宣言在篇末呼吁：“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除此之外，同一战后美国化的欧洲相比，部分国家（苏联、中国、第三世界）的发展不平衡。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即使极为缓慢，但仍取得了成功。毕竟，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一些俄国流亡者返回了苏联（高尔基，1928；爱伦堡，1930）。莫斯科为社会的另一种可能性提供了范例，这不仅在共产主义者中，而且在资产阶级左派中也成了普遍概念；但这另一种可能性—消除资本主义剥削，依然遥遥无期。苏联已经在坚定地组织大规模的新型剥削，但当时的局外人对此无法察觉，而且可以证实，即使内部的俄国人也无法看到这一点—例如特列季雅科夫或者阿西娅·拉齐丝及其德裔丈夫伯恩哈德·赖希。

在德国，纳粹开始成功地封锁所有现存的社会矛盾。在流亡初的几年中，布莱希特发现自己为歌集所作的诗是何等贴切：“粉刷匠希特勒/说：新房子马上就完工了！/漏洞、裂痕和裂缝/他直接把一切都涂满。/把这破烂全部涂满。”诗歌也与造型艺术惊人的一致。约翰·哈特费尔德（John Heartfield）以《希特勒纲领》（*Hitlers Programm*）为题创作了一部蒙太奇式作品，展示了威廉二世时期房屋外墙前一支作画的笔，并配有文字：“人民已经被成功地欺骗了，现在房子也要粉刷。”房子的照片下面写着：“希特勒在5月1日的纲领性讲话中说：‘为了消除失业，我们要整修房屋。’”多义词“Anschmieren”^[7]尽管与表示粉刷之意的“Anstreichen”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不容忽视，两者共同构成了纳粹意识形态及其“成功”的核心。

“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在教会阶层迅速蔓延，并且仿佛因此获得了赐福，这在《希特勒圣歌》（*Hitler-Chorälen*）中得到了

范例式的体现。这一组诗位于《歌、诗、合唱》的中部，尤为引人注目。布莱希特知道文本听觉传播的重要性，由于教堂歌曲特别是其旋律，脍炙人口，布氏根据旋律重新创作了歌词的新内容，并使这些不协调的音符融入原本的声调中，语言上的修改或者通俗化的改编几乎使其同原歌词无法分离。受到这样音乐的耳濡目染，人们便不再无条件地忍受传统的严肃和庄重。

第三首赞美诗的第一节便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它改编了保罗·格哈德（Paul Gerhardt）1653年的歌：

将你的道路

和你心间的忧伤

托付给天堂之主

最忠诚的守护。

他为云、空气和风

赐下阡陌纵横的途径。

他也会为你找到

踏足的路途。

（格哈德版）

哦，每每受伤的小牛犊

将你的道路

托付给磨刀的屠夫

最忠诚的守护。

他给那些做牛马的穷苦人

虚构了一枚新十字架

他会找到

如何屠杀你的路途。

（布莱希特版）

两个版本有多句诗行完全相同。布莱希特极少数的新表达足以在内容上同原文产生距离，但同时又利用了旧版的历史经验。

原文同新改编的结合也表现在一些图像中，例如希特勒给工人们虚构的“新十字架”。“十字架”首先肯定是指纳粹标志反万字符（Hakenkreuz），而形容词“新”则为其添加了传统的基督教意义，因为“十字架”是基督受难的标志。基督为了拯救人类在十字架上死去，而新的“救世主”则把十字架压在了人们身上，将他们送去赴死。拯救者受难的背景说明，新的虚假救世主完全没有准备自我牺牲，而是要求他的人民为他而牺牲。这一颠倒不违背基督教受难的原始意义，因而也并非渎神，更多的是作为衬托背景，揭露希特勒标榜自身为救世主的无比僭越。布莱希特1933年创作了这首诗，当时正值希特勒统治伊始，他看似正在引领德国走出经济困境。

这同教会在希特勒独裁早期的态度还有关联。基督教领袖主动把法西斯主义同基督教协调起来。教会作为机构团体，以惊人的速度向“新帝国”妥协。1933年3月，好似十万火急一般，德国新教教会同盟（Der 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nbund）改组为德国新教教会（Die 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üller）4月出任希特勒新教问题的“代理人和全权负责人”，并在希特勒统治中公开代表自己的教会。新组建的全国教会代表会议证实了穆勒的政治角色，他在1933年9月又被授予“帝国主教”的圣职。这样，希特勒成功地树起了庄严的幌子，而教会也进行了无耻的配合。

天主教会的行径也类似。经过初期的观望之后，天主教会1933年7月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条约，其中教会主教有责任向纳粹统治者履行“效忠誓言”。誓言督促他们“尊重依照宪法建立的政府”，并负有责任防止影响“德国国家体制”和“繁荣”的“任何损失”出现，天主教会从而也告别了其国际性的自我认知。

1933年3月21日的“波茨坦日”也同《希特勒圣歌》有直接的关系。布莱希特追踪德国的各项事件，利用可能利用的一切。“波茨坦日”是由戈培尔精心策划的庆祝活动，在当地的兵营教堂举行。出席活动的有兴登堡、外交团队、王储威廉和国会成员（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不包括在内）。庆祝活动以“新”“旧”德国（德国国防军与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合作为标志，接下来的国会制宪会议在克罗伯歌剧院（Krolloper）举行。新教主教奥托·迪布柳斯（Otto Dibelius）主持了布道，1926年迪布柳斯因出版了图书《教会百年》（*Das Jahrhundert der Kirche*）受到重视，书中他批判了十一月革命，因为这影响了所谓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体制，即帝国主义君主国。迪布柳斯在兵营教堂的讲话在广播中进行了转播，其中有片段讲道：“国家历史的新开端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暴力。因为国家即权力。……我们从马丁·路德博士那里学到，当教会行使自己的职责，不应该掣肘正当的国家权力，即使它变得强硬或毫无顾忌。我们知道，路德在农民战争中曾疾声呼吁当局者：果断前进，还德国以秩序。”

同往常一样，这样的公共布告吸引布莱希特的并非其策略手段，而是其中的暴露性字句，虽然极为克制，但仍在通过联系历史为暴力统治正名。布告以国家“秩序”的幌子为（公然的、血腥的）暴力辩解，而“秩序”的代表则是国家及其权力（纳粹独裁）。马丁·路德主张果断镇压农民起义，迪布柳斯试图借路德对农民战争的立场，证实教会应该附和“当局者”——即便路德的言论更“可怕”，对当局者

的符合也更明显。 [《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 (*Wider die räuberischen und mörderischen Rotten der Bauern*) , 1525]

对布莱希特而言，这等同于对“德意志悲苦 (deutsche Misere)” 的明确赞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93年致弗兰茨·梅林 (Franz Mehring) 的信中提出了这一概念。恩格斯把德国历史称为“唯一持续不断的悲苦”，并认为它以路德对农民战争的立场为开端。“德意志悲苦”的概念成为德国历史进程的关键词，德国历史的各次革命要么未能成形，要么失败。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日夜站在舰桥上

强化的女性角色：

豪斯曼、施德芬、贝尔劳、魏格尔

布氏1933年同安娜·西格斯 (Anna Seghers) 在巴黎的碰面很可能是为了创作《工作岗位或者你汗流满面也不得糊口》 (*Der Arbeitsplatz oder Im Schweiß Deines Angesichts sollst Du kein Brot essen*)。西格斯跟布莱希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她家乡美因茨的真实事件，并想由此创作一部小说。案件1932年8月在法院审理，并在媒体中曝光，相应也引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一女子名为玛利亚·艾斯曼 (Maria Einsmann)，犯下的罪行是利用离异丈夫的伤残证伪造了约瑟夫·艾斯曼 (Josef Einsmann) 的身份，并与自己的女朋友海伦娜·穆勒 (Helene Müller) 结婚，并将其非婚子女登记为自己的孩子。她假扮男人从事守夜人等各种职业。由于一次意外，她的真实身份在九年后暴露，她假扮男人的理由十分简单：作为女人她永远不会得到上述工作。法院将之视为减刑的理由，判决她收容教养。

布莱希特加强了事件冲突性，他把这位女子〔被布莱希特称为豪斯曼（Hausmann）〕的困境设定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豪斯曼的丈夫失业后幸运地重新获得了工作，但在去往岗位之前病逝了，由于必须照料两个孩子，她除了接任自己丈夫的工作之外别无选择，这项工作她也成功地从事了四年。她后来因一次锅炉爆炸受伤，在一家妇女医院从昏迷中醒来。当她出院时，由于没有其他衣物，仍穿男士衣服返家，蜂拥的人群前来观看这位“假男人”，豪斯曼的事件众所周知。她后来被警察拘留所收容，仍然身着男士衣物被释放，做女招待员艰难度日，而那些她服务的男人都把豪斯曼当作“怪物”。豪斯曼最终消失“在百万大军之中，他们为了勉强谋生，被迫完全或者部分地出卖自己，或者相互出卖”。

布莱希特小说中匿名的叙事者把豪斯曼的案件作为社会实例展示，这一事件“比和平协议、历史书和统计学数据更好地展示了荒蛮的状态，表现了欧洲国家在暴力和剥削之外保持经济增长的无力”。其真实案件已经证实，在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上，魏玛共和国时期仍普遍有效的性别差异已不复存在，布莱希特的小说中，资本主义的荒蛮迫使了受其压迫的人必须完成生产的规定，直至放弃自己的身份：“几日内，女人成了男人，方式同几千年来男子把自己锻造成男人的途径一样：通过生产过程。”布氏对所谓的生物学差异没有过多赘述，因为社会压迫比自然和性别特质更深刻地决定了人，同时也对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因素。普通市民——“整个区”期待着这个“假男人”——视豪斯曼的性别角色转换为轰动的、病态的事件，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涉及其中，但仍不与豪斯曼团结一致，布莱希特又一次表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劣根性。更甚之，双标题《工作岗位或者你汗流满面也不得糊口》中对圣经的引用也令上帝的惩戒失效，这惩戒显然有着人类学本源，从根本上把两性区分开。

在创作这一故事的同时，布莱希特考虑将《三毛钱歌剧》未加工透彻的材料用其他文学体裁加以表达。那么除了长篇小说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体裁呢？这也正合前基彭霍伊尔出版社编辑赫尔曼·凯斯滕的心意。阿姆斯特丹的阿尔勒特德朗格出版社新设立了德语部，凯斯滕正在为第一份出版计划寻找合作者，他同布莱希特一样都在巴黎逗留。1933年6月已经确定，布莱希特将写作《三毛钱小说》

（*Dreigroschenroman*），阿尔勒特德朗格出版社负责小说的出版发行工作，双方延续了在德国时的良好的合作传统。7月初布莱希特便得到了合同，当然根据他的要求还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布莱希特甚至在合同中加入了对插图设计保有发言权的要求，这是完全不寻常的，因为出版社（时至今日）仍原则上把这些视为自己的事务。图书的最终成品证实，布莱希特在这一领域也有非凡的品味，虽然其中出现了很多波折，让阿尔勒特德朗格出版社的所有人几乎崩溃；布莱希特在这些事情上也极为固执。

虽然小说由布莱希特写作，但仍是同玛格丽特·施德芬的共同作品。布莱希特一再强调，最好在图书上市之前的创作时期就开始评论工作，结果可以被直接采纳到作品中。这部分工作恰好由玛格丽特·施德芬担任，布莱希特把写好的部分寄往巴黎，施德芬修改、编审、进行评论、抄写副本，并把自己的评论融入其中。10~12月两人又一次在巴黎共同创作，之后施德芬迁居丹麦。12月19日，施德芬踏上前往丹麦的旅途，布莱希特“大家庭”的丹麦流亡从此彻底开始。凭借《三毛钱小说》的预付费用和卡瑞·米夏埃利斯的帮助，布莱希特在斯文德堡斯考斯布海滩（Skovsbo strand）8号购得了一所茅草顶的农舍，但施德芬起初不被允许搬入这里。她前三个月在露特·贝尔劳（Ruth Berlau）处暂住，贝尔劳在这期间也同布莱希特相识，当时尚无人知晓这数人之间日后将会发生的一切。

卡瑞·米夏埃利斯还帮助布莱希特获得了必要的丹麦签证。由于海伦娜·魏格尔是犹太血统，因此布氏一家被列为受种族迫害者，政治上受到保护（丹麦并不欢迎所有流亡者入境）。而且恰恰是丹麦，最终给布莱希特打上了共产主义的烙印。维尔纳·乌特瑞希（Werner Wüthrich）在瑞士联邦档案馆发现了一份1939年的秘密报告，报告显示布莱希特在丹麦领导“共产国际传达处”。个中原因则扑朔迷离。施德芬暂时（1933年末）生活在哥本哈根的诺德兰酒店（Nordland Hotel），而共产国际的联络点也设在此处，这一事实是瑞士为布莱希特编制名录的起因，好似在处理一名恐怖分子（这份名录在他流亡归来之后仍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施德芬在1936年8月同共产国际的一名工作人员假结婚，从而获得了她急需的丹麦国籍。虽然经过了细致的资料搜寻，也没有任何征兆能证实这封秘密报告中的指控，而且也无法确认档案的制作者。偏偏布莱希特有这样的档案，这一点就很奇特：布氏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使其个人定位很模糊；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必须将它归为一类，而这一类也只能是共产主义了，布莱希特被塞进了这个范畴，而后又被杜撰了相应的证据。

再次回到露特·贝尔劳。她的多个情人之中出现了第一个生气、嫉妒的人，原因是自己的情人关心的是布莱希特的一个女人，而非自己。此人是摩根斯·福尔特伦（Mogens Voltelen），丹麦一名成功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日后还帮助布莱希特一家布置过新居，他致信贝尔劳：“我对布莱希特很气愤，他因为施德芬给你施加了很多责任、束缚和不自由，而且长达数月之久。我对这个女人也很气愤，她事事依赖于你，虽然我很同情于她。”他同情施德芬不仅因为她患有结核病，而且还因为她一点魅力也没有，是个“讨厌而悲伤的人”，此外她还患有鼻炎，俗语称“臭鼻子”，一种鼻黏膜退化症，同时伴有嗅觉丧失，因此无法察觉自身发臭得多么严重。据福尔特伦记载，待在她身边“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但尽管几经努力，他仍然没有能让露特·贝尔劳远离布莱希特和施德芬。

露特·贝尔劳在哥本哈根的名字是“红露特”，职业是记者和摄影师，曾担任哥本哈根王家剧院的演员，写过一些小说故事，领导一个工人剧团，其中福尔特伦也参与演出。贝尔劳曾于1928年夏天携一辆自行车前往巴黎，靠杜撰一些报道度日，这些杜撰的报道都发表于一家丹麦报纸。1930年她又骑自行车前往苏联，返回时已经成了一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很快加入了丹麦共产党。她曾经扮演过《夜半鼓声》中的安娜，因而间接认识布莱希特，自然也听闻过《三毛钱歌剧》的成功。在楚尔岛的米夏埃利斯家里，贝尔劳第一次见到了布莱希特；这次相遇是因为她想请布莱希特的妻子来5小时车程之外的哥本哈根为大学生晚会发表讲话。趁这次机会她还偷走了布莱希特《母亲》的剧本，由于高尔基的小说，贝尔劳对这部改编戏剧很感兴趣。贝尔劳开始插手所有的事情，努力为这位著名作家制造机遇，并扮演所有演出的组织者，例如哥本哈根《屠宰场的圣约翰娜》的首演，她当然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女主角的角色。当她与布莱希特尚未建立情人关系时，三个女人之间就已经关系紧张。海伦娜·魏格尔还必须习惯于格丽特住进他们的新居，当然是隔离的，甚至吃饭时格丽特也只能用自己的餐具，即便如此，这些餐具魏格尔也总是认真清洗。

贝尔劳开始成为家中的常客，也会拖布莱希特去哥本哈根参加与导演的会谈。施德芬立即发觉，一名情敌出现了，这即使不阻碍，至少也限制了自己同布莱希特的工作关系。布莱希特一心想把未演出过的剧作搬上舞台，这包括1932年暂时完成的《圣约翰娜》和《圆头党和尖头党》一刊印在《尝试》（未出版）的第8期，之后还经历了多次修改（1934~1936）。

1933年12月，布莱希特在巴黎时还与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发生了一次后果严重的争执。霍普特曼滞留柏林，把布莱希特所有的作品都整理在箱子里，以伺机寄给或者亲自带给他。11月，盖世太保突袭了她的家，在房子里仔细搜寻可疑资料，并最终于11月15日逮捕了她，

这当然意味着生命危险，因为盖世太保把霍普特曼列为共产党员。但整整一周之后她又被释放，这其中的缘由霍普特曼从未吐露。家里已经无法逗留，她尽一切努力整理了布莱希特所有的物品，并踏上了同样有生命危险的流亡巴黎之路。霍普特曼12月10日到达巴黎，而且只得告知布莱希特不知何时何地丢失了其中一个箱子。虽然没有直接见证人，但布莱希特必定曾大发雷霆，对她恶言相向，霍普特曼深受打击，不禁病倒，虽然霍普特曼曾想过在巴黎继续两人的工作关系，仍终止了同布莱希特的合作。“我们的关系一直薄凉、不温和、不适宜，但这是您曾拥有过和我曾拥有过的最伟大的工作友谊。我将会怀有一颗良善之心，或许我们日后还会见面。”1943年1月，霍普特曼如此致信布莱希特，转而使用了敬语“您”，日后也一直如此；当月28日，霍普特曼赴美流亡。

不强制购买的商品

随时可以退回

媒体间性：不同的视角

同玛格丽特·施德芬《三毛钱小说》的合作持续到1934年8月，合作卓有成效。小说的篇幅增长，第一次大规模印刷共有492页，而且随着不同版本的多次修改而越来越好。小说1934年10月出版，同年12月9日，小说的第一批评论问世，布莱希特感谢格丽特，好似是她写作了这部小说一般：“现有的评论：《巴黎日报》（*Pariser Tagblatt*），拉尼阿评，当然十分卓越。然后是《欧洲期刊》

（*Europäische Hefte*，《世界舞台》的竞争对手），施拉姆评，非常伟大。巴塞尔《国家报》（*National-Zeitung*）同样歌颂有加（即使以小号字体印刷）。总体上，你完成了一部杰作。尤其著名的是你纯净的语言，不开玩笑：有个最挑剔的读者在家是件好事！”

布莱希特以这部小说发展出讨论时事话题的体裁，融汇了经济、政治、犯罪、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主题，同时不片面地偏袒。布氏在作品中一再强调和分析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但并未将两者等同起来或者宣称资本主义必然向法西斯主义转变；因为法西斯除了强化经济之外也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显著扩张。同时他还区别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比如后者并不推行反犹主义，但又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中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德国纳粹党纲领中规定：“我们要求完成并保持中产阶级的健康发展，将大百货公司划归地方经营，并以低价出租给工商业者。”1927年，自从可以公开肆虐以来，纳粹展开了反对“百货公司瘟疫”的宣传，“犹太人来了，他们的百货公司成了德国商人的上司”，这一切都像一场疾病的扩散；必须以一切手段彻底消除这场瘟疫。

1933年4~5月，纳粹开始封锁“犹太”百货公司，禁止建立新的百货公司，这一系统性实施的破产计划导致了数千工作岗位消失，商品生产商以及百货公司的物流供应商都有大量工作人员失业，投资百货公司的银行也几近崩溃。6月，拥有14000名职员

的赫尔特（Hertie）百货公司面临破产，希特勒方才宣布原有计划告吹，顺从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这打破了中产阶级的浪漫美梦，他们原本要在纳粹统治下发展为自由、独立的商人。《三毛钱小说》的经济情节以此为背景展开。麦基成功地说服了小工商业者，他们虽然保持独立，但将店铺—通过非法组织—连接为统一的商品流通链，全力发挥其效力，从而实现了行业垄断。

为了展现这一疯狂的经济情节及其“执行者”，布莱希特开启了散文的新“技术化”，这主要是剪接技术，如同蒙太奇。小说中利用了不同视角的转换，使各个不同的主线平行叙述。在皮丘姆线索的第一部分和科克斯（Coax）线索交会之后，第三章连接的是麦基故事的第一部分以及对B.商店的介绍。紧接着，小说又随即转回对皮丘姆的

叙述。虽然皮丘姆和麦基当时就对彼此感兴趣，开始相互观察，但两人在小说结尾的喜剧结局才最终相见。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他们的外貌是不确定的。对皮丘姆的描述：“他是个小个子、瘦削的男人，其貌不扬：但这也可以说并非最终结果。在对一个小个子、瘦削、其貌不扬的男人原本毫无前景的商业地段，人们应该能看到皮丘姆先生陷入沉思，思考他怎么样才有可能变成一个中等身材、营养充足的乐观男人。他的矮小、瘦削和其貌不扬因此只是他的一项提议，一个不强制购买的商品，随时可以退回。”皮丘姆的外貌根据局势而改变，不得已时能化身老虎般的形象，这完全取决于哪种对他更有利。

布莱希特的叙事艺术与同时代的市民文学存在巨大的差距，对比托马斯·曼的作品便可以对这一点有最深入的了解。联想《约瑟夫》小说中瑞贝卡（Rebekka）的“特征”：盲人伊萨克（Isaak）要根据长子法则给他的儿子伊索（Esau）祈神赐福，这件事必须通知瑞贝卡。知内情的女仆飞速向瑞贝卡跑去，“她的乳房上下跳动”。此事时间紧迫，但没有阻止叙事者用较长的段落介绍瑞贝卡这一人物。虽然时间飞逝，但整个事件被静止下来，从而在读者面前构建起瑞贝卡这一人物。只有当人物特征表述完毕，才能继续情节的发展。托马斯·曼的人物在情节的推动中固守着叙事者规定好的人物特征；而读者也可以完全信赖这些人物“性格”，相反，布莱希特却拒绝给予他的人物如此的信任。

布莱希特的人物塑造绝不止步于此。新添加的人物科克斯按照被布莱希特曾拒绝的“内省”模式来塑造，这自然不是为了证实这一模式的有效性，而是为了对它进行讽刺和揭露。其原型有可能是鲁道夫·施里希特尔的自传作品《灵界》（*Zwischenwelt*, 1930）、《反叛的肉体》（*Das widerspenstige Fleisch*, 1932）以及《陶土足》

（*Tönerne Füße*, 1933）。施里希特尔对自己和性强迫症的详细描述类似于一个受虐狂的自白，其直白程度在德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科克斯一再经历“无法控制的性欲发作，原因是便秘”。他以日记的方式进行“深刻的自我研究”，其中细致列举了自己的排便和同妓女的性交，只记录不评论。叙事者并非通过暗示手法展现科克斯的性放荡，读者可以直接看到内省的原型——（私密）日记的内容，日记沉湎于下流的观阴癖，在色情和厌恶之间快速转换，令人读起来深感不适。

小说从一个男性色情文学的视角引导读者，内容上也呼应这一点，科克斯为了使波莉能在性事上顺从于他，用一些色情图片——“全然是污秽之物”——引诱她，第一次没有结果，第二次却相当成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性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出于“伴侣”之间情欲的相互吸引，两人甚至不是情侣关系，而是借助于匿名的色情图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占有这一类物品是违法犯罪，而像科克斯一样使用这一类物品则构成了强奸的犯罪事实。相应，叙事者的话语也很清晰：“他……扑向她。/她半推半就”（这事出有因，科克斯许诺把一枚胸针作为本次性行为的交换物）。被物化的身体发生结合，爱情的没落得到了最极致的展现，即使色情的性爱细节描写也完全没有采用暗示的手法。

低级小说（Groschenheft）——歌剧的题目“Dreigroschenoper”已经暗指了这一体裁——是发行量极大的消费商品，内容首先是情与（大多是暗指的）性。讽刺的是，《三毛钱小说》也可以归于这一类，它似乎已经降到了可接受范围内最低俗的水平。下文引用了原文中自嘲的一段，也能清晰地表现这一点。科克斯时常反复的性欲强迫症又一次发作了，他跟一个“十分年轻的人”回到酒店房间，并向她提出了某些特定的要求：“她说自己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丰富，而且毫无偏见，这一点她着重强调……她轻易就为他找到了许多比喻，如

果本书要再现全部的这些内容，那么要因她的辞藻丰富变成长篇累牍。”

此外还有“桃子”。因为“这一带人都称皮丘姆小姐为‘桃子’。她的皮肤非常好看”。而引出波莉的一章标题是“桃花”，桃花的开放与乞丐商店的兴盛两条线索平行发展。同时代著名的“桃子”形象出自曼·雷（Man Ray, 1931）的手笔，画中的桃子形成了褶皱，对观看者来说很像裸露女性的下体，但仍十分纯洁与美丽。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的物化，因为人只有具备必要功能的一部分进入了图画。波莉也完全被父母当作了推动生意兴旺的商品，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对色情图片进行了跨媒体的处理，他把两个媒介融合起来，使得图像本身也能在语言上得到展现。模拟视觉化促使读者阅读文本时也阅读其中的图像，并（通过观看）对图像进行视觉上或者实际上的转换。这在视觉上是文本和图像的蒙太奇组合。从“图像化语言”可以得到视觉图像在语言上的表现。因此，要对“图像化语言”的多重意义进行恰当的分析，必须注重图像。

现在他不指责自己的设想

而是指责那些偏离预想的事物

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一首歌，柯尔施的精神干预，苏联作协大会

虽然有三名女性同他一起工作或者照料他的起居—最后一项主要是海伦娜·魏格尔的责任，而且情况将长期如此，但布莱希特仍在“丹麦的西伯利亚”抱怨孤独、与世隔绝，只有邀请朋友前来或者自己出去寻找朋友才能聊以慰藉。1934年3月，先是汉斯·艾斯勒来到了斯文德堡，同格丽特和贝尔特一起改写《圆头党和尖头党》。6月，瓦尔特·本雅明也到来了，而且逗留至9月。大家坐下，抽烟，喝茶，聊

天，下棋，无聊。本雅明7月末致信一位法国女友：“简短来说，这里生活被外部所限制—阴沉的天气，交通不便，贫瘠、石化的沙地，很多天我都除了工作之外无事可做。施德芬的存在让B的家里时常很压抑，这您也很容易可以想象。而且她还被隔离开，很多天我都经常见不到她。”至此，本雅明的描述听起来完全不像愉悦的夏日休假，而且也完全不隐瞒自己对这位工人女儿的好感。同时，本雅明也不无苦楚地记录，这里的生活给了他足够的时间，来写对1880年至1920年间德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评论。本雅明还在社民党的政党机关报《新时代》（*Die Neue Zeit*）中找到了权威资料，这些资料布莱希特有完整的收藏可以供他使用，《新时代》是1883~1923年间社民党最重要的理论报纸。

本雅明的手记让他在斯文德堡的两次夏日度假—第二次发生在1938年—众所周知。手记篇幅寥寥数页，记录了布莱希特即使对那些他平日不甚赞同的文学作品也会细致阅读：从1934年两人对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布莱希特不仅是卡夫卡作品的行家，而且对卡夫卡也有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可能最贴切地阐释了卡夫卡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布莱希特赞扬了那些贴切而深入的图像，抓住了命运悲剧中的小市民，可惜卡夫卡对这些没有寻根究底，只是在寻找那些不会到来的“指引”。而另一方面，布莱希特指责卡夫卡“神秘的琐碎”，它营造出一种“深度”：“这种深度是一个为其本身而存在的维度，其中空无一物。”就《审判》（*Prozess*）布莱希特断言，人们可以在这部小说中看到契卡（Tscheka）的结局，这是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秘密组织，迫害和谋杀异己（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其职能是秘密警察，用一切血腥手段排除所谓的敌人；列宁自1918年命契卡建造劳造营关押政府的反对者）。布莱希特再次明确了自己对苏联有所保留的立场。

在斯文德堡之旅开始前，本雅明写作了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者》（*Der Autor als Produzent*），而且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作了相关报告，本文发表于克劳斯·曼的流亡杂志《文集》（*Die Sammlung*）之中。同布莱希特的《三毛钱诉讼》类似，本雅明也论述了文学必须对生产关系持明确立场：“文学在生产关系中地位如何？问题直接针对的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在‘文学生产关系中’的作用，换言之即直接针对作品中的写作技巧。”以特列季雅科夫的《田一主》为例，本雅明定义了积极参与到政治趋势中的“行动型”作家。克劳斯·曼对本雅明的“绝对判决”很气恼，因为就市民文学而言，本雅明认为市民文学作家一比如海因里希·曼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一属于反动分子。“实际上：贝尔特·布莱希特，是仅存的一个；其他皆是反动的。”

克劳斯·曼把本雅明的文章交予伯父海因里希·曼裁夺，海因里希·曼虽极为克制，但仍表示：“自从他们的政党被取缔之后，共产主义文学的狂妄之徒愈来愈多。‘如我们所了解的’，失败没有让他们学会斟酌，是否一切，包括思考，都是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对他们而言，创造性成就不存在权威，而这些小人物对此也喜不自胜。”海因里希·曼认为，那些有关布莱希特的篇幅还值得一读；如果剔除其中对市民文学的批判，这一部分可以独立构成一篇文章；但是本雅明的文章最终也没有发表。

1934年10月初，为了同汉斯·艾斯勒合作，布莱希特前往伦敦近两个月，同时也和维兰德·赫茨费尔德商讨作品在马利克出版社（Malik-Verlag）的印刷事宜；这一出版社当时已经正式迁往伦敦。10月，《萨尔之歌》（*Saarlied*）在伦敦创作完成，艾斯勒还为之谱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曲。这一歌曲例证了布莱希特周遭的流亡者对希特勒纳粹统治的不日消亡多么充满信心，他们甚至认为1935年1月13日萨尔区的公投或许就是事件的转折点。萨尔区的人民要投票表决，本区

是加入德国或法国，还是保持由国际联盟管辖的现状。伯恩哈德·赖希曾在《你为何鄙夷〈萨尔之歌〉？》（*Warum rempelst Du das Saarlied an?*）一文中批评这首歌，布莱希特为此致信赖希：“歌曲在萨尔区传播1万份，刊登在所有的反法西斯报纸中，也包括英文报纸，它的重要性胜过半打戏剧。”在副歌的歌词部分，歌词按照《德国之歌》（*Deutschlandslied*）的模式写作而成：“保住萨尔，同志们/同志们，保住萨尔。/之后形势会有所转变/从1月13日起。”虽然布莱希特身旁似乎不乏宣誓要保卫萨尔区现状的同志，但现实中他们并不存在。萨尔区以90.5%的得票率归属德国，纳粹又一次以合法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国际）成功，而且蒙骗境外各方，令他们认为德国一切泰然。

在伦敦期间，布莱希特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住在同一所膳宿公寓里，柯尔施租住的房间位于布莱希特楼上。柯尔施1886年生人，1923年担任图林根的司法部长，1924~1928年晋升为国会议员，拥有了自己的政治事业，当他1928年初遇布莱希特时，柯尔施的学术生涯也早已起步，取得了耶拿（Jena）的法学教席。在从独立社民党转入社民党之后，柯尔施1926年因极左观点被政党开除，只能在柏林啤酒馆和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Marxistische Arbeiterschule, MASCH*）发表演讲，1931年布莱希特也在工人学校听取了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的详细讲解。无论如何，布氏最晚于此时开始研究柯尔施的哲学，柯尔施的思想大都集中于其认识论作品中。

即使布莱希特明确将卡尔·柯尔施称为“马克思主义导师”，这并不意味着布氏的“马克思主义”同柯尔施是统一的。这一时期的笔记记录是否可以算作布莱希特的文章，它们是否代表布氏的观点，都存在巨大疑问。它们虽然都是布莱希特亲笔记录的，也看似是布莱希特的真迹，但大多（布莱希特总把笔记本带在身边）是抄写或者摘录一些他人的文章或观点。透过柯尔施和《易经》可以看出，布莱希特

的所谓“哲学”呈现唯心主义的多变性，其“干预性思维”一用柯尔施的话来说是“精神干预”一是对现实进行思想性的改变。“人们可以通过改变事物而认识事物。”布莱希特一再强调，柯尔施必然仍相信“无产阶级”，但因为这种信仰却一再丧失同现实的关系，布氏记录道：“现在他不指责自己的设想，而是指责那些偏离预想的事物。”其态度已相当明显。布莱希特总结道，如果事物背离了预想，必须对这些想法进行纠正，或者必须完全放弃那些欺骗性的想法和迷惑性的信仰。这是无比明确地在批判柯尔施这位“马克思主义导师”其实是唯心主义者。

对于非干预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歌德在《色彩学》（*Farbenlehre*）中就已提出过警示，非干预性思维在语言或者思想之中寻找出一些关联性，并以这种方式构建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性的精神建筑。其经典范例是黑格尔的、叔本华的或者海德格尔某些特殊形式的作品，其本质是被人们视为高深莫测的语言魔力。布莱希特否定诗学中的“作品”这一概念，它把语言艺术视为和谐而完美的，从而具有自主性的产物，其整体与部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样，布氏在哲学系统中反对系统学和神秘学，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这个概念本身在语言和思想中就是陈旧的。关于《系统论》（*Behandlung von Systemen*）有一则格言：“如果句子被断章取义，哲学家大多会很气愤。墨子却推荐这种方法。墨子曰：系统中的句子像犯罪团体中的成员一样相互勾结。各个击破要容易得多。”

“矛盾即希望”已经被布莱希特作为《三毛钱诉讼》的题词，这同样也属于“干预性思维”，其实，它被称为“与实践相关的”或“以现实为导向的”思维似乎更好。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如今在众多大学仍被当作哲学所谓的基本前提在教授，黑格尔早已证实，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单一明确性（*Eindeutigkeit*）本身就是一种悖谬。例如逻辑学的第一条定律—同一性定律，其数学公式是 $A=A$ ，这本身便不具

有单一明确性，而是悖谬。黑格尔认识到，需要两个A才能定义同一性，由于这两者至少不会存在于同一地点，而且根据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对同一性所要求的，这两者不具备“不可区分性”。苏联和民主德国在其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不加辩证地断言，历史发展进程具有单一性，但如果逻辑学不唯一，那么历史进程如何以单线的、逻辑的或者甚至法律的唯一性发展呢？由此，布莱希特得出一种社会实践理论：“思想是困难之后、行动之前的事物。”思想无法从本源便是正确的，原因在于现实思想所能掌握的要复杂得多。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两难困境，但并不意味着某一些被证实为正确的事物是可以不被认识的。

17岁的欧根在自己那本奥斯卡·王尔德的《教义与箴言》中画线标出了一句“所有的装腔作势中，道貌岸然是最卑劣的”。《易经》中专门有一篇题为《伦理学判决》（*Verurteilung der Ethiken*），其中断然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树立“道德学”，因为它只会偏离事实。面对纳粹宣传、唯心主义生活观的要求以及英雄主义的立场，布莱希特写道：“墨子曰：有人称颂某些国家，因为它们强调一些特定的美德，例如勇敢、牺牲、正义感，等等。而我不信任这些国家。当我听说一艘船需要英雄来做船员时，肯定要问这船是否已腐烂而老旧？”还有：“墨子曰，希特勒要求他的民族成为英雄主义的民族。农民的头脑越羸弱，他家公牛的肌肉就必须越强大。”

但《易经》确实包括一些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这让布莱希特思想中的一些矛盾面显现出来。尽管注重现实主义，布莱希特仍树立起未来“伟大秩序（Große Ordnung）”的大旗，它虽然没有具体轮廓，但仍起到了乌托邦的作用，本应通过苏联的“发展”得到实现。为此，还必须有一种“伟大方法”（Große Methode）能作为辩证法来指引思想为秩序作出准备。《易经》关于“伟大秩序”的篇章同后期《逃亡者对话》中对“秩序”和“秩序偏爱”的讽刺形成了鲜明对

比。布莱希特真的认为他的格言书字字箴言，并确实视之作为一种哲学吗？“秩序”在《逃亡者对话》中的定义更现实得多：“如果东西不在正确的位置上，此即无秩序。如果正确的位置上空无一物，此为秩序。”

布莱希特在伦敦深感不适，“百无聊赖”地给玛格丽特·施德芬写十四行诗，《英国十四行诗》（*Englischen Sonette*）。1934年11月2日，他向在高加索山脉疗养的施德芬抱怨：“我时时受冻，我房间里有一只烧炭的壁炉；楼上的柯尔施的壁炉是煤气炉，但他也时时受冻。英国人的饭食好似是用皮革和杂草制作的。”同巴黎一样，这里一切都“很缓慢”，他再次“在漫长的路上散步”，在“纯真”中度日，即暗示他没有追求其他姑娘。但同柯尔施相处很费神。虽然布氏一再强调，他从柯尔施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更喜欢从对话而不是阅读中获取知识，而这位哲学家要求布莱希特聆听时也要足够耐心，虽然布莱希特是出名的好听众，他也有自己的短处：柯尔施的句子太长了。

由于柯尔施正在写作马克思传记，所以有许多讨论的机会出现，布莱希特对此十分重视，强调不要像共产党内部一样把马克思英雄化：“让那些光辉人物、正直的同伴、真正的斗士都见鬼去吧！对马克思雄狮的胸膛或者雄狮的鬃毛，我已经忍无可忍！”布莱希特恳求柯尔施，不要把马克思塑造成“假大空的雷神”。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早已脱离了社会现实，因为片面地看，它已经从“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至少这样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变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柯尔施尝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化”，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它本身，这也没有取得成效，原因是所有“精神活动”无法稳定地植入到社会关系中，同时也无法影响它所面向的工人阶层，因为“精神活动”的前提条件是能够在矛盾中进行辩证的思维，而绝大多数工人都不具备这一点。这也是柯尔施在流亡期间总远离政治的原

因。虽然布莱希特从柯尔施那里学习了知识，除弗里茨·施坦贝格外也称柯尔施为导师，但这绝不意味着布莱希特赞同他的思想，甚至恰恰相反，因为布莱希特深入地对柯尔施的观点进行了根本性批判。同时，布氏也大量使用了这位哲学家的知识，高度评价他的这位文学评论家，因为柯尔施具备发现并指出缺点的能力。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在伦敦百无聊赖，对英氏餐饮心有忌惮，因为这样的饭菜总令他胃痛，布氏干脆说英国菜会给人带来“生命危险”。布莱希特同莱奥·拉尼阿一起创作电影故事，希望能赚英国人一些钱，但并不顺利：“这里是十分老旧、磨练已久、精密谋划的资本主义。”在离开这一无聊之地前，布莱希特还有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英国女作家伊丽莎白·比贝斯科（Elisabeth Bibesco）公主一向对共产主义者亲善，这一点众所周知，她邀请布莱希特到高档的沙威酒店（Savoy Hotel）共进晚餐，布莱希特计划从她那里骗取些钱财来开展自己的计划，但酒店门房却禁止他入内。布莱希特穿着不得体，对此他立刻解释：他们要么认为布氏是“危险的或者至少对沙威酒店气氛有损害的人物”，要么没有认出他是“一名思想层次很高的人，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34年布莱希特还参与了另一事件，本次事件对他身为作家的自我理解意义重大，而且也构成了他拒绝流亡苏联的又一原因。这是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为了使苏联作家忠于政党路线，除1932年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的377名会员外，参加本次会议、来自全世界的591名参会者中仅有21名女性。在如此悬殊的人数对比下，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j Schdanow）同志在开幕致辞中还誓称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这里的文学“维护和保护全球所有劳动者的平等和女性的平等”。除此之外，日丹诺夫还指出了市民文学腐化的情况：“市民文学的没落和腐化源于资本主义体制的没落与腐朽，这是典型的特征，也是当代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的特殊状

态”。这位政党思想家和文化官员的讲话相当冗长，而且恰恰是这位斯大林独裁的帮凶被擢升为艺术领域的独裁者；从当年12月1日起，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大清洗”和苏联艺术的衰亡。

出身奥地利—匈牙利籍犹太家庭的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以最长的讲话构成了会议的高潮，他列举实例谴责市民文学：“他[乔伊斯（Joyce）]最值得注意的是坚信生活中没有大事，没有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人、伟大的思想；这位作家随便选取了‘某一天的某一个人’[影射《尤利西斯》（*Ulysses*）]加以最细致的描绘，并以此来塑造生活。粪堆上密集的虫子中的一只，用带显微镜的电影摄影机记录下来——这就是乔伊斯的作品。”

布莱希特在会上从头至尾一言未发，虽然他确实受到邀请，虽然特列季雅科夫在讲话中将布氏称为当代文学令人称赞的人物，而且还曾在一封信中保证，本次大会“意义非凡”，因为它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证明。布莱希特被如此告知，但特列季雅科夫如何得出这一结论令人捉摸不透，因为本次大会上得以表述的所有主题都同布莱希特想在文学中贯彻的革新大相径庭。特列季雅科夫提出一些题目进行辩论，布莱希特也没有参加。可以证实，布氏并不赞同关于市民文学的这种判断，而且他很早就认识到詹姆斯·乔伊斯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习惯将其与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相提并论，同时也熟悉乔伊斯的世纪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将其遴选为1928年年度最佳小说（舍此其谁），还用一些嘲弄的反话对小说大加赞赏。还有一点小小的事后聪明，恰恰是拉狄克在报告中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反法西斯作家发起一项决议，但提及的每一位都是市民作家；被点出名字的有：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海因里希·曼、萧伯纳，他们“勇敢地完成了劳动人民最好朋友的高尚义务”。布莱希特没有被列入其中。

德国戏剧的前景尚存，但十分渺茫

莫斯科之旅：无间离

从1935年3月14日至5月17日，布莱希特同玛格丽特·施德芬经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列宁格勒再次到达莫斯科，在当地宣扬叙事剧。对本次旅程的评价存有争议。布莱希特的信件并没有显示出欢欣鼓舞；他还患病两周有余。其间布氏的大多数信件都是寄给需要安慰的海伦娜·魏格尔，其主要内容是同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斯

（Joris Ivens）和布莱希特完全不欣赏的剧作家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Gustav von Wangenheim）之间的争执，原因是万根海姆阻挠海伦娜·魏格尔担任某一角色。布莱希特不由自主地写信训诫两人，要求他们明确态度：“某一工作方法在德国出现，但这由于当地的工作方式并非偶然，也没有对政治艺术造成损失；现在，它在全新的境况中被不加批判地采用，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风险。我指的是小团体封闭的工作方式，排除任何‘外在’影响的流入。”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布莱希特显然是将上述两人在苏联的工作方式同德国（法西斯）的方式相比较，而所谓“‘外在’影响的流入”只可能经由魏格尔实现。

在莫斯科，布莱希特的戏剧深受欢迎，有关他的广播讲话也不乏正面的报道和反馈。布莱希特对此以诗歌《1935年4月27日莫斯科工人占领大都市》（*Inbesitznahme der großen Metro durch die Moskauer Arbeiterschaft am 27. April 1935*）回应，这首诗于5月16日刊登于（莫斯科的）《德国中央报》（*Deutsche Zentral-Zeitung*），即莫斯科地铁落成的次日。诗歌以“我们听说”开篇，说明这并非一首颂诗。诗歌的内容并非对亲历事件的诗性报道，而是关于一个流言，一个谣传。诗中占领大都市的欢喜并非出自抒情主体“我们”，而是向“我们”传播这一报道的人。因此可以排除诗歌记

录作者生平某一真实事件的可能性。布莱希特其他所有言论也首先归功于他的技巧，能成功地在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标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莫斯科之行的收获还在于布莱希特观看了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从中了解了中国的表演艺术。中国戏不以写实为宗旨，梅兰芳在中国表演的也是旦角，京剧程式化的、极具仪态表现力的动作和神韵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考虑将这为叙事剧所学、所用。除此之外，莫斯科之行的另外一个收获便是“间离（*Verfremdung*）”这个概念及其定义。虽然有人提醒布莱希特阅读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chklowski*）的杂文《作为诀窍的艺术》（*Kunst als Kunstgriff*），书中作者提出了名为“*Ostraneniye*”的理论，这一概念大多被译为“*Verfremdung*”，但更确切地说意为“使变得奇特（*Seltsammachen*）”，也就是说将事物从对其习惯成自然的认知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什克洛夫斯基以此宣传一种艺术手法，使石头再次成为“石头”，目标是“传授对事物的感知，这种感知是看到和发现，而并非再次认出”（类似于哲学现象学）。布莱希特从未引用过什克洛夫斯基，他显然也不认识什克洛夫斯基；而且布氏一再强调，自己没有发明“间离”这一概念，因而就更没有必要无视这位俄国评论家了。

说出理性的言语是多么困难

文化拯救：无财产关系

“我告诉你……一个重要通知：我们拯救了文化。会议用时四天，我们决定，与其任由文化堕落，不如牺牲一切。紧急情况下我们要牺牲一两千万人。谢天谢地仍找到了足够的人愿意承担责任。”这是“止水之主写给流水之主”的信件，即布氏6月底从斯文德堡写给纽约流亡的“忠实的兄弟”一格奥尔格·格罗兹的信，格罗兹自1933年

起已定居于纽约。信中的事件指的是为了拯救文化而举办的第一届国际作家大会（I. Internationaler Schriftstellerkongreß），会议1935年6月21~25日在巴黎举行，参会的有包括布莱希特在内的来自27个国家的250名作家，会议上发表了近90篇讲话。对布莱希特而言，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是否因其“非必要”的残暴而遭到谴责；布氏也提出疑问：如果人不再有价值，文化又价值几何？

布莱希特不会在大会上公开发表讽刺性评论，这些他更多是私下向某一位艺术家表述的。1932年格罗兹赴美数月，在艺术学生联盟（Art Students League）教授人体素描。后短期归国，1933年1月12日一时间正好及时一流亡美国，最终于1959年去世之前才决定回国。格罗兹在这期间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1934年5月12日致德国同时期作家马克斯·赫尔曼—奈瑟（Max Herrmann-Neiße）的一封信中谴责“左派、极左派、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流亡中仍坚持“在刀尖上”斗争，同时又热情洋溢地观赏百老汇烟柳之地的裸舞（“相比之下巴黎颇具乡土气息”），在这里倍感舒适，格罗兹还确信，“无论是希特勒的还是台尔曼的”，德国将永远成为“严格‘锻造男人’的国家”。但格罗兹已江郎才尽，因为他的画愈发失去了攻击性和政治挑战，甚至有一部分转为了田园风格。

布莱希特同格罗兹之间的友谊成了单方面的，但这次是对布莱希特不利。由于格罗兹在美国愈发非政治化，甚至反对共产主义，所以对布莱希特的政治讽刺性文章大多毫无头绪。当布氏给他寄送了《歌、诗、合唱》，格罗兹赞扬了其反法西斯宣传的作用，但仍强烈批评了诗歌《巨型城市纽约消失的荣光》。它“有失偏颇”，因为“跟恐怖笼罩下的欧洲相比，这里仍是一片祥和……有如战前一般”。美国同俄罗斯极为相似——这当然是玩笑话，“同封建的欧洲小国和小镇相比，这里是社会主义的”，格罗兹还嘲讽地补充道：“只有在你的歌曲中人们才察觉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图像。”（格罗兹于

1934年8月13日)。如果忽略对欧洲落后性的揭露，格罗兹对苏联的评价和布莱希特对美国的讽刺性批判同样不准确，至此布氏对这个国家完全陌生，诗歌无非是对美国一些通行的陈词滥调的（不乏幽默的）罗列，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要求。两人的言语都带些玩笑之意。

两人之后为数不多的信件往来中的主要内容是反讽和夸张。1934年5月底，布莱希特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迁居丹麦的事宜和德国“知识分子”的状况：“茅草屋之主致信高楼大厦之主：危险时期的幸运。几个月以来，你的朋友落户于小岛上一座茅草覆盖的长形房屋，带着那台破旧的收音机。为什么有些人将他以‘民愤’为由清洗掉。虽然他的鼻子没有鼻梁，头发在脖颈处没有卷曲，他还是必须跺掉脚上金色的尘土。沥青文学的时代过去了。促进适度发展协会（社民党）在许可范围内解体了，还有武装起义之友协会（德国共产党）。……如我所读到的，我们的敌人把他们的统治时间计算为三万年，一些谨慎者认为仅有两万年。直到那时，我们的作品都只能封存在抽屉里。”

1935年5月23日，格罗兹试图劝说布莱希特前往美国，目的是能把他“关在舒适的条件下”，从而写出“当世的堂吉诃德”。必须“有一位伟大的讽刺家”出现，“最终有效地把那些左的空话逐一驳倒”。即使那些同他有联系的流亡者，格罗兹也对其加以嘲笑：“他们那些骗人的玩意被过高估计了。宣传必须平实、甜蜜、呆板，以大众为目标。所有这些艺术和宣传的空话废话都被过分高估了。……对我而言，所有的艾斯勒们、沃尔夫们、皮斯卡托尔们和恩斯特·托勒们都像可敬的卖空投机者。在好莱坞（我的意思是被好莱坞），重新复活的拉斐尔恬静之美完全操纵了大众，大家对其趋之若鹜。（你知道，一定是资本主义愚钝了无产者的头脑—阿尔诺·霍尔茨可能会这样说）。”布莱希特与女友在莫斯科深受赞誉，还观看了五月庆典，但格罗兹嘲笑苏联的庆祝是“色当英雄大会”^[8]，他永不会参加。那

么工人们呢？“工人想看的是漂亮姑娘，希腊后裔的女孩儿，露点儿乳头，露点儿屁股，一切都那么甜美，令人心潮澎湃……”

格罗兹日后在自传中曾回顾，自己每年都会回到欧洲，曾在丹麦再次短暂地见过布莱希特，布氏“陈旧不堪的福特车还必须手工发动，即使发动机能够转动，也会剧烈地颤抖。……当我再次见到他穿着工装、戴着皮帽子站在发抖的福特车旁，我大笑不止；这是布莱希特游艺演出的一幅图像：‘贝尔特·布莱希特和他奇特的汽车’，只不过伴有发动机的音乐”。

1934年，布氏同维兰德·赫茨费尔德商定，由马利克出版社发行《布莱希特全集》，格罗兹负责其中的插图设计。由于这项计划，这是布莱希特1935年最后一次尝试同这位画家合作，但同样没有成功。这样的想法对布莱希特而言十分典型，他认为阅读剧作价值不大，因为，联想歌德的意见，阅读只有在“自然真实再现或者在鲜活的幻想中再现时”，才能被“享受和使用”。布莱希特1935年1月致信格罗兹：“剧作的阅读其实不过是阅读提词册，因而无比困难。大多数读者无法看到我们当时加入到新戏剧场景中的那些暗示，因而也无法想象这些事物的上演。”对于这些人来说，插图自然必须夸张而荒诞，从而有所弥补：“情节的经过不是理所应当的，而是‘不可相信的’、‘太过易懂的’、‘闻所未闻的’、‘对人性本身不可能的’、极为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人深省的、发出了乐（或悲）观契机的、‘将造成恶果的’、被单方面再现的、被进行了趋向性扭曲的，等等。”布莱希特具体推荐了《三毛钱歌剧》：“乞丐们口袋里塞着存折。强盗也同样，妓女也同样。火药箱子上铺了木板，就是婚礼的餐桌。/绞刑架由X & Co. 公司生产。/皮丘姆的《圣经》拴在链子上以防被盗。/麦基的总账（第四场：麦基和波莉）开篇为：‘愿上帝保佑。’/可以说麦基用一把撬锁工具打开了波莉的心。”

格罗兹最初同意这一计划，努力去满足所有提出的愿望要求。出版商也支出了预付款，一切都看起来相对完美。之后格罗兹却杳无音讯，直至1937年9月11日。布莱希特也从赫茨费尔德处得到消息，格罗兹的绘图工作没有进展，而且他也退回了预付款中的钱。格罗兹1936年2月12日告知布莱希特，布氏曾经的合作者赫尔曼·博尔夏特因犹太人身份流亡苏联，如今被遣送回德国，这是两人之间最后的书信往来。尽人皆知，格罗兹把博尔夏特称为“博尔夏坦斯

（Borchardthans）”，对这件危及受害者生命的事件，格罗兹却不以为意；格罗兹更多的是含沙射影地挖苦苏联官员做此事的动机：“我们先给他点最基本的钱，因为无产阶级真正的愉悦会驱使他远离金钱。无产阶级意识，我的同志，容不得玩笑。如果我们使用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小市民，将会有损无产阶级的荣誉。这样，他便可以良心安好地加入理想主义者（托马斯·）曼的统一战线，并且全心投入到为祖国无产阶级伟大自由的奋斗中。”相反，布莱希特表示很吃惊，并猜测“一些小人物的同博尔夏特的竞争”是离境的原因，因为如果由于政治因素，“不应以驱逐出境对待”，而是由古拉格^[9]负责。纳粹把博尔夏特投入了集中营，对其施以虐待，但许诺他如果能出示国外邀请便予以释放。布莱希特设法恳求美国的“珍贵朋友”（确切的收件人未说明）使博尔夏特确实得到了邀请，格罗兹也设法为其搞到签证，博尔夏特最终流亡美国，并在美国再次与布莱希特相遇。

在博尔夏特事件之后，布莱希特和格罗兹的联系完全断开了，因而也不再知晓格罗兹的地址。1947年3月，布莱希特请求格罗兹为其诗歌《自由与民主》（*Freiheit und Democracy*）绘制插图，遭到了格罗兹的断然拒绝，其原因也可用以解释马利克出版社全集的插图工作何以未能完成：“大体算来，我今生已经免费完成了近200万幅作品……但为‘政治标语’（即使是诗歌形式的）绘制插图仍然是全世界最困难的。”格罗兹的拒绝不留半点情面，原因仍是战前对布氏的

评价，不仅首先怀疑他政治上以及之后共产主义（政党）的观点，而且也否定其诗学要求。毕竟，由于“‘希特勒曼’的集中营事件”，格罗兹从1935~1936年开始已对政治事务毫无兴趣；因为“如今仍然同当年一样：棒打、射杀、刺杀、殴打、砍头，这些亘古不变，要么是这样的口号，要么是那样的……”^[10]这里指的是戈雅（Goya）的系列版画《战争的灾难》（*Désastres de la Guerra*，创作于1810~1814年）也描绘了同样的暴行。

小牛和屠户的统一，刽子手和牺牲品的统一

美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

无谓的反抗

如果考虑到布莱希特的书籍早已遭到焚毁，他本人也自1923年以来便名列纳粹的黑名单上，那么他被剥夺德国国籍的时间可谓相对较晚，1935年6月8日德国内务部才公布了这一命令。理由如下：“贝托尔特（贝尔特）·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作家，在一战战后利用其带有倾向性的剧作和诗歌宣传阶级斗争。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之后，又在流亡媒体或以宣传册的形式出版了大量反对德国的文章和诗歌。他拙劣的作品咒骂德国的前线战士，展现了极低劣的思想态度。”取消国籍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所有在德国的财产——这是布莱希特本不曾拥有的一以及版税——这原本也已经中断。

布莱希特立即作出了回应，他以第三人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指出父子之间一直存在着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儿子不会停止对德国的批判，与其终止通过涂涂写写创作反对德国的作品，他更愿意放弃自己的继承权。他的女儿汉娜不需要对父亲的行为负责任，她从来没有同他生活在一起。海伦娜·魏格尔和孩子们1937年4月5日也遭到株连，

同样被剥夺了德国国籍。除此之外一切平静；丹麦的生活乏味而缓慢，但不受任何事件的打扰。

玛格丽特·施德芬的状况完全不同。丹麦官员知晓，她是“隶属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组织”，因而无法返回德国，这些丹麦警察早已注意到，但仍不断用各种审讯折磨着施德芬。这是1935年末的事。当她1935年12月21日离境前往苏联，官员们甚为欣喜，两名丹麦刑事官员亲自把施德芬送往哥本哈根机场，坚信这位危险人物的确乘飞机前往列宁格勒。施德芬在苏联逗留至1936年，之后又多次疗养。

正如丹麦警方所担忧的，施德芬又回到了丹麦；原本的问题又继续了下去。露特·贝尔劳的想法是让施德芬同一名丹麦人结婚，她因而还恳求自己的老朋友摩根斯·福尔特伦：“同G. S. 结婚，这很严肃！请答复！”福尔特伦无法克服自己对“臭鼻子”的反感，而且首先认为这会玷污自己家族的声名，表示了强烈的拒绝。这是1936年6月15日。贝尔劳必须继续寻找，并最终找到了丹麦海员斯文·杰森·朱尔（Sven Jensen Juul），他同意这门虚假婚姻，并最终于当年8月29日完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尔认为这样的帮助在情理之中，而且两人之后也自然再无往来。施德芬住在布莱希特处，朱尔留在哥本哈根。当施德芬同布莱希特一家一起离开丹麦，她提交了离婚申请，但由于各种行政的繁文缛节而一再拖延，离婚在她死后才最终得以正式批准。假结婚发生在1936年，是当时政治形势所逼。她的卷宗必须要在档案里消失，日后也不会再有出于政治原因的警方监视。这些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对患病的施德芬来说更是一剂毒药。

自1935年10月7日至1936年2月16日，布莱希特待在纽约，同早已身处美国的汉斯·艾斯勒参加10~11月共产主义戏剧团体—戏剧联盟（Theatre Union）《母亲》的排练。但整个事件最终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布莱希特的评论为：“老旧的自然主义表演让我感到腻

烦。这或许适应煤油灯的黯淡之光，却不适应如今的电灯。”汉斯·艾斯勒日后同汉斯·布格交谈时也曾回忆：“导演是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17级别的模仿者，但又缺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才华，舞台上……像是在演出特格尔恩湖（Tegernsee）的农民节庆。”《母亲》在纽约的演出几乎只面对工人观众，最终也收效甚微，但布莱希特还是向高尔基告知了此事。《母亲》本次的演出不如人意，布莱希特只好安慰小说家，作为戏剧原型的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除此之外基本无事可做，只有打发时间。但仍然完成了一些事情。艾斯勒和布莱希特首先“学习”了美国电影，以便更好地为日后的工作所用。因为电影票很廉价，两人能够负担得起每天去观看一部电影。据艾斯勒回忆，他们几乎只看了黑帮电影，“我们相互欺骗，这是为了进行社会研究”。正值此时，1935年10月著名的黑帮大佬“荷兰人舒尔茨（Dutch Schulz）”及其保镖被不明人士杀害，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肆报道。布莱希特收集了这些材料，并带回斯文德堡供日后所用，这可以说就是后来戏剧《乌依》（Ui）的开端。

本次纽约之行另一个不可思议的收获是布莱希特——在没有海伦娜·魏格尔的帮助下一使德国总领事馆将他德国护照（Nr. 538）的有效期限延长至1941年1月26日。为了在纽约逗留，布氏原本就必须延期签证多次，因而也希望利用这次访问美国实现这一目的，便立即申请延长护照。或许他被剥夺德国国籍一事没有流传到纽约，或许德国秘密机构在美国的运作方式无法避免这一“错误”，因此，这位被取消国籍的纳粹反对者多年之后仍能出示有效的纳粹德国护照。这一收获最终比《母亲》的成功上演更具意义。

布莱希特1935年11月14日向施德芬抱怨道：“总体来说这座城市无法居住。交通工具、住房、饮食都不健康。没有大规模的电影这里的人们估计会无法忍受下去（他们饭后会吞噬一些活性炭片剂，将胃

里阻止食物腐烂的各种化学物质清除出去)。我同这里的剧团一再起争执。董事会大概有10个人，争吵的剧作家、讨厌的小人物，总是评头论足又不断提出要求，如果一个场景表演不佳，他们就直接删除它，毫不顾忌。我的肾又疼了，把它割掉吧！”布莱希特无奈地再次发现，共产主义者无法将艺术和政治（这里指对法西斯的批判）相互联系起来，真正从事政治艺术，而不是仅仅将政党政治搬上舞台。他对排练期的评价如同上文一样：“全然都是垃圾。”美国人也不习惯这样的戏剧格调，这出戏剧完全不受欢迎。艾斯勒早就知道布莱希特正常情况下最多只能喝一杯啤酒，但当时也曾向其保证：“听着，你知道我从不喝酒，但在这座城市必须不时喝上一杯……没有威士忌我无法坚持下去。”难怪布莱希特再次肾病发作。

1936年1月，莫斯科开始了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的预审，其成员包括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Sinowjew）、列甫·加米涅夫（Lew Kamenew）、伊凡·斯米尔诺夫（Iwan Smirnow），以及托洛茨基的忠实追随者阿法纳西·别洛博罗多夫（Alexandr Beloborodow）。他们被指控同盖世太保合作，由于酷刑折磨，他们必须在法庭前承认自己是人民公敌和法西斯主义者，并得到了“公正的”判决：被处决。

在这一背景下布莱希特还向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纽约，胡克是托洛茨基工人党的领袖人物，这是美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布莱希特在《母亲》排练的某时遇到了胡克，向他控诉共产党派来的一名文化委员多么的颐指气使，此人在戏剧领域完全是一个白痴，但同时又事事妄自尊大。胡克问道，如果布莱希特把美国共产党视为“粪土”，为何又愿意同其合作，这引起了布莱希特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执政进行的反讽式赞扬，布氏继续道：“就被捕者而言，越无辜，就越应当去死。”胡克将这句话视为蔑视人性的愤世嫉俗，并把布莱希特赶出了自己的办公

室。再一次，一名机关工作人员不能理解布莱希特正用极端的逻辑嘲笑他，并讽刺他对莫斯科各项事务的片面理解。

面对胡克，布莱希特嘲弄讽刺的态度源自他在美国的沮丧经历，同格奥尔格·格罗兹逐渐终止的书信往来也是原因之一。德国和苏联每日都在公开舞台“上演”的不可理解的暴行，格罗兹已经谙熟了这一风格，在最终决定流亡美国之后，他决心对此不再置喙，而且还观察到，某些特定的美国人还对苏联的许多事件报以掌声。他曾致信维兰德·赫茨费尔德（这封信的日期被错误地记载为1935年3月8日）：“对173名背叛者的处决引发了欢呼声一片——而欢呼的都是纯正的‘民主人士’。共产党认为这些被外国钱财收买的叛国者理应以比击毙更严厉的方式去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受雇于‘外国’势力的反动派在阴谋破坏苏联的伟大计划。”

格罗兹所指的只可能是1936年8月25日对16名“恐怖分子”的处决（173这个数字毫无根据）；原因是他明确提到了季诺维也夫的名字——这位“矮小、肥胖、嗓音尖细”的列宁主义者曾在格罗兹的苏联之旅中开车送他穿过列宁格勒。格罗兹评论道：“是与非的问题是一个民主抽象的宏大问题——臃肿的季诺维也夫失去了自己的政党；各类建设事业的专家已经向我们证明，铁汉斯大林朋友是正确的，而后天季诺维也夫或者托洛茨基的宣传人员或许又向我们证明……”最迟自1936年开始，各方政治局势已经剑拔弩张，众说纷纭，似乎已经无法辨别还有没有正义可言。格罗兹和紧随其后的布莱希特只能从中玩味自己的政治游戏，用来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掩饰自己的不确定，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能采取的方式只有用嘲讽拉开距离，至少这是他们能够自己支配的。

高墙上用粉笔写着：他们要求战争

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和平鸽

为了斯文德堡的烟囱能冒烟，布莱希特还是要赚钱维持生计，因此他决定参与理查德·陶博尔（Richard Tauber）的电影《小丑必须笑》（*A Clown Must Laugh/Bajazzo*）的剧本创作，必须前往伦敦，从1936年3月6日至7月28日在当地按照周薪工作。布莱希特因此还再次遇到了汉斯·艾斯勒，艾斯勒为电影作曲，并担任音乐总监。电影是一部音乐剧，而且最终是一场惨败，但布莱希特也获取了新的经验，可以说是作为一名“伦敦工人”的经验。由于材料及其改编事实上与布氏毫无关系，他只能完成一些别人布置的任务，因此布莱希特突然想到，他应该尽量慢、尽量耗费时间地工作：“我的利益和雇主的利益相冲突。”他还向同样也在这个团队中工作的弗里茨·考特纳表示一定要“团结一致”，坚持周日不工作，并将这一态度戏称为“阶级意识的觉醒”。这样，布莱希特在伦敦几乎成了一名工人，但仅仅是几乎。

在伦敦，布莱希特还决定要成立流亡杂志《言语》（*das Wort*），在莫斯科出版，将德国反法西斯左翼人士团结到反对纳粹的斗争中。玛利亚·奥斯滕（Maira Osten）作为编辑在莫斯科负责这个项目，而编者则有：共产党员威利·布莱德尔（Willi Bredel），同共产党亲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以及左翼资产阶级利翁·福伊希特万格。1936年7月21日出版了杂志的第一期，并解释了杂志名称的寓意，“德意志言语”因“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胡言乱语”而衰落，因而需要新的形式。“由于真正的德意志言语在第三帝国境内无法生存，我们的使命是在境外守护它、保护它。当破坏者被清除，这份精心守护的遗产又将被纯正、清晰地归还于德国人民。”杂志的内容和语言风格表明，布莱希特最初根本没有参与到《言语》的工作中：

“胡言乱语”更多的是用于形容病人或者酒醉之人，对纳粹的咆哮而言几乎不是一个适宜的词语。语言、面目全非的文学以及变质的戏剧在经历过破坏之后还能够“纯正、清晰”地归还于人民，这只有远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会相信，例如苏联那些心胸狭隘的德国文化干

部。这里已经表述了战后的灾难性后果：对清理，进而才有可能去终结“德意志悲苦”，仍然缺乏准备。

由于愈演愈烈的混乱，反法西斯战线要么越发坚定，要么则变得不再旗帜鲜明，模糊了自己的界限，这也使短期内清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希望逐渐落空。相反，纳粹正向全世界高呼自己绝对的和平愿望，并且将1936年的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加入了自己的宣传计划——1931年柏林就被确定为举办城市，同时也开始实施新的军备计划（1935年3月16日的《国防建设法》），1935年10月1日开始贯彻普遍兵役制，修建新的集中营，例如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期间由集中营囚犯强制劳动修建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1933年就已经设有集中营的奥拉宁堡周边）。在第一批奥运会参赛者抵达柏林时，希特勒已经把秃鹰军团（Legion Condor）^[11]的第一支飞行中队派往了西班牙，在西班牙内战中“演练”世界大战，摧毁了格尔尼卡（Guernica）及其居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1936年7月31日。

1936年上半年，布莱希特开始构思《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1937年《言语》的第一期和《斯文德堡诗集》中没有收录的诗歌和诗歌草稿都被标注了“1936”的年份，这证实了布莱希特最晚何时便已经考虑到，希特勒所谓的和平政策里早已根植了不日将至的战争野心。其中一首诗的题目为《体育场上》（*Auf ein Stadion*），毫无疑问它剑指新建成的用于纳粹阅兵的奥林匹克体育场（1934年以来）。布莱希特的诗歌如下：

这座体育场

由从人民手中偷来的金钱而建

用来

训练杀手

跑得更快的

是盗贼

跳得更高的

是那些觉得足下这片土地烫脚的人^[12]。

不仅此事，同德国本土人民相比，以及同那些被迷惑因而（非本意地）支持希特勒的外国人相比，德国流亡者很多情况下都更清楚国内的真实状况。布莱希特“从人民手中偷来的金钱”一句，影射了纳粹用（在社会上广为宣传的）就业计划的钱来填补体育馆建设上财政漏洞的事实。对希特勒而言，重要的显然不是和平的体育运动，而是在全世界巩固自己的权力，获得普遍的、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但所有的人都被蒙蔽了。

1936年6月6日和7日，“保卫奥林匹克精神大会（Konferenz zur Verteidigung der Olympischen Idee）”在法国巴黎召开，这可以说是努力在最后一刻阻止法西斯德国的疯狂举动。虽然海因里希·曼慷慨陈词，但呼吁仍收效甚微：“一个依赖于强制劳动和大众奴隶化的政府，一个筹备着战争、通过欺诈性宣传鼓动才能存在的政府，它怎能尊重和平、自由的体育运动？请您相信我，那些前往柏林的各国运动员，在那里无非是成为那位早已认为自己是世界之主的独裁者的角斗士、俘虏和玩物。”

当然纳粹政府在奥运会之前也发布了国际奥委会要求的书面保障声明，承诺遵守“奥运精神”。纳粹政治黑帮承诺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自由参赛，同意在奥运会期间接受一个政治独立的组委会介入，看似准备好进行非政治的妥协，以至于国际奥委会荣誉主席—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936年5月向希特勒汇款一万德国马克，加入了支持者的队伍：“我的印象是，”顾拜旦在一

次公开讲话中说，“整个德国，从元首到匹夫都燃起了强烈愿望，将1936年奥运会打造成这个世界所见的最美丽的盛会。”语言首先就出卖了他。

由于纳粹尽一切手段使这座城市披上和平、开放的外衣，1936年的柏林成了一个传奇，唤起了人们对包容性独裁的期望（无论它到底是什么）。乐于被欺骗的态度也在奥运会的宾客中传播，在一战的生灵涂炭之后，人们无法想象恰恰又是德国人在筹备第二次大屠杀一而且此时早已开始。

1936年奥运会：到处充斥了轻松的节日氛围，天气风和日丽，《先锋报》（*Stürmer*）^[13]16天不公开发售，柏林市民在街头向那些不符合德国种族理念的外国知名运动员索要签名，人们一短短几日间一在鸡犬相闻的城市中闲逛。尽管如此，独裁统治仍不可忽视：从菩提树下大街到勃兰登堡门，处处飘扬着纳粹的反万字旗旗阵；不少运动员，特别是机关干部在心情好和阳光好时，都会面向全世界伸出右臂“致以”问候，这个概念本身就显示了屈从与臣服。法国人为之辩护的理由是，这种问候的方式在早期奥运会上就十分普及，这本是正确的，但仍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奥运会的问候虽然也是伸出右臂，但正如法国代表队所做的那样，明显转向一侧，相反，纳粹礼是右臂向上、向前伸直。但这一区别几乎或者完全没有被注意到，尤其是对在场的德国观众。运动会首日，当希特勒抵达运动场时，德国观众不仅敬畏地起身，而且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

作为观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贵宾，希特勒在所谓的“元首包厢”内接受了电影记录，这也展现了他对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在100米短跑中获胜后的身体反应。希特勒先是激动地注视着比赛，然后他神色渐渐黯淡下来，德国人被战胜了。他无助地看向戈培尔，戈培尔抱歉地耸耸肩，面色凝重地转向另一侧。希特勒先是用用力地揉捏着

自己的右膝，然后是右侧大腿，一直抓耳挠腮。他最终转身离开了发生这一切的地方，故意撞开了挡在路上的记者，仓皇而去。所发生的是：一个“黑人”获得了胜利的明珠，而且在这样一个国度，它正在向“世界”证实，“黑人”种族是何等的低劣。

布莱希特在诗集《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中又发明了一种新的体裁，即“墙面涂写（Die Wandinschriften）”，他曾设想将这些文字涂写于德国所有可利用的墙面上。布莱希特这次没有选择用韵，而是语言上的极简主义，用短小、简练的句子来展现矛盾。这些诗歌由于语言简明扼要，因而容易记忆，而且可以快速、粗略地写在纳粹统治下的公共场所内（是否真的得以实施则不得而知）。下面的诗歌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高墙上用粉笔写着：

他们要求战争。

而写下这些人

已经倒下。

诗歌开篇便给出了行为指令：把这些写到高墙上。“他们要求战争”是希特勒和戈培尔这一时期持续性的口号，这句话说明是别人——我们的敌人要求战争，而我们一直主张和平。真实情况是，“倒下”这一概念仍然是战争杀戮的通行委婉语，而且具有双重意义，内战已经开始，而且马上要转化为对外战争，因为统治者要挑起战争，以转移对内战的注意力并唤起“民族集体感”。1938~1939年，的确有不少德国人坚信希特勒给他们带来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诗歌结尾句是对那些参与传播短诗之人的警告：你们的反抗是有生命危险的。布莱希特成功地在这首短诗中既提出了行动指示，又预警了可能的后果。汉斯·艾斯勒自行在其中选取了一部分诗歌谱曲，组成《为无伴奏混

声合唱和电影（或照片）而作的康塔塔变奏曲》 [*Kantate in Form von Variationen für gemischten Chor a capella und Film (oder Photos)*] ，于1936年6月在伦敦创作完成，还参加了瑞士的一次有奖竞赛。这支康塔塔后来更名为《战争前夕》 (*Vor dem Krieg*) ，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又改为《反战》 (*Gegen den Krieg*) ；它应该跨媒体地同电影或者照片记录一同展示，并一对艾斯勒十分典型——强调了音乐与记录性内涵的关系。

如今我听说，你深陷囹圄。

我给你写的信/杳无音讯

德国人在莫斯科：

悲观主义，清算，背叛，死亡

美丽的卡罗拉·内尔1900年生人，是魏玛共和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女演员，在《三毛钱歌剧》电影版中饰演波莉一角，伊丽莎白·霍普特曼可以说为其量身打造了救世军成员莉莉安·郝丽黛 (*Lilian Holliday*) 的角色，不久之后布莱希特也将《屠宰场的圣约翰娜》的主角交给她担当。由于卡罗拉·内尔的德国共产党身份，1936年春，苏联秘密警察对她进行了审讯，并于同年7月实施抓捕，卡罗拉·内尔此时还不知，自己之后还会发生什么。由于同指挥家赫尔曼·舍尔兴 (*Hermann Scherchen*) 的恋情，卡罗拉·内尔对苏联产生了好感，自1932年同罗马尼亚共产主义者阿纳托尔·贝克尔 (*Anatol Becker*) 结婚以后开始流亡，起初前往布拉格，1934年又来到了给她和她的丈夫带来厄运的苏联。在苏联，卡罗拉·内尔在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领导下的左列剧团 (*Kolonne Links*) 工作。当剧团的一些成员被捕，万根海姆感到当下必须要证明自己具有“布尔什维主义的警惕性”。1936年6月，他用5页纸的报告揭发了卡罗拉·内尔及其熟人和朋友，

其中包括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的妻子岑策尔·米萨姆（Zenzi Mühsam），埃里希·米萨姆1934年7月10日在奥拉宁堡劳造营被杀害。万根海姆告发卡罗拉·内尔的理由是：“在政治态度上，她反苏联，追随托洛茨基，反政府。”1951年，当万根海姆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时，还为自己辩护：“每一名清白的党内同志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和义务，信任他人的勇气与警惕性不可分割”。

资深老“同志”，如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威利·布莱德尔、埃里希·魏讷特、在《言语》中公开反对布莱希特戏剧的尤里乌斯·海伊（Julius Hay）、弗里茨·艾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等众多人士，在这期间都晋升为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前身）党员，他们在莫斯科严密防范，不让任何来路不明的或者可疑的“因素”在党内蔓延，这些人可能出于机会主义已经加入到共产党之中。1936年8月10日，皮克有言论为：“我们的政党迄今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受到了队伍里这些败类（卡罗拉·内尔、阿纳托尔·贝克尔、恩斯特·曼斯菲尔德）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这样的屈辱从党内剔除掉。我这里有我党40人的名单，他们已经由于对共产党的敌意和部分由于对苏联的敌意而被拘捕。但这些看似只是从事这一犯罪行为的很小一部分。”

恩斯特·奥特瓦尔特想讨好这些屠夫，因而也支持万根海姆，造谣卡罗拉·内尔及与其要好的玛利亚·奥斯滕和米哈伊尔·库尔佐夫（Michail Kolzow）夫妇同维护“调解派”的“俄国政党高层”有联系。除此之外，奥特瓦尔特还参与了对奥尔加·维克托洛诺娃·特列季科夫和谢尔盖·特列季科夫夫妇的公开谴责。借此可以回顾一下布莱希特1935年的莫斯科之旅，当时布氏还同与妻子同住一家酒店的奥特瓦尔特关系紧密，奥特瓦尔特是1931年《库勒·旺贝》电影剧本的重要合作者之一。1935年3月底，布莱希特还曾写信给海伦娜·魏格尔，称奥特瓦尔特是“了解很多小道消息的人，失去很多却一无所

有”。5月12日，在国际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大获成功的布莱希特之夜，当晚，德国流亡者一方卡罗拉·内尔、亚历山大·格拉纳赫以及同样隶属于左列剧团的作曲家汉斯·豪斯卡（Hans Hauska）进行了钢琴表演，以此向被官方称为“伟大无产阶级艺术家”的布莱希特致敬。同样出席的还有政党高官威廉·皮克、万根海姆、阿纳托尔·贝克尔以及奥特瓦尔特等，其中奥特瓦尔特的身份并不明确，因为他在1936年9月4~9日的非公开政党会议中左右逢迎，抹黑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附和对布莱希特的普遍非议，同时也指控自己有严重的疏忽之责。这5名参加布莱希特之夜的德国流亡人士中，内尔、贝克尔、奥特瓦尔特一年后被捕，豪斯卡和格拉纳赫两年后被捕。格拉纳赫曾在基辅的依地语^[14]剧团工作，被捕后在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的斡旋下奇迹般地被释放，后逃往瑞士；而豪斯卡被移交盖世太保，后随即关押于德国监狱。其他三人没有从拘禁中活下来。

由于“外国人”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WD）^[15]看来原则上都是可疑的，因此布莱希特即使不是1932年第一次访苏时，最迟也在1935年以后受到监护，不过在当时告密和暗中侦查的混乱状态中，也无法确定孰是孰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1936年非公开政党会议上，“同志们”提出的批判足够将布莱希特立即处决。万根海姆揭发了布氏想为海伦娜·魏格尔安排电影角色的无谓努力：布莱希特编制了“一个卑劣的故事”，并曾解释，“我坚持不允许犹太人在莫斯科出演电影的观点。施德芬也曾向党内同志说，这件事必须透露给外国媒体，这个万根海姆必须剥夺党籍”。尤里乌斯·海伊提出了另一项指控，他能够在“布莱希特圈子”中发现“最低劣的悲观主义和清算态度”，以至于“不仅无党派的布莱希特，而且党内同志海伦娜·魏格尔也完全受这一情绪所控制”。

就此还必须回顾一下利翁·福伊希特万格1936年12月至1937年2月的莫斯科之旅。他回国之后立即用“给朋友的旅行记录”《莫斯科

1937》（*Moskau 1937*）展示了这段经历。福伊希特万格在苏联是一位知名作家，他的小说在这里存有数千册，他在莫斯科的账户也数额可观。福伊希特万格的描述一方面听起来像是对斯大林统治的维护，因为虽然有西班牙内战，福伊希特万格仍然把苏联视为一位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国家；另一方面，这一次访问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其中福伊希特万格开始坚信，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证实的，在暴力横行的世界“绝对和平主义的原则”无法得以贯彻，因而斯大林有必要对托洛茨基采取行动。福伊希特万格对莫斯科之旅的另一篇文章刊载于《言语》：“右倾道路是通往战争的道路。”在当时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但恰恰是斯大林在1939年8月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纳粹战争开辟了道路，但当时这无人知晓。

布莱希特1937年春才得知卡罗拉·内尔被捕，他立即向福伊希特万格求助，恳求他利用一切对斯大林的影响：“您能看到任何在斯大林秘书那里打听内尔状况的可能性吗？苏联定然要清理戈培尔的组织，但这一过程中也很可能发生错误。您知道，高尔基一生也时常为艺术家和科学家挺身而出。如果内尔真的从事了叛国活动，那么没有人能帮助她，但或许可以提醒人们她具有伟大的艺术天赋，从而可以加快审理程序，澄清她的案件。”由于知道联共（布）高层对他的看法，布莱希特努力尽量回避卡罗拉·内尔的案件，而且他自己也没有积极干预的能力，此外自然也暴露了布氏害怕引火烧身的怯懦。在布氏的莫斯科之旅期间，他也了解到卡罗拉·内尔在当地几乎没有朋友，人们都同她保持距离。1937年5月，布莱希特再次向福伊希特万格提出了请求：“您能为现在被困在莫斯科的内尔做些什么吗？虽然不知为何，但我不认为她是对联盟存续构成危险的人物。”布氏本身没有门路，他提出的所有疑问都得不到重视，他只知道内尔被卷入了一个“黑暗的故事”。1952年布莱希特还致信民主德国的苏联监管委员会顾问弗拉基米尔·塞姆杰诺夫（Wladimir Semjonow），询问“内尔

的命运”，时间是3月14日；布氏得到最后关于卡罗拉·内尔的消息是在1940年：“她生活在莫斯科。”

此外，自1937年3月以来，布莱希特还同自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裁判员尤里乌斯·海伊发生了争执，因为海伊拒绝印发布氏的一篇文章，并回以威胁，“海伊在一封极为放肆的信中向我保证，他决意无论如何都要一辩高低，而且所有他接触过的同志都赞同这一观点”。1937年3月11日，布氏致信约翰内斯·R. 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说明此事，期望贝歇尔能够给与支持，但贝歇尔其实早已隶属于另外一方。布氏信件最后一句中的插科打诨“简言之，我们不需要海伊式的鼻过敏”，^[16]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消极尝试，在政治窘迫中保留幽默的一面。

这里/自然之力无效

西班牙内战：演练世界大战，

战争旅游，文学辩论

布莱希特本应同露特·贝尔劳共同参加第二届保卫文化国际作家大会，大会1937年7月4日在瓦伦西亚开幕，之后转移到马德里，7月16~17日在巴黎闭幕，但相比西班牙的战争危险，布莱希特偏爱安全的丹麦，或者正如他的新女朋友所说：他“有些讨厌炸弹”。因此贝尔劳同支援西班牙的苏联政委米哈伊尔·库尔佐夫结伴，库尔佐夫是玛利亚·奥斯滕的丈夫，玛利亚·奥斯滕也是（莫斯科）《德国中央报》参与西班牙内战的驻外记者，因此贝尔劳同库尔佐夫一同飞往马德里。当时马德里是一块是非之地，每天都可能被卷入战事。布莱希特同贝尔劳约定，她应该在大会结束后立即返回丹麦。

但贝尔劳显然喜欢同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士兵交往。对一些作家而言一例如努达尔·格里格（Nordahl Grieg）、博多·乌塞（Bodo Uhse）、埃里希·魏讷特——战争旅行既紧张又有趣，而且发生一些罗曼史也不会遭到非议。贝尔劳对这期间的政治局势无甚了解，比如在西班牙不可能将反政府者、托洛茨基派和共产主义者组成反对佛朗哥的统一战线，令她更感兴趣的是一名革命红军女战士，在必须返回莫斯科前，她决定在最后几个夜晚献身给前线战士，让他们免受西班牙妓女梅毒的侵害。

因此，贝尔劳也无从得知布莱希特已经起程，在相对安全的巴黎发表演说。这篇演说虽然好战尚武，但布氏在当时的情势下重新（同1935年一样）将注意力从拯救文化转移到物质领域仍是正确的：“如果文化同人民的整体创造力不可分离，如果同样的暴力袭击抢夺了人们手中的黄油和十四行诗，如果文化中也有物质因素，”那么必须“将对牺牲者的同情转化为对施暴者的无情……将怜悯转化为对暴力的气愤和厌恶，甚至转化为暴力本身，以暴制暴。”长久以来，我们只用“精神武器”守护文化，现在它必须得到“物质武器的守护”。

1937年4月26日，这是一个周一同时也是集市日，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遭遇轰炸，悲剧又将战争罪行提升到了新的等级。英国战地记者乔治·L. 斯蒂尔（George L. Steer）在伦敦的《泰晤士报》（4月28日）发表评论：“本次袭击策略清晰：首先是炸弹和手榴弹，使居民开始无谓地逃亡，然后用机枪射击将他们赶到地下藏身处，最终用燃烧弹摧毁这些避弹所。”秃鹰军团参谋长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同戈林一起负责这次大屠杀，里希特霍芬对本次“事件”只发表了简短的军事意见：“格尔尼卡，5000居民的城市。……250公斤爆破炸弹摧毁了大量房屋，破坏了供水。燃烧弹从而得到了发展和起作用的时间。房屋的建筑样式：瓦顶屋、木质

长廊、木框架建筑，遭到彻底摧毁。……街头仍能看到空弹壳，甚佳。”没有提及人员伤亡。

同西班牙内战相关的还有一个有些动人的故事，即期待露特·贝尔劳返回丹麦。贝尔劳在西班牙的逗留持续到11月中旬，而且其中伴随着一些对当事者不利的消息，也就是说等待很可能是徒劳的。贝尔劳也曾来信称自己将乘某一艘船返回丹麦，希望能在哥本哈根得到布莱希特的迎接（信件没有得到保留）。但贝尔劳也没有露面。

而正是这一时期，布莱希特巧妙地为露特·贝尔劳创造了“赖荼（Lai-Tu）”这个角色，将贝尔劳作为他的“妹妹”推到了与性无关的距离上，这一时期他还干脆把玛格丽特·施德芬称为必须完成自己任务的“革命战士”；而女人们都应该接受这些标签，不为大师的性出轨制造麻烦。当布莱希特同海伦娜·魏格尔于9~10月前往巴黎，施德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并写道：“我如此爱他，我将会因此而死去。”布莱希特返回时，施德芬大吵大闹；布莱希特用冷漠回应，像往常一样逃开以避免纷争。当贝尔劳返回丹麦，施德芬在自己的随身日历中写道：“我希望她会惨死。这样会给她买个漂亮的花圈。”

为了躲避斯文德堡的争执和悲伤，布莱希特支持他的妻子抓住仅剩的机会之一，再次登台表演：饰演《卡拉尔大娘的枪》（*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的同名女主角。海伦娜·魏格尔在流亡中失去的最多。短短几年间，她在魏玛共和国曾是位冉冉升起的明星演员，但如今却必须在陌生的国度担任家庭主妇的角色，对此她不仅展现了极高的管理天赋，而且用兢兢业业的执着完成着这项任务。这不仅包括操持每日必须完成的家事，还要为丈夫整理工作资料，誊写文章，甚至还要制作一些日常使用的小工具（例如剃须刀），尤其还要招待那些能温暖“丹麦的西伯利亚”的客人们，为他们提供住宿。在所有流亡地她还要负责保障布莱希特有单独的工作间，而且是所有房

间中最大的，以便能保障有写作的条件。如此看来，魏格尔完成了劳苦功高的工作，但由于失去了自己的事业也渐渐出现了一些苦闷，而且还要面对布莱希特同两名其他女性关系亲密的苛刻要求，她要么需同这些女人一起居住，要么几乎每天都有交往；因为露特·贝尔劳最迟从1937年初开始就成了布莱希特的新情人。

魏格尔开始在西班牙和法国寻找工作机遇。1937年1月18日，她询问埃尔文·皮斯卡托尔，她是否“可以像曾经那样做些事情”，就像当年在柏林的宣传组织中那样；皮斯卡托尔身处西班牙内战之中，在前线组织一些小型的作品演出。魏格尔如此评价自己的境遇：“我白痴一样的生活简直令人窒息。我曾经是，现在也是一个可用之才，冬眠的时间太久了。”

西班牙毫无音讯，但巴黎的德国作家保护协会却同意赞助《卡拉尔大娘》的演出，在斯拉坦·杜多夫的执导下，海伦娜·魏格尔再次得以登台演出。布莱希特利用这次机会，在于蓝色海岸流亡的福伊希特万格处隐遁了几日，但又及时返回参加最终的彩排和10月16日的首演。布莱希特还致信卡尔·柯尔施，并在信中评价了魏格尔的表演：

“赫莉（Helli）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在演出中断的这些日子里她的才华没有受到损失，她很开心。她的表演是迄今在叙事剧舞台上所见的最好、最纯粹的。她饰演安达卢西亚的一名渔妇，完全打破了别处现实和程式化表演方式之间的对立。”安娜·西格斯参加了高朋满座的首演，并在《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4月刊中对演出大为赞赏：“这是我们的戏剧，为我们而演，演我们的故事。……魏格尔的声音现在能有何作用？这个声音同一沓沓报纸、一捆捆传单或者一车车的弹药一样重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声音威慑敌人、坚定自身。大家都在讨论她的声音，因为在漫长的时间后终于再次听到了它。”

当布莱希特返回丹麦时，魏格尔拒绝同往。相反，她努力在维也纳父亲那里，以及日后的布拉格和苏黎世寻找其他可能性，她让布莱希特坐立不安。但布莱希特呢？他还有他的格丽特，格丽特自9月起已经搬入了茅草房，日渐恐惧地等待着露特·贝尔劳归来。格丽特还同汉斯·艾斯勒及其妻子路太太（Frau Lou）共度了几个快乐的星期，艾斯勒于1937年1~10月在斯文德堡创作他的《德意志交响曲》

（*Deutsche Symphonie*），这样，即使布莱希特不在时，她也不至于孤独。

1937年9月刊的《言语》中，阿尔弗雷德·库莱拉（Alfred Kurella）开启了日后被称为“表现主义论争”的辩论，德国流亡作家的大部分为之忙碌了一年之久（克劳斯·曼、赫尔瓦特·瓦尔登、鲁道夫·莱昂哈德、恩斯特·布洛赫等）。虽然库莱拉属于德国共产党内部的活跃分子，在党内以及民主德国成就了一番事业，但由于他的弟弟海因里希1937年在试图逃离苏联时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37年10月执行了枪决，所以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阿尔弗雷德·库莱拉只能以假名伯恩哈德·齐格勒（Bernhard Ziegler）发表文章；本次亦如此。库莱拉断言，正如本恩事件所证实的，“如今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谁是表现主义的精神之子，而跟随这一精神又会走向何方：法西斯主义”。

在这期及后续期刊（至1938年7月刊）中刊登的争论被冠以了“布莱希特—卢卡奇论战”之名，原因是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之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上的分歧构成了本次论争的核心，虽然布莱希特没有—至少没有公开—参与这次论争。还有猜测认为，布莱希特此时已经被排挤出了《言语》编辑部，也不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但这没有得到证实。在一封没有公开发表的信件，即1937年11~12月间致斯拉坦·杜多夫的一封信中，布莱希特以如下理由解释自己的沉默：他的理论只有大致框架，发表这些会导致读者的不理解，因而只会拖延和滞后

实践工作；而且他的理论缺少实践机会，含有无法证实和刚愎自用的因素，看似仅以攻击他人为目标。这位艺术实践家此时再一次说明，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结构中，不存在自己立场的真实对应物，因为他的（叙事）戏剧基本无从上演，而技术化的散文和诗歌也无从证实，它们大多数都被纳粹付之一炬。

对这场表现主义论争，布莱希特还有自己不为人广知的美学贡献。1934年布氏在同玛格丽特·施德芬交换爱情十四行诗时，就挖掘了但丁的故事，他的爱情也郁郁不得终，却因此创作了经典的文学作品。借此布氏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以经典十四行诗的形式开展文学评论。1938年，布莱希特写了六首文学评论性的十四行诗，其中包括《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Über Shakespeares Stück »Hamlet«*）、《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婚姻的定义》（*Über Kants Definition der Ehe in der »Metaphysik der Sitten«*）、《论席勒诗歌〈人质〉》（*Über Schillers Gedicht »Die Bürgschaft«*）、《论歌德诗歌〈神与印度舞伎〉》（*Über Goethes Gedicht »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布莱希特将有关但丁的诗整理为一本小诗集，命名为《研究》（*Studien*），这对诗歌体裁而言是一个不寻常的题目。由于诗集没有找到出版商，布氏将一些胶印版寄送给他的朋友和一些德国流亡者。这一时期，他要将同古典文学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研究》中，布莱希特举例将“整体”世界文学进行了批判和唯物主义（“低端”）“建构”（Konstruktion，布氏的表达），以证实对古典文学不加批判的学习会对现实主义文学造成严重的后果。而“社会批判性”十四行诗精湛的美学技巧在于，以十四行诗的古典形式对“继承”进行批判。由此，布莱希特可以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信条的形式主义者证明，他可以灵活运用“古典的传承”，而且精熟掌握了他要批判的典范人物所采用的高贵形式。采用古典形式这

一做法，赋予了对“继承”所发表的批评以形式主义意义的精炼和无懈可击。这样的嘲笑本能够使形式主义者颜面尽失，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这些诗歌展现在文化官员的眼前，他们也无法理解。

在证实自己不具有脱离布莱希特实现独立的物质基础之后，海伦娜·魏格尔1937年11月17日返回了斯文德堡——虽然布莱希特也是借债度日。1937年6月，布氏在一纸证明书上签字，表明自己对卡瑞·米夏埃利斯负有大量债务——52000克朗。《三毛钱小说》的收入早已用尽，从德国也再没有一分钱进账。同时还丢失了《三毛钱歌剧》在巴黎演出的版税，因为导演把版税交给了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出版社，虽然布氏明确告知这样会令其无法得到版税。德国出版社指控布氏不遵守合同，而且要求作者退回预付费用，这笔钱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41508.36德国马克。

极具语言天赋的施德芬完成了一些翻译工作，从而减轻了一些经济负担，根据布莱希特的强烈愿望，翻译作品包括努达尔·格里格的《失败》（*Die Niederlage*），即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汉斯·柯克（Hans Kirk）的小说《日薪者》（*Die Tagelöhner*）以及自1938年3月以来马丁·安德森·尼克索（Martin Andersen Nexös）的《回忆》（*Erinnerungen*）。由于当时翻译费用不菲，这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收入，也减轻了布莱希特的负担，布氏因施德芬为他工作而一直支付经济上的酬劳，而且这一时期还要一再为其支付医生和疗养的费用。虽然布莱希特不精通上述任何一门外语，但他仍参与到翻译工作中。在翻译格里格的作品时，施德芬1938年2月1日和3月12日两次在信中明确告知瓦尔特·本雅明，在布莱希特的帮助下，她在翻译中细心地创造了一种（人工）方言（“对此我们都很骄傲”）。但弗里茨·艾尔彭贝克不经询问直接把它转换回了“糟糕的”标准德语，并以施德芬的名义发表于《言语》上，如此一来包括乔治·卢卡奇、阿尔弗雷德·库莱拉、约翰内斯·R. 贝歇尔、弗里茨·艾尔彭贝克的“莫斯

科派”又开辟了一块新的战场——针对布莱希特的这名女同事。由于无法压迫布莱希特团体的工作，他们开始对其进行惩戒。

在对马丁·安德森·尼克索的翻译事宜上，布莱希特的参与又完全是另一种方式。如同当时普遍的情况，安德森·尼克索明确要求布莱希特参与其中，他甚至还建议向施德芬“直接预付相应的稿酬”，然后又向准备于1938年圣诞节出版《回忆》的古腾堡图书行会要回了这笔费用。1938年2月2日，安德森·尼克索确实向布莱希特致信：

“条件是，你在译本上署名。”布莱希特反对这一提议，要求译者署名应该是两人，而且施德芬作为第一译者，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安德森·尼克索咬牙坚持，但他仍然希望，“你要相信自己，担负起翻译的美学责任”，布氏应该“像语言之神一般对此游刃有余”。布莱希特参与本次翻译的方式如同《三毛钱小说》，只不过角色进行了互换，布氏扮演了家中第一位评论家的角色，但评判的并非施德芬的翻译，而是她的德语。

为了赚钱布莱希特还计划写作一部有关恺撒的戏剧，他1937年10月底就开始筹备这一计划，但又于1938年1月放弃，转而开始了长篇小说的项目。由于已经掌握了相关的史料，第一部书稿的写作从1月17~23日迅速推进。长篇小说，而且是历史性长篇小说，这一体裁可以借用历史素材影射时事，因而借之赚钱的前景也一片大好。从《三毛钱小说》中布莱希特积累了小说写作的经验，而且小说还是可能的收入来源；德国艺术与科学协会（Deutsche Akademie für Künste und Wissenschaften）只资助散文，所以布莱希特提交的《斯文德堡诗集》没有受到评委会的关注。他还接触了这一协会的支持者——美国促进德国文化自由协会（American Guild for German Cultural Freedom），为自己申请奖学金，并于1938年5月得到了这笔费用，由于小说要求大量的资料检索，布氏也成功申请到了延长奖金支付时间。

政治如同真正的商业生活

新物理学的应用：

羁绊于事业之中的恺撒

历史小说多用讲述历史的方式展现现实事件，但同时又为之披上了历史的外衣，希望借此在法西斯德国尚能找到读者——例如海因里希·曼的《法王亨利四世的青春时代》（*Die Jugend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 1935）以及维尔纳·贝根格吕恩（Werner Bergengruen）的《大暴君和法庭》（*Der Großtyrann und das Gericht*, 1936），与之不同，布莱希特自始至终强调自己提供的并非“改装的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传记”。小说刻画的更多是“帝国的建立和独裁统治的巩固，以严格的历史为基础”。尽管如此，布莱希特仍尝试打破同时期现代小说的模式，完成一种新的类型。

《尤利乌斯·恺撒先生的事业》（*Geschä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 简称《恺撒》）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一名历史学家，而且首先是一名传记作家。他完成了一部关于雅典城邦立法者梭伦（Solon）的书籍，并且想在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逝世二十年后为他——“所有独裁者可望而不可即的榜样”书写传记。由于他所掌握的恺撒形象都源自传说，“我”开始尝试通过可靠资料和目击者获得“对真实动机的认识”。收获是巨大的。恺撒的传记并非简单地再现历史或者直接展现传统事实，通过不同目击者从而有可能实现多角度的描述，并且对恺撒周遭“原本”的史实进行评价。这里布莱希特自然得出的并非现代小说的结论，即质疑史实本身，并将所有的真实归结于主体的建构。布氏坚持，存在客观真实，即真实的历史，这些已先于书写的主体出现，此外还决定了主体的写作内容（而非反之）。这部小说的结论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准备写作一部恺

撒的（英雄主义）传记；而他最终完成的是一份这部传记为何失败的报告：他得到的资料更改了恺撒原本的形象。

但这部小说挑战性的创新其实是将海森堡（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Unbestimmtheits-Relation）”，进行现实解释及美学转化，海森堡1927年在哥本哈根诠释^[17]中为之冠以了“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名号，并于1955年在《当今物理的自然图像》（*Naturbild der heutigen Physik*）中再次对这一原理进行了阐释，否定了现代自然科学对客观化的要求。其事实如下。在宏观世界中，为了拍照，在夜间向一辆行驶中的火车头投射一束光，那么同火车头全力前进的力量相比，光的力量十分微小，因而可以在计算的时候忽略不计。但如果在微观世界中向一辆微观火车头投射一束光，那么光的力就同微观火车头的力同样大，甚至更大，这将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投射的光将使微观粒子脱离原本运行的轨道，有可能将其抛往任何方向，这样就无法对其进行投影。第二个后果，粒子将无法被确定，因为观察者会对被观察事物产生影响。如此一来，通过观察得到的结果不再能被客观化，粒子的行为将取决于实验规定。这看似确实是所有客观（更好地说：可实现的客观）真实的终结。

但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微观世界由大量极微小的微观粒子组成，它们同宏观世界或者正常世界中的物质有本质的区别，因而经典物理学的原理不再适用。在微观世界中：从运行轨道中脱离出来的粒子大部分都成了场力线，场力线使粒子的规则可以得到认识。而位于场力线之外的少量粒子则可以忽略不计。利用概率能够以百分比计算出粒子行为，并应用于未来情况。

布莱希特将单个粒子在微观物理环境中 的不确定性用于展现社会中的个体，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大众社会中的个体。由此得见，虽然个体对外以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出现，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同样的要

求，但只能作为“被斗争或多或少席卷而过的多数”得以展现，与此相对应，正如布莱希特所描述的，伟大的个体“只有与伟大阶级的伟大运动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而这恰恰是《恺撒》小说的内容。恺撒是城市中的政客，是新兴资本主义骑士的政客。为了自己的事业恺撒需要这些骑士，正如他们也同样需要恺撒，但这里的关系展现得更加复杂，恺撒是古老家族的成员，他本人将埃涅阿斯（Aeneas）^[18]作为自己的祖先，他的家族[母亲维纳斯（Venus）]也成为神族的后裔，因而，恺撒事业起步的有利形势（得到借债）要归功于他的出身。这里的运作原理如下：“政治如同真正的商业生活。不推荐小额的负债，但大额债务则会改变事情的角度。一个真正大量负债的男人反而享有尊重。面对他的债务，颤抖的不仅是他本身，还有那些债主。他必须得到伟大的事业，这样他才有能力偿还债务。还必须保障他心情良好，不然他会万念俱灰，对万事不管不问。同样还不能回避同其交往，因为要时刻提醒他债务问题。简言之，他成为一种权力。这就是经历过足够失败的政治家。他的名字就在所有人的嘴边。”

在各个阶级之间左右逢源，善于趋利避害，被视为政治家，恺撒要么在做生意，要么别人在同他做生意。但叙事者绝没有否认恺撒的个体性，而是一再强调机遇出现时他当机立断的能力。但：人物并非从内在凸显而来，他也不是所有伟大行动的创造者。恺撒更多是在机会之内发挥作用，而这些机会是外部提供给他，而他也证实了自己是那个时代认识和了解现实的行家。仅仅在可分割性上，盖乌斯·尤利乌斯的个体性被矛盾化地显现出来。

布莱希特借《恺撒》小说塑造了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形式，这一形式没有找到继承者，至少没有知名的继承者。小说的威慑力在于用新现实主义的目光回顾历史，展现历史矛盾，同时使人民意识到历史在过去就并非由伟人创造的。由此也对同时代的“大罪犯们”进行

了批判，布莱希特建议，应该将这些人作为“严酷罪行的实施者”称呼和描写，因为罪行与人物应该分开来看待。由于这部小说是部讽刺作品，对万恶资本主义的评述也属于愉快的调侃。

在布莱希特开始创作《尤利乌斯·恺撒先生的事业》之前，时事还给布莱希特和希特勒带来了一次事后聪明的机会。1937年9月26日的《巴黎日报》中刊登了一篇杂文，据其内容，《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的一则对纳粹党代会的报道以《夜半鼓声》为题。纳粹写手忽略了，纳粹党代会的鼓声不应该用布莱希特戏剧的题目。巴黎记者评论道，纳粹党不放过任何机会“剥夺对手的财产”。因此，1937年9月6~13日，为了降低失业率而举行的全国劳动党代会（Reichsparteitag der Arbeit）的组织者应该写明：“作者：贝尔特·布莱希特；导演：阿道夫·希特勒。”

当贵族头颅落地，他们至少尾巴还翘着

人类市民阶层：爱情的没落

1938年6月，瓦尔特·本雅明再次来到斯文德堡，他的大部分藏书都放置于此，并继续同布莱希特的著名谈话。本雅明住在一个果园庄主家，来布莱希特家就餐，传说中的象棋游戏也仅仅时而举行，因为虽然两人相互支持、关系友好，但美学和政治上的分歧还是给这个偏远的丹麦夏天划定了明显的限制。本雅明在巴黎为布莱希特的戏剧筹划演出机会，布莱希特与流亡杂志，特别是与《言语》发生了争执，因为这些杂志要么不刊登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文章，要么刊登了又不支付费用。虽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学院给予了本雅明微薄的资助进行社会研究，但本雅明仍然需要额外的收入，他深居简出，撰写关于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文章，这应该能给他带来一些报酬。7月20日，本雅明写于斯文德堡的手记即使尚未决绝，也显得很疏远：“即便布莱希特的友谊情至意尽，但我仍必须在严酷

的孤独中坚持我的工作。我工作中有一些特定的内容，是布莱希特无法认同和吸收的，他同我结交时间足够长，可以认识到这一点，也明智地尊重这点。”

两人之间也一定有紧张情绪，因为无论是他们的工作还是他们的意见都不能融合，虽然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激发了布莱希特开始记录法国受排挤的诗人，但本雅明却对《恺撒》小说完全不感兴趣。1938年夏，布莱希特对两人谈话的记录刻画了一个极为尖刻的布莱希特形象，布氏用挑衅的语调考验本雅明在政治事宜上的笨拙与迟钝，将他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对待，批判性地观察他对自己含沙射影挖苦的反应。例如布莱希特某天早晨带着一首诗歌出现在本雅明处，这是公元前1400年埃及一首无恶意的农民诗《农夫对公牛的讲话》

（*Ansprache des Bauern an seinen Ochsen*），布莱希特用沙哑的声音为这位吃惊的客人朗诵了诗歌：

哦，公牛，神的牵犁者
现在屈尊来耕田吧！
友好地不要弄乱犁沟！
你先走，领路人，驾！
我们曾俯身站立，切割你的饲料
赏脸吃完吧，最贵的养育者！
吃草时不要担心犁沟，吃吧！
为了你的棚厩，家族的守护者
我们唉声叹气地把房梁拉倒，
我们躺在潮湿里，你在干松之上
昨天，你咳嗽了，亲爱的引路者。

我们不知何往。

你想在播种前死去吗？你这条狗。

根据本雅明的手记，他一开始“并没有发觉事情的意义”，这也不自觉暴露了布莱希特的策略，用几乎令人羞愧的方式欺骗朋友上当。当本雅明意识到其中他几乎不愿相信的对斯大林的影射时，布莱希特又耍心机表示克制。他傲慢地解释道，这首诗“实际上是对斯大林的尊敬，根据他的观点，斯大林完成了无法估量的功绩”，他一布莱希特“不会用其他热情的形式表示敬仰”，他在流亡中等待着红军。虽然这首诗的含义如此隐晦，但本雅明不否认，仅仅这首诗就足以将布莱希特送上苏联的火刑柴堆。

在另一些谈话中，如果含糊地提到存在的“疑虑”，而这其实要求“对苏联事务进行持怀疑态度的审视”，那么布莱希特就会转移话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离题的谈话”中提到，苏联是“一些犯罪团体”在执政，这“不时从他们的罪行”中就能看出。这里，布氏想到的是他在莫斯科的敌手，完全没有考虑斯大林以及恐怖统治。当布氏向本雅明朗读他与卢卡奇的论战时，本雅明评论道，这事关“权力问题”，“那边的人”必须发表意见，他在那里有些朋友。对此，布莱希特回答道：“事实上我在那里没有朋友。莫斯科人民本身也没有朋友——他们像死人一样。”布莱希特这些话让人难以理解。两人还讨论了歌德的《亲和力》（*Wahlverwandtschaften*），这是布莱希特至此读过的唯一一部歌德的小说，本雅明认为德国人“痛苦地”接受了这部小说，对这样的说法布氏感到高兴，他接着说：“德国是一个糟糕的民族。人们并非不能从希特勒身上推断德国人的特质。我身上所有德意志的东西也都是恶劣的。德国人身上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其目光短浅的自立性。例如那些帝国的自由城市（Freie Stadt），奥格斯堡这样糟糕的城市到处都不曾有过。里昂就从来不是自由城市；文艺复兴

兴时期的独立城市都是城邦。卢卡奇选择成为德国人，这样的人已经消失殆尽了。”

布莱希特的这些攻击性言辞——特别是面对本雅明——在艺术上首先针对的是卢卡奇，这些要感谢“莫斯科派”，他们已经悄然显示了联盟思维，可以说是与对手进行不正大光明的斗争：根据1936年党代会的记录，文学判断——如同下文中阿尔弗雷德·库莱拉的鉴定——等同于对当事人宣判死刑。库莱拉1938年6月指控本雅明，他对歌德的阐释会“给海德格尔带来巨大荣耀”，这在间接上意味着，本雅明已经投身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航道。本雅明对布莱希特未予评论，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布氏及其韬光养晦的策略。本雅明在经法国逃往西班牙的途中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当时以为正面临的生命危险其实并不存在。但据记录中的文字显示，他在斯文德堡已经提前计划好了自杀。1938年这个丹麦的夏天毫无成果。

但两人仍讨论了性欲的未来。本雅明——不知他为何如此——宣称，面对爱情的没落，性也会麻木，或者必将麻木。这种看法布莱希特不能容忍。布氏1938年8月13日在工作笔记中记录：“本雅明声称，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性将完全麻木。而我们的布尔乔亚认为，这是人的本性。当贵族头颅落地，他们至少‘尾巴’还翘着。布尔乔亚甚至连性都破坏了。”布莱希特也将本雅明归于布尔乔亚的一员，批判他的思想是普遍人性的，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在辩证法上有严重的错误：对极为抽象的事物进行不加区分的、人类学的判断。如果本雅明确实如布莱希特所记载的，援引了弗洛伊德，他的断言也有失偏颇，因为弗洛伊德恰恰认为——借此确定了自己发现的划时代意义——性是根植在人性中不可逆的事物。

性当时同样也是露特·贝尔劳小说集的主题，这部小说集名为《每种动物都可以》（*Ethvert dyr kan det*，德语：*Jedes Tier*

kann es)，1940年出版于哥本哈根。小说讲述了女性中爱情的没落，以及她们同男人令人沮丧的性经历。小说中写道：“所有女性中应该有70%性冷淡。……高潮只是碰巧的事。”贝尔劳的德语水准欠佳，布莱希特同其一起创作德语版。布氏从小说中受到了教育，但他也几乎不能被算作其中相关的无法实现性满足的男人；因为布莱希特不仅赞同贝尔劳的观点，而且还竭力为她的小说寻找德国读者（这自然是日后才发生的事情）。与小说集相关联，布莱希特还写作了诗歌《关于爱情的没落》（*Über den Verfall der Liebe*），诗歌可以看作对贝尔劳论述的支持性评价，结束句直接呼应了小说集的题目：“每种动物都可以。在人类间/它被视作艺术。”证明未完。

针对社会的野蛮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关系，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19]表示，“所有的性迷失中”禁欲是最“特殊的”，在这一讽刺性表述中已经挑战性地说明，它应该脱离宗教和小市民道德对忠贞的要求。为何？因为性享受属于人类生理的基本内容，它同吃喝一样，原本既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也不需要道德上的探讨，而是必须用快乐来经历。但古老的意识形态问题将人类的性生产活动视为原罪，同时也忘记了，每一个人都是性交合的产物。性欲不仅服务于个人的满足，而且只有在同他人的交合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享受，所以性由于其首要特质从一开始便被定义为社会的、主体间的欲望，因此同样也提出了问题，为何性应该（必须）具有排他性？

虽然布莱希特先生有小市民的装腔作势，他与他的情人们之间反反复复的相互伤害、嫉妒、谩骂甚至当面的侮辱，但就其人生经历看来，布莱希特丹麦流亡的最后几年同三名女性同居，而且还要照料两个孩子。其间，孩子的母亲海伦娜·魏格尔所必须忍受的是最多的。所有的当事人一起初贝尔劳除外一都被迫共同居住，而且无法决定选择某一人或抛弃另一人。海伦娜·魏格尔曾尝试离开布莱希特，但现实情况不允许，而且还有孩子们将何去何从的问题。患病的玛格丽特

• 施德芬由于政治上受到胁迫而流亡，从而在生存上同布莱希特紧密联系，由于她通过为布氏工作或者布氏为她介绍工作而维持生活开支，同时病患也排除了她一再考虑的其他可能性，所以施德芬也留了下来，她在丹麦也有其他情人。由于患病，施德芬带来了死亡的威胁，对此海伦娜·魏格尔曾一度抵制，但最终也接受了。露特·贝尔劳是本土的丹麦人，能为布莱希特建立工作关系。这是流亡最昏暗的时期。

10月中旬，瓦尔特·本雅明离开丹麦，同时带走了寄存在布莱希特处的大部分藏书。起程之前，他向西奥多·W.阿多诺作出了如下总结：“在逝去的这个夏季，我同布莱希特交往得越自然、越平和，我就越不能无所顾虑地把他留下，因为这次交流比通常要更顺畅，其间，我明确地看到他日益增长的孤独。我不想排除对事实较陈腐的解释—孤独降低了他在谈话中习惯使用的挑衅性计策的乐趣；但更真切的是，在日益增长的孤独中仍能发觉他对我们共同之处的忠诚。在他的生活状态下，孤寂会在一个斯文德堡的冬日向他发起面对面的挑战。”

你看到什么？你什么也看不到。你仅仅在呆视。

呆视不是看

伽利略的新生：舞台上的实验

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4日，美国作家费迪南德·赖雅（Ferdinand Reyher）前来哥本哈根，赖雅1891年生人，主要在美国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布莱希特在柏林时期就与其相识，之后也曾多次相遇。这次布氏提到了自己的伽利略计划，并已经为之进行了大量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研究。赖雅乐意把这些材料在好莱坞以电影的形式呈现出来。1938年12月2日，布莱希特万分感激地致信赖雅：“您从伽利

略一事中能够看出，在如此一个经济衰败的大陆上，人们处于何等的孤立之中。您在哥本哈根志同道合的兴趣足以鼓励我立即开始这份宏大的工作。”最终发生了什么？布莱希特在一个月间完成了一部包罗万象的戏剧，同寄给赖雅的《伽利略传》（*Leben des Galilei*）草稿不同，此时剧本名称还是《地球自转》（*Die Erde bewegt sich*）。1938年11月23日，布氏在工作日记中宣告，剧本已经完成，当然，在他对戏剧作品的理解中，这只能指手中已经有了第一份可以示人的文稿。

在《恺撒》小说之后再次遁入历史题材？伽利略作为新时期科学的创始人，首次通过技术手段和时间获得了有科学根据的、可被证实的知识，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陷入了与教会的冲突，而教会同时又是政治当权者的代表。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称为“可见性假设（Sichtbarkeitspostulat）”，而伽利略的发现使其失去了效力，所以两方之间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托勒密的宇宙观主张地心说，围绕地球旋转的七大“行星”：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其他恒星被定义为人类无法达到的空间，即神的空间。只有可见的，即人类用眼睛可以看到的，才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布鲁门伯格在他的图书《新时代的正统性》（*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中揭示了此事的后果，世俗化是哲学和文学中著名的核心范畴，指宗教信仰（逐渐的）世俗化，但这只不过属于“历史错误的范畴”，因为托勒密的宇宙受到伽利略的驳斥，从而无法要求任何的合理性；所以世俗化也无从谈起。

戏剧开篇即将在普遍理解上复杂、最终其实十分简单的物理实验搬上了舞台。安德雷亚（Andrea），女管家的儿子，坚持说看到太阳“夜晚和早晨处于不同的位置。它绝不可能是静止的！绝不”。伽利略对此回答“你什么也看不到。你仅仅在呆视”，然后用现有的物品

组织了实验。伽利略用正在使用的洗手盆当作太阳，然后把安德雷亚放在一把椅子上，当作地球。问：“太阳在哪里？”男孩回答：“左边。”当然，如果伽利略把洗手盆拿向右侧，它就会出现在男孩的右边，然后伽利略把椅子连同安德雷亚一道放在房间的角落，并问道：“太阳在哪里？”安德雷亚当然回答：“右边。”那太阳是否移动了呢？安德雷亚回答：“是自己在移动。”伽利略说：“错了！傻瓜！是椅子！”安德雷亚：“但我同椅子一起！”伽利略：“当然！椅子是地球。而你坐在地球上。”萨尔迪大娘（Frau Sarti）走进房间，看完了实验，然后问我们的学者他到底在跟自己的儿子做什么，伽利略回答：“我在教他学会看，萨尔迪大娘。”舞台上伽利略的实验是一个例子，在不展现技术或科学本身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极为简单但天然的戏剧手段传递对深奥的自然科学技术及工作方法的美学认识。

伽利略的（新的）看不仅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有深刻影响，它同时也打破了社会原本由一种信仰而集合为一体的整体构造，它说明，生活中重要的并非等级，也并非这样的生活是否有价值，而仅仅在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能经受基督教的考验，无论你生为乞丐还是国王。“呆视”与“看”的主题一再被提及，统领全剧，并探讨了（新的）

“看”所引起的科学领域的后果。同时，语言艺术家布莱希特也成功地用同一个概念描述了（新的）“看”的社会意义，他写道：“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这里的“看”同时也意味着“照料”：神在他的世界体系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对于萨克雷多（Sagredo）的问题“神在何处？”伽利略回答[正如被教会焚烧在火刑架上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我们心中，或者无处可在。”

与此相关的还有人类认识能力的两个范畴：人类的好奇（拉丁语：curiositas）以及一切认识，包括自然科学认识的历史性。好奇在精神层面与新的人类类型相关，他们怀疑一切，不满足于任何知识，想要了解一切，而且不再能够信任任何事物；在身体层面指乐于

享受感官刺激的人，他们用欲望养护身体，喜欢吃喝，全心享受生活，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也采取这种行为方式，被塑造为一个令人喜爱的人物。对新人类来说不再存有界限（这当然也不意味着要为无秩序辩护）。而人类认识的历史性却牵扯到一个根本上的“疑难（Aporie）”，这是历史上的伽利略所不得而知的，但与其分庭抗礼的教会或许对此有所了解。伽利略否认“眼见为实”可以作为认识的源泉，甚至将其理解为错误世界观的传输者。但同时他又要求人们，在通过他的望远镜进行观察时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布莱希特没有把天主教学者塑造为执拗或者思想局限的傀儡，他们拒绝通过望远镜观察，由于他们静态逻辑思维中“真”与“伪”的绝对对立，这些天主教学者发现了伽利略的悖谬，并作出了正确的推理：如果“眼见为实”是虚假的，其逻辑后果说明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景象也是虚假的，那么为何又要致力于此呢？这一时期，科学实验还没有被认作知识的来源，即使伽利略也必须将他的物理实验作为思想假设来表述，这样才能像哥白尼一样在学者世界取得话语权。此外更困难的是，当时亦尚未发现重力，因此，伽利略要求这些学者把空中毫无支点的天体悬浮着隆隆而行当作最新事实来接受，完全是种苛求，对他们而言，这些都只能是荒唐的无稽之谈。

如果对其进行历史性的理解，“看”的疑难也可以得到解决。对伽利略来说，认识是人类工作和人类工具的产物。就工作而言，研究者必须有好奇心，必须思索他向“自然”提出何种问题。就工具而言，正如望远镜的例子，研究者必须使用技术工具，以获得可被证实的、可重复的结果。由此获取的知识同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使技术的应用又受其制约。自然科学知识只要经受住考验便是有效的，但它们可能提出虚假命题，或者适用范围被局限，或者被新的知识重新定义；绝对真理不（再）存在。

自然本身无法成为研究对象；自然太过复杂，无法作为整体加以实验。或者再次引用布鲁门伯格的说法：“同可见性假设的决裂以人类学为基础，人类学使我们理解并明了，人类只能适应世界，他的器官都是为了这个世界而生。望远镜的每一次成功都证实这些具有可能性的后果：可见性之于事实的落后，器官之于挑战的落后。”布莱希特借《伽利略传》指出了知识传授的必要性与紧要性，这些正被全线遗忘，而遗忘又给新的异端邪说开辟了通道。

在昏暗时代/那里也会歌唱吗？

矛盾即希望：诗的时代

《斯文德堡诗集》是为了《布莱希特全集》的印刷而完成的，原本以《流亡诗歌—1937》（*Gedichte im Exil. 1937*）为题；此外布氏在1936年还创作了《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并于1937年在《言语》中首次发表；而1937年创作的《德意志讽刺诗》也于当年在《国际文学》（莫斯科）中首次发表，之后在1937~1938年的《言语》中又再次发表。其中最后一部诗集是布莱希特为德意志自由频道（Deutscher Freiheitssender，首版的副标题注明了这一点）所作，电台位于马德里附近的波苏埃洛德尔雷（Pozuelo del Rey），自1937年1月起以短波FM 29.8MHz向德国发布广播。同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一样，这一电台也在国际基础上受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支持。广播在德国纳粹分子中引发了强烈的不安，他们猜测广播发射台安装在移动装置上（例如载重汽车），在“一体化的帝国”中巡回。有记载纳粹分子多次试图定位这一发射器而未果，这也间接说明，纳粹相信这样的反面宣传有极大的影响力。最终只能在短波波段安装干扰发射器，以全部或者部分地阻碍接收。

对布莱希特的媒体美学中的诗歌而言，中断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诗歌短小、简洁的语言，明炼地表达思想深奥的内容，都似乎只能

以专心致志的聆听为前提（而且没有中断或回溯）。例如《德意志讽刺诗》中较长的多节诗歌《宣传的必要性》（*Notwendigkeit der Propaganda*）就共有8节，讽刺地涉及了纳粹宣传的多个主题，营养部长能够巧舌如簧，使德国人民因此忘记了自己在挨饿：

4

为垃圾和元首的书

所做的宣传何等优异！

每一个人都必须捡起元首的书阅读

它被四处乱放。

为了给捡破烂做宣传，强大的戈林

宣称自己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拾荒者

为了存放这些破烂，在帝国首都的中心

建造了一座宫殿

它本身就如这座城市一般大。

5

一个好的宣传者

能将粪堆变为郊游胜地

如果没有油水，他就证明

纤细的腰身可以美化每一个男人

数千人听他吹嘘高速公路

开心得好似自己有了汽车。

在饿殍和阵亡者的墓前

他种上了月桂丛。但不久之前

大炮轰隆而过时，他还在大谈和平。

这首诗采用自由韵律，即布莱希特所说的“不规则”和无韵律。诗行当中的断裂造成了刻意的阻断，这在原本流畅的句子中以美学手段制造了干扰电台的实际效果：使句子中断。中断因而成为诗句的建构准则；干扰电台可以说不自觉地参与到诗句的建构中。此外还有内容上的罗列，布莱希特用一个接一个例子罗列了“宣传的必要性”，可以说采用了十分啰唆的处理方式。每个例子中都有一个“噱头”，而列举的顺序既没有目的性也没有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例子缺失，或者在播出时被窜改，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一旦了解了规则，就可以毫无困难地重建诗句，或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继续编织下去；因为不仅中断是真实“语言”的一部分，用以应对中断的想象力同样也是。

这一诗集最终应出版于《布莱希特全集》的第3卷，但这一卷由于政治灾难而宣告破产，但布莱希特仍考虑单独出版，维兰德·赫茨费尔德原本出于便捷的考量在布拉格组织了出版工作，但1937年被纳粹赶出了布拉格，之后其在伦敦重新组建了马利克出版社，露特·贝尔劳同玛格丽特·施德芬一同接管了诗集在哥本哈根的印刷工作。布莱希特在此期间忙于思考一个新的（更远更安全的）流亡地，施德芬1939年1月就建议离开这个“偏僻的小镇”：“我不断祈祷：美国！”但事情还没有到这一步。贝尔劳利用布拉格排版的毛样制作了所谓的哥本哈根排版，并在哥本哈根的环球出版社（Uiversal Trykkeriet）按照《尝试》的模式印刷，也就是说同《布莱希特全集》的排版样式存在差别。由于这些差别，赫茨费尔德曾指责过贝尔劳，她便将这一版本据为己有：“我对这个凭我一己之力完成的版本感到十分骄傲。”

她似乎还想自称出版商，但这自然根本不可能，因为赫茨费尔德已经一次性购得了版权；同样贝尔劳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个版本也与事实不符，因为诗集已经完成，而且由于贝尔劳德语水平欠佳，施德芬帮助校对，此外她还利用了赫茨费尔德的营销系统。但她毕竟自己就卖出了百份有编号的以及有布莱希特签名的诗集，当然签名版是普通版本价格的三倍多；用贝尔劳的话说，这些“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贝尔劳的一个朋友想购买诗集，当她向其推荐签名版时，朋友问没有签名的诗集价值多少，并购买了较为便宜的版本，理由是诗歌“没有签名也同样出色”。当贝尔劳气愤地向布莱希特讲述此事时，布氏微笑地回答：“这是一个理智的人。”

虽然诗集中有不少个别的诗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一个工人读书的疑问》（*Fragen eines lesenden Arbeiters*）和《著道德经的传说》（*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但《斯文德堡诗集》仍不为公众所重视。诗集呈现了对诗学语言的彻底颠覆，导致了一种闻所未闻的诗歌的政治化，对诗歌所谓的通用形象（主体性、内在化、强调感情）也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布莱希特的诗学语言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精雕细琢，汉斯·艾斯勒的谱曲也证实了这一点。1939年10月，艾斯勒已经身处纽约，他将《斯文德堡诗集》第二部分的题词谱曲为《箴言诗1939》（*Spruch 1939*）。类似此后的许多情况，这里艾斯勒也改动了布莱希特的文本，包括三个词：他删掉了一个词，添加了一个词，又对调了一个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动，表明两人之间虽然有许多一致性但仍存在巨大的差异。艾斯勒的版本为：

在昏暗的时代

那里还会歌唱吗？

是的！那里会歌唱

歌唱昏暗的时代。

而布莱希特笔下两句平行建构的诗行是：“那里也会歌唱吗？/那里也会歌唱。”这两句诗除了调换了两个词的位置，^[20]其他是完全一致的，但句子类型却不同，一个是疑问句，另一个是陈述句。

“也”出现了两次，分别对诗歌的创作可能性和创作意愿进行了提问和肯定的回答，这说明即使在昏暗时代，艺术也不会完全被排挤，因为否则人道的生活将不再可能。这同时也说明，昏暗时代绝非由此而丧失了其危险性，对涉事人来说它至少有潜在的致命性。享受艺术和创造艺术将不再是主要活动，但仍有，或者至少似乎有实现的可能。布莱希特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表述，而艾斯勒则是理想主义的；意义是：恰恰因为昏暗时代的统治，才必须为了反对它而疾声高歌；布莱希特虽然有所保留，但仍肯定艺术的可能性，艾斯勒则吹响了革命艺术的号角，虽然经历艰险仍要奋起反抗（忽视了其可能性）。

由于德国的军备扩张以及同德国近在咫尺，丹麦也令人感到不自在。布莱希特的愿望早就是流亡美国，因为莫斯科所有的消息都令人深感担忧，经由佩萨莫（Petsamo，拉普兰）逃亡的道路目前还是畅通的。布氏在哥本哈根的美国领事馆为一家人申请了移民签证，由于移民数量是定额分配的，重要的其实是争取移民定额。此外，因为害怕希特勒德国占领丹麦，布莱希特仅仅偶尔居住在斯文德堡，要逃出丹麦，从哥本哈根出发比从斯文德堡出发要少跨越一道海峡。

在放弃丹麦的住所之前，布莱希特就已经开始继续《四川好人》（*Gute Mensch von Sezuan*）的工作，1930年在柏林时，他便以《商品爱情》（*Die Ware Liebe*）为题开始筹备这部戏剧。布氏记录道，可以借此“发展叙事技术”，“并最终回归到一定水准”。为何恰恰在此时呢？在没有上演前景的情况下？他的理由是：“为抽屉写作不需要许可。”一切都表明，布氏想借这部戏剧延续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创作，而且由于没有演出的可能性，可以在美学上进行大胆的尝试。

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布莱希特将最后的几部作品，特别是《伽利略传》，归结为“机会主义”的成果，显然《卡拉尔大娘的枪》和《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也具有同样的特质，为了现实时事性而忽略了美学标准的制定。因此，《四川好人》这样非通常理解范畴中的寓言形式，或许可以提供放手实验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放弃舞台，他还可以让对未来戏剧的想象纵情飞扬，而（几乎）不去考虑自己的真实境况。

基本思想是利用天然的戏剧手段，塑造人物走出戏剧，出现在观众眼前。水达（Shui Ta）的活动空间同戏剧中的其他人物处于不同的虚构层次，因为他是由沈德（Shen Te）扮演的，八口之家的一对夫妇出于自私悄声告诉沈德，她应该用表哥的身份化解经营困难。这一事件明确以“提词”的形式发生，即通过悄声耳语台词的方式，传统上这是冷场时在舞台下的箱子里悄悄进行的。布莱希特把这一技术搬到了舞台上，将其作为戏剧的一部分，以此展现沈德如何极为犹豫地选择了这条出路。水达是被扮演出来的角色，因而也是虚构中的虚构。

戏剧进程中，沈德逐渐并越来越自信地熟悉了表哥的角色，其间她模仿男性的统治话语，学会了他们的用词；因为只有这样，她作为一名女子才能令人信服地扮演男性，让周遭的人出丑。这一学习过程是这部戏剧的根本性主题，正如1933年《工作岗位》中写道的：“几日内，女人成了男人，方式同几千年来男子把自己锻造成男人的途径一样：通过生产过程。”此处，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男性主导的统治和占有关系，他们在商业中不允许“女性品质”加入，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使生意无从可做。

在许多成功表达的基础上，该剧还传递了一些箴言，其中最著名的是：“幕布关上了，所有的问题仍是开放的。”这一引人注目的表达一再被解释为三位神灵慷慨地允许沈德“不要太经常地”烦劳表

哥。通过这种方式戏剧保持了开放式结局，即在神仁慈的条件下——“每月一次，这足够了！”沈德的障眼法可以继续下去。但这在现实的打击下并不可能，沈德怀孕了，沈德曾变身剧中最好的男人，但怀孕让她在生理上再次成为女人。布莱希特的戏剧毫无疑问地令情节以野蛮和残暴结束。当众神悄悄离去，沈德断定：“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此处舞台说明也明确地说：“她匆忙地看向门口，那些折磨她的人将会从这里进来。”结局完全不是开放式的，它只是没有表演出来。众神拿沈德进行试验，以证明这个（所谓）美好的世界，但剧情的结果是沈德把试验完全毁掉了，只是戏剧没有将它的悲剧展现出来。现实中对人类的屠杀早已比舞台上的更甚，而且传统悲剧对人类命运的处理比戏剧要草率得多。

1939年4月，布莱希特中断了所谓“为抽屉而做”的戏剧工作，由于德国在丹麦边境的军事行动，他再次以独幕剧《丹森》（*Dansen*）探讨了一个时事性主题，即东道国将自己出卖给纳粹，这是一部两人戏剧，布莱希特在瑞典的一个业余剧团那里找到了演出机会。其他就是要搬家，卖掉房子，保护好手稿和打字稿，制作复印件，决定要带走哪些家具，等等，这些布莱希特都交予海伦娜·魏格尔和玛格丽特·施德芬负责。海伦娜·魏格尔为布莱希特搞到了去斯德哥尔摩业余剧团协会作报告和朗诵的邀请，也为此获得了入境签证。瑞典成了流亡的“第三号国家”，而且由于战争的威胁他们也无法再返回丹麦了，因此，还必须为流亡美国筹备一些其他的前期措施，流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这个困难而血腥的和平时代

必须要投入到工作中（罗马人说：冲向剑刃）

作为贸易的战争：大胆妈妈的人祭

1939年初，布莱希特对形势的估计十分现实，他逃离丹麦也极为紧迫，因为完全可以预见，希特勒对邻国丹麦有同对待“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Böhmen und Mähren）”^[21]类似的计划。即使丹麦人1939年5月25日同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也无法给自身的安全提供任何保障。这一预见很快就得到了应验，强盗们1940年4月9日毫无顾忌地占领了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赢得了通往挪威和芬兰的“跳板”，那里储存着战争所需的原材料。丹麦看似得到德国的保护，但这一时期布莱希特就已经将世界局势同自身安危联系起来，并断然评论道，希特勒承诺不侵犯之后，随之而来的必定要承诺保护，而且还要保护对方不受自身的威胁，这样的保护最好当然是在集中营里。

1939年4月22~23日，布莱希特没有带孩子，仅同妻子一道乘船，然后乘火车前往斯德哥尔摩，在这里奈玛·威夫斯特兰德（Naima Wifstrand），布莱希特1938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因《卡拉尔大娘的枪》演出所认识的女演员，和亨利·彼得·马蒂斯（Henry Peter Matthis）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同这两人交好的女雕塑家妮娜·桑特逊（Ninnan Santesson）也准备好将自己在斯德哥尔摩前面海岛上的房屋供给两名流亡者使用。这是一座刷红漆的木屋，瑞典普遍的建筑风格，有一个篱笆围绕的大花园。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记录：

“房子很理想。在利丁厄岛（Lidingö）上，两侧有针叶林延伸出去。工作间之前是一个雕塑家的工作室，7米长，5米宽。我现在有了很多桌子。”由于对迁居有良好的筹备，布莱希特夫妇可以携带他们的家具、藏书和其他工具，在瑞典建立起家庭生活。施德芬被安置于附近，在海伦娜·魏格尔办理的居留许可到手后，施德芬于5月与孩子们一同跟来。在某种程度上，瑞典有可能让大家在这里舒适地生活。魏格尔在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后，现在必须满足于学校或者大学生之间一些少量的演出活动，但施德芬1939年6月仍在一封信中讲述，魏格尔完全按照东道国的风俗安排生活：“她独自为6个人做饭。现在鬼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她一天准备两次热餐（我觉得在瑞典人们都这么

做），有很多事情要做。每天会有人帮忙几个小时，但这些时间甚至不够把整个房子打扫一遍。”更困难的还有新环境以及理解沟通上的障碍。露特·贝尔劳住在花园的帐篷里，她总在哥本哈根和利丁厄岛之间往返。

4月底，布莱希特得到消息，自己的美国奖学金延长了半年，这也为在第三号流亡国家的生活确保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但仍会出现一些经济匮乏，例如施德芬患盲肠炎时，她曾考虑过返回丹麦，因为在那里她作为丹麦人可以免费接受手术。布莱希特必须亲自前去移民局，他借了礼帽，穿上西装，翻找出了自己还有的领带。布莱希特在移民局的登场相当令人信服，以至于拿到了6个月的居留许可，这是当时能实现的最高限额。但当曾经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德国成员来到布莱希特周围，大家一起讨论政治局势后，境况开始改变，这些人都处于监控之下，布莱希特也同样。布氏继续以强烈的兴趣关注政治事件，在被动掌握了一些与丹麦语相近的瑞典语知识后，他开始费力地阅读瑞典报纸。广播自然也继续发挥着传播政治信息的核心作用，收音机就摆放在布莱希特床边，早上第一件事和晚上最后一件事都是收听广播，布氏确信，瑞典同丹麦类似，都认为可以悄然继续贸易而不被卷入战争。瑞典是德国最重要的铁矿供应商，数年来已经直接支持了德国的战争筹备。布莱希特在初夏还写作了指涉瑞典的独幕剧《铁多少钱？》（*Was kostet das Eisen?*），这出戏剧也以这一背景为主题。

其间，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23日的协定为二战铺平了道路：法西斯和纳粹伸出魔掌瓜分波兰，把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布莱希特1939年9月9日在《工作笔记》中记录：“德—俄协定自然在所有无产者中都造成了巨大的困惑。共产主义者立即宣称，这是对和平值得尊敬的贡献。”还有：“在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面前，苏联背上了援助法西斯—资本主义最野蛮、最敌视工人的部分一的印记。我认为

无需再说更多，苏联为了自救，代价是让全世界无产阶级陷入了毫无希望与支援的境地。”但布莱希特的记录仍留下了一些开放的问题：谁是“所有无产者”？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9月1日，国际法遭到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平何在？苏联遗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在某些程度上，所有的问题听起来有些混乱，而且在布氏获得的这些有价值的消息中，他真正参透的也很少。他误以为红军的进驻是为了阻挡希特勒的战争企图，并认为这能阻止纳粹入侵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却不知，这是德俄协定的秘密条款早已约定的内容。

与对局势的主观臆测相较，将这一主题进行戏剧展现更具成效。此后，布莱希特坚持在二战开始之前就已经“预见性地”进行了戏剧创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简称《大胆妈妈》）写作于二战前的斯堪的纳维亚，这是第20次尝试。由保罗·德绍谱曲”，这是1950年第一次印刷时的注释。作品完成迅速—从9月27日至10月29日（根据施德芬的随身日历），就这一点而言，这个虚构的故事很可能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构思了。但布莱希特1939年在其中一册剧作上题写了献词：“我的大胆妈妈要感谢奈玛·威夫斯特兰德。”这一事实又与上述猜测相左，大胆妈妈这一人物形象没有威夫斯特兰德给予的灵感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因而是9月中旬才成形的。这段时间奈玛·威夫斯特兰德邀请布莱希特做客，并根据自己的记忆向其讲述了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的组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Fähnrich Stahl*），其中包括一首有关随军小贩洛塔·斯维尔德（Lotta Svärd）的诗歌，并给布莱希特寄送了翻译稿。不日之后布莱希特向奈玛·威夫斯特兰德朗诵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第一场。根据客观时间计算，战争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

现时联系不言自明，历史材料已经将其包含在内。鲁内贝格的随军小贩故事发生在瑞俄战争期间（1808~1809），布莱希特决定将它

改期到格里美尔豪森（Grimmelshausen）《女骗子和女流浪汉库拉舍的一生》（*Lebensbeschreibung der Ertzbetrügerin und Landstörtzerin Courasche*）中的三十年战争中，这场战争被瑞典人视作所谓的“信仰之战”。这一决定不仅展现了东道国的历史，而且还同现时利益相结合，正如布莱希特1953年回顾该剧的创作动机时曾讲道，“略微参与到边界另一方的活动中”。

戏剧的相关内容：大胆妈妈对自己的成年子女管教严厉，因为男人们必须去打仗，战争给了女人做生意的机会，因而在家庭中、在孩子面前也获得了原本属于男人的权威：她积极参与到战争中，经营着看似“和平的生意”。由此，战争和贸易从本源上形成了紧密联系，“妈妈”也被规定为家庭中男权利益的推动者。这些也就具有了现实性指涉：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就成了欧洲最重要的武器制造商之一，它的矿产供应装备了德国的战争机械，在战争尚未爆发之前就已参与其中。当战争发展到白热化阶段，布莱希特预测，瑞典自身也会遭到战争的蹂躏，正如《铁多少钱？》也以瑞典在“19??年”遭到“顾客”——纳粹——的突袭而最终结束一样，战争不懂宽恕：谁参与了，最终也会自取灭亡。

在瑞典事件上，布莱希特的判断并非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国家保持了中立，但付出的代价是纳粹——在占领挪威之后——获得军队和补给在瑞典通行的权利。1940~1943年间，共有大约200万德国士兵穿越了瑞典的关卡，除此之外，必需的矿产以及只有瑞典才能生产的、专门配备装甲车的滚珠轴承也被运往德国，瑞典还为纳粹统治培训了丹麦和挪威的“警察”，这些人后来被派遣回自己的祖国。战争期间，正如彼得·魏斯（Peter Weiss）在《抵抗的美学》（*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中半纪实性的描绘，瑞典成为一个难以言喻的国家，它同德国的关系即使在反抗者中也引发了蔑视和不信任。

布莱希特以世界历史大屠杀开端的三十年战争为历史依据，三十年战争漫长得令人难以置信，摧残了整个欧洲，消灭了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引发了一系列后续战争，以至于历史的秩序不再是战争与之后的和平，而是由一系列战争串联而成，用戏剧的语言来说，只是不时地“喘口气”，从而使战争更残酷地继续下去。这里涉及的不是简单的推导，资本主义贸易本身必然意味着战争，但历史也证实，没有贪腐和战争资本主义也仅仅勉强度日。基督教博爱的训诫和贸易规则之间的矛盾在早期—市民阶层兴起之时—就已经是文学的一个主题。通过贸易兴起的城市资产阶级要贯彻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就必须肆意妄为地发展商业，并同时传布严格的道德准则。利用这其实是“道貌岸然”的道德，资产阶级将自身定义为更优秀的“人类”，同时也抨击了贵族在道义上的堕落。

虽然《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以战争为舞台，但战争的“主人公”—那些所谓的历史制造者并未成为关注点。广播剧《审判卢库鲁斯》（*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1939年11月初）^[22]几乎写作于同一时期，其中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自以为是的伟大统帅卢库鲁斯，征服了本都^[23]，“解放”了亚细亚，死后在地狱审判面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他召唤亚历山大大帝做自己的证人，但亚历山大大帝在这里却不为人知，其灵魂早已被遁入无形。但还有其他标准适用。有一位农民要求做卢库鲁斯的支持者，以为卢库鲁斯把樱桃树带回了罗马，这是“你最美丽的奖杯”，比所有的战利品都更长久。这看似能挽回局面，但最终樱桃树无法抵消巨大的破坏和生灵涂炭，农民在稍许犹豫后也赞同了最终的判决：“好吧，让他灰飞烟灭吧！”这部广播剧主张将那些“伟人”从历史中剔除，因为他们并没有壮举，而是犯下了一系列罪行，这些事情看似惊人，其实不过是因为牺牲者数不胜数。

讨论是社会能够达到的

艺术享受之最高级别

造型艺术叙事化：托姆布洛克与布莱希特

1939年7月，布莱希特在斯德哥尔摩参加了德国流亡者的报告会，并遇到了画家、制图师汉斯·托姆布洛克（Hans Tombrock）。托姆布洛克出身于鲁尔区的无产者家庭，在动荡的一生中曾做过矿工和见习水手，由于德国的就业机会短缺，他开始在不同地区间迁移，并同其他人共同组成了“流浪者兄弟会（Bruderschaft der Vagabunden）”。他们开设了《流浪者》（*Der Vagabund*）杂志，赋予自己可悲的生活以文学意义。这些人不会得到纳粹的同情，而且托姆布洛克不愿接受新统治者的“保护”，他逃出了自己的祖国，历经千难万险穿越了整个西欧，包括加那利群岛（Kanarischen Inseln），来到了瑞典，作为画家、制图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en*）稳固了自己艺术家的身份。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看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托姆布洛克仍然凭借出卖素描和油画摆脱了量入为出的生活，而且还从1936年9月开始在瑞典组织起了安顿的市民生活。“我租了一个精美的房子。简直是一个珍宝匣。5个房间，地下室，浴室，集中供暖，写字台，工作间，花园。租金很高，每月220克朗。但还过得去。对了，还有正确的、良好的、规律的饮食，这是我现在懂得珍惜的。人会变老。”

1939年7月的那个晚上，托姆布洛克与布莱希特还不甚相熟，他提出要画布氏的双手，对此布莱希特自然没有拒绝，两人由此开始了一段友谊，并以新的方式将绘画艺术与诗学联系起来。托姆布洛克引发了布莱希特对这些看似毫无艺术性作品的兴趣，即画家对现实完全不同的、不寻常的洞察力。托姆布洛克的流浪汉画作令人联想起早期雅克·卡洛特（Jacques Callot）的《战争的巨大苦痛》（*Misères de*

la Guerre)，人物的布局、非专业的视角以及过于细致绘制的细节都起到了陌生、挑战性的效果，或许从而也有了间离的作用。

布莱希特在瑞典文化杂志（用瑞典语）发表了一篇对话，艺术家和诗人用这种形式讨论了“诗与画”的新关系，这是为“人民之家（die Volkshäuser）”所筹划的。“人民之家”由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经营，为瑞典工人在业余时间提供提升艺术和修养的机会，以及朗诵和讨论的集会空间。布莱希特在他的伽利略研究中找到了这种对话形式，作为探讨理论问题的上佳可能 [参见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 über die beiden hauptsächlichsten Weltsysteme*, 1630）]，它不仅被应用于在舞台上以对话形式讨论戏剧问题的《买黄铜》（*Messingkauf*）中，而且还使瑞典观众了解了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就诗人提出的将造型艺术与诗学相联系的建议，画家问道：

画家：你想到的是配有插图的诗歌吗？

诗人：不是，这些艺术作品扬弃了我们刚才所提及的绘画与文学之间的割裂，但同时绘画与文学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今，认为油画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偏见已经消除，偏见形成的原因是误以为油画处理内容丰富的主题，能与文学类似，唤醒所有可能的情感。现在可以继续消除另一个偏见，即绘画由于同文学作品的关系会丧失艺术价值。

画家：？

诗人：我想到那些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的艺术作品，一块板子上写诗，另一块板子上作画。它们可以悬挂于一个房间，而且不一定要并排摆放。绘画不必像插图一样为诗歌灌注生命，它可以脱离诗歌而独自“生存”。

画家：你认为，绘画和诗歌用两种艺术处理方式反映同一个主题？

诗人：是的，从绘画中涌现出某些思想因素，而从诗歌中涌现出某些视觉因素。

形式上可以有一些变化。托姆布洛克提出了在绘画中接纳诗歌的想法，要么可以把诗歌刻凿在木板上，或者如玛丽·圣德斯的事例，写在押着“犹太妓女”游行的街道两侧房屋的墙壁上。

素描展现了一位身着衬衣的女性，着重突出了她的胸部。她的颈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聚特林字体（Sütterlinschrift）^[24]写着：“玛丽·圣德斯/曾经和一个/犹太人上床！”她被剃去了头发，深色的眼睛悲伤地从作品的观赏者身上掠过。她的形象被着力推到前景，几乎占据了画作的整个左半部，冲锋队队员、警察、孩子、女人、过路人都要小得多，这些人组成了围观的人群，他们宛如在德国街头纳粹真实的刑柱旁，呆视着这蔑视人性的活动。玛丽站在一间灰色的出租屋前，房屋的窗子被画为了黑洞。画作的另一半，房屋的外立面上写着《犹太妓女玛丽·圣德斯的谣曲》第四节的叠句，诗句自然同托姆布洛克众多作品一样，都任意断句。房屋的窗子里有一些象征性刻画的人物，他们在好奇地凝视着这中世纪的女巫审判，这些人好似正要从窗户中挣脱出来，以亲临现场。但其中存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整个场景都表现了民众对侮辱这一女子的赞同，而诗歌文本——托姆布洛克还特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字体，墙上的诗歌使用了拉丁字母——则反驳了这一印象。在两种艺术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张力，但又在图画中以整体的形式出现，作为“矛盾的统一”。

一年之后，布氏已经身处赫尔辛基，他在1940年6月14日致托姆布洛克的信中，赞同两门独立艺术融和的美学方案。这种认同也适用于画家受布莱希特所托绘制的几幅铜版画。布氏又寄送了三首附注了“基督纪元1940年”的四行诗供其使用：“背面是三首小诗，是我在船上（渡海去芬兰）为你写的。我设想，你应该做些版画——或者其他价格最贵的画，也许应该绘制一些真正的画，版画的收入甚微——像那幅《堂吉诃德》一样，应该在角落里写上一首这样的四行诗。这是你作为画家征收的战争税。……文字你用德语写，人们能理解。当然不

要写我的名字。”素描完成后，托姆布洛克给流亡芬兰的布莱希特寄去了素描的照片，对此布氏表示：“这些图画让我很欣慰。文字的问题看来已经以最佳的方式得到了解决，没有对其进行自然主义的说明，而是让文字自由、独立地处于空间之中，显现了空间中的独特元素。正如你所展现的，可以将文字作为造型元素使用。”

带有布莱希特四行诗的画作之中有一幅托姆布洛克的自画像，描绘托姆布洛克站在被战争摧毁殆尽的景象前。这些风景突破了画框，带有布莱希特诗歌的牌子也被切掉了一部分，同样画家的人物形象也从图画中走出来。他脸色昏暗，胳膊下夹着素描画片的夹子，也暗示了他还有更多的警示牌。背后的风景前有牌子插在地里，牌子上写着托姆布洛克重新断句后的诗歌：

由于时局不利

由于坚守

理想

我和我的艺术

陷入了困境

我必须请求，不仅对

征税者

而且对我也要付钱。

基督纪元1940年

素描完全以布莱希特的理解表达了对战争辛辣的并具有自我批判性的政治评论，控诉战争的大肆破坏，此外，图画还展现了如何在昏暗时代从事艺术事业的自我反省；必须有买家来维持艺术家的生活。

如此一来诗学便真实进入了造型艺术之中。同戏剧一样，造型艺术也被叙事化了。观赏者除了感知图画内容及其中文本的植入外，还要阅读诗句，因而采取了同观赏图画不同的接受态度，并将两者结合起来。布莱希特：“毫无疑问，这些在人民之家展出的版画作品，将比单独一幅画或者一首诗引发更多的讨论。而讨论是社会能够达到的艺术享受之最高级别。”被活跃的艺术世界所孤立，导致布莱希特在造型艺术中寻求帮助，而一位业余爱好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向他传送了这样的帮助，这些新的见解不仅能创造性地运用于诗学和绘画的融合中，而且为未来叙事剧及其舞台设计开辟了新的维度。

在不引人注目的未完成的《论中国绘画》（*Über die Malerei der Chinesen*, 1934）中，布莱希特已经详细阐述了中国绘画间接地赋予他的戏剧以根本艺术原则。中国绘画放弃了透视法，所有表现对象或人物都并排排列，因而不受既定空间的限制，它们从图画中凸起，突破了画框。中国绘画第二个重要特征是不将画布画满，总是让观赏者看到在其上作画的材料：“在这些空白处，纸张本身或者亚麻布都展现了特殊价值。”也就是说，留白是着意保留的，与之类似的是内尔和布莱希特尽量照亮的白色舞台，参与表演的只局限于必要人物，避免舞台装饰。此外，留白同高亮度的空舞台一样，为观赏者保留了想象力的自由空间。

如释重负/我看到窗外黑夜般的赤松

我知道：我身处异乡

纳粹占领：驱逐同胞

1939年夏，瑞典官员决定将年轻的席勒（Schiller）夫妇驱逐回德国。德国流亡者为了相互帮助组织了某种通讯机构，也邀请布莱希特参与，布氏应该通过瑞典作家约翰内斯·艾德菲尔特（Johannes

Edfelt) 开展斡旋工作。但接触重要人物或官员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那是一个周六，除了社民党代表弗里德里克·施特罗姆 (Frederik Ström) 之外联系不到任何人，相关部长对施特罗姆的调解努力也充耳不闻。最终，他们三人想到了离奇的主意，给特瑞勒堡萨斯尼茨号 (Trelleborg-Saßnitz) 渡轮的船长发电报，令其设法帮助逃亡者有机会在起航之后跳入海中，如此一来，他们就有机会被从海里捞出并隐匿某处。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席勒夫妇被驱逐出境，事件所有参与者中无人知晓他们的命运。因此，布莱希特已有最坏的担心，二战开始之前他就开始应对此类事件，而他或许很快也要成为其中之一。

显而易见，大屠杀开始之后，形势愈加严峻。1940年初，斯堪的纳维亚被卷入战争，瑞典安全机构全面搜查了相关共产主义者的家，并拘留了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员，这里也包括同布莱希特有联系的社民党人。之后不出意外，德国国防军1940年4月9日突袭丹麦，并开始以军事暴力占领挪威（斗争持续到6月6日），布莱希特担心瑞典会发生他在戏剧中标注为“19??年”的遭遇。

次日，警察就在晚间敲响了布莱希特一家的门，还带来了房屋所有人妮娜·桑特逊，在流亡者的所有物品中搜寻政治文章。当然，布莱希特由于参与集会以及同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而具有嫌疑，托姆布洛克也是德国共产党员。本次事件之前两人还有过短暂的争执，布莱希特认为托姆布洛克在共产党总部露面得过于频繁。托姆布洛克说：

“我逃出第三帝国，不是为了在民主国家缄默不言。……我想同情谁，就同情谁，没有人可以干预我的政治思想。”布莱希特说：“它只是政治思想，而非政治行动。但你已经采取了政治行动，因为你客居此国，不允许从事政治。”这自然也适用于布莱希特，最后又有谁能区分托姆布洛克想搪塞开脱的一他参与的到底是文化政治还是政治活动？这也是布莱希特的老问题。布氏意味深长地微笑，并问道：

“在政党意义上，文化与政治的界限何在？”

被搜查后，布莱希特午夜打电话给赫尔曼·格拉伊德（Hermann Greid），请他来自己家咨询情况。赫尔曼·格拉伊德是演员、导演和业余哲学家，布莱希特友好地将他描述为“带着道德兴趣陷入思考的小市民”，格拉伊德同样生活在利丁厄岛上，由于1938年在斯德哥尔摩执导了《卡拉尔大娘的枪》，同布氏保持了较为规律的联络，布莱希特也在他那里找到了孤独中必要的谈话伙伴。这一时刻，布莱希特想从格拉伊德那里知道警察的搜查对他意味着什么。格拉伊德对瑞典是否被占领的问题表示了否定，但他从政坛友人圈子得知，即使政府也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国家被入侵时乘飞机离开。施特罗姆和瑞典国会的社民党成员格奥尔格·布兰廷（Georg Branting）也同样强烈建议，布莱希特一家和施德芬须尽快离开。布氏立即作出了反应，通过布兰廷介绍由芬兰女作家赫拉·沃里约基（Hella Wuolijoki）邀请布莱希特一家和玛格丽特·施德芬，他们从而可以申请芬兰的入境签证。由于情势所迫，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迅速。1940年4月17日，布莱希特一家和施德芬登上了前往芬兰的小船，赫尔曼·格拉伊德也加入其中，这个国家上个月还进行了反抗苏联的战争，3月13日不得不屈服于“强加的和平”，芬兰总统屈厄斯蒂·卡利奥（Kyösti Kallio）在签署协议时悲苦地说：“让我的手枯槁吧，它被迫在这样的纸上签字。”芬兰失去了农业和工业的10%，40余万芬兰人逃离占领区。遭受打击尤为沉重的是卡累利阿人（Karelier），布莱希特将在马勒柏克庄园（Gut Marlebäck）与他们相遇。

芬兰人在支持德国流亡者还是将他们遣返给盖世太保的问题上左右摇摆（两者都有发生）。德国虽然没有参与苏芬战争，但仍然同往常一样觊觎芬兰的镍矿和木材，希特勒也向苏联人民委员会（Rat der Volkskommissare）主席莫洛托夫（Molotow）着重强调（1940年11月13日的柏林会谈）了这一点，但同时也承认，不干涉苏联在芬兰的政治利益。但芬兰仍必须允许德国军队通行前往挪威，这导致芬兰民众

群情激奋，自然也毫无热情去帮助德国流亡者。赫尔辛基还飘扬着纳粹的反万字旗。

布莱希特和施德芬从一开始就商定，芬兰只是一个中转站，不将其历数为第四号流亡国家。这一时期无人能够知晓，找到下一个逃难的可能性还要一年。起程前，布莱希特就致信露特·贝尔劳，受新的形势—她无法再留在丹麦—所迫，布氏从此刻开始也会为她筹划流亡之旅，并要求贝尔劳申请美国的入境签证，经瑞典来芬兰找他，而且要尽快。

布莱希特在瑞典几乎不值一提的最后几步被彼得·魏斯在《抵抗的美学》第二卷的结尾描写为了传奇：“马蒂斯，同桑特逊、拉扎尔和戈特施密特一家陪同布莱希特一行到达港口，马蒂斯向我描述了最后一刻。左侧，布拉西岛（Blasieholmen）德国大使馆的建筑上，右侧，斯塔斯加德港（Stådsghardhafen）的德国货轮上，都有纳粹的反万字旗在飘扬。布莱希特在步桥上昏倒了，必须有人搀扶，几乎是被背上了船。”本次逃亡事出仓促，手稿、重要的书和文集都打包到了大箱子里，其他所有都留在了瑞典。

流亡瑞典期间，除了《施德芬诗集》（*Die Steffinsche Sammlung*）中的诗歌之外，布莱希特还创作了一些以回顾历史为主题的故事，展现那些每日都被迫背负着生存问题重担的生活，逃亡只意味着远离，而非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布莱希特当时刚刚年过四十，在生命最活跃的年岁被迫面对空虚，这让所有的当事人都看起来苍老。1939年5月20日，布莱希特的父亲去世。儿子何时得知此事以及对此作何反应已经再无考证。玛丽·洛克尔小姐得到了12000德国马克的馈赠，占整个遗产的五分之一。布莱希特作为无国籍者一无所获。乌廷（Utting）的房子过户给了女儿汉内。

9月17日还有另外一个原由可以回顾家庭历史，这是阿赫恩的祖母——卡洛琳娜·布莱希特，娘家姓乌尔茨勒——的百岁寿辰。在小说《有失体面的老妇人》中，这位72岁的老妇在丈夫去世后，勇敢地过了两年独立的生活。孩子们期待，这位老妇人为子孙们打开那座对她来说过大的房子的大门，继续扮演家庭服务者的角色，对此老妇回以了执拗的冷静，要最终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虽然事情不多，但她而言却意味着（几乎）整个生命。她同一名年轻女性建立了友谊，那些有成见的见证人认为这名女性“愚笨”，而且社会地位较低，但老妇人仍同她一起去电影院，这里当时也被视为藏污纳垢之地，老妇人还为她购买礼物，例如一顶礼帽。老妇人还同一名身份是社民党的修鞋匠交往，还在他那里喝红酒，这是她一生都没有做过的事。为了在有生之年能体验一下大城市，她还乘坐“够一家人坐”的四驾马车前往K.市。K.市指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虽然这次去较大城市的游玩并非耽于享乐，但对她说来已经十分丰富了，因为在那里她第一次观看了赛马。

在展现生平的角度，这些故事对挖掘布莱希特对祖母的评价十分有用，但其中仍然无一字是真，但或许如此反而恰恰更有帮助。布莱希特以一个虚构的孙辈为媒介讲述故事，孙子在族谱中寻找自己的出身，发现了对祖母故事的记载，试图通过不同的见证人及其通讯往来得到一些相对可靠的信息。这与《布登勃洛克一家》有难以忽视的相似性。小说中的预兆是托尼或者汉诺在家谱中乱翻，同样是孙辈在相关人员的偏见中寻找自己可以认同的祖母形象，并非在禁忌的意义上，而是寻找可以信任的家世渊源；同时，家庭中周遭的所有背叛都会形成各个不同的家族谱系，他们奸刁险恶，似乎剔除了那些不能帮自己自圆其说的说法。故事叙事者的结论是，亲戚们这些虚假的、仅注重个人利益的记录，即使得到了所谓的目击者叙述的证实，也应该遭到抵制，叙事者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她尽情享受了常年的奴役和短暂的自由，将生命的面包细细咀嚼直至最后的面包渣。”布莱

希特虚构了一个坚强的女性形象，即使年事已高，而且在自己的家中遭受压抑，仍然放肆自己去过短暂但热烈的生活，这也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

逃亡者寻找一个国家，在那里，

即使道德水平一般，有一些纤介之疾

也可以马马虎虎地生活

逃亡者之间的对话：勇气多余

在赫尔辛基的火车站，也就是说在德国人理解上毫无舒适可言的大厅餐馆，两名德国流亡者相遇了，他们来自德国未爆发的阶级斗争的两方，一名有产者和一名无产者。两人确信，他们的观点相去不远，因而可以相互理解。两人本可以在纳粹统治之前在德国相遇，但两人却把战场留给了他们（共同的）对手，自己成了牺牲品。如今他们必须承认，两人所剩的只有在赫尔辛基火车站大厅的秘密相聚，而且德国国防军成员还身着制服不断地在这里巡逻。芬兰这个国家依然如故地处于苏联的皮鞭之下，但毕竟（暂且）排除了德国入侵的可能性。在这块场地上，两名原本不愿出现在这里的德国人不期而遇，不得不意识到，逃亡的道路愈来愈少，也愈来愈窄。

在瑞典，虽然还不能提前得知地点具体是在赫尔辛基，布莱希特就已经开始构思《逃亡者对话》，其中“逃亡者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到处都被提出了太多的道德要求”。起初为之构思的题目是《大时代一个无足轻重男人的手记》（*Aufzeichnungen eines unbedeutenden Mannes in großer Zeit*），作为齐佛尔的《回忆录》。布氏为这部作品贡献了从伽利略研究中得到检验的对话形式，但两位对话伙伴一无产者卡勒（Kalle）和物理学家齐佛尔之间的对

立观点，虽然政治性较弱，却是从真实社会矛盾中产生，这也阻碍了这位有产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人类教养的范例来兜售。

齐佛尔试图说服卡勒认可自己的回忆录，他开篇先介绍了学校课程，之后可以使用的体裁只剩先锋派市民主义小说的断篇，断篇既遭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烈反对，也被市民阶层美学家所拒绝，因为这一所谓颓废的艺术深陷于庸俗生活的沼泽，还嘲笑那些有好品味的人。齐佛尔解释，这五张纸上的记录“仅仅为了勾勒一幅肖像”，却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被讨论。这些记录的真实性其实值得质疑，因为全部充斥着陈词滥调的语言和通俗的生活经验：“妈妈头疼。吃饭太晚了。……体面的孩子不赤脚走路。喝汤有咕噜声。乱写乱画。旱冰鞋。打破窗户。没来。吃酸菜一定健康。爸爸想安静一下。上床睡觉。奥托又让妈妈发愁了。不应该说‘该死’。”

齐佛尔描述了一个小学生的日常经验，除了“奥托”可能指自己的好友奥托·穆勒莱塞特之外，再现的要么是父母的敦促，要么只是一个孩子每日都会经历的琐事，没有任何个体性可言。试再举一例：“这个女孩病得厉害。你要找女人。汉森巷2号。圣马克斯神父。克拉姆里希家的约瑟夫做了牧师。眼睛下青紫。”

这里涉及的显然是初次性经历，甚至都不足以称之为经历。如果从齐佛尔的回忆录推测布莱希特的生平，那么将是空想而不真实的。但《逃亡者对话》在传记学的历史上标志着一次跳跃式的上升，齐佛尔虽然相信，同无产者相比，他利用有产者的经验可以更好地适应生活，但又必须认识到，这一模式，甚至是现代派的模式，是失败的。他这里真正想说些什么？

卡勒就其“语言片段（Sprach-Stücke）”问道，这些有何相互关联：“您就简单地把出现在您头脑中的事物记录下来吗？”卡勒怀疑，正如布莱希特对1920年代市民文学的批判，齐佛尔用他的“大杂

烩”罗列“美丽的图像和芬芳的词汇”，并将其恣意组合。齐佛尔：“不可能。我会进行组织。但要利用材料。”有产者齐佛尔坚持，他不仅进行了艺术整理，也利用了“材料”，其实是想借此说明，正如蒙太奇中普遍的，他从现实片段的组合中发掘了材料的新意义，从而为青年人的生活传授了新见解。

对于齐佛尔的问题—他是否应将这些蒙太奇式作品归结成章，卡勒答道：“有何意义？”齐佛尔反驳：“它看起来太现代了。现代已经过时了。”他借此影射了被评价为过时的1920年代的市民现代派，因为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技术化或机械化扩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领域，从而终结了断篇模式，完全扯断了那些错误的联系；因为社会现实以非人道的方式变得不再有联系。齐佛尔原本意欲，正如他回忆录中其他的对话所证实的，保卫情节、历史和人性联系。但事实在此间已换了另一副模样。

面对在西线战场迅速挺进的德国军队—经比利时、荷兰进军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布莱希特1940年6月3日在《工作笔记》中记录，这不是德国军士精神的胜利，而是机械的胜利，它使“个人的战斗勇气变得多余。机械化让德国总参谋部无事可做，脱离了战士的个人品质和‘部队精神’。军人从属于战斗工具，发动机‘携带军人前进’。行动的准时性不再有赖于责任感的保障，而是通过秒表得到实现”。这里所必须的“精神”“可以从工业日常培训中取消”。

作为戏剧和理论辩证探讨之间的新形式，《逃亡者对话》中的对话早已在德国文学史中证实了自己，因为它立足于欧洲历史的焦点，这片舞台1941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未来进程：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后，德国国防军筹备进军苏联；日本突袭了美军舰队基地珍珠港。布莱希特的对话根据其特点逐一“踏遍”了欧洲的流亡国家（作为讽刺作品自然不十分严肃）：瑞士、法国、丹麦、瑞典和芬兰，涉及了所有决

定性问题，从护照作为人“最高贵的部分”，到幽默感的必要性和战事报道，直到种族仇恨，布氏将对时事的记录同潜在的讽刺联系起来。

传来柔和的、强弱交叠的美妙声音

若有若无

不能预料的冬日之旅：芬兰夏夜

由于反抗苏联的冬季战争，数十万逃亡者需要被安置，而且苏联的轰炸让近9万芬兰人无家可归，这里原则上没有德国流亡者的立足之地。但布莱希特身边庆幸的是，又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些原来不曾认识的人和朋友，帮助他的家人和情人安身立命。某位法学家的妻子玛丽·佩卡拉（Mary Pekkala），作曲家西蒙·帕梅特（Simon Parmet），赫拉·沃里约基以及芬兰作家埃尔默·迪克托纽斯（Elmer Diktonius），图书商埃里克·奥尔索尼（Eric Olsoni），不仅帮助布莱希特在赫尔辛基的图罗区（Töölö）找到一处住所，还提供了布置住宅的家具，这些由海伦娜·魏格尔用一辆载重汽车搬回了家。住所位于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如魏格尔所说“从屋顶和烟囱上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像极了巴黎和塞纳河”。这虽然听起来不错，但仍然很有限，因为芬兰的供给储备愈发贫乏，而且也越来越依赖同德国的贸易。虽然受到德国的威胁，但苏联也根本不可能成为芬兰的政治伙伴。为此，布莱希特还同他的芬兰朋友进行了多次讨论。

布莱希特在芬兰并非不知名，早已被誉为经典作家。他成了一名享有特权的流亡者，尤其受到瑞典社民党人、布兰廷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总编辑蔡司·霍格伦德（Zeth Höglund）向芬兰同志的推荐。很多帮助都是匿名的，宛若有家神^[25]出现，至今也未能明确具体是哪些人提供了帮助。布莱希特用诗歌对这些帮助者表示了感谢，其中

有两首诗歌的部分诗行尤其引人注目。其中一首是《施德芬诗集》中以《1940》为题的组诗第八首：

在逃离自己同胞的路途上
我来到了芬兰。
那些昨日还不相识的朋友，
在整洁的房间里架起了一些床铺。喇叭里，
我听到了渣滓胜利的报道。好奇地
我注视着世界地图。在高处的拉普兰
望向北冰洋的方向
我仍看到了一扇小门。

此外当1942年流亡的旅途没有按计划中的推进时，又有诗文：

芬兰的工人们
给了他床铺和一张书桌
苏联作家把他
和犹太淘金者送上开往洛杉矶的船
赠与他一件西装：屠杀者的敌人
找到了朋友。

两首诗歌是不断改变的流亡环境的重要记录，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在第二首诗中把芬兰的帮助者在意识形态上归结为匿名工人，但这在事实上并不可能。如果之前这些人还是不知名的朋友，在最后几行诗句中，到了结尾才被明确身份，这会令人产生一种“社会主义联合会”的想法，是联合会帮助流亡者度过了昏暗时代。而“那些”帮

助布莱希特的苏联作家，不仅人数甚少，而且被斯大林无一例外地命人杀害。美国的“淘金者”也不是工人，而是曾经的手工业者（裁缝），在洛杉矶经营干洗店，在这期间已经成为一名实业家。那么布莱希特想以此嘲弄谁呢？

布莱希特在图罗区获得的住所有四个房间，房子并不像记载中的那样小，其中最大的一间当然供布氏工作使用，海伦娜·魏格尔用内尔帷幕把厨房分成了两半，一半用来烹饪，另一半是卧室；就这样现代的舞台设计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了用武之地。当具备了工作的前提条件后—布莱希特在旅馆中无法写作—他一心扑在《四川好人》上，以便能最终完稿。但事与愿违。芬兰的戏剧旺季已经结束，芬兰的夏季开始了，赫拉·沃里约基邀请布莱希特全家前往马勒柏克庄园。

根据所有的计划，这个夏季在芬兰的停留本应该很短暂。海伦娜·魏格尔在玛蒂尔达托尔顿号（Mathilda Thordén）上订了5个位子，这是一艘芬兰北美航线的小货船，只有很少的几个客舱，船1940年8月5日离开佩萨莫取道美国。露特·贝尔劳5月中旬来到赫尔辛基，由于她原本不在计划之内，布莱希特要求女朋友自己订一张同一艘海轮的票。如今，虽然海伦娜·魏格尔在瑞典已经尝试过，可第二个情人也无法被排除在外。贝尔劳不能返回丹麦，那将对她有生命危险。这个世界上，“红露特”除了布莱希特一家，再没有落脚之地，而且她精神也不稳定，虽然身体机能强健可以起到缓和症状的作用，但一些矛盾仍初露端倪。签证没有如期而至，船票必须退掉，后续旅途吉凶未卜。

布莱希特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孤立无援，对离开首都去荒野之地不甚有兴趣，但他严重低估了芬兰的夏季。向着夏日的方向，赫尔辛基人去楼空，布氏最终明白，这里盛行着自然所赋予的生活习惯，那是他所无法抵制的。此外，从那个“时刻变更的”外部世界传来的消息

愈加寡少。7月1日，还在赫尔辛基，布氏记录，起初还有一些报纸，“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萨尔州的德语报纸”，它们纷纷停刊了，然后是广播，“某一天，维也纳沉默了”，接着是布拉格，最后是华沙，现在从奥斯陆和哥本哈根传来的只有德国——即纳粹——电台，巴黎再无消息：“法国陷落，一个世界大帝国在三周内垮台。”闪电战以雷霆之势推进，粉刷匠胜利的消息此起彼伏。明天打开收音机还能听什么？

7月5日，布莱希特一家和施德芬、贝尔劳共同前往马勒柏克庄园，庄园位于赫尔辛基北部120公里处的科萨拉（Kausala），这里几乎连一个村庄都算不上，除了庄园的房屋和别墅外只有田野和森林，还有一个湖和一条河。“我们居住和劳作在水边一个带有桦树园的别墅里，由于电台报道一周以来安然无事，秃鹫也没有食欲，我们可以完全投入自然之中，以轻松的方式。”此外还有一座驳船小桥和一座游泳的木板小桥，后者供桑拿房的使用者用来降温。在布莱希特的描写中：“庄园的房子，白色，两排大窗户，每排各八个，房子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按照法兰西第一帝国的风格建造。房间都可以送进博物馆了。房子一旁是（大约80头）奶牛的巨大石质建筑，上部有草料窗口，载重汽车从这里填草料进去，还有先进的水箱设备，用铁和北方的红杉制成。”布莱希特一家和施德芬住在别墅，露特·贝尔劳起初居住在庄园，庄园里还有供娱乐使用的大空间沙龙。

对患病而且身体愈加虚弱的施德芬而言，去大自然郊游能令人恢复精神：“城市里浆果和蘑菇价格高昂，但在乡村我们自己寻找，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而且一分钱都不用花。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菜园，需要什么就来采什么。”海伦娜·魏格尔仍负责做饭，但布莱希特担心，这里反而会使她更为劳累；一切都十分繁琐，炉子必须自己点，而且房子里也没有水。

据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关于马勒柏克庄园及其周边环境的记录，他不但不为换地方感到惋惜，反而于1940年7月8日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可以理解此地人们为何如此热爱他们的景色。它是那么丰富，而且变幻莫测。水中鱼儿成群，参天的森林中飘来浆果和桦树的芬芳。……风几乎从未停止，而且吹过各种不同的植物、小草、果实、灌木和森林，所以传来柔和的、强弱交叠的美妙声音，若有若无，但一直存在着。”一个德国人在乡村期待些什么？宁静与舒适。布莱希特感知到些什么？“在外面我们都说这里宁静。但这里并非静止的；只是声响都更自然，草丛的窸窣声，鸟儿的啾啾声还有流水的声音。”

马勒柏克庄园并非与世隔绝。赫拉·沃里约基是位热情的女主人，整个夏季都让这里宾客如流。这些客人她自然也区别对待。房子是法兰西第一帝国风格的内部优雅布置，自然是社交集会地。当政客们——其中还有一些部长——前来，玩扑克也用不正派的伎俩叫牌，我们的住客就不能参加，因为布莱希特似乎见不得人。赫拉的女儿瓦普·图米额雅（Vappu Tuomioja）曾记录道：“我眼中的布莱希特是个小个子、安静、几乎阴郁易怒的男人，他的脸上布满了讨厌的胡茬，如果向他表示敬仰，他总是毫不客气而理所当然地领受。”瓦普·图米额雅还补充道，他穿无领上衣，趿拉着拖鞋走路，玩扑克也一直跟不上。

但晚上桑拿过后的长谈阔论弥补了这一切。沃里约基是个有传奇经历的女人。布莱希特：“沃里约基的故事太神妙了，这座庄园里人们的故事，这片曾经有一间锯木厂的森林的故事，都出自英雄的时代。沃里约基看起来美丽而智慧，总是纵声大笑讲述着简单人的心计和伶俐人的愚蠢，她不时会狡猾地眯起眼睛看人，她粗胖的手会伴随别人的讲话而做出流利的叙事性手势，仿佛在为只有她才能听到的音乐打节拍。”

露特·贝尔劳回忆，“那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布莱希特都闭上了嘴”。这也有数个原因；因为沃里约基讲述的故事都是布氏作品的原始材料，值得用心聆听，而且布莱希特还把这些记录下来。沃里约基回顾这段往事时如此描述玛格丽特·施德芬在这些讨论中的形象与作用：“在我的书桌旁，在插满了马勒柏克的亨利奥夫人玫瑰（Madame-Henriot-Rose）的花瓶后，坐着小个子的玛格丽特·施德芬，布莱希特的女秘书，她在摆弄她的铅笔。（后来才明白，原来她在速记我的以及布莱希特的故事。）可怜的格丽特有一双真诚的大眼睛，总是微笑，对生活乐观，但她阳光般的泰然中，脸上却带着死亡的烙印。”

这样的夜晚布莱希特自然也有表现。如果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便开始聊起戏剧，模仿爱米尔·强宁斯（Emil Jannings）或者蒂莉·洛施（Tilly Losch）^[26]：“他爬到桌子上，发表讲话，在地板上爬行，用假音（头音）大叫，为我们表演美国的电影女明星。我们都笑出了眼泪，这出独角戏可以看数个小时而不知厌倦。”瓦普·图米额雅如此回忆那些被很多嬉闹丰富了愉快夜晚。

我完全也有那些不解风月的时候

错乱关系的情爱学：

性爱的气味

1940年9月中旬，在马勒柏克一定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情，资料虽然没有记载详细的始末，但仍有一些间接证据。首先后果很明确：露特·贝尔劳离开了庄园，再次住进了帐篷，其原因可能是女主人和布莱希特这位情人之间的争执。但布莱希特给贝尔劳的两封信说明，事情也可能有其他的背景；两封信都写于9月15日。这里大家住得近在咫

尺，每日必会碰面，书信这一方式表明布莱希特想避免任何的面对面的争执。但他与情人之间的不愉快一定闹得很激烈。

布莱希特的两封信十分粗暴。根据信件内容，贝尔劳很可能用性事来讨好布莱希特，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难堪。布莱希特明确提到了贝尔劳在庄园或者近旁（桑拿房）筹划的“芬兰的夏夜”，据推测这可能发生于庄园的长谈会期间或者结束时。在第一封信中，布莱希特写道，“此时沉浸于工作之中，对性爱毫无兴趣，连对情色最无心的评论都令人无法忍受。我可以设置一个芬兰的夏夜，在这样的时刻，我认为你任何的念头都极不适宜，事实上还有辱蔑性。这当然是我的愚笨，但你必须包容它。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会有这样不解风月的时刻，或许还认为我的态度是欺骗或者伪善。这很不好”。

这是一个错乱关系的情爱学。贝尔劳期待，如果她要求，布莱希特就会满足她的性欲望；因为按照当时的性别角色分配，由女性提出献身的要求，而男性则满意地配合。根据以往的经验，贝尔劳没有计划到她的情人头脑中并非总是痴云腻雨，因而血液也没有充盈在所需要的器官上。布莱希特的信件在极度气愤和担忧一切遭到破坏间交替。

布莱希特的表述相当贴切：“极不适宜”，但表达中也显示了一些不确定性，“设置一个芬兰的夏夜”作何理解？如同《潘蒂拉》中的内容，这里自然暴露了性爱欲望，但“设置一个夜晚”？可以出现一个夜晚，或者利用一个夜晚，却无法谈及设立、建制任何夜晚。而且“事实上还有辱蔑性”这样的表达也绝不高明。这是说贝尔劳应该把拒绝算作布氏这一方的无能，还是因为精神工作而淡忘了肉体？还有一种猜测是布莱希特只是佯装拒绝，而且必须一再为此道歉。

贝尔劳在回忆录中声称，她主动离开庄园是为了更接近布莱希特，这与事实不相符；因为马勒柏克一带所有的道路都很短，短到人

们无法相互回避。布莱希特最终十分气恼，而且收回了在斯德哥尔摩对贝尔劳的承诺，从此以后不再负责她的未来。在当时的境况下，这对贝尔劳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布氏在9月15日的第二封信中对她说：“我说‘回家’仅仅指‘离开’，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或者柏林都可以。这是很糟糕，但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当时疾言怒色。但你没有‘回家’真好。”贝尔劳搬回帐篷是两人第一次情感危机的表现。

赫拉在一次长谈会上讲述了自己叔叔—富农鲁普·琼图拉（Roope Juntula）的故事。1926年，沃里约基庆祝生日时请他来到庄园，当他酒醉时，对庄园的雇工们平易近人，在庆典的前一天还觉得没有喝够，驱车前往17公里外的科萨拉，据称是为了治疗自己家患猩红热的奶牛，搞到了一些合法的酒，继续痛饮起来（芬兰已经颁布了禁酒令）。沃里约基在其戏剧《锯屑公主》（*Die Sägemehlprinzessin*）中描写了鲁普叔叔喝酒的场面。当同露特·贝尔劳爆发争执时，布莱希特已经处于《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Herr Puntila und sein Knecht Matti*，简称《潘蒂拉》）的创作之中。

在关于这部戏剧的多次争论中，布莱希特批评了庄园的女主人，“传统的戏剧技巧有碍于”喜剧效果，因此两人决定，改编并翻译这部戏剧。在施德芬完成抄录后，布莱希特独自负责了后续工作，并形成了初步修改。而最本质的改动在于：布莱希特消除了其中的分幕结构，进而改造为松散的各个场景的串联。司机的情节被沃里约基设置为虚假身份，所谓的司机卡勒事实上是出身富裕家庭的法学博士，因此适宜于一个符合社会等级的喜剧结局；而布莱希特则把这一人物安排为真正的仆从，也排除了大团圆结尾的可能性。

布莱希特最大的改编是潘蒂拉老爷这个人物，潘蒂拉老爷在第一个版本里是封建富农，也会同仆役们一起出力，而现在变身为大资本

家。布莱希特的潘蒂拉老爷虽然也是庄园主，但生活在工业时代，可以支配和使用机器。他的仆役也因此成了领工资的工人，是生产资料的操作者，潘蒂拉老爷自然不再亲自参与生产，而是去支配这些人劳动。其中的社会关系其实早已资本化和工业化，所以人也被物化了。马狄曾在“鲑鱼演说（Heringsrede）”中说——这不仅仅有形而上的意义，鲑鱼是一种力量，推动“那些被称为雇工的机器运作，他们还不是永动机”。

布莱希特在1940年9月24日的《工作笔记》中记录，当赫拉·沃里约基第一次阅读自己的文本时，她“极为震惊”，几乎没有认出这改编自自己的戏剧，很犹豫地参与到芬兰语版的翻译中，两人10月用这部戏剧投稿参赛，但并未入选。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出民间的酒鬼喜剧，类似卡尔·楚克迈尔的《欢乐的葡萄园》。但剧中喜怒无常的庄园主在“清醒袭来”时是蔑视人性的莽汉，而一旦酒醉，就立刻化身亲切和蔼之人，也就是说，布莱希特一同往常一样——在普遍人性的弱点中挖掘喜剧元素，似乎很不现实地遵循了自然主义的刻板模式和家庭画报心理学，即遵循了沃里约基版本中被视为错误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

戏剧关注的核心是时事，完全面对不同的方向，材料中表面上的封建关系实指德意志民族。在同时代的关联性上与易北河东部的容克贵族相关，他们不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能够维护自己倒行逆施的要求，而且还推动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和纳粹的兴起。兴登堡也属于这一集团，还曾下榻于他们的纽德克（Neudeck）庄园，兴登堡事后把纳粹组织在所谓的罗姆政变（Röhm-Putschs）^[27]中犯下的谋杀罪行合法化，从而将希特勒推上了国家总理的宝座，拆毁了法制国家最后的壁垒。

潘蒂拉这一人物时而自大目空一切，酒醉时气量豁达，时而清醒又陷于小市民的长吁短叹。酒醉时的善良没有人格基础，完全不能说明有两个灵魂住在他的胸底（他很可能一个也没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场景是潘蒂拉又在酒醉时吹嘘自己斥责在仆役市场上鞭打马匹的胖子：“如此讨厌的一个胖子，满脸脓包，是个着实的资本家，还想离间我和我的一名工人。”潘蒂拉有些混淆了概念，他才是资本家，而胖子还以马车这一封建时代特色的车辆出行，这里潘蒂拉也暴露了自己把人作为牛马来奴役。看得到马被鞭笞，但潘蒂拉打他的工人则是不可见的，例如虽然他在雇工市场上承诺雇佣，但实际上并没有，或者当他开除同样醉酒的苏尔卡拉（Surkkala）时甚至都不用抬手。资本主义的暴力虽然不可见，但仍能造成影响。

在第二十轮，月亮也开始呕吐

它把池塘当作垃圾桶

两种语言的沉默：

苏联和德国夹缝中的芬兰，莫斯科

10月初，夏季结束，布莱希特一行又回到了赫尔辛基的小房子里，那里已经没有了玛格丽特·施德芬的容身之地，她只能栖身于赫拉处。施德芬多次病危，在1940和1941年之交尤为严重。后来虽有所恢复，但始终无法痊愈，她把在高烧中的梦境写成了一部短篇小说，就文学创作而言，流亡的悲苦已经根植于她的潜意识里。施德芬梦到在一艘永不靠岸的船上漂流，当她询问看守还有没有获救的可能时，得到的答案是：如果你能回答一个问题。她问是什么问题，就被带到了船舱内，在浓浓雾霭中出现了一些人影。他们是演员，想从施德芬那里得到一些“角色”。她回答，有太多角色了，然后历数了布莱希特在纳粹统治前创作的戏剧中的人物。当被问到自己最喜爱的戏剧

时，施德芬没有回答其中的任何一部，说的全是流亡时期的作品，这些戏剧“由于时局不利，永远不会有被搬上舞台的机会”，但它们才是她“最喜爱的”。但它们无法上演，因为它们说了实话：“哎呀，这些蕴藏着伟大角色的戏剧，当一切都不同了你们才有可能表演它们，但如何才能不同呢？因为只有通过你们的表演才能改变这一切。/脚下摇晃的地板裂开，我坠落，坠落，坠落。”这两页施德芬用打字机书写的故事被布莱希特贴在了他芬兰的工作笔记中，并附上了题目《为布莱希特1941年生日尝试历数他的戏剧》（*ein versuch der aufzählung seiner stücke zu brechts geburtstag 1941*），并手写了补充说明“玛格丽特·施德芬作”。这一梦境表明了施德芬多么认同布莱希特的作品，而且从实际的戏剧工作中分离出来是多么的痛苦，毕竟她是通过戏剧工作才结识了布莱希特。

事实上施德芬再也没有康复，而且更加不利的是芬兰饮食水平也在直线下降。所有当时与她相处的人都看到了这是一位濒死之人，但布莱希特除外，他还在祈祷施德芬的康复，因为这实际上早已希望渺茫。布氏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完全是不现实的。施德芬一如既往地通过不知疲倦的工作进行自救，这一做法遵循了一句格言：工作是最好的良药。她目前还能够暂时蒙骗自己的身体，好似面对工作热情身体根本不存在。只要还有一丝可能，精神定会战胜肉体，这对所有唯心主义而言都是顺理成章的。

无论对健康还是对工作来说，雪上加霜的都是申请签证的艰辛，这已经成了持久的心理折磨。1940年末，在长期的苍黄翻覆之后，墨西哥签证终于辗转抵达了赫尔辛基；但得到签证的仅仅是布莱希特一家，没有人愿意接纳患病的施德芬，她看到自己已经被遗弃了：“我很悲伤，看到自己将孤零零的不知所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布莱希特有去美国的机会，他一定要抓住。”贝尔劳依旧在丹麦申请美国签证，而且最终于1941年3月29日达成所愿。

1940年12月2日，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终于历尽艰辛成功地逃到了美国（他在法国已经被拘留），福伊希特万格致信布莱希特：“我们在这里尽一切努力把您接过来。……也会为了您的访问签证而继续努力。但向您强烈建议，不要耽搁，尽快起程。”福伊希特万格贡献出了自己在苏联的银行账户，而且已经发出了汇款，随时为布莱希特支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行程的费用。此外，福伊希特万格还坚持另一项建议：“亲爱的布莱希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若携您的随行人员同往出现困难，那么，请您要遵循理智。不要犹豫，独自前来。我曾有过多次数经验，家人不会走散，他们会像链条一样相互维系，如果某一人能成功地脱离险境，把家眷接来。”显然，布莱希特无论如何要把他所有追随者都带去的想法已经流传到了美国。在附言中，福伊希特万格还补充道，一位“金主”——德国电影导演和演员威廉·迪亚特尔（William/Whilhelm Dieterle），愿意为布莱希特的旅程出资，因此美国的访问签证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在这里，一支小型的部队，在尽力帮您到底。”

但布莱希特决定，即便是逃亡墨西哥也一定要与格丽特同往。1941年4月，为自己的不合群而致歉，布莱希特在致芬兰作家黑格·奥尔森（Hagar Olsson）的信中表述：“我认为，您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害怕将那个同你共度了漫长流亡之路的人独自一并不是永远地一留下自生自灭。”

1941年1月初，布莱希特完成了《四川好人》的工作。在研究了美国经济和罪犯史后，布氏从3月10~29日写作了《阿尔吐·乌依的有限发迹》（*Aufhaltsamer Aufstieg des Arturo Ui*，简称《乌依》）；4月又润色了这部戏剧中的几首无韵诗。5月2日，布莱希特一家的移民签证抵达赫尔辛基，不可思议的是，5月12日，施德芬也收到了访问签证，赫拉·沃里约基断然订立了合同，将施德芬任命为自己的文学代

理人，因此，美国官员似乎看到了她不久后会返回自己在芬兰工作岗位的保障。

在申请美国签证的艰辛中，布莱希特可能是共产党的嫌疑一直事关重大。1935年《母亲》在纽约的上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的嫌疑在芬兰已经一再出现。最典型的是社民党女政治家西尔维-吉里基·基尔皮（Sylvi-Kyllikki Kilpi）的日记记录，她是流亡委员会的成员，在布氏流亡芬兰的最后一个月里时常出入布莱希特家，在日记中她记录了发生在马勒柏克庄园的一些争执。其中一个话题是特别法的问题，法律针对的是冬季战争^[28]末期的“和平过渡”时期。基尔皮维护这些法律，原因是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短期的，布莱希特笑道，“曾有一个女仆也这样维护自己的非婚子，说孩子还小。我们俩都笑了”。

而另一个问题则严肃得多：对德国人过境权的激烈讨论。“根据他们的（海伦娜和贝托尔特的）观点，我们得救离不开同苏联人建立的友好关系。”基尔皮意见相反，“我们宁死也不屈服于德国人或者苏联人的奴役”，而且表示，“布莱希特一家对芬兰当前政治局势的立场，及其同苏联绝对的友好”令她大为光火。基尔皮在1941年2月10日的这次争论之后几乎同布氏断交。布莱希特的观点是一海伦娜·魏格尔的想法或许更加决绝—德国纳粹决意要征服世界，将一大部分人作为下等人而奴役或谋杀，相比之下，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最终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且布莱希特和魏格尔一再考虑到，与德国不同，苏联应该存在能在希特勒之后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但1941年5月，社民党人没有阻止芬兰议会作出决议，为了驱逐占领区的苏联人，芬兰同德国结盟。1941年5月3日，基尔皮写道：“海伦娜·布莱希特突然前来，她完全陷入了恐慌状态。海伦娜说图尔库（Turku）前已经停了12艘德国战舰。”5月25日，芬兰人同意赋予德

国人权利，在芬兰的东部和北部边境驻扎德国军队以袭击苏联。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芬兰从这次他们所谓的“继续战争（Fortsetzungskrieg）”^[29]中收回了卡累利阿，但最终也没有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安定。苏联在二战之后强制要求的条件相比冬季战争时将更多。除了在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芬兰还被迫出让了整个拉普兰地区，丧失了北方唯一的入海口（因湾流而常年不封冻）以及不仅仅被德国人觊觎的镍矿储备。

虽然得到了芬兰朋友的帮助和包容，但这里受到广泛赞誉的自然景象也渐渐变得单调乏味。1941年4月14日的复活节星期一，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写道：“春天，肮脏和生产的时期。有希望摆脱坐骨神经痛、臭虫和纳粹主义。”春季，一个通常被赞颂为自然萌芽和生长的季节，由于东道国坚持民族独立，这样的政治局势使这个春天失去了意义。芬兰人在两种语言（芬兰语和瑞典语）中都缄默不语，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而同最邪恶的敌人结盟，最后也事与愿违。由于较早得到了翻译，布莱希特的诗歌《芬兰舞》（*Finnischer Tanz*）在芬兰成为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而且似乎也符合芬兰人的民族性格：封闭与沉默；而且正如基尔皮的记录所证实的，要尽量避免任何争执。在布莱希特看来，这也是社会主义反对党的沉默，早在马勒柏克庄园就出现了令人作呕的诗句：

四周矗立的桦树令人毛骨悚然

初升的月亮也对此感到恶心。

在第二十轮，月亮也开始呕吐

它把池塘当作垃圾桶。

诗歌通过在芬兰夏夜对舞蹈的观察描写了“这个国家的风俗”。有一些成对的比喻，它们相互踩了对方的脚，因而受伤或者不能站

稳：

爱国与耐心

在所有人中跳得最久

他们相互扶持，对视，紧密地拥抱

不然两人都会倒下。

这就是布莱希特眼中的芬兰。

施德芬拿到签证之后，布莱希特的营垒开始拔寨起营。5月15日，西尔维·吉里基·基尔皮还为此举行了短小的送别会，其间布莱希特再次“固执地”努力尝试改善芬兰同苏联的关系。基尔皮烦躁地评论道：“同一些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在政治上他似乎是个门外汉。”在他们离开之后，布莱希特将托姆布洛克为《伽利略传》创作的一包素描画留给了基尔皮；当她来取的时候，察觉了“布莱希特离开后的空虚感”。

由于战争，佩萨莫港无法使用，布莱希特一行人必须取道苏联。经列宁格勒布莱希特5月17日抵达了莫斯科，并在这里筹划下一步的旅程，这当然由海伦娜·魏格尔负责，而布莱希特——由于无法在宾馆工作——要么乘计程车在城市里兜风，要么步行着探索莫斯科市中心，用来转移思想。布氏一家在莫斯科逗留至1941年5月30日，然后继续起程，对这一时期最好的描写出现在奥地利记者、作家胡戈·胡佩尔特（Hugo Huppert）的回忆录《将军二重身》（*Schach dem Doppelgänger*, 1979）中，胡佩尔特在这段时间照料布莱希特，还有格丽特。虽然曾被拘禁和折磨，胡佩尔特依然选择留在苏联，因为正如流亡者每天都会自问的，到底哪里才能原则上保证日常的生存？据胡佩尔特记载，布莱希特“为紧张和不安所困扰”，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毕竟不是游客，同每一个逃亡者一样都无比的疲惫。但渐

渐也有所产出。细想来，剧作《伽利略传》、《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四川好人》、《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以及《阿吐尔·乌依的有限发迹》都创作于这一昏暗时期，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布莱希特完全从动荡的年代中抢来了自己的艺术作品。

我们的流亡者刚到莫斯科，入住了宾馆的两居室套房后，施德芬的状况就开始恶化，起先搬入了宾馆的单人间，在那里进行治疗。隔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照顾芭芭拉和施特凡并不高涨的情绪，芭芭拉11岁，施特凡17岁，两名无所事事的中学生在陌生环境的狭小空间里，确实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柱。当时席卷一切的混乱几乎无法想象。5月29日，施德芬再次昏倒，必须立即转入医院。布莱希特陪同她坐救护车来到莫斯科高山疗养院肺结核中心研究所，研究所坐落于野外，空气清新，施德芬在这里得到了苏联最好条件的医治，但由于只有六分之一的肺还能正常运作，等于没有了康复的可能。

布莱希特依然抱有希望，而施德芬的自我评价却截然相反。当胡佩尔特（在宾馆中已经开始）照料她，为她朗读马雅可夫斯基（Majakowski）的诗解闷时，施德芬就对他说：“在我死之前，还有些话想对您说。”“说这些时，”胡佩尔特写道，“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头艰难地从枕头上抬起，我的后背一阵凉意。”布莱希特无论如何试图退换已经购得的船票，但施德芬坚持，大家已经因为长时间等待她不能继续上路，一定要大家先走。胡佩尔特：“我几乎不能理解，一位濒死的女性如此重视和催促布莱希特一家应该立即起程，不要为她而担忧。不然她死不瞑目。”

米哈伊尔·阿普勒金（Michail Apletin）和玛利亚·奥斯滕承诺照料施德芬，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样布莱希特一家和露特·贝尔劳终于在1941年3月30日踏上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Wladiwostok，海参崴）的旅途。日后得以证实，这也是走这条路—

难道还有其他道路？一去美国绝对最后的机会，而且就目前已明了的局势而言，布莱希特若流亡苏联也无法幸免于难。当丈夫米哈伊尔·库尔佐夫1939年被捕，玛利亚·奥斯滕愚蠢地同养子来到了莫斯科，因为她认为这一切无非是一场误会，玛利亚·奥斯滕也在帮助施德芬后不久被捕，并作为所谓的法国间谍于1942年被枪毙。她的丈夫也早在2月即被斯大林的刽子手处决。

阿普勒金在布莱希特逃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令人不解。他在布莱希特获得签证的事宜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且负担了大额的经济支出以购买车票，照顾施德芬直至其离世，同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jew）一起写了含有她死讯的电报。布莱希特在美国多次感谢阿普勒金的帮助，没有他的帮助，布莱希特——当然还有其他人——无法逃生。阿普勒金是苏联秘密警察一个偏远部门的领导，负责监视外国作家，并在发现他们有嫌疑时将他们送交斯大林的刽子手。他也是1936年撰写《对德国作家意见》的人物之一，这份意见直接导致了对恩斯特·奥特瓦耳特的死亡判决。阿普勒金一定曾声名显赫，布莱希特还与恩斯特·布什在玛利亚·奥斯滕事件上公开谴责他是“托洛茨基派”。而且，绝对是斯大林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范作家的法捷耶夫也在布莱希特的戏剧性人生中登场，这让布氏的出逃更加扑朔迷离。

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德国人比台风更可怕

这与其说是游轮旅行，不如说是敢死队号令：

海上和海里的马克思

布莱希特一家和露特·贝尔劳踏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为期10天的通往俄罗斯东岸的旅程。6月4日，布莱希特收到了前述电报：玛格丽特·施德芬当日早晨安然离世。尸检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是她不知

疲惫的精神支持她度过了逃离自己同胞中那些刽子手的残酷旅程。如若不是受到小市民无产阶级出身和无产者疾病的巨大阻碍，施德芬定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德国女作家。但她只会同布莱希特一同取得成就，因为是布氏发现了她的才华并为己所用，但正如施德芬那些高烧中的梦境所证实的，这也并不违背她的意愿。她微薄的作品也得到了保存，虽然仅仅是初露端倪，但仍十分出色。她创作于鲜活爱情对话中的十四行诗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永存的内容。

1941年5月10日，火车沿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布莱希特一家和露特·贝尔劳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旅程，这绝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同一条铁轨上还行驶着斯大林开往“古拉格群岛”的火车，里面曾坐着布莱希特的朋友们，卡罗拉·内尔，阿西娅·拉齐丝，米哈伊尔·库尔佐夫，谢尔盖·特列季雅科夫，他们此刻要么已经被谋杀，要么在劳造营里艰难度日。

6月13日，圣安妮强森号（S. S. Annie Johnson）入水，这是一艘有51个客舱的货船，其中38个客舱被预订。布莱希特一行人乘坐的是头等舱，对船上一应俱全的奢侈甚为愉悦，这还包括布莱希特总是使用的一座游泳池。露特·贝尔劳一与自己的讲述不符—独自使用一间客舱，享受着丰富的食物，特别是酒精饮料。在同汉斯·布格的谈话中，她还透露自己同船上的话务员有暧昧关系，这也再次证实了其回忆录的不可靠性。据称贝尔劳没有获得客舱，因而接受了话务员使用自己客舱的邀请，而话务员自然也懂得利用这次机会。但这些无足轻重。船上同行的还有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埃贡·布莱纳（Egon Breiner），布莱希特与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日后在好莱坞与之一再相遇，向其朗读自己的新作以资评鉴。布莱希特船上的读物之一便是马克思，布莱希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家古董店里购买了一版马克思的著作（但具体有哪些作品没有得到记载）。

事实上，圣安妮强森号是最后一艘——自然也遇到了一些阻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往美国的轮船。6月22日，起航后的第九天，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苏联，此时船还没有行至马尼拉（Manila）。船在马尼拉卸下了一些货物，也重新装载了新的货物。日本潜水艇和战舰使得海路也并不安全，他们时常袭击被日本人断然称为“间谍船”的商船。此外，马尼拉港还被布雷封锁，在较长时间的等待后才能驶入港口。诗歌《台风》（*Der Taifun*）中描写了热带气旋迫使船只较长时间逗留在菲律宾，这同诗中提到的德国海盗船一样，都是纯粹的虚构，当地根本没有海盗船，布莱希特需要这些仅仅是为了结尾的“噱头”。在六天的停泊时间内，布莱希特和魏格尔有机会离开甲板，这是他们横渡大洋时唯一一次踏上亚洲大陆。贝尔劳和孩子们患上了腮腺炎无法外出。

在诗歌《流亡中的风景》（*Landschaft des Exils*）中，布莱希特提及了“被作了标记的马尼拉”。显然，这一区域随时可能发生集中了所有力量的公然军事行动，对此，马尼拉人民情绪紧张。离开马尼拉后，船只绕行吕宋岛（Insel Luzon）向北太平洋方向行驶5830海里到达了洛杉矶的圣佩德罗港（San Pedro），在露特·贝尔劳的回忆中，这与其说是邮轮旅行，不如说是敢死队号令。在1941年7月21日20点45分驶入港口之前，据布莱纳称，布莱希特把马克思的书籍扔进了大海，并解释道：“我不想在美国官员那里有任何困难。”这确实也没有发生。没有照例进行审问，美国官员仅仅弄清了布莱希特的担保人持有足够的外汇，便发放了入境签证。

玛塔·福伊希特万格和亚历山大·格拉纳赫组成了欢迎委员会。格拉纳赫和与其相熟的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弗里茨·考特纳都在经济上支持布莱希特一家。考特纳写道：“她，还有尽微薄之力的我，成功地筹集了足够的钱，让布莱希特和他的家人能够踏上来美国的道路。这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威廉·迪亚特尔

承担了其他的旅费，还为布莱希特一家在好莱坞资助了第一处住所。没有这些朋友和熟人无私的帮助，我们的流亡者几乎毫无机会逃离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残酷统治。但这些帮助也说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同的合作为抗击纳粹蔑视人性的浩劫构建了人道主义纽带。而且共同的艺术创作为所有的参与者奠定了相互帮助的基础，布莱希特则享受了这一成果。此外，不能忘记的还有这些被四处驱赶的流亡者拥有的几乎不可思议的幸运。

不自觉的，我在每一个丘陵带

或者每一棵柠檬树上寻找小小的标价牌

谎言中的公开贸易：必须合作

格奥格尔·格罗兹早已断然否定了布莱希特对美国和美国生活的设想，但踏上加利福尼亚这片土地时，布莱希特仍固执地坚持自己对美国的印象。伊丽莎白·霍普特曼于1934年流亡美国，1939年3月布莱希特还在斯文德堡时曾致信霍普特曼，已经开始为美国作精神上的准备。布氏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发现的是（温室里）“享有专利的鲜活植物，带有惊人的生命力（‘你理解我的意思’）”：“‘浪漫’现实主义”。这一时期《工作笔记》的一则记录也支持这一观点：小说作家如詹姆斯·马拉翰·凯恩（James Mallahan Cain）、贺瑞斯·麦考伊（Horace McCo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这些人“现实主义”的标签都是加引号的，他们反对“对某种环境的通俗描写”，寄希望于“‘放荡不羁’的描写能有全新的吸引力”；“以电影体验开始（最终以好莱坞结束）”。由于布莱希特列举的都是原文题目，所以这些作品，包括他的主要读物侦探小说，很可能都是英文原版。

在同时期的札记《近期美国文学的“现实主义”》（*Der »Realismus« der jüngeren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中，布氏也作出了阐释，“某些相当成功的书籍”“不仅没有为生殖器挡上遮羞布，而且还刻画了一些‘失败者’”。这些作家的态度“极为不道德”，布莱希特没有找到任何同黑帮作品有本质区别的东西。其中展现的只有“无原则性”，而且是“流氓资产阶级和流氓小市民，及其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血与土文学”的无原则。布氏还带有性别歧视地补充道：“饥饿和情爱统治着这里的熙攘。”这当然是含有诋毁意义的评价，青年时期的布莱希特就曾同巴黎作家一起谴责过手淫的市民文学。对美国而言，生活不过是纯粹的自慰：前景不佳。

自1941年7月21日起，布莱希特可以当场审核自己的偏见了。受伊丽莎白·霍普特曼之托，亚历山大·格拉纳赫和多萝西·汤普森为布莱希特及其家人在好莱坞置办了一处住所（贝尔劳除外，她居住于附近）。最初是威廉·迪亚特尔资助布莱希特的日常开销。威廉·迪亚特尔向移民局作出了具结，只要这一家人没有自己的收入，自己每月向其支付200美元（第一所房子每月租金是50美元）。至于布莱希特还能从他的，特别是施德芬的莫斯科银行账户中取到多少钱，这完全没有被记载。但是由于除了旅费外还要支付施德芬的治疗，有理由猜测，那应该仅仅是不值一提的数额。美国的担保人在布莱希特能顺利入境的事宜上有着决定性意义。威廉·迪亚特尔同格罗兹类似，自1930年就离开了德国，成了好莱坞的知名电影导演，也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美国化了。

虽然接待周到，但仍不能改善布莱希特一家预料中的坏情绪。在芬兰，身处郁郁葱葱的树林，面对桦树、浆果深受赞誉的清香和鱼群畅游的湖水，布莱希特仍让月亮在池塘里呕吐，因而对加利福尼亚同样也恶言相向：“奇怪，我在这样的气候里无法呼吸。空气完全没有任何味道，也没有四季之分。间或，特别是乘车去比弗利山庄时，我

也能感受到那‘本该’迷人景色的一些风貌：丘陵温和的线条，柠檬树丛，一株加利福尼亚的橡树。”对美国的自然风光仍然没有积极的看法。

根据《工作笔记》中的记录，1941年11月18日，作为老朋友为布莱希特一家倾尽全力的弗里茨·考特纳，为了让这位阴郁不定的作家打起精神，也给东道国以消极评价。考特纳被大家视作“忒耳西忒斯（Thersites）”^[30]，他控诉“这里的气候：徐徐的春风，在这里，这片‘上帝之乡’^[31]，会瞬间变成龙卷风，摧毁一切；降雨稀少，但也会增长为末日般的大洪水；长时间的日照使头脑干涸，人们最终只能写出好莱坞电影，等等”。由于找到了可靠的老朋友，所有对这个国家的反感似乎得到了证实。

虽然布莱希特能察觉到“景色的一些风貌”，但对好莱坞和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壮丽的海岸风景无动于衷，这显然同潘蒂拉的消极视角有关。潘蒂拉老爷对那些无法取得利润的事物视而不见，布莱希特在美国看到的自然出自能带来巨大收益的技术手段，因而不应被称为“自然”：“不自觉的，我在每一个丘陵带或者每一棵柠檬树上寻找小小的标价牌。这样的牌子也被贴到了人们身上。”这里有些不对头。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了科学史上的经典准则：只有顺从自然，才能战胜自然，但在美国，这条准则也被颠覆为：只有忽视自然，才能战胜自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1942年写了小说《威尼斯，得克萨斯》（*Venedig, Texas*），描写了在沙漠中心的干涸之地建造一座城市，这里起初被设定为高雅艺术之都，后转变为一座娱乐中心，因其水道和威尼斯式的风光获取了无法估量的财富（类似拉斯维加斯）。在布莱希特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之时，他笔下的美国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城市：天堂之都马哈哥尼。“他们的自然都是人

为的，因而使人产生一种更强烈的感受：自然被隔离了。从迪亚特尔房子的窗户可以看到费尔南多山谷（Fernando Valley）；川流不息的汽车在这里形成了一条闪烁的光带，穿过自然；但大家知道，这里的绿色拜沙漠灌溉技术所赐。遭到一点儿破坏，沙漠就会显现出来：若不付水费，没有东西能够生长。”日后，当露特·贝尔劳在纽约居住和工作时，布莱希特曾对她说：“此刻，即使无花果树，看起来都好像在讲述和兜售低级的谎言。”

布莱希特不禁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商品艺术，其价值不再同使用价值相关，而是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文化作何生产原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找到足够的买家，布莱希特在《人就是人》中以卖大象幼崽的例子已经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加工处理。而两者的区别在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这部戏剧，虽然引来非议，但试图向人们解释至此不为所知的市场关系，而在美国，交换价值公然踱步在媒体和市场宽阔的大道上：“这个国家击溃了我的《图伊小说》。这里无需对出卖观点进行揭露。这种买卖赤裸裸地在四周蔓延。”

一个典型的例子：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年在美国影院上映，但由于观众缺乏兴趣而下线，这就像戏剧背景降入活板门一样。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于1943年1月24日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会议，面对德国的战争罪行，商定打击德国直至其“无条件”投降。由此，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也被推上了“巅峰”，制片人再次成功地大规模上映这部作品，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年问鼎3项奥斯卡奖。即使一使用价值上一顶级的商品，如果不能实现交换价值，也只能被埋没。如今《卡萨布兰卡》成了史上最佳的爱情电影，并获得了史上最佳电影第三名的佳绩。

另一个事件被布莱希特在1941年10月22日的《工作笔记》中记录为“完全商业化舞台”的实例。美国作家本·赫克特（Ben Hecht）在

好莱坞出售剧本获得了巨大收益，“他走进一家酒吧，讲述了一个剧本计划，不过仅仅给出了一个环境（停尸间）和一些插科打诨的台词，立即就有一名同事说‘本，算我1000美元’”，他竟然随身携带了1000美元。布莱希特得出结论：“对金钱的态度暴露了这里的殖民地资本主义。感觉所有的人处身此地只是为了某日的离开。他们在美国也只是为了赚钱。这是一个到处漂泊的舞台，舞台上那些四处奔波的人为迷失的人表演。时间就是金钱，各种模式被组合在一起，而排练则纯粹是蒙太奇作品。在殖民地，无生活可言。”

布莱希特继续写道，从赫克特身上也可以获得经验，在纽约无法创作严肃的剧本。股市崩盘和罗斯福新政（1933~1941年间为救助贫困的人民大众而推行的一系列经济及政治改革）的影响已经消耗殆尽，无法形成戏剧文学：“百老汇取得了胜利，证明了自己有米特里达梯（Mithridate）^[32]的胃。搅屎棍成了掘金者。”（米特里达梯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药的方法来获得对毒物的免疫力。）

此时布莱希特还初次遇到了其他德国流亡者。在记者鲁尔福·纽伦堡（Rolf Nürnberg）处，布莱希特与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相遇，这两人于1923年组建了社会研究院（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流亡中在纽约的新址重新设立了这一机构。他们同音乐理论家、哲学家西奥多·W.阿多诺共同构成了知名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院从事教学活动，出版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为很多流亡的科学家提供了收入和发表文章的机会。布莱希特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革命性举动无非是一用阿多诺的话说——“对文字的过分迷恋”，他们的分析，无论是哲学性还是社会性的，都被布莱希特认为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影响。对布氏来说，他们是图伊主义的典型，布氏还立即向“双面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表示了戏谑的欢迎：两人“钦佩唯物主义理念绝非出于自私自利

的目的”。阿多诺在日后的戏剧《图兰朵》（*Turandot*）中化身为大图伊杜蒙卡（Munka Du）。

卡尔·柯尔施在纽约居住，试图在那里继续马克思主义研究，布莱希特在给柯尔施的信中挑起事端。布氏认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霍克海默、波洛克“除了对《图伊小说》之外，对其他都没有太多意义”。他们寄希望得到能在好莱坞拍摄的卢尔德镇（Lourdes）^[33]电影中的“神父角色”。“敌意像橙子一样肆意生长，而且也和橙子一样没有核。犹太人相互指责反犹主义，而雅利安德国人则相互指控‘亲德意志主义（Philodeutschismus）’。——德布林时而提及家乡，指的却是法国。莱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 Frank）看到好人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郑重宣布，必须从刚霍夫们 [路德维希·刚霍夫（Ludwig Ganghofer），1917年去世，威廉二世时期很受欢迎的小说家] 那里抢夺被他们占有的‘某些重要领域’，写一部革命性的‘Boy-meets-girl’（男孩遇到女孩）故事。”

曾经的朋友之间关系如此混乱，甚至（部分）相互争执，这场面还缺少占星学。这也被免费送上了门：而且恰恰是在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家，布莱希特1941年10月26日前去拜访他，赖欣巴哈是唯理论者，写作了世纪经典著作《科学哲学的兴起》

（*Aufstie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Philosophie*）。赖欣巴哈“夸赞《伽利略传》中的物理学部分，和历史真实性”。当然在场的还有几位心理分析学家，谈话也必然转向了占星学：“从对占星学的信任中会立即出现恋母情结——相信希特勒也类似；……赖欣巴哈说发表见解要进行‘wishful selection’（怀有希望的选择），但仍然用他的新逻辑宽恕了这些图腾崇拜者。”

事态进一步恶化。正当布莱希特发现这场被他称为“错误的战争”令人度日如年时，他在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别墅中遇到

了一些流亡者，他们正在专心听“英国王家占星师沃尔（Wohl，《柏林画报》前小说家），一个胖家伙，如何在1940年5月的星盘中找到了希特勒战胜法国的原因。布氏十分气恼，并反驳，希特勒在坦克和飞机上的优势在4月或者6月或许也同样突出”。这一时期纳粹的军队正在进军莫斯科，希姆莱给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下令，用毒气装置工厂化地杀害犹太人，在德国，随着犹太星^[34]的实施，犹太人显然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如今已经明了，这场看似只局限在欧洲的战争扩展为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根据资料显示，布莱希特一直关注战争局势，这样的“降神会”对布氏而言简直匪夷所思，而且弗里茨·朗和其他不少德国流亡者还能享有如此富足的生活。布莱希特自始至终都走对抗路线，不愿向生活或居住在不同物质状况下的德国同胞妥协。

玛格丽特·施德芬的离世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必定给布莱希特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苦恼，特别是，根据经验，虽然对露特·贝尔劳的组织才华没有任何诋毁之意，但她在共同工作中的创造力无法同施德芬相提并论。贝尔劳意欲独占布莱希特，并把其他每个女人视作闯入者，威胁为她所保留的地位，这也传染了海伦娜·魏格尔，而且变本加厉。此外，贝尔劳还指责魏格尔牺牲她而满足自己的利益，最终贝尔劳为每一件小事而歇斯底里地发作，所剩的，只有与布莱希特两人在性欲上的相互依赖。

早已明了，海伦娜·魏格尔由于自己的条件，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从事舞台戏剧表演外的其他领域的工作。但她英语水平不行，无法在美国得到电影或舞台角色。而且魏格尔在美国也不值一提，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还外表丑陋，太过男性化。因而魏格尔只能继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由于能支配的钱很少，她必须到廉价的地方购物，在美国没有汽车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也意味着必须寻求他人的帮助，是萨尔卡·菲尔特（Salka Viertel）载她到洛杉矶的中央大市场；每周供饮食使用的钱只有25美元。很快魏格尔的厨艺就远近闻名，吸引

了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让卡路里见鬼去吧”，（自然还有）萨尔卡和贝特霍尔德·菲尔特、弗里茨·考特纳及夫人约翰娜·霍福尔（Johanna Hofer），孩子们的朋友也慕名而来。桌上总是有香酥可口（但也富含卡路里）的维也纳烤鸡，还有布莱希特讨厌的蘑菇。

当日后魏格尔被问及，她在流亡过程中为布莱希特做过什么，回答很简洁：“我总是善于烹饪。”但这也有失偏颇，因为魏格尔还担任了整理材料、校对文稿等对布莱希特作品相当有益的工作。这样，布莱希特同往常一样，尽可能地从家庭生活和每日的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跨媒体”地同孩子们互动，即为孩子们写一些诗歌和歌曲，由母亲为孩子们表演。也就是说，施特夫——施特凡的昵称——自然早已过了需要人为其朗读的年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主要是在丹麦时期——而芭芭拉还需要母亲很多的照顾，特别是她刚到美国就患上了结核病，回忆中格丽特长年病痛的悲剧看似又要重演。从此直至芭芭拉完全康复大约持续了一年（疾病幸好没有复发）。

这样，海伦娜·魏格尔至少还能与女儿重操旧业，布莱希特也有了书桌边的安宁。布氏的书桌也愈发狭小，相比之下，丹麦和瑞典，甚至芬兰的工作室都有较为宽敞的空间。根据布莱希特自己的判断，缺少工作环境阻碍了他的创作。但也有很多其他的困难和精神挫败，不仅使人心境不佳，也让工作失去了活力。

1941年8月1日起，布莱希特一家搬进了圣莫尼卡25号街的小房子，房子闷不透风，门是丑陋的粉色——在别人眼中房子是什么样子没有得到记载；房子有一间工作室，这里只让人“能在工作中前进三步”，也就是说在这里无法进行正常的文学创作。但布莱希特必须忍受一年。回顾往事时，布莱希特1942年4月21日在《工作笔记》中记

录：“十年来我第一次不能井然有序地进行工作，这是十年颠沛的结局，也必然有其后果。”

每天，为了赚到面包/我乘车来到市场

这里卖的都是谎言

电影行业的尝试：失败了

由于戏剧作品在初期毫无希望，因而只能开发电影市场。被布莱希特设想为敲门砖的剧作《乌依》在美国无人问津。埃尔文·皮斯卡托尔——他也曾帮助过布莱希特入境——邀请布莱希特到他工作的纽约新学院（New Yorker New School）担任教师。但布莱希特在加州已经发现，如果去纽约，他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足够的教学经验，特别是在理论领域，而且同时也得到证实，洛杉矶比纽约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因此他把《乌依》交给了皮斯卡托尔，希望或许能有所进展。皮斯卡托尔也为之付出了努力，希望有人能接受这部剧作，但最终一无所获。

布莱希特写作这部戏剧时身处芬兰，坚信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美国风格，并且早已阅读了弗兰克·诺里斯的长篇小说《深渊》，布克·怀特（Bouck White）的虚构自传《丹尼尔·德鲁之书》和亨利·福特1935年关于其工作和生活的作品，还于1935年对美国侦探电影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美国，戏剧也必须适应娱乐工业，而娱乐工业对宣传和教育毫无兴趣，布莱希特力图创新的电影也早已存在。古斯塔夫斯·迈厄斯（Gustavus Myers）的《美国豪门巨富史》（*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是《乌依》的主要素材之一，迈厄斯给这部《美国豪门巨富史》添加了“结束语”：“并非笔者由于内心的堕落而塑造了这里的故事，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该书德文版译者可能指的是“不争的事实”。）迈厄斯继续写道，有很多评论家

认为他在书中描写的巨额财富可能是通过贪污和犯罪积累而来，因而迈厄斯必须确认，很多著书立说的高校科学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证实书中的事实”。所以那些姓氏，例如阿斯特（Astor）、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Morgan）、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卡耐基（Carnegie）、古尔德（Gould）、希尔（Hill）等，才名留青史，至今都有酒店、音乐厅、船只、基金会和图书馆因以他们命名而荣耀。

《乌依》以“白手起家”传记模式下一名黑帮成员的发迹为内容，而且同希特勒的崛起有众多相似之处。当美国被卷入二战只是时间问题时，布莱希特如何能指望凭借这部戏在美国深入人心，同时还作为一名“披露丑闻（muckraker）”的外国人呢？1941年2月18日，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35]，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准备好向所有对德作战的国家提供武器、船只和飞机，其中主要是英国和苏联（此时尽管处于斯大林时期，美苏关系仍相对缓和）。根据这一法案，连同在大西洋的潜艇战以及整条战线的军备扩充，事实上已经意味着美国参战了，因此不可能像布莱希特所预想的那样，对这个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乌依》因此也被宣告完结，在布莱希特有生之年没有被搬上舞台。战后布氏缩短了戏剧题目，剧作原名《阿尔吐·乌依的有限发迹》，后来题目中的定语被一笔划去。

此外，还要赶快向美国专家求助。其中最重要的是费迪南德·赖雅。1939年赖雅翻译了《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但起初并无人问津。两人尝试共同创作一个电影故事《面包大王学烤面包》（*Der Brotkönig lernt Brotbacken*），英语片名为《大王的面包》（*The King's Bread*），这是乔·弗莱施哈克故事的无聊改编，创作这一故事的动因是布莱希特怀念他原本晚间经常食用的黄油面包片。布氏笔下的这个农民家庭在美国大都市中处处碰壁，妻子想到了这个主意，教面包大王烤面包。在布莱希特的原版中：“居无定所之人不懂饮

食。他们必须学习土地能带来什么。他们不需要真正的面包，因为这样的面包不能切片，他们需要的必定是面包片，可以走着或者站着很快吃掉。他们确实是居无定所之人。换工作像换靴子一样，建造房屋也只打算二十年，而且还住不满这个期限，他们的故乡并不在当地。”这个故事用英语写成，（几乎）是一篇完整的小说（电影脚本），但同布莱希特与赖雅，或者同其他人一如罗伯特·索伦（Robert Thoeren）和萨尔卡·菲尔特一的许多电影构思一样，虽有彼得·洛（Peter Lorre）、弗里茨·考特纳、奥斯卡·霍莫尔卡（Oskar Homolka）等人的关系，在好莱坞仍毫无希望。

下面的例子暗示了两人无法合作：“我同德国演员、节目主持人罗伯特·索伦共同加工一则电影素材。极好的环境，极好的方法！他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公司米高梅旗下工作室的作家。索伦有一座豪华的别墅，还有一间可供休息的养鸡场。”索伦“不停地夸夸其谈，毫无计划可言，认真地避免所有的思考（主人公面临以下可能性：他可以掌掴自己的母亲，或者让她怀孕，或者因为金钱而求她，或者不得不忍受她，或者为她而冒生命危险。他很老练地选择了第一种……）”，因为好莱坞明星关注的只有“提高报酬”。这样已经十分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布莱希特会尽可能地避而远之，不可能形成任何有成效的合作。但仍有一些以《百慕大困扰》（*Bermuda Troubles*）为题的草稿，据露特·贝尔劳回忆，她也大量参与了其中的工作。但这个故事十分混乱，而且寥寥数页也显得这并非诚意之作。

此外还有保罗·锡纳（Paul Czinner）。锡纳自1940年同妻子伊丽莎白·贝尔格纳（Elisabeth Bergner）流亡美国，主要在百老汇工作，根据《工作笔记》1942年4月11日的记录，锡纳1941年底向布莱希特讲述了“一个电影的开篇（故事由催眠术而起），并问我是否愿意为之构想后续情节”。布氏表示愿意，并据称同锡纳和贝尔格纳共同

工作了数周，直至故事完成。“据贝尔格纳称，她向几个美国人讲述了这个故事，以听取意见”，但又很快对此失去了兴趣，忙于其他工作。“现在贝尔格纳又跟我说，我的电影被别人卖掉了，此人是怀尔德（Wilder）的朋友（怀尔德原本要和锡纳一起拍摄布莱希特的电影），卖掉的内容包括情节和一切细节，只是故事环境不同——不再以催眠术开篇。价格是35000美元。”但对此布莱希特无计可施，作为一个从敌国来的外国人，没有法律途径可以制裁这样的盗窃行为。这个电影的故事和一些粗略场景只以《实验》（*Das Experiment*）为题被记载下来。

另一事件则有关对电影构思和电影素材的大量购买，但这些又并非为了拍摄。这是好莱坞的实践经验，如此一来可以日后任意使用这些商品，“这好比一名面包师用他购买的烘焙用品烤面包：他可以根据对工具的不同理解烤制好面包或坏面包，或者瑞典制法的酥皮面包”。布莱希特1949年回到德国之后向再次相遇的友人汉斯·托姆布洛克讲述在好莱坞的经历。要处理原始资料这一点对托姆布洛克而言明白易懂，但他不能理解的是另一个事实，即布氏在美国卖出的其他一些电影材料，它们都封存在制片人的抽屉里，像烘焙材料一样毫无用武之地。托姆布洛克问：“但他们又为何买你的东西呢，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回答：“他们拥有这些，原则上仅仅为了使其他公司无法购得。这些商品或许某天还能被别人用到，那样还能卖出高于购买价的好价钱。”但从这次交谈可以推断，布莱希特凭借向电影工业出卖不会被拍摄的电影剧本，赚取了足够生存度日的钱。

布莱希特一家在加州也并非茕茕孑立。很多德国流亡者都聚集在加州，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不高，而且四季如春，不需要花费取暖的费用，也不需要太多衣服——人们几乎穿睡衣就够了（布莱希特有时也给人这种印象），由于有廉价超市，食品的花费也很低。而且处境好的流亡者也热情好客，经常邀请像布莱希特一家这样资产较少的人来

做客，他们1941~1942年的新年夜同福伊希特万格夫妇和亚历山大·格拉纳赫在锡纳家度过，1942~1943年也同艾斯勒夫妇、索伦夫妇、菲尔特夫妇在考特纳家跨年。

福伊希特万格夫妇在圣莫尼卡购买了一座墨西哥风格的大房子，也懂得利用这一优势在自己周围组建了德国流亡者的思想中心。从慕尼黑时期开始，玛塔·福伊希特万格在很多地方都是出色的女主人，而利翁则坐拥其他流亡者都不可比拟的万贯家财（即使托马斯·曼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准）。当布莱希特与福伊希特万格相遇，两人的交锋虽然并无敌意，但也着实激烈。两人争执的中心问题是希特勒是否德国工业的傀儡，仅仅扮演着独裁者的角色；是否如福伊希特万格所坚信的，最终是历史记录者把这名傀儡般的小人物塑造成了历史的制造者。福伊希特万格向《科里尔周刊》（*Collier's*）投稿相关文章，但被作为“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遭到拒绝。“他把希特勒描述为微不足道之人，仅仅是德国国防军无价值的传声筒，一名扮演元首的演员，等等。简而言之，希特勒并非什么‘人物’。”布莱希特评论道，此处完全不可理解，“美国已经花费了400亿来除掉这个人，他如何能微不足道？”当时正值1941年11月，珍珠港事件还没有被载入史册。布氏和福伊希特万格的争论还在继续。1942年2月，福伊希特万格夫妇受邀到布莱希特家用晚餐，两人重新回到了这个问题，是否希特勒“仅仅是国防军雇来的无足轻重的戏子”。福伊希特万格指出了“元首”本质的一点，他在公共场合的出现，他用一切神态和停顿细心准备的演讲，演讲中渐渐上升的音量以及那些程式化重复的仪式性风格，这些对于福伊希特万格这样远处的观察者而言确实与表演类似。从莱妮·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为国社党拍摄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 1934）和电视里录播的《新闻周报》（*Wochenschau*）中都可以看出，希特勒绝对练习过自己的出场方式，但并非在表演，而是愈加透彻地深入他的角色，直至最

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完全透支，必须由保镖阻隔那些欢呼的人群，因为他在完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无法见人。

福伊希特万格坦率拒绝去关注这位自命的、遵循所谓“天意”的引诱者，这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理解，特别是在那个持久战争已经日渐显露的时期。但布莱希特不愿附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讨论的这个人，直至战争爆发前，都用罪恶但后又合法化的手段，成功地把法国人和英国人拉到了外交谈判桌上，联合了奥地利，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同时也平息了美国的干预，因为美国人也不愿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后再次陷入世界大战。此外，希特勒懂得向德国重工业承诺商业繁荣，还用虚假的诺言将右翼保守主义力量争取到自己一方，因此才被“荣称”为国家元首。

这次争论没有给两人的友谊蒙上阴影，凭借对此事的印象，布莱希特1942年4月写作了《我最无法遗忘的人物》（*My most unforgettable Character*）。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视角虚构了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1922年在慕尼黑一家高档咖啡馆与“某位阿道夫·希特勒”相遇，“一个长相平平的男人，前额头发丑陋地脱落，面色不健康，仪态粗俗”，此人就坐在邻桌。布莱希特和福伊希特万格同其他文人和戏剧界人物在这一高档场所聚会，发觉了这位当地知名的宣传鼓动者，他经常发表反犹演讲。布莱希特一行人中有人曾听闻，希特勒在慕尼黑皇家演员弗里茨·巴瑟尔（Fritz Basil）处进行每小时8马克的学习，大家无视邻桌人能够听到的可能性，对其进行了嘲弄。当布莱希特一行人起身离开时，福伊希特万格伸手拿自己的大衣，希特勒从座位上跳起来，自觉地帮这位《犹太人苏斯》（*Jud Süß*）的作者穿上。

布莱希特知晓希特勒1920年代初期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常十分笨拙、拘束，面对知名人士低声下气。直至1922年，希特勒糟糕的穿着

和谈吐都令人侧目，他畏惧慕尼黑社会的轻视，在啤酒馆或者其他聚会场合半公开的演讲也大多被视为异类。1920年代的演讲，以及之后的部分演讲，在内容上（战争责任问题、支付战争赔款、经济危机）和修辞上（开篇令人乏味地介绍政党历史，演讲第二部分主要诉诸情感，频繁使用数据和外来词，等等）都遵循同一个模式。后期，希特勒也仅仅有限制地摒弃了自己在着装、举止和演讲方式上的特点，更多的使它们显得具有教养，也因此受到了“上流社会”和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对希特勒众说纷纭的评价还在继续，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同福伊希特万格的谈话。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袭击非常突然和血腥，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看似被大规模挫败。美国人民断然表示赞成和支持美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布莱希特通过弗里茨·考特纳之子在12月8日获得了消息：“当我们打开收音机，一切都明了了，我们再次回到了‘这个世界上’。一个泱泱大国起身，在半梦半醒之间走向战争。街头，汽车司机们以一种特殊的姿势蹲着听收音机。考特纳在药店看到一名青年士兵，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他认为是一种护身符，其实是身份名牌），挂在脖子上，微笑着同人交谈。在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加入战争的这几天，希特勒察觉到，俄罗斯的冬天真冷。”

同一天，报纸号外刊登了美国对日宣战的消息，布莱希特把标题页贴到了自己的《工作笔记》中；英国随即加入。当月11日，同日本结盟的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1942年1月1日，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Erklär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其中包括“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以及从印度到南美直至澳大利亚的半个地球，这也构成了日后联合国的雏形。为了人类的生命、自由、独立，为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为了人权和平等，必须“彻底消除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后来选用的规范语言是“无条件投

降”。宣言展现了美国和英国坚定的意志，同时也得到了其他24国的赞同，用武装手段结束战争，将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永远扼杀。1943年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重申了战争目的：“彻底摧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能力与无条件接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同样重要。这绝非意味着要灭绝那里的人民，但定要根除这些国家建立在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布莱希特立即作出了回应，同其他人一具体哪些人没有被记载一撰写了两页的宣言，包括8点。他们提出了以在“德国内部孤立纳粹和军国主义者”为目的的建议，由于26国宣言在世界范围上孤立了纳粹德国，这一行为必须推进到德国内部。“签署者全部来自德国，考虑到德国由于军事失败和愈发严重的经济枯竭，因抵抗骗子政权而长期完全受到压制的反对党代表了民众的大多数阶层，定会再次赢得势力。”

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发表（原因不明）。作为替代，海因里希·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布莱希特1942年2月9日以电报的形式向德国人民发出了呼吁，纽约报纸《洲际新闻》（*Intercontinent News*）在3月19日刊登了这篇电报。这是一则“求救信号，为了所有的人，也为了你们，德国人！你们把世界和自己都拖入了无限的不幸之中。很快将再也无法挽回，除非你们结束这一切。/只有你们可以终结这次最危险、最无意义的战争。/……战胜你们的元首吧，他使你们负担了仇恨和耻辱，将你们引入毁灭。”这是在1942年初；战争还要持续三年有余，而且已经超越了以往任何战争的规模。

从电影工业中或许能够有所斩获

如果能开一间都是老女人的妓院

人质电影：尽管困难重重，仍要坚持到底

美国的参战对这些来自敌国的外国人意味着危险；美国官员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拘留了流亡美国的日本人，由于日本袭击美国是绝对野心勃勃的，所以也不需对这些人表示同情。德国流亡者也可能同样被集体拘捕，但由于德国流亡人员在美国参战后——其实早已在1941年2月的《租借法案》后——便首先被视为希特勒的反对者，因此他们没有被打扰。但这并不说明大家是安全的，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首脑的人物，例如布莱希特、汉斯和格尔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兄弟，以及所有曼氏家族的成员，包括拒绝成为联邦调查局线人的埃里卡·曼和同性恋的克劳斯·曼，甚至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也包括在内；联邦调查局监视他们，并寻找原由将其定罪，从而可以实施拘禁。

诗歌《关于移民的称呼》（*Über die Bezeichnung Emigranten*）就足以让联邦调查局怀疑布莱希特的可靠性，诗歌开篇如下：

我总认为人们给我们的称呼是错误的：移民。

这意味着移居国外的人。

但我们

并非出于自由的决定移居国外

选择另一个国家。

我们迁入一个国家，并非为了，或许，永远留下。

我们在逃亡。

我们被驱逐、被流放。

那个接纳我们的国家，不是家园，而是流亡地。

联邦调查局认为诗歌的作者视自身为非移民，因而在美国感到不适。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自我理解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怀疑他们

不愿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进而有可能从事反美活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原话是：“美国告诉那些人（流亡者），你们必须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这涉及所有无耻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或者无论他们自己作何称呼。”由于布莱希特被归为共产党员，那么肯定具有所谓无耻的意识形态，因而也尤其危险。

根据布莱希特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他1941年12月8日曾在洛杉矶申请美国国籍。此举目的何在没有得到解释。这是布莱希特讨好美国当局、洗刷在联邦调查局嫌疑的计策？或者他确实想得到美国国籍？那么这很可能意味着布氏将被征兵入伍，与自己的同胞作战。

1942年5月27日上午，捷克抵抗组织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党卫军副总指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布拉格屠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36]投掷了手榴弹，使其重伤。虽然在几次手术之后有了存活的可能，但海德里希还是于6月4日死于伤口感染。刺客在圣赛利尔（St. Cyril）主教的帮助下，起初成功地藏身在教堂内。纳粹开始疯狂地寻找刺客，并启用了《紧急军事管制法》。与其他一些情况类似，纳粹也关押了人质，逼迫交出作案者，并在海德里希死后肆意枪杀布拉格居民，随后变本加厉。布拉格一个村落的所有成年男性全部被枪决，妇女则被送进集中营，利迪策村（Lidice）遭到完全摧毁。

刺杀的消息在全球甚嚣尘上，布莱希特也于当天通过《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晨版获悉。次日他已经开始同弗里茨·朗“在海边构思一部人质电影”（以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处决为题），当时还没有确认莱因哈德的死亡，因此他死亡所引发的残酷后果也没有完全显现。显然对布莱希特而言，扣押人质事件必须从头开始调查。在布拉格扣留捷克市民作为人质构成了电影的中心：要么立即交出刺客，要么除掉这437名人质，这个数字是作者们为电影制定的。由

于人质中有一些人知道刺客的身份，因此电影的情节围绕“1对437”的生存威胁展开。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了杀死“布拉格屠夫”而使437条人命陷入危险，这合理吗？是否可以由这次事件推而广之，尽管会引发任何可能的可怕后果，但电影仍为起义而辩护，这或许能为一切受压迫者点燃起义的烽火。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没有喜剧结局。但喜剧结局在好莱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义务。这样一部反映不可调和矛盾并影射其多重意义的电影能通过吗？

弗里茨·朗立即研究了布莱希特的想法，但日后又再三强调这些都是自己的创意，两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制定了电影的“大纲”，即电影情节发展的梗概，不过只是大体上遵循事实，其中的细节就连两位作者也尚未知晓。这一电影方案开始实施，1942年7月14日，朗和布莱希特签署了一份“同意书”，其中朗将布莱希特规定为自己的“雇员”，自己享有电影故事的一切权利。合同双方同意将布莱希特为电影所作的所有贡献在法律上规定为朗个人所有。布氏这样的机灵鬼从没有签署过如此不利的合同，他已经习惯了总为自己争取最佳条件。但这也说明布氏受生活所迫，而且好莱坞的商业惯例同他在魏玛共和国所习惯的也大相径庭。

布莱希特开始工作，起初是与弗里茨·朗一道。1942年6月29日，布氏记录道：“同习惯上一样，我每天从早9点到晚7点同弗里茨·朗一同创作一个人质的故事。”7月初，已经完成了长达100页的德文版文学脚本，汉斯·菲尔特（Hans Viertel）—萨尔卡和贝特霍尔德·菲尔特的儿子将其翻译为英文，7月16日在电影编剧协会（Screen Writers Guild）以《永不投降》（*Never Surrender*）为题被登记在册。剧本篇幅95页（由于翻译而相应地有所缩短），作者署名为朗和布莱希特。

布莱希特7月20日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为了糊口，全部时间都和朗一起写的那个人质的故事。为此我应该得到5000美元，此外还有支付后续性工作的3000美元。”这只能意味着，两人早已打算将文学脚本中的对话扩充为最终的分镜头剧本。虽然两人的英语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但可能也不足以充分表达所思所想，因此朗雇了一名“母语者”，转而把布莱希特安排到“好莱坞拉斯帕尔玛斯街艺术家联合办公室（office von United Artists in Lapalmasstreet in Hollywood）”。这位可怜的人在那里遇到的不仅有“配有几个女秘书的炎热办公室”，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此人的任务是在语言上根据好莱坞的规则对布莱希特的文章进行润色：“约翰·韦克斯利（John Wexley），他每月收入1500美元，人十分左倾和正派。”这是布莱希特起初对他的评价。韦克斯利1907年生人，在好莱坞是知名的电影剧本作家，曾是共产党员。对这次“随意的”，事实上是“强压”在他身上的工作，布莱希特记录道：“首先我和他讨论了一组连续的镜头，他用英语口语述给女秘书。她复印了四份，当我想要一份时，他开始编造一些幼稚的托词。纸张的页眉上悍然写着约翰·韦克斯利的名字和日期。”

1942年8月5日，一部世界级电影的版权之争开始了，这也导致了布莱希特在电影剧本上的贡献被忽视，这部电影也被从他的作品表中删除。在电影成品中，布莱希特仅仅同弗里茨·朗一起被列为原始故事的作者；分镜头剧本作者是约翰·韦克斯利，虽然布莱希特在他的《工作笔记》中很好地记录了自己的原创思想和协助作用，而且弗里茨·朗的陈述也证实，90%的剧本都源自布莱希特。最终，在弗里茨·朗的遗物中发现了绝对证实布莱希特和朗是著者的材料和剧本时，情况才得以改变。

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从合作的第一天，就开始为每一页文稿而斗争。布莱希特曾讲述，韦克斯利因为一个场景而需要德语的翻

译稿，布莱希特就把稿件给了他。随后韦克斯利四处打电话说：“我如果拿走了他需要的稿子，他没法子继续工作。事实证明，这点诡计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虽然从这些评论中能推测出不信任之感，但布莱希特从当时直至10月中旬都同韦克斯利一同撰写剧本，当然大多数时间是在圣莫尼卡26号街的新居。布莱希特对合作仍表示满意，他致信卡尔·柯尔施：“最初来到这里时，我囊中羞涩，现在可以赚些钱了，我正同弗里茨·朗一起创作剧本（我不知道最终在大屏幕上效果如何，但至少剧本看起来不赖）。”

但布莱希特完全没有识破韦克斯利的打算，他想确立自己作为独立作者的地位，因而不断攫取整篇文章，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在策划一场骗局。当布莱希特1943年1月在电影上映前夕得知片头字幕中并没有把自己列为剧本作者时，他向电影编剧协会提出控诉，要求索回自己的份额。在仲裁法庭前，弗里茨·朗和为电影作曲的汉斯·艾斯勒都为布莱希特作证。但韦克斯利作足了准备。他向法庭呈交了“自己的”文稿，从而提供了证实自己著作权的证据。法庭根本没有继续进行调查，也确信，同一名不久会离开这个国家的流亡者相比，判定韦克斯利为著者意义更大。唯一令布莱希特能得到些许安慰的是，当韦克斯利要求并最终得到了更高的报酬后，布氏事实上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份额，大约为10000美元甚至更高，而且还有特别稿酬。如此一来，日常糊口的花销至少有了保障。

对布莱希特而言，这部电影首先是为了展现无论进行怎样的血腥镇压，也不能遏止人民的反抗。他这次针对的并非工人阶级，而是人民大众，因此还想将这部人质电影命名为《相信人民》（*Vertraut dem Volke*）。刺杀最残暴的纳粹分子就已经证实，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力量。这就是希望。

电影的情节推动以布莱希特的戏剧为基础，戏剧有双重立足点，为了塑造闪光的、难以理解的角色而拒绝设定人物性格。对当时的好莱坞习惯而言，电影由于另类而轰动一时。因为在好莱坞，通常会规矩地叙述电影故事，并通过人物特点和角色设定较为明确地标示人物善恶，对此并不会投入太多心思。汉斯·海因里希·冯·特瓦多夫斯基（Hans Heinrich von Twardowsky）十分老练地饰演了恶棍海德里希，但亚历山大·格拉纳赫饰演的盖世太保警官却较为人性化：他贪婪地狼吞虎咽吃饭，酗酒，沉溺于性爱，喜欢开玩笑，展现了淘气的幽默感。因此这个人物的矛盾引发了争议，无论是观众还是评论家都不清楚他们对此应如何理解。

但电影的整个情节更具有挑战性。反抗的“胜利”并非出于英雄主义的献身，也不是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道德“启蒙”，遵循“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殃及他人”的箴言；在这部电影中，胜利是源自处心积虑的两面派把戏。反抗小组想出了这个方案，为了在紧迫之下找到作案人，并将其移交盖世太保，从而救出人质，他们需要一个恶棍来顶罪，因而利用了反抗小组中一名富有的啤酒酿造者，他已经被证实是为盖世太保服务的双重间谍，但其本人没有觉察自己已经暴露。这样，反抗小组成员就可以利用两面派把戏和圈套编织一张颇具风险的谎言之网，变节者被这张网越捆越紧，直至他就是刺客的嫌疑似乎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张无形的网也使盖世太保最终采取行动。而完全不知情的牺牲品惊慌逃跑，在途中被击毙。整个事件也得到了平息。

但盖世太保仍然怀疑，他们是否处决了真正的刺客，因而开始了深入的调查，电影没有展现调查过程，但展现了调查结果，而且结果明确断定，处决之人并非刺客。结果没有公布，新任“帝国保护官”达鲁格（Daluge）往柏林向“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寄送了大量加密文件，并在附函中写道：“人民受到最严酷的暴力措施后仍拒绝移

交真正的刺客，面对这一事实，为了维护德国占领军的最高权威，我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事件也以此最终了结。就此，布莱希特和朗也为电影找到了一个折中的结局。^[37]

凭借此片，布莱希特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中至少部分地贯彻了自己魏玛时代的戏剧革新，并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最终他对电影轻蔑的评价使得他的名字同这部经典电影的联系仅仅是边缘化的，这部惊悚片在某种程度上难掩其好莱坞制造的来源；同样也使得传言几十年都流传不破，布氏在好莱坞一败涂地。

野兽之美，更高意义上的无罪，

不应问询自然

《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战争报道忽视自然和人类

5月28日，《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所谓的“美国首演”通过自由德意志文学与艺术论坛（Tribüne für Frei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nst）在纽约友好俱乐部（New Yorker Fraternal Clubhouse）举行。该剧由贝特霍尔德·菲尔特执导，戏剧的上演也是布莱希特在美国流亡期间第一次作为戏剧家被介绍给观众，当然仅限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流亡者。演出十分成功，而且加演了一场，随即被加入到了拯救流亡者的义演系列中。菲尔特评论道：“美国参战的第一年，流亡者在纽约组织了‘论坛’演出，这从多个方面看，在戏剧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令人满心愉悦。

同样令人欣喜的是布莱希特1942年8月12日搬进了圣莫尼卡26号街的一所房子，在此居住到1947年10月16日，即美国流亡时期的终结。

“这所房子是最古旧的之一，大约有三十年的历史，一座加利福尼亚的木屋，墙面是粉刷过的，第二层有四间卧室。我有一间长长的工作

室（近7米），我们立即把它粉刷成白色，配备了四张桌子。花园里是一些古树（胡椒树和无花果树）。房租每月60美元，比25号街贵了12美元50美分。”稍后他又记录道：“房子很美。花园里又可以读卢克莱修（Lukrez）^[38]了。”这意义重大，因为对布莱希特而言，在美国的“与世隔绝”似乎已经令自己的创作同古风时期的传统相结合变得不为可能。布莱希特还打算将露特·贝尔劳至少在夜间（偷偷地）接来自己身边，但此事也不了了之：1942年5月，贝尔劳前往纽约，试图在那里将布莱希特同他的家庭分开。

电影由于结局不尽如人意，遭到了审查的介入，虽然经过弗里茨·朗的游说，《刽子手之死》的损失并不严重，但对美国秘密警察而言，布莱希特从一开始就被确认为一名企图颠覆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国家的诗人，而且采用的是最刁奸的手段：阴谋破坏。《斯文德堡诗集》的《年代记》（*Chroniken*）中有首诗，名为《被全体水手拆除的奥斯卡瓦船》（*Abbau des Schiffes Oskawa durch die Mannschaft*），它成了上述罪名的证据。洛杉矶大区特工R. B. 胡德（R. B. Hood，当地部门负责人）1943年4月16日制作了一份备忘录，想以此说服“清剿行动长官”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此人在布莱希特的众多事宜上还将扮演重要角色），布莱希特是一名危险人物，应该尽快对其实施拘禁。胡德写道：这位先生是共产党的御用诗人，他的诗歌不仅为建设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宣传，还提供了如何阴谋破坏美国财富的指导说明。这首诗展示了一次特殊事件，美国蒸汽船由于支付的酬劳过少，被自己的船员占领而毁灭。对整个事件的描写甚至可以被投射到美国的国家层面。而且符号也相符，因为船只经常被用来充当美国的国家象征。

更奇怪的是，这首诗和其他一些文学“证据”当时在美国完全不为人知，因为这些文本仅存在于联邦调查局，因此可以说，直至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 1947) 湊集大量文稿为止，联邦调查局享有首次翻译布莱希特诗歌的“功绩”（当然翻译水平低劣），并在其中发现了企图对美国人民实施共产主义颠覆的隐秘内容。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布莱希特这首被指控的诗歌恰恰以美国历史上的一则真实故事为题材。布氏最迟于1920年代已经认识到，不再是欧洲，而是美国将承担起资本主义的事业，1935年他就让海伦娜·魏格尔购买了美国文学中有关阶级斗争的经典著作：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的《炸药—美国阶级暴力的故事》（*Dynamite: The Story of Class Violence in America*, 纽约：1931）。阿达米克在书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1922年亲身经历的故事，一群杂乱的水手酗酒、斗殴，在没有任何导航知识的情况下，开始拆卸一艘带有鲜肉冷藏设备的昂贵船只，最终只留了一堆废铁给公司的持有人，但并没有给美国联邦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布莱希特的诗句都加了双引号，用以清晰表明，这些是虚构的“目击者”阿达米克所说。

布莱希特最重要的文学革新之一自然还有自流亡丹麦便开始书写的《工作笔记》，起始时间是1938年7月20日。同日记和随笔不同，《工作笔记》毫无例外用打字机写成，除了标题外全部使用小写，采用散页的纸张，收集整理在文件夹中，并非完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但每张记录都标有日期。笔记的标题页上记录了流亡地和时间跨度，包括了布莱希特历经的各个流亡地：丹麦（1938年7月20日至1939年3月15日），瑞典（1939年4月24日至1940年2月10日），芬兰（1940年4月17日至1941年5月31日），美国（1941年7月21日至1947年11月5日），以及回国途中的瑞士（1947年12月16日至1948年10月20日）和最终回到柏林（1948年10月22日至1955年7月18日）。

在丹麦的《工作笔记》中，布莱希特粘贴了一些个别的（私人）照片，其数量在瑞典也不断提升，在芬兰和美国的笔记中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些附件中的照片不再是插图，而是对时事的记录，虽然

并非每每，但经常与布氏的作品形成联系。在1940年10月15日芬兰的《工作笔记》中，有两张从报纸上剪裁下来的照片，照片上希特勒（在一个德国家庭）的餐桌上享用菜肴，另一张是他在街头与一名女士握手致意。在粘贴的照片下有一首诗，为四行诗节，交替韵，五步抑扬格。这一诗歌形式源自古风时期的箴言诗，布莱希特的儿子施特凡1940年向父亲赠送了奥古斯特·厄勒尔（August Oehler）翻译的《墨勒阿格罗斯的花环》（*Kranz des Meleagros*），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希腊箴言诗，由公元前1世纪的讽刺作家、箴言诗诗人墨勒阿格罗斯·冯·戈达拉（Meleagros von Gadara）所作，布莱希特从中也受到了启发。

古风时期的箴言诗大多出现于圣职典礼、墓地、神首柱和花瓶上，即同一定的客体相联系，在翻译成德语后似乎失去了根基。布莱希特1940年8月28日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古希腊的箴言诗中，人造日用品毫无顾忌地成为诗歌的对象，武器也同样。猎人和战士把土地献给了神。无论箭射穿了人还是山鸡的胸膛，这没有区别。在我们的时代，道德顾虑尤其阻碍了那些咏物诗的出现。飞机之美有些可憎。”布莱希特此为何意？他从画报中剪下照片并粘贴，在《工作笔记》中把厄勒尔的翻译同这些当代战争照片组合起来。“弯弓与箭筒/射出来如此之多的死亡之箭”和“你这乌木而制的矛，立于此/你这杀戮的凶手”，布氏以上述内容同两张表现现代武器的照片形成对照。

这看似偶然的蒙太奇构成日后被称为“照片箴言诗（Fotoepigramm）”（《工作笔记》，1944年6月20日）的雏形。这一手法的发明要早于概念。正如这一新体裁的起源，重要的是文本和图像完全不协调。弯弓同战斗机的驾驶舱有何联系？矛又同炮弹有何关联？虽然同样都是致命武器，但其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曾经面对面的战斗（也具有致命的效果）被无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取代，不再需要任何勇气和人力的投入，其致命性作用如今被转让于机械，甚至不会被轰

战机的操纵者所察觉。这使飞机之美变得可憎。那些对现代照片一无所知的古风时期的诗句，并非对照片作出阐释，而是要求读者去认识纵跨两千年历史的差距，并从中得出结论。同时，这些照片也得到了它们本身无法传达的含义，而如果想看透诗句、照片和两者不寻常的组合，那么读者必须更具主动性，这同剧院里的活跃观众类似；与“技术化（Technifizierung）”类似，布莱希特谈到了“活跃化（Aktivisierung）”。

布莱希特的照片（即使能够如此）也并非描摹战事，更多的是引用对真实战事进行加工的画报，这些画报宣称描写现实，但事实上，根据意图、党派的不同，不过是媒体虚构的战争报道，其中的照片或是插图，或是为报道提供的证明，也就是说其原本需要纪实性的特质，但其实并不具有。照片箴言诗具备多媒体的传播性，至今人们才隐约意识到其塑造事实的各种可能性，但布莱希特1944~1945年就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世纪之作：《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此书1955年才得以出版。

最终的成书包括69首照片箴言诗，它不仅采用了文本和图像蒙太奇的组合方式，而且每首诗都有对开的两页，这使其关联性更加复杂。左侧一页是白色的，或是空白，或是印制了照片及其签名（如果有），大多数都是译文，因为是采自国外的画报，照片还经常包括一些其他配文，例如第四十二首诗，其中的照片还复制了《生活》

（LIFE）杂志的题目、年号和刊号。全书都呈黑白色，书名页用简单的黑白线条表明，这些照片箴言诗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象征内涵。每首箴言诗包括白色的左侧页和黑色的右侧页，两者间的对比有众多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左侧是和平、无罪、纯净，右侧是死亡、悲伤、无望，此外还有看似十分表面的含义：和平的（白色）一侧空无一物，或者仅仅寥寥数语，而右侧页面却或多或少地被填满，涂炭生灵的战争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而且从中可以推断出书中没有明言

的结论，人类的历史是战争的历史，和平其实从未真正到来，或者用大胆妈妈的话来说，不过是在战争的持续中喘口气，“和平”这一称谓名不副实。“你知道，一切最终仍是艰难。”

例如：第三首诗在白色的左侧页面上只有标题《西班牙1936》（Spanien 1936），而黑色的边框几乎填满了右侧的整个页面，因为照片本身很小，而且大面积地使用了黑色。照片上一名女性身着并不好看的针织或者钩织泳衣，头部位于照片的一角，但截掉了一部分，只能看到脸，她惊异地看着自己的手和脚掌，其中一只脚搭在右腿的膝盖上。手掌和脚掌都被染成了黑色。从背景中能看到这名女性是坐在海边的石头海岸上，因为能辨认出海水和浪花。箴言诗写道：

在西班牙的海岸，女人们
从海岸峭壁间出浴而来
发现手臂和胸部上黑色的油渍：
沉没船只最后的印记。

文本的大部分内容照片上都看不到。照片上的女性并非从浴场走出来，而是坐在海岸上，油渍覆盖的并非胳膊和胸部，而是手掌和脚掌，船只也毫无踪迹。那么问题是，为何文本和图像之间有如此出入呢？

首先，语言高雅：这名女性所谓自“海中出浴”，这一短语如果替换为日常语言，不应用“从水中走出来”，而应该说她“优雅地结束了沐浴”（浴室也无从可见）。手臂和胸部暗示着裸露，有女性性感之美的隐含意义，但照片并没有兑现这层隐义。女人的胸部并不诱人，而且被丑陋的泳衣遮盖，手臂只描绘了一只，在肩部被切断了，另一只手臂只能看到手。

“出浴而来”与“海上升起的维纳斯（Venus Anadyomene）”是类似表达的词组；维纳斯或是腿部站在海中，或者在海面上飞升，根据描绘的不同有的有贝壳，有的没有。维纳斯自然是全身裸露，发丝缠绕，突出了美丽、性感的胸部和诱人的下体，因为她是爱之女神，在海中浪花里出生，为了性爱之情而生。照片的6英寸版式采用了当时对观淫癖的表现方式，男人们流着口水透过锁孔呆视，裸体的女人让他们血脉贲张。这些在书中的照片上都没有。

文本所建构的关联性为照片添加了广泛的维度。此处仍然是与古风时期的对比以突出差异性，女神诞生于人迹未至的自然中，因为她源自自然，这与1936年西班牙的自然形成了对比，这里的法西斯在纳粹的支持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着演习。任何历史学的战争报道中都没有提到战争对自然与地貌的破坏。如果观看关于历史战争的电影，这一电影类型仅对战争数据感兴趣。战争报道（同样也包括图像记录）的话语显然仅仅是从战术策略层面讨论自然与地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根本熟视无睹。即使战争报道提到破坏，也仅仅是那些断壁残垣的城市，例如对鹿特丹老城的破坏，城市的废墟反而被希特勒煞有介事地列入了“文化保护”计划。《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的第七首诗仅仅展现了海洋，这片海域掩盖了“威瑟堡行动（Fall Weserübung）”^[39]中死亡士兵的尸体。正如前文中的第三首诗，虽然内容完全不同，但这里的照片也清晰地表现了在美好的表象下早已掩藏了现代技术战争的毁灭性力量。

《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是布莱希特责问纳粹血腥战争罪行的又一尝试。媒体为了蛊惑大众而歪曲事实，对此，必须进行揭露，而且必须通过文学的技术化创造新的表现方式。纳粹阴险的宣传像往常一样维持了巨型的战争机器，文学新的表现方式使其在美学上能够得到展现，从而也有了与之斗争的可能。或者用露特·贝尔劳在前言中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用血腥的方式小心维护了大众对社会现状的无

知，这使本书上千幅照片成了象形文字一般难以理解的插图，让不知情的读者们无法解读。”

天堂与地狱/可以融于一城

艺术卖淫：

毁灭了个人的自由

布莱希特不仅与好莱坞电影工业保持距离，对其深恶痛绝，甚至还将这份厌恶发展成了攻击性。美国不再是希望之邦，具有无尽的可能性，对于左翼或者具有社会批判性意识的艺术家来说，由于苏联无法成为流亡地，美国成了最后的得救机会，是流亡的终点站。例如卡尔·楚克迈尔就看到了“一个被标准化了的失去了想象力的国家，充斥着乏味的物质主义和毫无精神可言的机械化”，还有味同嚼蜡的食物，连像样的面包也没有，在心灵上和情爱上都十分冷漠，给楚克迈尔这样一个充满性欲望的人带来了无尽的失望。此外，构成潜在市场的700万说德语的同胞大多数来自加利福尼亚地区世代居住于此的移民，他们的美学品味仍停留在19世纪的故土小说、浪漫的伤感诗歌、《凉亭》（*Gartenlaube*）^[40]杂志式的文章和家族故事上。对这些人而言，海因里希·曼、斯蒂芬·茨威格、卡尔·楚克迈尔等人无人问津。这也就意味着，要么向好莱坞妥协，要么完全隐退。但又能以何为生呢？君特·安德斯（Günter Anders）如此描述在加利福尼亚的流亡：“对过往的兴趣证实了人们对颠覆的喜好。”西奥多·W. 阿多诺却发觉流亡美国或许还有一个可取之处，“摆脱欧洲特有的晦涩和异想天开”，但代价是可能要将自己的语言和思想“搅拌在精神理念混杂糅合的酱汁中”，其中自我只能作为“多彩个性（colourful personality）的识别符号”出现。

布莱希特时常思考该如何处理自己或许仍存在的地位和市场价值：“我喜爱清晰明了，其缘由在于我不清晰的思考方式。我曾有一些独断专行，因为我急需引导。我的思想很容易迷惘，但把这些说出来不会使我感到不安，令我不安的反而是那些迷惘。当我有了一些发现，又立即会对其激烈驳斥，痛苦地对一切提出质疑，之前我会孩子气地感到高兴，至少——正如我对自己所说——我还保留了一些卑微的要求。有一些话语，例如只有吃了才知道这是不是布丁，或者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总能使我平复，直至再次陷入麻烦之中。还有那些在人与人之间突然发生的场景，事实上我把它们写下来，是因为否则我对此会没有清晰的想象。”

布莱希特这样的自我理解或许能解释他的工作方法，即用表述的过程来检验思路，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仍不断进行思考和斟酌，可以说是不断重复，不断循环。布莱希特发展了一种遗忘的艺术，它反而矛盾地一再呼唤被遗忘事物的实体，使其恰恰因此无法被忘记。布莱希特保持对已知事物的陌生感，从而不断从中得到新发现。他当时大量未曾发表的文章都并非由于流亡期间不得不面对的出版境况，或者出于对流亡环境的顾虑，而是由于文章本未完成，必须一再重新开始反思，或者不断重复准备和总结的双倍工作。汉斯·艾斯勒在同汉斯·布格的谈话中将布莱希特的思维进程描述为思维弯路：“这一思维方式的固执和 困难——弯路——对布莱希特极为重要。在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经常能得出惊人的结论，而且是十分简单的结论。”

无论如何，自4月起，汉斯·艾斯勒“这位幽默而智慧的老朋友”再次来到了布莱希特身边。艾斯勒完成了在纽约的项目，前来好莱坞寻找新的事业机遇，有希望获得洛杉矶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一个教授席位，但在1944年此事才有所成。而且布莱希特也可能是艾斯勒迁居的原因之一，因为两人又一次开始了紧密的合作。艾斯勒坚定地拒绝为情感服务的音乐，所以猛扑向布

莱希特的《施德芬诗集》。诗集中收录了布莱希特1938~1940年创作的诗歌，由玛格丽特·施德芬整理，在施德芬死后为纪念她而以“施德芬”命名，汉斯·艾斯勒也一同对其中的诗歌进行了修改。布莱希特1940年8月22日在芬兰的《工作笔记》中记录，对于这些诗歌，“箴言隽永而风趣的效果解除了抒情诗人追求抒情效果的义务，这里的表达或多或少是纲要性的，词语间的张力消失了，如果从抒情的角度观察，选词也完全不精心，因为抒情也可以是幽默的。诗人仅仅代表自己”。布莱希特将这一诗学技法称为“语言清洗

（Sprachwaschung）”，也就是说，所有的情调都消失了，语言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放弃了押韵，形式也极具张力，而内容上将自然描写与当时的战事结合起来，抒情主体或成为无名的观察者，或一同布莱希特本人接近——明确地自称“讲述主体（sprechendes Ich）”，这一主体不断同周围不得不面对的环境发生摩擦。下面是两个例子。

雾气蒙住了

街道

杨树

农庄和

大炮。

这看似是一首描写自然的诗；自然，指1940年流亡芬兰，当德国战舰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域破浪前进时，这里的自然受到了大炮的威胁。诗歌在形式上采用了严格的排比序列，这样至少需要三个诗行才能构成序列；两个太少，而再多一个又会太多。开篇诗行朴实地点出了雾气弥漫的图景，很可能是在早晨，初看是一幅自然景观。第四诗行由于“和”字同序列中其他诗行产生了差异，由于其在句末的位置反而得到了突出和强调，将其实不应该属于这一序列的内容联系起来，既同这一序列相矛盾，又在表达上具有一致性。在自然景象中能

看到战争带来的社会反常。在真正的破坏开始前，享受自然的体验已经遭到了破坏。

海峡旁的柳树上

在这春天的夜晚时常有小鸮在啼鸣。

农民们迷信

人若将不久于世

小鸮会来报信

我知道，关于那些统治者

我说了实情。我，

死亡之鸟已经不需要

再来报信了。

抒情主体明确地站了出来，面对丹麦农民的迷信，他强调了自己的信念，而且共分为三步。小鸮的啼鸣最初仅仅是被察觉，而后根据迷信想法对其进行了阐释，最终又被抒情主体评判为多余。艾斯勒也在布莱希特诗歌的页面边缘写道：“我同样也已经知道。”形式上，诗歌采用了重复和坚决的对立，而且通过两次使用否定词“不”进行了强调突出。同时，“我”在诗句中也位于句末，在句法上独立出来，在形式上也同农民的迷信予以区别。

艾斯勒的谱曲（只涉及钢琴和人声声部）在钢琴声部中加入了强烈的不和谐音，赋予了人声声部以反思性特点，以此对抒情主体的自我确信（Selbstgewissheit）提出异议。此外，艾斯勒让“我说了实情”和“农民们迷信”采用了同样的速度演唱，他还删除了“关于那些统治者”，仅仅一般性地强调了“我”的强进入，如此一来，此处文本和音乐就出现了冲突；抒情主体的孤立没有得到音乐的支持。

1942年7月26日，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艾斯勒日后被称为《好莱坞歌本》（*Hollywooder Liederbuch*）的创作：“他讲述了，这些诗歌如何在较长时间的推敲后才得到了完善。就像演出之于剧本，对我而言，他的谱曲犹如一次测试。他阅读得十分细致。最后提到的诗中，他反对‘作品’一词，当我把它换为‘诗歌’或者‘诗句’时他才满意。在诗歌《海峡边的柳树上》（*In den Weiden am Sund*）他删除了‘关于统治者’一句，他认为这首诗这样会更加纯净。我个人并不确定，这样是否会产生纯净的效果，这一点有待争论，或许诗歌会失去其历史孤立性。1940年组诗中的第三首诗题为《佛兰德之雾》（*Nebel in Flandern*），也被批评令人费解，直到我把题目改为了《佛兰德风光1940》（*Flandrische Landschaft 1940*）。”

艾斯勒需要给他的音乐带来现实基础的文本，这些文本美国当时（几乎只有）布莱希特能够创作，艾斯勒对文本的处理产生了一种丹麦、芬兰的自然美与流亡者越发无望的现实之间的分裂效果。但艾斯勒一连同布莱希特一把流亡理解为“希望的复杂工艺”。好莱坞是“公开的寂寞”之地，人们在这里百无聊赖，日复一日，或许拜访一些朋友可以打破这种状态，例如去考特纳家、福伊希特万格家、迪亚特尔家，但曼一家除外，虽然这个家庭中有海因里希、埃里卡、克劳斯、托马斯，在文学领域人才济济。

回忆往事时，在同布格的交谈中，艾斯勒把无聊厌倦比喻为伟大艺术创作的发动机。如果整日无所事事，最终除了辛苦工作之外别无选择，至少一天12个小时，而且全是白费劲？不，艾斯勒和布莱希特一致认为，或许要过二十年或者更多，或许那时候他们已经往生，但终有时日他们的艺术会迎接自己时代的到来。艾斯勒的原话为：“流亡时期最重要的灵感并非来自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或者来自真实—我希望—而且高尚的反对法西斯、支持社会主义的斗争，而是来自折磨

人的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实事求是——一名流亡者痛苦的寂寞，他一天有12个小时只能端详自己。这就是创造性的力量。”

最迟自好莱坞时期开始，哀歌（Elegie）^[41]进入了布莱希特的作品之中，而且直至他盛年早逝都起着决定性作用。艾斯勒是发起人，事已至此，那么“在好莱坞永恒春天的混沌中”哀歌又重新有了现实意义：“这里是必须写作哀歌的典型场所”，还有“我们必须创作些什么。在好莱坞并非就不受惩罚了，这些都要随之记录下来。”而艾斯勒发觉，对布莱希特而言生活也是“无所事事”：“无聊让他身体上出现了病态。”因此，布莱希特在8月和9月写了《好莱坞哀歌》（*Hollywoodelegien*），艾斯勒立即为之谱曲，他从《最后一支哀歌》（*Letzte Elegie*）开始：

四城区之上，

盘旋于九天之外，歼击机。

防御的。

贪婪和苦难的恶臭，

无法涌向它们。

四城区指组成洛杉矶市的四个城区，其中也包括布莱希特居住的圣莫尼卡以及好莱坞。在上空盘旋的歼击机也被赋予了其他意义，即作为“老大哥在注视着你”^[42]的工具被投入使用，而且并非出于宣传中所说的防卫。“防御的”构成了一个省略句，通过标点符号同诗歌首句的句法分离。监察机制一方面时时刻刻提醒民众，他们被控制，没有什么比耳畔总是充斥着飞机不停盘旋的噪音更恼人，另一方面，由于飞机高的惊人，怨气冲天的悲苦也不会被感知。

对此的诊断为：美国虽然加入了反法西斯斗争，以彻底打倒法西斯势力为目标，但完全没有准备允许本国人民享有个人和政治自由。竞争和监视使每一个个体都承担了爱国主义义务，这令意识形态上追求自由和个人发展的誓言贻笑大方，所有在美国的德国新移民几乎都感受了这一点。恰恰是这个国家，这个把“自由”和“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国家，在要求无条件的妥协和服从。利翁·福伊希特万格用他的《感染力》（*Pep*, 1924~1928）组诗，嘲笑了美国意识形态上对社会权力关系的游辞巧饰，讽刺其以总体构成国家象征，进而呼吁要相信“健康的直觉（gesunde Instinkte）”，由社会一体化替代个体性。福伊希特万格认为美国所追求的整齐划一比苏联还要恶劣，而且在诗歌《艺术》（*Kunst*）中，将为自己国旗上有多颗星而自豪的美国同只有一颗星的苏联等同起来。

1942年9月，布莱希特把自己创作的哀歌拿给奥地利作家汉斯·维格（Hans Winge）参详——这位作家当时在一家洗衣厂里做工为生。维格说：“它们就好像是从火星上写来的。”布莱希特对此如此阐释：“这一‘距离’并非作者个人所有，而是由这座城市带来的：这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有这种距离感。居住不能使一座房子成为自己的财产，这要靠支票。房主能支配这些房子，又不会总在这里居住。房子不过是车库的扩建。”

根据这一体裁的传统，哀歌一般以悲伤的情绪反思和回顾更美好的过往，以现代视角控诉过往的遗失。相反，艾斯勒和布莱希特的哀歌，目的在于至少点出时事政治中的矫饰伪行，因为已经不可能再去揭露“政治的美学化”，它已经被大肆兜售。除了被黑格尔定义为“反思性世界观察”的哀歌外，已无他法。

同时，战争在动荡中进入到第三个年头。1940年秋，英国人第一次轰炸柏林，空战就此开始（参见《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第二十二首照片箴言诗）。同盟国也开始系统性地空袭德国城市，例如1942年4月的吕贝克和5月末的科隆，9月1日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被苏联军队合围。最晚从这一时刻算起，希特勒的军队已经输掉了战争。之后继续的不过是希特勒的又一罪行，命令“他的”人民“坚持下去”，这个民族直至1945年5月几乎都无力反抗，任人宰割。

对此布莱希特的立场如何？1942年6月初，他记录道：“报纸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对战后的时光寄予了厚望。由于战争目的而得到了充分开发和按比例分配，生产展现了巨大的能力。……为了繁荣我们的工业，战争是必须的，各个国家都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成就……”事实上，所有参战国都展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承受能力。斯大林把“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杀戮嫁祸于他对匮乏和苦难已经安常习故的臣民，如此一来，他们能够愿意继续遭受非人的辛劳，仍将斯大林尊为“国父”，因为他自称保卫了苏联免受那些自称为统治者种族的奴役。相反，资本主义国家，仍继续大肆剥削劳动力，就好像战争原本不存在一样，因为商业贸易还一如既往地继续。即使德国也是如此，虽然食品短缺，破坏日益加剧。那些留在家乡的人民依然耐心地等待着承诺中“胜利的结局”。

此刻工人阶级又在哪里呢？1942年初，布莱希特开始思考，这一阶级还可能留下什么：“阶级这一概念，或许由于它是上个千年构想中的概念，如今使用起来已太过机械化。纯统计学上的德国工人阶级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但它又根深蒂固：工会和政党习惯了计算成员人数。其政治概念也失去了价值，因为它的必要前提是形成组织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即可受统治阶级调度的‘各势力的自由较量’。”此外，“阶级的经济概念”也遭到了战争经济的破坏。阶级本身还存

在，但仅仅出于没有无产阶级便无法进行战争这一事实并不能推导出结论——不会发动“不同情无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不曾有过阶级意识，更谈不上洞悉自己的处境，因而完全不能被称为无产阶级。当布莱希特之后写道，只能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自我主动性”，它将清除战争的失利；这只能推断，战争早已使概念混乱到无从辨识。布莱希特使用的这些早已过时的概念，在真实事件中也再无体现。

布莱希特陷入如此的矛盾之中，同他再次与汉斯·艾斯勒合作有关。艾斯勒——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同布莱希特一样从未成为共产党员，但执着地同共产党一样坚信无产阶级终将获得胜利。对布莱希特而言，这是老朋友的重聚，两人的合作极具创造性，而且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什么不在好莱坞这个完全不合时宜之地搞一些阶级斗争呢？艾斯勒甚至认为，他可以利用《好莱坞歌本》中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谱曲拯救“民族（Volk）”这一概念，并宣称辩证法不过是“正常的人类理解，是对立精神”：“辩证法向来是最具民族性的事物”，这并不可能，原本这里指的应该是“最具无产阶级精神的”，因而，这一时期为荷尔德林的祖国赞歌谱曲也符合现实的辩证法，此时，祖国遭到了蹂躏，而“民族”这一概念也早已沉入了纳粹意识形态的血腥沼泽。

像布莱希特一样每日受到天真信念洗礼之人，为何能对理想主义充耳不闻？他（还）不愿意接受德意志民族会坚持到那苦难的结局？此外，他还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立足之地。这一状况使布莱希特对周遭的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而世界局势和德国国内血腥的迫害却被推到了远方。1941年中期，希特勒已经命令纳粹分子建立工厂式屠杀犹太人的毒气设备，并在年底命令犹太居民从事强制劳动，由此一些德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如法本（IG Farben）、巴斯夫（BASF）或者拜耳（Bayer）。同时，德国的城市却

深陷在废墟中，魏玛市的居民甚至没有嗅到布痕瓦尔德

（Buchenwald）集中营燃烧尸体的臭气，更谈不上大屠杀。对流亡者而言，事实上（几乎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红军战胜希特勒的野蛮之军，苏联红军开始迫使苏联人民成为奴隶，进行长期的压榨。不是斯大林，而是希特勒曾在1941年划定了未来的前线。最终，对左翼知识分子而言，只有斯大林成了希望，因为他们正亲身忍受着美国的民主之苦。

布莱希特每日都面临着被拘禁的危险。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一直通过个人努力试图向司法部门告发这位作家是反美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拘禁起来。但胡佛遭到了拒绝。司法部门拒绝发布逮捕令，而且理由十分罕见：这名违法者虽然是共产主义者，但同美国政府共有一致的反法西斯立场，因而没有拘捕的缘由。这是在1943年6月26日。最迟在1943年5月，海伦娜·魏格尔发觉，联邦调查局除了通过那些在汽车里打盹的特务实施监视之外，还在布氏家的电话上安装了窃听器。为了捉弄这些密探，魏格尔和玛塔·福伊希特万格约定，有机会就在电话交谈中穿插朗读一些波兰餐谱的片段，这样窃听的人一定会认为两位女士在商定密谋。当然两人都不懂她们念了些什么，但联邦调查局或多或少会陷入恐慌，几乎无法想象这些官员能够理解其中的玩笑。

1943年8月10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迎来了他的65岁诞辰。最迟从1920年起，布莱希特多少成了德布林小说的热情读者，称赞其对时事词汇的使用，还有长久坐着辛苦工作的耐力，完成了如此的长篇巨著。流亡期间，曾经功成名就的德布林处境悲惨。他在法国战役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的书也无人问津，而且很大程度上以赊借为生。大家必须帮助他。在艾斯勒同布格谈话之后，是布莱希特，“一位出色的朋友”，一再敦促，“天啊，我们现在必须庆祝德布林的诞辰”，并且询问艾斯勒能否提供资助。艾斯勒说服了他的朋友——完全不认识

德布林的钢琴家爱德华·斯图尔曼（Eduard Steuerman）一来演奏汉斯为此特别创作的乐曲。

海伦娜·魏格尔和伊丽莎白·赖欣巴哈（Elisabeth Reichenbach）——哲学家汉斯（Hans）的妻子——共同组织了这次庆祝，安排在蒙塔纳大街（Montana Avenue）的剧场（Play House）中。由于布莱希特想为海伦娜·魏格尔至少创造一次小的登台机会，魏格尔朗读了布氏的生日祝词，并以此向德布林致以了崇高的敬意：“无论同任何人相比，我从德布林那里都获悉了更多叙事的本质。他的叙事文学，甚至他关于叙事文学的理论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戏剧，在英国、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戏剧中都能发觉他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戏剧当然也受到了我的影响。”最后一句评论对布莱希特是必须的，这是为了不贬低自己。此外，海因里希·曼、弗里茨·考特纳、彼得·洛、亚历山大·格拉纳赫和路德维希·哈特（Ludwig Hardt）也发表了讲话或表演了朗诵，这是一届十分成功的晚会，直至不和谐出现了。最终晚会的主角德布林发表了一席震惊四座的宗教讲话，其中德布林道歉，自己对纳粹的崛起也负有责任，“因为我当时没有寻求神的帮助”。显然，美国尤其活跃的传教士成功软化了德布林原本极具批判性精神的头脑。

这次事件之后，艾斯勒极为愤怒，气愤布莱希特不断纠缠他“为这样一个蠢人写音乐作品”，而且还让他可怜的朋友斯图尔曼不去海边度假，而是来这里演奏钢琴，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甚至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福伊希特万格夫妇、布兰迪娜·埃宾格尔（Blandine Ebinger）都演唱了柏林的香颂歌曲，然后就出现了那满是宗教意味的当头一棒：“那是一次悲惨事件。我听到他说，我应该寻求上帝的帮助。/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不愿在报告厅里吵嚷，但仍粗莽地离开了观众席，布莱希特向我发出‘嘘’声，但我仍离开了，并且就像人们说的，‘令人侧目’。”布莱希特为此写了诗歌《尴尬事件》

(*Peinlicher Vorfall*)，这也又一次真切反映了艾斯勒和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的流亡。

当最高的神灵中有一位迎来了他万年华诞

我与我的朋友、学生来给他庆贺

在他面前歌舞，诵读诗篇

气氛感人。宴会接近尾声。

此时这位神灵走上那属于艺术家们的讲台

大声

面对我如沐汗水的朋友和学生

说，他刚刚有所顿悟，从此皈依宗教

匆忙之中

他挑衅地给自己戴上了被虫蛀的教士礼帽

猥琐地跪在地上

开始无耻地演唱一首放肆的教堂歌曲，

伤害了他非宗教听众的情感

其中还有许多青少年。

三天来

我不敢，

在朋友和学生眼前露面，

我感到羞愧。

这首诗歌无需过多评论，表现了对这位贵宾及其东道国道德虚假的不满。他试图适应表面的宗教仪式，理所当然地要求对其敬畏，因此也奚落了生日聚会上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的所有参与者，而且对此还毫无觉察。

我只是还不知道

应该朝你开枪还是让你滚蛋

百老汇的帅克：

嘲弄希特勒

在观看了1926年由卡尔·拉马奇（Carl Lamac）执导的捷克电影和1928年由皮斯卡托尔执导的戏剧后，1929年，库尔特·魏尔就曾想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好兵帅克》谱曲改编为歌剧，魏尔1929年12月1日致信环球出版社：“一部蹩脚的电影和汉斯·莱曼（Hans Reimann）更蹩脚的戏剧只采用了士兵帅克300次经历中的两到三个情节，甚至都不能提醒我自己可以发挥的内容：利用某一个幽默人物展现战争的巨大谬误。”魏尔还补充道，布莱希特也对这一计划很感兴趣，愿意同他一起写作剧本。“这部伟大的小说，绝对是战争创造的很有价值的作品，但至今没有得到舞台上的开发。”但此事暂且搁置了。

1942年10月，魏尔和布莱希特在好莱坞重聚，相约拾起这个陈年计划。布莱希特1943年前往魏尔居住的新城（New City，纽约郊区）。之前布莱希特就已经寄来了诗歌《士兵的妻子得到什么》（*Und was bekam des Soldaten Weib*），魏尔为之谱曲，犹太时事评论员曼弗雷德·乔治（Manfred George）和恩斯特·约瑟夫·奥夫里希特（Ernst Josef Aufricht）在纽约组织了娱乐节目《我们反击》（*We*

fight back)，为了纪念焚书事件十周年而上演了滑稽短剧《帅克精神永存》(*Schwejk's Spirit Lives On*)，其中包括这首诗歌。歌曲由洛特·莱妮亚演唱，魏尔钢琴伴奏。埃尔文·皮斯卡托尔也不放弃《帅克》，一直在纽约为这一题材寻找舞台表演和拍电影的机会，但毫无成效。同时，皮斯卡托尔开始游说布莱希特和魏尔，并争取到了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Alfred Kreymborg)，还想吸引布莱希特。但布莱希特再次拒绝了皮斯卡托尔，希望借助魏尔并且同魏尔一起——魏尔当时已经在百老汇取得了成功，1941年《黑暗中的女士》(*Lady in the Dark*)演出467场——立足纽约。

1943年6月，布莱希特写作了第一版文稿，并多次修改直至秋季。奥夫里希特如此回忆这部临时性书稿：“它是不成功的。布莱希特从《帅克》小说中抄写了成页的对话，然后杜撰了一个结局：帅克在冰雪覆盖的战场上遇到了苏联的希特勒，并同他交谈——构思上具有原创性，但无法实施。魏尔拒绝为之谱曲，我也否决了这个计划。”文稿多次修改，并由克兰伯格进行翻译，但1943年12月5日魏尔认为“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美国的舞台上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此，魏尔和布莱希特的再度合作也终止了，或者说没有真正开始过。

尼尔斯·葛洛施(Nils Grosch)在这期间证实，魏尔同布莱希特的合作出现了困难，并警告他的妻子洛特·莱妮亚(两人1937年复婚)：“要远离布莱希特。生命太短暂了。”但他最终也没有放弃在美国演出《帅克》的计划。相反，他的拒绝与其说是针对布莱希特的《帅克》剧本，不如说更多的是针对克兰伯格的翻译。因为魏尔在一封信中看似表达了最终的反对，但仍包含了一条使成功合作成为可能的条件：“除非，美国顶尖的作家(本·赫克特级别的)，能找到一条路径，将您在德语原文稿件中的幽默传递到英语之中。”布莱希特确实也表示要给赫克特写信，劝说他一起合作。此事后果如何并没有

得到记载。但这说明，魏尔认可德语原文表达中布莱希特的幽默，只是苦于没有适合的翻译。

而且原本的苦恼还在于，布莱希特无法下决心前往纽约几个月，在那里同魏尔一起为这部“音乐剧”创作文本和音乐。魏尔了解百老汇的美学原则，至少必须把他的经验带入这部戏的编剧工作中，而且两人都熟悉了以共同、互换的方式创作文本和音乐。《帅克》作为一部反对希特勒的音乐剧或许正合时宜，特别是美国电影已经为这一主题找到了怪诞的一面，而且反纳粹电影在美国参战之后也颇为景气。1940年，查理·卓别林以《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为题拍摄了一部讽刺希特勒的影片。1942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出品了一部荒唐的动画片《元首的真面目》（*Der Fuehrer's Face*），片中唐老鸭梦到在一间德国弹药厂里工作，必须一直呼喊“希特勒万岁！”一部《帅克》电影很可能适应这一潮流。并不能因此确认在魏尔和布莱希特之间出现了决裂。相反，魏尔邀请布莱希特为1948~1949年的演出季写作《帅克》，而且所谓的《莫尔多河之歌》（*Moldaulied*）^[43]——布莱希特最美的歌曲之一——没有魏尔在1934年写作的《塞纳河的叹息》（*Complainte de la Seine*）将根本无法想象。

几乎在二十年之后（1961），汉斯·艾斯勒重新拾起这一素材，他在作曲上忠于了与布莱希特两人在1943年创作的剧本情节。艾斯勒强调，他的讽刺歌剧是介于“歌剧，必须是在布莱希特赋予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和“音乐性喜剧”之间的类型；布莱希特意义上的歌剧自然也是魏尔意义上的，即两人借《三毛钱歌剧》和《马哈哥尼》所确立的歌剧风格。一方面，艾斯勒的音乐继承了魏玛共和国时期音乐戏剧的高水准，另一方面，又在战后贯彻了流亡时期失败的艺术尝试。凭借他的音乐，《帅克》在观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此外，1943年库尔特·魏尔就赠与了我们这位潜在的合作者莱妮亚的法文唱片，其中包括他的塞纳河之歌还有其他一些（当时不出名的）法国香颂歌曲，布莱希特在创作文本期间为了“活跃情绪”会时常播放它们。除此之外，魏尔还一再努力在百老汇为《四川好人》谱曲，而且尝试在好莱坞“将《马哈哥尼》销售给电影产业，因为我想，这是让您赚到一些钱的好机会”。这是魏尔1月30日致布莱希特的信件。但两个计划艾斯勒都没有寄予太多成功的希望。被落在后面的还有深受挫败的皮斯卡托尔，布莱希特抢走了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皮斯卡托尔的《帅克》电影最终不了了之。

四处造谣

明知这会痛伤每一个人

德国人的问题：

魔鬼的伎俩把它最好的品质变成了恶

1943年7月12~13日，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举行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Nationalkomitee Freies Deutschland）”的成立仪式。德国流亡者和战俘发表声明，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为颠覆纳粹独裁而斗争，在战后建立一个反法西斯的自由德国。因为这次会议，1943年8月1日，在萨尔卡和贝特霍尔德·菲尔特夫妇家，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汉斯·赖欣巴哈、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聚集在一起，共同起草声明，声明中大家对“苏联境内德国战俘和流亡者的公告”表示赞同，“它号召德国人民，通过斗争迫使压迫者无条件投降，建立德国坚强的民主体制”。当天参加集会的人员还认为必须“对希特勒的统治及其相关阶层与德

国人民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没有“坚强的德国主体制”将不会有“长久的世界和平”。签名没有遵循字母顺序，曼氏兄弟为首，与福伊希特万格和弗兰克签在第一行，其他人在第二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在这里签署了自己出生登记中的名字：

“Berthold”。

声明积极地去决断未来德国何去何从的要害问题，即“严格”区分希特勒的野蛮和德国人民。事实上，从前所未有的骇人战争罪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一个民族不仅能忍受这样的“元首”，还在积极与其一同承担战争，谦顺地执行他的命令。这不应该意味着，不仅要令战争罪犯，也要令整个民族承担责任吗？托马斯·曼多次坚持，他1943年12月10日致布莱希特的信中也同样如此，他懂得区分德国人民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和大工业者这样背负罪责的权力组合”；而且，托马斯·曼同时也倾向于给德国人民钉上“本质上的内省性”标签，根据歌德“简要的定义”，在古典、健康与浪漫、病态之间踌躇不定：“恶的德国，是走上歧途的善，是不幸、罪责和覆灭中的善。”德国本质中存在“迷惘的悖谬”，将“反对纯道德性的对生命力的颂扬”同“死亡亲缘性”合而为一，并“最坚定、最极端”地代表这一悖谬。最终，托马斯·曼还借用了魔鬼之说，他断定，只有一个德国，“魔鬼的伎俩把它最好的品质变成了恶”。

自1941年起，英国外交官、记者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引发了关于德国集体罪责的讨论。范西塔特认为，战争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德国人的“好战性格”，在德国历史上，从卡尔大帝^[44]以来，这一品质就一再重新“突然出现”，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幸。这里涉及的并非“这个”德意志民族，而是根据其国籍而定义的“德国人”，他们应该获得一种国家形式，保证自由和平等中社会民主的共同生活，排除其他战争的可能性。另一个可能性是所谓的摩根索计划（Morgenthau-Plan），即在二十年内实现德

国的“去工业化”，将德国转变为一个农业国，这样就无法从这片土地上发动战争；或者集体性地肃清所有德国人及其“本质”：“德国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

在理性（人性）的方式上，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寄希望于流亡中的和德国境内的反法西斯力量，同他们一起筹谋为所有德国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民主也包括对所有的案犯施以处罚，教育同犯、无意识的追随者和顺从的帮手。同时，还必须把所有不应受到惩处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岗位上驱赶下来，之后，如果他们能证实自己有民主行为的能力，才能给予他们共同决定的权利。这些虽然在战后有所规划，但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都没有得到贯彻。

1943年8月1日的声明是美国境内德国流亡者的胜利，在《工作笔记》中布莱希特把这份文本逐字逐句地抄写下来，像原稿一样十分珍视。这份声明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将当时美国境内重要的德语作家结成反希特勒联盟，而且毫无意识形态上的或者其他形式的保留。但次日，托马斯·曼就电话通知利翁·福伊希特万格，他要收回自己的签名。因此，这份声明也失去了价值。

托马斯·曼在美国由于其《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两部作品，当然也由于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荣誉而知名。托马斯·曼1938年2月开始流亡美国，获得了客座教授的职位，并很快在公众中成名。他有理由把自己理解为“更好德国的代表人物”，同样也带着这样的自信露面：“吾在之地，即德国。”单独引用，这句话可能会被误解，误以为托马斯·曼在语言和行动上都代表德国文化，其他人都不具备这项优先权。事实上本句指，面对德国境内被毒化的气氛，不会因为流亡而失去重要的东西；如此一来流亡会变得较为容易。如果能争取托马斯·曼来支持这一集体事业，便可以引起美国公众的关注；而且必须要争取美国公众的关注，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在反法西斯斗争取得

胜利后，准备好去支持德国追寻已久的民主之路。谁将是战争最终的胜利者，这早已明了，因此现在就需要他们的友善。

流亡期间，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之间争斗的状况有所改变。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布莱希特能支配那些能令他在公众中露面的机构，因而可以公开口诛笔伐，使托马斯·曼不得不予以回应，但流亡美国期间这一行为方式失去了基础，最多被记为无礼行为，会令布莱希特显得不成体统甚至可笑。如今，在公开的政治意见营造方面，布莱希特受制于托马斯·曼。

在给“亲爱的朋友”美国记者阿格娜丝·迈尔（Agnes Meyer）的信中，托马斯·曼这样解释自己的做法：他认为全国委员会的成立是苏联的计策，受到了前共产主义国会议员的操纵，这令他感到厌烦。事实上，其中极少数是国会议员，上文所涉及的莫斯科流亡者是一群卓越的人才，布莱希特与这些人关系紧密。这些人中有埃里希·魏讷特（Erich Weinert），被评价为“真正的党派诗人”，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威廉·皮克，流亡德国共产党骨干部门的重要人物；同苏联红军合作紧密的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Walter Ulbricht）和安东·阿克尔曼（Anton Ackermann），以及约翰内斯·R. 贝歇尔、威利·布莱德尔、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等；所有这些都代表严格的党派路线，如果自己的同志对此有所偏离，便会遭到揭发，他们效忠于自己特有的民族主义，其中特别是贝歇尔，他既在理论上又在其宏大的德国作品中为民族主义撰写了言辞激昂的篇章。“没有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最深层次的核心内容不是由本民族命运的经历所决定。”一种“类型”的“新德意志国家文学”必须到来：“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将成为一种国家文学，否则它将不能被称之为文学。”贝歇尔还带着宗教式的炽热要求大家：“要树立起新的共同体，以形成德国意志，德国意志将通过我们得到实现。而至高无上的，是对这一共同体

的统治：永恒德国的守护神。”布莱希特评论道：“邻居，你们的呕吐桶！”

正如布莱希特在1943年9月9日所记录的，托马斯·曼曾透露，当自己被迫在德国和希特勒之间作出区分，那些“布莱希特一样的左派”是在执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只怕是另一种宣战方式，也证实了托马斯·曼在流亡美国时期的政治幼稚。因为联邦调查局早已在等待这些流亡人员被揭发为莫斯科的走狗，而布莱希特也已经位列黑名单。布莱希特对此十分气恼：“这个爬行动物无法想象，有人会在没有被任何组织命令的情况下为拯救德国（以及反对希特勒）有所行动，或者有人完全是出于自身，或者说是出于信念，苦于不仅仅把德国看作一个大型的读者群体。曼氏夫妇的阴险显而易见——他的妻子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四处造谣，明知这会痛伤每一个人。”

尽管历经失败，但布莱希特仍然继续努力，这一次是争取托马斯·曼支持“民主德国委员会（Council for a Democratic Germany）”。1943年12月1日，他致信“尊敬的曼先生”，“您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国”，布莱希特在信中指出，工人政党之间的不和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恰恰是我们这些流亡者必须要“揭露”这个“魔鬼”的罪行；不能回避的是，“极权恐怖统治给受制于他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道德损害”。布莱希特还指出，“德国境内30余万人”“在与极权统治的斗争中”失去了生命，但“大多数仍不为人知”，而且这“仅仅是到1942年为止”的数字，而且“不少于20万活跃的希特勒反对者在战争伊始就被关进了集中营”。“时至今日，德国境内的希特勒反对者还牵制着希特勒精锐部队——所谓的党卫军——的50多个师团。”必须着重强调德国境内“重要民主力量”的存在，并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布莱希特无法知晓，托马斯·曼已经在11月一当时他被邀请参与民主德国委员会的工作一同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建立了联系，以便了解这样的委员会是否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因为作为未来的美国公民，托马斯·曼只愿意参与得到美国政府明确支持的活动，没有这样的支持就不会有成功的希望。与国务卿阿道夫·贝勒（Adolf Berle）的对话1943年11月25日在华盛顿举行，但毫无结果。

11月中旬，托马斯·曼已经同布莱希特水火不相容。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新教神学家和“民主德国委员会”主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听了托马斯·曼题为《战争与未来》（*The War and the Future*）的报告，并告知布莱希特—布氏1943年11月19日至1944年3月22日在纽约逗留—托马斯·曼在报告中“向德国宣判了死刑”，对此布莱希特做出了“嘲讽的苦脸”。在给阿格娜丝·迈尔的另一封信中，托马斯·曼甚至声称，“政党的忠实拥趸（party liner）”将对其“施以暴行……如果苏联人帮助他（布莱希特）在德国取得权力”。由此，托马斯·曼正迎合了联邦调查局检查人员的低劣水准，也完全抹杀了与布莱希特和解的机会。1943年12月10日，托马斯·曼回信布莱希特表示拒绝，布莱希特必须在失去曼支持的情况下寻求反法西斯同盟。

事实上，同布莱希特通常的习惯相反，他在纽约逗留期间（1943年末至1944年初的冬季）积极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的组建工作。他致力于搁置各流亡者战前的政治分歧，尤其要照顾到资产阶级团体，当然还必须接纳共产主义者。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他们同往常一样进行了监视，田立克曾说：“在我们的委员会中有两个半共产党代表，贝尔特·布莱希特就是那半个。”布莱希特的政治活动一直在符合美国宪法的轨道内开展，而且如果莫斯科共产党对其有所耳闻，定会表示不赞同，因为布氏的政治活动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执行亲共路线。联邦调查局更严苛的监视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监视本以

将这位敌国侨民最终挫败为目的，但即便是苏联驻旧金山副领事的来访——此人很可能是苏联特务——也不能提供任何有关布莱希特从事“反美”活动的证据，因此他依旧安然无恙。

报告中还介绍了联邦调查局的另一次暗算。露特·贝尔劳于1944年春在约瑟夫·布赖滕巴赫（Josef Breitenbach）处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摄影课程，之后她影印了布莱希特的手稿，1945年3月31日从圣莫尼卡返回纽约。布莱希特把她送到洛杉矶的火车站；途中他们在一家柯达商店停下，购买了胶卷。布莱希特陪同贝尔劳，并把她随身携带的一个箱子送上火车，拿着她的两个文件包，给她递到车厢里。为了查证这些秘密的纸张上有何内容，至少有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乘坐了同一列火车，并等候时机，以便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检查箱子和包里的内容，至少会拍摄部分照片为证。在一些女士衬裤、胸罩、胸衣中间确实有一些照片，根据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审查，这是布莱希特部分（文学）作品的翻拍。

即使他征服整个地球，让它杳无人烟

也不会有赞颂他的歌曲存在

劳顿的花园：及时行乐

露特·贝尔劳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下带到纽约的，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档案（Bertolt-Brecht-Archiv, BBA）”的开端。布莱希特曾惶惶不安，害怕自己的作品在流亡中只有少数能留存在记忆中，所以很可能会遭受损失。在贝尔劳那些照片的帮助下，文稿至少增加了一倍，并且保存在不同的地方。此外，底片很小，所以大量的胶片并不占太多地方，可以用于保存和运输。对当时的时代而言，这在为文学作品建立档案的角度上是一次媒介技术的小型革命，布莱希特延续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媒体为导向的工作方式，用以保存自己的作

品。对当时的技术来说，翻拍手稿是耗时费力的事情，而且前提条件是原稿状态良好，即字迹清晰可辨，因此布莱希特必须使用写作整齐的清样。

由于再次抄写或者打字都太耗费时间，布莱希特发明了一项剪切粘贴技术，这是德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他曾表示或许自己更应该成为一名木匠的愿望，因为当木匠便不会遇到这么多困难，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他用精湛的手工艺将现有的或者要添加的文稿改造、拆解，组成新的整体。由不同的（多是）打字稿组合而成的新页面同原稿的格式保持了一致。

还要补充一些对布莱希特生平重要的资料，这些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事实上却包含在内。布莱希特努力至少能部分地亲自照顾儿子弗兰克，但努力失败了。几经周折，1935年弗兰克才来到母亲身边，在奥格斯堡完成了商业学徒的学习期，1939年被征入空军，负伤，显然不能继续从事飞行员工作，1943年加入陆军，在那个惨烈的冬季进军苏联。同他的父亲一样，弗兰克也偏爱社会研究。当时他正在一个临时的兵营里观看侦探电影，由于所处的建筑被炸药袭击而死去。这是1943年11月13日，在博尔霍夫（Porchow，位于苏联西北）。那时布莱希特对自己儿子的死一无所知。

相反，还有一件事布莱希特是知道的，却从他书面记录的生平中删除了：就曾经的那句“让他们成长吧，小布莱希特们”而言，他1943~1944年的纽约之旅是成功的。露特·贝尔劳1942年底在纽约获得了“战时情报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一个职位，在为期10个月的时间里都是一名出色的战争记者，她通过短波向自己的同胞播报战争信息。贝尔劳很高兴，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不再是“布莱希特的小跟班”，终于能实现经济独立。但1943年8月，这一切都结束了。在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之后，美国的

亲苏氛围开始冷却。斯大林1943年6月解散了共产国际，保证决不再干涉别国事务。这被理解为对美国和英国的妥协，因为走这一步苏联看似放弃了开展世界革命的目标。同时，斯大林在1943年7月11日致罗斯福的秘密照会中要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您应该记得，”斯大林写道，“本年1月26日，您和丘吉尔先生曾在密函中告知，决定将德国重要的陆军和空军力量从苏联战场引开，并在1943年迫使德国投降。”随后几个月的胜利表明，苏联军队的前进势不可挡，希特勒的军队已露败势。美国的右翼和反共势力以这次事实为机，警告大家提防这一时期尚不明确的共产主义威胁。露特·贝尔劳也被谴责，批判她“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为错误的一方效力”，并将其无限期解雇。布莱希特第二次前往纽约时，曾终于得到过她经济上的支持，如今，贝尔劳需再次依靠布莱希特养活。

布莱希特在离开纽约之前就得知了贝尔劳怀孕的消息，1944年3月29日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立即给她写信，让她负责《阿茜的救国梦》（*Die Gesichte der Simone Machard*）：“你要为此做所有必需的一切。而且出于健康的考虑，你现在不能节省，绝对不能。你要照顾好自己。我下周给你寄支票。”这一时期布莱希特给露特写了很多封信。

1944年6月底，贝尔劳有幸能返回圣莫尼卡，在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得到了一个大房间。9月3日她因为肿瘤接受了手术，由于手术所致产下了一个7个月的男婴，名为迈克尔（Michel），孩子几天后夭折。布莱希特1944年9月3日在《工作笔记》中记录：“露特在黎巴嫩雪松医院（Cedars of Lebanon）接受了手术。”仅此一条记录，这样毫无感情色彩的句子应该会让贝尔劳对他很生气。9月5日的记录也是他想推卸责任和负罪感的又一条证据：“今天的计划：7点起床。报纸、广播。煮咖啡，用小铜壶。上午工作。12点简单的午餐。读侦探小说休息。下午工作或者拜访朋友。7点

晚餐。之后接待客人。晚上半页莎士比亚或者亚瑟·威利的中国诗歌集。广播。侦探小说。”对肿瘤布莱希特不需要负责任，放弃孩子的决定也由贝尔劳—她自己如是说—自己决定。

9月中旬，布莱希特致信此时居住在菲尔特家的贝尔劳：“亲爱的，我不知道你为何会如此不安。我们相伴已有十年。你同我一起游历了半个地球，你为我工作过，就像我也为你工作过一样，你为我生了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死去了，但他对我们的意义没有改变。我很高兴，没有同时也失去你。”

布莱希特这一时期时常逗留于劳顿的庄园，尤其是庄园里硕大的花园。因此这个花园也必然拥有与之相关的诗歌，布莱希特1944年夏创作了这一题目独特的诗歌—《建造中的花园》（*Garden in progress*）。8月底，劳顿躲到布莱希特处，原因是他俯瞰太平洋的花园，一角突然塌陷坠落，一株巨大的云杉也倒掉了，此时布莱希特已开始《工作笔记》中着手这一文本。作为一名演员，而且还有报纸对此事的大肆报道，劳顿认为这破坏了他毕生的事业。缺失了云杉，花园有一面直面着大海，劳顿从后门前往布莱希特处，他不断大声叫苦，但也为录制唱片作了准备。“为了让他开心，”布莱希特给他展现了当时已经完成的诗歌段落，并且向他保证，“您的花园将成为一个神话，存在于享有盛名的传说中。人们说，短暂是美的本质内容，它能升华乐趣。”没有哪句表达能比这里更加具有布莱希特的特色。

1944年，德国的败势已经渐露，战争还在残酷地继续。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是试图结束战争的又一尝试。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发表了骇人听闻的见解：“当希特勒和容克贵族将军之间的血腥事件渐渐传开，我有一瞬间向希特勒竖起了大拇指；因为，如果不是他，谁又会为我们剔除这一犯罪团伙。他起初为绅士俱乐部（Herrenklub）^[45]牺牲了自己的冲锋队，现在又牺牲了绅士俱乐

部。‘财阀统治’又如何？德国资产阶级的容克头脑患上了脑溢血。（苏联人进军东普鲁士。）”布莱希特的论述有多少真实性不得而知，但可以注意到，参加刺杀的将军们也同样有令人愤慨的战争目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被选定为新政府的帝国总理，根据莱因哈德·库恩尔（Reinhard Kühnl）的意见，戈德勒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政策的“目标在于，通过瓦解希特勒政府和与西方力量的和平谈判，继续同苏联的战争，尽可能多地为德国挽救法西斯统治占领的区域，并在内部建立一个保守、独裁的政权”。布莱希特选用的词汇以及他对这次事件清晰的认识，都证实了布氏洞识了绅士俱乐部的目的。戈德勒的计划是维持德国1914年时的版图，但这次自上而下的反抗中，还有其他的政治力量否定了这一计划，对此，布莱希特（可能）不得而知，或者在他这条记录中没有重要的作用。

这同德国文化有着何种关系？布莱希特1942年4月在《工作笔记》中写下的一句话同战争有紧密联系：“为争夺斯摩棱斯克（Smolensk）^[46]的战役有关诗学。”在流亡美国期间，布莱希特十分关心拯救文化艺术的问题，并特意创作了电影脚本，相关文稿1998年才在加利福尼亚被发现。这是一份40页的电影大纲，标题页写着《逃亡的维纳斯—原创剧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改编：伯特霍尔德·菲尔特》（*The Fugitive Venus. Original Story by Bertold [sic] Brecht. Adatped for the Screen by Berthold Viertel*）。在好莱坞，电影大纲（多数已经是对话形式）指短篇小说的扩充版，包括详细的情节走向。因而被发现的版本并非布莱希特的原稿，它基于好莱坞常见的电影集体创作，这里除了布莱希特之外，萨尔卡、伯特霍尔德和汉斯·菲尔特也加入进来。电影是布莱希特为好友彼得·洛所筹划，虽然符合好莱坞的一些标准，但最终没有成形。这是一个侦探故事，发生在虚构的、被德国军队占领的马赛。

在美国，法国被视为与纳粹勾结的国家。但与德国不同，法国有“抵抗运动（Résistance）”，而且自1943年起得到了赞赏和支持，因为一个被解放的法国将是与纳粹德国相抗衡的又一盟友。好莱坞用宣传性电影支持法国的抵抗运动，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就是让·雷诺阿（Jean Renoir）的《吾土吾民》（*This Land is Mine*），查尔斯·劳顿和玛琳·奥哈拉（Maureen O’ Hara）分别饰演男女主人公，电影自1943年5月起在美国72家电影院上映。为了向美国民众讲解法国的政治变革，展现反法西斯的立场，电影使用了侦探片、西部片、黑帮片和爱情片的常见模式，自然也仅仅十分局限地符合现实。布莱希特的电影也毫无违和地融入了这种潮流。

虽然正如德国官方委派艺术每日所公开展示的，纳粹分子们是彻头彻尾的不懂艺术的庸俗之人，他们仍在被占领国特意设立官员，组织对艺术品的大肆掠夺，这些作品他们既不珍视也不理解，却想“保护”。他们要占用的作品必须是价值连城的，但价值由何决定则并不重要；比如卢浮宫里的作品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出自卢浮宫。电影中的季彭霍伊尔（Kippenheyer）就符合这伙艺术强盗的形象，他们被组织为“全国领袖罗森堡部队”，还下辖着“造型艺术特别部队”，在库尔特·冯·贝尔（Kurt von Behr）的领导下把巴黎这座享誉世界的博物馆中典藏的艺术宝藏“保护性扣押”，而且因抢占犹太人财产而臭名昭著。贝尔身后隐藏的是戈林的个人喜好，他喜欢被包围在画有丰腴裸女出浴的华而不实的作品中。在电影中，季彭霍伊尔还受到了帝国元帅戈林的亲自指令，将一幅此类画作充公没收。

电影《逃亡的维纳斯》讲述了拯救一座珍贵的维纳斯木质蹲像，“枫丹白露的维纳斯”的故事。在德国军队进军巴黎之前，雕像被转移到了马赛当地博物馆，亟待第二次被拯救。在跌宕起伏的悬疑片情节中，这座雕像被博物馆馆长藏在了一间夜总会里，见证了馆长刺死了纳粹艺术强盗季彭霍伊尔，识破了他的诡计。维纳斯雕像同一名

死去的德国人调换，被装进了一口棺材里，送往葡萄牙，得到了拯救。

布莱希特在电影提纲中探讨了以何种手段可以将（仍存在的）艺术品拯救出纳粹的魔掌：绝对是不合法的、犯罪的手段。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为了拯救雕像，但同时也在艺术雕像前将杀戮辩护为正当防卫。艺术作为抵抗的见证者留存了下来。

布莱希特精确感知了纳粹与艺术的真实联系，而且绝非像市民文学一样流于表面，仅仅作为惯用语句或者象征。对应于悬疑片的情节，汉斯·菲尔特在《逃亡的维纳斯》中拯救的是一尊维纳斯的蹲像。在希腊罗马时期有数个阿芙洛狄忒蹲态像，例如多达萨斯的阿芙洛狄忒（Aphrodite des Doidalses）或者维纳斯蹲像（Vénus Accroupie），由于人物呈蹲态，腹部出现褶皱，遮盖了小腹部，因而并没有情欲的吸引力。维纳斯蹲像的形态为：裸体人像，重心在左脚，从而右膝与地面水平，左膝向上。左臂搭在（左）大腿上，左手垂在胸前，（部分）遮盖了小腹部。右手搭在左肩，手臂在胸前交叠，遮盖了裸露的胸部。头转向右侧，目光投向下方。

古典时期的雕塑用大理石展现了女性的身体，因而历经昏暗的时代而得以存留。电影故事中的维纳斯是木质的，因而是“易逝”的。纳粹艺术家阿尔诺·布雷克（Arno Breker，雕塑家）和阿道夫·齐格勒（Adolf Ziegler，画家）的拙劣作品中，女性的裸露被塑造得对观赏者有强加的性吸引力。例如布雷克的《伊欧斯》（*Eos*，朝霞），为新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庭院所作，雕像同希特勒在讲话时的习惯一样，容光焕发地向上望（参见《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第一首箴言诗），双臂伸出，因而胸部呈现向上的形态，尤为裸露而充盈。双腿稍叉开，所以小腹部清晰可见，特别强调了大腿向躯干过渡的位置，给人以强有力的印象（此外，虽然极力追求，对女性下体的塑造完全不符

合古典时期的雕塑风格，当时的雕塑对这个身体部分处理得十分优雅，展现了和谐的臀部曲线）。简言之，布雷克的雕塑展示了性欲旺盛的日耳曼女性，预示着孕育和生产种族纯正的后代。当然这些雕塑要么是石质或者采用大理石材料雕刻，要么使用青铜浇铸而成，寓意希特勒帝国的恒久。

希特勒在统治期间用不同的形式吹捧上述尖刻冷漠的艺术，布莱希特的电影脚本利用自己抵抗性的艺术手法，至少展现了此类艺术虚假的，而且带有性别歧视地支持血腥暴力统治的作用。昏暗时代的艺术是否艺术？其期限又有几何？借助木质的维纳斯蹲像，布莱希特再次提出这样的质疑供人思辨，这次讨论虽空前罕见，却没有为人注意。真正的战争还在继续，既无视艺术也无视自然。1944年8月22日，希特勒颁布了“元首命令”摧毁巴黎，给逼近的同盟国军队只留下了一片废墟。

请记住古人的教训

一切要归于/能善于对待它的人

练习民主：不能限制艺术

在苏联1943年末至1944年初的冬季和春季进攻战之后，1944年5月，高加索地区已经完全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中有一张照片（第三十三首），题为《突袭苏联（沙盘推演）》[*Überfall auf die Sowjetunion (im Sandkasten vorbereitet)*]。箴言诗诗文为：“兄弟们，在遥远的高加索/我，施瓦本农民的儿子，现在埋葬在这里/被苏联农民射中而倒下。/很久以前我也在施瓦本被击败。”照片的后记中写道：“起初进展良好。除了1941年6月22日踏上苏联土地的德国士兵之外，还有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军团。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地主与意大利的贵族也在

广袤的苏联分到自己的一杯羹。……戈培尔在体育馆宣称，对苏战争主要是为了小麦、矿产和石油。”

在为《高加索灰阑记》（*Kaukasischer Kreidekreis*）^[47]制订计划时，布莱希特关心的是如何在战后重新梳理社会秩序。由奥地利移民到美国的女演员路易丝·赖纳（Luise Rainer）对好莱坞以及美国的电影和戏剧产业影响巨大，她对《帅克》不感兴趣，对《乌依》更毫无热情，由于记得克拉邦德成功的剧作，赖纳建议布莱希特同样创作一出类似的灰阑记。凭借1940年的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Der Augsburger Kreidekreis*）和各类不同的戏剧构思，布莱希特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准备。1944年2月初，纽约戏剧企业家朱尔斯·J. 利文撒尔（Jules J. Leventhal）签订了合同，聘请布莱希特写作这部戏剧，戏剧家们保证资助这一计划，并将其搬上舞台，路易丝·赖纳许诺饰演格鲁雪（Grusche）一角。布莱希特急需钱用，所以也获得了预付款项。

戏剧主题不再是反抗，而是战后面临高加索巨大的人员伤亡与战争破坏，如何建立保障和平民主共存的新秩序。布莱希特因此写了一部序幕，同《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中的照片类似，在沙盘筹备重建。日后序幕得名《山谷之争》（*Der Streit ums Tal*），并融入整部戏剧中。彼得·苏尔坎普曾因政治争议对这场戏提出过质疑，1954年5月底，布莱希特在一封致彼得·苏尔坎普的信中说明了原由，戏剧所讨论的问题是出于“现实的必要性”：“没有这部序幕，既不清楚为何这部戏剧并非原本的中国《灰阑记》[法官（包公）断案的老故事]，也不清楚为何它名为《灰阑记》。”为了不凭空捏造，必须有“历史性的、可提供解释的背景”，而这就是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高加索。

内容：“一个废墟中的高加索村庄”，名为弩卡（Nukha），这里聚集了“罗莎卢森堡牧羊农庄”和近旁“加林斯克水果种植农庄”的成员，大家讨论如何分配和利用这里的土地。战争把畜牧农庄的人赶出了山谷，他们现在考虑迁回。早先的牧场是“牧草生长比较贫瘠的山谷”，出产廉价的山羊奶酪，果园农庄想把这片地转为水果和葡萄的种植园，并且已经制订了灌溉计划。果园农庄的计划预示了更高的生产力，最终也能给畜牧农庄带来收益，因此农民们就服从了“山谷的强盗”。

为了重新赢得的未来，畜牧以现实性为导向，展示如何作出一个理性的、最终为所有成员都赞同的民主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十分必要，因为为了完成重建，必须定额分配所有的娱乐活动：“烟草、葡萄酒还有讨论。”但只有一项例外，即艺术。青年女拖拉机手当天必须返回提弗里斯（Tiflis），她询问歌唱完需要多久，阿尔卡第·车依采（Arkadi Tscheidse）回答：“几个小时。”当她追问：“不能压缩点儿吗？”车依采简单明快地答道：“不能。”早在1944年上半年，在第一部战后戏剧作品的序幕中，布莱希特就既展现了如何实施民主的戏剧纲领，又研究了新的美学，探讨艺术在经历了昏暗时代的洗礼之后，如何重新为自己争取重要的社会角色，摆脱限制和要求。

故事的详情：歌手演唱的两个故事发生在“古代，那个流血的时期”。他们原本毫不相关，似乎是具有绝对的巧合，两个故事的发展才融合到一起。布莱希特借用骑马而来的信使之口也明确说明了这一点，这一信使形象在《三毛钱歌剧》的喜剧结局中已经出现过。阿兹达克（Azdak）半裸着，流着血站在绞刑架下，最后关头，他当初曾无意救过的大公，派来风尘仆仆的信使，信使出现并宣布，大公任命“弩卡的一位阿兹达克”作为法官。这位村里的文书从而得救了，除了格鲁雪的案件需要这名法官外，情节上似乎对此完全没有合理的解

释。由于阿兹达克知道，大公的回归不会带来新的时代，而且他被任命为法官的错误也会很快被发现，因此他抓住机会，至少在这个开庭日打破一些现行的法律，结束这个真假母亲抢夺孩子的案件，从而抽身隐退。他还建议格鲁雪立即逃走，因为当旧势力复辟，它的报复将会无比残酷。

序幕和戏剧的两个故事融合，是因为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它们展现“一种特定的智慧”，“对现在的争端也有示范作用”：对那些不公事件的发生，现行的法律也承担部分责任。戏剧情节中“法”的问题是原本《灰阑记》的主题，讲述了孩子与母亲的关系，现行法律中将孩子归于生母，她可以对其为所欲为，这样是否人性仍值得商榷。而且纳粹的种族政策及其“血与土的意识形态”使这一问题愈发激化。在屠杀之后，在这种意识形态名义下实施的法律，是否还能适用于建立新的秩序？

有所发现反遭骂名

尽管有超级屁：同劳顿的戏剧合作

伽利略的原型

为了能再次全心投入于《伽利略传》的写作，布莱希特需要查尔斯·劳顿的帮助。1944年12月，两人的合作开始，首先自然是要完成剧本的翻译。最简便的应该是把这一任务委托他人，但劳顿和布莱希特决定由两人共同完成翻译工作。“最棘手的情况是，其中一名译者不会德语，而另一名英语知识有限，因而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采用戏剧表演作为翻译方法。我们被迫采用语言上更精进的译者应该使用的手法：翻译动作和手势。语言因而具有了戏剧性，将说话者彼此的态度表达出来。”

很多方面都能证实，劳顿连一个德语单词都不曾掌握（当然也并非绝对如此）。但布莱希特的英语知识并不像谣传中的一样可怜，布氏能享受劳顿朗诵的莎士比亚，能在美国良好地与人沟通或者用英语通信，这些事实已经可以推断，他至少能被动地听懂、看懂英语。这样两人开始了不同寻常的合作，地点或是在劳顿的小图书室中，或是在花园内。具体情况是：劳顿和布莱希特，经常两人独自或者同少数几个客人一同试验不同的语言形式和与之相关的肢体动作—伊索、圣经、莎士比亚、莫里哀。较长的人物独白被布莱希特称为“咏叹调”，两人分开处理，因为在纳粹政治修辞的背景下，这些片段一例如剧终伽利略的自我哀叹—绝不允许沾染上夸夸其谈的色彩；或者戏剧开篇尝试了多种流派，最终找到了一种适合的切入方式。

这次翻译的原稿采用了1938~1939年的剧本，翻译过程中布莱希特先用（较为）蹩脚的英语，必要的话部分用德语，表演一个段落，劳顿再次表演，并用英语进行修改，直到达到语言上的最佳效果，同时也找到最佳的肢体语言，并且布莱希特作为导演能说：“过。”劳顿然后把结果逐句记录下来，一再修改，并再次表演。我们的演员向我们的剧作家表现出，这精心创作的剧本其实是多么的不重要，因为它只为演出而存在：“劳顿用明白且时而残忍的方式，展现了他对‘书稿’的满不在乎，这是剧作家所不再具有的。”回顾往事时，布莱希特不得不赞叹劳顿，在他的体内仍澎湃着伊丽莎白时期对戏剧的热情，这种热情“像关键时刻的即兴表演一样”吞噬了剧本。而剧本只不过成了“欢乐的纪念品”，它仅仅是促成了演出。对于一位流亡作家而言，这自然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他能支配的只有文本，因而试图将每一句话，即使这句话不能进入到演出当中，仍要使它在书稿中得到挽救。

最终将书稿制作成一部可以独立演出的作品，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接洽的导演也有很多，例如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约

瑟夫·洛塞（Joseph Losey）。布莱希特把现有的文稿交予赖雅指正，之后又同劳顿对其再次进行了修改，幅度之大到了赖雅已经几乎认不出来的程度；然后由劳顿负责筹划电影制作及其他事宜。1946年1月7日，布莱希特和劳顿签订了合同，合同内容有关当时的书稿，《伽利略传》一作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英文版作者：查尔斯·劳顿》，标题中认可了两人共同的合作。约瑟夫·洛塞担任导演（同布莱希特一道），演出最后在比弗利山庄的皇冠剧院（Coronet Theatre）举行，在一间只容纳260个坐席的大厅里，但有众多知名人士出席：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时间是1947年7月30日。演出很成功，但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布莱希特的表演方式令美国观众很不习惯。观众的主要兴趣是明星，而非戏剧。《伽利略传》共上演了17场，每场都爆满（共有4500人次观看）。不错，但称不上大获成功。

排演的过程得到了良好的记录，因为除了规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档案”外，布莱希特还委托露特·贝尔劳用照相机系统记录了戏剧演出。虽然贝尔劳的记录1956年才得以出版，题目为《一个角色的塑造——劳顿的伽利略》（*Aufbau einer Rolle. Laughtons Gailei*），但她在1947年就已公开了一系列图册。《一个角色的塑造》还有一段别样的渊源，即贝尔劳的老师，报道及人像摄影师约瑟夫·布赖滕巴赫。1937年布莱希特就曾聘用约瑟夫·布赖滕巴赫进行《卡拉尔大娘的枪》10月16日首演的记录工作。布赖滕巴赫1932年曾被慕尼黑室内剧院聘用，因而也略微了解布莱希特的戏剧及风格。

布赖滕巴赫的摄影作品特色是不以再现演员某一时刻的表演艺术为宗旨，而是再现人物关系。布赖滕巴赫选用全景的对焦方式，视角并非集中在中央，从而避免了太过刻意。这一稍带倾斜的全景模式适

合布莱希特的戏剧，处于剧照中心的不再是某个人，整个人物谱系都清晰可见，这里塑造的不再是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而且是舞台空间布局中的主体间性。观察者能够看到人物之间不同的距离，当戏剧开始时，卡拉尔大娘即海伦娜·魏格尔与儿子霍塞（José）间隔着半个舞台的距离，并背对着他说话，回避与其交流。从而可以清晰得见，卡拉尔大娘不愿参与同儿子的讨论，很久之后，她才放弃了这个态度，转而面对自己的谈话对象。布赖滕巴赫的剧照1952年由德累斯顿艺术出版社同露特·贝尔劳拍摄的哥本哈根（1938）和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 1952）演出剧照一道出版，没有明确注明出处，所以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在布莱希特研究中一直不为人所知。

《一个角色的塑造》中露特·贝尔劳对查尔斯·劳顿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她虽然只部分使用了全景模式，但一直注重清晰展现人物关系，使表演者的姿态符合他们当时的身体状态和心灵状态。当伽利略让他的朋友萨克雷多用他的望远镜观测时，他在一旁十分放松，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神态自若，双手交叉在脑后，等待着自己的发现得到证实。在同小修道士的对话中，劳顿起初也采用了这一姿势，深信自己学说的传播不会遭到任何反对意见，但当他必须向小修道士捍卫自己的理论时，则若有所思地把左手放到面前，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这里，贝尔劳照相机的视线也集中在两名辩论者身上。

这期间国际舞台上也发生波澜。意大利法西斯1943年7月已经基本被打垮，英军在卡拉布里亚（Kalabrien）登陆，墨索里尼撤退，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仍试图毫无顾忌地牺牲自己的人民以自救，最终在米兰的广场上暴尸示众；至少在意大利北部，民众揭竿而起，处决了自己的压迫者。几乎一年之后，同盟军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最终开辟了西部的第二战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1944年9月25日，希特勒下令组建“德意志人民冲锋队（Deutscher Volkssturm）”，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德国人继续进行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1945年2月，当

英美军队的炸弹摧毁了德累斯顿，纳粹的宣传仍成功地再次兜售了他们的谎言：同盟国意欲灭绝整个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态上的暴力持续到最后。

1945年5月8日，布莱希特最终得以记录：“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早晨6点钟，美国总统在广播里发表讲话。聆听着广播，我凝视这加利福尼亚欣欣向荣的花园。”但8月他又绝望地写道：“我们，这些没可能同希特勒一起胜利的人，同他一起受到了打击。”战争还没有过去，对布莱希特一家而言也没有。1944年，因为持有美国国籍，施特凡被征入美国军队。在德国投降后，日本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决定，继续与同盟国进行战争，从而导致了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日本占领区更激烈的海战，这场战事又持续了三个月。因而施特凡也完全有可能被送上战场（事实上并没有发生此事）。美国总统富兰克林·R. 罗斯福致力于建立战后国际政治秩序与联合国新秩序，而且要包括苏联，但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突然离世。他的继任者哈里·S. 杜鲁门，如布莱希特所述，终结了罗斯福“启蒙民主者”的时代，将美国政治转向了好战路线。杜鲁门向他的军队妥协，于8月6日和9日向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据称是因为这样可以拯救数十万美国士兵的生命（时至今日这一行动仍备受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投放原子弹应该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和优越性，震慑苏联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令西方同盟国没有预料到的是，苏联红军已经向中欧进军直逼易北河，如果早些开辟斯大林所要求的第二战场，这本是有可能被阻止的。苏联人攻占了纳粹帝国的首都，干涉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事务，还占领了中国的满洲里和北朝鲜，杜鲁门意欲采取强硬的姿态，同时也阻止苏联进入日本。

1945年9月10日，布莱希特在美国的《工作笔记》中写道：“原子能借原子弹合乎时宜地进行了自我介绍，对‘普通人’而言它的触动是十分可怖的。对那些焦急等待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归来的人们而言，

对日本的胜利因此变了味道。这个超级屁压过了所有胜利的钟声。”在《一个角色的塑造》中，布莱希特也曾回忆，投放原子弹的那天对“每个在美国经历此事的人而言都是难以忘怀的”。关于《伽利略传》他也曾评论：“从今天到明天，我重新阅读这位新时代物理学奠基人的传记。”重新是因为伽利略背叛了他的学说，使其被贬低为神秘学。自此，知识被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少数几个实施者就能造成极大的灾祸。只有一架飞机，共载有13名人员，其中主要是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还有一名庇佑他们的牧师，这已经足够在广岛摧毁城市的80%，立即夺取了近20万人的生命，给12万人带来了严重的身体伤害，使他们在随后的几年中因此身亡。

1945年8月15日，在没有作者获悉或同意的情况下，卡尔-海因茨·马丁（Karl-Heinz Martin）在柏林黑贝尔剧院（Berliner Hebbeltheater）首次于战后上演了布莱希特的戏剧《三毛钱歌剧》（非此其谁）。由美国占领区官员因“再教育（re-education）”事宜而任命，马丁担任柏林一座保存较完整剧院的经理，从而可以以这出传奇歌剧庆祝自己的就职，这也是纳粹禁书目录上首屈一指的剧目。根据美国占领区官员的意见，戏剧是尤为适宜文化宣传的工具，来实现使德国人民永远克服法西斯主义的目的。虽然这在当时是重新活跃戏剧的伟大机遇，但布莱希特对此并不以为意，因为纳粹时代对表演艺术的破坏使他明白，他的剧作只可能不如人意地被搬上舞台。美国人的“再教育”是一次政治教育计划，很快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分别采纳，并改革为“再造（reconstruction）”和“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计划，它们认为民主行为和个人责任在和平和自由中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所以必须给德国人上这一课，以使他们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

《三毛钱歌剧》不仅是纳粹统治之前最著名的剧作，而且适宜以快速、娱乐的方式复苏德国批判性的社会文化。德国人对挽救经典艺

术有巨大的需求，这在每每售罄门票的演出中也得到了证实。仅仅在战后的第一个冬季，黑贝尔剧院就能容纳500名观众，每天都有500人不惜徒步穿过完全被炸毁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区域，只是为了能再次欣赏到不被意识形态所沾染的戏剧。演出持续了半年有余。布莱希特所听到的却是另一幅情景，他1945年9月25日写道：“我们听说，柏林在上演《三毛钱歌剧》，场场爆满；但之后由于苏联人的干涉遭到了取消。作为抗议，英国广播公司（BBC，伦敦）引用了谣曲《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我本人不会同意演出这一剧目。在没有革命运动的情况下，它传递的‘信息’纯粹是无政府主义。”

这一虚假消息可能同德国共产党干部汉斯·延德雷茨基（Hans Jendretzky）对卡尔·海因茨·马丁的直接批判有关，文章刊登于8月18日的《德意志人民报》（*Deutsche Volkszeitung*，柏林，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这部《三毛钱歌剧》，如今上演面向的人群，他们不辞辛劳地在废墟中投身国家的重建，迎着成千上万的困难克服十二年来的思想荒漠，对于这些人，舞台上不可以也不允许喊出‘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当然，第二天弗里茨·艾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便在同一地点附和了延德雷茨基的看法，艾尔彭贝克假惺惺地问道：“1945年，更确切的是1945年的8月，在一流的剧院上演带有流氓无产者倾向的作品，这是否代表了观众和剧院的文化政治利益？我们认为：不。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在艺术享受上也是。”

战后的文化“复兴”便是如此：布莱希特断定了革命运动的缺失，延德雷茨基认为德国面对的首先是废墟中的精神低谷，而艾尔彭贝克毫无疑问地只推崇共产主义艺术，却不知道这一艺术的内容应如何展现。德国流亡者几乎还没有从莫斯科返回，就已经再次陷于原本的争论和对立中。好似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一样，德国共产主义者立即为德国人“原本的善根”（类似托马斯·曼所说的“善”）做起了文章，在重新思索人性价值后，“善根”会再次发挥作用。这一文化理

解同美国的教育计划恰恰背道而驰。对共产主义小市民而言，在这一点上他们不需要学习。在布莱希特未在场的情况下，关于他以及他作品的争论便已开始。

“新德国”如此迅速又如此秘密地修建了干部居住区（直至东德结束的“万德利茨沃尔沃格勒”^[48]），这在阿尔弗雷德·坎托洛夫斯基（Alfred Kantorowicz）流亡美国返乡后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展现。坎托洛夫斯基很期待能再次见到约翰内斯·R. 贝歇尔，因而在1946年末至1947年初的冬天被柏林广播电台的一辆车送往潘科

（Pankow），更确切地说是下逊豪森（Niederschönhausen），这里“依照战争的规格设置了路障”，路障在苏联占领区的帮助下被轻易建成。司机曾是空军军官和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提前就防备性地提示坎托洛夫斯基注意相关手续，为了抵达以重武器把守的区域必须呈递通行证、证件号、时间、陪同人、企图和请求等。在坎托洛夫斯基最终进入了这一区域后，却“发现了一个邪恶的政党秘密委员会”。贝歇尔就像在干部会议上那样说话，必须“避免每一个口误”，他的愤世嫉俗也完全失去了幽默感，但他离权力中心更近了，因为皮克

（Pieck）、乌尔布里希特（Ulbricht）、格罗提渥（Grotewohl）、弗兰茨·达勒姆（Franz Dähle）“及其他数十名政要都是住在这一特殊区域的邻居”。布莱希特的名字也被贬低为不可信之人，简言之：“他恶毒的言论是赤口毒舌。”当大家开始就餐后，坎托洛夫斯基小心地询问，是否他在外面寒风中等待的司机也有充饥的食物，贝歇尔太太被触怒了，表示她无法照料每一个（随从的）司机。在回程的路上，司机评论道：“您必须习惯这一切。这是新的处事方式。”

布莱希特也将很快亲身体会到这种处事方式，即使并非直接面对共产党的首脑“乌尔布里希特派（Gruppe Ulbricht）”。这一小组4月底被苏联人派往柏林，以便于那些尤为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们能在苏联占领区，特别是柏林担任管理性和政治性任务。而头一件事，他

们就在远离废墟之地，在老旧的封建庄园上安家落户，动用一切手段让这里一应俱全。

当时正是“关爱包裹（CARE-Paket）”时期，德国人民正忍饥挨饿，因此必须得到一些救助。不允许向纳粹德国派送救助物资的禁令也在1945年12月被废除。CARE是“美欧汇兑合作组织（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的缩写，这些包裹最初是“标准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包含一最初作为食品包裹（由于短缺，德语称其为“Fress-Pakete”）一各种必要的食品，从黄油到肉类再到奶粉，还有少量的巧克力或者葡萄干和糖。1947年初，布莱希特在长时间四处询问之后得到了格奥尔格·范策特（Georg Pfanzelt）的地址，也想过为其寄送关爱包裹，因为范策特在信中向布莱希特描述了那个漫长而艰苦的冬天：没有煤，只有木柴，但也只够做饭用，无法用来取暖，电也按小时供应。

此时布莱希特收到了从欧洲和德国寄来的第一批信件。彼得·苏尔坎普在1945年秋来信。回信中，布莱希特回忆起，苏尔坎普是他在德国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国会纵火案的第二天，我从您家前往火车站；流亡期间，我一直没有忘记您的帮助。”直至1943年，彼得·苏尔坎普仍让拜尔曼·费舍尔（Bermann Fischer）留下的S.费舍尔出版社正常运转，但后来苏氏因所谓的谋反和叛国罪被盖世太保拖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KZ Sachsenhausen）。苏尔坎普在那里身患重病，但经阿尔诺·布雷克的许可而被党卫军释放：一次绝无仅有的情况。苏尔坎普是第一批得到占领国颁发执照的出版商之一，而且同布莱希特再次建立了联系。

经过数月的调查，布莱希特最终查明了卡斯帕尔·内尔的地址，并立即提出了合作请求。内尔二战期间留在了德国，纳粹时期他通过制作现代音乐剧和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49]打造

的低俗戏剧巧妙地躲过了灾祸。在1946年10月的一封信中，内尔向他战后初期在瑞士工作两年多的朋友建议，留在国外；回到德国不会有任何益处。“根据我在这里获悉的一切，要对东部有所了解还需要几年；这自然很糟糕，但最好对此要作好准备。卡斯。”内尔建议，两人最初应该在瑞士或者意大利北部继续之前的合作，在当地准备德国的排演工作。对此，内尔的舞台设计是不可或缺的，他还在12月份补充道：“我个人坚信，我们要再次创造一种戏剧；这只有我们两人可以做到。”

沃尔夫冈·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f）1946年担任柏林德意志剧院的经理，他厌烦了在舞台上展现正风靡一时的法国存在主义悲观主义，因此向布莱希特寻求帮助，想说服他尽快返回德国。“在荒漠中，对德国诗人的呼唤正逐渐消失，贝尔特·布莱希特在德国默默无闻。”布莱希特对上演自己剧作的要求回答得十分克制，他没有表示赞同。在上述给苏尔坎普的信中他也清楚明白地确认，他的任何作品，“无论新作还是旧作”，在他不发表意见的情况下都不要上演：“一切都需要改变。”

戏剧的地位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确定。1946年8月，布莱希特对埃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他而言，现在的没落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因而是次要的：“各类艺术中的新鲜元素必须经过不同的人来论证，而且要注意不要从冰箱中取出那些旧物。雄辩者的民族剧院里因此有着一些乌托邦的东西，过去人们也设想过乌托邦，它是陈旧之物。”大家必须坚定思想，放弃任何一种“心中的萦回”（我们头脑中对古老而美好时代的欺骗性影像）。从此，正确地“将市民自然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视为新戏剧的开端；为了实现‘伟大’的时代戏剧，我们必须回到比易卜生更久远的时代，即资本主义革命的时代”。此处已经暗示了布莱希特想在欧洲

坚定贯彻的戏剧纲领：先对过去进行结算，然后再思考未来。乌托邦？已陈旧。

不，我是，我是，我觉得，确实，是

瓦伦丁式的表演：自我否认作为自我维护

HUAC面前的布莱希特

1947年夏初，布莱希特已经决定离开美国返回欧洲。但9月19日，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传讯布莱希特，这是美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极端进程，原则是共产主义无非是红色法西斯主义，因而必须像感染或瘟疫一样从健康的头脑中根除（纳粹语言）。这首先涉及了所谓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好莱坞，即美国的电影工业，它面对广大公众，因而必须坚决支持效忠美国。

1947年10月23日，布莱希特被召唤到了华盛顿，事实上审讯10月30日才进行，布氏被告知，没有HUAC的允许，他不准离开美国。因此，返回欧洲的计划又问题重重，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审问官罗伯特·E. 斯特里普林（Robert E. Stripling）把汉斯·艾斯勒称为“音乐界共产主义的卡尔·马克思”，从艾斯勒那里布莱希特得知，审问中艾斯勒表现倔强，审问结束后，HUAC禁止艾斯勒出境。汉斯·艾斯勒的哥哥格尔哈特·艾斯勒确实是德国共产党的知名人物，而且由于长姐露特·费舍尔（Ruth Fischer）伪造护照被揭发，格尔哈特也两次入狱。布莱希特同汉斯·艾斯勒的合作众所周知，因此他也有被株连的危险，而且约翰·埃德加·胡佛还向HUAC恶毒诬蔑布莱希特，胡佛的特务也参加了审问。

虽然不能预见HUAC的审问会有何后果，但布莱希特一家仍搬离了好莱坞，10月16日和17日乘火车前往纽约。布氏一家携带了迪亚特尔

夫妇准备的“关爱包裹”，旅途上布莱希特也感谢地写道：“已经是第二天了，我还在吃你们给的肉、糖、蛋糕、自家烤制的黑面包和你们家奶牛出产的黄油——一次机车上的盛宴。/火车上人不是很多，大兴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各站的商店里物价都上涨了。每一次战争的失败者都是老百姓。/你们的布莱希特夫妇。”在纽约，布莱希特居住在赫尔曼·布得茨斯拉夫斯基（Hermann Budzislawski）处，布得茨斯拉夫斯基曾任《世界舞台》和流亡期间《新世界舞台》（*Neue Weltbühne*）的主编，其中也刊登了布莱希特的文章。布得茨斯拉夫斯基在纽约担任专栏作家。1944年2月德国左翼人士在纽约为焚书举行纪念活动，布莱希特与布得茨斯拉夫斯基相遇、结识，日后两人共同参与了“民主德国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在审问中应该如何表现的问题，布莱希特说：“我们练习一下。我给你我作品的样本，你盘问我。”布莱希特也向已经经历过审问的汉斯·艾斯勒询问，让他列举所有被问到的问题，以便有所准备；艾斯勒认为，这些问题都遵循某种既定模式，这一模式是可以摸透的。

在此之前，布莱希特也做了预防措施，即便HUAC禁止，也设法逃往欧洲；虽然一切后果并不严重，但最终仍是一场逃亡。10月26日，布莱希特与T. 爱德华·哈姆贝尔顿（T. Edward Hambleton）——一名艺术资助者，布莱希特把美国版《伽利略传》的版权卖给了他——和约瑟夫·洛塞一同从纽约前往华盛顿。10月31日飞往巴黎的机票已经订好，他们出于谨慎还计划一切情况都报哈姆贝尔顿的名字，仅仅在飞机起飞前才确认布莱希特的身份，但这些小心谨慎最终幸好是多余的。10月30日审讯开始。

首先必须有合适的衣服。布莱希特选择了端正的深色西装，白衬衣，深色领带，一袭正统、顺从的市民形象。布氏决定以极慢的速度说话，好似在艰难地寻找每一个词，给人以自己英语水平不足的印象，也好像有些愚笨、反应迟钝。这导致了布莱希特最初就被迅速问

道，是否需要一名翻译员，布莱希特对此表示了肯定。而翻译说话极为含糊不清，以至于必须一再继续追问（这又偏离了原本的话题），给了布莱希特时间。斯特里普林和J. 帕奈尔·托马斯（J. Parnell Thomas）一众议院代表——作为主席提出问题。最初的几个问题就出现了偏差（根据德语翻译）。被问及出生日期，布莱希特开始慢而费力地说出一个个数字，先是“19……”，停顿，然后是“1898”，被要求再重复一遍，他又说“89”。稍后斯特里普林从卷宗中读到布氏是1888年2月9日出生：“这正确吗？”布莱希特回答：“是的。”几经周折才最终确定是1898年。

不实谰言对布莱希特也并不困难，因为他发现，某些答案委员会完全无法查证。例如有关阿尔弗雷德·坎托洛夫斯基的问题，在坎托洛夫斯基的杂志《东与西》（*Ost und West*）中，1947年刊登了《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中《犹太女人》（*Die jüdische Frau*）一幕；被问及是否认识坎托洛夫斯基，布莱希特据实表示了肯定，又被问到是否知道这位坎托洛夫斯基先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布莱希特又典型而迂回地回答：“当我在德国遇到他时，我认为他是乌尔斯坦出版社的记者。这家出版社原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一家共产主义报社，而且并没有发行过共产主义性质的报纸，因此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德国共产党党员。”当然，布莱希特其实知道实情。对于“布莱希特先生”在美国“是否曾参加过共产主义政党的集会”这一问题，他回答：

“不，我认为没有。”当被追问是否确定时，他费力地说：“不，我……我……我认为，确定，是的。”如果去除布莱希特在这次审问中多次使用的（类似拉长音的“嗯……”）“我认为”，他在美国公众面前首先也是一位可信之人。

这些布莱希特都用一种正直而无辜的语调讲述，因而没有人会想到他其实在委员会面前演了一出瓦伦丁式的闹剧。但他成功了。对于核心问题他如此回答：“我听我的同事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合

规，但我是贵国的客人，不愿陷入任何一场司法纠纷；因此我也会完整地回答您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从不是党员，也不是任何共产党的党员。”最后，委员会主席向布莱希特表示感谢，并向他证实：“您是所有证人的优秀榜样。”他胜利了。

被传唤的其他美国作家和艺术家成了历史上的“不友好十九人”，因为他们决定抵制审问，向媒体揭露真相—HUAC本身就是“非美的”。他们还决定对于是否或曾经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保持沉默。最终这些“不友好人士”中的十人因拒绝作出陈述而被HUAC宣判了一年监禁和1000美元罚款，对他们中的一些而言，这是毁灭性的打击。

在案件中，布莱希特虽然一再被提示美国法律也适用于他，但事实上，律师们在多次谈话中也一致认为，布莱希特可以据实回答问题。1947年11月布莱希特在给艾斯勒的一封信中也强调：“此外，从报纸报道中我看出，一些记者猜测我在华盛顿表现得极为骄横；事实上我不过是听从了6名律师的建议，他们建议我实话实说，对其他事闭口不言。像你一样，我也没有考虑过拒绝陈述，你同样也不是美国公民。”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在11月20日的信件中对布莱希特这次典范式的登台首演作了正面评价：“您全部的作品也没有像这些机警的语句一样带来如此之多的关注度和成功。从托马斯·曼到我的园丁，全世界都赞赏其中的创意。”因为布莱希特“尤为老练和有效”的陈述令记者们追捧，因而能在广播中一再听到（其片段）。这位老战友立即认识到，布莱希特是如何巧妙地躲过了这次潜在的危险：利用他的戏剧手段。

布莱希特立即返回纽约，此刻施特凡也到达了纽约。施特凡决定留在美国，在波士顿继续自己的学业。施特凡当年23岁，但已经可以独立决定如何规划自己将来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内部没有对

这一决定进行讨论，而是表示认可和尊重。事实上施特凡·布莱希特一直是美国人，也越来越具有美国特色，踏上了“美国之路”，还于1980年代写了有关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戏剧的著作。

对联邦调查局而言，布莱希特前往欧洲又是一次当头一棒。胡佛等待着审问的结果，如若布莱希特能脱身，其已经计划11月传唤他来“访谈”，目的是将布氏驱逐出境。这一传讯令11月12日到达纽约特勤人员手中，但布莱希特当时已经离开了。布氏正确地审时度势，险些已经没有了逃离的时间。1947年12月2日，在获悉了布莱希特此时身处瑞士之后，胡佛向中央情报局写了封长信。他自然认为，布莱希特不仅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其作品也推动了共产主义宣传，代表激进的观点。此外，他还猜测，布莱希特会在德国东部安顿下来，在那里“为共产主义思想”效力。中央情报局表示会观察“目标”，跟踪“目标在欧洲具有苏维埃情报性质的活动”，并立即汇报。事实上，如果布莱希特想重返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传达信号，立即将其逮捕。因此，布莱希特的儿子虽然是美国公民，但他没有与其在美国相见的机会，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没有。

[1] “Giftzweg”在德语中多指因自己个子矮小而故意凶恶对待他人以取得心理平衡的人。

[2] 德国传统的供儿童游戏的设施，由石头或者木条搭建框架，里面放满沙子。

[3] 出自哥伦布的一则轶事。有些贵族瞧不起他，认为只要坐船出海，谁都会碰到那块陆地。一次宴会上，哥伦布让讥笑他的人把鸡蛋竖起来，没有人成功，而哥伦布把鸡蛋壳敲破，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他说我能想到你们想不到的，这就是我胜过你们的地方。因而德国有一句俗语“das Ei des Kolumbus”，即“哥伦布的鸡蛋”，意为解决困难问题的简易方法。

[4] 根据十四行诗的韵律应该是“Ficken”，性交。

[5] 希腊神话中的生殖之神。

[6] “Carrefour”是法语词，德语中对译的“Kreuzweg”也指耶稣受难之路。

[7] 有“乱画、乱涂”，也有“欺骗、使上当”之意。

[8] 色当会战（Schlacht von Sedan）发生于普法战争时期，普鲁士俘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及其军队，决定了普方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

[9] 原苏联国家机构劳造营管理总局，日后成为苏联政府镇压异见人士的工具。

[10] “希特勒曼（Hitlermann）”是对希特勒和德国的一种讽刺性表述。

[11] 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为支持佛朗哥而下令组织的军团，成员来自当时的德国国防军。

[12] 原文为“Denen der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zu heiß geworden ist”，系德语固定用法，意为“某地不是逗留之地，某地对某人太危险”。

[13] 1920年代创立的纳粹反犹报纸。

[14] 语言学上称犹太德语。

[15]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警察机关，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1946年改称内务部。

[16] 原文为“Hayschnupfen”，将“Heuschnupfen”（花粉热、花粉过敏性鼻炎）中的“Heu”替换成海伊的姓氏。

[17] 主要由尼尔斯·波尔和海森堡于1927年在哥本哈根提出，尝试对量子力学带来的一些复杂问题进行解答，例如波粒二象性和测量问题。

[18] 特洛伊的英雄，安基塞斯王子与爱神维纳斯的儿子。

[19] 戏剧评论家，作家。

[20] 布氏版德语原文分别为“Wird da auch gesungen werden?”和“Da wird auch gesungen werden”，两句只有da和wird的位置不一样。

[21] 纳粹德国于1939年在捷克西部建立的保护国，随纳粹德国战败而灭亡。

[22] 公元前1世纪罗马将军和执政官，参加过多场重要战役。

[23] 古代小亚细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在黑海南岸。

[24] 1935~1941年德国学校使用的德语手写体。

[25] 原文为“Heinzelmännchen”，即传说中身材如侏儒，在人们睡觉时助人做事的神。

[26] 皆为同时期德语国家演员。

[27] 又称“长剑之夜”，是发生于1934年6月底至7月初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处决，恩斯特·罗姆被杀。

[28]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之间爆发了苏芬战争，芬兰战败，被迫割让部分领土，双方最终签订《莫斯科和平协定》。

[29] 苏联同芬兰之间1941年6月至1944年9月的战争，芬兰认为它是“冬季战争”的延续，因而称其为“继续战争”。

[30]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希腊军队围困特洛伊时，经常挑衅阿伽门农，后被俄底修斯痛打。

[31] 原文为“God's Own Country”，指加州。

[32] 本都国王，罗马共和国末期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政治人物，罗马最著名的敌人之一。

[33] 法国最大的天主教朝圣地。

[34] 黄色六角形标志，是纳粹德国统治期间，在纳粹影响下的欧洲国家内的犹太人被迫戴上的识别标记。

[35] 即美国免费向英国、法国、中国、苏联和其他同盟国提供粮食和军需物资的法案。

[36] 党卫军的重要成员，地位仅次于希姆莱，因行事极为残酷，有着“金发的野兽”“纳粹的斩首官”“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许多称号，希特勒有意培养

其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在1942年5月27日夜同盟国的“猿人作战”中，其被英国派遣的捷克特工暗杀，于6月4日身亡。后希特勒展开疯狂报复，下令屠杀捷克利迪策村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村民，此次惨案即为6月1日国际儿童节的直接由来。

[37] 这部影片即《刽子手之死》（*Hangmen Also Die*, 1943）。

[38]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著称于世。

[39] 德国在二战期间向挪威和丹麦发动的袭击，代号“Weserübung”。

[40] 德国19世纪的著名画报杂志，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一般刊登可供全家共同阅读的文章。

[41] 西方的一种诗歌体裁，源于古希腊的挽歌。

[42]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随处可见的标语，意指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假看护之名，行侵犯人权、实施暴政之实。

[43] 莫尔道河即捷克语所称的伏尔塔瓦河。

[44] 即查理曼大帝。

[45] 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纳粹时期由大地主、大工业家、银行家、国家部门高官等组成的协会，在提名希特勒成为国家总理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46] 俄罗斯东部城市，二战期间苏德战场在此地爆发过两次重要战役，分别在1941和1943年。

[47] 根据李潜夫著名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改编。

[48] 万德利茨（Wandlitz）坐落于东柏林北部，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大多数官员居住于此，过着相对奢侈的生活。1980年代开始被民间称为沃尔沃格勒（Volvograd），因为这里的人逐渐不再使用苏联的海鸥轿车，而乘坐瑞典的沃尔沃汽车。

[49] 纳粹德国的一个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其基础为由血缘相同且有着相同命运和相同政治信仰的民族来构成共同体，其阶级敌人为外族人。成为民族共同体一员的必要条件为雅利安人，另外还需承诺忠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

德国的后果（1945/47～1956）

这个星球即将爆裂/它所制造的，将会摧毁它

无法了结历史：只能（暴力）解决

居住和工作之地毫无希望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曾隶属“莫斯科派”，所以在莫斯科得到了同志们（皮克、阿普勒金、巴尔塔）的宽容。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战后再次于柏林从事文化政治工作，在1947年3月致埃尔文·皮斯卡托尔的信中，他如此评价自己的同胞：“你完全是个不可饶恕的乐观之人；我为我的国家而几经周折，先是万恶的韦尔内（Viernet）集中营，然后是三年的前线抗战，匆匆忙忙地回家；但像我们这样一个自负、不可教化的民族，在整个星球上也绝无仅有！旧势力四起；如今自然是民族主义政党占绝对多数，民主局势因而也相应展现了这一特征；谁如果不愿自缢身亡（即便如此也应该由其他人来施行），必须搏斗和撕咬。”沃尔夫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组织人民舞台的重建工作，他邀请皮斯卡托尔——“在我吊足了你对日耳曼的胃口之后”——担任新人民舞台的导演。

除了是一名成功的作家，沃尔夫还是共产主义的文化官员，他信中选用的词汇引人注目。其中的美国化词汇已是不同寻常，因为当时同志们原则上都完全不懂英语。对战后“日耳曼”的评价在整体上也是全盘诋毁，沃尔夫针对的并非工人阶级，而是整个民族，在希特勒

之后，他们大多数依旧以愚蠢的方式坚持着民族主义思想倾向。这个国家一再对自己的人民宣布严酷的斗争，先是为了民主，之后或许是为了某个类似社会主义的目标。

沃尔夫在信中的表述第一次证实了，为了自上而下地引入社会主义，那些（看似）成功的德国人从苏联返回，他们乐意忽视那些仍居原职的旧纳粹人士的罪行，只要这些人愿意合作。1946年12月，沃尔夫就在《论德国新戏剧学》（*Um eine neue deutsche Dramatik*）中明确表示，反法西斯作家已经被迫转为守势。为了人民舞台的革新，莫斯科官员立即贯彻自身的观点，他们的政治与文化视野都十分狭隘，无法认识到反法西斯和社会批判艺术会比共产主义教条的宣传队—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取得更大的成就。类似建设人民舞台这样的小项目也引发了巨大纷争，原本的合作分裂为东方（亲共，媚俗）和西方（小市民、娱乐性）派别，并各自成立了自己的人民舞台。东部人民舞台最初坐落于德意志剧院，而后迁入船坞剧院、位于施特格利茨（Steglitz）的提塔尼亚电影院（Titania Palast）的自由人民舞台，即最终的选帝侯大街剧院。

在美国，杜鲁门政府好战并反苏，这一政治变革也转嫁到了战败的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欧洲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一去不返。一方是苏联，另一方与之对峙的是美国、大不列颠和同其联盟的法国。苏联征服了东欧和中欧，苏联红军镇压或遏制当地为本国国家革新而奋斗的各项运动，以对其实施控制，或者令其加入苏联；前者涉及了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而后者是乌克兰和整个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1945年7月17~25日的波茨坦会议上，“三巨头”——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还能就不对德国进行分割达成一致。布莱希特在8月3日的《工作笔记》中评论：“波茨坦会议的德国计划，最重要的是：确定了经济（和政治）的统一。即使要花费些努力，这一时期也要记住，德国是一个完

全被压倒在地资本主义国家。如若苏联凭借一己之力战胜了希特勒德国，只有这样他们或许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工人政府，而且即便如此也很难发展成社会主义。”这或许意味着，布莱希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对社会主义有所预计。

但当年年末，大家为之忧心忡忡的德国分裂已经渐露端倪，特别是丘吉尔，当初仅仅是为了反对希特勒而结盟，才搁置了对共产主义明确的反对，如今苏联的领土要求使其观念转变变得合理化，虽然对外仍是盟友，但丘吉尔已经对这一共同战胜国怀有了一切不信任。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Triest），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铁幕之后，莫斯科越来越强烈地操纵着看似被解放了的人民的命运。在其他占领区，战胜国之间不同的政治观念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美国认为，应该以改良的方式继续实施1924年曾取得过成功的道威斯计划（Dawes-Plan），也就是说，通过分割卡特尔（Kartelle）^[1]来扶植德国工业，必须投入的资金从而可以凭借产品得到回笼。苏联则选择自上而下地建立社会主义—以所谓“革命”的方式，剥夺了工业企业以及大量地产，而且还十分没有意义地把企业拆除，把这些本质上已经老旧的一技术设备运往苏联，在那里重建，但这些技术设备在苏联也不能或者仅仅很勉强地运行。

为了所谓的“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美国进行了长时间的问卷调查，也帮助老纳粹恩斯特·冯·萨罗蒙创作了自己最成功的自传性作品《问卷》（*Der Fragebogen*, 1951）。萨罗蒙用玩世不恭的调侃嘲弄了这次调查，自然也没有“揭露”自己与纳粹的纠葛，反而表现了他的自负，用尼采的方式祭奠快乐虚无主义。这部作品是战后的文学纪实，证实了美国人的问卷并无太大意义，而真正的

纳粹则没有被缉捕。另一方面，苏联人虽然全面惩处纳粹，将他们赶出原本的岗位，但仍保全了那些自愿做自己帮手和执行人员的纳粹分子，反而迫害那些从未为纳粹服务、从未同情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即社民党人、神职人员和自由党人，因为他们拒绝为建立专制社会主义效力。这些人直至1948年还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身陷囹圄，这次，看守是苏联人。

对战后的布莱希特而言，特别之处在于他现在可以直接继续使用反抗纳粹的文学手段和技术。如果这些形式确实适用，那么它们至少能证实，在布莱希特的理解中，一切（几乎）都未改变。很多人都在讨论德国投降后所处于的“零点时刻（Stunde Null）”。如今已经明了，文学并未发生变革，面对经历过的残暴，当时的文学趋势选择脱离现实，作家们要么转向形而上学，要么重提完满的古典主义。德布林1945年曾对此发表过“恰当的”言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个事件，曾经由于实证主义和科学变得过于清晰，如今又浸入了神秘之中。”相应的，他也把文学放置于政治及其反常情状之外：“那里接近神性，由于神性的严肃、敬畏、真实和崇高，艺术之歌走向了不同的曲调。竖琴必须重新调音。这不是阶级、民族和个人孤僻的时代。这个时代，再一次，而且绝非最后一次，抛出了对人性的追问。”

布莱希特以《斯文德堡诗集》中《德意志讽刺诗》的新版本对此作出了回应，这一诗歌形式抨击了纳粹的过度宣传，并将其拆分为各个可以认知的部分。1945年末布氏（已经）写了《被玷辱的战争》（*Der Krieg ist geschändet worden*）：

我听闻，上流社会在谈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道德层面上

并未达到第一次的高度。

国防军应该悔恨

党卫军为了灭绝某些种族而采取的手段。

也就是说

鲁尔区的巨头在控诉这血腥的驱赶

使他们的矿井和工厂充满了奴隶。

我听闻，

知识分子谴责实业家对工人奴隶的苛求和虐待。

即使主教也斥责如此进行战争的方式。

简言之，现在到处充斥着这一感觉，

可惜纳粹帮了倒忙，

战争本身是必然和必要的，

但由于发动战争猖狂、非人性的方式，

才使其遭到长时间的诋毁。

布莱希特诗学批判的核心针对虚假的道德，它拒绝承认那骇人听闻的现实，即纳粹帝国践踏整个世界，使5500万人丧失了生命。在柏林的废墟中，汉斯·延德雷茨基首先看到的是德国的思想低谷，因此，大发战争横财的人、工业巨头、重工业企业家、奴隶工厂的经营者、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教会上层，甚至市民知识分子都在用道德上的忠诚进行自我谴责，以求得赎罪，重要的是，只求不被从他们的产业、地位和职务上驱赶下来。

约翰内斯·R. 贝歇尔用类似纳粹的语言，要求德国进行“涤荡和净化”，因为德国人现在获得了机会，“将所有病态的、敌意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切除”，解放“作为自己本质的拯救性本体”的“健康力

量”。布莱希特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即1943年5月告知布得茨斯拉夫斯基，维兰德·赫茨费尔德正打算建立一个袖珍图书出版社时，就曾建议，组织印刷“一系列十分简洁的小册子”。这些袖珍书应该由飞机在整个德国投放，“用‘教育’的大规模空袭来了结希特勒，这不仅是战后教育，也是反战教育（同盟国的飞机给德国带回了它的文学）”。布莱希特以此表达了自己战后的纲领，德国人大部分不仅必须被改造，而且还必须从根本上祛除他们的军国主义思想。

布莱希特因此进入了一种文化政治的窘境，直至他盛年早逝，这一窘境都对其影响深刻。布氏决定，将自己未来的创作毫无保留地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反对那场战争。此外，现在也到了对德国语言进行一次“语言清洗”的时代，这不仅要在昏暗的时代避免那些把生活描写为圆满与感性的表达，更多的是祛除德国人身上由于空洞而高涨的激情，使那些大肆张扬以及对内省、移情等心理状态的召唤受到嘲笑的惩罚。

就“语言清洗”而言，布莱希特1940年8月在他的芬兰箴言诗中发现了有关德国诗学发展的内容，在歌德之后，语言“美妙的辩证统一”分裂成了（海涅的）“平俗”和（荷尔德林、格奥尔格、克劳斯的）“主教般的庄严”。“平俗”这条线愈发意味着语言的衰败，而格奥尔格则“在藐视政治的面具下，完全、公开地反革命”，他的语言毫无感性可言。克劳斯的语言“由于其纯粹的精神性”而同样“毫无感性”：“格奥尔格是教权封建主义的，对他而言，宗教即‘异教’；克劳斯具有激进的批判性，但又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由上述评价可以反证得出布莱希特的语言观：清晰、非千篇一律，带有“词语间的张力”，感性、诙谐并且在以下两个意义上做到精确：睿智和幽默。

在战争和奥斯维辛之后，文学如何能“经受住”这些事件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意识形态上的两极——托马斯·曼和约翰内斯·R. 贝歇尔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复思考。托马斯·曼深入地考量了语言和语言批判问题，并将想法应用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论性阐释。曼式语言批判思考了语言的边界及可能性问题，而并非探求语言很可能无法胜任的对事件的展现力。那些“变成巨兽的土鳖”将他们被摧残了的头脑中的想法付诸实践，之后，卡尔·克劳斯关于语言是否“贴切”的问题就变得十万火急了。

就这一问题，曼借助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怀疑性的语言批判作出了如下决定：语言在事实上根本不具备再现功能，因为所有成为语言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语言模式。在托马斯·曼后期小说《被挑选者》

（*Der Erwählte*, 1951）中曾有言：“人类的生活在破旧不堪的模式中迷失，但仅仅是言语变得陈旧而传统，生活本身总是崭新而年轻的，除了陈旧的语言叙事者很可能一无所有。”这一处时常被误解为普天之下再无新鲜事，其实是点出了一个语言问题，即现代叙事者能够支配的，从本质上看，也只有被遗留下来的语言资源。相应的，托马斯·曼也令自己的小说由一个无人称的“它”进行叙事，“它”是“叙事思想”的精神化，并在爱尔兰僧侣克莱门斯（Clemens）身上得到了体现。

对于语言工具是否可能“贴切”事实的问题，此类的语言理论无法回应，因为“事实”刚刚发生，而且是闻所未闻的，也确实使语言丧失了表达能力。语言在生活上烙印了自己的模式，因此，“后来者”也只能再次讲述旧的故事，对其进行“阐发”（扩充、发挥）和“详细化”（修饰、拓宽），正如托马斯·曼在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和《被挑选者》中所做的，这些作品甚至让曼的追随者们也或多或少地失语了。

那么约翰内斯·R. 贝歇尔呢？他1950年在日记《另一种巨大的希望》（*Auf andere Art so große Hoffnung*）中宣告：“失败可以成为触发国家涤荡和净化的契机，因而可从失败中萌发果实的成熟。认识失败真正的意义，意味着为失败的悲剧性争取良好、有益的一面，那令人极度沮丧的力量将成为动力，令一切在荒废中崛起。”引文似乎措辞崇高、能激发高尚的思想，但完全是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语言，除此之外，贝歇尔的思维中仅仅只有不合时宜的旧概念。纳粹的罪行和“悲剧性”可有任何关系？在为民主德国创作国歌时，贝歇尔也只有“在废墟上崛起”这样的一些鄙言累句。显然，1949年民主德国执政的小市民中没有人发觉，贝歇尔再一次把“新的德国”称为（世界的）“救世主”。这里不禁要问，汉斯·艾斯勒对布莱希特的文章能保持批判精神，为何为贝歇尔的作品谱曲时却不予干涉？

布莱希特辩驳道：“在奥斯维辛、华沙的犹太人居住区和布痕瓦尔德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无法对其进行文学形式的描写。文学毫无准备，也没有为这些事件发展出任何手段。”布氏这里表述的观点击中了战后文学原本必须面对的窘境核心，但战后文学却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布莱希特的表达也代表了自己语言上的不确定，例如“事件”一词被使用了两次，这一概念给人以某件事突然发生的感觉，无法表达此处那令人发指的程度。

西奥多·W. 阿多诺曾有一句被广为讨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布莱希特的记录早于阿多诺一年就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阿多诺1949年撰写了上述文字，发表于1951年，引发了一场完全同当前政治史现状不符的讨论。即使阿多诺提及了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但问题仍同对诗歌的反动理解相关。但讨论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阿多诺用“批判性理论”在联邦德国贯彻了一种艺术理解，借由这一理论的定语，它摆脱了传统的、市民性的艺术理解，贯彻了反抗

性的、本质上难以理解的艺术，例如保罗·策兰（Paul Celan）、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或者音乐领域的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将他们阐释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这类艺术缺乏沟通力，荒诞而拒绝任何意义，并以此将不可言说的新恐惧十分矛盾地表达出来。纳粹统治之前，布莱希特在阿多诺的事业中起到过作用，这在战后却停滞了，因为阿多诺陷于冷战两大阵营之间，不再被视为艺术家，而被假定为思想家。阿多诺毫无批判性地参与了这一过程，并宣称布莱希特热衷于时事的艺术绝对是伪艺术。

问题是，在这样矛盾性的不统一中如何寻找出路。对布莱希特而言，复辟希特勒权力下的社会关系是完全不可行的。无论如何，必须形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并且真正民主的，受大部分民众支持的德国新秩序；在这一观点上，布氏绝非孤军作战。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48年在致力于讨论“社会主义之争（Streit um den Sozialismus）”的《月份》（*Monat*）中阐述：“问题并非：社会主义还是自由？更多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措施来扩展政治民主。……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没有规定好的社会主义化模式，它知道，至少煤炭、钢铁、重工业和大银行必须转为集体所有。”作为德国艺术学会的主席，海因里希·曼1950年也作好了从东柏林前往民主德国的准备，原因是对联邦德国复辟的不信任。

当布莱希特1947年11月1日乘飞机降落在巴黎，他就已经明了“必须在德国之外也有一处安身之所”。布氏早已决定首先前往瑞士，而且此时也发现，在瑞士的逗留很可能会大幅度延长。卡斯帕尔·内尔在苏黎世剧院工作，可想而知，布莱希特首先是去投奔自己的老朋友。这座剧院在战争期间首演了至少三部布莱希特的戏剧，从而使布莱希特在欧洲没有走出人们的视野。布莱希特在苏黎世的首次报纸采访中就立即强调了自己首先对艺术感兴趣：“我不是以一名政治家

的身份返回德国，也没有意图参与每日的争论或者使自己被政治辩论纠缠。”

尽管如此，警察局外事处仍对布莱希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首当其冲的是一布莱希特在美国已经提出了请求一布氏及家人能够得到居留许可的问题，若答案是肯定的，能够停留多久？苏黎世城市警察的“迈埃尔四世警官（Kommissar Meier IV）”为此事“作出了贡献”，他尽力给苏黎世当局施加影响，拒绝发放居留许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瑞士作家联盟的表态：“布莱希特是德语诗人和作家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在我们国家一如同在国际上一样一享誉盛名，而且相当受欢迎。毫无疑问，值得为其创作减轻负担并提供任何资助。”因此，布莱希特及其随行人员得到了期望已久的居留许可，时间期限是1948年5月31日，并可以延期。

但对布莱希特的怀疑还在继续。由于维尔纳·乌特瑞希（Werner Wüthrich）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用两册书的篇幅进行了记录，本书这里只进行简短的概括。在布莱希特于苏黎世旁的费尔德麦伦（Feldmeilen）安家之前，伯尔尼警方就向苏黎世警察局发出了指令，“这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和戏剧作家布莱希特”要在苏黎世停留：“我们请求您处对其执行紧急秘密调查。”露特·费舍尔是艾斯勒兄弟的姐姐，已经演变为粗暴的反共分子，她毫无缘由地多次对布莱希特进行诋毁，因此布氏也被暗中监视，工作室里也被安装了窃听器；结果同在美国时一样：毫无所获。相反，暗中监视表明，布莱希特除了尽力维护和平外，不追求任何政治利益，也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瑞士如此疯狂地追捕可疑人士，同当时被称为“克里普托（Krypto）”的政治气氛有关——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共产主义者仍化身“披着羊皮的狼”，进行反抗宪法秩序的地下、隐秘战争。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预防措施，在“叛国罪既成事实之前”，抓捕那些共产党或者对他们有过同情的人。由于布莱希特一直同共产主义者

的标签纠缠不清，他也受到了威胁。此外，美国拒绝他进入西方占领区，因此在布莱希特个人身上，就进入欧洲这一问题，德国的分裂已经发生了。他应该何去何从？

在两德分裂的事情上，业已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提出了他的“杜鲁门主义”，据其内容，存在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一种是自由中民主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压迫中非民主的生活方式；十分明确，这两种生活方式分别意指何处。“杜鲁门主义”以美国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世界性要求，同时承诺“限制”所有极权主义体制，首当其冲的便是苏联[遏制政策（Containment-Politik）]。随着“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冷战开始了，美国也以此确认了自己管理世界道德的要求。对德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是1947年6月6日德国各州政府总理会议的失败。苏联占领区的代表要求，讨论并尽量决定组建德国中央政府，根据西方占领势力的指示，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于当年年初已经合并为统一的经济区—双方占领区（Bizone），后来法国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三方占领区（Trizone），被戏称为“特里措尼亚（Trizonesien）”，因此西方占领区的代表们拒绝了上述提议。1948年6月20日的新币制最终确定了德国的分裂，西方占领区实行德意志马克（Deutsche Mark, DM），每10元原帝国马克兑换1元新德意志马克，这意味着底层人民手中的钱或多或少地丧失了部分价值，而生产资料和田产的占有者们却实现了财富的增值。6月23日，苏联占领区随之推行货币改革，但推出的东德马克[Mark (DDR)，俗称“铝片（Aluehip）”]已经陷于劣势。

我的兄弟们/两人都被拖入了克瑞翁战争

抗击遥远的阿尔戈斯，两人都战死

游戏方式的损害：

为复制而做的台本范例

1947年11月9日，在苏黎世剧院当时的副院长库尔特·希尔施费尔德（Kurt Hirschfeld）处，卡尔·楚克迈尔、霍斯特·朗格（Horst Lange）、埃里希·科斯特纳、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亚历山大·勒奈特—霍勒尼亚（Alexander Lernet-Holenia）、维尔纳·贝根格吕恩（Werner Bergengruen）以及新加入的布莱希特举行了会晤，要起草一份呼吁。由于集会的几人设想能由各个国家的作家共同签署这份呼吁，布莱希特向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寄送了这份文件，因此它也在福伊希特万格的遗物中得到保留：“对新战争的预料使重新建造这个世界失去了动力，这个世界面临的不再是和平与毁灭的选择。那些对此尚不知情的政治家们，我们坚定地向他们解释，人们想选择和平。”在随之寄去的信件中，布莱希特恳求这位老朋友，在美国不仅要收集德国流亡者的签名，而且也不要忽略美国的同事。只有“德国名字构成多数”，这份呼吁才有意义。布氏还补充道：“随着愈加紧迫的警报，我们确认，欧洲不同经济体制的存在将会被利用，成为宣传战争的借口。”这些行为虽然出发点良好，但于事无补。

这时候如果能引人一笑，或许也可以鼓舞人心。苏黎世老城雾笛卡巴莱剧团的来访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剧团由维尔纳·芬克（Werner Finck）领导，芬克在纳粹统治期间，尽管反对法西斯主义，但仍懂得趋利避害，用自己的幽默迷惑当权者。试举一例，1935年戈林（据称是亲自）将他从集中营中释放。剧团上演了剧目《纯粹非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Unvernunft*），一个半小时的独角戏，其中采用了众多文字游戏，断句方式也使其内涵写作多重解释，以这种幽默、辛辣的方式，芬克叙述了自己生命中的一些章节。其中一节如此开始：芬克展开一张《柏林报正午版》（*Berliner Zeitung am Mittag*），并评论道：“如今出现了征兆和奇迹；正值春季，但树叶已经开始变黄。”或者另一处，芬克被关押和监禁，监狱

中也没有受到友好的对待。一位党卫军成员对他盛气凌人地呵斥：“您有武器吗？”芬克回问：“这里需要武器吗？”

埃里希·科斯特纳为（慕尼黑）《新报》（*Die Neue Zeitung*）撰写了该演出的剧评，并在其中对观众也给予了赞赏：“此处，作家先生们和苏黎世的观众在比着大笑。贝尔特·布莱希特是声音最大的，在笑这一领域他应该算作‘高手’。”无论是受到了这次演出的启发还是作为回赠的礼物，布莱希特撰写了诗歌《奥伦施皮格尔在战争中活了下来》（*Eulenspiegel überlebt den Krieg*）^[2]，为打字稿签上了名字，标注了日期：“苏黎世，1947年11月14日。”在到达后为数不多的几天里，布莱希特就准备好去适宜地评价与自己共同战斗的艺术家。

但最重要的是戏剧之夜。布莱希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是怎样筹备这些演出，并给了海伦娜·魏格尔登台表演重要角色的机会？剧院作为专业的演出机构，早已制订了演出计划，所以在接下来的演出季中不可能以此为场地。但卡斯帕尔·内尔与汉斯·库杰尔（Hans Curjel）相识，库杰尔为表演发掘了原本是一座电影院的库尔城市剧院（Stadttheater Chur），1945~1946年的演出季收获了巨大成功，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的评论家慕名而来，对“库尔的戏剧之春”大加赞叹。库杰尔曾在柏林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 Berlin）担任戏剧顾问，布莱希特1929年3月也在柏林听过库杰尔的讲座，但对此已经记忆模糊。两人于1947年11月24日建立了联系，库杰尔在其中看到了与伟大作家合作的机会，一切蓄势待发，但选择什么素材呢？他们想到了可以从索福克勒斯^[3]的《安提戈涅》（*Antigone*）入手，随后又想采用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对这部戏剧的改编，但似乎行不通，因为这意味着布莱希特要转向完全陌生的德国文学“主教般庄严”的路线。

12月，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他决定听从内尔的建议，采用荷尔德林的翻译，“这样的内容由于被视为太过暗黑，很少或者没有上演的机会”。在德国文学史上，荷尔德林的《安提戈涅》引起的更多是负面反响，因为当时的评论家们就提出了疑问，作者在翻译时是否有些心不在焉，这首先基于其匮乏的希腊语知识，其次似乎证实了荷尔德林连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完全掌握。例如，现代由沃尔夫冈·沙德瓦尔特（Wolfgang Schadewaldt）翻译的译文为：“所谓何事？你似乎有些激动！”（以至于脸色泛红。）而荷尔德林从中得出的是：“所谓何事？你喜欢给红色的字染色。”布莱希特本可以降低难度，选择“平俗”的意义，但他使整个篇章更加怪诞不经，“拯救”荷尔德林表面上的语言癫狂：“尘土飞扬，你，似乎，为我染红了文字。”布氏就像回到了学生时代，感到十分兴奋：“我找到了施瓦本的语调和高中学的拉丁语结构，感觉像回到了家。黑格尔的不少思想也在其中。”而且这里的语言“与我的投入相比，理应得到更深入的研究。它具有惊人的激进性”。

布莱希特起初完全不同意这一计划。如若为了应对存在主义，恰当的应该是选择时政题材，或者至少是同当代问题相关的题材。如果为了最终给海伦娜·魏格尔再次创造一个重要角色，年轻的安提戈涅与这位47岁的女演员也完全不相称。此外，古典时期的经典悲剧，其中反映的还是个人的悲剧性，面对人类十五年的浩劫与恐怖，这仅仅是对遥远年代边缘化的回忆。

再一次，仍然是语言起了决定性作用。纳粹将荷尔德林归为“日耳曼”诗人，虽然不理解他的诗歌，但剥夺了其作品中浩瀚和激进的特点。莫斯科派毫无语言理解力，也毫无批判精神，试图贯彻温克尔曼式经典文学威严的文风，虽然荷尔德林的语言完全与布莱希特的完全不同，但布氏可以借此反抗“莫斯科派”，再次将辩证思想和辩证表达引入人们的视线，荷尔德林笨拙的文风恰恰是对抗所有虚假的和

谐化语言的有力武器。荷尔德林的“德意志”语言至少能令人回想起德国人曾经达到过的境界。此外，当布氏在1947年圣诞节将自己的这部改编作品寄往美国时，剧作家提醒自己的儿子注意：“从《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生平》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尝试从给定的经典因素中发展出一种提升了的舞台语言。”

但纳粹的鼓动宣战和纳粹的艺术不仅破坏了语言，还将舞台艺术驱至谷底。在《安提戈涅模式》（*Antigonemodell*）的前言中，布莱希特1948年曾断言：“戏剧院建筑的损坏如今比表演方式的倒退更引人注意。原因在于，前者发生于纳粹统治崩塌之时，而后者发生于纳粹统治兴起之时。现在确实还有人谈及戈林戏剧‘光辉的’技术，就好像这一技术仍可以被采用，无论照射在何处都能发射出同样的光辉。戈林技术为掩盖社会的因果关系服务，无法被应用于揭露社会的弊病。现在已到了为好奇者创作戏剧的时代！”

为了上演这出戏剧，布莱希特同海伦娜·魏格尔和卡斯帕尔·内尔共同组建了“海伦娜魏格尔客座演员团体（Gastspiel-Produktion Helene Weigel）”，可以说是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 BE）的雏形。1947年12月16日，剧本的创作由布氏和内尔两位挚友改编完成（同往常一样，仅仅是暂时完成），内尔和布莱希特当天向汉斯·库杰尔朗读该剧本以资消遣，之后库杰尔接受了这个剧本，但条件是必须由布莱希特执导，这原本是不被允许的，但通过在头衔上耍了小小花样之后也得以解决。这个来自瑞士的年轻剧团1948年1月开始工作。布莱希特虽然急需必要的经费，但首先考虑的并非要深受观众好评，他更多的是想继续发展魏玛时代的实验性戏剧，而且是同团体中历经考验的中坚力量共事：魏格尔和内尔。由于露特·贝尔劳的回归指日可待（布氏在到达瑞士后为她铺垫了道路），布莱希特还打算让她作为台本范例（*Modellbuch*）的摄影师参与到工作中来。

虽说这次排演工作只是重新在欧洲立足的初步开端，但对布莱希特以及内尔还有魏格尔而言，它都是后续事业的里程碑。三人重拾了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工作—1931年柏林国家剧院（Staatstheater Berlin）的《人就是人》，从《爱德华》开始继续发展了改编原则，并在柏林剧团继续上演了歌德的《初稿浮士德》（*Urfaust*）、伦茨的《家庭教师》（*Hofmeister*）、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Coriolan*）^[4]以及莫里哀的《唐璜》（*Don Juan*），这些同台本范例一起为民主德国和整个戏剧界提供了戏剧记录文献的典范。

为了制作这些记录，露特·贝尔劳是不可或缺的，她1月10日抵达苏黎世，布莱希特既没有为两人准备共同的住所，还由于忙于《安提戈涅》的排练—首演在1月底—而没有特别关照她，贝尔劳因此极为失望。贝尔劳还想象着终于能挤掉正妻的位置，长伴布莱希特身边。布莱希特给贝尔劳安排的并非具体的戏剧工作，而是记录，其中内尔的舞台设计是重中之重，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内尔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幕布，因为不仅古典时期，中世纪的教会戏剧或者莎士比亚的环形剧院都不使用幕布，而且内尔认为舞台应该开放，不隐瞒任何“秘密”。舞台分为两部分，后半部是古典时期剧院的半圆形结构（希腊语：orchestra），里面安置了长凳，暂时不参与表演的演员坐在此处。主舞台的前半部分构成表演区域，可以同观众直接交流，并且同正面的前排座位构成了一个整体。舞台的主要道具是野蛮的、带有马头骨的神柱，这些内尔并没有装饰性地置于背景的长凳处，而是位于主舞台的中心，表演就在神柱之间进行。

舞台布景也完全符合布莱希特对新舞台设计的设想。当被问到希望采用什么样的颜色时，布莱希特回答，什么样的颜色都行，只要选用的是灰色调就可以，他的杂志《尝试》就坚持了这种色调：把舞台照得通亮，大量留白，少部分道具起了所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1948年2月7日，布莱希特在首演前致信自己的朋友内尔：“你对《安

提戈涅》的所有舞台设计（包括服装、道具和基本分组）都是典范，必须予以保留，而且这些都具有多重变化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你对合唱队的解决方案也是永久的贡献。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共事。”

这些台本范例不仅仅是记录，而且还为戏剧再次上演时实现仿效性的“转换”创造了可能性。但这一举措一再被（错误地）理解为布莱希特想将自己的导演编排强加给他人，在一定程度上专制地建立规定，阻碍所有的“自由创作”。对此，布莱希特有两个根本性理由。在真正的新戏剧成为可能之前，必须再次制定标准，因为不应该再打破标准。关于第二个理由布莱希特如此写道：“必须摆脱对复制的普遍轻视，这并非‘较为容易的选择’。这也不是耻辱，而是一门艺术。也就是说，它必须被发展为艺术，而且发展的方向绝非公式化与僵化。……您给我一个《李尔王》的理性模式，我将会找到效仿它的乐趣。”这位雄辩者还说：“提供一种模式是承认自己的成就，同时也是‘超越’成就的挑战。”

此外他还解释了一下“染红文字”的内涵。此处是一则隐喻，将语言同红色，即同攻击性和战争联系起来。伊斯墨涅（Ismene）对两名兄长的死尚无所知——“不再有关爱之词传入我心”——她将从姐姐那里得知这个消息：“那么，听我说吧。”信使随口说出了套话，他必须对这则消息负责，乃至消息的内容及其可怕后果的内容就被忽略了。戏剧中吟诵的诗句几乎不足30行，但语言隐喻已经预示了，被排挤的语言被蒙难者真实的血液浸染。相对于荷尔德林，布莱希特的“似乎（Scheint's）”更强烈地表达了抗议，语言是为了人类有可能进行交流，言语并非（必须）被真实的血液所浸透。布莱希特再次强调了滥用语言会产生巨大后果。就这一点而言，《安提戈涅》也是语言艺术家对语言破坏的政治清算，在战后的东西方阵营对立中，语言破坏又回归到了原本的状态。

如同监狱一般，

是为再造劳动力商品而建的小室

作为破坏的重建：

装备了科技产品的贫民窟

“此外，我们还忙于流亡者们耗费神力的事业：等待”，布莱希特1948年4月给费迪南德·赖雅的信中如此写道。等待是指等待文书，能让丧失了国籍的布莱希特及其家人踏上归途，同时，他们还生活在被驱逐（至何处？）的达摩克利斯之剑^[5]下。试图安置布莱希特的努力渐渐变得荒诞，没有人愿意收留他，而且布莱希特必须时刻小心，不要在政治上引人注目。如果按照他和魏格尔的想法，他们最好留在瑞士，在给赖雅信件的附言中布莱希特也写道：“目前我也在想安顿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Salzburg）地区，以便以后有个退路（也可以从此地离开前往别处）。”布莱希特同作曲家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Gottfried von Einem）建立了联系，艾内姆在萨尔茨堡音乐节（Salzburg Festspiele）的管理部门任职，很可能为布氏的艺术工作开辟新的前景。

库尔特·希尔施费尔德—苏黎世剧院副经理、出版商埃米尔·欧普莱希特（Emil Oprecht）、本诺·弗兰克（Benno Frank）—盟国管制理事会文化事务美国代表，都为布莱希特作出了努力。希尔施费尔德还专程前往柏林会见本诺·弗兰克，让弗兰克也在西方为布莱希特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苏联军事政府的文化官员亚历山大·蒂姆施茨（Alexander Dymshitz）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但一切都毫无结果。虽然苏联方面对布莱希特发出了邀请，但布氏没有作出回应。希尔施费尔德说明了理由：布莱希特“根本没想在东部忍受监视和审查制度，同样也不愿让自己的戏剧创作服从于党派政治的考虑”。因此：继续

在苏黎世湖畔的费尔德麦伦等待，布莱希特一家在这里得到了一处住所。

1948年5月初，布莱希特几乎每天都乘火车参加《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的排练，这部作品将在苏黎世剧院首演。乘车途中，布氏最终再次感受到了欧洲的风光，尽管仍言辞苛刻，但怀着友善和享受：“八年来第一个欧洲的春季。这里植物世界的色彩比加利福尼亚鲜嫩得多，也精致得多。向苏黎世延伸的火车路线旁，果木林林。规划不像加利福尼亚的动物园或者种植园一样精打细算。”

不久之后，布莱希特还参观了马克斯·弗里施的建筑。弗里施当时的主要职业是建筑师，1947年11月的机遇令弗里施能够间或与布莱希特见面，并将其当作“出类拔萃之人”来尊重，半年的相处之后弗里施感觉很吃力，尽量回避。弗里施当时在苏黎世莱茨格拉本

(Letzigraben)的建筑工地，在公园中修建巨大的露天游泳池，包括专业游泳场、瑞士第一个10米跳台和巨大的住宅区。对这些住宅布莱希特如此评价：“都很狭小，如同监狱一般，是为再造劳动力商品而建的小室，改善了的贫民窟。”

据弗里施《1946~1949年日记》(*Tagebuch 1946-1949*)，布莱希特对现代住宅建筑对德国的破坏很感兴趣。在瑞士，人们已经获得了德国1960年代才意识到的经验：建造同时也意味着破坏。布莱希特将苏黎世湖斜坡上的别墅视为“古老的罪孽”，但或许还可以被饶恕。对新的住宅布莱希特就没有那么仁慈了，他不断想到居住其中的人需要活动场地和一定的舒适度。他或许战栗地想到自己被关到如此住宅中的景象：根本无法工作。科技带来的便利当时被认为是主流趋势，但其实完全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游泳池部分的景象布莱希特也无法表示赞赏，那里他看到的更多是最初自然的根本性丧失。因此，弗里施某次同布莱希特一同在湖中游泳时推断，对布氏而言，自

然不过是“环境”，因而“不可改变，他对此并无多少兴趣”，弗里施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战后已经不再是改变自然——这是18世纪或19世纪初的事——而早已是清除自然。布莱希特在1948年也领悟到了这一点，他附言道，面对如此的游泳公园，湖河中的畅游将成为“历史纪念”。

此时的自然景象在提奥·奥托（Teo Otto）《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首演的舞台背景中有所展现。潘蒂拉对“他的”林地贪婪占有的目光意味着给它们打上了标价牌。对此，奥托的解决方式如下：“以桦树树皮制成的墙壁作为背景，背景前悬挂了一些像公司招牌一样的太阳、月亮和各种小云朵的标志（由黄铜或者漆木制成），白日场景中强光照射墙面，而夜晚灯光变弱（当然从不使用色光）。这是展现自然景象的解决方法。”起初有人会认为这一举措俗不可耐。但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奥托为潘蒂拉老爷观看芬兰自然的目光找到了美学图像：桦树本身就已经具有占有者的象征意味，在自然中已经排除在自然之外。

1948年初夏，海伦娜·魏格尔就怂恿我们的剧作家，为将要进行的实践工作先作一些叙事剧——布莱希特当时也将其称为科学时代的戏剧——的理论铺垫，以说明对此可以有何种期待。在实施方面，布莱希特根据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1620）模式，以最短的时间写作了包括前言和77条条款在内的《戏剧小工具篇》（*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8月18日，布莱希特记录，已经基本完成了书稿的写作，《戏剧小工具篇》是布莱希特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之一。

布莱希特将戏剧情节置于中心，这并非对亚里士多德戏剧的回归，而是符合他一再重申的坚定思想：人类创造历史，因而人类的命运即人类本身，所以，故事会一直持续下去。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娱

乐，布莱希特一如既往地视其为戏剧的最高目标，但娱乐必须同传达一定的认识相结合。

《戏剧小工具篇》似乎证实了布莱希特借助对“共鸣”的拒绝将一切情感排除在戏剧之外。相反，其实这里重要的是最终阻止人们像纳粹时期的政治戏剧一样，继续无意识而偏激地陷入感情的迷醉中。布莱希特写道：“每一种必要的思想都有它的情感对应，每一种情感也有其思想对应。”还有：“一些事物是否‘真实’，在情感中得到证实。（回答或许是：正确）……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舞文弄墨地论证，这才是永恒的艺术。‘艺术就是借助情感的力量。’情感被堆砌为‘基础’，而理智成了‘上层建筑’。”因此，布莱希特1953年就对这一决定表示了懊悔，文章的写作导致了一系列误解：“如果评论家们向观众一样观看我的戏剧，对我的理论不予重视，那么他们观看戏剧将会是我希望的那样，带着幻想、幽默和欲望……我认为，困境开始于我的剧作必须‘正确地’上演，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为了非亚里士多德戏剧，我必须写，哦，忧愁；哦，痛苦；写一出叙事剧。”

第一次，我感到这里令人作呕的乡土气

德国共产党莫斯科派聚集区：

社会主义统治

库尔特·希尔施费尔德和艾尔莎·萨格尔（Else Sager）—苏黎世剧院的经理秘书—巧妙地利用了苏黎世六月节开幕典礼，将布莱希特介绍给瑞士的政治高层和社会精英。布莱希特原本厌恶此类节庆，本次或多或少是被逼无奈出现在公众面前。出席的还有政要人物，这样可以大快朵颐、痛饮为快的场合他们都不会缺席（艺术表演不过是借口）。“Sagi”（萨格尔）在晚会进行中向在座知名人士介绍了他

们的保护对象，布莱希特再次衣着得体，成功地使自己的居留许可延长到了1948年夏末，甚至获得了前往德国的旅行护照。这发生在5月29日，原本的居留许可到了5月31日便会过期。

德国的旅行护照只对前往康斯坦茨（Konstanz）法国占领区的一小段路程有效。希尔施费尔德、弗里施和布莱希特—布莱希特坚持步行穿过边境—1948年8月前往康斯坦茨城市剧院，马克斯·弗里施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在这里演出。剧院经理海因茨·希尔佩尔特（Heinz Hilpert）接待了三位尊贵的客人，相互介绍后，几人坐下享用（德国）啤酒，布莱希特“一向”（有如弗里施在《1946～1949年日记》中写到的）将其称颂为“最佳啤酒”。与“一向”不同的是，布莱希特在回程路上长时间的沉默后爆发了：“这些幸存者的行为，他们恬淡的无知、无耻，他们直接继续生活，就好像遭到破坏的仅仅是他们的房子，他们享受着艺术，急忙同自己的国家构建了和平，这一切比忧虑中的更加糟糕。”布莱希特的结论是，这里，一切必须重新开始。

1948年9月，布莱希特决定再次前往柏林。他同德意志剧院商定，在剧院上演《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由海伦娜·魏格尔饰演同名主人公。由于美国的入境禁令，只可能途经布拉格，穿过苏联占领区抵达柏林。由于萨尔茨堡位于旅途路线上，布氏在那里同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和艾丽卡·内尔—卡斯帕尔·内尔的妻子—共度了一夜。随后汉斯·艾斯勒加入了继续前往布拉格的旅途。和艾斯勒一同抵达柏林后，几人10月22日晚在暗夜的废墟中找到了勃兰登堡门旁的阿德隆酒店（Adlon），酒店的侧翼尚可居住，为他们准备了住处。

“柏林，一幅希特勒之后丘吉尔的蚀刻版画。/柏林，波茨坦旁的瓦砾堆。”柏林受到的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1945年5月一名英国参观者认为，应该将柏林曾经的废墟作为现代巴比伦或者迦太基保存起

来，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政权恐怖统治的纪念。整个城市一片死寂，无法再重建。布莱希特习惯早起，次日清晨立即四处观望，记录道：“相较于废墟，使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人们在这个城市变成废墟的过程中都做了什么。一名工人给我指出了方向。‘直到这里有些模样，还需要多久？’”

此外还有精神上的破坏。从其他工人那里布莱希特获悉了在占领柏林，或者说在解放柏林时发生的事情。人们本可以带着“绝望中的欣喜”欢迎“解放者”苏联人——在《阿尔吐·乌依的有限发迹》中，布莱希特还引入了“颤抖的喜悦”这个概念，但是，当苏联红军酩酊大醉的乌合之众涌入柏林的街道，洗劫房屋里所剩无几的财物，强暴妇女，射杀前来干预制止的男人时，“相会变成了袭击”。如此，人民身体和精神上遭受了德国同胞的蹂躏，同时也伴随着占领国的残害。苏联总指挥不去阻止这些丧失人性的破坏行动，这一事实似乎在证实戈培尔的谎言。无论如何，对苏联人很快流传出了纳粹式的笑话，在他们身上打上了“下等人”和“凶恶的野兽”（“俄罗斯熊”）的烙印。

给苏联人的威望投下阴影的还有1948年6月23~24日开始的柏林封锁，苏联人关闭了对柏林的远程电力供应，次日一早切断了一切水陆交通。这是苏联对西方占领区货币改革的回应。这一过激行为首先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恐慌，西方同盟国对此也毫无准备。美国的将军们提出军事突破计划，但由于可能挑起战争，方案遭到了杜鲁门的拒绝，他下令搭建空中桥梁，即美国和英国空军向柏林运输食品、煤、汽油、药品和数吨重的建筑材料，这些货物或者空投，或者卸载在滕伯尔霍夫机场（Flughafen Tempelhof）。布莱希特在10月曾记录：“在完全寂静的废弃街道上空，夜间，空中桥梁的运输机隆隆作响。”

满目疮痍，他心中“只充斥着一种愿望：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没有了和平，这个世界令人无法栖身”。在柏林，布莱希特第一次直接遇到了他1948年1月6日曾作出的评价：“这个国家在审时度势中为自己骗得了一次革命。”12月，他当场意识到：“德意志新的悲苦”笼罩着这片土地，一切都没有得到清算，“但几乎一切都被破坏了”。“苏联人给出了强劲的推动力，其他占领势力进行抵制形成了漩涡激流，而德国人在漩涡中越陷越深。德国人反抗抵制纳粹的命令；只有少数人坚持强制的社会主义优于没有社会主义。”根据一切记载，所有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德国人，已经完全麻痹，仅仅为了自己能活着走出这场战争而庆幸。

在两德对立之前，已经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于1946年成立，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制联合而成，虽然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并非选举产生，但仍专断地以新“领导者”的姿态露面，他们不能依靠一再被召唤的“工人阶级”，因为乐意重建德国的工人们无法理解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他声音尖细，带有萨克森口音，在长达8小时的演讲中努力向听众灌输的思想令人不知所云。工人们更多是亲身体会着艰辛的劳作，日复一日，食不果腹，家徒四壁。空洞的口号坚持了四年，1953年，现实再次逼来。

布莱希特1948年12月写作了序曲《F. D. J. 建设之歌》（*Aufbaulied der F. D. J.*），他错误地认为进行了理智的思考，并把歌曲交给了青年同志，也由此了解了新的“领导者”对“领导”这一概念作何理解。歌曲包括以下语句：

比被感动更好的是，感动自己

因为领导者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混沌

只有当我们最终能引领自我，

才能别旧国，迎新家。

大家或许认为不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因为这正是统一社会党每日所宣传的。但德国自由青年团（Freie Deutsche Jugend）表示反对。当时德国自由青年团主席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布莱希特一直将他的名字恼人地写作“Honegger”—要求“审查‘因为领导者无法引领我们走出混沌’一句，因为如今已然没有人对希特勒感兴趣”，现在只有“党的领导”，其他一切不过是“陈词滥调”。

这说明埃里希同志—东德人民总是把同志念作“Ärisch”（埃里施）—显然完全不理解这首诗，除此之外，还展现了老旧的仆从精神：不愿“引领”自己，而是不断需要甚至要求他人来引领。同布莱希特的“自我引导”截然不同的是共产主义颂歌—《党之歌》（*Lied der Partei*），绝顶的媚俗之作，歌曲1950年由路易斯·福恩伯格（Louis Fünberg）所作，明确区别了“党”与“我们”：首句便是“党赋予了我们一切”，而且为了将个人崇拜极致化，还写道：“党啊，党啊，党啊/源自列宁精神/由斯大林所锻造。”副歌也洗脑般地（谱曲也由福恩伯格完成）唱道：“党啊，党啊，永远正确！”这首歌曲到处播放，代表了一个所谓共和国的民主精神。对昂纳克的意见布莱希特作了说明：“如果不加注意，陈词滥调很容易就变成了歌功颂德。”

而遗留下来的市民阶层呢？作为不可或缺的专家，特别是在经济、科技、医学和社会供给领域，同样也在文化领域，图伊们都成了社会的必要因素。他们的信念—如果他们还拥有信念—同民主德国掌权者的路线完全不吻合。社会主义，或许在形式上是“科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简写为ML），没有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该如何取得成功呢？他们谄媚献殷勤。这包括著名的“Pajok”（干粮）^[6]，“Pajok”是苏联的方案，类似于前文中的“关爱包裹”，由苏联人提

供给知识精英。在文献资料《明镜—零点时刻》（*Spiegel, Die Stunde Null*, 2009）中，同乌尔布里希特等人一同返回柏林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Wolfgang Leonhard）认真描写了“智慧包裹”的内容：“很多很多烟、伏特加、科涅克和葡萄酒，巧克力和面粉—所有人们的生活所需之物。”从他的列举中，可以得知聚居区官员们的生活景象。小人物们对这样的特殊优待和偏爱表示的怀疑也跃然纸上。他们为自己和有同样想法的政客打造了贬义概念“贪吏（Bronzen）”。习惯了旧时代的特权，苏联占领区和之后民主德国的新图伊们接受了这些优先便利，但又不认同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旦这些优势面临着转变为劣势的危险，他们便逃走—逃向西部。如果具有手段和途径，许多工人同样也将逃离，特别是在1950年代。

从艺术成果上看，1948年对布莱希特而言收获颇丰。三部戏剧《伽利略传》、《第三帝国的恐惧与灾难》和《高加索灰阑记》的美国版上演，《四川好人》也演出了三次，11月《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在汉堡剧院上演，同月，除了自己导演的《潘蒂拉》在苏黎世上演之外，维也纳新剧院（Neues Theater Wien）的早场还演出了《我们时代的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Ein Dichter unserer Zeit—Bertolt Brecht*），特丽莎·吉泽（Therese Giehse）和卡尔·帕里拉（Karl Paryla）参与表演。很多剧院开始询问演出权，还包括汉堡的一所学校，对此布莱希特大多断然拒绝。柏林的主要工作除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排演外，还有“剧院工作室计划”，布莱希特和魏格尔12月同沃尔夫冈·朗霍夫商定了这一计划，现在要在政治上予以贯彻。由于没有自己的剧院，只能在德意志剧院进行创作和演出。两人拟定，为柏林剧团的事业争取身陷流亡困境的一流演员，例如考特纳、斯特科尔、吉泽、彼得·洛等；当然也有新的发现，比如在苏黎世上演的《潘蒂拉》中饰演牧牛姑娘的蕾吉娜·路茨（Regine Lutz）。

1949年布莱希特撰写了一份备忘录，主要想争取亚历山大·蒂姆施茨的支持。布氏在这里使用了一贯的手段，例如：“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戏剧没有高超的表演方式将无法得到充足的展现。演员、导演、舞台设计师，例如特丽莎·吉泽、莱昂纳德·斯特科尔（Leonard Steckel）、克特·戈尔德（Käthe Gold）、海伦娜·魏格尔、奥斯卡·霍莫尔卡、彼得·洛、库尔特·博伊斯（Kurt Bois）、贝特霍尔德·菲尔特、卡斯帕尔·内尔、提奥·奥托等，这些人必须返回柏林。因而需要一些极少量的外币，来资助这些客人的旅费和生活费。”布莱希特首先赞扬了苏联戏剧的进步——这当然是子虚乌有，点明的全部是德国艺术家，其中无一人生活在苏联占领区，对他们来说民主德国的货币毫无价值，所以必须筹备一定量的外币。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也请求亚历山大·蒂姆施茨利用自己的朋友圈子帮助布莱希特。蒂姆施茨表示乐意相助，并称自己为“布莱希特的追捧者”，他也立刻注意到了在柏林建立布莱希特剧团的客观限制。人民舞台的剧院已经在战争中被摧毁，因此苏联人给剧院经理弗里茨·威斯腾（Fritz Wisten）指派了船坞剧院；威斯腾同属纳粹的迫害对象，所以不可能将他驱逐出剧院，只能考虑同其他剧院展开合作。

更令人伤心的还是当局对柏林剧团的冷淡态度。布莱希特曾谈到，1949年1月6日，他同朗霍夫和威斯腾拜访柏林的新市长——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艾伯特之子，商谈戏剧计划。艾伯特没有表示问候，仅仅说了“一句对某些计划报以怀疑的话”，“这样的计划会破坏现存的秩序”。如今旧剧院尚在修葺中，必须给人民舞台找到落脚之地。布莱希特评论：“（社会民主党的小市民企业给‘每个小人物重新修建了剧院包厢’，上演着低俗戏剧。）第一次，我感到这里令人作呕的乡土气。”

1949年2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教育部举行会议，商讨“德意志剧院内部组建布莱希特剧团”，作为“德意志剧院中的独

立剧团”，由海伦娜·魏格尔担任艺术指导。在形成有效决议之前，在资金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布莱希特就给朋友和同事们写信，要求大家参与这一目前仅仅在规划中的剧团的工作。布氏致信斯特科尔：“我们明年将在船坞剧院客座演出现代戏剧。剧组成员班底绝不逊色，恩格尔（但愿还有菲尔特，但愿还有您）将担任导演。”致信特丽莎·吉泽：“下一个演出季在船坞剧院上演现代戏剧，这已基本是确凿之事。”之后布莱希特从2月22~24日途经布拉格返回瑞士，处理繁杂的居留证事务。他尽一切努力保留瑞士的房子——“德国之外的住所”。在柏林，他也于1月3日亲自前往瑞士大使馆，延长返程签证和身份证明的有效期限。申请递交到了州警察局外事处，前文曾提到的“迈埃尔四世”正坐镇此地，他的回复是：既然如此，布莱希特先生应该尽力在2月底之前来瑞士亲自提出申请。

伯尔尼的警察局在这期间也作出了侦查，并向联邦检察院报告了惊人的“犯罪事实”：“由递呈我们延期的个人证件中可以推断，布莱希特先生在德国逗留于苏联占领区，并将由此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显然布氏是通过这条路线赶赴莫斯科。官员们拒绝给布莱希特确切的答复，因此布氏眼前也一直呈现着无法继续停留在瑞士的景象。1949年4月中旬，为了寻找出路，布莱希特给作曲家艾内姆写了一封特别的信件：“我和卡斯坐在一起，谈论着音乐节，似乎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我现在想出了另一个方法，这对我而言比任何形式的预付款都更具价值；这便是避难，即避难护照。……赫莉（指海伦娜）生来是奥地利人（维也纳人），她同我一样自1933年起失去了国籍，现在也不存在德国政府。她现在是否能获得奥地利护照？……我无法身处德国的某一地，而对别的地方的人而言我却不存在。或许您能帮助我？”

但艾内姆提供的帮助令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当然，当时在奥地利参与这一事件的人中，无一能在此时预测到将带来困扰的各种反应。

后文对此还会作详细描述。但布莱希特自视为寻求避难者，虽然签发了有效期直至1949年9月的瑞士返程签证，他已决定不再自怨自艾，不通知瑞士官员，直接动身前往萨尔茨堡。5月24日，布莱希特同芭芭拉（魏格尔还在柏林）驱车前往萨尔茨堡。当“迈埃尔四世”企图再次刁难布莱希特时，只无奈地发现笼中之鸟已不知飞往何方。

即使布莱希特早已离去，仅仅因为他们曾经接触过“共产主义特务”，瑞士警方仍监视、窃听了弗里施、提奥·奥托，甚至好酒的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将监视记录整理为长达数千页的卷宗。1969年10月1日，苏黎世《世界周刊》

（*Weltwoche*）还曾报道，瑞士军队的一个法庭判定，沃尔夫冈·博尔谢特（Wolfgang Borchert）、库尔特·图索斯基和布莱希特等作家及对他们作品的阅读都危害国家安全。

战争作为伤残者归来。

他慢慢痊愈，“失明的”反抗女神提携他

冷战：魏格尔、布莱希特及其剧团

无容身之地

还要补充一下，1949年1月11日《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时获得巨大成功，由埃里希·恩格尔（Erich Engel）和布莱希特担任导演。布莱希特出任导演在整个德国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各个占领区的观众都涌入剧院，多年之后终于能再次欣赏伟大的戏剧。但布莱希特本人对这次艺术成就的评价十分保守，因为他认为投入准备的时间不足，对叙事化风格无法实现完美的掌握。尽管如此，由于海伦娜·魏格尔的表演，本次演出堪称传奇，为布莱希特享

誉世界奠定了基础，特别在1954年6~7月布氏赴巴黎客座演出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布莱希特革命”。

相对于内尔和布莱希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作品的激进，例如《爱德华》、《都市丛林》、《人就是人》和《马哈哥尼》，这四部戏剧的激进性彻底改变了整个戏剧界，而《大胆妈妈》相比之下是一部中规中矩的舞台戏剧，人们可以在其睿智的语言中逐步看出，这是一部主要在孤独而禁锢的书桌边产生的作品。此外，大胆妈妈的台词十分冗长，甚至是繁琐（咏叹调），布莱希特日后为电影剧本所改的删减版也证实了他本可以写得更好。剧本的水准极高，给人以明澈、睿智之感，但缺少棱角，即使戏剧冲突存在白热化的摩擦，仍缺少遁入没落（Fallhöhe）^[7]的深渊之感，简言之，缺少（看似）不明之处和引人思考的深刻，这使当时的观众感到迷惘或愤怒。

更重要的是，戏剧中的人物都具有既定的性格特点。哀里夫（Eilif）勇敢，是个缺少头脑的冒失鬼；施伐兹卡司（Schweizerkas）真诚但愚笨；卡特琳（Katrin）关爱孩子，但也有些笨拙；羽菲特（Yvette）是个颇有心计的军营妓女；厨师是个好色的犟种，只想着羽菲特和自己；随军牧师见风使舵，毫无信仰；小商贩大胆妈妈仅仅是个商贩，不知反省，也不愿反省。观众完全可以依照这些特点作出判断。剧中人所陷入的矛盾和分歧都来自外界，无法渗透至人物内心，因为他们的性格特点都是既定的。同样，由于人物不作出改变，也都最终因此走向灭亡。这些可以算作对市民角色的嘲讽，但布莱希特早期作品里没落人士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在流亡时期的创作中却消失了。

《大胆妈妈》的音乐和歌曲也是如此。流亡美国期间，保罗·德绍1946年为之作曲，1948年因柏林演出进行了修改。如德绍在《乐谱笔记》（*Notizen zu Noten*）中记录的，布莱希特引导作曲家进行了

剽窃。德绍以《大胆妈妈之歌》（*Mutter Courages Lied*）（“长官们，令战鼓停息”）为例作出了解释。布莱希特给了德绍一本《家庭修身集》，让他特别注意其中的《海盗谣曲》（*Ballade von den Seeräubern*），歌曲的旋律基于《贫瘠的军旗》[*Die Standarte der Armut*, 1905, 埃米尔·韦斯利（Emile Wesly）作曲，里昂·杜罗秋（Léon Durocher）作词]，并要求德绍按其谱写《大胆妈妈》的开场曲。德绍依其行事，虽然当时这种“对模式的剽窃”对他而言仍十分陌生。但《大胆妈妈》的音乐证实，它“不仅合法，而是完全自然而富有成果”。由于特殊配器的协助—钢琴的音锤上安装了小图钉，最终效果虽然有各种不和谐音，但仍能够听到“极熟悉旋律的新形式”。德绍甚至称其为“真正的民族音乐”。

弗里茨·艾尔彭贝克说“首演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这也证实，虽然是部不寻常的剧作，但《大胆妈妈》不具有挑战性。布莱希特只能绝望地接受，虽然在文本中对主角作出了修改以突出强调，但最终意图仍没有深入人心，观众们更多是对“可悲的母性动物”报以同情。此外，文化官员艾尔彭贝克恰恰以这次演出为契机，将流亡时期对于表现主义的争论拖入到战后的德国。首演刚过，1月13日艾尔彭贝克就在《前进》（*Vorwärts*）中写道：这是“伟大的戏剧之一，令德国首都再现了1933年前的文化繁荣。在很多方面，它都是1945年以来最具意义的戏剧事件”。

柏林聚居区的官员一定作出了不同的思考。显然，伴随着伏特加、科涅克、葡萄酒、巧克力和香烟，他们作出了决定，要从源头上阻止布莱希特先生的新艺术脱离他们的管辖范围。艾尔彭贝克同乌尔布里希特派一起从莫斯科归来，要建设出版业和新闻业，尤其要确立戏剧和文化政策理念。但布莱希特温和的叙事剧明显成了绊脚石。1月18日，艾尔彭贝克在《世界舞台》中提出了抗议：必须回归“本质”；因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涉及“德国戏剧学的根本性问

题”，而且因为布莱希特虽然是“我们文学上最伟大的德意志戏剧家”，却拒绝“成为戏剧上最伟大的作者，即最具民族性的德意志戏剧家”。因为：“从戏剧学来看，戏剧理所当然必须是戏剧性的”，因此，“叙事性戏剧”本身就不可能被称为戏剧。对布莱希特而言，他必定能轻而易举地将“其作品‘纪事式’的结构……连接成紧凑的戏剧情节”。“尽管意志进步，能力高超，如果道路指向脱离群众的颓废，那么，进步的意志和高超的能力就能引领这条道路通向民族特色和德国戏剧亟须的复兴吗？”柏林聚居区的同志们不仅证明自己完全不具备学习能力，而且甚至真的认为，能够将自己脱离历史的、故步自封的、带着小市民的狭隘所陈述的基本原则作为真正民族特色的革新来兜售。

原本1948年圣诞之际便可以出版，但由于纸张匮乏，《日历故事》的发行被推迟到了1949年。同1949年于魏斯兄弟出版社（Verlag Gebrüder Weiß）发行的《安提戈涅模式1948》（*Antigonemodell 1948*）一道，布莱希特所著的书籍再次出现在德国公众面前。值得注意的是，布莱希特选择的并非当时正在上演的剧本，比如《大胆妈妈》或者《潘蒂拉》，而是一种戏剧模式和一部短篇散文集。以散文而非诗歌作为开端至少是不同寻常的。事实上，布莱希特1948年就整理了诗集《流亡诗抄》（*Gedichte im Exil*），并交给了维兰德·赫茨费尔德在纽约开设的奥罗拉出版社（Aurora-Verlag）。1947年维兰德·赫茨费尔德破产，连同布莱希特的诗集，将《奥罗拉图书馆》（*Aurora-Bücherei*）系列的版权卖给了东柏林的建设出版社（Aufbau-Verlag）。1948年10月，诗集虽然已经排版，但布莱希特仍收回了同意出版的承诺。理由是诗集“特地为纽约”所作，尤为空洞。诗歌是布莱希特经历了面对战后柏林破败的震惊后，口述给赫茨费尔德的。

散文集《日历故事》具有试金石的作用，包含8首诗歌，代表了两种散文形式：中篇小说（Nouvelle）和《科尔纳先生的故事》所采用的形式—微型小说（Kürzestgeschichte），这一形式沿袭了巴洛克时期箴言的历史（格言、笑话）。露特·贝尔劳负责甄选和排序工作，也同出版社进行协商。她编排了8首诗歌和8部短篇小说互为补充，并且附加了39个科尔纳先生的小故事作为日历故事。散文集以1940年的《奥格斯堡灰阑记》开篇，表示对故乡的敬意；随后是《犹太妓女玛丽·圣德斯的谣曲》；《实验》则讲述了一名小男孩如何将伟大的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成功完成的故事；而随后的诗歌《乌尔姆1592》（*Ulm 1592*），讲述的却是乌尔姆的一名裁缝是如何在试飞中失败的。

《一个工人读书的疑问》的意义在于，布莱希特借《日历故事》揭露了英雄伟人的历史不过是战争的历史，必须对历史编纂学作出修正，它不过是由后人书写，目的是使历史合法化。那些卷册中出现的“伟人”，当他们失去权力或者放弃权力时，才别有意思，例如受伤的苏格拉底。作为步兵，苏格拉底赢得了一场重要的战役，因为在波斯人进攻时，他跑向了正确的方向—往回逃跑。苏格拉底陷入了一片荆棘地，一根刺扎入了他的脚中，拔不出来。由于无法继续逃跑，他只能高声叫喊，产生了一种希腊人占多数的假象。波斯人落荒而逃，希腊人赢得了战争，把一向宣扬和平的苏格拉底当作战斗英雄来表彰。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犹豫和一些思想上的纠结之后，苏格拉底最终收起了懦弱，供认了整件事情的始末，也证实了自己一种同社会主流不同的勇气。

同早期的小说相比，这里的8部小说全部采用了传统的叙事方式，表现了一对布莱希特而言非典型的一浓重的感情。借此也记录了，流亡、远离文化机构、人际空间上的隔离制约了布氏的语言，阻碍了魏

玛时期写作技术的丰盈，因为现在通行的写作技巧是好战的，从中无法发展出新的文学形式。

能够让人进入这个国家

护照才是护照

诗人：动摇社稷

此外，还要解释一下布莱希特在战后的悲苦境地中，是否没有护照也能保护自己的生存权。《逃亡者对话》中有言：“护照是人最宝贵的一部分。同人不一样，它不会如此简单地问世。到处都有人出生，以最简单的方式，毫无特别的原由，但护照从不如此。如果它是一本有效护照，便会得到承认；而人完全可以是一个好人，而得不到承认。”目前，布莱希特明显仅仅是人，而并非“护照的自动持有者”，他一如既往地缺少有效护照。

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同卡斯帕尔·内尔有紧密合作，乐于将布莱希特也引向这条共同创作之路，艾内姆表示：“我将利用我能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帮助布莱希特。我乐于做此事。他将极大地丰富奥地利，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只可惜艾内姆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同胞。1949年5月24日，布莱希特致信萨尔茨堡州政府，请求“授予奥地利国籍”，并附上了生平，其中布莱希特强调自己具有一定的国际声誉，纳粹剥夺了他的国籍，他的妻子是著名演员，出生于维也纳，并且自己在萨尔茨堡拥有“固定住所”。布氏明白自己不可能靠国家养活，特意强调能够依靠书籍、剧作和电影的收入生活，并指出自己的戏剧作品已经在奥地利上演，这例外地符合事实，他还在为萨尔茨堡筹备节日戏剧——《萨尔茨堡死亡之舞》（*Salzburger Totentanz*），这也属实。州政府官员在布莱希特申请信上的亲笔记录注释中表明，申请信在5月25日立即转呈了相关部门，显然是要予以批准。

“固定住所”一事详情如下：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用自己的房子收留了寻求避难的贝托尔特和芭芭拉，布莱希特在居民登记处正式以这一地址和“房主古斯塔夫·费希廷格博士（Dr. Gustav Feichtinger）”的租户名义进行了登记，并把这一地址作为了日后的通讯地址，尽管海伦娜·魏格尔早已为一家人在柏林的魏森湖（Weißensee）安顿了住处。布莱希特发觉了自己“对奥地利的思念”。

奥地利国籍事宜不断拖延。艾内姆成功地借助内务部长埃贡·希尔伯特（Egon Hilbert）的帮助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萨尔茨堡州政府、奥地利民主作家与记者协会、教育部。教育部甚至表示授予布莱希特奥地利国籍，自然还有海伦娜·魏格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有趣的是，根据在萨尔茨堡州政府的记录，“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先生居住于柏林魏森湖，柏林大道（Berliner Allee）190号。此事最终告吹，但造成了不良后果。

1951年秋，一些奥地利报纸报道布莱希特已经获得了奥地利国籍，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运动，抗议负责入籍的官员，也针对布莱希特，因为众所周知布氏居住在东柏林，并且在那里工作。如今，两德对立，尽管民主德国的宪法和贝歇尔作词的国歌中（“德国，统一的祖国”）都保存了对统一的期盼。报道中写道：布莱希特的入籍证实，“由于个别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过分狂热和人民党文化独裁者的软弱，我们的国家遭到了共产主义的破坏，美国人也在资助对奥地利精神的布尔什维化。”

再一次，由于布莱希特，整个国家从根基上发生了动摇；再一次，事态极为严重。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也有所觉察。人们为反共情绪煽风点火，他同样成了众矢之的。布莱希特原本有可能进入萨尔茨堡音乐节指导委员会的希望也破灭了，10月31日，冯·艾内姆飞

离奥地利，失去了自己到了1953年才凭借歌剧《审判》（*Der Prozeß*）获得的工作场地。在这种情况下，对布莱希特而言，奥地利这扇大门也关闭了。

此外，在柏林剧团演出场地的问题上，统一社会党的文化官员也继续制造障碍，1950年9月，布莱希特不得不努力在西部联系相应的剧场。时事评论家和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缪尔（Alfred Mühr）——前纳粹成员（当事关艺术时，布莱希特毫无政治头脑）——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在慕尼黑和奥格斯堡两次同布氏的会面，其间布氏建议他组建一家客座演出剧院，“布莱希特剧团和那一边的演员，改换东家”。这一布莱希特从未提及的计划最终也没有成形。

床单必须忏悔

复辟：阉割替代自由之爱

1947年，玛格丽特·施德芬翻译的努达尔·格里格（Nordahl Grieg）的戏剧《失败》（*Die Niederlage*）在柏林出版。这部作品完成于1937年，1938年曾部分（曲解后）发表于《言语》。布莱希特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但由于其争议性主题，即1871年德法联军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血腥镇压，仍计划进行改编，甚至将作为柏林剧团的开幕演出。布莱希特1949年在苏黎世写作了剧本，内尔也同在苏黎世，他完成了舞台设计和剧本大纲。巴黎公社起义是一次人民起义，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后，起义按照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起初似乎取得了成功。

取得胜利的巴黎公社社员没有暴力镇压资本主义，而是相信了布尔乔亚的民主自由，由此引发了矛盾。这一指导方针被对方利用，血腥镇压了完全武装不足的巴黎公社，复辟了旧秩序。由于德国人民也完全陷入了困境，这一作品至少可以激起大家的反思，思考清算历史

时尚存有的漏洞。作品也可以作为反对复辟的论战，它展现了由美国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总理政体承诺的民主自由，很可能自愿被镇压。战后，美国在德国电影院中轮番播放宣传性电影，试图向德国人民展示，在德国建立成熟的民主体制至少还需要二十年。布莱希特1954年曾回忆：“我们在德国所拥有的选举不可能是完美的。我的一生中，有两次，德国人用这一文明的方式选择了战争。两次，通过‘自由选举’，他们认可了煽动侵略战争并惨败的政府。”

因此，布莱希特将《公社的日子》（*Die Tage der Kommune*）的核心设定为巴黎公社在胜利后尝试实施的新型集体生活。这首先意味着，劳动和享受不再彼此分离，而是按劳分配，父权制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解体，性别斗争被性享受所替代。布莱希特把1871年3月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的结盟展现成自由恋爱的行为，带有明显的性暗示。例如当女人们混进士兵中，说：“你们真丢脸，冲向女人，却毫无非分之想！”士兵喃喃地说想要回家，她们又嘲笑道：“喝点儿吧，我的孩子！来，给我们看看你的粗棒，而不是枪口，洞我们都有。”从社会关系上看，“下流”的概念（猥亵、无耻、不雅）在越南战争（1968）中得到了价值上的颠覆。它曾首先与性有关，但布莱希特在越南战争前大概十年就抗议市民对性的蔑视，将这种蔑视的矛头引向了战争。性爱并不下流，下流的是合法的杀戮。

到了1949年，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布莱希特开始寻找可能的演职人员，筹备排练，最终仍选择了《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作为剧团的开幕演出。原因从未明确说明，但仍可以推测。《公社的日子》是一部极端的政治剧，立足于历史史实，布莱希特对此没有精确的了解，而且他也找不到任何人检查剧中的历史事件，显然不愿在开幕演出时就进行过于大胆尝试。

为了进行开幕演出，必须首先成立剧团。这里又发生了一出闹剧。柏林剧团曾以“柏林新剧团”为名，在主管的问题上进行过长期的拉锯战，仅仅由于海伦娜·魏格尔坚决而不妥协的态度才得以坚持下来，也由此证明只有她而非布莱希特，应该担任日后的经理工作；此外，同我们轻狂的作家不同，魏格尔还达成了一系列成就。她明智地签订了合同，政客们毫不知晓其中的资金来源（而且是1万美元的外汇！），她还编制了演出表，遴选了戏剧作品，使柏林剧团在官员，特别是“主席”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头脑中，成为既定事实。



1949年4月29日，乌尔布里希特告知德国经济组织（Deutsche Wirtschaftsorganisation）主席海因里希·劳（Heinrich Rau），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已经根据皮克和格罗提渥同志的建议，决定：“由海伦娜·魏格尔领导，组建一支特殊的剧团，并在1949~1950年的演出季中上演进步作品。演出将在德意志剧院或柏林室内剧院举行，并列入剧院6个月的演出计划中。在苏联占领区，剧团还会进行为期5个月的巡演。基本预算包括112.5万马克的持续投入和34万马克的一次性支出，另外还有大约每年1万美元用于支付外国演员的薪酬。还要同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Sowjetische Militäradministration, SMA）的政治及金融机构进行以筹措这一金额为目的的谈话。”但会由谁担任柏林剧团的法定领导人仍然毫不明确。剧团不属于柏林市，因为它不是市立剧院，但它同时也不是国家剧团，因为没有国家或者行政机关负责这一剧团。作为权利人出现的是德国人民教育部（Deutsche Verwaltung für Volksbildung），它管理众多事务，但绝对不包括剧院。

海伦娜·魏格尔巧妙利用统一社会党责任的混乱建立了柏林剧团，统一社会党确实想将剧团压给德意志剧院经理沃尔夫冈·朗霍

夫，朗霍夫虽然赞赏魏格尔和布莱希特，但对强制性地将柏林剧团设立在自己的剧院中表示完全不同意。1949年12月30日，在《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成功上演之后，朗霍夫立即发出书面通知，取消合作。海伦娜·魏格尔和布莱希特为《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选择了优秀、特殊的演员；两位主角中，莱昂纳德·斯特科尔早已是明星，埃尔文·格绍奈克（Erwin Geschonneck）还并不知名，但由于接演了这一角色而即将成为一名新星，配角有在《大胆妈妈》中饰演哑女卡特琳的安格莉卡·赫尔维茨（Angelika Hurwicz）和蕾吉娜·路茨。

这是布莱希特战后第二次同内尔合作。排练中的一些细节展示，布莱希特同埃里希·恩格尔担任导演，努力执意在演出中继续同劳顿合作时的经验。露特·贝尔劳讲述：“在排演时，如果有内尔的‘笔录’——这里我用了引号，因为很多都是内尔自己的观点——作为备忘，布莱希特进展起来就容易得多。”在第九场，当马狄把扫帚当作“法官”发表致辞，许诺给予潘蒂拉老爷的四位“新娘”庄园里的美好一天时，布莱希特将内尔的笔录进行了更具细节化的扩充：扫帚的长柄在地上撞坏，马狄的姿态，头转向他，伸向女士们的双臂，张开的手掌，马狄同女士们之间的距离，以及新娘们之间的距离。此外，内尔仅仅粗略勾勒的服装也被布莱希特搬到了剧中。当布莱希特1950年出版《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时，采用了很多内尔的实用意见和一些舞台执导说明，并将它们作为最终版确定下来。这位舞台设计师的图画创造了新的文学文本。

首演于1949年11月19日在德意志剧院的室内剧院举行。“老手”莱昂纳德·斯特科尔和年轻的格绍奈克力求达到卓越的合作，效果也立竿见影。“名单上其实只有四个熟悉的名字，剩下的都是新人，但十分出色，还有三个有些格格不入。”《新报》联邦德国的首席评论员弗里德里希·路福特（Friedrich Luft）11月13日写道。《每日新

闻》（*Tägliche Rundschau*）的霍尔斯特·罗默尔（Horst Lommer）则在同一天表示，“我们昨天见证了新德国戏剧的诞生”。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喜剧以及其中的幽默确实在评论和观众中得到了贯彻，演出中笑声不断。路福特说，“充满了一阵阵理解的笑声和欢喜，剧终观众们热烈鼓掌”：“细节精湛，构思大胆。”首演中，皮斯卡托尔的和平鸽也第一次作为柏林剧团的“剧团标志”使用在帷幕上。

但如果这些来自西德的评论能流传到当时已经建立的民主德国，一切就太美好。1949年3月19日，“人民议会”通过宪法，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由此也开始了有计划地诋毁柏林剧团“反戏剧（Anti-Theater）”：简化、唯理主义、颠覆性、颓废、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在冷战的影响下，西部1949年10月3日也成立了联邦德国，贯彻所谓的“质量”，却没有意识到一切不过是重复，而且是人云亦云。12月30日，柏林市政府人民教育部的统一社会党党员库尔特·波尔克（Kurt Bork）同志接受了沃尔夫冈·朗霍夫的解约通知。柏林剧团不能关闭，所以波尔克认为必须同轻歌剧院进行合作，这又是一次强制性安排。

海伦娜·魏格尔立即向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威廉·皮克表示抗议，布莱希特也义正词严地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列举了现在无法应对的各种状况，但德意志剧院“两次巨大的艺术和经济成功”仍要归功于此，这两次成就的“回响超越了柏林的边界，甚至德国的边界”。如今其实已经是一种“义务”，给柏林剧团一个可供自己支配的剧院：“对我们而言，我们像每周都需要被周济的穷亲戚一样，做客不同的剧院，也就是说在一周中，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在另一个地方演出或排练。可以说，我们承担着两个剧团经理的负担。”就算妥协，也有一定的限度；这也已经达到了。布莱希特在信的结尾写道：“如此四处游荡，不可能将青年人教育成优秀的演员和导演，也不可能吸引伟大的演员来这里表演。”

但境况仍未改变，一切悬而未决，柏林剧团只能作为不受欢迎的客人继续运营。1951年1月，当必须为下一个演出季签订合同时，海伦娜·魏格尔仍不知道她的工作是否有物质和经济基础。那么：继续。继续进行对雅各布·米哈伊尔·莱茵霍尔德·伦茨《家庭教师》的改编，对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的文化官员而言，这又是一次当头棒喝。歌德已经把伦茨评价为“转瞬即逝的流星”，单单选择伦茨对他们而言已是一种侮辱。而且柏林剧团绕过古典文学时期，将狂飙突进运动早已遗忘的粗糙文本硬拖上舞台。布莱希特将伦茨的戏剧阐释为对德意志悲苦极端化的表达。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后，德意志市民用思想和精神“解决”身体和物质问题的方法已经无法再俨乎其然，布莱希特随之对其付诸一笑。

这一次，又是弗里德里希·路福特。他4月16日在慕尼黑《新报》中认识到了布莱希特戏剧的闪光点：“完全是尽善尽美。……其中的爽朗和喜悦源自思考。……戏剧风格贬责了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党和家庭教师’的一切，以及那些轻蔑的谎言。他让幻想和情感戏剧都出现了疑点。这种表演方式再三尝试下终究会得以贯彻。”同类似状况一样，统一社会党的机关报对改编和演出只字不提，用这种方式予以回避，以便能关起门来作裁决，对此柏林剧团最终也有所觉察。

1951年6月，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分析”了德意志学会（Deutsche Akademie）表演艺术部的工作，在柏林剧团一事上作出如下决断：“表演艺术部不完成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工作。……布莱希特的戏剧表演方式大行其道。这一方式主要在于忽视细致而真实的舞台布景造型，一再显现片面的无产阶级崇拜倾向，将演员的成果‘简化’到乏善可陈的程度。……表演艺术部的罗登堡（Rodenberg）同志对此表示：‘布莱希特是出色的，但决不允许他创立一个学派。这个

部门必须注入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人员构成也不可以一成不变。’ ”

1951年夏，柏林剧团提议将其现有的作品一由露特·贝尔劳制作插图一出版为一册《戏剧作品》（*Theaterarbeit*）。对此，波尔克同志表示只有在题目中添加“柏林剧团的”之后才能予以准许，因为这样就不会令人产生这是一部有关民主德国戏剧记录的印象。同时，波尔克同志还要求其他剧院提交自己的戏剧书籍，使柏林剧团无法占据“领导者位置”。只有在对发行量等进行诸多限制的前提下，民主德国的官员才“许可”了布莱希特的作品。自此以后，借维尔纳·海希特（Werner Hecht）的话说，布莱希特只能交付“许可产品”。

无疑，德意志恶名昭彰的悲苦，

让我们失去了本能由歌德写出来的喜剧

德国高于一切或者统一（神圣）的祖国：

在排挤中联合起来

1951年全年，布莱希特都努力在柏林周边寻找一处庄园。在布科市（Buckow）他找到一座塔楼，露特·贝尔劳日后居住于此。1952年2月，布莱希特一家在“谢尔米策湖（Schermützelsee）美丽的湖水旁，参天的古树下发现了一座小房子，古老但并不奢华，一旁大约50步外还有一座同样简朴的房子”。庄园位于勃兰登堡小瑞士

（Märkische Schweiz），柏林东部50公里。3月，布莱希特签订了多纸租约，包括湖边的两座房子，前文提到的塔楼以及林荫道旁的另一处地产。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至少部分地远离柏林的繁忙，特别是夏季的几个月。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别的事。1949~1950年保罗·德绍和布莱希特为电台广播改编了《审判卢库鲁斯》并谱写了音乐。由于无法实现电台表演，两人计划将其改编为歌剧。3月12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禁止了这部被视为颓废和形式主义的作品，1951年3月15日，这部歌剧在德意志国家歌剧院进行“试演”，但必须在政府官员出席的情况下，当局希望通过选择观众让歌剧不受欢迎。统一社会党向各工会和德国自由青年团发放了免费入场券，但这些人对现代歌剧不感兴趣，将入场券转送他人，因而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政客先生们也只能面露窘色。自然禁令又再次颁布，布莱希特的助理克特·吕丽柯（Käthe Rülicke）评论道：“政治上否定的原因——迷惘，几乎是战争状态——我理解，但不能理解用看似艺术的论述来说明理由，那无非是专家们判断能力的缺失。”

反对的主要原因是所谓德绍的音乐太艰涩、具有“非民族性”，以及歌剧的和平主义内容，抗议任何战争。在民主德国，由于苏联红军的胜利，不允许批判战争，只能批判侵略战争。被吕丽柯认为还可以忍受的“战争状态”，事关愈发严峻的冷战和联邦德国内部麦卡锡主义^[8]影响下不断升级的反共运动，该运动还波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53年联邦议会选举时，自由民主党（FDP）在海报上描绘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埃里希·奥伦豪尔（Erich Ollenhauer）用犁在地里开垄。奥伦豪尔身后，一名超过真人大小、装备了炸弹的苏联士兵将苏联红星播种到垄沟中：“奥伦豪尔犁地/播下莫斯科的种子/因此投FDP吧。”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海报上写着：“所有共产主义的道路/都通往莫斯科/所以投CDU吧。”反共运动取得了成功。

在《审判卢库鲁斯》遭禁之后，统一社会党针对布莱希特采取了又一不友好、不体面的行动，而且后果很严重。1951年5月2日，瓦尔特·乌尔布里希特亲自委托《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的编辑威廉·基尔努斯（Wilhelm Girnus）同志，“对布莱希特实施长期的

政治工作”，即明文规定对布莱希特进行持续的国家安全监视。监视严密毫无缝隙。对布莱希特实施其他行动时，基尔努斯也是密探。

1952年2月，在莎士比亚之前，布莱希特第一次考虑演出歌德的《初稿浮士德》，也就是又一次绕过了古典文学时期。布莱希特继续着自己的倔强。1951年8月2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室作出了如下记录：“必须通知贝尔特·布莱希特，我们在艺术上不允许改编经典著作，这使原著仅仅如同讽刺画一般。在戏剧《公社的日子》演出之前，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审查。不同意演出《科利奥兰纳斯》。《大胆妈妈》的演出也必须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相反，布莱希特对这一状况评价为：“无疑，德意志恶名昭彰的悲苦，让我们失去了本能由歌德写出来的喜剧。即使是《浮士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表演方式中也沉寂了成吨的灰尘。在那些悲剧片段中，那些柔情很纤弱，而伟大的东西又似乎在自夸，绝望具有了代表性，而狂热不过是装饰。”因此，必须进行干预。在第一次商讨时，卡斯帕尔·内尔和库尔特·帕尔姆（Kurt Palm）负责服装，内尔的学生海伊纳·希尔（Hainer Hill）负责舞台设计，布莱希特的学生之一埃贡·蒙克（Egon Monk）参加了导演工作。布莱希特建议采用“丢勒式的中世纪”^[9]，从而使“魔鬼、魔法和所有旧玩偶剧的琐碎能够显得质朴”。这样，地灵就能够是嘎嘎叫的畜生，蹲坐着玩耍，而墨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则是“长着角和畸形足的魔鬼”，大声叫喊。这也奠定了演出的基本概念，之后还给予了汉斯·艾斯勒创作《浮士德》歌剧的灵感。

1952~1953年，17岁的中学生汉斯·尤尔根·聚贝尔伯格（Hans Jürgen Syberberg）拍摄了布莱希特《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狄》、《初稿浮士德》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演出的部分内容。这些记录没有收录演出的原音，但展示了排演工作的精确和幽

默。尤为突出也因此特别受到批判的是书斋和奥艾尔巴赫（Auerbach）地下室的两场戏。

书斋：一名学生求学于浮士德，没有想到遇到了魔鬼墨菲斯托。墨菲斯托为了取乐假扮教授——一名毫无忌惮的图伊，用书本知识强求他人的尊重，保障自己偏爱的生活方式。这位学生习惯于向尊贵的先生和高超的学识致敬，墨菲斯托赶走了他对真正科学的所有热情，因为热情可能会使人询问市民大学的意义。当墨菲斯托发现学生将信将疑地接受了一切，就感到厌倦，重新扮回了魔鬼：“我受够了教授的嗓音/想再次扮演魔鬼。”但温顺的德国傻瓜即使对此都没有理解，魔鬼建议他：“要特别学会操纵女人”，因为这比钻研哲学好得多，对此，学生还表示高兴。

奥艾尔巴赫的地下室：对知识的追求逐渐变弱。圆桌周围，一群肥胖、衰老的学生形象在野蛮、堕落、迟钝中进行着低级趣味消遣。海伊纳·希尔和库尔特·帕尔姆灵巧地找到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将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可恶、随时可能诉诸暴力同时又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搬上舞台。这里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喧哗，但他们并非出身街头，而是生活无虞，他们扯开嗓子高声呼喊，这是瓦尔普吉斯之夜（Walpurgisnacht），5月1日前夜：“5月已经到来……”

由于柏林剧团必须寻找地点进行演出，所以《初稿浮士德》的首演1952年4月23日做客勃兰登堡波茨坦州剧院（Brandenburgisches Landestheater Potsdam）举行，这甚合文化官员心意，因为那里不怎么引人注意。事实也如此：反响虽然还算积极，但影响不广泛，因为几乎无人知晓此事。1952年6月，海伦娜·魏格尔询问是否可以在船坞剧院演出，弗里茨·艾尔彭贝克受国家艺术委员会（Staatliche Kunstkommission）之托表示拒绝，“由于舞台和《劳动法》原因而不具备可能性”，这显然不过是托词。但魏格尔仍坚持不懈。

这一直持续到1953年3月13日，《初稿浮士德》以波茨坦演出为基制作了录像在室内剧院播放，3月29日，民主德国广播在节目《我们开始放映》（*Wir blenden auf*）中报道了如下发现和问题：“文本内容随意，通过所谓的‘插叙’歪曲情节，歪曲人物形象，这无非意味着挖空作品的人文主义内涵，剥夺其意义。这样对民族文化的伟大遗产进行歪曲，仅仅拒绝是不够的。如果这样的戏剧表演还会出现，那么必须要问：柏林剧团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对其实施严肃审查的地步？”

《新德国》没有通过《五月之歌》，并断言，在德国舞台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对德意志民族歌曲的嘲讽”。其中所谓的民族歌曲源自艾曼努埃尔·盖贝尔（Emanuel Geibel），他于1841年写下了歌词，1843年由尤斯图斯·威廉·吕拉（Justus Wilhelm Lyra）作曲。歌曲从那时起就被视为感伤，具有德意志狂热，无意识地歌唱悲苦，布莱希特的演出也突出了这一点。但这些不懂历史自以为是的人却不知道，恰恰是这位出生于吕贝克的盖贝尔，纳粹有一句格言就源自他的诗歌《德国使命》（*Deutschlands Beruf*）：“权力与自由，法制与道德，/清醒的思想和精准的出击/强大的中流砥柱/约束每一份自私的狂野欲望/德意志本性/将有一日拯救世界。”由此，柏林剧团的演出也同纳粹主义建立了关联，这自然是那些“同志们”所不知晓的。

布莱希特的批判者更不知道，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让·雅各·霍普斯泰德（Jean Jacques Hoffstede）这一人物即以艾曼努埃尔·盖贝尔为原型，而且完全是反面人物。小说中房主邀请大家庆祝乔迁，“简单的午餐”也成了反常的饕餮之宴，吕贝克的“城市诗人”（暗指盖贝尔），以海上升起的维纳斯和火神的勤劳能干——即自负、无教养、自称布尔乔亚的贵族社会——为题吟诵了媚俗的诗歌。如此，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这对“思想争端”采用了相同的主题，而且主题的运用同样是为了社会批判。

通过对《家庭教师》和《初稿浮士德》的改编，我们的剧作家发现了德国也曾存在过的社会批判传统，引起了一但在相当的时间推迟之后一轰动：已经被遗忘的伦茨立即引发了众人的兴趣，而歌德尽管努力适应枢密使的职务，仍然是老成的局外人和德意志悲苦的批判者。艾斯勒在布莱希特的帮助下，尝试以背叛天主的浮士德形象创作民族歌剧，他把这一题材置于农民战争的历史背景中，讲述了一名平步青云的农民之子背叛了农民，从而得到魔鬼的帮助。对此，文化官员们进行了数周的讨论，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保留意见和教养的缺乏，他们扼杀了许多重要的作品。艾斯勒陷入了深刻的危机，长期沉溺于酒精，只创作了几首小歌，这些在1980年代一仍然是民主德国时期一才得以首演。而计划中的歌剧仍停滞不前。艾斯勒心灰意冷，以至于1953年10月，只能让布莱希特代笔，向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致信：“同志们：长期严重的情绪低落已经阻碍我将全部力量投入到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阻止我全力进行艺术创作，如果不向大家坦白这一点，那将是我的不诚实。由于我的这些状况亦非零星出现，所以不能向你们隐瞒，流亡归来之后随即常有沉重之感，虽获得一些外部荣誉，其中包括十分重要的工作（受邀谱写国歌，获得国家奖金），但目前我的艺术才能和创造欲望其实已经无法再持续工作了。”

一度曾几乎统治世界

人民成为主人/但我愿，你们还没有胜利

原子弹试验：

长达数百年的空气污染

布莱希特原本无论如何也想将已经完稿的《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作为战后的首批作品出版，还将72首照片箴言诗交给露特·贝尔

劳审查，但最终遭到出版业文化咨询委员会的拒绝。原因是：“未完结”和“宽泛的和平主义倾向”。因此，布氏又一次开始了穿越文化行政指导的障碍跑。1950年3月16日的一封信中，咨询委员会作出了详细说明：布莱希特把联邦德国的复辟，俗称“新法西斯主义”，刻画为“希特勒的重生”，因而没有抓住其“支柱”，即“他们的宣传者——美国康采恩^[10]巨头，还有对我们德国人而言尤为特殊的那些西德叛徒”。布莱希特回应，《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针对的是希特勒战争，而非战后时期。同时，这些批评又成了灵感来源，“在书籍结尾撰写评注，这些评注能消除这样那样的误解，对记录作出解释”。

1954年9月，布莱希特同奥伦施皮格尔出版社（Eulenspiegel Verlag）签订的出版协议包括71首照片箴言诗，但再次遭到反对，这一次是文学管理局（Amt für Literatur）。箴言诗中直呼美国女演员简·惠曼（Jane Wyman）为“婊子”，这在古板的小市民社会阶层情境下是绝不允许的。有关艾伯特的照片箴言诗也没有通过审查。在艾伯特一张精妙照片上配有诗歌：“我是马鞍匠/重新/扶容克流氓上马/我这猪猡/被他们收买/用的是穷人的一个个铜板/没有给我的一条绳索吗？”不得不承认，文本初看毫无品味，但含沙射影地引用了埃里希·鲁登道夫1920年策划的阴谋：“如果我再次当权，将毫无宽恕。我将心安理得将艾伯特、谢德曼等人绞死，看他们的尸体在吊绳上摇摆。”

布莱希特为了维护和平作出了不懈努力，甚至为此而收集签名，但仍得不到民主德国上层的认可。自两德对立以来，看似和平的关系时刻受到转化为“热战”的威胁，尽管如此，美国和唯其马首是瞻的西德仍然高举着反共的大旗，而苏联与其麾下的东德则谴责对方为复仇主义、好战和背信弃义。自1950年来也确实出现了“热战”——朝鲜战争，据美国报道，甚至比希特勒战争更加残酷。

战后，布莱希特陷入了宣传教育者典型的两难境地，即明白所有的宣传教育都毫无用处，但对其又决不能舍弃。在生灵涂炭之后，看似每一种战争手段都在原则上（永远地）受人唾弃，但仅仅布莱希特这么认为，统一社会党仍将其作为“和平主义”观念在追寻。1951年9月，布莱希特在《致德国艺术家和作家的公开信》（*Offener Brief an die deutschen Künstler und Schriftsteller*）结尾所写的内容也于事无补：“强盛的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第一次之后仍然强大，第二次之后尚可居住，第三次之后这个国家消失了。”

直至辞世，布莱希特一直坚信必须克服德国的分裂，即两种体制无法长期“和平共存”。1950年6月，布莱希特向在西柏林召开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Kongress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呈递备忘录，号召与会者：“对于能想到的所有社会体制，请您允许我们要首先考察，没有战争它是否能存在；请您允许我们为自由而奋斗，允许我们要求和平。”所有不谴责战争的政府，都应该受到诋毁，这样“才不会由原子弹决定文化的未来”。1956年去世前夕，布莱希特记录道：“当德国统一，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天将会到来，但没有人知道会是哪一天—但不会是通过战争。”

当西德人民在伯尔尼沉浸在“我们东山再起”^[11]的喜悦中，尽管仍身处触目惊心的废墟，仍旧忘记了战争，而且对环境污染也一无所知（或者不愿知道）；布莱希特仍坚持为和平问题寻找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像民主德国一样，坚持看似有苏联保障的和平。1953年5月和1954年2月以后，美国加强了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Bikini-Atoll）和内华达州的原子弹和氢弹实验。1954年5月28日，在柏林的和平代表大会上，布莱希特发表讲话：“数周来，日本和美国的城市都降下酸雨。日本人民心怀忧患地注视着他们的远洋渔轮，这些渔轮给他们带来的是主要的食品补给。海洋和天空，数千年来的

无主之地，如今找到了它们的主人，自以为拥有了这里的支配权—污染它们的权力。人类的健康将受到长达数百年的威胁。”

在这次讲话的草稿中，有关内华达的原子弹实验，布莱希特写道：“学者们无法预测天气，而根据天气的不同，巨大的云团将污染发臭的空气四处传播，甚至超出了自己国家的边界。……知识的果实多么恶毒，其势愈发严峻，因为绝大多数人民都无助而无知，而他们的主人用尽一切信息手段（新闻、广播、电影、中小学和大学）来保持这种状态。”布莱希特要求，“五大洲”的数百万人不了解这巨大的危险，因此—既然原子弹被婉转地称为“非常规性武器”—必须“采用非常规性的知识传播方式”。

像常有的那样

被当作女神邀请

被当作丑妇对待

兵营人民军的戏剧：

6月17日后，在布科的间离化存在

布莱希特回忆，1953年6月，起义的两天前，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承诺，将在船坞剧院重建的人民舞台交予柏林剧团使用。作为一贯的策略，布莱希特写道：“您或许已经听说，在西德，一些荒唐的流言又甚嚣尘上，捏造我同民主德国政府之间的诸多不和。由柏林剧团来接管船坞剧院，此事已经举世瞩目，也能明确证实我同我们共和国的紧密关系。”布莱希特想抢先行动，以求自保。

如果有人相信船坞剧院一事已经尘埃落定，那么他将又一次失望。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柏林剧团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

1953年4月9日，中央委员会送交海伦娜·魏格尔如下通知：“船坞剧院将属于兵营人民警察剧团（Ensemble der Kasernierten Volkspolizei）。”至今尚无法解释，是谁想到这个疯狂主意的；因为他们不过是展示了民主德国政府精神上和艺术上绝对的最低水平。兵营人民警察剧团成立于1950年，致力于“保护德意志民族歌曲”，组织宣传活动，因此也被相应地作为煽动宣传工具来使用。他们在文化宫或者企业中演出，受到了一定的欢迎，因为工人参加这类演出可以计算工时。

魏格尔和布莱希特威胁，如果当局不遵守承诺，他们将“减少”演出时间，也就是停止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戏剧工作，转向西德。这最终收到了成效，但这一让步仍必须经过基尔努斯的同意。乌尔布里希特也亲自过问此事。基尔努斯：“我向你告知如下事宜：1953年7月25日，周日上午，我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正如对布莱希特某些理论的态度一样，从很多角度，特别是从国际影响来看，我认为，长期拒绝向布莱希特提供剧院是不可行的。此外，我期望从这一行为中得到教育性作用；因为他将必须证实，自己有能力通过自己的戏剧吸引赢得观众，特别是劳动人民。迄今为止，他凭借目前的手段还无法做到。因此，不能随便给他一个弹丸之地，而必须是一座真正的剧院，由此，他便不能用缺乏技术支持来为他的原始主义和清教主义开脱。显然，我们也会不时地从原则上批判相应的表演，但同时又不过于粗俗或失态。”

柏林剧团以“弹丸之地”早已赢得了观众，但是否能同样打动劳动人民，仍值得怀疑，这些人被统治者设想为在意识形态上思想境界最低、逆来顺受、任人摆布，对党则唯命是从。魏格尔和布莱希特也不欢迎这些人来到他们的剧院。布莱希特和魏格尔的柏林剧团是民主德国文化事业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布莱希特有生之年从未得到真正认可，他们的成就也没有得到承认。事实上，仍如基尔努斯所暗示

的，统一社会党文化政治的官方评论要么（小心地）猛烈抨击柏林剧团的演出，要么对其完全无视。仅仅是出于担心“国际影响”，担心在外国人面前有失颜面，才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在这一争执中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使布莱希特又一次在西方媒体中成为众矢之的：3月5日斯大林的死和1953年的“六一七事件”。就斯大林之死，《新德国》发表祭文，其中包括布莱希特的文章。文章指出，斯大林是“五大洲受压迫者”希望的“化身”：“他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武器仍在，他的学说仍在，以此来创造新的学说。”同往常一样，布莱希特“创造新的学说”的批评十分隐晦。同时他也策略性地隐藏了文章中未公开的附加内容：他对斯大林的赞扬仅仅在于，“在他的领导下，强盗被击败。强盗，我的同胞。”自然，这样的语句同往常一样，被算作对斯大林主义的信奉。

布莱希特对工人起义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反应则更加扑朔迷离。胜利者总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改写历史，因此，这次工人起义的记载，西德的版本很可能毫无争议地在未来得到贯彻。布莱希特仍提醒大家，工人阶级合法合理的起义也伴随着极右破坏分子的操纵，企图将其发展为一场政变。在东德的记录中，是西德的阶级敌人和他们的乌合之众非法穿越边境，在柏林造成骚动，而且事件的规模也不仅仅局限于柏林。所谓布莱希特对统一社会党的效忠信，也是由《新德国》捏造的。布莱希特试图组织柏林剧团进行广播剧表演，但明显遭到了阻挠（反之播放的是兵营人民警察剧团的民族歌曲），同时，布莱希特对时事的评判也愈发尖刻。

民主德国政府组织布莱希特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只能通过艺术手段干预政治或者至少对政治进行诠释和评论，《布科哀歌》

（*Buckower Elegien*）便证实了这一点。《布科哀歌》是短篇组诗，表达了布莱希特的政治见解，并借此清算民主德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时

所犯的错误。布莱希特最后一部原创戏剧也恰恰再次采用了1930年代的图伊题材，这也证实，这一曾经讽刺法西斯主义的主题也可用于对民主德国的讽刺。在《图兰朵或者洗刷嫌疑者大会》（*Turandot oder Der Kongreß der Weißwäscher*，简称《图兰朵》）的前言中，布莱希特写道：“特别在战争失败的混乱中，高度文明的政体和高度的劳动分工使得不可能放弃国家机器，且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机器将更为艰难。在新的指令下，纳粹机器又开动了。通过自上而下的操纵，此类机器无法被填充新的精神，它需要自下而上的控制。猜疑但胆怯，敌对但卑躬屈膝，保守僵化的官员们又一次开始了令民怨沸腾的统治。”

由于在西方遭到诽谤，布莱希特被视为潘科最令人作呕的党棍和叛国者，彼得·苏尔坎普担心自己新建的出版社，要求布莱希特表明态度，对此布氏写道：“标语变换迅速，从‘脱离政府！’变为‘绞死他们！’人行道担任了领导作用。正午前后，在民主德国也同样，莱比锡、哈勒、德累斯顿，所有的游行都变为了动乱，火焰再次扮演起先前的角色。……无论是今天还是曾经，纵火的都不是工人：它不是建造者的武器。然后——在各个城市——人们冲进书店，把图书扔出来焚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集在火焰中化为乌有，这些著作和当众被撕碎的红旗一样，都并不敌视工人阶级。……数个小时，直至占领军介入，柏林都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布莱希特所言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至少触及了起义的一个根本点，这一点在普遍的讨论中未曾提及，因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再次）阻碍了对纳粹历史的适当清算。随着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爆发，艺术创作的困难之外又增添了政治困难。此时，据布莱希特的助理克特·吕丽柯所述，布莱希特确实考虑过流亡中国，尽管显然没有思考过对这一计划应该从何处着手。

至少出于两个原由，联邦德国也被排除了成为避难所的可能性，因为客观情况确实如此，在联邦德国，布莱希特将会遇到比奥地利更严重的困难和更激烈的反对。而且，谁又能提供给他一座剧院呢？因此，对他而言，除了心计和迎合之外别无选择，也就是说通过左右逢源为自己和柏林剧团保障最佳的工作条件。已经能够时常观察到，布莱希特不仅仅个人忌惮面对公众，他之所以没有真正站出来公开反抗民主德国，不仅是出于怯弱，而且还由于这一时期他在西方无法为自己的工作找到基础。布氏至少已经稍许安顿下来：他是奥地利公民，已经在1950年5月21日给彼得·苏尔坎普的一封信中，将自己作品的版权转交给了西德出版社：“亲爱的苏尔坎普：/自然，无论如何我都想与您领导的出版社合作。/衷心问候，您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他还在民主德国为自己安置了（没有公开声明的）流亡地：布科。

1953年8月20日，布莱希特在《工作笔记》中记录：“布科。《图兰朵》。还有《布科哀歌》。“六一七事件”间离了整个存在。”这里还有言外之意。间离（verfremdet，陌生化）本应写为“异化（entfremdet）”。当他使用了自己诗学的核心概念“间离”时，对此只能解释为，布莱希特确实必须以（众所周知的）第三人称生存，即使没有失去自己的个体性，也至少对其产生了质疑。“间离的存在”，不再意味着生存，而是“被生存（gelebt zu werden）”，不再能支配“生活艺术（Lebenskunst）”的各种可能性，根据布莱希特的纲领，所有的艺术都应该为“生活艺术”服务。

事实上，1953年夏布莱希特的身体状况逐渐衰退，在实际上已经享有特权的条件下，在船坞剧院短暂的工作期间内（刚满两年），他都是在巨大的疲惫和突然出现的心脏疼痛中坚持下来的。布氏还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实施了又一次“语言清洗”，也就是说：再一次降临的“昏暗时代”迫使他在创作中放弃了所有“使人类圆满并具有人性”的东西。这一时期的诗学作品《文学的七次生命》（*Die sieben*

Leben der Literatur)，将民主德国为文学或者艺术设定的角色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

四处流传着

文学并非一株含羞草

像常有的那样

她

被当作女神邀请

被当作丑妇对待

她的主人

夜晚玷污她的身体

白日又把她架在木犁前耕作

布氏精通圣经，自然使用了数字“七 (sieben)”^[12]的象征意义。

1953年6月30日，艺术科学院全体会议达成一致，作为“六一七事件”的后果，统一社会党和政治至少不应干预艺术事务。会议记录的序言中写道：“国家机构应该以每一种可能想到的方式促进艺术发展，但不应以行政方式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倾向等问题，应将其交予公共批评裁决。”积极参与的还有一他们的发言都记录在案—汉斯·罗登堡 (Hans Rodenberg)、德国电影股份公司 (DEFA) 的一位主管、阿诺尔德·茨威格、约翰内斯·R. 贝歇尔以及布莱希特。如下语句也源自布莱希特的手笔：“国家应该同艺术事宜毫无关联，对其不应像迄今为止的那样，予以干预、约束和钳制。”他们虽然表达了愿望，但政府对此丝毫不以为意。1953~1954年，民主德国的政治氛围每况愈下。

想对政治局势发表意见吗，老朋友？

花费不过三日元，立等可取

巧舌如簧：从未言之有物

1953年夏，布莱希特费力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戏剧《图兰朵或者洗刷嫌疑者大会》。根据较早时的计划，这部作品隶属图伊系列，还包括图伊小说、图伊故事、图伊杂文、图伊叙事诗及相关组诗。1762年卡洛·戈齐（Carlo Gozzi）将波斯童话改编为戏剧《图兰朵公主》，《图兰朵或者洗刷嫌疑者大会》借童话故事的原型，讲述了戈格（Gogher Gogh）的发迹之路，戈格虽然不是图伊，但成功地爬上了国家机构的顶峰。而图伊们则起到了帮助性作用，他们能言善辩地回避社会现实。当戈格最终当权时，便不再需要这些图伊，将他们血腥地杀人灭口。如果追求者无法答出图兰朵公主提出的三个问题，将会被杀头，这一情节在布莱希特笔下不过起着次要作用，图兰朵公主的角色不再是为了寻找相伴一生的王子，而是被图伊们的讲话所挑逗。有言道：“精神是春药。”如果图伊们做不到这一点，便会被杀头。

故事的背景仍然是经济行为，如同《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一样，布莱希特将其塑造成一场投机者的游戏。中国的皇帝储藏了大量的棉花，因此棉花短缺，价格飞涨。而图伊们在图伊学校得到培训，任务就是向公众解释为何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有棉花，当然还必须用长篇大论和夸夸其谈来隐瞒真正的原因。贸易自由和言论自由像是一所人尽可夫的妓院，这里用钱可以买到图伊们模板目录上任何一个中意的见解，并随意为自己所用。

布莱希特早期便曾讽刺意见和想法可以像金钱一样被支出的现象，《图兰朵》的故事背景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不仅如此，在经历了纳粹和民主德国政治家的虚伪（这也是这部戏剧所首要针对的）之

后，他还借此抨击了那些完全是妄自臆想的观点，它们毫无根据，只不过是大脑的错位。

洗刷嫌疑者大会上，杜蒙卡（Munka Du）就各种不同的意见进行了一场空话连篇的内阁演说，基本上只用了“自由”和“意见”两个概念。杜蒙卡开始说：“我在这里说……我在这里说，因为我不愿被剥夺言论的自由，无论在哪里，无论有关何事。是的，我站在这里，捍卫自由，我的，你们的，所有人的自由。”此时有人打断他，喊道：“还有狼的自由！”杜蒙卡绝望地说：“是的！”并继续道：

“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不认为（为自己擦汗），我不认为，应该扣留那些衣不蔽体者的棉花，但是，如果我是这种意见，如果是这种意见，我希望，可以被允许充分表达这种想法，这种意见，我不赞同，不与任何人分享。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棉花，而且是关于棉花表达意见的自由，重要的不是棉花，问题不是棉花。这里从事的不是贸易，这里形成的是意见。（骚动）这里重要的是意见，而非贸易。”

在另一场讲话的开场白里，他建议不再讨论棉花，而讨论人民缺少棉花仍艰难度日的美德，他问道：“美德何在？欣然放弃的理念何在？”如此洋洋洒洒，文章气势恢宏，论述一重复是必须的，不仅为了不断强调加强记忆，还能为下一个借口争取时间——如何远离眼前的（物质）事物，最终达到最普遍的“道德问题”，如此一来，这些事物就最终会在眼前消失，不再需要谈论。

在民主德国，这恰恰是几乎每日都发生之事，正如布莱希特在致人民教育部部长保罗·万德尔（Paul Wandel）的信中所写，用一切权力，言辞华丽地排斥“本国的西部”。1953年9月，布莱希特记录道：“同一名白铁工谈话。……由于偷盗和蠢笨，他解雇了一名学徒，此人现在却成了人民警察，报名参加军官学校。由于‘违背人权’而被判刑十年的纳粹分子现在成了人民警察，这样的故事在城市里流传

着。在希特勒统治之下，官僚机构已经臃肿庞大，但当时钱多些。……必须自由选择。我曾说过：那样被选出的会是纳粹。”

这部戏剧还包括了对挽救文化的讽刺，对布莱希特而言，这是既传统又时兴的题目。当戈格的统治扩张后，图伊们纷纷把他们的“杰作”带到安全之处，为此专门找到了制作武器的匠人，还雇用了一些民众。正义女神（Justitia）的巨大立像需要被存放，由于无法把她搬进房子，就打通了房顶，为了不吓到孩子们—孩子们真的“害怕看到她的脸”，就干脆将其倒立。她的任务是不让制作武器的匠人好好工作，也就是不再为了抵抗而打造武器。另一名图伊认为无论如何必须要拯救地球仪，这样后人就不会忘记地球是圆的。布莱希特以此不仅反思了纳粹历史，也讽刺了民主德国时期的文化政策，不经思考和批判，无论如何都要接纳市民性和古典主义的文化遗产，美其名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挽救”。布莱希特意欲反思市民阶层文化在纳粹时期和为纳粹崛起所起到的客观作用。

1952年，柏林剧团在为罗斯托克的人民剧院筹备莫里哀的《唐璜》。海伦娜·魏格尔从瑞士请来了本诺·本森（Benno Besson）担任客座导演，本森和伊丽莎白·霍普特曼最初负责剧本创作。由本森提出建议，在布莱希特未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加工，布氏在1952年5月25日首演前夕才加入进来，“认可”这一集体工作的成果。1953年，柏林剧团将要得到一座自己剧院的事情已日渐明朗，在集体决定后，将莫里哀作为开幕的首演作品。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唐璜》不涉及德国历史或政治主题，而且是一部“非德意志”戏剧：风花雪月，浪漫妩媚，机智风趣又含沙射影。

本森和霍普特曼对原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偏移在于将充满诱惑能力的个体转变为“巨大的性能力”。莫里哀笔下的人物以其个人气质和冒险者、猎艳者的特点著称，这些在改编

中仅仅是代表性的，唐璜的仆人斯卡纳奈勒（Sganarelle）对此一语道破：“给我他的大衣、绶带和床，我也能轻而易举地引诱你们；但之后就有你们的好看了！”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

（*Coriolan*，如同1951~1952年的《科利奥兰纳斯》）也类似，作品仅仅看似展现了众多伟大的个人，并特别告诫他们要收敛自己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与其说源自自身的能力，不如说源自他们所代表的角色和作用，最终也被角色的光辉所毁灭。

但一切仍然岌岌可危，沃尔夫冈·朗霍夫1953年10月1日致约翰内斯·R. 贝歇尔的一封信毫无保留地详述了这一点：“瓦尔特·费尔森施泰因（Walter Felsenstein）表示，必须立即流亡国外，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执行新的政策。你知道，费尔森施泰因能在维也纳照老样子过生活。恩斯特·布什想放弃国家奖金和职务，控告赫尔穆特·霍尔茨豪尔（Helmut Holtzhauer，国务秘书）诽谤。……格蕾特·帕鲁卡（Gret Palucca，著名舞蹈家），如她的事件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同样也想流亡西德。……布莱希特周围的小团体（赛茨、耶林、费尔森施泰因、布什）确实构建了公开的反对派。以上信息供你参考。”斗争一直在不懈地进行，以至于最终柏林剧团接管船坞剧院已经有了奇迹的色彩。

1954年3月19日《唐璜》的首演受到了观众的巨大欢迎，因而之后又上演了80场。给予柏林剧团赞许的评论家汉斯·乌尔里希·艾劳（Hans Ulrich Eylau）惊讶于布莱希特入主新剧院没有照例进行彻底的改建——之前已经有这样的猜忌传出，“老柏林人有理由衷心喜爱的剧院”中旧的屋顶石膏雕花、小天使雕像、枝形吊灯、配有花饰的小灯都得到了保留，这也标志了布莱希特宁愿在德国经济繁荣时期（Gründerjahre）^[13]装饰繁复的巴洛克风格中安家落户，也不愿坐在人民剧院被擦拭得光洁明亮的座椅上。只有一处发生了改变。剧院

建筑的角楼上挂起了旋转、发亮的圆形标识，刻印着文字“柏林剧团”，剧院外部的新标志。

德国四处弥漫着落后的“乡土之气”，在西德，“六一七事件”后也发生了反对潘科“奴仆”的极激烈的运动，甚至规定对布氏全面禁演，对此，当时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哈利·布克威茨（Harry Buckwitz）表示抗议，认为现在应该借助外国影响使布莱希特及其新的表演方式得到早应拥有的认可。1954年6月初，柏林剧团携《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做客莎拉伯恩哈特剧院（Théâtre Sarah Bernhardt），参加巴黎第一届国际戏剧节，演出三场。尽管戏剧评论对剧本（结果较差）和演出（得到一致赞扬）予以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剧本和导演（布莱希特和恩格尔）仍都荣获一等奖。尤为突出的是戏剧的精炼和简洁，还有极具现实主义的舞台布景和道具（提奥·奥托）。大多数法国人将作品评价为全新的、符合时代的戏剧，是一场“戏剧革命”和“戏剧史上的重要事件”。

杂志《流行戏剧》（*Théâtre Populaire*）将特刊题词献给布莱希特和他的剧团，并呼吁一场“布莱希特革命”。巴黎学者、评论家、戏剧家中的重要人物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伯纳德·多尔特（Bernard Dort）、米歇尔·哈伯特（Michel Habart）、勒内·莱博维茨（René Leibowitz）、瓦尔特·瓦德力（Walter Weideli）、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在此发表文章，他们积极地，一部分甚至热情地对这次重要事件发表意见，美学和政治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得到统一，并获得了社会性和社会批判性的立场。罗兰·巴特认为布莱希特对他而言是一次“觉醒的体验”，巴特表明传统戏剧是陈腐的，要求法国放弃目前盛行的平庸和市民性的自鸣得意，以布莱希特为榜样创作具有政治热忱的戏剧。即使在德国也几乎未曾提及“布莱希特革命”，柏林剧团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艺术地位，这至少使国内面临的果断排斥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布莱希特和柏林剧团还经历了另一场辉煌的成功。《高加索灰阑记》于1954年10月7日在柏林首演，共演出175场，持续到1958年8月，剧中固定的演员包括：饰演格鲁雪的安格莉卡·赫尔维茨，饰演阿兹达克的恩斯特·布什，饰演西蒙（Simon）的莱蒙德·谢舍尔（Raimund Schelcher），饰演总督焦尔吉（Fürst Georgi）的埃尔文·格绍奈克，饰演总督夫人阿巴什维利（Abaschiwili）的海伦娜·魏格尔，饰演沙尔瓦（Shalva）的埃克哈德·沙尔（Ekkehard Schall），卡尔·冯·阿佩（Karl von Appen）负责舞台布景。此处要补充一下为何卡斯帕尔·内尔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这同布莱希特的奥地利国籍有关，它（暂时）终止了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的事业。由于布莱希特不再关照冯·艾内姆，卡斯帕尔·内尔决定同作曲家朋友共患难，并中断了与布莱希特的联系。1955年上演《伽利略传》时才再次取得联系，自1955年12月起，两人之间进行了一些工作会谈，撰写了一些初步构思。1956年1月，布莱希特的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中断了工作，而后最终完全停止。内尔返回萨尔茨堡，两人未曾再相见。布莱希特的葬礼内尔也没有参加。

威廉·基尔努斯就《高加索灰阑记》运用了乌尔布里希特所说的策略，虽然《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署名为“S. L.”的评论员不可能了解这一背景信息，但联邦德国已经察觉了上述策略。“S. L.” 11月13日写道：“迄今为止，贝尔特·布莱希特的《灰阑记》是东柏林数月以来最重要的艺术事件，但党报对其三缄其口。从诸多事实中可以看出，最知名也最固执己见的艺术家给他的文化官员带来了多少不快；柏林其他报纸的评论清晰表明，对此类艺术作品的评价是多么艰难，其艺术质量不言而喻，但根据东部的用语却毫无争议地具有‘形式主义’特色。” 艾尔彭贝克重新发起的反对叙事剧的运动布莱希特没有参与。艾尔彭贝克恰恰选择了《高加索灰阑记》中最精彩的片段，以严肃批判“‘叙事剧’低俗的最初阶段”。这一情节是格鲁雪和西蒙相对而立，但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

法，由歌手吟诵两人的思绪。恰恰是这一幕为本剧的闻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5年6月，《高加索灰阑记》前往巴黎，再次做客莎拉伯恩哈特剧院，相比一年前《大胆妈妈》带来的“布莱希特革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媒体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未来的戏剧”，并用“绝妙”“令人钦佩”等定语证实这一说法。自然也有批评，但不是针对戏剧家，而是针对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他的《戏剧小工具篇》此间已经成了必读书目。

作为对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功的回应，统一社会党改变了策略。在1955年6月的《新德国》中，整版刊登了法国、美国、英国和波兰报纸对巴黎《高加索灰阑记》的报道片段。由此，开始了新一轮别有用心地宣传运动。布莱希特的成功被写在了镰刀锤头的旗帜上，被作为高水平民主德国文化的突出案例进行大肆宣传。当然，这样的宣传活动仍存在阻挠，即布莱希特本人。

宁愿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不愿怂恿如此这般有计划地摧残不可或缺的人才

《大胆妈妈》电影的始末

早在1947年秋，布莱希特就考虑将《大胆妈妈》剧本改编成电影。从1951年具体计划成形到1954年，他同德国电影股份公司—民主德国的垄断性电影公司—进行了长期接触。来自西德的导演沃尔夫冈·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1955年8月开始拍摄工作，9月中旬，投资15000马克之后，布莱希特终止了拍摄。发生了什么事？

起初施多德同布莱希特的合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后来出现了一些最初的分歧，”施多德回溯时辩解道，“我想做一部真正国际化

的电影，宽银幕立体声彩色电影，启用知名演员。这同布莱希特的想法相左。这一点上我尚能贯彻自己的观点。……我们极为细致地进行了试拍，投入心思制作了道具和布景，设计了精美的服装一筹备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开拍时，一个灾难接着另一个灾难，魏格尔在制造困难，布莱希特也在制造困难。”

在施多德贯彻了“大电影”的设想之后，布莱希特认为自己的“文学电影”无法得到保证。当矛盾无法协调，海伦娜·魏格尔在相去甚远的两个工作场所（柏林剧团和巴贝斯堡电影工作室）之间奔波已显得精疲力竭之时，布莱希特不得不武断地终止了拍摄。在给特丽莎·吉泽的信中布氏解释道：“施多德计划了一部鸿篇巨制的电影，但没有作到完全充分的准备。……多处开始草草了事，赫莉也被苛求几乎无节制地听候吩咐。我现在插手，特别是因为前些日子我们这一辈中好些优秀的人（贝歇尔、布莱德尔、阿克尔曼、福恩伯格）因心脏病而病重或去世。这个观点也完全得到了政府的理解。政府宁愿承担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不愿怂恿如此这般有计划地摧残不可或缺的人才。如今我们必须努力，如施多德先生所说，用艺术的、（并且也）健康的工作条件来替代对电影陌生的人所不理解的惯例做法。”

布莱希特论述透彻。自乌尔布里希特宣布不再执行他曾许诺的新政及“六一七事件”以来，批判民主德国一有计划性地一摧残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呼声震天，自然，根据“高层”的自我认识，这些批判是在腐化国家。布莱希特所谓“完全得到了政府的理解”也再次证实了他的机敏：抢先一步作此声明，几乎就不再可能出现反对意见。

1955年5月25日，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被授予斯大林和平奖（Stalin-Friedenspreis）。现在已明了，他当时不过是替代托马斯·曼的候选人，两人也因此去世前不久得以再次同时露面。但仍无法查证的是，布莱希特是否知道托马斯·曼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拒绝领

奖，如若知道，他是否也会拒绝这一奖项呢？由于西方再次掀起了批判“莫斯科奴仆”的媒体宣传，布莱希特以查理·卓别林为例为自己辩解，因为卓别林也接受了奖项。1954年，布莱希特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平奖（Friedenspreis des Weltfriedensrats），并又一次“缺乏原则性”。造成不愉快余波的是布莱希特得到的16万卢布奖金，他没有照理把钱存入民主德国的银行账户，而是汇往了瑞士。在西方评论中，布莱希特露出了“资本主义者狡兔三窟”的真相。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XX. Parteitag der KPdSU）后，这一奖项在民主德国更名为“列宁和平奖（Lenin-Friedenspreis）”，布莱希特并未得奖。

1953年夏至1956年，只要没有工作召唤他前往柏林，布莱希特大部分时间会在布科度过。而原因是愈发严重的疲惫和衰弱，这都需要不断的克服，而且对创作也没有促进作用。在“间离的存在”中，布莱希特发觉：“这个国家仍十分可怕。今日，我同三名学习戏剧的年轻人驱车前往布科，我晚间坐在园亭里，他们三人则在室内工作和讨论。我心中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十年前，无论曾读过我的什么作品，如果我落到他们三人手中，一定会被毫不犹豫地交给盖世太保……”这是1954年6月。在《布科哀歌—八年前》（*Buckower Elegie Vor acht Jahren*）中，布莱希特也描写了民主德国这样压抑混沌的气氛：“那会儿是个什么年代/那会儿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肉铺老板娘知道那时的情形/我们的邮递员现在走起路来/仍然过于正规笔挺/而我们的电工师傅呢/当年又是何许人？”诗句详细描写了民主德国一贯的特点：人与人之间无法相互信任。隐蔽的专制虽然从纳粹时期学到了教训，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少露面，但它仍散播着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信任气氛，将所有人性的友善扼杀在萌芽中。肉铺老板娘知道那时的情形。

令人厌恶的事情还在继续。1955年10月，布莱希特向内务部长卡尔·马龙（Karl Maron）申请特许证，可以凭此证通行至布科：“当时，我把国家奖金用来在布科购置一处房产，建造工作室，以便在此处度假。”现在“检查点的人民警察语气如此颐指气使，已经完全败坏了我对假期的兴致。但我需要休息。请您帮助我得到这份证件，能将我从与人民警察的口舌中拯救出来”。

但“国家”与其逐渐晋升为“首都”的大都会之间不再有自由的（“国内”）交通，因为方圆30~40公里外，直至民主德国末期，围绕柏林建造了带有瞭望塔的封锁线，检查每一辆有任何疑点的汽车。此外还有些类似集中营的临时火车站，开往柏林的火车都必须进站，检查每一位乘客，如果出现“逃离共和国”的迹象便实施抓捕。布莱希特甚至必须为其新买的奥利维蒂（Olivetti，意大利打字机）进行特殊申报，因为机器可能被他用于间谍活动。根本上，统一社会党从1950年代初便开始围绕柏林修建最初的柏林墙。布莱希特得到了特许证，但有效期只有一周。他又该如何理智地生活和工作呢？

布莱希特几乎回绝了一切事宜，感觉工作能力已经十分有限，但1955年12月初，他表示“心脏区域令人不安的压力减轻了”。负责治疗的医生奥托·梅尔滕斯（Otto Mertens）也不反对他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样《伽利略传》的彩排得以继续。布莱希特的特点是，他不仅会为自己着想，当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给莱蒙德·谢舍尔安排了一部电影中的重要角色时，他也立即提出抗议。莱蒙德·谢舍尔刚刚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必须保重身体。他还求助于文化部长贝歇尔，以便贝歇尔能对“摧残一流艺术家”的行为作出裁决。这一表示非人性待遇的概念再次出现，它在民主德国已经成了层见叠出之事。

为庆祝《三毛钱歌剧》1956年2月在米兰成为艺术领域的轰动性事件，乔尔焦斯特雷勒小剧院（Piccolo Teatro Giorgio Strehlers）和埃伊纳乌迪出版社（Verlag Einaudi）在演出后特别为布莱希特安排了接待仪式，并预想这将是一次成功的活动。据媒体报道，这位尊者一直置身角落，不曾愿意交谈。布莱希特的举止与场合格格不入，站在他一侧的提奥·奥托回忆此事时作出了澄清：“健康状况欠佳，他对人和噪音都极度过敏。为了不腹背受敌，他选择了角落的位置。当无法承受时，他拉扯我的外衣。由于虚弱，他汗如雨下。我把他扶到偏室中，他精疲力竭地坐下。两只眼睛像苍白脸上的两个黑洞，颈部也神经性地抽搐。”

返回柏林后，医生诊断为病毒性流感，从4月12日至5月12日在夏里特医院住院治疗了四周。汉斯·艾斯勒并未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表示愿意谱写一部《夏里特医院卡农曲》（*Kanon für die Charité*）：“疾病消逝，布莱希特长存。”医院本次虽然也作出了心内膜炎的诊断，但并没有严肃对待。

1956年2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Chruschtschow）在莫斯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揭露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讲话起初在民主德国不被允许印刷，因而也不为人知。4月，克特·吕丽柯搞到了讲话的手抄稿，并命人翻译。当布莱希特阅读此文时，他“深为感触”。1956年夏，“上帝已经腐朽/祈祷者叩击胸膛/就像在拍打女人丰腴的臀/伴着享受。”以及：“沙皇同他们讲话/用枪械和皮鞭/在血腥的星期日/他用枪械和皮鞭对他们讲话/一周的每一天，每一个工作日/人民的称职谋杀者。”布莱希特将斯大林的罪行比作沙皇尼古拉二世（Zar Nikolaus II）的残暴统治，尼古拉二世1905年1月9日血腥镇压了一次和平游行，导致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这也构成了《母亲》（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历史背景，布莱希特谙熟这段历史。其中“人民的称职谋杀

者”的表达嘲笑了民主德国从苏联引用的称谓，例如，根据1954年12月12日《新德国》中的说法，医生们从民主德国卫生部长那里获得了“称职人民医生”的荣誉称号。

在夏里特医院长时间的住院治疗，使布莱希特有了对死亡的预感，这在诗歌《当我在夏里特医院白色的病房中》（*Als ich in weißem Krankenzimmer der Charité*）中得到了反映。治疗完全没有成效，因为没有给他使用抗生素。出院后布莱希特处理了一些出版事宜，欢喜地迎来了精选集《诗与歌》（*Gedichte und Lieder*）在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出版，之后他于5月26日（至8月8日）迁居回到布科。负责治疗的医生是西奥多·布鲁格施（Theodor Brugsch）—夏里特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和心脏专家—他不时来到勃兰登堡小瑞士探望病人，但病情没有好转。8月3日，布莱希特决定接受西方的治疗，而且是约翰内斯·路德维希·施密特（Johannes Ludwig Schmitt）的私人诊所。施密特发明了一种新的呼吸按摩技法，这一技法基于顺势疗法和心身医学，令施密特卓有成就。布莱希特约定的治疗开始日期是8月20日，他还询问是否能为他的车提供停车位；显然他是要自己驾车前往。

1956年8月8日，布莱希特在柏林致信保罗·德绍：“之前布鲁格施一直因我的健康而欣喜，而事实上连5分钟的谈话我都无法坚持。虽然我的状况仍不十分乐观，但仍愿能早日见到你。”德绍的回信证实，布莱希特开始怀疑夏里特医院的学院派医学，并在寻找其他出路，但这条路根本不适合他。德绍评论道：“亲爱的bb: between you and me: 对抗疗法医生布鲁格施做的也不是‘干净的工作’。”

8月10日，布莱希特再次接受治疗，医生们（布鲁格施正在休假）仅仅诊断“有严重心脏张力不足的症状，但没有明显的心脏疾病”。克特·吕丽柯记录了当天布莱希特参加排练的状况，同上述诊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许多同事都惊讶于布莱希特的病容。他说话声

音极小，舞台上几乎听不到，而且提前离开了排练场——他没有力气坚持到结束。”同一天，布莱希特决定8月15日前往慕尼黑的疗养院，他起草了一封给布鲁格施的信，为施密特的治疗方案辩解。他写道，虽然“治疗的效果”不曾消失（明显的谎言），但仍“没有恢复”，现在必须抓紧时间了。“施密特将通知您，我希望能很快回到您那里。”

关于布莱希特人生的最后两日、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死亡原因存在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又明显相互矛盾。主治医生H. H. 亨内曼（H. H. Hennemann）代表布鲁格施对布莱希特进行治疗，亨内曼1988年回忆，当年8月13日他曾出诊肖瑟街（Chausseestraße）125号。布莱希特主诉心脏区域疼痛，亨内曼解释为心绞痛。“他当然没有给我病重的印象。”之后亨内曼证实，布鲁格施8月14日诊断了严重的心绞痛发作，布莱希特因此被送入了莫阿比特医院（Krankenhaus Moabit），并因心肌梗死去世。

1956年8月15日正式的医疗总结报告由布鲁格施教授、拜尔教授（Prof. Beyer）和克洛克尔医生（Dr. Krockner）签字，内容为：“8月14日出现暂时的意识丧失，同时出现身体机能衰竭。当日中午又出现明显的心力衰竭，并伴有心动过速，心动过速在下午加剧。血压急剧下降，几乎测量不到。能够听到心包摩擦音（诱因是心包炎，心包和心外膜摩擦所致），心电图显示明显的大面积心梗。对心脏和循环功能的支持治疗也没能阻止愈发严重的心脏衰竭。”

芭芭拉·布莱希特—沙尔（Barbara Brecht-Schall）在一次访谈中回忆，慕尼黑的路德维希·施密特医生也来到了医院，并指出：“这是一次错误的诊断，也是一次错误的治疗。”当布莱希特8月14日感到极为不适时，她的母亲派人去请布鲁格施，“布鲁格施刚休假回来，拒绝前往”。

心脏专家—例如科隆的汉斯·卡尔·舒尔腾（Hans Karl Schulten）—2000年通过远程诊断证实，“潜在数月的肾盂肾炎和心内膜炎是间接的死亡原因”，足够大剂量的抗生素有可能治疗疾病。奥格斯堡的心脏专家沃尔夫冈·冯·沙伊特（Wolfgang von Scheidt）和泌尿学家罗尔夫·哈茨曼（Rolf Harzmann）2010年审阅了病历并得出结论，心肌梗死说“可能性极低”，因为与“数月来的症状不相符”；布莱希特所患更像是心肌炎，由肾机能不全所致，而且可能引起了肾萎缩（布莱希特的肾已经被多次提及）。此外，奥格斯堡的医生还指出，布莱希特吸烟的习惯同慢性心脏病无关，否则他将活不过50岁。

确定的是，布莱希特1956年8月14日23点45分去世于肖瑟街的居所。在场的有奥托·穆勒莱塞特—出于绝望海伦娜·魏格尔把他叫到了病榻旁—夏里特医院的拜尔教授、芭芭拉·布莱希特和海伦娜·魏格尔。布莱希特最后的遗言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根据他意愿的明确要求，没有告别仪式，8月17日在多罗媞施达特（Dorotheenstadt）公墓的葬礼上也没有致吊唁词。

8月19日，海伦娜·魏格尔收到如下信件：“我们两人曾打算8月在慕尼黑相聚，在‘欢快的谈话’中把共同的多彩回忆记录下来……但是，一则消息从天而降，使人无法呼吸。几乎一个小时逝去了，都不能驱散这一事件带来的印象。所有理性的考虑也都于事无补，无法把精神从阴暗的国度中呼唤回来。因此，我不敢给你写信；大家曾觉得—至少我的头脑中如此—他是幸存者，会在耄耋之年仍给我们明智的建议，看透事物的短暂易逝，为他那些先走的朋友们而悲伤痛心。现在，这幅图像在我面前扭曲了，我无法再看到它。怎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伴着这个问题，一天开始，一天又结束。”写信的人是卡斯帕尔·内尔。

[1] 垄断的组织形式之一，是生产或销售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经订立协定而形成的同盟。

[2] 奥伦施皮格尔全名“Till Eulenspiegel”，是德国一部流传很广的笑话集中的人物。据传他生活在14世纪，到处流浪，每到一地都有一番恶作剧。

[3]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4] 即《科利奥兰纳斯》，又译《大将军寇流兰》。

[5] 狄奥尼索斯的臣子在宴会时发现，国王宝座的上方有一根细线，上面高悬着一柄长剑。后达摩克利斯之剑比喻时刻存在的杀机和危险。

[6] 根据驻德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的命令，因物资短缺而向苏联占领区特定的演员、教授、工程师和各领域专家提供生活和食品补给。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防止具有重要作用的人士叛逃的举措。

[7] 巴洛克文学和启蒙运动文学时期尤为兴盛的一种假设，即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社会地位越高，摔得越重。

[8] 指1950~1954年间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反共、极右倾向，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的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

[9]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德国画家、版画家、木版画设计家，作品朴实、简单、精确，饱含丰富的情感，生动形象，具有典型的文艺复兴气息，且保留了传统的哥特式风格。

[10] 康采恩（Konzern），原指多种企业集团，是一种规模庞大而复杂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式，以大垄断企业或银行为核心，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是金融寡头实现其经济统治的最高组织形式。

[11] 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联邦德国夺冠，被称为“伯尔尼奇迹”，胜利给战后九年仍处在颓败状态的德国带来了巨大的振奋。

[12] 德文的她写作“sie”。

[13] 1871~1873年。

后记

前面所述的传记是笔者第五次从头至尾地“穿越”布莱希特的人生和作品。第一次是《布莱希特手册》（*Brecht-Handbuch*, 1980 & 1984），两卷本，每卷各500页，以词典的形式撰写。自1985~1998年，笔者还参与编写了《布莱希特全集柏林及法兰克福注释版30卷（33本）》[*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der Werke Brechts in 30 Bänden (=33 Teilbände)*，GBA]。此后，以GBA为基础，笔者旋即写作了个人的第一部布莱希特长篇传记（2000）。由于GBA也需要新版的《布莱希特手册》，而我无法独自完成，因此也成了这部五卷本权威著作的编者之一（2001~2003）；那里也有本书中或许缺失的参考书目。

这部新的传记首先基于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布莱希特研究所（Arbeitsstelle Bertolt Brecht, ABB）收集的资料。其中包括约400部大开本书籍，以及大量未装订的复印资料，将它们编排起来尚属首次。布莱希特的每一部作品，不仅有全部文本，还有布莱希特所作评论的所有记录。ABB的资料由以下内容组成。

一 《布莱希特全集》中所有由ABB所撰写卷本的资料，它们是五卷诗歌集（GBA 11—15）和三卷散文集（GBA 18—20）。这些资料来自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档案”原稿的查阅和复印拆版，也包括各档案馆（例如，伊丽莎白·霍普特曼、露特·贝尔劳、汉斯·艾斯勒）和各图书馆（例如，柏林国家图书馆、法兰克福德国国家图书馆、奥格斯堡国家及城市图书馆、慕尼黑拜仁州国家图书馆）的资料，还得到了私人藏书者的补充，例如汉斯·布格提供了大量资料。

二 1985~1990年民主德国布莱希特中心海希特工作组和此后维尔纳·海希特本人为文集卷（GBA 21—25）和工作笔记卷（GBA 26—27）及其注释而收集的所有资料。

三 海希特为他的《编年史》（Chronik）收集的所有文献，包括总共27部对开本卷册，其中包含异常珍贵的资料，有待进一步充分利用。

四 笔者为其他布莱希特研究而复印和使用的资料，例如《四川好人》、《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三毛钱歌剧》和《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所有重要资料，后两部作品的资料尤为珍贵，因为它们出自如今不再被允许查阅的环球出版社藏书。还包括所有的笔记、工作笔记、大量的书信集、布莱希特使用原始材料的复印件，以及我的学生们从布莱希特档案（BBA）和其他档案馆收集的资料，以上均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

五 大多数布莱希特重要作品的初版，部分是原版。

六 有关布莱希特的专业图书馆资料。

正如以上列举所说明的，我的主要任务是：删略。

注释

布莱希特的作品引自《布莱希特全集柏林及法兰克福注释版30卷（33本）》[维尔纳·海希特（Werner Hecht）、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克劳斯-德特勒夫·穆勒（Klaus-Detlef Müller）、维尔纳·密腾茨威（Werner Mittenzwei）主编，柏林和魏玛/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88~2000]。引用以缩写GBA加卷码、页码的方式注明。其他引用都采用明确和清晰的格式，但版本说明并不详尽（例如省略了副标题）；多次引用时仅出现了作者名和/或书名简称。本书没有附参考文献，详尽且较新的参考文献请参见《五卷本布莱希特手册》（雅恩·克诺普夫主编，斯图加特和魏玛，2000~2003）。报纸与杂志的引文在正文中有明确标注，并配有一定的出版日期，另一部分则在下面列出。篇章名只有在正文出现过时才有注明。

德意志帝国（1898~1918）

Mythos: Herkunft - GBA 11, 119; GBA 13, 241; GBA 18, 427-432; zit. nach Erstdruck Wien 1929, S. 47; vgl. GBA 13, 181-183; GBA 11, 81f.; GBA 84f.; zit. nach Bertolt Brecht: *Baal. Drei Fassungen*, Frankfurt a.M. 1966, S. 171.

Leben: kleinbürgerlich bis gutbürgerlich - Titel: GBA 26, 52; <http://www.zum.de/psm/imperialismus/hunnen2.php>; GBA 13, 87.

Herzneurose: Fehlanzeige – GBA 26, 14; vgl. Carl Pietzcker: »Ich kommandiere mein Herz«, Würzburg 1988, passim; GBA 26, 108f.

Schreibimpulse: starke Stoffe – Walter Brecht: Unser Leben in Augsburg, damals, Frankfurt a.M.1984, S. 162, vgl. 229; GBA 26, 107; GBA 21, 248; Hans Tasiemka in: NLZ, 6. 12. 1927.

Tagebuch No. 10: übungen zu Form und Stil – GBA 26, 98; GBA 26, 54; GBA 26, 14; GBA 26, 67; GBA 26, 75; GBA 26, 9; GBA 26, 21f.

Autor: Produzent – GBA 26, 69; Bertolt Brechts *Die Ernte*, Augsburg 1997, S.85; GBA 26, 79; GBA 19, 13f.

Brecht – Clique: keine Orgien – GBA 28, 18; Werner Frisch/K.W.Obermeier: Brecht in Augsburg, Berlin, Weimar 1975, S. 51; GBA 11, 61; GBA 11, 112; vgl. GBA 1, 230; GBA 13, 93f. (*Serenade*) .

Kriegspoeseie: bestellt – Titel: GBA 13, 76; nach Jan Knopf: Brecht-Journal 2, Frankfurt a.M. 1986, S. 44-46; Rosa Luxemburg: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 Zürich 1916; <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index.asp?id=517&pn=texte>; GBA 21, 7f.; nach Jürgen Hillesheim: »Ich muß immer dichten«, Würzburg 2005, S. 81-86; GBA 13, 76.

Krieg und Hungertote: ignoriert – Nach Hillesheim 120-131.

Schule: Grundtypen der Menschheit – GBA 18, 212f.; nach Walter Brecht 243; GBA 13, 92.

Mutter: Doppelmoral – Titel: GBA 26, 116; GBA 26, 75; GBA 26, 116; Walter Brecht 350; nach Hillesheim: Bert Brecht fand zu sich selbst, in: *Literatur in Bayern* 23/2008, S. 9–14; nach Frisch/Obermeier 24; nach Hillesheim: Marie Röcker, in: *Augsburger Brecht-Lexikon*, Würzburg 2000, S.152f.; GBA 13, 111f.

Militärdienst: Zeit für den Theaterprofessor – GBA 28, 24; Sappho: *Muse des äolischen Eresos*, Frankfurt a.M. 1990, S. 45; Paula Banholzer: *So viel wie eine Liebe*, München 1981, S. 37f.; nach Frisch/Obermeier 137–142; Artur Kutscher: *Der Theaterprofessor*, München 1960; GBA 11, 22; GBA 11, 17.

kv: Dolchstoß legende – Titel: GBA 11, 113; nach Frisch/Obermeier 137–142; GBA 11, 11; Hanns Otto Münsterer: Bert Brecht, Zürich 1963, S. 96; GBA 11, 13; GBA 28, 60; GBA 11, 322 (Kommentar) ; nach Arthur Rosenberg: *Die Entsteh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1961, S. 205–216; Friedrich Ebert: *An-sprache an die Heimkehrenden Truppen*, in: *Politische Reden* 111, Frankfurt a.M., S. 94–96.

Theodizee: Materialismus – GBA 13, 100f.

Baal: Entmachtung des Individuums – Titel: GBA 1, 24; GBA 28, 66; GBA 28, 96; Hugo von Hofmannsthal: *Das Theater des*

Neuen, in: Gesammelte Werke, Lustspiele IV, Frankfurt a.M. 1965, S. 405–426.

Verratene Revolution: Knopfstiefel – Titel: GBA 1, 228; GBA 1, 232; GBA 1, 182; GBA 1, 228; nach Rosenberg 221–234; nach Rosenberg: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a.M. 1961, S. 5–71; GBA 17, 27; nach Frisch/Obermeier 143–149; zit. nach Brechts »Trommeln in der Nacht«, hg. von W.M. Schwiedrzik, Frankfurt a.M. 1990, S. 312f.; GBA 23, 241; GBA 1, 228f.; GBA 17, 43–50.

魏玛共和国 (1918~1933)

Der kleine Jude von Kimratshofen: Spartakus – Titel: GBA 21, 300; GBA 28, 61; GBA 28, 73; GBA 26, 213; Walter Brecht 155; Rudolf Fernau: Als Lied begann' s, Frankfurt a.M. 1972, S. 107; George Grosz: Ein kleines Ja und ein großes Nein, Frankfurt a.M. 2009, S. 227–230; GBA 21, 300; GBA 28, 97; nach Jeske/Zahn: Lion Feuchtwanger, Stuttgart 1984, S. 83f.; nach Frisch/Obermeier 145, 163–170; GBA 28, 81.

Europas Untergang: Marx' Tod – GBA 21, 45; GBA 28, 163; GBA 11, 48f.; nach GBA 11, 311f. (Kommentar); GBA 28, 139.

Tuismus: verwirklicht – Titel: nach Dieter Thiele: Bertolt Brecht, Frankfurt a.M., Bern 1981, S. 405; GBA 17, 46; vgl. GBA 28, 424; GBA 17, 142; GBA 17, 14–17; Jonathan Swift: Bescheidener Vorschlag, wie man verhindern kann, daß die Kinder der Armen ihren Eltern oder dem Lande zur Last

fallen (1729) ; GBA 21, 413; GBA 17, 96; GBA 17, 117f.; GBA 17, 146; GBA 17, 26; GBA 17, 96.

Freieste Verfassung der Welt: Apparaterlebnis – GBA 17, 46; GBA 17, 52–64; GBA 21, 306f.; Gottfried Benn: Gesammelte Werke I, Gedichte, Wiesbaden 1961, S. 7–16; Silvio Vietta/Hans-Georg Kemper: Expressionismus, München 1975, S. 30 u. ö.;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Berlin 1923, S. 100; GBA 26, 125.

Schaubude: Civilis – Titel: GBA 11, 18; GBA 28, 66; zit. nach Werner Hecht: Brecht Chronik, Frankfurt a.M. 1997, S. 72; http://de.wikipedia.org/wiki/Alliierte_Rheinlandbesetzung; Münsterer 143f.; GBA 13, 181–183; Karl Valentin: Sämtliche Werke in 8 Bänden, München 1992–1997, Band 3, S. 26–30; GBA 28, 45; GBA 11, 18, 33.

Durchbruch mit Prosa: gut erzählt – Titel: GBA 1, 60; GBA 28, 143; GBA 19, 24–37; GBA 21, 464.

Weltanschauung: abgeschafft – Titel: GBA 11, 34; GBA 18, 18; Theodor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a.M. 1969, S. 42; Kant, Hamburg 1956, S. 321 (=A 277/ B 333) ; GBA 18, 60.

Berichterstattung: die schönste Frau Augsburgs – Titel: GBA 13, 145; Frisch/Obermeier 79; GBA 21, 78; GBA 21, 77; GBA 21, 97; GBA 21, 86; nach Karoline Sprenger: Der »Bürgerschreck« und die »verkrachte« Opernsängerin, in:

Brecht-Jahrbuch 34/2009, S. 25-41; Zoff bei Banholzer 160f.; GBA 26, 195; GBA 26, 190.

Promiskuität: Recht und Brecht – GBA 26, 211 (Hure) ; GBA 28, 139 (stiermäßig) ; GBA 26, 259; zit. nach Banholzer 83f.; zit. nach Bertolt Brecht: Briefe an Marianne Zoff und Hanne Hiob, Frankfurt a.M. 1990, S. 14-16; nach Zoff bei Banholzer 165; zit. nach GBA 28, 154-156; nach Banholzer 87; zit. nach GBA 28, 129; GBA 11, 46; Banholzer 43, Zoff bei Banholzer 165; GBA 26, 128f.; Neher: Tagebücher (Staats- und Stadtbibliothek Augsburg) , zit. nach Christine Tretow: Caspar Neher, Trier 2003, S. 488.

Ware Kunst: Konsum – GBA 1, 22-24; GBA 26, 146; GBA 26, 283.

Im Dickicht: Bolschewismus – GBA 26, 229 (Pinakothek) ; Arnolt Bronnen: Tage mit Bertolt Brecht, Darmstadt, Neuwied 1976, S. 16; Jhering in: Der Tag, Berlin, 16.4.1922; Karl Kraus nach Bronnen Umschlag (Rückseite) ; Bronnen 38; Das Tage-Buch, 4.2.1922, angekündigt; 32; GBA 28, 177, 627f; Jhering in: Berliner Börsen-Courier, 17.11.1922; Stolzing nach Wyss 19.

Feinkost: Thomas Mann und Brecht – GBA 21, 61; GBA 21, 160; Mann nach Wyss 23f.; Thomas Mann. Gesammelte Werke, Band 3: Nachträge, Frankfurt a.M.1974, S.304-306 (Aufzeichnung vom April 1924) ; GBA, Registerband 739.

Schräges Deutsch: materialistisch gewendet – GBA 1, 346f.; GBA 11, 145f.; Goethe: Faust I, Vers 1112; GBA 15, 171; GBA 21, 158; Rainer Maria Rilke: Die Gedichte, Frankfurt a. M. 1998, S. 344; Stefan George: Gedichte, Stuttgart 2004, S. 12; GBA 1, 467.

Triebherrscher Eduard: Zusammenarbeit mit Feuchtwanger – GBA 22, 358f.; GBA 2, 60; GBA 2, 80; GBA 21, 181; Bouck White: Das Buch des Daniel Drew, S. 171f.; Bernhard Reich: Im Wettlauf mit der Zeit, Berlin 1970, S. 247; nach Jeske/Zahn 80–105; Braun nach Wyss 46; Reich 245; Homolka und das Nachspiel nach Marta Feuchtwanger: Nur eine Frau, München/Wien 1983, S. 46–67, und nach Reich 263; nach Reich 241; nach Jeske/Zahn 102.

Schacher um Verträge: Berliner Verlage – Titel: nach Erwin Piscator: Das politische Theat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S. 141; GBA 28, 102; GBA 28, 101; vgl. GBA 28, 105; GBA 26, 260; GBA 26, 269; nach Friedemann Berger: Die nichtgedruckte »Hauspostille«, in: Notate 6/1984, S. 1f.; Dorit Abiry: »Sie müssen Ihre Lyrik herausgeben«, in: Dreigroschenheft 2/2010, S. 4–7 (Widmungsexemplar Baal); GBA 28, 231; GBA 11, 301 (Kommentar) .

Kabarett: gescheitert – Hesterberg: Was ich noch sagen wollte, Berlin 1971, S. 106; GBA 28, 139.

Im Blauen Vogel: russische Volkskunst mit Folgen – GBA 26, 269; Kurt Tucholsky: Der blaue Vogel, in: Die Weltbühne 12/1922, S. 305; Wolf Oschlies: »Eine mit allem geistigen

Comfort der Neuzeit ausgestattete Puppenstube«, in:
Eurasisches Magazin 1/2006, S. 1-6; Jacobsohn nach Oschlies;
GBA 10, 36; GBA 13, 198; GBA 27, 353.

Fundgrube Berlin: Tanz auf dem Vulkan – Ehrenburg nach
Otto Friedrich: Morgen ist Weltuntergang, Berlin 1998, S.
106; Text von Bert Roda; Oschlies 6; Ehrenburg: Menschen,
Jahre, Leben, Bd. 2, Berlin 1978, S. 9; Klaus Mann: Der
Wende-punkt, München 1989, S. 166; nach Heinz Geuen: »Das hat
die Welt noch nicht gesehen«, in: Beiträge zur
Populärmusikforschung, Bielefeld 15/16, 1995; 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 46/1927, S. 29-39; GBA 21, 40f.

Dollarsonne: Berlin im Aufschwung – GBA 28, 148; GBA 21,
224; GBA 21, 119; 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München
1959, S. 249; GBA 22, 808.

Bio-Interview: Boxer als Mitarbeiter – GBA 19, 216-235;
GBA 19, 216; GBA 19, 225; GBA 21, 207; Hans Tasiemka in: Die
literarische Welt, 30.7.1926.

Lichterstadt Berlin: Brecht eingerichtet – Berlin-im-
Licht nach Nils Grosch: Die Musik der Neuen Sachlichkeit,
Stuttgart, Weimar 1999, S. 80-99; GBA 14, 12f; Hertzka nach
Grosch 85; Butting nach Grosch, 86f.; Thomas Mann an Erich
Ebermayer, 24.3.1927, zit. nach Helga Belach: Das Kino und
Thomas Mann, Berlin 1975, S. 5; Sabine Kebir: Ich fragte
nicht nach meinem Anteil, Berlin 1997, S. 26-29.

Mann ist Mann: Konsumkritik – GBA 2, 408 (Kommentar) ; GBA 2, 126–129; vgl. *Das Elefantenkalb* 158–168; Brechts »Mann ist Mann«, hg. von Carl Wege, Frankfurt a.M. 1982, S. 105; zit. nach Wyss 59; *Das Elefantenkalb* 158–168; GBA 158; Tretow 147–150; GBA 2, 123; GBA 21, 164; Uhu, S. 188–190, 191–193; GBA 21, 158–160; GBA 21, 160; GBA 21, 655 (Kommentar) ; GBA 21, 164.

Marx: Marktgesetze unbegreiflich – Kebir: Ich fragte nicht 61; GBA 22, 138 f.; GBA 21, 143; GBA 21, 338; GBA 21, 256f.; GBA 28, 238; Frank Norris nach: Brechts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 hg. von Jan Knopf, S. 87–11; GBA 21, 1936; GBA 21, 191–193.

Wirklichkeit: zur Sprache gebracht – GBA 11, 157; GBA 11, 165; nach Heinrich Breloer. *Die Manns* – ein Jahrhundertroman (Film 2001) .

Brecht-Piscator: episches Theater reklamiert – Piscator 61f.; Piscator 78–82; Piscator 102f.; GBA 28, 292; Piscator 158; GBA 1, 139f., 525 (Kommentar) ; GBA 28, 298; GBA 27, 152; Piscator 180; Piscator 181; BBA 349/1–72 nach: Materialien zu Bertolt Brechts »Schweyk im zweiten Weltkrieg«, hg. von Herbert Knust, Frankfurt a.M. 1974, S. 31; Piscator 158; Piscator 236; Piscator 138–141 (Kritiken) ; Piscator 232; im Gespräch mit Guillemin, in: Brecht im Gespräch, Frankfurt a.M. 1975, S. 189; Piscator: *Das politische Theater*, Berlin 1929, S. 48–59, bes. 58f.; GBA 28, 309f.; GBA 28, 316; Alfred Döblin: *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Olten, Freiburg i. B. 1972, S. 256.

Grosz, Schlichter, Brecht: Zeitdiagnose unter Künstlern trostlos – Hans Hess: George Grosz, Dresden 1982, S. 45–51; GBA 28, 295; so der Text auf dem Plakat am Hals der Puppe; Die Rote Fahne, hg. von Manfred Brauneck, München 1973, S. 75–78 (G. G.L.) ; Rudolf Schlichter: Zwischenwelt, Berlin 1931, S. 84; GBA 21, 340; GBA 28, 299; GBA 4, 423–426; Grosz 228; nach Ernst Jünger–Rudolf Schlichter: Briefe 1935–1955, hg. von Dirk Heißerer, Stuttgart 1997, S. 357–360 (Kommentar) ; nach Helmut Kiesel: Ernst Jünger, München 2007, S. 326f.; Heiner Müller: Krieg ohne Schlacht, Köln 2009, S. 218; Fritz Sternberg: Der Dichter und die Ratio, S. 37.

Auto, Technik, Sex: Freiheit gefälscht – GBA 28, 238; GBA 17, 576 (Kommentar) ; Kebir: Ich fragte nicht 53; Canetti: Die Fackel im Ohr, München 1980, S. 306f.; Piscator 181; GBA 13, 392f; GBA 19, 281–283; Uhu 6/1929, S. 62–65; Canetti 307.

Mahagonny: Selbstausslöschung im Musentempel – GBA 28, 205; GBA 26, 279; GBA 11, 100; GBA 2, 331; zit. nach Hans Curjel, in: Brecht/Weill »Mahagonny«, hg. von Fritz Hennenberg und Jan Knopf, Frankfurt a.M. 2006, S. 210; Weill in: ebd, S. 145ff; Kurt Weill: Briefwechsel mit der Universal Edition, Stuttgart, Weimar 2002, S. 78f.; S. 95; S. 97; S. 97–99; Bronnen 116; GBA 2, 350; Text bei Hennenberg/Knopf 43; Weill nach ebd. 179, 168; GBA 24, 79; GBA 24, 77; GBA 24, 78; Weill: Briefwechsel 195; nach Harmut Kahnt: Die

Opernversuche Weills und Brechts mit »Mahagonny«, in: Kühn, Hellmut (Hg.) : Musiktheater heute, Mainz 1982, S. 73f.; Weill: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1975, S. 54; nach Hennenberg/Knopf 289.

Rundfunk: Einübung mediengerechten Verhaltens – GBA 21, 229–232, 690–692 (Kommentar) ; Goethe, Faust I, Vers 239f.; nach Barbara Konietzny–Rüssel: Der Medienpraktiker Bertolt Brecht, Würzburg 2007, S. 33f.; GBA 24, 87–89; GBA 3, 405 (»Heldenglied« ist ein Druckfehler) ; GBA 3, 11, 13f., Essener Theater und Kunstverhältnisse, 23. 7. 1927; GBA 13, 374–379.

Stück mit Musik: Drei Groschen für das Hauptgericht – Weill: Briefwechsel 128; Ernst Josef Aufricht: Erzähle, damit du dein Recht erweist, Berlin 1966, S. 66; Text in: Brechts »Dreigroschenoper«, hg. von Werner Hecht, Frankfurt a.M. 1985, S. 17–28; ebd. 27; 28; Aufricht 72; Lotte Eisner in: Film-Kurier, 17. 11. 1930; Ludwig Berger in: Das Neue Mainz, 1.–31. 1. 1965; GBA 14, 462; Aufricht 77f.; Lotte Lenja nach Hecht 122f.; Felix Hollaender in: National-Zeitung, Berlin, 2. 9. 1928; Harry Kahn in: Die Weltbühne, Berlin, 2. 10. 1928, Nr. 40, S. 531–533; nach Ned Rorem: Setting the Tone: Essays and a Diary, New York 1983, S. 56; Ernst Bloch nach Hecht 78, 80; GBA 28, 312f.; Hans Heinsheimer nach Archiv Universal-Edition, Wien; Weill in: Der deutsche Rundfunk, Berlin 17. 5. 1929; ebd., 6. 2. 1931 (Kritik anonym) ; Sternberg 25.

Musikalische Lehrstücke: Lernen im Spiel – GBA 28, 320; Elisabeth Hauptmann: *Julia ohne Romeo*, Berlin, Weimar 1977, S. 65–135; GBA3, 23f., 27; nach Dieter Krabiel: *Brechts Lehrstücke*, Stuttgart, Weimar 1993, S. 7–15; GBA 21, 343; GBA 14, 228; GBA 22, 370–381; GBA 3, 28; GBA 3, 29–35; Lukács 100; vgl. Bertolt Brecht: *Der Untergang des Egoisten Fatzer*. Bühnenfassung von Heiner Müller, Frankfurt a.M. 1994; GBA 18, 14.

Wissenschaft der Geschichte: das Bekannte nicht erkannt – Motto 22, 33; Sigmund Freud: *Eine Schwierigkeit der Psychoanalyse*, in: *Text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der Gegenwart*, Stuttgart 1996, S. 161–170; GBA 11, 119; Engels, Friedrich: *Das Begräbnis von Karl Marx*, 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19, Berlin 1972, S. 335; *Karl Marx: Die Frühschriften*, hg. von Siegfried Landshut, Stuttgart 1964, S. 340; Marx 353; Marx 346;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1952, S. 28; Marx 339; Wolfgang Fritz Haug: *Parteilichkeit und Objektivität*, in: *Das Argument* 255/2004, S. 222; Marx 353; Marx 361; GBA 18, 245f.

Lehrstücke: Jasagen und Maß nehmen – Nach Erdmut Wizisla: *Benjamin und Brecht*, Frankfurt a.M. 2004, S. 70; GBA 12, 16f., 361 (Kommentar) ;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3, Berlin 1969, S. 218; GBA 3, 432; GBA 23, 156; *Hanns Eisler: Gesammelte Werke*, Bd. 1, Berlin 1975, S. 64; GBA 3, 433 (Kommentar) ; GBA 3, 47–65; GBA 3, 57–72; Kurt Weill: *Über meine Schuloper »Der Jasager«*, in: *K.W.:*

Ausgewäh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1975, S. 61–70; GBA 3, 73–98; GBA 3, 92; GBA 3, 96; GBA 3, 79; GBA 3, 75; Ernst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Kapitel 1–32, Frankfurt a.M. 1959, S. 315f., 322; Lenin: Was tun? Berlin 1946, Kapitel 3b; Hanns Eisler in: Bertolt Brecht: Die Maßnahme. Kritische Ausgabe, Frankfurt a.M. 1972, S. 245f.; Hans Heinz Stuckenschmidt in: ebd., S. 324f.; GBA 3, 75;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München 1970, S. 17f.; GBA 24, 98f.; Durus in: Die Rote Fahne, Berlin, 20.1.1931; nach Harmut Reiber: Grüß den Brecht, Berlin 2008, S. 141f.;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Werke, Bd. 3, Berlin 1969, S. 218.

Ökonomie nur für Eingeweihte: Corner – Alles nach Bertolt Brechts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 hg. von Jan Knopf, Frankfurt a.M. 1985, passim; GBA 3, 127–227; GBA 3, 187; Bertolt Brecht: 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 hg. von Gisela E. Bahr, Frankfurt a.M. 1971, S. 163. Rudolf Hilferding in: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Referate und Diskussionen vom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tag 1927 in Kiel, Kiel 1927; Kritische Ausgabe 410.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 Technifizierung der Literatur – GBA 21, 448–514; GBA 21, 448; GBA 21, 456; GBA 21, 315f.; GBA 21, 512f.; GBA 21, 458; 21, 464, 482; GBA 19, 307–320; GBA 19, 308; GBA 19, 309; GBA 19, 314; GBA 19, 320; GBA 19, 464; 19, 202–204; GBA 21, 107f.

Fordismus, Behaviorismus: Wachstum verordnet – GBA 11, 174–176; GBA 21, 478; nach Wizisla 71.

Tretjakow: Biologie sozialistisch – Nach Fritz Mirau: Erfindung und Korrektur. Tretjakows Ästhetik der Operativität, Berlin 1976; Text in: Mirau, S. 179–246; GBA 15, 232; Sergej Tretjakow: Biographie des Dings, Berlin, Hildesheim 2003, S. 5–8 (1929) ; GBA 14, 435; 14, 66, 496 (Kommentar) .

Realitätsstudien: Arbeiter als Kleinbürger – Nach Reiber 141ff.; Reiber 143; Otto Rühle: Illustrierte Kultur- und Sitten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2 Bde., LahnGießen 1977, Bd. 1, S. 387–406; Filminhalt nach Bertolt Brecht: Kuhle Wampe. Protokoll des Films, Frankfurt a.M. 1969; Gad Granach: Heimat Los! Augsburg 2008, S. 47–50; http://de.wikipedia.org/wiki/Dringender_Appell; Theodor W. Adorno/Hanns Eisler: Komposition für den Film, Leipzig 1977, S. 187; Kracauer, Siegfried: Von Caligari zu Hitler. Eine psychologisch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Films. Frankfurt a.M. 1984, S. 259–261.

Republik im Untergang: Arbeitertochter zwischen den Fronten – Titel: GBA 14, 91; Margarete Steffin: Konfutse versteht nichts von Frauen, Berlin, 1991, S. 190; GBA 28, 341; GBA 14, 151f., 537f. (Kommentar) ; zur Wirkung GBA 3, 487–493; Georg Lukács, Johannes R. Becher (u. a.) : Die Säuberung, Moskau 1936,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S. 175 (Aussage: Becher) .

Keine Rassenfrage: Brecht und die Juden – Augenblick: Brecht: , Augsburg 1998, S. 73; nach Bertolt Brecht: Terzinen

über die Liebe, hg. von Jan Knopf, Frankfurt a.M. 1998, S. 32; Augenblick: Brecht 19; GBA 26, 18; GBA 28, 73; GBA 19, 294-299; GBA 12, 16f.; GBA 28, 414; GBA 26, 299; GBA 14, 286f.; GBA 4, 385-390, 363-378; GBA 30, 184; GBA 18, 242.

法西斯德国 (1933~1945/47)

Bücherverbrennung: gegen Klassenkampf und Materialismus - GBA 22, 13; Gottfried Benn: Antwort an die literarischen Emigranten, Berliner Rundfunk, 24.5.1933; BBA 784/8-12 (nach Hecht: Chronik); BBA 783/33 (nach Hecht: Chronik); Bücherverbrennung nach allgemein zugänglichen Rundfunk-Aufnahmen;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Br. am 27.5.1933. Breslau 1933; GBA 12, 377 (Kommentar).

Die Nazis, das Unsägliche: Grenzen der Sprache - GBA 22, 35; Kraus: Die dritte Walpurgisnacht, München 1967, S. 18; nach Bloch: Politische Messungen, Frankfurt a.M. 1970, S. 185-192; GBA 14, 195-197; GBA 12, 16.

Liebesbriefe in Sonetten: Dinge beim Namen genannt - GBA 22, 7; GBA 28, 294; GBA 11, 185; Margarete Steffin: Konfutse versteht nichts von Frauen, Berlin 1991, S. 201; <http://6press.twoday.net> (das Gedicht entstammt aus Pietro Aretino/ Thomas Hettche: Stellungen oder vom Anfang und Ende der Pornografie, Köln 2003; GBA 11, 190; Steffin 206; Sprich leise, wenn Du Liebe sagst. Der Briefwechsel Kurt Weill/Lotte

Lenya, Köln 1998, S. 513–515; GBA 2, 349; GBA 11, 186; Steffin 204, 316, 199, 198.

Globalisierung durch den Kapitalismus: sieben Todsünden, ein Liederbuch und Choräle – Titel: GBA 4, 277; GBA 4, 265–277; Donald Spoto: Die Seeräuber-Jenny, München 1990, S. 141–143; GBA 4, 269f.; GBA 11, 197–254; GBA 15, 124f.; GBA 11, 215; Evangelisches Kirchengesangbuch, Göttingen 1958, Nr. 294; GBA 11, 219; Dokumente in: Faschismus. Renzo Vespignani, hg. vom Kunstamt Kreuzberg, Berlin, Hamburg 1976, S. 85–87.

Frauenrollen aufgedrängt: Hausmann, Steffin, Berlau, Weigel – Titel: GBA 16, 371; GBA 19, 667f. (Kommentar); GBA 4, 345–349; Wüthrich: Bertolt Brecht und die Schweiz, Zürich 2003, S. 219f.; nach Hans Christian Nørregard: Die unfreiwillige Dänin Margarete Juul, in: »Ich wohne fast genauso hoch wie er«. Margarete Steffin und Bertolt Brecht, Berlin 2008, S. 116–140; nach Kebir: Ich fragte nicht, S. 169f.

Intermedialität: anders blicken – GBA 28, 465; nach Wolfgang Jeske: Brechts Poetik des Romans, Frankfurt a.M. 1984, S. 155–157; GBA 16, 273; Thomas Mann: Joseph und seine Brüder, Frankfurt a.M. 1964, S. 150f.; GBA 16, 60; GBA 16, 80f.; GBA 16, 61; zur medialen Vernetzung und zum gelenkten Blick vgl. Andreas Zinn: Bildersturmspiele, Würzburg 2011, S. 128–163; GBA 16, 118; GBA 16, 95; GBA 16, 25ff.; Zinn 136.

Marxistischer Idealismus: ein Lied, Korsch's geistige Aktion, Allunionskongress – GBA 28, 407; nach Wizisla 107f.; Walter Benjamin: *Versuche über Brecht*, Frankfurt a.M. 1966, S. 121–125; Benjamin: *Versuche* 95–116; nach Wizisla 190f.; GBA 14, 219f.; GBA 28, 463; GBA 22, 45; GBA 21, 521–525; GBA 22, 45; Goethe: *Farbenlehre*, Vorwort; GBA 18, 95; GBA 18, 62; nach Hecht: *Chronik* (8.11.1915) ; GBA 18, 152f.; GBA 18, 141f.; GBA 18, 155, 159, 170, 184 u. ö.; GBA 18, 203; GBA 28, 454; GBA 22, 45; 22, 40; vgl. Jan Knopf: *Bertolt Brecht. Ein kritischer Forschungsbericht*, Frankfurt a.M. 1974, S. 194–174; GBA 28, 458; GBA 28, 459; GBA 28, 470; *Sozialistische Realismuskonzeptionen. Dokumente zum 1. Allunionskongreß der Sowjetschriftsteller*, Frankfurt a.M. 1974; S. 43–50 (Schdanow) , 203f. (Radek) , 281f. (Resolution) ; nach Mierau 262–264; GBA 21, 255.

Moskaureise: ohne Verfremdung – GBA 28, 499f.; GBA 12, 43–45; Knopf: *Forschungsbericht* 19f.

Rettung der Kultur: ohne Eigentumsverhältnisse – GBA 28, 510; George Grosz: *Briefe 1913–1959*,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S. 194f., 196, 200, GBA S. 182; Goethe: *Farbenlehre*, Vorwort; GBA 28, 484–486; Grosz, *Briefe* 232–234; GBA 28, 546f.; Grosz, *Briefe* 389f., 213.

Kommunismus in den USA und der UdSSR: Widerstand zwecklos – Nach Hecht: *Chronik* (8.6.1935) ; GBA 28, 509; Nørregard 124f.; GBA 28, 522f.; Bunge/Eisler: *Fragen Sie mehr* 231, 233; GBA 28, 532f.; Bunge/Eisler 234; Wladislaw Hedeler:

Chronik der Moskauer Schauprozesse 1936, 1937 und 1938, Berlin 2003, S. 7; nach James K. Lyon: Bertolt Brecht in Amerika, Frankfurt a.M. 390, 406; Grosz: Briefe 212f.

Olympische Spiele: keine Friedenstauben – GBA 26, 303; Das Wort, Heft 1, S.3f.; GBA 14, 322; <http://dhm.de/~jarmer/olympiaheft/olympia3.htm>; nach Leni Riefenstahls Film: Olympia – Fest der Völker (1938) ; GBA 12, 12.

Deutsche in Moskau: Defaitismus, Liquidatorentum, Verrat, Tod – Nach Reinhard Müller: Menschenfalle Moskau, Hamburg 2001, S. 190–192; Georg Lukács, Johannes R. Becher (u. a.) : Die Säuberung, Moskau 1936,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S.568–570; Müller: Menschenfalle 191; GBA 28, 496; GBA 22, 926 (Kommentar) ; Säuberung 416f., 431f.; nach Jeske/Zahn: Feuchtwanger 197–203; GBA 29, 13f.; GBA 29, 30; GBA 30, 118f.; GBA 29, 20f.

Spanischer Bürgerkrieg: den Weltkrieg proben, Kriegstourismus, Literaturdebatten – Titel: GBA 14, 353; Brechts Lai-tu. Erinnerungen und Notate von Ruth Berlau, Darmstadt 1985, S. 73, 75; GBA 22, 323–325; nach Jörg Diehl: »Sie haben die Stadt eingeäschert«, in: Der Spiegel, 26.4.2007; nach Reiber: Steffin 277; Werner Hecht: Helene Weigel, Frankfurt a.M. 2000, S. 303; GBA 29, 57; Seghers bei Wyss 180;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hg. von Hans-Jürgen Schmitt, Frankfurt a.M. 1973, S.50; GBA 11, 267–273; GBA 22, 493; nach Reiber: Steffin 281–283; Nørregard 128.

Anwendung der neuen Physik: Caesar in seine Geschäfte verstrickt – GBA 29, 111; GBA 16, 171; GBA 16, 167; GBA 22, 691f.; GBA 16, 307; GBA 24, 316.

Bürgertum als Menschheit: Verfall der Liebe – Nach Wizisla 107f., GBA 12, 52; Benjamin: Versuche 131f, 133, 132f.; Wizisla 106; GBA 26, 317; GBA 14, 416; Ludwig Marcuse: Obszön, Berlin 1965, S. 67; Wizisla 109.

Galileis neues Sehen: Experimente auf der Bühne – GBA 29, 120; GBA 26, 326; Blumenberg: 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 Frankfurt a.M. 1975, S. 722; Blumenberg: Die Legitimität der Neuzeit, Frankfurt a.M. 1996, S. 138; GBA 5, 11f.; GBA 5, 65; GBA 5, 29f.; Blumenberg: Genesis 722.

Widersprüche als Hoffnungen: Zeit für Lyrik – GBA 12, 65f.; vgl. GBA 22, 357–365; nach Reiber: Grüß den Brecht 293; Brechts Lai-tu 90f.; Hanns Eisler: Gesammelte Werke, Band I/16, Leipzig 1976 als *Spruch* 1939; GBA 12, 16; GBA 26, 332; GBA 26, 330; GBA 6, 188–190; GBA 19, 347; GBA 6, 277.

Krieg als Handel: Menschenopfer der Courage – Titel: GBA 29, 151; GBA 26, 339; nach Hecht: Chronik (Mitte Juni 1939) ; GBA 26, 343f.; GBA 6, 8; nach Hecht: Chronik (Dezember 1939) ; GBA 24, 272; GBA 5, 323; GBA 6, 55; GBA 6, 87–113.

Episierung der bildenden Künste: Tombrock und Brecht – Nach Bertolt Brecht und Hans Tombrock, hg. von Rainer

Noltenius, Essen 2004, S. 126; GBA 22, 597–583, 1078–1083 (Übersetzung) ; Abbildung bei Noltenius 88; GBA 29, 169f.; GBA 29, 175f.; Noltenius 87; GBA 22, 579; GBA 133 f.

Nazi-Eroberungen: Landsleute vertreibend – Titel: GBA 12, 97; Jan E. Olsson: Bertolt Brechts schwedisches Exil, Lund 1969, S. 6of.; Noltenius 145; GBA 26, 337 (Greids Buch wurde nicht veröffentlicht) ; GBA 29, 163f.; Peter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and 2, S. 326; GBA 18, 427–432.

Gespräche unter Flüchtlingen: Mut überflüssig – Titel: GBA 18, 580 (Kommentar) ; GBA 18, 580 (Kommentar) ; GBA 18, 223; GBA 18, 219f.; GBA 18, 220; GBA 18, 221; GBA 26, 373f.; GBA 18, 197.

Weiterreise in den Stemen: finnische Sommernächte – Nach Hans Peter Neureuter: Brecht in Finnland, Frankfurt a.M. 2007, S.34f.; GBA 12, 98; GBA 15, 72; GBA 26, 396f.; GBA 29, 182; GBA 26, 398; nach Reiber 314f.; GBA 26, 400; nach Neureuter 98f.; GBA 26, 402f.; Bunge: Lai-tu 130; nach Neureuter, Habilschrift (Masch.) , Anhang S. 129; nach Neureuter 99f.

Erotogramm einer verstörten Beziehung: Gerüche sexualisierend – GBA 29, 186f.; Bunge: Lai-tu 130; GBA 26, 421f.; GBA 6, 351; GBA 26, 428; GBA 6, 289; GBA 6, 347; GBA 6, 313.

Schweigen in zwei Sprachen: Finnland zwischen Sowjetunion und Deutschland, Moskau – GBA 26, 465f.; nach Reiber: Grüß

den Brecht 324; Lion Feuchtwanger: Briefwechsel mit Freunden, Band 1, Berlin 1991, S. 35; GBA 29, 204; Sylvi-Kyllikki Kilpi in Neureuter, Habilschrift, Anhang, S. 133-142; GBA 26, 473; GBA 15, 23f.; Kilpi 141f.; Huppert: Schach dem Doppelgänger, Halle, Leipzig 1979, S. 30-34.

Kreuzfahrt als Himmelfahrtskommando: Marx übers und ins Meer – Nach Holger Teschke: »Ich sitze hier in Tahiti, unter Palmen und Künstlern...«, in: Das Angesicht der Erde. Brechts Ästhetik der Natur, Berlin 2009, S. 87-104; GBA 26, 486 (Telegramm von Maria Osten) ; Bunge: Brechts Lai-tu 136; GBA 15, 42; GBA 15, 88; Teschke 99; Fritz Kortner: Aller Tage Abend, München 1959, S. 500.

Offener Handel mit Lügen: Mitmachen erforderlich – GBA 29, 131; GBA 26, 332; GBA 22, 538f.; GBA 27, 50; GBA 27, 24; GBA 27, 50; GBA 29, 299; GBA 27, 12; GBA 27, 84; GBA 27, 19; GBA 27, 19; GBA 27, 13; GBA 27, 177; GBA 29, 215; GBA 27, 18f.; GBA 27, 15; GBA 27, 18; Stephan: Im Visier 231f.; nach Brecht – Die Kunst zu leben 2006 (Film von Joachim Lang; Aussage von Barbara Brecht) ; GBA 27, 115; GBA 27, 85.

Versuche im Filmgeschäft: Tendenz scheiternd – Gustavus Myers: Money, Frankfurt a.M. 1979, S. 788; GBA 27, 13; GBA 20, 30-39; GBA 27, 27; GBA 20, 40-46; GBA 27, 81f.; GBA 20, 55-57; Noltenius: Brecht und Tombrock 146; GBA 27, 22; GBA 27, 63; GBA 20, 59-62 (erstmalig auf Deutsch, übers. von Peggy Knopf in: Der Spiegel, 9.12.1996) ; GBA 27, 30f.; GBA 23, 7-9, 423 (Kommentar mit Text des Appells) .

Geiselfilm: trotz Hindernissen durchgesetzt – Titel: GBA 27, 17; GBA 12, 81; Alexander Stephan: Im Visier des FBI, Stuttgart, Weimar 1995, S. 195f., 197, 228; nach Im Visier des FBI. Deutsche Autoren im US-Exil, TV Film von Alexander Stephan und Johannes Eglau, 1995; nach Hecht: Chronik (8.12.1941 = FBI-Akte vom 6.3.1943) ; GBA 27, 99; GBA 27, 115; vgl. GBA, Registerband 682; GBA 29, 253f.; Filmanalysen nach James K. Lyon: »Das hätte nur Brecht schreiben können« sowie nach Irène Bonnaud: Entstehung und Verfilmung von »Hangmen Also Die« in: Brecht plus minus Film, Berlin 2005, S. 26–37; 38–47; GBA 27, 118f.

Die Kriegsfibel: Kriegsberichterstattung Natur und Menschen ignorierend – Titel: GBA 27, 22; Viertel in: Marbacher Magazin 9/1978, S. 18; GBA 27, 119f.; GBA 12, 41–43, 372 (Kommentar) ; Stephan: Im Visier 195f.; GBA 26, 434f.; GBA 26, 401; GBA 26, 419–421; GBA 28, 564; GBA 12, 127–283; vgl. Zinn: Bildersturmspiele 284–288, 337.

Kunst als Prostitution: die Freiheit des Einzelnen vernichtend – Titel: GBA 12, 117; Carl Zuckmayer: Die langen Wege nach: C.Z.: »Ich wollte nur Theater machen«, Marbacher Katalog 1996, S. 271; GBA 27, 353; Bunge/Eisler 182; GBA 27, 85; GBA 12, 93–112; GBA 26, 416; GBA 12, 97; GBA 12, 95f.; Claudia Albert: Das schwierige Handwerk des Hoffens, Stuttgart 1991, S. 62–64; GBA 27, 115f.; GBA 12, 110; Bunge/Eisler 195, 19f.; GBA 12, 115f.; Feuchtwanger: Gesammelte Werke, Band 14, Berlin, Weimar 1975, S. 217; GBA 27, 125; GBA 27, 103; GBA 27, 46; Bunge/Eisler 152f.;

Stephan: Im Visier 210f.; nach Hecht: Chronik (Mai 1943) ;
Bunge/Eisler 160f.; GBA 23, 23f.; GBA 15, 91f.

*Schweyk am Broadway: Hitler der Lächerlichkeit
preisgebend* – GBA 7, 251; Weill: Briefwechsel mit der
Universal-Edition 203f.; Aufricht 256; nach Grosch: »an einer
einzelnen humoristischen Figur den phantastischen Irrtum des
Krieges aufzuzeigen«: Weill, Eisler und die musikalische
Dramaturgie in >Schweyk<, in: Les Cahiers de l' ILCEA 8,
Grenoble 2006, S. 153–66; GBA 29, 271.

*Die Deutschenfrage: sein Bestes durch Teufelslist zum
Bösen ausschlagend* – GBA 27, 161f.; Thomas Mann: Briefe 1937–
194, Frankfurt a.M. 1979, S. 339–341; nach James K. Lyon:
Bertolt Brecht in Amerika, Frankfurt a.M. 1984, S.358f.;
Thomas Mann: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Rede vom
6.6.1945, Berlin 1947, S. 7; Thomas Mann bei der Einreise in
die USA zu einem Reporter; Stephan: Im Visier 111; GBA 27,
181; GBA 27, 172; Lukács/Becher: Säuberung 563; GBA 29,
317f.; Stephan 110; nach Herbert Lehnert: Bert Brecht und
Thomas Mann im Streit um Deutschland, in: Deutsche
Exilliteratur seit 1933, 1. Kalifornien, Bern, München 1976,
S. 79; Hecht: Chronik (3.5.1944) .

Laughtons Garten: Vergänglichkeit Genuss erhöhend –
Titel: GBA 15, 113; Brechts Lai-tu 163; nach Grischa Mayer:
Ruth Berlau. Fotografin an Brechts Seite, München 2003, S.
18; GBA 29, 329; GBA 27, 203; GBA 29, 339; GBA 27, 197;

Reinhard Kühnl: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Heilbronn 1988, S. 67; GBA 27, 80.

Eintübung in Demokratie: Kunst nicht beschneidend – Titel: GBA 8, 92; GBA 12, 194f., 420; GBA 30, 256f.; GBA 8, 9–14; GBA 8, 9–92; GBA 8, 82; GBA 24, 342.

Trotz Superfutz: Theaterarbeit mit Laughton für den Galileo als Modell – GBA 25, 12; GBA 25, 11; GBA 27, 202; GBA 25, 12f.; GBA 27, 225; GBA 27, 228; GBA 27, 223; GBA 27, 232; GBA 25, 65; GBA 27, 232; Alfred Kantorowicz: Brecht in Freiheit – Becher im Ghetto, in: Die Welt, 12.8.1959 (Winter 1946/47) ; GBA 29, 365; GBA 29, 380, 401; Langhoff nach Brecht-Chronik (16.12.1946) ; GBA 29, 366; GBA 29, 396f.

Valentiniade: Selbstverleugnung als Selbstbehauptung, Brecht vor dem HUAC – Stephan: Im Visier 68–73; GBA 29, 424; Lyon: Amerika 433; Sind Sie oder waren Sie Mitglied? Verhörprotokolle über unamerikanische Aktivität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S. 77–95; GBA 29, 430; nach Stephan: Im Visier 206 (zit. nach dem Original) .

德国的后果 (1945/47~1956)

Statt Erledigung der Vergangenheit: Bewältigung (mit Gewalt) , keine Aussicht für einen Wohn- und Arbeitsort – Titel: GBA 15, 160; Henning Müller: Wer war Friedrich Wolf? Köln 1988, S. (vom 17.3.1947) ; GBA 27, 228; Alfred Döblin: 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Olten, Freiburg i.B.

1972, S. 462f.; GBA 12, 287f.; Johannes R. Becher: Auf andere Art so große Hoffnung. Tagebuch 1950, Berlin 1969, S. 15, 331f.; GBA 29, 263; GBA 26, 416; Thomas Mann: Der Erwählte, Frankfurt a.M., Oldenburg 1967, S. 18; Das Thomas Mann-Buch, hg. von Michael Mann, Frankfurt a.M., Hamburg 1965, S. 162, 147-154; Thomas Mann: Joseph und seine Brüder, Frankfurt a.M. 1964, S. 1102; GBA 23, 101; Lyrik nach Auschwitz. Adorno und die Dichter, Stuttgart 1995; Brandt in: Der Monat, Berlin, Heft 5, 1948/49 (die Zeitschrift gait als antikommunistisch ausgerichtet); GBA 29, 425; im Gespräch mit John H. Winge in: Die Tat, Zürich, 15.11.1947; nach Wüthrich: Bertolt Brecht und die Schweiz, Zürich 2003, S. 227, 233, 227f.

Beschädigung der Spielweise: Modellbücher für ihre Wiederherstellung – Titel: GBA 23, 62, 457 (Kommentar); GBA 189f., 425f (Kommentar); nach Werner Wüthrich: 1948. Brechts Zürcher Schicksalsjahr, Zürich 1946, S. 42f.; GBA 27, 255; Griechisches Theater. Deutsch von Wolfgang Schadewaldt, Frankfurt a.M. 1964, S. 91; GBA 27, 255; GBA 29, 440; GBA 25, 73, GBA 29, 444f.; GBA 25, 388f.; GBA 8, 200. GBA 23/225f.; GBA 30, 178; GBA 24, 409f.; GBA 30, 182-185; Hecht: Chronik (29.7.1953); GBA 30, 24; GBA 27, 346; GBA 23, 290; GBA 14, 388; GBA 15, 274; Hecht: Collage 45.

Die Kunst des Wegredens: nie zur Sache kommen – Titel: GBA 9, 147; GBA 9, 161-163; GBA 30, 191; GBA 27, 347; GBA 9, 182-188; GBA 24, 413; GBA 9, 225; Hecht: Collage 50; Eylau in: Berliner Zeitung, 18.3.1954; Erpenbeck in: Freies Volk, Düsseldorf, 22.1.1955; nach Agnes Hufner: Brecht in

Frankreich, Stuttgart 1968, S. 50–52; nach Angelika Hurwicz: Rezitierter Kommentar, in: Theater der Zeit 2/1955, S. 9f.; Hufner 62–73; Hecht: Collage 51, 53f.

Der Courage-Film und die Folgen: zum Verschrotten anhaltend – GBA 20, 580f. 592–598 (Kommentar) ; GBA 30, 380; GBA 27, 350; GBA 12, 314; GBA 30, 384; Hecht: Chronik (Anfang Dezember 1955) ; GBA 30, 411; Teo Otto: Meine Szene, Köln 1965, S. 42; Hecht: Chronik (12.4.1956) ; Rüllicke: Brecht-Porträts 179; GBA 15, 301, 300; GBA 30, 476; Hecht: Chronik (13.8.1956) . Rüllicke 181; Hennemann nach Brecht: Chronik: Ergänzungen 144; Hecht: Chronik (14.8.1956) ; nach Joachim Lang: Brecht – Die Kunst zu leben (Film) ; Neher: BBA 885/30f.; zit. nach Tretow 417.

作品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单本或断篇

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 10f., 12, 142, 144, 183, 184-194, 200, 201, 252, 257, 263, 273, 285, 286, 428, 484

Baal 23, 36, 50-54, 63, 66, 101, 103, 106, 123f., 129, 160, 199

Coriolanus 471, 497, 510

Dan Drew 103, 115

Dansen 353

Das Badener Lehrstück vom Einverständnis 209

Das Elefantenkalb 147, 392

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Hörspiel) 358, 495

Das Verhör des Lukullus (Oper) 495f.

Der Aufstieg des Arturo Ui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 318, 382, 385, 396f., 441, 477

Der Flug der Lindberghs 198, 210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351–353, 372, 382, 385, 428, 480

Der Hofmeister 471, 494, 499

Der Jasager 219, 221–224

Der Jasager. Der Neinsager 222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441–443, 480, 512f.

Der Neinsager 222

Der Streit ums Tal (Kaukasischer Kreidekreis, Vorspiel) 442f.

Der Untergang des Egoisten Fatzer 208, 212

Die Antigone des Sophokles 469–473

Die Bibel 22

Die Dreigroschenoper 49, 144, 152, 167, 188, 189, 200–205, 208, 234, 235, 251, 259, 263, 296, 314, 325, 334, 428, 443, 448f., 517

Die Erde bewegt sich (Leben des Galilei) 344

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 331f., 352, 354, 364, 446

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 144, 148, 152, 154, 155, 178, 218, 230–233, 271, 296, 297, 325, 508

Die Hochzeit (Die Kleinbürgerhochzeit) 62, 100, 253

Die jüdische Frau 268, 455

Die Luden-Oper (Dreigroschenoper) 201

Die Maßnahme 157, 197, 219–230, 233, 248, 249f., 251, 252, 261, 287

Die Mutter 220, 250, 257, 260f., 280, 287, 296, 317, 318, 319, 382, 497, 517f.

Die rote Zibebe 106

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köpfe 259, 297, 302

Die sieben Todsünden der Kleinbürger 285f.

Die Tage der Kommune 490f., 497

Die Verurteilung des Lukullus (Oper) 496

Die Ware Liebe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351

Don Juan von Molière 471, 510, 511

Fatzer 208, 212

Furcht und Elend des III. Reiches 175, 268, 352, 397,
409, 455, 480

Galgei (Mann ist Mann) 79, 129, 145

Galileo (Leben des Galilei) 445f., 448, 480

Garga (Im Dickicht) 123

Gesinde (Die Dreigroschenoper) 200

Gösta Berling 124

Happy End (von Elisabeth Hauptmann) 182, 208f., 325

Im Dickicht (auch: Garga) 106, 107, 122, 123, 145, 148,
191, 239

Im Dickicht der Städte 107f., 109f., 111–114, 484

Herr Puntila und sein Knecht Matti 377–379, 385, 391,
474f., 480, 481, 486, 491, 492f., 497

Jae Fleischhacker 103, 151, 152, 154, 155, 167, 230, 231

Leben des Galilei 210, 344–347, 352, 358, 368, 384, 385,
394, 444–446, 512, 516

Leben Eduards des Zweiten von England 25, 83f., 110, 114–
118, 124, 145, 184, 204, 470, 471, 484

Lebenslauf des Mannes Baal 12f., 164

Lehrstück (Das Badener Lehrstück vom Einverständnis)
83, 148, 197, 208, 209

Lindbergh (Der Flug der Lindberghs) 198f., 208, 209, 210

Lux in tenebris 100, 133

Mahagonny. Songspiel (von Kurt Weill) 167, 186f., 189,
197

Mann ist Mann 52, 79, 83f., 125, 129, 143, 145-148, 151,
153, 160, 167, 191, 199, 230, 252, 392, 471, 484

Maß für Maß oder die Salzsteuer (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köpfe) 259

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 356-358, 385, 477, 480,
483f., 486, 492, 511f., 513, 514

Rechtsfindung 268

Ruhrepos 199f.

Salzburger Totentanz 488

Schweyk 426-428, 441

Spartakus (Trommeln in der Nacht) 66

Trommeln in der Nacht 24, 37, 54-56, 57, 58f., 66, 68,
103, 106, 109, 118, 124, 160, 184, 192, 196, 199, 296, 339

Turandot oder Der Kongreß der Weißwäscher 393, 505, 506,
508–510

Urfaust (von Goethe; BE-Bearbeitung) 471, 496–498, 499

Was kostet das Eisen? 355, 357, 364

散文

Aufzeichnungen eines unbedeutenden
Mannes (Flüchtlingsgespräche) 368

Barbara 181f.

Bargan läßt es sein 48, 85–89, 103, 123, 143

Bermuda Troubles (Film) 398

Buch der Wendungen 90, 113, 305, 306f.

Das Experiment 486

Das Experiment (Film) 398f.

Das Mysterium der Jamaika-Bar (Film) 142

Das Renommee 179

Der Arbeitsplatz 293, 352

Der Augsburger Kreidekreis 441, 486

Der Brotkönig lernt Brotbacken (The King's Bread) 397f.

Der Javameier 103

Der Lebenslauf des Boxers Samson-Körner 136-138, 179, 244

Der Tango 22

Der verwundete Sokrates 487

Der Tuiroman 57, 59f., 72, 74-76, 147, 392, 393, 508

Der Zweckdiener 212f.

Die Bestie 266

Die Beule (Dreigroschenfilm) 234, 236-238

Die Geschä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 335-339, 340

Die unwürdige Greisin 9f., 366f.

Dreigroschenroman 126, 202, 294f., 298-301, 334, 335, 336

Drei im Turm (Film) 142

Flüchtlingsgespräche 31, 216f., 268, 307, 368-370, 487

Geschichte auf einem Schiff 103

Geschichten vom Herrn Keuner 89, 90, 212, 486

Hangmen Also Die (Film) 406-409, 410

Herr Keuner und die Frage, ob es einen Gott gibt 89

Kalendergeschichten 271, 486

Kein Weltbild machen 90

Kuhle Wampe 247, 250–257, 326

Mutter Courage (Film) 514f.

My most unforgettable Character 401

Mysterien eines Frisiersalons (Film von Karl Valentin)
84, 107, 145

Never Surrender (Hangmen Also Die; Film) 406–409

Robinsonade auf Assuncion (Film) 105

The Crouching Venus (The Fugitive Venus; Film) 438–441

The Fugitive Venus (Film) 438–441

The King' s Bread (Film) 397f.

Trust The People (Hangmen Also Die; Film) 406–409

Tui-Epos 508

Tuigeschichten 508

Tui-Komplex (Plan) 508

Tuitraktate 508

Turmwacht 25, 27, 29

Verurteilung der Ethiken 306

诗歌

Abbau des Schiffes Oskawa durch die Mannschaft 410f.

Alabama Song 185

Als das Dritte Reich gegründet war 275

Als der Klassiker am Montag 280f.

Als einer meiner höchsten Götter 425

Als ich in weißem Krankenzimmer der Charité 518

Als ich schon dachte, daß wir einig wären 281

An einem grauen Vormittag 185

Ansprache eines Bauern an seinen Ochsen 247, 340f.

Arie der Lucy (nicht in der GBA) 202

Augsburger Sonette 278, 279

Auf der Flucht vor meinen Landsleuten 372

Auf der Mauer stand mit Kreide 324f.

Auf ein Stadion 322

Aufbaulied der F.D.J. 479

Auf nach Mahagonny 185

Aus dem Lesebuch für Städtebewohner 157–161, 218, 219

Aus verblichenen Jugendbriefen ging hervor 23, 129

Auslassungen eines Märtyrers 37f.

Baals Lied 52, 53

Ballade von den Seeräubern 484

Ballade von der Judenhure Marie Sanders 219, 266, 486

Ballade von des Cortez Leuten 12

Ballade vom ertrunkenen Mädchen 205

Ballade zu Paragraph 218 251

Befiel du deine Wege 290

Benares Song 185

Berlin im Licht 141f.

Berliner Requiem 205f.

Bertolt Brechts Hauspostille 9, 13, 23, 52, 68, 69, 70, 99, 123–126, 176, 186, 484

Bertolt Brechts Taschenpostille 125

Bonnie Mac Sorel freite 33

Buckower Elegien 505, 506, 515

Civilis-Song 81f.

Da war eine Zeit 515

Das Beschwerdelied 33

Das erste Sonett 278f.

Das dreizehnte Sonett 282

Das dritte Sonett 281f.

Das fünfte Sonett 283

Das Lied vom Anstreicher Hitler 289

Das Lied vom SA-Mann 251

Das Lied von der Wolke der Nacht 52

Das Lied von der Eisenbahntruppe 12, 29, 33, 34

Das Meer ist blau-Song 209

Das Saarlid 304

Das zwölfte Sonett (Über die Gedichte des Dante) 280

Deutsche Satiren 267

Der Barbara-Song 237

Der Bilbao-Song 209

Der Choral vom großen Baal 52

Der Gesang des Soldaten der roten Armee 68-70

Der Fähnrich 29

Der Führer hat gesagt 259f.

Der Jüngling und die Jungfrau 42, 53

Der Kälbermarsch 210

Der Kaiser 29f.

Der Kanonen-Song 203, 237

Der Krieg ist geschändet worden 461f.

Der krumme Bogen und der Köcher hier 412

Der Marsch ins Dritte Reich 259f.

Der Nebel verhüllt 417f., 419

Der Taifun 388

Der Tsingtausoldat 29

Der Himmel der Enttäuschten 46

Deutsche Kriegsfibel 322, 324, 384

Deutsche Satiren 267, 348f., 461

Die Ballade vom toten Soldaten (Die Legende vom toten Soldaten) 54

Die Ballade von dem Soldaten 220

Die Ballade von der sexuellen Hörigkeit 202

Die Bücherverbrennung 272

Die Brust entblößt in militärischem Schnitt (Kriegsfibel) 500f.

Die drei Soldaten 174

Die finnischen Arbeiter 372

Die Gewaltigen 20

Die Hörerin der Romanze in F. 39

Die jungen Mädchen lieben uns nicht 39

Die Legende der Dirne Evlyn Roe 52

Die Legende vom toten Soldaten 24, 29, 43f., 45f., 54, 57, 80, 125f., 126f., 170, 287

Die Moritat von Mackie Messer 203

Die Orgel 15

Die Seeräuberjenny 205, 237

Die sieben Leben der Literatur 507

Die Songs der Dreigroschenoper 126

Dieses Stadion erbaut 322

Du Speer aus Ebenholz 412

Durch die Ungunst der Zeit 362

Ebert-Epigramm (Kriegsfibel) 501

Englische Sonette 307

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 104

Es wechseln die Zeiten (Moldaulied) 428

Eulenspiegel überlebt den Krieg 468

Feiertag 20

Finnischer Tanz 384

Flandrische Landschaft 417-419

Fragen eines lesenden Arbeiters 350, 486f.

Freiheit und Democracy 315

Garden in progress 437

Gedenktafel für zwölf Weltmeister 138

Gedichte im Exil. 1937 (Svendborger Gedichte) 348

Gedichte im Exil (nicht gedruckt) 486

Großer Dankchoral 18, 206

Hauspostille 9, 13, 23, 52, 68, 69, 70, 99, 123–126,
176, 186, 484

Historie vom verliebten Schwein Malchus 99

Hitler-Choräle 18, 289–292, 312

Hollywoodelegien 420

Hymne an Gott 46f., 89, 90

Ich, Bertolt Brecht, bin aus den schwarzen Wäldern 9f.,
13

Ich bin der Sattler, der dem Junkerpack (Kriegsfibel)
501

Ich zum Beispiel spielte Billard 37

Immer fand ich den Namen falsch 404

Inbesitznahme der großen Metro 310f.

In den finsternen Zeiten 276, 351

In den Weiden am Sund 418f.

Ist das Volk unfehlbar? 248

Kleines Lied 53, 129

Kriegsfibel 269, 409–415, 421, 441, 442, 500f.

Kriegsfibel Nr. 1/Wie einer, der ihn schon im Schlafe
ritt 440

Kriegsfibel Nr. 3/Die Frauen finden an den spanischen
Küsten 413f.

Kriegsfibel Nr. 7/Achttausend liegen wir im Kattegat 415

Kriegsfibel Nr. 22/Such nicht mehr Frau 421

Kriegsfibel Nr. 33/Ihr Brüder, hier im fernen Kaukasus
441, 442

Kriegsfibel Nr. 42/Daß es entdeckt und nicht getötet
werde 413

Landschaft des Exils 388

Lautenbibel 102

Legende vom Soldaten 57

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350

Lehrgedicht 288

Lied an die Kavaliere der Station D 42

Lied an Herrn Münsterer 23

Lied für Lyriker 287

Lied von der Eisenbahntruppe 12, 29, 33, 34

Lied von der Unzulänglichkeit menschlichen Strebens 111

Lieder Gedichte Chöre 287–292

Lieder zur Klampfe von Bert Brecht und seinen Freunden
53, 102

Lob der U. S. S. R 223

Mahagonnygesänge 185

Mahagonnygesang Nr. 1 185

Mahagonnygesang Nr. 2 185

Mahagonnygesang Nr. 3 185

Moldaulied 428

Mutter Courages Lied 484

1940/8 (Steffinsche Sammlung) 371f.

Notwendigkeit der Propaganda 348

O Deutschland, bleiche Mutter 287

1933 287

Orges Gesang 24

Orges Wunschliste 24

O wie brannten euch 42

Paula! 29

Peinlicher Vorfall 425

Psalmen 40, 44, 84f.

Rat an Tretjakow, gesund zu werden 248

Salomon-Song 202

Sang der Maschinen 200

Sentimentales Lied (Erinnerung an die Marie A.) 104

Serenade 25

700 Intellektuelle beten einen Öltank an 240

Steffinsche Sammlung 366, 371f., 417f.

Singende Steyrwagen 180f.

Soldatengrab 31, 34

Solidaritätslied 251, 255f., 259

Steil. Treu. Unbeugsam. Stolz, Gerad. 29f.

Studien 334

Surabaya-Johnny 209

Svendborger Gedichte 276, 322, 336, 348–350, 410, 461

Taschenpostille 125

Terzinen über die Liebe 188, 265

Tief in den dunkeln Tälern 47

Tod im Wald 52, 124

Trenne dich von deinen Kameraden 157

Tschaganak Bersijew oder Die Erziehung der Hirse 246f.

Über den Verfall der Liebe 342

Über den vier Städten kreisen die Jagdflieger 420

Über die Bedeutung des zehnzeiligen Gedichts 275f.

Über die Bezeichnung Emigranten 404

Über die Gedichte des Dante auf die Beatrice (Das zwölfte Sonett) 334

Über Goethes Gedicht »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 333

Über Kants Definition der Ehe 333

Über Schillers Gedicht »Die Bürgschaft« 333

Über Shakespeares Stück »Hamlet« 333

Ulm 1592 486

Und was bekam des Soldaten Weib 426

Valse plus triste 384

Verschollener Ruhm der Riesenstadt New York 287, 312

Vom armen B.B. 9f.

Vom ertrunkenen Mädchen 205

Vom Schwimmen in Seen und Flüssen 100f., 181

Vom Tod im Wald 52, 124

Von der Kindesmörderin Marie Farrar 99

Wenn die Juden es ihm nicht abrieten 267

Wer in Mahagonny blieb 185

Weil unser Land zerfressen ist 68

Wiegenlieder 261

Wie ich höre, wird in besseren Kreisen 461

Wir haben zu viel parat 141

Wir stammen / Aus einer Waffenfabrik 180

Wyman-Epigramm (Kriegsfibel) 500f.

文集

An den Kongreß für kulturelle Freiheit 501f.

Antigonemodell 1948 470, 486

Aufbau einer Rolle 445f.

Aufführungsprobe (Gesprächsaufzeichnung) 196

Augsburger Kriegsbriefe 34

Aus dem Theaterleben 133

Der Dreigroschenprozeß 234–239, 241, 248, 303, 305

Der Einzug der Menschheit in die großen Städte (Projekt)
151

Der Messingkauf 360

Der »Realismus« der jüngeren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389f.

Die Not des Theaters (Rundfunkgespräch) 195–200

Die Straßenszene 210

Erläuterungen zum Flug der Lindberghs (Radiotheorie) 198

Glossen zu Stevenson 239

Journale 269, 342, 344, 354, 355, 370, 374, 378, 380,
383, 389, 390f., 392, 396, 398, 402, 406, 411f., 417, 418f.,
430f., 436, 437f., 448, 459, 469, 472, 506

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 475f., 513

Offener Brief an die deutschen Künstler und
Schriftsteller 501

Radiotheorie 198

Regeln für M. S. 277

Reisen um Deutschland 269

Tagebuch No. 10 16, 19f., 21

Über die Herrenmode 64f.

Über die Malerei der Chinesen 363f.

Versuche 126, 198, 201, 233, 297, 350, 472

Wenn der Vater mit dem Sohne 150

人名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busch, Alexander 70

Ackermann, Anton 431f., 514

Adamic, Louis 410f.

Adenauer, Konrad 490

Adorno, Theodor W. 90, 208, 256, 343, 393, 416, 464f.

Äsop 444

Alberts, O. A. 185

Anders, Günter 416

Andersen Nexö, Martin 334f., 390

Angelus Silesius 181

Anzengruber, Ludwig 91

Apletin, Michail 386, 431, 458

Appen, Karl von 512

Aretino, Pietro 279

Arp, Hans 173

Astor, Johann Jacob I.-III. 397

Aufricht, Ernst 200f., 203, 426f.

Baader, Alfred 173

Baal, Johann 52

Bach, Johann Sebastian 227f.

Bacon, Francis 391, 475, 486

Banholzer, Blanka 61

Banholzer, Frank (Sohn) 61-63, 96, 123, 266, 435

Banholzer, Paula (genannt Bi oder Bittersweet) 16, 39, 43, 61f., 65, 67, 84, 95-99, 100

Banholzer, Karl 61

Barta, Sándor 431, 458

Barthes, Roland 512

Basil, Fritz 401

Baudelaire, Charles 340

Bauer, Ludwig 21

Baum, Vicki 126

Beatrice 279f.

Becher, Johannes R. 163, 243, 329, 335, 432, 450, 462, 463, 464, 489, 507, 510f., 514, 516f.

Becher, Lilly (geb. Korpus) 450

Becker, Anatol 325f., 327

Beckett, Samuel 465

Beethoven, Ludwig van 93, 227

Behr, Kurt von 439

Beloborodow, Alexandre 319

Benjamin, Walter 22, 143, 208, 217-219, 242, 244, 302f., 335, 339-342, 343f.

Benn, Gottfried 77f., 153, 177, 242f., 269f., 333

Bentley, Eric 452

Berber, Anita 132f., 143

Berg, Alban 465

Bergengruen, Werner 336, 467

Berger, Kurt 203

Berger, Ludwig 203

Bergmann, Ingrid 445

Bergner, Elisabeth 398, 399

Berlau, Michel 436f.

Berlau, Ruth 24, 295, 296f., 317, 329–332, 342f., 349f.,
355, 365f., 373, 374, 375, 376f., 381, 386, 387f., 39of.,
394, 398, 409f., 415, 434f., 437, 445f., 471, 486, 492, 495,
500

Berle, Adolf 433

Bermann Fischer, Gottfried 270, 451

Bermann, Gottfried (Berman Fischer) 270, 451

Besson, Benno 510

Bethmann Hollweg, Theobald von 26

Beyer 519, 520

Bie, Oskar 128

Bibesco, Elisabeth 308

Bingen, Julius 20

Bizet, George 92, 99

Blei, Franz 126

Bloch, Ernst 85, 89, 204f., 225, 275, 333

Blumenberg, Hans 345, 347

Bois, Curt 481

Borchardt, Hermann 139, 314f.

Borchert, Wolfgang 483

Bork, Kurt 493, 495

Bosch, Hieronymus 497

Boyer, Charles 445

Brandt, Willy 465

Branting, Georg 365, 371

Braun, Hanns 110, 118f.

Brecht, Barbara (Tochter; später: BrechtSchall) 258,
261, 285, 316, 354, 385, 388, 395, 483, 488, 519, 520

Brecht, Berthold Friedrich (Vater) 9, 11, 12, 14, 21,
35, 37, 41, 42, 43, 52, 62, 100, 123, 259, 316, 366

Brecht, Fanny (Cousine) 36

Brecht, Hanne (Tochter, spätere Hiob) 98f., 316, 366

Brecht, Karl (Onkel) 10

Brecht, Karoline geb. Wurzler (Großmutter) 9f., 17, 34-38, 366

Brecht, Stefan (Sohn) 144, 261, 285, 316, 354, 385, 388, 395, 411, 447, 456, 457

Brecht, Stephan Berthold (Großvater) 9, 17

Brecht, Walter (Bruder) 15, 17, 23, 25, 35, 36, 39, 62f., 154

Brecht, Wilhelmine Friederike Sophie geb. Brezing (Mutter) 9, 11f., 18, 20, 36

Bredel, Willi 321, 326, 432, 514

Breiner, Egon 388

Breitenbach, Josef 434, 445f.

Breitensträter, Hans 136, 137, 138

Breker, Arno 440, 451

Brentano, Bernhard von 244, 250, 261, 327

Brezing, Amalia (Tante) 11

Brod, Max 165

Bronnen, Arnolt (eigentlich: Bronner, Arnold Hans) 17, 58, 85, 104f., 109, 119f., 122, 126, 128, 144, 145, 149, 172, 177f., 184, 190

Bronner, Ferdinand 104

Brüstle, Wilhelm 29

Brugsch, Theodor 518f.

Bruno, Giordano 346

Bubis, Ignaz 265f.

Buckwitz, Harry 511

Budzislowski, Hermann 454, 462

Büchner, Georg 108, 220

Bunge, Hans 227, 317, 387, 416, 419, 424

Burri, Emil 261

Busch, Ernst 236, 250f., 386, 511, 512

Busch, Wilhelm 277

Busoni, Ferruccio 185, 200

Butting, Max 140f., 142

Caesar 22, 336

Cain, Malahan 389

Callot, Jacques 359

Canetti, Elias 179f., 182, 183, 263

Carnegie, Andrew / Thomas M. 397

Carpentier, Georges 137

Celan, Paul 465

Chagall, Marc 128, 173

Chaplin, Charles 78, 143, 427, 445, 515

Christus 22, 49

Chruschtschow, Nikita 246, 517

Churchill, Winston 392, 402, 436, 459, 460, 477

Cicero 33

Claudel, Paul 39

Cocteau, Jean 285

Cortez, Hernando 12

Coubertin, Pierre de 323

Curjel, Hans 469f.

Czinner, Paul 398, 399

Czirson, Paul 138

Dahlem, Franz 450

Daluege, Kurt 408

Dante Alighieri 86, 89, 279f., 282, 333

Damaye, Henry

Darwin, Charles 213f., 243

Defoe, Daniel 214

Dehmel, Richard 277

Deinhard, Hans 85

Dempsey, Jack 137, 138

Denke, Karl 71f.

Dessau, Paul 246, 356, 484f., 495f., 518

Detzer, Paul 18

Deutschenbaur, Kaspar 27

Dibelius, Otto 291f.

Dieterle, Charlotte 419, 453

Dieterle, William (Wilhelm) 381, 389, 390, 391, 419, 453

Diktonius, Elmer 371

Disney, Walt 427

Dix, Otto 173

Döblin, Alfred 58, 161, 163, 168f., 172, 303, 309, 393,
424f., 461

Donna Laura (Laura de Noves) 279f.

Dorn, Erna 268

Dort, Bernard 512

Drew, Dan 115f., 396

Dudow, Slatan 251, 257, 332, 333

Dürer, Albrecht 497

Dürrenmatt, Friedrich 223, 483

Durocher, Léon 484

Durieux, Tilla 163

Dymke, Herbert 282

Dymschitz, Alexander 473, 481

Eberle, Vera Maria 92

Ebert, Friedrich 44f., 56f., 60, 122, 171, 501

Ebert, Friedrich (Sohn) 481

Ebinger, Blandine 84, 425

Eckart, Dietrich 275

Edfeld, Johannes 363

Ehrenburg, Ilja 68f., 130–132, 289

Eichheim, Josef 107

Einem, Gottfried von 473, 477, 482, 487f., 489, 512

Einstein, Albert 255

Einsmann, Josef 293

Einsmann, Maria 293

Eisenstein, Sergej 245

Eisler, Gerhard 403, 453, 466

Eisler, Hanns 211, 219–221, 224f., 226–229, 248, 249f., 251f., 253, 256, 259, 261, 263, 265, 277, 286–288, 302, 304, 313, 317f., 320, 325, 332, 350f., 399, 403, 407, 416–421, 422f., 424f., 428, 453, 454, 456, 464, 466, 477, 497, 499f., 517

Eisler, Lou 332, 399

Eisner, Kurt 66

Eisner, Lotte 203

Eisler, Rudolf 220

Engel, Erich 84, 107, 108, 145, 214, 482, 483, 492, 511

Engels, Friedrich 48, 214, 288, 292, 306, 505

Ensel, Fritz 138

Ernst, Max 173

Erpenbeck, Fritz 326, 335, 449f., 485f., 498, 513

Ewers, Hans Heinz 115

Eylau, Hans Ulrich 511

Faber, Erwin 120

Fadejew, Alexander Alexandrowitsch 386

Falckenberg, Otto 114

Farrar, Geraldine 99

Fehling, Jürgen 120f.

Felsenstein, Walter 510f.

Fernau, Rudolf 63, 120

Ferry, Julius 13f.

Feuchtwanger, Lion 65f., 74, 103, 107, 114–121, 168,
203, 209, 220, 270, 321, 327f., 332, 381, 391, 399–401, 403,
419, 420f., 425, 429, 431, 456, 468

Feuchtwanger, Marta 66, 117–120, 388, 399f., 419, 424,
425

Feuerbach, Ludwig 48f., 214f., 225

Fichte, Johann Gottlieb 72

Finck, Werner 468

Fischer, Samuel 150, 270

Fischer, Ruth (geb. Eisler) 453, 466

Forster, Friedrich Wilhelm 271

Ford, Henry 34f., 116, 147, 240, 396

Forster, Rudolf 236

Frank, Benno 473

Frank, Bruno 429

Frank, Leonhard 261, 393

Franco, Francisco 330

Friedrich Wilhelm von Preußen 45

Freud, Sigmund 213f., 271, 342

Frick, Walburga 61

Frisch, Max 467, 474f., 476f., 483

Fülöp-Müller, René 150

Fürnberg, Louis 479f., 514

Galilei, Galileo 90, 215, 344, 360, 368, 448

Ganghofer, Ludwig 393

Gasbarra, Felix 163, 165, 166, 194

Gay, John 200f.

Gebhard, Friedrich 34

Gehweyer, Franz 31

Gehweyer, Fritz 21, 23, 30, 31, 61

Gehweyer, Georg 31

Geibel, Emanuel 498f.

Geis, Jacob 107, 108, 122

George, Heinrich 105

George, Manfred 426

George, Stefan 102, 112f., 156, 463

Gerhardt, Paul 290

Gert, Valeska 106, 138, 236, 251

Geschonneck, Erwin 492f., 512

Gilbrecht, Walter 188, 194f.

Giehse, Therese 480, 481, 482, 514f.

Girnus, Wilhelm 496, 503f., 512f.

Glaeser, Ernst 271

Goebbels, Joseph 92, 270, 272, 291, 321, 324, 328, 441,
460, 478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71, 72, 102, 127, 197, 199,
214, 220, 227, 277f., 284, 305, 314, 341, 430, 463, 471,
494, 496-498, 499

Goerdeler, Carl Friedrich 438

Göring, Hermann 270, 330, 439, 468, 470

Gold, Käthe 481

Goldschmidt, Alfons 67

Goldschmidt (nicht identifiziert) 366

Gorki, Maxim 260, 289, 296, 317, 328, 517

Gould, George / Jay 397

Goya, Francisco de 315

Gozzi, Carlo 508

Grabbe, Christian Dietrich 50, 53

Graf, Oskar Maria 272

Granach, Alexander 254, 327, 388, 390, 399, 408, 424

Granach, Gad 254

Greid, Hermann 364f.

Grieg, Nordahl 329, 334f., 489f.

Grimmelshausen, Hans Jacob Christoffel von 356f.

Groener, Wilhelm 57

Groos, Walter 21, 22

Grosch, Nils 141, 427

Grotewohl, Otto 450, 491, 503

Grosz, George 64, 128, 163, 165, 169–177, 184, 220, 265,
311–315, 319f., 389, 390

Gründgens, Gustaf 178

Gryphius, Andreas 146f.

Grzesinski, Albert 206

Gurk, Paul 105

H. E. (nicht identifizierter Kritiker) 108

Haarmann, Fritz 72

Haase, Hugo 26

Habart, Michel 512

Hagemann, Carl 94–96

Hagenbeck, Carl 83

Hagenbruch, Charlotte (Dieterle) 419

Haindl, Clemens 15, 62f.

Haindl, Friedrich 62

Hambleton, Edward T. 454

Harich, Wolfgang 481

Hardt, Ludwig 106, 424

Hartmann, Rudolf 20, 23

Harrer, Johann 23

Harzmann, Rolf 519

Hase, Friedrich Traugott 168

Hašek, Jaroslav 164f., 426

Hauptmann, Elisabeth 68, 124f., 139f., 145f., 151, 152, 153, 179, 183, 185, 200f., 202, 208, 209, 221, 230, 258, 261, 297, 325, 389, 390, 510

Hauptmann, Gerhart 22

Hauska, Hans 327

Hausmann, Raoul 173

Hay, Julis 326, 327, 329

Heartfield, John 173, 289

Hebbel, Christian Friedrich 52, 91

Hecht, Ben 392f., 427

Hecht, Werner 495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49, 73, 215, 216, 251, 305f., 421, 469

Heidegger, Martin 73, 272, 305, 341

Heine, Heinrich 65, 101, 271, 463

Heinsheimer, Hans 205

Heisenberg, Werner 337

Hemingway, Ernest 389

Hennemann, H. H. 519

Henschke, Alfred (d. i. Klabund) 85

Hertzka, Emil 142, 187f.

Herrmann-Neiße, Max 174, 312

Herzfelde, Wieland 261, 304, 314, 319, 349, 350, 462, 486

Herzog, Wilhelm 174

Hesse, Hermann 86

Hesterberg, Trude 126f.

Hettche, Thomas 279

Heydrich, Reinhard 404f.

Heym, Georg 52

Hilbert, Egon 488

Hilferding, Rudolf 232

Hill, Hainer 497, 498

Hill, James 397

Hiller, Kurt 255

Hilpert, Heinz 476f.

Himmler, Heinrich 394, 408

Hindemith, Paul 186, 209, 210, 211

Hindenburg, Paul von 43, 44, 45, 171f., 249, 291, 379

Hirschfeld, Kurt 467, 473, 476f.

Hitler, Adolf 46, 51, 74, 116, 175, 190, 206, 217, 242f., 259f., 261, 262, 267, 270, 275, 289, 290f., 299, 306, 312, 315, 321, 322–325, 328, 336, 339, 341, 354–356, 365, 379, 383, 389, 394, 397, 400f., 402, 403, 411, 421, 423, 427, 429, 432f., 436, 437f., 440f., 447, 458, 460, 462, 465, 477, 479, 500f., 509

Höglund, Zeth 371

Hölderlin, Friedrich 113, 442f., 463, 469f., 472

Hofer, Johanna (Kortner) 395, 399, 419, 422f.

Hofmannsthal, Hugo von 52f.

Hohenester, Max 21, 23, 30, 32

Hold, Maria 284

Hollaender, Felix 203f.

Holtzhauer, Helmut 511

Holz, Arno 110, 313

Homolka, Oskar 118f., 398, 481

Honecker, Erich 479f.

Hood, R. R. 410

Hook, Sidney 319

Hoover, John Edgar 404, 410, 423, 453, 456f.

Horaz 32f., 161

Horkheimer, Max 339, 393

Horwitz, Kurt 106, 119

Hube, Ernst 245

Humperdinck, Engelbert 93

Humboldt, Alexander von 14

Humboldt, Wilhelm von 14, 22

Hunt, Nelson Bunker 154

Hunt, Herbert William 154

Huppert, Hugo 385f.

Hurwicz, Angelika 492, 512

Hutten, Ulrich von 17

Ibsen, Henrik 22, 452

Ivens, Joris 310

Jacob, Heinrich Eduard 85

Jacobsohn, Siegfried 128

James, Edward 285f.

Jannings, Emil 375

Jendretzky, Hans 449f., 462

Jessner, Leopold 120f., 144

Jhering, Herbert 16f., 88, 104, 105f., 107, 108, 118,
145, 157, 163, 273, 511

Johst, Hanns 36, 50f., 53

Joyce, James 309

Jünger, Ernst 175, 177f.

Juntula, Roope 377

Juul, Sven Jensen 317

Kästner, Erich 255, 271, 277, 467, 468

Kafka, Franz 302f.

Kahn, Harry 204

Kallio, Kyösti 365

Kamenew, Lew 319

Kant, Immanuel 30, 74, 90

Kantorowicz, Alfred 450, 455

Kapp, Wolfgang 122

Karl der Große 430

Karlstadt, Liesl 82, 84, 106, 107

Kasack, Hermann 85, 88, 122f., 123–125

Kautsky, Karl Johann 271

Kesten, Hermann 126, 261, 294

Kerr, Alfred 86, 121, 145, 195–198, 271

Kheifetz, Grigory 434

Kiepenheuer, Gustav 124f.

Kilpi, Sylvi-Kyllikki 382f., 384

Kindler, Helmut 265

Kipling, Rudyard 146, 202

Kirk, Hans 334

Klabund (d. i. Henschke, Alfred) 85, 106, 123, 128, 203, 277, 441

Klein, James 132

Knutzon, Per 334

Koch, Carl 199

Kollwitz, Käthe 255

Kolzow, Michail 326, 329, 386, 387

Kopernikus, Nikolaus 90, 213, 347

Kopp, Conrad 39

Kortner, Fritz 127, 136, 138, 321, 388, 390f., 395, 398, 399, 419, 424, 481

Kortner, Peter 402

Korsch, Karl 302, 304–308, 332, 393, 407

Kracauer, Siegfried 256f.

Kraus, Karl 105, 262, 265, 273–276, 463

Krauss-Elka, Leopold 185

Krauß, Werner 120f.

Krausser (Pfarrer) 18

Kreuger, Ivar 168

Kreymborg, Alfred 426f., 428

Krocker 519

Kroher, Franz 21

Kühl, Kate 174, 201, 202

Kühnl, Reinhard 438

Küpper, Hannes 139f., 157

Kuhn, Emil Ludwig 271

Kuhn, Hedda (genannt He) 39, 40f., 41, 84, 96, 122, 128

Kurella, Alfred 332f., 341f.

Kurella, Heinrich 333, 335

Kutscher, Artur 35f., 40, 50f.

Lacis, Asja 117, 118f., 217, 245, 289, 387

Lagerlöf, Selma 124

Lamac, Carl 426

Lane, Dorothy (Elisabeth Hauptmann) 208

Lan-Fang, Mei 310f.

Lang, Fritz 394, 405-408, 410

Lange, Gerard de 295

Lange, Horst 467

Langhoff, Wolfgang 452, 480, 481, 492, 493, 510f.

Lania, Leo 162, 165, 168, 234, 236, 298, 308

Laughton, Charles 395, 437, 439, 444-446, 492

Laura de Noves 279f.

Lazar, Paul 366

Lefebvre, Henry 512

Léger, Fernand 140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306

Leibowitz, René 512

Lenin 69, 153, 225, 247, 303, 479

Lenja (Lenya) , Lotte 201, 203, 236, 250, 281, 285f.

Lenya, Lotte (Lenja, Lotte) 426f., 428

Lenz, Jakob Michael Reinhold 42, 471, 494, 499

Leonard, Wolfgang 480

Leonhard, Rudolf 333

Lernet-Holenia, Alexander 467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223

Leventhal, Julius J. 441

Lidin, Wladimir 132

Liebknecht, Karl 75, 207

Lingen, Theo 211

Lissitzky, El 128

Livius 33

Löbe, Paul 171f.

Lommer, Horst 493

Loos, Adolf 274

Lorre, Peter 398, 424, 438, 481

Losch, Tilly 285, 375

Losey, Joseph 445, 454

Ludendorff, Erich 43f., 45, 56f., 501

Ludwig, Emil 73

Lüttwitz, Walther von 122

Luft, Friedrich 493, 494

Lukács, Georg 48, 78, 211, 239, 261, 333, 335, 341

Lukrez 33, 409

Lunatscharski, Anatoli 261

Lustig, Hans G. 249

Luther, Martin 19, 113, 292

Lutz, Regine 481, 492

Luxemburg, Rosa 26, 75, 205f., 238

Lyra, Justus Wilhelm 498f.

Lyssenko, Trofim Denissowitsch 246

Mackeben, Theo 194

Majakowskij, Wladimir 128, 245, 385

Malewitsch, Kasimir 128

Man Ray 301

Mann, Erika 149, 270, 403, 419

Mann, Heinrich 255, 271, 303, 309, 322f., 336, 403, 416,
419, 424f., 429, 465

Mann, Katia 432

Mann, Klaus 132, 149, 270, 303, 333, 403, 419

Mann, Thomas 14, 32, 49, 76, 86, 108–111, 143, 148–151,
156, 160, 234, 270, 277, 300, 315, 400, 419, 425, 429–433,
450, 456, 463f., 499, 515

Mannheim. Dora 122

Mansfeld, Ernst 326

Marcuse, Herbert 393

Marcuse, Ludwig 342f., 429

Marlé, Arnold 65

Marlowe, Christopher 114

Maron, Karl 516

Martin, Karl-Heinz 448f.

Marx, Karl 48f., 69, 147, 151, 152, 153, 171, 174, 175,
212, 214–216, 219, 225, 229, 253, 287f., 305, 307, 505

Matthis, Henry Peter 354, 366

Max von Baden 56, 60

McCoy, Horace 389

Mehring, Franz 292

Mehring, Walter 127, 163, 166, 220

Mei Lan-Fang 310f.

Meier-Graefe, Julius 128

Melagreos von Gadara, Christus 411

Mersmann, Hans 221

Mertens, Otto 516

Meyer, Agnes 431, 433

Meyer IV (nicht identifizierter Schweizer
Geheimpolizist) 466, 482, 483

Meyer-Förster, Wilhelm 91

Meyerhold, Wsewolod 244, 248

Michaelis, Karin 144, 284, 295, 296, 334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83

Milestone, Lewis 445

Milhaud, Darius 186

Mithridates 393

Mitschurin, Iwan Wladimirowitsch 246

Molière 444, 471, 510

Molotow, Wjatscheslaw Michailowitsch 365

Monk, Egon 497

Morgan, J. Pierpont / Junius, Major 397

Morgenstern, Christian 277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93, 94f., 204

Mühr, Alfred 489

Mühsam, Erich 66, 326

Mühsam, Zensi 326

Müller, Heiner 12, 177, 212

Müller, Helene 293

Müller, Hermann 208

Müller, Ludwig 291

Müllereisert, Otto (genannt Heigei, Hei) 23, 33, 62,
96, 179, 369, 520

Münsterer, Hanns Otto 23, 24f., 33, 42, 68, 80f.

Münzenberg, Willy 286

Musil, Robert 86

Mussolini, Benito 336, 447

Myers, Gustavus 396f.

Nabokow, Vladimir 128

Napoleon 22, 71

Neher, Carola 175, 202f., 236, 325–329, 387

Neher, Caspar (genannt Cas) 23, 24, 36, 40, 43, 50, 61,
62, 63, 80, 83, 96, 100f., 104, 108, 119f., 122, 124f., 148,
170, 175, 190–193, 261, 263f., 327, 363, 372, 451f., 465,
469–472, 481, 482, 484, 487f., 490, 492f., 497, 512, 520

Neher, Erika 477

Nero 379

Nietzsche, Friedrich 30, 46, 48, 49, 69, 175, 213, 460,
463

Nikolaus II. (Zar) 517

Norris, Frank 154f., 232, 396

Noske, Gustav 57, 60, 75, 171

Nürnberg, Rolf 393

Nungesser, Charles 209, 210

Oehler, August 411f.

O' Hara, Maureen 439

Ollenhauer, Erich 496

Olsoni, Eric 371

Olsson, Hagar 382

Oprecht, Emil 473

Ossietsky, Carl von 271

Osten, Maria 321, 326, 329, 386

Oswald, Richard 99, 133

Otto, Teo 475, 481, 483, 511, 517

Ottwalt, Ernst 250, 251, 261, 326f., 386

Ovid 33

Owen, Jesse 324

Pabst, Georg Wilhelm 236–238

Palm, Kurt 497, 498

Palucca, Gret 511

Paquet, Alfons 85, 161f., 168

Parmet, Simon 371

Paryla, Karl 480

Pasetti, Otto (Pasetti-Friedenburg, Otto Freiherr von)
285f.

Paulsen, Harald 201, 203

Pekkala, Marie 371

Perrot, Heinrich 177f.

Petrarca, Francesco 279

Petrus 49

Pfanzelt, Georg (genannt Orge) 23f., 451

Picasso, Pablo 493

Pieck, Wilhelm 326, 327, 431, 450, 458, 491, 493

Piscator, Erwin 135, 161—169, 172, 173, 174, 176, 179,
194, 205, 220, 228, 313, 332, 396, 426, 428, 458

Plato 73

Polgar, Alfred 128

Pollock, Friedrich 393

Prem, Georg 66f.

Prem, Lilly (geb. Krause) 67

Prestel, Ludwig (genannt Lud) 23

Prestel, Rudolf 23, 24

Preuß, Hugo 75f.

Puni, Ivan 128, 173

Quinn, Anthony 445

Radek, Karl 309

Raff, Julius 42f.

Raffael 279, 313

Raimondi, Marcantonio 279

Rainer, Luise 441f.

Rasp, Fritz 236

Rathenau, Walter 177

Rau, Heinrich 491

Recht, Oskar Camillus 92, 93, 94, 95–99

Reich, Bernhard 117, 289, 304

Reichenbach, Elisabeth 424

Reichenbach, Hans 393f., 424, 429

Reifenberg, Benno 126

Reimann, Hans 165, 426

Reinhardt, Max 102

Reiser, Theodore 309

Reitter, Hermann (Onkel) 11

Remarque, Erich Maria 77, 271

Renoir, Jean 438f.

Reyher, Ferdinand 344, 397, 445, 473

Richthofen, Wolfram von 330

Riefenstahl, Leni 400

Rilke, Rainer Maria 112, 156

Rimbaud, Arthur 50

Ringelnatz, Joachim 106, 120

Rockefeller, John D. 397

Roda-Roda, Alexander 110

Rodenberg, Emma 495

Rodenberg, Hans 507

Röcker, Marie 36f., 62f., 366

Röhm, Ernst 263, 379

Roosevelt, Theodore 264

Roosevelt, Franklin D. 392, 402, 436, 447

Rorem, Ned 204

Rottenberg, Ludwig 206

Rubens, Peter Paul 103

Rühle, Otto 251, 25

Rülicke, Käthe 496, 506, 517, 518

Rundt, Arthur 144

Runeberg, Johan Ludvig 356

S.L. (nicht identifizierter Kritiker) 512f.

Sage, Russell 397

Sager, Else 476

Salomon, Ernst von 177f., 262f., 460

Samson-Körner, Paul 136-140, 179, 244

Santesson, Ninnan 354, 364, 366

Sauer, Romuald 34

Sauerbmch, Ferdinand 277

Sappho 39

Schadewaldt, Wolfgang 469

Schall, Ekkehard 512

Schdanow, Andrej 308

Scheffauer, Hermann Georg 145

Scheidemann, Philipp 56, 60, 501

Scheidt, Wolfgang von 519

Schelcher, Raimund 512, 516f.

Scherchen, Hermann 325

Schiller (nicht identifiziertes Ehepaar) 363f.

Schiller, Friedrich 91

Schklowskij, Victor 128, 311

Schlamm, Willy Siegfried 298

Schlegel, Friedrich 160

Schlichter, Max 172, 175

Schlichter, Rudolf 63, 128, 163, 169, 170f., 172–178,
184, 220, 265, 300

Schlichter, Speedy (geb. Koehler, Elfriede Elisabeth)
172, 177

Schmalhausen, Otto 173

Schmeling, Max 135f.

Schmitt, Carl 177

Schmitt, Johannes Ludwig 518f.

Schönberg, Arnold 220, 228

Schopenhauer, Arthur 39, 305

Schreck, Max 106

Schünzel, Reinhold 236

Schulten, Hans Karl 519

Schulz, Dutch 317

Scotti, Tommaso Gallarati 85

Seelenfreund, Hermann 139

Seeler, Moritz 105

Seghers, Anna 126, 293, 332

Seitz, Adolf 41f.

Seitz, Gustav 511

Semjonow, Waldimir 329

Shakespeare, William 114, 146, 166, 259, 274, 437, 444,
471, 496f., 510

Shaw, George Bernard 126, 309

Sinclair, Upton 165, 220

Singer, August 151, 152

Sinowjew, Grigori 319, 320

Smirnow, Iwan 319

Solon 336

Sophokles 469

Spielhagen, Friedrich 150f.

Stalin 243, 246, 247, 248, 254, 308, 319, 320, 328, 340, 341, 355, 372, 383, 386, 387, 389, 397, 421f., 423, 435f., 448, 459, 479, 504, 517

Stanislawski, Konstantin Sergejewitsch 129, 317

Staudte, Wolfgang 514f.

Steckel, Leonard 481, 482, 492f.

Steer, George L. 330

Steffin, August 257

Steffin, Johanna 257

Steffin, Margarete (genannt Grete) 18, 130, 229, 249f., 257–259, 261, 277–285, 286, 295–297, 298, 302, 307, 310, 313, 316f., 318, 327, 331, 332, 333, 334f., 343, 349f., 353, 354f., 356, 365, 373, 374, 375, 378, 380f., 382, 385f., 387, 390, 394, 395, 417, 489

Steinbeck, John 389

Sternberg, Fritz 163, 172, 176, 177f., 207, 239, 307

Steuermann, Eduard 424f.

Stolzing, Josef 107, 110

Stramm, August 52, 101

Strehler, Giorgio 517

Straub, Agnes 105, 120

Strindberg, August 177

Stripling, Robert E. 453, 454f.

Ström, Frederik 363, 365

Süskind, Patrick 149

Süskind, Wilhelm Emanuel 149

Suhrkamp, Peter 183, 261, 268, 442, 451, 452, 505, 506,
518

Swanson, Gloria 121

Swift, Jonathan 72

Syberberg, Hans Jürgen 497

Tacitus 33

Tasiemka, Hans 183f.

Thälmann, Ernst 175, 254, 312

Thoeren, Robert 398, 399

Thom, Andreas 50f., 52

Thomas, J. Parnell 454f.

Thompson, Dorothy 388, 390

Tiessen, Heinz 141

Tillich, Paul 433

Toch, Ernst 186

Toller, Ernst 58, 66, 163, 25, 313

Tombrock, Hans 359–363, 364, 384, 399

Tretjakow, Sergej 136, 242f., 244–248, 289, 303, 309,
326, 387

Tretjakowa, Wiktoronowa 326

Trine, Ralph Waldo 34f.

Trotzki, Leo 319, 320

Truffaut, François 148

Truman, Harry S. 447, 448, 459, 467, 478

Tucholsky, Kurt 128, 220, 251, 271, 483

Tunney, Gene 138

Tuomioja, Vappu 374f.

Twardowski, Hans Heinrich von 105, 408

Uhse, Bodo 329

Ulbricht, Walter 431f., 450, 451, 479, 480, 485, 491,
496, 503f., 512, 515

Vajda, Ladislaus 234, 236

Valentin, Karl 82f., 84, 103, 107, 122, 129, 147

Valetti, Rosa 201

Vanderbilt, Cornelius / Cornelius jun. 397

Vansittart, Robert Gildbert 430

Velde, Henry van der 73

Verdi, Guiseppe 93

Vergil 33

Verlaine, Paul 50, 101

Vesper, Will 51

Viertel, Berthold 104, 395, 399, 406, 409, 429, 437,
438, 481, 482

Viertel, Hans 406, 429, 437, 438, 440

Viertel, Salka 395, 398, 399, 406, 437, 438

Villon, François 50

Voltelen, Mogens 296, 317

Wagner, Richard 93, 105, 270

Walden, Herwarth 128, 333

Waley, Arthur 221, 437

Wandel, Paul 509

Wangenheim, Gustav von 310, 326, 327, 432

Warschauer, Frank 40, 85, 128

Watson, John B. 241

Weber, Carl Maria von 93

Wechsler, Lazar 252

Wedekind, Frank 40, 50, 54, 62, 86, 92, 101, 103

Weichert, Richard 195–197

Weideli, Walter 512

Weigel, Helene 125, 144f., 175, 179, 185, 191, 202, 247, 250, 258, 260f., 262, 273, 278, 284, 295, 297, 302, 310, 316, 318, 326f., 327, 331f., 334, 343, 353, 354f., 371, 372, 373, 374, 384, 388, 394f., 410, 423f., 424, 446, 468–472, 473, 475, 477, 480, 481, 482, 483, 488, 491, 492, 493, 494, 498, 503, 504, 510, 512, 514, 520

Weill, Kurt 111, 141, 142, 163, 182, 185–190, 192–195, 199f., 200f., 203–206, 209, 219, 221–223, 235, 250, 257,

263, 265, 273, 281, 285f., 426—428

Weinert, Erich 250, 326, 329, 431

Weisenborn, Günther 250

Weiskopf, Franz Carl 514

Weiss, Peter 357, 366

Wekwerth, Manfred 64

Welk, Ehm 162

Welles, Orson 445

Wells, H. G. 28

Werfel, Franz 156

Wesley, Emile 484

Westheim, Paul 68

Wexley, John 406f.

Wifstrand, Naima 354, 356

Wisten, Fritz 481

White, Bouck 115f., 396

Wilde, Oscar 37, 306

Wilder, Billy 398

Wilhelm II. 14, 26, 30, 44, 60, 71, 73, 76, 77, 217

Wilhelm von Preußen 291

Willemer, Marianne von 277

Wilson, Robert 456

Wilson, Woodrow 44, 56

Winckelmann, Johann Joachim 470

Winge, Hans 421

Withman, Walt 41

Wittgenstein, Ludwig 239

Wodtke (nicht identifizierter Sekretär) 260

Wolf, Friedrich 313, 458f., 514

Wolf, Theodor 271

Wohl, Louis de 394

Wollheim, Ernst 96, 128

Wright, Orville 28

Wright, Wilbur 28

Wüthrich, Werner 295, 466

Wuolijoki, Hella 365, 371, 373, 374, 375, 376, 377f.,
380, 382

Wayman, Jane 500

Zarek, Otto 54, 104, 126

Zech, Paul 52 Ziegler, Adolf 440

Ziegler, Bernhard (Alfred Kurella) 333

Zörgiebel, Karl Friedrich 206f.

Zoff, Marianne 39, 92–99, 127, 185

Zuckmayer, Carl 253, 378, 415f., 467

Zweig, Arnold 77, 126, 255, 507

Zweig, Stefan 416

概要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7 前言

德意志帝国（1898～1918）

9 神话：出身

13 生活：小市民到中产阶级

16 心脏神经官能症：假警报

17 写作灵感：好素材

19 《10号日记》：形式和风格的练习

21 作者：出版人

23 布莱希特派：绝非纵酒宴乐

25 战争诗：约稿

30 战争与饿殍：被无视

31 中学：人的基本类型

- 34 母亲：双重道德
- 39 兵役：戏剧教授的时间
- 41 入伍合格：背后一刀
- 46 神正论：唯物主义
- 50 巴尔：剥夺个体主义的权力
- 54 被出卖的革命：系扣的靴子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 61 来自吉姆拉茨霍芬的犹太男婴：斯巴达克斯
- 67 欧洲的陷落：马克思之死
- 70 图伊主义：已经实现了
- 75 世间最自由的宪法：机械体验
- 80 流动的戏台：茨威利斯
- 85 散文的突破：优秀的叙事性
- 89 世界观：已废除
- 91 报道：奥格斯堡最美丽的女人
- 95 乱交：莱希特与布莱希特
- 101 艺术商品：消费

- 103 丛林之中：布尔什维主义
- 108 美食：托马斯·曼与布莱希特
- 111 怪异的德语：唯物主义转向
- 114 本能统治者爱德华：同福伊希特万格的合作
- 122 为合同而讨价还价：柏林的出版社
- 126 卡巴莱：失败了
- 128 在蓝鸟：俄国民族艺术的后果
- 130 柏林聚宝盆：火山口上的舞蹈
- 134 美元太阳：蓬勃发展的柏林
- 136 生命访谈：拳击手作为同事
- 140 光之城柏林：布莱希特已立足于此
- 146 人就是人：消费批判
- 151 马克思：市场法则无法理解
- 157 现实：谈论
- 161 布莱希特—皮斯卡托尔：叙事剧之争
- 169 格罗兹、施里希特尔、布莱希特：艺术家们对时代的诊断，
绝望
- 179 汽车、科技、性：虚假的自由

- 184 马哈哥尼：剧院中的自我覆灭
- 195 广播：适宜媒体的熟练行为
- 200 音乐剧：三毛钱主菜
- 206 音乐教育剧：游戏中的学习
- 213 历史科学：对已知无法认识
- 217 教育剧：《说是》和《措施》
- 230 仅限于知内情者的经济：垄断购买
- 234 社会学实验：文学的技术化
- 240 福特主义，行为主义：规定增长率
- 244 特列季雅科夫：生物学社会主义
- 248 现实研究：工人作为小市民
- 257 共和的覆灭：不同阵营间的工人之女
- 265 并非种族问题：布莱希特和犹太人

法西斯德国（1933～1945/47）

- 269 焚书：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
- 273 纳粹，不可言说：语言的界限
- 277 十四行诗情书：直呼其名

- 285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罪戾七行，歌曲集和赞美诗
- 293 强化的女性角色：豪斯曼、施德芬、贝尔劳、魏格尔
- 298 媒体间性：不同的视角
- 302 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一首歌，柯尔施的精神干预，苏联作协大会
- 310 莫斯科之旅：无间离
- 311 文化拯救：无财产关系
- 316 美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无谓的反抗
- 320 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和平鸽
- 325 德国人在莫斯科：悲观主义，清算，背叛，死亡
- 329 西班牙内战：演练世界大战，战争旅游，文学辩论
- 336 新物理学的应用：羁绊于事业之中的恺撒
- 339 人类市民阶层：爱情的没落
- 344 伽利略的新生：舞台上的实验
- 348 矛盾即希望：诗的时代
- 354 作为贸易的战争：大胆妈妈的人祭
- 359 造型艺术叙事化：托姆布洛克与布莱希特
- 363 纳粹占领：驱逐同胞

- 368 逃亡者之间的对话：勇气多余
- 371 不能预料的冬日之旅：芬兰夏夜
- 376 错乱关系的情爱学：性爱的气味
- 380 两种语言的沉默：苏联和德国夹缝中的芬兰，莫斯科
- 387 这与其说是游轮旅行，不如说是敢死队号令：海上和海里的马克思
- 389 谎言中的公开贸易：必须合作
- 396 电影行业的尝试：失败了
- 403 人质电影：尽管困难重重，仍要坚持到底
- 409 《德意志战争初级读本》：战争报道忽视自然和人类
- 415 艺术卖淫：毁灭了个人的自由
- 426 百老汇的帅克：嘲弄希特勒
- 429 德国人的问题：魔鬼的伎俩把它最好的品质变成了恶
- 434 劳顿的花园：及时行乐
- 441 练习民主：不能限制艺术
- 444 尽管有超级屁：同劳顿的戏剧合作，伽利略的原型
- 453 瓦伦丁式的表演：自我否认作为自我维护，HUAC面前的布莱希特

德国的后果（1945/47～1956）

458 无法了结历史：只能（暴力）解决，居住和工作之地毫无希望

467 游戏方式的损害：为复制而做的台本范例

473 作为破坏的重建：装备了科技产品的贫民窟

476 德国共产党莫斯科派聚集区：社会主义统治

483 冷战：魏格尔、布莱希特及其剧团，无容身之地

487 诗人：动摇社稷

489 复辟：阉割替代自由之爱

495 德国高于一切或者统一（神圣）的祖国：在排挤中联合起来

500 原子弹试验：长达数百年的空气污染

503 兵营人民军的戏剧：6月17日后，在布科的间离化存在

508 巧舌如簧：从未言之有物

514 《大胆妈妈》电影的始末

521 后记

523 注释

537 作品索引

544 人名索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德）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著；黄河清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1

ISBN 978-7-5201-3373-9

I. ①贝… II. ①雅…②黄… III. ①布莱希特（Brecht, Bertolt 1898-1956）-传记 IV. 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9814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著者/〔德〕雅恩·克诺普夫（Jan Knopf）

译者/黄河清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责任编辑/陈旭泽 周方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8.75 字数：503千字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3373-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448号

定价/9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書

/ 2018

-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 【德】瓦迪格纳·伊布兰斯基 / 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
- 【德】克里斯托弗·诺恩 /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
-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 【英】卡丽·吉普森 / 加勒比史：从哥伦布到现在的加勒比史
- 【德】雅恩·克洛普夫 /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 【英】亚当·查及斯基 / 幻影恐惧：政治与鬼与当代艺术的创建
- 【波兰】安娜·比康特 / 罪行与沉默：直布罗陀 / 布内犹太人 / 屠杀
- 【日】伊藤之雄 / 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
- 【美】萨蒂亚·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康拉德
- 【德】彼得·欣文 / 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 【美】尼古拉斯·雷 / 杀手、士兵、间谍：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 【英】理查德·霍恩 / 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
- 【德】沃尔夫冈·希曼 / 梅特涅：战略家、宰相
- 【德】约尔格·劳斯特 / 魔法的世界：基督教文化史
- 【德】沃尔夫冈·莱因哈德 / 世界的征服：拿破仑扩张的全球史
- 【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 / 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 【美】约翰·詹姆斯·理查德·尼克松：人生

扫码 GO
京东微店



忘掉地平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一涛

R
索·恩
THORN BIRD

一部伟大的书。优秀传记的范本。具有批判性，但从不揭秘窥探；细致入微，但丝毫不呆板稚嫩。……这部传记充满了知识，而且将其与精辟的背景解析交织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那位自称“色情文学作者与圣灵”的人物，正是从这些背景中创作了他伟大的作品。轻视布莱希特的人们，你们读一读这本书吧！——弗里茨·J·拉达茨(Fritz J. Raddatz),《时代周刊》(Die Zeit), 2012年11月8日。

我正在读雅恩·克诺普夫的布莱希特传记……布莱希特的生平 and 作品能如此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甚是欣喜。克诺普夫为我带来了观察布莱希特其人其作的新视角，也让我重新审视那个他经历过并艰难幸存下来的时代。此外，雅恩·克诺普夫还让这些自然面令人信服地与对今时今日的观察联系在了一起。——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西德意志汇报》(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2013年4月12日。

克诺普夫娓娓道来……在相当精简的各个章节中，他令人惊喜地将人物生平、社会历史和文本阐释交汇融合。——米夏埃尔·拉格斯(Michael Laages),《今日戏剧》(Theater heute), 2012年12月。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读来舒顺，内容丰富，简言之：一本好书。——约尔格·施拜特(Jörg Späth),《巴登日报》(Badische Zeitung), 2012年12月8日。

一幅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人物肖像！——克里斯多夫·弗拉茨(Christoph Vratz),《当代图书》(hoch aktuell), 2012年4月。

克诺普夫的传记作品精确详实，细致入微，但又绝非索然无味。即使

研究布莱希特的行家读这五百页的作品也是兴致盎然、趣味百生。——克劳斯·瓦尔特(Klaus Walthert),《开姆尼兹自由报》(Freie Presse Chemnitz), 2012年10月12日。

昏暗时代 ■ 的 生活艺术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R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ISBN 978-7-5201-3373-9

9 787520 133739 >

定价: 96.00 元

R
THORN BIRD
索·恩

Die Manns

对于托马斯·曼来说，是榜样还是阴影？
朋友还是对手？
20世纪最著名的文豪之家，
相爱相杀的家庭秘史，
纳粹阴影下流亡作家群体的缩影，
精英阶层的崩溃，
药物滥用、抑郁自杀，
挥霍巨额的精力与金钱，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传奇

〔德〕蒂尔曼·拉姆 / 著 朱锦阳 / 译

之家

总有一天
人们不但为我们每个人立传，还会书写我们
这个传奇之家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托马斯·曼一家的
故事 Tilmann Lahm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蒂尔曼·拉姆 (Tilmann Lahme) / 作者简介

曾在基尔大学和伯尔尼大学专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曾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版编辑，目前在吕纳堡大学讲授文化学。拉姆潜心研究曼氏家族多年，2009年发表了著名的戈洛·曼传记。为撰写《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一书，他对曼氏家族的全部书信往来进行了研究，这些书信大部分不为世人所知，目前已由他和霍尔加·皮尔斯 (Holger Pils) 、凯尔斯廷·克莱因 (Kerstin Klein) 整理出版。

朱锦阳 / 译者简介

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哥廷根大学日耳曼学系博士，德国康斯坦茨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译有《从国家意识形态出走——中国新艺术展》和《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曾为南京《周末报》、香港《信报》和《明报》周刊撰稿。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20世纪
最著名的
文豪之家

传奇

故事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Die
Tilmann Lahme
Manns

「德」蒂尔曼·拉姆
朱锦阳 / 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一个成功的作家父亲对孩子来说，是榜样还是阴影，是朋友还是对手？

20世纪最著名的文豪之家；

相爱相杀的家庭秘史；

纳粹阴影下流亡作家群体的缩影；

情爱绯闻、政见风波、药物滥用、抑郁自杀：光鲜背后的精疲力竭，
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总有一天，人们不但为我们每个人立传，还会书写我们这个传奇之家。”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ie Manns: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2015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Tilmann Lahm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

Die 传 奇 之 家
Manns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序曲](#)
- [第一章 一个德国家庭（1922~1932）](#)
- [第二章 在流亡中（1933~1936）](#)
- [第三章 传奇之家（1937~1939）](#)
- [第四章 危险与金钱（1940~1941）](#)
-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1942~1946）](#)
- [第六章 希特勒之后（1946~1952）](#)
- [第七章 能者为之（1952~2002）](#)
- [曼氏家族一览表](#)
- [缩略语](#)
- [注释里的书名缩写](#)
- [关于曼氏家族的文献](#)
- [图片来源](#)
- [人物及其著作](#)

序曲

有一个家庭要被褫夺国籍了。“不配做德国人！”各家报纸都这么写着。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家在1936年12月被视为“毒害人民的害人虫”。^[1]三年以来，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国外。在这三年中，托马斯·曼彷徨过、动摇过，现在，正如他自己所说，终于“洗心革面”，把自己流亡国外的事情公布于世，从而站到了希特勒政权的对立面。他们全家人如同久旱盼甘霖，一直渴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为了这一时刻，他们无不绞尽脑汁，使尽各种招数：有时候发飙，就像女儿艾丽卡（Erika）那样；有时候直言不讳，如同儿子克劳斯（Klaus）那般；有时候绵里藏针，柔和却又十分坚定，就像儿子戈洛（Golo）和妻子卡蒂娅（Katia）那样。戈洛·曼心里觉得不爽，倒不是因为失去了德国护照。他本想跟姐姐艾丽卡和哥哥克劳斯一样，靠自己来“挣得被剥夺国籍的这份荣耀”，现在只能“以儿子的身份屈就，多少有点不开心”。^[2]

纳粹分子到1936年底才剥夺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国籍，究其原因，只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早在1936年2月，托马斯·曼就已宣布背弃希特勒德国。之后不久，德国驻瑞士大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即后来的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的父亲，就主张吊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护照。希姆莱（Himmler）的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其中指出，托马斯·曼在国外被视为“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德国诗人”。^[3]是可忍，孰不可忍。既然拿“最伟大的”和“诗人”这样的称号没辙，对“依然健在

的”说法当然也毫无办法，那么至少可以在“德国”这一点上做做文章。希特勒政权总算熬过了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现在，12月2日，终于把褫夺国籍这一步骤落到了实处。这一步骤早在预料之中，但到了此时，从形式上来看，已属“名不正言不顺”了：托马斯·曼及其大部分家人从11月起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了。

米夏埃尔·曼（Michael Mann）在1936年圣诞节前不久去了巴黎。他在考虑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音乐学业。米夏埃尔是家里的幼子，17岁，几周前刚从苏黎世音乐学院小提琴师范专业毕业，他的实践课成绩特别优秀，理论课却马马虎虎。人们一再信誓旦旦地向米夏埃尔和他父亲保证，米夏埃尔是个天才，对此，父亲特别自豪。但米夏埃尔还是不得不离开这家音乐学院，因为他跟院长有段“过节”，^[4]父母亲轻描淡写地这样说。为抗议院长给他的一个警告处分，米夏埃尔曾经甩过院长一记耳光。

比米夏埃尔大一岁的姐姐伊丽莎白（Elisabeth）不会惹这样的麻烦。她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功课门门特优，中学毕业时还受过嘉奖。但她也并非没有让人揪心的地方：伊丽莎白想成为钢琴家，每逢有人说她水平算不得上乘，她就以双倍的练习作为回敬。父亲在日记里不无忧虑地写道，她“对音乐痴狂”。^[5]不幸的是，伊丽莎白爱上了比她大17岁的弗里茨·兰茨霍夫（Fritz Landshoff），而且好几年了，他是哥哥克劳斯的朋友兼出版商。兰茨霍夫爱的是艾丽卡·曼，艾丽卡爱的是自己的自由。

克劳斯和艾丽卡于1936年秋天前往纽约。在流亡欧洲时，艾丽卡的政治性文学小品剧《胡椒磨》（*Pfeffermühle*）曾风靡一时，气得纳粹分子发疯抓狂，现在，她希望能在美国继续这一辉煌。艾丽卡的心情好极了：“我非常愿意来这儿。在这里，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意义和理性，还有1000种不同的可能性，多年来，这还是头一回。”^[6]但

她也第一次产生了怀疑：《胡椒磨》在美国演出，难道不应该最好是用英语吗？可是演出队伍里没人真正会说英语，这该怎么办呢？

克劳斯·曼穿梭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心情糟糕透顶。长篇小说《梅菲斯托升官记》（*Mephisto*）刚在阿姆斯特丹用德语出版，这部书不仅是对德国，而且也是对他的前姐夫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Gustaf Gründgens）进行清算。格伦特根斯是个演员，在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统治下仍旧飞黄腾达。《梅菲斯托升官记》将成为克劳斯·曼名气最大也最具争议的一本书。美国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部小说。他的女代理人告诉他，可以作各种各样的报告，题目就用《我的父亲与他的作品》（*My father and his work*）。^[7]克劳斯·曼有先见之明，这一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是一个奇特的家庭！以后，人们将要撰写各种书籍来介绍我们，而且不仅仅是介绍我们中的每一个人。”^[8]

莫妮卡·曼（Monika Mann）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与政治局势无关，跟她失去了德国护照也没有关系。父母亲在为这个女儿发愁，因为她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而他们早已把这看在眼里：她的人生和她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中学辍学，声乐学不下去，工艺美术学校也没读完，现在轮到弹钢琴了。对此，就连家庭的心理治疗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Erich Katzenstein）也无能为力了，家里的六个孩子中有四个都接受他的治疗，母亲在给克劳斯的信中这样写道。莫妮卡的颓势“显然是无法挽回了”。^[9]在家里，圣诞节是仅次于父亲生日的最重要的家庭团聚日，却因为“可怜的莫妮卡”而蒙上了阴影，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她经历了一场危机，就连父母来到她的床头看望她也不见起色。”^[10]

在莫妮卡经历危机和全家准备盛宴期间，托马斯·曼正在奋笔疾书，写信给波恩大学，该大学因为托马斯·曼被褫夺国籍而取消了

1919年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头衔。他在信中写道，他只是想顺便提一下，哈佛大学新近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同时还想发布一个预言，这是他一直准备要说的：“他们”——那些剥夺他德意志身份的当权者——“竟然胆敢把自己跟德国混为一谈，真是厚颜无耻！在那里，那一时刻的到来或许并不会太久远了——到了那一时刻，德国人民最不希望的，就是把他们跟纳粹混淆在一起。”^[11]仅仅几天后就已刊印的《波恩公开信》（*Bonner Brief*）将成为流亡文学最著名的宣言。

几个星期后，一拨共产党人在柏林格鲁勒森林区（Grunewald）的一个住宅内秘密聚会，其中有一个16岁的文学青年，名叫马塞利·赖西（Marceli Reich）。是姐夫带他来的，他时不时地会为地下运动充当信使。“大家都鸦雀无声。半黑的屋子里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个人朗读着一篇非法作品——托马斯·曼的《波恩公开信》，这封信或以伪装的形式，或以手抄本形式在德国到处流传。马塞利·赖西有点坐立不安，这位《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作者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把短篇小说《托尼奥·克律格》（*Tonio Krüger*）称为其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文学经历，它“是一部《圣经》，那些把文学当作唯一精神家园的人的《圣经》”。托马斯·曼如何看待“第三帝国”，这个问题对赖西来说也就相应地非常重要了。“信的最后一个句子读完后，没有人敢说些什么。于是，读信的人建议，我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谈谈这篇文章。我利用休息时间向众人表示感谢和告别。我说不想回去太迟，因为明天还要写一篇重要的课堂作业。这是撒了个谎。实际上我是想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享受我的幸福。”^[12]

马塞利·赖西-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即马塞利·赖西的全名）^[13]侥幸逃过了大屠杀的劫难，后来成为德语界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他将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事托马斯·曼及其家人的研

究。“我相信，”他有一次这么写道，“在本世纪的德国，没有比曼氏一家更为重要、更为独特、更为有趣的家庭了。”

[1] Lübecker Generalanzeiger vom 4.12.1936, zit. nach Kinder der Manns, S.135

[2] GM an K1M, 11.12. [1936] , GM: Briefe, S.26

[3] Gutachten vom 25.3.1936, zit. nach Ursula Amrein: Im Visier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Neue Zürcher Zeitung, 10.11.2010

[4] Tgb TM, 22.10.1936 sowie KM: Memoiren, S.120

[5] Tgb TM, 18.3.1934

[6] EM an KM, 24.10.1936, in: EM: Briefe I , S.99

[7] Tgb K1M, 27.9.1936

[8] Tgb K1M, 3.7.1936

[9] KM an K1M, 29.10.1936 und 9.11.1936, MON

[10] TM an K1M, 26.12.1936, in: K1M: Briefe, S.278

[11] TM: Ein Briefwechsel, Essays IV, S.187

[12] Marcel Reich-Ranicki: Mein Leben, 3.Aufl., Stuttgart 1999, S.104f.

[13] Marcel Reich-Ranicki: Die Stimme seines Herrn, in: Marcel Reich-Ranicki: Thomas Mann und die Seinen, 2.Aufl., Frankfurt a.M.2011, S.410-422, hier S.418

第一章 一个德国家庭（1922~1932）

诗人家里造反了。托马斯·曼的两个大孩子反了。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反正拿学校和他们的老师都不当回事。他们跟“公爵公园团伙（Herzogparkbande）”一起给他们的慕尼黑邻居带来恐慌。面对警告和善意的劝告，他们彬彬有礼，却不予理睬。两位家长本不想干涉，最终却只能痛下决心作最后的决断。

起初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将旧秩序打得稀巴烂，在这期间，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于1919年1月1日跟他们的朋友里奇·哈尔加藤（Ricki Hallgarten）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他们自称“德国业余哑剧团（Laienbund deutscher Mimiker）”。不久就有一批青少年加入，像格蕾特·瓦尔特（Gretel Walter）和洛蒂·瓦尔特（Lotte Walter），她们是音乐指挥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的女儿，曼家的邻居和朋友；此外，还有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Wilhelm Emmanuel Süßkind），他要大几岁，对文学着迷；两个弟妹莫妮卡和戈洛·曼不时也被允许参加演出。戈洛在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里扮演悲伤中的妇人这一角色，引人捧腹大笑，非常成功。

不久，年龄大一些的哑剧演员就扩展了他们的舞台。艾丽卡、克劳斯和瓦尔特的女儿们在慕尼黑的有轨电车里或马路上演出，向人们表演所谓现实的情景，表现人们如何残暴地折磨动物，又是怎样害怕

凶巴巴的男人发出的威胁；他们打电话搞恶作剧，艾丽卡因其天才的模仿能力而令人叹服；他们还屡屡去商店偷东西，手段愈发高明。原本当作小打小闹的玩耍变成了刑事犯罪行为。^[1]他们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次庆典。这场庆典是“公爵公园团伙”为向一位成为朋友的演员致敬而举办的，那是1922年年初，所有食品都是偷来的，无一例外。事情被抖搂了出来。两位家长算是受够了：他们把16岁的艾丽卡和15岁的克劳斯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

让父母劳神操心的并不止老大和老二。1909年出生的戈洛·曼上的是赫赫有名的威廉文理中学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八年级），他在复活节拿到了全年的成绩单。戈洛留级了。班主任在“特别成绩单”上写道，毫无疑问，戈洛是有天赋的，但因为在希腊语和数学方面“特别懒惰”，所以得了“不及格”。“他试图通过耍滑头和玩计谋——在这些方面他非常有创意——来掩饰其懒惰。”^[2]戈洛此时13岁，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别人说他长得丑陋，而且笨手笨脚。家里的哥哥姐姐谈吐幽默，风度翩翩，调皮捣蛋，非常招人喜爱，戈洛在他们面前很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又遭遇了这样一场滑铁卢，拿着一张留级的成绩单回家了。

莫妮卡是曼家的第四个孩子，生于1910年，她也不是让人觉得能够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学生。有一回，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个耽于梦想、往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小蠢货”，这一评语就其核心而言十分中肯，最多是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还可以商榷罢了。^[3]1922年5月，莫妮卡上了慕尼黑路易森文理中学的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用她母亲的话来说：“莫妮（Moni）^[4]跌跌撞撞地进了二年级。”^[5]

霍赫瓦尔特豪森山地学校（Bergschule Hochwaldhausen）是一所位于富尔达（Fulda）附近的教育实验寄宿学校。去后没几个星期，克

劳斯·曼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圣灵降临节的那个周末，他跟艾丽卡一起坐车去了法兰克福的几个熟人那里。他们在那儿猛吃了几顿，看了几场话剧，好好犒劳了一下自己（“远远超过了慕尼黑的水平”）。但乘车、吃饭、话剧票和小费贵得很。他马上需要100马克，这比曼氏家里的女佣每月所挣的钱差不多要多出一倍。^[6]克劳斯·曼说，他们事前没来得及征得父母的同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临时决定的。艾丽卡·曼在信里补充了一句说，弟弟可能没怎么拿100马克“当回事”。“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棒了。”^[7]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写信讲述寄宿学校的生活，没谈到多少好事。高年级的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曼家的两个孩子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就连参加话剧表演也没能让他们俩感到这个不受人待见的寄宿学校变好了一些。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在毕希纳（Büchner）的《莱昂斯和莱娜》（*Leonce und Lena*）一剧中担任主角，该剧将在学校演出。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一门心思想走。克劳斯·曼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对我们来讲，待在这里倒不完全是让我们伤心，而是完全徒劳无益。”回到慕尼黑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在这里重新找到我那久违的力量，找到可能掩藏在德国体操教育背后的弱点。”他学的东西太少了，而那些“该死的‘实际劳动’”就跟这里吃的饭菜一样，他一点都不喜欢。克劳斯还写道，他在想，“慕尼黑（除了上学以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好东西呀”。^[8]

父母束手无策。“我们让你们去，这一决定可不是草草率率作出的”，卡蒂娅·曼在给艾丽卡的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要是克劳斯现在“随随便便地写信声称，他在考虑慕尼黑给你们提供了什么，霍赫瓦尔特豪森又提供了什么，所以他觉得你们待在那里纯粹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这种看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她还写道，在此期间已经收到了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Otto Steche）的一封信。对艾丽卡，校长的评价“非常积极”。“他对克劳斯的性格进行了描述，我觉得

绝对贴切，虽然这些描述并不能让我感到开心。”卡蒂娅·曼写道，父母把他们俩送到寄宿学校的理由至今仍然成立，“只有你们确确实实地改变了自己，不再去偷偷摸摸地拜访那些电影和话剧演员，不再说任何谎话和进行任何欺骗，不再跟瓦尔特家的人去干那些蠢事……我们才有可能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生活。” [9]



图1 克劳斯和艾丽卡·曼扮演莱昂斯和莱娜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离开山地学校，回到了慕尼黑。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接受了这一教训。他不想跟处在青春期的大城市孩子再有任何关系，关掉了他们寄宿学校的高年级班。

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做父亲的都不闻不问。教育孩子完全由母亲负责，这一点，威廉文理中学在关于克劳斯·曼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且不乏批评的口吻：“作为父亲，作家托马斯·曼从来不过问他儿子的事情。”^[10]家里的各种事情，从开销和用人，到越来越多的财产事务，所有这一切都由卡蒂娅·曼掌管。但最重要的是，她要保障丈夫在工作上不受干扰。家庭琐事一般都不会去打搅托马斯·曼的写作世界，即便有，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一旦要写作，那么悠悠万事，安静为大——这对一个大家庭来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此时，这个家庭有六个孩子，四个用人，还有一个当作家的敏感父亲，他的书房是这座位于慕尼黑波辛格大街（Poschingerstraße）的华丽别墅的中心。

托马斯·曼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1901年26岁时，他发表了其成名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一个商人之家衰亡的故事。知情者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作者本人在吕贝克家庭的影子。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首次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的光景。第二部长篇小说《国王陛下》（*Königliche Hoheit*）发表后，批评家们总体反应冷淡。有些创作计划只停留于一个框架。这些年中，托马斯·曼本人对一些事情当然不太满意，但他的中篇小说《死在威尼斯》（*Tod in Venedig*）却犹如参天大树般挺拔。小说叙述一位正在老去的著名作家的故事。这位作家在威尼斯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并放纵自己的情感，虽然保持着距离，但连失去自己的尊严也在所不惜，并因此而死去。这是一部杰作，这一点，托马斯·曼自己很清楚：“这一次我好像在这本书里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界。”^[11]托马斯·曼还开始了一部短篇小说^[12]的创作，故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所高山肺病疗养院里。

《魔山》（*Zauberberg*）的灵感来源于卡蒂娅·曼在达沃斯（Davos）一家疗养院的长期疗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不得不中断了这篇小说的写作。

突然间，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内心有一种冲动，要在政治上表明观点，而至此为止，其作品和思想无不围绕着美、艺术家以及小人物这些主题而展开。托马斯·曼为战争所作的贡献是在书案旁，在几位有文学头脑的医生的帮助下，他无须真正奔赴战场去厮杀，而是以爱国檄文为形式，为战争和德国的专制国家进行辩护。

托马斯·曼的兄长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跟他的见解完全不同。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的第一部分在一家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极尽犀利的讽刺，鞭挞皇朝统治下的德国专制精神。战争开始后，那家杂志停止了小说的连载，该书未能付梓。在一片战争的狂热之中，托马斯·曼也未能免俗，海因里希·曼的批判立场孤掌难鸣。兄弟阅墙，文学上的竞争，旧日的诋毁，跟政治上的对立夹杂在一起。接下来是敌对的沉默，历经数年。在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曼写下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这是一篇关于精神与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内容越写越广泛。托马斯·曼以600页的篇幅攻击西方的启蒙式民主并且不指名道姓地抨击自己的兄长。1918年秋，德国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托马斯·曼却发表了他的这篇超长文章。

1922年新年伊始，兄弟俩又言归于好，起因是海因里希·曼生了一场大病。托马斯·曼从心底里开始向魏玛共和国靠拢，并因此向这位兄长靠近，而后者因他的《臣仆》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这个崭新的民主国家的精神代表之一；而这一角色恰恰是托马斯·曼也正在追求的。他把自己看作天生的主流派代表，而不是反对派人物。兄弟俩和好不久，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周”开幕式上认识了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

孩子们呢？在寄宿学校经历了一次短期历险后，艾丽卡·曼要重新去慕尼黑的路易森女子文理中学上学。她的入学考试勉强合格。弟弟克劳斯的情况要复杂多了。他在学校的学业比姐姐差得更多，对于家长或老师们的警告，他更不愿意听从。克劳斯想成为作家，为什么要中学文凭？父亲不也没有吗？卡蒂娅·曼看不到儿子在学业上会有功成名就的可能，如果考虑到克劳斯在学校以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在慕尼黑就更没什么指望了。

8月，母亲跟克劳斯一道去位于博登湖（Bodensee）畔的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Internat Schloss Salem），想看看儿子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此时，托马斯·曼坐车去了波罗的海。显然，他是跟重归于好的兄长海因里希一起去的。反正卡蒂娅·曼有点担心。“我实在有点好奇，”她写信给丈夫时说，“你跟海因里希一起长时间到处旅行，情形会是怎样。到现在为止，你一般跟他在一起最多待上个把小时，这次可是个大胆的实验了。千万别发火，但也别让他主宰一切。”她还谈到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的事。卡蒂娅写道，“总体印象还不错”。主要是学校校长库尔特·哈恩（Kurt Hahn）让她深感敬佩，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似乎异乎寻常的认真，令人觉得高尚，极具感染力”。哈恩曾经担任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的最重要的谋士。1920年，他在马克斯亲王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立了一所普通学校和一所寄宿学校。哈恩对克劳斯“震惊不已”，卡蒂娅·曼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哈恩却拒绝接受克劳斯在萨勒姆就学。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和作为重点的体育锻炼并不适合他。按照哈恩的说法，萨勒姆的其他学生“一般都是那种头脑简单或单纯的”，克劳斯在他们中间肯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哈恩建议这位“非常优秀但容易遭受挫折的男孩子”去奥登瓦尔特学校（Odenwaldschule），他愿意给那所学校写封推荐信。^[13]

哈恩的副手玛利亚·埃瓦德 (Maria Ewald) 给奥登瓦尔特学校写了封信。信中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萨勒姆王宫学校的人对克劳斯的印象跟母亲所描述的不一样。信中虽然说克劳斯·曼是“一个天资非同寻常、情感细腻男孩”，“思想层面的兴趣浓厚”，但他“读书太多，过早地接触到人类思考范畴里的大部分问题”，“因为从事这类精神活动，其童真与天性泯灭了许多”。他在萨勒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矫揉造作、自以为是、早熟而能力颇强的男孩”，“其生命力已被耗损，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自然兴趣，并在实际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无能为力，这是人为所致，是其虚荣心使然，他还以蔑视行动和动手的世界来加以掩盖”。^[14]这封推荐信不啻一种警告。虽然如此，奥登瓦尔特学校还是接受了他。

托马斯·曼利用在波罗的海边的乌瑟多姆 (Usedom) 休假的机会，要写一篇文章，表明自己拥护民主。他把为格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d Hauptmann) ——他称之为“共和国的国王”——所写的一篇文章打造成一篇民主宣言。6月，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腾瑙 (Walther Rathenau) 遇刺身亡，凶手为一个右翼极端派恐怖组织的年轻人，这一事件最终促使托马斯·曼走到了这一步。这一事件对他来说是个“重大打击”，他感到有责任规劝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年轻人”。^[15]10月13日，托马斯·曼在柏林作了题为《关于德意志共和国》(Von deutscher Republik) 的演讲，这篇演讲跟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他的《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多大关系一样。他的自白是一个理智的共和派人士的表态，表明他接受了现状。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他的论点以及他所引证的人，从诺瓦利斯 (Novalis) 到尼采，都鲜有说服力。重要之处在于表态这一行动本身。要说托马斯·曼并没有完全弄明白要支持什么的话，那么，要反对什么，这一点他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些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反犹太人的共和国之敌——这些人通过煽动闹事、街垒战与谋杀来反对魏玛共和国。对托马斯·曼的这一举动，公共輿

论作出了相应的反应：右翼报刊发现了一个新的敌人，它们曾把此人当作自己的盟友。有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把曼扔下船去》（*Mann über Bord*）。^[16]

到了秋天，克劳斯·曼写信报告他在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新生活，他谈到自由的气氛、早上的晨练、上课的情况（“温馨的小班上”）、体育课和实际技能课（“令人恐惧”）。学校要他——正如萨勒姆王宫学校的信中所批评的——缩小这方面的差距，“上帝啊，惩罚英国吧”，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这样诅咒道。“我总是得劈木头。万一我只剩下一只膀子回来，你们可别大惊小怪。”但这所寄宿学校的生活“并非那么糟糕”。只是他急需巧克力。“没有巧克力我连诗都写不了。安奈特·科尔布（Annette Kolb）^[17]当年只有在咖啡馆才能创作点东西出来。我觉得我其实比她更有魅力。”^[18]克劳斯说，姐姐完全可以将这封信给父母看看。“天哪——我再也没有安宁了”，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里写道。“可惜我爱上了小男孩乌托（Uto），得给他弄些贵重的礼物，因为他太可爱了。另外，我们的茶话晚会着实费了我不少小钱，要化妆，还要买巧克力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读本。”这篇“文化小札”可别落在了父母亲的“手中”，^[19]克劳斯·曼补充道，却没有详细说明他认为哪件事不能让父母知道，是尼采的著作、化妆、爱上了一个同学，还是所有的都不能。当托马斯·曼10月旅行去作报告时，他妻子写信告诉他，没得到克劳斯太多的音信。但她“怀疑，他在奥登瓦尔特学校正在变成一个自私的享乐者”。^[20]

母亲过世了。1923年3月，托马斯和海因里希·曼急匆匆地赶往尤莉亚·曼（Julia Mann）的灵床前。弟弟维克多（Viktor）和妹妹尤莉亚（Julia）也来了——另一个妹妹卡拉（Carla）已于1910年自杀身亡。尤莉亚·曼是汉萨城吕贝克（Lübeck）商人和参议员托马斯·约翰·海因里希·曼（Thomas Johann Heinrich Mann）的遗孀，丈夫

去世后，她于1893年卖掉了公司，随即离开北方，带着几个年纪较小的孩子移居慕尼黑。托马斯·曼在结束了毫无光彩的学业后亦移居该地。前几年，两个儿子相互争吵，母亲为此痛苦不堪。现在，这两个重归于好的儿子一起来送别敬爱的母亲。托马斯·曼的孩子们对祖母并不太熟悉，因为她最后几年忙着搬家，从一个公寓搬到另一个公寓。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只带了艾丽卡去参加在慕尼黑森林公墓举行的葬礼。根据弟弟戈洛的《回忆录》，艾丽卡事后曾经嘲笑神父笨拙的讲话，并“不无自豪”地讲述她看见海因里希、托马斯和维克多“三兄弟都在哭，各哭各的，你方唱罢我登场”。[\[21\]](#)

5月，托马斯·曼给奥登瓦尔特学校校长保罗·戈黑普（Paul Geheeb）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一次做父亲的亲自出马了。一方面，时值经济危机爆发，通货膨胀，到1923年发展为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货币贬值，因此，学校的学费让家里捉襟见肘。父亲写道，给克劳斯交的学费每月不能超过10万马克。但另一方面，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戈黑普知道，他对戈黑普教育克劳斯的方法持怀疑态度。托马斯·曼写道，作为家长，他们希望克劳斯“只有在具备走上工作岗位的能力后，才从中学毕业，这一岗位无论如何要跟他的文学爱好有关系，比如去一家出版社或当个戏剧顾问”。这个“弱不禁风、对自己特别怜惜的男孩子”在走这条路时需要的是“铁腕式的领导”。[\[22\]](#)

此后不久，克劳斯·曼决定离开奥登瓦尔特学校。他在给保罗·戈黑普的信中感谢学校给予他的很大自由——到最后校长似乎免去了他在学校的大部分义务，让他能够从事诗歌创作。这跟托马斯·曼所指的“铁腕式的领导”估计不是一回事。“这类学校的气氛和空气”还是不适合他，克劳斯·曼写道。他在这所寄宿学校里“不能有感而发地去创作，就像我平时所能做的那样”。他还说，不知道能否找到

一处让他“完全觉得宾至如归”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我都将是一个陌生人。” [23].

克劳斯·曼回到了慕尼黑的父母亲家中，弟弟戈洛刚刚离开。留级后，戈洛在慕尼黑上了一年的老实验文理中学。成绩上来了，但想要跟家里保持距离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在家里感到不舒服。1922年打算把克劳斯送进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而无果时，母亲就想到了儿子戈洛。当时她写信给托马斯·曼，说跟同龄人共处，学生必须参加体育锻炼和手工劳动，这对戈洛来说“非常合适”。 [24]. 在克劳斯上私人辅导课，准备在慕尼黑的一所文理中学参加毕业考试之际，卡蒂娅·曼于12月带着戈洛坐车去萨勒姆，把戈洛介绍给校长。库尔特·哈恩接受了曼家的这个儿子。1923学年开始时，戈洛·曼搬进了王宫北楼的一间简陋的房间，跟九个同学合租。每天除上文化课外，他还有体育课、车间和农业劳动课、野外游戏、备战运动以及骑车和徒步郊游等。对这位诗人之子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戈洛立刻喜欢上了它。

托马斯·曼想方设法通过写文章和举办作品朗读会在国外挣钱，这些外汇不像德国马克那样以脱缰野马似的速度在失去价值。相反，对艾丽卡和克劳斯·曼来说，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交上了泰奥多·吕克（Theodor Lücke）这位朋友，此人是外汇投机商，比艾丽卡大5岁，通过投机钻营从这场巨大的危机中获利。艾丽卡和克劳斯，还有聚斯金德、里奇·哈尔加藤以及一位新的女性朋友，帕梅拉·韦德金德（Pamela Wedekind）——已故诗人弗朗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的女儿，跟吕克一起去慕尼黑最贵的餐馆吃饭，去最豪华的夜总会狂欢，掏钱的是吕克。为了了解首都的夜生活，他们还旅行去了柏林，却告诉父母亲，他们去图林根

（Thüringen）徒步旅行。 [25]. 这两个大孩子的所作所为自然还是没能瞒过家长太久，而且知道的还有其他人。伯伯海因里希夫妇有个7岁的

女儿，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艾丽卡和克劳斯。托马斯·曼感谢兄长及嫂子“帮助教育这两个没有理智的混账孩子。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能够唤醒他们的理智”。^[26]此时此刻，曼家的老大和老二对政治既无感觉也无兴趣，他们看不到经济危机和货币贬值对百姓来说犹如釜底抽薪般的打击，而人们对国家的信任也遭受了持久的伤害。

*

在新的一年里，曼氏一家人要再一次适应没有母亲的生活。卡蒂娅·曼病了，和过去几年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医生把她送进了一家疗养院。在慕尼黑的家里，用人们照看着日常的生活，做饭做菜看孩子，尤其是5岁的伊丽莎白和她4岁的弟弟米夏埃尔。艾丽卡·曼负责监督，同时准备中学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父亲很少离开他的书房。

1924年2月1日，卡蒂娅·曼从达沃斯的克拉瓦德疗养院（Sanatorium Clavadel in Davos）写信回来。她写道，疗养院的医生昨天给她作了检查，肺部完好无恙。但医生说，从“预防”的角度来看，来这里是对的，她身体虚弱，医生估计是“精神原因”造成的。医生要她逗留四到六个星期，强身健体，增加体重，接受新鲜空气卧疗法，散步。一般情况下，卡蒂娅·曼在疗养院逗留期间会进入思考状态。她有时会写信抱怨丈夫，说他太少写信，连她写的信也不好读。1920年10月，她甚至向托马斯·曼提出过一个问题，即自己把一生“彻底地扑在你和孩子们的身上，到底是不是个错误”。^[27]这一次却完全两样。卡蒂娅·曼开心地讲述了所吃的美味佳肴，还有为“肺病囚”举办的一次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其中有几个人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大厅的。^[28]她唯一担忧的只有一件事：“但愿阿西（Aissi）能基本顺利。”她指的是克劳斯上的私人辅导课，家里人还

用乳名“阿西”或“艾西（Eissi）”来称呼克劳斯。“要是阿西看到花了这么多钱而稍稍有点责任感的话，那就好了！”^[29]

3月初，这一希望也化为泡影。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妻子，克劳斯坚决拒绝继续学下去。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进学校了，一天也不去了。当父亲的感到无法让克劳斯改变主意，已经解聘了私人老师。“要是我的话也会这样决定，”卡蒂娅·曼从达沃斯回信说，“这孩子如果一百个不情愿，那就没有必要去参加中学毕业考试，且不说他也不可能通过。他毕竟最后努力了一次，动机不错，虽然失败了，我却不觉得有多糟糕，当然，我在精神上早已对此作好了准备，这你可以想象得到。”^[30]

相反，艾丽卡·曼于1924年复活节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不是凭借学习和成绩，而是以气质与幽默来通过这一关，这是她打的算盘，居然大获成功：在她的毕业文凭上，拉丁语、法语、英语、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分数全都是“差”——就凭这样的成绩，学校竟然能证明她“有能力去上大学”，这真是慕尼黑的一个秘密。^[31]不管怎么说，艾丽卡·曼非常开心，打赢了“这场不落榜之战”。她不久便搬到柏林，在著名的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的演员学校学习。艾丽卡在5月从首都给女友洛蒂·瓦尔特的信中写道，幸福地闯过了“令人作呕——作呕——作呕——作呕的毕业考试”，“现在，我在这里快活得像个神仙。上大学，搞摄影，秋天在德意志剧院忙活——演些难看的不起眼的角色——但不管怎么说，好歹也是个角儿呀”。^[32]

艾丽卡·曼从路易森文理中学毕业后不久，她妹妹莫妮卡不得不离开了该校。是何原因，人们所知甚少。或许是她跟一名男老师走得超乎寻常的近。后来，莫妮卡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是他把她引诱至“非许之地”的，^[33]但这种说法并未能扫除有关的疑团。到6月将满

14岁的莫妮卡在慕尼黑圣安娜女子文理中学上了几个月的学。她的成绩糟糕透顶：宗教、德语、英语、地理、算术、自然和物理课得了“差”，历史和速记课甚至“不及格”。好在唱歌得了个“优秀”。^[34]到了秋天，卡蒂娅·曼替莫妮卡在萨勒姆报了名。“你生气了吗？”艾丽卡写道，她现在越来越深得母亲的信任，“我当时那么竭力地反对你把莫妮卡送到萨勒姆的建议，也实在是太过分了。”艾丽卡·曼列举的理由肯定是，这所寄宿学校男女生混合，鉴于之前发生的事情，这里对妹妹不会太好。母亲对此的看法却不同。一处地方的精神面貌和气氛很重要，像萨勒姆这样“道德高尚而无情色气息之地，男女生一起上学所面临的危险不会太大”。卡蒂娅·曼认为，莫妮卡的哥哥戈洛对这所寄宿学校非常满意，而莫妮卡也必须离开家里一段时间，前些时候莫妮卡是那般“暮气沉沉，令人不爽”。卡蒂娅·曼还说，路易森文理中学的校长曾经吃惊地讲过，两个姐妹怎么会这等不同。按照“洞察一切的曼”的说法，莫妮卡有时候“水平最多跟女仆差不多”。^[35]

克劳斯·曼一分钟也不想再耽搁。辍学以后，他原想立刻去柏林，要当舞蹈家，要当演员，当然还要当作家。他朝思暮想地要去冒险，想要成名。5月，他的处女作——一部短篇小说在一家报纸上刊印出来。6月，他跟帕梅拉·韦德金德订婚。这时，父母亲踩了刹车。他们觉得这个17岁的儿子太不成熟，不想放他到野蛮的首都去，那里充满了政治斗争，更别提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大女儿艾丽卡在那里生活就已经让他们耿耿于怀，但是，她虽然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生活能力却极强。他们要克劳斯先去海德堡一段时间，到新堡

(Neuburg) 修道院去，父亲的一位熟人在那里当院长。他可以在那里静思冥想将来想干什么。克劳斯答应了，踏上了旅途——不久便坐车去了汉堡，在那儿待了几天。他跟在山地学校结识的格特鲁德·费斯 (Gertrud Feiß) 一起尽情地享受圣保利 (St. Pauli) 的夜生活，钱是费斯通过欺骗手段为他们俩弄来的。^[36]克劳斯迷上了一个年纪不

大的漂亮鼓手，跟他“约会”。他是同性恋，在奥登瓦尔特学校曾恋上同学乌托，而这并非只是青春期的行为，对此，克劳斯此时已经非常清楚。虽然他已订婚，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一般人普遍认为同性恋“变态”，同性恋行为会受到惩罚，这一切似乎也没有让他感到窘迫。在写信给姐姐艾丽卡时，克劳斯毫不掩饰地叙述跟那位鼓手的各种体验，还有在汉堡的其他各种冒险经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这位女性朋友卖淫时的那种泰然自若。他还写道，他的这封信不要随随便便敞开着。这封信肯定会给人以“毁灭性的印象。我可是好人家的孩子”。^[37]

儿子迫切地要去柏林，当父母的也阻止不了。原本说好要在海德堡待一段时间，结果比原计划缩短了很多。克劳斯·曼于9月去了柏林。卡蒂娅·曼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Klaus Pringsheim）是莱因哈特剧院的音乐指挥，他答应照顾这位外甥，替克劳斯在《12点午报》（*12-Uhr-Mittagsblatt*）谋得了一个小戏剧评论员的差事。经普林斯海姆的安排，著名的《世界舞台》（*Weltbühne*）杂志出版人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Siegfried Jacobsohn）读到了克劳斯·曼的几篇文章。这位舅舅把那些文章交给雅各布森，却没告诉他作者是谁。这位出版人读后觉得很好，想在《世界舞台》杂志上刊登这些文章，但不署名，就像普林斯海姆所建议的那样。可是克劳斯·曼坚持要署名。^[38]发表匿名文章怎么能成名呢？

艾丽卡·曼的耐心也好不到哪里去。刚开始上表演课，她就希望出演主角了，而且是要在柏林德国剧院当年引起轰动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话剧《神圣的约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里，这是该剧德语版的首次公演。艾丽卡拿到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父亲好言安慰，言语中夹杂着对女儿的急不可耐的一丝不理解。“想演约翰娜的想法当然不错，但还是早了点。”他认为，只要艾丽卡继续勤奋练功，努力学习，那么这样的角色不久便会“从天而

降”，落到她头上。^[39]对于这类建议，艾丽卡听不进去。在她看来，在柏林的发展实在太慢了，上课她觉得无聊，别人分配给她的跑龙套角色她很不满意。

托马斯·曼的《魔山》终于写完。慕尼黑家中的喜庆气氛却因为最小的两个孩子生病而蒙上了一层阴影。两个孩子都必须动手术摘除盲肠。5岁的米夏埃尔已经出现了炎症。托马斯·曼原打算等这部长篇小说脱稿后去度假，带上妻子和6岁的小女儿伊丽莎白。要把米夏埃尔放在家里交给保姆照看。现在他们可能不得不带上米夏埃尔而不是伊丽莎白了，托马斯·曼有点不太高兴地写信告诉艾丽卡。“但愿马上就是一场冰雹。”^[40]父亲不喜欢他的小儿子。“我一再确认，我对我们的幼子有一种陌生、冷淡，可以说是厌烦的感觉”，他在日记里写到米夏埃尔时如是说，当时孩子还不到一岁，而那些年的日记本保留下来的很少。^[41]相反，伊丽莎白是他的“小宝贝”，从一开始就受到宠爱；“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孩子”。^[42]对于四个大孩子，作为父亲的他情感也是有偏袒的。托马斯·曼曾经写道，他再次确信，“在六个孩子中，我更喜欢老大、老二，还有伊丽莎白，其程度之强烈非常少见”。^[43]喜欢谁，不喜欢谁，他不隐瞒，孩子们也心知肚明。卡蒂娅·曼10月写信给艾丽卡，说两个小的已经出院了。伊丽莎白〔小名“麦迪（Mädi）”〕恢复得相当不错，米夏埃尔〔小名“比比（Bibi）”〕还相当虚弱。父亲——孩子们管他叫“魔术师”——已先行乘车去了意大利。她不日将带上两个最小的前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只带麦迪去，那也太没心没肺了，魔术师也这么看。”^[44]

11月，托马斯·曼的《魔山》出版，讲的是一个关于汉堡商人之子汉斯·卡斯托普（Hans Castorp）的故事。卡斯托普去达沃斯的一家肺病疗养院探望病中的表兄弟，结果落入了疗养院的封闭世界，一待就是七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把他从瑞士的山上

“轰”回人世。这部长篇小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读者和大部分批评家都认为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无愧为《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后续之作。有些人则认为小说过于冷漠，有太多编排和剪接，一句话：太摩登了。恰恰是这一点却又让其他一些人跟托马斯·曼冰释前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封信里写道：“我曾像痛恨少数几个政论家一样地痛恨曼这家伙，他的最新一部长篇巨作《魔山》我碰巧看了，这本书甚至让我跟他心心相印。”^[45]圣诞节时，卡蒂娅·曼的母亲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Hedwig Pringsheim）告诉一位女友：“我女婿的名望现在达到了巅峰状态，这你大概知道吧。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其地位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整个世界都闪烁着光芒，卡蒂娅正沐浴着这一光芒。她经常陪伴他去旅行，参加为他举办的各种授奖仪式。”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还补充说，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婚后之初的几年曾经在经济上得到富裕的普林斯海姆一家的大力支持，现在他们自身已经非常富有了。他们刚买了一辆汽车，“够豪华的”。^[46]她还顺便提到：从现在起，在猜测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托马斯·曼每一年都是热门人物。

克劳斯·曼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问世：话剧《安雅和埃斯特》（*Anja und Esther*）。他没有像父亲那样需要数年的时间，而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一蹴而就，同时还写了戏剧评论、短篇小说以及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话剧描写了一拨年轻人的爱情与各种希望和渴求，这些年轻人生活在一座偏僻的修道院里，让人想到奥登瓦尔特学校。母亲读了手稿。她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说她很喜欢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气氛”，“许多对话”“细腻而上口”，“要是演出水平很高，效果也许能出得来”。她承认，剧中的“年轻人”和“氛围”对她来说“太过病态”，“而最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是埃里克（Erik）这个人，他作为对比人物，面对远离尘嚣和不健康的修道院原本代表的是生活，结果也是一个变态的马戏团女骑手的儿子，吸可卡因，除了踢踏舞和夜酒吧之类的事物外，对生活一无所知”。^[47]该剧的“氛

围”她不喜欢，具体说就是：吸毒、同性恋的氛围和年轻人对堕落表示的同情；比这更让她不爽的是，她会想到曼氏家族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建筑在作者本人的经历与观察之基础上的。

*

戈洛·曼在萨勒姆寄宿学校很快乐。他已经适应了体育和军事训练课程。对他来说，集体和他在这一集体中找到的位置十分重要；倒不是作为一个天分不高、在丙级队打球的曲棍球运动员，而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探讨哲学与政治问题。

萨勒姆学校的准军事性质十分明显。库尔特·哈恩是名死硬的反民主人士。他想在他的学校培养一批精英分子，他们将洗尽“凡尔赛的耻辱”，重建德国的伟大与光荣。即便因此可能会跟法国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他也在所不惜，还让他的学生为此作准备。对作为教师 and 个人的库尔特·哈恩，戈洛·曼非常尊重；在政治上，戈洛却是个坚定的反对派人物，反对学校及其校长的民族保守精神。即将年满16岁的戈洛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也是和平主义者，赞同在寄宿学校里也建立民主结构。1925年2月，他策划发动了一场造反运动，反对学校行使学生共同决策权的形式。那时候只有部分学生，即“学生组织的成员（Farbentragende）”，才能获得不同的职务和各种优待。学生组织通过增选成员来扩大，由校长监督并操控。戈洛刚被接纳进去，就批评这种方法不民主，也不公正，要求改变现状并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学校里一片混乱。此时，库尔特·哈恩尚在柏林，正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起撰写当帝国首相的回忆录。哈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遥控将戈洛的“政变”控制住，他答应实行改革。哈恩说的当然不是民主改革。他写信给一名学生说，“萨勒姆是反对现今德国的阵地”。该学校“肩负着抵制衰亡的责任”。^[48]作为抗议，戈洛宣布退出学生组织，对此，这位校长气愤地作出了反应：他写信给戈洛，

说他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件事，戈洛不过是想抬高自己而已。一拨学生在复活节要去意大利，戈洛也想参加，对此，哈恩作出决定，不允许他跟着去。“现在让这个好激动、神经过于紧张的小伙子经历南国意大利的氛围，我觉得是一种犯罪。”^[49]哈恩真的气疯了。他的校园王国对他来说十分神圣，容不得反抗。相反，在校的成绩和分数在萨勒姆王宫学校并不那么重要。学年结束时，戈洛·曼在“至关重要的几个专业”拿了四个“差”，卡蒂娅·曼这样写道。但他还是被允许升到高一年级，尽管是“察看性的”。^[50]

总统去世了，托马斯·曼曾在关于共和国的演讲里称他为“父亲艾伯特”。^[51]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经跟共和国的敌人，尤其是右翼极端分子交恶并遭到后者的迫害，最后卷入了一场荒诞无稽的叛国案官司，不仅令他身心憔悴，而且拖延了一次腹部手术，年仅54岁的他于2月28日撒手人寰。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撰文，赞扬这位总统是一位“宽容、冷静和深思熟虑的钢铁汉子”。他特别强调了艾伯特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但是，对总统在魏玛民主制度跟其敌人所作的斗争中和在稳定经济与货币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托马斯·曼均只字未提，而1923年的巨大危机正是由于艾伯特的策略才在这一时刻得以克服。托马斯·曼的悼文虽然充满了友情，却表露了一种悲观的距离。这在一个段落里表现得十分明显：托马斯·曼谈到“第一任总统性格里的小市民特征”。他还写道，社会民主制度“只有跟更高尚的精神德国接轨”，只有“卡尔·马克思读过了荷尔德林（Hölderlin）”，^[52]才能够从总体上完成其民族使命。托马斯·曼还没有彻底地跟这一新型国家及构成其政治基础的一切和解。《法兰克福报》删掉了这一段落。

卡蒂娅·曼去柏林看望她的两个大孩子。在柏林逗留期间，恰逢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举行公开葬礼。在拥挤的人群里，她虽然不可能确认什么，但人们对总统去世所表现的哀悼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她写信给丈夫说：“真让人感动，到了夜晚，所有仪式结束后，人们站在运河的一座座大拱桥上，宛如一道城墙，目送艾伯特最后一次乘车过去，乘着一列专车驶过一座座铁路桥。”“令人作呕的右翼报刊”对所谓的“骄奢葬礼”感到气愤，对此，卡蒂娅·曼写道：“那又该怎样安葬国家元首呢，倘若他不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的话？”她还补充道，她一直在想：“你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在结尾时过于平淡。”^[53]

克劳斯·曼写呀写呀，在完成他的话剧处女作后还在不停地写：短篇小说、戏剧评论，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汉诺威的保罗·施特格曼（Paul Steegemann）。施特格曼出版社于1924年10月在行业杂志上通过一则广告宣布出版此书：不久将出版克劳斯·曼的短篇小说集《在生活面前》（*Vor dem Leben*），这位“托马斯·曼17岁的儿子”将以此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名字的继承人。他虽说年轻，却是一位诗人”。为了人们不至于忽略主要的信息，关于该书的广告还用很大的字母写着：“托马斯·曼的儿子”。^[54]

克劳斯·曼后悔跟施特格曼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打着父亲的牌子做广告，他倒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1924年圣诞节，父亲送给他一本《魔山》并在书页上写道：“献给我非常尊敬的同行——他满怀信心的父亲。”这个个人题词不久就被克劳斯·曼用来为自己做广告。他不觉得会惹太多的麻烦。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跟施特格曼出版社解约。此间，汉堡的恩诺赫出版社（Enoch）给了他一份更优惠的合同，包括高额的预付金。在施特格曼出版社已经开始排版时，克劳斯·曼宣布，他不能信守合同，说他父亲不允许他发表这一作品，并请求出版社理解他不能违抗父命。克劳斯说出版社肯定知道，他尚未成年，所以合同上的签字不具法律效力。像施特格曼这样的小出版社不想跟大名人托马斯·曼过不去，咽下了这口气，白花了生产费用，

忍受着出书未果的尴尬。[\[55\]](#)不久，即1925年初，《在生活面前》一书在恩诺赫出版社出版。

克劳斯未婚妻帕梅拉的妹妹卡蒂佳·韦德金德（Kadidja Wedekind）突发灵感，写了一首题为《克劳斯·曼》的诗：

这就是那个

能书会写的曼

虽然他父亲也在写

虽然父亲脑袋很灵光

还是开动自己的小脑袋瓜！

这是一个曼[\[56\]](#)。

却不是一个男人

他打扮得像个女人。

噢你们这些出版商呀

他骗起你们来可是没商量

笑起来又是那般楚楚动人。[\[57\]](#)

德国将选举一位新总统，要选的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继任者。卡蒂娅·曼写道，她的女佣们宣布，“无论如何都不参加”此次选举，“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为其国民尽心尽力”。“这些妇女”到底希望国家做些什么，她不知道，卡蒂娅在给丈夫的信中继续写道，“或许国家本该有责任给她们配备全副金假牙”。她本人投了中央党候选人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一票。[\[58\]](#)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中左翼政党统一意见，派马克斯竞选第二轮，而右翼政党同样选派了一个共同的候选人参加角逐：它们说服了保罗·冯·兴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接受提名参选——滑稽的是，选举法竟然允许第一轮没有参选的候选人参加第二轮选举。托马斯·曼在一篇题为《拯救民主!》(*Rettet die Demokratie!*) 的文章里发出强烈警告，不要选举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德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的人，文章在多家报纸上发表。“这位候选人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托马斯·曼写道，这位陆军元帅“会将这个国家重新带回一种混乱、骚动和内部纷争的局面——一种幸好似乎已经被克服了的局面”。他还写道，“要是我们的人民放弃选举一位过气的勇士的话”，他将为“人民对生活与未来的直觉”感到自豪。[\[59\]](#)对政党民主制度充满蔑视态度的兴登堡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统，时年77岁。

克劳斯·曼呢？无聊至极。他这时18岁，他供稿的报纸把这位新人派往柏林郊区的话剧舞台，而不是去采访重大的首演。他干了几个月，然后请了假，用预付金去旅行。第一站是伦敦，克劳斯·曼不会说英语，好在聚斯金德也在那里。他接下来前往巴黎，钱用完后，又找到了另一种资助旅行的办法。克劳斯让汉斯·费斯特(Hans Feist)，一位年纪较大的犹太富商和戏剧爱好者来供养，费斯特是他和艾丽卡在一年前认识的。费斯特因口齿不清被姐弟俩称作“迷雾”，他爱上了克劳斯，资助了两人的一次共同旅行，从巴黎到北非，共计两个月。这位长者和情人跟寻找冒险与自由的年轻人的关系，包括他们俩在经济和情色上的依赖关系非常尴尬，对文学创作却十分有利。克劳斯·曼毫不迟疑地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里采用了这一素材。

在此期间，父亲读完了克劳斯·曼的短篇集《在生活面前》。《父亲笑了》(*Der Vater lacht*) 是其中的重头戏，讲述了政府某个部的一位名叫泰奥多·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 的处长跟女儿库尼贡德(Kunigunde) 的关系。霍夫曼是个鳏夫，从外表来看，是个冷

冰冰的特立独行者。父亲和女儿相互间非常陌生，对此，两人都痛苦不堪。直到他们俩开始乱伦关系以后，这种距离才得以克服。小说的结尾是一阵哄堂大笑。托马斯·曼——以前孩子们叫他“皮兰因（Pielein）”——在给女儿艾丽卡的信中写道：“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小克劳斯的书，许多情节都很奇怪。但这个诚实的人患有严重的皮兰因综合征及其他病征。”^[60]

*

6月6日，托马斯·曼50岁。在慕尼黑的老市政厅举行的隆重庆典上，他的兄长海因里希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讲话，回忆在吕贝克的童年时代所过的那些生日。后来，托马斯·曼写道，这篇讲话“不仅仅让我感动得潸然泪下”。^[61]除海因里希·曼外，年轻的表现主义作家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也在场，托马斯·曼非常欣赏并提携他。托马斯·曼在1920年写信给他，说“我非常爱你。你代表着青春、勇敢、极端主义和最强的现实”。^[62]卡蒂娅·曼于两年后结识了这位诗人并在信中给艾丽卡和克劳斯介绍了他。约斯特是“一位可爱、情感丰富和热心的人，在立场上非常适合父亲”。^[63]之后不久，约斯特对托马斯·曼就共和国所作的表态感到气愤，并公开批评了这位大师。但两人并没有绝交。借托马斯·曼50岁生日之际，汉斯·约斯特积极加入了表示衷心祝福的行列。

为祝贺托马斯·曼的生日，费舍尔出版社发行了一本《新评论刊》（*Neue Rundschau*）专辑。年初，他亲自为这本专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Unordnung und frühes Leid*）。小说描写的年代是1923年战后通货膨胀时期，叙述了一位中产阶级的历史学教授家里发生的风风雨雨。阿贝尔·柯奈利乌斯（Abel Cornelius）有四个孩子，两个已快成年，两个小的还是上托儿所的年纪。老大贝尔特（Bert）和老二英格丽特（Ingrid）造中产阶级家庭

的反，反对父母所代表的旧价值观。他们四处捣蛋，不听话，不讲礼数，代表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混乱、不安全、没有秩序的世界。当教授的父亲迷恋旧世界，他是历史学家，热爱历史，只因为这些历史成了过去，而且过去得越久越好。18岁的英格丽特被描写为一个“非常妩媚动人的姑娘”，面临中学毕业考试，她“可能会”参加考试，“虽然只是因为她把那些老师，尤其是校长弄得神魂颠倒，对她绝对的宽容”。她“笑容可掬”，“声音甜美”，“有一种特别的、令人愉悦的滑稽模仿天才”，所以要去演话剧。相反，小一岁的贝尔特“打死”也不要从中学毕业，而是要成为“舞蹈家或卡巴莱小品剧[64]朗诵演员或跑堂的”，“要跑堂就一定要在开罗”。父亲公开承认的宝贝是5岁的女儿洛尔欣（Lorchen）。柯奈利乌斯不太喜欢4岁儿子“复杂的男子气质”，觉得他是条“好咬人的恶犬”。这个儿子生来“情绪不稳定，好激动”，“容易暴怒，发火跺脚，芝麻大点事也会绝望地痛哭流涕，仅仅因此就需要母亲的特别关照”。[65]

小说描写英格丽特和贝尔特在自家的房子里举办的一个庆祝会。年纪小小的洛尔欣在跳舞时爱上了大哥大姐的一位男性朋友。爱情的不幸对她打击很大，后来，那位年轻小伙子来到她的童床边看望她，安慰她，她才安静下来。父亲因为没能为女儿解除痛苦而苦恼；但更让他感到苦楚的是，现在就体验到了那种苦痛——那种有一天因为另一个男人而要失去洛尔欣的苦痛。

这篇小说在叙事时设身处地，幽默感强，轻描淡写，但绝不是一部可以小觑的作品，它把许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及其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几代人的冲突，当代历史及其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杂乱无章”的关联。阅读这类小说需要有距离，不带偏见。这部短篇在曼氏家里却引发了不安和怒气。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体色彩：小说里的四个孩子显然是自己孩子的写照，一览无余，只是中间少了一个；两个大孩子的恶作剧，各种打算和冒险；父爱的偏倚；就

连伊丽莎白—洛尔欣的儿童恋也有个现实的版本。托马斯·曼想把这篇小说献给他的朋友、“宝贝女儿”伊丽莎白的教父、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恩斯特·贝特拉姆（Ernst Bettram），后者却以他“出卖孩子们”为予以拒绝。^[66]感觉最强烈的是克劳斯·曼。贝尔特的形象深深地伤害了他。小说对他的各种生活规划冷嘲热讽，但与此相比，小说中的父亲对他的评价更伤了他的自尊心。这位父亲把大女儿的朋友跟自己的儿子进行对比，认为儿子“不安分、嫉妒和丢人”。其他所有的年轻人都是那么勤奋，可相反，“我可怜的贝尔特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一心只想着演小丑，虽然就连这么一点天分他也没有”。^[67]克劳斯悲愤地向艾丽卡控诉“魔术师的小说犯罪”。^[68]

此前不久，保罗·戈黑普给托马斯·曼寄来一封信，谈的是克劳斯·曼的文学处女作——《在生活面前》中的一个短篇。克劳斯在题为《老家伙》（*Der Alte*）的小说中描绘了一位校长，他猥亵他的女学生，在他的房间里拥抱、亲吻和抚摸她们。这个老家伙一脸的大胡子，身穿短裤，明显是以保罗·戈黑普为原型。这位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校长大发雷霆，说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用心险恶”。克劳斯·曼离开学校后还一直跟戈黑普保持联系，给他写信，还来学校拜访他，感谢校长曾经赋予他的自由，让他获得勇气。现在，戈黑普给父亲写信，说他“再也不想见到您的公子克劳斯了”。他请父亲转告克劳斯，“不允许他再次踏进奥登瓦尔特学校的校园”。^[69]托马斯·曼回信说，他不能表示多少道歉，只能作点解释。克劳斯平时在谈到戈黑普时总是充满敬意，所以肯定没有要损害戈黑普形象的意图。克劳斯本“以为，可以将现实中的深刻印象跟虚构的人物在艺术上融为一体，却没有弄清楚，这种做法对他人会造成何种伤害”。他将跟儿子“非常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托马斯·曼写道：“您可以从这件事看到他那种行为艺术家的天真，即满怀虔诚地把书寄给您，或许还在指望您的表扬呢。”克劳斯这么描写人物当然“肆意妄为”，但是

奥登瓦尔特学校和戈黑普本人肯定不会因为一个显然还很不成熟的文学青年开个滑稽的玩笑而受到伤害。整本书都贯穿着相似的情调，即“不断地从现实滑向怪诞、幻想和非现实的丑陋”。这位当父亲的还补充道，他本人对“克劳斯的整个发展都不那么认可”，为他操过很多心。托马斯·曼说：“我对他发表作品基本上也是敬而远之，我的参与形式就是不阻止他发表作品。”结尾处，他有点儿听天由命地写道：“让年轻人走自己的路，能走多好就多好。”^[70]两年前，托马斯·曼曾经建议戈黑普在跟他儿子打交道时要使用“铁腕”，显然，他本人已不再信奉这样的做法了。

两周后，克劳斯·曼自己写信给保罗·戈黑普。信中写道，给父亲的信他读了，戈黑普没有直接写给他，让他很是伤心。戈黑普的信“口气很严厉，因受到侮辱而侮辱别人，且缺乏理解”。小说《老家伙》表达的不过是“梦想与鬼魂的幻觉”，其中出现了“您的胡子，您的眼神，您的脸部表情”。克劳斯·曼还写道，虽然戈黑普因把信写给父亲而出了“洋相”，“我还是以敬重的心情怀念您”。^[71]作为教育家，戈黑普让了步，压下怒火，容忍了克劳斯又一次的放肆行为，收回了禁止踏进学校的禁令和中断关系的威胁，却没有忘记再一次规劝他的这位昔日弟子：“亲爱的克劳斯，您必须认识到，您的所作所为是不负责任的，您必须明白，一个作者也要对产生的各种影响负责任，虽然并非有意为之，却又是如此明显，显然要算到作者的头上，就像这起事件一样。”^[72]

艾丽卡·曼对在莱因哈特剧院出演不起眼的角色不满意，决定中止在柏林的学习和活动，转赴不来梅（Bremen）。她打的算盘是，宁愿在名气不太大的剧院出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也不要再在首都继续跑龙套。父母一方面很高兴女儿离开柏林——这个不受人待见、在他们看来很危险的地方；另一方面，他们对大女儿缺乏耐心心存不安，更何况她在不来梅同样没有感到快乐，抱怨这个城市和演出的剧目。她会

在那里“扎下根的”，父亲在8月这样安慰女儿，然后谈到自己的工作——日前刚写完的一篇题为《论婚姻》（*Über die Ehe*）的政论文章：“文章写成了长篇大论，极具道德水准，从原则的高度对同性情爱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哎呀，哎呀。米兰因（Mielein，卡蒂娅·曼的昵称）非常喜欢。”^[73]信中以明快的语调透露了三重奇怪的暗示：一篇关于婚姻的文章为什么要探讨同性情爱这一问题？这为什么偏偏要让母亲“米兰因”喜欢？在父亲给女儿的信中为什么要谈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托马斯·曼在文章中阐述了一种有别于同性情爱的婚姻理论，同时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他本人的解释，究竟为什么走进了婚姻殿堂：告别其同性恋的倾向，走向普遍为世人所认可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托马斯·曼写道，婚姻象征着忠诚、家庭与生活，同性情爱则意味着“放荡不羁、漂泊流浪、反复无常和没有道德”，也代表着“无繁衍力、前途无望、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74]卡蒂娅·曼“喜欢的”，正是对婚姻的这一表白。在结婚后的最初几年，她逐渐明白了丈夫那些隐秘的倾向和渴望，不管是在其作品中的明确信号——最迟是在小说《死在威尼斯》里，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反正她跟丈夫不知在什么时候谈过这些事。根据托马斯·曼1918~1921年的日记记载，对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其性取向的问题，卡蒂娅知道得一清二楚，日记里还写到在床第之欢时一再出现的“无能”，还有他对妻子表示理解的感激之情，说她“对爱情忠贞不渝，如果始终挑不起我的兴趣，情绪也不会败落”。“面对这种情况，她的冷静，她的爱，她的泰然处之，真叫人赞叹，”托马斯·曼写道，“这样，我也就不用自惭形秽了。”^[75]卡蒂娅·曼是否真的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且另当别论。但托马斯·曼公开拒绝同性情爱，至少在生活的实践中加以拒绝，他宣布婚姻为最本质的，是造福于社会的，并把婚姻当作对生活的肯定来颂扬，这些话她爱读。对

于同性恋问题，家里不公开讨论，但也不是沉默不语：谈话中有隐喻，文学作品里有影射，还有给艾丽卡的信中那样的提示。

就在父亲公开表示拒绝同性情爱之际，儿子克劳斯却毫不掩饰他对男人的爱恋之情。正因为如此，柏林吸引着他：这里是欧洲同性恋的中心，有着宽容的警察局和许许多多的同性恋酒吧。尽管如此，克劳斯·曼也不得不小心行事。在社会上，同性恋还完全没有得到认可。“淫乱”是违法的，同性之间的爱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变态。性解放意味着此时可以在性科学范围内讨论下列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也许可以治愈；较新的观点则认为，同性恋是人类生命中另一种自然的情爱形式。不久，家里就对克劳斯的爱情生活了如指掌。两位家长毫不知情的是，他们的女儿艾丽卡，多少男人钟情的美女，刚刚陷入了一场热恋之中——对象是她弟弟的“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

卡蒂娅·曼对女儿莫妮卡疑惑不解，虽然她作为寄宿学校的女生很少出现在父母家中。卡蒂娅写信给艾丽卡说，“我拿这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76]两个月后，她向大女儿谈到了莫妮卡的一些新情况。库尔特·哈恩的母亲去了一趟萨勒姆，“对莫妮卡简直是推崇备至：在歌剧《费加罗》的演出中，她扮演苏珊娜（Susanna），不但唱得感人，演得也动人，莫妮卡已经出落成为一个小女人了。真奇怪！”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莫妮卡还是决定复活节时离开寄宿学校。母亲还写道，按戈洛的说法，萨勒姆的人“现在就已经对她离校”感到悲伤，卡蒂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人对她女儿的印象跟她和艾丽卡的完全不一样。“看来，我们肯定是把莫妮彻底看错了。”^[77]

1925年底属于克劳斯·曼。除短篇小说集《在生活面前》外，话剧《安雅和埃斯特》此时也已出版。小说集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些

评论家认为，这些短篇过于病态，苍白无力，另一些人强调作品在修辞上的草率，还有一些批评家则提到作者的出身。按照不成文的行规，不要对一位作家的处女作穷追猛打，倘若不能唱赞歌，就不要发表评论，但这些都不适用于18岁的克劳斯·曼：出版社和作者所造声势太大，还用父亲的名字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儿子一咳嗽一吐痰跟他老子活脱脱一个样，要我们怎么想呢？”有个评论这样写道。克劳斯·曼的小说展示了一个“悲楚的内心世界，充满着感官刺激与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年轻人的作为，没有中规中矩的行动，没有奋力向上的努力；恰恰相反，小说里充满着赘疣般的、龌龊的东西，一种散发着金银珠宝气息的风格更是通贯全书。缺少的是个人性格；跟着托马斯·曼亦步亦趋，每头驴子都能做到”。^[78]在这风口浪尖上，较为平和的声音几乎被淹没，这些评论认为，不管如何，这是一个天才的尝试，一个作家的起步，可以期待他会有其他作品，更好的作品问世。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是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对年轻作家一贯给予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写信给克劳斯·曼表示鼓励。茨威格的信中有一句极具广告效应的话。不久，恩诺赫出版社打出广告，说克劳斯·曼是“新一代青年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79]

在此期间，汉堡小型剧场的一位年轻戏剧行家满怀激情地找到了克劳斯·曼，想把《安雅和埃斯特》搬上舞台。按照现行计划，主要角色由作家本人、他的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她这时一直渴望着走上舞台——和他姐姐艾丽卡来担任，另外还有那个汉堡演员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同时接手导演一职。该剧还要在慕尼黑演出。克劳斯·曼写信给艾丽卡说，“到处都有我的巨幅广告，我可真的出名了”。^[80]为了出演安雅这一角色，艾丽卡·曼在不来梅请了假。10月22日，首次公演在汉堡举行。该剧洋溢着青少年青春期的激情，讲述同性恋爱的故事，努力将年轻一代的渴望与困境向世界呐喊，引起了轰动：年轻的剧作家是托马斯·曼的儿子，这位诗人的孩子们上台演出，更加上大胆的题材。演出的票房很好，评论则大多是负面

的。戏剧评论大师赫伯特·伊贺苓（Herbert Ihering）在柏林看了演出后认为，该剧不过是舞台版的同性恋玛丽特^[81]小说而已——如果放在今天，大概会拿“罗莎蒙德·皮尔彻（Rosamunde Pilcher）”^[82]而不是玛丽特来作比较了。^[83]10月底，家喻户晓的《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把克劳斯和艾丽卡·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的一幅照片刊登在封面上。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些“诗人的孩子”。

卡蒂娅·曼原本很想看《安雅和埃斯特》在汉堡的首演，却错过了机会。因身体欠佳，她不得不留在慕尼黑。报纸上大多是负面的评论，她都一一细读过了。“不管立场如何，个个都批评这出剧，也不奇怪”，卡蒂娅在给大女儿写信时如是说——主要是红灯区的氛围让她感到不快，这一点，她丝毫不加掩饰。“你知道，要是剧中的男女是在花园里漫步，我会更喜欢的。”好在大部分评论家的“调子都还算公允”。^[84]父亲也开口了。他给艾丽卡写信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她“演得最好”。他本人跟母亲和小女儿、小儿子在慕尼黑看了《安雅和埃斯特》的第二轮演出，由其他演员接手艾丽卡和克劳斯在汉堡所演的角色。该剧的“某种青年和超青年的魅力”让他深受感染，托马斯·曼这样写道，这也是他从那时起“在任何人面前都要辩护的东西”。至于“新闻界的拒绝态度”，大概只能说“算不上特别”，虽然面对那些刊印出的或“乱打瞎棍、没有水平的匿名信”他“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但我并不因此而乱了方寸，我认为，即便这出剧原本不一定非上演不可，若以起步作品而论，它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做得那么糟糕。”^[85]

克劳斯·曼身陷关于他个人及其话剧的纷争大潮之中，他写信给父亲，“几乎所有媒体的解读都充满着恶意、敌视和带有成见的歪曲”，这使他“很伤心”。^[86]三天后，德国最著名的讽刺杂志《傻

瓜》（*Simplicissimus*）^[87]发表了一幅尖刻的漫画，讽刺克劳斯·曼试图走出父亲的阴影。

克劳斯·曼的首部长篇小说《天真无邪的舞蹈》（*Der fromme Tanz*）于12月在著名的《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上先行刊登出一部分，1月正式出书。克劳斯·曼早在12月就给斯蒂芬·茨威格写信，感谢他为其短篇小说集所写的激励话语。克劳斯·曼说他的第一部长篇正在出版，问茨威格想不想为这部小说写评论，比如发表在《世界舞台》杂志上。^[88]

*

新年伊始就伴随着不愉快。曼氏一家人在位于慕尼黑阿奇斯大街（Arcisstr.）的外祖父母普林斯海姆家里过除夕夜，就是那幢800平方米的宫殿，卡蒂娅·曼——曾经的卡塔琳娜·普林斯海姆（Katharina Pringsheim）——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直到她21岁时成为托马斯·曼的妻子。数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Alfred Pringsheim）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企业家的家庭，家里在西里西亚（Schlesien）从事矿山开采而发了大财，这位教授的妻子颇具艺术鉴赏力，博学广闻，两人定期能见到女儿卡蒂娅一家，至少在周日总能在“阿奇斯”见面。托马斯·曼跟岳父母的关系不那么融洽。岳母出生于一个文学家庭，其父恩斯特·多姆（Ernst Dohm）曾是讽刺杂志《一地碎片》（*Kladdendatsch*）的主编，其母海德维希·多姆是名作家，通过小说为妇女的权益而斗争。当年，岳父母曾支持托马斯·曼向女儿求婚。岳母虽然偶尔讥讽托马斯·曼的“钞票”，却为她的“女婿托米（Schwieger-Tommy）”以及他作为作家取得的成就而自豪。^[89]她曾经这样描述她宝贝女儿的婚姻：“他们是一对爱发牢骚的小夫妻，却很幸福。”^[90]跟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困难，他对文学没什么感觉。不管怎样，托马斯·曼跟岳

父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两人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托马斯·曼出生于吕贝克的一个参议员和商人家庭。对此，他很自豪，却没能让岳父觉得有啥了不起。作为参议员的托马斯·约翰·海因里希·曼英年早逝，给家里留下了价值40万德国马克（Reichsmark，一译“帝国马克”）的财产，这仅相当于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每年从父亲那儿所得遗产的一半。此时，经过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普林斯海姆家的财富也已减少了相当大一部分，但他们家依旧是慕尼黑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面对这些人，你不会想到是犹太人，”托马斯·曼于1904年给哥哥海因里希写信时说，“你感觉不到跟犹太文化有什么关系。”^[91]普林斯海姆一家人自己也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家早于19世纪就皈依了天主教，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及其父母已经离开了犹太教会，虽然卡蒂娅·曼的这位父亲非常自傲，不会仅仅为了要去适应社会而去接受洗礼。



图2 漫画《托马斯·曼跟他儿子克劳斯》，Th. Th. 海涅作，1925年11月9日
发表于《傻瓜》杂志

1925年的除夕夜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争吵。起因是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他是托马斯·曼的哲学圣人。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不大看得上这位哲学家，谈到他时口吻有些“轻蔑”之意，还得到他儿子、物理学家彼得·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的支持。“魔术师脸色苍白，手在颤抖”，卡蒂娅·曼在给女儿艾丽卡描述事情经过时说。那天晚上将就着熬了过去，可是“一到家，他就失去了控制，说别人故意要侮辱他，贬低他，就像这些年所做的那样，然后他又毫不客气地说到我的全家，我也是家里的一个成员呀，很难再听得下去，然后彻夜未眠，精神真的崩溃了”。后来，父亲总算平静了一些，“但对阿奇斯街的火气依然未消”。母亲写道，她自己“无疑也看到这里面对我的不客气行为，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92]

三周后，托马斯·曼携夫人前往巴黎。这是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前往法国——他哥哥海因里希特别钟情的国度；当年，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托马斯·曼把法国当作战争中的敌人和精神上的对手加以批判。现在，他跟这个西部邻国进行和解，而且不仅流于个人的层面：法国把托马斯·曼当作魏玛共和国的代表性人物来接待。他应邀作报告，参加各种会谈与招待会，人们把他当作最伟大的德国作家来欢呼。这是一场“顶级冒险”，托马斯·曼这样写道。^[93]国际舆论和自由派的德国舆论把这次旅行看作德法相互谅解的象征。诗人家乡的民族主义者以仇恨和愤怒来对待这场访问“死敌”的友好之旅，当时法国还继续军事占领着莱茵河地区。比如汉斯·约斯特，他在半年前还是托马斯·曼生日庆典的座上宾，此时却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上攻击“虔诚的托马斯”，在巴黎“丢人现眼”。^[94]

在此期间，围绕克劳斯·曼掀起了另一股风暴。《安雅和埃斯特》在维也纳、柏林和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公演。在黑森邦（Hessen），邦议会甚至就该剧的道德缺失进行辩论。1月，《天真无邪的舞蹈》出版。该书讲述了一个18岁青年的故事，他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大家庭，想成为作家，一头扎进柏林的夜生活，发现自己是同性恋，纵欲无度，还尝试着以文学手段表现同龄人的各种渴望。对该小说的口诛笔伐远远超过了支持与赞扬的声音，矛头也少不了指向父亲。有些批评异常极端：一则评论写道，这部小说让人想起“爆裂的阴沟管道”。^[95]文学上与传统风格的决裂出现在《美文学》（*Die Schöne Literatur*）杂志上，这份民族主义杂志掀起了一场反对一切的斗争，凡是有西方腐朽嫌疑的，凡是突出软弱和个性的，凡是宣传异样和宽容的，它都反对。托马斯·曼在评价青年文学时，从“年轻人对复仇战争的冷淡立场出发”，批判了该杂志的态度，^[96]这种态度曾经冲着克劳斯的戏剧而来。克劳斯·曼能以其小说找到拥护者，主要在于他们的共同点，即这些人赞同他的倾向：《天真无邪的舞蹈》是德国文学中最早公开描写同性爱情的小说之一。

对克劳斯·曼的各种攻击并非没有留下痕迹。他给艾丽卡写信说：“我毫不怀疑收获了巨大的荣誉，但它并不能替代这么多烦恼。”^[97]克劳斯·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一起旅行，举办作品朗诵会。之后去尼斯（Nizza），继而前往巴黎。法国正处于一场经济危机之中，跟1923年的德国很相似。在通货膨胀的年代，用外国钞票过起日子来特别爽，克劳斯·曼尽情地享受着，没有任何顾虑。

3月，托马斯·曼写了封读者来信给《新维也纳新闻》（*Neue Wiener Journal*）。他在信中写道，在这家报纸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里，“我不得不又一次读到，说是我觉得我儿子的作品‘太不讲道德’，所以不想与之有什么关系”。托马斯·曼写道，不知道是谁

“散布了这种童话般的谣言，说我对儿子的态度是根本无法理解”，这种说法反正一点也不符合事实。“我又不是修女”。^[98]

他妻子病了，又病了，一场长时间的感冒变成了肺炎。医生感到担心，又建议她去疗养院疗养。于是，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夫妇于5月前往阿罗萨（Arosa）的森林疗养院，自从《魔山》出版后，托马斯·曼觉得在达沃斯“是看不到好脸色了”。^[99]6月6日是托马斯·曼的生日，此时他已经离开当地，因为要在吕贝克作一个庆典演讲，祝贺该市建城700周年。就在当天，一封克劳斯和艾丽卡·曼从巴黎发出的电报送到了阿罗萨，内容是要钱。母亲回信说，她“气得要命”，不仅因为“你们5月就透支了6月的钱（这种行为当然不合适）”——他们俩虽然自己有收入，还是按月得到家长给的生活费。在“天寒地冻之时”，又是“独自一人在床上”，他们这封电报差点把她吓死了，“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往阿罗萨打电报？我还得用我的破法语来读你们的讨债电报。我手头撑死了只有300法郎，准备好星期一付每周的费用的，只好让那个又蠢又有些贪婪的男仆人晚上很晚到我的床边来，跟他商量星期天如何去做好这件事，一句话……恶心透了”。



图3 （左起）艾丽卡和克劳斯·曼跟帕梅拉·韦德金德、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一起

更让母亲焦头烂额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艾丽卡想结婚，而且要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那个大她6岁的天才演员，曾跟“诗人的孩子们”一起在汉堡把《安雅和埃斯特》搬上舞台的那个人。“天哪，艾丽，亲爱的艾丽！我肯定不是瞎操心，可你要彻底想好了！你知道，我在慕尼黑跟你说过，订婚绝对不是就要结婚的理由，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100]在母亲的眼里，她所有的结婚计划都太过匆忙。艾丽卡·曼之前表示过保持特立独行的巨大决心，为什么现在不到21岁就想结婚，这谁也搞不清楚。就连弟弟克劳斯也感到吃惊，而不是开心。或许跟帕梅拉·韦德金德有关系。“请你爱我！”艾丽卡·曼在两年前曾写信给她。她没有爱她，抑或没有这样爱她。7月24日，艾丽卡·曼变成了格伦特根斯太太。没过多久，她写了一封信给帕梅拉。“我的帕梅拉，求你，求求你，快快来。我太想你来了，我爱你可是胜过一切呀！”^[101]艾丽卡·曼的这封信发自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还在蜜月之中。

戈洛·曼也参加了他姐姐在慕尼黑的婚礼，“身穿一套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显赫的无产阶级领袖”，克劳斯·曼这样讽刺他弟弟的政治热情。^[102]而戈洛当时的心思恰恰不在政治上。复活节时，学校来了一个新学生，名叫罗兰德·H（Roland H.），一位海德堡来的教授的儿子。17岁的戈洛·曼爱上了这位新人。两人交上了朋友，暗地里手牵着手。到了暑假，戈洛被允许在父母休假时把这位朋友带到慕尼黑的父母家中。在这里，罗兰德显得比主人更没有禁忌。他要性交。腼腆的戈洛觉得来得太快了，罗兰德就寻找替身。他从慕尼黑的大街上找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们俩在曼家的房子里——在托马斯·曼的卧室里性交，戈洛在门口站着，既失望又恶心。他立马不想跟罗兰

德再有任何瓜葛了。但戈洛·曼很难摆脱他的“第一个男朋友”，“不得不把罗兰德当作镜中花”。[\[103\]](#)

*

在此期间，父母正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意大利度假。托马斯·曼抱怨在马尔米堡（Forte dei Marmi）逗留期间的一些遭遇，事情不大，却令人讨厌，他认为跟“当前的（意大利）国内情绪有关，一种让人不快、过度紧张和反外国人的情绪”；[\[104\]](#)本尼托·墨索里尼正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卡蒂娅给艾丽卡的信更具体地描绘了那些“令人讨厌的遭遇”：“一个可恶的法西斯对麦迪（Mädi）十分反感”——她才8岁——“因为她在海滩上脱了一会儿衣服，以便在海水里把身上的沙子冲掉，可怜的小家伙哪里知道捅了娄子？那家伙先是冲着我来了一场令人作呕的表演，说这样做也不害臊，亵渎了主人好客的热情，侮辱了意大利，接下来还叫了警察，我不得不跟他去警察局，接受审讯，可以说失去了尊严。最终也许只是罚点小钱了事，可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罗马吐出了圣饼的犹太人那样。”[\[105\]](#)在意大利逗留期间，托马斯·曼夫妇及两个孩子观看了一位魔术师的表演，他用催眠术让观众们惊叹不已。从沙滩遭遇，意大利的国内气氛，到魔术表演，这几件事加在一起构成了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师》（*Mario und der Zauberer*）的基础——托马斯·曼最著名的中篇之一。托马斯·曼、他的家庭及其周围人士“体验着”作家作品中的“素材”——这是岳母对这种情况的说法。[\[106\]](#)

10月，克劳斯·曼的一本新书问世，书名为《儿童中篇小说》（*Kindernovelle*）。小说叙述了一位作家的寡妇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故事。有一名年轻男子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不久即成为这个女人的情人。作品里明显可以看到曼家的影子。寡妇带有卡蒂娅·曼的特征，拥有去世的作家的一副死者面具，“大鼻子，紧闭的嘴巴，带着幻想

的严厉目光”，表现的是托马斯·曼，而那个年轻男子却带着克劳斯·曼的身影，他跟那位寡妇调情，床上面挂着那副死者面具。这部中篇小说是对托马斯·曼的《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的回应。书中的其他孩子也同样是根据曼家的孩子来塑造的。戈洛在福里多林

(Fridolin) 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虽然聪慧，却长得矮小，丑陋，疯狂，卑躬屈膝，“野心极大”。[\[107\]](#)

萨勒姆的校长库尔特·哈恩特别害怕同性恋：害怕自己的同性恋——他一直在压抑着，也害怕他的学校里发生同性恋。他以怀疑的眼光观察着戈洛·曼跟罗兰德的友情，试图把他俩拆散。慕尼黑事件发生后，已经没必要这样做了：他们俩已相互躲避。尽管如此，到了1926年，戈洛·曼是同性恋已在萨勒姆尽人皆知了。库尔特·哈恩于11月带他去苏黎世的一位“神经与忧郁症”专家那里。路易斯·弗朗克医生 (Dr. Louis Frank) 很快就给校长寄来了一份诊断报告：病人有跟其他男孩子性交的幻觉，但迄今为止尚未“付诸行动”。这位医生还写道，病人的同性恋倾向是“可以治愈的”。但要克服这种“非正常状态”，需要意识到这一问题，要花大力气，需要“长期和彻底的治疗”。[\[108\]](#)库尔特·哈恩把医生的诊断报告寄给戈洛的父母，同时寄上一封给托马斯·曼的信。“病情的严重性可惜不容怀疑”，但戈洛具有坚强的意志，克服他“阴暗的想象”，并要扼杀“非分之想”。哈恩在信中还加上了一句急切的警告，要戈洛无论如何不要跟哥哥克劳斯谈及此事。医生向哈恩解释说，“只有在下列情况下他才会作出负面的预后判断，即倘若戈洛接触到一种较为时髦的倾向，这种倾向把非正常的冲动生活当作有趣和有价值来加以肯定”。[\[109\]](#)

圣诞节即将来临。托马斯·曼情绪高昂。他妻子又恢复了健康，正穿梭于大街小巷，为这个大家庭购买礼物。他自己在《魔山》出版两年后又开始撰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他想讲述《圣经》里关于约瑟与其兄弟们的故事[\[110\]](#)，“而且要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讲出来”。

[111]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写道，真的很高兴，又写作了。“只有你做事情，你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才了解自己一点。无所事事时光令人恐怖。”父亲高兴地等待着节日光临的客人，期待着岳父岳母和小舅子彼得·普林斯海姆的到来，关于叔本华的争论曾使新年伊始蒙上了阴影，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艾丽卡跟丈夫和克劳斯在汉堡过节，家庭的其他成员在慕尼黑聚集一堂。莫妮卡从洛桑（Lausanne）赶来，她在复活节时中断了萨勒姆的学业，来洛桑想接受音乐教育。戈洛从萨勒姆回来时的状况如何，没有记载；为了“扼杀非分之想”，他不得不接受过哪些治疗，亦无说明。

托马斯·曼新近一段时间开始了一项强身计划。他告诉艾丽卡，有一位按摩师兼体操教练每两天来一次，“让我运动，包括让我跳跃40次，然后用科隆香水给我按摩”。[112]

*

“诗人的孩子们”去巡回演出。克劳斯·曼在冬天又创作了一部新剧——《四人歌舞剧》（*Revue zu Vieren*），由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导演，要在莱比锡首演。克劳斯·曼给姐姐艾丽卡、帕梅拉·韦德金德、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定制了主要角色。舞台布景出自莫布莎·施特恩海姆（Mopsa Sternheim）之手，她是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之女。该剧由卡蒂娅·曼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谱曲。这出歌舞剧表现情爱的发展，迷惘的一代人的生活感觉和重大题材：政治、宗教、哲学、艺术和爱情。《四人歌舞剧》要争取成为新一代青年的舞台文学宣言。可是，在首次公演前就发生了争执。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很快便发现，要他导演的这出戏是多么不成熟，多么异想天开，他立马将该剧的导演工作交给了帕梅拉·韦德金德。但他不可能完全脱离干系，否则就会冒婚姻破裂的危险。艾丽卡·曼具有清醒和尖锐的判断力；唯一的例外，就是对她亲

爱的弟弟克劳斯：不管他写什么或干什么，什么都完美无缺。4月21日，首场演出在莱比锡举行，遭遇了一场滑铁卢，巡回演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从科特布斯（Cottbus）到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汉堡直至哥本哈根，无一例外。观众们大喝倒彩，每到一个新的演出地人们却又蜂拥而至：演出的娱乐价值在到处传播。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柏林演出后撂了挑子。帕梅拉·韦德金德也只是通过好言相劝才留了下来。气氛很糟糕。

评论家们的黄金时刻来到了。特别遭到讽刺和恶意攻击的，是要以他们那一代代言人自居的克劳斯·曼。“这些诗人的孩子凝聚成了一代人”，赫伯特·伊贺苓这样讽刺道。他把这出戏称为“中学毕业生汇报”和“儿童剧”，“克劳斯·曼在剧中用尽了时髦的词汇，令人难堪，喋喋不休，毫无遮拦”。^[113]另一位评论家强调该剧没有创造力，说这出戏“大概算得上是韦德金德式的风格，却幼稚得可笑”。^[114]



图4 1927年中学毕业时的戈洛·曼（右二）；前排左二为朋友“波洛”，后排中为罗兰德·H

就在哥哥和姐姐大红大紫之际，戈洛·曼回到了慕尼黑的父母家中。他在复活节时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在自然学科方面成绩平平，在他喜欢的学科，如德语和历史课，却取得了优异成绩。尽管发生了很多事，告别寄宿学校仍让他感到难舍难分。在过去的四年里，萨勒姆成了他的家，他现在就思念田园风光里的集体，学校的话剧——他最后曾出演席勒《华伦斯坦》（*Wallenstein*）里的主角，他还想念他的朋友们，特别想念“波洛（Polo）”，一个名叫胡里奥·德尔瓦尔·卡图拉（Julio del Val Caturra）的德国—西班牙裔学生。经历了罗兰德灾难后不久，戈洛就爱上了这个具有南欧风韵的漂亮小伙子，却将他的情感深埋心里。他们俩成了最好的朋友。托马斯·曼有一次去萨勒姆访问时，也注意到了戈洛的这位新朋友，并请他找几张波洛的照片。这些照片帮助父亲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塑造了年轻、英俊的约瑟的形象。现在，波洛在剑桥（Cambridge）开始上大学，而戈洛在慕尼黑大学注册了夏季学期，但一时还没有具体的学习目标。

夏天，全家人去海边度假，这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传统。在巴特特尔茨（Bad Tölz）的那个乡村别墅虽然装满着四个大孩子的各种传奇故事，但家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把它卖掉，因为托马斯·曼不想让上巴伐利亚（Oberbayern）拴住腿脚，而是想经常去海边。后来一段时间的混乱局势让这些度假计划未能实施。1924年，全家曾首次一起去波罗的海的希登海岛（Hiddensee）度假。家里人，无论是写信还是在回想时，无不热烈地谈论着大海、沙滩和广袤无际的天地，只有母亲例外，她认为那次度假很不完美：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邀请他的同行托马斯·曼及全家前往“他的”夏季住地，可是人们在那里对霍普特曼尊重有加，让很注重丈夫名声与荣耀的卡蒂娅·曼有点不舒服。1926年在法西斯意大利的度假非常不爽，今年8月要带上两个小的去叙尔特岛（Sylt）。托马斯·曼非常高兴。没有什么地方比叙尔特的风光“更具典型性，也没有更漂亮的大海了”。[\[115\]](#)不久，母亲给在慕尼黑的父母家中过夏天的两个大孩子写信，要

他们千万别像抢劫似的把家里的钱花光。“天呀，千万别这么做，我这会儿在这里已经愁死了。”北海很冷，叙尔特岛“压根就是一个阴雨寒冷的小岛”，旅馆太贵，社交聚会也没什么劲，“旅馆里的客人大都很无聊，又世故，没有几个名人，来的孩子都索然无味，肥头大耳，我们的孩子在他们中间算得上鹤立鸡群了”。卡蒂娅继续写道，有个柏林商人让她“特别感到恶心”，他“有十个孩子，这些孩子显然都是在百无聊赖中‘生产’出来的，其中有六个孩子来了”。这个商人整天都“带着一群长相难看的孩子做着各种僵硬的体操动作，晚上穿着高直领男式小礼服谈论国家大事”；一句话，“真让人受不了”。[\[116\]](#)

《四人歌舞剧》的失败，队伍内部的争吵以及各种尖锐的批评让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大伤元气，也影响了艾丽卡的婚姻和克劳斯跟未婚妻帕梅拉·韦德金德的关系。格伦特根斯和帕梅拉·韦德金德认为克劳斯的这出戏是造成众人大失所望的原因。克劳斯·曼在一篇关于巡回演出的文章里则宣布，他完全没有想过要作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登台演出，这种理解是一场误会。那么多观众的热情支持跟恶意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甚至宣称：“总体来说，一切都是那么有趣，那么美好。”[\[117\]](#)在公开散布乐观情绪的同时，他有一个愿望——慢慢地远离这一切。

艾丽卡·曼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不到在汉堡的格伦特根斯那儿去：她在慕尼黑的小剧场演出布鲁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话剧《一万》（*Zehntausend*）。弗兰克是作家，也是曼家的一位密友。虽说如此，艾丽卡还是不满意；但她不想回到丈夫身边，也不想回到她签约的剧场。仲夏之际，她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在一段时间里逃避这一切？10月7日，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开始环球旅行。起点是美国，克劳斯·曼的《儿童中篇小说》翻译后在那里出版了，美国的出版商似乎许诺有这种可能，通过

作报告来挣些钱。还在横渡大西洋时，通常的那种开心情绪已经恢复。他们在考虑假装成双胞胎，这样就可以打出旗号：“曼氏双胞胎文学”。

一家人在叙尔特岛休假两周以后，托马斯·曼在一封信里写道，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海涛拍岸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118]他为何跟妻子相反，这样享受在北海的度假，其实不完全在于小岛的魅力，而是跟另一件事情有些关系。托马斯·曼在叙尔特岛爱上了克劳斯·豪伊泽尔（Klaus Heuser），杜塞尔多夫一位艺术史学家的17岁儿子。10月，克劳斯·豪伊泽尔应邀在慕尼黑曼氏家里待了两个星期。托马斯·曼写信给在美国的两个大孩子，说演员阿尔伯特·巴塞曼（Albert Bassermann）的老婆埃尔塞（Else）非常讨厌，她喋喋不休地唠叨，说看着他的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对托马斯·曼深表同情。她老是说：“帕梅拉、克劳斯和艾丽卡，这些孩子在玷污他们父辈的名字！”然后托马斯·曼谈到克劳斯·豪伊泽尔：“我用‘你’称呼他，在告别时，他特别允许我把他抱在我的心口上。要求艾西

（Eissi）自愿退让，不要打扰我的圈子。我已经老了，也出名了，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来玷污它呢？”在后来的日记里（他最后把1922~1932年的日记烧了），托马斯·曼还常常想到这一年夏秋之际的热恋，而且出乎预料的是，他公开让家里人知道。他称自己为“幸福的情人”：“黑色的眼珠，为我而流淌着泪水，我曾吻过的动人嘴唇——这是爱，我也爱了，当我死去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说。”^[119]豪伊泽尔后来否认接过吻。父亲在给艾丽卡和克劳斯的信中还写道：“生活中那些秘密的、几乎悄无声息的冒险是最伟大的冒险。”^[120]母亲容忍了丈夫的这一热恋，接受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那份激情，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他，只是在给女儿艾丽卡的信中透露了对这件事的看法：“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可魔术师的感情也太投入了。”



图5 1927年，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带着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在叙尔特岛

戈洛·曼更直接地表达了他对父亲这段爱情的不满。母亲在给艾丽卡的信里写道，戈洛在克劳斯·豪伊泽尔来访时差不多是“妒火中烧”。戈洛在大学读第一学期，历史、国民经济和法律课都让他提不起精神来。最主要的是没有找到朋友圈。他太腼腆，自己不敢跟同学接触，所以大部分时间是一人独处，直到后来足不出户。他陷入了一场忧郁的危机，就像两年前在萨勒姆不得不经受过的那样。他现在缺少的是寄宿学校那种排满的日程。虽然被母亲发现他成了一个“打不起精神的家庭成员”^[121]，但要跟母亲谈论他的各种不安和忧愁他做不到。于是，戈洛·曼在这年夏天就坐在书桌旁，做他——一个在作家家里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要做的事：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

莫妮卡·曼也回到了父母家中。她仅比哥哥戈洛小一岁，跟他却没有像大哥大姐之间的那种亲密、互信的关系；他们俩都长大后，两人相互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对莫妮卡来说，在洛桑学习音乐好像也不是她想要的。1927年10月，她开始在慕尼黑上声乐课。不久，母亲给在美国的两个大孩子写信，说她本希望“我们的小莫妮（Mönchen）通过声乐课能找到寄托”，这一希望一时看来还实现不

了。莫妮卡觉得女声乐老师非常讨厌，就不想再去上课了。但总体来说，她变得“活泼些了，也关心人些了”，非常喜欢母亲给她买的衣服。她“那么自豪、那么积极地整理她的新衣柜，真有点让人感动”。[\[122\]](#)

又一次面临今年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了。几年来，托马斯·曼一直是个热门人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在他跟别人的信件来往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托马斯·曼强调这一奖项对他并非那么重要；他在给克劳斯和艾丽卡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它其实太过喧闹”，他如果喜欢这场“冒险”的话，最多是因为“你希望你所爱的人有机会感到自豪，而且机会越多越好”。[\[123\]](#)母亲的信听起来却不一样。她在11月写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久将揭晓，水落石出之际她会感到高兴，即使父亲拿不到，“因为这事多少让他有些激动”。[\[124\]](#)

卡蒂娅·曼陪同丈夫去柏林。上一年，普鲁士艺术学院建立了诗歌艺术学部。托马斯·曼被聘为院士，不时得参加学院的会议。海因里希·曼同为学院的院士，甚至让人把他选进一个每八周开一次会的工作委员会。在经历了大伯的一起“艳遇”后，卡蒂娅·曼心生疑团，觉得海因里希的兴趣好像不单纯在院士的会议上。她写信给艾丽卡，说曾应约打电话到钻石旅馆（Hotel Exzelsior）找他，“电话打到他的房间，等了好一会儿，一个女性的声音接了电话。我当然以为是打错了，就问，我在跟谁说话，那个声音（没教养的高嗓门）回答说是海因里希·曼的夫人。这也太厉害了：像他那般年纪和地位的男人在柏林‘寻欢作乐’（就这我已觉得粗俗之极）不至于非要在钻石旅馆吧，那儿谁都认识他，而且他还经常带夫人出入于此”。卡蒂娅写道，这也纯属巧合，打电话的是她，而不是海因里希真正的夫人米米（Mimi）。“这个老伪君子还用激动的语调跟我说，为了孩子，是他希望米米待在慕尼黑的。”[\[125\]](#)

此时，戈洛·曼也在柏林。从冬季学期开始，他在首都继续上大学，不久便找到了在慕尼黑求而未得的东西：一个男朋友。皮埃尔·贝特鲁（Pierre Bertaux），法国日耳曼语言文学家菲利克斯·贝特鲁（Felix Bertaux）的儿子，他这学期也到柏林来上大学了。他父亲跟海因里希·曼是朋友，还将托马斯·曼的《死在威尼斯》译成了法文。戈洛立刻喜欢上了大他两岁的皮埃尔。他长得英俊潇洒，外表让戈洛想到萨勒姆的中学朋友波洛，有魅力且聪明。这位法国人对戈洛·曼的第一印象却完全相反：“他一开始给人的印象不好，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别扭、佝偻、僵硬、冷冰冰的”，贝特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没过多久他便发现，戈洛“是他们家最让我喜欢的一个：聪明，判断力强，有勇气”。没过几天他又补充道：“我愈发喜欢戈洛了，他开诚布公，正直，没他父亲那么矜持，更容易受到鼓舞”；他“比克劳斯严肃，也比他更文静一些”。[\[126\]](#)

12月初，他们俩再次见面，戈洛向他倾诉衷肠，此时离他们认识不过才五天。贝特鲁现在才理解，戈洛为什么在家里被视为“阴险的（mechant）”。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位新朋友直率得出乎预料，让他有些意外。比如说，戈洛告诉他，六个孩子的家庭太大。他完全可以不要这多么兄弟姐妹：他一直处于大姐和大哥的阴影之下，又比年纪小的弟妹少了些娇惯。还在那天晚上，“戈洛·曼来了个大坦白（la grande confidence）”。他告诉皮埃尔·贝特鲁，在慕尼黑的那个不开心的学期里，他写了一本自传体中篇小说：讲述他的生活、他的感觉、他的忧愁。这部中篇不久将在一本小说集里用笔名发表——这是他从哥哥经历的暴风骤雨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他哥哥正是以出版小说集开始其作家生涯的。[\[127\]](#)

圣诞节前不久，《最新散文集》（*Anthologie jüngster Prosa*）出版。戈洛送给皮埃尔·贝特鲁一本。贝特鲁读着这位朋友以笔名米夏埃尔·奈宜（Michael Ney）发表的中篇小说《大学生赖蒙特的生

活》（*Vom Leben des Studenten Raimund*）。小说讲述了一个聪慧、不幸而执着的年轻人。赖蒙特是名寄宿学校的学生，他确认自己爱的是男人。“从来只把我当男同学，过一点都不行，”他抱怨说，“距离，距离，永远都是距离。”^[128]可他不能向别人吐露心声。在中学时还有社交生活和其他活动，上大学后，赖蒙特在父母家里陷入了一场心灵危机：他找不到生活之路，不知道该干什么，况且没有帮助他的人，中学时代的朋友帮不了，父亲也帮不了——他始终在忙着他自己的那些事情。最终有一天，赖蒙特在恐慌之中跑向川流不息的车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皮埃尔·贝特鲁给父母写信谈到他对朋友的这部中篇小说的看法：“小说真不错，不少地方很感人——可是，上帝啊，他为什么要发表它？”对于这一问题，戈洛·曼早就在拷问自己，而且数周以来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他生怕会抖搂出来，在笔名“米夏埃尔·奈宜”之后隐藏的是谁，也怕会揭露小说内容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儿子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后果完全可以想象：各家报纸会大做文章，托马斯·曼的又一个儿子在写作……皮埃尔·贝特鲁写信给父母说，“他让人觉得可敬的是，他有时候能感觉到这一点”：“（曼氏）家族的嗜好主要不在于写作，而在于发表。”^[129]

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欢庆一场“派对”，一场长达九个月的派对。他们坐船前往纽约，订的是二等舱，这成了他们此次旅行的最大不幸。白天，他们总是悄悄地溜到头等舱的甲板上，最终被人发现并被赶出了这个高人一等的圈子。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从此，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订头等舱，并寻找相应的旅馆。账单的数额越来越大，反正会有人付钱。他们在纽约下榻阿斯特旅馆（Hotel Astor），12月从好莱坞的普拉扎旅馆（Plaza Hotel）给父母写信。钱始终不够用，但他们靠着魅力、厚脸皮和幽默，总是让人邀请他们，送他们东西，或以父亲的名义借债。他们的“报告之旅”

让自己都觉得好笑：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英语，虽然不时地走东跑西，在说德语的观众面前登台，克劳斯·曼讲述欧洲的青年人的情况并朗读自己的文章，他姐姐则朗诵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和赖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诗歌，但这都不能缓解他们缺少旅行费用的窘迫境况。克劳斯·曼通过给德国报纸撰写关于美国的报道挣了一部分钱。曼氏“双胞胎”受到友好的接待，到处被人介绍；曼氏的大名如雷贯耳，姐弟俩待人接物的方式又可亲可爱，这一切都让他们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在好莱坞亦不例外。1927年圣诞节，他们应邀到伟大的埃米尔·杰林斯（Emil Jannings）家里，两年后，杰林斯将以最佳男主角的身份获得历史上第一个奥斯卡奖。他们在芝加哥结识了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跟电影导演弗里德里希·威廉·穆尔瑙（Friedrich Wilhelm Murnau）交了朋友，他带着他俩参加了其电影《日出》（*Sunrise*）的首映式。克劳斯·曼写信告诉父母，“这是虚荣的盛会”。他一方面觉得首映式的场面令人振奋，一方面又觉得讨厌：他“对电影本身没有丝毫兴趣”。^[130]他们俩自己计划在好莱坞拍电影，而且要把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国王陛下》搬上银幕。艾丽卡饰演一个角色，克劳斯跟人合写电影剧本，有从影经验的朋友艾里希·艾博迈耶（Erich Ebermayer）特地帮他们设计了电影脚本的框架。但这一计划流产了。

除夕，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导演路德维希·贝尔格（Ludwig Berger）家里欢度节日。这一夜，克劳斯·曼在派对上跟好莱坞的第一个女明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调情，而《汉诺威信使报》（*Hannoverscher Kurier*）就“您在新的一年里做什么？”的问题刊印了《克劳斯·曼的回答》（*Antwort von Klaus Mann*）一文，人们在元月一日可以读到：“我暗地里打开了你们给父亲的信，决定不把这个问题告诉老人家。或许是你们搞错了，本想询问我的工作计划如何——这就要由我而不是他来答复。抑或你们没有弄错，的确是要问他

——那就更要由我来答复了。”父亲正在写一部关于《圣经》里约瑟的长篇小说。“风格——关于风格，我现在只想说：不怎么样。这类风格也许还可以写，读是读不下去了。我本人正在以韦德金德的风格写四部滑稽歌舞剧，我在剧中扮演列宁，跳查尔斯顿舞。在最后一组画面里，十二个女孩在切腹。再多我就不说了。”^[131]

像罗伯特·诺伊曼（Robert Neumann）的这种讽刺性仿效之作是公众对克劳斯起步当作家的反应，这种反应现在仍旧非常强烈，积极的评价少而又少。克劳斯·曼像是生怕那些想恶心他的人找不到攻击他的把柄似的，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写就了一篇政论文，他的出版社将其单独出版：《今天与明天——论年轻的精神欧洲之现状》（*Heute und Morgen. Zur Situation des jungen geistigen Europas*）。这篇文章糅合了海因里希·曼的《理性的专政》（*Diktatur der Vernunft*），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Graf Coudenhove-Kalergi）的泛欧运动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空想精神》（*Geist der Utopie*）——克劳斯尝试着将刚读到的东西拼凑成为欧洲青年的一项伟大纲领。批评家们看到的是异想天开和不成熟的想法，还有使用政治概念方面的不老到。克劳斯·曼的那种“我来了”的气概更是火上浇油了。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世界舞台》上嘲讽说，克劳斯·曼是“职业青年”，“在严肃的书评中当然不用”提到他。^[132]克劳斯·曼过去对政治问题没有一丁点兴趣，他的发展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为了一个和平的欧洲而振臂疾呼；告诫知识分子，不要重蹈1914年的覆辙。克劳斯·曼在他1927年的政论文中还谈到“精致法西斯主义（Edelfaschismus）”的危险：“1930年属于军事独裁吗？好吧，我们这样的人到那时将生活在流放之中——可以肯定的是，1935年时人们已经改变主意了。”^[133]

克劳斯·曼在美国时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他自认为“很不错”。“小说叫《中国的对面》（*Gegenüber von China*），地点在好莱坞，

讲述了一个年轻男演员，他让人对鼻子动了手术。”^[134]这一次不是讽刺的模仿之作。

姐弟俩在考虑，他们的环球旅行还应该去哪儿。在美国逗留了几个月后，他们想继续前往亚洲和苏联，并在不断地寻找旅行所需要的钱。父母提醒他们最好尽早回家，对此，两人在写的很多封长信中置之不理。

在此期间，卡蒂娅·曼一直在向他们俩通报家里发生的事情。按照母亲的说法，莫妮卡喜欢“假装参加少女聚会”，聚会完了总要到早上6点才回家。她也有崇拜她的人。“不管怎样，她在享受着生活，这让母亲十分开心。”戈洛刚从柏林写来“满意而充满欢乐的信，我差不多相信，他完全变了个人”。在谈到家里时，也没少提到幼子米夏埃尔。他昨天跟母亲说：“父亲大人会满足麦迪的每一个愿望，我的愿望却一个也不满足。对我来说，好在不是父亲大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真是件幸运的事。”^[135]托马斯·曼也听到了8岁儿子的话，他没太当真。在给艾丽卡的信中他写道，“我要是这样的话，当然会注意的”。^[136]

戈洛·曼写回家的信听起来是那么开心，他却需要能向皮埃尔·贝特鲁吐露心声的机会。这位朋友写信告诉父母，说戈洛抱怨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名人父亲的儿子来看待；父亲对他态度冷淡，让他很不好受。他曾说过，他父亲“似乎从未给他写过只字片语”——戈洛甚至以《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为例。他在父亲那里是那样无足轻重，在这篇小说里连他的影子都没有。尽管如此，戈洛对父亲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间长了，这位法国人受不了他的这位德国朋友总是不停地谈论他的家庭和父亲。贝特鲁写信给父母，说戈洛的命运当然比较悲哀，但“托马斯·曼的命运也很悲哀；围绕着他的都是些杂碎、难缠和超级紧张的事”。^[137]

这两个朋友在巴黎上夏季学期。戈洛想在回到柏林前积累些实际经验，便以一个热忱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去体察普通工人的生活。他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南部的下劳西茨（Niederlausitz）煤矿里当矿工。他在干苦活时显得笨手笨脚，矿工们表现了排斥的态度。最终他碰伤了膝盖，不得不离开那里。好在他能够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文章，介绍在矿山劳动的经验。那家报纸把他当作“托马斯·曼的二儿子，克劳斯·曼的弟弟”来加以介绍，这是无法避免的。戈洛·曼在文章里介绍了工人们的小资梦想和缺失的革命意志，对此他感到困惑。他写道，作为大学生必须参与工人的“解放”，别指望工人自己会发动革命。[\[138\]](#)

戈洛·曼在劳西茨地区的煤矿工作了没有几周时间，却是托马斯·曼家里唯一一个成员，也是唯一的一次——靠体力劳动去挣钱。

7月，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结束环球旅行回国：他们从美国前往夏威夷（Hawaii）、日本和朝鲜，又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最后经华沙回到柏林。他们经历了许多事情，结识了很多人，也欠下了巨额债务。在东京时，萨姆埃尔·费舍尔（Samuel Fischer）给他们寄了一笔钱，让他们能够继续旅行，这笔钱算是预付款，资助他们写作一本关于其旅行的书，现在，他们不得不写这本书。他们各自的爱情关系都已破裂，且不谈这些关系当年到底有多当真。在此期间，帕梅拉·韦德金德在跟比她大28岁的剧作家卡尔·施特恩海姆谈情说爱；这一消息对艾丽卡的打击似乎比对她弟弟还要大。艾丽卡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对此，同性恋的格伦特根斯并不感到特别伤心。艾丽卡去美国时给他留下了一屁股的债，还破坏了跟“他的”剧院所签订的合同。[\[139\]](#)他们没有太大争吵就分手了，1929年1月，两人离婚。格伦特根斯这个名字她反正几乎没用过。现在，她又正式叫艾丽卡·曼了。



图6 1927年的曼氏一家：（左起）莫妮卡、米夏埃尔、戈洛、卡蒂娅、托马斯、伊丽莎白、艾丽卡和克劳斯·曼

*

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的《到处游历——一次世界之旅的冒险经历》（*Rundherum: 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 以下简称《到处游历》）出版了。他们俩没花多少时间便把这本书搞定了，很多内容都出自克劳斯·曼在美国写的游记，其他部分则简单地勾勒，一蹴而就：跟所有名人，特别是在美国的相遇相识，他们的各种经历，还有为挣钱而付出的各种努力。这本书格调轻快而肤浅，态度严谨的费舍尔出版社在《德国图书贸易交易报》（*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为该书打的广告上干脆说明，作者们“没有进行批判性的观察，也没有对这些国家和人民进行深入的思考”。

[140]确实如此：透过豪华旅馆和高级饭店的玻璃窗，他们没有真正看到实处。这本书是他们这次旅行的真实写照：一对出身名门的姐弟凭借诙谐、大胆和父亲的名声闯荡世界，把他们的旅游经历写得非常吸引人，趣味横生，却主观得一塌糊涂，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想另辟蹊径，写出另一种格调。出版社不久又印行了第二版，有一些评论还很

不错。对此，雄心勃勃的克劳斯·曼好像并不苟同：“当年对严肃的《四人歌舞剧》就这德行！”[\[141\]](#)。

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充当曼氏家族的崇拜者。像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就觉得讨厌。《到处游历》一书出版后不久，他就在《世界舞台》上讽刺“诗人的孩子们”的环球之旅和他们对私人生活的公开渲染（“艾丽卡·曼抵达柏林，为了结婚、离婚、复婚和出席葬礼”），嘲笑克劳斯这位年轻的作家，讥讽他为宣传自己而大吹大擂（“克劳斯·曼在草拟他的第100个广告笔记时扭伤了右臂，所以今后几周讲话不方便”）。[\[142\]](#)。

皮埃尔·贝特鲁回法国去了。戈洛·曼借此机会也离开了柏林。他想在海德堡继续学业，之前不得不接受一次膝盖手术，那是在矿山劳动受伤的结果。四年前，戈洛已经接受过一次膝盖手术，之后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抑郁症，正如他猜测的那样，是麻醉引起的。面临手术，他现在忧心忡忡。两个星期后，他告诉皮埃尔·贝特鲁，不仅一切都很顺利，他父亲甚至来到病床边探望过他，父亲是“自己开车来的；两人的交谈非常有用，气氛很轻松；真是值得怀念的经历”。[\[143\]](#)。

克劳斯·曼一直在路上，他从不在一个地方逗留得太久；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好像旅行是他的第二天性一样。4月，克劳斯写信给艾丽卡，介绍他在巴黎的生活。他称艾丽卡为“我的第一情人”。虽然天性开朗，充满着冒险精神，在他生命的天空中当然也会出现乌云。克劳斯告诉姐姐，“忧郁的乌云笼罩”在他的心头，[\[144\]](#)一再把他的推向深渊，死亡的念头经常成为一种危险的深切渴望，而后生命又成为胜利者。写信告知忧郁症后两周，他又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充满欢乐的情绪。有位朋友让他介绍巴黎的夜生活，那人为了他们俩花了很多钱，“做得非常理智，非常有情趣，

非常温柔。亲爱的艾丽卡，我们也逛了妓院；他跟一个小矮胖姑娘拼命地干，干得她嗷嗷直叫；一个黑丫头特别妩媚动人，我上她时却硬不起来，让她也很不好受”。[\[145\]](#)

阿达贝特·德吕墨（Adalbert Droemer）是莱比锡科瑙出版社（Knaur Verlag）的总经理，他给了托马斯·曼一个诱人的出版计划。德吕墨想出版廉价的大众版《布登勃洛克一家》。这位出版商给托马斯·曼10万马克的稿酬。托马斯·曼前往柏林，跟萨穆埃尔·费舍尔商谈。这位出版商拒绝了；他看不上大众图书市场，但更不想放弃该书的版权。在出版社跟其最重要的作家的关系处于危机之际，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的机会来了。萨穆埃尔·费舍尔的这位女婿在跟布丽吉特·费舍尔（Brigitte Fischer）订婚时许诺，放弃医生的职业并于1925年进入出版社工作，他提出了自己的出书预算。最终，萨穆埃尔·费舍尔改变了主意。费舍尔出版社自己出版了大众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

正当托马斯·曼成就了一生中最大生意之际，世界经济跌入了一场最严重的危机之中。10月24日，即“黑色星期四”，纽约股市大幅下跌，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破裂。危机给德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更何况因战争的后果和赔款，国家本来就遭到了削弱：贷款被撤走，生产在减少，失业在增加。不久前，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去世，他是外交部部长，也是推动德国跟法国与欧洲和解的中流砥柱。

托马斯·曼关心的自然是其他事情。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又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等待，让评委会去作决定，以满怀信任的眼光注视着命运的发展——托马斯·曼不大喜欢这么做。好几年来，他力图摸清斯德哥尔摩的气氛，对那些他认为有影响力的人物施加影响。格哈特·霍普特曼作为最后一个德国人，于191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

虽曾多次力荐托马斯·曼，却一直未果。1929年10月，托马斯·曼写信给霍普特曼：“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消息说，经过一帮中学教师的大力举荐和宣传，阿尔诺·霍尔茨（Arno Holz）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怎么看待这一消息？”他觉得选上这位德国诗人和剧作家“既荒唐，又耸人听闻”，“整个欧洲都将挠头表示无法理解”。托马斯·曼保证，他说得“很客观”，他自己“得生活下去”（从物质的意义上）并衷心希望“聪明和重要的里卡尔达·胡赫（Ricarda Huch）”获得该奖。“可霍尔茨呢？！那真的会惹起众怒，所以一定要采取点什么行动来加以阻止。”^[146]霍普特曼对这种“把自己绑架到曼氏荣誉战车上”的微妙企图感到好笑。即便如此，他还是照办了，以便阻止和他结下梁子的霍尔茨当选。^[147]他叫一位朋友，名叫汉斯·冯·徐尔森（Hans von Hülsen）的记者在瑞典报纸《今日新闻》（*Dagens Nyheter*）上写一篇相应的文章。托马斯·曼对徐尔森表示感谢。他希望，徐尔森的文章“能对上面起到警示作用”。“不”能出现“某种愚蠢的情况”。^[148]托马斯·曼在给汉斯·冯·徐尔森的信中着重强调了“不”字。三天后，阿尔诺·霍尔茨告别人世。

11月12日下午，一封电报送到了慕尼黑的波辛格大街。卡蒂娅·曼派宝贝女儿伊丽莎白送到父亲的书房，孩子们一般是不可以进去的。她在弟弟米夏埃尔的陪同下，把电报交给了父亲。托马斯·曼荣获192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大部分德国媒体都备受鼓舞，把这一大奖当作民族的荣耀。获奖通知公布后的第二天，自由派的大报纸《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在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和对托马斯·曼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列举了所有那些“至少同样有资格获奖的诗人”，谈到“这样一种奖项的忧伤阴影”。“像阿尔诺·霍尔茨不也有获得该奖的权利吗？鉴于这种情况，他的去世让我感到双重的痛心疾首。”^[149]

克劳斯·曼在柏林获悉了这一消息。“真是蓬荜生辉啊”，他在给艾丽卡的信中这样写道。“所有的人都向我道喜，从银行家夫人到理发的。”他本人“真的是由衷地高兴”。^[150]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父亲的荣誉给他带来的“忧伤阴影”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小，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当朋友艾里希·艾博迈耶向他祝贺父亲获奖时，他在回信时只用了正好一个句子来谈这个问题：“确实，拿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伟大而美好的事情。”^[151]几天后，他在写信跟姐姐聊天时顺便说到，他“偶尔服用点吗啡”。^[152]

12月10日，托马斯·曼在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v V.）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的陪同下，他要驾驭一个盛大和庄严的典礼。卡蒂娅·曼在给艾丽卡的信中写道，托马斯·曼说话时“精神抖擞，兴致勃勃，每一个中午，每一个晚上，无不如此”。在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宴会上，他的演讲“真的是超群绝伦——也难怪，其他人也不过是些自然科学和专业人士”。^[153]奖金额相当于19万马克（今天的奖金额约为90万欧元）。获得诺贝尔奖还促销了托马斯·曼的书籍，尤其是大众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年后，该书廉价版的销售超过了100万册。

德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经济危机之际，正是曼氏家族在经济上巅峰的一年。所有的孩子也都应该沾些光。艾丽卡和克劳斯被免去了他们在环球旅行时欠下的债务。他们俩却不那么开心，因为本来就没想过要还这笔钱。戈洛被告知，因为给大姐和大哥免去的债务数额巨大，他也可以要一个比较昂贵的礼物。戈洛决定要一台留声机。

12月，克劳斯·曼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Alexander*）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这原本是父亲的出版社，《到处游历》出版后也成了克劳斯的出版社。小说叙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泛情色空想：一个胸怀

世界的征服者，其动力来自对男友克雷托斯（Kleitos）的爱情。小说对历史事实自由发挥，让不少批评家气愤不已：《世界舞台》杂志评论说，这本书“幼稚”，类似于“轻歌剧”。其他评论则指出作家克劳斯·曼的进步发展。^[154]克劳斯·曼的最初几本书曾经招来铺天盖地的注意力，现在，这部长篇小说发表后没有引发那种喧闹，或许是因为兴趣在减退，或许是托马斯·曼诺贝尔文学奖的风头盖过了儿子的这部作品。

“不得了啦，我冻死了！冻得受不了了。”圣诞前夕，莫妮卡·曼从巴黎写信回来。她在那里上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在给姐姐艾丽卡的信中却更喜欢谈其他事情，比如天有多冷。而天冷也有它的好处：山中有积雪，她想去萨瓦省的阿尔卑斯山（Savoyer Alpen）滑雪，对此，“莫妮佳（Monigga）特别期待”。她们的滑雪团队有60人之多，“可能会很有趣”。身处异乡总有点伤感，莫妮卡继续写道，其字体飘逸、隽秀，却有别于家人的风格。她说吃得太多，裙子嫌紧，下个星期一去剪个“短短的齐刷刷的男孩头”。她有一件连衣裙，黑底色带点彩色的绣花，“很有艺术感，把我衬托得十分靓丽”。莫妮卡在社交方面也有收获：“巴黎市长很喜欢我，最近在舞会上跟我密切互动。”^[155]

1929年，艾丽卡·曼在慕尼黑摄政王剧场演出的席勒《唐卡洛斯》（*Don Karlos*）里扮演女王伊丽莎白，受到相当的好评。接下来，她在巴伐利亚国家剧院1929~1930年的冬季演出季登台演出。她不喜欢要她扮演的角色，就向总经理表示不满。这位刚满24岁的女演员写信向总经理挑战，要求扮演其他角色，所用的口气肯定让他感到惊愕不已。艾丽卡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久，艾丽卡·曼在柏林投入演出，而不是继续在慕尼黑生气。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在德意志剧院导演了安德烈-保罗·安东尼（Andre´-Paul Antoine）的法国通俗喜剧《可爱的女敌人》（*Die liebe Feindin*），让他前妻出演一个小

角色。3月11日为首场演出。该剧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准备延长演出周期。可艾丽卡·曼又撂了挑子，她又有了其他打算，想跟弟弟克劳斯一起开车去非洲旅行。托马斯·曼不得不出马帮忙，请剧院老板马克斯·莱因哈特更换角色。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暴跳如雷。对他来说，话剧就是一切，他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够拿这么成功的一出剧不当回事，如此轻易地放弃，只是为了一次寻欢之旅，既没有特别的缘由，也没有什么必要。接下来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一年后，克劳斯·曼在给艾丽卡的一封信里影射此事：“是吧，将来一旦事业前景在召唤，就立刻取消驾车旅游！——你的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还补充道：“我恨透他了。”[\[156\]](#)

年初，艾丽卡和克劳斯·曼驾车旅游，经瑞士去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最后来到北非。克劳斯·曼从摩洛哥的非斯市（Fez）给一位朋友写信：“几天来，我们在一个童话般的阿拉伯城市——你根本无法想象它有多阿拉伯，我们住的旅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支付能力。”他还补充说：“我们在吸大麻（别告诉别人！）。”[\[157\]](#)吸毒的实验失去了控制。艾丽卡·曼经历了一场恐怖之旅。在姐弟俩的通信往来中，“非斯”变成了一个暗语，象征着他们一生中最可怕的经历之一。

德国在讨论同性恋。国会也在讨论《刑法》第175条——该条款禁止同性恋，违者受到惩罚——讨论的焦点是放开抑或按照右翼保守派的要求甚至加大惩罚力度。托马斯·曼公开发表了意见：“这一条款必须取消。”对成年人交换“性的温柔进行暗中侦探，有失于一个法治国家的体面”。他要求“多一点幽默，多一点理智，多一点人性”！“雅典并非因为男童之爱，而是因为它的政治无能才走向毁灭的，而我们始终有可能重蹈其覆辙，哪怕祖国更严厉地对待同性恋。”[\[158\]](#)

暑假，曼氏夫妇带上三个小的孩子去立陶宛的奈达（Litauen, Nidden）。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上一年见识了库尔斯沙嘴（Kurische Nehrung），他们特别喜欢东海的沙丘景色，所以在那里找了一个度假房。他们于7月第一次前往那里。母亲在给艾丽卡的信里说，抵达目的地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全村空无一人，港口却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所有的人，渔民也好，游泳的人也罢，都摩肩接踵，伸长了脖子，掏出照相机，享受着乔迁新居的热闹场面”。房子“漂亮极了”，“几乎是尽善尽美”。连陪同父母一起来的莫妮卡也受到了热烈情绪感染。母亲写道，“我们的梦勒（Mönle，即莫妮卡）情绪不错”，她“最后也心情舒畅了！”^[159]

四个星期后，该跟艾丽卡谈谈正经事了——关于钱的事。母亲写道：“虽然有得罪你的危险，我还是必须说出来，你今天要钱让我堵得慌。”父母最近为艾丽卡和克劳斯“花了很多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作为礼物免去了他们的债务，母亲迫不得已刚往非洲寄了1700马克，“现在又要650马克，全部都意外地要从邮局汇款，这让我非常不爽”。他俩要钱的方式也够气人的，“总是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前不久，为了给克劳斯寄300马克，我不得不直奔邮局，今天是20号，你又来了，为了一张22号要到期的汇票”。在宣泄了这段火气后，母亲用这句话打住：“还有这等事！”写到这里，她已经平静了下来，又讲述起家里的新情况：父亲在小说《约瑟》的写作方面进展良好；她父母很快要来访；另外她的同胞弟弟克劳斯已经来过奈达，他是个“相当可爱的客人”，虽然“以对牛弹琴的方式努力教育比比，而不是回到胡布西（Hubsí）”，即他自己儿子那里。^[160]

经济处于谷底，失业人数在飙升：股市崩盘前的1929年10月，失业人数为150万，到1930年底，已经接近500万。在德国大城市周围，形成了简陋小木屋组成的棚户区，失业人员穿梭于全国各地到处打工，赈灾食堂仅仅能够减轻一点饥饿的苦难。^[161]由资产阶级政党和

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破裂。之后组成了由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借助于兴登堡总统签署的紧急法令执政。9月14日的国会选举给极端政党，尤其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贬称“纳粹党”）带来许多选票，使该党成为第二大政党。“纳粹”在议会的议员人数达到107人，之前为12人。选举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政党的人数超过了600万。两周后，克劳斯·曼在给艾里希·艾博迈耶的信里写道，他“害怕希特勒的独裁专制”。^[162]10月17日，托马斯·曼在柏林的贝多芬大厅向德国民众发出号召，面对那些极端势力及其“暴力独裁”，站到社会民主党人一边，捍卫共和，跟敌人作斗争。^[163]纳粹党人的战斗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愤怒地发表长篇文章，反击托马斯·曼为社会民主党所作的“宣传讲话”，指责他“显然受到犹太人的指使”！^[164]

至此为止，戈洛·曼在海德堡集中精力学习。之前的几个学期，他在学习上很盲目，现在，哲学成了他的主专业。戈洛想在他敬佩的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那里写博士论文。本来最让他感兴趣的专业是历史，但德国各大学讲授的历史局限于本民族的角度，这让他兴趣全无，遂把历史贬为副专业。9月的选举把戈洛·曼从故纸堆里震醒。一位朋友带他去社会主义学生会，一个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其主要对手是纳粹大学生。戈洛·曼很快便成为该会刊物《社会主义大学生》（*Sozialistische Studenten*）的主要评论员。他在1931年1月非常感叹地给自己和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会在大学生中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虽然纳粹“在精神上是如此卑鄙无能”。只要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潮流的主要著作加以对比，立刻就能看到鲜明的例证：马克思的《资本论》（*Kapital*）跟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戈洛·曼写道，前者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浸透着德国哲学的成果，保持了德国智慧的最高水平”，后者则“是一部主观自负之作，在几个月内匆匆写就，语言上

粗俗不堪，思想上草率得无以复加”，封面上的作者“蓄着一撮精心打蜡的小胡子，姿势像个女佣们在1900年崇拜的偶像”。戈洛·曼继续写道，民族社会主义反对什么，这很清楚，但它追求什么，却不那么清楚。把民族主义和各国之间的争斗宣布为积极的目标，实在是可悲至极。“纳粹分子在世界观上需要一个藏身的屋檐，却没有能力去建造一个新的，于是再一次把陈旧的、四处漏风的民族主义洗刷出新；我们正在经历最后一场死灰复燃，其撩拨的火焰完全有可能吞噬人类近两千年来所创造的一切。”[\[165\]](#)



图7 1930年夏天在奈达的新度假房前：阿尔弗雷德（右三）和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右二），伊丽莎白（左一）、戈洛（左二）、卡蒂娅（左三）和托马斯·曼（右一）

艾丽卡·曼不时在问自己，如果要她去小地方演出或者扮演她不喜欢的角色，是否真的还想当演员。旅行，最好是开车旅行，给她带来的快乐跟舞台一样多。1931年初，她跟着参加了一场横穿欧洲的汽车大赛，这是上层社会所热衷的一种享乐方式，比赛由汽车俱乐部ADAC和福特公司举办。陪她参赛的是少年时代的男闺蜜里奇·哈尔加藤，克劳斯没有驾照。比赛进行到10000公里处，他们俩在15个车队中率先冲过终点。在环球旅游并出版了《到处游历》一书后，艾丽卡·曼间或给报纸写些文章，报道一些类似汽车大赛之类的经历。在3月的

《速度》（*Tempo*）杂志上，艾丽卡·曼发表了一篇文章并总结性地写道：“不久之前，出现了一种新型女作家，在我看来，她们最有前途：这些女作家以文章、戏剧作品和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她们不表明观点，不触及自己的灵魂，本人的命运与作品没有丝毫干系，她们进行报道而不是忏悔。这些女作家对世界十分了解，知之甚多，风趣，聪慧，而且有让自己置身事外的本领。”^[166]不过，这些特点均不适用于艾丽卡·曼本人，因为她的文章只涉及艾丽卡·曼自己，还有她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在旅馆吃果酱时的各种经验，因为超速行驶而收到的罚单，“我是如何结识汽车理工工的”，在“父母家中与各种名人打交道”，等等。“没有干系”，“置身事外”：若用这些词语来形容风情万种的艾丽卡·曼，那就大错特错了。

她弟弟戈洛在海德堡继续跟纳粹同学激烈辩论。作为政治对手，双方在游行或集会时，或在教授们的讲座课及讨论课上相遇时，一方要维护，一方要捣乱。戈洛·曼在大学生报纸上写文章，一再攻击民族社会主义在智力上的浅薄。戈洛写道，纳粹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大学同学最愤愤不平的是：“我们比他们更聪明。”^[167]海德堡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德里希·贡多夫（Friedrich Gundolf）经常邀请戈洛来家里，并给他写了一首诗：

他用笔头而非刀剑，
去刺激顽固的小爬虫。^[168]

终于有一天，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反击了。一帮大学生将戈洛·曼团团围住，用棍棒打他，直到一位朋友把头上冒着鲜血的他解救出来。

最近一个阶段，克劳斯·曼的信件发自不同的地方：瑞昂莱潘（Juan-les-Pins）、邦多勒（Bandol）、柏林、慕尼黑、巴黎……他

在8月写了类似诗歌的《向第1200个旅馆房间致敬》（*Gruß an das zwölfhundertste Hotelzimmer*）。

为了过圣诞节，克劳斯·曼坐车回家。“跟戈洛聊天，很有意思，先谈政治，后谈情色之事”，他在日记里写道——几周前他开始记日记。慕尼黑父母家中的气氛让他们俩感到压抑。兄弟俩都谈到“家庭生活和各种负担”。戈洛·曼差不多跟克劳斯同时开始写日记。他在日记中称父亲为“TM”或“老头儿”，而从不像其他兄弟姊妹那样用“魔术师”来称呼。戈洛写道，“老头儿”在他眼里“既倔强又陌生”。“我不能说，在这里感觉很好。”他在圣诞夜的前一天写道：“我们经历了多么苦难的童年啊。”^[169]

*

1月13日，在慕尼黑的联合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妇女和平大会。里奇·哈尔加藤的母亲康斯坦采（Constanze）是组委会成员之一。法国女作家玛赛·凯皮（Marcelle Capy）为主要演讲人。艾丽卡·曼将朗诵几篇文章，但她病了，发烧，本应当卧床休息。可她在克劳斯的陪同下硬撑着参加大会。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记道：“纳粹小儿企图挤进会场进行捣乱，搞得人心惶惶”，引起了“短暂的混乱”。^[170]比起当晚的后果，更严重的是其他一系列的反响。三天后，《人民观察家报》撰文谈到“慕尼黑和平主义者的丑闻”和“反对德国国防的煽动性宣传”。艾丽卡·曼的登场“特别令人作呕”。她是个“妄自尊大的臭丫头”。“‘曼氏家族’已逐步演变成慕尼黑的一桩丑闻，到了适当的时机必须了结。”其他纳粹报纸也攻击会议的举办者，尤其是艾丽卡·曼。她弟弟伸出援手，以慎重的口吻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晚情况的反驳文章。一个纳粹评论员发誓“要好好警告他一下”。^[171]艾丽卡·曼的回击跟弟弟不同：她状诉纳粹报纸进行诽谤，还打赢了官司。

这对周游世界的姐弟对所有的狂热与堕落寄予同情，早已招来了批评家们的抨击。这些批评家希望在德国的舞台上和小说里看到坚强的、捍卫民族荣誉的年青一代。现在，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也像父亲一样，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敌人。

1932年1月，克劳斯·曼又一次前往巴黎，见到了他崇拜的伟大偶像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克劳斯在日记里满怀激情地记下了跟纪德度过的那个下午，说纪德“热情，知识渊博，狡黠，有好奇心，深奥莫测”。他记下了纪德的一句名言：克劳斯“有巨大的能量去要一个东西，却没有一丝能量去拒绝一个东西”。纪德所指，主要是毒品，从1929年秋季开始，毒品已成为克劳斯·曼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跟纪德见面前一周，他在日记里对可卡因与吗啡的不同功效进行了详细描述：吗啡“对身体作用强”，见效快；可卡因“更容易上头”，不容易让“身体似腾云驾雾般酥爽”。跟纪德交谈三天后，克劳斯·曼见到了老朋友——作家让·科克托（Jean Cocteau），两人一起抽鸦片。克劳斯·曼觉得鸦片跟吗啡基本上差不多，“略淡一点，医疗功效少一点”。^[172]第二天，他又试了一点新东西，并写信告诉姐姐艾丽卡：他注射了海洛因，“因为我可是一个好奇的小不点”。毒品“确实让人舒坦，着实有用”。^[173]要拒绝一样东西也真不是克劳斯的的天分。

在毒品方面，艾丽卡·曼也好奇，也喜欢尝试新东西。一年半前，克劳斯·曼就曾开玩笑地给她写信，叫她不要“享用太多的‘奥卡（Euka）’”，即他俩经常服用的吗啡衍生品羟考酮（Eukodal）——“它会败坏整个性格”。^[174]其实她对毒品也有瘾，但比弟弟更能控制住毒瘾，也没有不断地加大剂量或增加吸毒的次数。对外，她比克劳斯掩饰得更为巧妙一些。

像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对毒品的迷恋让姐弟俩亲密无间，他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游历，一旦不在同一个地方相聚，就相互写信。艾丽卡不喜欢公开谈论情感，而克劳斯间或会迫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1932年1月，他在尝试各种毒品时写信给姐姐：“左手托着全世界，右手托着你——你看，在飘悬中保持着平衡。”^[175]

米夏埃尔继承了曼家的传统：他不是个好学生。早在二年级（现今的六年级）时威廉文理中学就已经抱怨“他有烦躁不安的倾向”，直到拿年终成绩单前不久，母亲还非常担心幼子能否升级。^[176]他还是升级了，但在文理中学的第三年，学年刚过三分之一，暑假时他拿着成绩单回家，数学、拉丁语和自然课的成绩是“差”。到了圣诞节，他的糟糕成绩就更糟糕了：拉丁语和数学甚至拿了“不及格”。^[177]谁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反正年度成绩单是没什么好结果了。卡蒂娅·曼在这一学年结束后作出决定，把她的小儿子也送进寄宿学校。1932年复活节后，米夏埃尔去位于上巴伐利亚的新博伊恩宫殿邦教育学校（Landerziehungsheim Schloss Neubeuern）上学。

3月7日，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做了一个梦，令人毛骨悚然：纳粹强迫魔术师自杀，之前因为一篇关于奶油问题的文章早想把他抓起来；而且要他开枪自杀，心口带着枪伤，从六楼跳下去（这发生在下一场总统选举之前，那场选举中希特勒终于得逞）。我在恐惧中惊醒了。”^[178]

右翼和左翼激进党派，尤其是右翼党派的支持者大增。4月举行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之前托马斯·曼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德意志之深思熟虑的胜利》（*Sieg deutscher Besonnenheit*）的呼吁。他希望“德国不要蜕变成为血腥的疯人院”。“我因此而厌恶那种自称为‘民族主义’的卑鄙混合物，厌恶伪装的革新，其本身不过是一场愚蠢和漫无目的的混乱，只会制造混乱与不幸，这种由陈腐的循规蹈矩和大众

闹剧拼凑而成的破烂大杂烩，高中德文老师在它而不是一场‘人民运动’面前卑躬屈膝，它不过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在欺骗人民和毒害青少年。”^[179]

5月，戈洛·曼的博士考试在海德堡举行。考试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戈洛交上了一篇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论文，卡尔·雅斯贝尔斯不满意，答辩考试的成绩也一般。戈洛·曼以“良好”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对于有抱负、寻求认可的戈洛·曼来说，这不啻一个失败，他曾对自己博士论文的重大意义有过憧憬：这篇论文“可以成为曼氏家族的理论基石”。^[180]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家中第一个能够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就在他对分数感到气恼之际，父母亲非常自豪，送给他一辆汽车。戈洛·曼已经有了下一步计划：他想通过国家考试，成为一名文理中学老师，以后也许争取拿到一个教授职位。

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又在筹划一次驾车旅行。他们想在5月6日，即戈洛·曼博士答辩的日子，开始前往波斯的一次大型驾车旅行，同行的有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Annemarie Schwarzenbach），她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瑞士企业主家庭，跟克劳斯分享对毒品和对姐姐艾丽卡的激情，里奇·哈尔加藤也同行。可就在启程的那一天，里奇·哈尔加藤自杀身亡。姐弟俩如五雷轰顶。克劳斯·曼是因为跟哈尔加藤一样，深知抑郁和对死亡的渴望意味着什么，朋友之死犹如一道闪电在他身边闪过；艾丽卡则是因为她曾经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任务，即通过自己的强势和对生活的勇气来劝阻情绪波动的里奇，不要受到死亡的诱惑。为了转移注意力，艾丽卡和克劳斯·曼跟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随即一同开车前往威尼斯。父亲忧心忡忡。他本人已失去了两个因自杀而亡的妹妹——1927年，尤莉亚·曼（Julia Mann）继卡拉·曼（Carla Mann）之后也寻了短见。托马斯·曼写信给艾丽卡表示安慰。艾丽卡还在反思，本来是否有可能阻止“里奇犯浑”，并以此来折磨自己。父亲写道，她已经尽到了“朋友所能尽到的责任（并

非所有朋友都如此），支持他并打消他对死亡的憧憬。没有你和你对他的权威，他肯定早就服从他那迷惘的心绪并行使死亡的自由，只不过这一次你没能阻止他而已”。^[181]艾丽卡感谢父亲的安慰，说他写得“总体上是对的”，“却也不尽然”。^[182]她的力量还没有大到足以阻止里奇自尽，“这太让人伤心了”。

年初，克劳斯·曼的两本书同时出版。一本是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无穷无尽里的碰头地点》（*Treffpunkt im Unendlichen*），讲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描写了爱情、毒品和自杀。老出版商萨穆埃尔·费舍尔将此书称为克劳斯·曼“第一本真正的书”。^[183]相反，批评家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报》上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克劳斯·曼具有写作天才，将他的龌龊生活照抄不误，却没能从中领悟出某种意义，还自我感觉良好。”克拉考尔的结论是：“一个被污染了的天才。一部粗制滥造的作品。”^[184]

克劳斯·曼年初出版的第二本书叫作《这个时代的孩子》（*Kind dieser Zeit*），一本回忆录。他以25岁的年纪，用欢快的语调公开回顾其一生：慕尼黑的孩提时代，夏天在巴特特尔茨度过的田园时光，父母家中保姆的管教，相距遥远的父亲，往往只能通过雪茄烟的气味才能感知到他的存在；他写到母亲——儿子心目中的英雄，在世界大战期间和艰难的岁月里要照顾好一大家子，这一任务造就了她；最后，克劳斯还描述了他无羁无绊、敢于冒险的青春期。这本书写到克劳斯·曼开始作家生涯时结束。这是一本呼唤美好时代的书。恩斯特·克劳依德（Ernst Kreuder）在《傻瓜》杂志上写道：“这本书读起来这么顺畅，始终让人感到惋惜，要知道书中所写的年代曾是那样的艰难与沉重。”然后他又表示怀疑：“难道并非如此吗？”这样看待并向公众展示他的青少年时代，对克劳斯·曼来说是一种需求。克劳依德觉得这本回忆录缺少距离感：“非要现在就写吗？”^[185]

托马斯·曼于7月初前往奈达，陪同他的是朋友、作家兼翻译家汉斯·赖西格（Hans Reisiger），其他家人两周后再去。7月31日举行国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获得37%的选票，成为议会的最大党，把其他政党远远甩在后面。但希特勒还不能执政。他没有绝对多数，而此时已经84岁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依旧凭借紧急法令支持总理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

选举前两周，克劳斯·曼曾坐在慕尼黑佳通饭店（Hotel Carlton）的咖啡厅里。他在日记里记录如下：“希特勒就坐在我身边的桌子旁，由一群魑魅魍魉陪伴着。其自卑感暴露无遗，也没有半点天资；他展示的魅力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耻辱，带有某种病理学的特征。” [\[186\]](#)

[\[1\]](#) Vgl. Jens/Jens: Frau TM, S.120

[\[2\]](#) Zit. nach Lahme: GM, S.26

[\[3\]](#) KM an TM, 6.11.1920, in: KM: Rehherz, S.59

[\[4\]](#) 本文人物的完整姓名和昵称详见附录中的“曼氏家族一览表”。——编者注

[\[5\]](#) KM an EM, 3.5.1922, TMA

[\[6\]](#) Vgl. KM an EM, 26.9.1920, TMA

[\[7\]](#) K1M/EM an KM, [ca. 8.6.1922], MON

[\[8\]](#) K1M an TM/KM [17.6.1922], in: K1M: Briefe, S.10f.

[\[9\]](#) KM an EM, 4.7.1924 [richtig: 1922], TMA

[\[10\]](#) »Besondere Schulzensur«1916/17,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37

[11] TM an Philip Witkop, 12.3.1913, GKFA 21.1, S.515

[12] 托马斯·曼原计划写作一部题为《魔山》的幽默、怪诞的短篇小说，后来写成了一部两卷本长篇小说，他自己称其为“被扩写的短故事”。——编者注

[13] KM an TM, 13.8.1922, TMA

[14] Martina Ewald an Paul Geheeb, 11.8.1922, zit. nach Schaenzler: K1M, S.25

[15] TM an Ernst Bertram, 8.7.1922, GKFA 22.1, S.440

[16] Zit. nach Manfred Görtemaker: TM und die Politik, Frankfurt a.M. 2005, S.53

[17] 一位慕尼黑的女作家。（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18] K1M an EM, [Herbst 1922], MON

[19] K1M an EM, [Herbst 1922], MON

[20] KM an TM, [Oktober 1922], TMA

[21] GM: Erinnerungen I, S.94f.

[22] TM an Paul Geheeb, 30.5.1923, GKFA 22.1, S.481-483

[23] K1M an Paul Geheeb, 12.6.1923, in: K1M: Briefe, S.14f.

[24] KM an TM, 13.8.1922, TMA

[25] Vgl. Schaenzler: K1M, S.28

[26] TM an HM, 17.10.1923, in: TM-HM: Briefwechsel, S.182

[27] KM an TM, 2.10.1920, in: KM: Rehherz, S.51

[28] Vgl. KM an TM, 12.2.1924, TMA

[29] KM an TM, 1.2.1924, TMA

[30] KM an TM, 3.3.1924, TMA

[31] Das Zeugnis vom 9.4.1924 ist abgedruckt in: Kinder der Manns, S.65

[32] EM an Lotte Walter, 24.5.1924, zit. nach Lühe: EM, S.32

[33] MoM: Vergangenes, S.40

[34] Abgangszeugnis vom 26.9.1924, abgedruckt in: Kinder der Manns, S.65

[35] KM an EM, 5.10.1924, TMA

[36] Vgl. KIM-Schriftenreihe II, S.80

[37] KIM an EM, [ca. Juni 1924] , MON

[38] Vgl. KIM-Schriftenreihe II, S.81f.

[39] TM an EM, 19.9.1924, in: EM: Mein Vater, S.66

[40] TM an EM, 19.9.1924, in: EM: Mein Vater, S.66

[41] Tgb TM, 13.2.1920

[42] Tgb TM, 28.9.1918

[43] Tgb TM, 10.3.1920

[44] KM an EM, 5.10.1924, TMA

[45] Zit. nach GKFA 5.2, S.113f.

[46] Hedwig Pringshei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 24./26.12.1924, in: Thomas Manns Schwiegermutter erzählt oder Lebendige Briefe aus großbürgerlichem Hause. Hedwig Pringsheim-Doh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 hg. von Hans-Rudolf Wiedemann, Lübeck 1985, S.47

[47] KM an EM, 25.12.1924, TMA

[48] Kurt Hahn an GM, 13.2.1925, in: Kurt Hahn: Reform mit Augenmaß. Ausgewählte Schriften eines Politikers und Pädagogen, hg. von Michael Knoll, Stuttgart 1998, S.118

[49] Zit. nach Lahme: GM, S.38

[50] KM an EM, 6.3.1925, TMA

[51] TM: Von deutscher Republik. Gerhart Hauptmann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KFA 15.1, S.515

[52] TM: Brief über Ebert, GKFA 15.1, S.949f.

[53] KM an TM, 4.3.1925, TMA

[5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56

[55] Vgl. KIM-Schriftenreihe II, S.78f.sowie Schaenzler: KIM, S.41f.

[56] Mann在此处有双重含义：既是姓，又指男人。

[57] Gedicht um 1925, zuerst 1999 veröffentlicht in: Ruhe gibt es nicht, S.61

[58] KM an TM, 18.3.1925, TMA

[59] TM: Rettet die Demokratie! Ein Appell an das deutsche Volk, GKFA 15.1, S.978

[60] TM an EM, 7.5.1925, GKFA 23.1, S.161

[61] TM an Ernst Bertram, 14.6. [1925] , GKFA 23.1, S.167

[62] TM an Hanns Johst, 16.9.1920, GKFA 22, S.369

[63] KM an EM/KIM, 27.6.1922, TMA

[64] 卡巴莱小品剧为一种滑稽、幽默的舞台小品剧。

[65] TM: Gesammelte Werke in dreizehn Bänden, Bd.VIII, Frankfurt a.M.1994, S.618-657, hier S.618 und 625

[66] Ernst Bertram an Ernst Glöckner, 20.1.1926, in: TM an Ernst Bertram: Briefe aus den Jahren 1910-1950, hg. von Inge Jens, Pfullingen 1960, S.263f.

[67] TM: Gesammelte Werke in dreizehn Bänden, Bd.VIII, Frankfurt a.M.1994, S.618-657, hier S.643

[68] K1M an EM, 17.5.1925, MON

[69] Paul Geheeb an Thomas Mann, 30.4.1925, zit. nach K1M: Briefe, Anhang, S.668

[70] TM an Paul Geheeb, 4.5.1925, GKFA 23.1, S.158f.

[71] K1M an Paul Geheeb, 16.5. [1925] , in: K1M: Briefe, S.19f.

[72] Paul Geheeb, 27.6.1925, in: K1M: Briefe, S.21f.

[73] TM an EM, 16.8.1925, GKFA 23.1, S.182f.

[74] TM: Über die Ehe, GKFA 15.2, S.1033

[75] Tgb TM, 17.10.1920

[76] KM an EM, 9.9.1925, TMA

[77] KM an EM, 17.11.1925, TMA

[78] Zit. nach Schaenzler: K1M, S.48

[79]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68

[80] K1M an EM, 11.10.1925, MON

[81] 指19世纪德国著名女小说家E. 玛丽特 (E. Marlitt) 。

[82] 20世纪英国著名言情女作家。

[83] Zit. nach K1M-Schriftenreihe II, S.139

[84] KM an EM/K1M, 26.10.1926, TMA

[85] TM an EM, 6.11.1925, GKFA 23.1, S.201f.

[86] K1M an TM, 6.11. [1925] , in: K1M: Briefe, S.27

[87] 又译作《西木卜里其西木斯》。

[88] Vgl. K1M an Stefan Zweig, 12.12.1925, in: K1M: Briefe, S.28; der Brief von Zweig scheint verloren zu sein

[89] HP an Dagny Langen-Sautreau, 8.3.1907, in: Thomas Manns Schwiegermutter erzählt oder Lebendige Briefe aus großbürgerlichem Hause. HP-Dohm an Dagny Langen-Sautreau, hg. von Hans-Rudolf Wiedemann, Lübeck 1985, S.26

[90] HP an Maximilian Harden, 19.11.1909, in: HP: Meine Manns. Briefe an Maximilian Harden (1900–1922) , hg. von Helga und Manfred Neumann, Berlin 2006, S.101

[91] TM an HM, 27.2.1904, in: TM-HM: Briefwechsel, S.98

[92] KM an EM, 7.1.1926, TMA

[93] TM: Pariser Rechenschaft, GKFA 15.1, S.1115

[94] Zit. nach GKFA 15.2, S.776f.

[95] Zit. nach K1M-Schriftenreihe II, S.150

[96] TM an EM, 6.11.1925, GKFA 23.1, S.202

[97] K1M an EM, 16.1.1926, MON

[98] Zit. nach TM: Essays III, S.13

[99] TM an Philipp Witkop, 2.4.1926, GKFA 23.1, S.225

[100] KM an EM, 6.5. [richtig: 6.] 1926, TMA

- [101] EM an Pamela Wedekind, Juli 1926, in: EM: Briefe I, S.13
- [102] KLM an Pamela Wedekind, 26.7. [1926], in: KLM: Briefe, S.37
- [103] Tgb GM, 30.10.1931, zit. nach Lahme: GM, S.43
- [104] TM an Hugo von Hofmannsthal, 7.9.1926, GKFA 23.1, S.245f.
- [105] KM an EM, 22.8.1926, TMA
- [106] HP an Maximilian Harden, 2.8.1912, in: HP: Meine Manns. Briefe an Maximilian Harden (1900–1922), hg. von Helga und Manfred Neumann, Berlin 2006, S.118
- [107] KLM: Kindernovelle, Frankfurt a.M.1978, S.22 und 97
- [108] L [ouis] Frank an Kurt Hahn, 11.11.1926, TMA
- [109] Kurt Hahn an TM, 13.11.1926, TMA
- [110] 小说名为《约瑟与其兄弟们》(Joseph und seine Brüder), 下文简称为《约瑟》。该小说分为四部, 先后于1933年至1943年间出版。——编者注
- [111] TM an Carl Helbling, 15.11.1926, GKFA 23.1, S.261
- [112] TM an EM, 23.12.1926, GKFA 23.1, S.267
- [113]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II, S.166f.
- [11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79
- [115] TM an Ernst Bertram, 28.7.1927, GKFA 23.1, S.308
- [116] KM an EM, 5.8.1927, TMA
- [117] KLM: Aufsätze I, S.130
- [118] TM an Ernst Bertram, 24.9.1927, GKFA 23.1, S.311
- [119] Tgb TM, 20.2.1942

[120] TM an EM/K1M, 19.10.1927, GKFA 23.1, S.315

[121] KM an EM, 19.10.1927, TMA

[122] KM an EM, 1.11.1927, TMA

[123] TM an EM/K1M, 19.10.1927, GKFA 23.1, S.316

[124] KM an EM, 1.11.1927, TMA

[125] KM an EM, 1.11.1927, TMA

[126]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 28.11.1927 und 1.12.1927, in: Bertaux: Un normalien, S.116 und 121 (im Original französisch)

[127]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 3.12.1927, in: Bertaux: Un normalien, S.123

[128] Die Novelle ist unter dem Namen GMs erstmals 2009 erschienen: GM: Essays, S.31-46, hier S.41

[129]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 20.12.1927, in: Bertaux: Un normalien, S.410

[130] K1M an KM/TM, [5.12.1927], in: K1M: Briefe, S.52f.

[131] Zit. nach Mann oh Mann. Satiren und Parodien zur Familie Mann, hg. von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S.55

[132] Kurt Tucholsky: Auf dem Nachttisch (1928), in: Kurt Tucholsky: Gesammelte Werke, Band II (1925-1928), hg. von Mary Gerold-Tucholsky/Fritz Raddatz, Reinbek bei Hamburg 1961, S.42

[133] K1M: Aufsätze I, S.152

[134] K1M an Pamela Wedekind, 5.2.1928, in: K1M: Briefe, S.54

[135] KM an EM, 8.2.1928, TMA

[136] TM an EM, 7.2.1928, GKFA 23.1, S.338

[137]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 13.1.1928, 28.1.1928 und 1.2.1928, in: Bertaux: Un normalien, S.155, 183 und 280

[138] Zit. nach Lahme: GM, S.62

[139] Vgl. Thomas Blubacher: Gustaf Gründgens. Biographie, Leipzig 2013, S.97f.

[140] Zit. nach EM/KlM: Rundherum. 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 9.Aufl.,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S.149

[141] Zit. nach KlM-Schriftenreihe III, S.62

[142] Zit. nach Mann oh Mann. Satiren und Parodien zur Familie Mann, hg. von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S.56f.

[143] Zit. im Brief von Pierre Bertaux an seine Eltern, 19.3.1929, in: Bertaux: Un normalien, S.321

[144] KlM an EM, 8.4.1929, MON

[145] KlM an EM, 21.4.1929, MON

[146] TM an Gerhart Hauptmann, 15.10.1929, GKFA 23.1, S.425f.

[147] Nach Hans von Hülsen, der in seiner Autobiographie ein Telefonat mit Hauptmann wiedergibt, zit. nach GKFA 23.2, S.447

[148] TM an Hans von Hülsen, 23.10.1929, GKFA 23.1, S.428

[149] Zit. nach GKFA 23.2., S.452f.

[150] KlM an EM, 13.11.1929, MON

[151] KlM an Erich Ebermayer, 15.11.1929, in: KlM: Briefe, S.63

[152] KlM an EM, 19.11.1929, MON

[153] KM an EM, 13.12.1929, TMA

[15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93

- [155] MoM an EM, 18.12.1929, MON
- [156] K1M an EM, 6.5.1931, MON
- [157]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98
- [158] TM: Essays III, S.281f.
- [159] KM an EM, 17.7.1930, TMA
- [160] KM an EM, 20.8.1930, TMA
- [161]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551f.
- [162]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106
- [163] TM: Essays III, S.268
- [164] Zit. nach TM Chronik, S.218
- [165] Zit. nach Lahme: GM, S.71
- [166] EM: Blitze, S.85; die weiteren genannten Feuilletons ebenfalls in dem Band
- [167] Zit. nach Lahme: GM, S.72
- [168]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 S.285
- [169] Tgb GM, 22., 23. und 25.12.1931, zit. nach Lahme: GM, S.86; Tgb KM, 5.1.1932
- [170] Tgb K1M, 13.1.1932
- [171] Zit. nach Lühe: EM, S.86 und 88
- [172] Tgb K1M, 24., 16. und 27.1.1932
- [173] K1M an EM, 29.1.1932, MON
- [174] K1M an EM, 26.6.1930, MON

- [175] KIM an EM, 23.1.1932, MON
- [176] Vgl. KM an EM, 18.2.1931, TMA; Zeugnis vom 26.3.1931, MON
- [177] Vgl. MiM: Fragmente, S.134
- [178] Tgb KIM, 7.3.1932
- [179] TM: Essays III, S.343
- [180] Tgb GM, 30.10.1931, zit. nach Lahme: GM, S.84
- [181] TM an EM/KIM, 25.5.1932, GKFA 23.1, S.633
- [182] EM an TM, 28.5.1932, in: EM: Mein Vater, S.77
- [183] Zit. nach KIM-Schriftenreihe III, S.179
- [184]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121
- [185] Ernst Keuder: KIM: Kind dieser Zeit, in: Simplicissimus Jg.37 (1932) , Heft 9, S.102
- [186] Tgb KIM, 14.7.1932

第二章 在流亡中（1933~1936）

1932年3月22日，13岁的米夏埃尔·曼坐在新博伊恩寄宿学校冰冷的宫殿房间里，给母亲写一封信，谈到昨天举行的“波茨坦日”庆祝会。总理希特勒在会上导演了一场德国民族保守人士团结一致的表演，让米夏埃尔感到厌恶。他写道，会上发表了爱国的演讲，人们挥动着德国和纳粹的旗帜，接着是冲锋队队员的盛大游行。“德国男人在一个德国之夜高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到处都洋溢着“普遍的喜悦与满足”。米夏埃尔写道，只有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叫哈洛·谢林（Harro Schilling）的同学“几乎要作德意志式的呕吐，以更德意志的方式拒绝参加第三帝国的建国日”。然后他要家里给他150马克，以参加复活节的一次学生旅行，去意大利10天。这可能“不合时宜”，“脸皮也太厚了”，但是也许……曼家的孩子们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给母亲写信没有不要钱的，即便到了历史性的时刻也不会打破。“祝福（治好）希特勒^[1]，比比”。^[2]

三周前，哥哥克劳斯打破了这一传统。他非常自豪：“谁在那里写作，那么勤奋地写作？他还不要钱，看不起那些纯物质的东西。”父母去旅行作报告[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题为《理查德·瓦格纳的烦恼与伟大》（*Leiden und Größe Richard Wagners*）]，然后赴瑞士的山里休息，克劳斯从慕尼黑的家中写信给父母亲。2月27日夜里，国会大厦被烧，纵火者据说是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克劳斯·曼写

道，对纳粹党人来说，“这显然正中下怀”，他们可能会“因为此次事件而采取无法预见的措施，所以，对纵火的各种猜测虽然八九不离十，却永远也不许说出来”。好在伯伯海因里希很快便离开柏林远走他乡，“现在，恐怖在柏林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了”。2月28日，克劳斯·曼对德国、对家庭、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就在当天，希特勒政权颁布《国会纵火案法令》（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宣布宪法中的主要基本权利失效。克劳斯·曼写道：“情况不妙，情况不妙，情况绝对不妙。” [3]

不久前，世界看上去还完全是另一种情形。1932年圣诞节，全家人跟以往一样，只要有可能，都聚集在父母家中，情绪高昂地谈论政治和不远的未来。此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纳粹党人的支持率在下降，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不得不接受选票减少的事实，1930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不仅仅是曼氏一家人认为，危险已经过去。 [4]

克劳斯·曼从伦敦回到慕尼黑，他在伦敦的生活依然如故：住普拉扎旅馆，吸毒，在土耳其“夜浴店” [5]里寻求性接触。他的归来让弟弟戈洛十分开心，之前，在哥哥姐姐未归的情况下，戈洛在父母家中过了几天。单独跟父母或跟父亲一人在饭桌边谈话让他觉得难受，为此，一到吃晚饭的时间，他就去散步。艾丽卡也回来了，在准备她的小品剧《胡椒磨》，其中由她本人跟女友兼情人特蕾莎·吉赛（Therese Giehse）出演主要角色。克劳斯·曼为这台小品剧写了几篇台词，该剧将于1933年元旦在宫廷啤酒馆的“糖罐剧场（Bonbonniere）”举行首演；此时的《胡椒磨》并非像后来那样以政治性和战斗精神著称，而是集“诙谐的笑话与地方特色”于一身，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观众和评论都非常看好。 [6]

父母和六个孩子跟汉斯·赖西格、布鲁诺·弗兰克及聚斯金德等朋友一起过圣诞节，时而探讨严肃的话题，时而聊起轻松愉快的事

情，比如“海因里希的女人”，说的当然不是其前妻米米，而是内莉·克吕格（Nelly Kröger），一个来自红灯区的女子。大家激动地谈论费舍尔出版社的文学杂志《新评论刊》更换主编一事。托马斯·曼的很多文章都是首先在该杂志上发表的。克劳斯·曼认为，撤掉成就显著的鲁道夫·凯瑟（Rudolf Kayser）是桩“骇人听闻的丑事”，他出身犹太家庭，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婿。克劳斯猜测犹太血统的出版商费舍尔一家作出这样的决定，背后有政治动机，即这家出版社要投进纳粹的怀抱。几天后，凯瑟的接班人来托马斯·曼这里作自我介绍：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身材瘦削，金发，世界大战的英雄。克劳斯·曼评价说，他给人的“印象就是想象中的那样，年纪不小的‘流浪者’，对文学一窍不通”。^[7]

虽然家里气氛活跃，政治局面向好，姐姐的成功带来了欢乐，克劳斯·曼却身心憔悴。“感觉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处于低谷，纯粹从事业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8]这种感觉算不上奇特。如果一位作家刚刚写完一部自传的话，这往往是作家生涯中的最后一本书，一本回首往事和告别人生的文献。可是，作为自传作家，克劳斯刚刚庆祝完他的26岁生日。

新年伊始，托马斯·曼给家人朗读他写的一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报告，不久他将在慕尼黑作这一报告。父亲对瓦格纳的迷恋 [《大师与北方的上帝》（*Meister und Nordischer Gott*）^[9]]，儿子们无法苟同。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有问题的那些方面，那些从某种意义上跟纳粹相通的方面（对此，托马斯·曼也同样持拒绝态度，在报告里也谈到这些方面）：民族神话和让人疯癫的那些东西“令人作呕”^[10]。克劳斯跟戈洛·曼在咖啡厅里进行讨论，他们对父亲的评价一致：“内容单一，叙述的展开达到极致。”^[11]

那么如何看待“[希特勒]攫取政权”呢？人们有意把权力交到一个被打败的人手里，这是1933年2月初戈洛·曼的看法，家里其他人也持相同的看法。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看法难得这么一致。

“太累了，连对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发飙的劲都没了。”^[12]尽管如此，戈洛·曼还是希望能够参加国家考试，希望这届政府很快又会倒台，他把希望寄托在其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

姐姐和哥哥跟他的看法不同。要是希特勒上台会怎样——这一联想在过去的一年里时常在脑海里萦绕，答案只有一个：到那时就得流亡国外。^[13]1933年3月，艾丽卡和克劳斯·曼离开德国。跟这个国家他们绝不妥协。克劳斯从巴黎写信给母亲说，他正在安置“简单的流亡生活”。“人们自然会问，感觉如何？经常感觉要骂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工作、要写作都很难；“然后，你又抱着愚蠢的幻想：今天折磨你的，也许会在一个幸福的历史时刻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文艺复兴把后古典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重新发掘出来一样；然后，人们会撰写各种关于曼氏家族有趣的小册子”。^[14]这当然是炫耀自己的家庭。不久的将来会如何，对克劳斯·曼来说完全无所谓，他现在就要发挥作用，就要受到瞩目，就要受人欣赏，作品就要有人读——他已经在制订跟希特勒作斗争的计划，虽然是用笔作斗争，却是干劲冲天，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投入，像现在这样认真。克劳斯在1933年前就已经时常去旅行，以世界的大都市为家，住在旅馆里，一辈子都将不会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跟家乡告别要比在德国扎根的父母或者弟弟戈洛容易得多。他不需多少时日就能适应新的情况。他要成立一家杂志社，文学性与政治性兼而有之，要把伟大的德国流亡者和欧洲的知识分子汇集到一起。

克劳斯·曼暂且以书信的形式进行斗争。他于3月23日宣布退出“德国作家保护协会（Schutzverband deutscher Schriftsteller）”——该协会原本打算把托马斯·曼从自己的行列

开除出去。眼看着人们在新当权者面前投降，面对着“德国的这一罪孽”，克劳斯·曼火气冲天，慷慨激昂地在流亡中首次发表政治见解。^[15]托马斯·曼对克劳斯的这封“粗鲁书信”^[16]大为恼火，就连艾丽卡也不赞同，写信提醒她的“双胞胎老弟”要小心，必须考虑到尚在德国的兄弟姐妹们。在纳粹“大权在握的当下，将受人攻击的把柄奉送到他们的手中”，这样做毫无意义，“在国外应当默不作声，像一头小鹿一样小心，你自己却将把柄交给他们，太情绪化了”。艾丽卡写道，他的怒火可以理解，“犬吠也会让人抓狂”。她自己也写信表示愤慨，“但这些信我不寄出去，否则就太危险了”。像是为了安慰他，艾丽卡建议经常见面，同时警告他不要吸毒：“别吸了，我的上帝，别吸了，正因为当下这样做太容易，所以要能放得下——时代太过糟糕，所以不能在各种诱惑面前随心所欲。”为了强调这一警告，艾丽卡还描述了她跟克劳斯也认识的女性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的一段难受的吸毒经历：“安奈玛丽的胃不停地痉挛，一刻也不停，我痉挛得比她更厉害，蜷缩在只有一张单人床的旅馆小房间里，到了夜里三点，不得不请来安奈玛丽那位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海默理（Hämerli），然后只能竹筒倒豆子般承认了所有的事情，到最后，他用氢吗啡酮才把我们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很厉害的鸦片类止痛药。她在信的结尾写道：“用不着沮丧，跟我们一同受难的都是精英，这种苦难也不会没有尽头，至少不会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这一点我敢肯定。”^[17]

3月，艾丽卡来到在瑞士的父母身边。她跨出德国的脚步，就是迈向流亡道路的脚步。托马斯·曼呢？他于2月离开德国，去国外作报告，旅行结束后正在阿罗萨休假。难道他也开始流亡？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欢迎女儿的到来：“这不是什么偶然，而是我生命中‘阳光明媚’的日子。这几天，我最心爱的两个孩子，大女儿和最小的女儿，都在我的身边。”^[18]他在给自己鼓劲，但在日记里记下了一连串的问题：失眠，服用镇静药片，痉挛性抽泣。他的生活宝殿——保证他

进行艺术创作的中产阶级艺术宝殿受到了威胁。他该怎样生活，即该怎样写作？希特勒上台了，还回德国吗？抑或先在苏黎世安家落户，静观事态的发展？慕尼黑的房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办？家乡怎么办？“大约一年之内不能回慕尼黑，想回也回不去，这一想法我得牢记于心，而且得去适应它。”^[19]可就是做不到——心中不断地产生怀疑，怀疑流亡者，怀疑自己在流亡者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德国是否真的出现了“重要的变革，巨大的革命性变革”，^[20]这一切是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否会是一场革命，一场“不仅迫使阿尔弗雷德·凯尔（Alfred Kerr）和图霍尔斯基，也迫使像我这样的人和英才离乡背井”的革命？^[21]多年来，托马斯·曼跟共和国的敌人进行战斗，虽然算不上坚定的民主人士，却是一名坚定的斗士，反对右翼极端分子，反对纳粹分子，反对好战分子。他痛恨希特勒这个歇斯底里的畜生，^[22]这种仇恨到现在也没有丝毫减弱。托马斯·曼依旧是这一新兴国家的敌人，这个国家在他的家乡日益巩固，民主制度一步步地转变为专制独裁，反对者被关进集中营或遭杀害。尽管如此，托马斯·曼现在还是不想公开表态，他一再怀疑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也一再陷入人生的低谷。比如，作为一名坚定的挺犹人士，他却在日记里为“司法的非犹太化”拍手叫好。^[23]

父亲犹豫不决；儿子戈洛则希望能在德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名文理中学教师。这时，他在慕尼黑照看父母的家。妹妹伊丽莎白非要回到朋友们的身边，回到她的学校，所以在过15岁生日的几周前，即3月，她又回到了慕尼黑。父母跟她告别时忧心忡忡。弟弟米夏埃尔也回到了他在下巴伐利亚的寄宿学校。只有克劳斯·曼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母亲写信，表示担心，分析形势，还提出建议。他在4月12日小心翼翼地写道，这件事可以考虑，那件事也可以考虑，唯一不能认真考虑的，就是回到德国的可能性。“我坚信我们大家都回不去了。”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该断就断，钱和财产，能救多少就救多少，然后筹划在异国他乡的生活。^[24]克劳斯·曼，这个卡

蒂娅·曼眼里的“天才魔少”，^[25]一个辍学者，一个花花公子，一个周游世界的人，一个吸毒和性交上瘾的人，处处惹人注目，深受母亲之爱，虽想方设法要以作家身份成名，却不为母亲所看好：可就是他，对形势洞若观火，判断准确。好像是为了消除这一矛盾，他很快又补充说，他感觉自己在写作时“有点令人可怕地变成了维克多叔叔”。^[26]维克多·曼（Viktor Mann）是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的小弟，一个银行职员：在托马斯·曼的孩子们的眼里，他是家中的一位谦谦君子。

卡蒂娅·曼在回信时写道：“我要回复你的两封信，其中没有一封主要是为要钱的，这在我们的书信往来中算得上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也是一种象征，说明这个时代乱到了何种地步。”儿子表现着从未有过的严肃，对此，她还不想完全当真。“要是可敬的维克多也能在你心中成长，能抵消那‘小资’（母亲通常对儿子吸毒的隐喻）的累赘”，那也许是件好事。当然，她多少受到儿子观点的影响，用好几页纸向他描述了局势的重重困难，以及所作的种种尝试，以便至少拯救一部分财产。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意见一致。卡蒂娅也想来个干净的了断。先是托马斯·曼在费舍尔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奥斯卡·雷尔克（Oskar Loerke）写快信，劝他及早回归。《国会纵火法令》，《授权法》（Ermächtigungsgesetz），一场由国家组织的抵制犹太商店的运动，首部反犹太法律（将犹太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在柏林，就连雷尔克那样坚定的反希特勒人士好像也认为政治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卡蒂娅·曼身处瑞士，她的看法完全不同。从纳粹“一个又一个地实现其梦想”的方式来看，“形势很可能越来越令人发指，越来越荒唐”。战争或者内战是最有可能的后果。“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最好待在外面。”^[27]

四个小的孩子还在德国，这让卡蒂娅·曼非常不爽。4月初，她让戈洛带着伊丽莎白经博登湖进入瑞士；两周后，米夏埃尔利用班级去

意大利旅行的机会，独自从罗马辗转来到瑞士的家中。这时，只有戈洛和莫妮卡·曼还生活在德国。

4月，以歌剧院院长汉斯·科拿帕茨布施（Hans Knapp - ertsbusch）为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人士在慕尼黑组织了一场“理查德·瓦格纳之城——慕尼黑的抗议运动”。他通过广播电台和不同的报纸宣布反对托马斯·曼，反对“诋毁和污蔑德国大师”理查德·瓦格纳。慕尼黑的纳粹分子迫不及待地加入到这场抗议的行列中。^[28] 托马斯·曼在他的报告里对瓦格纳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和崇敬，同时也分析了瓦格纳的“矛盾特征”：瓦格纳的音乐兼具“心理学与神话”的双重性，既是“闹剧”又有“隐匿的悲伤”，既是“悲剧”也是“高雅的玩笑”，“貌似健康的”病态，“腐朽式的”英雄史诗。^[29]《人民观察家报》认为，这一分析在恶毒地攻击德意志民族与其最伟大的艺术家的荣誉。该报尤其感到气愤的是，托马斯·曼甚至敢在外国作报告，对英雄瓦格纳进行这样的攻击。此时，托马斯·曼的家乡慕尼黑的许多德高望重者公开站出来反对托马斯·曼，这正中新当权者的下怀：瓦格纳属于希特勒，而不是托马斯·曼。

纳粹分子，尤其是希姆莱的亲信、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对这一抗议运动作出了反应，接管了托马斯·曼一案。曼家的三辆汽车被充公，银行账号被封，之前，戈洛·曼还从该账号上提取了6万马克，并在法国大使馆的帮助下偷带了出去。到了8月，房子也被没收了，有些家具和书籍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运往国外。海德里希在这场抗议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对托马斯·曼下达了“保护性逮捕令”：他一旦回国，就要被抓起来。

托马斯·曼把这场抗议运动看作自己的家乡城市抗议他本人，“自己人反对自己”，是一种“诅咒”。^[30]这一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也深深地刺伤了他，对他造成的伤害要超过经济上的各种损失和

纳粹当局的违法行为，其程度大概只有之前跟海因里希的兄弟阅墙可以相比。自此刻起，直至其生命的终点，只要谈论到德国，都可以感觉到慕尼黑抗议运动及其造成的创伤所留下的痕迹。即便到了垂暮之年，卡蒂娅·曼一提到这一奇耻大辱，仍会气得暴跳如雷：“他们把我们抛之国门外！虽然我们的生活曾经那样受人尊重！”^[31]

房子虽然被没收了，艾丽卡·曼还是于1933年夏回到了褐色的慕尼黑。她，一个毫无畏惧、被纳粹分子恨之入骨的“堕落腐朽分子”，^[32]多少人都想把她送进“度假之地”——达豪集中营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在跟克劳斯·曼共同撰写的《逃避生活——流亡中的德国文化》（*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 1939，下文简称为《逃避生活》）一书中，艾丽卡描绘了这次冒险经历：“我开车回去，戴了一副深色眼镜，心想，这样他们就认不出我来了。事实上，这更惹人注意。”夜里，她悄悄绕过纳粹的岗哨，进入父母的家中，拿起父亲的长篇小说《约瑟》的手稿，“帽子深深地卡在前额上，手稿夹在宽松的雨衣里”，然后逃之夭夭，“虽然满街都是纳粹分子”。她把厚厚的手稿藏在汽车座位下油腻的工具之间，然后幸运地带过了边界。^[33]过后，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赞扬女儿的这一勇敢行动，有些研究者也采纳这种说法。她弟弟戈洛在《回忆录》（*Erinnerungen*）中写道：“在她无数的英雄业绩中，这是最辉煌的一页。”^[34]问题是，这一切均属虚构，是杜撰出来的，是吹牛皮。这是曼氏家族的一个传奇，众多传奇中的一个——而大部分传奇都出自艾丽卡之口。也许这一传奇被重复了太多遍，就连自己家人也相信了。事实上，早在1933年3月流亡时，艾丽卡·曼就已经把《约瑟》的手稿带走了。3月15日，托马斯·曼在其日记里开心地欢迎女儿和手稿的到来。^[35]

并非传奇的是，4月，托马斯·曼的日记不见了踪影。戈洛·曼原本应当将父亲近几年的日记保存好并寄往国外。装日记的那个箱子一

直没有寄到。家人一再去查询，心情焦虑，以至于越来越陷于恐慌。后来才知道，那个不忠诚的司机是个希特勒的走卒，他向政治警察通报称有一个可疑的箱子要运走。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首先担心的，或者说几乎最担心的，是我的个人秘密受到损害。这种担心非常强烈。有可能发生可怕的事情，甚至是要命的事情。”^[36]最私密的自白与想法，那些虽然距离遥远却让他心仪的青年男子——这一切都将落入令人憎恨的敌人之手，那些粗大笨拙的手：不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描绘其后果。事实上，那个箱子确实在边境被查抄；当局显然以为涉及外汇走私。那些日记本被当成手稿，所以没什么用。历经几周的等待以后，托马斯·曼终于迎来了那个箱子。

4月底，曼家作出了决定：暂时不作决定，先在法国地中海海岸度假，然后静观其变。艾丽卡跟两个最小的弟妹一起先行，前往勒拉旺杜（Le Lavandou），父母几天后再去。伊丽莎白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驾车旅行“棒极了，只是我感觉不太舒服。马路笔直而宽阔，可以飙车，艾丽卡的车开得太好了”。海水“冰冰凉”，“我正在看《新评论刊》上父亲大人关于瓦格纳的文章。我觉得，我把这篇文章读懂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37]

克劳斯·曼不时地在日记里记下所做的梦。作为精神分析时代的孩子，他很重视这些梦。“梦得太逼真了，”他在这一年的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莫妮卡饮弹自尽——因为体重增加了。”^[38]

戈特弗里德·贝恩在政治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他在新政权那里找到了，虽然时间不长。克劳斯·曼给这位他尊敬的诗人写了一封表示失望的信。贝恩回了一封题为《答文学流亡者们》（*Antwort an die literarischen Emigranten*）的公开信：“他们坐在海滨浴场上，要我们进行辩解，因为我们参与重新建设一个国家，其信仰是独特的，其实干精神令人倾倒……”^[39]

1933年夏，全家人在蓝色海岸的萨纳里海滨（Côte d’Azur, Sanary-sur-Mer）为卡蒂娅·曼庆祝50岁生日。这就是戈特弗里德·贝恩讥讽的那些海滨浴场中的一个。曼氏一家在这里租了一幢房子。5月底，莫妮卡·曼来到了法国。作为家庭最后到达的一个成员，戈洛·曼于6月初抵达。前面几周，他是在柏林度过的，作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家中的客人。5月10日，戈洛在柏林歌剧广场（Opernplatz）上见证了公开的焚书行动，眼看着海因里希·曼和克劳斯·曼的作品，还有那本刊发戈洛匿名发表的文学处女作的文集被付之一炬。“可惜我们没逮着这些（作家）本人。”人群中有人在他身边说了这么一句。^[40]戈洛·曼对德国未来的希望破灭了，将来会发生什么，无法预料。在流亡开始的第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家庭是我剩下的唯一所有；这不会是什么好事……”^[41]

过生日那天，所有孩子都聚集在母亲身边，房子里放满了鲜花和一件又一件的礼物，孩子们为过生日的母亲准备了歌曲演唱和诗歌朗诵节目，只有托马斯·曼依旧扮演着他自己认定的角色，“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倒在三角钢琴上”。^[42]少了一个孩子。克劳斯待在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准备他的《文萃》（*Die Sammlung*）杂志。他写来了一封生日贺信，对“我伟大的漂亮母亲”的一生作了总结：“妩媚动人、闻名遐迩的孩提时代，美满的婚姻，难以逃脱的温柔之乡；以最大的谨慎度过了战争、瘟疫和各种磨难；说一口漂亮的法语，学过一点开车；精通数学，熟读荷马，对瓦格纳的所有歌剧和莫泊桑（Maupassant）的所有小说了如指掌；布置过许多别墅，用过锅碗瓢勺，给人送过不少睡裙，在许多书里都被提起过……遭到很多厨师的憎恨，到处都受人尊敬：这一切都可圈可点，而最重要的事情我还没有说出来。所有这些都是纳粹分子望尘莫及的。总之一句话，我非常伤心不能在场，问题是，我要是在场的话，恐怕要小哭一场。”^[43]

虽然生日庆典隆重而热闹，但这半年的狂风骤雨已给这一家人留下了明显的印记。而这不仅仅是对生性脆弱、需要安静、有条不紊的托马斯·曼而言。卡蒂娅的“精力也已大不如前”，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忧心忡忡地这样写道，她常常生病，“这段时间体重减轻了两公斤”。^[44]然后是艾丽卡·曼，她在替弟弟克劳斯朗读给母亲的信时哭了起来。^[45]

流亡生活不是什么享受，在地中海边不是，在其他地方也不是：背井离乡，留下亲朋好友，放弃许多财产，往往是一文不名，心中无底，不知前景，没有希望。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头几个月，有4万多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46]其中许多人曾经是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学者。现在，他们不得不苦熬时日，每获得一份工作，每得到一种支持，都无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陷入贫困、低人一等，这些忧虑始终萦绕在托马斯·曼的脑海里。住在广场旁的第一家旅馆时，他把这些忧虑一一记录在日记里。为慎重起见，1929年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的一半已经存放在瑞士，有10万马克的现金，外加股票，还有戈洛·曼从德国拯救出来的6万马克。德国和外国出版商定期支付稿费。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一如既往，对女儿一家给予支持。家具、书籍和其他一些物品也源源不断地从慕尼黑的家中走私出来。要说一家人会面临贫困的威胁，这谈不上。6月，戈洛、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对拯救出来的财产进行了估算，总价值在20万瑞士法郎左右，换算成法国法郎为100万，这让他们很高兴。买了一辆新汽车，标致敞篷车，花去13000法国法郎。遇到有些境况不如曼氏家族的人，他们给予帮助，这是真实的事情，同样真实的是，他们要给自己孩子钱，包括已成年的。克劳斯·曼于10月在阿姆斯特丹给母亲写信，说他希望每个月的补贴能够“按时拿到”，他本人可惜“做不到放弃它，没它还不行——没辙”。^[47]

克劳斯·曼的很多冒险经历在父母家中闲聊时都上不了台面。“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肥胖妓女把我勾引到里面的房间（‘三个法郎可吮吸……’），我的裤子立马被脱光。然后的事情难以言状。她那风情万种的挑逗（乳房和屁股）。然后逃跑。发现她偷了我50法郎。叫来了警察，回到妓院。从那位突然间悲戚万分、打扮得近乎雍容华贵的老鸨那里要回了钱，没遇到任何麻烦。（感谢警察。）”^[48]1933年：一年都是政治，没有任何爱。这种情况让克劳斯·曼备受煎熬。他在7月写道：“打从离开慕尼黑后……都是用钱来买春：我不得不付钱。水兵、按摩师、街头娼妓。”三天后又写道：“思来想去，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既不像话，又实在可怜，我本不想这样——这都跟艾[丽卡]有关。”^[49]他始终不能跟别人开始固定的爱情关系，原因在于从情感上跟自己的姐姐难舍难分，这一想法一再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在回顾1933年夏天的萨纳里海滨时，路德维希·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将其称为“德国文学的首都”。^[50]德国思想界响当当的名人都来到这里，有的来几天，有的来几周，大家相聚在海滩上、咖啡馆里或仲夏夜的派对上，讨论德国，谈论共产党人即将发动的针对性革命，畅谈自身的前途：来者中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威廉·赫尔佐克（Wilhelm Herzog），埃尔温·皮斯卡托尔（Erwin Piscator），弗朗茨·维尔费（Franz Werfel），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回过头来看，这一切都比当年，即1933年更加有趣：拿戈洛·曼来说，24岁，哲学博士，差一点就要通过国家考试，他现在应该开始做什么好呢？戈洛的朋友皮埃尔·贝特鲁向他建议：投身法国，把它当作自己的新祖国，再参加一次中学毕业考试，再上一次大学，争取成为高年级德语教师。戈洛·曼认为，这一前景十分令人沮丧。跟其他流亡者他又保持着距离。戈洛认为，这些人与其现在对希特勒和自身的命运进行抱怨，不如想办法来阻止他。戈洛在日记里写

道：“昨天晚上，阿诺尔德·茨威格来了，一个爱虚荣、中等聪明、爱唠叨的男人，跟其他人并无二致。除了老爹和海因里希外，我还没见到真正高品位的流亡者。”^[51]戈洛·曼像着魔似的把目光投向德国，注视着那里的政治发展，并在日记里用很长的篇幅进行评论。父亲夸奖说，他的“政治见解有水平”。^[52]可一想到父亲的摇摆不定（“像一只被砍了头的黄蜂”^[53]），看到流亡人士在晚间对形势进行分析，父亲的夸奖很难算得上是一种慰藉。“只要一一开始讨论，我就不得不给自己倒上一杯红酒……‘如果至少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算个啥东西，我怒气冲冲地发问。就是不同的单一国家，这些国家就是现在这德行。国际联盟跟这些国家没什么不同，就是说，国际联盟啥也不是……”^[54]戈洛·曼除了在政治上感到苦闷外，还有另外的不快。他在日记里写道，总的来说，“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看作一种巨大和完全的不幸”。^[55]

在家里，讨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围绕着托马斯·曼跟德国的关系这一话题在进行，还有“那个讨厌的瓦格纳事件”——这是几个大孩子对那一事件的称呼。^[56]在父亲对抗议运动作出第一次保守谨慎的回应之后，孩子们，尤其是艾丽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阻止他再作第二次回应，这种回应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他待在国外是个人受到伤害的结果。^[57]此外，全家人还在讨论，秋天要不要在德国出版长篇小说《约瑟》的第一部。克劳斯·曼的观点是：“你如果满怀激情地离开一个国家，怎么能将自己美好的财富交给它呢？”^[58]对此，父亲表示理解。卡蒂娅·曼随即开始跟流亡出版社“库埃利多（Querido）”谈判，托马斯·曼却又听从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的意见改变了主意。费舍尔苦苦哀求他的这位最重要的作者，甚至建议托马斯·曼回到德国。费舍尔说，那里并非那么糟糕，人在外面，无法正确作出判断，自己的出版社需要他，需要这部小说，以便继续生存下去——也别忘了，有丰厚的报酬……^[59]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坚决表示反对，他妻子和新近备受好评的儿子戈洛也都婉转地表

示反对（“心情激动且不快”，托马斯·曼写道，因为戈洛也“望眼欲穿地等待我发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言论”^[60]）。

托马斯·曼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立场。克劳斯·曼的《文萃》于9月出版，不出所料，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政治文章。比如海因里希·曼抨击“全民教育的倒退”^[61]——行文相当克制，柏林当局依然认定是“诽谤新德意志国家”。^[62]费舍尔出版社让托马斯·曼——他曾宣布是该杂志社的成员——就《文萃》杂志公开表态，同自己的儿子克劳斯·曼划清界限。对于这一举措，德国的宣传部门自然太乐于坐享其成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勒内·施科勒（Rene Schickele）和斯蒂芬·茨威格也都效法托马斯·曼，大家都担心自己在德国出书有危险，或在其他方面受到歧视。

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跟斯蒂芬·茨威格是朋友，两人于1933年11月就《文萃》事件相互致信，信里充满了政治激情。约瑟夫·罗特是位才华横溢的副刊写手、作家和论战家，于1933年毫不迟疑地率先流亡他乡。早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当日，他便离开了德国，在几乎一文不名的情况下踏上了流亡之路。斯蒂芬·茨威格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百万富翁，他从萨尔茨堡静观德国的事态发展，关注日益扩大的流亡运动。

约瑟夫·罗特写道：“跟臭气熏天的鬣狗进行战斗，跟地狱的渣滓进行战斗，就连我昔日的老友图霍尔斯基也是我的战友。纵使《文萃》做错了一千桩事，在反对戈培尔，反对刽子手，反对亵渎德国和德语者，反对臭不可闻的路德屁等方面，《文萃》做得肯定对。”为了排除任何可能遭人怀疑的地方，这位酗酒成病的罗特又补充说：

“我不是在酒后给你们写这封信。现在，我几乎只喝白葡萄酒。我非常清醒。对此，请你们不要有半点怀疑。”

斯蒂芬·茨威格：“请给你们认识多年的人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要一有读不懂的地方，就立马大喊‘背叛’（对托马斯·曼这位最正直的人也不要这样，作为雅利安人，他过去没有必要掺和犹太人的事情）。”

约瑟夫·罗特：“绝对正直的托马斯·曼教授就是单纯。他有天赋，写得比想得好。他的思想跟不上自己的天赋。”两周后他又写道：“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您没看见：对德国来讲，您，（我），阿诺尔德·茨威格……福伊希特万格，托马斯、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曼都是一路货，绝对是相同的犹太狗屎。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已经死亡。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死亡。没有了指望。它的卑鄙下流，它的宽宏大量，都已经没了指望。那只是一场梦而已。请您好好看清这一点吧。”[\[63\]](#)。

有一点，罗特说得不对：德国的卑鄙下流还是可以有指望的。汉斯·约斯特证明了可以怎么做。这位托马斯·曼的超级崇拜者，曾被卡蒂娅·曼视为一个那么“有亲近感”、那么热心的人，对她丈夫的“态度把握得恰到好处”[\[64\]](#)。约斯特虽然在1922年对托马斯·曼走向共和派颇有微词，三年后却还是坐到了托马斯·曼50岁生日的宴席上。作为文化官员和作家，这位约斯特在“第三帝国”飞黄腾达。1933年10月，他给朋友海因里希·希姆莱写了一封信，主要是为了克劳斯·曼的事，他的《文萃》杂志在德国也引起了不安。约斯特写道，估计抓不到“这个半犹太人”，“所以我建议，处理此事时采用扣押人质的办法。难道不可以将在慕尼黑的托马斯·曼先生抓起来一下，补他儿子的过？”约斯特不知道，曼氏家人早已全部离开了德国。他在给他的朋友“海尼（Heini）”[\[65\]](#)的信中还写道，托马斯·曼的作品“生产”“不会因为达豪的秋凉而受到影响”。[\[66\]](#)。

托马斯·曼不知道，汉斯·约斯特正在想方设法把他——自己昔日的偶像——送进集中营。托马斯·曼在日记里盘算着如何能够留在外面，既不属于流亡者的圈子，也不跟德国交恶。“作为外籍德国人，我可以从德国拿到钱，卡[蒂娅]也有希望得到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可能去奈达了，前提当然是德国的形势有所好转，而我们的生活又可以回到较为安全的轨道上来。”^[67]面对儿子，他替自己跟《文萃》杂志公开划清界限进行辩护，还批评儿子“毫无顾忌”：在德国有“很多大无畏的人和望眼欲穿的人”。恰恰在最近几周，他的那些书卖得很不错，许多人对《约瑟》翘首以盼。“要是[这一尝试]成功，要是德国的读者让这本书，这部遭唾弃的著作，一部从素材上已经持反面意见的作品取得成功，而当权者却没有胆量去阻止——你得承认，跟流亡者进行论战的整个攻势相比，这一成功要有效得多，也有趣得多，让当权者更加恼羞成怒，就是对他们的巨大胜利。”^[68]

克劳斯·曼很生气，但跟过去一样，他把对父亲的愤怒压了下去，给那些对《文萃》有二心的人写去了愤怒的信。跟克劳斯不同，艾丽卡·曼写信给父亲，说明她对父亲态度的看法，写给弟弟克劳斯的信则更加直言不讳，尤其是她对出版商贝尔曼·费舍尔的看法——费舍尔对克劳斯和海因里希·曼进行过批评：费舍尔是“马屁精”“蠢猪”“垃圾”。^[69]不久，托马斯·曼面临着要不要加入帝国作家协会（Reichsschrifttumskammer）的问题。倘若他的书还要在德国出版，这是必要的一步。当克劳斯·曼向父亲指出这个归于一统的组织的章程效忠于纳粹时，托马斯·曼很生气，还是决定加入该协会。^[70]但是，家庭的抵抗渐渐发挥了作用。他最后还是拒绝签字。帝国作协主席弗里德里希·布伦克（Friedrich Blunck）也没难为他。跟德国决裂还是不决裂：这一问题日后再定。

关于贝尔曼·费舍尔和《文萃》杂志的争论，对德国态度的潜在冲突，都留下了痕迹：激烈的讨论，用词尖刻的信件，砰然作响的关门声。这一切都影响到私人生活和家庭气氛。对外没有泄露一丝消息。一直到1933年秋——这一讨厌的政治年的秋天，才多少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托马斯和卡蒂娅·曼经过长期的犹豫不决后（去巴塞尔还是尼斯？），于9月底带着最小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前往苏黎世。艾丽卡·曼在居斯纳赫（Küsnacht）找到了一幢房子，每月租金600法郎。不久，从慕尼黑救出来的家具和书籍也到了，卡蒂娅·曼指挥两个女用人做家务，并努力给两个孩子找到新学校。

克劳斯·曼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文萃》杂志曾被父亲称为“流亡者的论战”，经过月复一月的努力，克劳斯将其打造成为一个论坛。艾丽卡·曼除了为父母做各种事情外，还把她的讽刺小品剧《胡椒磨》成功地带到了流亡地；她的女友特蕾莎·吉赛，音乐家和作曲家马格努斯·海宁（Magnus Henning）以及漂亮的浪荡姐聚比勒·施洛斯（Sybille Schloß）都参与进来，施洛斯并不仅仅把沃尔夫冈·科彭（Wolfgang Koepfen）弄得神魂颠倒 [他要自杀，遗书的结尾是：“其他人跟她上床。我爱她。”后来他还撰写了长篇小说《不幸的爱情》（*Eine unglückliche Liebe*）] ^[71]。9月30日，新版小品剧《胡椒磨》在苏黎世老城的赫斯臣饭店（Hirschen）首演。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72]“盛况空前”，观众们备受鼓舞，新闻媒体为之亢奋——《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夸赞艾丽卡·曼的美貌，赞扬该剧成功地把娱乐和政治讽刺融为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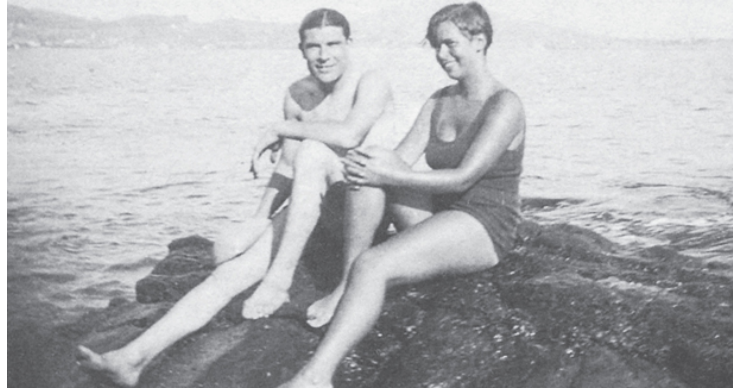


图8 莫妮卡与陌生男子在萨纳里海滩

戈洛·曼在菲利克斯·贝特鲁的帮助下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圣克卢高等师范学院（Saint-Cloud）担任德语语言文学讲师，该校是培养师资的精英学校，位于巴黎郊区。这是迈向新家园的一步：从此，戈洛用法语记日记。

只有莫妮卡·曼还在萨纳里德国流亡者的圈子里继续徘徊了一段时间。她还不清楚，今后该怎么办。莫妮卡写信给在苏黎世的母亲：“母亲你好！情况怎么样，已经适应了吗？你们高兴吗？这是不是你们所希望的？”她写道，萨纳里的海滩和海滨大道已经空空荡荡，她弹钢琴，散步。“无花果又涨价了，葡萄也是。”生活的舒适程度已经不是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女儿所习惯的那种。“还有，厕所不是我一人单用，大家都用，来去匆匆，还得自己打水冲洗，只能这样。”1933年夏天过去了，就是蓝色海岸也不例外。“明天我还去游泳，但愿天气终于能转好，好看的棕色皮肤也消失了！”^[73]

克劳斯·曼像发了疯似的工作。他写信，为《文萃》杂志争取作者，制订计划，进行组织工作，寻找可能的捐款人，花费了很大精力，却大多无功而返。他的女性朋友安奈玛丽·史瓦岑巴赫用她瑞士富裕家庭的钱帮助他，她爱艾丽卡，对吗啡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克劳斯。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克劳斯·曼自己为杂志撰稿，另外还写文

章、时评和报告。他撰写的东西有时如神来之笔，比如关于作家和鸦片瘾君子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评论文章，或关于1934年去莫斯科的旅游纪行。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表示同情，却不乏批评的态度，也不愿意与其过于亲近。^[74]

在德国，当局将流亡者的一举一动均记录在案，诸如他们之间的各种争论或团结一致的努力，向外国警告希特勒等。纳粹作家维利·维斯帕（Willi Vesper）在跟纳粹保持一致的杂志《新文学》（*Die neue Literatur*）上写道：流亡者们“试图用文学的臭气来围堵德国”。在这方面，由“半个犹太人”克劳斯·曼出版的《文萃》是“特别危险的小爬虫”。^[75]这是“抬举”他。

写作之余，克劳斯·曼还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逃往北方》（*Flucht in den Norden*）。小说于1934年秋在流亡出版社“库埃利多”出版。这是一部充满政治色彩的爱情故事。女共产党人约翰娜（Johanna）为逃避民族社会主义（纳粹）前往芬兰她的女友卡琳（Karin）家，结果爱上了卡琳的兄弟拉克纳尔（Ragnar），最后必须作出选择：要爱情还是要跟希特勒进行斗争。她选择了斗争。有些作家，如恩斯特·布洛赫，赞扬约翰娜的蓬勃朝气；知情人从中看到克劳斯·曼跟芬兰人汉斯·阿米诺夫（Hans Aminoff）的爱情故事，阿米诺夫本人则对前男友的轻率感到震惊。该书按照曼氏家族一贯的文学套路，更多是去发现而不是发明。在评论《逃往北方》这本书时，往好了说，在描述芬兰风景和芬兰人时作了淡笔清墨式的勾勒。说到不足之处，则是草草了事，没有章法，虎头蛇尾，对希特勒德国进行模式化的描写，特别是连篇累牍的伤感和陈词滥调：约翰娜的头发在那个爱情之夜散发着“柔和的、金灿灿的光芒”，好像是一束圣光：“这一魔幻般光亮的午夜发出绿色之光，比白天更清晰地照映着她的情影”；这对情侣“兴高采烈地”摸索着上床，“毫不害羞，又中规中矩，尽情地享受着酣畅淋漓的床第之欢”，“这个男性特征突出的

小伙子”……^[76]克劳斯·曼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写就了这部长篇，与此同时，他还在忙碌其他事情，要办杂志，加上“日常的各种挑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作严肃的修改。到了这时，他在写作时大多借助于“各种小资事物”（毒品）。毒品不再是工作之余或个人开心的一部分，而是帮助他有能力去工作的“助手”。

前途未卜和恐惧心理，这是所有流亡者所面临的命运，并不时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反应。1934年7月，克劳斯·曼跟约瑟夫·布莱特巴赫（Joseph Breitbach）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位多年来在巴黎生活的作家，发表了一篇不幸的文章，内容涉及生活在国内外的德国作家。对克劳斯·曼来说，他这样做就成了戈培尔的代理人。克劳斯的这种反应毫无道理，不仅令人难堪，毕竟布莱特巴赫还是曼氏家族的朋友，而且克劳斯·曼还欠着人家的钱。戈洛·曼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哥哥，跟大学生们一起把鞭挞布莱特巴赫的檄文翻译成法语，还没忘记指出布莱特巴赫在这场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久，他们俩又重归于好，而不像克劳斯·曼那样跟布莱特巴赫继续交恶。

因为断绝了关于德国真实情况的可靠信息来源，流亡者之间流言满天飞。1934年初，戈洛·曼写信给受人尊重的女历史作家里卡尔达·胡赫，指责她对第三帝国的态度。“我捍卫过什么，同意过什么吗？”胡赫回敬道。“我相信，德国没有多少人，态度是这样势不两立。的确，在信件来往中要相互理解不很容易。”^[77]在德国，当局为这位被称作“民族妇女”的女诗人创造了一些条件。身为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当局要她以某种形式发表声明，对新当权者表示效忠。她保持缄默。接下来，艺术学院院长写信给她，宣称将其态度视为心照不宣，即表示同意——跟托马斯·曼和帝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做法相似。只是到了此时，即1933年4月，里卡尔达·胡赫在致艺术学院的一封信里异常坚定地表示划清界限：“现政权对民族思想所定下的基调有悖于我的德意志。中央集权，强制和残忍的手段，污蔑政见不同的

人，胡吹乱捧的自我赞扬——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不是德意志的，都意味着万劫不复。本人的想法游离于国家定于一尊的思想之外，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留在国家艺术学院里。” [78]当局想尽办法不让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公开发表并流传到国外，也就可以理解了。后来，戈洛·曼对里卡尔达·胡赫这封信的评价要高于他父亲于1936年所写的《波恩公开信》。 [79]

里卡尔达·胡赫理解流亡者的境遇，对戈洛·曼的信也不表示怪罪，而是回想起曾经的美好时光和六年前他们在柏林的第一次相遇：“我还在想着，在乌兰特大街，我第一次给您开门时的情景：瘦瘦的，有些羞怯，有个性，讨人喜欢。我立刻就喜欢上了您，并保持至今，虽然您现在估计已经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80]不久，她还突发奇想，给戈洛·曼做媒：巴黎有个年轻的女大学生，“不是因为有个不合适的祖母，而是因为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励”，两人有着不少共同的兴趣爱好，所以应该去跟她见一面…… [81]

戈洛·曼也获准可以为《文萃》写文章。从第二年起，他用笔名“G”撰写《政治编年史》（*Politische Chronik*）。在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他逐步告别了少年时代的左翼社会主义理想。戈洛试图挖掘“第三帝国”的思想根源，却未获成功。他既没有在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身上，也未能在左翼知识分子和流亡者所作的现实分析中找到答案：这些人想把希特勒看作资本主义的傀儡。

戈洛·曼在圣克卢师范学院当讲师，一直到1935年秋，他一步步地在适应法国。在私生活上也是如此：戈洛爱上了他的一个学生，跟他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一起徒步旅行，长时间地交谈，还邀请他去父母家——但出于安全起见，戈洛没有跟他谈到过自己的感受。

在这方面，他哥哥的顾忌要少得多，虽然不见得更幸福。克劳斯·曼在演出《胡椒磨》时爱上了剧团的一个演员——汉斯·斯克冷卡（Hans Sklenka）。他情不自禁地坠入情网：“这很有可能是真的。”^[82]艾丽卡·曼十分担忧，提醒他考虑是否先作些小的试探，然后再来大动作（先弄清楚他是不是同性恋，先调情，然后再进一步）：“你对这东西根本就没有半点了解，他当然是个尤物，但是否通情达理，是什么样的人，能派上什么用场，这些我都不清楚，更何况你呢。在你知道并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之前，你真不用那么投入。”^[83]这事成不了，因为那小伙子喜欢女人。在克劳斯·曼的日记里，对“斯克冷卡这孩子”的渴望还持续了两年。他对这两年的情爱总结是：“折腾很多，却很少是为了爱。”^[84]

莫妮卡·曼于1934年初从萨纳里移居佛罗伦萨。家里的熟人提供了住房和社会交际的机会。她上钢琴课。7月，莫妮卡写信给母亲：“母亲，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生日！噢，祝贺！噢，祝贺！银发只多了一根，智慧却增加了不少！……魔术师在衣服扣口戴着一朵玫瑰，几个孩子也前来祝贺。另外几个没来。没办法，只能从当地给寿星送上祝贺……太好了，太好了！一个难得的好人！”^[85]2月，母亲在给克劳斯写信时说：“莫妮卡……很少从佛罗伦萨写信来，一旦来信，总是带着那熟悉的萌萌快乐，只可惜我缺乏享受的神经。”^[86]

1934年初，托马斯·曼给柏林的帝国内政部写信。他在信中说明自己的处境，描述他遭到的人身攻击，陈述自家在慕尼黑的财产被没收。托马斯·曼为自己在政治上支持魏玛共和国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辩护，并直言，他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观与世界观”表示反感。

“但自从历史作出决定后，我不再说话，并严格遵守我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时发表的声明：我决定，不再担任任何正式职务——那些久而久之挂在我身上的职务，彻底隐居，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87]托马斯·曼要传达的信息明白无误：给我的财产放行，让

我作为外侨过我的日子，让我写作并在德国出版我的书，若此，我将闭口不谈德国的政治事务。当局没有给予回复。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希特勒起事时期的同党之一，在一年后安排对慕尼黑的别墅解禁。托马斯·曼真的会信守自己的沉默诺言吗？这样的考验没有出现。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此时已爬到了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反对弗里克的安排，重新下达财产没收令并申请褫夺托马斯·曼的国籍。

说到艾丽卡·曼的《胡椒磨》，真是捷报频传，最早在苏黎世上演，然后在瑞士巡回演出，又去荷兰，去布拉格。小品剧团的演出不掺和日常政治，也不直接涉及时事。比如，特蕾莎·吉赛扮演X女士，一个玩世不恭、自以为是的小店老板娘，“一个特别寻常的妇女”，谁如果愿意（没人这样说），可以视其为“第三帝国”的典型女市民。

要打仗，那就打吧——

要不国家要军队干啥？

工业界不也得生存下去嘛。

我和我丈夫，我们早已看到了这一点。[\[88\]](#)

到最后，世界变成了一片灰烬，X女士哼着小曲，似乎这一切跟她都没啥关系：“该倒霉的还得倒霉。”艾丽卡·曼自己扮演的最著名角色是歌曲《冰冷的恐惧》（*Kaltes Grauen*）里的皮埃罗

（Pierrot）。只有左派媒体对演出表示失望，他们本希望它能更直接一些，更政治化一些，有更多的阶级斗争，少一点文学。但恰恰是这一点让演出取得了成功。观众有流亡者、瑞士人，有的只想开开心，有的则从政治上继续演绎剧中的影射。演出常常座满。每逢在舞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父亲的眼中就噙满着热泪，边激动边自豪。开始

时，纳粹分子觉得这部小品剧无伤大雅，虽然有点生气，但气的是《胡椒磨》和艾丽卡·曼受欢迎的程度。

虽说很成功，剧组的气氛却不那么好。你争我斗，妒忌，争吵：艾丽卡·曼在给母亲的信里谈到背地里的恶语中伤，表面上“大家都唯唯诺诺、恭恭敬敬的”。^[89]男演员伊戈尔·帕伦（Igor Pahlen）后来表示了对艾丽卡·曼的钦佩，但也提到她的高傲自大，一再强调剧团跟她和特蕾莎·吉赛之间的不同等级。巡回演出时，艾丽卡·曼和特蕾莎·吉赛坐头等车厢。“我们不能坐，”帕伦说道，“除去演出或排练，我们其实很少跟艾丽卡在一起。”^[90]

1934年11月出现了几次政治性的群殴。《胡椒磨》的节目变得更政治化了，艾丽卡·曼身着党卫军军服上台演出，以歌唱的形式描述谎言的国度，在那里，杀人不会受到惩罚。约瑟夫·罗特在写给艾丽卡·曼的信中说：“您向野蛮开展的斗争比我们所有作家加起来还要多十倍。”^[91]阵线分子（Frontisten）——瑞士法西斯分子——破坏演出，在演出大厅和大街上出现了殴斗。不久，警察控制住了局面，政府也支持小品剧团。但因为担心继续爆发斗殴，一些城市不再邀请巡回演出中的《胡椒磨》来表演。在达沃斯，有人不仅指责该剧团可能引发骚乱，还拿托马斯·曼的《魔山》说事，说这部小说“无疑给这个度假胜地带来了不良后果”。^[92]



图9 艾丽卡·曼在歌曲《冰冷的恐惧》中饰皮埃罗

瑞士人感到不安。一点娱乐加上一点政治上的含沙射影，这是一回事儿；公开向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国挑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据艾丽卡·曼的说法，似乎真有人威胁要将她劫持回德国。假如她对待事实不那么倾向于添油加醋的话，本来是应该相信她的。在公开回顾往事时，她把围绕《胡椒磨》发生的暴力斗殴演绎成纯政治斗争。她闭口不谈瑞士人的抗议有着不同的个人原因。^[93]阵线分子受到史瓦岑巴赫家的竭力唆使，对这家人来说，女儿安奈玛丽跟曼家孩子的那种关系，即集爱情、友谊与毒品为一体的关系，是他们的眼中钉。

艾丽卡·曼在其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反抗和回击在激励着她。弟弟克劳斯天资特高，艾丽卡作为其战友曾贯彻他的各种主意，在他的剧作里出演角色，跟他旅行、写作和生活；但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艾丽卡有自己的主见，有时公开批评弟弟（对雅克布·瓦赛曼^[94]的悼文过于夸张，他为《胡椒磨》撰写的一些内容没法用）。克劳斯·曼的反应十分敏感。他打从心底里祝愿姐姐成功，同时对她新近摆脱对别人，也包括对他的依赖表示疑惑。只因为他不可能跟艾丽卡共同生活，所以他才渴望有一个生活伴侣。^[95]克劳斯的

生活理想是跟艾丽卡永远“到处游历”，而她脑子里想的跟他想的不是一回事。

长篇小说《约瑟》的头两部分别于1933年10月 [《雅各的故事》 (*Die Geschichten Jaakobs*)] 和1934年3月 [《约瑟的青年时代》 (*Der junge Joseph*)] 在德国问世。出版社在小说出版预告里力图将该书打造成“英雄的冒险”：“一个勇敢和具有使命感的农人和国家奠基者的时代。这位英雄在土地上劳作，在心中跟诸神和鬼怪一起庆祝。”^[96]就是说，这是一部关于亲情与土地的书。国内的批评界并不相信这种说法。有关的评论大多是负面的。在一个趋于一尊的时代，面对一个多少算是半流亡者的作家，更何况此人还是共和国的捍卫者和纳粹的对头，对这类书的评价在当时是不可能客观的；一个犹太人的出版社，一部以犹太人和《旧约全书》为题材的长篇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为有利；托马斯·曼在给儿子克劳斯的信里也宣布他寄希望于个体读者而不是公众的批评和赞誉，并把这本书看作文学上的反抗——但所有这些都于事无补。托马斯·曼只看见负面的批评，感觉受到了伤害。^[97]过后，托马斯·曼自己又振作了起来。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天赋超过所有留在德国的那些人。”^[98]一年半后，他又更进了一步：“天才的感觉。”^[99]

来自德国的反响令人失望，但来自美国反响恰恰相反。英文版《雅各的故事》 (*Tales of Jacob*) 于6月出版，在美国好评如潮。多萝西·汤普森 (Dorothy Thompson) 是美利坚合众国最重要的女记者之一，她对该书的评价最高。在《纽约先驱者论坛报书评》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Review*) 上，汤普森发表了一篇书评，题为《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 (*The Most Eminent Living Man of Letters*)，为托马斯·曼大唱赞歌。她把这本书称为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决定性突破”。^[100]

学校放假，父母亲去旅行。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留在居斯纳赫，起居由女仆照管。米夏埃尔的一个慕尼黑朋友来访。米夏埃尔写信告诉母亲，他们一起骑车出游，看电影（“电影愚蠢无比，而且非常庸俗”），去苏黎世玩。“沃尔夫冈除了相当纳粹化（在预料之中）以外，几乎啥也没变。”很快便因为政治而发生了争吵，“这样做其实既愚蠢又多余。可是他不明事理到了可怕的程度，这肯定要让我生气，尤其是他一点也不蠢，而仅仅是不明事理和无知而已，最可怕的是，他说的都是官方那一套充满矛盾的东西”。^[101]

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是家里出了名的“调侃大师”，她定期从慕尼黑给女儿写信，笔调开朗，处处是影射和调侃，不时还来点恶心人的一一普林斯海姆家人的绰号都不中听，当年追卡蒂娅的托马斯·曼得到的绰号是“肝疼的骑兵队长”，就算是不错的了。“G.G.”的意思是“鹅脸”，这是玛丽·库尔茨（Marie Kurz）的绰号，她在慕尼黑的曼家服侍了很多年。一位茶客很正经，却索然无味，因此被称作“食时动物”，一位女邻居叫“害虫”，一个孙子叫“蟑螂”。堪称经典的是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信中的一句话：“昨天喝茶，宾茨（Binz）在座，他的坐肌愈加发达了，又讲了好多新鲜事，没有哪一件是真的。”^[102]这就是普林斯海姆们谈话的口气，托马斯·曼将这种风格吸收进文学作品里，通过短篇小说《维尔宋之血》

（*Wälsungenblut*^[103]）中的双胞胎阿伦霍德（Aarenhold）来表达。说话时“尖酸刻薄”，“会伤人，却又可能只是为了一个神来之语而心花怒放，所以要是怪罪他们，那就太迂腐了”。^[104]卡蒂娅·曼写信也是这类口气，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相互写信时继续保持了这一传统：装蠢卖萌，暗语影射，讽刺挖苦，无不发挥得淋漓尽致。

卡蒂娅·曼的父母不考虑流亡，虽然早在1933年底已经被迫卖掉在阿奇斯大街的房子并搬了家。数十年中，他们那幢800平方米的别墅曾是普林斯海姆一家人的生活中心，也是慕尼黑市的文化交流中心之

一。1904年，托马斯·曼正是在这里向他未来的妻子求婚的。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幢“领袖建筑”——纳粹党的一座有代表意义的建筑。普林斯海姆老两口只能顺从，搬到了一套租的房子里，有八个房间，好在他们还有财产和仆人。

“第三帝国”的政治现实只是偶尔出现在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信件里。戈洛·曼曾在信中提到，他的外祖母对希特勒表示过“委婉的钦佩”^[105]（1933年初，戈洛曾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试图向外祖母指出希特勒可能造成的危险，却未能如意。打那时起，戈洛本人被她称作“吼叫的公牛”）。她参加了“希特勒政变”阵亡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在给女儿写信时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了此事（“死者在最后一次号令时齐声高呼‘在这里’，真让人疼得慌”），但同时又被当时的气氛、队列和颂歌所感染。^[106]

按照纳粹的标准，普林斯海姆夫妇为犹太人，因而被剥夺权利，信中很少提起这些事，或者只是婉转地加以表达，比如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突然被勒令退休”，就是说，他作为犹太人被剥夺了在大学教书的许可。当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5年9月的党代会上通过《纽伦堡种族法》（Nürnberger Rassengesetze）时，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是这样描写她整个夜晚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我昨天半个晚上过得既舒坦又激动，几乎彻夜未眠，今天走到镜子前面一看，难过地发现，我看上去至少有95岁半了。”^[107]这是一种以法律为形式的野蛮血统文化：信里虽然洋溢着开朗的情绪，却显然流露忧愁。相关篇幅不长，这封信的其他部分和后来的信件又恢复了往常的聊天特征。表述情感时总有点遮遮掩掩，往好了说，是为了让女儿省心，大概也是安慰自己。

克劳斯·曼憧憬着父亲的生活——“魔术师那隐匿不宣的同性恋生活”。^[108]

*

1934年秋，莫妮卡·曼来父母家玩。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讲述这位他“最喜欢的具有个性的妹妹”的情况，特别是她“到达车站时，简直太酷了，浓妆艳抹，身材纤细，装束优雅，衣着华丽，自信地踮着脚走下火车，自己的姊妹愣是没把她认出来”。卡蒂娅·曼写道，这些变化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而已。在父母家里待了几周后，她“还是原来的她，懵懵懂懂，与众不同，无忧无虑，像只小老鼠似的在厨房来回游荡（这不利于苗条的身材），无动于衷，毫不操心，不时会有突发和惊人的想法。她也许不会有什么改变了”。[\[109\]](#)

后来莫妮卡·曼病了，发高烧，烧了一个星期，直到查出来是黄疸病。托马斯·曼很担心，担心他妻子。卡蒂娅·曼心情烦躁，因为病人莫妮卡“倔强，不知道感恩，有恐病心理”。在这个家庭里，只能有男性疑病症患者。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录病情时写道：“这孩子要是在佛罗伦萨治病就好了。”[\[110\]](#)

萨姆埃尔·费舍尔——托马斯·曼出道以来合作的出版商去世了。曼氏家族的人都希望托马斯·曼跟费舍尔出版社的个人纽带就此结束，他可以从现在，即1934年起，完全不用再顾及出版社的面子了。可他们都想错了。托马斯·曼继续摇摆不定。1934年夏，他拟定了计划，给《泰晤士报》（*Times*）写一封公开信，要西方大国停止跟希特勒政权进行合作。几个月里，托马斯·曼对材料和行文一再斟酌，最后还是放弃了该计划。卡蒂娅·曼衷心希望丈夫能公开站出来反对“第三帝国”，同时又担心，这样有可能出现《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那篇文章所造成的局面，成为那篇文章的续篇。[\[111\]](#)最后，托马斯·曼把计划中的一本含有他那篇瓦格纳报告的政治文集作为试金石：要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不敢在德国印刷此书，他就可以最终解脱，在国外找一家新的出版社，政治上也就可以随心所欲

了。1935年3月底，《大师们的烦恼与伟大》（*Leiden und Größe der Meister*）一书由费舍尔出版社在柏林出版发行。

1935年4月，托马斯·曼有了一项新计划：写一封“致德意志人民书或备忘录”，（“以热忱和真挚的方式”）警告他们不要与整个其他世界为敌。此时，希特勒刚刚恢复了义务兵役制，宣布将国防军扩充至58万人，这明显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这一次又是关系到政治上的灵魂救赎，我一直在寻找其正确和合适的形式。”^[112]一天后，贝尔曼·费舍尔来访，介绍了书籍销售的良好情况和数目不菲的稿酬。于是，那篇备忘录就不再被提起。托马斯·曼接到尼斯国际联盟委员会邀请，去一个会议作报告。他想在报告的结尾发出一一般性的政治呼吁，要人们鼓起勇气说“行和不行”。^[113]贝尔曼·费舍尔发出警告，没有忘记提醒他，恰恰是现在，他有关慕尼黑房子的事情是多么有希望。最后，托马斯·曼没有前往尼斯，原因是身体欠佳。出版该报告的文字版时，他删去了那个呼吁。

*

1935年4月10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希特勒之国”的二号人物，以极尽豪华的庆典在柏林大教堂跟女演员艾米·宗内曼（Emmy Sonnemann）结婚。柏林的所有雇员均被扣去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捐款”。克劳斯·曼写了一封致“总理夫人”的公开信，因为希特勒（假装）单身，所以，宗内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角色：“您从来没有恶心过吗？就算您从来没有恶心过，您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吗？您肯定有孑然一身的时刻吧——婚礼的热闹不可能永久，也不可能夜夜盛筵不断。您那肥胖的夫君先生离家外出——他或许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签署着死刑的判决，或许在视察轰炸机。天黑了，您孤身一人待在您的漂亮宫殿里。没出现过鬼魂

吗？在厚厚的帷幔后面，没出现过集中营里被打死的人吗？没出现过不堪酷刑而死的人吗？没出现过因逃跑而被枪杀的人吗？没出现过自杀的人吗？没出现过血淋淋的人头吗？这个人也许是艾里希·弥萨穆（Erich Mühsam）——一个诗人。在您成为一个该死的国家的国母之前，您不是以朗诵诗人的诗句为职业的吗？对那些勇敢的诗人，这个国家不是把他们打死就是把他们流放。”^[114]这封信发表在流亡报纸《巴黎日报》（*Pariser Tagesblatt*）上，后来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流传到了德国。赫尔曼·戈林搞到了一份，然后在上面写下“克劳斯·曼是谁？”。盖世太保回答说：“那个臭名昭著的作家和半犹太人托马斯·曼的儿子。”^[115]这是克劳斯·曼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文萃》杂志夭折了。1934年2月，一篇关于奥地利国内形势的评论因为不够谨慎，导致它在当地被禁。原本就销售不畅，发行量更加江河日下，出版社踩了急刹车。《文萃》杂志在出版两年共计24期以后，于1935年8月出版最后一期。这让克劳斯·曼十分沮丧，之所以也让其他人沮丧，是因为杂志的水平高。在克劳斯·曼的召唤下，这里聚集了许多响当当的名字，盛开着政治和文学的花朵，刊登了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恩斯特·布洛赫到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从欧内斯特·海明威、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安德烈·纪德、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约瑟夫·罗特直到弗朗茨·卡夫卡遗留的文章。把所有这些汇总到一起，由克劳斯·曼来组织和编辑，他精心缜密，运营勤勉，而且判断质量的眼光十分独到，这种眼光似乎跟他来去匆匆、忙进忙出的生活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文萃》也许是克劳斯·曼一生中最大的功绩。1934年11月，希特勒德国剥夺了他的国籍，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了。50年后，《文萃》涅槃重生，重印后找到了读者群——这在流亡年代是不可能找到的。

“小家伙们”（父亲在信件和日记里的用语），即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已经不再那么小了。1935年9月，伊丽莎白从苏黎世自由

文理中学毕业，年方17岁。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可能“有那么一点”嫉妒，母亲这样写道。^[116]1933年秋，家人也为他找过一个学校，因为14岁的他拒不同意，只好作罢。^[117]文理中学刚上完八年级，成绩单上希腊语和地理均为“差”^[118]，家里允许他集中精力去搞音乐。^[119]两个人都去苏黎世音乐学校，米夏埃尔学小提琴，伊丽莎白攻钢琴。他们俩想以后联袂登台演出。

伊丽莎白是六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让父母操心学业的。她让父母操心的是其他方面：固执己见，充满激情，“对音乐痴迷”，这些都让父母感到困惑。虽然好像没有哪个老师发现过她有什么特殊的音乐天赋，在音乐学校也只被分到三年级，^[120]她却执意要当钢琴家，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15岁那年，她爱上了弗里茨·兰茨霍夫，克劳斯·曼当年最好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库埃利多出版社德国流亡项目的负责人，《文萃》也是在他那里出版的。他比伊丽莎白大17岁，不但抑郁，病恹恹的，还吸毒上瘾。兰茨霍夫爱的是艾丽卡——伊丽莎白崇拜的大姐。

艾丽卡呢？她也喜欢兰茨霍夫，不过是有时候喜欢（这让特蕾莎·吉赛醋意大发），要她在爱情方面“从一而终”，那不可能。她要他戒掉毒瘾，自己却戒不掉。够复杂的。

米夏埃尔·曼出现在父亲的日记里，只有两种可能：因为他练小提琴（一般都为他高兴，偶尔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找麻烦，“犟种，不听话，粗鲁”。^[121]音乐学校的人都认为他“绝对有天赋”。^[122]但米夏埃尔容易暴怒，也容易伤感，且喜欢喝酒。1935年6月，克劳斯·曼观察到，“比比醉了，对我少见地温柔亲近。太变态了吧？”^[123]后来，伊丽莎白曾说过，“在那段时间，米夏埃尔曾有一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然后引诱戈洛跟他去湖上划船。他当时打算跟戈洛一起在小船上去死”。除了小弟情况不好以外，倒没发生什么其他事

情。^[124]跟之前他哥哥克劳斯和戈洛一样，米夏埃尔·曼被送到心理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那里去治疗。不久，伊丽莎白也步其后尘，原因是爱情的苦恼，再加上吞咽和呼吸困难这样的神经性毛病。在卡岑施泰因看来，她总体上还算正常，尤其是跟曼家其他人相比较的话。



图10 克劳斯·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

克劳斯·曼于1935年夏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悲怆交响曲》（*Symphonie Pathétique*）。该书描写了俄罗斯同性恋作曲家彼得·柴可夫斯基（Peter Tschaikowski）的悲惨人生故事。克劳斯在给妹妹莫妮卡写信时谈到，“我把许许多多自己的故事都写了进去”。^[125]伯伯海因里希·曼这些年不管从政治上还是其他方面都跟克劳斯·曼日益接近，他很友好地给侄子写了封信，说他的这部小说是一部“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书”。^[126]几十年后，瓦尔特·坎普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重温这部小说，然后在日记里写道：“可怜的父亲！”^[127]

父母亲接触美洲大陆比两个大孩子要晚。他们于1934年首次赴美，1935年再次起航，当时托马斯·曼刚过完60岁生日。他们坐轮船前往纽约。哈佛大学想授予托马斯·曼荣誉博士学位，他最初“回复得有点不冷不热”，这是卡蒂娅·曼在3月告诉克劳斯·曼的。第二天，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恰好在我们这里吃饭，当他得知此事时惊愕不已，脸是真的绿了：这样一种荣誉——哈佛大学的荣誉，太难得了！我们马上十万火急地追加了一封电报，表示同意”。^[128]在哈佛，托马斯·曼作为作家和“德国文化伟大传统的捍卫者”，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道受到表彰。^[129]几天后，他应邀前往白宫，跟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用餐。托马斯·曼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外加妻子帮助翻译，强烈告诫总统防范侵略成性的希特勒政权。“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马斯·曼在给勒内·施克勒的信里描绘了这次会面。“彻底瘫痪了10年，精力却是那般充沛，又是那样难得的——如果不说是革命性的——果敢。他在富人中树敌颇多，对他们敢说敢干；在宪法的守护者里也有许多反对者，因为他的一些做法独裁。可是，对这样一种开明专制，你现在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吗？”^[130]

在德国，当局对这一切都予以密切的关注，并且很生气。

费舍尔出版社在德国已无前途可谈，至少是在犹太出版商家庭的领导下。在跟德国当局进行长期谈判以后，出版社拆分了。一部分留在柏林，有了新的投资者并由彼得·苏尔坎普领导；另一部分，主要是在德国不再受欢迎的作者和图书，迁往国外。^[131]至于去哪里，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解决。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寻找合伙人和出版社新址，最好在瑞士。1936年初，他在伦敦跟海涅曼出版社（Verlag Heinemann）谈判。

1936年1月11日，流亡报纸《新日记》（*Das Neue Tagebuch*）上刊登了一篇社论，莱奥帕德·施瓦茨希尔德（Leopold Schwarzschild）——1933年前德国最具影响力的记者之一——在社论中宣布，贝尔曼·费舍尔是受纳粹分子保护的犹太人，目前正奉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之命，建立一家“伪装的‘流亡出版社’”。^[132]贝尔曼眼看自己的各项计划受到威胁，遂请他最重要的作者帮忙。托马斯·曼正在阿罗萨度冬假，写了一封简短的抗议信。他跟费舍尔出版社的其他作者，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和安奈特·科尔布一起，坚定地驳斥了对贝尔曼的指控。这封抗议信发表在《新苏黎世报》上。

莫妮卡·曼给哥哥克劳斯写了一封信。她跟他亲，希望他能给自己以安慰。1月12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日，她待在居斯纳赫，父母在打点行李准备去阿罗萨。家里个个都在忙，父亲在写《约瑟》，母亲忙着指挥做家务，小妹小弟“都在苦练音乐”，女佣们在做事，狗在叫唤。“我呢，我做啥呢？我要是再不完成我的必修课”——这里指她练钢琴的时间——“那就相当麻烦了！这是让我开心的时刻，虽然有时有点沮丧”。带着狗散散步，画点画，读点书，这都满足不了她。不开心的想法在冲击着她。“反正我属于那些孩子，可以无边地开心，也可以无边地伤心。还可以在瞬息之间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133]

小品剧《胡椒磨》在巡回演出。艾丽卡·曼从布里尔（Briel）给父亲写信，时间在父亲就贝尔曼所写的抗议信刊登于《新苏黎世报》以后。她感到伤心、失望和气愤。她认为，施瓦茨希尔德对贝尔曼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只有跟纳粹保持最佳关系，才能让出版社在“第三帝国”经营长达三年之久，而且现在还被允许带着出版社流亡国外。此时此刻，父亲公开站到“伪流亡者”——一个“面目不清的犹太商人”一边：“他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因为《文萃》杂志的发刊号）

成功地让你向所有的流亡者以及他们所作的努力搞突然袭击，我只能这么说了。”艾丽卡说，几乎不可能再度出现在父亲的眼皮底下了。她在信的结尾写道，父亲肯定会为这封信生她的气。她知道她在做什么。“你跟贝尔曼博士及其出版社的关系是坚不可摧的，你好像已经作好准备，为此作出任何可能的牺牲。假如其中的一个牺牲意味着，我一步步、确信无疑地离你远去——就把它当作跟其他牺牲一样吧。对我来说，这样会太伤心，也会很可怕。”[\[134\]](#)

克劳斯·曼给姐姐写信，表示同意她的看法，虽说他本人没有勇气写这些内容，也不会写得这么直白。[\[135\]](#)

阿罗萨的森林旅馆，跟往常一样，家人在这里度假：卡蒂娅·曼滑雪，托马斯·曼写作，偶尔去散散步。母亲，而不是父亲，给艾丽卡回信，很及时，以母亲的口吻敦促和解。卡蒂娅写道，当时她也不赞成写那封抗议信，因为父亲一直都三缄其口，本应当在这件事上也不插手。就事而论，艾丽卡不在理。她说施瓦茨希尔德的攻击“够阴险的”，并详细陈述了理由。对母亲来说，更重要的是亲情，而艾丽卡将此跟那件事挂起钩来。“除了我和麦迪，你是唯一一个让魔术师真正牵挂的人，而你的信让他极度失望，让他痛心不已。”她自己也是这样，说到底，她是父亲的“附庸”。[\[136\]](#)

托马斯·曼在森林旅馆里整整两天没去碰《约瑟》一书，为的是回复艾丽卡。这封信洋洋洒洒写了12页，“为她，也是为了后人”。[\[137\]](#)“要闹翻的话是在两个人之间，”托马斯·曼写道，“可我觉得，我对你的感情根本不允许我对你这样做。”他一一反驳了对贝尔曼的各项具体指控，称施瓦岑希尔德的指控为“轻率的仇恨幻想”，因为他是费舍尔出版社的作家，所以这种仇恨同样是针对他，针对他的书的前途。因此，他写了那封抗议信。艾丽卡如此坚定地站在施瓦岑希尔德一边，激情四射。“激情非常好，盲目的仇恨和蓄意的不公

就不对了。”但托马斯·曼并不想就这样简单地作了断。他很清楚，这件事情不仅仅关系到贝尔曼，而是关系到更多的事情，关系到“更大的全局”，即他在政治上的沉默；艾丽卡之所以发飙，是因为他还没有站出来反对希特勒德国。托马斯·曼再一次为自己辩解：他在国外生活本身就已经是“对第三帝国的一种抗议，虽然克制，却很极端”；他已经公开了自己的态度（比如在政论文集里）；人们还需要他的声音，他不应该在“流亡人士圈内”销声匿迹。然后他又打了一个回马枪。托马斯·曼解释说，女儿的怒火也表达了自己受拷问已久的良心。他请求“对我要有耐心”。他知道，“为了我的良心和你的怒火，我大概必须做什么”。[\[138\]](#)

莫妮卡·曼又回佛罗伦萨去了。她给卡蒂娅·曼写了一封沮丧的信，调子跟写给克劳斯的信差不多，母亲给了她一些建议（还谈到钱，这一点也很重要）。莫妮卡于1月26日回信说，母亲说的都很对，“我也有相同的想法，有时狂喊，有时收敛”。她诉说自己孤单，称只有音乐能抵挡孤单。她也请求对她要有耐心。究竟为什么呢？为了一个“丑陋的问题”，即“挣钱的问题”。卡蒂娅·曼似乎对女儿毫无目的地忙活音乐提出过批评，并提出过替代性建议——去找一份工作。莫妮卡感到非常恐惧。“要自己养活自己，这种想法确实不错，但同时也有点可怕。”[\[139\]](#)

还是1月26日：海因里希·曼介入了此事。他为弟弟辩护，驳斥了孩子们的指责。他在给侄子克劳斯的信里写道，倘若他本人还有可能在德国发表作品的话，“我也会尽快去做”。[\[140\]](#)海因里希·曼在流亡作家中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从一开始就是希特勒德国最尖锐的批判者。头把交椅的位子非他莫属了，二把交椅的位子还远远轮不到托马斯·曼。“这里，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兄弟间的问题，”托马斯·曼在给艾丽卡的信里这样写道，“处理好长幼顺序的关系有多困难，你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141\]](#)对此，海因里希·曼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兄弟俩之所以观点一致，倒不一定是对事情本身，更多的原因在于：再也不能出现兄弟阋墙的局面了。

艾丽卡·曼紧追不放。仍旧是1月26日，她再次写信规劝父亲。艾丽卡讥讽父亲的态度像“猪排小面包”，不想完全站到流亡者一边；她再次攻击贝尔曼，还列举更多个人感情上的理由来说事（她公开承认，上次威胁要断绝亲情的做法未达到目的），比如她指责父亲，在围绕小品剧《胡椒磨》爆发公开争斗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假如父亲现在还不采取正确行动的话，就要承担“毁灭流亡事业”的罪名。^[142]她无论如何都要托马斯·曼摆脱贝尔曼·费舍尔，最好能看到他在兰茨霍夫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书——他是艾丽卡的朋友兼前男友，偶尔共度良宵的好友。早在1934年她就满怀激情地替这家出版社作过宣传，并指出过克劳斯·曼和《文萃》杂志所面临的危难局面。要是父亲当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版其书的话，会给克劳斯多大帮助啊。^[143]

还是1月26日：《新苏黎世报》副刊负责人艾杜亚特·克洛狄（Eduard Korrodi）围绕关于贝尔曼的争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在前一天，莱奥帕德·施瓦茨希尔德对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和安奈特·科尔布在《新日记》上的抗议信作了回应，声称德国文学“几乎全都被拯救出来了”。^[144]克洛狄坚决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不可以把流亡的犹太作家跟德国文学混为一谈。而托马斯·曼的书恰恰一直都还在德国出版。^[145]这场争论走向另一个方向：流亡人士为一方，托马斯·曼为另一方。

1月26日的高潮：克劳斯·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发电报，“最恳切地”请求托马斯·曼对克洛狄这篇“糟糕透顶的文章作出回应，不管以何种方式，也不管在哪里，这一次真真切切地涉及一个关系我们大家生死存亡的问题”。^[146]

第二天，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回到阿罗萨。伊丽莎白去火车站迎接父母，她这几天很不开心，原因是她崇拜的姐姐艾丽卡讹诈她更尊重的父亲，为此，她生姐姐的气。^[147]托马斯·曼打算回复克洛狄，妻子写了份草稿。^[148]

三天后，在《胡椒磨》剧组从圣加仑（St. Gallen）去布拉格的路上，艾丽卡在苏黎世停留，在父母家里促膝谈心，和解了一半。

“很温馨”，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49]“忧心忡忡”则描绘了艾丽卡·曼的心境。谈完后，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她给父亲写信，口吻相当谨慎：“我祈求众神，保佑你的‘答复’将十分完美。”^[150]

2月3日，托马斯·曼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公开信，答复克洛狄。他在信中对跟艾丽卡·曼的具体争论焦点没有作任何让步，还为自己支持贝尔曼和他对费舍尔出版社的忠诚进行辩护，同时坚持自己在流亡人士圈内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但是，《致克洛狄的信》

（*Korrodi-Brief*）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也不是对德国国内与国外的德国文学的各种看法。关键之处在于，托马斯·曼明确而不容置疑地拒绝了“当今德国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干不出任何好事来”；他还拒绝了当权者，“三年以来，这些人犹豫不决，是否要在全世界面前剥夺我的德意志身份”。最后，他用奥古斯特·冯·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的诗句终结全篇。

可谁若用整个灵魂仇恨邪恶，

他也将被逐出家园，

那里受到人民尊重的是奴仆。

更聪明的是放弃祖国，

而不是在一个幼稚人物统治下

背负着盲目的群氓仇恨的桎梏。[151].

家里人感到高兴，同时也轻松下来。艾丽卡从布拉格发来一封电报：“谢谢祝贺祝福孩子艾。”[152].戈洛·曼从布列塔尼

(Bretagne)写信给哥哥克劳斯，对父亲的声明表示满意，对他姐姐艾丽卡所扮演的角色却不那么开心，责怪她的抗议形同讹诈。[153].卡蒂娅·曼非常开心，丈夫终于放弃了“近乎病态”的抗拒心理——拒绝公开跟希特勒决裂。[154].对此，全家人，各按其性格，都作出了贡献，而艾丽卡·曼激情迸发的信则是巅峰之作。虽说她的理由一条条非常具体，却没有一条能说服父亲。但她的发飙做到了。他不能继续沉默了。

三天后，阿道夫·希特勒在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宣布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8月，夏季奥运会在柏林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德国尽其所能，向全世界展示国家的开放。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成为杰出超群的运动员，他获得四枚金牌。有人建议出于宣传的目的跟“黑鬼”欧文斯照个相，对此，希特勒暴跳如雷。[155].

考虑到世界舆论的影响，当局并没有针对托马斯·曼反对纳粹德国的声明作出任何反应。这一次是德国当局犹豫不决了。

终于有时间做其他事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克劳斯·曼给莫妮卡回信，她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安慰。对她的烦恼，对她的疑虑，对她的未来规划，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好。怎么偏偏要他来提出对生活的忠告？克劳斯这样写道，不幸有时候会是好事：“你要是经历过惊心动魄和伤心的事情，最后反倒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艺术家。当然，只经历些惊心动魄的事情还绝对不够，还必须有一种过人的能量，一种真正的勤奋，只有它才能让坏事变成好事。”他突然扮演起母亲的角色：“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想法和计划。要准备好达到一

定的目的：在这个或那个时候我要做这件或那件事情，在这里或那里上台演出，也要赚钱，要更加努力。”这么写，他自己都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克劳斯·曼写信原本如行云流水，可这封信写得从未有过地别扭。他很快便结了尾，采用的是母亲的格式——母亲通常用它来结束写信，以表示不满，一般都是在跟钱有关的情况下：“就这么着了。” [156]

戈洛·曼这时已成为雷恩大学（Universität Rennes）德国文学讲师。他努力让法国成为自己的新家园，这里是这份努力的又一站。戈洛·曼对学生很上心，他得跟他们一起用中古高地德语读《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这对双方来说都痛苦不堪；他对心胸狭窄的房东很照顾；对他的信友很珍惜，这是通往德国的最后一点联系。利瑟·鲍尔（Lise Bauer）爱上了他，经常建议他在瑞士相会。戈洛表示拒绝，一开始是婉言相拒，然后比较明了，最后几乎毫无掩饰地向她告白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却依然没有效果。戈洛·曼抱怨说，她只要多些去人群中，“毫无疑问，你就会认为我不那么可爱了”。 [157]

5月，克劳斯·曼去蓝色海岸休假，住在萨纳里海滩的灯塔旅馆，没有艾丽卡，也没有其他人陪伴。“我独自一人时间太久了。” [158] 他试图放弃毒品，可戒毒让他很难受。为了转移注意力，克劳斯寻找交际和性爱。有天晚上，他开车去土伦（Toulon）。“（一个）小家伙说服我，跟他到最偏僻的地方。另一个人守候在那里（我居然愚蠢至极，没有看透这一切！），高喊‘我要杀了你！’，一阵厮打，我撒开两条腿像兔子一样飞奔，他们追上了我，打我，抢走了所有东西——钱（130法郎）、大衣、钱包等；我血流不止，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最近的警察哨所；由警察陪着去医院，在那里包扎；然后去警长办公室，作记录；错过了最后的公交车，打出租车回去。” [159]



图11 一家人在居斯纳赫：（左起）托马斯、伊丽莎白、卡蒂娅、莫妮卡和米夏埃尔·曼

警察的报告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这对纳粹的反宣传来说不啻一个好机会，倘若不是警察和当地记者的水平不那么靠谱的话。报纸上写着：一个叫托马斯·克劳（Thomas Klau）的德国人，萨纳里灯塔旅馆的雇员，于前一天夜里遭到抢劫……[\[160\]](#)克劳斯又轻松地回归了毒品。

他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演员，他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并为此跟“第三帝国”的当权者同流合污。写作时间为五个月。克劳斯·曼写道，他正在从事一项“用心险恶——可以说充满仇恨的事情”。[\[161\]](#)日记里写着“G. G. 小说”，直到找到书名为止。[\[162\]](#)“G. G.”的字样不断出现在日记里，在梦中，在（常常满腔仇恨的）思绪里，或在他上电影院时——出于研究资料的需要，他要在电影里看那个人的表演。克劳斯·曼在《梅菲斯托升官记》的赠书名单上也把他写上，而且置于首位。[\[163\]](#)

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于1936年6月跟玛丽安娜·霍佩（Marianne Hope）结婚。艾丽卡·曼的这位同性恋前夫在敌视同性恋的“第三帝

国”披上了一件“正常人”的外衣，他在这里一直爬到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的高位。

他的前妻也再次结婚。打从流亡起，艾丽卡·曼就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却长期未果。她有一次写信告诉克劳斯，说“流亡的女人”遭人嫌弃。“情况是这样的：谁要是官衔有地位，哪怕只是做生意的，就不敢蹚这浑水。而面对那些既无官衔亦无地位的人，或连生意也做不了的、只想干那事的人，我可不敢造次（！），因为太过危险了。我们该怎么办呢？”^[164]最终，经一位朋友、作家克里斯多夫·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介绍，她如愿以偿。同性恋诗人W.H. 奥登（W. H. Auden）“很乐意”帮她获得英国护照。^[165]他们俩于1935年6月初次见面，那是在去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的路上。几乎在被褫夺国籍的同时——因为《胡椒磨》的演出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艾丽卡·曼拿到了英国护照。奥登成为曼氏家族的一位忠实朋友。

父亲过生日，莫妮卡·曼从佛罗伦萨给他写了一封信。她想给他“讲点比较有趣、比较特别，或许有些悲伤的事！”她向父亲描述对童年时代的记忆，全家在巴特特尔茨的森林里采集覆盆子的事。“母亲以其典型的责任感从来都是第一个把篮子采满，那篮子还是最大的。艾丽自然跟她相差无几！虽说树丛密集，刺也扎人，她却像个熟悉林子的高挑男孩子一样，穿梭于树丛之间，采起果子来敏捷而巧妙！克劳斯采起果子来心不在焉，大概不是在想诗歌就是在考虑什么大的新游戏，可以说是让太阳替他干活！戈洛，勤奋而神秘的小个子，小手和小腿上早已是血迹斑斑，却开动所有的脑筋去采果子，最后倒也能装满一篮子，只是那果子多是‘歪瓜裂枣’。我呢，几乎啥也采不着！整个采集行动都让我感到不大舒服，让我害怕！我怕森林，怕那些响声，又很快会疲倦和失去勇气！我要是到最后能采到六七颗覆盆子，大家就该心满意足了！”莫妮卡继续她的童年记忆，说

她有一次失踪了：“也许是我的头发卷到了小树丛上——我觉得太热了，也许是特别害怕蚂蚱，这都有可能，反正到了中午时分，找不到我了！这时，大声呼喊，到处寻找，也没少淌眼泪！泪水、笑声、欢呼、伤心！激动人心的小小儿童世界！都变成了啥样？伟大的、苦涩的、美好的、神秘的一生！”她问父亲，上帝是否会送上一份“答案”——要求过上伟大而神秘的一生？“亲爱的魔术师，你赢得了这样的一生！一定精彩无比吧！”^[166]10月，莫妮卡·曼的心情不好，放弃佛罗伦萨，回到了父母家中。父母替她担心，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莫妮卡也许认识到“学习音乐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长此以往该如何是好。除了音乐，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什么是可以考虑的，所以或许还是要尽可能长久也尽可能认真地抓住它不放手”。^[167]家里人又在讨论“莫妮问题”。她是如此沮丧，连圣诞节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秋天，小说《梅菲斯托升官记》在流亡报纸《巴黎日报》上先行连载。该书在推介时被称为“核心小说”，主要人物具有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身影。克劳斯·曼及其出版人弗里茨·兰茨霍夫非常紧张，担心会有法律问题。克劳斯·曼很快便给报纸写了一份纠正说明，并在小说里附了一篇后记：“本书的所有人物表现的都是某种类型，而非某人的特写。”^[168]

格伦特根斯是同性恋，这一点克劳斯·曼没有照搬到小说的主人公亨德里克·霍夫根（Hendrik Höfgen）身上。目的是保护自己，而不是格伦特根斯，同时不让对男人的爱牵扯到那个无耻的野心家的事情上。他为霍夫根（跟格伦特根斯一样，他很容易受到当权者的敲诈）编造了跟一个黑皮肤妓女的一段自虐狂的情史。小说的有关章节属于克劳斯·曼文学创作中最差劲的内容。

1936年底，围绕着他这本书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克劳斯·曼在遥远的他乡注视着这一切。他追随艾丽卡的脚步去了纽约，艾丽卡是为了尝试在美国推出小品剧《胡椒磨》。不久，她结识了一位“先生”，名叫莫里斯·韦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一位特别有钱的银行家，比她大20岁。韦特海姆不仅愿意为《胡椒磨》“掏钱，而且真的准备承担损失”。[\[169\]](#)

弟弟克劳斯沮丧得很。他想在美国扎根，现实却不甚如意。何况一直年轻帅气的克劳斯也已到了而立之年，陷入了抑郁症，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想去死。”[\[170\]](#)他克服了这场危机，跻身上流社会，艾丽卡和他这些地方历来都是所向披靡：克劳斯跟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举杯畅谈，他比父亲晚一年获奖；艾丽卡则跟“电影大亨”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调情；[\[171\]](#)克劳斯给自己注射海洛因，跟男妓厮混。他给母亲写信，说《梅菲斯托升官记》应该是个“好机会”，让父亲再一次给他写信，“我现在离得这么远”。[\[172\]](#)母亲答应他，还承诺会注意不让父亲只是“感觉”一下这本书——这在家里意味着，托马斯·曼快速地翻阅一本书，然后写一份友好而不加区别的读后感。[\[173\]](#)

不久，托马斯·曼写信说，“你的小说让我非常享受”。“小说读起来流畅而有趣，可以说非常优秀，有的地方非常滑稽，语言细腻、干净。”这样一部“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却有个问题，即虚构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些地方自由发挥，但不太正确，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在理”。小说对纳粹上台前的话剧与文学生活进行了描写，父亲觉得这是书中“最成功，也是批判性的叙述最出彩的地方”。但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样的“滑稽”场面是否真实：“如果真是如此荒谬且腐朽”，难道不是“必然要出现不一样的东西，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就是必然的吗？这个问题很危险，这样对待共和国恐怕就不公正了”。托马斯·曼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一种时代的趋势，指出小说

跟伯伯海因里希·曼的风格相近：“道德上的极度单纯与强烈情感，以儿童童话般的眼光看待‘邪恶’，这是新的和时代的特征。”[\[174\]](#)

托马斯·曼这一次读得非常仔细：这是一个由低级趣味与严肃文学组成的联合体，有趣，但在政治与文学上不够聪明，因为给人的印象是，共和国跟其后继者一样的腐朽；在道德方面，对邪恶的看法幼稚、“好似儿童童话”。

克劳斯·曼有这样的天赋发觉让他高兴的事。他认为父亲的批评“令人感动”。[\[175\]](#)

斯蒂芬·茨威格像很多人一样，把《梅菲斯托升官记》当作一部复仇作品来读，而且读得很开心。茨威格饶有兴味地看着都能从书中辨认出哪些原型来，认为这部作品堪称“角色的杂技艺术”，因为克劳斯·曼在纠正说明和后记里还一再“可爱地编派着”。[\[176\]](#)

一家人都是艺术家，只有一个人竭尽全力追求普通人的生涯。戈洛·曼希望在法国的中学或大学获得一个教师职位。圣克卢、雷恩的工作鉴定写得很好，他的法语讲得非常流利，自己也愿意再次参加必要的毕业考试，以争取获得法国国籍，这是成为国家雇员的先决条件。亨利·里希滕贝格（Henri Lichtenberger）系法国最负盛名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之一，戈洛曾请他估计一下入籍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位法国学者告诉他，入籍所需的居留期限已延长至12年，而根据最新的法律，要成为国家雇员，必须在成为法国公民12年以后。里希滕贝格告诉他，“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您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177\]](#)三年以来戈洛对法国寄予了很大希望——现在一地鸡毛。在致海因里希·曼的信里，戈洛无可奈何地总结道：“没有哪个地方能给一个稳定的社会位置！”[\[178\]](#)戈洛·曼陷入了抑郁症，自杀的念头在脑海里闪过，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并借助强效药物才从这一陷阱中解脱出来。

克劳斯·曼暗地里不断地在读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诗歌，这是“负罪的享乐”。[\[179\]](#)他不跟艾丽卡说这事。不管以何种方式跟那些同纳粹为伍的人打交道，艾丽卡都毫不客气。他也会如此，“用那么深沉、难听、发狂的语调……”[\[180\]](#)。

你方唱罢我登场。作家瓦尔德马·邦泽尔斯（Waldemar Bonsels）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名字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在1933年纳粹焚书时，邦泽尔斯的有些作品被扔进了熊熊烈火之中，同时被烧的还有海因里希·曼、克劳斯·曼以及其他许多作家的小说，他们被视为“非德意志”和“腐朽的”。其实这是一场误会。邦泽尔斯可以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分子，仅仅因此就必定可以在新的德国找到其归属。[\[181\]](#)。

1936年12月，德国报纸公布了早在预料之中的消息：托马斯·曼及其家人被褫夺国籍。这一决定是希特勒本人亲自作出的。《约瑟在埃及》（*Joseph in Ägypten*）10月在维也纳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书还运到了德国，但时间不长：从1937年1月起，托马斯·曼的所有书籍都不允许在德国销售。

此时，邦泽尔斯获得了平反，并再次回归人民群众的行列。他于1912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小蜜蜂玛雅历险记》（*Die Biene Maja und ihre Abenteuer*）立刻成为当年的畅销书，而托马斯·曼的作品只能在柜台下面进行交易。[\[182\]](#)。

[\[1\]](#) “祝福（Heil）”跟“治好病（heilt）”的发音近似。

[\[2\]](#) MiM an KM, [22.3.1933], TMA

[\[3\]](#) K1M an KM, 28.2.1933, in: K1M: Briefe, S. 85

[\[4\]](#)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 617

- [5] Tgb K1M, 13.12.1932
- [6] Keiser-Hayne: Pfeffermühle, S.45
- [7] Tgb K1M, 22.12.1932 und 28.12.1932
- [8] Tgb K1M, 5.1.1933
- [9] TM: Der französische Einfluss, GKFA 14.1, S.75
- [10] Tgb K1M, 4.1.1933
- [11] Tgb K1M, 8.1.1933
- [12]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 S.484
- [13] Vgl. Tgb K1M, 25.4.1932
- [14] K1M an KM, 16.3.1933, MON
- [15] Zit. nach K1M-Schriftenreihe 4.1, S.35
- [16] Tgb TM, 29.3.1933
- [17] EM an K1M, 30.3.1933, MON
- [18] Tgb TM, 15.3.1933
- [19] Tgb TM, 30.3.1933
- [20] Tgb TM, 10.4.1933
- [21] Tgb TM, 2.4.1933
- [22] Tgb TM, 5.7.1934
- [23] Tgb TM, 10.4.1933
- [24] K1M an KM, 12.4.1933, MON
- [25] KM an EM/K1M, 1.1.1928, TMA

[26] K1M an KM, 12. 4. 1933, MON

[27] KM an K1M, 16. 4. 1933, MON

[28] Zit. nach Hans R. Vaget: Seelenzauber. Thomas Mann und die Musik, Frankfurt a.M. 2011, S. 471f.

[29] TM: Essays IV, S. 16, 50, 67

[30] Zit. nach Jürgen Kolbe: Heller Zauber. Thomas Mann in München 1894–1933, Berlin 1987, S. 414

[31] Thomas Grimm: Gespräch mit Manfred Mayer, Inge und Walter Jens, in: Sinn und Form 3/2007, S. 370–377

[32] Kurzke: TM, S. 315

[33] K1M/EM: 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 München 1991, S. 18f.

[34] GM: Erinnerungen I, S. 516

[35] Tgb TM, 15. 3. 1933; vgl. Lühe: EM, S. 103–105

[36] Tgb TM, 30. 4. 1933

[37] EMB/MiM an KM/TM, [27. 4. 1933] , MON

[38] Tgb K1M, 10. 10. 1933

[39] Zit. nach Schaenzler: K1M, S. 184

[40] GM: Erinnerungen I, S. 531

[41] Tgb GM, 3, 6. 1933,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 S. 541

[42] EM an K1M, 25. 7. 1933, MON

[43] K1M an KM, 19. 7. 1933, in: K1M: Briefe, S. 113f.

[44] Tgb TM, 31. 5. 1933

[45] Tgb TM, 21. 7. 1933

[46] Vgl. Juliane Wetzel: Auswanderung aus Deutschland, in: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hg. von Wolfgang Benz, 2. Aufl., München 1989, S. 425–431

[47] K1M an KM, 24. 10. 1933, in: K1M: Briefe, S. 149

[48] Tgb K1M, 25. 5. 1933

[49] Tgb K1M, 2. 7. 1933 und 5. 7. 1933

[50] Ludwig Marcuse: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Auf dem Weg zu einer Autobiographie, München 1960, S. 179

[51]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 23

[52] Tgb TM, 6. 6. 1933

[53] Tgb GM, 17. 6. 1933, zit. nach Lahme: GM, S. 119

[54] Tgb GM,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 41

[55] Tgb GM, 21. 8. 1933, zit. nach Lahme: GM, S. 104

[56] Tgb GM, 16. 7. 1933,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 36

[57] Vgl. EM an TM, 10. 8. 1933, TMA

[58] K1M an TM, 21. 8. 1933, in: K1M: Briefe, S. 123

[59] Vgl. GBF an TM, 17. 7., 25. 8. und 28. 8. 1933, in: TM–GBF: Briefwechsel, S. 27f., 37–39, 41f.

[60] Tgb TM, 11. 9. 1933

[61] HM: Sittliche Erziehung durch deutsche Erhebung, in: Die Sammlung 1, Heft 1 (September/Okttober 1933), S. 3–7, hier S. 3

[62] Literarische Emigrantenzeitschriften. Mitteilung der Reichsstelle zur Förderung des deutschen Schrifttums. 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10.10.1933, zit. nach TM im Urteil, S. 83

[63] Joseph Roth an Stefan Zweig, 7.11.1933; Zweig an Roth, 8.-13.n.1933; Roth an Zweig, 15.11.1933 und 29.11.1933, in: »Jede Freundschaft mit mir ist verderblich«. Joseph Roth und Stefan Zweig: Briefwechsel 1927-1938, hg. von Madeleine Rietra/Rainer Joachim Siegel, 2.Aufl., Göttingen 2011, S.125 und 129, 131 sowie 133 und 136

[64] Vgl. S. 3f.

[65]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昵称。

[66] Zit. nach Rolf Düsterberg: Hanns Johst: Der Barde der SS. Karrieren eines deutschen Dichters, Paderborn 2004, S. 288

[67] Tgb TM, 23. 9. 1933

[68] TM an K1M, 13. 9. 1933, in: K1M: Briefe, S. 132

[69] EM an K1M, [28. 9. 1933] , MON

[70] Tgb TM, 8. 12. 1933

[71] Zit. nach »Ich wurde eine Romanfigur«. Wolfgang Koeppen 1906-1996, hg. von Hiltrud und Günter Häntzschel, Frankfurt a. M. 2006, S. 109

[72] EM an K1M, 9. 10. 1933, MON

[73] MoM an KM, 1. 10. 1933, TMA

[74] Beide gedruckt in K1M: Aufsätze II

[75] Zit. nach Schaenzler: K1M, S. 422

[76] K1M: Flucht in den Norden, Reinbek bei Hamburg 1999, S. 107f.

[77] Ricarda Huch an GM, 4.2.1934, in: Ricarda Huch: Briefe an die Freunde, hg. von Marie Baum, Neubearbeitung von Jens Jessen, Zürich 1986, S.234

[78] Zit. nach Inge Jens: Dichter zwischen links und rechts. Die Geschichte der Sektion für Dichtkunst an der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Künste, dargestellt nach den Dokumenten, Leipzig 1994, S.254

[79] GM: Erinnerungen I, S.255

[80] Ricarda Huch an GM, 27.7.1934, in: Ricarda Huch: Briefe an die Freunde, hg. von Marie Baum, Neubearbeitung von Jens Jessen, Zürich 1986, S.237

[81] Ricarda Huch an GM, 4.2.1934, DLA

[82] Tgb KIM, 12.10.1934

[83] EM an KIM, 18.10.1934, MON

[84] Tgb KIM, 29.12.1934

[85] MoM an KM, Juli 1934, TMA

[86] KM an KIM, 18.2.1934, MON

[87] TM: An das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 Frühjahr 1934, in: TM: Essays IV, S.79–89, hier S.87

[88] Keiser-Hayne: Pfeffermühle, S.73

[89] EM an KM, 22.8.1934, MON

[90] Zit. nach Kröger: EM, S.31

[91] Joseph Roth an EM, Frühjahr 1935, in: EM: Briefe I, S.66

[92] Zit. nach Lühe: EM, S.126

[93] Vgl. Kröger: EM, S.29

[94] 雅克布·瓦赛曼 (Jakob Wassermann, 1873~1934) 系德国作家。

[95] In diesem Sinne oft im Tgb K1M, ausführlich: Tgb K1M,
5. 7. 1933

[96] Zit. nach Entwurf zur Rezeptionsgeschichte zu den *Joseph-*
Romanen, GKFA 7.2 (in Vorbereitung)

[97] Vgl. z.B. TM an Alexander Moritz Frey, 30.12.1933, in: TM:
Briefe I, S. 341f.

[98] Tgb TM, 21. 9. 1933

[99] Tgb TM, 15. 2. 1935

[100] Zit. nach Entwurf zur Rezeptionsgeschichte zu den *Joseph-*
Romanen, GKFA 7.2 (in Vorbereitung)

[101] MiM an K1M, [1934], TMA

[102] HP an KM, 8. 8. 1933; 19. 4. 1933; 16. 12. 1933; 1. 5. 1934;
6. 12. 1935, in: HP: Briefe an KM I, S. 41, 21, 28, 125, 274

[103] Wälsungen是神话中的日耳曼人物。

[104] TM: Wälsungenblut, GKFA 2.1, S. 432

[105] GM: Erinnerungen I, S. 512

[106] HP an KM, 12. 11. 1935, in: HP: Briefe an KM I, S. 267

[107] HP an KM, 16. 9. 1935, in: HP: Briefe an KM I, S. 254

[108] Tgb K1M, 5. 5. 1934

[109] KM an K1M, 5. 9. 1934, MON

[110] Tgb TM, 13. 9. 1934

[111] KM an K1M, 5. 9. 1934, MON

- [112] Tgb TM, 19. 4. 1935
- [113] TM: Essays IV, Anhang, S. 374
- [114] K1M: Aufsätze II, S. 288
- [115] K1M: Briefe, Anhang, S. 706
- [116] KM an K1M, 20. 9. 1935, MON
- [117] Vgl. Lebenslauf MiM, MON
- [118] Zeugnis MiM vom 6. 4. 1933, MON
- [119] Vgl. K1M an KM, 24. 10. 1933, in: K1M: Briefe, S. 149
- [120] EM an K1M, [9. 10. 1933] , MON
- [121] Tgb TM, 10. 7. 1934
- [122] Tgb TM, 6. 10. 1933
- [123] Tgb K1M, 13. 6. 1935
- [124] Zit. nach Holzer: EMB, S. 83f.
- [125] K1M an MoM, 30. 7. 1935, in: K1M: Briefe, S. 225
- [126] HM an K1M, 18. 12. 1935, in: K1M: Onkel Heinrich, S. 31
- [127] Walter Kemposwki: Alkor: Tagebuch 1989, 2. Aufl., München 2003, S. 10
- [128] KM an K1M, 24. 3. 1935, MON
- [129] Zit. nach TM im Urteil, S. 257
- [130] TM an René Schickele, 25. 7. 1935, in: Briefe I, S. 396f.
- [131] Vgl. Reiner Stach: 100 Jahre S. Fischer Verlag 1886–1986. Kleine Verlagsgeschichte, 3. Aufl., Frankfurt a. M. 2003, S. 125–127

- [132] Zit. nach TM im Urteil, S.101f.
- [133] MoM an K1M, 12.1.1936, MON
- [134] EM an TM, 19.1.1936, in: EM: Mein Vater, S.91
- [135] K1M an TM, 22.1.1936, TMA
- [136] KM an EM, 21.1.1936, in: EM: Mein Vater, S.93
- [137] Tgb TM, 24.1.1936
- [138] TM an EM, 23.1.1936, in: EM: Mein Vater, S.98-104
- [139] MoM an KM, 26.1.1936, TMA; der Brief von Katia Mann ist nicht erhalten
- [140] HM an K1M, 26.1.1936, in: K1M: Onkel Heinrich, S.34
- [141] TM an EM, 23.1.1936, in: EM: Mein Vater, S.102
- [142] EM an TM, 26.1.1936, in: EM: Mein Vater, S.104 und 107
- [143] Vgl. EM an TM, 16.8.1934, in: EM: Mein Vater, S.85-87
- [144] Zit. nach TM: Essays IV, S.385
- [145] Vgl. TM: Essays IV, S.385
- [146] K1M an TM [26.1.1936] , in: K1M: Briefe, S.243
- [147] Holzer: EMB, S.82
- [148] Tgb TM, 27.1.1936
- [149] Tgb TM, 29.1.1936
- [150] EM an TM, 29.1.1936, in: EM: Mein Vater, S.108
- [151] TM: Essays IV, S.169-174, hier S.174
- [152] EM an TM, 6.2.1938, in: EM, Mein Vater, S.109

- [153]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141; Brief ist verloren
- [154] KM an K1M, 1.2.1936, MON
- [155] Vgl.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Frankfurt a.M.2013, S.623
- [156] K1M an MoM, 14.3.1936, MON
- [157] GM an Lise Bauer, 30.12. [1936] , zit. nach Lahme: GM, S.104
- [158] Tgb K1M, 1.5.1936
- [159] Tgb K1M, 10.5.1936
- [160] Tgb K1M, 11.5.1936; dort wird auch der französische Zeitungsartikel zitiert
- [161] K1M an MoM, 4.2.1936, MON
- [162] Tgb K1M, 6.1.1936
- [163] Ruhe gibt es nicht, S.194
- [164] EM an K1M, 1.5.1935, MON
- [165] Zit. nach Lühe: EM, S.143
- [166] MoM an TM, 5.6.1936, TMA
- [167] KM an K1M, 29.10.1936, MON
- [168] Zit. nach Ruhe gibt es nicht, S.186f.; die Richtigstellung in K1M: Aufsätze II, S.405f.
- [169] EM an KM, 24.10.1936, in: EM: Briefe I, S.98f.
- [170] Tgb K1M, 23.11.1936
- [171] EM an KM, 24.10.1936, in: EM: Briefe I, S.100

[172] K1M an KM, 7.11.1936, MON

[173] KM an K1M, 23.11.1936, MON

[174] TM an K1M, 3.12.1936, in: K1M: Briefe, S.273-275

[175] Tgb K1M, 25.2.1937

[176] Stefan Zweig an K1M, 24.11.1936, in: K1M: Briefe, S.272

[177]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173

[178] GM an HM, 8.8. [1936] , zit. nach Lahme: GM, S.109

[179] Tgb K1M, 4.9.1936

[180] Tgb K1M, 8.10.1936

[181] Vgl. Wilhelm Haefs: Waldemar Bonsels im»Dritten Reich«: Opportunist, Sympathisant, Nationalsozialist? , in: Waldemar Bonsels. Karrierestrategien eines Erfolgsschriftstellers, hg.von Sven Hanuschek, Wiesbaden 2012, S.197-227

[182] Gianluca Falanga: Berlin 1937. Die Ruhe vor dem Sturm, Berlin 2007, S.96

第三章 传奇之家（1937~1939）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几乎是艾丽卡·曼一个人的忙碌，小品剧《胡椒磨》于1937年1月5日在纽约首演。结果极度令人失望。尽管托马斯·曼在节目单里写了一篇广告，依然无济于事。演员们，尤其是特蕾莎·吉赛，英语说得极差；作品对德国童话的隐喻和对欧洲政治局势的影射，观众们几乎都听不懂，而且也不感兴趣。对该剧的评论非常令人沮丧。没演几场，美国经纪人便中断了演出，计划中的巡回演出也取消了。《胡椒磨》在演出四年后走到了尽头。留下的，是债务。

艾丽卡·曼精疲力竭，跟剧团的人，特别是跟特蕾莎·吉赛发生了争吵，吉赛不久便回欧洲去了。艾丽卡·曼的有钱朋友——银行家莫里斯·韦特海姆想跟她结婚，付清了《胡椒磨》的债务。不久他俩也发生了争吵，艾丽卡离开了韦特海姆，并很快找到了另一个男朋友，名叫马丁·贡佩尔特（Martin Gumpert）。贡佩尔特是一位犹太医生和作家，夫人去世后带着女儿离开了德国，在纽约开了一家皮肤病诊所。艾丽卡不仅在他的怀里，而且在他开给她的毒品里找到了安慰。她写信给弟弟克劳斯说，“他曾经非常执拗地看重自己作为大夫的尊严，现在已经改正了”。贡佩尔特“很有分寸地配给剂量，不时会来点新的和有噱头的东西”。^[1]艾丽卡·曼在短时间里依恋于他，只是很短的时间。

米夏埃尔·曼从1937年1月起生活在位于巴黎的法国饭店（Hotel Français）。他的小提琴师范学位还是在苏黎世音乐学院获得的。自从他在一次争吵中打了院长卡尔·福格勒（Karl Vogler）以后，家人不得不为他的音乐学习另找新的学校。自称“扬（Jean）”的小提琴教育家伊万·盖莱缪（Ivan Galamian）在巴黎居留教课期间成了米夏埃尔的老师，而且课时费只要75法郎一小时，“看在著名父亲的面子上”。^[2]米夏埃尔·曼从父母那儿获得音乐课的钱，外加每月100瑞士法郎。

托马斯·曼觉得自由了。他的政治局面梳理清楚了，这是“一个成功的步骤”，^[3]剥夺国籍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1937年1月，托马斯·曼跟妻子一起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对获得的新国籍表示感谢，并受到总统贝内什（Benes ˇ）的接见，还去了一趟普罗采石（Prosec ˇ），该市接纳托马斯·曼一家为市民。戈洛·曼也同行，他这时在布拉格上大学。在法国的尝试失败后，他来到自己新护照的家园，希望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当一名教师。

《波恩公开信》是一篇檄文，跟希特勒政权的虚假德意志决裂，该文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反响极大。“他们在不到四年内，把德国带向了何方？为了战争而重新武装到牙齿，毁灭了德国，从心灵和身体上把它榨干，同时威胁世界，阻碍世界，阻止世界完成其根本的任务，巨大而急迫的任务——和平；没人喜欢它，都用害怕和冰冷的反感来看待它，它濒临一场经济灾难的边缘”，这场灾难注定要滑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德国没有能力去打，更不可能打赢。托马斯·曼在文章结尾写道：“祈祷上帝帮助我们的国家——一个受尽摧残与蹂躏的国家，祈祷上帝教导它，跟全世界、也跟自己实现和平！”^[4]沉默了多年以后，托马斯·曼以这篇宣言站到了流亡文学的最前列。

来自德国的反应非常愤怒。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一位忠于党国的教育学家，在《未来的人民》（*Volk im Werden*）杂志上攻击托马斯·曼及其《波恩公开信》。他写道，这是一派谎言，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活着的死人托马斯·曼”是一个“颓废、破败和腐朽”文人的例证。这个“老朽”不知道年轻人的渴望，也不知道他们的使命，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三道四，估计他连正规地行进都不会。克里克说，正是出于这些值得深思的原因，“托马斯·曼从德国被清扫出去”。这是“德意志国家（Reichsdeutsch）”的最后表态。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于1月26日发布指令，德国媒体“绝不允许纠缠于托马斯·曼的事情”，批判攻击也不行。宁可死扛。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描述说：“从此，那些褐色人士笑得不那么响亮了。”^[5]

莫妮卡·曼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她想去维也纳。父母劝她在瑞士图尔高州（Kanton Thurgau）的一位著名钢琴女教育家那里继续音乐的深造。^[6]1月底，莫妮卡前往维也纳。

米夏埃尔给母亲写来一封“乞讨信”，说他搬进了巴黎的一间比较贵的旅馆房间，本想用自己的收入来付旅馆费，结果钱没挣到，还七七八八置了些东西，一句话：“我必须能够偿还我的债务并活到月底，为此，我得有110瑞士法郎这么大的可怕数目。这么做对一个可怜的移民来说根本就不合适，这我很清楚，而且以后也不允许再次发生了。”^[7]

托马斯·曼正式进入政治与文学的流亡圈子，可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加入其他那些希特勒反对者的行列，跟海因里希·曼、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或者莱奥波德·施瓦茨希尔德等人平起平坐。不管是以他哥哥海因里希为代表（克劳斯·曼也在其中）的倾向于莫斯科的“人民阵线（Volksfront）”，还是革命的姿态，抑或是《新日记》所进行的论战方式，他都不想参加。托马斯·曼坚持自己的立场，1937年恰

好有一家杂志作为论坛。该杂志由卢森堡的一位女赞助者资助，由朋友埃米尔·奥普莱希特（Emil Oprecht）负责出版。奥普莱希特及其欧洲出版社（Europa Verlag）同情在苏黎世的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并为这些人排忧解难，《波恩公开信》就是他印刷的。托马斯·曼成为杂志的发行人。8月，托马斯·曼在这份名叫《尺度与价值》（*Maß und Wert*）的杂志第一期的前言里指出，该杂志的宗旨不在于从事具体的政治斗争，而在于重新构建超越时空的价值。^[8]年初回到欧洲的克劳斯·曼觉得杂志的名称太可怕了。他认为，还不如直接叫《一本真正好的杂志》（*Eine wirklich gute Zeitschrift*）好了。^[9]他既生气，又失望。父亲在筹划该杂志时没有考虑过把他拉进去，更谈不上想到让他这个熟谙杂志事务的儿子进编辑部。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感觉十分强烈，五味俱全，魔术师对我彻底冷漠。”“不管是好意还是嫌烦（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对儿子的存在感到‘尴尬’）：从未感兴趣过；从未比较严肃地问过我的事。他对人普遍不感兴趣，对我还特别极端。”^[10]

跟克劳斯相反，戈洛·曼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成为父亲的交谈伙伴和助理。他“可亲与忠诚可靠的性格”受到父亲的赞扬，还有那些“有判断力的”文章以及他的政治思考。^[11]戈洛替父亲起草文章，发表意见，删除内容，并用打字机打好。从对青少年戈洛的反感，到对青年大学生戈洛的不管不问，现在变成了友好的尊重，对这位“听话的年轻人表示好感”——儿子把这一切都感激地记录下来，他非常尊重父亲，多少年一直在争取博得他的宠爱。^[12]

托马斯·曼心情一直还都不错。他依旧感受到世界的“朝气”。^[13]他自认为看到“第三帝国”人心在动摇。在展望西班牙局势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法西斯主义”“作为精神时尚”已经过气。^[14]可是，没有精神支撑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居然取得了胜利，意大利法西斯跟德国结盟，德国政府从未像现在这样稳定，一方面是通过军备

竞赛（依靠借贷和有计划的财政资助；还有将要到手的战利品），另一方面是通过外交上取得的各种胜利。之所以取得这些胜利，无不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作出了让步，这些民主国家饱受创伤、自顾不暇，似乎这样可以填满希特勒的欲望。卡蒂娅·曼了解到丈夫的立场后对此进行了批评，戈洛·曼也是这样。托马斯·曼的好情绪维持到3月，直到患上坐骨神经痛。他因此几乎不能入睡，不能坐着，也不能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数月之久。

1937年3月15日，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美国首次抗议希特勒的群众大会正在进行，组织者为世界犹太人大会。艾丽卡·曼应邀以德国流亡女演员和托马斯·曼女儿的身份发表讲话。她在23000人面前宣读父亲的贺词，然后作为唯一的女性，在纽约市长和其他显赫人物讲话之前，就妇女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中所起的作用演讲了几分钟。她说，正是妇女们帮助希特勒掌握了政权，选举了他的政党，她们曾深受纳粹潇洒的军服和“领袖”的小胡子魅力的鼓舞。现在，她们不得不亲身经历如何受骗，如何被“挤”回家里。^[15]她说的跟事实相符的不多：投纳粹票的妇女其实相对较少。艾丽卡一般来说不太重视历史的事实，更何况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她努力争取别人站到她这一边，讲话时引经据典，魅力四射，充满战斗激情。听众报以友好的掌声，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位讨人喜欢的女演讲者——她用简单的论点来说服人。艾丽卡·曼在纽约的舞台上发现了自己作为政治鼓动者的天分。《胡椒磨》的失败阴影已经烟消云散。她找到了新的任务。

不久，艾丽卡·曼发现自己怀孕了。去年7月，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诧异地写道：“艾丽昨天跟我说，她想要一个孩子……”^[16]现在孩子来了，可来得不合时宜。或许她觉得，马丁·贡佩尔特不是她的真爱，也不适合做父亲，或许她觉得时间点不对：反正她去堕了胎。

艾丽卡写信给多少有点预感的父母，谈到曾去医生那儿，医生确信她没有怀孕。^[17]

米夏埃尔·曼除了音乐学习外，还参加了一个三重奏。他们计划在巴黎演出，其中一人建议去布拉格举办音乐会，说米夏埃尔的父亲应该可以去布拉格广播电台问一下，“不用太当真”。米夏埃尔·曼向母亲描述了这些计划，说时不我待，望母亲“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信时还想到一件事，于是写道：“总是要我到处讲托马斯·曼；可我不想这样做——我有我的‘事业前程’。”^[18]五天后，他又写信，说他退出了三重奏。老师盖莱缪也曾反对现在就公开演出。^[19]过了几天他又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想重犯我最亲爱的哥哥阿西克劳斯犯过的错误：他想要改正都那么困难。”^[20]

伊丽莎白·曼在苏黎世音乐学院准备年底要举行的教师资格硕士考试。5月，她要把艾丽卡的福特车开到阿姆斯特丹去。她在那里待了几天，与弗里茨·兰茨霍夫同住一家旅馆。出发前就十分清楚，他才是伊丽莎白这趟旅行的真正目的，对此，家里人是知道的。后来伊丽莎白讲过，父亲在她临行前好像想与她进行一次启蒙谈话，“后来他又放弃并说，‘好吧，没问题。好好玩’。”^[21]对年纪小的孩子跟对年纪大的孩子一样：父母相信，孩子们自己会弄懂必要的事情。

虽然没有父亲的指教，伊丽莎白·曼还是在一天晚上采取了主动行动，向弗里茨·兰茨霍夫坦白了自己对他的爱情。他反应得十分得体，但明确告诉她，她的爱情不会有结果。他爱艾丽卡，一直还在爱着。^[22]伊丽莎白回家后，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麦迪似乎跟兰茨霍夫“达成一致了”。^[23]弟弟米夏埃尔也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麦迪跟兰茨霍夫结婚！”^[24]不清楚伊丽莎白说了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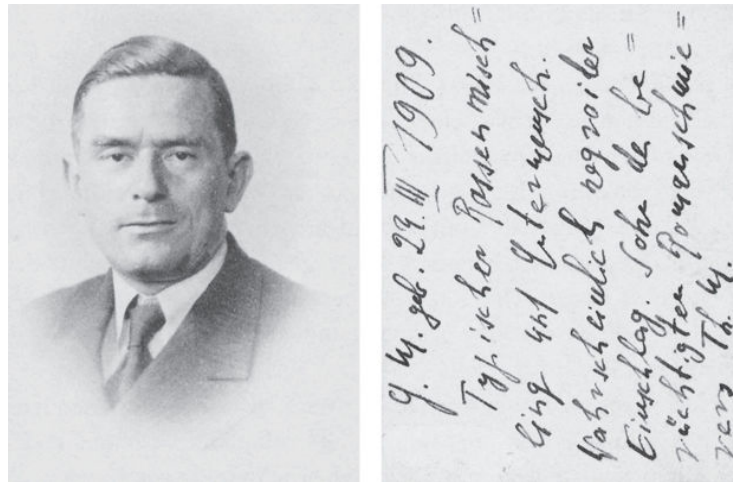


图12 戈洛·曼的护照照片，附在致女友利瑟·鲍尔的一封信上

她好像很难接受他说“不”。母亲再次仔细追问后，写信告诉克劳斯：“我差不多感觉到，弗里德里希（指弗里茨·兰茨霍夫）不肯这样做，对此我几乎深感惋惜，这可怜的孩子难得一次这么充满激情地希望着。” [25]

跟德国的各种联系逐步在中断，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内心的疏远，随着帝国与流亡生活之间的距离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想到邮件检查时的不祥感觉，即当局跟着阅读所有的信件。5月1日，戈洛·曼给他在德国的最后一位通信伙伴——爱他的利瑟·鲍尔写了一封信，信里附上了一张他最新的护照照片。他在信的背后写了几行字，更多是给信检当局而不是给女朋友看的：“G. M.，生于1909年3月27日。典型的杂种和人下人。可能是黑人血统。臭名昭著的小说家Th. M.之子。” [26]

米夏埃尔·曼祝贺父亲62岁生日的贺信寄到了居斯纳赫。他在巴黎生活得不错，音乐也有长进：“谁知道呀，说不定我到最后能为家里争光呢！”现在，他甚至有了一个“自己的奇迹”，并且想不久后将它带回苏黎世。 [27] “奇迹”在家里指的是伊丽莎白过18岁生日时得到的汽车，一辆福特501，差不多跟她年纪一样大——这辆汽车居然

还能开，这就是奇迹。4月21日米夏埃尔过18岁生日时，父母亲也答应送他一辆汽车，但要他先拿驾照，然后通过皮埃尔·贝特鲁的帮助在巴黎买一辆尚好的二手车，价格最高2000法郎。米夏埃尔·曼跟父母讨价还价，说基本能开的车至少要2500法郎。^[28]没过多久，驾照还没拿到，也没要皮埃尔·贝特鲁的帮助，他相中了一辆二手车，而且买下来了——一辆跑车，牌子是布加迪（Bugatti）。

在流亡的头几年，克劳斯·曼吸食的毒品越来越多，海洛因、吗啡、羟考酮，拿到什么吸什么。他的生活犹如过山车一般，时而腾云驾雾，时而因戒毒而消沉，大腿上的针眼溃变成慢性炎症。他经常呕吐，血液循环不正常，不时地冒虚汗。在去布达佩斯作报告的旅行中，克劳斯·曼昏倒了。5月底，他同意去一家戒毒医院戒毒。^[29]父母亲写信表示支持，并且“满怀着爱和担忧的心情”警告克劳斯，“结束这种廉价的美化生活的方式，它毁坏人的健康”。^[30]卡蒂娅认为，“其他人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毒品，为何我的一个儿子不行呢？！”^[31]姐姐不但开骂（“你混蛋，你无赖，你这臭小子！”），还从美国回来支持他。“我有1016个笑话要讲，关于美国的，关于所有向我求婚的，还有许许多多没有目的的小计划。”^[32]让所有家人担心的是，克劳斯相当——照艾丽卡·曼的说法^[33]——“口无遮拦地”谈到他的未来：“在不久的将来我是不会重新开始（吸毒）的，也许很久以后会试那么一回。我为啥要活到80岁呢？”^[34]经过难熬的几周后，他身心憔悴地离开了医院，其间克劳斯曾经多次泣不成声。现在至少毒瘾是戒了。三周后，毒瘾首次发作。接下来，又在秋天戒了一次毒，由马丁·贡佩尔特——艾丽卡·曼那位写诗的医生朋友实施帮助。疗效并没有持续多久。克劳斯·曼离不开毒品，他也不想离开。

卡蒂娅·曼不仅替克劳斯，也替幼子发愁。米夏埃尔·曼不明白，母亲到底要他怎样。“你是不是觉得‘购买奇迹’很荒谬，让你

难受了？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买一辆摩托车呢，不是更糟糕吗？”^[35]他去学车，准备考试，因为刚开始学法语，所以仅语言就是一大障碍。为了考驾照、上保险等，他特地要了近500法郎。至于布加迪车，他觉得母亲的看法不对。这是一辆“可爱的小车，并非你所想象的那么不结实”。当然还得修几样东西，因而也许要比“一辆老标致车”贵那么一点，但正因为如此，布加迪车“也要好多了”。^[36]

这真是一场奇遇：克劳斯·曼在布达佩斯因毒瘾发作而备受煎熬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记者。克劳斯爱上了他，那人也爱上了克劳斯。此人叫托马斯·奎因·柯蒂斯（Thomas Quinn Curtiss），比克劳斯·曼小九岁，天天去戒毒医院看望他。然后，他们一起旅行。克劳斯·曼称呼这位新朋友“托姆斯基（Tomski）”，因为明摆着的原因：“托马斯”他怎么也叫不出口。^[37]他想把这位新朋友介绍给家里。母亲很担心，写信给克劳斯，说她宁愿要一个“美国女孩”。母亲还写道，克劳斯当然可以把他的朋友带回来，但有个前提，这位朋友真的“摆得上台面”。母亲写道，在同性恋的恋人问题上，父亲“尤其敏感，所以必须保证最大的克制”。^[38]一切如愿。柯蒂斯受过教育，也“摆得上台面”，托马斯·曼认可了他，认可到他对这类“小朋友”^[39]所能做的程度。

托马斯·曼写完了《约瑟》第二部。在动笔写第三部前，他中断了该书的写作，以便着手早已计划好的一部关于歌德的中篇。《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后来写成了一部长篇。歌德本人直到第七章才出现，之前都是别人在谈论他，小说从不同角度向读者展示歌德的形象，其中一个角度是歌德之子奥古斯特（August）。托马斯·曼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于威廉·波德（Wilhelm Bode）的《歌德之子》（*Goethes Sohn*），这部关于歌德之子的传记被波德称作“一个次要人物的故事”。^[40]一个天才的儿子：这种题材很有意思。

米夏埃尔·曼写信回家说，布加迪车花费的钱“远远超过了允许的范围”。仅修电气部分就花了700法郎，其他的姑且不谈。他说，修理工看到马达后深受鼓舞，“我认为，买这车的主意还真不赖”。

[41].

戈洛·曼中断了在布拉格的尝试，他的前途也不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令人沮丧的时光后，他又回到居斯纳赫的父母家中。虽然又一次经历了失败，他在1937年夏季写的信却一下子充满了乐观情绪，他的心情也好起来。父亲新近对他的认可，在苏黎世交了几个朋友，打算写一本新书[他想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伟大的保守派政论家和拿破仑的反对者]——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解释他的心情之好。戈洛·曼恋爱了。更重要的是，他幸福地恋爱了。瑞士记者马努埃尔·加瑟（Manuel Gasser）成为他的第一位男性朋友，有修养，有魅力，完全公开地享受跟他的同性恋。这段恋爱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马努埃尔·加瑟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但这足以让28岁的戈洛·曼摆脱各种顾虑。加瑟带他去苏黎世的同性恋场所，成为他一生的密友，跟他，也只跟他谈论爱情生活，谈那些他们称为“小克拉拉（Klärchen）和小格蕾特（Gretchen）”的事情。

[42].

1937年6月，米夏埃尔·曼给母亲写了一封感谢信，谢谢她新近特别汇去的一笔钱。“你给我写了这样一封无可奈何的短信，真可以不要这样。何况这对我有点不公平，因为你说，已经不值得再跟我讲任何事情了。前一段时间我发火太多，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不晓得；但那都是那辆破车惹的祸，这是明摆着的事——而这一切百分之九十都是因为运气不好。我当然完全清楚，我不会‘算账’，今后必须更注意些，可我现在真的已经尽力了呀。” [43].

8月，艾丽卡·曼再次回到美国并以“某某之女”的身份向媒体宣布，她已经移民美国并在争取美国国籍。她主要居住在纽约贝德福德饭店（Hotel Bedford），跟马丁·贡佩尔特一起在那儿生活。她想写一本书，谈民族社会主义（纳粹）的教育，但又想参加一档演出，因而在演艺与政治之间徘徊不定，最后同时在做所有的事情。艾丽卡的财务状况很复杂，生活方式极其讲究，花费惊人。但她不跟母亲要钱。“有了个新情人，62岁，钱从他那儿来”，艾丽卡写信告诉克劳斯·曼，“他现在是我的累赘，既是负担又是麻烦”。^[44]她写信给母亲——这些事她也告诉母亲，说这个新情人吉姆·罗森贝格（Jim Rosenberg）很累人，但是，她不想跟他“闹翻”，这人实在“太有钱”了。^[45]马丁·贡佩尔特伤心地看着这一切。

8月，米夏埃尔·曼跟姐姐伊丽莎白一起开车去度假。格蕾特·莫泽尔（Gret Moser）也同行，她是伊丽莎白中学同班的一个瑞士女同学，比米夏埃尔大三岁，成为他的女朋友已经有些日子了。他们前往法西斯的意大利，在那里，正如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所记的：“被人认出是我的孩子，有些人对他们很尊重，有些人对他们很不客气。”^[46]三天后他又写道，卡蒂娅“昨天私下里告诉我，比比在旅途中跟格蕾特上床了，两人现在非常担心上床的后果”。^[47]

卡蒂娅·曼对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了如指掌，她给予帮助，提出建议，出谋划策。对莫妮卡也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她要了解现实，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要好高骛远，要她从事一项实际些的职业。此时，母亲认为，解决“莫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结婚。莫妮卡·曼最近有了一位新的崇拜者，一个匈牙利的艺术史学家，名叫耶律·兰易（Jenő Lányi）。可是她让他坐立不安，让她妈比这位求婚者还着急：“莫妮在终身大事上不答应兰易，实在气死人了！”克劳斯·曼是母亲诉苦抱怨的对象。莫妮卡不答应兰易，却在外公过生日

时寄去了一封“夸张得让人无法接受的信”，信中把“他称为孩提时代最美妙的经历。这叫什么事呀！”[\[48\]](#)。

扬·盖莱缪计划冬天去美国长期旅行。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他想陪老师同行，还顺便要40瑞士法郎，以便偿还债务。[\[49\]](#)卡蒂娅·曼对这趟旅行表示怀疑。10月底，儿子回到父母家中，家人商量这件事后，父母允许他去。一周后，米夏埃尔从他的“流放地”巴黎写信，抱怨母亲“胡猜乱想，说我的奇迹根本就不是奇迹”。他还带来了个好消息：买了只小狗，叫“比利”。“一只漂亮的带褐色的小动物，五个月大；有点猎獾狗的种，还有其他难以确定的成分。它已经能听我的话了，也差不多不在房间里拉屎撒尿了。”[\[50\]](#)。

秋天，克劳斯·曼也去美国旅行，想跟姐姐一样作报告，甚至想把他的一本书弄到好莱坞去拍电影。他作了一个关于自己家庭的报告，很成功，随后就到处去作报告，只要有人付钱；他去犹太人社区、女农庄主俱乐部或大学生那里。克劳斯·曼谈著名的父亲，这是美国人喜欢听的，也谈自己和自己的小说，谈纳粹和出逃德国的经历，谈《文萃》和《胡椒磨》，谈伯伯海因里希和犹太外祖父，也谈其他人。他强调家庭的“混血”——犹太和巴西血统——以此跟纳粹疯狂崇拜的“种族纯洁性”唱反调。“有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想到我父亲不是跟这个女人——幸运的是她是我们的母亲——而是跟一个汉堡新贵的女儿，一个‘纯种雅利安女人’结婚的话，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这种想法让我快活不起来。我担心，我们会变成无趣、孱弱的东西。当然，我们生来这样，也有我们丑陋的一面。但我们完全不是那样无聊得可怕……”[\[51\]](#)。

这场报告“泄露了点秘密，也很知心”，同时“充满了激情”，克劳斯·曼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52\]](#)最主要的是，他第一次讲述了这个敢于与希特勒抗争的家庭的故事，穿插着很多牛皮与传奇——艾

丽卡跟他都有这方面的独特天才，他们讲述这个家庭反对独裁统治的故事，一方面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夸大得有点过分，很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那么真实。

米夏埃尔给母亲写信，发信地点现在是欧洲酒店。因为狗的原因，他不能继续待在上一个旅馆里。而此时，比利染上了病毒性疾病——犬瘟热。他曾经想让狗安乐死，但如果请位兽医并进行注射治疗的话，救活它的希望还比较大，所以“要是就这么把它杀了，那我觉得也太悲哀了”。他对母亲给他写信时的严厉与尖锐相当不理解。他不知道，母亲到底责怪他什么。因为汽车的事？“你现在好对我激动，——那是因为你过去对我太软弱，我呢，这你能看得出来，我大概厚着脸皮利用了你的软弱。你现在听我说吧：你以为你对我的软弱从根本上来说对我就那么舒服吗？”他不想伤害母亲，但有一点却是明摆着的：“你基本上是咎由自取。” [53]

“做梦，梦到每一个细节”，克劳斯·曼在日记里记着，“魔术师死了。为此才哭起来”。 [54]着重一个“才”字。



图13 爱狗的米夏埃尔·曼

托马斯·曼的新假牙不太合适。他又得去完成“日常的要求”，而不是写小说，虽然很体面，也有利可图。托马斯·曼被说服了，同意来年2月再次在美国旅行。他要在哈佛大学开三场关于歌德的讲座，并在美国各地举办系列报告，题目是《当今的民主》（*Demokratie heute*）。耶鲁大学也表示感兴趣，想建立一个托马斯·曼作品收藏馆，收购他的草稿。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生意不错，或者可以做。”^[55]他本不想再充当什么“意见领袖”，不想过问政治。他想回归老本行，写作。^[56]写关于民主的报告让他觉得不轻松，特别是在欧洲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德国持绥靖态度的情况下。“民主理想主义？我相信吗？我不是像考虑进入一个角色那样在考虑民主吗？”^[57]他强迫自己态度坚决并保持乐观精神。他把在美国的报告命名为《民主将要到来的胜利》（*Vom kommenden Sieg der Demokratie*）。

巴黎寄来了今年最后一封信：小狗比利康复了。米夏埃尔期盼着美国之行。不过他需要钱，有兽医的账单，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贵得“讨厌”，他写信这样告诉母亲。他不得不救他的小狗，“所以又欠了些债”。额外要100瑞士法郎，而且是尽快。^[58]

1937年：从大局来看，不是什么特别惊心动魄的年份。回头看，那是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没有出现重大的政治事件，没有出版新的长篇小说，就连克劳斯也没有完成什么，只是挺过了两次戒毒治疗，不久又成为“小资”的俘虏。但对托马斯·曼来说，这是多产的一年，关于歌德的长篇进展顺利，虽然要忍受疼痛。这更多是一个私人年，一个爱情年：戈洛·曼有了第一个男友，在跟昔日那些根深蒂固的顾虑作斗争；米夏埃尔和格蕾特·莫泽尔；克劳斯跟托姆斯基；莫妮卡最后还是跟耶律·兰易订了婚；艾丽卡身边簇拥着一个个男人，他们都想跟她结婚；只有伊丽莎白不开心。

这也是米夏埃尔·曼之年：他首次离家远游。在父亲的日记里，米夏埃尔在巴黎的冒险经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托马斯·曼记下的只有一件事，即老师提醒他注意一种新的拉弓姿势。其他所有事情母亲都不让丈夫知道。她给他创造尽可能好的工作环境，自己一个人去应对家里大大小小的灾难，果断、干脆，过后又让步，带着幽默，不乏讽刺，常常掩饰着当母亲的忧愁。但即便对于这样一位母亲，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不留痕迹地流逝过去，克劳斯·曼在年初发现了这一点：“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看上去那么疲于奔命、乏倦和憔悴。她的担子太重了……” [59]

这一年似乎还需要一个高潮：12月，米夏埃尔·曼得了重病——脑膜炎，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担忧，他们强迫他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病刚好没多久，新一年里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在饭桌旁大哭时大家才获悉，米夏埃尔·曼在前一天晚上喝醉了酒，在清晨时分杀死了他的小狗比利。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一起“让人担心的事件”，这一事件也传到了父亲那里。 [60]

*

托马斯·曼小病不断，胃、头、牙、四肢，神经就更甭说了，反正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不舒服，日记里都一一记录了下来。要是他去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认为其状况稳定，身体健康。1938年1月，他心肌有问题，睡不好觉，得了很痒的湿疹，之后在阿罗萨例行度假时，又患上了感冒：咳嗽，喝甘菊茶。他自己写道，“心理上也很遭罪”。卡蒂娅坐在他的床边。“当她拉着我的手时，我在想，死的时候我就要这样。” [61]

克劳斯·曼不得不离开美国。他没拿到“宣誓书”，不能在这个国家长期待下去。 [62] 没有哪位出版商愿意给他出担保书，保证他作为外国人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没有人相信他的书，也不相信这些书

能适合美国市场。好莱坞的德裔明星，如弗里茨·朗恩（Fritz Lang）、比利·怀尔德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等，喜欢跟托马斯·曼这位有魅力的公子去吃早中饭，带着他去拍摄现场或派对。在一场派对上，他认识了卡塔琳娜·赫本（Katharine Hepburn），觉得她“真不赖”。^[63]他自己觉得有关电影的想法，比如关于路德维希二世的小说《装栅栏的窗户》（*Vergittertes Fenster*），是特别棒的好莱坞素材，却没人感兴趣。翻译他的作品或把它们搬上银幕都可以，但他不能想象，这一生可以做些比这低一等的工作。

就这样，克劳斯伤心地跟男友托姆斯基告别，他没有把握，两人的关系能不受距离的影响而维系下去。他跟在纽约的亲爱的姐姐告别，又回到了欧洲，跟以往一样，各种新的计划装在行李箱里——他现在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关于流亡的长篇。

克劳斯的父母乘坐“玛丽女王号”正在朝相反的方向行驶，把儿子米夏埃尔带在身边。他们原本没这样打算，可是，发生了一——按照父亲的说法^[64]——“香槟过量”事件，即杀死小狗以后，父母宁愿把儿子带在身边。托马斯·曼抵达纽约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主要问题是这些天日益昭著的事实——希特勒攫取奥地利。还在乘船横渡大西洋时，托马斯·曼就写信给哥哥海因里希，说紧张的政治局势有可能让他的此次旅行变成移民之旅。^[65]在美国新闻界面前，托马斯·曼严厉抨击西方大国的绥靖态度，还借此机会说出了他最经典的句子之一，这一名句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Where I am, there is Germany.）”^[66]托马斯·曼一直觉得自己是德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德国，文化已无容身之地，所以现在就在他这里，即在美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Wo ich bin, ist Deutschland.）”这是难以置信的表述，狂妄、自傲、骄横——但同时又是怎样一种豪放：

一个伟人公开站出来，担当起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角色，最起码是象征性的。这一角色不仅是托马斯·曼自己承担的，也是美国公众舆论赋予他的，这些舆论经常把他称为“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作家（the world's greatest living writer）”。同事们和流亡者的一些愤怒与仇恨都源自他的这一角色，源自被托马斯·曼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成功。这些人包括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后者在这位竞争者去世以后将说出这样一句话：这个人“能把裤褶子上升到艺术原则的高度”。^[67]你可以听到咬牙切齿的嘎嘎响声。

托马斯·曼在美国所扮演的杰出角色也跟他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有关，而且主要是女性支持者，如卡罗琳·牛顿（Caroline Newton），一位富有的遗产继承人，还有影响力巨大的女记者多萝西·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曾于1934年替小说《约瑟》大唱赞歌，为托马斯·曼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还一直在替托马斯·曼大造声势，称他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虽然她跟辛克莱·刘易斯是夫妻。托马斯·曼在美国最重要的资助者是艾格尼丝·E. 迈耶（Agnes E. Meyer）。她将成为托马斯·曼一生中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女人。^[68]这一点，他在1938年还不知道。艾格尼丝·迈耶也不知道，但无论怎样她都很清楚，她在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在托马斯·曼的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上一年，艾格尼丝·迈耶曾对他进行过一次简短的采访，然后写了两封友好、睿智的信。但这种方式太过细微。托马斯·曼真正记住她，是因为她在1937年5月写的第三封信。艾格尼丝在信中坦陈，她是谁，拥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她是《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所有人兼出版人、美国中央银行前总裁尤金·迈耶（Eugene Meyer）的夫人。她想邀请托马斯·曼去华盛顿作一个题为《民主能否生存下去？》（*Can Democracy Survive?*）的演讲。该演讲属于一个

系列演讲会，媒体将对这个演讲作广泛的报道，国家政治领导人都定期参加。最后，她还提出把《华盛顿邮报》作为他的论坛；为了让托马斯·曼真正弄清楚，他在那里可以做什么，艾格尼丝·迈耶还补充说，全国的所有精英都读这份报纸——上至总统。现在，她赢得了托马斯·曼的注意，从此，她的信属于最重要的信件，跟一大堆崇拜者的信分开——那些信大多由卡蒂娅简短地予以回复。托马斯·曼答应作这个演讲。

1938年初，在艾格尼丝·迈耶的推动下，托马斯·曼横穿美国进行巡回演讲，证实了他代表德国文化的资格。托马斯·曼成为演讲季节的“大红人”。^[69]他从纽约出发，穿越美国大陆直到加利福尼亚州，然后回头，共作了15场演讲，面对的是数千名听众，新闻界也十分尊重地加以报道。托马斯·曼共获得15000美元的酬金，是一个美国教授年薪的三倍。演讲由艾格尼丝·迈耶亲自从德语翻译成英文，托马斯·曼再精心研读。虽说他的英语水平一般，却能相当令人信服地作完报告。按照美国的习惯，接下来是提问阶段（他恨这种“盘根问底”，这显然太过民主了^[70]），如果遇到棘手的问题，艾丽卡会给予帮助，或翻译，或耳语。3月，他在华盛顿的“宪法大厅”进行演讲，作为客人住在迈耶家有40间房间的大别墅里。

就这样，托马斯·曼跟妻子和女儿一起于1938年初横穿美国，历经数千公里，向人们宣告《民主的未来胜利》（*Zukünftiger Sieg der Demokratie*）。他为“社会民主”呐喊，很容易让人看到罗斯福“新政”的影子。但是，对托马斯·曼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罗斯福的重新分配或实行平衡的政策，而是罗斯福的民主，托马斯·曼把这种民主首先看作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主义——的强大对手，同时，他没有忘记鞭挞欧洲民主国家的幻想：可以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妥协。托马斯·曼在结束报告时说，民主国家不仅将在和平方面战胜法西斯，而且——“如果非此不可的话”——也将在战争中战胜

它。^[71]托马斯·曼非常清楚，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罗斯福是最伟大的斗士。听众们当然喜欢听到对自己国家和总统的褒奖。可每当演讲结束时，掌声总是有所保留，几场演讲下来，托马斯·曼发现了这一点。他跟艾丽卡一起对演讲的结尾进行了修改，把它引到“个人层面”上。^[72]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对“战争”一词也缺乏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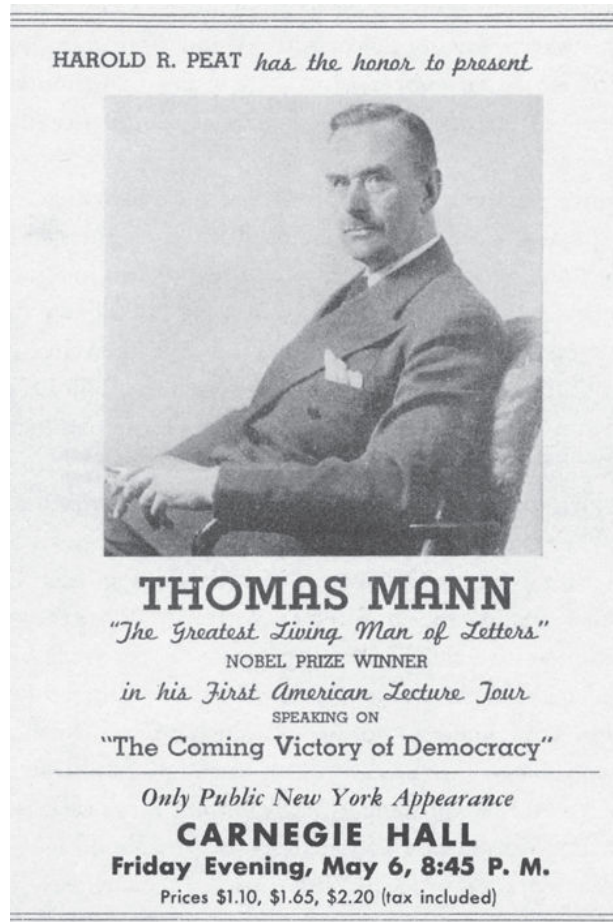


图14 1938年5月，托马斯·曼在卡耐基音乐厅演讲的海报

戈洛·曼留在了苏黎世。父母本来是愿意把他带上的。他对父亲的报告进行删减并打印出来，哥哥克劳斯还写信建议戈洛可以“一半以魔术师高级秘书的身份”同行，以便在美国看看能否在大学谋求到一个职位。^[73]戈洛不愿意。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位置

——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有自己的朋友，甚至偶尔还来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这会儿是一个叫弗里茨（Fritz）的自行车赛车运动员——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一个是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一个是竞技运动员；日后，在回顾这段插曲时，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也“不是非自行车运动员不可”。^[74]

戈洛·曼也有一项任务：他在撰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传记。此外，他还在《尺度与价值》杂志给父亲当助手，杂志每逢遇到重大问题，都要请他参与，出版人奥普莱希特夫妇已和他成为朋友，也会请他帮忙。受流亡之初几年的影响，他放弃了大学生时代的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就戈洛·曼而言，这一个人理想的发展因斯大林的莫斯科公审而达到高潮并终结，因为这一审判将苏联真实的恐怖特征暴露无遗。在戈洛·曼看来，共产主义作为制度已经失败，也不再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具体盟友。在这一问题上，他跟伯伯海因里希发生了争执，虽然戈洛在流亡的最初几年曾跟伯伯相互理解，还给过伯伯一些帮助。海因里希·曼不允许批评斯大林和苏联，包括那些残暴的公审，连同那么多的死刑判决他也觉得公正、合理，并在公开场合直言不讳。^[75]克劳斯的想法跟伯伯一样，虽然对苏联有些怀疑。他跟伯伯的关系非常好——跟弟弟戈洛的关系也很融洽，虽然他们俩在政治上意见并非完全一致。

3月12日，德国国防军进军奥地利。在欧洲，人们曾寄希望于法西斯意大利，希望它会阻止德军的这一步骤，可是两个独裁者早已秘密结盟。英法两国作为保障凡尔赛和平秩序的大国无能为力，只好袖手旁观。^[76]当希特勒将其故土“并入”德意志国家版图之际，一场新的移民潮开始了。作家卡尔·祖克迈耶（Carl Zuckermayer）和宇顿·冯·霍瓦特（Ödön von Horvath），后来还有82岁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纷纷离开奥地利。托马斯·曼的出版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维也纳刚待了两年，就不得不带上他的出

出版社再次逃亡。在一次大逮捕中，曼家的朋友汉斯·赖西格也成为牺牲品。这一消息特别让托马斯·曼深感震惊。他离不开赖西格。托马斯·曼跟世界保持着距离，虽然认识很多人，也受到许多人的崇拜和赞赏，却几乎没什么朋友，也几乎不让任何人接近自己。赖西格是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跟他在一起，托马斯·曼感到舒畅。即便他来访好几周，他的在场总是令人愉快和兴奋。托马斯·曼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赖西格总让他“更加开朗，思路更开阔，笔下更高产，也更加开心”。^[77]相比之下，其他一些让他和妻子感到疑惑的事情都算不上什么，比如“赖西格特别不作为，没有能力和犹豫不决”，还有他那“过寄生生活”的方式。^[78]不久，汉斯·赖西格又被释放，然后去了柏林。托马斯·曼成功地替这位瓦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大学谋到一个教席。可赖西格对大学的邀请回答得很谨慎，后来干脆没了音信。他留在了德国，跟曼的书信往来也中断了。

戈洛·曼在5月的《尺度与价值》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观点》（*Politische Gedanken*）的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即人们在国外为什么不听从德国流亡者的意见，不听从他们发出的警惕希特勒的警告，也不听从他们的多方告诫——希特勒不会因为对他的所有让步而停止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要用和平手段来制止他亦无可能。原因在于，所有这些警告都来自流亡者。“因为往往弄不清楚，流亡者在推行外交政策时所持的是何种立场，代表谁的利益；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根基。”跟克劳斯·曼不同，戈洛·曼不相信流亡者会有伟大的政治前途，两人也经常为此而发生争论。^[79]戈洛·曼认为，纳粹覆灭以后，掌权者不管是谁，都将来自“德国国内而不是出自流亡者的行列”。在展望奥地利跟德国的强制合并时，他认为，跪倒在德国脚下的欧洲不可能长久。“在欧洲的德国人太多，以至于其他立志生存的民族早晚都必将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包括所有德国人在内的侵略性国家；若要应对这样一种联合阵线，德国人又嫌太少了。”^[80]戈洛对

1938年政治形势的这些分析既明确，又具有前瞻性，还充满着自我批判精神，这在德国流亡者的笔下可谓凤毛麟角。不久，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戈洛的“发展非常令人兴奋，他为《尺度与价值》撰写了非常出色的文章”。^[81]

卡蒂娅·曼采用了一种新策略。她陪同丈夫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期间，不再是每月给儿子米夏埃尔汇一次钱，而是分几次，他当时跟着他的提琴老师盖莱缪待在纽约。卡蒂娅叫他不要每月月头就把钱花光。米夏埃尔写信告诉她，这种教育方法很不“实际”，而且也很危险。这样做等于强迫他去借钱，因此，多借钱的诱惑——哪怕没有必要——“自然非常巨大”。“所以请你尽快把剩下的钱寄给我”，最后还以不怕你不信的逻辑结尾：“债务压得我快要窒息了。”^[82]卡蒂娅·曼又让步了。

托马斯·曼在好莱坞休息了几周，不作演讲。人们热情地接待他，邀请他到处走走、看看。瓦尔特·迪斯尼（Walter Disney）在电影工作室里给他放映正在制作的卡通电影《幻想曲》（*Fantasia*），米老鼠在这部电影里充当魔术师的徒弟。彼得·洛瑞（Peter Lorre）曾把一个可怕的精神病人表演得活灵活现，他带着托马斯·曼去福克斯电影公司（Fox）。托马斯·曼在那里见到了“美国的宠儿”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83]两人交谈的内容未见报道。

之前，有些谣言已飞越大西洋传到欧洲，说父亲的演讲之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属实），还说他的书籍销售之好令人意外，甚至那部翻译出版的鸿篇巨制《约瑟在埃及》也是如此（也属实）；还有传闻称，托马斯·曼在好莱坞签署了一项超级合同，而且对方是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但这一传闻并不属实，却让儿子克劳斯在日记里写下了苦涩的心声：“我的反应——自己感到意外，也非常痛苦：我必须承认，主要是嫉妒和毫无意义的委屈感。他所到之处，战无不

胜。”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儿子：这是克劳斯毕生面对的问题。他有时候可以排遣掉这个烦恼，比如在能够利用父亲的名字时，又比如，他以“某某的儿子”进行自我介绍时，或为了达到自己的文学目的而使用“曼”姓时。“有我摆脱他阴影的那一天吗？”克劳斯这时在日记里自问。“我的精力足够用吗？”^[84]

毒品早已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情况比以往更糟糕，虽然有了男友托姆斯基。这位男友威胁说，要是克劳斯不摆脱毒瘾，就跟他分手。4月，他再次试图戒毒，这一次是在苏黎世。“简直就是下地狱。淌了多少泪水。绝望。”^[85]两周后，他中断了戒毒，原因是多方面的，精神治疗时的音乐，被询问跟母亲和姐姐的关系，都让他感到讨厌；跟父亲的关系好像跟这事没什么关系。^[86]六天后，他毒瘾复发。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享受着毒品，“自己也生自己的气。我想戒掉它，我必须戒掉它，我不久一定要戒掉它。我要跟托姆斯基共同生活和工作”。在下决心的当天，克劳斯在马努埃尔·加瑟那儿参加了一场性爱派对。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在考虑，托姆会不会也玩这类特别的小游戏。我从内心希望他不玩，如果玩的话，会让我感到羞耻。”^[87]

父母在美国期间，莫妮卡·曼住在居斯纳赫的家里。她已经放弃了维也纳。她的男朋友，不久以前成为未婚夫的兰易忠诚地陪伴着她，从佛罗伦萨到维也纳，从维也纳到苏黎世。未婚夫耶律·兰易出生于匈牙利，在瑞士长大，当年他还是个孩子时，一家瑞士人接纳了他，并从经济上资助他。兰易于1929年在慕尼黑拿到艺术史博士学位，正在进行关于多拿特罗（Donatello）——米开朗琪罗之前的一位著名的文艺复兴雕塑家——的研究。^[88]“告诉你们吧，莫妮变成了一个非常讲究的小家伙”，克劳斯·曼于夏初写信给在美国的父母亲。“当然并非失去了独特的个性，却有了许多收获——如果一个像兰易那样彬彬有礼的人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那她身上肯定有什么过

人之处。”他猜到他们会觉得奇怪。“真的，她是那样轻盈体面，时而心事重重，时而充满幽默，不乏奇想，妩媚娇柔，真的相当漂亮。” [89]

在美国巡回演讲期间，托马斯、卡蒂娅和艾丽卡·曼在艾格尼丝·迈耶的咨询和支持下，决定举家移民美国。除莫妮卡想跟兰易待在欧洲外，所有的孩子“都要过来”，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他们在这里会有最好的前途，也只有在这里才有前途。” [90] 就他自己而言也同样如此。艾格尼丝·迈耶在最短时间里给他在东海岸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谋到了一个收入丰厚的客座教授教席。大学在纽约东边，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要尽的义务十分有限：一个学年作四场报告。 [91] “美国对我好得要命”，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这一点克劳斯也注意到了。“穿越美国大陆，然后回头，这大概算得上是一场凯旋之旅了，到处都挤满着听众，其听讲的认真程度令人感动。”克劳斯·曼还以矛盾的心情了解到，父亲夸奖新一期的《尺寸与价值》——又是一期杂志，没有克劳斯·曼的片言只字；父亲告诉克劳斯，特别是弟弟戈洛的政治警句写得异常“出色”。 [92]

卡蒂娅·曼陪伴着自己的丈夫，当助手，提建议，艾丽卡不在的话还担任翻译——她的英语比托马斯·曼要好得多。她本人对新的流亡之乡缺乏热情。卡蒂娅告诉克劳斯：“可惜我根本就不适合美国，这一点我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接下来的理由使其他所有的理由为之逊色：“但说到底，这里对魔术师来说实在不错，为此，我也应当高兴才是。 [93]”

艾丽卡·曼于5月底从美国回到苏黎世。她跟克劳斯正在一起撰写一本书，类似“谁是流亡者”之类的书，讲述流亡者的故事，穿插着许许多多鲜活的故事和人物特写。在余下的时间里，她还替父母打理家务，从青少年时期起她就经常如此。艾丽卡找莫妮卡的未婚夫兰易

“谈话”，让他公开其财产状况。还跟小妹妹伊丽莎白讨论跟弗里茨·兰茨霍夫的问题，告诉她对他的感情没有丝毫前途。艾丽卡写信到美国告诉父母，伊丽莎白什么都明白，但她硬说对兰茨霍夫的爱“生死不渝”。^[94]

6月，老大和老二一起前往巴黎。克劳斯·曼去“按摩”，狠狠过了把毒瘾，还写信给“亲爱的托姆斯基”。^[95]他很激动。第二天，艾丽卡和他前往西班牙直接深入内战，想为多家报纸和杂志报道人民阵线政府的共和军跟弗朗哥将军的叛乱分子进行的战斗。他们拿起笔作刀枪，反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艾丽卡的主意，是艾丽卡的冒险。出于往日的依恋，加上有机会再次跟亲爱的姐姐共同行动，克劳斯也参与了。没过几天他就想走人，原因是伙食太差，香烟太少，还有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但艾丽卡如鱼得水，大胆鲁莽，寻求危险。后来她还爱上了一个名叫汉斯·卡勒（Hans Kahle）的德国流亡者，西班牙共和国国际纵队（die Internationalen Brigaden）的指挥官。她跟“汉斯将军”开始了一段桃色绯闻，弟弟妒忌地看在眼里。艾丽卡朝气蓬勃，克劳斯心里害怕。他在日记里写道：“奇怪，艾丽卡对这里的情况表现得那么有耐心，甚至是喜悦。我要撤离，这一愿望不断增强，难以控制。”^[96]

为了她，克劳斯留了下来，一共三个星期，却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去过巴塞罗那、瓦伦西亚（Valencia）、马德里和托尔托萨（Tortosa）——一个因空袭和埃布罗攻势被彻底摧毁的小城。他们撰写文章，报道共和国人士的英勇斗争，有时合写，有时各写各的。克劳斯·曼在他的《西班牙之旅的总结》（*Fazit einer Spanienreise*）里向自己、也向读者发出充满乐观的号召：“从我们流亡那天到现在，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能够赢得胜利。”“看到西班牙人民跟自由——他们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的敌人进行斗争，这种经历永远难以忘怀，也是我们在流放中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

情。”^[97]这无异于黑暗森林中的一声呐喊。对共和军来说，军事局势早已陷入绝望之中。没过几个月，弗朗哥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8年7月，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也再次回到欧洲，目的是清理家产并进行告别。接下来是第二次流亡，就他们俩而言，这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流亡。海因里希·曼从尼斯赶来告别，这位忠诚的大哥非常眷恋托马斯，把过去的伤害忘却得更彻底一些，他也从未像弟弟那样将相互的竞争和兄弟间的敌意看得那么严重。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崇拜的伯伯变得太老了，“几乎是白发苍苍”了。他们谈论莫妮卡，海因里希·曼对其命运表现了“高度的同情与人性的关怀”。相反，根据克劳斯·曼的观察，父亲对大哥“常常是心不在焉”，“可他对谁不是这样呢？”^[98]

克劳斯看父亲的眼光很忧郁，带着妒忌和怒气，这些怒气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养分。托马斯·曼在家人的圈子里朗读他写的关于歌德的小说，这一年的风风雨雨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去写作。他读了《绿蒂在魏玛》第六章。奥古斯特·冯·歌德（August von Goethe）作为父亲的代表，要跟老歌德爱过的奥提莉（Ottilie）结婚。托马斯·曼不仅用他曾仔细研究过的历史人物的特征描写奥古斯特，同时还借用了自己三个孩子的性格特征：酗酒让人想到米夏埃尔，轻浮像克劳斯，不讨人喜欢和笨手笨脚形同戈洛。他们的基本关系则像三个孩子跟他自己：小说中写道，“一个伟人的儿子意味着极大的幸福和可以估量的舒适，还有令人压抑的负担，以及自我尊严的不断缺失”。^[99]这一类比没有逃过儿子们的眼光。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的感觉。”^[100]戈洛·曼后来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父亲在此时“有点拿我当奥古斯特·冯·歌德玩”。^[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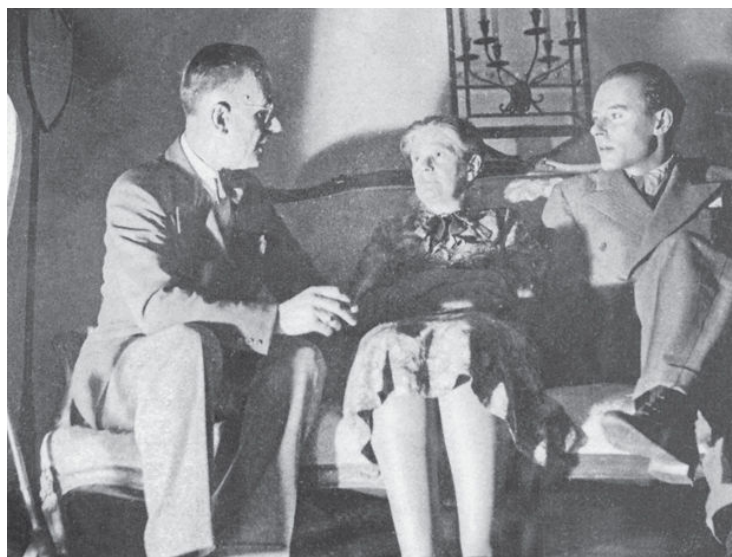


图15 1938年，克劳斯·曼跟父母在一起

卡蒂娅·曼对移居美国的兴致不那么高，她的“忧心忡忡”艾丽卡也观察到了。^[102]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原因是卡蒂娅的父母，她不得不把他们留下来。流亡的头几年，卡蒂娅的父母定期来瑞士看女儿，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提起时总不是那么愉快。虽然女儿一再催促，两位老人就是不想流亡。卡蒂娅说，他们可以一起跟着去美国。

“你这个小笨蛋，”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于1938年5月写道，“你可别当真，以为我们两个马上就88岁和83岁的耄耋老人，又没有足够的钱财，能够迈出移民的脚步，成为你们这些好孩子的负担，还要赔上丧葬费！”她在信的结尾写道，宁愿在德国体面地死去，也不要在美国“没有尊严地腐烂掉”。“就这么说了。虽然眼里噙满着泪水，但一言为定，绝不反悔。”^[103]

1937年初，托马斯·曼一家被褫夺国籍后不久，岳父岳母的护照被吊销。1938年夏，又有了一个再次相会的希望。据说在德国与瑞士边境地区可以获得去邻国瑞士的当日签证。海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于1938年7月前往康斯坦茨（Konstanz），卡蒂娅·曼同时来到瑞士边境一侧的克罗伊茨林根（Kreuzlingen）等待。可是，签证

申请被当地区政府“生硬和粗暴”地拒绝了。一次让人彻底绝望的经历。这一时刻，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她的幽默——她生活的基本情调。她非常伤心地写信给女儿，“只能说，这次实在是太难过了”。^[104]她们俩都预感到，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原本可以相见的机会了。

米夏埃尔·曼于6月回到巴黎，继续在提琴老师盖莱缪那儿学琴。他写给母亲的信很少提及音乐学习的事情。信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跟格蕾特·莫泽尔的婚礼；二是钱，他总是缺钱，每封信里总是一再讨要。8月，上一年的主要大事被重新提起：布加迪跑车。那辆车又得修理了，还谈到一个新问题：车辙完全歪了，新轮胎（他借钱买的）彻底开废了。米夏埃尔·曼对他的“奇迹”的热情已是烟消云散。他告诉母亲，打算把车卖掉，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个下家。“车子的那个问题我当然不告诉他”。当然，接下来又是必不可少的那句话：“有太多太多讨人厌的开销。”^[105]十天后，米夏埃尔又来要钱。他请母亲别以为他不停地借债是因为笃信母亲不管怎样都会付钱。他可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日子其实过得“挺节俭的”。不过：“我要不总是那么倒霉、那么愚笨就好了。”^[106]

这一年，克劳斯·曼为了维系他的种种关系，非常认真地作出努力，要戒掉毒品。弟弟戈洛和当医生的朋友卡岑施泰因帮他度过了这一难关。有段时间，好像还真要成功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日记里没再出现“服用”的字眼。不靠任何帮助也不行，特别是为了工作他需要点什么，所以现在定期服用一种叫苯齐巨林的兴奋剂。跟往日天天服用吗啡、海洛因或羟考酮相比，这是个进步。

就连伊丽莎白也让父母操心。她怎么也放不下对弗里茨·兰茨霍夫的爱，虽然跟姐姐推心置腹的谈话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而且跟兰茨霍夫一年几乎没能见上一次面。父亲在日记里把这称为“冥顽不化的

痴迷”。^[107]女儿的病，像哮喘、吞咽困难和失眠等，从心身医学来讲似乎都跟父母有关系。克劳斯·曼同样满怀同情地观察到，“她心里那份炙热的感情是那样的不幸，也着实没有半点希望，却令人害怕地在持续燃烧”。妹妹跟德国批评家汉斯·萨尔（Hans Sahl，好歹只比她大16岁）交好，试图借此来安慰自己，对此，克劳斯心存怀疑。他更希望伊丽莎白能在美国重新开始：“那里，不管在大学还是在好莱坞，有那么多好青年。”^[108]到了秋天，这时已在普林斯顿，弗里茨·兰茨霍夫来访。他带来了未婚妻里尼·奥特（Rini Otte），一位荷兰女演员。克劳斯·曼看着“小妹在受煎熬”。^[109]父亲认为，不应当还让这位“竞争对手”来访，让女儿难受。^[110]第二天，他安慰了女儿。

世界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不管曼氏一家是否已经安排妥当。就在托马斯、卡蒂娅和伊丽莎白·曼跨洋渡海前往美国的同时，欧洲朝着一场新的危机，抑或是一场战争前行。继奥地利后，希特勒此时又把手伸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势力强大的德裔少数民族成为他动手的借口。捷克的冲突直接关系到曼氏一家，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是他们获得国籍的国家。托马斯·曼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戈洛和米夏埃尔就得作好服兵役的准备。^[111]

到了9月，形势急转直下。各种消息也传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号”船上，气氛非常压抑。托马斯·曼写道：“法西斯主义很有可能将其魔爪伸向美国。”他再次厌烦政治，想摆脱这一切。“转向吧，转向！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做精神方面的事。我要的是明朗与快乐，要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无济于事的仇恨不应该拉扯上我。”^[112]到了美国不久，他又在别人的劝说下，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声援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他高呼“打倒希特勒！”20000名听众备受鼓舞。^[113]

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从中调停，英国和法国全线让步。1938年9月29日，签署《慕尼黑协定》。主要由德裔居住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被划归德国。在自己国家遭到瓜分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甚至连谈判桌的边也没沾上。《慕尼黑协定》成为“日益荒唐的绥靖政策”的顶峰，此项政策造成中东欧唯一尚存的民主国家成为其牺牲品，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道德沦陷”。[\[114\]](#)

同一天，曼氏一家，包括父母和伊丽莎白，搬进在普林斯顿租的房子，受到黑人夫妇——男女仆人约翰（John）和露西（Lucy）的欢迎。十个房间，五个洗澡间，月租250美元——房东们原想多要点，最后同意曼家提出的最高房价。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个像曼这样的名人住过的房子，以后更好卖。搬进富丽堂皇的维克多利亞式房子，托马斯·曼却无法尽情享受。他对《慕尼黑协定》恨之入骨。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来已被打败，不可能再进行一场战争了。他觉得已看到在柏林发生了“暴动”，在罗马甚至爆发了革命，一句话：“独裁者们已穷途末路。是英国拯救了他们。”[\[115\]](#)

第二天，托马斯·曼跟克劳斯打电话，两人十分沮丧，一致认为“英国在推行反苏拥德政策”。[\[116\]](#)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英国和法国害怕希特勒被推翻，“用尽各种手段扶持他。张伯伦（Chamberlain）对他那个阶级所尽的义务要超过对他的民族。”[\[117\]](#)克劳斯采用共产主义的术语并非源于眼前的混乱。在跟艾丽卡正共同撰写的《逃避生活》（*Escape to Life*）一书的结尾里，克劳斯进一步展开其想法：不是恐惧战争，而是恐惧行将替代法西斯的东西，这种恐惧让民主国家阻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走向覆灭，而他们的覆灭本来已成定局。[\[118\]](#)托马斯·曼也持类似的想法。他在题为《这种和平》（*Dieser Friede*）的文章里——计划作为下一部政论集的前言

——详细阐述了西方是如何将法西斯主义当作“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雇佣兵”的。他称英国为“希特勒的教母”。[\[119\]](#)

这段时间不是这对父子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刻。他们俩此时共同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是绝对地瞎胡闹。艾格尼丝·迈耶，托马斯·曼非常重要的美国女赞助者，读着他的文章，心生担忧，如果不说是感到震惊的话。她写信给他，称赞他的观点散发着“魔力”，然后笔锋一转，急切地劝诫他，不要在政治事务上浪费精力，要回归他的“创造性的工作”。[\[120\]](#)很难有比这更客气的说法了。

戈洛·曼对形势的分析要中肯得多，没有对独裁者们迅速倒台的幻想，也没有指责所谓跟法西斯的联盟。在11月的《尺度与价值》杂志上，他对西方大国进行清算，指出其“安抚政策”是黄粱美梦，他们过去拒绝对魏玛共和国施行这种政策，现在却拱手奉送给了希特勒。“有许多寄希望于欧洲的重要德国人——虽然在德国人中属于胆怯的少数，你们（西方大国）让他们对欧洲失去希望，你们允许希特勒证明：暴力等于成功，正义等于失败。你们不区分人民和领袖，而是蔑视人民而讨好领袖，但这种外交考虑没有丝毫意义，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希望。你们并非真正为和平而战，不过是为了证明你们在战争中是无辜的而已。”现在，德国强大了，武装好了，英国和法国的气氛也随之改变。“现在，大祸临头之际——你们为了引入这场灾难不可谓没有殚精竭虑——你们却诉苦抱怨：这讲的是哪门子理呢？”[\[121\]](#)

艾丽卡·曼以她的方式也同样战斗在政治的前沿阵地。她争取民众支持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要是愿意，她就可以既和蔼可亲，又妩媚动人。她英语早已讲得十分流利，到处旅行演讲，成绩斐然。她也经常被人介绍为“某某的女儿”，但并不觉得尴尬。在其演讲系列里，有一篇关于父亲的报告。但她一般都是以研究“第三帝国”专家的身

份上台，讲述希特勒统治下的青少年或民族社会主义社会的妇女问题。

1938年，她撰写了一本书，介绍希特勒统治下青少年的教育情况，该书于秋季在美国出版，同时在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用德语发行。该书非常巧妙地把文献材料、新闻报道和反邪恶的宣传糅合在一起，剪裁得当，适合美国人的需要：富有趣味，慷慨激昂，其基本主题一目了然，个人的命运和逸闻趣事穿插其中。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天衣无缝，无可挑剔，效果奇佳，其中大部分内容只可能来自艾丽卡·曼的丰富想象。若要靠这本书来分析“第三帝国”日常生活的情况，实在不大合适。可艾丽卡又能从哪里得知那些真实的情况呢？这恰恰是德国流亡者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来了解故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回乡察看已无可能，自由媒体亦不复存在。

艾丽卡·曼要的不是“第三帝国”的真实情况，而是如何赢得美国人作为盟友。她在书里把纳粹分子用于教学的斗争书籍相当简单地套用在德国所谓的教育现实上，缺失的亲身体验就用想象去弥补。她看德国的眼光充满着仇恨，所以有些夸大事实（比如她说，德国青少年不得不说“希特勒万岁”，每天甚至多达150次），艾丽卡的目的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野蛮人的学校》 [*School for Barbarians*, 又名《一千万个儿童》 (*Zehn Millionen Kinder*)] 一书是她为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作出的贡献。该书具有诱导性和趣味性，而且非常成功：到年底，这本书在美国共销售了40000册。[\[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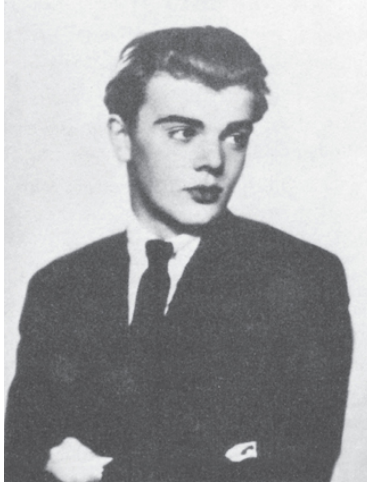


图16 托马斯·奎因·柯蒂斯

克劳斯·曼要回美国了，所以非常高兴，首先是因为要见到他的男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了。他俩已有半年没见面了，此时的他已经戒了毒，很想跟男友相拥在一起。可还在船上时，一封电报交到了他手里：柯蒂斯在去墨西哥的途中，迟些日子才能回到纽约。克劳斯·曼到了纽约以后，不清楚柯蒂斯究竟要“迟多少日子”，于是“彻底”崩溃：“泣不成声，号啕大哭，准备自杀。”^[123]后来得知，柯蒂斯没有路费，卡蒂娅·曼出面相救。克劳斯在纽约等候托姆斯基期间，跟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尤里·卡贝尔（Ury Cabell）开始了一段绯闻。柯蒂斯终于抵达纽约时，克劳斯·曼非常开心，但新朋友尤里·卡贝尔他也没放弃。

在德国，由国家组织的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规模：从歧视犹太人到系统地迫害他们。一位德国外交官在巴黎被一名犹太裔凶手杀死，纳粹分子借此机会实施早已计划好的暴行。11月9日那一夜，在全德国境内，犹太教堂在燃烧，犹太人商店遭到抢劫，墓地被捣毁，犹太人被逮捕并押往集中营。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心里清楚，她女儿会替他们担忧，所以“帝国水晶之夜”过后几天，局势开始平静下来时，她给女儿写信，说她和父亲“本人都还不错”，没有遭受损失。关于

总的形势，卡蒂娅大概从新闻媒体上已经了解到，所以她就不再“赘述”了。虽然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像往常一样争取把信写得轻松一些，从字里行间却能感觉到一种不安。那个暴行之夜过后三天，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来到家里，先是中午，然后是晚上11点以后。四个汉子“把我们所有现代技术带来的造化中解放出来”。^[124]在11月17日的信里，普林斯海姆又镇静了些。她写道，即便没有收音机，人也可以“生存得不错”。^[125]

不久，针对犹太人的恶毒“制裁措施”也降临到普林斯海姆一家人的头上，这些措施的一个主要动机是：用犹太人的财富来填满战争费用的大坑。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的大部分艺术藏品和银器被“没收”，也就是被当局抢走。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写往美国的信里说，他们“非常健康、镇定和勇敢”。几个朋友和熟人虽然还在“艰难旅行”，即在达豪集中营里，但她保证，他们个人“依旧安然无恙”。她尽可能用幽默的口吻掩饰其对艺术珍品遭受抢劫的愤怒：“他们友好地让我们减负：财产就是负担。”^[126]卡蒂娅·曼非常担心，再次催促他们流亡国外。虽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她父母还是不予考虑。

只有一个国家以坚定的态度回击德国由国家组织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行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柏林召回了美国大使。^[127]

曼氏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痛恨希特勒及其政权，这都是真实的情感。托马斯·曼后来写道，斗争的年代是“道德的好时代”，它使“情感简单化”；^[128]在政治的紧逼下，讽刺与怀疑，还有艺术创作都变成次要的了。1938年，托马斯·曼在这一领域来了个意外之举，让被憎恨的东西接近自己；人们会觉得太近了，近得耸人听闻。他在一篇文章里探究大众催眠师希特勒的艺术生涯和此人跟自己“许多令人难堪的相同之处”，以尖锐的笔触揭露希特勒的下作（“这家

伙就是一场灾难”，这个“胆小如鼠的虐待狂和不知羞耻的复仇疯子”），同时又称他为“兄弟”，虽然是“一个有点让人不舒服、令人难堪的兄弟”，一个自成一体但很“拙劣”的天才。托马斯·曼向自己、也向读者坦白，他和希特勒在艺术生涯上有共同点：自学成才，梦想伟大和受到崇拜；两人还有一个共同文化背景，即崇拜瓦格纳，反民主的怀旧感（构成《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的基础），渴望思维简单化。托马斯·曼写道：“我并没有跟时代的偏好、抱负以及那些追求完全脱节——二十年后，那些追求演变成为小巷里发出的怒吼。”

这是在玩魔术。《希特勒兄弟》（*Bruder Hitler*）这篇文章有一种魔力，托马斯·曼需要这种魔力，以便跟某一种东西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这种魔力在他就政治局势发表的即席讲话里往往是找不到的。

《希特勒兄弟》这篇文章只有唯一的一个句子涉及1938年的具体事件。托马斯·曼再一次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少有的希特勒形象，一个“伟大的胆小鬼兼和平敲诈者，到一场真正的战争爆发之日，他扮演的角色也就到头了”。^[129]不久即将证明，这是荒诞的误判——一个信息更加灵通的政治观察家在1938年秋肯定会看到希特勒在军事与内政上的优势，或者至少不会讲出与事实肯定相反的情况。另一点才是最根本的：托马斯·曼巧妙地接近希特勒这一现象，接近其少有的艺术生涯，以及他的伟大、天才与拙劣；最后还探讨希特勒这个人诱惑人的原因，而千里之外，在恨他的人眼里，希特勒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吆喝者，却能把大众拉入他的轨道。

这篇文章是政论集《小心，欧洲！》（*Achtung, Europa!*）的结束篇，该书将于秋季在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费舍尔出版社出版。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说服托马斯·曼抽走关于希特勒的文章，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也因为在德国发生打砸抢的暴行以后，他作为出版人担心，“个人攻击有可能招致更严重的迫害”。^[130]这篇文章最

终首次发表于1939年3月的美国男性杂志《先生》（*Esquire*）上，题目为《那个人是我兄弟》（*That Man is my Brother*），刊登在穿着暴露的“男性杂志女郎”的照片之间。

托马斯·曼拿的是一个教授的工资，暂时有一学年（到5月）的保障。他几乎不再寄希望于德国的读者与买主去读或者买他的书，所以只能依赖英语市场。托马斯·曼的下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其中有许多歌德的典故与传奇，他自认为在美国不大可能赢得很多读者。全家人一如既往，在流亡中的生活依然讲究奢华，但时局不稳，财务状况也早已大不如前。家里花费很大，那些定期指望母亲寄钱的人一个也没少。在家庭成员中，米夏埃尔·曼是最看不清时局的一个。他这一年写了那么多乞讨信，在圣诞节前几个星期又把节日要的礼物清单寄给母亲：皮手套、袖扣、衬衣、裤子、皮夹克、短上衣、拖鞋、精致的西装口袋方巾、围巾、一个琴谱包（“漂亮的”）、一个谱架、一台留声机、一个提琴盒、一个电动节拍器、一支新钢笔、一只手表、一个打火机、一瓶“巴黎之夜”（香水）、一块阿拉伯地毯、一个香烟盒……[\[131\]](#)。

圣诞节前，克劳斯·曼跟艾丽卡一起前往加利福尼亚州作几个报告，在那里的一次派对上见到了好莱坞大牌女明星葛丽泰·嘉宝，他们俩曾经一起欢度1927年的除夕夜。“再次被嘉宝所迷倒——跟电影里一样，跟十年前一样。她真是美极了。”她“对我很好”，克劳斯·曼写道，“几乎调情了”。这次会面让他神魂颠倒。他在想象，跟嘉宝一起，“唯一一次跟一个女人在一起”会怎样，这会是他生涯中的“奇特插曲”。后来他自己也发觉，这是“小孩子气”。[\[132\]](#)。

圣诞节之际，全家人在新家乡——普林斯顿的新家相聚：大家欢聚在高大的圣诞树下——只有莫妮卡不在，她跟耶律·兰易一起搬到伦敦去了。戈洛·曼强调说，他只是来玩玩，新一年里一定要回苏黎

世去。显然，大家都意识到，世界濒临一场灾难的边缘，刚刚才侥幸避免的一场战争还会到来，而且不会等太久。但谁都没有预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和平中共度圣诞，未来的日子将使曼氏家族陷入剧烈动荡之中。克劳斯·曼于新年之际在日记里写道：“1939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133\]](#)

戈洛·曼本不想来美国。他想去欧洲、在苏黎世生活，姐姐艾丽卡充满激情地动员他，必须放弃欧洲并彻底转向美国，他却不为所动。同样坚定不移的是，他不喜欢美国——这个肤浅、没有头脑的国家。他在给女朋友利瑟·鲍尔的信里写道，他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欧洲人的自负”是不是造成对美国这种看法的原因，“抑或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缺乏历史，缺乏竞争激烈的教育”。有一个巨大的愿望把他跟苏黎世紧密相连：戈洛·曼想接管他父亲出版的文化杂志《尺度与价值》的编辑工作。迄今为止的编辑费迪南德·列昂（Ferdinand Lion）是那个卢森堡女赞助者挑选的人，但她停止赞助了。艾格尼丝·迈耶和丈夫已经接手进行赞助。对戈洛·曼来说万事俱备，更何况父亲在有关杂志的所有问题上早就让他参与，而且托马斯·曼相信他能胜任这个任务。也许，等待和坚持这下子还是值了，虽说在前些年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挫折。戈洛·曼在给利瑟·鲍尔的信里说：“我算是那种后发者，那种慢性子，上帝若让我再活50年的话（？），我说不定还能成点气候呢。” [\[134\]](#)

1月，托马斯·曼在为一次新的演讲之旅作准备。他有时候很享受短时间离开写字桌登台演讲，这让他感受到他在美国的特殊地位；托马斯·曼喜欢听众和媒体的掌声，更何况收入很高。特别让他高兴的是，能跟女儿艾丽卡共度时光，女儿陪着她，给他做助手，效果极好。“她瘦得可怜，咳嗽，肯定太过疲劳了”，托马斯·曼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写道。艾丽卡写的关于“第三帝国”教育问题的书空前成功，她自己的各种演讲也很受欢迎，这都让她闲不下来。托马

斯·曼希望，对艾丽卡来说，跟他一起旅行可以是“一种度假和休息”；他还补充说，“我特别爱这孩子”。“有趣和突发的激情是她的天性，两者有时融为一体，有时同时、有时先后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特别能吸引并感动我的东西。”^[135]

从3月起，托马斯·曼跟妻子和女儿一起穿梭于北美大陆，从波士顿到洛杉矶，从南部的沃思堡（Fort Worth）到西北部的西雅图，作了很多次演讲。艾丽卡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说父亲克服了旅途的各种辛劳，程度之好令人吃惊：“若是我们到了魔术师这把年纪，遇到这类机会时还能这么顽强的话（等到了冰冷的坟墓里，我们哪来这种顽强！），我们可以用‘冯’来称呼自己了。”^[136]这次演讲谈的题目是《自由的问题》（*Problem der Freiheit*），算是上一年关于民主的演讲之续篇。他又一次赞扬罗斯福的“新政”，夸奖总统本人。对托马斯·曼来说，罗斯福就是现代民主执政者的偶像。在跟法西斯主义极权威胁进行的斗争中，托马斯·曼赞成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及其自由理念。他觉得，苏联是这场斗争中的自然盟友。他在日记里写道，其演讲也应当是一份隐秘的辩护词，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相互结盟而辩护。^[137]

4月，父亲的演讲之旅结束，艾丽卡离开父母，以便回归自己的演讲。她先得去俄亥俄州，然后去印第安纳州。艾丽卡写信告诉克劳斯，“我很无聊，很想再次从事艺术工作”。^[138]但这不过是一种心愿，一种宣泄而已，政治斗争才是她这段时间的生活中心。这一斗争一直浸透到私人生活里。除了跟马丁·贡佩尔特保持关系外，艾丽卡还跟莫里斯·韦特海姆再续情缘，就是那位替她为《胡椒磨》的冒险埋单的百万富翁。好多年以来，韦特海姆想跟她结婚，弟弟克劳斯也赞成，姐姐跟一位富翁的婚姻可能可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139]但艾丽卡·曼不愿意。托马斯·曼当年向百万富翁之女卡蒂娅·普林斯海姆求婚时，曾写信给哥哥海因里希说，“我不害怕财富”。^[140]艾丽

卡·曼不同，她害怕。花钱喝香槟，穿漂亮衣服，去派对，找乐，住豪华旅馆，这些她也很喜欢；她同样喜欢能用自己的钱或搞来的钱去帮助别人，比如那些流亡者，他们不像曼氏一家生活得那么富裕，而是生活在那种典型的捉襟见肘的窘境里。但是，一旦金钱限制她，剥夺她的自由，她就会反抗。两年前，她就觉得“有专车和男仆”的生活显得“玩世不恭，也不合时宜”。^[141]同时，艾丽卡也看到时局紧张，于1939年初告诉克劳斯，她为什么不当韦特海姆夫人：“他现在又写了一篇反对罗斯福的文章给《民族报》（*Nation*，他资助的重要的自由派报纸），作为他心爱的太太你能随他去吗？”^[142]艾丽卡·曼在爱情上当然注重实际的好处，但从来不会走到危害她独立的那一步。她想知道“禁酒”（就是说，这时靠吃药）的克劳斯吸食毒品的情况。她自己现在没有“图恩”（*Thun*，她对毒品的代称）了，但她“下定决心今天就离开老码头（贡佩尔特），要是他拒绝弄一些来的话”。



图17 马丁·贡佩尔特

3月6日，米夏埃尔·曼在纽约跟她的瑞士未婚妻格蕾特·莫泽尔结婚。在教堂举行婚礼时，20岁不到、长相年轻的米夏埃尔不得不说服教堂司事相信他是新郎官。^[143]没有举行盛大的婚礼，托马斯·曼不知什么原因连教堂的仪式都不出席。格蕾特原来是伊丽莎白的同学，在曼家颇受尊重，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希望她能对“劳神的比比”施加些好影响。^[144]婚礼当晚，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欢迎年轻的新婚夫妇，喝了香槟酒。莫妮卡·曼几天前跟耶律·兰易结了婚，家里人事后才知道。

克劳斯·曼在对长篇小说《火山》（*Der Vulkan*）进行最后修改时有个想法，这一想法将为他占领美国市场助一臂之力：克劳斯明显很兴奋地写信给艾丽卡，说要写一部长篇，内容是“关于一个富有、上进的女孩”；写成一部纽约社会的讽刺小说，一切的一切都不那么体面，带点施特恩海姆的味儿，主要人物“更多类似芭芭拉·韦特海姆（Barbara Wertheim）而不是佛罗伦斯·迈耶（Florence Meyer），两个人的影子各有一些，但愿这样到处都能闹出些丑闻来”。这里牵涉到艾丽卡的富翁男友、银行家莫里斯·韦特海姆的女儿，还牵涉到艾格尼丝·迈耶的女儿，写这女孩时，克劳斯·曼想写点“短小、时尚的东西”，“让这里的人开开心”。^[145]这是要写成一部暴露小说，让曼氏家族两个重要的支持者出丑：克劳斯·曼会严重偏离其一往无前的生活轨道。他后来放弃了这项计划，至于说是他自己的察觉还是姐姐的反对，这一点无从知晓。

1939年3月，希特勒向“捷克的剩余部分”发动进攻。他支持斯洛伐克独立的要求，下令德国国防军进军捷克，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k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这不仅违反了上一年签署的《慕尼黑协定》，而且德国外交政策首次可以不再以民族自决权为依据，而仅仅是想让所有的德国人团结在一个国家内。占领捷克主要出于经济利益，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用民族利益作为幌子来

加以掩饰了。西方大国没有直接干预。但对英国和法国来说，1939年3月16日是个历史转折点：其绥靖政策宣告失败。两国现在开始认真地准备跟德国发生冲突，如有必要就准备打仗。^[146]

在评价政治形势方面，托马斯·曼坚定地仇恨希特勒，拒绝民族社会主义，希望西方大国最终能够放弃面对德国的让步态度。在判断德国所发生的事情及其根源时，他的态度左右摇摆。托马斯·曼时而觉得希特勒是典型的德国现象，从路德（Luther）开始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147]时而又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非德意志的和陌生的，“纳粹布尔什维克主义”跟德意志民族文化特性没有任何相通之处，他曾经这样写道，^[148]而且他看到在德国政府跟人民之间有一道“鸿沟”，德国民众甚至“仇恨”其政府。^[149]他对德国内部局势的判断为何如此有把握，没人知道，估计是诗人的直觉，抑或是一厢情愿吧。海因里希·曼也持类似的想法，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德国人民随时随地可能起来造当权者的反，迎来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转折。^[150]此时既没有任何这样的征兆，希特勒也比之前任何一个德国执政者都要受欢迎，^[151]对此，曼氏兄弟中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到。

伦敦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艾丽卡·曼的《野蛮人的学校》一书。文章的作者是英国作家和政治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他本人认识托马斯·曼及全家。书评的题目叫《这个传奇之家》（*This amazing family*）。这一说法立刻成为曼氏家人的家用口头禅。

“这个传奇之家”赢得了许多掌声，也没忘记自己为自己鼓掌。3月，艾丽卡在美国的《时尚》（*Vogu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家庭的文章。在文章里，人们读到她是如何给好奇的父母展示美国的，面对欧洲黑暗现实是如何决定留在美国的；文章讲述自己家是怎样在普林斯顿找到一幢新房子，从而找到了一个新家园的，书桌很快便

放好，父亲又开始工作了；文章还描写家人如何客气地对待两位黑人仆人露西和约翰，跟他们学到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情；家里人都很有天分，有天资聪颖的音乐家、作家和学者，他们怎样相互朗读作品，演奏音乐，相互支持，一句话，大家都和谐相处；家里保留了一些老习惯（比如吃巴伐利亚土豆团，听舒伯特，读歌德），还把一些新事物融合到家庭生活里来（喝威士忌，听爵士乐，看美国电影）；文章还讲述父亲在观看普林斯顿跟耶鲁比赛足球时是如何跟着欢呼雀跃的。艾丽卡·曼在结尾处写道，他们又到家了，托马斯·曼的写字台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她用父亲的口吻说：“当局会允许我们留在美国的。这里的民主既强大，又真诚。”^[152]真是一部令人动容的家庭童话。

3月27日，戈洛·曼过30岁生日。他还在等待回欧洲的可能性。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已没有多大价值，他的第二故乡已不复存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坐在政府机构的走廊里，却拿不到签证。他利用等待的时间撰写一部关于拿破仑的对手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的书。这是一部历史传记，资料来源是书信和当时的文章，不进行文学加工，虽然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该书又是一部影射当代现实的书，戈洛·曼在书里视主人公根茨为自己的影子：根茨反对拿破仑，相比于他本人反对希特勒。这个月初，他在家人的范围内朗读了该书的一个段落。现在，他也成为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即朗读正在创作的文学作品，接受家人的批评。“很吸引人”，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大哥克劳斯也挺受感动：“非常有趣，水平很高，文笔也很好。”克劳斯·曼还看到“类比当代现状的危险”，戈洛的《弗里德里希·冯·根茨——一位欧洲政治家的故事》（*Friedrich von Gentz.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en Staatsmannes*）让人看到这种危险。“（你）以忧伤、浪漫的形式处理似是而非的事情，勾画出区别，写得引人入胜，内涵丰富，但并非没有危险。”^[153]

弟弟戈洛过生日那天，正处于戒毒阶段的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我不会、也不想活得太久。不知道哪一天，我又会通过毒品这一美妙又恐怖的间接方式去寻找死亡……这不是‘软弱’”（父亲这样指责他）。“我一定要这样做。”^[154]

《逃避生活》于4月出版：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凝视着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合写的书的封面，该书通过趣闻逸事和人物特写介绍德语流亡人士，从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和斯蒂芬·茨威格到布鲁诺·瓦尔特。书的重点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但两位作者把西班牙内战以及不少艺术家的生活都穿插进去，比如为“第三帝国”效力的格伦特根斯。爱因斯坦是父亲在普林斯顿的教授同事，父亲跟他刚刚开始交上朋友，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在写书时有机会采访他本人。能采访本人的还有一些被描写的人物，他们俩在写这些人物时故意写得好像跟这些人有私交，这样做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

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也对父亲进行了特写，甚至给了他一章的篇幅，即艾丽卡写的“父亲的肖像（Bildnis des Vaters）”：独特、亲切，往日的争议一概不提。“当然，我们经历过贫苦的日子”，这样描写曼家的流亡生活肯定让一些流亡者感到愤愤不平，他们的日子那才叫苦日子。父亲写的一段前言引导读者进入介绍他的章节，前言的形式为“一封致亲爱的孩子们的信”：“我的大女儿、大儿子，你们俩按照我的意思写了一本书，因为你们懂我；你们知道，我拒绝把我跟德国流亡者分开的企图，拒绝让我在他们中间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我特别强调我是属于他们的——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我当时这么做，是因为不想看到德国的当权者对剥夺我国籍一事继续犹豫不决。”^[155]长期以来，克劳斯和艾丽卡一直在公开制造关于自家的传奇（这本书也同样如此：在引言中可以读到艾丽卡从慕尼黑家中抢救出《约瑟》手稿的虚构故事），现在，这一风气也传到了托马斯·曼

这里。至于说，恰恰是“可爱的孩子们”不得不对父亲施加影响，让他真正加入流亡的行列，他又是怎样在流亡者中间力求获得“特殊地位”，而他本来并不想跟他们发生什么关系，还有他多年摇摆不定、踌躇不前的情形：这一切都只字不提。这是公开的版本。所有其他事情都秘而不宣。

《逃避生活》是一本题材广泛、“比较肤浅的”书，克劳斯·曼自己也承认。[\[156\]](#)但这本书很成功，不久便发行了第二版。对艾丽卡·曼来说，在美国获得成功并非什么新鲜事。现在，克劳斯·曼也首次在新世界取得了一点成就。两人立刻计划再次合作写一本书。

5月，克劳斯·曼来普林斯顿父母家玩。父母亲、戈洛——他还在等待返回欧洲的签证——克劳斯和伊丽莎白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围绕着文学和几位作家，《逃避生活》一书对他们都进行了善意的描写。父亲把家庭谈话的内容记到日记里。“[我们]谈论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谈到他们中谁的自卑感最强。”[\[157\]](#)

求救信雪花般地飞向托马斯·曼，大多数来自欧洲的流亡者，他们想逃往美国。托马斯·曼竭尽全力实施帮助。[\[158\]](#)具体说，就是由卡蒂娅·曼来负责。普林斯顿一位物理教授的夫人叫莫莉·申思通（Molly Shenstone），她帮忙处理信件并组织救援措施，由此而产生了一段亲密的友谊。在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奔走忙碌中，卡蒂娅·曼一直都比较孤独，没什么朋友。就连在慕尼黑时代，那些定期来访的人不是家庭成员或家人的朋友就是托马斯·曼的朋友。现在，卡蒂娅·曼这辈子或许第一次有了一个最好的女友。[\[159\]](#)

托马斯·曼在流亡岁月里虽然压力重重，但文学创作却硕果累累。非常自律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安静的工作环境，这

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而保证这样的环境仍然是家里最重要的规则之一，由卡蒂娅·曼严格看守。总统本人的电话、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只有这一级别的事情才够得上让托马斯·曼中止其上午的写作，这种习惯由来已久，轻易不变。他知道的其他事情无不是妻子同意后才让他知道的。托马斯·曼跟外部世界之间的那堵围墙很高。

最近一段时间，他钟爱的女儿伊丽莎白对法西斯意大利及其领袖墨索里尼的政权感兴趣，总是义愤填膺，这一点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伊丽莎白·曼如何看待自己的前途，别人不清楚，她本人也不知道。4月，伊丽莎白度过了21岁生日，文理中学毕业后至今没有争取去上大学，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到钢琴演奏上，虽然她上台演出时紧张不已，艺术天分也不能令人叫绝。伊丽莎白拿到可以担任钢琴老师的师范文凭后，没有再去考表演证书。在普林斯顿，偶尔能听到“上数学专业”的说法。^[160]但好像也就是说说而已。伊丽莎白是母亲的一个支柱，一个实干、聪颖的年轻女子，更多是通过实干和激情而非外表的美貌来引人瞩目。当然，她不会长期屈就于家庭第二主妇的身份。托马斯·曼于2月终于获悉，几个月以来，伊丽莎白跟一个男人——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Giuseppe Antonio Borgese）交往，这件事家里人早已知道，艾丽卡和克劳斯甚至参与了牵线搭桥。弗里茨·兰茨霍夫的那次可怕造访——带着女友来到父亲家里——后不久，伊丽莎白认识了这位意大利文学教授，一名流亡者，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她后来说，“我当时想摆脱兰茨霍夫的影子”。^[161]博尔吉斯时年57岁。

6月初，博尔吉斯的一封信交到了托马斯·曼的手里，他在信里向曼的女儿求婚。博尔吉斯写道，他爱伊丽莎白，尤其是她“那颗忠诚的心”，“令人耳目一新的坚强意志”，还有“其言行举止散发着的真实与自然魅力”。博尔吉斯也没有忘记指出托马斯·曼跟他——两

位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联合在一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博尔吉斯提出具体建议，来个考验期之类的，跟伊丽莎白一起去墨西哥待一段时间，好让她考验自己和对他的感情。[\[162\]](#)

托马斯·曼当即回信给“亲爱的朋友博尔吉斯”。信中说，他跟妻子共同阅读了博尔吉斯的信，心生“感动与好感”。“所有事情都按照您说的办，我们充满信任地把伊丽莎白留给您，相信你们的美好天使——或是人们常说的指导我们的生活本能，会引领她去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只想说，我们衷心欢迎这样一种结合，这种结合让我们觉得，从个人层面来看是幸福临门，从超个人层面来看既美满又有意义。”博尔吉斯应当明白，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有其感伤的一面，而且，如果这一天来临的话——现在好像确实要来临，我们将十分寂寞，但这是时代与生活的规律”。[\[163\]](#)写信给博尔吉斯后没几天，托马斯·曼在“法兰西岛号”轮船上——他跟妻子乘该船去欧洲过夏天——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精神严重沮丧，泪水与痛苦。”[\[164\]](#)

伊丽莎白正在学英语，而博尔吉斯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出于个人原因不愿意说）。在此期间，她写信给这位比她大36岁的男人，说奇怪得很，“这些年我觉得老了很多，在苦痛中挣扎。是你把我从泥潭中解救出来。我现在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非常年轻，非常强壮，充满着活力”。[\[165\]](#)

艾丽卡·曼于6月前往欧洲，乘坐的是父母也坐过的轮船，同行的是弗里茨·兰茨霍夫，两人甚至同住一个房间。这不是爱情共同体，更多是苦难共同体：艾丽卡在看他。前不久，兰茨霍夫的一位密友、作家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也称Münchener Räterepublik）的革命家恩斯特·陶乐（Ernst Toller）在纽约自己的洗澡间里上吊身亡。人们担心，情绪不稳的兰茨霍夫也同样会糟践自己。开船前，伊丽莎白也去探望了她少年时代的这位情人

并写信告诉了博尔吉斯。后者醋意大发。伊丽莎白向他发誓，根本没必要这样。是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想见兰茨霍夫，担心会“旧情复发”，她不想对博尔吉斯遮遮掩掩。但她对兰茨霍夫的爱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她只爱他，博尔吉斯。[\[166\]](#)

早在5月中，米夏埃尔·曼就跟妻子格蕾特一起前往欧洲旅行。她想看望在瑞士的家人，他则想在卡尔·弗莱什（Carl Flesch）那里上几节课，弗莱什是世界上最有名、也是价格最高的提琴老师之一。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打算在秋天返回纽约，这是跟卡蒂娅·曼说好的。米夏埃尔·曼从伦敦给母亲写了封备受鼓舞的信，特别推崇弗莱什及其提琴课，称其教学法无与伦比。“他说，我的情况很棘手，但棘手的情况恰恰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米夏埃尔写道，那些学生天赋都极高，大部分是波兰和苏联犹太人，部分人“刚从隔离区”来这里，跟他们比，米夏埃尔有一个优势，即能给大师带来每小时15美元的收入。[\[167\]](#)

两个月前，父母还在演讲旅途中时，米夏埃尔在普林斯顿动用了母亲留下的钱。他用说好买一件高档冬季大衣的钱买了其他东西，说好了用30美元，却花了45美元，然后在一封通常那种“我怎么会这样的信”里向母亲坦白。[\[168\]](#)这段插曲也顺便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换算公式：弗莱什的两节音乐课等于一件高档冬季大衣。

米夏埃尔继续从伦敦写信，汇报上课的情况。他说弗莱什还没能说出他这位新学生天赋究竟有多高。弗莱什说过，技术难度并非特别困难，“更重要的是‘心什么学’，我这种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当然听不懂这个词：他在讲课时一再提示我受过的教育和我出身的环境，还说我毕竟是文理中学毕业的，天哪，但愿他别知道！”[\[169\]](#)

对艾丽卡·曼来说，兰茨霍夫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他吸毒上瘾，心理脆弱，朋友恩斯特·陶乐的自杀使他感到震惊，连爱情也出了问

题。伊丽莎白为了摆脱兰茨霍夫的阴影找了另一个男人，而兰茨霍夫跟里尼·奥特的关系似乎也是为了摆脱艾丽卡·曼的阴影。现在他又旧情复发。其状况“令人沮丧，让人流泪”，艾丽卡·曼跨洋渡海后不久，从巴黎写信告诉克劳斯。在这种困境下，艾丽卡·曼甚至向兰茨霍夫提出跟他结婚（“这一建议可能让我们再也不能从贡佩尔特那里得到好处了”）。兰茨霍夫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这让她轻松下来。他说，只有她爱他，他才想要她。她想让他活下去，爱他却做不到。[\[170\]](#)

死神的召唤和陶乐自尽的诱惑让艾丽卡不仅替兰茨霍夫担忧，而且也为弟弟发愁。面对身边的突发事件，克劳斯·曼挺过来了，情况比兰茨霍夫要好，但他还是震惊不已。后来，约瑟夫·罗特也死了，死于酗酒后遗症。克劳斯·曼认为，“这事肯定要发生”，“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这一下也太多了……”在艾丽卡·曼和兰茨霍夫离开之前，家人和朋友在一天晚上举行了一次较大的聚会。聚会时，就流亡的意义和流亡者在未来德国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争论。克劳斯认为，作用很大；戈洛和马丁·贡佩尔特据理力争，说作用不大。再加上他的男朋友柯蒂斯那天晚上不愿意跟他性交，克劳斯·曼崩溃了，号啕大哭了一场。[\[171\]](#)6月，艾丽卡·曼在巴黎写了一首诗寄给克劳斯，用意是挽留他。诗的第一段如下：

再死几个，世界就空无一人，
那儿居住的不是敌人，那是陌生人。
敌人，一伙龌龊的敌人，
那么阴暗，那样无聊，一伙蒙昧人，
连空间也填不满的敌人，
空间依然黑暗，尽管他们放火、砸人。

再死几个，世界就空无一人。[\[172\]](#)

即使1938年11月发生了迫害德国犹太人的打砸抢事件，卡蒂娅·曼的父母仍然一直拒绝流亡异乡。到了这时，他们改变主意了。他们想离开德国。这时想流亡不仅日益困难，而且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也跟当局再次实施抢劫有关。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历经数十年，收集了非常珍贵、遐迩闻名的陶瓷画，即以高超的艺术手段制作的陶瓷艺术品。这些藏品先要拍卖，大头交给国家，然后才允许普林斯海姆老夫妻离开德国。这事拖了很久。卡蒂娅·曼7月就56岁了。她非常希望能跟父母亲一起在瑞士庆贺生日。最后她不得不以母亲写来的一封信聊以自慰。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写信给女儿：“我最心爱的双胞胎，又要过生日了，该说些什么呢？55年前，你是那么一点大，那么一点点大；生活伴随着你，你经历了多少可爱、有趣和美好的事情，现在，时代也有点跟你过不去了，但相比较而言，对你还算是过得去的。可到了最后，你也会像我可怜又可爱的‘妈妈’（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母亲）88岁时最后躺在病床上，摇着头惊奇地感叹：‘这辈子就完了？！’好在距离那个时候，你还有很长时间，我祝愿你度过更加美好、充满更多欢乐的时光，到那时，我将从安静的骨灰盒里送上一份来自母亲的祝福。”[\[173\]](#)

莫妮卡·曼，新婚的兰易太太，跟丈夫耶律在伦敦找到了一处新居，诺丁山区（Notting Hill）的斯坦利花园21号，离肯辛顿花园只需步行几分钟。莫妮卡可惜忘了，她想当钢琴演奏家，家里有一架音乐会用的三角钢琴。反正到她搬新居时才发现，三角钢琴进不去。家里人捧腹大笑，笑话莫妮卡的“笨蛋行为”。米夏埃尔写信给母亲说：“就我这样平时在许多方面糊里糊涂的人，大概也不会出这样的事吧。”[\[174\]](#)

克劳斯·曼的流亡小说《火山》出版了。他花了近两年时间，比之前任何一部作品花的时间都要多。这是一部流亡小说，描写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人物众多，故事各异，发生的地点从巴黎、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布拉格直到美国，时间跨度从1933年到1939年。小说让很多流亡的同命人深受感动，因为它描写了他们的命运。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对一部关于流亡人士的小说来讲，再“多一点贫困，多一点无钱的绝望，多一点不幸、肮脏和悲伤”会更加贴切些。[\[175\]](#)克劳斯没有经历过这些，所以没有写。

卡蒂娅·曼是1939年夏在欧洲读到这部小说的。她写信给儿子：“我真的认为，你写了一部成功的作品，一部比较美好、重要和有意义的作品，这是现存价值的时代记录。”她甚至“流泪了”。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马丁——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因吸毒而那般穷困潦倒，这跟小说作者克劳斯·曼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有关，这一事实让“母亲的心”感到有些“压抑”。[\[176\]](#)

不久，托马斯·曼也发表了看法。他写信给儿子，说本来私底下有个“见不得人的想法”，想跟这本书来个匆匆的“接触”。“可没做到。这本书让我欲罢不能，让我开心，让我感动，我用了几天时间，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有时候读到你母亲的小灯熄灭了以后很久。”父亲接下来所写的话，克劳斯期盼了很多年：“他们一直没有太把你当回事，拿你当小孩子，觉得你会吹牛。我没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大概不可否认的是，你比大多数人都能干。”这部流亡小说“整个没有竞争对手”，它描写了德国人失去根基和漂泊他乡的图景。或许有些人“觉得这幅图景让人差不多失去希望”，那么多依赖毒品者、同性恋（“鸡奸者”）和“天使的信徒”（克劳斯·曼真的在小说里让天使从头飞到尾，他笔下没点俗气和神秘感不行）。托马斯·曼说，有一个人物把整部小说串联成篇，这个人物“非常可爱、可敬、严肃、强大而富有战斗精神，她是小说的脊梁和中心，一群软

弱的崇拜者争先恐后地向她涌去，以寻求帮助”——这个人物就是第二主人公玛丽昂（Marion），在克劳斯·曼的诸多作品中，这是对姐姐艾丽卡最完美的艺术写照。父亲写道，《火山》在后半部分“越来越严谨、紧凑和健康”，“这将成为一本让德国流亡人士在许多方面毫无自卑感的书——不管是在尊严、力量还是斗争方面，如果他们不嫉妒，就会高兴地、感激地表示认同”。托马斯·曼继续写道，克劳斯“更坚强的姐姐”帮助他取得了成功，他本来更喜欢“堕落、情色与‘恐怖’”，而不是“道德、政治和斗争”。但“你若没有巨大而灵活的天赋，艾丽卡也帮不了你，你的天赋在于举重若轻的能力，既能非常滑稽，也可以悲伤至极，在文学创作上用对话和直接分析的方式充分发挥了才干，令人惊喜”。[\[177\]](#)

克劳斯·曼一般听不进批评意见，这一次就无须担心了，这一次听到的，是父亲美好、褒奖的话语。托马斯·曼在信里的批评轻描淡写，比如指出儿子在风格上“几乎以儿童般的幼稚”重复海因里希·曼、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及他本人的套路，没有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克劳斯·曼特别开心，有点忘乎所以，在回信时公开提起一件过去的伤心事，他至今仍旧耿耿于怀。克劳斯·曼写道，对父亲来讲，儿子要在世界上经受考验是件大事，而对儿子来说，要经受父亲眼光的考验也是件大事。“那个杂乱无章的年轻贝尔特受尽了嘲讽，他原本不可能收到这样一封信的，对不？那个轻率的少年想在开罗当跑堂，还希望跑堂时尽可能走得像演员费舍尔（Fischel）的模样，这个少年的形象也许深深地刺痛了我——恰恰在贝尔特的形象问世时，我其实要求特别高，特别激动，我自认为特别风趣。倘若这一小小的创伤，或者类似的情况不是‘早已差不多完全’愈合的话，那么……”信的草稿就此打住。[\[178\]](#)在最终寄出的信里，克劳斯·曼只字未提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里贝尔特这一形象造成的伤害。在这个难得的大家庭里，家庭成员一天到晚都在写着或谈论着任何可能的事情，但恰恰对关键的事情缄口不言。

7月，戈洛·曼可以从纽约返回瑞士了。他通过“较高级别的贿赂”——父亲在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况下这样写道^[179]——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当月22日，他抵达巴黎。现在，他得跟有关当局周旋，以获许进入瑞士。这事拖了很久。到了战争的前夜，欧洲的神经绷得很紧。戈洛·曼终于在8月到达苏黎世，立刻投入到《尺度与价值》杂志的工作中去。

米夏埃尔·曼这时跟着卡尔·弗莱什去比利时旅行。这位提琴老师跟他的几个学生一起在杜因贝根（Duinbergen）的小屋旅馆过夏天。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除了骑自行车、游泳、骑马外，他还刻苦练琴，在弗莱什的指导下，正在向“一名很不错的小提琴家”一步步地迈进。弗莱什“好像还不特别了解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过他现在要钱，说好的每月300瑞士法郎太少，不够在比利时北海海边旅馆里的生活开销。必须有400瑞士法郎才行。^[180]

瑞士和瑞典是托马斯和卡蒂娅·曼想去的两个欧洲国家。可卡蒂娅·曼父母发来的一份电报拖延了他们去瑞士的旅行。电报说，要是托马斯·曼现在去瑞士，他们的流亡计划就会泡汤。托马斯和卡蒂娅·曼俩在荷兰北海边的诺德韦克（Noordwijk）住了几个星期，直到最后确认，普林斯海姆两位老人无论如何一时不能离开德国。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前往瑞士，小住了几天，十分悲伤地去居斯纳赫看了看老宅，随后继续前往瑞典。这里将举行作家协会“国际笔会

（P. E. N.）”的一次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在瑞典伯尼尔出版社（Verlagshaus Bonnier）的帮助下又成立了一家新的流亡出版机构，可以继续其出版事业，却不用自己马上出钱。在没有德国读者市场的情况下想出钱也几乎做不到。尽管财务状况不佳，该出版社依旧秉承费舍尔的传统，出版了一套新的托马斯·曼作品全集——斯德哥尔摩版全集。托马斯·曼没有放弃他的老东家，也没有投奔库埃利多或其他流亡出版社，这一次又有了回报。

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去瑞典前在英国停留，这让米夏埃尔深感疑惑，立刻就从比利时写信给他们：“你们究竟为啥去伦敦？我可不会相信仅仅是为了看看莫妮。”^[181]他们的确想问问莫妮卡和她丈夫的情况。在飞往伦敦前，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说她不得不承认，莫妮卡最近写的信，尤其是祝贺母亲生日的信，“真好，可以说让人心里暖融融的，我决定，从此刻起，走到哪里就把对她的赞歌唱到哪里”。^[182]这一决心可惜没能维持多久。卡蒂娅从伦敦发出的第二封信里就已经抱怨莫妮卡“少见的能力缺陷”，即无能。^[183]

艾丽卡·曼在欧洲不是度假。这年夏天她得写两本书：第一本跟弟弟克劳斯合作，书名应该叫《另一种德国》（*The Other Germany*），描写德国人的民族特征，介绍“另一种德国”：一个非法西斯的德国，一个诗人、思想家、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者的德国。书的主题是，为纳粹覆灭以后将要到来的一切所作的各种准备。克劳斯承担历史部分，艾丽卡准备当代部分。不管是克劳斯还是她，都对德国历史没有研究，他们对第三帝国内的另一种德国既不能、也不想了解，这些情况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在美国，若要成功，就需要幽默、勇气和狂妄，这是艾丽卡这些年在美国得出的众多教训中的一个。她于1939年夏天写的另一本书叫《灯光熄灭了》（*The Lights Go Down*），该书按照老套路，讲述纳粹德国内部发生的事情，描绘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一个小城市里个人的不同命运。又是一部设计巧妙的反宣传作品，为了正义的事业。

艾丽卡开足马力工作，把写好的篇章寄给弟弟，催促他干活，修改他写的部分，她常常觉得克劳斯写的理论性太强，不够活泼，缺少趣闻逸事。艾丽卡写信给在美国的克劳斯：“在写我们的书时你别忘了，尽量用个人和虚拟的笑话来点缀准确的新材料！不要添加太多的个人看法！”^[184]艾丽卡知道美国市场是怎样运作的，人们想听或不想听什么，想读或不想读什么。她不可能为自己的书下功夫去调查研

究，也没有时间。所以，这里也都是些“虚拟的笑话”，被写成在民族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真实命运。至于说这两本书是如何在短短几周内写成的，反正是个奇迹。

在姐弟关系中，现在甚至在文学创作上，艾丽卡都一步步地扮演着主导的角色。对此，克劳斯·曼并非没有感觉。年底，他在日记里回忆当年的情况：他写什么，姐姐就在打字机上打出来，那是什么光景呀。[\[185\]](#)都过去了。

7月和8月，克劳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度过的，他跟第二个男友尤里·卡贝尔一起在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租了一幢房子。最近一段时期，他跟另外那个真正的男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一直发生争吵，他一点也不喜欢柯蒂斯的独立与批判态度，也不喜欢柯蒂斯对他所说的、所计划的和所写的东西所持的态度。这种危险不可能发生在这位新朋友身上。尽管如此，克劳斯跟尤里在一起也不幸福。他在日记里写道：“尤里在本质上是少有的蠢货，他的愚笨经常折磨着我。”“他很迟钝，糊里糊涂地倔强。这个蠢货还自鸣得意……”[\[186\]](#)钱又不够花了，克劳斯跟母亲要200美元。他又给母亲写了一封富有其独特魅力的乞讨信，说这么多钱“让一个孩子过一个夏天实在太多太多了！！！”他恳请母亲“看在他过去几年表现良好的份上”，以后也不会再要了。“你日后若偶尔陷入困境，我却在朝中做官，我会偿还、报答这一切的”，这段话简洁如电报，决心可见一斑。“希特勒一垮台，收入大大的。”[\[187\]](#)这句玩笑话里隐藏着巨大的希望，它同时也是一种期待：跟希特勒进行的勇敢斗争以及这些流亡岁月有朝一日会有回报的。

继捷克之后，希特勒于1939年年初和夏季开始向波兰挑起领土争端。这次争端涉及但泽（Danzig）——该市自《凡尔赛条约》签署后处于国际联盟的控制之下，还有那条“走廊”，即那块自1919年起将

东普鲁士跟德意志国分割开来的波兰领土。希特勒在内部公开承认，跟波兰的冲突不过是达到更大目的的幌子而已，向波兰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也是故意为之，以便挑起他蓄谋已久的战争。西方大国远不像德国那样武装到牙齿，美利坚合众国目前笼罩在闭关自守——不加干涉——的气氛之中，对此，就是罗斯福总统也无能为力。希特勒认为，发动战争的时机非常有利。[\[188\]](#)

艾丽卡·曼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兰茨霍夫的问题，写那两本书面临的时间压力，再加上欧洲面临战争的大背景，这还不够，又发生了一桩可怕至极的事情。慕尼黑的女友格蕾特·瓦尔特是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的女儿，参加过曼家孩子少年时代的许多冒险行为，她从1933年起跟电影制作人罗伯特·奈帕赫（Robert Neppach）结婚。这是一段不幸的婚姻，她也早已离开了他，重又回到自己父母家中。她又有了一段新的恋情，对象是意大利歌剧演唱家艾奇奥·品察（Ezio Pinza）。1939年8月，格蕾特·瓦尔特应丈夫之邀前往苏黎世，再次跟丈夫商谈事宜，艾丽卡·曼曾劝她不要去。这次会面时，奈帕赫开枪打死了格蕾特·瓦尔特，随后饮弹自尽。艾丽卡·曼悲痛万分。她跟弟弟戈洛一起去参加追悼会，给格蕾特父母讲了不少童年的记忆，尽量给他们一点安慰。

不久，她得知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即把它称作“下流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取得了一致，这无疑使欧洲和所有德国流亡者感到震惊。在跟希特勒的斗争中，许多流亡者都曾把希望押在苏联身上。在从瑞士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路上，艾丽卡·曼的箱子又不见了踪影，估计被偷了，连同那两本书的手稿和演讲稿，还有晚礼服、首饰、钱和其他许多东西。艾丽卡·曼崩溃了。着急的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可怜的艾丽卡惊慌失措地从阿姆斯特丹打来电话。她遭遇了如此的不幸，哭成了泪人，我们俩尽力安慰她。”[\[189\]](#)就在当天，艾丽卡又振作起来。几粒药片起了作用，她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作解释，

谈她为什么在短时间内“暂时”失去了自制力。[\[190\]](#)字里行阅读起来像是在请求原谅，她，一个强者和更勇敢的人，一个为帮助别人东奔西跑的人，一时间自己成了弱者，需要别人的帮助。后来，她的部分行李又找到了，手稿都在。

米夏埃尔·曼在比利时北海边过夏天，8月，度假就要结束。他很想跟弗莱什回英国，想在弗莱什那里待更长时间，这些他都在从杜因贝根发出的信里说过了。他明确谈到钱，说他缺钱。每月400瑞士法郎不够用，现在又要旅行，先去瑞士的岳父母家，然后前往英国，他还欠了几处债，“真可怕，真可怕”。母亲必须立刻汇钱。还要母亲给弗莱什写封信，说明每节课15美元太贵，10美元肯定够了。他自己不能跟弗莱什说。“好了，这封信估计是我给你写的那么多信中最不要脸的信了，可惜了，从现在起，你再也不会喜欢我了。”[\[191\]](#)

在此期间，希特勒竭尽全力要对跟波兰的冲突作出了断。1939年8月底，为保障和平作出的各种急切的努力都没有结果。跟纳粹决策层的另一些人——比如戈林——不同，希特勒要打仗，哪怕英国和法国保证支持波兰而反对德国也在所不惜。[\[192\]](#)

米夏埃尔·曼和妻子格蕾特从苏黎世前往英国。他给母亲寄去一封信，报告他在瑞士时的情况。他说进入英国非常之难，还描述了他在英国驻布鲁塞尔领事馆经历的歇斯底里的气氛和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有许多德国犹太人在那里乞求得到一份签证，然后残忍地遭到拒绝，“那些可怜的可怜人”。他写道，打从上封要钱的信寄出后，母亲没有多给他一文钱，所以他从家人的一位瑞士熟人那里借了些钱（比他跟母亲要的多一倍）。但他现在急需钱！而且要“很多很多钱”，以防万一，比如短期内必须要买去美国的船票等。他本想留在英国，留在弗莱什身边，哪怕战争爆发，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在手头上留有余地。[\[193\]](#)卡蒂娅·曼把钱寄了。

8月31日，托马斯·曼在斯德哥尔摩会见记者。第二天的《今日新闻》这样写道：“‘在当今的德国土地上，文化不可能繁荣。但我足够乐观地相信，这一政权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已’，托马斯·曼如是说，他在讲话时下嘴唇前撅，非常严肃，身穿普鲁士蓝色斜纹花呢西服，就像一位他那种类型的英国绅士一样。曼夫人的样子与众不同，忧心忡忡，看上去显得不那么有信心。”^[194]



图18 格蕾特·曼探望丈夫，1939年夏天于杜因贝根

就在那份瑞典报纸报道托马斯·曼的大无畏乐观精神和卡蒂娅·曼的怀疑神情的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下令进攻波兰。接下来几天，英国和法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南非和加拿大向德国宣战，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拉开序幕。^[195]这场战争曼氏一家人等待了六年之久，他们时而担心、时而又在暗地里盼望其到来，以便尽快清除希特勒及其政权。现在，战争已来临，大家却深感意外。正当8月危机处于最高潮之际，艾丽卡匆匆赶往瑞典父母那里。她不想把他们俩单独留在这“混沌”之中，就像她给克劳斯的信里所写的那样。^[196]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居住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波罗

的海的萨尔特舍巴登（Saltsjöbaden），他们俩替孩子们担心，替欧洲大陆担心，也担心自己如何能够安全回到美国。战争爆发那天，托马斯·曼见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并共同进餐。这两人本来相互讨厌，可现在，在这历史的时刻，已冰释前嫌：“祝酒时说了许多知己话，希冀能够峰回路转。”^[197]两人都祝愿有个好结局，甚至不久可以回家。

艾丽卡写信给老弟克劳斯，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绝对要留在美国等她。“现在就飞速赶往伦敦或巴黎”没有任何意义。关于战争中如何才能施救的问题，应当由他们俩共同商定。她警告说，绝对不要“执意赴死”。“我从早上八点起听广播，一直听到凌晨三点，听着‘张伯传真机’〔即英国首相张伯伦〕用我们的口气说话，他这个病人现在——因为太迟了——被所有的人骂成犯罪的疯子，好像在这六年里看不出来似的……——这一切没有丝毫可信之处。”^[198]

米夏埃尔·曼写了一封信报平安。格蕾特和他都“得救了”。他们跟小提琴老师弗莱什和几个他的学生辗转来到威尔士，住在一家私人旅社。格蕾特在旅社里帮忙，他集中精力拉琴。他不想回美国，现在回去“没有意义”。^[199]

戈洛·曼在苏黎世百般思忖，战争对他本人及其在《尺度与价值》杂志社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跟出版人埃米尔·奥普莱希特一起决定继续干下去。瑞士举国上下弥漫着爱国情绪，已作好德国入侵的准备，对此，戈洛·曼有一种陌生和受到排斥的感觉。他在大街上讲法语，不让别人把他当作德国人。^[200]他在日记里表达了他对这场新战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1813年的意义在于原本要建立民族国家，1918年的意义在于要建立邦联式的欧洲。这两个目的都未能实现，两个世纪都因此而陷入混乱之中。”^[201]

托马斯、卡蒂娅、艾丽卡、戈洛和米夏埃尔·曼不得不在欧洲静观战争对其生活以及各种计划产生的影响；克劳斯在美国也替其他所有家人焦虑发愁；就在同时，伊丽莎白跟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在墨西哥城无忧无虑地度假，公开的说法是各住各的旅馆房间。她开心地给母亲写了好几封信聊天：她在8月底的信里写道，皮肤已经晒黑了，跟在阿罗萨待三个星期一样，她还讲述“博吉”（博尔吉斯）的事，“他很孩子气，深夜在店里突然喝麦乳精，你看，我们方方面面都很般配吧”。[\[202\]](#)

在紧张的战时状态下，要安排回美国并在一艘安全的船上弄到舱位实在不容易。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救援行动来自最高层。艾格尼丝·迈耶找到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他向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发去电报：要帮助曼氏一家人。[\[203\]](#)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拿到美国轮船“华盛顿号”的船票，该船将于9月12日带着他们从南安普敦（Southampton）出发，前往纽约。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坐船途经马尔默（Malmö）、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抵达英国南部的这个港口城市，离开船还有三天。艾丽卡负责办理离境手续，过了不久也到了。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这次航行“比想象的更无秩序，也更像战时状态”，虽然曼一家跟“轮船的船长等认识后”升到了头等舱。船上载有约2000人，严重超载。许多人，也包括曼家几位，不得不将就着睡在铺板上。就连头等舱沙龙里的鱼子酱和香槟酒都未能让人感受到习以为常的旅行奢华；托马斯·曼在此次旅行结束后写下这样的字眼：“受了很多罪。”[\[204\]](#)他在给哥哥海因里希的信里说，船上的情形类似一座集中营。[\[205\]](#)

艾丽卡、卡蒂娅和托马斯·曼逃脱了欧洲所陷入的混乱。曼家有三个孩子还在那里，虽然没有直接受到威胁，但也并非安全。父亲的日记里不断提到米夏埃尔和卡蒂娅担心小儿子的愁绪。他自己在替戈洛担忧，“多么希望他能回来”。[\[206\]](#)没有提到莫妮卡。

抑或是受到旅途折腾的影响，托马斯·曼到了普林斯顿家里的头一天，在日记里彻底发泄政治上的仇恨：“我期待并希望：德国成为苏联跟西方争斗的战场，战争中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希特勒灭亡。这个政权覆灭，这个罪有应得的国家遭受重创，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 [207]

托马斯、卡蒂娅和伊丽莎白·曼于10月初去艾格尼丝·迈耶及其丈夫在基斯克山（Mount Kisco）的庄园，该庄园在纽约北边，行车一小时。伊丽莎白写信给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介绍他们的这次访问：庄园那叫一个美呀，她的房间那叫一个大呀，整个庄园极尽奢华（带网球场、室内游泳池、保龄球场，有8匹赛马，10到12名用人 [208]）。伊丽莎白骑了马，在钢琴上给大家演奏了几支曲子。她在一封信里写道，尽管玩得非常开心，她却觉得这一切彻底让人讨厌。迈耶家富得让人恶心。“真的”，她最希望看到共产党人来夺走他们的所有东西。伊丽莎白继续写道，艾格尼丝·迈耶热恋着父亲，在卡蒂娅·曼面前表现得居心叵测。可惜父亲提到了即将举行的婚礼。迈耶夫妇表示热烈祝贺并赞扬博尔吉斯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还问起年龄多大，42岁了？ [209]

米夏埃尔跟格蕾特已回到伦敦，他不停地给母亲写信，竭力争取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要父母亲允许他们留在那里。他说情况根本就不那么危险，以后肯定也可以回美国，而且会比现在还容易，也更便宜。他无论如何都要跟弗莱什继续学小提琴。“假如我的天赋（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更高些、问题更少些的话，我不会迟疑半刻，随便在美国的哪一位老师那里毫不费力地结束我的学业。”但要是没有弗莱什的“天才帮助”，他可能连“左后排第三小提琴手都轮不上”。他总算弄明白了，美国反正不适合他。 [210] 在10月的一封信里，米夏埃尔·曼终于摆出他最重要的理由：家庭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跟父母的关系“有问题，而且很难处理”，特别是“跟父亲的关系，我

对他感到陌生，就像他对我感到陌生一样（而且我用不着把更多的责任强加于我头上）”。他虽然很想待在亲爱的母亲身边，但各种关系却摆不平。^[211]伴随米夏埃尔·曼成长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灾难，他把这些灾难很轻松地解释为倒霉或不幸，以便朝着下一个新的灾难前进。所有这些母亲都不怪罪他，但是，这个儿子竟敢对父亲发表批评意见，这个不讨喜的儿子，这个“惹是生非之徒”竟然希望疏远父亲，认为父亲冷淡和陌生，这让卡蒂娅·曼非常气愤。

10月底，卡蒂娅·曼的父母终于可以离开德国了。战前不久，苏富比（Sotheby）拍卖其陶瓷画藏品，结果只拍出其真正价值的一个零头，第三帝国以“逃离帝国税（Reichsfluchtsteuer）”为由拿走了其中的80%，不用说，这当然是符合法律的。尽管如此，还是难以想象，纳粹德国居然能放他们——托马斯·曼的岳父岳母出国，托马斯·曼可是《希特勒兄弟》那篇文章的作者——那篇最具智慧、最恶语中伤的文章。据说是一位勇敢的党卫队中尉帮的忙。^[212]真正作出让海德维希和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去瑞士的决定的，肯定是另一个地方。^[213]

现在，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有个迫切的愿望，要纠正女儿的看法，即父母亲或许在慕尼黑生活更好，因为他们显然在那儿感觉不错。在从苏黎世发出的第一封信里，第一封不用害怕审查机关审查的信里，她要女儿知道，他们在褐色的慕尼黑最后经历的真实生活：他们俩，一个84岁，一个89岁，不得不再次放弃他们的住所，被划分为“犹太人”的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不许再得到住房，而是“被随便‘安置’”。按照纳粹的标准，她本人似乎最后被划分为“雅利安人”，这很奇怪，原因也许在于，他们家早在19世纪初就皈依基督教了。“两年了，不许我们去剧院，不许听音乐会，不许看电影，不许看展览”，她在信里继续叙述道：“到了某些纪念日，中午12点以后不许上街。让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非常气愤的是，他不得不用阿

尔弗雷德·以色列（Alfred Israel）来签名，同样，他不得不到犹太人居住点用食品票买东西，而且只能到某些偏远的商店购物（女厨师艾尔塞当然不这么做）。同事们因为是公务员，所以不允许去看他；但这些同事照样来看他，都是甘冒风险。说了这么多，够了吗？我想是够了。”在乘火车流亡时，卡蒂娅的父亲遭到搜身，作为“最后的下马威”，他被迫脱光全部衣服，受到野蛮的对待和侮辱。“经历了这件事后，他怒火冲天，我从未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这样写道。“在这儿，我们就不用担心这类事情了。”

[214]卡蒂娅·曼想去苏黎世父母亲那里。战争使其无法成行。苏黎世的朋友、出版人奥普莱希特夫妇和孙子戈洛·曼照顾着两位老人，在苏黎世的上等出租屋“红色宫殿”里给他们租了一套房子，并陪伴着他们。

伊丽莎白·曼跟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结婚。在墨西哥共度时日后，两人显然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但他们必须等待博尔吉斯跟其意大利太太离婚，两人已分居多年。11月23日，他们在普林斯顿登上婚礼圣坛。伊丽莎白本想放弃教会的赐福，但新郎官不肯。父母陪着最小的女儿步入教堂，这一次托马斯·曼在场。晚上，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家里为新婚夫妇举行宴会。艾丽卡·曼不得不安慰精神受到打击的父母亲。她在婚礼那天写信给母亲：“天哪，他们俩不管怎样都能行，小伊丽莎白不是惹事的孩子，她更喜欢一辈子都给别人当典范。” [215]

父亲需要更多的安慰。婚礼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神经衰弱得哭了。” [216]三天后，艾丽卡写信给他：“亲爱的魔术师，那天晚上，我们的公主杜拉拉带着兴致勃勃的老头（他在我面前自称为夏天的落日，强大、美丽、金光闪闪——只可惜已近黄昏！）回家，他又带着她离开斯托克顿大街时，我（通过我布满全世界的情报网）听说你‘有点脆弱，有点悲伤’。”艾丽卡·曼的拿手好戏就是用她的幽

默让父亲忘记生活的阴暗面，此时是忘记“倔强的小怪人”伊丽莎白所作的决定，这一决定让全家都觉得奇怪。从此，卡蒂娅跟托马斯·曼住在普林斯顿斯托克顿大街的大房子里，孩子们都走了。艾丽卡·曼又踏上了演讲的旅程，途中写信给父母，说她多么想念他们。“我们这个传奇之家分散在各地，各自作战，真令人心酸，这烦人的东跑西颠真让我受够了。”[\[217\]](#)。



图19 新婚：伊丽莎白和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1939年11月

艾丽卡·曼认为，弟弟米夏埃尔“决心”要让母亲“心碎”。[\[218\]](#)他还待在伦敦。即使卡尔·弗莱什本人离开英国前往荷兰，他还想留在欧洲；他说可以跟弗莱什去荷兰，弗莱什也可能很快重新回来，此外，弗莱什的一个学生也可以给他上课。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弟弟克劳斯，母亲如何因为小儿子而伤透了脑筋，特别是他说什么也想待在伦敦：“至少弗莱什在那儿的话，还可以帮着改善点他那不着调的天赋，可他这样做，是否居心不良？？？！！”[\[219\]](#)米夏埃尔很清楚，他公开说的那些话对母亲造成了伤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

母亲道歉，请求原谅他“那些多余和愚蠢的信”，还有对他跟父亲关系的“错误解读”。都是他的错，都是他自己的责任。[\[220\]](#)

几周以来，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住在莫妮卡和耶律·兰易在伦敦的房子里。战争初期，莫妮卡跟丈夫一起躲避战乱，来到英国南部的托基（Torquay），把伦敦的房子留给了弟弟和弟媳妇。可是，这个被称为“老人天堂”的地方无聊得很，[\[221\]](#)此时也没有任何敌机轰炸或德国入侵的迹象：11月底，兰易夫妇俩回到了伦敦，现在四人共住一个房檐下。米夏埃尔·曼看着姐姐跟姐夫腻歪着回到自己的家里，有点不开心，觉得自己的夫妻生活受到了影响。他写信给母亲，说“交道打多了以后，很喜欢莫妮卡”，其实她很容易相处，“她要是没那么使唤人，不那么无所事事就好了”。莫妮卡的大拇指受伤后，就把所有家务事都交给了格蕾特，兰易心好，却帮不上忙。最后，信又回到了米夏埃尔·曼给母亲写信的主题：要钱。卡蒂娅·曼曾寄钱给儿子以防万一，因为数字很大，就要儿子报账。米夏埃尔回答说，报账几乎不可能，所有的钱是怎么花的，他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开销很大，因为一只箱子丢了，他不得不从头到脚重新买衣服，再加上昂贵的提琴课，总而言之，“我虽然每次都痛苦万分”，但他又需要一笔钱，而且要尽快。[\[222\]](#)

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戈洛·曼在苏黎世，刚完成“他的”第一本《尺度与价值》杂志的出版工作；他仍希望在苏黎世能有前途。米夏埃尔和莫妮卡·曼跟配偶在伦敦。虽然其他家人都团聚在普林斯顿，克劳斯·曼还是孤身一人，艾丽卡·曼跟马丁·贡佩尔特及其女儿，伊丽莎白跟女婿博尔吉斯也来了（这位“女婿”比卡蒂娅·曼还大几个月）。跟往常一样，他们还邀请了朋友，艾里希·冯·卡勒（Erich von Kahler）和布鲁诺·弗兰克带着家眷参加家宴。只有弗里茨·兰茨霍夫没被允许在场，这是伊丽莎白考虑到丈夫

的嫉妒心而提出的请求。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要是我不愿意的话”，大哥大姐们应该会理解的。[\[223\]](#)

托马斯·曼朗读他的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的最后一章，该书不久前完稿，目前正在斯德哥尔摩印刷。托马斯·曼叙述歌德跟其少年时代的恋人夏洛蒂·布芙（Charlotte Buff）——《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绿蒂的原型——40年后再次相遇，以两位老人的一段梦中对话结束全书：夏洛蒂严厉指责这位冷冰冰的天才、这个伟人，其周围及家人都为了他的利益而服从他，其伟大让所有这些人成为其牺牲品。她控诉这位诗人，这位把生命献给艺术的诗人，说他毫无顾忌地把这些人当作其作品的原型，他们在其“艺术殿堂和生活环境里”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224\]](#)普林斯顿的这些听众非常清楚，这部小说具有自传体性质，他们也非常清楚，托马斯·曼写的是歌德，同时也在说自己。他们所有人，尤其是卡蒂娅·曼，都是夏洛蒂意义上的牺牲品。对此，谁也不提。

圣诞节期间，克劳斯·曼在观察妹夫博尔吉斯。妹夫激动地讲述着对战争的看法，夸大意大利在复杂的力量角逐中的作用，显得有些焦躁。他所说的一切都“有点纷杂浪漫，虚荣心十足，而表面的敏感更让人讨厌……另一方面，他又表现着幼稚般的冲动、聪明和热情。还有对伊丽莎白的那种自豪的父亲般的爱情”。[\[225\]](#)克劳斯·曼自然又有了不少新计划，但没有人像他自己那样觉得这些计划了不起，这使他感到失望。他想创建一本美国文化杂志。至于说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实施这一想法，更何况这里对他的各种写作志向几乎没有敞开胸襟表示欢迎，他又怎样能够找到投资者和读者，则无从知晓。他不管跟谁谈及这一计划，都只有他自己觉得这不是问题。要说是，那也只是他不无苦涩地发现，他的各种计划和想法都无法像从前那样立刻赢得志同道合者。就连艾丽卡也因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抱负，还有其他人的困境而心有旁骛，在她心里，这些人的事显然要比我的

更重要”。到了年底，他不禁顾影自怜：“我孤身一人，何以成事？” [\[226\]](#).

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最终还是在英国登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1月10日，卡蒂娅·曼在纽约港的码头迎接他们。米夏埃尔给母亲带来了一个惊喜：他要当父亲了。 [\[227\]](#)消息很快传开。几天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信给母亲，说她非常“激动”。“但愿这孩子别那么傻乎乎的。”至于说她的老弟，她有些担忧。“这对比比有可能是好事”（她强调“有可能”，以此表示自己的怀疑）；“他有可能因为责任重大而感到应当去工作、去赚钱”。这一喜讯也有让人伤心的一面：“博尔吉斯有些失望，他现在不能第一个生下曼家的（外）孙子了。” [\[228\]](#).

[\[1\]](#) EM an KIM, 22. 2. 1937, MON

[\[2\]](#) MiM an KM, 18. 2. 1937, TMA

[\[3\]](#) Tgb TM, 1. 1. 1937

[\[4\]](#) TM: Essays IV, S. 187f., S. 191

[\[5\]](#) Zit. nach TM im Urteil, S. 290-294 und S. 282

[\[6\]](#) Tgb TM, 19. 1. 1937

[\[7\]](#) MiM an KM, [18. 3. 1937] , TMA

[\[8\]](#) TM: Maß und Wert, in: TM: Essays IV, S. 201f.

[\[9\]](#) Vgl. GM an Hans Mayer, 9. 6. 1986, Stadtarchiv Köln

[\[10\]](#) Tgb KIM, 25. 2. 1937

[\[11\]](#) Tgb TM, 19. 5. 1934, 6. 9. 1934, 4. 4. 1936

[\[12\]](#) Tgb TM, 17. 10. 1936; vgl. GM: Erinnerungen II, S. 138f.

[13] TM an K1M, 26.12.1936, in: K1M: Briefe, S.278

[14] Tgb TM, 15.2.1937

[15] Deutscher Text in: EM: Blitze, S.118–124

[16] Tgb K1M, 7.7.1936

[17] Schwangerschaft nach Aussage von EMB in: Anja Maria Dohrmann: Erika Mann. Einblicke in ihr Leben [Dissertation Universität Freiburg 2003] , S.204, <http://www.freidok.uni-freiburg.de/fedora/objects/freidok:1393/datastreams/FILE1/content> (Abruf: 10.6.2015) ; EM an KM, 1.5.1937, in: EM: Briefe I , S.120; vgl.Tgb TM, 28.4.1937

[18] MiM an KM, [20.3.1937] , TMA

[19] MiM an KM, [25.3.1937] , TMA

[20] MiM an KM, [März 1937] , TMA

[21] Interview EMB, in: Heinrich Breloer: 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Frankfurt a.M.2001, S.89

[22] Vgl.Holzer: EMB, S.89

[23] Tgb TM, 19.5.1937

[24] MiM an KM, [23.5.1937] , TMA

[25] KM an K1M, 28.5.1937, MON

[26] GM an Lise Bauer, 1.5. [1937] , in: GM: Briefe, S.27; dass die Briefe Gms geöffnet bei ihr ankamen, berichtete Lise Bauer später, vgl. Lahme: GM, S.124f.

[27] MiM an TM, 5.6.1937, TMA

[28] MiM an KM, [6.5.1937] , TMA

- [29] Vgl. Schaenzler: K1M, S.291f.
- [30] KM/TM an K1M, 4.6.1937, in: K1M: Briefe, S.724
- [31] KM an K1M, 28.5.1937, MON
- [32] EM an K1M, 5.6.1937, MON
- [33] EM an K1M, 11.6.1937, MON
- [34] K1M an KM, 7.6.1937, in: K1M: Briefe, S, 306
- [35] MiM an KM, [13.5.1937] , TMA
- [36] MiM an KM, 7.6.1937, TMA
- [37] Vgl. Tgb K1M, 12.6.1937
- [38] KM an K1M, 28.5.1937, MON
- [39] Tgb TM, 11.7.1937
- [40] Zit.nach TM: Lotte in Weimar, GKFA: 9.2, S.82
- [41] MiM an KM, [23.6.1937] , TMA
- [42] Vgl. Lahme: GM, S.136-140
- [43] MiM an KM, [Juni 1937] , TMA
- [44] EM an K1M, 14.8.1937, MON
- [45] EM an KM, 12.9.1937, MON
- [46] Tgb TM, 30.8.1937
- [47] Tgb TM, 2.9.1937
- [48] KM an K1M, 12.9.1937, MON
- [49] MiM an KM, [14.9.1937] , TMA

- [50] MiM an KM, 6.11.1937, TMA
- [51] K1M: Aufsätze III, S.251
- [52] K1M an Ludwig Hatvany, 29.10.1937, in: K1M: Briefe, S.323
- [53] MiM an KM, 16.11.1937, TMA
- [54] Tgb K1M, 2.12.1937
- [55] Tgb TM, 11.12.1937
- [56] Tgb TM, 13.11.1937
- [57] Tgb TM, 27.11.1937
- [58] MiM an KM, [ca.Ende November 1937] , TMA
- [59] Tgb K1M, 6.4.1937
- [60] Tgb TM, 22.1.1938
- [61] Tgb TM, 30.1.1938
- [62] Schaenzler: K1M, S.301
- [63] Tgb K1M, 24.12.1937
- [64] Tgb TM, 22.1.1938
- [65] TM an HM, 20.2.1938, in: TM-HM: Briefwechsel, S.293
- [66] Zit. nach Harpprecht: TM, S.978
- [67] Alfred Döblin: Zum Verschwinden Thomas Manns, in: ders.:
Ausgewählte Werke in Einzelbänden.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und
letzte Aufzeichnungen, hg.von Edgar Pässler, Olten 1980, S.575-577
- [68] Zu Agnes Meyer vgl. Veget: TM, der Amerikaner, S.157-215,
sowie Veget: Einleitung, in: TM-AM: Briefwechsel, S.5-71

- [69] Harpprecht: TM, S.982
- [70] Tgb TM, 18.3.1940; vgl.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231
- [71] TM: Essays IV, S.244
- [72] Tgb TM, 8.3.1938; vgl. auch Tgb TM, 4.3.1938
- [73] K1M an KM, 25.11.1937, MON
- [74] GM an Manuel Gasser, 25.3.1941, zit. nach Lahme: GM, S.137
- [75] Vgl. Manfred Flügge: Heinrich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bei Hamburg 2006, S.332f.
- [76]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846
- [77] Tgb TM, 7.1.1936
- [78] Tgb TM, 20.2.1934
- [79] Vgl. Tgb K1M, 6.6.1939
- [80] GM: Politische Gedanken, in: Maß und Wert, Jg.1, Nr.5 (Juni 1938) S.783–797.
- [81] TM an HM, 6.8.1938, in: TM–HM: Briefwechsel, S.296
- [82] MiM an KM, 13.4.1938, TMA
- [83] Vgl. Tgb TM, 9.4.1938 und 22.4.1938
- [84] Tgb K1M, 30.3.1938, zum angeblichen Vertrag mit Warner vgl. auch Tgb TM, 24.4.1938
- [85] Tgb K1M, 6.4.1938
- [86] Schaenzler: K1M, S.302f.
- [87] Tgb K1M, 22.4.1938

[88] Vgl. Andert: MoM, S.29f.und 93f.sowie Kinder der Manns, S.144f.

[89] K1M an KM, 1.6.1938, MON

[90] TM an HM, 21.4.1938, in: TM-HM: Briefwechsel, S.294

[91] Vgl.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267-274

[92] TM an K1M, 12.5.1938, in: K1M: Briefe, S.351

[93] KM an K1M, 25.4.1938, MON

[94] EM an KM/TM, 1.6.1938, in: EM: Mein Vater, S.127

[95] Tgb K1M, 21.6.1938

[96] Tgb K1M, 1.7.1938

[97] K1M: Aufsätze III, S.421-430, hier S.430; vgl. auch die Texte zum Spanischen Bürgerkrieg in EM: Blitze

[98] Tgb K1M, 28.8.1938

[99] TM: Lotte in Weimar, GKFA 9.1, S.160

[100] Tgb K1M, 14.8.1938

[101] GM an Adolphe Dahringer, 12.1.1979, in: Lahme: GM, S.120

[102] Tgb K1M, 31.5.1938

[103] HP an KM, 11.5.1938, in: HP: Briefe an KM II, S.125

[104] HP an KM, 21.7.1938, in: HP: Briefe an KM II, S.138; »schroff u.brutal«: Tgb HP, zit.nach Anhang von HP: Briefe an KM II, S.466

[105] MiM an KM, 10. [8.1938] , TMA

[106] MiM an KM, 20. [8.1938] , TMA

[107] Tgb TM, 25. 7. 1938

[108] K1M an KM, 1. 6. 1938; der Brief ist in K1M: Briefe, S. 354–358, abgedruckt, die hier zitierte Passage aber ausgelassen

[109] Tgb K1M, 23. 10. 1938

[110] Tgb TM, 23. 10. 1938

[111] Vgl. Tgb TM, 12. 6. 1938

[112] Tgb TM, 20. 9. 1938

[113] Harpprecht: TM, S. 1029

[114]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 861

[115] Tgb TM, 29. 9. 1938

[116] Tgb TM, 30. 9. 1938

[117] Tgb K1M, 29. 9. 1938

[118] EM/K1M: 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 (1939) , München 1991, S. 392–395

[119] Zit. nach Harpprecht: TM, S. 1030f.

[120] Agnes E. Meyer an TM, 14. 11. 1938, in: TM-AM: Briefwechsel, S. 134f.

[121] GM: Rezension zu Robert Ingrim: Der Griff nach Österreich, in: Maß und Wert, Jg. 2, Nr. 2 (November/Dezember 1938) , S. 259–261, hier S. 261

[122] Lühe: EM, S. 191

[123] Tgb K1M, 16. 10. 1938

[124] HP an KM, 13. 11. 1938, in: HP: Briefe an KM II, S. 163f.

- [125] HP an KM, 17.11.1938, in: HP: Briefe an KM II, S.165
- [126] HP an KM, 22.11.1938, in: HP: Briefe an KM II, S.166
- [127]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866
- [128] TM: 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 GKFA 19.1, S.529
- [129] TM: Bruder Hitler, in: TM: Essays IV, S.309, 306, 311, 309, 310f., 310
- [130] Zit. nach TM: Essays IV, Anhang, S.433
- [131] MiM an KM, [1938], in: MiM: Fragmente, S.16
- [132] Tgb K1M, 15.12.1938
- [133] Tgb K1M, vor 1.1.1939
- [134] GM an Lise Bauer, [Januar 1939], zit. nach Lahme: GM, S.142
- [135] TM an Agnes Meyer, 7.2.1939, in: TM-AM: Briefwechsel, S.145
- [136] EM an K1M, 24.4. [1939], MON
- [137] Tgb TM, 11.5.1939; vgl.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248
- [138] EM an K1M, 24.4. [1939], MON
- [139] Vgl. Tgb K1M, 5.12.1937
- [140] TM an HM, 27.2.1904, in: TM-HM: Briefwechsel, S.99
- [141] EM an KM, 1.2.1937, in: EM: Briefe I, S.109
- [142] EM an K1M, 24.4. [1939], MON
- [143] Vgl. Holzer: EMB, S.101

- [144] KM an K1M, 9. 11. 1936, MON
- [145] K1M an EM, 17. 3. 1939, MON
- [146]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 868–874
- [147] Tgb TM, 19. 10. 1937
- [148] Tgb TM, 11. 9. 1939
- [149] TM an HM, 14. 5. 1939, in: TM–HM: Briefwechsel, S. 304
- [150] Vgl. Harpprecht: TM, S. 1043f.
- [151] Vgl.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Frankfurt a. M. 2013, S. 793f.
- [152] Zit. nach der Übersetzung in: EM: Mein Vater, S. 261
- [153] Tgb TM, 2. 3. 1939; Tgb K1M, 2. 3. 1939
- [154] Tgb K1M, 27. 3. 1939
- [155] EM/K1M: Escape to life, S. 107
- [156] K1M an Stefan Zweig, 8. 7. 1939, in: K1M: Briefe, S. 387
- [157] Tgb TM, 28. 5. 1939
- [158] Vgl. Harpprecht: TM, S. 1035–1039
- [159] Vgl. Jens/Jens: KM, S. 217f. , 225–227
- [160] Vgl. EMB an G. A. Borgese, 22. 10. 1939, MON
- [161] Zit. nach Holzer: EMB, S. 101
- [162] G. A. Borgese an TM, 2. 6. 1939, MON
- [163] TM an G. A. Borgese, 4. 6. 1939, MON
- [164] Tgb TM, 11. 6. 1939

- [165] EMB an G. A. Borgese, [Anfang Juni 1939] , MON
- [166] EMB an G. A. Borgese, 4. 6. [1939] , MON
- [167] MiM an KM, 24. 6. 1939, TMA
- [168] MiM an KM, [ca. März 1939] , TMA
- [169] MiM an KM, 24. 6. 1939, TMA
- [170] EM an K1M, [18./19. 6. 1939] , MON
- [171] Tgb K1M, 6. 6. 1939
- [172] Zit. nach Lühe: EM, S. 217
- [173] HP an KM, 22. 7. 1939, in: HP: Briefe an KM II, S. 209
- [174] MiM an KM, [Sommer 1939] , TMA; vgl. auch EM an KM, 12. 7. 1939, MON sowie EMB an KM, [Ende August 1939] , TMA
- [175] Stefan Zweig an K1M, [Juli 1939] , in: KM: Briefe, S. 385
- [176] KM an K1M, 9. 7. 1939, MON
- [177] TM an K1M, 22. 7. 1939, in: K1M: Briefe, S. 388–391
- [178] Zit. nach Kinder der Manns, S. 74; abgeschickter Brief: K1M an TM, 3. 8. 1939, in: K1M: Briefe, S. 391–394
- [179] TM an Ferdinand Lion, 12. 7. 1939, in: TM: Briefe II, S. 103
- [180] MiM an KM, 17. [7. 1939] , TMA
- [181] MiM an KM, 15. 8. [1939] , TMA
- [182] KM an K1M, 30. 7. 1939, MON
- [183] KM an K1M, 29. 8. 1939, MON
- [184] EM an K1M, 11. 6. 1939, MON

- [185] Tgb K1M, 26.12.1939
- [186] Tgb K1M, 5.8.1939
- [187] K1M an KM, 7.8.1939, MON
- [188]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874–889
- [189] Tgb TM, 26.8.1939
- [190] EM an KM, 26.8.1939, MON
- [191] MiM an KM, 23.8. [1939] (Zitat) sowie 15.8. [1939] , beide
TMA
- [192]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884f.
- [193] MiM an KM, 28. [8.1939] , TMA
- [194] Zit. nach TM Chronik, S.348
- [195]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887
- [196] EM an K1M, 2.9.1939, MON
- [197] Tgb TM, 1.9.1939
- [198] EM an K1M, 2.9.1939, MON
- [199] MiM an KM, 5.9. [1939] , TMA
- [200] Vgl. Lahme: GM, S.147f.
- [201] Tgb GM, 6.9.1939, zit. nach Lahme: GM, S.151
- [202] EMB an KM, [Ende August 1939] , TMA
- [203] Vgl. Harpprecht: TM, S.1112
- [204] Tgb TM, 12. u. 19.9.1939
- [205] TM an HM, 26.9.1939, in: TM–HM: Briefwechsel, S.312

[206] Tgb TM, 19. 9. 1939

[207] Tgb TM, 19. 9. 1939

[208]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175

[209] EMB an G. A. Borgese, [1.10.1939] , MON

[210] MiM an KM, 3.10. [1939] , TMA

[211] MiM an KM, 9.10.1939, in: MiM: Fragmente, S.21

[212] Vgl. Inge Jens/Walter Jens: Katias Mutter. Das außergewöhnliche Leben der Hedwig Pringsheim,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S.227-230

[213] MiM berichtet an KM, [Mitte Juli] , TMA, Göring habe di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er wisse das von der Schülerin von Carl Flesch, Alma Moodie, deren Ehemann, Alexander Balthasar Alfred Spengler, der Rechtsanwalt der alten Pringsheims sei. TM nennt als entscheidend die Hilfe des»Hauses Wahnfried«, der Familie Wagner um Winifred Wagner (TM an HM, 26.11.1939, in: TM-HM: Briefwechsel, S.313)

[214] HP an KM, 14.11.1939, in: HP: Briefe an KM II, S.216f.

[215] EM an KM, 23.11.1939, MON

[216] Tgb TM, 23.11.1939

[217] EM an TM, 26.11.1939, in: EM: Mein Vater, S.141, 142

[218] EM an K1M, 2.9.1939, MON

[219] EM an K1M, 3.12.1939, MON

[220] MiM an KM, 9.11.1939, TMA; vgl. auch MiM an KM, 25.11.1939, TMA

[[221](#)] Jenő Lányi an Franz Baermann Steiner, 28.10.1939,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231

[[222](#)] MiM an KM, 25.11.1939, TMA

[[223](#)] EMB an KM, [18.12.1939] , TMA

[[224](#)] TM: Lotte in Weimar, GKFA 9.1, S.443

[[225](#)] Tgb K1M, 25.12.1939

[[226](#)] Tgb K1M, 26.12.1939

[[227](#)] Tgb TM, 10.1.1940

[[228](#)] EMB an KM, [Anfang 1940] , TMA

第四章 危险与金钱（1940~1941）

艾丽卡·曼又一次高估了自己。几周以来，她心急火燎地穿梭于美国大陆，向妇女协会、学生或犹太人组织介绍第三帝国妇女和儿童的状况，讲述自己父亲以及她们家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她组织帮助流亡者——他们争先恐后地逃离战火纷飞的欧洲；她还捐献出自己的部分收入。艾丽卡的收入相当高，每次出场费约150~250美元，从10月底到2月初计划出场52次，三个多月里，她收入近9500美元。^[1]1940年初，她的身体罢工了。一般情况下，艾丽卡会置之不理，让她当医生的男朋友贡佩尔特开一些厉害的药物，然后继续登台作报告。艾丽卡服用各种兴奋剂、安眠药，大量喝酒，还定期服用毒品，虽然比克劳斯有所节制，但所有这些都混合到一起，那就相当危险了。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身体又一次发出各种预警信号，她却置之不理。虽然她因为发烧和咳嗽几乎不能说话，却依旧一天作两场报告，然后坐夜车赶往下一站。到了艾奥瓦州（Iowa），她终于挺不住了。艾丽卡写信告诉母亲，不管是在火车的铺位还是站台上，“冰将军、雪将军和寒冬将军都那么粗暴”，她不得不去医院进行“颈部护理”。艾丽卡·曼的信件历来轻松愉快，这一次却伴随着另一种情绪：她需要安慰和鼓励，她要母亲尽快回信。在她软弱的时刻，信里还夹杂着另外一种东西：嫉妒。

艾丽卡在给母亲的信里苦涩地写道，她自认为，“你不愿意替我操一点点心”，“另一方面，世人皆知，你居然在港口整日整夜地徘徊，等待你那个宝贝疙瘩”。^[2]那个“宝贝疙瘩”就是弟弟米夏埃

尔，他刚坐船从欧洲回来。母亲一直关心幼子，照顾他，什么都满足他。卡蒂娅非常爱他。艾丽卡·曼在信里经常发火，对受到宠爱、没啥用处的小弟和对外表看上去果断刚毅的母亲表示不满。在米夏埃尔第一次来美国前，艾丽卡就曾当着母亲的面讽刺说，他应当开着他的布加迪跑车到美国来，让所有学琴的同学都坐在里面。^[3]米夏埃尔啥也没做，却成为母亲的“宝贝疙瘩”，这让她气不过。奇怪的是，抱怨家长对孩子宠爱不均的，恰恰是家里最受宠爱、最受恩惠的孩子中的一个；更奇怪的是，家里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提出过质疑，没有人质疑父母的宠爱不均以及相应的表达，父亲直截了当，母亲遮遮掩掩，这些家里人都看得到。三天后，艾丽卡·曼从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写信给母亲，告诉她自己又踏上了报告之旅，情绪也好了一些。至于说女儿从病床上发出的那封信里谈到的棘手话题，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儿，都绝口不提。

克劳斯·曼搬进了自己的第一个住所，时年33岁。如果不算在父母家的房间，他从来都是居无定所，总是住在酒店或家庭旅舍，一个漂泊者，从不在某个地方待很长时间，然后就走人，往往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上哪儿去。1940年1月1日，他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租了一套带洗澡间和小灶具的公寓房，月租55美元。写一本新书的计划也在他脑海里形成：他想向美国人介绍《杰出的访客》

(*Distinguished Visitors*)，这是一部历史性的人物肖像集，介绍著名的欧洲人及其跟美国的相遇，其中包括女演员爱莲诺拉·杜塞

(Eleonora Duse) 和莎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dt)，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Peter Iljitsch Tschaikowski) 和安东宁·德沃夏克 (Antonín Dvořák)，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 和瑞典火柴巨头伊娃·克雷格 (Ivar Kreuger)。这是克劳斯·曼首次以英语作家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

米夏埃尔同意离开英国，再次回到美国。他曾经对父亲发表过批评意见，也曾表示要跟家庭保持距离，对此，他一再表示后悔并收回这些话。但他确实不想在美国东部定居。他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托马斯·曼也时不时地提到想在美国西部生活，提到那里四季如夏，还提到那里庞大的德国殖民地和“电影痞子”。他其实更喜欢这些痞子而不是普林斯顿的学者气氛，这种学者气氛让他这种自学成才者有点胆怯。^[4]卡蒂娅·曼认为，幼子应当等一等，更何况他身边还带着怀孕的格蕾特。父母亲反正计划夏天在加利福尼亚州租一幢房子。但这个儿子等不及，对他来说，跟父亲保持距离很重要，其重要性比他当着母亲的面承认的要大。

于是，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在2月从纽约向西旅行。他们没有具体的计划。重要的是，母亲寄钱。3月，米夏埃尔·曼从比弗利山庄（Beverly Hills）写信，说他“花的钱惊人，真的多得要命”。卡蒂娅·曼四周前给他的220美元已经花光，他不得不跟格蕾特——她从父母那里得到自用的钱——借了50美元。反正现在什么都撞到一起了，“但众所周知，万事不仅开头难，而且还贵，你必须理解，所有这一切都应当算是个开头”。米夏埃尔还公布了继续要花的钱：他要找一幢房子租下来，在此之前得买一辆汽车，他还问母亲，是否知道现在有能够录音的留声机？他一定要买一台。计算了所有支出后，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买留声机的事也许还可以放一放。米夏埃尔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写的信充满着忧愁，对他这个幼子的各种生活计划不像他自己那样抱有信心。“我觉得，你对即将出世的孙子并不那么高兴，你看到的更多是烦人的一面。”^[5]

战争开始后，戈洛·曼曾在短时间内犹豫不决，不清楚继续出版《尺度与价值》杂志是否有意义。然后，他本着“更待何时”的精神在苏黎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跟其前任纯文化的导向不同，戈洛·曼更倾向于把这本杂志打造成为政治性更强的杂志。战局或清算

民族社会主义不应当成为杂志的主题。他坚定不移地认为，希特勒德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纳粹行将覆灭。然后呢？这是他在《尺度与价值》杂志里想讨论的问题。戈洛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经过激烈的辩论，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未来德国的基础；他印刷那些推荐文章——推荐斯堪的纳维亚的榜样或罗斯福的新政作为社会民主的社会形式；他组稿讨论联邦制，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获取对未来的各种设想。对戈洛·曼来说，只有一个统一的、把后希特勒德国作为伙伴的联邦制欧洲才能够战胜民族主义的毒瘤。^[6]他清楚地看到，每牺牲一个士兵，战争每拖一个月，一个真正的、有建设性的和平就少一分希望。

只要读一读戈洛·曼写的编辑部来信，就可以看到他的自信心在增加。他在那些信中批评像赫尔曼·凯斯滕（Hermann Kesten）和路德维希·霍尔（Ludwig Hohl）那样的名家寄来的稿件。克劳斯·曼的朋友凯斯滕不得不阅读对他的批评：悼念勒内·施科勒的文章又长又差，不能付梓；戈洛·曼在写给凯斯滕的信里说，“在您的风格范围内，您曾写过比这漂亮百倍的文章”。^[7]新编辑部不是来者不拒，这一点也不奇怪。弗朗茨·舍恩贝尔纳（Franz Schoenberner）系讽刺杂志《傻瓜》的前任主编，他在《尺度与价值》杂志上几乎发表不了文学作品了。该杂志的新方针不讨他的喜欢，也就不足为奇了。舍恩贝尔纳写信时的火气越来越大，骂“这乳臭未干的矮小子，他干这差事的唯一合法性不过是因为他的姓氏而已”。^[8]这么说没错：戈洛·曼确实没有任何资质证明自己能够作为主编来驾驭一本文化杂志。可这“乳臭未干的矮小子”干得还真不赖。《尺度与价值》的色彩增加了，更善于表态了，现实感更强了。虽然处于战争状态，前两年读者人数减少的状况却得到了改善。托马斯·曼对儿子的工作也很满意。这是戈洛·曼在流亡岁月里首次取得的成功。

克劳斯·曼在纽约的房子里仅仅住了六周，就又放弃了。他在逃跑。这一次不是害怕内心的魔鬼，而是面临具体的威胁。他弄来了一个年轻人，“小家伙”把他的住宅当作自己的家，带男朋友回来，开派对，吸毒。一开始，克劳斯觉得这一切都好极了（又重犯一回毒瘾他也没当回事）。可不久后，小家伙带来一个堂兄弟，敲诈他这位新朋友，跟他要钱。他们威胁说，要去警察那里举报他是毒品贩子。克劳斯付了钱，逃离自己的房子，又回到贝特福德旅馆，让一位律师帮忙了结这帮敲诈者。独居的计划又泡汤了。

好在这些冒险经历为他用英语撰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速度》（*Speed*）提供了素材。这篇小说他不满意，也没有付印。用外语写散文比写新闻稿或非文学作品要更难一些。就连后两类的写作也很艰难，虽然有一个美国女子帮他进行文字修改。他常常给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他们俩分手了，只是普通“朋友”了）看他那本描写历史人物的书的片段。柯蒂斯认为写得“很糟糕”。^[9]克劳斯·曼不时会产生怀疑，他想成为美国作家的打算能否成功。他“悲催”地读着自己昔日的德文作品。“我当时的风格是多么丰富多彩呀。”他非常害怕：“难道我还得失去曾经拥有过的唯一一样东西：我的语言吗？”^[10]

3月，艾丽卡·曼在太阳谷（Sun Valley）滑雪度假，恢复健康。她享受着阳光和滑降，可是世界局势一直传到了艾奥瓦州的大山里。美国静观欧洲战事的发展，不想参与其中，对此，她感到气愤。在美国，那些想让自己的国家与世隔绝的孤立主义者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总统罗斯福不得不逐步而巧妙地将美国引向战争，但他首先得拿下11月的选举，然后才能放手大干，对此，艾丽卡·曼不能理解，也没有耐心。她对“这个令人作呕的中立国”发火，^[11]能发到自己的健康受到影响的地步。



图20 艾丽卡·曼跟爱娃·赫尔曼在爱达荷州滑雪度假

在此期间，米夏埃尔·曼买了一辆车（一辆别克敞篷车，大部分钱是老妈掏的），租下了一幢房子，而且是在海边的卡梅尔

（Carmel），距旧金山两小时路程。米夏埃尔承认，“从职业的实际”来考虑，靠旧金山更近一点应该更好些，但他却有个愿望，“在下一阶段尽可能在乡间的与世无争中保持并维护自己的艺术与个人发展”。他已经找到了一位新的提琴老师，名叫亨利·泰缅卡（Henri Temianka），是卡尔·弗莱什的学生。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米夏埃尔·曼就特别兴奋，说泰缅卡照搬弗莱什的方法进行教学，但他年轻、有活力，不像弗莱什本人那样“衰老和枯竭”。^[12]

这样，米夏埃尔·曼每个星期坐两小时火车去旧金山，在旅馆过夜，然后到泰缅卡那儿学琴，因为泰缅卡的课第二天上。他妻子格蕾特留在卡梅尔。米夏埃尔·曼写信说，她“一人在家真的害怕”。格蕾特在瑞士的母亲可能担心怀孕的女儿，所以宣布要来。对此，米夏埃尔感到震惊。他写信给母亲说，“没法想象三个人一起生活”，若是这样，他们远去卡梅尔就失去了意义。面对着战事，格蕾特的母亲恐怕根本就回不去。^[13]他阻止岳母成行，给妻子买了一只叫米奇

(Micky)的狼狗，对自己和自己所作的决定非常满意：“我相信，这事我做得还不赖，靠的不是多大智慧，而是良好的直觉。”^[14]

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当客座教授，任务不多，偶尔要作几场报告。年初，他从每年的演讲之旅回来后，作了一场题为《关于我自己》(*On Myself*)的报告，分两个部分。他在报告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布登勃洛克一家》使德国小说艺术取得了突破，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至于《魔山》，他说这部小说“滑稽戏谑地让德国教育小说史就此而告终结”。他正在写作的关于歌德的小说《绿蒂在魏玛》是他在文学上暂时的终点，小说叙述“大人物自己的问题”。^[15]托马斯·曼告诉听众，小说也涉及歌德。

在苏黎世，戈洛·曼定期去看外祖父母。只要不谈及德国与战争，他们相处得都很融洽。4月初，德国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丹麦，开始了对挪威的争夺。德国国防军跟同盟国一样，都把该国当作重要的战略目标。打从战争开始，这是德国军队第一次遭到有效的抵抗。英国、法国和波兰流亡者的部队支持挪威人。他们主要使德国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6]戈洛·曼跟瑞士人一起欢呼同盟国的胜利，因此跟外祖母发生了争执。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写信给卡蒂娅·曼，说她在这件事情上很矛盾，虽然卡蒂娅可能无法理解母亲的感受，“我知道你的强烈态度”。可她“毕竟是个德国人”，因此，“每当我想到所有那些德国母亲和妇女，想到她们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这些年轻人毫无作为地被人推向血腥的死亡，我的心就在流血”。^[17]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前几年在德国所经受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屈辱、肆意枉法、国家指使的抢劫，都没能改变她那种德意志民族的感觉。

德国国防军最终在挪威还是获得了胜利。这是同盟国的一场败仗，迫使英国首相张伯伦在议会举行的激烈辩论结束后辞职。5月10

日，新当选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接任，他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赞成对希特勒德国采取强硬立场，因而被当作战争贩子，不为人们所重视。就在同一天，德国开始西线攻势。德国国防军入侵中立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法国挺进。拿下阿姆斯特丹后，盖世太保立刻来到库埃利多出版社并将其关闭，该出版社因为其战斗性的流亡出版物早已成为盖世太保的眼中钉。弗里茨·兰茨霍夫幸好出差伦敦，逃脱了被捕的命运。该社的出版人埃马努埃尔·库埃利多（Emanuel Querido）是位勇敢的荷兰人，多年来为德国流亡者利用出版物进行反对纳粹的斗争提供了一个论坛。他在荷兰一直藏匿到1943年，后来遭人出卖，被交到德国人手里，同一年跟其夫人一起在索比堡死亡集中营（Vernichtungslager Sobibor）惨遭杀害。

在美国的托马斯·曼一家忧心忡忡，他们特别担心在苏黎世的戈洛·曼。托马斯·曼于5月15日在日记里写道，人们都在担心德国即将进攻瑞士。艾格尼丝·迈耶又一次竭尽全力实施帮助。跟1939年9月的船票一样，她又一次成功地让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插手这件事。赫尔跟苏黎世联系，以便让戈洛·曼获得美国签证。办手续困难重重，拖延了这件事。但戈洛·曼不想等待。他根本就不想让人把他从欧洲弄出去。他搞到了一张法国总领事馆的通行证，另外还有一封特别推荐信，然后“眼里噙着泪水”、手里拿着玫瑰花跟外祖父母告别，就像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给女儿的一封充满惆怅的信里所写的那样。^[18]戈洛·曼于5月20日坐车前往法国，想在那里加入捷克军团投入抵抗德国国防军的战斗。他刚踏上法国领土，就被法国人逮捕，作为“敌方外国人”投入监狱。他的命运跟其他许多在法国的德国人一样：法国人对所有德国人不加区别，不管你是效忠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希特勒信徒，还是第三帝国的逃亡者、牺牲品和被剥夺国籍者。戈洛·曼意在帮助法国，身边还带有法国外交官的推荐信，对此，没有任何人感兴趣。^[19]

最初，远隔重洋的家人并不知道戈洛·曼遭到囚禁。他们以为他正在法国投身于“某种战争行动”。^[20]普林斯顿家里的气氛更为压抑，一则因为令人沮丧的战争走向，二则是对儿子、对在尼斯的海因里希·曼和在欧洲的许多亲朋好友的担忧。因为德国的胜利，他们突然间落入了希特勒的势力范围。托马斯·曼聆听美国总统就欧洲当前形势发表的讲话。他觉得这篇讲话“非常拘谨，其程度令人难以忍受，好像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不得已而为之似的。”好在美国转入战时经济状态，虽然仅仅着眼于本国的国防，“跟欧洲正面临的惨状没有关系”。^[21]托马斯·曼那么崇敬的罗斯福让他彻底失望了。

格蕾特跟米夏埃尔·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家园感觉很惬意。米夏埃尔认为，卡梅尔的人虽然都是些艺术家、拜金者或炫富者，而且这三者“其实又浑然一体”，他还是寻求接触新环境。正因为如此，他宣布愿意以类似音乐会助理的身份为当地的巴赫艺术节演出提供帮助。他说，这差事“要求很低”，所以他的老师泰缅卡相信他能干好。为了不让父母产生错误的希望，他补充道，干这些活儿是义务的，从根本上来说，“我宁愿实话实说，在不久的将来我还成不了大器，虽然我并不想被人看作‘问题儿童’”。他指的是自己挣钱，比如说在某个交响乐团谋个职位。

像是为了证明在加利福尼亚州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似的，米夏埃尔还给母亲讲述了一桩他干的蠢事：他在“这里的乡村照相馆”让人给照了几张相，“部分是职业的需要，部分是寻求开心的虚荣心”，现在“这头蠢猪”为三张照片要价35美元（作为比较：房子月租45美元）。这么多钱他付不了，“我完全崩溃了，你压根就不知道，我是多么不情愿向你伸手”。^[22]的确，要买带录音功能的留声机还是六周以前的事。他写信告诉母亲，这机子他现在必须得要。虽然比当时告诉她时又贵了，不是69美元而是89美元，但没办法，必须得买。他

没有再问母亲，而是借了钱，买了机子，然后把账单给了她；^[23]这次又是“不情愿”。卡蒂娅·曼又照单付钱。

正当德国军队从北部打入法国之际，戈洛·曼被关在法国东南部洛里奥（Loriol）附近的一个拘留营里，以“最愚蠢的方式”^[24]，即囚徒的身份，经历着这场战争。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用铅笔头在日记本的每一个空白处涂写。戈洛·曼在日记里愤怒却又无助地控诉法国——这个他想帮助的国家：“法国在矛盾中挣扎：一个它想向世人展示的自我与一个现实中的自我；这个国家在理论上大方且具有世界胸襟，实践中却表现着疲惫、高傲和不忠的冷漠。”他自己的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法国人不想打仗却宣战；在上一世纪的革命中成立了捷克军团，又把想加入的捷克人囚禁在边境。”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情绪不好又跟世界作对，就不可能捍卫最崇高的理想，连自己的财富也守不住。”^[25]

父亲的生日将至。莫妮卡·曼从伦敦写信来——她有点伤感地发现，自己的30岁生日也将到来，父亲生日大庆后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莫妮卡想写点美好和开心的事情，就讲述了一次游历“天堂”的经历：伦敦的邱园（Kew Gardens），世界上最老的植物园之一。“对它进行描写几乎是不可能的”，莫妮卡·曼这样认为，却照做不误：“整座花园笼罩在新鲜和暗蓝色的空气里！”她在信的开头写道，重点是感叹号。“哪里都看不到‘禁止’的字样！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深深地呼吸，仔细地端详！——先是灌木丛，在其树荫下紫色的花朵氤氲着阵阵香气，哪像是凡夫俗子的世界？然后，一片草地舒展开来，伸向天际，其尽头是一条明亮的金色条带，走向它，你会感到无限的宁静。”就这样，莫妮卡在信里跟父亲手挽着手，在植物园里缓步向前，直到最佳境地。“可那儿，那儿是什么？绚丽的色彩吸引住了你的眼球。好像在梦境里似的：是杜鹃花丛！这是一片花的海洋，上帝挑选的缤纷五彩飘向远方，无穷无尽。树丛叠嶂，姹紫

嫣红，花海波澜，赏心悦目，天之童话！你心静如水般地在此徜徉——好了，我还是不再叙述为好，因为太美了，无法用言语来描绘！”她在结尾时带着倦意：“现在我一个字也写不了了！——否则我会痛哭一场！——再次送上最美的祝福！崇敬地爱你的小莫妮。”
[26]

莫妮卡的信还没到普林斯顿，耶律·兰易的一封电报已抢先到达：一声恐惧的呐喊——他们害怕在英国陷入战争的混乱。家人竭尽全力，让他们俩能够前往加拿大。
[27]

在洛里奥被拘禁不到三周后，戈洛·曼于6月11日跟其他囚徒一起被关在运牲口的封闭车皮里，经马赛运往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附近臭名昭著的雷米拘留营（Lager Les Milles）。戈洛·曼在那里碰到许多熟人，如作家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茨（Alfred Kantorowicz）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拘留营里气氛十分紧张，人满为患，诸如吃饭、卫生等生活条件都是灾难性的。
[28] “有经验的人说，这里比达豪（集中营）还要糟糕，”戈洛·曼在日记里记录跟囚徒们的谈话时写道，“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只有一样我觉得是对的：德国人把残酷组织得干净而细致；法国人不大动脑子，可以把吊儿郎当和无能做到残酷无比。缺水、尘土和肮脏，在厕所前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还有那许多无处不在的无聊、饥饿、怒火和害怕——其效果反正非常残酷，有点地狱的味道。”
[29]



图21 海因里希和内莉·曼

从法国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进行得太恐怖了。法国人作好了打一场持久阵地战的准备，固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可是，德国部队绕过这条防线，从阿登高地（Ardennen）发动进攻，而法国军队曾宣布这是不可能的。^[30]战争打了不过44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于6月22日签署了一份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如果提出要求，法国必须交出德国流亡人士。囚徒们落入了陷阱之中。

这时，普林斯顿的家人已经获悉，戈洛·曼在法国遭到拘禁。儿子和其他人面临着何等危险，已经越来越清楚；海因里希·曼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虽然没有被拘禁，在尼斯却同样面临着被移交德国人的危险。所有想从美国实施救助的努力都没有成功。托马斯·曼陷于愤怒和担忧之中，他的政治判断变得歇斯底里：突然间，他认为美国本身正在走向内战和法西斯主义。^[31]

在雷米拘留营，所有人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消息，紧张地展望着战争的走向。德国流亡者跟着法国人一起欢呼，其他被囚禁的德国人寄希望于希特勒的胜利。6月17日，谣传即将停战，拘留营爆发了一场暴动。“流亡者们已经看到自己被交到德国人手里，被枪杀，被分

尸，纳粹分子被解放，受重赏，并获奖”，戈洛·曼在其日记里不动声色地描绘着，似乎这一切均与他无关。“院子里的喊叫声和抗议声愈加愤怒，拘留营指挥官尴尬至极，让人架起了机关枪。紧接着，造反者的头上打出了一条标语：‘开枪吧，我们宁愿死在法国的枪林弹雨中，也不要死在德国人的酷刑下！’——这反而震慑住了那些当兵的。” [32]

四天后，拘留营司令官佩尔雄（Perechon）向所有害怕德国人的囚徒提出建议，送他们去非洲。停战那天，即6月22日，戈洛·曼跟几百名同命相连的难友一起，乘火车朝大西洋方向开去。并非所有雷米拘留营的囚徒都希冀能够得救。作家瓦尔特·哈森克赖夫（Walter Hasenclever）在火车开动的前夜自戕。载着流亡者的火车经过艰难的旅途，穿越解体中的法国，抵达法国最西南端的巴约讷（Bayonne）。他们希望在那里渡海前往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有消息传来，说德国人正在挺进，引起了一片混乱。这是天大的误会：流亡者乘坐的火车的指挥官发电报说，他带两千名德国人来。海边的人把这一消息理解为德国军队正在靠近的警告，旋即通知流亡者们，说他们处于危险之中。火车立即出发，开往法国内地——成为一场摆脱自己影子的大逃亡。到了图卢兹（Toulouse），戈洛·曼终于离开了“雷米魔鬼列车”，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证件被没收后没有还给他。跟他的难友们一样，戈洛·曼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分崩离析的法国并在德国人的面前让自己安全获救。这段火车冒险的经历后来遐迩闻名，于1995年以《自由列车》（*Les Mille*）的片名被拍成电影。1940年的实际情况却并不是喜剧性的。火车驶离巴约讷的缘由虽然离奇，同时却也是个造化：原本应当可以驶往摩洛哥的船只实为子虚乌有。两天后，德国军队真的抵达了当地。

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想在加利福尼亚州过夏天。他们在洛杉矶西部的布伦特沃德区（Brenntwood）找到了一幢可以租的大房子，带游

泳池，想一起同来的艾丽卡和克劳斯有地方住，来自普林斯顿的仆人夫妇路西和约翰也住得下。在去西部的途中，父母亲看望了在芝加哥的伊丽莎白和朱塞佩·博尔吉斯。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两个主题在进行：海因里希和戈洛·曼在法国的境遇和伊丽莎白的怀孕情况——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预期于11月降临这个世界。

此时，即7月初，戈洛·曼从图卢兹辗转来到马赛。他跟美国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可因为没有证件，在一次搜捕行动中再次被抓并被投入监狱。“无政府状况”和“警察的极度死板与迂腐”让他狼狈不堪。这么多个星期里，戈洛·曼头一次失去了他的沉着与冷静。“这些侦探和官员用‘你’来作为称呼，然后拍着你的肩膀说：‘你的勇气很大的，我的老头。谁会把生命那么当真？’然后，宫殿的门就关上了，你被关在了一座城堡地牢里，本来6个人待的地方，像死鱼般并排躺着12个人。”他们不许他跟监狱之外的任何人有联系，不管是美国领馆还是其他什么人。

两周后，戈洛·曼又一次被递解到一个拘留营，这一次是去尼姆（Nîmes）附近的圣尼古拉斯（Saint-Nicolas），比雷米拘留营要好受些，但这里同样缺少卫生设备。战败后的解体现象处处可见。士兵们拿其警戒任务几乎不当回事，许多被羁押者成功出逃，营地黑市交易盛行，部分警卫人员自己也参与其中。“这里的生活比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要放肆得多”，戈洛·曼在日记里写道。所有城市都已经出现物资紧缺状况，而在这里，最好是有美元，“可以像拿着神灯的阿拉丁一样生活”。他想为法国和美好的事业而战，结果浪迹于这虚假的欢乐之中。“我更愿意在英国的一艘战舰上当个司炉，而不是在这里，在拘留营的咖啡店里坐着，喝着薄荷茶，恍如隔世。”

7月28日，戈洛·曼悄悄溜出了拘留营，虽说“对军队高官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但还是闯关来到区指挥官那里，向他报告了自己

的情况。戈洛在日记中写道：“‘您本来是绝对不允许被关押的。千万别让德国当局知道您的去处，离开法国，越快越好。’他叹了口气说，若在和平时期，‘您是可以提起诉讼的’。我为这个人的友善态度所感动和陶醉，走了出去。一句理智的话，把那么多怨恨和受过的苦难抛到了九霄云外。”^[33]戈洛·曼自由了，却远还没有处于安全之中。

7月31日，一封电报发到了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的度夏住地。格蕾特·曼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弗里多林（Fridolin），第一个孙子。托马斯·曼的日记这样记载：“当爷爷太迟了，我没什么太大感觉。”^[34]

他的情绪非常低落：“英国人的一场胜利或戈洛的到来马上就会改善他的状况！”卡蒂娅·曼几天前在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时如是说。这位美国女朋友又竭尽全力进行帮助。^[35]8月10日，终于从法国传来消息。戈洛·曼发来电报，说他拿到了一张美国签证——多亏了艾格尼丝·迈耶，也是她亲自为戈洛和海因里希·曼做的担保人。戈洛告知，他被安顿在图卢兹附近勒拉旺杜的熟人家里，情况很好，但如何离开法国却是个难题。^[36]

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他“既高兴又感动”，并表示感谢。她现在想帮助戈洛，也许还有海因里希·曼离开法国，而且不惜利用其惊人的关系网和金钱。她委托一个熟人，即勒内·德尚布拉（Rene´ de Chambrun）处理戈洛·曼一事，此人系法国投降后跟德国人合作的维希政府成员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的女婿。为让戈洛·曼出境，艾格尼丝·迈耶给了正好要去法国的德尚布拉500美元。

对他来说，“重新得到这个孩子会带来更多安慰”，托马斯·曼这样写道，因为其女艾丽卡正计划前往英国。英国情报部部长达夫·

库帕（Duff Cooper）“特别看重她”，可能要她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进行改革，以适应宣传的目的。“英国人真笨，笨死了，他们可能确实需要她。派驱逐舰给英国人吧！”——这是影射美国人迄今为止没有给英国人什么帮助。“我率先做出榜样，派我的女儿给他们。” [37]

这样的勃勃兴致是写在信里的，事实上，托马斯·曼绝非“派”女儿去，相反，艾丽卡赴伦敦的计划在深深地折磨着他。女儿试图写信安慰父亲。“第一次谈及这次旅行时你说过，不想再把一个孩子投入深渊，当时我肯定也说过我不去。事实上，要是我出了什么状况，我一定后悔莫及，因为我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我的消失更让你伤心，更让你受到伤害。”她说会照顾好自己：“我自己，①相当幸运，②相当机智，③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发生任何事情。” [38]是在美国坐等，观望战争的走向，还是敢于在欧洲冒险，为有意义的事情作出贡献，对渴望行动的艾丽卡·曼来说，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并非难事。

她生平第一次飞越大西洋，乘坐的是“飞剪船（Clipper，波音314客机）”，然后从里斯本写信，向“传奇之家”描述这种新式旅行的经历：“乘船旅行时就不大容易搞清楚，突然间你到了哪里；用这种方式旅行就更容易让你晕头转向了。”她努力组织营救在法国处于危险中的戈洛和海因里希·曼。她认为，他们俩也许只能通过非法途径离开法国。她让一个去马赛的人带250美金给他们。 [39]她本人于8月底继续前往伦敦。

卡蒂娅·曼终于在57岁当上了祖母。8月，她坐车前往卡梅尔，去米夏埃尔、格蕾特和小宝贝弗里多林那里。她把丈夫一人丢在家里，虽然他很难忍受独处的生活——没有妻子的精神和实际的支持。这么多年来，他们俩很少分开，哪怕只是一天。1938年夏，卡蒂娅·曼得

组织移民美国的事宜并在普林斯顿寻找房子，让丈夫一个人独居两天。托马斯·曼顿时出现精神危机、孤独感和郁闷，他采用曼家传统方法来对付——嗑药。^[40]为此，她现在只花三天时间去看孙子。仆人夫妇照管日常的家事，儿子克劳斯负责陪伴在布伦特沃德区的托马斯·曼。对卡蒂娅·曼来说，这是少有的机会，给她“最亲爱的羔羊”写信。她描述火车旅行的经历，自豪的年轻父母，还有她觉得长得很小的大孙子。“新生儿大概都这样，我这老奶奶已经把这给忘了。”卡蒂娅·曼知道，丈夫在惦记着她，但她不抱任何希望，他会对她描述卡梅尔的家庭生活感兴趣。“写得够多了，”她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你反正不读。”为保险起见，她在自己的抵达时间下面重重地划了一道杠。^[41]

不管何时，亦不管何种情况，托马斯·曼都没有停止过写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下，他在神话式的《约瑟》素材中逐步找到了感觉，中断多年后，他想用第四部来结束该作品。8月，克劳斯·曼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书完稿。可没有哪家出版社愿意将这本名叫《杰出的访客》的书付印。1992年出了德文版，但这算不上是为作者克劳斯·曼弥补了什么重大遗憾。一则书评这样写道，这本书“毛糙不定、品味低下到了可笑的地步”。^[42]克劳斯·曼本人在书中似乎显得“更为重要”。^[43]

就其他方面而言，这个夏天对克劳斯·曼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时光。三天单独陪着情绪不稳、容易发怒的父亲，让他颇受折磨。他在日记里写道：“吃早饭时跟魔术师聊天，有些勉强。”^[44]为了尽量不单独跟父亲相处，他不断请人来玩；布鲁诺·弗兰克跟太太一起过来，还有戈特弗里德和布丽吉特·贝尔曼·费舍尔，跟父亲的出版人昔日的争吵似乎已经平息。贝尔曼·费舍尔刚刚带着全家以冒险的方式从斯德哥尔摩经苏联和日本逃往了美国。

后来，日常生活又发生了不幸。克劳斯·曼确信，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州没有驾照也活得下去，他不行。托马斯·曼很少愿意走出自己的世界，也一直有人为他开车。克劳斯·曼离不开机动能力，单为性生活就离不开它——“没车我怎么带男孩子回来？没有他们我如何活得下去？”，他在日记里自问。^[45]他已经有了一辆汽车，却没驾照。几次考试都没通过，后来终于拿到了美国驾照。不久便出了第一起交通事故，责任在他。后来，他又把他的汽车借给了他一个“男孩”，这人肇事撞了车，然后弃车逃逸。^[46]9月3日，警察在马路上把克劳斯·曼带走，因为开夜车没开灯，后来发现，还是无证驾驶。他被逮捕，接下来吃了一场狼狈不堪的官司，克劳斯不得不公开许多他不愿意明说的事情：照他的说法，过去两年，他自己挣了约3000美元，此外，从父亲那里获得2000美元的资助。这肯定只是个大概的数字，他还模棱两可地声称，父亲也替他付其他账，所以大概还有其他开销。他的所有陈述均进入其移民档案和联邦调查局的卷宗，调查局从当年开始设立关于曼氏家人的档案。^[47]

在生活上屡遭挫折之际，克劳斯·曼决定成立一家美国文化杂志，落实他于1939年底设计好的计划。其信条是：既然没人印刷我的文章，那我就自己印。他在这一时期唯一自己能挣钱的活，即艾格尼丝·迈耶给他介绍的替《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做编审的工作，他也立马不干了。^[48]克劳斯·曼于9月又回到纽约，像“一只带着巨大翅膀的蜜蜂玛雅”一样投入杂志的工作：考虑各种方案，寻找工作人员、资助者和办公室。^[49]朋友们都发出警告，家人也不无忧虑地劝他别干，有些人指出，现在处于艰难战争状况，就连美国老牌杂志都疲于奔命。可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艾丽卡·曼在伦敦恰逢“英伦空战”之际。打败法国后，希特勒想尽快制服英国，以便全身心地投入策划已久的对苏联的战争。9月7日起，德国空军定期对伦敦实施夜间轰炸，以摧垮英国人的意志。可

是，艾丽卡·曼毫不屈服。她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并播出向德国播发的德语广播稿。她这样做刺痛了某些德国人，《人民观察家报》诅咒她为“曼氏家族的政治娼妓”。^[50]

艾丽卡·曼只给充满忧愁的家人讲述一点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都说没那么糟糕，她一切都好。在她为纽约《建设》（*Aufbau*）杂志撰写的一篇稿件里，读起来就有些惊心动魄了：她的房子被炸毁，德国战斗机在市区上空呼啸而去，炸弹下落时发出刺耳响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碎玻璃片，而她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住所——虽然如此，人们却极度镇静且充满信心，旅馆里客人们在跳舞，充满着英国式的淡泊与超然。这篇文章到了11月才发表，此时她人已回到了美国。“我听到他们表达反对的最严厉说法是：‘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样。’”^[51]艾丽卡的这些描述把真实的经历跟她自己所说的“杜撰的滑稽故事”混淆在一起，真假难分，就像她这段时间所写的所有文章一样。但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英国人，尤其是伦敦民众的意志不容撼动。

但至少至少有两个人再也忍受不了“英伦空战”了。莫妮卡·曼和耶律·兰易想尽快离开这片土地。9月13日星期五，他俩为了躲避轰炸与战争，乘坐英国客轮“贝纳雷斯市号（*City of Benares*）”从利物浦出发前往加拿大。

就在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对伦敦开始第一波攻击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曼氏一家人应邀参加了一次晚宴；艺术家、流亡者、好莱坞人士，这是加利福尼亚州德国社区的一次很平常的聚会。晚餐结束后，众人一边喝着香槟，一边玩着文字游戏。“魔术师情绪极差，”克劳斯·曼记录道，“令人费解的是，他像是受到了侮辱，因为用英语他啥也想不起来。”托马斯·曼气呼呼地离开了这场派对。第二天，父亲依旧满腔“悲戚与愤恨”，克劳斯这样写道，他带着“忧愁，也不

无反感”地注视着父亲的情绪，观察他跟别人的距离及其离群索居，他越来越需要（也依此来评判他人）“别人恭维他”。儿子认为，托马斯·曼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阿谀奉承与效劳者的世界，正是那种“孤家寡人的荒凉，他在写歌德时意识到过这一点，并带着忧伤地嘲讽过”。[\[52\]](#)

在此期间，戈洛·曼正在考虑离开法国的各种可能性。他在马赛拿到了美国签证和艾格尼丝·迈耶给的500美金，也见到了伯伯海因里希及其太太内莉。但没有出境许可，他们谁都不能离开法国。艾格尼丝·迈耶使出了浑身解数，白宫也进行了干预，却无济于事。要逃出法国只有走非法途径。也有提供帮助的，即紧急救援委员会（ERC），一个帮助数千人逃离法国的组织。紧急救援委员会在马赛的美国负责人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也在戈洛、海因里希和内莉·曼逃亡时给予了帮助。9月12日，弗莱跟一名救援者一起带着曼氏三人和作家弗朗茨·维尔费及其太太阿尔玛·马勒-维尔费（Alma Mahler-Werfel）乘火车前往法国与西班牙边境的塞尔贝尔（Cerbere）。弗莱希望这几位持有美国签证的逃亡者——海因里希和内莉·曼用的是假名——还是能够通过合法途径前往西班牙；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第二天，即莫妮卡和耶律·兰易上船出海的同一天，这一小队逃亡者步行经比利牛斯山脉东部的山地前往西班牙的波特布（Portbou）。走这条路十分艰辛，特别是对年近70岁的海因里希·曼来讲。到了边境，只有戈洛·曼受到较为仔细的检查。一名西班牙警卫读着一份关于他的签证说明，上面写着他要去美国，看望在普林斯顿的父亲托马斯·曼。“‘这么说您是托马斯·曼的儿子？’，这名警卫问道”，瓦里安·弗莱回忆说。“戈洛·曼立刻想到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他觉得好运到头了，但决定，至少以英雄气概结束自己承担的角色。‘是的，’他说，‘您讨厌吗？’‘恰恰相反，’这名警

卫说，‘我感到很荣幸，认识一个这么著名的人物的儿子。’然后他跟戈洛·曼热烈握手。”^[53]他们终于成功逃离了法国。

从法西斯的西班牙继续向里斯本旅行的途中，这五位德国流亡者感觉极为不爽。但是，弗朗哥的西班牙对来自法国的难民的态度基本上无可挑剔。^[54]9月20日，托马斯·曼收到了一封盼望已久的电报，儿子跟哥哥安全抵达葡萄牙，正在等候跨洋前往美国的轮船。“感到幸福和满足”，他在日记里写道，“美中不足的是，那个‘小姐’也在其中”，他继续写道。^[55]他哥哥的女人——“可怕的娼妇”，^[56]他多想在法国的混乱中摆脱掉她呀。

托马斯·曼非常震惊地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些天发生的一条可怕的战争消息。9月17~18日夜里，一艘英国轮船在大西洋被德国的一艘潜水艇击沉，船上有许多儿童，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危险要前往加拿大的。90个孩子中，有77个溺亡，406名乘客中共有248人丧生。次日，他又获悉，“在对载满儿童的轮船进行丧尽天良的鱼雷攻击”时，德国著名记者、律师和流亡人士鲁道夫·奥尔登（Rudolf Olden）也遭遇不幸。^[57]又过了一天，即9月24日，一封艾丽卡·曼从伦敦发来的电报抵达家中：莫妮卡及其丈夫也在船上。“船沉莫妮获救兰易失踪”。^[58]

艾丽卡·曼立即动身前往苏格兰的格里诺克（Greenock），妹妹躺在那里的医院里。她照顾着莫妮卡。船沉后，妹妹趴在一块木板上，在水里泡了几个小时，直到被救起。她丈夫死了。跟家里其他人一样，艾丽卡对妹妹的坚韧与生存意志感到意外。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她听到这场灾难时，很难想象莫妮卡“活得下来，她的心理素质那样不稳，而兰易又意味着她的一切”。^[59]风暴和海浪把救生艇打翻了，艾丽卡·曼写信告诉父母：“莫妮还听到耶律从海浪中喊了三声，‘但第三次已经非常虚弱了’。她坚信（这也许是对的），他

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他觉得，她已经没了。（我深信，他对她的依恋到了超凡脱俗的程度。她这一辈子何时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呢？）当时她自己没法叫喊——在水里泡的时间太久了。” [60]

收到英国来电三天后，克劳斯·曼写信告诉母亲，“这起残酷事件”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可怜、愚蠢的莫妮佳（Monigga），被上帝抛弃的最可怜的妹妹！一个人怎么能够摆脱这样一种无法想象的经历呢？——哪怕你更强大、更勇敢。”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他这样想象：“那一场景，在救生艇里，当他们分开时，他也许还从甲板上向他的‘莫妮’招手呢。上帝可怜他们吧。或许还有一个微弱的机会，他在后来被找着的人里面，抑或突然哪一天会出现在北极，浮在一块木板上，头发沧桑得已经变白。”妹妹的悲剧给了他一个启发：这是个很好的素材，他非常希望将此用于文学创作。后来，克劳斯·曼真的把这场灾难加工成一出话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此外，我一直真的很喜欢兰易”，他告诉母亲。“他会说好话，说得你很舒服，而且是个非常仔细的读者；是个特别有教养的美食家——我对他一直都很很有好感。” [61]

10月13日，戈洛、海因里希和内莉·曼以及他们的逃亡难友弗朗茨和阿尔玛·维尔费乘坐希腊轮船“海拉斯号（Nea Hellas）”抵达纽约。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去迎接他们。克劳斯·曼很高兴，在普林斯顿的父母家中“跟弟弟戈洛继续以前中断的交谈”。“他很睿智。经历了那么多乱七八糟、内容空洞的辩论以后，跟他的谈话沁人肺腑。” [62]戈洛·曼不大喜欢讲述法国以及在那儿的惊人冒险经历。海因里希·曼在其回忆录中揣测说，因为他侄子“为这个他无比钟情的国家感到羞愧”。 [63]



图22 美国报纸的报道：卡蒂娅·曼在纽约迎接女儿莫妮卡

两周后，寡妇莫妮卡抵达纽约，她也是坐船来的，其“状态可悲可叹”。^[64]没过几天，艾丽卡坐飞机回到美国。全家人——只缺了耶律·兰易——齐聚美国，目前处于安全之中。还在莫妮卡到来之前，托马斯·曼就在发愁，不仅仅是因为女儿。“我的感觉不好，”他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莫妮卡的命运不仅可怜，而且可能会有问题。”^[65]欧洲在打仗，工作的安静环境又受到了威胁。

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芝加哥跟博尔吉斯一家欢度新年。11月30日，伊丽莎白生下了女儿安吉丽卡（Angelica）。父母在11月曾专门来过一次，可是产期一拖再拖，他们就又回去了。现在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小外孙女的时候了。很像她父亲，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66]

在芝加哥看了外孙女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跟艾丽卡一起前往华盛顿。他们受到总统的邀请——准确地说，是托马斯·曼请求对方发出邀请的。罗斯福仍旧没有强力干预欧洲战争，对此，托马斯·曼非常失望。尽管如此，曼氏一家人对罗斯福的再次当选还是非常高兴，“这是七年来的首次胜利，这七年带来的是失望与悲伤”，托马

斯·曼这样写道。克劳斯跟戈洛·曼一起溜进了一场共和党的竞选派对，以欣赏“拉得越来越长的面孔”。^[67]

此时，即1941年1月14日，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在白宫跟总统共进早餐。托马斯·曼有些紧张；罗斯福，这位“轮椅恺撒”^[68]，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斯福虽然患有神经疾病，大腿以下瘫痪，却保持了尊严。“他的现状让人感动”，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你坐在他旁边，想到他的权力与重要性，感觉很有意思。”^[69]他们谈到流亡人士的境况和源源不断、还在试图逃离欧洲的大批难民。对许多人来说，托马斯·曼是他们求助时的首选对象。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把援救难民当作自己的任务，亲力亲为。她在幕后操作，而不是公开行动，因为营救难民，比如说从战败的法国把人救出去，从形式上看往往属于损害某一外国主权的行为。

晚上，总统还邀请这位德国作家去其办公室，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鸡尾酒会。他是一个“有特殊魅力的人”，托马斯·曼后来写信告诉哥哥海因里希，“虽患残疾，却特别阳光、缜密、快乐和机智，也有点演技，同时具有坚强、不可撼动的信仰，是那些欧洲流氓的天敌，他跟我们一样痛恨他们。罗斯福没能早些把话说出来，感到很难受。倘若说出来，就会危及他的再次当选，就他而言，这理所当然是头等大事”。^[70]当选前三天，总统还向美国人保证，“这个国家不会投入战争”。^[71]刚一当选，罗斯福就向美国国会提交了《租借法案》，该法案将于2月获得通过。美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重要的战争物资“租借”给其他国家，而此时，首先是英国已到了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在跟德国的战斗中急需援助。事实上，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无异于“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宣战”，戈洛·曼这样写道。^[72]美国在表面上依旧中立。

拜访总统并在白宫住宿两夜是桩大事，对曼家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早已习惯于跟重要人物会面。一般很少有什么事能让艾丽卡激动不已，这次她从首都给弟弟克劳斯寄了一封信：“就图个好玩儿！”重要的并非信的内容，而是写有“华盛顿白宫”的信笺。^[73]

家庭的日常生活很快回归正常，肯定比卡蒂娅·曼所希望的要快。幼子米夏埃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她，说明其财务状况和音乐学习的计划。他的事“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拍，要比别人难双倍”，米夏埃尔写道，而“最优良的外部条件”目前让他感到“非常舒坦”。他“对新年有一个很真心的愿望”，简单地说：他需要更多时间来学习音乐，同时需要更多钱。^[74]

克劳斯·曼矢志不移地坚持要办杂志。1月，《决定》（*Decision*）杂志第一问世：一份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化杂志，与《文萃》相似，却不仅仅以流亡人士为对象，而更具有美国特点和国际性，从使用英语和撰稿人的身份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威廉·萨穆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厄普顿·辛克莱、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后面几期为《决定》杂志撰稿，另外还有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斯蒂芬·茨威格和弗朗茨·维尔费，父亲和伯伯当然也在其列。作为编者，克劳斯·曼对第一期很满意。“总体来说，我为自己从事这项冒险事业感到高兴——有风险，又劳神。但毫无疑问，这正是我要做的。”^[75]为庆祝这次“首秀”，他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大型派对，同时也是为了筹款的目的。他打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种杂志几乎不可能在公开的市场上通过销售和广告来养活自己。克劳斯·曼寄希望于有钱的投资者和赞助者，要他们鼎力相助。至此，他却几乎一个人都没找到。克劳斯相信，肯定会有有的。

去年夏天，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洛杉矶逗留了很长时间，这是他俩的一次尝试：年初，他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州，这里有玩电影的人，有庞大的德国“殖民地”，有朋友和熟人。他们在洛杉矶的郊区——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已经买了一块地皮，想在那儿盖一幢房子。作为过渡，他们已在附近租了一幢房子。搬家的决定是根据托马斯·曼的意愿作出的，他不想继续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几年里一直在考虑，要在太平洋畔度过一生。卡蒂娅·曼宁愿留在普林斯顿，不仅仅是因为将面临的许多困难和计划组织工作，即从搬家到造房子等所有这些事情，跟以往一样，都要她一个人亲力亲为。她也很不愿意离开美国东部的欧洲风情与她亲密的朋友莫莉·申思通。好几年里，卡蒂娅一直写信给她，倾诉想回普林斯顿的愿望。可是，托马斯·曼魂牵梦萦，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阳光下完成《约瑟》。所以就这么做了。

戈洛·曼到达美国后的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普林斯顿的父母家里，适应着新家园的生活，帮助父亲写点草稿，做些其他助手的活。1939年回欧洲去，以编辑的身份领导《尺度与价值》杂志，显然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 响。他去不同的大学和学院应聘，一时均无结果。自战争打响后，大约有13.2万名以德语为母语的难民移居美国，其中很多人是科学家。^[76]围绕那不多的职位展开的竞争异常激烈。

戈洛·曼利用父母迁居西部的机会尝试着做些新的事情。他前往纽约，打算先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打天下。他不时可以给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寄文章，发表在瑞士的《世界周报》（*Weltwoche*）上。他的英语很快就流利起来，哥哥克劳斯的杂志给他提供了在美国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机会。戈洛跟怀斯坦·奥登（Wystan Auden，即 W. H. Auden），姐姐艾丽卡的（护照）丈夫，成了好朋友，奥登请戈洛去他在纽约的群租房。他们的房子在布鲁克林（Brooklyn）米达大街，以艺术之家遐迩闻名。奥登跟时装杂志《哈泼斯芭莎》

(*Harper's Bazaar*) 的文学主编乔治·戴维斯 (George Davis) 是这幢房子的主要房客。除他俩外，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和简·伯尔斯 (Jane Bowles)，其丈夫、作家保罗·伯尔斯 (Paul Bowles)，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 (Benjamin Britten) 及其生活伴侣、男高音彼得·皮尔斯 (Peter Pears)，脱衣舞明星吉普赛·罗斯·李 (Gypsy Rose Lee) 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í) 及其太太加拉 (Gala) 也经常来访……这里是纽约最著名的艺术之家。[77]

有段时间他很喜欢这里的一切，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这幢房子有三层楼，老式建筑，布置得具有维多利亚风格，也可以是巴塞尔的房子。”可他本属于住瑞士山地小木屋的那种人。

“布鲁克林是另一种浪漫。距离这个非同寻常的共同体所住的这幢房子不到两分钟，一座巨大的桥梁横跨被称作东河的海湾通向曼哈顿；可以看到摩天大楼，矗立着自由女神像和其他著名建筑的海域，巨大的造船厂等。轮船的警报声日夜回响。”[78]繁忙的大都市，艺术家群体的派对氛围——羞怯的思索者戈洛·曼已经预感到（并在给这位朋友的信里暗示）：从长远看，这里并非久留之处。

对父母来说，把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可怜的莫妮”[79]重新开始。但不是在他们这儿。去年11月，莫妮卡·曼抵达美国后没几个星期，弟弟米夏埃尔就提出建议，把她安置在卡梅尔的自己家里。他写信给母亲，说他怀疑“你对她太没有耐心”。因为她跟莫妮卡的关系反正已“无可救药”，所以这个女儿如能跟父母家拉开距离，在他这里和他处于偏远乡村的家里疗伤的话，肯定会更好些。这肯定很麻烦，“但我们这些卡梅尔的自私者到底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80]现在，父母接受了这一建议，莫妮卡·曼搬到弟弟那里去了。

艾丽卡·曼又有了一段新的桃色绯闻。但这人不是新人，而是大家早些年就认识的布鲁诺·瓦尔特，他经常来访，是曼氏家人欢迎的客人。此人即著名指挥家，曼家在慕尼黑时的邻居，是父亲的朋友，后来他甚至跟托马斯·曼以“你”相称，实为罕见。布鲁诺·瓦尔特也是托马斯·曼要迁居洛杉矶的一个理由，这位指挥家住在该市的贝弗利山区。他是两个女儿的父亲，艾丽卡在幼儿园就跟她们认识；格蕾特于1939年不幸身亡时，她曾设法安慰其父母。妹妹洛蒂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艾丽卡曾经摇头讥讽妹妹伊丽莎白跟“活跃的老头”博尔吉斯的婚姻。现在，她以35岁的年纪跟一位即将年满65岁的男人热恋，这人只比父亲年轻几个月。她自己说这一切都是“疯狂之举”。^[81]跟“魔鬼（Unhold）”——这是她对瓦尔特的称呼——的事，绝对不能外漏：不能让他老婆，也不能让他女儿知道，最好也不让托马斯·曼晓得。只有克劳斯·曼，不久还有母亲知情。姐姐每次介绍新恋情，克劳斯·曼从来就没有开心过，这一次比以往更难过了。

安排好秘密幽会并非那么容易。艾丽卡·曼为作演讲要经常旅行，还有一个男朋友马丁·贡佩尔特，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权，但这些都是小问题；对布鲁诺·瓦尔特来讲，就要困难多了，他妻子好嫉妒，要让她相信，虽然没有音乐会，他现在却要去旅行，这就有难度了。“昨天我跟‘魔鬼’约好在巴尔的摩

（Baltimore）见面，他几经周折总算到了那里”，艾丽卡·曼写信告诉克劳斯。“后来我却去不了，因为我突然得在阿克伦（Akron）露面，甚至来不及通知‘魔鬼’情况有变。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电话争吵，给了我一次教训，我给对方（‘魔鬼’的内心生活）造成了何等的伤害——还忘了给我家里留下的创伤。伤心啊！”事情的方方面面都很复杂。面对弟弟的尖刻回复，艾丽卡开宗明义地写道：“你现在也不用太高估我的精神病！”^[82]

莫妮卡·曼很喜欢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这地方真是个天堂”，她来后不久写道。^[83]她租了一间带钢琴的房间，^[84]可以不受干扰地（也不干扰别人地）练琴。她在悬崖边的海岸和空荡荡的沙滩上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或者跟弟弟一家人，跟小弗里多（Frido，弗里多林的昵称）和牧羊犬米奇共度时日。莫妮卡“一周比一周活泼，精力也更加充沛，面容愈加姣好”，米夏埃尔·曼于五周后向母亲报告道。这令人高兴，却不是“她还能长期待在我们这里”的理由。他需要独立，艺术上也需要寂寞。莫妮卡也许还可以待四个星期，“她之后怎么样，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了，因为我们也拿不出好的建议”。此时，米夏埃尔绝口不提是他建议把她接到卡梅尔的。或许可以把她安排到洛杉矶，家里不是有几个朋友在那儿吗？“这是否有点不讲人情？”他继续写道，他决不能为了她而开始“扪心自问”，这不行，“我没时间这样做，也做不了，我没那个本事，所以我拒绝这样做”。再说莫妮卡的情绪已经相当稳定。“不管你把她放到哪儿，她都会自己重新开始的（就是不能在家里——因为她在家里太舒适了），因为她非常理智地考虑了她的福祉。”^[85]

母亲的抗议无济于事。“莫妮问题”又落在了父母身上，对此，卡蒂娅·曼非常严肃而认真地对待，仅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因孩子的困境而打扰他的工作安定，这种事情极为罕见。“许多烦人的事在折腾着我们”，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遭遇厄运的莫妮卡不能在卡梅尔长期待下去了。那里的孩子发出了最后通牒，一定要她离开他们，否则他们就开溜。”^[86]艾丽卡建议，是否可以把莫妮卡安排到伯克利大学的国际之家住下：“莫妮可以在那里不受干扰地挤眉弄眼，继续编织其生活谎言，学习音乐。”大学生中甚至会有耶律·兰易的接班人在等着她。^[87]这事没成。卡蒂娅·曼在圣莫尼卡给女儿找了套小房子，离父母家只有几分钟路程。莫妮卡在喧嚣的洛杉矶感觉不舒服。她渴望回到她“钟爱的卡梅尔”。^[88]

克劳斯·曼的《决定》杂志只出了三期就濒临破产。一开始，杂志的资助就不稳定：资金太少，购买者太少，支出太大——办公室、女秘书、经纪人，以及作为出版人克劳斯·曼的助理的一名编辑——然后还有各种开销，用在派对、晚餐和其他寻找资助者的尝试上。克劳斯·曼奉承、笼络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大款，却鲜有成效。现在，托马斯·曼不得不伸出援助之手，替儿子的杂志做广告，还要请亲朋好友予以支持并给潜在的捐款人写信，克劳斯原本极不愿意让父亲掺和进来，充其量让他以作者身份写稿，或任命他为16个“顾问”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之所以竭尽全力予以支持，艾丽卡写的一封忧心忡忡的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她特别担心弟弟如果不得不“关掉小作坊”的话，“在心理与财务方面”可能将要面对“十分可怕的各种后果”。[\[89\]](#)

少不了有各种委屈。克劳斯·曼写信告诉父亲，有个“蠢驴富豪”愿意投资两万美金，前提是托马斯·曼成为《决定》杂志的出版人。[\[90\]](#)可父亲和儿子都觉得不妥。克劳斯·曼写了一封洋洋洒洒好几页的信，向父亲描述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搞到钱，却没起到任何作用。他在4月写信给母亲，倾诉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你需要高昂的情绪才能挺下去——或以药片的形式，或是心里充满这种激情。”[\[91\]](#)

四周后变得更加绝望了：“昨天晚上我伤心欲绝，先走了50个街区，然后痛哭不止。”他写信告诉母亲。跟一位可能资助杂志的人谈了话，结果不如预期。他认为“这帮富豪太恶劣、太恶心”。“梅菲斯托式的老皮条客让我坐立不安，他提出各种苛刻、残酷的条件，要我服从他，然后才会满足他重复多次的许诺。就在这一瞬间，那个毫无耐心的印刷厂老板闯进房间，手上晃动着一叠账单。”完全是靠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的帮助，“我才勉强度过了以泪洗面的这一夜”。柯蒂斯施以安慰，又慷慨解囊。“我彻底绝望了，”克劳斯·

曼继续骂道，“我们的发言人迪瓦斯（Divas）和格臣（Götzen）表现得太可怜了。替戈培尔博士干活该有多爽啊。他不但付钱，还懂得一名刻苦干活的知识分子的价值。”^[92]克劳斯·曼深陷思想的误区不能自拔，觉得美国和美国人有义务支持他的《决定》杂志。他认为，该杂志奉行良好的宗旨，为欧洲与美国的文化交流服务。他不时听到别人提出异议，说目前欧洲来的难民无数，更需要向各种救援计划而不是他这本杂志解囊相助，这种说法克劳斯·曼不予认可。

戈洛·曼于5月前往美国中西部。密歇根州的奥利韦特学院（Michigan, Olivet College）邀请他作关于拿破仑的系列报告。当地报纸在做宣传时称他为“托马斯·曼的著名儿子”。12天完成6场报告后，他写信告诉母亲：“学院的人非常友善，这地方本来是非常适合我的，可惜了：绿色盎然之地，小湖，山丘，清洁的奶牛，友好、稚气和热心的青少年，憧憬着欧洲、求知欲旺盛的教授们，只是他们深受剥削。”他认为，这次访问极其成功，硕果累累，只可惜没有具体结果。学院没有职位提供给他。

在回到他在纽约的奇特群租屋的路上，戈洛·曼在芝加哥访问了妹妹伊丽莎白，他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她了。妹妹给他留下了“非常友善、勇敢和动人的印象”，戈洛写信告诉母亲，她丈夫是“一个有名气和可爱的傻瓜”。朱塞佩·博尔吉斯用政治热情来鼓舞别人对他及其话题产生兴趣，用各种努力赢得人们支持一种包括世界政府和世界宪法在内的世界民主，他有抱负要成为这类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一切征服了年轻、寻求依靠的伊丽莎白·曼。她哥哥戈洛是位擅长用历史眼光思考问题、略带悲观情绪的现实主义者，他以尊重但有点嘲笑的眼光看待这位空想家——这名为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理想主义战士，看待博尔吉斯身上“那份执着，那份从未真正受到过尊重的精神”及其“对计划的斟酌与打造”。这个妹夫很像家里以前在慕尼黑的熟人本采尔先生（Herr Bunzel）的一个“高配版”，那人也总是高

谈阔论各种计划，却无一能够实现。博尔吉斯的“本采尔阔论”成为曼家的口头禅之一。^[93]

米夏埃尔·曼再次“甩掉”姐姐莫妮卡一周后，从卡梅尔写信给母亲。这封信听起来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卡蒂娅·曼曾问他，下一步对音乐有何打算，还提出建议，要米夏埃尔在一家乐团谋个职位。儿子为此震惊不已。他觉得母亲的急躁危及他的进步。“很久以来，你公开表明，你的兴趣更多是要我去从事我的职业而不是要我继续学习，你也许认为，你拖家带口的22岁儿子没完没了地靠学习而生活，这样做不合适，或者真的出于紧迫的物质原因，你们确实不能继续承受我给你们造成的负担。”他说，他跟家里商量的结果不是这样的，本来说好允许他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其艺术发展。他继续写道，母亲怎么就是弄不明白，他需要这么多时间，“以便为自己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这一点我已经给你讲过多少次了。相反，你能把我的时间多减掉一个月也是开心的。你难道不相信，我自己最清楚怎么做对我最好（？）”^[94]

写书和作报告，讲述纳粹德国和德国流亡人士的情况，呼吁不要跟希特勒妥协的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战争，美国人想听其他东西。艾丽卡跟克劳斯·曼最近的书——两人合写的《另一种德国》和艾丽卡·曼的《灯光熄灭了》卖得不好；战争开始后，克劳斯·曼几乎没再收到作报告的邀请。姐姐要成功一些，情况也好一些，她作起报告来比弟弟更具魅力，更引人入胜。但她也需要新题目和新故事——她曾经经历的德国与德国人，此时已属陈年往事，用再多的想象力都已无法掩盖这个事实。

1941年初，艾丽卡·曼考虑再次前往伦敦，置各种危险于不顾。德国空军停止了对英国首都的轰炸，因为他们认识到，用这种方式无法战胜英国人。但英国究竟能否、又怎样才能撑下去，德国人是否还

会入侵，这些问题在美国看来好像并不明了。曼氏家人当然很不愿意看到艾丽卡身处情况不明的境地。前往战火中的欧洲旅途很不安全，仅这一点就让家人忧心忡忡。艾丽卡·曼心里并没有把握，这一次她不像一年前那样心急火燎地要赶赴危险与冒险之处。她向洛蒂·瓦尔特讲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属于她的职业，即哪儿危险上哪儿，这样可以获得她作报告所需的素材。^[95]她最终作出决定：去。父亲写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他“真的感到心痛”。但艾丽卡很清楚，“失去她大概是我们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特别是对我。这孩子总能活跃气氛，只要她在身边，我就兴奋，我就快乐。可是，她的责任感、对行动的渴望和斗争荣誉感更强烈，而我当然不会不充分尊重她的决定。”^[96]

6月中旬，艾丽卡·曼在加利福尼亚州跟父母亲告别。在纽约，她跟处于绝望中的弟弟见面。她好言相劝，要他最终下决心放弃那本让他负债累累、心力交瘁的杂志。这番话没起任何作用，克劳斯虽然深受多重打击，却“完全一意孤行”，执意不肯放弃他那本《决定》杂志。^[97]艾丽卡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让他们安心的电报：她很好，克劳斯精神抖擞，虽然杂志的境况很困难。她不想给父母添加更多的烦恼。

艾丽卡·曼在考虑，能如何帮助弟弟克劳斯。她晓得，她必须帮他，以避免出现最糟糕的事情，虽然她心里明白，杂志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在其飞机飞往欧洲之前，她只有一周的时间。除了克劳斯的麻烦和自己准备旅行外，她还在替父母亲担忧，他们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租房子住，本来是想自己盖房子的。现在，能帮忙的艾丽卡不在了，造房费用在上涨，真让人怀疑，在战争时期造房子是不是个好主意，而财务状况总体也很吃紧：米夏埃尔·曼根本就不考虑去找个工作干，连同一家子都要人养着；“莫妮的问题”依旧无解，需要花钱；戈洛的情况尚无着落，克劳斯的财务状况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

这一点居住在太平洋畔的父母还是知道的——他的事情过去一直靠他们，这次也少不了要靠他们来解决，对此，至少母亲早已心知肚明；海因里希·曼的财务状况也很困难，从年初起，又少了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做客座教授的那份固定薪水……

在弟弟的敦促下，艾丽卡·曼决定来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她写了一封信，然后飞往欧洲。

刚刚过去的6月的这一周，艾丽卡·曼心急火燎地在纽约奔波，忙着弟弟的事情，同时准备自己的旅行，此时，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希特勒打响了争夺“东方生存空间”的战争。托马斯·曼认为，这很可能是战事发展的一个“令人高兴的转折点”。现在，苏联将被打败，这给盎格鲁—撒克逊人^[98]赢得了时间。^[99]托马斯·曼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继续进行远程诊断，其分析走得更远：希特勒大概“被完全掌控于战无不胜的将军们的手里”。一旦迅速战胜斯大林——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德国军队的首领们估计将对希特勒政权“釜底抽薪”；要是征战苏联失败，希特勒的末日同样将要来临。“总而言之，我们跟和平的距离要比前不久所想的近一些。”^[100]托马斯·曼在如何应对民族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大义凛然，是非分明：打从一开始，除短时间里有点犹豫不决外，在后来的流亡年代里对公众发挥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美国。托马斯·曼代表着另一种德国，一个更美好的德国。这位伟大人物在分析政治事件时一再走偏——这次一下就错了四个地方，对此好在知情的人不多。

正当大家讨论各种问题之际，诸如钱、克劳斯和《决定》杂志、造房子和德苏战争的意义等，一封来自苏黎世的电报送到：卡蒂娅·曼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去世。三周后，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给女儿来信，叙述父亲最后几周的情况及他的去世造成的打击，还有自己的寡居生活，此时她已搬进养老院一间比较便宜的单间居

住。母亲写道，对她来说，新房间“足够大了”。最近一段时间，钱在这里也成了一大问题：在昂贵的老年寓所的三间房间，加上一个日间和一个夜间护士照顾需要护理的丈夫——这两位昔日的百万富翁被纳粹德国榨取得一干二净，没能携带足够的钱财应对流亡生活。托马斯和卡蒂娅·曼不得不予以帮助，母亲跟女儿后来的通信常常是谈钱，尽管两人都不愿意这样。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信里写道，“我的生活空虚而孤单”，尽管如此，她还是拒绝了女儿要她去美国的邀请。她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完全变得‘多余了’，只希望这么将就着苦熬下去罢了”。^[101]她说，就算能够平安无恙地到达美国，也“只能是个累赘，那我会感到极其难受的”。^[102]



图23 艾格尼丝·迈耶

“强大的父亲，美貌的母亲”：克劳斯·曼鼓起全部勇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内容涉及《决定》杂志，他棘手的财务状况以及一项很尴尬的忏悔。艾丽卡给父亲的富婆朋友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信，克劳斯认为，这是一封“非常出色的信函”，“行文巧妙，既热情又聪明，既高雅又迫切，充满着孩子的挚爱与就事论事的思考，丝丝入扣却又不那么拘于小节”。艾丽卡向艾格尼丝·迈耶报告了造

房子遇到的困难，诉说父亲多么需要这幢房子，以在安静的环境中完成他的长篇小说《约瑟》。“这一切都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克劳斯继续向父母介绍艾丽卡的信：“‘爸’是多么喜欢这幢房子呀，却宁可放弃也不愿意请这位富有、聪颖的朋友帮忙。”整个信函充满着尊严又十分感人，结尾处提出请求，要15000美金。“‘爸’毫不知情，也绝不能让他知道。要迈耶夫人帮助父亲造房，但不能提出问题和建议，以免损害父亲的自尊心。”这里面有个秘密的如意算盘：父母用12000美金可以“建造一幢赏心悦目的房子”，而剩余的3000美金可让他的《决定》杂志渡过难关。艾格尼丝·迈耶永远也不会知道实情的。[\[103\]](#)

这一欺骗计划没有得逞。艾格尼丝·迈耶不愿意就凭女儿的一封信，而且是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出15000美金。她8月本来就打算来洛杉矶，跟托马斯·曼见面，然后在当地了解造房的情况。之前她曾经写信给他，说本应该坚决劝他不要造房。美国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战，但总统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将经济调整为战时经济。艾格尼丝·迈耶认为，在多长时间内还能找到好材料和好工人，就连这些问题都无法确定。[\[104\]](#)

克劳斯·曼在信里又声讨了一下“不忠诚的百万富翁们”，然后就谈起第二个棘手的事情。他把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寄托在迈耶家身上”，现在，他拿着一份印好的8月份的《决定》杂志坐在那里，急需1500美元。这些钱肯定会还父母的，最迟到“迈耶家”还是肯掏钱盖房子时，到那时，可以把杂志需要的这笔钱——也许还要多一点——截留下来。可他等不了那么久了：请卡蒂娅·曼尽快寄1500美元来，算是“预支”。[\[105\]](#)

托马斯·曼获知两个大孩子的“财务阴谋”后暴跳如雷。[\[106\]](#)尽管如此，父母还是把1500美元寄给了克劳斯。

里斯本的7月非常炎热，艾丽卡·曼一丝不挂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快要把一瓶干邑喝完了。她在给弟弟克劳斯写信。“亲爱的、尊敬的库奇”，她开篇写道，库奇是布鲁诺·瓦尔特——她的秘密艳遇对象——在家的昵称：“你现在肯定吓着了吧”，她继续写道，“也许犹豫了片刻，是否要读下去”。她已在里斯本苦等了六天，等着飞往伦敦的可能性。她跟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争执，这种情况极少出现，一旦出现，则是更为令人痛心疾首的那一种：那本杂志境况可怜，他却抗拒咨询，最后在绝望中挣扎，想从父亲富有的朋友那里骗取金钱来拯救《决定》杂志，结果把姐姐也拖累进去。艾丽卡·曼后来从伦敦给父母亲写信表示道歉，并告诉他们，那样做不是她的主意，“从头到尾都是他的荒唐点子”。[\[107\]](#)

现在，她给克劳斯写一封和解信。但愿他们之间的误解——他肯定对她进行了严厉指责——没有留下长久的不愉快，他肯定知道，她跟他“完全心心相印”。“这一点你肯定知道，所以，你说的大部分话并非完全当真，对不？”她给克劳斯描述里斯本所有那些德国纳粹分子——葡萄牙独裁政权表面上中立，暗地里却同情希特勒德国。她对那些德国的“讨厌蚊子”怒目而视，艾丽卡·曼继续写道。今天，她甚至毫不犹豫地跨进了盖世太保总部，操着萨克森口音，以鲁佩尔夫人（Frau Ruppel）——一个德国商人太太的身份介绍自己，说自己无聊至极，请他们“下次举行烤肠晚宴时”邀请她。“那个有可能认出我的头头不在场，我可以毫无阻拦地四处打量，看着到处摆放和悬挂的东西，用充满仇恨的眼光扫视周围。”没人注意到这些，都对她很客气，虽然她并未行希特勒问候礼。“这么做实在是小打小闹，没啥意义，有点神经病！”[\[108\]](#)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或许更多是干邑聊发的兴致和艾丽卡·曼的非凡想象，而不是里斯本那炎热、无聊的现实[\[109\]](#)——不过，人们可以相信，她完全干得出这种冒险的事……

7月，戈洛·曼放弃了在布鲁克林的那个五光十色的艺术家群租屋，也放弃了想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打拼的尝试。他唯一不时能够发表文章的杂志——《决定》付不了稿费。花父母的钱来维持在纽约的生活，或写信讨钱，或总是摆出一副下个月一切将好的样子——他不屑这样做，其自尊心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戈洛花了三天时间，坐着最便宜的火车横穿美国，又一次很不情愿地回到父母家中。作家兼学者艾里希·冯·卡勒是曼家多年的朋友，借给他20美元，他现在还不了。戈洛·曼非常动情地写信告诉卡勒，说他“进行了一次稳妥的长线投资。您若知道，缺钱的日子让我有多生气就好了。钱是幸福，是爱与安宁，钱就是一切”。[\[110\]](#)

他哥哥需要的钱完全是另一个数量等级：父母为《决定》杂志付的1500美元已经花光。刚过四个星期，即7月底，克劳斯·曼的又一封彻底绝望的信寄到家里：“我彻底完了，泪水也哭干了。”是继续干下去还是把杂志关门了事？不管怎样他都需要钱。父亲可不可以尽快向艾格尼丝·迈耶要钱盖房子？他需要8000美元，这样，杂志可以熬到秋季。“我若能做自己的主，”他继续写道，“我将会自戕——这是真的。我从不理解，生活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人们何以畏惧死亡。我相信，在彼岸会得到理解，活着的亲人却难以做到。我最终大致不会这样做：如是，则为大不敬——这从来不是本人的处事之道。”[\[111\]](#)

父母跟戈洛一起就此事进行磋商并决定，要克劳斯把杂志停掉。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就这已经够贵了，为此，他可能被迫要跟“迈耶两口子”伸手要钱，“为这种轻率之举留点必要的后路”。“令人不安，让人败兴。”[\[112\]](#)

戈洛·曼认为，不能轻率地，并且是在依赖借债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当一家杂志的出版人，这样一种职位必须通过努力打拼挣到手。戈

洛钦佩大哥克劳斯，但无法理解他的毫无节制。收到那封8000美元的信后，戈洛给马努埃尔·加瑟写信说，“这种人从来都是寅吃卯粮。更愚蠢的是，他有足够的资本，我指的是他的天赋，来做一些正经的、有尊严的事情，只要他愿意更理智地去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过紧日子，就连该我的那一份也未敢动用过。”^[113]

一年半前，迈耶家位于基斯克山的庄园因其奢华曾让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大为震惊，她当时希望苏联人来，夺走这些不义富豪的所有一切。现在身为人妻与人母，她想法变了，宽容了不少，或许跟艾格尼丝·迈耶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系：她尽其一切可能，从金钱到各种关系帮助曼氏一家人，不管是帮戈洛与海因里希·曼逃出欧洲，还是帮所有的家庭成员移民美国，加上把卡蒂娅·曼的兄弟彼得·普林斯海姆从法国南部的拘留营里拯救出来，接着又帮他逃往美国。1940年的基督降临节期间，托马斯·曼向这位富豪朋友转达了伊丽莎白的一个问题：“圣诞节迈耶女士会不会给我送点什么？”他女儿“还有点孩子气，虽然方式方法很聪明”。^[114]这条信息有点难堪，却卓有成效：伊丽莎白获得了昂贵的馈赠，父亲很满意。

1941年8月，伊丽莎白·曼写信告诉母亲，她现在跟艾格尼丝·迈耶建立了个人联系。两人之间书信往来，气氛友好，不久还将见面。这一友谊并非没有个人的小算盘。“今年过圣诞她会送我什么呢？”^[115]资本主义的渴望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的政治态度形成了微妙的矛盾，她在家里大概是立场最左的一个了。伊丽莎白鄙视美国，同情共产主义，崇拜“伟大的苏联人”。^[116]其立场有时让她的社会主义丈夫都觉得走得太远了。但她对丈夫来说是一大支柱，如同卡蒂娅·曼之于父亲：她指挥调度女佣和保姆，学习速记法和打字，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并崇拜地仰视着他的学生、秘书、厨师和助手。圣诞前，一件昂贵的礼物寄到了家里。

统领曼氏一家并非易事。今年显得比以往更困难，夏天过了58岁的卡蒂娅·曼虽说强大且果断，此时也落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一方面是敏感、沉浸于创作的托马斯·曼，他在任何实际事务中都帮不了忙，有位送货员把洗净后的西装送来，他却把人打发回去，原因竟是妻子不在，他不知道在家里哪儿能找到钱；^[117]另一方面是那许多孩子，各有各的问题与要求；再加上对苏黎世老母亲的担忧，其来信让人看到精神恍惚的迹象；卡蒂娅·曼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后，一直难以适应，这也是个问题；最后还有造房工程。迈耶夫妇8月来访，曾再一次阐述当前的时局为什么不适合造房。曼氏夫妇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却还是决定造房，即便没有迈耶的钱，他们的固执己见，跟克劳斯·曼不肯放手《决定》杂志如出一辙。或许托马斯·曼对他工作区域的建筑设计情有独钟——他的“书房”会带有单独的卧室和洗澡间，所以他无法放弃，也不愿等待；他仍寄希望于艾格尼丝·迈耶，倘若真遇到困境，她不会撒手不管。



图24 父亲在朗读：（左起）米夏埃尔、卡蒂娅、戈洛、艾丽卡、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曼

卡蒂娅·曼在9月给儿子克劳斯写信，倾诉盖房子遇到的问题 and “那些人吊儿郎当，做事不可靠”。克劳斯拒绝了家里要他停办杂志的建议，月复一月地守着《决定》杂志苦苦煎熬。卡蒂娅·曼继续写

道，也许圣诞节已经能在新家庆祝了。她希望孩子们多回来看看，虽然“由于该死的艾格尼丝没帮任何忙，所以缺少孩子们的房间，这一点你们都知道”。母亲告诉克劳斯家里的情况，谈到戈洛，说“他肯定不是最简单、最和蔼可亲的那种孩子”，但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可爱、帮得上忙的同屋”。她介绍米夏埃尔的情况，说他搬到了旧金山附近，带了三个学音乐的学生。“小家伙其实很听话，极其认真而且特别努力，他要是成不了气候，只能是缺少天分的缘故。”米夏埃尔的提琴演奏虽然有进步，但“表现力不够”，父亲在日记里写道。^[118]父母对小儿子的音乐天赋信心有限。

接下来，卡蒂娅·曼在信里又谈到另一个问题孩子莫妮卡，她虽然在圣莫尼卡有自己的房子，在父母看来待在家的时间还是太长。“莫妮卡也缺少天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不是唯一的问题，她以自我为中心、异想天开、自恋，还时常发火和不耐烦，跟这样一个姑娘共同生活会让人绝望。”最后，东道国也遭到母亲的一顿鞭挞。卡蒂娅·曼在之前给克劳斯的信里曾提到她“讨厌美国”。美国在步入战争的边缘辗转，对此她没有耐心。“这不仅现在是，而且将来会一直是一种耻辱，”她此时写道，“发生在苏联的战争已经到了第四个月，才开始在莫斯科讨论提供援助的形式。目前就取消中立法进行讨论，又要一个月。我不得不说，永远也不要民主！”^[119]她强调说，“老妈我”的情绪难得这么差。

艾丽卡·曼在伦敦撰写并播送针对德国听众的广播稿，由英国广播公司向德国播出。收听“敌台宣传”若被抓住，极有可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这年秋天，对偷听外国广播的人进行了首次宣判。艾丽卡·曼对希特勒及其同伙充满着仇恨，主持播音时也难以抑制。从宣传角度看，仇恨并不恰当，必须给听众提供些什么，比如希望，至少提供一些信息，让他们心服口服。艾丽卡·曼告诉德国听众，对手的世界有多大，从长远来看，德国根本就无法与之抗衡；德国根本无法长

期统治那么多被视为下等人的异族人民；她呼吁抛弃“弱肉强食”的理念与德意志种族优异的狂妄想法。“要敢于听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些声音比我们想象的要正确、也要中肯得多。不要绝望，也不要等待太久。你们现在还能作出决断。”[\[120\]](#)

戈洛·曼尽一切可能进行帮助，给父亲当助手，帮母亲干活，还重新拿出已接近完稿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根茨的书进行修改，以贴近美国读者。戈洛对在父母这里的生活并不满意。他想独立，想过自己的生活，赚自己的钱。艾格尼丝·迈耶在想办法帮他在一所学院谋个教师的职位。在此期间，她对托马斯·曼的二儿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两人惺惺相惜。艾格尼丝的努力虽然还没有结果，但她还在继续努力，两人书信往来非常友好，即便没有圣诞礼物。

本人的境况不佳，令人窒息的战争消息又根本不像父亲所说的让人看到很快结束的希望，这一切都让戈洛·曼书写了很多满腹惆怅的信函。现在，身处加利福尼亚州的歌舞升平之中，他迫切需要给瑞士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写信，感谢他把自己从对同性恋的羞怯中解放出来：“你在我身上找到的东西，当时对我来说是个很大也很美妙的惊喜。过去我习惯于单方面地将我最真诚的好感送予他人，在跟你相处时，我也没有期望会比之前得到更多的情感回报。”[\[121\]](#)四周后他写信告诉这位朋友，在美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因此偶尔花钱买春，更多出于惆怅而不是高兴。[\[122\]](#)

这一年，凡事都跟钱有关，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牵涉艾格尼丝·迈耶。在家人中有种看法占了上风，即她爱上了父亲，不仅仅是因为钦佩大师而产生了崇敬与爱慕的那种爱，而是很具体的爱。艾丽卡·曼在年初曾告诉父亲，艾格尼丝·迈耶跟法国作家兼外交官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曾经有过绯闻。“这也可能轮到我”，托马斯·曼在日记里不无火气地写道。[\[123\]](#)跟克洛岱尔的谣言并不属

实，至于说艾格尼丝·迈耶除了渴望接近托马斯·曼这位伟大作家，探究其艺术的秘密以外，是否真的奢望跟托马斯·曼干些其他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每逢托马斯·曼跟艾格尼丝·迈耶谈话，卡蒂娅·曼虽说并不总是在场，但一直就在附近。不管如何，曼氏家人最迟在1941年初坚信不疑，艾格尼丝·迈耶之所以不惜代价进行帮助，其原动力是要跟托马斯·曼来一场桃色绯闻的心愿。

10月7日和8日，托马斯·曼坐到书桌旁，打破了上午写作的清规戒律，给这位女财神写信，他在日记里把这封信称为“国家信函”。^[124]艾格尼丝·迈耶曾写信，说她预感到托马斯·曼的情况不好，并补充道：“您的女朋友是否可以帮点什么忙？”^[125]她可以。他把她的信视为“良心过不去的证明”——依照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的看法，她从道义上有责任帮助他，这种看法托马斯·曼早已拿来为己所用。他在回信里兜了一个大圈子，叙述自己的生活，讲述开心的事情，比如令人幸福的艺术追求，但也谈到流亡生活的各种压抑，世界局势造成的负担，对纳粹的仇恨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她其实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舒适，也几乎不知道严重的疾病是什么”），为的是到最后，在写了厚厚的一摞信纸以后，转到真正要说的事情上来：造房。这事大概算得上一个“有点玩世不恭、固执己见的闹剧”，但符合他生活处事的风格及习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七次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可没有任何人想到给他一些实际的帮助。瑞士的一位富豪赞助者给他的朋友赫尔曼·黑塞盖了一幢房子。“在这个国家，为何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大学会动相应的脑筋，给我类似的东西呢？哪怕只是出于虚荣心，以便能够说一声：我们有他，他是我们的？”因此，他现在靠贷款自己建房。即使他的书籍目前销售情况不佳，但更好的时代不久一定会来临，最迟到《约瑟》完成的时候。他说，应当把他“视为一家有财务信誉的企业”。^[126]

艾格尼丝·迈耶非常礼貌，知道有些事不能提，比如托马斯·曼自己没有努力去延长普林斯顿收入丰厚的名誉教席，那是她给他介绍的；也没有谈托马斯·曼对东道国的指责，说它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她觉得，若要看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流亡者，包括海因里希·曼在内，这种指责有点奇怪。她想帮助，但要以她的方式。她后来写信告诉他，简单地把钱给他，“依我来看对您并非最好的方式”。

[127]她找到她跟丈夫多年来一直支持的国会图书馆，安排任命托马斯·曼为名誉顾问。为此，他每月获得400美元的工资。这笔钱出自一家基金会的基金，该基金会由艾格尼丝·迈耶负责，托马斯·曼却毫不知情。作为义务，他每年得在图书馆作一次报告，以顾问身份公开行事。这位美国大款的这种资助形式既巧妙又周到，避免了直接给钱的那种尴尬，也没有要承担义务的强迫感。托马斯·曼瞬间领悟到，他的这位财神女朋友行事的方式有多高雅。“没有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法了，”他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我也是老艺术家了，对您给我选择的这种方式感到无限的高兴，其程度甚至快要超过‘工资’了。” [128]

曼氏家人比较隐秘地试图拿到“可咒的艾格尼丝”的钱，结局令人高兴——从钱来讲比本来提出的要求还要诱人，因为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安排没有期限限制。12月，托马斯·曼收到艾格尼丝·迈耶的一封信，该信暗示，她心肠再好，对孩子们背着父亲所捣鼓的那些事也并非一点也不知情，“（她）指责孩子们”，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有些生气，一半是事实”。[129]女朋友的这封信，像她的许多信件一样，进了废纸篓（而她，不用说，把他所有的信件都保存起来）。她是否告诉过他，克劳斯·曼在秋天又曾直接给她写信，为《决定》杂志讨过钱？她拒绝了，但给克劳斯寄去了一张支票，用于其个人消费。[130]她跟《华盛顿邮报》的关系不容许她资助另一家美国刊物，这是她的解释。这或许并非唯一的原因：最迟到克劳斯写信

要钱时，艾格尼丝·迈耶肯定看穿了艾丽卡·曼要15000美元的那封信的个中含义。

托马斯·曼在回信时替自己孩子辩护，说他们并非如她想象的那样靠他来养活，“要是用吸血鬼的性格来看待他们，那就把他们看扁了”。艾格尼丝·迈耶至少有一半有道理，他只在日记里承认。托马斯·曼在信里写道，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得说孩子们“有些自卑”。其他方面都“有条不紊，如果公正合理地看事情，其实他们都有严肃的追求、良好的意愿和谦虚的态度”。他突出强调米夏埃尔在音乐方面的努力奋斗，现在已被旧金山青年交响乐团录用；然后又大谈戈洛，表扬他知足和坚韧不拔，先力争在欧洲奋斗，现在又争取在美国拿到一个教师的职位。至于两个大孩子，他知道他们曾试图欺骗艾格尼丝·迈耶，对此，托马斯·曼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一想到艾丽卡，我就心情开朗，克劳斯至少也能感动人。伊丽莎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只有莫妮卡无所事事。”[\[131\]](#)

艾丽卡·曼从伦敦回来了。她也没有主意，如何能让弟弟克劳斯放弃他那坑人的杂志：“这个走火入魔的家伙，脑袋瓜里不停地蹦出新主意，无论你怎么反对，他口若悬河，谎话连篇，喋喋不休地将你的反对意见一一化解，而他巨大的胆识、感人的勤奋和我无法理解的激情几乎让我心碎。真叫人无力招架！”[\[132\]](#)

1941年12月还带来了三项重大结果：美国在珍珠港受到攻击后正式参战，德国向美国宣战；曼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无法竣工；《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托马斯·曼的重要文章，分两部分刊登。

这份高品位、读者众多、不乏讽刺口吻的杂志是托马斯·曼最喜欢的报刊之一。珍妮特·弗朗勒（Janet Flanner）以《好莱坞的歌德》（*Goethe in Hollywood*）为题撰写了一篇人物特写，精彩纷呈，

引人入胜，具有揭秘性质。她试图解释托马斯·曼为何能够成为其时代的文学巨匠、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作家，虽然他本人如此深居简出、死板和不入流，看上去就像“一根削得齐整的拐杖”；其小说错综复杂，情节却又十分简单。他的书籍销售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弗朗勒介绍了在美国的数字，这是她从托马斯·曼的美国出版人那里获得的：《约瑟在埃及》在零售市场销售47000册，在“每月图书俱乐部（Book of the Month Club）”的系列丛书里卖掉21000册；《布登勃洛克一家》销售48000册；《故事集》（*Stories*）卖了92000套；他在美国最有名的长篇小说《魔山》共售出125000册。

弗朗勒在文章中盛赞托马斯·曼作为希特勒的对手所起的作用，同时毫不客气对托马斯·曼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进行描述——在1914年对战争的狂热，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的反民主倾向，就连1933~1936年他的沉默也没有忘记一提。珍妮特·弗朗勒还透露，她从曼家内部获得了可靠的信息。至于是谁，文章写得很明白——她顺便提到，在纽约跟克劳斯·曼非常熟悉。珍妮特·弗朗勒还描述了1933年3月发生的一个场景：当时两个最大的孩子在政治上很有前瞻性，他们有一天在电话里告诉父亲，慕尼黑的天气不好，他不能回来，托马斯·曼却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回答说是的，苏黎世的天气也不好。还是卡蒂娅·曼明白指的不是天气。此后，艾丽卡·曼，家里的“总监”，花了两年时间，说服父亲公开站出来反对纳粹。然后是艾丽卡戴着太阳镜化装潜入慕尼黑，把《约瑟》手稿从纳粹分子重重包围的父母家里救了出来……

艾丽卡跟弟弟克劳斯被珍妮特·弗朗勒描绘成周游世界的人，所到之处功成名就，亦受人爱戴。德国流亡群体掌握在他们手中。人们说，只有得到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的恩许，才真正可以称自己为难民。珍妮特·弗朗勒称戈洛·曼为家里的保守人士，是有教养的父亲的一个黑黢黢的农村翻版，他决心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因为这是为数

不多、父亲不擅长的行当之一。“脆弱的莫妮卡”在其船难发生前就在家里被称为“可怜的莫妮卡”。伊丽莎白跟大她36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朱塞佩·博尔吉斯的婚姻被珍妮特·弗朗勒称作“极度浪漫的姻缘”。还有幼子米夏埃尔，努力成为小提琴演奏家，是母亲的宠儿。按照文章的说法，卡蒂娅是曼氏家族的总管，曾让不少出版商绝望到希望托马斯·曼还是个单身汉。^[133]父亲在弗朗勒那里被描写成一个只潜心于自己伟大创作的自私和自恋者。

对于人物特写，托马斯·曼原本是很有兴致阅读的，倘若不是牵涉他本人的话。他生气地骂这份“搞笑杂志气人”。^[134]文章有些细节不符合事实，道听途说，还有点尖酸刻薄，他为此而生气，却根本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恰恰证实了他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有一个传奇之家的事实。哪怕是在思想尖锐的珍妮特·弗朗勒的眼里，托马斯·曼也是好莱坞的现代歌德。

^[1] Vgl. die Liste der Vortrags- und Einnahmenaufstellung, »Season 1939-40«, MON

^[2] EM an KM, 10. 1. 1940, MON

^[3] EM an KM, 4. 2. 1938, MON

^[4] TM an KIM, 12. 5. 1938, in: KIM: Briefe, S. 351

^[5] MiM an KM, 1. 3. 1940, TMA; vgl. Gret Mann an KM, 12. 3. 1940, TMA

^[6] Vgl. Lahme: GM, S. 150-155

^[7] GM an Hermann Kesten, 20. 3. [1940], in: GM: Briefe, S. 44f.

^[8] Franz Schoenberner an Hermann Kesten, 23. 2. 1940, in: Franz Schoenberner-Hermann Kesten: Briefwechsel im Exil, Göttingen 2008, S. 175; vgl. auch ebd., S. 180-186

- [9] Tgb K1M, 28. 2. 1940
- [10] Tgb K1M, 22. 2. 1940
- [11] EM an KM, 10. 3. 1940, MON
- [12] MiM an KM, 7. 4. 1940, TMA
- [13] MiM an KM, 16. 4. 1940, TMA
- [14] MiM an KM, 14. 5. 1940, in: MiM: Fragmente, S. 26
- [15] TM: On Myself, in: TM: Über mich selbst.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1994, S. 64, 70, 91
- [16]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 904f.
- [17] HP an KM, 11. 4. 1940, in: HP: Briefe an KM II, S. 245
- [18] HP an KM, 22. 5. 1940, in: HP: Briefe an KM II, S. 252
- [19] Vgl. Lahme: GM, S. 155
- [20] Tgb TM, 25. 5. 1940
- [21] Tgb TM, 26. 5. 1940
- [22] MiM an KM, 14. 5. 1940, in: MiM: Fragmente, S. 26 und 28. 5. 1940, TMA
- [23] MiM an KM, 16. 4. 1940
- [24] GM: Erinnerungen II, S. 242
- [25] Tgb GM, 23. 5. 1940,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 246f. Das Tgb führte GM auf Französisch, übersetzte aber Teile für den Abdruck in seinen Erinnerungen II ins Deutsche
- [26] MoM an TM, 24. 5. 1940, TMA
- [27] Tgb TM, 31. 5. 1940

[28] Vgl. André Fontaine: Internierung in Les Milles. September 1939–März 1943, in: Zone der Ungewissheit. Exil und Internierung in Südfrankreich 1933–1944, hg. von Jacques Grandjonc/Theresia Grundtner, Reinbek 1993, S.274

[29] Tgb GM, 16.6.1940,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253

[30]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908

[31] Vgl. Tgb TM, 23.6.1940

[32] Tgb GM, 18.6.1940,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257

[33] Tgb GM, 3.8.1940, zit. nach GM: Erinnerungen II, S.259f., 262, 265, 267f.

[34] Tgb TM, 31.7.1940

[35] KM an Agnes Meyer, 26.7.1940, in: TM-AM: Briefwechsel, S.216

[36] GM an KM/TM, 10.8.1940, TMA

[37] TM an Agnes Meyer, 12.8.1940, in: TM-AM: Briefwechsel, S.224f.

[38] EM an TM, 19.8.1940 in: EM: Mein Vater, S.145; vgl. auch EM an KIM, 19.8.1940, MON und EM an KM, 21.8.1940, MON

[39] EM an KM/TM, 26.8.1940, in: EM: Mein Vater, S.145f.

[40] Vgl. Tgb TM, 16.6.1938

[41] KM an TM [Aug./Sept.1940] , in: KM: Rehherz, S.95

[42] Klaus Harpprecht: Eine Reliquiensammlung, in: Die Zeit, 23.10.1992

[43] KIM an Hermann Kesten, 14.8.1940, in: KIM: Briefe, S.422

[44] Tgb K1M, 23. 8. 1940

[45] Tgb K1M, 17. 7. 1940

[46] Vgl. Tgb K1M, 23. 8. 1940

[47] Vgl. K1M-Schriftenreihe V, S. 246f.; vgl. Tgb K1M, 6. 9. 1940

[48] Schaenzler: K1M, S. 343

[49] K1M an Bruno Frank, 7. 10. 1940, in: K1M: Briefe, S. 429

[50] Zit. nach Lühe: EM, S. 250

[51] EM: Eine Nacht in London, in: EM: Blitze, S. 181

[52] Tgb K1M, 8. 9. 1940

[53] Varian Fry: Auslieferung auf Verlangen. Die Rettung deutscher Emigranten in Marseille 1940/41, München 1986, S. 75-89; vgl. auch Mahler-Werfel: Mein Leben, Frankfurt a.M. 1963, S. 266-268; HM: 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 (1945), Berlin 1973, S. 440-444

[54] Hans-Albert Walter: Deutsche Exilliteratur 1930-1955, Band 3: Internierung, Flucht und Lebensbedingungen im Zwei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88, S. 336

[55] Tgb TM, 20. 9. 1940

[56] Tgb TM, 16. 4. 1941

[57] Tgb TM, 22. 9. 1940, 23. 9. 1940 und 24. 9. 1940

[58] EM an KM/TM, 24. 9. 1940, in: EM: Mein Vater, S. 148

[59] KM an K1M, 24. 9. 1940, MON

[60] EM an KM, 24. 9. 1940, MON

[61] K1M an KM, 27. 9. 1940, MON

[62] Tgb K1M, 13.10.1940

[63] HM: 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 (1945) , Berlin 1973, S. 443

[64] Tgb TM, 28.10.1940

[65] TM an Agnes Meyer, 1.10.1940, in: TM-AM: Briefwechsel, S. 240

[66] Tgb TM, 29.12.1940

[67] Tgb TM, 6.11.1940; Tgb K1M, 10.11.1940

[68] TM an Bruno Frank, 4.2.1941, zit. nach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94

[69] Tgb TM, 14.1.1941

[70] TM an HM, 4.2.1941, in: TM-HM: Briefwechsel, S. 331

[71] Zit. nach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 926

[72] GM an Manuel Gasser, 22.2. [1941] , zit. nach Lahme: GM, S. 164

[73] EM an K1M, 13.1.1941, MON

[74] MiM an KM, [Anfang 1941] , TMA

[75] Tgb K1M, 26.1.1941

[76] Walter F. Peterson: Das Umfel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und die deutschen Emigranten, in: Was soll aus Deutschland werden? Der Council for a Democratic Germany in New York 1944-1945, hg. von Ursula Langkau-Alex/Thomas M. Ruprecht, Frankfurt a. M./New York 1995, S. 49-73, hier S. 49

[77] Vgl. Humphrey Carpenter: W.H. Auden. A Biography, London/Boston/Sydney 1981, S. 303f.

[78] GM an Manuel Gasser, 25.3. [1941] , zit. nach Lahme: GM, S. 162

[79] Tgb TM, 12.6.1941

[80] MiM an KM, 21.11.1940, TMA

[81] EM an K1M, 20.3.1941, MON

[82] EM an K1M, 27.3.1941, MON

[83] MoM an Molly Shenstone, 24.3.1941, zit. nach Andert: MoM, S. 81

[84] Vgl. Gret Mann an KM, 13.5.1941, TMA

[85] MiM an KM, 28.4.1941, TMA

[86] TM an K1M, 11.6.1941, in: K1M: Briefe, S. 463

[87] EMB an KM, [Ende Mai/Anfang Juni 1941] , TMA

[88] MoM an Molly Shenstone, 14.7.1941, zit. nach Andert: MoM, S. 82

[89] EM an TM, 13.4.1941, in: EM: Mein Vater, S. 149

[90] K1M an TM, 11.4.1941, in: K1M: Briefe, S. 450

[91] K1M an KM, 20.4.1941, in: K1M: Briefe, S. 455

[92] K1M an KM, 25.5.1941, in: K1M: Briefe, S. 456f.

[93] GM an KM, 10.5.1941, TMA; vgl. Holzer: EMB, S. 124

[94] MiM an KM, 16. [6.1941] , TMA

[95] EM an Lotte Walter, 1.5.1941, in: EM: Briefe I , S. 170

[96] TM an Agnes Meyer, 18.6.1940, in: TM-AM: Briefwechsel, S. 290

[97] EM schildert es zwei Monate später: an KM/TM, 25.8.1941, in: EM: Mein Vater, S.159

[98] 此处指在英国出生并把英语作为母语的人。——编者注

[99] Tgb TM, 21.6.1941

[100] TM an Agnes Meyer, 26.6.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291

[101] HP an KM, 11.7.1941, in: HP: Briefe an KM II, S.297

[102] HP an KM, [18.7.1941] , in: HP: Briefe an KM II, S.298f.

[103] K1M an KM/TM, 26.6.1941, MON

[104] Agnes Meyer an TM, [26.6.1941] , in: TM-AM: Briefwechsel, S.291f.

[105] K1M an KM, 26.6.1941, MON

[106] Tgb TM, 28.6.1941

[107] EM an KM/TM, 25.8.1941, in: EM: Mein Vater, S.159

[108] EM an K1M, 4.7.1941, MON

[109] Den angekündigten Artikel über ihr Erlebnis als Frau Ruppel im Gestapo-Hauptquartier hat Erika Mann jedenfalls nie geschrieben; Lühe: EM, S.246, gibt die Geschichte als wirkliches Erlebnis EMs wieder

[110] GM an Erich von Kahler, 3.10. [1941] , zit. nach Lahme: GM, S.165

[111] K1M an KM, 30.7.1941, in: K1M: Briefe, S.464f.

[112] Tgb TM, 1.8.1941

[113] GM an Manuel Gasser, 7.8. [1941] , zit. nach Lahme: GM, S. 165

[114] TM an Agnes Meyer, 3.12.1940, in: TM-AM: Briefwechsel, S. 246

[115] EMB an KM, 1.8.1941, TMA

[116] Vgl. EMB an KM, 1.8. und 15.12.1941, beide TMA

[117] Konrad Kellen: Mein Boss, der Zauberer. Thomas Manns Sekretär erzählt, hg. von Manfred Flügge/Christian Ter-Nedden, Reinbek bei Hamburg 2011, S. 45

[118] Tgb TM, 6.4.1941

[119] KM an K1M, 23.9.1941, MON

[120] EM: In Deutschland (30.7.1941) , in: EM: Blitze, S. 223f.

[121] GM an Manuel Gasser, 19.9.1941, in: GM: Briefe, S. 52

[122] Vgl. GM an Manuel Gasser, 19.10.1941, zit. in: Lahme: GM, S. 139

[123] Tgb TM, 19.5.1941

[124] Tgb TM, 8.10.1941

[125] Agnes Meyer an TM, 4.10.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19

[126] TM an Agnes Meyer, 7. [10.] 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21-327

[127] Agnes Meyer an TM, 28.5.1943, in: TM-AM: Briefwechsel, S. 484

[128] TM an Agnes Meyer, 3.11.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29f.

[129] Tgb TM, 3.12.1941

[130] Vgl. Vagets Kommentar in TM-AM: Briefwechsel, S.973f.

[131] TM an Agnes Meyer, 6.12.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36f.

[132] EM an KM, 24.11.1941, MON

[133] Janet Flanner: Goethe in Hollywood (1941) , in: Janet Flanner' s World. Uncollected Writings 1932-1975, ed.by Irving Drutman, New York/London 1979, S.165-188

[134] TM an Agnes Meyer, 16.12.1941,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42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1942~1946）

克劳斯·曼的《决定》杂志在出版了1942年1~2月最后一期合刊后，终于闭上了其“温柔与聪慧的眼睛”。^[1]杂志倒闭早已无法继续拖延下去。“我伤心欲绝”，克劳斯·曼还在作最后一次抵抗前就已经写道。“不仅仅，或者说并非首先是因为失去杂志本身，亦非徒劳的努力与辛苦，而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整个不幸一步一步地向我逼近，在这个可叹的世界上，人们很少要我们，用我们，赞扬我们。”^[2]克劳斯·曼已经耗尽所有的精力。他在纽约贝特福德旅馆的房间里坐到写字台边，写一篇他称为《最后的决定》（*The Last Decision*）的文章。这是一篇愤怒的檄文，充满了对美国人的仇恨，其真实的面目，他在过去几个月算是领教到了：“他们没有情感，势利，自私。因虚荣心而麻木不仁，因攫取钱财上瘾而走火入魔。他们侮辱我，残害我，使我穷困潦倒：我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们懒惰至极，傲慢，缺乏同情心；他们缺少创造性的想象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3]这篇文章是绝望的告别。克劳斯·曼吞下超量安眠药，然后躺到旅馆的床上等死。好在一位《决定》杂志的工作人员兼朋友克里斯多弗·拉查勒（Christoph Lazare）及时发现了她。^[4]

这一消息没有一丝外漏，太平洋畔的家人毫不知情。尽管如此，卡蒂娅·曼依旧忧心忡忡。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德圣雷莫车道旁的新房子终于造好了：485平方米居住面积，20间房间，海景，地皮有4000平方米，花园里长着棕榈和柠檬树。现在得组织搬家了。卡蒂娅·曼面对这座“宫殿”，心里有点打怵。^[5]她给在纽约的克劳斯写信，说戈

洛是她的一大帮手。至于他妹妹莫妮卡，父母本来就认为她总不好好在圣莫尼卡自己的家里待着，不时在父母这里转悠，搬家前，人影子都见不着，连她自己的东西也不整理，“到了搬家那天，她准时来到（我们的）新家，让人给她送上中午的面包”。^[6]不久前卡蒂娅·曼在给克劳斯的信里写道，“这孩子一成不变，恰恰要她来帮我们，实在苦不堪言，不过小戈洛（他可是一点也不喜欢她呀）和我还是认为，要说现在就作些改变，那也太残酷了点，估计就这么将就着还能过一段时间（？）吧。”^[7]“这段时间”在几个星期后结束。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全家人讨论莫妮卡的事情，父亲“发泄对她生活的彻底失望，敦促让她走人”。^[8]莫妮卡·曼是那样悲惨地变成了寡妇，但是，家庭呵护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图25 曼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

这段时间，托马斯·曼的情绪总不大好。搬家打乱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参与具体事务，而是让妻子和儿子戈洛去指挥搬家的人和具体的搬家工作，但他心里却也乱糟糟的。好几天了，托马斯·曼享受不到书房里那种熟悉的井然有序，不得不在卧室的临时书桌旁写作。搬家后的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又累又不开心”，“坐在沙发上，头靠着卡蒂娅的肩膀”。^[9]搬家的前夜，他还不得不忍受在朋友家里举行的一次“群体派对”，看着弗朗茨·维尔费扮演主要角色。维尔费人不错，他太太至少称得上有个性；他们

俩曾跟戈洛·曼一起逃出法国，因此成为好朋友。按理说，托马斯·曼挺喜欢这位波希米亚—犹太作家的，但在当晚，维尔费及其长篇小说《本纳德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成为活动的主题，托马斯·曼觉得“烦人，品位低下，愚蠢，伤人自尊心，又干扰了寂寞”。^[10]后来《本纳德特之歌》在美国销售得非常红火，让所有流亡人士难以望其项背，不久又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托马斯·曼很难接受这一切。即便身处搬家之中，他也无法咽下自己的怒火：“维尔费真气人。”^[11]

日本进攻夏威夷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以机会，将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天曼氏家人等待已久，而且越来越没有耐心。但就是现在，托马斯·曼还是觉得不够快，也不够勇往直前。他在2月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至少可以确定，“各民主国家没有完全理解这场战争的革命性质，在精神上不够坚定，也没有积极主动、坚韧不拔地去打这场战争”。他担心，“在很多方面都缺少明确和强烈的取胜意志，因为害怕胜利可能带来的各种变化，而这是要付出的代价”。^[12]具体来说，他认为，战争带来的可能结果是，欧洲中部发生共产主义巨变——这一点他在信里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只是点到为止。对于共产主义巨变，他本人没有问题。托马斯·曼于夏天在日记里写道，他不害怕“世界革命”：“我会忠诚于共产主义，并将服从之，甚至欢欣鼓舞地拜倒其统治之下，倘若这是反对纳粹主义要作出的选择的话。”^[13]

托马斯·曼何以对美国的强大和西方民主国家的胜利——不管是在军事还是政治意义上——如此缺乏信心，这一点，艾格尼丝·迈耶不清楚。她居然敢于公开表示难以理解，还批评了托马斯·曼的态度。“迈耶的信既愚蠢又气人”，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然后销毁了这封“女王式教母蹂躏我的”讨厌信。^[14]他回信说，“您18日的信是一起重大事件”，“我凭啥要受到这般对待？”四天后，他又

赶写了一封信寄去：他也许没有表达清楚，“您最近的那封抨击信让人醍醐灌顶”。他对美国以及美国对希特勒的战争坚信不疑。^[15]

这段时间，托马斯·曼跟艾格尼丝·迈耶的关系正在经受着考验。托马斯·曼一定是在不知情，即不知道他作为国会图书馆顾问的工资出自何处的情况下，抱怨过工资的数额。这迫使艾格尼丝挑开她作为财神爷给予资助的高雅面纱，向他解释，每月的400美金是她提供的，还就为何提供这一数额作了说明：“并非我自己说，‘这么多够了’——不是这样，这一数目并非那样冷漠并通过计算来定的，不，亲爱的朋友，决定的方式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这笔钱是我作为私人所拥有的全部收入——这些钱我可以想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不用询问，也不用咨询。我也更愿意钱能多一些，但这份钱是有保障的，就像现今的任何东西一样。”她用行文讲究、只有一点点不到位的德语补充道：“不管是对实际的还是精神上的亲人关系，我都始终如一。对于两者，我都贡献出我所有的一切。”^[16]

托马斯·曼在回信时表示自己感到“震惊与羞愧”，^[17]但震惊与羞愧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3月底，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来太平洋帕利塞德拜访，参观了新居，托马斯·曼为这位女友朗读了正在创作中的《赡养者约瑟》（*Joseph der Ernährer*）。在跟她的交谈中，他听出她“囿于成见”，作为回应，他就故意表示“无法理解”。艾格尼丝·迈耶打算写一部关于托马斯·曼的传记，跟他探讨自首批小说起就出现的原始主题：生活与精神的对立，艺术家的冷漠以及他为何在“普通事物带来的欢乐”之外独善其身。从诸多交谈中，托马斯·曼只听出一点：“一切都是为了解释我为何没有跟她发生关系。”^[18]谈话也有令人安慰之处，因此，值得“忍受，对某些可怕的话题避而不谈”。^[19]迈耶夫妇保证，如果这幢大的新房子运转成本过高，将给予帮助。

这几天，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因为有华盛顿的各种政治渠道，他们俩消息极其灵通——介绍了美国巨大的战争物资生产，其规模之大，是托马斯·曼全家极为欣赏的罗斯福新政从未达到过的：它带来了经济腾飞。^[20]迈耶夫妇还通报了军事形势和美国军队的战况。托马斯·曼在谈话中拿出朱塞佩·博尔吉斯拟定、受到他赞赏的一份《备忘录》（Memorandum）：这是一份“进攻计划，从阿拉斯加经白令海峡和北极冰海进入苏联，打击德国和日本”。艾格尼丝·迈耶对这两位非同寻常的军事战略家惊愕不已，未能将其情绪好好地掩饰住。“迈耶夫妇不相信”，托马斯·曼生气地在日记里写道。^[21]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不满足于协助丈夫的角色。她有自己的追求。严格地说，她已经放弃了弹钢琴，转而追求其他目标。年初，她自豪地告诉母亲，要作两个报告；一个报告不拿钱，另一个报告拿25美元。“我一直说我很快会赚大钱的。”^[22]在接下来的几封信里，她一再谈到她的报告，内心深处完全深信，走上了像受尊重的姐姐艾丽卡那样的成功之路。年初，人们要她作报告，谈流亡人士的自杀问题——不久前，斯蒂芬·茨威格，最成功的德语作家之一，在政治与财产都未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巴西自杀身亡。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信告诉母亲，对这个题目她“恨之入骨”。她对文学所知甚少，斯蒂芬·茨威格的风格她认为可怕（可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能说的），后来才知道，报告会在一座社会体操馆举行，级别比她想象的还要低：邀请者为芝加哥德裔体操协会。^[23]托马斯·曼写信给他宠爱的女儿：“要说我对你的报告成果忍不住多次开怀大笑的话，那是带着欢乐与感动。”^[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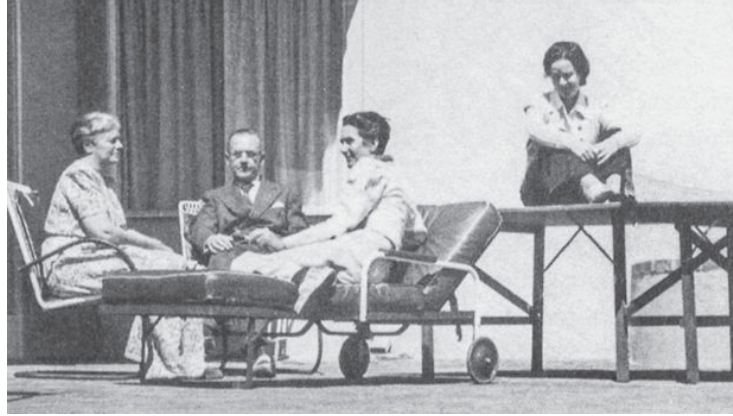


图26 莫妮卡·曼（坐在乒乓球台上）跟姐姐和父母在一起

妹妹伊丽莎白本来必须提到哥哥克劳斯·曼的：他在《决定》杂志破产后企图自杀，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也只能说勉强过去了。克劳斯·曼在纽约文学界的声誉因办杂志而受损，所有人都曾对这份杂志摇头说不。他欠着许多人的钱，主要是朋友和熟人，人们都料到他永远也不会还。在纽约一听到克劳斯的大名，很少有人会受到鼓舞。他几乎找不到发表作品的机会，也不再被邀请去作报告或参加各种活动。“一事无成”，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道，现在他用英文记日记。^[25]但他还在写作，这是其为数不多、坚持不懈去做的几桩事情之一。他以其常见的神速（而且直接用英语）写自传，定名为《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但文学上的转折点还不够，还必须来一个真正的转折。克劳斯·曼以志愿者的身份报名参加美军。对这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来说，这是个异常举动；但这一步可以让他摆脱眼下的烦恼、讨债人和前途的无望。再说，要是当了兵，他就成为美国公民了。后来发现，克劳斯·曼在其现任男友约翰尼（Johnny）——纽约男娼行当的一个熟人那儿染上了梅毒。“多少个夜里濒于自杀”，^[26]他在日记里写道。染上性病的他美军可不想要。

凡是家里出了难事，都由卡蒂娅·曼来管，现在大伯子海因里希·曼也进入了要她管的行列。他跟妻子内莉在洛杉矶的西部，住越来越

越便宜的房子。他在美国几乎没有卖书的收入，功成名就的弟弟不得不帮助他。卡蒂娅·曼每月寄100美元给他，不久又转而采用比较体面的方式。托马斯·曼付钱给一个援助基金，由该基金来帮助海因里希·曼。他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退点税。

海因里希·曼此时已71岁，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前。他妻子内莉帮不了大忙，有时在某家洗衣店干活，有时在医院里帮忙，她考了驾照，可是酗酒问题一再使她陷于困境。1942年初，夫妻俩考虑，在纽约情况是否会好些：海因里希·曼喜欢大城市，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他不适应，在纽约可能更有机会发表作品。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艾丽卡跟海因里希·曼的家庭医生进行了一项“密谋”：要“老人家”来弟弟的住处休养一段时间，以适应移居东部的生活，要“酒鬼娼妓”内莉先行。卡蒂娅·曼继续叙述这一计划，说海因里希·曼将特别“享受”跟妻子的分离，以至于他根本就不想回到“那个堕落的婊子”那里。

1942年4月，海因里希·曼来弟弟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住所居住一段时间，由卡蒂娅·曼来照顾。她认为，“真是白白忙活了”，因为大伯子不停地炫耀自己的老婆，根本就不考虑离开她。只要他回到她的身边，“就又要造反了，这些情况都是他们不断通电话时泄露出来的，因为那女人邪性，酒一喝就开始造反，他俩就不能继续在房子里住下去”。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沮丧、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卡蒂娅这样结束关于海因里希·曼的情况介绍，“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他那么多钱，既能满足他俩日常的简单生活，又要够这女人去糟践，所以，他将无法摆脱重重困境与灾难，这当然也将毁坏他的健康和才能，或许已经全都毁掉了”。[\[27\]](#)

正如卡蒂娅·曼所料，计划全部泡汤。海因里希·曼留在了洛杉矶，留在了老婆身边，他们俩在经济上仍然由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来

负担，还偶尔来玩玩。“海因里希和老婆来吃晚饭”，托马斯·曼于6月在日记里写道。“这女人喝醉了，不仅大声喧嚷，还放肆地干扰海因里希朗读描写腓特烈二世生活的一个场景。真要我的命。这是最后一次来这儿了。我没打招呼就躲开了。” [28].

6月，戈洛·曼从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的新家给普林斯顿的朋友艾里希·冯·卡勒写信：“西部的吸引力（主要属于自然方面）是东部没有的。但东部也有西部没有的东西：在那里，空气里多少会散发一些严谨与思想。”这些他在洛杉矶，甚至在德国流亡者中间都找不到多少。“我们在这里有海洋，我天天在海里游泳，尽情地享受，新近又有了一座大花园，我母亲和我每天都要跟野草打仗——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此外，人们可以一年四季穿着短袖衫行走，不用打领带，很少穿鞋，也不会弄脏，永远也看不到疾苦、贫穷、悲伤与丑恶——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好处。这类好处的特点在于，只有等你年老以后才能最终在此落地生根。”然后他大胆进行了政治预测：“同盟国将赢得胜利，大师希特勒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而此后，同盟国之同盟，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亦将很快走向终结。”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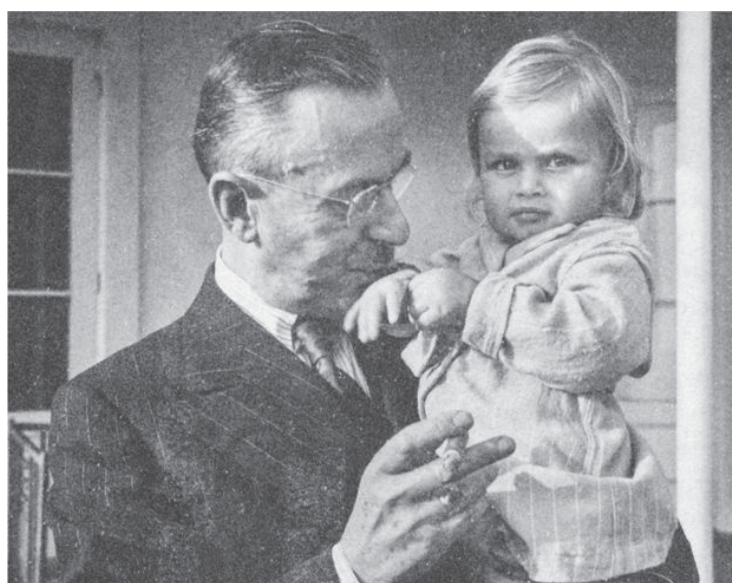


图27 托马斯·曼与孙子弗里多林

很久以来，戈洛·曼一直争取在自己跟家庭之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时不时来看看、玩玩是一回事；食、住和零花钱都要靠父母，而且已是33岁的年纪，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戈洛写信告诉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因为流亡而被迫跟家里如此亲近，“用我未来的传记用语来讲，对我的成长道路至少可以说正面和负面影响兼而有之”。^[30]但既无工作，又无自己的工资，戈洛·曼除了顺其自然外，亦无其他选择。他写完了关于根茨的书，一时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为父亲代笔捉刀，倒也派上了用场；同时继续在不同的学院应聘教师职位。在其信件里，戈洛已在考虑找一份工作，去工厂当工人。就在这时，戈洛收到了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秋天起在那里任教——一年前他曾在该学院作过几场报告。

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前四周，米夏埃尔把儿子弗里多送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家。托马斯·曼喜爱这个“小儿子”，就像20年前对他的“宝贝”伊丽莎白那样。1月，弗里多在他们这里也过了几个星期，托马斯·曼写信告诉艾格尼丝·迈耶，“他是我的最后一次爱”。^[31]

戈洛对这小侄子“亲切得令人感动”，卡蒂娅·曼告诉克劳斯，“他假如连个自己的小家也没有，那就太可惜了。但在奥利韦特他恐怕很难找到合适的女人，这个国家就根本没有适合他的女人。”^[32]在家庭计划方面，这个同性恋儿子除了应当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之外还存在另一种问题，这一点她只字不提。卡蒂娅·曼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她不想看的事就看不到。

7月20日，安东尼·曼（Anthony Mann）出世。他是难产，留下了残疾，这些残疾现在就可以预感到，在他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也逐步显现：他的语言机能和视力有缺陷。四个月后，到了秋天，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才从祖父母那里接回两岁的弗里多，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

很多。弗里多反应得有些“恍惚”，起初没认出父母亲来。他第一次看到三个月的弟弟托尼（Toni，安东尼的昵称），表现得有些嫉妒。[\[33\]](#)

卡蒂娅·曼很少听到苏黎世老母亲的消息。“我撞头了，现在写不了了”，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在1941年10月的一封信里写道。这位书信大师一直跟女儿保持交流，发现自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步步地减少跟外界的交流。她很少再写信。1941年12月，她来信的新地址是苏黎世的一幢廉价公寓。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再一次努力，以开朗的口吻写信，“我这儿一切都算得上井井有条”。然后就写不下去了。“今天不写了，因为这不是信，只是一个信封而已。”[\[34\]](#)卡蒂娅·曼后来听到她母亲的消息是1942年7月：她已离开了人世。整整四年前，德国当局拒绝普林斯海姆老夫妇过境去看女儿，母亲和女儿当时在康斯坦茨的边境就已预料到，他们将不会再次见面。

克劳斯·曼的《转折点》在纽约的L. B. 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弗里茨·兰茨霍夫和戈特弗里德·费舍尔这两位德国出版商曾在曼氏一家流亡法国期间一再争吵，一再为托马斯·曼这位作家你争我夺，现在正在合作。克劳斯·曼此时35岁，这已是其第二部自传了。《转折点》这本书销售不佳：不过数百本而已。[\[35\]](#)好在美国评论界对它评价不错。父亲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谈到，这本书取得了“令人振奋，甚至是令人欣喜若狂的成就”，并且指出，该书展现的不仅是“这个传奇之家，而且是这一时代的动人画卷”。[\[36\]](#)这本书叙述家庭故事时平铺直叙，没有套用文学形式，对此，他感觉不大舒服，这一点可以从他关于克劳斯·曼这本书的信函里察觉到。用心险恶的批评家可能会“取笑对家庭秘密的这些忏悔”。他自问，这样叙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是否“略嫌太早了些”。但从对孩提与青年时代的鲜活记忆来看，写这本书是对的。“我们当家长的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满意了。”除此之外，吸引他儿子的那种环境让托马斯·曼感到不

快，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的确是名人荟萃，但谁能没有点瑕疵？”总而言之，《转折点》是“一本极具魅力的书，情感细腻，个人色彩浓郁”。[\[37\]](#)

米夏埃尔·曼也经历了一次转折。其提琴老师亨利·泰缅卡建议他从小提琴转学中提琴。小提琴高手比比皆是，好的中提琴手却不多见。为此，米夏埃尔·曼刻苦练习这种新乐器，它比小提琴稍大一点，音色要低一些。或许并非偶然，换为中提琴后，米夏埃尔·曼于11月就可以以中提琴手的身份在著名的旧金山交响乐团登台演出了。

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位于美国一个偏远的尖角地带，距离芝加哥四小时车程，戈洛·曼从1942年秋天起在那里讲授历史课程，这意味着主要讲授美国历史。他先得把课程内容熟悉起来。戈洛写信告诉妹妹伊丽莎白，因为工作负担太重，所以目前不能去芝加哥看她。

“我一般早晨三点起床，很快就要累死了：但我现在就已被称为‘最棒的教师’了。”[\[38\]](#)

在德国，可以定期听到托马斯·曼的声音。他为英国广播电台写稿，每周一发一篇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讲话先录好音，然后由伦敦多次播放。有些批评家，如美国宗教学家赖因霍尔德·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指责托马斯·曼讲话的调子和内容都居高临下，具体事情方面没能给德国人民带来多少希望；他尤其没有理解那些本身渴望希特勒下台的人。[\[39\]](#)

但不管怎样，托马斯·曼让他的德国听众弄清了两桩事情：一是还有另一种德国（以他为代表）；二是他给听众提供了从家乡的媒体上得不到的信息。6月，托马斯·曼不仅谈到“嗜血成性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暗杀，还报道了德国人对利迪策(Lidice)居民的可怕的“报复行动”，据说当地人藏匿过行刺凶手，因而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惨遭杀害，村庄亦被夷为平地。德国听众从托马斯·曼的讲话中

也听到了谋杀犹太人的消息，至少是当时在美国所能得到的信息。早在1941年1月，托马斯·曼就谈到用毒气毒死荷兰犹太人的实验。他在9月的讲话中指出，“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绝对真实”，有70万犹太人已遭残杀。“你们德国人知道这些情况吗？你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引用一份报道，说11000名波兰犹太人在火车车厢内遭毒气杀害。“对整个过程都有非常详尽的描写：遇难者的嘶喊与乞求，党卫军狗杂种们的开怀大笑，他们在执行过程中那样开心。你们德国人觉得奇怪，甚至感到气愤，文明世界为何正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那些大脑被民族社会主义塑造成形的几代人，还有那些道德上毫无廉耻、思想畸形的杀人凶手，用什么样的教育方法能把他们改造成人？”^[40]为了达到劝说德国人放弃战斗或对纳粹政权实施抵抗的宣传目的，这种控诉的口吻在事实上并不正确。但是，凡是听到托马斯·曼讲话的人没人可以说，他之前什么都不知道。

1942年10月，纽约：克劳斯·曼破产了。这一生中，他头一次因骄傲而不愿意再次向父母伸手。“明天又是一天，没有真正的饭菜吃；从长远来看，不知道我能否坐得起地铁，买得起报纸。”他觉得孤苦伶仃的。每当克劳斯跟其他人交谈时，比如这时跟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他们相互勉励说，他们都非常优秀），他都觉得像个演员似的。“悲伤与孤独让我痛不欲生。我为何不能把这可怕的孤独变成好事呢？很显然，没有人愿意或有能力帮助我，也就无人有权利干涉我去死的愿望。”日记成了告别信，成了一份报告，说明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他正在对“我的悲伤境遇进行苦思冥想”之际，朋友托马斯·奎因·柯蒂斯打来电话——克劳斯欠他很多钱。柯蒂斯跟克劳斯·曼约好，晚上请他吃饭。“然后我答应了，推迟了自杀。”他让马丁·贡佩尔特给他打每天一针的治疗梅毒病的药（“地铁票要5美分”），然后去参加一场派对，喝了几杯苏打威士忌，又一次跟卡森·麦卡勒斯聊天，接下来是珍妮特·弗朗勒（在《纽约客》上发表父亲专题特写的女作者）和梅赛德斯·德·阿科斯塔（Mercedes de

Acosta，据说是葛丽泰·嘉宝的女情人，克劳斯·曼觉得她看上去是“很可笑的女同性恋”。)回到旅馆后，他接到柯蒂斯的消息，把一起吃饭的时间推迟到22点。“我说‘好的’，然后决定立即自杀。”可这时他的朋友约翰尼来拜访他，他们一起去旅馆酒吧，克劳斯·曼让人把饮料钱记在他的账上。“然后我想回房间，最终完成‘那事’。可约翰尼察觉到我身心疲惫、饥肠辘辘，就坚持让我跟他一起去汤普森饭馆，花光了最后一分钱，给我买了点吃的。对他这一朴实的举动我万分感谢，我将永志不忘。”不一会儿，约翰尼因当逃兵被捕。柯蒂斯最终取消了当晚的饭约。“这显然是很好的事情。我决定，不要再耽误时间，而要尽快行动。我泡了个热水澡，然后拿起小刀，这是我几周前特地为此而买的。我试图割开右手腕的动脉。可刀子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锋利；再说这也太齜齜——我指的是刀子，也是说整个事情。觉得疼——但不太厉害，倒是很难受。我开始出血了。我停下来，估计是害怕了。就在我考虑是否再试一次时，电话铃响了：克里斯多弗[·拉查勒]想跟我一起喝点什么。”他们一起去时代广场。“克里斯多弗发现了我手腕上的这个愚蠢小伤口，叫我别做蠢事。他说，他和我，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逃避的命。我们得活很久，受很久的罪。要是就这样死了，匆匆忙忙地死了，那也太舒服了。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克里斯多弗付了酒钱。”^[41]

第二天：“我最后的愿望是，善待约翰·弗莱切（John Fletcher，即约翰尼），监号29。他是个真正的好小伙子。”^[42]

又过了一天：“我又试了一次，没成功。”^[43]

1942年11月，莫妮卡·曼迁往纽约居住。这是她自己的决定，想远离父母家，尝试着重新开始做点什么。母亲写信给克劳斯，说她怀疑莫妮卡之所以东迁，“主要是因为在家里要做一点点家务，而这是她本来就应该做的”。^[44]母亲的这一说法听起来虽然严厉，却说明

最近一段时间跟“问题女儿”的共同生活平安无事，莫妮卡甚至让自己派上了用场。不久，母亲还会说莫妮卡派不上“太大用场”，这是家里的惯用语，如果觉得什么事情不错的话。^[45]当然，这不是最后一回谈论莫妮卡。



图28 在瓦尔特家做客：托马斯·曼坐在洛蒂·莱曼（Lotte Lehmann）、布鲁诺和艾尔萨·瓦尔特旁边，后排是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右边边上是洛蒂·瓦尔特

又到了报告季节，此时，艾丽卡·曼作为旅行报告人达到了事业的高峰：她准备好了四篇不同的报告，在50个城市登台作报告。11月，她写信给女友洛蒂·瓦尔特——她对艾丽卡跟她父亲的艳遇一无所知：“12天里要作17场报告，而且是在17个不同的地方，我正在想办法要熬过这么多天！哪里有别墅，哪里就有路；不通火车的地方，肯定通公交车。”^[46]

年初，艾丽卡·曼先为宣传部门工作，这是美国人参战后建立起来的，但她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美国人不愿意采用她的各种坚定的想法。她一直抱怨美国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防止敌人的渗透；她觉得，自己在贝特福德旅馆就被纳粹分子所包围。^[47]年初，艾丽卡公开要求美国的广播电台不要播放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等德国作曲家和演奏家的音乐作品,因为这些人在希特勒德国活动积极。为此进行了一场公开、热烈的讨论,艾丽卡·曼参加了讨论,她的发言既幽默又尖锐。她还采用了另一种斗争形式:早在两年前,艾丽卡·曼就主动跟联邦调查局取得了联系,提出当情报员,为追查纳粹在美国的同盟者提供帮助。^[48]她不是“非正式探员艾丽卡(IM Erika)”,去刺探德国流亡圈子的情报;但她毫不忌讳跟情报机构打交道。艾丽卡·曼的“护照丈夫”W. H. 奥登有一次曾写信跟她说:“别恨得太多。”^[49]

今年夏天,最大的两个孩子回来探家时,家里爆发了一场争论。克劳斯·曼认为,美国将因为战争而变得野蛮起来,美国应当避开欧洲的血腥屠杀。这种态度让他十分孤立,更何况跟他报名参加美军显然有些矛盾。艾丽卡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只要战争还没有打赢。母亲批评“儿子的温和和平主义态度”,父亲跟克劳斯争论得异常激烈,结果病倒在床,躺了两天。战争的乱象让托马斯·曼在写字台边坐立不安。几个月来,他在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里就一直在发火,批评美国缺乏打赢战争的坚定意志。他在日记里对轰炸德国城市表示赞同:“200架飞机和大口径炸弹轰炸慕尼黑。爆炸声一直到瑞士都能听见,泥土掀到了数公里之外。这个可笑的地方已完成其使命。”^[50]克劳斯·曼在情绪激烈的家庭讨论中提出不同意见,说必须注意,不要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丢弃了自己的价值观。在这节骨眼上,没人想听这话。

11月17日,托马斯·曼以顾问的身份首次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作报告。他介绍即将完成的鸿篇巨制:长篇小说《约瑟》。艾格尼丝·迈耶为他的出场作了完美的准备:报告前三天,她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天的安排》(*Order of the Day*)——托马斯·曼的一个政论文集——的文章。她的文章内容详细,对托马斯·曼赞誉有加,充满着好感与钦佩,为美国的精英迎接

当晚的活动作做好准备。在图书馆馆长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美国副总统的引领下，托马斯·曼进入人头攒动的图书馆大礼堂。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公共知名度由此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在讲话中一再感谢副总统诚挚友好的话语，其高度评价让他深感荣幸。接下来在艾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上，除副总统外，托马斯·曼还见到了司法部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几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大名鼎鼎的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应迈耶夫妇的邀请出席。托马斯·曼又跟美国和解了，就在前不久，他还再次抱怨过这个国家。

四天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离开华盛顿。在这里的日程十分累人，“这位主妇”也同样累人。托马斯·曼得给艾格尼丝·迈耶朗读他的小说，跟她交谈，需要保持距离的他觉得她靠得太近。“这位女士告别时来到我的房间，”他在日记里记道，“亲密得可怕。走，赶快走。”^[51]下一站是纽约。因为只想着“走”，托马斯·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忘记了跟迈耶夫妇打招呼，感谢在华盛顿的隆重仪式。艾格尼丝·迈耶感到疑惑。“迈耶极度令人不快的信”，他记在日记里。给她发去了一封“安慰的电报，虽说我心里很恼火”^[52]（一切都好，应酬太多，未能及时打招呼）。没过多久，迈耶夫妇也到了纽约。这次见面气氛有点冷冰冰的：“这女人恶心人，这男人最近没有教养地摆着个脸。告别时的气氛跟目前的关系一样很不友好。”^[53]

回家前，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去旧金山看望米夏埃尔·曼一家。他们俩第一次在新的交响乐团听小儿子拉中提琴。看到他在乐团的地位“很艰难”，托马斯·曼赶紧给指挥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写了一封信帮助儿子。^[54]后来米夏埃尔又病了，肠梗阻，得进医院。不久，他从家里给母亲写了一封极不寻常的气馁信，此

时，他住在紧靠旧金山的米尔谷（Mill Valley）的一幢房子里。当年决心当音乐家，究竟对不对？“假如我在过去的岁月里早就知道，我的职业要求集体性与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那我就不会选择它了。”1月，交响乐团将迎来传奇人物莱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作为客座指挥，他将跟乐团一起表演肖斯塔科维奇（Schostakowitsch）的第七交响曲，这首曲子于1942年8月9日在被围困的、遭德国军队轰炸的列宁格勒演奏，从而一举闻名于世。面对这首《列宁格勒交响曲》（*Leningrader Symphonie*），米夏埃尔·曼忐忑不安：据说斯托科夫斯基“习惯于点年轻交响乐手的名，让他们单独演奏特别难的片段……”。[\[55\]](#)

12月中，卡蒂娅和托马斯·曼结束旅行回到洛杉矶。在太平洋帕利塞德，他们首先拜访了帮他们照看房子的德国流亡邻居。“喝完茶拜访霍克海默（Horkheimer）一家，感谢他们照看房子和植物。”[\[56\]](#)

*

1943年1月4日，托马斯·曼结束了《赡养者约瑟》的写作，《约瑟》也就此全部完成。这部小说扩展到了四部，他从1926年开始写作，除了有所中断外，他在整个流亡时期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他视这部作品为“坚韧不拔的里程碑”；不管怎样，他结束了这部作品的写作，结束得比“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要早。[\[57\]](#)之后，他陷入了类似产后忧郁症的状态。虽然历经外部与内心的震撼，这部著作却一直维系着他的生命，现在它结束了。他需要新的写作任务。作为过渡，他在几个星期里动笔写作《约瑟》的副产品——关于摩西的短篇小说《戒律》（*Das Gesetz*）。他在过去那些年的草稿堆里翻找，筹划一项新的工作计划。他自己往日的生活又浮现在眼前——《布登勃洛克》时代对保尔·埃伦贝格（Paul

Ehrenberg)的爱，这是在他决定结婚之前的事。“对爱情的经历不可能比这更强烈”，他这样写道。“再者，我可以跟自己说，我承担了所有的责任。艺术在于，把它艺术化。”^[58]对于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来说，这是何等的动力；同时又是多么令人伤心。

推陈出新，一项新计划轮廓方显。托马斯·曼在4月给儿子克劳斯的一封信里谈到他的计划，写“一个艺术家/音乐家跟魔鬼交换灵魂的现代故事”，故事将描写“可怕的灵感和天才化的题材”，以“被魔鬼带走，即瘫痪结束”。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描写关于亢奋的主题”，涉及“反理性”，“也就是政治的、法西斯的，即德国的悲剧命运”。这里自然少不了他又爱又恨的理查德·瓦格纳：“这将成为我的‘帕西法尔(Parsifal)’。”^[59]

经过第三次体检，克劳斯·曼终于达到了目的：他被宣布适合当兵并参加了美军。父亲把儿子当兵称作“彻底的大转弯，自己否定自己”。^[60]克劳斯·曼从阿肯色州写来的关于基础训练的报告证实了父亲的怀疑。“对我来说，军事训练相当困难，特别是不知道端起枪来该怎么办。虽然如此，我将怀着敬畏和善意的嘲讽来对待。在我的帐篷或平房里，人家喊我‘教授’。”^[61]母亲回信写道，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的孩子几乎连打字机的色带都换不了，更何况要舞刀弄枪呢。^[62]可当兵时的笨手笨脚并非唯一的问题。1943年的美国军队不仅实行“种族”隔离（克劳斯·曼写信时怒火冲天地报告说，军营里有类似“黑人隔离区”的地方：“这怎么能行呢！”^[63]），而且容不得自己队伍中的同性恋。为了不引起怀疑，克劳斯请女友洛蒂·瓦尔特给他寄一张照片，“因为我想用一个靓妹来糊弄我的寝室战友。给我寄一张诱人的照片来，肩膀要光着，眼神色眯眯的，怎么好就怎么做”。^[64]

德国国防军在斯大林格勒刚经历了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场惨败。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明确表示，他们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不会跟敌人谈判，不会让步。尽管如此，艾丽卡和托马斯·曼依旧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女儿写信给父亲，介绍她想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但不是针对希特勒，而是针对自家人：“美军、富人、国务院，不用说当然少不了教会，他们正在用干练的杀人之手准备建立其世界法西斯，并下了决心，在任何被我们‘解放的’国度里都不容忍任何人或任何事，只要他或它从远处看上去有那么一丁点反法西斯主义的苗头（更甭说社会主义了！）。”^[65]家里看样子曾经讨论过美国人的黑心勾当。艾丽卡·曼的言语尚未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已经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类似的信：托马斯·曼曾经想过，“犹如我们国务院的梦想，要是在欧洲都是些善良、四平八稳的君主国和天主教-半法西斯政府的话”，就终于会有和平了。^[66]

年初，艾丽卡·曼在纽约跟妹妹莫妮卡见了面，然后给母亲提了一条气馁的建议，要母亲最好不要去“打扰”她，“直到她做蠢事，要钱或有其他事”。莫妮卡只有一个目标：“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间，她就自己练练钢琴。艾丽卡说，“曾祖母的那些装饰花瓶不可能比她——我的这个妹妹，更无用处”。^[67]1月底，艾丽卡·曼又有了新消息。已经有段时间了，家里在讨论莫妮卡是否跟已婚的钢琴家库尔特·艾普鲍姆（Kurt Appelbaum）有段艳遇，她跟他学钢琴。艾丽卡·曼相信，可以证实这一传言。“我听说，莫妮卡跟‘艾普’还是有事；他要是把她带回家，那就太有意思了。到最后，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真的要当起托马斯·曼的女婿来了。”^[68]卡蒂娅·曼不仅拿这当回事，甚至还在给克劳斯的信里进行了令人吃惊的描绘：

“从原本那么喜欢写信的莫妮那里，我现在啥消息也没有得到，让人特别不安，我有时怀疑，她肚子里怕是要长出一棵苹果树苗来了^[69]。这可不行！”^[70]不管库尔特·艾普鲍姆跟莫妮卡·曼之间发生

着什么：她跟他学习钢琴，却没有成效。他确信，莫妮卡没有进步。从此，他弹，她听。据说如此。[71].

在新年的头三个月，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够忙活的。从圣诞节起，伊丽莎白跟朱塞佩·博尔吉斯带着他们的女儿安吉丽卡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里。这是伊丽莎白的主意，而洛杉矶的意大利流亡圈子吸引着并非没有政治野心的博尔吉斯：他已把自己当作西西里岛的总督，把妻子托付给了她父母。[72].他们在这里待了三个月，自家在芝加哥的房子出租了。博尔吉斯跟大学拿了一段时间的假期，这是他平时“积攒起来的”，[73].但他手头很紧。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急着跟家里要钱，让他们准时把每月的90美元寄给她，当了教授夫人后，她继续从家里拿到这笔钱，“我们太穷了”。[74].看着小女儿的情况，卡蒂娅·曼既高兴又担心。她写信告诉克劳斯，说小女儿“太依恋父母家了”。[75].

这两位家庭主妇似乎完全驾驭住了挑战，“让两个男人分合有序”，就像伊丽莎白·曼事先婉转表达的那样。[76].共同度过的时光过去后，托马斯·曼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两人其实相处得还不错，博尔吉斯“虽说嗓门大了点，有点烦人，其思想的固执与意大利爱国主义也让人有点压抑，但他心肠好，容易受感动，从根本上来说很柔和，虚荣心很容易得到满足”。他努力争取在加利福尼亚州谋求一个大学的职位，“但恐怕成不了，他太左，太反教会”。[77].克劳斯·曼不久又收到母亲的一封信，信里谈到跟博尔吉斯的共同生活——她更注重自己的女儿及其婚姻。“麦迪真是个可爱至极的小家伙，友善，单纯，没有要求，对待她的孩子极其温柔。肯定是这孩子，而不是古怪、难缠的丈夫才是她生活的幸福所在。”[78].

克劳斯·曼也不知怎么就通过了基础训练。但他并没有被分配去一支战斗部队，而是被调往马里兰州（Maryland）的一支宣传部队，

甚至还被提拔当了参谋军士（Staff Sergeant）。可当这支部队于5月1日被派往欧洲时，克劳斯·曼却留了下来。在入籍方面出了问题，若无美国护照，他在部队就待不下去。有人告诉他，对他有“特别的调查结果”。至于人们指责他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政治？把他当作一名共产党人？或者是因为爱情生活？他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从1940年起就对他进行调查，设置了卷宗，其中这两个方面的材料都有。他有可能是斯大林的间谍和一个“色情变态者”；有男人一再到克劳斯·曼的旅馆房间过夜，而里面不过只有一张很窄的单人床而已……有人怀疑他跟姐姐艾丽卡有乱伦的关系，档案里也记录在案。他们认为他著名的父亲甚至将这一素材运用于《维尔宋之血》的文学创作中。[\[79\]](#)不过，有一点联邦调查局疏忽了：这篇小说发表于克劳斯·曼出生的那一年。

6月初，美国国防部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中。母亲写信告诉儿子，他们“直截了当地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人”。父亲和她矢口否认。母亲还写道，她不时在想，也许还牵涉“其他事情”，即爱情生活，“这比较难以反驳”。[\[80\]](#)这事，那两个男人没有开问。

艾丽卡·曼参战了。不是去当兵，而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她本想去苏联，去世界大战的焦点战场，可是行不通。现在，她以官方认证的通讯员身份，为《芝加哥先驱者论坛报》（*Chicago Herald Tribune*）、《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 Weekly*）和《自由杂志》（*Liberty Magazine*）奔赴伦敦，并从那里继续前往北非。她被编入美军序列，穿上军官制服。艾丽卡·曼去开罗、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去德黑兰和伊拉克。但这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冒险生活。前线距离遥远，这里的一切跟她在西班牙内战经历的激动人心的那几周没有什么可比性。艾丽卡·曼在开罗的一家旅馆里待了好几个星期，等待美国空军中东司令路易斯·布里尔顿少将（Generalmajor Lewis

Brereton) 接受她的采访。这个男人看不上穿军装的女人。在《自由杂志》上发表的报道《等候将军》(*Waiting for the General*) 一文中, 艾丽卡·曼把究竟通过何种手段能跟这位将军说上话写成文章的中心内容。^[81]这位将军几乎没有向她提供任何信息: 没有吸引人的军事信息, 连士兵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或他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也没有透露, 这是艾丽卡·曼几乎陷于绝望后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令她失望, 她写的这篇文章也相应地无趣。



图29 米夏埃尔·曼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任中提琴手

相反, 艾丽卡·曼自己策划的一次旅游倒十分有趣: 她前往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 (Tel Aviv), 在一篇篇幅很长、她自认为“相当重要的”^[82]文章里报道阿拉伯人跟移居此地的犹太人之间发生的巴勒斯坦冲突。在这场冲突中,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 都不准备妥协, 双方只在一个方面意见一致: 拒绝英国人——他们受国际联盟的委托在管理巴勒斯坦。艾丽卡·曼赞同建立双重国家。她让人在短期内看到的更多是希望而不是现实——她对该冲突的详细分析让人觉得不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国家。^[83]

艾丽卡·曼告诉弟弟克劳斯, 夏天的这趟旅行还有个次要目的: “魔鬼”, 即布鲁诺·瓦尔特在她的心里已经失去了部分位置, 原因

是另一个人在那里占据了重要的战略地位。^[84]她说的是达夫·库帕（Duff Cooper），1940~1941年任英国情报部部长，他在那两年曾邀请艾丽卡·曼前往伦敦，让她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德广播工作。库帕是位战斗英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有过很多次艳遇的丈夫。面对这些艳遇，他太太信心十足地说，那都是些草花，我是大树。^[85]此时，库帕政治上不得意，有时间跟“草花”艾丽卡·曼周旋，她于来回的旅途中在伦敦待一段时间。10月回美国时艾丽卡确信，用这种方法甩不掉“魔鬼”。

米夏埃尔·曼受聘于皮埃尔·蒙特指挥下的旧金山交响乐团，赢得了家人的钦佩。可他的位子坐得并不很稳。冬天的第一个演出季结束后，他是否也能获得夏季演出的聘书并无着落。初夏，为了加强练习，米夏埃尔·曼把两个儿子送到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祖父母家，一送就是两个月。“比比也是个听话的小伙子，”卡蒂娅·曼于6月写信告诉克劳斯，“但实在过于自卑，他虽然刻苦勤奋地练习，却好像没多大长进，这明显让他十分苦恼。”^[86]7月初，米夏埃尔·曼接两个儿子回家，这次他成为父亲的一个难得的交谈伙伴。父亲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米夏埃尔可以给他许多重要的指点。小说的主人公亚德利安·勒佛居恩（Adrian Leverkühn）是个天才的作曲家，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米夏埃尔给父亲讲解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与和声学。^[87]此时，他在交响乐团当中提琴手的合同又延长了。

卡蒂娅·曼是位坚强、无所畏惧、敢作敢当的女子，是曼家这艘大船的舵手，她倾注了全部精力，保证敏感的丈夫专心致志地投入其创作，同时又维系整个家庭，不管写信还是亲自出马，她都提出建议，给予安慰，必要时掏钱，有时候也许不够敏锐，却从来都是有忙必帮——卡蒂娅·曼累了。带了两个月的小孙子，一个1岁，一个3岁，让她精疲力竭。7月24日是她60岁生日，此前一天，她写信给儿子

克劳斯，说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看上去已经像个白发苍苍的老祖母了。“那个给我修表的古怪老头最近曾问起我的年龄，他无法想象我还这么年轻，显然把我当作100岁的人了，当他得知我才60岁时，那难以置信的表情，好像马上就得挠挠我的下巴似的。”^[88]生日那天有点惨兮兮的，虽然有香槟，而且去了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电影院看了一场恩斯特·刘别谦的专场电影，但六个孩子中，莫妮卡是唯一到场并跟母亲一起庆贺生日的。

戈洛·曼喜欢在密歇根州奥利韦特学院的工作，学校也很想把他留下。尽管如此，他还是自愿报名参加了美军，想为结束战争提供帮助。8月初，戈洛去体检并被宣布合格，不久便在亚拉巴马州

(Alabama)开始了基础训练。他并不抱有幻想，作为士兵真能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次手榴弹实弹训练中，他投掷得太差，差点把自己给炸上了天。他写信请求朋友艾里希·卡勒把他的学术文章寄一篇过来，想把这篇文章“到处给人看看，炫耀炫耀自己：因为我的双手那么不灵活，我总得在哪儿证明一下，我还是有点才的：人家反正已经叫我‘教授’了，并且用善意的‘丘八行话’来讽刺我”。^[89]有个18岁的战友吉姆·费里斯(Jim Ferris)在日常的实际当兵生活中帮助他，他爱上了吉姆。令他吃惊的是，吉姆以情相报。这是戈洛·曼在军队里的第一次恋爱。为了避免别人的闲言碎语，他给爱娃·赫尔曼(Eva Herrmann)，一位德裔美国女画家和家里的朋友写信，提出跟他哥哥克劳斯向洛蒂·瓦尔特提出的相同要求。没过多久，漂亮的“宝石”——这是电影界的行话里对爱娃·赫尔曼的称呼——寄来了一张“女友的照片”以及一封相应的信。这个世界“既容易轻信，又可以存心不良”，戈洛·曼在感谢信里写道，“有时你必须甩块诱饵给他们，填满他们那恶毒的臭嘴……”^[90]11月1日，戈洛·曼成为美国公民。不久，部队把他调往华盛顿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简称OSS)。他

知道，自己更适合坐在打字机前，而不是扛着枪杆子为战争服务。但他还是伤心，因为这意味着告别吉姆。

几个月了，情况依旧不明，克劳斯·曼在等待期间被调到密苏里州，并在这里的军营里编写连队编年史，还为部队报纸写作。克劳斯一再写信并宣誓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从来就不是，他忠诚于美国。克劳斯遭到审问，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也没有抑郁症。他很绝望，在日记里考虑自杀，一旦入籍申请遭到拒绝并被开除军籍的话。^[91]9月25日，他终于成为美国公民，立即给他在北非的宣传部队发去电报，请求他们调人。不久，他接到了进军令。

托马斯·曼通过第三者收到了一条信息：“不要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R。”^[92]他自问，谁是这个“R”。是老朋友汉斯·赖西格？托马斯·曼当年那么想把他弄到美国来，他却因为无法理解的原因想留在德国。

托马斯·曼和艾格尼丝·迈耶的关系本来就很困难，这一年更是面临严峻的考验。5月，两人相互误解，各说各的，在信里激烈争吵，结果托马斯·曼寄了一封告别信给她，并取消了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好在两人及时察觉到，托马斯·曼的生活与著作跟艾格尼丝·迈耶的各种努力早已水乳交融，成为一体，分手根本就不可能。这场争吵也提供了一次重新摆正他们关系的机会。艾格尼丝·迈耶在给他的信里表示，要是更多一点友好的关心，她会非常珍重的——“您要是想伤人的话，硬得就像块石头”。^[93]她还把他从最大的顾虑中解放出来：她可真不是那种女人，“出于失望而疯狂地企图对爱情的对象进行报复”。“这跟我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不是我，对我来说，我们的友谊曾经是一种狂喜，现在已经变得安静了许多，崇高了许多。”就是说跟情爱无关。这为托马斯·曼提供了重归于好的基础。他虽然明确说明，今后不想参与很多事，特别是那些他描写为“令人

难堪的感情冲动的事”，然后又表达了一种希望，但愿这场危机“在良好、有益和牢固的意义上转化成为我们友谊的里程碑”。^[94]

秋天，第一场考验来临：要在国会图书馆作第二场年度演讲。托马斯·曼正投身于新小说的写作之中。这场演讲打断了他的创作，他觉得不爽。为了搞定这篇“该死的”^[95]演讲，他东拼西凑，从旧作中找些段落，然后把正在写作的小说的素材拿过来，内容涉及理查德·瓦格纳、“糟糕透顶的”德国人、共产主义和民主。然后把这篇题为《命运与任务》（*Schicksal und Aufgabe*）的文章寄给艾格尼丝·迈耶去翻译。她迟迟没有回信。9月12日，信到了。信里谈到对内容有些疑虑，然后写道：没有人比她更崇敬他了。正因为如此，考虑到他公开表态的重大意义，她不得不请求他，写一份质量更高的演讲稿。这些大实话让他极不开心。“迈耶关于演讲的信太过放肆、太不着调。”^[96]

艾格尼丝·迈耶非常担心，她批评的言辞会造成什么后果，于是向戈洛·曼求助。如此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一位伟人，是否错了？她要戈洛·曼有话直说，还说她现在可能不受欢迎了。^[97]戈洛·曼从亚拉巴马州的基础训练营给她回信。他本人经常因为父亲的政论文章而备受煎熬，这些文章往往有误或肤浅，或者借用他人的材料，因为父亲被逼无奈，不得不写些他原本不感兴趣的事情。戈洛·曼继续写道，他从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父亲，因为他知道，他的批评是不受欢迎的。写到这里，内容更尖锐了，戈洛·曼便把这封英语信改用法语继续写下去：父亲“是头驽驴，在某种程度上被宠坏了，尤其是他没有把握时，特别会发飙”。戈洛请她务必对父亲继续开诚布公，发表批评意见，这也是为了托马斯·曼本人。她对“这位伟人”有影响，可以对他发挥作用。面对一位“伟人”也必须开诚布公，所以他提出建议，她可以将批评意见包装得柔和一些，同时要多鼓掌，多唱

赞歌。父亲需要这些。他虽然不知道她信的内容，但知道其直来直去的方式……^[98]

过了不久，艾格尼丝·迈耶以轻松的口吻写信给戈洛·曼，介绍托马斯·曼在华盛顿进行演讲的情况。托马斯·曼非常重视她的批评，对演讲稿进行了彻底修改。除其他修改外，他还增加了关于受到压迫的好德国的论述，为了它值得进行战斗——这些内容是她希望听到的。^[99]托马斯·曼在其演讲里解释说，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他们被关在“残暴的集中营”里，对他们来说，“祖国同样变成了陌生的国度”，就像对流亡者们那样：“数以百万计的‘内心流亡者’期待着结束，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至于艾格尼丝·迈耶未能改变的段落，她没有提。托马斯·曼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他对民主的独特解释，这一点他丝毫不愿作出改动：他理解的民主主要不是下层的一种诉求或是让他们平起平坐，而是上层的宽容、正义与同情。艾格尼丝·迈耶曾提出异议，说美国人没法理解这种慈善式的民主概念，他所描写的不是民主，却并未能说动他。托马斯·曼在表述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时，更是对政治概念自由发挥，演绎得更加厉害：他把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担忧——尤其是在美国——称为“我们时代的低级蠢事”。按照他的预测，世界将从总体上向共产主义迈进。他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理解的共产主义：“全世界将抽相同的香烟，吃相同的冰激凌，看相同的电影，在收音机里听相同的音乐……”过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趋势，这是无法视而不见的。因此，不应当害怕共产主义。^[100]在写演讲稿期间，托马斯·曼曾在一封信里写道，他偶尔会说些“左得可怕的事情”。^[101]要说幼稚得可怕，应当更为贴切。卡蒂娅·曼对修改后的报告也不满意。^[102]他的有些听众大概会一头雾水地自问，这位德国作家玩弄的这些概念跟世界上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莫妮卡在纽约找房子。卡蒂娅·曼生气地写信告诉大儿子克劳斯，莫妮卡本打算从现在起自己挣些生活费，一下子又闭口不谈了。她不能总是呆坐在一家旅馆的便宜房间里，啥事也不干。在每个人、也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工作的时代，母亲不想，也不能资助她“75美金的房子”。“不谈这陈年老调了。”^[103]

她当然在做事。莫妮卡·曼在写作：比如警句格言，细小的观察等。“纽约。一个笔直、简单的城市。就是说，人们每天都受到压抑。”或者：“人们察觉不到这里在生产物品，生活只跟成品有关系。”还有：“冒着酷暑在华盛顿大桥上。风在吹。一条紫红色的天际线。风吹就像一次性高潮。”^[104]她的写作实验还是不给母亲看为好。

戈洛·曼从亚拉巴马州的美军军营给艾格尼丝·迈耶写信，再次涉及父亲与政治。有人从纽约写信告诉他，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努力，争取让托马斯·曼在战后的德国承担一个政治角色，有可能是在一个德意志共和国出任总统。戈洛·曼写道，他对此有很大的保留。玩政治太险恶，他父亲不是这块料。他可能跟美国人搞不好关系，又不能真正回到变得陌生与敌对的德国。他太容易被那些不地道的人拉入某一事件，并且上当受骗。艾格尼丝·迈耶能否非常谨慎地施加对他的影响？^[105]此时，确实有计划要建立一个民主德国委员会（Council for a Democratic Germany）。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和其他流亡人士想争取让托马斯·曼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蒂利希向国务院的一位副国务卿进行咨询，然后收回了建议：有关人士劝他放弃。美国政府认为，战争尚在进行中，没有必要组成一种德国的影子内阁。估计对托马斯·曼的不信任也起了一定作用，他给人以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印象——最迟从他在华盛顿发表最新讲话开始。

12月初，父母还在演讲之旅的途中，在堪萨斯城见到了艾丽卡和克劳斯，跟他们告别。这两个最大的孩子准备上战场，克劳斯作为士兵，艾丽卡又一次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母亲流了眼泪。父亲跟儿子之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克劳斯·曼感动地在日记里写道：“告别时，他拥抱了我——开天辟地头一回。”[\[106\]](#)

*

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必须参加考试，事关美国国籍，要入籍就得通过一项公民考试。内容涉及美国历史、国家机构与宪法。邻居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及其太太罗瑟（Rose）作为证人陪同他们。卡蒂娅·曼事前进行了学习，她丈夫没作准备。想到考试的日子，他有点紧张，但把考试当作走走形式而已。在一般情况下，提问应当是10分钟。可是，1944年1月5日，托马斯·曼在考试时，整整出了50分钟的汗，不得不多次承认自己的无知。最后，移民局的女官员请托马斯·曼在她的那本《布登勃洛克一家》里写点什么。她之所以拓展了其工作职责，是因为想跟这位著名人物多聊聊天。[\[107\]](#)

半年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进行公民宣誓。“这就成为美国公民了”，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这样写道。[\[108\]](#)在写给别人的信里情绪要热烈得多。他写信告诉儿子克劳斯，遣词造句几乎跟给别人的一模一样：“在这大宇宙共同体的时代”，最好把他的“德意志埋葬掉”。他们大概将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托马斯·曼继续写道，他深信未来的欧洲将会出现有意思的事情，但是，“这一发展没有多少”会出现在他的有生之年。[\[109\]](#)

曼氏家族在美国化：克劳斯和戈洛作为美军士兵拿到了美国护照。伊丽莎白从1941年起已是美国公民，孙子辈的反正生下来就是美国人；只有莫妮卡，跟着她死去的丈夫享有匈牙利籍，艾丽卡是已婚的英国人，米夏埃尔暂时还是流亡的捷克人。

戈洛·曼对他在华盛顿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不满意。“日子在不断重复的单调中逝去。我必须在办公室待八个小时，大部分时间不过是读一读报告，有时要做一点小小的翻译工作，那就像过节似的。”^[110]他有时去艾格尼丝·迈耶的别墅拜访她。在写给家里的一封信里，他描述了跟她的一次谈话，内容涉及父亲。托马斯·曼记下了儿子信的内容：戈洛“提到迈耶的一句話，说从我的信里看得出，我讨厌她。由于这些信充满着忠诚、赞赏、感谢、关怀和谦逊，她的说法不啻为非常睿智的观察”。^[111]

艾丽卡·曼在重新开赴战场之前，在美国继续其报告之旅，讲述上一年在战争的边缘所经历的事情。她告诉弟弟克劳斯，还要写文章，而且要写“反德国的文章”。这项工作其他人做不了，她是唯一一个人们可以信赖的人。^[112]这些文章要反映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所作的各种努力，为后希特勒时代作准备，还有关于战后德国的各种计划，总的来说要反映好的德国——“另一种德国”，即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四年前撰写的《另一种德国》里所描绘的德国。托马斯·曼经过几度反复思考，没有参与这些活动，但也不想跟同命运共患难的流亡者把关系搞坏。他女儿立场分明，态度坚决，这一点可以从题为《一种拒绝》（*Eine Ablehnung*）的文章里读到，这篇文章于4月21日发表在纽约的《建设》杂志上：直到战争爆发，她本人曾经一直相信有“另一种”德国，这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没有“另一种德国”，因为整个德国都团结一致，非但为了希特勒，而且跟着希特勒进行战争。世界已经疲倦，不想“再次对纳粹跟德国的细微区别进行甄别”。流亡者毕竟都是像她一样的希特勒反对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反法西斯人士，她却把这些人称作“德意志共和国的破产者”，说他们正在“争权夺利”，将用“德意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威胁“全人类”。^[113]卡尔·祖克迈耶系剧作家，也因希特勒而出逃，在佛蒙特州（Vermont）经营一家农场，正在从事《魔鬼的将军》（*Des Teufels General*）的创作，他在《建设》杂志上回应说，他不属于任

何流亡组织，但艾丽卡·曼的文章让他感到震惊：一来因为其激烈程度，二来是它对德国作为“整体”的批判。人们反对的是法西斯，而不是全体德意志人民。[\[114\]](#)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3月6日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多米尼卡（Dominica）。没过多久，外祖父母从加利福尼亚州前往芝加哥并在那里待了两周。有关政治的讨论和朱塞佩·博尔吉斯的“顽固立场”给此次逗留罩上了阴影。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下了博尔吉斯的长篇大论：“因为没能登陆，[他]宣布战争已经失败。”按照博尔吉斯的说法，这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道德上走到了尽头，“只剩下德国人和俄罗斯人”是“高尚的民族”。如果出于礼貌把这些说法当作“有点夸张”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说得就令人讨厌了：“一番令人压抑的大话。德国将在欧洲变得强大，美国将变穷变弱。”博尔吉斯——这位伟大的战士和梦想者为何突然失去了信心，无人可以解释。几天后还有续篇：“博尔吉斯关于意大利和同盟国的夸夸其谈让人难以忍受。真丢人。”正如托马斯·曼第二天所记录的，伊丽莎白反对丈夫的说法：“因为昨天说过了头，麦迪给他洗脑了。”[\[115\]](#)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于4月4日告别时，眼看着要告别女儿和外孙女，心情复杂，既轻松又惋惜。

4月，戈洛·曼被调往伦敦。没过几个星期，美国国防部宣传处把他从情报机构挖走。美国人决定不跟英国人合作，而是建立一家自己的广播电台：美国欧洲广播电台（American Broadcasting Station in Europe，简称ABSiE），主要是想跟英国广播公司那样，向德国人民广播。戈洛·曼播送新闻，还把文章翻译成德文。虽说这也不是他想象的战斗行动，但比无聊的情报工作要好。

艾丽卡·曼也来到了伦敦，却不十分满意。达夫·库帕让她觉得厌烦，想尽快甩掉他。她问弟弟克劳斯，她为什么从来没有过一段有

理智的爱情史？^[116]他也不清楚。晚上，她经常跟弟弟戈洛一起喝上一杯威士忌。戈洛写信告诉家人，说艾丽卡十分沮丧，因为美军不允许她直接上战场进行报道。^[117]

克劳斯·曼更接近世界大战厮杀的战场。他跟着宣传队随第五集团军穿越意大利。克劳斯撰写传单和文章，用高音喇叭向那些撤退的德国士兵喊话。主要的信息是：投降吧，战争胜负已定。“谁现在还战死，那就是白白地送死。”^[118]6月，克劳斯从罗马给母亲写信，说美军迅速向北挺进。7月，他写信给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谈到父亲的预言——战争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将结束，他不得不置之一笑。事实上，到战争结束还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克劳斯的好心情估计跟一件事情有关，此事他立刻告诉了母亲。有人问他，姓什么，他回答说“曼，先生”，那人说：是的，他已经听说过他了，他就是克劳斯·曼的儿子嘛……真的克劳斯·曼很开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了个大风头。^[119]



图30 戈洛·曼服务于美军

父母亲很感谢三个大孩子写来的每一条消息，这表明他们都很好，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手信息。尤其是托马斯·曼，不管听到还是读到任何有关战争的时事报道，他都记下来。令人吃惊的是，凡是报纸上印的，他都特别当真。对于7月20日施陶芬贝格

（Stauffenberg）刺杀希特勒，托马斯·曼写道：“越来越深信，从未有过用炸弹刺杀希特勒。”^[120]过了不久他又深信，德国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作为最后的手段，有人试图开展一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争。^[121]到了秋天，他相信德国不会投降，因为德国人民就这么打下去，能拿7000万德国人怎么样呢？^[122]有许多冒险刺激的故事，诸如希特勒想乘坐一艘专用潜艇经阿根廷逃往日本的秘密计划等，都不加批评、考证地出现在他的日记或信件里。^[123]

《赡养者约瑟》终于出版了，有德文版和英文翻译版。艾格尼丝·迈耶又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书评，大唱赞歌。《纽约时报》的评论说，毋庸置疑，这是一部伟大和睿智的作品，但人物的僵化和夸张的对话亦显而易见。一言以蔽之，《赡养者约瑟》无聊得让人抓狂，又无聊得叫人昏昏欲睡（“aggressively dull”，“soporifically dull”）。《纽约客》的评论家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不用说，托马斯·曼是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写作《约瑟》这样的作品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成为“健在的最伟大的无聊家”之一。^[124]对此，托马斯·曼的反应一如既往：他表示，这些指责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同时强调，这些批评家批评的都没有道理。这部小说的核心他们都没有抓住：这是“一部非常幽默和通俗的小说”。^[125]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说他不知道，人们何以会有这种印象，好像他要达到“奥林匹克水准”似的。其实，他不过是想让“人们开怀大笑”，“另外还要表现不断升华的谦虚本身”。^[126]各种批评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在后来几个星期的各种信件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及这些批评。

几十年后，露特·克吕格（Ruth Klüger）指出，《约瑟》除娱乐价值外，还有另一种价值范畴。这位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儿时侥幸逃过大屠杀，她写道，就托马斯·曼所有作品里的犹太人物形象而言，他并非完全没有表达过偏见。但在《约瑟》四部曲中，她看到了一个非犹太人对犹太传统进行了“极其出色和热情的赞颂，这种传统在西方文学中几乎没有可以与之比肩者”。[\[127\]](#)

这一年，曼氏家族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赡养者约瑟》虽说受到了批评，却被美国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收录，这就意味着有20万册的铁定销售额。1944年2月，托马斯·曼自己告诉艾格尼丝·迈耶，其实不再需要为国会图书馆工作的那笔资助。但这笔钱他是否还可以拿到年底，“以支持我哥哥和其他那些没有受到美国笑脸相迎的作家”？[\[128\]](#)

夏天，米夏埃尔·曼带着一家人来太平洋帕利塞德的父母家中待一段时间。对此，托马斯·曼非常欢迎：他很高兴见到最疼爱的弗里多；在《浮士德博士》写作期间，米夏埃尔是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作为音乐家可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些解释。卡蒂娅·曼以犀利的眼光审视儿媳妇跟儿子的关系，写信把自己的印象告诉克劳斯：格蕾特是“个模范媳妇，跟着这位易冲动、特别好受刺激的年轻丈夫真不那么容易”，但她也有点“马虎和草率”。[\[129\]](#)更严重的是，卡蒂娅认为，格蕾特为了丈夫而忽视孩子，“我可从来没这样做过”。[\[130\]](#)

这段时间，在母亲的信里还能听到另一种声音：思念家乡。无论在气候还是其他一些方面，太平洋帕利塞德都宛若天堂。卡蒂娅·曼写道，“尽管如此，我其实还是更喜欢待在家乡”。然后她察觉到，家乡的概念有问题，就继续写道，她说的“不是这里的家乡，而是任何一个我现在不在的地方。我开车外出，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割舍得下，根本没有时间来享受这天堂般的生活，并非我该做的事情多得无

法形容，而是我已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精力不足、笨手笨脚的老太婆了”。^[131]卡蒂娅·曼一生有50年是在家乡慕尼黑度过的，虽说经过了11年的时间，家里在太平洋畔有一幢又大又漂亮的房子，但她还是未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

除儿子米夏埃尔外，托马斯·曼这一年找到了另外一位音乐顾问，此人对正在写作的小说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阿多诺是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跟马克斯·霍克海默正在共同撰写《启蒙辩证法》（*Dialekt der Aufklärung*）一书。为了合作，阿多诺搬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霍克海默家附近。阿多诺愿意将他的才能与知识提供给托马斯·曼使用。他解释音乐的复杂问题，甚至起草了某些段落。这就引发了问题，对此，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进行了思考：“借用阿多诺的音乐思想，虽然借用是写书的一种创作原则，但在实践中运用却很难堪，只有创作时从思想上透彻地加以消化吸收，才能让这类借用名正言顺。”^[132]换句话说，托马斯·曼是在抄袭。“这类高级抄袭”他早已进行过，并且把它当作艺术形式加以辩护。但阿多诺为其小说《浮士德博士》起草的段落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范围。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关于伤寒的医学百科词条，那时他对之略加修改后移植进《布登勃洛克一家》，目的是通过罕见的、触动读者心灵的客观描写解释小哈诺（Hanno）的天亡。而这里，另一个人像合著者一样在写作。这种方式折磨着他的自豪感，也对他的作家天赋提出质疑。托马斯·曼不得不经常进行自我辩护。几个月后他在日记里写道，“阿多诺的一些东西为我所用”，然后进行自我辩护，这些辩护都用引文和法语来表述，这是遇到特别棘手的情况时的通常做法：“我用我觉得对我有用的地方。”^[133]这显然是在拷问自己的良心，他必须再三地抚慰自己。

从纽约传来不好的消息：莫妮卡·曼情况不佳。母亲给儿子克劳斯写信，谈到莫妮卡写来的“一封彻底绝望的信，依我的感觉，这封

文绉绉的信并非完全诚实，有点难堪”，“她在信里悔恨交加地抱怨说，她的存在毫无意义，也一事无成”。卡蒂娅·曼认为，莫妮卡对自己的处境感觉极为不爽，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那么她完全是咎由自取。虽然她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表露自己瞧不起自己，但她绝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永远也改不了的”。从18岁起，她把“所有的提醒和建议都当作耳旁风”，她的“懒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却用音乐作为幌子来加以掩饰，这一点谁都能看穿”。现在很难再给她提建议和进行帮助了。

[134]莫妮卡状况不好的消息一直传到托马斯·曼那里。他跟妻子讨论那封“令人不快的信”。他在日记里写道，不应当因为这封信而变得太软弱。[135]这个女儿千万别又住到他们身边来。

跟他的两个哥哥不同，米夏埃尔·曼不想自愿报名当兵。他的音乐生涯刚刚起步，作为中提琴手只能坐在乐团的最后边，好在是在一家闻名遐迩的交响乐团。虽然他是著名乐团的乐手，还是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但都无济于事，他还是被抽去参加入伍的体检。米夏埃尔通过不同的办法，诸如故意劳累过度、超量喝咖啡和失眠等，试图让自己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处于不合格的状态。[136]面对这些老掉牙的欺骗伎俩，美军根本就不上当，给他寄去了入伍命令。1945年1月，他开始基础训练。

10月，博尔吉斯一家来到太平洋帕利塞德，跟去年一样，一来就是三个月。卡蒂娅·曼预言说，这个女婿不会是“省油的灯”。[137]女儿一家人刚到，托马斯·曼就在日记里给自己打气，说博尔吉斯“经常想去演讲”。他一来又发表“意大利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仇视英国的言论”，说意大利似乎遭到系统性的摧毁，“好像同盟国要负责任似的”。[138]“女婿的讲话令人压抑”，[139]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这句话和类似的表达经常被记在日记里。对此，卡蒂娅·曼写道，她佩服丈夫的超级忍耐。[140]12月中旬，女儿一家临行前两个星

期，这种忍耐差点就到头了。“跟博尔吉斯去爱娃·赫尔曼家吃完饭。博尔吉斯信口开河、滔滔不绝的样子可怕至极。他是个好人，爱虚荣，知道感恩，性格像火山，令人难以忍受，虽然不时会和解。”托马斯·曼受够了：“我要一个人在家里。”^[141]

对忍耐的考验刚刚结束，新的不幸又降临了。海因里希·曼的妻子内莉于12月17日服用超量安眠药自尽。托马斯·曼对他哥哥的这位“自我毁灭的夫人”哀悼有限。^[142]克劳斯·曼的看法也类似。他曾这样评价内莉·曼，说海因里希·曼像带着“传染病”一样地跟随她生活。^[143]现在，克劳斯·曼写信给母亲，谈到海因里希妻子之死对“可怜的老头海因尼”来说肯定非常可怕，估计他不久也将跟随她步入黄泉。她难道就不能再等上几年吗？这样做实在是懂礼数又缺乏自律！^[144]克劳斯还给伯伯写信：他非常想念伯伯，并且非常同情他深爱的妻子；她是战争的牺牲品，希望她能生活在一个好人不用自杀的世界里。“写得太好了，我亲爱的克劳斯”，海因里希·曼在信上写下了这几个字。^[145]

在伦敦的美国欧洲广播电台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了戈洛·曼是何等的英才。到了秋天，他已经成为德语广播的主要评论员，德语部副主任。^[146]他定期就政治与军事形势撰写稿件并进行广播。上级的规定非常明确：不说谎（“永远不说谎话”），对未来也不作任何承诺。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就宣传工作而言是个问题：如果不作任何承诺，如何能够劝说对手投降呢？戈洛·曼在美国欧洲广播电台赢得了上司的信任，上司同意他在贯彻这一规定时可以灵活运用。他在广播讲话里——这些讲话作为录音资料保留了下来——至少泛泛地谈到了未来。他于12月23日解释说，美国人或英国人的真正面目不是体现在被炸毁的德国城市，“而是他们怎样打造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还体现在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家的历史与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他们正在为德国制定的计划里，这些计划不是复仇的计

划，而是恢复秩序、保持克制的计划。但是，要达成和平需要涉事双方的努力。只要德国还服从其领袖，继续工作，继续战斗，那么，毁灭就将继续下去”。^[147]1944~1945年新旧交替之际，戈洛·曼讲述6月西方大国诺曼底登陆给战争带来的决定性转折。德国人的阿登战役的攻势已经被击退。戈洛·曼说，战争现在势如破竹般地接近尾声。“到了年底，那些微不足道、个人清白的德国人能给自己、家人还有朋友祈求些什么呢？首先是祈求团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生活在和平之中。”从政治权力来看，德国在不久的将来无所作为，这是咎由自取。但并非永远如此：“一个新帝国——一个知道自己的国界、尊重他国国界的德国，有朝一日将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前提是，德国人确实想要如此。”^[148]

托马斯·曼身在远方的加利福尼亚州，此时又一次产生了怀疑。他在日记里写道，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如果之前德国没有迅速取胜的话”。^[149]

托马斯·曼正在写作《浮士德博士》中关于魔鬼的篇章，过圣诞的客人陆续抵达：卡蒂娅·曼的哥哥彼得·普林斯海姆和米夏埃尔·曼一家。博尔吉斯一家也还没走，家里人满为患。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住在朋友家里。年底，两个最小的孙子和外孙女托尼和多米尼卡跟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在洛杉矶的一神教堂受洗。^[150]

在此期间，艾丽卡·曼也到家了。她带来了一位新女友，名叫贝蒂·诺克斯（Betty Knox），也是战地记者。这只“猫头鹰”——这是家里称呼客人的口头禅，要是父母觉得客人来头不明，表示不满的话——“有点疯狂”，父亲在日记里写道。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允许她留宿，在客厅里过夜。^[151]

夏天，艾丽卡·曼曾打算在爱情方面找一位理智一点的，可她并没有做到。她向克劳斯坦陈，贝蒂确实有点“奇怪”，远不是那种讨

人喜欢的伴侣。^[152]几个月后，艾丽卡带着这位疯疯癫癫的女友——这时艾丽卡已经晓得她“像地狱般疯狂”^[153]——参加在布鲁诺·瓦尔特家为父亲举办的一场私人生日庆典。母亲认为这样做好像“不大合适”，这种关系让她“感到不安”：“每只猫头鹰我们都可以勉强接受，但这只——我担心的是，从长远来看怕不是什么好鸟。”^[154]

艾丽卡·曼和布鲁诺·瓦尔特结束了两人的秘密关系。此时，瓦尔特的妻子在中风后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卡蒂娅·曼担心，女儿走不出对瓦尔特爱情的阴影，他一旦单身，恐怕又会死灰复燃。母亲本人跟克劳斯一样反对这一关系，并在8月已经写信告诉他：“反正从长远来看，这种关系让我堵得慌，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个很大的错误，就像一个女儿要嫁给自己的父亲那样。我根本就不想再要一个跟我们同辈的女婿，就一个我已经受够了。”^[155]艾丽卡这次来父母家看望父母，虽说带了个贝蒂·诺克斯来，卡蒂娅·曼的担心却愈发强烈。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虽说布鲁诺·瓦尔特很快就要成为鳏夫，但他是胆小鬼，在跟艾丽卡的关系上，既害怕女儿的妒忌，也不敢直对他朋友托马斯·曼的犀利眼神。她在给克劳斯的信里补充说，父亲“完全不知情，也根本不要他知道”。^[156]



图31 1944年圣诞节，米夏埃尔跟伊丽莎白·曼携家带口来父母家过节

*

德军在盟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德国在战争的阴影下所犯的罪行日益清晰，其规模还是超出了任何想象，尤其是在东欧。托马斯·曼于1945年1月14日发表《致德国听众》的广播讲话，其中报道了红军在刚解放的卢布林附近的马伊达内可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Majdanek）所发现的一切：“要是你，我的德国男同胞，我的德国女同胞，要是你想听的话：尸骨、石灰桶、氯气瓶、焚烧炉，一堆堆从受难者身上扒下来的衣物和鞋子，有很多小鞋子，儿童穿的鞋子。”托马斯·曼说，这不是集中营，而是“巨型的杀人基地”。[\[157\]](#)

作为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为OWI）”的工作人员，戈洛·曼对所有罪行的了解要比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父亲更加清楚。1945年1月27日解放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当日，他在一篇广播讲话中解释说，应该怎样看待德国的宣传——面对盟军的超级优势，这些宣传把德国的抵抗始终定性为“自由之战”：他从对平民百姓犯下的战争罪行到德国在占领下的东欧滥杀无辜和无数次强奸谈起，讲到残暴的强迫劳动和德国领导层的自豪——“杀死了300万犹太人，只是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要更为可怕，这在事后才知道。戈洛·曼在广播讲话中继续说道，“这样一种自由之战在全世界找不到一丁点同情，或一丁点尊重”。[\[158\]](#)戈洛·曼有多激动，那些暴露出来的伤天害理之举让他多么沮丧，这一直传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父亲写了一封信给他鼓励，并建议他，应该买药效很强的止痛和镇静药Optalidon，[\[159\]](#)他自己经常服用。

在此期间，戈洛·曼已经不大相信，他在电台的工作有多大意义。在广播讲话中，人们听到他的愤怒，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比如，他在3月对走向覆灭的“第三帝国”说了下面一段话：“是结束这场游

戏的时候了。凡是纳粹不想结束的地方，盟军就来结束。”^[160]他在许多信里写道，上战场就必须开枪，否则就在家待着。^[161]有一次，他甚至提出申请，要求调到战斗部队去。上级不为所动，不放他走。3月，他从伦敦被调往卢森堡的军事广播电台。戈洛·曼在美国欧洲广播电台的上司乔治·汉夫曼（George Hanfmann）给他带去了一封推荐信。汉夫曼在信里写道，他和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在能听到的盟军广播电台中，戈洛·曼是最杰出的德语评论员。^[162]

他弟弟的军旅生涯完全不同。1945年1月初，米夏埃尔·曼跟妻子格蕾特和孩子们告别，去福特奥德（Fort Ord）参加基础训练，该地离他曾经的住地卡梅尔不远。10月时，美军曾很快就看穿了他假装不适合入伍的把戏，现在，部队发现他真的不适合当兵。服役的第一天，米夏埃尔·曼就被打发回家。部队认为，他在使用武器时过于紧张。^[163]

克劳斯·曼跟随部队在意大利向北挺进。1月底从佛罗伦萨写信给母亲，说他在那里见到了妹妹莫妮卡以前的几位熟人，他非常吃惊地获悉，妹妹当年在这座城市是多么受欢迎。他写道，结识耶律·兰易的那几年或许是她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成功的一段时期。“太叫人伤心了”，^[164]卡蒂娅·曼对此感到意外，回信介绍莫妮卡的最新情况。莫妮卡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倾诉着感情，有点难堪”，还说她在学习速记，“估计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实际中得到运用，但她就是这么天真，总以为要是她学点什么——不管是钢琴还是其他什么——别人就不能要求她做什么了”。几个月来，莫妮卡跟卡蒂佳·韦德金德生活在一起，她姐姐帕梅拉曾经想跟克劳斯结婚。卡蒂娅·曼认为，这两个女人的组合倒也挺幸福。在此期间，莫妮卡还找到了几个男朋友。“到最后，她在纽约会跟在佛罗伦萨一样留下同样的美名”，母亲还写道。“奇怪的是，人们认为她的信也非常感动人，到最后，我成了找麻烦和不公正的人。可我不信我是这样的人。”^[165]

战争结束前夕，即4月12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上一年11月，他以多数票第四次当选为总统——最多连任两次的限制到1947年才实行。竞选期间，托马斯·曼曾不惜为“他的”总统的选战摇旗呐喊。现在，他和全家人都对罗斯福的死讯感到震惊。后来，他在《致德国听众》的广播讲话中说，一位“伟人”去世了，“一位政治艺术家，一位英雄，一位人类的朋友和领袖”。听到希特勒幸灾乐祸的嘶喊，托马斯·曼的反应非常愤怒。“罪孽呀罪孽，你这个愚蠢的灭绝种族的刽子手，他不得不走了，你却还活着！你怎么还活着呢？”^[166]

在柏林的帝国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和戈培尔一时还在相信命运的青睐，希望出现一种类似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的“奇迹”：那是七年战争时期，腓特烈即将面临战败，俄国女沙皇却驾崩了，其继任者为腓特烈的崇拜者沙皇彼得三世（Peter III），他让俄国退出了战争。希特勒帝国的奇迹没有出现。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接任美国总统一职后，这场世界大战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罗斯福去世18天以后，希特勒自杀身亡。

莫妮卡·曼从4月开始写类似日记的东西。她不是描述日常事件，而是连篇累牍地叙述她联想中的各种印象与想法。之所以这样写，是她觉得全家都会读到。莫妮卡这样做不是因为“无聊而瞎转悠”，“我之所以自顾不暇，并非游手好闲，也不是缺少自律”。有人告诉她，说她有当“艺术家的禀赋，最有可能成为音乐家”。这话是谁说的，她不愿意透露。但人们还补充说，她沉浸在“梦幻”之中，所以没有成功，而且她“懒惰、杂乱无章”。这种说法她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我很清醒，有条有理，而且很努力”，可人们不相信她。莫妮卡还写道，她有着“许多天赋”，但“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不过是“起步较晚而已”。她正在寻找一种“使命”，一种让她“心灵满足”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能挣钱的一种工作。学习速写没能让她找到

这种满足感。她为何要将生活填得满满的，就像帽盒子一样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我父母在抚养我——倘若我一文不名，不得不去工作的话，那我多少也会感到满足的。”但她不相信，“外部的条件决定我们怎样去生活”。她思绪纷飞，无事不想，其中包括跟卡蒂佳·韦德金德艰难的共同生活，然后谈到自己的家庭。“我为什么害怕？我有18个月没见到父母了，现在他们想来看我，我害怕。”这是天生的，是一种必须克服的童真。她认为，最关键的不是考虑“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及其决定会说“什么”，而是“我怎么说，我怎么想”。

从道德上给自己打完气并与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和解后，莫妮卡探讨起更大的各类挑战。此时，欧洲的战火已经熄灭，德国人也已投降。莫妮卡认为，所有这一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使用暴力不可能让任何事情变好，哪怕是为了一桩美好的事业而战斗。世界需要“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它不能从大众中发展而来，而必须“从个体中发展而来”。她的结论是：“世界上的问题”千千万万，都必须解决。但这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倘若不是所有人都成为基督教徒的话”。[\[167\]](#)

艾丽卡·曼写信给弟弟克劳斯，她听说有一群弱智的崇拜者，以同屋卡蒂佳·韦德金德为首，鼓励她妹妹莫妮卡开创文学、政治和哲学的生涯——“善良的上帝啊！”[\[168\]](#)

莫妮卡怕啥就来啥——父母真的启程前往美国东部，在那里跟女儿见面。这趟旅行是托马斯·曼的“荣耀之旅”：[\[169\]](#)首先去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题为《德国与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这是个棘手的题目，“不管你怎么写，都是错的”，之前他写信告诉戈洛，“你会得罪所有人，德国人及其保护者与毁灭者”。[\[170\]](#)战争结束三周后，这位另一种德国的伟大代表在演讲中阐述原始德意志的偏好：内向、浪漫、音乐与亢奋，作为最后也是邪恶

的结果是，民族社会主义由此而产生。这篇演讲采用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中的诸多观点，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托马斯·曼不再替德意志背离启蒙与民主进行辩护，而是指出这种立场对希特勒带来的祸根要负多少责任。他宣布，没有两个德国，即一个邪恶的与一个美好的德国，“而是只有一个德国，其美好的东西在魔鬼的诡计下变成了邪恶的东西。邪恶的德国是好东西蜕变为恶，是美好变为不幸、罪孽与覆灭”。托马斯·曼解释说，所有这一切他都不感到陌生，“我亲身经历过所有这一切”。[\[171\]](#)

作为对民族社会主义历史根源的分析，这次演讲说服力不够。尽管如此，这也无愧于一场意义重大的亮相和一篇伟大的演讲：托马斯·曼指出，他的个人发展与那种蜕变有着共通之处，同时指出陷入这种湍流的危险——它导致了希特勒犯罪统治的形成。托马斯·曼跟保守的德国市民阶层不同，他虽出身于此，也自视为其中的一分子，却没有掉入这一湍流之中，而是领导了一场有代表性的斗争。现在，战争结束三周后，他没有欣喜若狂地站到胜利者的一边，而是承担起共同的责任，指出自身的危险：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见证。

“荣耀之旅”结束后，接下来是一次演讲之旅，其高潮是在纽约及其周边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庆祝托马斯·曼70岁生日。其中一场庆典由他的出版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举办：来了许多客人，一个钢琴三重奏演奏了舒伯特的曲子，大家为老寿星举杯庆贺。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卡尔·祖克迈耶拿起一把琉特琴，重重地踩着地板，唱起他的《干邑鸟歌》（*Cognacvogellied*）。托马斯·曼一点也不开心，日记里写道：“祖克迈耶唱得不怎么好。”[\[172\]](#)

七周后，即7月，是卡蒂娅·曼62岁生日。没有一个孩子在太平洋帕利塞德跟母亲一起庆贺生日；也没有人提醒父亲。卡蒂娅·曼写信给克劳斯，说托马斯·曼“完全忘了”这一天，“一句祝贺的话也没

有，有点让人伤心”。^[173]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提到克劳斯和伊丽莎白曾打电话祝贺，^[174]至于自己的过失，他对自己和后世都保持缄默。

战争结束后不久，克劳斯·曼前往德国。他现在是美国军队报纸《星条旗报》（*Stars and Stripes*）的记者。5月10日，他站在慕尼黑的父母家前。粗看上去，“波辛”（这幢位于波辛格大街的别墅的昵称）并无损坏，从里面看，这幢别墅被一颗炸弹击中而遭到了破坏。克劳斯·曼继续向南部德国进发，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并同其他记者一起看到了被囚禁的赫尔曼·戈林，他很肥胖，不停地出汗，发誓说一点也不知道谋杀犹太人的事情。克劳斯·曼还见到了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对他的“自恋与幼稚”感到气愤，^[175]还跟幡然悔悟的演员埃米尔·杰林斯谈话，然后拜访了维尼弗雷德·瓦格纳（Winifred Wagner），她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和希特勒的朋友。克劳斯在给父母写信时提到，她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纳粹的人。^[176]克劳斯·曼驱车前往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见到了海因里希·曼的前妻米米，她因为侥幸才逃脱了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Theresienstadt）的厄运。克劳斯·曼把所有这一切都写信告诉父母，并著文发表在《星条旗报》报上——很少泄露情感，好似雾里看花一般：关于特雷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报道甚至有些美化的倾向。^[177]

克劳斯·曼很失望，他回到了家园，却物是人非，他对德国人很失望：他们没有忏悔，也不想知道德国对世界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克劳斯找不到任何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失望，所以只能通过一种态度：他想尽快离开。



图32 克劳斯·曼在慕尼黑被毁坏的父母旧居前

9月，克劳斯·曼离开美军，移居罗马。他写信给父母，要他们绝对不要考虑返回德国的废墟，回到物质与道德的混乱之中。[\[178\]](#)克劳斯·曼的斗争结束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实现另一种德国的斗争。在那么多年的流亡日子里，还有他的信件里，克劳斯总是抱着希望与期待，希特勒倒台后可以重归故园——这场斗争将得到回报。这一梦想破灭了。克劳斯·曼在1945年面对的现实是：“故园虽在，却无法返回。”[\[179\]](#)

艾丽卡·曼终于又可以投身于第一线了。几个月来，她不得不从二线——战争的后方进行报道。深思熟虑的考量、对细节的审视、关于新闻背景的报道，这些都不是她的拿手好戏。艾丽卡是那么希望能跟随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而不是大战过后去询问一些伤兵。巴黎解放后，她从那里发来一篇报道，这是她发表过的最差劲的文章之一：该文不作任何思考，照搬照抄游击队员们编造的谎言故事，对巴黎上流社会进行笼统的批判，说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曾经跟德国人合作过。^[180]现在，战斗结束了，艾丽卡·曼扩大了行动范围。她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主管部门，允许她去探访“big 52”——52个纳粹大梟，这些人被盟军囚禁在卢森堡蒙多夫（Mondorf）的一家旅馆里。艾丽卡·曼在给父母写信时这样描述她的印象：“很难想象有比这更阴森恐怖的冒险了。”她在旅馆里走了一圈，见到了“戈林、帕彭（Papen）、罗森贝格（Rosenberg）、施特莱希（Streich）、雷伊（Ley）——所有的恐怖世界[还有凯特尔（Keitel）、邓尼茨（Dönitz）、约德尔（Jodl）等人]”。“由于不允许我跟这帮蠢货本人说话，事后我派了一名审讯官员去他们那儿，让他们知道我（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入那个地方的女人）是谁。雷伊听后大叫：‘够了！’，然后用手打脸。罗森贝格嘟囔道：‘见鬼了’。施特莱希哀叹道：‘我亲爱的上帝呀，这个女人曾经来过我的房间。’”戈林最为激动。“他说，要是我作自我介绍的话，他本来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倘若是他处理曼的案情，他会作出另一种处置的。像托马斯·曼这种级别的德国人本来肯定可以顺从第三帝国的。”^[181]随后，艾丽卡·曼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介绍她的这次重大亮相，《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把这篇文章登在了头版头条。

艾丽卡·曼在德国穿梭旅行，大部分情况下自称是美国人“米尔德里德（Mildred）”，用美国口音进行采访，她很喜欢伪装，喜欢亮相。她还报道了纽伦堡法庭对战争罪犯的第一轮审判。艾丽卡在那里

遇到了儿时的朋友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1933年后他留在了德国，曾写信鼓励克劳斯和艾丽卡·曼回国。作为记者，他一直爬到了《克拉科夫日报》（*Krakauer Zeitung*）副刊主编的位置。当他想问候艾丽卡时，她不予理睬。那些昔日的朋友和熟人，只要他们跟第三帝国有过什么瓜葛，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就不想跟他们往来。

戈洛·曼也同样去了纽伦堡，是从诺伊海姆（Neuheim）去的，这时他在当地帮助建立法兰克福电台（Radio Frankfurt），即黑森州广播电台（Hessische Rundfunk）的前身。他也伤心地看到第三帝国把流亡者跟故乡撕裂开来的深渊。戈洛对那些德国人的态度也很失望——他处处都遇到这种态度，也讲给父母听：人们不停地哀叹、抱怨，说无辜者不得不替有罪者受过。若是追问，有罪者最后怎样了，听到的回答始终是：许多人根本就没有罪，这些人现在也溜之大吉了。^[182]跟他的哥哥姐姐不同，戈洛·曼还看到了德国人的苦难。他写信告诉父母，鉴于德国城市遭到了无法想象的破坏，他认为没有必要对德国人民进行这样的惩罚——那些本人犯下罪行的人除外。他对美国同事的无动于衷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德国人是咎由自取。^[183]戈洛·曼跟老朋友进行联系并重新认识他们。艾丽卡·曼从德国发回的报道表达了誓不两立与憎恨的情绪，对于这些情感，戈洛·曼感到陌生。他写信告诉女朋友爱娃·赫尔曼，艾丽卡甚至宣称，德国人有足够的食品可供食用。这真的不符合事实。^[184]营养专家确实计算过，战后的最初几个月，美国占领区的德国居民所获得的定量配给人均每天的营养值在850~1150卡路里之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饥饿的问题估计会更加严峻。^[185]

有一个问题，三个最大的孩子意见一致并写信告诉父母：曼氏家族不应该考虑回到德国。

这年秋天，来自德国的一封信寄到了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托马斯·曼手里。在纳粹统治时期深居简出的作家瓦尔特·冯·莫洛（Walter von Molo）要求他以“好大夫”的身份回到德国。这一呼吁也公开发表了。托马斯·曼也公开回应：《我为何不回德国》（*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他指出个人的原因：年龄、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在美国成长的孙儿孙女等。作为理由，他还谈到对故乡的异化感、德国的罪责、“流亡的悲哀”、被逐出家园的痛楚以及自己家乡慕尼黑的瓦格纳抗议事件等。最后，他还写道，在他眼里，“那些1933年至1945年间能够印刷的书籍比没有价值还没有价值，拿在手上很不舒服。这些书里散发着血腥与罪孽：应当统统扔进废纸堆里。”^[186]至于说他本人1933年至1936年间公开保持沉默，为的是不妨碍他的书籍在德国出版，这一点托马斯·曼成功地忘在了脑后。作家弗兰克·蒂斯（Frank Thiess）发表了一篇文章，以激烈的措辞批驳托马斯·曼，并试图用“内心流亡”——他自认为属于这一圈子——来贬低真实的流亡。蒂斯写道，经历过大火、饥饿与轰炸所获得的知识与经验远胜于这样的悲剧——在“国外的包厢里或大花坛边袖手旁观”。^[187]



图33 艾丽卡·曼跟女友贝蒂·诺克斯在一起

戈洛·曼写信向父母汇报德国的这场辩论，对蒂斯等人的厚颜无耻感到气愤。他在寄往加利福尼亚州的信里写道，蒂斯的信几乎跟艾里希·艾博迈耶的一封信一样让他感到“恶心”。艾博迈耶是哥哥克劳斯的旧友，曾经每年都为戈培尔拍摄几部电影并因此而成为巨富，虽然如此，他“现在却把自己打扮成‘内心流亡者’和伟大的殉道者”。^[188]有些情况他没有告诉父母：他并不喜欢父亲的立场，也不喜欢父亲一再卷入这场争论。他写信告诉朋友约瑟夫·布赖特巴赫（Joseph Breitbach），父亲本人对这起“丑闻”要负部分责任。父

亲当然应该留在加利福尼亚州。但他犯不着这样愤世嫉俗地大肆渲染，也不应该跟这些不着调的人进行争论。[\[189\]](#)

22岁的拉尔夫·佐丹奴（Ralf Giordano）系“半个犹太人”，在地下状态中逃脱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噩运，后来成为联邦德国一名著名的敢于争辩的政论家。他在一封读者来信里就托马斯·曼的争论发表了看法：“终于有一位德国人，有勇气讲真话！”德国人民“把民族社会主义抬到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El Alamein），为保卫纳粹一直打到柏林和马格德堡变为废墟，今天，他们对1933年至1945年发生的一切理所当然地没有‘任何罪责’！他们太过胆怯，不敢将可怕至极的思想错误跟谋杀犹太人联系在一起”。[\[190\]](#)像这类声音没有传到美国。托马斯·曼听到的只是“内心流亡者们”的声音——他们高调反驳，十分自信。个别人为了一己之利而攻击他，以便在未来的德国占据有利地位。托马斯·曼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引申出对德国现状的判断。他在给艾里希·卡勒的信里写道：“这是纳粹之国，并将继续这样下去。”[\[191\]](#)

充满着期待的一年在失望中过去。克劳斯·曼写信给母亲，说“世界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它会不会真的将世界推向毁灭？这样也许就一了百了了。”[\[192\]](#)戈洛·曼在医院里过圣诞节，他的膝盖在一起汽车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克劳斯和艾丽卡·曼相聚在苏黎世，跟特蕾莎·吉赛、奥普莱希特一家等朋友欢度节日，疯疯癫癫的贝蒂·诺克斯也在场。不久，艾丽卡·曼也不得不进医院：一场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她写信告诉父母亲，如果美国人把所有好的和新鲜的东西留给德国人吃，留给自己人的尽是些“恶心人的罐头食品”，那么这就是后果。她不久便恢复了健康，以记者的身份穿梭于欧洲大地。

一段时间以来，卡蒂娅·曼告诉孩子们，父亲的健康状况不佳。支气管慢性发炎，发烧，体重在减轻，甚至到了咖啡不想喝、香烟不

想抽的地步。1946年4月初，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医生认为有可能涉及没有痊愈的肺结核病，建议请一位肺科专家诊疗。本来必须做一次非常难受的支气管镜检查，以排除肿瘤的可能。母亲原本既坚强又能干，这封信却给人以无能为力的感觉。她写道，父亲对事态的严重性一无所知，这也必须保持下去。母亲继续写道，要是发现肿瘤，手术是唯一的出路。父亲年事已高，这样做还有意义吗？要是艾丽卡在家该多好呀！母亲哀叹道：“我已手足无措，也很绝望。”

“我哪能一个人作这样的决定？” [\[193\]](#)

没过多久，卡蒂娅·曼找回了那份作决定的气力。她决定进行支气管镜检查，而且是在芝加哥的比灵斯医院。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介绍了一位肺科专家。托马斯·曼非常感激妻子作出所有的决定。至于做这一检查的目的和检查的结果，托马斯·曼一概不知，他也不知道。他仍旧以为是“感染性脓肿”， [\[194\]](#)而在场的家庭成员此时已经知道了真相：肺癌。医生决定，实施手术。从欧洲以最快速度赶回芝加哥的艾丽卡·曼给克劳斯发去一份电报：马丁·贡佩尔特估计父亲存活的可能性为“五五开”。

[\[1\]](#) TM an K1M, 26.1.1942, in: K1M: Briefe, S. 479

[\[2\]](#) K1M an KM, 3.1.1942, in: K1M: Briefe, S. 474

[\[3\]](#) Zit. nach Schaenzler: K1M, S. 351

[\[4\]](#) K1M-Schriftenreihe V, S. 293–295 (und ihm folgend Schaenzler: K1M, S. 350f.) datiert den Selbstmordversuch auf den Juni 1941 mit inhaltlichen Argumenten zum Text *The Last Decision*; Erika Mann datiert den Text und den Suizidversuch ihres Bruders aber auf die Zeit nach dem Ende der Zeitschrift (EM an MiM, 21.11.1968, MON). Die dichte und keineswegs deprimierte Korrespondenz Klaus Manns, seine Pläne und Geldhoffnungen im Juni 1941 sprechen für EMs und gegen die Datierung Krolls und Schaenzlers, während er im

Februar 1942 regelrecht verstummt. Das Tagebuch setzt am 19.3.1942 wieder ein

[5] KM an K1M, 11.1.1942, MON

[6] KM an K1M, 13.2.1942, MON

[7] KM an K1M, 11.1.1942, MON

[8] Tgb TM, 16.4.1942

[9] Tgb TM, 7.2.1942

[10] Tgb TM, 4.2.1942

[11] Tgb TM, 5.2.1942

[12] TM an Agnes Meyer, 16.2.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69

[13] Tgb TM, 5.7.1942

[14] Tgb TM, 20.2.1942; TM an EM, 24.2.1942, in: EM: Briefe I, S. 185

[15] TM an Agnes Meyer, 21.2.1942 und 25.2.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73 und S. 375

[16] Agnes Meyer, 25.1.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61; vgl. auch TM an EM, 24.2.1942, in: EM: Briefe I, S. 185: Da nennt TM sein Consultant-Gehalt noch »Archie's genialen Einfall«, nach dem Direktor der Library of Congress, Archibald MacLeish

[17] TM an Agnes Meyer, 30.1.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 363

[18] Tgb TM, 4.4.1942

[19] Tgb TM, 3.4.1942

- [20] Vgl.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S.926
- [21] Tgb TM, 29.3.1942
- [22] EMB an KM, 16.1.1942, TMA
- [23] EMB an KM, 10.5.1942 und 29.6.1942, beide TMA
- [24] TM an EMB, 7.6.1942, MON
- [25] Tgb KIM, 11.6.1942; für die Edition wurde das Tgb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 [26] Tgb KIM, 8.6.1942
- [27] KM an KIM, 29.4.1942, MON
- [28] Tgb TM, 26.6.1942
- [29] GM an Erich von Kahler, 5.6.1942, in: GM: Briefe, S.57 und S.60
- [30] GM an Manuel Gasser, 21.6.1942, in: GM: Briefe, S.63
- [31] TM an Agnes Meyer, 22.1.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359
- [32] KM an KIM, 29.7.1942, MON
- [33] Tgb TM, 3.10.1942; KM an EMB, 10.10.1942, MON; FM: Achterbahn, S.69 und S.17f.
- [34] HP an KM, 8.12.1941, in: HP: Briefe an KM II, S.305
- [35] Schaenzler: KIM, S.356
- [36] TM an Agnes Meyer, 15.10.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435
- [37] TM an KIM, 2.9.1942, in: KIM: Briefe, S.487f.

[38] GM an EMB, 10.10. [1942] , zit. nach Lahme: GM, S.168

[39] Reinhold Niebuhr: Mann Speaks to Germany, in: The Nation, 13.2.1943, S.244; vgl. Harpprecht: TM, S.1310f.

[40] TM: Der Judenterror, in: TM: Essays V, S.202f.

[41] Tgb K1M, 22. u. 24.10.1942

[42] Tgb K1M, 25.10.1942

[43] Tgb K1M, 26.10.1942

[44] KM an K1M, 29.10.1942, MON

[45] KM an K1M, 17.10.1943, MON

[46] EM an Lotte Walter, [13.11.1942] , in: EM: Briefe I, S.186

[47] Vgl. EM an KM, 12.1.1942, MON

[48] Vgl. Alexander Stephan: Im Visier des FBI. Deutsche Exilschriftsteller in den Akten amerikanischer Geheimdienste, Stuttgart/Weimar 1995, S.174-193

[49] W.H.Auden an EM, [Ende Mai 1939] , in: EM: Briefe I, S.131

[50] KM an EMB, 29.7.1942, MON und Tgb TM, 20.9.1942

[51] Tgb TM, 22.11.1942

[52] Tgb TM, 27.11.1942

[53] Tgb TM, 30.11.1942

[54] Tgb TM, 10.12.1942; 11.12.1942; 13.12.1942

[55] MiM an KM, [Dezember 1942] , TMA

[56] Tgb TM, 15.12.1942

- [57] Tgb TM, 4.1.1943 und 8.1.1943
- [58] Tgb TM, 17.3.1943
- [59] TM an K1M, 27.4.1943, in: K1M: Briefe, S.509f.
- [60] TM an Agnes Meyer, 27.6.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412
- [61] K1M an KM, 14.2. [1943] , in: K1M: Briefe, S.498
- [62] KM an K1M, 18.2.1943, in: K1M: Briefe, S.499
- [63] Zitat aus einem-unklar, ob fingierten oder echten-Brief von K1M an EM, 14.2.1943, den er abdruckt in: K1M: Wendepunkt, S.609
- [64] K1M an Lotte Walter, 28.2. [1943] , in: K1M: Briefe, S.502
- [65] EM an TM, 29.1.1943, in: EM: Mein Vater, S.169
- [66] TM an Agnes Meyer, 23.1.1943, in: TM-AM: Briefwechsel, S.459
- [67] EM an KM, 11.1.1943, in: EM: Mein Vater, S.168
- [68] EM an KM, 29.1.1943, in: EM: Mein Vater, S.172
- [69] 卡蒂亚·曼所用“Appelbäumchen”一词意为“小艾普鲍姆”，又与“Apfelbäumchen”（苹果树苗）形近。
- [70] KM an K1M, 18.2.1943, MON
- [71] Andert: MoM, S.103
- [72] Tgb TM, 11.9.1942
- [73] TM an Agnes Meyer, 12.12.1942, in: TM-AM: Briefwechsel, S.441
- [74] EMB an KM, 20.10.1942, TMA

[75] KM an K1M, 4. 2. 1943 in: K1M: Briefe, S. 494

[76] EMB an KM, 23. 9. 1942, TMA

[77] TM an K1M, 9. 3. 1943, in: K1M: Briefe, S. 505

[78] KM an K1M, 15. 3. 1943, MON

[79] Zur FBI-Akte von K1M: Alexander Stephan: Im Visier des FBI. Deutsche Exilschriftsteller in den Akten amerikanischer Geheimdienste, Stuttgart/Weimar 1995, S. 155-174, hier S. 164; vgl. Schaenzler: K1M, S. 360-364

[80] KM an K1M, 4. 6. 1943, MON

[81] Deutsche Version des Textes in: EM: Blitze, S. 281-290

[82] EM an K1M, 26. 10. 1943, MON

[83] EM: Pulverfass Palästina, in: EM: Blitze, S. 290-300

[84] EM an K1M, 4. 8. 1943, MON

[85] So der Sohn von beiden im Interview: John Julius Norwich: »Deep down, I' m shallow. I really am«, in: The Telegraph, 4. 6. 2008

[86] KM an K1M, 29. 6. 1943, MON

[87] Vgl MiM an TM, 6. 7. 1943, GKFA 10. 2, S. 1088-1114

[88] KM an K1M, 23. 7. 1943, MON

[89] GM an Erich von Kahler, 19. 9. [1943] , zit.nach Lahme: GM, S. 169

[90] GM an Eva Herrmann, 10. 10. [1943] , zit.nach Lahme: GM, S. 170

[91] Vgl. Tgb K1M, 1. 7. 1943

[92] Tgb TM, 14.10.1943

[93] TM an Agnes Meyer, 2.6.1943 und Agnes Meyer an TM, 28.5.1943, in: TM-AM: Briefwechsel, S.486 und S.484

[94] TM an Agnes Meyer, 2.6.1943 und Agnes Meyer an TM, 28.5.1943, in: TM-AM: Briefwechsel, S.486 und S.484

[95] Tgb TM, 6.8.1943

[96] Tgb TM, 12.9.1943

[97] Agnes Meyer an GM, 4.10.1943, zit.nach TM-AM: Briefwechsel, Anhang, S.986 f.

[98] GM an Agnes Meyer, 17.10.1943, in: GM: Briefe, S.70 f.

[99] Agnes Meyer an GM, 19.10.194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00] TM: Schicksal und Aufgabe, in: TM: Essays V, S.232 f., 234 f.

[101] TM an Konrad Kellen, 19.8.1943, in: TM: Briefe II, S.329

[102] Vgl.KM an K1M, 17.10.1943, MON

[103] KM an K1M, 17.10.1943, MON

[104] MoM: USA 1940-Notizen,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46 f. (Die Notizen, die MoM 1976 veröffentlicht, können, jedenfalls teilweise, nicht vor 1943 entstanden sein.)

[105] GM an Agnes Meyer, 21.11.194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106] Tgb K1M, 3.12.1943

[107] Vgl.Kurzke: TM, S.447

- [108] Tgb TM, 23. 6. 1944
- [109] TM an K1M, 25. 6. 1944, in: K1M: Briefe, S. 526
- [110] GM an Erich von Kahler, 7. 3. 1944, in: GM: Briefe, S. 74 f.
- [111] Tgb TM, 14. 2. 1944
- [112] EM an K1M, 13. 3. 1944, MON
- [113] EM: Eine Ablehnung, in: EM: Blitze, S. 300-302
- [114] Zit nach EM: Blitze, Anhang, S. 496 f.
- [115] Tgb TM, 20. 3. 1944, 23. 3. 1944, 29. 3. 1944, 30. 3. 1944
- [116] Vgl. EM an K1M, 23. 7. 1944, MON
- [117] Vgl. KM an K1M, 14. 8. 1944, MON
- [118] Kinder der Manns, S. 188
- [119] K1M an KM, 23. 7. 1944, MON
- [120] Tgb TM, 14. 8. 1944; vgl. TM an Agnes Meyer, 12. 8. 1944, in: TM-AM: Briefwechsel, S. 580 (»glatter Schwindel«)
- [121] Tgb TM, 23. 8. 1944
- [122] Tgb TM, 18. 10. 1944
- [123] Tgb TM, 18. 9. 1944
- [124] Zit. nach Harpprecht: TM, S. 1414 und 1416
- [125] TM an HM, 29. 7. 1944, in: TM-HM: Briefwechsel, S. 344
- [126] TM an Agnes Meyer, 17. 7. 1944, in: TM-AM: Briefwechsel, S. 572

[127] Ruth Klüger: Thomas Manns jüdische Gestalten, in: Ruth Klüger: Katastrophen. Über deutsche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4, S.54

[128] TM an Agnes Meyer, 16.2.1944, in: TM-AM Briefwechsel, S. 539

[129] KM an K1M, 14.8.1944, MON

[130] KM an K1M, 10.7.1944, MON

[131] KM an K1M, 24.8.1944, MON

[132] Tgb TM, 29.9.1944

[133] Tgb TM, 23.7.1945; vgl. Tgb TM 3.10.1944, dort zitiert TM diesen Satz von Cyrano de Bergerac ebenfalls

[134] KM an K1M, 23.10.1944, MON

[135] Tgb TM, 23.10.1944

[136] MiM: Fragmente, S.142 f.

[137] KM an K1M, 6.10.1944, MON

[138] Tgb TM, 8.10.1944

[139] Tgb TM, 9.10.1944

[140] KM an K1M, 14.10.1944, MON

[141] Tgb TM, 13.12.1944

[142] Tgb TM, 20.12.1944

[143] K1M an KM, 29.3.1941, in: K1M: Briefe, S.444

[144] K1M an KM, 31.12.1944, MON

[145] K1M an HM, 1.1.1945, in: K1M: Onkel Heinrich, S.67

[146] Vgl. Lahme: GM, S.174–178

[147] GM: Essays, S.174

[148] GM: Essays, S.176 f.

[149] Tgb TM, 31.12.1944

[150] Vgl. zu TMs Beziehung zur unitarischen Kirche Heinrich Detering: TMs amerikanische Religion. Theologie, Politik und Literatur im kalifornischen Exil, Frankfurt a.M.2012

[151] Tgb TM, 31.12.1944

[152] EM an K1M, 15.1.1945, MON

[153] EM an K1M, 8.5.1945, MON

[154] KM an K1M, 14.3.1946, MON

[155] KM an K1M, 29.8.1944, MON

[156] KM an K1M, 19.2.1945, MON

[157] TM: Essays V, S.258

[158] GM: Essays, S.182

[159] TM an GM, 26.2.1945, in: TM: Briefe II, S.414

[160] GM: Essays, S.188

[161] Vgl. Lahme: GM, S.178

[162] Vgl. Lahme: GM, S.178

[163] MiM: Fragmente, S.142 f.

[164] K1M an KM, 27.1.1945, MON

[165] KM an K1M, 19.2.1945, MON

[166] TM: Essays V, S.282, 283 f.

[167] Das New Yorker Tagebuch von MoM aus dem April und Mai 1945 ist abgedruckt (im englischen Original und einer deutschen Übersetzung) in: Andert: MoM, Zitate: S.228-230, 235 f., 267 f., 277 und 279 f.

[168] EM an K1M, 8.5.1945, MON

[169] KM an K1M, 1.6.1945, MON

[170] TM an GM, 26.2.1945, in: TM: Briefe II, S.414

[171] TM: Essays V, S.279

[172] Tgb TM, 13.6.1945; vgl. 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 Bedroht-Bewahrt. Weg eines Verlegers, Frankfurt a.M.1967, S.212

[173] KM an K1M, 25.7.1945, MON

[174] Vgl. Tgb TM, 24.7.1945

[175] K1M an TM, 16.5.1945, in: K1M: Briefe, S.775 (engl.Original ebd., S.535: »selfishness and naiveté«)

[176] K1M an KM, 13.6.1945, MON

[177] Vgl. Schaenzler: K1M, S.375 f.

[178] Vgl. K1M an TM, 16.5.1945, in: K1M: Briefe, S.540

[179] Deutscher Titel eines Textes von K1M für *Stars and Stripes*, 20.5.1945, in: K1M: Aufsätze V, S.224-230

[180] Der deutsche Text in EM: Blitze, S.306-314

[181] EM an KM, 22.8.1945, in: EM: Briefe I, S.206 f.

[182] GM an KM, 4.4.1945, zit. in Tgb TM 1944-1946, Anhang, S.613 (Brief verschollen)

[183] GM an KM, 4.5.1945, zit.in Tgb TM 1944–1946, Anhang, S.640 f. (Brief verschollen)

[184] GM an Eva Herrmann, 7.1.1946, in: GM: Briefe S.80

[185] Vgl.Günter J.Trittel: Hunger und Politik. Die Ernährungskrise in der Bizone (1945–1949), Frankfurt a.M./New York 1990, S.36 f.

[186] GKFA 19.1, S.72–82

[187] Zit.nach Jost Hermand/Wiegand Lange (Hg.): »Wollt ihr Thomas Mann wiederhaben? «Deutschland und die Emigranten, Hamburg 1999, S.24 f.

[188] GM an KM, 6.9. [1945], zit.nach Tgb TM 1944–1946, Anhang, S.705 (Brief verschollen)

[189] GM an Joseph Breitbach, 18.2. [1946], in: GM: Briefe, S.82 f. (»pomp and bitterness«)

[190] Leserbrief vom 19.1.1946 in der Hamburger Freien Presse, zit.nach TM Chronik, S.417

[191] TM an Erich von Kahler, 13.2.1946, zit.nach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S.489

[192] KIM an KM, 23.11.1945, MON

[193] EM an KM/TM, 10.1.1945, in: EM: Mein Vater, S.184

[194] KM an KIM, 4.3. [richtig: 4.] 1946, MON

第六章 希特勒之后（1946~1952）

1946年5月3日，柏林德意志剧院的帷幕拉开。卡尔·施特恩海姆的《伪君子》（*Der Snob*）正在首演。已经好几天了，只有在黑市上才能搞到票。主人公克里斯蒂安·马斯克（Christian Maske）是个无所顾忌的伪君子，阴险狡诈，平步青云。此时，他正站在舞台上，本应当喊一声“这实在是荒诞不经”，可观众不让他喊。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让主人公无法开始演出。观众的热情倾注给德国戏剧舞台的大明星——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他将哈姆雷特和梅菲斯托扮演得惟妙惟肖，无人能够望其项背。此前，格伦特根斯在勃兰登堡的苏联特别拘留营度过了九个月的时间；现在他被释放，又回到了舞台上。

克劳斯·曼，他的前小舅子和早年的朋友，正坐在第一排。克劳斯·曼是《梅菲斯托升官记》的作者，这部小说据称并不是揭露小说，却充满着对格伦特根斯的仇恨，此人曾因为野心膨胀，跟第三帝国的当权者们同流合污。听到《伪君子》的演出消息和演出阵容后，克劳斯·曼就在《艺术与政治》（*Kunst und Politik*）杂志上撰文，称这一阵容“令人发笑”；他声称，就个人而言，他基本上还是“看好”格伦特根斯的。“但我觉得，戈林的这位知心朋友用不着这么着急嘛。”^[1]在这首演之夜，格伦特根斯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这让克劳斯·曼深感不悦。同样让他不悦的是，舞台上看到的这个人魅力未减、“光彩照人”：“依旧是那么楚楚动人，打着白色领带，脸色微红，头上套着金色的假发：这位柏林的宠儿光环永不消退，纳粹时期如此，纳粹垮台后照样如此。”^[2]

克劳斯·曼本来就很沮丧：无论是政治形势，还是战后德国人对流亡者不闻不问的态度，都让他感到沮丧，更糟糕的是，他本人一事无成。他写了一个名为《第七个天使》（*Der siebente Engel*）的剧本，可没人愿意演这出剧。他打算拍摄一部关于莫扎特的电影，布鲁诺·瓦尔特也将参与，后来又想拍一部关于一个艺术造假者的影片，可这些想法没有一个能够实现。年前，克劳斯·曼在罗马结识了一位电影导演，这位导演想拍摄一部关于美军在意大利征战的电影，虚构中穿插真实的记录：将虚构的美军士兵跟意大利平民百姓交往的故事跟战争的真实摄影剪辑成片。本来要克劳斯·曼参与其中，可他跟其他剧作家发生了争执；克劳斯·曼提交的对话不被看好，被人改写。电影还没开拍，克劳斯·曼就已退出。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这部电影——《同胞》（*Paisà*）于9月在威尼斯双年展上首映，成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大师之作。片尾字幕没有提到克劳斯·曼的名字。

在剧院跟格伦特根斯相遇一周后，克劳斯·曼给母亲写信。他听说父亲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对其他情况却所知甚少。“这次患的是什么病？”他还没有给父亲本人写信，“虽然我应当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为好，特别是不清楚，他究竟哪里不好，他本人对病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如果不麻烦的话，他想在7月回父母家。其实他想多待些时间，得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在父母家里待的时间如果太久”，又会产生“不便之处”，因为他“自己不开车，会产生依赖心理”。也许可以在靠近父母的地方租一幢房子，“前提是，能弄到一辆老式福特车和一位年轻司机……司机得会做点饭，相貌要养眼。”克劳斯·曼写道，具备这些条件后，他也许想待上个半年，不知道母亲能否顺便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房子。“要是你们那儿有什么好吃的，我就学莫妮卡，去你们那儿吃，吃完了就不帮着洗碗了。”^[3]

卡蒂娅·曼在回信中写道，父亲目前已经克服了种种磨难。他们刚离开芝加哥的医院，住进一家旅馆。“这次倒大霉了，要按正常情况看，他显得十分消瘦、无精打采，其实，他能恢复到这一步，真要感谢上帝，现在离那场可怕的手术才不过四个星期，那场手术本来也可能会要他命的。”父亲的右肺被切除了四分之三。母亲告诉儿子，“可惜是肺癌”。“但病人自己一点也不知情，就算他曾经怀疑过——这我肯定相信，也彻彻底底地把它遗忘了，而完全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说法——他的病是没有大碍的肺脓肿。”他们不久将跟艾丽卡一起回家。家里随时欢迎克劳斯回来，时间长一些也没问题。至于儿子提出的各种要求，租房子外加司机和做家务，卡蒂娅·曼只能摇头。母亲写道，这些事现在真的不能考虑了，新近的房价涨势就更不容许这样做了。“要是运气好，可以租到一间房，起价100美元”。[\[4\]](#)

回到太平洋畔他钟爱的家里，托马斯·曼当天在日记里对过去几周作了总结。他谈到“传染性的肺部脓肿”，手术和“后来的检查”——结果“极佳”。他对生活很乐观。“光线和色彩让人心醉神迷。花园和风景犹如天堂一般。”他想很快就回归写作——彻底回归正常生活。日记里还提到，“一天抽了几根香烟”。[\[5\]](#)

戈洛·曼的书终于出版，该书早于四年前即已完稿：《欧洲的秘书：拿破仑之敌弗里德里希·根茨的一生》（*Secretary of Europe. The Life of Friedrich Gentz, Enemy of Napoleon*，简称《根茨》）由著名的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曼在芝加哥的医院里读了这本书。他在6月写信给儿子，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重要而积极的书评让他感到非常高兴。《根茨》一书的翻译版也是一部“出色并吸引人的著作，判断清晰，思想独到，它给作者带来各种荣誉，而且必将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和资助”。[\[6\]](#)接下来，托马斯·曼请儿子出出主意。一个德国的“和平同盟（Friedensliga）”请他就

任荣誉主席，他请戈洛·曼考量一下，就任此职意味着什么。他并不想“总是逃避”，但同时“根本就不相信，受毒害的德国青少年可以通过一个（立刻就会被视为叛国的）和平同盟得到改造。青少年不可能从内部，而只能通过外部，通过外部的现实，通过铁一般的世界的现实来加以改造，他们的愚蠢只有在这些现实面前，而且是50年以后才能最终得以消除”。现在，随着东西方冲突的开始，德国人的这种愚蠢“又会受到怂恿和固化”。“德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大国间的矛盾和新的战争。一个德国的和平社会又有何用？”^[7]

此时，戈洛·曼是法兰克福广播电台的美国文职督察官。他对旧日的同胞同样持批判态度，虽然没有父亲那么刻骨铭心。“我可以继续待在德国并且挣很多钱”，他在夏天写信告诉阿尔玛·马勒-维尔费——1940年那场法国冒险经历时的难友，“但这里的生活无论对心灵、思想还是身体都太不健康，所以我想离开”。^[8]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罪行和流亡岁月在他跟故园之间撕开了一条沟壑，现在他无法跨越——最多只能在个人层面上，在跟作为个体的德国人的接触中才能做到，他不是跟这些人再度见面就是在过去几个月里新交了朋友。艾丽卡和克劳斯姐弟俩也做不到。少年时代的朋友W. E. 聚斯金德——艾丽卡·曼在纽伦堡审判时见到过他，却装作素昧平生——写信给克劳斯·曼，试图通过回忆共同的经历重新唤起旧时的友谊。聚斯金德除了留在德国并跟第三帝国的生活作过妥协以外，并没有什么孽迹，这是很清楚的。克劳斯·曼友善地给他回信并寄给他一包食品。克劳斯写道：“回忆让人感伤、也很美好，却不能填平沟壑。”^[9]

秋天，艾丽卡·曼踏上了报告之旅。她在欧洲经历了很多事情，因而可以给美国人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此次的报告之旅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总共讲了92场。父亲给处在“喧嚣的孤单”中的女儿写信：“我们非常想你，这你知道。只要你在，家里便多一分温馨和热闹，也更有朝气。”女儿的生活情趣对“我们的小薄书”——这是

父亲的信中用语——也有积极的影响。《浮士德博士》一书托马斯·曼越写越长。小说的有些段落作者自己也觉得太过冗长，可他很不情愿舍弃已经写就的句子。他不愿意自己来作删减，所以艾丽卡在夏天接手了这一任务，并且让托马斯·曼非常满意，他本来就很愿意这个女儿经常在自己的身边，支持和帮助自己。托马斯·曼告诉女儿，自己也在计划一次演讲之旅，甚至要去欧洲，“前提是有你的陪同，这样我才能鼓起那一点点勇气”。父亲还报告了一些家中的琐事，谈到弗里多和托尼，他们因为父母要单独去墨西哥度假，所以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待了几周，这让他很开心。母亲的双胞兄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和他那个叫作“胡布西（Hubsy）”的儿子从日本移居美国，接下来一段时间也想在家里住——“真可怕”。莫妮卡不久也要来访。父母曾经考虑，让她移居瑞士，“那里不允许工作，这样，她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好好过日子，亲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要为这个‘传奇之家’争光！”父亲还写道，艾丽卡还应该在华盛顿作一场报告，“气气艾格尼丝·迈耶”。[\[10\]](#)

半年后，托马斯·曼在妻子和女儿艾丽卡的陪伴下，真的踏上了赴欧之旅——这是1939年来的头一回，当时曼氏一家在战争爆发后不得不从欧洲辗转前往美国。1947年5月，三人漂洋过海抵达英国。还在船上时，托马斯·曼就接受了英国通讯社路透社的采访，就当前的政治问题表明了立场。之前不久，温斯顿·丘吉尔公开发表讲话，此时他已经落选，不再担任英国政府首脑，而是出任在野党领袖。丘吉尔为一个统一的欧洲造势——一个在法国领导下、以德法合作为主导的欧洲。托马斯·曼觉得这一想法很荒唐。他认为，丘吉尔是过气的人物，作为保守派人士理解不了未来世界。托马斯·曼认为，西方结盟反对苏联无济于事。“只有美国更加社会主义化，同时苏联更加民主化”，局势的紧张才能化解。听得出他对德国充满着不信任，说不应当让人感到还会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托马斯·曼批评德国人的自我怜悯，指责他们缺乏跟同盟国合作的诚意。他目前不想访问故国。[\[11\]](#)

在采访中，这个问题回答得十分坚决，其实他的态度事前并非如此。托马斯·曼曾经思来想去，是否要回德国，因为这类邀请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到了他这里，回国的计划却因为女儿艾丽卡的强烈反对而搁置。接下来，他在英国作了几次演讲，参加了几场欢迎会。然后，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乘坐一架私人飞机飞往苏黎世，在那里受到出版商奥普莱希特夫妇和格蕾特·曼——她在看望自己的父母——以及孙子弗里多和托尼的欢迎。

托马斯·曼的采访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翻译上的一个错误更让不满的声音夹杂着刺耳的弦外之音。托马斯·曼宣布，他不喜欢“在盟军的刺刀下”访问慕尼黑或波恩——波恩大学不久前给他恢复了1936年取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翻译的版本里这样写道，波恩大学是在盟军的施压下重新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所以 he 不想访问德国。在接下来的几次采访并在《致德国人民书》（*Botschaft für das deutsche Volk*）中，托马斯·曼试图解释真相，并且较为温和地重复了他的一些其他说法，可是，德国正好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一机会，对这位德国流亡人士的代表人物进行攻击，说他如此尖刻、如此不讲道理地谈论德国。



图34 1947年，托马斯·曼跟女儿艾丽卡和孙子弗里多和托尼在苏黎世-克洛滕机场

在一片众怒之下，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于6月前往瑞士的弗里慕斯（Flims）休假。艾丽卡从苏黎世给父亲写信说，“这帮病人”——即德国人——败了他的兴致，使他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度假，这让她“伤心和光火，在心里感到愤怒”。她认为，不去德国旅行的决定完全正确。“在目前情况下，不管你怎么做，都无法跟这些人相处，越少打交道越好，（对大家）都省心，而且从长远来看，前景要好些。”^[12]不应该跟德国和德国人发生任何瓜葛。艾丽卡的态度非常坚决，并以这种态度敦促父亲，托马斯·曼虽说也持批判态度，同时却十分渴望看到昔日的家园。

戈洛·曼于1946年秋返回美国，自此成为设在纽约的美国之音广播电台（Voice of America）的工作人员，他从远方关注着这场围绕父亲展开的辩论。他很恼火，既对父亲，也对艾丽卡。他问瑞士朋友马努埃尔·加瑟，什么叫“到了今天，憎恨已经化为瓦砾的、臭气熏天的德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我理解不了；我竭尽全力，试图让

父亲回到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上来，所有的努力却都化为乌有。”

[13]戈洛·曼还写信给其他德国朋友，如记者多尔夫·施泰恩贝格（Dolf Sternberger），说他并不赞同父亲跟姐姐的不和解态度。

[14]戈洛的气愤经过他人传到了艾丽卡那里，为此，他不得不替自己的批评辩护，诸如批评她对父亲的负面影响等。戈洛在回应姐姐的指责时，一开始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大肆渲染不访问德国，这样做非常不幸。”父亲跟德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容易，当下就更为不幸、更为矛盾、更为糟糕了。原因在于他发表的关于德国人的言论，忽冷忽热，变幻无常”。对此，艾丽卡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她应当更好地利用其对父亲的影响。[15]这种话艾丽卡·曼当然容不得她弟弟来说。结果，姐弟之间留下了深深的裂痕。

这年夏天，托马斯·曼在瑞士跟弟弟维克多重逢，这在战后是头一回。他感觉不好，而且事先受到艾丽卡的警告。艾丽卡在上一年春天就已见过叔叔，并在给父母的信里给他下了严厉的结论。她写道：“自我辩护，自我欺骗，这在德国很普遍”，而维克多就是个例子，就那么“一个非常典型的条顿小人物”，连“真理跟一块肥皂的区别都分不清”。[16]托马斯·曼跟小弟在一起也觉得不舒服，弟弟在第三帝国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人，一个沉默的受益者。这场会面发生在1947年的6月，事后，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谎言，遮遮掩掩，难堪的拥抱。这一切都那么怪怪的。”[17]

父亲、姐姐和哥哥好像对德国以及他们个人在德国的前途都已不再看好。戈洛·曼的看法却不一样。战争还在持续时，他比艾丽卡和克劳斯要悲观一些，曾经预言说，流亡者在战后成不了大气候；现在，他变得乐观了，相信有那么一天，流亡者又可以在德国和欧洲有所发展，不管在政治还是个人事业方面，即便不是就在眼下。秋天，戈洛·曼在克莱尔蒙特（Claremont）一所学院接手了一个讲师职位，离父母家不过半小时车程。但他并没有考虑完全以美国为家，跟欧洲

的联系也不应该中断。“我们必须做到，至少有一条腿踏上欧洲的土地——哪怕所处的地位十分尴尬”，他在给流亡的同命人艾里希·冯·卡勒的信里如是说。^[18]戈洛·曼努力乐观行事，但他看得非常清楚，流亡者身负沉重的枷锁，世界大战的残酷对他和其他人的一生造成了巨大影响。这些人和他一样，在年轻时就被逐出家园，现在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戈洛·曼写信告诉马努埃尔·加瑟，“我那在很多方面可亲可爱、在其他方面又相当讨厌的父亲在各方面过得都要好得多，他一生得到精心呵护，令人羡慕，没有理由故作受苦受难、郁郁寡欢之状，让他周围的人心情不悦，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19]

克劳斯·曼在加利福尼亚州没待多久。1946年11月，他又从纽约给朋友们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一些还不太成熟的打算和旅行计划。要是这些计划均无着落，“那就去好莱坞挣点钱，这或许更明智些”。^[20]从1925年开始写作生涯起，克劳斯·曼就一直说要拍电影。虽然一再进行尝试，而且有着再好不过的关系，还毫不胆怯地对父亲的多部长篇小说进行改编，历经21年之久，却没有丝毫进展。虽说如此，他还是放不下好莱坞。另一个念头也再次萌发：克劳斯·曼想成立一份新杂志。《综合》（*Synthesis*）杂志要以四种语言出版，成为国际性的文化与政治论坛。这一次倒没有走到破产那一步，因为杂志在成立前就已经进了坟墓。9月，克劳斯·曼从巴黎写信给姐姐艾丽卡。他们俩的一个共同出版计划已经夭折，他们打算出一本关于1944年至1946年欧洲见闻的书，却没有哪家出版社有兴趣出版关于德国崩溃的故事。商家们想向前看，看到积极的东西，看到歌颂美国人的贡献——不管是克劳斯·曼还是他姐姐，谁都拿不出这类作品。克劳斯·曼还写道，曾有计划对他的几本书进行翻译，译成英语和法语。他正在把自己的作品《转折点》译成德语，做起来却十分艰难。这位昔日的写作快手——往往快过了头——为了遣词造句而绞尽脑

汁。他的情绪很差。“没有能让我开心的事。”^[21]毒品早已再次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10月，《浮士德博士》在斯德哥尔摩版全集里出版。托马斯·曼的这部音乐小说叙述浮士德跟魔鬼进行交易，反映着社会的现实：德国人内心的非政治化倾向——他自己就曾因此而备受煎熬——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最后堕落到大众对希特勒的盲目信仰。一开始，这部小说只能在德国以外买到。就在当月，瑞士发表了两位著名评论家——马克斯·里希纳（Max Rychner）和艾杜亚特·克洛狄充满溢美之词的书评。里希纳大唱赞歌，把《浮士德博士》称作“黑夜里照亮德国的一盏明灯”。^[22]

托马斯·曼熟人圈里的一些人读着这部长篇小说，既吃惊又气愤，因为他们发现，书里对自己不是进行特写，就是作了漫画式的描绘。托马斯·曼跟妻子公开讨论这部小说“赤裸裸的自传性质”，在自己朋友圈内实施的文学“谋杀”，比如对“赖西格”。^[23]老朋友汉斯·赖西格在上一年曾首次寻求联系，托马斯·曼回答说，他肯定没有成为纳粹，两人若见面，也会相互理解。过去，托马斯·曼见到赖西格总是非常开心，现在却责怪他不愿意流亡美国，虽然托马斯·曼在1938年曾出手相助，这一点他告诉了艾里希·冯·卡勒，而没有对赖西格本人直言相告。托马斯·曼只告诉赖西格，他在最新的小说里对他进行了“正确的描述”：“您在书里叫吕迪格·席尔德克纳普（Rüdiger Schildknapp），在别人需要您时，总是找不到您，在其他情况下您却总是讨人欢心。”^[24]赖西格在读到这部小说并看到贪图享乐的寄生虫席尔德克纳普这一人物形象时，真是五味杂陈。

莫妮卡也读了《浮士德博士》一书。父亲给她寄去了一本，她于12月回信表示感谢。莫妮卡写道，自己没有“能力对这本书作出什么评价”，这部小说把一切该说的都说了，“一切都说了——而且比一

切还要多！”这一礼物的“能量不可撼动”。莫妮卡继续写道，要是“我们被卡住喉咙而喘不过气来，要是我们大声呼喊而无人听见，要是我们因恐惧而走向死亡的话”，那就必须“呼救似的大喊一声‘还要’”。“我想说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这本书的质量盖过了内容。‘怎么样’盖过了‘什么’！内容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垃圾，而是超越自我得到了升华——升华为内容的爆炸、内容的繁盛、内容的沸腾……我原本几乎想说，内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小说因其简洁与充实转化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无私而优雅地使其超凡脱俗……其实我就是想说，消极被转化为积极，通过奇迹——艺术的奇迹。”^[25]莫妮卡的信是回应托马斯·曼给她写在《浮士德博士》书上写的题词：“送给小莫妮，她会懂的。”^[26]

*

家庭的另一个成员也发声了。1948年1月，米夏埃尔·曼在《瑞士音乐报》（*Schweizer Musik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书评。这是他平生首次发表作品。父亲对这篇“出色的评论”表示感谢，说他在阅读时不仅作为作者，而且以父亲的身份来看都很满意。可惜不能把这篇德语文章给米夏埃尔的乐团负责人皮埃尔·蒙特看，“他大概会出于尊重马上再给你加几个琴谱架的”。父亲继续写道，米夏埃尔的文章“有很多有益的看法”，比如对小说蒙太奇技术的评论。他暗自问，“这些看法是你自己思考的结果，还是受到家里哪些谈话的启发？”托马斯·曼在结束给儿子的信时写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句子：“你在谈到埃索（Echo）时很有分寸，冷静而得体。”^[27]奈普穆克·施耐德魏因（Nepomuk Schneidewein），又叫埃索，是音乐家亚德利安·勒佛居恩最心爱的侄子。因为勒佛居恩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不可以去爱任何人，所以埃索不得不因脑膜炎而悲惨地死去。这个五岁孩子的悲惨早逝大概是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了，托马斯·曼写信时告诉艾格尼丝·迈耶。^[28]埃索在现实中的原型是弗里

多——托马斯·曼的“最后之爱”。^[29]在文学创作中杀死自己最宠爱的孙子，让他良心上过意不去，因而感到压抑。埃索死去的那一章一定要瞒着格蕾特·曼，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米夏埃尔“镇静”地接受自己儿子在小说中的残酷命运，这让托马斯·曼深感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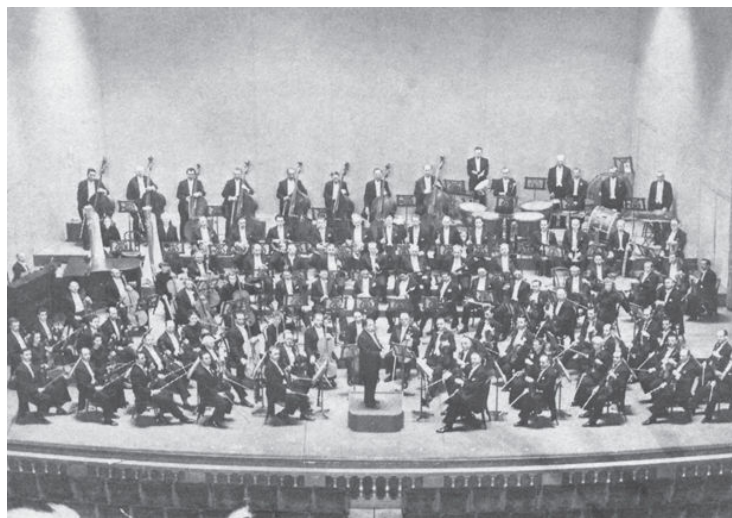


图35 皮埃尔·蒙特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靠墙最右边为米夏埃尔·曼

母亲在替女儿莫妮卡担忧。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克劳斯，莫妮卡相当沮丧地给她写了信，“显然是因为她跟施魏策尔（Schweizer）的关系。经过急促而充满激情的几个星期以后，这一关系现在显然维持不下去了”。1947年夏天，剧作家理查德·施魏策尔为创作电影《乱世孤雏》（*The Search*）来到纽约。他在写剧本，后来因此获得奥斯卡奖。在纽约的半年里，这位已婚的施魏策尔跟莫妮卡·曼发生了一段艳遇。但“这个轻浮的人当然不想”为此而离婚。^[30]一周后，母亲有了纽约传来的好消息。施魏策尔虽然真的走了，回苏黎世他太太那儿去了，但莫妮卡还是给母亲写来了“振奋人心的信”，卡蒂娅写信告诉克劳斯。《新评论刊》采用了莫妮卡的一篇报道，介绍纽约的生活气氛。文章说，在纽约，谁也不管谁，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糟糕的地方。文章这样写道：“极端的不宽容与民主的大度交织在一起，让人产生一种‘恐惧’家园的感觉；你在那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穿

着拖鞋到处游荡，不时又会害怕自己所过的匿名生活，就像害怕鬼魂似的。”^[31]母亲写信告诉克劳斯，“艾丽卡读后感觉很不舒服”。

“我可不觉得有那么糟糕，倒希望可怜的小东西有足够的事情要做，虽然她明显高估了这样做的作用。莫妮卡的文学抱负当然有些不成体系，可是，懦弱、懒惰、自负的她在这世界上又能干什么呢？要说她的行为会伤害到这个传奇之家的其他成员，这我不信。”^[32]

艾丽卡·曼又去旅行作报告了。上一年，她作了超过90场报告，可谓硕果累累。而10月至3月只安排了21场。艾丽卡后来写信告诉克劳斯，“听众们口无遮拦，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是自己害自己。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在大部分情况下，我能让听众勉强表示喜欢，偶尔还会让他们深受鼓舞”。^[33]换句话说：报告的效果很差。艾丽卡·曼强烈批评美国的战后政策，对德国充满着仇恨，鼓吹对苏联采取妥协态度，这一切听众都不想听。多年来，艾丽卡在她的书和文章里以及数百场报告会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让美国人相信纳粹的卑劣，相信甚至必须用武器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现在，她很失望，因为美国人在欧洲不想引入社会主义。突然间，她觉得美国渴望战争，是个帝国主义国家，而当年，这个国家更多是被动地被罗斯福拖进这场世界大战的。艾丽卡·曼后来在一封信里写道，苏联绝对不想打仗，美国却在德国人的支持下急不可耐，要将世界推向另一场“可怕的灾难”。^[34]

艾丽卡·曼作为报告人的生涯慢慢走到了尽头；对此，她自己十分清楚。2月1日，她跟父亲谈过一次话，内容涉及她的未来。他们还谈到一项计划，要撰写一本关于托马斯·曼的书。“我的根本愿望是，艾丽卡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作为秘书、传记作者、遗产守护人和助手”，父亲在日记里写道，还补充说，这次谈话让他“很感动”。^[35]第二天，托马斯·曼跟妻子讨论这件事。至于说女儿艾丽卡现在

要接手许多工作，而这些工作在过去数十年内都是妻子的工作，对此，卡蒂娅·曼的态度如何，他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

克劳斯·曼周游欧洲并尝试着进行写作。4月18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吞下了30粒安眠药环己烯巴比妥（Phanodorm，或称Cyclobarbital），被送进医院后捡回了一条命。然后又去戒毒，不久毒瘾又再复发。克劳斯一再谈到打算写小说的计划，却丝毫没有进展。其自传体小说《转折点》（德文叫作*Der Wendepunkt*）的翻译还没有脱稿。妹妹莫妮卡主动提出帮助他，可她的“翻译初稿”水平很差，克劳斯没法采用。^[36]5月，他又一次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父母家中，以便回家看看并跟艾丽卡一起做些事情。可她没什么时间。克劳斯碰上了一位电影代理人，再一次燃起了对好莱坞的希望，可这回依旧没有结果。一个叫“哈罗德（Harold）”人的出现了，引起了很多麻烦，甚至是跟警察。克劳斯·曼不得不交500美元的保释金。然后哈罗德失踪了，他因入室抢劫而被捕，接着又暂时被放了出来。为了写一篇文章，克劳斯·曼绞尽脑汁，花了几周时间，若在过去，不用两天时间就写好了。“我为何不能写了？我这是怎么了？？”^[37]他第三次尝试着学会开汽车，为此而去驾校学习。他服用兴奋剂，给自己打吗啡和氢吗啡酮（Dilaudid，“艾丽卡送的”^[38]）。7月5日，克劳斯·曼跟哈罗德一起住进洛杉矶的一家租来的房子。夜里，哈罗德单独出门，回来时带来了另一个男子。7月11日，克劳斯·曼打开屋里的煤气开关，躺进浴缸里，切开动脉。邻居闻到了煤气味，叫来了警察。克劳斯得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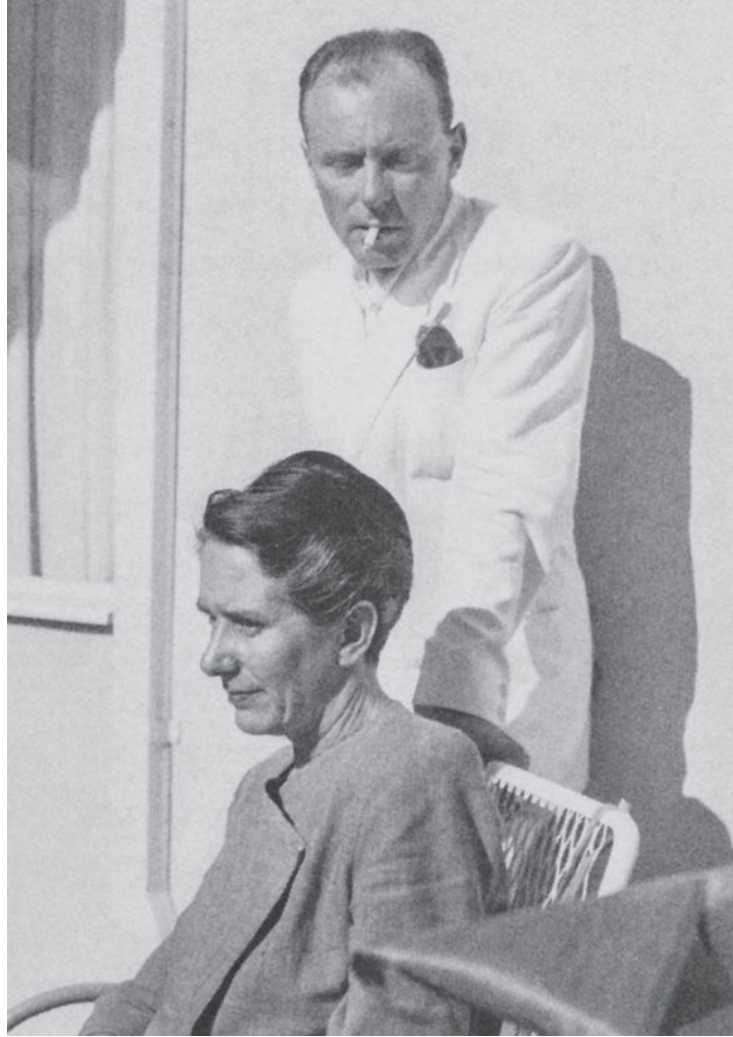


图36 1948年，克劳斯跟艾丽卡·曼在一起，由艾格尼丝·迈耶的女儿弗洛伦斯·霍莫尔卡（Florence Homolka）拍摄

妹妹伊丽莎白正好带着女儿也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她去医院看望克劳斯，然后写信告诉丈夫：“我得老实承认，在怜悯的同时，我感到更多的是恶心。”四天后，她告诉丈夫，希望“这次经历造成的震惊可以起到荡涤的效果，让他不至于在不久的将来重犯这老毛病”。^[39]克劳斯·曼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新闻界并被公布于众，甚至德国报纸也报道说，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想自杀。安慰的信件从各地纷飞而至。厄普顿·辛克莱写道：“别这么做！你得好好写书。”克劳斯·曼觉得这种安慰“一半是慰藉，一半让我羞愧”。^[40]

克劳斯打开煤气开关三天前，他还给恰好也来看望父母的妹妹莫妮卡鼓劲。“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显然又犯了抑郁症……”^[41] 这年夏天，家里一再跟莫妮卡发生争执。父亲认为，“莫妮卡的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不是在家里，要在其他地方。“不同意她大脑有问题的说法。”^[42] 她本来在纽约跟卡蒂佳·韦德金德同屋，两人吵翻了，那里是回不去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停地让人生气，所以父母亲担心，女儿想赖在家里不走了。最终大闹了一场，之后，格蕾特·曼受家庭的委托，把姑子莫妮卡送进了洛杉矶附近一家名叫阿南达·艾什拉姆（Ananda Ashram）的印度疗养院。不久，艾丽卡告诉父母，莫妮卡“离开了其居住地，在洛杉矶的一个熟人处落脚，并要求找一名神经科医生”。^[43]

共同抗击希特勒德国的前盟友分道扬镳了。同盟国之间于1948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冲突。西方民主国家对德国的看法跟苏联大相径庭，以至于西方大国最终打算在西部建立一个德意志民主国家，并于6月实行了货币改革。作为回应，苏联在其占领区内也实行了货币改革并对柏林实行封锁。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由所有同盟国共同管制。是为柏林而战还是任由苏联进行封锁，人们为此进行辩论，艾丽卡·曼也参与其中。8月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电台辩论中，她所持的观点原本比较平和，建议跟苏联谈判。然而，当一位听众提问时，她一激动，就发表了对德国非常严厉的看法：不，不要为了柏林而贸然进行战争，这个城市对西方盟友并不重要。听众提问，德国人现在已经民主化了，是否要拯救他们不受共产党人侵犯时，她回答说，没什么要拯救的，德国几乎没有民主人士。^[44] 这种说法就连父亲也觉得“太敌视德国”了。^[45] 德国公众舆论义愤填膺。

8月，至少有一个好消息传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美国版被“每月图书俱乐部”收录。25000美元的额外收入有了保证——这是戈洛·曼作为学院教师年收入的六倍。

然而，这部小说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程度非同寻常。抱怨的人不少，而且不仅仅是书中人物的原型。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系十二音技法的创立者，而小说里却将这种技法归功于亚德利安·勒佛居恩，勋伯格认为《浮士德博士》剽窃了他的作曲发明，因而怒气冲天，不容安抚。对托马斯·曼来讲，更重要的是，是否要将西奥多·阿多诺所起的作用公布于众，以安抚自己的愧疚之心——阿多诺为他出言献策，在几个关于音乐的段落里甚至是合作者。托马斯·曼在写一篇文章，题为《〈浮士德博士〉一书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想特别褒奖阿多诺所起的作用。对艾丽卡和卡蒂娅·曼来说，这么写太过分，有损于原创天才托马斯·曼的声誉，所以要求删减阿多诺写的段落。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艾丽卡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是她“对阿多诺怀有敌意”；妻子则相反，她觉得，人们将会“大失所望”，要是托马斯·曼实情相告的话：经阿多诺的同意，他“照搬”，即采用了阿多诺的建议。^[46]最后，托马斯·曼同意她们提出的作删减处理的建议。

艾丽卡·曼跟布鲁诺·瓦尔特之间的爱情关系原本已告结束。可到了秋天，剧情反转。卡蒂娅·曼告诉此时已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克劳斯，“傻乎乎的”布鲁诺·瓦尔特把女歌唱家黛莉亚·莱因哈德（Delia Reinhardt）接到美国，当年在慕尼黑她就是瓦尔特的情人。“这事对艾丽卡的触动——历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她确实曾把自己全身心的爱交给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家伙，虽说他在艾丽卡面前表现得糟糕透顶，跟他彻底分手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这一次是艾丽卡自己非要这么做的。”^[47]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1月，母亲告诉克劳斯，在最新的一次谈话中，布鲁诺·瓦尔特对艾丽卡说，他想把他们的关系——他们的爱情火花肯定不断地复燃过——最终回归到一种“自然的”形式上来，对他来讲就是“父辈的基础”上来。^[48]艾丽卡大发雷霆，备受委屈，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她写了好几封愤怒的信，最终断绝了跟布鲁诺·瓦尔特的联

系。在他们谈话前不久，卡蒂娅·曼曾经在信里这样惊叹：“对这么一个谎话连篇的家伙，怎么能够走火入魔到这步田地呢！”^[49]所有这些事都不能让托马斯·曼知道，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艾丽卡总得找出个自圆其说的借口，为何父亲的这位朋友来访时她每次总是碰巧有事要做。对她来说撒个谎并不难，但在这种情况下要比其他情况难多了。

为祝贺克劳斯·曼过42岁生日，托马斯·曼给在阿姆斯特丹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回忆起克劳斯出生时的情形，说所有的人都为这“漂亮的小男孩”感到高兴；托马斯·曼写道，一场盲肠炎“在你9岁时差点把你从我们手中夺走”，“前不久你又差点离去”。他活下来了，全家人无不“打心底里”表示感激，他要继续“活下去”，“你那么可亲可爱，聪慧又理智，虽说内心忧郁，但始终与人为善，勤奋耕耘”。^[50]父亲在替儿子担忧。

圣诞节，一家人聚集在父母家里，克劳斯也从欧洲赶来，只有博尔吉斯一家留在了芝加哥。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来了14天，然后将两个儿子留在祖父母家里三个月，甚至要他们在圣莫尼卡上学。戈洛·曼从父母家写信告诉朋友马努埃尔·加瑟，圣诞节前“父母家里人满为患，吵吵闹闹的”，他还介绍了当学院老师的生活以及对遥远的德国的一些看法。眼下，德国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媒体的文章对姐姐艾丽卡——在她就封锁柏林发表看法以后——进行了恶语中伤，这让他感到厌恶，虽然他在政治上跟姐姐的看法并不相同。表现最抢眼的是《每周回声报》（*Echo der Woche*）主编哈利·舒尔策-维尔德（Harry Schulze-Wilde），他把艾丽卡·曼——按照血缘关系把弟弟克劳斯也带上——称作斯大林的间谍，却连寻找证据的功夫也不肯花。戈洛·曼告诉加瑟，他知道总是谈论“我和德国”这一题目会让老朋友感到厌烦。但是，“我不信任德国人”。舒尔策-维尔德之类的人物在当今的德国如鱼得水，但“我不行；我爱真理、缜密和品味，

容不得半点沙子，我坚决避免任何下流的极端（也包括对德国的极端仇恨），命中注定要走自己的路”。然后，戈洛·曼谈到哥哥克劳斯——他跟加瑟在1933年曾经有过一段绯闻。“现在，他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位置；我也没有多少，只不过我需要的没那么多，我可以保证自己有那么一个苟且偷生的角落，没有多少空气用来呼吸和成长，却有足够的空间让我苟活下去。”克劳斯“目前状况似乎不错，可不管在他还是在其他人那里从来打听不到真相”。^[51]

除夕夜，家里一片热闹的景象，莫妮卡却因“歇斯底里地发飙”而再次显眼。本来说好去纽约的，现在一下子又不愿意走了。卡蒂娅·曼帮她租房子，“经小普林斯海姆的帮助在好莱坞落了脚”，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道。“还来个愚蠢的红杏出墙。[我]没兴趣管这些事。”^[52]几个星期后，莫妮卡最终还是去了纽约，她的一篇文学作品寄到了父亲这里，请求父亲作个评价。“亲爱的小莫妮，该说什么好呢！”父亲回答道，“你这么直截了当地让我进行评价，其实不大合适。你几位兄弟姐妹也都写作，却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从未在编辑作出评价之前评价过他们的什么作品。”托马斯·曼认为，作为父亲，他反正不够客观。莫妮卡的文章是“一篇细腻的抒情小品，也许力度差点，但不乏魅力，韵味十足。和以往一样，你有时候能找到十分地道的表达，有时候则是表面上地道，实际上并不合适”。父亲写道，作品的那些主题并非完全和谐，某些细节也是如此。“写作时，实事求是和准确的记忆至关重要。”他要莫妮卡“不要多想，把这首小诗寄给《新评论刊》”。“我们都相信，这首诗会找到欣赏者的。作品有点梦幻和诗情的品味，即便不完全算得上诗作，那也离一篇诗作不远了，这就够了不起了。祝你好运！”^[53]《新评论刊》感谢赐稿，却不予采用。

对于新年的到来，克劳斯·曼在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是他的决心：“这日记我不再继续写了。我不期望能活过今年。”^[54]

此时，米夏埃尔·曼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想尝试着当个独奏演员并在欧洲巡回演出，主要想演奏现代音乐。他已向旧金山交响乐团辞职，本演出季结束时走人。年初的头几个月，他利用两个儿子在祖父母家的机会着手准备工作。这些计划并非十分成熟。米夏埃尔打算通过私人关系来推动计划的落实。“我弟弟想于1949~1950年演出季在瑞士、德国和其他国家举办音乐会”，戈洛·曼写信给一位在海德堡的女朋友。“他算不上什么音乐大家，但中规中矩，可以演奏各种不知名的、现代的和美国音乐，还有我们这类人不感兴趣的那些音乐。”戈洛·曼问她，能否帮忙在海德堡组织一场音乐晚会。

“不是为了钱，而是玩个心跳、攒点名声而已，可以办个半私人性质的。不知哪儿有喜爱艺术的音乐协会或类似的团体？我附上一份这个乖小伙子的节目单；他至少在政治上无可非议，从未在哪里讲过或写过关于任何人的任何话，连想都没想过，因为他对这些事没有任何兴趣。” [55]

3月22日，米夏埃尔·曼给父母发去一份电报：他将于第二天把孩子们从太平洋帕利塞德接走。“很意外”，托马斯·曼这样评论儿子的临时决定。得把孩子们从学校里接走，祖父不能再带着弗里多散步，再给他读故事书，跟他开心地说笑，就像日记里记录的那样。第二天，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曼带着孩子从太平洋帕利塞德向东横穿美利坚大陆，驱车4500公里，目的地为纽约。途中，他们刚抵达新墨西哥（New Mexico），米夏埃尔·曼便写了一封信给母亲，报告路上的情况：汽车抛了一次锚，他们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村庄并从村子里开过去，还介绍了孩子们的情况。“弗里多当然整天都唠叨在祖父母家里的生活（格蕾特套他的话），比如说托尼怎样把水倒进爷爷的礼帽里，爷爷只是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而你碰也没碰他……”之前，米夏埃尔在太平洋帕利塞德逗留的时间不长，对父母和大姐的印象不佳。“你们三老都有点疲惫不堪的样子，”米夏埃尔写道，“我只希望这跟孩子们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56]

冷战开始，没有任何地方比在德国表现得更为明显。几个月来，西方通过空中走廊向柏林运送物资，以克服苏联的封锁。迄今为止，托马斯·曼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看法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苏联进行的反希特勒的艰苦斗争，他对苏联人民的同情，尤其是对其文学的好感。面对1945年以后斯大林在德国以及东欧国家实行的具体政策，即用暴力分别建立起依附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托马斯·曼开始产生了怀疑。12月，托马斯·曼还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逐步占据上风——并在日记里写道，共产主义虽然“在方法上令人厌恶”，可“现在或许是唯一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力量”。^[57]3月的一个早晨，托马斯·曼在饭桌上说——更多是说给艾丽卡而不是妻子听的：“共产主义可不是什么娱乐。这是一个严酷的苦修士世界。也许我们应当赞同针对它的保护措施”，即赞同美国的“遏制”政策，支持西欧成为在东欧的对抗苏联霸权的反制力量。^[58]对此，艾丽卡·曼肯定不表苟同，但具体答复并无记载。她一再就政治问题进行争论，甚至跟亲爱的父亲，这一点大概可以确定无疑。托马斯·曼在夏天不仅想去欧洲旅行，甚至考虑前往慕尼黑，为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3月的一个夜晚，海因里希·曼和克劳斯及戈洛来玩，又谈起可能去德国的旅行。艾丽卡气呼呼地离开了桌子。父亲感到疑惑不解：“她对我可能访问慕尼黑感到伤心，这样做不理智。”^[59]

在此期间，克劳斯为了写一部小说，想经纽约去阿姆斯特丹，然后继续前往法国南部。小说《转折点》终于完成，克劳斯想在旅行期间交给库埃利多出版社。英语版的《转折点》译成德文时几乎变成了一本新书，因为他对该书进行了大幅扩展。3月20日，他跟父母、弟弟戈洛和姐姐艾丽卡告别。

不久，父母亲在艾丽卡的陪伴下也动身上路，先去美国东部，然后前往欧洲。米夏埃尔·曼已于4月让一家人先行前往苏黎世，5月，他在纽约也登上一艘赴欧洲的轮船。此时，他跟格蕾特一样，已成为

美国公民。姐姐莫妮卡临时决定与他同行。母亲自问，莫妮卡是一时的兴致还是试图在欧洲重新立足。母亲写信给克劳斯，“我怕她用不了多久，就会在瑞士的文学市场毁掉自己的名声：她那半吊子天赋将因其庸俗和不自量力而黯然失色”。母亲还有一条消息——一条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授予父亲歌德奖，打算于8月28日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举行授奖仪式并请他发表演讲。可他们根本不会在欧洲待那么长时间，从根本上来说还夹杂着一份悲观情绪。那些慕尼黑人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一点消息。不久，托马斯·曼决定接受歌德奖和演讲的邀请，艾丽卡很生气，她曾经阐述过反对的理由，态度非常坚决。

在去美国东部的途中，艾丽卡、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先在芝加哥博尔吉斯家停留，然后应艾格尼丝·迈耶夫妇之邀前往华盛顿。这对夫妇为欢迎托马斯·曼举行了一场有三十位高官显贵参加的盛大宴会。第二天，托马斯·曼在国会图书馆发表题为《歌德与民主》（*Goethe und die Demokratie*）的演讲。卡蒂娅·曼觉得华盛顿之行有点败兴，原因是艾格尼丝·迈耶“随着年岁的增加愈加摆阔显富，到了让人实在无法忍受的地步”。^[60]

克劳斯·曼想在法国南部致力于小说创作。小说的框架已经构思完毕，讲的是两个英雄人物在冷战中的故事：其中一个将在故事结尾自刎，另一个则被苏联士兵枪杀。写作进展不顺利。对克劳斯·曼来说，写东西不再得心应手。现在连抑郁的情绪也难以克制，再加上一个毒品贩子卖给他的吗啡不纯净，致使他精神恍惚。一个名叫多丽丝·冯·舍恩坦（Doris von Schönthan）的旧日女友带他到尼斯的一家医院戒毒。克劳斯在日记里只是干巴巴地记事，在信件里却尽显乐观情绪。戒毒前的那一天他给姐姐写信，说她的担心太过“夸张”，他的毒瘾并没那么大：“尽管放心吧！”^[61]戒毒出院后，他从尼斯写信告诉姐姐和母亲，自己是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他已听说法兰克福授予父亲的荣誉。此次访问的时间跟成立西部德意志国家的计划

几乎同步，因此，人们很有可能“提出让父亲担任总统职务”。克劳斯已经想入非非：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开展美好的家族政治”。

“我会这样做，只让男同性恋者拿到好职位；要放开销售有治疗效用的吗啡；艾丽将以‘枢密大臣’的身份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出谋划策，父亲则在波恩跟苏联将军们品尝红酒……”[\[62\]](#)

在妻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托马斯·曼结束了对其欧洲之行第一站——英国的访问。在牛津，他荣获了一项名誉博士学位，在这里和伦敦作了关于歌德的演讲。应接不暇的表彰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过后，他们一行前往斯德哥尔摩。5月21日，白天出游，回到豪华旅馆后接到一条来自尼斯的消息——一封由多丽丝·冯·舍恩坦拍来的电报：克劳斯情况危急，被送进医院。接下来通了电话，真相大白：克劳斯因服用超量安眠药已经离开了人世。

*

7月25日，托马斯·曼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接受歌德奖并发表演讲，题为《1949歌德年致辞》（*Ansprache im Goethejahr 1949*）。这是他1933年后首次访问德国。托马斯·曼从法兰克福前往慕尼黑，该市无动于衷，未作任何接待，他接着又继续前往魏玛。当地授予托马斯·曼新设立的歌德国家奖。西部和东部德国正处于各自的建国时期——联邦德国于5月，民主德国紧接着在10月成立，两国在诸多事情上相互竞争：争夺歌德，争夺托马斯·曼，争夺德国文化。作为被争夺者，托马斯·曼思忖良久，扪心自问，倘若接受东部的奖，是否会损害跟美国的关系。最终，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和魏玛公开宣布的立场占了上风：“我不认识任何占领区。我访问的是德国，作为整体的德国，不是占领区。”[\[63\]](#)一时间公众反应激烈，像炸了锅似的。有人威胁要暗杀“叛国分子”托马斯·曼，他和妻子——艾丽卡拒绝同行——因而全程受到保护，不致受到伤害。但总体

来说，此次的故乡之行算得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德国人和大部分媒体都为托马斯·曼欢呼雀跃。

返回美国之前，卡蒂娅·曼写信给女儿艾丽卡，描述他们的德国之行，尤其是对德国东部的访问。她叙述前往魏玛的凯旋之旅，电台转播车和护驾的车辆，每到一地都要停车：管乐队、学生合唱团、大幅标语、花环，还有无数的市长讲话。特别是青少年组织——德意志自由青年（FDJ），“从早到晚尖着嗓子唱着他们的‘和平版霍斯特·威塞尔之歌’^[64]，时不时地齐声大喊：‘我们欢迎我们的托马斯·曼’”，这些场景让她浮想联翩、不寒而栗，母亲这样写道。“让当地的宣传捞足油水大做文章，不知道是否正确，反正我有点怀疑，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不完全是坏事。”访问魏玛前，曾有人公开要求托马斯·曼在访问魏玛期间应当谈论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Buchenwald），现在那里囚禁着新制度的敌人，其中包括正直的反法西斯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反对将社民党跟共产党强制合并。对于这些声音，托马斯·曼不予理睬，那些精心策划的政治活动他妻子不喜欢，他却没有这种感觉。托马斯·曼在妻子给艾丽卡的信上加了几句话，说他“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她可能无法想象“图林根大众节日”的盛况，当地人那样“疯狂”地欢乐，那样“万众一心”，最后写了一句“没什么可后悔的”。“所有的高人都赞扬我，因为我敢作敢为。”^[65]按照托马斯·曼的定义，很多人都不在“高人”之列，比如欧根·柯贡（Eugen Kogon），他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曾被羁押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柯贡批评托马斯·曼任凭一个新的极权制度向他献媚。不久，东部德国雀跃欢呼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托马斯·曼发表了下面这段讲话，以回应对他访问魏玛的最新批评：“专制的人民国家自有其恐怖的一面，但它亦带来积极的方面：终于有了这么一天，愚蠢和狂妄不得不在这里停止狂吠。”^[66]

圣诞节来临，全家人聚集于父母家中，博尔吉斯一家也来了，米夏埃尔·曼一家这次没来，他们跟莫妮卡一样留在了欧洲。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气氛有些压抑，这是第一个没有了克劳斯的圣诞节日。悲伤的一年即将过去，虽说托马斯·曼表面上在欧洲赢得了无数表彰与光环。儿子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曾跟家人商量该怎么办，随后决定继续其演讲之旅。戈洛也从加利福尼亚州提出建议，要他继续旅行计划。至于戈洛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是否要父亲不加休息、马不停蹄地继续旅行，以至于连安葬克劳斯的时间都腾不出来，这一点并无记载。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5月24日，米夏埃尔·曼从苏黎世赶来，他是唯一的家庭成员，送了哥哥最后一程。弟弟在哥哥的墓前用中提琴演奏了一支巴洛克作曲家贝内代托·马尔切洛（Benedetto Marcello）的曲子。同一天，父亲在乌普萨拉（Uppsala）作演讲，妻子和女儿陪伴在他的身边，而没有去尼斯克劳斯的墓前。人们没有找到克劳斯有什么告别信，有一封寄给母亲和姐姐的信倒是寄到了，写于他服用致命的安眠药的最后那个日子。克劳斯在信里说情况还算“过得去”，然后再次抱怨钱不够用。他提到一家德国出版社给他的一封信，该出版社原本打算出版《梅菲斯托升官记》一书，现在又胆怯地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格伦特根斯在德国又发挥“重要作用”了。“就是不敢担风险！”克劳斯·曼气愤地答复这家出版社。“总是害怕权势！都知道最终的结局如何：最后是那些集中营，事后都说从来没听说过……”^[67]克劳斯·曼在其最后一封信里写道，人们是不会把他的这一答复“公布于众的”。这封信没有指出未来是什么，不过是一曲悲凉的哀歌而已。^[68]

儿子过世后，托马斯·曼作出的反应是进行指责，就像对待他身边的人自杀一样，那些人的死都曾给他造成沉重的打击：“害人、丑陋、残忍、冷酷、不负责任”，怎么“能”让母亲和姐姐承受这样的打击；^[69]他决定不再过问此事——从此，不管写信还是写日记，儿子克劳斯几乎都不再被提起，托马斯·曼也从未去过儿子的墓地。艾

丽卡·曼给她年轻时的情人帕梅拉·韦德金德写信，感谢她的唁函，虽然她俩已多年未有联系：“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只知道，我必须活下去；根本不敢想象，没了他，我这日子如何过得下去。”^[70]圣诞节前不久，托马斯·曼在为艾丽卡发愁，担心她的“愤世嫉俗、好激动”，担心她的“忧伤，以及动辄仇恨、跟一切决裂的倾向”。夏天，艾丽卡最终跟马丁·贡佩尔特吵翻了，他还一直爱着她，她却不想再跟他有任何关系，原因是受《生活》（*Life*）杂志委托，他曾陪同托马斯·曼赴欧洲旅行。卡蒂娅·曼写信告诉伤心欲绝的贡佩尔特，艾丽卡·曼大概知道自己反应“太过分”，但她的悲痛已演变成“破坏性的极度悲愤”，“大概只有一项真正能够让她满意、符合其天赋的工作才能把她从中解脱出来”。^[71]而给父亲当助手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工作，卡蒂娅·曼这样认为，却没说出口。

圣诞节期间，艾丽卡跟弟弟戈洛就政治问题进行争吵，后来又跟“女主席”——小妹伊丽莎白争论，她可能在信里无意间写错了，托马斯·曼这样猜测。^[72]几年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支持丈夫关于创建世界宪法的各种计划，帮助他出版有关的杂志。按照他们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应当迎来一个新时代，对世界的统治应当是全球化的、和平的，不受任何民族利益政策的干扰。不是博尔吉斯，而是他太太要在下一年担任世界邦联主义者总协会（Dachverband der Weltförderlisten）主席一职。艾丽卡·曼讥讽妹妹的雄心大志，嘲笑她为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正在做着黄粱美梦；米夏埃尔·曼也写信讽刺这位“世界女主席及其丈夫”，还顺便提到，父亲最爱的孙子、他的儿子弗里多变得“太胖了”，一副“小市民”的样子。^[73]其实，让伊丽莎白成为女主席的各种计划对她丈夫的打击最大。博尔吉斯觉得受到自己太太的排挤。几个月后，伊丽莎白写信告诉母亲，博尔吉斯有“性格缺陷”，缺乏团队意识，为此，人们才想要她而不是她丈夫担任这一职务的。^[74]到了1949年底，博尔吉斯两口子的冲突也让曼氏家里的气氛更加郁闷。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甚至

向岳母卡蒂娅告状，说“麦迪既有野心又傲慢，试图排挤他”。家人嘲笑这位“傻丈夫”，但这段时间，就连博尔吉斯“火山爆发”式的性格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欢快了。[\[75\]](#)

1950年3月1日，米夏埃尔·曼坐在火车上给母亲写信。他刚结束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之旅，由妻子陪同，正在回苏黎世的路。两个孩子在格蕾特的父母——苏黎世的莫泽尔家里。米夏埃尔写道，他努力在欧洲成为有影响的音乐家，目前成效不错。他告诉母亲，“在马尔默（Malmö），人们一再强调我根本就不需要著名父亲的名声，而在其他所有地方只要客气地提到我们家族的荣耀就行了”。代理人坚持要用曼氏的显赫名字做广告，这可以理解。过去的几个月里，米夏埃尔·曼在德国和瑞士举办音乐会，他拉中提琴，由一位女钢琴家伴奏。他演奏的是古典和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从巴赫到欣德米特

（Hindemith）和克热内克（Krenek）。还有一场演出是在苏黎世音乐学院——他曾经学习过的地方，也是1936年甩了院长一记耳光后不得不走人的地方。《新苏黎世报》对这场音乐会的评价比较善意。评论家写道，演出当然并非完美无瑕，中提琴手热情奔放，女钢琴家贝伯尔·安德里亚（Bärbel Andreae）冷峻严肃，风格不配，但米夏埃尔·曼的“力量触及心灵”，极具“表现力”，值得赞扬。[\[76\]](#)米夏埃尔在信里告诉母亲，荷兰新闻界的评价不高，但斯堪的纳维亚的各种好评把“令人讨厌的阿姆斯特丹的伤痕”“细细抚平了”。现在，本季的音乐会行将结束，现在是对不久的未来进行思考的时刻了。他不想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再回到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在交响乐团寻找位子。虽然不能指望下一个演出季的收入能比现在多，靠这些音乐会微不足道的酬金他也养活不了自己，更何况还要养家糊口了——“但即便我以前在旧金山交响乐团不停地演出，收入也没完全够用啊”。此话要表达的意思，母子俩根本就不用多讨论。在上封信里，卡蒂娅·曼告诉米夏埃尔，她刚刚不得不交16000美元的收入税，几乎相当于八年前在太平洋帕利塞德造房子花的钱。米夏埃尔·曼回复说，真

“可恨”。 “你们现在要是变穷了，对我自己来说也够难堪的。”
[77].

米夏埃尔的信寄到太平洋帕利塞德时，家里正在为其他事情发愁。海因里希·曼去世了。他在美国的这些年过得悲惨，几乎无声无息。但是，离弟弟不远，又由弟媳妇卡蒂娅照顾，他觉得老有所依，所以几个月来一直回避民主德国向他提供的诱人条件，即接他去东柏林，任命他为艺术科学院院长。还没等到正式作出答复，他便于3月11日告别人世，享年78岁。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 he 现在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守护者” [78]。——比他小15岁的弟弟维克多早在上一年已突然撒手人寰。

冷战正在毒化美国的政治气氛。曼氏一家人移民美国时，认识的 是一个具有世界胸襟、宽容、保证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在不同制度的世界性冲突中，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正在形成，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对共产党人——真的也好，假的也罢——产生恐惧，似乎一场革命危在旦夕。托马斯·曼也被猎共分子盯上，尤其是他年前去德国旅行以后，当时他访问了苏联占领区。记者尤金·蒂林格（Eugene Tillinger）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运动，视他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4月，托马斯·曼要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发表其每年的演讲。六年前停止每月支付图书馆“顾问”的酬金后，双方达成协议，每年作一次演讲，出场费为1000美元——由艾格尼丝·迈耶资助。托马斯·曼题为《我的时代》（*Meine Zeit*）的演讲稿已经撰写完毕。他在日记里写道，这篇演讲“或许具有历史意义”，要比193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更加恢宏”。在当年的那篇文章里，他号召德国中产阶级在跟纳粹党人的斗争中同社会民主党人结盟。 [79] 托马斯·曼打算在华盛顿公开表达他对苏联及其人民，对俄罗斯文学和革命的同情。他想告诉大家，现如今，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其实都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作为演讲的结束语，他要宣布其大同世界的梦想，要求美国去

实现这一梦想：在这大同世界里，不再是各民族的利益决定政治，而是有一个世界政府，它将为了和平，为了公平分配所有财富而努力。苏联倘若反对这些计划，那便将证明，它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并且拒绝和平，就像现在所有人都宣称的那样。^[80]

3月23日，托马斯·曼接到女友艾格尼丝·迈耶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国会图书馆新馆长提议放弃今年的演讲，原因是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对托马斯·曼的公开批评，尤其是针对他造访德国东部以及接下来发表的不当言论——关于共产主义专政的“善举”之说。艾格尼丝·迈耶本人也同意此项建议：当前，“对共产党人的围剿已失去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曼的名字很容易“成为攻击的靶子”，为此，必须保护他不受侵犯。“而且，亲爱的朋友，我们实话实说吧，您给那些反对理性的敌人提供了太多攻击的炮弹。”^[81]托马斯·曼在回信中没有表露失望的情绪，同意这一决定，他根本不想招惹进一步的抗议。他还写道，前段时间，因为怒火中烧，确实写过一些“愚蠢的东西”。^[82]后来，他在芝加哥不太知名的地方作了这一演讲。

就在艾格尼丝·迈耶的信到达的同一天，托马斯·曼收到彼得·苏尔坎普的一封信，此人自1936年起领导费舍尔出版社留在德国的那一部分。1945年，苏尔坎普跟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协商一致，把他领导的出版社跟贝尔曼·费舍尔的流亡出版社重新合并。过去几年，双方已进行了合作，流亡出版社发放出版许可，其书籍由这家名为“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德国出版社出版，该社曾经不得不把“犹太”人名——费舍尔去掉。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德国版即于1948年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此时，彼得·苏尔坎普在他的信里向托马斯·曼报告，已跟贝尔曼·费舍尔分道扬镳。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解决争端。一方是贝尔曼·费舍尔，他回到德国代表这个犹太出版商家庭，要恢复被驱逐的老东家的各种权利；另一方是留在德

国的苏尔坎普，他为出版社努力工作，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不得不在纳粹分子的集中营里蹲了几个月：双方未能通过协商取得一致。这又是一场流亡者与“内心流亡者”的对峙，相互都无法理解。第二天，托马斯·曼写信给其出版商贝尔曼，提出警告。信还没寄到，争端已见分晓，苏尔坎普与贝尔曼达成谅解：费舍尔家拿回出版社，而苏尔坎普获准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并带走一批决定跟他走的作家，这些人都是他领导费舍尔出版社时的作者。联邦德国两家最重要的出版社，一家新建，一家重生。至于说两位出版商的合作究竟为何失败，这个谜至今尚未解开。



图37 在托马斯·曼75岁寿辰庆典上：托马斯·曼跟格蕾特、卡蒂娅、艾丽卡、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曼在一起，地点为苏黎世

夏天，曼氏一家人赴欧洲旅行，有的已经在那里。6月6日，托马斯·曼的75岁寿辰庆典在苏黎世隆重举行，只有莫妮卡缺席，她已于4月回纽约了。鲜花、电报、贺信、生日贺语从世界各地雪片似的飞来。晚上举行了盛大宴会，来宾们讲话，托马斯·曼宣读了准备好的答谢辞。他没有提到一年前过世的儿子克劳斯。事后，估计经艾丽卡或卡蒂娅·曼的提醒，他在日记里写道，“本该纪念一下可怜的克劳

斯的”。^[83]第二天，妻子告诉他，她下身必须做手术，考虑到他这次过大生日，所以一直没开口。次日，卡蒂娅·曼就被送进了医院。

米夏埃尔·曼在奥地利的施特罗布尔（Strobl）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带着家人前去度假。动身前，托马斯·曼表示，想带弗里多去加利福尼亚州。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事可能办不成，因为不清楚米夏埃尔和格蕾特何时回美国；让母亲跟她儿子分离得太久好像不大可能。好在钱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托马斯·曼写道，虽然米夏埃尔在欧洲逗留的时间或许要拖延至几年，但至少不会让他掏腰包。最近一段时间，米夏埃尔一家人的生活都是格蕾特的父亲“莫泽尔先生在掏钱”。^[84]

今年夏天，阿姆斯特丹的库埃利多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克劳斯·曼》（*Klaus Mann zum Gedächtnis*）一书，文章由艾丽卡·曼和弗里茨·兰茨霍夫征集而来，作者系克劳斯的朋友、患难与共者及同事。这是记录他一生的文献：文章来自世界各地，用三种文字写成，著名作家有厄普顿·辛克莱、麦克斯·布热特（Max Brod）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这又是他一生各种失望的写照：几乎没人提到克劳斯·曼的著作，许多文章，如厄普顿·辛克莱的，肤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写道，他们俩相识于克劳斯·曼1927年环游世界之际，克劳斯很喜欢辛克莱的著作，因此，辛克莱很容易就喜欢上了克劳斯）。还有一种失望，克劳斯·曼也无须经历了，那就是众多名人的名字没有在书里出现，排名第一的要数安德烈·纪德。克劳斯尊他为良师益友，经常在巴黎跟他见面，还于1943年将一本书献给他。纪德于1947年荣获诺贝尔奖，居然不知道该给克劳斯·曼写点什么。在书的前言里，托马斯·曼描绘儿子“好玩淘气、天资聪慧的童年”，叙述把他打造成“男子汉”的流亡岁月，称赞他辛勤耕耘，属于“同辈人中最有天赋者”之一，“甚至是最具天赋的一个”，虽然他的写作往往“一蹴

而就，信手拈来”。托马斯·曼还谈到儿子在青少年早期就产生过对死亡的渴望，以及父亲的成功给他的生活投下的“阴影”。^[85]

写得最漂亮的纪念文章是一位名叫汉斯·凯尔宋（Hans Keilson）的作家寄来的，纪念集的其他作者对他均一无所知，他本人也不认识克劳斯·曼。汉斯·凯尔宋于1933年作为最后一个犹太裔德国作家在费舍尔出版社发表了长篇处女作《生活还在继续》（*Das Leben geht weiter*），不久便流亡荷兰。他在当地躲藏起来，熬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入侵。凯尔宋以心理医生为职业，很少写作。但是，当他于2011年以101岁的高龄谢世时，全世界都称赞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1950年，他曾谈到是如何开始写作的：他当时在勃兰登堡的乡下当中学生，是通过托马斯·曼的小说《无秩序和早先的痛苦》了解到他儿子克劳斯的，据说克劳斯在这部中篇小说里被塑造成贝尔特的形象。凯尔宋讲述当时怎样弄到了克劳斯·曼的处女作《在生活面前》，被短篇小说《宋雅》（*Sonja*）感动得死去活来。这篇小说“让我感到震撼，那种震撼只可能源自那么一种感觉，即这是你自己本来也可以完成的，或至少是希望能够完成的”。^[86]克劳斯·曼因此而成为他本人走向作家生涯的“推动者”。

莫妮卡·曼也为克劳斯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但愿他乐于助人的本性能够变成唯一的一个请求，出于孤独……他身上的犹太血统……他的那些论点虽然击中要害，却无以藏身。”^[87]艾丽卡拒绝在纪念集里收入妹妹的这篇文章。

*

6月25日，即托马斯·曼过完生日三周后，朝鲜战争爆发。这个国家是分裂的德国在亚洲的翻版：曾被日本吞并，然后被同盟国解放，不同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北方跟亲西方的南方——在这里相撞。朝鲜战争中，中国站在朝鲜的一边，而南方却受到美国，还有后

来的联合国军的支持；有些人担心，这场战争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就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卡蒂娅·曼手术后正在医院里跟并发症鏖战，拿到了止痛的吗啡，托马斯·曼则在苏黎世的道尔德豪华酒店（Grand Hotel Dolder）遇见了一个他喜欢的人：“慕尼黑来的跑堂，长得真帅。”女儿艾丽卡半忧半喜地看着父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寻找机会，跟这位跑堂“弗朗策尔（Franzl）”接触。“我还在端详着他的脸，艾丽卡一边拉着我的袖子一边骂我。反正也不可能在大厅里继续聊下去，别人看我的眼神那倒无所谓，那些人在观察我是怎样热情地点头告别的。他肯定看得出来，我喜欢他。我还告诉艾丽卡，这跟喜欢上一只漂亮的卷毛犬并无二样。这事跟情色没什么关系。她不大相信。”卡蒂娅出院后也知道了这件事。“吃中饭时，那个‘万人迷’有段时间就在附近，”托马斯·曼写道，“卡蒂娅对他很客气，那是因为我。”那个“道尔德的小伙子”几乎每天都魂牵梦萦般地出现在日记里，托马斯·曼只是偶尔提醒自己：“回归写作，不要沉浸在这种幸福里，必须这样做。这是所有天才的规则（或源泉？）——”这次的回归真难，离开酒店后还是这样。“受了太多煎熬，凑了太多热闹，让我神魂颠倒。像木偶似的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好好玩了一回”，托马斯·曼于8月底写道，此时他已踏上归途，在芝加哥写进日记里。“我为什么写这些？为了在我死之前及时毁灭我自己？抑或希望世界了解我？”^[88]

托马斯·曼本希望弗里多跟祖父母去加利福尼亚州并留在他们那里，这一想法此时已经弃而不谈了，这让10岁的弗里多很不开心。米夏埃尔·曼从施特罗布尔写信告诉母亲，他在弗里多那儿找到一张“秘密纸条”，上面写着他打算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能跟祖父母同行：“给爷爷写信”——那封信已经被找到并没收；还要找“伯伯戈洛”帮忙。有人——托马斯·曼——“最近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让这孩子“神魂颠倒”。米夏埃尔·曼在信中告诉母亲：他可是“尽心

尽力、打从心底里为这往往非常冷峻的孩子”付出了一切，“收获的却是忘恩负义”。[\[89\]](#)

在卡蒂娅、艾丽卡和托马斯·曼回美国之前，伊丽莎白寄来了一封信，她在信里——就像父亲日记里所写的——“多少有些遮遮掩掩地警告我们，暂时别回去”。朝鲜战争爆发后，女儿觉得美国不再安全——而家中早已开始讨论是否应当再次移居欧洲的问题。“形势的最新发展日益严峻，这个问题越来越现实。如何能暂时待在这里？在瑞士当美国难民？派艾丽卡去那边处理家产？不能派她去，因为她有可能受到警察的虐待？”“那边”即美国，“一切都在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这一点托马斯·曼觉得“十分清楚”。其实，他想最好能“蜷缩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犄角旮旯”静观事态的发展。“关键问题是艾丽卡。”[\[90\]](#)最后，他们决定上路。



图38 1950年左右，父母跟米夏埃尔、艾丽卡和戈洛·曼在一起

好几年了，这个“关键问题”一直在争取获得美国护照。艾丽卡·曼一如既往地信赖美国——这个她在1938年把全家弄来的国家，虽说有各种疑虑，而且这些疑虑越来越大，可她还是觉得这里是最好的第二祖国。这一年，她再次用尽浑身解数，想拿到美国国籍，却白费力气。不批准她的申请，却又不拒绝，一直让她干等着，究竟具体

原因何在，她不知道。她有感觉，也许跟其政治言论有关，她那样公开批评美国，再加上其他一些言论，使她在那些猎共分子的眼里成为苏联的同情者。但是，谁要是看看她写的东西和公开作的报告，就绝对不会获得这种印象。人们可以了解到艾丽卡·曼毫不妥协坚决反对的东西，可以读到一些对美国严厉的、也许不公正的批评，而对苏联却较为谨慎；她追求的东西既模糊，也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绝非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到了12月11日，艾丽卡·曼受够了。她撤回入籍申请，并给纽约移民中心主任写了一封长信，这一做法让她的律师瞠目结舌。艾丽卡在信里指出，她为美国作出过贡献，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忠实地为国家服务，也没有忘记提到她因其“爱国行动”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她痛斥这种不光彩的移民程序，对其周围人士进行盘问，拖延时间，还有各种怀疑。所有这一切造成她目前既不能去作报告，也不能继续当记者。“纳粹把我从我的出生地德国赶走，我在那里曾经相当成功；随着希特勒在欧洲的影响日益增强，我被迫离开欧洲大陆，在那里，我曾经巡回演出上千次，献上我自己的表演；当下，我眼看着自己在这样一个国家——在本人没有任何责任的情况下——沉沦，一个我热爱的国家，一个我曾经希望成为其公民的国家。”^[91]

艾丽卡·曼跟美国有关部门的争执愈演愈烈，但这并非年底时家里的唯一一场危机。11月20日，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把电话打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伊丽莎白“有了爱情”，她刚刚向他坦白了。是一个阿根廷人，年纪跟她差不多大；伊丽莎白于1949年在巴黎认识的他，不久前把他弄成了世界邦联主义者协会总书记，她现在自己任主席。卡蒂娅·曼必须马上来。^[92]就在当天晚上，67岁高龄的母亲坐上火车前往芝加哥，行程3200公里，一天半后抵达那里。到达当天，卡蒂娅·曼写信告诉丈夫情况如何。伊丽莎白来火车站迎接母亲时就告诉她，这样做的原因“并非主要是跟那个阿根廷男人的炙热爱情”，“而是一种愿望，要结束一种早已无法忍受的状况”，即寻找一个由头，逃脱婚姻。孩子的问题，“还有完全精神错乱、婚姻失

败的丈夫的现状”让伊丽莎白非常压抑。卡蒂娅·曼继续写道，她人刚到，博尔吉斯就把她请去书房，“一人叽里咕噜了两小时”。“他立刻觉得，我要从他手中夺走伊丽莎白（我没想过非这么做不可），而他在尽一切办法挽救这段婚姻，这一点我在听电话时就感觉到了。我们当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他面无血色、暴跳如雷地来吃中饭，突然间又缩了回去，麦迪跟着他进去，没过几分钟，他们俩双双回到饭桌上，博尔吉斯口齿不清地喊道（[女儿]尼卡丽，即安吉丽卡在场）：麦迪待在我这儿！伊丽莎白于心不忍，大概近期情况多少要好一些，时间长了会如何，当然很值得怀疑，虽然他肯定先会尽心尽力的。”卡蒂娅写道，现在她本可以回家了，可是路途太远，旅费又太贵，所以还要待一段时间；“但愿不要太想我”。^[93]

托马斯·曼给他的朋友汉斯·赖西格写信。小说《浮士德博士》曾对他作了人物特写，两人因此而闹别扭，现在一切烟消云散，多年分离造成的沟壑也已填平。托马斯·曼在1949年首次访问德国时，汉斯·赖西格曾前往法兰克福，陪着他走了一段衣锦还乡之旅。昔日的那种信任也几乎恢复了。1951年4月，赖西格刚刚治愈了肺炎，托马斯·曼给这位朋友寄去一封信，详细报告了他本人的痛苦：臀部神经发炎，还有“颊黏膜炎”，好在控制住了。他问赖西格，是否收到了他最新的长篇小说《被挑中者》（*Der Erwählte*）——哈特曼·冯·奥厄（Hartmann von Aue）关于“善良的罪人”格雷戈留斯（Gregorius）传奇^[94]的一个现代翻版。托马斯·曼还叙述了待在欧洲的家人，即儿子米夏埃尔的情况，说他“已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音乐家”，此时正跟一位“优秀女钢琴家”进行巡回演出。这位女钢琴家就是耶尔塔·梅纽因（Yeltah Menuhin），百年不遇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妹妹。托马斯·曼还写道，赖西格对古老欧洲的政治气氛感到不安，被迫考虑是否远走他乡，“好吧，可这里有些人还想离开呢。自然也有其原因”。^[95]

这段时间，曼氏一家人不断讨论有可能离开美国的问题，这里的政治气氛让他们感到厌烦。艾丽卡·曼现在觉得美国几乎一无是处，她的看法激进化了，认为一场“法西斯革命正在蔓延中”；^[96]卡蒂娅·曼在这“新世界”反正从未找到家的感觉。托马斯·曼对麦卡锡（McCarthy）时代的美国咬牙切齿，前不久，在评价小说《浮士德博士》时，除了赞誉，也有人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让托马斯·曼忘记了过去几年获得的所有荣誉和好处。要是有人，比如说艾格尼丝·迈耶，提醒他或告诫他，他就充耳不闻。不久前托马斯·曼刚加入了一场和平呼吁，也没有仔细查询，跟他一起呼吁的都是些什么人。《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温和的批评文章，该文指出，托马斯·曼这次不是被和平主义者所簇拥，而是落入了共产主义积极分子的圈子。

“迈耶又一封歇斯底里的来信”，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位女友又一次提醒他，请他最好继续著书立说，不要从事政治冒险活动。托马斯·曼讽刺道，“这是背叛这个行善好施的国家”，“既愚蠢又讨厌”。^[97]托马斯·曼对瑞士朝思暮想，恨不能立刻离开美国。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不想“在这片没有灵魂的土地上安息”，“我没有要感谢它的地方，它对我一无所知”。^[98]

在全家人里，戈洛·曼是融入美国最深的一个，虽说他并不想长久待下去。四年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学院教书，还找到了一位生活伴侣：埃德·克罗茨（Ed Klotz）。如果戈洛带“男孩埃德”来玩，托马斯·曼不时会在日记里提到他。^[99]不久，埃德即成为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女受骗者》（*Die Betrogene*）中的人物肯·基顿（Ken Keaton）的原型。作为学院老师，戈洛·曼几乎不再写作。年初，他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一项资金，现在可以在学院申请到一年不带薪的休假。戈洛打算写一本关于历史哲学的书。在受资助的这一时间里，他想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欧洲度过。对此，他充满着期待，但是，有几个月将见不到自己的生活伴侣，这让他感到有点美中不足。



图39 1950年代，耶尔塔·梅纽因（左）跟哥哥耶胡迪和姐姐荷西巴（Hephzibah）在一起

米夏埃尔·曼自己都感到惊讶，其独奏生涯居然如此成功。由女钢琴家耶尔塔·梅纽因演奏钢琴，他俩在音乐上配合得天衣无缝。更何况这对二重奏很好“推销”：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和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妹妹——这对二重奏年初在欧洲巡回演出时，大多数关于音乐会的评论都很友好，但许多评论家都没有忘记说明这一点。秋天，他们在美国演出，还录了一张作曲家恩斯特·克热内克的曲子，而格蕾特和孩子们留在了欧洲。一场音乐会结束后，

《旧金山考核报》（*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评论员夸奖这两位名门出身的音乐家演出和谐，就凭他们的水平，几乎不用提及两人的家庭，结果还是没有免俗。米夏埃尔·曼的演奏既老练又善于表达，耶尔塔·梅纽因则欢快、清新、专业。^[100]10月21日，托马斯·曼在圣莫尼卡的一场音乐会上观看和聆听儿子及其女搭档的演出：“演奏得漂亮。到后台看望他们。夸他们合作得好。”^[101]儿子“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勃勃的雄心开始得到回报。^[102]两人已计划好，在未来几

个月进行大型巡回演出，先在美国，接下来去欧洲旅行，最后甚至要在新西兰登台演出。

11月4日是个星期天，他们原定在洛杉矶的“新音乐协会（New Music Society）”举办一场二重奏音乐会，电台将要进行转播。可是坐在收音机前的家人及朋友们听到的不是音乐会的转播，而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场音乐会因一场意外事故被取消。耶尔塔·梅纽因的丈夫本雅明·罗尔夫（Benjamin Rolfe）打电话到太平洋帕利塞德，情绪激动地向艾丽卡·曼报告说，在去音乐会的路上，米夏埃尔在汽车里当着耶尔塔9岁儿子的面，莫名其妙地用刀子袭击并弄伤了她，随后跳车逃跑。罗尔夫说，米夏埃尔很危险，是个神经病，必须报警。没过多久，米夏埃尔来到父母家。他的说法完全两样：早晨为音乐会进行练习时，两人就发生了争吵。耶尔塔的两个孩子不停地捣乱，她丈夫也一样。在开往音乐会的汽车里，两人继续争吵，然后他在气头上抓住耶尔塔的头发摇晃，她丈夫把车停住，扑向米夏埃尔，米夏埃尔手脚并用进行自卫，有可能用鞋跟不幸碰伤了耶尔塔，可他一无所知，随后下了车，打了一辆出租车到音乐大厅，在那里等候他的钢琴女搭档。耶尔塔没来，他当时觉到很奇怪。^[103]曼氏一家人对这起事件以及接下来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感到异常震惊。耶尔塔·梅纽因的眼睛上方受了伤，不得不缝针。她取消了所有的巡回演出，不想再跟米夏埃尔有任何关系。梅纽因-罗尔夫一家还威胁要告米夏埃尔并要求他必须立刻离开美国，让耶尔塔能够重新获得安全感。让家人特别气愤的是，米夏埃尔居然意识不到形势的严重性，把这起事件轻描淡写地称作“儿戏”，太不当回事。家人决定，马上把他送往欧洲，好让情势平静下来。卡蒂娅·曼坚持要儿子在苏黎世去找心理医生和家里的朋友艾里希·卡岑施泰因并进行治疗。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老实说，他要是走了，我才会开心。他的性格我不喜欢，包括他的笑。”^[104]

莫妮卡·曼又写了一篇文章，描绘美国富人的除夕派对。发邀请的是“伍尔沃兹女王（Woolworthkönigin）”。“她的皮肤似雪花石膏般洁白：这还不算什么，她还浑身闪烁着轻浮放荡的光芒。”这位百万富婆讲起尼斯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把右手——揉皱的雪花石膏——伸给穿燕尾服的年轻小伙子们。年已八十的她，举止彰显着其美元世界的脆蹦蹦的传奇。富得流油的悄悄话从垂老的雪花石膏的舌头上流出，戴戒指的右手不停地伸向来宾，他们鱼贯走过，轮番献媚。那只手像伍尔沃兹海绵，套满了外科手术器具般的珠宝”。^[105]莫妮卡·曼把文章寄给父亲。“亲爱的小莫妮，还真不赖！”父亲回复说。“这就是说，面对实实在在的恶心来了一场正直的恶心宣泄。所用的印象主义让我现在觉得不太舒服。揉皱的雪花石膏？脆蹦蹦的传奇？套满了外科手术器具般的珠宝？我在自问。当然，在恶心之处又从哪里可以找到恰当的表达呢！”^[106]

年初，克劳斯·曼的最后一本书——其自传《转折点》在S. 费舍尔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现在又由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领导。贝尔曼悉数接收了库埃利多出版社的德语作家，克劳斯·曼的这本书只是在父亲的压力下才出版的，原因究竟是经济的——如贝尔曼所述，还是担心流亡人士对过去几十年的批判性视角有可能在德国引发愤怒？出版社跟艾丽卡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一些有争论的段落，比如关于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的，被删除了。

其他一些事情，如毒品和各种情爱史，克劳斯·曼自己已经删掉。马努埃尔·加瑟写信给戈洛·曼，对此提出批评，说克劳斯在他的所有小说里曾把那些棘手的问题作为主题，在这部自传里却加以规避，对其生活的这一面闭口不谈，虽然他的伟大偶像安德烈·纪德发表了《如果种子不死》（*Stirb und werde*，法文版标题为*Sile grain ne meurt*），公开表白自己的同性恋，为赤诚的坦白胸襟做出了榜样。“纪德式的新教风格跟这本书是两码事”，戈洛·曼替哥哥辩

护。倘若是他，也会像克劳斯一样那么做。“为何要在居心不良的歹徒面前揭露自己？要是不想揭露自己，你会说，那就别写。好吧。”
[107].

《转折点》一书发挥了克劳斯·曼的历来传统——赤裸裸地表现自己。典型的天真烂漫的童年——他在第一部自传里已作过描绘——在书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终结。孩子们在巴特特尔茨的乡村别墅想演一出话剧。该剧的剧名克劳斯·曼曾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一书里提到过：《潘多拉的盒子》（*Die Büchse der Pandora*）。这是孩子们根据神话传说自己编写的故事，据此，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在盒子打开后跑到了人世间。后来克劳斯·曼自己都觉得这一剧名不那么可信，所以在《转折点》一书里舍弃了“潘多拉的盒子”这一说法，但父亲关于战争的一句话却保留了下来，据说这句话是孩子们偷听到的：“天空不久将出现一把带血的剑。” [108]后来，弟弟戈洛讲述的情况跟克劳斯的说法却大相径庭，没有那么动听，或许更为接近真相：根据戈洛的说法，这部话剧叫《入室抢劫者》（*Die Einbrecher*），也没有发誓过会出现一把带血的剑。“当时我们在吃中饭，坐在‘特尔茨别墅’的阳台上，TM（托马斯·曼）对我们说，神情之严肃，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是的，孩子们，这是战争……’” [109].

克劳斯·曼在整本书里都是以这样高昂的兴致对待事实真相：他在《世界舞台》杂志开始写作时，出版人西格弗里德·雅各布森坚持要在文章上用作者的真实姓名发表，而他则希望用笔名，克劳斯宣称，雅各布森这样做是出于私心，不过是想在其报纸上引发“轰动效应”而已。就这样，在这本书里，“我写作生涯早期所犯的决定性错误”记到了别人头上，事实上，错误是他自己犯的，是克劳斯坚持要印上他的真姓大名的。父亲在那本《魔山》里的题词不久便公布于众，据说这并非克劳斯所为——而原本大书特书的父子关系在这本书

里却几笔带过。埃米尔·杰林斯在曼氏姐弟俩1927年周游世界时曾热情接待过他们，《到处游历》一书以超级的热情对他进行过描写，在这本自传里，克劳斯却突然把杰林斯描绘得很不讨人喜欢。第三帝国时代杰林斯是在德国度过的，仅此就让他跟克劳斯早期的往来黯然失色。连他的那只松狮狗现在也长着一对“狡诈的小眼睛”，[\[110\]](#)而在《到处游历》里还是用狗友的眼光来描写的。就这样，《转折点》一书里从头至尾都充斥着许许多多曼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在书的最后一章，克劳斯·曼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的信件和日记内容放进去，而这些都是他为了这一目的构思出来的。《转折点》一书不能被视作资料来源或对时代的记录。但这本书文笔流畅，用词讲究，观察深入，人物特写精彩纷呈：克劳斯·曼的小说艺术达到了其顶峰水平。

米夏埃尔·曼带着一家人在施特罗布尔深居简出几个月。他努力解决耶尔塔事件造成的灾难，给那位前音乐女搭档及其丈夫、哥哥还有父母写信，并向母亲报告所有的情况，而母亲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尽一切努力，减轻事件对儿子造成的伤害，保护家庭的声誉。梅纽因一家对这起事件的描述不仅涉及米夏埃尔拿刀伤人，还涉及卡蒂娅·曼在谈话时对耶尔塔·梅纽因的指责：挑衅米夏埃尔·曼。卡蒂娅·曼曾以威胁的口气补充说，永远也不要让一个男人情绪失控。耶尔塔·梅纽因则回敬道：一个曼家的男人曾经企图杀死一个梅纽因家的女人。[\[111\]](#)

心理医生艾里希·卡岑施泰因把这事看得很淡。他告诉卡蒂娅·曼，米夏埃尔没有“特别严重的错乱”，他“精神上完全健康”，就是这么个“气质——属于其职业的气质”。[\[112\]](#)米夏埃尔·曼并没有多少负疚感，对梅纽因一家的愤恨倒是极其强烈。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声称，他们不应该就这件事小题大做。父母最多只要给耶尔塔付个医疗费，就他而言，掏钱给她做个整形外科手术也未尝不可。[\[113\]](#)米夏

埃尔在另一封信里告诉母亲，给耶尔塔“那个弱智”，还有她丈夫“那个贱骨头”写了封信，可是“这帮畜生”没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给他回信。[\[114\]](#)这段时间，格蕾特·曼满腹忧愁。她写信告诉卡蒂娅·曼，米夏埃尔对外装作若无其事，实际上很可能是“绝望透顶”。刚才他又一次大发雷霆。“这是一种敏感与报复心理的混合体，对此，你是了解的。”[\[115\]](#)

最后，住在奥地利的米夏埃尔把姐姐艾丽卡搬了出来——她对调解纠纷很有经验。米夏埃尔要姐姐请一位律师帮忙，阻止梅纽因家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他向姐姐建议，可以这样来据理力争：这场冲突发生前，他曾经想方设法跟耶尔塔·梅纽因建立起一种“单纯的专业共同体”，却未能如愿。“R [olfe] 女士性格怪僻（这种性格估计跟苦难的童年有关），她在个人与情色方面的问题又始终不断，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单纯的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假如要打一场官司的话，一些私密的细节将浮出水面，他以此暗示跟耶尔塔·梅纽因有过绯闻。对此，对方肯定是不会有兴趣的；必须威胁“这帮可怜虫”，一场官司将意味着“一起最耸人听闻的家庭丑闻”。[\[116\]](#)

此时，梅纽因-罗尔夫一家根本没想要打官司，相反，他们家，尤其是耶胡迪·梅纽因有着非常良好的社会关系网，所以到处散布关于米夏埃尔·曼的事情，说他危险，是个疯子。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认为，必须将这一情况告诉弟弟米夏埃尔及妻子格蕾特，米夏埃尔在音乐圈内已基本无路可走。[\[117\]](#)卡蒂娅·曼得出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并告诉了小儿子：“很多事情你都是自己害了自己。”[\[118\]](#)

6月6日，托马斯·曼庆祝77岁寿辰。孩子们一个都没来。早晨，他跟妻子商讨“未来的问题，诸如艾丽卡、房子、瑞士和所有其他事情”，还谈到“卡[蒂娅]受艾[丽卡]的气”。父亲跟女儿相处得倒是非常和谐，艾丽卡在他面前控制自己的暴躁情绪。“我一方面感

谢她，一方面又担心她很容易跟她弟弟一样。她显然不想比我们活得更久。”^[119]托马斯·曼想立刻离开美国。至于说那些反对麦卡锡疯狂之举的自由运动，他几乎充耳不闻，其实有证据说明尚有另一种美国的存在：不久前，被人攻击为共产党之友的托马斯·曼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院士，进入了“美国50位不朽名人”之列。就像写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中所述，他对这一消息一半是高兴，一半是无所谓，他感到荣幸，却没有跟美国和解。在同一封信里，他问艾格尼丝·迈耶，她为什么不是美国总统，她“一定会是个国家的好母亲”，“可能会坚持让自己的国家多关心些自己的教育，让民主更加纯洁，而不是去拯救世界”。^[120]

过完生日三周后，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启程前往欧洲。他们走得就像去度暑假，没有跟人告别，亦不再回首。他俩在芝加哥用一天时间跟博尔吉斯一家见面。女儿的婚姻依旧不稳。此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丈夫的要求下，已辞去世界邦联主义者总协会主席的职务，倘若没有他，伊丽莎白是不可能走上这一岗位的。此外，随着冷战的爆发和联合国的成立——该组织努力将世界邦联主义者的许多想法从空想变为实践——世界政府的设想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在此期间，博尔吉斯收到邀请，重回米兰担任教授，二十年前是法西斯分子把他从这一职位上赶走的。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考虑，是否单独让丈夫和孩子们去意大利，要是跟着走，就要鼓起勇气在婚姻和生活上重新开始。最后她辞退了离婚律师，开始打包收箱子。

艾格尼丝·迈耶提出想在基斯克山见面，托马斯·曼拒绝了，虽然他知道，而她却不知道：此去将不再归来。起飞前往欧洲之前不久，曼氏一家得到消息，艾丽卡·曼再次入境美国的申请遭到拒绝，提出这一申请是为了以防万一。卖掉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产并移居瑞士，这些计划早已确定，但始终流于说说而已，这一下突然变得现实得要命：就父母而言，没有女儿艾丽卡，他们是不可能再回美国的。

莫妮卡·曼从远方关注着家人的移民举动：父母前往瑞士，艾丽卡已经早一步去往该处；伊丽莎白和一家人正准备迁往意大利；米夏埃尔眼下带着一家子在奥地利，哥哥戈洛也经常去造访，他不是在德国到处旅行，就是在写书。莫妮卡·曼前不久刚成为美国公民。其他家人都背离美国，她该如何是好呢？母亲写信告诉伊丽莎白，莫妮卡写了“好几封不知所措、情绪激动的信”，感觉她“无所适从，摇摆不定”。^[121]莫妮卡·曼此时告诉一位朋友，她“并非因为写信而激动”；“我有感觉，有人在暗中窥视我”。^[122]不能忍受寂寞、更不堪忍受独自旅行的她于9月临时作出决定，乘坐运送博尔吉斯一家去意大利的轮船，跟他们一起回到古老的欧洲大陆。母亲感到厄运临头：“我几乎觉得，她好像打算在欧洲赖在父母家。我的上帝呀！”^[123]

^[1] K1M: Aufsätze V, S. 327

^[2] K1M: Alte Bekannte, in: K1M: Aufsätze V, S. 380 f.

^[3] K1M an KM, 10. 5. 1946, in: K1M: Briefe, S. 554 f.

^[4] KM an K1M, 21. 5. 1946, in: K1M: Briefe, S. 556, 558

^[5] Tgb TM, 28. 5. 1946

^[6] TM an GM, 16. 6. 1946, in: TM: Briefe II, S. 492 f.

^[7] TM an GM, 16. 6. 1946, TMA (der Brief ist in TM: Briefe II, S. 492 f., abgedruckt, dort ist aber die hier zitierte Passage ohne Kennzeichnung ausgelassen; vgl. S. 391–394)

^[8] GM an Alma Mahler-Werfel, 15. 7. [1946], in: GM: Briefe, S. 85

^[9] K1M an W. E. Süskind, 23. 12. 1946, in: K1M: Briefe, S. 565

^[10] TM an EM, 26. 10. 1946, in: EM: Mein Vater, S. 190 f.

[11] TM: Frage und Antwort. Interviews mit TM 1909–1955, hg. von Volkmar Hansen/Gert Heine, Hamburg 1983, S. 266–269

[12] EM an TM, 26. 6. 1947, in: EM: Mein Vater, S. 197

[13] GM an Manuel Gasser, 27. 6. 1947, zit. nach Lahme: GM, S. 197

[14] Vgl. GM an Dolf Stemberger, 8. 7. 1947, DLA

[15] GM an EM, 18. 9, [1947] , MON

[16] EM an KM/TM, 24. 3. 1946, zit. nach der Übersetzung des englischen Briefes in EM: Mein Vater, S. 526

[17] Tgb TM, 2. 7. 1947

[18] GM an Erich von Kahler, 23. 8. 1947, zit. nach Lahme: GM, S. 195

[19] GM an Manuel Gasser, 7. 9. 1947, zit. nach Lahme: GM, S. 197

[20] KIM an Herbert Schlüter, 29. 11. 1946, in: KIM: Briefe, S. 562

[21] KIM an EM, 19. 9. [1947] , in: KIM: Briefe, S. 574

[22] Zit. nach GKFA 10. 2, S. 104

[23] Tgb TM, 18. 7. 1947

[24] Zit. nach Tgb TM 1946–1948, Anhang, S. 436; TM an Erich von Kahler, 10. 9. 1946, zit. nach ebd. , S. 433

[25] MoM an TM, 10. 12. 1947, TMA

[26] Zit. nach MoM: Vergangenes, S. 102

[27] TM an MiM, 31. 1. 1948, in: TM: Briefe III, S. 16

[28] TM an Agnes Meyer, 16. 1. 1947, in: TM-AM: Briefwechsel, S. 675

- [29] Vgl. S. 262
- [30] KM an K1M, 17. 1. 1948, MON
- [31] MoM: Notiz über New York, in: Neue Rundschau, Heft 10 (1948) , S. 240
- [32] KM an K1M, 24. 1. 1948, MON
- [33] EM an K1M, 19. 4. 1948, MON
- [34] EM an Duff Cooper, 22. 9. 1948, in: EM: Briefe I , S. 248
- [35] Tgb TM, 1. 2. 1948
- [36] Tgb K1M, 9. 8. 1947
- [37] Tgb K1M, 26. 6. 1948
- [38] Tgb K1M, 15. 6. 1948
- [39] EMB an G. A. Borgese, 12. und 16. 7. 1948, zit. nach Holzer: EMB, S. 133
- [40] Tgb K1M, 13. 7. 1948
- [41] Tgb K1M, 8. 7. 1948
- [42] Tgb TM, 15. 8. 1948
- [43] Tgb TM, 1. 9. 1948
- [44] Vgl. Lühe: EM, S. 301
- [45] Tgb TM, 10. 8. 1948
- [46] Tgb TM, 12. 9. 1948 und 27. 10. 1948; »aufmontiert«: TM an MiM, 31. 1. 1948, in: TM: Briefe III, S. 17
- [47] KM an K1M, 23. 10. 1948, MON

- [48] KM an K1M, 22.11.1948, MON
- [49] KM an K1M, 6.11.1948, MON
- [50] TM an K1M, 12.11.1948, in: K1M: Briefe, S.601
- [51] GM an Manuel Gasser, 22.12.1948, in: GM: Briefe, S.98 f.
- [52] Tgb TM, 31.12.1948
- [53] TM an MoM, 24.2.1949, in: TM: Briefe III, S 74 f.
- [54] Tgb K1M, 1.1.1949
- [55] GM an Leonore Lichnowsky, 14.2. [1949] , in: GM: Briefe, S.100
- [56] MiM an KM, 25.3.1949, TMA
- [57] Tgb TM, 13.12.1948
- [58] Tgb TM, 19.3.1949
- [59] Tgb TM, 4.3.1949
- [60] KM an K1M, 22.4.1949, MON
- [61] K1M an EM, 4.5.1949, in: K1M: Briefe, S.613
- [62] K1M an KM, 15.5.1949, in: K1M: Briefe, S.617, 619
- [63] Zit.nach Harpprecht: TM, S.1737
- [64] 霍斯特·威塞尔 (Horst Wessel) 系纳粹分子, 他创作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成为第三帝国国歌的第二部分。
- [65] KM/TM an EM, 4.8.1949, in: EM: Mein Vater, S.208 f.
- [66] TM: Antwort an Paul Ohlberg, GKFA 19.1, S.720
- [67] K1M an Georg Jacobi, 12.5.1949, in: K1M: Briefe, S.614

[68] K1M an KM/EM, 20.5.1949, in: K1M: Briefe, S.624 f.

[69] Tgb TM, 22.5.1949

[70] EM an Pamela Wedekind, 16.6.1949, in: EM: Briefe I, S.260

[71] Zit.nach Lühe: EM, S.315

[72] Tgb TM, 21.12.1949

[73] MiM an KM, 29.12. [1949], TMA

[74] EMB an KM, 29.11.1950, TMA

[75] Tgb TM, 30.12.1949

[76] Zit.nach Claudia Meurer Zenck: Michael Mann.Bratscher, Krenek-Interpret, Musik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in: Schönheit und Verfall. Beziehungen zwischen Thomas Mann und Ernst Krenek.

(Mehr als) ein Tagungsbericht, hg.von Matthias Henke (=Thomas-Mann-Studien Bd.47), Frankfurt a.M.2015, S.155-201, hier S.174

[77] MiM an KM, 1.3.1950, TMA; vgl.zur Steuerzahlung Tgb TM, 7.1.1950

[78] Tgb TM, 11.3.1950

[79] Tgb TM, 21.3.1950 (TM schreibt falsch 1932 statt 1930)

[80] TM: Essays VI, S.180

[81] Agnes Meyer an TM, 23.3.1950, in: TM-AM: Briefwechsel, S.733 f.

[82] TM an Agnes Meyer, 27.3.1950, in: TM-AM: Briefwechsel, S.735

[83] Tgb TM, 6.6.1950

[84] Tgb TM, 9.6.1950

[85] K1M zum Gedächtnis (1950) , Hamburg 2003, S.8, 9 f.

[86] K1M zum Gedächtnis (1950) , Hamburg 2003, S.75

[87] Zit.nach Andert: MoM, S.64

[88] Tgb TM, 25.6. , 7.7. , 13.7. , 14.7. , 25.8.1950

[89] MiM an KM, 17.7.1950, TMA

[90] Tgb TM, 12.8.1950

[91] Zit.nach EM: Briefe I , S.280 (Original englisch)

[92] Tgb TM, 20.11.1950

[93] KM an TM, 22.11.1950, in: KM: Rehherz, S.96 f.

[94] 格雷戈留斯为中古德语宫廷文学里的一个传说人物，哈特曼·冯·奥厄的作品探讨了罪与罚的问题。

[95] TM an Hans Reisiger, 2.4.1951, in: TM: Briefe III, S.196 f.

[96] Tgb TM, 3.12.1950

[97] Tgb TM, 6.2.1951

[98] TM an Hans Carossa, 7.5.1951, in: TM: Briefe III, S.205 f.

[99] Tgb TM, 20.12.1949

[100] Alexander Fried: Connoisseurs Recital Praised, San Francisco Examiner, 16.10.1951; diese und weitere Kritiken in MON

[101] Tgb TM, 21.10.1951

[102] Tgb TM, 28.10.1951

[103] Vgl.KM an Yaltah Menuhin Rolfe, 29.11.1951, MiM an Yehudi Menuhin, 28.11.1951, EM an Robert W.Kenny, 14.1.1952, alle MON

- [104] Tgb TM, 5.11.1951
- [105] MoM: Silvester bei Woolworth, Datierung und Publikationsort unklar, Zeitungsartikel in MON
- [106] TM an MoM, 8.1.1952, in: TM: Briefe III, S.239
- [107] GM an Manuel Gasser, 1.5.1951, zit.nach Lahme: GM, S.428
- [108] KLM: Wendepunkt, S.65; vgl.KLM: Kind dieser Zeit (1932), Reinbek bei Hamburg 1982, S.50 f.
- [109] GM: Erinnerungen I, S.32
- [110] KLM: Wendepunkt, S.258
- [111] Lionel Rolfe: The Uncommon Friendship of Yaltah Menuhin and Willa Cather, Los Angeles 2011, S.35
- [112] Erich Katzenstein an KM, 20.11.1951, MON
- [113] MiM an KM, 25.11.1951, MON
- [114] MiM an KM, 10.12.1951, TMA; alle hier zitierten Dokumente zur Auseinandersetzung MiM-Menuhin in MON, EM B 138
- [115] Gret Mann an KM, 3.12.1951, MON
- [116] MiM an EM, 26.12.1951, MON; vgl.EM an Robert W.Kenny, 14.1.1952, MON
- [117] Vgl.Gret Mann an KM, 22.12.1951, MON
- [118] Zit.nach MiM: Fragmente, S.47
- [119] Tgb TM, 6.6.1952
- [120] TM an Agnes Meyer, 7.12.1951, in: TM-AM: Briefwechsel, S.760 f.
- [121] KM an EMB, 28.8.1952, MON

[[122](#)] MoM an Hermann Kesten, 23.8.1952,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243

[[123](#)] KM an EMB, 28.8.1952, MON

第七章 能者为之（1952~2002）

米夏埃尔·曼的心情糟糕透顶。他想方设法在欧洲登台演出，偶尔也会受到邀请，却看不到新的事业前景。他争取到诸如音乐学校等地方去任教，甚至愿意为此而回到德国，可这一努力也徒劳无功。父母亲于8月到沃尔夫冈湖（Wolfgangsee）边的施特罗布尔看望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时，托马斯·曼观察到“格蕾特样子憔悴，寡言少语”。她也“真不容易，跟着孩子们的这位心情烦躁、自私自利、暴君般的父亲”。^[1]音乐会季节在即，米夏埃尔·曼几乎没有演出排期，就更谈不上巡回演出了。他决定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在好莱坞争取弄个电影音乐人的职位。他找到卢卡斯·福斯（Lukas Foss）作为新的钢琴搭档，尝试着组织在美国演出，^[2]至此却鲜有成效；他还努力争取去旅行作报告，介绍新音乐，却同样无果。或许到了当地事情要好办些。在耶尔塔·梅纽因跟丈夫的争执中也涉及情爱的因素，这一点并没有逃过格蕾特·曼的眼睛。从此，她时时刻刻都盯着丈夫，再也不让他独自参加音乐会或者作报告。新学年开始之际，格蕾特和米夏埃尔把两个孩子送进伯尔尼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然后前往美国。

不久，托马斯和卡蒂娅·曼在苏黎世附近的埃伦巴赫（Erlenbach）租到了一幢合适的房子。托马斯·曼写信给艾格尼丝·迈耶——他在美国的外交代理人——谈到了这幢房子，但强调待在欧洲只是暂时的。他对往来于两大洲之间的旅行感到疲倦，心里向往着“故土”，想在这片土地上先待一年。但是，这绝对不是“背弃美

国”，他“有那么多美妙和友好的事情”要感谢这个国家，他现在是，以后也还是美国公民。他们想卖掉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对他和妻子来说，这房子本来就太大了。^[3]没过多久，托马斯·曼了解了成为瑞士公民的可能性，并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将在欧洲度过晚年。记者们连续发问，引诱他上当。有记者提问说，在西方的民主与东方的共产主义这两种政治制度之间，他更推崇哪一种。托马斯·曼答复说，这个问题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最好以一本书的形式”来回答。公众对这句话的反响强烈：西方社会对他采取回避态度感到愤怒，共产主义社会则欢呼雀跃，好像托马斯·曼跟他们意见一致似的，原因是他拒绝吹捧“美国式民主”相对于“东方人民民主”的各种优势。^[4]事后，托马斯·曼力图纠正这些说法，表示认同西方民主制度，但所有的努力都于事无补。在由艾丽卡起草的一份声明中，托马斯·曼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甚至声称根本就没有人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5]这种辩护方式显然算不上什么妙招。

父亲日渐垂老，招架不住公众政治舆论的阴险狡诈，让人误导后说些并非深思熟虑的话，这种情况戈洛·曼已经注意了好几年了。他不时会给父亲出些主意，并且能够阻止托马斯·曼把撰写的一些时政文章拿去发表。戈洛这样做，一般都要经过跟艾丽卡的争吵，而这些文章本来是会掀起新的轩然大波的。父亲对美国的批评往往是有道理的，但对戈洛·曼来说，这些批评跟托马斯·曼谈到共产主义时的幼稚相比，显然轻重失调，面对东欧阵营国家的不公正与不自由，他也置若罔闻。一旦谈及这些问题，戈洛总会跟姐姐艾丽卡发生争执。戈洛指责她向父亲灌输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与公众舆论打交道时没有注意让他不讲错话。就在这年夏天，争吵又发生了，既为政治问题，也为戈洛那些来访的朋友，这些人艾丽卡一个也看不上。苏黎世的女出版人艾米·奥普莱希特（Emmie Oprecht）系家里的一位世交，曾经无微不至地照料过卡蒂娅·曼的父母，现在又为曼家找房子而奔波。在艾丽卡的眼里，就连她也是一名美国“间谍”。^[6]托马斯·曼在日记

里写道，艾丽卡无疑是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但“她的尖刻、负面的夸张、怒气，还有对待弟妹毫无耐心的方式”都让父母发愁。^[7]

父亲公开声明引发的纷争还波及了美国的报纸，对这一切，戈洛·曼都从远方予以密切的关注。此时，他已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欧洲待了一年，成绩显著。虽说他向古根海姆基金会申报的那本书没有写成，却发表了许多杂文与文章，好评如潮；他还作了很多报告，建立了许多关系。他没有辞去加利福尼亚学院的那个教职而去接受巴登巴登（Baden-Baden）广播电台的一项十分诱人的工作，于1952年夏末回到美国。戈洛要回到男友埃德·克罗茨的身边，他们相识时克罗茨还是个大学生的，这时已成为一家中学的老师。他们俩合租了一幢房子，可是，他心驰神往的两人世界却无法实现：埃德·克罗茨带回来一个女朋友。不久真相大白，克罗茨已下决心，告别秘密的同性恋生活，给他的生活套上一件中产良民的合法外衣；同性恋在当时始终遭人非议，甚至会招惹官司，直到1976年，同性恋在美国一直处于违法状态。不久，克罗茨举行了订婚仪式。戈洛·曼很失望，从此看什么都不顺眼：学院的学生曾选举他为最可爱的教师，突然间，戈洛觉得这些学生“又笨又幼稚，还时常怀有敌意”，他从根本上“憎恨”当学院老师的生活。^[8]麦卡锡时代的反共气氛从未像现在这样让他感到压抑。戈洛告诉艾里希·冯·卡勒，^[9]他听到“夺权的声音”，情绪之坏跟姐姐艾丽卡已相差无几。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获胜，戈洛·曼把这次选举当作又一个例证，说明他回到美国的决定错得有多离谱。他陷入了一场抑郁症危机，不得不去接受心理治疗。“戈洛在那边不开心”，父亲在日记里写道。

“卡[蒂娅]想在我们这里收留他，可艾丽卡肯定接受不了。她已经愁眉苦脸了，因为跟麦迪都很难友好相处。可怕又可悲。”^[10]

11月底，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带着女儿到苏黎世附近的埃伦巴赫看望父母。到意大利后，她跟家人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菲索勒

(Fiesole) 租了一幢房子，离米兰300公里，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在米兰大学教书。伊丽莎白跟父亲交谈，说到她朋友、芝加哥大学教务长罗伯特·哈钦斯 (Robert Hutchins) 提出建议，由她来负责文化杂志《前景》 (*Perspectives*) 德语版的出版工作。伊丽莎白谢绝了哈钦斯的好意，可能是顾及依旧不稳的婚姻。离开瑞士后的第二天，伊丽莎白打电话到父母家告诉他们：她丈夫陷入昏迷。就在当天晚上，70岁的朱塞佩·博尔吉斯死于脑血栓。卡蒂娅·曼立刻赶赴菲索勒的女儿家。托马斯·曼感到力不从心，不能跟着去参加女婿的葬礼，心怀忧愁地展望未来，首先是他个人的“未来”——他觉得“越来越糟糕”：“孤家寡人的日子又要来了，又要不停地接电话了。”四天后，卡蒂娅归来，结束了他“独处的憋屈”。卡蒂娅讲述“在菲索勒的经过和情况”，以及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吉斯的葬礼。托马斯·曼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麦迪和孩子们现在对逝者要动情地显示忠诚坚守，身后的他被各个方面捧上了天。”^[11]“现在”一词令人毛骨悚然。

1953年夏天，曼氏家族庆祝卡蒂娅·曼70岁寿辰。她的双胞胎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他于1951年离开美国再度移居日本——从日本赶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带着女儿从意大利来，东奔西颠了几个月的莫妮卡从泰辛 (Tessin) 辗转而来。孙子弗里多和托尼代表留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父母亲。母亲生日庆典前不久，戈洛·曼也于7月24日赶到，他就此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并回归欧洲。克莱尔蒙特学院的职位他辞了，退休基金的钱也退了。今后，戈洛打算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在欧洲打天下。他还带了一份稿约回来：斯图加特的科尔海默出版社 (Kohlhammer Verlag) 要他写一本关于《美国精神》 (*Geist Amerikas*) 的书，介绍20世纪美国人的思维与行动。

母亲的生日庆典一如既往地由艾丽卡操办。她安排当天的活动，购买礼物，筹划了一场生日小品，由孙子辈来演出。前一段时间，母

亲跟女儿相处得不总是十分和谐。自从离开美国后，艾丽卡极易受刺激，几乎一直没有改观，大女儿跟其他弟妹难以相处，让母亲痛心疾首。虽然女儿伊丽莎白作为寡妇和单亲母亲带着孩子在意大利打拼，现在还接下了那本杂志的活儿，卡蒂娅也只有在艾丽卡外出以后，才邀请伊丽莎白来父母家，以免发生争吵。在日常生活和照料托马斯·曼时，艾丽卡也会插手指挥。这一切卡蒂娅·曼都不喜欢。托马斯·曼曾在日记里忧伤地提到妻子的愿望，要艾丽卡搬出去。^[12]过生日那天，谁也感觉不到有一丝的不和谐。艾丽卡·曼在瑞士妇女杂志《安娜贝拉》（*Annabell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粗略地勾勒了“米兰因”为“魔术师”作出的贡献。托马斯·曼在晚宴上发表了准备好的贺词。事前，女儿不得不说服父亲，必须这样做。这几个月，托马斯·曼的情绪十分忧郁，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最糟糕的是，他感到江郎才尽。大剂量服用镇静和安眠药让他倒胃口，他非常怀念自己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在谈到美国时，他又一次发泄自己的怒火，似乎是想再次证明，回到欧洲的决定有多正确。不久前，一场官司引起了轰动：埃塞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Ethel und Julius Rosenberg）夫妇因替苏联窃取美国原子弹的情报而被判处死刑。艾丽卡动员父亲，发一封电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抗议这场“司法谋杀”。艾丽卡起草的稿子内容很详细，托马斯·曼十分满意，却因为要花200多法郎的费用而发火。没过几天，消息传到欧洲，罗森堡夫妇已被处决。托马斯·曼觉得这是“卑鄙的行径”，也证明美国在从事“破坏和平的活动”。罗森堡夫妇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下了另一起政治事件：“东柏林工人造反，肯定受到挑拨，虽然不乏自发因素，被苏联军队克制地加以阻止。出动了坦克，朝空中开枪。”^[13]托马斯·曼看东方的眼光是温和的：在这里，人们友好地向他欢呼，用外交行李袋装满稿费送到苏黎世他家；在这里，新闻媒体受到控制，他不用担心会出现用心险恶的批评。对6月17日的起义^[14]，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进行了强烈批判，批判的却是西方的态

度，西方国家——他忠实地按照东方的宣传口吻——是罪魁祸首，民主德国民众之所以提出各种要求，责任在于西方国家。“阿登纳的德国虚情假意，为苏占区的殉道者们举行悼念集会。每天24小时都在引诱和挑动那里的民众出来闹事。所有这些捣乱行为都令人发指。”
[15]

由于情绪低落，托马斯·曼在生日贺词里没有表现欢快的心情，没有讲述色彩斑斓的回忆，也没有对妻子本人进行动人的描绘，就像克劳斯·曼20年前祝贺母亲50大寿时所做的那样。[16]托马斯·曼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谢妻子为他、他的作品和全家人付出的辛劳。他希望，在悲伤的时刻，“当阴影降临之际”，妻子依旧挽着他的手，安慰他。在贺词的高潮处，托马斯·曼谈到了死亡。“黑暗的天使，他松开双手，让每个人在涅槃中孤独无助。他真的有权发号施令，对每个人都这样做吗？我不信。……我们将在一起，手牵着手，纵使黄泉之下又何所惧？倘若有任何一种来世赐予我，赐予我存在的精华，我的著作，[我妻子]都将跟我生活，与我携手并肩。只要人类纪念我，就是在纪念她。” [17]

9月，艾丽卡·曼写信给弟弟米夏埃尔。自耶尔塔·梅纽因之祸发生后，姐弟俩关系有所好转。只要能帮助人，艾丽卡心情立马大好。她告诉“亲爱的米奇”弟弟她新近的一些活动。根据托马斯·曼小说《国王陛下》改变的电影濒临“夭折”，人们请她出山，她不得不重新改写电影剧本。“请”的意思是，托马斯·曼向电影制片人宣布，如果不请他女儿当顾问并让她发挥作用，他就公开宣布抵制这一项目。于是人们就请了她。艾丽卡在咨询时态度非常坚决，给自己加了一个小角色，结果大获成功：这部电影由迪特·波尔舍（Dieter Borsche）和卢蒂·洛韦利克（Ruth Leuwerik）主演并于12月上映，观众如潮，影评也很积极。艾丽卡·曼的主要任务在于让父亲开心，说服并加强他的信心：他目前正在撰写的长篇小说《大骗子菲利克斯

·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以下简称《克鲁尔》）是个有价值的工程——他在1913年中断了这部小说的写作。从事电影工作也终于让她重新找到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托马斯·曼对“她的成功尤为满意”，衷心希望女儿能进一步获得机会，“发挥其天赋”。^[18]

艾丽卡在给加利福尼亚州的弟弟米夏埃尔的信里还谈到莫妮卡的情况。莫妮卡在参加母亲生日庆典后一直待在父母家里。“莫妮说好久来三周，结果一直赖在这儿。”已经两个月了，不得不又一次给她找医生，用镇静剂进行治疗，这次又要“帮她打点行李，送她到火车站”。^[19]两个月后，艾丽卡·曼过48岁生日那天，托马斯·曼在日记里记到：“跟莫妮告别，9点半由卡[蒂娅]送到火车站。”^[20]是否自愿，不得而知，但知道去哪儿：她想去看看家乡慕尼黑。

米夏埃尔·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愿意相信，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过了几个月后总算弄明白了：打了耶尔塔·梅纽因，他作为独奏演员的音乐生涯也就走到头了——至少在美国西海岸是这样。现在作报告谈音乐也好，在钢琴伴奏下演奏中提琴也罢，其事业前景无不等于零。在好莱坞搞电影音乐也轮不到他。此时，他朋友卢卡斯·福斯已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音乐教授、交响乐团团长，但这好像也不能给他带来多少机会。他们偶尔联袂登台演出，仅此而已。虽说米夏埃尔拿得出布鲁诺·瓦尔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winsky）和恩斯特·克热内克写的推荐信，可这些都无济于事。梅纽因一家跟这事的发展到底有多少纠葛，没有人搞得清楚。反正米夏埃尔在考虑，放弃音乐生涯，在意大利经营一个庄园，而这得由老丈人给他出钱。^[21]他跟格蕾特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父母家住过一阵，一年后房子终于脱手。曼家不得不降低房价——一个房产中介让他们相信，房子应当能卖到75000美金，^[22]是十年前的投入的三倍。房子最终以50000美元售出。

11月，米夏埃尔·曼从东京发来消息。在加利福尼亚州熬过了令他沮丧的几个月后，他决定去日本和印度旅行，格蕾特陪伴着他。母亲的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是他的第一个求助站。舅舅及其儿子汉斯·埃里克（Hans Erik）照顾客人，给他们找了住处。米夏埃尔写信告诉母亲，尤其是表弟“真的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动”。东京是“美国的丑陋和日本的稀奇古怪组成的混合物”。格蕾特跟他作为二房客住在一幢“有很多拉门”的“小纸屋”里。“最好玩的要数厕所小拖鞋了，厕所是个很奇特的地方，进去时一般都要穿上这小拖鞋——这个地方还是不谈为好。”房子的全体人员每周在浴缸里洗两次热水澡，用的是同一缸水，水事先在房子外面烧好：“最先洗的是房主，然后是他那相当受压迫的太太，接下来是我们——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期盼周六的晚上了！但这些人绝对干净——从厕所小拖鞋就可见一斑。”不管怎么说，这位“最先洗澡的”房东——一个银行职员，用日语读过《魔山》和《布登勃洛克一家》。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为作曲教授，跟儿子一起帮助米夏埃尔·曼组织了几场音乐会。米夏埃尔没指望能拿到多少钱，因此，他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又一次谈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他能否蹭点父亲的稿费，以资助在日本的费用和前往印度的旅行？表弟汉斯·埃里克好像在管托马斯·曼在日本的收入。本来他没有资格“过问”表弟的事情。但还是想请母亲授权让他来管一下。汉斯·埃里克大概时不时汇过一点稿费给父母，但米夏埃尔猜测，埃里克可能也“截留”了一些。“不管怎么说，把情况了解得清楚一些，即他从何时起插手这件事，这些年汇给你们的钱大约有多少，还有多少应该在账上；为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做法或许是，你把相关信息连同你对我们计划采取的‘劫富济贫’的行动方式所持的态度一并写给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给他看。”^[23]

11月，莫妮卡·曼在慕尼黑闲逛，然后给《慕尼黑信使报》（*Münchner Merkur*）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她在故乡的见闻，她跟慕尼黑阔别了20年。“慕尼黑让我感到那么陌生，让我晕头转向，我得找人问路。一听到他们说话，我就又想起来，想起了道路和其他一些事情。”^[24]文化记者理查德·劳帕赫（Richard Raupach）是托马斯·曼的崇拜者，他在慕尼黑采访了莫妮卡。四个月的时间，也通了几封信，在此期间，莫妮卡先是辗转来到罗马，试图在那里落脚，因不堪忍受又躲到了南蒂罗尔的菲尔诺斯（Südtirol, Villnöss）。莫妮卡从那里给劳帕赫写了一封信，说她“处于人生低谷和杂乱无章之际”。清晨醒来她感到“胸口一阵压力——我该上哪儿去呢？”她渴望在一个人的身边，一个她能信任的人。“我信任您。这是浪漫？大胆？还是儿戏？接受过一次采访，写过几封信，然后就想认识并信任一个人？”她说自己不是“可怜的小孩子”，也不是“忧伤的残躯”，请他不用担心，“我有足够的生命活力”。她对他动了情：“这位理查德，这位神父，这位‘不幸者’，这位未婚者，这个非同寻常的人，我想在他身旁。这样好。这样肯定好。所以：有必要。”在附言中她明示自己的心迹：“您是我的依靠吗？您不让我去冒险，对吗？”几个月后，即1955年1月，她从意大利卡普里岛（Capri）给他写信。劳帕赫在回信中显然没有邀请她去。莫妮卡懒得多说了。“谢谢。顺其自然吧。”2月11日是父母金婚庆典。“我可能不回去。没多久就是‘80’大寿——庆祝活动也太多了。我反正‘机动灵活’。没什么特别要说的。您是个值得爱的人。今天这里是春天。爱你的莫妮。”^[25]

2月11日金婚大典前不久——莫妮卡真的没来——托马斯·曼给其美国朋友兼赞助人艾格尼丝·迈耶写了一封长信。跟在美国的那些年不同，他已经不再定期给她写信了。上一年，托马斯·曼告诉她买了新房子，于1954年4月跟卡蒂娅和艾丽卡一起搬了进去。房子在基尔希贝格（Kilchberg），苏黎世湖畔的山坡上，俯瞰苏黎世。托马斯·曼

利用这次机会明确告诉她一件事——此事之前只能在字里行间揣测到：在瑞士的临时居留地早已成为他“不会更改的最终地址”。^[26]现在，结婚50周年大庆前不久，托马斯·曼告诉她，自己身体欠佳，因为感染了病毒，甚至不得不中断在阿罗萨的冬季度假而去医院治疗。他谈到自己撰写的关于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长篇小说，坦陈自己曾经信心不足，是艾丽卡鼓励他，给了他宝贵的支持。书终于完稿，虽不尽善尽美，但可以发表。现在，读者和批评家都为笔调轻快、幽默的《克鲁尔》叫好，书也极为畅销：才三个月多一点，就卖出了60000本。托马斯·曼还回应艾格尼丝·迈耶的想法——她打算把自己关于托马斯·曼的文章、从未完成的曼氏传记以及他写给她的信件交给国会图书馆。至于说他顾及后人的看法，故意销毁了她的许多信件，从而将迈耶看问题的角度，还有她偶尔对他及其政治判断提出的批评都清除得一干二净，这些事托马斯·曼在信里只字不提，而是把话题转向即将到来的80岁生日。托马斯·曼写道，他想像安徒生童话里坚定的锡兵一样听凭摆布——坚定的锡兵似乎根本就是他一生的象征。写到“象征”一词时，他想起新近梦到的一个“孩子气的梦想”：“那就是您送我一枚生日戒指，镶着一颗精美的宝石——一颗翡翠，这枚戒指应当象征着一条纽带，从这里，从我这儿，跨越大西洋连接着华盛顿特区市。”他在梦中对这枚戒指感到开心，“像个孩子，我这么孩子气，到了向您坦白我的梦想的程度”。还嫌不够清楚，他又以间接却又明白无误的方式补充道，正如他多年前为盖房子去求助，或者向她转达女儿伊丽莎白希望这位富豪女友赠送礼物的愿望时那样。“要是您觉得[这一梦想]太小孩子气——也许真是这样，那就不用再费心了，也不用提它了。”^[27]艾格尼丝·迈耶给他回了信。托马斯·曼认为，她对翡翠戒指的梦想答复得简短，但“热情”。她写道，会“想着”锡人和戒指的。^[28]“卡[蒂娅]和艾丽卡肯定要拿我开涮了，要是[戒指]真的到来的话”，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29]

父亲80华诞那天，全家人在苏黎世聚集一堂。这一年，托马斯·曼已经完成了几桩艰辛的差事。他不顾艾丽卡的坚决反对，坐火车去了吕贝克，在当地被任命为名誉市民。此举可被视为他晚年跟故乡的和解。之前，他在斯图加特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这篇演讲倘若没有艾丽卡的帮助——就像晚年其他作品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艾丽卡非常巧妙地将关于席勒的大量文章浓缩进不到一小时的演讲里。托马斯·曼后来又在魏玛重复了这篇关于席勒的演讲。他在魏玛再一次表示不愿意承认德国作为分裂的国家，但此次东德之行得到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代表联邦德国的认可，豪斯是斯图加特席勒纪念会上的另一位重要演讲者。民主德国尽举国之力，再次欢迎托马斯·曼：簇拥的人群，政界的名流，魏玛名誉市民和耶拿大学名誉博士。此时，面对着80岁寿辰带来的各种荣誉，托马斯·曼心里更多是担忧而不是开心。马丁·贡佩尔特，艾丽卡的前男友，不久前去世，享年57岁。“啥时候轮到我？”托马斯·曼在日记里写道。^[30]



图40 1955年5月，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告别吕贝克

艾丽卡·曼除了全方位照料父亲外，还帮忙把父亲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后来又忙于自己的计划：写儿童故事。以前她就曾经写过，现

在找到了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再次发行了《克里斯多弗飞往美国》（*Christoph fliegt nach Amerika*）和《我们的魔术师穆克叔叔》（*Unser Zauberonkel Muck*），还发表了她的新近写就的关于少年梯尔（Till）的系列故事：梯尔成为“候鸟”少年合唱团的成员，唱着歌曲周游欧洲。这些书水平上乘，但中规中矩，一名评论家称之为“大妈型”。^[31]令人吃惊的是，那么强大、充满激情和勇敢的艾丽卡写的这些故事里居然没有一个有趣的女孩形象。尽管如此，艾丽卡的儿童故事非常成功：她计算给弗朗茨施耐德出版社（Franz Schneider Verlag）的数字是销售了10万册，该出版社在出版了第四本梯尔故事后终止了双方的合作。^[32]为父亲的写作提供帮助，还要忙于自己的项目，艾丽卡·曼殚精竭虑，身体状况日趋欠佳。她不得不经常去疗养院疗养或去医院看病。多年来大量滥用药物、吸毒和喝酒无不在伤害她的身体。但艾丽卡依旧认为，一切均在掌控之中，所以，即便她最终接受别人的劝诫去进行戒毒治疗，结果也没有相应的疗效。

米夏埃尔·曼带着全家，伊丽莎白亦带着女儿从意大利前来参加父亲的生日庆典。米夏埃尔跟格蕾特一起在亚洲旅行，一直玩到年初。他们在印度各地游玩，开了几场音乐会，作了几场关于新音乐的报告。1954年复活节，时隔一年半后，他俩再次跟儿子弗里多和托尼相见，此时老大14岁，老二12岁。1954年秋天，米夏埃尔·曼在姐姐伊丽莎白位于佛罗伦萨菲索勒的住处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两个儿子在伯尔尼的寄宿学校待了两年，从这时起跟他们的表姐妹一样，在佛罗伦萨一所瑞士学校上学。米夏埃尔还再次鼓起勇气，想在德国找到工作职位。曼家的巨大关系网都动员起来，比如米夏埃尔请西奥多·阿多诺——此时已从流亡的加利福尼亚州回到法兰克福当教授，替他在法兰克福音乐大学争取一个职位；^[33]他还要姐姐艾丽卡利用关系让他去从事电影配乐，结果都是徒劳一场：想以音乐家的身份在生活上混得下去，看来已经没了指望。格蕾特·曼的父亲弗里茨·莫泽尔

——一位事业有成的工程师和企业家，又拒绝米夏埃尔的想法：离开音乐，经营一家意大利的农庄。

戈洛·曼来参加父亲的生日庆典，心情极好。他的《美国精神》（*Vom Geist Amerikas*）一书于1954年出版，销售得很不错，评价也很积极。市场对这类书的需求很大，人们想更多地了解美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对手、现在的盟国，可德国人对这位盟友知之甚少。戈洛·曼在书里描述他的流亡之乡及其各种矛盾现象，带着好感，亦不乏批评的眼光：一方面是孤立主义，另一方面是扩张的欲望；一方面古板拘谨，另一方面又纵情享乐；一方面肤浅草率，另一方面又对宗教充满着虔诚。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弗里茨·雷特里希（Fritz Redlich）在《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把戈洛的这本书称为“大概是用德语写作的关于美国精神的最佳入门”。^[34]从此，戈洛·曼在德国被视为美国专家。这一时期，他也经历了一次打击：瑞士的《世界周报》曾聘请他在1953年夏末担任社论撰稿人，戈洛·曼的政治判断，还有在推崇西方的同时提出的告诫，即不要中断跟东欧阵营的对话——这些立场均跟该报所持的咄咄逼人的冷战路线大相径庭。1954年7月，他最终被扫地出门。而此时，戈洛早已克服了曾经的失望，一个新书项目——撰写《19世纪与20世纪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也起到了安抚作用。最近几个月，戈洛·曼是在妹妹伊丽莎白或弟弟米夏埃尔处度过的，他享受着与家人的团聚和代替弟弟给弗里多当“爹”的角色。然后，他又退居博登湖边阿尔特瑙（Altnau）的一家旅店，专心写作。阿尔特瑙是他在萨勒姆上学期间就喜欢的地方，但在瑞士一侧——在旅行中探访德国，跟德国朋友会面是一回事，长期住那儿又另当别论，这样做他仍感到心有余悸。

莫妮卡·曼答应要来。“过生日可是件好事，”父亲回信时写道，“既可以让你轻松轻松，又能让你长大一点。没有这生日只怕你

永远耗在卡普里岛了。”^[35]她在写一本书，具体写什么家人不知道，大概也不想知道。

庆典持续了三天，从6月4日至6月6日。瑞士联邦主席亲自莅临并发表致辞，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表示敬意。苏黎世技术大学授予他一个新的博士学位。在苏黎世大剧院，专程从美国飞来的布鲁诺·瓦尔特作为惊喜嘉宾站在舞台上，指挥着莫扎特的《小夜曲》。演员们，其中有艾丽卡的旧日情人和曼家的老朋友特蕾莎·吉赛，朗诵着托马斯·曼的作品。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弗里茨·施特里希主持当晚的活动，他曾于1935年明白无误地告诉曼氏家人，对哈佛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不能反应得“不冷不热”。^[36]托马斯·曼在美国的出版人阿尔弗雷德·A.科诺普（Alfred A. Knopf）也来祝贺，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自然也到场了。朋友汉斯·赖西格及其他许多人纷纷祝贺老寿星——他在舞台上朗读了《克鲁尔》中的一个段落。在真正的生日那天，民主德国的一个代表团将一套刚印好的12卷本《托马斯·曼全集》交到他手上。艾格尼丝·迈耶肯定写了信，也一定寄来了一份礼物。但这两件事我们都无从知晓，只知道她没有满足她朋友托马斯·曼希望得到一枚翡翠戒指的梦想。家里人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但因为翡翠太贵，所以选择了碧玺。艾格尼丝·迈耶是幼稚地把戒指的“梦想”当作梦和跟她联系的纽带的象征，还是故意没把托马斯·曼的昂贵愿望当回事——这个男人在背离美国时甚至没有亲自跟她道别，这一点并不清楚。她2月的最后一封信听起来已经像是在跟一位伟人，跟一段伟大的、即使是单相思的爱情告别：她在信的结尾感谢托马斯·曼，“您让我的生活与追求升华，使其完美”。^[37]

生日过后两个月，托马斯·曼在苏黎世躺在病床上。他跟妻子在生日庆典后不久曾一起坐车去荷兰，作报告，接受表彰，拜访女王，然后又一次去海边度假，因为腿肿而中断了在荷兰的逗留。托马斯·曼被送进苏黎世州立医院。卡蒂娅·曼跟医生商量好，在她丈夫面前

说是“血管发炎”，而医生的诊断为血栓。实际病情比医生的诊断还要糟糕：腹主动脉严重硬化并破裂。8月12日，托马斯·曼去世，当时妻子卡蒂娅在他的身旁。

四天后，托马斯·曼在基尔希贝格的墓地安葬。米夏埃尔·曼及其家庭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正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Ischia）度假。在坐火车去苏黎世的途中，弗里多·曼经历了父母之间发生的争吵。突然间，他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开始“挥舞着双拳打我母亲的脸”。^[38]旅行不得不中断，格蕾特得到医生的救治。情绪稳定后，旅行才得以继续。戈洛·曼跟母亲和艾丽卡一起在医院陪伴着父亲度过了其最后的时光。葬礼前，他过于激动，艾丽卡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一生中从未见到过的情景：母亲哭了。



图41 托马斯·曼在基尔希贝格的葬礼：前排为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和卡蒂娅·曼，其后为米夏埃尔和艾丽卡·曼，弗里多和戈洛·曼，最后为格蕾特和莫妮卡·曼

*

托马斯·曼去世一年后，有两家出版社宣布要出关于他的书，而且都出自其家庭成员之手。莫妮卡·曼写信告诉姐姐艾丽卡，说她的出版人刚刚把这一情况告诉她。“肯定会有闲言碎语和肤浅而无聊的比较，不管我们的意见，背着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眼皮下，你信不？！很有可能。我将不予理睬。希望你也一样！”^[39]莫妮卡出版其自传《往事与今事》（*Vergangenes und Gegenwärtiges*）。她强

调，5月，即父亲去世前几个月，她就已开始写作此书。担心姐姐会发火并非空穴来风。艾丽卡·曼回信说，所有这一切都“令人讨厌”。她写道，莫妮卡应该知道，她受费舍尔出版社的委托，在写一部关于父亲的书，名为《最后一年》（*Das letzte Jahr*）。相反，莫妮卡的自传几乎不可能跟父亲有什么关联。现在，艾丽卡看到，金德勒出版社（Kindler Verlag）到处都以著名的父亲和莫妮卡看他的眼神来做广告，“真是无孔不入，或和谐，或震撼，或隐私——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这辈子还从未见过谁这样报道过托马斯·曼。”艾丽卡要求妹妹，尽快让出版社停止继续用托马斯·曼来做广告。莫妮卡的自传必须“立足于本人”，她没有“权利”谈论父亲，父亲跟莫妮卡的关系容不得她“在书里哪怕用一页纸的篇幅和内容”来谈论他。艾丽卡写道，否则结果将是，关于这两本书的“讨厌的流言蜚语”横飞。“说真的，这一切都令人恶心！”^[40]

四周后，这两本书面世。莫妮卡书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帧肖像，加上一句说明：“托马斯·曼的女儿主要讲述她父亲。这样看待和描写托马斯·曼，如此私密，如此直接，如此无遮无拦，前所未有的。”^[41]莫妮卡·曼在另一封信里向姐姐保证，书的广告、封面及其他所有跟书有关的事情都与她无关，“这我可以发誓”。她认为，从根本上说来其实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难道这场不幸不会在‘世界的湍流’中消逝吗？每个人不是应当为自己负责吗？难道我们就那么在乎（或许是！）闲言碎语吗？来点幽默不好吗？”^[42]

艾丽卡·曼在其关于托马斯·曼的书里记录了最后一年的庆典、荣誉和旅行，描述了导致父亲死亡的病情发展，病情跟之前的劳累没有关系。她强调自己在托马斯·曼后期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比如对纪念席勒的讲话进行了删减。她赞颂父亲的“谦虚、善良和幽默”。^[43]一想到那些书评，艾丽卡就对莫妮卡充满怒火。《明镜》（*Der Spiegel*）周刊嘲笑两姐妹行动迅速，托马斯·曼过世后这么快就让书

上市。赫尔曼·凯斯滕曾经声称，曼氏家人个个写得都好，而《明镜》周刊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曼氏家人个个都喜欢写”。^[44]总体来说，批评家们的基本评价是，艾丽卡·曼的书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珍贵的资料，也包含太多无聊的细节。《法兰克福汇报》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写道：“比如艾丽卡·曼对烧熟的海鸥蛋的软硬程度进行的描述，读者就无须知道。”^[45]跟对细节进行的批评相比，更让艾丽卡痛心的是，大部分书评作者都认为，莫妮卡·曼的自传更胜一筹。虽说她也得承受一些批评，特别是对一些章节，她想让自己显得重要，结果反而变得庸俗不堪，抑或像《明镜》周刊所述，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由回忆、幼稚的哲学和天真的评论组成的混合体”。^[46]但莫妮卡原汁原味的各种观察，该书“自成一体的韵味”，还有对父亲爱意浓浓却不乏批评的眼光受到了称赞。^[47]托马斯·曼具有过人的力量，莫妮卡·曼写道：“他要是冷了，不会发出哆嗦的声响，也不会颤抖身体，但他周围就会变得非常冷。”^[48]他是个伟人，作为父亲，他在女儿眼里显得有些遥远、有点威严，并非不友好，但潜心于他的艺术创作。卡蒂娅·曼告诉弟弟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莫妮这野丫头”写的书“不真诚，歪曲事实，而且不合法”，却“极为成功”。^[49]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弟弟，有一位评论家曾称赞莫妮卡却批评艾丽卡，莫妮卡虽说具有“独特的写作天赋”，但她对父亲的各种回忆是“不地道的”：“在所有六个孩子中，她跟父亲的距离最远，书中所有关于他的真实情况——虽然也没讲多少——无不源于她的想象。”^[50]莫妮卡·曼写信告诉一位美国女朋友：“全家‘沸腾’了。个个似野狼般地向我扑来！”^[51]

莫妮卡·曼在《往事与今事》里很少具体描述她的各种经历，许多事情都是云里雾里的。她回忆各种心境，还原许多场景与印象，还首次公开描绘她一生中最大的灾难——“贝纳雷斯市号”的沉船事件，她丈夫在这场大祸中遇难，她在水中漂浮四个小时等候救援：

“然后我身边全都是死尸，夜特别黑，浪特别高，我口渴，喊不出声音，我的手冰寒彻骨，呕吐了一次……海浪像黑乎乎的巨山般压过来，把我彻底覆盖在下面；有死去的孩子，因恐惧和寒冷，还有饥渴而死，是的，那种饥渴！死孩子像玩具娃娃一样在我身旁漂浮，暴风骤雨狂泻而来，然后月亮升起，此时，孩子们在月光下的黑色海浪中上下漂浮。” [52]

9月，莫妮卡·曼来基尔希贝格父母家探望母亲，艾丽卡·曼离家远行。

米夏埃尔·曼跟妻子格蕾特坐在马萨诸塞州马萨葡萄园岛的沙滩咖啡馆给母亲写信，这是1957年9月。自从最终放弃作为独奏演员登台演出的希望后，他在匹兹堡交响乐团当中提琴手达两年之久，现在辞职了。米夏埃尔想彻底远离音乐。下学期，已年近38岁的他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米夏埃尔中学没毕业，究竟怎样去学，谁也不清楚。他告诉母亲，刚刚又在读父亲的长篇小说《约瑟》。但在学习期间他不想碰父亲的著作，他的博士论文要“写一篇音乐故事”。等成了“老先生”后，他总有一天会重回托马斯·曼的作品，姐姐艾丽卡得“早早作好思想准备”。接下来，米夏埃尔谈到孩子们的来访。格蕾特和他于1955年重回美国前作出决定，把弗里多和托尼留在欧洲。先打算把他们安排在菲索勒的伊丽莎白家，托马斯·曼去世后家里决定，要弗里多去基尔希贝格祖母卡蒂娅家，托尼到佐利空（Zollikon）外祖父母莫泽尔家。此时，两个儿子，一个17岁，一个15岁，正好来看父母，这是格蕾特和米夏埃尔回到美国后第一次见到他们。两个孩子“让人感到特别舒服，是体贴周到、说话算话的聊天伴侣”，米夏埃尔·曼写信告诉母亲，但他还是有些担心，主要是弗里多：“其生活态度”让他想起——“直白了说，像你的莫妮，只是其智慧、敏感和特别需要讨人喜欢让人看不到真相而已”。对于他的“傲慢”、“生活上的懒惰”和“缺失的现实主义”必须坚决抵制。

“妈妈，我知道，你从不让他缺少什么，至少是不缺好东西（说到底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感谢你。”他觉得很成问题的是，弗里多一方面看到“莫泽尔先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对托马斯·曼后人的角色深感自豪——他在苏黎世大概经常被人“当成托马斯·曼的儿子”，这让他喜滋滋的。弗里多想当音乐指挥家，对此，米夏埃尔·曼坚决不同意。“他音乐天赋平平，状况只会越来越不利，最后充其量不过能当个生活上捉襟见肘的乡下乐团指挥，我可不希望他这样。”弗里多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文理中学毕业后，最多从生活上再支持他一年。米夏埃尔在对儿子长篇大论后结尾说，他很高兴，不必“无休止地跟他们纠缠”，“因为我大概也不会；你肯定做得比我好多了。别想歪了，我是把我的印象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53].

米夏埃尔资助自己的学习计划靠的是“佐利空的牛皮大王”，这是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对家财万贯的老丈人的称呼。格蕾特和他虽然拿他们的钱，但米夏埃尔并不愿意依靠他。他的部分生活费用自己筹措——所谓“自己”就是：作为托马斯·曼的遗产继承人。卡蒂娅·曼是主要继承人，不仅继承了大部分财产，而且有权获得未来图书销售所得以及电影改编和其他权益收入的75%。但米夏埃尔·曼说服母亲放弃大部分稿费收入。现在，孩子们每人拿到托马斯·曼15%的稿费。一位大学教授当年在德国年收入为25000马克左右。1956年至1960年，S. 费舍尔出版社每年给托马斯·曼的五个孩子平均汇去38000马克。 [54].

莫妮卡·曼现在长期住在卡普里岛上。她找到了一个去处，外加一个男人——安东尼奥·斯帕达诺（Antonio Spadaro）。斯帕达诺在岛上开一家卖饮料和纪念品的小售货亭，一幢名叫“摩纳哥（Monacone）”的别墅属于他家，许多年前，奥斯卡·科科施卡（Oskar Kokoschka）曾在爱情的狂热中把情人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画到墙上——她后来曾是戈洛·曼在法国逃亡时的难友。这些画早已被覆盖。斯帕达诺一家人对艺术没有感觉，他们只是普通的

手艺人。莫妮卡住楼上，安东尼奥·斯帕达诺住楼下，结为夫妻后依旧如此。1960年，莫妮卡的一本新书问世：《启程》（*Der Start*），副标题为《一部日记》（*Ein Tagebuch*）。封面是她的玉照，怀里抱着一只小猫。那些希望对这个著名家庭有进一步了解的读者感到失望。短小、粗浅、几乎没有情节的故事，那些叫本（Ben）、梅特（Met）或阿兰（Alain）的人物，都如浮云般倏忽而过，其间夹杂着印象主义的大杂烩：“你躺在沙里。那么多沙。有几粒碰到你。一道光。轮廓，无数的，物体和你的轮廓重叠在一起。这就是成功。”
[55]

著名女演员特蕾莎·吉赛身染重病，她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Mutter Courage*）和弗里德里希·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的《老妇还乡》（*Besuch der alten Dame*）里饰演女主角。1959年年中，艾丽卡·曼的这位昔日情人不得不取消直到秋季的所有演出。她收到来自苏黎世一位女崇拜者的信。信中说，早在1930年代她就十分欣赏吉赛在苏黎世话剧院和“难以忘怀”的小品剧《胡椒磨》里的表演，从此一直在关注她的事业。这位苏黎世女士继续写道，听说吉赛染恙，她担心这位女艺术家收入可能减少，所以希望，在信里附上的2000瑞士法郎“或许对她有用”。“对不起，吉赛女士，要是我的这点心意您个人不能接受，那就请用于其他用途吧。” [56]钱和信均出自艾丽卡·曼之手，用的是假名。

1960年10月，戈洛·曼搬往斯图加特。至此，他重新返回家乡——德国，此前，他做了许多准备，旅行，作报告，在明斯特当了两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流亡27年后他回来了。戈洛·曼仍然感觉不太舒服，在任聘教授谈判时，他态度坚决，请求允许他保留其美国国籍。戈洛·曼时年51岁。他在斯图加特工业大学担任科学政策教授。两年，他撰写的《19世纪与20世纪德意志史》（以下简称《德意志史》）出版：当年，德国历史学家曾把大学生戈洛·曼从课堂上赶

走，让他去学哲学，现在，他的这本书用欧洲的视角代替了那帮历史学家狭隘的民族眼光。戈洛·曼赞扬社会民主，称之为“贯穿德国历史的一条红线”。此外，他对德国的最新历史、民族社会主义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穷追不放。他谈到矗立在德国社会中间的“凶手屋”，没有人想谈论它，甚至当时的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对最新的黑暗历史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学校的历史课或家中的谈话就更不用说了。^[57]身为当年的希特勒反对者和流亡人士，更何况有曼氏家族

“传奇之家”成员的身份，作者戈洛·曼是可信的。尤其对年轻读者而言，他们绝不认为，非要“亲身经历过”才能评判第三帝国，他们开始向老一辈发问。在《德意志史》的最后一章里，戈洛·曼甚至敢于对分裂中的德国和冷战中的世界之最新发展进行勾勒。这在当年对一本历史书籍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本书既遭到极左分子的痛斥（全都是错的，因为反马克思主义），又受到极右分子的攻击（这位流亡者缺乏对德意志人民的爱）。除了这些人外，该书受到了一致好评：“如果这本书到了很多人的手里，可能会让德国人民——当下他们似乎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中——重新找回其过去的历史，他们竭尽全力忘掉它，却枉费心机”，《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样写道。^[58]

《时代》（*Die Zeit*）周报评价说，戈洛·曼成功地展示了一本“扣人心弦的书，该书轻重有序，臧否有度”，文笔隽永，人物描写神形兼备，一句话：这是一场“令人赞叹的成功冒险”。^[59]

在关于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那一章节里，戈洛·曼也谈到父亲及其扮演的政治角色。“有十多年的时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从事艺术和精神的梦幻般的创作。战争开始时 [1914年] 他突然睁开眼睛，刹那间睁得很大，反对起政治来。结果是既深刻、厚重，又复杂、笨拙，属德意志中最德意志的。”在《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里，托马斯·曼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非政治化的德意志进行的一场保卫战——反对“西方政治化、民主化的文明”。“如果说这种美好、特别聪明、正派的思想混乱曾经有过某种实际意义的话，

那就是已不单纯是为了捍卫从根本上早已动摇的专制国家。”几年后，托马斯·曼表示拥护共和国。“正如曾经赋予战争某种意义那样——一种跟现实几乎没有太多关系的意义，他从思想上替共和国寻找到了依据，这些依据都是用美好的德国古典艺术创作堆砌而成的：是文学，而不是现实。”托马斯·曼的《魔山》就政治与哲学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成为魏玛共和国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身为作者的托马斯·曼公开支持德国和法国的相互谅解与社会公正，其目的是为内部和外部的和平作出贡献，因为他自己需要和平——为了自身的、非政治性的创作。“最后，当极右派开始对共和国进行大规模攻击时，他变成了战士。他说‘是’，总是半心半意，因别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削弱。他说‘不’，则总是明确无误，掷地有声。这位伟大的市民曾经亲自给市民阶层做出了榜样，这种榜样他们原本是可以效法的，而且也应当效法。现在，他们总算基本上遵循了他的榜样，虽然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恰恰是这一点成为“托马斯·曼，这位政治家的光荣”，他很早就为直到现在才成为现实的事业而战：社会民主与欧洲统一。^[60]

戈洛·曼对父亲的描写温馨而充满敬意，同时又不乏批评。除此之外，他还跟父亲在1945年以后的公开立场——同时也是艾丽卡和克劳斯的立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热情地叙述家里所有其他人都坚决反对的事情：联邦共和国的发展及其融入西方的努力。《时代》周报以评价《德意志史》为契机，对曼氏家族进行反思：一个“传奇之家”，以一位天才为首，火花迸射的智慧与魅力迷人的天才并举，“跟政治打起交道来却又是那么不幸”。戈洛·曼的这本书证明了一点：“这个家庭培养出了一个后生，他的的确确懂得用政治头脑（从国家、历史、现实的角度）去思考问题。”^[61]

《德意志史》的销售空前成功。S. 费舍尔出版社在极短时间内又出版了戈洛·曼的一本政论集——《历史与故事》（*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该书甚至进入《明镜》周刊畅销书榜的行列。一套十卷本的、之后又扩版的《普罗皮连^[62]世界史》(*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由戈洛·曼担任主编，同样于1960年问世。这套书的作者来自许多国家，这是一种尝试，要写成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而不是用德国眼光书写世界历史。米夏埃尔·曼也获许参与，写了一篇欧洲音乐史，从各种源头写到贝多芬时代。这套书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根据出版社的数据，后来几年的销售数超过了300万册。戈洛·曼仅在1960年至1965年就拿到16万马克的稿费。突然间，他富有了，成名了，不断有人采访他，请他写文章、作报告。1959年3月27日，50岁生日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荣誉——青少年时代的补偿。”^[63]

1960~1961年冬季学期开始时，戈洛·曼来到斯图加特，住在旅馆里，不得不请他的新助手们开着车到处跑。他膝盖骨断裂，拄着拐杖走路。戈洛自问，这是不是不祥之兆？

艾丽卡·曼在参与托马斯·曼作品的电影改编——是人家“请”她的，先是《克鲁尔》，然后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电影拍摄。而艾丽卡最主要的项目则是出版父亲的书信集。S.费舍尔出版社为此公开发出号召，恳请有关人士提供托马斯·曼书信的影印件。这本书也是为另一本书作准备——艾丽卡·曼已计划并跟S.费舍尔出版社敲定好的书：她想写一本托马斯·曼传记。可是身体已不听使唤。艾丽卡不得不再三进医院治疗或去疗养院疗养。除吸毒、嗑药和酗酒等老毛病外，新的疾病和伤痛接连不断：循环系统、胃和支气管有疾，脚骨骨折，尤其是大腿股骨颈断裂后一直未愈。她几乎在每封信里都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当前的病痛，也少不了自我怜悯。1961年1月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也如此，此信是她在苏黎世的西斯兰登医院写的，她不得不在那里接受血栓治疗。艾丽卡描述了她处处受限的状况，然后说母亲亦经常生病，支气管炎，又染上了病毒，之前两次发生血栓，现

在又有“严重的肠炎”。可惜伊丽莎白对“亲爱的母亲关心得少得可怜”。伊丽莎白每次来访，总是很快便又消失；每次带母亲去滑雪，总是跟女儿上滑雪道，对老母亲整天不闻不问。母亲现在需要帮助，需要人陪着聊天。她自己目前在医院，伊丽莎白的女儿们都成年了，可以管好自己了，一句话：“希望你这位人所皆知的宝贝疙瘩能来”，而且是“特别希望”。^[64]伊丽莎白答复说，眼下还真不行，杂志的事务太多。跟母亲通过电话后她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母亲的状况令人担忧似的。是否能发动在苏黎世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来陪陪母亲。“你的意外指责让我真的感到意外，也让我痛心，但我决定不再纠缠此事。”^[65]

成为公众人物后的弊病，戈洛·曼看得很清楚。在加利福尼亚州时，他跟男友埃德·克罗茨在一起生活，根本就不用遮遮掩掩，因为没人对他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他得小心了。1955年以来，他有了个男朋友——汉斯·贝克（Hans Beck），戈洛认识他时他还是个中学毕业生。在此期间，戈洛资助贝克学医。戈洛于1962年荣获冯塔纳文学奖，他跟汉斯·贝克一同前往柏林。他们订旅馆，对外是每人一间房。他把这位年轻人称作继子。无论如何别惹来闲言碎语。过后，两人继续前往汉堡。这是私人旅行，所以戈洛在这里敢跟这位男友在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不用再订一个房间来做样子了。



图42 汉斯·贝克于1959年

*

1963年1月，法兰克福大学生杂志《铁饼》（*Disku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西奥多·W. 阿多诺进行猛烈攻击。这位社会学教授跟马克斯·霍克海默一起成为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因为一篇音乐评论而遭到质问。文章是他在1934年流亡国外前匿名发表的。阿多诺在文中赞赏男声合唱团唱希特勒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的诗——该诗被谱成曲子，还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浪漫现实主义（romantischer Realismus）”这一概念——一个算在戈培尔名下的概念。^[66]阿多诺当年顺从的自我同化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也成为艾丽卡·曼跟阿多诺书信往来时的话题。他们因为出版托马斯·曼的书信一直保持着联系。“真是的！不就是几个考虑不周的句子嘛！”艾丽卡写信给他。倘若是托马斯·曼，也同样“不会理睬这桩小事的”，而且“他在梦中也不会对您这样一位他非常敬重的人在年少时的那么一点点傻事而有所怪罪的”。更何况阿多诺是多么“优雅”地从这么一桩“区区小事”中脱身的。^[67]阿多诺放下心来，回信告诉艾丽卡，她的信让他感到很高兴，对他来说，世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的声援能比得上艾丽卡·曼的。希望能够再次相见。致以最热诚的问候，也请向敬爱的母亲问好。^[68]

西奥多·阿多诺跟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是曼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邻居：曼家如果出行，霍克海默夫妇就照看房子和花草，两家相互邀请喝茶或吃晚餐，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在入籍时他们还作为证人予以帮助。就《浮士德博士》一书而言，倘若没有阿多诺的建言和对书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很难想象能获得成功。阿多诺并没有期望得到什么回报，对那场争论也一无所知，即托马斯·曼在描述小说创作过程时考虑如何描写阿多诺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艾丽卡与卡蒂娅·曼的坚持下对小说进行的删减处理。大家相处得都非常友好，回到欧洲后依旧如此。但这都是虚情假意。多年来，法兰克福再三作出各种努力，要聘请戈洛·曼到大学来担任教授。特别是黑森州文化部部长，一位《德意志史》的铁杆崇拜者，竭尽了全力。可这位部长每次都遭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的指控荒唐可笑，却十分有效：戈洛·曼，其母亲按照纳粹的标准为犹太人，却被指责为暗地里反对犹太人。他们还凭借某些迹象宣布戈洛·曼是同性恋，而让这样的人担任大学教师是对年轻大学生不负责任。戈洛·曼获悉了这两项旨在阻止他去法兰克福任教的指控。他反过头来又把阿多诺那篇难堪的音乐文章寄给《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文章是艾丽卡弄来的，她还鼓励戈洛这样做。但该报拒绝发表。争夺影响力及对公众的吸引力把昔日的流亡战友变成了敌人。这是暗中的敌意，背地里暗潮汹涌，表面上却极其热情。这不是艾丽卡·曼的行事风格。她要求赔礼道歉，而不是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在试图通过弟弟戈洛让阿多诺的文章变成一场丑闻时，艾丽卡就建议，报纸一定要提到消息来源是谁。^[69]1963年4月，她通过写信让阿多诺落入圈套后，好好享受了一回报复的甜美滋味。艾丽卡在回复阿多诺那封感到放心的信时写道，好一个“恐怖又可怕的误会！”“恰恰是您，‘浮瓶传信’^[70]之语言的发明者（跟霍克海默一起），居然把我所说的全都

当真——倘若是我，肯定不会这样。”阿多诺应当知道，“但凡事关戈培尔、席拉赫及其同谋者”，她“从来都不会开任何玩笑”。阿多诺肯定会注意到，“我的每一个用语‘听起来’都那么不可信，或者说错得那么离谱（‘从音乐上’来讲）。“不就是几个考虑不周的句子嘛”！考虑不周？您当年还是个小男孩吗？”他真会相信，托马斯·曼拿这件丑闻不当回事？“他肯定会对您大加讨伐，愤怒到极点，相比之下，‘沃坦的愤怒（Wotans Zorn）’^[71]不过是喃喃耳语罢了，剩下的是反感与不信任，而且肯定永远不会消失——并且永远无法消除。”^[72]

1963年7月，戈洛·曼退掉了斯图加特的房子，在打包装箱。他在这里住了不到三年，现在离开这个城市，回到母亲位于基尔希贝格的房子里，他在屋顶阁楼的一个小房间反正住了好几年了。戈洛在大学停薪留职一年，但并没有再度回到斯图加特的打算。1962年12月，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危机，不得不住进一家精神病医院。活动安排的压力太大，人们想从他这儿得到的太多，他不能说不，浪费了许多精力。戈洛马不停蹄在外面跑，面对人山人海的观众登台演讲，但让他非常气愤的是，斯图加特对他所作的贡献几乎视而不见。当年，他有意识地挑选了一所技术大学而不是综合性大学，因为行政管理事务比较少。但是，除了几个拿他的课程当副科来修的未来工程师和对他产生兴趣的几位斯图加特女士之外，来听他讲座的人寥寥无几，这让他很生气。此外，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想当个作家。戈洛·曼总说他要写一部重要作品，不是杂文，也不是报告。虽说迄今为止出版的那些书，尤其是《德意志史》赢得了巨大成功，但他觉得它们都谈不上真正的扛鼎之作。要写一部比较重大的、新颖的、叙述性的著作。在熟人圈子里，他偶尔会说，当年要是愿意的话，本可以当名作家的。他姐姐艾丽卡回答说：“能者为之。”^[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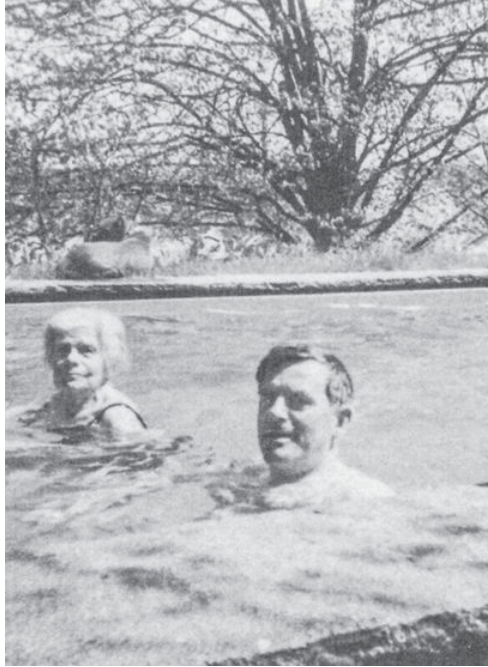


图43 卡蒂娅跟戈洛·曼在基尔希贝格家里的游泳池里

1963年7月，曼氏一家人在苏黎世巴尔拉克酒店（Baur au Lac）庆祝母亲80寿辰，该酒店正是1905年卡蒂娅和托马斯·曼旅行结婚时的住处。米夏埃尔和格蕾特·曼从美国赶来。伊丽莎白带着女儿多米尼卡从意大利来，比多米尼卡大4岁的安吉丽卡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所以不能来参加——卡蒂娅·曼的第一个重孙米歇勒

（Michele）四周后呱呱坠地。莫妮卡·曼从卡普里岛来，家里的其他人反正都生活在苏黎世或附近。伊丽莎白的女儿在上大学，安吉丽卡学物理，多米尼卡学生物。弗里多刚从苏黎世音乐大学结束学业，正在探寻他未来的生活道路。祖母生日刚过，他就从基尔希贝格的家里搬了出去，为的是去罗马参加一个音乐指挥的课程，其实他有个秘而不宣的目的：改信天主教并学习天主教神学。他弟弟托尼刚完成了花匠学徒的课程。卡蒂娅·曼的生日变成了一个难得的全家人再次团聚的机会。

生日过后，戈洛·曼跟弟弟米夏埃尔和他儿子弗里多去奥地利徒步旅行。兄弟俩关系不错，谈论了许多事情，也包括父亲。父亲之死对他们俩来说既是一种打击，也是一种解放。米夏埃尔·曼已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学习，以一篇关于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音乐批评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大学拿到了一个助教的职位。对于他的入选，日耳曼语言文学系有人提出批评，说聘用他仅仅是因为那个姓氏的光环。米夏埃尔逐步开始接触父亲的作品，但也仅限于作品。他曾写信告诉艾丽卡，一听到父亲的录音就有心理障碍，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看到姐姐编辑出版托马斯·曼书信集就敬而远之。^[74]但他已经收集了材料，打算出版一部托马斯·曼文集，要成为“内心自传”一类的书。^[75]边徒步旅行边交谈，米夏埃尔和戈洛一致认为，父亲其实是个胆小如鼠的男人，这样就能解释其生活与作品里的许多现象。戈洛·曼说，他自己胆子也很小，不像米夏埃尔那样胆大。聊天时大家无所忌讳，所以米夏埃尔坦白了一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怀疑戈洛是托尼的生父。这让哥俩都捧腹大笑。据说如此。^[76]

莫妮卡·曼出了本新书，题为《宇宙的圆点》（*Tupfen im All*）。新书开篇第一章叫“城市”，第一节为“地下铁道”：“下面那儿永远都一样。永远都是破烂不堪、震耳欲聋的单调。永远都是深处的屈辱。这是啥地方呀，一个个挤在一起，就像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我们心中响起安慰的话语——很多我们这样的人！”^[77]她写的书只要不涉及自己家，就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出版社出版。各家报纸也拒绝评论她的大部分作品，如果内容不涉及曼氏家族或她著名的父亲的话。她在卡普里岛自己的房门上挂了一个牌子：“莫妮卡·曼。作家”。可几乎从来没有人登门拜访。

艾丽卡·曼编辑出版三卷本托马斯·曼书信集，其中头两卷于1962年和1963年发行。这是女儿为父亲做出的又一大壮举：数千封

信，收信人散落各方，要动员他们提供复印件，再对这些浩繁的信件进行筛选，真是艰辛至极。就其文字编辑工作而论，能说的好话也就这些了。艾丽卡·曼对文字工作。在导言中，她对编辑工作进行说明，同时穿插着个人对父亲的回忆——那些家庭的传奇也没有忽略。在这里，托马斯·曼得以再次用克劳斯虚构出的警句格言来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天空不久将出现一把带血的剑。”^[78]艾丽卡·曼对书信所作的说明很肤浅、不严谨，时而过于简短，时而啰里啰唆，总体来看不够专业，因而遭到批评家的嘲讽。更严重的是她所作的删减。刊印托马斯·曼的信件，要对有些段落作删节处理，对此，艾丽卡有其标准：在不同信件里内容重复之处，还有“过于私密”的内容——对后者公众“还”没有知情权。^[79]第一个标准引发了批评：英格·延斯（Inge Jens）在《时代》周报上写道，这种做法“破坏了”信件的上下关联，读者原本宁愿看重复的段落而不要看到这类删减。^[80]可批评家们并不知道：对这些书信的删减范围实际上还要大得多，不仅仅涉及重复的段落和“过于私密”的内容——当然也包括这些，比如托马斯·曼提到其同性情爱的地方。在第一卷的导言里，艾丽卡·曼引用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的话，想通过这些书信集向人们展示，托马斯·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81]听起来很好，事实上却跟她想做的背道而驰。特别是有关政治的段落，只要这些段落跟艾丽卡·曼要描绘的父亲形象不一致，她就删除：针对民主的批判性言论，这些言论就是在美国那些年的信件里也可以读到，还有托马斯·曼在流亡的最初几年所表现的摇摆不定。第一卷里，艾丽卡·曼挑选出12封父亲给她的信，却没有一封是1933年以后那段时间的，当时——尤其是到了1936年——艾丽卡使尽了浑身解数要说动父亲公开宣布自己流亡。为了维护父亲的形象，她选用了托马斯·曼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他在克劳斯和艾丽卡合著的美国流亡之书《逃避生活》里，为描写自己的那篇人物特写所写的前言。这篇文章被当作父亲致大女儿和大儿子的私人信件来处

理：[\[82\]](#)这样做是为了突出父亲的典型形象，而这种形象是托马斯·曼塑造给美国读者看的，目的是宣传他在流亡初年的政治态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艾丽卡·曼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敦促父亲以流亡者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艾丽卡不仅删掉了托马斯·曼在1945年以后对德国的批评——1946年给儿子戈洛的信中关于和平同盟的那些犀利言辞，还有德国人“愚蠢”以及希望来一场新战争的说法，而且甚至对删节处未作任何标识。[\[83\]](#)在一封给弟弟戈洛的信里谈到书信集的一个问题时，艾丽卡称，她对待真相是“实验性的”，只是尝试，是例外。[\[84\]](#)这是句玩笑话，却又并非玩笑。

第二卷的跨度是从1937年至1947年，也就是托马斯·曼的美国岁月。他写给艾格尼丝·迈耶的信构成该卷的主要内容，这些信均由这位美国女友提供给艾丽卡·曼：艾丽卡收录了110封，占该卷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书信往往涉及政治，只要是艾丽卡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她就照删不误——她相信托马斯·曼的这位女崇拜者不会对这类删节发表意见。艾格尼丝·迈耶为曼氏家族作出了巨大的付出，艾丽卡·曼却只字不提，在导言里只谈到迈耶“乐于助人”。很多信都谈到托马斯·曼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那个收入不菲的“顾问”职位，对此，艾丽卡在一个注释里提到是艾格尼丝·迈耶“推荐”的他。至于说这一职位不过是貌似存在，顾问的薪酬是艾格尼丝·迈耶用私人财产支付，目的是资助曼家在加利福尼亚州盖房子，这些情况这卷的读者当然了解不到。[\[85\]](#)曼家的形象——“在赤贫中”走向流亡生活，后来通过艰辛的打拼和取得的成就不但自己养活自己，还去帮助别人，是艾丽卡在这本书和其他文章及采访中塑造的，跟其他家庭传奇的性质如出一辙，比如她从纳粹严密看守的慕尼黑家中抢救出《约瑟》手稿等。[\[86\]](#)

艾丽卡于1961年5月把托马斯·曼书信集第一卷的导言寄给戈洛，戈洛小心翼翼地试图建议姐姐采用另一种风格：宁可“不带感情色

彩”，“完全是字斟句酌、官方文风、平淡、简短”，比如说不用个人的眼光来描述父亲。“当然可以采用另一种风格”，戈洛立刻又退了一步。^[87]他不想破坏跟姐姐原本就比较脆弱的关系。艾丽卡没有理会这一建议。在导言的结尾处，她让父亲在回忆中变得栩栩如生，强调他的可亲可爱，他对别人的关怀，感谢别人让他开心。艾丽卡还谈到父亲喜欢自己的亮相，并引用托马斯·曼本人的名言：他在“沙龙”里是个“相当平淡、无聊的人”，到了大讲坛上却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说这话时他还笑了。艾丽卡·曼补充说，“都过去了。他——那个磁石般的人物，再也不能吸引我们，让我们无法摆脱。”^[88]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爱的宣言，一曲哀悼失去父亲的动人挽歌。以女儿兼出版人的身份保护父亲的传记和著作不受敌对世界的攻击，这样做不可能给她带来幸福，更不可能把父亲还给她，这一点艾丽卡预感到时已为时太晚。大概在跟女友希格涅·冯·斯坎佐尼（Signe von Scanzoni）交谈时她也才真正感悟到。^[89]

莫妮卡·曼萌发了写本新书的想法，于是跟姐姐商量。姐妹俩勉强克服了1956年的那场危机，在过去几年里不时有信件来往，但只有像母亲过生日那样的极少数机会才能见上一面。莫妮卡于1964年1月写道：“另外，我打算出一本文选。《我们这十一口子》（*Wir sind elf*，包括外祖母、外祖父），十一口写作的人。不是豪华的纪念碑，更多是开心的东西，是优雅的小雕像。”一本收有家人文章的集子将由莫妮卡·曼写序并出版。她请艾丽卡同意她这样做，可能的话请她选一篇合适的克劳斯的文​​章。按照莫妮卡的计划，父亲将由《约瑟》里的一个章节来代表。“尚未敲定哪家出版社。反正是一家好的。”^[90]艾丽卡·曼的答复明确无误：不同意。这一计划“完全不合适”，而且“没有品位”，何况这不只是她个人的看法。然后艾丽卡又拿其他事情说事：莫妮卡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一再发表关于家庭和父亲的文章，大家在一次“圣诞节家庭咨询会”上谈到了这些文章，参加会议的除她外，还有戈洛、伊丽莎白、母亲和几位朋友。与会者

对莫妮卡散布的那些谎话——在其自传里，现在又不断出现在她新写的文章里——都感到非常气愤。对于这些谎话，人们现在都信以为真，并拿去当作原始资料使用。比如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曼家过圣诞节的文章：父亲根本没有把雪茄烟放在莫妮卡声称的地方，而是放在另一个柜子里，金箔片在圣诞节前不是放在孩子们的手里，而是撒在床上。“没人强迫你叙述些你想不起来或者你觉得令人感动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不符合事实的话。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你要是再一次把你那些关于魔术师或[和]他家的‘回忆录’公开抖搂出来，其中含有不实之语的话，米兰因和我就将发一份说明给各家新闻社，声明所有这些回忆录——不管其文学价值如何——均不能、也不容许作为原始资料被使用。”艾丽卡还在信末附言里加了一句：“这封信米兰因读过并表示同意。”^[91]家里个个都跟她作对。这封信深深刺痛了莫妮卡。她痛斥姐姐“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怪罪”她，完全是出于“极大的嫉妒心”。大家不是不知道，她没想提供什么“原始资料”；我“以印象主义的抒情方式抒发感情，某些地方带有自传体性质”，“每个人都可以——或愿意的话——得出结论，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不污蔑任何人，也不打算给文学史添加些垃圾和谎话，抑或造成其他什么伤害”。^[92]姐妹俩就此中断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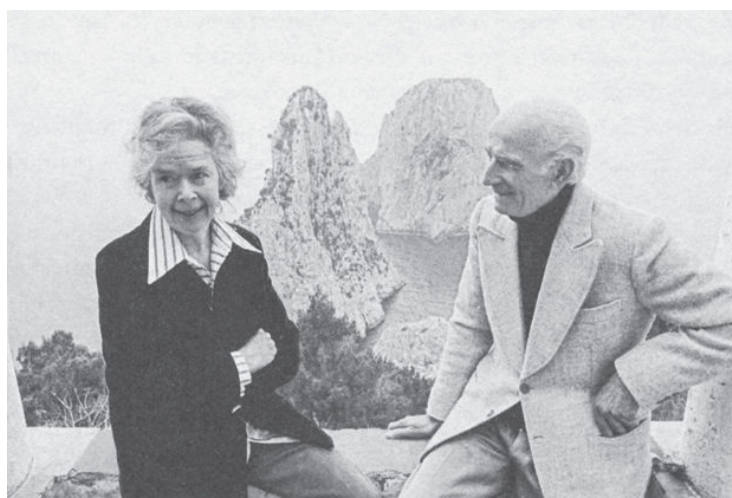


图44 莫妮卡·曼跟安东尼奥·斯帕达诺在卡普里岛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68年5月从加利福尼亚州写信给母亲，激动地报告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她是在伯克利参加的。此时已成为日耳曼语言文学正式教授的米夏埃尔也参加了。这两个小弟、小妹关系很好，自从伊丽莎白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以来，两人见面的次数又多了起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在意大利施展了各种才华，写了不少小说和剧作，其灵感得益于她的意大利生活伴侣、比她大33岁的科拉多·图米亚提（Corrado Tumiatì）。卡蒂娅·曼这样评论女儿对老男人的偏好：“谁也不可能把他当我儿子看。”^[93]后来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发表了一本表明心迹的书——《妇女的崛起》（*Aufstieg der Frau*）。这本书描述对人类和动物世界女性本质的各种观察，试图展示一个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女性在这样的乌托邦里依附于年长的男性，以便学习，然后摆脱他们，走自己的路。接下来她把人与动物的交流当作自己的课题，研制了一台她的那些狗能弹的钢琴，还教她的猎狗“阿里（Arli）”用打字机打字——一台专门设计的狗鼻子打字机。圣诞节时她把狗写的信息发了出去。伊丽莎白从苏黎世出发，开车去旅行，穿越印度，跟大象进行交流。她联系上一位巫师，这人有一只神犬。所有这些事情她都在自己的书里进行介绍，这些书的名字有《动物世界：从写字的狗到看书的猴子》（*Das ABC der Tiere. Von schreibenden Hunden und lesenden Affen*）等：“现在〔那条狗阿里〕完全无须帮助就能写了，而且空格完全正确：一条坏一条坏狗（A BAD A BAD DOOG）。他说的是真的？我们面临真正交流的突破口吗？”书的作者确信无疑：“他‘说的’真是他要‘表达’的。”^[94]姐姐艾丽卡有一次问伊丽莎白，她自己是否相信她所描写的这一有趣世界，或者她“只是想要成功和金钱”？^[95]



图45 1960年代的艾丽卡·曼

1964年，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应朋友罗伯特·哈钦斯之邀，去位于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由他成立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工作。从这时起，她又重新开始研究世界政府的设想。科拉多·图米亚提于1967年去世后，她彻底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去住了。可是，伊丽莎白已经不喜欢“穿旧鞋走老路”了——她现在这样称呼那个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实施的旧日想法。前不久她接触到一个新课题。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阿维德·帕尔多（Avid Pardo）于1967年11月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个演讲，热情地为实施一部新海洋法作宣传，据此，海

底将被宣布为人类共有遗产。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深受鼓舞，立刻邀请阿维德·帕尔多来圣巴巴拉。她找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说服了哈钦斯并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她要拯救海洋。伊丽莎白于1968年5月给母亲写信，满意地谈到世界大国美国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希望——在意大利和法国建立左派的社会党人政府。在离伯克利不远的奥林达（Orinda）——米夏埃尔在这里盖了一幢房子——举行过一次反越战游行，事后她“挺开心的”，“阳光灿烂，游泳池，鱼子酱，愉快的谈话”。S. 费舍尔出版社是否终于把托马斯·曼的稿酬汇出了？她曾收到数额为10万马克的部分预付款，但通常的清单还没寄到。她的工作“进展顺利”。[\[96\]](#)

戈洛·曼辞去斯图加特的教授职位后，跟母亲和姐姐艾丽卡一起住在基尔希贝格的别墅里。卡蒂娅·曼写信告诉女儿伊丽莎白，[\[97\]](#)。她跟戈洛就像过着“很不错的婚姻”，但他的多愁善感和抑郁发作的阶段让人感到压抑。在另一封信里她又写道，“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讲，生活总是这么循规蹈矩、慢慢流逝”。[\[98\]](#)生活变得有些空落落的。因为一再出车祸，前不久她失去了驾照，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有拿回来。身体不算好，但她不喜欢诉苦。跟艾丽卡的关系不好，影响到家里的气氛。母亲告诉伊丽莎白，“艾丽卡心肠不好”。[\[99\]](#)她检查母亲的信件，有时候以卡蒂娅的名义回信。两个强者碰撞在一起，中间夹着无助的戈洛·曼，他不是个很机灵的调解人。双方都不太拿他当回事，在电视里露多少次面也好，拿过多少种奖也罢，就连给联邦总理当顾问也没用。戈洛说这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冷战”，要是他觉得受不了，往往外出旅行，不是去朋友处就是去位于泰辛的度假房。[\[100\]](#)

1969年5月，戈洛·曼告诉一位女友，他们家里简直是糟糕透顶。姐姐艾丽卡得了重病——“一个无法治愈的脑肿瘤”。动过手术，却不成功，还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101\]](#)五周后他又写道：“可惜

姐姐还活着：因为这已经不能称为‘活’了。好几个星期了，她连一个字也没吐过：只有眼睛还无比悲伤地瞅着，充满着恐惧和疑问，还有责怪。”^[102]戈洛·曼不再去医院看她，看着曾经那么受人称赞、魅力无比、让人钦佩的姐姐到了只有儿童智力的程度，他受不了。相反，这星期刚过完86岁生日的卡蒂娅·曼每天都去女儿那里，艾丽卡·曼的最后一位生活伴侣希格涅·冯·斯坎佐尼只要有机会也来看望她。艾丽卡·曼于8月27日离开人世，距父亲逝世14年，离弟弟克劳斯·曼去世20年。不久，希格涅·冯·斯坎佐尼开始写下对艾丽卡·曼的回忆和思考，不是写给公众，而是写给自己。她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柔情似水的艾丽卡·曼，对父母家、对老母亲负有责任感，跟这位女友等待着“以后”——等到母亲去世以后一起去克洛斯特斯（Klosters）的一幢房子里共度未来；这样一个未来没有了，现在艾丽卡已先于母亲安葬在基尔希贝格的墓地，在父亲的右边。

五年前发生争吵后，莫妮卡·曼跟大姐再没有任何联系。米夏埃尔和伊丽莎白·曼在艾丽卡动过颅脑手术后分别从美国赶来看望濒临死亡的大姐，安慰年迈的母亲。莫妮卡待在卡普里岛，连姐姐的葬礼也没参加。卡蒂娅·曼生气地给她写信，大加指责。“谁都推卸不了责任”，莫妮卡·曼答复道。“但凡对我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我是个拘束、内向的人，因而绝不缺少情感、同情与关心，也许比较安静和疏远。我所说和所写的一些事情，特别是涉及家里的事情，听上去总是‘相当动人’，这是睿智、亲近的朋友们说的。这必然有其原因！我过的（当然有其原因）隐居生活可能让我遵循其他规则，我遵循的生存规则跟你有一点点不同，你能认可并予以尊重吗？我只求把我和我的生活安安静静地安排妥当，不想惹是生非。”^[103]

在过去几年里，米夏埃尔·曼特别小心，尽量不跟大姐艾丽卡发生争执。每逢姐姐必须去医院治疗，他就经常写信让她开心，给她送花。姐姐去世后，他第一次走进基尔希贝格父母房子时说：“其实这

里现在真的蛮舒服的。”至少莫妮卡·曼在1984年发表的《试谈艾丽卡·曼》（*Versuch über Erika Mann*）一文中是这样宣称的。她这样评论弟弟的这句名言：“什么叫不孝不敬的典型？这就是。”^[104]

*

1974年10月，卡蒂娅·曼的《我未写的回忆录》（*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出版。正如书名所述：这是一本卡蒂娅·曼不想写的书，她没写这本书。它由米夏埃尔根据一系列电视采访卡蒂娅·曼的记录编辑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在伊丽莎白·普莱森（Elisabeth Plessen）对她进行采访时，卡蒂娅·曼勉强同意。她说，之所以接受采访，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好脾气”。“一直都有人要我写回忆录。对此我说：在这个家庭里一定得有一个不写作的人。”^[105]现在，这本未写的书在卡蒂娅91岁生日过后不久出版，作为她丈夫百年诞辰纪念的序曲。在回忆录里，卡蒂娅·曼以聊天的方式讲述跟托马斯·曼在一起的生活，讲述家庭及其各种冒险经历，还有“魔术师”去世后的生活状况。其中有很多趣闻逸事，经过这许多年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一如既往地辛辣有趣。书的最后是家人的谈话。戈洛·曼说，按照法国人的诙谐说法，“有些寡妇好丢人现眼”，他母亲却从不这样，也从来不想在公众面前抢着出风头：“她不想出风头，甚至该出的时候也没出，这是我的看法。”“行了！”母亲回答道。“老冯塔纳（Fontane）曾经说过：人只要活着就必须好好活，现在我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这样做罢了。”^[106]

1975年6月的第一周，汉萨城吕贝克市庆祝其伟大的儿子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托马斯·曼的遗孀卡蒂娅从瑞士前来参加活动，由一个女护理员和两个儿子戈洛、米夏埃尔陪同。戈洛·曼自觉自愿地将舞台留给小弟，所以由米夏埃尔·曼在纪念父亲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米夏埃尔的演讲充满哲理，学术性强，哥哥戈洛不无吃惊地在日记里记下。^[107]本能让米夏埃尔远离父亲，在日耳曼语言文学方面的抱负又让他欲罢不能。米夏埃尔已计划好在欧洲进行报告之旅，作关于父亲的报告，总共86场——再一次以“独奏艺术家”的身份巡游。来欧洲前他已在美国上过几次台，但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首次作关于托马斯·曼的报告时就绊了一跤，从讲台上摔下来，把腿摔断了。接下来他拄着拐棍继续报告之旅。戈洛·曼特别迷信这类征兆，因而很担心：父亲诞辰纪念年开局不顺。^[108]

弟弟接手了作为托马斯·曼继承人的部分任务，戈洛·曼对此感到高兴。他经常强调绝不想当父亲“在地球上的牧师”。^[109]可每当他认为托马斯·曼受到不公正的公开批评时，他又会气愤不已。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工作笔记》（*Arbeitsjournale*）发表后，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在加利福尼亚州流亡期间，托马斯·曼眼睁睁地看着哥哥海因里希·曼差点饿死。对此，当儿子的戈洛在《时代》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回应这“臆想的诽谤”。^[110]他跟弟弟时常商讨两人都涉及的事情：在公开场合出场前吃什么药片，哪一种药对治疗抑郁疗效好，他们俩都在跟这种疾病作斗争。两年前，米夏埃尔曾写信问哥哥，现在有一种叫锂的新药，“你知道吗？”他想请一位“透露这一消息的心理医生”开这种药，“教宗的手杖或许还真能开花呢！”^[111]兄弟俩还交换作为“托马斯·曼儿子”的经历，看谁有过更离谱的经历。他们谈到有这样一类人，谈话一开始便讨论父亲，作一些不恰当的比较，或提一些令人发窘的问题。父亲也经常成为两人聊天的话题。米夏埃尔在一封信里给哥哥描述了一个曾经做过的梦，“在魔[术师]去世前不久，我把他痛打了一顿”。当米夏埃尔跟他讲这个梦时，戈洛回答说：“这样做哪里还值得呀。”^[112]戈洛·曼自己常常梦见父亲并把这些梦记录在日记里：“父亲长途旅行回来，好像又是庆祝一个什么大生日。我跑进他待的房间，说

了个反正挺尴尬的‘那么’，我是那么幸福，那么激动，真的好想拥抱他。他冷冷地躲过我，嘴里冒出一个硬邦邦的‘再见’。”^[113]

戈洛·曼创作的传记《华伦斯坦》（*Wallenstein*）于1971年出版，成为惊人的畅销书，这本书厚达1300页，在一年之内卖出近10万册。大部分评论家的反应都是欢欣鼓舞：一部“撰写历史的大师之作”，一件“学识渊博的艺术品”，一曲“讲述历史的凯歌”。与此同时，戈洛·曼作为政论家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多年来，他赞同跟东欧阵营国家进行对话并和平共处，为推行新东方政策而奋斗。戈洛认为，作为第一步，必须最终承认，德国东部地区已经失去，因为除非进行战争，否则如何能从波兰人手中夺回西里西亚（Schlesien）？无论是作报告，参加专家论坛讨论，抑或在电台和电视节目里，他都坚持这一立场，因此多年来一直遭到攻击，甚至包括谋杀恐吓和反犹势力的袭击。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出任总理后为其新东方政策大造声势，戈洛·曼站在他一边，既当顾问又当评论家，给报纸写文章，接受采访，参加公开活动。现在，《莫斯科条约》（*Der Moskauer Vertrag*）等签订后，他功成身退。社民党左翼青年和埃贡·巴尔（Egon Bahr）关于一个中立社会主义德国的蓝图让他坐立不安。在他看来，对融入西方和欧洲的联合绝不能产生任何动摇。

参加完1975年吕贝克的庆典后，戈洛与米夏埃尔兄弟俩各奔前程。戈洛·曼去看望昔日的生活伴侣汉斯·贝克。贝克在几年前成立了家庭，成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虽然没有结束大学的学业，却在戈洛·曼的穿针引线下，在位于莱沃库森（Leverkusen）的化学康采恩拜耳找到了一个职位。在莱沃库森奥普拉登（Opladen）他家的房门口挂着一个牌子：“贝克-曼”，房子是戈洛资助的。从1968年起成为瑞士公民的戈洛·曼这时获悉，他收养汉斯·贝克的申请遭到拒绝，本来这样可以正式让他们一家成为曼氏家人的。此后不久戈洛·曼申请德

国国籍，以便按照德国法律收养汉斯·贝克。被褫夺国籍近40年后，戈洛·曼又成了德国人，同时保留瑞士国籍。



图46 米夏埃尔·曼跟继女拉耶在一起

米夏埃尔·曼在启动欧洲报告之旅前，又一次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此期间，他儿子弗里多已成为临床心理医生，这时带着妻子克里斯汀（Christine）——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贝格（Werner Heisenberg）的女儿——和儿子斯蒂芬（Stefan）也在加利福尼亚州。他们看望格蕾特·曼并认识了拉耶（Raju），一个印度女孩，是格蕾特跟米夏埃尔·曼于1970年收养的，她当时7岁。可是，米夏埃尔·曼早在几年前因通信跟弗里多发生过争执，随后断绝了跟儿子的关系。只要弗里多来访，他就去他在纳帕谷（Napa Valley）的周末小屋。弗里多·曼给父亲寄来一封信，提议和解。父亲的回信很快便寄到了：“我们俩决定相互保持距离，这一距离不应当成为影响你生活的因素。父亲们和儿子们应当经常相互避开，而不要总是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安排得还不错。”^[114]不过，他们俩这年夏

天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见了面。上一次相见是九年前，米夏埃尔·曼这次送给儿子一只和平烟斗。

托马斯·曼诞辰100周年过后不久，即1975年8月12日，是托马斯·曼逝世20周年纪念日，他指定的日记保密期也随之宣告结束。他的日记要尽快出版，米夏埃尔想负责这件事。在去作报告的旅途中，他已经让人把日记的片段寄给他，晚上在旅馆里阅读——不管在赫尔辛基、利兹、佛罗伦萨、巴黎还是雅典。他以旅行日记的形式给一位朋友写信，信里隐约提到他大量喝酒和大量服用药片——他在旅行时带着一只公文箱，里面装有特制的“威士忌酒吧”。米夏埃尔·曼还在信里描述阅读父亲日记的情况：“文学上当然可以用，虽然毫无掩饰的隐私让我在准备出版工作时面临着不少问题。”对于1918年的日记他写道：“我还是胚胎。”他读到医生的建议，要把他打胎打掉。

“可母亲不愿意。虽说增加人口对经济状况没啥好处，但五个孩子还是六个孩子，这有啥区别吗？这是父亲的立场。他唯一算得上担心的就是，要是再来一个‘宝贝’，可能会减少他对宝贝‘丽莎’（麦迪）诗一般的快乐享受。下一批信里就能看到我出生了。明天在斯德哥尔摩。”他对父亲的日记欲罢不能。“魔幻般的风景，”他在意大利时写道，“在写作和阅读时，担心会错过这些好风景（1954年日记——那场不幸的意大利旅行；我带来的信到此为止）。”^[115]

在纪念父亲之年，米夏埃尔·曼集中全副精力忙着父亲的日记。戈洛·曼在他多年担任出版人之一的《新评论刊》上发表了《忆吾兄长克劳斯》（*Erinnerungen an meinen Bruder Klaus*），这篇人物特写也作为后记发表在一本克劳斯·曼与他人的往来书信集里。哥哥克劳斯在1945年后备受煎熬，因为人们对他的书籍反应不大，兴趣很小，但最近几年来，他成为非常受人欢迎的作家。人们对反法西斯作家和流亡文学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大，再加上同性恋运动发现了克劳斯·曼。德国司法部门也帮了忙。新出版的《梅菲斯托升官记》打上了

官司，虽然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已在数年前亡故——其生活伴侣和唯一继承人状告这部小说的出版。联邦宪法法院于1971年裁定，古斯塔夫·格伦特根斯死后的人格保护要重于艺术自由，因此不允许《梅菲斯托升官记》出版。这一判决给克劳斯·曼带来了巨大声誉。一纸禁令反而撩拨了人们的兴趣。戈洛·曼对兄长的描写充满个人的情感与同情，他在文章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本人就曾向兄长提过，那是克劳斯1948年又一次自杀未果以后：为什么？戈洛认为，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探寻克劳斯在什么条件下不会自杀更有意义。“德国图书市场倘若更早些对他开放，正如其现在所为，倘若他自己弄清楚，就他而言，这里蕴藏着巨大而非微弱的机会，而且他要继续当个美国作家的抱负根植于一场误会，倘若他再耐心等待一下，德国人对他的书籍可能会趋之若鹜，反响、影响和金钱都会向他招手——要是如此，他或许就不会自杀了。另外，倘若父亲——我们说1949年冬天——就去世的话，克劳斯也不会自杀。一小部分原因是有了遗产，到那时自然而然就会分到他头上，更大一部分则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116]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全身心地投入她的人生课题：海洋。她写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海洋之悲剧》（*The Drama of the Oceans*）。她在书里激动地呐喊，要人们注意海洋的问题：污染、过度捕捞、开采资源，还有海洋对世界气候的意义。此外，她还在演绎着她的乌托邦：要是迄今为止的无人之地——海洋没有陷入民族利益的纷争，而是被宣布为人类的共同遗产，要是人类满怀责任心地从经济上对待海洋，让贫穷国家享受海洋的宝藏及其财富，那会怎样呢？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提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海底管理局”：“矿藏资源将超越国家领土与法律范畴，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由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她还明确表示，这样一个机构对她来说只是第一步：“如果能够成功……建立这样一类机制，应对我们的海洋问题……，那么，这种成功的做法可以扩大到更

大范围：这样做意味着创立了一种21世纪世界组织的范例。”^[117]她没有放弃世界政府的旧日梦想。



图47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阿维德·帕尔多于1980年代

《海洋之悲剧》是一本畅销书，被译成13种文字，这是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前，她协助举办了首届国际海洋法会议，并参与成立设在阿维德·帕尔多家乡马耳他的国际海洋研究所。她响应帕尔多的号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课题，现在跟她景仰的帕尔多开始了一段绯闻。伊丽莎白再次将爱情与工作挂钩，这一次她的男友只比她大4岁。他们俩并不经常见面，只是在大小会议上和工作碰面时聚首，一切都要保密。帕尔多没有抛弃自己的家庭。

1976年12月31日晚，米夏埃尔·曼为参加一场除夕夜派对准备住到朋友家里。他妻子格蕾特染上了重感冒，早早就上了床。^[118]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玩命工作，特别是为了父亲的日记，该书不久将要问世。米夏埃尔·曼计划出版两卷本的日记选集。第一卷将收录托马斯·曼仅存的早期日记，时间跨度为1918年9月至1921年12月，此外还有1933年至1936年的日记。第二卷计划挑选剩余日记里的一部分，时间为1936年至1955年他去世前。S. 费舍尔出版社请彼得·德·门德尔松

(Peter de Mendelssohn) 评估这一计划，他于1975年发表了一部大型托马斯·曼传记的第一卷。门德尔松认为，差不多所有部分都必须另起炉灶，完全不同于米夏埃尔·曼的计划。他的注释错误连篇，也不准确，对日记所作的删减在门德尔松看来过于随心所欲。书的前言——一篇特别短的“出版人辩护词”——没有一句话对选择的标准作出解释，对日记的历史及其传承亦无说明。同样，对1921年至1933年间日记的缺失也只字未谈，这一缺失造成日记选集第一卷前后不连贯。^[119]米夏埃尔·曼对这些建议和批评基本上置之不理。戈洛和伊丽莎白向出版社表示，同意门德尔松提出的修改建议，可能还指出了在法律上决定权在母亲手里。听到这一消息，米夏埃尔·曼感觉打击很大：用产权的归属来威胁他，“做得算不上漂亮 (not of particularly good taste)”。他正在寻找一条途径，“我在试着走出所有这些是非之地 (I am just trying to map my way out of all this nonsense)”。^[120]他说此话用意何在，下一步该如何走，这一点并不清楚。现在，米夏埃尔在去朋友那里欢度新年之前，拿起药片，跟往常一样，用酒吞服下去。他，身着节庆的西服，躺到床上，就一会儿。

格蕾特·曼没有注意到，米夏埃尔根本就没有出门去参加庆祝活动。第二天中午时分，她让13岁的继女去看看，他是否醒了。拉耶看见父亲身着西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苍白。^[121]格蕾塔·曼也没能把他叫醒。家庭医生确认米夏埃尔已经死亡，然后打电话给警察。根据警察的报告，此案涉及一位57岁的白人男子，死亡原因明显系过度服用药物。根据死者妻子的描述，死者一直大量服用药片，有安眠药，有唤醒药，还有“抗压力药”。服药时他经常把剂量搞错，或忘记已经吃过药了，然后又吞下平常的剂量。是的，他曾经提到自杀，但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圣诞节对他来说总是意味着抑郁。据家庭医生所述，死者已经有过一次自杀的企图。过量服药过去也发生过，但医生认为均非有意为之。^[122]

弟弟去世三个星期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从加利福尼亚州给母亲写信。“但愿你的小牙松动得还不太厉害。牙医那儿去过了吗？”她说刚从欧洲飞回美国，纽约冷得出奇，还提到刚刚跟女友格蕾特过了“开心的一天”。^[123]对米夏埃尔只字未提。剩下的三兄妹决定，对母亲隐瞒米夏埃尔——她最小、最宝贝的儿子——过世的消息。卡蒂娅·曼7月满94岁，慢慢变糊涂了。三兄妹认为，母亲因患老年痴呆反正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米夏埃尔住在遥远的异乡，又很少回来探家，所以他们希望母亲察觉不到实情。卡蒂娅·曼偶尔会给远方的孩子们回信。一年前，她在给伊丽莎白的一封信的结尾处写道，还能“东拉西扯地写上几句”，“但我觉得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她母亲在35年前一样，卡蒂娅·曼感觉精力大不如前，世界也变得愈发乱糟糟的。她在一封致伊丽莎白的信里加了一句，“乱涂了几句”，“但我以前一直对亲爱的父母说：宁愿短点，次数要多点”。^[124]一年后，卡蒂娅的老年痴呆发展得很快。孩子们致母亲的信也相应地简短：报个平安，这种交流是不指望有回复的。莫妮卡于3月从卡普里岛写信来，说现在是春天了，“因为地球不停地在转动，我们也跟着它转动并且变老，而地球却没有丝毫变老的迹象。这句话也许记在那本日记里。虽然日记本上上了一把小锁，你当时还是照读不误（我当时8岁），还记得吗？！你情况到底怎样？我听别人说——也通过别人了解到——蛮好。我很高兴”。^[125]跟昔日那么强大的母亲在一起生活让戈洛·曼备受煎熬。他在日记里记道：“情况越来越恐怖。”她现在每天都在喊“Offi”——她母亲。“我觉得，也更希望这种梦魇不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人必须死得及时，否则就毁了一生一世：只有魔鬼才喜欢看到这一切。”^[126]他组织人员照顾母亲，让她全天时时刻刻都有人照料。他觉得两个妹妹把担子都甩给他了。妹妹伊丽莎白甚至还写信，说她不认为戈洛作出了牺牲，而是只有好处，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过了一年才又恢复。^[127]基尔希贝格家里的状况使他感到压抑，搞得他手忙脚乱。“怜悯”和“厌恶”的情

绪不断在切换。戈洛在日记里写道，母亲的有些做法过去就让他惊愕不已，比如缺少章法和性格强硬，到了老年糊涂时仍旧没有改变。然后他又写道：“昨天心血来潮亲了母亲一下，因为我实在觉得她可怜：又在空空荡荡、弥漫着悲哀气氛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艾丽卡，那种表情太可悲了。”^[128]

在此期间，围绕托马斯·曼的日记爆发了一场争论。S. 费舍尔出版社以彼得·德·门德尔松的鉴定为由，敦促在米夏埃尔·曼交来的书稿基础上对日记选集进行修改。出版社恨不得对整个稿子进行全面修改，至少放弃对1918年至1921年那段特别敏感时期的删节，那是托马斯·曼反民主的最后阶段。门德尔松给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写了一封信，指出一部删节本会引发“轩然大波”，“若干年后都不会平息”。全世界都会对“有意在中括号里所加的省略号感兴趣。人们自然而然地会猜测，那家人不让发表的段落或许在政治上（或者人品上）比发表的部分还要有失体统”。^[129]客观上兄妹三人意见一致，同意门德尔松的意见。问题在于格蕾特·曼，她把死去的丈夫留下来的这一版本当作一种遗愿，坚决反对作任何形式的修改，即便注释里的错误也不容改动。“增加或减少内容，就已经是篡改，已经在改动了，”她写信给大伯子戈洛·曼，“不管作任何改动，只要改了总归是错的，比比的去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定格下来。”^[130]伊丽莎白试图说服这位女友，向她解释“不可修改的想法并不正确”。她还以自己的观点来分析弟弟之死，指出他的书稿错误不少，思路有问题，而这跟他的亡故亦有关系。“他知道面临着种种困难：或许这一认识促成了他的死亡。”^[131]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坚信，弟弟是自杀身亡。回过头来看，她最后一次看望米夏埃尔时，其行为举止和送给她的礼物无不意味着永远的告别。^[132]格蕾特·曼却不这么认为。她告诉戈洛·曼，那是疏忽，是不小心服药过多。^[133]后来疑点越来越多。秋天，格蕾特去苏黎世并将米夏埃尔·曼的骨灰安葬在家庭墓地，她给大伯子戈洛·曼带去一首诗，是她在米夏埃尔的纸堆里找到

的。这首诗源于题为《自杀者之歌四》（*Selbstmördergedichte IV*）的诗歌集，内容描写了直到脉搏跳到最后一下的旅行。[\[134\]](#)

父亲的日记对戈洛·曼来说是一大折磨。弟弟米夏埃尔以前寄来首批复印件时，他就在日记里写道：“让人难堪的轻率之举，形同在验尸。他为何没将这些东西销毁？”[\[135\]](#)现在，格蕾特·曼一气之下把米夏埃尔的版本收回后，家里跟出版社达成一致，要彼得·德·门德尔松出版一套基本上没有删节的版本，戈洛·曼作为家属代表必须阅读那些复印件。他决定，只删除很少几段有关隐私的部分，主要是婚姻中对情爱的细节描写，他不想印出来，更何况母亲还健在。另外有些段落他没有删掉，却让他本人备受折磨，尤其是托马斯·曼对同性情爱的渴望、压抑和恐惧——父亲的日记对戈洛·曼来讲形同一面可怕的“超级大镜子”，像是自己性格的写照。[\[136\]](#)再加上昔日共同经历过的悲伤时代又重新浮现在眼前。他妹妹莫妮卡根本就不愿意同父亲的日记有任何瓜葛。她写信告诉彼得·德·门德尔松：“没人问过我，要我的话，就让所有这些东西都见鬼去吧！！！说老实话，这些破事让我作呕。”[\[137\]](#)

*

1981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戈洛·曼写了一封信：“最亲爱的小猫咪”，开头这样写道，信里透着一种欢快的心情。他告诉妹妹伊丽莎白，跟家人——贝克·曼一家共度节日，还谈到基尔希贝格的房子，说进行了整修并用新家具和画作对房间进行了布置。但他有那么“一丝感觉：好像在布置一艘正在下沉的船”。[\[138\]](#)

1980年4月25日，母亲去世，差三个月97岁。卡蒂娅·曼在基尔希贝格度过的最后时光更多是让人感到悲哀和难过。远方的孩子们不时写写信，伊丽莎白讲述“老掉牙的事”，主要是去参加纽约联合国的各种各样的会议，作为积极分子和说客，她在那里为各种海洋法而奋

斗。1978年，提携她的罗伯特·哈钦斯去世后，此时年已六旬的伊丽莎白再次确立新的人生方向。她接受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 Halifax）的一个职位——这一职位在1980年将变成一个政治学教授的教席。从这时起，她带着她的六条狗生活在哈利法克斯附近一幢坐落在海边的老木头房子里。伊丽莎白写信给在基尔希贝格的家人：“这算不上疯狂，还有比这更糟糕的。”^[139]莫妮卡·曼从她蛰居的卡普里岛写信给母亲报平安，跟她共同生活的安东尼奥·斯帕达诺身患心脏病：“莫妮向你问声好，打电话时你听不出来是谁，拼命在大叫。”^[140]莫妮卡在另一封信里写道，戈洛快要过70岁生日了，她自己明年也70岁了：“要是自己的孩子70岁，并非每个母亲都那么开心——因为也有讨人嫌的地方。”^[141]1979年3月，戈洛·曼在挚友——黑森的玛格丽特郡主（Margaret Prinzessin von Hessen）于达姆施塔特附近的狼园宫殿庆祝他的70寿辰。联邦总统瓦尔特·舍尔（Walter Scheer）乘坐直升机前来祝贺，许多朋友都一起欢庆，妹妹伊丽莎白和戈洛的继子一家也都在场。莫妮卡没有受到邀请。戈洛·曼忍受不了跟老年痴呆的母亲生活在一起，也不愿意总是跟她的护理人员发生冲突。70岁生日前，他搬到慕尼黑附近伊京（Icking）去住，他在那里买了一幢房子。戈洛·曼又一次试图回归家园，又一次回归政治：这段时间，他为巴伐利亚州州长和总理候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摇旗呐喊。回归德国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人们架起望远镜，仔细观察这位声名显赫的邻居。他让一名漂亮的摩洛哥男佣照顾生活，还经常有年轻后生来访。1980年4月，在母亲临终的最后几天和最后一刻，伊丽莎白跟戈洛·曼都一起待在基尔希贝格。他们觉得死去的母亲“像在睡梦里被睡美人的诅咒击中一样”。^[142]

1981年，在纽约为卡蒂娅·曼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上，戈洛·曼为母亲写的一篇悼文被朗读出来。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很不情愿看到前几年、前几个月、前几周的她，可她不得不那样。我愿意看到从

前的她，那是保持着自己尊严的她：强大、勇敢、清醒、打不倒压不垮；聪慧、热心、机智，敢做敢当，几乎不流泪，时刻都准备笑；那么天真，却又明察，天生笃信真理，我不认识任何人，能像她那样痛恨谎言；表面上开心，内心里沮丧；肚量大——自己却不知道，帮助别人、救助人——却不为此而骄傲；指挥着一个人丁兴旺、令人惊叹的大家庭，就像船长在艰难的航道上指挥着航船一样；忠诚，非常忠诚，对别人、对自己都一样。”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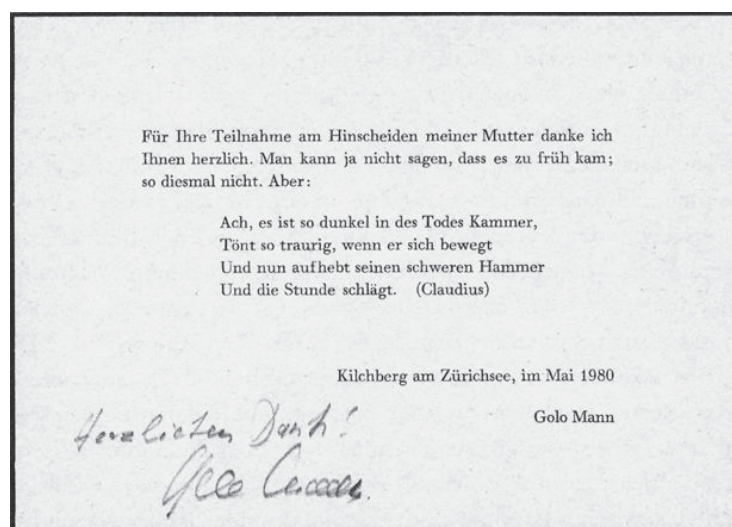


图48 戈洛·曼在母亲去世后致出席葬礼者的感谢信

卡蒂娅·曼留下了近300万瑞士法郎的遗产。戈洛·曼接下基尔希贝格的房子，又搬了进去，付钱给其他遗产继承人：伊丽莎白、米夏埃尔的三个孩子——弗里多、托尼和拉耶。只有妹妹莫妮卡死活不想卖。她宣布，一旦其生活伴侣过世，就搬进基尔希贝格的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戈洛·曼一写信，就会抱怨妹妹的这一想法。“您很意外地详细谈到您的小妹，我对她不了解，只知道写过一本很不错的小书[其自传]”，朋友恩斯特·柯莱特（Ernst Klett）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要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住在楼上一层，就真的那么糟糕吗？她很有可能疯疯癫癫的，抑或继承了曼氏家族的一种缺陷，并非人人都能像您一样把曼家的各种缺陷转化为积极的因素。” [144].

托马斯·曼日记选集一卷卷地出版，引起了轰动。《法兰克福汇报》以《关于托马斯·曼的真相》（*Die Wahrheit über Thomas Mann*）为题就第一卷发表评论。马塞利·赖西-拉尼茨基在文章里写道：“到最后，他这样矗立在我们面前：软弱且无力自卫，备受煎熬而令人怜悯，强调自我且十分自负，一些人觉得厌恶，另一些人却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有勇气将自己展现在后人面前，所以伟大。”^[145]这些日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托马斯·曼的形象，据说这也是艾丽卡·曼曾经想用自己出版的书信选集来表现，最后却又不愿意表现的形象：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中产阶级的外表，艺术家的内心生活；婚姻，六个孩子，对同性恋的渴望；以自我和作品为中心，却又积极参政；作为德意志代表出场时的淡定自若跟日常的烦恼形成对照。这些日记成为他人尖刻挖苦和攻击他的把柄，同时又将托马斯·曼从古典文学的故纸堆里拽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让这位“裤褶子”诗人的所有传奇重生：一个诗人，性格冷酷，内心深处波澜不惊，一页接着一页地写个不停。他的书籍销售量在上升。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重新发现了她，甚至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也带着另一种眼光重读这位伟大的同行。对曼氏家人来说，了解到每个人都可能跟这个家庭的私密生活有关，至少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有些奇怪。对托马斯·曼产生新的兴趣，也表现在询问的人在增多，稿酬支付得越来越高上。托马斯·曼继承人获得的稿酬在1969年下降到12万马克，直到1975纪念年也一直没有太大增加。戈洛·曼曾经担心，最后一次装修房子，大船即将沉没。^[146]结果完全相反：随着日记选集相继出版，托马斯·曼的稿酬大增，自1979年起，每年的收入都超过50万马克。^[147]

*

戈洛·曼在写他的自传。多年来，他一直在考虑，也在跟朋友们商量，应该如何着手这项工作。他觉得，若像兄长克劳斯那样灵活地对待真相，那是错误的，可要像纪德那样毫无掩饰地坦陈一切，又不

是他的风格。不应当闭口不谈自己的错误与堕落，却也没必要让自己出丑，这是戈洛的态度：叙述真相，不想讲的就避而不谈。正因为如此，他写的不叫自传，而是书名所指的意思：《回忆与思考》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这本书于1986年出版，销售状况空前，五个月内卖出10万册。涉及自己家庭时，戈洛·曼只谈他认为有必要的事情。19岁时他曾在日记里把童年称作“可怜的童年”，表述得非常清楚，却不作任何解释。^[148]戈洛详细描写自己解放自己的尝试，尤其是在萨勒姆寄宿学校的生活以及跟着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大学的学习。他直陈经历过的难堪局面，其他一些事情却只字不提。此外，他还对几个人物进行了恶意描写，陈述自己的观察，算是报了当年对他造成伤害的一箭之仇。虽说他崇尚真相，但由于日后的各种经验，许多事情还是掺杂了主观因素，特别是年轻时他对政治的那些看法。年事已高的戈洛·曼试图对他当年作为左派的所作所为重新进行解读，将此贬低为短期的误入迷途。他在书中发表的日记内容却纠正了他自己设计的形象。回首往事，其语气是和解的，而非控诉性的。几乎全家人早在1933年以前就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这一壮举戈洛·曼并没有当作英雄史诗来歌颂，而是更多地指出家人的幻想与谬误。父亲的形象显得苍白无力。他的朋友恩斯特·柯莱特写道：“您的读者最好奇的地方，您却让他们‘食不果腹’。这当然是故意为之，其分寸的拿捏在这里做到了极致。”^[149]



图49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戈洛·曼于1987年

戈洛·曼的《回忆与思考》于1986年问世之际，汉斯·贝克——曾经的生活伴侣，现在的继子去世了。另外一人也告别了人世：安东尼奥·斯帕达诺，他于1985年圣诞节前不久离世。半年后，莫妮卡·曼接受了一个女记者为《金叶子》（*Das Goldene Blatt*）杂志进行的采访。她伤心地回顾在安东尼奥·斯帕达诺身边度过的日子。他是个普通人，坦率说是个文盲，但在她心里却是个哲学家；在卡普里岛的31年里，除了他，莫妮卡没有找到过其他朋友，现在不得不搬走，因为斯帕达诺家把房子卖了。这次采访也是莫妮卡·曼对自己家人的一次清算。权欲熏心的姐姐艾丽卡自认为似乎比父亲还要闻名遐迩。冷酷、严厉的母亲只知道全身心地照顾父亲而忽略了孩子们。有一次，莫妮卡带着她的生活伴侣安东尼奥来到基尔希贝格，母亲的态度简直是傲慢至极。莫妮卡称妹妹伊丽莎白在音乐上没有天赋，在另一次采访中还说她贪钱。^[150]最后谈到哥哥戈洛，莫妮卡说他性情怪僻，到处散布消息，反对她现在搬进基尔希贝格的父母家，虽然从法律上讲她有这样的权利。^[151]

情况当然好不了。妹妹搬进来，戈洛·曼就离家外出。她忍耐不住这份寂寞，就逃到一位朋友家。戈洛回来时，莫妮卡也回来，他就再次外出。就这么来来回回地折腾，直至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的莫妮卡·曼已是疾病缠身，精神上也已大不如前，戈洛继子的妹妹英格丽特·贝克-曼（Ingrid Beck-Mann）在莱沃库森接纳了她。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91年初旅行来到科隆。此时她已72岁高龄，仍旧像从前一样在全世界满天飞，以赢得人们对海洋事业的支持。她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参与起草了联合国于1982年通过的《海洋法公约》。虽说她提出的要求与希望，尤其是有利于贫穷国家的那些要求与希望并没有全部实现，但也有不少已经落实，比如建立一家国际机构的想法——一家超越各国的海洋权利，把海洋当作“人类遗产”

来管理的机构。为此，在牙买加金斯顿（Kingston）建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设在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也是根据该项公约建立的后续机构。为推动世界各国批准《海洋法公约》，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及其志同道合者们这几年来不停地奋斗。《海洋法公约》终于在1994年生效：60多个国家批准了这项公约。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于1991年1月造访科隆时，看望了哥哥戈洛，他正在医院检查心脏起搏器和前列腺癌的状况。伊丽莎白写信告诉女儿多米尼卡，戈洛的情况相当不错；相反，她接下来去莱沃库森的贝克-曼家探望莫妮卡时，发现其健康状况不好，血液循环系统的毛病让她日子不好过。她早已是魂不守舍，只有一半尚在阳界，另一半附身于布鲁诺·瓦尔特——这位差不多30年前就已死去的曼家朋友，莫妮卡说布鲁诺把她的所有糖果都吃了。英格丽特·贝克-曼是一名专业护士，充满爱心地照顾莫妮卡和戈洛，堪称楷模。伊丽莎白继续写道，她在考虑，自己是否要在贝克-曼家里预留一个房间……[152]。

1992年3月17日，莫妮卡·曼去世。戈洛，她年过80岁的哥哥，无论精神还是体力上也已每况愈下。在他的最后岁月，英格丽特·贝克-曼也同样精心加以照料。莫妮卡谢世两年后，1994年4月7日，戈洛·曼与世长辞。

*

2001年圣诞节前不久，《曼氏家族——一部世纪小说》（*Die Manns. Ein Jahrhundertroman*）在德国电视台播放，引起了轰动。以导演海因里希·布雷吕尔（Heinrich Breloer）为首的制作组历经四年的辛劳，制作了这部“纪录大片”，共分三集，耗资2000万马克。在该片中，原始图像、采访时代见证人跟电影的场景相互交替。阿尔明·穆勒-施塔尔（Armin Mueller-Stahl）[153]展现了一个柔和、疲倦的托马斯·曼形象。这些电影和相关的三集纪录片里的明星却是另

一个人，一个梳着短发、个头矮小的老年妇女，不断发出咯咯的笑声：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这位曼氏之家的最后健在者讲述自己家庭的故事：大家曾经相互支持，和谐、友好地相处，父亲充满爱意地眷恋着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弗朗克·谢马赫（Frank Schirrmacher）在《法兰克福汇报》上这样写道：“说话人是尚健在的那一位，恰恰又是一辈子日子过得最好的那一位。”^[154]

对于最近几年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保持沉默，这些事跟公众舆论无关。围绕莫妮卡的遗产问题发生了争执，结果对簿公堂。莫妮卡指定哥哥戈洛为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她的财产要通过戈洛留给贝克-曼家人，他们在莫妮卡的最后岁月照顾了她。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跟弟弟米夏埃尔的两个儿子一起打官司，质疑莫妮卡的遗嘱和戈洛，理由是莫妮卡在思维上已无分辨是非的能力。戈洛·曼去世后，双方于1996年达成和解。之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仍旧不依不饶，诅咒那些坏心肠的人——莫妮卡和戈洛在晚年落入了他们手中。^[155]海因里希·布雷吕尔为拍摄曼家的电影曾经采访英格丽特·贝克-曼，由于伊丽莎白态度强硬，并以停止参与相威胁，所以电影里没有播放这次采访的任何一个镜头。戈洛·曼作为家庭代理人曾管理基尔希贝格家中的财产，英格丽特·贝克-曼却将这些家产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卡蒂娅·曼的母亲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的日记，伦巴赫（Lenbach）^[156]画的海德维希·多姆（Hedwig Dohm）、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和12岁时的卡蒂娅的肖像（图46的背景油画），以及弗朗茨·德弗雷格（Franz Defregger）画的卡蒂娅·曼兄弟埃里克的童年肖像——所有这些画和其他一些东西后来都出现在莱沃库森，其状况之悲惨令人扼腕。^[157]为了实现拯救海洋的目的，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不遗余力地争取获得莫妮卡·曼的钱，却对家庭的遗产置之不顾。

在跟海因里希·布雷吕尔交谈时，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也谈到了艾格尼丝·迈耶，这位曼家的美国女友于1970年去世。伊丽莎白认为迈耶是个“伟大的女性，智商特别高”，但往往会“纠缠不休”。然后又说到艾格尼丝·迈耶甚至对克劳斯·曼办的《决定》杂志也不肯解囊相助：“有钱人吝啬，所以才有钱。”^[158]这是曼氏家人对其伟大的资助者所作的最后评价。

《曼氏家族——一部世纪小说》于2001年底再度掀起一轮新的曼氏热潮，收视率非常高，曼氏书籍的销量也一再飙升。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顿时成为德国的宠儿，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脱口秀。这些热闹的场面对她为之奋斗的海洋事业非常有利，可惜她未能享受多久。2002年2月，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去圣莫里茨（St. Moritz）度假滑雪，因染上一种急性肺炎于2月8日在当地去世。头一天她还活跃在滑雪场上。

曼氏家人的墓地坐落在基尔希贝格墓园，居高临下，远眺苏黎世湖和阿尔卑斯山。一家人安葬于瑞士的土地上，离位于老乡村公路街39号曼家的最后一处居所不远。父亲和母亲的大理石墓碑质朴无华，名字和生卒年月用罗马字母镌刻而成。曼家孩子的墓碑平放在父母墓碑的前面：艾丽卡、米夏埃尔、莫妮卡和伊丽莎白。有两个孩子缺席：最早离世的克劳斯·曼安眠于戛纳；戈洛·曼——遵照他本人的特别嘱咐，也在其他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跟全家人在同一座墓园、同一片土地，却在这小小墓园离家人最远的地方，在靠近墓地围墙处的一个单人墓穴。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书籍与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这个“传奇之家（amazing family）”的故事。

[1] Tgb TM, 13. 8. 1952

[2] Vgl. MiM an Ray Kendall, 10. 4. 1952, MON

[3] TM an Agnes Meyer, 7.11.1952, in: TM-AM: Briefwechsel, S.773 f.

[4] Zit.nach Harpprecht: TM, S.1942

[5] Vgl.TM: Bekenntnis zur westlichen Welt, in: TM: Essays VI, S.236-238

[6] EM an TM, 28.1.1953, in: EM: Mein Vater, S.213

[7] Tgb TM, 23.8.1952

[8] GM an Manuel Gasser, 31.10. [1952] , und GM an Erich von Kahler, 27.11. [1952] , zit.nach Lahme: GM, S.223

[9] GM an Erich von Kahler, 17.1.1953, zit.nach Lahme: GM, S.223

[10] Tgb TM, 1.12.1952

[11] Tgb TM, 5.12. und 9.12.1952

[12] Tgb TM, 24.12, 1954

[13] Tgb TM, 15. , 16. , 19. u.20.6.1953

[14] Vgl.Heinrich August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Vom Kalten Krieg bis zum Mauerfall, München 2014, S.177 f.

[15] Tgb TM, 26.6.1953

[16] Vgl.S.92 f.

[17] TM: [Katia Mann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 in: TM: Über mich selbst.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a.M.1994, S.180-185, hier S.184 f.

[18] Tgb TM, 9.9.1953

[19] EM an MiM, 10.9.1952 [korrekr: 1953] , MON

[20] Tgb TM, 9.11.1953

- [21] Vgl. Tgb TM, 5. 5. 1953
- [22] Vgl. Tgb TM, 4. 12. 1951
- [23] MiM an KM, 10. 11. 1953, in: MiM: Fragmente, S. 28–31
- [24] MoM: Fremd zu Hause, Münchner Merkur, 21./22. 11. 1953, zit. nach Kinder der Manns, S. 233
- [25] Zit. nach MoM: Das fahrende Haus, S. 247–249 und S. 249 f.
- [26] TM an Agnes Meyer, 8. 2. 1954, in: TM-AM: Briefwechsel, S. 785
- [27] TM an Agnes Meyer, 9. 2. 1955, in: TM-AM: Briefwechsel, S. 797
- [28] Agnes Meyer an TM, 14. 2. 1955, in: TM-AM: Briefwechsel, S. 799
- [29] Tgb TM, 17. 2. 1955
- [30] Tgb TM, 22. 4. 1955
- [31] Zit. nach Lühe: EM, S. 340
- [32] Vgl. Kröger: EM, S. 113
- [33] Vgl. die Korrespondenz von MiM und Gret Mann mit Adorno in: Schönheit und Verfall. Beziehungen zwischen Thomas Mann und Ernst Krenek. (Mehr als) ein Tagungsbericht, hg. von Matthias Henke (=Thomas-Mann-Studien Bd. 47), Frankfurt a.M. 2015, S. 263–274
- [34] Fritz Redlich: Vom Geist Amerikas,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2 (1956), S. 189 f.
- [35] TM an MoM, 17. 4. 1955, in: TM: Briefe III, S. 394
- [36] Vgl. S. 116
- [37] Agnes Meyer an TM, 14. 2. 1955, in: TM-AM: Briefwechsel, S. 799

- [38] FM: Achterbahn, S.106
- [39] MoM an EM, 4. 5. 1956, MON
- [40] EM an MoM, 7. 5. 1956, MON
- [41] Abgebildet in Kinder der Manns, S. 248
- [42] MoM an EM, 5. 6. 1956, MON
- [43] EM: Das letzte Jahr, in: EM: Mein Vater, S. 408 und 422 f.
- [44] Protokollchef Erika, in: Der Spiegel 31, 1. 8. 1956
- [45] C.F.W.Behl: Erika Mann: Das letzte Jahr,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1. 3. 1955
- [46] Protokollchef Erika, in: Der Spiegel 31, 1. 8. 1956
- [47] Gustav Hillard: Thomas Mann im Blick seiner Töchter, in: Merkur 10 (Oktober 1956) , S. 1025; vgl. auch Oskar Maria Graf: Zwei Töchter sehen ihren Vater,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 195–201
- [48] MoM: Vergangenes, S. 90
- [49] KM an Klaus Pringsheim, 13. 7. 1956, zit. nach Andert: MoM, S. 39
- [50] KM an Gustav Hillard, 25. 11. 1956, zit. nach Inge Jens: Nachwort, in: MoM: Vergangenes, S. 139
- [51] MoM an Anna Jacobson, o. D., zit. nach Andert: MoM, S. 39
- [52] MoM: Vergangenes, S. 78
- [53] MiM an KM, [7. 9. 1957] , TMA (teilweise abgedruckt in MiM: Fragmente, S. 31–33, Auslassungen dort z. T. nicht gekennzeichnet)
- [54] Vgl. Lahme: GM, S. 238
- [55] MoM: Der Start. Ein Tagebuch, Fürstenfeldbruck 1960, S. 105

[56] Zit.nach Kröger: EM, S.151

[57] GM: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1958, S.974 und S.11 (aus»Vorrede«und»Ein letztes Wort«, die in späteren Ausgaben umgeschrieben wurden)

[58] Günther Gillessen: Streng, aber nicht herzlos,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1.1959

[59] Fritz Rene Allemann: Golo Manns Deutschland-Bild, in: Die Zeit, 13.3.1959

[60] GM: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2009, S.721-724

[61] Fritz Rene Allemann: Golo Manns Deutschland-Bild, in: Die Zeit, 13.3.1959

[62] 普罗皮连 (Propyläen) 为出版社名。

[63] Tgb GM, 27.3.1959, zit.nach Lahme: GM, S.265

[64] EM an EMB, 19.1.1961, MON

[65] EMB an EM, 23.1.1961, MON

[66] Vgl.Stefan Müller-Doohm: Adorno.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2003, S.281

[67] EM an Theodor W.Adorno, 28.3.1963, in: EM: Briefe II, S.124

[68] Vgl.Theodor W.Adorno an EM, 5.4.1963, MON

[69] Vgl.EM an GM, 3.5.1961, MON

[70] 阿多诺曾用“浮瓶传信”来比喻新音乐和他的理论，意为无人理睬。

[71] “Wotan”即“Odin”（奥丁），系日耳曼神话中的神。

[72] EM an Theodor W. Adorno, 11. 4. 1963, in: EM: Briefe II, S. 130; vgl. zur Affäre um GM und Adorno/Horkheimer Lahme: GM, S. 287–307

[73] Zit. nach FM: Achterbahn, S. 123; vgl. auch: Historiker geht ja noch, sagte Mutter Katja. Golo Mann erinnert sich: Fragen zum 75. Geburtstag von Udo Reiter, Rheinischer Merkur, 23. 3. 1984, dort formuliert GM den Ausspruch selbst, ohne EM zu nennen

[74] MiM an EM, 5. 10. 1963, in: EM: Briefe II, S. 147

[75] Das Thomas Mann-Buch. Eine innere Biographie in Selbstzeugnissen, hg. von MiM, Frankfurt a. M. 1965

[76] Vgl. Tgb GM, 7. 8. 1963, SLA

[77] MoM: Tupfen im All, Köln/Olten 1963, S. 13

[78] TM: Briefe I, S. X, vgl. S. 354; die Legende ist so einprägsam, dass sie von einem Teil der Mann-Forschung bis heute übernommen wird; vgl. Albert von Schirnding: Die 101 wichtigsten Fragen: Thomas Mann, München 2008, S. 93, Dirk Heißerer: Im Zaubergarten. TM in Bayern, München 2005, S. 163 oder KIM-Schriftenreihe II, S. 22; das »blutige Schwert« als Legende; vgl. Harpprecht: TM, S. 373

[79] TM: Briefe I, S. XI

[80] Inge Jens: Vom Fin de siècle zum amerikanischen Exil. Thomas Manns Briefe-seine Autobiographie, in: Die Zeit, 26. 1. 1962

[81] TM: Briefe I, S. V

[82] Vgl. S. 175 f.

[83] Vgl. S. 313

[84] EM an GM, 11. 5. 1961, MON

- [85] TM: Briefe II, S.6 und Anhang, S.656 f.
- [86] Vgl.EM im Gespräch mit Roswitha Schmalenbach (1968) , in:
EM: Mein Vater, S.9–60
- [87] GM an EM, o.D. [ca.13.5.1961] , MON
- [88] TM: Briefe I , S. XII
- [89] Vgl.Signe von Scanzoni: Als ich noch lebte.Ein Bericht über
Erika Mann, Göttingen 2010, S.102 f.
- [90] MoM an EM, 9.1.1964,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190
- [91] EM an MoM, 13.1.1964,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190–
194; der Text *Rauschgold*, auf den EM sich bezieht, ist abgedruckt
ebd. , S.211–214
- [92] MoM an EM, 20.1.1964, MON
- [93] KM an Klaus Pringsheim, 4.10.1955, zit.nach Jens/Jens: Frau
TM, S.278
- [94] EMB: Das ABC der Tiere. Von schreibenden Hunden und
lesenden Affen, Bern/München/Wien 1970, S.74 und 76 (englische
Ausgabe zuerst 1965)
- [95] EM an EMB, 11.11.1962, MON
- [96] EMB an KM, 21.5.1968, TMA
- [97] KM an EMB, 21.4.1968, MON
- [98] KM an EMB, 7.2.1968, MON
- [99] KM an EMB, 20.1.1969, MON
- [100] GM an Jens-Peter Otto, 29.6.1968, zit.nach Lahme: GM,
S.335

[101] GM an Margaret von Hessen, 6.5.1969, zit.nach Lahme: GM, S.336

[102] GM an Jens-Peter Otto, [17.6.] 1969, in: GM: Briefe, S.191

[103] MoM an KM, 11.10.1969, TMA

[104] MoM: Das fahrende Haus, S.158

[105] KM: Memoiren, als Motto dem Buch vorangestellt

[106] KM: Memoiren, S.175

[107] Vgl.Tgb GM, 14.6.1975, SLA

[108] Vgl.Tgb GM, 2.5.1975, SLA

[109] GM an Kurt Horres, 11.6.1979, zit.nach Lahme: GM, S.385

[110] GM: Die Brüder Mann und Bertolt Brecht (1973) , in: GM: Essays, S.94

[111] MiM an GM, 11.10.1973, SLA

[112] MiM an GM, 15.10.1970, SLA

[113] Tgb GM, 17.9.1973 (Original englisch) , zit.nach Lahme: GM, S.377

[114] MiM an FM o.D. [Juli/August 1975] , zit.nach FM: Achterbahn, S.230 f.

[115] Eintragungen aus den Briefen MiM an Frederic C.Tubach vom 14.10.und 11.11. [1975] , zit.nach MiM: Fragmente, S.121 f.; der unpublizierte Teil der Briefe in MON

[116] GM: Essays, S.136

[117] EMB: Das Drama der Meere, Frankfurt a.M.1977, S.236, 247

[118] Vgl. Bericht Sally Tubach, o.D., MON; Frido Mann zufolge habe MiM die Silvestereinladung nach einem Streit mit seiner Frau abgesagt und sich zurückgezogen (FM: Achterbahn, S.241)

[119] Vgl. Peter de Mendelssohn an MiM, 15.8.1976, sowie nach dem Tod MiMs: Peter de Mendelssohn: Thomas Mann/Tagebücher-Anmerkungen zu Prof. Michael Manns Editionsplan und der bisher geleisteten Herausgeber-Arbeit, 1.2.1977; Vorwort: MiM: Apologie des Herausgebers, alle in: Verlagsarchiv S.Fischer, Frankfurt a.M., dort auch weitere Korrespondenz zur geplanten Edition

[120] MiM an GM, Telegramm o.D. [1976], Nachlass Anita Naef,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München

[121] Vgl. Bericht Sally Tubach, o.D., MON

[122] Vgl. Polizeibericht zum Tod von MiM, MON

[123] EMB an KM, 21.1.1977, TMA

[124] KM an EMB, 20.3.1976, MON

[125] MoM an KM, 4.3.1977, TMA

[126] Tgb GM, 25.3.1977 (im Original französisch) zit.nach Lahme: GM, S.403 f.

[127] Vgl. Tgb GM, 17.6.1977, SLA

[128] Tgb GM, 25.3. und 6.4.1977 (beide im Original französisch) sowie 27.6.1977, zit.nach Lahme: GM, S.404

[129] Peter de Mendelssohn an EMB, 2.3.1977, Kopie im Nachlass GM, SLA

[130] Gret Mann an GM, 5.3.1977, SLA

[131] EMB an Gret Mann, 12.3.1977, Kopie im Nachlass GM, SLA

[132] Vgl. Interview EMB, in: Heinrich Breloer: 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Begegnungen Gespräche, Interviews, Frankfurt a.M. 2001, S.180 sowie Tgb GM, 9.5.1990, SLA

[133] Vgl. Tgb GM, 2.1.1977, SLA sowie GM an Hans-Martin Gauger, 17.2.1977, in: GM: Briefe, S.239 f.

[134] Vgl. Tgb GM, 25.10.1977, SLA

[135] Tgb GM, 4.11.1975, zit.nach Lahme: GM, S.383

[136] Tgb GM, 22.6.1977, zit.nach Lahme: GM, S.385

[137] MoM an Peter de Mendelssohn, 7.6.1977, in: MoM: Das fahrende Haus, S.119

[138] GM an EMB, 26.12.1981, Privatbesitz

[139] EMB an KM, 30.8.1979, TMA

[140] MoM an KM, 26.4.1979, TMA

[141] MoM an KM, 16.2.1979, TMA

[142] Tgb GM, 25.4.1980, zit.nach Lahme: GM, S.408

[143] GM: Erinnerungen an Katia Mann, in: GM: Essays, S.143 f.

[144] Ernst Klett an GM, 24.8.1981, zit.nach Lahme: GM, S.411

[145] Marcel Reich-Ranicki: Die Wahrheit über Thomas Mann. Zu den Tagebüchern aus den Jahren 1933 und 1934,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1.3.1978

[146] Vgl. Tgb GM, 3.1.1975, SLA

[147] Tantiemenabrechnungen vom S.Fischer Verlag im SLA

[148] GM: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I, S.362

[149] Ernst Klett an GM, 11.9.1986, zit.nach Lahme: GM, S.429

[150] Vgl. Andert: MoM, S. 66

[151] Interview Helga Schalkhäuser mit MoM, 15.5.1986, Abschrift des Gesprächs in MON; nicht bekannt ist, ob und welche Teile des Gesprächs publiziert wurden

[152] Vgl. EMB an Dominica Borgese, 13.1.1991, MON

[153] 阿尔明·穆勒-施塔尔为著名德国演员，在影片中扮演托马斯·曼。

[154] Frank Schirmacher: Gesang vom Kindchen. Um einen Thomas Mann von innen bittend: Breloers Film,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7.12.2001

[155] Vgl. EMB an Lise Kleefeldt, 16.3.1997, Privatbesitz

[156] 伦巴赫为19世纪德国著名肖像画家。

[157] Vgl. Lahme: GM, S. 437-440

[158] Heinrich Breloer: 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Begegnungen, Gespräche, Interviews, Frankfurt a.M. 2001, S. 136

曼氏家族一览表

保尔·托马斯·曼 (Paul Thomas Mann)

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

又称：托米 (Tommy)，魔术师 (Zauberer)，磊 (Reh)，皮兰因 (Pielein)，父亲大人 (Herrpapale)

卡塔琳娜·海德维希·曼 (Katharina Hedwig Mann)

娘家姓为普林斯海姆 (Pringsheim)

1883年7月24日～1980年4月25日

又称：卡提亚 (Katia)，卡蒂娅 (Katja)，米兰因 (Mielein)

艾丽卡·尤利娅·海德维希·曼 (Erika Julia Hedwig Mann)

1905年11月9日～1969年8月27日

又称：艾丽 (Eri)

克劳斯·海因里希·托马斯·曼 (Klaus Heinrich Thomas Mann)

1906年11月18日～1949年5月21日

又称：阿西（Aissi），艾西（Eissi）

安格鲁斯·戈特弗里德·托马斯·曼（Angelus Gottfried
Thomas Mann）

1909年3月27日～1994年4月7日

又称：戈洛（Golo），戈洛洛（Gololo），小戈尔（Gölchen）

莫妮卡·曼（Monika Mann）

1910年6月7日～1992年3月17日

又称：莫妮（Moni），梦勒（Mönle），梦佳（Mönga），小莫妮
（Mönchen），莫妮佳（Monigga）

伊丽莎白·维罗妮卡·曼·博尔吉斯（Elisabeth Veronika Mann
Borgese）

1918年4月24日～2002年2月8日

又称：麦蒂（Medi），麦迪（Mädi），小孩儿（Kindchen），丽
莎（Lisa）

米夏埃尔·托马斯·曼（Michael Thomas Mann）

1919年4月21日～1977年1月1日

又称：比比（Bibi）

缩略语

AM	艾格尼丝·E. 迈耶
DLA	马尔巴赫德语文学档案馆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EM	艾丽卡·曼
EMB	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
FM	弗里多·曼
GBF	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费舍尔
GM	戈洛·曼
HM	海因里希·曼
HP	海德维希·普林斯海姆
KlM	克劳斯·曼
KM	卡蒂娅·曼
MiM	米夏埃尔·曼

- MoM 莫妮卡·曼
- MON 莫纳岑西亚馆：慕尼黑文学档案馆和图书馆
(Monacensia.Literaturarchiv und Bibliothek München)
- SLA 伯尔尼瑞士文学档案馆 (Schweizerisches
Literaturarchiv, Bern)
- TM 托马斯·曼
- TMA 苏黎世托马斯·曼档案馆 (Thomas-Mann-Archiv
Zürich)

注释里的书名缩写

Andert: MoM

Karin Andert: Monika Mann. Eine Biografie, Hamburg 2010

Bertaux: Un normalien

Pierre Bertaux: Un normalien à Berlin. Lettres franco-allemandes 1927–1933, hg. von Hans Manfred Bock, G. Krebs und H. Schulte, Asnières 2001

EM: Briefe I und II

Erika Mann: Briefe und Antworten, 2 Bände, hg. v. Anna Zanco Prestel, München 1988

EM: Blitze

Erika Mann: Blitze überm Ozean. Aufsätze, Reden, Reportagen, hg. von Irmela von der Lühe und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1

EM: Mein Vater

Erika Mann: Mein Vater, der Zauberer, hg. von Irmela von der Lühe und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1999

FM: Achterbahn

Frido Mann: Achterbahn. Ein Lebensweg, Reinbek bei Hamburg 2008

GKFA

Thomas Mann: Große kommentierte Frankfurter Ausgabe der Werke, Briefe und Tagebücher, Frankfurt a.M. 2002ff.

GM: Briefe

Golo Mann: Briefe 1932–1992, hg. von Tilmann Lahme und Kathrin Lüssi, Göttingen 2006

GM: Erinnerungen I

Golo Mann: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a.M. 1986

GM: Erinnerungen II

Golo Mann: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Lehrjahre in Frankreich, hg. von Hans-Martin Gauger und Wolfgang Mertz, Frankfurt a.M. 1999

GM: Essays

Golo Mann: »Man muss über sich selbst schreiben«. Erzählungen, Familienporträts, Essays, hg. v. Tilmann Lahme mit einem Nachwort von Hans-Martin Gauger, Frankfurt a.M. 2009

Harpprecht: TM

Klaus Harpprecht: Thomas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

HP: Briefe an KM I und II

Hedwig Pringsheim: Mein Nachrichtendienst. Briefe an Katia Mann 1933–1941, 2 Bände, hg. und kommentiert von Dirk Heißerer, Göttingen 2013

Holzer: EMB

Kerstin Holzer: Elisabeth Mann Borgese. Ein Lebensportrait, 2. Aufl., Berlin 2001

Jens/Jens: Frau TM

Inge Jens/Walter Jens: Frau Thomas Mann. Das Leben der Katharina Pringsheim,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Keiser-Hayne: Pfeffermühle

Helga Keiser-Hayne: Erika Mann und ihr politisches Kabarett ›Die Pfeffermühle‹ 1933–1937. Texte, Bilder, Hintergrün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

Kinder der Manns

Die Kinder der Manns. Ein Familienalbum, hg. von Uwe Naumann in Zusammenarbeit mit Astrid Roff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KLM: Aufsätze I – V

Klaus Mann: Aufsätze, Reden, Kritiken, hg. von Uwe Naumann und Michael Töteberg, 5 Bänd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2–1994

KLM: Briefe

Klaus Mann: Briefe und Antworten 1922–1949, hg. v. Martin Gregor-Dellin, Reinbek bei Hamburg 1991

KLM: Onkel Heinrich

Klaus Mann: »Lieber und verehrter Onkel Heinrich«, hg. v. Inge Jens und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11

KLM-Schriftenreihe I – VI

Klaus-Mann-Schriftenreihe, 6 Bände, hg. von Fredric Kroll, Hamburg 1976–2006

KLM: Wendepunkt

Klaus Mann: 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Mit Textvarianten und Entwürfen im Anhang hg.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Fredric Kroll, Reinbek bei Hamburg 2006

KM: Memoiren

Katia Mann: 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 hg. von Elisabeth Plessen und Michael Mann, Frankfurt a.M. 2004

KM: Rehherz

Katia Mann: »Liebes Rehherz«. Briefe an Thomas Mann 1920–1950, hg. von Inge Jens, München 2008

Kröger: EM

Ute Kröger: »Wie ich leben soll, weiß ich noch nicht«. Erika Mann zwischen »Pfeffermühle« und »Firma Mann«. Ein Porträt, Zürich 2005

Kurzke: TM

Hermann Kurzke: Thomas Mann. Das Leben als Kunstwerk.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9

Lahme: GM

Tilmann Lahme: Golo Mann.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2009

Lühe: EM

Irmela von der Lühe: Erika Mann. Eine Lebensgeschichte, Reinbek bei Hamburg 2009

MiM: Fragmente

Michael Mann: Fragmente eines Lebens. Lebensbericht und Auswahl seiner Schriften von Frederic C. und Sally P. Tubach, München 1983

MoM: Das fahrende Haus

Monika Mann: Das fahrende Haus. Aus dem Leben einer Weltbürgerin, hg. von Karin Andert, Reinbek bei Hamburg 2007

MoM: Vergangenes

Monika Mann: Vergangenes und Gegenwärtiges. Erinnerungen, 2. Aufl., Reinbek bei Hamburg 2002

Ruhe gibt es nicht

»Ruhe gibt es nicht bis zum Schluss«. Klaus Mann (1906–1949). Bilder und Dokumente, hg. von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1

Schaenzler: KLM

Nicole Schaenzler: Klaus Mann.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1999

Tgb KLM

Klaus Mann: Tagebücher 1931–1949, 6 Bände, hg. von Joachim Heimannsberg, Peter Laemmle und Wilfried F. Schoeller,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

Tgb TM

Thomas Mann: Tagebücher 1918–1921 und 1933–1943, hg. von Peter de Mendelssohn; Tagebücher 1944–1955, hg. von Inge Jens, 10 Bände, Frankfurt a.M. 1977–1995

TM-AM: Briefwechsel

Thomas Mann/Agnes E. Meyer: Briefwechsel 1937–1955, hg. von Hans Rudolf Veget, Frankfurt a.M. 1992

TM Chronik

Gert Heine/Paul Schommer: Thomas Mann Chronik, Frankfurt a.M. 2004

TM: Essays I–VI

Thomas Mann: Essays, 6 Bände, hg. von Hermann Kurzke und Stephan Stachorski, Frankfurt a.M. 1993–1997

TM-GBF: Briefwechsel

Thomas Mann: Briefwechsel mit seinem Verleger Gottfried Bermann Fischer 1932–1955, hg. von Peter de Mendelssohn, Frankfurt a.M. 1973

TM-HM: Briefwechsel

Thomas Mann/Heinrich Mann: Briefwechsel 1900–1945, hg. von Hans Wysling, Frankfurt a.M. 1995

TM im Urteil

Thomas Mann im Urteil seiner Zeit. Dokumente 1881-1955, hg. und mit einem Nachwort und Erläuterungen von Klaus Schröter, Frankfurt a.M. 2000 (Thomas-Mann-Studien Bd. 22)

Vaget: TM, der Amerikaner

Hans Rudolf Vaget: Thomas Mann, der Amerikaner. Leben und Werk im amerikanischen Exil 1938-1952, Frankfurt a.M. 2011

Winkler, Geschichte des Westens 1914-1945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Geschichte des Westens.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1914-1945, München 2011

引用说明

本著作已按正字法对所引文献中的拼写错误及原作者在文内前后不统一的写法进行订正，并适当将部分字词校订为更符合现行表述习惯的形式。

关于曼氏家族的文献

本著作讲述了曼氏家族八位成员的故事，他们是父母辈的卡蒂娅和托马斯·曼，六个孩子艾丽卡、克劳斯、戈洛、莫妮卡、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一方面，《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的创作依托了丰富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和各种档案，这些原始资料是由家族成员保留下来的，部分经过修改，部分被保存在苏黎世托马斯·曼档案馆、慕尼黑莫纳岑西亚城市图书馆和伯尔尼瑞士文学档案馆；另一方面，关于整个曼氏家族和各位家庭成员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也是本著作的写作基础，没有它们，此书就不可能写成。本书注释部分主要对正文内的引用作了出处说明，以下部分将向读者介绍关于曼家族的一些重要文献。

关于曼氏家族

学界鲜见关于作为整体的曼氏家族的研究文献，到目前为止，针对各位家庭成员分别开展研究更常见。

1. Hans Wißkirchen: Die Familie 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0（关于整个曼氏家族的简要介绍）；

2. Manfred Flügge: Das Jahrhundert der Manns, Berlin 2015；

3. Marianne Krüll: Im Netz der Zauberer. Eine andere Geschichte der Familie Mann, Frankfurt a.M. 2010 (1991年首次出版的关于曼氏家族的故事, 采用了女性解放视角, 将托马斯·曼视为家庭的压迫者);

4. Die Kinder der Manns. Ein Familienalbum, hg. von Uwe Naumann in Zusammenarbeit mit Astrid Roff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5 (此作品为同名展览“曼家的孩子: 一个家庭相册”的展出目录, 就曼家子女的照片和档案提供了丰富的介绍);

5. Die Familie Mann in Kilchberg, hg. von Thomas Sprecher und Fritz Gutbrodt, Zürich 2000 (关于曼氏家族之瑞士岁月的照片和档案集);

6. Heinrich Breloer: Unterwegs zur Familie Mann. Begegnungen, Gespräche, Interviews, Frankfurt a.M. 2001 (纪录片《曼氏家族——一部世纪小说》的指南);

7. Mann oh Mann. Satiren und Parodien zur Familie Mann, hg. von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8. Frido Mann: Achterbahn. Ein Lebensweg, Reinbek bei Hamburg 2008 (一部自传, 用孙辈的视角对家族进行了描写)。

关于托马斯·曼

关于托马斯·曼的研究十分丰富, 不容忽视。《托马斯·曼手册: 生平、作品和影响》(Thomas-Mann-Handbuch. Leben-Werk-Wirkung, hg. von Andreas Blödorn und Friedhelm Marx,

Stuttgart 2015) 为读者提供了很好的综述。在本著作中尤为重要的文献如下。

1. Hermann Kurzke: Thomas Mann. Das Leben als Kunstwerk.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1999;

2. Hans Rudolf Vaegt: Thomas Mann, der Amerikaner. Leben und Werk im amerikanischen Exil 1938–1952, Frankfurt a.M. 2011;

3. Klaus Harpprecht: Thomas Mann. Eine Biographie, Reinbek bei Hamburg 1995。

托马斯·曼的作品、书信和日记由S. 费舍尔出版社编辑出版，最新的带评注的版本被收录在全38卷的法兰克福评注版大全集（Große kommentierte Frankfurter Ausgabe）中。

关于卡蒂娅·曼

1. Inge Jens / Walter Jens: Frau Thomas Mann. Das Leben der Katharina Pringsheim, Reinbek bei Hamburg 2003;

2. Kirsten Jüngling / Brigitte Roßbeck: Katia Mann. Die Frau des Zauberers. Biografie, München 2003。

关于艾丽卡·曼

1. Irmela von der Lühe: Erika Mann. Eine Lebensgeschichte, Reinbek bei Hamburg 2009;

2. Ute Kröger: »Wie ich leben soll, weiß ich noch nicht«. Erika Mann zwischen »Pfeffermühle« und »Firma Mann«. Ein Porträt, Zürich 2005;

3. Signe von Scanzoni: Als ich noch lebte. Ein Bericht über Erika Mann, hg. und mit einem Nachwort von Irmela von der Lühe, Göttingen 2010 (此为艾丽卡·曼最后的生活伴侣所写的告别信和动人的人物特写)。

最重要的文章、演讲、报告，以及给家人写的文字和部分书信已由罗沃尔特出版社 (Rowohlt Verlag) 出版。收录跨度为1984~1988年的两卷本书信集现已绝版。

关于克劳斯·曼

1. Nicole Schaenzler: Klaus Mann.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1999;

2. Uwe Naumann: Klaus 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6;

3. Klaus-Mann-Schriftenreihe, Band 1-6, hg. von Fredric Kroll, Hamburg 1976-2006;

4. »Ruhe gibt es nicht bis zum Schluss«. Klaus Mann (1906-1949), Bilder und Dokumente, hg. von Uwe Naumann, Reinbek bei Hamburg 2001。

克劳斯·曼的小说、回忆录、散文，以及一部书信集和日记已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

关于戈洛·曼

1. Urs Bitterli: Golo Mann. Instanz und Außenseit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2004;

2. Tilmann Lahme: Golo Mann. Biographie, Frankfurt a.M. 2009。

戈洛·曼的历史作品、散文、回忆录由S. 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他的一部书信集（Golo Mann: Briefe 1932-1992, hg. von Tilmann Lahme und Kathrin Lüssi, Göttingen 2006）于2006年在瓦尔施泰因出版社（Wallstein Verlag）出版。

关于莫妮卡·曼

Karin Andert: Monika Mann. Eine Biografie, Hamburg 2010。

莫妮卡·曼生命中的许多细节尚未被揭晓，大部分遗留下来的作品都散佚了，稍稍弥补这个空缺的唯余一部关于她的传记，这部传记试图对抗家人对她的固有印象。卡琳·安德特（Karin Andert）出版了莫妮卡·曼的副刊文章、家庭通信和其他书信等（Monika Mann: Das fahrende Haus. Aus dem Leben einer Weltbürgerin, hg. von Karin Andert, Reinbek bei Hamburg 2007）。包括莫妮卡的自传（Monika Mann: Vergangenes und Gegenwärtiges. Erinnerungen, 2. Aufl., Reinbek bei Hamburg 2002）在内，其所有作品都已绝版。

关于伊丽莎白·曼

1. Kerstin Holzer: Elisabeth Mann Borgese. Ein Lebensportrait, Berlin 2001（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尚健在时的

人物特写，主要基于与她的谈话写成）；

2. Elisabeth Mann Borgese und das Drama der Meere, hg. von Holger Pils und Karolina Kühn, Hamburg 2012 (同名展览“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和海洋之悲剧”的展出目录，附有丰富的资料)。

目前尚未见关于伊丽莎白·曼·博尔吉斯的较有分量的传记。她的部分作品已被出版，读者可读到其最新版本，而更多的文学文本、戏剧作品、早期关于动物和海洋的专业读物以及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妇女的崛起》均已绝版。

关于米夏埃尔·曼

目前未见关于米夏埃尔·曼的传记。逝世后，他的部分文章和书信被收录在一部纪念集中，由其在伯克利大学的同事出版：Michael Mann: Fragmente eines Lebens. Lebensbericht und Auswahl seiner Schriften von Frederic C. und Sally P. Tubach, München 1983 (已绝版)。

读者可以通过Schönheit und Verfall. Beziehungen zwischen Thomas Mann und Ernst Krenek. (Mehr als) ein Tagungsbericht, hg. von Matthias Henke (= Thomas-Mann-Studien Bd. 47), Frankfurt a.M. 2015一书，对作为音乐家的米夏埃尔·曼有所了解。

图片来源

图1、12、14、18、30、42、43、48: Privatsammlungen

图2: Th. Th. Heine/VG Bild-Kunst, Bonn

图3: Privatsammlung Blahak, Hannover

图4: Kurt-Hahn-Archiv, Schule Schloss Salem

图5、6、15、22、24、31、37、40、41: Thomas-Mann-Archiv
Zürich/Keystone

图7、11、13、27、28、34: Thomas-Mann-Archiv Zürich

图8、9、10、16、20、25、26、32、33、36、38、45、46:
Monacensia. Literaturarchiv und Bibliothek München

图17: Eric Schaal/Weidle Verlag. Standort: Deutsche
Nationalbibliothek/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图19: Bettmann/Corbis

图21: 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 Marbach

图2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图29、35: San Francisco Symphony Archives

图39: Gamma-Keystone/Getty Images

图44: Luciano d' Alessandro, Napoli. Standort: Monacensia.
Literaturarchiv und Bibliothek München

图47: Alfred Hamm/International Ocean Institute, Halifax,
Kanada

图49: Schweizerisches Literaturarchiv, Bern

本书作者和S. 费舍尔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对以上版权所有
者授权印刷图片表示感谢。对图片版权信息不详或无法联系版权所
有者的情况，S. 费舍尔出版社将依照法律规定按一般费用标准后续进
行补偿。

本中文译本为保持作品的完整性，使用德文原著的全部图片。如
有侵权，请联系告知。

人物及其著作

（此部分页码为德文版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Acosta, Mercedes de 266

Adenauer, Konrad 364

Adorno, Theodor W. 291, 327, 372, 386–388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zus.mit Max Horkheimer） 291

Aissi→Mann, Klaus

Alexander der Große 69

Aminoff, Hans 101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Der standhafte Zinnsoldat 369

Andreae, Bärbel 338

Antoine, André-Paul

Die liebe Feindin 70

Appelbaum, Kurt 274

Auden, Wyston Hugh 125 f., 229, 269

Bach, Johann Sebastian 338

Bahr, Egon 403

Bassermann, Albert 55

Bassermann, Else 55

Bauer, Lise 123, 137, 169

Beck, Hans 385 f., 403, 417

Beck-Mann, Familie 412, 419

Beck-Mann, Ingrid 418-420

Beethoven, Ludwig van 384

Beneš, Edvard 132

Benjamin, Walter 27

Benn, Gottfried 60, 92, 129

Antwort an die literarischen Emigranten 92

Berger, Ludwig 61

Bermann Fischer→Fischer

Bernhardt, Sarah 203

Bertaux, Frau (Mutter von Pierre Bertaux) 58 f., 62

Bertaux, Félix 58 f., 62, 100

Bertaux, Pierre 58 f., 62 f., 65, 95, 138

Bertram, Ernst 35 f.

Bibi→Mann, Michael

Biddle, Francis 270

Bloch, Ernst 101, 114, 133

Geist der Utopie 61

Blunck, Hans Friedrich 99

Bode, Wilhelm

Goethes Sohn 140

Bonsels, Waldemar 129 f.

Die Biene Maja und ihre Abenteuer 130

Borgese, Angelica 226, 274, 287, 293, 295 f., 324, 328,
332, 335, 348, 357–358, 363 f., 372, 385, 389

Borgese, Dominica 286 f., 293, 295 f., 324, 328, 332, 335, 348, 357 f., 363 f., 372, 385, 418 Borgese, Giuseppe Antonio 178 f., 192, 194, 196 f., 199, 215, 226, 234 f., 243, 251, 257, 274, 286 f., 292 f., 295 f., 325, 328, 332, 335, 337 f., 347f., 357 f., 363

Borsche, Dieter 365

Bowles, Jane 229

Bowles, Paul 229

Brandt, Willy 403

Brecht, Bertolt 60, 94, 114, 147, 191

Arbeitsjournal 401

Mutter Courage 381

Breitbach, Joseph 102, 306

Breloer, Heinrich 420

Die Manns. Ein Jahrhundertroman (Regie) 419 f.

Brereton, Lewis H. 276

Brod, Max 343

Britten, Benjamin 229

Brüning, Heinrich 72

Buchner, Georg

Leonce und Lena 13 f.

Buff, Charlotte → Kestner, Charlotte, geb. Buff

Bunzel, Herr 235

Cabell, Ury 165

Capy, Marcelle 76

Chamberlain, Arthur Neville 162, 191, 208

Chambrun, René de, Comte 217

Churchill, Sir Winston 208, 273, 315

Claudé, Paul 247

Clemenceau, Georges 203

Cocteau, Jean 77

Colocci, Michele (Sohn von Angelica Borgese) 389

Cooper, Alfred Duff, Viscount Norwich 217, 277, 287

Coudenhove-Kalergi, Richard Nikolaus, Graf 61

Curtiss, Thomas Quinn, gen. Tomski 139, 145 f., 154, 156, 164 f., 181, 205 f., 233, 266 f.

Dalí, Gala Eluard 229

Dalí, Salvador 229

Davis, George 229

Defregger, Franz 420

Disney, Walt 153

Fantasia 153

Döblin, Alfred 96, 147

Dönitz, Karl 304

Dohm, Ernst 42

Dohm, Hedwig (Marianne Adelaide Hewig) , gen. Mimchen
43, 182, 420

Donatello 154

Droemer, Adalbert 66

Dürrenmatt, Friedrich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381

Duse, Eleonora 203

Dvořák, Antonín 203

Ebermayer, Erich 60, 68, 72, 306

Ebert, Friedrich 17, 30, 32

Ehrenberg, Paul 272

Einstein, Albert 84, 113, 116, 175

Eisenhower, Dwight D. 362, 364

Eissi→Mann, Klaus

Elisabeth Petrowna, Zarin von Russland 299

Else (Köchin der Familie Pringsheim) 196

Eri→Mann, Erika

Ewald, Marina 18

Feiß, Gertrud 25

Feist, Hans 33

Ferris, Jim 279 f.

Feuchtwanger, Lion 94, 97, 114, 133, 175f., 212, 343

Fischer, Familie 84

Fischer, Brigitte Bermann 66, 219

Fischer, Gottfried Bermann 66, 92, 96, 98f., 112, 117-122, 151, 167, 185, 219, 263, 301, 341, 353, 374

Fischer, Samuel 64, 66, 80, 111

Flanner, Janet 266

Goethe in Hollywood 250–252, 266

Flesch, Carl 179f., 185, 189f., 192, 194, 197f., 207

Fletcher, John 259, 266f.

Fontane, Theodor 401

Foss, Lukas 359, 366

Franco Bahamonde, Francisco 156f., 223

Frank, Bruno 83f., 199, 219

Zehntausend 54

Frank, Elisabeth, geb. Massary, gen. Liesl 199, 219

Frank, Louis 50

Franzl (Kellner) 345

Freschi, Maria 196

Freud, Sigmund 151, 175

Frick, Wilhelm 105

Frido→Mann, Fridolin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König von Preußen 261, 299

Fritz (Freund von Golo Mann) 149

Fry, Varian 222

Gala→Dalí, Gala Eluard

Galamian, Ivan (Jean) 132, 136, 142, 153, 159

Garbo, Greta 61, 168, 266

Gartmann, Uto 19, 25

Gasser, Manuel 140, 150, 154, 229, 242, 246f., 317f.,
328f., 353

Geheeb, Paul 20, 21, 36f.

Gentz, Friedrich von 140, 150, 174, 246, 261

Gide, André 77, 114, 343, 353, 416

Giehse, Therese 83, 99, 105f., 115, 131, 308, 374, 381

Giordano, Ralph 307

Goebbels, Joseph 9, 97, 102, 117, 133. 233, 299, 306,
387f.

Göring, Hermann 9, 113, 189, 302, 304, 310

Goethe, August von 140, 157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39 f., 143, 157, 167, 174,
199, 208, 222, 252, 334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99

Gründgens, Gustaf 9, 41, 47f., 50f., 54, 64, 70, 125, 127, 175, 310f., 336, 353, 405

Gumpert, Charlotte 131

Gumpert, Nina 131, 199

Gumpert, Martin 131, 135, 138, 141, 170, 172, 180f., 199, 201, 231, 309, 337, 371

Gundolf, Friedrich 75

Gustav V., König von Schweden 68

H., Roland 48f., 52f.

Hahn, Charlotte, geb. Landau 39

Hahn, Kurt 17, 18, 21, 29, 39, 49f.

Halifax, 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Lord Irwin, Earl of 270

Hallgarten, Constanze 76

Hallgarten, Richard, gen. Ricki 11, 22, 74, 76, 79f.

Hämerli, Dr. 86

Hamsun, Knut 184

Hanfmann, George 298

Hartmann von Aue

Gregorius 349

Hasenclever, Walter 214

Hauptmann, Gerhart 18, 53, 67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79

Heine, Heinrich 390

Heisenberg, Werner 403

Hemingway, Ernest 114

Henning, Magnus 99

Hepburn, Katharine 146

Herrmann, Eva 206, 279, 293, 305

Herzog, Wilhelm 94

Hesse, Hermann 117, 121, 248

Heuser, Klaus 55

Heuss, Theodor 370

Heydrich, Reinhard 89f., 105, 265

Himmler, Heinrich 7, 89, 97, 105, 265

Hindemith, Paul 338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32f., 72, 81

Hitler, Adolf 7, 9, 72, 78, 81, 82–85, 87, 89, 91, 93, 95f., 101f., 104f., 110, 112–114, 116, 119f., 122f., 130, 132–135, 147, 149, 151f., 160–164, 166f., 172f., 175, 189, 191, 193, 195, 201, 204, 208–210, 214, 220f., 235, 237, 241, 246, 251, 256, 261, 265, 269, 273, 286, 289, 299, 301–303, 319, 326, 331, 347, 382, 386

Mein Kampf 74

Hohl, Ludwig 204

Hölderlin, Friedrich 30

Holz, Arno 67f.

Homer 93

Homolka, Florence, geb. Meyer 172, 325

Hoppe, Marianne 125

Horkheimer, Max 271, 284, 386–388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zus. mit Theodor W. Adorno)

Horkheimer, Rose Christine (Maidon) , geb. Riekher 271,
284, 387

Horst-Wessel-Lied → Wessel, Horst

Horvath, Ödön von 151

Hubsi → Pringsheim, Klaus jun.

Huch, Ricarda 67, 103

Hülzen, Hans von 67

Hull, Cordell 193, 209

Hutchins, Robert 363, 397, 412

Huxley, Aldous 228

Ihering, Herbert 41, 51f.

Isherwood, Christopher 125

Jacobsohn, Siegfried 26, 354

Jannings, Emil 60, 302, 354f.

Jaspers, Karl 73, 79, 416

Jens, Inge 392

Jodl, Alfred 304

John (Hausangestellter der Familie Mann) → Long, John

Johnny (Freund von Klaus Mann) →Fletcher, John

Johst, Hanns 34, 45, 97f.

Jünger, Ernst 104

Kafka, Franz 114

Kahle, Hans 156

Kahler, Erich von 199, 241, 261, 279, 308, 318, 320, 362

Kahler, Josefine von 199

Kantorowicz, Alfred 212

Katzenstein, Erich 9, 116, 160, 352, 355

Kayser, Rudolf 84

Keilson, Hans 343f.

Das Leben geht weiter 343

Keitel, Wilhelm 304

Kerr, Alfred 87

Kesten, Hermann 204f., 377

Kestner, Charlotte, geb. Buff 199

Klett, Ernst 414-416

Klotz, Ed 350, 361, 385

Klüger, Ruth 290

Knappertsbusch, Hans 89

Knopf, Alfred A. 374

Knox, Betty 295f., 307f.

Koeppen, Wolfgang 99

Eine unglückliche Liebe 99

Kogon, Eugen 335

Kokoschka, Oskar 380

Kolb, Annette 19, 117, 121

Korrodi, Eduard 121f., 320

Kracauer, Siegfried 80

Krenek, Ernst 338, 350, 366

Kreuder, Ernst 80

Kreuger, Ivar 203

KriECK, Ernst 132f.

Kröger, Nelly→Mann, Nelly, geb. Kröger

Kurz, Marie 109

Landshoff, Fritz H [elmut] 8, 114f., 120f., 127, 136f.,
160, 178–181, 199, 209, 263, 343

Lang, Fritz 146

Lányi, Jenő 141f., 145, 154f., 172, 182, 186, 198f.,
212, 221–225, 232, 285, 298, 378

Laval, Pierre 217

Lazare, Christopher 253, 267

Lee, Gypsy Rose 229

Lehmann, Lotte 268

Lenbach, Franz von 420

Lenin, Wladimir Iljitsch 61

Les Mille (Film, Regie: Sebastien Grall) 215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Minna von Barnhelm oder

Das Soldatenglück 11

Leuwerik, Ruth 365

Lewis, Sinclair 128, 148

Ley, Robert 304

Lichtenberger, Henri 129

Lion, Ferdinand 169

Lippmann, Walter 270

Lisa→Mann, Elisabeth

Löhr, Julia (Julia Elisabeth Therese) , geb. Mann 20, 80

Loerke, Oskar 88f.

Long, John 161, 174, 215, 218

Long, Lucy 161, 174, 215, 218

Lorre, Peter 153

Lubbe, Marinus van der 83

Lubitsch, Ernst 146, 279

Lucy (Hausangestellte der Familie Mann) →Long, Lucy

Lücke, Theodor 22

Ludwig, Emil 176

Ludwig II., König von Bayern 146

Luther, Martin 97, 173

Mädi→Mann Borgese, Elisabeth

Mahler-Werfel, Alma, geb. Schindler 222, 224, 255, 313,
380

Mann, Anthony, gen. Toni 263, 277f., 285, 292, 295–297,
306, 314–316, 328, 330–332, 335, 338, 342f., 350, 355, 359,
363, 372, 379f., 389–391, 414, 420

Mann, Carla (Carla Augusta Olga Maria) 20, 80

Mann, Christine, geb. Heisenberg 403

Mann Borgese, Elisabeth (Elisabeth Veronika) , gen.
Mädi, Medi, Lisa 8, 22, 26f., 35, 48, 56, 62f., 68, 71, 73,
83, 87, 89, 91, 99, 109, 114–116, 121, 124, 136–138, 141,
145, 156, 160f., 172, 176–180, 193f., 196f., 199f., 215,
226, 230, 232, 234f., 242f., 250f., 257–259, 262, 264f.,
274f., 285–287, 292f., 295f., 302, 309, 324f., 332, 335,
337f., 342, 346–348, 356–358, 363f., 370, 372f., 375, 379f.,
385, 389, 394, 396–399, 405–414, 417–421

*Das ABC der Tiere. Von schreibenden Hunden und lesenden
Affen* 396f.

Der Aufstieg der Frau 396

Das Drama der Meere (The Drama of the Oceans) 406f.

Mann-Auden, Erika (Erika Julia Hedwig) , gen. Eri 7f.,
11–15, 17, 19–28, 33–41, 44, 46–48, 50f., 53–57, 59–66, 68–

72, 74–80, 83–87, 90–96, 98–101, 104–108, 110, 114f., 118–122, 124–129, 131, 135f., 138, 141–143, 145, 149, 155f., 158, 163f., 168–172, 174, 176, 178–181, 183f., 191–193, 196–200, 201f., 206f., 215, 217f., 220f., 223–227, 229–231, 233, 236f., 240f., 245–247, 249–251, 258–260, 268f., 273–277, 284–287, 295f., 300, 303–305, 307–309, 312–319, 323f., 326, 328, 331–337, 342, 344–347, 349, 351, 353, 356–358, 360–366, 369–372, 374–381, 383f., 387–400, 410f., 415, 417, 421

Eine Ablehnung 286

Bildnis des Vaters 175f.

Blitze überm Ozean

Christoph fliegt nach Amerika 371

Das letzte Jahr. Bericht über meinen Vater 376f.

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 (zus. mit Klaus Mann) 90, 162, 175f., 392

The Lights Go Down 235

Noch ein paar Tote (Gedicht) 181

The Other Germany (zus. mit Klaus Mann) 235, 286

Rundherum. Das 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 Ein heiteres Reisebuch (zus. mit Klaus Mann) 64f., 69, 74, 108, 354f.

Thomas Mann and his family 174

Till-Bände 371f.

Unser Zauberonkel Muck 371

Waiting for the General 276

Zehn Millionen Kinder (School for Barbarians) 164, 173

Mann, Fridolin, gen. Frido 216, 218, 231, 245, 262f., 271, 277f., 285, 290, 292, 295–297, 306, 314–316, 321, 328, 330–332, 335, 337f., 342f., 345, 350, 355, 359, 363, 372, 375, 379f., 389, 403f., 414, 420

Mann, Golo (Angelus Gottfried Thomas), Peusodym: Michael Ney 7, 11f., 21, 24, 28–30, 35, 40, 48–50, 52f., 55f., 58f., 62–65, 69, 73–76, 79, 83–85, 87, 89, 91–96, 100, 102–104, 110, 115f., 122f., 126, 129, 132, 134f., 137, 140, 145, 149–153, 155, 157, 160, 162, 168f., 174–176, 181, 184f., 192f., 196, 199, 204f., 208–218, 222–227, 229f., 234, 237, 241–243, 245f., 249–251, 254f., 261, 263–265, 279–285, 287f., 292–294, 297f., 301, 305f., 308, 313, 317f., 327–330, 332, 335–337, 345f., 350, 353, 358, 360–363, 372f., 375f., 380–387, 390–394, 397–399, 401–403, 405, 408, 410–421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373, 381–384, 387–389

Erinnerungen an meinen Bruder Klaus 405f.

Erinnerungen und Gedanken 20, 90, 416

Friedrich von Gentz.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en Staatsmannes (Secretary of Europe. The Life of Friedrich Gentz, Enemy of Napoleon) 150, 174f., 246, 261, 313

Geschichte und Geschichten 384

Politische Chronik 104

Politische Gedanken 152

Vom Geist Amerikas 363, 372

Vom Leben des Studenten Raimund (unter dem Pseudonym Michael Ney erschienen) 59, 92

Wallenstein 402

Mann, Gret, geb. Moser 141, 145, 159, 172, 179, 189f., 192, 194, 198–200, 203, 207, 210, 216, 218, 231, 245, 262f., 271, 290, 295–297, 314f., 321, 326, 328, 330–332, 335, 338, 342f., 350, 355f., 359, 366f., 372, 375, 378–380, 389, 403, 407–409, 411f.

Mann, Heinrich (Luiz Heinrich) 16f., 20, 22, 34, 44, 57f., 83f., 88, 90, 95–97, 99, 116, 120, 128f., 133, 142, 147, 151, 153, 155, 157, 171, 173, 184, 193, 210, 213–215, 217f., 222–225, 227f., 237, 243, 248, 259–261, 290, 293, 302, 332, 339, 401

Diktatur der Vernunft 61

Der Untertan 16

Ein Zeitalter wird besichtigt 225

Mann, Julia, geb. da Silva Bruhns 20

Mann, Julia→Löhr, Julia

Mann, Katia (Katharina Hedwig) , geb. Pringsheim, gen. Mielein 7, 9, 11-13, 15-28, 30-32, 34, 37-42, 44, 46-51, 53-57, 62f., 68, 71-73, 76f., 78-80, 82f., 85-94, 96-100, 104-106, 109-112, 114, 116-124, 126-128, 132f., 135-143, 145f., 148f., 152-161, 165f., 168, 170f., 176-182, 185, 189-200, 201-205, 207-211, 215f., 218, 224-247, 251, 253-255, 258-263, 266f., 269-279, 283-288, 290-293, 295f., 298-300, 302f., 305f., 308f., 311f., 314-316, 318, 320-325, 327-339, 342, 344-346, 348, 352, 355-358, 359, 361-363, 365-367, 369f., 374-376, 378-380, 385, 387-390, 394, 396-401, 405, 408-410, 412-414, 417, 420f.

Meine ungeschriebenen Memoiren 400f.

Mann, Klaus (Klaus Heinrich Thomas) , gen. Aissi, Eissi 7-9, 11-15, 17-21, 23, 25f., 28, 31, 33-37, 39-42, 45-48, 50-66, 68-72, 74-81, 82-88, 91-99, 101f., 104f., 108, 110f., 113-129, 131, 133-135, 137-139, 141-143, 145f., 149, 151-160, 162, 164f., 168, 170-172, 175f., 178, 180f., 183f., 186f., 191f., 198-200, 201-205, 215, 218-224, 226-229, 231-233, 236-238, 240-242, 244f., 247, 249-251, 253f., 259f.,

262, 266-269, 272-280, 283-285, 287f., 290, 292f., 295f.,
298, 300, 302-395, 306, 308f., 310-314, 318f., 321-325, 327-
330, 332-337, 342-344, 355, 357, 365, 378, 383, 391, 394,
399, 405f., 416, 420f.

Alexander 69

Anja und Esther 28, 40-42, 45, 47

(Hg.) *Anthologie jüngster Prosa* 59, 92

Antwort von Klaus Mann 61

Distinguished Visitors 201, 219

Escape to Life. Deutsche Kultur im Exil (zus. mit Erika
Mann) 90, 162, 175f., 392

Fazit einer Spanienreise 156

Flucht in den Norden 101f.

Der fromme Tanz 42, 45

Gegenüber von China 62

Gruß an das zwölfhundertste Hotelzimmer 76

*Heute und Morgen. Zur Situation des jungen geistigen
Europas* 61f.

Kind dieser Zeit 80, 354

Kindernovelle 49, 54

Kunst und Politik 310

The Last Decision 253

Mephisto 9, 125, 127–129, 310, 336, 405

The Other Germany (zus. mit Erika Mann) 235, 286

Revue zu Vieren 51f., 54, 65

Rundherum. Abenteuer einer Weltreise. Ein heiteres Reisebuch (zus. mit Erika Mann) 64f., 69, 74, 108, 354f.

Der siebente Engel 311

Speed 205

Symphonie Pathétique 116

Treffpunkt im Unendlichen 80

Vergittertes Fenster 146

Vor dem Leben 31–33, 36f., 40

– *Der Ahe* 36f.

– *Sonja* 344

– *Der Vater lacht* 33

Der Vulkan 172, 182f.

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The Turning Point)

259, 263f., 319, 324, 332, 353–355

Mann, Leonie (Leonie Carla Maria Henriette) 58

Mann, Michael (Michael Thomas) , gen. Bibi 8, 22, 26f., 35, 48, 56, 62f., 68, 71, 78, 82f., 87, 89, 91, 99, 109, 114–116, 124, 131–133, 136–146, 153, 157, 159f., 168, 172, 179f., 182, 185f., 189f., 192–195, 197–200, 202–204, 207, 210, 218, 227, 230–232, 235, 237, 245, 249, 251, 262–264, 271, 277f., 285, 290–292, 295–298, 314, 321f., 328, 330–332, 335, 337–339, 342f., 345f., 349–352, 355f., 358, 359, 365–367, 372, 375, 378–380, 384, 389–391, 396, 399–405, 407–412, 414, 420f.

Selbstmördergedichte IV 411

Mann, Mimi (Maria) , geb. Kanová 22, 57f., 84, 302

Mann-Lányi, Monika 9, 11f., 24f., 35, 39f., 50, 56f., 62f., 69–71, 83, 89, 92, 100, 104f., 111, 116–120, 123f., 126f., 133, 141f., 145, 154f., 157, 168, 172, 182, 186, 192f., 198f., 211f., 221–225, 230–232, 235, 250f., 254, 258, 267f., 273f., 279, 283, 285, 292, 298–300, 312, 320–322, 324–326, 328f., 332, 335f., 341, 344, 352f., 358, 363, 366, 368f., 373, 375–377f., 380f., 389, 394–396, 399, 410–415, 417–421

Der Start. Ein Tagebuch 381

Tupfen im All 391

Vergangenes und Gegenwärtiges 376–378, 415

Versuch über Erika Mann 400

Wir sind elf 394

Mann, Nelly, geb. Kröger 84, 213, 222–224, 259–261, 293

Mann, Raju 403f., 408, 414

Mann, Stefan 403

Mann, Thomas (Paul Thomas) 7–10, 11–13, 15–23, 25–28, 30–42, 44–46, 48–51, 53–57, 59–73, 76–81, 82–99, 103, 105f., 108–124, 126–128, 130, 131–163, 166f., 169–180, 183–185, 189–197, 199f., 203, 205, 207–212, 214–234, 236–252, 254–278, 280–297, 299–309, 311–318, 320f., 323–343, 344–346, 348–350, 352–354, 356–358, 359–380, 382–385, 387–395, 397, 399–402, 404–406, 408, 410–412, 415–417, 419, 421

Achtung, Europa! 167

Ansprache im Goethejahr 1949 334

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 365, 369, 374, 384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6, 18, 44, 112, 166, 251, 301, 383

Die Betrogene 350

Bonner Brief 10, 103, 132–134

Botschaft für das deutsche Volk 316

Bruder Hitler 167, 195

Buddenbrooks 10, 15, 27, 66, 69, 208, 250, 272, 285,
291, 367, 384

Deutsche Ansprache 340

Deutsche Hörer! 245, 265f., 296, 298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300

Dieser Friede 162

Doktor Faustus 277f., 290f., 295, 314, 319–321, 326f.,
341, 348f., 387

Die Entstehung des Doktor Faustus 327

Der Erwählte 349

Das Gesetz 272

Goethe und die Demokratie 333

Joseph und seine Brüder 50, 53, 61, 72, 91, 95, 98,
108, 117, 139, 147, 176, 219, 228, 238, 248, 251, 270–272,
290, 379, 393f.

– *Die Geschichten Jaakobs (Tales of Jacob)* 108f.

- *Der junge Joseph* 108
- *Joseph in Ägypten (Joseph in Egypt)* 130, 153, 250
- *Joseph der Ernährer (Joseph the Provider)* 257, 271, 289f.

Königliche Hoheit 15, 60, 365

Leiden und Größe der Meister. Neue Aufsätze 112

Leiden und Größe Richard Wagners 82, 91, 112

Lotte in Weimar 139, 145, 157, 167, 199, 208

Mario und der Zauberer 49

Meine Zeit 340

On Myself 207

Order of the Day 270

Rettet die Demokratie! 32f.

Schicksal und Aufgabe 281

Sieg deutscher Besonnenheit 78

Stories 250

That Man is my Brother 167

Der Tod in Venedig 15, 38, 58, 144

Tonio Kröger 10

Über die Ehe 38f.

Unordnung und frühes Leid 34–36, 49, 62f., 184, 344

Versuch über Schiller 377

Vom zukünftigen Sieg der Demokratie (The Coming Victory of Democracy) 149f.

Von deutscher Republik (Gerhart Hauptmann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18

Wälsungenblut 110, 275f.

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 306

Der Zauberberg (The Magic Mountain) 16, 26f., 31, 46, 50, 106, 208, 250, 311, 354, 367, 383

Mann, Thomas Johann Heinrich 20, 43

Mann, Viktor, gen. Vikko 20, 88, 317f., 339

Mao Tse-tung 331

Marcello, Benedetto 336

Marcuse, Ludwig 94

Margaret, Prinzessin von Hessen 13

Marlitt, E. 41

Marx, Karl 30

Das Kapital 74

Marx, Wilhelm 32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228

Maupassant, Guy de 93

Max, Prinz von Baden 17, 29

McCarthy, Joseph 349, 357, 362

McCullers, Carson 228f., 266

Medi→Mann Borgese, Elisabeth

Mendelssohn, Peter de 408, 410–412

Der Zauberer. Das Leben des Schriftstellers Thomas Mann

408

Menuhin, Hephzibah 351

Menuhin, Marutha 355

Menuhin, Moshe 355

Menuhin, Yehudi 349–351, 355

Menuhin-Rolfe, Yaltah 349–352, 355f., 359, 365f.

Meyer, Agnes E [Elizabeth] , geb. Ernst 148f., 155, 162, 169, 172, 193f., 209, 217, 220, 222, 225, 236–240, 242–250, 255–257, 262, 264, 269f., 273, 280–283, 285, 289f., 321, 325, 333, 340f., 349, 357, 359f., 369f., 374, 393, 420

Meyer, Conrad Ferdinand 392

Meyer, Eugene 148f., 169, 193f., 242, 244, 248, 257, 270, 333

Meyer, Florence→Homolka, Florence, geb. Meyer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54

Mielein→Mann, Katia

Mimchen→Dohm, Hedwig

Molo, Walter von 305f.

Monteux, Pierre 271, 277, 321f.

Morgenthau, Henry 270

Moser, Fritz 203, 207, 315, 338, 343, 366, 372, 379f.

Moser, Gret→Mann, Gret, geb. Moser

Moser (Mutter von Gret Moser) 203, 207, 315, 338, 379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311

Eine kleine Nachtmusik 374

Figaros Hochzeit 39

Mühsam, Erich 113

Mueller-Stahl, Armin 419

Murnau, Friedrich Wilhelm 60

Sunrise (Regie) 60

Musil, Robert 96

Mussolini, Benito 48, 149, 161f., 177

Napoleon I. Bonaparte, Kaiser der Franzosen 140, 174, 234

Neppach, Robert 188

Neumann, Robert 61

Newton, Caroline 147

Ney, Michael (Pseudonym) → Mann, Golo

Nibelungenlied 123

Nicolson, Harold 173

This amazing family 174

Niebuhr, Reinhold 265

Nietzsche, Friedrich 19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9

Novalis 19

Olden, Rudolf 223

Oprecht, Emil 133f., 151, 192, 196, 308, 315

Oprecht, Emmie 151, 308, 315, 361

Otte, Rini 160, 180

Owens, Jesse 122f.

Quincey, Thomas De 101

Pardo, Arvid 397, 407

Pahlen, Igor 106

Papen, Franz von 81

Pears, Peter 229

Peat, Harold R. 150

Perechon (Lagerkommandant) 214

Peter III. Fjodorowitsch, Zar von Russland 299

Pilcher, Rosamunde 41

Pinza, Ezio 188

Piscator, Erwin 94

Platen-Hallermünde, August Graf von 122

Polo→Val Caturla, Julio del

Pringsheim, Alfred 28, 42-44, 50, 73, 93, 110, 142,
158f., 165f., 181, 195f., 208f., 238, 263, 361, 410

Pringsheim, Erik 420

Pringsheim, Hans Erik 367

Pringsheim, Hedwig (Getrude Hedwig) , geb. Dohm 27f., 42-
44, 50, 73, 109-111, 158f., 165f., 181f., 195f., 208f., 238,
244, 263, 361, 409f., 420

Pringsheim, Katharina→Mann, Katia

Pringsheim, Klaus, 25f., 51, 314, 364, 367

Pringsheim, Klaus jun., gen. Hubschi 314, 329

Pringsheim, Peter 44, 50, 243, 295

Protest der Richard-Wagner-Stadt München 89f., 95, 306

Querido, Emanuel 209

Querido-Kozijn, Jane 209

Rathenau, Walther 18

Raupach, Richard 368

Redlich, Fritz 373

Reich-Ranicki, Marcel (eigtl. Marcelli Reich) 10, 415

Mein Leben 10

Die Wahrheit über Thomas Mann 415

Reinhardt, Delia 327

Reinhardt, Max 24, 37, 70

Reisiger, Hans 81, 83, 151f., 280, 320, 348f., 374

Remarque, Erich Maria 147, 176

Rilke, Rainer Maria 60

Rolfe, Benjamin 351f., 355f., 359

Roosevelt, Eleanor 226

Roosevelt, Franklin D [elano] 116, 149, 166, 170f.,
177, 204, 206, 210, 226f., 239, 255, 257, 273, 299

Rosenberg, Ethel 364

Rosenberg, Jim 141

Rosenberg, Julius 364

Rossellini, Roberto *Paisà* (Regie) 311

Roth, Joseph 96f., 107, 114, 180

Rychner, Max 320

Sahl, Hans 160

Scanzoni, Signe von 394, 399

Scheel, Walter 413

Schickele, René 96, 116, 204

Schiller, Friedrich von 370

Don Carlos. Infant von Spanien 70

Wallenstein 52

Schilling, Harro 82

Schirach, Baldur von 387

Schirmacher, Frank 419

Schloß, Sybille 99

Schönberg, Arnold 175, 327

Schoenberner, Franz 205

Schönthan, Doris von 333f.

Schopenhauer, Arthur 44, 50

Schostakowitsch, Dmitri Dmitrijewitsch 7.
Symphonie (Leningrader Symphonie) 271

Schubert, Franz 174, 301

Schulze-Wilde, Harry 328f.

Schwarzenbach-Clarac, Annemarie 79, 86, 101, 108

Schwarzenbach, Familie 108

Schwarzschild, Leopold 117-119, 121, 133

Schweizer, Richard 322

Die Gezeichneten (The Search) 322

Shakespeare, William *Hamlet* 310

Shaw, George Bernard *Die heilige Johanna* 26

Shenstone, Molly 177, 228

Sinclair, Upton 60, 228, 325, 343

Sklenka, Hans 104

Sonnemann, Emmy 113

Spadaro, Antonio 380f., 395, 413, 417

Stalin, Josef W. 151, 237, 275, 328, 331

Stauffenberg, Claus Schenk Graf von 289

Steche, Otto 13, 15

Steegemann, Paul 31

Sternberger, Dolf 317

Sternheim, Carl 51, 64, 172

Der Snob 310

Sternheim, Mopsa 51

Stokowski, Leopold 271

Strauß, Franz Josef 413

Strauss, Richard 269, 302

Strawinsky, Igor 366

Streicher, Julius 304

Stresemann, Gustav 67

Strich, Fritz 116, 374

Süskind, Wilhelm Emanuel 11, 22, 33, 84, 204, 313f.

Suhrkamp, Peter 84, 117, 341

Temianka, Henri 207, 210, 264

Temple, Shirley 153

Thiess, Frank 306

Thompson, Dorothy 147

The Most Eminent Living Man of Letters 109

Tillich, Paul 284

Tillinger, Eugene 339f.

Toller, Ernst 179f.

Tomski→Curtiss, Thomas Quinn

Toni→Mann, Anthony

Trotzki, Leo D. 114

Truman, Harry S. 299

Tschaikowski, Pjotr (Peter) Iljitsch 116

Tucholsky, Kurt 61, 65, 87, 97

Tumiati, Corrado 396f.

Uto→Gartmann, Uto

Val Caturla, Julio del, gen. Polo 52f., 58

Vesper, Will 101

Vogler, Carl 132

Vikko→Mann, Viktor

Wagner, Richard 43, 84, 89, 93, 166, 272, 281, 302

Parsifal 272

Wagner, Winifred 302

Wallace, Henry A [gard] 270

Walter, Bruno, gen. Kuzi 11, 175, 230f., 240, 268, 277, 295f., 311, 327f., 366, 374, 418f.

Walter, Elsa, geb. Wirthschaft, gen. Korneck 231, 268, 295

Walter, Gretel 11, 13, 230

Walter, Lotte 11, 13, 24, 230f., 236, 268, 273, 279

Wassermann, Jakob 108

Wedekind, Frank 22

Wedekind, Kadidja 32, 298, 300, 326

Klaus Mann (Gedicht) 32

Wedekind, Pamela 22, 25, 32, 39–41, 46–48, 51f., 54, 61, 64, 298, 336

Weizsäcker, Ernst von 7

Weizsäcker, Richard von 7

Werfel, Franz 94, 222, 224, 255

Das Lied von Bernadette (The Song of Bernadette) 255

Wertheim, Barbara 172

Wertheim, Maurice 127, 131, 170–172

Wessel, Horst

Die Fahne hoch (Horst-Wessel-Lied) 82, 335

Whitman, Walt 152

Wilder, Billy 128, 146

Witkop, Philipp 109

Zuckmayer, Carl 151, 286, 301f.

Des Teufels General 286

Zweig, Arnold 94f., 97

Zweig, Stefan 40, 42, 96f., 129, 175f., 2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德）蒂尔曼·拉姆著；朱锦阳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201-6301-9

I. ①传… II. ①蒂…②朱… III. ①传记文学-德国-现代
IV. ①I51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0939号

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

著者/〔德〕蒂尔曼·拉姆（Tilman Lahme）

译者/朱锦阳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0.5 字数：369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301-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0543号

定价/9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

《我所认识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犹太人的世纪》

- * 一个成功的作家父亲对孩子来说，是榜样还是阴影，是朋友还是对手？
- * 20 世纪最著名的文豪之家；
- * 相爱相杀的家庭秘史；
- * 纳粹阴影下流亡作家群体的缩影；
- * 情爱绯闻、政见风波、药物滥用、抑郁自杀：光鲜背后的精疲力竭，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 * “总有一天，人们不但为我们每个人立传，还会书写我们这个传奇之家。”

蒂尔曼·拉姆成功地将他们相对秘密的一面展示出来，而没有伤害他们的隐私。我们不可能看到比这部作品更贴近这段家庭史的书了。

——汉斯·迪特·海门达尔 (Hans Dieter Heimendahl)，德国广播电台文化频道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2015 年 10 月 14 日

Tilmann Lahme gelingt es, die familiären Schichten frei zu legen [...] ohne sie als Menschen zu verraten. Intimer kann man die Geschichte einer Familie nicht erzählen.

—Hans Dieter Heimendahl,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2015-10-14

正因为身处可与他匹敌的同类中，托马斯·曼的故事才能成为德国的“家庭史诗”，那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福尔克·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明镜周刊》(Der Spiegel) 2015 年 10 月 10 日

Erst als gleichberechtigtes Mitglied im Kreise der Seinen erweitert sich seine [Thomas Manns] Geschichte zu der großen deutschen Familiensaga von damals, von heute.

—Volker Weidermann, Der Spiegel 2015-10-10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是托尔斯泰的名言。人们读了这本书，会更好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于尔根·考伯 (Jürgen Kaube)，《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5 年 10 月 10 日

Alle unglücklichen Familien sind auf ihre Art unglücklich, heißt es bei Tolstoi. Man lese dieses Buch, um zu verstehen, was dieser Satz heißen kann.

—Jürgen Kaub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5-10-10

第一章 / 一个德国家庭 (1922~1932) 第二章 / 在流亡中 (1933~1936) 第三章 / 传奇之家 (1937~1939) 第四章 / 危险与金钱 (1940~1941) 第五章 / 战争与和平 (1942~1946) 第六章 / 希特勒之后 (1946~1952) 第七章 / 能者为之 (1952~2002) 附录 / 曼氏家族一览表 / 缩略语 / 注释里的书名缩写 / 注释 / 关于曼氏家族的文献 / 图片来源 / 人物及其著作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定价: 96.00 元

DIE MANNEN

R
THORN BIRD

索·恩

DIE TOTENGRÄBER

掘——墓——人

魏 玛 共 和 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德] 吕迪格·巴特 Rüdiger Barth / 豪克·弗里德里希 Hauke Friederichs 著 靳慧明 译



DER LETZTE WINT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2年11月17日—12月1日 大 厦 倾 倒
1932年12月16日—1933年1月1日 寂 静 的 夜
1932年12月2日—12月13日 计 划
1933年1月2日—1月29日 风 口 浪 尖 上
1933年1月30日 取 得 权 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吕迪格·巴特 / 作者简介

1972年生于萨尔布吕肯，在图宾根大学学习当代史和普通修辞学。供职德国《明星周刊》(Stern) 15年，现居汉堡，为自由撰稿人和“Looping Studios”联合创始人。

豪克·弗里德里希 / 作者简介

1980年生于汉堡，在汉堡大学获得社会和经济历史学博士，曾学习犯罪学、政治学和新闻学。为《时代周报》(Die Zeit)和《GEO视界 - 历史》(Geo Epoche)等供稿。

新慧明 / 译者简介

女，1974年生于黑龙江省嘉荫县，1992年至1996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在北京某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2009年至2012年于FH Münster学习企业管理专业。译有《爸爸要结婚》《扫烟囱的男孩儿》等。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DIE TOTENGRÄBER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Die Totengräber: Der letzte Wint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18

掘墓人

魏 玛 共 和 国 的 最 后 一 个 冬 天

DER LETZTE WINT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德】吕迪格·巴特 Rüdiger Barth / 豪克·弗里德里希 Hauke Friederichs 著 靳慧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掘墓人](#)
- [序幕](#)
- [大厦倾倒](#)
 - [11月17日, 星期四](#)
 - [11月18日, 星期五](#)
 - [11月19日, 星期六](#)
 - [11月20日, 星期日](#)
 - [11月21日, 星期一](#)
 - [11月22日, 星期二](#)
 - [11月23日, 星期三](#)
 - [11月24日, 星期四](#)
 - [11月25日, 星期五](#)
 - [11月26日, 星期六](#)
 - [11月27日, 星期日](#)
 - [11月28日, 星期一](#)
 - [11月29日, 星期二](#)
 - [11月30日, 星期三](#)
 - [12月1日, 星期四](#)
- [计划](#)
 - [12月2日, 星期五](#)
 - [12月3日, 星期六](#)
 - [12月4日, 星期日](#)
 - [12月5日, 星期一](#)
 - [12月6日, 星期二](#)
 - [12月7日, 星期三](#)
 - [12月8日, 星期四](#)
 - [12月9日, 星期五](#)
 - [12月10日, 星期六](#)
 - [12月11日, 星期日](#)
 - [12月12日, 星期一](#)
 - [12月13日, 星期二](#)
 - [12月14日, 星期三](#)
 - [12月15日, 星期四](#)
- [寂静之夜](#)
 - [12月16日, 星期五](#)
 - [12月17日, 星期六](#)

- [12月18日, 星期日](#)
- [12月19日, 星期一](#)
- [12月20日, 星期二](#)
- [12月21日, 星期三](#)
- [12月22日, 星期四](#)
- [12月23日, 星期五](#)
- [12月24日, 星期六](#)
- [12月25日, 星期日](#)
- [12月26日, 星期一](#)
- [12月27日, 星期二](#)
- [12月28日, 星期三](#)
- [12月29日, 星期四](#)
- [12月30日, 星期五](#)
- [12月31日, 星期六](#)
- [1933年1月1日, 星期日](#)
- [风口浪尖上](#)
 - [1月2日, 星期一](#)
 - [1月3日, 星期二](#)
 - [1月4日, 星期三](#)
 - [1月5日, 星期四](#)
 - [1月6日, 星期五](#)
 - [1月7日, 星期六](#)
 - [1月8日, 星期日](#)
 - [1月9日, 星期一](#)
 - [1月10日, 星期二](#)
 - [1月11日, 星期三](#)
 - [1月12日, 星期四](#)
 - [1月13日, 星期五](#)
 - [1月14日, 星期六](#)
 - [1月15日, 星期日](#)
 - [1月16日, 星期一](#)
 - [1月17日, 星期二](#)
 - [1月18日, 星期三](#)
 - [1月19日, 星期四](#)
 - [1月20日, 星期五](#)
 - [1月21日, 星期六](#)
 - [1月22日, 星期日](#)

- [1月23日，星期一](#)
- [1月24日，星期二](#)
- [1月25日，星期三](#)
- [1月26日，星期四](#)
- [1月27日，星期五](#)
- [1月28日，星期六](#)
- [1月29日，星期日](#)
- [取得权力](#)
 - [1月30日，星期一](#)
- [尾声](#)
- [参考文献](#)
- [报纸](#)
- [写作花絮](#)
- [感谢](#)
- [年表](#)
- [人物译名表](#)

掘墓人

保罗·冯·兴登堡（生于1847年）

一战传奇，鄙视民主的总统

兴登堡是个板着面孔的统帅，男低音，他发号施令的样子让那个小下等兵浑身颤抖。

——胡伯特·伦弗洛·克尼克博克，《纽约晚邮报》记者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生于1882年）

将军兼总理候选人，自己可能突然成为总理

与施莱谢尔达成一致并不容易。他目光机敏，却掩藏得很深。我确信他并不坦诚。

——阿道夫·希特勒

弗朗茨·冯·帕彭（生于1879年）

谋划复仇的赌徒

帕彭看起来像迷途的山羊，穿着丝绸内里的黑礼拜服，试图做出一种姿态。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人物。

——哈利·凯斯勒伯爵，时事评论员，花花公子

阿道夫·希特勒（生于1889年）

想建立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元首”

当我最终进入阿道夫·希特勒在酒店的沙龙里时，我确信会见到未来德国的独裁者。但是大概过了五十秒，我就确定并不是这样。

——多萝西·汤普森，美国记者

约瑟夫·戈培尔（生于1897年）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部长

元首在这里进行权力的博弈。这是一场扣人心弦而激动人心的战争，但是在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中，也让人感到刺激。

——约瑟夫·戈培尔

序幕

1932年11月，德国第一个民主体制建立14年后，面临着深刻的危机。11月6日，德国国会进行这一年第二次选举，这对于魏玛共和国背后的温和派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三分之一的工人或雇员失业，大约有500多万人。很多人尽管还在工作，工资却大幅降低。

经济一落千丈，政治文化也遭到摧残。街头总是会爆发争斗，已经有几百人死亡。政治家、企业家以及时事评论家都担心发生内战。

多亏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发布了紧急法令，总理弗朗茨·冯·帕彭才得以继续执政。紧急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只是这一法令并不是由人民代表决定。《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国家元首发布紧急命令的权力，自1930年起，兴登堡就最大限度地使用这一权力。

国会当然可以取消紧急法令，或以不信任为由提请政府引退——这些是宪法的控制工具，制定者曾努力寻求平衡。但为了避免走到这一步，总统两次解散议会，并因此导致新的选举。后果是德国政治史无前例地瘫痪。

德国人民刚刚再次选举完。未来的国会将由弗朗茨·冯·帕彭领导，他是个有坚定信念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帕彭将要面对的大部分议员尽管像他一样想废除民主，却希望是以他们的方式来废除。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痛恨这一体制。

总统终于明白，总理需要同盟者，但是只有德国国家人民党（DNVP）对帕彭忠诚。他们在584个议员席位中占51席，少得可怜。直到最近，帕彭才下赌注，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1]可能支持他的主张——自今年7月以来，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国会中还是最强大的党派。紧急情况下，帕彭也可以让这个党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副总理，以控制德国法西斯分子。帕彭刚刚尝试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合作，他称之为“所有国家力量的联合”。然而希特勒却通过信件断然拒绝。

1932年11月的德意志国^[2]是个令人担忧的国家。美国记者胡伯特·伦弗洛·克尼克博克写的书《德国，该走哪条路？》（*Deutschland. So oder so?*）于几个月前出版，已再版多次，他在书中这样写道：“500万布尔什维克掀起了俄国革命。在德国，估计有600万共产党（KPD）的选民。20万法西斯分子帮助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权。国家社会主义党阿道夫·希特勒背后可能站着1200万的选民。德意志共和国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个问题。即将到来的冬天将决定魏玛共和国的命运。

^[1] 下文简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如原著中简写为“Nazi”，则译文也对应译为“纳粹”（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Deutsches Reich是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名，此处指魏玛共和国。——编者注

大厦倾倒

1932年11月17日至12月1日

11月17日，星期四

垮台前的总理！

今天做出决定。

《抨击报》

帕彭提出辞职。

内阁全体辞职？——今日兴登堡演说。

《福斯日报》

德意志国主要由普鲁士自由邦主导，由首都柏林执掌权力。实际上权力就集中在几座建筑内，这几座建筑以其毗邻的街道来命名——“威廉大街”。

离开国会大厦（Reichstag），经过勃兰登堡门，在巴黎广场后面的阿德隆酒店（Hotel Adlon）右转，就来到威廉大街。经过英国使馆和农业部时，在右侧可以看到宫殿的建筑群，其中总理府（Reichskanzlei）的侧楼向前凸出，是一年前建造的，外墙呈浅灰色。

在街上看外墙有点儿不起眼，不过后面延伸着一片古老的大花园。地下通道将威廉大街西侧的建筑群连在一起，还有密道通向阁楼。大门与这些花园连在一起，如果愿意，人们可以从这里过去而不被发现。

就我们所知，内阁会议将在总理府的花园大厅举行，此次内阁会议关乎政府首脑弗朗茨·冯·帕彭的职业生涯，另外，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也在这次内阁会议中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朝西的落地窗使花园大厅在这个时候阳光非常充足。一个阳光明媚、凉爽宜人的秋日到来了。橡树、榆树和菩提树上，秋叶闪着光，当年腓特烈大帝在此散步时这里的很多树已经长得很高了。

朝着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大街的后墙上，象征普鲁士王国的陶制的雄鹰头顶着镀金的青铜冠，栩栩如生。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宰相，在这个房子里生活了28年。一些仆人的孩子非常喜欢在这里玩儿，他们说，在这些花园的某个地方，埋葬着俾斯麦忠实的獒犬，还有一匹骏马，1866年，这匹马在克尼格雷茨（Königgrätz）战场上把他拉了回来。18岁的保罗·冯·兴登堡作为普鲁士第三步兵近卫团的少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如今，兴登堡已经85岁了，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坦能堡包围战的指挥官，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直到今天他还靠着这一荣誉过活。他有着浓密的胡须，嘴角深深的皱纹，钢丝般的头发——安静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一座石碑。1925年以来，他担任总统，所有人都讨他欢心，讨这个老人的欢心。

今天早上，部长和国务秘书也到了花园大厅。



两天来，美国工会组织者亚伯拉罕·普洛特金逛遍了巴黎。他乘货轮从纽约到勒阿弗尔（Le Havre），是五名乘客之一，正如他所愿，也是他经济所能承受的，旅途并不豪华，是一次低调的旅行。他40岁了，因为经济危机，在家乡丢掉了纺织厂的工作。

他年轻时，全家从沙皇俄国移民到了美国。现在，普洛特金又返回了欧洲，只是身上多了几件衣服，还有手杖和打字机。

他到达不久后便开始写日记。普洛特金对知识如饥似渴，口才过人，他了解普通人的处境。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来法国而到欧洲的。五天后，他的旅程还要继续。

他的目的地是德国，他要在那里见证工人为争取权利进行斗争。他听说，在柏林街头左翼和右翼的激进分子正在互殴，已经死了人。这个首都城市吸引他，使他着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这本小说他已烂熟于心，现在，他想沉浸在作者所描述的令人震撼的环境中。他想见见妓女、小贩、乞丐和杂役。他想看看大家都在谈论的，令人恐惧又令人震撼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据说柏林体育馆中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有启发性，没有能与之媲美的。对其他游客来说，11月份并不是来柏林的最佳时间，因为一个月冬季将来临。

普洛特金才不管那么多，他打算向德国人学习。



已渐渐胖起来的50岁的国防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走进花园大厅。照片上，他看起来有点笨拙，笑容僵硬，但他的眼睛闪着光，炯炯有神。许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对他的外表并没有什么印象，但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他秃顶已经很久了，个子也不高，却

很能吸引女人。对施莱谢尔没什么好感的人，总爱讲述他花心的故事。他给已婚妇女送花，其中不乏颇有影响力的人妻。真是处处树敌。

在威廉大街，他获得了“顽固的单身汉”的称号，他知道如何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到了1931年，他和一个骑兵将军的女儿伊丽莎白·冯·海宁结了婚，这是一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女人。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来自军人家庭。他的曾祖父死于1815年的利尼战役（Schlacht von Ligny），也就是在滑铁卢攻陷拿破仑军队的前两天。库尔特的父亲也是个军人，他最后的职务是中校。

施莱谢尔也像总统兴登堡一样，从第三步兵近卫团开始其军事生涯，世纪之交时，他在那里遇到了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奥斯卡同时也是兴登堡的副官），还有现任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

施莱谢尔很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启了职业生涯。自1914年以来，他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组织、策划、指挥（以及结识）将军们，与他们打成一片，这些将军又反过来赏识他、提拔他。少将威廉·格罗纳成了他的导师和忘年交，他让施莱谢尔随心所欲，甚至越权行动。大战结束时，施莱谢尔最终服务于当时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之后也并未中断联系。

此后，施莱谢尔就在暗中处理政治和军事工作。他是部长事务办公室的领导，是最大的幕后操纵者。他会见了各党派的领袖，并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包括第一任总统、社民党（SPD）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施莱谢尔组建的“国防军部”

（Wehrmachtteilung）直接听命于他：在那里制定了防卫军政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作为国防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经常工作到深夜。他睡眠很少，天刚破晓，便骑马1个小时穿过蒂尔加滕公园（Tiergarten）。尽管如此，他还是精力充沛。他说话总是很急，魅力十足，随心所欲，总是人群中的焦点。

从来没有哪个德国公民在选举中将选票投给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但在这一年夏天，正是施莱谢尔将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的名字暗中给了兴登堡，对此无人提出异议。

今天上午11点整，他准时出现在花园大厅，出席内阁会议。



房子的主人是53岁的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他迟了几分钟。与会者说帕彭坐在桌子中间，对面是高高的窗子，这样他的目光可以投向花园。他的朋友施莱谢尔在他旁边坐下，6个月前，帕彭的职业生涯令人吃惊地突飞猛进，这要感谢施莱谢尔。6个月中，帕彭取代了施莱谢尔，成为总统最重要的顾问。6个月，足以使朋友变成敌人。



几步之遥，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在办公室里正对着一堆文件冥思苦想。伟大的俾斯麦，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者，肯定不会像他这么艰难。德国人在危机中彻底分裂，他们选出来的党派争权夺利，民族团结受到威胁。除他以外，没人能将德国多数人聚集在一起。只有他能拯救德国。

这一年6月初，他从要翻修的总统府（Reichspräsidentenpalais）搬出来——总统府中的家具必须用木块支撑起来，因为木地板好像都下沉了。自此以后，这个国家元首一直在总理府工作。

3个星期后，12月6日，又可以召开国会了，到那时也会清楚谁是新总理了。但兴登堡现在应该将谁确定为总理呢？通常情况下，他应该委任国会中最强大的党派的代表来组阁。那就应该是阿道夫·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元首”。希特勒正是4月时总统选举的对手。自8月末以来，这个政党第一次将赫尔曼·戈林立为国会议长，在国家最高职位中排名第三。这个党的议员经常打断别人的话，扰乱秩序，发起挑衅。有一次，在国会餐厅中，他们居然把一名左翼记者打得送到医院里——总的来说，真是让人厌恶的一群人。很难想象，这些人民代表会处理好国家事务。对兴登堡来说，最好是弗朗茨·冯·帕彭继续担任总理，他总是那么喜欢帕彭开朗的性格。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可以，尤其是考虑到他现在正掌管军队。有人说，施莱谢尔很刻薄，并且很难看透。不过兴登堡长期以来一直信赖这个冷静的人。

政治是棘手的，特别是对于一名忠诚的军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命令中不会产生妥协。民主是政治中最复杂的形式。但是无论兴登堡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得避免德国人民受到伤害。

当然，还有他百年后的声誉。



奥托·梅斯纳，兴登堡的国务秘书，此时也在花园大厅中。1920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总统办公室主任。他是阿尔萨斯一个邮局职员的孩子，52岁，能讲流利的法语和俄语。他有法学博士学位，刚开始是在铁路工作。一战中他升职为主管，1915年结识了兴登堡。

奥托·梅斯纳是个务实的人。1932年5月7日，他已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还有施莱谢尔将军一起会见了颇有影响力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阿道夫·希特勒。他们讨论了内阁怎样才能迫使顽固的总理海因里

希·布吕宁体面退位，以便给新人让出位置。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几个月后，八面玲珑的帕彭就已感受到同样的压力了。



半年前，卡尔·冯·奥西茨基被拘，奥西茨基是左翼知识分子周刊《世界舞台》的编辑，据说涉嫌泄密和叛国。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航空之风》（*Windiges aus der Luftfahrt*），写到了防卫军秘密军备升级。军方长期以来痛恨和平主义者，现在他们还击了。

奥西茨基受到背叛祖国的谴责，但毕竟军队违反了国家法律！他们的秘密武器，以及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行径甚至已成为国会的重大主题。《世界舞台》周刊中引用的所有文件、数据和事实从前都是公开的。能说是泄密吗？

无论如何，检察官针对他的第二次诉讼被撤销了。他手下最重要的作者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在《世界舞台》周刊中写道：“军人是杀人犯。”防卫军看到自己的荣誉受到伤害。

奥西茨基，43岁，监狱中饮食恶劣，还饱受禁烟之苦。在知识分子和左翼中，具有批判精神的奥西茨基就是司法牺牲品。5月份被捕时，许多作家护送他到了柏林泰格尔监狱。阿诺·茨威格也在，还有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埃里希·米萨姆和恩斯特·托勒尔。奥西茨基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他是有意进监狱的，是为8000名政治犯去示威的，“无名之士在监狱的黑暗中受苦”。他没有要求特权和特殊地位，他要“未被改造”地释放。

直到1933年11月10日，他才被释放，差不多过了整整一年。



今年6月份时，并没有人预计到弗朗茨·冯·帕彭会成为总理。现在他也没准备这么快引退。他来自中央党（Zentrums）右翼。他之所以能成为总理，是因为施莱谢尔认为他很容易控制。

实际上，这一天帕彭计划去曼海姆参加新莱茵大桥落成典礼，报纸上说，人们在符腾堡和巴登等待着总理的“访问”。一切都被取消了。昨天，保守的中央党领袖告诉帕彭，他们虽然“基本上同意国家集权政策的想法”，但他却不适合做这样一个联合政府的总理。他们谈到如果他继续留任，将会面临多方混乱的局面。最好他可以辞职。社会民主党人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根本没有被允许参与会谈。

帕彭意识到了这一切。当然中央党人都很愤怒，帕彭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现在中央党的人都觉得被帕彭背叛了。

在战争中，帕彭是皇帝忠诚的军官——在华盛顿是间谍和破坏者，是西线的指挥官和在土耳其的一名少校。之后他作为一名议员，代表中央党反动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如今，作为总理统治着他所鄙视的共和国，没人支持他。宪法改革浮现在帕彭眼前：国会瘫痪半年，然后向人民提交一部新宪法进行投票。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清除议会制令人生厌的弊端。

帕彭来自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18岁成为柏林皇家宫廷中的侍卫。他太太是瓷器制造商唯宝（Villeroy & Boch）的继承人。帕彭从未为钱犯过愁。嘲笑他的人称他为“绅士骑士”。不过柏林有很多马术爱好者。当帕彭骑着马，歪戴着帽子和领结，穿过蒂尔加滕时，可以看出来，他技艺高超。

他所寻求的宪法改革意味着回归君主制的第一步，或者说是回归独裁政府。这是帕彭的梦想。这将是一场政变。



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是美国驻柏林大使。他所面临的问题是，驻德使馆人丁稀少。华盛顿方面向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认为来自柏林的进展报告、分析及评估都太少了。

几星期前，他给国务院写信，说希特勒是“泰勒·巴纳姆^[1]以来最伟大的演员之一”，是马戏团老板之一，并称约瑟夫·戈培尔为希特勒的“巧舌少尉”。自1930年以来，萨克特一直被派驻柏林，这使他成为使馆的老将，使馆的外交人员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德国待过这么久，而且只有少数人掌握德语。预算削减在各个层面都有苗头。许多工作人员年轻，没有经验。情报活动根本不存在。简言之，最近在本德勒大街上落成的美国使馆很不称职。

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本人63岁。不得不说，他总是被人冒犯。他和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靠近中央党人是他立足的全部策略：帮助他们的政府，稳固德国经济，支持布吕宁反对极端政党的方针——这是他的信条。

可是自1932年6月以来，一切都不同了。布吕宁被排挤。他的继任者弗朗茨·冯·帕彭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帕彭是驻华盛顿的军事专员，为德国人秘密创建了间谍网。帕彭太放肆了，以至于被驱逐出境。如何应对帕彭？忽略他，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最近几个星期，萨克特在美国为他的朋友——总统赫伯特·C. 胡佛的选举耗尽精力，最终徒劳无功。他又回到柏林，努力在这些动荡的日子中找到头绪。国家社会主义党可能取得权力，单单这个想法就叫人不堪忍受。



为了不被迫辞职，帕彭需要的不仅仅是支持。帕彭在花园大厅中开始讲话。

帕彭说，总统必须再次去找党派领袖，为了“国家集权”政府而争取让他做总理，但是内阁不应该给人留下贪恋权力的印象。恰恰是国防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立刻表示赞同，他觉得只有通过整个内阁引退，才能清除弥漫全国的毒害。他说的是那些谣言——到现在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国家阵线，这是政府的错。这一次大家同意了。这里聚集着人们所说的“贵族内阁”。多数人名字里都有个“冯”（von）字，他们都来自贵族家庭。帕彭选择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他们中有令人尊敬的专业人士。

嗯，好吧，总理帕彭说。

显然他放弃了。

他说，他会告知总统，他的整个内阁都准备引退了。

沉默弥漫在屋子里。外面花园中，斜阳照耀在落叶上。没有一个部长反驳他们的政府首脑，施莱谢尔并没有表现出他很满意。帕彭早就在国内政治方面表现出自己其实是半瓶醋，根本没有能力打造联盟。

帕彭点点头。这就结束了吗？他这么快就失去最高职位了吗？



在大家所熟知的“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中，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卡尔·施密特，宪法学教授，为政府提供了咨询。

总统兴登堡于7月通过紧急法令废除普鲁士邦政府，他的知己，总理弗朗茨·冯·帕彭被任命为国家特派专员^[2]。社民党和共和国的壁垒被移除了。他的理由是：社民党并没有阻止共产党人的暴力，因此普鲁士的内部情况得不到控制。“阿尔托纳流血星期日”前不久，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共产党区域的游行导致18人死亡。警察疯狂地射击，他们必须为所有死去的人负责。

社民党并没有用武力抵挡帕彭的攻击，没有给他们的战斗联盟送去“国旗团的黑红金的旗子”，也没有像1920年“卡普政变”（Kapp-Putsch）时呼吁大罢工。他们站在国家这边——即使国家反对他们。德国社民党的斗争是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的。作为共和政体的忠诚拥护者，他们相信司法的独立性，这时，莱比锡法院正在对被废除的奥托·布朗的普鲁士政府提起诉讼。巴伐利亚自由邦和符腾堡邦也给共和国最高法官打电话。他们担心，下一个权力遭到挫败的就是他们。



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刻到来了吗？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元首”终于要掌握政权了。他最近给弗朗茨·冯·帕彭的回信中表述的不能再明确了：“唯一让我感到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在国家财富创造过程中，我对德国历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我却必须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财富在您——总理先生的糟糕治理下，一天天地被挥霍。”

希特勒就这样宣布了一个尚未开始的合作的终结。这是一个政党元首的语录，这个元首此时也以这种方式出场。也许并不果断，但是非常有信心。

事实上，在这段时日里，国家社会主义党让人们感到焦虑。在11月6日的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自1930年以来首次失去大量选民——200万！——高潮似乎已过去。沉重的财务问题困扰着这个党。竞选活动所需费用高昂，几个星期以来，希特勒每天乘飞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似乎无处不在。冲锋队成千上万人的游行也不是做样子的：冲锋队的酒馆、厨房和协会也花了大笔资金。银行不再放贷，工业赞助者也停止资助。组织内部，希特勒的对手格里高·斯特拉瑟也对他越发不满。斯特拉瑟提出一个实用路线，将国会党团的一些议员和党内的一些大区领袖聚集到自己这里。

最重要的柏林区的资金流动情况也令人沮丧——其领导人约瑟夫·戈培尔最近也收到下属提交的一份报告。“只有资金短缺、债务和义务，”他后来在日记中抱怨，“这次失败后，从哪儿都不可能筹措到那么大一笔钱。”

戈培尔又派冲锋队成员带着募捐袋（上面有小铃铛）走到大街上。就算是以乞丐身份登场，也总比不登场要好。但是如果这次不幸没有得到权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冬天就很可能失去动力、吸引力以及信誉，以失败告终。

11月18日，星期五

没有人民支持的总理放弃角逐。

帕彭政府即将引退？

《人民观察家报》

无产阶级的进攻轰散了帕彭内阁。

帕彭政府引退——施莱谢尔公开呼吁希特勒成为总理——劳动人民面临空前的危机。



组建新政府的谈判立即在上午晚些时候开始。保罗·冯·兴登堡努力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他称之为“从中央到纳粹的国家集权”。他先是在11点半时接见了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众所周知，胡根贝格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是很固执的，他是大工业家和乡绅^[3]的代言人。胡根贝格对阿道夫·希特勒提出严重质疑。

许多人嘲笑胡根贝格，漫画家总是喜欢把焦点对准他。可是他拥有权力，这一权力建立于印刷机和胶片之上。胡根贝格是欧洲最大的企业家之一，很多日报、杂志和电影制作公司都听命于他。他清楚地知道他对于公众舆论及政治的影响。成立一届将他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排除在外的右翼政府？目前还看不到这种苗头。

晚上6点钟，中央党人路德维希·卡斯来到总统面前。他曾建议由三到四个“勇敢的党派领袖”签订“忠诚条约”。希特勒好像也没有令他感到不安。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的爱德华·丁格蒂也在半小时后光临。丁格蒂说，总理的任命是出于总统先生的个人信任，他的政党将支持兴登堡的候选人。还有，他个人不会对重新委任帕彭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对于兴登堡来说，民主决策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925年，他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时，他的前皇帝威廉二世在流亡地荷兰给了他祝福。兴登堡从不是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但他充满爱国激情和责任感，他知道作为总统的责任，当然也知道他的权力。他没必要和每个人讲话。

他没有邀请社民党的人进行会谈。社民党成立快70年了，它成就了共和国，可是，这一过程中，所有人都与之为敌，特别是共产党人。1932年4月，该党支持兴登堡再次参选，以遏制其对手希特勒。不过社民党并没有得到老家伙的感谢，相反，“是谁选择了我？是社会主义选择了我，是天主教徒选择了我，”兴登堡曾向新闻官抱怨过，“我的人民并没有选择我。”他的人民——君主主义者、反对共和者、保守党——大多数都跑到希特勒那里去了。对于社民党支持者的声音总统感到特别尴尬。

前几天，总理曾邀请社民党就政府在国民议会的命运进行会谈，而社民党严正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这可能也让他生气。“我们不会去帕彭那里”，库尔特·舒马赫在一次社会民主党派的党团主席会议上宣布。



贝拉·弗洛姆，这个长着风骚的嘴巴和深色眉毛的女人，41岁，是《福斯日报》的记者。对于柏林那些与政治相关的，和在社会上想发挥作用或正在发挥作用的人来说，这份报纸是必读的。部长们读，议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军人、说客、外交官及他们的妻子也都读。

对于弗洛姆来说，做记者与其说是出于激情，不如说是迫于形势。她来自犹太上层富裕家庭，父母做葡萄酒的国际贸易，葡萄酒产自美因河地区和摩泽尔地区，生意经营得不错。他们把女儿送到柏林的一家音乐学校接受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贝拉结了婚，生了个女儿，名叫高妮，之后她的婚姻并不幸福。离婚？如果离婚，她必须证明丈夫有通奸行为——她做到了。她又一次结婚并再次分手。贝拉·弗洛姆只享受了短暂的自由，然后通货膨胀发生了。她继承的遗产缩水很多——尽管这些钱在此期间还够在柏林买一套别墅、一辆

跑车和两匹马。但是她需要有收入来源，她在首都属于一个较好的阶层，所以她开始写她的生活。从1928年起，她成为《福斯日报》的专栏作家，并成为柏林地方报纸“B. Z.”及乌尔施坦出版公司（Ullstein）的报纸的员工。

贝拉·弗洛姆在《福斯日报》的专栏“柏林外交官”（Berliner Diplomaten）特别受读者欢迎，她热衷于写外国大使、外交部工作人员及首都政客的无伤大雅的八卦。她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分析写进报纸，这些只被写在日记里。

将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纳入政府，并不会对政府造成什么损害，贝拉·弗洛姆认为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四天前，她在恺撒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与德意志帝国银行前行长亚尔马·沙赫特见面，当时沙赫特正要去找希特勒。“我想知道，他在那里要做什么，”她说，“对于体面的人来说，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在《福斯日报》中，她的读者是读不到这样的句子的。

为获得独家信息，她甚至毫不犹豫地当起了“间谍”。一年前，总统要求接见外交使团，媒体却并没有收到邀请，弗洛姆就女扮男装混在看客中溜进总统府，想要弄清楚谁是什么时候和谁一起来的，更重要的是，谁是什么时候和谁一起离开的。多数情况下，她并不需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因为外交部和总理府的先生们早就被她的魅力折服了。

常在恺撒霍夫酒店闲逛的人，随时都会得到信息。贝拉在熟人圈子里称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为“皇帝阿道夫”。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在这个豪华酒店的院子里时，她有时会在接待大厅里看着这一热闹场面。

就在不久前，她坚持待了好几个小时。一开始没什么事发生，希特勒总是让人等待。激动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期待着被接见，他们站在吧台旁，靠喝啤酒保持耐心。外国报社记者朝里看了看，徘徊了一个小时左右，就放弃了。

晚上8点，门终于开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们穿着褐色衬衫出现在酒店大厅。在弗洛姆看来，简直像是举办集市，因为人们都戴着各种颜色的袖标和徽章，有浅蓝的、亮红的、金黄的，还有一些鬼才知道的颜色。

穿褐色衬衫的人趾高气扬得像孔雀，弗洛姆想，幸亏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他们的裤子看起来裁剪得过于宽大，仿佛腿上长着翅膀。

一阵脚步声后，这些人站成一排，房间里满是嘟哝声，这时希特勒出现了。弗洛姆记录下了他脸上严肃好斗的表情，看到胳膊迅速向上，听到那些人雷鸣般的呼喊——“万岁”。贝拉·弗洛姆心想：“曼尼托”^[4]。

阿道夫·希特勒走进屋子，并没有左顾右盼，而是马上穿过侧门。

喧哗结束后，看热闹的人开始大笑，全都是外国人。弗洛姆想，他们有资格笑。

今天——今天人们又在柏林等待希特勒。恺撒霍夫酒店都已经在颤抖。



今年2月份，阿道夫·希特勒刚刚成为德国公民。他只要在柏林，就会下榻恺撒霍夫酒店。过去几个月，他经常在柏林：与政府代表秘密协商，拜访兴登堡，与随行人员开会。他在套房里接见高级别客人、记者及政治对手。酒店里有沉重的吊灯和石膏花纹装饰的墙壁，这个酒店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战斗中心，是个理想的基地，是一个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地方。威廉广场上这个建筑的迷人之处，在于有一个玻璃拱形餐厅，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美食。50年前，这个酒店刚刚开业时，就提供了各种便利：气动电梯，230个房间都有暖气。位置简直无与伦比，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威廉大街77号。

阿道夫·希特勒只要从恺撒霍夫出来，走到入口前的柱子之间，总理府就近在咫尺了。



莱比锡第五刑事法院判处三名共产党人监禁。指控书上说，他们严重叛国，违反《爆炸物法》和《枪支及军备法》。一个31岁的木匠被判监禁6年，并被剥夺公民权10年——这意味着被剥夺选举权；两名建筑工人，一名25岁，一名28岁，都被判监禁3年。警察在这些人那里发现了65公斤炸药、步枪、手枪和弹药。法官认为他们有进行袭击的打算。

在卡塞尔附近的霍夫盖斯马尔（Hofgeismar），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法庭上受审。他们组装了一辆有防弹板和射击孔的坦克，警察在8月1日夜里将其没收。被告在法庭上说，他们想用坦克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防止共产党人的袭击。检察官提请向冲锋队成员征收50~200马克的罚款。



哈利·凯斯勒伯爵，前任外交官，现为艺术品收藏家，也是个知识分子。对他来说，今天是开心的一天。帕彭终于辞职了。这个永远微笑着的、轻浮的半瓶醋在这半年内引发了太多的灾难，比他任何一个前任都要多。最糟糕的也许是他让战争英雄兴登堡出了丑。几个月前，凯斯勒写道，帕彭看起来像“迷途的山羊，穿着丝绸内里的黑礼拜服，试图做出一种姿态。真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人物”。

凯斯勒是国旗团（Reichsbanner）^[5]成员，也是社民党保护协会会员。11月的选举中，每五个德国选民中就有一个选了社会民主党，凯斯勒也投了社民党的票。毕竟社民党是最后努力保卫共和国的政党之一。



贝拉·弗洛姆也不会去缅怀众叛亲离的总理。帕彭首先代表国家东部大地主的利益，这些日子里，大地主们都想夺取权力，而贝拉认为他们都“低估了这场激进的运动”。她指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

两个月前，贝拉还与施莱谢尔和帕彭在赛马场度过了一个星期日。当她和施莱谢尔以及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站在一起时，帕彭也走过来。帕彭吻了她的手，他真是帅极了。“贝拉夫人，为您的报纸来个合影，岂不是个好主意？”他问道。弗洛姆暗自想道，他这样只是为了让人们认为他和国防部部长关系一直很好。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作秀，这两个人关系早就疏远了。



海尔曼广场地铁站旁卡尔斯达特商场的食品部，今年11月18日，1磅黄油1.44马克，1磅五花肉64芬尼，1升埃登科本（Edenkoben）^[6]的葡萄酒60芬尼——这还是在买10升的前提下。

一个工人每月平均收入为164马克。



“这就是他们每天的生活”——共产党人在柏林街头散发的传单上这样写道。“希特勒在恺撒霍夫酒店的账单：一顿早餐23马克——乘以12就是276马克！房间28890马克！你们必须得挨饿！”

这是宣传还是真相？至少在1931年底，三个晚上，七个房间，包括饮食和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才支付了650.86马克。这是事实。不管怎样，恺撒霍夫酒店确实是首都最昂贵的酒店之一。

然而，希特勒经常避开恺撒霍夫主厨声名远扬的饭菜，这也是真的。没人知道谁会策划阴谋。此外，他还有更好的选择。玛格达·戈培尔，约瑟夫·戈培尔的妻子，厨艺精湛。她做素食，正如她的“元首”所爱。戈培尔家住在夏洛滕堡区，在德国体育场方向，开车几分钟就到。他们的公寓墙很高，空间很大。玛格达是带着这个公寓结婚的。她的前夫，百万富翁君特·宽特为她付的钱。客厅里有一架三角钢琴。

帝国总理广场2号，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很引人注目。



约瑟夫·戈培尔，35岁，身材瘦小，上身纤瘦，头很大，棕色眼睛，黑头发。由于儿时患骨髓炎，他一只脚畸形，走路一瘸一拐。他的政敌嘲笑他是“微缩日耳曼人”。但在讲坛上，他却迸发出力量，是个煽动者，在柏林为国家社会主义党赢得了数千名支持者。1928年11月，他在首都接管了一群完全不和睦的乌合之众。现在他却控制了大柏林区。

不少柏林人害怕这个人，他太激进，不择手段，而且狡猾。他的政敌却鄙视他。戈培尔野心勃勃到病态，他是个自大狂、工作狂，极度渴望被认可。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得到一个人的青睐：阿道夫·希特勒。他将全力配合希特勒的崛起。有朝一日，只要“元首”成为全德国人的元首，他的才华也会被映照得熠熠生辉。希特勒？“神话般的人！”戈培尔在1932年11月写道，“为了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希望希特勒和兴登堡最终会再次面对面，互相握手，凝视对方，相互信任。据称，兴登堡称希特勒为“波西米亚的下等兵”。

1点钟，一架从慕尼黑飞来的专机在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着陆。机上乘客是阿道夫·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国会党团中的领导人威廉·弗瑞克，党的组织领袖（Organisationsleiter）^[7]格里高·斯特拉瑟，还有主管外国媒体的恩斯特·汉夫斯坦格。他们是来谈政权交接的。希特勒让司机从机场开到戈培尔家里。戈培尔将告诉他的客人们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

问题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这个暗自怂恿兴登堡的人，有什么打算。汉夫斯坦格在和说英语的线人交谈时，只称这个国防部部长为“爬虫先生”。但这听起来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一个古怪的名字。噢，汉夫斯坦格是一个文化人，一位有名的艺术品商人的继承者，他的钢琴演奏让人充满喜悦，尽管有些粗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把瓦格纳的歌剧那样砸在琴键上，并触动希特勒的内心。



在奥地利出生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一年里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德国公民身份？没有这一身份，他根本无法参加总统选举。在德国有不少人提出质疑，社民党的国会议员奥斯卡·蒂勒曼也想知道。

官方理由是：不伦瑞克自由邦授予希特勒行政专员身份，并由于他的“卓越服务”授予他公民身份。卓越服务？什么服务呢？蒂勒曼向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的内政部提出质问：“到目前为止，行政专员希特勒给不伦瑞克的经济做了什么，迄今为止，他究竟为不伦瑞克做了哪些工作？”

昨天这一问题有了回答：“根据内政部部长的消息，行政专员希特勒先生作为不伦瑞克内政部部长先生的特别顾问，就下哈尔茨（Unterharz）的采矿业问题提供了卓越服务。”

希特勒，矿业专家？这可能不只让社民党议员吃惊吧。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谜。他想通过记录来探究自己的动力，想知道自己在欧洲要寻找什么。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家人就逃离俄国“沙皇的黑暗暴政”，来到美国。“现在我又回去了。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为了逃脱我们国家城市里的麻木不仁，”还有，“要是我以后弄清楚真相，也许会觉得自己很蠢。弄清真相前，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傻瓜。”



午夜时分，希特勒回到帝国总理广场的公寓。戈培尔夫妇正在等他。他很高兴，讲了些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政府将于明天再次宣布“城内和平”^[8]，到1月2日之前都不应出什么乱子，不得游行，不得大规模露天集会。格里高·斯特拉瑟已令“元首”讨厌——最近希特勒总是带着蔑视来谈这位党的组织领袖。可是担忧足够多了，该来点音乐了。毕竟客厅里还有一架三角钢琴，不能白白浪费——而戈培尔

喜欢拉手风琴。他注意到，在耗神的斗争后，音乐是唯一可以使希特勒放松的东西。

11月19日，星期六

今天希特勒去兴登堡那里。

《福斯日报》

帕彭引退之后：没有犹豫！历史时刻的要求。

《人民观察家报》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宣言。

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独裁！

《红旗报》



组建政府的谈判是以严肃而孜孜不倦的态度进行的，尽管兴登堡已经85岁了。总统访客名单上今天有个他很不愿意接见的客人。阿道夫·希特勒向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请求与兴登堡密谈。梅斯纳是总统最重要的工作人员。他们同意严守秘密。

11点半，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如约出现。总统明确向希特勒表示：他会坚守一个超越党派的、中立的政府原则。如果由希特勒来领导政府，那就是党政府了。希特勒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个由中立者领导的政府中达到目的。兴登堡愿意给他的政党提供几个部长职位。

希特勒带着很高的期望到来，这时正努力隐藏起他的愤怒。他只有取得政治领导地位才可以进入内阁。希特勒威胁道：“当然，在一

段时间内，我们还可以用超越党派的内阁来实行独裁统治，内阁也会得到国家机器的支持。可是这不会坚持太久，到2月就会有一场新的革命，到那时，德国将不会再有独立的外交政策了。”

但总统拒绝了。

这时兴登堡控制住自己，他面前坐着的毕竟是个总理候选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会谈并不像约好的那样持续15分钟，而是25分钟。其实这不过是他们俩的第四次私人会谈。梅斯纳记住了这些，实际上梅斯纳记住了一切。后来兴登堡告诉了他会谈的每个转折点。

之后希特勒把建议摆到桌面上，说兴登堡可以通过一部《授权法》。这是几年前自由派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所证实可行的、合法的一着，这是为了使执政的总理在没有多数人支持的情况下也能继续全权执政，并使总统从日常的政治琐事中脱身。但也意味着有可能解散国会。当然，施特雷泽曼1923年当政时，正值鲁尔地区抵抗法国人，还有恶性通货膨胀，可是，那时和今天相似的是，也有由左翼和右翼引起的严重内乱。

一部《授权法》。这也许会是个出路。



快到中午12点半时，希特勒离开总理府上了车。威廉大街入口前聚集了很多人。这些人突破警察包围，挤到大门口，他们迟疑地站在两边，中间空着。希特勒的车只能以步行速度往前开。人们在恺撒霍夫酒店前欢呼。“万岁，希特勒！”人们呼喊，特别是那些穿着褐色衬衫的人。

希特勒没有站在他们面前，他没什么可宣布的，快速走进酒店，将充满希望和有些不耐烦的低语留在身后。只一会儿，他们的“元

首”就在窗口出现了。



下午5点钟，巴伐利亚人民党（Bayerische Volkspartei）的弗里茨·舍费尔出现在威廉大街77号的总统府。他认为希特勒没有他周围的那些人那么危险，这个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谢谢，兴登堡说着又继续陷入沉思。

每个党派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很难估计的个人恩怨，以及所涉及的人的从属关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才能使德国人和解，不让他们分裂呢？人民团结一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2点钟，在泰尔托大街的议会厅里，柏林—勃兰登堡—劳塞茨—格伦茨马克区的第19届共产党区域党代会正在召开。100多万共产党选民生活在这里，这是德国最重要的党区。约有800个代表到会。共产党人是自信的。威廉大街正处于动荡中，这反倒使选民都跑到他们那边了。

今天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政治局势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做报告。在柏林运输公司大罢工期间，瓦尔特·乌布利希与约瑟夫·戈培尔一起于11月初接管了大罢工。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大会上警告大家注意国家社会主义党。

但实际上共产党主要关心的一个敌人是社民党，是那些背叛了真正社会主义方向的同志——至少从宣传上看，共产党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领导坚决与社民党为敌，而不是与纳粹为敌，这一点并不是党内所有人都能明白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本不能自由决定如何与社

民党打交道。这一战略是由莫斯科决定的，而莫斯科的战略却是首先让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德国接管政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预言了吗，说这一行动会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只要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德国，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跑到共产党这边。

这就是计划。

苏联的同志们认真听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公开讲话了吗？一朝大权在握，国家社会主义党就会想永远掌握政权，并消灭马克思主义。



威廉大街上兴登堡的办公室里收到一封信。并非所有德国经济界领军人物都在上面签了名，不过还是有不少人签了名。“尊敬的阁下，最尊贵的总统先生！像阁下一样，我们沉浸在对祖国和人民的温暖之爱中，阁下在国家事务的领导中力求根本转变，我们带着深切的期待迎接了这一转变。”这封信的签署人之一是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他在莱茵兰地区非常有影响力。

关于希特勒，他还有很多计划。集团领导人弗里茨·蒂森、爱尔兰·默克，还有前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也写了同样论调的信。他们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原则上”是认可兴登堡的政策。

“总理内阁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从主观上看，都是由最专业的人组成的，总理内阁的领导权将被转移到最高的国家集团元首手中。这将消除历次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今天上百万被边缘化的人，最终会得到重新鼓舞。”

看到这些信，兴登堡非常震撼。尤其是爱伯哈特·冯·卡克奥特伯爵也签了名，他是“德国农业协会”的会长，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地主之一。

企业家们并没有详细提及“缺点和错误”。



民族保守主义者议员莱恩霍尔德·乔治·库阿茨很紧张。如果希特勒和国防部部长施莱谢尔串通一气，他们就有可能在国会中成为多数，从而得到总统的好感。德国国家人民党人库阿茨写道：“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所有的人都在说施莱谢尔，施莱谢尔，施莱谢尔。库阿茨对这位军人并不在意。施莱谢尔到底能否顽强地将一个伟大的计划进行到底？库阿茨听说施莱谢尔生病了。

您认为怎么样？不久前他问国务秘书梅斯纳，施莱谢尔会成为总理吗？梅斯纳和库阿茨彼此很了解，也很坦诚。

“施莱谢尔的意图总不是很清楚”，总统的顾问梅斯纳这样回答。他本人很排斥将此人任命为总理，可是他这样想并没什么用，因为兴登堡想保留这个将军以建立一个军事政权。



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拜访了总统。哈利·凯斯勒伯爵这个晚上已听了太多的讨论。乔治·本哈德是乌尔施坦出版社的领军人物，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反对者。他召集了晚宴。受本哈德邀请出席的还有：海因里希·曼，他在《臣民》（*Untertan*）中以独特的方式与普鲁士军国主义做了清算；沃夫冈·胡克，报纸发行商，柏林最大的纳税人；汉斯·舍费尔（Hans Schäffer），今年年初还在财政部担任国务秘书，负责国家预算，现任乌尔施坦出版社负责人；本哈德·卫斯，柏林前警察局局长，被帕彭驱赶下台。还有鲁道夫·希法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在两届由社民党领导的政府中担

任财政部部长。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家、政治评论家及外交人员也参加了晚宴。很有名望的一群人，能获取很多新闻——而且通常都能准确地预感到其他信息。

但即使在这里，凯斯勒也并没有真正了解到目前兴登堡那儿怎样了。连传言都没有。胡克说，兴登堡和希特勒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完全不像从前的会面。本哈德宣布：帕彭的引退只是个花招！他会再回来的。很多人认为总罢工是不可避免的，应该由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接管权力。

可是现在谁当总理？

那个漫长的夜晚的尽头，凯斯勒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人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听任偶然性以及四五个人的心情所摆布。”

兴登堡、梅斯纳、施莱谢尔、希特勒——还有帕彭？哈利·凯斯勒伯爵还想到别人了吗？无论如何，这与透明的民主决策没有半点关系。



午夜时分，约瑟夫·戈培尔出现在柏林冲锋队领导面前，冲锋队召集了“同志友谊之夜”，可是并没有什么同志友谊。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党的战士们终于想要上台了。戈培尔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渴望靠自己的忠诚而获得职位和奖赏。长久以来，他们不怕牺牲，勇于献身，为了“元首”被打得住进了医院，或是把对手打得住进了医院。对他们来说，因为希特勒看起来离总理职位还有一步之遥，这年8月也是带着苦涩的失望结束了。

但现在必须要搞定一切，希特勒最终一定要当总理。快承受不了这种绷紧的神经的，不仅仅是冲锋队。

“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戈培尔这样说道。

11月20日，星期日

帕彭的遗产：

社民党——面临政治大规模罢工的威胁——共产党加强内战的煽动。

《人民观察家报》

也就是说：红色墙壁越来越高，越来越宽。

第一个人已经撞破了头！

现在请第二个上来吧！

《红旗报》



死亡星期日。这一天是纪念死者的日子。各家各户都去扫墓。专栏作家阿尔弗雷德·克尔曾经这样描写这一天笼罩在德国首都的气氛：

柏林墓地根本不像墓地，更像是专门处置躯体的地方，那些躯体毫无生气……

城市中的墓地既乏味又冷清，火车在铁轨上呼啸而过，墓地对面是些小酒馆。

死亡星期日这一天，所有人都走到公墓：寡妇、儿子、新娘、女儿、母亲。他们带着鲜花。

柏林的观念：先扫墓。几乎纤尘不染……然后再进行真正的哀悼。

在这里扫墓，就是心灵的集会。

死亡星期日。有些人纪念他们失去的人——虽然肉体还在，却似行尸走肉。



星期日，休息日，安静的私人谈话的日子。但柏林目前不知道什么是安静。

中午时分，国务秘书梅斯纳来到恺撒霍夫酒店，他来拜访希特勒，安排第二天与总统的一个新的会谈。

许多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终于嗅到时机。约瑟夫·戈培尔对总理府发生的事却很冷淡。总统真的想把政权转移到希特勒那里吗——或者他只是努力把这个党拉进政府中，来破坏它的活力？“所有人对施莱谢尔都有猜疑”，他在日记中记录道。他警告道，不要太乐观，不要过于相信。

兴登堡也许希望希特勒会顺从。但戈培尔知道，他的“元首”会坚定不移。

他还推测，施莱谢尔将军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其他领导人秘密会谈。施莱谢尔的目标非常明确：分裂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左翼的格里高·斯特拉瑟，党内第二强者，正进行他的“不得已的背叛”计划，正如戈培尔所说的那样。大区领袖中约一半都在斯特拉瑟这一边，他们反对希特勒的“全或无的战略”，他们想要妥协，想要权力的一个边角，立刻，马上就要。如果斯特拉瑟寻求冲突，这些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四处都是流言蜚语。

国会所有党派或沆瀣一气，或想尽花招。中央党表示，他们可以和希特勒总理共存。德国国家人民党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次国家社会主义党会谈的邀请。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跟其他党派领袖磋商时，戈培尔正前往恺撒霍夫酒店，为希特勒及其随从提供咨询。“元首在这里运筹帷幄，”他写道，“元首在这里进行权力的博弈。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战争，但是这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也让人感到刺激。”

哪条路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呢？几个月前，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合法？跟中央党？恶心！呸！”

希特勒无论如何都会将谈判落实到纸面上，这一点戈培尔很确定，没有不必要的情感，没有鲁莽的言论，每个细节都字斟句酌。



担任法国驻柏林大使，在经济危机前已经是一个挑战，但现在政局格外令人费解。《凡尔赛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距离现在已13年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话题能这样激起人们的情绪：失去的领土如阿尔萨斯，所有殖民地的丧失，战争罪行问题，还有对法国的高额赔款。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从小就对德国人很熟悉，他在奥芬堡上学，后来学了日耳曼语言文学，在与德国人的战争中负了伤。他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德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防止一场新的战争的发生。他想要一种“权宜的妥协”，一种暂时的一致，在这种基础上，两国能持久地和平共处。

他现在已任职一年多了。他家是个迎来送往及举办派对的地方，他娇小的妻子已赢得“柏林最著名女主人”的声誉，记者贝拉·弗洛姆也这样认为。弗朗索瓦-庞赛双鬓斑白，他的脑后头发稀疏，毕竟他也四十几岁了。他很注重优雅的形象，唇上胡须的末梢卷得很精致。

他是当天晚上听到帕彭引退的消息的。这个大使从来没有真正欣赏过帕彭，他有一次写道，这个人“肤浅、好斗、虚伪、野心勃勃、爱慕虚荣、诡计多端、工于心计”。帕彭说自己是法国人的朋友，但是弗朗索瓦-庞赛确信，帕彭渴望看到德国军队复仇并胜利攻占巴黎的那一刻。

还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就弗朗索瓦-庞赛所知，施莱谢尔周围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尤其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是个高超的阴谋家。防卫军之所以不喜欢他，是因为他并不是在前线或军营中戎马倥偬，而只是一个坐办公室的。国防部部长是怎样上台的，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大使这样写道：“秃头，头盖骨上精光，分外苍白，他的表情就像面具一样，面具上两只眼睛闪着寒光；臃肿的脸上，轮廓不是很清晰，几乎看不见的窄窄的嘴唇。这些对他都很不利。但有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特点：漂亮的手。”施莱谢尔说话很生硬，不会拐弯抹角，但是在谈话中却展示出风趣的嘲讽。啊，对了，还有一点：“他很爱笑，而且声音很大。”

11月21日，星期一

兴登堡交给希特勒的任务：

确定是否有可靠能干的多数人支持希特勒内阁——希特勒将于下午书面回复。

《福斯日报》

希特勒又到了兴登堡处。

《抨击报》



警察早上在恺撒霍夫酒店前戒备。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队员已经到了那里，他们很不安。要向希特勒欢呼的人们期待着希特勒不久就能达到目的。

他的豪华轿车已在外面等候。见总统其实只有一百步的路，但希特勒还是让人开车过去，他像他所梦想的政治家那样，从路的另外一边下了车。



涉及权力问题的时候，口头说出来的话是不算数的。必须宣读文书，进行书面交流。这是1932年8月13日的教训。当时希特勒错误地认为他已经达到要当总理的目的，到头来才发现兴登堡很显然在最后一刻没有支持他，尽管他周围的人都口头对他说，兴登堡是支持他的。他坚信这是个阴谋。谁隐藏在后面？帕彭？施莱谢尔？这些人，希特勒一个都不信任。字斟句酌的措辞才是首选。

在10点半开始的会见中，兴登堡对希特勒说，他应该到星期四晚上确定，“您领导的政府是否有可靠能干的多数人，并在国会中有坚定统一的工作计划，如果有的话，是在哪种条件下”。希特勒在开始会谈前已把答案以书面形式递交给了兴登堡。

“我只向阁下提出一个请求，”希特勒写道，“请至少给我与前面那些人同等的威信和地位，那些人只会辱没阁下巨大的威信以及名誉，却没有像我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我将自己的名字和这场最大的德国运动的生死存亡作为筹码，如果行动失败，我和这场运动都将毁灭。但是，总统先生，我们现在面临的并不是军事独裁，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混乱局面。”

这有作用吗？的确很多德国人害怕共产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希特勒也得到了兴登堡的书面委托——从现在开始，有80个小时的思考时间。



在泰格尔监狱，卡尔·冯·奥西茨基在律师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了字。这个《世界舞台》的主编多次被起诉，这次是因为针对烟草集团利姆茨玛（Reemtsma）的一系列批评文章，文章中可以读到行贿受贿的内幕，以及财政部与工业集团之间的裙带关系。现在要进行针对诽谤罪的调解。奥西茨基也负责《世界舞台》的时事评论。几个月之内，他要为自己进行第三次辩护，并且第二次成为阶下囚。

这真是让人伤脑筋，怎么办呢？有两篇关于利姆茨玛裙带关系的文章，是奥西茨基自己放到报上的，他称自己与这两篇文章无关。他是因为战斗而疲惫了吗？“长久看来，厚厚的墙壁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不久前，他给流亡的朋友库尔特·图霍夫斯基这样写道。



国防部部长施莱谢尔还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的前任，也是老领导和导师威廉·格勒纳不想再与施莱谢尔谈话。好吧，格勒纳的辞职一部分是由于施莱谢尔的阴谋。谣言暗中传播着，说格勒纳老朽了，施莱谢尔也未能消除这一谣言——也许这些谣言就是他周围的人散布的。政治就是这样，有必要如此苦闷吗？

今天施莱谢尔想出了新办法来挽救旧日的友情，明天格勒纳65岁了，他以国防部的名义，也完全以个人的名义来祝贺格勒纳“尊贵的阁下”65岁生日快乐。

“尊敬的阁下，”他写道，“我希望您的生日将会带来我期待已久的谈话，我认为，我至少有权利了解一下，有哪些未知的原因使我们疏远。”

施莱谢尔的这封信能否改变什么？格勒纳比任何人都了解施莱谢尔。1932年5月底——他辞任国防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后快3个星期的时候——他在给一位知己的信中解释了施莱谢尔的动机：“他并不想帮助纳粹取得权力，他自己在努力争取权力，并且是通过兴登堡来达到目的，他利用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兴登堡的儿子——给兴登堡以巨大的影响。梅斯纳只关心自己的职位，他是施莱谢尔心甘情愿的帮手。”

格勒纳又接着写道：“施莱谢尔早就梦想没有国会，而是借助防卫军的帮助来统治。他的计划当然不会再告诉我，但是他的计划真是让人捉摸不透，也许纳粹确实比他精明多了。”

不久后，1932年6月18日，布吕宁内阁倒台以及他自己下台两个多星期后，格勒纳又给同一个朋友写道：“回顾最近的事态发展，施莱谢尔越来越像个谜。大约10个星期前，在俄国使馆的一次宴会上，他告诉一些德国客人（国务秘书舍费尔可以作证）：防卫军绝不容许纳粹取得政权，那边还有个人（哈玛施坦因）将用全力阻止纳粹夺取政权。他可能是在装腔作势。”

哈玛施坦因，这里指的是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是陆军总司令，关于他，格勒纳在另外一处写道：“哈玛施坦因就像训练有素的猎犬一样跟着他的朋友施莱谢尔。”



四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袭击了腓特烈大街的一个报刊经销商，这个经销商受国旗团之托出售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这个29岁的人头部被打成重伤。警察赶到那里时，袭击者已逃走。



这可真是考验神经。兴登堡还不想正视总统独裁这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们重新回到了恺撒霍夫酒店的五层来进行咨询。格里高·斯特拉瑟鼓起勇气站出来：必须要和德国国家人民党谈判，是结盟的时候了！

希特勒断然拒绝了。他不会妥协的，永远不会。外面追随者的呼喊声一直向上传播，传到酒店最高层，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都坐在那儿。

“希特勒万岁！”他们呼喊着。

街上的人们热切地期盼着，好像这一运动马上就要达到目的。党内不少人都确信希特勒已经是国家总理了。

“可怜的幻想家们！”戈培尔想，“希特勒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距离目标如此之远。”

原则上计划还是成功的。街头的压力越来越大，冲锋队来了，共产党也如预料的那样喧闹起来。这一切都非常有利。总会有办法来对付老家伙的反对吧？

11月22日，星期二

最高警报！

兴登堡给希特勒的任务——

希特勒对冲锋队下达的恐怖命令。德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准备战斗！

《红旗报》

希特勒迟疑不定。

《柏林日报》

无论是通过左翼还是右翼，只有新制度稳定下来，国家危机才会结束。在此之前，每个政府的组建都有权宜之计的色彩。

《世界舞台》



美国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在夜里坐火车从巴黎到了柏林。三等车厢的木椅子使他不得安宁，一直合不上眼睛。在法国完全不同，那里即使便宜车厢也有软座椅。德国铁路的木凳太硬了，他屁股一会儿就开始痛起来，而且太滑，整个旅途他都没有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早上7点钟，普洛特金下车时，他揉揉眼睛，试图驱赶疲惫。铅灰色的光笼罩在城市上方。四处都是骑着自行车上班的人。警察盯着他。一些乞丐躺在人行道上，但是普洛特金很奇怪：与家乡纽约或旧金山相比，这里的乞丐少得多，德国不也遭受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吗？普洛特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想遇到友好的工会会员，因为他想看看，一个福利国家国库空空是怎么运转的。显然它还在运转。

城市还在沉睡，商店关着门。他放下行李开始走路，不知什么时候，他来到勃兰登堡门前，然后到了菩提树下大街。下雨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天开始亮起来，路灯还亮着，宽阔的街道上弥漫着晨雾。光对他来说非常不真实，树和建筑都沉浸在一种奇怪的光晕里。

普洛特金决定去阿德隆酒店。他知道，政治之城柏林的核心正活跃在周围。不过他还不可能搞清楚，几百米之外的威廉大街上，现在正在进行哪一回合。

倦意席卷了他。普洛特金带着他的便携式打字机走进阿德隆酒店的咖啡厅，这台打字机使他看起来像个很忙碌的作家，不过他还没有点咖啡，没有写一行字，就闭上眼睛睡着了。在阿德隆酒店的扶手椅上，他睡得很沉，没人能叫得醒他。



许多柏林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党最近的英雄行为感到惊叹。为如期参加最近关于政府组建的会谈，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取消了与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会晤。戈林特地乘飞机从罗马飞到威尼斯，Ju 52运输机在那里等着他，希特勒在夏天时乘坐这架飞机进行了传奇的竞选之旅。路上，戈林这个歼击机飞行员自己来开飞机。至少之后他是这么说的。

从罗马到柏林用时还不到6个小时！毫无疑问，他创造了一个新纪录。一战中，戈林在西线赢得了蓝马克斯勋章（Pour le Mérite），最高的勇者荣誉。一个王牌飞行员。



柏林《12点杂志》（*12-Uhr-Blatt*）的标题：“如果希特勒失败了……梅斯纳总理？”

不过，报纸又接着写，梅斯纳根本就不需要这一提名，因为他“在这个国务秘书的职位上对于国家事务的影响根本一点都不小”。正如柏林的记者们所说，梅斯纳属于“国王私人内阁”，就是给保罗

·冯·兴登堡提供咨询的一小圈子人，或者说是操纵兴登堡，至少评论家是这么认为的。

以政治运动观察家的角度看，梅斯纳既令人害怕，又不可或缺——忠于他的上司，尽职尽责，了解一切，建立最佳关系网，并没有明显的个人意图。他是权力总管，宪法法律的专家。

梅斯纳是个习惯明哲保身的人。他眼镜后面的眼睛非常警惕。灰白色的小胡子覆盖着薄薄的、向内抿着的嘴唇。嘴角向下垂。他的头向后仰，像拳击手一样等着对手出击。他的西装口袋里总是装着胸袋帕，看起来总是小一号，领结紧紧地系在脖子处。当他吃自助餐拿龙虾的时候，平时一直被隐藏的贪欲，就会突然迸发出来。对此，人们会觉得非常惊讶。

今天，在柏林，奥托·梅斯纳也是建议总统让希特勒做总理的人之一。这或许也是那些谣言之一。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最近起草的一封信中支持了梅斯纳，在措辞方面起了辅助作用。这封信是写给希特勒的。

这又是一个事实。



《12点杂志》也在梅斯纳家的桌子上。一个仆人早些时候因为杂志上的标题，从阿德隆酒店的角落拿回来了这份报纸。女主人希尔德加德·梅斯纳读报时脸色苍白。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不要这样，”国务秘书的太太小声说，“亲爱的上帝，请宽恕我们！”



国务秘书梅斯纳的另外一封信抵达恺撒霍夫酒店。希特勒应该寻求联盟伙伴，这一措辞无疑比“离权力远点儿”更礼貌。

希特勒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戈培尔也非常激动。

为了放松，两人晚上去了柏林国立歌剧院。演出的是《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这部作品振奋起压抑的心情。后来，最后一幕之后很久，戈培尔写道：“乐团演奏得前所未有的精彩，且有些压抑。瓦格纳永恒的音乐又给了我们新的力量和张力。大合唱《醒来！》（*Wacht auf!*）使我们胸怀非常开阔。”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在腓特烈大街和多萝西大街之间的角落里找到一个栖身之地。房间每个晚上2.5马克。他给社民党日报《前进报》打了电话，得到了拉法埃·阿布拉姆维奇（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电话号码。这是他以前在美国认识的一个俄国人，这个人被流放，生活在柏林，属于在1917年与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的孟什维克。从那以后，像拉法埃·阿布拉姆维奇这样的人在俄国被威胁、迫害、关押，有些甚至被谋杀。电话那边，拉法埃·阿布拉姆维奇的声音非常友好，几乎是热情洋溢。他问，普洛特金是否从美国带来了什么新闻？

普洛特金说，当然，而且他非常渴望了解德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马上约定第二天见面。

后来普洛特金漫步走过腓特烈大街。很难相信，大多数人都穿得非常得体。他听说目前德国6000万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依靠国家支持来生活。国家怎样支撑呢？普洛特金被深深地触动。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区域，他今晚目之所及，没有贫困的迹象。

11月23日，星期三

希特勒今天才做出回答；

看来会拒绝政府的任务。

《福斯日报》

总统原则或议会多数；

总统给希特勒的任务中的不明确之处；

元首首先希望解决矛盾。

《人民观察家报》



格拉德巴赫-瑞德（Gladbach-Rheydt）的特别法庭判处一名国旗团成员10年监禁。该成员与社民党组织其他同伙一起在街上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打了起来。他用一根棍子击打对方其中一人，并向他扔石头。他是按照新的《恐怖紧急条例》（Terrornotverordnung）被判决的，事实上该事件发生时，新条例并未生效。



国防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与希特勒会晤。总统要求这位对他很谦卑的将军在祖国意义的层面上探索合作的机会，而且是口头的。

施莱谢尔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如果他削弱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计划落空，也许前者至少可以为他所用。“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就把他们杜撰出来”，他在3月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他所指的是国家社会

主义党人。他继续说，他们的存在会阻止共产党人诱惑更多失业的、愤怒的年轻人。

这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军队“冲锋队”大概有44.5万人。涉及国防问题，将这一军队融入防卫军，对于这个将军来说是非常紧迫并有吸引力的一个想法。《凡尔赛条约》使得防卫军至今依然非常薄弱，不能在战争中保卫国家——更不用说向敌人进攻了。德国有10万陆军，1.5万海军。秘密武器计划确实已进行了一些年，但防卫军离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还差得很远。

希特勒先生，施莱谢尔问道，您愿意进入一个我自己作为总理领导的内阁吗？

大约一年前，两人第一次会面。之后施莱谢尔这样评价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一个有趣的人，有杰出的演讲才华。他的计划常常不容易理解，他说的大家一开始还都明白，但一会儿就不懂了，大家就得把他又拉回到现实中来。”

希特勒反过来给党员讲：“与施莱谢尔达成一致并不容易。他目光机敏，却掩藏得很深。我确信他并不坦诚。”

不愿意，希特勒这时回答。

但是，他们的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之后，施莱谢尔受到了总统的谴责。他可以试探，对，试探，却不应该立即将自己代入总理的角色，更不应该立刻提出一个要求！这样一个强势而令人不愉快的兴登堡是从来不会展示在公众面前的，只有离他最近的人才知道。至少那些在兴登堡身边的人这样说。



自从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取得重大胜利后，有一些人（工业家，其他政党的政客和外交家）一直想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大多数人从后门进来，或者在偏远的地方等着碰到阿道夫·希特勒。许多人都觉得与他见面很有趣——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也觉得很有趣。他的方法并不正规，因为他毕竟不是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他是肯塔基一个富裕的羊毛生产商的儿子，最初他是商人，后来被选入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几个月来，他习惯了去找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用餐的地方，然后出现在那里，像是偶遇。他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看赫尔曼·戈林走过来。一个难以捉摸的家伙。

萨克特的英国同行荷瑞斯·胡姆博德爵士拒绝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也不与这个党的党员会面。相反，萨克特却已经拜访过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元首”。一年前，1931年12月5日，萨克特在伊米尔·乔治·冯·史道斯家中见过他，伊米尔是德国大公司董事会成员，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朋友。萨克特带着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做翻译，为掩人耳目，他们也都带着太太，装得好像是个社交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

门突然开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鲁道夫·赫斯、赫尔曼·戈林、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出现了。他们旁边的一个人被称为“沃尔夫先生”。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美国大使与德国反对派的会面，一个有政治意义的事件，完全秘密地进行。这一会面是由亲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银行家们安排的，他们关注着美国的信贷，因为这些信贷在德国公司占了很大比例。

当天下午他一直都竭尽全力。萨克特从此便对希特勒不抱什么希望了。“元首”讲话时——他讲得很多，像面向公众那样朗诵——他

根本都不看大使一眼。一个狂热的十字军，萨克特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肯定不是那种能成为政治家的人。

萨克特今天还把纳粹看成流氓，看成暴力革命的象征，而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更怕共产党——他知道，白宫也同样怕共产党的进军。



拉法埃·阿布拉姆维奇看起来很疲惫。他是个小个子，已经50多岁了，普洛特金从他眼中看出了恐惧。他的这位东道主在俄国组织了地下运动，支持政治犯，并帮助其中一些人逃走。他在美国做报告时，共产党人滋事寻衅。

阿布拉姆维奇旁边坐着一位从俄国来的年轻的逃犯。茶端上来了，他们谈美国，谈经济危机，谈工会的情况。普洛特金为什么恰好这个时候来柏林？

普洛特金回答：“因为这个冬天德国的确会发生什么。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我想亲眼看到。百闻不如一见，有些事情读到的和实际发生的并不同，这让我受不了。”

“不要想错了，”阿布拉姆维奇建议道，“希特勒是很危险的。他是今天德国工会、社民党和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德国总失业人数比上个月增加了156000人——总数为五百二十六万五千人，也许用文字写出来会比阿拉伯数字更有说服力。其中许多人都是要养家糊口的。无论如何，增幅还是低于上一年了。



柏林报纸上午报道，国家社会主义党下属官员昨晚在恺撒霍夫酒店前互相殴打。希特勒既愤怒又痛苦，去了剧院，以此躲避他的政党的悲惨遭遇。对戈培尔来说，这就是“柏林犹太媒体”的谎言。

他到酒店时，希特勒正口授让人给兴登堡写信。尽管“元首”正“表达深切的忠诚”，但听起来却很叛逆，他又一次讨论内部事务。下午4点多，希特勒口授完了信。戈培尔认为这是政治策略的杰作。



下午晚些时候，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亲自将希特勒的信送到了总统国务秘书那里，总统所给的考虑时间还长着呢。希特勒信中拒绝了组建政府的任务——“因为它内在的不可行性”，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提出了建议，48小时之内提交计划内容，24小时之内提交一份部长名单。为此，他再次要求授权，要求被授予“在如此危急困难时期，连议会制国家的总理都不会被拒绝授予的”全权。

这是异常果决的人正常的政治考量——或者只是插科打诨？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真的会相信，传说中的老顽固兴登堡可以被另外一个更顽固的人所强迫？

梅斯纳迅速做出回答，太过于外交化是不行的。“总统先生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德国人民面前不能接受这一提议，不能授权给一个总是强调绝对性的党派领袖。他不得不担心，由希特勒领导的内阁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政党独裁，其后果是使各个党派之间失去了同一目标。对这一后果，总统先生无法以良心和誓言来负责。”

“政党独裁”？天哪。



戈林离开不久，突然有几百名共产党人聚集在威廉广场的恺撒霍夫酒店前。“打倒希特勒”，他们呼喊。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涌了过来，在这所豪华酒店的入口前与这些左翼人士开始打斗。过了一会儿，警察介入，将打成一团的人分开。

来自街头的压力——一个飘摇的社会还能承受多久？



体育馆里正进行着激烈的决斗。但是今天这里进行的不是选举，而是冰球。柏林的B. S. C. 冰鞋俱乐部对阵维也纳的普茨莱道夫（Pötzleinsdorf），比分是3：1。这是德国与奥地利的决赛。直到最后一刻钟，柏林才奋起直追。

尽管票价相对较低，露天看台上还是有许多空位。



戈培尔确定，尽管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到了晚上情况却仍旧没有改变。等待让人几乎无法忍受。难道威廉大街会迫于要向公众展示一个清晰可靠的政府形象的压力而做出让步吗？戈培尔在他的公寓里研究晚报——自娱自乐。“媒体处于狂热的紧张状态。最不实的新闻也都是借助油墨传播开来的”，他写道。

然后那个人来了，他在个人记录中也称他为“元首”。他们闲聊，听音乐，这几个小时，先让征服威廉大街的计划去一边吧。



施莱谢尔的情报系统特别警觉。据说到处都有他的人。他的心腹和格里高·斯特拉瑟的追随者都谈了话，而斯特拉瑟是希特勒在党内最大的对手。所得信息特别振奋人心。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为施莱谢尔将军做的简报这样记录道：“这些人明确宣布，斯特拉瑟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只是源于阶级优越感。斯特拉瑟并没有参与各种信函以及最后一天的备忘录的起草。如果希特勒的努力白费了，他已准备好亲自上阵。”



总理府的拐角处，也就是沃斯大街3号，今晚，巴伐利亚自由邦公使康拉德·冯·普雷格告别柏林^[9]。250名客人陪伴着这位好先生步入退休生活。几乎整个内阁都参加了，还有总理帕彭。同一时间，选帝侯大街旁的剧院正在举行《快乐的旅程》（*Die glückliche Reise*）的首演。这是爱德华·昆内克的轻歌剧，是关于爱情的，除了这个主题还能有什么？观众被热情洋溢的节奏所吸引，中间还夹杂着一点点忧伤。最后作品中的英雄们离开了德国，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寻找他们的快乐。

夜里，不知是谁用石头投掷威尔默斯多夫区摄政王大街上犹太教堂的窗子——几天之内这已是第三次。警察怀疑是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警察宣布加强巡逻。

11月24日，星期四

希特勒拒绝了；

但是他想成为内阁的总理。

《福斯日报》

德意志帝国银行前行长沙赫特博士评价柏林谈判：

“只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人民观察家报》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总部所在地柏林恺撒霍夫酒店，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堡垒，好像从四面都能攻破。国家现在有两件事难以忍受：总统危机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崩溃。后者将大大推动共产主义的进程。

《每日评论》



阿道夫·希特勒坐在恺撒霍夫酒店的楼上，马路的对面坐着那些做决定的人。又是苦苦等待和苦思冥想的一天。兴登堡现在准备好了吗？不是应该必须准备好了吗？就连那些工业界很有影响的代表也都加入到运动这一边了，难道压力还不够大吗？

3点钟时，梅斯纳又送来一封信。总统表示，他的大门随时都为希特勒敞开，他随时准备听取希特勒对于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看法。兴登堡不想放弃希望，“以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真的可以使您和您的运动，能与国家其他党派中有建设意愿的力量合作”。

希特勒的回答很冗长。一封辩论信。他宣布讨论结束。“此外，我请求您向尊敬的阁下一一总统先生——表达我一如既往的最深切的忠诚。”

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作为反对党，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还能坚持多久？约瑟夫·戈培尔还能为取得权力之日斗争多久？这一日，也许永远都不会到来？戈培尔狂怒地写道：“施莱谢尔，永恒的阴谋家，这一次他又胜利了。可总有一天他也会被革命吞噬的。”

希特勒呢？是不是如同几个月前一些社论所预言的那样，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呢？



这个希特勒是谁？9年来，自从在慕尼黑发动政变失败，向统帅堂进军以来，他就成了魏玛共和国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不少在柏林的外国记者视他为未来之星，一直努力安排对希特勒进行采访。此外，外国媒体负责人恩斯特·汉夫斯坦格确信国家社会主义党还为自己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关注。

恩斯特·弗兰克·斯德卫克·汉夫斯坦格博士（昵称为“普茨”）和一个美国女人结了婚。他父亲的家庭曾为维特尔斯巴赫家族（Haus Wittelsbach）（该家族产生了不少巴伐利亚统治者）做过顾问，他外公的兄弟是约翰·斯德卫克将军，在美国内战中被南军的狙击手击毙。汉夫斯坦格在哈佛读书，是美国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同学。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向希特勒解释美国是怎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大战中以最短的时间征召了200万士兵，并将他们派到大西洋彼岸。美国，新的世界强国。

希特勒很为三K党、摩天大楼及反犹太主义者亨利·福特所振奋，他的美国观已有了轮廓。当然他也清楚，德国经济强烈依赖美国贷款，因此美国对于纳粹运动有很大的兴趣。

1931年11月24日《时尚》（*Cosmopolitan*）杂志安排了一次与希特勒的会面，多萝西·汤普森去恺撒霍夫酒店赴约。一年已经过去了，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对于这件事的怒气还没有消散。

多萝西·汤普森来自纽约，那时37岁，父亲是卫理公会传教士。她经常给《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和《纽约晚

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10\]](#)写文章。她德语说得非常流利，能巧妙地模仿柏林和维也纳的方言。对于汤普森来说，威廉大街是个特别的地方。1927年，在外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一次茶会上，她在外交部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

众所周知，汉夫斯坦格喜欢让记者们坐立不安。记者们要期待着祈祷着，只有通过精神考验才能最终得到“元首”的召见。对于汤普森也一样。

她的书《我见过希特勒》（*I Saw Hitler*）稍后出版，它并没有还原采访，倒更像是一次失败的采访记录——它展示了希特勒固执的形象。

多年来她都在争取一次会面，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搞砸了。“我其实期待着一声坚定的‘您请进来’，”汤普森写道，“取而代之的却是我必须要提交要问的问题，要书面完整起草，而且提前24小时提交。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通知我，让我把问题减少到3个。”

有经验的记者对于这种刁难可能已经有了抵抗力。至少在约定的时刻汤普森还是步入了酒店。

有人安排她在顶层门厅等候。希特勒在一个贴身保镖的陪同下匆匆经过。她继续等着。一个意大利记者排在她前面。最终还是轮到她了。多萝西·汤普森只有一种感觉：失望。

当我最终进入阿道夫·希特勒在酒店的沙龙里时，我确信见到了未来德国的独裁者。但是大概过了50秒，我就确定并不是这样。

人们正需要这段时间来认清，这个引起世界如此好奇的人其实微不足道。

据汤普森的描述，希特勒几乎不露面。这个记者看到一个人影，“他的面容像讽刺漫画”，身躯似乎是软骨组成，没有骨头似的。她的判断更恶毒：他前后矛盾，却巧舌如簧，同时又反复无常而信心不足。“他就是小人物中的典范。”

但是他并不缺乏某种魅力：他很温柔，拥有奥地利人特有的那种近乎女性化的魅力。“光是眼睛就值得注意。暗灰色，典型的甲状腺疾病的特点，有着某种特殊的光芒，这种光芒通常是天才、酗酒者和歇斯底里的人才有的。”

对于汤普森来说，希特勒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处于恍惚状态的人”。



他们特别着迷又紧张地看着德国国家人民党熙熙攘攘的人群。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这个党太优秀了，他们的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勤奋忙碌的媒体企业家——对于兴登堡来说非常可怕。

这可能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个问题。

胡根贝格的追随者库阿茨在日记中写道：“危机仍在继续。经过长时间反复磋商，希特勒又像8月13日时那样表示拒绝。戈培尔——应该是莫斯科的间谍——和斯特拉瑟吵翻了。戈培尔胜利了，因为希特勒自己也害怕负责。他显然是个‘老狐狸’。”

戈培尔，莫斯科的间谍？

是谁散布了这样的谣言？德国保守派有这样丰富的想象力吗？难道戈培尔及其追随者不是刚刚在与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唇枪

舌剑中无情地打击了他们吗？戈培尔总是攻讦共产党人，无论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他最想对共产党做什么事，没人会质疑。

尽管如此。

苏维埃通过特工支持共产党的主力，这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间谍渗入了哪个社交圈子。只知道他们已经在那里了。

“特别联络”部已将画家格特·卡登——代号“大提琴”——安置在防卫军军官林格·冯·巴登斯坦家里做租户。他们的熟人还有弗里德里希·冯·科赫恩豪斯将军，也就是德国军事政治及军事科学协会主席（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Wehrpolitik und Wehrwissenschaft），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他们也维系着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周围的关系。

卡登开始在这个圈子里轻手蹑脚地行动了，现在他是“钢盔团”（前线士兵的右翼组织，亲近国家人民党）成员。他同瓦伦贝格银行也建立了联系，该银行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可以观察防卫军演习，在各种招待会中都是个受欢迎的客人。

这种人在共产党的名单上。可是戈培尔呢？

共产党在德国有30万党员。没有什么比秘密机构更神秘的了，从名称开始，就不断地在变化。军事机构、M-机构、军事政策部、基彭贝格机构、阿力克斯机构、亚当机构。

“阿力克斯”和“亚当”是汉斯·基彭贝格的化名，基彭贝格是领导这一部门的人。在1923年汉堡起义中，他出尽风头，后来在莫斯科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在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有一间阁楼，只有通过一个秘密楼梯才能上去。这里就是共产党军事政治机构中心。这里是指挥领导间谍的，他们中的112人自1930年起直接接受

莫斯科的培训。训练的重点是起义策略、爆炸物、武器及通信技术，以及机动车、火车、坦克驾驶。课程计划上还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史和党的技术。

“党的技术”，听起来很有意思。

间谍里不乏有名的人。汉斯·胡伯特·冯·兰克，化名为“莫里茨”，一个皇家军官的儿子，是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的高级职员。还有海尔加·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格莱特”），陆军总司令的女儿，是共产党的线人。“伊瑞卡”是梅克伦堡一位大地主的女儿，“丽泽洛特”是一个大工业家的女儿，“吉赛拉”也是德国波罗的海沿岸一个贵族的女儿，“波娃”是瑞士大工业家的女儿，“莉塔”是使馆职员的女儿。其他间谍特别神秘，他们只用像“Be”、“奥斯卡”、“Ru 1”和“Ru 27”这样的化名来行动。“Be”与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媒体负责人埃里希·马克斯（施莱谢尔的心腹），还有经济部秘密顾问瓦尔德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Ru 27”在总统兴登堡左右活动。他的预测被证明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还是应该说：他们的预测？谁藏在“Be”和“Ru 27”后面？德国防卫军军事情报机构（Abwehr）[\[11\]](#)也一定很想知道。



普鲁士法官协会斥责戈培尔发表在《抨击报》上对多名法官的抨击。协会在一份声明中提到，这是“对法院以及对整个司法机构的严重侮辱和恶意毁谤”，他们拒绝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新闻界的所有指控。“普鲁士法官拥有权利也履行义务，而不是左顾右盼。威胁是不会影响他们的。”



议长戈林与国会议员弗瑞克、戈培尔和斯特拉瑟，还有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观察家日报》和《抨击报》上发表声明：“自国家社会主义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政治动荡的时期，敌对媒体发表各种各样的伪新闻，在公众面前损害党的领导人的形象。”他们“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追随该运动的领导人，并且声明他们不屑于以某种形式对这种谎言再做出回应”。

斯特拉瑟也在其中。当然了，未来他将坚定不移且忠诚。



弗里茨·卡姆勒在报纸上为他的“充气自行车”做广告，“质量上乘，脚闸刹车，三年质保，可分期付款。48马克”。他的店在柏林欧拉尼恩大街70号。



下午5点钟赫尔曼·戈林邀请首都媒体前往恺撒霍夫酒店。酒店的一面墙上悬挂着腓特烈大帝的肖像，是由蓝色瓷砖砌成的。最近几天特别紧张。戈林看起来慢吞吞的很懈怠。对于拥挤的人群来说，大厅实在太小了。

可是戈林做了他最擅长的事：他站在他的“元首”前面。

人们没有给希特勒机会，戈林向记者喊话，人们有意制约他！希特勒绝不想做总统任命的内阁中的总理，“元首”只是要求大家任命他为总理。有一些力量，戈林说，用不着他详细说明是哪些，正在有计划地阻止希特勒组阁。好吧，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会消灭每个内阁，就像消灭帕彭内阁一样。

戈林说：“只有希特勒才能拯救德国人民。”然后就结束了。



德国金发演员汉斯·阿尔伯斯今晚在腓特烈大街的海军上将剧院演出。演出8点15分开始，是匈牙利剧作家菲伦克·莫尔纳的剧作，有个晦涩的名字《利力姆》（*Liliom*）。阿尔弗雷德·普尔加将之翻译为德文。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来自柏林东部的诗人、心理咨询师和医生，曾透彻地描写过亚历山大广场所在的这片区域。由于德布林的缘故，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迷上了小巷的纷杂，小巷子里挨挨挤挤的都是犹太人的二手车商店、妓院和当铺。妓女们在房门前等候。这让他想起纽约历史悠久的“地狱厨房”。在亚历山大广场，他在一家饭店与一名妓女攀谈起来。“你读过德布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吗？”她问道。普洛特金奇怪地看着她，“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说。

“你还记得吗，”她接着说，“德布林说过，时间是个屠夫，我们所有人都要从屠刀下逃走？好吧，我在逃，我们都在逃。你也一样。我要跑到倒下再也跑不动为止。但是在我倒下前，我还想活着。来光顾我的生意吧。”

他两次拒绝与她过夜。5马克。她说：“威丁区的女人把自己卖掉，就为了一片面包！”

普洛特金继续往前走，他不是放纵自己的人。

他碰到一个卖糖果的年轻女人。她不会超过25岁，金发，消瘦，紧绷着脸，她的衣服在这个季节太单薄了。普洛特金买了10芬尼的糖

果，买的时候看着她，然后继续向前走，却忘不掉她的脸。他在这张脸上看到了饥饿，突然他又回到她身边。

“你今天吃东西了吗？”他问她。他们站在一家连锁饭店“阿星格”前，该饭店的标语是“物美价廉”。

女人并没有回答，而是晕倒了，在她倒在地上之前，普洛特金接住了她。她的身体多么轻啊。

他把她拖进“阿星格”，一名警察跟着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女人苏醒过来，普洛特金可以解释当时的情况。她默默地接过一碗热汤，默默地用勺子搅着。她看起来很害怕讲话。她的糖果，在门前掉了，不见了。普洛特金往她手里塞了1马克，想着她可以买些吃的。但是当他要送她回家时，她却拒绝了。

在亚历山大广场上，普洛特金明白过来，人们很少接受陌生人的帮助。



政治警察瞄准了共产党。今年，内勤部2.5个部门和1个刑事委员会，6个刑事警官和73个外勤公务员被派去处理共产党的阴谋诡计。相反，只有1个部门、1个刑事委员会、3个刑事警察和49个侦探来处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事情。这被称为优先权。

共产党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渗透。两年前，共产党揭露了近70例特工和肇事者——39人为政治警察工作，3人同时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和政治警察工作，9人只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工作，2人为社民党工作，11人为境外特工工作，5人接受公司委任。

许多事正在柏林发生。

11月25日，星期五

只有阿道夫·希特勒才能解除政府危机！

元首已准备好，一旦他的提议被采纳，他就全力以赴，并让运动达到最大规模。

《人民观察家报》

兴登堡的决定：不许希特勒独裁。

希特勒内阁失败——总统专政权被拒绝。

《福斯日报》



一个星期前，他们开始准备。国防部邀请了来自警察局、邮局、铁路和技术紧急援助部门的专家进行思想实验，也就是“模拟游戏”（Planspiel）。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情况全都被考虑到。即“如果……

那么……”思维。针对哪种威胁，防卫军如何做出反应？接着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共产党和自由工会将强大的行动发展为总罢工，冲锋队部分成员及国家社会主义导向的工人阶级也将参与进去”，这是“模拟游戏”的前提，是以这个月柏林交通公司的罢工为蓝本的。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联合起来，共同与警察对抗，结果是：4人死亡，47人受伤，583人被捕。如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这样的联盟该怎么办？谁能阻止这些激进的左翼及右翼分子？如果德国所有工人同时不上班该怎么办？专家们模拟了这些情景，考虑了风险，计算了工人罢工对国家的影响——并讨论了防卫军是否该派兵镇压暴乱。

中校奥尔根·奥特开启了内战模拟。明天将继续“模拟游戏”——穿制服的人们想继续深入考虑细节。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向执行内阁的部长们说自己不想当总理，因为总理不能同时兼任国防部部长。在可能发生内战的这些日子里，他是不是不想放弃对防卫军的影响？不可想象。

施莱谢尔还汇报了两天前他与希特勒的对话：希特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踏入政府。即使不是帕彭，而是另外一个人被任命为总理。希特勒也不允许其他任何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这样做。

当天晚些时候，国防部负责人费尔迪南德·冯·布雷多上校向他的上司通报了针对青少年开展“防御”教育的理念。众所周知，防卫军需要紧急增援，只要外国允许，就要开始行动——这些天，美国和欧洲各大国外交部部长正在日内瓦谈判。此外，如果可以给青少年提供实惠，就会使他们从大街上消失：食物，床，井然有序的运动。这样就没有人这么快再产生愚蠢的想法了。



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在克兰茨勒咖啡店的楼上为《芝加哥日报》（*Chicago Daily*）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即在腓特烈大街和菩提树下大街的交叉口。在二楼，他的同胞可以安静地读报并交流意见。

最近德国发生的事情使这个外国记者不安。让他的读者弄清事情的发展，真让这个美国人觉得很犯难：在华盛顿只有两个党派争权夺利，民主党和共和党。相反，德国却有很多党派，有的党派只代表很小的团体的利益，关键时刻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一切都如此激进，如此紧张，让人无法呼吸。

在政治之城柏林游荡的美国人对某些人来说是个特别的冲击。3月时，在与美国记者和外交人员谈话后，戈培尔曾经抱怨，说他“被挤榨得像柠檬一样”。他们的判断通常很恶毒。胡伯特·伦弗洛·克尼克博克，红头发的得克萨斯人，在夏天的《纽约晚邮报》中告诉他的编辑：“希特勒是个同性恋者，娘娘腔的下等兵，有着超常的政治嗅觉。兴登堡是个板着面孔的统帅，男低音，他发号施令的样子让那个小下等兵浑身颤抖。”



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正酝酿着一种情绪。许多新成员，当然也有许多资历老的成员，都很不满意。国会选举后，国家社会主义党丢了许多选票，党内一些人希望至少能在普鲁士邦掌权，毕竟普鲁士是国家最重要的邦。统治普鲁士的人也能指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警察。9万武装力量成员，光是在柏林就有12000名。成千上万穿制服的人拥有自动武器和装甲车。真是一股力量。

这其实很有吸引力，但是约瑟夫·戈培尔却有另外的想法。“我们将陷入尴尬境地”，他写道，最后政府甚至会安排一个政府专员放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眼前。后果也许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毕竟今年夏天总统已经废除了普鲁士的社民党政府，并任命那时的总理帕彭为该邦政府专员。通过紧急法令，就这么简单。社民党政府控制不了共产党的暴力，这个理由足够了。但这种指责没能被证实。

尽管普鲁士邦前总理布朗在法庭上得到了部分权力，但是只有总统才能罢免作为政府专员的帕彭。



希特勒的行为为自由派所津津乐道，有人觉得他踌躇犹豫，有人觉得他打得一手好牌。“几天前，他和总理府的距离只有几米，现在又变成了几英里远了，所以在他仓皇败退后再发射一枚毒气弹，以此来报复。”《福斯日报》的一个评论员这样写道。这里指的是为失败的谈判寻找合理性。“这个人数年来一直标榜他‘钢铁般的能量’，他‘冰冷的决心’以及他的冒险精神。从要证明这些特质的那一刻起，他长达数天进行文字考证及文字比较，使自己沉迷于吹毛求疵的实验中，探求总统授权制内阁与议会制内阁的区别。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件事，就算不是什么英雄行为，他也会写非常敏感的信。”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再到巴伐利亚山脉旅游或进入下一次选举，他就会很开心。“他生来就是个大吹大擂的人，至少在潜意识中他知道自己的极限。”

格里高·斯特拉瑟是否给他的心腹传阅了这篇文章？甚至也许将信息透露给了记者？约瑟夫·戈培尔确信是后者。



下午5点钟，兴登堡会见了中央党领袖，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官方公告称，这一会见的主题为：探寻“组建国会多数席位的一些可能性”，为“政府切实的紧急计划及工作计划”奠定基础，这一政府应是由多数人选举产生的。卡斯希望当天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及德国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的领袖进行交谈。但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很快拒绝了这一请求。

卡斯于是礼貌地请求总统不必再进一步联系了。

这种倡议也失败了，大家各怀鬼胎，达不成一致。兴登堡还剩下什么？



兴登堡！他被多少德国人神化了呀！美国记者多萝西·汤普森这样描写他：“一张脸如同用石头雕刻的。没有想象力，没有光，没有幽默。并不是一张吸引人的脸。但是恰如其分地展现了这个人的性格，好像这个人的命运早就被决定好了。”



17点10分，冲锋队的爱尔兰·耶内氏在奥古斯特-维克多利亚医院去世，他是冲锋队第13分队领队。清晨时，他曾与国旗团的人发生了冲突。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说，“在发生于柏林的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有28人殉难”。



在火车站大街，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找到一个阁楼，月租金48马克。从窗口可以看到半个柏林。距离洪堡大学、博物馆和皇室城堡只有几步远。位置不能再好了，而且可以沉湎于从未有过的奢侈：令人惬意的温暖。他惊讶地发现，“暖气额外加25芬尼”。“德国人已经习惯没有暖气了——可是这些外国人都被娇宠惯了，需要比孵蛋更多的热量。”



记者贝拉·弗洛姆由于公务出席了国务秘书的妻子梅斯纳夫人的招待活动。来自外交使团的许多客人出席了招待活动：像英国、土耳其、法国大使的太太，挪威、荷兰、波兰、比利时、爱沙尼亚的大使及他们的太太们，还有国务秘书爱尔兰·普朗克的太太。

普朗克是与国防部部长要好的同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普朗克效命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不效忠他又能怎样呢？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儿子，现在他属于施莱谢尔圈子中的人，就像费尔迪南德·冯·布雷多一样。



晚上，亚历山大广场上的建筑在灯光下闪着光。多年的建设终于竣工了。外墙上飘着旗子，今天商店开放的时间比平时长。41家商店将他们的橱窗模特遮盖起来——如果谁能猜中确切数字，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奖品有：R. 以色列（R. Israel）的室内装修、一台新歌缝纫机、一部收音机或500马克现金。

11月26日，星期六

卡斯也失败了。

今天任命总理——帕彭今天在兴登堡处。

《福斯日报》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党员们！！

经济危机持续，失业率攀升，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强大起来，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几乎完全孤立。

在德国从来没有一个内阁像目前这个内阁有这么多的权力，也没有一个政府像今天这个政府一样失败，这个政府只是我们人民中一个很小的少数人的阶层。

阿道夫·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讲话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特别想泡个澡，将身上沾染的马路上的灰尘彻底搓掉。他问新房东浴室在哪儿。

女房东惊讶地盯着他，他确定说的是“浴室”吗？

普洛特金没穿多少衣服，手里拿着毛巾和香皂。

女房东把她丈夫叫过来，这时普洛特金的牙齿开始打战，他的皮肤冷得发青。

“您知道吗？”女房东的丈夫问。

普洛特金摇摇头。有什么要知道呢？

楼下的女士被叫了上来，保险起见，两位女士又叫来了一楼的女士。他们一起商量着什么，说了几分钟。

最后，女房东带着胜利的表情递给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最近的公共浴室的地址。



“模拟游戏”结束了，他们把所有的“如果……那么……”都考虑到，并且讨论了，也分析了结果。军官们和他们铁路、警察局及邮政部门的客人们得出了令人崩溃的结论：防卫军目前无法在危机情况下维持国家正常秩序。或者必须动用武力来对抗民众的大规模反抗。

魏玛共和国：防卫能力有限。当然这要严格保密。



今天星期六，但在国防部却没什么周末的气氛：机构负责人开会讨论，谁才是下一位总理。

布雷多做会议记录，前不久他还是防卫军军事情报机构的主管，最近刚刚做了国防部办公室主任，也就成了施莱谢尔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他们谈到过去这个星期的“三个幻觉”：希特勒还会让步，兴登堡还会任命希特勒，党派还能统一意见。这些幻觉只是没有涉及施莱谢尔。现在大家都来紧逼着他，好像他有责任。

这一轮探讨党派及职能部门的布局，探讨必须设定的大的路线。对此防卫军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否则国防部部长就是总理了。

最后他们也说到了国会可能的行为，可能出现的骚乱和罢工——“那就进入紧急状态”，布雷多写道。他又接着写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奥特堪称楷模，残酷，毫无畏惧。”

奥特，就是那个中校，是他领导“模拟游戏”。他是施莱谢尔的心腹。



股市这一天有很大波动——谣言四起，说总统兴登堡暗示自己要辞职。



在一次对恺撒大道48a的大搜查中，警察制服了卡尔·威恩，28岁，还有爱尔兰文·科勒特，30岁。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发现一个完整的造假车间，里面有技术设备和化学药剂。警察总局说，造假者是共产党人，这就是共产党反国家行为的证据。共产党的确在这个城市经营多个造假工厂。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一个特殊部门安排这种非法工

作，设立秘书办公室，设法弄到住处和假地址，不断地更换部门化名：I-设备或者“伊弗兰德”（Iffland）部，还有后来的“伊都那”（Iduna）。共产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仅在柏林，他们就设立了60多个藏身之处。“韦尔斯”（Wels）部门负责采购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储藏在那里。这够不够开始一场革命呢？他们也在官方上谋求合法方针——国家社会主义党也一样。



帕彭、施莱谢尔、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出现在总统面前。唯一的主题：政治局势。但是毫无结果。



《红旗报》是拥有大量读者的共产党党报，因严重违反《国家保护法》，被禁刊三个星期。这一报纸仅在柏林就有25000份的发行量。几乎每期都呼吁无产阶级武装起义来反对这个国家。

11月27日，星期日

（被禁）

《红旗报》

决定德国命运的时刻中，小道消息的影响。

与希特勒的谈判——把他排挤到一边的“另一种方法”。

《人民观察家报》

施莱谢尔内阁要来了吗？

在当今失控的形势下，施莱谢尔内阁看起来果然是唯一的出路。人们认为最晚星期二会有决定的。

《每日评论》

希特勒和戈培尔乘车前往魏玛。一次美妙的旅途，风吹拂着他们的脸庞，吹走了阴郁的思绪。戈培尔感到自己又能自由地呼吸了。晚上，两人在魏玛国会大厅（Die Weimar-Hallen）里讲话。尽管在柏林惨败，当晚气氛还不错。只要党内没有分裂，戈培尔对自己说，国家社会主义党终将赢得权力。深夜，他们一起在城里漫步。但是他们并没花太多时间，希特勒继续前往慕尼黑。



这一天晚上，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去了一家名叫“欧得恩”的剧院，据说放映喜剧《苏茜的音乐》（*Musik von Susie*）。这是一家现代剧院，他吃惊地写道，一个伟大出色的乐团。“音乐远远超出百老汇的演出”，他记录道。

从剧院到菩提树下大街要经过两个街区。还没到菩提树下大街，就遇到了30个妓女，他根本数不过来。

他抑制不住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里是多么陌生。“面包要预订，水要乞讨。到现在为止，我去过的餐厅里，还从来没有见过桌子上有黄油的。”

11月28日，星期一

帕彭还是施莱谢尔？——公众的兴趣现在集中在两个名字上。

《福斯日报》

阿道夫·希特勒的伟大演讲：

“过不了多久，人们就要第三次召唤我们”。



这天夜里，柏林的冬天来临了。今年的冬天迟迟没有来，现在终于来了。但还不是那种猛烈的使这座大城市冻僵的大陆性气候。对于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来说，这是一种先兆，预示着什么他却并不清楚。早上他从阁楼的窗口向外望去：“霜冻，白色的，像雪。远处是大教堂白色与绿色相间的圆顶，高高的教堂尖塔直冲着天空，天空中是粉红色的朝霞。”他用冷水洗漱，并问自己：“如果冬天真正来袭，柏林将会怎样？”



不，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不想当总理。当然不想。但是研究一下形势没什么坏处。侦察员孜孜不倦地工作，将军本人也在探察可以进行军事演习的地形。

他遇到了提奥多·莱帕特，即德国总工会主席，及其副手威廉·埃格特。该组织是德国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显然，拥有350多万成员的这一组织代表着80%的有组织的工人，他们与社会民主党结盟。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与帕彭政府势不两立。9月初，总理宣布废除劳资协定，并削减失业人员的冬季补贴。最晚在那个时候，所有战线都明朗了。

会谈进行得很友好，施莱谢尔表现出自己是个可与之交谈的人。灵活性和洞察力，以及他的信念表现得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不是一种阻碍。

基础打好了。



弗朗茨·约瑟夫·富特文格勒也在德国总工会工作，负责统计和公共关系工作。他快40岁了，蓝色眼睛，红色的头发根根立着。他说话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在动。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看着他，好奇又夹杂着愉悦。“他疲惫紧张，太累了，根本休息不过来，”普洛特金观察到，“他西装革履，仿佛一位瘦弱的年轻的美国生意人，疲于奔命，马上就要丢掉一大笔生意似的。”

富特文格勒在工作条件领域是专家，是个数字怪胎，也是个书虫。他们坐在连锁店阿星格中，吃着三明治，喝着啤酒。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坐在附近的咖啡厅里继续谈。他们聊了6个小时。

有三种社会保险，富特文格勒解释，第一种是来自雇主的，第二种是来自州的，第三种是来自城市的。前两种是有限的。国家援助持续26个星期，然后由城市来接力——只要城市还有钱。

不知道什么时候，富特文格勒开始带着怒气说道：“当城市资金枯竭时，就会出现绝望和动乱。这个冬天我们将要经历许多骚动，所有人都预测这些骚动可能会导致革命运动。我的意思是革命的运动，不是革命。”

普洛特金想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在德国是不会发生革命的。”富特文格勒说。

可是谁会领导这样的运动呢？

“每个许诺人们面包的人都能领导，”富特文格勒说，“我们的人民已经绝望了。他们的痛苦每增加一分，都可能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一个许诺给他们东西吃的人，都会赢得他们，就像风

把花粉带走一样。要不然怎么解释那么多支持共产党和纳粹的声音？人民大众相信这两个党可以通过奇迹使他们获得面包。这真是荒谬，他们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并没有告诉人们真相。”

再来一杯咖啡。普洛特金是个好听众，聚精会神并且得到很多信息。他能引导人讲话。也许有些德国人只不过是骄傲，毕竟一个美国人对他们这么感兴趣。

“只要一个运动形成，”富特文格勒接着说，“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怎样发展了。这种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警察和士兵出动，并导致流血。然后就会有瘟疫蔓延的危险。这种东西从一个城市传播到另一个城市，而德国的城市又都离得那么近。”富特文格勒说。要来临的，将会“像野火”一样。



君特·格瑞克是一个保守派团体的负责人，这一团体宣传经济改革复苏劳动力市场。格瑞克是乡村议事会主席^[12]，也是个高效聪明的组织者——不过，他骨子里非常保守，想要专制集权的国家。他这时的提议实事求是，非常精准。格瑞克根本不是个狂热的人，有些人已经把他当成总理候选人了——不过这的确有些过誉。

这天晚上，施莱谢尔与这位苦行僧模样的人会面。“奥斯卡·冯·兴登堡给您打了电话！”施莱谢尔这样问候格瑞克。

“是的，”格瑞克回答，“不过您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兴登堡想让我们的会谈秘密进行。”

施莱谢尔笑了，拿出一张唱片，放在电唱机上，给目瞪口呆的格瑞克播放了窃听到的通话，是他与总统儿子的。“在这个国家，我们什么消息都能得到”，施莱谢尔不无骄傲地说。

格瑞克并没有愤怒，也没有觉得被背叛。“那您有个非常棒的军事情报机构，”他只是说，“我们肯定能好好利用起来。”



选举结果姗姗来迟。在11月6日国会选举时，国家社会主义党还拉到了一大半的选票，可是，在这个星期日不来梅城郊区域的选举中，他们却丢掉了这些选票。在汉堡都市圈的格斯塔特市（Geesthacht）他们丢掉了三分之一的选票。

这样的震动当然被柏林的“地震仪”监测到了。



2点钟，收音机里又收到了一个共产党非法电台的信号。宣传持续了10分钟，最后节目以《国际歌》结束。很久以来，邮政和刑侦机构试图找到这个电台，目前还是徒劳无功。



施莱谢尔与一名基督教工会的干部、一位资本家协会的先生，还有极富影响力的社民党人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以及中央党主席、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会面。

显然有人想知道这些。

11月29日，星期二

难道因为兴登堡的顾问，整个国家都要走向灭亡吗？

《人民观察家报》

冯·施莱谢尔将军谈判；

国会停战/国家社会主义党将会做什么？

《每日评论》



毕竟，他有所反应。威廉·格勒纳，前国防部及内政部部长，为施莱谢尔的贺信写了回信。这是怎样的一封信啊！

亲爱的施莱谢尔！

您给我的生日回信真是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从中读出了您希望与我恢复旧日关系的意愿。您想和我谈一谈，以了解我们为什么“疏远”。亲爱的施莱谢尔，“疏远”这个词说得太温和了。我要开诚布公地说，我的血液都在愤怒，因为我对于您，我的老朋友和学生非常失望，对我的祖国和人民非常失望。这根本无法分析，更不能理解或智慧去探究。这就是灵魂最深处的感受。也许是我错了，如果我冒犯了您，我将从心底里感到抱歉。

如果您成为总理，请展示一下您能做些什么，但请做一个伟大的、完整的人，这样才值得得到所有人的信任。谁会现在相信您？几乎没有人，大家都觉得您是个超常聪明又精明的人，期待着您因为聪明和精明成为总理。您有我全部的祈愿。可是请不要太果断，相反要温和，不要像轻骑兵那样，靠着人海战术取胜，不要想着大事小事一下子解决。……这些军阀作风必须停止。这些希特勒也能做，这些不用您来做！

我还可以说很多我不满的事。也许您也注意到我内心有火山在迸发。如果我的爆发让您不舒服，那就把这封信扔到厕所里。收起您那无味的谄媚吧，我从前的施莱谢尔是不需要这一套的。此外，我还是希望您原来的施莱谢尔。

您的格勒纳



也许能起决定作用的会谈：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与格里高·斯特拉瑟约好，想弄清楚国家社会主义党是不是还能准备接受政府责任。施莱谢尔对此会谈寄予厚望。从希特勒对手那里传来的消息，完全符合他的期待。

可是斯特拉瑟临近会谈时拒绝出席，说施莱谢尔应该亲自和希特勒谈。到底怎么了？

戈培尔又去了魏玛，在那里接到希特勒的一封信。他的元首并没有像计划中那样在柏林提出申请。“让施莱谢尔等着吧，太好了！”戈培尔在日记中用电报的风格写道。希特勒没有去柏林，他也去了魏玛。

11月30日，星期三

希特勒今天上午去柏林与冯·施莱谢尔将军会谈。

《福斯日报》

阿道夫·希特勒没有在柏林。

《抨击报》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不会容忍施莱谢尔内阁；

施莱谢尔的过渡内阁——反动派联盟最后的希望。

《人民观察家报》

帕彭还是施莱谢尔？

谈判的良好进展/妨碍者已经开始行动！

《每日评论》



9点钟，施莱谢尔在等待一位重要的客人：阿道夫·希特勒。可是，他只是徒劳。戈培尔在党的宣传报《抨击报》上写道，在图林根的选举比在柏林的会谈更重要。昨天希特勒为什么从魏玛到慕尼黑？难道他昨天没有乘夜车回到柏林？在首都放烟幕弹真是太完美了。



难道没有另外的出路了？施莱谢尔和兴登堡没有放弃——他们想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结盟，不管要付出什么代价。国防部部长通过一个中间人告诉希特勒，让他“在12月1日，星期四，11点半到总统府讨论政治局势”。这个兴登堡现在又想做什么？阿道夫·希特勒问道。他让戈林来查清这一点。



柏林的报纸上又充满了内战的味道：冲锋队成员在柏林弗路格大街持枪袭击了共产党的一个酒馆。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用手枪射击，另一些人对共产党人拳打脚踢。两人受重伤。19岁的奥托·缪勒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肩膀，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必须住院。警察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



在政治之城柏林，现在只有一个主题：帕彭还是施莱谢尔？谁会赢得这场总理竞选？据说，知情人跟《福斯日报》记者说，帕彭现在根本不在兴登堡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施莱谢尔现在是他的候选人。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



下午，希特勒、戈林、斯特拉瑟和弗瑞克在魏玛见面。他们的主题是：施莱谢尔将军暧昧的邀请。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戈培尔和戈林希望拥有全部权力。斯特拉瑟则要求彻底放弃“全或无”的原则，并进入一个新的政府。弗瑞克也认为这比较理智。希特勒呢？这两伙人都努力争取希特勒同意他们的观点。“元首”和他的手下讨论了4个多小时。



戈林的副官去拜访国务秘书梅斯纳。梅斯纳想知道戈林要找他说什么——希特勒要和总统单独面对面地谈吗？还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人可以陪着他？梅斯纳的回答有点拖泥带水：总统希望就整个政治形势与希特勒会谈，自然要讨论对于施莱谢尔内阁的容忍问题。但是总统并不希望有其他领导人参加。

戈林承诺会尽快给他希特勒的答复。不过国会议长戈林是打电话到威廉大街的。他从魏玛图林根议会打电话过来。梅斯纳接了电话，戈林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他说希特勒最近在一种很不愉快的情况下拜访了总统，另外，他已经跟总统说了他想说的一切。再次见面只能唤醒人民的希望，如果见面毫无结果，只会带来新的失望。

梅斯纳回答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兴登堡现在想知道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否能容忍一个由施莱谢尔领导的总统任命的内阁，如果能的话，是在什么条件下。对此，的确有必要再谈一次。总统先生对于会谈没有任何限制。希特勒也可以私下里单独与总统会谈。戈林答应尽快回复。

但梅斯纳直到离开办公室回家时，也没有得到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任何回复。



夜里，梅斯纳的私人电话响了。是戈林的副官。希特勒是不会到柏林的。拒绝信已经连夜发出。明天，12月1日9点半左右，梅斯纳应该能收到。

这是捣的什么鬼？信里写的是什麼，梅斯纳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夜里，国防部部长施莱谢尔也抓起电话。他打给他最亲密的同事。奥尔根·奥特明天要立即前往魏玛。这是命令：跟希特勒会面。要传达施莱谢尔的建议，希特勒将在他的内阁任副总理。施莱谢尔将继续担任国防部部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可以得到其他一些职位。施莱谢尔没说太多话，他相信奥特。



12月1日，星期四

两个星期的危机——希特勒拒绝了。

希特勒在柏林发出通告，说他离开慕尼黑到柏林，不过夜里改变了目的地。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官方媒体一直辟谣，但很明显这是确切无疑的。

《福斯日报》

一方面声称，希特勒今天回柏林，另一方面又宣称希特勒已返回慕尼黑，还有另外一种版本，说并不是希特勒，而是斯特拉瑟到了柏林，简而言之，大家被元首坚定的克制弄得非常尴尬。

《抨击报》



兴登堡难道真的希望能抓住希特勒吗？无论如何，9点半时，戈林的副官到了国务秘书梅斯纳处，将希特勒的信交给了他。“我在图林根竞选，只是为了获取信息，而拜访对我来说似乎很困难，因此，我真诚地请求最尊敬的总统先生，在这一刻最好不要邀请我。”

梅斯纳赶快打发走了戈林的副官，立刻去找总统报告。他向兴登堡报告了如下情况：希特勒不来。

两星期前政府引退——眼前的政治危机并没有结束。



国家社会主义党又有新成员了，这一新成员来自最好的社会圈子，国家社会主义党为此很高兴。12月1日，安娜莉泽·冯·里宾特洛甫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号码：1411594。她是跟随丈夫的，她的丈夫已在5月提交了入党申请。安娜莉泽，本姓汉凯（Henke11），来自同名的香槟王朝，她的丈夫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柏林主管汉凯香槟的经销业务。此外，他还建立了一家威士忌进口公司。

里宾特洛甫家里经常举办盛大庆祝活动，许多犹太家庭都是他们的老朋友。只可惜，新认识的人永远都不能被邀请参加这种聚会活动。里宾特洛甫在自家庄园里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志同道合的人另外组织庆典。



奥特到了魏玛。施莱谢尔的奥特，就是他进行的“模拟游戏”。这位中校在希特勒的酒店拜访了他。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实际上根本不是对话，因为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希特勒要求获得总理职位。他警

告施莱谢尔不要接管政府——否则军事力量将被耗尽，这种企图必将以惨败告终。真是个威胁。



在柏林热闹的旅游没有掖着藏着。谣言又四起。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听说一则特别有意思的逸闻：昨天一个接待委员会在安哈尔特火车站守候着，委员会由格里高·斯特拉瑟和奥尔根·奥特组成。他们一起等待阿道夫·希特勒。

但希特勒没有来。因为戈林在上一站把他的“元首”截住，用车带着他去了魏玛。在途中，戈林告诉希特勒，施莱谢尔和斯特拉瑟说谎：兴登堡对于总理职位绝对不是容许不了任何改变的。帕彭可以把事情搞定。真是个好故事——还是说不止如此？

记者们也都以此为话题，所有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希特勒的对手们浓墨重彩地脑补出一幅画面：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如何将他们的“元首”从火车上接下来。“所有人都在卧铺车厢打盹，这时过道里突然响起脚步声以及一个粗暴的男人的声音，”《前进报》这样写道，“拳头砸在车厢门上，元首正在里面休息。紧张的几秒钟后，希特勒衣衫不整地出现在门口——谁都不曾认识这样的希特勒！——认出那个打扰他睡觉的粗暴的人就是——国会议长戈林。”

整个柏林都在解读、猜测、押注：谁会占上风？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媒体这时也发表声明：“某些政治利益团体在公众面前散布消息，称阿道夫·希特勒承诺、宣布，或者只是打算就组建政府进行谈判，并要谋得柏林的某些职位，现我党正式宣布，所有消息完全是杜撰的，其目的是混淆视听。”



帕彭还是施莱谢尔？帕彭想要一部新的宪法，最终：独裁。施莱谢尔想要遏止内战，他想扩充防卫军的军备，这样一来也意味着会将一些右翼准军事集团纳入防卫军——如果冲突升级，局面将更加不利。对兴登堡来说，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召集帕彭和施莱谢尔晚上6点来做报告，像平时一样，梅斯纳和奥斯卡·冯·兴登堡也在。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是怎么形容总统的儿子呢？“容貌笨拙，本质粗俗，所知甚少，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高大笨重，只是不像他父亲那样有教养。”

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帕彭和施莱谢尔都未能给总统提出一个满意的方案。施莱谢尔毕竟还说了中央党和工会承诺在他的领导下会“有可喜的温和的态度”。

可是这能说服总统吗？



晚上，奥特给他的上司施莱谢尔打电话，汇报了他在魏玛的谈话。其实这并不是应该在电话里谈论的话题。晚些时候，奥特登上了夜车，连夜去了施莱谢尔的办公室。

国防部部长等着他。奥特汇报道：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进入政府的提议；戈林听起来不是太坚定；斯特拉瑟不赞同希特勒的方针，与之对抗。他们谈了很久。

[1] 美国马戏团经纪人兼演出者。

[2] 国家专员 (Reichskommissar) 是国家直接委派处理专项问题、接管个别地区政府、监控社会秩序或驻外收集情报等的专门人员，一般直接听命于总理，或由总理亲自兼任。——编者注

[3] 又翻译为容克。

[4] 阿尔冈昆语，意为“强大的力量”。

[5] 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个组织，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成员于1924年成立。

[6]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一个小镇。

[7] 国家社会主义党共设18位“全国领袖”（Reichsleiter）负责党的各个领域，其中，斯特拉瑟于1926~1928年担任全国宣传领袖（Reichspropagandaleiter，或称“宣传部长”，后由戈培尔接任），于1928~1932年担任全国组织领袖（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后由罗伯特·莱伊接任）。——编者注

[8] Burgfrieden，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指在城堡的管辖范围内强制执行休战状态。

[9] 1919~1932年担任巴伐利亚自由邦驻德意志国柏林公使（der bayerische Gesandte in Berlin）。——编者注

[10] 1934年更名为《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编者注

[11] 或音译为“阿勃维尔”或“阿勃韦尔”。——编者注

[12] Deutscher Landgemeindetag，成立于1919年（一说正式成立于1922年），代表国内部分邦及其乡村地区的利益，是各地区乡村议事团体在国会层面的联合和指导性机构，性质与代表大城市的“德意志城市议事会”（Deutscher Städtetag）和代表中型城市的“国家城市联盟”（Reichsstädtebund）相似。——编者注

计划

1932年12月2日至12月15日

12月2日，星期五

工会对于施莱谢尔的要求；

消除社会弱势群体的困难——促进公共就业。

《福斯日报》

期待任命新的帕彭内阁。

《B. Z. 》午间版



施莱谢尔和防卫军指挥官通电话直到凌晨。这是一个短暂的夜晚。他至今也没有放弃每天早上骑马穿过蒂尔加滕的习惯。他喜欢在第一缕晨光中骑马出行。

骑行后，施莱谢尔直接去了总理府。他又将面临辛苦的一天，有决定意义的一天。



对于美国人来说，德国的政治剧真是令人不安。美国大使萨克特认为，德意志共和国还从未陷入现在的政治困境。

结果会是施莱谢尔吗？

将军无穷的精力和能力将把他带往何处？萨克特听说兴登堡对此没有把握，非常担心。毕竟他比希特勒掌权要好。萨克特也确定施莱谢尔跟帕彭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临时内阁又一次在总理府聚集。早上9点，所有的部长都到了。外面云层低垂。明亮的秋天，现在只是一个褪色的记忆。

大家等待总理时在低声谈话。还是深夜的时候所有人就收到集合通知了：外长冯·牛赖特，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还有其他内阁成员。国务秘书梅斯纳也来了。施莱谢尔的心腹，埃里希·马克斯，是少校，也是国防部部长的战友。马克斯是国家新闻官，因此也是帕彭政府的发言人。国务秘书爱尔兰文·普朗克做会议记录，他也是施莱谢尔的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部的老熟人。施莱谢尔将他的人分配到各个重要的位置上。

总理9点过几分来了。弗朗茨·冯·帕彭汇报了情况——看起来很糟糕。看不到多数人的支持，也看不到容忍。

施莱谢尔在会上发言。他说，他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保证说会容忍甚至支持内阁。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谈判进展缓慢。格里高·斯特拉瑟还没有为会谈来到柏林，但他预计星期六会来的。要冷静，因此他建议总统在他做出最终决定前先等一下这次谈判的结果。

国务秘书梅斯纳反驳说，以总统的精神状态，不会允许推迟的。

帕彭突然接过话。总统委托他组阁，就在昨天晚上，他被授予全权处理相关事务。

他请求部长们表达意见。

这可真是一个让人吃惊的转折点。

没有人回答，沉默。

然后，康斯坦丁·冯·牛赖特开始讲话。他是这房间里最年长的，花白头发，灰色的短胡须，脸颊上有疤痕。他说得很慢，好像要克服很大的障碍。他说他对帕彭第二次组阁持强烈怀疑态度，他甚至警告不要重新委任现任总理。

沉默再一次降临到房间里，直到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的声音响起。他请求帕彭告诉总统，即使不是所有内阁部长，那么也是大多数的内阁部长都与牛赖特持同一意见。帕彭激动地环顾四周。内阁中难道没有人有别的看法吗？他恼怒地问，看起来他好像马上就要失控了。只有一个部长做出了反应。主管邮政和交通的部长彼得·保罗·冯·埃尔茨-吕本纳赫男爵，他说他不认为用施莱谢尔代替帕彭又能赢得什么。

这听起来也似乎不是诚挚的表白。

施莱谢尔接过话头，他汇报了中校奥特与希特勒在魏玛的会谈。国家社会主义党宣布了最尖锐的抵抗。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内战。防卫军并不能应付这种情况。别忘了“模拟游戏”。

施莱谢尔示意奥特进房间。他汇报了1个小时。很客观的讲话，而且丝毫不做判断，正如他在总参谋部学的那样。根据他的汇报，防卫军中的很多年轻士兵和军官直到上尉，都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追随

者。他们向左进攻时会努力战斗，而向右时，只有被攻击时才会防守。

奥特客观地陈述了一个恐怖的场景：码头工人罢工，分裂主义者在莱茵兰起义，波兰总动员，总罢工，内战。在这其中是完全超负荷的防卫军。

房间里骚动起来，部长们想了解更多。

接下来是询问。奥特详尽解释，仅凭武力是不能制服对手的，特别是总罢工会使整个国家瘫痪，并且德国东部地区无法得到保护。

“因此，认真研究了所有的事实，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奥特说，“东部边界的防御，以及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进行内部秩序维护，这些同时进行超出了国家所拥有的力量的承受范围。因此必须告知政府，不要采取会导致这种情况的措施。”

奥尔根·奥特合上笔记本，将脚后跟并在一起行了军礼，然后离开了大厅。房间里的人猜测可能是施莱谢尔安排了这一切：“模拟游戏”的灾难性结果，奥特大胆的登场，牛赖特对帕彭的口头攻击。难道一切都是阴谋？帕彭站起身，失败已经很痛苦了，可是在众人面前出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告别内阁，前往总统处。

帕彭来访前不久，兴登堡了解到如果发生总罢工事件，防卫军将无法保卫国家。他立刻明白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他的部长们拒绝跟随他这个总统。闻所未闻的背信弃义。他觉得这一切尤其是一个人的责任：库尔特·冯·施莱谢尔。

总统对帕彭说，他太老了，无法再对内战负责。“那我们就以上帝的名义让冯·施莱谢尔先生碰碰运气。”



不久，施莱谢尔来找兴登堡。他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他觉得自己达到目的了，还是觉得是履行义务？他是否感觉到胜利了？还是被自己的勇气吓倒了？



兴登堡接见施莱谢尔。总统仍然是个高大魁梧、肩膀宽阔的人，他的身材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些拜访过他的人，事后惊讶地讲述有多少工作人员在忙忙碌碌：兴登堡的首席女秘书、女佣、文员、仆人和办事员。女秘书们悄悄地进来，把纸条放在写字桌上，然后又悄悄地走了。众所周知，兴登堡会用铅笔在小纸条上写许多备注。他称之为“便笺”。

桌面左右两侧摞的都是文件。一个被射穿了的头盔，是1866年克尼格雷茨战役的遗留物——如人们所说，这是兴登堡自己的头盔，他当时从生死线上逃脱，他也曾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1871年，在凡尔赛镜厅发布德意志帝国宣言时，他是自己军团的代表。两年后，他来到普鲁士战争学院，这是一所军官大学。1876年，他结束学业，成绩单上的评语写着：“一个独立、果敢的人，具有伟大的才能和坚定的军事眼光。各方面都会非常出色，尤其适合指挥总参谋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他成为帝国最高军官之一：陆军上将。

兴登堡竭力效仿统一战争中伟大的战略家赫尔穆特·冯·毛奇，但是制定自己的战略从来不是兴登堡的强项。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还有三年，他就已经退休了，戴上了象征普鲁士最高荣誉的黑鹰勋章。1914年8月，大战爆发，最初他请求进行指挥，但无人理他，后来，人们还是把他调了回来，进行指挥。

他异常冷静。即便是在坦能堡包围战中，他也是中午1点钟准时吃饭，然后躺下休息。“我自己很好，打雷都吵不醒我”，他有一次跟记者说。

他在威廉大街的办公桌上有个带相框的座右铭：“Ora et labora”，意为“祈祷和工作”。还有他太太格特鲁德的照片。她已经去世11年了，在很多方面，她与丈夫完全相反，和蔼可亲，充满激情。她死于癌症。兴登堡的三个孙子辈的孩子，也就是奥斯卡的孩子，生活在兴登堡身边。他的两个女儿也时常带孩子来看他。

墙上有幅油画——库尔特·克里斯朵夫·冯·施未林伯爵元帅的葬礼。施未林是普鲁士的英雄，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中，他在战场上牺牲。施未林为了祖国而献身。

就核心问题而言，国家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兴登堡一生中只有一次不是为了战争而在国外，那是1911年在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他是与太太格特鲁德在一起。

前一天晚上，总统选择了帕彭。他的话曾经是命令。几个月前，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拒绝进入帕彭内阁，兴登堡只是说，一个军官和一个高尚的人不应该使他的老元帅陷入困境，随后这个人成了财政部部长。

而现在，兴登堡已被他的部长们背叛了，被一个将军所打败，这个将军思维行事像个政治家。

施莱谢尔进来了。这是历史的一刻。

保罗·冯·兴登堡太自律了，从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想法。他坚信情感在行事中不起任何作用。他常说：“感情用事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取得任何正面结果，世界历史的每一面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跟下一任总理像军人一样讲话，用命令的语调。

施莱谢尔现在必须成为总理，可是他却犹豫了。

“元帅先生，我是您马厩里最后一匹马，”施莱谢尔说，“最好还是藏好了。”

“您不会陷我于困境吧！”兴登堡回答。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忠诚。忠诚，这是他最终的要求。

可是，施莱谢尔似乎并没有坚定的信念。现在总统许诺他，如果有必要的话，会随时授予他全权以解散国会。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听起来对他是无条件的信任。尽管在这之前兴登堡恰恰已对施莱谢尔失去了信任。

问题是他在什么时候需要它，他要等多久才能有答案。权力永远是个时间点的问题。

总统要签发任命书。他的内心很复杂。施莱谢尔，总理，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兴登堡也想到了弗朗茨·冯·帕彭。他寄了一张照片给帕彭。是兴登堡的画像，他签了名字，并写道：“我曾有过‘一个同志’！”

对这个老人来说，这是个反常的姿态。他在这个年龄是不会再缔结友谊了，但是他对帕彭是有好感的。帕彭最好能在他身边。但世事难料。这个时代很难找到可靠的人。



奥斯卡·罗伊克，S. 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的审稿人，也是普鲁士艺术学院诗歌艺术部的秘书，正在柏林散步。他看着所有的新建筑。柏林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除了散步，他并没有在日记中记录别的什么。他已经有几个星期不再写政治了。夏天的时候这里还是另外一个样子！7月22日，他还听收音机来了解一些最新发展。他的结论：“政府又一次想到了武力。”8月4日，他就已经写道，“想到了被迫旅行。我有种会被驱逐的预感。德国的掘墓人也会活埋我的。”现在的日记：散步，天气和出版社的琐事。罗伊克已远离政治，远离那些掘墓人。



下午早些时候，电传打字机将新的政府首脑的任命消息传播开来。50岁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被总统任命为第12届总理，并被委托组建魏玛共和国第20届政府。

这是第二位统治德国的将军。第一位是列奥·冯·卡普里维，从1890年到1894年担任总理，是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继承人。



哈利·凯斯勒伯爵松了一口气：施莱谢尔是总理。“帕彭，这个萦绕不散的幽灵终于被赶走了，”他写道，“它是被德国人民厌恶地吐出的口水所淹没的，这使老兴登堡深深地忧伤。”



在图林根的竞选活动中，几乎所有知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都很活跃。戈培尔向《抨击报》口授了一篇社论。“有一件事已经实现，

之前冯·施莱谢尔将军一直站在幕后，在日常事务中只是露出自己的影子，现在他已经迈向台前了，因此被公众明亮的聚光灯所照亮。我们并不认为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因为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影子总是比他本人要大得多。”



下午，施莱谢尔首先接见了富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他们讨论了社会问题。施莱谢尔说到他的“交叉阵线”（Querfront）[\[1\]](#)战略：这一理念在于通过工会、社民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左翼，以及经济团体和防卫军的支持，在国会中建立容忍接受的基础。

但自由工会提出诸多要求。在他们上午会面前，施莱谢尔已在《福斯日报》晨刊上读到了这些要求：应废除若干紧急条例，例如9月5日通过的允许企业家削减第31到第40小时的工资的条例。此外，一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0小时，并且要在冬季改善失业者的供给。

在秘密会谈前给媒体爆料——这是未来盟友的行为方式吗？



如果在柏林待腻了，也许可以在冬季运动中放松。《每日评论》中的一则广告承诺：“那里有雪！圣诞节——新年。高山/乌帕河[\[2\]](#)。超值旅游，德国体操协会认证的滑雪教练针对初学者、高级滑雪者及旅游滑雪者进行专门指导，易北中区。请于德累斯顿阿玛丽恩大街18号，通过格哈德·舍尔得到更多相关信息。”

高山。滑雪乐园西里西亚。离柏林有400公里，要开一整天的车才能抵达。8月时，在德国西部科隆和波恩之间开通了第一条“无交叉路口的车行道”——有关部门是这样命名的。向别人说起这种新型车道时，大家越来越常用另外一个容易记住的概念——“高速公路”。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作为总理要展示多少种政治形式呢？在小圈子里，他是个愉快的谈话伙伴，能让每个人都感到他们原则上与他意见一致。可是施莱谢尔，出生在勃兰登堡的哈弗尔河边，也有着柏林式的伶俐口齿和机敏反应。这种语气，既欢快，又很有伤害性。他喜欢格言，人们背后说他出奇地傲慢，又洒脱不羁。他曾被邀请与一位工业家共进晚餐，据说，这位工业家贿赂他所遇到的所有的政治家。喝完汤，施莱谢尔拿起盘子问道：“那100万在哪儿？”

现在，作为总理——他会收敛些吗，能从幕后策划者成为一个政治家吗？也许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可以为他提供建议，她以自己的魅力、优雅的举止及时尚品位在外交界享有盛名。1931年拍的一张照片上，施莱谢尔站在他太太后面，双臂环住她，她抚摸着他的左前臂，显然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在那年，施莱谢尔给一位知己顽皮地写道：“从下士一直到做将军之前，我都非常支持他们独身。而将军们则是需要女性智慧和手段来支持的。”

那么对于总理呢？10月他还在黑森林地区的巴登韦勒（Badenweiler）进行疗养。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浑身疼痛，贫血尤其折磨着他，这种疾病会消耗人的能量。



保罗·冯·兴登堡怎样呢？政府危机解决了。但是与总统计划的并不同。他把施莱谢尔的阴谋——一切都让人感到是施莱谢尔的一次阴谋——看作耻辱。大家不能这样对待他这位陆军元帅。

在保守派的圈子中，人们也都准确地记录着这一切动荡。伯爵夫人阿达·韦斯达普——她的丈夫库诺是德国国家人民党早期主席，多

年来一直是总统的知己——在给她女儿格特奥德写信时说：“兴登堡狂怒。”

12月3日，星期六

写下这一内阁的组阁史是不可能的。这一历史是这么混乱，并被各种影响挫败，这一团乱糟糟的线真是很难理清楚。

《每日评论》

施莱谢尔的方针。

现在发生的一切，跟民主没什么关系。民主已经悄然离开德国了，它坐在接待室，总有一天会再回来，但是它已经把好房间让出来了。

《福斯日报》

不要容忍施莱谢尔！

一种解决不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抨击报》



赫尔曼·福尔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读新内阁一览表时，揉了揉眼睛。施莱谢尔重新任命了几乎所有的部长。帕彭的“男爵内阁”要在新的领导下继续进行吗？就连内部工作人员都觉得会有新的员工。福尔迟担心地问施莱谢尔，在接受这些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要接受旧内阁不受欢迎的事实。“是的，伙计”，施莱谢尔以他那种让人担心的讽刺语气说。“您完全说对了，可是我不能少了这些人，因为我没有其他人了。”



第一次内阁会议于12点45分开始。施莱谢尔汇报说，他接替帕彭做了总理，“公众中的一大部分”都认为是“松了一口气”。他们谈到应该放宽紧急法令，谈到即将出台的政府声明，以及从前对政治犯的过重处罚。

施莱谢尔还未上任，这些人就从各个角落跑过来：说客们和各种利益代表者带来他们的要求。没有一句温暖的话，很少有人祝贺。或许只是偶尔说一句“请”。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也听说，德国最重要的工会会员正跟施莱谢尔谈判。德国总工会的提奥多·莱帕特和威廉·埃格特也去过施莱谢尔那里。普洛特金甚至听说头头儿们已与总理达成一致。可这是真的吗？普洛特金与海因里希小姐谈起这件事，海因里希小姐是德国纺织工人工会主席马丁·普雷托的女秘书。“没有，”海因里希小姐回答，“没有协议，也没有协定。工会永远不会与施莱谢尔达成一致的。”大家互相拜访只是……对，只是出于礼貌。

真的吗，只是出于礼貌吗？普洛特金亲自闯入马丁·普雷托那里。普雷托40岁出头，总是捻着他那稀疏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胡须。普雷托说，莱帕特和埃格特跟施莱谢尔讨论了“实际的国民经济”问题，即国家创造就业计划的可能性。还没有什么结果。无论如何，协议不可能存在。“我们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与那个施莱谢尔代表的军国主义政权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



下午，约200名共产党员在弗里德里希海因区的施特劳斯贝尔格广场进行非法游行。他们排队上火车时，一个不明身份者打碎了法兰克

福大街上一家军火商店的橱窗。他们从橱窗中偷了气手枪和气步枪。一家食品店的橱窗也被打碎了，价值10马克的香肠也被偷走了。游行队伍被立即驱散，一名共产党人被警察“强行管制”。



在柏林的舍嫩贝格公墓（Schöneberger Hauptfriedhof），正在举行冲锋队的爱尔兰·耶内氏的葬礼，他是冲锋队第13分队领队，最近在柏林被杀。戈培尔让宣传部将他作为“殉难者”，一个“运动的殉难者”来歌颂。



周六深夜，国旗团在哈姆波恩-杜伊斯堡（Hamborn-Duisburg）一个大规模军事体育训练基地训练他们的成员。训练结束后，350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袭击了一组150人的国旗团成员。袭击者用铁铲和铁棍作武器。9名国旗团成员受重伤，多数人头部受伤，一人腿部中弹。

12月4日，星期日

任命施莱谢尔内阁；

施莱谢尔也是国防部部长。

《福斯日报》

今天，老一代将他们最强大和最后的代表以将军形象推出。他们再没有后备力量了。最后一匹马被从马厩里牵了出来，现在马厩空了。

《每日评论》

委任施莱谢尔意味着什么？政府再次反对人民的意志！最糟糕的是：防卫军仍然被牵涉进内部政治权力斗争！



这些天，议员莱恩霍尔德·库阿茨参加了威廉广场上三一教堂的礼拜会，就在恺撒霍夫酒店旁边。兴登堡经常会出现在这个朴素的教堂中：他是个虔诚的路德派新教教徒。总统如果在柏林，就的确经常来这里；如果总统也来这儿参加礼拜会，这个礼拜会就成了一种领导接见了。许多父母带着孩子们来这里，让孩子们能见一见兴登堡——这个活着的传奇。

这一圆顶建筑1739年落成，已有近200年历史；俾斯麦曾在这里举行坚信礼。这是一座古老的普鲁士教堂。星期天：一直到布告板都站满了人。开始前半小时，人们都穿着礼拜服，摩肩接踵地站在走廊里，教堂前有上百个看热闹的人等着看一眼国家元首。

警察为总统开道，终于，总统坐的车优先开了过去。司机打开车门。兴登堡下了车，并未用别人帮忙，举起帽子，向人群致意。教堂里一片安静。人们都很肃穆。圣坛两侧坐着残疾人，尤其是一战的退役军人。

兴登堡向前走，一手拿着礼帽，一手持圣歌簿，他的儿子还有国务秘书紧随其后。几位老妇人佝偻着身子。牧师迎面走向兴登堡，双手握住他的右手——鞠了一躬。

第一排给兴登堡和他的陪同留出了位置。兴登堡将所唱的圣歌都背了下来。他的男低音唱起来。最后，神职人员大声说：“我们全心全意请求万能的上帝，保护在我们中间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礼拜会结束时，兴登堡向那些胸前戴着勋章的退役军人鞠躬。其中几人还在1870年到1871年参加过战斗。他们跟元帅说到他们被俘的

地方，他们轻声地说出那个战场的名字。这都是老皇历了，已没有人愿意听。兴登堡却想听他们说。他与老人们握手，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才转身离去。



那么多人担心的共产党起义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是冲锋队首先失去了耐心？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不安地发现，街头警察比平时多了。每个街角都站着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穿着制服，拿着募捐箱。然后他明白了：国会两天后就召开了。安全措施将非常可观。可是冲锋队的活动意味着什么呢？



阿道夫·希特勒继续活跃在图林根。今天要选举，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元首还一直在拉选票。在艾斯费尔德（Eisfeld），他从市议会那里获得荣誉市民身份。在索内贝格（Sonneberg），他对10000多名追随者说：“这些人民，我们倾注我们所有的心血的人民，我们能因为一点小恩小惠和渺茫的希望现在就出卖他们吗？我今天能做的，和4个月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称新政府为‘实现社会平衡的内阁’，他们总是找新名称来掩盖所有行为的空虚。”



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前往他的家乡汉堡，参加沿海地区党代表大会。他称自己为“无产阶级领袖”。一幅列宁的肖像挂在大厅里。台尔曼呼吁“对法西斯的施莱谢尔独裁进行大规模进攻”。

这是共产党的逻辑。这是莫斯科规定的路线，台尔曼以这一路线来调整他的党。在共产主义者之右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者。



一次秘密会面：施莱谢尔和斯特拉瑟。总理到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家中做客，这个人有可能分裂国家社会主义党。

斯特拉瑟说，许多大区领袖都站在我身后，他们更喜欢追随我，而不是希特勒。

你可以成为副总理，施莱谢尔说。甚至也许还可以成为普鲁士总理。



不管是什么原因，保罗·冯·兴登堡写给弗朗茨·冯·帕彭的告别信被公开了。“您的个人意愿，并且我也认可您向我陈述的理由，促使我以沉重的心情让您离开这一职位，”总统写道，“我对您个人的信任与尊敬，对您影响力的信任与尊敬，丝毫没有减少。您作为总理和普鲁士专员只有半年时间，我了解您勇于献身、乐于负责的工作精神，您忘我的爱国精神，以及崇高的品格，对此我给予高度评价。我永远不会忘记与您一起工作的日子。对于您在这艰难的几个月中为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我以祖国的名义，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



50000人观看了德国国家足球队与荷兰队在杜塞尔多夫进行的比赛，荷兰队也带来了8000名球迷。主队由奥托·内尔茨带领，这次经历了惨败。特别是德国前锋理查德·霍夫曼碰上了倒霉的一天。0：2的结局已经还算让人满意了。

德国队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很难说。夏季奥运会时，足球还未被列入奥运会项目，1930年第一届足球世界杯时，德国队并没有乘3个星期的船去乌拉圭参赛。



在图林根的竞选产生了明显的失败者：国家社会主义党。戈培尔已确定了罪魁祸首：斯特拉瑟，他在竞选中根本没有真正投入。“可以这么说，他根本没有讲话”，戈培尔后来记录道。他也并没有展现出热情。这是妒忌者还是竞争者的声音？党内都知道，野心勃勃的戈培尔想要对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负责。然而斯特拉瑟隶属第二宣传部，他负责管理党内所有的发言人，以及他们的培训和出场。戈培尔认为自己是这次运动的最佳宣传者——当然是仅次于他的“元首”的。

12月5日，星期一

希特勒在图林根的失败。

除希特勒外，斯特拉瑟、弗瑞克、戈林和戈培尔也时常在竞选中发言。

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在竞选中的失败更清楚、更确凿无疑了。

《福斯日报》



星期一夜里，近4点钟，在莫阿比特区炮兵司令官大街3号，26岁的工人马克斯·布里恩被人发现倒在血泊里。鲁道夫·菲尔肖医院的医生确定为子弹射中肺部。这名男子命悬一线。有政治动机吗？布里

恩应该是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但并不是党员。在警察看来，似乎布里恩与一伙贴海报的共产党人发生了冲突。



戈培尔研究了一上午报纸，当然只有一个主导话题：新总理。戈培尔注意到，所有犹太报纸都言过其实地盛赞施莱谢尔，“公众人物永远都不会这样”，他写道。对于戈培尔这样的反犹主义者，几乎没有比犹太人的称赞更糟糕的了。

他很快写了一篇抨击新总理的文章。党内角色分配是很明确的：戈培尔负责抨击，戈林继续与施莱谢尔谈判。

“我们马上就要呼吁，而且把能榨干的都榨干。”这条路线是戈培尔三天前定下来的。今天他就开始执行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大人物”在恺撒霍夫酒店召开高级会议。有许多事情要讨论：明天新国会成员将首次会晤。同样重要的是：在图林根地区选举中的糟糕结果。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该怎样与这位位高权重的将军相处？热烈的讨论开始了。非常紧张。大家都知道：情势非常危急。他们已经等了那么久的机会了。年初的时候，他们就这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新画刊报》（*Neue Illustrierte Zeitung*）派记者们到恺撒霍夫，那时胜券在握的国家社会主义党还允许这么做。不久后，报道出现了。“大厅右边的大圆桌是为希特勒和他的指挥部保留的。如果需要政治谈判，则在这张桌子上开会。所有著名的领导都坐在那儿……头碰头，紧张地仔细听着希特勒边比画边说，他每动一下，一绺桀骜不驯的头发就会落到额头上。”

《新画刊报》的记者们也被允许接近更神秘的东西：希特勒的套房。

“四层楼高。电话声响起，命令下达。人们来来往往。在重要的政治时期……与慕尼黑褐宫（das Braune Haus）的电话联络几乎没有断过。酒店里的接线员恨不得多生几只手，给元首连线一位在莱茵兰的冲锋队的领队，又给他连线一位东普鲁士的大区领袖。不知哪个房间传来打字机低低的打字声。希特勒的房间号是440。一个德英双语的小纸条挂在门把手上：‘请勿打扰。’重大决定将要被做出。国务秘书梅斯纳，总统的代表正来访。”

这是1932年1月。那之后又有过多少会谈？讨论了多少次，如果得到权力，该做些什么？但是哪一次都比不上格里高·斯特拉瑟现在挑起的争吵。

除了希特勒的竞争对手斯特拉瑟，另外还有弗瑞克强烈建议国家社会主义党必须在国会中容忍施莱谢尔政府。否则总理将召集新的选举——众所周知，重新竞选就筹不到钱了。运动将面临失败。

希特勒反对：光是参与到政府中去就肯定意味着运动的失败了。

在随后与国会议员的会谈中，斯特拉瑟僵在那里。希特勒讲话，他说每次妥协都是对党的荣誉的侵犯。我们现在必须赢得时间。

圣诞节假期来得正是时候。



施莱谢尔呢？这时他正在继续争取各党派领袖的支持。他请求他们让他先放开手做。高级教士卡斯向他承诺，他的党，也就是中央党将在国会中尽其所能，争取“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暂时休会，为政府赢

得机会”。只要国会不举行会议，就没人可以针对施莱谢尔内阁提出不信任提案，也就没有人可以推翻总理。当然总统除外。



在一家犹太人的路边小店里，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被店主和店主的儿子还有店里的客人盘问起来。“不要一下子问这么多，”店主儿子告诫好奇的人们，“在美国并不是大家都在同一时间说话的。”这么多问题：美国也有法西斯党吗？在纽约他们也把犹太人从地铁车厢里赶出来吗？在美国也破坏犹太人的商店吗？犹太人在美国也遭到抵制吗？

当这些人听说在美国也有反犹太主义时，他们几乎都不能相信。店主儿子对普洛特金说：“我们每周五晚上祷告时，都浑身发抖。”他们担心犹太人将被驱逐到某个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晚上，阿道夫·希特勒在戈培尔夫妇那里逗留。帝国总理广场。一大群拥护者，还有艺术家和音乐家。这些艰难的、神经绷紧的日子过后，他们也要放松放松，戈培尔写道。

只是放松吗？他们难道没有在小圈子里谈论斯特拉瑟，还有上午的争吵？戈培尔谈到了斯特拉瑟的破坏政策。他认为终于找到了竞争对手如此行事的原因了：斯特拉瑟星期日晚上与施莱谢尔会谈，施莱谢尔已给他提供了副总理的位置，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二把手没有拒绝。没有，他甚至提出条件，下一次国会竞选带着“斯特拉瑟的名单”来接任。戈培尔后来写道：“这是对元首和对党的无耻背叛。”

12月6日，星期二

体会到1月？

放假5个多星期后国会再重新开放，施莱谢尔内阁的政府声明应该届时再递交。

《福斯日报》

施莱谢尔内阁快滚开！

《抨击报》



议会开幕之前1个小时，国会大厦被警察封锁。

是的，国会又开会了！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看到共产党人在大学前分发《红旗报》。几十名头戴钢盔的警察骑着马。到处都是募捐的冲锋队队员，他们把系着铃铛的募捐袋伸到行人的眼皮底下。普洛特金最初只想当个观众，看双方辩论，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警察圈根本冲不进去。他决定在国会附近等，就像其他柏林人一样，他估计有50000人。

主要是男人，年轻的小伙子们。普洛特金觉得他们心情不错，不过并不是欣喜若狂。

他们在等待什么呢？



新总理施莱谢尔并没有出现在全体大会上，国务秘书普朗克代表他出席。

名誉议长卡尔·李兹曼是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将军。他说他在1914年坦能堡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他认为，如果不能让希特勒当

总理的话，那就是“世界史的厄运”落到了兴登堡头上。这位前战友在开幕词中这样说。他收获了左翼的嘲讽。

共产党代表马上说，大家一开始就没想与内阁妥协——不信任提案。但不信任提案并没有传播开来，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票数也阻止了事态立即激化。

赫尔曼·戈林再次当选为国会议长，议员们已经知道议会要延期了。施莱谢尔与大多数党派领袖已经讲过了。



国会大厦是个非常坚固的建筑，比勃兰登堡门要大很多——第一次来柏林的人都对勃兰登堡门感到震惊。对于威廉大街上的政治家，路途并不遥远。沿街道向下，在阿德隆酒店向左转，穿过大门向右，就能看到国会大厦雄伟的柱子。快点走的话，离总理府也许只有10分钟的路。

大门上写着“为了德意志人民”。威廉二世丝毫不掩饰他的厌恶之情，他称国会为“闲扯皮的房间”。在这里，社会民主党于1914年批准战争贷款，1920年，年轻的共和国国会在这里接手工作。决定德国命运的地方，是用石头砌成的。

也似乎是坚不可摧的。



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针对赦免政治犯和经济犯提出法律修改草案。如果这些法律条例通过，则有许多囚犯获释，包括一直被关押的卡尔·冯·奥西茨基。



警察把群众推向蒂尔加滕方向，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也被一起推了过去，他什么也做不了。

渐渐地越来越拥挤了。很快大家都意识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人们互相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没有人知道。突然，人们开始跑了起来。普洛特金意识到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意识到一种可怕的群体本能。大喊大叫，警察发出一声雷鸣般的咆哮。

普洛特金开始跑，就想离开这儿。

他想跑，这时他夹克衣领处被打了一下，一只拳头打到了他肋骨上，他看到了普鲁士警察的脸。警察正跟他吼什么，普洛特金叫了起来，他还从未这么叫过，特别大声地用英语喊叫。



布雷多的上司现在是总理，而且也保留着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所以他继续为施莱谢尔写“简报”。今天，他从很多拜访者那里听说，“人们在内阁里讨论了紧急状态下的困难，已经形成共识，防卫军在紧急状态下并不能应急，现在要抽出更多钢盔团成员，让防卫军马上就有更多储备”。

换句话说：这些“拜访者”建议施莱谢尔，不要与工会、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交好，相反要与德国保守党接近。德国国家人民党在国会选举中也许不能再得到太多选票——确切地说，在11月份只有8.7%——但和他们走得很近的又独立的战斗联盟钢盔团非常强大。一旦发生内战，这可不是个令人愉快的对手。



听到一个人这么喊叫，警察是不是很吃惊？还是因为他是用外语喊的？普洛特金永远都不会知道。不过没那么拥挤了。警察用红红的眼睛瞪着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然后——会有什么样的条件反射呢？——他把脚跟并在一起站直了。

“我不知道你是外国人”，警察说道。

请您告诉我，普洛特金说，这里都是和平的人，您为什么要驱赶他们呢？

警察没有回答。而是叫来另外一个警察，让人把普洛特金带到安全的地方。在勃兰登堡门，他被查了证件。在他离开时，一位官员给了他一个建议：“以后一定要远离人群。”



总理的游说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倾向保守的基督教工会总联盟主席本哈德·奥特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说：“没有人会错误判断施莱谢尔政府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事实如此，又有诸多的风险，因此人民代表为了经济和人民利益，使人民群众在一段时期内有内在的凝聚力，并要求政府建立一个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这是非常必要的。”

施莱谢尔可以希望，他的“交叉阵线”理念不久会实现吗？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晚上又在戈培尔夫妇家里度过。他们从容地讨论了整个局势。戈培尔后来思量道：“元首完全是个有艺术家似的敏锐的人。凭着准确的直觉，他瞬间就掌握了每一种情况，他的决定

总是绝对清楚，逻辑透彻。在他面前不能耍花招。即使施莱谢尔内阁也会撞得头破血流。”

戈培尔的确非常崇拜希特勒。

12月7日，星期三

黑色—棕色多数派；

新议会第一天——戈林又是议长；

新选出的国会召开会议，围绕着主席团人选问题，双方表决势均力敌。

《福斯日报》

与施莱谢尔的斗争开始了；

胡根贝格威胁/中央党等待/社民党重获勇气/国家社会主义党希望公开对决；

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议会策略家。如果不是关系到德国，人们就会赐给策略家们开放式独裁或内战，施莱谢尔已避免了这两种情况。

《每日评论》



对手在暗中窥伺。他们等着施莱谢尔的进展。总理看起来像是有个计划。此外他很勤勉，很精明。为了赢得信任，他似乎在所有地方同时谈判，用承诺来诱惑。他要瓦解前线，想唤起理解，他也想引起不安，削弱联盟，质疑既成的事实。他的计划是赢得温和的左派和中立派，以及他认为有价值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内的左翼，如果这一计划失败，他还有别的选择吗？兴登堡任命他是不情愿的。总统还能支持他多久？

施莱谢尔没有太多时间展示自己的进展——即使国会不给他找茬儿。



又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它在国会提出一项法律草案：如果总统因病缺席，谁来领导国家事务？目前宪法规定的是总理，未来应该是最高法院院长。

观察家们猜测，这难道是对施莱谢尔的侮辱？还是阴谋诡计？可能兴登堡也因此至今都不肯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因为如果他病了或死掉，希特勒也许会替代他。这一法律还要在新国会第一次开会时讨论。

这期间，大概两个星期前，奥托·梅斯纳也被卷入这场游戏。



国务秘书爱尔兰文·普朗克代表政府出席国会，施莱谢尔则于11：45召集内阁。施莱谢尔在部长面前陈述了他对国内政治的看法。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已决定容忍这届政府，这样就能实现国会中多数的支持了。从前布吕宁也面临过这种局面，他可以以紧急法令，用统治手段来解决。不过当时支持他的是社民党，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党。

内阁中有些人会问：施莱谢尔的信心源自哪里？前几天希特勒难道没有告诉他，希特勒的党除了自己的政府，是不会认可任何一个政府的吗？

施莱谢尔坚信，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是不会使国会瓦解的，因为党内现在正在进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是希特勒与斯特拉瑟之间的斗争。

的确如此：今天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争端激化了。



国会的第一次辩论非常温和，并不如预想的那么激烈，但是会场大厅之外却非常激烈。共产党人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走廊里恶语相向，互相攻讦——然后人民代表打成一团。一名共产党议员将一部电话机扔到了一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头上，这就是导火索。不久痰盂也飞了起来，拳头乱打，烟灰缸和桌面被当作盾牌。窗玻璃碎了，吊灯也坠了下来，许多议员都受伤了。

德国国会又召开了。



戈培尔似乎对这场打斗感到高兴。他在日记中抱怨议会的日常生活，抱怨党团会议和全体会议，报怨表决——他记录道：“在此期间，我们和共产党之间在讲坛上和走廊里有一场血战。”他们的人有一人受重伤，戈培尔记录道。对于对方的损失，戈培尔没有做任何记录。



“咆哮怒吼，我们越来越巴尔干化了，”保守派议员库阿茨晚上写道，“纳粹和共产党之间的斗殴。”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政治上“完全依赖于中央党”。但是施莱谢尔“情况更糟，因为中央党、纳粹和共产党都不是好惹的”。

情况糟糕？施莱谢尔早上跟他的内阁可不是这么说的。



晚上6点钟，瓦尔特·拉特瑙协会（Walther-Rathenau-Gesellschaft）成员在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大厅开会。哈利·凯斯勒伯爵被授予银质奖章。这个知识分子做了报告：“拉特瑙和机械时代的人”。瓦尔特·拉特瑙在被右翼激进分子谋杀前担任魏玛共和国外长。他把自己的身心和信心都献给了共和国，是个很多人都信任的政治家。



国家社会主义党筋疲力尽，异常紧张烦躁起来。在恺撒霍夫酒店，希特勒和斯特拉瑟正在进行激烈争论，这是几天之内的第二次。

最后，斯特拉瑟收拾他的东西，招呼也不打地离开了房间。回到酒店房间，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他宣布辞掉党内所有职位。

如果斯特拉瑟想开战的话，那么这就是战争宣言了。

他现在要做什么？党内有谁会跟着他呢？他要铤而走险，将决裂公之于众吗？

12月8日，星期四

无论怎么吵还得工作。

代理法案在国会获多数通过。

《福斯日报》

这个星期三的国会会议以一个漂亮的噱头开始，就是会议秘书的选举。胡根贝格先生甚至以291票当选为会议秘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安慰奖。从部长事务办公室领导和总理候选人沦为会议秘书——这就是他的职业生涯。

《抨击报》



阿道夫·希特勒早上接到了斯特拉瑟的一封信。这位党的同志在信中写道：先让德国陷入混乱，然后开始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他不想再参与到这一政治中去。他辞去党内所有职务，作为普通士兵退出这场运动。

另外，斯特拉瑟还宣布从柏林动身去国外。他顺便还透露，说他还是忠于运动的。

这封信引起了党内领导层的恐慌。



中午，希特勒了解到斯特拉瑟在党的7名地方监察官^[3]面前陈述了辞职理由：希特勒想独自一人坐上总理的宝座，他认为希特勒这一策略是不合适的，错误的。这时希特勒把那7位同志叫到恺撒霍夫酒店。他驳回了一切对他方针的批评。



这些日子充满着暧昧的提议、密谈以及公开的争吵，在这种日子里，是否还有正常的人的情感冲动？

当其中一位政治家经过彻夜无眠，疲惫不堪，早上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受不了。这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还能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艰难时期，但是这种权力的斗争正是人的作品。

是否有人因压力而胃疼，并问自己，该如何承受这一切？他们其中之一是不是每个晚上都喝了太多的烈酒，好让思想暂时停止？阿道夫·希特勒能睡通宵吗？他做梦吗？梦到了什么，又梦到了谁？梦到了斯特拉瑟吗？

我们不知道。

斯特拉瑟是个糖尿病患者，而且在一次滑雪受伤后就要拄拐杖了。他在苦思冥想接下来要做的事吗？因为他感到他必须建立一种声望来除掉对手。他想当革命者吗？或者他只是很开心这一切都能很快过去？如果他现在跑掉，事实上就是投降，他知道吗？他是怎么想到离开柏林向南走的呢？

这些我们也不知道。



德国基督教工会代表来到总统这里。梅斯纳做会议记录。兴登堡已经知道这些人的立场了——人们在物质及伦理上面临艰难处境。他也有那种有事情要发生的预感了。他了解这些要求。毕竟工会的人宣称，他们对施莱谢尔内阁充满信心。

兴登堡向他的客人保证，他对人民和小人物永远满腔热忱。“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贝拉·弗洛姆在埃及大使哈森·纳哈特·帕莎处进餐。真是一个愉快的聚会。坐在她旁边的是美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报业集团的特约记者卡尔·冯·威甘德。他是个老朋友，当权力关系有所变化时，他有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第六感。弗洛姆想，每当一场政治剧开始的时候，可爱的卡尔准会出现在柏林。

“国家社会主义党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政府呢？”弗洛姆问邻座的卡尔。“不会太久了”，卡尔这样回答。威甘德是极少数真正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他第一次采访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是认真的。贝拉·弗洛姆亲切地称威甘德为“老预言家”。威甘德说得对吗？难道希特勒这么快就要当权吗？他不是刚刚才失败吗？



晚上，希特勒拜访戈培尔夫妇。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绪，全都非常沮丧。他们担心党会分裂，多年的工作都付诸东流。

这时电话铃响起，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是一个线人。党内形势越来越尖锐。希特勒必须立即回恺撒霍夫酒店。

夜里2点钟，戈培尔的电话又响起来。“元首”正在等他。马上！戈培尔马上出发，在酒店里，他先碰到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此急迫的原因是：《每日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斯特拉瑟宣布辞掉所有职务。直到发文章时，他辞职的事都还是秘密！



在恺撒霍夫，他们彻夜苦思冥想。紧急会议。他们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6点。可怕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各区传来。党内起了骚乱。斯特拉瑟的诡计动摇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基础。据说斯特拉瑟坐在埃克

塞尔西奥酒店（Hotel Excelsior）中，朋友们和联盟者簇拥在他身边。他们要做什么？

他的“元首”却显得非常苦闷，正如戈培尔后来所写道，“被背信弃义伤得很深……面对如此多的卑鄙行径，我们都傻了。背叛！背叛！背叛！背叛！”

背叛？斯特拉瑟到底做了什么？

谣言四起。恺撒霍夫酒店的走廊和吧台上，人们都在说，就连希特勒的副官威廉·布鲁克纳都赞成进入政府。

阿道夫·希特勒内心波澜起伏。这是决定性的一刻，这是肯定的。难道不就是要在这种时刻展现一个人的真正面目吗？

“如果党分裂了，我3分钟之内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希特勒对戈培尔说。

约瑟夫·戈培尔呢？他也在倍受煎熬，这一天他只睡了2个小时。

12月9日，星期五

戈培尔嘲讽斯特拉瑟。

《福斯日报》

我们要求努力创造财富的人民享有生活的权利！废除帕彭紧急法令！
国家社会主义党反对无法承受的养老金与工资缩减。

《人民观察家报》



早上整个柏林都在骚动。威廉大街上报童吆喝着轰动事件：斯特拉瑟接管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每日评论》中这样写道。恺撒霍夫的大厅里，人们站在一起讨论着。空气中满是躁动不安。变革。

在安哈尔特火车站，一名列车员看到斯特拉瑟已经登上了去慕尼黑的火车。

斯特拉瑟要在慕尼黑做什么？



还有一个人说，国会已经没有执行能力了：在第三次宣读法律草案时，全体通过了法律，该法律重新规定在总统患病情况下的代理问题——并不是由总理，而是由法院院长来代理。修改宪法要取得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票数远远超出了这一要求。

议员们也通过了特赦法草案。卡尔·冯·奥西茨基会因此被释放吗？

国家社会主义党议员汉斯·弗朗克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预言：“此外，阿道夫·希特勒在几个星期之内会在德国取得权力。”其他议员嘲讽的笑声迎面响起。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与社民党和工会的一名农业顾问会面，他们谈了很久。为什么这么多德国人在挨饿？普洛特金问，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这位农业顾问叫巴丁，他回答说，其实有足够多的食物，问题是人们买不起了，食物都在仓库里腐烂了。



希特勒现在要不顾一切地进行他的计划。

他努力防止党内分裂，让国家社会主义党媒体传播下面的消息：“党员格里高·斯特拉瑟经元首同意，休三个星期的病假。所有相关的各种版本谣言都是不准确的，没有任何基础。”全国组织领袖（Reichsorganisationsleiter）的权力范围立即被重新分配。希特勒自己接管组织工作，戈培尔将来的职责范围是“人民教育”（Volksbildung）。斯特拉瑟的联盟者被取消职位。所有在柏林出席的领导都必须签署一份忠诚宣言，不能有异议。



会议结束时，国会决定无限期休会，一直到元老委员会（Ältestenrat）^[4]和国会主席团再次召集。只有社民党和共产党投反对票。

虽然委员会的工作在继续，但是圣诞节休战在节前15天开始了。

这对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来说正是时候。现在他可以在收音机里朗读他的政府宣言，而不是在国会中那些吵吵闹闹的人面前朗读。



晚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党的干部聚集在国会议长宫（Palais des Reichstagspräsidenten）里，赫尔曼·戈林就住在这里。

希特勒就斯特拉瑟及其背叛进行了激烈的演讲。“如果您也想离开我，那么我毕生的工作和为之而进行的斗争将不再有意义，我们的运动也将破产。”他对着大家大声疾呼。

每个人都向阿道夫·希特勒伸出了手。

他们每个人都向党的“元首”发誓效忠。一幅团结一致的画面。强令之下产生的效忠。



晚上，议员汉斯·弗朗克在恺撒霍夫酒店见到了他的“元首”。“您可不是个好律师”，希特勒说，他影射的是弗朗克在国会的预言，说国家社会主义党不久就会取得权力。“您今天的演讲说对了，而且接近事实，不久就会实现。”希特勒认为律师通常不说实话。在涉及重大的、令人轰动的案件时，弗朗克一直都是希特勒的人——他领导着国家社会主义党右翼。

不久，希特勒离开首都，前往布雷斯劳（Breslau），他还命令戈林和戈培尔处理斯特拉瑟事件。

晚上，约瑟夫·戈培尔写道：“斯特拉瑟被孤立了。这个该死的人。”

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公开与斯特拉瑟决裂。他像平常一样，总是推迟做不愉快的决定。也许他还会再需要格里高·斯特拉瑟？



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国家社会主义党并没有分崩离析。

12月10日，星期六

将军还是将死？

格里高·斯特拉瑟的反叛。

《福斯日报》

全国组织领袖格里高·斯特拉瑟的休假，让德国所有敌对者都觉得离希望越来越近了，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分裂自我毁灭。德国所有敌对者的希望都徒劳无功！所有人都发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

《抨击报》



“冬天来了，” S. 费舍尔出版社的审稿人奥斯卡·罗伊克，同时也是诗人，在日记中写道，“外面阴暗，松树都成了剪影。地面冻结，最后的菊花还带着一抹颜色挂在茎上。”



领导们在总理处开会。施莱谢尔需要尽快取得对抗失业的成功。君特·格瑞克，国家主管劳动的新专员，要尽快拿出些什么。针对此议题，由内阁成员成立了委员会。针对一些迫切性议题，如东部援助（Osthilfe）和农村地区问题，也成立了委员会。普鲁士东部如何帮助贫困农民的问题是很棘手的。这一区域都是普鲁士的空克，他们是大地主，政治上重量级的人物，是兴登堡的朋友。甚至总统在那里还有一个老庄园，那是工业家和大地主送的礼物。

总理本人想担任委员会主席，但这个会议他必须提前离开。

他还说，格瑞克，请您今后要参加内阁所有的会议！

格瑞克不是部长，但格瑞克是能帮施莱谢尔的人，他可以帮施莱谢尔把一切流毒从德国清除。



威丁是柏林典型的工人区，这里门挨门住着不少冲锋队和红色阵线同盟的人。1929年5月1日，普鲁士社民党政府警察开枪向游行工人射击，15人死在街头。“红色五月”，还在所有人的记忆中，痛彻骨髓。

在阔斯里纳大街，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注意到，高大的住宅区那样密地挤在一起，那么密，狭窄的院落几乎进不来光。

在2号房里，一群孩子围住了他。“有多少人住在这里？”他问陪同他的人。

“80人住在这里。”

“他们中有多少人工作？”

“5个人有工作。”

公共厨房里一个叫汉斯的人带着他。汉斯20岁，看起来和美国青年人一样，只是更忧伤，更有见识。他们跟着打火机的光穿过黑暗的走廊。一只老鼠窜到一边。敲了一下门，一个女人开了门，认出了汉斯。现在是下午2点钟，但是走廊里黑得像深夜。

舒纳女士请他们进来。她11岁的女儿过来了，行了个屈膝礼。

“我们快受不了老鼠了，”舒纳夫人说，“把我们仅有的一点点食物都给吃光了。”她丈夫正试图找到房管员。普洛特金看到墙上的湿气，胃里痉挛到想吐。屋里有一股浓烈的热乎乎的尿臊味。

这个家庭有四口人，两个房间，23马克的房租。他们每月从慈善机构得到60马克。通常会有白菜汤喝，有时会有土豆配鲱鱼。星期天，桌上会有肉，四个人吃一磅肉。很少会有牛奶。孩子们当然需要牛奶，不过就是没有。

美国来的客人和他的陪同再也受不了了，就离开了这座房子。这里为什么这么臭？普洛特金问道。他们继续向后走，走到公寓楼的后院。他们站在一个院子里，面前有两个装牛粪的坑。拿着粪叉的人正在往车上装冒着热气的粪。后面的马厩听到马蹄踢地的声音。

他们上了楼梯。这是格润一家。上面住着富哈特夫人和她的七个孩子——五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富哈特先生是冶金工人，但四年前他就没有工作了。

他们离开阔斯里纳大街时，汉斯说：“在柏林还有其他更糟糕的地方。”



约瑟夫·戈培尔再次应对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所负责的区域财政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节约措施及强制管理”，他在日记里倾诉。



游说者来自四面八方。施莱谢尔接到一封来自“德国工人、职员和公务员联盟”的信。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对抗失业，为当前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提供充足的援助，防止工人进一步减少收入，制定公正的税收政策，以及促进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复苏的贸易政策。

对于这封寄到总理府的信，回信要避重就轻而又友好。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写的。这是一场持久的防守战。各种突围方式。但是总有一天要改变。总有一天，得让德国总理喘口气，休息一下吧。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在恺撒霍夫酒店说起，马丁博士昨天在斯特拉瑟家中探访了他。斯特拉瑟，冷静中有些认命，据说他说了一些痛苦的话：“马丁博士，我是个被死神打了烙印的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再互相见面了，为您考虑，我建议您不要再过来了。无论发生什么事，请您记住：从现在开始，德国将掌握在一个奥地利人、一个从前的军官，以及一个跛子手里，这个奥地利人是个十足的谎言家，军官是个变态，跛子是他们中间最糟糕的一个。他是变成人形的魔鬼撒旦。”

“变态”说的是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从前的头目，他的同性恋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跛子说的是戈培尔：斯特拉瑟的老对手，和他争夺希特勒的青睐。



贝拉·弗洛姆在右翼阵营这边并不受欢迎。因为她有犹太人血统，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无论如何都鄙视她。现在连钢盔团的领袖也说她的坏话。在一个有匈牙利大使的社团中，反动的战争联盟代表人提奥多·杜伊斯特贝格也斥责她。“您太左了，”他盛气凌人地对她说，“我不想我的名字出现在您的报纸上。”

贝拉·弗洛姆垂下头，不去理这些。然后又驳斥道：“我希望钢盔团不要太晚恢复理智啊。”

此外，杜伊斯特贝格还是个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



在国防部，人们坚信从11月末的“模拟游戏”的灾难性结果中得出了教训。

冯·布雷多给施莱谢尔写信：“关于防卫军和公共服务部门（Zivilressorts）内部紧急状态的一些问题还需要澄清。”他还附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多个部门的，信中要求他们与国防部部长一起讨论这件事。

防卫军为所有情况做准备，包括极特殊情况。这不再是模拟游戏了，这是一次操作计划。

12月11日，星期日

国会咨询第一部分已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在与社会反动派及司法恐怖的斗争中取得成功。

我们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同志们！

《人民观察家报》

日内瓦的新政策：

针对和平条约的平等权利——法国同意了——柏林什么意见？

《福斯日报》



现在白昼缩短了，天亮得晚，却黑得很早。柏林的空气肮脏又灰暗。天空乌云密布，有点雾，非常冷。

还有两个星期就过圣诞节了，柏林的圣诞市场开放了，开始卖圣诞树了。一棵长得不错的树卖1.5~2马克，价格比去年低一些。这是节日前的一个好消息。



终于，总理施莱谢尔也收到了好消息。日内瓦关于裁军的谈判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将给予德国军事平等权利，条件是所有国家的安全要得到保障。

不管这具体意味着什么。

但是从瑞士到柏林的消息却是明确无误的：长期制约魏玛共和国的《凡尔赛条约》渐渐瓦解。激进的右翼很快就不再有那么多的争论。防卫军可能会多些士兵，这样共和国才能抵抗内部的敌人。昨天，外长们谈了几个小时。现在，有一份签了名的声明。外长牛赖特说，这已经取得了最大成效。施莱谢尔通知：签字！他没有向部长们征求意见，他根本都没有告诉他们。



年轻的女诗人玛莎·卡乐可，1907年生于西加利西亚，在犹太社区中心的女子学校上学，后来在德国犹太组织“工人福利处”从事办公室职员的培训工作。1928年，21岁的她嫁给了比她年长9岁的记者索尔·阿隆·卡乐可，卡乐可是个美国人。一年后，22岁的她开始发表诗歌。现在她把一本诗集卖给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 Verlag），下个月就会问世：“抒情的随笔小册子，来自日常的诗句。”

30年代初，她出入于文学咖啡厅，第一次得到了女抒情诗人的称号。柏林“罗曼斯咖啡馆”是个著名的艺术家聚会的地方，在那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与她攀谈。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剪下她在报纸上

发表的诗，并收集起来。“给我看看您所有的诗”，他跟她第一次见面时说。她将获得销售额的10%，并得到200马克的预付款。

第一场雪

一天早上，房间亮了起来，

你忆起：又到了这个季节，

降温了，雪也降下来。

——又到了嗓子痛的季节。

……真想再回到十四岁：

圣诞假期……带着雪橇出去！

如果某处有一所小房子，

我们就不用流鼻涕。

门前几株积了雪的冷杉，

离城里还需要好长时间。

没有办公室，没有电话。

——几乎没有必须要做的事。

……几天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有几个小时，什么也不知道。

不属于你的东西，

又谈什么失去。



这个星期天，施莱谢尔在国防部，最重要的人还在工作。布雷多在给施莱谢尔准备广播讲话。他写道：“我认为有必要向各方各派提醒一点，军事任务并不是青年和党派的事情，而是由防卫军专门全权负责的事情。”布雷多是军官——慢慢地，也像他的总理一样。党派的私有军队会使他感到恐惧。但是如何削弱冲锋队，并让这些训练有素的军人为国防服务，并与共产党斗争呢？怎样才能不完全激怒国家社会主义党，又在施莱谢尔的讲话中阐述这一点呢？布雷多挖空心思内容，表述让别人去做。他不是个善于修辞的人。他的上司施莱谢尔也更关注事实，而不是情感方面的言辞。这值得吗？他的几个知己担心施莱谢尔的讲话对于选民来说后果会很严重。但是还有四天时间用来斟酌语句。



即使在国外，大家也想仔细听听施莱谢尔要说什么——特别是在美国。喜欢数字的记者克尼克博克认为，德国对于美国来说，关系到40亿美元。这笔巨款超过美国国民财富的1%，超过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投资。他还引用了更多事实：38%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来自美国的。因此，共和国的垮台、政治风向往极右偏转或共产党独裁将是由此而来的一场灾难。人们必须致力于在国家中保持私人资本主义。



英国作家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观察了柏林购物街圣诞节前的熙熙攘攘。他写道：“整个陶恩沁恩大街站着许多人，他们在兜售明信片、鲜花、歌曲本、发油和手镯。圣诞树在电车站台间堆着。穿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把募捐盒弄得嗒嗒作响。满载警察的货车在小巷中等着，现在，人群的每一次聚集都可能发生一次政治起义。”



来自美国工会的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已来德国几个星期了。他一直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解释极端分子的崛起？“每个人都告诉我德国中产阶级破产了，”他若有所思地记录着，“可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很难反驳。我所到之处，店铺都开着门，很少见到空荡荡的店铺。我在美国正常时间看到的空店铺比这里非正常时间看到的还要多。”



“西部百货大楼”，也就是柏林选帝侯大街的卡迪威（KaDeWe），节日生意红红火火。儿童溜冰鞋3.5马克，电动烤面包机9.75马克，带闹钟的夜光旅行表12.5马克。今天，装点节日气氛的百货大楼一直开到晚上7点钟。三楼举办冬季运动展。卡迪威找来了名人进行促销，甚至请来最有名的女演员莱尼·里芬斯塔尔在那里签名。今年如期上映的《蓝光》（*Das blaue Licht*）还由她出演，她本人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剧中，是个冷美人。此外，她自己也担任导演。以《白色沉醉》（*Das Weiße Rausch*）还有《帕鲁峰的白色地狱》（*Das Weiße Hölle vom Piz Palü*）而闻名，里芬斯塔尔当然最适合冬季展了。



奥托·梅斯纳，兴登堡的国务秘书，会见了美国大使。他对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说，希特勒和斯特拉瑟之间的决裂“非常严重”。斯特拉瑟和弗瑞克已经做好准备，并愿意支持施莱谢尔政府。“国家的大部分”都是支持施莱谢尔政府的，国会是“可塑的”，也许从现在到复活节要休会，梅斯纳对此很满意。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明确的信号。施莱谢尔坚定地坐在宝座上，迎来了平静的几个星期——自身的人事问题被掩盖起来。

还是梅斯纳想麻痹来自美国的、神经紧张的放贷人？

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萨克特说：总理冯·施莱谢尔用“手腕和能力与周围的人周旋，这些手腕和能力与他前任挑衅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目前的平静可能就是这样达到的”。但是“预言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公开分裂还为时过早”。



欧司朗在报纸广告专栏为“电动圣诞蜡烛”做广告：“这种蜡烛不滴蜡油，易于安装，价格便宜，只需要购买一次。和真蜡烛一样可以渲染气氛。无火灾危险。”



罗沃尔特出版社推出了汉斯·法拉达的新书。《小人物——怎么办？》（*Kleiner Mann—was nun?*）已经印刷了35000本，每本卖4.5马克。故事发生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讲述了普通人的困境。这部小说的英雄是会计师约翰·品内贝格，他的女朋友爱玛为他怀孕，他就与之结了婚。二人过着快乐的生活，直到品内贝格失业。一场震撼人心的戏剧。

在这种时候——人们会愿意读这样的书吗？



这时社民党也发生了一场戏剧。社民党想保卫共和国，却不知道该怎样做。它受到来自左右两派的压力。共产党抢走了它的选民，国家社会主义党削弱了它国旗团的成员。施莱谢尔呢？如何与新总理周旋呢？

古斯塔夫·诺斯克，汉诺威行政区最高长官，他主张与施莱谢尔合作。工会的莱帕特先生和格拉斯曼先生也想如此，他们已经在与新政府会谈。由于帕彭的普鲁士政变，普鲁士的内政部部长卡尔·泽韦林于7月20日被强制解职，此后，他只是有名无实。现在就连他也表达了容忍新内阁的意见。但是，许多年来一直支持魏玛共和国的老社民党却不能成功地形成一个统一方针。讨论继续进行。



自今年6月以来，兴登堡住在总理府，威廉大街77号，这里是尊敬的奥托·冯·俾斯麦从前的官邸。引退的总理帕彭仍然舒服地住在威廉大街74号的内政部，他的公务住房中。施莱谢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法国的外交职位，他拒绝了。这也是兴登堡请求的结果。如果总统有紧急事务需要他，他也只需带着花园大门的钥匙，步行数十米穿过外交部的草地来到总统和他儿子奥斯卡的私人房门前。

对于新总理施莱谢尔来说，这真是一种不能忍受的状态。虽然他可以把帕彭从住处请出去，自己搬进去。可是这样就会成为一个轰动事件，媒体及政治对手会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件事。国防部在本德勒大街有一个公寓，此时，施莱谢尔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刚入住这一公寓。

本德勒区离威廉大街有很远一段路，但这么快又搬家也没必要，况且还要带着伊丽莎白与前夫11岁的女儿，还有多年的厨子玛丽·君特尔，以及两只腊肠狗。



兴登堡的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直到最近一直和他的家人住在总统府，对兴登堡来说招之即来。现在这么热心服务的人也搬到了本德

勒大街，因为总统府在装修。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从大老远赶过来，只探讨几件事，互相说一些关于国会政客的闲话，反复思考一些忧虑，想出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兴登堡的确任命施莱谢尔当了总理，但是他却更愿意在深夜里跟帕彭闲聊政治，而不是跟梅斯纳。



施莱谢尔知道这一点——而且为此忍受着折磨。帕彭在打什么鬼主意？他总是习惯称帕彭为“小弗朗茨”，而且他相信自己使帕彭失去了影响力。

施莱谢尔吩咐他在国防部的人监听总理府的电话。对于国防部的专家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监听也是为国家着想，施莱谢尔要保卫祖国免受灾难。但是兴登堡用不了电话真是糟糕。总统有什么需要告知的，就写在小纸条上。他把记录一些想法的笔记本锁在卧室的保险柜里。



晚上，约瑟夫·戈培尔登上火车，他要去慕尼黑。一整天他都在他的管辖区动员所有官员向希特勒效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并在勃兰登堡区会议上做了2个小时的演讲，用最严厉的言辞批判了脱党者。在车厢里，他放松下来，读报纸。他听到外面走廊里有人窃窃私语。这让戈培尔好奇起来。他打开门。啊！他的“元首”站在他面前。希特勒从莱比锡来，在萨克森，他要求他的政党与破坏分子做斗争。戈培尔无比钦佩这种果敢。

12月12日，星期一

新的裁军基础；

协议陈词滥调：承认平等权。欧洲和平协定——德国重返会议。

《福斯日报》



国家总统兴登堡邀请大家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接待了议长戈林和普鲁士议会议长汉斯·凯尔。施莱谢尔和梅斯纳也来了。

是关于普鲁士政变的事，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整个法律界都在忙这件事。这里只有这些记录：戈林说，在普鲁士组建政府非常迫切——因为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要求这样做。兴登堡回答道，他不允许在国家和普鲁士邦之间出现权力斗争：只有普鲁士的新总理同时也是国家政府成员，他才允许。他难道是想通过这个办法诱使国家社会主义党来支持他吗？

国家社会主义党要求：戈林必须成为普鲁士省长。但在国家政府中，他们只接受希特勒做总理——因为这是希特勒一直坚持的。

形势失控。



在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所住荷兰多恩（Doorn）的房子中，仆人们制服了一个入侵者。下午，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这个人爬到了房子的墙上，溜进了房子里。工作人员在塔楼里发现了她；警察逮捕了他，并在他身上发现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警察认为，这个人计划谋杀流亡中的君主。



国会预算委员会会晤，主题是为生活困苦的人提供冬季援助，以及他们的财政问题。国家人民党议员莱恩霍尔德·乔治·库阿茨观察着各个党——国家社会主义党、社民党和中央党——竭其所能，用尽手腕。所有人都试图掩盖在冬季援助方面的退缩。库阿茨确定施莱谢尔政府处于优势地位，所有党派都对议会的重新解散和由此进行的新选举感到恐惧。即使共产党也显得格外驯服。



汉堡“布洛姆福斯”（Blohm+Voß）大型造船厂抱怨生意不好，企业盈余比上一年减少一半。今年股东没有分红。由于没有新订单，明年的前景看起来一点都不好。造船厂的管理者们费力地开始一些项目，至少让一些工人有活干。为美国富豪打造的一艘豪华游艇“撒瓦罗纳号”刚刚下水，目前在建两艘汉堡—美国航线的柴油机船。可是此后怎么办？



晚上，社民党成员在斯图加特会晤。库尔特·舒马赫从柏林赶来，为他家乡的同志们讲述了一下这些天的印象。舒马赫，38岁，社民党的接班人，严厉斥责“施莱谢尔式的精神变态”延伸到德国媒体。新总理代表进步和放松，但是我们不要被蒙蔽。施莱谢尔是“本德勒大街的办公室的波拿巴”，并不是帕彭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不管一切现代浪潮，他是个专制国家的人，一个反民主主义者，一个君主主义者，一个被自身渊源和等级所禁锢的人”。所以舒马赫要求，社民党要百分之百地与之对抗。

舒马赫是社民党中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大家都认为他富有进攻性，是党内坚定的人物之一。他严厉拒绝对于帕彭的前任布吕宁的容忍政策。他也与国家社会主义党一直对着干。在全体大会的讲坛上，

他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鼓动为“呼唤人内心深处的魔鬼”。从那时起，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就开始恨他。他也必须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他在家乡斯图加特领导社民党，即使在那里，没有国旗团的贴身保镖他也不敢再活动。他也不再在城堡花园咖啡馆、小酒店或人气很旺的餐厅会见同志，而是在私人住处。安全当然才是最重要的。



在格拉德巴赫—瑞德，这个晚上是在一场斗殴中结束的。很多冲锋队队员讨论希特勒和斯特拉瑟之间的争执。一伙人将斯特拉瑟被迫离开称为丑闻，另一伙完全支持“元首”的队员殴打了他们的同志。队长试图阻止同志们的斗殴，但是徒劳无功。直到警察来了才解决问题。

12月13日，星期二

针对日内瓦的德国行动计划；

防卫军的安全、裁军和变革。

《福斯日报》

权力或是斗争？

元首不妥协的政策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区产生了暴风雨般的共鸣。

《人民观察家报》



早上10点钟，第一届“圣诞展会”在柏林莱尔特火车站开幕。对于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来说，给他们的情人买礼物是义不容辞的

事。接下来的三天，展会将开到晚上10点。6点到7点，福泽尔乐队奏军乐。门票25芬尼，无业人员和儿童10芬尼。



弗朗茨·冯·霍尔奥夫将军，国家社会主义党军事办公室在慕尼黑黑褐宫的领导，他给威廉王储写信——施莱谢尔收到了这封信。

“昨天在与弗瑞克单独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后，”霍尔奥夫倾诉道，“我确定他与斯特拉瑟极端对立。格里高·斯特拉瑟还是远走了，他今晚从罗马打来电话。由于孩子们的缘故，圣诞之夜他想回来。”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事态会怎样发展呢？弗朗茨·冯·霍尔奥夫对此进行了思考，也思考了怎样阻止希特勒：格里高·斯特拉瑟必须站出来领导运动。然后希特勒必须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决裂，而不是和斯特拉瑟。他最后提出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如果殿下或冯·施莱谢尔先生目前有什么想告知格里高·斯特拉瑟的，我可以随时效劳。”



贝拉·弗洛姆在“柏林外交官”栏目中说起美国大使夫妇宴请宾客的事情。萨克特夫人，一位非常高贵的女士，她邀请大家去玛格瑞特汉斯大街19号。几乎所有大使与领事都到了，他们中有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男爵夫人冯·牛赖特，即外交部部长的夫人，还有国务秘书梅斯纳的夫人也在客人之列。高级官员们也参加了节日庆祝会，其中包括哈玛施坦因和上校布雷多。

贝拉·弗洛姆喜欢这个布雷多，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对防卫军的官员没有抵抗力，而且因为布雷多还是个老朋友，并且很能干。她经常与布雷多见面，最后与布雷多的上司，也就是冯·施莱谢尔也成了亲

密的朋友。对于施莱谢尔，这个女记者简直是崇拜。他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个有远见的男人，偶尔非常辛辣，但是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的笑声真是悦耳——笑起来也好看。可惜的是，这个“永远的单身汉”去年结婚了。尽管如此，他与贝拉·弗洛姆仍保持非常私密的关系。不用打招呼，她也能随时去他那里——这是将军的一个指示。“您一直都是我忠实的同志”，有一次他对她说，并抚摸着她的手臂。



防卫军小组和军事地区指挥官的会议开始了。施莱谢尔发表简短演说。还要努力争取达成与斯特拉瑟领导下的纳粹的合作。如果希特勒不成全，就会发生斗争。“这可不仅仅是被蚊子叮一下！”施莱谢尔喊道。他说得很暧昧，但是却谈到“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允许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媒体报道称国家社会主义党不断获得政府职位，现在，军官们不必为此感到奇怪：为了击溃他们，施莱谢尔说，必须要给他们责任。总理在他的军官精英面前表达的意思，希特勒应该不久就会知道。毕竟他在国防部有很多支持者。施莱谢尔当然知道这些。像他这样的人都喜欢通过关系沟通。



戈培尔还在慕尼黑。有消息从柏林传来。终于有个开心的理由了。他最喜欢的宣传工具《抨击报》在一年里的盈利是6万马克。这样，他管辖区里的一大部分债就能还上了。



社民党主席的一个宣传单上罗列出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发动的军事干涉。“阿尔特马克^[5]现在还一直有显著的纳粹恐怖。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次选举，纳粹入侵我们的集会，四处抢夺话语权。我们的农业工人害怕恐怖袭击，这种恐怖袭击总是会引起裁员，如果他们都在当地，就得忍受这一切。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冲突，我们在阿尔特马克几乎天天都有报道。我们的官员几乎都不敢出去，因为他们总是不得不想到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

社民党主席建议，礼堂将来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加强防护。

12月14日，星期三

希特勒的明星的坠落。

《福斯日报》

两个内阁垮台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

《抨击报》

与人民的敌人不存在休战！

《红旗报》在第50次被禁后又投入战斗。

《红旗报》



晨报宣布，总理施莱谢尔将于明天，也就是周四在广播里发表就职演说：晚上7点钟，播音员的声音将在整个国家传播。整个演说将持续一个小时。在美国可以听到简短的英文版本。



11点钟的部长会议，施莱谢尔当然是第一个发言人。他首先向所有人宣布：不要给报纸杂志的圣诞及新年特刊写东西！这在过去几年一直制造麻烦。不要留下话柄。目前一切已经很复杂了。不要有任何轻率的行为！以往几届政府都不堪其扰。

问题是：长久以来，施莱谢尔并不信任他内阁中的所有部长。他很想更换由帕彭任命的一些官员，可是兴登堡并不一定配合。施莱谢尔只能与那些能接受旧的官员的人一起统治。

最紧迫的话题是冬季援助。社民党要求，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从12月到次年4月每个星期得到2公斤面包，还有半公斤肉和1000公斤的煤，这些费用由国家承担。国家将为此花费4亿马克。作为反对党，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提出这些要求。但是对于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来说很清楚的是：这显然与国家财政状况不一致。他向议员宣布，政府只在财政能力范围内提供援助。他的建议是：已经降了价的煤和肉再继续降价，这样冬季援助的额外费用只需要2000多万马克。

那面包和牛奶怎么办？内政部部长意识到这种分配对于后勤有多么复杂。部长们陷入争执。

最后施莱谢尔终止了争论。主管的部长们在小范围内讨论面包和牛奶怎么处理。然后他要求内阁考查一下，怎样解决依靠小额保险金生活的人的困境。这是总统的意愿。劳动部部长马上建议提供180万马克援助。

兴登堡的意愿对内阁来说就是命令——总统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干涉日常政治。施莱谢尔没有选择。兴登堡想做的，他必须执行。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慕尼黑审查他们的一份杂志。《观察家画报》今后不允许再出现。这份刊物上印了个图画故事：“人与性格：格里高·斯特拉瑟”。四幅图片展示了斯特拉瑟站在讲坛旁，有力的手势，伸出的食指，伸展的臂膀。在一张图片上，画面定格于“元首”在上斯陶芬拜访斯特拉瑟，因为斯特拉瑟滑雪受了伤，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痊愈。这一段说：“我们都认识他，这个穿着褐色衬衫的巨人，在政治斗争的暴风雨中如橡树一样屹立的人，格里高·斯特拉瑟，典型的巴伐利亚人，身材魁梧，性格和精神都坚强有力：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即便是最仇恨他的反对者，对他的尊敬也油然而生。”这可真是不合时宜。



德国工业界都在悲伤，他们为帕彭政府感到悲伤。德国工业协会会长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协会主要委员会议上说：“我们希望施莱谢尔政府小心维护帕彭计划的基本原则，小心处理这个或那个集团的修改意见，最重要的是防止危险的信贷及货币政策。”克虏伯，共和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又说：“就此而言，我由衷地说，冯·帕彭先生在职期间所做的一切非常值得感谢——不仅狭义的工业界，广泛的民众圈子都要为此致谢。”

信息很明确：施莱谢尔应该继承帕彭的亲工业界的政策。但施莱谢尔认为亲工业界政策将德国推向了内战边缘。



总统为冯·恩斯特·刘别谦^[6]夫妇安排了一次活动，奥托·梅斯纳做东道主。这种活动当然少不了贝拉·弗洛姆。她对刘别谦评价甚高，认为他是个卓越而又有趣的导演。40岁，早已征服好莱坞，拍摄了很成功的电影，成为沙龙喜剧大师。仅在今年，就有《乐园的烦

恼》（*Ärger im Paradies*）、《和你一小时》（*Eine Stunde mit Dir*）、《如果我有100万》（*Wenn ich eine Million hätte*）三部电影上映。贝拉·弗洛姆委婉地问刘别谦为什么不想在德国长住。“已经过去了，”他回答，“我要去美国，长久来看这里没有什么好的了，在好莱坞，每天阳光普照。”



间谍防卫开始了。一份电报呈交给了施莱谢尔，这是他的密探截获的。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部长的防卫军军事情报部门监视一些主要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其中也有赫尔曼·戈林，毕竟他是议长。如果间谍活动突然暴露，当然是个确确实实的丑闻。但是这一活动并没有暴露。施莱谢尔并不情愿分享他所知道的事情。充其量也只能在小圈子里讲一下防卫军军事情报部门到底窃听了谁。就连海因里希·布吕宁在任总理期间也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他很怀疑国防部部长：发出咔嗒声的电话，从壁炉里伸出来的金属线，来到他办公桌前的陌生人。布吕宁引退后，帕彭委任的内政部部长冯·盖尔甚至雇了一名侦探，以使自己免受暗中监视。过度紧张，偏执狂？或者这就是正常的现实？

该电报是由意大利使馆向罗马的外交部发的。主题：大使翟禄第与戈林于12月9日会晤，探讨如何控制普鲁士，控制普鲁士警察。

施莱谢尔阅读后表示赞同。他应该是对他的秘密情报人员表示满意。哪一个军官能拥有这么好的政治关系网，如此了解情况，并精明地在幕后操纵一切呢？有一次施莱谢尔在国防部一名工作人员的报告上胡乱写道：“可惜，我没有成为自大狂的天赋。”

去年，情报部门还在上校布雷多的领导下钓了条大鱼。他们获悉了一份戈林发给翟禄第前任的电报内容——在电报中，戈林提到了国

家社会主义党起义的计划。

12月15日，星期四

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拒绝；

在普鲁士没有达成联合执政的谈判。

《福斯日报》

在希特勒的压力下；

施莱谢尔除掉了帕彭！

《抨击报》



夜里，不明案犯闯入亚历山大购物长廊（Alexanderpassage）的肉铺中。他们打破三面墙，并冲进肉制品贮藏室。他们偷了香肠和火腿——300公斤的赃物。几公里之外，在威丁：多个肇事者抓住女售货员，其他人则抢东西。他们带着价值100马克的物品逃走。在另一家店里，15名年轻人将陈列窗里的桌子和上面的货物洗劫一空，将双肩袋装得满满的，骑自行车逃走了。警察来得太晚了。



国防部的官员再次与共产党打交道。布雷多定期向施莱谢尔汇报共产党的宣传活动，以及意图分裂防卫军的文章。1930年时，军方就试图处理这件事。他们在军营中散发传单：“如果你为了一点儿赏金向共产党特工泄露军事秘密，那简直就是个无耻的混蛋。因为你犯了叛国罪，把最大的敌人送到了你的家乡。”所谓的“钟表公告”已经

出现了一段时间：告发共产党文件的传播者，将获得一只钟表作为奖励。

现在军方准备采取强硬措施对抗共产党。布雷多在给他上司的“简报”中写道，国防部针对共产党制定了一项特殊规定。“这项工作是有计划进行的。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有待观察。然后我们就会明白需要采取哪项措施。”



晚上7点整，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声音在德国上千个客厅及酒馆里响起。新总理的广播讲话是这一天的大事。

许多城市都在讨论这一消息及与此相关的党派活动：社民党、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邀请了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共同收听这一讲话。没有观众，只有必需的广播技术人员：这能使施莱谢尔感觉良好。但是他僵坐在一个大麦克风后面，穿着浅色西装，看起来很局促。他的表情是忧心忡忡的。

“我带着最沉重的心情接任总理这一职位，”他这样开始，“一方面，我不想成为我的朋友帕彭的接班人。这个无畏而又完美的骑士，他的影响很晚才被认可，这一影响充满了最纯粹的意愿和高度的爱国情怀。特别是国防部部长作为总理有独裁的味道，而且这两个职位的结合会使防卫军深深地卷入政治中，这一危险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施莱谢尔的句子有些支吾搪塞，他的想法很复杂。一位总理这么讲话会赢得民众的信任吗？他真的说帕彭是个“无畏而又完美的骑士”吗？

“考虑到这样的措施能明示情势的严峻，并给煽动者降温，能降低国防力量的实际投入，我才消除之前的顾虑。”

施莱谢尔说，他只是想被当作“紧急时刻各阶层民众利益的超党派的暂时代理人”。不，他没有打算建立军事独裁：“坐在刺刀尖上坚持不了多久，也就是说，长期来说，没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无法统治。”他的政府只追求一件事：“创造就业！政府在下个月所采取的全部措施都或多或少地以此为目标。”



所有部委和机构代表聚集在国防部。主题是“模拟游戏”的结果，这一“模拟游戏”是由奥尔根·奥特领导的。议程上有“对抗政治罢工”和“在政治紧张状态下，紧急状态的准备措施”。受布雷多邀请，军方第二重要的人物参加了会议。他的上司没有时间出席。他正在给全民进行广播讲话。



施莱谢尔这时详细地谈论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收音机前人们是否充满期待地坐在那儿？他们是不是互相发出嘘声要求保持安静？还是很多人已经关掉了收音机？

有一些想法值得注意。德国是分裂的，但施莱谢尔表示他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得多离经叛道，才能承认我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对我来说，‘私人或计划经济’根本没有意义，非常简单，因为经济生活中再也不存在这么纯粹的概念，也绝对不可能再存在。”

然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称自己为“福利将军”。

政治是树立自己的话语模式的艺术，对于既想得到援助又想被领导的人民来说，“福利将军”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约瑟夫·戈培尔听到了总理的讲话。非常浅薄、平淡，有意这么随便，他判断道。施莱谢尔承诺的太多了。再有几个星期，戈培尔预测到，所有的幻觉都会破灭。



保罗·冯·兴登堡呢？没有任何消息。总统终于获得些安宁，因为总理的第一天过去了。

施莱谢尔需要展示他到底能做些什么。

[1] 即施莱谢尔试图组建的“工党政府”，现在用于形容左翼右翼团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交叉渗透，也称“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编者注

[2] 易北河支流。

[3] “监察官”（Inspekteur）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内于1930年设立的政治头衔，分为“地方监察官”（Landesinspekteur）和“国家监察官”（Reichsinspekteur）两级，相关人员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开展组织工作，联系选民。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后，前者职能与大区领袖合并，后者则统一为“全国领袖”（Reichsleiter），为地位仅次于元首的准军事头衔。——编者注

[4] 是德国议会的委员会，往往由最年长的议员组成，负责议会日程的安排，分领域设立专门小组讨论议会中出现的争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目前，德国联邦议院的元老委员会由联邦议院议长、副议长及其他资深议员组成。——编者注

[5] Altmark，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北部地区。

[6] 德国一位电影导演，对于喜剧电影影响很大。

寂静的夜

1932年12月16日至1933年1月1日

12月16日，星期五

施莱谢尔威胁对共产党实施紧急法令！

《红旗报》

施莱谢尔的一个小时。

帕彭依靠防卫军这张最后王牌，尝试统治90%的人口。施莱谢尔想避免投入防卫军，他知道不能简单地扭转这种关系。

《福斯日报》

懒惰的妥协政策；

施莱谢尔蹩脚的政府计划。

《抨击报》



晨报详细报道了总理的广播讲话。许多社论文章说，先让他做起来。许多报纸在背面刊登了整个讲话内容，或是摘录了一部分。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报纸表达了最严厉的批评，社民党也表示怀疑。“福利将军”——这怎么可能？



希特勒回到柏林。他让普鲁士议会中的国家社会党人聚集在戈林阔气的公寓中。国会中有162名该党派议员。国会议长的风格很快就被描述出来：戈林喜欢所有又贵重又宏大的东西。他的工作间整个都是红色的，这已经让拜访者误以为古罗马的尼禄皇帝充其量也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今天的主题是大政方针。国家社会主义党该怎样应对总理？希特勒明确表示：党派中不容许有异见分子，斯特拉瑟的分裂已经够让人不愉快了。希特勒说，施莱谢尔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代理人的态度愈发明显，毕竟他从政府前任的命运吸取了教训。昨天的演讲薄弱且蹩脚。这一演讲表明：如果冯·施莱谢尔先生站在公众舞台上，那些他在后台展开的巨大干劲就所剩不多了。“我们的意愿和道路很清楚了，”希特勒对议员们说，“我们决不能偏离目标。我们有德国青年，我们有巨大的勇气，还有最强烈的意愿，我们最坚韧。对于取得胜利，我们还缺什么呢？”



如果施莱谢尔的策略能成功，他还需要“铁锋”^[1]的支持：工会、国旗团和社会民主党。他们的主要代表在柏林会面。如何应对施莱谢尔？毫无疑问，总理在示好。但社民党想和政府做斗争。社民党主席奥托·威尔斯敦促大家避开“辩论的折磨”。“铁锋”不能露出任何破绽。

可是工会却想继续与施莱谢尔合作。大家在争执中分裂。



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危机继续酝酿。他们在汉堡议会的党团负责人要被取代——因为他公开为斯特拉瑟站台。明天希特勒将会到这个汉莎城市参加“元首会议”。

此时正逢黑森人民邦的大区领袖卡尔·林茨卸任，他也将卸去他的国会议员之职和党内之职。这并不是自愿的。但他是斯特拉瑟的人——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他也必须要休假。最近，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高官今天这个病了，明天那个病了。

现在斯特拉瑟在法律方面又遇到了新麻烦。他的弟弟奥托·斯特拉瑟发表了一篇文章，控诉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中的恐惧和怯懦”。阿道夫·希特勒愤怒了。一个格里高·斯特拉瑟从前的追随者来拜访希特勒，想为从前运动的二把手说句好话，希特勒痛斥了他。

戈培尔却欢呼起来，并对这种“失败的愤怒”进行了嘲讽。现在格里高·斯特拉瑟在党内可能已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新总理的讲话使许多工业家感到震惊。汉莎商贸及工业联合会（Der Hansa-Bund für Gewerbe, Handel und Industrie）主席恩斯特·莫西奇在写给总理的一封信中说，“最广泛的商业企业主对于昨天总理先生的广播讲话绝对没有共鸣”，这“并不像今天市民报纸上所说的那样”。

“对于重建工作和经济重建的意愿，有多么强烈的心理障碍”，政府首脑对此“不应该不清不楚”。施莱谢尔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讲话，掌握公司命运的人非常不喜欢。如果帕彭掌权是不会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况的。

如果施莱谢尔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工人及其政治代表的亲近态度是认真的，他就必须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些话。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这天晚上也在路上。为什么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最近在交通公司罢工一事上合作？他对这件事感到很奇怪。这些日子，无论何时，每当在德国人面前提起这件事，他都会被人嘲笑。这不是很清楚吗，跟他谈话的人说，就是联合起来对抗社会民主！

普洛特金决定，他也要近距离地观察一次纳粹。关于他们的聚会，有一些传奇的事情在流传。他一大早就出发了，因为他听说，如果是这位富有魅力的政治家讲话，就会非常拥挤，这个政治家就是戈培尔。

活动应该是8点开始，6点开门，普洛特金7点到了那里。当他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他看到数十名警察和数十名身穿黑色裤子的纳粹。他很生气，难道他来晚了吗？但他很顺利地花了1马克买到了门票。

体育馆。这个地方总是在上演伟大的战斗、伟大的演讲和伟大的空话大话。这个体育馆是1910年11月开放的，在波茨坦大街172号，一开始是作为室内滑冰场。马克斯·施梅林^[2]在这里战斗过，这里定期举办博克啤酒节，最重要的是，这个体育场是大型党派集会的舞台。这里最多能容纳10000名观众。但是当普洛特金进入华丽的大厅时，却很失望。该建筑呈椭圆形，形状像“0”。后面部分被一个帘子隔开，前面是乐队和演讲者的舞台。他估计大厅里能容纳5000人，上面三个阳台还能再容纳10000人。但是现在也许不到2000人。普洛特金觉得，年轻的纳粹尽管穿着制服，看起来却很沮丧很失望。快8点时，现场也许有7000人，其中至少1000人是穿制服的。

8点整，200人的乐队庄严地开始演奏，但是掌声很弱。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内部纠纷吗？还是因为政治集会禁止？这肯定不对劲，普洛特金想。一切似乎都毫无灵魂，让人觉得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溜走了。

音乐家们演奏了半个小时，普洛特金四处溜达，研究观众。一半观众是中年女性。8点半，大家都伸着脖子，一队乐手鱼贯而入，后面是两队穿着制服的人，拿着巨大的卐字旗。这时大厅里的人都举起胳膊行希特勒礼，其中许多人毫无热情。普洛特金突然想：这种漫不经心地将手举过头顶，特别像老妇人招手的样子。鼓手到达舞台时，乐队又演奏起来，“大楼中的每根柱子都在颤抖，”普洛特金后来记录道，“整个晚上只有这一刻，观众是投入的。”

哪儿有狂喜？哪儿有群众的融合？传说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活动就是这样吗？普洛特金感到奇怪。这种有气无力的表演。国家社会主义党让他想起了祖国的三K党，他们最后的人气也急剧下降。

乐队站到舞台上，一直演奏到9点。周围群众向党卫军呼喊“希特勒万岁”。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到话筒前，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同意政治休战，而这个承诺在德国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微弱的欢呼，多数在大厅里的人都沉默。

他说，下面由戈培尔博士上台讲话，但是他今晚不会谈及政治。一个女人喊道：那不对！热烈的掌声响起来了。

为了这，听众要花1马克买票入场？

普洛特金看够了。这就是那个对于德国及世界的臭名昭著的威胁？他想，一场拳击比赛都要比这个刺激多了。

还没等约瑟夫·戈培尔走到台上，他就离开了体育馆。



国家社会主义党到底怎么了？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国会议员莱恩霍尔德·乔治·库茨访问国务秘书梅斯纳。这是他们的一次秘密谈话。是的，斯特拉瑟在国外，但是梅斯纳说，施莱谢尔一直都算计着要分裂国家社会主义党。总统和他周围的人都对这一策略有所保留。兴登堡还依赖着帕彭。

关于施莱谢尔，总统那里的态度如何？梅斯纳说，气氛很冷。



晚上，弗朗茨·冯·帕彭终于又隆重出场了。极端保守主义的“绅士俱乐部”^[3]邀请大家参加年度晚宴——前总理做节日致辞。700位客人涌入离勃兰登堡门非常近的科罗尔剧院：有政治家、工业家、军官。一年前，这里演出了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最后一幕。一部充满了阴谋、欺骗和复仇的歌剧。后来由于费用过高就停演了。现在帕彭提供了好的谈资。他捍卫自己6个月的执政，赞扬东道主“绅士俱乐部”，也稍带提了一下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是不是一种慎重的接近呢？帕彭也为施莱谢尔想了些友好的话语。毕竟施莱谢尔在昨天的广播讲话中也赞美了他。帕彭说，他的朋友及继任者有明确的计划，施莱谢尔的聪明才智，还有他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精力值得充分信任。

这是不是迷惑人的赞美呢？只有工作人员才有专业知识？也许值得注意听听。

有个人特别值得注意：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吃过饭后他同帕彭攀谈起来。与阿道夫·希特勒就政治状况进行交流是不是很有吸引力？施罗德说，他可以安排一次会面。

为什么不呢？帕彭同意了。

施罗德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表示同情，即便他并不是党员。他所属的“凯普勒圈子”^[4]是一个精英实业家团体，他们想让国家社会主义党掌权。11月，很多企业家给兴登堡写信，要求把权力转移到希特勒手中，施罗德也是其中之一。



“绅士俱乐部”欢庆时，希特勒和他的随从来了，约瑟夫·戈培尔也在。他的“元首”讲述了从前运动时的美好时光。但即便如此，也总会有西格斯特斯（Segestes），一个叛徒。西格斯特斯，传奇人物，曾是日耳曼部落首领，在罗马服役时背叛了切鲁西部落的赫尔曼。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西格斯特斯，也就是格里高·斯特拉瑟，至今在党内还有崇拜者。虽然希特勒与戈培尔对外声称的与此完全不同，但他们都知道事实真相。两人决定用一切手段处理党内同志。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都想在下一个星期去另外一个区给区代表们讲话，如果不扑灭这场火，它就会把党消耗殆尽。



恩斯特·普朗克，施莱谢尔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接到一条紧急警报。一名线人说，帕彭最近在“绅士俱乐部”有与施莱谢尔作对的迹象，而且他与兴登堡的紧密关系对新总理也是个真正的威胁。

可是普朗克并不担心弗朗茨·冯·帕彭：“您让他说吧，毫无意义。”他说：“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的。冯·帕彭先生是个妄自尊大的人。这种讲话就是失败者最后的悲歌。”



“海外德国妇女联盟”（Auslandsbund Deutscher Frauen）邀请客人参加舞会。贝拉·弗洛姆当然前来，这是必赴的约。这个女记者称，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极端，简直是个极端宣传的传声筒。像“凡尔赛耻辱协约”或“生存空间”这样的词在他们的讲话中频繁出现。这是些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也很欣赏的词语。但是许多外交官都在邀请之列，所以贝拉·弗洛姆也必须在。威廉王储和他的太太塞西莉娅是当晚的明星。粗笨的伯爵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穿着冲锋队制服出现，是晚会中不那么愉快的一幕。他在柏林领导冲锋队，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心腹，以及戈培尔与施莱谢尔之间的中间人。海尔多夫的一个客人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穿燕尾服。因为制服表达了他的信念。“如果霍亨索伦家族有什么反对的话，”伯爵继续说，“可以把我赶出去。”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这些从前的贵族中赢得这么多朋友，这让弗洛姆感到非常泄气。她与一位伯爵争执起来，这位伯爵坚信希特勒要复辟君主制度。她这时正在往餐厅走的路上，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从她旁边经过。“啊呀，”这个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第四个儿子穿着褐色的冲锋队制服。

现在弗洛姆真的被激怒了。玛格达·戈培尔，君特·宽特的前妻，也转过拐角。作为一名女秘书，她认识了那个工业家，结婚了，后来玛格达出轨，接着离婚了——不久，她结识了约瑟夫·戈培尔。四个月前，这对夫妇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共同的孩子——一个女儿。贝拉·弗洛姆不得不承认，今晚玛格达·戈培尔的确非常漂亮。“除了脖子上一条天然珍珠项链，没有别的珠宝，”她记录道，“她金色的头发不是染的，而是真正的金色，闪亮的大眼睛，眼睛的颜色在钢灰色和黑色之间变化，眼里是冰冷的果断和非凡的野心。”

优雅的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接近贝拉·弗洛姆。“您喜欢她吗？”他问道。这个法国大使并没有期待回答，“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有这么冰冷的眼睛”。

12月17日，星期六

在饥饿骚乱影响下的施莱谢尔的讲话；

赢得民众信任的尝试失败了。

《人民观察家报》

废除恐怖条例；

没有延长共和国保护法。

《福斯日报》



一个可憎的政府，就应该被推翻。有无所不为的阴谋者，有储藏起来的武器。

但是他们的炸弹爆炸得太早了。叛徒出卖了自己。

在阿根廷，反对军人政权的政变就这样失败了。“激进公民联盟”（Unión Cívica Radical）的追随者们想再次以暴力强制夺取民主。许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阿根廷的两位前总统。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宣布戒严，民权受到严格限制。

在这里，一个独裁国家与寻求自由的恐怖伪君子做斗争。



一大早，冲锋队成员在柏林克珀尼克区袭击了一名有轨电车乘务员，该乘务员正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伤得很厉害。其中一名暴徒最近还在柏林交通部门工作，11月初，因罢工被开除。前一天夜里已经有一名冲锋队队员袭击了另一名电车工作人员。



威廉大街，总理府。内阁会议11点开始。先是一些组织事务性方面的事。部长们要推迟一点他们的圣诞假期。在计划之外还需要一次会面，是有关农业方面的。施莱谢尔将这次会面定在12月21日下午。没人能说这个政府不作为。

现在到了最重要的议题！创造工作岗位，施莱谢尔不是已经在广播讲话中承诺了吗？现在要落实。总理确定：对人民最有效的支持不是国家补贴的冬季援助，而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这件事，国有集团应该起先锋作用。但根据施莱谢尔所得到的信息，德意志铁路作为公共领域内最大的岗位提供者，在提供岗位这方面做得并不够。还需要紧急协商。

一些限制民权的紧急法令很快就要被废除掉——是为了促进内部和平的。



兴登堡是否感觉中了暗箭？国会中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李兹曼将军，在国会开幕时就攻击总统，现在更是加强追击。最近他宣称，坦能堡战役其实是他，李兹曼的胜利。兴登堡最终必须要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施莱谢尔为此在他的广播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李兹曼。李兹曼认为他不能这样对待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老兵。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媒

体说，他正处于他生命中“最痛心的失望”中。

兴登堡鄙视不忠诚的行为。在国会里坐着如此不忠诚的人，对这些人发号施令的居然是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二等兵。



来自巴登的重要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卡尔斯鲁厄会面。星期六晚上开始一场大型领导会议，要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结束。大区领袖罗伯特·瓦格纳在开幕式上发言。“阿道夫·希特勒目前所有的决定都显示是正确的，也许有的人过半年才明白这一点。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明白元首的态度，而且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明白，因为没有人知道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但是每个人都要对元首充满信心，这一点是必要的！”

坚持的呼号。效忠的誓言。“如果敌人相信能分裂这次运动，”瓦格纳说，“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运动只听从一个人，就是建立它并将它发展为德国最强大政党的人。”

12月18日，星期日

阿道夫·希特勒谈论即将到来的战斗的一年；

元首给普鲁士党团指引方向；

施莱谢尔时代也只是一个过渡时代。

《人民观察家报》

时势对希特勒不利而对施莱谢尔有利。

《周日报》



还有六天就是圣诞节，但是冬天还是看不见踪影。“美好的秋日，”诗人奥斯卡·罗伊克写道，“阳光在花园里。庄严。寂静。紫罗兰零星开放，却没有香味。剩下最后一些与天气对抗的菊花。”



贝拉·弗洛姆一大早就来到总理府。她只想对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说一句“你好”，再给他一个小礼物。大家都知道，总理随时让她进来的——她这会儿正好利用这个便利。可惜有人拜访施莱谢尔。贝拉·弗洛姆等不了太长时间，她还约了人吃早餐。

于是她将一束铃兰交给施莱谢尔的员工布雷多，请他一会儿给他的上司。“谁告诉您这是他最爱的花呢？”布雷多问道。

“我想这肯定是爱告诉我的”，贝拉·弗洛姆回答道，然后匆匆走了。



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阿道夫·希特勒先是去了在马格德堡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大会。来自哈尔茨、阿尔特马克、安哈尔特和马格德堡的党员到场。党的干部在市政厅的大厅里聚集，希特勒则举起手臂，在市政厅的荣誉厅检阅冲锋队队员的列队。稍后在大厅里，他在演讲中斥责对手的阴谋，最后，所有在场的人员都宣誓效忠。然后“元首”马上继续行程。同一天，他要在汉堡给党和冲锋队及党卫军的干部做报告，这些干部来自北部各地。

希特勒正在为他的党的生存而战。

戈培尔也在旅途中：哈根、明斯特、埃森。24小时内他给国家社会主义20000名干部做了报告。真是一大圈。



在泰格尔监狱，卡尔·冯·奥西茨基给库尔特·图霍夫斯基写了几行字。“如果接下来我被放出去，而您又到北边来，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见面，如果您不想来柏林的话。”奥西茨基还是给自己一点儿渺茫的希望。获释后去瑞士图霍夫斯基那里是不可能的，因为5月入狱时他的护照被没收了。



在卡塞尔发生了两起冲锋队叛乱。冲锋队第5分队和贝滕豪森分队一致从国家社会主义党退出，以此抗议一个党内头领被开除。这个头领卖了农民捐赠的15000公斤的土豆。所得收入用于为部队购买制服，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等党内的经费。有些成员甚至自掏腰包支付供货商。但是这种买卖是不被允许的，结果是队员被开除。这件事现在在卡塞尔的冲锋队中发酵。因为忠诚问题总共开除了三分之一的当地成员。



德累斯顿旁小镇奥斯特里茨（Ostritz）进行地区选举。不到2000名选民投票。平时柏林没人对此感兴趣——可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又一次痛失选票。中央党胜出，领先于资产阶级联盟。对于选举结果，《福斯日报》头版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党运动浪潮失败了。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的生活总是一个样子。他与工会成员富特文格勒和埃格特结为朋友，星期天一起打牌消遣时光。他们喝啤酒，举杯共祝：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他们也谈到德国总工会主席提奥多·莱帕特。莱帕特曾邀请普洛特金。普洛特金虽然感觉有点受宠若惊，不过邀请至今尚未成行。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提出这样一个请求——有个熟人跟他说——在德国，这可以说是一种命令。

第二天，普洛特金就要给莱帕特写信。



《工人画报》中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所做的广告——这家公司在菩提树下大街62-63号——“到苏联冬季旅游，很便宜，1932~1933年。工人和职员，从1月28日到3月18日之间出行，行程6天，从柏林出发，168马克。教育工作者的考察之旅，12月23日出发，行程9天，225马克。”

在苏联欢庆圣诞？



这是和煦的一天，8~9度，但奥斯卡·罗伊克却睡不踏实。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精神衰弱地醒来。有一次梦到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水从甲板裂缝中涌入，”他写道，“很快船剧烈地摇摆起来。在从甲板上掉下去的瞬间惊醒。”对罗伊克来说，这是一段艰难时光。在社会危机四伏中，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他饱受煎熬，感觉自己被排斥，没有归属感。



12月19日，星期一

元首在大厅里，马格德堡和汉堡；

希特勒在星期六晚上说：1932年国家社会主义党向“德国决定性的运动”迈进。它有权力要求领导地位。

《抨击报》

圣诞节前不召开国会；

参议院中多数赞成大赦。

《福斯日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87公里，从柏林莱尔特火车站到汉堡中心火车站，只有2个小时22分钟！8点钟，新火车DR877在柏林试运行，10点22分到达目的地。这意味着轨道交通的新纪录：160公里每小时！这一切都是由双柴油机以每台420马力推动直流电发电机和电子轴承驱动器实现的。此外，外部被漆成奶油色和紫色的快速驱动车在风洞中得以优化，其前端显著变低。两个大容量车厢有98个座位，另外还有4个座位在“茶点房”。

虽然大家都叫它“飞翔的汉堡人”，但DR877并不能持续不断飞驰。这一段路也并不是为这个速度而铺设的。所以现在要安装所有的信号装置：媒体给它起的名字是“马达快车”，在完全刹车后，它所需的停车时间比其他车长很多。



柏林苏联使馆，共产党特工进进出出。他们虽然想推翻魏玛共和国，但在最高层，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却高度文明——大家都在探测共同利益。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接待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李维诺夫相当于苏联的外长，他努力推进与西方的紧密接触。正好施莱谢尔要采取针对莫斯科政府的新政策。帕彭不仅在德国与共产党斗争，还确定了未来的对手在苏联。而施莱谢尔一贯比帕彭务实。目前，他也许可以利用苏联的帮助促进德国经济发展，签订一个贸易协定将会很有意义。不过国会目前并不配合。

李维诺夫当然知道这一切。但对于施莱谢尔再次耍花招，他应该感到开心。德国总理说，他会让人审查，看贸易协定没有国会同意是否能执行。



阿星格总部前进行了一场游行。阿星格是德国最大的餐饮公司，在柏林有近30家酒馆和小酒吧，还有面包坊和旅馆，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机构。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详细描写了它的一家分店，埃利希·克斯特纳则在《法比安》（*Fabian*）中让主人公在这里投宿。

在阿星格吃东西喝啤酒很划算。但现在门口站着20个年轻人，想要免费吃喝。阿星格管理层接待了他们的代表，与他们进行谈话。这些年轻人每人要一块面包、一磅奶油和一根香肠。管理层回答：抗议者应书面递交他们的要求，之后餐厅才能决定是否提供帮助。中间人被激怒了，其中一个人以武力威胁在场的人，大家都跑到了亚历山大广场上。

德布林描写的那家分店就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要求管理层给饥饿的队伍每人一顿午餐。

对不起了——他们只是这么说——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免费发放食物。

其中一个参与者自发在酒店客人面前演讲。他谈到了饥饿者的痛苦，他们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大快朵颐，抗议无济于事。

年轻人继续往前走，没有人给他们吃的东西。

最后他们闯入位于米特区的老顺豪森大街的一家食品店里，然后就四散离去。

警察着手调查。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策划了饥饿游行，煽动起骚乱。



勒文斯泰因夫人是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见过的最有魔力的女人。坐在她家里装饰豪华的壁炉前，立刻就会觉得很舒适。亚伯拉罕如同被施了魔法。这种温暖和魅力，他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忘记。

普洛特金是来找勒文斯泰因博士的，勒文斯泰因博士是柏林利希滕贝格区卫生部部长。因为博士在家，所以他的太太只是翻译。她的英语超级棒。她出生在纽约52号大街，在英国长大，在德国上的学。可惜是勒文斯泰因夫人。

普洛特金专注起来。他讲述了他在威丁区见到的一切，饥饿、疾病。博士先生，这些人怎么办？勒文斯泰因快40岁了，梳着背头，双颊有点内陷，很瘦。他的眼睛很吸引人，大而黑，并很警醒。

勒文斯泰因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普洛特金沮丧地在日记里写道：摆事实，分析，堆积成一篇小说，讲述一个民族肉体及精神的衰

退。

传染病正在德国蔓延。公共浴室已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客人，几块钱洗一次澡，人们却已经承受不了。人们喝太多酒来解忧。每年有100万例堕胎。上千妇女死于庸医之手。

一个看似乏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普洛特金。他问起那次国会游行的事，那次他几乎被警察打伤。他问起穿过城市散步时“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街上”，这让他很奇怪。

“您不必奇怪，”博士说，他的太太继续翻译，“人们在街上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闲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家庭的，他们没有钱买电或煤。在街上总比在他们那个又冷又暗的屋子里舒服点。”

讲完后，普洛特金感到筋疲力尽。真是个噩梦！他明白了，他在威丁只是看到表面上的肿块，而没有看到深藏在里面的癌细胞。

勒文斯泰因知道他的美国访客听后的反应。他说：“我是作为一个学医的人在跟您讲话，而不是作为宣传者。第一次流行病来了，将会横扫一大批人。”

然后呢？普洛特金问。共产党会来吗？“不可能，那将意味着战争。希特勒已经失去了40%的支持者。经过艰苦斗争，很可能是君主制。”今晚，勒文斯泰因在温暖的火炉旁第一次展现出自己的情绪。

“欧洲更加混乱，我们希望的战前状况永远不会回来，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年轻人会死在更多的战场上。我希望有出路，可是我却看不到。”



国会元老委员会开会——这是共产党迫使的。他们要求圣诞节前议员们在全体大会上确定冬季援助事项，并针对施莱谢尔内阁提起不信任案。如果不信任提案成功，其结果是重新选举。上一次，11月6日那一次，除了共产党以外，几乎所有政党都失去了选票，所以没有人会希望再次举行选举。于是一直延期。



莱恩霍尔德·库阿茨，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政客，偶然听到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传言。运动继续分化，据说冲锋队的8个分队刚刚在柏林叛乱。四处都缺钱，梅斯纳最近说国家社会主义党有1400万马克的债务。



企业家威廉·凯普勒，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经济顾问，向希特勒报告：他与亚尔马·沙赫特和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还有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一起到了科隆。帕彭想要会谈。

偏偏是帕彭。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他在位时与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希特勒知道，要相信凯普勒。在“凯普勒圈子”中，有很多企业家联合起来支持希特勒。凯普勒1927年就参加了运动，会员编号为62424。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离权力还远着呢，选举中他们是小派别。

凯普勒说的事情扣人心弦。根据帕彭的说法，兴登堡与施莱谢尔的关系已被干扰。不过凯普勒认为，也有可能是因为帕彭向兴登堡说了，他如何被施莱谢尔折磨的。而总统相信了帕彭。

怎样进行毫无约束的意见交换呢？施罗德提供了他在科隆的家作为交流的场所。



“政府就业委员会”于18点45分会面。施莱谢尔、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还有其他内阁成员，当然还有主管专员格瑞克。以后，该委员会将在格瑞克的领导下开会。施莱谢尔宣布，专员的任务是尽可能加速一切。只要是涉及必要的基本问题，他随时待命。

总理想尽快看到成功。



塞西莉娅的慈善舞会在“海滨大道”酒店举行。组织者首次向公众出售入场券。梅克伦堡的公爵夫人塞西莉娅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组织的赞助人^[5]，但现在却来了一个“多彩但并不优雅的集团”，贝拉·弗洛姆描述道。霍亨索伦王朝代表了没落的帝国：普鲁士的皇储威廉穿着旧军团“第一贴身轻骑兵”的制服。制服包括一顶裘皮帽，上面银色的骷髅和交叉的骨头引人注目——没有宽恕的象征。皇储于1911年接管轻骑兵。他的弟弟奥斯卡，前皇帝的第五个儿子也来了。前总理帕彭和他的太太及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代表了摇摇欲坠的共和国。贝拉·弗洛姆觉得胡根贝格总是那么可笑。矮胖，军人发型，长胡须，眼皮浮肿，小眼睛，总是露出轻蔑的笑！

不过她很快就不去嘲讽他了，因为她发现了维克多利亞·冯·迪克森，柏林的一位时尚女士，一位希特勒的崇拜者。她带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玛格达·戈培尔。贝拉·弗洛姆马上变得没情绪了。“看到有些人如何讨好玛格达，真的让人反胃。”

晚上，施莱谢尔的手下人来找贝拉·弗洛姆。那束花！手下人带来总理写的一张纸条表示感谢：“您真是迷人，请再来！”贝拉·弗

洛姆很开心，施莱谢尔明白了她的表示。他知道，她是多么欣赏他，而她也知道，他现在是多么艰难。

12月20日，星期二

圣诞节的和平有保障了。

《每日评论》

大赦！

今天参议院的决定。

《抨击报》



代表各邦国的参议院投票表决，针对施莱谢尔提出的、国会确认的大赦法，是否提出申诉。44人反对，19人同意，最终放弃了申诉。

这一法律即日就可被制定出来。德国许多监狱到圣诞节都会空空如也了。



德国农业协会促成了希特勒和胡根贝格之间的对话。两人进行了秘密谈话。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努力解除双方的紧张关系。



总统致全体德国人民：“紧急状况必须一一克服。响应冬季援助号召‘众志成城’的人，就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

仰。”兴登堡并没有说这样有助于共和国的巩固。也许现在还不是圣诞奇迹出现的时候。

12月21日，星期三

针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新的谎言煽动破产了；

这些犹太媒体的谎言太蹩脚了！

冲锋队斗殴、大规模退出国家社会主义党以及真相。

《人民观察家报》

4700万马克对抗冬季紧急情况；

每人每天20芬尼，青少年的每日补助金。

《福斯日报》



今日起，圣诞大赦生效。第一批囚犯被释放。泰格尔监狱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是否已打点好行李？他是否需要感激谁呢？恰好是那些他经常痛斥的社民党议员为他出了力。



德国国家人民党媒体与美国记者共进早餐，胡根贝格和库阿兹做东。这一次还谈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危机。冲锋队中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队员们挨着饿，还要缴纳党费。



国家社会主义党以相反的陈述回应了众多关于党内及冲锋队内冲突的报道：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敌人着手准备谎言和诽谤，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新的大规模攻击。在这场谎言斗争中，社民党的《前进报》、犹太人的《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针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哈雷（Halle）举行的大区会议以及元首在那里的演讲刊登了所谓的‘报道’，几十个‘市民’小报都在散布元首的讲话。里面说，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与希特勒的支持者‘互殴’。另外一系列关于‘斯特拉瑟事件’的意见表达都转嫁于阿道夫·希特勒身上。我们断言，这些谎报没有一句真话。”



总理施莱谢尔接待了德高望重的英国大使荷瑞斯·胡姆博德爵士。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在轻松的氛围中谈到政治的重大话题。两人在完全融洽的氛围中互道再见。对于德国领导人来说，这次愉快的会面总算是对以往气氛的一种调剂——即使关于军备以及清偿战争债务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保罗·冯·兴登堡不接受太多采访。不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认识罗尔夫·勃兰特，那时勃兰特是战地记者。兴登堡向他保证这一天会接受他的采访。兴登堡脱口而出：“您看，我无能为力，只能一直说：你们团结起来吧，团结，团结吧！对于这些较真的人，他妈的，让他们互相握手，总比让他们互相威胁要好。”

最后兴登堡又说：“我们应该把祖国放得高一点，再高一点，高到忘掉自己。”



这一天下午5点钟，施莱谢尔组织召开部长会议。议程上通常会有政府要处理的事情。这时却异常安静。

又开始周而复始了吗？



施莱谢尔从前的导师威廉·格勒纳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越来越广泛的圈子里，甚至在‘胡根贝格们’那里，对于纳粹的看法已经转变，我从施莱谢尔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不管怎么说，我最近显然被国防部那边拍了马屁。施莱谢尔想与我和解，我并没有拒绝。然后他发了电报给我，说他在就职演说中感谢了他的老朋友和老师，对此，我看在曾经志同道合的份上表达了我的愿望。现在我想看看，他作为总理要做些什么。”

“胡根贝格们”——当然格勒纳在这里指的是胡根贝格和他手下的人。格勒纳自己已没有兴趣来玩政治了。他四处都能感受到阴谋诡计——他也许有理由这样认为。他写道：“我的感觉是，布吕宁和施莱谢尔要和纳粹上演一出好戏。”



冲锋队学校校长、冲锋队高层领导之一弗朗茨·冯·霍尔奥夫少将在慕尼黑向皇储威廉汇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内部信息。

他认为希特勒和斯特拉瑟之间的裂痕不可修复。“就我看来，希特勒又一次错判了局势，这次是在自己党内，完全错判。”然后又说：“事实上这件事对他造成极大伤害，而且根本没有结束。”很大一部分党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厌倦了旁观和赤裸裸的否定，厌倦

了等待希特勒取得权力的那一天。他们想最终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
“我认为斯特拉瑟真是个分外有能力、有组织天赋，并分外有精力的人，如果有可能将斯特拉瑟推到负完全责任的政府职位上去……那么在我看来，无论是否有希特勒，斯特拉瑟都会不可避免地终结国家社会主义党。”

这封信也到了施莱谢尔那里。

12月22日，星期四

失业率继续攀升。

《每日评论》

格瑞克的“马上行动”；

增加5亿马克就业补助。

《福斯日报》



泰格尔监狱接到一封电报，电报是最高法院检察机关（die Anklagebehörde am Reichsgericht）发来的。这封电报涉及叛国罪的刑事案件。“因为大赦立即释放……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请求执行。”



圣诞前夕，美国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遇到德意志帝国银行前行长亚尔马·沙赫特。莫维尔问，您在圣诞节期间有什么计划？沙赫特回答道：“我要去慕尼黑与希特勒会谈。”

“您也去，我的好民主党人！”莫维尔回答。

“啊，您根本不理解，”沙赫特说，“您是个愚蠢的美国人。”

莫维尔反应很平静：“同意，可是请您告诉我，您对希特勒有什么期待呢，且用一句话来回答，我试着去理解您。”

沙赫特中分头，目光严峻，嘴角向下垂，他回答道：“我们如果不让希特勒得到政权，德国就永远无法实现和平。”



贝拉·弗洛姆前往美国领事馆接待处乔治·梅瑟史密斯那里。梅瑟史密斯两年前来到柏林，他一直非常认真地观察着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虽然大使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越来越相信，施莱谢尔能够成功遏制纳粹威胁，但梅瑟史密斯对此却持不同看法。梅瑟史密斯对贝拉·弗洛姆说：“德国政府应该更快更强硬地采取措施。这么多重要人物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让人很不安。如果我没有完全弄错的话，这里不久就会放烟花了。”

弗洛姆在她的日记中补充说：“我不相信我的朋友梅瑟史密斯会弄错。”



有一个人没有过圣诞节的心情——约瑟夫·戈培尔。尽管有些意外收入，但党员工资却面临缩减，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件事就发生在圣诞前夕。他的运动远离权力，对于这种命运戈培尔只能抱怨。

所有党员都表现出一种充满自豪感的牺牲精神，这是戈培尔唯一的安慰。但是形势非常紧张。

现在圣诞节要到了，他感觉自己病得不轻。



总理正在寻找一个谈判者，以完成一件分外重要的任务。施莱谢尔有个计划。他希望国会继续休会，这样就不用面临重新选举的风险。他还想将国旗团和反动的钢盔团整合成“国家战争联盟”。同时，要禁止其他军事组织，如冲锋队。

一个有迫切现实意义的计划。可是社民党必须配合才行。施莱谢尔的心腹布雷多接手了谈判任务。

突然从罗马来了电话，是格里高·斯特拉瑟。天气不错，电话那边的人说。



一个消息吓坏了这座城市。一位父亲在厨房将他12岁的儿子勒死，然后将自己吊死在旧墓园那里。作案者是个鳏夫，1930年起失业，是个绝望者。

一天还没过去，就又有人自杀：跳河、打开煤气、自缢或服毒。报纸报道。人们互相讲述这些消息，讲述时皱着眉头，轻轻地摇头，耸肩，内心深深地恐惧。大家都是这样讲述的。



这扇沉重的门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城堡，晚上6点钟它打开了。卡尔·冯·奥西茨基离开了泰格尔监狱，终于自由了。终于从这个“隔离的世界里出来了，这个世界把我们隔离开来，我们对这儿所知甚少，甚至比西藏或复活节岛知道得还少”。

他5月10日被关进来，在里面待了整整227天。奥西茨基觉得自己快窒息了。他对于自己节日前被释放觉得非常愧疚，其他狱友还在里面。他受良心谴责，要马上写关于监禁期间的事。下一期的《世界舞台》一个星期后出版，他应该能写完。马上回去工作？奥西茨基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就直接从监狱去了编辑部。

可是他不应该先看看他的太太吗？他在监狱给太太莫德写了很多信，她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嗜酒成瘾。奥西茨基一直都非常害怕她终有一天崩溃掉。在监狱里，他拜托朋友图霍夫斯基照顾一下莫德。可是他现在人在苏黎世。现在，奥西茨基当然能自己照顾她了。他虽然是个优秀的记者，却显然不是个体贴的丈夫。



德国总工会主席提奥多·莱帕特是个训练有素的车床工人，差不多与社会民主党同龄，65岁。他在广播中发表了圣诞节演讲。当然与危机有关。对于这样有责任感的一个人来说，不可能有别的主题。

“女士们先生们，”他说，“对于许多人来说，今年的圣诞节不是什么喜庆的节日。困难迫在眉睫，挤压在全体人民身上，对于广大工人来说尤为困难。”

不，莱帕特并没有修身养性的心情。“许多家庭的幸福已被摧毁，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出现强烈的厌世心理，会在国家中出现一种威胁国家和人民的情绪。但那些激进的口号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



“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唱片是一个出色的圣诞礼物，将为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带来永久的快乐。价格为5马克——书商

和音乐商店有售。弗朗茨-伊尔继承人音乐出版社（Musikverlag Frz. Eher Nachf.），慕尼黑。”

《人民观察家报》今天的一则广告。



一串串的灯在昏暗中亮起。广告牌照亮了购物街。装点节日气氛的橱窗在圣诞节前展示着色彩缤纷的商品世界。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在城市中散步时，看到整个柏林都沉浸在圣诞节的购物狂潮中。肉铺橱窗中的精美食品，让看的人都流出了口水。红焖鹅是普洛特金的最爱。

12月23日，星期五

只投入5亿就业补助资金；

巨大的失望/格瑞克阐释他的计划。

（最初计划是15亿）

《每日评论》

格瑞克的悲喜剧；

雄心勃勃的计划——痛苦的执行；

如果资本家是公益的。

《抨击报》



约瑟夫·戈培尔的电话响了，是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听起来很忧虑。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经济理论家

及创始成员，据说与施莱谢尔同谋。这就是费德尔为什么圣诞节前来柏林。

这么说，又一个知名的叛徒？

戈培尔让希特勒进行调查，并派了一个心腹去费德尔下榻的埃克塞尔西奥酒店。斯特拉瑟也经常在这个酒店下榻。然后警报解除：费德尔并没有与施莱谢尔谈话，他是因私事来首都的。希特勒应该高兴。

戈培尔夫妇参加了在福斯大街礼堂举办的圣诞派对。戈培尔发表了简短讲话：新的一年一定并且最终会给运动带来胜利。回到帝国总理广场的家，又怀孕了的玛格达抱怨说突感不适。

约瑟夫·戈培尔马上求助于玛格达的妇科医生，瓦尔特·斯托克尔教授。教授马上向伊达-西蒙基金会下达指示，安排她去大学妇科医院私人病房，玛格达9月份就是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海尔加。医生似乎非常担心。玛格达·戈培尔获悉她圣诞节要待在医院时哭了。

最后，她的丈夫一个人回家了。房间中死一般寂静。他沉思着、痛苦着。他们一年前才结的婚，也就是1931年底。

他们经常吵架，也非常爱对方。戈培尔接受玛格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崇拜希特勒。有一次他俩旁若无人地眉来眼去。戈培尔记录了他的痛苦：“玛格达好像和头儿有一腿，为此我非常痛苦。她不是个真正的贵妇人。彻夜难眠。我一定要做出改变。我担心她并不那么忠诚。如果这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可是，因此责备希特勒吗？“对头儿我还是应该保持真心并视他为高贵之人，他是多么缺少这两点啊。”

这一刻，戈培尔觉得非常孤独。他没有个可以倾诉的人。他只有向日记倾诉：“我在党内除了希特勒，几乎没有朋友。所有人都妒忌我的成功和盛名。”前一段时间，由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冲锋队甚至在柏林成立了间谍办公室，暗中监视他，直到“元首”干预才算了事。



有多少人这些天离开了柏林！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写道：“每个人都回家。”

德国人圣诞节都回到故乡。



《芝加哥日报》的记者在思考今年圣诞节的节日市场状况。毕竟，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第三个圣诞节，埃德加·莫维尔判断已经没有去年那么糟糕了。就算悲观主义者也得承认，销路还算让人满意。然而，外界看来，德国的贫困比上一年要严重。甚至各个党都在大规模乞讨。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举着卐字旗；人们也能在街角看到共产党的红色旗，或民族主义者的黑白红旗帜，要钱的锡罐头盒直接伸到人的脸前。

街头随处可见的是穷光蛋、真假小商贩，他们只能依靠施舍度日，还有街头音乐家和衣衫褴褛的孩子们，他们的手指冻得青紫。莫维尔经历着感伤的时刻。他觉得那些被忽视的孩子们最让人同情。女孩子十一二岁，在街上闲逛。



总统兴登堡在假期里前往东普鲁士。他从远离大都市的纽德克庄园（Gut Neudeck）写信给在柏林的施莱谢尔：“有这么安静祥和的圣诞节，我任职以来最最安静祥和的一个圣诞节，为此我非常感谢您。”接着又写：“我很高兴地向您，我年轻的朋友，表达我对您统治的巨大满意。”

这真是异常温暖的全新的论调。所有的怨恨都被遗忘了吗？还是老先生已被这些日子舒适的氛围所征服？

相反总理在圣诞期间却备受折磨，尽管有胆囊病，却一直在工作。几个月前，他还不是总理。他谈到兴登堡时说：“年龄这么大的人，和共事的同志已没什么情谊。只有家庭的影响不会改变。如果老先生不需要我了，他也会像对布吕宁那样毫不犹豫地把我打发掉。”



贝拉·弗洛姆得到她的第一份礼物——在圣诞前夜的前一天。罗特兄弟邀请她和演员吉塔·阿尔帕和古斯塔夫·弗洛里希去参加圣诞展——《卡特琳娜一世》（*Katharina I*）的首演。

阿尔弗里德·罗特和弗里茨·罗特兄弟在柏林拥有九家娱乐场所，其中有西部剧院、喜剧院、莱辛剧院和大都会剧院。他们的“德国演艺企业股份公司”（Deutsche Schauspiel-Betriebs-Aktiengesellschaft）如此复杂，以至于对于财务问题，他们永远不用亲自过问。但是他们的首演，无论是歌剧还是莎士比亚作品，在柏林都是社会重大事件。圣诞展票当然早就卖光了。贝拉·弗洛姆很开心施莱谢尔夫妇就坐在她附近，在邻近包厢里。陪同总理的是一名陆军上尉和一名海军上尉汉斯·朗斯多夫，二人都身着制服。“这是我们对于私人军队的非正式抗议”，朗斯多夫说。

施莱谢尔穿着便装，他吻了贝拉·弗洛姆的手表示问候。“库尔特，您对我说过要一直穿制服的，”弗洛姆说道，“您可是知道您不能便装出门的。”

施莱谢尔的太太伊丽莎白点头表示赞同。“他不听我的”，她说。然后又讲她的丈夫过度工作，每天夜里，在写字桌前坐到2点钟或更晚。今晚在剧院里，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没有文件和电话的。

首演后，罗特兄弟邀请弗洛姆去他们在格吕内瓦尔德的别墅。也许有点过头了，贝拉·弗洛姆想道，但是她爱这种热闹的派对。大量的香槟，超级大的龙虾，美妙的自助餐。

梅斯纳夫妇当然也来了，尤其是国务秘书的太太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他们和贝拉·弗洛姆坐在一张桌子旁，还有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以及他优雅的太太。今晚正合奥托·梅斯纳心意。他几次迫不及待地去自助餐台拿龙虾，龙虾令他迷醉不已。当然贝拉·弗洛姆听过无数个关于梅斯纳偶尔无节制的故事，可是她还是非常惊讶。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偷偷地碰他太太一下，互相笑笑。梅斯纳夫妇不明所以。把一只龙虾拆开可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



为什么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这么不受欢迎？如果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不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就简单多了。莱恩霍尔德·乔治·库阿茨在他的日记中清醒地记载道：“他没有性吸引力。”



医生的担心是有理由的——玛格达·戈培尔状况非常不好。她会流产吗？晚上戈培尔一个人在家里，沉溺于阴郁的思绪中。

“193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真是流年不利，我们必须粉碎它。”

12月24日，星期六

圣诞前夜

共产党骚乱；

警方进入警戒状态；

1932年灾难圣诞；

我们的目标和任务。

《抨击报》

对希特勒的再次召唤？

1月9日召开国会？/解散和重新选举？

《每日观察》



圣诞前夜，5度。下着雨。柏林不会有白色的圣诞。



冲锋队在屋子里竖起了圣诞树。将近一岁半的海尔加笑着看着圣诞树。约瑟夫·戈培尔羡慕自己女儿的童真。他刚从医院那里得悉他的太太病得很严重——玛格达在为她的生命而战。别的地方，圣诞的宁静缓缓降临。约瑟夫·戈培尔最想自己在某座山里单独待着，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



玛莎·卡乐可的一首诗。她的书很迟才问世。这首诗叫《12月24日的单身先生》（*Lediger Herr am 24. Dezember*），诗是这样开始的：

没有哪个房间

像我这个房间这样空旷。最后一个小铺子的女售货员

回家了

——这时圣诞节也来吞噬了我。



不是每个人都已回归私人生活。忙碌的库阿茨去探望国务秘书梅斯纳，一场有启发的闲谈总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这一天晚些时候，他给党主席胡根贝格写信说：“今天，我又一次去了我朋友那里，他圣诞后离开几天，我把您的信朗读给他听。对此，他再次表示希望德国国家人民党人担任政府重要职务。我们也谈到了局势，我暗示了在我们党内反对施莱谢尔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他们连圣诞节也不放过吗？



对于犹太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来说，基督降生并没有属灵的意义——在房间里摆一棵圣诞树的德国犹太人不在少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欢庆节日。今年，犹太人光明节的第一天是在12月24日。

普洛特金总归没什么节日的心情。尽管下着毛毛雨，他还是漫步走过工人区。他看到一个5岁的孩子穿着拖鞋在街上玩耍。一个男孩站

在一家面包店橱窗旁，他第一次路过时已经注意到了。普洛特金问他：“你在这里站这么久做什么？”

男孩儿没有回答，也许他太害怕了，或者不能说话。普洛特金猜测，可能是因为孩子看到了饼干而不说话了。

接下来的时间，普洛特金在威丁一个公共厨房帮忙。为庆祝节日，这里供应双份的食物。当然，普洛特金也四处环顾一下。失业者建了个图书馆，里面有歌德、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厄普顿和辛克莱的著作。



美国作家夫妇多萝西·汤普森和辛克莱·刘易斯也没有在柏林停留。他们在维也纳附近的塞默灵（Semmering）庆祝节日。很多朋友一起跟着，还有莫维尔一家。他们在大自然里待了10天，呼吸新鲜空气，滑雪橇，享受生活。汤普森和刘易斯也想挽救他们摇摇欲坠的婚姻。

但是，并没有冬季运动的喜悦，反倒有许多雾和雨，人们很快就绷紧了神经。圣诞派对主要邀请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有乐队奏乐，大家跳舞，喝了许多葡萄酒。对多萝西·汤普森来说这是一段引人深思的时光。她向日记吐露同性恋的经验，以及她对无法实现的爱的渴望。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寻找自我，寻找一点儿运气。



主管就业的专员君特·格瑞克有幸做政府圣诞演讲。或者必须要说：被强迫的。他告诉听众，整个内阁都会尽全力在这个冬天使失业率明显降低。



共产党的报纸《大众画报》（*Allgemeine Illustrierte Zeitung*）在标题上刊登了一系列蒙太奇照片。一位冲锋队队员手里拿着带铃铛的袋子和牌子，下面写着：“给我们元首差旅费。”还印着一首取笑斯特拉瑟度假的诗：

小冲锋队队员，然后呢？
可怜的希特勒的人，
渺小的希特勒的人，
你也想去“度假”，
就像那些高高在上的绅士们，
那些喜欢争吵的雅利安人，
啊，你想起了什么？
你只是“平凡”
不久你就会得知，
领导你的人，诱导了你，
大庇天下寒士的地方，
在共产党人这里。



5点钟，多数店铺都关门了。马路上顿时空旷起来。有轨电车穿过城市，里面只有一个人：列车员。



玛格达·戈培尔状态越来越差。妇科领域的专家瓦尔特·斯托克尔教授警告约瑟夫·戈培尔，他妻子的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出现心脏痉挛，痉挛性疼痛。

约瑟夫·戈培尔还是在医院安排了一个小型圣诞派对。他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哈拉尔德，第一桩婚姻中的儿子，一起在玛格达房间前的走廊里点亮了圣诞树上的烛光。

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祝她早日康复。许多党员送来了礼物、花束、卡片。可是这些并没有提升气氛。“一个悲伤的圣诞节，”戈培尔记录道，“心情沉重，充满忧虑。”

晚上他要与党卫军队员在一起，他们是忠诚的陪伴者，整个这一年，他们从未抛弃过他。约瑟夫·戈培尔渴望工作。



就基督教传统而言，德国陷入了静寂，圣诞前夜，神圣的夜晚。天黑了，蜡烛燃起来了。锡铂条挂满了装饰好的冷杉和云杉，熠熠生辉。教堂里满是人。人们都希望得到解脱。一点点和平降临到能感受到和平的人心中。

是的，德国的圣诞节。关于从前的轻声的谈话，关于那些不再存在的想法，古老的家庭传统，西里西亚餐桌上的香肠和酸菜。这些仪式会出现在许多小屋中，在君主制时期，孩子们从小都要学习这些仪式。那个时候还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这么糟糕。

在东普鲁士的纽德克农庄，白发苍苍的总统汲取了力量，他很高兴政治家歇斯底里的喧嚣已经枯竭。也许他想到了在流亡中的皇帝；他当然可以与上帝对话。

弗朗茨·冯·帕彭去了在萨尔的瓦莱尔凡根（Wallerfangen an der Saar）家人那里。但是他心中只有柏林，柏林！他打算报仇，他要除掉这个施莱谢尔。接下来的几天就可以好好打算。

阿道夫·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当他看着圣诞蜡烛的火焰时，眼睛是否也会亮起来呢？

为修身养性，他是否听瓦格纳呢？还是他在聆听自己的声音？戈培尔将希特勒的一个或几个演讲录成唱片，现在希特勒也可以随时陶醉于他自己的演讲艺术了。



“圣诞节是个俗气的东西——可是人们想做什么呢？”

这句话来自阿尔弗雷德·克尔。明天是这个《柏林日报》剧评家的生日。65岁了。但还谈不到退休。

12月25日，星期日

圣诞节第一天

生活用品极大丰富。成千上万的人和机器还等着生产更多的产品。与此同时，饥饿和贫困却无处不在。

《周日报》

没有国家社会主义就没有圣诞节！

我们为德国而战挽救了对于光明的信仰；

这个痛苦的夜晚必将产生德国的胜利。

《人民观察家报》



家庭日。很多柏林人去了教堂，去做圣诞弥撒，看宗教剧，听管风琴音乐会。首都中让人冥想的一天。



“地球上的和平——从国防政治角度来看”——威廉·格勒纳作为特约嘉宾为《福斯日报》撰写文章。最近，在日内瓦缔结的“五国协议”（Fünf-Mächte-Abkommen）^[6]将前国防部部长描述成“给人民的礼物”。协议中赞扬新政府的外交技巧，说是紧承海因里希·布吕宁的衣钵。毕竟对施莱谢尔也有一半的恭维。



圣诞节第一天对于约瑟夫·戈培尔来说太过安静了。他在准备即将于德国最小的自由邦利珀（Lippe）举行的选举，还要治疗他的圣诞抑郁症。医院传来一个让他充满希望的消息：他的太太玛格达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12月26日，星期一

圣诞第二天

今天没有报纸。



成千上万柏林人漫步穿过这座城市，展示他们的圣诞礼物：首饰、新大衣、新帽子、时髦的靴子。餐馆和咖啡店也有很多人，是的，这是危机时期，是的，人们想要生活。



赫塔BSC和柏林体育协会之间的足球决赛吸引了20000名观众。受人欢迎的赫塔以3：1战胜了柏林，赫塔球员开始时很紧张，但是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



人民剧场有个圣诞小型歌舞场，有许多大人物登台表演。当中包括维尔纳·芬克。

芬克也许是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小型歌舞演员。几年前，他在贝拉维大街3号创立了“地下墓穴”（Katakombe），在那里，他主持了整个节目。他并不是一个辛辣的政治评论者，但是这个秋天他却在舞台上表演了下面这一段：

今夜怎么下这么大的雨，

我立即想到了：啊哈！

夏天结束了。

噢，我的预感！

今天早上这一带

真的非常冷，秋天的感觉。

太阳仍在照耀，

可是小心：这只是看上去

这只是它的余光

不，不，夏天已经过去，

为了我们的军事联盟

田野和田地都清空。

时光如梭！是呀，大自然！

不相信，独裁者会这么快消失。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放慢了节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更多地投入家庭生活。他和太太并没有共同的孩子。但是伊丽莎白第一段婚姻的女儿露尼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施莱谢尔执行人们所说的“幕后指挥”：维护他的关系网；发消息。比如他与美联社（AP）办公室负责人路易斯·保罗·洛赫纳一起进餐，洛赫纳是个德国通，他从1921年开始在德国做记者。他们谈论国内情况，施莱谢尔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安宁，安宁，安宁”。他接着说：“正如您所见，我成功了。德国很久没有像现在这么安宁了。就连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也都安静了。这种安宁持续越久，那么就越能确定的是，目前政府必将重建内部和平。”

洛赫纳被施莱谢尔说的话搞糊涂了。施莱谢尔真的相信圣诞节的安静意味着更美好时光的来临吗？



不，社民党的库尔特·舒马赫并不认为好时光要来了。在圣诞节和新年这段时间，他和他的未婚妻玛丽娅·塞博特（他昵称她为米加）谈了很多。她谈起婚事，现在不是该结婚了吗？舒马赫严肃起来。“我现在不能将别人的生命系在我身上，”这个政治家说，“纳粹现在必须上台或者滚蛋。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如果他们抓到我，会对我做些什么，我已经完了，但我不想他们对你做什么。”



今年8月到底发生了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臆想着得到权力，兴登堡却断然拒绝了他。那时幕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些为希特勒获取权力铺路的、雄心勃勃的人也想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经济专家威廉·凯普勒就此给在科隆的银行家施罗德写了信——施罗德不久前刚刚在绅士俱乐部内部与帕彭搭上话——是关于希特勒和帕彭之间的会面：“我希望这次会谈能够对近几个月的政治事件做进一步阐明；我估计，在8月13日的遭遇也要归因于冯·施莱谢尔先生；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样的阐明格外重要。”

1932年8月13日，希特勒从兴登堡那里获悉他没有当选为总理。这对希特勒来说，至今都是个重创。党内也弥漫着极大的愤怒、失望和厌世情绪。难道是施莱谢尔在后面躲着，而当时的总理冯·帕彭先生其实是无辜的？这当然是希特勒感兴趣的新消息——这将为即将到来的谈话缓和气氛。那些日子里，希特勒对帕彭的行为总是勃然大怒。凯普勒继续给施罗德写道：

鉴于元首总是将8月13日当成个人的失败日，他对冯·帕彭先生很久以来都没有好心情。我和他在一起时，一直是支持冯·帕彭，而反对冯·施莱谢尔的；他的心情倒是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现在所表达的愿望他应该能满足；我希望您的技巧能为会谈消除最后的障碍。



圣诞第二天，柏林当然并且一定要上演戏剧。哈利·凯斯勒伯爵观看《利力姆》，因为汉斯·阿尔伯斯扮演主角，整个柏林都在谈论这部剧。阿尔伯斯是个身材强壮的电影演员，但并不是凯斯勒的菜，根本不是：“一部愚蠢无聊、多愁善感的拙劣的作品，阿尔伯斯的粗暴又为之雪上加霜。”

12月27日，星期二

通过紧急法令本来是要拖垮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一法令却被取消了关于内部和平的维护。

《人民观察家报》

揭开同志之间的谋杀：

一名冲锋队队员的尸体在蓄水坝中被发现；

德累斯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政治谋杀。

《福斯日报》

柏林人在原始的希望中度过了这一年的最后几天，希望好时光很快来临。孩子们和父亲们玩耍，母亲们非常开心，亲戚们都走了。纳税申报表已填好，书已取出来了，终于可以读书了。

柏林人思考着艰难的1932年，他们约朋友，出城游玩，不读报纸了，他们还处在那种圣诞节的特别气氛里，这种气氛，每到圣诞节就深入德国人的灵魂。忧伤的，内心温暖的。这是些和平的日子，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尽管有各种敌意，却也15年，即差不多有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应该会熬过这场危机的。



卡尔·冯·奥西茨基又回《世界舞台》杂志工作了，无须再从监狱里发指令，他释放后的第一期已送到了订阅者手中。出版商没有将他视为新闻自由的英雄来欢迎，也没有把他看作言论自由的殉道者。关于他的监禁，他只写了17行字，其中“我”这个词只使用了两次。短文上方写着“返回”。“入狱是一次伟大的体验，没有哪个政治人

物能幸免，”奥西茨基写道，“我并没有认识到监狱是个特别残酷的地方，一个传统上让人备受折磨的地方，但监狱一直是个痛苦的地方，在这里，每扇铁门后面，都有一个悲伤的星球在转动，只不过是命运造化而到了这一轨道。罪过吗？这里没有这个词，这里只有牺牲者。”



格里高·斯特拉瑟又离开了罗马！他在回德国的路上！这是从施莱谢尔处得到的消息。终于！这时总理要做出决定性的尝试，把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纳入自己的政府。



弗朗茨·冯·霍尔奥夫，曾在国家社会主义党服役的前少将，再次向皇储威廉泄露冲锋队内部消息。他从慕尼黑写的一封信中说：“在柏林，史图尔普纳格—帕彭—希特勒阵线（Stülpnagel-Papen-Hitler）似乎正在建立，目的是越过总统摧毁总理，而且要在新选举前。”

约阿希姆·冯·史图尔普纳格，步兵上将，自己要求退役——他实际上是施莱谢尔的对手。

霍尔奥夫继续写道：“我也无法判断会发生怎样的事。有一件事，即使冒着有损殿下威严的风险我也要说：将君主制问题推到前面，目前来看是不合时宜的。”

那么希特勒的强大竞争对手呢？霍尔奥夫非常了解他。他写道：“我今天与斯特拉瑟谈了很久。我发现他状态很好，对事物的判断冷静清晰。这个人还有好牌没出呢。”



《福斯日报》报道了希特勒与斯特拉瑟约定的会面。晚刊的标题是：“斯特拉瑟的要求，希特勒会让步吗？”文章中写道：“斯特拉瑟回来，不是作为向‘元首’忏悔屈服的臣服者，而是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文章中说，格里高·斯特拉瑟想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总书记，拥有广泛的权力。问题是希特勒愿意吗？他们的关系还可以修复吗？如果彻底决裂，谁会失去更多？



西部剧院在播放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喜剧《好兵帅克》。通常很严格的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认为这个剧令人喜悦。“这个晚上补偿了最近所有的痛苦，”他在《柏林日报》的评论中写道，“一切都乱七八糟，这种情况下却放映这么好的电影。”

他的新书最近发行。《一个叫科西嘉的岛》（*Eine Insel heißt Korsika*），一篇游记。



12月28日，星期三

冲锋队的消耗；

德国中部地区部队不再参与其中；

国家社会主义党内的危机和蜕变比看起来还要严重。

《福斯日报》

为夺回被掠夺的薪水而战斗！

人造黄油价格上涨规定——全体员工都整装待发——把多出来的东西给失业者。

《红旗报》



年终岁末，对一些人来说，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一切都在沉睡，一切都可以等待。有些人努力在新的一年里取得先机。



约瑟夫·戈培尔先去医院探望他太太玛格达，然后告辞去山里。希特勒邀请他过节，连同他的小“旅伴”，玛格达11岁的儿子哈拉尔德。戈培尔在家里很快打包好了行李，然后登上了开往慕尼黑的列车。他在那里见到了萨克森大区领袖马丁·穆切曼。穆切曼告诉他：斯特拉瑟与施莱谢尔在谈判关于斯特拉瑟进入内阁的事情。这将是最后的背叛！

戈培尔、哈拉尔德、穆切曼和他的太太一起前往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坐雪橇上到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阿道夫·希特勒在那里等他们。一个银色的世界，远离尘世的田园风光。

真是考验人的神经。



胡根贝格写信给希特勒，他对于“整个民族运动的最终胜利”深表担忧。“这一运动我也有责任，”他接着写道，“如果不起眼的中央党再起决定作用，幸运就不会降临到这场运动上，实质上被挫败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死灰复燃。”胡根贝格想要一场民族运动，他非常害

怕希特勒会与中央党串通一气，于是让他的国家人民党也参与进来。他建议“再次就是否能达成一致进行谈判”。



格里高·斯特拉瑟的计划目前并不那么卑鄙。旅行前，萨克森大区领袖兼国会议员马丁·穆切曼答应去阿道夫·希特勒那里帮他。但现在穆切曼却在谈话中说出他的条件：只有斯特拉瑟与施莱谢尔断绝关系他才会去帮希特勒。因为穆切曼去贝格霍夫^[7]见希特勒时，手里需要有些具体的东西。他们分手时却无任何结果。斯特拉瑟继续前往柏林，穆切曼和太太一起去南方。

到了柏林，斯特拉瑟在埃克塞尔西奥酒店下车。几分钟后他房间里的电话就响起来。

是总理府，施莱谢尔要和他谈话，马上！

斯特拉瑟拒绝了。但是他说，可以晚些时候见面。



阿道夫·希特勒晚上与马丁·穆切曼会谈。当穆切曼要谈从前的支持者斯特拉瑟时，他发现希特勒对斯特拉瑟事件根本不感兴趣了。时过境迁。



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邀请大家共进晚餐。一个私密的小圈子，只有12位客人。有施莱谢尔的“老同志”贝拉·弗洛姆，他一直这么称呼她。

这位女记者很为朋友担心。毕竟柏林政治圈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帕彭与“绅士俱乐部”努力要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获取权力。现在她终于可以不受干扰地与施莱谢尔谈话了。她告诉施莱谢尔她与卡尔·冯·威甘德的谈话。威甘德是美国记者，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专家，他认为希特勒不久就会取得政权。如果施莱谢尔不把她的想法当回事，那一定要听听“老预言家”的话！

施莱谢尔只是笑：“你们媒体人都一样。你们是靠职业的悲观主义来谋生的。”

弗洛姆坚持认为帕彭会与希特勒合作，想再次当总理。“我想我能阻止这一切”，施莱谢尔说。“只要老家伙还和你站在一边”，弗洛姆回答道。

后来，弗洛姆还可以更坦诚地说话，在施莱谢尔的工作室，她与施莱谢尔单独在一起。

“要有信心，贝拉，我认为格里高·斯特拉瑟很有价值，”施莱谢尔说，“他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是党的左翼。也许，如果我把他弄进内阁……”

这个主意并没有让弗洛姆愉快起来。“怎样看待宗教，如何看待纳粹党内对犹太人的迫害？”她问道。

施莱谢尔试图安抚这个女记者。“您应该更了解我，贝拉，”他说道，“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我也想要您的朋友布吕宁或迟或早回来。”

斯特拉瑟在政府里？布吕宁回来？施莱谢尔真的以为这些计划有实现的机会吗？——还是他说这些只是为了适合自己的角色？斯特拉

瑟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内根本得不到权力，这已经不能再清楚了，布吕宁最近在疗养院的时间比在政治幕后的时间要多。



电话通了，科隆银行家施罗德打给弗朗茨·冯·帕彭。帕彭圣诞节住在萨尔兰地区的瓦莱尔凡根。对于即将到来的会谈，希特勒愿意遵循前总理的意愿来安排。他们约定了1月4日。

12月29日，星期四

逃往意大利；

德累斯顿凶手的避难所；

德累斯顿冲锋队队长海尔伯特·汉驰被谋杀，他的尸体于圣诞节第二天在埃尔茨山脉马尔特水坝被打捞起来，掀起轩然大波。

《福斯日报》

物价上涨运动；

施莱谢尔新的紧急法令——他使重要的食物变得昂贵——社民党宣传“福利”将军——争取更高薪水和支持！

《红旗报》



在贝希特斯加登，阿道夫·希特勒在口授他的新年号召。他呼吁国家社会主义党团结一致，任何妥协都会使毁灭的种子植入党内，同时也植入德国的未来。

“我们了解我们的对手和他们的想法。‘让我们的党参与到政府中，让它负责任，但是阻止它真正参与决策……’如果我们的对手邀请我们以这种方式参与到政府中去，那么他们并不是让我们慢慢地、逐渐得到权力，而一定是要永远摆脱我们。”

希特勒正处于一场巨大的防守战中——他自己也这样表述。斯特拉瑟的诡计使每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策略有可能被替代。同时也表明希特勒本人也可以被替代。



戈培尔从柏林得到令人担忧的消息。玛格达情况并不好。流产。他要马上回去。不过有个心腹打来电话：病人又好起来了。戈培尔决定留在希特勒这里，没有回去见太太，他留在上萨尔茨堡山。



租户会议在柏林威丁区阿卡大街132号召开。臭名昭著的“迈耶庭院”（Meyer's Hof）的6个内院都参加了会议。居民决定，从1933年1月1日起，如果不满足下列要求就不支付房租：1. 整个建筑群全面翻新；2. 要有纯净的饮用水；3. 撤销要求强制迁出的起诉；4. 免除拖欠的租金；5. 租金降低25%。

230个租户中有227个签署了申请，只有3个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没有一起跟着干。

今天首都很冷，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降到零度以下。



又是玛莎·卡乐可：

致逝去的一年

这一年逝去了。这一年也无任何起色。

它早就到了生命的暮年。

——几乎不值得为它悲伤。

因为我们配得上，拥有新的一年。



晚上希特勒和戈培尔谈话。他们关心一个话题：斯特拉瑟带来的危险。穆切曼的感觉完全错误，希特勒的冷静是伪装的。希特勒没有忘记穆切曼曾是斯特拉瑟最近的心腹——他甚至将其总部命名为“格里高·斯特拉瑟之家”，而不是像其他人的“阿道夫·希特勒之家”。

但是还有一线慰藉。几天后，可能是1月4日，希特勒要与弗朗茨·冯·帕彭会面，帕彭一直都与总统关系最好。希特勒和帕彭双方的谈判代表写信并秘密会面。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右翼阵营中一个声名狼藉的幕后操纵者，从前反动的“绅士俱乐部”成员，他也参与此事。他是施莱谢尔的人，但却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重要人物有紧密接触。年初，他曾经安排施莱谢尔和希特勒手下人进行重要会谈，这次会谈导致布吕宁下台，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机遇。

12月30日，星期五

一位母亲的控诉：

“保护你们的孩子，防着国家社会主义党。”

《福斯日报》

威斯特法伦地区的农民组织对抗施莱谢尔的斗争。

《抨击报》



本周五，德国人民为1932年最后一个节日采购。喜欢汉凯^[8]可以买汉凯的干红——里宾特洛甫家族会开心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能买得起，还是享受一瓶香槟吧。

汉凯公司，香槟酒企业集团在报纸上为他们的珍珠红酒^[9]做广告。



戈培尔在贝希特斯加登感觉不错。从柏林医院传来了令人愉快的消息，玛格达正在康复。戈培尔与斯托克尔教授通了电话，教授使他平静下来。玛格达的儿子哈拉尔德跟着戈培尔一起来到贝格霍夫，希特勒与哈拉尔德一起给玛格达写了一封信。柏林的政治局势没有改变。戈培尔躺在冬日暖阳下，享受着阿尔卑斯山的迷人景色，享受着“元首”身旁的轻松时刻。晚上，希特勒给他看了写好的给党内的新年号召。号召中，他严词反对所有的悲观论者，拒绝与斯特拉瑟进行任何方式的和解，并宣布战斗到底。

戈培尔认为，仅仅是这种激进主义，就将使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希特勒太了不起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语气听起来像恋爱中的中学生。



共产党准备1月4日在卢斯特花园（Lustgarten）举行大型集会。“给施莱谢尔看看你们的力量！”《红旗报》这样鼓动道。



如果约瑟夫·戈培尔读了慕尼黑政治警察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分析，那么阿尔卑斯山迷人的景色对他来说就不重要了：“党员不仅没有新增，反而越来越软弱无力，这是很显然的；日程单上数不清的离职，经费不断缩水，由于经费不足而活动取消也越来越频繁。”党、冲锋队和党卫军给人留下精疲力竭的印象。一些高官的消息是从国家社会主义党密探那里得到的，这些高官认定：“高潮已过去，也许最有利的前景也已错过，很多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都这样认为。”



“政治警察”：共和国绝不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应通过有关部门受到保护，免受激进分子侵害，据说这些部门有上千名工作人员，其中很多都是特工。这些特工还挑唆、诱捕，并向上级报告非法游行的情况。有些反过来被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情报部门揭穿。

自去年以来，柏林警察总局政治部接管了“在普鲁士和全国监控和打击分化防卫军及警察的势力”的任务。从那以后，共和国臆想的敌人被大范围抓捕。这些日子，由此产生的资料显示，普鲁士就有超过50万人被记录在册。

12月31日，星期六

新年前夜

他们鼓动迫害共产党人！

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受到瓦解的威胁——驱逐是加强镇压共产党的前奏。

《红旗报》

戈林奚落兴登堡。

总统府新年接待。

《福斯日报》



一层薄薄的、缓慢融化的冰覆盖着马路和路边，路上非常滑。冰层使柏林陷入瘫痪状态。汽车和公交车缓慢爬行，却还是有无数交通事故。到中午，急救人员要处理30多起事故。骨折、扭伤，还有脑震荡。



阿道夫·希特勒请客，当然差不多所有人都一拥而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层聚集在贝希特斯加登辞旧迎新。希特勒的贝格霍夫装饰一新。



赫尔曼·戈林并没来。他是给希特勒提供消息的人，除了戈林以外，在运动中希特勒没有如此相信过任何人——这一年，戈林去了瑞典，要与朋友在罗克尔斯塔德城堡（Schloss Rockelstad）欢度新年前夜。戈林的第一位太太卡琳来自瑞典，1931年不幸去世。

戈林的新欢爱米送他一个收音机作为圣诞节礼物，他带着收音机去了瑞典。戈林写信给他的女朋友：“你送的收音机里播放的是瑞典电台的节目。你带给我怎样的喜悦啊。我要表达对你真诚的谢意，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牺牲，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祝我们在即将到来的一年有好运。”



最近，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在星期六都与他工会的伙伴马丁·普雷托去森林。他们乘火车离开柏林。普雷托是下巴伐利亚人，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然后两人随便投宿到某处，边喝边热烈地讨论。



德国总工会的提奥多·莱帕特在《工会报》（*Gewerkschafts-Zeitung*）上为自己与施莱谢尔的接触进行辩护。文章的标题是“反对背叛的谴责——致德国工人阶级”。他对大量诽谤表示不满。“有人指责我们与总理施莱谢尔有勾当。有人怀疑我们与反动集团合作。有人认为我们已放弃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目标。”

他说，恰恰相反。施莱谢尔政府要满足工会要求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一政府并不会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拒绝政府让我们创造就业机会吗？”

在莱帕特周围会有许多人回答：绝对不能，否则我们就是背叛自己！



柏林的酒店、剧院、歌舞厅、餐厅和酒吧预计今年新年庆典会比两年前的客人多很多。商业研究所确定：“经济危机动摇了经济结构的基础，1932年，德国几乎已度过了这场危机。”为此，人们可以干杯庆祝了。美国记者莫维尔很清楚：“今天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深信不疑，情况不能也不会变得更糟，这个国家已跌落到谷底，现在正朝着预定坦途前进，德国将会崛起。”

另外，不要忘记：这一年没有发生政治灾难。阿道夫·希特勒没有取得政权，共产党也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发展壮大。魏玛共和国还在。莫维尔的结论：1933年应该比1932年还要好。



国旗团主要成员提奥多·豪巴赫在团刊上回顾这一年：“这一年有许多失败和屈辱，但国旗团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并已投入新的战斗列队。我们在怀疑与绝望之间的曙光里又踏上征程了。……我们非常肯定，1932年没被摧毁的军队，1933年也不能被打败。”

社民党和他们的联盟是不会走错路的，这种无可辩驳的确定性使他们感到欣慰。



总统冯·兴登堡向士兵发布公告：“新年这一天，我向防卫军和海军成员表达我衷心的祝福。要继续保持老兵的传统美德，忠诚、服从和履行义务。”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也签了字——作为国防部部长。



英国大使荷瑞斯·胡姆博德爵士向施莱谢尔总理转达了英国总理的问候，并提出一个愿望：拉姆齐·麦克唐纳爵士最大的希望是两国之间为欧洲友谊和睦邻关系而诚挚合作。



哈利·凯斯勒伯爵平静地度过年度之交。这个人通常都在寻找兴趣相近的人，在招待会上或晚宴上总是能找到他。新年前夜，他却一

个人在魏玛的家中度过。



乔治的家在俾斯麦大街34号的万湖旁，这里非常热闹。海因里希·乔治，著名的、受欢迎的、有活力的演员，正与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新年。他们是几天前搬到这里的。

外面开始噼啪作响，大丹犬弗洛爬到门厅沙发椅后面。乔治的未婚妻贝尔塔·德鲁兹，也是他们儿子彦的母亲，抚摸着狗，让它振作起来。彦在他带栏杆的小床里啼哭，他想回到庆祝会中，那里大家都很开心。刚过午夜，大家都入迷地看着乔治在花园里表演“烟花特技”。噼啪声过后，他准备了一杯火钳酒，痛快地喝了起来。他后来又化妆成东方美女，戴着黑色卷发和飘荡的面纱，给客人预测了未来。

据他预测，他和他的未婚妻贝尔塔当然是不久后就要结婚了。



午夜。1933年0点。

在贝希特斯加登，约瑟夫·戈培尔将手伸向他的“元首”，看着他说：“我祝您拥有权力。”

山谷下面是新年的烟花，到了山顶，火光绽放，钟声响起。“粉碎旧的一年！”戈培尔想道。

后来希特勒的其他信徒在庆祝新年，喝酒、聊天，戈培尔拼命把电话压在耳朵上。从柏林打来的电话，玛格达状况突然恶化。她不能

自主进食，非常严重，有生命危险。他还想了解更多，可是电话断了。

对于戈培尔来说，他是带着巨大的心理痛苦开始1933年的。



施莱谢尔给在瓦莱尔凡根的弗朗茨·冯·帕彭发了新年贺电。“祝你1933年一切顺利，非常感谢过去一年在决定性的战斗中的先驱，我亲爱的小弗朗茨和他的家人。施莱谢尔。”

害怕对手会报复，却会给对手发这样一份电报吗？“我亲爱的小弗朗茨”？

施莱谢尔也许就是这样做的。

1933年1月1日，星期日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对民主国家的大规模进攻被击退。

《法兰克福汇报》

新年——新的战斗？

艰难的一年已经过去。更艰难的一年在我们面前。为了再次度过这一年，必须使德国最强大的工人党的战斗力达到最完美。

《前进报》

这个世界人们到处都在谈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阿达尔伯特·希特勒”。还有呢？下落不明！

《柏林日报》



新年。酩酊大醉的一天。



在乌特列支大街，一个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瓦尔特·瓦格尼茨早上1点钟时下腹被捅了一刀死掉了。据推测，作案人是共产党人。一个叫萨罗夫的人很可疑。瓦格尼茨在一家酒吧与希特勒青年团第3分队庆祝新年。凶杀案就发生在这条大街上。



约瑟夫·戈培尔启程回柏林。他回去时玛格达还能活着吗？这几天戈培尔总是想到上帝。



由大使致辞迎接新年是法国使馆的传统，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的亲切致辞：我们至少可以满意地认为，“法德关系目前正处于放松而平静的氛围中。”

此外，以往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谈判会议——对德国人来说更像是军备升级谈判会议——一方面充满了法国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体现着德国的任性。帕彭任职时代表团的姿态是不同的，不像以前那么恭顺，至少美国人这么说。



报纸上是形形色色的新年祝福。秘密顾问弗里茨·德穆特，柏林工商业协会（Die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 Zu Berlin）法律顾问，表达着乐观的想法：“即使是最谨慎的判断者，在年底也确信德

国经济已克服了最艰难的一段。冬天就是一个停滞时期，希望春天能够好转。”



当然，按照惯例所有受邀者都要在12点钟去总统那里迎接新年。大家都要去。但是在总理府并没有见到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的影子，如赫尔曼·戈林，毕竟他是国会议长。本已下台但在这期间还继续行使职权的普鲁士社民党政府也只有很少的代表到场。

活动从迎接外交团体开始。很多人做演讲。出席的记者都认为兴登堡和施莱谢尔一致宣传温柔方针。德国要和自己和解。

兴登堡说：“确实需要投入最大的力量，采取非常措施，来保证我们国家的公共事务和经济生活免受危险的内部冲击。但是危机尚未度过。”

接下来政府问候到场者。施莱谢尔对兴登堡说：“总统先生，您几个星期前安排我就任政府最高职位时曾对我说过：请您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社会补偿来缓解我们德国人民的紧张局势。政府会将这一指导思想作为施政纲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德国人民以目标和希望。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条路漫长而艰难。”

最后施莱谢尔感谢了他的前任。目前政府创造就业就是建立在“帕彭政府坚定而宝贵的工作基础上的”。

一句友好的话总不会有什么坏处。



传统的新年跳台滑雪比赛在帕滕基兴（Partenkirchen）开始了，年轻的德国人托尼·埃斯格鲁勃获胜。这应该是在这一跳台上的最后一跳——1936年冬奥会要在古底贝格（Gudiberg）建一个新的大型木制跳台。



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比利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卢森堡的共产党在埃森秘密会面。是关于可能即将来临的革命吗？可惜议程也是保密的。

不管怎样，德国共产党目前正在胜利与自我毁灭之间徘徊。11月国会选举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人民群众整个重组过程的重要特征就是共产党人获胜，而社民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党留不住群众，中产阶级独裁不能持久。”

选举结果完美地证实了党的方针，不是吗？6个星期前，9月17日，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宣布策略，“推翻帕彭政府，反对法西斯独裁的兴起，需要一马当先，在工人阶级阵营中反对作为社会支柱的社民党，反对作为金融资本的法西斯恐怖组织和战斗组织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但这场战斗有一个问题：党自身的战斗力值得怀疑。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各种形式及方法的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们的党组织还非常不称职”。

魏玛共和国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做好抵御准备。但是，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却认为，他们的成员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做好进攻准备。



对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来说，新年伊始情势可喜。总统看起来无疑很满意，经济看来不久就会有飞跃。经济研究所最新季度报告分析道：“经济衰退已结束，并触底反弹，之后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

从去年年初起，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和抵押债券价值不是增加了超过30%吗？



天主教徒路德维希·卡斯，中央党领袖，在他的新年号召中谈及“斗争还是募捐”，要求从“领导方面”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德国的救世主从哪来，只有上帝知道”，他说道，他的党会“大度而又感激”地献身于这个救世主，“这个真正伟大真正有丰功伟绩的、能让群众愿意追随又渴望的救世主”，又说，“谁领导德国真的无所谓，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做什么”。

这些出自一个中庸的、天主教领导人的话语完全可以引起不安。似乎德国未来政府领导者不必具备任何态度和价值。一个可以来自任何地方的政治弥赛亚。



汉斯·采尔是《每日评论》的主编和所有者，这一刊物是支持施莱谢尔的。1932年8月，一群知识分子收购了该刊物，他们与月刊《行动》（*Die Tat*）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有传言说施莱谢尔投了很多钱。《行动》的出版人也是采尔，他在年轻的保守派圈子里赢得了声誉，对当前主题进行非常透彻的剖析——如此说来，采尔其实就是右翼的奥西茨基，却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

今天他在《行动》里写道：“施莱谢尔只有决心做出最后改变，才能表现自己，也就是说，他今天将毫无执行力的民意融入国家中。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冯·施莱谢尔将军是一代人中最后一个能带领众人有意义地过渡到新时代的人，今天也找不到可以替代他的人。如果他失败了，我们很可能在经过短暂的轮番尝试后陷入内战，这将大大危及国家的生存。”

正如威廉大街私底下传说的，汉斯·采尔正在施莱谢尔那里谋求一个非常有影响的职位。这些社论当然可以当作求职信，很清楚。但是采尔眼前浮现出一个独裁国家的形象，这个国家和民主没有半点关系。



在败于荷兰后，教练奥托·内尔茨领导的国家足球队也输给了意大利。面对博洛尼亚里托利亚勒球场^[10]的30000名观众（只坐了大约一半），奥托·罗尔带领德国队一路领先，但是意大利球星朱塞佩·梅阿查反击——最后主队3：1逆转取胜。

教练维多利奥·波佐执教的意大利队是当时的一流球队。虽然由于经费问题没有参加1930年乌拉圭世界杯，但是意大利国家队在这一年捧回了欧洲杯的奖杯，位列奥地利的“奇迹队”之后，获得第二名。即将到来的1934年世界杯将在意大利举行，意大利国家队也被认为是种子队之一。10月以来，大家都清楚意大利将是东道主——这要感谢贝尼托·墨索里尼慷慨的经济支持。

说到奥地利。1931年，以维也纳职业球员兼广告明星马蒂亚斯·辛德拉为核心的奥地利队，以6：0和5：0的比分两次战胜德国。奥地利国家队出线机会很大。相反，德国还在为拿到世界杯的入场券努力。



房屋公司“罗兰”和“普利穆斯”的住宅区的大多数租户进行抗议。2800人生活在这些住宅区。不少居民一半左右的收入用来付了房租。他们之前要求降低10%的房租，但没有成功。



据官方统计，柏林各地共有166152栋住宅楼，1357812个公寓登记在册。其中三分之二的公寓只有一两个房间。

1931年人口普查显示，柏林共有4288700人口。



慕尼黑“糖果盒”剧院离位于马克思-约瑟夫广场的国家剧院只有400米，晚上卡巴莱小品剧团“胡椒磨”（Die Pfeffermühle）在这里首演。

德国很多知识分子都知道创始人的名字：女演员特蕾泽·吉泽，她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以及“曼家族的双胞胎”爱瑞卡和克劳斯，他们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孩子。当然他们并不是双胞胎，但是总是一起行动——他们也一起营销、出版有关他们旅行的图书和文章系列。

“糖果盒”与“皇家宫廷啤酒屋”毗邻，早年希特勒很喜欢光顾的啤酒屋。正好，“胡椒磨”在1933年1月登台演出，是针对希特勒，针对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要奠定“好战的反纳粹的”基调。另外“胡椒磨”这一概念是托马斯·曼发明的。晚餐时，爱瑞卡说她的小品剧还没有合适的名字，她父亲就举起餐桌上的胡椒磨说：“这个怎么样？”

爱瑞卡·曼作为节目主持人迎接嘉宾并贯穿节目始终，她称希特勒是一个思想未受过教育、喜怒无常、性格变化非常大的人。单说他的身体：先天不足。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反正也不喜欢这个思想自由、生活自由的女权主义者。但是表演小型戏剧的女演员吉泽也跟着加入“胡椒磨”。希特勒说过，他觉得“非常棒”，认为她是“民族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只有在德国才能见到”^[11]。——看起来希特勒并不知道她的犹太出身。

如果特蕾泽·吉泽继续演下去，希特勒就不会这么经常说了。



晚上，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柏林看了雅克·奥芬巴赫的轻歌剧《特拉比松公主》（*Die Prinzessin von Trapezunt*），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东方。之后，在场的人讲述，一位女演员在剧情高潮时问道：“我们现在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回答道：“我们建立一个新政府，解散国会。”

群众大声呼喊。

总理对此应该是冷笑吧。



阿道夫·希特勒新年这一天去了慕尼黑国家剧院：瓦格纳的歌剧。理查德·瓦格纳开阔了他的情感，这部《纽伦堡的名歌手》演出时长超过4小时，并且是由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院长，著名的汉斯·克纳佩茨布什^[12]指挥。希特勒与瓦格纳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拜罗伊特总是受到欢迎。

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金发女秘书也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位有魄力的年轻女子叫伊娃·布朗。她和希特勒之间正发生着些什么，具体是什么，即使身边的人也并不清楚。但是一个女人在希特勒身边，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保密，这事关选票。更准确来说：女选民的选票。恩斯特·汉夫斯坦格连同他的太太海伦也在这场音乐会中，海伦是希特勒在慕尼黑战斗岁月中的一位女性朋友，还有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太太伊尔赛。

音乐会后，这一群人前往博根豪森^[13]，汉夫斯坦格一家下榻在公爵公园旁比恩泽瑙大街。在壁炉旁喝着咖啡，聆听着留声机里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曲，闲谈着，汉夫斯坦格演奏起瓦格纳，所有人都忘记了时间。希特勒虽然不喜欢克纳佩茨布什的解读，但他心情很不错，几乎是欢快的。到最后访客登记时，旅馆主人感到希特勒都要抑制自己的兴奋。“今年属于我们，”“元首”对汉夫斯坦格说，“我向您保证。”

[1] Eiserne Front，在魏玛共和国成立的反纳粹、反君主制和反共产主义的准军事组织。

[2] 一位德国拳击手。

[3] Herrenklub，魏玛共和国大地主、大工业家、银行家及高官联盟。

[4] Keppler-Kreis，或称“经济之友”圈，是一群德国工业家，其目的是加强纳粹党与工商界的联系。该组织由阿道夫·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组建和协调。

[5] 指妇女组织Bund Königin Luise，活跃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由霍亨索伦家族赞助，与“钢盔团”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关系密切，活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君主主义和反犹主义色彩。——编者注

[6] 也称“五国声明”（Fünf-Mächte-Erklärung），指日内瓦裁军会议1932年12月的大会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五国代表达成协议，承

认德国在各国同样安全体系范围内享有平等权利。此前拒绝继续参与谈判的德国由此重返谈判桌。协议也对一直有争议的“战争”概念做出明确定义。——编者注

[7] Berghof, 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山的别墅。——编者注

[8] 位于威斯巴登的香槟、葡萄酒和烈酒的德国生产商。

[9] 一种半起泡的葡萄酒。

[10] Stadio Littoriale, 二战后更名为“市政球场”（Stadio Comunale），1983年更名为“雷纳托达拉拉球场”（Stadio Renato Dall'Ara），可容纳超过50000名观众，最多甚至有大约60000名观众同时挤在球场内观赛。——编者注

[11] 原文使用了“völkisch”（种族的、民族的）一词，为纳粹用语。——编者注

[12] 德国著名指挥家。

[13] Bogenhausen, 慕尼黑市辖区，是该市的上流社区。

风口浪尖上

1933年1月2日至1月29日

1月2日，星期一

现在该告别圣诞蛋糕与圣诞树了，德国必经的年终政治低潮已结束。

《福斯日报》



共产党在德国许多城市中准备接下来几天将举行的集会。他们画海报，练习喊口号。他们宣布：“滚蛋吧，施莱谢尔政府和所有的法西斯军团！”另外还有：“抵制掠夺工资、裁员和物价上涨！”当然还有：“结束纳粹恐怖谋杀！”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跟一个心腹抱怨，为复杂的经济问题伤脑筋，就连细枝末节都要考虑到，真是伤神，有争议的问题中各个阵营互相交错。不管怎么说，经济也不是施莱谢尔的专长，但如果德国经济没有回转，德国将会很艰难——当然他也会很艰难。



早上，党卫军的情报部门开始新的一年的工作。党卫军特务们的办公室在慕尼黑上流社区博根豪森一条死胡同的倒数第二幢房子里，离汉夫斯坦格家不远。这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家人的房子。

海德里希的组织和为其提供资助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缺乏经费来支付党卫军队员的薪水，1月2日这一天，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来上班了。他们中很多人都失业，有些人只能寻找其他机会。

莉娜·海德里希为还在工作的人及其他党员提供膳食。她用干菜做汤，准备一份没有鱼的鲑鱼沙拉。气氛非常沮丧。用勺子搅着汤的人，也在考虑着要走人。

1月3日，星期二

施莱谢尔敦促解释。

政治假期结束。昨天“城内和平”也结束了。明天国会元老委员会将举行会议，将决定国会何时重新开会。

《福斯日报》

“走到街上去！”

反对施莱谢尔独裁和纳粹恐怖谋杀的红色集会游行。

《红旗报》



是的，“城内和平”结束了。这个奇怪的、中世纪出现的概念，似乎不太适合用来描述民主过程，可是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用这个词。无论如何，今天起，政治集会、游行和政治会议又没有限制了。“城内和平”是11月7日由总统兴登堡通过紧急法令宣布的。



像卡尔·冯·奥西茨基这样的人，如果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来阻止他，他会做些什么？他会写作，不停地写。在夏洛滕堡区的康德大街152号，《世界舞台》的编辑部发出了这些文字：“1932年初，纳粹独裁即将来临，空气中满是血腥。最终，希特勒党被一场严重的危机所动摇，长刀无声地回到鞘中，只有元首在观察时局。德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但是非常迅速。”

施莱谢尔现在是“一个已经达到目的的雄心勃勃的人。如果他像他的职业生涯那样，为祖国的利益展现出他的强硬，那么我们就迎来了黄金时期。”奥西茨基冷静而又狂热地观察着德国政治家。施莱谢尔这种类型也许并不能打动他。但他成了很多人的希望。这是为什么呢？

“德国今年夏天在反革命上显得无能，正如1918年在革命上一样无能，现在右翼既不是更聪明，也不是更有力，这使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惊讶困惑。施莱谢尔的新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种混乱。

由于缺少重要的市民阶级的平衡力量，即使是顾问、助手或辅助人员频繁更换，施莱谢尔也可能会坚持很久。有一点是确定的：他开了‘禁卫军总理’（Prätorianer-Kanzler）的先河。”

这是个多么引人注目、多么强大的概念，“禁卫军总理”。当然这一概念是指罗马帝国时期，禁卫军作为皇帝的贴身保镖。奥西茨基的用词把施莱谢尔简化得只剩军事功能。奥西茨基真的把保罗·冯·兴登堡看作是德国事实上的皇帝吗？



在利珀的竞选可以开始了。阿道夫·希特勒几天前阐述了他的“突破性竞选”，所以非常清楚：为了取得好结果，资金匮乏的党将全力以赴。希特勒宣布亲自去利珀，而且晚上真的在慕尼黑上了火车——但是奇怪的是往科隆方向，而不是向汉诺威方向，如果去利珀应该走汉诺威方向。他的新闻主管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卡尔·冯·奥西茨基鄙视很多党派政客，国家社会主义党他打心眼里特别鄙视。“纳粹危机首先是资金危机。党内对理论感兴趣的阶层一直都非常薄弱。大部分党员都是笨得不能再笨的人，穿褐色衣服的教官都是靠钱聚集起来的，而不是靠思想。”

格里高·斯特拉瑟的形象也并不突出：“正是因为这个格里高有种使人有好感的气质，人们更倾向于客观地审视他，这种审视，对于像戈培尔这样的歇斯底里的尘螨简直是浪费，但是这种审视除了让事情更扑朔迷离外，别无他用。

一个党几个月前还要求一切，并且以它当时的规模确实可以要求一切，今天却在危机中挣扎，这当然是一场独特的闹剧。不过，这样可以警告我们不要有过度的期望，这似乎对我们来说也是适当的。只有普遍经济形势重新好转才能彻底消灭国家法西斯主义。”

戈培尔读到这些了吗？“歇斯底里的尘螨”——这已经将潜在的恶意又升级了。戈培尔对这些恶意诽谤非常敏感：有一次，他派一位党卫军队员到编辑部，把一位记者暴打一顿，这位记者曾经很不尊重地写了她太太玛格达的事情。或者这只是戈培尔自己吹嘘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



晚上，《以色列家庭报》（*Das Israelitische Familienblatt*）的编辑在汉堡遇刺。午夜时分，一个年轻人在哈维斯特胡德路向伊茨里尔·卡乐巴赫多次射击时，这位犹太编辑正要寄一封信。很幸运没有打到他，但是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帽子，他倒下了，摔到了头，失去了知觉。

卡乐巴赫夏天时曾惹恼共产党，引来了仇恨，因为他访问苏联后曾写了一系列文章，告诫信仰犹太教的人不要去苏联生活。从此以后，共产党经常伏击他、威胁他。现在他们严肃行动了。

1月4日，星期三

国会等待着利珀；

最小的邦级选举应当作为舆论晴雨表。

《福斯日报》

敬爱的同志们！

同志们！不要让敌对组织抢在我们前面，耗尽我们的青春，而是要努力争取吸引那些中立的年轻人。

自由！

《国旗团》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想出很多主意摆脱“元首”的追踪者。早上，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其他代表乘坐夜车从慕尼黑到达波恩。在火车站，希特勒的司机将随行人员接到一辆六座车上，然后在巴德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er）的德累斯顿酒店吃早餐，酒店坐落于莱茵河畔一个美丽的地方。

然后希特勒指示他的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坐第二辆车开往杜塞尔多夫方向，在距离科隆3公里处等候，这辆车的窗帘一直紧紧地闭着。迪特里希坐在希特勒一直坐的位置，也就是司机旁边的副驾，戴着一顶帽子。

希特勒和他的同伴此时却消失在第一辆车中。威廉·凯普勒坐在驾驶位置。那些中型企业家、国家社会主义党员成立了一个顾问圈，将国家社会主义党与财力雄厚的工业家聚集在一起。



早上，亚伯拉罕·普洛特金阅读柏林报纸的头条。头条报道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的群众集会。警察悬赏500马克奖励提供谋杀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瓦尔特·瓦格尼茨的线索。纳粹认为：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起政治谋杀。另外一些人说：这是酗酒者滋事的不幸结果。



2点钟开始，柏林警察进入警戒状态。下午，共产党在卢斯特花园召集集会——因为从1931年10月31日起实施的示威禁令于1月3日正式废止。



希特勒的目标是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的别墅，城市森林路35号。施罗德有张与众不同的脸：半秃，一道疤痕划过左颊。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随行人员的车开在前面。下车时他们都很生气。为什么有个摄影师在门前？难道不是说好严格保密的吗？

阿道夫·希特勒和不久前还是德国总理的那个人——弗朗茨·冯·帕彭，兴登堡的顾问——在施罗德的书房里谈了两个多小时。为了准时到科隆，帕彭甚至取消了一次打猎。这时他说，最好形成一个有保守和民族元素的政府，这些支持过他的党派可以和纳粹一起执政。为什么帕彭本人和希特勒不能一起领导这一政府？

希特勒以他特有的方式回答：发表演讲。如果他成为总理，只要帕彭的支持者也支持他，他会将这些帕彭的支持者作为部长纳入政府。

这只是开始。也许是的：开始。



由于政府大赦，到今天为止，有6074名政治犯被释放。他们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卡尔·冯·奥西茨基一样，在未来的日子里，被当成魏玛共和国的筹码。



出现了丑闻吗？

东普鲁士纽德克农庄成了话题，这个地方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1927年从大地主和工业家那里得到的80岁生日礼物——那块家族旧时的地产埋葬着他的祖先。

埃里希·鲁登道夫在他的周刊《鲁登道夫的人民瞭望》（*Ludendorffs Volkswarte*）中严肃批判了这一馈赠，提出了兴登堡是否通过抵押地产来牟取“东部援助”资金的质疑。所谓“东部援助”是由61个法律法规混合组成的项目，各级政府用以刺激农业发展，阻止农村人口外流。

该农庄转移到了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名下。如果老人有一天离世，就省掉了遗产税。这合法吗？对于总统来说，是否符合道德？

施莱谢尔并没有来见总统，兴登堡一家表示很不满。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看到共产党在卢斯特花园游行时，非常好奇。他看到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年轻人涌向广场，他看到许多戒备森严的警察。他是否想到了上次警察的告诫，让他远离人群？那次他差点被德国警察暴打一顿。但普洛特金无法抑制住自己的好奇。

卢斯特花园是施普雷河中一个岛上公园，这个公园的大小让他想到曼哈顿的华盛顿广场公园。这里是大教堂，那里是皇家城堡，那边是宏伟的博物馆。集会开始，共产党人唱起了《国际歌》。合唱嘈杂又粗糙。然后开始演讲。人们总是呼喊三遍“红色战线”，并将拳头向上举起，应该有几十万人前来。

一个寒冷、阴霾又雾气弥漫的冬日。普洛特金四处望去。他意识到这一天的光是多么奇怪。他觉得柏林的灯在雾中看起来跟他所见到的其他城市都不同。

“红色战线！”

他又沉思良久。

一种迷人的光。

“红色战线！”

路灯是明黄色，里面有一点粉色，最后成了一种玫红色的光，这光使每张接近它的脸和每个接近它的身体都分外突出。

“红色战线！”

今天的主讲人是威廉·弗洛林，四年来，他一直是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此外还是国会议员。弗洛林是一位有成就的演说家，他所说的，肯定能煽动群众。他号召所有的无产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统一战线”，他从希特勒和戈培尔的“血腥恐怖”说到他们“反对工人阶级”，还不忘控诉最邪恶的敌人——共和国忠实的社会民主党人，控诉他们“左翼的空话”，“伪装成工人，这样可以与乡绅联盟以推进社会化”。他的演讲以口号结束：“工人阶级国际战斗联盟万岁！”

大家唱起《马赛曲》，法国人民的自由之歌。

一起走吧，祖国的子民，

荣耀之日来临了！

我们面对着暴政

升起血染的旗子

但这些人还是缺少些什么。一种内心的热情，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一种信念。普洛特金感到很奇怪，他对自己说，这一过程中，这些人不管怎么说还是像士兵一样有纪律，从他们的街区出来走了好几个小时。

人群开始散开时，普洛特金还在沉思着共产党是如何在整齐的队形中唱着歌行进，当一名警察向他们发出指令时，他们又是怎样服从

地在街边停下来。这是真实的德国吗？一个连革命都能仪式化的德国？他问自己。

不，他对自己说，这些人今天手里没有任何与真正权力相符的东西。

并不是权力的展示，而更像个假面舞会。



各党派在利珀选举的计划公开了。阿道夫·希特勒在10日内要在16次集会上发言，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城市与乡村。除他之外，戈林、戈培尔和凯尔也参与由150次集会组成的竞选之行。

由恩斯特·台尔曼代表的共产党宣布举办160次集会，胡根贝格代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宣布举办100次活动。从1918年开始在这个最袖珍的邦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计划了150次竞选活动。

要大张旗鼓争取的只有大约117000名选民。在其他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将之看作是民主政治原则的胜利。



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国家社会主义党提出申请，主管繁殖纯种马和赛马活动的最高机构在未来应抵制外国人拥有“驯马师及职业赛马骑师许可”。



当帕彭得知摄影师在银行家施罗德的别墅前潜伏，他就知道，他们的会面被泄露了！如果他不想跟施莱谢尔搞僵，就要赶快处理。他

即刻前往杜塞尔多夫，他母亲住在那里。他写了一封信给总理，为他与希特勒的会谈辩护。



元老委员会开会，讨论召集国会的相关事宜。施莱谢尔总理派国务秘书爱尔兰·普朗克出席国会，普朗克宣称，政府随时准备出席国会并宣讲政策。经过激烈讨论，大家一致同意1月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社民党和共产党、中央党、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德国人民党投了同意票。国家社会主义党弃权。在此之前，1月20日，元老委员会将再次开会，以确认日期是否合适。



奥托·迪特里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媒体负责人，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希特勒的车终于到的时候，天已经又快黑了。希特勒指示，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向利珀方向前进。马路非常滑。



站在门前的这个摄影师是谁派来的？帕彭猜测他是个探子，因为他怀疑施莱谢尔的特工在监听他。还是像之后施莱谢尔所认为的，是斯特拉瑟的特工？

事实上，是柏林一位牙医委托的这位摄影师。这位牙医的诊所在大桥林荫道14号，很久以来，海因里希·布吕宁、格里高·斯特拉瑟还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都是在这个诊所看牙。这个牙医名叫海尔穆特·埃尔布莱希特，兼职做记者，给《行动》和汉斯·采尔的《每日评论》写文章。一战时，他是一名歼击机飞行员，两次从射击中逃生。20年代以来，他与格里高·斯特拉瑟建立了联系，并在后者的圈子里认识了约瑟夫·戈培尔——也很鄙视他。有些人认为他是斯特拉

瑟，也是施莱谢尔的顾问，尤其是在经济政治领域。他有时会把自己在莎帕大街29号的公寓让出来，让这两个政治家进行密会。

摄影师是一名退休的陆军上尉，名字叫汉斯·约翰内森，是斯特拉瑟身边的人。他的照片准时到达柏林《每日评论》那里，编辑还来得及改变明天早上的头版——并刊登照片。

真正的独家新闻。



同一天晚上，希特勒在利珀做了他的第一场竞选演讲。由于路面很滑，他晚了2个小时到达博星菲尔德（Bösingfeld）；可是人们在冰冷的帐篷里坚持到10点。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伴随着雷鸣般的欢呼，然后又去了邦首府代特莫尔德（Detmold）。接近午夜时分，他做了第二场演讲。

这样的日子结束后，希特勒出透了汗，筋疲力尽，完全被掏空了。试图睡觉前，他会心不在焉地用勺子喝口汤。成功的代价是昂贵的。

但是机会不错。这次选举简直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党量身打造的——用以摆脱危机。利珀位于条顿森林东北侧，是魏玛共和国17个邦国中最小的一个，只有德意志国国土面积的0.25%——人口和面积都是最小的，是典型的农村新教区。在这里，国家社会主义党比在别的地方都更容易找到倾听的人。工业？矿业？几乎没有。相反，却有一些制造家具或海泡石烟斗的小工厂。

此外，利珀还被一些人口密集的邦所包围，运动更容易获得援助——还有观众。希特勒发表第一次演讲时，国家社会主义党将支持者运送过来，有6辆专车，许多公共汽车，还有货车。上百名冲锋队队员

骑着自行车前来。他们的“元首”夜宿在一座历史悠久的水堡里，他们寻找仓库和阁楼，躲避刺骨的寒霜。尽管他们和社民党一样很勤奋地宣传，但他们的集会并不像社民党的那么枯燥。他们引进小型乐队，奏起军乐。谁要是太引人注目，就会被从礼堂中清除。

这也符合事实：1929年邦议会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只取得了21个席位中的1个。

在利珀，国家社会主义党只能赢。

1月5日，星期四

胜利的工人大军游行反对施莱谢尔独裁；

10000多人在卢斯特花园。

《红旗报》

希特勒和帕彭对抗施莱谢尔。

《每日评论》



《每日评论》的报道在政治之城柏林引起轰动。该报描述了帕彭与希特勒在科隆银行家施罗德处的密会，这密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个事件甚至出现在社民党的《前进报》上，这并不是亲施莱谢尔的媒体。在科隆已形成反施莱谢尔联盟——不是吗？

弗朗茨·冯·帕彭也即刻获悉了头版内容。他确信：他的对手库尔特·冯·施莱谢尔通过关系动用早间新闻来反对他。

当然，所有的记者对此都立即做出反应。恺撒霍夫酒店的旋转门响个不停。电话中心超负荷运转。



据说施莱谢尔和斯特拉瑟昨天见面了！这一谣言也在威廉大街传开了。反希特勒联盟？

施莱谢尔的顾问布雷多在他的日历上记录道：“没有从帕彭处听到任何消息。”



在旧金山，一个目标远大的建筑正破土动工，许多人说这是一个世纪项目。一座巨大的桥梁将在几年后跨过城市所在的宽阔海湾。这就是“金门大桥”。



昨天的印象让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不能忘怀。共产党似乎有“铁的纪律”。但是演说家弗洛林并没有激起特别的热情，普洛特金感觉他也并不想激起什么热情。那么社会民主党呢？普洛特金问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宣布游行。他想：“也许他们在等着让别人先开枪。”

对，也许社民党就在等待。等待时机成熟就猛然反击。



谣言，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每日评论》的负责人汉斯·采尔用巨款贿赂了希特勒的一名保镖，从而获得了密会的消息。



这一年开始得很温和，至今为止，唯一让人不安的就是政治谋杀。新年以来已有5人死亡。在布雷斯劳，一名年轻的社民党人被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刺杀。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支持者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汉堡、埃尔福特和亚琛的争端也时有报道。



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共产党是对社会真正的威胁。这个党是由苏联控制的，而苏联是新的超级大国。在武装反对国家政权面前也不退缩——对不少人来说，共产党这一套明显比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空谈更具威胁性。

一年半前，1931年夏天，共产党人杀害了几名柏林警察——阴险的谋杀，在公众中引起极大不安。1928年1月到1932年10月底，普鲁士警方公布共有11位官员被杀害、1155人受伤。他们将8名死者和870名伤者归责于共产党。另外3起谋杀还未调查清楚。虽然共产党官方一直在与这些罪行保持距离，但总理府一直都有禁止该党的具体打算。这也将大大改变国会中的多数比例。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与他的智囊团在讨论近期的选择。唯一的问题是，这会不会是在玩火自焚？如果共产党的雄辩真的起了作用会怎样，总罢工？甚至是爆发革命？



晚上，亚伯拉罕来到体育馆，这一次，他真想听一听约瑟夫·戈培尔的演讲。今天，柏林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不是那么……散漫。很幸运，他在楼上找到了一个位置。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活动还是以游行开始的，一个全身黑衣的女人由一个男人陪同，她是游行中的一分子。这是瓦尔特·瓦格尼茨的父母！人们窃窃私语，那个被

害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父母。下面的舞台上，一个人站起身问候这个女人。是戈培尔！人们低声说。

这时鼓声慢慢响起。送葬。

虽然普洛特金有看戏剧的望远镜，可是他也没有看清戈培尔的脸。他可以看到深色头发、深色面孔、深色轮廓，一直在动，却不能在脑海中形成这个人清晰的形象。但戈培尔的声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声音如此有力，使普洛特金想道：这声音要是出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1]也一点不奇怪。

戈培尔开始了他的演讲：政治休战过去了。“战斗重新开始！”戈培尔说道：“施莱谢尔说，他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资本主义者，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他没有原则，他用武力来统治，只是用武力。”

普洛特金注意到掌声越来越热烈。人们走近舞台。“每个运动都会落实到每个个体，而每个个体又体现整个运动，如果离开希特勒，就会摧毁整个运动。”

戈培尔情绪激昂起来，普洛特金所感受到的，他也一定感受到了。礼堂里的人群情激愤，一直在喊“希特勒万岁”。

“我们会接着努力，就算是需要一个世纪，我们也会接着努力。我们拥有古罗马的力量，他们年复一年地与迦太基人作战，直到迦太基灭亡。我们会不舍昼夜地工作，直到我们的斗争取得胜利。我们将用生命实现这一目标。”

“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声犹如风暴。普洛特金看到男男女女都在呼喊，形成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他们的手都向上举着，他注意到，因过度激动，灯光都在眼前乱跳。

这时戈培尔又说，瓦尔特·瓦格尼茨！谁为年轻的瓦格尼茨的死负责呢？他问道，“谁？谁来负责？除了犹太人，别无他人，只有犹太人。读读他们的报纸吧。没有任何关于谋杀的内容。为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说，必有隐情。”

普洛特金感到人群像是被充了电。男男女女都嘶哑地喊着。另外一些人诅咒着犹太人。

有那么一刻，普洛特金以为戈培尔失控了，人群会因激动而议论纷纷。但是戈培尔突然又掌控了一切。这时他的声音又响起来，他又叫喊起来。“犹太人主宰了我们民族的生活，”普洛特金听到这样的话，“还有我们的经济、报纸和我们的政治，直到再没有德国人。我们是一群由少数犹太人统治的奴隶。为了从犹太人手中拯救德国，才掀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运动完成之前，我们都是奴隶。”

普洛特金震惊了。他几乎不能相信，戈培尔肆无忌惮地利用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死，使群众陷入极度兴奋。他竟然将犹太人刻画为肇事者。普洛特金明白了，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党集会的真实气氛。他确信，这种纯粹的情感强化，这种仇恨的基石，迫使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运动有这样的本性：没有耐心，没有持久性。这一运动如果不能迅速取得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瓦解。或者，它真的会取得政权。

那必将是仇恨统治。

1月6日，星期五

会谈是为了让帕彭先生与总统及总统的儿子恢复良好的关系，再次向总统建议希特勒当选总理，冯·帕彭先生可能以某种形式进入内阁。

《每日评论》



普洛特金也读了报纸，他读完后四处打听了一下。左翼方面对此都兴高采烈。工会会员及社民党成员已经开始嘲笑希特勒和帕彭之间联盟的前景了。帕彭做总理时，难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不是很清楚他们对这个人的看法吗？

另外，人们也告诉普洛特金，重工业行业非常不满意施莱谢尔的亲工人方针。



臆测越来越不着边际，压力越来越大。帕彭和还在利珀旅途中的希特勒发表联合声明：针对媒体中广泛传播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及前总理冯·帕彭会面的不实推论，我们声明，我们会谈的主题仅仅致力于建立伟大的、民族的政治统一战线，此次会谈丝毫未触及对现任内阁的看法。

有人会相信吗？



威廉大街的花园正处于冬眠状态，树早就秃了，但偶尔也会显现出生机。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带着一位访客到总理府后门：格里高·斯特拉瑟。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正在休短暂的冬假而没有在柏林。兴登堡随后表达了对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赞赏。

然而希特勒方面也获悉了这次密会。



非正式会面：德国总理下午晚些时候去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处品茶。他们并不只是互相尊重，还彼此喜欢。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未来和平世界的宏伟蓝图：由“德国和法国共同逐步”实现的“欧洲经济需求的满足和经济的一体化”。尽管几天前，两国刚刚解除贸易和工业政策的争端，但在这样一个围绕《凡尔赛条约》而充满争执的时代，在农场主要求征收关税的时代，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游行示威的时代，这不失为一个大胆的想法。

当然，二人也谈起这两天的事件。施莱谢尔说，对于帕彭和希特勒之间的会晤，兴登堡“非常震惊”。很显然，帕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的意图并不坏。“他太草率了，”施莱谢尔接着说，“他只是想做一件大好事，想把希特勒绑缚起来摆到我们面前。希特勒难道不是已经多次证明了人们不可以信任他吗！现在帕彭很尴尬。他怕我们责备他。我也不会责备他。我只是对他说：‘我的小弗朗茨，你又出了洋相了。’”



社会民主党有动静了，体现在实际上被剥夺职权的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朗身上，他给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个人提出一项建议。

如果施莱谢尔能说服兴登堡在普鲁士再次任命他的内阁，作为响应，他将致力于解散国会和普鲁士众议院（Preußisches Abgeordnetenhaus）。然后，施莱谢尔就可以以紧急全权来统治——有他在社民党的支持与影响，就可以一起对抗国家社会主义。

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建议，这也许是唯一一次与社民党结盟的机会。但是那里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斯特拉瑟，施莱谢尔是坚信他的影响力的。

施莱谢尔回避了布朗的提议。



几乎同时，其他富有影响力的社民党人也突然活跃起来：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社民党在国会中的党团主席，邀请德国总工会主席提奥多·莱帕特在党派主席团中做报告。莱帕特准备与施莱谢尔合作的慌乱信号，无论如何也逃不过社民党的眼睛，不用说，他们已经戒备了。现在他们劝说莱帕特，几个小时地劝。他怎能这样，他到底在想什么，这可是关系到团结一致——等等……

最后工会领导就随他去了。从此以后他和施莱谢尔的内阁只能尴尬地保持距离。



是的，如果左翼能合作该多好。但在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这儿想都别想。上次总统竞选中，也就是1932年春天，他与兴登堡和希特勒出场竞选。他当时说：“选兴登堡的人就选择了希特勒，选择希特勒的人，就选择了战争！”这是有先见之明的话吗？还是斯大林主义者的煽动？

恩斯特·台尔曼是汉堡人；上一次在柏林，他住在夏洛滕堡区的科瓦尔斯基家，在俾斯麦大街24号，他以这个地址落了户。这些天，他搬到克鲁君斯基家，吕茨欧威尔大街9号，也在夏洛滕堡区。这里并不是秘密栖身之处，他也经常在此出入。

台尔曼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许多德国人很害怕共产党人，甚至是生理上的厌恶。比方说弗朗茨·冯·帕彭就是这样。

这种害怕有理由吗？共产党在国会选举中的选票一年年增加。1930年至1932年之间，选票从450万增至690万。每6个德国人中就有1人最后选择了共产党。

共产党宣扬革命，每天都在他们的传单上、集会上和《红旗报》上宣传革命。或者在议会中。在巴登邦议会中，共产党议员波宁不久前曾说过，“我们共产党知道，这个国家只能被武装力量推翻。工人们可以放心，工人阶级在必要的情况下会使用武器来进行这些战斗”。

共产党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说的。恩斯特·台尔曼也这样说，他是极左派（Ultralinker）。10岁时，他经历了汉堡港口1896~1897年工人大罢工。在学校，他读了席勒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他曾经写道：“所有的疑惑一下子”被撕碎，“让我的思想更自由、更自信地向社会主义发展，甚至并不知道社会主义实际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

后来，早在战前，台尔曼在科隆第九炮兵团服役，却背上“没有祖国的人”^[2]的骂名并被开除。他在“美国号”轮船上做装炭工，跑了3次汉堡—纽约航线。他于1915年1月13日结婚——那时他已经半秃顶了，招风耳倒是一直都有——1月14日又应征入伍。

他的太太罗莎在一家洗衣公司做熨衣女工，他给这家公司开车。他是个总爱辩论的人。罗莎所认识的他就是这个样子：恩斯特，罢工，为他的东西斗争，为工人利益想改变世界，从不放弃他的原则。现在，在魏玛共和国阶段，一方面，他反抗资本主义，反抗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因为台尔曼是个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知道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知道资本主义要发展到危机四伏的时候，才能被共产主义战胜。所以国家社会主义党取得权力也不错，这样就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这样共产党人首先自己就是个靶子。

台尔曼意识到了这一点。1931年7月，当社民党和国旗团干部问他，共产党关于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提议是不是认真的，他回答道：“希特勒式的军官和贵族子弟这些流氓们已经宣称，要把共产党运动扼杀掉，要使上百万的男男女女死于非命；鉴于这一事实，鉴于德国要成为死亡之国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难道我们共产党对于反法西斯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不是认真的吗？”

1月7日，星期六

被发现了！

希特勒和帕彭狼狈为奸！

《前进报》

我们得到可靠消息，这一会晤试图停止国家社会主义党与帕彭身后力量之间的战火。为在新的更广阔的基础上重建从前“哈尔茨堡阵线”^[3]而努力。

《每日评论》



1点半，太平间中正举行追悼会，悼念被谋杀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瓦尔特·瓦格尼茨。约瑟夫·戈培尔和青年团头目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出席了。守灵人是希特勒青年团第3分队。

短暂祈祷后，送葬队伍前往路易森城市公墓。成千上万人排队跟在灵车后面，路上走了两个多小时。在墓地，人们唱起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4]的第一节。演讲，献花束和花环。然后人群在渐渐降临的日暮中继续向卢斯特花园进发。

下午，当亚伯拉罕·普洛特金看到国家社会党人身穿制服，一队一队地从身边走过，他也跟着混进了人群。普洛特金的一个同伴问旁边一个女人，这些人唱的是什么。

“我不跟犹太人讲话的”，女人回答。

天早就黑了，7点半，这时候已经有十几万人来到了卢斯特花园。又是演讲。普洛特金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放眼望去，一片帽子的海洋。葬礼进行曲响起，接着约瑟夫·戈培尔讲话。

“我们知道杀人犯的名字”，戈培尔喊道。

这对普洛特金来说简直是“炮弹一样的效应”。之后他便确定了这样的印象：“卢斯特花园的各个角落都疯狂地喊道：快说！快说！戈培尔站了起来并沉默着。当他重新开始发声，便是用洪亮的声音，用缓慢的语速，用和在体育馆一样的伎俩，重复一个词或一种表达方式，直至在人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抨击报》报道，戈培尔高高地站在城堡坡道上继续演讲：

我们献出心灵，举起双手呼喊：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了。我们的耐心到头了。是犹太人的错，这是我们的控诉。

他们褻渎了我们的荣誉，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和面包，他们煽动起内战，他们弄得德国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注意到有一支1200万人的队伍向他们挺进，现在他们开始颤抖，现在恐惧已植根于他们的体内。他们知道阿道夫·希特勒就站在门前。他们胡说着分裂、瓦解和叛乱。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幻想。

他们知道我们团结一致，如果我们分崩离析，犹太就会取得统治。

最后几十万人唱起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为褐衫军清道

为冲锋队员清道！

百万人已充满希冀望着卐字旗

自由与面包的日子渐渐来临

普洛特金记录道：这些纳粹完全不需要说出事实和真相，就使群众陷入极度兴奋中，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的情绪。群众是多么容易被诱骗，他们心胸多么狭窄。

号角最后一次吹响，

我们都准备好去战斗！

希特勒的旗帜已到处飘扬，

我们被奴役的日子已经不再漫长！

后来，集会过后，普洛特金看到年轻的冲锋队员在待命，“像一群中学男生一样待命，而当卖香肠的开始分散在他们中间，他们也像一群中学男生一样买香肠”。



由于缺少杀害瓦尔特·瓦格尼茨的证据，有作案嫌疑的共产党人萨罗夫又被释放了。



由于对政治犯实行普遍大赦，针对约瑟夫·戈培尔的叛国罪诉讼终止了。去年4月，由于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干部在多个演讲及多篇文章中呼吁暴力颠覆国家政权，最高检察官曾努力起诉戈培尔。

1月8日，星期日

这场围绕权力的少数人的游戏越来越呈现出奇特的形式。越来越有必要最后进行谈判。

《每日评论》，汉斯·采尔

你们无产阶级的家庭主妇，你们还记得黄油的味道多么美吗？你们已经有多久无法把它拿到餐桌上了？

《大众画报》



12月，一名共产党人在莫阿比特街区将冲锋队队员埃里希·萨迦瑟砍伤，他身上现在还有刀伤。正如约瑟夫·戈培尔常说的那样，又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牺牲者”。



年轻的女诗人玛莎·卡乐可开心不起来，其实如果她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旁边的罗曼斯咖啡馆里和艺术家们聊天，她会是个开心的人，时不时也会卖弄风情。但在她诗意的忧郁中，可以为那寻找信心的人找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使阅读不那么忧伤。

苍白的日子

我们所有的苍白的日子

堆叠在寂静的夜里

堆叠成一座灰色的墙。

石头挨着石头。

所有空虚时刻的忧伤

都锁进灵魂。

梦像幽灵一样来了又流散

这是白天

我们总是犹豫不决地去捕捉彩色的碎片

在苍白日子的阴影里，

我们活着，因为我们没有死。



《大众画报》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冲锋队队员决斗。照片下面写着：“冲锋队练习突袭。穿褐色衬衫的队员带着左轮手枪、橡皮棍和匕首在柏林市郊进行‘清新欢快的野外侦察游戏’。”



英国作家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自1929年以来生活在柏林，近来他住在诺伦朵夫大街17号，那里离“舒适角”（Cosy Corner）及其他同性恋酒吧不远，这些地方都是他和他的朋友喜欢去的。11月他搬到公寓前厅睡觉——这里在黑暗的季节里至少还有些光进来，而且更容易取暖。伊舍伍德虽然只有32岁，但这里的冬天还是让他很虚弱。

“在柏林多待一天，我就凋零，而且变得更加丑陋。我的头发有头皮屑，头发掉光了，牙齿很糟，我闻到自己嘴里的气味。但我知道，我决不能离开这里。现在不能。如果要让我的小说更符合事实，小说的结尾部分还需要再做研究。”

和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伊舍伍德也是这样：现实激发他形成最可靠的虚假图像。他常常在这个城市游逛，其实他认为这个城市是个“梦”，因为警察是宽容的，因为这里的人们很开放，因为国际派对的场景使夜生活变得无比轻浮。

伊舍伍德写道：“柏林真正的核心，蒂尔加滕——一个小而潮湿的黑暗的森林。这个季节，寒冷驱使农民的孩子从没有防护的小村庄进城，他们期待在城里找到食物和工作。城市的夜空如此明亮，如此诱人，在大地上闪着光，可是它却是冰冷的、残酷的、死亡的。城市的温暖只是幻象，是冬季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城市不会欢迎这些孩子。它没什么东西可馈赠。寒冷驱使孩子们从街上进入森林里，进入这个城市的残酷之心。在森林里，他们蜷缩在长椅上，饥寒交迫，梦想着火炉和他们遥远的家中小屋。”

柏林是多变的。每个人都看到这个城市他所想看到的样子，或者他们害怕看见的样子。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真实的。



约瑟夫·戈培尔最近很难入睡。他的太太玛格达状况起伏不定。“这种可怕的痛苦和恐惧，”他在日记中写道，“真是让人绝望。”希特勒也打来电话，他也担心玛格达。明天他要和戈培尔一起从利珀去柏林，去医院看望玛格达。戈培尔写道：“我非常感激他。”

1月9日，星期一

帕彭在施莱谢尔处；

几个小时的谈话。

《福斯日报》

弗朗茨·冯·帕彭又到了柏林。他认为自己是作为败露的罪人去拜访——还是去赔礼？反正他去探访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们聊了很久。他说，与希特勒的会面只是要探探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在何种情况下才会支持施莱谢尔政府。施莱谢尔很专心地听着。

他在怀疑吗？并不是像平常那样怀疑。他认识他的“小弗朗茨”已经很久了。他永远不敢欺骗他。

他告诉施莱谢尔一些他非常感兴趣的东西。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不再相信自己能成为总理了，而是想担任国防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即身兼二职。

真是个好消息。虽然让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元首”有支配军队和警察的权力是个绝对荒谬的建议。

但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消息，因为希特勒似乎终于失去了耐心。



约瑟夫·戈培尔却听到另外一个版本。阿道夫·希特勒告诉他，帕彭向希特勒提出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能让帕彭再当选总理，希特勒就可以担任最重要的两个部长——国防部部长或内政部部长。

希特勒还说帕彭“强烈”反对施莱谢尔。他可以在兴登堡耳边吹风，而且他住在兴登堡那里。戈培尔很高兴，施莱谢尔在走下坡路。最好的消息是：总理没有解散指令，不能随意解散国会。帕彭确定了这一点。



拜访总理后，帕彭从总理府走了几步去总统那里。他知道这里的路，熟悉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兴登堡脸上满是皱纹，眼神里露出疲惫，不过还是能感觉到紧张的期待。正如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告知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的一样，当总统获悉这一会晤时，难道不是“深深地震惊”吗？

帕彭没有受到严厉的斥责。大家都在听他讲，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兴登堡说，施莱谢尔要求他不要单独接待帕彭。但是他，身为总统，从一开始就相信施莱谢尔对帕彭的看法是错误的。

帕彭说，阿道夫·希特勒已经不再致力于在内阁中做总理。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现在同意让他的党参与到有保守势力的联合政府中。

好啊，好啊。

国务秘书梅斯纳自然在场，保罗·冯·兴登堡转向他说，那么就需要一个新的总理。新总理只能又是弗朗茨·冯·帕彭。

至少在此次对话后已很清楚：总统与前总理结盟反对现任总理。一个密谋。然后呢？接下来怎样呢？

首先，帕彭想保持与希特勒的联系，私人的，严格保密的。

兴登堡同意了。

他对梅斯纳说：不要告诉施莱谢尔，他同意与希特勒继续保持联系！



从西班牙传来戏剧性的消息，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企图政变，特别是在城市的一个火车站进行了激烈交战，死伤人数尚不可知。



女演员伊丽莎白·伯格纳和导演保罗·锡纳在伦敦结婚。两人都来自奥匈帝国，刚刚一起拍了电影《做梦的唇》（*Der träumende Mund*）。他们是被公众和批评家赞赏的艺术家。人们知道，伯格纳最近住在柏林达勒姆区法拉达路15号。

但德国的政治局势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他们想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希望在那里他们是不是犹太人这件事并不重要。

1月10日，星期二

星期一，在帕彭的要求下，冯·施莱谢尔将军和冯·帕彭之间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谈话。

谈话中，帕彭着重证明了他的忠实。

《每日评论》

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者发表讲话：

斯大林同志对布尔什维克的总指挥部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任何困难能吓倒列宁的党！”

《红旗报》



斯特拉瑟在汉堡的广告攻势传到利珀。这一消息让在利珀的一些人紧张。希特勒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要去柏林。他乘夜车从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出发，于清晨抵达柏林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他今年第一次在首都停留。



施莱谢尔总理占上风。他和乌尔施坦出版社的约瑟夫·莱纳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福斯日报》记者也在场，施莱谢尔说：希特勒“几乎绝望，因为他觉得党已快分崩离析，而自己却从未能将党放在决定性位置上”。希特勒永远无法靠近总统，对总统来说，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几乎和共产党一样糟糕”。

这是信念，还是伪装的乐观主义，还是自我激励？总理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找到一条路将国家社会主义党拉进来。但这却是他的任务。很快国会将再次召开，一定会有人表达不信任的。在此之前，他必须去兴登堡那里请求解散指令。这之后的关键是，总统是否支持他的总理。

希特勒到目前为止固然保持了镇定，但如果施莱谢尔现在击中他要害怎么办？

像平时一样，总理有个计划。他明天要通过媒体负责人向记者发送信息，他将提名3位新部长来“支撑”他的内阁。一位是亚当·施特格瓦尔德，中央党议员兼基督教工会领袖。第二位——这个政治上比较敏感——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作为农业部部长和经济部部长进入内阁。

施莱谢尔将渐渐透露出第三位的名字，他就是副总理和内政部部长，也是普鲁士邦的新总理——格里高·斯特拉瑟。



这是虚张声势的恫吓。

施莱谢尔和胡根贝格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和施特格瓦尔德也没有——和斯特拉瑟的事情更是已经长久地郁积在他心中，迟迟没有结

果。每一次的虚张声势是否成功，都与对手有关。这次的虚张声势直指一个人：阿道夫·希特勒。

施莱谢尔对外宣称，他的大门一直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敞开。

阿道夫·希特勒如何反应呢？他将如何面对施莱谢尔呢？

答案是：根本不作反应。

不打电话，不去拜访，一封信也不写。

“元首”沉默着。



总理府召开记者招待会。总统和总理的关系如何？兴登堡与施莱谢尔的关系不同于他与帕彭的关系。没有与帕彭那么密切，是真的吗？

当然是这样，一位新闻发言人说，不过也很清楚，“施莱谢尔绝对能得到解散指令”。

很明显：总理并没有得到总统指令来对抗不信任提案。

还没有？这是个问题。



一周还没过去，在科隆的密会就已不再是秘密。现在帕彭和希特勒将进行下一次密会——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这次是在柏林的环境

雅致的达勒姆区，正是伊丽莎白·伯格纳和保罗·锡纳刚刚离开的那个区。从法拉达路到兰茨林荫大道7-9号的直线距离有3公里。

这天晚上，约阿希姆和安娜莉泽·冯·里宾特洛甫夫妇在等他们的客人。9点钟，司机先是接了弗朗茨·冯·帕彭一家。除两名心腹外，其他工作人员都被打发走。10点钟，一辆车在侧门前停了下来——和以前一样，希特勒穿过花园到了主人的别墅。在香槟酒商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书房里，帕彭和希特勒谈到了深夜。

1月11日，星期三

前进，红色自由军队；

世界在聆听！

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的胜利。

《红旗报》

希特勒绕道去柏林；

没有遇到总理。

《福斯日报》

国家专员格瑞克在国会社会政策委员会中解释了他的“即时就业计划”。5亿马克供公共部门的基础建设工作使用。这些任务首先要委托给私人企业。“目前已探讨了许多要求，超出了即时就业计划中应该满足的。”

如果在施莱谢尔内阁中有个可以寄托希望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法学家君特·格瑞克。格瑞克与右翼及工会的联系现在非常有帮助。如果他成功了，如果失业率降低，如果德国人又有更多的钱、更多的

食物，如果他们更加满意，那么这将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胜利。只是这些必须尽快进行。

格瑞克知道这些，他只能尽他所能。圣诞节前，格瑞克起草了一份内阁法案，施莱谢尔已批准这一法案，兴登堡也就默认了。节后，这一计划开始运行。大量申请的项目未经重大审查就获得批准——涉及道路建设、桥梁修复、运河工程。全国范围内开始施工。失业人员也开始按协定的工资工作。

自12月初以来，格瑞克有些日子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因为他必须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完整的机构。毕竟 he 可以从各部中挑选能干的人员，总理特批这些人员迅速到岗。每天早上7点，格瑞克让人来接他到威廉大街，时常过了午夜才回家。

这种工作量不可能苛求别人。施莱谢尔有一次会心地对他说：“这点我很赞赏：您同时给两个司机、两个私人保镖和双倍人数的打字员团队带来了工作和食物。”

总理需要这样的人。



193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变”，通过国家剥夺了邦政府的权力，使社民党和左翼工会陷入困境。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朗提的建议还在施莱谢尔的桌上放着。总理对格瑞克说，他自己会取消当时的紧急法令，然后就能把莱帕特拉到自己这一边，同时也把工会拉到自己这一边。但是施莱谢尔说，总统先生绝不会配合的。



5点半时，天早就黑了。在总统兴登堡的主持下，会议在总理府紧张进行：有施莱谢尔，还有食品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以及农业协会的代表。

农业协会。在魏玛共和国，人们需要很长时间四处寻找，才能找到有影响力的说客。农业协会主席甚至两年前迫于兴登堡的压力，被布吕宁政府任命为食品部部长。部长作为利益代表者，立即无耻地向国外竞争产品征收关税。农业协会里聚集的都是些大地主、农业企业家和东部的容克，他们对民主优越性的理解非常有限。上一次总统竞选，人们表示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因为保罗·冯·兴登堡与社民党为伍。在此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占据了农业协会中的关键位置。出席会议的爱伯哈特·冯·卡克奥特伯爵就是农业协会的关键人物：51岁，庄园主，11月作为向总统请愿书上的签字人，要求希特勒成为总理。实际上兴登堡很欣赏这个伯爵。

总统对农业协会的人绝没有公开的怨恨。上帝保佑，他的家庭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当然会以个人身份站在这一边。

官员们怨声载道。施莱谢尔难道不是答应继续帕彭的政策吗？难道不是该用关税、贸易壁垒，采取各种措施来给廉价食品的进口设置障碍吗？那些破产的农场主怎么办？帕彭在职期间，这些政策的强制执行被推迟，因此施莱谢尔必须继续执行！

施莱谢尔说，是的，措施还在讨论中，但是债权人也需要得到保护。

最后，总统干预此事：施莱谢尔要立即与相关负责的部长会面。总统希望第二天能有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是一种侮辱，也与宪法背道而驰。毫无疑问，兴登堡越权了。国家宪法第56条说：“总理决定政治方针。”

农业协会一个代表将一张纸塞到施莱谢尔手中，然后他们站了起来。纸上的内容是已经转给媒体的一项决议。谴责声十分锐利：施莱谢尔实际上在经营着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

大家在争吵中分开了。施莱谢尔有些震惊。

很快，他从自己这方面发表声明。由于农业协会“以蛊惑人心的形式，进行客观上毫无根据的攻击”和采取了“背信弃义的行为方式”，政府从现在开始拒绝与之进行协商。

保罗·冯·兴登堡事先批准了施莱谢尔的声明，他对这些农场主阴险的行为也非常愤怒。

1月12日，星期四

失业率持续增长；

12月，新增失业人数超过40万——尽管如此，政府依然进行不负责任的煽动和施行“有一线希望的政治”。

《人民观察家报》

苏联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斯大林的讲话。

《红旗报》



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又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气氛。采取谨慎措施，最大程度保密。阿道夫·希特勒和弗朗茨·冯·帕彭说好要来吃午饭。在这里，他们所在的达勒姆，很可能会决定德国的政治方向——这对于别墅主人的职业生涯绝不是什么坏事。

帕彭果然来了，他是个靠谱的人，里宾特洛甫在战争岁月里作为军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印象。二人共同在奥斯曼帝国一个军事顾问处服役。但突然来了一个消息：希特勒不能前来。“元首”在利珀脱不开身。

尽管如此，大家还都坐在桌旁。里宾特洛甫和帕彭吃着饭谈论着即将举行的选举，但这并不是前总理到这里来想谈的话题。雄心勃勃的主人提供了汤，帕彭却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用勺子搅着汤。别墅外的人都在利用时间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执行他们的计划。



在城市的工人住宅区，越来越多的租户进行抗议。确切人数还不清楚，但这期间在整个柏林大概有几千名租户提出抗议。

阿卡大街132号的居民也决定于1月1日不缴纳租金。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并不知道，但这一天他去了柏林最臭名昭著的出租区——威丁的“迈耶庭院”，许多社会报道的事发地。记者经常光顾这些房子，描述庭院石板地面上的洞，人们经常会被这些洞绊倒，导致腿骨折。其中一个光秃秃的墙上写着：“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窗台上的海绵，漏水的马桶，不能防雨的屋顶。“出生在阿卡大街就是被诅咒”，《世界舞台》杂志的作者库尔特·图霍夫斯基不久前刚刚写道。

阿卡大街132号的住宅区包括前楼和5幢后楼。多达2100人一起住在这么拥挤的空间中。该建筑群建于19世纪70年代，还没等建完，就已经有很多寻找栖身之处的绝望的人占据了这里。后来有很多小作坊巢居在院子里：印刷工、水管工、鞋匠。1929年，据《柏林晨报》（*Berliner Morgenpost*）统计，1000对新人在这里结婚，500个孩子出生，150人死亡。进入“迈耶庭院”要经过一个拱形门。为罢工者把风的人今天还是让普洛特金进去了，因为普洛特金知道暗号：“吐马金”（Turmarkin）。

吐马金是这里的人所仇恨的人的姓，这个人名字叫亚历山大。他是俄罗斯人，是这里的新业主，不愿在居住质量上投资，一点儿都不投资。

普洛特金出示了证件。美国人？人们让他进去了。这一排排的房子像山谷，阴暗寒冷。每个窗子上都挂着共产党的红旗。这些房子建的时候，城市还没有现代供水系统。从水管中流出的混浊的液体也解释了这一切。二楼的一个租户给普洛特金看了一个瓶子，里面装着水龙头里的水。“这就是水管里的脏东西，”他说，“红棕色的液体，锈水。”

今天，335个家庭生活在这里，一共1301个人。

你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普洛特金问道。

我们必须知道。他回答道。警察时不时地带走一个，我们每天都数一数，看是不是少一个。

普洛特金又下到地下室，这里也住着人。他遇到一个女人，叫玛塔。她住处的墙上还闪着新鲜油漆的颜色，潮气在绿色墙上形成白色

斑痕。她可能只有40岁，但是脸庞浮肿。她的双手长满老茧且肌肉发达。普洛特金被吸引住了，他问女人做什么工作。

“我不工作，”她说，“没有工作可做。”

不久前，玛塔每月付18马克的租金，她把住处称为“洞”。说这一切时，她几乎哭了。还要付12马克的取暖费和电费。她每月从福利局那里领到36马克。

每月还剩下6马克来生活。

普洛特金抓住她的手，翻转过来。他抱住她时，感受到她在颤抖，但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也是那么坚硬，普洛特金想：似乎这个女人的苦痛散发着命运的光。



意大利罗马足球俱乐部为亚历杭德罗·斯科佩里付了8万马克的转会费，亚历杭德罗·斯科佩里是阿根廷前锋，有丰富的世界杯经验。他之前是为拉普拉塔大学队效力。这种情况也会在德国出现吗？多年来，德国足协一直反对运动专业化。1930年，14名沙尔克04足球俱乐部的球员被关押，理由是他们每场比赛收取了10马克的差旅费，而实际上只允许收取5马克。但几周前，10月份，德国足球协会决定组织“国家联赛”，职业选手可进入其中，这关乎顶尖俱乐部在国际赛事中的竞争力。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利珀的总部接到一个消息，总统兴登堡不久前与格里高·斯特拉瑟见了面。施莱谢尔的确是认真的。约瑟夫·戈培

尔在日记中写道：“斯特拉瑟绞尽脑汁，他在兴登堡那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叛徒。我看得很清楚。希特勒很震惊。”

星期日要选举。从现在起到星期日，要为利珀而战。这将非常困难。这期间，希特勒捐出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版税——这根本不是他一贯的风格，但这却是迫在眉睫的。在选举活动中，其中一个组织者请求媒体负责人奥托·迪特里希借钱给他，因为他没钱付礼堂租金。在某个地方，一个执法人员没收了他全部的收入。



农业协会主席又一次反对总理。据说人们对施莱谢尔总理非常不满，“因为政府对农业的疾苦完全视而不见”。在一封公开信中，一位协会代表向保罗·冯·兴登堡求助，说人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背信弃义，相反，协会有义务支持贫困的农民。在总统周围的人说兴登堡也持同样的看法。

也许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正在挑衅一个他根本不能驯服的力量。



德国国家人民党议员莱恩霍尔德·库阿茨一直都喜欢八卦。他从前内政部部长盖尔那里听说不应该加速施莱谢尔下台——仿佛他的下台早已被决定了。施莱谢尔和兴登堡之间已“破裂”，盖尔告诉库阿茨，的确是这样。库阿茨不无满意地写道，忠诚于共和国的政党看起来非常紧张。其实盖尔并不特别喜欢施莱谢尔——几个星期前，总理将他赶出内阁，取而代之的是弗朗茨·布拉赫特。



利珀一家当地的报纸刊登了一位医生的辞职声明，这位医生长期以来担任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区域领导人。他称最高领导人是“政治骗子、卡里斯欧特罗魔法师^[5]、魔法学徒^[6]、哗众取宠的人”，他批判“不断加剧的拜占庭主义”，因为地方小组都在互相争夺成员。他辞职信最高潮的一句是：“不能以奴性进行自由的战斗。”



还有奥斯卡·冯·兴登堡，总统的儿子、副官、顾问和同一屋檐下居住的人。专员格瑞克最晚在去年选举时就与奥斯卡相识并攀谈起来，他得知：施莱谢尔不仅没有得到国会的解散指令，根本没有，而且他绝不可能从总统那里得到。

也就是说：他对于政敌的打击毫无抵抗力，他的政敌可以随意甩掉他。

奥斯卡·冯·兴登堡补充说，是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以前也曾是他的朋友。但现在，他深深地鄙视施莱谢尔。

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奥斯卡·冯·兴登堡对此没说过一句话。



晚上，在舒曼大街13a的小型剧场中，“失业演员组合”（Ensemble erwerbsloser Schauspieler）表演了德国幽默剧作家约阿希姆·林格纳茨的一部喜剧。这个令人振奋的喜剧的标题是：“瓶子和带着瓶子旅行”（*Die Flasche und mit ihr auf Reisen*）。

1月13日，星期五

食品部长应该走人；

农业协会的要求。

《福斯日报》

对“冯·烟囱”和“冯·秸秆”先生的褐色恐怖谋杀；

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独裁及其走狗的抢掠活动。

《红旗报》



华盛顿发出明确公告，要求各驻外使馆向总部发送更多的分析。因此，在此期间，在柏林的外交官可能会变得更为活跃；在圣诞期间，使馆也变得非常太平。政治的平静有助于年轻的力量加入其中。每个人都可以休几天假。弗里德里克·萨克特还在为布吕宁不再是总理而感到难过。在他的家乡，自从胡佛输掉大选以后，他就致力于准备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今天他要抵达日内瓦——如果不是美国新总统罗斯福有意推迟，这个会议在4月或5月就应该举行了，用以帮助世界贸易的重新振兴。

德国的内政政策？在德国，目前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外交官的看法。对了，还有报纸报道的前总理和阿道夫·希特勒之间于1月4日的会面。在美国使馆，大家都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萎缩的财政状况。该党的债务迅速增加——据美国人的资料显示，其债务已为1200万马克——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赞助者可能会向“元首”施加压力，让他一定要进入政府。该消息可能已传到帕彭那里。

不是太令人兴奋。二者会面9天后的今天，星期五，萨克特的高级参赞乔治·乔丹才将会面的消息转发到华盛顿。如果白宫的人想看到工作成绩，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儿。



利珀风口浪尖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从弗兰肯地区得到令人不安的消息，在那里，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国会议员威廉·费迪南德·施戴格曼要放弃他的席位——希特勒亲自免去了他在冲锋队的职务。几个星期以来，冲锋队的中弗兰肯分队的负责人与大区领袖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一直都在争吵，按照施戴格曼的意见，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没有把钱给冲锋队。

施特莱谢尔的律师对于这一事件却有另外的解读，这是很明显的。施戴格曼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收到的6000马克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按照规定用在了冲锋队那里。

据施戴格曼说，1500马克给了冲锋队下弗兰肯分队的队员，但是那里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此外，众所周知，施戴格曼因租用地产负债很高。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愉快的事件。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收集了许多数据，他想知道一切，理解一切，他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也许回国后可以将报道卖给媒体。柏林劳动局负责人哈尔特博士接待了普洛特金，哈尔特博士向他讲述了沉重的失业保险话题——普洛特金不理解这一原则，与此相关的专业文献对于他说来“阴暗晦涩得像密西西比河”一样。

哈尔特博士说，近年来，保险金额和紧急救助已降低好几倍。有紧急需求的人得到的救助比1927年少三分之一，因为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一队伍，因此，他和同事必须用更多的工作时间来将这些诉求合理化。

他似乎很担心，却绝没有批判。典型的德国公务员。分别时，他将一堆空白表格塞到普洛特金手中，说在美国对抗当地失业时可以作为参考。



不久前，美国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出版了他的集子《德国使时光倒流》（*Germany puts the clock back*）。他现在是普利策奖的候选人，今年1月，他成为柏林外国媒体协会的会长。多年来，他和太太莉莉安·汤姆森以及他们的女儿戴安娜在这个城市中生活。

亚尔马·沙赫特与莫维尔见面后三个星期，他们又在路上碰到了。

莫维尔问，希特勒在慕尼黑怎样？

“非常棒，”沙赫特回答道，“我对这个人很有信心。”

莫维尔犹豫地不再问。后来回忆这一刻时，他终于意识到，德国要考虑到最糟糕的情况。莫维尔非常了解这个国家。正如莉莉安所说，莫维尔有时会跟着柏林警察的装甲车“去前线”。他报道了冲锋队对犹太人和外国人的袭击。他去咖啡馆和啤酒屋，冲锋队队员在里面摇着卐字旗。“你们为什么反对犹太人呢？”莫维尔问这些人。

“犹太人跟其他人根本不是一类人”，他听到这样的回答。

莫维尔又追问：“这是你们自己的想法还是你们党的想法？”

其中一人说：“我们厌倦了思考，思考又不能带你去哪里。元首自己说，真正的纳粹用鲜血来思考。”

不久前的一天，莫维尔的女儿放学回家问她的母亲：“妈咪，我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她们在学校里说起过这些事。母亲想解释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做犹太人不好”，小女儿说。



媒体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和他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支持大力加强总统强权，因此他们秋天时支持总理帕彭，这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在上一次竞选中，针对德国国家人民党组织了一次野蛮激烈的煽动活动，德国右翼打成一团。将政府责任交给这些无赖，让他们来指挥警察和士兵？对于德国国家人民党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胡根贝格一开始在总统兴登堡那里，然后又重新去施莱谢尔那里。在与胡根贝格的谈话中一直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将内阁中的农业部部长和经济部部长提供给这个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这个出价并非毫无吸引力。就胡根贝格看来，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这两个职位——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但是他说，只有选取一个新的政府方针——极端专制，一年时间内无视国会——他才会进入内阁。

这个代价太大了，施莱谢尔拒绝了。胡根贝格的亲工业之路最终将使他陷入政治孤立，因为斯特拉瑟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的羽翼、社民党和工会都将会是愤怒的反对者。

不行，他不能跟德国国家人民党继续下去。



晚上，媒体负责人埃里希·马克斯邀请记者在总理府会议室举行非正式晚宴。总理施莱谢尔穿着便装很早就来了，这样不会让出席的

人觉得惊讶——施莱谢尔最近几乎没怎么穿过将军制服。他看起来苍白，比刚刚上任时消瘦些，面颊更瘦。晚餐后，大家又去相邻的房间里闲谈。乌尔施坦出版社的约瑟夫·莱纳也在，他一会儿要为上司做个记录。

在这些非正式谈话中，施莱谢尔可以施展他的魅力，他保持着一种同志式的语调——并保证亲密性。施莱谢尔在这个晚上展现了非同寻常的乐观主义。他们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施莱谢尔也很乐意跟着他们转换话题。

怎么跟国家社会主义党周旋呢？他说：“不久我就会让他们屈服，他们会听命于我的。”施莱谢尔微笑着，他做了一个蔑视的手势，他会使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放弃“言过其实的弥赛亚信仰”。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他说，“希特勒害怕自己的政府责任”。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将“国家的”（national）这一词语与党派名称“国家社会主义的”（nationalsozialistisch）并列，如果他成为国防部部长，他就想将“现在独立的国家防卫军变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军队”。

施莱谢尔说啊说，他很少允许记者这样了解自己的思想。希特勒曾向帕彭宣布，他作为国防部部长将访问全国，参观所有的地方，并与军官、士官和全体士兵分别交谈。施莱谢尔说，希特勒这样想证明了他对军人思想根本一无所知，接二连三的演讲和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只能令人反感。

为什么帕彭不再是总理？施莱谢尔以他“浪漫的演讲方式”热血沸腾地概述了11月底的“危险局势”：当时局势简直已发展为“反对帕彭的精神的极度不安”，如果他“不及时发现，并接管总理府，那么三天后，防卫军就带着机关枪站在街上了”。

这真是些激烈的话。对，施莱谢尔今晚不设防。

但他当然想在记者面前放话。重要话题是军事训练。这个星期，他在总理府接待了大学生，举行“啤酒之夜”，当中唯独缺少社会主义的大学生。一个愉快的夜晚。施莱谢尔确定，年轻人对“普遍义务兵役、青年军事训练和军营的热情非常高”。

说到军营（Wehrlager）——在公开场合是不可以称为军营的——这个词太敏感了。但是很快，记者就能在“青少年营地”

（Jugendlager）观看训练了。从国旗团到国家社会主义党，年轻人成群来到这里。施莱谢尔继续说道：这将是一个基础。如果裁军谈判会议确定能带来军事平等的结果，他们将要尽快建立起一个忠于共和国的民兵组织。然后，可能在1934年引入普遍服役制度。

然后是关于施莱谢尔如何进行长久统治？国会再次开会会发生什么？总理说，原则上政府工作不应被国会阻碍。现在国会只是一个阻碍。

今晚是政治运作中一个普通的宣传之夜。可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很罕见，也非常奇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总理的两个心腹之间产生了彻底的分歧，而且是在很重要的一点上意见不合。

专员君特·格瑞克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六个星期之内，施莱谢尔就完蛋了。因为德国铁路、邮政以及银行和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尽其所能，反对任何创造就业机会的举措，并对之进行破坏。工会也并不支持施莱谢尔。此外，奥斯卡·冯·兴登堡非常痛恨施莱谢尔。没有奥斯卡，老家伙不能做任何决定。简而言之：施莱谢尔绝不会得到解散指令的。

格瑞克是不是喝多了？还是他感到沮丧，没有希望？或者这只是现实？不管怎样：施莱谢尔最重要的内阁成员怎能这样与记者讲话？

记者们糊涂了。

另一方面，媒体负责人马克斯恰恰强调：总统刚刚答应施莱谢尔给他指令。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1月14日，星期六

正在澄清：

农业协会的突进及带来的冲突将施莱谢尔的内阁重组推到台前。

《每日评论》

施莱谢尔进行协商：

三人执政小组斯特拉瑟—胡根贝格—施特格瓦尔德？

《福斯日报》



公共关系是这样运行的：施莱谢尔宣布即将到来的内阁重组，这一消息已按计划出现在报纸上。问题是希特勒拒绝施莱谢尔及其权力的方针还能坚持多久。施莱谢尔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月的前几天异常温暖，即使夜里，温度也没有降到零度以下。这对柏林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和那些没钱取暖的人来说真是福音。但是从

前天开始，一股冷空气从东部过来，霜冻越来越严重。



希特勒让冲锋队头目威廉·施戴格曼从弗兰肯来见他，在利珀汇报工作。

施戴格曼差不多有2米高，身强力壮，从前是自由军团的队员（Freikorps-kämpfer），是个爱挑事儿的人，不喜欢希特勒的处事方法。他于1925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运动上，渐渐失去了耐心。他想看到冲锋队在街上取得胜利，暴力对他来说是一种合法手段。半年前，他还被监禁——他与其他两位国家社会主义党议员在国会餐厅里将一个时事评论员打倒，这个时事评论员曾将冲锋队领导恩斯特·罗姆同性恋的事公之于众。在弗兰肯地区有多少冲锋队队员支持他呢？肯定有上千人，简直就是弗兰肯地区的地方首领。

施戴格曼比希特勒高一头，可是他也只能听元首的长篇大论。这种异类是不能容忍的。紧接着就是演戏似的和解——施戴格曼公开说：“今天我和元首在一起，我认识到，他对我行为的指责完全合理，我便自愿向他提供在国会所占的席位，并承诺他，作为党员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然后施戴格曼带着羞辱与愤慨立刻启程，并决心反抗。



柏林的事让英国作家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觉得非常无聊。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这里的政治形势似乎非常疲软。我想，幕后一定发生了很多事情。帕彭去拜访兴登堡，希特勒去拜访施莱谢尔，胡根贝

格去拜访兴登堡，出乎意料的是，兴登堡居然不在……这种乞丐面对电车售票员时产生的‘危机感’已消失殆尽。”



《红旗报》报道了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福利局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该事件其实星期四已发生，但当局并未公开披露。威廉·戴米沁被发现吊死在厕所里，他是个失业家庭的父亲，从前是电车工作人员。如《红旗报》一位记者所调查，戴米沁已婚，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17岁，一个19岁。每14天，他和全家得到12.6马克的补助。债主还紧逼他，他付不起电费了。衣物和特殊补助的要求都被拒绝；不过他收到了肉和煤的打折卡。在其中一张打折卡上，他写给一个儿子：

“亲爱的海尼！乖一点，就和你平常那样，记住我吧。要永远记着我对你的好，不要把我想得太坏。爸爸。”

在另外一张打折卡上写道：“亲爱的海尼！劝劝你母亲，让她也不要把我想得太坏。你们保重！”

威廉·戴米沁在他44岁生日时自杀了。

1月15日，星期日

胡根贝格在总统那里；

昨天，总统冯·兴登堡接见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胡根贝格。毫无疑问，这次会谈旨在拓展施莱谢尔内阁的基础。

《福斯日报》

今天，利珀从11月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元首发出最后一次呼吁/施莱谢尔以新的媒体紧急法令和恐怖紧急法令进行威胁。

《人民观察家报》

总理的强烈警告；

反对日益加剧的煽动——恐怖浪潮在崛起。

《每日评论》



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坐在家裡，瑟瑟发抖。他写道：“天气特别冷，下雪了。我用厚厚的毛毯裹着膝盖写东西。”



又是在体育馆。中午，基弗霍伊泽协会^[7]举行传统的国庆庆典，当日正好是德皇在凡尔赛镜厅发表声明62周年纪念日。对于中立的观察者来说，这个活动看起来非常“君主制”。这次保罗·冯·兴登堡出席，并没有派他忠诚的国务秘书梅斯纳作为代表出席。这是他罕见的一次公开露面。总统是国家战士协会（Reichskriegerbund）的荣誉主席，他对待这一荣誉非常认真。

几位部长也是客人。钢盔团负责人杜伊斯特贝格和赛尔德特也来了，还有弗朗茨·冯·帕彭。当然还有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他作为国防部部长出席。

在前军官和士兵的圈子里，施莱谢尔虽然知道自己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但这次讲话将现场直播。他称针对德国的军备限制为“降级”，但也算承认了军事平等权，对德国人民来说这是“主权的决定”

性特征”。普遍兵役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不过他最先想到的是引入民兵。

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在体育馆里唱起了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8]写的德国国歌。大家把第四节^[9]也唱了，这是几年来基弗霍伊泽协会及其他一些极端右翼协会的习俗——《凡尔赛条约》后，这一节被写成了歌词，但还并未成为正式的。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尤在祖国多难之时

唯经厄运，方见深情

热爱之心坚定真实；

同将此曲，世代传颂，

从母至女，自父至子；

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

尤在祖国多难之时。



在这个寒冷落雪的星期日，施莱谢尔与奥地利司法部部长库尔特·冯·许士尼格进行秘密会谈。施莱谢尔轻松地说，他要通过工会运动建立一种横向联系（Querverbindung），并希望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平台。

“那么希特勒先生呢？”许士尼格先生问道，他对德国内政非常熟悉。

“希特勒先生不再是个问题了”，施莱谢尔回答道。

施莱谢尔的乐观主义真是出乎许士尼格的意料。



这几天，施莱谢尔有什么事发生吗？他是个目光犀利的人，会用前所未闻的手段，行为方式暧昧。他的批评者认为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像他本人所声称的，首先考虑祖国的利益。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没人会认为这个将军是单纯并且政治上是盲目的。

他将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他的王牌是什么？他还有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应该是有保障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哪个聪明人不得给自己留一手，谁会毫无保留呢？



利珀的投票站终于关闭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得票率达到39.5%，21个邦议会席位中占到了9个。当然，这比上一次1929年邦议会选举时多了8个席位。但在10万张提交的选票中，也只比11月那次灾难性选举多出5000张；社民党也比那个时候多了3000张。为了这么一点点，费这么大劲值得吗？

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天在魏玛度过，他让全国的党干部都到了那里。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他就向同志们宣布：我们的党正在崛起！

国家社会主义党国会议员汉斯·弗朗克也来了。当选举结果渐渐传出，他看到希特勒像个男孩儿一样，满脸生辉。后来他到“大象”酒店（Hotel Elephant）去拜访“元首”。

利珀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希特勒说：“这是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政斗争中的决战。”他马上就会胜利进军柏林。

在首都，《柏林日报》的主编提奥多·沃尔夫马上就要在一则评论中做出判断：“事实上，希特勒在利珀的英勇斗争中，只是带回来一只穿在刀尖上的苍蝇。”

1月16日，星期一

利珀的预言：

希特勒—戈培尔组合在百分百权力诉求中得到加强。

《福斯日报》



内阁会议11时15分在总理府举行。部长们谈论着“政治局势”。利珀的选举结果出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颓势停止了。但施莱谢尔对于选举没有做出反应。他透露了他的“支柱”计划：内阁应由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央党、工会和其他团体来支持。

施莱谢尔继续说，实际上，这涉及两个问题。是赢得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合作，还是希望国家社会主义党反对内阁？在做出决定之前，他还要重新与希特勒谈判。施莱谢尔说：“我坚信希特勒并不想掌握政权。最近他想成为国防部部长。这清楚地证明了他并不想取得政权，因为他肯定知道，总统先生决不会将国家的军事权交付给他的。”

施莱谢尔真的相信帕彭所说的一切吗？

斯特拉瑟呢，他会退出这一轮吗？他想负责吗？“是的”，施莱谢尔说，斯特拉瑟很想进入内阁，但他能否带来大批支持者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还必须赢得胡根贝格，还有跟随他的德国国家人民党。

这时，劳务专员格瑞克发言：他很担心通过内阁重组达不到多数支持。

施莱谢尔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回答。自信，满怀信心，也许有人会说：鲁莽。他清楚，只有和希特勒联手才能达到议会的多数。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人民的情绪慢慢改变。只有通过内阁实质工作的成功才能实现这种根本改变。

当然，这首先意味着格瑞克的任务：大规模创造就业。但格瑞克再次提出质疑：“到1933年秋天也无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功。”

施莱谢尔却在执行另一个计划。他说，如果国会想开会，他就要利用总统的解散指令了。经济状况不允许有不久后重新选举的想法。这种情绪在工人阶级中也传播开来。那么，我们将重新选举推迟到秋天。

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施莱谢尔有个固定模式——他做了关于“反对国会行为”的报告，探讨无须过分考虑宪法的“积极的政府政策”。当然，奥尔根·奥特一直致力于这一模式，他是施莱谢尔的法律专家，魏玛宪法的行家，了解魏玛宪法的一切空子和可引起争论的突破口。

奥特的理念可以为施莱谢尔赢得时间，以便让公民来相信他的政策。计划要解散国会，却没有为重新选举确定时间。就这样继续统治，不与麻烦的议员协商。宪法定的最长期限是两个月。这分明是违

反宪法。这种在将军领导下的政府形式不会被称为军事独裁吗？施莱谢尔在广播政府声明中不是明确将军事独裁排除掉了吗？他当时不是说，坐在刺刀尖上不能长久吗？

所以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支柱”成功，要么总统保障施莱谢尔的自由。这就是总理的计划。他这一计划是以现实为基础吗？

奥托·梅斯纳突然发言，他是这个会议中总统的传声筒。他这时说，这对于部长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支柱”（大联合政府）的理念破坏了总统指定内阁这一政体特征。

是什么驱使着总统最重要的顾问？他想阻止左翼（比如通过亲社民党的工会）再次获得影响力吗？兴登堡已迫使布吕宁放弃追求社民党的接受并由此赢得多数席位。但另一方面，如果施莱谢尔拥有多数，他就不再需要兴登堡的庇护了。总理保持了冷静。他说他已与总统探讨过他的计划。可是为什么梅斯纳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兴登堡身边的任何事情可是从来都没能逃过梅斯纳的眼睛的。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魏玛召开大区领袖大会。斯特拉瑟事件已进入会议议程。像戈培尔这样的纳粹大区领袖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组织的脊梁。格里高·斯特拉瑟在被解雇前是这个党的领袖，但阿道夫·希特勒则一直是党的“元首”。

12月，为了激怒斯特拉瑟的支持者，希特勒更换了大区领袖，重建了党内势力结构。这时希特勒足足演说了3个小时。戈培尔称这种风格为“完全不妥协”。希特勒先是祝贺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利珀的胜利，然后再与斯特拉瑟及其支持者算账。希特勒要求忠诚。如果国家

社会主义党人只能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就是忠诚。斯特拉瑟的支持者都跟旧主划清界限。

“斯特拉瑟事件已经结束”，戈培尔事后确定。



亚当·施特格瓦尔德在基督教工会报纸《德国人》（*Der Deutsche*）上宣称，他不会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进入同一内阁的。施莱谢尔失去了保守的工会羽翼了吗？并且也由此失去了中央党吗？

不久前施特格瓦尔德还是布吕宁手下的劳动部部长，现在是基督教工会联合创始人。他在内阁中是代表这一派系的，是“交叉阵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在《德国人》中，他却强烈抨击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也间接激烈抨击施莱谢尔将许多政治潮流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如胡根贝格所愿，一个有胡根贝格的战斗内阁，会将施莱谢尔政府打上第二个帕彭内阁的烙印，变成独裁的战斗内阁，而整个国会，除胡根贝格的党外，都会一起对抗这一战斗内阁。”

施莱谢尔的策略崩溃了吗？很多人都这么说。他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支持，左翼工会也忸怩作态，现在又出现了基督教工会的广泛联盟。

上午，中央党领袖、高级教士卡斯拜访总理。他向施莱谢尔转达了施特格瓦尔德的消息。两人讨论了几个小时。



即使是像莱恩霍尔德·库阿茨这样久经考验、惯于幕后谈话的政治专家，德国国家人民党议员，也要努力不让自己失去全局观。“局势混乱，”他写道，“施莱谢尔声称，他现在要逆议会而行。”

内阁会议的细节怎么又泄露出来了？



希特勒动身去卡塞尔，他的身边是赫尔曼·戈林。在这个黑森人民邦的城市，冲锋队队员中发生了骚乱。结果是大规模退队。希特勒和戈林与党员们交流时，街上发生了暴乱。国家社会主义党与共产党互相殴打，冲锋队队员们拿起铁锹袭击对手。

街头的压力，不仅柏林有。

1月17日，星期二

施莱谢尔！下台！

《红旗报》

施莱谢尔正经历利益斗争最激烈的混乱。工业家与大地主正陷入争执，国家经济政策显示了国家的脆弱。

将军亲切地和所有人握手，想进行和解，从各地得到战争声明。

《世界舞台》，卡尔·冯·奥西茨基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利珀的胜利；

尽管有恐怖和谎言，前进却势不可挡。

《人民观察家报》



回到柏林，阿道夫·希特勒在戈林的官邸会见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但二人之间却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对希特勒来说，胡根贝格是个无可救药的反动派。

而对胡根贝格来说，希特勒就是个下等公民，他的想法太极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对持不同政见的人的威胁十分危险。1931年底，希特勒粉碎了“哈尔茨堡阵线”。就这件事，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没有原谅希特勒。这一战线是由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党、钢盔团及其他极端组织组成的右翼反民主联盟，是由胡根贝格打造的。



近期，施莱谢尔晚上在信任的人面前所声称的事情，记者们终于可以写了：根据宪法规定，新选举在国会选举60天后再进行，无论是政党还是选民，还是经济界或工会都不会反对。

后果就是猜疑，还有解读。有人说施莱谢尔要剥夺选民的权利。不少评论这样判断：嗅出了独裁的味道。

总理马上让他的媒体团队辟谣：总理府会拒绝施莱谢尔任何违反宪法的意图。



财政部部长鲁茨·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刚生了一个男孩儿。这个家庭已经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了。小家伙受洗的名字是戴多·保罗。他中间的名字是按照卓有声望的教父起的：是科洛希克所钦佩的保罗·冯·兴登堡——兴登堡是每个家庭第七个孩子的教父，无论是工人家庭还是贵族家庭。



保罗·冯·兴登堡给农业协会领导人写了一封很真诚的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朋友之间的信，是一个大地主写给另一个大地主的信。丝毫看不出意见不一致的痕迹。兴登堡难道是要暗算施莱谢尔吗？还是要摆平局势？



但是，柏林也有很敏感的人。在阿勒曼大街瓦德萨乌姆的波罗广场上，诗人奥斯卡·罗伊克和作家赫尔曼·卡萨克一起散步。他们漫步穿过白雪覆盖的地方。罗伊克家的房间里，玻璃花瓶中的连翘枝已开花，它在圣诞节开始就已经开了花，越开越满。“枝头已发出嫩叶，它们是我们花园里的美好的东西，”罗伊克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演奏一点音乐。莫扎特的几个小型音乐会。”



对于施莱谢尔来说，与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对话非常重要。比起盛气凌人又自恋的胡根贝格，有许多更令人愉快的人值得交谈。胡根贝格的同事库阿茨一定不会“与施莱谢尔取得一致”，“在我看来，他比帕彭更没有耐心”。

库阿茨从胡根贝格那里获悉前不久和希特勒之间的谈话。据说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宣布：“我必须成为总理，但是却不想建立党政府。如果施莱谢尔给我让路，那么我可以容忍他。必须要打压马克思主义，但却不是由国家机构来打压。”据说希特勒对总统发表了极为不尊重的看法：兴登堡并不是能独立表达意见的人。他的政治词汇可以组成80个句子，他只不过是个留声机而已。

希特勒的出场似乎给胡根贝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库阿茨被惊动了。他警告自己的上司，他认为会有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危险。

除了施莱谢尔，毕竟德国国家人民党还有另外的选择，这毕竟还不错。当然，库阿茨确定：希特勒一旦上台，就会给胡根贝格颜色看的。



动物园旁的乌法宫正在放映乌法电影《反抗者》（*Der Rebell*），

导演是路易斯·特伦克。首映于18：30开始。乌法交响乐团为其现场配乐。

电影制作公司“乌法”（Ufa）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在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皇宫（Palais Friedrich Leopold）接待了500多位受邀客人——位于威廉大街的外交部不为这种聚会提供场所。贝拉·弗洛姆也出现在外长身边。

总理并没有出现在客人中，施莱谢尔没有时间来参加这些活动。弗洛姆觉得这是个令人担忧的迹象。至少冯·布雷多还来了，他说总理有很多安排。布雷多谈到他上司的近乎超人的工作负荷。

1月18日，星期三

希特勒—胡根贝格座谈：

就新的共同行动交换意见。

《福斯日报》

疯狂的希特勒的挑衅！

冲锋队计划周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前游行；

红色柏林！出来！

《红旗报》

共产主义大学生在大学袭击国家社会主义党人。

《人民观察家报》



国会预算委员会开会——会议议程上有个非常爆炸性的议题：“东部援助”。就在不久前，布吕宁总理因这一议题失去了总统的支持。国家支持东部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农庄。兴登堡的密友、熟人以及爱戴他的邻居也都从中受益。这个圈子里，有许多赞助者送给他大农庄，并帮助他还清了翻修债务。在政治的柏林，大家都知道，为帮助地主，兴登堡多次干涉政府事务。

现在国会预算委员会的中央党议员对容克提出严重指控，认为他们都是中饱私囊，要在东部援助中扣除上百万马克。根据来历不明的详细财务报表，中央党党员抨击一些有名望的地主，说他们非法挪用资金。他们还指责总统的朋友及亲戚。他们宁愿用补贴购买更多的土地，买赛马、豪车或到法国里维埃拉度假，而不是偿还贷款、进行企业运营投资。在这样紧急关头！

中央党的人是从哪里得知这些信息的？报纸马上将此事件称为“东部援助丑闻”。谁能从“东部援助丑闻”中得益？谁想给兴登堡

施加压力？施莱谢尔开始揭发隐私了吗？

和往常一样，当德国政治中出现丑剧时，兴登堡的名字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样总理不会伤害到自己吗？或者国家社会主义党才是详细信息的来源？他们难道想要敲诈兴登堡，使希特勒成为总理吗？

“东部援助”事件使柏林谣言满天飞。



中午12点，希特勒与帕彭再次在达勒姆里宾特洛甫的别墅见面。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也参加了。他们一起用餐。探讨的问题是大家怎样才能共同掌权。

希特勒说，他必须要当总理，特别是在利珀取得胜利之后。

帕彭回答说，他在总统那里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不能使总统消除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抗拒。最近帕彭建议国家社会主义党应该支持他成为总理。

这将不会有任何结果。

主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参与讨论，说要把兴登堡的儿子和希特勒召集到一起。如果说服奥斯卡，也许就能说服老家伙。在柏林，传言他与前战友施莱谢尔的关系明显降温。



希特勒在与帕彭艰难的谈判后要放松一下。他去了电影院。《反抗者》是部合他口味的电影：大学生与拿破仑做斗争，反对他攻占蒂罗尔。路易斯·特伦克是自由斗士。这部电影展示了生命力量的大规

模场面。戈培尔写道：他的“元首”就是“火与火焰”。对他来说，很明确，这是电影艺术的“顶级表演”。



希特勒与帕彭在里宾特洛甫那里会面的事随后就在记者圈子里流传开了。研究人员在总理府新闻办公室询问这件事。这些谣言有多少是真的？施莱谢尔的媒体人士给大家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总理已经事先批准了二者会面。对，帕彭甚至是按照施莱谢尔的命令行事的，他要消除希特勒与内阁之间的分歧。

事实上，施莱谢尔对他们的会面一无所知。他的线人究竟在做什么？不久前，他不是还在吹牛，说在德国发生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吗？现在，在他眼皮底下就有个阴谋——他却根本没有注意到？

1月19日，星期四

红色“国际”野蛮登场。他们不知道一个叫德国的祖国。

《人民观察家报》

希特勒避开施莱谢尔；

帕彭的调解失败了。

《福斯日报》



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探望了在大学妇科医院住院的玛格达，玛格达分外开心。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跟几个教授进行了一次“政治授课”。

几个小时后，玛格达退烧了。一位教授说：“希特勒先生，假如您对于德国的作用像对这位病人的作用一样，那么德国不久也会健康起来了！”



《警报》（*Der Alarm*）是通过“德国市民犹太信仰中心协会”（Centralverein deutscher Staatsbürger jüdischen Glaubens）出版的，这一协会有上万名会员。这一周刊的文章如同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煽动文章——只是编辑立场刚好相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这份报纸经常在“铁锋”的集会上散发。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也曾得到一期。上面写着：据称，希特勒承认有500万马克债务。

普洛特金没想到《警报》正将讽刺作为工具使用。

但这份报纸有一点没说错，希特勒确实有债务——德意志国的债务。根据他的报税表，他在1932年有65000马克的收入。他的书《我的奋斗》已售出了几十万本，直到今天还在出售。他的这项收入却没有干干净净地上税，由此积累了不少债务。如果他很快上台，再卖出更多的书，他就得注意，不久就必须向国家缴纳6位数的税了。

但是一旦获得政权，也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第一艘装甲舰“德国号”在基尔离港。它由德国船厂（Deutsche Werft）所建，很快，2月末，将要交付给海军。军备升级开始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内矛盾一直在发酵。弗兰肯冲锋队首领威廉·施戴格曼立即辞去党内职务。本来党因“叛乱”要开除他，但是他在党把他开除之前退了党。他昨天刚刚成立“弗兰肯自由军团”

(Freikorps Franken)，据说实际上有上千人加入自由军团，其中许多都是前冲锋队成员。



《柏林晨报》在德国日发行560000份，是德国最大的报纸，由自由派的乌尔施坦出版社发行。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批评路易斯·特伦克电影《反抗者》——是希特勒那么喜欢的一部电影。一部“宏伟艳丽的风景画册”，批评家虽然这样写，却又评论道：“用木刻的方式平庸、生硬地讲故事；一个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年轻大学生的命运，英勇地与拿破仑斗争，最后与其他同志们一起依照紧急状态法被枪杀。”

庄严的布景中一个狂热的信仰者，英雄姿态，死去的法国人。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党在目前情况下出现内乱会怎样——这一后果对共和国来说会不会很可怕？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外交部的国务秘书，给在华盛顿的德国大使写信：“国家社会主义党境况不怎么好，党的组织结构受到严重动摇，财政状况令人绝望。有些人甚至担心这一党派的崩溃是否来得太快，选民无法被吸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债权人针对罗特兄弟（阿尔弗雷德和弗朗茨·罗特）的剧院集团提出破产申请。不久前，兄弟俩还邀请贝拉·弗洛姆参加他们的毫无

节制的欢庆活动。他们在柏林拥有庞杂的大型文化企业，即大大小小的歌剧院和剧场。他们用借来的钱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现在这个帝国瓦解了。罗特兄弟本人并没有破产。他们安排了一个替罪羊放在公司。他们宣称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强烈抨击了这两位企业家。拥有复杂公司结构的罗特兄弟正适合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阿尔弗雷德·罗特在1月8日或9日仓皇逃离柏林，他早就买到了列支敦士登的身份，为的就是逃到那里。那些煽动性的报纸非常享受地把这些事拿出来深刻剖析。

罗特兄弟是犹太人。



第一夫人邀请大家喝茶：伊丽莎白·冯·施莱谢尔以支持医院发展为主题发起了茶话会邀请。贝拉·弗洛姆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如她所称，国家的“老精英们”齐聚一堂：官员、军人和政客。弗洛姆与她的朋友罗尔夫谈起帕彭上个星期二在哈雷做的报告。罗尔夫说：“两面派就是帕彭的性格，一方面，他在‘基弗霍伊泽协会’中赞扬施莱谢尔关于建议普及兵役的讲话，另一方面，他却只是在等待出其不意地袭击施莱谢尔。”

众所周知，胡根贝格、沙赫特与希特勒会面了。“绅士俱乐部”的成员也公开探讨希特勒是否该赢得一次机会。弗洛姆说：“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人瞎眼睛，这可真叫人抓狂。”

至少国家社会主义党内部纷争不断，这还是个小小的安慰。



巴黎不懂德国人。为什么国家总理这么不受人欢迎？弗朗索瓦-庞赛大使在一份电报中给政府阐述了政治局势：右翼希望施莱谢尔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府。但总理却脱下军装，显得很软弱，而且毫无军事行为。他并未采取措施反对左翼，而是任由工会施压而做出妥协。

现在，施莱谢尔与斯特拉瑟结盟，以此向希特勒“公然宣战”。“在目前德国此消彼长的各种潮流中，将军无法做出任何决定；而且大家都感觉他在观望，看这些潮流中哪一个被大家普遍接受，然后再跟这个或那个潮流为伍。”

外交邮件都是加密的，并且不会被截获，这对大使来说无疑是幸运的——施莱谢尔可能不会喜欢法国大使所写的东西。然而在电报的最后，大使还是展示了对于施莱谢尔的善意：“目前我们只能确定，将军迅速失去光芒，而这些人是多么轻率，他们已经准备好要牺牲德国最有天赋、最聪明的人——却并不知道谁应该是他的继任者。”



安娜莉泽·冯·里宾特洛甫在她个人记录中写道：“约阿希姆和帕彭单独谈了很久。”她的丈夫约阿希姆是希特勒最新的忠诚追随者，难道他要直接说服他的熟人帕彭将总理之位让给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吗？



共产党人来拜访施莱谢尔——这并不是个寻常事件。毕竟共产党激烈地与总理做斗争，如果后果可以控制，施莱谢尔恨不得禁止这个党派。

1924年以来，恩斯特·托格勒一直是国会议员，3年前成为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他与威廉·卡斯帕同志一起出现，威廉·卡斯帕是普

鲁士邦议会中的党团领导。他们请求施莱谢尔禁止冲锋队游行，这一游行将直接经过共产党的总部。这应该是个挑衅。今年夏天，汉堡类似的情况导致了“流血星期日”。

托格勒和卡斯帕是著名人物。几个月前，他们与普鲁士社民党政府高级官员见面，谈论在防御国家社会主义党中如何结盟。

秘密会见被媒体公开之后，当时的总理帕彭利用这一事件来说明他罢免社民党主席奥托·布朗的理由。现在他的继承人与国家敌人交谈！



希特勒要留在柏林，目前首都发生了太多的事。斯特拉瑟请求与他面谈。戈培尔写道：他肯定不会因此恢复声誉的。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党最有权力和党的前任二把手目前不应该会面。戈林要与斯特拉瑟见面，并讨论从前的首席组织领导现在应怎样继续下去。即使戈培尔不愿意承认，但希特勒并没有与斯特拉瑟公开决裂。他经常把最终决定推到不能再拖延。



在沃尔夫斯堡市（Wolfsburg）法勒斯莱本区，120名冲锋队队员前往电影院。但他们并不是想看电影，他们是去阻止一部电影的上映。这里要上映《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一部反战电影，由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小说改编。电影快要放映的时候，冲锋队冲进礼堂。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以铁锹做武器——士兵们曾用这样的武器在西线战壕里互相打斗。冲锋队队员威胁观众。国旗团成员阻止了事件升级，并叫来警察。12个乡警出现了，可是要面对10倍人数的对手？警察干脆制止了电影上映。

1月20日，星期五

大地主对人民的袭击——国会严厉谴责“东部援助牟利者”——部长沉默。

《柏林晨报》

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汉诺威新的胜利；

乡村民众反对施莱谢尔政府的战线不断壮大。

《人民观察家报》

布洛广场开放；

施莱谢尔—布拉赫特独裁要法西斯战线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前列队/应该镇压共产党游行/德国工人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武装起来反对希特勒的挑衅！

《红旗报》

对施莱谢尔狂轰滥炸；

帕彭的调解失败了——局势依然如此。

《每日评论》



元老委员会是由经验丰富的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国会议事秩序。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团主席威廉·弗瑞克在座谈小组中要求，委员会要政府尽快公布1933年的预算。只有这样，国会才能开会。这可能还会拖延几周，共产党和社民党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国务秘书普朗克以总理名义说，政府迫切要求迅速理清当前政治局势。形势如此混乱，我们自己都不能看得清楚。施莱谢尔仍然不知

道国家社会主义党对他的支持力度，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想怎样行事。

施莱谢尔茫然不知所措。

元老委员会最终下令，国会不按原有计划1月24日召开全体会议，而是1月31日召开。1月27日，大家将再次就此商榷。

一个星期的宽限期，也许是决定性的一个星期。



柏林人私下打听，星期日纳粹在共产党总部前游行时发生了什么。上千名冲锋队队员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前，并没有枪响！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等待着的会发生“流血”的传闻使亚伯拉罕·普洛特金长久地感到不安。在他看来，一夜之间，局势似乎已剑拔弩张，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使人警觉的。特别是他听说，共产党说他们绝不接受这样的侮辱。

普洛特金拜访了库尔特·茨伦茨格，茨伦茨格是柏林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来自柏林最古老的犹太家庭，长着薄薄的胡须，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好。他的叔叔是柏林证券交易所负责人。他与亚伯拉罕·普洛特金谈到了社会中犹太人的处境。只有特别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才拥有一定的安全感。他说：“但大部分犹太人没有这种安全感。上千名犹太人必须放弃他们经营的小本生意，成千上万的犹太雇员也失去了工作。他们能去找谁？”反犹主义随着希特勒的上升得到鼓动，日益增长，茨伦茨格对此深感不满。分别时，茨伦茨格深思着说：“在德国的犹太人，未来尚不清晰。”



德国部分地区，流感疫情蔓延。不伦瑞克和哥廷根的学校都关闭了。在汉堡，每天都有上百名患者被送往医院。只有柏林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阿道夫·希特勒晚上在体育馆演讲。在震耳的欢呼声中，他昂首阔步走入礼堂。他身穿褐色上衣，褐色马裤，黑色靴子。“你们可以伤害我们，但从未战胜我们！”他向热情的群众呼吁。“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战斗，永远不离开旗帜。我的任务就是作为运动的旗手，不停歇地走在前面。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高举着旗子，永远不放弃，永远不收起。”

诸如此类。



帕彭没法再独自继续下去，他不得不离开他的“掩体”，走到日光之下寻求帮助。现在帕彭正向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奥托·梅斯纳——兴登堡最亲近的顾问——透露他的计划。二人似乎根本不反对更换总理，即使这意味着让希特勒参与到政权中。

晚上，帕彭将过程告诉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二人都同意与希特勒见面，可以在本周日进行。事情就这样发展着。



夜里3点钟，戈培尔与他的“元首”以及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在家里。汉夫斯坦格带来了两位女士。戈培尔觉得很“糟糕”，他是不是

想到他的玛格达还在医院里？玛格达今天不错，在逐渐康复中。戈培尔可以将精力完全集中到后天冲锋队的大规模游行上，这已经策划很久了，就在共产党总部的门前。

1月21日，星期六

明天布洛广场！

人们还是想一决雌雄。

《福斯日报》

工厂和打卡处的愤怒的风暴；

反对希特勒的挑衅！反对施莱谢尔—布拉赫特独裁！

《红旗报》

农民反对施莱谢尔的新公告：“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只能当作镇静剂！”

《人民观察家报》

现在很清楚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党最终得到了许可，可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前游行。据说，共产党已经呼吁进行反示威游行。普洛特金在日记中写道：“双方碰头地点在工人区的中心，血流满地是确凿无疑的。”警方代表宣称，游行许可早就下发了，但普洛特金真是不明白那些负责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在我看来，施莱谢尔并不清楚这次相互接触能导致什么。”总理能接受摩擦升级吗？

谣言满天飞，说施莱谢尔就是要让纳粹和共产党碰撞，直到敌对双方都两败俱伤再出面干预。咖啡馆人满为患，人们所谈的都是即将到来的游行，几乎没人谈论别的话题。城市中弥漫的都是紧张情绪。他们从各个区排队前往布洛广场。

普洛特金写道：“从前我乐于看到骚乱，现在我必须承认，肯定会有骚乱的。”

他坐在柏林最大的餐厅之一“英白拉多”（Imperator），一楼有几个沙龙。四个乐队正在演奏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人们懒洋洋地蜷缩在柔软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或咖啡。这个星期天，这座房子里拥挤不堪。坐在这个美国人旁边的又是马丁·普雷托。

“施莱谢尔的动机是什么呢？”普洛特金问道。二人都认为总理确切地知道这里要发生什么。社民党成员普雷托讲述了几年前一个类似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在社民党总部前游行。“我们一直很被动，只是要求警察保护我们。”普雷托的理论是这样的：施莱谢尔知道希特勒会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他也许将希特勒当作工具。希特勒正在走下坡路，但同时他也为施莱谢尔提供了挑衅手段来消灭共产党，所以对施莱谢尔来说，即将举行的选举将是坦途。”

一个聪明的理论。

普雷托继续说：“我认为，分裂希特勒主义，消灭共产主义，自己却躲开这些纷争，没什么能伤害到他，这就是施莱谢尔的把戏。唯一有效的阻力来自我们党，可是很难说我们何时发生冲突。在所有党派中，我们是唯一一个头脑清醒的党。让施莱谢尔主义、希特勒主义和共产主义分个高下吧。前路将会清晰起来。”



门前雪花漫天飞舞。花园中满是冬天的气息。奥斯卡·罗伊克这些天正在写诗。这天夜里，他读了很久的书。散步去斯托尔普^[10]让他头脑又清晰起来。起初阳光明媚，“然后云朵聚拢，小雪时飘时降”。罗伊克的句子多么轻巧。



戈培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一整天都在策划明天的游行。在这次游行中，他们要公开表彰霍斯特·威塞尔，这位来自柏林的冲锋队领导人被共产党人杀害。党歌就是以他来命名的——霍斯特·威塞尔自己谱写了《霍斯特·威塞尔之歌》。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党是想展示党的力量，让总理丢脸。只有一个担忧折磨着戈培尔：警察也有可能禁止冲锋队的游行——毕竟是媒体要求禁止的，而他认为媒体是由犹太人主宰的。

还有一个问题让他神经紧张。他从一位女访客那里听说，党内有关于他的一个传闻。他，柏林大区领袖，在走私外汇，用下流的伎俩中饱私囊。这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通常喜欢针对犹太人的谴责。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党一个区领袖来说，这些指控可能是很危险的。这些诽谤是从哪里来的？戈培尔想，人不能太敏感。他心里满是苦涩。



慕尼黑警方在一份报告中写到，当地冲锋队现在迅速萎缩。据称1932年12月被开除的冲锋队队员不少于35人，今年1月又有15人被开除，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玛格达·戈培尔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下了床。“多么开心啊！”约瑟夫·戈培尔写道。但是他很担心他的“老板”。阿道夫·希特勒觉睡得很少，吃东西也很少。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透露了最新情况。就在明天晚上，小兴登堡和梅斯纳将秘密来到达勒姆。希特勒同意见面，他要带着戈林，还有另外一个心腹。但是希特勒叮嘱，无论如何都不能邀请施莱谢尔，以防万一有人会想到这个主意。看起来，希特勒完全不相信他的盟友帕彭。



下午，总理与内政部部长弗朗茨·布拉赫特进行商讨。施莱谢尔受到来自左右两派的压力：经典的政治困境。如果他禁止希特勒的追随者游行，就会惊吓到一个潜在的重要伙伴。如果禁止共产党的游行，他就会被批评反民主。他这个国家总理是多么频繁地处于一种棘手的困境中。全德国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将怎么做。



斯特拉瑟去戈林的公寓拜访他。斯特拉瑟态度谦卑，姿态非常低。至少戈林事后这样讲给他的党内朋友戈培尔听。



《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赞扬了爱瑞卡·曼和特蕾泽·吉泽的卡巴莱小品《胡椒磨》：“太有魅力了，这才是人们应该赋予年轻的慕尼黑歌舞剧的特性。”

每天晚上慕尼黑的演出票都被售光。不久，人们就觉得“糖果盒”太小了，“胡椒磨”的策划者已经开始考虑搬到一个大些的地方去上演。有时，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甚至也坐在观众中。他们偷偷地嘲笑“元首”吗？还是记下每一个恶意的表现？

1月22日，星期日

反法西斯者捍卫红色柏林！

《红旗报》

穿过布洛广场；

在全部封锁的情况下迅速列队通过。

《福斯日报》



柏林异常寒冷，天空乌云密布。星期日临近中午的时候，身着制服的警察控制了共产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警察将员工都赶到街上去，甚至用枪对着《红旗报》的一位编辑。然后他们搜查了整个建筑。更多警察来到这里，分散在冰雪覆盖的广场上。为清空道路，他们封锁了该区域。装甲警车开到十字路口。警察持枪在街上巡逻，枪的保险已打开；他们也在屋顶上用望远镜监视周围，对居民们发出指示：窗和门关上，任何人不许去阳台上。他们等着，直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队伍接近。



柏林企业委员会会议。提奥多·莱帕特致开幕词。普洛特金也来旁听，但他更多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兴趣。莱帕特指责工会容忍施莱谢尔。德国总工会主席辩解说，工会不是政党。“我们有社民党。作为工会，我们不能越权，也根本不可能推翻政府，因此更谈不上容忍了。”

普洛特金觉得很无聊。他想出去，走到寒冷的外面，布洛广场方向。



13点钟，第一批冲锋队在警察的护卫下游行到布洛广场。“滚蛋吧自由！”他们喊道，“滚蛋吧犹太共和国！”到最后有将近16000名冲锋队队员参加了游行，大约有相同数量的警察为游行做安保。

什么都没有发生。

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媒体欢呼雀跃。约瑟夫·戈培尔发出胜利的呼喊：“共产党在小巷里喧哗。到处都是装甲车和机枪，警察确保着我们的安全，以防我们被从窗子里出来的子弹射中。”他的结论是：“我们赢了一场战役！”



奥斯卡·罗伊克去柏林新威斯滕德参加朋友的生日派对。“精选的饮品，周到的接待，各种殷勤恳切。演奏的音乐是莫扎特作品、《生日奏鸣曲》（降E大调）、《赞美主》（*Gelobt sei der Herr*）、亨德尔作品、《D大调奏鸣曲》。”罗伊克还注意到，过生日的孩子有一把新的小提琴，还没有上漆。



刚过中午，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活动仍在继续。希特勒在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尼古拉教堂墓园为霍斯特·威塞尔纪念碑揭幕。数千名运动支持者参加了追悼会，还有从布洛广场出发前来的16000名冲锋队队员。



约瑟夫·戈培尔去医院看他的太太，希特勒陪着他一同前往。医生们曾经给她宣判死刑，现在戈培尔要感谢上帝重新把玛格达还给了他。他很“感动”希特勒的用心与周到。

尤其是因为这一天对希特勒来说还没有结束。他再次在体育馆讲话，再次提醒国家社会主义党记住霍斯特·威塞尔。党的“元首”颂扬每个狂热者，“他们在时代中担负伟大使命，与他们的使命共存亡”。



晚上，两名全城闻名的先生与他们的太太们一起去柏林国家歌剧院，他们在一个包厢里坐了下来。今天要上演的是理查德·瓦格纳根据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改编的《禁恋》（*Das Liebesverbot*）。中场休息，两人混在其他客人中间，与熟人碰头、闲聊，又在下半场打铃时准时回到包厢里。当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他们悄悄地站起来，并溜了出去。他们从后门到了外面，外面正下暴风雪，他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去达勒姆，但是并未给出详细地址。司机不会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最后一段路他们步行前往。已经有人在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等着奥斯卡·冯·兴登堡和奥托·梅斯纳。他们是帕彭、戈林和希特勒。

帕彭9点钟已经到了，希特勒到得晚一些。10点钟，兴登堡的心腹到了。

有汉凯集团的香槟酒——希特勒其实只喝水——他们相互说些乏味的话。但过了一会儿，希特勒请求与奥斯卡·冯·兴登堡单独谈话。这可不是简单的谈话。奥斯卡·冯·兴登堡这会儿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朋友，他曾警告他的父亲不能任命希特勒。几个星期前，他曾对总统说：“如果让希特勒掌权，就别想看到一份组阁时的部长名单，也别想着他会遵从什么协议，他会形成一党独裁。”奥斯卡·冯·兴登堡坚持要求奥托·梅斯纳这一晚也在场。

希特勒与他进了茶室。

他们谈了2个多小时，然后又回来继续谈。他们对谈话内容保持沉默，但是共同的目标已经很清楚：施莱谢尔应该下台。他们又吃了一顿便餐，由身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仆人服务，他们还喝了些香槟。最后，梅斯纳与小兴登堡又乘出租车回去了。

此后，希特勒和帕彭又单独会谈。帕彭说，他现在决定要为希特勒当选总理而努力。但是如果希特勒不信任他，那他就立刻停止。

当然，总统之前已得知了这次会面。对所有人来说，他的默许就是信号：会认真考虑帕彭的提议。



国家剧院掀起了首演热。20多年来，《浮士德II》第一次在柏林大剧院上演，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饰演魔鬼梅菲斯托费勒斯。剧评家阿尔弗雷德·克尔为他的魔鬼诱骗者的表演所吸引，他在这个角色中感受到“最强烈的灵魂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把这个角色看成是“丰满的兽性的哲学家造物——却带着忧郁的阴影”。

阿尔弗雷德·克尔是文艺专栏的巨匠，他为《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报》写文章。自1931年秋以来，他去广播电台为他的广播评论录音时，都会有警察保护。然后，1932年，新的政治广播专员从节目单上取消了他的广播评论，这位专员也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追随者。纳粹开始监视克尔。

克尔是“铁锋”的支持者，并不是个过分敏感的人。他公开剖析了希特勒：“那是个读尼采的暴徒。”1931年，他在《柏林日报》中发表了下面这首诗：

你看到纳粹毫无阻碍地

带来大屠杀

带来大屠杀

还有合法性

就在不久前，共产党的一份报纸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我们如何与第三帝国做斗争？”克尔异常尖锐地做出了回答。他期待着第三帝国“下等兵和无职业的神秘主义者让已获得的智识倒退；伦理道德的破坏”。他表达了“运动计划”的想法：“尽可能迅速培训左翼军官——他们不发动内战，但是如果开始，他们应该在场。”

1932年8月，《人民观察家报》印制了一份作家名单，这些作家将在纳粹取得权力后被禁，克尔就在这份名单上，还有斯蒂芬·茨威格、卡尔·楚克玛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弗朗茨·韦弗尔、克劳斯·曼。戈培尔在国家社会主义党报《抨击报》宣布：“将写作的乌合之众枪毙。”

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党真的接管政府，会发生什么呢？阿尔弗雷德·克尔还有他的家庭还能待在柏林吗？在过去几个月，这个65岁的人有着饱满的创作欲，满是不安，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长篇评论。

好像他的时间不多了。



柏林又一次盛会，又是一场重大的社交活动，又是关于慈善，这次是为了冬季援助。赞助者是保罗·冯·兴登堡。当然作为国家元首的他并不在场。贝拉·弗洛姆认为这肯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盛会。但气氛几乎到了冰点。弗洛姆在谈话中获悉，亚尔马·沙赫特与希特勒是一伙的。许多人嘲笑他，说他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救世主事业

中。帕彭呢？他也是被谈论的对象。据称他搞阴谋诡计来对付他的总理府的继承者。故事在威廉大街与恺撒霍夫酒店来回跳跃。

1月23日，星期一

党派面临的重要日期：

1月31日将发表政府声明。

《福斯日报》

团结迫在眉睫！团结，而不是统一战线行动！……德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前进报》特刊



8点半，施莱谢尔打电话给梅斯纳。他想知道昨天晚上在里宾特洛甫那里他们说了些什么。他问得很刻薄：昨天的大杂烩味道怎么样？

施莱谢尔的线人网络，还是起作用的！

没有人知道梅斯纳的回答。施莱谢尔11点半在兴登堡那里有约。显然他很紧张。



这天早上，帕彭找到总统，向他提出政府的重建计划。他建议将施莱谢尔解职，兴登堡认真聆听。

然后，帕彭建议任命希特勒做继承者。

希特勒？

兴登堡反对。他叫来他的心腹梅斯纳和他的儿子奥斯卡。梅斯纳站在帕彭一边，他认为希特勒应当做总理，帕彭做副总理。国家社会主义党应担负起责任来。不行，兴登堡父子说，帕彭应做总理。



冲锋队与党卫军的领导人在恺撒霍夫酒店开会。阿道夫·希特勒做了2个小时的演讲，他认为运动的局势非常有利。国家社会主义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强大，都要好。作为“德国人民起义的政治士兵”，摆在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面前的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去拜访阿道夫·希特勒。他向希特勒汇报了帕彭劝说兴登堡让希特勒做总理碰了壁。里宾特洛甫提出一个新的想法：由亚尔马·沙赫特领导内阁。这个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前银行行长似乎在兴登堡那里更能达到目的。但是，一切不能使希特勒成为总理的选择，都被希特勒拒绝。



贝拉·弗洛姆路过总理那里，他们说了几分钟的话。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似乎知道在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为推翻他，一个阴谋正在进行。他向弗洛姆倾诉，说在兴登堡那里再没有机会了。各种诽谤、荒谬的耳边风使老家伙确信，如果不任命一个强大的人物做总理，国防部就会发生起义。为什么施莱谢尔没有足够的警觉注意到这一切呢？弗洛姆问自己，并找到一个答案：奥托·梅斯纳麻痹了施莱谢尔，梅斯纳总是对施莱谢尔说兴登堡根本不支持希特勒。



施莱谢尔快到总统那里时，又看了一眼他的单子，单子上写着他和同僚们准备的各种谈判的可能性。该怎样与国会周旋呢？

第一条路。

先要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要在60天之后，就这样继续统治。但这样就违宪了。帕彭在两个月前提出了完全相同的建议，却失败了。此外，施莱谢尔将处于守势。其实他现在就已经是守势了。

第二条路。

另外一个选择，可惜也是违宪的：国会将无限期休会，直到施莱谢尔找到建设性的国会多数席位再重新召开国会。但他怎样才能使各党派不通过元老委员会召开全体大会呢？

第三条路。

这个模式是基于宪法的一个漏洞，卡尔·施密特等有经验的宪法专家早就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漏洞：宪法之父忽视了一种负面多数的可能性，这些多数虽然能通过不信任提案，推翻政府，自己却并不能组建内阁。如果施莱谢尔完全忽视不信任提案——继续统治，那么会怎样呢？如果这样，就不是强制违宪。也许后果是一场总罢工，大规模抗议，甚至是内战。他的紧急法令也可能被国会取消。但施莱谢尔会因此赢得时间，宝贵的时间。

施莱谢尔在过去这几个小时做了什么？他是否为做决定而饱受折磨？他是否与最优秀的同僚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他与法律专家奥尔根·奥特进行讨论了吗？还是孤独地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呢？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偶然听到，自新总理上任以来，失业人数增加了25万人。这个美国人仔细思考，他看清楚了，德国政府首脑正处于困境中。他写道：“施莱谢尔受到工业家的批评，因为他破坏了帕彭的工业计划，也受到了共产党的批评，因为他无法控制失业，同时也受到纳粹的批评，因为他鼓舞工会和犹太人的气焰。”



施莱谢尔做出了选择。唯一可行的路是解散国会，然后推迟议会的召开。他并不是有意拖延，也不是在耍什么把戏，他只是把一切都押在这张牌上。

现在总理还要依靠总统。



美国使馆的代表阿尔弗雷德·科利福特给美国外交部写信：一个“忠诚的代表”向他提出问题，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否有向美国借贷的可能性。

国家社会主义党显然已经非常绝望，四处拼命筹钱。这场运动的势头还能持续多久？



11点半。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请求保罗·冯·兴登堡同意解散国会和推迟选举，以保障他能自由处理“国家紧急状态”。理由是：国家正处在紧急状态。正如后来梅斯纳所记录的：“这一步将被解读为违宪。”后果会是，报纸上将出现强烈呼声，对兴登堡进行大规模批评。如果真要考虑这些情况，必须事先问一问各党派领袖，是否承认国家目前处于紧急状态。

不过兴登堡说，他会考虑是否让施莱谢尔得到解散指令——如果得到，当然不能推迟新选举。他会考虑吗？兴登堡难道违背了他12月的承诺了吗？那时他向施莱谢尔保证，施莱谢尔会随时得到解散指令的。

现在，他显然要让总理陷入绝境。只要国会再次开会，共产党就会提交不信任提案，废除总理。能拒绝这一提案的多数派在哪儿？

除非兴登堡有另外的考量，不管是因为什么。



阿道夫·希特勒离开柏林去慕尼黑。作为告别，他说24小时之内要有一枚炸弹爆炸，然后冯·施莱谢尔将军将成为过去式。

他在影射什么？

1月24日，星期二

褐色游行笼罩着柏林；

20000名斗士致敬“霍斯特·威塞尔”；

阿道夫·希特勒：“他的精神永远在我们心中！”

《人民观察家报》

国会必须被关停，那些政党也必须被排挤。

《每日评论》

明天我们将向法西斯主义展示我们的力量！

红色柏林，反法西斯活动的风暴周；

所有人，所有人都到布洛广场！

《红旗报》



报纸还在讨论布洛广场周日发生的事。对于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来说，要旨是明确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作为柏林的主宰者站在那里的。

这时社民党宣布即将在接下来这个周日进行游行——在卢斯特花园。等待这场游行的不仅仅是这个来自美国的工会成员。普洛特金注意到，“比较两场游行的气场和方法，就会发现很有趣”。



在纽伦堡的一场集会上，叛变的冲锋队头目威廉·施戴格曼激烈地批评了希特勒的战略。“这一运动的历史时刻已错过，”他说，党会“在今后的每次选举中都以失败告终。”冲锋队不能总是只扮演“消防队”或“禁卫军”的角色了，必须结束“执着于合法性”。夺取权力的战斗必须“更残酷和更革命”地进行。



奥斯卡·冯·兴登堡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他的才智可以支持他达成什么。希特勒这些天都在跟戈培尔讲，这个上校是个“少有的蠢货”。



香槟商人里宾特洛甫的家逐渐发展成为阴谋者的总部。今天，弗朗茨·冯·帕彭在这里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弗瑞克先生和戈林先生喝

茶，当然，还有主人也在场。

在什么情况下兴登堡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呢？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果德国右翼的主要人士能汇集在一个内阁中。“民族阵线”（Nationale Front）一定要成为现实。但这需要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和钢盔团头目弗朗茨·塞尔特的参与。只有一个问题：二人与希特勒很长时间以来都有龃龉。

但这是可以改变的。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这些天来终于成为夺取权力斗争中的关键人物。这个人68岁，很自负，德国政界中几乎无人对他表示过好感。他在国会的演讲简直就是催眠。在帝国时代，他被授予“枢密顾问”（Geheimrat）的头衔，因为他忠诚地服务于皇权，至今人们还用这一荣誉头衔来称呼胡根贝格。

对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来说，胡根贝格并不是能马上被看透的：“魁梧，戴着金色眼镜，一簇蓬乱的白色胡子，他看起来很正直，像个乡村医生。事实上，他是个思想狭隘、目光短浅的人，固执到极点，是个激烈的宗派主义者，疯狂的政党人物，是德国最邪恶的灵魂之一。”

今天，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彻底拒绝与施莱谢尔合作，必须“重新组建一个完整的内阁，来确保政府领导必要的战斗力和统一性，保证经济政策的施行。人民日益恶化的困境和日益增长的怨恨需要一个解释”。

这是最高级别的宣战。现在，总理快窒息了。



慕尼黑，希特勒在喝咖啡时跟戈培尔说了当前的情况。戈培尔也不可以亲自参与今年1月在威廉大街的协议，戈培尔的信息常常不完全，支离破碎。而且他的形象太糟糕了，总统和其他党派领导太厌恶他了。戈培尔后来记录道：“施莱谢尔的地位非常危险，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可怜傻瓜！”

1月25日，星期三

胡根贝格抨击内阁；

先是推翻施莱谢尔政府，然后是“国家紧急状态”——给兴登堡施加压力。

《每日评论》

施莱谢尔被孤立！

全体人民反对他的贫困化政策；

失业灾难性地增长；

总理的立场保持不住了。

《抨击报》

反对失业率的斗争；

就业促进计划生效；

看来1月上半月失业状况的发展还令人满意。

《福斯日报》



共产党人现在也在布洛广场游行——是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三天前胡说八道的反应。恩斯特·台尔曼和其他共产党领导站在自己搭建的台子上，台子就在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前面。栏杆中间悬挂着象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镰刀锤子旗。

130000人从他们旁边走过，拳头高高地举起。

只有极少数警察跟着游行，因为这次不用担心狙击手会向游行者的射击了。在政府的许可下，共产党主宰了这个广场。



在“反法西斯主义战斗联盟”（Kampfbund gegen den Faschismus）

[被禁止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frontkämpferbund）的后继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晚上他们在德累斯顿与警察发生了枪战。9人死亡，11人受伤，全部都是共产党人。根据官方的说法，警察是被射击而后反击的。当局宣布进行调查。



社民党最重要的思想家召开作战会议，随后发表了他们称为“决议”的东西：“针对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法的颁布计划，德国社民党主席和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进行最强烈的抗议。这一计划的实现将导致政变，这一政变将剥夺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并使那些不顾全局利益，尤其是罔顾工人阶级利益的小团体受益，他们只维护其特殊利益，并以各种理由回避国会的批判。”



里宾特洛甫又请了一位政客来他的别墅喝茶，这次奥斯卡·冯·兴登堡出现了。让希特勒成为“民族阵线”政府总理的想法似乎并不是没有希望的。小兴登堡向里宾特洛甫承诺，在他父亲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会再与他取得联系。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情况如何呢？他的“交叉阵线”的理念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的。工会失败了。格里高·斯特拉瑟被晾在一边。但至少内阁还是支持他的，国防部也支持他。

他准备好战斗了吗？他还在努力快速采取创造就业措施吗？还是会陷入一种情绪中，这种情绪，只有某些强权者才时不时会有。这些强权者处于权力丧失的边缘，被误解，并毫无道理地感觉无能为力：没有我，你们做去吧，走着瞧，你们会得到什么！他可以去滑雪，可以和他的太太一起上山，在平静中恢复一下他的不很稳定的身体状况，等着威廉大街再来找他。因为肯定会有人来找他的，也就是几个星期，不会再长的。

然而，施莱谢尔这些天并没有说起自己。但从他说的话中有一点是清楚的：他特别担心兴登堡会任命一个人做总理，这个人会不可避免地将国防部卷入流血内战中。不，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对于现任的他来说还是好一点的。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害怕弗朗茨·冯·帕彭卷土重来。



一次可怕的旅行。戈培尔去上西里西亚的格利维采（Gleitwitz in Oberschlesien）——在敞篷车中，气温在零度以下。冲锋队大张旗鼓地迎接了他。等着他的是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礼堂，他是今晚的主要

发言人。戈培尔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巨大的成功。”然后又继续前往比托姆（Beuthen）。路上车出了故障，他在严寒中待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是一个演讲。竞选，痛苦曲折的斗争。



在社民党人鲁道夫·希法亭家中共进晚餐。晚宴上，哈利·凯斯勒伯爵近距离地观察了海因里希·布吕宁，这个中央党政客，他知道取得权力又失去权力是什么样的体验。

在凯斯勒看来，布吕宁比他想象的更活跃更年轻，几乎是风趣的。他们谈了1918~1919年革命，谈了魏玛共和国诞生的时间。现在才过去了15年，却恍如隔世。

布吕宁先是沉溺于过去，又谈起了近日的政治，认为帕彭内阁会卷土重来。

凯斯勒回答，一想到要再次忍受这么一个蠢货和半疯子，这么一个“堂·吉珂德”作为总理，真是恶心死了。如果帕彭重新被任命为总理，就会有暴力爆发的危险，后果将是左右阵营的极端分子的暴动。

布吕宁表示反对：如果施莱谢尔继续留任，这种危险也存在。在政治上，施莱谢尔和帕彭一样，他只是更加谨慎。无论如何，布吕宁都认为会有一场革命。

1月26日，星期四

施莱谢尔最后一次挽救尝试：

新的紧急法令！

《抨击报》

前进大街上满是欢呼的人群；

那是红色柏林！

《红旗报》

胡根贝格扑空了；

没有背景的抨击。

《每日评论》



一个强有力的高压带覆盖欧洲，源源不断的冷气团从波罗的海诸国和北俄罗斯来到德国。夜晚晴朗又冰冷。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Pommern）冷到零下28度。西部莱茵河上的冰危及航运，不久后就要停运。

在柏林，有些地方的温度降到零下20度，许多公寓的水管被冻破，难民收容所——城市中共有70个——简直拥挤得无法形容。政府说，煤炭储备还充足。在“迈耶庭院”住的人现在怎样呢？



谈话、打探、欺骗形成了漩涡。威廉大街发烧了。施莱谢尔就在其中。

他与亲社民党的工会领袖会面，努力想再次取得他对推迟新选举的支持，却徒劳无功。工会与他保持距离。现在社民党也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奥托·布朗，已下台的普鲁士邦总理，给施莱谢尔写

了一封信，并寄给总统一份副本。信中，他将施莱谢尔的计划称为“叛国要求”。

兴登堡欣赏的社民党人并不多，布朗是其中之一。两人的狩猎区接壤。往日去打猎时，他们偶尔还能见到对方。



国务秘书普朗克告诉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施莱谢尔后天会请求得到解散指令。普朗克补充道，因为兴登堡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内阁将会引退。



据说，奥斯卡·冯·兴登堡的突然背弃让施莱谢尔本人很难接受。帕彭所做的，让总理觉得深不可测。

但为什么施莱谢尔如此极端行事，为什么他要去挑动决定，为什么他不干脆等着看事态如何发展？作为总理，他如果被动一些，是不是也许就能度过这次危机？



国会专项事务委员会还在开会，好像外面并没有政治动荡一样。单是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天就开了4个小时的会，讨论“少数民族政策”。不过，当然所有与会者都高度紧张。德国国家人民党人库阿茨记录道，“还在继续踢皮球”。

库阿茨的上司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那里得到一封信。这个香槟商现在也与德国国家人民党人谈判，为希特勒铺平道路。几个月前，他在柏林政治中还没有任何作用。



施莱谢尔从来不是个犹豫不决的人，这一天他孤注一掷。他站在总统面前请求他“解散国会，推迟新选举，并无保留地交付给我全部行政权力”。

从不同角度来看，总理的要求或是勇敢，或是无耻：这样兴登堡自己也被剥夺了作为防卫军总指挥的权力。

后来梅斯纳说，施莱谢尔打算禁止共产党和冲锋队。这些措施可能会引起内战，而内战恰恰是他一直想要阻止的。

兴登堡拒绝了他，并少有地温和地补充道：“亲爱的年轻的朋友，我不久也该在天国了。在那里我还能看到我是否做对了。”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情绪怎样呢？阿道夫·希特勒明天要返回柏林。他仍然不知道这次是否能达到目的。他还必须耐着性子。耐心不是件容易的事。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总统手中。老家伙让他失望太多次了。如果再次委任帕彭怎么办？但如果希特勒被委任为总理，却不允许他的任何心腹任职重要部门，这该怎么办？

约瑟夫·戈培尔知道，“元首”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新政府的样子还没有呈现出来。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施莱谢尔完蛋了。“他完全被孤立了，”约瑟夫·戈培尔写道，“他所有伟大的计划都成了泡影。”但他不允许自己对将军的末日欣喜若狂。过去几个月已经有太多的失望了。



晚上，哈利·凯斯勒伯爵参加了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的招待会。那里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施莱谢尔马上就要下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将会有第二个帕彭内阁。凯斯勒简直不敢相信。他认为，“幕后政治自威廉二世以来从未这样放纵过”。



今天晚上，由乌尔施坦出版社发行的一份柏林晚报《速度》（*Tempo*）报道了一个“轰动的事件”。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惊讶地读道：“将建立一个由希特勒、帕彭和胡根贝格组成的新政府！”

普洛特金马上给应该知道这件事的朋友们打电话，他很怀疑地跟朋友们讲了报纸的头条内容。《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赫伯特·克莱恩回答，他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另外一个朋友警告他，不要相信类似《速度》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报纸。还有一个人笑了起来，“他们再也不敢启用帕彭，帕彭现在是德国最让人憎恨的人”。

1月27日，星期五

德累斯顿的流血之夜：

在实现“社会平衡”的名义下，根据官方确认，共有9人死亡，11人受伤——这是在施莱谢尔统治下不断升级的布尔什维克的谋杀煽动的结果——恐怖——紧急法令声明。

《人民观察家报》

上任！

帕彭、戈林、胡根贝格、弗瑞克和史图尔普纳格的内阁？

加强反法西斯斗争！保卫你们的党！



在国防部的领导层中漫延着各种猜测和解读。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决定主动一些。早上，他去探访朋友施莱谢尔。他问，兴登堡想再次任命帕彭为总理的谣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施莱谢尔回答道，他不再拥有总统的信任，预计一两天内会被免职。不过他还想留任国防部部长。

他是听天由命吗？还是他了解哈玛施坦因？

防卫军陆军总司令就这件事去找了国务秘书梅斯纳并发出警告：国防部不会支持第二个帕彭内阁！施莱谢尔应继续任总理。

不久之后，哈玛施坦因和陆军人事办公室的领导埃里希·冯·戴姆·布舍-伊彭堡将军参与了和保罗·冯·兴登堡的谈话。将军们这时也亲自警告总统，如果帕彭成为总理，会有内战的威胁——哈玛施坦因反对希特勒当选总理。

总统非常生气。难道军人们要再一次干预政治吗？这并不是他们的工作！

但他保证自己并没打算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无疑是柏林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官，但即使是他目前也无法预测势态的发展。他当然听到了前一天晚上的一些传言，说施莱谢尔辞职就在眼前——所以他向巴黎报告了这件事。



希特勒又在柏林了。里宾特洛甫在戈林的公寓中拜访了希特勒，向他报告了情况。

希特勒说他要马上动身。

里宾特洛甫回答，事态并非毫无希望。还有一个方案：“民族阵线”。希特勒必须与胡根贝格达成一致。里宾特洛甫再次把自己家作为希特勒与帕彭会面的地点。今晚10点，希特勒可与帕彭就所有细节达成一致。



戈培尔见到了农业协会的关键人物，就是在施莱谢尔后面施压的那些大地主。他们达成一致：施莱谢尔必须下台，希特勒要成为总理。

后来，希特勒、戈林、弗瑞克和戈培尔一起商量对策。可是他们自己又能做什么呢？没什么可做的。总理现在还叫施莱谢尔，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则是帕彭。希特勒如此接近权力，但他却一直都没有拥有它。他在等待。如果需要，他从恺撒霍夫2分钟就可以走到总理府。



有些什么事将要发生。每个有第六感的人都能感觉到。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胡根贝格对于国家总理的攻势是那么强烈，这让普洛特金感到很惊讶。这意味着什么呢？

普洛特金这个细致的观察者完全被搞糊涂了。“我提出问题，但是答案却如隔云烟。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推测。没人知道会发生什

么，但每个人都认为整件事是不可能的。”

谜一样的柏林，谜一样的德国政治。

普洛特金写道：“一座巴比伦塔。”



国会元老委员会确定1月31日召开国会。政府方面并没有极力推迟这一日期。



右翼阵营下午开会。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说服希特勒与胡根贝格见面——他说这是成为总理的途径。时机似乎成熟了，现在要协商如何尽快打造民族联盟^[11]。大家在国会议长那里碰面。戈林请求里宾特洛甫也参加。

但这是一种不信任的决斗：希特勒、弗瑞克和戈林是国家社会主义党这边的，而胡根贝格和议会党团主席奥托·史密特-汉诺威是德国国家人民党这一边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吹嘘着，似乎德国国家人民党根本没有退避的可能。戈林强调说，弗朗茨·塞尔特加入了我们，钢盔团也加入了我们，希特勒马上就要掌控国家内政部和普鲁士邦内政部。很难将这一交涉称为谈判。刚一见面就互相攻讦。

胡根贝格说，不行，绝不可以是普鲁士内政部。此外，总理府负责人及内阁通讯社负责人职务都要由德国国家人民党来担任。

政治通常是一种反击游戏——胡根贝格的反击也同样是不屈不挠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立即终止谈判，并解散了这次会议。



帕彭获悉了这一不幸。他要与希特勒谈谈，要马上！

不行！希特勒说。不要与帕彭谈！戈林与里宾特洛甫说服了他。最后，“元首”还是顺从了。他留在了柏林。至少是目前。



德国国家人民党议员库阿茨记录道：“兴登堡不想要希特勒；帕彭很愚蠢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希特勒，却要求胡根贝格在兴登堡那里探讨与希特勒合作的可能性。”

真是疯狂把球踢过来踢过去。谁还有全局观？



帕彭是柔韧的，帕彭又是坚定的，帕彭如鱼得水。他对里宾特洛甫说：胡根贝格的事并不是主要问题。从现在开始，他力挺希特勒担任国家和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

帕彭想成为普鲁士邦专员，接替普鲁士邦总理的工作，从而实际上成为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上级。



国家专员格瑞克的电话响了，是奥斯卡·冯·兴登堡打来的。奥斯卡说他代表父亲打电话，希望与格瑞克在蒂尔加滕单独面对面密谈，他们相约黄昏时在胜利大道旁假装“邂逅”。格瑞克很不安地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了。

“你是继续站在兴登堡这边，还是要站在叛徒施莱谢尔那边？”总统的儿子这样问他。

“为什么说是叛徒？” 格瑞克问道。奥斯卡说，他有一个可靠的消息，施莱谢尔在波茨坦守备部队（Potsdamer Garnison）的支持下，一心打算以总统年老为由取而代之，自己当选国家总统。为安定民心，施莱谢尔想将希特勒任命为总理。“叛徒”这个词用得还是很轻的呢。

格瑞克非常愤怒。他说，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是卑鄙的栽赃。他说他几乎每天都与施莱谢尔谈话，施莱谢尔不可能策动这样一个计划。他立即去拜访总统。他发现老兴登堡很忧伤，一位默默坐在那里的白发老人，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

格瑞克是施莱谢尔的人。他能怎样做呢？至少要通知施莱谢尔，而且他必须这么做。

“奥斯卡·冯·兴登堡是个狡猾的阴谋家，” 总理说，“他使我失去了他父亲对我的信任。如果奥斯卡宣称波茨坦守备部队要发动政变，这完全是谎言。尽管老家伙对帕彭和对纳粹的行为让我感到苦闷，可是我的良心却使我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1月28日，星期六

绝望地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施莱谢尔政府。

《人民观察家报》

总统危机的游戏？

今天施莱谢尔在兴登堡那里——到处是不断攀升的躁动。

《每日评论》



严寒依旧笼罩着德国。西里西亚地区和南部为零下10度，东普鲁士甚至到了零下25度。但是从斯堪的那维亚却来了暖空气。对柏林来说，这意味着接下来这个星期温度会升高，会是融雪天气，不过可能会带来降水。



保罗·冯·兴登堡本想早上接见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但总统办公室在预定见面时间前不久突然取消了这次接见。大型工业协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也接到取消接见的通知，态度很友好，并告知了稍后来国家元首这里的时间。

兴登堡是要重新安排国家命运，要集中全部精力。



时间接近11点，里宾特洛甫到老同志帕彭那里。“希特勒在哪儿？”帕彭问道。里宾特洛甫答道，他可能已经走了，也许在魏玛还可以联系到他。帕彭说，必须马上把希特勒叫回来，一个转折点出现了，当总理现在是可能的了。里宾特洛甫急忙赶到戈林那里，戈林知道希特勒还在恺撒霍夫酒店。戈林打电话给他的“元首”。希特勒还在柏林。

但希特勒今天不想见帕彭，明天，11点。



11点半，内阁在总理府开会。这会是最后一次吗？它的统治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做些什么，两个月时间太短了。

众人的目光穿过窗子游移到外面。高大的树木，被霜冻住了。

施莱谢尔发言，他说，几分钟后，他就要去总统那里请求得到解散指令。不过他预计兴登堡会拒绝他的。然后——他将辞职。他不能让自己和内阁被嘲弄。根据所有预测，最终会出现一个由胡根贝格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支持的帕彭内阁。

多个部长宣称要警告总统小心这种局势。

施莱谢尔把椅子推回去，站起身来。



12点15分。这是决定一切的一次谈话。兴登堡坐在写字桌旁。一个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人，将一切希望寄托给了上帝。

总理描述了摆在总统面前的各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由议会多数支持的希特勒内阁。施莱谢尔指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

第二种选择是希特勒统治下的总统内阁，但是这违背了总统的原则。这不在考虑范围内。

第三种选择是让他，施莱谢尔继续留任。加强他的力量，赋予他紧急全权。

没有其他路可走，帕彭与胡根贝格——这会引起革命的动乱。



兴登堡本质上是个军事战略家，他明白冲突中的细微之处，知道如何解读这些信号。他也同样知道，总理与《每日评论》保持着密切联系。

今天早上竟然刊出——《总统危机》这篇厚颜无耻的文章！施莱谢尔真的以为他能以这样愚蠢的手段撼动这个出生入死的元帅吗？

不，希特勒和帕彭使兴登堡可以根据宪法行动，而无须过度使用总统权力。这真是极大的解脱。

施莱谢尔说，我请求解散指令。

“不行，”兴登堡说，“您不可以得到解散指令。”他就是这样回答的。就是这样傲慢。这就是给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判的刑。

兴登堡说，他很感谢施莱谢尔，“您竭力要赢得国家社会主义党，想创造国会的多数席位。可惜没有成功，因此，现在必须寻求其他途径”。

总理回答：“我承认您有权力废黜我，但是，我不承认您有权力在总理背后与另一个人串通一气，而这个总理是由您违背他本人的意愿来任命的。这是背信弃义。”

他宣布辞职。整个内阁都跟他一起。

兴登堡预计到会这样，这是当然的。辞职申请已经准备好了。梅斯纳拿了过来。梅斯纳总是面面俱到。施莱谢尔曾与梅斯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梅斯纳，见风使舵的人。

新内阁决定下来之前，施莱谢尔还要留在任上。

近一刻钟之后，总理回到内阁成员身边。沮丧。一切都结束了。在任仅仅56天之后。

他对部长们说，他刚刚就像对着一面墙讲话。



这些消息在城市里迅速传播开来。施莱谢尔要辞职！

这件事尤其在共产党内造成了警戒气氛，现在是时候迅速采取行动，把自己武装起来应付一切了。党的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对奥托·弗朗克同志说，中央委员会必须尽快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会议。他问道：“你知道一个合适的地方吗？”——“台尔曼同志，有两个地方可选择”，弗朗克回答道。二人认识有些时间了。弗朗克在共产党建党之时已入党，是个资深人士，绝对值得信赖。

台尔曼选择了柏林东南面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Königs Wusterhausen）附近的“齐根哈斯体育馆客栈”^[12]（Sporthaus Ziegenhals），主人是共产党人威利·莫舍尔。共产党所有领导人要在2月7日来此集合。



弗朗茨·冯·帕彭的这一天刚刚开始。兴登堡正式委托他组建政府，这件事他不用别人多说。他下午与胡根贝格谈话，胡根贝格有些抱怨，但又非常贪婪。帕彭向他承诺，让他做经济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胡根贝格这时不再那么断然地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担任国家和普鲁士邦内政部长。

帕彭与现任部长谈话一直谈到晚上，他们中有些人会跟着他干。中午，帕彭给施未林·冯·科洛希克家里打电话，他说，只有两种选择：希特勒内阁，帕彭做副总理，或是帕彭—胡根贝格内阁。他明天要和希特勒协商，此外还要和中央党主席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谈判。帕彭快要达到目的了。



具有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领导人听说帕彭要试探政府的可能性。巴伐利亚人民党主席弗里茨·舍费尔在会谈中向希特勒提出， he 可以和得到国会支持的内阁合作，而这一内阁是由希特勒领导的。他也是为了阻止帕彭。

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他并没有被授权组建政府，因此无法参与关于联合执政的谈判。



局面很棘手。帕彭很清楚，如果兴登堡认真对待，并采纳天主教徒们的建议，那么希特勒就无法不通过国会多数而被任命为总理了。但这是希特勒的条件：他不会领导执政联盟的，他也不会接受需要他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的情况。

一定还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施莱谢尔下台了。这个可怕的帕彭再次被委任组建政府。花花公子哈利·凯斯勒伯爵惊恐地想到了这一变化——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看到威廉大街的喧嚣，但凡是个人有头脑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凯斯勒仔细思考了总理的垮台，在这一刻他认为这件事根本没有必要。很明显，这是东部援助丑闻中的一个阴谋，就是这次东易北河（Ostelbien）^[13]的严重的受贿。“对那些受贿的大人物们来说，要掩盖他们那些肮脏的勾当，施莱谢尔太软弱了；因此老家伙的宠儿必须再次向他展示，他在处理这些事务上更强硬。所有这一切都是行贿受贿、幕后政治和裙带关系的混合物，让人联想到绝对君主制度的最糟糕的时期。”



柏林的记者们开始了新闻竞赛。谁是第一个获悉下一个新闻的人？时代转折点的热潮向编辑部袭来。贝拉·弗洛姆也被牵扯进来。对她来说，这并不只是抢独家新闻，而且涉及一个朋友的命运。她所在的乌尔施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紧张、激动的气氛，她简直无法再忍受。她跳到车上，直奔去找施莱谢尔。她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别那么在意这些事，亲爱的贝拉，”施莱谢尔说。他想安慰她。“我今晚会在新闻界舞会上见到您。我会去乌尔施坦包厢，跟您跳第二支舞。”现在是中午2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赫尔曼·戈林是兴登堡唯一可以信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这个从前的王牌飞行员这时向总统传递了一个消息：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一旦掌权，将永远尊重兴登堡的权威，无意违反宪法或对国防部施加影响。

这给兴登堡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无疑是一位正直的人的承诺。



在造船工人大街剧场 (*Komödienhaus am Schiffbauerdamm*)，今晚《油漆未干！》(*Achtung! Frisch gestrichen!*) 首演。一向严厉的剧评家阿尔弗雷德·克尔非常愉快，他认为这部法国人勒内·福舒瓦的喜剧非常吸引人，散发着魅力。演出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他的家在格吕内瓦尔德区道格拉斯大街10号，在红白网球俱乐部的拐角。如果他还有幸没有感染蔓延全国的流感，那么明天一大早他就要马上写评论。也许他会坐在他和妻子一起写的戏剧《编年计划》(*Der Chronoplan*) 前。尤莉娅非常爱谱曲，两年前他们开始写这一作品。

目前政治上发生的事，克尔并不那么担心，他并不是随时准备走人的。他在国外没有钱，他所有珍贵的收藏——第一版的海因里希·海涅作品、原版版画、油画、乐谱——在家里堆得到处都是。如果纳粹真的夺取了政权，肯定还会有时间看看他们是否像自己声称的那样进行统治，最终妥善地处理一切。



8点：布洛广场。上百名共产党人涌了进来，他们唱着被禁止的左翼阵营的歌。几队警察立即赶了过来。队长确定这是非法游行，并下令解散！警察清理广场，并用橡皮警棍打人。1个小时后，警察们又在卡尔大街疏散了另一个共产党游行。



8点，约瑟夫·戈培尔在罗斯托克体育馆给大学生们做报告。之后他也获悉施莱谢尔辞职了。他马上赶回柏林，满是怀疑，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个“骗子集团”——他私下里就是这么称总统的智囊团的。因为他认为兴登堡本人，这个满嘴忠义的人，也是不可预测并背信弃义的。

在恺撒霍夫酒店，希特勒跟他说了事态的进展。帕彭探查了局势。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元首”似乎思绪纷繁。他并不相信这个帕彭，他怀疑帕彭滥用他的指令，最后一刻使自己成为总理。随后，希特勒开始独白，咒骂那些不忠的贵族，他们那些怪念头，骂所有名字带“冯”的人。他的随从早就习惯这一切了，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形成了希特勒所需要的听众。



夜里，帕彭再次穿过冰雪覆盖的部长花园，去拜访兴登堡。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要求很适度，只要求少数部长职位，老部长们会继续留任。谨慎起见，帕彭并没有谈及希特勒和胡根贝格之间的争吵。

兴登堡坚持要他的心腹担任两个部的部长，最重要的两个：外交部和国防部。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会继续担任外交部部长的，帕彭说。

很好。

但施莱谢尔不能继续担任国防部部长。

对。兴登堡确定。

兴登堡说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可以，勃洛姆堡正代表德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

帕彭必须向兴登堡承诺作为副总理进入希特勒政府，然后才可以离开。

帕彭说可以。



新闻界舞会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后面动物园旁的礼堂举行，这是社交界的大事件。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多数部长都没有出席，为政府预订的包厢几乎都空着。有许多文学家、演员和音乐家都参加了，他们没有被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影响情绪：埃利希·克斯特纳、罗达·罗达、卡尔·楚克玛雅、威廉·富特文格勒，还有美国人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作为外国媒体协会会长的埃德加·安塞尔·莫维

尔在庆祝的人群中漫步着。午夜过后，又来了一些新客人，变得拥挤不堪。柏林又回到了老样子。

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贝拉·弗洛姆。难道她在乌尔施坦出版社的包厢里等施莱谢尔来请她跳舞吗？可能工作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毕竟她首先是为了工作到这里来：谁跟谁调情了，谁穿了什么衣服，谁跟谁坐一张桌子。为了配合这一场合，她面带柔和的微笑，而且微笑与衣服相配：一件淡粉色曳地天鹅绒镶毛丝鼠皮边的连衣裙，是她特意从巴黎买来的。可是总理却看不到她了吗？弗洛姆并不天真，她心中满是阴霾的预感，心情非常沉重。

事后她写道：“新闻界舞会中弥漫着焦虑的期待：无总理状态！施莱谢尔满不在乎，希特勒、帕彭和胡根贝格则还没有责任感。”



美国人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星期日凌晨参加了一个化装舞会，是由一个社会主义杂志举办的，许多记者都来到这里。这是与新闻界舞会竞争的活动。这一活动场地组织了三个沙龙，每个沙龙都有乐队演奏，所有房间都满满的。普洛特金觉得这里的人跳爵士和百老汇一样。3马克可以买一大瓶葡萄酒。6个人一桌，客人可以随时换，每桌整个晚上可以喝掉3瓶。没有人觉得今晚是个愉快的夜晚。他们的笑都是勉强的，普洛特金摆脱不了这种感觉。3点，他回家了。舞会进行到5点钟。

不过明天是星期日，没什么事可做的一天。

1月29日，星期日

施莱谢尔下台后我们的要求：

希特勒当总理。

《人民观察家报》

警戒！警戒！

反对法西斯总进攻行动的统一战线；

反对红色自由党的恐怖紧急状态；

《红旗报》

与希特勒协商；

国会星期二会议取消；

禁止所有共产党游行。

《福斯日报》

工会动员起来；

反对帕彭的浪潮——兴登堡会怎样决定？

《每日观察》



威廉大街的人晚上是怎样睡着的？在这个星期日又是怎样醒来的？

德国的未来将要在一个冬日被决定，在这个不怎么晴朗的冬日。虽然并不怎么冷，但今天的温度却并没有升到零度以上。德国至少不再是严寒。温度在零度左右，降水量不大，偶有降雨或降雪——或者是雨夹雪。这就是今后的天气。



上午10点钟，兴登堡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个星期日，他没有多少时间献给亲爱的家人，也几乎没有自己的思考空间。他把梅斯纳叫来，传达他的决定：立即解除施莱谢尔国防部部长的职务。

一封电报发到日内瓦：中将勃洛姆堡立即回柏林。勃洛姆堡作为东普鲁士军界的指挥官经常拜访兴登堡，兴登堡很欣赏这个个子高高的人，这个人总是跟他说不赞成施莱谢尔的政治主张。

这些事根本没有通知帕彭。



这封电报的副本也马上到了施莱谢尔的办公桌上。他的线人还在打探着、活动着。勃洛姆堡到柏林？施莱谢尔拿起电话，从勃洛姆堡指挥部那里获悉，由于天气恶劣，将军将乘火车出行。

明天一早，勃洛姆堡将到柏林。一个热爱军事史的人。训练有素、温和，却没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不是现在，他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竞争对手。



希特勒推迟了一切出行计划。他留在柏林，现在必须在这儿。他提前考虑一切。汉斯·海因里希·兰马斯多年来一直在内政部宪法部门工作，希特勒请求他过来跟着自己。兰马斯曾经是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一年前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兰马斯会当国务秘书吗？“我是政治家，”希特勒说，“我不懂管理，而且也不想为此费心，但我也也不想出洋相。我需要一个专业人员，您准备好担任这一职务了吗？”

兰马斯回答，准备好了。他已经准备好了。



又是一场在卢斯特花园的游行，这次是社民党召集的。“铁锋”聚集在一起——这是共和国捍卫者联盟：国旗团黑一红一金、德国总工会、工人体育联合会和全体职员联合会。按他们自己给出的数据，仅国旗团就有300万成员。

从前的霍亨索伦城堡上悬挂着一幅标语，“柏林是红色的”。约20000名身着制服的人列队，他们中许多人一大早走了15公里，还有些人走了20公里。另外还有80000人涌入卢斯特花园，马路两边还有100000人。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当然也在观众里，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铁锋”。他觉得他们走起来和纳粹一样强有力。他们的红色旗子高高飘在空中，对这个美国人来说这真是“动人的一幕”。共和国的捍卫者似乎非常坚定。柏林社民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弗朗茨·昆斯特勒对群众发表讲话。“柏林属于红色，”普洛特金听到他这样讲，“铁锋两次挽救了共和国，也许还有必要挽救第三次。我们既不允许纳粹，也不允许君主主义者摧毁我们用心血筑成的共和国。”

普洛特金能看出来，这是个使人振奋的演讲。大家都全神贯注，对普洛特金这个工会成员来说，这是他听过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15分钟演讲。

人民，请倾听信号！

到了最后一战！

国际社会

正在争取人权。

然后“铁锋”就散开了。



哈利·凯斯勒伯爵也参与了游行。他期待看到共产党人，但是却一个都没有发现。国旗团所有部门在星期三参加一个共产党的游行时，共产党明明是宣称要一起游行的。不过凯斯勒很高兴，尽管天气湿冷，却来了这么多人。这还是带来了希望。



在帕彭的住处，一大早很热闹。希特勒和戈林到了那里。协商继续进行，一直在讨价还价。心理上的挑战。国家社会主义党中谁应该成为部长？

希特勒发言：弗瑞克要成为国家内政部部长，戈林是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因为普鲁士警方“最终要落到可靠之人的手里”——帕彭没有反对。相应的，希特勒接受帕彭作为副总理和普鲁士国家专员。

但“元首”又亮出一个新条件：国会应尽快解散，并安排新选举。因为他作为总理要依赖于一部授权法，国会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部法律——只有这样他的内阁才能拥有相应的全权。

帕彭也同意。他立即去了兴登堡那里。



这天上午，施莱谢尔在本德勒大街国防部和几个部长讨论局势。要阻止希特勒或帕彭当总理，但是怎样才能阻止呢？

一个将军说：用暴力。由国防部废黜总统！我们把兴登堡软禁起来，把他带到纽德克农庄。然后国防部警戒，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

态。费尔迪南德·冯·布雷多也赞成。

那就是一场政变了。

不行，施莱谢尔说，绝不可以！

施莱谢尔回家了。他想留任国防部部长，不惜任何代价，而且他还觉得没有任何阻止他留任的因素。



现在这个总理也下台了。卡尔·冯·奥西茨基要在下一期《世界舞台》对此加以评论。他写道：

“可真能消耗拯救者啊，又完蛋了。如果专制政权继续这么搞下去，那不久就会：每个德国人都当一次总理！”

上一个总理，各方面都被称为堪当国家大任的天才，上台才多久？今天冯·施莱谢尔将军又倒下了，遍体鳞伤，像恺撒的尸体在无人的神殿上。这个“福利将军”，要把所有的重量一下子举起来，结果垮台了，事实证明他只是半瓶醋，甚至败在他个人的强项——阴谋诡计上。”



下午，希特勒和戈培尔一起喝茶，突然戈林进来了。他叫道，一切都很完美。明天“元首”就要被任命为总理。很长时间没人说话。然后，希特勒和戈培尔站了起来，向对方伸出了手。即使在小圈子里，他们也喜欢煽情。



帕彭的公寓——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上任之初其实是可以住在这儿的——现在成了各种谈判的焦点。下午，兴登堡的代表约了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胡根贝格和两位钢盔团领导人塞尔特和杜伊斯特贝格。他向他们说了事态状况——这意味着：并没有全部说出来。他并未提及希特勒要求不久后的新选举。

相反，他把劳动部给了塞尔特，又对胡根贝格说：总统希望把国家和普鲁士邦的经济及农业部委托给他。胡根贝格，超级部长。

帕彭老奸巨猾，他很熟悉这位前枢密顾问及其自卑心理。

胡根贝格晃着头，说“我们限制住了希特勒”，他所恨的中央党根本没有被提及。听起来不错，非常好。

但一同出席的党派同事敦促他们的主席拒绝，他们说希特勒是个狂热分子！帕彭问道：“您想要什么！我有兴登堡的信任。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将希特勒逼在角落里，把他挤得够呛。”

可是，提奥多·杜伊斯特贝格也站在希特勒的对立面，尽管他也是以反犹闻名，但他个人由于是犹太人后裔，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媒体上被强烈攻击。

所以大家再次产生分歧，一切都悬而未决。但是帕彭向国家社会主义党汇报说，通往政府的路一路坦途。

与此同时他还未再和兴登堡谈过话。



德国人民党的国会党团小组发表了一份声明：我们批判导致新危机的政治颠覆活动。德国国家党（Deutsche Staatspartei）向总统和

国会要求有“民主权威”（demokratische Autorität）的政府：如果国家“有朝一日，在所有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成为革命的玩物”，那么自由也就丧失了。



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将军，陆军总司令，他要立即与希特勒会谈。他是为施莱谢尔来说话的。他也会以防卫军的反抗行动来威胁吗？至少不久就会有传言，说军队计划政变，阻止政府改组。

现在到了决定性的时刻了。

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一场心理战。



谣言传遍柏林。弗朗索瓦-庞赛听线人说，帕彭已放弃了与希特勒组建政府的计划。无党派人士、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也接到了类似的消息——帕彭明明早上刚刚告诉他，希特勒内阁正要组建。

这是妄自尊大的人的时刻。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也听说胡根贝格要求帕彭回来做总理；另外一个线人告诉他总统糊涂了，因此施莱谢尔会动用军队。该相信哪种说法呢？



晚上，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将军又拜访施莱谢尔将军。另外一个人也来了：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一个可疑的保守派，他几乎与所有的右翼派别都有着很好的关系，是施莱谢尔的信使和线人。



希特勒和戈林去帝国总理广场戈培尔的公寓里拜访戈培尔，三个人在那里共进晚餐。门铃响了一——是他们都认识的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他想打探事态的走向。阿尔文斯雷本声称，防卫军已把自己武装起来，目的是防止出现让他们不满意的新政府的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心里起疑。是威胁吗？他们没有对阿尔文斯雷本透露任何消息。



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层中也笼罩着深深的不安。阿尔文斯雷本悄悄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很神秘——这么说防卫军还是要政变？

这难道只是“谣言”吗？戈培尔问自己。无论如何，希特勒很不安。戈培尔不相信施莱谢尔有勇气反对兴登堡。但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是把柏林冲锋队队长冯·海尔多夫伯爵叫来了。海尔多夫要采取“措施”——具体什么意思，戈培尔并没有在日记中透露。

最后戈林到了帕彭和梅斯纳那里。这些该死的政变传言，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这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也传到了总统那里。当然，越来越多的新闻涌向了总理府。大家现在都说施莱谢尔动员了波茨坦守备部队，要推翻兴登堡，将他放在密封车厢里，并带到纽德克庄园去。

兴登堡的指挥部并没有人去核实消息是否可靠。

相反，在威廉大街，大家都充满恐惧地竖起耳朵听是否有行进的军靴声。



多么好的机会。如果弗朗茨·冯·帕彭愿意，他就是个干劲十足的人。夜里，他还向兴登堡递上一份部长名单。戈林也坚持做不管部部长、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和国家航空专员。弗瑞克为国家财政部部长。戈培尔并不在名单上。保守派都很讨厌他，这个人不能任命职位。

一些职位还空着，如司法部部长——尚未任命。例如中央党只需立即行动即可将之收入囊中。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议会多数席位。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这些还不够。但希特勒并不想进行关于联合执政的谈判，他要自己掌握权力。帕彭当然并没有对兴登堡说这些，他给人的印象是跟中央党有深入的对话。

这是一个计策。希特勒看透了，胡根贝格看透了，梅斯纳也看透了，每个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看透了。也许兴登堡也看透了。

但对他而言，这是个最终摆脱责任的机会。他可能干脆相信新政府已经有多数人的支持了。



德国国家人民党内弥漫着紧张情绪。一方面，莱恩霍尔德·库阿茨对自己很满意。正如他所写，他的党派在最后通牒给了施莱谢尔“致命一击”，尽管总理四处强调3个月后他还会回来，因为“兴登堡在‘帕彭实验’中精疲力竭”。

另一方面，德国国家人民党人知道他们将要冒什么样的风险。“最后通牒在党内像得到解放一样，我们现在突然成了事件的中心。”然后：“如果我们跟着希特勒，就必须驯服他。否则，不管他是获得权力还是失败，我们都会完蛋的。”

如果希特勒政府没有组建成功，那么帕彭、梅斯纳，甚至也许兴登堡都会把罪责推到德国国家人民党身上。库阿茨写道：“我们也必须防止希特勒—中央党联盟，但不可以与中央党完全闹翻。”这是“五球游戏”（ein Spiel mit fünf Kugeln）^[14]。幸运的是，所有其他的人都依赖于我们。

“五球游戏”？如果权力划分，也许真的会有死亡。



社民党在做什么？社会民主党在讨论建立“统一战线”——必须马上，或很快与共产主义工人将之建立起来。为有效唤起深入人心的责任意识，他们在讨论是协商更有效，还是等待更有效。

社民党在讨论，并准备就绪。

[1] 是美国纽约市的一座著名体育场馆，是许多大型体育比赛、演唱会和政治活动的举办地。——编者注

[2] Vaterlandsloser Geselle，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被用作针对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咒骂语。——编者注

[3] Harzburger Front，德国魏玛的一个短命的激进右翼反民主政治联盟，成立于1931年，旨在向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提出统一的反对意见。

[4] *Horst-Wessel-Lied*，根据首句歌词又称为《旗帜高扬》（*Die Fahne Hoch*），是1930~1945年纳粹党党歌，也是1933~1945年在《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之外的另一首国歌。

[5] Cagliostros, 一位意大利冒险家和自封的魔术师。

[6] Zauberlehrlinge, 歌德写的一首诗, 魔法师走了, 学徒却学了一些不该学的东西。

[7] Kyffhäuserbund, 德国退伍军人和预备役协会的保护伞组织, 位于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 (Rüdesheim am Rhein)。

[8]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德国诗人。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德意志之歌》 (*Das Lied der Deutschen*), 它的第三节现在是德国的国歌。他创作的一些受欢迎的儿童歌曲, 被认为是Young Germany运动的一部分。

[9] 第四段不属于原作, 而是1921年德国另一位诗人阿尔伯特·马泰 (Albert Matthai) 续写的, 为一战失败后的祖国和人民打气。

[10] Stolpe, 柏林西郊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

[11] das nationale Bündnis, 即上文所说的“民族阵线”右翼联盟。——编者注

[12] 1953年2月7日由威廉·皮克 (Wilhelm Pieck, 东德第一任总统) 在此主持恩斯特·台尔曼纪念馆落成典礼。该建筑已于2010年被拆除。——编者注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此概念泛指易北河东岸延伸到原东普鲁士地区的广阔平原, 该地区农业经济发达, 由容克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和产业。——编者注

[14] 俾斯麦时代的外交政策, 特指平衡。

取得权力

1933年1月30日

1月30日，星期一

在历史面前，总统冯·兴登堡应负主要责任，他的连任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在决定性的职位上任命一个全体人民的代言人，一个可以和解的、内心平静的，代表同等的权利与同等的义务的人。

风暴中的征兆。

《福斯日报》

面对国家政变威胁的政府，社民党和整个“铁锋”都站在宪法和法制一边。

《前进报》



希特勒和戈林在戈培尔那里，头碰头地一直坐到凌晨5点钟。施莱谢尔会怎样行动？“政变？”戈培尔问道。“威胁、严肃、幼稚的行为？”他们猜测着。喋喋不休、冥思苦想。希特勒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怎么办呢？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最后他们躺下睡了，几个小时的放松。



早上7点多。帕彭在公寓里会见钢盔团的提奥多·杜伊斯特贝格，气氛非常紧张。帕彭叫道：“如果到11点还没有组建新政府，防卫军就上街了。这就会有施莱谢尔和哈玛施坦因军事独裁的威胁。”

“您从哪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杜伊斯特贝格问道。

“从兴登堡的儿子那里听到的”，帕彭说。

杜伊斯特贝格前往总理府，奥斯卡·冯·兴登堡一家住在那里。门前站着—个警卫。小兴登堡被关押了吗？没有，警卫只是在放哨。然后门开了，小兴登堡迎面走来，他要去火车站。



中将勃洛姆堡8点半要到安哈尔特火车站。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派儿子——上校奥斯卡·冯·兴登堡去火车站。命令是：将勃洛姆堡带到总统办公室。

哈玛施坦因将军派他的副官，一位少校去火车站。命令是：将勃洛姆堡带到国防部施莱谢尔处。

清晨的火车站熙熙攘攘。机车的蒸汽声、哨声及沉重的隆隆声，人们在冷空气中呼出的热气。勃洛姆堡从驶来的夜车中下了车。

少校接到了他。请您快走，有车在等您，非常紧急！

奥斯卡·冯·兴登堡也来了。

勃洛姆堡决定去见级别更高的人，同时也代表最高命令权的人——兴登堡那里。



到了总理府，奥斯卡·冯·兴登堡汇报了国防部接到的命令。

政变一定迫在眉睫！

总统没有片刻犹豫。9点刚过，他让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宣誓任职，成为新的国防部部长。刚刚制止施莱谢尔违反宪法的兴登堡，此举却违反了宪法——在魏玛共和国，总统不可以使任何一个未经总理提议的部长任职。

梅斯纳拿来任职证书。

施莱谢尔因此被剥夺了权力，防卫军不再属于他管辖了。他通过梅斯纳的电话获悉了这一消息。

施莱谢尔脱口而出，这是违反宪法的！

梅斯纳回答，总统是不得已而为之。

宣誓任职后，勃洛姆堡打算前往国防部，但奥斯卡·冯·兴登堡却警告他：他在那里会被捕！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上午与工会同志在一起。他的朋友，德国总工会的富特文格勒一直强调，说任命希特勒是不可能的，兴登堡宁可辞职，也不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白色星期”开始了。柏林商家开始季末特价甩卖：床单、枕套、毛巾、毛毯等。商场屋顶挂着白色的长长的标语，橱窗里满是打折的商品。



到处都处于混乱之中。施莱谢尔的国务秘书爱尔兰文·普朗克与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通电话并汇报，希特勒结束谈判，并离开了柏林；帕彭被兴登堡召见，马上就要宣誓任职总理。



不久，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接到总统办公室的电话，要他11点钟到，他将被重新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谁是总理？对此没有说法。

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打电话给外长牛赖特——二人达成一致，不参与帕彭内阁。牛赖特也被简短的通知召过去。

终于，施未林·冯·科洛希克到了弗朗茨·冯·帕彭那里。帕彭故作平静状，说不要在意那些传言，希特勒内阁差不多就要宣誓就职了。



早上，英国大使荷瑞斯·胡姆博德——他也住在威廉大街——向伦敦汇报，所有迹象表明，弗朗茨·冯·帕彭会被任命为新总理。他听说了政变的传言。他的政治直觉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



9点到10点之间，钢盔团的塞尔特和杜伊斯特贝格，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胡根贝格和奥托·史密特-汉诺威齐聚内政部帕彭的公寓。主人再也不冷静了。他又重新要求：一定要立即宣誓任命内阁，防止军事政变。

问题只是：阻力总是不可克服的。

史密特-汉诺威和杜伊斯特贝格绝不接受希特勒的条件。至少希特勒要放弃普鲁士内政部。

两个人赶快到了总统处，但兴登堡的门却关着。他们只是碰到了生气的奥斯卡·冯·兴登堡，他一直在疯狂斥骂施莱谢尔的背信弃义。

回到帕彭公寓，希特勒和戈林也到了那里。

局势非常复杂。钢盔团联盟的领导塞尔特想进内阁，但必须要他的同僚同意才行。但是这个被纳粹媒体如此猛烈地攻击的杜伊斯特贝格，甚至拒绝与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握手。

希特勒与戈林谈了一小会儿，然后希特勒向杜伊斯特贝格走近。“元首”拿起了庄重的腔调。他个人也表现得很震惊。“我很遗憾我的媒体让您受到了侮辱，我向您发誓，这一切不是我引起的。”

这次出场并不是没有作用。



他们必须经历严寒。通过内政部后门，走过外交部的花园，就到了总理府的后门。那时，即使在没有月亮、没有雪的漆黑的夜里，帕彭也觉得这条路很安全。鞋底走过踩得实实的雪。

快11点时，一行人进入梅斯纳一楼的办公室。那些重新宣誓就职的前任部长也来了。



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刚刚到总理府时，总理府的老随从开玩笑说：“没位子坐了。”一个主席团成员最后从他的办公室给财政

部部长，还有外交部部长牛赖特拿来一把椅子。意思是：等着。

施未林·冯·科洛希克是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简言之，他努力为新总理确定责任重大的财政政策基本特征：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措施，以及平衡的预算。希特勒给施未林·冯·科洛希克留下了很尴尬的印象。“请您和戈林讲一下细节，”希特勒说，“他比我更关心这一点。”

果真：施未林·冯·科洛希克知道，戈林在这件事上做了不错的功课。



在梅斯纳的办公室里，一场讨论正在进行。

希特勒坚持他的诉求：必须马上重新选举！

什么，再说一遍？胡根贝格第一次听到这个，并断然拒绝。

现在讨论进入白热化。帕彭通过合纵连横、半真半假、秘而不宣以及魅力与谎言巧妙编织起来的艺术品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坍塌？

希特勒又拿出他最后一张大王牌——他自己的名誉！他保证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都绝不会改变内阁。这张王牌总是会被拿出来：一个光明磊落的人的名誉！我们毕竟是在普鲁士。

不行！胡根贝格很强硬。

奥托·梅斯纳在混乱中溜走了。

这时帕彭出面。他抨击胡根贝格：您破坏民族团结！您怎能质疑这种名誉！

胡根贝格一直坚持说不行。

门开了，是梅斯纳。心跳加速。老家伙给他施加了压力。国务秘书梅斯纳手中拿着一块表。“先生们，总统先生本来要在11点宣布部长名单的。现在已经11点15了。你们不能让总统先生等太久。”现在。

房间里的人感受到什么了吗？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凝结了，都已成定局了吗？

这时，胡根贝格的反抗瓦解了。他再也无法抗拒触手可及的权力。他说，总统可以决定是否解散。

戈林第一个明白过来。“现在所有一切就绪！”他喊道，“我们现在上楼吧。”

大家就都跌跌撞撞、匆匆忙忙地跑上了楼。



兴登堡让选定的内阁又等了自己一小会儿，然后穿着礼服出现了。他的动作和话语里没有任何一点儿庄严。

帕彭宣读了部长名单，但没有司法部部长的名字。大家说好要立即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进行谈判。结果并不确定，这点大家都很清楚。

将近11点半，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按魏玛宪法宣誓就职：“我宣誓：捍卫德国人民的法律，我将为德国人民的利益付出毕生精力，履行人民赋予我的义务，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

新内阁得到560票中的248票支持，未到半数。尽管如此，兴登堡还在幻想：这不是内阁。一定还会出现一个多数派。

坦能堡包围战的英雄掉到了帕彭的圈套里，自投罗网。

保罗·冯·兴登堡只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从前在战场上，要送部队打仗时，他可能会对军官们说的一句话：现在，我的先生们，和上帝前进吧！



威廉大街上从早上开始就满是人。大家都伸长着脖子。是时候了吗？

冲锋队头目恩斯特·罗姆用望远镜从窗口望向恺撒霍夫酒店。他观察着总理府的出口，希特勒肯定会在这儿出现的，从他脸上一定能读出发生了什么。

先是戈林出来了，喊了些什么。最后是希特勒。“元首”上了敞开的轿车，让司机开到恺撒霍夫。他直直地站在车里，眼泪流了下来。“我们成功了”，他喊道，喊了又喊，他的声音刺耳尖锐。

他们在恺撒霍夫的大厅。鼓掌，欢呼万岁！希特勒走入电梯。“现在我们准备好了”，在电梯门关上前，他说了这句话。

然后他站在戈培尔对面，什么都没有说。戈培尔和其他人也什么都没有说。戈培尔看得很清楚：他的“元首”眼含热泪。

酒店餐厅里临时有个小型的庆祝，几乎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高层人物都一同庆祝。他们奋斗了多长时间啊！他们受了多久的苦啊！这种拥有权力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样陌生。



在国会大厦会议室，社民党的领袖与工会领袖正在开会，他们在讨论政治局势。议会党团主席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说，如果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国会可能就会休会或解散：“由此我们将进入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首先就是要把法西斯主义从权力中清除。”在这件事上，社民党不能与共产党合作。社民党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将坚定果断记录下来”。一名社民党人在布莱特沙伊德演讲之后离开了，将主席的声明传达给党媒《前进报》。但他没有再回来。他要去拿电话听筒时，突然听到走廊里一阵狂野的呼喊：希特勒被任命了！



共产党赶快印传单。

总罢工，现在！

中央委员会决议指出：“这个新的公开的法西斯独裁内阁是对劳动人民最残忍的、最赤裸裸的战争宣言。”

社民党和工会也会跟着一起干吗？



官方消息如下：

“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根据他的建议，国家政府重组如下：

已离职的前总理冯·帕彭为副总理，兼任普鲁士邦的国家专员；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为外交部部长；

前部长及国会成员威廉·弗瑞克博士为内政部部长；

中将冯·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部长；

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为财政部部长；

秘密财政顾问及国会成员胡根贝格为经济部部长、食品部部长及农业部部长；

冯·埃尔茨-吕本纳赫为邮政部部长和交通部部长；

国会议长戈林为不管部部长，同时为航空专员。

国家部长戈林也被委托管理普鲁士内政部。

国家就业专员格瑞克依旧保留原职。

国家司法部职位尚未确定人选。国家总理今天还要与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谈判。今天下午17点将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



戈培尔马上到办公室，告知大家。所有人都非常庄严。“就像在教堂里一样”，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道。第一步！帕彭做副总理，塞尔特为劳动部部长？这可是美中不足，他对同事和区领袖们说，“这些美中不足要彻底清除”。

然后他与恩斯特·汉夫斯坦格，还有威廉王储去他太太玛格达那里，玛格达还一直在医院里养病。



1点半，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最后一次召集他的内阁。他对所有政府成员“深信不疑的合作”表达了“真诚的谢意”。然后就结束了。

财政部部长施未林·冯·科洛希克后来写道：“大家看不出他内心的波澜，但这种经历对他来说是致命的。”



2点钟，哈利·凯斯勒伯爵通过一个朋友获悉了希特勒被任命一事。他呆了：这么快，他一点都没想到。他听到楼下喜悦的声音——“纳粹守门人”——凯斯勒这样称呼他——在欢呼。



历史就发生在他眼前。亚伯拉罕·普洛特金喜忧参半。但是他这样安慰自己：军队会由胡根贝格和他的人来控制。他希望，独裁者们不会把军队交给别人掌管。



凯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恺撒霍夫酒店里拍了集体照。一张“足球队”照片——正好11个人。希特勒将手交叉放在身前。戈林身穿宽大的军用防水雨衣站在那里，右手放在口袋里，左手拿着帽子。戈培尔当然也在，还有罗姆、希姆莱、赫斯、弗瑞克。

希特勒稍后穿过夹道里兴奋的人群离开酒店，后面跟着鲁道夫·赫斯。四处都是熠熠生辉的眼睛，高举的手臂，“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声。希特勒举起手，他微笑着。总理系着深色领带，领带打的结很窄，穿着一件浅色军用雨衣。他的头发缝像用刀子划的一样整齐。



社民党党魁兼国会党团主席发言。上百万德国人也同样在等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决心战斗，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社民党要求追随者“从容，坚定，守纪团结，再团结”——还要大家保持冷静。“个别组织或团体擅自采取无纪律行动，将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最严重的伤害”，大家要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

工会领导再度恳请成员要“冷静谨慎”。这是恳求还是命令？“不要被误导，采取草率而有害的个人行动。”德国总工会正直的领导提奥多·莱帕特强调：“这一时刻的口号是组织，而不是游行。工会几十年来一直都贯穿着这种精神。”

共和国的捍卫者仍在他们的岗位上坚守。他们等待着。他们的领袖在等待什么？

还要发生什么？如果真会发生，能晚一些吗？



恺撒霍夫酒店里忙成一团，旋转门飞转。恩斯特·汉夫斯坦格有太多事要做。一群外国记者涌向他，所有人都想采访新总理。



社民党主席，斯图加特国旗团主席库尔特·舒马赫与家乡的一个心腹通电话，传达明确的指示：由国旗团及工会成员组成的“铁锋”只能听命于“铁锋”。所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比如来自共产党的指示，都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还有，“在柏林，在风暴中心，我们的队伍中完全没有沮丧，因为没有半点机会让我们沮丧”。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叛徒、间谍，他并没有按惯例将工作交代给他的继任者，而是缩回到他的公寓。据说，他要写一本书。



受恩斯特·台尔曼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柏林共产党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建议社民党主席结盟：“与共产主义同志一起，在工厂、工人居住区进行大规模游行、大规模罢工以及总罢工。”

不行，社民党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下午早些时候，希特勒第一次坐在总理府的办公桌前，并拍了一张照片。他将手放在外套口袋里，向远处望着。他后面是鲜花，前面是削尖的铅笔。



根据1925年德国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德国有6250万人口。其中有563733人称他们属于犹太教团体。但是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10年来一直在下降。1933年初有约500000信犹太教的人在德国生活。



5点钟，第一次内阁会议召开。胡根贝格和希特勒马上就是否进行新选举开始争吵起来。大多数部长附和希特勒的看法。内阁只成立了几分钟，德国国家人民党主席就已经处于失势状态。



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想到新政府就抑制不住微笑。他德语极好，能够很好地评估参与者。他给朋友斯蒂芬·斯彭德写信：“你会看到的，我们有了一个新政府，内阁中有查理·卓别林和圣诞老人。这真是不能再用文字描述了。”但希特勒将会被证实是个不可靠的人，因为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也许更大。



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毫不迟疑地开动了。新政府的第一次采访开始了，部长们看起来非常努力。



今天发生的一切，聪明的、中立的观察家怎样评价呢？

卡米尔·霍夫曼，捷克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内阁匆忙组阁，希特勒与弗瑞克博士和戈林都在其中，可是胡根贝格、帕彭和国防部部长勃洛姆堡就像是配送给他的宪兵，其中有多数老部长，如牛赖特。尽管挂着希特勒的名字，却并不是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政府。不是第三帝国，连两个半都不是。”《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一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总统兴登堡和他的‘同志’冯·帕彭先生把希特勒关在笼子里，然后把他的脖子扭断，还是他们自己坐在笼子里？”《巴塞尔日报》（*Baseler Nachrichten*）记者判断：“即使在熊的鼻子上拴个环，用绳子牵着它，它总归都是熊。”

贝拉·弗洛姆写道：“希特勒内阁在没有司法部部长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似乎极具讽刺性。”



《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中，大家很忙碌。第二天的报纸肯定满版面都是权力交接。为这一历史性的一天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满是骄傲、激动和压力。一位编辑写了一篇社论：

“第三帝国的基石

1933年1月30日，作为代表德国历史转折点的一天，必将载入史册。经过14年史无前例的牺牲和努力，阿道夫·希特勒今天站在了这个位置上，这个从很久以前就应该属于他的位置上。这些年来，上百万人的渴望、斗争、献身都是为了要洗刷1918年11月9日的耻辱，这时，一种不可遏制的骄傲涌上这些人的心头。”

某部作品早就完成了。出版商们在右边的角落上发表了一则迎合当时情况的广告：

“当日之书：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阿道夫·希特勒会做什么呢？——今天，上百万充满希望的德国人都在问！——每一个知道希特勒作品，并因此知道他的意愿与目标的人，都能回答这一问题。现在，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能忽视希特勒的作品了。

两种版本：两册，纸板装订，每册2.85马克；两册全亚麻面精装共7.2马克。

每家德国书店都有这本书的存货！弗朗茨-伊尔继承人出版社，慕尼黑2号。”



晚上，亚伯拉罕·普洛特金想要弄到国家剧院《浮士德II》的票，但是却没有得到，格伦德根斯应该非常了不起。他在马克伯爵大街的莱比锡大街方向走下去时，看到第一个拿着火炬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他走得越远，就看到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肯定有上千人，他们都向威廉大街方向涌去。到处都能看到列队的钢盔团成员。



黑暗中，希特勒的追随者在蒂尔加滕大角星广场列队。深夜里，一片火炬的海洋。据估计，仅在柏林就有25000名冲锋队和党卫军成员在路上，还有上千名钢盔团成员。7点多，游行队伍走了起来，穿过勃兰登堡门，绕过阿德隆酒店，向威廉大街走下去。

整个德国都在发生类似的情景，许多城市自发组织游行。卐字旗飘扬。冲锋队行进着走过马路，闯入市政厅，闯入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办公室，还有报社编辑部。一种不能预先调动的、突然出现的情绪的爆发。

在班贝格，一个身穿制服的人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是少尉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获悉冲锋队的游行路过勃兰登堡门时，就派所有干部到他们各自的区域。所有同志都要动员起来。同时，党必须切换到非法模式——为此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作为告别，台尔曼对他手下人说：“如果中央委员会开会，过几天我们还会再见。你们会得到更多详细信息的。”

许多共产党员已收拾好东西。他们找到的一切武器已准备就绪。现在万事俱备，只等战斗的信号了。

只等一个信号。

只等星星之火。



是戈培尔想出了火炬游行的主意。除了他还能有谁呢？他稍后在广播里声称有50万人在路上。英国使馆估计有50000人。贝拉·弗洛姆认为有20000人参加。

当游行队伍的前列8点半到达总理府时，普鲁士军乐《腓特烈大帝颂》之《掷弹兵进行曲》（*Fridericus-Rex-Marsch*）响起来了。

埃米·索涅曼，戈林的新太太从恺撒霍夫酒店的一个窗口观看游行。她的先生赫尔曼·戈林站在离她几百米的总理府二层的窗户旁。国家的新统治者——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帕彭——也观看着火炬手，聆听着军乐、歌曲、“希特勒万岁”的呼喊。另外一个窗口，是保罗·冯·兴登堡的身影。

恺撒霍夫酒店的阳台上，挤满了著名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也跟着欢庆。楼下的冲锋队和党卫军扛着旗子走过时，他摘帽示意。他把11岁的儿子也带到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来。

希特勒万岁，一直在呼喊，希特勒万岁！

有些事情结束了，有些事情就开始了。

希特勒对帕彭说：

“我们面前的任务多么艰巨，冯·帕彭先生。在我们的杰作完成前，我们永远都不能分开。”

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哈雷门（das Hallesche Tor）的会议厅，德国作家保护协会在开会。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出席。他要求全体与会者，这个时刻要保持坚定。多数作家都说，什么都不做，只是等待。喧嚣很快就会过去。然后卡尔·冯·奥西茨基站了起来。房间里静了下来。

《世界舞台》杂志的负责人轻声说：“这一切都比您想象的要长久。也许几年。我们对此毫无力量。但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起来，让那些掌权的人，永远都不会得到哪怕一个小手指。”



海因里希·乔治，德国电影明星，在万湖邀请来自匈牙利的导演保罗·费犹斯做客。费犹斯5年前开始在美国好莱坞工作；在他看来，乔治就是“演员之王”。冲锋队向东又游行了几公里时，二人讨论乔治是否应该在美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在美国会更安全，工作收入也高，不只是导演恩斯特·刘别谦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入侵前已经逃到加利福尼亚。一些艺术家已经离开柏林——绝不仅仅是犹太人。海因里希·乔治呢？他最近于1930年与“米高梅”公司签了合同，他的薪酬为20000美元。一笔可观的收入。



晚上，哈利·凯斯勒伯爵像往常的星期一样去恺撒霍夫酒店，那里，欢庆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正在举行晚宴，理查德-尼克拉斯·康登霍维-凯勒奇在晚宴中演讲，主题是：“德国的欧洲使命”

（Deutschlands europäische Sendung）。凯斯勒糊涂了，理查德-尼克拉斯·康登霍维-凯勒奇，这个知识分子，一半日本血统，一半奥地

利血统，将他的“国际泛欧联盟”（Pan-Europa）的理念理解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壁垒。伊米尔·乔治·冯·史道斯，是德国银行监事会成员，并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经济政治部门任职，席间，他吹嘘与希特勒有极好的关系，说希特勒会满足他一切愿望。有人说，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胡根贝格和希特勒就已经起了冲突。

凯斯勒稍后回到家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恺撒霍夫酒店及其周遭，一场真正的狂欢正在肆虐；身着制服的党卫军在入口和礼堂里形成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廊里是巡逻的冲锋队员和党卫军；我们从演讲会场中出来时，没有尽头的冲锋队队伍正步从某个名人（第二把手，希特勒本人在总理府）旁边列队走过，他们在正门列队，并向他行法西斯礼；一场真正的游行。整个广场满是看热闹的人。”



一位久已不联系的访客来到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处。是威廉·格勒纳，施莱谢尔从前的忘年交。他一度觉得施莱谢尔背叛了自己，但他在这个屈辱的日子来到这里，帮助他从前的知己。这一姿态，让施莱谢尔深受感动。他失去了权力，却重新赢得了一个朋友。



火炬游行后，人群散开，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冲锋队第33分队在临近午夜时也要回去了，冲锋队队员穿过克莱恩威丁，再穿过瓦尔大街。他们的领队叫汉斯·埃伯哈德·麦考斯基。1931年12月，他射杀了一名共产党员，逃往意大利，后来又回到德国，10月份被捕。由于施莱谢尔的大赦，圣诞节前，他被释放。

瓦尔大街上共产党说了算。“马克斯·霍尔兹”（Max Hölz）保卫队正在此处等待着。线人告知集合的冲锋队来了，按上司的命令一

个名叫约瑟夫·曹利茨的警长陪同他们到来。冲锋队要进攻吗？

共产党走向他们。双方开始互相咒骂，拳头乱挥。几十名共产党从一家名为“鹿”的酒馆冲出来。他们试图缓和局面，但紧接着枪声就响起了。

曹利茨被射中，致命一击，倒在地上，麦考斯基也一样。

只有共产党员被监禁。

谁开的枪，永远是个谜。



戈培尔夜里获悉了死讯。一旦权力在握，戈林也该收拾共产党了。



已经很晚了，希特勒与党内同志穿过积雪的部长花园，漫步在威廉大街。马上他们就要走进恺撒霍夫酒店好好睡一觉。

德国新总理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尾声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在柏林一直待到1938年，然后在意大利担任法国大使。之后他成为维希政权的顾问，于1949~1953年任法国驻德国高级专员，后来任驻波恩大使。他于1978年在巴黎去世，终年90岁。

贝拉·弗洛姆1934年被禁止工作，四年后她移民美国，于1972年在纽约去世，终年81岁。

君特·格瑞克在纳粹取得权力几天后由于被控贪污被捕，到1945年为止，他三度被拘留。战后，他在西部继续其政治生涯，1952年决定去东德，在那里，他任职于东部基督教民主联盟（Ost-CDU）。于1970年去世，终年76岁。

约瑟夫·戈培尔于1933年3月13日成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后来成为文化协会会长。他的法令使无数知识分子被禁止工作，被迫流亡。他的演讲挑起了德国人民的战斗狂热和对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支持。他死于1945年5月1日，自杀，可能是使用了氰化钾。

玛格达·戈培尔也于1945年5月1日自杀。自杀前，夫妇二人把他们的6个孩子杀死。

赫尔曼·戈林1933年已是国家航空专员，普鲁士总理，另外还担任步兵将军。纳粹政权结束前，他一直都是领导人之一。在纽伦堡审

判中，他被判为主要战犯之一，于1946年自杀，终年53岁。

威廉·格勒纳一直都是富裕的有闲阶级的人，1939年5月死于肝部感染，终年71岁。参加他葬礼的军官不允许穿制服。

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于1933年10月提出离职申请，但于1939年被重新启用，但不久，希特勒又让他最终退休。他成为抵抗政权的一分子，于1943年死于癌症。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从希特勒的追随者变为批评者，于1937年逃离德国。二战爆发时，他在英国被捕。盖世太保将他列为要被肃清的对象。他于1975年死于故乡慕尼黑，终年88岁，50年前，他在慕尼黑结识了希特勒。

1934年，**奥斯卡·冯·兴登堡**在父亲死后，公开宣称，希特勒也将成为国家总统。二战期间，他任职国防将军。死于1960年，终年77岁。

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于1934年8月2日去世，终年86岁。他至死都没有明白，自己将德国权力交到了错误的人手中。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8月，即兴登堡死后，成为德国总统。这个“元首和总理”迫害犹太信仰、艺术家和反对派，禁止党派活动，并强制对媒体进行“一体化”（gleichschalten）。1945年4月30日，史无前例的战争结束，也结束了对欧洲犹太人的有组织的谋杀，希特勒开枪自杀。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于1933年6月29日辞去部长职位，但直到1945年他都是一体化国会（der gleichgeschaltete Reichstag）成员，于1941年任名誉议长。他死于1951年，终年85岁。

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于1933年5月离开德国，自1939年开始在美国生活。死于1986年，终年81岁。

玛莎·卡乐可1936年生下一个儿子。她的书被当权者禁止。她和儿子及第二任丈夫于1938年移民美国。她于1975年在苏黎世去世，终年67岁。

阿尔弗雷德·克尔于1933年2月15日逃往布拉格，不久，他的家人也前往布拉格。他是第一位被国家社会主义党取消公民权利的人。他住在伦敦，被视为德国公敌。于1948年去世，终年80岁。

哈利·凯斯勒伯爵1933年离开德国。从此以后生活在马略卡岛和法国。后来破产，死于1937年，终年67岁。

提奥多·莱帕特先是尝试使德国总工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党达成一致，但是1933年5月被捕，不过不久后被释放。工会瓦解。1946年，他加入苏联占领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于1947年去世，终年79岁。

奥斯卡·罗伊克继续任职出版社编辑，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于1941年去世，终年56岁。

奥托·梅斯纳为阿道夫·希特勒工作到1945年，担任元首和总理的办公室主任。战后审判被判为无罪。于1953年去世，终年73岁。

埃德加·莫维尔在权力移交后受到死亡威胁，他于1933年离开德国。在东京和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回到自己的祖国美国。于1977年去世，终年87岁。

卡尔·冯·奥西茨基于1933年2月28日再次被捕，被带到一个集中营。他病得很重，于1936年11月被释放。不久后，他被授予诺贝尔

和平奖。1938年，死于肺结核，年仅48岁。

奥尔根·奥特于1933年6月1日作为观察员被派驻日本军队，从1938年，也就是他入党的这一年，直到1942年，担任德国驻日本大使。他整个一生都为施莱谢尔的政治辩护。于1977年去世，终年87岁。

弗朗茨·冯·帕彭于1934年被解任副总理一职，作为希特勒的使者被派往奥地利，后来又担任驻土耳其大使。1947年，他被战胜国归为“罪魁祸首”，监禁两年。于1969年去世，终年79岁。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于1933年5月8日离开柏林，7月1日回到纽约。他为在德国的左翼政治家、工会会员及犹太人代言，创立了一个组织，使上百人可以逃到美国，其中有许多普洛特金在柏林结识的人。他于1988年在洛杉矶去世，享年95岁，他的日记在他死后出版。

莱恩霍尔德·库阿茨被国家社会主义党归为半个犹太人，本人却是反犹主义者，在国会任职，直到1933年11月。战后，他参与到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于1953年去世，终年77岁。

国家社会主义党取得权力后，将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安排在外交使团中，1936~1938年，他担任德国驻伦敦大使，1945年，担任德国外长。纽伦堡审判中，他被判为战犯，于1946年被处决，终年53岁。他的太太安娜莉泽于1973年去世，终年77岁。

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于1933年离开柏林回到家乡，不再从事外交工作。他于1941年死于心肌梗死，终年71岁。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于1934年6月30日在家中被党卫军杀害，他们的许多私人资料被作案者带走。

库尔特·冯·施罗德于1933年2月1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1936年加入党卫军。他在第三帝国属于极富影响力的高级领导。战后他被判一年监禁和处罚金。他于1966年去世，终年76岁。

库尔特·舒马赫于1933年被捕，1945年之前，他几乎都是在集中营度过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战后他成为德国社民党重建的决定性人物，1949年在第一届联邦议会担任党团主席。他于1952年去世，年仅56岁。

在国家社会主义党取得权力后，格里高·斯特拉瑟一开始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希特勒于1934年6月13日请他担任经济部部长。斯特拉瑟决定接任，但要求内阁中不可以有戈林和戈培尔。不久后，6月30日，斯特拉瑟被党卫军枪杀。

在希特勒政府成立最初的几个星期，恩斯特·台尔曼试图组织左翼抵抗运动。1933年3月3日被捕。11年后，1944年，这个58岁的共产党主席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被杀害。

1934年8月，多萝西·汤普森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德国，回到美国，后与辛克莱·刘易斯于1942年离婚。她于1961年去世，终年67岁。

汉斯·采尔的《每日评论》于1933年7月停刊。战后，采尔担任《世界》（*Die Welt*）的总编和《图片报》（*Bild-Zeitung*）的专栏作家，并担任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出版社（Axel Springer）最重要的顾问。他于1966年去世，终年67岁。

参考文献

在研究期间，我们在图书馆和档案室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我们使用数据库，搜索了数百本书籍及论文，以寻找当时的生动描述。我们想尽可能精准地重构当时的情况。因此我们重点搜索日志、日记、信件、报刊文章及官方文件。魏玛共和国官方记录作为一个来源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当时每日出版两次，消息非常灵通的《福斯日报》。

研究中最大的空白当然是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的遗物，他和他的太太于1934年6月一起被害——国家派出的凶手还带走了许多文件。除此之外，信息来源相对来说比较丰富，我们当然也非常感谢历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当时共产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柏林交通运输公司的罢工或街头暴力。

我们将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文献整理到档案系统中，然后对其进行评估。我们总是用另一个资料来源来检验所有事实的真实性，如果我们认为不可信，就放弃对其进行描述。

Baedekers Berlin und Umgebung, Leipzig 1927.

Bahne, Siegfried: Die KPD und das Ende von Weimar. Das Scheitern einer Politik 1932-1935, Frankfurt am Main 1976.

Benz, Wolfgang: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2000.

Beuys, Barbara: Verteidigung der Republik: der sozialdemokratische Reformler Theodor Haubach (1896–1945) , Hamburg 2000.

Blasius, Dirk: Weimars Ende. Bürgerkrieg und Politik 1930–1933, Göttingen 2005.

Bracher, Karl Dietrich: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Stuttgart/Düsseldorf 1955.

Bracher, Karl Dietrich/Funke, Manfred/Jacobsen, Hans-Adolf (Hrsg.) : Die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33, Bonn 1987.

Burke, Bernard V. : Ambassador Frederic Sacket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1930–33.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tler' s Rise of Power, Cambridge 1994.

Büttner, Ursula: Weimer–die überforderte Republik. 1918–1922 (Gebhardt Handbuch der Geschichte, Bd. 18, 10. Aufl.) , Stuttgart 2010.

Collomp, Catherine/Groppo, Bruno (Hrsg.) : An American in Hitler' s Berlin: Abraham Plotkin' s Diary, 1932–33, Champaign 2008.

Conradi, Peter: Hitlers Klavierspieler. Ernst Hanfstaengl: Vertrauter Hitlers, Verbündeter Roosevelts, Frankfurt am Main 2004.

Demant, Ebbo: Von Schleicher zu Springer. Hans Zehrer als politischer Publizist, Mainz 1971.

Easton, Laird M.: Der rote Graf: Harry Graf Kessler und seine Zeit, Stuttgart 2007.

Engel, Hartmut/Ribbe, Wolfgang (Hrsg.): Geschichtsmeile Wilhelmstraße, Berlin 1997.

Fest, Joachim: Hitler: Eine Biographie, Berlin 2002.

Fischer, Conan: Stormtroopers. A social, 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1929–1935, London 1983.

François-Poncet, André: Als Botschafter im Dritten Reich. Die Erinnerungen des französischen Botschafters in Berlin, September 1931 bis Oktober 1938, Mainz 1983.

Frank, Hans: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Deutung Hitlers und seiner Zeit auf Grund eigener Erlebnisse und Erkenntnisse, München 1953.

Friedrich, Thomas: Die missbrauchte Hauptstadt. Hitler und Berlin, Berlin 2007.

Fromm, Bella: Als Hitler mir die Hand küsste, Berlin 1993.

Glatzer, Ruth: Berlin zur Weimarer Zeit. Panorama einer Metropole, Berlin 2000.

Goebbels, Joseph: Die Tagebücher. Band 2/III: Oktober 1932–März 1934. Bearbeitet von Angela Hermann, München 2006.

Golecki, Anton (Hrsg.) : Das Kabinett von Schleicher. 3. Dezember 1932 bis 30. Januar 1933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 Boppard am Rhein.

Groener-Geyer, Dorothea: General Groener. Soldat und Staats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55.

Hanfstaengl, Ernst: Zwischen Weißem und Braunem Haus, München 1970.

Harter, Johannes: Wilhelm Groener. Reichswehrminist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8–1932) (Schriftenreihe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39) , München 1993.

Heuss, Theodor: Hitlers Weg. Eine historisch-politische Studie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7. Aufl., Stuttgart, Berlin, Leipzig 1932.

Hömig, Herbert: Brüning. Kanzler in der Krise der Republik, Paderborn et. al. 2000.

Kaléko, Mascha: Großstadtliche. Lyrische Stenogramme, Reinbek 1996.

Kaufmann, Bernd u. a. : Der Nachrichtendienst der KPD 1919–1937, Berlin 1993.

Kellerhoff, Sven Felix: Die NSDAP. Eine Partei und ihre Mitglieder, Stuttgart 2017.

Kellerhoff, Sven Felix: Hitlers Berlin. Geschichte einer Hassliebe, Berlin 2005.

Kempner, Robert M. W.: Das Dritte Reich im Kreuzverhör. Aus den unveröffentlichten Vernehmungsprotokollen des Anklägers in den Nürnberger Prozessen, München 2005.

Kershaw, Ian: Hitler (1889–1945), München 2009.

Kerbs, Diethart/Stahr, Henrick (Hg.): Berlin 1932. Das letzte Jahr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92.

Kessler, Harry Graf: Das Tagebuch 1880–1937. Band 9: 1926–1937, hg. von: Gruber, Sabine/Kamzelak, Roland S./Ott, Ulrich, Stuttgart 2010.

Kissenkoetter, Udo: Gregor Strass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

Lange, Annemarie: Berli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1987.

Longerich, Peter: Deutschland 1918–1933. Die Weimarer Republik, Hannover 1995.

Longerich, Peter: Goebbels. Biographie, München 2010.

Longerich, Peter: Hitler. Biographie, München 2015.

Meissner, Hans-Otto: Junge Jahre im Reichspräsidentenpalais. Erinnerungen an Ebert und Hindenburg 1919-1934, München 1988.

Möckelmann, Reiner: Franz von Papen. Hitlers ewiger Vasall, Darmstadt 2016.

Nagel, Anne C.: Johannes Popitz. (1884-1945). Görings Finanzminister und Verschwörer gegen Hitler, Köln/Weimar/Wien 2015.

Nagorski, Andrew: Hitlerland. American Eyewitness to the Nazi Rise to Power, New York 2012.

Papen, Franz von: Der Wahrheit eine Gasse, München 1952.

Paschen, Joachim: Hamburg zwischen Hindenburg und Hitler.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oberung in einer roten Festung, Bremen 2013.

Plehwe, Friedrich-Karl von: Reichskanzler Kurt von Schleicher. Weimars letzte Chance gegen Hitler, Frankfurt am Main/Berlin 1990.

Plieber, Ulla: Theodor Leipart (1867-1947). Persönlichkeit, Handlungsmotive, Wirken, Bilanz-ein Lebensbild mit Dokumenten. 2. Halbband: Dokumente. Berlin 2001.

Pünder, Hermann: Von Preussen nach Europa, Stuttgart 1968.

Pufendorf, Astrid von: Die Plancks. Eine Familie zwischen Patriotismus und Widerstand, Berlin 2006.

Pyta, Wolfram: Hindenburg. Herrschaft zwischen Hohenzollern und Hitler, München 2007.

Pyta, Wolfram: Hitler. Der Künstler als Politiker und Feldherr. Eine Herrschaftsanalyse, München 2015.

Reuth, Ralf Georg: Goebbels. Eine Biografie, München/Zürich 2012.

Ribbentrop, Rudolf von: Mein Vater Joachim von Ribbentrop. Erlebnisse und Erinnerungen, Graz 2008.

Röhl, Klaus Rainer: Die letzten Tage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Kommunis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im Berliner BVG-Streik von 1932, Wien 2008.

Rosenkranz, Jutta: Mascha Kaléko: Biografie, München 2012.

Rott, Joachim: »Ich gehe meinen Weg ungehindert geradeaus«. Dr. Bernhard Weiß (1880–1951). Polizeipräsident in Berlin. Leben und Wirken, (Aus Religion und Recht), Berlin 2010.

Salewski, Michael: Preußischer Militarismus–Realität oder Mythos? Gedanken zu einem Phantom, i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und Geistesgeschichte 2001, Jg. 53, S. 19–34

Schäfer, Claus W.: André François-Poncet als Botschafter in Berlin (1931–1938) (Pariser Historische Studien; 64), München 2004.

Schober, Volker: Der junge Kurt Schuhmacher, Bonn 2000.

Schulze, Hagen: Weimar. Deutschland 1917–1933, München 1998.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Es geschah in Deutschland, Tübingen/Stuttgart 1952.

Schwerin von Krosigk, Lutz Graf: Memoiren, Stuttgart 1977.

Strenge, Irene: Ferdinand von Bredow. Notizen vom 20.2.1933 bis 31.12.1933. Tägliche Aufzeichnungen vom 1.1.1934 bis 28.6.1934 (Zeit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39), Berlin 2009.

Strenge, Irene: Machtübernahme 1933–Alles auf legalem Weg? (Zeitgeschichtliche Forschungen; 15), Berlin 2002.

Thompson, Dorothy: Cassandra spricht. Antifaschistische Publizistik 1932–1942, Wiesbaden 1988.

Turner, Henry Ashby, Jr.: Hitlers Weg zur Macht. Der Januar 1933, München 1996.

Turner, Henry Ashby: German Big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Hitler. Oxford, 1985.

Ullrich, Volker: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2. Aufl., Frankfurt am Main 2013.

Vogelsang, Thilo: Kurt von Schleicher. Ein General und Politiker, Göttingen/Frankfurt/Zürich 1965.

Vogelsang, Thilo: Die Reichswehr und die Politik 1918–1934,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 Heft 1, 1959.

Wandel, Eckhard: Hans Schäffer. Steuermann in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Krisen, Stuttgart 1974.

Weiß, Hermann/Hoser, Paul (Hrsg.) : Die Deutschnationalen und die Zerstö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Aus dem Tagebuch von Reinhold Quaatz 1928–1933, München 1989.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4. Aufl., München 2005.

Winkler, Heinrich August: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Bd. 1: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is zum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 München 2012.

Wirsching, Andreas: Die Weimarer Republik.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München 2000.

报纸

《抨击报》（*Der Angriff*）：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在柏林的日报

《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跨区域发行的日报

《B.Z.》：即《柏林报》（*Berliner Zeitung*），街头小报

《红旗报》（*Die Rote Fahne*）：共产党中央刊物

《每日评论》（*Tägliche Rundschau*）：保守派报纸，亲防卫军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日报

《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独立的倡导自由主义的报纸

《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左翼知识分子周刊

《前进报》（*Vorwärts*）：社民党党报

《周日报》（*Sonntags-Zeitung*）：斯图加特的独立杂志

写作花絮

魏玛共和国的最后10个星期是全社会陷入疯狂的时期，是充满能量与恐惧的时期，是政治上危机四伏的时期，是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人的时期，也是幕后操纵的人的时期。这段短短的时间决定了一些人的职业生涯和命运，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加速了所谓的历史进程。

有两个动机使我们构思这本书并着手进行资料搜集。作为喜欢与历史叙事材料打交道的记者，两年前，我们致力于研究一个深深吸引我们的主题：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总理职位之争。帕彭被学校教科书称为魏玛的“掘墓人”，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场博弈是多么复杂。1932年末到1933年初，许多力量在发挥作用，德国第一个民主时期的结束，所有这些力量都负有责任。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一切多么可能有另外的走向。那时，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其实已面临分崩离析：国会选举票数减少，财政状况不堪一击。德国经济也开始慢慢复苏。

那些日子，晚上，我们俩偶然看到美国权谋系列剧《纸牌屋》，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扮演的恶魔般拥有权力的人想成为总统一一而最终也真的成了总统。有一回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谈起来：魏玛的结局，也就是帕彭、施莱谢尔、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所推动的结局，其实比《纸牌屋》更扣人心弦。这一过程，同样充满诡计，不同的是它真的发生了，而且对百万人造成了可怕的后果。这是怎样的素材啊。

我们互相看了看，立即开始着手。有许多书讲述魏玛共和国，其中不乏卓越者，但描述这几个星期戏剧性变化的细节的，可作剧本蓝本的书，我们一本都没找到。我们的目标是，在书中以纪录片的蒙太奇手法进行记录，也就是尽可能让人物自己说话，在摆脱后人评论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进入人物的思想。一部自己讲述的当时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说希特勒取得政权绝不是必然的，也许太荒谬了。可是直到写这本书，我们才认识到，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政治家们，是多么难以捉摸，多么自私自利，同时又是多么毫无顾忌。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当时有多少种可以失败的可能性啊！

这些掘墓人不是必胜无疑的。

感谢

当然，如果没有善意的人们支持，我们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我们从内心深处深深地感谢这些人。首先是我们的代理人Thomas Hölzl，他以顽强、耐心和追求精准的态度帮我们找到这本书合适的基调和写法。S. Fischer出版社的编辑Tanja Hommen和Nina Sillern的热情及敏锐令人深受鼓舞，还有在法兰克福的整个出版社团队。

我们感谢卓越的《P.M History》杂志社——在为这本杂志工作时，我们有了写《掘墓人》这本书的想法。感谢Bettina Daniel, Julia Franz, Florian Gless, Ruth Hoffmann, Katharina Jakob, Imke Keyssler, Jan Krummrey, Gunhild Lübeck, Andreas Pufal, Thomas Rübke和Martin Scheufens。

汉堡、石勒苏益格和柏林市（州）立及大学图书馆还有研究机构耐心接受了我们的叨扰和询问，我们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们要感谢Irene Strenge，她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所处的环境，还有Wolfgang Kopitzsch，他为我们了解“阿尔托纳流血星期日”（Altonaer Blutsonntag）提供了支持。

吕迪格·巴特

这本书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妻子Petra，还有儿子Tom和Kim——与你们仨在一起，生活总是那么喜悦。献给我的父亲Günter，在读完第

一章后，他收起了他的疑虑（“你们拿这些老掉牙的事情做什么？”）。感谢我的母亲Silke，感谢她的信心、力量和爱。

感谢我在汉堡、慕尼黑和柏林Looping Studios的同事和朋友们，感谢他们的团队精神和他们探险的兴趣，特别是Robin Houcken和Dominik Wichmann。还感谢Johannes Erler富有经验的建议。

豪克·弗里德里希

在写这本书时，我的儿子Jonathan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将《掘墓人》献给他和他的母亲Martina。我万分希望我的儿子永远不要经历1932/1933年这么黑暗的岁月。我妻子在汉堡市议会为富有生机活力的民主而斗争，令我感到分外自豪。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Franklin Kopitzsch，他总是在新闻工作方面给我很好的建议，还有Monika和Wolfgang，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和巨大的支持陪伴我完成所有的项目。还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我还是小学生时，他就带着我去国家及大学图书馆，唤起我对历史的热情。

年表

大厦将倾

1932年11月17日 11月6日国会选举对忠于共和国的党派来说是一场灾难。总理冯·帕彭宣布解散内阁。

1932年11月18日 总统兴登堡开始寻找新总理人选。

1932年11月19日 兴登堡接到一封信：经济界的领军人物要求阿道夫·希特勒——国会中最强党派的领导人——做总理。

1932年11月21日 兴登堡要求希特勒寻求国会多数席位，以选举希特勒成为总理。

1932年11月23日 国防部部长冯·施莱谢尔问希特勒是否愿意进入施莱谢尔内阁。希特勒拒绝了。——希特勒建议兴登堡，不通过国会多数成为总理。

1932年11月24日 希特勒在一封信中向兴登堡宣称，他不会尝试去寻求国会多数席位的。

1932年11月25日 《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弗瑞克、戈培尔、戈林、罗姆和斯特拉瑟对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诚表白。——国防部开始“模拟游戏”，检验部队在内部动乱的情况下的防御能力。

1932年11月30日 希特勒与党内反对派格里高·斯特拉瑟发生争执，斯特拉瑟要求国家社会主义党参与联合执政。

1932年12月1日 兴登堡重新委任帕彭组建政府。

计划

1932年12月2日 “模拟游戏”的结果出来了。多个内阁成员拒绝成为帕彭的追随者。施莱谢尔将军被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第12任政府首脑。

1932年12月4日 施莱谢尔会见斯特拉瑟，想争取他进入政府。

1932年12月5日 国家社会主义党“首脑会议”在柏林恺撒霍夫酒店召开。

1932年12月6日 新国会开幕。

1932年12月7日 国家社会主义党内部争执升级。

1932年12月8日 斯特拉瑟宣布辞职，并离开柏林。

1932年12月15日 冯·施莱谢尔发表广播讲话。他介绍了政府工作计划：“创造就业”。

寂静的夜

1932年12月16日 “绅士俱乐部”的年度晚宴。前任总理帕彭做报告，批判了他的继任者的经济政策。

1932年12月21日 “大赦法”生效，数百名囚犯圣诞节前可以离开监狱。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被释放。

1932年12月28日 科隆银行家施罗德与帕彭电话约定，1月4日与希特勒会谈。

风口浪尖上

1933年1月4日 希特勒与帕彭在科隆秘密会谈。会面被曝光。——总统兴登堡在柏林接见前国家社会主义党干部格里高·斯特拉瑟。

1933年1月9日 帕彭与施莱谢尔会谈。

1933年1月11日 在总统处会谈：农业协会向兴登堡和施莱谢尔抱怨农业不断恶化的状况。

1933年1月12日 帕彭与希特勒在工业家里宾特洛甫家中秘密会谈。

1933年1月13日 胡根贝格推荐他所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给施莱谢尔作结盟伙伴，他要求自己领导经济部和食品部。施莱谢尔犹豫不决。

1933年1月15日 在利珀进行选举。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近40%的选票，成为国会中的最大派别。

1933年1月16日 施莱谢尔在内阁继续推行他拉拢斯特拉瑟共同组建的“交叉阵线”的想法。

1933年1月18日 国会预算委员会中，东普鲁士大地主侵吞“东部援助”资金被揭露。报纸纷纷报道这一“丑闻”。——帕彭与希特勒又一次在里宾特洛甫的别墅会面。

1933年1月21日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公开与施莱谢尔总理保持距离。

1933年1月22日 冲锋队在布洛广场共产党总部前游行，由普鲁士警察保护。——晚上，帕彭与希特勒又一次在里宾特洛甫家中会面，这次，国务秘书梅斯纳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也在场。

1933年1月26日 施莱谢尔向总统兴登堡要求准独裁性质的紧急全权。

1933年1月28日 施莱谢尔辞去总理职务，因为兴登堡没有给他国会解散指令。

取得权力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为副总理和普鲁士专员，胡根贝格为经济和农业部部长。赫尔曼·戈林和威廉·弗瑞克也从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内阁职务。——共产党呼吁总罢工。——晚上，冲锋队和党卫军及钢盔团举行火炬游行，并穿过勃兰登堡门。

人物译名表

- Abramowitsch, Rafael 拉法埃·阿布拉姆维奇
- Albers, Hans 汉斯·阿尔伯斯
- Alpar, Gitta 吉塔·阿尔帕
- Alvensleben, Werner von 维尔纳·冯·阿尔文斯雷本
- August Wilhelm von Preußen, „Auwi“ 奥古斯特·威廉·冯·普鲁士（“奥维”）
- Bading, Harri 哈利·巴丁
- Baldenstein, Rinck von 林格·冯·巴登斯坦
- Barnum, P. T. (Phineas Taylor) 泰勒·巴纳姆
- Bergner, Elisabeth 伊丽莎白·伯格纳
- Bernhard, Georg 乔治·本哈德
-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
- Blomberg, Werner von 威尔纳·冯·勃洛姆堡

Boch-Galhau, Martha von (Frau von Papen) 玛莎·冯·波
赫-加尔豪 (帕彭夫人)

Böning, Franz 弗朗茨·波宁

Bracht, Franz 弗朗茨·布拉赫特

Brandt, Rolf 罗尔夫·勃兰特

Braun, Eva 伊娃·布朗

Braun, Otto 奥托·布朗

Brecht, Bertolt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redow, Ferdinand von 费尔迪南德·冯·布雷多

Breitscheid, Rudolf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

Brien, Max 马克斯·布里恩

Brückner, Wilhelm 威廉·布鲁克纳

Brüning, Heinrich 海因里希·布吕宁

Bülow, Bernhard Wilhelm von 伯恩哈德·威廉·冯·比洛

Bussche-Ippenbunrg, Erich von dem 埃里希·冯·戴姆布舍-伊
彭堡

Caden, Gert, „Cello“ 格特·卡登 (化名“大提琴”)

Caprivi, Leo von 列奥·冯·卡普里维

Carlebach, Ezriel 伊茨里尔·卡乐巴赫

Cecilie, Kronprinzessin von Preußen 塞西莉娅，普鲁士威廉王储夫人

Cerruti, Vittorio 维多利欧·翟禄第

Cochenhause,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科赫恩豪斯

Coudenhove-Kalergi, Richard-Nikolaus 理查德-尼克拉斯·康登霍维-凯勒奇

Czinner, Paul 保罗·锡纳

Dämichen, Heini 海尼·戴米沁

Dämichen, Wilhelm 威廉·戴米沁

Demuth, Fritz 弗里茨·德穆特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Dietrich, Otto 奥托·迪特里希

Dingeldey, Eduard 爱德华·丁格蒂

Dirksen, Viktoria von 维克多莉亚·冯·迪克森

Döblin,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Dostojewski, Fjodor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Drews, Berta (Frau Heinrich Georges) 贝尔塔·德鲁兹
(海因里希·乔治的妻子)

Duesterberg, Theodor 提奥多·杜伊斯特贝格

Eber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Eggert, Wilhelm 威廉·埃格特

Eisgruber, Toni 托尼·埃斯格鲁勃

Elbrechter, Hellmuth 海尔穆特·埃尔布莱希特

Eltz-Rübenach, Peter Paul Freiherr von 彼得·保罗·冯·
埃尔茨-吕本纳赫男爵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nger, Rolf (Freund von B. Fromm) 罗尔夫·恩格 (贝拉·
弗洛姆的朋友)

Fallada, Hans 汉斯·法拉达

Fauchois, René 勒内·福舒瓦

Feder, Gottfried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

Fejos, Paul 保罗·费犹斯

Feuchtwanger, Lion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

Finck, Werner 维尔纳·芬克

Florin, Wilhelm 威廉·弗洛林

Foertsch, Hermann 赫尔曼·福尔迟

Ford, Henry 亨利·福特

François-Poncet, André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

François-Poncet, Jacqueline 杰奎琳·弗朗索瓦-庞赛

Frank, Hans 汉斯·弗兰克

Frick, Wilhelm 威廉·弗瑞克

Friedrich der Große 腓特烈大帝

Fröhlich, Gustav 古斯塔夫·弗洛里希

Fromm, Bella 贝拉·弗洛姆

Fromm, Gonny (Grete-Ellen) 高妮·弗洛姆

Fuchalt 富哈特夫人 (柏林阔斯里纳大街的女人)

Furtwängler, Franz Josef 弗朗茨·约瑟夫·富特文格勒

Furtwängler, Wilhelm 威廉·富特文格勒

Gayl, Wilhelm von 威廉·冯·盖尔

George, Heinrich 海因里希·乔治

George, Jan 彦·乔治

Gereke, Günther 君特·格瑞克

Giehse, Therese 特蕾泽·吉泽

Goebbels, Harald 哈拉尔德·戈培尔

Goebbels, Helga 海尔加·戈培尔

Goebbels, Magda 玛格达·戈培尔

Goethe, Johann Wolfgang 约翰·沃夫冈·歌德

Gordon, George 乔治·乔丹

Göring, Carin (卡琳·戈林原姓福克)

Göring, Emmy (geb. Sonnemann) 埃米·戈林(原姓索涅曼)

Göring, Herrmann 赫尔曼·戈林

Graßmann, Peter 彼得·格拉斯曼

Groener, Wilhelm 威廉·格勒纳

Gründgens, Gustaf 古斯塔夫·格伦德根斯

Güntel, Marie 玛丽·君特尔

Haertel, Dr. (柏林劳务局) 哈尔特博士

Hammerstein-Equord, Helga von, „Grete“ 海尔加·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格莱特”)

Hammerstein-Equord, Kurt von 库尔特·冯·哈玛施坦因-埃克沃德

Hanfstaengl, Ernst „Putzi“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普茨”）

Hanfstaengl, Helene 海伦·汉夫斯坦格

Hans 汉斯（住在柏林阔斯里纳大街的人）

Hašek, Jaroslav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Haubach, Theodor 提奥多·豪巴赫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蓝道夫·赫斯特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Heinrich 海因里希（普雷托的秘书）

Helldorf, Wolf-Heinrich von, Graf 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

Hennigs, Elisabeth von→Schleicher, Elisabeth von 伊丽莎白·冯·海宁→伊丽莎白·冯·施莱谢尔

Hentsch, Herbert 海尔伯特·汉驰

Heß, Ilse (geb. Pröhl) 伊尔赛·赫斯（原姓普略尔）

Heß, Rudolf 鲁道夫·赫斯

Heydrich, Lina 莉娜·海德里希

Heydrich, 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Hilferding, Rudolf 鲁道夫·希法亭

Himm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Hindenburg, Gertrud von 格特鲁特·冯·兴登堡

Hindenburg, Oskar von 奥斯卡·冯·兴登堡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

Hoffmann, Camill 卡米尔·霍夫曼

Hoffmann, Heinrich 海因里希·霍夫曼

Hofmann, Richard 理查德·霍夫曼

Hoover, Herbert C. 赫伯特·C. 胡佛

Hörauf, Franz von 弗朗茨·冯·霍尔奥夫

Huck, Wolfgang 沃夫冈·胡克

Hugenberg, Alfred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Isherwood, Christopher 克里斯朵夫·伊舍伍德

Jänisch, Erwin 爱尔兰文·耶内氏

Johannesson, Hans 汉斯·约翰内森

Kaas, Ludwig 路德维希·卡斯

Kalckreuth, Eberhard, Graf von 爱伯哈特·冯·卡克奥特伯爵

Kaléko, Mascha 玛莎·卡乐可

Kaléko, Saul Aaron 索尔·阿隆·卡乐可

Kammler, Fritz 弗里茨·卡姆勒

Kasack, Hermann 赫尔曼·卡萨克

Kasper, Wilhelm 威廉·卡斯帕

Kästner, Erich 埃利希·克斯特纳

Keppler, Wilhelm 威廉·凯普勒

Kerr, Alfred 阿尔弗雷德·克尔

Kerr, Julia (geb. Weißmann) 尤莉娅·克尔 (原姓威斯曼)

Kerrl, Hanns 汉斯·凯尔

Kessler, Harry, Graf 哈利·凯斯勒伯爵

Kippenberger, Hans 汉斯·基彭贝格

Kliefoth, Alfred 阿尔弗雷德·科利福特

Kline, Herbert 赫伯特·克莱恩

Kluczynski (Familie) 克鲁君斯基 (家庭)

Knappertsbusch, Hans 汉斯·克纳佩茨布什

Knickerbocker, Hubert Renfro 胡伯特·伦弗洛·克尼克博克

Kohlert, Erwin 爱尔兰·科勒特

Kowalski (Familie) 科瓦尔斯基(家庭)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 Alfried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
·冯·勃伦和哈巴赫

Künneke, Eduard 爱德华·昆内克

Künstler, Franz 弗朗茨·昆斯特勒

Lammers, Hans Heinrich 汉斯·海因里希·兰马斯

Langsdorff, Hans 汉斯·朗斯多夫

Leipart, Theodor 提奥多·莱帕特

Lenin, Wladimir Iljitsch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Lenz, Karl 卡尔·林茨

Lewis, 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

Litwinow, Maxim Maximowitsch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
维诺夫

Litzmann, Karl 卡尔·李兹曼

Lochner, Louis Paul 路易斯·保罗·洛赫纳

Loerke, Oskar 奥斯卡·罗伊克

Löwenstein, Georg 乔治·勒文斯泰因

Löwenstein, Johanna (geb. Sabat) 约翰娜·勒文斯泰因 (原姓萨巴特)

Lubitsch, Ernst 恩斯特·刘别谦

Ludendorff, Erich 埃里希·鲁登道夫

MacDonald, Sir Ramsay 拉姆齐·麦克唐纳爵士

Maikowski, Hans Eberhard 汉斯·埃伯哈德·麦考斯基

Mann, Erika 爱瑞卡·曼

Mann, Heinrich 海因里希·曼

Mann, Klaus 克劳斯·曼

Marcks, Erich 埃里希·马克斯

Martha 玛塔 (失业者)

Martin, Dr. 马丁博士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Meazza, Giuseppe 朱塞佩·梅阿查

Meissner, Hildegard 希尔德加德·梅斯纳

Meissner, Otto 奥托·梅斯纳

Merck, Erwin 爱尔兰文·默克

Messersmith, George S. 乔治·S.梅瑟史密斯

Möhle, Otto 奥托·缪勒

Molnár, Ferenc 菲伦克·莫尔纳

Moltke, Gertrud von 格特鲁德·冯·毛奇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赫尔穆特·冯·毛奇
(卡尔·本哈德)

Mörschel, Willy 威利·莫舍尔

Mosich, Ernst 恩斯特·莫西奇

Mowrer, Diana 戴安娜·莫维尔

Mowrer, Edgar Ansel 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

Mowrer, Linian (geb. Thomson) 莉莉安·莫维尔 (原姓汤姆森)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沃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

Mühsam, Erich 埃里希·米萨姆

Mussolini, Benito 本尼托·墨索里尼

Mutschmann, Martin 马丁·穆切曼

Nachat, Hassan, Pascha 哈森·纳哈特·帕莎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波拿巴

Nero 尼禄（罗马皇帝）

Nerz, Otto 奥托·内尔茨

Neurath, Emilie Adelheid, Freifrau von 男爵夫人冯·埃米
• 阿德黑尔德·牛赖特

Neurath, Konstantin von 康斯坦丁·冯·牛赖特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尼采

Noske, Gustav 古斯塔夫·诺斯克

Offenbach, Jacques 雅克·奥芬巴赫

Oskar Prinz von Preußen 普鲁士奥斯卡王子

Ossietsky, Carl von 卡尔·冯·奥西茨基

Ossietsky, Maud (geb. Lichfield-Woods) 莫德·奥西茨基
(原姓利希菲尔德-伍兹)

Ott, Eugen 奥尔根·奥特

Otte, Bernhard 本哈德·奥特

Planck, Erwin 埃尔文·普朗克

Planck, Max 马克斯·普朗克

Plettl, Martin 马丁·普雷托

Plotkin, Abraham 亚伯拉罕·普洛特金

Polgar, Alfred 阿尔弗雷德·普尔加

Pozzo, Vittorio 维多利奥·波佐

Preger, Konrad von 康拉德·冯·普雷格

Quaatz, Reinhold 莱恩霍尔德·库阿茨

Quandt, Günther 君特·宽特

Rachmaninow, Sergei Wassiljewitsch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
·拉赫马尼诺夫

Ranke, Hans Hubert von, „Moritz“ 汉斯·胡伯特·冯·兰克
(“莫里茨”)

Reiner, Josef 约瑟夫·莱纳

Remarque, Erich Maria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Ribbentrop, Anneliese von (geb. Henkell) 安娜莉泽·冯·
里宾特洛甫(原姓汉凯)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Riefenstahl, Leni 莱尼·里芬斯塔尔

Ringelnatz, Joachim 约阿希姆·林格纳茨

Roda Roda, Alexander 亚历山大·罗达·罗达

Röhm, Ernst 恩斯特·罗姆

Rohr, Otto 奥托·罗尔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Rotter, Alfred, und Fritz 阿尔弗里德·罗特和弗里茨·罗特

Rumbold, Sir Horace 荷瑞斯·胡姆博德爵士

Sackett, Frederic M. 弗里德里克·M. 萨克特

Sagasser, Erich 埃里希·萨迦瑟

Sarow 萨罗夫（可能的杀人凶手）

Schacht, Hjalmar 亚尔马·沙赫特

Schäffer, Fritz 弗里茨·舍费尔

Schäffer, Hans 汉斯·舍费尔

Scheer, Gerhard 格哈德·舍尔

Schill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席勒

Schirach, Baldur von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Schleicher, Elisabeth von 伊丽莎白·冯·施莱谢尔

Schleicher, Lonny von 露尼·冯·施莱谢尔

Schmeling, Max 马克斯·施梅林

Schmidt-Hannover, Otto 奥托·史密特-汉诺威

Schmitt, Carl 卡尔·史密特

Schoner (Frau aus der Köslinerstraße, Berlin) 舒纳 (住在柏林阔斯里纳大街的一位女士)

Schröder, Kurt, Freiherr von 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

Schumacher, Kurt 库尔特·舒马赫

Schuschnigg, Kurt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

Schwerin von Krosigk, Dedo Paul 戴多·保罗·施未林·冯·科洛希克

Schwerin von Krosigk, Johann Ludwig, „Lutz“, Graf 约翰·路德维希·施未林·冯·科洛希克伯爵 (“鲁茨”)

Schwerin, Curt Christoph von, Graf 库尔特·克里斯朵夫·冯·施未林伯爵

Scopelli, Alejandro 亚历杭德罗·斯科佩里

Sedgwick, John 约翰·斯德卫克

Segestes (Germanenfürst) 西格斯特斯 (日耳曼部落首领)

Seibold, Maria, Miga 玛丽娅·米加·塞博特

Seldte, Franz 弗朗茨·塞尔特

Severing, Carl 卡尔·泽韦林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Sinclair, Upton 厄普顿·辛克莱

Sindelar, Matthias 马蒂亚斯·辛德拉

Sonnemann, Emmy → Göring, Emmy 埃米·索涅曼→爱米·戈林

Spender, Stephen 斯蒂芬·斯彭德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Stauffenberg, Claus Schenk Graf von 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Stauß, Emil Georg von 伊米尔·乔治·冯·史道斯

Stegerwald, Adam 亚当·施特格瓦尔德

Stegmann, Wilhelm 威廉·施戴格曼

Stoeckel, Walter 瓦尔特·斯托克尔

Strasser, Gregor 格里高·斯特拉瑟

Strasser, Otto 奥托·斯特拉瑟

Strauss, Johann 约翰·施特劳斯

Streicher, Julius 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Stülpnagel, Joachim von 约阿希姆·冯·史图尔普纳格

Thälmann, Ernst 恩斯特·台尔曼

Thälmann, Rosa (geb. Koch) 罗莎·台尔曼 (原姓考赫)

Thielemann, Oskar 奥斯卡·蒂勒曼

Thompson, 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Thyssen, Fritz 弗里茨·蒂森

Toller, Ernst 恩斯特·托勒尔

Torgler, Ernst 恩斯特·托格勒

Trenker, Luis 路易斯·特伦克

Tucholsky, Kurt 库尔特·图霍夫斯基

Turmarkin, Alexander 亚历山大·吐马金

Ulbricht, Walter 瓦尔特·乌布利希

Wagner, Richard 理查德·瓦格纳

Wagner, Robert 罗伯特·瓦格纳

Wagnitz, Walter 瓦尔特·瓦格尼茨

Waldeck, Max 马克斯·瓦尔德克

Weiß, Bernhard 本哈德·卫斯

Wels, Otto 奥托·威尔斯

Werfel, Franz 弗朗茨·韦弗尔

Wessel, Horst 霍斯特·威塞尔

Westarp, Ada von, Gräfin 阿达·韦斯达普伯爵夫人

Westarp, Getraude von 格特奥德·韦斯达普

Westarp, Kuno von 库诺·韦斯达普

Wiegand, Karl von 卡尔·冯·威甘德

Wiehn, Karl 卡尔·威恩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Wilhelm Prinz von Preußen 普鲁士威廉王子

Wolff, Theodor 提奥多·沃尔夫

Zauritz, Josef 约瑟夫·曹利茨

Zehrer, Hans 汉斯·采尔

Zielenziger, Kurt 库尔特·茨伦茨格

Zuckmayer, Carl 卡尔·楚克玛雅

Zweig, Arnold 阿诺·茨威格

Zweig, 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德）吕迪格·巴特（Rüdiger Barth），（德）豪克·弗里德里希（Hauke Friederichs）著；靳慧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

ISBN 978-7-5201-4763-7

I. ①掘… II. ①吕…②豪…③靳… III. ①魏玛共和国-历史-研究 IV. ①K516.4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5583号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著者/〔德〕吕迪格·巴特（Rüdiger Barth） 豪克·弗里德里希（Hauke Friederichs）

译者/靳慧明

出版人/谢寿光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陈嘉瑜 黄丹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59千字

版次/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4763-7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9-0245号

定价/7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梅特涅：帝国与世界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1914-1945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100 个物品中的德国历史

幻影恐惧：政治妄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

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扫码 GO
索恩微店



忘掉地平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涛

这是一份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10个星期的引人入胜的报告。历史学家吕迪格·巴特和豪克·弗里德里希以天为单位描写这段充满戏剧冲突性的肆无忌惮地争夺权力的历史，在故事最后，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总理，将德国引上独裁统治的道路。

这部作品为那段将欧洲引向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日子描绘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层次丰富的画像。用极富冲突感的手法呈现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人祸。

DER LETZTE WINTER DER WEIMARER REPUBLIK

这个我们从前只在历史课本上认识到的事件现在获得了鲜活的颜色。

——安德里亚斯·基尔伯 (Andreas Kilb)，《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 2018年5月13日

丰富的参考资料就像一个包罗万有的陈列馆，展现彼时彼处，尤其是首都柏林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罗伯特·普罗伯斯特 (Robert Probst)，《南德意志报》2018年5月7日

这是一段刺激的历史，它总是显出非常强的、让人不安的现实意义，却很少有人用如此贴近和生动的手法去描写它。

——斯蒂凡·施密茨 (Stefan Schmitz)，《明星周刊》2018年4月26日

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史料翔实，让人手不释卷，变化多样，读来趣味盎然。

——曼弗里德·魏斯贝克 (Manfred Weißbecker)，《新德意志报》2018年9月7日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重要作品，它对史料的搜索力度之强让人惊讶。

——P.M.，2018年6月19日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段用类似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下来的历史，它讲述了人们肆无忌惮地争夺权力的故事。

——G/Geschichte，2018年5月25日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 78.00 元

R
崇·恩
ARTIST BOOK

(美) 大卫·金 著 经雷 译 David King

THE TRIAL OF ADOLF HITLER 审判希特勒

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

The Beer Hall Putsch and the Rise of Nazi Germany



审判官：阿道夫希特勒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审判 希特勒的罪恶 政权由此走上崛起之路

这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审判

希特勒的罪恶 政权由此走上崛起之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栩栩如生……惊人地呈现了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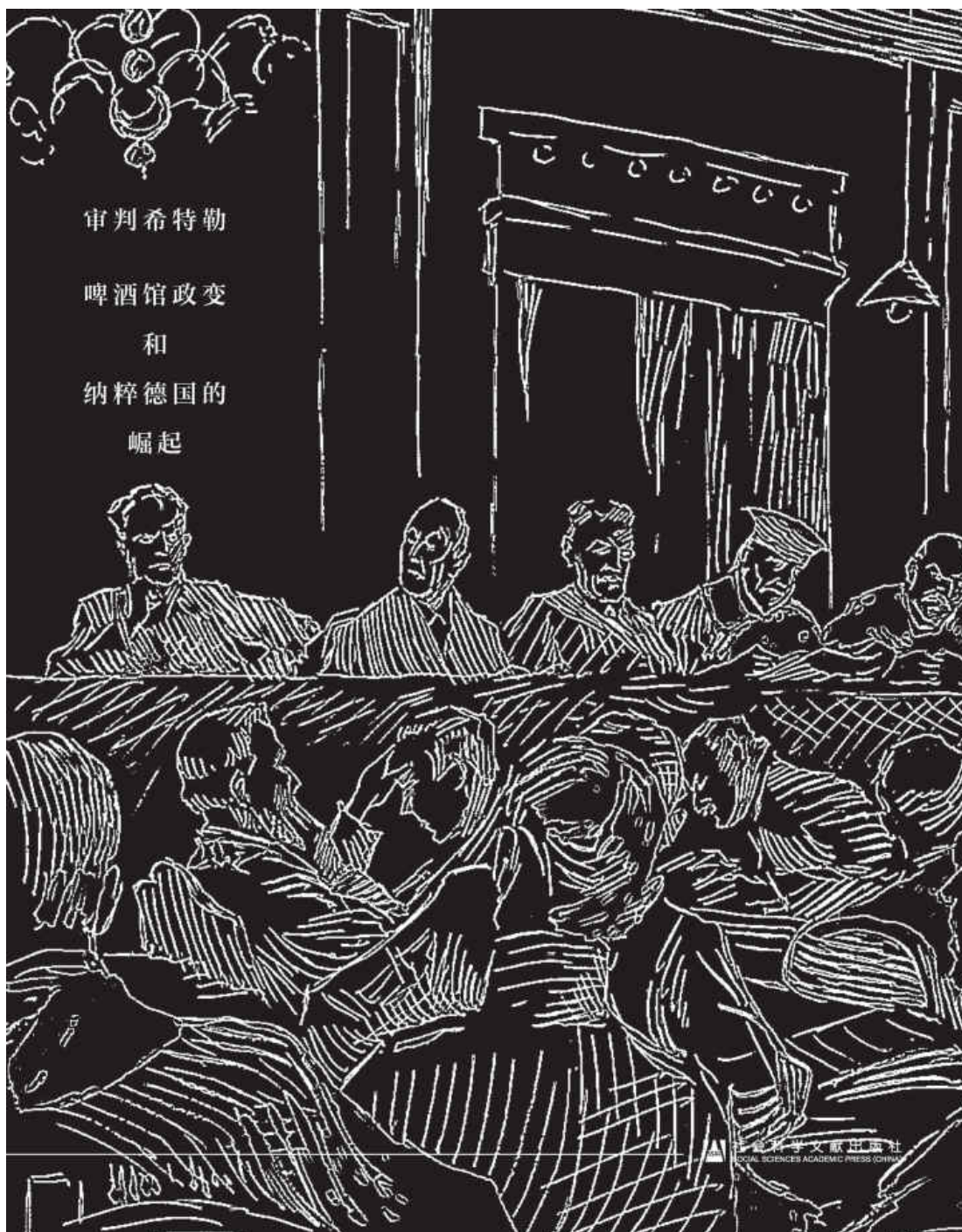
乃至纳粹此前未曾披露的侧面

——奈吉尔·琼斯，《旁观者》

Copyright © 2017 by David King

All rights reserved

审判希特勒
啤酒馆政变
和
纳粹德国的
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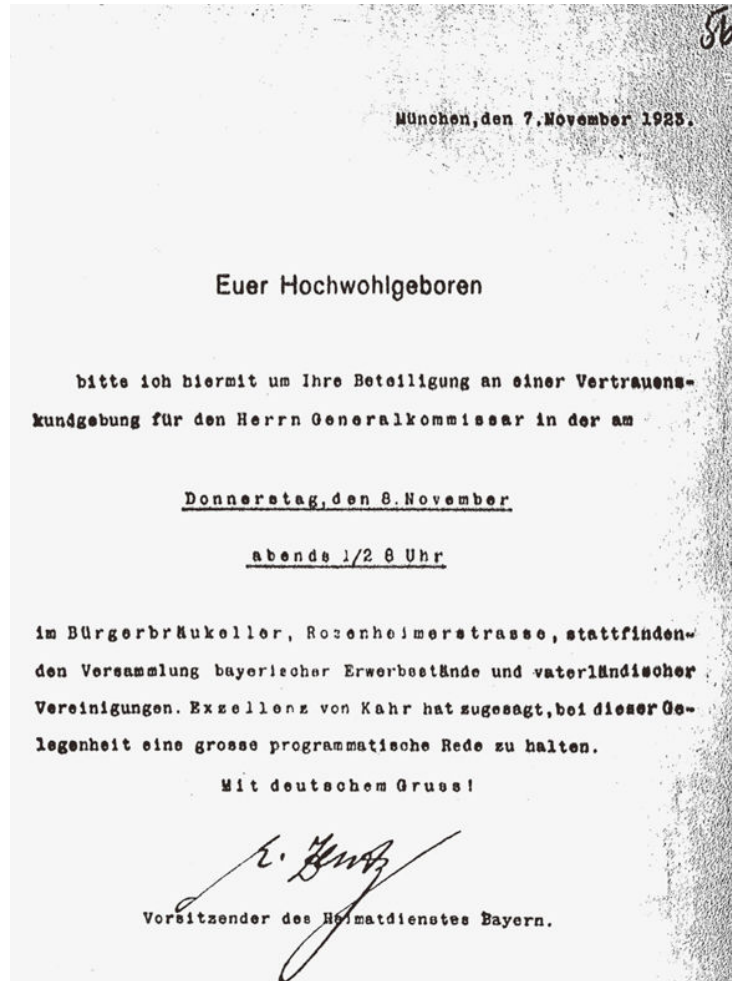




贝格勃劳凯勒外的人群 摄于1923年

“在巴伐利亚，有政治的地方就有啤酒”

加泰罗尼亚报纸《加泰罗尼亚之声》写道



- 少数得以留存至今的1923年11月8日夜贝格勃劳啤酒馆活动邀请函。



- 希特勒突击队，这支突击部队负责压制现场的警察，控制啤酒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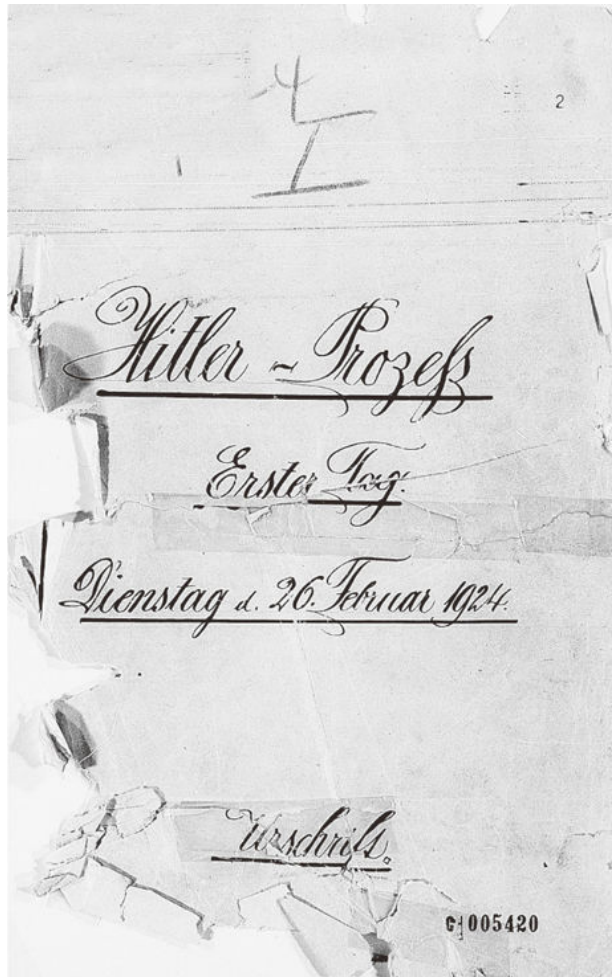
■ 希特勒突击队将慕尼黑市议员扣为人质。



■ 恩斯特·罗姆上尉的部队控制战争部后设置路障。手举旗帜的士兵是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



- 骑警在1923年11月9日早晨清理街道。有传闻说希特勒已经被杀，还有的说他已经撤离，准备集结支持者再次攻打慕尼黑。



- 希特勒审判的官方庭审记录厚达将近3000页。



■ 阿道夫·希特勒在法庭上发言。小桌边坐着负责记录庭审过程的速记员。



■ 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右），他的律师费直到希特勒掌权后才付清。这一幅以及后面两幅素描都出自艺术家奥托·D. 弗朗兹（Otto D. Franz）之手，是罕见的希特勒审判场景描绘。



- 负责检控阿道夫·希特勒的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右）面临着可怕的考验。左侧坐着首席检察官路德维希·施坦莱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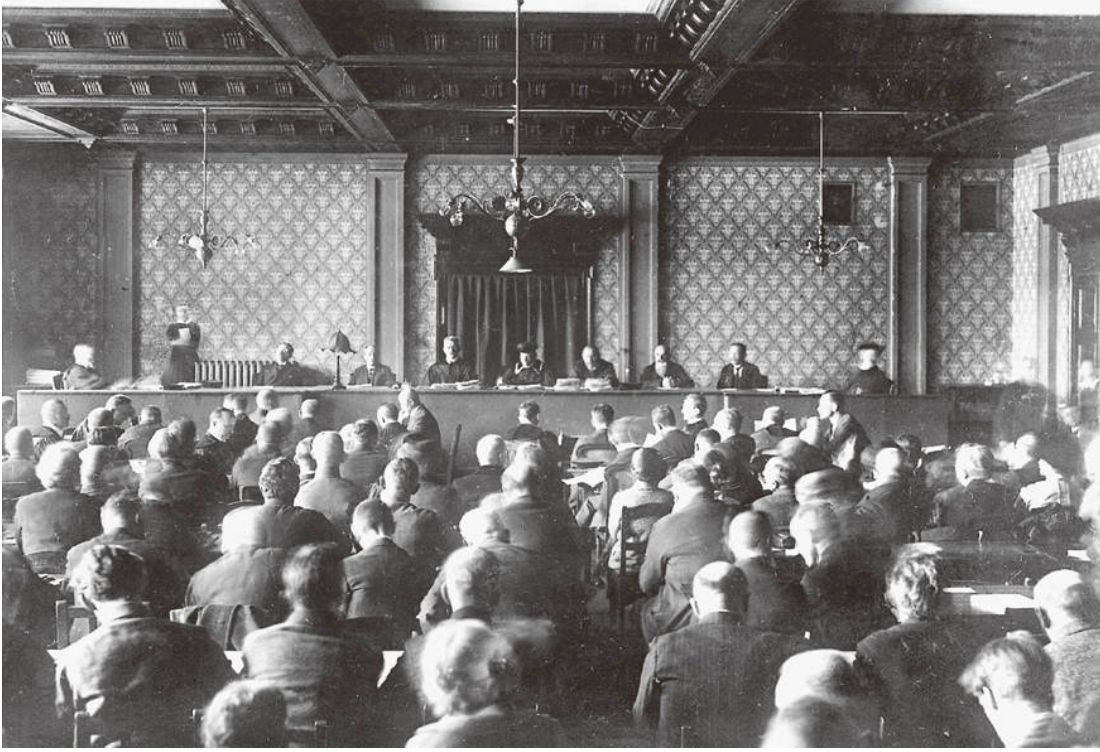
- 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靠着他对右翼的好感以及详尽的媒体报道，希特勒在这场审判上得以触及此前不可想象的大量观众。



- 此前从未发表的一幅卡尔·奥古斯特·耶格尔 (Carl August Jäger) 的速写描绘了一个神情烦躁的希特勒，当时他有可能会被逐出德国。



- 到底谁在受审，希特勒还是魏玛共和国？批评人士问道。这幅画描绘了一个乱哄哄的法庭，直到1924年才在《慕尼黑最新消息》上首次发表。



- 法庭内禁止拍照，不过有些人偷偷带了相机进去。这是一张质量相对较高的庭审照片。



■ 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被告人在审判期间稍事休息。



■ 随着审判接近尾声，法庭现场的安保再次加强。



■ 宣读判决书前，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在院子里合影：（左起）海因茨·佩尔内、弗里德里希·韦伯、威廉·弗里克、赫尔曼·克利伯、埃里希·鲁登道夫、阿道夫·希特勒、威廉·布吕克纳、恩斯特·罗姆和罗伯特·瓦格纳。唯一不在其中的被告人是恩斯特·珀纳。



- 希特勒的牢房，后来配备了打字机和一面纳粹旗。希特勒获释后，一同受审的恩斯特·珀纳曾在这间牢房短暂服刑。



-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的牢房里。



- 在兰茨贝格，希特勒读书、接待访客、写作《我的奋斗》。希特勒说他在监狱那段时间就是公费接受大学教育。



- 阿道夫·希特勒和狱友们在兰茨贝格的惬意时光。站着的埃米尔·莫里斯是囚犯乐队成员。手拿杯子的赫尔曼·克利伯为囚犯报纸撰稿。囚犯们还排演过一出嘲讽模仿审判的剧，最后希特勒得到的惩罚是被逐出兰茨贝格。



- 希特勒与他的司机、冲锋队首任队长埃米尔·莫里斯在花园漫步。兰茨贝格的囚犯有充足的时间回顾（以及重塑）过去，规划未来。



■ 1924年12月20日，重获自由的希特勒离开兰茨贝格。

本书获誉

入围2018年犹太季刊-温盖特奖（JQ-Wingate Prize）和2018年坎迪尔历史奖（Cundill History Prize）长名单

无论在英文、德文还是任何一种其他文字的世界里，本书都是关于希特勒审判的绝对权威。

——彼得·罗斯·兰奇（Peter Ross Range），《1924：造就希特勒的一年》（*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作者。

引人思考……《审判希特勒》给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说明煽动术具有转败为胜的威力。本书以揪心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先进国家坠入混乱深渊的过程，以及这场混乱带来的惨痛损失。金先生对这场失败政变做出了精彩的叙述，其中亦可窥见一众恶人的嘴脸，日后他们的罪恶将笼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华尔街日报》

几近逐分逐秒的叙述扣人心弦……《审判希特勒》的研究工作无懈可击，文笔动人，成功地将这充满忧虑与混乱的事件呈现了出来。

——罗杰·摩尔豪斯（Roger Moorhouse），《泰晤士报》

栩栩如生……惊人地呈现了希特勒……乃至纳粹此前未曾披露的侧面。

——奈吉尔·琼斯（Nigel Jones），《旁观者》（*The Spectator*）

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史料翔实，工整严谨。

——《新准则》杂志（*The New Criterion*）“评论人札记”（Critic's Notebook）

本可以阻止希特勒上台的早期刑案审判……作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的金以生动的笔法将这场早年的审判呈现了出来。借由深刻而吸引人的文字，他叙述了希特勒如何将一场官司变成一个舞台，用来展示自己恶毒的煽动手段——以及将一段短暂的牢狱时光变成他的政治跳板。

——《全美书评》（*The National Book Review*）

对1923年政变失败和审判纳粹领袖事件做出了扣人心弦的叙述……在这一波叙事类的新书中，这是最有魅力的一本。”

——哈辛托·安东（Jacinto Antón），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 Babelia*）

639页严谨、详尽的文字，笔法精炼卓绝，将治史之学化为一篇充满文学韵味的故事。

——劳尔·康代（Raúl Conde），西班牙《世界报》（*El Mundo*）

一部巧夺天工之作。

——马努埃尔·P·比拉多罗（Manuel P. Villatoro），西班牙《阿贝赛报》（*ABC*）

一个杰出的历史故事……[金]对审判的纪录与分析有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

——若迪·阿玛（Jordi Amat），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

那一刻，希特勒从小丑变成元首……天下奇闻。

——安娜·阿贝拉（Anna Abella），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晨报》（*El Periódico*）

金用充满活力的节奏详述了1923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以及此后的审判。希特勒走入法庭时是个可怜虫，出来时却已经顶着领袖的光环……金的文字中回响着普里莫·莱维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这三位作者，在当下都是值得一读的。

——路易斯·马乌利（Luis Mauri），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晨报》

在有关这个恶名昭彰的历史人物的生平撰述中，一个最关键却最被忽视的时刻可能是在1924年4月1日[阿道夫·希特勒案宣判]……大卫·金用一种透彻而生动的方式重现了全程，其中包含大量细节。他的量刑比慕尼黑的法官们要严厉许多。

——戴维·巴雷拉（David Barreira），El Español网站（西班牙）

逾600页的宏大故事，作为迄今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完整撰述，本书将是很难赶超的，值得给予最高的评价。卓越的史学家大卫·金写下了一则精彩、详尽、严谨、史料翔实的故事。简单说，这毫无疑问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

——何塞·玛丽亚·马努埃尔·加西亚-奥苏娜·罗德里格兹
(José María Manuel García-Osuna Rodríguez), Todo Literatura
网站(西班牙)

一般的历史研究爱好者可能会觉得,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切,他的崛起与垮塌,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但是……现在对“元首”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

——罗宾·艾特金(Robin Aitken),《天主教先驱报》(*The Catholic Herald*)

研究扎实,叙述动人……这是英文世界首次以书的篇幅介绍希特勒审判,对我们理解现代极权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戴维·霍拉汉(David Holahan),《基督科学箴言报》

一场滑稽的法庭戏,同时也透露着不祥的预兆。本书对希特勒上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但常被忽视的——阶段进行了有趣而详尽的叙述。

——约瑟夫·卡农(Joseph Kanon),《德国好人》(‘*The Good German*)和《离开柏林》(*Leaving Berlin*)的作者

金的研究工作十分细致……很难想象在公众可以接触到的书籍中,有哪本书能像本书这样,以如此丰富、详尽的方式呈现未曾发表的研究成果。

——乔·皮涅埃罗·达·丰塞卡(Joel Pinheiro da Fonseca),巴西《考验》杂志(*Exame*)

通过庭审记录、警方文件和新闻材料，包括从兰茨贝格监狱档案中发现的近500份文件，金剖析了一场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庭审。

——阿根廷《12页报》（*Página 12*）

啤酒馆政变是个熟悉的题材……但大卫·金的这部500页的《审判希特勒》丰富多变、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在转译到芬兰文的著作中无出其右。

——佩特里·伊默南（Petri Immonen），芬兰《赫尔辛基日报》（*Helsingin Sanomat*）

金翻阅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知，有的未曾披露，他详细叙述了一场惊人的法律丑闻，为希特勒日后造成的大灾难埋下伏笔。

——乔恩·H·里德（Jon H. Rydne），挪威《世界之路报》（*VG*）

史学家大卫·金是一位技艺精湛的叙事者……本书述及的事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有必要去了解它的实情——这是一次极其恶劣的罪行，在当时没有得到阻止，以致酿成一场导致多国被卷入、数千万人丧生的剧变。

——艾维德·施瓦兰格（Øyvind Svaleng），挪威公共图书馆月度最佳传记（2019年6~7月）

本书用某种颇为骇人的方式记载了一个失败者反败为胜的故事——以及一个民主国家司法系统的全然失能。对所有的历史爱好者，我只想说：去看这本书！

——汉斯·克里斯蒂安·戴维森（Hans Christian Davidsen），德国《弗伦斯堡报》（*Flensborg Avis*），2019年10月月度最佳图书最好的历史写作。

——克里斯蒂安·伊甘德·斯科夫（Christian Egander Skov），丹麦《基督教日报》（*Kristeligt Dagblad*）

金的研究工作十分出色……史料经过了精湛的处理和激动人心的呈现，使之成为一本关于希特勒审判的权威之作……金的书仿佛一部“真实犯罪”类的惊悚小说，但它的恒久价值在于，这是一本介绍煽动家如何反败为胜的教科书。

——弗莱明·奥斯特加德（Flemming Østergaard），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

金的书充满了戏剧性的场面……[同时也是]一部扎实的非虚构作品，以深入而详实的方式描绘了初任国家社会主义党党魁的希特勒。

——本特·布吕德尼科夫（Bent Blüdnikow），丹麦《贝林时报》（*Berlingske*）

啤酒馆，闹剧，荒唐的判罚……大卫·金的结论是，如果有一场公正的审判，煽动家希特勒也许就能从此消失了。但是法制的崩坏为他筑就了一条通往权力的坦途。

——马塞尔·胡斯巴斯（Marcel Hulspas），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

最初步入法庭时，阿道夫·希特勒只是个垂头丧气的失败者。离开法庭时却成了未来的希望……金利用了3000页的庭审记录，在巴伐

利亚档案馆里发现了不计其数的资料，并且幸运地取得[兰茨贝格监狱文件]……透彻之余又不乏精彩。

——赫尔曼·维恩霍夫（Herman Veenhof），荷兰《荷兰日报》（*Nederlands Dagblad*）

正是这场审判成就了希特勒的上台……叙述中展现了精湛的技艺。对我们理解这段人类历史上格外阴暗的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迪克·范·德·韦恩（Dick Van der Veen），荷兰Hebban网站

1924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审判使纳粹党成了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JP·奥马利（JP O’ Malley），《以色列时报》（*Times of Israel*）专题特稿

希特勒的关键时刻……有关这起事件、审判以及此后的徒刑的细节，被这位史学家充分呈现了出来。

——秘鲁《共和国报》（*La República*）

很少有作者能在呈现赤裸裸的现实的同时，始终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很高兴现在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位作者。这是一个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故事。

——克里斯·罗伯茨（Chris Roberts），英国Crime Review网站

史学家大卫·金回顾了政变是如何发生的，但更加重要的是，政变之后那个彻底改变人类历史的判决是如何做出的。

——塞巴斯蒂安·索里亚诺（Sebastián Soriano），西班牙《真理报》（*La Razón*）

饶有趣味……未来的纳粹领袖如何将一场失败的政变转化为胜利。

——戴维·亚古维（David Yagüe），西班牙《20分钟报》（*20 Minutos*）

写作了《光之城的死亡事件》和《维也纳，1814》等畅销书的大卫·金，用细致的笔触逐分逐秒地描述了一系列将改变世界历史走向的事件。

——特雷莎·雷（Teresa Rey），西班牙65ymas网站

这本发人深省的书揭示了事情的原委，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是什么为此后发生的剧变铺平了道路。

——《历史探幽》（*History Revealed*）

如果吉奥格·奈特哈特在1924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纳粹还会在十年后上台吗？……一部有力的杰作，凸显了这场审判是何其重大的历史转折——以及事态如何往一个极端错误的方向发展。

——安·巴特莱特（Anne Bartlett），《书页》杂志（*BookPage*）

通过史料翔实……节奏急促的叙述，金用本书再次证明自己是一流的叙事历史学家。

——《出版商周刊》（*Publishers Weekly*）

2017年最佳海滩读物和夏季新书

——Thrillist网站

面对当下极右翼暴力的威胁，《审判希特勒》成为一个刺眼的提醒，告诉我们当法律系统运转失灵时，当仇恨得到认可并最终常态化时，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好奇蜥蜴”书店（Curious Iguana）

以新近发现的有关阿道夫·希特勒狱中生活的文件为基础……金成功地表明，在希特勒掌握权力的过程中，这场审判虽然只是一小部分，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一部学养精深、文笔鲜活的杰作……本书依托于一丝不苟的研究，充满了教育意义，正适合放在右翼卷土重来的当下来读。”

——Kirkus（热门评论）

本书献给范·金（Van King），以志怀念

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审判。希特勒的罪恶政权由此走上崛起之路。

——奥托·格里特施内德（Otto Gritschneider）

- [慕尼黑，1923~1924：人物表](#)
- [序](#)
- [第一篇 啤酒馆](#)
 - [1 贝格勃劳凯勒](#)
 - [2 吃不饱饭的亿万富翁](#)
 - [3 四发子弹](#)
 - [4 德国尤利西斯](#)
 - [5 “聒噪、粗陋、刺耳”](#)
 - [6 流光溢彩的都市](#)
 - [7 哈佛的馈赠](#)
 - [8 新政权](#)
 - [9 “安全送达”](#)
 - [10 反政变](#)
 - [11 主动权](#)
 - [12 野蛮之辈](#)
 - [13 午夜慕尼黑](#)
 - [14 第264号令](#)
 - [15 “我不是胆小鬼”](#)
 - [16 决断时刻](#)
 - [17 大院里](#)
 - [18 希特勒的外国军团](#)
 - [19 浴血之地](#)
 - [20 逃亡](#)
 - [21 人质的劫难](#)
 - [22 新十一月罪人](#)
 - [23 遗嘱](#)
 - [24 绝境](#)
 - [25 审判前的审判](#)
- [第二篇 法庭](#)
 - [26 “我们不会害德国”](#)
 - [27 被告人希特勒](#)
 - [28 供认与曲解](#)
 - [29 闭门审理](#)
 - [30 辩方的攻势](#)
 - [31 无知的杰作](#)
 - [32 一杯苦酒](#)

- [33 弗里克博士](#)
- [34 第一证人](#)
- [35 检察官的霉运](#)
- [36 当务之急](#)
- [37 “古怪的先生”](#)
- [38 危险的游戏](#)
- [39 逃脱毁灭的命运](#)
- [40 第十三天](#)
- [41 是政变，不是政变](#)
- [42 大爆发](#)
- [43 暗示](#)
- [44 希特勒的保镖出庭](#)
- [45 大转变](#)
- [46 “叛国者生正逢时”](#)
- [47 从慕尼黑到瓦尔哈拉](#)
- [48 最后的陈词](#)
- [49 结束与开始](#)
- [50 名字说明一切](#)
- [第三篇 监狱](#)
 - [51 7号牢房的恺撒](#)
 - [52 面对面](#)
 - [53 谎言、愚蠢与懦弱](#)
 - [54 “持续的威胁”](#)
- [后记](#)
- [鸣谢](#)
- [注释和原始资料](#)
- [图片来源](#)
- [索引](#)

慕尼黑，1923～1924：人物表

马克斯·阿曼（Max Amann）：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所在团的二级上士。现为纳粹党办公室商务负责人。

伊琳娜·拜希施坦（Helene Bechstein）：一个柏林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有势力的上流社会女主人。

约瑟夫·贝尔希托德（Josef Berchtold）：雪茄经销商，刚组建的“希特勒突击队”的指挥官。

威廉·布吕克纳（Wilhelm Brückner）：冲锋队慕尼黑军团指挥官。

雅克布·冯·丹纳骑士（Jakob Ritter von Danner）：少将，慕尼黑城守备部队指挥官。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社会民主党的一名公务员，后成为德意志共和国^[1]首任总统。

汉斯·埃哈德（Hans Ehard）：阿道夫·希特勒案中的副检察官，后成为巴伐利亚邦总理。

赫尔曼·埃瑟（Hermann Esser）：年轻的记者，擅长煽动民众的纳粹演说家。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Gottfried Feder）：一家建筑公司的所有人，希特勒在早期的经济顾问。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一名法律系学生，曾和一支突击队分队一起接受检阅。

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慕尼黑警方政治情报办公室主任。

奥托·加德曼（Otto Gademann）：赫尔曼·克利伯的辩护律师。

卡琳·戈林（Carin Göring）：爱上了赫尔曼·戈林的瑞典贵族，政变后协助戈林逃离慕尼黑。

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行事招摇的战时飞行员，社会地位显赫的纳粹党新人，突击队指挥官。

吉奥格·葛茨（Georg Götz）：威廉·弗里克的辩护律师。

乌尔里希·格拉夫（Ulrich Graf）：阿道夫·希特勒的保镖。

弗朗茨·格尔特纳（Franz Gürtner）：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部长，民族主义者。

“小家伙”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Ernst “Putzi” Hanfstaengl）：显赫的出版商家族出身，哈佛大学毕业。

海伦·涅梅耶·汉夫施丹格尔（Helen Niemeyer Hanfstaengl）：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美国裔妻子，帮助希特勒躲过警方搜捕。

瓦尔特·汉密特（Walther Hemmeter）：恩斯特·珀纳和罗伯特·瓦格纳的辩护律师。

弗朗茨·汉姆里希（Franz Hemmrich）：兰茨贝格狱卒。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慕尼黑大学学生，已经表现出对希特勒的狂热忠诚。

海因里希·希姆莱（Himmler Heinrich）：罗姆上尉的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的一名年轻成员。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时年34岁的奥地利裔纳粹党领袖，政治煽动者，狂热反犹人士。

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唯一获准拍摄阿道夫·希特勒的摄影师。

阿尔弗雷德·霍尔（Alfred Holl）：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辩护律师。

西格蒙德·因霍夫男爵（Sigmund Freiherr Imhoff）：巴伐利亚邦警司。

古斯塔夫·冯·卡尔骑士（Gustav Ritter von Kahr）：被任命为邦务委员的巴伐利亚政治人物，这个新设的职位掌握了巨大的行政权力。

奥尔根·冯·克尼林骑士（Eugen Ritter von Knilling）：保守派巴伐利亚邦总理，在委任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邦务委员一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卡尔·科尔（Karl Kohl）：威廉·布吕克纳的辩护律师。

赫尔曼·克利伯（Hermann Kriebel）：（退役）中校，“战斗联盟”（Kampfbund）军事主官。

奥托·赖博尔（Otto Leybold）：兰茨贝格典狱长。

赫尔曼·冯·洛索（Hermann von Lossow）：巴伐利亚军方首脑。他和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邦警总长汉斯·冯·塞瑟有紧密合作。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备受极右翼崇拜的一战时期德国陆军军需总监。

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Walter Luetgebrune）：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两名辩护律师之一。另一人是威力巴德·策奇维茨。

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司机，钟表匠，希特勒突击队的拳击好手。

海尔穆特·梅耶（Hellmuth Mayer）：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的同事。

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29岁的美国副领事，从啤酒城密尔沃基来到了另一座啤酒城慕尼黑。

吉奥格·奈特哈特（Georg Neithardt）：最高法院院长，阿道夫·希特勒案主审法官。

尤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教廷驻慕尼黑大使，后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

海因茨·佩尔内（Heinz Pernet）：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女婿。

恩斯特·珀纳（Ernst Pöhner）：前慕尼黑警察总长，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

洛伦兹·罗德（Lorenz Roder）：阿道夫·希特勒的辩护律师。还曾替恩斯特·珀纳和威廉·弗里克辩护。

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防卫军上尉，准军事组织“帝国战旗”领导人。

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一个极度反犹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主编。

马克斯·舒伊勃纳-里希特（Max Scheubner-Richter）：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一个活跃在慕尼黑极右翼和俄国侨民圈子里的阴谋家。

克里斯托弗·施哈姆（Christoph Schramm）：恩斯特·罗姆上尉的首席律师。

弗朗茨·施威耶（Franz Schweyer）：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部长，多年来一直不满希特勒和纳粹党。

汉斯·西克特（Hans Seeckt）：德国防卫军总司令。

汉斯·冯·塞瑟骑士（Hans Ritter von Seisser）：巴伐利亚邦警总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和赫尔曼·冯·洛索的密切盟友。

路德维希·施坦莱恩（Ludwig Stenglein）：希特勒审判的首席检察官。他的副手是汉斯·埃哈德。

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Julius Streicher）：纽伦堡一所小学的校长，激进反犹报纸《冲锋报》（Der Stürmer）出版人。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总理，后改任德国外交部部长。

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慕尼黑步兵士官学院的一名学员。

弗里德里希·韦伯（Friedrich Weber）：兽医，准军事组织“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政治领袖。

威力巴德·策奇维茨（Willibald Zezschwitz）：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两名辩护律师之一。

[1] 此处指德意志国，即后来历史学家所称的“魏玛共和国”。——编者注

序

慕尼黑市中心以西的布鲁登堡街（Blutenburgstrasse）原本是个僻静所在，此刻却聚集了一大群人。骑马的卫兵，便衣警察，还有两个营的邦警部队，在一座红砖建筑外巡逻。任何人不得入内，除非持有盖着相应印章的通行证及带照片的证件。^[1]建筑里面，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尽头的小房间，^[2]保安会检查包里有没有手榴弹^[3]，或是长筒袜里会不会有匕首。

这一天是1924年2月26日，举国上下凝神屏气，期待着叛国案庭审^[4]的第一天。据慕尼黑警方获得的线报，^[5]一伙流氓歹徒打算冲进城内阻挠法庭审案，营救被告人，说不定还会再发起一场叛乱。

上午快八点半，被告人阿道夫·希特勒走进挤满了人的法庭。他身着黑色套装，别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他的头发整齐地拢向左边，胡子修得很短，方方正正的，也就是人们戏称的“鼻涕制动器”^[6]。

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7]，体重达到了170磅，个人的最高纪录。不过在柏林《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的一位记者看来，他的瘦小身形仍然很不起眼^[8]——和已经被禁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散发的那些照片比起来，他本人没那么威风。在走向前排座席的途中，希特勒停下来^[9]亲吻了观众席几位女士的手。大概就是奥地利人的礼数^[10]吧，一位巴黎《晨报》（Le Matin）记者写道。

十名被告有九人和希特勒一样，是从这座建筑内的一个临时牢房押到这里出庭的。不过第十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被告，却是坐着豪华轿车而来。他就是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东线胜利的功臣，他制定的大胆战略差一点赢下了西线战事。然而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说他在1918年春的一系列冒险的攻势耗尽了德国本已不多的资源，将国家推向战败的结局。

鲁登道夫的表情坚毅而肃穆，一头精心修剪的白发，看上去是典型的普鲁士人，傲慢而自负。合众社记者说他“趾高气昂，一脸轻蔑地”^[11]走进来，仿佛超然于世外。从高耸的衣领里冒出来的硕大双下巴被他稀落卷曲的胡须遮盖住。鲁登道夫走到前面，在希特勒身边坐下，德国民族主义者卢克·吕德克（Luke Lüdecke）日后会说，他的样子就像“一座傲视这个世界的高塔”^[12]。

以叛国罪审判这么一位武功彪炳的人物，势必是轰动事件。然而在那天早上的法庭里，很少有人想到，将在这场法律大戏里露脸的真正明星是他身边的那个一等兵。

在审判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虽野心不小，但终归是个小人物，一个支持者不多的地方政党领袖。国际媒体时不时还会拼错他的名字，对他的背景介绍，就算有也很马虎，只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他领导了一场被《纽约时报》称为“巴伐利亚滑稽歌剧”^[13]的运动。然而等到审判开始，这样的好日子也就没多少了。

在法官们准备进入法庭时，房间的两扇侧门出于安全考虑都是关着的。来自美联社的外国记者看到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握了手，^[14]进行了友好的交谈。鲁登道夫看上去很镇定。希特勒则有些烦乱，看得出情绪紧张。这可以理解。

一旦罪名成立，刑法第81条规定最高可处终身监禁。不过对希特勒这种尚未取得德国国籍的奥地利人来说，还有另一条相关法律。

《保卫共和国法》第9节第2款要求，犯有叛国罪的已决犯在刑满后需驱逐出境。

希特勒会不会被定罪、入狱、驱逐，进而被世人遗忘呢？

那天早上出庭时，他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个下场。[\[15\]](#)

[\[1\]](#) *Sicherungsmaß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 Genossen*, February 23, 1924, HA 68/1498.

[\[2\]](#)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 February 15, 1924, HA 68/1498.

[\[3\]](#) 1924年2月27日《纽约时报》。

[\[4\]](#) 1924年1月28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1924年2月24日《前进报》；1924年2月26日《布拉格日报》；和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5\]](#) Report, February 8, 1924, MA 104221, BHStA, and preparations, MINN 73699, BHStA.

[\[6\]](#) 德文是“Rotzbremse”。

[\[7\]](#) *Aufnahme-Buch für Schutzhaft, Untersuch. u. Festungshaft-Gefangene 1919*, JVA 17000, StAM.

[\[8\]](#)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和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9\]](#) 1924年2月27日《巴黎之声》。

[\[10\]](#) 1924年2月27日《晨报》。

[\[11\]](#) 1924年2月26日合众社。

[12] 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65. 本书采用了他的姓氏Lüdecke的英文拼写形式。

[13]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14] 1924年2月27日美联社和1924年2月26日《汉堡导报》。

[15] Otto Gritschneid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52 and note 25, p.145.

第一篇 啤酒馆

1 贝格勃劳凯勒

在大城市邻近郊区^[1]的某些街灯稀少、警察三两成行的角落里，往往有那么一些房屋，你上楼后到达的终点就是歪歪斜斜的顶楼，顶楼上住的是面容苍白、才气横溢的年轻人，他们是睡梦中的犯罪分子，常常在胸前叉起胳膊，低头沉思……

——托马斯·曼，《在预言家的屋子里》（*At the Prophet's*）

1923年11月8日

一个阴冷、灰暗的上午，十点左右，一贯起得晚的阿道夫·希特勒在一阵剧烈的头疼中醒来，嘴里也在刺痛。^[2]他的牙已经疼了好几天了，但一直拒绝就医。没时间看牙医，他说。

今年四十三岁的希特勒在蒂尔施街41号租了一间靠里的小卧室。^[3]这个约八乘十五英尺的房间没什么陈设，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书柜以及一张大床，唯一的窗户被床头板挡住了一部分。墙上钉着几张画，亚麻地板上铺着破旧的厚毯。他很少请人到家里来，不过最近的这次生日，他在屋子里摆满了鲜花，还有一个装点着奶油钩十字的蛋糕。

希特勒扣上风衣腰带，手腕缠着马鞭，匆匆赶往位于谢林街39号的人民观察家报社——那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报。报社就在慕尼黑

的中世纪老城的北面，离其中一条林荫道仅几个街区。现年三十岁的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正坐在三楼一个四面白墙、空空荡荡的房间里，这个心思细密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已经以党的哲学家自居。^[4]他穿着一件紫罗兰色衬衫，外面是棕色马甲和蓝色外套，系了一条鲜红的领带。办公桌上有一叠纸，上面是一把当镇纸用的手枪。

罗森贝格正在和三十五岁的党内同僚、有一半美国血统的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投入地聊着，^[5]这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大个子行事张扬，涉猎广泛，家里拥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艺术出版社。两人谈了今早的报纸，在这个深陷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报纸的售价是50亿马克。^[6]不过还是比它的社会主义对手《慕尼黑邮报》便宜30亿马克。^[7]

在走廊里跺脚走来走去的希特勒，打断了罗森贝格和汉夫施丹格尔的谈话，他在嚷着：“戈林队长在哪？”^[8]

谁也不知道。赫尔曼·戈林经常迟到，要么就是出去和朋友共进午餐了，通常是在慕尼黑最贵的餐厅。不过那天上午，戈林是在上门钦郊区的家里，和患有肺炎^[9]的瑞典妻子卡琳在一起。

罗森贝格和汉夫施丹格尔起身迎接进屋的希特勒。希特勒先要两人发誓保密，然后直奔主题：罗森贝格需要画一系列海报，并负责出一份号外。^[10]汉夫施丹格尔的任务是用最隐晦、低调的方式通知外国媒体，一定要在当晚前往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但又不能透露原因。在这之后，两人要在晚上七点整到啤酒馆报到，带上手枪。

“该采取行动了，”希特勒说，“你们知道什么意思。”^[11]

* * *

在那个几乎看不到星星的漆黑夜晚，^[12]八点光景，^[13]一辆艳红色奔驰车^[14]停在了市中心以南大约一英里处的贝格勃劳凯勒门口。

像这样的啤酒馆经常用于举办政治集会，^[15]这里能提供充足的食物、酒水和空间，此外也指望这样一个热闹的环境有助于凝聚对党的忠诚。同时，啤酒馆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干扰对手集会有一个机会。

然而那个晚上的集会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只在《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上发了一则小小的公告，另外还有大约五十份邀请函，大多是最后一刻发出的。然而当晚有约三千人赶来参加这场政治集会。

在过去四十五分钟里，慕尼黑市警方一直在限制人们入内。人群已经扩散到警戒线外的石阶和马路上，一直蔓延到电车轨道。

那辆奔驰打开了车门，希特勒刚一下车——用他的话说——就“被一大群人围攻”了，他们叫嚷推搡着，希望他能帮他们进入会场。^[16]他只是受邀前来，^[17]希特勒说，他无权决定谁可以进去。他径直走向拱门，^[18]进入啤酒馆。

希特勒带着罗森贝格走进贝格勃劳凯勒的宴会厅，那是个昏暗阴森的地方，缭绕着香烟和雪茄的烟雾。远侧有一支铜管乐队，正演奏着沉闷的音乐。怀抱啤酒的侍者围着木桌走来走去。空气里有一股牛排和酸炖牛肉味。

人群里有政客、外交官、记者、银行家、酿酒师和商人，许多穿深色套装或军装的男人，还有身着皮草和长晚裙、披金戴银的女人。衣帽间里满是佩剑、高帽和大衣。《慕尼黑报》的一位记者说，这座德国啤酒名城的政治和爱国精英^[19]似乎都来了。

唯独只缺当晚的演讲人——巴伐利亚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原计划是由他来向支持者发表一场可能意义重大的讲话。他已经迟到超过三十分钟，人群开始躁动起来。

一头黑发、身穿黑色长外套的小个子卡尔终于走进了人头攒动的大厅。陪同六十一岁的卡尔前来的，还有巴伐利亚最高军事指挥官奥托·赫尔曼·冯·洛索将军，他戴着单片眼镜，脸上有军刀留下的伤疤，身穿军服，腰间佩剑。两人在警察的协助下^[20]才得以挤到大厅前面。

活动筹办人——烟草商奥尔根·岑茨（Eugen Zentz）做了一番简短的介绍，随后卡尔走上讲台演讲——或者说朗读了一篇稿。稿子冗长而枯燥，讲得也索然无味。他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统治，以及慕尼黑应该如何抵制这“瘟疫”和“极致邪恶”。人群里的一名警方线人形容演讲像一堂稻草一样干巴^[21]的历史讲座。^[22]

“有谁听得明白卡尔想说什么吗？”^[23]希特勒也不以为然。

按照既定计划，希特勒、罗森贝格和一小撮支持者在门厅集合。汉夫施丹格尔好不容易带着几个报社记者进了会场。他觉得大家太显眼了，于是奋力挤到吧台，买了几十亿马克的啤酒回来。

“在慕尼黑，”汉夫施丹格尔日后会说，“没人会怀疑，一个正把鼻子伸进大啤酒杯里的人能有什么不轨企图。”^[24]

希特勒靠着柱子喝了口酒，等待着。

在附近一条街的一座闲置工厂里，二十六岁的雪茄商人约瑟夫·贝尔希托德^[25]正在分发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弹药。^[26]他率领的这支小型精锐武装名叫“希特勒突击队”，是六个月前组建的，挑选队员主要看重的是勇气和忠诚。

突击队有大约125人，^[27]接受了在街头或啤酒馆之类的封闭空间内作战的训练，经常执行一些“格外危险的任务”^[28]，比如在一些行动中做先头部队，或者到最后来收拾残局。他们穿着野战灰军服和

黑色长靴，戴着滑雪帽，上面有一个红底的骷髅。希特勒突击队日后将构成党卫队最初的骨干，[\[29\]](#)也就是那支穷凶极恶的纳粹党“卫队”。

贝尔希托德旁边站着一个人虎背熊腰的男人，头上的钢盔有一个巨大的白色钩十字，腰间佩一把军官剑。他就是现年三十岁的队长赫尔曼·戈林，一名王牌飞行员，于1918年4月接替阵亡的“红色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成为大名鼎鼎的“飞行马戏团”中队的指挥官。戈林不到一年前才加入希特勒的这个党，但立刻成为社会声望最高的党员。

此时的戈林还不是那个有吗啡瘾的胖子，不是那个每根手指都戴着戒指、被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称为“妓院老鸨”[\[30\]](#)的戈林。他是一个英姿飒爽、趾高气昂的浪子，在慕尼黑名流圈子里有着“空中骑士”的美名。他得到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功勋勋章，号称在自己的空战生涯里亲手打下了至少二十七架敌机。战后他曾移居丹麦，然后是瑞典，在那里做过特技飞行员、开过私人包机，还曾是福克飞机制造公司的销售代表。

八个月前，戈林受命担任冲锋队指挥官，这是个有时不太服管束的庞大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建的这支“会场卫队”[\[31\]](#)，已经发展成一个“运动与体操”团队，潜心磨练队员的拳击、柔术和体操技能。冲锋队的组织结构日渐军事化，有连、营、团等编制，它的名称则是为纪念一战时德军的一支精锐特种兵部队。

冲锋队队员身着灰色制服，[\[32\]](#)大多是战争冗余物资，配滑雪帽、防风夹克，左臂佩戴一个10厘米宽的红臂章，上面有一个带圆底的钩十字。那身受德国东非殖民军着装启发的褐衫，要到几个月后才出现，并在1926年成为制服。[\[33\]](#)一个美国人见过这些人边高喊“消

灭犹太人！”边在慕尼黑街头正步走的样子，说那是他见过的“最彪悍的凶蛮之徒”。[\[34\]](#)

在戈林的领导下，任何东西在冲锋队队员手里都可以变成啤酒馆打斗的武器：折断的椅腿、重型啤酒杯、暗藏的刀子、大头棒、警棍、指虎以及枪械。“够残忍才能让人记住”，[\[35\]](#)希特勒说，他要求自己的这支私人军队打架不得临阵逃脱，“除非是断了气被人抬出去”。[\[36\]](#)

就在戈林和贝尔希托德紧急商量着计划的时候，一个负责侦察现场形势的人报告说，警方终于驱散了贝格勃劳凯勒门前的人群。[\[37\]](#)现在入口可以通行。此外，场外只看到十来个慕尼黑市警察。

贝尔希托德看了看表。[\[38\]](#)他和戈林下令所有人登上待命的卡车。

没过多久，卡车的大灯[\[39\]](#)已经照亮了罗森海姆大道的一条昏暗小街。四辆平板卡车在贝格勃劳凯勒门前的马路中间停了下来。

“别挡道——说你们呢！”约瑟夫·贝尔希托德冲那几个慕尼黑警察嚷道。第一辆车上的冲锋队队员跳下车，挥舞着汤普森冲锋枪和刺刀。好几个警察以为这些人是德国陆军的人。[\[40\]](#)用贝尔希托德指挥官的话说，这几个警察“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制服。[\[41\]](#)

戈林拔出剑，[\[42\]](#)从卡车侧踏板上跳了下来。他大声表示柏林政府已被推翻，[\[43\]](#)他的人只承认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的政权。二十来个人跟随他进入啤酒馆，高喊：“希特勒万岁！”

晚上8：25，大约一百人已经分散到周围封锁出口、控制电话、遮挡窗户，在大厅里沿墙站成一排。一小队人举着钩十字横幅，还有一队人在通向啤酒馆的石子路上推着一架重机枪。

此时希特勒已经脱下风衣，露出一身尺码有些过大的晨礼服。他的胸前别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他拿起酒杯喝了最后一口，据说随后还摔了杯子。^[44]希特勒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45]指向天花板，朝着宴会厅的方向走去。

他的保镖——人称“红格拉夫”的乌尔里希·格拉夫紧随其后，^[46]这个四十五岁的屠夫和前业余拳击手蓄着浓密的八字胡。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人。“留神背后开枪。”^[47]希特勒对格拉夫说。

在讲台上，正盯着讲稿的古斯塔夫·冯·卡尔抬起头，看到人群中正闪出“一条小路”^[48]。他一开始以为是来挑事的共产主义分子，^[49]正和几名军官坐在讲台阶梯附近的冯·洛索将军也这么想。

叫嚷声听上去像是一场迅速激化的争论。“站住！”“退后！”^[50]“你们要干什么？”酒客们站到圆木桌和椅子上，想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骚动。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看到烟雾缭绕的大厅里出现了一大片钢盔。他依稀能认出他们戴着血红的钩十字（swastika）臂章。

卡尔呆呆地站着。那群全副武装的男子推搡着向前推进，踹开挡道的桌椅，碗碟和啤酒杯被打落在地。^[51]大家惊愕地看着，以为即将目击一场刺杀。

到这个时候，偶尔的尖叫声已经被困惑与惶恐所取代。^[52]冲锋队员们在前厅布置好了重机枪，枪口朝向人群。^[53]

希特勒来到前方离讲台五六步远的地方，站到椅子上喊了几句，大概是在要求人群安静下来，但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一片喧闹中。有人用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台子附近的几个目击者说，开枪的是

希特勒的人，可能是他的保镖。人群还是没静下来，于是希特勒举起他的勃朗宁扣动扳机，朝天开了第二枪。[\[54\]](#)

他从椅子上跳下，奋力向隔着一张桌子的讲台挤过去。一名警察——弗朗茨·洪林格尔（Franz Hunglinger）警司——挡住了他的去路。[\[55\]](#)希特勒枪指警官额头，命令他闪开。邦警总长、总警监汉斯·冯·塞瑟骑士示意警官照做。

“全国革命已经爆发！”[\[56\]](#)希特勒在宴会厅前方嘶喊。六百名武装人员已经包围了啤酒馆，谁也不许离开。巴伐利亚和柏林政府已被推翻，他用尖厉刺耳的声音喊着，军营和警察总部已被占领。这些，自然都是虚张声势，但他的确希望能尽快成为事实。他出了不少汗。样子看上去是发疯了或者喝多了，或者两者皆有。

他转向前排的巴伐利亚三巨头：古斯塔夫·冯·卡尔、冯·洛索将军和冯·塞瑟总警监。他请他们和他一道去鲁道夫·赫斯早前订好的一个单间。[\[57\]](#)只需要十分钟，他说。[\[58\]](#)

几位大人物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缓缓离开宴会厅。[\[59\]](#)

[\[1\]](#) 引文见于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32。
本译文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钱鸿嘉译。

[\[2\]](#) 埃贡·汉夫施丹格尔未出版回忆录第101页，此外他还回忆了自己跟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学射击的日子，Box 45, John Toland Papers, FDR。

[\[3\]](#)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52和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271-72, 而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240-41中对房东的问讯也提供了一些侧面的描述。据慕尼黑黑警方记录, 希特勒是1920年5月1日搬进这里的。房东的女儿安东尼·海希尔特 (Antonie Reichert) 证实了这一日期, September 9, 1952, ZS 287, IfZ。

[4] 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理论深化”, 引自Alfred Rosenberg, interrogation with Munich police, VIa 2500/23, June 6, 1924, HA 67/1493。

[5]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06。

[6] 1923年11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

[7] 1923年11月8日《慕尼黑邮报》。

[8]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29。

[9]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07。

[10] Alfred Rosenberg, interrogation, VIa 2500/23, June 6, 1924, HA 67/1493。

[11]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29。

[12] *Vorgänge beim Stab der 7. Division am 8. 11. abends und 9. 11. vom Verlassen des Bürgerbräukellers bis zur Wiederinbesitznahme des Kriegs-Ministeriums.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82, Anlage 4, 507。

[13] *Bericht an das 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 München*, December 5, 1923, HA 67/1491。

[14] 常有历史文献称是一辆梅赛德斯，应该是错的。是一辆奔驰。

[15]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xii-xiii.

[16] NA T84 EAP 105/7, 96.

[17] Police report, *Wahrnehmung im Bürgerbräukeller*, November 22, 1923, HA 67/1490.

[18] 有一个说法是，和希特勒同车来的还有安东·德莱克斯勒 (Anton Drexler),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160. Hofmann引的是Walter Görlitz and Herbert A. Quint, *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Steingrüben-Verlag, 1952), 201, 但后者没有给出任何证据。德莱克斯勒在最初接受警方或媒体问询时没有这么说过，警方问讯过的目击证人也没有提到他们是一同抵达。如他后来所说，他可能是和马克斯·阿曼一起来的。

[19]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

[20] *Bericht über meine Tätigkeit in der Zeit von 8.-9. November*, HA 67/1490.

[21] 日期不详的机密报告, *Der Putsch vom 8. Nov. 1923*, HA 67/1491.

[22] 古斯塔夫·冯·卡尔演讲稿, “Vom Volk zur Nation!” MA 104221, BHSStA, 发表于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23]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回忆录,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6, HA 5/114II.

[24]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96.

[25] Police report, Nr. 2673, *Persönliche Wahrnehmung vor dem Bürgerbräukeller in der Nacht v. 8./9.11.23*, November 20, 1923 HA 67/1490.

[26] Johann Georg Maurer, VI a F413/24,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4, Walter Hewel, VI a F 425/24,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and MA 103476/3, 1217, BHStA.

[27]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0.

[28] Josef Berchtold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50.

[29] 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228. The SS developed over time into what Heinz Höhne called “the guillotine used by a gang of psychopaths obsessed with racial purity,” Heinz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3.

[30] Rebecca West, “Greenhouse with Cyclamens I” (1946), in *A Train of Powder* (Chicago: Ivan R. Dee, 1955), 6.

[31] 或称“会场守备队”，是在1920年2月24日或这之后成立的，Bruce Campbell, *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20.

[32]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8.

[33]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698, note 81. 冲锋队褐衫最早据说是1924年6月由弗里茨·帕策尔特 (Fritz Patzelt) 拿给关在兰茨贝格的希特勒的。监狱记录显示这个人在据称的那一天——6月9日——的确曾前来探视，143140, STA 14344, StAM。褐色帽子要更晚一些，最早是在1927年2月出现，Stabsführer der Oberstern SA-Führung, Akten-Vermerk, November 6, 1935, HA 5/129.

[34] Truman Smith, *Berlin Alert: The Memoirs and Reports of Truman Smith*, ed. Robert Hessen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57.

[35]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44.

[36] 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312, 513. 另外还有关于“破门槌”的描述, 见1923年8月14日《人民观察家报》, 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Voice: The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20-1933*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I, 55.

[37] Police report, *Wahrnehmung im Bürgerbräukeller*, November 22, 1923, HA 67/1490.

[38]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54.

[39]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回忆录,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6, HA 5/114II。

[40] 对队伍抵达的描述见Max Beckerbauer, *Bericht über gemachte Wahrnehmungen anlässlich der Versammlung der vaterländischen Verbände am 8. November 1923*, November 22, 1923, HA 67/1490.

[41] Berchtold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54.

[42] Police report, Nr. 2364, *Bericht über meine gemachten Wahrnehmungen im Saale des Bürgerbräukellers am 8. 11. 23 abends*, November 22, 1923, HA 67/1490.

[43] Police report, Nr. 1415, *Wahrnehmungen i[n] der Nacht vom 8./9. 11. 23 am Bürgerbräukeller*, November 20, 1923, HA 67/1490, 以及 Nr. 1609, *Wahrnehmungen [ü]ber die Vorgänge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November 1923*, November 21, 1923。

[44] Marc Sesselmann, 未出版陈述,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and incident reported by a detective, *überwachung der Versammlung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Donnerstag, den 8. 11. 1923*, November 20, 1923, HA 67/1490 and MA 103476/3, 1222, BHSStA.

[45] NA T84/2 EAP 105/7, 1255.

[46]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 7, F14, IfZ。

[47] NA T84 EAP 105/7, 98.

[48] NA T84 EAP 105/7, 1344.

[49] Kahr (NA T84/2 EAP 105/7, 1344) ; Lossow (NA T84/2 EAP 105/7, 1255) , 此外还有Georg Stumpf, *Hitlerputsch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11. 23*, November 23, 1923, HA 67/1490。

[50]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 另外警方记录也提及了这起骚乱, *Teilnahme an der Versammlung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XI. 1923*,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0。

[51] NA T84/2 EAP 105/7, 97以及Theodor Singer, *Versammlung der vaterl. Vereine im Münchener Bürgerbräukeller vom 8. November 1923*,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0。

[52]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回忆录,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HA 5/114II。

[53] NA T84 EAP 105/7, 125.

[54] 多数史料记载只有一枪, 但是许多目击者称还有一枪, 比如Friedrich Bernreuther, NA T84 EAP 105/7, 829, Georg Stumpf, *Hitlerputsch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11. 23*, November 23, 1923, HA 67/1490, 还有一名当时不当值的警察的陈述。

[55] 希特勒后来说洪林格尔是唯一让他肃然起敬的警察, NA T84 EAP 105/7, 806-7。

[56]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3-4, StAM;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以及Police report, Johannes Müller, *Bericht über den Verlauf der Versammlung am 8. November 23*,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0。

[57] Rudolf Hess, *Briefe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 November 8, 1923, 311.

[58] NA T84 EAP 105/7, 977.

[59] NA T84/2 EAP 105/7, 1257.

2 吃不饱饭的亿万富翁

加注一万亿的感觉是相当刺激的。^[1]

——美国驻慕尼黑副领事罗伯特·墨菲在1923年秋打牌时说

坐落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慕尼黑是一块富丽绮靡的新古典主义宝地，到处是咖啡馆、小酒馆、啤酒花园、画廊和歌剧院。过去一百年，这里的人口剧增，从一个3.4万人的地方市场变成约60万人的繁华都城^[2]。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和维特尔斯巴赫王朝（Wittelsbach dynasty）的继任者用慷慨的文化资助丰富了这座城市，让慕尼黑有了“伊萨尔河上的雅典”^[3]的美誉。

1871年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首度将德意志统一成一个单一国家时，慕尼黑实际上是被强拉硬拽进入联邦的。新国家由普鲁士统治——其领土比其他二十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大。慕尼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边缘势力。它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而是第三大城市，远远不及更大、更富有也更具影响力的北方城市柏林和汉堡。

仿佛是为了弥补地位的损失，慕尼黑纵情享受着这座艺术与啤酒、温情与好客之城的独特。到了世纪之交，慕尼黑已经进一步远离首都。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导致了传统、随和、农业化的天主教南方和尚武、傲慢、工业化的新教北方的分裂。慕尼黑人最难听的一句骂人话是说某人是“普鲁士猪”^[4]。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这种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推向了转折点。和德国的许多地方一样，慕尼黑一开始十分支持战争，以为会是一场速战速决的胜利。然而随着战争的拖延，一系列苦难来临了：物资匮乏、限额配给、黑市经济，还有各种代用品的普及，导致咖啡有一股大头

菜味，^[5]啤酒喝着像刷盘子水。^[6]英国的禁运更是雪上加霜。全国营养不良致死人数达到七十五万左右。^[7]

除了营造不切实际的期待，首都在战争动员管理中还过度扩大了联邦官僚体制。这样一来，饥饿而愤怒的人民自然就盯上了政客。事实上在很多慕尼黑黑人眼里，柏林比协约国更像敌人。发动并输掉战争的是普鲁士政府。此外，德国打胜仗的消息被严重夸大——败仗的消息却被封锁了——所以最后的投降让人们大吃一惊。

这场持续1560天的战争让德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约200万人丧生，伤亡总数将近500万。^[8]到1918年秋，这个国家每天要为战争付出1.36亿美元。靠借钱维持战争支出的德国政府背负了巨额债务。仅利息就已经超过了战前整个联邦政府的预算。经济危如累卵，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人民对当权者信心尽失。

经过这么多的流血牺牲，到头来柏林政府居然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大笔一挥，德国就失去了10%的人口、13%的领土、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还在实质上失去了军队——只象征性保留10万人。德国还不能拥有飞机、潜艇、坦克、重型火炮以及载重1万吨以上的船只。第231条明确德国要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并做出赔偿，赔款金额最终将超过330亿美元。^[9]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可耻的和平”^[10]，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屈辱。

君主政体和大国地位一去不复返。德国不再是这块大陆上最富有、强大的国家。协约国嘴上说着民族自决，但在重新规划欧洲版图时，却把说德语的人民划给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丹麦、重建的波兰王国和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获胜者的高尚理想和行动之间的确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虚伪和不公受到痛斥。

让君主和军国主义者大为惊恐的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建起了共和政体。更糟的是政权还首次落到了社会主义者手里，社会民主党近年在柏林以及北部和西部几个工业城市有了很大的势力。作为一个年轻的共和国的领导者，这些社会主义者是被临危扶持上台负责签停火协议的，以免让德国军方背上战败的骂名，同时也让慕尼黑又多了一个痛恨柏林政客的理由。

到了1923年秋，战后的幻灭已达至顶点。经过五年的动荡，这个国家已经处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缘。敌对的政治派系之间爆发了名副其实的内战。法律与秩序已经瓦解，或者在渐渐消逝。巴伐利亚和莱茵兰正在酝酿着分裂主义运动。

慕尼黑的极右翼想回到君主统治和穷兵黩武的年代。激进左翼在苏联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感召下想发起一场革命。主流政党被夹在一个越来越狭窄的中间地带，希望稳住摇摇欲坠的共和国。大部分人在孤立和愤懑中进一步走向极端。德国正在变成“一个没有民主的民主政体。”^[11]社会民主党人保罗·洛贝（Paul Löbe）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在巴伐利亚，国王治下享受的诸多特权已经不存在^[12]，这让这个邦面临的问题愈发复杂。魏玛共和国一夜之间剥夺了巴伐利亚对其铁路系统、邮政和税收的控制权。许多邦民觉得，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王国已经沦落。

这些对未来的惶惑充分反映在了货币汇率的不稳定上。战争开支以及为此产生的借贷，导致战前汇率保持的4.2德国马克比1美元，到1918年12月已经跌到8马克兑1美元。这还只是个开始。1923年1月，在德国没能按时支付赔款后，汇率跌到了将近18000马克兑1美元。法国立即指责德国违约，并入侵鲁尔区——德国剩下的煤、铁和钢产量有八成来自那里。德国工人利用政府出资支持的“消极抵抗”计划^[13]。

进行了反抗，其中主要的行动是一场大罢工。为了支持他们，柏林开始印更多的钱。

近2000台印刷机加班加点印制钞票。德国马克的贬值已经失控。汇率在7月达到35万马克兑换1美元，再到8月的第一天已经是100万马克兑换1美元。一周后，马克兑美元汇率跌破450万，迅速来到千万、十亿、千亿级别，最终在1923年12月达到最低的6.7万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已经沦为现代工业经济历史上最惨痛的恶性通胀案例。[\[14\]](#)

在希特勒冲击啤酒馆两周前，一个面包的售价是令人咋舌的18亿马克；现在则已经达到320亿。用不了多久，买一个鸡蛋的钱，在战前可以买到10000000000000个鸡蛋。[\[15\]](#)在通胀梦魇之中，中产阶级的毕生积蓄化为乌有。多少年的省吃俭用换来一场空。

在这场货币末日（monetary apocalypse）中，大企业趁机压榨工人，支付给他们的微薄薪水每分钟都在贬值。装满小推车的成堆马克不足以支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手握坚挺货币的外国人，却在恬不知耻地低价抢购房地产或家传的宝物。德国成了一个吃不饱饭的亿万富翁的国度。随着货币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德意志帝国掠夺了人民的财富，成为希特勒所说的“头号骗子和无赖”！[\[16\]](#)

在许多民族主义者看来，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是解决德国危机的榜样[\[17\]](#)。1922年10月，他进军罗马夺取了权力，至少流传后世的故事是这么说的。事实上，墨索里尼率领的只是一支武器装备很简陋的小部队，由大概2万名拥护者组成，他们在城外停了下来，意大利陆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将其击溃。是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任命了墨索里尼为总理。然而神话还是生根发芽了，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希望由一个充满生气与力量的领袖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右翼极端分子，将从这个神话中汲取灵感。

“如果给德国一个德国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政变前夕对伦敦《每日邮报》记者说，“人民会跪下来膜拜他，比墨索里尼得到的拥戴更甚。”^[18]记者不以为然。私下里他不屑地表示希特勒只是个“信口开河的商人”^[19]。但希特勒实际上已经决定效仿法西斯进军柏林了。

有多位顾问表示过，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希特勒一直在说要革命——而且高声斥责他的对手只知道摆空架子——但如果最终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他和他的党将是灾难性的打击。冲锋队慕尼黑军团指挥官威廉·布吕克纳说，迟早有一天他会管不住手下的人。希特勒以他一贯的方式，把眼下的局面简化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行动，要么等到别人行动时自己颜面扫地。

原本的计划是在11月10日周六晚出击。^[20]那毕竟是个周末，在希特勒看来是最适合闹革命的时间。这时候政府当局不上班，警察的人手减到了最低，路上车也少，不会妨碍他的卡车和部队调动。还有比较象征性的原因，次日上午——预计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将是签订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部可憎的停战条约五周年。

然而到了11月7日，希特勒改主意了。^[21]他收到了古斯塔夫·冯·卡尔明天晚上要在啤酒馆集会的消息，担心这场活动可能会预告一个消息，可能是卡尔宣布自己的讨伐柏林计划，甚至宣布巴伐利亚独立。^[22]不过，即便演讲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结果——希特勒估计这个可能性大一些——届时巴伐利亚政府的要人都会在啤酒馆——这是拉他们入伙，一同北上实施他的大胆计划的好机会。

希特勒认定，无论是哪种情况，考虑到当时空前混乱的局面，他都不能再等下去了，否则有被人抢风头、占先机的危险。^[23]这样的机会可能再也不会有了。他下令在24小时内发起攻击。

[1] Robert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25.

[2]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xviii. 到1923年的时候, 人口估计达到了630711人, *Gener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District of American Consulate at Munich, Germany*, Box 6, Folder 11, HI.

[3] Albrecht Hoffmann, *Der 9. November 1923 im Lichte der völkischen Freiheitsbewegung* (1923), 14. 这方面尤其可以参阅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Rainer Metzger, *Munich: 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以及Christoph Stölzl, ed., *Die Zwanziger Jahre in München: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im Münchner Stadtmuseum Mai bis September 1979* (München: Münchner Stadtmuseum, 1979)。

[4] NA T84 EAP 105/7, 2361. 关于这种对普鲁士的仇视, 可参阅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81.

[5] Kohlrübenwinter, 即“大头菜之冬”, 经常用来指1916~1917年那个冬天。

[6]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Hamburg, 1933; Rowohlt, 1998), 82.

[7] Frederick Taylor, *The Downfall of Money: Germany's Hyperinf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18-19.

[8] Richard Bessel, *Germany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6.

[9]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465-67, “330亿”这个数字见第480页。

[10] Erich Malitius, *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 Handel, 1935), 4.

[11] Dietrich Orlow,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71 to Present*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2), 137.

[12] 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 1923-1925* (London: F. Cass, 1989), 1-2.

[13]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91.

[14] Gerald D. Feldman, *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vii.

[15]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 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311, note 332.

[16] Frederick Taylor, *The Downfall of Money: Germany's Hyperinfl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249.

[17]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80. 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事件过去不到一周，赫尔曼·埃瑟就拿希特勒和意大利领袖相提并论了，speech November 3, 1922, St. R. V. 14/1922 ff, 23, HA 4/90.

[18] *Daily Mail*, October 3, 1923. 本文片段被收录于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580, 1027.

[19] F. L. Carsten, *Britain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British Documents*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84), 116.

[20] MA 103476/3, 1207-1208, BHStA.

[21] 希特勒说决定是会议当天做出的 (NA T84/2 EAP 105/7, 93), 主持人赫尔曼·克利伯中校 (NA T84/2 EAP 105/7, 402-3, 2621) 和起诉书上也是这么说;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15, StAM。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回忆也是这样, 见未出版回忆录, 60, F14, IfZ。

[22] 关于他的政见, 参阅 *Die Politik des Bayerischen Volkspartei*, HA 5/114II, 以及即将出版的费迪南德·克雷默 (Ferdinand Kramer) 和马提亚斯·比舍尔 (Matthias Bischel) 的学术版卡尔回忆录 (NL Kahr 51, BHSStA)。

[23] *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December 14, 1923, HA 5/120, 以及洛伦茨·罗德未出版的 *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 HA 5/126。

3 四发子弹

比如，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冲锋队不是个绅士俱乐部。^[1]

——赫尔曼·克利伯中校

武装人员押送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到门厅，抬腿迈过机枪，^[2]来到宴会厅外，与此同时，戈林的冲锋队正忙着把慕尼黑警察集中到一起。这支因为制服的颜色而被称为“蓝警”的部队总数大概1500人，^[3]不过当晚当值的只有40人上下。戈林的人毫不费力地就把现场周围的绝大多数警察给抓了起来。

在前排嘉宾席附近的一张桌子边，一个穿着旧巴伐利亚军服的清瘦小伙子站在椅子上。此人就是鲁道夫·赫斯，^[4]一名29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他抽出一张希特勒此前递给他的纸，开始朗读起来。

那是一份名单，包括巴伐利亚总理奥尔根·冯·克尼林骑士，他的三名阁员，警察局局长卡尔·曼特尔（Karl Mantel）。^[5]赫斯要求这些人站出来。他们被一一逮捕。^[6]至于为什么要扣押这些人，没有任何解释。

被扣押的人由赫斯负责。这个安静、腼腆、内向的年轻人时常让人觉得冷漠，甚至孤僻，不怎么能见到笑容，跟人眼神交流都极少。^[7]和许多知名的早期党员一样，赫斯也是在国外出生的，他的出生地是埃及亚历山大港，他父亲在那里做批发出口生意。直到12岁那年，他才被打发回国，去了莱茵河边的巴德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读寄宿学校。

赫斯战时曾在一支巴伐利亚部队服役（不过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和希特勒在一个团），后来成了一名飞行员。两人直到1920年才

认识；希特勒的一场演讲让赫斯振奋不已。他在同年7月1日加入了这个1600人的政党，是当时刚建立的“情报部门”的活跃分子，最终成了冲锋队的一个营长。此外赫斯还继续研究地缘政治、写诗、听古典音乐，追求自己对占星术的兴趣，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希特勒拉近了距离。

得到希特勒召见的时候，他正待在菲希特尔山（Fichtelgebirge）的祖屋。他连忙赶回慕尼黑，受命在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抓捕巴伐利亚总理和几名阁员。“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8]赫斯说。

他押着刚抓起来的9人顺着一道狭窄的楼梯来到啤酒馆二楼的一个房间，^[9]离啤酒馆经理科比尼安·莱恩德尔（Korbinian Reindl）的宿舍不远。又来了三名配备步枪和手榴弹的冲锋队队员，还有两个人在走廊把守。赫斯在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与此同时，^[10]在楼下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又递给希特勒一杯啤酒，^[11]然后检查了自己那把上了膛的毛瑟手枪。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休想活着离开这个房间”，^[12]希特勒对着小房间里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吼道。他满头大汗，^[13]挥舞着手上的枪，时不时喝口啤酒润嗓——嗓子发干的毛病是在一战末期吸入毒气后留下的——他冲着他们喊叫的样子，仿佛在对一大群观众演讲。

德国会有一个新政府，希特勒说，并且会由他亲自领导。鲁登道夫将军负责军队，希特勒提出可以把三人安排在军中任职。

“我清楚诸位的难处，”希特勒说，“但是这事总得有人来做。”^[14]他试图晓之以理，解释当晚行动的原因，说服三人接受自己的新角色。“我的手枪有四发子弹，”希特勒接着说，“三发给跟

我合作但背弃我的人，第四发留给我自己。”次日早上，希特勒用手枪顶着自己的太阳穴，再次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冯·塞瑟总警监提醒希特勒，当年早些时候他曾经承诺不发起政变。

“是有这回事，”希特勒说，“但是看在祖国的分儿上，请原谅我。”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没能遵守诺言。

洛索扭头和同僚耳语，被希特勒阻止。

这个计划真的有鲁登道夫的参与吗？洛索问道，显然是觉得奇怪，为什么鲁登道夫本人没有到场。

已经与他取得联系，希特勒说，很快就到。

卡尔提醒在场的各位，他对加入新政府是感到为难的，毕竟，用他的话说，他和巴伐利亚的几位同僚“被全副武装地押送出了会场”，人们对他们会缺乏信心的。他连演讲都没有完成。

希特勒看上去犹豫而惶恐。突然间，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主意似的，一下冲出了房间。

众人一言不发。卡尔站在窗边凝神思考。^[15]洛索此刻靠着一张桌子在抽雪茄。塞瑟在门边。卡尔打破了沉默：“他们居然敢把我就这么拐到这里来……不能跟个土匪似的就把人这么关着吧！”^[16]

那位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穆勒在宴会厅的桌边跟朋友聊着。有人问，希特勒是不是真的认为他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就把事情办成了。还有人指出，卡尔现在有了一个他一直渴望得到的天赐良机，那就是参

加谋反，创建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时不需要承担策动或领导的责任。

“肯定没谈拢，”穆勒说，“希特勒不是说十分钟解决问题，然后就回来吗？”[\[17\]](#)。

人群开始躁动起来。

“这就是德意志忠诚？”有人喊道，“这就是德意志统一？”[\[18\]](#)。

“南美！”一个人叫嚷着。

“戏院！”另一个人喊道。[\[19\]](#)。

有吹口哨的，起哄的，甚至还有人拿希特勒的形象开涮。那件裁剪拙劣的黑色风衣[\[20\]](#)，导致他被人比作饭馆大堂经理、小酒店礼宾员、已经拿出自己最上等的衣服的收税员，还有小地方来的新郎官儿，在自己大喜的日子里正手足无措。

赫尔曼·戈林拿着手枪上台，试图安抚骚动着的人群。希特勒的“意图是非常友好的”，他在喧闹的宴会厅里大喊着。结果戈林也不得不朝天鸣枪以引起人群的关注。他向观众保证希特勒此举“绝不是要跟卡尔作对”，也无意针对军队和警察。目标实际上是“柏林的犹太政府”。这话获得了一阵掌声。

大家需要有耐心。一个新德国正在诞生。何况，戈林用他那响彻宴会厅的洪亮声音说道：“你们手里有啤酒。有什么可担心的？”[\[21\]](#)。

尽管有戈林的这番笨拙的安抚，宴会厅里的许多人仍然在担心几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以及自己的安全。冲锋队队员已经控制了这里，他们列队站在墙边，把守着出口，全都武装到了牙齿，冯·洛索将军后来形容他们的脸“因为狂热而扭曲着”^[22]。穆勒教授就担心冲锋队队员会把所有人关一晚上。更可怕的是这拥挤的啤酒馆里保不齐会有人做出愚蠢或草率的举动，导致场面混乱，最终酿成一场血腥杀戮。

[1] NA T84 EAP 105/7, 429.

[2] NA T84/2 EAP 105/7, 1346 and 1489.

[3]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1, note 7.

[4] Dietrich Orlow, “Rudolf Hess: Deputy Führer” in Ronald Smelser and Rainier Zitelmann’s *The Nazi Elite*, trans. Mary Fisch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74–84.

[5] MA 103476/3, 1389, BHStA.

[6] NA T84 EAP 105/7, 401–402. 通常认为这些人质是当晚过了很久之后才被扣押的，连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90这样的权威都是这么认为。但从多份警方报告、媒体以及包括抓捕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在内（见1923年11月8日写给克拉拉和弗里茨·赫斯的信，还有此后的1923年11月16日和12月4日，辑录于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11–12。）的多人陈述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见Johann Kress statement, VI a F 2601/23, December 7, 1923, HA 67/1493;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3年11月10日《巴伐利亚邦报》。

[7] 例见Kurt G.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587.

[8] 见1923年11月8日写给克拉拉和弗里茨·赫斯的信，还有此后的1923年11月16日和12月4日，Nr. 322, in 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10.

[9] Police report,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and VI a F 168/24, January 30, 1924, HA 67/1494.

[10] 关于里屋发生的事，在起诉书、在屋内八人的审前和法庭证词以及宣传册中有大量述及，如Friedrich Weber's *Die Wahrheit* (1923)，《班贝尔格日报》1923年11月13日号以及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回忆录*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61。

[11] Graf testimony of November 25, 1924, *Zur Pistolenkomödie* HA 5/117. 格拉夫在自己的未出版回忆录中对这一段一笔带过，61-62, F14, IfZ。

[12] NA T84/2 EAP 105/7, 1346, and NA T84/2 EAP 105/7, 1489.

[13] NA T84/2 EAP 105/7, 1262.

[14] Anz. Verz. XIX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4-5, StAM; NA T84/2 EAP 105/7, 1262, 1346, 1490.

[15] NA T84 EAP 105/7, 163.

[16] NA T84 EAP 105/7, 229. 韦伯在1923年12月8日写信给岳父说，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称他们没有发出过任何威胁，HA 5/114I。

[17]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92.

[18] NA T84/2 EAP 105/7, 972.

[19] NA T84 EAP/2 105/7, 978.

[20] 大堂经理的比喻见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另见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37, 以及Kurt G.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185。

[21] NA T84/2 EAP 105/7, 956-57,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报道的那个版本措辞略有不同。

[22] NA T84/2 EAP 105/7, 1258.

4 德国尤利西斯

这不只是一次战败。这是一个世界的终结。[1]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

离开小房间时，希特勒对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小个子谢顶男人说，该去把鲁登道夫叫来了。[2]此人是马克斯·厄文·冯·舒伊勃纳-里希特中尉医生，羽翼渐丰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吸引到的众多神秘人物之一。

这个39岁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来自里加，化学专业工程师出身，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1910年来到慕尼黑，[3]与他同来的还有比他大将近30岁的新婚妻子玛蒂尔德·冯·舒伊勃纳。两人是在1905年暴动时认识的，当时他所在的骑兵部队奉命守卫她父亲的产业。他走法律程序获取了妻子的姓氏，成为舒伊勃纳-里希特（他的本姓是里希特）。

舒伊勃纳-里希特在战时志愿加入了一支巴伐利亚轻骑兵团，而后在1914年12月进入德国驻土耳其埃尔祖鲁姆领事馆工作。他很快被提拔为副领事，凭借这一身份，他得以目睹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4]在发回柏林的外交电文中，他描述了奥斯曼帝国在被俄国人击败后拿本国亚美尼亚少数族裔做替罪羊的情景，其中的细节令人发指。

一座座村庄被洗劫一空；女人和孩子被成群结队押送到别处“安置”，等待他们的是饥饿、疾病和屠戮，沿途随处可见烧焦的、被刺刀肢解的尸体。对于这场导致30万~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的人道惨案，他的函件以及他对屠杀发起的正式抗议，至今仍是最为珍贵的早期亲历叙述之一。

吊诡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对迫害和屠杀弱势群体的愤怒，和他病态的反犹主义立场是并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愈演愈烈。被调往波罗的海任德国第八集团军新闻官后，舒伊勃纳-里希特对俄国革命的影响深恶痛绝。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无非是恐怖、掠夺、奴役和饥饿，意在根除中上产阶级，毁灭西方文明。他还称那是个犹太人主使的阴谋。

1920年10月，舒伊勃纳-里希特创办了一个精英秘密会社“重建会”（Aufbau），促进德国和俄国民族主义者的结盟。会社的目标是与“国际犹太人”对抗，推翻俄国和魏玛共和国的所谓犹太政权，并最终实现莫斯科和柏林的君主复辟。

舒伊勃纳-里希特正是在这种右翼阴谋氛围下初识慕尼黑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彼时该党的简称“纳粹”还没有得到广泛使用。这个只成立了四年的组织，最初只是战后慕尼黑乱局中冒出来的四十几个大同小异的右翼极端组织之一。和当时的许多民族主义组织一样，这个年轻政党的成名靠的不是它支持什么，而是反对什么：它反共和国、反议会、反共、反犹。

然而与此同时，它在策略和组织层面上又有着相当的实力。^[5]它拥有一个侧重宣传的政工部门。它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已经军事化，成为慕尼黑最早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军队的政党之一。他们积极征募年轻人，为自己注入了活力与热情。据后人的一项估算，^[6]在1923年11月时，有三分之二的党员年龄在31岁以下。此外当然还有这个党的最大卖点：一个能让啤酒馆人山人海并点燃大家的狂热的讲演者。

在波罗的海老乡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指点下，舒伊勃纳-里希特于1920年11月20日第一次去听了希特勒的演讲，他和罗森贝格是在里加认识的，两人当时同在一家联谊会。没过多久，舒伊勃纳-里希特就

加入了纳粹党，和罗森贝格一样成了这个圈子的熟面孔。他们给人感觉是党内一个强势的派系，人称“波罗的海黑帮”。

接下来的三年里，舒伊勃纳-里希特鞍前马后为希特勒做了不少事。在他苦心经营之下，慕尼黑形成了一个不小的右翼俄国和乌克兰移民群体，其中许多人是老沙皇时代的贵族，为避革命和内战来到这里。他煽动反布尔什维克，动员他认识的那些担心左翼抬头的保守派实业家和地主捐钱。他还利用了自己在王室里的关系，包括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和俄国大亲王基里尔（Kirill）之类的人物。希特勒夸赞过舒伊勃纳-里希特的功劳：“所有人都是可以替代的，”他后来说，“唯独他不行。”^[7]

事实上舒伊勃纳-里希特正是怂恿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的人之一。他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吸取了教训，^[8]认识到列宁和一个小团体是怀着决绝之心，靠胆大包天的行动才改变了历史进程。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得到“阿塔图尔克”这个姓氏）在土耳其，也做了同样的事。在他看来，慕尼黑右派的谋反也是十拿九稳。柏林的腐败政权已经松动。是时候把它掀翻了。

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后，舒伊勃纳-里希特奋力穿过此刻已经挤满了冲锋队队员的贝格勃劳凯勒前厅。三个人跟了过来^[9]：他的管家约翰·艾格纳（Johann Aigner），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Kurt Neubauer），以及鲁登道夫的女婿、在战争中当过飞行员的年轻老兵海因茨·佩尔内。

一行人来到外面，经过一排停在啤酒馆门口作为路障的卡车——那是为了防备警方有人来增援。远处一辆电车发出断断续续的铃铛声，要其他车辆让路。^[10]

一名冲锋队队员挥手将他们放行，四人要驱车去14英里外的一个地方接将军，他对这场行动的支持将是整场行动成败的关键。

那个晚上，埃里希·弗雷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上将正在自家楼上的书房里。他并没有像平常的傍晚时分那样，坐在写字台前，而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11]八点半刚过，电话响了起来，那一头传来一个声音表示，“迫切期盼”^[12]他能亲临贝格勃劳凯勒。

鲁登道夫后来说，他问出什么事了，对方只是说很快会向他禀报。他称自己没听出致电人是谁，并且事先也不了解希特勒的意图。（打电话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

58岁的鲁登道夫将军正在艰难适应平民生活。他的军旅生涯始于12岁进入荷尔斯泰因一间军校学习。鲁登道夫出生于今属波兰的西普鲁士省份波森的克鲁瑟乌尼亚，是一个穷商贩的儿子——并非出身贵族——尽管当时以及此后人们一直错误地称呼他为“冯·鲁登道夫”。身为一介庶民的鲁登道夫没能成为显赫的骑兵团的一员，转而进入德国总参谋部，于1894年得到了参谋红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月里，鲁登道夫凭借在列日要塞的一场出人意料的胜仗出了名。他在东线坦能堡取得了更加了不起的战绩，包围人数占优的俄军，俘虏9万余人。鲁登道夫和他的上司保罗·冯·兴登堡上将后来联手击败俄国，从而确立了鲁登道夫大战略家的名声。

当时还是驻德记者的H. L. 孟肯（H. L. Mencken）形容鲁登道夫的智慧堪比“十个皇帝”，1917年夏，他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详述了自己对将军的印象：

一旦拿定主意，他会立即着手行动……他有想象力。他能领会内在含义。他有远见。此外，他还乐于运筹帷幄，解决难题。而更重要的是，他

没有儿女情长。你见过他饱含热泪谈什么祖国，或像兴登堡那样满口虚伪陈词吗？当然没有。他关心的只是博弈本身——而且在这方面非常擅长。

孟肯说，鲁登道夫被誉为“深不可测的战场尤利西斯”^[13]。

然而对许多在指挥部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来说，鲁登道夫是个傲慢、冷漠、离群的人，不懂得折中或者承认错误。而且他还不能忍受有人和他意见相左。他对下属总是绷着脸，所谓下属，在他看来就是几乎所有人，尤其是平民百姓。他整天戴着单片眼镜，以至于有传闻说他睡觉都戴着。缺乏幽默感是他的注册商标，这本身也成了人们逗乐的素材。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说，鲁登道夫并不总是这么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她记得有段时间他是“欢快而无忧无虑的”，他的面部表情还没有凝固成“那副无动于衷的顽固模样”。她认为是战争的经历——可能还有由此而来的崇高声望——把他锤炼成了一个威严而可怕的男人，感情“已经结成了冰”。^[14]

然而随着德军在西线的溃败，那些反对他的大举进攻策略的人越来越有底气，鲁登道夫自己也到了几近精神崩溃的境地。他彻夜不眠，一点小小的刺激就能让他大发脾气，陷入不能自己的哭嚎。鲁登道夫对酒精的依赖加剧，开始沉浸于自己的想象，设想战壕里西班牙流感爆发，导致敌军大量减员，为德军赢得奇迹般的胜利铺平道路。

1918年10月，鲁登道夫被解除军职。“皇帝把我给撤了”，他对妻子说，这件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他的解职以及此后一个月德国的战败是“我人生中最苦涩的一段时间”。曾经的指挥官，现在要乔装潜逃了，戴着假胡子、墨镜以及一本伪造的护照，先是去了丹麦，而后又在瑞典海斯勒霍尔姆一座乡村别墅里住了一阵子。

“还有谁能有我这么命苦”，鲁登道夫后来写道。他将自己和古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相提并论，后者在和罗马作战后过上流亡生活，最终服毒自尽。鲁登道夫说他已经生无可恋，感觉在和自己、和世界对抗。他白天花很多时间在树林里漫步，思考自己的战时经历，为日后的一系列回忆录做准备。

1919年2月，鲁登道夫回到德国，后悔自己没有战争末期果断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来]独揽大权”。又过了一年，在参与了谋划欠周全的“卡普政变”——那是一场企图扶持右翼军政府上台的行动——后鲁登道夫再次被迫认输。他在1920年夏登上一列前往慕尼黑的火车，^[15]称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卡尔的巴伐利亚盛情欢迎了鲁登道夫的到来。^[16]

鲁登道夫开始死咬着一个说法不放，即德国输掉战争肯定不是因为他不计后果地把赌注压在西线，耗尽了人力和资源，也不是他坚持要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导致了美国的参战。事实上，是他的国家“被背后捅了刀子”。左翼政客的懦弱出卖了国家，先是在战场上的投降，而后《凡尔赛条约》的签署是第二次卖国。德国因此置身于孱弱而危险的境地，外国人像秃鹫一般，在一旁等待分食它的尸体。

在战后的世界里，将军看到了同样的一股叛国和懦弱的邪恶势力在兴风作浪，毁坏了他的祖国的道德品质。他尤其认为德国的衰弱与崩塌应归咎于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以及天主教徒，这些人被他悉数视为可憎的外国势力。他加入了舒伊勃纳-里希特的秘密会社“重建会”，并于1921年3月结识了阿道夫·希特勒。^[17]介绍两人认识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

希特勒很快在公开场合称赞鲁登道夫是“德国最伟大的统帅”^[18]。他说鲁登道夫新近出版的书《战争领导与政治》（*War Leadership and Politics*）帮助他理解了现代世界的许多重要真理，

尤其是犹太国际阴谋势力如何在法国和英格兰拥有巨大影响力，甚至可能还掌握着协约国政府。鲁登道夫反过来也钦佩希特勒的“坚定决心”，^[19]称他是仅存的一个还懂常理的政治领袖。

到了1923年夏天的时候，鲁登道夫已经把自己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纳粹党总部——他的妻子形容那里的活动就像“鸽子窝似的进进出出一刻不停”^[20]。她还说将军把自己的谋反大业隐蔽得很好。他会去自己的花园，像个退休老人似的修剪玫瑰，浇花，保养草坪，发生在身边的那些密谋似乎跟他毫无关系。

一行人从啤酒馆出发来到索伦-路德维格斯高地这处高档居住区，他们驶入海尔曼街，停在了五号宅邸门口。司机按了下喇叭。在后座的舒伊勃纳-里希特跳下车，和海因茨·佩尔内一同入内。^[21]鲁登道夫穿着一身棕色花呢狩猎夹克^[22]招待了他们。为了节省时间，他说，他决定不换制服了。

他们的确是要赶时间，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军这有违礼仪的反常之举是另有动机的。一旦计划失败，作为一介草民的鲁登道夫可以辩称自己对谋反一事毫不知情。

几人来到摆满书籍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将军和兴登堡一起凝视地图的油画，草草聊了几句后，鲁登道夫披上大衣，拿着自己的绿色费多拉帽上了车。他们在雾气蒙蒙的夜里疾驰，^[23]用鲁登道夫的话说，是“狂风般的速度”^[24]。天开始下起雪来。^[25]

^[1] 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9.

^[2]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7, StAM; see also NA T84/2 EAP 105/7, 98.

[3] Mathilde Scheubner-Richter, August 18, 1952, ZS 292, IfZ.

[4] Paul Leverkuehn, *A German Officer During the Armenian Genocide: A Biography of Max von Scheubner-Richter*, trans. Alasdair Lean (London: Gomidas Institute, 2008), lxxxvi, 18-29. 关于舒伊勃纳-里希特的愤怒, 还可参阅 *The Armenian Genocide: 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1915-1916*, ed. Wolfgang Gus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4)。

[5]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8.

[6] 据1923年11月9日对1672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统计, 准确说是对994名有出生日期数据的党员, 31岁以下的占将近三分之二,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68-72。

[7] Georg 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Verlag K. W. Schütz, 1977), 15. 据玛蒂尔德·舒伊勃纳-里希特说, 希特勒是在1931年或1932年这么说的, August 18, 1952, ZS 292, IfZ。另见Hermann Esser, interview, March 5, 1964, Band II, 6, 和March 6, 1964, Band I, 21, ED 561/4, IfZ。

[8] 见Michael Kellogg, *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 White émigré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17-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和Stefan Ihrig, *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手稿,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HA 5/114II。

[10] 约翰·布鲁克梅尔 (Johann Bruckmeier) 的观察, Police report, Nr. 1609, *Wahrnehmungen [ü]ber die Vorgänge im Bürgerbräukeller am*

8. *November 1923*,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0。

[11]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248.

[12] November 9, 1923, NL Ehard 94, BHStA; 在NA T84 EAP 105/7, 531中亦有述及。

[13] 1917年6月《大西洋月刊》。

[14]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19.

[15] 对此鲁登道夫有个不太可信的说法，称他去那里是为了跟他的一个姐姐住的近一些，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8; NA T84/2 EAP 105/7, 496。

[16]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172, 178, 180-81, 280。对此鲁登道夫在*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4-5中略有提及。另外可参阅 Robert B. Asprey,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at War: Hindenburg and Ludendorff Conduct World War I* (New York: Quill, 1991), 484, 以及 Will Brownell and Denise Drace-Brownell, with Alex Rovt, *The First Nazi: Erich Ludendorff, the Man Who Made Hitler Possible* (New York: Counterpoint, 2016)。

[17] 不少史学家称是赫斯介绍他们认识的，但舒伊勃纳-里希特促成两人的见面比赫斯早了四个月。

[18] 后来他又说是“战争中最伟大的将军”，1938年1月17日《生活》杂志。关于鲁登道夫受到的赞誉和他的缺陷，可参阅Brownell and Brownell with Alex Rovt, *The First Nazi: Erich Ludendorff, the Man Who Made Hitler Possible* (New York: Counterpoint, 2016)。

[19] NA T84/2 EAP 105/7, 525.

[20]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245. 赫尔曼·埃瑟曾详述鲁登道夫公馆的热闹景象, interview, March 3, 1964, Band II, 30-32, ED 561/3, IfZ。

[21] 他起初否认自己在车里, 不过后来承认了, NA T84 EAP 105/7, 694。另一个当时在车里的约翰·艾格纳受审时也是这么说的, VI a F 36/24, January 5, 1924, HA 68/1494。珀纳的儿子也在车中的传闻不实。

[22] 史学界一般认为鲁登道夫当时身着军装, 包括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07和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88等知名权威, 但从当晚多名目击证人的陈述看并非如此。鲁登道夫的着装选择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跟更大层面上有关预谋的问题是相关的。

[23] 约翰·艾格纳,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8, HA 5/114II。

[24] NA T84 EAP 105/7, 531.

[25]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42; 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5 “聒噪、粗陋、刺耳”

我经常要在艰难的状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在这里就是如此。^[1]

——埃里希·鲁登道夫上将

希特勒过了很久才一个人来到宴会厅，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携三巨头一起回来——此时他发现人群越来越躁动，有跟他翻脸的危险。讥讽和嘘声不时传来。希特勒要求肃静，提醒他们别忘了前厅那挺机枪。

然后希特勒和之前的戈林一样向观众保证，这场全国革命的目标不是卡尔的巴伐利亚政权、警方或军队；只是为了反对“十一月罪人”把持柏林政府。他公布了自己的新内阁，甩出了仍未到场的鲁登道夫将军的大名，称其是拟建军队的总司令，他承诺他们已经做好“向邪恶巴比伦城——柏林进军”的准备。^[2]

人群是如何反应的呢？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抛却了一切怀疑，当时大厅中央一张桌子边的一名不在岗警察说道。他还听到有人喊：“希特勒万岁！”^[3]

于是希特勒要求在场的众人向巴伐利亚领导人卡尔、洛索和塞瑟表明他们的态度，他说他们此刻正“踌躇不决”。他有意隐瞒了几位领导人的抵制态度。“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会站在他们一边？”^[4]

演讲谈不上有新意——演讲者“聒噪、粗陋、刺耳”^[5]，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一名记者说，但是观众高声表达了赞同。^[6]穆勒教授认为这是一场经典演说。事实上在他

看来，这简直是一个魔幻、魅惑的瞬间。希特勒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心态，“把他们像手套一样翻了过来”^[7]，或者用汉夫施丹格尔的话说，就像大师演奏斯特拉迪瓦里琴一般驾驭着他们。

这排山倒海的赞同声传到了里屋。^[8]他的任务完成了。希特勒再次来到被扣押的领导人面前。“你们听到大厅的欢呼了吗？”他问。

啤酒花园外，年轻的希特勒拥护者马克斯——或“马克”塞瑟尔曼——正在跟一个站岗的朋友说话。在走到室内的灯光下欣赏那人的枪时，塞瑟尔曼凑巧透过窗户看了一眼。意外的是，他看到了里屋正在进行的谈判。卡尔当时坐在一张圆桌边，双手抱着头望向远方。塞瑟尔曼心想，他的样子看上去是被吓坏了。^[9]

僵局在持续，里屋无法达成共识，宴会厅却越来越吵闹。突然之间，又一阵欢呼和喊叫声响起，同时伴随着敬礼和靴子碰撞的声音。有人喊了一个军事口令：“立正！”^[10]

鲁登道夫上将驾临贝格勃劳凯勒。^[11]当时在观众席里的同僚少将卡尔·奥古斯特·冯·克莱因亨策骑士（Karl August Ritter von Kleinhenz）说，他从未见过将军的表情如此凝重。^[12]希特勒在里屋门口迎接鲁登道夫。^[13]

“先生们，我和你们一样意外”，将军说，他看也没看希特勒，直接对着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说道。这显然是在表达一种轻蔑。

为什么那天鲁登道夫的脾气比往常还要暴躁？

可能是他不赞成希特勒的行动，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也可能是不满用枪逼着卡尔、洛索和塞瑟离开宴会厅的做法。或者是他不能接受自己一个战功彪炳的将军居然要听命于一个一等兵。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切都可能是为了掩盖他与这场行动的瓜葛。

鲁登道夫始终不承认自己在政变筹划阶段有任何参与，但多年后，和他一起去了贝格勃劳凯勒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确认，[\[14\]](#)他对此事并非不知情。然而不管他事先知道多少，无论如何鲁登道夫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和希特勒联手了。在那晚的谈话中，他首先提到一场“伟大的全国粹运动”，并请求三巨头“与我们携手”。他向三人伸出了手。[\[15\]](#)

第一个向将军投诚的是洛索；他攥着自己的军刀，小声地表达了自己的认同，几乎像是在耳语。似乎在等别人先表态的塞瑟也伸出了手。然而卡尔依然不为所动。他觉得希特勒的粗鲁举动给他造成了“个人伤害”。鲁登道夫试图劝他缓和态度，还说卡尔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辜负德国人民”。

卡尔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场政变要么成不了，成了也持续不了多久。[\[16\]](#)只要希特勒能有耐心再等一两个礼拜，前景就可以理想许多。

这时候，巴伐利亚法官、前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也来到小房间，此前他一直和警局里的老同事坐在宴会厅的一张预定桌边。珀纳是纳粹党发展初期的重要支持者。任警察总长期间，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杀人成性的右翼恶棍正在巴伐利亚横行，他给出了臭名昭著的回答：“是的，是的，就是太少了点！”[\[17\]](#)

珀纳被叫到里屋来是因为在希特勒身边就属他和卡尔最熟。两人从1920年3月卡尔上台以来一直在共事。

“我不能参与〔这场政变〕”，卡尔坚称，他自认是一名君主主义者，像这样惊天动地的行动，需要得到国王的首肯才行。他口中的国王指的是巴伐利亚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在一战结束时被废的王储鲁普雷希特。

“这正是我的看法，阁下”，有着六英尺二英寸的瘦长身形的珀纳俯身对卡尔说。^[18]作为国王的忠诚拥护者，他们有责任采取符合君主利益的行动。珀纳觉得卡尔看上去“心烦意乱”，在场诸位陷入“难堪的缄默”。^[19]

希特勒站出来说，他只想匡扶社稷，纠正那些推翻王朝的罪人做的错事。何况，希特勒说，难道他们真的要回到宴会厅，宣布这一切“是不对的，今晚不会闹革命了”？^[20]

大概40~50分钟后，卡尔屈服了。他接受了希特勒给的一个职位，条件是他在新政府中的身份将是“国王的总督”。^[21]

作为军警界的代表，鲁登道夫和珀纳在当晚达成的协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出面劝说心存疑虑的政府首脑回到宴会厅，与纳粹党人一同走上讲台。洛索后来表示，他当时曾小声对同僚们说，要“演一出戏”。^[22]

就在众人准备回到挤满了支持者和冲锋队队员的宴会厅时，卡尔突然踌躇起来，想要打退堂鼓。希特勒向这位不情愿的盟友保证，到时候大厅里将响起他这辈子都没见识过的热烈掌声。卡尔耸耸肩。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他说：“现在没有退路了！”^[23]

^[1] NA T84 EAP 105/7, 532.

^[2]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6, StAM.

^[3]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4] 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 *Im Wandel einer Welt. Erinnerungen Band Drei, 1919-1932* (München: Süddeutscher, 1966),

162-63, 以及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88.

[5] 1923年11月10日《新苏黎世报》第二晨版。

[6] Karl Rothenbücher, *Der Fall Kahr* (Tübingen: Mohr, 1924), 6; 1923年11月9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以及1923年11月12日《贝希特斯加登公报》。

[7] NA T84 EAP 105/7, 978.

[8] 关于里屋的主要目击陈述见第3章。

[9] 马克·塞瑟尔曼的未发表陈述(他的本名为马克斯),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10]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7, StAM.

[11]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1.

[12] NA T84 EAP 105/7, 1046.

[13] 希特勒可能确认了舒伊勃纳-里希特在路上跟将军说的话。Ludendorff interrogation, 1923年11月9日, NL Ehard 94, BHStA.

[14] 据1967年3月与吉奥格·弗朗茨-威尔林(Georg Franz-Willing)的通信, 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内说, 有关政变的细节全都向将军通报过,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ch Oldendorf: Verlag K. W. Schütz KG, 1977), 67, note 6.

[15] NA T84/2 EAP 105/7, 1266, 1348, 1492.

[16] Lorenz Roder, *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 HA 5/126.

[17]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46-47.

[18] NA T84/2 EAP 105/7, 1362-63.

[19] *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1923年12月19日, HA 5/120。

[20]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103.

[21] NA T84 EAP 105/7, 1348.

[22] NA T84/2 EAP 105/7, 1260 and 1755. 洛索称他在讲台和去里屋的路上都这么说了。对此希特勒、韦伯、珀纳和鲁登道夫当然是不信的。详见法庭辩论。

[23]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7, StAM, 以及NA T84/2 EAP 105/7, 101。

6 流光溢彩的都市

这座美丽、舒适的城市，曾经吸引了帝国最杰出的人物。怎么现在他们都走了，取代他们的是所有腐烂而邪恶、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出路的货色？这些人仿佛被魔力吸引，纷纷来到慕尼黑。[\[1\]](#)

——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成功》
（*Erfolg*）

放在十年前，很难想象阿道夫·希特勒会有机会面见鲁登道夫将军这样的显赫人物，更不用说还结成了同盟。1913年5月25日，时年24岁的奥地利穷画家希特勒首次来到慕尼黑。他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只有黑色手提箱里。[\[2\]](#)

在施赖斯海默街34号的裁缝铺，他看到窗户上贴着手写字条说“有带家具的房间可供体面男士租住”[\[3\]](#)，于是顺着一道阴暗的楼梯走上了三层的阁楼。与他同行的是三个月前在维也纳一个男士之家认识的鲁道夫·霍伊斯勒（Rudolf Häusler），一名20岁的失业商店售货员。[\[4\]](#)

那是个顶多八乘十六英尺的小房间，位于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区施瓦宾的最西边。这里似乎到处是拖着画架、颜料盒、画布卷和作品集的艺术家。19世纪末的时候，生活在这个区的画家、雕塑家已经比柏林和维也纳加起来还多。[\[5\]](#)

希特勒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他会画明信片和水彩画，大多是慕尼黑的宏伟建筑：有300英尺尖顶的圣母教堂；巨大的啤酒馆——普拉茨畔皇家宫廷啤酒屋；位于音乐厅广场的意大利式建筑“统帅堂”。而后他会去咖啡馆、啤酒馆以及城中各处的街角兜售他的作品。“刻

奇”（kitsch）一词^[6]据信就是这段时期在慕尼黑出现的，用来指称卖给游客的廉价纪念品。

和那一带的许多艺术家不同的是，希特勒通常不会到户外的自然光下作画。他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在俯瞰一个学校操场的窗户边摆一个画架。他用来临摹的明信片或照片是房东的儿子、12岁的小约瑟夫·伯普——又叫“佩皮”——帮他弄来的，^[7]希特勒会用些硬币或糖果来犒劳他。他称自己在慕尼黑的最初15个月是他人生“最快乐，无疑也最充实”的时光。

他立刻喜欢上了慕尼黑。用他日后的话说，这是“一座德国城市”，和他过去五年所在的维也纳形成鲜明反差，后者被他鄙称为“一个种族混杂的巴比伦国”。然而根据希特勒的房东太太安娜·伯普（Anna Popp）的回忆，她的这位新房客并不怎么去发现这座城市，整天像个隐士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偶尔外出，通常会带些香肠或点心回来。除此之外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画画和看书。^[8]

在房东一家的印象里，从来没有人来看过他，也没有任何个人邮件，仅有的一次是在维也纳的妹妹宝拉突然来了封信。他似乎也没有结交任何好友。施瓦宾一带的一些居民记得希特勒，包括街角一家店的面包师，他能想得起来的只有此人爱吃甜食，有礼貌，还有那身长礼服很整洁，他的裁缝房东经常会给他熨烫。

没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当时曾像他日后声称的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柏拉图、卡尔·马克思^[9]或阿图尔·叔本华等人的哲学著作。不过佩皮记得曾经替他去附近的巴伐利亚国立图书馆（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找书，比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On War*）^[10]和《德国海军年鉴插图版》（*Illustrated German Naval Almanack*）。有一次房东太太问她的房客，这些读物对他的绘画能有什么帮助。

“亲爱的伯普太太，”她说他当时答道，“人活一辈子，谁知道什么东西能派上用场，什么不能呢？”^[11]

希特勒到来之时，慕尼黑的确正值一个生机盎然的文艺“黄金年代”^[12]。希特勒钟爱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就是在这里写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名歌手》和《莱茵的黄金》。为避反犹潮离开维也纳的古斯塔夫·马勒，也是来到这里，用一个有858名歌手的合唱团和171名乐手的管弦乐团首演了自己的《第八交响曲》。

还有许多艺术家来到慕尼黑，以便沉浸在这里的氛围之中，顺带享受相对低廉的房租。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有段时间住在谢林街30号，跟未来的纳粹报社总部一条街。他就是在慕尼黑开始完全转向当代主题和挪威背景设定的创作的，其中不少开创性的社会现实主义剧作，包括《玩偶之家》^[13]《群鬼》《野鸭》和《海达·高布乐》，正是在这里诞生。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曾在宁芬堡街45号小住，在那里写了《浪迹海外》，并完成了代表作《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当然，自1891年易卜生离开后，慕尼黑的艺术家们又开启了其他一些带有先锋派色彩的现代主义美学运动。音乐中有理查德·施特劳斯对无调性和不谐和音的摸索，摒弃了旋律与节奏。绘画中有保罗·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的抽象实验，后者尤以他对“纯粹绘画”的追求掀起了一场现代艺术革命，超越了希特勒崇尚的那种精心雕琢的自然主义再现。

从其他许多方面看，慕尼黑处在现代派和先锋艺术的前沿。得名于康定斯基名画的慕尼黑团体“青骑士”（Blue Rider）开创了一种雄浑的用色，启发了日后的德国表现主义。一个由离经叛道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组成的青年团体将这座城市变成了新艺术运动之都。分

离主义运动在慕尼黑兴起的时间远比名气更大的威尼斯和柏林要早。
[\[14\]](#).

希特勒客居的这座城市最早举办了巴勃罗·毕加索的个人画展，本地土生土长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自然也在这里上演了他的早期剧作。此时的慕尼黑号称拥有比柏林以及巴黎以东任何欧洲城市都多的卡巴莱。在土耳其街一家施瓦宾酒馆的里屋，就有一个名叫“十一刽子手”的卡巴莱团体，存在时间不长但极具创造力，产生了很大影响。穿着绯红色袍子、戴刽子手面具的表演者攻击世俗社会，将它的道德与陈规放在砧板上，展开鬼头刀一般锋利的批判。

在半个多世纪里，慕尼黑一直是一个推崇天下大同与包容的地方，对外国人、局外人和自由的思想者保持着欢迎的态度。无政府主义剧作家、诗人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形容那些成群结队前往咖啡馆和卡巴莱的人是慕尼黑的波希米亚一族：

画家、雕塑家、作家、模特、闲人、哲学家、宗教创始人、革命者、改革者、性道德家、心理分析师、音乐家、建筑师、女工匠、离家出走的富家女、永远的学生，有的勤勤恳恳，有的无所事事，有的热爱生活，有的厌倦尘世……[\[15\]](#).

就在两个街区开外，跟希特勒同一条街上，住着一个木匠，他把一间房租给了一个俄国移民。此人自称是梅耶先生，但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是1901年搬到慕尼黑的，在这里，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名字。除了时常在施瓦宾人咖啡馆进行的知识分子辩论和象棋局，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列宁发表了革命小册子《怎么办？》，还办了一份《火星报》。列宁在慕尼黑的作品被偷偷送回沙俄，帮他争取到了不少新的追随者，包括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洛茨基还因此产生了搬到这里的念头，并于1904年成行，住了六个月。

慕尼黑是个既进步又堕落的城市，这让它显得跟呆板、规矩的皇城柏林截然不同。在希特勒到来前，慕尼黑居民托马斯·曼出版了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在对中产阶级腐化的描绘中捕捉到了这种世纪末的气氛。同在那个时候，一个穷困潦倒的前汉堡高中历史教员也刚搬到慕尼黑不久，他的名字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6]通过一部划时代巨著《西方的没落》，他开始将这种毋庸置疑的瓦解主题转移到西方文明之中。斯宾格勒试图将历史变成哲学甚至预言，展望了西方即将到来的崩塌，以及一个新恺撒的上台，届时，他将得到乌合之众的盲目拥戴。

而这座耀眼的都会本身也走向了衰落。到了1920年代初，慕尼黑对画家、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的吸引力已经跟此前半个世纪无法比拟。此时它孕育的是另一群人，他们追求的东西要残暴得多。现代主义先锋派与针锋相对的尚武、排外保守派将在这座城市爆发一场激烈冲突——这场慕尼黑之战，对德国乃至世界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些艺术家就已经开始离开这个沉醉于昔日荣光的地方，许多艺术家不满地表示，创作精神在这里受到限制，被迫要去与这座城市自身不服管束的做派保持一致。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青骑士画派的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和奥古斯特·马克（August Macke）自愿参战，都死在了西线。康定斯基于1914年彻底离开了。崇尚和平的钢琴演奏家雨果·鲍尔（Hugo Ball）和妻子艾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搬到了苏黎世，1916年在那里办了一个叫“伏尔泰卡巴莱”的咖啡馆^[17]并开创了艺术抗议运动“达达”（Dada）。

留在慕尼黑的作家和演员们处境艰难，许多出版社和剧场关门了，有的则削减了剧目制作的预算。煤炭匮乏导致很难在冬天维持运营，战争年代的困苦让市民不愿意把钱挥霍在剧院或最新的小说上。

更糟的是排外愈演愈烈，这座城市出了名的国际化面貌受到压制。剧场不再欢迎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萧伯纳等敌国文艺人士的作品。

随着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918年11月7日，慕尼黑成为德国第一个推翻统治者的城市，持续了750余年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覆灭。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连夜逃出王宫，其中一位公主带上了用手绢包着的王冠珠宝，国王本人则抱着一盒雪茄。^[18]由于司机参加了革命，王室被迫租了辆车。路德维希最终成功抵达匈牙利，此生再也没能回到慕尼黑。

一个叫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革命者出人意料地上了台，时年56岁的艾斯纳是社会主义报纸《慕尼黑邮报》的一名戏剧评论人。当时他在啤酒节举办地特蕾莎草坪面对人群演讲，不远处就是巴伐利亚雕像，在有自由女神像之前，那是世界上最高的铸铜雕塑。艾斯纳成功地煽动人们去冲击军营，夺取武器，而后占领了城中一些关键地点，例如火车站、报社和马替瑟啤酒馆。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我们的革命一滴血也没有流，多么美好啊！”艾斯纳说。^[19]

面色苍白、不修边幅的艾斯纳留着花白的大胡子，戴着一个小小的夹鼻眼镜，身上的大衣脏兮兮的，如一位记者所说，“没见识的人想象中的波希米亚一族”^[20]就长这样。此外，这个理想主义者甚至都不是慕尼黑甚至巴伐利亚人。他是来自柏林的犹太人。

那年11月艾斯纳的就职庆典为他规划中的“轻盈、美丽、理性的国度”^[21]定下了基调。他让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布鲁诺·瓦尔特

（Bruno Walter）指挥下演奏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序曲》；一班演员表演了歌德的《埃庇米尼得斯的觉醒》（*Epimenides Erwachen*）中的一场戏；一个合唱团演唱了一段亨德尔的《弥赛亚》；在这场宏大仪

式的最后，观众和艾斯纳一起咏唱了他亲自谱写的诗歌《人民赞歌》。这位前剧评人实际上制作了一场超现实舞台剧，但正如柏林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Vorwärts*）所预言的，“幕布终会落下，一切都会结束”。

尽管摆出了大排场，基本的潜在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艾斯纳的受欢迎程度开始滑落。在1919年初的议会选举中，他的党得票率不足3%。接着在2月21日上午，艾斯纳从蒙特哲拉宫（Montgelas Palace）出发前往议会大楼，可能是打算去辞职，但在走过一道门时，一个22岁的右翼骑兵军官正拿着枪等着他。这位安东·冯·阿尔克·奥夫·瓦莱伯爵（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从暗处走出，开了两枪，一枪打中艾斯纳的头，一枪击中他的背部。艾斯纳当场死亡。

一夜之间，那些曾经批评艾斯纳的人开始称他为殉道者，他的拥护者行动起来，充分利用了这种民意的突然转向。25岁的无政府主义诗人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会同他的朋友、剧作家埃里希·米萨姆和其他一些施瓦宾咖啡馆的常客，趁机掌握了权力。理想主义泛滥成灾。

在许多人没有工作、住房甚至食物的情况下，这个政权的领袖们再一次呼吁创造新的艺术形式。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负责改革教育，他打算废除大学学费、考试、学位和职称，此外还要取消历史课程，因为那被认为是对文明构成威胁的东西。小学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世界，”改革派宣告，“应该是一片繁花的原野，每个人都可以采摘自己的那一份。”[\[22\]](#)

但是巴伐利亚桃花源未能实现。上台一个星期后，这群所谓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23\]](#)被一个更极端的派别挤走，那就是布尔

什维克，他们讥笑这场布尔乔亚改良，^[24]提出要发起真正的革命。新组建的“红军”冲击了慕尼黑的银行、商铺、印刷厂和私宅，随意没收钱财、食物、衣物、珠宝等。他们解除了警察和民众的武装，将武器交给那些宣誓效忠政权的工人。

这场革命最受质疑的行动发生在1919年4月30日，慕尼黑红军没收了一些巴伐利亚贵族的财产，并把他们带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就读的卢伊特波尔德文理中学（Luitpold Gymnasium）^[25]杀死。对这残酷行径的描绘很快变得越来越夸张，称士兵们肢解了尸体，砍下生殖器，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极右翼的宣传材料。

到了5月初，布尔什维克上台四周后，一支受雇于共和国的右翼独立武装进军慕尼黑，意图恢复秩序。这个名为“自由军”

（Freikorps）的半官方志愿部队比革命党人要残暴得多，杀了至少600名“布尔什维克”^[26]，其中不乏冤死者。不过如此血腥的杀戮不妨碍自由军被当作解放者来赞颂。^[27]

另一方面，慕尼黑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基本上只剩下“红色恐怖”，还有其领导者是犹太人的传闻。这段动荡的记忆会一直被右翼政客当作把柄，用于推进恶毒的反犹主义和威权统治。其中一个领导者就是古斯塔夫·冯·卡尔。

在1920年3月通过一场政变夺权后，卡尔着手把慕尼黑变成一片“法治之地”。^[28]他欢迎右翼极端分子入驻这里，其中不少人进而成为战争和革命后涌现的一些准军事组织的成员。卡尔还把其中一些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叫作“市民自卫队”（Einwohnerwehren）^[29]的松散联盟，其人数很快会超过30万。从执法到边境巡逻，这支地方志愿军被卡尔用于各种场合。他说他们就像“消防队”一样不可或缺。

对市民自卫队的支持让卡尔在极端主义圈子里颇有些威望。但是法国开始抗议这支“秘密军队”——在协约国施压下，柏林要求巴伐利亚解散该组织。卡尔一度表示誓与市民自卫队共存亡，[\[30\]](#)不过后来自卫队解散后他并没有下台。一直到1921年9月，卡尔才因为无法平抚右翼阵营的不满而辞职。

许多原先的市民自卫队成员改投随后出现的一些更极端、更排外的新准军事组织，包括纳粹冲锋队。

1923年秋，随着德国进一步深陷危机，巴伐利亚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任命卡尔为邦务委员，[\[31\]](#)这个新设立的职位拥有接近独裁的巨大行政权力。据当时的人说，卡尔将被当作一把抵御暴风雨的伞，待雨过天晴后就可以抛到一边。[\[32\]](#)

然而卡尔究竟该如何带领巴伐利亚逃脱这场灾难，却不存在清楚的共识。一些支持者希望他利用刚得到的专制权力来促成巴伐利亚君主复辟，并宣布独立。有的主张成立一个更大的“多瑙河君主国”[\[33\]](#)，与奥地利、德国南部的巴登和符腾堡合并。还有人认为巴伐利亚应该讨伐首都柏林，把左翼领导人赶下台，建立独裁政权以实现国家复兴。

众说纷纭之间，愤懑的巴伐利亚人中一些走向极端的群体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外力的逼迫，卡尔根本无意采取真正意义上的行动。

[\[1\]](#) Lion Feuchtwanger, *Erfolg. Drei Jahre Geschichte einer Provinz* (Berlin: Gustav Kiepenheuer Verlag, 1930; Berlin: Aufbau-Verlag, 1993), 31-32.

[\[2\]](#) Karl Honisch letter, May 31, 1932 in folder HA 1/17.

[3] Anna Popp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49.

[4] 有一个人——卡尔·霍尼施 (Karl Honisch) ——记得当时看到希特勒离开维也纳时是有一人同行的，但他不记得那人叫什么，May 31, 1939, HA 1/17。此人的身份是德国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在1990年代查明的。见他的著作的修订版,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17, 80-81。

[5]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xvi. 彼得·盖伊 (Peter Gay) 称慕尼黑是“帝国的画家之都”，*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7。

[6] Rainer Metzger, *Munich: 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195.

[7] Josef Popp communication of May 1966, Werner Maser, *Hitler: Legend, Myth & Reality*, 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4), 133.

[8]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126.

[9]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希特勒至少要到1924年才拥有第一本马克思的著作。

[10] Josef Popp communication of May 1966, Werner Maser, *Hitler: Legend, Myth & Reality*, 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4), 133.

[11] Anna Popp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52.

[12] 关于这一时期的慕尼黑的更多资料，见本附注文献介绍部分。

[13] 不过，这部剧作的开场以及前三幕的初稿是剧作家在1878年春夏之交去罗马度假时写作的，Michael Meyer, *Ibsen: A Biograph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71), 446-53。

[14] Peg Weiss, *Kandinsky in Munich: The Formative Jugendstil Ye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 以及Frank Whitford, *Kandinsky* (London: Paul Hamlyn, 1971)。

[15] translation, Lothar Machtan, *The Hidden Hitler*, 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60.

[16] Rainer Metzger, *Munich: 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64-65, 191.

[17] 伏尔泰卡巴莱与另一位前慕尼黑居民列宁的公寓就隔一条街。

[18]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38.

[19]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1: Die Jahres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91.

[20] 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56. 对他做了描绘的还有恩斯特·托勒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3; Hamburg: Rowohlt, 1998), 86. 关于库尔特·艾斯纳还可以参阅 Bernhard Grau, *Kurt Eisner 1867-1919. Eine Biograph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21]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09.

[22] 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141, 167.

[23] Richard M. Watt, *The Kings Depart: The Tragedy of Germany: Versailles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0), 326.

[24] Pierre Broué,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7-1923*, trans. John Archer and intro. Eric D. Weitz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05),

280.

[25] David Luhrssen, *Hammer of the Gods: The Thule Society and the Birth of Nazism*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12), 9.

[2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Weimar 1918–1933. Die Geschichte der ersten Deutschen Demokrat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8), 81.

[27]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Hamburg, 1933: Rowohlt, 1998), 116.

[28] Wilhelm Hoegner, *Die verratene Republik.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79), 109.

[29] 刊载于1920年10月3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上的协约国通知，以及次日卡尔做出的回应，见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Nr. 211, 68。关于该民兵组织的详情可参阅David Clay Large,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A History of the Bavarian Einwohnerwehr 1918–1921*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0)。

[30] 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

[31] Generalstaatskommissar, *Niederschrift der Ministerratssitzung*, September 26, 1923,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2, 180–82, and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267–70, NL Ehard 90/3, BHStA.

[32] *Zeitübersicht zur nationalen Erhebung und zuderen Missbrauch*, HA 5/127.

[33] 这个词广为流传，比如在1924年3月25日的《大德意志报》中。

7 哈佛的馈赠

哈佛和希特勒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这里，两者是直接的联系。

[1]

——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

看到冲锋队队员推搡着把总理和其他政要押到楼上，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担心这群痞子会伤害人质，或者至少会有损党在外国记者中的形象。他决定上去看看他们的情况。

他在吧台停了下来，掏出身上最后几十亿马克买了几杯啤酒，然后上楼进了小屋。所有人都接过了酒，只有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施威耶例外，他拒绝与抓他的人共饮。这些人没有受到伤害，至少在汉夫施丹格尔看来是这样。

在希特勒的同道中，恩斯特·F. 塞奇威克·汉夫施丹格尔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36岁的世界主义者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六英尺四英寸的大个子，有个小名叫“小家伙”（Putzi）[2]。他父亲家三代辅佐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的母亲是美国人，家里出了两位参加过内战的将军：在西点军校立有雕像的约翰·塞奇威克（John Sedgwick），以及曾在亚伯拉罕·林肯的葬礼上扶灵的威廉·海涅（William Heine）。

“小家伙”在美国生活了16年，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家族的艺术品印刷和复制企业[3]的纽约分部当经理。他把作坊搬到了第五大道和四十五街的拐角，靠着这份工作认识了不少人，其中包括亨利·福特、查理·卓别林和J. 皮尔庞特·摩根。在那之前，他在哈佛读书，和T. S. 艾略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大儿子小西奥多·罗斯福等人有交情。“小家伙”弹钢琴颇有天赋，经常跟人说起有一晚在白宫地

下室的一场雄鹿派对上纵情狂欢，没收住劲，把一台“华丽的史坦威三角钢琴 [里的] 七根低音弦”给弹断了。

1921年夏，“小家伙”携生于美国的妻子海伦·涅梅耶（Helen Niemeyer）、他们的幼子埃贡乘“亚美利加”号轮船前往欧洲。他们发现，德国是“一间疯人院”，到处是政治和经济阴谋。那年年末，他在慕尼黑大学研究历史期间第一次看到了希特勒的一场啤酒馆演讲。“小家伙”被震住了，希特勒对观众的完全掌控令他惊叹不已。那一晚，“小家伙”激动得彻夜难眠。^[4]

他当场就承诺了一笔借款，^[5]每月给纳粹党一笔钱，用于购买两台圆压圆印刷机给《人民观察家报》。在当时，许多德国报社在缩减规模或面临倒闭，希特勒的报纸却自创办以来首次扩大成了日报^[6]。报纸的幅面也变大了，靠着“小家伙”从左翼讽刺杂志《傻瓜》

（*Simplicissimus*）挖来的一个漫画师，报纸的设计得到改进，有了新的报头。他声称报纸的新格言——“工作与面包”^[7]——是他想出来的，反映出报纸一心想要打动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大众。

汉夫施丹格尔在充满波希米亚风情的慕尼黑施瓦宾区根茨街有一间三居室公寓，就在大学的北面，过去几年希特勒是那里的常客。由于来得实在太勤，“小家伙”干脆管那里叫“根茨咖啡馆”。希特勒对他那出了名的甜食嗜好^[8]毫不收敛，巧克力蘸着咖啡吃，^[9]或者大口吞吃堆着一大团奶油的面点。“小家伙”把他引见给了慕尼黑新潮人士的圈子；用一个纳粹党人的话说，“小家伙”已经成了希特勒这块平底锅派的“上层酥皮”^[10]。

“小家伙”否认自己曾指导过希特勒的言行举止，不过希特勒这个日渐形成的新造型的确有他的影响。他让希特勒放弃了那顶黑色宽沿“黑帮帽”^[11]，还有他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时穿的那双笨重的旧军

靴。不过，不管怎么努力，“小家伙”始终无法说服希特勒放弃牙刷胡——就是他所说的那块“可笑的小污渍”[\[12\]](#)。

而现在，“小家伙”又要着手打磨希特勒突兀的棱角了，这一次是面对国际媒体时的表现。任务是艰巨的。美国驻外记者、25岁的德州人休伯特·伦弗洛·尼克博克（Hubert Renfro Knickerbocker）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在记者中间是有代表性的：漠然的眼神，小小一撮胡子，一缕头发在前额晃荡，还有为了显得坚定而刻意伸出下巴的样子。“我一下笑了出来！”尼克博克说。[\[13\]](#)

当晚之所以有许多外国记者来到啤酒馆，包括尼克博克，都是“小家伙”的功劳。他在当天临近中午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去慕尼黑最上档次的酒店和餐馆寻找记者。在匈牙利餐厅，“小家伙”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拉瑞·卢（Larry Rue）吃了饭——这位外国记者界的新星凭借自己的飞行技能，可以开着自己的飞机赶往欧洲大陆的新闻热点发生地。两人吃着精美的鱼子酱、野鸡肉和奶油覆盆子，[\[14\]](#)佐以白兰地和咖啡。“小家伙”向这位有“敏锐新闻嗅觉”[\[15\]](#)的记者保证，贝格勃劳凯勒的这个夜晚不会让他失望。

54岁的慕尼黑警察局刑事处处长、高级督察菲利普·基弗（Philipp Kiefer）目睹了啤酒馆的事态发展[\[16\]](#)，担忧逐渐加剧。大概八点半的时候他正在衣帽间，听到了人群的扰动，而后是一声枪响。他走向门廊，看到一大队统一着装的人拿着卡宾枪或机枪正冲进来。

很快基弗就得知，他手下的30名警官中已经有不少被纳粹抓起来了。其他的警官则戴上钩十字臂章，表示对希特勒的支持。有人看到其中一个叫尤瑟夫·葛洪（Josef Gerum）的在门廊帮冲锋队队员架设机枪。

企图去召集援兵的基弗被希特勒的一个手下粗暴地下令不许离开或进入；任何人都不可。于是他偷偷去找厨房里的电话，可惜有人占着。基弗不想冒险继续等下去，决定趁乱溜到啤酒花园，然后再躲过正在从卡车上卸武器的冲锋队队员。这一次他的计划奏效了。他发现厨房有个出口没人把守，很快就来到了街上。

在往南几个街区的第15区警署，基弗给总部挂了个电话，但是占线。最后他改拨主值班室，终于接通了；基弗报告，有武装分子占领贝格勃劳凯勒，封锁了周边地区，把所有酒客和他的巡警给困在了里面。作为高级督察的他“完全无能为力”^[17]。

当值警官弗里茨·斯图姆夫（Fritz Stumpf）警监说他待会儿打过来。

于是基弗就等着。

漫长的十分钟过去，电话响了。

来电的是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博士，慕尼黑警察的政治情报和安全部门“六处”的处长。听取了啤酒馆事态的报告后，弗里克的指示很明确：“其实你也没什么可做的。”^[18]弗里克提醒督察，^[19]许多手握大权的人物正在啤酒馆里，包括警察总长和多位政府官员。他们知道怎么办。

基弗傻眼了。难道这位长官还不明白，那些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吗？

当晚早些时候，早已下班的弗里克在警署逗留了许久。他问警官们打不打算去参加集会。此刻他似乎在拖延和逃避，迟迟不决定要不要去贝格勃劳凯勒解救人数和火力上都处于劣势的警察。他说当务之急是“避免流血”。^[20]他反复说“等候指示”。^[21]

有一头灰白短发的弗里克现年46岁，已经坐上了慕尼黑政治警察的头把交椅。他是1915年8月1日从区总部开始干起的。此后靠着追捕发战争财的商人和黑市骗子一步步往上爬。^[22]弗里克拿到了一个法学博士学位，做过一段时间的执业律师。他已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2岁。这些情况总部的同事都清楚。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威廉·弗里克博士最近加入了纳粹党。

^[1] Ernst Hanfstaengl,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first edition 1957), 31.

^[2] 这个小名是他的保姆凯蒂给取的, Peter Conradi,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 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14.

^[3] Rainer Metzger, *Munich: 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 198.

^[4] Ernst Hanfstaengl,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first edition 1957), 27, 30.

^[5] 警方在政变后搜查人民观察家报社时发现了借款合同的一个副本,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See also MA 103476/1, 114, BHSStA. 关于这笔借款的重要性可参阅 Detlef Mühlberger, *Hitler's Voice: The Völkischer Beobachter, 1920-1933*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I, 21, 这份报纸对于希特勒的意义可见于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1919-1933*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9), 21.

^[6] Horst J. Weber, *Die deutsche Presse, 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 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 1930), 10.

[7] 1923年8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Peter Conradi,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 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 53.

[8]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 44.

[9] Helen Niemeyer, “Notes, ” 279, folder “ErnstHanfstaengl (1) ,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10] 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 95.

[11]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 188.

[12] Ernst Hanfstaengl,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11, first edition 1957) , 67.

[13] H. R. Knickerbocker, *Is Tomorrow Hitler's? : 200 Questions on the Battle of Mankind*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1) , 1-2.

[14] Peter Conradi, *Hitler's Piano Player: The Rise and Fall of Ernst Hanfstaengl, Con dant of Hitler, Ally of FD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 57.

[15]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 130.

[16] Police report, November19, 1923, HA, 67/1490; Fritz Stumpf, Police report, *Putsch der Nat. Sozialisten in der Nacht v. 8./9. 23*, 1923年11月13日, HA 67/1490, and MA 103476/3, 1223, BHStA; Sigmund Freiherr von Imhoff, November 15, 1923, Handakt der GSK, MA

104221, BHSStA; Wilhelm Frick' s testimony, NA T84/2 EAP 105/7, 714-19; *Bericht über den Verlauf der Nacht vom 8./9. November 1923*, HA 67/1490 and NA T84 EAP 105/7, 868-71.

[17] Police report,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18] NA T84/2 EAP 105/7, 871.

[19] Reports, Abteilung VIa, *Polizeiliche Massnahmen aus Anlass von Versammlungen*, November 19, 1923, and report by Fritz Stumpf, 1923年11月13日, HA 67/1490.

[20] MA 103476/3, 1223, BHSStA.

[21]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 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 80.

[22] Reinhard Weber, “ ‘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 , Heft 1, 129-50; 弗里克自己的叙述可见于NA T84/2 EAP 105/7, 700-703, 还有他在1923年11月10日的审讯, Sonderakt Frick, HA 5/114I, 以及阿尔伯特·克莱布斯 (Albert Krebs) 的评价, *The Infancy of Nazism: The Memoirs of Ex-Gauleiter Albert Krebs 1923-1933*, ed. and trans. William Sheridan Alle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 259-62.

8 新政权

老百姓肯定吓蒙了。我不能用官员，人民已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最理想的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这个人不需要多少聪明才智，政治是世界上最蠢的东西了。^[1]

——迪特里奇·艾卡特（Dietrich Eckart）

在宴会厅后方传来的一阵欢呼声中，刚才去了里屋的巴伐利亚领导人和陪同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一起走向讲台。

古斯塔夫·冯·卡尔第一个讲话，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宣誓、声明和效忠承诺，以至于观众中的一些人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Wilhelm Tell*）里的自由呼唤。^[2]怀着“沉重的心情”，卡尔说，他决定“在这苦难深重的时刻”响应为国效力的召唤，担起“以副王之身份带领巴伐利亚走向未来”的职责。一名警方安插在人群中的线人注意到，掌声很热烈。穆勒教授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响亮、最热烈的欢呼。^[3]

希特勒热情地握了卡尔的手，几乎像是在拉扯或摇晃，而后他兴高采烈地宣布新政府成立，引起雷鸣般的欢呼声。他接着说，他会去实现五年前立下的誓言——当时他躺在帕塞瓦尔克的一间军医院里，治疗在芥子气攻击中受的伤——他会“不眠不休，直到把十一月罪人赶下台”。他准备在“苦难深重的今日德国的废墟上”建起……“一个强大而杰出、自由而宏伟的德国”。^[4]

“希特勒万岁！”的喊声响彻大厅。^[5]

新政权的所有成员在示意下纷纷表示他们会配合行动，用希特勒的话说，要将那些背叛国家、屠杀人民的罪人清除出柏林。鲁登道夫

用他最拿手的“铁拳”^[6]风格做了简短的讲话，重申这场革命让他感到意外，但是他同意眼下是“我们的一个历史转折点”^[7]。身形魁梧的“小家伙”站在椅子上，将演说翻译给外国记者。

穆勒教授看着希特勒，他站在台上，高兴得几乎站不稳。^[8]鲁登道夫看上去也心潮澎湃，他的表情显露出，他相信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时刻，同时也笃定要迎接未来的挑战。观众高唱去年定为国歌的《德意志之歌》。和希特勒的新政府一起站在台上的恩斯特·珀纳说，那是自1914年8月宣战以来^[9]他见过的最热烈的掌声。^[10]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中。一名警方线人听到人群里有人讽刺说，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个精神病医生。^[11]

在宣布成立新的国家政府后，希特勒准备放人们出去了。^[12]要离开啤酒馆的人首先要接受问话。良好的爱国者可以走。其他的——外国记者、共产主义者，或一切被怀疑会和新政权为敌的人——会被扣留。他让戈林负责此事。

希特勒去查看赫斯和被俘的巴伐利亚总理及其阁员的情况，他估计这些人永远也不会支持革命。他就此事给他们带来的“不便”道了歉，^[13]承诺不会伤害他们，同时特意没有正眼瞧巴伐利亚内政部部长弗朗茨·萨瓦·施威耶。此人一直跟纳粹对着干，公开斥责他们“自行其是、肆无忌惮的恐怖组织本质”。^[14]去年希特勒还向施威耶保证过，绝对不会发起政变。^[15]

施威耶对待希特勒的样子“就像个愤怒的教员”。^[16]他用手指戳着希特勒的胸口，怒斥他言而无信。

希特勒未作回应，转身向门口走去。

而后，他命令赫斯把人带走。^[17]

[1]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33.

[2] 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 NA T84/2 EAP 105/7, 981. See also NA T84/2 EAP 105/7, 1676–77, 以及未注明日期的机密报告, *Der Putsch vom 8. Nov. 1923*, HA 67/1491。

[3]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9, StAM.

[4]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8, StAM.

[5]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6] 1923年11月10日美联社。

[7]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9, StAM;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1–62.

[8] NA T84/2 EAP 105/7, 980.

[9] *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1923年12月19日, HA 5/120。

[10] 1923年11月12日《贝希特斯加登汇报》。

[11] 未注明日期的机密报告, *Der Putsch vom 8. Nov. 1923*, HA 67/1491。

[12] Berchtold, April 17, 1924, MA 103476/3, 1216, BHSStA, 在人群中搜索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的人, 见Police report, 1924年3月8日, HA 68/1494, 扣押人质见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11, StAM.

[13] 奥尔根·冯·克尼林与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的对话，见*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November 14, 1923, Nr. 322, 144, 以及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证词, VIa 2500/23, June 6, 1924, HA 67/1493。

[14] St.R.V. 14/1922 ff, 19, HA 4/90. 另见Franz Schweyer, *Politische Geheimverbände. Blicke in die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es Geheimburdwesens* (Freiburg: Herder, 1925)。

[15] 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后来都曾提到，他的承诺是有条件的，例如Roder, *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 HA 5/126。

[16]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778, note 48.

[17] NA T84 EAP 105/7, 873.

9 “安全送达”

如果行动的人能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影响——不行动的人能理解他们无所作为造成的影响——那么人类就不会成为自己的天敌了。^[1]

——恩斯特·托勒尔

慕尼黑的夜生活渐入佳境。上演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和《蓬帕杜夫人》的大歌剧院和园丁广场剧院刚刚散场。^[2]准备纵情狂欢的人们坐着有轨电车前来，在市中心的餐馆、酒吧、卡巴莱和电影院大肆挥霍。

这其中就有来自威斯康星州的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墨菲。这个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一头红发的健硕男人今年29岁，是一名美国副领事。^[3]实际上自打他的总领事升职并调走后，他就是美国驻巴伐利亚的最高官员了。墨菲和他的妻子米尔德莉德（Mildred）住在摄政王子街，广场对面就是希特勒后来的住处。

墨菲夫妇两年前来到慕尼黑，这位外交官参与了战后美德两国最早的领事关系重建。他和一个小团队到库房取出家具，重新开放了在莱德勒街的领馆。此前的驻地是从一个学生兄弟会那里租来的。

墨菲在那年3月和希特勒第一次见面。会晤的地点——“一间阴冷、简陋的办公室，天花板上挂着一只电灯泡”^[4]——反映了纳粹党刚刚起步的状态。墨菲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希特勒不可能征服见多识广的巴伐利亚人。后来他对美国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说，只需要50000美元，他们可以彻底消灭整个纳粹组织。^[5]

墨菲的外交生涯始于1917年4月23日，就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7天后。他的第一份外交工作是去中立的瑞士伯尔尼做译电员，与

未来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共事。战后，墨菲回到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法学学位。

墨菲从没想过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的父亲是一个爱尔兰裔铁路蒸汽装配工，四年级文化程度。墨菲从小生活在密尔沃基一个贫困地区。^[6]一份马凯特大学的奖学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没过多久，他就靠优异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在华盛顿的邮政总长办公室谋到一份差事。在为国效力和游历世界的愿望驱使下，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兴趣。

在慕尼黑领馆，墨菲的工作一般包括撰写经济报告、处理护照续期，检查签名以完成平均每天400份的签证申请。^[7]然而现在墨菲有一个重大事件需要报告。他以一名啤酒馆事件目击者的陈述为基础，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标记为“紧急”和“机密”的电报：

希特勒言称新政府意在柏林，连夜战斗；称若破晓时仍未见新国民政府，则出此言者已死。^[8]

他认为，华盛顿需要掌握此事的进展。

* * *

当晚，在慕尼黑城的另一头，有1500~1800人来到老字号大啤酒馆鲁文勃劳凯勒，要“与战友一同过节”^[9]。从他们身上的徽章和臂章看，许多人来自已经结为同盟的各路准军事组织。

他们就是“战斗联盟”（Kampfbund）。这个组织是不到两个月前成立的，包括三个与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反战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凡尔赛条约》支持者誓不两立的激进右翼团体。三个创始成员分别是纳粹冲锋队、与之关系密切的“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以及刚成立不久的“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当晚活动是后者主办的。

宴会厅里的装饰到处是帝国时代的白红黑三色，还有巴伐利亚的白与蓝。鹰和钩十字旗竖立在前方。两支乐队在演奏行军曲和歌剧序曲。

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此前宣布希特勒——战斗联盟的政治领袖——会登台讲话。不过走上讲台的是24岁的记者赫尔曼·埃瑟，他本来因为得了黄疸卧病在床，[\[10\]](#)被硬拉来顶替希特勒。[\[11\]](#)作为前《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埃瑟被认为是党内最有活力的演说家之一。他在煽动底层民众方面早已恶名远扬，用一个同僚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演说家，只不过是来自地狱更深层”。[\[12\]](#)

在当晚9点前的某个时候，埃瑟正在咆哮着“犹太巨贾”[\[13\]](#)何其危险，一个公共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安全送达。”[\[14\]](#)电话是从贝格勃劳凯勒的厨房打来的。[\[15\]](#)这个表示德国革命开始的暗号被迅速带到宴会厅，[\[16\]](#)转达给坐在主桌的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他就是恩斯特·罗姆上尉，“帝国战旗”主脑，曾经是冯·洛索将军麾下一名参谋。[\[17\]](#)罗姆五英尺五英寸的个子，沙褐色头发，绿眼睛，胸廓宽厚，下巴、面颊和鼻子上有明显的疤痕。[\[18\]](#)他在他的军旅生涯里还负过另外十来次伤。用同僚卢克·吕德克的话说，他是个“活生生的战争缩影”。[\[19\]](#)

罗姆属于最早进入纳粹圈子的成员之一。1919年10月16日希特勒的第一次重要演讲只有111名观众，罗姆就在其中。三个月后他入了党，成了与孤僻而冷淡的希特勒最接近的一个人。他是少数会用亲热的“你”来称呼希特勒的人之一。[\[20\]](#)

凭借自己在民族主义圈子里德高望重的声誉，罗姆帮助希特勒在德国部队中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此外还有被《凡尔赛条约》解除军职、而后纷纷参加慕尼黑武装组织的老兵们。罗姆是死硬派巴伐利亚君主主义者，是准军事地下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私藏被《凡尔赛条约》定为非法的武器和战争物资，而且还随心所欲地将这些东西分发给各组织。他的这份功劳帮他赢得了“机枪王”^[21]这个绰号。

贝格勃劳凯勒的胜利让罗姆欣喜万分，他跳上台，对还在演讲的埃瑟耳语了几句。^[22]而后埃瑟把革命的消息通报给了观众，^[23]其中不少人已经痛饮了相当多的啤酒。

一阵短暂的平静后，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嘶喊、喝彩、拥抱，在场的不少军人扯下帽子上的共和国徽章。^[24]人们跳上了桌椅。铜管乐队的乐手在台上跳起舞来，然后开始放声演奏《德意志之歌》。^[25]在众人的欢腾咆哮中，罗姆扯着嗓子呼吁大家去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会合。

两支乐队都在大声演奏，一支在游行队伍前面，^[26]另一支在后面，鲁文勃劳的人群涌到大街上，吵吵嚷嚷地向贝格勃劳凯勒进发。喧闹声引得许多人从咖啡馆跑出来看个究竟。围观者也发出欢呼，向他们喊话鼓劲。在队伍前方，大号手的身后，是一个23岁的化肥厂帮工，手举着武装社团的旗帜。^[27]他戴着灰色滑雪帽、厚厚的无边眼镜，留着一撮牙刷胡。他的名字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游行至啤酒馆途中，罗姆上尉派了一小队慕尼黑冲锋队队员去城中心的方济各会圣安娜修道院教堂。^[28]率队的是威廉·布吕克纳，^[29]一个高大魁梧的政治系学生，39岁，一度是全国顶尖的网球选手。布吕克纳带领几人来到这座罗马复兴式双尖顶教堂，沿着一道石砌走廊下一个点着蜡烛的地窖。里面的一个库房里存放着大量步枪。

几天前，修道院的僧侣被告知这些武器是用来防备一场共产党暴动的。修道院院长坡旅甲神父（Father Polycarp）觉得，那晚似乎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威胁出现。他开始担心这些人的意图，于是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冯·卡尔，想问他该怎么办。

然而冲锋队队员们并没有等待他的答复，硬是冲进库房夺取枪支。他们强迫僧侣们手递手把3300杆步枪从地窖转移到停在公共广场的卡车上。还有一些僧侣提供了咖啡和朗姆酒。^[30]这些武器显然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藏在这里是为了避免被协约国当局查抄。

储藏在帕拉提亚团（Corps Haus Palatia）^[31]——一个学生击剑社团所在地——的武器也是这样。门卫安德里亚斯·穆茨醒来，看到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一队“帝国战旗”成员就站在门外。一等他打开门，那群人就把他推到一边，直奔地下室而去。他们自己动手，把队友事先藏在社团保龄球场的步枪、弹药、头盔和其他补给搬了出来。^[32]

接着，希姆莱一伙人跟罗姆会合，向贝格勃劳凯勒进发。^[33]在路上，一个骑摩托的信差带来了又一个行动命令，这一次的更加大胆：罗姆的人需要控制战争部，^[34]也就是冯·洛索将军的指挥部，以便将那里作为总部，制订攻打柏林的计划。

面对罗姆和百余名武装人员，^[35]在场的指挥官就算想拦阻也是徒劳，而他究竟有没有拦阻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他后来说他是不希望看到流血，并且考虑到罗姆的军阶和名声，他也相信了洛索和卡尔支持政变的说法。全程未发一枪。巴伐利亚战争部被人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义占领了。

在罗姆的人横扫教堂和学生击剑社团的同时，别的战斗联盟组织也在行动。希特勒派了高地联盟的一队人去陆军工兵营取武器。

1921年10月由高地自由军演变而来的高地联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最庞大、强悍的准军事组织之一。^[36]其成员宣誓要为“德意志帝国伟业”而战，拒绝《凡尔赛条约》和“对德意志民族的死刑宣判”。联盟在巴伐利亚高地地区招兵买马。其标志为雪绒花。

高地联盟事先安排了机动训练计划，^[37]他们每周二、周四（以及周六下午）都有这样的行动，所以预计不会遇到任何抵抗。在得到武器后，高地联盟需要控制中央火车站，其目的用一名成员的话说，是要预防“东边的犹太异族刁民携大量外汇在最后关头乘火车仓皇逃走”^[38]。

但是据贝格勃劳凯勒收到的报告，他们在接到命令几小时后仍然没能抵达火车站。延误的原因一时间还不清楚。经过当晚的一连串胜利后，信心过度膨胀的希特勒做了一个仓促的决定，要亲自前往那里解决问题。然而事后可以看到，在当时离开啤酒馆是一个大错。

在陆军工兵营，^[39]希特勒发现情况远比他收到的报告严重。负责训练的军官、第七工兵营一连的奥斯卡·坎茨勒（Oskar Cantzler）上尉带着几个人把高地联盟小分队的400人成功困在了训练大厅里。

这位狡猾的上尉用了一个让人防不胜防的简单方法。在高地联盟要求得到武器用于训练后，坎茨勒起了疑心。他说如果真要携带武器进行机动训练，他们必须留在室内。怒气冲冲的高地指挥官马克斯·冯·穆勒骑士（Max Ritter von Müller）鲁莽地把整队人都带进了训练大厅里。然后坎茨勒锁上了大门。希特勒的人进了圈套。里面当然是没有武器的，而且如果他们企图强行冲出去，坎茨勒在门口部署了两架机枪。

然而等到希特勒抵达时，坎茨勒还是拒绝打开兵营大门。盛怒之下，希特勒一度考虑调火炮把门炸个粉碎，好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最终打消念头可能是因为，他想到完全可以回啤酒馆去，让冯·洛索将军下令放了高地联盟的人。

这趟毫无建树的兵营之行浪费了希特勒的宝贵时间，而且回到贝格勃劳凯勒后他还发现，卡尔、洛索和塞瑟都不见了。^[40]

鲁登道夫将军觉得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都已经疲惫不堪。^[41]他们答应当晚过些时候在战争部与他会合，共商讨伐柏林大计，他相信了这番君子之言，于是放了他们。

希特勒完全没想到^[42]鲁登道夫会让他们离开啤酒馆，不过一开始，他可能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担心。他也相信巴伐利亚领导人支持革命的承诺。毕竟，有3000人见证了他们的效忠誓言。

希特勒的顾问舒伊勃纳-里希特就没那么放心了。他问鲁登道夫是不是真的认为三人会回来，毕竟放他们走的时候“连个警卫都没有”。

鲁登道夫向来不习惯有人对他的决策说三道四，他警告舒伊勃纳-里希特以及在场的所有人，一名德国军官的诺言是不容置疑的。^[43]

^[1] Ernst Toller,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3; Hamburg: Rowohlt, 1998), 153.

^[2] *Ereignisse von der Nacht vom 8./9. 11. 23*, November 20, 1923, HA67/1493.

^[3] 不久他将升为七级领事，不过官衔仍然是代理副领事，Murphy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1, 1923, Robert D. Murphy Papers, Box 6, HI.

[4] 1976年3月8日《人物》杂志罗伯特·墨菲访谈。

[5] Murphy testimony, December 11, 1975,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Activities: Intelligence costs and scal procedures*, US Congress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1976), 1868.

[6] 1958年8月10日《新闻与快报》 (*The News and Courier*) 。

[7] American Consular Service, *Summary of Business*, Form No. 243, Robert D. Murphy Papers, Box 6, Folder 10, HI. See also Robert D.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15.

[8] Murphy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8, 1923, M336, 862.00/1338, No. 19, NA.

[9] 1923年11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

[10] Hermann Esser, interview, March 6, 1964, Band II, 11, ED 561/4, IfZ, 可通过Police report, April 11, 1924, HA 67/1493, 以及当晚与他说过话的海因里希·霍夫曼,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54, 得到确认。

[11] NA T84 EAP 105/7, 575.

[12]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36.

[13] Police report, VId/131, *Versammlung der "Reichskriegsagge" im Löwenbräukeller am Donnerstag, den 8. November 1923 abends 8 Uhr*, November 27, 1923, HA 67/1490.

[14]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 35, StAM.

[15] Albert Simmerding, January 19, 1924, and his statement in VI a F,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16] NAT84EAP105/7, 576; NAT84EAP 105/7, 882-83。

[17] 罗姆的请辞以及获批, November 17, 1923, HA 5/114I以及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12-15。关于这段曲折, 可参阅Eleanor Hancock, *Ernst Rö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55-57。

[18]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2, and Eleanor Hancock, *Ernst Rö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

[19] 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245。

[20] Franz Xaver Schwarz, July 21, 1945, ZS 1452, IfZ。

[21] 左翼媒体尤其喜欢用这个绰号,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75。

[22] Friedrich Mayer, testimony in VI a F 404/24, February 13, 1924, HA 68/1494。

[23] 不少史学家称是罗姆向人群宣布的消息, 但实际上是埃瑟, Police report, VI d/131, November 27, 1923, HA 67/1490, 以及多名目击者与参与者, 包括埃瑟本人, interview, March 6, 1964, Band II, 27, ED 561/4, IfZ。

[24] IV a F 2671/23, December 6, 1923, HA 67/1493。另可见罗姆的 *Denkschrift über die Ereignisse des 8./9. November 1923*, November 17, 1923, HA 5/114I。

[25] NA T84 EAP 105/7, 576-77, 街头的庆祝, NA T84/2 EAP 105/7, 716, 以及人们从咖啡馆跑出来, NA T84/2 EAP 105/7, 609。

[26]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讯, A. V. I. 209/23, April 30, 1924, HA 68/1494。他是“帝国战旗”成员, 但直到1925年8月2日才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

[27] Peter Longerich, *Heinrich Himmler*, trans. Jeremy Noakes and Lesley Shar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8–69.

[28] Police reports in files at VIa 2500/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police reports, November 10, 1923 and November 13, 1923, HA 67/1493.

[29] Police report, No. 138, 1923年11月13日, HA67/1494, and Friedrich Mayer, VI a F 404/24, February 13, 1924, HA 68/1494.

[30] A. Winderl, unpublished *Der Weg zur Feldherrnhalle*, HA 4/100.

[31] Karl Osswald testimony, February 3, 1924, HA 67/1493.

[32] Andreas Mutz interrogations at VI a F 317/24, February 8, 1924, and Karl Hühnlein, VIa 2500/23, May 3, 1924, HA 67/1493.

[33] Johann Sebastian Will testimony, IV a F 2671/23, December 5, 1923, HA 67/1493.

[34] Röhm, XIX 466/23, January 3, 1924, HA 67/1493;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45–46; NA T84/2 EAP 105/7, 2207; 鲁登道夫否认下过这个命令, Ludendorff–Ehard interrogation, December 22, 1923, HA 5/114I.

[35] Generalstaatskommissar Kahr an die Vorstandschaft der Bay. Of ziers–Regiments–Vereine, 1923年11月14日,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25, 385.

[36] Wilhelm Hoegner, *Die Verratene Republic.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79), 132. 另可参阅Friedrich Weber, 1923年11月16日, MA 103476/3, 1123–24, BHStA, and Kameradschaft Freikorps und Bund Oberland, *Für das stolze Edelweiss. Bildund Textband zur Geschichte von Freikorps Oberland und Bund Oberland* (repr. München: Brienna–Verlag, 1999)。

[37] Police report, *Bericht zur mündlichen Einvernahme durch Herrn Obereg. Rat Thenner*, 1923年11月13日, HA 67/1490。高地联盟的多名成员后来向慕尼黑警方证实了此事。

[38] NA T84/2 EAP 105/7, 165.

[39]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20–21, StAM, and VI a F 2500/23, Hans Oemler, December 18, 1923, HA 67/1493,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89, 296–98. 另见尤利乌斯·施雷克 (Julius Schreck) 的审讯, VI a F 23/24, January 5, 1924, HA 67/1493。

[40]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25, StAM.

[41]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2.

[42] 一开始他可能并不像传记作家和史学家们描绘得那么担心, 例见 Werner Maser, *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 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 (Frankfurt am Main: Ullstein Sachbuch, 1981), 452, 或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169。希特勒在1923年12月确实想要留下这种印象, 但是这些似乎都是事后才有的想法, 也体现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之间正在产生的分歧。另外可以参考乌尔里希·格拉夫在审讯中的证词, VI a F 244/23–24, February 8, 1924, HA 67/1494。他的支持者已经说了, 在此之前就已经犯了一个错, 那就是本来就不应该指望卡尔, 1923年11月9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43] 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证词, NA T84/2 EAP 105/7, 168。

10 反政变

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不具备领导角色所需的技能。[1]

——汉斯·菲尔（Hans Fell），“慕尼黑警察报告”，1923年12月18日

舒伊勃纳-里希特并非唯一对鲁登道夫的决定表达了担忧的人。这“完全是疯了”，在鲁文勃劳演说完后来啤酒馆外的赫尔曼·埃瑟说。“谁让那几个家伙走的？……这么胡闹的事是谁干的？”[2]

“小家伙”也觉得难以置信。[3]他在历史中读到了太多这样的教训：怀着革命抱负的人，绝对不可以让当权政府的领导人来去自由。他和埃瑟回到啤酒馆内，据埃瑟说，两人在里面要了杯啤酒，商谈了一番。

此时的宴会厅基本已经空了，只有冲锋队队员和纳粹党员还在悠闲地喝着啤酒，大口吃着剩下的香肠。掀翻的桌椅胡乱堆在一起。碎玻璃满地都是。看上去就像狂欢节过后的慕尼黑。

天花板上的一個窟窿被认为是开启德国革命的第一枪留下的。纳粹党人马克·塞瑟尔曼（Marc Sesselmann）收集了一个啤酒杯的碎片，[4]据推测就是希特勒冲上台前砸碎的那个。一部围绕着啤酒馆政变展开的神话，已经开始成形。

晚上11点左右，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德国革命策动者乘坐三辆小汽车离开啤酒馆，前往已经被他们夺取的战争部商讨策略。此时他们还是认为，三名巴伐利亚领导人会去那里跟他们会合，制订攻打柏林的计划。

然而古斯塔夫·冯·卡尔没有去战争部，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的公寓和自己的办公室同在一栋楼^[5]——慕尼黑政治权力中心马克西米连街的一座爬满藤蔓的新哥特式建筑。

在被任命为邦务委员——一个为应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设立的职位，实质上是一个独裁者——的六周里，卡尔多次公开与柏林唱反调。作为出了名的君主派，他不反对推翻共和国，并且有好几次几乎就要参与谋反，甚至自己谋划。但是他担心这一次政变会失败。不幸的是，他当着挤在啤酒馆里的众人的面表达了对它的支持。

他走上楼，和女儿打了招呼，把大衣交给她。^[6]他要了杯茶，然后匆匆换了身衣服，去三楼的125室，他的办公室。他的几名顾问已经在集结力量准备与希特勒对抗。

卡尔似乎被吓坏了。^[7]对于在贝格勃劳凯勒公开表示认同希特勒，他说自己别无选择。然后他责备警方没有采取恰当的预防措施，而这就有些讽刺了，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在那天晚上减少警力的。他不想显得自己需要对自己的人民严加提防。

眼下的局势远非不可挽回，他的顾问艾伯哈特·考特尔（Eberhardt Kautter）说。考特尔是个老兵，曾经领导准军事组织“维京联盟”（Bund Wiking）在本地的分支，其前身是其中一个臭名昭著的自由军团体——埃尔哈特海军陆战旅（Marinebrigade Ehrhard）。考特尔说希特勒的行动很不明智，在巴伐利亚的支持者都不多，更别说整个德国了。如果卡尔能迅速行动，依然可以成为赢家。他提了一个建议。

卡尔应该暂废魏玛宪制，宣布建立独裁政权，自称是被废国王的特命总督，或者副王。他可以跟民众说这么做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威胁。不少准军事团体肯定会加入进来——他已经调动了自己的维京联

盟。^[8]人民也会站在他们这边。棋差一着的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只有听命于卡尔，否则会被革命的洪流淹没。

在考虑这个提议的时候，卡尔显然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摸清他的同僚洛索和塞瑟在希特勒政变上的立场。三名领导人一直没机会在纳粹不在场的情况下坦率地交谈。

正在商谈时，电话响了。来者既不是洛索也不是塞瑟，而是卡尔的副邦总理、偶尔和他作对的教育和文化部部长弗朗茨·马特（Franz Matt）。马特那晚没去啤酒馆听卡尔的演讲，据他说是要和慕尼黑大主教和教廷使节尤金尼奥·帕切利蒙席（Monsignor Eugenio Pacelli）——也就是后来的教宗庇护十二世——参加一场宴会。

“希特勒到底要干什么？”马特问道。

“风风光光进军柏林”，卡尔说。^[9]

那祝他好运了，马特嘲讽地答道。两人结束谈话时，马特已经得出结论，卡尔要么是希特勒的同伙，要么不具备赢下这一阵的能力。总之，他不信任这个人。

马特会在当晚建议内阁同僚向北撤退到六英里外的多瑙河畔城市雷根斯堡。^[10]他们可以在那里作为合法政府行使权力，以保全邦体。然而以当时局面的混乱，这些人无非是成了参与权力争夺的其中一个派系。

与此同时，反对政变的力量正在警察总部集结。

晚9：15前后，^[11]邦警司西格蒙德·冯·因霍夫男爵刚刚上完一堂关于骚乱控制的课。正要离开大楼的时候，一名警探“上气不接下

气地”^[12]跑来报告了希特勒袭击啤酒馆的消息。慕尼黑的环境向来容易滋生谣言，不过因霍夫意识到，这次是真的。

弗里克依然在用那套谨慎行事的说辞阻止一切成规模的警方行动。已经意识到这个同事在为谁效力的因霍夫假装同意，但是一等弗里克离开房间，他就开始打电话了。

因霍夫让邦警（因其警服颜色又被称为“绿警”）全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派遣其他单位守卫慕尼黑的电话局、电话交换所、中央邮局以及关键政府大楼和桥梁，以防遭到攻击。

这位邦警司的迅速行动保住了关键的通信中心。尤其要考虑到，在他立下这个大功的过程中，警惕的弗里克博士时不时跑进办公室来查看他，还用他那僵硬、别扭的方式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因霍夫在那一晚还有一项功劳，那就是他和正在家中的慕尼黑守备部队指挥官雅克布·冯·丹纳骑士取得了联系，知会这一紧急情况。丹纳立即来到警察局，^[13]他也担心弗里克博士从中破坏，于是很快离开前往他的办公室，那是一座新巴洛克式建筑，同时也是陆军博物馆所在地。和因霍夫一样，他打算尽自己所能全力反对希特勒。

作为一名屡立战功的指挥官，丹纳的军人生涯始于义和团期间前往中国的德国远征军。在他看来，政变是一种反对合法邦政权的举动，是不可饶恕的。此外他还十分不满自己的直接上级冯·洛索将军，因为他不仅禁不住政治的诱惑，还没能管住那帮可鄙的纳粹狂徒。他说洛索是个“可悲的人物”，^[14]更是个“懦夫”。

抵达办公室后，丹纳意识到市内的兵营也已经靠不住。战争部被罗姆的“帝国战旗”占领了，有人在圣安娜教堂看到在行军的冲锋队。丹纳决定在慕尼黑市中心之外建一个与希特勒对抗的新指挥中

心，就在城市西北部：深藏于第19步兵团兵营中的一座木头搭建的通讯站里。

他下令驻扎在奥格斯堡、兰茨贝格、雷根斯堡、纽伦堡等地的部队赶来增援，而后又向所有指挥官发出了一条明确的指示：来自冯·洛索将军的命令一概无须执行。丹纳并没有公开对长官的忠心表达质疑，而是称将军目前应被视为“被囚”^[15]状态，所有来自他的讯息应予无视。换句话说，指挥官们只能听从丹纳本人或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命令。

[1] VI a F 2500/23, December 18, 1923, HA 67/1493.

[2]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38-39. 另见埃瑟的问讯, March 6, 1964, Band II, 33-35, ED 561/4, IfZ, 以及不久后和他有交谈的海因里希·霍夫曼,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55-56.

[3]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38-39, 以及Helen Niemeyer, “Notes, ” 305,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4] Sesselmann,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5] Karl Rothenbücher, *Der Fall Kahr* (Tübingen: Mohr, 1924), 21-22.

[6] NA T84 EAP 105/7, 1351.

[7] NA T84/2 EAP 105/7, 2052.

[8] NA T84/2 EAP 105/7, 1404-5, 关于时机和进一步的细节, 包括废除魏玛宪制的建议, 可参阅NA T84/2 EAP 105/7, 2050-53. 另见*Die Drahtzieher in München*, HA 5/116. 此事卡尔做出了确认, NA T84/2 EAP 105/7, 1711.

[9] NA T84 EAP 105/7, 1352, 大致在同一时间, NA T84 EAP 105/7, 1440。

[10] Telegramm aus Regensburg 9.11 2 Ur 40, HA 67/1491, 以及Karl Rothenbücher, *Der Fall Kahr* (Tübingen: Mohr, 1924), 22-23。

[11] NA T84/2 EAP 105/7, 1167-68; Fritz Stumpf, Police report, *Putsch der Nat. Sozialisten in der Nacht v. 8./9. 23*, 1923年11月13日, HA 67/1490, 以及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7。

[12] 因霍夫警司, 1923年11月15日, MA 104221, BHStA。他在NA T84/2 EAP 105/7, 1167中重复了这一说法。

[13] NA T84/2 EAP 105/7, 1168-69. 关于此次会面的更多细节可参阅慕尼黑黑司令部日志, No. 4453/I, November 19, 1923, StAM, 以及丹纳的报告, *Ereignisse und Anordnungen am 8. November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14] 汉斯·卑尔根警监的证词, NA T84/2 EAP 105/7, 1872, 以及1943-51中丹纳的陈述。

[15] 卡尔和塞瑟也被认为已经在囚禁中, 雅克布·冯·丹纳, *Ereignisse und Anordnungen am 8. November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以及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命令, NA T84/2 EAP 105/7, 1941。

11 主动权

我们必须争取主动，否则就被别人抢去了。^[1]

——阿道夫·希特勒对恩斯特·珀纳说

鲁道夫·赫斯和他的冲锋队小队持枪押送七人上了停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外的一辆卡车，这七人分别是巴伐利亚邦总理、三名阁员、王储鲁普雷希特的一名顾问以及两名警察，其中包括警察局长卡尔·曼特尔。随后卡车载着这些地位显赫的俘虏，向格罗斯黑塞洛黑的森林方向进发。

车队来到霍尔茨基兴街2号^[2]一座装饰成姜饼风格的大房子前，停在了铺着石子的行车道上。这是著名的莱曼出版公司的创始人尤利乌斯·F. 莱曼（Julius F. Lehmann）的家，他的公司专业出版医学著作以及民族主义和反犹书籍。经女婿弗雷德里希·韦伯医生——一名年轻的兽医，高地联盟的政治领袖——推荐，^[3]莱曼同意把他的宅邸拿出来。

“诸位就当是来我家做客吧”，莱曼说。^[4]

私下里，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拿他的大宅关押人质是不满的。“这个布谷鸟蛋是我亲爱的女婿下在我窝里的，”他说。^[5]

在这座没有供暖的冰冷的房子里，被他称为“宾客”的人被分开关押。每个临时囚室外有两名冲锋队队员把守，还有一些人在花园和周围的树林里巡逻，以防警方发现后前来营救。屋外架了一挺机枪，枪口朝向街面，还有一挺在正门的门廊里。交谈是严格禁止的，赫斯警告那些领导人，冲锋队队员们已经得到指示，一旦有人试图逃离此地，他们会开枪。

此刻，被占领的战争部已经挤满了罗姆的人，然而相比之下，纳粹党在哥尼流街的办公室却意外地安静。用“小家伙”的话说，这里通常是个酝酿“阴谋诡计”^[6]的喧闹所在，如今却丝毫看不出来。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24岁的总务主任助理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还有两个20岁出头的打字员：艾尔瑟·吉斯勒（Else Gisler）和安娜·舒尔兹（Anna Schürz）。

布勒建议两个女人早点去吃晚饭，因为当晚的工作会很繁重。^[7]然而，五个小时后两名打字员仍然在桌边待命。她们早已经把函件和其他一些文书工作做完了。没有进一步的指示，也看不到有任何其他活动的迹象，直到晚上11点后，布勒才冲进办公室，要她们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们要转到一个新地点。

他们的老板、纳粹党总务主任马克斯·阿曼^[8]为新政权物色了一个更豪华的总部。阿曼在战时是希特勒的军士长，至今仍是一副军士长做派。^[9]他是个矮个子，一头金发，两个肩膀之间几乎看不到脖子。用“小家伙”的妻子海伦的话说，他是个“无情、冷酷的人……做事肆无忌惮”。^[10]据说一个党员曾经被他一把抱住扔出办公室，因为此人居然胆敢要求查账本。^[11]

几年后，美国的战时谍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前身OSS对阿曼的概括是，“一个知道自己是平庸之辈的平庸之辈”，^[12]然而却毫不忌讳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做决定。此外报告还说，希特勒的领导技巧就是从这个蛮横、时显残忍的军士长身上学来的。

当晚早些时候，阿曼闯进一家银行，以希特勒政府的名义征用了那里。他选中的这家位于运河街29号的金融机构——“定居地与土地银行”——是他很熟悉的。他就住在这座楼的四层，曾经在银行里工作过。^[13]

他们的这间阔气的办公室和规划军事行动的战争部遥相呼应。其中一个房间定为新的财政部，由戈特弗里德·费德尔博士主事，这位工程师和建筑承包商是党内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1919年9月12日希特勒在施特恩埃克勃劳第一次参加党会议，讲者正是费德尔。^[14]他的题目是“用何种方式、以何种手段消灭资本主义？”

作为新成立的财政委员会^[15]的临时负责人，费德尔计划冻结全国所有银行账户；在那天下午早些时候，为了以防万一，他先把自己的储蓄取了出来。^[16]当晚，当希特勒冲上啤酒馆的讲台时，费德尔感觉仿佛刚刚从一场梦中醒来。

银行里还有一间办公室留作宣传中心，负责人将是矮个子、秃顶、粗脖子的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恶毒的反犹小报《冲锋报》的出版人。^[17]施特莱谢尔在纽伦堡一个小学当副校长，当晚抵达慕尼黑。^[18]

此外还为鲁文勃劳集会的演讲者赫尔曼·埃瑟留了一间办公室。埃瑟被叫来为希特勒的政府起草一则公告，^[19]用在报纸和党的海报上。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打字员随时候命。

次日清晨，第一则纳粹党公告将广为传播，热烈宣告新政府的成立，以及“德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期”^[20]结束。其中一些公告的署名是“阿道夫·希特勒，德意志国总理”，^[21]这是已知对他的这个未来头衔最早的提及。^[22]

日后发布的公告将煽动公众采取行动，宣布“全面围剿……在1918年11月9日犯下叛国罪行的恶徒”。血红色的海报声称，凡爱国之士都应尽自己的一份力，努力抓捕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及其政府部长——“不论死活”。^[23]

在阿曼布置银行办公地的同时，希特勒派恩斯特·珀纳去警察总部和他的前同事与幕僚洽商。

抵达总部后，珀纳找到他的老朋友和门生威廉·弗里克博士，带着他去了已被冲锋队队员扣押的警察总长卡尔·曼特尔的办公室。是的，珀纳大方地说，这间办公室现在是弗里克的了。

由弗里克担任警察总长的主意实际上是古斯塔夫·冯·卡尔在贝格勃劳凯勒里屋提出的，他知道珀纳和弗里克曾融洽地共事过。1919年5月，执掌警察部队刚两周的珀纳选择由弗里克负责势力很大的政治部。珀纳将自己的手下分成两大类：前途无量的官员，以及其他在他看来无非是为薪水和铁饭碗而来的人。他称那些人为“婊子”。

在珀纳看来，弗里克显然是为官之材。他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恪尽职守，并且证明了自己有坚强的意志。用珀纳的话说，他不是“墙头草”。^[24]珀纳和弗里克的合作如此密切，就像古代神话里的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一样，形影不离且互补。

罗姆上尉对这个比喻做了解释。珀纳是个急性子，“精力旺盛，大胆，做决策很快”，^[25]不过一旦遇到强硬抵抗，他也随时会另谋他策。弗里克则要细腻、冷静得多，遭到挑战时极其顽强。两人在慕尼黑警察部队中打下了一个难以撼动的权力基础。希特勒指望他们替他实现这个效果。

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珀纳和弗里克筹划如何将希特勒的新政权介绍给它声称代表的人民。他们打算把慕尼黑的顶尖编辑和出版人叫到警察总部图书室，来一场午夜新闻发布会。^[26]

新闻界人士到场后，珀纳向他们宣讲了爱国主义，警告他们要是不可“理喻”，拒绝以足够正面的方式描绘当晚的事件，下场可能会

不太好。应该赞颂希特勒的新政权带领国家走出1918年的噩梦。珀纳说，只要编辑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责任感，或者说“规矩”，[\[27\]](#)就不会面临审查或其他令人不快的后果。

珀纳开始接受提问后，[\[28\]](#)拥护王权的《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的保罗·埃根特（Paul Egenter）问，既然卡尔称自己是国王的副手，他是否得到了王储鲁普雷希特的支持。这是个好问题——答案是没有——但珀纳企图回避。珀纳还躲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如何看待卡尔的君主主义和希特勒的“共和-独裁”野心之间的根本矛盾。

《慕尼黑最新消息》（*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的编辑弗里茨·葛里希（Fritz Gerlich）提到了关于冲锋队队员骚扰犹太人的一些早期报道。犹太工厂主路德维希·瓦瑟曼（Ludwig Wassermann）在离开贝格勃劳凯勒时遭到扣留。[\[29\]](#)

珀纳丝毫不以为意。[\[30\]](#)

[\[1\]](#) 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338.

[\[2\]](#)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11, StAM, and NA T84 EAP 105/7, 829-30.

[\[3\]](#) Friedrich Weber, statement at Gefängnis Stadelheim, XIX 466/23, January 9, 1924, HA 67/1493.

[\[4\]](#) John Dornberg's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156. 此外还可参阅MA 103476/3, 1367, BHStA.

[5]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90, note 66.

[6]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44.

[7] Elsa Gisler, November 19, 1923, HA 67/1493; Anna Schürz, November 20, 1923, HA 67/1493.

[8] MA 103476/3, 1243-1246, BHStA, 在银行的工作见1946年12月6日审讯记录, ZS-809, IfZ。

[9] Albert Krebs, *The Infancy of Nazism: The Memoirs of Ex-Gauleiter Albert Krebs 1923-1933*, ed. and trans. William Sheridan Allen (New York: New Viewpoints, 1976), 246.

[10] Helen Niemeyer, “Notes,” 287,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 FDR. 赫尔曼·埃瑟在一次问讯中用了类似的词, March 2, 1964, Band I, ED 561/3, IfZ。另见Ludwig Ess, letter to Adolf Hitler, March 6, 1925, HA 4/85。

[11]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60.

[12]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0.

[13] Police report, VId 1659 VId/131, HA 69/1500.

[14] 希特勒对他的赞扬,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210, 215.

[15] 戈特弗里德·费德尔未出版日记, *Tagebücher*, ED 874/5, 20, IfZ。公告刊发于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副本可见于HA 5/119。

[16] 此事得到了银行职员的证实, VI a F 161/24, January 21, 1924, HA 67/1494。另见1923年11月23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5月14日《人民

信使报》。

[17] Horst J. Weber, *Die deutsche Presse, 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 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 1930), 20.

[18] Police report, December 1, 1923, HA 67/1493.

[19] Philipp Bouhler, January 31, 1924, HA 67/1492.

[20] *An die Münchner Bevölkerung!*, copy in HA67/1492.

[21] *An alle Deutschen!*, copy in HA 67/1492.

[22]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08.

[23] 准军事组织调查委员会掌握了由一名希特勒突击队员传达的这道命令，其副本归档见HA 69/1500A。另外还刊登在了1923年11月9日的《人民观察家报》上。

[24] NA T84 EAP 105/7, 209.

[25]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34.

[26] NA T84/2 EAP 105/7, 721; Police report, December 7, 1923,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74, 475; *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1923年12月19日, HA 5/120, 此外还有对保罗·埃根特、弗里茨·葛里希等参加发布会的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问讯，收录于HA 67/1493文件。

[27] NA T84/2 EAP 105/7, 348.

[28] Interrogation, January 30, 1924 and March 20, 1924, HA 67/1493, as well as Eugen Mündler, February 2, 1924, HA 67/1493.

[29] Dr. Ludwig Wassermann statement, November 21, 1923, HA 5/114I, and Police report, VI a F 566/24, 1924年3月21日, HA 68/1494, and MA 103476/3, 1439, BHStA.

[30] MA 103476/3, 1231, BHStA.

12 野蛮之辈

我们尚不具备执行的权利或权威。[1]

——赫尔曼·戈林，1923年11月9日

当晚早些时候，贝格勃劳凯勒已陷入一种敌对而危险的气氛中。山雨欲来的迹象很早就出现了。当活动组织者介绍古斯塔夫·冯·卡尔时，他对美好未来的召唤引来责难，有人喊道：“不包括犹太人！”[2]人群中响起欢呼声。据犹太电讯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特别记者马塔特亚胡·辛德斯（Matatyahu Hinder）的陈述，后来冲锋队又在宴会厅里搜寻需要抓的人，就像一群带着手枪的“乌克兰反犹暴徒”。[3]

在戈林痛骂了一阵柏林“犹太”政府后，冲锋队队员把外国记者集中在了宴会厅前部一个区域，拿枪指着他们。“记者都是犹太人，”他们轻蔑地说。当其中一名记者要求立即释放他们时，有人听到希特勒在数落他们：“我们都等了五年了，你们记者等等无妨。”情况不断恶化，辛德斯身边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唱民族主义歌曲，大喊：“真可惜这里没有犹太人可杀！”

最终，这位犹太电讯社记者利用啤酒馆里的混乱，从一个没人把守的小门逃了出去——可能就是其他记者在厨房找到的那扇门。三天前在犹太电讯社的另一则报道中曾提到有这么一个威胁：“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向犹太人宣战。”[4]逃跑时他恐怕在想，啤酒馆里的人也许是要付诸实践了。

在另一头的阿特海姆角街19号，楼里满地是碎玻璃。

在敌对党派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报社外，纳粹党精英突击部队“希特勒突击队”的队员争先恐后跳下卡车，在鹅卵石街道上设置路障。纳粹对这家“犹太报纸”^[5]的批评报道以及对纳粹活动的揭露深恶痛绝。他们称之为“慕尼黑瘟报”^[6]和“毒药厨房”^[7]，后者是利用了一个流传几百年的古老说法，用来栽赃犹太少数民族裔，煽动对他们进行集体迫害。

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用枪指着报社总务主任（business manager）的头，要他打开铁门。进入大楼后，突击队员开始捣毁写字台，推倒柜子和书架，往墙上泼墨水，切断电话线。^[8]

还有一些人用枪托捣碎了四扇橱窗。^[9]在这场疯狂的打砸中，约有320块玻璃——据后来检方的统计是380块——被打碎。被毁坏的办公室的景象日后会被做成明信片。^[10]

“我们强行〔破门〕而入，把大楼掀了个底朝天，把我们能找到的所有印刷品都扔到了街上，”贝尔希托德后来说。^[11]这其中包括了人事档案、订户的邮寄地址、广告商的账户信息、尚未完成的手稿，以及一切有社会民主党领袖或共和国旗帜的照片或半身像。^[12]

行动中，曾有一名警察前来制止这场无谓的袭击。他很有可能只是来保住里面的印刷机，因为希特勒已经决定把机器交给战斗联盟的报纸《祖国》（*Heimatland*）。

希特勒突击队运走了大量设备，^[13]包括五六台打字机、好几摞文件，另外从一个钱匣里抄走了约6万亿德国马克。车库也没有放过，他们企图偷走报社唯一的汽车。但是无法把车发动起来，于是拿走备胎了事。^[14]

其中一名突击队员发现了报社主编和慕尼黑社民党领袖埃尔哈特·奥尔（Erhard Auer）的住址，他们打算接下来袭击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目标之一。^[15]等到贝尔希托德带人回到卡车上时，报社二楼阳台上飘扬着一面红黑白三色的钩十字旗，^[16]一名纳粹目击者形容办公室的景象是“冒着烟的废墟”。^[17]

到了深夜12点半左右，15~20名希特勒突击队员已经涌入胡桃街10号的楼梯，前往四楼的报社主编寓所。强行闯入的人当中有希特勒的司机、外号“莫里仔”的埃米尔·莫里斯，^[18]这个26岁的钟表匠是冲锋队的首任队长。^[19]

“你丈夫在哪？”莫里斯用手枪指着主编妻子、55岁的苏菲·奥尔的头问道。

她说她不知道。

莫里斯选择用暴力威胁，他要求她回答问题，然后推了她一把，她向后退了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他的两个手下把她关进一个房间，然后开始搜查寓所。

埃尔哈特·奥尔的确不在家。他之前收到消息说他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去了同为社民党人的律师朋友威廉·赫格纳（Wilhelm Hoegner）在谢林街的寓所。事实上，奥尔的藏身地距离一个冲锋队的主要集结点就一个街区。

奥尔的大女儿苏菲要求这些不速之客尽可能小声点，因为她两岁的女儿在睡觉。莫里斯没有理睬，一边翻找着橱柜、脏衣服和床铺，一边问她父亲在哪。之后他砸了一个餐具柜，推倒了几个书架，看起来是在寻找武器或什么值钱的东西，顺便也在留意跟主编的下落有关的一切。“我们是主人了，现在我们管事，”莫里斯叫嚣道。^[20]

在贝尔希托德下令停手前，莫里斯和他的同伙已经打开了保险柜，抄走了里面的东西——不过就是几封写给艾伯特总统的信，一些关于纳粹的文章，还有女儿以前的成绩单。

其中一些文件会带回啤酒馆，显得好像是满载而归，不过几个突击队头目显然有些失望。他们没找到奥尔，也没有任何有关他的下落的线索。到头来，他们只能拿走他的左轮手枪，还有一把老旧的驳壳枪，算是聊以自慰。^[21]他们还带走了奥尔的另一个女儿艾米莉的丈夫卡尔·鲁伯（Karl Luber）博士充当人质，^[22]直到他们找到那个胆敢指责纳粹是恐怖和种族歧视政党的主编。

当晚从慕尼黑多地传来袭击事件的报告，但不全是政变领导人授意或统一进行的。其中一伙人的头目是恩斯特·胡博纳（Ernst Hübner），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他当时在市政厅对面的多尼斯尔啤酒馆喝酒，并不知道贝格勃劳凯勒发生的事。酒过三巡，他偶然见到高地联盟的几个朋友，他们出来单独行动，伺机袭击“犹太人和其他人民的敌人”。胡博纳决定加入他们。^[23]

在该组织内是个长官的胡博纳带队前往热闹的亲王宫饭店。“所有犹太人站出来！”^[24]他喊道。大家都没动静。看来没有犹太人在场，试图化解事端的经理说。于是高地联盟的暴徒又去了斯巴滕勃劳餐厅和精益酒店寻找犹太人。

不幸的是，警方的报告^[25]对当晚的袭击事件提及不多，且不完整，日后对政变的陈述也偶尔掺入一些错讹。其中一个错得最离谱的说法是，当晚的肆意毁坏令希特勒深感不安，以至于他出面试图制止暴力行动，甚至将几名打砸了一家犹太店铺或熟食铺的党员开除出党。^[26]

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高级警长马特乌斯·霍夫曼（Matthäus Hofmann）的证词。然而霍夫曼是纳粹党员（而且与党高层关系不一般，希特勒入狱后，霍夫曼被乌尔里希·格拉夫选中负责照看他的狗）。即便是这样，根据这位警官的陈述也看不出希特勒曾出手干预，帮助犹太受害者。

别的且不说，按照霍夫曼的陈述，对犹太熟食店的袭击并不是政变当晚发生的，而是在那之前的某个未明确的时间。更何况，希特勒恼火的不是暴行的规模与残酷程度，甚至不是这件事造成的不良公众形象。希特勒对犯事的冲锋队队员的不满在于，他们在打砸那地方之前把党徽给摘了下来。

对慕尼黑的犹太社区而言，政变带来的是一个恐怖之夜。^[27]类似胡博纳带领的这种团伙在市中心和火车站附近游荡，伺机抢劫或袭击犹太人。有的在邮箱上寻找看上去像犹太人的姓名，或在慕尼黑电话簿里翻找。他们砸了店铺的橱窗，比如方济会修士街的一家犹太人所有的服装店，而后把他们发现的犹太人拖走。

究竟有多少犹太人有过这样可怕的经历，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说有24人被劫持。^[28]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低估的。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一个跟班当晚在啤酒馆离希特勒很近，他在自己的未出版回忆录中称，全城抓捕的人和宴会厅里被扣押的人加起来，总共有64名犹太人被“暂时拘禁”。人质当晚是在贝格勃劳凯勒过夜的，其中许多人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1]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79.

^[2] Police report, *Hitlerputsch im Bürgerbräukeller*, November 22, 1923, HA 67/1490.

[3] 1923年11月14日犹太电讯社。

[4] 1923年11月5日犹太电讯社。

[5] 吉奥格·福克斯 (Georg Fuchs) 未出版回忆录, HA 5/114I, 71。

[6]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57.

[7] 这个说法得到大量使用, 例见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15以及Erich Malitius, *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 Handel, 1935), 12。关于这种形象, 还可参阅罗恩·罗森鲍姆 (Ron Rosenbaum) 的杰出著作*Explaining Hitle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is Evil*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9), 38。

[8] 1923年11月27日《慕尼黑邮报》和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9]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 1924年5月21日《前进报》; 以及1923年11月27日终于得以复刊的《慕尼黑邮报》。除了报社遭到的破坏, 久久不能复刊还因为禁令直到1923年11月9日才解除。当时参与行动的汉斯·卡兰巴赫的叙述可见于*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München: Kress & Hornung, 1939), 26-27。

[10] 副本可见于HA 5/125 and 67/1491。

[11]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57.

[12] 1923年11月10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13] Ferdin and Mürriger gegen Berchtold, Maurice et al., A.V. XIX 466/29 December 24,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14] Proz. Reg. 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Gründedes Urteiles, May 3, 1924, HA 67/1493.

[15] MA 103476/3, 1217, BHSStA.

[16] 是从一扇打碎的窗户伸出来的，报告见于VI a F 425/24,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17] *Der Zerstörung der 'Münchener Post.'* HA 5/116. 另可参阅MA 103476/3, 1232-34, BHSStA.

[18] 身份证副本见HA 4/94。

[19] 莫里斯是运动与体操组的头目，Police report, September 27, 1921, HA 65/1483, 以及未发表手稿, *Regiment München, II Batallion, 6 Kompanie*, HA 4/100, 和他在1946年3月16日接受的国际军事法庭问讯, ZS 270, IfZ。关于莫里斯在“会场卫队”中的工作, 见Bruce Campbell, *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20, 以及他和希特勒的关系, Anna Maria 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 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 Heyne, 2003)。

[20] Sophie Auer testimony, Anz. Verz. XIX. 592/23, *Akt Hübner Ernst u. Gen. wegen Landfriedensbruch*, HA 67/1491.

[21] Proz. Reg. 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Gründe des Urteiles, May 3, 1924, HA 67/1493.

[22] NA T84 EAP 105/7, 1607.

[23] MA 103476/3, 1447, 1234-35, 1056-57, 1070, BHSStA.

[24] Anz. Verz. XIX. 592/23, *Akt Hübner Ernst u. Gen. Wegen Landfriedensbruch*, HA 67/1491.

[25] 在当晚的媒体报道和警方报告中, 提到抓捕犹太人的次数远比其他犯罪少。见警方日志,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以及警方于1923年12月7日呈交卡尔的报告, 发表于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74, 474-75。

[26] 理查德·J. 埃文斯 (Richard J. Evans) 在他的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46-49中提到了这个讹误。霍夫曼的证词见于NA T84 EAP 105/7, 886-87。关于霍夫曼的背景资料, 尤其是作为纳粹党员的事迹, 可见于议会调查, MA 103476/2, 788, BHStA。霍夫曼前往兰茨贝格探视可见于 *Sprechkarte*, Folder No. 4, JVA 17.000, StAM。

[27] 一个当晚在那里遭到扣押的人的陈述: 1923年11月18日报告, HA 5/114I; 路德维希·瓦瑟曼的陈述, 1923年11月21日, HA 5/114I; 1923年11月26日《前进报》; 约翰·塞尔比警监的报告, 1923年11月22日, 发表于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36, Beilage C, 421。另见MA 103476/3, 1439, BHStA。

[28] Erich Eyck,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trans. Harlan P. Hanson and Robert G. L. Wai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I, 276。还有一个说法是20人, Georg 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Verlag K.W. Schütz, 1977), 82-83。未出版回忆录中的数字和“暂时拘捕”这个词来自约翰·艾格纳,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5, HA 5/114II。在MA 103476/3, 1236, BHStA中可以找到一个接近的数字(58)。

13 午夜慕尼黑

孔雀是需要拔毛的，否则会毁在自己的羽毛上。^[1]

——赫尔曼·戈林

在柏林，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总理和财政部部长亚尔马·H. G. 沙赫特（Hjalmar H. G. Schacht）博士正在大陆酒店的一个包间里吃夜宵。^[2]晚上11点半，两人正在用甜点时，一个信差缓缓来到桌边，对总理耳语了一番，告诉他媒体报道了“慕尼黑的一场政变”^[3]。施特雷泽曼起身告罪，匆匆赶往帝国总理府参加一个紧急会议。^[4]

已经谢顶的施特雷泽曼作风勇悍、头脑敏锐，是魏玛共和国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那年秋天，上任才几个月的施特雷泽曼下了很大功夫，想带领国家摆脱通胀和孤立的混乱局面。英国大使戴伯隆子爵（Viscount D' Abernon）说他“行事颇无顾忌”，且“素喜剑走偏锋”。他还说，施特雷泽曼“与温斯顿·丘吉尔可谓同道”。^[5]

与会的还有德意志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这位53岁的社民党人只有八年级学历。他曾经是一名马鞍匠，^[6]还做过别的营生，后来在不来梅买了一间酒馆，成了行会活跃分子。1919年2月，艾伯特在新共和国的第一届全国选举中爆冷获胜。在位的四年半里，德国局势极为动荡，左右阵营的政敌对他百般诋毁。

面对慕尼黑的这场最新的危机，艾伯特总统、施特雷泽曼总理以及他们的顾问匆匆制定了对策。他们审查封锁来自巴伐利亚的新闻，冻结金融交易，把守道路、火车站以及其他与这个陷入动乱的南方邦之间的联系渠道。

对于希特勒政变会如何收场，一个关键因素显然是德国军方。军人会听从他们宣誓保卫的这个共和国的调遣，还是会支持民粹主义偶像鲁登道夫将军领导的叛党？

艾伯特总统直接向57岁的总司令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大将提出了这个问题，将军曾在奥古斯特·冯·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麾下任参谋长，是德军在俄国、土耳其和东部战场取胜的策划者。此前西克特已经派兵到汉堡、萨克森和图林根平抑过共产主义叛乱。但是，这个出了名的右翼领袖会采取同样手段对付这次叛乱吗？

“总统先生，防卫军听我的，”^[7]据报道，左眼戴着单片眼镜^[8]的将军当时说。

但果真如此吗？包括施特雷泽曼总理在内的不少人不是很确定。德军有部队向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投诚的消息已经陆续传来。即便多数部队会听命，冯·西克特将军又会发出什么样的命令呢？许多人认为他自己也在图谋篡权。他对共和国无疑缺乏好感。这位戴单片眼镜、城府极深的将军可不是凭空得到“斯芬克斯”^[9]这个绰号的。

当晚，眼看革命和内战就要爆发，艾伯特总统启用了臭名昭著的魏玛宪法第48条——这是一个保障措施，让领导人在“德意志国公共安全和秩序……面临严重侵扰或威胁”^[10]的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行政权力。艾伯特最终将动用这项权力不下136次，^[11]这种依赖对维持脆弱的共和国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无疑没什么好处。

而后艾伯特将紧急权力交给了冯·西克特将军。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如此巨大的权力合法授予一名军队领袖，在德国近代历史上可谓闻所未闻。

当然，柏林的根本问题是：如果希特勒到头来还是杀到了首都，他会做什么？

他和同党会不会宣布巴伐利亚独立？这显然是他的一部分支持者想要的，但可能性不大。政变者当然希望艾伯特总统和他的内阁下台，但是他们会推翻共和吗？如果是这样，他们会不会用一个独裁或复辟君主政权取而代之？^[12]如果是后者，会选哪个王朝？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还是在一战结束前统治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众所周知卡尔是支持前者的，鲁登道夫支持后者。有许多问题尚待解答，慕尼黑方面在细节上一直含糊其词。

另外有人还担心，一场德国革命会如希特勒承诺的那样，导致撕毁《凡尔赛条约》，立即终止所有赔款。即便政变不成，现在还存在一个可能性是法国会利用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以发起严厉的惩戒行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就是这么看的。加斯帕里枢机还提醒说，政变会刺激巴伐利亚的分裂分子，给巴伐利亚和德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13]

果不其然，法国对此事十分警觉。听到政变的消息后，法国驻德大使皮埃尔·德·马尔若希（Pierre de Margèrie）发出一份声明，向柏林强调他的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财力和人命，用了四年击败“普鲁士军国主义”，可不想到头来让它伪装成“一群誓要撕毁《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独裁者”卷土重来。大使还说，英国也是这样的立场。^[14]

回到慕尼黑，罗姆上尉正在战争部高声发号施令，^[15]筹备与巴伐利亚领导人的会晤。在做好周边布防后，罗姆将洛索的办公室外的一间前厅设为战争室，也就是筹划攻打柏林的总部。

等到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抵达时，这场重要会议已经准备就绪。但是卡尔、洛索和塞瑟在哪？

这时候他们应该已经抵达战争部才对。给卡尔办公室的电话打不通，让他们更加紧张的是，电话那一头一直在忙线状态。事实上等到有人接听电话的时候，对方会说卡尔已经在路上，或者去了陆军工兵营，或在另一条线上，如果是后者，那么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等待，莫名其妙地被挂断。洛索和塞瑟的情况也一样。

鲁登道夫并不担心几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失踪，因为他们向他做了承诺。希特勒也不是太担心。^[16]不过焦虑的迹象是这时候开始显现的。据“小家伙”回忆，当时穿着初来这座城市时那身腰带风衣的希特勒，开始“像个亡命徒似的来回[踱步]”^[17]。

冯·洛索将军的去向无疑成了很多人关心的事，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其中有一群人绝对没想到当晚会见到他，那就是他在市内兵营的参谋。在发出一系列命令后，洛索的下属雅克布·冯·丹纳将军来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让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冯·洛索将军已经坐汽车从贝格勃劳凯勒来到了这里。

“这一切肯定都是虚张声势，对吧，将军阁下，”丹纳问道。^[18]

当然了，洛索回答，他对希特勒在宴会厅的“可耻偷袭”^[19]表现出的恼怒和愤慨至少让在场的某些军官觉得，他是在自责。据邦警监汉斯·卑尔根（Hans Bergen）说，他当时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极其激动和气愤”，^[20]并且显然不太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丹纳不信任洛索，不过他知道自己需要这个人，别的不说，要想获取由他的同僚卡尔和塞瑟掌握的资源，就得通过他。比如塞瑟作为邦警总长掌握着目前城中最庞大的武装力量^[21]，包括驻扎在营地里的约1800人。在军队增援抵达前，要想保持对慕尼黑的控制，和希特勒对抗，这些邦警部队至关重要。

于是丹纳认为，当务之急是转移到第19步兵团营地内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点。他们发信给在官邸的卡尔和在警察营地的塞瑟，要他们速来会合。一座原为通讯站的木头平房成了他们的新指挥中心，洛索、丹纳和他们的参谋将藏在那里，准备弹压希特勒的叛乱。

[1] Leonard Mosley, *The Reich Marshal: A Biography of Hermann Goering*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1975), 57–58.

[2] Gustav von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Der Nachlass in Drei Bänden* (Berlin: Ullstein, 1932), I, 204.

[3]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 Nr. 231, 997–98. See also report, Nr. 264 November 11, 1923, HA 5/114II.

[4] Kabinettsitzung von 9. November 1923, 12 Uhr, R 43 I/1389 B1 81–82 in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 998–1000.

[5] Viscount Edgar Vincent D' Abernon, *The Diary of an Ambassad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29–1931), III, 10.

[6] 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Sch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1983 edition), 123.

[7] Jonathan Wright, *Gustav Stresemann: Weimar's Greatest States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8.

[8] Friedrich von Rabenau, *Seeckt. Aus seinem Leben 1918–1936* (Leipzig: Hase & Koehler, 1940), 374.

[9] Frédéric Hirth, *Hitler, ou le guerrier déchaîné* (Paris: éditions du Tambourin, 1930), 135, and F. 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04.

[10] 魏玛宪法第48条。

[11] 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80.

[12] F. 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87.

[13] Bayerische Gesandtschaft beim Hl. Stuhl an das Staatsministerium des äussern, 1923年11月9日,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91, 317–18.

[14] 1923年11月9日《纽约时报》。另见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3年11月9日《小巴黎报》、1923年11月8日路透社报道以及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267, 657。

[15]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47.

[16] 不少史家的看法正相反, 然而具体在这个时候可能性甚微。有多名目击者的陈述可以证实, 比如乌尔里希·格拉夫, VI a F 244/23–24, HA 67/1494。

[17]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102.

[18] NA T84/2 EAP 105/7, 1272 and 1942; 另见1923年11月22日洛索的陈述,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19] NA T84/2 EAP 105/7, 1942.

[20] NA T84/2 EAP 105/7, 1871.

[21]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1-73.

14 第264号令

我不想太早亮底牌。^[1]

——古斯塔夫·冯·卡尔

到了1923年11月9日凌晨大概1点或1点刚过没多久，^[2]卡尔、洛索和塞瑟已经抵达新设立的平叛指挥中心。同时他们还收到了两条重要信息。首先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强烈反对这场政变。^[3]其次他们收到了柏林的总司令冯·西克特将军的表态，^[4]称他也反对“这场疯狂的哗变”^[5]。他下令巴伐利亚当局立即镇压叛乱，如若不然，他会亲自动手。

到了凌晨2：50，^[6]离开啤酒馆四个多小时后，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已经向帝国全境的电台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

邦务委员冯·卡尔、冯·洛索将军和冯·塞瑟总警监反对希特勒政变。在武力逼迫下做出的贝格勃劳凯勒集会声明是无效的。务必小心有人滥用以上三人的名义行事。^[7]

三人还起草了一份长一些的文稿用于对外张贴，其中痛斥希特勒“阴险狡诈，违背诺言”，^[8]并誓称要果断行动，粉碎这一背叛行径。

此时纳粹党及其战斗联盟已经被宣布为非法并取缔。卡尔发出的第264号令^[9]还要求查抄这些被禁组织的所有钱财、武器、装备、车辆等，并强调其成员可面临最多15年的徒刑。后续的命令要求，^[10]对鲁登道夫、希特勒及其支持者应“当即”予以逮捕。

多篇反对希特勒的公告在城中各处张贴。然而这些公告需要和纳粹的那些宣告成功组建希特勒-鲁登道夫-卡尔-洛索-塞瑟政权的告示

竞争。希特勒的人在报摊争夺战中占据巨大优势。

更糟的是，三人还需要驳斥即将发行的报纸上的说法。卡尔的顾问和讲稿作者、《慕尼黑报》主编阿道夫·席特（Adolf Schiedt）提醒他们，报社记者只能写他们在啤酒馆看到的東西，即巴伐利亚领导人支持革命的发言。换句话说，慕尼黑人在早晨的报纸上看到对卡尔、洛索、塞瑟与希特勒结盟的连篇报道，对他们的否认则只字不提。为了避免混淆国民视听的“巨大危险”，^[11]席特吁请他们制止报纸的印行。

巴伐利亚当局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当晚情况一团糟，谁都顾不上去做这件事。在凌晨3点到4点之间的某个时候，席特终于找到了一台电话，与他的出版人汉斯·布赫纳（Hans Buchner）联系，此人还兼任慕尼黑编辑和出版人协会主席。“今晨慕尼黑全城的报纸发行应予禁止，”^[12]席特说，他要求布赫纳向同行转达这一命令，同时告诉他们，凡有违背者会被处死。

布赫纳对这一惊人命令的反应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他顺从地给全城的同行打了电话。《慕尼黑最新消息》编辑弗里茨·葛里希在参加了警方的图书室新闻发布会后已经睡下，现在又被他叫了起来。

葛里希告诉他，报纸已经印了至少3万份，就快开始递送了。他说现在已经不可能停下来。就算他愿意照办也来不及了。

葛里希随即致电恩斯特·珀纳，^[13]抗议这种在最后关头妨碍言论自由的行为。

但这个消息让珀纳也感到意外。

在发布会后也睡了一会儿的珀纳说，他没有收到这样的命令。他可以肯定卡尔也没这么做过。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已经睡不着的

珀纳试图给警察总部的亲信威廉·弗里克打电话。^[14]

电话交换台的值班警官说，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来问弗里克，但他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住所，谁也不知道他在哪。

几分钟后，葛里希给珀纳回电向他证实，经过一番调查后，他敢肯定停发报纸的命令是卡尔的办公室下达的。这让珀纳大吃一惊。卡尔是他的老朋友。他要是下了这种命令，肯定会事先通知自己。但他还是开始担心起来。弗里克去哪了？不跟下属打招呼就离开岗位，这不是他的作风。

就在珀纳琢磨着这些的时候，门铃响了。^[15]是马克斯·冯·舒伊勃纳-里希特奉命来让珀纳去战争部。他说情况有点不太妙。希特勒需要他立即过去。

^[1] NA T84/2 EAP 105/7, 2505.

^[2] 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不过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称几人的再度会合最晚是在凌晨1:15: NA T84/2 EAP 105/7, 1747。见Kommandantur München, No. 4453/I, November 19,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以及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100。

^[3] 1923年11月10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另见代副领事R. D. 墨菲的《巴伐利亚政局分析》，1923年11月23日（邮寄），M336, 862.00, No. 19, NA, 以及格拉夫·冯·索登（Graf von Soden）发表于1924年3月21日《慕尼黑最新消息》上的文章。

^[4] Georges Bonnin, *Le putsch de Hitler: à Munich en 1923* (Les Sables-d'Olonne: Bonnin, 1966), 111. 另见西克特在1923年11月5日政变前夜给卡尔的信，摘录于Didier Chauvet的*Hitler et le putsch de la*

brasserie: Munich, 8/9 novembre 1923 (Paris: L' Harmattan, 2012) , 126-27.

[5] 1923年11月9日《纽约时报》。

[6] NA T84/2 EAP 105/7, 1275. 塞瑟错把时间写成了凌晨2: 15, NA T84/2 EAP 105/7, 1499。

[7] NA T84/2 EAP 105/7, 1276, 1356.

[8] *Aufruf*, 1923年11月9日, copy in HA 67/1492。

[9] 命令副本见于HA 68/1495。另见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以及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 1923-1925* (London: F. Cass, 1989) , 28-30。

[10] Kommandantur München, No. 4453/I, November 19,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NA T84/2 EAP 105/7, 1092.

[11] NA T84/2 EAP 105/7, 930.

[12]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 Nr. 182, Anlage 7, 513. 另见Horst J. Weber, *Die deutsche Presse, 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 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 1930) , 51。

[13] NA T84/2 EAP 105/7, 242-43; *Erklärung des Herrnber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December 29, 1923, HA 5/120.

[14] NA T84/2 EAP 105/7, 243.

[15] NA T84/2 EAP 105/7, 243. 以及约翰·艾格纳未出版回忆录,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2, HA 5/114II。

15 “我不是胆小鬼”

你的梦想恐怕很快就要破灭了。^[1]

——艾伯哈特·考特尔（Eberhardt Kautter）对一名希特勒-鲁登道夫
政变支持者说

在步兵营碰头后，巴伐利亚领导人下达的第一批命令里有一道就是逮捕威廉·弗里克。^[2]慕尼黑的邦警指挥官约瑟夫·班泽（Josef Banzer）总警司和他的幕僚长西格蒙德·冯·因霍夫警司很乐意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们对此人的动机早有怀疑。凌晨3点半左右，弗里克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询问三名领导人的最新消息，这给他们的任务提供了方便。^[3]

趁着因霍夫悄悄出门叫帮手，班泽设法若无其事地跟弗里克聊了两句。等他回来的时候，弗里克打算离开。因霍夫堵在了门口。

“弗里克先生，我很遗憾，但这是我的职责，”因霍夫说。^[4]

班泽跟他摊了牌：弗里克被捕了。

“是谁的命令？”弗里克问。

“政府。”

“可是，哪个政府，总警监？”^[5]

弗里克大吃一惊。难道真是古斯塔夫·冯·卡尔的命令，就是那个几小时前刚刚承诺支持希特勒政权的人？

因霍夫叫进来的两名警官把弗里克带到楼里的另一个房间。下一个任务是逮捕珀纳。

舒伊勃纳-里希特和珀纳来到战争部，^[6]房间和走廊里到处是士兵，有些在抽烟、闲聊，或者干脆打算睡一觉。三楼，希特勒正在和罗姆谈话，指责没有到场的冯·洛索将军辜负了他。在场所有人都表示赞同，只有鲁登道夫仍然拒绝相信一名德国军官会言而无信。

希特勒寄望用说服的艺术来化解危机。有10万份新政权的告示将会在城中张贴。像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这样善于蛊惑人心的人物会出来演讲，^[7]慕尼黑各地会有14场集会。会有赫尔曼·埃瑟撰写的文章和公告。《人民观察家报》及其他的慕尼黑报纸会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慕尼黑人的早餐桌上。“宣传，宣传就是一切，”希特勒说。^[8]

在那家被征用的银行，埃瑟正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忘我地做着这件事。他的那些即将在报纸上发表的公告，加上他抱病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这一点，令希特勒的人对他称赞有加：

十一月罪人的革命止于今日……五年前，一伙聒噪、可悲的逃兵和罪犯从我们的监狱逃脱，在英雄的德意志人民背后捅刀子。这些民族的叛徒，向轻信他们的人民撒谎，许以和平、自由、美和尊严……结果呢？^[9]

埃瑟接着描写了饥饿与困苦的人民，他们被“投机倒把分子和政治骗子”以及柏林那些将国家资产拱手送出的罪犯政客尽情宰割。强行施加的凡尔赛和平致使1700万德意志同胞“与我们分离，被百般羞辱”。与此同时，“一个曾经的妓院龟公”——他指的是艾伯特总统——“篡夺帝国总统之位，”这是在“败坏德意志人民与德意志共和国的荣誉”。

“只有傻瓜才会指望从这样的地方获得帮助。”

尽管在公告中洋溢着必胜的信心，埃瑟还是有担忧的。他把稿件交给了报社，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10]此后埃瑟去了摄影师朋友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在街对面的工作室，向他吐露了自己的忧虑。

“全完了，”^[11]霍夫曼记得当时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说。他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让巴伐利亚领导人离开啤酒馆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洛索会纠集军队——加上塞瑟的邦警——大举发起反攻。而纳粹的势头则在消失。

几个小时下来，政变无疑正在显露它的真面目。糟糕的计划，马虎的决策，草率的急中生智，这些都显示出政变严重缺乏对细节的关注。毫无章法的通讯联络和对冗长的演说和浮夸的声明的偏好也拖累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临时改变计划，将行动提前到11月8日，导致无法进行有效的准备和组织，更不用指望找到足够多的盟友。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党没能争取到充分的支持，无力抵挡掌握大量军事、工业和经济资源的对手。

希特勒和政变领导者们陷在了一个超现实的幻想世界里，错把愿望当成现实，他们不愿意承认巴伐利亚领导人不会与他们合作。到了那天早上6点，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正视现实。

最后让他们醒觉的是一个双方都熟悉的人物，55岁的慕尼黑步兵学校教官路德维希·利奥波德（Ludwig Leupold）上校。他在学校被人叫醒，说鲁登道夫将军要见他，于是立即赶往战争部。^[12]经过漫长的等待，利奥波德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二人。对于让他们等了将近七个小时的洛索，鲁登道夫将军表达了不满。电话没人接；信差也一去不回。鲁登道夫径直问他洛索的去向。

他不会来的，利奥波德说。接着他又证实，洛索已经下令要军队反抗希特勒及其支持者。

据利奥波德后来说，鲁登道夫惊呆了。将军大概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洛索不打算跟他们并肩拼杀。

而后鲁登道夫要求教官去面见洛索，劝说他履行自己的诺言。

这场会面的最后，希特勒有一段长时间的咆哮，说他为德国做了四年的工作，他“准备为[他的]事业而战”。他高喊“我不是胆小鬼！”至于洛索，如果他为德国所做的事毁在此人手上，这名巴伐利亚将军就是在放弃“生的权利”。^[13]

虽然有这番夸夸其谈，希特勒此刻肯定已经意识到，一旦调动了防卫军，他的人将很难守住战争部。他们决定撤回到贝格勃劳凯勒。^[14]这场政变要回到啤酒馆这个起点。在那片属于希特勒的天地，他们将筹划与当权者的决战，不管所谓当权者指的是什么。纳粹显然没什么准备，更别说行动失败之后能有什么替代或应变方案了。他们再次不得不见机行事。

在去啤酒馆的途中，希特勒顺便回自己的寓所换了身衣服。鲁登道夫和其他政变者会在贝格勃劳凯勒与他会合。罗姆受命留在战争部，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里。

^[1] 1924年1月2日，HA 5/114I。

^[2] Major Imhoff to I. Staatsanwalt beim Landgericht München I, 1923年11月15日，MA 104221, BHStA.

^[3] 此处的场景描绘依据了多人对弗里克被捕的陈述，包括因霍夫（NA T84/2 EAP 105/7, 1172-73）、弗里克（NA T84 EAP 105/7, 725-26）和罗德，*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 HA 5/126, 此外还有NA

T84 EAP 105/7, 2694, 以及报告, *Bericht an den Herrn Generalstaatskommissar München*, December 7, 1923, HA 67/1491。

[4] NA T84/2 EAP 105/7, 1173.

[5]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09.

[6] 大概是凌晨4:30, 至少是在5:00之前, NA T84/2 EAP 105/7, 243。

[7] MA 103476/3, 1349, BHSStA.

[8]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194.

[9] 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10] Alfred Rosenberg interrogation, VIa 2500/23, June 6, 1924, HA 67/1493.

[11]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55-56.

[12] 此处的场景描绘依据了当时在场者的证词, 包括路德维希·利奥波德上校 (NA T84 EAP 105/7, 195. 802-4); 阿道夫·希特勒 (NA T84/2 EAP 105/7, 110-11); 埃里希·鲁登道夫 (NA T84/2 EAP 105/7, 538-40; 以及1923年11月22日Police report, HA 68/1494, 和检方的论证,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28-29, StAM。当然,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一些下属几个小时以前就已经意识到三巨头会反对: Richard Kolb, *Bericht über den 8. und 9. November 1923*, HA 5/116。

[13] NA T84 EAP 105/7, 804.

[14] Walther Lembert, A. V. XIX 421/23, January 3, 1924, HA 67/1493.

16 决断时刻

如果有人给他建议或提出警告，他会说，“我应该坚持自己的路”。至于那路会通向何方，他看不到，也梦不到。^[1]

——玛格丽特·鲁登道夫

经过一夜的劳顿，约1000名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人此刻已经在啤酒馆里四散休息，^[2]有的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趴在桌上，有的直挺挺躺在拼起来的椅子上。运气好的可以吃上有黑麦面包、奶酪、香肠^[3]和黑咖啡的早餐，多数是从街对面一家餐馆抢来的。希特勒则享用了两个煎蛋、一片肝泥糕、两片面包和一杯茶。

整晚待在人民观察家报社的外国记者拉瑞·卢那天早上获准进入被占领的啤酒馆。他觉得那片地方像是一座战时的军营，到处是军粮、弹药和补给。小伙子们已经在花园里操练，尽管又饿又累。大家基本上都相信，向共和国发起的攻击已经成功了。

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几名顾问躲进了二楼一个小型私人餐室里。这里的气氛沉郁，与外面的热情高涨截然不同。“看起来我们的情况不太妙，”希特勒在上午早些时候跟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说。^[4]

鲁登道夫还穿着那件花呢夹克，在变味的雪茄和香烟浓雾中喝着杯红酒。希特勒在那件有腰带的风衣里穿了件暗色双排扣套装。一名《纽约时报》的记者那天上午看到希特勒凝视着一张慕尼黑地图，看上去“显然情绪不佳，十分劳累”。

希特勒以这个新独裁政权的领袖自居，但是他“看上去不太像能胜任这个角色，”《纽约时报》记者还说。他似乎只是一个“穿着一件旧防水大衣、腰上别着把左轮手枪的小矮子，没刮胡子，头发蓬

乱，喉咙嘶哑得几乎无法说话”。反观鲁登道夫就显得“极为友好”，不过“在和希特勒以及其他政治顾问交谈时显得焦虑且心事重重”。将军表示他迫切希望得到英格兰的承认，尤其谈到了“新德国的辉煌未来”。^[5]

对于他们所处的困境以及合理的对策，希特勒与鲁登道夫显然有不同看法。希特勒对将军的敬畏在渐渐消失。他不再是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被同僚比作服侍将军的勤务兵，或是在伺候最尊贵的主顾的伙计。希特勒是不是已经在怪罪鲁登道夫放走巴伐利亚领导人？

希特勒说他只是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跟卡尔、洛索和塞瑟沟通。鲁登道夫反过来指责希特勒，说他当初就不该用枪逼他们进里屋。他当时相信他们已经达成共识。

这就是此刻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热情在消退，指挥陷入瘫痪，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希特勒坚持实施他构想的一个宣传攻势，派激昂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深入到慕尼黑“大街小巷去演说”。他让赫尔曼·戈林和马克斯·阿曼负责派冲锋队队员去印刷厂取海报，在全城张贴。

另外为了打点徒众，他们还急需用钱，为此希特勒命令一帮冲锋队队员去打劫两家商店，分别是散步广场上犹太人所有的帕库斯公司（Firma Parcus）^[6]和达豪大街的埃·穆尔塔勒公司（E. Mühlthaler and Company）。选这两家企业是因为这是获取大量金钱的一个捷径：它们是印钞票的。

冲锋队队员那天上午搬回来14605万亿马克，^[7]20个箱子堆在前一晚乐队演奏的那个台子上，将近五英尺高。事实上乐队还在，但只是偶尔无精打采地演奏一下。又累又饿的乐手们抱怨说，这笔飞来横财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希特勒下的最后一道命令进一步疏远了鲁登道夫。他派了一名密使^[8]代表他个人去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见鲁普雷希特王储，恳请他出面，说是只要他一发话，卡尔就会支持革命。鲁登道夫并不拥护信奉天主教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但希特勒相信，鲁普雷希特的协助将是他们成败的关键。

在屋外，这个阴冷的上午依然在下雪。^[9]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些赶去上班的人，仿佛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慕尼黑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经历革命的阵痛。^[10]

对城里的大多数人来说，贝格勃劳凯勒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报纸知晓。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大标题是“钩十字的胜利”，狂热地表示犹太人和犹太政权治下“饱受屈辱的五年”已经被希特勒终结。一个新时代到来了，报纸表示。德国雄鹰即将展翅高飞。

这一期报纸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精心策划的。他一一赞美了革命领袖：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自然不可少，但和他们一同登台的巴伐利亚当权者也包括在内。卡尔是模范公务员，忠于祖国和人民；洛索被描绘成“大无畏的军事统帅”；塞瑟的形象则是勤奋工作，成为稳健的后援，并参与了重新唤醒“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精神的行动。他们是将要创造历史的人。^[11]

最先刊发的那批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慕尼黑影响力最大的日报《慕尼黑最新消息》也对这场显然的胜利进行了生动的报道。^[12]正如卡尔的顾问阿道夫·席特所警告的，媒体对尚在初期阶段的政变肯定会有帮助，它们会传播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左右的信息，还会给政变领导者带去鼓舞，让他们知道这场运动还没有失败。

而在其他地方，许多欧洲报纸收到政变的消息已经晚了，只能给出最基本的陈述。在巴黎，《晨报》表示鲁登道夫已经宣布成为独裁者，^[13]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人被慕尼黑法西斯关进了监狱。《小巴黎报》（*Le Petit Parisien*）则称，现在存在一种普遍的担忧，认为革命党会撕毁《凡尔赛条约》。^[14]《泰晤士报》及其他几家英国报纸表示要小心德国分裂并走向内战。^[15]

在大西洋对岸，报纸利用时差的优势对事件进行了更详细的报道。“阿道夫·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开始了攻打柏林的行动，”^[16]

《纽约时报》报道。那天早上他们刊发了六篇关于政变的文章。德国内外的大多数报纸都强调了鲁登道夫将军的角色，他无疑是此次政变中名气最大的人物。希特勒自己的《人民观察家报》是少数先提到希特勒的报纸之一。

其中一些报纸把希特勒说成只是个次要的配角，如《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所说，是“鲁登道夫的助手”。^[17]还有比如《每日新闻》这样的报纸把他的名字拼成了“Hittler”，^[18]或像《纽约论坛报》那样，错把他当成一名副官。那一年刚刚创刊的《时代》杂志把他归为巴伐利亚君主派。^[19]《十字架报》（*La Croix*）称他是“希特勒将军”。^[20]

但希特勒不是将军、保皇派，不是鲁登道夫的助手，无疑也没打算去柏林。此刻他还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二楼来回踱步，思考如何拯救这场失控的革命。

与此同时，恩斯特·罗姆和其他几名高层同僚正在把巴伐利亚战争部变成一座纳粹堡垒，周围布设了铁丝网和尖利的钢铁障碍，窗口架着机枪。他的一些手下把守着入口，在院子里巡逻。他们几个则深藏于大楼三层的作战室，等待下一步行动。

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已经有几个小时没有发来命令或消息。恩斯特·珀纳的警察总部也没动静，珀纳被希特勒派去那里查看弗里克的情况，而本应该已经到达那里的洛索将军更是不见踪影。罗姆后来说，他感觉“孤身一人，被抛弃，不知所措”。^[21]

深受通讯不畅之扰的罗姆不久就要面对大批的国防军，这支受雅克布·冯·丹纳将军调遣的部队据说正在向战争部进发。其中一部分已经抵达路德维希街：两个步兵营、三个炮兵营、一个迫击炮连，另有八辆装甲车和大批分遣出去的邦警。军队的狙击手匆匆进入附近楼顶的战略位置，或者高楼层的窗口，就位后等待命令。

虽然政变面临抵抗，希特勒对慕尼黑当局依然有人员和枪械上的数量优势。希特勒的冲锋队和战斗联盟总共约有4000人；^[22]相比之下接受政府指挥的部队只有2600人，其中1800人是邦警。

不过大批援军正在从巴伐利亚周边地区赶来。已经调动起来的邦警单位控制了市中心的桥梁和主要道路。希特勒在一开始形成的兵力优势正在减弱。

在二楼的私人餐室，希特勒、鲁登道夫等人在商量对策。战斗联盟的军事指挥官赫尔曼·克利伯中校称前景“一片渺茫”，强烈主张“有序撤退”。^[23]戈林也认为该撤退，但前提是他们要能借此重整旗鼓，伺机再次发起攻击。同时他还提议把行动大本营转移到慕尼黑以南大约40英里处的罗森海姆^[24]，离奥地利边境很近。那里是一个纳粹支持者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纳粹党在慕尼黑以外的第一个分支组织就在罗森海姆，而且戈林对那里的路很熟，他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

希特勒一开始赞同这个方案，后来犹豫了起来，他指望巴伐利亚王储来救他，或相信宣传的力量能扭转事态。鲁登道夫则既反对希特

勒的观望，也不喜欢戈林撤退到罗森海姆的计划。他鄙夷地说，后者是把国家革命带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土路”^[25]上去。

上午11点多，有消息说邦警正在收紧对城中各处的控制，^[26]包括在横跨伊萨尔河的桥上设路障，控制进入市中心的入口。革命的领导者们需要马上做出决断。再这么待在啤酒馆，他们会被包围，和罗姆一个下场。

鲁登道夫提议组织一场示威，或者说公开展示一下力量。他们应该让支持者在城里游行一遍，号召大家加入，至少能给他们鼓劲。此举还能让四周无所事事的人没那么懈怠和厌倦。如此坐等敌人不断增强实力、步步进逼，对士气是格外有害的。

也许通过展现群众的支持可以打消卡尔、洛索和塞瑟的抵制。另一个考虑是，军队要是看到游行的带头人是鲁登道夫将军这样受全民爱戴的人物，自然也不会开枪。“天塌下来部队也不会向我开火的，”鲁登道夫在前一天对同僚说。^[27]他们的设想是士兵会纷纷倒戈，站到钩十字旗下。运气好的话，这股民族主义势头可以把希特勒推到柏林，就像墨索里尼被推向罗马那样。

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鲁登道夫说，“我们游行。”^[28]

^[1]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284.

^[2]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München-Gräfelfing: F. A. Beck, 1953), 61, and Walter Hewel interrogation, VI a F 425/24,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3] Julius Schaub, interrogation, April 25, 1924, HA 68/1494, 以及黑咖啡,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18.

[4]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 63, F14, IfZ。

[5] 1923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

[6] Fritz Stahl未出版陈述, *Bericht*, January 18, 1938, HA 5/116和《慕尼黑邮报》, November 27, 1923, 以及Mühltaler: Police report,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7] Buch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 Gebrüder Parcus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 November 19, 1923,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37, 423.

[8] Max Neunzert, H. B. No. 170/24, April 17, 1924, HA 67/1493, 以及1924年1月22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9] response of Karl Kessler, question 47, Fragebogen über Ereignisse an der Feldherrnhalle in München am 9. November 1923, January 1936 HA 5/115.

[10]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

[11] 1923年11月9日《人民观察家报》。

[12]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3] 1923年11月9日《晨报》。

[14] 1923年11月9日《小巴黎报》。

[15] 1923年11月9日《泰晤士报》, 其他数家媒体报道了此事, 例如1923年11月10日的墨尔本《每周时报》选用了《曼彻斯特卫报》提出的警告。

[16] 1923年11月9日《纽约时报》。

[17]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195.

[18] 这个拼写将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不过在审判开始后渐渐减少。

[19] *Time*, July 23, 1923. Another variant was “leader of Bavarian nationalists, ”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ember 17, 1923.

[20] 1923年11月10日《十字架报》。

[21]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74; 另见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47-48.

[22]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73.

[23] NA T84 EAP 105/7, 435.

[24] 成立于1920年4月21日，是纳粹党在慕尼黑以外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25] NA T84 EAP 105/7, 542.

[26]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5.

[27] 格拉夫·海尔多夫 (Graf Helldorff) 1924年1月11日陈述，HA 5/114I。

[28] NA T84/2 EAP 105/7, 114 and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5-66.

17 大院里

我是个顽劣而幼稚的人，反正比起有头有脸的市民过着的规矩生活，我更喜欢战争和动荡。^[1]

——恩斯特·罗姆上尉

戈林下令让希特勒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发起最后的搜捕。部队需要抓慕尼黑市长爱德华·施密德（Eduard Schmid）和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用他的同僚克利伯中校的话说，就是那个“红、更红、最红党”。^[2]

但是这支约50人的远征军^[3]在前往市中心的路上遇阻，讽刺的是，造成麻烦的恰恰是希特勒亲手委派的演说家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在慕尼黑最大的广场玛利亚广场，他的煽动已经导致严重的交通堵塞。

新政府会“把犹太奸商吊死在路灯上”，^[4]施特莱谢尔站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座上咆哮着。希特勒会取缔“犹太”股票交易所，将所有银行国有化。他承诺饥者得食，而那些在掠夺而非治理的恶人会被绳之以法。“屈辱的时代到头了，”施特莱谢尔高声说道。

希特勒突击队的这支特遣分队^[5]绕过了人群——其中许多人正在高喊“希特勒万岁！鲁登道夫万岁”——最终抵达市政厅。^[6]

贝尔希托德带着十几名持机枪和步枪的队员冲了进去，^[7]疾步上楼闯入议会，大喊一声你们被逮捕了。他命令所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站起来。没人做出反应。

倒是有一位市议员——副市长汉斯·库夫纳（Hans Küffner）——胆敢反问：你怎么定义社会主义者？[\[8\]](#)

这位62岁的副市长被抓着领子往墙上撞。阿尔伯特·努斯鲍姆（Albert Nussbaum）议员[\[9\]](#)被揪住手腕和后脖领，左侧太阳穴被枪管捅了一下。议员们被逐一拖到外面，在一群已经被煽动得怒火中烧的民众面前经过。人们啐口水、推搡、叫骂着，要求对他们严加惩治。

战时做过航空摄影、几个月前被任命为希特勒个人摄影师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带着相机和玻璃底片，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在他拍下的一张令人胆寒的照片中，[\[10\]](#)市长和七名市议员被押上一辆卡车，即将前往贝格勃劳凯勒。

骚乱期间，钟琴在11点钟用机械小丑和骑士的舞蹈报了时。

在北边不到1英里的地方，德国防卫军正向被占领的战争部进发。邦警负责两翼和后方的保护。附近房子的窗口架起了机枪，枪管对准那座石砌建筑的正门。

罗姆的人在战争部周围和院内布防。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路德维希街的铁丝网路障上挂起一面“帝国战旗”的旗帜。窗口的机枪瞄着正在行进的军队。罗姆骄傲地说，他的人都是“不离不弃的兄弟”。[\[11\]](#)

双方形成僵持后，防卫军的行动指挥冯·丹纳将军派出一队人举着白旗上前谈判，[\[12\]](#)希望对政变者晓之以理，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自己从楼里走出来。

其中一名代表，就是罗姆上尉曾经的指挥官和恩师、少将弗朗茨·沙瓦·冯·埃普骑士（Franz Xaver Ritter von Epp）。[\[13\]](#)埃普

率领过的“埃普团”是最强大的自由军团队伍之一，参与了对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暴动的镇压。他还为纳粹党筹集了大约60000马克用于收购报社。^[14]总之，埃普在极右翼圈子里是很有声望的权力掮客。

看热闹的人群——其中一些人还冲谈判人员挥舞着拳头——注视着埃普和同僚通过了罗姆的岗哨，进入战争部。

抵抗是徒劳的，有人听到谈判代表跟罗姆说。^[15]卡尔、洛索和塞瑟已经决定举全邦之力反对政变。罗姆“人数和火力都在绝对下风”，^[16]除了投降别无选择，埃普说。罗姆拒绝了。他是在执行命令，要让他收兵，唯有鲁登道夫发话。

但是其中一名谈判代表说，政变已经成功了。柏林已经启动第48条，向冯·西克特将军授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向罗姆保证这会是“一场体面的投诚”。^[17]

罗姆要求和他们的指挥官冯·丹纳将军通话，双方约定停火两小时，以便在土耳其街的邦警营地谈判。然而在他走后没几分钟，战争部外就传来枪声。^[18]

谁先开枪当然是存在争议的。防卫军称开枪的是罗姆的人，在被占领大楼的一座侧楼里。罗姆的人说他们一枪未发，开枪的是控制了战争部后面一座车库三楼的防卫军。然而几年后罗姆承认，罪魁祸首可能是一个跟他的手下共事的暴脾气。

第一声枪响化成了激烈的交火，仅邦警就开了17枪。^[19]蹲在考尔巴赫街附近一堵墙边的两名防卫军士兵受伤。^[20]在战争部东侧大院里，^[21]罗姆手下的年轻银行职员马丁·福斯特（Martin Faust）^[22]也中枪了，子弹从他右耳后侧穿了过去。他脸朝下倒在地上。

福斯特的上司西奥多·卡塞拉（Theodor Casella）中尉高举右手大喊，[\[23\]](#)让所有人停止射击。他赤手空拳跑到福斯特身旁，结果自己大腿中了一枪。两人都被希姆莱带人抬了回来。福斯特已经死亡，卡塞拉被送到附近的若瑟芬医院，于当天下午死亡。啤酒馆政变有了第一批烈士。

[\[1\]](#) 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 210-11.

[\[2\]](#) NA T84 EAP 105/7, 435.

[\[3\]](#) *Die 6. Kompanie-ehemalige 4. Hundertschaft des Regiments München der S. A. der N. S. D. A. P. am 8. und 9. November 1923*, HA 4/93, and December 1, 1923, HA 67/1493.

[\[4\]](#) Proz. Reg. 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 Gründe des Urteiles, May 3, 1924, HA 67/1493, 以及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5\]](#) Proz. Reg. 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 Gründe des Urteiles, May 3, 1924, HA 67/1493, 以及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6\]](#)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7\]](#) Berchtold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 159.

[\[8\]](#) Julius Schaub, April 25, 1924, HA 68/1494.

[\[9\]](#) NA T84/2 EAP 105/7, 1960-1961;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10\]](#)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 56.

[11]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51.

[12] Walther Lembert, A.V. XIX 421/23, January 3, 1924, HA 67/1493.

[13]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6-17, 29, 两人存在不合, 75。埃普对政变本身的看法, 尤其对法国以及德国的敌人的有益之处, 《贝希特斯加登汇报》, November 17-18, 1923。关于此人还可参阅Katja-Maria Wächter, *Die Macht der Ohnmacht. Leben und Politik des Franz Xaver Ritter von Epp (1868-1946)* (Frankfurt am Main: P. Lang, 1999)。

[14] Albrecht Tyrell, “Exkurs. Zur Vorgeschichte der Erwerbung des ‘Völkischen Beobachters’ durch die NSDAP” in his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75), 177.

[15] Hildolf Freiherr von Thüngen, February 6, 1924, HA 67/1493.

[16] Translation in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76。关于此次谈判还可参阅Police report, *Umsturzversuch in der Nacht vom 8. auf 9. 11. 1923*, November 22, 1923, HA 68/1494。

[17]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53.

[18] Testimony of Alfred Andersch, Zum Akt Röhm, December 19, 1923, HA 5/114I.

[19] NA T84 EAP/2 105/7, 1076.

[20] Georg Träger was in the garage at the time, 1923年12月17日 Police report, HA 5/116。Helene Perutz也看到有士兵受伤, 1923年12月20日 Police report, HA 5/116。

[21] NA T84 EAP/2 105/7, 1067-68。更多细节可见于1923年12月17日警方报告HA 5/116对车库三楼机枪的陈述; 大院草图可见于HA 5/114II, 以及报告 *Leutnant Casellas und Fausts Tod im Wehrkreiskommando am 9 November 1923*, HA 5/114I. Röhm's admission is at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53-54。

[22] Zum Akt Röhm, 1923年12月19日, HA 5/114I, and testimony of Wilhelm Greiner, PV19, December 29, 1923, HA 5/116。

[23] 1924年1月11日HA 5/114II, 冲上去援救见 *Leutnant Casella's und Faust's Tod im Wehrkreiskommando am 9 November 1923*, HA 5/114, 以及 Police report, VI a F 2546/23, November 28, 1923, HA 67/1493。

18 希特勒的外国军团

千万别去，罗森贝格先生。那纯粹是自杀。[1]

——印刷工阿道夫·穆勒（Adolf Müller）

前慕尼黑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本应参与希特勒政府的一项制止恶性通胀的计划。其中一个首要目标是制止“犹太人和政治敌人的资本外逃”。[2]在上午8点有一个会，商讨行动的细节。但是珀纳没有露面。

他的同事马克·塞瑟尔曼打电话到他家问情况，珀纳的妻子玛格丽特接的电话，声音很激动。“那么，你们还不知道？”她问道。卡尔的支持已经不存在了。希特勒的人被出卖，珀纳已经被捕。当局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像一群猪猡”翻找写字台，搬空了文件柜。“赶紧逃命，”她建议，“全完了。”[3]

那天早上珀纳的确已经被捕。[4]得知三名领导人发起抵抗后，希特勒派他去了警察总部，让他利用自己的关系控制那里，以备革命之需。然而和弗里克一样，他立即被班泽和因霍夫两位警官逮捕了。感觉就像“被打了一记闷棍”，[5]珀纳说。

纳粹现在只剩下两个主要的抵抗据点：啤酒馆和战争部。但是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目前在哪个地点呢？[6]《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晨版问道。这个谜在报纸付梓之时仍未揭晓。

快到正午的时候，约2000人[7]在贝格勃劳凯勒外排成松松垮垮的队形。队伍前端是两名旗手，其中一人手持一面带钩十字的黑白红三色旗帜，另一个人拿的是蓝色钻石加高山火绒草的高地联盟旗。

他们身后是穿着风衣的阿道夫·希特勒，手上拿着皱巴巴的费多拉帽，腰间别一把勃朗宁手枪。在他左侧紧挨着的是舒伊勃纳-里希特；^[8]右侧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们的身后有克利伯中校、乌尔里希·格拉夫和赫尔曼·戈林。游行队伍即将出发，将这个希特勒日后称为“[他]人生中最孤注一掷的大胆决策”^[9]付诸实现。

“情况看来很不妙，”舒伊勃纳-里希特对罗森贝格说，^[10]他的这个老朋友刚刚从人民观察家报社赶来，站在队伍前列。舒伊勃纳-里希特还向希特勒表达了担忧，称那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走在一起了。^[11]

清晨的雪已经停了，微弱的阳光^[12]奋力穿透阴郁灰暗的天空——用一名游行者的话说，那是冉冉升起的德国自由太阳。^[13]过去几个小时里，邦警已经集结起来，部署到各个战略要地，巩固对火车站、电报局和电话交换所的控制。希特勒一度试图夺取的警察局如今也已经被现政府掌握。

不过面对不断增强的防卫军和邦警，戈林有一个计策。他想把刚抓来的市长和市议员放到游行队伍里。^[14]如果警方胆敢朝他们开枪，戈林就会威胁“处决所有人质”。^[15]假如警方愿意合作，这些政客也仍是宝贵的资本，可以用来交换己方被抓的珀纳和弗里克。

听到这个计划后，希特勒突击队的约瑟夫·贝尔希托德或是他身边的某个人表达了异议，认为杀人质“用子弹太不值了”，^[16]建议让他的人用棍子。然而希特勒的决定终止了这场讨论，他要把犯人送回到贝格勃劳凯勒的关押地。^[17]他不想成就殉道者。^[18]

大概在这个时候，午间报纸《慕尼黑报》已经上市了。在付梓前，报社主编、卡尔的讲稿作者阿道夫·席特设法加了一条新闻，讲的是巴伐利亚领导人对政变的拒绝。报纸还发表了一篇短评，指责希

特勒的欺骗与背信弃义。“希特勒政变——卡尔遇劫”，^[19]大标题如是写道。巴伐利亚邦已经做好了捍卫政权的准备。

纳粹游行队伍向西北方向的市中心行进，其中不少人整晚待在啤酒馆，饿着肚子，宿醉未消。他们挥舞着钩十字旗帜，高唱他们的颂歌《冲锋歌》（*Sturm-Lied*）：“醒来吧，德国！扯断你的锁链！”这首歌的曲作者迪特里奇·艾卡特是亨里克·易卜生的《培尔·金特》（*Peer Gynt*）德文版译者，还写了一个作品的改编版搬上德国舞台，大获成功。艾卡特错过了冲击啤酒馆的一幕，于是在伊萨尔门火车站附近的人行道看了游行。

与此同时，街上除了少数拥堵路段以外依然川流不息，电车照旧接送着周五早间忙忙碌碌的人们。游行队伍在这座超现实城市中穿行。支持纳粹的人开始加入他们，用克利伯中校的话说，“就像一大群蜜蜂”^[20]。街头小贩向这些似乎已经在庆祝胜利的人们吆喝着，乐手们在吹号打鼓。

当时在游行队伍中的汉斯·辛克尔（Hans Hinkel）多年后回忆道，现场流溢着“欢天喜地的热情”。“我们是工人、学生、官员、市民、手艺人，老老少少，”^[21]他说，大家团结在一起，满怀激昂而崇高的热忱。

宣告德国革命的海报还在，宣布巴伐利亚当局反对革命的也不少。有些人停下来观看、欢呼，或高喊“万岁！”有的则在笑。年轻的法律系学生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22]那天在博物馆桥^[23]架设了一挺机枪。有看热闹的问他，玩这么危险的玩具有没有经过妈妈的同意。

希特勒的游行队伍15分钟后到达了伊萨尔河上的路德维希桥。人称“绿警”的邦警^[24]已经先于他们一个半小时左右来到这里，是一个

30人的小队，配有重机枪，他们受命阻止政变者过桥。

游行队伍沿着下山路向着桥头走去，其中不少人也认为，警察要么会加入他们，要么就袖手旁观。然而，在现场的邦警指挥官吉奥格·胡弗勒（Georg Höfler）警督却命令手下严阵以待，拦住政变者。戈林没有理会。于是警察在号令下装上了实弹。

“不要向自己的战友开枪，”戈林向桥上的警察防线喊话。^[25]

警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阵军号声响起，贝尔希托德的希特勒突击队冲了上去，将警察推到一边，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有的还吃了几记枪托。游行队伍里还有一些人向警官吐口水，恶语相向。至少28名警察被俘，^[26]手放在头上被押回啤酒馆。这在后来纳粹的宣传里被说成是“警察倒戈”。

希特勒的游行队伍过桥来到伊萨尔河对岸，沿着茨韦布吕肯街向西走，街边开始出现许多人，有的挥舞着钩十字旗，有的加入队伍里。“全城的态度，”目击者约翰·艾格纳说，“无疑都是支持我们这场冒险的。”^[27]队伍穿过伊萨尔门，来到宽敞的塔尔街，向着市中心的狭窄街道进发。

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在玛丽亚广场一处街角观看了这场喧闹的游行。在他看来，大步向前的鲁登道夫是“老德国陆军最伟大的将领之一”。^[28]相较之下他身后那些人像“一群乌合之众，乱哄哄的”。^[29]他们看上去是一些“孤注一掷的革命党人”，有人讥讽他们是希特勒的外国军团。连当时也在游行的汉斯·弗兰克都觉得他们像“一支未战已败的军队”。^[30]

正在玛丽亚广场吃午饭的年轻编剧卡尔·扎克梅耶（Carl Zuckmayer）觉得游行是一场喧闹的胜利庆典，仿佛又一个啤酒节。

[31].

[1] Alfred Rosenberg, *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 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 and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 Ziff-Davis, 1949), 72.

[2] Marc (Max) Sesselmann,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3] Sesselmann,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The police search of the apartment is in Abt VIa, *Betreff Pöhner*, Ernst, 1923年11月10日,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4] *Vernehmung Pöhner*, 1923年11月10日, HA 5/120; Imhoff testimony, NA T84 EAP 105/7, 1173.

[5] NA T84/2 EAP 105/7, 244.

[6] 1923年11月9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7] 这个数字相对比较可信，有些人给出了更高的估计，比如希特勒，但他位于队伍前部，应该很难对人群的规模有个准确的衡量，NA T84/2 EAP 105/7, 2075。他还过高地估计贝格勃劳凯勒的观众数量达到5000人，NA T84/2 EAP 105/7, 98。

[8] 不少史学家说舒伊勃纳-里希特在希特勒右边，包括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283-84, 但是他应该在左边。这样说的包括舒伊勃纳-里希特的跟班约翰·艾格纳的未出版回忆录*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4, HA 5/114II、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的未出版回忆录F14, 67, IfZ, 以及1936年2月他对纳粹党问卷第2题的回答, HA 5/115。还有多名参与游行的人对此表示同意。

[9] 这个说法出自1935年11月11日的一场演说，翻译版见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307。

[10] Robert Cecil, *The Myth of the Master Race: Alfred Rosenberg and Nazi Ideology* (New York: Dodd Mead & Company, 1972), 41.

[11] NA T84/2 EAP 105/7, 113. 约翰·普雷姆也记得这句话, 在自己的未出版回忆录中有提及, *Bericht über den 9. November 1923*, HA 5/115.

[12] Question 47, Karl Kessler and Lisbeth Kessler, Fragebogen HA 5/115.

[13] A. Rossmann, unpublished account, *Der neunte November 23*, HA 5/116.

[14] Proz. Reg. Nr. 187/1924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May 3, 1924, HA 67/1493.

[15] XIX 466/23, February 15, 1924, HA 67/1494 and Ulrich Graf未出版回忆录, F14, 64, IfZ.

[16] Johann Georg Maurer怀疑这句话并不存在, VI a F 413/24, November 21, 1923, HA 67/1494。不过大量证据证明的确说过, 尽管不一定是用了这几个词, 例如在XIX 466/23,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以及 Adalbert Stollwerck's testimony, VI a F 416/24, 1924年2月21日, HA 68/1494。另见1925年10月30日《慕尼黑邮报》。

[17] Heinrich von Knobloch, VI a F, February 20, 1924, HA 67/1494.

[18] NA T84/2 EAP 105/7, 115.

[19] 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报》。报社主编阿道夫·席特是卡尔的讲稿作者, 因此文章中出现卡尔的公告中的措辞, 也就不稀奇了, 1923年11月9日MA 104221, BHSStA。

[20] NA T84 EAP 105/7, 438.

[21] Hans Hinkel, *Einer unter Hunderttausend* (München: Knorr & Hirth, 1938), translation in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85.

[22] Hans Frank,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München-Gräfelfing: F. A. Beck, 1953), 61; 另见Martyn Housden, *Hans Frank: Lebensraum and the Holocaus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2。

[23] NA T84/2 EAP 105/7, 115;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31-32, StAM; 《慕尼黑邮报》, November 27, 1923。

[24] 得名于绿黑两色的制服。 , 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4。

[25] Georg Höfler, November 10, 1923,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98, 332。

[26] Proz. Reg. Nr. 187/1924, May 3, 1924, HA 67/1493. The claim of saluting is in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15。

[27] 约翰·艾格纳未出版回忆录,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0, HA 5/114II。

[28]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86。

[29] Karl Alexander von Müller, *Im Wandel einer Welt* (München: Süddeutscher, 1966), 166; NA T84/2 EAP 105/7, 983。

[30] Otis C. Mitchell, *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 1919-1933*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8), 78。

[31] 关于他对游行的印象可参阅Carl Zuckmayer, *A Part of Myself: Portrait of an Epoch*,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272-73。

19 浴血之地

越过了卢比孔河，当然就要进军罗马了。^[1]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2月26日

那天上午11点过后不久，“小家伙”离开啤酒馆前往党报《人民观察家》的办公室。眼看大势已去，他决定回一趟家，据他说是“做好逃亡准备”。^[2]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他的姐姐艾尔娜来电告诉他游行队伍进城的消息，这样的事“小家伙”当然不想错过，于是改变主意，前去和游行队伍会合。在老绘画陈列馆，他撞见一群人正朝他的方向逃跑，他们是从音乐厅广场过来的。

“太可怕了，汉夫施丹格尔先生，”一名冲锋队队员对他说，“德国完了！”^[3]他说军队向爱国义士开枪了，血流成河。鲁登道夫带领他的追随者走上了玛丽亚广场。但是他并没有像队伍里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在广场停下来。他也没有带着大家拐进一条小街，回到啤酒馆去——这也是队伍里一些人预想的计划，其中包括负责为他制订军事计划的赫尔曼·克利伯。

他选择右转进入维也纳街，然后再右转进入佩鲁贾街。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始终没有给出充分解释。“人活到了一定时候，”将军日后会说，“就会按本能行事，不知道为什么。”^[4]他们会不会是去解救被围困在战争部的罗姆，并让两支部队会师呢？

有这个可能，但一些参加了游行的目击者在途中曾听闻，一个警察提示鲁登道夫^[5]，邦警部队和一辆坦克正在音乐厅广场等着。鲁登道夫可能在根据这一情报行事，不过他没有理会其他的建议——也就是继续走宽阔的马克西米连街，以免力量汇聚于一处。游行者的转而走

上了王宫街，那是一条途经王宫的狭窄街道，据推断其优点是可以从警方的背后包抄过去。^[6]

音乐厅广场上的邦警二队指挥官是一级警督米夏埃尔·冯·戈丁男爵（Michael Freiherr von Godin），^[7]一名27岁的巴伐利亚贵族。他的哥哥埃默尔里希^[8]在战争末期做过希特勒所在军团的指挥官，事实上正是他向上级提议授予希特勒一级铁十字勋章。

戈丁知道不能让纳粹党人从窄街道转入宽阔的空间，那样他们就可以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大约是2000比100。

来到王宫街的游行队伍已经亮出步枪、手枪和刺刀。士兵们嘶喊、欢呼着，高唱民族主义颂歌《噢，崇高荣耀的德意志》（*O Deutschland hoch in Ehren*），他们的声音在王宫高墙间回荡，变得愈发响亮。

在街道尽头通往音乐厅广场的地方，统帅堂上已经架起一挺机枪，邦警猫着腰躲在雕塑后面。一级警督冯·戈丁叫了几个人站在游行队伍面前。他命令队伍停止向前。

游行没有理会他的指示，继续往前走。

“不要开枪，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在此。”^[9]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喊道。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不断向着枪口行进。希特勒和舒伊勃纳-里希特挽着手臂，相互支撑着向前走。^[10]

* * *

究竟谁开了第一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没人能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政变者认为错在警方，警方说是政变者。戈丁说他的警队只用了“枪托和警棍”，^[11]直到第一发子弹贴着他的脑袋飞

过，击中邦警尼克劳斯·霍尔韦格（Nikolaus Hollweg）警监的头部。戈丁称当时还没等他下命令，警方已经几乎同时开火还击。希特勒的人也一样，窄小的街道里枪声震耳欲聋。

这个说法没有多少中立的目击证人能证实。一名退休学校教员 [12] 当时正想通过统帅堂附近的警方警戒线，她听到远处走来的游行队伍发出山呼海啸的“万岁”声。而后她周围的一排戴着钢盔的警察突然蹲了下来，她确定先开枪的是他们中的一个人。

学生阿诺·施密特（Arno Schmidt）那个上午也在那一带，他说当时一名警官向前跑了几步，然后单膝跪地，率先开了枪——而且不是朝天，而是让自己的枪保持着“完美的水平” [13]。另有多名目击者说，在听到第一阵枪响时，也是警察在持枪保持射击姿态，而希特勒的人则没有。 [14]

参加过政变的人还说， [15] 他们当时在巷子里人挤人，一旦开枪难免打到自己人。 [16] 此外，有很多枪没有撞针，可能是被暗中破坏的修道士拆掉的。还有一些人没有弹药。在游行开始前，希特勒曾下令枪械要退弹， [17] 不过究竟有多少人照做就不得而知了。不少政变者要么没听见这个命令，要么根本没当回事。

负责把俘获的警察押解到啤酒馆的贝尔希托德回来了，正好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歌声和叫喊声被枪声打断，而后是“吓人的机枪声大作”！

在那之后，“一切就只剩下恐怖、痛苦和混乱”。 [18]

警察从正面和侧面 [19] 向游行者的猛烈开火。音乐厅广场，统帅堂的阳台，王宫的高塔，普莱辛宫的后巷。一切都是在“转瞬间” [20] 发生的。鲁登道夫这样形容那场短暂而惨烈的街头战斗。

希特勒是最早倒下的人之一。可能是被舒伊勃纳-里希特或他的保镖拽倒，或者是像他在一战的枪林弹雨中当通讯员时那样，本能地找掩护。他按住剧痛的左肩，担心自己中枪了。他身上的血其实是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他被击中肺部，当场丧命。^[21]子弹离希特勒只有大概1英尺。

这位纳粹党党魁倒地时摔得很重，以致肩膀脱臼。^[22]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为了保护希特勒受了重伤，^[23]可能救了他一命。格拉夫的肺部、胸部、两条大腿以及右臂都中了枪，^[24]其中右臂的子弹穿过肘部到了肩膀。还有不少人和他一起倒在地上。其中一个穿黑色外套的大块头浑身是血，他相信那就是鲁登道夫。

戈林的大腿和腹股沟中枪。^[25]他爬到了王宫的一个石狮子后面，身体痛苦地扭曲着。好几个同伴冲上去救他。罗森贝格也倒下了，正在四处找掩护，结果很快发现，他被另一个在向警方射击的纳粹党人当成了沙袋。最终罗森贝格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在那座石狮子附近。他看到一个政变者倒在人行道上，脑袋被炸开，脑浆流了出来，“冒着热气”。他的身体还在抽动。

克利伯中校为躲避子弹往统帅堂跑去。他看到有个穿深棕色大衣的男人倒在血泊中，以为那是鲁登道夫。街上倒着两面战旗，下面盖着两个死人。克利伯还认出了已经死了的舒伊勃纳-里希特。他记得一个警察朝一名已经牺牲的战友开了三枪，“每中一枪尸体都会从地上弹起来一下”。^[26]

接着从王宫的一扇窗户飞来好几发子弹，没打中克利伯，大概都进了统帅堂的墙壁。他决定倒在地上装作已经中枪，但愿这样他们就不再朝他射击。在混乱中，克利伯记得当时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击中了，心里咒骂着警察。^[27]

子弹似乎是从四面八方射来。不少游行跑进了门廊，或是转身躲到自己所在的游行队伍里，因而导致更多的混乱与恐慌。高地联盟的汉斯·里克梅尔斯（Hans Rickmers）看到自己身后有个穿毛皮大衣的女人单膝跪地，[\[28\]](#)还有个穿雨衣的女人摔倒了。这时候，他感到脑后受到一记重击，踉踉跄跄地逃走，最后在一家汽车俱乐部楼上找到了一个医生，以及一瓶烈酒。他后来说，当时风传鲁登道夫遇害了，他感到仇恨、愤怒和绝望。里克梅尔斯在三周后离世。

慕尼黑冲锋队头目威廉·布吕克纳躲进了一家药房。他后来说，自己平生参加过那么多巷战，“最令人作呕的就是音乐厅广场那片浴血之地”。他说他以此为“奇耻大辱”。[\[29\]](#)

政变者四散逃跑。高地联盟的奥托·恩格尔布莱希特（Otto Engelbrecht）向鲍恩格尔格餐馆[\[30\]](#)跑去；在邮局上完夜班后来参加游行的约翰·普雷姆（Johann Prem）跑到了内政部，[\[31\]](#)没命敲打门房宿舍的窗户，直到有人开门。他的膝盖、下巴和右肩被子弹擦伤。冲锋队二连的卡尔·凯斯勒（Karl Kessler）毫发无损地跑到了附近一间咖啡馆。[\[32\]](#)他在那儿遇到的一个战友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被击中了头部。

“这真是疯了！”冲锋队队员理查德·科尔布（Richard Kolb）喊道。[\[33\]](#)

虽然流言纷纷，但鲁登道夫其实既没有遇难也没有受伤。事实上他临危不惧、在枪林弹雨中坚定前行的表现很快将传为佳话。牛津大学史学家约翰·W. 威勒-本内特（John W. Wheeler-Bennett）称传闻中他昂首挺胸的架势[\[34\]](#)是“老帝国军人的最后表态”。[\[35\]](#)不过有的目击证人认为，实际情况跟这个正在成形的传奇是有出入的。

美国副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好在附近，他一口咬定鲁登道夫的表现和常人并无不同：他“紧贴着地面躲避子弹”^[36]。他只是个凡夫俗子，在根据自己的战场本能行事。还有不少目击者的描述与此相符。事实上另一个相反的谣言很快也会传开，这个谣言说鲁登道夫一直趴在地上装死，最后是在警察的喝令下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鲁登道夫可能没多久就站起来，向着广场对面的警察走去了。一颗子弹也没沾到他。

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则腹部中弹，看来当时他是飞身挡在了将军身前。^[37]舒伊勃纳-里希特的侍从约翰·艾格纳爬过来帮忙，他感到脖子一热，^[38]发现自己的脑后有血。他也以为自己中枪了，但那其实是旁边一个喉咙中枪的人的血。

有不少警察的确是奉命向地面射击的，但是子弹击中路面和墙壁反弹，^[39]在花岗岩上崩出碎片，刀片般锐利的石头可以嵌进人肉和骨头里。

“到处是倒地不起的人，”约瑟夫·贝尔希托德回忆道，“他们在地面上痛苦地扭动，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正在死去，而子弹仍然在将死亡与杀戮不断带向乱作一团的人群……死者躺在地上，将生者绊倒；灰色的铺面路被鲜血染红。这整件事就是一场骇人的大溃败。尖叫和哭喊声不绝于耳，疯狂的射击永无休止。”^[40]

在一条窄巷子里，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将身体紧贴着一座宅子的围墙，哭了起来。^[41]这是一场屠杀。

枪声响了不到一分钟，等到硝烟散去，啤酒馆政变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片狼藉。前往柏林的游行止步于音乐厅广场，只走了一英里。街上满是已死和将死之人，残缺不全、血肉模糊。

20人丧生，包括四名警察：尼克劳斯·霍尔韦格、弗雷德里希·芬克（Friedrich Fink）、马克斯·朔勃特（Max Schoberth）和鲁道夫·肖特（Rudolf Schaut），最后这位五个月前刚结婚。玩具店老板奥斯卡·克尔纳（Oskar Körner）^[42]将盈利的相当一部分捐给了纳粹党，这一次游行他走在第三排，丢了性命。另有不少人受伤，可能超过100人。19名伤者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医院急救室，外科教授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Ferdinand Sauerbruch）医生和他的下属为了救他们的命忙得团团转。^[43]

有个头部中枪^[44]的青年男子入院数日一直没有明确身份。在他死后人们才得知，他既不是游行参与者，也不是邦警；他是名侍者，叫卡尔·库恩（Karl Kuhn），当时正穿过广场去上班。一个叫苏珊·圣·巴贝·贝克（Suzanne St. Barbe Baker）的英国女人运气好些，她当时想去英国领馆延长在慕尼黑逗留的时间。她从音乐厅广场的“战场”逃了出来，爬到了一家玻璃已经全碎的咖啡馆避难。

警方尽全力抓捕游行参与者，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躺在地上一边哀号一边咒骂当局的人。鲁登道夫投降了。政府居然向他和他们心目中的赤诚爱国者开枪，这令他大感震惊。他拒绝对方^[45]以“阁下”或将军相称，并鄙夷地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穿德国军服。

另一个中枪的，也就是前排那位被误以为是鲁登道夫的黑衣大汉^[46]，是恩斯特·珀纳的朋友、巴伐利亚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西奥多·冯·德·福尔滕（Theodor von der Pfordten）。他的口袋里有一份带着血迹的新德国宪法草稿。其中描绘了一个严酷的威权主义政权，主要诉求包括废除议会、将犹太人驱逐出境、没收犹太人财富、将政权的敌人关进他称为“集合营”^[47]的地方。在那个上午，王宫外的一条窄街上，这份草稿成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预兆，提醒人们此事意味着怎样的后果。

[1]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2]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105.

[3]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44. 关于伤亡情况的谣言在当天上午广为流传，例如Anton Zahner, VI a F 405/24, February 14, 1924, HA 68/1494;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251-52; NA T84/2 EAP 105/7, 1143; 《慕尼黑报》，November 10-11, 1923; *Dalpielen* (Falun, Sweden), 1923年11月13日。

[4] NA T84 EAP 105/7, 543.

[5] 他在铁阿提纳街和佩鲁贾街路口收到消息，而后改变了行进方向，Richard Kolb, Fragebogen, 30, January 1936, HA 5/116。克利伯往前继续走了一段，没有听到警告，队伍的转向让他出乎意料。

[6] 行进的方式像是一次攻击敌人后方和侧翼的军事行动，NA T84/2 EAP 105/7, 1281。

[7] Confidential file in Akt Freiherr v. Godin, Akt. Nr. 121, *Akten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 Staatspolizeistelle Innsbruck, HA 5/117.

[8] 关于埃默尔里希·冯·戈丁的更多资料可见于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5。戈丁于1918年7月31日起草了推荐信。

[9] NA T84/2 EAP 105/7, 172.

[10] 玛蒂尔德·舒伊勃纳-里希特的未出版叙述，她称这个细节是希特勒本人提供的，[XT]Bericht[ZT], April 4, 1936, HA 5/116。

[11] 米夏埃尔·冯·戈丁，1923年11月10日，MA 104221, BHSStA。

[12] VIa, *Umsturzversuch 8./9. November 1923—hier Vorgänge am Odeonsplatz*, 1924年3月3日, HA 68/1494。

[13] Arno Schmidt, VI a F 489/24, 1924年3月1日, HA68/1494。

[14] 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以及Anton Reithinger, *Umsturzversuch 8./9. November 1923—hier Vorgänge am Odeonsplatz*, 1924年3月3日, HA 68/1494。

[15] 许多人声称他们没有开火，比如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8。声称开了火的有一例: Walter Hewel, MA 103476/3, 1347, BHStA。

[16] 洛伦兹·罗德未出版陈述, *Herr Hitler hat kein Ehrenwort gebrochen*, HA 5/126。

[17] NA T84/2 EAP 105/7, 170. 2 SA-Company received order during the march, Karl Kessler, Fragebogen question 23, HA 5/115. 不过事后发现还有很多枪上了膛, MA 103476/3, 1353-57, BHStA。

[18]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60。

[19] 1923年11月13日《德意志日报》。

[20] NA T84 EAP 105/7, 544。

[21] NA T84/2 EAP 105/7, 117, 中枪部位见约翰·艾格纳,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7, HA 5/114II。

[22] NA T84/2 EAP 105/7, 117。

[23] 阿道夫·希特勒服刑期间的信件, 1924年6月, 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640, 1235。

[24] *Das geschah am 9. November 1923*, HA 5/116, and unpublished memoir, F14, 67–68, IfZ.

[25] Carin Göring, letter to her mother, Huldine, 1923年11月13日,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08–9.

[26] NA T84 EAP 105/7, 442.

[27] 塞瑟尔曼也看到了克利伯挥舞拳头嘶喊的样子, Sesselmann, *Bericht*, November 1, 1935, HA 5/116.

[28] Hans Rickmers, letter from hospital, November 16, 1923, HA 5/116.

[29] NA T84/2 EAP 105/7, 618.

[30] Otto Engelbrecht, questionnaire, answer to No. 36, HA 5/115.

[31] Johann Prem, *Bericht über den 9. November 1923*, HA 5/115.

[32]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33.

[33] 理查德·科尔布未出版陈述, *Bericht über den 8. und 9. November 1923*, HA 5/116.

[34] 不少人做出了这样的陈述, 如Richard Hanser,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362, 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212, 以及许多希特勒传记, 如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178。不过一些目击者给出了不同说法。除了下文引用的罗伯特·墨菲的描述, 还有1923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 1923年11月23日《小巴黎报》; 1923年11月23日《晨报》; 1923年11月23日《波士顿环球日报》; 《前进报》还说他一直趴在地上, 他的追随者则已经四散逃走, 以及1923年11月27日《慕尼黑邮报》。也有人批评鲁登道夫这样笔直站着是鲁莽的表现。

[35] John W.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4), 176.

[36] Robert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22.

[37] 赫尔曼·克利伯在1938年7月12日提供的信息，HA 5/116。

[38] 约翰·艾格纳,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6, HA 5/114II。

[39] Chirurgische Universitäts-Klinik, *Leichendiagnose des Schraut Otto*, 1923年11月13日, HA 5/118.

[40]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61, and the bloodbath, as Gottfried Feder put it, in his unpublished diary, *Tagebücher*, ED 874/5, 20, IfZ.

[41] Friedrich Weber, NA T84/2 EAP 105/7, 173.

[42] James Pool and Suzanne Pool, *Who Financed Hitler: The Secret Funding of Hitler's Rise to Power 1919-1933* (New York: Dial Press, 1979), 15, and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66.

[43] Dr. Ferdinand Sauerbruch, GStK.Nr. 15, BHStA,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90, 316-17.

[44] Johann Prem, *Bericht über den 9. November 1923*, HA 5/115.

[45] 此人是侍者卡尔·库恩,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报》。

[46] Suzanne St. Barbe Baker, *A Wayfarer in Bavari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 36, in Charles Bracelen Flood, *Hitler: The*

Path to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555.

[47] A. 罗斯曼 (A. Rossmann) 未出版陈述, *Der neunte November 23*, HA 5/116, 以及鲁登道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 (1937) 中做的有所保留的陈述, 68-69。

20 逃亡

鲁登道夫被捕。希特勒成功逃脱。^[1]

——1923年11月11日《每日邮报》（*Daily Mail*）（布里斯班）

混乱之中，希特勒踉踉跄跄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2]在马克斯-约瑟夫广场的财政部附近，冲锋队医疗队队长沃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tze）医生将一脸茫然的领袖送上在那里候命的汽车。有目击证人称见到汽车载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迅速离开了。^[3]

肩膀剧痛不止的希特勒正处在震惊与困惑之中，此刻他已经没什么选择。他对自己的计划一直胸有成竹，以至于最起码的应急或替代方案都懒得制定。如今游行以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收场，他得临时想一个撤退方案了。

希特勒的手下死伤惨重，而他自己却逃跑了。用前自由军成员、日后知名的反纳粹人士弗雷德里希·威廉·海因茨（Friedrich Wilhelm Heinz）的话说：“自大狂阿道夫溜了……把他的人丢在那里不管不问……你难道还指望他能有别的反应？”^[4]

后来开始流传一个故事，替希特勒这个有失刚勇的举动找补。据说^[5]他是在街角看到一个负伤的小男孩，为了救他而离开现场的。在纳粹日后的描述里，他甚至是背着那个10岁孩子走的（用他那脱臼的肩膀！）。

此外还有一些谣言和半真半假的传闻在解释希特勒的行为。例如，据说他是被迫跑走的，警察在追捕他，他的车被机枪扫射。希特勒跟鲁登道夫比起来肯定是很不堪，后者没有抛弃他的战友，并且普

遍认为——尽管不太可信——他是毫无畏惧地迎着枪林弹雨向前走的。

大腿和腹股沟受伤的戈林在王宫外的石狮子边痛苦挣扎。有支持者把他架到了同在王宫街上的一个庭院。尽管伤者是希特勒的冲锋队指挥官，楼里的两个人^[6]——皇家巴伐利亚家具厂的犹太老板罗伯特（Robert）和马丁·巴林（Martin Ballin）——还是收留了他。罗伯特的妻子贝拉一战时护理过伤员，她在楼上的会客厅做了急救。

他们的邻居、内科医生埃米尔·纽斯塔特（Emil Neustadt）透过临铁阿提纳街（Theatinerstrasse）的一扇窗户看到了全过程。枪声过后他就出门了，街上没过多久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穿着制服的人在跑来跑去。有一堵墙边靠着几个冲锋队队员，“身上挂着彩，衣服扯破了，在痛苦呻吟着”。^[7]医生给伤势最重的两人打了针，他们基本上已经失去知觉。他始终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下落。

在阿尔西街，一辆汽车从正在狂奔的“小家伙”身边驶过，急刹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他的朋友赫尔曼·埃瑟、迪特里奇·艾卡特和海因里希·霍夫曼。他跳上车，前往摄影师的工作室，而后从那里分头出城。“小家伙”在另一个朋友保罗·冯·辛慈（Paul von Hintze）将军的帮助下弄到一本假护照，很快就越过了边境。

一伙政变者逃到了音乐厅广场附近的一间女子学校，躲进了壁橱和床底。还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去了霍滕胡弗点心店，在烤箱下、面粉袋和蛋糕盒里、咖啡机背后藏了武器弹药。^[8]汉斯·弗兰克一伙人去了艾勒斯咖啡烘焙公司，把他们的冲锋队装备藏在里屋，装成一伙早晨喝咖啡闲聊的人。

31名政变嫌疑人被警方逮捕，^[9]实行“暂时监禁”，等候起诉。很快又有203人被以较轻的罪名逮捕，如攻击当局或散发革命小册子。

抓捕行动会持续一段时间。到了下午两点，罗姆已经投降。^[10]他的人受命来到战争部大院，被解除武装和徽章，据说还脱掉了制服。在与其他被关押的纳粹头面人物会合时，罗姆的情绪很糟。

警察封锁了音乐厅广场和王宫一带；路面上到处是尸体、丢弃的钩十字旗和臂章。人们赶开尸体上的鸽子，把尸体集中到王宫庭院内。伤者也被运到那里抢救。伤势较重的会用汽车送去医院。

“我快疯了，”管家约翰·艾格纳说，他是靠一个同情他们的警察帮忙才进入禁区的。他看到王宫正门摆着一具具尸体。其中有舒伊勃纳-里希特和他的好友、鲁登道夫的侍从科特·诺伊鲍尔。“我失魂落魄，彻底垮了。”^[11]

这场街头战斗的最初报道语焉不详，且时有矛盾的说法。包括柏林《福斯日报》、巴黎《费加罗报》和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多家报纸称，^[12]希特勒和鲁登道夫据守在战争部，打算战斗到底。《小巴黎报》称攻击地点是在老绘画陈列馆附近的阿努尔夫王子营，^[13]报道描述了鲁登道夫和希特勒是如何被军方抓获的。同期报纸里还有一篇文章却是准确的，称希特勒负伤了，但是已经逃走。

最初的一些传闻说希特勒逃到了罗森海姆、^[14]特罗努恩，^[15]或是伊萨尔谷的某个地方。据说是聚集在慕尼黑东部的保皇党人^[16]在保护他，准备做最后一搏。《小巴黎报》的说法则截然不同，宣称他已经越境抵达蒂罗尔。“结局好，一切都好，”报社驻外记者说，因为希特勒回到了奥地利的老巢。^[17]

* * *

在慕尼黑以南约35英里处的乌芬村，汉夫施丹格尔的家族别墅里，“小家伙”的妻子海伦在二楼起居室和儿子埃贡吃晚饭。晚上7点

过后不久，女仆进来说，有人在小声敲门。

由于之前听闻“有一些危险团伙在乡下流窜活动”，她已经紧锁大门，合上窗板。她来到楼下，隔着闷住的门和陌生人讲话。“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海伦后来说，“我认出了那个虚弱但确凿无疑的声音，是希特勒。”

她这样描述门廊的情景：“他站在那，面色惨白，没戴帽子，脸和衣服上都是泥巴，左胳膊耷拉着，肩膀歪着的样子有些奇怪。”舒尔茨医生和勤务员在使劲架着他，不过在她看来，他们的情况也没好多少。用她的话说就是“狼狈不堪”。

他们的确考虑过逃到奥地利。通常的说法是希特勒直接否决了这个提议，估计是缘于他对祖国的厌恶，不过据当时在车上的医生说并非如此。和其他许多政变者一样，^[18]他们是往奥地利去的，但在去往加米施的路上，大约在穆尔瑙一带，他们的车抛锚了。

考虑到警察在搜捕，希特勒和另外两人判断进镇子里找汽修工风险太大，于是决定进附近的树林等天黑。就在这段时间里，希特勒想到了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宅子。他们让司机负责处理汽车的问题，然后去和戈林取得联系——他们完全不了解他的伤势情况。希特勒、舒尔茨和勤务员^[19]随即走小路步行前往汉夫施丹格尔的家。

以希特勒肩膀的伤情，这段路程想必十分艰难，最终他们来到村子里。海伦把众人带到了楼上的起居室。

“Also doch?” 她问，意思是，“那么，都是真的？”

希特勒只是低下了头。

海伦询问了丈夫的情况，她从早上到现在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

希特勒心想，游行的时候“小家伙”正在报社，于是表示他应该很快就到了。

希特勒的状况很糟糕，情绪低落。经过两个不眠之夜，他已经累坏了。他说起鲁登道夫和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的死，他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并表示他也宁可死掉，好从这痛苦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他还把政变的失败归咎于鲁登道夫将军让三人离开啤酒馆，破坏了计划。接着他的情绪突变，开始发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要继续战斗”。^[20]

海伦建议正在发高烧的希特勒休息一下。医生和他的勤务员帮他上楼，进了一间阁楼卧室，在那里处理肿胀的左肩。肩关节脱臼了，关节窝有骨折。在她未出版的手写札记中，海伦写道，从那扇关着的门里传出的痛苦惨呼，在楼下都能听到。

再过一会儿，希特勒已经蜷缩在那间摆满了书的阁楼里，身上裹着“小家伙”去哈佛时用的英式旅行毯，^[21]他通常把毯子放在一个木箱上面。勤务员在楼上的另一间客房里睡觉，房间所在的区域是他们去年夏天刚装修过的。^[22]与此同时，舒尔茨医生和海伦聊了那天上午游行到音乐厅广场后的种种怪事，对现在手头的选项做了一番权衡。

至于司机能否修好或藏匿抛锚的汽车，他们心里完全没底，更别说联系到戈林了。他们能确定的是，警察会在主要公路、街道和铁路巡逻搜捕希特勒。乌芬的居民相互间关系紧密，有陌生人到来的消息很快会传开。希特勒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1] 1923年11月11日《每日邮报》（布里斯班）。

^[2] Dr. Walter Schultze, MA 103476/3, 1358-59, BHStA.

[3]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4] Robert G. L.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 (New York: W. W. Norton, 1952), 259.

[5]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30, 以及*Die Vorgänge im München am 8. und 9. November 1923*, HA 5/116。后来还找出了一个男孩作为希特勒英勇救人的证据，不过有充分理由怀疑此事的真实性，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90。

[6] Tobias Mahl, “Die ‘Arisierung’ der Hofmöbelfabrik Ballin in München,” in Angelika Baumann und Andreas Heusler, eds., *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ünchen: C. H. Beck, 2004)。

[7] Dr. Emil Neustadt, April 24, 1934, HA 5/116.

[8] Karl A. Kessler, *Der 9. November 1923 in München. Erlebnisse eines SA Mannes* (München: Walter, 1933), 33. 另见Erich Malitius, *Der 8. u. 9. November 1923. Die Geschichte von Treue und Verrat der deutschen Jugend* (Breslau: Handel, 1935), 13。

[9] Polizei Direktion an Generalstaatskommissar, 1923年11月13日, MA 104221, BHStA.

[10]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82, Anlage 4, 511, and testimony of Lt. Col. Theodor Endres in Didier Chauvet’s *Hitler et le putsch de la brasserie: Munich, 8/9 novembre 1923* (Paris: L’Harmattan, 2012), 153-54.

[11] 约翰·艾格纳,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en Erhebung im November 1923*, 18, HA 5/114II。对这一情景的另一个叙述版本

可见于未出版的 *Tatsachenbericht vom 9. November [23] bei der Feldherrnhalle München*, HA 5/116。

[12] 1923年11月9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3年11月10日《费加罗报》；1923年11月10日《泰晤士报》；1923年11月10日《纽卡斯尔太阳报》等。

[13] 1923年11月10日《小巴黎报》。

[14] 1923年11月10日伦敦《每日邮报》和澳大利亚有线新闻服务；1923年11月11日沃尔夫通讯社通过《十字架报》发布报道；1923年11月12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5] 1923年11月11日《纽约时报》，伊萨尔谷，1923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

[16] 1923年11月1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7] 1923年11月11日《小巴黎报》。

[18] 例如有个叫格哈德·罗斯巴赫 (Gerhard Rossbach) 的政变者潜入奥地利，自称是电影导演，Gerhard Rossbach, *Mein Weg durch die Zeit. Erinnerungen und Bekenntnisse* (Weilburg-Lahn: Vereinigte Weilburger Buchdruckereien, 1950), 82。

[19] Dr. Walter Schultze, December 10, 1923, HA68/1497A, and MA 103476/3, 1357-59, BHSStA.

[20]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 307-9,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21]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49.

[22] Helen Niemeyer, “Notes, ” 297,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21 人质的劫难

亲爱的罗森贝格，这场运动现由你领导。^[1]

——阿道夫·希特勒，1923年11月11日

戈林在制订逃跑计划。幸亏贝拉·巴林^[2]在她的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公寓里给他处理了伤势，他现在可以给妻子卡琳打电话了。正发着高烧的卡琳从病榻上下来，打车去同情纳粹的医生埃尔文·冯·阿赫（Alwin Ritter von Ach）的办公室见他。

几名冲锋队队员搀着戈林上车——据卡琳回忆，当时他身上裹着“毛皮和毯子”^[3]，还因疼痛而“神智混乱”——往南逃到60英里外的加米施。在那里，他们在朋友家中躲了两天，但开始有好事者来问东问西，想一睹这位曾经参战的飞行员、纳粹冲锋队指挥官的风采，于是他们不得不离开。

为了帮他脱困，克利伯中校把戈林的名字弄进了死亡名单，^[4]发表在了《慕尼黑最新消息》上。其他一些畅销的日报也跟进报道了这个消息，《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就猜想，这位著名飞行员会不会就是“第二十个死者”^[5]。然而警方仍在继续搜索。

与此同时，在贝格勃劳凯勒，戈林的助手尤利乌斯·绍布（Julius Schaub）在看守着被他们劫持的市长和市议员。下午1点左右，一个去参加游行的希特勒突击队员回来了，^[6]脸上带着血，情绪十分激动。他对政府咬牙切齿。他指责他们制造了一场屠杀，杀死了希特勒、鲁登道夫以及其他一些游行人士。人质们很担心成为报复目标，他们被押上一辆敞篷卡车，向东南方向的城郊驶去。

阿尔伯特·努斯鲍姆议员企图和一个看守交谈，一个冲锋队军官拿着手枪走过来：“再说一个字，我毙了你们两个。”^[7]

卡车停在了一片树林里。市长和议员们当然已经想到了最糟的结局。^[8]让他们长出一口气的是，对方要的只是他们身上的便装，不是他们的性命。顺从地交出帽子、夹克和大衣后，人质被押上车去往附近一个叫赫亨基尔兴的村子。^[9]

接着过了没多久，市长连同几名政客就被释放了。据警方报告，这一切全靠了一位机灵的市政厅员工，他乘车一直尾随冲锋队的卡车。^[10]在他们歇脚的一家酒馆，他赶上来跟他们说，议员们需要尽快回到办公室，签署文件授权向无家可归者发放救济。冲锋队的人显然不想成为救济金发放延误的责任人，他们相信了这个说法。在要求他们不得透露任何有关劫持的细节后，议员们获释了。市长驱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他议员则上了下一班开往慕尼黑的火车。^[11]

此时在出版商尤利乌斯·莱曼的别墅里，鲁道夫·赫斯和被劫持的阁员开始听到政变失败的传闻。鲁登道夫据信已经殒命，希特勒“头部中枪”，^[12]还有一些同僚据称已经在大屠杀中毙命，甚至被砍了头。有初步报告似乎可以证实，一伙高地联盟的人在逃亡途中打劫印刷厂，整整抢了20万亿马克。

这是最恐怖的时候，人质之一、总理奥尔根·冯·克尼林忆起这段劫难时说。别墅的主人也警觉起来。即便冲锋队不打算报仇，他也担心这里会被警方包围，到时候冲锋队队员们会最后拼死一搏。

虽然花园有武装把守，但这里很难再继续待下去了。警察无疑会发现，别墅里的食物和补给也已经所剩不多。于是赫斯决定另作打算。他把两个地位最显要的人质——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施威耶和农业部部长约翰·沃策尔霍弗（Johann Wutzlhofer）——转移到阿尔卑

斯山上的某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找个滑雪旅舍或小屋。^[13]他们可以在那里拿人质谈判。

下午4:10，^[14]赫斯和两名俘虏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几名冲锋队员和20万亿马克的钞票。他要去的是巴特特尔茨，他认识那里的一个兽医，是高地联盟的人，可以带他们进山。

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杳无人烟的幽暗森林。据人质施威耶说，途中赫斯四次停车，用前灯照着树林，然后和一名冲锋队队员下车。这位部长担心的是，这是在找地方处决他们。^[15]

积雪覆盖的山路曲折狭窄，完全不适合汽车，他们的行进越来越困难。雾气和黑暗进一步增加了危险，最后他们不得不调头往回走。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无法抵达小屋的。他们没有必要的登山装备，两名年迈的人质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挑战。

他们转而选择了附近的一座房子。赫斯和他的向导前去寻找、打探那个地方，把人质和那20万亿马克交给冲锋队队员看守。在冰冷的车里，时间过得很慢。赫斯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

这段时间里，明显处于紧张与焦躁状态的冲锋队队员下了车，在商量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让人质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发动汽车，向慕尼黑方向驶去。在经过霍尔茨基兴时，他们停了下来，突然就释放了人质。两位阁员遭遇的这场可怕劫难，就这样结束了。^[16]那几万亿马克，则从此人间蒸发。

被赫斯留在出版商的别墅的那五名人质，^[17]也在周五晚上获得了自由。赫斯走后的最初三个小时，局势一度十分焦灼。供电被切断了，他们担心要被当局包围甚至发生枪战。然而冲锋队队员们干脆陆

陆续离开别墅，有的是三三两两结伴而行，有的是一个人。最后莱曼打电话给警方，报告有高官被扣押在自己家里。

等回到原地时，赫斯惊讶地发现车已经不见了。他四处寻找人质和看押他们的人。他对此事深感自责。和希特勒一样，他很快也开始表达自杀的想法。不过实际上他联络了未婚妻伊尔瑟·珀尔（Ilse Pröhl），然后和几个朋友一直躲到1924年春天。

[1] Alfred Rosenberg, *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 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 Ziff-Davis, 1949), 73. 德莱克斯勒对警察说他见过这封短函，1923年11月30日，HA 68/1497A。

[2] 待纳粹掌权后，戈林会帮助巴林一家离开德国，在他的安排下，他们于1941年10月移居瑞士。一家人后来又动身前往阿根廷，不幸的是贝拉在途中去世。罗伯特、马丁和马丁的妻子苔克拉最终在美国安顿下来。可参阅Tobias Mahl, “Die ‘Arisierung’ der Hofmöbelfabrik Ballin in München,” in Angelika Baumann und Andreas Heusler, eds., *München arisiert: Entrechtung und Enteignung der Juden in der NS-Zeit* (München: Beck, 2004)。

[3] Carin Göring, letter to her mother, Huldine, 1923年11月13日,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09.

[4] “Den toten Kameraden!” 1923年11月15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5] 1923年11月14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6] Eduard Schmidt and Albert Nussbaum, XIX 466/23, February 15, 1924, HA 67/1494.

[7] Albert Nussbaum testimony, NA T84/2 EAP 105/7, 1964–1965. 海因里希·冯·诺布洛赫（Heinrich von Knobloch）证实有禁止交谈的命令，VI a F, February 20, 1924, HA 67/1494.

[8] NA T84/2 EAP 105/7, 1965.

[9] Walter Hewel, VIa F425/24, February 22, 1924, HA 67/1494, and NA T84/2 EAP 105/7, 1966.

[10] 《巴伐利亚邦报》，November 10, 1923 and *Das Ende des Münchener Staatsstreichs*, Nr. 265, 1923年11月13日, HA 5/114II。

[11]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以及驱车返回, MA 103476/3, 1380-81, BHStA.

[12] NA T84 EAP 105/7, 830.

[13] 1923年11月8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克拉拉和弗里茨·赫斯, 还有此后的11月16日和12月4日, 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12。

[14] MA 103476/3, 1368, BHStA.

[15] 弗朗茨·施威耶后来因为另一桩案件在慕尼黑邦地方法院作证, 对这件事做了描述, *Zeugen-Vernehmung in der Privatklaugesache Hitler gegen Dr. Strausse wegen Beleidigung*, January 5, 1929, HA 69/1507; 符腾堡部长根据奥尔根·冯·克尼林提供的信息也给出了陈述, 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1923年11月14日, Nr. 322, 144, and MA 103476/3, 1370-72, BHStA.

[16]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17] Police report, VI a F, January 16, 1924, HA 68/1494, 1923年11月11日《慕尼黑最新消息》以及MA 103476/3, 1368-69, BHStA.

22 新十一月罪人^[1]

没有慕尼黑啤酒客的掌声，他就神气不起来了。^[2]

——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评希特勒

到了11月9日午后，警方已经清理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内剩余的希特勒支持者。他们还解救了关押在二楼密室的最后一批囚犯，查抄了大量武器弹药，装了将近四卡车。^[3]

在清点了一片狼藉的啤酒馆后，贝格勃劳凯勒的经理^[4]向已被取缔的纳粹党开了一张总额113440亿马克的账单。除了大量的食物、啤酒和咖啡消耗，账单还列出了许多丢失和损坏物品的费用：143个啤酒杯、80个玻璃杯、98张板凳、2个乐谱架、1面镜子、148付刀叉。奇怪的是对天花板上的枪眼只字未提。

下午3点左右，^[5]洛索传话给古斯塔夫·冯·卡尔：“阁下，鲁登道夫-希特勒政变已被挫败。”^[6]但慕尼黑市中心的情况看上去远不是那么回事。

示威者涌入音乐厅广场，高喊“希特勒万岁！”和“打倒卡尔！”^[7]不少人对警察挥舞着拳头，大骂他们是“叛徒”“走狗”和“犹太人后台”。^[8]约翰·塞尔比（Johann Salbey）警监记得当时人群在“叫嚷、吹口哨、起哄和恐吓”。^[9]对此他的反应是命令下属亮出警棍，把闹事者里最恶劣的抓起来。

另一位警官——高级警长阿方斯·格鲁伯（Alfons Gruber）希望让人群冷静下来，他让手下用大啤酒杯在统帅堂门前倒了18杯水，

[10]清洗地上的血迹。与此同时，尸体仍在王宫的院子里。由于城中气氛越来越紧张，警方要求入夜前任何人都不许搬动尸体。

的确有一些冲锋队队员在重新集结。市内许多地方可以见到这些人在唱歌、叫嚷。人群聚集在医院和国立剧院外，还有一些人似乎是要去王宫，他们认为鲁登道夫就被关押在那里，当局担心他们会企图营救他。由于暴力威胁逐渐加剧，邦警决定先不撤下街角那些机枪。

有传闻说躲在山中的希特勒会卷土重来，仿佛现代版的腓特烈一世。有人说见到他在巴伐利亚南部小镇奥特芬的一个狩猎屋里，或者是蒂罗尔州的库夫施坦。[11]还有人猜他已经逃到了因斯布鲁克和萨尔茨堡之间的某个奥地利小村庄。不管在哪，总之很多人相信他正在集结支持者，[12]准备发起一场包围慕尼黑报仇雪恨的大行动。

到了下午6:00，警方报告有约1000名“希特勒的人”[13]在向火车站行进。再到8:45，有一伙人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社外转悠，数量为1500~2000人。警方担心报社和《慕尼黑邮报》一样遭到灾难性的袭击。

市民看起来已然失控，有关骚乱和劫掠的谣言四起。据《芝加哥周日论坛报》报道，在慕尼黑的东部，骑警[14]持骑枪冲击了人群。五名伤者被担架抬走，另有多人受轻伤，包括伦敦《每日画报》记者珀西·布朗（Percy Brown），他在试图拍下这个混乱场面时被打了一顿。

有不少慕尼黑居民对巴伐利亚政府心怀怨恨，认为它镇压民族革命，动用“多瑙河哥萨克”[15]对付人民。他们认同希特勒突击队指挥官约瑟夫·贝尔希托德的话，他后来控诉“反动派彻头彻尾的懦弱”和“对这一切的背叛”[16]。反对卡尔和背信弃义的三巨头的示威持续了整晚，一直延续到周六。

警察在街上巡逻，封锁主要广场，公共机构的屋顶布置了枪手。公共场所禁止三人以上聚集，[\[17\]](#)不得散布非官方渠道得来的宣传页、传单或海报。晚8点开始宵禁。咖啡馆、餐馆和啤酒馆要在晚7:30之前关门，其他形式的公共娱乐一律禁止，如戏剧、音乐会、电影和舞蹈。由于担心希特勒要对慕尼黑发起袭击，城中主要车站被封锁。

在警方试图控制市中心的同时，国家和国际媒体在盘点这场未遂的政变。“冯·鲁登道夫将军”是“过去四年里德国最危险的人物”，《纽约世界报》在11月10日的文章开篇犯了一个常见错误，给将军的名字凭空加了一个尊贵的“冯”。然而如今他已经“走上穷途末路”：

为了实现重新团结条顿人民的远大志向，鲁登道夫走向了疯狂的境地，他与希特勒联手，希望人民能够凝聚成一股扎实的战斗力量，进而征服世界。希特勒昨晚仓促行动，在慕尼黑宣告法西斯革命的到来，鲁登道夫也被他拖下水。

于是政变“就像被扎爆了的气球一样……”[\[18\]](#)

警方的行动标志着“这场滑稽戏的结束”，恩斯特·费德尔（Ernst Feder）在《柏林日报》上写道——“第二次鲁登道夫政变”输得比上一次还要惨，也就是1920年试图在柏林夺权那次。乱党的行动给他的感觉就是一场小孩子的恶作剧，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都有漏洞。虽然高喊着要向“十一月罪人”寻仇，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其实自己也成了十一月罪人。[\[19\]](#)

关于希特勒的下落甚至是他的背景，到这时候都还没有多少可靠的信息。《纽约时报》11月10日刊发的报道是当时最为详尽的一篇，其中称希特勒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标牌画工和“外来煽动者”，甚至不是一个“德国的德国人”。不过希特勒的年龄被写成了39岁（应该

是34岁），出生地是维也纳郊外（应该是因河畔布劳瑙），并且说他是奥地利陆军服役（应该是巴伐利亚的利斯特团），1922年1月初到慕尼黑（应该是1913年5月）。[20]

《纽约时报》相对准确的地方是称希特勒为啤酒馆演说大师，有着充沛的活力。他非常擅长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举国的愤恨与失落被希特勒编织成了一派德国屈从于共产主义者和叛国贼的景象，这些人又转而听命于犹太人和企业家。希特勒是一名非凡的煽动家。报道说，他以战场归来的巴伐利亚老兵为骨干建起了这个小小的政党，带着他们到处亮相，为他的演讲增加戏剧化效果。

局势令法国的《法兰西共和报》感到担忧。它提醒读者注意，不要把啤酒馆政变简单归结为一场共和国与君主派之间的战斗，更不是和平民主与军事应对的冲突。事实上它是两种不同独裁构想的战争，而报道认为，最危险的不是音乐厅广场上被镇压的那方。多家左翼报纸同意这一看法。作为失败的一方，希特勒看上去荒唐可笑，不像阻止他政变的邦政府那么可怕。在未来几个月里，这个错觉会越来越强烈。

[1] 希特勒至少在1922年9月18日的一场演说中就已经开始用这个词，刊载于 E. Jäckel und A.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405, 692.

[2] Otto Strasser, *Hitler and I*, trans.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42.

[3] Johann Salbey, November 10, 1923, MA 104221, BHStA.

[4] Bürgerbräu an das Herrn Generalstaatskommissar Dr. v. Kahr, November 19, 1923, HA 68/1497.

[5] 1923年11月18日报告，HA 5/114I。

[6] 1923年11月10日, HA 5/114I。

[7] 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3年11月11日《华盛顿邮报》，对官员的影响见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November 10–14, 1923, Nr. 122–24, 142–44。

[8] Johann Salbey, November 10, 1923, MA 104221, BHStA. 关于辱骂的更多细节可见于*Beschimpfung der Landespolizei*, 1923年11月13日, HA 67/1491。

[9] Johann Salbey, November 10, 1923, MA 104221, BHStA.

[10] *Tatsachenbericht vom 9. November [23] bei der Feldherrnhalle München*, HA 5/116.

[11] 1923年11月1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12] 如Konrad Linder, *Familiengedenkblatt zum 9. November 1923*, HA 5/116。

[13] Police report,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in der Nacht vom 8./9. 11. 1923*, HA 67/1490。

[14] 1923年11月1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

[15]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164.

[16] Josef Berchtold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48. 另见贝尔希托德在1923年12月写给希特勒突击队队员的信, 警方在搜查汉斯·威格林(Hans Wegelin)的住所时找到了这封信, January 14, 1924, HA 67/1493。有不少观察人士提到卡尔对希特勒先支持后镇压的转变, 如1923年11月17日《伦敦新闻画报》, 报告 Nr. 265, *Das Ende des Münchener Staatsstreichs*, 1923年11月13日, HA 5/114II, 以及1923年11月24日的奥格斯堡《警钟报》(*Sturmglöcke*)。

[17] 这条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1923年11月10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18] 1923年11月10日《纽约世界报》。

[19] 1923年11月10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20]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23 遗嘱

背信弃义之举无处不在。^[1]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随着古斯塔夫·冯·卡尔收紧对城市的控制，慕尼黑警方搜查了哥尼流街12号纳粹党总部。他们把那里上上下下翻了个遍，没收了这个非法组织的所有财物：各种办公设备和家具——桌子、文件柜、书架、餐具柜、打字机，以及一台用来复印的沙皮罗油印机。

警察还没收了挂在墙上的艺术品。其中有一些风景画和静物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希特勒作为画家的口味。此外还有肖像，包括腓特烈大帝、奥托·冯·俾斯麦、兴登堡元帅，当然还有阿道夫·希特勒自己。比较意外的是警方发现了两幅“吉卜赛人”^[2]的照片，其中一幅是一个小男孩，一幅是女孩，他们认为这应该是某党员的私人物品。

其他被查抄的物品有图书馆藏书、雪茄盒、一双鞋、六袋土豆、一辆米法牌自行车、一把配有弹药的猎枪，还有大量纳粹党信纸，后来被警察拿去当便笺纸用。其中最值钱的应该是七辆小汽车和卡车，包括戈林的梅赛德斯以及他送希特勒去贝格勃劳凯勒开的那辆红色奔驰。不过现场找到的六个铁保险箱都是空的。党员路德维希·艾斯（Ludwig Ess）^[3]已经把全党55787名党员的身份卡带走了。

到这个时候，当局已经掌握纳粹党与外国联系的铁证。^[4]起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政变当晚在奥匈边境的一次戏剧化的抓捕。被捕的是法兰茨·乌兰（Ferenc Ulain），一名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极端右翼组织“觉醒的匈牙利”领导人。

在乌克兰的行李中，警方发现了这个匈牙利组织和希特勒的部队签订的一份“初步协议”^[5]，“觉醒的匈牙利”也打算在布达佩斯发动政变。德国和匈牙利的这两个右翼组织有不少共通的地方，其中包括反犹和对《凡尔赛条约》的痛恨。匈牙利也遭到瓜分，失去了至少三分之二的领土，约350万人被划给邻国。

乌克兰的这份协议是由希特勒的下属在1923年11月2日带到布达佩斯的。协议规定由希特勒提供士兵和他们瞒着协约国私藏的武器。而掌握着大量田产的匈牙利方面则拿农产品交换。然后希特勒可以用这个食物供给源来赢得德国民众的支持——此举实际上预示了他后来在1930年代提出那些受欢迎的举措，通过将经济转向军事生产来创造就业。

这个计划里还有一个要素。这个匈牙利组织计划把国内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向国际组织发出警告，如果协约国或者其他什么人胆敢干预，他们就屠杀人质。

然而这个跨国同盟在慕尼黑和布达佩斯都没能成功。只是由于经济和社会仍未脱困，掩埋在灰烬下的躁动余火也始终没有熄灭。

* * *

政变从根本上动摇了慕尼黑。依然支持卡尔的《慕尼黑报》说，由于希特勒鲁莽、草率的行动，民族复兴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各界人士纷纷指责希特勒蛊惑人心，宣扬一种离奇而病态的意识形态。

《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出版人形容他“歇斯底里……被浮夸虚荣的魔鬼[迷了心窍]”。^[6]

然而街头却是另一番景象。卡尔似乎成了巴伐利亚最招人恨的人。^[7]

刚刚获释的邦总理奥尔根·冯·克尼林在11月10日下午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8\]](#)讨论政府是否需要撤换卡尔。他还提出解除洛索和塞瑟在军队和邦警的职权。

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站出来替卡尔说话，并问道：撤掉卡尔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克尼林直截了当地说，他支持了政变，并且在讲台上慷慨宣誓。

格尔特纳说，卡尔是不是真这么想还有待商榷。此外，如果是逢场作戏，那他又有什么错？且不说有没有做戏，军队和邦警的成功平叛可是卡尔、洛索和塞瑟的功劳。

有人插话说，不，不是他们。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这一点都经常被忽略，但这的确是事实。等到卡尔、洛索和塞瑟从啤酒馆回到办公室时，主要的工作已经由他们的下属丹纳和因霍夫完成了，包括征调援兵控制慕尼黑关键建筑和通讯中心。

关于巴伐利亚领导人在政变中起到的作用，接下来会有一场争论，而这次保密的内阁会议给争论划定了一个笼统的边界。不过会议记录显示，会议曾被窗外街上传来的叫嚷声打断：“打倒卡尔！支持希特勒！”[\[9\]](#)

* * *

回到乌芬，[\[10\]](#)希特勒已经决定逃亡到奥地利。为了躲过警方巡逻队的抓捕，他让勤务员穿上一件旧夹克、戴着“小家伙”的帽子去慕尼黑，还拿了一袋黄油和鸡蛋。他的样子就像是去乡下走亲戚的，希望这样能瞒过警方的眼睛。

他的任务是找到伊琳娜·拜希施坦，也就是那位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此人住在柏林，不过经常去慕尼黑，在那里有产业，另外在四季酒店开了间套房。希特勒是在1921年6月结识这位地位显赫的贵妇的，并且她还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11]他就是通过她认识了^[12]巴伐利亚许多有分量的人物，包括理查德·瓦格纳的遗孀柯西玛以及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圈子。拜希施坦有足够的权势、金钱和人脉，可以把他悄无声息地弄出这个国家。

于是，在勤务员去附近的村子搭去慕尼黑的火车后，舒尔茨医生又等了一会儿，跟他保持一个适当的间隔，再出发去相反方向的一个车站。他的目的是带回来一个外科医生，治疗希特勒的肩膀。

与此同时，在11月10日星期六的多数时间里，希特勒和海伦·汉夫施丹格尔只是在等待医生和逃亡用的汽车。他们坐立不安，无法静下心来吃饭——只有幼小的埃贡例外，他的调皮嬉闹跟以往没什么不同。

海伦心里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两个佣人和儿子埃贡走漏了家里来人的消息。

快入夜的时候，医生和一个朋友乘着借来的车来了，不过对希特勒的肩膀仍然没什么办法。他们再一次前往慕尼黑。希特勒和海伦再一次守着这座空房子，思考、等待着。

消息开始一点点传到耳边。

漫长的等待仿佛没有尽头。

到了夜里11点前后，已经就寝的海伦被她的厨子叫醒，说有人在外面等着。来人自称是戈林队长的园丁，说他带了鲁登道夫将军的口信给“住在咱家里的一个人”。怀疑有诈的海伦假装不知道这个陌生

人在说什么，把他打发到了附近一间旅馆，答应他一旦有人来了就联系他。

会不会司机已经联系上戈林了呢？

海伦跑到楼上通知希特勒。根据她的描述，希特勒觉得的确像是戈林的园丁，但不能确定。他们决定让海伦明早给这人打电话，请他到家里来。希特勒相信自己到时候躲在楼上看，可以分辨出来。

次日早上，那人来了，希特勒认定他的确是园丁，于是来到楼下会客室和他见面。会面时间很短，而后希特勒就回楼上打了个盹，海伦始终也不知道园丁此行的目的。“小家伙”一直怀疑此人其实是个线人，打算向警方告发希特勒的行踪。

11月11日星期天，原本应该在欢庆共和国成功被推翻的希特勒，仍然躲在汉夫施丹格尔的阁楼里。他穿着一条借来的白色睡裤和深蓝色毛圈棉浴袍，这身宽大的衣服在汉夫施丹格尔身上是合适的，希特勒穿起来就格外显瘦小。这想必挺适合他那有伤的肩膀。希特勒跟海伦开玩笑说，这一身松垮垮的，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古罗马元老。

正午时分，希特勒和海伦、埃贡吃了他到这里的第一顿也是唯一一顿好饭。希特勒的情绪似乎不错，跟埃贡开玩笑说他需要一个“金发碧眼的姐姐”。海伦把孩子放到婴儿床上睡觉，然后回到客人身边。希特勒已经在会客室里踱步，东拉西扯地说着啤酒馆政变，在想他的同志们是死是活。他提到了自己在政变中的几个错误，发誓下次绝不再犯。

拜希施坦那辆送他去奥地利的车，到底在哪呢？

海伦说她可以联系她的水管工，她知道那人是个狂热的纳粹支持者，他有一辆摩托。希特勒可以躲在侧斗里，上面盖些枕头、毯子和

篷布。没人会起疑心的。希特勒拒绝了。

* * *

快到傍晚的时候，窗板已经合上，窗帘也拉了起来。希特勒再一次在屋里踱步，“没有声音，但情绪激烈，”海伦回忆道。到了大概5点，她的婆婆来电话说警方在搜查她在乌芬之外的另一处房子。那座与世隔绝的大宅无疑是个不错的藏身地。

11名警官搜了两个小时，直到其中一人听到了海伦和婆婆的通话。他抢过话机，喝问电话那头是谁。海伦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警察于是问她是否知道丈夫的下落，以及上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是什么时候。

“今天，”^[13]海伦答道。意外的是，她丝毫没有打算替家里这位客人打掩护。

“被逮住了！”在她未发表的陈述里，就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海伦去二楼起居室跟希特勒说，警察肯定正在往这里赶。于是，用她的话说，希特勒“彻底沉不住气了”。

“这下一切都完了，”她记得当时他嚷道，“都是徒劳！”^[14]

然后他一把抓起了柜子上的手枪。有一个说法（并且写进了历史书）是，惊慌失措的希特勒差一点就自杀了。最早这么说的是“小家伙”。据他说，希特勒的确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被海伦救了下來。她用了丈夫教的一个“柔术窍门”^[15]夺过了手枪，“小家伙”自己则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跟一个波士顿警察学的。接着手枪据说被她甩进了一个面粉桶里。

然而海伦在她的手写札记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而且要更可信一些。她只是平静而又坚决地抓住他的胳膊，把枪拿走了而已。而且她还痛斥希特勒，才第一次遇到挫折，就产生了这么没意义、没出息的念头。她没提到用什么柔术技巧解除希特勒的武装。趁着希特勒坐下来绝望地抱着头的机会，她拿到了枪，藏到她临时想到的地方：埋进一桶面粉里，并且是在另一层楼。多年后，海伦还在想，她是真的阻止了希特勒的一次自杀，还是无非又见识了一次“他那些寻死觅活的戏码”。

等她回来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坐在原地，沮丧地抱着头。在等待警察上门的过程中，海伦问有什么要交代给他的追随者的，“趁现在还有时间”。^[16]于是希特勒连忙口述了他的“政治遗嘱”，^[17]大致说了说他对继任者的选择。

新任党魁的人选出人意料。不是戈林、赫斯、阿曼或者其他政变中的显要人物。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也不是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他在政变当晚曾收到希特勒匆匆写下的便条，将“整个组织”^[18]交由他打理。可能希特勒只是指政宣工作，不过施特莱谢尔很快会争辩说他的意思就是整个纳粹党。

希特勒选中的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

海伦想必也大吃一惊。她和丈夫一样，一直不喜欢这个人，认为他是个冷漠、自行其是的人，连领导一个报社的本事都没有，更别说一个政党了。用罗姆的副手卡尔·奥斯瓦尔德（Karl Osswald）的话说，罗森贝格是个懦夫，在他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狗屎而不是爱国之情”。^[19]

连罗森贝格自己也没想到会被选中。“有关组织事务的秘密，希特勒是从来不会跟我说的，可是现在，我要在这么一个危急关头接手！”^[20]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给人的感觉几乎就是，希特勒有意找了个不受欢迎的平庸之辈，以免此人太有魅力，到头来成了个威胁到他的对手。与此同时，其实更有可能是希特勒在压力之下仓促决定，^[21]在少数几个仍在慕尼黑并且绝对忠诚的人当中选了一个。

由于警察随时可能到来，希特勒的遗嘱和手枪一样，被藏进了面粉桶里。卡车引擎声和狗吠声意味着他们越来越近了。警察很快包围了房子。走到门前的是29岁的一级警督、来自威尔海姆的鲁道夫·贝尔勒韦尔（Rudolf Belleville）。他并不是很乐意干这个差事。

首先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他的手下很多在休假。为了出这趟任务，他还得去本地一家酒厂借辆卡车。此外，一战的时候他跟鲁道夫·赫斯是战友，在同一支空军部队里当炮手，1920年加入纳粹党。他根本不想逮捕阿道夫·希特勒。

贝尔勒韦尔敲了门，问能不能搜查房子。海伦带他上了阁楼，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她打开了房门。一位叫约翰·巴普蒂斯特·洛里茨（Johann Baptist Loritz）的政府高级官员描述了接下来的场面：

希特勒穿着白色睡裤在房间里站着，手臂上缠着绷带……希特勒心不在焉地望着他。在得知对方是来逮捕他后，希特勒伸出手，表示悉听尊便。^[22]

这时候外面气温已经很低，海伦提出借几件“小家伙”的衣服给他。希特勒没有接受，只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穿上了不合身的大浴袍。他就穿着这一身，外加那件披在外面的大衣，被警察押送到了门口。

小埃贡挣脱了佣人，从厨房跑出来，冲着把“道夫叔叔”带走的人喊“坏蛋，坏蛋”^[23]。希特勒拍拍孩子的脸，和海伦以及两个佣

人握了手。而后一言不发地跟着警察离开了。

在警方开着征用来的酒厂卡车离开约一小时后，另一辆车停在了宅子门口。马克斯·阿曼送来了拜希施坦的车^[24]，希特勒本应坐着这辆车逃往奥地利。

[1]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

[2] 见HA 68/1495文件夹中的清单。

[3] 路德维希·艾斯致信阿道夫·希特勒，1925年3月6日，HA4/85。艾斯将名单交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党，1925年11月10日，Folders 215 and 1220, HA 4/85。

[4]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51, 445-47, Nr 181, 486-87; Nr. 188, 522, and Vienna's *Die Rote Fahne*, January 8, 1924.

[5] 1923年12月19日《国家》杂志。

[6] 1923年11月16日《柏林日报》。

[7] 1923年11月12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3年11月15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8]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92, 318-20.

[9]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92, 引语见第320页。

[10]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315-17, folder "Ernst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 FDR.

[11] Max Amann, *Zeugen-Vernehmung in der Privatklassesache Hitler gegen Dr. Strausse wegen Beleidigung*, Amtsgericht München, January 5, 1929, HA 69/1507. 关于拜希施坦还可以参阅Wolfgang Martynkewicz, *Salon Deutschland. Geist und Macht 1900-1945* (Berlin: Aufbau, 2009), 401-3.

[12] MA 103476/1, 89, BHStA.

[13]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326.

[14]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317-23,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 FDR. 关于鲁登道夫捎信来的说法, 例见1923年11月13日《萨尔茨堡人民报》。

[15]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108. 还需注意的是, 在写回忆录之前, 她的丈夫曾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过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 更接近海伦的回忆以及希特勒是如何“放弃手中的枪”的。更早的这个版本没提到过柔术技巧, 见《战略情报局材料集》(OSS Sourcebook)中的“取自恩斯特·汉夫施丹格的信息”。不过汉夫施丹格尔的那个不太可信的版本经常出现在传记里。

[16]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323-25,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John Toland Papers, FDR.

[17]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49.

[18]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187.

[19] HA 68/1497A.

[20] Alfred Rosenberg, *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 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 and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 Ziff-Davis, 1949), 73.

[21]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Norton, 1999), 225-26, 以及对对自己的地位的反思, Georg 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Verlag K.W. Schütz, 1977), 193.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希特勒不可能预想到自己会接受那样的审判和刑罚。阿兰·布尔洛克 (Alan Bullock) 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有可能是有意在避免竞争对手的崛起,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65, and his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150。

[22]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 1923年11月13日,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18, 372. 有些地方称希特勒当时发脾气、大骂政府, 警方有可能在报告中略去了这些事。

[23]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 329,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24] Helen Niemeyer, unpublished “Notes, ” 329,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 and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178.

24 绝境

狱卒人选上我们得小心，否则他会给他们来场演说，让他们开始为革命欢呼。^[1]

——奥托·冯·洛索将军

监狱看守弗朗茨·汉姆里希睁着眼躺在宿舍里，听着钟表的滴答声和走廊上巡逻的同事发出的有规律的脚步声。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2]窗户都在发颤。这时候，门铃声和敲门声同时响起。一个助手说典狱长要他马上过去。

典狱长奥托·赖博尔递给他一封电报，^[3]上面说希特勒已经被抓，当晚会送到这里来。需要做一些安排。^[4]从巴伐利亚第7师调来了32名士兵用于加强戒备，以防希特勒的支持者劫狱。届时会有巡逻队，院子里布设机枪，另外新加了一条直达军营的电话线，以备不时之需。

莱希河畔兰茨贝格隐匿在慕尼黑以西约40英里处的阿尔卑斯山里，怎么看都不像一座现代的邦监狱，更像一座乡间别墅或中世纪遗迹。然而这个有两座洋葱顶大楼和巨大的正门的监狱，其实是14年前才落成的。它的四座主翼楼呈十字形排开，共关押了500名囚犯，中间是一个中央监视站。这种“全景监狱”的建筑模式让狱卒可以看到每一名囚犯，囚犯反过来则看不到狱卒。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关押地不在兰茨贝格的这个区域。

自1919年以来，兰茨贝格一直兼用于关押政治犯和被定罪的决斗者。这些人会得到“堡垒监禁”（Festungshaft），属于一种“礼待关押”。这种1813年在巴伐利亚建立起来的关押形式，是专为那些罪

名较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准备的。比起强调肃静、禁闭的关押以及高强度劳役的监狱（Gefängnis）及其更严厉的形式（Zuchthaus），堡垒监禁不会带来同样的污名，对囚犯的要求也和其他机构不同。

在兰茨贝格，处于礼待关押之下的囚犯有专门的耳房，位于一座独立的附属建筑物内，这座两层楼的现代建筑被称为Festung，也就是“堡垒”。耳房通过一道走廊与主监狱联通，囚犯不需要穿囚服、接受强制理发、打扫自己的囚室，可以免去许多限制措施的制约。他们甚至不需要一直待在囚室里。

他们白天可以去其他囚犯的房间串门，每周有六小时的接待访客时间，并享受每天最少五小时的放风。他们可以在囚室里摆设图画或花卉之类的装饰，还可以买雪茄、香烟、葡萄酒，每天在餐厅可以喝到一升啤酒。堡垒监禁是德国最高级别的徒刑，基本上意味着“囚犯的活动与生活方式接受监管，从而失去自由”。^[5]

当晚快10点半的时候，门钉密布的正门徐徐打开，囚犯在门外等候。戴着帽子、身穿深蓝色带肩章制服^[6]、腰带系着钥匙的兰茨贝格狱卒走上前去。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印象是：“一缕黑发耷拉在苍白的脸上……双眼冷冷地盯着前方。”

成为第45号囚犯的希特勒被录入档案：“天主教徒，34岁，父亲是一名奥匈帝国林茨海关官员，1889年4月20日生于上奥地利州因河畔布劳瑙，未婚。职业：据称为作家，此前为艺术家……双亲：皆已亡故。他和在维也纳的妹妹没有通信。他住在慕尼黑蒂尔施街41号。”^[7]档案还记载了他在第16预备役步兵团的服役情况，以及在军中得到的嘉奖。

在众多警察和一条牵在手上的狗的簇拥下，希特勒来到了二楼的5号牢房^[8]——整个耳房里最大、最亮堂的一间。面积有九乘十二英

尺，配一张铺着毛毯的铁床，一个床头柜，一张餐桌，一张写字台，一个橱柜和两把椅子。白天的时候，阳光透过上了铁条的窗户照进来，照亮粉刷过的墙壁。这就是兰茨贝格的所谓名人牢房。之前关在这里的是刺杀了慕尼黑社会主义者库尔特·艾斯纳的安东·冯·阿尔克·奥夫·瓦莱伯爵，他被转到了医务所营房，给这位新囚犯腾地方。[\[9\]](#)

希特勒拒绝了送上来的面包和汤，直接躺了下来。他很累了，并且显然很痛苦。监狱医生、66岁的约瑟夫·布林斯坦纳（Josef Brinsteiner）给他的诊断是“左肩脱臼，肱骨头有一处骨折，导致非常痛苦的创伤性神经症”。[\[10\]](#)医生估计这个伤会“导致左肩[永久性]局部僵硬和疼痛”。

不过随着体检的继续，医生还会有一个意外发现。[\[11\]](#)希特勒患有隐睾症，一个睾丸没能下降至阴囊。这个说法在学术界最早是由俄国作家列夫·贝兹曼斯基（Lev Bezymenski）于1968年提出来的。他的依据，据称是1945年5月由苏联进行的尸检，但史学界对此一直存有怀疑。不过兰茨贝格的医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动机，事实上他对希特勒还颇有好感。于是根据这个新发现的报告，我们意外地发现俄国人的这个判断并非无凭无据。[\[12\]](#)

* * *

从得知政变消息那一刻起，阿根廷报纸《阿根廷日报与周报》（*Argentinisches Tag- und Wochenblatt*）记者卡尔·克里斯蒂安·布莱（Carl Christian Bry）一直处于吃惊状态。希特勒和同党试图推翻政府，但他们是在政府大楼或军营里吗？哪怕警察局里也行。可是，他们是在一家啤酒馆。“这是典型的希特勒，典型的慕尼黑，”他揶揄道。[\[13\]](#)

11月9日，布莱急匆匆下楼去取一份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里面那些无意而就的幽默“宝藏”令他啧啧称奇。荒唐而浮夸的句子，与对犹太人的恶毒攻击交织一处，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一个好似劣质犯罪小说的叙事。现在政变失败了，希特勒被捕了，布莱欣喜地表示他没有“高估希特勒”。不过他也没想到希特勒会这样“匆匆收场”。[\[14\]](#)

共产主义通讯社国际通讯社（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的维克多·塞尔吉（Victor Serge）说，希特勒真的以为，只要找个啤酒馆，“拿把左轮枪往天花板开几枪”，他就“成了德国新皇帝似的？”路透社预言，这场所谓的革命将被作为史上最短暂的革命为后世所铭记。

希特勒的确将被载入史册。纳粹党已被取缔，其党员四散逃亡，陷入分裂与争吵之中。希特勒的事业还没开始多久，似乎就已经结束了。他自己肯定是这么看的。啤酒馆政变眼看将成为一个笑话。

“这场贝格勃劳凯勒政变，是史上最疯狂的闹剧，”《纽约时报》认定。这群靠“啤酒和演说”调动起来的人马虎而业余，更适合“滑稽戏的舞台，而不是推翻柏林政府这样严肃的行动”。[\[15\]](#)《小巴黎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歌舞杂耍表演；[\[16\]](#)《晨报》将它比作一次“狂欢节式的历险”。[\[17\]](#)

“江湖骗子希特勒”的末日到了，《福斯日报》说。[\[18\]](#)《法兰克福日报》刊发了纳粹党的讣闻，[\[19\]](#)《纽约时报》的西里尔·布朗（Cyril Brown）表示，“慕尼黑的这场流产的业余政变……无疑将终结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们”。[\[20\]](#)

与此同时，古斯塔夫·冯·卡尔正逐步恢复过来。卡尔得以继续掌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的支持。

[21]其他议员同意格尔特纳的看法，认为现在撤掉卡尔会显得是希特勒赢了。

当晚，总理克尼林会同格尔特纳，去和卡尔、洛索和塞瑟谈话。又一场气氛紧张的会议。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为他们在政变夜未经授权擅自行动做了辩解，并且认为他们非但不该辞职，反而应趁乱为卡尔争取更多的权力。塞瑟使用了“无上权力” [22]这样的字眼。

格尔特纳是保住了卡尔，但巴伐利亚内阁还是没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总理显然想撤下卡尔、洛索和塞瑟，但他意识到他们会反抗，而他不确定政府有没有足够的力量逼他们下台。另外，正如其他阁员所说，面对极右翼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宣传，政府需要靠这个联合阵线共同御敌。

接下来的几周里，卡尔、洛索和塞瑟会分头行动，力求影响巴伐利亚舆情。他们封禁了支持纳粹的右翼报纸， [23]如《祖国》和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的《冲锋报》，还顺势取缔了一直在批评邦政权的共产党。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主义媒体实施禁制以及更严格的审查，不过这项扼制讨论的宏大计划后来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在巴伐利亚之外，尤其是那些社会主义或左倾的报纸里，卡尔和纳粹、极右翼的区别，远不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大。他先是去玩火，被烧到了又装成一脸吃惊的样子。还有人在想，与其说卡尔是背弃了誓言，倒不如说是“出卖”了希特勒，被德国企业大亨——要么就是支持王储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的君主-耶稣会派——招安了。甚至还有人认为，卡尔背叛希特勒，是因为一个卖地毯的犹太富商用七张波斯地毯收买了他。 [24]

“到处是锃亮的钢盔和步枪，” 弗朗茨·汉姆里希这样形容加强了军事警戒的兰茨贝格。 [25]另一个狱卒奥托·鲁尔克 (Otto

Lurker) 也回忆说, 当时走廊传来武器的咣当声^[26]和沉重的脚步声。看到这么多士兵在周围走来走去, 希特勒表示他担心自己就要被行刑队枪决了。^[27]

即便他真这么想过, 在得知邦检察官即将来问讯以后, 估计也已经改变了。正在进行审前调查的检察官是想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 但是希特勒拒绝合作。他威胁要自杀, 然后开始了一场持续至少一周、可能达到十天的绝食。

看守用老办法劝他进食, 即把饭放在他的牢房里, 到下一顿饭来了再拿走。他们还用了各种各样的说辞, 想打动这个顽固的囚犯。据汉姆里希回忆。他就“坐在那儿, 活脱一个小小的、萎靡的倒霉蛋, 脸刮得马马虎虎……带着冷漠、疲倦的笑容听着我那些简单的词句”。^[28]布林斯坦纳医生在这段时间的记录显示, 希特勒的体重从160.9磅(73公斤)掉到了149.9磅(68公斤)。^[29]

1923年11月19日, 监狱心理医生阿洛伊斯·玛利亚·奥特(Alois Maria Ott)给希特勒做了检查, 发现他的情绪已经十分低落。希特勒控诉了支持者和德国人民的背叛, 并表示他为了他们受的这些罪毫无意义。他打算让他们好好尝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这样他们就知道没了他会有多惨。“我受够了,” 希特勒说, 长时间的咆哮让他嘴角泛出了白沫, “要是我有把枪, 我会做个了断。”^[30]

希特勒看来跟许多到兰茨贝格看他的人说过类似寻死觅活的话。安东·德莱克斯勒是当月晚些时候来的, 他看到这个瘦削、苍白的囚犯坐在窗边——绝食让他“更瘦、更弱、更白了”。此外, 希特勒似乎在努力给人留下一个印象, 就是他无法接受有16个人在他的领导下失去生命的事实。

“他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德莱克斯勒后来说。他愤愤地表示，花了这么多心血去经营这个党——“我们所有的辛劳、筹划、奋斗、克制、拼凑和节省”——到头来一场空。德莱克斯勒说希特勒的哀怨是会传染的，不过他声称，希特勒不管前途多么黯淡最终还是没有放弃这一点，应该还是有他的一份功劳。^[31]

在捷克斯洛伐克创立了苏台德纳粹党的德国人汉斯·克尼尔施（Hans Knirsch）在11月23日去探望了希特勒，他也发现这个身陷囹圄的人“抑郁至极”。^[32]克尼尔施想让他少胡思乱想，要是没有他，这个党以及党的计划肯定会崩溃。但据克尼尔施的回忆，当时希特勒摇摇头，“怯生生地说，谁会愿意追随一个经历如此惨败的人”。^[33]他“没权利活下去，”希特勒还说，在导致了如此惨痛的伤亡后，他自己别无选择，唯有“绝食而死”。^[34]

根据克尼尔施的讲述，他叱责希特勒背弃自己的支持者，并提出政变其实是一场胜利。从短期看，它提振了民族精神。而长远看则有助于他们走向最终的胜利，因为失败是斗争的必要一环，也是成功的前奏。

与德莱克斯勒和克尼尔施一样，许多来探望的人都觉得自己鼓励了希特勒，甚至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据“小家伙”说，他的妻子海伦也属于这一类。他说，她提醒希特勒当初在自己的庄园里劝阻他自杀，可不是为了让他“在兰茨贝格把自己活活饿死”。^[35]此外，如果他执意要这么做，等于正中敌人下怀。她可能是给希特勒递了张便条，总之在监狱档案里找不到她的探视记录，在她自己的未发表回忆录里也没有这样的激励言辞。

监狱记录里倒是显示有个不太寻常的探视者，真的给这个郁郁寡欢的囚犯注入了活力。1923年12月3日，一名访客登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这只名叫“狼”^[36]的狗是希特勒前一年收到的生日礼物。^[37]

[1] 1923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

[2]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 *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 ED 153-1, 6, IfZ, 以及采访,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69。

[3]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 November 12, 1923,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07, 352。

[4]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 *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 ED 153-1, 6-8, IfZ;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69-70。另见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4。

[5] Peter Fleischmann, ed., *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 Verlag Ph.C.W.Schmidt, 2015), 24, citing Wilfried Otto's 1938 dissertation at Friedrich 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Die Festungshaft: Ihre Vorläufer, Geschichte und Zukunft* (1938), 235。关于兰茨贝格还可参阅Fleischmann的精彩论述。

[6] 1923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

[7] Schutzhaftanstalt Landsberg, Haftpapiere, Hitler, Adolf No.45, 1e 3/1, JVA 17.000, StAM, and Peter Fleischmann, ed., *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 Verlag Ph.C.W.Schmidt, 2015), 83。

[8] Hemmrich, ED 153-1, 27, 113, IfZ。

[9] Hemmrich, ED153-1, 9, IfZ. See also Hemmrich's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0, and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5-6。

[10] Brinsteinerreport, January 8, 1924, and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10-11.

[11] *Aufnahme-Buch für Schutzhaft, Untersuch. u. Festungshaft-Gefangene 1919*, JVA 15124, StAM. 关于本文件的发现，可参阅本注释部分的开头。

[12] Lev Bezymenski, *The Death of Adolf Hitler* (London, 1968), 46. 苏联法医病理学家法奥斯特·什卡拉夫斯基医生领导的团队发现，希特勒的左睾“不在阴囊内或腹股沟管内的精索上，在小骨盆中也没有找到”。德国史学家沃纳·马瑟尔 (Werner Maser) 认为俄国人认错了尸体。就算他们能找到希特勒，在那么多软组织已经烧毁，检验的主要是骨骸的情况下，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此外，多名希特勒的医生要么没注意到有这个问题，要么在被问及此事时明确表示他的生殖器是正常的。在林茨行医的爱德华·布洛赫 (Eduard Bloch) 医生曾在1906年和1907年给希特勒做过治疗，他在接受美国战略情报局问讯时称，他的病人“没有身体残缺” (1943年3月5日，美国战略情报局)。1944年夏天给希特勒检查过身体的厄文·吉辛 (Erwin Giesing) 医生也是这样跟美国问讯人员这么说的。但吉辛是亲卫队的一名耳鼻喉科医生，他在别的地方承认过，自己只是草草看了一眼，不足以掌握情况。布洛赫的意见 (1941年3月15日《科利尔》杂志) 也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事了，其中有不少的错误，以至于战略情报局的问讯官觉得，他的回忆录是不是太多受到康拉德·海登 (Konrad Heiden) 的传记影响。前牛津钦定近代史教授、英国军情六处情报官休·特雷弗-罗珀尔 (Hugh Trevor-Roper) 在1945年受命寻找希特勒死亡的证据，他简要地概括苏方报告是一份医学声明，同时也是政治声明。布林斯坦纳医生的报告因此就有些令人意外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苏联人称未下降的是左睾，而这位狱方医生说的是右睾。这种不一致可能只是视角不同导致——医生的左还是病人的左——甚或是记录的笔误。在布林斯坦纳的另一本笔记本中，他称睾丸是左睾，但是接着又涂掉，改为右睾。

[13] Carl Christian Bry,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45.

[14] Carl Christian Bry,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50 and 157.

[15]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16] 1923年11月11日《小巴黎报》。另见约翰·克雷顿 (John Clayton) 在1923年11月10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中的文章。

[17] 1923年11月10日《晨报》。

[18] 1923年11月9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19] 1923年11月10日《法兰克福日报》。

[20]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

[21]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102.

[22] *Niederschrift der Ministerratssitzung vom 12. 11. 1923*,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05, 342.

[23] Horst J. Weber, *Die deutsche Presse, 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 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 1930), 12-13, 20.

[24] 1923年11月13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在有些版本里价码是20张地毯, 1923年11月19~20日《上巴伐利亚人》。

[25] Franz Hemmrich interview,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0.

[26]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t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6.

[27] Die Regierung von Oberbayern an das Generalstaatskommissariat, November 13, 1924,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18, 373.

[28] ED 153-1, 20, IfZ.

[29] January 8, 1924, OSS.

[30] 这句话出自前兰茨贝格监狱心理医生阿洛伊斯·玛利亚·奥特在1988年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已经是98岁高龄，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35。1924年2月，希特勒会对法庭说，他后悔没有像他的同僚那样，在游行时死在街头：NA T84/2 EAP 105/7, 119。

[31] Drexler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64-65。安东·德莱克斯勒在1934年表示他劝阻了绝食，不过显然在1933年没这么说。另外可参阅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30-31, 以及Esser, interview, March 16, 1964, Band I, 2, ED 561/5, IfZ。

[32] Knirsch in the Czech *Der Tag*, cited by 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75), 277, note 178.

[33]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246.

[34] Robert Payne, trans., *The Life and Death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 Popular Library, 1973), 184。他的探视可见于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68, 465。另外可参阅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9-60。

[35]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54.

[36] *Sprechkarte* December 3, 1923 in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18-20, 关于希特勒的愉快心情的描述见第8页, 另见Franz Hemmrich, *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 ED 153-1, 20, IfZ.

[37]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 13, F14, IfZ.

25 审判前的审判

我得承认，当时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个多了不得的人，非凡就更谈不上。^[1]

——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第一次问讯希特勒后

鲁登道夫将军的确已经获准回到索伦-路德维格斯高地的宅邸接受软禁。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潜心准备他的辩词。^[2]妻子玛格丽特说他现在的状态比政变前还要投入。他的待客不受限制，因此迎来了各色拥护者和素不相识的人，他清理了堆满书籍、杂志和报纸的咖啡桌。^[3]“他们对他们[来客]讲述的每个故事，他们的每一个意见，都十分看重，”她说，此外他还把这一切都视为“马赛克画的组成部分”。^[4]

鲁登道夫选择加入这样一场愚蠢的政变，可谓有失明智，坊间对此反应不一，有意外、嫌恶、取笑，也有惊愕。他的批评者推测将军可能羞愧之下已经自尽了，省得接受叛国罪审判蒙受更多的耻辱。鲁登道夫的墓志铭已经写就：“一名优秀的战士，不慎触上空想政治的暗礁。”^[5]

与此同时，戈林越境进入奥地利，在因斯布鲁克一个私人诊所卧床养伤。由于大量失血和疲劳，他的身体很虚弱。枪伤令他备受折磨，而且伤口受到感染，可能是在王宫附近子弹击中石头激起的尘垢导致的。^[6]他几番失去知觉，想象着自己再一次走上街头战场，时而发出骇人的大叫和呻吟，时而啃咬自己的枕头。^[7]

戈林就是在这时候开始注射吗啡的。^[8]这很快成了日常习惯，最终变成持续多年的嗜瘾。没过多久，吗啡就导致他进了瑞典的兰格勃

罗疯人院，在多次尝试治疗这个昂贵的嗜瘾后，他开始了日后为世人所熟知的暴饮暴食。

12月24日，注射了吗啡的戈林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离开诊所，据卡琳说脸色“雪白”。^[9]两人仍然不能回慕尼黑，他们的宅子受到监视，^[10]信件被人拆看，银行账户被冻结。^[11]他们搬到了蒂罗尔庄园酒店，有冲锋队队员送来了圣诞树，每根蜡烛都装饰了白、黑、红色的丝带。在酒店老板和其他支持者的慷慨相助下，蒂罗尔庄园让他们得以恢复习以为常的奢侈生活。

相比之下，其他逃亡的纳粹党人就只能如“小家伙”所说，“流浪汉一样”^[12]远走他方了。当时“小家伙”用墨镜和新蓄的“弗朗茨-约瑟夫式羊排络腮胡”作为伪装，使用了假护照。他在一群铁路工人的协助下越过了德奥边境，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在经济陷入混乱后转向右派的。其中一个人把他安顿在了库夫斯坦一家花店里，他睡在地上，周围是一排排的菊花。

在奥地利期间，“小家伙”去探望了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时年40岁的安格拉·豪巴尔（Angela Rauba1），她住在维也纳勋伯格街一座公寓楼上，家境贫困。20岁的时候，她嫁给了林茨的税务官里奥·豪巴尔，不过这段婚姻并不长久，丈夫在七年后早逝。安格拉现在要养活三个年幼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条件让“小家伙”感到意外。透过她勉强打开的门——在他看来是因为觉得丢脸——他看到了一个污秽不堪的房间。

“小家伙”请她和她的大女儿去咖啡馆，在那里，他发现安格拉很腼腆，而她女儿倒是落落大方。她就是时年16岁的吉莉，阿道夫·希特勒的未来情妇。^[13]

那年12月，安格拉前往德国探望了狱中的希特勒。^[14]她发现这个异母弟弟^[15]的情况没她想得那么糟。经过定期的按摩，他的胳膊在恢复，^[16]不过仍然只能抬到肩膀高度，并且动的时候会疼。他开始吃东西了；绝食后的第一餐吃的是一碗米饭。

他的牢房里堆满了礼物。有一套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的五卷本文集（1920年版），^[17]一本德语字典，一本内容不详的“外文”书籍，此外还有纸张、两支羽毛笔、一个笔架。这些都是12月4日由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送来的，希特勒在1922年结识了这位41岁的慕尼黑公设辩护人。后来希特勒的同僚在啤酒馆袭击了一个敌对的演说人，于是请了罗德代理诉讼。

在安格拉来到兰茨贝格前，有人刚刚送来了薇妮弗雷德·瓦格纳——也就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齐格弗里德的英国妻子——的圣诞包裹。里面有一张毛毯^[18]、一件夹克、长内衣、袜子、香肠、烤面包片，还有一本丈夫的剧本《马林堡的铁匠》（*Schmied von Marienburg*）。几位探视者注意到，希特勒正在恢复往日那种高涨的热情。

《纽约时报》发了一篇关于他在兰茨贝格关押情况的报道。“作为关押地，[这里]肯定谈不上太糟糕，”^[19]文章开头说道，其中列举了这个在押犯享受的种种优待，比如书本、锻炼，以及对囚犯不加严苛限制的先进模式。希特勒把这种宽大待遇充分利用了起来，唯独锻炼在当时被他以肩膀伤势为由拒绝了。文章称审判短时间内不会进行，因为巴伐利亚政府要等希特勒的人气降下来。

然而民众对希特勒的拥戴没有分毫减弱的迹象，至少许多右翼和民族主义群体是这样。他们中有部分人呼吁政府^[20]给予特赦，或者某种形式的大赦。慕尼黑工业大学德国哲学和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杜

·穆林·艾卡伯爵（Richard Graf du Moulin Eckart）博士和古斯塔夫·冯·卡尔私下见面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被巴伐利亚领导人拒绝。

对于希特勒和政变带来的问题，一则政府内部备忘录拿出的计划要更有见地一些。^[21]其中建议实施一项三管齐下的策略，重点是对谋反主脑发起严厉检控，全面解除私人准军事组织的武装，集中力量搜查并阻断其资金流，让他们无法维持报纸、宣传册、20人的办公室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至于这份建议能引起多少注意，就不得而知了。

那年圣诞节，位于慕尼黑波希米亚区施瓦宾的花丛咖啡馆上演了一出“活人画”^[22]，题为《狱中的阿道夫·希特勒》。幕布升起，观众看到一个背对着他们的男人独自坐在写字台前，双手抱着头。窗外飘着雪。一个天使飞进孤独的牢房，带来了一棵发着亮光的圣诞树。台下一个男声合唱团唱起《平安夜》。

在演出的高潮，那个男人缓缓转身面向观众。不少观众一时间以为台上的就是希特勒本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对自己能找到如此合适的演员很是得意。灯光亮了起来，霍夫曼说有不少人噙着泪水，轻声啜泣，匆匆收起他们的手帕。

政府在12月宣布，审判将由一个多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没有陪审团。“普遍的看法是他〔希特勒〕会被处决，”《纽约时报》报道。^[23]还有一些观察人士，比如美国驻慕尼黑副领事罗伯特·墨菲，预测希特勒会在服完长期徒刑后被驱逐出境。^[24]

希特勒仍然拒绝与政府合作。在威胁自杀和发起短暂的绝食后，他现在又拒绝说话了。54岁的检察官路德维希·施坦莱恩是一个保守派巴伐利亚人，面对这个顽固的囚犯，他束手无策，^[25]最后只能把问讯交给自己的副手。后者就是汉斯·埃哈德，一个出身班贝格天主教

教徒家庭的年轻律师，时年36岁，不过样子看上去还要再年轻许多。埃哈德上个月刚刚被提拔到这个位置。事实上在希特勒冲进啤酒馆的时候，他担任此职只有七天。[\[26\]](#)

不过埃哈德将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选。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的儿子，埃哈德小时候曾想当一名法官。在慕尼黑和维尔茨堡的法学院，他表现出了天分，以极优等成绩毕业。战时他是军事法庭助理，随军去了俄国、塞尔维亚和法国，获得了包括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在内的许多嘉奖。

而后他和妻子安娜·伊利奥诺尔（Anna Eleonore）——又名“安娜洛尔”（Annelore），父亲是个酒厂老板——以及三岁半的儿子卡尔汉斯（Carlhans）一起搬到了慕尼黑。埃哈德热爱阅读，在一个弦乐四重奏里拉大提琴，不过他不太有时间去做这些事了。他现在接手的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受瞩目的案子。

这位年轻的检察官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日后会说，常有人评价他缺乏活力，或者在面临重大决定时太过犹豫，他觉得会这么想情有可原。这就是他的性情：慎重，自省，有条不紊。他的其中一个座右铭是“了解自己，永远保持自控”。还有一个是“明辨本末，期待最好的结果，但行事要讲求实际”。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这些历经艰辛得来的智慧，无疑正是埃哈德十分需要的。[\[27\]](#)

1923年12月13日，年轻的检察官乘火车来到兰茨贝格，[\[28\]](#)用施坦莱恩的话说，此行是想试试能不能“从希特勒那里问出点什么”。那是颇为难熬的一天。埃哈德在一张小桌边，对面的希特勒坐在藤椅上，胳膊仍然吊着。

埃哈德问希特勒是不是还在疼。

没有回答。

准备好谈话了吗？埃哈德接着问道。

希特勒看着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透着“严厉与憎恨”，[\[29\]](#)喷射着怒火。埃哈德后来说，他当时感觉希特勒“想要把我一口吞了”。[\[30\]](#)

埃哈德告知他有权聘请律师。

依然没有反应。

他只是尽自己的职责，埃哈德接着说，他尽可能保持语气平静，像对待“一只生鸡蛋”[\[31\]](#)一样小心翼翼。

“我没什么可说的，”希特勒脸朝向墙壁，终于开口了。他还说，他是不会被律师的把戏蒙骗的，他想说的话，都会写进他计划中的回忆录里。

埃哈德进一步追问他的行动、同党和背景，希特勒不为所动，声称他不会“给你一份毁了[他的]政治生涯的供述”。

埃哈德反驳了他，说无论是对他自己还是和他一起受指控的人，合作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希特勒耸耸肩。他需要考虑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一个法庭的裁决对他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埃哈德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让速记员收拾打字机离开房间。他则收起了纸笔。埃哈德称他对希特勒的政治理念很感兴趣，他想聊聊。“没有记录，没有规则，”他说，“我们只是聊天。”

用埃哈德日后的话说，这个简单的招数“立竿见影”。[\[32\]](#)

希特勒开始长篇大论，仿佛自己现在不是在监狱探视室面对一名检察官，而是在啤酒馆里对着狂热的支持者讲话。他无法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做出清晰、简洁的回复，满口污言秽语，时常唾沫飞溅。埃哈德后来开玩笑说他应该带把伞去。^[33]

滔滔不绝的咆哮持续了五个小时。^[34]结束时，检察官感谢了希特勒的这次“发人深省的面谈”，^[35]而后将他能想起来的关键点全都敲打了出来。那是一份15页的文件。^[36]它成为一个重要的起点，从中可以看到希特勒接下来的策略，但是埃哈德担心希特勒会如他威胁的那样，把最佳的论据留到法庭上。

到了1924年1月，检方已经把主要被告的数量减到10人。除了阿道夫·希特勒，还有仍在软禁中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战斗联盟指挥官、据称是政变的军事计划制订者的赫尔曼·克利伯中校；法官、前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以及他在警察局的亲信威廉·弗里克博士。

战斗联盟的三个重要准军事团体的头目也包括在内：“帝国战旗”的恩斯特·罗姆上尉，高地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韦伯，慕尼黑冲锋队头目威廉·布吕克纳。最后两名年轻的被告是政变中的小人物：鲁登道夫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以及学生罗伯特·瓦格纳，瓦格纳被指煽动慕尼黑步兵军官培训学院的学员参加政变。

所有被告都被控犯有重大叛国罪。法典第80条对此罪的界定是企图以武力更改德国或诸邦的宪法。（相比之下，叛国罪指的是向外国势力泄露国家机密。）一旦被判重大叛国罪成立，可处终身监禁或堡垒监禁。

那么还有导致四名警察死亡、绑架政府部长、袭击犹太市民、偷盗数万亿马克以及冲击《慕尼黑邮报》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罪行

完全没有被纳入指控。这种将本案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重大叛国上的策略将会招来不少批评。

此外，为什么审判要放在慕尼黑呢？

按理说，这场“阿道夫·希特勒审判”^[37]根本不应该在这里举行。在《共和国保护法》通过后，一个专门的国事法庭（Staatsgerichtshof）^[38]于1922年7月21日在莱比锡成立，负责审理重大叛国案件。当初社会民主党控制的议会促成这项立法为的是遏制一股最终导致犹太裔德国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遇刺的政治骚乱和杀戮潮。

然而巴伐利亚拒绝承认这部法律。反对它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中央政府的步步进逼之下守住（尚存的那些）邦权是无比重要的。此外，巴伐利亚本身就有用于惩戒叛国罪行的机构，也就是1918年11月紧急成立的所谓人民法庭，^[39]用于检控非政治犯罪，如谋杀、误杀、强奸、入户盗窃、纵火或抢劫。后来该法庭将管辖权扩展到其他犯罪，包括重大叛国。

1919年7月重新成立的人民法庭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性。它绕过了传统的司法系统，侧重没有上诉权的快速裁决。称之为“人民法庭”是因为，它是一个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其中包括两名法律专业人士，以及三名从男性国民中选出的普通百姓。不过在实践中，主审法官对几名平民法官的筛选是有很大的决定权的。这种影响，加之不存在任何的司法复核，使人民法庭的主审法官实际上成了——一位慕尼黑律师所说的——“司法国王”^[40]。

现在巴伐利亚司法部认定，这个法庭对本案有司法管辖权。不过人民法庭的问题在于，自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后，像这样的地方司法机构已属违宪和非法。不少人猜测，巴伐利亚之所以无论如何都不

肯服从宪法，是因为当局想保护被告人，同时更有可能的是想保守他们自己的秘密。

无论怎么强调他们镇压了叛乱，卡尔、洛索和塞瑟在政变中的牵连无疑成了他们的污点。经过当局的示意，加上迫切想和这场惨败保持距离，他们在正式声明中称1929年11月8日到9日的事件是“希特勒政变”。希特勒也乐得接受这个称呼，明确他在此事中担负的责任，哪管这对他实际的角色存在多少夸大。

然而，在法律上有理有据的柏林，为什么没有出手干预呢？首先，如果坚持要求纳入联邦司法管辖，可能需要动用武力，[\[41\]](#)这是当局想要避免的，毕竟政变刚刚结束不久。此外施特雷泽曼的政府在1923年11月23日未能通过信任表决，总理已经辞职。新一轮选举在即。此刻的柏林政客不愿意去捅慕尼黑这个马蜂窝，做一些让许多巴伐利亚选民极度不满的事。

于是在柏林看来，让本案在慕尼黑审理似乎是一个最不得罪人的方案。然而对慕尼黑来说，麻烦才刚刚开始。

首先他们找不到一个足够大、足够安全的法庭来举行这样一场重大审判。有人提出奇思妙想，说就在贝格勃劳凯勒进行，被当局否决。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提议也未予采纳，比如在城外一个叫施特劳宾[\[42\]](#)的小镇，甚至就在兰茨贝格监狱[\[43\]](#)。不过在后者被否决之前，典狱长已经兴冲冲地开始装修堡垒的二楼，为审判做准备。他还为鲁登道夫选了一个双人监室，亲自挑选一名狱卒负责伺候他。

到了1924年2月，巴伐利亚司法部已经确定以防卫军步兵学院为审判地点。这里曾经是巴伐利亚军队的战争学院，后来成为一所极具威望的军官培训学校。由于大部分学员是希特勒支持者，曾经举着钩十字旗上街誓要推翻政府，这所学校在啤酒馆政变后被关闭。[\[44\]](#)

有传闻说审判只会进行几天，选择息事宁人的巴伐利亚当局到时候会结束这场势必丢人现眼的大戏。还有人预测连这一步都做不到，审判很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推迟或取消。据说古斯塔夫·冯·卡尔是在幕后主事的马基雅维利式人物，慕尼黑的弗兰肯斯坦博士^[45]敲敲打打打造出了一个可以把他毁掉的怪兽。

巴伐利亚当局显然希望能悄悄地从速审理。越少人注意越好。而希特勒一方则正相反。“小家伙”记得审判前有一次去探监时的对话。“他们能拿我怎么样？”^[46]希特勒问道，他的膝上坐着在吃糖果的小埃贡。他只需要揭露巴伐利亚当局的合作，整个检控的根基就坍塌了。

人民法庭把开庭时间定在了1924年2月18日上午。但正如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所料，在距离开庭还有几天的时候，日期突然推迟了。^[47]而到了原定开庭日期当天，又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古斯塔夫·冯·卡尔和冯·洛索将军双双辞职。^[48]

柏林方面一直都在向巴伐利亚施压，要求他们将有“反叛”^[49]行径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解职。到了这个时候，巴伐利亚内阁已经不再支持他，也不打算保卡尔，而卡尔对这份差事也已经心生厌恶。在他看来，这是让他去负责处理难题，同时又不给他解决问题所需的权力。

不过，如果这些动作是企图打消有关高层丑闻和掩盖真相的传闻，效果就很一般了。慕尼黑现在成了臆测与谣言贩子的乐园。而政府缺乏坦率的沟通，自然让这一切愈演愈烈。

各路爱国社团联合起来呼吁停止诉讼，在他们看来，审判将成为民族的耻辱。一个知名的老兵团体甚至求到了保罗·冯·兴登堡元帅

那里。^[50]不过这位大名鼎鼎的领袖拒绝介入，理由是他知道自己的战时同僚鲁登道夫将军不会想要这种特殊待遇。

随着新开庭日期2月26日的临近，许多人怀疑审判是不是真的会举行。如果举行，会不会完全闭门举行？^[51]还有人在想证人有没有胆量露面。比如卡尔就收到了死亡威胁。他换了办公室，雇了保镖，^[52]拒绝在歌剧院或戏院露面，^[53]除非是在一群警探簇拥下一直待在后台。有一个说法^[54]是法庭的传票寄到了他最新的藏身处：一家疯人院。

还有多名被告^[55]据称健康状况不佳，无法出庭作证。希特勒的肩伤需要手术，他的支持者们设法争取再次延期。还有人说他情绪抑郁，需要精神治疗。^[56]弗里克称自己失眠^[57]、心悸、气短，有自杀念头。珀纳因为一种未披露的肠胃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导致有人离谱到猜测他是被投毒。^[58]据《人民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有三到四名被告再次开始了绝食抗议。^[59]

开庭前，慕尼黑咖啡馆和啤酒馆里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最匪夷所思——也最让人担心——的是死硬派纳粹流氓痞子会涌进城里，潜入法庭制服现场的安保，将被告劫走，然后准备发起事先计划好的第二次政变。^[60]希特勒党人警告，这一次他们不会失败。

巴伐利亚加强了军警力量，承诺一定严阵以待。

^[1]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37，NL Ehard 99，BHSStA。

^[2]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69–70, 73.

[3] *Eine halbe Stunde bei Ludendorff*, visit on December 2, 1923, HA 5/116.

[4] Margarethe Ludendorff, *My Married Life with Ludendorff*, trans. Raglan Somerset (London: Hutchinson, c.1929), 260.

[5] 1923年11月11日美联社。

[6] 卡琳·戈林于1923年11月13日从因斯布鲁克写信回家时是这么说的,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08-9.

[7] 卡琳·戈林在1923年11月30日和1923年12月8日致信妹妹莉莉,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14, 116.

[8] 这是卡琳·戈林对朋友海伦·涅梅耶说的, unpublished “Notes, ” 291, folder “Ernst Hanfstaengl (1), ” John Toland Papers, FDR。卡琳自己在1923年12月20日也说过,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18。关于戈林的药物成瘾可参阅 Richard Overy, *Goering*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2003), 7。

[9] 卡琳·戈林于1923年12月28日告诉她的父亲,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19.

[10] Stenglein to police, November 12, 1923, 3099, StAM, and reported by Bezirksamt Garmisch, *Meldungen über die Vorkommnisse*, November 12, 1923, HA 67/1490.

[11] 见卷宗HA 68/1497中的文件。另见1923年11月19日Police report, HA 68/1496。

[12] 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110.

[13]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53, 145.

[14]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Miterlebt und nach amtlichen Aktenstück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59.

[15] 安格拉·豪巴尔的信件，摘录于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248, , 在后面第302页的插页有该信的照片。还有一些探视者也发现他在好转，见Linz' s *Tages-Post*, January 3, 1924.

[16] 埃哈德在前去跟他谈话时也发现了他的疼痛状况，protocol, December 14, 1923, NL Ehard, 94, BHStA.

[17] December 1, 192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18]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ünchen: Piper, 2002), 96-97.

[19] 慕尼黑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其中一例见Robert Murphy, *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 November 12, 1923, M336, 862.00/1371, No. 19, NA.

[20] 1923年11月15日《纽约时报》。

[21] *Aktenvermerk des Staatsministerium des äusser: 'Die bayerischen staatspolitischen Notwendigkeiten, die sich aus den Ereignissen vom 8. und 9. Nov. 1923 ergeben, '* probably November 15, 1923,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26, 386-90.

[22]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57.

[23] Richard Hanser' s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367.

[24] Robert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22, and page 17 of his *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 1924年3月10日 (Date of Mailing: 1923年4月3日), M336, 862.00/1469, No. 20, NA.

[25]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 ED 153, IfZ。

[26]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 16, NL Ehard 99, BHStA。

[27] *Dr. Hans Ehard 1887–1980. Eine Ausstellung des Bayerischen Hauptstaatsarchivs aus dem Nachlass des Bayer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nlässlich seines 100. Geburtstages*, eds. Ludwig Morenz und Michael Stephan (München: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1987), 21.

[28] Ehard interview with Guido Fuchs in *Abendzeitung*, February 25, 1974, NL Ehard 98, BHStA.

[29]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 36–37, NL Ehard 99, BHStA。

[30]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328. 日期错写为11月12日。实际应该是1923年12月13日。

[31] 刊载于1974年2月25日《晚报》的埃哈德访谈, 其副本可见于埃哈德的文件, NL Ehard 98, BHStA。

[32] translation,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328–29.

[33] *Hans Ehard über den Prozess gegen Adolf Hitler in Jahre 1924*, NL Ehard 98, BHStA.

[34] 有人说是10个小时 (Dornberg, 1982, 329), 或12个小时 Charles Bracelen Flood, *Hitler: The Path to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571)。我查阅了1923年12月14日的记录副本, 其中提到是五个小时。 *Bericht des II. Staatsanwalts Dr. Ehard*, December 14, 1923, NL Ehard 94, BHStA.

[35] John Dornberg,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329.

[36] *Bericht des II. Staatsanwalts Dr. Ehard*, December 14, 1923, NL Ehard 94, BHStA.

[37] 在开庭前夕还有称此案是“鲁登道夫审判”或“鲁登道夫-珀纳审判”的，见1923年1月29日《慕尼黑邮报》。这些说法接下来会越来越来少，不过也有些媒体一直坚持用这个称呼，比如《米斯巴赫汇报》。

[38] 本案应受莱比锡司法管辖，尽管巴伐利亚在三天后的1922年7月24日企图用自己的法律来否决它。更多细节可参阅法学教授亚历山大·格拉夫·楚·多纳（Alexander Graf zu Dohna）1924年发表于《德意志法律人报 29》的评论文章，“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 Heft 9/10, 333ff, 另外关于巴伐利亚所认为的主权威胁，见Bernd Steg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 442, note 3。有关法律争议的更多信息可参阅奥托·格里迟内德（Otto Gritschneider）的划时代著作，*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49-50。

[39]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342-44, NL Ehard 90/3, BHStA, 关于与柏林的管辖权争议还可参阅291-95, 317-18。另见*Akten der Reichskanzlei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Stresemann I u. II. Band II* (1978), Nr. 248, 1055-56, and Nr. 268, November 19, 1923, 1126, and Otto Gritschneider, “Das missbrauchte bayerische Volksgericht,” in Lothar Gruchmann, Reinhard Weber, and Otto Gritschneider,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München: K. G. Saur, 1997), I, xvii-xli。

[40] 这个词是律师菲利普·鲁文菲尔德（Philipp Loewenfeld）提出的，见Douglas G. Morris, *Justice Imperiled: The Anti-Nazi Lawyer Max Hirschberg in Weimar German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45。另见马克斯·赫施贝尔格的回忆录，*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 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8)。

[41] 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51. 关于柏林的不愿插手, 尤其是西克特和施特雷泽曼, 以及政府面临的动荡, 可见Bernd Steg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 444 and 447-48, 455。

[42] 1924年1月8日《福拉尔贝格日报》, 还有一些传闻中提到的地点, 见1925年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43]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 *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 ED 153-1, 25-28, IfZ。

[44] 学校搬迁到了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 西克特在1924年3月曾训斥那里的学员是叛兵, John W. Wheeler-Bennett, *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 1918-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4), 178, note 1。

[45] 1924年1月13日《纽约时报》。

[46]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56, 关于埃贡的描述见Ernst Hanfstaengl, *Hitler: The Memoir of a Nazi Insider Who Turned Against the Führer*, intro. John Willard Tolan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57, repr. 2011), 113。希特勒此前也威胁过要把秘密练兵的事捅出来, Lothar Gruchmann, “Hitlers Denkschrift an die bayerische Justiz vom 16. Mai 192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39 (1991), 305-28。

[47] Report, February 11, 1924, HA 5/114I; 1924年2月11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924年2月12日《雷根斯堡日报》。

[48]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328-29, NL Ehard 90/3, BHStA. 塞瑟没有辞职, 但有人说他也应该退休, 1924年5月17日《新自由人民日报》。

[49] R. D. Murphy, *Confidential Political Report*, 1924年1月16日寄出(日期错写为1923年), M336, 862.00/1397, No. 20, NA; 另见1923年10

月20日《日耳曼尼亚》。

[50] 1924年2月25日《慕尼黑报》，兴登堡的拒绝干预还可见于1924年2月24日的《布拉格日报》；1924年2月25日伦敦《泰晤士报》；以及Report, Nr. 49, 1924年2月27日, HA 5/114II。

[51] 1924年2月25日《巴黎之声》，或者至少最重要的部分会秘密审理，1924年2月27日《每日邮报》（奥地利林茨）。

[52] Carl Christian Bry,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63, 关于威胁, 见1923年11月1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午间版。

[53] 1924年2月10日《纽约时报》。

[54] 1924年2月26日美联社报道。

[55] 1924年2月24日《慕尼黑最新消息》。珀纳的问题由来已久, 据他的医疗记录, 最近一次是1924年1月, Der Vorstand der II. med. Klinik, Anz. Verz. Nr. Ib 235/24, October 7, 1924, HA 69/1503。媒体也报道了他的病情, 比如1924年1月28日《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1924年2月6日《人民信使报》。据说有多名证人染病, 1924年2月26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56] 1923年11月7日《小巴黎报》。在注意到他的抑郁状况后进行了评估, 结论是可以出庭受审, Dr. Brinsteiner, Gutachten über den Geisteszustand des Untersuchungsgefangenen Adolf Hitler, January 8, 1924, 19-20, OSS。

[57] Reinhard Weber, “ ‘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 Heft 1, 131.

[58] 1924年2月8日《每日邮报》（布里斯班）。

[59] 在审判前夕, 克利伯也在住院, VI a F406/24, February 20, 1924, HA 67/1494。

[60] 1924年2月24日《新自由报》；其中一个被警方制止的闹事计划，1924年2月8日，MA 104221，BHStA，行动筹备见MINN 73699，BHStA。

第二篇 法庭

26 “我们不会害德国”

就算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得彰。[1]

——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

1924年2月26日

在通往一座巨型红砖建筑正门的人行道上，穿着厚实冬装的男男女女排起了长队。门口有两个警卫，而这座城堡似的建筑的高墙之外，全副武装的邦警在街头巡逻。铁丝网、钢铁路障以及大约50名邦警封锁了道路，只允许行人和官方车辆通过。

只有少数人有幸弄到了官方签发的通行证，[2]在这个下着雪的寒冷早晨，[3]他们通过警戒线[4]后上楼，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这里的戒备愈发森严了，有成排手持卡宾枪的警察把守。在进入二楼临时搭建的法庭前，还需要再接受两次搜身。“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高卢人报》（*Le Gaulois*）驻外记者写道，“这是第一次见识此等规格的警方措施。”[5]

冬日的阳光透过四扇大窗照进透着凉风的前学员食堂，在墙纸和天花板的粗重橡木梁上投下几近发红的光斑。[6]旁听席挤满了人。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就没有空位了。右翼报纸《巴伐利亚祖国报》（*Das*

Bayerische Vaterland) 记者有一个不满之处：观众里太多女人了。^[7]《格拉芬格市场周报》(*Markt Grafinger Wochenblatt*) 记者看不惯的则是：太多外国人。^[8]

房间长约53英尺，宽38英尺，对于这样一场重大诉讼而言似乎太小了。^[9]此外《柏林日报》说，传音效果也很糟。^[10]约300名记者申请了媒体旁听证，只有60人获批，^[11]也就是说到场的记者、专栏作家、漫画家以及各种特稿作者，大多没那个运气。有旁听证的记者于是就挤在旁听席的中央，^[12]他们的前面是一些衣着考究、有门路的人物，最有利的位罝都被他们占了。^[13]

房间的前部摆了十张小桌，五张是给被告的，另外五张给他们的法律顾问。他们身后是一排给证人的座位，大部分属于军人、邦警、公务员和前军校教员。讲台原本是放在楼里一间原教室里的，现在临时用作审案。一位《慕尼黑邮报》记者发现，原本用作原告席的桌子上有个墨水涂画的钩十字，开庭前一天当局悄悄换上了一张干净桌子。^[14]

那天早上快8点半的时候，一列警官押送10名被告人走进法庭。队列最前面的是鲁登道夫将军，^[15]穿一身深蓝色套装，^[16]不是他曾经鄙夷地发誓再也不会穿的军服。他坐在前方的一个小桌子前，手一直插在夹克口袋里，《西方闪电报》(*L' Ouest-Éclair*) 记者说衣服看起来是新的。^[17]

有记者认为他的样子显得矜持而高傲，俯视着观众，对他脚下万物怀有一种蔑视。还有人嗅到了不耐烦，仿佛在不满这个胆大包天的法庭居然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来麻烦他。不过也有人猜测，在刚毅的仪态之下，将军内心深处怀着焦虑，担心这场诉讼会对他的名誉不利。右翼记者和民族主义人士则只看到一个高风亮节的战士泰然迎向着自己的命运。

这位天下闻名的德国人背后跟着阿道夫·希特勒，他跟鲁登道夫保持几步距离，腋下夹着一只厚皮革公文包，蓝眼睛扫了一眼现场众多的支持者。他和鲁登道夫坐在同一张小桌前，显得对将军毕恭毕敬。《人民信使报》记者认为，希特勒看上去在监狱里休养得不错。

“这个花哨的小地方男人，一头油光光的黑发，一身常礼服，仪态笨拙，巧舌如簧，难道这就是恐怖的叛乱分子？”在法庭里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维尔（Edgar Ansel Mowrer）说，“他看上去就是出差在外的服装公司推销员。”^[18]

突然之间，房间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椅子在木地板上摩擦，发出仿佛“一群蜜蜂”^[19]离开蜂巢的声音。五名身穿飘逸黑袍的法官走了进来，此外还有两名替补。他们来到房间前方枝形吊灯下的一张20英尺长的呢面桌前，在各自的黑色皮椅上落座。

戴着传统高贝雷帽的主审法官是吉奥格·奈特哈特，^[20]一位55岁的上邦法院院长，也就是德国司法体系中级别最高的承审法官。奈特哈特是一位慕尼黑知名商人之后，作为法官，他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倾向著称。要知道，当时法官这个群体本来就出了名地热衷袒护专制思想。他的仪表严肃而庄重，留着修剪成三角形的山羊胡，看上去好似刚从威廉二世皇帝的法庭走出来。

奈特哈特生于1871年1月31日，距离奥托·冯·俾斯麦在普法战争结束之时宣告德意志国诞生刚刚过去13天，他的成长伴随着德国军事和工业力量的惊人崛起。他似乎始终无法接受祖国在一战中的失利，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化。事实上，非要说的话，这些只能是加剧了他的右倾，从他的判词可以看到一种日趋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

希特勒案会不会得到秉公审理？绝对不会，法国共产主义报纸《人道报》（*L' Humanité*）驻外记者预言。在这个右翼巴伐利亚反动派的法庭里，想都别想，^[21]而且另外几个法官有可能更极端：包括57岁的上邦法院仲裁官奥古斯特·莱伊恩戴克（August Leyendecker）和三名非专业法官，^[22]分别是做保险生意的菲利普·赫尔曼（Philipp Herrmann）和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Christian Zimmermann），以及印刷装订商、文具店老板莱昂哈德·贝克（Leonhard Beck）。

魏玛统计学家埃米尔·尤利乌斯·龚贝尔（Emil Julius Gumbel）的研究表明，法国记者的判断不无道理。他对1918年到1922年夏的政治谋杀进行的分析揭示了明显的倾向性。在354起案件中，右派被告得到无罪判决的不下326起。^[23]没有一例死刑，只有一例终身监禁。而左派被告在22起案件只有4起得到无罪判决，有10例死刑和3例终身监禁。刑期长短也佐证了双重标准：左派平均为15年，右派平均4个月。魏玛是创立了一个共和国，但皇权时代那些负责司法解释的法官们仍然在位。

早上8：52，^[24]奈特哈特法官未做致意或介绍性的陈述，径直开始了被告人点名。阿道夫·希特勒，34岁，身份为来自奥地利布劳瑙、现居慕尼黑的作家^[25]；埃里希·鲁登道夫特意出言纠正了家乡“克鲁瑟乌尼亚”一词的拼写错误；恩斯特·珀纳，在被问及身体是否已经从近日的疾患中康复，可以接受庭审时，他点了点头。英国驻外记者、《每日邮报》的G.沃德·普莱斯（G. Ward Price）说他看到主审法官向被告们笑了笑。

那天早上已经有传闻说，^[26]奈特哈特对几位被告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敬仰，^[27]私下里赞扬鲁登道夫是“德国仅存的美好的一面”，并对希特勒说他很遗憾没能早点和他见面。传闻之盛，以至于

法官觉得有必要在法庭上提一提。他坚决否认曾以那种方式与希特勒打招呼。《小巴黎报》记者看到旁听席里有人露出了怀疑的笑容。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可以肯定法官说的是实情，因为他和希特勒并非素昧平生。1922年1月，^[28]希特勒在鲁文勃劳啤酒馆的演说中袭击某巴伐利亚政敌^[29]后被告上法庭，承审法官就是奈特哈特，当时他面临3~6个月的徒刑。然而奈特哈特给了一个轻判，刑期仅1个月，^[30]一点象征性的罚款，并缓刑至1926年3月1日。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许多相关的信息始终没有披露，其中就包括希特勒此前已经被定过罪——而在啤酒馆政变时正在缓刑期间。

被告人点名后，奈特哈特要求检方开始读起诉书。“1923年11月8日，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代行上司之职的汉斯·埃哈德说。^[31]由他来开场是理所应当的。^[32]首先他的发言更有力，此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33]起诉书大部分是这位勤奋的副手起草的。埃哈德很快就赢得了赞誉，《巴伐利亚信使报》称他是整个法庭里最有头脑的人。^[34]

希特勒以军事行动般的精密手段占领了啤酒馆，埃哈德在陈述起诉依据时说。宣布罢免巴伐利亚现政府后，希特勒企图建立一个新政权，作为“成立帝国政府的跳板”。等到有朝一日挥师首都，就会和那些被他称为“毁了德意志的罪人”进行一次“总清算”。

埃哈德将10名被告合在一起，全都告了重大叛国罪，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鲁登道夫将军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他只是被控“重大叛国罪行的从犯”。接着，检察官开始分别针对每一个被告。

埃哈德称希特勒是“整场行动的灵魂人物”。

鲁登道夫得到的指控是在心怀不满的爱国者中散布言论，称他会用自己作为功勋将领的名誉和才能为政变背书。此外，他的行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早有预谋。“我们的判断是，”埃哈德说，“在11月8日之前，鲁登道夫对这场有计划的行动已经有了切实了解。”^[35]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36]埃哈德一直在痛斥被告人。这份概括了论据和罪证的稿件排字细密，厚达42页，具有相当的分量。不过也有人不这么认为。用被告罗姆上尉的话说，希特勒的支持者会觉得检察官“出言不逊”，旁听席里至少有一名外国记者说自己心不在焉。给他留下印象的主要是，他从来没见过一份法律文件这么频繁地提到啤酒。

那天上午大约10:20，首席检察官路德维希·施坦莱恩提出了一个策略性的要求。他称本案“对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威胁”，^[37]要求接下来的审理中旁听席清场。

对控辩双方来说，这个问题干系重大。如果审判转为闭门进行，希特勒就会失去他最宝贵的资本。他仍然可以发表长篇大论，对证人百般盘问，这些都是德国法律允许的，他还可以一一据一名目击者说——在证人席“像火山一样爆发”，不过只有少数人能欣赏到这些戏剧性的演出。

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反对检方的动议。德国人民有权自行判断被告是否有罪，这种最后时刻提出闭门审判的手段显然会导致人民与本案脱节。对事实的公开核查不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损害；恰恰相反，这是应尽的职责。三位辩护律师支持了他的这个理由。

奈特哈特下令法庭清场，以便私下讨论检方的保密动议。施坦莱恩强调，讨论结束后，在论证本案的过程中，他势必会介绍一些事实，可能会揭露德国军方与慕尼黑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这些联

系可能是见不得光的，几乎肯定违反了对德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范围做出了限制的《凡尔赛条约》。

他在暗示的是，希特勒的审判会不会发展成为国际事件，甚至可能导致与法国、英国以及其他监督条约执行的战胜国开战？此事需小心对待。施坦莱恩说，法庭“是在广大民众面前审理此案，这民众实际上就包括了全世界”。[\[38\]](#)

不行，韦伯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博士表示，这位矮小结实的前飞行员在凡尔登之战中失去了一条腿，需要拄着拐杖。众多旁观的外国人士的看法与此次诉讼是无关的。“让法国人和英国人知道巴伐利亚有人想要清理一间柏林猪圈，”霍尔说，“能有什么坏处？”[\[39\]](#)

大家都想听到被告人是如何解释11月那个晚上的所作所为，鲁登道夫将军的辩护律师威力巴德·冯·策奇维茨附议。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的当事人受到的指控只能用“荒诞不经”[\[40\]](#)来形容，他应该有权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

从来想到什么说什么的鲁登道夫将军也加入进来，很快开始跑题，对起诉书本身发起攻击。他的声音沙哑，嗓音尖得让人有些意外。他说在看到这些控罪时，他“甚为惊讶”，[\[41\]](#)然后称起诉书本身就是重大叛国。“如果我是检察官，”鲁登道夫还说，“我会对这名检察官采取行动！”

“这就有点太过了，”奈特哈特法官说。[\[42\]](#)

就在关于合宜程序的争论进行到白热化时，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发话了。他承诺自己和其他被告人会谨慎行事。就像战士在为国而战，希特勒说，“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辩护给德国造成伤害”。

与此同时，希特勒希望区分“害德国”和“害几个对德国构成严重伤害的人”。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公开自辩的机会。“我们不会害德国！”[\[43\]](#)

检察官很快意识到，让一个啤酒馆煽动家站上讲台是很危险的，他称希特勒的“公共利益”[\[44\]](#)诉求只是一个伪装，目的是让他的夸张表演有观众，在法庭上制造耸动效应。两位辩护律师表示反对。

在这场争吵中，汉斯·埃哈德一度对所有人大吼，让他们不要忘记检方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然后他对着鲁登道夫将军说，他至少应该懂得恪尽职守的重要性。此外，埃哈德也不打算就这么蒙受重大叛国的指控。如果鲁登道夫再提起这个不可理喻的说法，他接着说，“检方自然会以最严厉的方式做出尽职的反应”。

这一下众人又开始你言我语乱作一团。

“检方不想再被指控叛国！”埃哈德在吵嚷声中吼道。[\[45\]](#)

奈特哈特法官立即终止了争论，并下令所有人不得泄露出去。随后他与合议庭全体退至法官办公室，商谈闭门进行叛国罪审判的动议。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他宣布了最终决定。

“本案将公开审理。”

但他加上了一个条件：“本庭会就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将公众排除在外。”[\[46\]](#)

这种妥协是给检方的一点甜头，进而会导致许多将诉讼程序转入秘密庭期的动议——出现这些要求的频率和时机，只能让人们审判

的公正和法官的动机产生许多怀疑与不屑。希特勒将以高超的技巧利用这一点。

而另一个后果就更是意义非凡了。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不只是对着法庭发言，借助耸动的新闻标题和大量媒体报道，希特勒现在可以触及空前广大而重要的观众群。啤酒馆一役希特勒兴许是输了，但奈特哈特法官刚刚给了他赢下权力之战的第二个机会。对一个来自奥地利布劳瑙的无名作家的检控即将成为近代史上最重大、最具决定性的审判之一。

[1]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23, StAM. 不过奈特哈特的拉丁引文没有“et”（“和”）这个词。另可参阅Lothar Gruchmann, Reinhard Weber, and Otto Gritschneider,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I-IV (1997-1999), I, 353, note 9.

[2] *Sicherungsmaß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 Genossen*, 1924年2月23日, HA 68/1498。埃哈德的通行证副本可见于NL Ehard 97, BHSStA。

[3]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

[4]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 February 15, 1924, HA 68/1498.

[5] 1924年2月27日《高卢人报》。还有不少报纸提到了安保措施，比如1924年2月24日《星期六世界报》（*Die Welt am Samstag*）；1924年2月27日《北卑尔根郡报》（*Nordre Bergenhus Amtstidende*）；以及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

[6]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以及1924年2月24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7]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8] 1924年2月29日《格拉芬格市场周报》。有不少说英语的人，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2月27日《人民信使报》。

[9] *Skizze des Sitzungssaales für der Infanterieschule
Blutenburgerstr. 3/I*, MINN 73699, BHStA.

[10]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1] No. 292/24, February 19, 1924, NL Ehard 97, BHStA. 一些报道提到，需求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比如1924年2月26日维也纳《工人报》（*Arbeiter-Zeitung*）。

[12]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13] 1924年2月27日《巴黎之声》。根据HA 68/1498中列出的旁听证申请来看，这不意外。

[14] 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邮报》。

[15] 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和1924年2月26日《德意志汇报》。

[16] 常有报章说鲁登道夫这一天穿了军装，事实并非如此：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4年2月27日《晨报》和1924年2月26日路透社等。

[17] 1924年2月27日《西方闪电报》。

[18] Edgar Ansel Mowrer, *Germany Puts the Clock Back*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33), 252. 另见OSS Sourcebook, 642, 另外莉莉安·安塞尔·毛沃尔在她的《记者之妻》（*Journalist's Wif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37）第186页描述了他的印象。

[19]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20] 奈特哈特自1920年起担任上邦法院院长。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63.

[21] 1924年2月25日《人道报》，1924年2月23日的林茨《每日邮报》。

[22] 有史学家对法官安排存在不同看法，但该合议庭的确是这样构成的。

[23] E. J. Gumbel, *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Fichtenau: Verlag der Neuen Gesellschaft, 1922), 73-78, 左翼被告人的情况, 79-80。

[24] NA T84 EAP 105/7, 3.

[25] 希特勒早在1909年8月22日搬到维也纳赛克斯豪瑟街的时候就自称作家了。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52.

[26] NA T84 EAP 105/7, 204; 1924年2月28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另有汉斯·冯·胡尔森 (Hans von Hülsen) 无意中听来的一个版本，见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205。

[27] 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另见1924年2月28日《西方闪电报》。

[28] MA 103476/1, 74, BHStA. 希特勒在1923年5月1日示威活动中的行为，理应导致他的缓刑被取消，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58。

[29] 希特勒袭击的是巴伐利亚联盟领导人奥托·巴勒施迪特 (Otto Ballerstedt)。巴勒施迪特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行动中遇害。

[30]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134.

[31]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answaltschaften 3098, 2, StAM, 以及当庭宣读, *Der Hitler-Prozess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ünchen* (München: Knorr & Hirth, 1924), I, 2。本文件没有包括最后加入被告名单的两人，克利伯中校和海因茨·佩尔内。关于这两人可参阅Stenglein's *Nachtragsanklage*, January 24, 1924, and February 7, 1924, Staatanswaltschaften 3099, StAM。

[32] 1924年2月27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33] 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41-42，NL Ehard 99，BHStA。

[34] 1924年3月17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35]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des I. Staatsanwalts*, 4, 6, 32, 33,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36] 1924年2月27日美联社；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的说法是一小时多一点，还有一个说法是一小时稍微不到一点，见Report Nr. 50, February 28, 1924, HA 5/114II。

[37] NA T84 EAP 105/7, 3, 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和1924年2月28日维也纳《帝国邮报》(*Reichspost*)表达了意外。

[38] NA T84 EAP 105/7, 10.

[39] NA T84 EAP 105/7, 13. 霍尔的背景可见于Nr. 72, 1924年4月25日, HA 5/114II。

[40] NA T84 EAP 105/7, 16.

[41] NA T84 EAP 105/7, 24.

[42] NA T84 EAP 105/7, 24.

[43] NA T84 EAP 105/7, 25. 希特勒曾经威胁要公开他的人接受政府训练的事，从而避免在五朔节庆典之后接受检控，Lothar Gruchmann, “Hitlers Denkschrift an die bayerische Justiz vom 16. Mai 1923, ” VfZ, 39 (1991), 305-28。

[44] NA T84 EAP 105/7, 26.

[45] NA T84 EAP 105/7, 31.

[46] NA T84 EAP 105/7, 32.

27 被告人希特勒

我下定决心为自己辩护，拼死也要反抗。^[1]

——阿道夫·希特勒，1924年2月26日

在观众的翘首企盼下，法庭重新开放，主审法官将希特勒传至证人席。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名被禁政党的领袖身上，他头发整齐地分开，淡蓝色的眼睛直视前方，纤长的手指^[2]跟他普通大小的手掌比起来有些不成比例。他会像一个演员一样对这双手进行夸张的使用。慕尼黑《汇评》（*Allgemeine Rundschau*）记者形容他的脸像“一名颇神气的奥地利军士”。^[3]

按照当时德国刑法程序的惯例，审问是由主审法官主持的。然而问题很大一部分来自检方。因此，在诉讼的这个阶段，法官应该是在替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说话。

在生平介绍中，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证实奥地利出生的希特勒不是德国公民，因而一旦被判重大叛国罪成，是需要被驱逐出境的。

“1912年来到慕尼黑的时候，”希特勒这样描述自己初到德国的情景，“我不是要学习[成为一名建筑画师]。我已经完成了学业。但我得谋生。”他表示自己当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和建造师。^[4]

没有人注意到，他在这里成功地误导了法庭，其中涉及一段自己毕生都将遮遮掩掩的过去。他抵达慕尼黑的时间不是1912年，而是整整一年后。^[5]他的这个谎可能让他得以掩盖一个事实，即他是在没有做兵役登记的情况下离开奥地利的，当时当局正在以逃避兵役为由追捕他。^[6]德国警方依靠奥地利同行提供的情报在1914年1月逮捕了希

特勒，将他送回他的祖国。然后1914年2月5日，希特勒没能通过规定的入伍测试。奥地利征兵委员会认定他“不适合战斗和辅助性职责，太弱”。^[7]希特勒在证人席上耍的这个心眼，让他免于被揭穿当年的丑事。

在不知道此事且对他的过往未做彻底调查的情况下，法庭反而强调了希特勒在德国的杰出军旅生涯。奈特哈特宣读了他的事迹。希特勒在1914年8月志愿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整整四年，多次得到嘉奖，包括那天早上他佩戴的一级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的部队文件对他的表现总结是“极佳”。

由此在法庭里留下的印象^[8]是，战时希特勒曾在壕沟里拼杀。但他实际的主要职责只字未提，从1914年11月开始，他在第16步兵团某营做过通讯员（Meldegänger）。在做这份差事的时候，他自然是见识过交火的，不过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后方，在参谋总部和营部主官之间送信。

他多数时候可以保持双脚、军服和毛毯的干燥，这是他那些壕沟里的战友无从享受的。他的食物相对容易下咽一些，喝的东西也更充足，尽管他只喜欢加了代用蜂蜜的甜茶。他的信差皮包没有发霉。虱子和大大小小的老鼠离他很遥远，更不用担心冻疮、斑疹伤寒还有随时遭到敌人的轰炸。那些人称“前线脏猪”的老兵管希特勒这种相对养尊处优的人叫“后方白猪”。^[9]

法官询问了希特勒“为德国而战”^[10]时负的伤。

“战时负伤方面，我的左腿大腿被弹片击中，后来还中了毒气，”希特勒说，两个都是事实。第一次负伤是1916年10月5日，^[11]通信兵所在的掩体入口中了一枚手雷。第二次是两年后的1918年10月13~14日夜里，在伊珀尔郊外，当时英军的一次芥子气攻击烧伤了他

的皮肤，导致视网膜受损和咳血。一开始“完全瞎了”，他在法庭上说，当时担心自己会从此失明。^[12]

在11：53的时候，也就是公开审理开始几分钟后，奈特哈特宣布法庭进入午休时间。在法官的小心讯问之下，希特勒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很明确：一位杰出的德意志爱国者，志愿参军，因骁勇善战得到重大嘉奖，为了报效侨居国差一点丢了性命。作为一场非德籍公民因重大叛国罪受审的诉讼，如此开场十分不寻常。

休庭期间，警察将被告人押到二楼走廊另一头的囚室。^[13]那里准备了八个房间，^[14]另外还有两个房间是供那些不需要一直待在这里^[15]的被告就餐和休息用的，其中包括每晚会回到自己的别墅的鲁登道夫将军，以及因病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恩斯特·珀纳。

希特勒住在接近走廊尽头的160房。里面陈设非常简单。在这个原本是军校学员宿舍的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张白色的桌布，上面放了一瓶花。审案期间，希特勒和其他被告每天可以在后院锻炼两个小时，偶尔可以去学校的体育馆。如有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抽烟，喝少量的啤酒。

法官和法庭工作人员、检察官和媒体、证人以及各刑警和安全部门人员都有专门的房间。罗德和辩方法律顾问也有休息室。房门就在法庭的后面。律师们还在同一条街的一栋楼里租了一套位于三楼的套房。他们预计，由于工作量巨大，他们不会有多少闲暇时间，更别提回家了。

下午2：30，法庭开始了下午的审理，奈特哈特法官要求希特勒作开庭陈词。

“法官大人，”黑色大衣上别着一级和二级铁十字的希特勒站在法庭前方开始发言。^[16]如柏林社会主义报纸《福斯日报》的记者所说，希特勒将会用一场强有力的演出展现出他那毋庸置疑的技能——这位记者称他在吸引无产阶级上是个“天才”^[17]。

一开始，希特勒的举止是谦恭^[18]而克制的，几乎有些紧张。^[19]随着陈述的进行，《法兰克福日报》发现，他开始用一种尖锐、刺耳的声音，就像一个突击队员在激动地发号施令。他可以自如地调节声音的粗细，时而柔和时而强烈，调门陡然升高或下降，在情绪的最高点则几乎变成沙哑的嘶叫。而这位记者还说，这一切都被他利用来制造戏剧效果。

这是一场精湛的演出，《格拉芬格市场周报》说。^[20]《十字架报》外派记者认为，希特勒更多的是以当世护民官自居，在对旁听席而不是法官讲话。^[21]《巴黎之声》（*L'Écho de Paris*）记者将他比作在街角兜售的骗子。^[22]

证人席上的希特勒自信满满、喋喋不休，时不时显露出欢快的样子。为了强调他的陈词，他会举起一只手，食指朝天，或举起双手，掌心相对，同时抬头望着天花板。有时候他会挑衅地直指邦检察官。如炬的目光反映了他炽烈的情感。一位《小巴黎报》记者由此判断，不难想象为什么此人可以在啤酒馆里得到巴伐利亚年轻人的认可。^[23]

那天下午希特勒讲了至少三个小时。^[24]旁听的众人将对希特勒的自传有一个初步印象。这场精心编制的陈词展现了令人瞠目的事实操控能力。

被告人希特勒首先回顾了自己的一段过去，也就是他的军旅生涯，那显然是一段可以引以为傲的时光，也是他的抗辩中极具价值的

一部分。他提醒法庭自己在军中六年得到了“极佳”的评定，并自称他由此懂得了作为一名战士“要尊重上级，绝无异议，完全服从命令”。

希特勒对军人背景的强调十分见效，以至于新西兰的《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在报道中通篇郑重其事地称他为“希特勒中校”。^[25]一名英国联合通讯社记者给他的称呼是“冯·希特勒先生”。^[26]

在努力表明自己有着一个战士而非叛徒的性格后，希特勒开始谈起自己的青年时期，称那也是他的一段性格塑造时期，影响了他的观念形成。17岁的时候，他搬到了维也纳，并称自己在那里“被迫要自食其力”。那天下午，这个词他重复了许多遍。正如多位记者所指出的，他的用词，时而是低地德语的措辞，时而又变成自学成才^[27]之人才有的表述方式。

在维也纳，希特勒说他发现了现代世界的两个重大危机。首先是“广大人民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和贫困”；其次是“种族问题”，导致大众在他所说的“所有雅利安人的头号敌人和对手”面前不堪一击。希特勒没有绕弯子，他说当他离开那座以多元化著称的城市时，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28]

这个主题希特勒在后面还会展开，他强调自己在维也纳产生的反犹观念，并且这些痛苦的教训成了他世界观的一块“花岗岩基石”^[29]。这个说法后来成为他的自传的基础，多年来一直被写进他的传记，不少史学家已经开始对它的准确性产生怀疑。

别的不说，至少现在找不到任何一条^[30]可以证实的反犹言论是出自他的维也纳时期（1907年9月^[31]到1913年5月）。1930年代的纳粹研究专家尴尬地发现，他当时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一个名叫约瑟

夫·纽曼（Josef Neumann）的擦铜匠]；他的画商是犹太人[塞缪尔·摩根斯特恩（Samuel Morgenstern）]；他的相当一部分主顾是犹太人。在维也纳跟希特勒走得最近的人都想不起来他有过任何反犹的表示，倒是有不少人坚称，他当时还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仇恨。

实际上，今天所知希特勒最早的反犹言论出自他移居慕尼黑以后。到了1919年秋天，对犹太人的仇恨言论在他的政治演说里已经很常见。由此也许可以推测，希特勒的极端反犹更有可能是在一战德国战败，慕尼黑爆发左翼革命，以及1919年在德国军队里接受思想灌输之后产生的。

如果真是如此，希特勒为什么在证人席上（以及后来的《我的奋斗》中）费尽心机把自己的仇恨源头引到维也纳？一个可能的原因很快会浮现出来。

希特勒并非像他声称的那样，是1919年3月随部队回慕尼黑的。^[32]实际上应该是当年的1月，最晚2月中旬。这消失的四到六周，正好是慕尼黑左翼革命政权上台的时间——经德国史学家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Anton Joachimsthaler）核实，希特勒曾为这个政权效力。

他是一名Vertrauensmann，也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第二步兵团复员营“代表”，^[33]德国战败后，革委会趁乱夺取了权力。他的其中一项职责是传播“教育”或宣传材料，以争取士兵对左翼政权的支持。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希特勒还赢了一场选举，成为工人-士兵革命政权——也就是慕尼黑的“红色共和国”——的助理营代表。

从赫尔曼·埃瑟到埃米尔·莫里斯，希特勒的许多同党在慕尼黑那场短暂革命中加入过社会主义政党。^[34]不过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希特勒始终没有承认过。^[35]他回避了这个话题，坚持含糊其词的说

法，称他如何如何反对那场运动。一旦被迫要谈——毕竟现在是在证人席上——他就会篡改时间，避免有关这段往事的真相败露。

然后他紧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对这些左翼意识形态发起恶毒的攻击，尤其是越来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所到之处的文明构成了威胁。它教规规矩矩的德国百姓去对当权者挥舞拳头，企图建起一个“国中之国”——讽刺的是，这跟检方给他安的罪名是一样的。

主审法官并没有打断希特勒这段冗长的咒骂。旁听席里有不少人显然怀有相同的想法。希特勒说共产党“不是人”，还迫不及待地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要拯救德国，唯有让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弦更张，或将其毁灭。”^[36]

柏林共产主义报纸《红旗报》（*Die Rote Fahne*）提醒人们别上当，文章点出了希特勒的意图，他在用编造出来的个人苦难故事和他的“社会主义速成课”蒙骗不明就里的群众。这家报纸后来称希特勒和他的同党是“种族主义捕鼠人”，他们为了吸引容易上当的大众，散布“绝望与惶惑”的意识形态。^[37]

希特勒的确一点时间都不耽误，把对他的叛国审判变成了纳粹宣传的舞台。^[38]与此同时，他还在描绘一幅招揽追随者的自画像。将自己的反犹和右翼源头拉回到战前的维也纳时光，效果也非常好，而曾经为一个如今被他痛斥的敌对政党效力这件事也就瞒住了。

伦敦《泰晤士报》报道，那天下午，慕尼黑法庭里的观众是支持希特勒的。^[39]被希特勒称为纳粹“运动”的这个政党并不以“谋求议会席位”为目标。它的主旨是要改变德国的命运。

当国家在他看来“被大卸八块”的时候，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法国夺走了德国工业心脏地带鲁尔，还在努力让一个大国解体，成为许多更小、更弱的邦。德意志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处理好这场危机。然后恶性通胀开始了，德国陷入经济混乱。千千万万人倾家荡产——用他的话说就是“口袋里最后一个马克都被人抢走”。

德国人民吃不饱饭，那些本可以养育他们的土地被懦弱的政府拱手送了出去。而困境“每分每秒”都在恶化。200万热爱祖国的年轻人战死沙场，难道就换来这些？希特勒问道。[\[40\]](#)

过去四年里，他在慕尼黑各地的啤酒馆演说，提出了很多类似的观点，但这一次，他的观众之多是他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来自德、法、英、美等国家的大报记者纷纷摘录他的言论，传达给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读者。这样的曝光度，他花多少钱也买不来。

奈特哈特对被告人丝毫不作约束，于是希特勒可以游走于各类话题间。《慕尼黑邮报》发现，他的语调更像是个宣传者或煽动者，而不是被告人。世人的瞩目让希特勒十分受用，他在法庭上讲演如何发动战争，终于实现了他本想通过政变实现的目的。

要想获得胜利，他说，一个国家需要集中前线和后方的资源，他的人在啤酒馆做的事就是出于这样一个根本目的。鲁登道夫可以在战场上得胜，而希特勒可以将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他是这场运动的鼓手。他看起来是个友善的人，尽管会有种浮夸、做作的感觉，注意到他很有些派头的瑞士《公正报》（*L' Impartial*）写道。[\[41\]](#)

接下来，投观众所好的希特勒开始自夸，称他已经证明自己的纳粹党可以实现怎样一番大业。他声称，这个组织从在某啤酒馆里屋成立时的六个人[\[42\]](#)发展成了数百万之众。这是又一个会在《我的奋斗》以及后来的许多场合得到重申的谎言。根据1919年9月12日希特勒

首次参加会议时的记录，有41人到场，这还不算他以及和他同去的人。在警方突查前从纳粹党办公室抢救出来的文件显示，当时的党员数为55787人，到不了几百万。然而希特勒的这番误导性陈述令右翼媒体十分赞赏。

“我需要郑重声明，”^[43]希特勒继续用激昂的语调做着自我宣传，“对于一件我知道我能做到的事情，我是不会谦虚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受到了某种召唤去做一件事，那他就有义务去做！”^[44]

而后希特勒转到和他一起走上贝格勃劳凯勒舞台的巴伐利亚领导人。他说卡尔同意与他合作。塞瑟则说过，一场民族革命眼看就要爆发，他们为此已经准备好了炸药和导火索。洛索看起来也是同意的，至少——照希特勒略带嘲弄的说法——从未拒绝过。他们都怀着向柏林进军的大志。唯一的区别，希特勒说，就是这些所谓的领导人缺乏“纵身一跃的意志”——就像“在障碍前失去了勇气的马”。^[45]

那么，希特勒在最后总结道，如果他和其他被告犯了重大叛国罪，巴伐利亚这三巨头肯定也是有同样罪行的。“这几个月来，唯一在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要因为这些行为出庭受审。”^[46]

卡尔、洛索和塞瑟在设法避开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希特勒则不同，他似乎准备好了捍卫自己的行动与信念。“我来这间法庭可不是要否认一切，”^[47]他自夸道，“所有的责任以及相应的后果，都由我一人承担。”与此同时，在被问及是否承认检方提出的具体罪行时，他却反悔了。照他的说法，“对1918年那些卖国贼，不存在什么重大叛国！”

在结束陈词前，希特勒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他提醒法庭，自己无论在战场上“作为一名服从命令的士兵，还是在国内”，都是在保

卫德国。此外，“自少时我就不觉得自己是个奥地利人”。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德国人，“全心全意为自己的人民着想”。他请求法庭允许他继续留在这个国家。[\[48\]](#)

许多媒体在把审判当成一场拳击赛来报道。希特勒显然是赢了第一回合。不过从法律层面来看，检方有理由感到满意。施坦莱恩认为，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提供了“可以充分证明其罪行的证据”。于是检方做了当天的最后陈词，接着奈特哈特摇铃宣布：“对证词的查验将揭示更多事实。”[\[49\]](#)

[\[1\]](#) NA T84/2 EAP 105/7, 120.

[\[2\]](#) G. Ward Price, 17, in *OSS Sourcebook* OSS, and G. Ward Price, *I Know These Dictators* (London: George G. Harrap, 1937), 18.

[\[3\]](#) 1924年3月20日《汇评》。

[\[4\]](#) NA T84 EAP 105/7, 33-34.

[\[5\]](#) 倒是有一些报纸称希特勒抵达慕尼黑的实际时间是1913年，比如1923年11月10日《萨尔茨堡人民报》，不过希特勒在法庭上编造是之后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47, 但是给出了正确年份的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希特勒的布劳瑙同乡弗朗兹·耶琴谔, 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尤其是第156~159页，另外在第175~182页提到他是如何保住盖世太保的文件的。

[\[6\]](#) 1889年《征兵法案》。另外可参阅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145.

[\[7\]](#) 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155, 关于动机的结论见第157、158页。伊恩·克肖 (Ian Kershaw) 也认为兵役是他出国的主要原因,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81, 此外还有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8] 希特勒出名后，一些记者开始质疑他的服役经历。比如1931年1月有一些报纸，包括《慕尼黑邮报》以及《回声周报》(*Echo der Woche*)。关于该争议的讨论以及希特勒的官司，见Lothar Machtan, *The Hidden Hitler*, 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65–88, 以及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2–87。

[9]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91, 本书还谈到了希特勒的战争经历，尤其是第91~105页。

[10] 希特勒当然见过打仗的，尤其是1914年10月19日在伊珀尔，当时利斯特团有349人阵亡。1914年11月3日，他被提拔为“豁免兵”(Gefreiter)，六天后成为团部通讯员。

[11] 希特勒在法庭上没有提到第一次负伤的日期，在《我的奋斗》中说是10月7日。但是10月5日应该更准确，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163–64;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4; 以及Peter Longerich, *Hitler. Biographie* (München: Siedler, 2015), 48。一份他的医院记录保存于HA 4/96。

[12] NA T84 EAP 105/7, 34.

[13] *Wache anlässlich des Hitler-Prozesses*, February 20, 1924, HA 68/1498.

[14]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 February 15, 1924, HA 68/1498. 1924年

2月24日《星期六世界报》的简报中预先介绍了这一安排，而1924年3月4日《法兰克福信使报》提供了更多细节。

[15] *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Hitlerprozesses*, 1924年2月21日, HA 68/1498.

[16] NA T84 EAP 105/7, 36.

[17]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8]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晚间版，以及1924年2月28日《布拉格日报》。

[19] 1924年2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和1924年2月27日《人民信使报》。

[20] 1924年2月29日《格拉芬格市场周报》。

[21] 1924年2月28日《十字架报》。

[22] 1924年2月28日《巴黎之声》。

[23]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24] 有的估计要长一些，达到四个小时，比如1924年2月27日《汉堡导报》（*Hamburger Anzeiger*）；1924年2月27日《农民周报》（*Der Landsmann*）；1924年2月28日《巴伐利亚祖国报》；有的是三小时多一点，如1924年2月27日维也纳《红旗报》（*Die Rote Fahne*）。

[25] 1924年2月28日《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

[26] 1924年2月29日联合通讯社（英国）以及1924年2月26日路透社。

[27] 《汉堡画报》（*Hamburger Illustrierte Zeitung*）1924年第9期。

[28] NA T84 EAP 105/7, 36-37以及1924年2月27日《前进报》。

[29]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22.

[30]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47-57, 和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10 and 96。1919年秋天(8月)在雷希贝格的言论, Volker Ullrich, *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1889-1939*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 100。希特勒的第一篇关于“犹太问题”的著名文章, 是在卡尔·迈尔(Karl Mayr)的鼓动下于1919年9月16日完成的。另见Ernst Deuerlein, ed.,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7 (1959), 177-227。

[31]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37, 以及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还有一个说法是他在1908年2月的某天回到维也纳, 在施东佩尔巷31号租了一间寓所。

[32] 这一点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发现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修订版中谈到了那场选举, 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190-216。

[33] Vertrauensmann der sozialistischen Propaganda-Abteilung des 2. Inf. Rgt., 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83, 198-202, 210-12。

[34] 事实上埃瑟在1920年3月8日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党之前一直是社民党人, 是该党第881号党员(在1925年3月重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中, 他成了第2号)。海因里希·霍夫曼承认自己戴了红袖章,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35-37。关于希特勒身边的左翼人士, 可参阅Hellmuth Auerbach, “Hitlers politische Lehrjahre und die Münchner Gesellschaft 1919-1923,”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5 (1977), 1-45。

[35] 此前曾稍露端倪: 恩斯特·托勒说他听到过一些传闻, *Eine Jugend in Deutschland* (Amsterdam: Querido Verlag, 1933; Hamburg: Rowohlt, 1998), 148。1953年, 赫尔曼·埃瑟向沃纳·马瑟尔承认, 希特勒可能在1919

年春天戴过红袖章，Maser, *Hitler: Legend, Myth & Reality*, trans. Peter and Betty Ros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4), 367, note 153. 史学家厄恩斯特·多耶赖恩 (Ernst Deuerlein) 也告诉沃纳·马瑟尔，他认为希特勒曾经想过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Hitler's Mein Kampf: An Analysis*, trans. R. H. Bar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0), 203, note 2. 近年发现的一张粗粒底片显示“希特勒”站在了库尔特·艾斯纳的葬礼队列里，被许多史学家引为证据，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那是希特勒，并且他们的怀疑也不无道理。当然，彼时的希特勒是否承担起了这份职责，仅凭他有没有去送葬也是无从证实或驳斥的。

[36] NA T84 EAP 105/7, 41.

[37] Horst J. Weber, *Die deutsche Presse, insbesondere die völkische, um den Hitlerprozess.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n der Parteipresse*. Diss. (Universität Leipzig, 1930), 48.

[38] 1924年3月7日《博尔扎诺消息》。

[39] 1924年2月27日伦敦《泰晤士报》；1924年3月1日《独立报》和1924年2月26日《小日报》。

[40] NA T84 EAP 105/7, 52-53.

[41] 1924年2月29日《公正报》 (*L'Impartial*) 。

[42] NA T84 EAP 105/7, 39, 43-44, 他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第七名党员，有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见 *Mitglieder Liste*, HA 8/171。党的指导委员会除他之外还有六名委员，不过这并非当时希特勒在法庭上陈述或暗示的东西。

[43]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rans. H. Francis Freniere, Lucie Karcic, 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I, 58.

[44] NA T84 EAP 105/7, 73.

[45] NA T84 EAP 105/7, 86-87.

[46] NA T84 EAP 105/7, 82.

[\[47\]](#) NA T84 EAP 105/7, 120.

[\[48\]](#) NA T84 EAP 105/7, 122.

[\[49\]](#) NA T84 EAP 105/7, 127.

28 供认与曲解

那时我已得出结论，在巴伐利亚，完全分不清楚谁是主谁是仆。^[1]

——恩斯特·珀纳

1924年2月27日星期三，审判的第二天。摄影师和拍摄组^[2]只允许在大楼外面拍照，前提是持有特殊许可证。鲁文勃劳及附近的其他啤酒馆禁止举行政治集会。警察再次封锁了周边的街道，这引发了当地居民和商铺的抗议。一个摩托车经销商^[3]尤其对自己的生意受到的干扰大为光火。

安保人员严格查验了各种颜色的入场证件^[4]：绿色是检方、辩方律师和法庭官员；黄色是邦政府部门；棕色是贵宾和被告的亲属；蓝色是媒体人士，只能进入媒体室的记者则是白色。民众的通行证是临时发放的，通常有效期为一天或半天。这些证件由奈特哈特亲自签发。

已经有人指责主审法官在发放珍贵的旁听证时存在偏袒。一位从柏林赶来的知名共产主义者遭到轻慢的拒绝，而对右翼有好感的观众会比较容易弄到一个席位。很快有人开始指责奈特哈特，说他在旁听席里塞进许多慕尼黑《汇报》所称的“希特勒那伙人里的渣滓”。^[5]

慕尼黑庭审现场的警力^[6]似乎比第一天还要多。建筑周边、附近的街道和法庭外的走廊上，头戴钉盔、腰别手雷、肩扛步枪的男人挤得满满当当。《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揶揄这“合围之势”^[7]比啤酒馆政变吓人多了。

“啤酒爱国者”^[8]和他们那场微型“啤酒馆革命”^[9]无疑还是很受欢迎的笑料。“政变审判成笑谈”，《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 的标题写道。^[10]希特勒和他的同党誓要清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犹太敌人，合众社记者写道，但是他最后这场“可笑的啤酒窖政变”^[11]只是一出滑稽戏。一群巴伐利亚爱国人士纷纷追随起鲁登道夫这样一个普鲁士宿敌，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人”希特勒，其中的讽刺意味引来《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 的讪笑。^[12]

虽然在柏林、巴黎之类的地方沦为笑柄，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在慕尼黑的人气仍然很高，前一天的演说得到右翼媒体盛赞。“布鲁登堡街上到了拼死一搏的时刻，”一位《巴伐利亚祖国报》记者写道。^[13]他还说，希特勒的状态极佳，他从未见过如此鼓动人心的精彩演说。

看到被告人再度对犹太人发起攻击，这位《祖国报》的反犹作家也十分欣慰，说这让他想起了“老希特勒”^[14]。这指的是1919~1921年那个尚未成为纳粹党党魁的狂热煽动家希特勒，而在他看来，后来希特勒为了顾及更广大的受众，对自己的宣讲语气做了些缓和。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声望促使当局在审案期间让被告人住在这座老军校里。除了安保上的考虑，还因为不用每天抵达和离开，从而避免被告人得到群众欢呼喝彩的尴尬场面。

不过鲁登道夫受到了优待。这位曾经的指挥官可以每天晚上回到自己的大宅，伦敦《每日快报》已经在称审判是一出“闹剧”，它的副标题应该是“鲁登道夫的洗白”。文章预测将军可能会被判无罪，然后就像个淘气的小学生一样离开，还客气地要求他“下次别这样了”。^[15]

让左派报纸格外开心的是，希特勒攻击了与他同属右派的巴伐利亚保守主义领导人。柏林社会主义报纸《福斯日报》问了一个和希特勒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卡尔没有被捕？”^[16]法国共产主义报纸

《人道报》（*L' Humanité*）也在拿希特勒和卡尔的关系做文章，尽管他们刊登的一张据说是希特勒的照片，其实是古斯塔夫·冯·卡尔。[\[17\]](#)

到了审判的第二天，法庭的进度已经滞后。前四名被告人这时候本应已经做过陈词，但希特勒的演说把整个下午的时间都占了。偏题、转向以及其他各种分散注意力的事情才刚刚开个头。

早上8:35，奈特哈特法官传召第二名被告人出庭，也就是高地联盟的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战后涌现的许多激进右翼准军事组织中，高地联盟是财力最为雄厚的一个。[\[18\]](#)它脱胎于凶蛮的高地自由军，后者参与了1919年慕尼黑共产主义革命和1920年鲁尔左翼暴乱的镇压。从奈特哈特的介绍听来，这位被告俨然是一位自由战士。

政变后，韦伯出版了一本题为《真相》[\[19\]](#)的小册子，对巴伐利亚三巨头的串谋做出了煽动性的指控。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迫使政府做出一连串的否认。然而韦伯的说法并没有就此消失，站在他这一边的《上巴伐利亚人》（*Der Oberbayer*）说，考虑到韦伯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些指控是很难反驳的。[\[20\]](#)

身材高瘦的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比他32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他的职业是慕尼黑理工学院兽医系研究助理。慕尼黑《汇评》认为他本人的样子就是个学生。[\[21\]](#)他戴着一副小小的圆边眼镜，谈吐平静而简洁。这和希特勒有天壤之别，柏林《福斯日报》称后者的演说是“宏论”，[\[22\]](#)指的是它的篇幅而不是品质。

在那天上午韦伯的证词有许多看点，比如从中可以了解希特勒的一些早期支持者的动机。韦伯说，按照他的经验，武装社团吸引了两个极端群体。一个是想要恢复一战后失去的帝制与皇权道统的爱国

者。另一个是要求进一步走向民粹主义和革命的德国人，例如废除贵族头衔，消灭阶级隔阂。这些人的意愿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靠的是三个原因。据《小巴黎报》记者观察，此时观众已经被他的论述深深吸引。^[23]

首当其冲的是对《凡尔赛条约》的痛恨，他们认为这种强加的和平以不公正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的人口、领地、资源和尊严。其次，在“挣脱这可耻的”^[24]条约的桎梏之前，他们必须先击败所谓德国自由的头号敌人，他把这些敌人笼统地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犹太人以及对大众和多数群体唯唯诺诺的民主议会体制”^[25]。在上战场前不先解决自家后院的威胁，德国爱国者可能会再次被人“从背后捅刀子”。这就带出了让他们团结起来的第三点：需要“发起一场精神圣战和道德重建，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然后通过我们来触及尽可能多的人民”。

这就是一条自由新德国之路——阿道夫·希特勒是实现这个未来的最佳机会，韦伯说。这样的背书极具说服力。

在奈特哈特的追问下，韦伯确认了希特勒在之前一天的许多证词。倚仗鲁登道夫将军的名望，啤酒馆政变的策划者预计可以得到北德陆军的支持。他们相信，军队和战斗团体的联盟可以推翻柏林政府，他们“无计可施，只能屈服于压力，从政界消失”。^[26]

事实上韦伯称，如果不是相信有巴伐利亚军队和邦警的完全支持，希特勒根本不会行动。他提到与冯·洛索将军和塞瑟总警监多次私下会面商谈行动筹备事宜。

“你最早得到〔巴伐利亚领导人倒戈的〕可靠通知是什么时候？”奈特哈特问道。

“我们没接到过可靠通知，”韦伯说，“直到他们开始向我们开枪，我们才知道。”[\[27\]](#)

奈特哈特问韦伯是否想过会有其他的结果。

如果卡尔、洛索和塞瑟“没有如此可耻、可鄙的背信弃义之举，”他答道，“我们在德国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可以实现的。”[\[28\]](#)

在问讯环节的最后，主审法官问了被告人的两名幼子——阿诺德和弗里德里希——的年龄，随后第二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接手，立即就打乱了韦伯的阵脚。

希特勒及其同谋欲向柏林施压，以达到他所说的“你们自己的目的”，被告人是否了解这一庞大的计划，埃哈德问道。

“我抗议使用‘追求我们自己的目的’这一表述，”韦伯说，“我们从未追求自己的目标，永远只是为了德国。”

“哟，你好像很敏感啊，”第二检察官嘲弄地说。[\[29\]](#)接下来，他进一步质疑了鲁登道夫的威望：“你难道没听说，鲁登道夫将军在军中没什么影响力，尤其是在北德？”[\[30\]](#)

这番话在旁听席引起不小的躁动。“太过分了！”[\[31\]](#)有人喊道。还有人说，在德国法庭里不应该问出如此不敬的问题。《晨报》的一名记者看到，鲁登道夫在一片嘈杂声中站了起来，对这种人身攻击表达了不满。[\[32\]](#)

奈特哈特喝止年轻的检察官，提醒他在法庭必须遵守秩序。

法官和观众的反应丝毫没有吓倒埃哈德，他说他在追问的是一个关键。

然而赢得满堂彩的是韦伯，他用一段长篇独白表达了自己对鲁登道夫的尊敬甚至仰慕，他说他被鲁登道夫深深打动，认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指挥官。

“好，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埃哈德说。

“事实上你想知道的是别的，”辩护律师卡尔·科尔猛地站起来[33]反驳道，语气中透着不屑。[34]这个身材壮实的矮个子用洪亮的声音祝贺韦伯，称他对检察官的侮慢做出了高贵的回应。观众再次欢呼起来。[35]奈特哈特敲了敲法槌。他们这不是在戏院里，主审法官说。

待场面平静下来后，韦伯表示，和很多说法正相反，他从未听说卡尔、洛索和塞瑟当时在里屋是被禁止相互交谈的。被告人语调的镇定自若，导致他几分钟后的表现让人感到意外。埃哈德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给他下了个套：他们进入里屋的时候，他有没有听到洛索跟他的一个助手说了些什么？

他们是不允许说话的，韦伯说。紧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的前后矛盾，试图纠正。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也连忙来协助。巴伐利亚领导人是在可以在房间里自由行动的，对不对？

韦伯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门口不是有一名警卫吗？奈特哈特问道。

“在门外。”

“所以他们几位是不可以离开房间的？”[36]

韦伯再次露出马脚。

在下午的庭期中，巴伐利亚法官、前慕尼黑警察总长恩斯特·珀纳走上证人席。他时年54岁，属于被告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位，已谢顶，没有蓄须，曾经断过的鼻子上有一副夹鼻眼镜。柏林《福斯日报》记者认为他的样子更像波希米亚人而不是德国人。^[37]

和希特勒一样，珀纳无意否认自己在此事中的角色。^[38]他提到政变前夕希特勒曾来找他，大致讲了讨伐柏林的计划，希望他出面协助。珀纳承认了他在啤酒馆里屋发挥的作用，即劝说卡尔与希特勒一同起事。他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巴伐利亚领导人在耍花招、假装，甚至都不存在异议。^[39]

证人席上的珀纳语调缓慢而谨慎，极少有手势，握着拳的左手一直放在背后。^[40]他的发言克制而平白，语气中显然没有透露任何的悔意。他问道，冯·洛索将军作为一名军官，面对鲁登道夫这样的司令官，怎么会先是宣誓服从，而后又有意蒙骗呢？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珀纳提出，洛索是加入了政变，但后来后悔了，于是编造出“在演戏”^[41]的说法。

辩护律师想继续就珀纳和卡尔的关系提问，尤其是考虑到两人在1920年3月曾试图推翻共和国未遂。法官显然对这个方向感到不安，提出留到保密庭期再问。

但是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坚持要问，表示“根本无法”^[42]想象这个话题怎么会关系到国家安全大事。如果将重要的证词转入秘密环节，“给人感觉有双手在小心翼翼地保护卡尔，”将会有损法庭的声誉。鲁登道夫的律师表示赞同。

施坦莱恩完全反对这个提问方向。“我认为这些问题于[被告人]罪行之评断毫无干系。”^[43]在这次庭审过程中，检方将多次重

复这一观点，因为辩方采取了一种消耗与覆盖战略，让检方淹没在无数旁枝末节之中。

当天的最后，法官问珀纳是否会去游行反对政府，他说他肯定会。德国政客是罪人和“杀人犯”，他们谋取不属于他们的权力，疯狂侵吞赃物。然后珀纳说了一句让法庭愈发沸腾的话，他带着嗤笑[44]对法官说：“你们说的‘重大叛国’这档子事，过去五年我们一直在干！”[45]

[1] NA T84 EAP 105/7, 218.

[2] *Sicherheit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Hitler prozesses*, 1924年2月21日, and *Sicherungsmass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 Genossen*, February 23, 1924, HA 68/1498.

[3] Staatsministerium des Innern, Nr. 2004 k a a 539, November 21, 1924, HA 68/1498.

[4] Der Präsident des Landgerichts München I an den Herrn Präsidenten der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 February 19, 1924, Nr. 292/24, HA 68/1498. 证件样本可见于HA 5/114I, 埃哈德的证件保存在他的文件里, NL Ehard 97, BHSStA.

[5] 1924年3月7日《汇报》。

[6] 1924年2月27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7] NA T84 EAP 105/7, 908.

[8] 1924年2月25日合众社。

[9] 1924年3月1日《英戈尔施塔特报》（*Ingolstädter Anzeiger*）。

[10] 1924年2月27日《温哥华太阳报》。

[11] 1924年2月25日合众社，由《伯克利每日公报》（*Berkeley Daily Gazette*）印发。

[12] 1924年2月26日《小日报》。

[13]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14] 1924年2月2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在那段时间，几乎每场演说都要攻击犹太人，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51。

[15] 不少报纸通过澳大利亚通讯协会（Australian Press Association）转载了这一指责，包括布里斯班的《电讯报》；墨尔本《阿尔戈斯》（*The Argus*）；纽卡斯尔《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以及霍巴特和伯尔尼的《信使报》（*The Mercury*）和《倡导报》（*The Advocate*），刊发日期皆为1924年2月27日。

[16]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另见《汉堡画报》1924年第9期。

[17] 1924年2月27日《人道报》。

[18] MA 103476/3, 1124, BHSstA. 关于韦伯的生平可参阅Svantje Insenhöfer, *Dr. Friedrich Weber. Reichstierärztesführer von 1934 bis 1945* (Hannover dissertation, 2008)。

[19] Dr. Weber, *Die Wahrheit* (1923)。

[20] 1923年11月14~15日《上巴伐利亚人》。

[21]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2] 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23] 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

[24] NA T84 EAP 105/7, 138-39.

[25] NA T84 EAP 105/7, 139-40.

[26] NA T84 EAP 105/7, 151.

[27] NA T84 EAP 105/7, 169.

[28] NA T84 EAP 105/7, 175.

[29] NA T84 EAP 105/7, 193.

[30] NA T84 EAP 105/7, 194.

[31] 1924年2月28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32] 1924年2月28日《晨报》。

[33] Nr. 51, Report, February 29, 1924, HA 5/114II.

[34] NA T84 EAP 105/7, 195.

[35] 这一点写入了法庭记录，见NA T84 EAP 105/7, 195。观众的倾向在报道中多有提及，如1924年2月27日《福斯日报》，1924年2月28日《小巴黎报》，以及1924年出版的庭审记录，*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33。

[36] NA T84 EAP 105/7, 198。韦伯的回应见庭审记录，*Der Hitler-Prozess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ünchen* (München: Knorr & Hirth, 1924)，I, 35。

[37] 1924年2月2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8] 从他的预审陈词来看，这样的抗辩并不意外，*Erklärung des Herrn Oberstlandesgerichtsrats Ernst Pöhner über die Vorgänge vom 8./9. November 1923*, December 9, 1923, HA 5/120。据符腾堡邦部长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称，珀纳三年前就已经支持这些主张了，*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July 8, 1920, Nr. 149, 64。

- [39] 此次会面是在11月8日上午，而不是起诉书中所说的11月7日。
- [40] 2月28日《福斯日报》，晨间版，以及1924年第9期《汉堡画报》。
- [41] NA T84 EAP 105/7, 235.
- [42] NA T84 EAP 105/7, 257.
- [43] NA T84 EAP 105/7, 258.
- [44] 1924年2月28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 [45] NA T84 EAP 105/7, 273. 法庭记录也提到了旁听席的欢腾气氛。

29 闭门审理

我尝试着用冷静而庄重的方式问了希特勒一个问题。[1]

——汉斯·埃哈德

1924年2月28日星期四早上，观众遭遇了一次意外的延误。大雪席卷[2]了慕尼黑乃至从比利牛斯山到亚平宁山脉的相当一部分地区，鲁登道夫将军的车似乎是在来法庭的路上抛锚了。[3]

其他被告人在聊天看报，打发时间。上午9：20左右，大楼外响起欢呼和拍照的声音，将军搭乘一名支持者的车赶来了。然而审理仍未开始。据法国哈瓦斯通讯社（Agence Havas）记者称，有人弄丢了130室[4]的钥匙，也就是合议庭存放庭审记录的地方。[5]

被指控为啤酒馆政变军事策划人的赫尔曼·克利伯中校走上证人席。48岁的克利伯体格魁梧，浓眉毛、宽肩膀，外表看上去十分整洁，用《小巴黎报》记者的话说，就像要参加婚礼的新娘。这位记者是在报道德国民族主义期间认识克利伯的。他的结论是，这辈子没见过哪个德国人像这位“巴伐利亚巨人”[6]这样，对法国怀着如此深的仇恨。

克利伯回顾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侧重于战争末期的悲凉遭遇，尤其是奉命随德国停战使团前往比利时斯帕。那是一段屈辱和刺痛的经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愤怒与沮丧的感觉，一边要在西线与“残酷无情，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敌人”作战，一边要忍受着国内“那一帮帮的卖国贼”的攻击。

接下来，他厌恶地看着这群卖国贼背弃他们对德意志皇帝的誓言，却反而得到了新共和国的权力。谈起战后在法据普法尔茨地区的

时光，他咒骂签署停战协议的“十一月罪人”，因为他们不允许他用鞭子抽对方的法国将军，在他看来，那是“这种家伙应得的教训”。陈词期间，奈特哈特漫不经心地警告被告人保持克制。^[7]

法国民族主义报纸《法兰西行动》（*L' Action Française*）记者在文章中说，现在看来克利伯是跟希特勒一样的狂热之徒，并且把他的名字错拼成了“Hittler”^[8]。有不少国际记者此时仍无法正确拼写头号被告人的姓氏。^[9]《高卢报》（*Le Gaulois*）和德国电讯联盟社（Telegraphen-Union）的新闻通讯在开审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坚持在“Hitler”里多加一个“t”，不过后来越来越少见了。

借着介绍个人经历的机会，克利伯夹带了一些关乎近代德国起落兴衰的轶事。他回忆了在斯帕签署停战协议后，他的火车离开车站的情景，当时他攥着拳头对着窗外大喊：“咱们来日方长！”比利时人则用“如潮的怒火、吼叫、石头和手枪子弹”招呼他。在那一刻，克利伯说他发誓“决不罢休”，要把在车站的宣言变为现实。^[10]

克利伯以“一个忠诚的巴伐利亚人”的身份表示，他希望吞并奥地利——用他的话说是“德属奥地利”——并恢复祖国的力量与威望。在这方面，他和希特勒有不少共同语言。然而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理念甚至立场并不是吸引他的主要因素。实际的原因与此毫不相干，克利伯说，不过他不太想公开谈论。^[11]

奈特哈特领会了他的暗示。于是，刚刚经历了早上的延误的观众，在才听了15分钟的证词后，又不得不离开宝贵的旁听席。法庭将进入秘密审理环节。在接下来的审理中，这样的秘密庭期还有不少。

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美国乃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样遥远的国度都在密切关注此案。不少外国记者对主审法官关门审案的决定表达了质疑，尤其是巴黎来的记者。

《小巴黎报》猜测，克利伯的保密证词涉及德国人为反抗《凡尔赛条约》而在暗地里组建的军队。^[12]还有多家报纸猜，克利伯要透露的是，在他制订的攻击共和国的计划中德国军方会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很多人判断，无论是什么，这些讨论可能的确是非常有必要遮掩起来。

克利伯的闭门证词的确会成为不少报章大肆报道的话题。一开始，克利伯站在自己的角度谈了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愿不愿意，终有一天要打起来的伟大解放战争”^[13]中，德国爱国社团发挥的作用。然而，外界对这些社团存在根本上的误解。

公众当然是认为，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是得到军方和警方协助的。事实恰恰相反。克利伯赞扬了德国的平民百姓，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藏匿武器，避免被监督《凡尔赛条约》执行的协约国调查员发现。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说，随时都会有检察官找上门来，这是当着施坦莱恩和埃哈德的面指桑骂槐。德国爱国者是勇敢无畏的，尽管要受到他们自己的“罪恶政府”^[14]颁布的法律约束。

“中校！”奈特哈特说，“你在说罪恶政府。这是我不能容许的。”^[15]

接着被告解释了他为什么支持希特勒。德国军队需要吸引民众，尤其是劳动阶级。问题是战争结束后工人纷纷投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没有哪个德国爱国者，或者说民族主义政党或领袖，能够争取到他们，他很快注意到，有一个人可以：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的魅力和演说技巧，配合他“不可思议的意志力”^[16]，让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助于德国为下一场势在必行的战争做准备。无论是可以参加战斗的年轻工人，还是可以为军队制造武器、

生产物资的老年工人，他都能争取到。在克利伯看来，“没有这些工人，我们不可能发动解放战争”。[\[17\]](#)

透过闭门审讯中的这次直截了当的承认，可以了解到一些军官最初是如何被这个啤酒馆煽动家吸引的，而他的对手往往会低估他，甚至把他当成一个卓别林式的小丑。克利伯接下来要给出的详尽证词，若是传出去将会掀起轩然大波。

他证实，讨伐柏林的筹备工作一直是明确告知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冯·塞瑟总警监甚至还协助他操练人马。克利伯提到1923年10月与塞瑟的一次会面，当时他们俯身查看德国地图，计划了北上首都的行军路线以及途中的部署区域。

克利伯说计划的目标是在“边防警察”[\[18\]](#)的协助下夺权，而那些警察无一不是各种爱国战斗社团的成员。塞瑟认可了那个计划。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他说。直到10月的时候，“进军柏林还是确凿无疑的事”。[\[19\]](#)

他拿出了他的人收到的一份关于北上的具体命令，[\[20\]](#)日期是1923年10月16日，表示大家可以传看。

“现在？”奈特哈特问道。他警告克利伯，这样的文件依法必须上呈法庭。

克利伯还是把文件递给了法官。上面附有一张地图，标示了前往首都的路线。

施坦莱恩看了看那张纸。这真的是在说部队调动吗？

“还有筹备，”克利伯答道。

埃哈德问是谁起草的计划。

“从柏林来的。”

埃哈德检查了命令。这件事非同小可，他表示很惊讶，冯·塞瑟总警监在预审陈词里对这道命令只字未提。

“没什么可惊讶的，”克利伯反驳。他们得到了巴伐利亚当局的全力配合。[\[21\]](#)

被告人韦伯医生和恩斯特·珀纳证实，北上的准军事社团在调动中是伪装成应急警察部队。

审判席上的其中一位法官警告被告人，不得将这一信息告知公众。[\[22\]](#)

希特勒也在这次秘密审理中加入了一些信息。冲锋队队员也在接受德国军队的训练。一开始是在军营进行的，后来那里已经容纳不下他的人，于是邦警提供了场地。他们从1923年1月开始一直与政府当局有这样的合作，当时法国入侵鲁尔，军方高层担心他们可能很快要投入战争。训练的强度在秋天开始加大。

事实上，希特勒说，是军队和邦警在催促他们行动。到了1923年11月，冲锋队已经躁动不安。他说，军营里整天谈论打仗，再加上训练，根本没办法约束他们的情绪。

“他们是在军营里训练？”奈特哈特问道。

是的，希特勒说，并且这项指令巴伐利亚当局是知情且支持的，他们还提供了部分制服。

“是国家防卫军的军官？”

“是的，国家防卫军的军官。” [23]

这无疑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在秘密审理中，克利伯一度表示，一旦媒体掌握了这样的信息，“所有人都会来讨伐我们，爱斯基摩人都会来”。 [24]毫不夸张地说，会是一场国际丑闻。而当初导致法军入侵鲁尔的原因，还不及这个严重。

那天下午2:37，仍然是闭门审理，克利伯的律师呈交了一系列说明部队调动和行军计划的机密文件。克利伯说，让他的人去跟德国军队和邦警作战的想法荒诞至极。他们是盟军，不是敌人。

为支持同僚的说法，希特勒就他的行动又透露了一个不想公开说的事。他承认曾下令去盗取印刷厂的钞票，称军方承诺在“调动的时候” [25]会提供资金，然而11月9日上午他无法联系上冯·洛索将军。当时他需要钱给他的人买早饭，以避免暴力事件发生。

“我判断当时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切手段，”希特勒说。 [26]

埃哈德问希特勒如何看讨伐柏林的可能性，毕竟此事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后果，希特勒回之以一段长长的独白，涵盖了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和大国政治。他简述了法国如何一直在寻求“德国的巴尔干化”， [27]把它分成若干小的、可控的部分。英国也把德国当成人质，用在它拿手的势力平衡算计中，力求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曾经是西班牙， [28]后来是荷兰，再之后是法国，最后，是我们。”面对如此决绝的敌人，德国唯有利用它们之间的裂隙，因为它们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催生分歧和冲突。

接着希特勒批评柏林缺乏民族主义和战斗精神，辜负了德国人民，导致战败以及当下的苦难。他还说，各国历史证明，首都是无法

领导一场民族复兴的。造就阿塔图尔克的不是君士坦丁堡而是安卡拉；墨索里尼崛起于意大利北方而不是罗马。慕尼黑和德国的重生也会是这样，希特勒说。

此外，考虑到对德国犯下的罪行之深重，希特勒不指望事情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反，这需要“施展巨大的、空前的武力 [并且] 可能还要忍受相当痛苦的折磨”。^[29]他本人为这项事业做了赴死的准备。他无怨无悔。如有必要，他发誓会再来一场政变；他相信如果不是巴伐利亚领导人辜负了他，这一次应该是会成功的。

检察官问希特勒是否认为他能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能，当然不能，希特勒冷笑着说道。历史的书写者不是多数群体，而是个人，或者说“英雄”，他往往要顶着多数民众的反对来行事，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社会之上。他不是叛国者，他的同僚们也不是。“重大叛国是唯一一种因失败而受惩罚的罪行。”

基于这一点，始终未被主审法官打断的希特勒接着对检方发出警告。“不要以为这场审判能毁了我们！你们可以若无其事地把我们关起来——你们可以。但德国人民不会毁了我们。我们的监狱会打开，有朝一日，遭到指控的人，会反过来指认罪人！”^[30]

^[1] NA T84 EAP 105/7, 379.

^[2] 1924年2月28日《西方闪电报》，1924年2月28日英国联合通讯社。

^[3] NA T84 EAP 105/7, 278；1924年2月2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2月29日《布拉格日报》；以及1924年2月29日《每日邮报》。1924年2月29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则对将军的借口存疑。

^[4] VId, *Sicherungsmaßnahmen anlässlich des Prozesses gegen Hitler und Genossen*, February 19, 1924, HA 68/1498.

[5] 1924年2月29日哈瓦斯通讯社。

[6] 1924年2月29日《小巴黎报》。

[7] NA T84 EAP 105/7, 281-82.

[8] 1924年2月29日《法兰西行动》。

[9] 《高卢报》、美联社和电讯联盟社仍然管他叫“Hittler”。

[10] NA T84 EAP 105/7, 282.

[11] NA T84 EAP 105/7, 286.

[12] 1924年2月29日《小巴黎报》。1924年3月12日《阿根廷日报与周报》也认为，最重要的事实都是在闭门庭期中透露的，Carl Christian Bry,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86。

[13] NA T84 EAP 105/7, 288.

[14] NA T84 EAP 105/7, 290.

[15] NA T84 EAP 105/7, 291.

[16] NA T84 EAP 105/7, 296.

[17] NA T84 EAP 105/7, 295.

[18] NA T84 EAP 105/7, 305.

[19] NA T84 EAP 105/7, 306.

[20] *Befehl des Deutschen Kampfbundes* (“Grenzschutzbefehl”), October 16, 1923,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42, 221-23.

[21] NA T84 EAP 105/7, 307-8.

[22] NA T84 EAP 105/7, 312. 珀纳也这么认为，不过庭审记录将说话人的身份标为弗里克 [NA T84 EAP 105/7, 310-12]。考虑到其中参引了他昨天的言论，并且使用了“*Ich mache keinen Hehl*”之类他偏爱的短语，显然应该是珀纳。

[23] NA T84 EAP 105/7, 313.

[24] NA T84 EAP 105/7, 347-48.

[25] NA T84 EAP 105/7, 363.

[26] NA T84 EAP 105/7, 366.

[27] NA T84 EAP 105/7, 369.

[28] NA T84 EAP 105/7, 370.

[29] NA T84 EAP 105/7, 373-75.

[30] NA T84 EAP 105/7, 377.

30 辩方的攻势

在这片谎言、欺骗和背信的沼泽前，鲁登道夫是一座高山。他会永远傲然而立。他的王冠上的珍珠没有因为与强盗勾结而掉落。^[1]

——赫尔曼·克利伯中校

这场审判在德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新闻热点。对许多左翼报纸来说，尤其是柏林和德国北方那些，这就像是希特勒和他的党羽在上演一场可笑的马戏或哗众取宠的舞台剧。而南方那些右翼报纸，比如《罗森海姆汇报》（*Rosenheimer Anzeiger*），则认为，柏林本以为审判会是“一场聚会”，然而实际上更像是一出“慕尼黑悲剧”。^[2]

次日，也就是2月29日早上，昏暗、阴郁的法庭没有像之前那样迅速坐满人。许多人估计今天又会有长时间的延误，或者很快就会开始秘密审理。^[3]还有人觉得，这场奇怪的审判为什么老是关注一些与正题无关的细节。“如果公开审理部分就只是些反法国、反比利时的演说，”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这里指的是克利伯的证词，“那么这审判根本没什么必要继续下去。”^[4]

希特勒在1924年闰日（2月29日）的早上走入法庭，精神抖擞地环顾四周，此时留给公众和媒体的座位实际上有一半还空着。鲁登道夫和他的顾问走在希特勒后面，然后是一群慢悠悠的辩护律师，他们的长袍在地板上发出嗖嗖的刮擦声。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赞扬了辩方的克制，努力回避可能有碍德国利益的敏感问题，不过他们的律师就不行了。罗姆上尉的首席顾问克里斯托弗·施哈姆受到了攻击。所有律师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即在为当事人辩护的同时不危及国家安全。作为一名得体的德国人，他说他希望明确一点，那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会以祖国利益为重。

他还希望大家注意《人民信使报》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一个人在慕尼黑搭电车时恰好坐在了两个旁观审判的漫画家中间。其中一人据描述“看起来是个保加利亚或匈牙利人，至少是典型的斯拉夫人”，^[5]他把合议庭的其中一名法官画成了奸诈的骗子，另一个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漫画家则画了一幅讽刺画，把鲁登道夫画成了形容憔悴、面颊深陷的泼妇，两眼无神地望着前方。施哈姆请求法官将“这类人”逐出法庭。奈特哈特同意了。

既然说到媒体报道，路德维希·施坦莱恩也提到一篇文章，其中形容他在听希特勒的发言时始终带着嗤笑的表情。^[6]他郑重声明事实并非如此。然而柏林的聪明人想必对此感同身受，他们觉得，这么一场浮夸拙劣的审判，又有谁能一直保持严肃呢。

克利伯中校继续作证。在排除了昨天出庭时讲的几乎所有内容后，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克利伯用一种慎重的、经过过滤的方式，解释了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官在占领啤酒馆行动中的作用。他的发言斟字酌句，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任何有关又一场战争的必然性，他的人马得到的军方操练，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震怒的东西。

在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权责任后，克利伯描述了希特勒和其他谋反者的动机，从中揭示了巴伐利亚当局的配合。他向法庭陈述了他和洛索在政变两天前的一次对话，后者当时表示如果有51%的成功机会，他就支持讨伐。克利伯随后表达了对这种思维的鄙视，认为这不是一个战士该有的，更别说还是巴伐利亚最高军事指挥官。德国军队在上一场战争中要是抱着此种心态，那么在1914年8月就投降了。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的人冲入了啤酒馆。他说他们是在给磨磨蹭蹭的三巨头打开一扇门——然后找准时机推他们一把。他又换了个比喻，说他把这看作是一块“跳板”以及“一点点怂恿”，帮助领导人克服恐惧，加入进来。^[7]

被告人承认“安全送达”^[8]这个暗号是他想出来的，表示在贝格勃劳凯勒成功发起了革命，没有流血。他还承认把这几个字写在了后来被警方发现的一张纸上，但没有亲自或命人给罗姆中尉或弗里克博士打电话。

奈特哈特提醒他，纸上还写了“先报弗里克”，此外还有“鲁文勃劳凯勒”。^[9]这几个字是通过电话传到啤酒馆的吗？

“简单说，不是。”

法官告诉他，检方已经确定了打电话的副官的身份。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要公开的话，”克利伯改口了，“那我承认。”

这个小小的争议体现了辩方的一种策略，他们通过运用这一策略制造了灾难性的效果。他们有时候会在法庭上否认一个事实，如果被纠正，他们就会说自己只是在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隐瞒。这让辩方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检控阿道夫·希特勒的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而言，就是又一项挑战了。

和之前的被告一样，克利伯似乎决意要帮鲁登道夫免除政变的任何责任。他在证词中说，这位德国指挥官满怀对巴伐利亚领导人的怒火，因为他们的背叛导致革命失败，而且在邦警向他们开枪前没有任何警告。这份证词，在旁听席引发激烈的反应。克利伯接着赞扬了鲁登道夫的信誉，与这方面严重不足的卡尔、洛索和塞瑟有云泥之别。被告还对警方的行为倍感震惊。当一名警官听到鲁登道夫被杀的传闻时，有个警察说，“那是最佳对策了”。^[10]

观众顿时开始起哄。

“骇人听闻！”有人大吼。[\[11\]](#)

“可耻！”还有人嚷道。

“这叫什么警官！”[\[12\]](#)

法官敲响法槌。

检察官也表示反对。“我想请你们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面之词，其中有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他吁求对“这类极端刺耳的见解”至少应予以斥责，且法庭在听到另一方的说法前不应妄下判断。

这下变成奈特哈特法官对检察官有意见了。“我不认为在审案期间斥责主审法官是公共检察官的事。”[\[13\]](#)《柏林日报》记者说他的语气听来“十分严厉”，法官的这番话引来一阵阵叫好。[\[14\]](#)

借着法官这通非难的势头，辩护律师卡尔·科尔决定对检察官发起攻击。克利伯对巴伐利亚领导人的负面看法“是全德上下每一个体面人都会有有的”，不知道施坦莱恩是否认为自己是个体面人，律师自言自语道。

“这太过分了！”奈特哈特说，“这样的人身攻击我是不会容许的。”[\[15\]](#)

待气氛和缓下来后，克利伯强调，前往市中心的游行并没有滋事的打算。他重申他的人受命枪弹退膛，不得开火。他们本来也没有与防卫军或邦警开战的想法，并且他说，这一点从他们的队形看就已经很明显了。在行军的时候，任何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官都不会让部队排得那么密穿过一条处在敌人火力范围内的狭窄街道。

检方没有问他，部队的负责人花了多大力气，或者说有没有花力气去监督这些象征性命令的执行情况。他们的人这时候都饿着肚子，多少有些不满，他们自己也承认当时怀着拼死一搏的想法，很难控制住。检方同样没问，既然打算进行一场和平示威，那何苦要背着笨重而吓人的武器。

倒是希特勒的辩护律师洛伦兹·罗德问了一连串的问题，确认克利伯在1923年的前10个月里与卡尔、洛索和塞瑟多次见面。然后罗德直截了当地问被告，如果不是确信他的好友冯·塞瑟总警监会参与，他是否还会在11月8~9日行动。

“我不会对我的老朋友采取任何行动，”[\[16\]](#)克利伯说，他和冯·塞瑟年轻时就认识，保持了35年的友谊。“我对他的参与没有一丁点的怀疑。”

辩方律师卡尔·科尔趁机想再次确认，邦警在向游行队伍开枪前是否给出过哪怕一次警告。克利伯说没有。

何况辩方说，游行者的选择已经不多。在震耳欲聋的噪音里，他们没法靠喊叫来通知他们的人。就算可以，他们身后有太多人，这导致他们没法停下来，或者在狭窄的街道里掉转头。此外，如果游行者可以继续往前再走50米，进入开阔的广场，克利伯表示，这场和平示威可能就自然而然地结束了，20条人命也可以保全。

辩方律师科尔此刻已经十分激动。“按照我方的看法，统帅堂事件只能是‘谋杀！’”[\[17\]](#)

主审法官一言不发，更别说表达反对了。其他辩护律师也加入进来表示赞同。《人民信使报》记者说，科尔的话像扔进法庭的一颗炸弹。[\[18\]](#)

[1] NA T84 EAP 105/7, 418.

[2] 1924年3月1/2日《罗森海姆汇报》，一些刊物对此进行了图片转载，比如1924年3月11日《巴伐利亚信使报》，以及*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3, 5-6。

[3] 1924年2月29日《慕尼黑报》。

[4] 1924年2月29日伦敦《泰晤士报》。

[5] NA T84 EAP 105/7, 384-85.

[6] 具体出处未曾说明，但可能是1924年2月27日《柏林本地新闻》(*Berliner Lokal-Anzeiger*)。

[7] NA T84 EAP 105/7, 402.

[8] NA T84 EAP 105/7, 408. 关于发现字条的过程，见XIX 466/23, December 28, 1923, HA 67/1494。

[9] NA T84 EAP 105/7, 409.

[10] NA T84 EAP 105/7, 419.

[11] 庭审记录中提到了观众的责难，NA T84 EAP 105/7, 419-20。

[12] Nr. 53, 1924年3月2日, HA 5/114II。

[13] NA T84 EAP 105/7, 420.

[14] 1924年2月29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15] NA T84 EAP 105/7, 421.

[16] NA T84 EAP 105/7, 460.

[17] NA T84 EAP 105/7, 472.

[18] 1924年3月4日《人民信使报》。

31 无知的杰作

鲁登道夫是一个超级爱国者吗？^[1]

——《卡尔加里先驱日报》（*Calgary Daily Herald*）

仰慕鲁登道夫的人不想看到这位爱国主义偶像公开受审的场面。反对他的人也认为，他不会出庭。考虑到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他们说，奈特哈特可能会要求让鲁登道夫在保密庭期作证，因为这位暴躁、不可捉摸的将军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到了那天下午3点，在得知鲁登道夫的确会公开作证后，法庭里充满了期待。

仍然拒穿军服的将军穿着一身蓝色套装，^[2]胸前别着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3]他的长篇发言可能持续长达三个小时，在此期间，鲁登道夫会把他的角框眼镜^[4]夹在额头上，翻着他的手写讲稿——他煞费苦心地把稿件副本先期发给了记者。然后他会把眼镜放回到鼻梁上，透过镜片看着法官。人们常说鲁登道夫不是个演说家，而在柏林《福斯日报》看来，他显然也不打算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

他会犹豫，话说一半停下来，在成叠稿纸中笨拙地翻找着某一张纸。他在出汗，手在抖，看起来十分不自在。这种不自在并非因为紧张，一些民族主义支持者解释道，那是因为邦政府的背叛让他怒不可遏。

“我无法像希特勒那样，在昨天的闭门审理中用精彩绝伦的发言表达自己，”鲁登道夫用他那尖利刺耳的声音说道，这种声音在法庭里会不太容易听清。不过他认同希特勒对德国困境的分析，认为那并非外国势力导致，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行”。^[5]

他具体提到了国内的三种敌人，认为是他们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破败和堕落。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战时就反对德国军队，认为战场上的胜利“损害了他们的政党利益”。接着他攻击了犹太人，[\[6\]](#)说他们在从身体和道德上腐化日耳曼种族，并且他们在国家事务上的发言权应该跟一个外国人——比如英国人或法国人——没什么不同才对。最后，他指责天主教会在国家解放和未来重生过程中也是一股负面的力量。

发言过程中全场寂静无声。[\[7\]](#)

《罗森海姆汇报》等右翼报纸的记者称将军的讲话“将本次审判推向一个全新高度”。[\[8\]](#)也有许多记者对虚夸、散乱的发言大加嘲弄，比如《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 伊巴拉（Thomas R. Ybarra）称之为“一件政治无知的杰作”。[\[9\]](#)

至于他和巴伐利亚三巨头的关系，鲁登道夫回到了他熟悉的领域，详述他对冯·洛索将军的“坚定信心”，[\[10\]](#)并且他很确定，本案被告人与巴伐利亚领导人是在合作的。他们看上去完全可信。鲁登道夫的猜想是，怀着野心的高层政客已经习惯了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弃。

而后鲁登道夫形容游行是一次和平行动，意在说服人民——“一支启蒙的队伍”[\[11\]](#)。他说当警察开始向他们开枪时，一切都改变了。希特勒的党成为“出卖、背叛祖国和未遂谋杀企图”的受害者，但鲁登道夫预言，“烈士的鲜血”终将给这个党注入新的力量。

他认为种族的复活对这个国家的重生至关重要。他们不想看到德国被法国人——或他刚刚痛斥的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 or 天主教徒——玩弄于股掌。“我们想要……一个只属于德国人民的德国——”

个强大、有力的德国，同时也和俾斯麦时代一样，是一个和平的港湾。” [12].

然而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该如何实现，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在许多左翼报纸看来，鲁登道夫只有一个解决办法：要由他来掌权。这名被告人是个危险人物，柏林《前进报》（*Vorwärts*）写道。他是“当初导致德国成为一座废墟的那种心态”的死灰复燃。

在奈特哈特即将结束当天的审理之际，埃哈德抓紧时间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将军是否意识到，他在政变中的行为伤害的不只是巴伐利亚邦，还有德国的国体。

“我们反对的只是政府官员，”他说。 [13].

法庭给了鲁登道夫一些礼貌的掌声。一个赞赏他的右翼记者说，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走下证人席时仍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那天下午鲁文勃劳啤酒馆的伙计拦下了正在离开的将军座驾，向他奉上一大杯啤酒。 [14].

在法庭外长走廊的另一头，恩斯特·罗姆上尉坐在原为军校宿舍 [15]. 的房间里，日子过得还挺惬意。 [16]. 跟1907年他作为学员的时光比起来，现在的吃喝无疑要好很多。审判期间的伙食有啤酒、维也纳香肠、碱水包、奶酪、黑麦面包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特色食物。据说这属于法庭管理方的一种思想战术，意在避免被告人再次发起绝食抗议。 [17].

辩方律师的气势汹汹让罗姆深感欣慰。他认为法律团队在策略和战术协调上可以更有效，也许可以果断地利用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但他不想吹毛求疵。他们打了检方一个措手不及，审判的形势看起来不错。

能再次见到被告席上的这些同伴，也让罗姆很高兴。慕尼黑的法庭是他们在政变后的首次重聚。罗姆认为希特勒尤其情绪高昂，看到同伴们没有把啤酒馆惨败归咎于他，并且都做好了在法庭上战斗的准备，他无疑是长出了一口气。

1924年3月1日8:40刚过，罗姆走上证人席。他是身穿制服抵达的，浅褐色的短发仔细地梳成中分，出庭时会戴上一副夹鼻眼镜。他后来说，他的策略就是忠于自己和大家，尤其重要的是，避免走上他所说的“羞愧与忏悔之路”。[\[18\]](#)

被告一上来先是发表了一篇全面的声明，为当天的证词定调：

法官大人，今天我要为自己正名。不得不说，我至今无法理解，我要为一件在我看来再自然不过的事自辩，而我，对我在1923年11月8日那一天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任何悔意。[\[19\]](#)

他难道还没犯罪吗，记者们问道，重大叛国，攻占政府机关，绑架政府人员，盗取数万亿马克，还有导致四名警察丧生？

罗姆的语调高傲而铿锵，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有种忽高忽低的韵律。[\[20\]](#)他的样子僵硬而自负，下唇专横地绷着。

他看上去很符合人们想象中的普鲁士战士，《道义报》（*La Justice*）记者说，此外声音也很像。《柏林日报》觉得他“相当无趣”，[\[21\]](#)唯一看点也许是作为一个标本代表了战后德国出现的那一类唯利是图的不法之徒。

“我是一名军官，一个战士，”罗姆说，[\[22\]](#)他说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在这里公开得到评判——这也是日后他在回忆录开篇会说的话。他的话语间带有一种“好像在哼哼的怪声”，[\[23\]](#)可能是因为他的鼻子在战时受过伤，或者接受了不太成熟的整形手术。

罗姆似乎很乐于强调他对王朝的崇敬，他认为那是使德国走向强盛的原因。期间他还宣称自己从未忘记效忠国王的誓言。被人逼着要放下那神圣的承诺，令他“沮丧不已”^[24]。他拒绝了他们，同时也不理解为什么其他的战士可以背信弃义。

罗姆忠于被废的帝王，然而《汇评》的记者惊讶地发现，他对希特勒的忠顺似乎更加狂热。^[25]接下来罗姆开始回忆纳粹建党之初的火热岁月，十几号人在达豪街一家酒馆开会。罗姆对共和国抱着无限的恨意。他称德国总统为“艾伯特同志”，^[26]奈特哈特没有要斥责他的意思。

比起希特勒或鲁登道夫，观众对他的证词的兴趣小了很多。不少记者表示根本就是索然无味，他们顶着困意听罗姆大谈哗变的一些琐碎细节。“屋外是提不起劲的天气，[屋里是]提不起劲的无聊，”《巴黎之声》说。^[27]记者还说，人们终于开始期待来一段闭门审理，好让他们从这冗长乏味的证词中解脱出来。

奈特哈特问罗姆有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

他和他的人是在欢呼而不是沉思，罗姆答道。

“你很高兴，这可以理解。但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件事是否合法？”

“没有，”罗姆重申，“我们的热情非比寻常。”^[28]

他的律师、资深法务顾问克里斯托弗·施哈姆博士——他的儿子加入了罗姆的“帝国战旗”——此时提起了战争部食物和其他给养被盗窃的事。

罗姆说抢夺物资的事完全是子虚乌有。

奈特哈特法官打断了他，称这方面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旁听席里有几名记者感觉，法官的重点并非确保审理的重点放在重大叛国上，而是想要掩盖一场丑闻。这个想法情有可原。

在其中一次闭门审理中，罗姆承认政变期间从印刷厂盗取的钱有四分之三下落不明。他说在他的人投降时，那些钞票还在战争部的一个办公室里，他认为是攻下战争部的邦警和防卫军偷的。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陆军库房在被希特勒的人占据期间失窃，这件事同样没查出个结果。丢失清单^[29]上列出了总计5700余项财物，包括299件衬衫、528双袜子、125顶野战帽、87顶制服帽、87双步兵靴、78双骑行靴、65顶钢盔、65只臂章、49双皮手套以及从歌集到卡宾枪背带的各种物品。

罗姆坚称他在鲁文勃劳的活动与贝格勃劳凯勒是不相干的，至于他的人通过电话收到“安全送达”这个暗号，他完全不知情。他的说法同样没受到追问。对这名被告的质问索然无味，也得不到什么信息。

下一个出庭做自我介绍的被告是威廉·布吕克纳，这个健壮的大个子率领三个排的慕尼黑冲锋队队员控制了贝格勃劳凯勒。除了威风的身形和还算入时的打扮外，在场的许多记者对这个政治学专业出身、现年40岁的男人印象不佳。柏林《福斯日报》记者认为他是个“相当迷糊的絮叨政棍”，^[30]喋喋不休地说着他那些混乱的观念，透着一种粗野的犬儒态度和骇人的冷酷。

和他手下的许多冲锋队队员一样，布吕克纳追随希特勒是因为他“对付马克思主义毫不手软”。他显然痛恨这种思想以及其他的左翼学说，一度要骂遇害的社会主义领袖库尔特·艾斯纳是猪，话说到一

半咽了回去。国家社会主义者与这些内奸展开了斗争，用他的话说，在这可悲的局面下，希特勒似乎是唯一一个能“拯救德国”的人。

布吕克纳说，希特勒的一个成功秘诀是，他“也许是第一个能让我国萎靡不振的青年重获理想的人”。比起当下这帮完全无力面对混乱局面，被协约国吓得瑟瑟发抖的当权者，希特勒实在太不一样。

“我们想要、需要一个深爱着祖国，同时有着满腔热忱与怒火的人，”布吕克纳宣称。希特勒正是以这种特质吸引着德国人民，没有哪个领导人可以与他相比。此外他的支持者来自各个阶层：中产阶级、公务员、商贩、学生和工人。在政变前，布吕克纳对希特勒已经“笃信不疑”，他说，然而在狱中度过这三个月后，这种信心又有了难以估量的巩固。[\[31\]](#)

在最后，布吕克纳始终保持着不逊的态度。经过在狱中的深思熟虑，他断定：

我必须得说，作为一名德国人，能够参加11月8日和9日的事件，我很骄傲——无比地骄傲。今天，如果再次置身这种处境，我无疑仍会追随我的领袖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与上一次不会有任何不同。[\[32\]](#)

对于罗姆，多位记者[\[33\]](#)给出了合理的评估，称这是一场短暂而没什么内容的讯问。那一天的最后，被告人在他的发言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点：魏玛共和国不存在宪法。

[\[1\]](#) 1924年2月27日《卡尔加里每日先驱报》（*Calgary Daily Herald*）。

[\[2\]](#) 1924年3月1日《华盛顿邮报》。还有人觉得他老迈而疲倦，见1924年3月4日《博尔扎诺消息》。

[\[3\]](#) 1924年3月1日《福斯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1日《小巴黎报》；1924年3月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1924年3月1日

《费加罗报》；Nr. 53, 1924年3月2日, HA 5/114II; 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80。

[4] 1924年3月3日《凯恩斯邮报》 (*Cairns Post*) ; 1924年3月3日路透社。

[5] NA T84 EAP 105/7, 482.

[6] 1924年出版的一份亲希特勒的庭审记录强调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段落, 鲁登道夫对天主教的攻击则列在次一级的标题下。而将军对勇敢的天主教和新教徒的赞扬用了粗体, *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52。

[7] 1924年3月1日《加拿大报》, 以及Erich Ludendorff, *Auf dem Weg zur Feldherrnhalle. Lebenserinnerungen an die Zeit des 9. 11. 1923 mit Dokumenten in fünf Anlagen* (München: Ludendorff, 1937), 82。

[8] 1924年3月1/2日《罗森海姆汇报》。

[9] 1924年3月2日《纽约时报》。

[10] NA T84 EAP 105/7, 514-15.

[11] NA T84 EAP 105/7, 543.

[12] NA T84 EAP 105/7, 545.

[13] NA T84 EAP 105/7, 547. “只是” (nur) 这个词是手写加入庭审记录中的。

[14] 1924年3月8日《人民报》, 法庭外为他喝彩的人群, 见1924年3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

[15]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für das Kriegsschulegebäude während der Zeit des Hitler-Prozesses*, February 15, 1924, HA 68/1498.

[16]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201-2.

[17] 甚至可能是制止一场已经开始的抗议，1924年2月27日美联社。

[18]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202. 他说希特勒和布吕克纳也是这么想的，另外他说是科尔提出，通过辩方律师之间更有效的合作可以避免走上这条路。

[19] NA T84 EAP 105/7, 551.

[20] 1924年3月2日《高卢人报》。

[21] 1924年3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他还被比作一名符合刻板印象的普鲁士军官：1924年3月1-2日《公义报》 (*La Justice*) 。

[22] NA T84 EAP 105/7, 551.

[23] 关于他的鼻部伤势以及不成熟的整形手术，见Eleanor Hancock, *Ernst Rö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2, 18.

[24] NA T84 EAP 105/7, 556.

[25]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6] NA T84 EAP 105/7, 566.

[27] 1924年3月2日《巴黎之声》。

[28] NA T84 EAP 105/7, 589.

[29] Br. B. Nr. 11223, November 24, 1923, HA 67/1493.

[30] 1924年3月1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1] NA T84 EAP 105/7, 605-7.

[32] NA T84 EAP 105/7, 619.

[33] 1924年3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日伦敦《泰晤士报》，1924年3月2日《法兰西行动》，以及1924年3月3日《时报》等，不过观众还是偏向被告一方，1924年3月2日《时代报》（*La Siècle*）。

32 一杯苦酒

他让我们行动了起来，然后他停住了，于是我们就从他身上辗了过去。^[1]

——罗伯特·瓦格纳，关于冯·洛索将军

阿道夫·希特勒的审判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展开，奥地利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写道。主要被告是一个没文化的家具软包匠，自称是作家，但大家都信了。他用了几个小时大谈他那无足轻重的人生，被阿谀奉承的报纸一字不落地印发出来。他的同党是个名誉扫地的将军，从历史的“死者名册”^[2]里拽出来的，他的出庭只能证明一件事：他没看过军事书籍以外的书。然而要论愚蠢，罗姆上尉才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人真的相信德军有不战败的可能吗？罗特问道。

《法兰克信使报》（*Fränkischer Kurier*）则正相反，认为本案的真正问题在于，这样一件德国内部事务，竟然允许外国人入内旁听，是法庭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蠢行”。《德意志日报》（*Deutsche Tageszeitung*）也这么认为。各路敌人都在幸灾乐祸。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之类的民主派报纸，他们不满地表示，这场审判的重点很奇怪：为什么共和国受到的质问比被告人还多？

3月3日星期一早上8:52，奈特哈特法官开启了又一个充满争议、各说各话的庭期。审判的第六天，将再度成为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观，让人难以分辨法官、检方和辩方的区别。

57岁的辩护律师、代理海因茨·佩尔内的海因里希·鲍尔（Heinrich Bauer）立即站了起来，对两份慕尼黑左翼报纸的审判报

道表达不满。他说辩方并没有一味发表“最不着边际”的演说，充斥着“炫耀和个人的野心，生怕被其他辩方律师盖过风头”。^[3]他称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寻求真相，希望奈特哈特没收这些不轨记者的旁听证。

卡尔·科尔提了一个相对有实质意义的观点。他说起昨天的一项控诉，即巴伐利亚领导人的行为无异于谋杀。科尔查阅了警察手册，把在和平示威活动中应对游行者的正当程序读了出来。

警方必须有三次尝试，可以通过号手、鼓手或信号员，每一次都要有现场主官发出的明确警告。警方必须给人群留出离场的时间。这些规定无一得到遵守。事实上警方是立即向示威者开火的，尽管游行队伍中有一名德国陆军元帅和许多参战老兵。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

“民众称音乐厅广场的流血事件为谋杀，毫无疑问，必须对卡尔、塞瑟和洛索先生发起控罪！”他要求立即逮捕三名领导人。^[4]

凭借像这样的言论，卡尔·科尔很快确立了最凶悍辩方律师的声名。伦敦《泰晤士报》形容他脾气“暴躁”。^[5]极右翼报纸《人民信使报》的一个记者都说，科尔说话不过脑子。他是一台大热新闻制造机，渴望得到关注，而且也的确做到了。每次他一张嘴，观众席就兴奋异常。^[6]

施坦莱恩选择先避开这种戏剧化的手法。“对音乐厅广场事件的初步调查尚未得出结论，”他宣称，同时他也表示对当局的清白有信心。^[7]奈特哈特开始进行后面的事项，没有让辩方继续把话题带离主线，即从对希特勒的审判转向一场对邦领导人的谋杀控诉。

今天出庭的被告人是政变里的次要人物。首先上场的是罗伯特·瓦格纳中尉，这名29岁的军校学员被控动员他的步兵学院同学去支持希特勒。他是第一个身着军装进入法庭的被告人，出庭作证时也是如此。一个倾向辩方的《人民信使报》记者说他看上去英姿飒爽。

和其他几位被告人一样，瓦格纳称他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始于1918年和1919年的革命动乱。而后他说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亲历故事，是他与总统的侄子“艾伯特上士”^[8]的一次遭遇，此人据说在瓦格纳所在的团挑起了一场兵变。他说这件事给他灌了满满一杯苦酒。

瓦格纳的话在媒体报道中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但是这个所谓的“艾伯特上士”并非总统的侄子，连亲戚都不算。事实上总统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负伤。被告所说的这个人假扮的，这一点当时还不为人知，导致法庭里的人们开始想，目前身处困境的总统的这位传说中的侄子是否背叛了他的祖国。

在述及军官学院事件时，瓦格纳解释了为什么他和同学们毫不怀疑巴伐利亚当局是支持政变的。在那里当校长至1922年的冯·洛索将军命令学员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学校教员也告诉他们，卡尔准备挥师柏林，并且希望希特勒能出来主事。

瓦格纳的证词所透露的一些巴伐利亚民族主义的幕后故事，让人甚为好奇。作证期间瓦格纳承认，他不接受重大叛国的指控是因为——用他的话说——宪法已经不复存在。此外，只要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治下，用“协商和谈判”^[9]来解决国家问题，德国永远得不到自由。

柏林《福斯日报》记者注意到，在瓦格纳作证时，法庭前排几名身着制服的军官显出不自在的样子。^[10]

等到被告人开始讲述11月8日在步兵学院的经历时，检方提出转为闭门审理。

37岁的辩方律师瓦尔特·汉密特表示反对。事件本身也许有可怕的牵连，但他认为没理由向公众保密。瓦格纳的证词完全没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東西。

然而法官裁决同意检方的提议，下令清场。

在闭门庭期中，瓦格纳称参加政变的军校学员们并没有违背纪律、服从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恰恰相反，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11月8日的行动，是几个月的秘密训练与筹备的结果，旨在为德国争取自由。这难道是背叛？

埃哈德问被告，作为一名军官，他是否曾向宪法宣誓？

瓦格纳承认宣誓过。

那么，埃哈德问道，他是否履行了义务？

瓦格纳试图说明，他没有背弃誓言。他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做错事，因为巴伐利亚军方支持了这项运动。他们从一开始就丝毫没有怀疑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主审法官提醒被告，他此前的证词说，在他看来宪法已经“不复存在”^[11]。

埃哈德转向法官，说幸好他们是在秘密审理中，因为看到像被告人这样的一名年轻的国家防卫军军官藐视宪法，会给人们留下很糟的印象。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德国会怎么看？更遑论全世界了。

“这是个问题还是谴责？”奈特哈特法官问道。

无法保持沉默的被告人开始攻击埃哈德。第二检察官这是要抓住他年轻这一点，瓦格纳说，尽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没那么大”。^[12]（埃哈德的长相显年轻。他36岁，比被告大7岁。）

此外，如果检方那么担心审判带来不好的印象，瓦格纳的律师说，那就应该面对本案暴露的最不堪的丑闻：军校里“从指挥官到年纪最小的军官”^[13]有约250人为了同一个目标去努力，他们现在都好好的，包括巴伐利亚领导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唯独邦政府要拿他的当事人问罪。

随着争议再一次转变为对当局的攻击，辩方律师洛伦兹·罗德说他的当事人希特勒注意到，其中一名防卫军代表在向检方发出暗号。他希望立即制止这种干预。

施坦莱恩说他完全没注意到有这样的信号。

不能再这样审下去了，主审法官说，这是在让所有人蒙羞。他无意去弄清楚军方代表是否真的试图与检方联络。他的对策还是老一套，敦促大家保持小心谨慎。

上午11点半左右，法庭重新开放，瓦格纳重述了他的证词，没有提到任何可能被认为有碍国家安全或令军队蒙羞的内容。这份经过删改的证词让人觉得乏味且无关痛痒，在德国和国际媒体上较少提及。

经过一段意外的延误——在此期间辩方律师聚在一起商谈策略——下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是鲁登道夫的女婿海因茨·佩尔内。他的证词在哈瓦斯通讯社看来几乎没什么内容，属于迄今最无聊的证词之一。^[14]无论是在政变还是审判中，佩尔内始终是个次要人物——而《巴伐利亚信使报》认为，这个角色跟他是相称的。^[15]伴随着耸人

听闻的爆发、喋喋不休的争吵，还有越来越频繁出现的闭门庭期，这场希特勒的审判将走向一个更糟糕的方向。

[1] NA T84 EAP 105/7, 655.

[2] 1924年2月29日《前进报》。

[3] NA T84 EAP 105/7, 627.

[4] NA T84 EAP 105/7, 631.

[5] 1924年3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

[6] 1924年3月4日《人民信使报》。

[7] NA T84 EAP 105/7, 633.

[8] NA T84 EAP 105/7, 638. 对此事真相的揭露见1924年3月9日《前进报》。

[9] NA T84 EAP 105/7, 639.

[10] 1924年3月3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11] NA T84 EAP 105/7, 668. 奈特哈特对瓦格纳这个说法的提及见NA T84 EAP 105/7, 668, 643。

[12] NA T84 EAP 105/7, 670.

[13] NA T84 EAP 105/7, 673.

[14] 1924年3月4日哈瓦斯通讯社。

[15] 1924年3月4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33 弗里克博士

我把那么多警官打发走是因为，我认为舞蹈将于明早开始。[1]

——威廉·弗里克博士

“喜剧，喜剧，可悲的喜剧，”安德烈·佩尔（André Payer）在《新闻报》（*La Presse*）上写道。[2]他指责这场审判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用的是观众已经看过的剧本，演员的才能也已经撑不起他们要饰演的角色。鲁登道夫尤其像是个选角失误。他看上去老迈而疲惫。他不通常理。《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 伊巴拉说，他只是一味地倾倒着“词语，词语，词语”，但是除了“让极端日耳曼民族主义出丑”以外并没有什么作用。[3]

瑞士《新苏黎世报》说鲁登道夫上演了一出“幻灯戏”，[4]强调了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的威胁。不过对将军的不满显然主要是他将天主教描绘成德国的敌人——在一个天主教徒甚众的国家，这不是受欢迎的立场。

教廷驻慕尼黑大使尤金尼奥·帕切利蒙席留意这一趋势已经多时。在写给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ri）的一封加急信函中，他谴责纳粹企图挑起人民对教会和教宗的仇恨，将耶稣会描绘成一个邪恶的国际共济组织。这些宣传和纳粹运动本身一样“粗俗而暴戾”，[5]不过从它的报纸过去几个月发出的种种咆哮来看，他并不感到意外。

科隆大主教是最早对鲁登道夫的言论发起抗议的人之一，他指出笃信本教的国民曾在德意志国建国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巴伐利亚信使报》发表长篇文章驳斥鲁登道夫的“与罗马开战”[6]的观点。从罗

马的《意大利晚报》（*Corriere d' Italia*）到伦敦的《每日邮报》，许多报纸摘录了这篇文章，并历数天主教徒对这个国家的价值。

当初难道不是本笃十五世和他的枢机卿伯多禄·加斯帕里出面干预，制止协约国将威廉二世、兴登堡以及许多德国知名将领作为战争犯告上法庭？这些躲过一劫的人当中，就包括鲁登道夫自己。

还有曾在鲁登道夫将军麾下精忠报国、战死异乡的天主教士兵呢？还有那些犹太士兵，为德国献出了生命，到头来却被他们的司令官恶语中伤？《时代》杂志写道，鲁登道夫的发言“写得拙劣，读来也拙劣”。^[7]其中的理念就更糟了。伦敦《观察家报》称他的话根本不着调。

鲁登道夫在法庭上发起的攻击本是打算展现他者之恶，结果只是“暴露了他自己的本性”，^[8]德国天主教中央党报纸《日耳曼尼亚》（*Germania*）写道。凡是听过鲁登道夫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发言的人，有谁会觉得他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大将军？顶多就是一个年轻的参谋。《福斯日报》觉得他更像是个精神错乱的步兵学员。《前进报》直接说他是头蠢驴。

对于鲁登道夫的怪异表现，《巴黎之声》记者有个猜想。从这位被告人多年来接受的采访看，他总结将军这个人“性情冲动，野心勃勃”，^[9]苦于自己在共和国政权中只是个次要角色。这种苦闷让鲁登道夫开始不顾一切——且容易被骗——以至于被希特勒这样的平庸之辈拉拢。

还有的更进了一步，提醒大家正是鲁登道夫糟糕的判断力导致德国战败。他不理解自己的国民，显然对这个世界也不太理解，仿佛一直活在俾斯麦的时代。连一些鲁登道夫的支持者也表示将军误入歧途

了。“令人遗憾，”《德意志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写道。

希特勒的审判还启发一些人去反思德国极右运动的本质。要理解“希特勒-鲁登道夫乱象”，[\[10\]](#)《前进报》写道，免不了要先分清因本次审判受到关注的两个新兴阵营。一个阵营大多为天主教徒和君主派，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在柏林，或者觉得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更大的问题。另一派人的精神根源是尼采，还有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之类的种族主义理论家。这个种族主义群体用钩十字作为符号，极为反犹，同时加入了一种反基督教观念，不过后者程度相对低一些。鲁登道夫的长篇大论打动的是第二类人。

这个分析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鲁登道夫在他的极右翼支持者当中造成了分裂，而希特勒没有。他横跨这两个阵营，正如他此前已经证明的，他很擅长将两群不太相干的人揉在一起，一方是纷纷去参加冲锋队的暴徒，另一方是相对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支持者，在恶性通胀中遭到重创。鲁登道夫的光环在消失，希特勒却从中赢得不少好感。城中甚至开始有传闻说，[\[11\]](#)希特勒会利用这次的人气提升[\[12\]](#)去竞选议员。

不过，首先他得撑过这次审判，逃脱长期徒刑和驱逐出境的惩罚。

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人是威廉·弗里克博士。作为慕尼黑警察六局，也就是政治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弗里克被控“玩忽职守”，[\[13\]](#)没有将贝格勃劳凯勒的紧急事件告知邦警和安全部队。

这位46岁的被告人举止温和典雅，^[14]《柏林日报》一位记者说他“又高又瘦，像一棵杨树”^[15]。这场官司引来的关注让弗里克颇觉有趣。在写给姐姐的信中，他说他一不小心成了一个欧洲名人。不过，在出庭作证的时候，就看不出幽默或打趣的痕迹了。

弗里克首先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重点是他的以国为权力化身的概念：“没有[这一点]，一个国家就没有权力、尊严、威望或政府策略。”^[16]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一权力原则一直是一个根本——无论是在本国还是海外。“我此生片刻未曾被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或民主的思维方式误导，”他骄傲地宣称。

弗里克对当今德国政府深恶痛绝，认为它是无能的化身。政权要受一个“不可救药的政党制度”摆布。国际关系上踉踉跄跄——像“一只皮球”——“被人厌恶地踢来踢去，把力气都用在对敌人或外国援助的可悲抱怨上，做出无力，进而显得荒唐的抗议。”

弗里克证词中格外惊人的一部分出现在下午，当时他只是在随意甚至即兴地谈着自己作为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弗里克承认从1919年开始，他一直利用自己的职务支持刚刚起步的纳粹党——他说那个时候这个组织“还小，很容易被压制”^[17]。弗里克选择希特勒的党是因为它可以在“被马克思主义感染的工人”群体中立足，因而有希望成为“德国复兴的胚芽”。^[18]

11月8日政变发生时，弗里克正在警察总部，因为他要在那里开会到当晚6点半。他记得自己当时在考虑要不要参加啤酒馆的集会。“精彩的演讲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19]他说，估计当晚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不过晚饭过后他改了主意，打算还是去。正在这时，他看到晚报已经来了，于是判断可能比他预想的要晚。他选择待在办公室工作。

弗里克对检方指控他玩忽职守的每一个事例都做出了解释。对于这种找借口和逃避的策略，柏林《福斯日报》的总结是“他什么都没承认，寸步不让”^[20]。他的话语间显得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英雄的待遇，这位记者接着说，尽管在那个晚上他拒绝面对任何的危险。

在弗里克看来，啤酒馆政变的惨败归根结底责任在巴伐利亚当局，尤其是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如果卡尔能把变卦的消息告知他们，那么，弗里克对法庭说，他可以在午夜新闻发布会上知会报社的编辑们，王宫外那场毫无必要的流血就可以避免。

[1] NA T84/2 EAP 105/7, 724.

[2] 1924年3月2日《新闻报》。

[3] 1924年3月2日《纽约时报》。

[4] 《新苏黎世报》1924年4月2日第一晨版。

[5] 尤金尼奥·帕切利致伯多禄·加斯帕里，Dokument Nr. 1091, 1923年11月14日，“Kritische Online-Edition der Nuntiaturberichte Eugenio Pacellis (1917-1929)”，获取自www.pacelli-edition.de。

[6] 另见其他报章对这场论战的报道，如1924年3月4日《柏林交易所报》晨间版，1924年3月11日和1924年3月13日《十字架报》，1924年3月6日《亨内夫人民报》和1924年3月14日《梅拉诺报》。另见1924年3月5日《农民周报》。

[7] 1924年3月10日《时代》。

[8] 1924年3月1日《日耳曼尼亚》。

[9] 1924年2月26日《巴黎之声》。

[10] 1924年3月3日《前进报》。

[11] 1924年3月5日美联社，以及他在审判后做出不参选的决定，例见1924年4月4日《梅拉诺报》。

[12] 慕尼黑偏爱希特勒和鲁登道夫，1924年3月2日《时代报》。

[13] Anz. Verz. XIX 421/23, *Antrag des I. Staatsanwalts bei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auf Anberaumung der Hauptverhandlung*, January 8,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35-36, StAM. 关于弗里克还可以参阅Reinhard Weber, “ ‘Ein tüchtiger Beamter von makelloser Vergangenheit.’ Das Disziplinarverfahren gegen den Hochverräter Wilhelm Frick 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2 (1994), Heft 1, 129-50。

[14]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15] 1924年2月26日《柏林日报》。

[16] NA T84 EAP 105/7, 700.

[17] NA T84 EAP 105/7, 704.

[18] NA T84 EAP 105/7, 704. 吉奥格·福克斯日后会在一篇关于纳粹党早期历史的未发表文章中阐述“胚芽细胞”的概念，其中借引了珀纳和弗里克的想
法，*Zur Vor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hebung*, HA 4/113。

[19] NA T84 EAP 105/7, 714.

[20] 1924年3月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34 第一证人

我想，是希特勒先生认为，[啤酒馆目击者的]证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当时可能受到酒精的影响。^[1]

——费力克斯·路德维希·波特默伯爵 (Felix Ludwig Count Bothmer) 将军

经过六天的审理，被告人终于完成了开场陈词。然而对审理的质疑越来越多。《慕尼黑日报》注意到，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每次走进法庭都显得兴高采烈、胸有成竹，^[2]宣扬着一模一样的政治极端主义。他们在发言时不用担心被打断，显然想说多久就多久，想不说话就不说。而在气氛紧张起来的时候，奈特哈特会介入，转为秘密审理了事。

警方抱怨他们的部门遭到被告人肆意的攻击，而奈特哈特都懒得“抬抬指头”制止他们。军方也有类似的批评，此外还有多位巴伐利亚内阁成员，这样一场丑剧让他们十分愤怒。

“被告人不是在接受审问；他们是在发表演说，”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施威耶在3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厉声说道。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部长称法官的纵容已经严重到居然允许其中一名被告人——韦伯医生——周末离开关押地，在城中散步。^[3]

这场审判让媒体忙得不亦乐乎。如果他是主审法官，《巴伐利亚祖国报》的一名记者说，他会终止这场拙劣的演出。^[4]不过，他发现其中还有一些未发掘的潜力。应该把审判录下来播出——德国第一家电台四个月前在柏林开播。这样一来，全世界不但能读到，还能听到这出难以置信的闹剧，法庭可以卖广告。他开玩笑说，希特勒的洪亮嗓音可以用来给牙膏或痔疮疗法打广告。

施坦莱恩同样遭到批评。《巴伐利亚祖国报》斥责检察官是个可悲之人，让被告人没完没了地夸赞自己的英勇事迹，准确说是罪行。社会主义报纸《慕尼黑邮报》也这么认为。报道夸大了检察官的名气小，称这是他的“首次登台”，同时预言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对施坦莱恩有好感的人则认为不要急于下结论，至少要等合议庭对检方整理的证据质量有了解后再说。1924年3月4日星期二，审判进入第二阶段，传召第一批证人并权衡证据。

不过那天上午稍稍有些延误，安保人员需要仔细查验各类旁听证和入场卡。然后是已经成为惯例的抱怨和投诉。这一次，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提出了一些严重的异议。

罗德首先想抗议一种蓄意掩盖事实和影响证人的企图。他声称——并非全无依据——这种控制巴伐利亚报纸的做法始于1923年11月9日，它们受命不得刊载任何与古斯塔夫·冯·卡尔认可的官方看法冲突的内容。

在平息对方的反对后，罗德接着说，有两份在传阅的文件对政变过程给出了一个巴伐利亚政府认可的版本。其中一份是长46页、没有署名的所谓“蓝白册子”^[5]——这个绰号来自巴伐利亚的传统色。另一份是有冯·洛索将军签名的秘密报告。这两份小册子和备忘录^[6]在军队、邦警以及各官员俱乐部内传播。其中指示各部门领导人了解案件“真相”，并敦促他们分享给自己的属下。

罗德拿出了报告的一个副本，上面标有“秘密！”和“机密！”^[7]字样。希特勒的律师翻看着文件，把一个圈出来的段落读了出来，内容是禁止对本文件进行复制或摘选。接着罗德查验了文件，并与证人的审前讯问进行比对，观众此时已经被深深迷住。“我发现冯·塞

瑟总警监的 [审前] 声明和这份文件是逐页对应的，几乎是逐词。”
[8].

他读出了其中一段来证明他的说法。

主审法官显然有些不安，企图阻止罗德，他建议罗德等一等，要用自己的证据开示来与证人对质。

罗德提醒合议庭，他在谈论的可是一项试图影响本案证人的统一行动——法庭应该在审阅证词之前了解这一真相。他还声称，根据他的调查，这份报告必定是由三巨头传布出去的，可能是冯·洛索将军，起草人是冯·塞瑟总警监，至少也是他的某个邦警下属的手笔。

此外，罗德想要指出一些不寻常之处。德国法律规定每一个证人必须独立做出陈述，但这一点显然没做到。卡尔、洛索和塞瑟是在审前调查的最后分别接受问讯的，然后他们可以阅读此前已有的陈述，甚至用在自己的陈述里。他保证这些严厉的指控都能拿出证据来。

奈特哈特再次阻止了他，称这些目前是无从证实的。

然而罗德不依不饶，并且得到鲁登道夫的首席律师威力巴德·冯·策奇维茨的支持。后者更进了一步。他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解释这份机密报告和本案起诉书之间的“惊人一致” [9]，那就是两份文件可能有同一个来源：检方。另外四名辩护律师立即表达了认同。

这时候，施坦莱恩一跃而起，强烈否认他的办公室与这份文件有任何关联。他和下属都完全没有参与机密报告的起草或传发。

无论是从哪里来，鲁登道夫的第二辩护律师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指出，事实上多名已安排出庭作证的证人收到了这份文件。出于审案的需要，至少应该当庭朗读它的内容。

法官决定退庭审议这项动议。

与此同时，美联社驻外记者惊讶地发现，辩方是可以自由活动的。^[10]阿道夫·希特勒在向旁听席的女人献殷勤，吻她们的手，被《汇报》形容“举止如纨绔子弟”^[11]。还有人看到他和一名衣着惹眼的男子交谈：此人身穿战地灰色军官大衣，^[12]上面别着黑白红三色的帝国帽章，毫不掩饰对魏玛共和国的侮慢。法官已经完全失去对法庭的控制了吗？

奈特哈特走出来宣布，暂不宣读小册子的内容。他承诺到后面会准许宣读，具体会由他来决定。但那一刻始终没有到来。

在法官传召第一个证人前，检方提出闭门审理。这些证人都来自国家防卫军，他们的证词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辩方反对。法庭没有闭门开庭的必要，鲁登道夫的律师策奇维茨说：现在需要做的是防止旁听席里的军中人士对证人进行不正当的影响，甚至是胁迫。他随即吁求主审法官将那些人驱离法庭。

这时候，旁听席里的两名军人站了起来，要求准许他们在作证期间旁听。

法官进入当天上午的第二次退庭审议，五分钟后回到法庭，再次做出支持检方的决定。民众需要离开法庭。奈特哈特还准许军方代表留在法庭。

开始闭门审理后，^[13]第一批安排了10名左右证人出庭，第一名证人——58岁的汉斯·蒂绍维茨·冯·蒂绍瓦将军（Hans Tieschowitz von Tieschowa）——当天上午走上证人席，他是步兵学院的指挥官，他的学员是此次政变的支持者。

对于步兵学员在11月8日夜里的这种似属叛国的行动，证人的解释是他们相信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起义即将爆发。在爱国之情的驱使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下反对国家的罪行。

随着提问继续偏离对被告重大叛国的审判，转向巴伐利亚领导人串谋的可能性，奈特哈特把证人打发了下去。在闭门庭期第二位出庭作证的是步兵学院教官路德维希·利奥波德上校，就是他在11月9日一大早去通知鲁登道夫，洛索已经决定反对政变。

问了半天没问出什么名堂，直到鲁登道夫插进来问证人是否记得，当时他承诺不会向防卫军或邦警开枪，并要求把这话转告冯·洛索将军。

利奥波德表示确有此事。

洛索反过来是否曾想过捎信给鲁登道夫，也许想警告他防卫军有开枪的打算？

不，他没有，证人表示。

主审法官决定终止利奥波德的作证，并表示其他九名防卫军步兵学院的证人没有出庭的必要。检控双方破天荒头一回都没有反对。对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而言，这些证词可能有损巴伐利亚领导人——他们的主要证人——的名誉，这对他们没好处，甚至可能进一步加深与政变的牵连。罗德和辩护团队也觉得，在闭门审理的情况下，他们准备的那些战术策动和一惊一乍的花招没有多少施展的机会。

那天下午2:52，^[14]法庭重新向公众开放，来自慕尼黑警方的一连串证人将依次出庭，媒体因此称这一天是“警察日”^[15]。11名证人鱼贯而过，不过不少人只是给审理平添更多的困惑。

其中42岁的政治警察部负责人弗里德里希·贝恩罗伊特（Friedrich Bernreuther）不得不承认，由于弗里克的干预，他并不知道啤酒馆发生的事。他进一步表示，在得知有如此重大的危机时，一名警官的职责是向邦警、市司令官、保安队和刑警报告。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贝恩霍于特说。^[16]

施坦莱恩和埃哈德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弗里克根本没那么做。

另一名证人、慕尼黑警察政治部门的海因里希·巴尔斯（Heinrich Balss）博士说，他曾看到弗里克得知要被提拔为警察总长时的表情。当时他看着弗里克的眼睛，感觉被告对这个消息深感意外，完全不像听到了喜讯。他还证实弗里克从未用这个新官衔自称，也不允许其他人这么称呼他。

埃哈德问，希特勒是真的表示要成为德国的领导人，还是只是声称是运动的吹鼓手？

证人表示记不太清了。他在报纸上看到很多东西。就在埃哈德进一步逼问之时，希特勒插话说，他非常肯定自己宣布过，他希望“承担国家临时政府的政治领导工作”^[17]。他拿出一份《慕尼黑最新消息》，^[18]在全场的注目之下，希特勒开始大声朗读上面报道的他那场啤酒馆演说。

而后希特勒看着检察官，^[19]突然显得异常的激动，仿佛此刻回到了贝格勃劳凯勒。他怒吼道：“对十一月罪人的追责和清算，终归是我的头等大事，检察官先生，就算现在做不到，咱们来日方长！”^[20]

欢呼声响彻法庭。

[1] NA T84 EAP 105/7, 961.

[2] 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报》。

[3] 1924年3月4日内阁会议记录,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215-17. 奈特哈特的偏袒引起了广泛注意, 比如1924年3月6日《前进报》以及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March 2, 1924, Nr. 75, 153.

[4] 1924年3月7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5] 小册子署名“我来我见”(Veni Vidi), 标题为《鲁登道夫在巴伐利亚, 或十一月政变》(*Ludendorff in Bayern, oder Der Novemberputsch*, Leipzig: Vedula-Verlag, 1924)。

[6] “Der Putsch am 8. November 1923. Vorgeschichte und Verlauf,”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r. 182, 487-515, 另有一些内容收录于Anlage 4a and 4b, 530-35。

[7] NA T84 EAP 105/7, 750.

[8] NA T84 EAP 105/7, 750.

[9] NA T84 EAP 105/7, 760.

[10] 1924年3月5日《高卢人报》。

[11] 1924年3月7日《汇报》。

[12] 1924年3月17日《时代》, 以及与希特勒交谈, 1924年3月5日美联社。

[13] NA T84 EAP 105/7, 774.

[14] NA T84 EAP 105/7, 817.

[15] 1924年3月5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6] NA T84 EAP 105/7, 828.

[17] NA T84 EAP 105/7, 861. 希特勒常说他是在狱中产生这个念头的，但是从所谓吹鼓手到领袖的转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将兰茨贝格作为起源地之前早已开始。

[18] 他提到的文章刊载于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最新消息》。

[19] Nr. 57, March 7, 1924, HA5/114II; 以及1924年3月5日《前进报》。

[20] NA T84 EAP 105/7, 862.

35 检察官的霉运

“关于不公开的讨论，我不能再做详述”——在公开讨论中，按照目前的情况，这样的言论足以引致一些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结论。^[1]

——路德维希·施坦莱恩

时至3月初，慕尼黑狂欢季渐入佳境，而希特勒的审判被认为是城中最大的狂欢。^[2]柏林《福斯日报》称这是德国近年来最奇异的政治事件。《巴黎之声》称之为“对正义的嘲弄”。^[3]

主审法官奈特哈特看来已经不堪重负。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这场磨难仿佛已经耗尽他的精力，法庭里越来越热，他在与疲劳甚至睡意做着斗争。有一两名记者说看到他在别人陈词时打过瞌睡。

奈特哈特的另一个问题引来了更多的批评，那就是他给人一种在偏袒辩方的印象。他文雅而恭逊，但可能有点过头了。《加拿大报》（*Le Canada*）惊讶于奈特哈特会当庭称呼鲁登道夫为“阁下”^[4]。事实上他对所有被告都使用这个称谓，只有一个例外：阿道夫·希特勒。这个首要被告人没有那个身份，于是仍然是“希特勒先生”。^[5]这种鲜明的差异，可能愈发提升了希特勒的平民化形象。

《小巴黎报》也嘲笑了主审法官的谄媚，仿佛是在说“希特勒先生，能不能向您提个问题？”《新闻报》则说，接下来，他连最无伤大雅的问题都得包裹一层限定条件。^[6]记者H. R. 尼克博克认为，奈特哈特根本就是吓蒙了，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一个被告发难时，连雪白的山羊胡都在颤动。^[7]

此外，面对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的大放厥词，奈特哈特没有表现出要阻止的意思，哪怕他们管被推翻的统治者叫“国王陛下”^[8]，不

把共和国放在眼里。维也纳的《维也纳报》（*Wiener Zeitung*）觉得，像瓦格纳这样身着军装的青年军官在斥责总统的画面尤其让人难以接受。^[9]

还有许多地方遭到指责。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的那些无理由、无意义的秘密审判，引起了一些左翼和中间派报纸的不满。这一点在德国乃至国外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在《日报》（*Der Tag*）那里，这却是值得称赞的地方。在该报看来，这是整场审判少有的几个与希特勒无关的可取之处。它认定主审法官保守国家机密的决定是正确的，没有让那些虎视眈眈的外国人得逞，他们都想知道防卫军手里有多少加农炮、机枪等战争物资。

3月6日，奈特哈特在上午9:15再次放观众入场，旁听第八天的这场简短但激烈的庭审。他开始宣读一系列信件，都是对某些证词的抗议，尤其是有关巴伐利亚军队和邦警配合啤酒馆政变的指控。主审法官也认为，遭到诋毁的政府当局理应得到一个自辩的机会。

辩方律师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对法国《晨报》的配图表达了不满，其中将他的当事人鲁登道夫将军描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头子。这些被他称为可鄙、愚蠢的“涂鸦”^[10]的画作，“无疑是没资格叫作‘讽刺画’的”。他赞扬了奈特哈特将这类人逐出法庭的决定。

他还对其他一些讽刺德国及其爱国公民的外媒文章表达了抗议。尤其是《纽约先驱报》。在一篇题为《啤酒革命领袖》（“The Leader of the Beer Revolution”）^[11]的文章里，这家美国报纸嘲弄了一场持续不到30分钟、最后以“希特勒仓皇逃跑，高贵的鲁登道夫将军哭喊着‘我投降’”收场的谋反。

另一位辩方律师卡尔·科尔起身表达抗议。不过这次不是替他的当事人、慕尼黑冲锋队指挥官威廉·布吕克纳说话，而是他的朋友威廉·魏斯（Wilhelm Weiss）上尉。此人原为遭封禁的报纸《祖国》的出版人，接着在后续的刊物《人民信使报》任主编，他因涉嫌参与政变而被捕。^[12]科尔攻击检方“肆意抓捕”^[13]像魏斯这样的无辜者，却让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逍遥法外。

法官打断了他，“我们现在处理的不是魏斯的问题，而是希特勒及其同党的问题”。^[14]

两者是相关的，带着点巴伐利亚口音的科尔高声说道。现在的问题是古斯塔夫·冯·卡尔空前严重的权力滥用。科尔问道，如果要抓人，难道那些造成11月9日流血事件的人不应该抓起来？

旁听席有人在喝彩，^[15]奈特哈特再次驳斥了辩方律师离题且无礼的言论。科尔拒不相让，说他在最后的陈词里还会再提起，因为法庭需要知道真相。

这时候，显然已经很烦躁的施坦莱恩站了起来，^[16]没有了一贯的气定神闲。他先是不知不觉咕哝了些什么，^[17]而后表达才清晰明确起来。“本案审理过程中，我反复遭到恶意中伤，”施坦莱恩说，这时候他的话开始磕巴起来，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尖利嗓音。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坚决，^[18]说他一直在克制地回应不间断的伤害和频繁的人身攻击，努力维持庄重的态度。“但今天我受够了！”^[19]

对突如其来的大爆发本已见怪不怪的观众，在震惊中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怒不可遏的施坦莱恩表示他不能再参与本案的审理。他转向汉斯·埃哈德，请他接手后面的工作。随后，他拿起自己的公文包冲出法

庭，摔门而去。[\[20\]](#)

法庭里一片寂静。观众、被告和法官面面相觑。一脸惊愕的副检察官提议休庭。

主审法官徒劳地想要避免此事成为又一桩引人注目的丑闻，斥责辩方律师使用“侮辱性的表述”。[\[21\]](#)

科尔接受了这一指责，不过在他做出抗辩时，埃哈德插话重申了他的休庭建议，接着他也离开了法庭。

“反正检察官有的是！”科尔讥讽地说。[\[22\]](#)

法庭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不少人鼓掌[\[23\]](#)大喊：“好样的！”[\[24\]](#)

“检察官遭羞辱”，[\[25\]](#)远在新西兰奥克兰的报纸都用上了这样的头条标题。《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 伊巴拉用“大吵大闹”形容当时的场面，还提到一些德国报章现在已经称希特勒审判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26\]](#)

极端右翼媒体对施坦莱恩和埃哈德发起了新一轮人身攻击。此事“精彩地展现了检方的敏感”，[\[27\]](#)《人民信使报》嘲弄地说。一名邦检察官主动认输，逃离法庭，如此玩忽职守可谓闻所未闻。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被告人每天都在法庭上遭到攻击——审判本身就是一种侮辱！——然而他们并没有逃走。

不过不少人对这位深受困扰的检察官表达了同情，毕竟他要日复一日地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氛围。《巴伐利亚信使报》记者赞扬施坦莱恩有着“天使般的耐心”。从这场“怪诞的审判”一开始就困扰着他的不公正待遇，终于让他不堪忍受了。[\[28\]](#)

《福斯日报》也说，检察官的不满就像一道闪电，让人们瞬间看清了这场审判的状况。希特勒等被告人摆出一副“日耳曼英雄”^[29]的样子，而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场面，不管是出于好感还是无能，法官们竟然一言不发，任凭检察官在徒劳地努力证明他们的罪行。《柏林日报》认定施坦莱恩离开法庭没有错。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面对如此“空前绝后的司法丑闻”，也只有这样的回应才算不失体面了。^[30]

还有人猜测施坦莱恩可能是长出了一口气，这场艰难的审判迟早会迫使他担负起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就是对巴伐利亚政府的许多权势人物发起检控。无论怎么看，伸张正义的希望都很渺茫。不少人公开表示，面对这场在《小巴黎报》看来“带有闻所未闻的歌舞杂耍式特征”的审判，最好是能离开慕尼黑，远离奈特哈特法官的法庭。^[31]

[1] NA T84 EAP 105/7, 2133.

[2] 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 1924年3月4日《巴黎之声》。

[4] 1924年3月1日和1924年3月6日《加拿大报》（蒙特利尔）。

[5] 1924年2月27日《小巴黎报》。

[6] 1924年3月6日《新闻报》。

[7] H. R. Knickerbocker, *Is Tomorrow Hitler's? : 200 Questions on the Battle of Mankind*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1), 11.

[8] 1924年3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9] 1924年3月6日《维也纳报》。

[10] NA T84 EAP 105/7, 908. 他指的可能是《晨报》1924年3月2日刊载的一些漫画。

[11] NA T84 EAP 105/7, 908.

[12] 1924年3月4日电讯联盟社；1924年3月5日《柏林交易所报》。另见VIa H. B. 123/24, February 28, 1924, HA 68/1494。

[13] NA T84 EAP 105/7, 911.

[14] NA T84 EAP 105/7, 911.

[15] 1924年3月7日《晨报》。

[16] 1924年3月7日《布拉格日报》。

[17] 1924年3月7日《巴黎之声》。

[18] 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3月6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7日《小巴黎报》。

[19] NA T84 EAP 105/7, 912.

[20] 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21] NA T84 EAP 105/7, 912.

[22] NA T84 EAP 105/7, 913.

[23] 主审法官花了不少时间才让场面安静下来，1924年3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

[24] 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庭审记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i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85。

[25] 1924年3月7日《晚间邮报》（新西兰奥克兰）。

[26] 1924年3月7日《纽约时报》。

[27] 1924年3月8日《人民信使报》。

[28] 1924年3月7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29] 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30] 3月6日《柏林日报》晚间版，有的报纸提及了检察官的尊严，比如1924年3月9日《温哥华太阳报》，以及批评科尔的非难，1924年3月8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3月7日《慕尼黑邮报》。

[31] 1924年3月7日《小巴黎报》。许多报纸对审判能否继续下去表示了怀疑，比如1924年3月7日《人道报》；还有不确定检察官是否会回归，1924年3月8日路透社；以及很难找到替代人选，1924年3月7日维也纳《工人报》。

36 当务之急

一场远为险恶的阴谋正在酝酿中，其意在更迭德国的现行宪政，据推测，这一目标目前仍然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1924年3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1]。

《福斯日报》认为希特勒的审判读来就像一部连载小说。全过程本来应该只需要两周，结果现在可能还要再用上三周。检方预计要传大概80名证人，辩方150名。有些报纸的报道给出的数字还要高。由于一个笔误，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给出了最高的预测，“超过2000人”^[2]。

1924年3月7日，奈特哈特宣布开庭。在卡尔·科尔代表辩方律师道歉后，施坦莱恩同意回到法庭——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起的作用可能也不小。^[3]法官重申，他希望这场审判能有礼有节地进行，避免一切“为法庭尊严所不容”^[4]的事件。如若不然，他会对被被告人进行分别审判。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巴黎之声》饶有兴味地说，仿佛暴风雨过后透过乌云的一抹蓝天。^[5]

法官和律师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不过包括《人道报》在内的多家报纸还是嗅到了一点丑闻的气味。这种突然而意外地出现的一团和气，表明法官、检察官和辩方律师在求同存异，^[6]联合起来防止这场丢人现眼的审判被转到莱比锡的邦最高法院。不少批评人士称这是有可能的，并且也不失为结束慕尼黑这场司法闹剧的好办法。

《慕尼黑邮报》尤其不太相信表面的和谐能保持下去。文章说，就算辩方律师无奈之下走上了前往卡诺莎的忏悔之旅^[7]——这里指的是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前去寻求教宗格里高利七世的

宽恕，结果被迫在暴风雪中等待了三天——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对其有利的现实。

就在主审法官准备传召当天上午的第一名证人的时候，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清楚审判庭有权决定以何种顺序传召证人，然而他提出，法庭应该放弃一系列的证人，因为他们只能就自己在啤酒馆的所见所闻作证。奈特哈特应该传召的是对本案会有重大影响的三个人：卡尔、洛索和塞瑟。他们的证词可以让法庭明白，他们的行为是“彻底的虚伪”，还是“严肃的合作”，顺便还能尽快地得出裁决，完成人民法庭的使命。^[8]

奈特哈特没有理会他的建议，按原计划传召了下一位证人。

此人就是《慕尼黑日报》主编阿道夫·席特，卡尔的新闻主管，也是邦务委员在啤酒馆政变之夜的演说稿作者之一。罗德提出反对，认为他不是中立人士。作为一个受雇于卡尔的人，^[9]席特应该更适合被当成一个重大叛国罪的共犯，而不是证人。法官再次没有理会他。

席特显然很不自在，说话犹犹豫豫，声音很低。他认为1923年11月8日晚在啤酒馆的集会“有益甚至必要的”，可以让卡尔有机会展现他“与马克思主义搏斗”的决心。^[10]活动本意是动员他的支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柏林迟迟不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政权十分不满。

然而考虑到这场讲话的性质，席特当晚发现，聚集在啤酒馆外的人远比他预想的要多。他费了好大劲才挤到宴会厅前方给他预留的位子。随着希特勒的到场，以及一系列向新成立的国家政府的宣誓，席特意识到，他实际上目睹的可能是一场革命。

他当时是否认为卡尔在演戏？

不，他没有，^[11]证人说，不过他开始思考并且最终认定，他无法解释卡尔的行为。到最后，啤酒馆的冲锋队开始放人时，席特是带着忧愁和不安离开的。

辩方律师科尔于是开始利用证人攻击卡尔，他问这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作为“国王的总督”的就职演说，和他维护共和国宪法的誓言如何能够共存。

奈特哈特否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三名辩护律师同时出言阻挠。

“绝对不可以！”奈特哈特说。^[12]

接着席特顺利应对了一系列问题，或者用《小日报》驻外记者的话说，是“被12名律师用相当不友好的问题滋扰”。^[13]主审法官一度问席特，在计划啤酒馆集会前，他是否跟什么人联系过，证人迟疑了一下，然后直接拒绝回答问题。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人道报》发现，奈特哈特法官毫不犹豫地容许了这样的回绝，仿佛在掩盖一桩因卡尔而起的丑闻。^[14]

得出这个结论的不只是这家法国报纸。在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在国会起身表示，卡尔、洛索和塞瑟理应和希特勒一同受审。退一万步讲，巴伐利亚政府哪怕有那么一丁点的警觉和远见，啤酒馆政变本身就不会发生。关于高层人物串谋推翻德意志共和国的说法，必须加以调查。

在上午和下午的庭期中，一共有17名证人在法庭前匆匆而过。他们大多是啤酒馆的目击证人，并且显然是卡尔、洛索和塞瑟的支持者。

下一个证人费力克斯·冯·波特默伯爵将军就符合这个特征。“此事给我的印象是，”波特默评价希特勒冲击啤酒馆的行动，“这

是一场精心准备的、野蛮的伏击，靠某种预防措施挫败它是不可能的。”^[15]他接着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卡尔和三巨头是真心参与。将军有种居高临下的威严，以至于《高卢报》注意到，连辩方都难得地没插嘴。^[16]

当时坐在讲台附近的历史教授卡尔·亚历山大·冯·穆勒不这么认为。他丝毫没有觉得，三巨头对政变的参与是在表演。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想。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巴伐利亚领导人看上去都太严肃了。仿佛历史的篇章正在展开。

还有一位证人，外交部高级参事、就政变写过多份备忘录的卡尔·索默尔（Karl Sommer），描述了他在希特勒攻入宴会厅时感受到的恐惧。他第一时间担心的是极左派来袭，因为这是卡尔的反马克思主义集会。

“高级参事好像在读稿子一样！”希特勒的律师提出反对。^[17]

“我不是在读，我认为我有权利使用笔记辅助我的陈词，帮助我回忆。”

除了手上的文件，这位证人还读到了其他东西。他显然知道蓝白册子，^[18]也知道在卡尔、洛索、塞瑟的支持者中间传阅的机密备忘录。军方和邦警的所有证人到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看过。

其中不少人似乎更关心的是替巴伐利亚领导人开脱，而不是回答关于本案的问题。其结果正如罗德所预料，导致了含糊与困惑。这个庭期一直拖到快8点，并且如瑞士《时报》（*Le Temps*）所说，没什么有意思的地方。^[19]

然而，通过法官在问讯方向上的拿捏，实际上可以看到这场慕尼黑审判的一个重要动因正在浮现。传统上认为奈特哈特是一名民族主

义者，偏向阿道夫·希特勒一方。这个说法并没有错，但主审法官的另一个优先级更高的事项被忽视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他最关心的是保护卡尔、洛索和塞瑟——进而也延伸到他们所领导的巴伐利亚政府、军队和邦警。这种对高层权势人物的袒护，将让希特勒在慕尼黑审判中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1924年3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

[2] 1924年3月6日哈瓦斯通讯社。

[3] 埃哈德在他的未发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司法部的会议，暗示了格尔特纳的作用，41, NL Ehard 99, BHStA。格尔特纳承认他在这段时间与律师见过面，*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384, copy in NL Ehard 90/3, BHStA。

[4] NA T84/2 EAP 105/7, 917.

[5] 1924年3月8日《巴黎之声》。

[6] 1924年3月8日《人道报》。

[7] 1924年3月8~9日《慕尼黑邮报》。

[8] NA T84/2 EAP 105/7, 918.

[9] 1924年3月7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8日《晨报》。

[10] NA T84/2 EAP 105/7, 920.

[11] 连卡尔的讲稿作者对他的所谓计谋都一无所知，是很说明问题的。外国记者卡尔·克里斯蒂安·布莱（Carl Christian Bry）问，难道就不能像对洛索和塞瑟那样，给自己的幕僚使个眼色吗？*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95。

[12] NA T84/2 EAP 105/7, 945.

[13] 1924年3月8日《小日报》。

[14] 1924年3月8日《人道报》。证人这是在以官员的保密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53项] 为依据，行使作为公务员的权利。不过作为讲稿作者，他究竟算是政府雇员，还是卡尔个人的雇员？法官不愿意就此质问证人。另外可参阅Gruchmann, Weber, and Gritschneider (1998), II, 576, note 4。

[15]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rans. H. Francis Freniere, Lucie Karcic, 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II, 24.

[16] 1924年3月8日《高卢人报》。

[17] NA T84/2 EAP 105/7, 990. 关于他在读稿的说法，见1924年3月8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8] 指的是“Veni Vidi, ” *Ludendorff in Bayern, oder Der Novemberputsch* (Leipzig: Vedula-Verlag, 1924)。

[19] 1924年3月9日《时报》，没有透露什么重要的信息，见报告，Nr. 57, March 7, 1924, HA 5/114II。

37 “古怪的先生”

希特勒连穿马甲的墨索里尼都谈不上。^[1]

——1924年2月28日《工人意志报》（*Arbeiterwille*）（奥地利格拉兹）

1924年3月8日，审判第十天一开始就是一个秘密庭期，奈特哈特警告绝不可将审理的内容透露出去。接下来的打算是重新开放法庭，传后面的七名证人，其中防卫军六人，邦警一人。

闭门出庭的是54岁的雷根斯堡第20步兵团团长汉斯·埃策尔（Hans Etzel）上校。埃策尔说他在啤酒馆政变前一天去战争部开了一个会。冯·洛索将军讨论了希特勒发起袭击的可能性，并且明确表示如果这个鲁莽的狂徒过早行动，他将指挥巴伐利亚军队予以抵抗。

主审法官问证人，他是否记得，冯·洛索将军曾用“我们不会参与这种发疯的事情”^[2]这样的措辞来拒绝希特勒的计划。

埃策尔确认使用了“发疯”这个词。他还证实，相比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上台，洛索倾向于由柏林一些未具名盟友组建的一个专制政权。问题是北边似乎没人打算动手。

奈特哈特举了一些据说是洛索对希特勒的评价，问证人是否记得。其中一句说：“希特勒〔成事的〕希望不大，因为他相信一切由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解决。”埃策尔表示确有此言。

“在他看来，关于希特勒是德国墨索里尼的证据，目前还没能看到。”

埃策尔说这句也有。^[3]

上午10:30，奈特哈特请民众进入法庭。在下一名证人出庭前，鲁登道夫将军想要发表一份声明。

指挥官表示，检方试图在法庭上营造一种误导性的印象，即他和其他的被告人在攻击防卫军，这一点有必要做出澄清。事实绝非如此。在被控重大叛国的这十人当中，有九人曾在军中服役（唯一例外是弗里克博士）。“在我们眼里，防卫军是老陆军的延续，”将军说道。

德国的基本问题，鲁登道夫接着说，不在这些被告身上，而在他们的敌人，那些想方设法伤害这个国家及其军队的名誉的人。“本着我们对祖国的爱，对防卫军的愛，对防卫军的尊严与榮耀的关切，他们每一个，我们都不会放过。”

旁听席开始高喊“好样的！”

鲁登道夫这里自称要对抗的敌人都是什么人？是检方，还是他之前在法庭上点过的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这一次，仿佛是对之前遭受的批评有所顾忌，他选择不明确说出来。

卡尔·冯·希尔德布兰特（Karl von Hildebrandt）少将走上证人席，准备为鲁登道夫恢复名誉。在沿着差不多的线索陈述的过程中，他就鲁登道夫将军与希特勒打交道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日后在希特勒夺得权力的过程中，他所阐述的这种妄想会被许多怀着野心的政客反复拿出来说：鲁登道夫相信，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的人。

证人还说，鲁登道夫并没有与维特尔斯巴赫王朝和巴伐利亚为敌。恰恰相反，对于生活在这片南方土地上的坚毅、爱国的人民，还

有这里的“湖光山色，乡野美景”^[4]，他是充满敬意的。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他的敌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军官。

在证词的最后，证人对鲁登道夫评价德国天主教敌人的争议性言论做出了解释，说那是在攻击天主教中央党，而不是教宗、梵蒂冈或善男信女们。这个时候，希特勒不能再继续待在聚光灯外了；他对法庭说，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5]

和之前一天一样，最初的一批高级别证人^[6]说话都小心谨慎，好像在努力避免说出一些未经许可的证词。还有一些人，比如战争部参谋长奥托·冯·贝尔海姆（Otto von Berchem）中校，则出言捍卫军队的尊严，为他们在镇压政变中起到的作用辩护。

“我相信您大概可以理解，就因为尽了这份该死的职责，我们终于招来了这么多人辱骂我们，向我们啐口水，”贝尔海姆说，接着又改口说是“我们这份艰难的职责”。这番话引起法庭一阵骚动。^[7]

过了一会儿，鲁登道夫打断证人，说夺取战争部的命令虽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出，但命令本身正是冯·洛索将军签署的。

贝尔海姆迟疑了。的确有一道命令，他说，但那是四个月前了。他不可能记住自己过手的每一道命令。“阁下您也做不到吧。”^[8]

旁听席开始起哄。

他说的是事实，证人说，鲁登道夫不可能记得他在四个月前发出的每一道命令。

弗里德里希·韦伯的辩护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本来还有别的问题，但考虑到证人对一位德国英雄如此轻蔑，他不打算问了。旁听席爆发出更加响亮的欢呼。

这些辩护律师真是一群“古怪的先生”，《柏林日报》写道。^[9]当贝尔海姆这样的证人用事实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拒不配合他们的手段，把一场对已认罪的共和国叛徒的审判变成侮辱政府、军队和邦警的讨论会，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不敬。然而，最古怪的还是要属奈特哈特法官了。

旁听席那些起哄的，给鲁登道夫鼓掌，对证人发出讥讽，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毕竟整座大楼挤满了警察。为什么不把那些惹是生非的人赶出去，至少没收他们的旁听证？显然，奈特哈特对被告的好感——更糟的是，他生怕刺激他们，导致巴伐利亚邦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反柏林计划败露——促使他不能在审判中采取主动。如果奈特哈特不能维护法庭的尊严，《柏林日报》认为，德国政府应该阻止这出“司法喜剧”^[10]，将诉讼转至莱比锡的邦法院，那才是理应审理此案的地方。

临近中午的这段庭期揭示了不少事实，也出现了不少“状况”。当天最后一个出庭的是在政变镇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格蒙德·弗莱希尔·冯·因霍夫警司，是他让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并控制了城中的一些战略要地。弗里克和珀纳两名被告也是他逮捕的。

法官还没完成证人的宣誓，希特勒的律师罗德就要求中止仪式。既然这是一场重大叛国的审判，这名证人本身就应该受审。这是在秘密庭期中已经证实了的，罗德声称，十位被告在政变之夜的行动跟因霍夫警司这种政府当局的叛国者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施坦莱恩表示反对。

因霍夫说，尽管辩方试图造成那样的印象，但警方并无意向希特勒的人开枪，也无意加入他们。他们的职责是打击一切试图推翻政府的暴力行动，这和革命者持有的政治信念无关。

罗德问证人是否知道冯·塞瑟总警监给邦警下发的“密令”[\[11\]](#)。

因霍夫说他不能公开回答这个问题。

眼见接下来一连串问题仍然撬不开证人的嘴，辩方律师瓦尔特·汉密特也旁敲侧击地表示，因霍夫对啤酒馆政变中官员合作的情况了解，不只是他在法庭上说的这些。“我会很注意的，”汉密特闪烁其词地提起与政府当局的某些秘密会议。[\[12\]](#)

“事实上，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因霍夫答道。[\[13\]](#)

在这里，辩方律师再次利用了法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他对秘密庭期的依赖，以及民众对闭门审判内容的不知情。

当天的最后，辩方律师霍尔要求略过这些烦冗多余的问题和无关大局的证人，直接传召巴伐利亚领导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出庭，了结这些争议。令旁听席的许多观众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这一次主审法官说，对他们的盘问将于周一上午开始。

[\[1\]](#) 1924年2月28日《工人意志报》。

[\[2\]](#) NA T84/2 EAP 105/7, 1111.

[\[3\]](#) NA T84/2 EAP 105/7, 1113-14.

[\[4\]](#) NA T84/2 EAP 105/7, 1130.

[\[5\]](#) NA T84/2 EAP 105/7, 1146.

[\[6\]](#) NA T84/2 EAP 105/7, 1148. 另见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602, 1059. 接下来几个月里，在鲁登道夫攻击天主教的问题上，希特勒会继续与将军保持距离。

[7] 许多军方证人令人们兴味索然，1924年3月10日《政治与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8] NA T84/2 EAP 105/7, 1154.

[9] NA T84/2 EAP 105/7, 1158.

[10] 3月9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11] 1924年3月22日《晨报》。当然，类似的表述有很多，比如“贝格勃劳凯勒喜剧”，1924年3月9日《前进报》；或“蹩脚的喜剧”，1924年3月6日《慕尼黑邮报》。

[12] NA T84 EAP 105/7, 1180.

[13] NA T84 EAP 105/7, 1185.

38 危险的游戏

我没把这太当回事。当时感觉几乎就是希特勒在分配职位：你当皇帝，你当教宗，然后你是国王。^[1]

——奥托·冯·洛索将军

1924年3月10日，法庭将开始听取巴伐利亚政府高层的证词，他们已经成为辩方关注的焦点。气氛十分紧张。警方的警戒线和安保检查再度全面启动，以至于慕尼黑打趣地管法庭叫“占领区”^[2]。

上午的庭期照旧是以一系列的抗议、澄清和纠错开始。辩方律师吉奥格·葛茨想要驳斥《德意志汇报》的观点，该报称这位辩护律师的抗辩聒噪而粗鲁，反复打断别人，却什么也不能证明——唯一说明的是限制律师自由的必要性。他说辩护人的成功并不在于迷惑证人，干扰法庭的证据评估工作，而是试图去明确事实。要是某些媒体人士面对复杂的案件理不出头绪，他也无能为力。

讽刺的是，在反复要求传召卡尔、洛索和塞瑟后，现在却有一名辩护律师——奥托·加德曼——对此举表达了抗议。作为“整个计划的操纵者”，^[3]加德曼说，这些人理应以被告的身份上庭，接受重大叛国罪的审判。

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不同意同事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加德曼不是完全没道理：巴伐利亚领导人无论如何都谈不上“公平和中立”^[4]。罗德希望他们能如实承认自己在此事当中的角色，明确他们负有和被告同等甚至更多的责任，因为整个计划是在他们的示意下开始运作的。

这下轮到检方开始抗议。所有这些说法都缺乏证据，施坦莱恩说。双方吵作一团，直到奈特哈特宣布传奥托·冯·洛索将军出庭。这时候，全场安静了下来——一片“死寂”，^[5]《柏林日报》说，所有眼睛都盯着法庭的门。冯·洛索将军走了进来，^[6]手上拿着一叠纸慢慢走向证人席。他身形高挑，披着一件黑色长礼服，因为被解职后他已经不允许穿着军装。已经56岁的洛索看上去体型匀称、精力充沛，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

奈特哈特法官提醒证人，他有权拒绝自证其罪，拒绝回答任何在他看来可能构成损害的问题。主审法官还提示他，在发言时要考虑到对德国外交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

整个上午洛索一直在发言，时常显得兴致勃勃，让他那洪亮、铿锵的嗓音飘荡充满整个法庭——就算充满伦敦阿尔伯特音乐厅也没问题，^[7]《每日电讯报》记者说。他并不像许多证人那样坐在桌前，而是在法庭前方四处走动，时不时回到他布置好用来放笔记的讲台。

洛索的谈吐听上去就是个习惯了交际沙龙和会客厅的巴伐利亚官员。与此同时，他又时常显得很动情，用锐利、生硬的手势配合他的言语，露出牙齿的样子简直像只在狂吠的军犬。此外他还避免和多数被告人有眼神交流，尽管有时候会盯着希特勒或鲁登道夫看，透过他的夹鼻眼镜射出一道锐利的目光。《巴黎之声》记者说他看上去巴不得要跟他们“刀兵相见”。^[8]

冯·洛索将军从一开始就承认，他试图与北方的某些未透露姓名的权势人物结盟，他说这些人也希望能让德国从“日趋绝望的状况”中解脱出来。他们的计划实际上是建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或者说一个拥有“独裁权力”的右翼政权。不过他强调他们的目标不是发起政变。^[9]

他们打算在臭名昭著的魏玛宪法第48条的基础上实施法律和宪制策略。根据这条法律可以在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临时独裁政权，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曾136次启用该法，^[10]直至1925年2月下台，共和国的动荡不安跟这条法有莫大的关系。

他们的计划问题出在柏林。首都的政客和盟友拖了他们的后腿，顺便也让希特勒这样的局外人钻了空子。对此洛索毫无保留：

这些人，在政治和爱国集会上为了证明他们的民族行动主义什么都敢说；他们狂热的爱国情绪已经让他们忘记如何冷静思考；他们行事的根本动力就是政治野心。^[11]

这些人发表着看起来“有点幼稚”^[12]的演说。他们丧失了一切理智。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证人和希特勒只是在政变前大概9个月的时候才认识的，不过他对这个性急的年轻人给出了精辟的评价。“希特勒的雄辩是出了名的，一开始，这种迷人和善于启发的能力给我留下了极佳印象，”洛索说，“很明显，希特勒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听他讲得多了，第一印象就开始慢慢消退了。”

接着他开始详述自己对这位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的敬意是怎样消失，并且很快演变为彻底的厌恶的：

我注意到，他的长篇讲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点：他的观点，其中一部分对有民族意识的德国人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还有一部分则是在证明，对于什么是可能的、可实现的这些现实和尺度的问题，希特勒毫无概念。

因此，证人说，任何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能够抵御对理性的冲击，就不会受希特勒的演说影响。

同理，和希特勒交谈也是件让人抓狂的事。永远是希特勒在说，其他人很难发表什么见解，更别说反对了。冯·洛索将军说希特勒是个不善于倾听的人，很难让他接受与他的既有观念或意愿冲突的建议。

一开始，希特勒还显得缺乏个人野心，把自己说成是吹鼓手，想要为“将来出现的人”铺平道路。然而到了1923年10月，洛索已经明显感觉到变化。此时的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舞台上趾高气昂，他是“德国墨索里尼”，是能给收留他的这个国家带来重生的人。

洛索承认他在多个场合见过希特勒，甚至也得知了他的计划。他说自己之所以牵涉其中是因为，他想给这个有力的政治宣传家施加影响，他似乎是唯一能触及工人阶层的人。用他的话说，他的目标是把希特勒“拉回地面”。而后他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角色：他们不想“暴力镇压希特勒的运动”，因为他认为它“内里是健康的”，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用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将它引向合理的、现实的目标。[\[13\]](#)

结果到最后，洛索发现希特勒根本就不适合做领袖，独裁当然就更不行了。他很擅长为一项事业造势，但是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才能。证人的结论是，基本上希特勒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小地方政客”。[\[14\]](#)

不幸的是，引人遐想的新闻标题和一连串的臆测——洛索那双沾了血的手在政变里起了什么作用——淹没了他对希特勒领导风格的缺陷以及行事动机的深刻见解。不过，透过洛索的证词还是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些地位显赫的人物——哪怕那些不存在反犹立场的——会被希特勒这样一个意气用事、充满仇恨的人物迷倒，进而愿意去包庇与保护他。他们想要的回报是他在街头的号召力。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而洛索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

在希特勒和辩方的证词中有不少错误和对事实的歪曲，洛索说。他带着点怒气地表示，要想一一澄清，“我得说上好几天”。^[15]

那天接下来他说了几个小时。他说，自己与政变者达成的所谓共识，或者他们打算对柏林采取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凭空捏造”^[16]。他说11月8日去啤酒馆的时候，他以为就是一场古斯塔夫·冯·卡尔的普通政治集会。他完全没考虑做什么特别的防备，甚至连手枪都没带。

希特勒往讲台方向挤的时候，洛索表示当时脑子里“思绪万千”。这场狡诈的袭击让他“愤怒且无比厌恶”，这不仅是一种背叛，更糟的是，还有可能破坏他们自己的爱国运动计划。洛索带着“极度的悲伤”看着他们的计划徐徐展开。当前危急的局势本是他们行动成功的保障，现在全白费了。

“还能怎么办呢？”洛索问道。

首先，三巨头不能在啤酒馆直接对希特勒发难，因为那里有太多武装支持者。稍有意外或轻率之举，都可能导致某个暴徒慌张之下开了火，触发一场“全面而毫无意义的枪战”。同理，洛索说他当时判断三人在啤酒馆里屋也无法与希特勒对抗。

旁听席的起哄声打断了他的陈词。奈特哈特威胁再不恢复秩序他就休庭。

“要把祖国从这深重的险境中解救出来，”洛索这样解释自己在那天晚上的所作所为。他承认他的策略是“骗倒希特勒和他的同党，就像此前〔希特勒〕骗倒卡尔、塞瑟和我一样”。

他说上台的计划是他想出来的。根据同事卡尔和塞瑟“一闪而过的眼色和小声的言语”，他知道他们会配合。在和冲锋队队员一同去

啤酒馆的路上，洛索说了一句“演场戏！”于是三人一直等到可以自由行动后才使出全力抵抗希特勒。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无论他们有多不乐意或丢脸。[\[17\]](#).

接着洛索问，为什么希特勒和他的人在证人席上说到他们时带着“轻蔑…… [说成是] 可怜虫，彻头彻尾的蠢货”[\[18\]](#)，然而他们却想“把本邦最重要的职位交给我们”[\[19\]](#)。这样的自相矛盾该如何解释？

然而这里面的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难以理解。被告们在1923年的秋天希望卡尔、洛索和塞瑟能与他们联合。然而希特勒冲击啤酒馆的拙劣计划连慕尼黑当权者都争取不到，更别说推翻柏林政府了，此时他们迅速抓住巴伐利亚领导人自己已经承认的两面三刀，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们。

在奈特哈特宣布开始盘问时，辩方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说他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20\]](#)，不过要等法庭听取了塞瑟和卡尔的证词后才拿出来。希特勒也是这么打算的，尽管他还是一跃而起，对着乱哄哄的法庭大喊：“洛索先生的陈词是不实和错误的！”[\[21\]](#)

本庭期于下午6：33结束。

[\[1\]](#) NA T84 EAP 105/7, 1239.

[\[2\]](#) 1924年3月11日《纽约时报》。在发表于1924年3月9日《世界明镜》(*Der Welt Spiegel*)以及第9期《汉堡画报》封面的一张摄于近日一个早晨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武装警卫和拍摄组。

[\[3\]](#) NA T84 EAP 105/7, 1215-16.

[\[4\]](#) NA T84 EAP 105/7, 1217.

[5] 1924年3月10日《柏林日报》晚间版。观众比平常还要多，1924年3月10日路透社。

[6] 1924年3月11日《慕尼黑邮报》；1924年3月11日《小巴黎报》；1924年3月11日《费加罗报》。

[7] 1924年3月11日《每日电讯报》。

[8] 1924年3月11日《巴黎之声》。

[9] NA T84/2 EAP 105/7, 1221.

[10] Richard J. Evans, *The Coming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3), 80.

[11] NA T84/2 EAP 105/7, 1225.

[12] NA T84/2 EAP 105/7, 1226.

[13] NA T84/2 EAP 105/7, 1234-37.

[14] NA T84/2 EAP 105/7, 1234-37.

[15] NA T84/2 EAP 105/7, 1240.

[16] NA T84/2 EAP 105/7, 1252.

[17] NA T84/2 EAP 105/7, 1257-60.

[18]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rans. H. Francis Freniere, Lucie Karcic, 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II, 159.

[19] NA T84/2 EAP 105/7, 1270.

[20] NA T84/2 EAP 105/7, 1286.

[21] NA T84/2 EAP 105/7, 1287.

39 逃脱毁灭的命运

简而言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只是一堆堆冒着烟的瓦砾，毁灭，到最后就是彻底的崩溃。^[1]

——古斯塔夫·冯·卡尔

经过连续几周的降雪，1924年3月11日，第十二天的审判在春天的希冀与众人的迫切期待^[2]中开场了。前邦务委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应该在今天出庭作证，驳斥关于他是政变同谋的指控，顺便澄清一些至今困扰着希特勒审判的含混与矛盾之处。

卡尔在一个侧门下了车，躲过了准备拍摄他的到场的摄制组。早上9点刚过，主审法官正携其他法官进入法庭时，卡尔悄无声息地走进来，^[3]向法官席匆匆鞠了个躬，走上了证人席。

61岁的卡尔是个敦实的小个子，一头黑发，有时会把浓密的胡须往上翘。油光光的头发^[4]梳成中分，硕大的脑袋陷进滚圆的肩膀。他谨慎地扫视四周，带着漫画家会喜欢的那种愁容。《西方闪电报》形容卡尔的样子像个“真正的多瑙河乡下人”。^[5]

有人认为他看上去紧张而矜持，非常依赖自己的笔记。还有《巴伐利亚信使报》之类的报纸说他有一张经典的扑克脸，难以捉摸。^[6]卡尔的声音犹豫^[7]而细弱，即便到后面开始有了力量，音调也还是很平。他简要回顾了1923年秋天德国出现的经济动荡和政治混乱，他的这个掌握巴伐利亚大权的职位，就是因此而取得的。

奈特哈特法官要求证人不要一味读稿子。

在表示接受这个批评后，卡尔继续谈论他如何通过“政治压力”^[8]而非武力来应对危机。他说邦务委员办公室在1923年9月开始察觉到希特勒-鲁登道夫政变的迹象，但是反对这种残酷的方式，因为它将对巴伐利亚和德国产生“极恶劣的、灾难性的”^[9]影响。他预计会爆发内战，可能还要与法国及其盟国开战。

此外，卡尔问道，难道希特勒及其党羽没意识到，军队缺乏“服装、鞋袜、装备、弹药、武器和钱？”^[10]这个说法格外像是在向国际社会保证，德国没有在重建军队，从而违反《凡尔赛条约》。

“我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和厌恶，”卡尔回忆希特勒冲击集会那一刻的感受。让他愤懑不已的是，自己的爱国政权居然会受到一群号称“心系国族”的人攻击。当他意识到这一鲁莽之举可能导致“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政治面临灭顶之灾”时，他感到“深切的悲哀与焦虑”。

他想过去争取啤酒馆那些为他的演说欢呼的人们。他作为演说家自然跟希特勒没法比，但真正促使他没有行动的原因是现场有许多神经紧绷的武装冲锋队队员，以他们兴奋的状态来看，恐怕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手中的武器。他担心会造成“不可想象的不幸和流血”。^[11]

卡尔提到，他在讲台上小声跟洛索和塞瑟说话，敦促他们寻找逃脱之法。他说他始终很镇定，心里想着的是人民的福祉。他们决定玩一个事关重大的哑谜，由此来换得自己的自由。

奈特哈特法官再次要求证人不要读稿子。^[12]

巴黎《晨报》驻外记者^[13]也对卡尔有怀疑，不过是因为另一个原因。他对事件的描述和洛索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时候是逐字逐句的相同。

接下来卡尔解释了自己在政变之夜的行为。无论在事态发展的哪个阶段，证人口中的自己都是一个无私的领袖，毫无野心，只为共和国大局着想。

上午约11:25，奈特哈特法官问还有谁要提问。

施坦莱恩提出转为秘密审理。

没人反对，奈特哈特将民众请出了法庭。

在一段漫长的庭期里，卡尔承认巴伐利亚防卫军在扩编，但并不是像辩方说的那样，是发起政变的前奏，而是针对共产主义暴动进行的安保预防措施。他还承认防卫军补充了一些爱国社团的志愿兵。他坚称那是为了协助警察预防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共产主义叛乱，不是在准备进军柏林。

主审法官宣布可以提问后，鲁登道夫问他，当局计划扩编几个营的防卫军。

卡尔说他不知道。

在自问自答前，鲁登道夫指出卡尔所说的增兵命令是10月9日下达的，但隔了超过两周才执行。如果动员真的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威胁，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卡尔说他无法解释推延的原因。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奈特哈特问。[\[14\]](#)

“不知道。”[\[15\]](#)

鲁登道夫接下来的问题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他问卡尔是否知道那道防卫军命令（Ia Nr. 800/23）^[16]反复使用“行动”一词，而不是在单纯的警察部队调遣中会用的“调动”。“行动”是一个军事术语，鲁登道夫说道。

卡尔说他不记得这道命令。“可能是经过我的手，但我不记得了。”^[17]

鲁登道夫接着提请大家注意，防卫军的扩编并不是如卡尔说的那样，只是一小群志愿兵。它的规模扩大了两倍。^[18]如此大幅的扩军，卡尔还能做何解释？

“我不知道，”卡尔说。

经过进一步的盘问，卡尔托称他不知情，要么就说相关的事情并不在他职权范围内。只是偶尔塞瑟告诉他他才知道。

塞瑟怎么说的？奈特哈特问。

“我不记得了。”^[19]

在接下来的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审理中，卡尔一味地否认、躲避，摆出一无所知的样子。有时候辩方会提出他们听不清或听不懂他的回答，愈发加剧了他的不自在。

卡尔以保密为由拒绝回答一个关于警察在10月底贮备弹药的问题——辩方嗅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提醒他现在就是在闭门审理。

“这的确是很不寻常，”^[20]被一连串的拒绝回答激怒的奈特哈特法官终于说道。

不胜其烦的卡尔一度对法官说：“我每天从早到晚要负责许多官府事宜，无暇顾及这些小事。” [21].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休庭后，法庭于下午4：10开始进入公开环节，这场对古斯塔夫·冯·卡尔的盘问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然而接下来将是更多的否认、躲闪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是谎言。目前看来，澄清事实的希望再度破灭了。

在开庭时，奈特哈特要求辩方律师提问要有选择、有条理。罗德问卡尔，他在下午读的那篇打字稿有没有复印和分发出去过。

这些只是他的笔记，卡尔说，但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副本。

追问之下，卡尔承认他给了洛索和塞瑟一份。他说有必要“核对我在这里说的一切，看看是否与事实一致”。 [22].

罗德问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有没有见面讨论证词。

卡尔否认了。

法官打断了罗德的进一步提问。接着希特勒就卡尔的邦务委员任命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但他也被奈特哈特阻止。

这一次，罗德和希特勒并不只是在利用旁听席的偏向。他们实际上在进行一次法律策略的转变。如果无法将卡尔和三巨头确立为政变的主动串谋参与者，那么他们就得选择另一个攻击的思路了。具体来说：检方的控罪是被告人图谋用武力改变宪制。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卡尔被任命为邦务委员那一刻起，宪制就不复存在了。

施坦莱恩立即表示反对。“邦务委员的权力是明确源自 [紧急] 法令的。” [23].

罗德反驳道，事实上他无法找到可以佐证这一解释的法律条文或法令公报，或是任何的官方文件。也许卡尔或者检方可以说明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让大家长长见识。

这个出乎意料的辩词促使奈特哈特宣布短暂休庭。法官们回来后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这个方向的提问不能再继续。罗德试图改一个措辞，但被法官再次制止。越来越不耐烦的法官再次打断他的话，问辩方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

罗德列出了一串他想问卡尔的问题，都是围绕他的权力的法律基础，以及他的行为的合宪性。卡尔再一次仿佛成了被告人，这位前政府官员苦于无法打消他曾越权行事的印象，而在另一位辩方律师海尔穆特·梅耶看来，这一点是“本案的关键”。^[24]

奈特哈特宣布合议庭进入当天下午的第二次休庭，并在会商之后表示禁止辩方再提这些问题。

等到罗德重新提起这个话题时，奈特哈特再次裁定不合程序。

于是，铁了心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的罗德问卡尔，他是否真的如他声称的那样反对政变，为什么等了将近五个小时 [其实更接近四个小时] 才告知其内阁成员打算抵制政变？

“事情没那么简单，”^[25]卡尔说，不过他没能向法庭说清楚到底什么地方比辩方所说的更复杂，以及为什么。

在检方狼狈不堪的一天即将结束时，辩方继续质疑卡尔作为证人的可信性，以及他作为啤酒馆政变的无辜受害者的身份。奈特哈特则一边要顾及这位显要人物的名誉，一边在担心审判给人造成的印象，而他的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

[1] NA T84/2 EAP 105/7, 1329.

[2] 1924年3月11日《慕尼黑报》和1924年3月12日《高卢人报》。

[3] 1924年3月1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1924年3月11日《慕尼黑报》。

[4] Carl Christian Bry, March 11, 1924,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81.

[5] 1924年3月12日《西方闪电报》。

[6] 1924年3月12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7] 1924年3月12日和1924年3月13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黑邮报》。

[8] NA T84/2 EAP 105/7, 1327, 而不是向柏林发起军事攻击, NA T84/2 EAP 105/7, 1339。

[9] NA T84/2 EAP 105/7, 1327.

[10] NA T84/2 EAP 105/7, 1329.

[11] NA T84/2 EAP 105/7, 1344-45.

[12] 记者普遍提到卡尔是在读, 1924年3月12日《大德意志报》和1924年3月12日《汇报》。

[13] 1924年3月12日《晨报》。

[14] NA T84/2 EAP 105/7, 1372.

[15] NA T84/2 EAP 105/7, 1372.

[16] Ia Nr. 800/23, MA 103476/2, 989, BHStA and printed in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189.

[17] NA T84/2 EAP 105/7, 1373.

[18] Minutes of meeting, November 6, 1923, report, *Zur Vorgeschichte des 8. Novembers 1923*, HA 5/127. See also F. L. Carsten, *The Reichswehr and Politics 1918-193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79.

[19] NA T84/2 EAP 105/7, 1372-87.

[20] NA T84/2 EAP 105/7, 1387.

[21] NA T84/2 EAP 105/7, 1393.

[22] NA T84/2 EAP 105/7, 1414.

[23] NA T84/2 EAP 105/7, 1423. 关于这段情节还可参阅辩护律师海尔穆特·梅耶的备忘录，1924年2月19日，HA 5/114I，以及他的“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 *Der Gerichtssaal* 91 (1925), 93-124。关于这名律师，见Natalie Willsch, *Hellmuth Mayer (1895-1980). Vom Verteidiger im Hitler-Prozess 1924 zum liberalkonservativ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ler. Das vielgestaltige Leben und Werk des Kieler Strafrechtslehrers*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8)，本书以她在克里斯蒂安-阿尔伯特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

[24] NA T84/2 EAP 105/7, 1431.

[25] NA T84/2 EAP 105/7, 1441.

40 第十三天

我以为法庭是打算容许辩方律师开口讲话的。[1]

——洛伦兹·罗德

为了争取被取缔的纳粹和战斗联盟报纸的读者，《人民信使报》在提到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被告人面临的控罪时，一贯会加上引号。他们的行为，文章问道，真的是“重大叛国”吗？报纸的回答很直白：“我们根本不在乎！”[2]

更重要的是，文章提出，此事还涉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德国对民族英雄的感恩，以及滥用权力的政府在爱国者背后捅刀子，然后又在街头朝他们开枪。这些言论掀起了波澜，报纸刚送到报摊，就被读者抢购一空。以本案罪责问题之重大，《人民信使报》认为，不能就这么交给法官和邦政府官僚来决定。应该由人民来决定。

希特勒审判第十三天的重头戏是总警监汉斯·冯·塞瑟骑士出庭作证。9点过后不久，身材瘦高、时年49岁的塞瑟走上证人席，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文件。他身穿曾由他执掌的邦警的制服，准备为军队、邦警和巴伐利亚当局辩护，捍卫它们的名誉。

奈特哈特首先宣布，此前对塞瑟、卡尔和洛索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几周后该调查就悄悄终止了。）接着主审法官要求证人的陈词要简短，不要读稿子。一种“箭弩拔张”[3]的气息笼罩着法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伊巴拉写道。《费加罗报》记者说现场气氛紧张得仿佛一场雷暴。[4]

忽然，塞瑟开始采取攻势。他说阿道夫·希特勒是个逢迎民众的喝彩的年轻人。一开始，他似乎满足于一项事业的“吹鼓手”[5]角

色；如今他的野心膨胀了，将自己置于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前沿，是“那个可以凭一己之力扭转国运的人”。对希特勒来说，巴伐利亚“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途径”。^[6]他想要的就是在柏林建立独裁政权，自己走上权力之巅。

不出意外的是，法庭里的许多记者觉得^[7]塞瑟是个比卡尔更坦诚、更直白的证人。他强调三巨头永远不会跟希特勒合作，并提醒法庭注意，希特勒自己实际上也同意他们是不相容的。卡尔的火车是往巴黎开的，希特勒曾经对塞瑟说，而他的车要去柏林。两个人要想合作，唯有卡尔改变方向。

证人表示，经过一系列的会面，希特勒和巴伐利亚领导人之间的裂隙进一步扩大。其中一个格外重要的会议是在1923年11月1日，希特勒的发言冗长而絮叨，重申自己永远不会发起政变。塞瑟说：

[希特勒] 反复向我保证……当时我警告他不要采取暴力行动：“我不会对防卫军和邦警采取任何行动；我没那么傻。我不会发起政变，这我可以保证。”^[8]

七天后，希特勒违背了诺言。三位巴伐利亚领导人信了他，结果落入他的圈套。

在提出转入闭门审理被否决后，塞瑟指责辩方律师使用了闭门庭期上呈的证据，然后在不了解相关讨论细节的观众面前严重夸大其重要性。“这是个影响舆论的简便方法，”塞瑟表示。^[9]奈特哈特用一种低沉的、几乎听不清的声音礼貌地让他不要再说下去。

辩方多名律师被激怒了，其中罗德的嗓门尤其大：“在我看来，总警监是作为证人上庭，不是公诉人！”^[10]

接下来，被要求继续作证的塞瑟在法庭上描述了希特勒对啤酒馆发起的“不幸而愚蠢的冲击”。他几乎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原本清晰可辨的话音，现在经常因为愤怒而变得尖利起来。

希特勒企图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为了德国不得已而为，证人说，但是所谓的救国最终会导致亡国。西面的法国和比利时人会调动部队；东面还有捷克和波兰人。这样一来，德国在没有一支国家军队或充足资源的情况下，要面临两线甚至可能三线的作战。这种对军备匮乏的强调，自然是说给公众听的。不能让协约国知道任何可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秘密行动。

于是，同时考虑到国内和国际关切的塞瑟说，最终结果是德国“只能用甘愿牺牲的热血男儿”去战斗。这将导致德国再次被击败，失去“我们最后一点点领地和我们最后的希望”。巴伐利亚领导人面对的正是如此千钧一发的局面，证人说，他们要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拯救国家。^[11]

塞瑟接着说，当希特勒冲进贝格勃劳凯勒时，观众对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政变者的这一举动，导致多年来为民族主义大业付出的艰苦努力与筹划全部白费。

和之前的卡尔和洛索一样，塞瑟声称站在宴会厅的讲台上时就已经决定反希特勒。据他说，洛索的确小声跟他说“做出戏”。塞瑟还说，他们通过一闪而过的眼神和不动声色的点头了解了彼此的心思。

而后塞瑟提出了这场热闹的审判经常忽视的基本要点：如果希特勒和三名领导人真的达成了一致，为什么还需要冲进啤酒馆，置3000名德国人的生命于险境？这一点，希特勒永远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这是有原因的。他在那晚的举动——尽管与三人有过几个月的商谈，也有相当多的共识——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

希特勒全过程如坐针毡。

“太放肆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说了一句全场都能听见的话。^[12]

据《高卢人报》驻外记者说，冯·塞瑟总警监当时“气得涨红了脸”^[13]，要求法官对希特勒的发作加以斥责。一场响彻法庭的对骂^[14]开始了。哈瓦斯通讯社驻外记者说，混乱持续了整整10分钟。

好不容易恢复了法庭秩序后，主审法官谴责了希特勒的不当言论。罗德试图说希特勒只是在向他的律师发出指令。不过《柏林日报》记者说，^[15]他看到两人在塞瑟陈词时一直在小声交谈，然后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希特勒转过头来骂出了那句话。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依然被搪塞过去，不需要付出代价。

塞瑟接着解答了很多人在问的一个有关巴伐利亚领导人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通知鲁登道夫计划有变，从而避免流血？很简单，塞瑟说，他们已经不能信任将军了，担心他已经效忠于希特勒，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除了战斗他们别无选择。“在准备战斗前宣布要开战，从军事上绝对是不合适的，根本就是犯傻。”^[16]兹事体大，这一仗不能不赢。

此外，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在那天早上五六点之间就已经知道，政府是反对他们的计划的。他们有的是时间取消游行。经过塞瑟一连串直抵要害的发言，施坦莱恩提出改为闭门审理。

辩方的阿尔弗雷德·霍尔反对：检方传召了证人，但在作证后突然要求进入秘密庭期，这样一来，这些陈述就“在国人面前未接受质疑”^[17]。这种单方面的叙述是在误导公众。

法官反对的并非检方已经再明显不过的策略，而是公众被误导这一指责。闭门审判的唯一理由是国家安全，奈特哈特表示。如果他坐视敏感细节被公之于众，那才是背叛国家。

霍尔于是要求并且得到了20分钟的休庭时间，为法官提出的闭门庭期做准备。

重新开庭后，辩方立即发言，趁着公众和媒体还在场，迅速列出一些要点。

希特勒首先否认了总警监对他的所有指控，并承诺一旦有机会一定会予以反驳。接下来是珀纳，他指责塞瑟“歪曲历史事件”，鲁登道夫也认为证人用一些“事后的捏造”给他的证词添油加醋。

然后是罗德出场，他称塞瑟的证词充斥着错误与谎言。在被法官批为“不妥”后，罗德发誓他在作证的最后会证明自己的说法。与此同时，他对三名领导人——准确说是三名卖国贼——得到了以国家安全为名的保护表示抗议。

“这几位先生的重大叛国受到保护？”奈特哈特问道，这是在指责本庭吗？[\[18\]](#)

在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后，罗德将批评的目标转向了邦检察官，表示对这些高级别证人的罪行似乎总是会关起门来处理。

施坦莱恩怒不可遏，跳起来否认存在对巴伐利亚领导人的袒护。

“诽谤！”有人听到不满的埃哈德在自言自语。[\[19\]](#)

眼见气氛如此紧张，奈特哈特与合议庭退庭商议再次进入秘密庭期事宜。回来后，奈特哈特做出了支持检方的裁决。观众再次被请出

法庭。

[1] NA T84/2 EAP 105/7, 1508.

[2] 《人民信使报》1924年2月23~24日；1924年2月29日第一插页和1924年3月14日第一插页。

[3] 1924年3月13日《纽约时报》。

[4] 1924年3月13日《费加罗报》。

[5] NA T84/2 EAP 105/7, 1463.

[6] NA T84/2 EAP 105/7, 1464.

[7] 1924年3月13日《巴伐利亚祖国报》；1924年3月13日《慕尼黑邮报》。另见1924年3月13日《晨报》和1924年3月13日《人道报》。

[8] NA T84/2 EAP 105/7, 1473.

[9] NA T84/2 EAP 105/7, 1481.

[10] NA T84/2 EAP 105/7, 1481.

[11] NA T84/2 EAP 105/7, 1482-83.

[12] NA T84/2 EAP 105/7, 1490. 有人说这句话是施坦莱恩或埃哈德说的，但是从法庭记录和上下文来看，显然应该出自希特勒。

[13] 1924年3月13日《高卢人报》。

[14] 1924年3月13日哈瓦斯通讯社。

[15] 3月12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16] NA T84/2 EAP 105/7, 1501.

[17] NA T84/2 EAP 105/7, 1503.

[18] NA T84/2 EAP 105/7, 1506-9.

[19] NA T84/2 EAP 105/7, 1510. 关于埃哈德是否说过这个词，曾经有人表示过质疑，不过他在第1510页承认了，并在第1512页再次确认。

41 是政变，不是政变

什么被告、证人、法官、律师……在慕尼黑，只有共犯。[\[1\]](#)

——德维勒莫斯（De Villemus），《巴黎之声》，1924年3月13日

尽管被人嘲笑是滑稽戏，但这场“希特勒奇遇记”[\[2\]](#)眼看就要导致一场国际危机了。坊间盛传，卡尔、洛索和塞瑟放弃政变并非因为成功希望渺茫，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就算计划成功了，也无法带来多少长远的好处。这个说法在德国之外尤其盛行。

推翻柏林政府明显是违反《凡尔赛条约》的。那么预计巴伐利亚将首当其冲，[\[3\]](#)遭到外国军队入侵。德国陆军的规模被限制在10万人，再加上草草训练出来的爱国社团，跟欧洲军力最强的法国无法抗衡，况且对方很可能还会得到国际联盟的支持。

此外，国家防卫军的武器、装备、弹药是怎么落在希特勒手上的？目前还没看到解释，而且很难不注意到，每当有军方证人出庭，奈特哈特经常就会宣布进入闭门审理。“德国在备战，”《芝加哥每日新闻》在一篇关于该国秘密备战的报道中直截了当地说。[\[4\]](#)

德国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试图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忧。然而令民族主义者大为光火的是，他把问题归咎于“反德大战”的狂妄与失策。那是旧德国了，他声称，新的共和国已经回到本源，是欧洲最和平的国家。

与此同时，当天上午余下的时间一直闭门进行的审判却和总理的说法背道而驰。冯·塞瑟总警监详细介绍了将邦警用作北部边境增援部队的准备计划，正如辩方所说，部队的确收编了一些爱国社团成员

以增强实力，其中包括高地联盟。塞瑟一度承认，三巨头制订了一项整肃柏林文官政府的计划。

当天下午，一些去看审判的观众坐着慕尼黑的电车回家。什么都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抱怨道。重要的东西都是关起门来说的，他们猜辩方律师已经证明巴伐利亚政府有攻打柏林的计划。对审判程序和领导人问责的幻灭显然没有减弱。

审判进行到第十四天，古斯塔夫·冯·卡尔回到证人席，接受延期进行的公开盘问。对秘密军事行动很在行的辩方律师奥托·加德曼开场首先对证人的权威和职责发起质疑。

多数问题被卡尔以无关、多余或在秘密庭期已经回答为由搪塞过去。他接着表示，关于巴伐利亚领导人发动政变的讨论，前提是得明确他们的目标是平抑而不是参加政变。而后，在被问到“进军柏林”^[5]这个说法时，卡尔表示它的意思不是攻打柏林，而是试图防止巴伐利亚脱离德国。

这时候希特勒插了进来，说证人在滥用德语，拿出一些简单的词，然后给它们新的含义。进军柏林的意思不是进军柏林，政变不是政变。“如果今天这些先生们可以给一些再明白不过的词完全不同的意思，”希特勒说，法庭就不能判他或其他的被告有罪。^[6]毕竟他们的所有证词都是基于一些显然已经无效的词义。

奈特哈特法官多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希特勒和辩方律师提问。于是卡尔一如既往地回避问题，否认了解事件的细节，并将问题推给同事。卡尔在反复推卸责任，或者尽可能降低自己行为的重要性。

这位“巴伐利亚俾斯麦”^[7]似乎并不是很了解自己的工作，要么就躲在一道无耻诡计的烟幕后面。万般烦乱之下，律师冲口而出，说他无法忍受下去了。

“你是否可以忍受是无关紧要的，”奈特哈特法官说道，“证人有义务说出真相。”^[8]

辩方回到了证人与希特勒在宴会厅那次臭名昭著的握手。在本案的宏大布局中，这可能只是一个次要的点，然而辩方严重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如果能在这个细节上取胜，也许可以弥补之前没能把更大的共谋罪名安到卡尔头上的缺憾。

卡尔否认握手时用了两只手，于是希特勒跳起来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他开始失控了。卡尔无动于衷地坐着。卡尔越是平静，希特勒就越暴躁。很快，他几乎已经是在冲着证人嘶喊了。“现在是在撒谎吗？”^[9]

卡尔依然直视前方，不跟被告人有眼神接触，冷冷地说他不记得有希特勒描述的动作。但是啤酒馆里所有人都看到了，辩方律师吉奥格·葛茨说，“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忘记！”^[10]法庭爆发出一阵掌声。^[11]

嗅到血腥味的希特勒，就政变当晚卡尔的所作所为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法官要求希特勒说慢点、小声点，因为他的激动情绪已经有碍“法庭的庄严”^[12]。然而过不了几分钟，希特勒再次开始朝证人吼叫，称他是个骗子。^[13]

罗德代表他的当事人道了歉，并把他的情绪归咎于此事关乎他的名誉。接着他试图将这一点为本方所用，请法官要求卡尔面朝希特勒，“四目相对，”^[14]就11月8~9日的事件真相对质。这里是在指

证人那天的肢体语言，他坐在椅子上，低头看地，望向远方，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远离被告人投来的目光。

法官拒绝强迫双方进行一场对决。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倒是再次指摘起希特勒的语言来。啤酒馆演说家“纯粹靠着肺部力量”^[15]赢下了这一天，《展望》（*The Outlook*）说。

《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认为，如果说出庭之初的卡尔显得忧愁而倦怠，那么现在的他就是一副凄惨的模样了。对这位倒台的领导人向来没好话的右翼民族主义报纸《德意志新闻》（*Deutsche Presse*）也这么看。

卡尔的支持者后来则说，他巧妙地逐一绕过了一系列越来越险恶狡诈的陷阱。^[16]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律师军团可耻地将慕尼黑的法庭变成了宗教裁判所，或是一座中世纪刑房。^[17]

还有一种看法是，卡尔凭借否认、躲闪和拒绝回答的策略——以及主审法官的协助——成功挨过了审问。毕竟，奈特哈特给了卡尔特权，让他可以裁断什么属于“行政特权”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换句话说，证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自行决定是回答还是回避某个问题。

奈特哈特反复做出有利于这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决定，否决可能将政府当局进一步牵扯到政变中的问题。然而，这种法庭管控手段对当局的名誉并无益处。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卡尔、洛索和塞瑟要么背叛了德国，要么背叛政变者，或者两者皆有，而这只是因为，他们不想因为抛弃了战场归来的爱国战士而被追究责任。让来自各政治阵营的国民愈发愤怒的是，这些巴伐利亚幕后主使人似乎得到了法官的袒护。

奈特哈特想保护当权者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政府，结果却给了擅于煽动暴民的辩方一个难得的机会。希特勒现在可以站起来反抗强权人物，而这些人柏林和巴伐利亚都是不招人待见的。对他的重大叛国罪审判因此也成了一个舞台，他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为民族事业牺牲小我，成为一出大戏的领衔主演。演出在法庭上引起热烈的掌声，在媒体上也获得赞美。

[1] 1924年3月13日《巴黎之声》。

[2] 1923年11月10日《小巴黎报》。

[3] 1924年3月14日《纽约时报》。另见巴伐利亚当局此前的证词，1923年12月8日，HA 5/114I。

[4] 欧洲媒体转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判断，比如1924年3月15日《晨报》。

[5] NA T84/2 EAP 105/7, 1624.

[6] NA T84/2 EAP 105/7, 1637.

[7] R. D. 墨菲《机密政治报告》，1924年1月16日邮寄（年份误作1923年），M336, 862.00/1397, No. 20, NA。

[8] NA T84/2 EAP 105/7, 1640.

[9] NA T84/2 EAP 105/7, 1678 and 1679.

[10] NA T84/2 EAP 105/7, 1679.

[11] 3月14日《柏林日报》晨间版。法庭记录也提到了这一阵喧闹（NA T84/2 EAP 105/7, 1679）。

[12] NA T84/2 EAP 105/7, 1695.

[13] 1924年3月14日《前进报》。

[14] NA T84/2 EAP 105/7, 1697.

[15] *The Outlook*, 1924年3月26日.

[16] 这个看法在此前科尔首次上庭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1924年3月12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17] 3月1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和1924年3月14日《晨报》。

42 大爆发

德国与德国、谋反与反谋反的大战。[1]

——《奥克兰星报》（*Auckland Star*）

审判第十五天，轮到冯·洛索将军出庭接受盘问。外界对他此前的证词褒贬不一。一方面他揭发了政变者的残酷和不义。但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串谋反对共和国的指控，他没能做出驳斥。《柏林日报》认为，他在慕尼黑法庭上的形象“不太好看”。[2]

洛索用自己辛辣的挖苦和机敏巧妙的答辩才能，对被告和他们的律师发起了攻击。首先证人希望明确，他的目标——基于魏玛宪法第48条赋予的应急权力建立起一个合法的专制政权——和被简单粗暴地曲解、最后沦为一场“政变”的目标是不同的。他说他无意建立军人独裁统治，尤其是不会让阿道夫·希特勒参与进来。

洛索试图利用弥漫在法庭内的反当权派情绪。别的不说，他至少捍卫了一名将军拒绝执行腐败政府命令的权利，当然这里指的是柏林政府。他提到了通胀噩梦期间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我们的战士，可不是整天用来射杀饥饿的人民的，就因为你们[政客]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像样的政府。[3]

和卡尔一样，洛索说他对“putsch”或“coup d'état”[4]的使用理应被看做是一种向首都施压的手段。

那么，辩方律师霍尔问道，“被告人构想的政变与阁下并无任何不同？”[5]

这在旁听席激起一阵讪笑，他们中不少人现在佩戴起了各种新的时髦配饰；“钩十字胸针、项链、手工雕刻的金银腰链”已经“蔚然成风”，《纽约先驱报》写道。^[6]

那天上午，法庭里多次响起哄堂大笑，这促使奈特哈特法官敲着法槌，威胁要把胡闹的观众赶出法庭。与此同时，辩方律师保持对证人的压力，给人感觉在受审的是他而不是希特勒。

罗姆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施哈姆问，为什么这些反对共和国的大阴谋最终的线索都指向慕尼黑。

“你怎么知道指向慕尼黑？”洛索答道。^[7]他纠正了自己的说法，称他不认为存在这一情况，而后又认定他清楚地知道不存在。在柏林以及其他地方，也有阴谋在酝酿着。

证人难道没有盘算着在新政府里谋个官位？

“没有，绝对没有！”洛索说。^[8]他接着用第三人称来谈及自己，说：“我已经表达了我的看法，冯·洛索将军涉足政治本身是违背了他的意志与愿望的，他渴望有一天能够离开。”

另一个律师问他是否曾经说过柏林的领导人“只是一群不敢做决定的太监和阉人”。^[9]

洛索承认他可能是说过类似的话，但他本希望只在内部流传，很遗憾——拜辩方律师所赐——现在已经为外人所知。他的怒气在积聚。几分钟后，洛索已经开始拍桌子，拒绝回答又一个他认为无关要旨的问题。法官要求他保持冷静。

“如果不再问没有必要的问题，我会很感激！”证人厉声回应。^[10]

哈瓦斯通讯社记者认为洛索是个“强悍的对手”。^[11]在审问期间，他在法官席前方的开放空间背着手走来走去。他给人一种强大而自信的印象。然而和卡尔一样，他有时会回避，或者回答问题的方式让人觉得不太可信。

希特勒要求证人说专制政权计划的最初构想者是谁，洛索一开始想推诿，直接拒绝回答问题。而后他说他不知道，接着又再次改口，说他是后来在“机密会谈”^[12]中得知的。

“我们有义务明确而公开地将机密事宜告知法庭，”希特勒说。^[13]而后他大声要求主审法官不要纵容证人逃避问题。

奈特哈特平静地命令希特勒控制情绪，并判定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

这时候辩方律师瓦尔特·汉密特提议短暂休庭，以重新评估策略，因为在他看来，这场审判目前已经被出庭的证人控制了。

主审法官没有太在意他的批评，但汉密特还有话说。他抗议冯·洛索将军的不得体行为，在法庭里走来走去，像在军营里似的叫嚷着。^[14]辩方律师可不是他的新兵。

此外，证人拒绝回答问题有何法律依据？

“证人已经说了，他认为他需要保持相关谈话的机密，”奈特哈特说。

“但程序规则不是这样说的。”

“这我知道，”奈特哈特没有理会他的反对。^[15]接着他说，他否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它与本案不相干。

恰恰相反，霍尔说，这是辩方的核心问题。如果巴伐利亚领导人果真像他们陈述的那样，制订了反对柏林的计划，那么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被告就只是在执行命令。

主审法官再次裁决问题与本案无关。

不依不饶的希特勒还在坚持。也许洛索实际上不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么，有没有可能问他，他觉得是谁提出的这个建立柏林专制政权的想法？奈特哈特下令短暂休庭考虑这一问题。

上午11:15，奈特哈特回到法庭，否决了希特勒的提问。

希特勒按捺不住了。“我根本无意批评法庭的决定，”希特勒的声音很快变成了吼叫，11月8日的事件根本就是“洛索、卡尔和塞瑟的叛国行为的结果！”^[16]

旁听席再次骚动起来。^[17]

“你无权做出这样的指责，”奈特哈特说，“无论是对是错，本庭已经做出裁决。”^[18]他要求辩方只发表基于事实的陈述，尤其希特勒需要小声说话。然而没过多久，希特勒和洛索再次怒目相视。

美国记者休伯特·伦弗洛·尼克博克后来回忆起这个惊人的场面：希特勒跳了起来，冲着证人咆哮，等到气焰被压下来后，就瘫坐到椅子上，“像被人一拳击倒”。^[19]这位普利策奖获奖记者后来说，自己报道外交事务多年，这是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在骂战中被压下去。这话略有夸张，但不能说完全不属实，而这个混乱的场面最后以又一次冲突收场。

在《费加罗报》所称的一次“激烈对峙”^[20]中，希特勒首先发难，称洛索在啤酒馆里屋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受到胁迫。他对法庭

说，他们没把证人当作人质，而是当作未来的民族主义新政权的军事领袖。

希特勒紧接着强调，过去几个月来他的支持者和巴伐利亚领导人在反柏林这件事上一直是同仇敌忾，直到政变进入到紧要关头，这些政客才出卖了他。法官再次要求希特勒说话“稍微冷静点”。^[21]不用担心法庭里有谁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由于对证人的喊叫、插嘴和侮辱，或反复提出法官已经认定不可接受的问题，奈特哈特究竟斥责了希特勒多少次？有人听到奈特哈特私下里抱怨说，根本没办法让希特勒安静下来。

希特勒一度承认，他的确承诺过如果要发起政变，一定会事先通知冯·塞瑟总警监。但他接着就开始发起攻势，迫使洛索承认他的承诺是包括一定的保留和条件的。其中一条是，如果出现意外的情况，他不需要再谨守这个诺言。

一直趾高气昂的冯·洛索将军对被告嗤之以鼻，就像一个贵族军官，自信满满地训斥着一个平民一等兵。那依然是背弃诺言，并且是在偷袭。希特勒在法庭上的抵赖是毫无意义的。洛索指责希特勒道德败坏。观众开始闹起来。

“中将！”^[22]气急败坏的希特勒说，他不存在什么“道德败坏”，因为这件事上唯一违背诺言的是洛索自己。希特勒这番话是自相矛盾的，但观众无所谓。旁听席陷入了长时间的喧闹，包括一阵掌声。此刻已经怒火中烧的证人拿起自己的东西，大步走出了法庭。^[23]

有人说洛索是提出过离开法庭的要求的，但就算是真的，至少没什么人听到过。法官而后指责希特勒的举止“大为不妥”，^[24]并立

即终止了审理。

在慕尼黑法庭里的许多观众看来，冯·洛索将军就是一个鲁莽的德国军官，在法庭上乱发脾气。而希特勒则再一次显得是在反抗当权者的谎言、懦弱与卖国。^[25]从柏林到巴黎的许多左翼读者则在想，谁应该受到最多的谴责：像洛索这样的反动分子，还是希特勒这样的激进极端分子，或者监督这场可悲闹剧的进行的法院系统。

[1] 1924年3月12日《奥克兰星报》。

[2] 1924年3月11日《柏林日报》晨间版。

[3] NA T84/2 EAP 105/7, 1734.

[4] 皆为“政变”的意思。（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5] NA T84/2 EAP 105/7, 1735.

[6] 1924年3月15日《华盛顿邮报》援引《纽约先驱报》。另见1924年4月18日《卫士报》（*The Sentinel*）。

[7] NA T84/2 EAP 105/7, 1737.

[8] NA T84/2 EAP 105/7, 1740.

[9] NA T84/2 EAP 105/7, 1751. 关于洛索的言论，另见格拉夫·海尔多夫的陈词，1924年1月11日，HA 5/114I。

[10] NA T84/2 EAP 105/7, 1757.

[11] 1924年3月16日哈瓦斯通讯社，更多关于他的嘲讽，1924年3月11日和13日《慕尼黑邮报》。盘问给人一种决斗的感觉，1924年3月15日《福斯日报》。

[12] NA T84/2 EAP 105/7, 1768.

[13] NA T84/2 EAP 105/7, 1769. 对希特勒的激动情绪的描述可见于1924年3月16日《时报》。

[14] NA T84/2 EAP 105/7, 1769. 1924年3月15日《人民信使报》也做了报道。

[15] NA T84/2 EAP 105/7, 1769.

[16] NA T84/2 EAP 105/7, 1773.

[17] 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庭审记录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182.

[18] NA T84/2 EAP 105/7, 1773.

[19] H. R. Knickerbocker, *Is Tomorrow Hitler's? : 200 Questions on the Battle of Mankind*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1941), 12.

[20] 1924年3月15日《费加罗报》。

[21] NA T84/2 EAP 105/7, 1805.

[22]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216.

[23] NA T84/2 EAP 105/7, 1806.

[24] 1924年3月15日《人民信使报》和1924年3月16日《太阳报》(悉尼)。

[25] NA T84/2 EAP 105/7, 1806.

43 暗示

检方证人成了辩方证人。[1]

——卡尔·科尔

自上次情绪失控，气冲冲离开法庭后，冯·洛索将军定于1924年3月15日星期六上午再次出庭。《巴伐利亚信使报》觉得，旁听席里的人们首先想到的问题是：他会回来吗？[2]答案在早上8：30揭晓了，主审法官宣布开庭。冯·洛索将军没有现身。

结果是奈特哈特法官宣读了缺席证人的一封短信，表示他拒绝回到法庭，而原因“在〔昨天的〕审理进行到最后应该已经很明确”。[3]

罗德要求法庭下令让洛索前来接受盘问，但主审法官未予理会，开始传召一系列无关痛痒的证人。那天上午的进度很慢——考虑到坊间传闻审判要在下周末之前结束，这样的节奏颇具讽刺意味。据《星期一世界报》（*Welt am Montag*）报道，奈特哈特已经私下里向多名律师证实这一时间安排。

审判的确是需要赶紧得出裁决了，因为负责本案审理的紧急司法机构人民法庭将于1924年4月1日期满。[4]这是巴伐利亚和柏林之间为了在慕尼黑进行审判而达成的一项妥协，交换条件就是在这之后人民法庭要悄无声息地消失。

因此，随着期限的临近，还有这么多次要的证人出庭，从一切可能的角度给出不那么要紧的证词，唯独不触及有助于澄清本案事实的地方。这场审判似乎不打算解决问题，而是要分拆出一系列无关的、分散注意力的旁枝末节。

此外，迄今出庭的证人大致给人一个印象，法庭过多侧重于那些权势人物的证词。11月那天的晚上以及次日上午在城中的工人、手艺人、散工之类去哪了？比如巴伐利亚邦理发师协会就对这种偏向权贵的做法提出了正式抗议。^[5]有什么事实是不可以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发表的？有的人则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6]

《巴黎之声》预言这场“希特勒审判”——许多报纸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用这个名称，而不是“鲁登道夫审判”——将导致慕尼黑法官们成为法律寓言^[7]和警世故事里的人物。“巴伐利亚审判”将成为嘲弄法律公正的代名词。《人道报》猜想这闹剧的结果将是法官判自己十年堡垒监禁。^[8]

然而，这些次要的、往往无关的目击证人仍在不断走进法庭。那天曝出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54岁的退伍骑兵上尉弗里德里希·冯·席拉赫（Friedrich von Schirach），他的证词让不少人感到吃惊。

在陈述所谓进军柏林不等于发起真正的攻击时，证人一带而过地提到，奈特哈特法官曾暗示他不要提起这个话题。这个惊人的说法立即促使法官和检方提议改为闭门盘问。

清场后，席拉赫承认他知道战争部发出的命令 [1923年10月26日的Ia 800号令]，即给步兵军团补充三个营的武装社团志愿兵。此前鲁登道夫用来盘问卡尔的就是这份文件。席拉赫的准军事组织“慕尼黑VVV”为此欢呼雀跃，他们相信这次收编意味着期待已久的攻打柏林计划启动了。

施坦莱恩问命令是否得到了执行。

“志愿兵报到了。他们被转给战争部。”而后要在1923年11月11日上午10点前往第19步兵团接受检查。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做？”奈特哈特问。

“因为出了8日和9日的事情。”[\[9\]](#)

盘问之下，席拉赫言之凿凿地确认有多个武装社团已经做好准备，要和巴伐利亚陆军一同出发，与北方的民族主义盟军会师，而后使用这股联合起来的力量逼迫总统及其内阁辞职。如果这些政客拒绝，他们会使用武力。

希特勒想证实这名证人的证词。作为一名政治领袖，他每天都会收到“准确的进度报告”。他手下的所有人“显然都认定，这就是一直说的进军了——而且，我的确也相当有意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因为不存在象征性、假想性的进军。他们这是要向柏林进发。[\[10\]](#)

真正让他确信无疑的是炮兵部队的集结。如果只是想向首都施加政治压力，巴伐利亚领导人不需要这样集中大量加农炮和榴弹炮火力。

这项计划的问题在于古斯塔夫·冯·卡尔，希特勒接着说，他是个软弱、犹豫的政客，缺乏肩负起领导重任的能力。希特勒不想坐等他倒台，于是决定冲进贝格勃劳凯勒，要求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担任“政治领导人”。[\[11\]](#)

这话激起检方的一通叫嚷。[\[12\]](#)

希特勒压过了他们。“[卡尔的]弱点会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13\]](#)

多年来，希特勒一直说他只想当民族主义运动的吹鼓手。但在这一次的爆发中，他再一次承认他想要的不只是那些。

与此同时，奈特哈特试图阻止希特勒的发言，不要再讨论巴伐利亚政府参与政变这个尴尬的话题。他还打算不再传后面的证人出庭。

在当天的审理进入尾声时，奈特哈特再次做出不利于辩方的决定，拒绝强迫洛索接受盘问。辩方律师加德曼、霍尔、罗德和汉密特再次要求让他回到证人席。他们声称，他们需要他回答的问题对辩方至关重要。

奈特哈特不为所动，只是以“未经许可的缺席”为由处洛索50马克的罚款，如果罚款没能缴纳，则将面临五天的监禁。

下午1:20，[\[14\]](#)主审法官结束了这一周的审理，这让许多人不禁在想，接下来的五天这场审判会如何收场。与此同时，法庭外有一群德国青年正在抗议古斯塔夫·冯·卡尔，支持阿道夫·希特勒。这是接下来事态发展的一个征兆。

[\[1\]](#) NA T84/2 EAP 105/7, 1609.

[\[2\]](#) *Bayerischer Kurier*, March 17, 1924.

[\[3\]](#) NA T84/2 EAP 105/7, 1853.

[\[4\]](#) *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342-44, NL Ehard 90/3, BHStA. 关于该机构的更多信息，可参阅Otto Gritschneider, “Das missbrauchte bayerische Volksgericht, ” in Lothar Gruchmann, Reinhard Weber, and Otto Gritschneider,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München: K. G. Saur, 1997), xxxvii-xl.

[\[5\]](#) NA T84/2 EAP 105/7, 1610-11.

[\[6\]](#) 例如1924年3月11日《阿根廷日报与周报》对审理中缺乏事实披露表达了不满，尤其是在公开庭期中，Carl Christian Bry, *Der Hitler-Putsch. Berichte und Kommentare eines Deutschland-Korrespondenten, 1922-*

1924 für das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ed. Martin Gregor-Dellin (Nördlingen: Greno, 1987), 183.

[7] 1924年3月7日《巴黎之声》。

[8] 1924年3月18日《人道报》。

[9] NA T84/2 EAP 105/7, 1914-15.

[10] NA T84/2 EAP 105/7, 1923.

[11] NA T84/2 EAP 105/7, 1930.

[12] NA T84/2 EAP 105/7, 1930. 在会议记录中显示是埃哈德。

[13] *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rans. H. Francis Freniere, Lucie Karcic, 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III, 37.

[14] NA T84/2 EAP 105/7, 1974.

44 希特勒的保镖出庭

这种审判在人民法庭可不是每个礼拜都有的。[\[1\]](#)

——阿尔弗雷德·霍尔，法官对此的回应是，“谢天谢地”！

在柏林，英国大使埃德加·文森特·戴伯隆子爵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坐下来聊了几句，这位前总理最近刚刚被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部长。话题很快转向了希特勒审判。

从慕尼黑传来的许多事实“揭露”令施特雷泽曼吃惊。显然，德国和欧洲面临的危险“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认知”。英国大使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

[施特雷泽曼]自己就清楚，右派随时可能在德国发起一场真正的、成功的“政变”，但是柏林的官员圈子始终对这个国家所处的险境缺乏足够认识。

施特雷泽曼意识到，卡尔的反共和国阴谋“颠覆性丝毫不小”。希特勒的草率举动让他们功亏一篑。[\[2\]](#)

不少驻柏林的外交官也在关注这场耸动的审判。符腾堡邦部长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Carl Moser von Filseck）3月初去旁听过一次，看到被告人兴高采烈地聊着天走进法庭，[\[3\]](#)彼此以及和旁听席的民众打招呼，他心生厌恶。根本没人打算制止他们。现场混乱不堪，他们的抗辩肆无忌惮。他在美国领事馆的同僚罗伯特·墨菲后来总结这些人的表现是“粗野的虚张声势”[\[4\]](#)。

3月17日星期一，希特勒的审判出现在慕尼黑讽刺杂志《傻瓜》的封面上。[\[5\]](#)这份绰号“红狗”的刊物描绘了一个仪态娇柔的希特勒，高昂着头，手上举着火把，点燃了一座政府建筑。他坐在冯·洛索将

军的肩上，而后者则是被古斯塔夫·冯·卡尔背着。卡尔同时还在召唤警察。远方有一颗飞升的流星，是钩十字的形状。

那天上午，审判进入了第四周。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首先投诉了一个据说在就审判写书的人。该作者据说在与一名军官合作，后者每天用他在秘密庭期收获的信息换取报酬，外加卖书的提成。作者是打算揭露希特勒审判的内幕。

罗德认为这个传闻是可信的，毕竟公众对此很感兴趣，并且已经有大量的敏感内容泄露给了媒体。奈特哈特同意调查。由于涉嫌泄密的人——约瑟夫·施劳登巴赫上校（Joseph Schraudenbach）当时就在那里，于是大家有幸见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场面，那就是主审法官对旁听席的某个人发起质询。

施劳登巴赫承认他曾在报纸上打广告，愿意为关于本案的书充当写手和摄影师。他无意否认罗德说的事情，唯独有一点：他发誓绝不会透露任何机密信息。

至于他在闭门庭期中做的笔记，施劳登巴赫说那是为了确保他的陈述准确。他保证绝对不会发表半个字。^[6]为了避免不经意的错漏，他已经把所有敏感材料用括号括起来。罗德和奈特哈特都接受了他的解释。上校得以继续与作者合作，不过他很快会因为合约纠纷放弃这桩买卖。

慕尼黑的舆论一边倒地站在希特勒和被告一边。巴伐利亚领导人被认为是这场爱国主义审判中的真正卖国贼，如瑞士《时报》记者所说，他们已经不敢抛头露面了。^[7]有传闻说冯·洛索将军收到的决斗挑战已经多到应付不过来。^[8]《时代》杂志称，其中一名挑战者据信就是被告人克利伯中校。^[9]

在当天的漫长审理中，罗德使了一个相当戏剧化的招数。为了证明卡尔的计划并非一种象征性或假设性的图谋，他提出传召四名新证人：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军事统帅冯·西克特将军，以及国防部部长奥托·盖思乐（Otto Gessler）博士。主审法官不可能同意这个要求，但是不少记者还是写了。^[10]罗德的这个哗众取宠的怪招登上了德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端。

同时得到报道的还有那天下午对德国宪法的公然漠视。其中的一名证人是辅佐卡尔的知名顾问艾伯哈特·考特尔，他在出庭时首先要求允许他发表一份声明。而后他概述了政变的历史背景，其目标主要是证明卡尔和希特勒的举动都是有正当理由的。而当他说到魏玛宪法“对人民意志的压制”时，同样没有遇到任何异议。^[11]

在下午的庭期中，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出庭了。这是自啤酒馆政变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见到这个可能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在那之后的几周里，他一直在住院，据他在未发表回忆录中说是挣扎在生死之间。此外他的情绪也很低落：希特勒在牢里，纳粹党看起来已经被“击垮了”，他的毕生积蓄也因为恶性通胀化为乌有。“日子不好过，”他说。^[12]

这位保镖对冲击啤酒馆的理由做出了类似的陈述，但接着他对里屋谈话的描述包含了鲜有人知的细节。这段讯问“相当有意思”，《柏林人民报》（*Berliner Volks-Zeitung*）认为。^[13]格拉夫说，虽然他没有听到完整的对话，但就他所看到的已经足以让他相信，洛索和塞瑟在鲁登道夫进来前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他还说，当他看到被告韦伯医生递给塞瑟总警监一支香烟，冯·洛索将军接着也要了一支，就愈发相信他们已经取得一致。

“会谈有那么愉快？”奈特哈特问道。^[14]

是的，格拉夫说，而且当时的气氛跟报纸的描绘大相径庭。此外，希特勒在三巨头这里取得的成功比他预想的要容易。他记得自己当时觉得，他们也没有必要喝那么多吧。

关于前往市中心的游行，辩方律师克里斯托夫·施哈姆问证人，当时他有没有通知音乐厅广场的邦警，鲁登道夫在跟他们一起游行。

有，格拉夫说，并描述了当时他如何向对方喊话。“鲁登道夫在此！你们要向自己的将军开枪吗？”^[15]这时候子弹已经飞过来了。他在后面还能听到游行人群在唱《德意志之歌》。

也许现场的吵闹和混乱导致警方没听见他的喊话？

不可能，格拉夫说。“我可不是在呼喊——我在咆哮。”^[16]

接下来的问讯没有什么惊人发现，直到希特勒发言表示对保镖的赞赏，称他是“最正直、忠诚、真挚的人”。希特勒还说格拉夫“随时愿意为我而死”。他的确差点就这么死了。在小女儿格莉特尔的照料下，格拉夫仍在康复中。希特勒的赞誉让这位证人在离场时显得十分欣喜。

当天最后阶段的审理主要在讨论是否传召余下的证人。主审法官想尽快结束作证环节。检方则想再传召一名证人，辩方也有自己的名单。这些都将导致审判陷入一个证词与反证的迷宫。法官在下午5:12宣布休庭，并承诺尽快宣布裁决。

^[1] NA T84/2 EAP 105/7, 2161.

^[2] Edgar Vincent, Viscount D' Abernon, *The Diary of an Ambassad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1929-1931), III, 56.

[3] 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March 13, 1924, Nr. 86, 155-156.

[4] R. D. 墨菲《机密政治报告》，1924年3月10日（邮寄日期1924年4月3日），M336, 862.00/1469, No. 20, NA,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用了这个措辞,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22。

[5] 《希特勒审判，或曰卡尔如何拯救祖国》，1924年3月17日《傻瓜》。

[6] NA T84/2 EAP 105/7, 1978, 关于合约问题的信息，见2039~2040。另见1924年3月1~2日《慕尼黑邮报》。

[7] 1924年3月15日《时报》。

[8] 1924年3月6日合众社。

[9] 1924年3月17日《时报》。

[10] 1924年3月17日《柏林交易所报》晚间版和1924年3月18日《晨报》等。

[11] NA T84/2 EAP 105/7, 2047.

[12] 乌尔里希·格拉夫未出版回忆录, 68, F14, IfZ。

[13] 1924年3月18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14] NA T84/2 EAP 105/7, 2070.

[15] NA T84/2 EAP 105/7, 2080.

[16] NA T84/2 EAP 105/7, 2081.

45 大转变

我已经预见到，和所有的公开审判一样……照着这门艺术的种种规则，这场审判将备受攻击。[\[1\]](#)

——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

在审判刚开始的时候，鲁登道夫被奉为与腓特烈大帝或奥托·冯·俾斯麦一脉相承的强悍领袖。但到了第十八天，光辉形象已然不再。希特勒凭借“喉间的雷鸣”[\[2\]](#)蹿红了，鲁登道夫却渐渐退至背景。

将军在法庭上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让许多人觉得缺乏共鸣，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合众社记者说，他暴露了自己是个“呆头呆脑的政客”和“道德懦夫”[\[3\]](#)——“不知所谓的鲁登道夫，”《奥格斯堡邮报》（*Augsburger Postzeitung*）说。[\[4\]](#)在获得奈特哈特的批准重返证人席后，将军即将做出的声明，无疑对他的名誉也没有什么好处。

鲁登道夫首先称自己是一名君主派，他意识到，要想实现德国帝制复辟，唯有等人民自己产生那样的期待，他用这个念头聊以自慰。与此同时，他说他希望有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的独裁政权，类似于法国、英格兰和美国在战时建立的那种。他这些关于西方专制政权的言论，让一些观察家觉得他精神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奈特哈特问鲁登道夫在抵达啤酒馆之前是否知道希特勒的计划。

不，鲁登道夫说，他不知道。他还否认自己曾考虑参加“对柏林的军事行动”。他的目标只是进行“道德威压”。[\[5\]](#)

奈特哈特又问了一遍，要求他确认，因为这个新的说法与鲁登道夫此前的证词有明显冲突，主要有三点：他参加了一场有预谋的国家革命；他在去啤酒馆的路上得知了计划；他有意攻占首都。

“我听到了太多东西，留下太多的印象，我已经说不太清楚细节了，”鲁登道夫说。^[6]

《小日报》记者有不同看法：“鲁登道夫推翻了他的供述。”^[7]

鲁登道夫现在的立场——尤其是他声称进军柏林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听上去突然和卡尔、洛索、塞瑟的官方口径取得了一致。包括柏林《八点晚报》（*8 Uhr-Abendblatt*）在内的一些报纸很久之前就预测鲁登道夫会倒戈，跟其他被告拉开距离以求自保。

有时候鲁登道夫会试图把这份修正版供述中存在的明显矛盾给说圆了；有时候则什么也不做，或者干脆就一问三不知。不，他不知道有部长被关在啤酒馆。不，他不知道希特勒想要罢免总统，并且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打算。转眼间，这些借口和抵赖让不少记者觉得，一个有如此名望的人居然变得如此可悲而恶劣。“大无畏的将军，”《人道报》说，“在罪责面前瑟瑟发抖。”^[8]

阿道夫·希特勒一度向将军施以援手。鲁登道夫已经被任命为军事统帅，他说，因为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了。至于政治领导方面，希特勒将啤酒馆行动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顺便明确他的贡献。“我现在是一个年轻的德国政治领袖，”^[9]希特勒说，并自称四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此后一直在为它呐喊助威。

他在1923年11月8日、9日的目标是发起“一轮庞大的宣传攻势”，希特勒说，让柏林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卖国政权无法招架。谦恭和审慎不适合这样一项事业，希特勒还说，“一个有能力的

人，有责任和义务去把这该死的事情做出来”。卡尔完全无法胜任。
“归根结底，治国之术并非一门应用政治学。必须得是天生的。”
[\[10\]](#).

埃哈德提醒法庭这一行动会在国内外造成严重后果，希特勒说这正是他想要的。他想要毁了政府，他声称这个政府五年来一直在亵渎德国，挟持国家以推进其“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主义的、和平主义的、民主的”[\[11\]](#)图谋。他重申，政变有着爱国的目标。如果法庭不这么认为，那就判他死刑。

希特勒的演说在法庭里引起了反响。“慕尼黑的叛国大审判绕了一圈回到了原点，”《纽约时报》的托马斯·R. 伊巴拉说。[\[12\]](#)鲁登道夫将军，一位终生不渝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者和知名将领，开始否认自己在政变中的角色，而希特勒，一个一等兵，“公然宣称自己意在进军柏林……武力推翻共和国政府”。

将军在法庭上的表现，和他写书时是一致的：他在努力撇清自己的一切责任。希特勒则因为担负起“主要责任”而精神焕发。年迈的昔日英雄鲁登道夫给人感觉没有知晓、看到或选择任何东西，把责任往所有人身上推——唯独没有他自己。他那位名气没那么大的同仁则很不一样，愿意去承担他自己乃至同事犯错的责任。

这台荒诞的、“吊诡之极的大戏”尤其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一位《福斯日报》记者就在想，这个蓄着卓别林牙刷胡、在慕尼黑的法庭上呼风唤雨的人，真的就是“年轻的德国”[\[13\]](#)的代言人吗？

* * *

鲁登道夫得以成为这场重大叛国罪审判中最后一位出庭作证的人。上午10:35，在听任将军彻底反口之后，奈特哈特宣布将不再传

召任何证人。^[14]按照律师提交的名单和媒体的预测，接着本来还应该有不少证人需要出庭，现在都不可能了。《福斯日报》嘲讽地说，主审法官终于表现出一点决断力。

对这场审判普遍怀有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认为奈特哈特在保护鲁登道夫的名誉。多家报纸还说，他希望避免将政变的全部实情透露给公众。审判看上去的确像一个充斥丑闻、阴谋和不公的肮脏故事，巴伐利亚邦政府高层可能在掩盖事实，甚至包括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本人。

奈特哈特接下来的举动更是成为批评者的口实。在取消了余下的证人后，他宣布法庭清场，闭门讨论检方的提议，即最后部分的审理全部改为闭门进行。

讨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其中出现的论点和审判第一天没太大区别。不过这一次，奈特哈特倾向于不公开结案陈词。眼下关系到诸如国家安全这样“更重大的利益”，^[15]人民不应享有出席审判的特殊权利。

至少有六名辩方律师呼吁审判能在最后展现出开放性。德国民众对本案进程极为关注，期待正义得到伸张，关起门来进行最后的辩论于人民无益。对国际观众也不是好事。就像施哈姆说的那样，“全世界都全神贯注于本案”。^[16]

当然，还有一个人主张公开审判，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他认为，对信息的压制，并不能阻止对知识的索求。如果法庭坚持将审理保密，那么来自不可靠信源的信息将充斥市场。此外也可以想象会有许多人出于对被告的支持，将机密信息泄露出去，意识不到这样做会对德国构成伤害。

如果说迄今听到的所有意见都不足以说服奈特哈特，鲁登道夫的辩护律师沃尔特·鲁特格布鲁恩可能有一个：德国刑法的程序保护被告人“在世人面前为自己洗脱罪名”^[17]的权利——而他强调，如果没有达到公开审判的要求，法庭得出的裁决是可以被推翻的。

这一点促使希特勒再次加入争论，他的发言很快变成了长篇演说。希特勒想强调的是，如果他和他的同僚“犯了罪，那么我们是出于好意，是因为对祖国的热爱”。因此，他向奈特哈特保证，如果允许公众听取结案陈词，他和其他的被告人当然不会透露任何敏感信息。但是他又说，面对玷污国家的领导人，他也绝不会放弃斗争。恰恰相反，希特勒说，“我们想要大声向全世界宣告！”

他还希望明确一点，德国的首要目标是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桎梏。他认为，要拯救这个国家，重建强大的国防以击溃联手敌人，只有这一条路可走。而后他指责这场慕尼黑审判本身就是一场灾祸，因为它在良善的德国人中间挑起争斗，大家都“如同尼伯龙根人一般厮打着”。希特勒接着表示，施坦莱恩对此应该深有感触，因为审判“迫使他扮演检察官这个角色”。^[18]

有意思的是，施坦莱恩完全没有否认或驳斥这个说法的打算。

这是希特勒在审判中发表的最具政治性的一次演说，是在闭门状态下，说给检察官、被告人、合议庭和几名以军人为主的旁听者听。这是他的盛大演出的预演，实际上几乎是一次试镜——如果合议庭决定公开进行的话。

^[1] NA T84/2 EAP 105/7, 2136.

^[2] 这个措辞来自传记作者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他在1923年听了希特勒的讲话，当时他在慕尼黑读书，并且是《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

[3] 1924年3月21日合众社。

[4] 1924年2月17日和1924年2月21日《奥格斯堡邮报》。

[5] NA T84/2 EAP 105/7, 2108-9.

[6] NA T84/2 EAP 105/7, 2111.

[7] 1924年3月24日《小日报》。比较鲁登道夫之前的证词，的确是这样，尤其在2108~2114他接受汉斯·埃哈德的初次问讯时说的话，1923年11月9日，NL Ehard 94, BHSStA。

[8] 1924年3月24日《人道报》。其他对鲁登道夫“退却”的批评可见于1924年3月18日《柏林日报》晚间版和1924年3月19日和20日《法兰克福日报》。

[9] NA T84/2 EAP 105/7, 2120.

[10] NA T84/2 EAP 105/7, 2123.

[11] NA T84/2 EAP 105/7, 2131. 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庭审记录在这段陈词中加入了“犹太人”，*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218. 在慕尼黑邦地方法院的记录中没有这个词。

[12] 1924年3月24日《纽约时报》。九年后，托马斯·R. 伊巴拉将再次见到希特勒，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他，1933年7月1日《科利尔杂志》(*Colliers*)；一份(摘选)副本可见于OSS Sourcebook, NA。

[13] 1924年3月24日《福斯日报》晨间版。

[14] 这是个意外的决定，1924年3月18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15] NA T84/2 EAP 105/7, 2137.

[16] NA T84/2 EAP 105/7, 2135.

[17] NA T84/2 EAP 105/7, 2151.

[18] NA T84/2 EAP 105/7, 2153-55.

46 “叛国者生正逢时”

好心的先生们，判希特勒先生无罪！^[1]

——洛伦兹·罗德

经过一个公共假日和一天的休庭，审判于3月21日星期五早上9:15恢复进行。奈特哈特首先表示要澄清近日的一些传闻，即法庭为了保护某权势人物^[2]的名誉而进行了秘密审理。《法兰克福日报》认为这个人是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王储鲁普雷希特。

这个说法荒谬至极，奈特哈特说。据他所知，没有任何一个要人对审判施加了影响，并且向公众保证，根本就没有人提起过王储。这个猜测是众多围绕秘密审判而产生的谣言之一，由此可以预见，如果审判最后阶段选择闭门进行，会出现怎样的景象。

由于这一点，法官宣布他否决了检方将余下的审判闭门进行的提议。法庭在有必要时会改为闭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敦促所有人在公开陈词时要小心慎重。

该进行结案陈词了。首先是检方。

施坦莱恩首先承诺会专注于事实而不是个人观点、政治问题，以及在他看来“在审理中占据了太多空间的”无关“琐事”。而后他开始长篇累牍地阐述德国爱国运动如何因冲突和纷争变得四分五裂。每个派别都对其他对手充满猜忌，尽管他们都一样“热切地、急不可耐地”希望让国家重现昔日的辉煌。

和其他许多展现青年热情的运动一样，多一些耐心和审慎对这场爱国运动有好处。施坦莱恩呼吁运动的追随者要有某种韧劲：“一种

强硬、彪悍和坚韧的耐心，它是无声无息的，未来的作为与信心令它欣喜，它紧咬牙关，直到播下的种子发芽生根，那一刻终于到来。”
[3].

当今德国的问题根源在“政府权力的衰颓”和对法律缺乏敬畏，这些都不利于国家的未来。他还强调，“有一个高尚的，也许合乎道义的目标，并不等于就可以使用犯罪手段”。即使爱国心切，也不等于这行为就是合法的。魏玛宪法依然是“国之根本”，反对它的人，无论觉得自己多么理直气壮，“也永远不可以用暴力去改变或去除宪法”。
[4].

施坦莱恩接着说，辩方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巴伐利亚当局的行动上，但那与本案是无关的。这番言论让法庭里的不少人感到意外——《小巴黎报》记者用“大吃一惊”
[5].来形容。在论证了这种无关性后，施坦莱恩接着用了几分钟时间为几名当权者正名。

最后检察官开始对被告人逐一发问。这些人要为“相关事件及其后果”
[6].负全部责任，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说到这里，这份结案陈词变得愈发怪异而可疑：

出身贫寒的希特勒作为大战中的一名勇敢战士，已经证明自己有着德国人的心性。他对伟大的德意志祖国怀有一种真挚、炽烈的情感。战后，他苦心经营，把微不足道的组织经营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7].

“对于这个党的政见，我不发表意见，”施坦莱恩说，尽管他刚刚用“伟大”来形容它。

每一个字似乎都经过仔细推敲。这位可能要被驱逐出境的奥地利被告，由于有着“德国人的心性”，且“为激发对德国大业的信念做出了诚挚的努力”，得到检察官的赞赏。希特勒给“被压迫、被解除

武装”的人民带去希望，施坦莱恩说，尽管在秘密庭期中存在大量的证据证明，德国在重整军备。

检察官的陈词^[8]时常听起来像是在辩解，甚至是赞颂。^[9]至少不像是在谴责。事实上辩方律师后来对检察官的这番描绘表达了谢意。^[10]重大叛国行为造成的伤亡和其他后果基本没有提及。有人说很少见到检察官做出如此无力、失衡的结案陈词。

接着施坦莱恩说到了重点，语气中依然带着点勉强：

作为人，我们很难不对希特勒心生敬意。然而，虽然犯下如此重罪，他的罪行却又是伟大的。^[11]

施坦莱恩对鲁登道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赞美。他赞扬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勇敢的战士”，他“作为一名将军的名望 [依旧] 完好”。然而，虽然是这样一位勇武忠效之士，鲁登道夫终归是违反了法律，因此是需要被惩罚的。对此，鲁登道夫作为“恪尽职守、刚强坚毅的楷模，自然最能理解”。^[12]

唯一的问题是将军是应该被控重大叛国，还是只有怂恿和教唆。施坦莱恩选择了情节较轻的那个，^[13]他的理由是将军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只是在行动开始后才加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断都是根据鲁登道夫的第二份供述，也就是法庭允许他做出的一个修正版本。

在总结了对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的控诉后，施坦莱恩将结案陈词交给了助手埃哈德，由他完成对剩余八名被告的陈述。然后施坦莱恩提交了刑罚建议：

希特勒：8年

珀纳、克利伯和韦伯：6年

鲁登道夫、罗姆和弗里克：2年

瓦格纳和布吕克纳：1 1/2年

佩尔内：15个月

这些都属于“堡垒监禁”，对重大政治犯罪的传统惩罚。在押候审的时间会在刑期中扣除。

在宣读量刑建议时，《德意志日报》记者觉察到旁听席涌动着一种情绪。要将鲁登道夫关进一座堡垒这件事，让人格外无法接受。不少报纸预测到时候并不会真这么做。《人道报》提醒大家，在慕尼黑可是“阶级正义”^[14]当道。

在法庭里的《前进报》记者看来，施坦莱恩似乎不太想起诉这些被告人。《人道报》驻外记者觉得施坦莱恩的声音沉郁，“说服力小之又小”^[15]——要不就是在赞颂受审的人。《每日电讯报》认定他的陈词中“有多少谴责，就有多少赞美”。^[16]比起重大叛国罪本身，检察官似乎在说起“有利减罪的情形”时显得更坚定也更起劲。

结案陈词和量刑建议的确让不少人大为惊骇。无论是出于惩治犯罪还是祭奠受害者的需要，这样做都是不公正的。如《晨报》所说，他们觉得这样的刑罚似乎是象征性的，或者只是走走形式^[17]——用《柏林人民报》的话说，这再一次说明，在眼下的德国，“叛国者生正逢时”。^[18]

* * *

奈特哈特宣布休庭后，罗德有将近四个小时时间给自己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抗辩做最后的润色。罗德的结案陈词时长约三个半小时，措辞颇为有力。

“六年前的今天，春季总攻开始了，”罗德首先提到的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攻势。本案多数被告都曾冒死“为德国的伟大、自由和荣耀”而战。今天，这些老兵面对的是另一种战斗，罗德说，这一次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誉”。当初鼓舞他们跳入西线战壕的那种高尚的爱国和尽忠之心，也驱使他们走上了慕尼黑法庭的被告席，面对叛国的指控。[\[19\]](#)

当前这场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罗德所称他们手中最强大、最崇高的武器：真相。但这不是一场公平的对抗。被告面对的是高高在上的巴伐利亚当局，他们被投入大牢等待接受审判，然后又被玷污名誉。卡尔的政权对官方报纸进行审查，压制民族主义报纸，并在传单和备忘录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散布事件的官方版本。

律师换了一种姿态，将旁听席也作为宣讲的对象：

在座的各位先生，过去几周来你们听到希特勒在反复发言。你们审视了他的灵魂。你们从他的演说中看到，他不是个欠缺勇气与诚信的人，而是一个说出真相，同时丝毫不顾及个人利益的人。他毫无保留。[\[20\]](#)

他的当事人愿意“认罪、担责”，罗德说，但他强调背景的重要性。希特勒是在抵抗经济动荡、法国对鲁尔区的侵略，以及国际社会对德国的不断羞辱。德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然而国内的敌人却在闹事。柏林似乎毫无权威可言。全国各地的许多可敬的公民开始对这个政权心生一种“无比的怨恨”。[\[21\]](#)

“现在发生的这件事，”罗德这样评价啤酒馆政变，“只有在这些前提下去理解。”[\[22\]](#)

事实上，罗德接着说，非要说重大叛国罪的话，那么也不是出现在1923年11月8日。应该是在几周之前巴伐利亚政府高层的一系列会谈、密谋和计划中，涉案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尔、洛索和塞瑟。

如今他的当事人希特勒——一个“慕尼黑反柏林政府高层的斗争”中的马前卒——却成了替罪羊。这太荒谬了，罗德表示，而巴伐利亚领导人还在对他的检控中成了证人，这是在伤口上撒盐。他们上庭的唯一合理身份应该是共谋，更准确说是“主犯”，[\[23\]](#)他们发起的行动导致希特勒和其他被告得到了重大叛国的指控。

奈特哈特这时候表达了他的不赞成。

罗德接着对三名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名誉发起攻击。他回溯了从宴会厅到里屋的政变过程，强调当局和被告之间达成的一致。做出承诺并握手以示达成共识后，巴伐利亚领导人转脸就做出了冷酷无情的背叛，为此罗德朗读了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一段，说的是狡猾的统治者会如何利用自己诚实的外表。

至于向市中心的游行，则不是一种攻击行为。那是最后时刻的孤注一掷，希望挽救因背叛而面临崩溃的德意志爱国运动。罗德说当局领导人没有打算告知被告人他们已经改主意；事实上他们扣押了希特勒的信使，是在主动避免让他知道。满怀爱国热情的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和平游行，唱着《德意志之歌》来到音乐厅广场，结果被当局射杀。因此，沮丧而愤懑的德国民众认为这场惨剧的罪魁祸首是巴伐利亚领导人，并指称他们是杀人犯，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

奈特哈特再次叫停，命令他不要再发表“挑衅性、煽动性的言论”。[\[24\]](#)

此时已经过了晚上7点，罗德开始陈述结论。“眼前这个人，”他说起他的当事人希特勒，“将自己的力量、头脑和双手用在一项他相信正确的事业上。”简而言之，他和他的同僚在配合卡尔、洛索和塞瑟。刑法中没有哪一条说，听命于巴伐利亚军政最高领导人是犯罪。

本案干系重大，罗德说。

你们这是在让一个为德国人民、国家乃至德国之伟大献出一切的人继续他的事业。此举意味着你们将让他恢复工作……他是那个释放未来力量的人；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伟大的德意志祖国将得到更多的发展与繁荣。

“好心的先生们，”罗德恳求，“判希特勒先生无罪。” [25]

[1] NA T84/2 EAP 105/7, 2291.

[2] NA T84/2 EAP 105/7, 2167. 奈特哈特指的可能是1924年3月1日《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3] NA T84/2 EAP 105/7, 2169.

[4] NA T84/2 EAP 105/7, 2170-72.

[5]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

[6] NA T84/2 EAP 105/7, 2175.

[7] NA T84/2 EAP 105/7, 2185-86.

[8] 1924年3月23日《时报》和1924年3月21日《柏林本地新闻》。

[9]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或美化，1924年7月22日，HA 68/1498。另见1924年4月24日《北豪森人民报》（*Nordhäuser Volkszeitung*）中的批评。

[10] NA T84/2 EAP 105/7, 2312.

[11] NA T84/2 EAP 105/7, 2189.

[12] NA T84/2 EAP 105/7, 2189, 2193.

[13] NA T84/2 EAP 105/7, 2216-17.

[14] 1924年4月25日《人道报》。

[15] 1924年3月22日《人道报》。

[16] 1924年3月22日《每日电讯报》，1924年3月22日路透社。

[17] 1924年3月22日《晨报》。

[18] 1924年3月22日《柏林人民报》。

[19] NA T84/2 EAP 105/7, 2219.

[20] NA T84/2 EAP 105/7, 2228-32.

[21] NA T84/2 EAP 105/7, 2235.

[22] NA T84/2 EAP 105/7, 2232.

[23] NA T84/2 EAP 105/7, 2262.

[24] NA T84/2 EAP 105/7, 2287.

[25] NA T84/2 EAP 105/7, 2289-91.

47 从慕尼黑到瓦尔哈拉

如今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做噩梦，梦到的是自己在巴伐利亚。[\[1\]](#)

——托马斯·R. 伊巴拉，《纽约时报》

3月22日，审判第十二天，辩方律师阿尔弗雷德·霍尔总结了自己对韦伯医生的辩护。这是又一场在欢腾的观众中间激起热烈掌声的民族主义演说。霍尔将啤酒馆政变的源起归结到“所谓的《凡尔赛条约》”。这份在他看来恶名昭彰的文件编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将德国作为战争的唯一责任人，“怀着施虐的恶意”对这个国家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惩罚。[\[2\]](#)

面对柏林那些签署条约、出卖德国的野心政客，被告席上的爱国者们拒绝沉默，他们希望扭转战后“懦弱而腐败”的可悲局面。这是千千万万德国人共同的心愿。“如果这是重大叛国，”霍尔说，“那么牢房得要有好几公里长！”

法官拦住了他，表示不能允许“懦弱而腐败”这样的措辞。

“我已经无法找到任何其他的表述了，”霍尔说，“不管怎么看，这些词都表达了全体德国人的感受。”[\[3\]](#)

几分钟后，霍尔再次开始攻击魏玛共和国，称它是在“背叛与假誓”[\[4\]](#)中诞生的，不存在一丁点的正当性。而后他又称魏玛宪政违宪，同样没人反对。至于音乐厅广场惨案，霍尔说当时在街头的许多人自然心里会想，“什么样的祖国……会下令向这些心系家国的年轻人开枪？”[\[5\]](#)

这番言论让不少旁听的外国记者目瞪口呆。“巴伐利亚是德国的‘讨厌鬼’，”托马斯·R. 伊巴拉在他的下一篇《纽约时报》报道中写道。^[6]看旁听席的反应就知道，慕尼黑泛滥着足可视为重大叛国的反共和主义者。

霍尔结束发言后，奈特哈特宣布休庭30分钟。四名辩护律师要求得到更多的时间打磨他们的最终辩词。在被法官拒绝后，罗德表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有三名被告身体状况不佳（珀纳、弗里克和罗姆）。法官接受了这个理由，宣布休庭两天。

与此同时，慕尼黑警方注意到一些迹象，表明如果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被宣判有罪，城中会发生骚乱。巴伐利亚军队和邦警取消了休假计划，布鲁登堡街加强警戒。判决预计于本周内做出。

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庭听取了12名辩护律师的结案陈词。其中许多发言冗长、沉闷而啰唆，并且主要说的是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以外的被告人。旁听席里几周来第一次出现了空座。^[7]

连一些被告人都没来。威廉·布吕克纳和克利伯中校据称是生病，得以获准缺席。3月25日星期二，希特勒也缺席了，据说是因为疲劳。慕尼黑审判的名歌手大概是得润润嗓子，《慕尼黑邮报》揶揄道。^[8]

每天要在法庭里待上10个小时，被告人很难承受，罗德表示，说得好像这种情况是常态。也许法官可以增加午休时间，减轻一点负担。

“或者辩方也可以缩短抗辩的时间！”奈特哈特的话让其他法官忍俊不禁。^[9]

所谓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再次成为结案陈词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另一个主题是巴伐利亚领导人的叛国。要想得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施哈姆主张，法庭在裁处所有被告人的同时，也应该惩治卡尔、洛索和塞瑟，否则所有人都不应该获罪。如果选择检控，那么出于公平起见，当时在啤酒馆里的几千人也应该起诉。单单把他的当事人恩斯特·罗姆拎出来做出有罪判决太过荒唐。罗姆支持政变的情节，和当晚在负责倒热咖啡的人并无不同。

施哈姆接着又对检方观点提出了另一个挑战。律师援引1916年在最高法院的一个先例：

如果法律与人民的感受不再相符，那就是过时的法律，是立法者玩忽职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对法律的诠释纾解不公之感就成了法官最高尚的职责。[\[10\]](#)

本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施哈姆说。他呼吁法官倾听德国民众的声音，怀着义愤对这些指控做出全票否决。

卡尔·科尔按计划要就本次审判给出最终的辩方律师总结。这位有一说一、无拘无束的律师游走于大量的拉丁文箴言、动情的恳求和法律争辩之间，将政变描绘成了一场联合行动，其中一方是像希特勒、鲁登道夫及其他被告这样的实干家，另一方则是卡尔、洛索和塞瑟这样的背信弃义之人。辩方律师用煽动性的言辞总结了一种极端观点：“在多数德国人民看来，魏玛宪法无非就是用来毁灭德意志国的炸药！”[\[11\]](#)

惊人的是，法官和检方都没有表示反对。

在发言的最后，科尔用理查德·瓦格纳歌剧中的古老条顿传奇打比方。希特勒是“新德国的齐格弗里德第二，他手刃马克思主义恶龙，让德国工人免受马克思主义之扰”。[\[12\]](#)而现在，他要为自己的

荣誉和自由而战了。考虑到证据一边倒地支持辩方，科尔说，他既不会恳求也不会主张无罪判决。他是在要求。

1924年3月27日上午，记者以及其他有入场资格的人早早地来到前军官学院餐厅，希望能赶在人群聚集起来之前入场，旁听这场跌宕起伏的审判的第二十四天，也就是最后一个常规庭期。控辩双方律师已经做过结案陈词。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在审判团开始审议之前，被告人可以最后做一些补充。

克利伯中校首先起身发言。

鉴于他的军队背景，克利伯说他选择了一种得体的抗辩方式，小心地避免了任何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材料泄露。他承诺自己的供述属实，尽管相当一部分内容只能在闭门庭期中提出，另外他对自己在1923年11月8~9日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接下来是珀纳，他的发言围绕自己第一次作证时提出的问题，即自1918年以来政府及其法律的正当性，或者说缺乏正当性。讽刺的是他指责检方企图夸大他的案子，并拒绝承认有重大叛国行为。这名狂热的君主派还说，他绝不会对国王的正统权力有半点违背，这是在公然侮辱共和国。

真正的叛国，珀纳认为，发生在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时候，罪犯是他归为“犹太人、逃兵、为了钱背叛德国人民”的那群人。这些人不具备合法权威，他说道，因为他们是欺骗人民、篡取权力的“异族”。^[13]珀纳管德国总统叫“弗里茨”^{[14][15]}，引起了旁听席里的一阵阵笑声。

下一个发言的是与珀纳关系密切的盟友弗里克博士，他依然声称，政变当晚他在警察总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避免了一场灾难。和

克利伯一样，他骄傲地表示自己毫无悔意，正满怀信心地等待法庭的裁决。韦伯也强调他和同事是在配合巴伐利亚法定政府行动。他意识到这是在对领导人发起严重指控，但不幸的是，这是他能得出的唯一结论。这些人是可耻的罪犯，在德国“艰难求生”^[16]之时背后捅刀子。

下一个发言的是主张“背后捅刀子说”的头面人物鲁登道夫将军，他说他的杰出同事和律师们已经做出陈述，他没什么可补充的。他转而上了一堂简短的历史课。他提醒法庭，他一向以“大战和杰出的战役”^[17]为人所称道，但他对国家灾难的预言同样出名。他希望再次敲响警钟，呼吁每一个爱国的德国人支持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运动，因为在他看来，仅靠这一场运动就可以拯救德国于水火。

假如运动没能成功，鲁登道夫将军说国家将陷入一个无比凄惨的境地：“我们会迷失方向——万劫不复！”^[18]德国的下场，会比屈辱与可耻的《凡尔赛条约》的还要可怕。他呼吁法庭听取他的警告，“倾听德意志灵魂的自由呼声”。^[19]被告人必须无罪释放。

不过说到底，奈特哈特的法庭如何判决是无关紧要的，鲁登道夫说。“世界历史不会把报效祖国的人送进监狱；他们会被送到瓦尔哈拉，”也就是北欧神话中敬奉阵亡英雄的神殿。^[20]

这个不寻常的说法被世界各地的报纸写进了新闻标题。“鲁登道夫自封为神，”《纽约时报》的标题写道。但与此同时，其记者托马斯·R. 伊巴拉称赞将军的发言给人“尊贵与雄辩”之感。和此前的陈词不同，将军这次没有“费尽心机去粉饰自己，抹黑其他所有人”。他还说，这段简短的、略显犹豫和磕巴的讲话在慕尼黑法庭里激起了“热烈的喝彩”。^[21]

鲁登道夫坐下来，接下来罗姆、布吕克纳、瓦格纳和佩尔内都放弃了向法庭做最后陈词的权利。这样一来，最后一个发言的将是被告人阿道夫·希特勒。

[1] 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

[2] NA T84/2 EAP 105/7, 2293.

[3] NA T84/2 EAP 105/7, 2294, 2333-34.

[4] NA T84/2 EAP 105/7, 2369.

[5] NA T84/2 EAP 105/7, 2382.

[6] 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

[7] 1924年3月27日《政治与文学辩论报》。

[8] 1924年4月28日《慕尼黑邮报》。

[9] NA T84/2 EAP 105/7, 2570.

[10] NA T84/2 EAP 105/7, 2607.

[11] NA T84/2 EAP 105/7, 2805.

[12] NA T84/2 EAP 105/7, 2838. 这种形象此前也在报章中出现过，比如1923年11月13日《德意志日报》。

[13] NA T84/2 EAP 105/7, 2849.

[14] NA T84/2 EAP 105/7, 2850, 在第2853页和第2855页中也有。在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庭审记录中也提到了笑声，*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258。

[15] “弗里德里希”的昵称。

[16] NA T84/2 EAP 105/7, 2865.

[17] NA T84/2 EAP 105/7, 2867.

[18] NA T84/2 EAP 105/7, 2870.

[19] NA T84/2 EAP 105/7, 2871.

[20] NA T84/2 EAP 105/7, 2869. 《鲁登道夫以“战神下凡”姿态现身》，1924年3月29日《晚间邮报》，以及他的浮夸演讲，1924年3月29日《时报》。

[21] 1924年4月28日《纽约时报》。

48 最后的陈词

相比得到你们〔法庭〕的开释，我无疑更渴望在我所有战友心目中得以免除罪过！^[1]

——阿道夫·希特勒

当天早些时候希特勒进入法庭时，迎接他的是观众的欢呼，^[2]男人们肃立致意，几个女人向他挥动手帕。据《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 伊巴拉所见，在这段发言的多数时间里，希特勒“恣意挥洒着自己的口才”，相当一部分“是用最高的调门喊出来的”。^[3]

这场持续超过一小时的演说——至今仍是希特勒一生最被低估的演出之一——将为期四周的媒体热炒推向了更高的热度。在这四周的法庭审理与媒体报道中，他的地位越来越显眼。希特勒首先谈到一些此前已经说过的问题，不过这一次用了更加非黑即白的简单描绘。

魏玛是建立在“一次重大叛国罪行”^[4]之上的，希特勒继续对共和国发起攻击。而后他赞美了那个皇帝治下收留了他的国家。在战前，德国拥有举世艳羡的军队和文官。26个国家焦头烂额，用了四年半的时间试图击败它，而这个庞大的国际联盟一直没能得逞，直到最后德国垮了，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军队“被背后捅刀子”。

这时候，一场革命爆发了，发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承诺“充满幸福、美好、体面的生活，并且工作比以前轻松”。真是大失所望，希特勒嘲弄地说。德国人民现在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已经“在绝望中被迫走上街头”。当政府失去耐心时，所谓人民的代表下令国家防卫军向人民挥舞鞭子，甚至开枪射击。民众无处可去。中产阶级全军覆没。一辈子的积蓄变成了装在小推车里的一堆堆废纸。

国家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共和国领导人依然对协约国低三下四，宣讲着《凡尔赛条约》的美好。

他们承诺世界和平，可是德国的下场是什么：“踩着我们的尸体实现的世界和平！”

他们承诺裁军，但被裁军的只是德国，为的是方便他们继续掠夺。其他国家依然武装到牙齿。

还有自决权呢？“是的，所有黑人部落都有自决权！”希特勒怒吼道。但是1700万德国人却被强行转交给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归外国政府统治。

还有承诺的“国际联盟”？那个联盟无非是为了保障败坏的和平条约用的，不是一个“为未来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组织。

然后希特勒攻击了德国的所谓人民政权，这个政权不敢问人民的真实想法——选择了一个被多数国民反对的人当总统。简而言之，魏玛共和国的过去五年里，有不少东西被人“从德意志国手中夺去”。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弃”，柏林政府只是“我们的外族暴君的行政机关”。

有如此不堪的事迹，这个所谓的政府还敢“把年事已高的德国英雄拉进法庭，戴着镣铐……除了为祖国而战，这些英雄没做过什么别的事”。他引用了自己在狱中读到的克劳塞维茨，说英勇的人民宁愿在光荣的斗争中死去，而不是苟且偷生。

希特勒还提到检方结案陈词中慨叹国家权力和法治威严的衰落。然而那权力是谁创造和维持的呢？希特勒自问自答，是德国君主创建起来的国家，再次向他想讨好的保皇派致意。这是项旷日持久的工

程，尤其是在腓特烈大帝和奥托·冯·俾斯麦治下，直到战争末期因卖国贼作乱而崩塌。

缺乏领导力的革命党人最后得到了权力，这既反映了国家的衰弱以及对法律失去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问题的诱因。德国人民看到法律系统并没有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许多公民无论如何努力长时间工作，也还是吃不饱饭，而有一小撮人却利用他们大赚其钱。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当这样一个体制会去抓“微不足道的小偷，却对暗中屠戮人民的罪犯视而不见！”希特勒说，这说明有根本性的东西出了问题。

于是当至高无上的法律变成了《凡尔赛条约》时，一个低劣的政府得以当道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大声说道。这份文件“用440条规定”明确了何为不道德，于是乎一辈子奉公守法的公民突然变成暴民甚至罪犯。与此同时，真正的罪犯在控制政府，尽管他们已经毁掉了德国的货币，令经济陷入瘫痪。^[5]

要恢复对法律的尊重，唯有等德国从这场灾难中缓过来——等有一天，希特勒拍着桌子^[6]说，能有一名检察官站在法庭里，指控德国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他的同党“毁了7000万人民的国度……属重大叛国！”

说到这里，奈特哈特法官终于打断了被告人。

接着希特勒详细解释了恢复法律尊严的必要条件。其中一个最令人侧目的先决条件是，他认为将来一名检察官需要恢复“自己的职责和自己的人类情感之间的内在和谐”。意思是说，目前的普遍情况是每个检察官都是“与自我不一致”的，需要想清楚是做“一名律师还是一个人”。令人惊讶的是，法庭里包括奈特哈特在内的所有人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这些观点。^[7]

希特勒的话锋转到战后世界，德国只是外交棋局中的一个小卒。外国势力能收走他们的武器，但永远无法摧毁他们的抵抗精神。希特勒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他都会为爱国主义呐喊助威，哪怕要激发对遍布于这个国家的敌人的仇恨，也在所不惜。他尤其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国际犹太人中的种族肺结核”。

希特勒还说，在啤酒馆里起哄、攻击他的就是这些敌人，他们给他扣各种帽子，“反动派、战争贩子、杀人犯和屠夫”。但有一种人他肯定不是，那就是煽动家。他对法庭说，如果他有那本事，自己的成功之路要平坦很多。“相信我，对手也会张开双臂欢迎我的！”^[8]这段少有人知的离奇言论，会不会指的是他在1919年初作为社会主义政权支持者的经历？

希特勒现在几乎就是在喊叫了，他说他的行动如何如何不是出于野心或投机，跟他知道的不少政客不一样。他说，在他看来这关系到一种责任感。他再次对冯·洛索将军发起攻击，这位巴伐利亚战争部部长说希特勒“只想做个对人民进行灌输和恐吓的人”。

小人之心何其狭隘！法庭的先生们，我可以肯定地说，谋个部长之职，在我看来不是个值得拼命争取的成就。

他的目标“比当部长要远大千倍”：他想成为人民的吹鼓手和“马克思主义的粉碎机”。

他嘲弄了追逐名誉的野心家的虚伪，表示自己更希望追随理查德·瓦格纳的脚步，这位他心爱的作曲家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任何头衔。

和急着摆脱自己的同类往上爬的卡尔不一样，希特勒说他只是在做他个人必须去做的事。归根结底在于天命的召唤，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尽管这事业听起来远比他刚刚声称的要远大得多：

在我看来，正如鸟儿一定要歌唱，因为它是鸟，为政治而生的人必然要从政，无论他是在监狱、地牢里，还是自由身；无论是坐在丝绸椅子上还是只有一张硬板凳。他生来就是做这个的……从早到晚，他都会心系自己的人民的命运。

同理，他还说：“天生的独裁者都是不需要‘催促’的，他自己就想独裁；不需要推动他前行，他自己会推。”何况，那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他重申了民族革命的目标，其中并不包括推翻共和。需要反对的只是它“可耻的那部分”。他说他希望改革这个政权，建立国家预算秩序，赶走好吃懒做之徒，与“国际股票市场的奴役”和“我们整个经济体的垄断联盟化”展开真正的斗争。他还希望脱去“外敌施加的铁枷”，恢复德国人持枪保卫祖国的权利与责任。

这些目标，是重大叛国吗？希特勒问道。

希特勒最后向法庭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他的手下的所作所为，一切责任都由他来承担，他们只是在本着党要求的绝对服从态度，执行他的命令。第二，如果法庭要宣判他有罪，他请求法庭不要考虑《共和国保护法》第9条，即犯有叛国罪的外国人需驱逐出境。

他声称这一诉求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考虑到这样一个可悲的决定将在历史上写下何其可耻与羞辱的一笔。

他再次提醒法庭他在战时曾为德国效力，并且他期盼着能继续做出这样的贡献。希特勒驳斥了施坦莱恩说的啤酒馆政变是一场失败：

哪怕有一位母亲来跟我说，希特勒先生，我的孩子阵亡了，你的良心该受谴责，那么这场政变都是不成功的。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们，一个都没有。恰恰相反，1万——又有1万人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中。

“那一刻会到来的，如今戴着钩十字走上街头的群众……会在11月8日那天团结起来，与那些违背他们意愿的人展开对抗。”当他得知向他的人开火的不是军队而是邦警时，他倍感释然，因为如果是军队，那名誉的损毁就太过严重了。

法官终于对他“污蔑”邦警的言论提出异议。

希特勒没有理会。“我们训练起来的这支军队每分每秒都在更快地壮大，我们在培育一种骄傲的希冀，这群汉子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营，营变成团，团变成师。蒙尘的老帽章会重新佩戴起来，老军旗将再度迎风飘扬。”旁听席不少人落下了眼泪。

希特勒的措辞就是要吸引他的目标受众：从乡下人到保皇党人，从学生到老兵；满腹牢骚和被社会遗弃的人；痛恨《凡尔赛条约》的人；饱受恶性通胀折磨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困境的泥沼中艰难过活的工人、手艺人 and 技工；希望找个东西或人来发泄他们的愤怒与憎恨的人。

在这过程中，希特勒还描绘了另一种未来——这个以恢复德国国力和声誉为中心的未来将由他来奉上，而他的身份仍然是一名鼓手，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那些对他言听计从的人看来——是一位人民领袖。他小心地避免了鲁登道夫在法庭上犯的 error，尤其是将军对天主教徒的批判。希特勒的言论是针对自己的目标受众定制的，而这个群体现在已经远不仅限于啤酒馆和慕尼黑的法庭。

希特勒目光直视主审法官，用以下的话结束了堪称他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即使您宣布我们有罪一千遍，[历史的]永恒女神的永恒法庭，也将微笑着撕碎检察官的建议和法庭的裁决；她会判我们无罪！

语毕，希特勒坐了下来。此刻的法庭一片寂静。

“本案审理完结，”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宣布。^[9]

为期四周的审判以充满骚动的一天结束，观众用雷鸣般的掌声^[10]为被告人们喝彩。一些人冲上前去与他们热切地握手，在《晨报》看来，阿道夫·希特勒轻松获胜。^[11]

宣读判决书要等到1924年4月1日上午10:00，即五天之后。中间这段时间，民众除了等待也没别的事可做，具体说是等待、猜测，再加上《巴伐利亚祖国报》建议的经典慕尼黑风格——也许可以喝上一杯上好的啤酒。^[12]

^[1] NA T84/2 EAP 105/7, 2144.

^[2] 1924年4月28日《费加罗报》。

^[3] 1924年4月28日《纽约时报》。

^[4] NA T84/2 EAP 105/7, 2871.

^[5] NA T84/2 EAP 105/7, 2876-87.

^[6] 希特勒在这一庭期中多次拍桌子，包括此处，这一点在1924年出版的节略版法庭记录中有所体现，*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265。

^[7] NA T84/2 EAP 105/7, 2888-89.

^[8] NA T84/2 EAP 105/7, 2895.

^[9] NA T84/2 EAP 105/7, 2897-916.

^[10] 1924年3月27日路透社。

[11] 1924年4月28日《晨报》。

[12] 1924年3月20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49 结束与开始

如果德国把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一个检察官认为诚实、勇敢、无私的人——关起来，那你只能相信是恶棍 [当道] 了……我相信英格兰会很乐意收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1]

——一名英国女子写给施坦莱恩的公开信，《大德意志报》
(*Grossdeutsche Zeitung*)

整个周末，咖啡馆、商店和啤酒馆里都在热烈讨论着审判，[2] 《米斯巴赫汇报》(*Miesbacher Anzeiger*) 已经称之为慕尼黑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3] 当红卡巴莱艺人魏斯·费尔 (Weiss Ferdl) 在皇家宫廷啤酒屋众多观众面前赞颂着被告人：希特勒和他的同伴“勇敢无畏地……坦白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没什么可遮掩的。你们倒说说，他们做了什么错事？难道拯救祖国于耻辱和绝望是一种罪”？[4]

到了审判末期，希特勒已经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成竹在胸。《前进报》认为这种“突破天际的狂妄”[5] 说明，希特勒根本就是个冷血精神病人。《法兰克福日报》把重点更多地放在了他对人群讲话的效果上，惊叹于演说使用简单、浅易的“修辞技艺”令群众陷入狂热，令“千千万万人感动落泪”。[6] 其过程可以把方方面面顾及到：怒火、痛苦、愤懑、热血。无论他这个人还是他的演讲都不存在任何拐弯抹角。

在《巴黎之声》的夏尔·博纳丰 (Charles Bonnefon) 看来，希特勒审判仿佛来自14世纪。各敌对部落的首长，率领着各自的部队，出没于这片“群雄逐鹿”的大地：其中有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卡尔和巴伐利亚当局；艾伯特总统和他的内阁；冯西克特将军和德国军方。此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莫非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形态”？[7]

费城《公共记录报》（*Public Ledger*）驻外记者描绘的是另一幅景象，称之为慕尼黑版“爱丽丝梦游仙境”审判。从“志在成为墨索里尼”的希特勒，到“前独裁者”卡尔，所有角色就像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小说里的女王和扑克牌：“不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就会崩溃。” [8]

但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务必要认真对待，《温哥华太阳报》提出。如果合议庭还想重振慕尼黑法庭的尊严，那么一定要坚决处理普鲁士将军、“奥地利风景画师”以及他们那群不走正道、满怀仇恨的党羽。像德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应该“尽可能不要进行重大叛国的公诉”，但一旦开始了这个程序，司法系统“必须有力执行”。对这个共和国尤其如此，因为有大量自以为是、口无遮拦的敌人在质疑它的合法性。 [9]

而此案的情节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前进报》认定。被告人已经供认——甚至炫耀——了自己的罪行。然而在奈特哈特法官主持下，经过这段时间的审理，谁还敢打包票说这些人会被判有罪？

按照坊间普遍的推测，希特勒将是唯一被惩罚的人， [10]因为他表达了对柏林、巴伐利亚和《凡尔赛条约》的蔑视。美国领事罗伯特·墨菲就认为希特勒会获徒刑，并依法驱逐回奥地利。他的朋友尤金尼奥·帕切利，也就是梵蒂冈大使和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教宗，也这么认为。目前看来，希特勒得有一阵子不能惹是生非了。 [11]

考虑到审判的两极分化，当局担心在宣判时会爆发示威、打斗甚至骚乱。 [12]左派和右派都有报纸在那一周被禁止出版，比如社会主义的《慕尼黑邮报》和极端主义的《大德意志报》。慕尼黑当局还禁止分发一切政治宣传册、海报、传单，连印刷的判决通告都不行。

警方一方面庆幸合议庭不是在周末宣布裁决，^[13]因为有更多空闲时间，周末的人群规模会更大，容易导致事件的升级。另一方面，宣读判决书的时间改到了另一个可能会出问题的日子：正好是民族英雄奥托·冯·俾斯麦的生日。

那个周末，警方得到线报，称有人计划^[14]在奥古斯丁勃劳掀起一场骚乱，奥格斯堡发来一封电报^[15]提醒主审法官，纳粹党会明目张胆地拒绝接受任何有罪判决。有从遥远的美国寄来的信件，恨意满满地称施坦莱恩是个“可悲的杂种”^[16]。他的副手汉斯·埃哈德甚至收到死亡威胁。^[17]在这样一个火药味十足的氛围里，警方决定采取最稳妥的方案。

3月31日星期一，警方高层^[18]在埃特街总部的图书室开会，制定最后一个庭期的局面控制方案。重点是要尽可能减少出现骚动的机会，一旦出现要立即予以扼杀。警方绝不容忍任何的抗议或喝彩。布鲁登堡街一带禁止大型集会，在火车站对抵达慕尼黑的来车进行严密监视。

防卫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从巴伐利亚周边市镇调集增援部队。在慕尼黑城中各关键场所还加设警卫，以防遭到袭击，其中包括法国领事馆^[19]、政府官员的寓所，尤其是奈特哈特法官、合议庭其他法官以及检察官的宅邸。^[20]

当然，此次得出的将是终审判决。人民法庭是不存在上诉的。那一年创刊的《时代》杂志为读者回顾了审判过程，对于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因为重大叛国被斩首、绞死或以其他方式处决”，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的理由可以归结为：

他们实际上在说：“我们不是唯一〔犯下这一罪行〕的人。巴伐利亚最高官员也参与了，但是由于他们觉得政变会失败，就退出了。其中一个 是卡尔，还有洛索等。就是这样！”^[21]

尽管语气戏谑，这位记者承认他觉得这个主张还是可信的。

事实上据《强硬报》（*L' Intransigeant*）报道，啤酒馆阴谋的涉案人数之多已经让巴伐利亚司法部不知所措。^[22]坊间风传已经有幕后交易，确保鲁登道夫、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得到无罪释放。

至于三巨头，在审判快结束的时候已经逃离慕尼黑。有人说他们去了意大利^[23]，还有的说在科孚岛^[24]、希腊^[25]或者瑞士^[26]。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大家都不觉得意外。这几个巴伐利亚领导人已经证明他们的狭隘心胸^[27]，《汇评》说。他们没有选择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倒是靠着官府的遮遮掩掩，钻法律的空子。他们逃离慕尼黑^[28]这件事，难道不正说明了他们的罪行或懦弱，或者两者兼有？

尽管正在因为自己的叛国行径受到调查，法庭还是允许他们出国，这也是不出所料的。奈特哈特在保护卡尔、洛索或塞瑟的时候，可比保护宪法起劲多了。

《巴伐利亚信使报》认为，这样的一场审判在近代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29]主被告人的表现像“中了邪”，柏林的《前进报》说。记者提到了他在审判中听到的一段对话：旁听席里有个人在赞美希特勒是一个演讲大师，仿佛一个古风时代的巨人在昂首前行。此人还说，只要他想，他可以“让整个世界崩塌”。^[30]

于是，眼看希特勒从政变的失败中挣脱出来，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需要法庭去回答的问题是：这将是他的政治生涯的终点，还是起点？

[1] 1924年3月22日信件，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2] 如1924年3月29日《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等。

[3] 1924年2月26日《米斯巴赫汇报》。这是个很常见的说法，无论是在审判开始前（见1924年2月26日《农民周报》），还是审判过程中（见1924年3月6日《福斯日报》晚间版）。

[4]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93. 需更多了解，可参阅 Robert Eben Sackett, *Popular Entertainment, Class and Politics in Munich, 1900-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以及 Jeffrey S. Gaab, *Munich: Hofbräuhaus & History—Beer, Culture, & Politic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 67. 后者最初是作者在1997年夏的慕尼黑大学经济史研讨班中的部分内容。

[5] 1924年4月28日《前进报》。

[6] 1924年4月28日《法兰克福日报》。

[7] 1924年3月8日《巴黎之声》。

[8] 1924年3月21日《公共纪录报》。

[9] 1924年3月9日《温哥华太阳报》。

[10] 1924年3月22日《小巴黎报》。许多法律专家也得出了这个结论，比如慕尼黑法学教授卡尔·罗滕布希尔，Karl Rothenbücher, *Der Fall Kahr* (Tübingen: Mohr, 1924), 30. 许多法国报纸预测，至少鲁登道夫会脱罪，或者只得到象征性的惩罚，如1924年3月22日《巴黎之声》、1924年3月26日《十字架报》和1924年3月26日《法兰西行动》。

[11] Robert 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64), 22.

[12]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 Abtlg. A/Nr.678, 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 1.4.24, 1924年3月31日, HA 69/1499, 在1924年4月1日的《最后警告!》(Letzte Warnung!)中做了重申。另见媒体报道，如1924年4月25日《纽约时报》、1924年4月25日《高卢人报》、1924年3月29日《前进报》、1924年3月30日《时报》、1924年3月31日《慕尼黑报》，以及1924年4月1日联合通讯社(英国)。警方措施还可见于MINN 73699, BHStA.

[13] *Sicherung des Hitler-Prozesses*, March 12, 1924, HA 68/1498.

[14] VId, *überwachung*, March 29, 1924, HA 68/1498. 民间还有一些关于骚乱的传闻, 见1924年4月28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关于压力可见1924年4月28日《法兰克福日报》和1924年3月29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关于释放被告人的威胁, 见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15] Telegramm aus Augsburg 2658. 33/31.W, 1924年3月31日Police report, VIa 1010/24, 以及同天的HA 68/1498。

[16] 除此之外, 文件中还有别的一些信件, StAnW 3099, StAM。

[17] 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 30, NL Ehard 99, BHSStA。

[18] *Zusammenfassung der Ergebnisse der Besprechung am 31. März 1924 vormittags 9 1/4 Uhr in die Bücherei der Polizeidirektion*, HA 68/1498.

[19]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 Abtlg. A/Nr.678, *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 1. 4. 24*, March 31, 1924, HA 69/1499. 关于宣判前的安保方案, 见*Sicherung des Urteilsverkündigung*, March 31, 1924, MINN 73699, BHSStA。

[20] Kommando der Landspolizei München, Abtlg. A/Nr.678, *Kommandobefehl für Dienstag, 1. 4. 24*, March 31, 1924, HA 69/1499. 关于宣判前的安保方案, 见*Sicherung des Urteilsverkündigung*, March 31, 1924, MINN 73699, BHSStA。另见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 30, NL Ehard 99, BHSStA。

[21] 1924年4月24日《时报》。

[22] 1924年3月21日《强硬报》。

[23] 1924年3月29日电讯联盟社, 1924年3月29日《汇报》, 1924年4月1日瑞典法伦《箭头报》(*Dalpielen*), 1924年3月29日《柏林交易所报》晚间版对此毫不怀疑。

[24] NA T84 EAP 105/7, 2825-26, 这一说法也得到广泛报道, 比如1924年4月1日《巴伐利亚祖国报》; 1924年4月2日《费加罗报》; 以及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202。

[25] Carl Moser von Filseck, *Politik in Bayern 1919–1933. Berichte des württembergischen Gesandten Carl Moser von Filseck*, ed. Wolfgang Benz. Schriftenreihe d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Nummer 22/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1), 1924年3月26日, Nr. 101, 157.

[26] 1924年4月1日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北方标准报》 (*Northern Standard*) 。

[27] 1924年3月20日《汇评》。

[28] 1924年3月31日《法兰克福日报》和1924年4月9日《人民信使报》。

[29] 1924年3月15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30] 1924年3月7日《前进报》。

50 名字说明一切

假如让我重新主审本案，一丁点改动也不会有。^[1]

——吉奥格·奈特哈特

1924年4月1日星期二上午，老军校二楼的法庭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导致一些持有正规入场证的人也被拦在了外面。记者们^[2]在预留给报社的区域也很难找到座位。在旁听席落座的有政府官员、军官，还有一—根据许多资料的记载——不少女人。大家都“屏息静气”^[3]等待裁决，《柏林日报》记者说。

法庭的气氛就像一场歌剧演出或时髦的戏剧首演式。^[4]希特勒相当于演出的头牌，甚至可以是一位圣徒。《每日电讯报》驻外记者听到旁听席有两个女人在说，她们渴望能在希特勒的浴缸里泡一泡。

由于门卫室里堆积了许多献给被告人的花束^[5]，他们选择到后院集中起来拍了一张照片。^[6]希特勒在他那件熨烫过的大衣里面穿了身黑色套装，右手抓着自己的帽子。另一个穿了套装的是弗里克博士。

其他被告人穿军装，佩戴一排排的十字、勋章以及其他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徽章。鲁登道夫穿着他发誓再也不穿的德国军服。唯一没出现在照片中的被告人是恩斯特·珀纳，他因肠胃疾病获准缺席宣判。

这些功勋彪炳的被告人会因重大叛国罪行受到惩罚吗？弗里德里希·韦伯医生的装束也引起了争论。他佩戴一把正装剑^[7]，戴了被禁组织高地联盟的蓝帽子。这身打扮再一次展现了他对共和国法律的蔑视，不过奈特哈特法官在看到韦伯时并没有表达什么异议。

第一个在法庭前方落座的是作风张扬的辩护律师卡尔·科尔。上午10点，或10点刚过不久，被告人入场了，最前面是鲁登道夫，后面跟着希特勒以及律师团队。检察官们紧跟在后面进入法庭。

10点过5分，奈特哈特法官携审判团坐在了长木桌后的巨大皮椅上。奈特哈特的表情凝重而紧张。经过五个星期万众瞩目的审判，这份判决书是压轴大戏。[\[8\]](#)

法官用缓慢而响亮的声音宣布希特勒重大叛国罪名成立。旁听席发出一阵不满的骚动和低语，有人高喊“不能接受！”“丑闻！”的口号。[\[9\]](#)在法庭外，一大群人不顾官员的指示，聚集在铁丝网路障前。等到冲出来抢着发稿的记者们[\[10\]](#)传达了宣判的消息后，这些人立即开始呼喊叫骂起来。[\[11\]](#)

另有三名被告得到跟希特勒一样的判决：韦伯、克利伯和珀纳。刑罚是五年徒刑加小额的罚款，不过从被捕到此时关押的时间会从刑期中减去，具体到希特勒，可以减掉四个月零两周。

根据德国刑法第81条，被判重大叛国罪成者需要终身监禁于普通监狱或堡垒监狱。不过慕尼黑法庭援引了减罪事由，量刑可降至5~15年，并且选择了最低刑罚。随后法庭还通过司法解释确保希特勒及其同党可以在服刑仅6个月后申请假释。

另外五名被告——布吕克纳、罗姆、佩尔内、瓦格纳和弗里克——被判犯有较轻的协助和煽动重大叛国罪。他们每个人所获刑期严格来说是一年零三个月，但法官减掉了自被捕以来已经关押的时间。换句话说，只要在1928年4月1日之前不犯什么事，这五名被告人一天牢也不用坐。

至于鲁登道夫将军，所有指控皆不成立。

“太棒了！”观众高呼。[\[12\]](#)

“鲁登道夫万岁！”

人们鼓起掌来。

根据德国司法程序的要求，奈特哈特接下来在这个短暂的上午庭期里给出了裁决的依据。[\[13\]](#)作为审判中心人物的三名当局领导人是否参与政变尚无定论，主审法官读道。但这无关紧要。他们并非此次受审的被告人。“唯一需要裁决的问题是被告人是有罪还是清白。”[\[14\]](#)

法庭判定希特勒、克利伯和韦伯是啤酒馆政变的谋划者。珀纳也被列入其中，因为他遵照计划行事，并且接受了一个新政权的职位。然而鲁登道夫也接受了职位，这一点并没有给出解释。

奈特哈特称，法庭相信将军去啤酒馆是因为他以为这是在支持古斯塔夫·冯·卡尔的政府，尽管同样是这个正当理由，却不能让其他被告人脱罪。这一推断跟鲁登道夫就这一问题给出的第一次陈述也是不符的。奈特哈特就这样得出难以服人的结论，鲁登道夫没有意识到他在犯下重大叛国罪行：

各方目击证人已经证明，鲁登道夫在讲台上深受感动，以至于很少留意身边发生的事。[\[15\]](#)

合议庭对啤酒馆里屋发生的事也做出了不太合理的解释，推断鲁登道夫可能以为他是在与卡尔的政权并肩行动，尽管这样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鲁登道夫要花那么多时间劝说卡尔，让他到照理会由他来领导的政府中做事。

至于其他被判重大叛国罪——或刑法第81条和第82条所说的武力改变宪法未遂——的被告人，奈特哈特解释了为什么会将减罪事由纳入考量：被告人的行动“完全出于爱国精神…… [带有] 高尚、无私的动机”。^[16]此外，他们以为他们与巴伐利亚当局有共识。

因此，虽然行动本身存在巨大危险，包括可能导致内战和外国入侵，奈特哈特认定此罪适用最低量刑。毕竟，制裁叛国的法律在他看来^[17]也太过无情。然而此前在给左翼谋反者量刑时，无论他还是其他的魏玛共和国法官，都没有因持这样的看法而手下留情。

例如在近期人民法庭的一桩叛国罪审判中，左翼犹太记者费力克斯·费辛巴赫（Felix Fechenbach）被判11年苦役。他还被剥夺公民权10年。同案还有两名被告人齐格斯蒙德·加加斯（Sigismund Gargas）和卡尔·海因茨·兰布克（Karl Heinz Lembke）分别获刑12年和10年。如此偏袒激进右翼被告人的裁决令德国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奇·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感慨魏玛司法系统是“第三帝国的源泉”。^[18]

这个结果让德国民族主义者十分振奋，至少鲁登道夫将军、罗姆上尉和其他多名被告将以自由身离开法庭。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柏林的《德意志报》赞扬法庭得出了一个全体右翼、爱国的德国人想要的结论。柏林《当地汇报》（*Lokal-Anzeiger*）称这是个贤明的裁决。

《德意志日报》从法律和情感角度对裁决给予了类似的肯定，强调了被告人的“高尚动机”。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在反抗外国压迫，并激起了高涨的爱国之情。法庭让德国幸免于“将自己最了不起的战士”关进监狱这样可悲的场面，《德意志汇报》写道。引起批评的主要是对希特勒及他的几个亲信的判决，《十字报》（*Kreuz-Zeitung*）认为实在太过严厉。

当然，这个判决也让不少人大惊失色。柏林的《时代周报》（*Die Zeit*）概括这整件事自始至终——比如啤酒馆这样的场景，近乎闹剧的笨拙行动，还有获得如此荒唐的惩罚——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巴伐利亚奇观，而事件本身除了重大叛国没别的解释。假设希特勒及其同伙没有上庭，《科隆人民报》（*Köln Volkszeitung*）说，对国家的损害恐怕要比奈特哈特的判决还小一点。1924年4月1日将永远是巴伐利亚和德国法律史“黑暗的一天”。^[19]

名字说明了一切（*Nomen est omen*）！^[20]这一天的别称——愚人节^[21]——不是已经预示了一切了吗？柏林的《前进报》称本案的裁决结果是一个可耻的笑话。“慕尼黑重大叛国审判的裁决是一场滑稽戏，如同小孩子过家家。”《法兰克福日报》总结道苏黎世的《新苏黎世报》提醒读者，这丢人现眼的裁决^[22]并非恶作剧，而是真正的“慕尼黑式正义”^[23]。《小巴黎报》称之为“一出史无前例的“公正喜剧””。^[24]

血也流了，人也死了，共和国的合法、合宪政权遭到了攻击，《柏林日报》说。然而被告人们站在法庭上，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受到赞美，^[25]还发誓如有必要他们还会再干一次。这其中包括了五名军人、一名高级警官和一名法官。反动分子是在欢呼雀跃，《图片报》（*Das Bild*）说，但是共和主义者只能沉浸在“耻辱与悲痛”^[26]之中。对政府及其宪法犯下重大叛国罪行，难道惩罚就只是坐6个月的牢？伦敦《泰晤士报》问道。

如果不去看极右翼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媒体，这项裁决招致的批判的确是十分严厉的。慕尼黑《汇报》认为，对鲁登道夫的判决毫无道理可言，除非法庭是以将军的高龄或心神衰弱为理由判他无罪。他在法庭上那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诌，不是挺能证明这个解释的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武装部队统帅，居然会在一个慕尼黑啤酒馆里这么稀里糊涂，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扯进一场重大叛国行动，根本就是胡扯，《奥格斯堡邮报》认为。慕尼黑这场审判的无法无天，反映了《福斯日报》所说的“巴伐利亚政治乱象”。^[27]德国将会落入怎样一个下场？

《日耳曼尼亚》斗胆做了一番猜测。那些试图推翻共和国的人将走出法庭，可能会回到啤酒馆，计划一场更有效的袭击。这个判决看上去根本就是一封邀请函，请其他极端右翼支持者也来采取重大叛国行动。这不是一般的“司法流产”，^[28]《前进报》写道，而是一场威胁国家道统与安全的司法灾难。

阿尔弗雷德·乌尔曼（Alfred Oulman）在《小蓝报》（*Le Petit Bleu*）上表示，他担心还有别的后果。他恳求国际社会——尤其是法国——要愈发警惕起来。一旦看到德国有入侵或越过边境进入邻国之举，应立即采取行动。

考虑到现在的刑期以及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假释，一名警探在一张小纸片的背面算了算，得出希特勒及其他被判有罪的叛国者也许可以逃脱九成的刑罚，而这刑罚本身就已经十分宽大。

为什么希特勒获刑如此之轻？奈特哈特对被告人们的好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是不是跟希特勒做了笔交易，换取他的合作，不在公开庭期中充分暴露巴伐利亚政府反对魏玛共和国和《凡尔赛条约》的行动？这显然不是完全没可能（被告人恩斯特·罗姆的确表示过，有人来跟他商量，让他在法庭上要有所谓“合理的保留”^[29]）。大名鼎鼎的魏玛律师马克斯·赫施贝尔格（Max Hirschberg）认为，对本案尤其是鲁登道夫的裁决表明，此事是事先安排好的：“司法界从未如此恬不知耻地暴露自己是法西斯的婊子，即便巴伐利亚都没有过。”^[30]

但司法的败坏并没有止步于此。^[31]《共和国保护法》第9条第2节规定，犯有重大叛国罪的外国人在刑满后要被驱逐出境。然而奈特哈特选择忽视这条法律。他是这样解释的：

希特勒是一名德奥人 [！] 他自认是德国人…… [他] 像个德国人一样思考和感受。他志愿在德国陆军服役四年半，因为骁勇御敌而得到高级别战斗勋章。他在战时负伤，健康受到损害。^[32]

因此，法官裁决强制性驱逐在本案中并无助益。希特勒应获准留在德国。当时和后来的法律学者都认为，这一解释无疑是违法的。

旁听席爆发出热烈的喝彩。^[33]

希特勒肯定长出了一口气。接下来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奥地利国籍，这样今后再遇到法律上的麻烦，他就不会被驱逐了。事实上此后希特勒一直处于无国籍状态，直到1932年夏才成为德国公民——距离他上台只有六个月。

获得假释的被告人需要留在法庭，等所有记者和旁听者离场后再走。上午11:10，奈特哈特准备结束审判。

这个荒诞的上午，此时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鲁登道夫将军站起来开始抗议他的无罪判决。他想和自己的同僚一同接受惩罚，称这个判决是“一种羞辱，对不起这身军装和上面的勋章”！^[34]

“鲁登道夫万岁！”旁听席里不少人喊道，“希特勒万岁！”^[35]

在哈瓦斯通讯社记者所说的“掌声雷动”^[36]的气氛中，奈特哈特敲响法槌，试图制止鲁登道夫。不少记者注意到，主审法官看起来对这一阵爆发深感困惑。^[37]他费了好大劲才让法庭恢复秩序。奈特

哈特命令警察找到起哄的人，他会判他们三天监禁。显然在敷衍了事的警察没能找到他们。[\[38\]](#)

在奈特哈特试图清场的时候，一名官员来到鲁登道夫将军身边，要求他从侧面的一个门出去，直接上院子里的一辆车。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大楼正门外引起骚动，聚集在那里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在高喊“希特勒万岁！”并唱起国歌。[\[39\]](#)

据《柏林人民报》记者说，鲁登道夫的脸气得“通红”，[\[40\]](#)他拒绝走侧门，并傲慢地跟那名官员说有本事就逮捕他。主审法官命令将军服从，依然没有效果。

“我现在是个自由人了。”[\[41\]](#)鲁登道夫说，完全没把官方当回事。

将军艰难地从走廊穿过，那里现在已经挤满了在为被告们喝彩的观众，他从正门走了出来，迎接他的是《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R·伊巴拉所说的“疯狂的喝彩欢呼”。外面的人群[\[42\]](#)无视警方的警告，不断挤向路障。鲁登道夫的妻子在车里等着，车上已经盖满了鲜花，都是“他的众多欢欣鼓舞的仰慕者扔来的”[\[43\]](#)。在汽车的引擎盖上[\[44\]](#)有一面小小的黑白红三色德意志帝国旗帜。

民族主义者们从步兵学校出发，民众夹道欢呼：“打倒共和国！”[\[45\]](#)还有人站在窗口挥舞着手帕，咒骂卡尔、洛索和塞瑟。人群越来越躁动。在慕尼黑城的西北部，骑警[\[46\]](#)手持裹着橡胶的警棍冲击抗议人群，造成多人受伤。

与此同时，希特勒被押送到二楼一个房间，在那里等待转往监狱。他走到窗边微笑着挥手致意，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47\]](#)

[1] Georg Neithardt, *Einige Bemerkungen des Vorsitzenden im Hitler-Prozess über die Prozessleitung*, April 1924, Nachlass Hans Ehard 97, BHSStA.

[2] 1924年4月2日《德意志汇报》和1924年4月1日电讯联盟社。

[3] 1924年4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其他报纸有类似的表述，如1924年4月2日《大德意志报》。

[4]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5] 1923年4月1日魁北克《每日电讯报》，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4月5日《人民报》，以及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9，NL Ehard 99，BHSStA。

[6] 不少知名权威错误地把拍摄时间说成了宣判之后，但实际上显然是在之前，见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8-29，NL Ehard 99，BHSStA，以及被告人罗伯特·瓦格纳的叙述，1924年9月12日，HA 69/1501。此外不少史学家忘了这张照片并不完整。珀纳不在其中。

[7] 当然，韦伯在法庭里没有戴那顶帽子，Landgericht München I, Report, September 2, 1924, HA 69/1501。不过，1924年4月19~20日《慕尼黑邮报》正确地总结道，跟过去几个礼拜的审理比起来，这身穿着的丑闻就不算什么了。

[8]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StAM.

[9]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

[10] 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4月2日《大德意志报》。

[11] 1924年4月2日《农民周报》，另外1924年4月4日《卫士报》描绘了当时歇斯底里的场面。

[12] 1924年4月2日《巴黎之声》；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报。

[13] 这是一篇东拉西扯的劣作，充斥着错别字、语法错误、自相矛盾、生硬的法律表述以及许多遗漏。可参阅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61。

[14]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13, StAM, 更多理据陈述见28-30。

[15]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40, StAM.

[16]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42, StAM.

[17]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43-44, StAM. 关于裁决本身，还可参阅Otto Gritschneid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93-95。

[18] Henning Grunwald, *Courtroom to Revolutionary Stage: Performance and Ideology in Weimar Political Tri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19]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和1923年4月3日《巴伐利亚信使报》。

[20] 1924年4月28日《慕尼黑邮报》。

[21]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22] 1924年4月2日《法兰克福日报》。

[23]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24] 《小巴黎报》1924年4月2日。

[25] 1924年4月1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26] 1924年4月1日《图片报》和1924年4月2日《柏林人民报》晨间版。

[27] 1924年4月2日《福斯日报》晨间版。1924年4月5日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也认为这不是个法律判决，而是政治判决。

[28] 1924年4月2日《前进报》。

[29] 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200.

[30] Max Hirschberg, *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 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8), 242.

[31] Alexander Graf von Dohna, “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 Heft 9/10, 335.

[32] Anz. Verz. XIX 421/1923, Proz. Reg. Nr. 20, 68, 97/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8, 44, StAM.

[33] 1924年4月2日《新苏黎世报》第一晨版。

[34] Lothar Gruchmann, Reinhard Weber, and Otto Gritschneider, eds., *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München: K. G. Saur, 1997), IV, 1593.

[35]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

[36] 1924年4月2日哈瓦斯通讯社和1924年4月2日《梅拉诺报》。

[37]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

[38] 还有目击者说警察拒绝了，*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 272。

[39] *Bericht über die Vorfälle an der Pappenheimstrasse anlässlich der Urteilsverkündung im Hitler-Prozess*, am 1. April 1924, April 2, 1924, HA 69/1499.

[40] 1924年4月1日《柏林人民报》晚间版。

[41]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鲁登道夫在正门，见Police report, Kommando der Schutzmannschaft, Nr. 1306, April 16, 1924, HA 69/1499。

[42] 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和1924年4月4日《大德意志报》。

[43] 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鲁登道夫在正门，见Police report, Kommando der Schutzmannschaft, Nr. 1306, April 16, 1924, HA 69/1499。

[44] 1924年4月2日《小巴黎报》。

[45] 1924年4月1日魁北克《每日电讯报》。

[46] 见警方文件，尤其是HA 69/1499，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如1924年4月5~6日《大德意志报》。

[47] 有传记称希特勒最后是急匆匆地上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甚至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就上车了，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261，但是实情并非如此。希特勒一直在法庭，后来走到了窗边：1924年4月2日《慕尼黑最新消息》；1924年4月2日《纽约时报》；1923年4月3日《法兰克福日报》；1924年4月2日《高卢人报》；以及汉斯·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28, NL Ehard 99, BHStA等都给出了目击陈述。

第三篇 监狱

51 7号牢房的恺撒

这锅德国政治大杂烩，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或几个怪人，或者可能是出乎意料的人物，突然就显要起来。^[1]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那天下午，慕尼黑警方将希特勒押回兰茨贝格监狱的堡垒。不久，二楼公共室粉刷一新的墙壁上将挂起一个装饰了黑白红色丝带的荣誉花环，^[2]彰显他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取得的胜利。

在1924年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和形象已经跟六个月前不可同日而语。那年出版的一本书概述了他在一个日渐壮大的群体中的地位。在吉奥格·绍特（Georg Schott）的《希特勒大众书》（*Das Volksbuch vom Hitler*）^[3]中，这名被告人被奉为先知、天才、谦谦君子、刚毅之士、唤醒众生的人、德国青年领袖。对这位新民族主义英雄的赞美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的语言，有时几乎有种神秘主义色彩。

而希特勒的拥趸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范畴，开始向上层蔓延。1924年5月8日，两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菲利普·莱纳德（Philipp Lenard）和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在《大德意志报》上撰文，表达他们对希特勒的赞赏。正如科学家对伽利略、开普勒、

牛顿等历史上的伟大开拓者推崇备至，两位物理学家写道，“我们对希特勒、鲁登道夫、珀纳和他们的战友怀有同样的赞叹与崇敬”。这些人站在法庭上，“仿佛远古神明的馈赠，那时候的种族更纯净，人民更伟大，思想更诚实”。两位诺尔贝奖得主打算从此追随德国的“人民领袖”。[\[4\]](#)

审判过后，被禁的纳粹党立即打着“民族集团”（Völkisch Block）的旗号重新组织起来，在春季选举[\[5\]](#)中取得大胜。三名被告人——鲁登道夫、罗姆和弗里克——参选国会议员，全都当选了。34名前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及其他极端主义者参选，32人获胜。在审判结束五天后的巴伐利亚邦议会竞选中，右翼集团的成绩还要好，得到该地区至少17%的选票，并得到慕尼黑全城人口约三分之一的支持。这是迄今为止极右翼的最佳表现，直到1930年纳粹党迎来那次“突破性选举”。

凭借奈特哈特的纵容以及媒体事无巨细地报道，希特勒在审判中的发言为他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名声。据一份慕尼黑警方报告称，“在[被告人们]被定罪并当成殉节的圣徒一般看待后，”希特勒的人气“不降反升”。[\[6\]](#)

被迫禁闭于监狱中的境遇给希特勒带来的好处，同样远远多于给德国或世界所带来的。现在希特勒不仅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在政变以及政治生涯方面的成败得失——这方面他很少表现出有多强的能力，而且也没什么意愿去反思——还可以享受支持者的狂热爱戴。这些狱友会逢迎他的虚荣，投喂他的野心，还通过许多其他方式导致兰茨贝格内形成一种危险的纳粹回声室效应。这一切都发生在堡垒的高墙之内，不用担心受到外界的反对或批驳。

希特勒得到的堡垒监禁刑罚是刑法体系中最缓和的关押形式。由于现在是被定罪的囚犯，他在狱中的编号改成了21，并搬到了7号囚

室。^[7]里面宽敞明亮，可以看到花园，在20英尺高的石墙外是一片辽阔的田园，汽车在远处的马路上疾驶而过。对车很着迷的希特勒，很快开始做起汽车和高速路的白日梦。

克利伯中校关在右侧隔壁的8号囚室，韦伯医生在相对小一些的9号囚室。兰茨贝格的其他囚犯管这片区域叫“指挥官楼”^[8]。

还有两名囚犯搬进了这一区。一个是埃米尔·莫里斯，^[9]他在另一场审判中因参与政变被定罪。另一个是鲁道夫·赫斯。在得知法庭做出如此宽大的裁决后，^[10]他在5月12日向慕尼黑警方自首。人民法庭在期满前的最后一天裁决赫斯犯有重大叛国罪，因此得到了和希特勒一样的惩罚。^[11]

兰茨贝格无疑将给希特勒提供他直到当时为止享受过的最舒适的生活。从每天的生活作息可以看出，他享受着相当多的优待。^[12]早上6点狱卒换岗时，希特勒的囚室门会打开，他可以在楼内自由走动。

7点，^[13]他的狱友会在公共室给他端上早餐，那里有一张6人餐桌，通常会铺一张白色桌布。在几英尺外有一个铁炉、一个双水槽，墙上还有一面普通的镜子。在一个角落摆着两张藤椅。早餐通常有咖啡、面包、燕麦粥配黄油，还有可以另外购买的橙子酱，吃完后其他囚犯会收拾。这些人是所谓杂役（Kalfaktoren），^[14]都是关押在主监狱的囚犯，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个美差。他们会打扫房间、铺床、擦鞋，饭后收拾桌子，把剩下的饭菜吃掉。

早上8:00，希特勒和一同关在堡垒的亲信可以用监狱里的双杠、鞍马和其他体操器械锻炼。身形瘦削、运动能力出众的韦伯医生有时会当起教练和指导。囚犯们还可以跑步、摔跤、练习柔术^[15]、表演健身操——他们开展从赛跑到扔石头和木棍等各种竞赛。鲁道夫·赫斯一刻也没耽误，一进兰茨贝格就成了这些监狱比赛的健将。^[16]其

中一项比赛的奖品是一本皮面精装版北欧萨迦，上面有阿道夫·希特勒的题字。

此外还有拳击。在2号牢房的希特勒突击队队员埃德蒙德·施耐德（Edmund Schneider）是个业余拳手，他说服兰茨贝格狱方给他弄来一袋沙子当沙袋用，然后开始把这门艺术传授给狱友们。其中一场比赛的一方是6号牢房的埃米尔·莫里斯，希特勒的司机，有丰富的打鬥经验，对手是另一个希特勒突击队队员、11号牢房的赫尔曼·弗布克（Hermann Fobke），两人都被打得几乎人事不省。囚犯汉斯·卡兰巴赫（Hans Kallenbach）说他从没见过希特勒笑得那么开心，就算有也是极少。^[17]经此一役，希特勒要求搏击类项目只允许摔跤，不过到头来囚犯们还是得一瘸一拐去医务室。

希特勒自己通常是不参加训练和比赛的，^[18]始终是个观众，另外据典狱长说，偶尔还会做裁判。^[19]除了肩部有伤以外，希特勒似乎不太可能跟其他囚犯长时间相处。他对艰苦的肢体活动没兴趣，并且显然也认为，一个领袖参与这种竞赛有损于他在支持者眼中的形象。

晨练后，希特勒和兰茨贝格的囚犯可以使用堡垒的图书室和花园。有些囚犯会打牌、下棋，或用他们的零食、雪茄或香烟赌博。克利伯中校除了下象棋外还喜欢在花园里做事，穿着工装裤、戴着宽檐草帽四处走动，像个“巴西咖啡种植农”^[20]。赫斯在家信中说，他有时候会劈劈柴来调剂，在“头脑劳动者”和“拳头劳动者”^[21]之间实现一种平衡。

希特勒喜欢在建筑和围墙之间的一条近200米长的石子路上走。那地方有两条这样的路，一路上有灌木丛、春花植物、果树和他从窗口能看到的那个花园。希特勒经常会跟埃米尔·莫里斯或鲁道夫·赫斯一起走。这条路很快就有了“希特勒小径”^[22]之称。

上午11点分发信件，希特勒会收到大量的信和包裹。所有寄到监狱的东西都会被拿到值班室，平摊在一个大桌子上。像衣服这样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的物品，需要检查缝线，至于面包、蛋糕或香肠之类，狱卒会切下一块，确定里面没有藏什么字条、武器或有助于越狱的工具。然而实际上，这项措施的执行无疑是很松懈的。

狱卒汉姆里希描述了囚犯们拆包裹的情景。克利伯中校是“攻”包裹，就像指挥官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最强点——最坚韧的绳子部分。韦伯就很不一样，对待一个包裹就像一道谜题，“对每一个圣洁的绳结都用最大限度的谨慎和耐心”去拆解。^[23]希特勒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会根据包裹及发件人的不同采取不一样的方法。

一天中最重大的时刻自然就是正餐时间了，每天中午在公共室就餐。所有囚犯会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直到有人高喊“立正！”表示希特勒来了。希特勒随后向桌首走去，顺便跟每个人握手。在他们身后的墙上有一面血红色的钩十字旗，是偷带进监狱的。要是听到有狱卒来，囚犯们会把旗藏到一个盆下面。狱卒则会装作没看见，因为展示党派标志是违反兰茨贝格条例的行为。

饭后，还是由主监狱的囚犯^[24]收拾餐具。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可以抽烟，用旧雪茄盒当烟灰缸。本身不抽烟的希特勒会吃水果和蛋糕。一旦希特勒站起来回自己的牢房读信或回信，聊天就戛然而止了。他还会画画。他画了虚构的博物馆^[25]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会画剧院、国家图书馆和大学的建筑设计图；为几出瓦格纳歌剧、普契尼的《图兰朵》和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设计了舞美。

午后，一些囚犯会看书、午睡或玩扑克之类的游戏。到了下午3点半前后，用过下午茶或咖啡后，囚犯可以去花园。下午6点在各囚室分别用晚餐，通常是香肠或腌鲱鱼，配煮土豆或土豆沙拉，另外还可以购买半升葡萄酒或啤酒。这么小的分量，囚犯汉斯·卡兰巴赫说，对

那些嗜酒之徒来说就成了坦塔罗斯式（Tantalus-like）的折磨，[\[26\]](#)。尽管狱方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通过在监狱花园或庭院里干活，增加每天的饮酒限额。

最后，关在堡垒的囚犯还有额外的一小时锻炼时间，可以赛跑、比试弹弓、打球，然后傍晚可以喝着茶或代可可再聊会儿天，通常还会有蛋糕或面点。克利伯中校——年轻的囚犯管他叫“克利伯老爹”[\[27\]](#)——经常说起义和团时期他在中国的时光；还有人会回忆他们在一战时的经历，或者在自由军里与共产主义者作战的往事。希特勒有时会来一场演说。怀有好感的囚犯和狱卒据说会屏息聆听，没过多久已经开始用“希特勒万岁！”作为彼此间的问候语。

这样的作息安排意味着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一楼的11号囚室，24岁的法律学生、什切青人赫尔曼·弗布克把牢房变成了“塔莉亚茶室”[\[28\]](#)。弗布克还向狱友们提供了另一项服务：11号囚室成了发行“秘密”监狱报纸《兰茨贝格自由人报》（*Landsberger Ehrenbürger*）的地方。报纸的名字是对他们所接受的监禁类型的一语双关，既有“自由的人”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兰茨贝格荣誉公民”。

1924年9月，狱方的审查员发现一个名叫埃米尔·丹纳贝格（Emil Danneberg）的囚犯信中提到了这份报纸，不过狱卒估计早已知道。据信所有报纸都被销毁了，不过至少有一期得以完整保留：1924年8月4日发行的第6期，是一份纪念一战十周年的号外。在这期报纸中，克利伯撰文谈了他的连队的调动；韦伯讲述了他的“雪鞋营”[\[29\]](#)在孚日山脉的山林中的袭击行动。鲁道夫·赫斯写了一首关于凡尔登血战的诗。

报纸的风格据说总体来说是轻松随意的，有笑话、谜语、评论以及当日新闻。此外还有以狱友和狱卒为题的配诗讽刺画。希特勒通常

会撰写头条文章，或添一幅素描。在其中一份留存下来的报纸中，希特勒讽刺了韦伯医生过分狂热的锻炼指导。他的学员东倒西歪，吊着胳膊，头上缠着绷带，靠拐杖撑着。按照计划，报纸要在周六晚的公共室集会上准时发行。

晚上10点熄灯，不过希特勒可以延长一段时间。每晚最后通常要喊一遍“胜利万岁”，唱民族主义歌曲。可能还会有监狱乐队伴奏[30]。一个希特勒突击队队员会拉小提琴，一个弹琉特琴，另外还有口琴、竖琴和一把聒噪的土制踩地琴，就是一根扫把柄上面绑着铃铛和锡罐。

“这么说吧，”囚犯赫尔曼·弗布克在1924年6月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在兰茨贝格的生活]还是相当能忍受的。”[31]

[1]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2] 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47. 此外监狱还收到了献花，见1923年4月3日《柏林日报》晚间版。

[3] 1924年12月17日《人民信使报》推荐他的书作为那年的圣诞节读物。

[4] 1924年5月8日《大德意志报》。

[5] 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 1923-1925* (London: F. Cass, 1989), 81-86.

[6] David Clay Large,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94.

[7]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16, and Franz

Hemrich, *Erinnerungen eines Gefängnisbeamten*, ED 153-1, 27, 113, IfZ.

[8] 除了囚犯，监狱的狱卒也是这么看的，例见汉斯·卡兰巴赫，*Mit Adolf Hitler auf Festung Landsberg* (München: Kress & Hornung, 1939), 56, 以及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D 153-1, 28, IfZ。还有一个说法是“指挥官山”，这可能是对哥特体德文（卡兰巴赫）或手写字（汉姆里希）的误读。

[9] Stosstrupp Hitler trial: Proz.Reg.Nr. 187/1924, May 3, 1924, HA 67/1493.

[10] 1923年5月11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克拉拉·赫斯，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22。

[11] 希特勒审判并非该机构审理的最后一案，尽管有不少地方这样写，比如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245。实际上应该是赫斯案。可参阅*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342-45, 356, NL Ehard 90/3, BHSStA。

[12] 1924年8月17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弗里茨·赫斯，见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49; Kallenbach (1939), 73-74, 78-79, 101 and 104;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17-19, 51-53, and 55; 1924年6月23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 (Ludolf Haase) 见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91-92。

[13] 弗朗茨·汉姆里希未出版回忆录，ED 153-1, 110, IfZ。

[14] ED 153-1, 27, 31, 40, 59-60, 113, IfZ.

[15] Kallenbach (1939), 80和Hemrich, ED 153-1, 34, IfZ。两个出处都使用了“柔术”的老式拼写“jiu jitsu”，也就是后来在1920年代里约热内

卢发展起来的“巴西柔术”的前身。

[16]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32, and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7.

[17] Kallenbach (1939) 79.

[18] Kallenbach (1939) 79. 一个领袖不能参与比赛，冒着失败的风险，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57.

[19] Hemmrich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4 and 183.

[20]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24.

[21] 1923年8月17日鲁道夫·赫斯致信弗里茨·赫斯，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49.

[22] Kallenbach (1939), 95, and Hemmrich, ED 153-1, 36-37, IfZ.

[23] Hemmrich interview in 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5.

[24] The *Kalfaktoren*, ED 153-1, 27, 31, 40, 59-60, 113, IfZ.

[25] 1924年5月18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26-27.

[26] Kallenbach (1939), 95.

[27] Kallenbach (1939), 65. 另一个绰号是“中国”，ED1531, 31, IfZ.

[28] Kallenbach (1939), 71. 弗布克应该是在11号，而不是有些地方说的1号，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267。

[29] 1924年8月4日《兰茨贝格自由人报》，副本可见于HA 4/92。

[30]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34.

[31] 1924年6月23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收录于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92。

52 面对面

纳粹暴徒的一个政治据点。^[1]

——1924年11月5日《慕尼黑邮报》评价兰茨贝格

在受审前，希特勒曾抱怨很少有人去兰茨贝格看他。审判后显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前往堡垒探望他的人源源不断，他们需要先验明身份，^[2]去典狱长办公室填探视卡，^[3]写上他们的姓名、想要探视的囚犯以及探视日期。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或他的副手会确定一个时长，然后签署通行证。接着访客会被带到二楼的其中一间探视室。

最初的一批访客中，^[4]当然少不了马克斯·阿曼这样的旧识，还有罗姆上尉、弗里克博士和威廉·布吕克纳之类一同受审的人，他们是4月10日上午一同前来的，聊了一个小时。还有一些参加政变的党内老人也是初期的常客：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乌尔里希·格拉夫、尤利乌斯·施特莱谢尔、赫尔曼·埃瑟、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小家伙”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最后这位先后来探视了五次，最早是在4月11日。

其中一次带上了他的小儿子埃贡，他本以为兰茨贝格是个地牢，希特勒戴着镣铐，睡在地上，老鼠在身边乱窜。然而他发现牢房窗明几净，还有花园景观。此外，埃贡记忆最深的是希特勒的声音，在激昂澎湃地陈词时，一度震得窗户都在抖。

探视通常安排在上上午9点到中午，然后是下午2点到5点。有时候希特勒需要连续见几个人。例如4月12日鲁登道夫来看他，之后希特勒又见了七个人，包括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一同受审的海因茨·佩尔

内；参加了政变的马克斯·塞瑟尔曼；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后者带来了一篮水果，^[5]还有他那台值得信赖的相机。

霍夫曼就是趁这个机会拍下了一系列照片，展现他在兰茨贝格高墙内的生活。其中一张照片里，希特勒穿着背带皮裤，手持一张报纸。还有一张有希特勒、克利伯、韦伯和埃米尔·莫里斯，后者拿着琉特琴，坐在一张摆着花的小桌边。拍摄这些照片无疑需要得到狱方的配合，由此可见兰茨贝格的管理多么宽松。

照片固然反映了不少真相，不过还是需要记得，狱方的“纵容”主要是由于希特勒得到的刑罚本身的性质（即堡垒监禁），而不是因为对希特勒的好感。但这不等于说兰茨贝格的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或他的手下就不是极端右翼思想的信徒，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属于此类。

事实上囚犯、访客乃至狱卒对希特勒百般奉承。5月1日第二次前去探望希特勒的恩斯特·罗姆走时大摇其头，那些被鲁登道夫称为“溜须拍马、工于心计”^[6]之徒把希特勒捧上了天，让他倍感无奈。三天后来探视的卢克·吕德克则推测，这段坐牢的经历对希特勒是好事。在他看来，这个阶下囚仍然有着“吞火者”的眼神，但同时显然又“显得更冷静了，对自己更有信心”。^[7]

前后有350名男女老少前往兰茨贝格探望希特勒，总计超过450次。^[8]在狱卒奥托·鲁尔克看来，探视者“什么阶层、年龄和地位都有”。^[9]从阿尔卑斯的山峦到波罗的海的沙滩，五湖四海的人乘着火车、汽车和自行车前来探望他。有不少人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赶来。甚至有一对年轻夫妇从德国北部徒步跋涉来到兰茨贝格。

然而从兰茨贝格的记录来看，访客的地区分布^[10]没有这位狱卒记忆中那么多样。每10名探视者至少有8名来自巴伐利亚，这其中半数

是慕尼黑人。只有27人确定是来自普鲁士，其中9人来自柏林。许多地方一个人也没来。这包括了将来会给纳粹党提供有力支持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以及东普鲁士，后者的容克和地主们一直是德国极右翼的坚定支持者。

这些都说明了一点，尽管经过审判后有了很大的提升，纳粹党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地区组织。不过情况在改变。1924年10月23日，莱比锡出版商F. A. 布罗克豪斯（F. A. Brockhaus）^[11]致信兰茨贝格，索取有关希特勒的信息，以收录于著名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的第15版。第8卷的字母H部分于1931年完成，其中首次收录了“希特勒，阿道夫”和“希特勒政变”这两个词条。后一个词条的释文提到希特勒如何在政变失败后重新赢得党的信任。

不过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确如兰茨贝格典狱长所说，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里面包括了教授、医生、动物学家、工程师、建筑师、作家、记者、教师，还有银行家、烘焙师、簿记员和学生，此外还有军人和邦警。在入狱的最初两个月里，希特勒还见了一名作曲家、一名风琴师、一名歌手、一名钢琴技师、一名古籍交易商、一名布料生产商以及多名机械师和锁匠。各路商家上门来推销从护发产品到五金器具、从打字机到墓碑的各种商品。

5月11日星期天下午前来的一名访客，想必让希特勒格外欣喜。那是和他一起在第16步兵团当通讯员的恩斯特·施密特（Ernst Schmidt）^[12]，战后两人还曾短暂共事，执行从站岗放哨到测试防毒面具等各种任务。而后这位希特勒的老战友去了慕尼黑以东的巴伐利亚乡村加兴，做室内设计。典狱长只给了他1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关押期间，多数人得到的探视时间就是这么长。

另一个熟人是布鲁诺·比希纳（Bruno Büchner），曾经的自行车赛车手和飞行员，他在上萨尔茨堡开了一家希特勒钟爱有加的小旅

馆。在发起政变前，希特勒在那里待过几个月，对雨天里的山峦美景赞不绝口。还有的探视者回忆起希特勒，说他用“沃尔夫先生”这个化名，甩着那根到哪都带着的狗鞭子，怒斥柏林的“犹太享乐主义”。比希纳在4月17日携年轻的妻子伊丽莎白前去探望他。

不少人在当时和日后都提到过希特勒的女人缘，并且多年来一直有传闻称，当时女人们蜂拥前往兰茨贝格。因此，实际前去探视的女性之少是出人意料的。记录显示共有57名女性探视者，不到总数的六分之一。何况这个数字还有水分，里面包括了希特勒的姐姐安格拉；侄女吉莉；邻居玛丽·贝赫托德（Marie Bechtold）；房东玛丽亚·莱赫特（Maria Reichert），^[13]她还带了11岁的女儿安东妮。莱赫特夫人会不会是来提醒他房租没交？至少还有一个来兰茨贝格的女人可能是奔着这个来的，那就是巴蓓特·格劳（Babette Grau），哥尼流街纳粹党总部所在地的房东。

在相对比较少的女性访客中，还包括了克莱斯岑齐亚·海辛贝尔格（Kreszenzia Hechenberger），她的儿子安东在游行至音乐厅广场时遇难。不幸的是，对于4月30日那段10分钟的探视，监狱记录里看不到多少详情。至于希特勒自称没有母亲因为在政变中失去了孩子来找他算账，也不知道这位母亲是否同意。

其他的女性探视者，有些主要是与希特勒的手下有关系：舒伊勃纳-里希特的遗孀玛蒂尔德；鲁登道夫的情妇、未来妻子玛蒂尔德·冯·开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洛伦兹·罗德的妻子伊丽莎白；赫尔曼·埃瑟的妻子特丽莎；以及赫尔曼·戈林的妻子卡琳。4月15日^[14]前来的卡琳本希望为她和她丈夫获取一点资金上的支援。结果只是拿到了一张希特勒的签名照片。

不过，虽然来兰茨贝格看望希特勒的女人不多，其中有几入却将在他的人生当中起到重要作用。倘若典狱长所言非虚，希特勒在吉莉

的嘴上结结实实亲了一下，^[15]除了她之外，另一个格外重要的访客是伊琳娜·拜希施坦，也就是差点把他偷偷送到奥地利去的那位知名钢琴商的妻子。

拜希施坦第一次去兰茨贝格是5月15日，当时因为带给希特勒的礼物要接受检查，她还发了一通脾气。她自己动手把包装撕开，^[16]把精美的果仁糖撒在监狱的地上。也许狱卒们会发现里面藏着把机关枪，她高声嚷道。其他几次来访给狱卒的印象就没那么深了，她一共来了12次，每次持续时间至少1小时。拜希施坦总共的探视时间达到了18个小时25分钟，成为与希特勒见面时间最长的人。其中有两次她带来了16岁的女儿萝特。^[17]这就足以导致传闻四起，^[18]说她在准备把希特勒变成自己的未来女婿。

拜希施坦在社交场上的对手、嫁给了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Hugo Bruckmann）的罗马尼亚公主艾尔莎·布鲁克曼（Elsa Bruckmann），也是一个日后会走进希特勒生活的兰茨贝格访客。她从19世纪末开始主办一个闻名遐迩的文学沙龙，吸引了从尼采到托马斯·曼，从莱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等人物。她是在兰茨贝格第一次跟希特勒见面——而她在1924年5月22日的这次8分钟的探视，^[19]将使她成为希特勒夺取权力过程中最重要的资助人之一。

希特勒毫不讳言拜希施坦和布鲁克曼的重要性。据说他曾表示，出狱后重建纳粹党的行动，没有这些女人^[20]是不可能实现的。

希特勒追随者的来信在兰茨贝格的审查员办公室里堆积如山。获刑三天后，马格德堡“雅利安联盟”的成员寄来一封信。他们想表达得知法庭裁决时他们感受到的“痛苦与愤怒”，他们觉得那就像“脸上挨了一拳”。^[21]这些极端分子对希特勒的赞颂狂热至极，导致狱方决定把信扣下来。不过还有许多表达类似感受的信件得以通过。

有人给了希特勒一份瑞典反犹报纸《维迪报》（Vidi），这样他就可以读到报纸对他在审判中的演说做出的正面评价。报纸尤其赞赏他对犹太敌人的怒斥。他的结案陈词是“一部力量与敏锐逻辑的杰作”。至于此次审判的其他部分，则彰显了“卡尔、洛索和塞瑟这个不光彩的加略人犹大三人组的惊天恶行、谎言和不择手段”。^[22]

由于有堡垒监禁的优越待遇，兰茨贝格的囚犯可以自己花钱购买物品或洗衣之类的服务。从采购报告来看，^[23]希特勒买的大多是黄油、鸡蛋、土豆、柠檬、糖、香草、咖啡、意大利直细面、通心面、线面、沙拉油、醋精、洋葱，至少有一次买了腌肉（罗蒂牌肉汤块）。6号囚室的邻居埃米尔·莫里斯把他的布丁烹制技能用了起来，为希特勒和“指挥官楼”^[24]的囚犯们服务。

最让人想不到的恐怕是希特勒买的最多的东西：啤酒。1924年7月，希特勒买了不下30瓶啤酒，还有好几瓶烧酒。入秋后的采购仍然保持在这个水平，8月他购买了48瓶啤酒，9月达到60瓶。

此外还要加上邮寄包裹或探视者带来的东西，从水果到花，从书本到白兰地，希特勒能收到各种物品。有的访客会带面包、馅饼^[25]、香肠、零食、烈酒和利口酒，还有南美的咖啡豆^[26]。赫斯说，里面有他吃到过的最酸的泡菜和最甜的蛋糕。还有人带来版画。伊琳娜·拜希施坦给了他们一台留声机，^[27]可能还往正在成形的唱片收藏里添了几张唱片：华尔兹、军事进行曲、舒伯特的《你是安宁》和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

4月20日，希特勒35岁生日以及那一年的复活节，这位兰茨贝格囚犯接待了12组访客，共21人。据狱卒奥托·鲁尔克回忆，当时“贺卡、信件和电报洪水般”涌入监狱，此外还有“成簇的鲜花”以及“堆积如山的包裹”。^[28]他的同事弗朗茨·汉姆里希说，光是信件就得用洗衣篮^[29]装着抬进来。据说所有蛋糕、饼干、巧克力和其他

礼物都堆在了桌椅上，已经蔓延到另一间囚室。汉夫施丹格尔两天后来到兰茨贝格，说希特勒的囚室就像个熟食店。^[30]狱卒汉姆里希觉得像个花店^[31]或温室。

有如此多的礼物，希特勒自然可以慷慨转送给其他的囚犯或狱卒，通常是在他们的生日或周年纪念时，从而有利于他和狱卒搞好关系。

兰茨贝格的第21号囚犯一开始对自己的成名还颇为享受。不过到了夏初，接待访客对他来说已经占据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希特勒表示希望减少探视。此时他正有别的事情需要操心。^[32]

[1] 1924年11月5日《慕尼黑邮报》。

[2] 1924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和ED 153-1, 47-48, IfZ。

[3] Folder No. 4, JVA 17.000, StAM.

[4] 探视者名单见143140, STA 14344, StAM。

[5]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58-59.

[6] *General Ludendorff über die Vorgänge in München*, HA 5/116.

[7] Kurt G. W. Ludecke, *I Knew Hitler: The Story of a Nazi Who Escaped the Blood Purg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8), 233.

[8] 名单收录于143140, STA 14344, StAM。这份名单终止于1924年10月，不过考虑到希特勒的假释希望以及写书的工作，他在11月和12月可能没有接受多少探视。

[9]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57. 另见兰茨贝格

呈交司法部的报告，1924年9月18日，HA 69/1501。

[10] 关于这个话题，可参阅Peter Fleischmann, ed., *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 Verlag Ph. C. W. Schmidt, 2015), 50–51。

[11] October 23, 1924, JVA 17.000, StAM.

[12] *Sprechkarte*, May 11, 1924, folder4, JVA17.000, StAM. 罗塔·马赫坦 (Lothar Machtan) 认为此人是希特勒的“特殊伙伴”和男情人, *The Hidden Hitler*, 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67–69, 71, 88–100。托马斯·韦伯 (Thomas Weber) 觉得这个看法“非常有意思”，但最终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两人间是这种亲密关系,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8。兰茨贝格档案或监狱回忆录都没能证实或批驳这一说法，也没有给出有价值的披露。

[13] 房东先后在1923年11月和12月催过房租,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No.258, 628。

[14] Björn Fontander, *Carin Göring skriver hem* (Stockholm: Carlssons, 1990), 154, and April 15, 1924, 143140, STA 14344, StAM.

[15] ED 153-1, 48, IfZ.

[16] ED 153-1, 48–49, IfZ.

[17] May 15, 1924 and August 5, 1924, *Sprechkarte*, Folder No. 4, JVA 17.000, StAM, and 143140 STA 14344 StAM.

[18] 几年后，据四季酒店的一名员工说，拜希施坦在酒店茶室把自己的女儿往希特勒身上推, Josef Lampersberger, February 1960, P. II. c. No. 1176, ZS 3146, IfZ。

[19] *Sprechkarte*, May 22, 1924, Folder No. 4, JVA 17.000, StAM.

[20] OSS Sourcebook, 47, NA, 依据Otto Dietrich, *Mit Hitler in die Macht. Persönliche Erlebnisse mit meinem Führer* (München: F.

Eher, 1934), 142-43。

[21] Aryan Bund, letter to Hitler, April 4, 1924, printed in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25-26.

[22]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29-30.

[23] JVA 15162/17, StAM.

[24] 有时候这个词会译成“指挥官山”，可能是对兰茨贝格监狱资料中的哥特体文字或手写德文的误读。见第429页注释。

[25] 1924年10月1日希特勒致信德意琛鲍尔夫人 (Frau Deutschenbauer), 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Nr. 661, 1245。

[26] ED 153-1, 115, IfZ.

[27] 1924年10月14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 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53。

[28]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20. 1924年4月27日《法兰克信使报》也描述了这一景象。

[29] ED 153-1, 46, IfZ.

[30] Ernst Hanfstaengl, *Zwischen Weissem und Braunem Haus. Memoiren eines politischen Aussenseiters* (München: R. Piper, 1970), 157.

[31] 汉姆里希访谈, 见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72, 还有他在回忆录中说的“温室”, ED 153-1, 47, IfZ。

[32] 1924年7月15日《人民信使报》。

53 谎言、愚蠢与懦弱

当今的统治者把我关起来，是打错了算盘。他们还不如就让我整天到处演说，一刻也不能休息！^[1]

——阿道夫·希特勒，1941年7月27~28日

尽管有通过审判集聚的人气，还有激进右翼政党在近期选举中的胜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仍然深陷困境。作为一个被封禁和压制的政党，它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被指定为党魁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使用“罗尔夫·艾哈特”^[2]这个化名与忠诚的核心党员联络。名字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变形，^[3]姓氏的大意是“坚守誓言”。

纳粹党用许多狩猎、徒步、运动和唱歌俱乐部作为幌子，^[4]在秘密运转。不过给党造成影响最大的不是当局的围剿，而是这个地下组织自身存在的紧张关系与分裂。

老党员分成了两派，^[5]一派是罗森贝格执掌下仍然留在慕尼黑的那些，另一派是逃往国外的党员——包括埃瑟和汉夫施丹格尔在内的不少人去了萨尔茨堡。有的并入了其他的合法右翼政党，还有的则想独立出来成为小的派别；有的想要更多强调民族主义，有的想要更多社会主义；有的主张用革命暴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的则想以一个政党的形式竞逐议会席位；有的想要推翻共和国，有的认为左派构成的危险更大，需要保持社会现状……

这些冲突在不断恶化，但希特勒始终不置可否，拒绝站队。到了1924年6月中旬，希特勒对支持者说他打算置身事外，等自己可以全面回归政界了再说。他禁止任何派别使用他的名号。

此外他也不允许任何人来监狱看他，或传递任何政治消息。他通过自己以及他的新“秘书”赫尔曼·弗布克起草的信件传达了这一要求。“我决定退出公开的政治活动，”希特勒在1924年6月16日写道，[\[6\]](#)直至他重获自由，再次成为他所说的“一个真正的领袖”[\[7\]](#)。他强调了“真正”一词。

三周后的7月7日，希特勒公开证实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人民信使报》报道，他已经“辞去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职务”。他说他深感力不从心，还说只要他身在监狱高墙之内，他能做的事就很有有限，这让他十分困扰。他还说他“过分劳累”，需要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最近的计划上，也就是写一本“全面的书”，总结自己的生平和政治思想。他希望不受外界的打扰。[\[8\]](#)

根据兰茨贝格的记录，[\[9\]](#)希特勒在5月每天至少有1名访客，6月几乎是每天1人。从4月的将近200次探视（160人）到6月的92次（62人），数字是在下降的。到了7月，探视次数已经下降到26次，每天不到1次。不过对希特勒来说还是太多了。7月29日，他重申了不要打搅他的要求。

同为被告的恩斯特·罗姆也让希特勒很担忧，他在获释后忙着把被禁的冲锋队及其他被禁的战斗联盟成员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前线联盟”（Frontbann）的新组织。[\[10\]](#)他很快招揽到了3万人马。希特勒反对这件事有几个原因，首先当然是这样一个中心化的、可以很强大的组织意味着它的领导者势力会很大，而罗姆已经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甚至不愿意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1924年6月17日罗姆去兰茨贝格探视，希特勒要他立即停止这项工作。罗姆没有理会，继续发展他的前线联盟。他还请来一位新领袖：鲁登道夫将军。

到了夏初，希特勒在兰茨贝格已经有了第二个房间，里面摆满书本、杂志、报纸和纸张，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四处。^[11]大多数东西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是从狱友赫尔曼·弗布克那里借来的，他在利用服刑的时间完成自己的法学论文。按照希特勒在1924年5月的一封信中的说法，他在利用这个机会“阅读并且学习”。

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全神贯注于他的写作计划。1924年5月12日，来自萨尔茨堡的一个纳粹党代表团来探望他时，希特勒已经在着手起草自己计划中的政治宣言。其中一个访客汉斯·普罗丁谔（Hans Prodinger）说这本书要对他的敌手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12]——“一次清算”这几个字眼，后来成为该书的一个副标题。到了月底，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书名：与谎言、愚蠢和懦弱斗争的四年半。^[13]

1924年6月出现了一份宣传册，宣布希特勒即将出版的书约400页。它的内容据称包括对他的参政、纳粹运动的崛起进行一次自传式的叙述，此外还谈了啤酒馆政变的内情。本书还承诺会提及许多问题，比如“中产阶级与社会问题”“犹太文明与马克思主义”“谁发起的革命？”“犯罪还是愚蠢？”“欧洲的布尔什维克化”以及他打算如何遏止这一进程。写作过程中，对政变中的敌人的清算，有时会被意识形态的讨伐所淹没，而这恐怕才是最吸引出版商的地方。^[14]

对于这本最终成为纳粹党意识形态正典的书，不少人日后会声称，当初是他们建议希特勒写的。奥托·斯特拉瑟说他的哥哥、兰茨胡特冲锋队老兵格雷戈尔（Gregor）^[15]最早提议希特勒把想法写下来，因为他受够了整天要听那些没完没了、翻来覆去的演说，只想继续打牌。这完全是捏造的。斯特拉瑟直到1924年2月4日才关进兰茨贝格，^[16]他和希特勒同时在狱中的时间只有12天，后来希特勒就被转往慕尼黑受审了。即便这段短暂的时间也已经晚了，两个月前，希特勒已经跟邦助理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提到了写回忆录的打算。

还有一个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即希特勒的这个写书计划是为了避免下属之间出现争执，^[17]并且有必要表明立场。但是他早在退隐之前就已经开始写了。毕竟最初计划的是1924年7月出版。

不过有个说法还是有些依据的。据说，希特勒之所以决定写书，是因为他希望把受审时获得的人气利用起来赚点钱。希特勒无疑需要钱，审判带来的罚款和法务费用不是小数目。（据洛伦兹·罗德说，5000马克的账单一直到1934年才付清。）不过稿酬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都不是主要原因。

希特勒早在1922年^[18]就已经在考虑写书了。《人民观察家报》报道过这么一个计划，不过当时希特勒忙于演讲和纳粹党务，书一直没有进展。相比之下，牢房这样一个禁闭空间很利于他集中精力，此外政变和审判中发生的各种可恨之事，也让他憋了不少怨言需要抒发。

“他每天在书稿上会花上几个小时，”兰茨贝格典狱长奥托·赖博尔在1924年秋写道。^[19]手稿的风格类似演说——这当然是意料之中，毕竟那是希特勒首选的沟通方式。不过，把他的演说才能从啤酒馆搬到纸面上，效果就不是太好了。

累赘，重复，没完没了地纠结于旁枝末节，充满恶毒的恨意，在希特勒蹩脚、浮夸的文字中充斥着生搬硬造、用一大堆名词堆叠而成的术语，盘根错节的从句让人不知所云。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形容这种造作的风格读来就像“一场漫长的演说”，用“不准确的德语和无限的自鸣得意”写就，纠缠于跟人和种族有关的骇人咆哮。^[20]

例如说到自己在哈布斯堡时代维也纳的艰难生活，他写道：“一个人如果没有被一条勒死人的蝮蛇紧紧锁在怀里过，就不知道那牙有

多毒。”这一个句子，流亡海外的早期传记作家鲁道夫·奥尔登（Rudolf Olden）在1930年代说，“比别人一整篇文章里的错还多。蝮蛇没有怀，而可以盘住人类的蛇是不会有毒牙的。此外，如果一个人被蛇勒住了，那他永远不会知道牙有多毒”。^[21]

不过希特勒的手稿与演讲的相似还有别的原因。^[22]《我的奋斗》——1925年2月，书稿改成了这个标题——其实是从希特勒在奈特哈特的法庭上的陈词发展而来的。自传部分尤其是这样。对于自己在维也纳的生活，以及他声称自己在那里得到的教训，希特勒提出了三个基本要点，与他在审判中的第一场发言在结构和风格上都很像。

此外还有在2月28日一个闭门庭期以及最后的陈词中发表的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第7章）和外交政策的论述。有关英法“巴尔干化”阴谋的一段牢骚，将成为《我的奋斗》下卷第13、14章的基础。

多年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当时是口述让狱友记录的，一开始是埃米尔·莫里斯，后来改为鲁道夫·赫斯。然而赫斯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妻子伊尔瑟·珀尔一直坚决否认此事，^[23]德国史学家奥特马·普罗金厄（Othmar Plöckinger）在他对这份文本的开创性研究中做出了确认。希特勒一开始是手写，后来在1924年6月初改用打字机，在一台崭新的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上用两根手指一点点打出来，机器据信是伊琳娜·拜希施坦送的。

典狱长提供了一张刷了清漆的小打字桌，^[24]还有充足的纸张。薇妮弗雷德·瓦格纳^[25]也送来了纸张，另外还有一包笔、墨水、笔擦和复写纸。还有人后来给他带来了有钩十字的纸——可能是没有被警察抄走的纳粹党用纸。在典狱长的特别关照下，希特勒可以晚两个小时熄灯。他还会早起，不过无论在政变前还是之后，他都没有这个习惯。不少囚犯记得他在早上5点左右就在打字了。

写完一个章节后，他有时会把稿子拿给5号囚室的鲁道夫·赫斯看，他们会边喝茶边讨论。1924年6月29日赫斯在给未婚妻伊尔瑟的信中提到希特勒写书的进度，当时他已经开始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第5章。被赫斯称为“护民官”^[26]的希特勒朗读了书稿，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踌躇，他“停顿许久”，^[27]终于放下稿纸，抽泣起来。

次月底，希特勒已经完成了有关维也纳和抵达慕尼黑那一章。在赫斯的牢房里，希特勒坐在藤椅上朗读《我的奋斗》的第3、4章。赫斯能感觉到血液在自己的血管里流过——他说他感到狂喜和窒息。意外的是，他认为书稿的文笔精良。他预言自己听到的正是德国的“未来主宰”。^[28]

探视的人少下去后，希特勒的书稿进度很快。到了8月的第一个星期，希特勒已经在让赫斯校对扩充的内容。他先是在私下里把书稿读给少数人听，然后开始在周六晚间到公共室对着更多的人再读一遍。狱卒们在楼梯上听到的就是这些公开的朗读。希特勒口述著书的传说，可能也是源起于他对着一群着迷的观众朗读书稿的声音。^[29]

8月，希特勒觉得再用一两周就可以完成了。他要赫斯帮他给计划中的豪华精装本选择最合适的封面和书脊配色。不过8月一转眼就过去了。而后希特勒认为10月应该可以完成，兰茨贝格的典狱长也这么想。实际上在最后出版的书中，卷首向16名“政变烈士”的致敬落款日期为1924年10月16日。^[30]

然而后来才知道，这个秋天的出版日期^[31]同样也言之过早了。希特勒低估了剩下的工作量，而更糟的是弗朗茨·伊尔出版社（Franz Eher-Verlag）面临财务和法律问题。希特勒确信自己很快就可以获得假释了，不希望有什么事影响出狱。这份充满仇恨的书稿描绘了他的未来蓝图，几乎每一页都和他退出政界的说法不符。

事实上《我的奋斗》并非在1924年秋完稿，甚至都不是在监狱里。据埃米尔·莫里斯说，手稿是藏在伊琳娜·拜希施坦送的留声机的木盒里偷带出兰茨贝格的。拜希施坦据说得到了原稿作为答谢[\[32\]](#)，至少是其中一份机打版。莫里斯则得到了打字机，[\[33\]](#)还有一本首版精装本，编号10，有作者签名：“致我忠诚而勇敢的盾牌手。”[\[34\]](#)

希特勒是1925年4月在上萨尔茨堡完成书稿的，而后这部782页的大作经过了重新组织，分成了两卷。大部分编辑工作是《人民观察家报》乐评人约瑟夫·施托尔辛-塞尔尼（Josef Stolzing-Cerny）和鲁道夫·赫斯的未婚妻伊尔瑟·珀尔完成的。《我的奋斗》上卷于1925年7月17日由纳粹党人弗朗茨·伊尔出版。下卷是1926年12月11日问世的。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本书已经以18种语言出版，总销量达1200万套。

[\[1\]](#)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1), 46.

[\[2\]](#) December 5, 1923, HA4/90 and January 15, 1924, HA 68/1497A.

[\[3\]](#) Alfred Rosenberg, *Memoirs of Alfred Rosenberg*, ed. Serge Lange and Ernst von Schenck, and trans. Eric Posselt (Chicago: Ziff-Davis, 1949), 77.

[\[4\]](#) Police report, *Illegale Fortführung des verbotene Organisationen*, HA 68/1497, and 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 1923-1925* (London: F. Cass, 1989), 48.

[\[5\]](#) 罗森贝格领导的这个政党现在叫作“大德意志民族共同体”（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简称GVG。埃瑟、施特莱谢尔及其同盟推翻了罗森贝格。鲁登道夫自立门户，建起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简称DVFP。

[6] 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致信鲁道夫·哈斯，信件后来收录于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78。希特勒的决定仅限于他在堡垒监禁期间，赫尔曼·弗布克在1924年7月18日致信阿达贝尔特·沃尔克 (Adalbert Volck) 博士时说，信件副本收录于HA 15A/1632，刊印于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94。另见希特勒在1925年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此事的陈述。

[7] 1924年6月16日希特勒致信鲁道夫·哈斯，见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78。

[8] 1924年7月7日《人民信使报》。

[9] 143140, STA 14344, StAM.

[10] Rudolf Hess, *Erklärung*, October 9, 1924, 以及对其他分歧的概述, XIX 734/24, December 1, 1924, HA 69/1501。关于这个组织可参阅档案HA 15A和16A/1627-37, 以及Eleanor Hancock, *Ernst Rö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71-81的处理, 此外还有Ernst Röhm, *The Memoirs of Ernst Röhm*, intro. Eleanor Hancock and trans. Geoffrey Brooks (London: Frontline Books, 2012), 221-22。

[11] Wilhelm Laforce, *Leipziger Neueste Nachrichten*, August 9, 1933, cited in Othmar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61.

[12] *Volksruf*, May 17, 1924, cited in Othmar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34.

[13] 宣传册副本可见于Folder No. 3/1, JVA 17.000, StAM。

[14] 宣传册副本可见于Folder No. 3/1, JVA 17.000, StAM。

[15] Otto Strasser, *Hitler and I*, trans.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53.

[16] Strafgefängnis Landsberga. Lech, February 4 to February 26, HA 3/66.

[17] Julius Schaub, July 27, 1951, ZS 137-1, IfZ.

[18] 若需进一步了解可参阅Othmar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11-15。

[19]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35, and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238,

[20] Peter Kurth, *American Cassandra: The Life of Dorothy Thomps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159.

[21]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203.

[22] 若需进一步了解可参阅Othmar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22。

[23] 1965年6月29日伊尔瑟·赫斯致信沃纳·马瑟尔, *Hitler's Mein Kampf: An Analysis*, trans. R. H. Bar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0), 23。她声称希特勒是自己用两根手指打出来的, 至少第一卷是这样。埃米尔·莫里斯一直也是这么说, 比如1951年6月23日, ZS 270, IfZ, 而马克斯·阿曼说他一开始是手写, 1945年8月13日, G. N. S., ZS-809, IfZ。然而多数希特勒传记说希特勒是口述。一个例外是约翰·托兰 (John Toland), 他也知道希特勒是自己打字的,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266, 不过偶尔也会口述给赫斯。还有一个例外是奥托·尤利乌斯·弗劳恩多夫 (Otto Julius Frauendorf) 和理查德·弗赖赫尔·冯·弗兰肯贝格 (Richard

Freiherr von Frankenberg), 他们用笔名Walter Görlitz und Herbert A. Quint写了*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Steingrüben-Verlag, 1952), 236。另见Dr. Ha/Ku, August 14, 1940, HA 3/63。

[24] Hemmrich, ED 153-1, 39, IfZ.

[25] Brigitte Hamann,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ünchen: Piper, 2002), 99.

[26] 希特勒对这个绰号的喜爱想必还有一个原因: 他心爱的瓦格纳歌剧《黎恩济》中的主人公就用了这个头衔。

[27] 1924年6月29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 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42。

[28] 1924年7月23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 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47。

[29] Othmar Plöckinger, *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122-25. 在兰茨贝格狱卒的回忆中经常提到口述, 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56, 以及弗朗兹·汉姆里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囚犯这么说。

[30]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3), dedication.

[31] 1924年11月6日《法兰克信使报》估计, 手稿在11月初的时候有400页。

[32] 纳粹党档案主管想要拿到手稿, 至少几页稿子——哪怕只是照片——用于一场筹划中的展览, 但未能如愿。NSDAP Hauptarchiv, 1e HA 3/63。拜希施坦持有一份手稿的说法此前出现过, 比如G. Ward Price, *I Know These Dictators*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37), 83-84, 此后不久也有, 比如马克斯·阿曼, 1945年8月13日, ZS-809, IfZ。

[33] Anna Maria 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 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 —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 Heyne, 2003), 81.

[34] 题字的图片可见于Anna Maria 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 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 Heyne, 2003), 73。

54 “持续的威胁”

德国对阵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也无法让它屈服。^[1]

——兰茨贝格监狱囚犯报纸《兰茨贝格自由人报》

监狱高墙之外，共和国似乎正在往正确的方向行进。一种新的德国货币得以引入，终于结束了恶性通胀的骇人景象。外国援助和投资源源不断涌入这个国家。失业率下降了。美国银行家查尔斯·G. 道威斯（Charles G. Dawes）的伦敦委员会敲定了一套方案，重新安排德国的赔款时间表，减轻了短期的负担。魏玛共和国即将迎来文化活动的大爆发。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窝在兰茨贝格的牢房里。不过，他远离党内纷争也不全是因为要写书以及监狱的禁闭环境。他还在努力好好表现。1924年10月1日——理论上获得假释的最早时间——正在临近。希特勒相信他会在那一天重获自由。^[2]

9月13日，希特勒给奥地利老乡雅克布·沃尔林（Jakob Werlin）去了封信，此人是汽车经销商，在谢林街有家奔驰展销厅，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被禁前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沃尔林在前一天去兰茨贝格看过他，当时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印刷商阿道夫·缪勒（Adolf Müller），《我的奋斗》的印刷后来就交给了他。希特勒现在给沃尔林匆匆写了封信跟进此事，打算让一个来探监的人帮忙带出去，也就是克利伯中校的儿子、时年18岁的沃尔弗拉姆（Wolfram）。这当然是违反兰茨贝格的规定，因为所有信件需要经过审查员的审核。

希特勒想要一辆灰色奔驰房车，配备高性能引擎和辐条胎，车型最好是11/40或16/50。不过希特勒说，唯一的问题是他的财务状况。

他那本尚未出版的书最早也得到12月中旬（！）才能开始拿版税，而且，审判的法庭开销和律师费据他说已经足够让他“坐立不安”^[3]。他请求沃尔林给他打个折，并且给他留一辆车，等他出狱的事有个着落，他说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

假释的传闻传开后，堡垒的囚犯们确信他们的刑期就要到头了，已经开始交换一些只言片语，纪念他们在兰茨贝格的时光。“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把德国从内寇外敌手中解救出来，”关在B栋一楼的希特勒突击队队员威廉·布里曼（Wilhelm Briemann）在1924年8月21日写道。^[4]韦伯医生绕过狱方审查偷偷给罗姆上尉写信说，“顺利的话”^[5]有望获释。

获得假释的主要条件是在狱中“表现良好”，^[6]并且经过法庭的评估，在押人员已经努力弥补自己的罪行造成的破坏。兰茨贝格典狱长奥托·赖博尔是支持希特勒的。他提前两周写了一封推荐信，对这位著名囚犯的模范行为大加赞扬：

希特勒证明自己是一个遵守秩序、纪律的人，不仅是自己的行为，还包括对待其他的在押人员。他欢快、谦逊、顺从。他无欲无求，为人平和、明理、严肃，从不骂人，认真接受监禁惩罚。他是一个没有自我虚荣的人，乐于迎合制度的要求，他不抽烟饮酒，此外，尽管注重同侪情谊，他还是懂得如何用一定程度的威严来指挥狱中的其他囚犯。^[7]

希特勒始终礼貌对待狱卒和官员，赖博尔还说，在接受探视时，他表现出了谨慎的作风，避免讨论政治，并且通信往来大多仅限于致谢便条。

总之典狱长表示，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的帮助下已经洗心革面，因此他理应得到释放：

在10个月的关押和服刑期间，他无疑变得比以往更成熟、更平静了。待重获自由后，他不会对那些曾反对他、挫败他1923年11月计划的

政府官员构成威胁，心怀报复他们的想法。他不会反政府煽动者，也不会与其他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为敌。他强调自己现在已经相信，一个国家要存在，必须有稳定的内部秩序和坚固的政府。

然而路德维希·施坦莱恩不这么看。在法庭上表现欠佳的施坦莱恩正在设法让希特勒继续待在牢房里。从他身上看不出有任何能带来改变的东西，尽管他显得好像意识到自己错了。这一举动很有可能是他的副手汉斯·埃哈德促成的，此人已经展现出了坚决反对纳粹的一面。埃哈德后来称法庭的裁决根本是“宪政政府和……司法的投降”。^[8]

1924年9月23日，检察官提交了法律异议，以期阻止希特勒的释放。政变对巴伐利亚乃至德国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施坦莱恩在一份九页的动议中主张。而这份文件几乎可以肯定是埃哈德写的。检方强调了损坏财物、攻击警察、偷盗印刷厂、威胁发起内战，当然还有人员伤亡。

从审判中那些长篇演讲来看，希特勒显然没有改变看法。恰恰相反，他对自己的罪行洋洋自得，并且誓称有机会还会再来一次。这其中的利害关系^[9]再明白不过。如果希特勒获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警告，他会继续实施之前未能成功的反国家计划。

慕尼黑警方完全支持检察官的立场。^[10]1924年9月16日，警察搜查了前被告人威廉·布吕克纳和他的一个同事的家。他们发现了从兰茨贝格偷偷带出的信件，其中有希特勒让沃尔弗拉姆·克利伯带的信。^[11]

兰茨贝格的囚犯显然在和曾经一同受审的被告人恩斯特·罗姆、威廉·布吕克纳保持联络，商谈在“前线联盟”这个伞式组织下重建准军事社团。简而言之，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表示，这一切都证实了慕

慕尼黑警方的结论：希特勒和兰茨贝格的囚犯“对国家的内外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12\]](#)。

这一信息被加急送至慕尼黑最高法院刑事处。信函到达时间戳为1924年9月25日下午12:10。然而在当天上午早些时候，法院已经做出了赞成假释的裁决。[\[13\]](#)希特勒将在10月的第一天与克利伯和韦伯一同获释。前提是邦检察官提出异议，不过《汇报》预测可能性不大。[\[14\]](#)。

但施坦莱恩和埃哈德恰恰是提出了异议。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末，四天后，施坦莱恩又呈交了一份上诉书，[\[15\]](#)要求推迟囚犯的假释，这次可能还是埃哈德主笔。

让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深感意外与失望的是，这一招还真见效了。巴伐利亚上诉庭推翻了之前的决定。施坦莱恩、埃哈德和慕尼黑警方至少暂时成功阻止了希特勒的释放。

* * *

但释放希特勒的努力还远未结束。支持者在慕尼黑、兰茨贝格以及巴伐利亚各地分发一份请愿书，[\[16\]](#)要求立即将希特勒假释出狱。很快有2000人签了名。一页页的签名来自各行各业，直观显示了希特勒在审判后的人气之高。

到了10月初，希特勒、克利伯和韦伯的律师已经分别提起上诉，反对法庭拒绝其当事人假释的裁决。三名兰茨贝格囚犯也联署了一份声明，称希特勒的确已退出政坛，从他提出外界不要打扰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合议庭的两名平民法官菲利普·赫尔曼和莱昂哈德·贝克承认，他们之所以同意了那个“极为困难的决定”[\[17\]](#)——有罪判决！——

是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和其他被告人可以较早地得到假释。此外这些平民法官的法律知识有限（赫尔曼是一名保险推销员，贝克是文具店老板），没有意识到检方的上诉是可以阻止法庭裁决的。他们希望希特勒获释，而且之前就以为会是这样。

各方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直到1924年10月6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否决了上诉，批准希特勒的假释。这促使路德维希·施坦莱恩和汉斯·埃哈德再次行动起来，独力与希特勒做对。施坦莱恩夜以继日——很有可能是埃哈德，在最后关头又呈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上诉状，试图阻止这些囚犯的释放。

检方显然意识到，即便再一次成功阻止了希特勒的假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不可能一直这样拖延下去。他们改变了策略，一旦希特勒被提前释放，他们要求将其驱逐出境。到了这个时候，慕尼黑与巴伐利亚邦警方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早在1924年3月26日，法庭判决之前，慕尼黑警方就致函奥地利政府，询问一旦能将希特勒递解出境，对方是否可以接收。林茨的邦政府确认，他们承认被告人的奥地利国籍以及他居住于此地的权利。奥地利地方当局已经做好了在帕绍边境接收希特勒的准备。^[18]

问题是到了秋天，希特勒眼看就要获释的时候，奥地利政府变卦了。^[19]奥地利总理伊格纳兹·塞佩尔（Ignaz Seipel）和他的基督教社会党内阁认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驱逐出境会给“[奥地利]内政外交造成严重威胁”^[20]。首先一点是希特勒主张奥地利和德国合并，那就可能意味着政府被推翻，结束奥地利的独立。

于是在1924年9月30日，塞佩尔和内阁宣布拒绝希特勒回国。

奥地利的这一立场，有一个很方便的依据——希特勒的服役情况导致他的奥地利国籍的有效性成疑。但那是无关紧要的事，巴伐利亚方面反驳道，因为希特勒从未正式放弃自己的奥地利国籍。此外，希特勒在德国——奥地利的盟国——参军是自愿的，而奥地利此前就认可这样的服役，称可以等同于尽到了国民的兵役义务。为什么在希特勒这里就不行？

慕尼黑方面在10月初派人到维也纳，就驱逐希特勒事宜磋商，但塞佩尔总理和奥地利内阁拒绝让步。等到了12月初，巴伐利亚法院按计划要再次就希特勒的假释做出裁决时，情况并没有改变。

为阻止希特勒的获释，施坦莱恩和埃哈德于1924年12月5日做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21]他们历数了这名囚犯的危险之处，还有他在兰茨贝格的违规情况。在法庭的要求下，典狱长奥托·赖博尔回之以一份报告，称赞希特勒的服刑表现完美无瑕。

在提交报告前，赖博尔和多名狱卒面谈，^[22]了解他们的看法。他们全都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约瑟夫·普费弗（Josef Pfeffer）和施特凡·舒斯特（Stefan Schuster）称赞希特勒是个性格开朗、毫无保留的人。他总是彬彬有礼，弗朗茨·舒恩（Franz Schön）补充说，并且表现得体。赖博尔在狱方报告中写道，希特勒唯一一次确凿的违规，是在没有得到审查员允许的情况下，给一名汽车经销商去了一封“无伤大雅的”信函。简单说，希特勒是一名“政治理想主义者”，一个模范囚犯。^[23]

1924年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宣布驳回关于假释的上诉。有意思的是，法院裁决的原始文件今已不存。法律评论人士一直怀疑是内政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在搞鬼，尽管他强烈否认。格尔特纳无疑掩盖得很好，加之二战末期的空袭毁掉了其他的许多档案。不过还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证明格尔特纳曾出手干预。

其中包括警方1930年呈交内政部的一份机密报告，是由杰出的魏玛律师、前普鲁士警方律师罗伯特·M.W.坎普纳（Robert M. W. Kempner）偷偷带出德国的。报告陈述了希特勒的叛国劣迹，最后提出“曾任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的弗朗茨·格尔特纳”^[24]出面驳回了警方对希特勒假释的反对意见。这当然谈不上确凿证据，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主张也不是没可能。日后希特勒将任命格尔特纳为第三帝国司法部部长。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也会促使巴伐利亚当局宁可让希特勒假释出狱，同时放弃就驱逐出境事宜向奥地利施压，那就是德国将于1924年12月7日再次举行全国大选。^[25]

随着货币改革和经济复苏，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之类的极端势力在新的民调中遭到重挫。审判后的人气急升势头已经退去，争吵和矛盾不断的右翼在艰难守住这期间取得的一些领先优势。普选票数少了一半：从1918300张变成了907300张。巴伐利亚的情况更糟。右翼民族主义者失去了约70%的支持者。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极右翼再一次出现大幅下滑。人们认为就算希特勒都已经无力挽回。

对司法部的人来说，这些都很适合拿来说明让希特勒尽早假释的必要性——同时也动摇他们的对手的立场。

希特勒即将获释的新闻在12月20日上午传到兰茨贝格。^[26]据狱卒汉姆里希的回忆，当时消息如野火一般在监狱里传开。“人们欣喜非常。”^[27]囚犯们奔走相庆。希特勒开始收拾行李，把其余的东西都送了人，并且感谢了狱方工作人员的支持。

“我离开兰茨贝格的时候，”希特勒后来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和其他的监狱工作人员……经过我们的争取，已经加入我们的事业中来。”^[28]

希特勒被判5年徒刑，但服刑时间不超过8个半月。根据邦检察官办公室一名官员的计算，希特勒提前3年333天21小时50分离开了监狱。^[29]假如一直被关押到1928年，或服了跟他的罪行相符的刑期，会是什么结果呢？

1924年12月20日下午12:15，希特勒已经是一个站在兰茨贝格监狱外的自由人。来接他的有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以及将来会负责印他的书的阿道夫·缪勒。事实上还有几个人已经先他们一步抵达。首先是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奥托·斯特拉瑟，他们打算带希特勒去见鲁登道夫，遭到断然拒绝。“希特勒争夺战这么快就开始了，出乎我的意料，”赫斯回忆当时各敌对派别纷纷想争取赢得他的关注。^[30]

霍夫曼自然想用一张照片作为纪念。兰茨贝格的狱卒威胁说，他要胆敢在监狱里架设相机，他们会没收，于是他们驱车前往城中一座古老的楼门，^[31]拍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动作快点，霍夫曼，否则人都要拥上来了，”希特勒不耐烦地说，他把帽子拿在手上，穿着长筒袜和大衣，里面估计穿着他那条背带皮裤。“反正，现在可是冻得够呛！”^[32]

他们回到了慕尼黑，几个朋友正在蒂尔施街他的住处等着。他从黑色汽车的后座走出来，此时此刻，他和他最狂热的支持者一样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一场失败政变的策动者，而是一名领袖，一位注定要统治这个国家的元首。

^[1] 1924年8月24日《兰茨贝格自由人报》。

^[2] 1924年7月29日赫尔曼·弗布克致信阿达贝尔特·沃尔克，刊印于Werner Jochman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124。他一直坚信自己会早早获得假释, 1924年8月21日弗布克致信鲁道夫·哈斯, 134。

[3] Hitler to Jakob Werlin, September 13, 1924, STA 14344, StAM.

[4] Wilhelm Briemann, August 21, 1924, HA 4/92.

[5] Friedrich Weber, note, HA 4/92.

[6] 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97-98.

[7]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35. 德文版发表于Otto Lurker, *Hitler hinter Festungsmauern. Ein Bild aus trüben Tagen* (Berlin: E. S. Mittler & Sohn, 1933), 60-62.

[8] 埃哈德未出版回忆录, 41, NL Ehard 99, BHStA。

[9] 1924年9月19日犹太电讯社。

[10] 警方报告 (VIa), September 16, 1924, HA 68/1497A, and September 27, 1924, STA 14344, StAM。

[11] 克利伯致罗姆、弗里德里希·韦伯致马蒂尔德·韦伯的信件以及其他的查抄所得收录于STA 14344 StAM and HA 69/1501。

[12] Polizeidirektion München, VIa 2427, September 23, 1924, STA 14344, StAM.

[13] Beschluss Anz.Verz. XIX 421/1923, September 25, 1924, STA 14344, StAM.

[14] 1924年9月26日《汇报》。

[15] Anz.Verz. XIX 421/23, September 29, 1924, STA 14344, StAM, and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237.

[16] HA 14A/1500, 在媒体上也做了宣传, 如1924年11月23~24日《人民信使报》。

[17] Nr. 26899, July 6, 1924, Staatsanwaltschaften 3099, StAM. 希特勒后来肯定了三名平民法官的功劳——或者特指菲利普·赫尔曼, “一个绷着脸的高傲之人”, 希特勒在1942年2月3~4日的席间谈话中提及,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1), 282.

[18] D. C. Watt,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272.

[19] 1924年10月15日犹太电讯社。

[20] 关于奥地利阻止驱逐一事, 见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163-64。弗朗茨·杰特辛格 (Franz Jetzinger) 曾是上奥地利州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 直到1934年该党被陶尔斐斯镇压, 杰特辛格还是位于林茨的上奥地利州档案馆的馆员。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阅D. C. Watt,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270-80。

[21] Der erste Staatsanwalt, December 5, 1924, 154151, STA 14344, StAM.

[22] Folder No. 3/1, JVA 17.000, StAM.

[23] Leybold, December 14, 1924, 152149, STA 14344, StAM.

[24] Robert M. W. Kempner, “Blueprint of the Nazi Underground—Past and Future Subversive Activities,”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XIII, No. 2, June 1945, Document B. 魏玛律师马克斯·赫施贝尔格也提到过部长对此事的影响, 见他的回忆录, *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 ed. Reinhard Weber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8), 242。格尔特纳出手干预的迹象还可见于埃哈德的未出版回忆录的补编, NL Ehard 99, 6, BHStA。其他做出这个判断的还有Wilhelm Hoegner, *Die Verratene*

Republic.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79), 190, 以及Otto Gritschneider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107, 后者得出的结论是这只能是个政治决策。格尔特纳对干预此案的指责做出了缺乏说服力的否认, 在审判开始前就做过报道, 如1924年2月25日电讯联盟社。

[25] Bernd Steger, “Der Hitler prozess und Bayerns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 note 66, 463.

[26] Dringendes Telegramm, XIX 421/23, December 20, 1924, STA 14344, StAM.

[27] 汉姆里希访谈, 见Heinz A. Heinz, *Germany's Hitler* (London: Hurst & Blackett, 1938), 193。

[28] February 3-4, 1942,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1), 282

[29] A. V. XIX 421/1923, March 18, 1926, HA 69/1501.

[30] 1924年12月20日鲁道夫·赫斯致信伊尔瑟·珀尔, 见Rudolf Hess, *Briefe 1908-1933*, ed. Wolf Rüdiger Hess (München: Langen Müller, 1987), 359。

[31] ED 153-1, 63, IfZ.

[32] Heinrich Hoffmann, *Hitler Was My Friend*, trans. Lt-Col R. H. Stevens (London: Burke, 1955), 61.

后记

1923年11月8日，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穿着过于宽大的大衣，冲进一场啤酒馆集会，宣称要推翻政府。当晚，他发誓不成功便成仁。然而，17个小时后，他既没成功，也没成仁。希特勒输得颜面尽失，仓皇逃离现场。从《纽约时报》到《法兰克福日报》，不少敏锐的观察者认为^[1]，这次惨败意味着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终结，而如果不是在慕尼黑接受审判，恐怕结果真的会是那样。

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对法律进行了滥用、曲解乃至公然的无视，他关心的主要是避免巴伐利亚最高当局反对共和国和《凡尔赛条约》的行动遭到全面曝光。他的首要目标是保护他们以及他们执掌的机构的名誉——正是这一点，让希特勒抓住了机会。他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空间——只要不暴露可能有碍巴伐利亚或德国利益的敏感信息就行。当然，奈特哈特总的来说是赞成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构想的，这一点自然也有帮助。

如果依法在莱比锡的邦法院举行审判，希特勒肯定不会只得到最低限度的刑罚。单是四名警察的死亡^[2]就足以判处极刑。然而在慕尼黑，希特勒得到的指控，跟他在政变中犯下的罪行比起来微不足道。

除了警察的丧生，还有非法关押政府部长、市议员以及犹太公民；对贝格勃劳凯勒内的人进行暴力胁迫；打劫印钞厂；盗窃和毁坏

敌对报社的财物；煽动暴乱。然而考虑到法庭唯一的关注点是重大叛国，这些罪行很快被遗忘了。

即便如此，希特勒得到的检控也没达到法律的要求。法庭给他的量刑是绝对的最低限度，而且非但没有将他递解出境，还裁决准许假释。希特勒在当年年底就出狱了。正如检察官施坦莱恩和埃哈德警告的那样，他立即恢复了之前的工作，只不过这一次，他对共和国构成的危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构想，一个更详尽的实现计划，同时也更加确信自己是一个有着经天纬地之才的领袖。

日后希特勒会说，自己在狱中的经历给了他“大无畏的信念，乐观的精神，以及对我们的天命的信心，从此再也没人能动摇”^[3]。兰茨贝格显然在他的人生当中意义非凡，然而，如果希特勒能从他那必胜信念和自利的传奇营造中暂时抽离出来，也许可以考虑另一个帮助他重燃使命感的因素。

他也许会感谢主审法官吉奥格·奈特哈特在审案期间的纵容、他所得到的宽大判决，当然还有让他留在德国这个不寻常的决定。事实上，希特勒可能还真找到机会这么做了，1937年奈特哈特退休时，希特勒给他捎了个信，感谢他多年的工作。他可能还感谢了弗朗茨·格尔特纳以及巴伐利亚司法部，假释得到批准有他们的功劳。因此当大萧条来袭时，希特勒既没有关在牢里，也没有被驱逐出境。他是个自由人，可以去利用崩溃的经济，以及内部已经瘫痪的共和国。

阿道夫·希特勒的审判本身并不是一个取得权力的故事，而是促成这种崛起的其中一个片段。正是这场审判，把他这个相对不起眼的地方领袖推上全国舞台。希特勒在奈特哈特的法庭里的演说和证词，构成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自传，让他的公众形象超越慕尼黑啤酒馆的世界，得以为那些此前根本不认识也不在乎他的人所知。很快，希特勒把被告席变成了他和他的政党的讲台，让年轻的共和国接受审判。

24天里，希特勒张牙舞爪地攻击政府，他那尖利、刺耳的声音忽高忽低，时而动情哽咽，略去某个音节，时而往自己的牙刷胡上啐唾沫，向指控他的人发起无休止的攻讦。他的言辞和作秀才能得到全面展示。希特勒在前步兵学院餐厅里的表演，包含了一些他生涯之中最出色，应该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演说。

从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乃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遥远国度赶来的记者，对他的丑态进行了详尽的描绘。这样的宣传，是他这样一个处于生涯初期的地方政治煽动者难以想象的。

在审判过程中，希特勒将啤酒馆惨败转化成了一场个人的、政治的胜利。他不再是把政变搞砸的小丑，在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眼里，他是一个爱国者，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起身抵制柏林的叛国迫害、巴伐利亚的懦弱，以及被协约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羞辱。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为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殉道者，而那些地位显赫于他的盟友却只知自保，或者像鲁登道夫那样，把自己犯的错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

“这个希特勒说得太好了！”一名前线归来的老兵说他在慕尼黑黑的法庭上被希特勒征服的。“他受审那段时间，是我对他的忠诚的开始。从那时起，我除了希特勒谁也看不上了。”在1920年代找到纳粹党的许多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这个党的领袖是个“实干家”，是德国未来的希望所在。^[4]

还有一个年轻人也被他在审判中的表现吸引，此人刚刚拿到德语文学博士学位，而后开始写作一部小说，他就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当时身在老家——位于鲁尔区的莱特——的戈培尔每天都在关注那场审判。在他的日记中，戈培尔说他认为希特勒是个鼓舞人心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知识分子。读着报纸上那些言语，戈培尔感觉像是“被带到了星星上去”。^[5]

他立即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您是在就一个新的政治纲领做出要理问答，而这纲领，是诞生自一个正在走向崩溃与世俗的世界。”他引用了歌德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神让你能说出我们的苦难。”两人的恐怖联盟由此开启，将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他们在地堡中死去。[\[6\]](#)

从志在成为艺术家的年轻人，到发起种族灭绝的杀人魔，希特勒的一生充满了“假如是这样，那将会如何”式的不幸瞬间。他的重大叛国罪审判就是其中之一。慕尼黑的法庭本可以将阿道夫·希特勒从公众视野中抹去，他也许会被世人遗忘。结果这场黑白颠倒的审判造成了深远影响，为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也让阿道夫·希特勒得以将难以置信的苦难施诸众生。

[\[1\]](#) 1923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和1923年11月10日《法兰克福日报》。

[\[2\]](#) Otto Gritschneid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51. 另见Alexander Graf zu Dohna, “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 333ff, 以及奈特哈特自己的回应, April 1924, Nachlass Hans Ehard 97, BHSStA.

[\[3\]](#)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6), 274. 另见H. R. Trevor-Roper,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intro. H. R. Trevor-Roper (New York: Signet Books, 1961), xxviii.

[\[4\]](#) Interview published in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8), 70.

[\[5\]](#) Toby Thacker, *Joseph Goebbels: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33. 托比·塔克 (Toby Thacker) 称希特勒的

审判是戈培尔的人生“转折点”，34，而彼得·朗格里希（Peter Longerich）认为，他“转向政治”的那一刻是在1924年4月4日，*Goebbels: A Biography*, trans. Alan Bance, Jeremy Noakes, and Lesley Sharp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36-39。

[6] Joachim C. Fest, *Hitler*,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200.

鸣谢

我很荣幸地向本书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谢意。首先需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的苏珊·格拉克（Suzanne Gluck）对本书给予的无限支持。苏珊是这个星球上最了不起的经纪人！此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恩的是，有W.W. 诺顿（W. W. Norton）公司的约翰·A. 格鲁斯曼（John A. Glusman）这样的人做我的编辑。约翰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与他共事愉快非常。约翰和苏珊是我的梦之队。没有他们，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我想感谢巴伐利亚州档案馆、慕尼黑州立档案馆、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胡佛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杰萨曼县公共图书馆及其他诸多提供珍本和微缩胶片跨馆出借的图书馆的馆员。特别鸣谢克里斯托夫·巴赫曼博士（Dr. Christoph Bachmann）、卢卡斯·赫贝克（Lukas Herbeck）、安德烈·盖斯特（André Geister）、丽塔·威廉姆斯（Rita Williams）以及慕尼黑州立档案馆团队，他们允许我查阅诸多宝贵馆藏，尤其是检方档案以及新近发现的一些令人激动不已的史料——兰茨贝格监狱的阿道夫·希特勒档案；感谢格哈德·黑策博士（Dr. Gerhard Hetzer）和巴伐利亚州档案馆的馆员们，他们提供了一座史料的宝藏，这其中有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的私人文件，包括他就此次审判写下的未出版回忆录，他在1980年去世以前接受的一些采访，还有许多意外收获，比如埃哈德本人的法庭通行证；感谢巴伐利亚州档案馆

的珍妮特·埃格特（Jeannette Eggert），她帮我取得了议会调查材料，其中揭示了大量有关啤酒馆政变的史实；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几位专业而友好的工作人员也让我心存感激，他们同样敞开了大门，欢迎我研究他们收藏的丰富资料。打开一箱档案查阅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的未发表回忆录，或兰茨贝格狱卒弗朗茨·汉姆里希的笔迹，那种激动的心情很难忘怀。还要感谢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图书馆馆员们的协助，包括提供一份海伦·涅梅耶手写回忆录的副本，其中描述了她将躲避警方追捕的希特勒藏在自家阁楼的经历。我还想感谢苏珊·霍尔穆特（Susan Hormuth）对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资料进行的专业拍摄。罗恩·贝斯克（Ron Basich）对罗伯特·D. 墨菲收藏材料的高品质拍摄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副领事驻慕尼黑期间向国务院发出的信函。罗恩·克里奇菲尔德博士（Dr. Ron Critchfield）和杰萨曼县公共图书馆的杰出馆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不懈的支持，帮我争取到许多跨馆出借的稀有材料，包括不少宝贵的微缩胶片，从二战末期美国陆军在帕绍和诺伊马尔克特-圣法伊特缴获的德国文件，到1920年代慕尼黑的外交和领事报告，不一而足。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料，尽管图书馆正在经历一场浩大的翻建工程，使其愈发成为蓝草地区的一座灯塔。每一位馆长、图书档案馆员都倾力相助，打开他们的史料宝藏，这成为我深爱治史之学的又一个原因。

《审判希特勒》缘起于我在肯塔基大学教欧洲史期间的一堂讲座。行走在慕尼黑城，我时常想起课上的谈话，我寻访与本书所围绕的那些罪与罚的故事相关的地点：从罗森海姆大道到音乐厅广场的政变者游行路线；根据警方报告和目击者陈述重建的政府部队调动，当时他们可以看到游行的人群渐渐逼近统帅堂；我走了恩斯特·罗姆的“帝国战旗”前去与希特勒会合并喝些免费啤酒时走的路。其中一个我格外喜欢的地方，自然是布鲁登堡街那一带，也就是举行希特勒审判的地方，当时的观众、记者、摄影师、拍摄组以及看热闹的人，就徘徊在那里的武装警卫、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之间。1923~1924年慕

尼黑历史遗址之旅不乏意外发现。比如，希特勒在1913年春刚搬到慕尼黑时住过的寓所底楼现在是一家热闹的店铺。希特勒在政变和受审期间居住的那幢楼现在也成了一家可爱的时尚小店，售卖捷克书籍、音乐和艺术品。我在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有不少难忘的经历，尤其要感谢退休的兰茨贝格狱卒约瑟夫·哈根布什（Josef Hagenbusch），他讲述了许多监狱工作的精彩掌故，还有希特勒在押期间典狱官和员工们的轶事，其中就包括奥托·赖博尔。我还要感谢许多曾经帮助我的人，我时常满怀感激地回想起在慕尼黑的时光，漫步于那些与政变和审判有关的地方。首先想到的是已故的雷蒙德·F. 贝茨（Raymond F. Betts）教授和简·凡斯（Jane Vance）教授。我很清楚自己受了他们多少恩惠，并无比珍视来自他们的影响与记忆。我还想感谢戴维·奥尔斯特（David Olster）教授，他给了我许多研究过程方面的教诲，同时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意味着什么。我还想感谢我亲爱的朋友马修·斯拉特金（Matthew Slatkin），他一直在留意珍本图书，帮助我充实我的希特勒资料收藏。

我要感谢纽约W. W. 诺顿公司的亚莉克萨·皮尤（Alexa Pugh）和莉迪亚·布伦茨（Lydia Brents），本书是在她们的引导下完成从手稿到出版物的旅程的。在伦敦，我需要感谢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乔吉娜·莫雷（Georgina Morley），她在《审判希特勒》英国版的编辑工作中展现了非凡的专业技能与热情。在阿姆斯特丹，我要感谢约布·李思曼（Job Lisman）和普罗米修斯出版社（Uitgeverij Prometheus）团队的荷兰文翻译；在巴塞罗那，我要感谢塞西·巴拉尔（Seix Barral）的西班牙文译本；在圣保罗，诺沃·塞库洛（Novo Seculo）的葡萄牙文译本；在哥本哈根，居伦达尔出版社（Gyldendal）团队的丹麦文翻译；在奥斯陆，卡普伦·达姆（Cappelen Damm）的挪威文翻译；在赫尔辛基，奥塔沃出版社（Otavo）的芬兰文译本。除了令我无比钦佩的苏珊·格拉克，我还要向威廉·莫里斯奋进娱乐公司驻伦敦的西蒙·特里文（Simon

Trewin）、驻贝弗利山的安娜·德罗伊（Anna DeRoy）、纽约的劳拉·邦纳（Laura Bonner）、伊芙·艾特博姆（Eve Atterbom）、克里奥·塞拉菲姆（Clio Seraphim）和萨曼莎·弗兰克（Samantha Frank）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感谢我的家人，他们这么多年来要忍受我对研究的执迷，时不时人间蒸发，去了1920年代的慕尼黑。我一如既往地想大声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女儿茱莉亚，现在已经是一个学业明星，对动物怀着非同寻常的热爱；我的儿子麦克斯，一名大无畏的运动员，炫酷的得分手，他一直在向往着我完成本书的那一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到后院来一场一对一的足球赛；我的母亲雪莉·金（Cheryl King），感谢她的母爱，感谢她让我在幼年时代就能领略到叙事的魔力和文字的力量；我的岳母阿妮卡·勒范德（Annika Levander），我至今持有她送给我那几万亿德国马克（可惜，是1923年的货币），更重要的是那些美好的回忆。愿她安息。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她对本书的帮助难以估量。和往常一样，她是书稿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也是第一个听到我的新想法的人，无论那想法多么原始或幼稚，并且从不讳谈她的真实看法。凭借精妙的编辑技巧，她给我的文字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能有一个聪慧而杰出的妻子，同时还如此美丽动人，是一个同度人生的理想伴侣，实在是我的幸运。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范·金（Van King）的智慧、慈祥与慷慨宽厚。从得知这个写作计划那天起，他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他于2013年因癌症去世，但生前得以看到这本书在美国的诺顿、英国的麦克米伦安家落户，并在世界各地找到诸多优秀的出版商。能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是那段灰暗时光里的一个亮点。我们对共同相处的时光感恩备至。怀着全心的爱意与仰慕，我将这本书献给他。

注释和原始资料

英文世界尚无一本关于阿道夫·希特勒审判的专著，确切地说，除德文外的任何语种都不存在这样一本书。考虑到此事的意义之重大，切题史料之丰富，这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围绕这场审判可以找到法庭卷宗、审前调查、警方档案、控辩双方律师的材料，当然还有对审判过程逐字逐句的记录——仅这部分就有将近3000页之多。

回忆录、日记、信件以及其他的目击陈述，也可以作为观众行为或法官、律师、被告、证人印象的参考，还有在法庭内的一些不会得到官方记录的事件。我还非常依赖世界各地的许多报纸对审判的详尽报道，里面有德国、奥地利、瑞士、法国、斯堪的纳维亚、英国、加拿大、美国，还有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的其他许多地方。此外还有新闻通讯社，包括沃尔夫通讯社（Wolffs Telegraphisches Bureau）、电讯联盟通讯社、南德通讯社（Süddeutsches Korrespondenzbureau）、犹太电讯社、国际通讯社（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哈瓦斯通讯社、无线通讯社（Agence Radio）、路透社、国际新闻服务、澳大利亚通讯协会、美联社、合众社和英国联合通讯社。

在我为本书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在纽伦堡一家跳蚤市场发现的500多份与关押希特勒有关的兰茨贝格记录办公室（record office）文件得以入藏慕尼黑州立档案馆。这些学界一直假定已经遗失或被毁的文件，此前从未在德文以外的世界中出现过，包

括英文。这是一份重要史料，澄清了关于希特勒的兰茨贝格生活日常的许多讹传，对其他珍贵的主要监狱资料做出补充，后者涉及从典狱长奥托·赖博尔就希特勒狱中表现给出的报告的副本到第11囚室出版的监狱报纸《兰茨贝格自由人报》目前所知仅存的一期。

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藏有狱卒弗朗茨·汉姆里希的未出版回忆录，还有1934年一名记者对他进行的长篇采访；另一位狱卒奥托·鲁尔克的回忆录；囚犯汉斯·卡兰巴赫的回忆录；以及多名囚犯的信件，如赫尔曼·弗布克、鲁道夫·赫斯和阿道夫·希特勒。有去监狱探视的人的回忆，如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和弗里茨·帕策尔特，后者在6月探视时带去一件新款冲锋队“褐衫”的一个早期版本。在纳粹主档案中，一个可喜的发现是一份兰茨贝格文件被错标为1925年——实际应该是1924年，其中有希特勒在押期间多名囚犯的便笺，包括鲁道夫·赫斯。

其他的档案资料包括海伦·涅梅耶的未发表回忆录，也就是警察搜捕期间将希特勒藏在家中的那个女人。她的手写札记描述了希特勒在前往音乐厅广场的游行后躲避警察追捕，藏在她家阁楼的情景。还有许多关于这段时间的未出版回忆录、陈述和个人回忆，包括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1923年11月9日与希特勒挽臂游行的马克斯·厄文·舒伊勃纳-里希特的跟班；提名财政部部长戈特弗里德·费德尔的一份报告和日记；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的未出版文章以及其他知名辩方律师的文件，包括克里斯托弗·施哈姆。此外还使用了检察官汉斯·埃哈德的私人文件，里面包括了一份关于他在这场审判中的经历的未出版回忆录。

慕尼黑警察局、慕尼黑地方法院、巴伐利亚内政部在这一时期的涉希特勒记录被国家社会主义党掌握，纳入纳粹主档案。这其中包括政变的警方调查和审前调查，以及一系列未发表的问讯、质询、回忆

录以及其他1923年11月8~9日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的第一视角陈述。警察审问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恩斯特·罗姆、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因里希·霍夫曼、汉斯·弗兰克、乌尔里希·格拉夫等事发后被捕的大小嫌疑人。议会委员会发起的调查得出了1700页的报告，至今没有发表（MA 103476/1-4, BHSStA），尽管其中包含了有关政变背景的大量信息，如主审法官奈特哈特、检察官施坦莱恩和巴伐利亚司法部部长弗朗茨·格尔特纳的证词。另外还有PD 6718-6719、StAM和HA 69/1500A的涉案资料。（该研究的发表版本，威廉·赫格纳匿名推出的*Hitler und Kahr. Die bayerischen Napoleonsgrößen von 1923. Ein im Untersuchungsausschuss des Bayerischen Landtags aufgedeckter Justizskandal* [1928]，只涵盖了整个调查的一小部分。）希特勒突击队的审判文件在空袭中被毁，不过有一份判决书副本得以留存（Proz. Reg. Nr. 187/1924, JVA 12436, StAM），此外还有一些保存于纳粹主档案中的相关材料，尤其是HA 67/1493、67/1494、68/1494、68/1498和80/1603。所有这些警察、法庭和议会调查委员会文件有助于澄清政变中的许多罪行，这些在审判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1923、1924年的一些宣传册也很有帮助，尤其是有助于理解当时骚动的氛围，比如Albrecht Hoffmann的*Der 9. November 1923 im Lichte der völkischen Freiheitsbewegung*（Lorch Württemberg: K Rohm, 1923）。从因为批评三巨头的处置措施而被巴伐利亚当局封禁的小册子，比如Karl Rothenbücher的*Der Fall Kahr*（Tübingen: Mohr, 1924），到肯定曾在军方高层和公务员圈子流传、在审判中发挥了一点作用的那些材料，比如臭名昭著的所谓“蓝白册子”，或“我来我见”（Veni Vidi）的*Ludendorff in Bayern oder Der Novemberputsch*（Leipzig: Vedula-Verlag, 1924），宣传册的内容五花八门。还有Ludwig Ernst发表的*Nachdenkliches aus dem Hitler-Prozess*（München: Dr. Franz Pfeiffer & Co. 1924），以

及当时的法学期刊的敏锐分析，尤其是Alexander Graf zu Ddhna发表在*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29 (1924), Heft 9/10, 上的“Der Münchener Hochverratsprozess”。其他的主要资料来源中，还有一部分是慕尼黑外交圈子的想法，包括梵蒂冈的尤金尼奥·帕切利；英国总领事R.H. 克莱夫 (R. H. Clive)；符腾堡的卡尔·莫泽·冯·菲尔塞克；以及美国副领事罗伯特·墨菲，此人写了一本回忆录《勇士之中的外交官》(*Diplomat Among Warriors*)，将文稿捐给了胡佛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墨菲在1924年从慕尼黑发回的一些通讯（比如43.7），在2005年6月因“国家安全保密”问题被移除了，不过与1910~1929年德国内政相关的微缩胶片仍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国务院档案”中，RG 59、M336、862.00文件，第19和20号。

此外我也荣幸地指出，在了解希特勒和这场审判的过程中，许多学者的作品给了我帮助。在当代史研究所资助下出版的德文版庭审记录十分出色，附有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和Otto Gritschneider的评注，*Der Hitler-Prozess 1924. Wortlaut der Hauptverhandlung vor dem Volksgericht München I, I-IV* (1997-1999)。这些杰出的权威专家发表了大量关于德国法律史的著作，他们对这一版记录的贡献，以及其他的学术著作，对本书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他们的作品至今仍是法律学者和历史学家了解魏玛共和国司法不可或缺的资源。

在希特勒生平方面，我受惠于Ian Kershaow、Joachim C. Fest、John Toland和Alan Bullock的经典传记，此外还有新近加入这一行列的一部——Peter Longerich的*Hitler Biographie*, München: Siedler, 2015和Volker Ullrich的*Adolf Hitler Biographie. Band 1: Die Jahre des Aufstieg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2013。我还翻阅了早期的传记，包括前《法兰克福日报》记者Konrad Heiden的里程碑之作，还有《柏林日报》编辑Rudolf Olden的书，两

人都是在1930年代流亡海外期间出的书，前者在苏黎世，后者在阿姆斯特丹；另有Ernst Deuerlein在战后的开创性作品*Hit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München: List, 1969)，他的其他著作在后面还会提到，以及Walter Görlitz和Herbert A. Quint的*Adolf Hitler. Eine Biographie* (Stuttgart: Steingrüben-Verlag, 1952)，后者是Otto Julius Frauendorf和Richard Freiherr von Frankenberg化名出版的作品。我还读了1930年代出版的一些奉承希特勒的专辑，希望从中找到认识他的人所做的采访，或是其他的目击陈述，另有纳粹党取得最初的议会胜利后出现的一些国际出版物。从Frédéric Hirth的*Hitler, ou le guerrier déchané* (Paris: éditions du tamourin, 1930) 到Arne Melgård在瑞典*Hemnets Journal*上发表的“Vackre Adolf” (1931)，这类材料范围很广。例如有一名英国记者以“海因茨·A. 海因茨”这个笔名出版了一本亲纳粹的书籍，其中采访了希特勒在慕尼黑租住的第一间寓所的女房东伯普太太（安娜·伯普）以及狱卒弗朗茨·汉姆里希。后者的陈词是对保存于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的手写札记的补充，从某些地方来看是巩固，那些札记是汉姆里希在几十年后写下的，存在一些记忆错误。

至于一些篇幅较短但富有洞见的研究，需要提及的有Sebastian Haffner, *The Meaning of Hitler*, trans. Ewald Os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Eberhard Jäckel, *Hitler's World View: A Blueprint for Power*, trans. Herbert Arno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John Lukcas, *The Hitler of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Ron Rosenbaum, *Explaining Hitler: The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His Evil*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9)；以及William Carr, *Hitler: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其他与这一时期相关的希特勒生平或对其人生某一侧面做出了有价值的

叙述的有Laurence Rees, *Hitler's Charisma: Leading Millions into the Aby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2); Andrew Nagorski, *Hitlerland: American Eyewitnesses to the Nazi Rise to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Timothy W. Ryback, *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8); Yvonne Sherratt, *Hitler's Philosoph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efan Ihrig, *Ata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和Detlev Clemens, *Herr Hitler in Germany. Wahrnehmung und Deutun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in Grossbritannien 1920 bis 1939*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还有一些富有启发性、争议性与助益的作品包括Lothar Machtan的*The Hidden Hitler*, trans. John Brownjoh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以及一些早期史家的撰述, 这些作品虽然有缺陷, 但在希特勒历史修纂 (the history of Hitler historiography) 中仍然有其价值, 如Werner Maser、William L. Shirer、Robert G. L. Waite、Robert Payne和沃尔特·C. 朗格 (Walter C. Langer), 其中后者与CIA的前身、美国谍报机构“战略情报局” (OSS) 的合作, 促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思维——秘密战时报告》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The Secret Wartime Repor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2) 一书的出版。我还利用了朗格参与解密的其他藏于国家档案馆的OSS希特勒文件 (《战略情报局材料集》), 以及关于苏联反情报活动的文件, 后者以*The Hitler Book: 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from the Interrogations of Hitler's Personal Aides*, eds. Henrik Eberle and Matthias Uhl, trans. Giles MacDonogh的形式出版, 由理查德·奥弗里 (Richard Overly) 作序 (New York: Bristol Park Books, 2005)。另见英国前军情五处特工、后成为牛津大学历史学家

的休·特雷弗-罗珀尔 (Hugh Trevor-Roper) 的研究, 尤其是他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的思维》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此文曾作为 *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 1941-1944*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Inc., 1953; Signet 1961) 一书的序言出版。

关于希特勒的青年时代, 需要提及的有 Anton Joachimsthaler, *Hitlers Weg begann in München 1913-1923* (München: Herbig, 2000);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Dictator's Apprenticeship*, trans. Thomas Thornt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anz Jetzinger, *Hitler's Youth*,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Hutchinson, 1958); Albrecht Tyrell *Vom 'Trommler' zum 'Führer.' Der Wandel von Hitlers Selbstverständnis zwischen 1919 und 1924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NSDAP*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75); Thomas Weber, *Hitler's First War: Adolf Hitler, the Men of the List Regiment,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eoffrey Pridham, *Hitler's Rise to Power: The Nazi Movement in Bavaria, 1923-1933* (London: Hart-Davis, MacGibbon, 1973); Bradley F. Smith, *Adolf Hitler: His Family, Childhood, and Youth*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7); Eugene Davidson, *The Making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77); Charles Bracelen Flood, *Hitler: The Path to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以及奥特马·普罗金格 (Othmar Plöckinger) 的作品, 尤其是下文提到的他对《我的奋斗》的研究。另见 Ernst Deuerlein, ed., "Hitlers Eintritt in die Politik und die Reichsweh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7 (1959), 177-227; Reginald H. Phelps

“Hitler als Parteiredner im Jahre 1920,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1 (1963), 274-330; 还有西奥多·阿贝尔 (Theodore Abe) 在哥伦比亚大学对600名冲锋队队员的研究, 其成果通过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8) 一书发表。

关于政变, 需要提及的有恩斯特·杜尔莱恩在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中的序言和史料整理, 还有Harold J. Gordon Jr., *Hitler and the Beer Hall Puts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另见Richard Hanser的 *Putsch! : How Hitler Made Revolution* (New York: Pyramid Books, 1971), 和John Dornberg的 *Munich 1923: The Story of Hitler's First Grab for Pow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以及Hans 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schichte 1920-1924*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61); Didier Chauvet's *Hitler et le putsch de la brasserie: Munich, 8/9 novembre 1923* (Paris: L' Harmattan, 2012); Georg Franz-Willing, *Putsch und Verbotszeit der Hitlerbewegung November 1923-Februar 1925* (Preussisch Oldendorf: Verlag K.W. Schütz, 1977); 以及Georges Bonnin, *Le putsch de Hitler: à Munich en 1923* (Les Sables-d' Olonne: Bonnin, 1966)。关于政变后的情况, 见前面提到的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和Otto Gritschneider的作品; Otto Gritschneider's *Bewährungsfrist für den Terroristen Adolf H. Der Hitler-Putsch und die bayerische Justiz*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0); Otto Gritschneider's *Der Hitler-Prozess und sein Richter Georg*

Neithardt: Skandalurteil von 1924 ebnet Hitler den Weg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1) ; Klaus Gietinger und Werner Reuss, eds., *Hitler vor Gericht. Der Prozess nach dem Putsch 1923—Fakten, Hintergründe, Analysen* (München: BR-Alpha, 2009) , 以及David Jablonsky, *The Nazi Party in Dissolution: Hitler and the Verbotzeit, 1923–1925* (London: F. Cass, 1989) , 此书始于他在堪萨斯大学的博士论文。Peter Ross Range, *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16) 第7、8两章对审判有少量提及。关于这一时期有价值的出版文献有Eberhard Jäckel und Axel Kuhn, eds., *Hitler. Sämtliche Aufzeichnungen 1905–1924*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80) ; Ernst Deuerlein, ed., *Der Hitler-Putsch. Bayerische Dokumente zum 8./9. November 1923*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 Ernst Deuerlein, ed., *Der Aufstieg der NSDAP in Augenzeu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8) ; Peter Fleischmann, ed., *Hitler als Häftling in Landsberg am Lech 1923/1924* (Neustadt an der Aisch: Verlag Ph.C.W.Schmidt, 2015) ; Werner Jochmann, ed., *Adolf Hitlers Monologe im Führerhauptquartier 1941–1944* (München: Heyne, 1982) ; Werner Jochmann, ed.,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 Ursprung und Geschichte der NSDAP in Hamburg 1922–1933. Dokumen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3) ; Werner Maser, ed., *Hitler's Letters and Notes* (New York: Bantam, 1976) ;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Nazism, 1919–1945: A Documentary Reader* (Exeter: University of Exeter, 1998) ; Othmar Plöckinger and Florian Beierl, eds., “Neue Dokumente zu Hitlers Buch Mein

Kampf, ”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7, Heft 2 (2009), 261-318; 另有Georges Franz-Willing (1977) 和 Georges Bonnin (1966) 最后随附出版的文献。有一些当时在慕尼黑的目击者陈述, 如《前进报》的Joseph Roth; 国际通讯的Victor Serge; 《阿根廷日报与周报》(*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的Carl Christian Bry; 加泰罗尼亚记者Eugeni Xammar (为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多家报社撰文); 《先驱日报》(*Daily Herald*) 的Morgan Philips Price (原为《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 他在1924年2月的时候已经在那里驻扎了五年; 记者以外的人物、赫尔曼·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时写的家书。

除非特别说明, 来自审理过程中的引语都来自现存的其中一份逐字记录(慕尼黑邦地方法院记录NA T84 EAP 105/7), 该文件于1945年被美国陆军缴获, 在送往华盛顿拍照存档后归还给德国, 此后一直保存在联邦档案馆(Bundesarchiv)。我收藏了这份文件的一个副本。我还使用了通过*Der Hitler-Prozess vor dem Volksgericht in München* (München: Knorr & Hirth, 1924) 出版的庭审记录, 我也掌握了它的一个副本, 此外还有慷慨出借给我的*Der Hitler-Prozess. Auszüge aus den Verhandlungsberichten mit den Bildern der Angeklagten nach Zeichnungen von Otto von Kursell* (München: Deutscher Volksverlag, 1924)。和前面提到的慕尼黑邦地方法院记录不同的是, 这两个版本都经过大幅删减, 考虑到它们都是1924年出版的, 自然不包括审判的许多闭门庭期。另一个使用过的版本是*The Hitler Trial Before the People's Court in Munich*, trans. H. Francis Freniere, Lucie Karcic, and Philip Fandek

(Arlington, V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6), 同样经过删减, 并且没有多少评注。如果想对这方面有更多了解, 见前面提到的当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庭审记录德文版, 及其编辑Lothar Gruchmann、Reinhard Weber和Otto Gritschneider的学术著作。关于

魏玛共和国的法律，有不少权威著作可以参考，包括Richard J. Evans、Heinrich Hannover和Elisabeth Hannover-Drück、Henning Grunwald、Benjamin Carter Hett和Douglas G. Morris的作品。

如果想从一位杰出律师的视角了解当时慕尼黑的法律环境，可参考Reinhard Weber编辑的马克斯·赫施贝尔格的著作*Jude und Demokrat. Erinnerungen eines Münchener Rechtsanwalts 1883 bis 1939*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1998)。1920年代曾任普鲁士警察法律顾问的Robert M. W. Kempner偷偷带出了一些文件，从中可以看到为驱逐希特勒和阻止他假释而展开的行动，这给本书关于希特勒在狱中情况的章节提供了帮助 (*Research Studies of the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XIII, No. 2, June 1945)。另见埃哈德文件的未发表手稿，*Chronik der Bayerischen Justizverwaltung* (NL Ehard 90, BHSStA)，尤其是关于政变和审判的第3卷。前文提到，埃哈德就此案的审判写下的未出版回忆录提供了研究希特勒审判的新鲜角度，Andreas Stenglein在*Ludwig Stenglein, der Anklager im Hitler-Prozess 1924* (Bamberg-Gaustadt: Selbstverlag, 2000)中写了一篇简短但珍贵的回忆，并在日后的补编中做了更新 (见德文网站andreas-stenglein.de)，此外还有下文提到的BHSStA档案中施坦莱恩在议会委员会调查中的陈述。Natalie Willsch写了审判中的另一位律师，见*Hellmuth Mayer (1895-1980). Vom Verteidiger im Hitler-Prozess 1924 zum liberal-konservativ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ler. Das vielgestaltige Leben und Werk des Kieler Strafrechtslehrers* (BadenBaden: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2008)。有关驱逐问题导致的法律争斗中的曲曲折折，以及巴伐利亚和柏林之间的争端，见D. C. Watt, “Die bayerischen Bemühungen um Ausweisung Hitlers 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6 (1958), 270-80, 以及Bernd Steger, “Der Hitlerprozess und

Bayerns Verhältnis zum Reich 1923/1924, ”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3 (1977), 441-66。

关于慕尼黑的文化生活，见David Clay Large’s *Where Ghosts Walked: Munich’s Road to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Rainer Metzger, *Munich: Its Golden Age of Art and Culture 1890-1920*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9)；和 Christoph Stölzl, ed., *Die Zwanziger Jahre in München* (München: Münchner Stadtmuseum, 1979)，这是慕尼黑市立博物馆 (Münchner Stadtmuseum) 在1979年5月至9月间举办的一场展览的图录，共750页。我还受惠于魏玛共和国史领域的学术著作，尤其是 Richard J. Evans、Eric D. Weitz、Heinrich August Winkler、Eberhard Kolb、Hans Mommsen、Detlev J. K. Peukert、Peter Gay、Henry Ashby Turner Jr.、Gordon A. Craig、James M. Diehl、John W. Wheeler-Bennett、Erich Eyck、Otto Friedrich、Pierre Broué、Frederick Taylor、F. L. Carsten和Paul Bookbinder的作品，另外还有Gerald D. Feldman的两部著作——*The Great Disorder: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in the German Inflation, 1914-19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和 *Hugo Stinnes. Biographie eines Industriellen 1870-1924*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8)。另一个优秀的资源是威廉·赫格纳的 *Die Verratene Republic. Deutsche Geschichte 1919-1933* (München: Nymphenburger Verlagshandlung, 1979)，他在1934年流亡瑞士期间开始写作此书，到1950年代末卸任巴伐利亚邦行政长官后完成。其他对魏玛文化某一侧面的论述也有帮助，比如Brigitte Hamann的 *Winifred Wagner oder Hitlers Bayreuth* (München: Piper, 2002)；Wolfgang Martynkewicz的 *Salon Deutschland. Geist und Macht 1900-1945* (Berlin: Aufbau, 2009) 和Anna Maria Sigmund, *Des Führers*

bester Freund. Adolf Hitler, seine Nichte Geli Raubal und der “Ehrenarier” Emil Maurice—eine Dreiecksbeziehung (München: Heyne, 2003)。关于《我的奋斗》，见奥特马·普罗金格的*Geschichte eines Buches.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1922–1945* (München: Oldenbourg, 2006 and revised edition, 2011)；奥特马·普罗金格与Florian Beierl合作发表于*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7, Heft 2 (2009), 261–318的“Neue Dokumente zu Hitlers Buch Mein Kampf”；Sven Felix Kellerhoff的*“Mein Kampf”. Die Karriere eines deutschen Buches*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5)；Barbara Zehnpfennig,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Studienkommentar* (Paderbor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1)；Christian Zentner, *Adolf Hitlers Mein Kampf. Eine kommentierte Auswahl* (München: List, 1974)；以及近期的两卷本注释版*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München: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2016)，由Christian Hartmann、Thomas Vordermayer、奥特马·普罗金格和Roman Töppel编辑。审判——以及政变后、入狱前——这段时期得到的研究意外地少，而用美国副领事罗伯特·墨菲的话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这段时间里：“全欧洲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揭示了这片纷乱大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档案

BHStA 巴伐利亚州档案馆

FDR 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HA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档案 (NSDAP Hauptarchiv)

HI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IfZ 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

NA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StAM 慕尼黑州立档案馆

图片来源

图片来源

卷首插图：贝格勃劳凯勒，1923年摄于慕尼黑（黑白照片）/ © SZ Photo / Bridgeman Images

中插

1.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档案

2. 希特勒政变（或啤酒馆政变）后，全副武装的纳粹党人准备开入慕尼黑（1923年11月8日）。/ Photo © PVDE / Bridgeman Images

3. 希特勒政变，1923年（黑白照片）/ © SZ Photo / Scherl / Bridgeman Images

4. 慕尼黑政变，1923年（黑白照片）/ German Photographer (20th Century) / Private Collection / Peter Newark Historical Pictures / Bridgeman Images

5. 希特勒政变被挫败后的骑警，1923年（黑白照片）/ © SZ Photo / Knorr & Hirth / Bridgeman Images

6. 美国国家档案馆

7. 国会图书馆，版画和照片部
8. 国会图书馆，版画和照片部
9. 国会图书馆，版画和照片部
10. 国会图书馆，版画和照片部
11. akg-images / Interfoto
12. 希特勒的审判，1924年/ © SZ Photo / Bridgeman Images
13. 审判希特勒和鲁登道夫，1924年2月26日（黑白照片）/ © SZ Photo / Scherl / Bridgeman Images
14. 埃里希·鲁登道夫和阿道夫·希特勒（黑白照片）/ © SZ Photo / Scherl / Bridgeman Images
15. 美国国家档案馆
16. 慕尼黑政变审判（黑白照片），German Photographer（20th Century） / Private Collection / Peter Newark Military Pictures / Bridgeman Images
17.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接受堡垒监禁期间的囚室（黑白照片）/ © SZ Photo / Scherl / Bridgeman Images
18. 阿道夫·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1924年（黑白照片），German Photographer（20th Century） / Private Collection / Peter Newark Historical Pictures / Bridgeman Images

19. 阿道夫·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黑白照片）/ © SZ Photo /
Bridgeman Images

20. 国会图书馆，版画和照片部

21. 美国国家档案馆

22. 阿道夫·希特勒，摄于1924年12月20日/ Photo © Tallandier
/ Bridgeman Images

索引

(此部分页码为原书页码, 即本书页边码)

- Ach, Alwin Ritter von, 110
- 8-Uhr-Abendblatt*, 262
- Action Française, L'*, 173
- Adolf Hitler in Prison* (tableau), 136
- Agence Havas, 172, 196, 214, 239, 249, 298
- Aigner, Johann, 23, 96, 103, 107
- Alice in Wonderland* (Carroll), 287
- Allgemeine Rundschau*, 155, 166, 188, 289
- Allgemeine Zeitung*, 165, 205, 286, 296, 327
- Amann, Max, xv, 62-64, 84, 124, 125, 310
- anti-Semitism, 8, 22, 34, 39, 61, 63, 66, 84, 119, 159-61, 165, 199, 228, 315; *see also* Jews (Judaism)

Arbeiterwille, 219

Arco auf Valley, Anton Graf von, 38, 128

Argentinische Tag-und Wochenblatt, 129

Armenian genocide, 21-22

Article 48 of Weimar Constitution, 72-73, 91, 226, 247

Article 80 of the German penal code, 139

Article 81 of the German penal code, xx, 292-94

Article 82 of the German penal code, 294

Art Nouveau, 35

Aryan Bund, 314-15

Associated Press, xx, 205

Atatürk, 23, 177

Atlantic Monthly, 25

“At the Prophet’ s” (Mann) , 3

Auckland Star, 159, 247

Auer, Erhard, 68-69

Auer, Sophie, 67-69

Aufbau, 27

Augsburger Postzeitung, 261, 296

Augustinerbräu, 288

Austria, 40, 108, 115, 117, 121, 122, 125, 133, 134,
150, 154, 156, 173, 219, 288, 312, 314, 328-30

Bad Tölz, 112

Baker, Suzanne St. Barbe, 104

Ball, Hugo, 36

Ballin, Bella, 106, 110

Ballin, Martin, 106

Ballin, Robert, 106

Balss, Heinrich, 207

“Baltic Mafia, ” 23

Banzer, Josef, 79, 93

Bauer, Heinrich, 192

Bauerngirgl (restaurant) , 102

Bavaria:

Communist uprising in, 38-39, 91, 166

Einwohnerwehren in, 39

judicial system in, 130–41, 277, 289, 327, 329, 334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5–6, 10, 16–20, 28–29, 46–48, 55–58, 61, 74, 76–77, 81–82, 84–86, 95, 120, 130, 135–36, 142, 163, 166, 169, 170, 175, 178, 182, 185, 192–93, 195, 201–3, 206–7, 217, 218, 224, 225, 229, 234, 237–41, 243, 245, 250, 251, 254, 258, 267, 271, 275, 282, 287, 294, 330

state of, 10, 13, 28, 86, 95, 116, 151, 176, 181, 204, 213, 216–17, 222, 231, 237, 242, 246, 253, 255, 264, 271, 274, 287–88, 295–97, 326, 335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ed in, 40

War Ministry of, 54, 55, 57, 59, 62, 63, 74, 78, 80, 82, 87, 90–92, 94, 99, 107, 188–89, 219, 221, 253

and Weimar Republic, 14, 57–58, 72, 73, 140, 333

Wittelsbach dynasty in, 11, 30–31, 37, 73, 76, 85, 88, 220, 266

Bavaria, statue of, 37

Bavarian Landtag, 304

Bavarian List Regiment, 117; *see also* Hitler, Adolf, in First World War

Bavarian Supreme Court, 104, 328, 330

Bayerischer Kurier, 65, 151, 196, 198, 212, 231, 252, 29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34

Bayerische Vaterland, Das, 147–48, 165, 203, 285

Bayreuth, 121

Bechstein, Helene, xv, 121, 122, 125, 314, 315, 321, 323

Bechtold, Marie, 313

Beck, Leonhard, 150, 328

Beethoven, Ludwig van, 37, 49

Belgium, 13, 173, 179, 238

Belleville, Rudolf, 124–25

Benedict XV, Pope, 198

Berchem, Otto von, 221

Berchtesgaden, Bavaria, 85

Berchtold, Josef, xv, 6–8, 67–69, 89, 90, 95, 96, 100, 103, 116

Bergen, Hans, 74

Berlin, 11, 12, 13, 15, 16, 22, 28, 33, 35, 36, 37, 47, 50, 57, 66, 71–73, 86, 88, 140–42, 153, 176, 177, 179, 203,

251, 253, 256, 263, 335

Berliner Tageblatt, 94, 117, 148, 182, 187, 200, 213,
221, 222, 225, 239, 247, 291, 295

Berliner Volks-Zeitung, 259, 269, 298

Bernreuther, Friedrich, 207

Bezymenski, Lev, 128

Bild, Das, 295

Bismarck, Otto von, 11, 118, 149, 186, 199, 244, 261,
281, 288

“Blue Rider” Group, 34, 36

Blute Café, 136

Bolsheviks and Bolshevism, 13, 22, 23, 26–27, 38, 39,
319.

Bonnefon, Charles, 287

Boston, Massachusetts, 123

Bothmer, Felix Graf von, 202, 217

Bouhler, Philipp, 62

Boxer Rebellion, 59, 308

Bracher, Karl Dietrich, 294

Brecht, Bertolt, 35

Briemann, Wilhelm, 325

Brinsteiner, Josef, 128, 131

Brown, Cyril, 129-30

Brown, Percy, 115-16

Bruckmann, Elsa, 314

Bruckmann, Hugo, 314

Brückner, Wilhelm, xv, 15, 53, 102, 139, 189-90, 211,
269, 274, 278, 293, 310, 327

Bry, Carl Christian, 129

Büchner, Bruno, 313

Büchner, Elisabeth, 313

Buchner, Hans, 77-78

Bund Oberland, 51, 54-55, 61, 69, 94, 102, 111, 112,
139, 166, 243, 292

Bund Wiking, 57-58

Bürgerbräu (Bürgerbräukeller) , 4, 5, 8, 10, 14-20, 23-24, 27-30, 43-47, 51-59, 61, 63-67, 69, 70, 74, 76, 77, 81-88, 90, 94-96, 98, 100, 106, 109-111, 114, 119, 120, 129, 137, 141, 151, 163, 181, 189, 200, 208, 238, 254, 271, 333, 334

Cabaret Voltaire, 36

Calgary Daily Herald, 184

Canada, Le, 209

Cantzler, Oskar, 54-55

Carroll, Lewis, 287

Casella, Theodor, 92

Catholic Center Party, 198, 221

Catholics (Catholicism) , 12, 26-27, 85, 137, 185, 186, 197-99, 220, 221, 285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199

Chaplin, Charlie, 42, 263

Chicago Daily News, 149, 243

Chicago Daily Tribune, 43

Chicago Sunday Tribune, 115

China, 59, 308

Christian Socialist Party, 329

CIA, 50

Clausewitz, Karl von, 34, 281

Communists (Communism) , 9, 13, 22, 47, 53, 58, 72, 91, 117, 129, 130, 149–50, 161, 164–66, 175, 185, 193, 199, 220, 232, 308

Communist uprising (1919) , 38–39, 91, 166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 129

Corriere d' Italia, 198

Croix, La, 86, 158

cryptorchidism, 128

Czechoslovakia, 13, 132, 165, 238, 312

D' Abernon, Vincent Viscount, 71, 256–57

Dada, 36

Daily Express (London) , 166

Daily Graphic (London) , 115–16

Daily Mail (Brisbane) , 105

Daily Mail (London) , 15, 150, 198

Daily News (New York) , 86

Daily Telegraph (London) , 225, 269, 291

Danner, Jakob Ritter von, xv, 59–60, 74, 75, 87, 90–91,
120

Danneberg, Emil, 308

Dawes, Charles G. , 324

Death in Venice (Mann) , 36

Decline of the West, The (Spengler) , 36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199, 224, 295

Deutsche Presse, 245

Deutsche Tageszeitung, 191, 295

Deutsche Zeitung, 120, 269, 294–95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 47, 52, 259, 271

Drexler, Anton, 124, 131–32, 310, 331

Dulles, Allen, 50

East Prussia, 312

Ebert, Friedrich, xv, 64, 69, 71-73, 81, 188, 193, 226, 258, 277, 280, 281, 287

Écho de Paris, L', 158, 188, 198, 209, 214, 226, 242, 253, 287

Eckart, Dietrich, 46, 95, 106

Eckart, Richard Graf du Moulin, 136

Egenter, Paul, 65

Ehard, Anna Eleonore (Annelore), 137

Ehard, Carlhans, 137

Ehard, Hans, xv, 133, 137-38, 151-52, 154, 155, 168, 169, 172, 174, 176, 177, 181, 186, 194-95, 206-7, 212, 241, 263, 269, 288, 320, 326-29, 334

Eiles Coffee Roasting Company, 106

Einstein, Albert, 38-39

Einwohnerwehren, 39

Eisner, Kurt, 37-38, 128, 189

Eleven Executioners, 35

Eliot, T. S., 42

Emmanuel III, king of Italy, 15

E. Mühlthaler and Company, 84–85

Engelbrecht, Otto, 102

Epp, Franz Xaver Ritter von, 91

Erfolg (Lion Feuchtwanger) , 32

Ess, Ludwig, 119

Esser, Hermann, xv, 51, 52, 56, 63, 80–81, 106, 160,
310, 313, 317

Esser, Therese, 313

Etzel, Hans, 219–20

Excelsior Hotel, 69

Expressionism, 34–35

Eyck, Erich, 70

F. A. Brockhaus (publisher) , 312

Faust, Martin, 91–92

Fechenbach, Felix, 294

Feder, Ernst, 116–17

Feder, Gottfried, xv, 63

Feil, Hans, 56

Feldherrnhalle (Munich) , 33, 99, 100, 101, 115, 183

Ferdl, Weiss (Ferdinand Weisheitinger) , 286

Feuchtwanger, Lion, 32

Figaro, Le, 107, 237, 250

Filseck, Carl Moser von, 257

Fink, Friedrich, 103

Firma Parcus, 84

First World War, xx, 12–13, 24–26, 36–37, 47, 50, 73, 101, 149, 156–57, 160, 162, 169, 173, 177, 181, 243, 270, 279–80, 286, 307, 308, 322; *see also* Hitler, Adolf, in First World War

Flying Circus squadron, 7

Fobke, Hermann, 306, 308, 309, 318–19

Fokker aircraft, 7

Ford, Henry, 42

Four Seasons Hotel, 121

France, 13, 14, 27, 39, 73, 117, 137, 153, 161, 162, 172, 174, 176, 177, 186, 231, 238, 242, 262, 296

Franco-Prussian War, 149

Frank, Hans, xv, 95–97, 106

Frankfurter Zeitung, 129, 158, 266, 286–87, 295, 333

Fränkischer Kurier, 191

Franz Eher-Verlag, 323

Frederick the Great, 118, 261, 281

Freikorps, 39, 57, 105, 308

Freikorps Epp, 91

Freikorps Oberland, 39, 54, 57, 166, 308

Frick, Wilhelm, xv, 44–45, 59, 64, 78–80, 87, 93, 94, 139, 142, 181, 197, 199–201, 207, 220, 222, 269, 274, 277, 292, 293, 304, 310

Frontbann, 318–19

Fürstenhof Hotel, 69

Gademann, Otto, xvi, 224–25, 243, 255

Garching, 312

Gargas, Sigismund, 294

Garmisch, 108, 110

Gasparri, Pietro, 73, 197, 198

Gaulois, Le, 147, 173, 217, 239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50

Gerlich, Fritz, 65, 78

German Army, 287

Germania (newspaper) , 198, 286, 296

German mark, *see* hyperinflation

Gerum, Josef, 44

Gessler, Otto, 258

Gisler, Else, 62

Gobineau, Arthur comte de, 199

Godin, Emmerich, 99

Godin, Michael Freiherr von, 99, 100

Goebbels, Joseph, 335–36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37, 336

Göring, Carin, xvi, 4, 110, 134, 313

Göring, Hermann, xvi, 4, 7, 8, 17, 20, 28, 47, 66, 71, 84, 87–89, 94, 96, 101, 106, 108–10, 119, 121, 122, 124, 133–34, 313

Götz, Georg, xvi, 224, 244

Graf, Ulrich ("Red"), xvi, 9, 18, 70, 84, 94, 99, 101, 109, 258-59, 310

Grau, Babette, 313

Great Depression, 334

Gregory VII, Pope, 215

Gropius, Walter, 21

Grossdeutsche Zeitung, 286, 288, 303-4

Gruber, Alfons, 115

Gumbel, Emil Julius, 150

Gürtner, Franz, xvi, 120, 130, 214, 264, 330, 334

Handel, George Frederick, 37

Hanfstaengl, Egon, 42, 108, 121, 122, 125, 141, 310-11

Hanfstaengl, Erna, 98

Hanfstaengl, Ernst ("Putzi"), xvi, 4, 6, 29, 41-43, 47, 56, 62, 74, 98, 106, 108, 109, 121-23, 125, 132, 134, 135, 141, 310, 316, 317

Hanfstaengl, Helen Niemeyer, xvi, 42, 62, 108-9, 121-25, 132

Hannibal, 26

Harvard University, 4, 41-43, 45, 109, 123

Häusler, Rudolf, 32

Hechenberger, Anton, 313

Hechenberger, Kreszenzia, 313

Heimatland, 68, 130, 211

Heine, William, 42

Heinz, Friedrich Wilhelm, 105

Hemmeter, Walther, xvi, 194, 223, 249, 255

Hemrich, Franz, xvi, 126, 131, 307, 316, 331

Hennings, Emmy, 36

Henry IV, Holy Roman Emperor, 215

Herrmann, Philipp, 150, 328

Hess, Ilse, *see* Pröhl, Ilse

Hess, Rudolf, xvi, 10, 17, 18, 47, 48, 61, 62, 111-13, 124, 125, 305-6, 308, 315, 321-23, 331

Hildebrandt, Karl von, 220

Himmler, Heinrich, xvi, 52-53, 90, 92

Hindenburg, Paul von, 24, 25, 27, 118, 142, 198

Hindes, Matatyahu, 66–67

Hinkel, Hans, 95

Hintze, Paul von, 106

Hirschberg, Max, 297

Hitler, Adolf, xvi, xix–xxi

alias of, 317

and Amann, 62–63

anti-Semitism of, 67, 89, 159–61, 165, 282, 315

apartment of, 3, 33, 82

appearance, xix, 84, 108, 149, 155, 291–92

as aspiring artist, 33, 34, 336

and Austria, 108, 156, 163, 173, 297, 328–29

and Bavarian leadership, 18–19, 28–31, 46–48, 55, 57–58, 65, 73, 74, 76–77, 80–82, 84, 85, 93, 95, 114, 117, 120, 130–31, 136, 140, 141, 163, 166, 177, 178, 180–81, 185–86, 193, 216–18, 226–29, 231, 237–40, 244, 248–51, 254–55, 257, 258, 259, 271–72, 275, 287, 289, 315

at Bürgerbräukeller, 5-6, 9-10, 18, 20, 21, 23-24, 28-31, 46-48, 50, 54-57, 63, 81, 82, 83-84, 86, 87-88, 94, 119, 129-30, 151, 216, 217, 228-29, 231, 238-39, 244, 259, 271, 333

capture and arrest of, 124-25

charisma of, 29, 175

citizenship of, xx, 155, 297, 329

confidence of, following trial, 286, 304, 334

and counterputsch, 59, 72, 73, 75-77, 82-85, 87-88, 100-101

on cruelty, 8

cryptorchidism of, 128

as demagogue, 120

diet of, 83, 305, 307, 315; *see also* Hitler, Adolf, and hunger strike

and Ehard, 133, 137-38, 151-52

escape of, following putsch attempt, 105-6, 108-9, 121-23

family of, 128, 134-35

and Feldhernhalle march, 96, 99-101, 105-6, 108-9

in First World War, 46-47, 99, 156-57, 159, 163, 267, 307, 312, 322, 329

in foreign press, 83, 86, 105, 107, 116, 117, 129-30, 136, 158, 159, 161, 162, 165, 166, 173, 210, 212, 279, 287, 291, 296

and German military, 72

on German republic, 15, 161, 279-82, 283

gifts sent to, while in prison, 135, 306-7, 314-16, 319

and Göring, 20

and Hanfstaengl, 41-43

and Hess, 18

and Hungarian fascists, 119

and hunger strike, 131-32, 136, 143, 186

and Kahr, 15-16, 28-31, 58, 84, 85, 130-31, 136, 163, 177, 250, 254, 257, 263, 283, 289

and Kampfbund, 51

at Landsberg Prison, 126-28, 131-32, 135, 137-38, 142, 303-16, 317, 319, 321-26, 331, 334

and Ludendorff, 27, 29-30, 32, 84, 85, 185-86, 198-99, 220, 262-63

and Marxism, 160–61, 200, 282, 319

Mein Kampf, 160, 162, 318, 319–21, 323, 325

and Munich, 32–36, 155–56, 160, 322

and Murphy, 50, 287–88

and Mussolini, 15, 23, 88, 177–78, 219, 220, 227, 287

and Neithardt, 150–51, 154, 156–57, 158, 162, 165, 176, 178, 193, 202–3, 209–10, 212–13, 218, 222, 234, 244, 246, 249–51, 255, 265, 282, 284, 285, 292–93, 295, 296–97, 303, 304, 321, 333–36

new regime announced by, 10, 28–29, 46–47

popular support for, 114–15, 135–36, 165, 258, 299, 304–5, 328

and the press, 66, 68, 86, 94, 107, 116–17, 120, 129–30, 136, 303–4, 335; *see also* trial, press coverage of

purported suicide attempt of, 123–24

and putsch attempt, 4, 9–10, 15–16, 18–20, 23–24, 28–31, 46–48, 54–58, 64, 74, 80–84, 87–88, 93, 94, 140, 170, 178, 181, 187, 228–29, 231, 238–39, 263, 271, 275, 293, 312

and raids, 53–55, 67–70, 84–85, 177

readings of, 33–34, 281

as “Reich Chancellor, ” 63

release of, from prison, 326-31

and Röhm, 52, 188, 318-19

and Rosenberg, 110, 124

rumors about fate of, 111, 115

and Scheubner-Richter, 23-24, 94, 99, 101

and Seisser, 237-39

on seizing the initiative, 61

sentencing of, 291-93

speeches of 9-10, 18, 42, 46-47, 52, 117, 158, 162, 175, 207-8, 226-27, 265, 279, 285, 286-87, 290, 304, 308, 315, 317, 320-21, 334-36; *see also* Hitler, Adolf, at trial

Strasser on, 114

sweet tooth of, 42

testament of, 124

at trial, xix-xxi, 139, 141, 142, 149-63, 166-68, 173-81, 183, 185, 187-91, 193, 195, 196, 199, 202-5, 207-12, 214, 216-17, 220, 221, 228-29, 239, 240, 243-46, 249-51, 254-55, 257, 262-65, 269, 278-85, 335

and Vienna, 33, 159, 322

and violence, 69–70

visitors to, while in prison, 135, 310–14, 315–16, 318–19, 322, 325, 326

at *Völkischer Beobachter* offices, 3–4

and Weber, 167–70

withdrawal of, from politics, 318

Hitler, Paula, 33

Hoegner, Wilhelm, 68

Hofbräuhaus, 33

Hoffmann, Heinrich, xvi, 81, 90, 106, 136, 311, 331

Höfler, Georg, 96

Hofmann, Matthäus, 70

Hofmannsthal, Hugo von, 314

Höhenkirchen, 111

Hohenzollern dynasty, 73

Holl, Alfred, xvi, 153, 221, 223, 229, 240, 248–50, 255, 256, 273, 274

Hollweg, Nikolaus, 100, 103

Holzkirchen, 112–13

Hotel Continental, 71

Hübner, Ernst, 69, 70

Humanité, L', 149, 166, 215, 216, 253, 262, 269

Hungary, 37, 119

Hunglinger, Franz, 10

hyperinflation, 14–15, 161, 247, 259, 281, 284, 324

Ibsen, Henrik, 34, 95

Illustrated German Naval Almanack, 34

Imhoff, Sigmund, Freiherr von, xvi, 58–59, 79, 80, 93, 120, 222–23

Impartial, L', 162

Intransigent, L', 289

Isartor Gate, 96

Italy, 13, 15, 23, 174, 177–78, 289

Jesuits, 198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66–67

Jews (Judaism) :

Bund Oberland and, 54, 69

and Communist uprising in Munich, 39

convictions of left-wing, 294

Esser on, 51

and Feldhernhalle march, 106, 115

Göring on, 20, 66

harassment of and attacks on, 54, 65, 67, 69-70, 84-85, 90, 93, 104, 139, 334

Hitler and, 139-40, 165, 282, 313, 315

in Hungary, 119

Kahr and, 131

Kampfbund and, 51

Ludendorff and, 26, 27, 67, 185, 186, 197, 198, 220

and *Münchener Post*, 67

and Nazi policy, 104, 117, 167

Pöhner on, 93, 276

Scheubner-Richter on, 22

Streicher on, 89

at trial, 180

Völkischer Beobachter on, 85, 129

see also anti-Semitism

J.F. Lehmanns Verlag, 61

Justice, La, 187

Kahr, Gustav Ritter von, xvi

backlash of Weimar regime against, 140-42

at Bürgerbräu, 5-6, 9, 10, 19, 20, 28-31, 46, 55, 57,
64, 66, 76, 163, 169, 170, 216-17, 228-29, 231-32, 239, 244,
271

and counterputsch, 57-58, 75, 76-80, 88, 91, 95, 114,
116, 118, 120, 130-31, 183, 192, 211, 228-29, 231-35, 239,
242

death threats against, 142

and Eckart, 136

and *Einwohnerwehren*, 39

and Father Polycarp, 53

and Frick, 64, 79-80, 201

as general state commissioner, 40, 57, 120, 130, 142, 211, 231, 234-35, 270

and Gürtner, 120, 130

and Hitler, 15-16, 19, 28-31, 46, 58, 65, 84, 85, 93, 136, 140, 163, 166, 193, 237, 243, 244-45, 250, 254, 257, 263, 283, 289

and Kautter, 57-58, 258

and Kohl, 192, 211, 275

and Kriebel, 182, 183

and Ludendorff, 26, 55, 58, 254, 262, 293-94

and Neithardt, 218, 237, 245-46, 289, 293-94

and Pöhner, 30-31, 78, 170

popular opposition to, 114, 116, 120, 255, 299

in the press, 95, 120, 130, 166, 203, 257, 287, 315

pretrial statements of, 204

and putsch conspiracy, 19-20, 29-31, 46, 54, 55, 57, 58, 74-75, 77, 85, 86, 93, 130-31, 140, 163, 168, 170, 201, 216-17, 234-35, 242, 245, 248, 250-51, 257, 271-72, 275, 289, 293

and Roder, 215, 258, 271, 272

and Rosenberg, 85

and Rupprecht, 31, 46, 65, 85, 216

and Schiedt, 215-16

and Schramm, 275

and Stresemann, 257

and Wagner (Robert) , 193

and Weber, 168, 169

as witness at trial, 223-29, 230-35, 243-45

and Wittelsbachs, 73

Kalfaktoren, 305

Kallenbach, Hans, 306-8

Kampfbund, 51, 54, 68, 77, 83, 87, 139, 236, 318

Kandinsky, Wassily, 34, 36

Kapp Putsch, 26

Kautter, Eberhardt, 57-58, 79, 258

Kemal, Mustafa (Atatürk) , 23, 177

Kemnitz, Mathilde von, 313

Kempner, Robert M. W. , 330

Kessler, Karl, 102

Kiefer, Philipp, 43-44

Kirill, grand prince of Russia, 23

Klee, Paul, 34

Kleinhenz, Karl August Ritter von, 29

Klinik Josephinum, 92

Knickerbocker, Hubert Renfro, 43, 210, 250

Knilling, Eugen Ritter von, 17, 112, 120, 130

Knirsch, Hans, 132

Kohl, Karl, xvi, 169, 182, 183, 192, 211, 212, 214, 216,
244, 252, 275, 276, 292

Kolb, Richard, 102

Kölnische Zeitung, 191

Köln Volkszeitung, 295

Konditorei Rottenhöfer, 106

Körner, Oskar, 103

Kreuz-Zeitung, 295

Kriebel, Hermann, xvi, 17, 87, 89, 94, 95, 98, 101, 110, 138-39, 172-77, 179-83, 258, 269, 274, 276, 277, 292, 293, 305-8, 311, 325, 327, 328

Kriebel, Wolfram, 325

Kufstein, Bavaria, 134

Kuhn, Karl, 104

Landauer, Gustav, 38

Landespolizei, 59, 87-88, 90, 94, 96, 99, 143, 147, 148, 167, 176, 182, 206, 210, 217, 218, 219, 237, 243, 284

Landsberg am Lech, 126-27

Landsberger Ehrenbürger, 308-9, 324

Landsberg Prison, 60, 126-28, 131, 132, 135, 137-38, 141, 303-16, 318-31, 334

Landshut, Bavaria, 320

Långbro insane asylum, 134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 283, 297

League of Nations, 280

Lehmann, Julius F., 61-62, 111-12, 113

Leipzig, Saxony, 139, 215, 222, 312, 333

Lembke, Karl Heinz, 294

Lenard, Philipp, 303–4

Lenin, Vladimir, 13, 23, 35

Leupold, Ludwig, 81–82, 206

Leybold, Otto, xvi, 126, 310, 311, 320, 322, 323, 325–
26, 329, 330, 331

Leyendecker, August, 150

Liège, battle of, 24

Lincoln, Abraham, 42

Löbe, Paul, 13

Lokal-Anzeiger, 295

Loritz, Johann Baptist, 125

Lossow, Otto Hermann von, xvii

at Bürgerbräu, 6, 9, 10, 19, 28–29, 30–31, 55, 74, 76,
81, 169, 170, 217, 228–29, 231, 239, 259

and counterputsch, 74–76, 77, 81, 82, 88, 91, 114,
120, 192, 206, 219

and Danner, 59, 60, 74–75

and Gürtner, 130

and Hitler, 19, 76, 80, 82, 84, 126, 140, 163, 177, 193, 219–20, 224, 225, 226–29, 247, 249–51, 257, 259, 271–72, 282, 289

and Kahr, 6, 58, 77, 114, 130, 204, 228–29, 231, 232, 234

and Kohl, 192, 275

and Kriebel, 181–83, 258

and Ludendorff, 30, 82, 170, 185, 206, 262

and Neithardt, 218, 220, 223, 237, 255

and Oberlanders, 55

and Pöhner, 170

popular opposition to, 245, 258, 299

in the press, 85, 232, 257, 315; *see also* trial, press coverage of

pretrial statements of, 204, 217

and putsch conspiracy, 28–29, 31, 54, 55, 58, 74–75, 85, 140, 163, 167–68, 170, 181, 183, 191, 195, 216–17, 221, 224, 226–28, 239, 242, 245, 248–51, 257, 271–72, 275, 293

resignation of, 142

and Roder, 215, 271, 252, 271, 272

and Röhm, 51, 87

and Rosenberg, 85

and Schramm, 275

on Storm Troopers, 20

and Wagner (Robert) , 191, 193

and Weber, 168, 169

as witness at trial, 223, 224, 225-29, 247-52

Löwenbräu (Löwenbräukeller) , 51, 52, 56, 63, 151, 164,
181, 186, 189

Luber, Karl, 69

Lüdecke, Kurt, xx, 52, 311

Ludendorff, Erich Friedrich Wilhelm, xvii

acquittal of, 292-94, 296-98, 304

anti-Semitism of, 26, 67, 185-86

appearance, xx, 148, 184-85, 292

arrest and imprisonment of, 105, 111, 115, 141

Brückner on, 190

at Bürgerbräu, 27-31, 47, 55, 57, 81, 83-84, 87-88,
94, 217, 259, 262, 293-94

and Catholicism, 27, 185-86, 197-98, 221

decision to prosecute, 138

in First World War, 24-26, 198, 199

and Germany's "stab in the back," 26-27

and Hindenburg, 142

and Hitler, xx, 18-19, 21, 27, 28, 29-30, 32, 52, 84-
86, 106, 109, 116-17, 122, 149, 162, 185, 198-99, 220, 261-
62, 263, 284-85, 311, 331, 335

and Hohenzollerns, 73

under house arrest, 133, 157, 166

involvement of, for putsch, 30, 31, 47, 55-58, 73, 74,
77, 81-84, 86, 87-88, 94, 96, 98-99, 101-4, 109, 116-17,
133, 151, 167, 185, 219, 231, 239-40, 250, 262, 275

and Kapp Putsch, 26

and Leupold, 81-82, 206

and Lossow, 30, 80, 82, 225-26

on making decisions, 28

Mencken on, 24-25

as nationalist idol, 72, 167, 179, 184, 286

and Nazi Party, 27

and Neithardt, 150, 209, 264, 297-98

personality, 25

in the press, 86, 94, 105, 107, 116-17, 165, 166, 180, 184, 185, 186, 197-99, 210-11, 236, 253, 261, 262, 263, 277-78, 286, 287, 296, 298, 303-4; *see also* trial, press coverage of

and Röhm, 87, 91, 99, 319

rumors of death of, 101-2, 109, 111

surrender of, 104

at trial, xx, 148-51, 153, 154, 157, 166, 168-70, 172, 180-82, 184-86, 188, 197-99, 204-6, 209-12, 217, 219-22, 225, 232-33, 239-40, 245, 250, 254, 259, 261-65, 268, 269, 274, 275, 277-78, 287, 289, 292-99

and Wittelsbachs, 85

Ludendorff, Margarethe, 25, 83, 133

Ludendorff, Mathilde, 313

Ludwig I, king of Bavaria, 11

Ludwig III, king of Bavaria, 37

Luetgebrune, Walter, xvii, 205, 210, 261, 265

Luitpold Gymnasium, 38-39

Lurker, Otto, 131, 311-12, 316

Macchiavelli, Niccolò, 271

Macke, August, 36

Mackensen, August von, 72

Mahler, Gustav, 34

Mann, Thomas, 3, 36, 314

Mantel, Karl, 17, 61, 64

Marc, Franz, 36

Margèrie, Pierre de, 73

Marienplatz (Munich) , 89-90, 96-98

Marinebrigade Ehrhardt, 57

Markt Grafinger Wochenblatt, 148, 158

Marx, Karl, 33

Marxism (Marxists) , 6, 51, 90, 160-61, 167, 185, 186, 189, 197, 200, 216, 217, 263, 276, 282, 319, 321

Matin, Le, xix, 86, 129, 168, 210, 232, 269, 285

Matt, Franz, 58

Maurice, Emil (“Maurizl”), xvii, 68–69, 160, 305, 306, 311, 315, 321, 323

Max-Josef-Platz (Munich) , 105

Mayer, Hellmuth, xvii, 235

Mein Kampf (Hitler) , 160, 162, 319–23, 324, 325

Meistersinger, Die (Wagner) , 34

Mencken, H.L. , 24–25

Miesbacher Anzeiger, 286

Ministry of Justice, 141, 289, 334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102

Molière, 36

Morgan, J.Pierpont, 42

Morgenstern, Samuel, 159

Mowrer, Edgar Ansel, 149

Mühsan, Erich, 35, 38

Müller, Adolf, 93, 325, 331

Müller, Karl Alexander von, 9, 19–20, 29, 46, 47, 96–97,
217

Müller, Max Ritter von, 55

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 5, 110, 118, 180, 245,
294–95

Münchener Post, 4, 37, 67, 115, 139, 148, 162, 203, 215,
274, 288, 310

Münchener Zeitung, 5, 77, 95, 120, 202, 215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65, 78, 86, 110, 115, 207–8

Munich, 11–12, 32–36, 49, 85, 94–95, 120, 140–43, 209,
286, 288

Communist uprising in, 38–39, 91, 160, 166, 193

Feldherrnhalle, 33, 99, 100, 101, 115, 183

Marienplatz, 89–90, 96–98

Max-Josef-Platz, 105

Odeonsplatz, 33, 98–104, 106, 107, 109, 114–15, 117,
192, 259, 271, 274, 313

Schwabing, 32–33, 35, 38, 42, 136

see also Bürgerbräu (Bürgerbräukeller)

Munich Philharmonic, 37

Munich police, 5, 8, 17, 43-45, 56, 64-65, 79, 93, 107, 116, 118, 199, 200, 207, 274, 288, 304, 305, 328-29

Munich Red Army, 38-39

Murnau, Bavaria, 108

Murphy, Mildred, 49

Murphy, Robert, xvii, 11, 49-50, 102, 136, 257, 287-88

Mussolini, Benito, 15, 23, 88, 177-78, 219, 220, 227, 287

Mutz, Andreas, 53

National Socialists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Nazi Party) , 4, 7, 21, 22, 23, 27, 30, 31, 42, 45, 48, 50-52, 56, 62, 63, 67, 69, 70, 77, 81, 91, 94, 103, 114, 118-19, 124, 125, 129-30, 132, 143, 162, 165, 188-90, 198, 200, 258-59, 268, 304, 312, 313, 317-20, 322, 335, 343

National Theater, 115

Neithardt, Georg, xvii, 147, 149-58, 161-69, 173-76, 178, 180-84, 186, 188, 192-95, 202-6, 209-16, 218-20, 222, 223, 225, 228-35, 237-42, 244-46, 248-62, 264-66, 270-75, 277, 282, 284, 285, 287-89, 291-98, 303, 304, 321, 333, 334

Neubauer, Kurt, 23, 103, 107

Neue Zürcher Zeitung, 29, 197, 295

Neumann, Josef, 159

Neustadt, Emil, 106

New York City, 42

New York Herald, 165, 211, 248

New York Times, xx, 84, 86, 117, 129–30, 135, 185, 197, 212, 237, 263, 273, 274, 277, 279, 298, 333

New York Tribune, 86, 136

New York World, 86, 116

Nietzsche, Friedrich, 199, 314

“November criminals, ” 28, 47, 80, 117, 173, 208

Nussbaum, Albert, 90, 111

Oberbayer, Der, 166

Observer (London) , 198

Odeonsplatz (Munich) , 33, 98–104, 106, 107, 109, 114–15, 117, 192, 259, 271, 274, 313

Olden, Rudolf, 321

On War (Clausewitz) , 34

Ordinance No. 264, 77

OSS, 62-63

Osswald, Kurt, 124

Ott, Alois Maria, 131

Ottoman Empire, 21-22

Ouest-Éclair, L', 148, 230

Oulman, Alfred, 286

Outlook, The, 245

Pacelli, Eugenio, xvii, 58, 197-98, 288

Palais Preysing, 101

Palatinate, 173

Peer Gynt (Ibsen), 95

Peil, Hans, 56

People's Court, 139-41, 215, 253, 289, 294, 305; *see also* trial

Pernet, Heinz, xvii, 23, 27, 30, 139, 151, 192, 195-96, 269, 278, 293, 311

Petit Bleu, Le, 286

Petit Journal, Le, 165, 216, 262

Petit Parisien, Le, 86, 107, 129, 150, 158, 167, 172, 174, 210, 213, 267, 295

Pfeffer, Josef, 329

Pfordten, Theodor von der, 104

Picasso, Pablo, 35

Pinakothek museums, 98, 107

Pius XI, Pope, 73

Pius XII, Pope, *see* Pacelli, Eugenio Plato, 33

Plöckinger, Othmar, 321

Pöhner, Ernst, xvii, 30, 31, 47, 61, 64, 65, 78, 80, 87, 93, 94, 104, 139, 142, 150, 157, 164, 169–71, 176, 222, 240, 269, 274, 276–77, 292, 293, 304

Pöhner, Margarethe, 93

Poland, 238

Polycarp, Father, 53

Popp, Anna, 33, 34

Popp, Josef (“Peppi”), Jr. , 33–34

Prem, Johann, 102

Presse, La, 197, 210

Price, G. Ward, 150

Prince, The (Machiavelli) , 271

Prince Arnulf Barracks, 107

Prodinger, Hans, 319

Pröhl, Ilse, 113, 321, 322, 323

Prussia, 11

Public Ledger (Philadelphia) , 287

Puccini, Giacomo, 307

“putsch” (term) , 247-48

Racine, Jean, 36

Rathenau, Walther, 139

Raubal, Angela, 134-35, 313

Raubal, Geli, 135, 313, 314

Raubal, Leo, 134

Reichert, Antonie, 313

Reichert, Maria, 313

Reichskriegsflagge, 51, 53, 59, 90, 139, 188

Reichstag, 216, 304, 330

Reichswehr, 72, 82, 87, 90, 91, 94, 141, 143, 176, 182, 189, 194, 195, 205, 206, 210, 219, 220, 232-33, 237, 242, 280, 288

Reichswehr Infantry School, 141

Reindl, Korbinian, 18

reparations payments, 14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ewspaper) , 117

Residenz Palace, 101, 107, 115, 201

Reuters, 129

Rheingold, Das (Wagner) , 34

Rhineland, 13

Richthofen, Manfred von, 7

Rickmers, Hans, 102

Rilke, Rainer Maria, 314

Roder, Elisabeth, 313

Roder, Lorenz, xvii, 135, 152, 158, 169, 170, 183, 195, 203-5, 207, 215, 218, 222, 225, 234-36, 238-40, 245, 252, 255, 257, 258, 266, 270-72, 274, 311, 313, 320

Röhm, Ernst, xvii, 51-54, 59, 62, 64, 74, 80, 82, 87-91, 99, 107, 124, 139, 152, 180, 181, 186-91, 248, 269, 274, 275, 278, 293, 294, 297, 304, 310, 311, 318, 319, 325, 327

“Rolf Eidhalt” (alias) , 317

Roosevelt, Theodore, Jr. , 42

Rosenberg, Alfred, xvii, 4-6, 23, 81, 85, 93, 94, 101, 110, 124, 310, 317

Rosenheim, Bavaria, 88, 107

Rosenheimer Anzeiger, 179, 185

Rote Fahne, Die, 161

Roth, Joseph, 191

Rue, Larry, 43, 83

Ruhr region, 161, 176, 177

Rupprecht, crown prince of Bavaria, 23, 31, 61, 65, 76, 85, 266

Russia, 13, 24, 72

Russian émigrés, 23

Russian Revolution, 22

Salbey, Johann, 115

Saturday Review, The, 303

Sauerbruch, Ferdinand, 103

Saxony, 232

Schacht, Hjalmar H.G. , 71

Schaub, Julius, 110

Schaut, Rudolf, 103

Scheubner-Richter, Mathilde, 21, 313

Scheubner-Richter, Max Erwin von, xvii, 21-24, 27, 55, 56, 70, 78, 80, 94, 99, 101, 103, 107, 313

Schiedt, Adolf, 77, 86, 95, 215-16

Schiller, Friedrich, 46

Schirach, Friedrich von, 253-54

Schleswig-Holstein, 312

Schmid, Eduard, 89, 110-11

Schmidt, Arno, 100

Schmidt, Ernst, 312-13

Schneider, Edmund, 306

Schoberth, Max, 103

Schön, Franz, 330

Schopenhauer, Arthur, 33, 135

Schott, Georg, 303

Schramm, Christoph, xvii, 180, 188, 248, 259, 264, 275

Schraudenbach, Joseph, 257–58

Schubert, Franz, 315

Schultze, Walter, 105, 108, 109, 121

Schürz, Anna, 62

Schuster, Stefan, 329

Schutzstaffel (SS) , 7, 42

Schwabing (Munich neighborhood) , 32–33, 35, 38, 42, 136

Schweyer, Franz Xaver, xvii, 41, 48, 112, 202–3

Sedgwick, John, 42, 43

Seeckt, Hans von, xvii, 72, 73, 76, 91, 258, 287

Seipel, Ignaz, 329

Seisser, Hans Ritter von,

at Bürgerbräu, 10, 19, 28–29, 30, 55, 76, 81, 169,
217, 229, 231, 238–39, 259

and counterputsch, 75, 76, 77, 81, 88, 91, 120, 192,
228–29, 239

and Danner, 74

and Gürtner, 130

and Hitler, 19, 55, 84, 140, 163, 237–39, 240, 250,
251, 259, 271–72, 289

and Kahr, 58, 229, 231, 233, 234, 239

and Kohl, 192, 275

and Kriebel, 175–76, 182, 183

and Ludendorff, 30, 55, 240, 262

and Neithardt, 218, 237, 240, 289

popular opposition to, 245, 299

in the press, 315; *see also* trial, press coverage of

pretrial statements of, 176, 204

and putsch conspiracy, 19, 28–29, 58, 76, 77, 85, 140,
163, 167–68, 175–76, 183, 195, 216–17, 239, 242, 243, 245,

250-51, 271-72, 275, 293

and Roder, 215, 271, 272

and Rosenberg, 85

and Schramm, 275

and Weber, 168, 169

as witness at trial, 236-40

Serge, Victor, 129

Sesselmann, Max ("Marc"), 29, 56-57, 93, 311

Shakespeare, William, 36, 38, 307

Shaw, George Bernard, 36-37

Simplicissimus, 42, 257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3, 67-69, 71-72, 89, 139, 193-94, 199, 216

Socialists (socialism) , 4, 13, 37, 46, 68, 90, 128, 130-31, 158, 160, 161, 165, 166, 175, 189, 193, 203, 263, 280, 282, 288, 304, 318

Sollen-Ludwigshöhe (Munich neighborhood) , 27

Sommer, Karl, 217

Spa, Belgium, 173

Spatenbräu, 69

Spengler, Oswald, 36

Staatsgerichtshof, 139

Stalin, Joseph, 35

Stark, Johannes, 303-4

Stenglein, Ludwig, xvii, 136-37, 152, 153, 155, 163, 170, 174, 175, 180-82, 192-93, 195, 203, 205-7, 209, 211-14, 222, 225, 232, 234, 240, 241, 254, 265, 267-69, 284, 286, 288, 326-29, 334

Sterneckerbräu, 63

Stolzing-Czerny, Josef, 323

Storm Troopers (Sturmabteilung) , 7-9, 15, 17-18, 20, 22-24, 31, 39, 41, 44, 51, 53, 56, 59-62, 64-66, 68, 70, 83-85, 87, 98, 102, 105, 106, 110-13, 115, 134, 139, 176, 189, 199, 211, 216, 229, 231, 318, 320

Stosstrupp Hitler, 6, 7, 8, 67, 68-69, 89, 90, 94-96, 111, 116, 306, 309, 325

Strasser, Gregor, 320, 331

Strasser, Otto, 114, 320

Straubing, Bavaria, 141

Strauss, Richard, 34

Streicher, Julius, xviii, 63, 80, 84, 89, 124, 130, 310

Stresemann, Gustav, xviii, 71-72, 140, 243, 256-58

Stumpf, Fritz, 44

Stürmer, Der, 63, 130

“Sturm-Lied, ” 95

swastika, 248, 307

Tag, Der, 210

Tannenberg, battle of, 24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136, 166

Telegraphen-Union, 173

Temps, Le, 218, 258

Theater am Gärtnerplatz, 49

Third Reich, 336

Thompson, Dorothy, 321

Thuringia, 232

Tieschowa, Hans Tieschowitz von, 206

Time magazine, 86, 198, 258, 289

Times (London) , 86, 161, 179, 192, 214, 295

Tiroler Hof (hotel) , 134

Toller, Ernst, 38, 49

trial, xix, 147-299

Brückner as defendant at, 189-90, 211, 269, 274, 278,
293

closed sessions at, 152-54, 174-78, 179, 194-95, 206-
7, 209, 219-20, 232-33, 238, 242, 243, 264-65, 266, 268, 276

Ehard as prosecutor at, 151-52, 154, 155, 168, 169,
172, 174, 176, 177, 181, 186, 194-95, 206-7, 212, 241, 263,
269, 288

Frick as defendant at, 181, 197, 199-201, 207, 220,
222, 269, 274, 277, 292, 293

Hitler as defendant at, xix-xxi, 139, 141, 142, 149-
63, 166-68, 173-81, 183, 185, 187-91, 193, 195, 196, 199,
202-5, 207-12, 214, 216-17, 218, 220, 221, 228-29, 239, 240,
243-46, 249-51, 254-55, 257, 262-65, 267-68, 269, 270-72,
278-85, 286, 289, 290, 291-92, 293, 296-97, 299, 333-36

Holl as defense attorney at, 153, 221, 223, 229, 240, 249-50, 255, 256, 273-74

Kahr as witness at, 215, 218, 223-29, 230-35, 243-45, 275, 299

Kohl as defense attorney at, 169, 182, 183, 192, 211, 212, 214, 216, 244, 252, 275, 276, 292

Kriebel as witness at, 172-83, 269, 274, 276, 277, 292, 293

Lossow as witness at, 215, 218, 223, 224, 225-29, 247-52, 255, 275, 299

Ludendorff as defendant at, 148-51, 153, 168-70, 172, 180-82, 184-86, 197-99, 204-6, 209-12, 217, 219-22, 232-33, 239-40, 245, 250, 254, 259, 261-65, 268, 269, 274, 275, 277-78, 284-85, 287, 289, 292, 293-94, 297, 298

Neithardt as presiding judge at, 147, 149-58, 161-69, 170, 173-76, 178, 180-84, 186, 188, 192-95, 202-6, 209-16, 218-20, 222, 223, 225, 228-35, 237-42, 244-46, 248-62, 264-66, 270-75, 277, 282, 284, 285, 287-89, 291-98

Pernet as defendant at, 151, 192, 195-96, 269, 293

Pöhner as defendant at, 150, 157, 164, 169-71, 176, 222, 240, 269, 274, 276-77, 292, 293

press coverage of, 158, 159, 161, 162, 163, 165-69, 172-74, 179, 180, 182-89, 191-94, 196-203, 205, 207, 209-19, 221, 222, 224-26, 230-32, 236, 237, 239, 242-43, 245, 247, 248, 250, 252, 253, 257-59, 261-64, 266, 267, 269, 273, 274, 277, 279, 285-91, 294-96, 298

Roder as Hitler' s defense attorney at, xvii, 152, 158, 169, 170, 183, 195, 203-5, 207, 215, 218, 222, 225, 234-36, 238-40, 245, 252, 255, 257, 258, 266, 270-72, 274-75

Röhm as defendant at, 180, 181, 186-91, 248, 269, 274, 275, 278, 293, 294, 297

Schramm as defense attorney at, 180, 188, 248, 259, 264, 275

security at, xix, 143, 147, 157, 164-65, 203, 224, 274, 288-89, 298-99,

Seisser as witness at, 215, 218, 222-24, 236-40, 275, 299

Stenglein as chief prosecutor at, 152, 153, 155, 163, 170, 174, 175, 180-82, 192-93, 195, 203, 205-7, 209, 211-14, 222, 225, 232, 234, 240, 241, 254, 265, 267-69, 281, 284, 286, 288,

Wagner (Robert) as defendant at, 191, 193-95, 210, 269, 278, 293

Weber as defendant at, 166–69, 176, 269, 273, 277,
292, 293

Tristan und Isolde (Wagner) , 34

Trotsky, Leon, 35

Truth, The (Weber) , 166

Turkey, 21, 23, 72

Twain, Mark, 34

Uffing, Bavaria, 109, 121–23

Ukrainian émigrés, 23

Ulain, Ferenc, 119

United Press, xx, 159, 165, 261

Vancouver Sun, 165, 287

Versailles Treaty, 12–13, 26, 51–54, 73, 81, 86, 119,
152–53, 167, 174, 176, 222, 231, 238, 242, 265, 273, 277,
280, 281, 284, 296, 333

Vidi, 315

Vienna, 33, 34, 159, 161, 321, 322

“Völkisch Block, ” 304, 330

Völkischer Beobachter, 3-4, 42, 51, 80, 83, 85, 86, 94,
98, 129, 320, 323, 325

Völkischer Kurier, 143, 149, 180, 183, 211, 212, 236, 318

Volksbuch vom Hitler, Das (Schott) , 303

Vorwärts, 37, 186, 198, 199, 269, 286, 287, 290, 295, 296

Vossische Zeitung, xix, 107, 129, 158, 166, 167, 169,
184, 189, 194, 198, 201, 209, 212-14, 263, 264, 296

V.V.V.Munich, 254

Wagner, Cosima, 121

Wagner, Richard, 34, 121, 135, 276, 283, 307, 315

Wagner, Robert, xviii, 139, 191, 193-95, 210, 269, 278,
293

Wagner, Siegfried, 135

Wagner, Winifred, 135, 321-22

Walter, Bruno, 37

War Leadership and Politics (Ludendorff) , 27

War Ministry, 54, 80-82, 90, 91, 94, 107, 188, 189, 219,
221, 254

Wassermann, Ludwig, 65

Weber, Arnold, 168

Weber, Friedrich, xviii, 61, 103, 139, 153, 166–69, 176, 203, 221, 259, 269, 273, 277, 292, 293, 305, 307, 308, 311, 325, 327, 328

Weber, Friedrich (son of Friedrich Weber) , 168

Weimar Constitution, 57, 72, 91, 140, 190, 194, 226, 247, 258, 267, 275

Weimar Republic, 13–14, 22, 57, 71–73, 149, 161, 205, 273–75, 279, 280, 287, 294, 296, 324, 333, 334

Weiss, Wilhelm, 211

Welt am Montag, 252

Werlin, Jakob, 324–25, 330

West, Rebecca, 7

Wheeler–Bennett, John W. , 102

Whitman, Walt, 38

Wiener Zeitung, 210

Wilhelm II, Kaiser, 198

Wilhelm Tell (Schiller) , 46

Wittelsbach dynasty, 11, 30–31, 37, 73, 76, 85, 88, 220,
266

Wolf (German shepherd) , 70, 132

Württemberg, 257

Wutzlhofer, Johann, 112

Ybarra, Thomas R. , 185, 197, 212, 237, 263, 273, 274,
277, 279, 298

Ypres, Belgium, 157

Zeit, Die, 295

Zentz, Eugen, 6

Zeuschwitz, Willibald von, xviii, 153, 205

Zimmermann, Christian, 150

Zuckmayer, Carl, 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美）大卫·金（David King）著；经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

书名原文：The Trial of Adolf Hitler: The Beer Hall Putsch and the Rise of Nazi Germany

ISBN 978-7-5201-6372-9

I. ①审… II. ①大…②经… III. ①希特勒（Hitler, Adolf 1889-1945）-传记 IV. ①K835.16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42362号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

著者/（美）大卫·金（David King）

译者/经雷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段其刚 周方茹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李志鑫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2.25 插页: 1 字数: 378千字

版次/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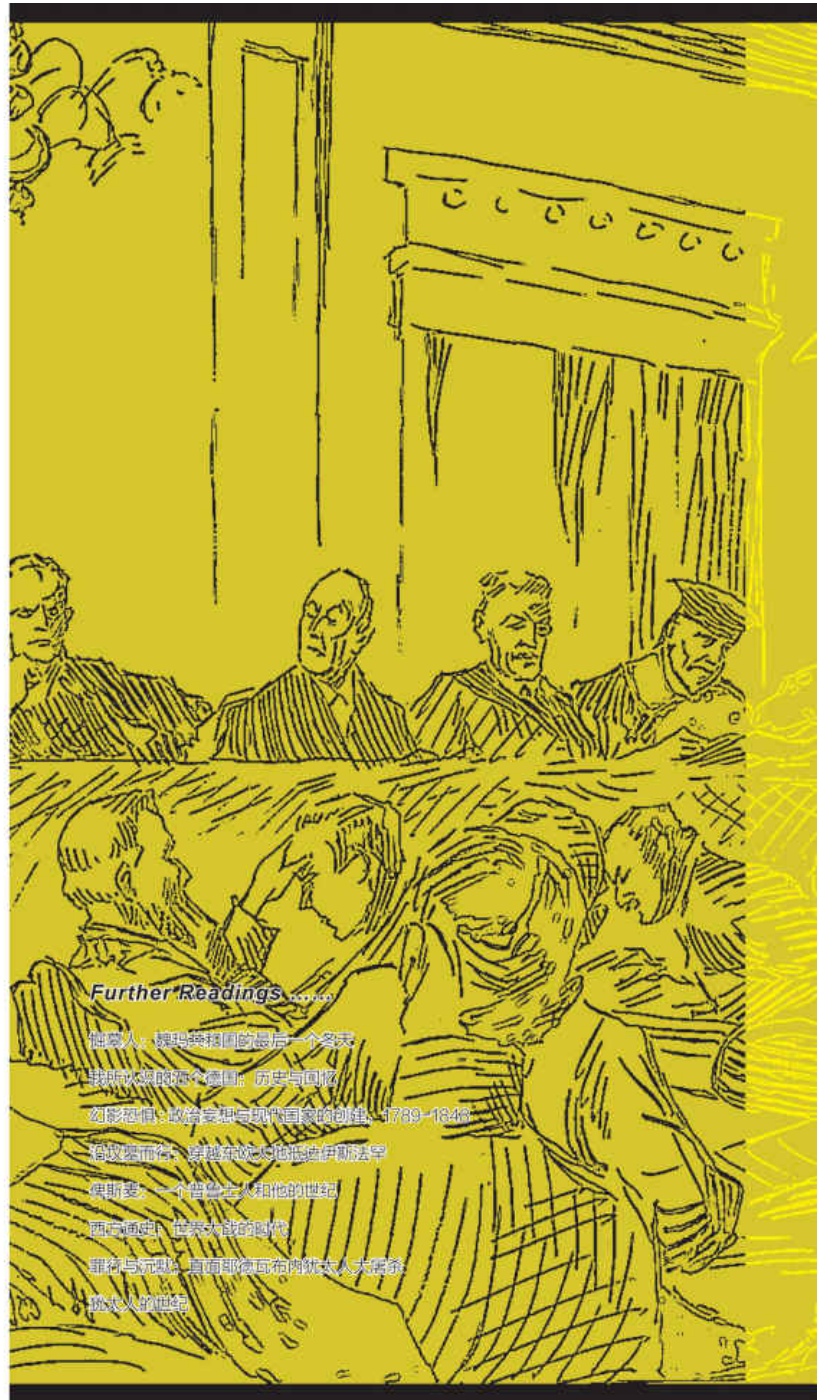
书号/ISBN 978-7-5201-6372-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153号

定价/92.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柏雷人：精英阶层的最后一个冬天

我这一生中的几个瞬间：历史与回忆

幻影恐惧：政治思想与现代国家的创建，1789-1848

稍纵即逝：拿破仑从埃及到伊斯兰堡

德斯塔：一个僧侣之人和他的世纪

西言西语：世界大战的时代

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犹太人的世界

无论在英文、德文还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字的世界里，本书都是关于希特勒审判的绝对权威。
——彼得·罗斯·兰奇（Peter Ross Range），《1924——造就希特勒的一年》（1924: The Year That Made Hitler）作者。

引人思考……《审判希特勒》给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说明煽动术具有转败为胜的威力。本书以揪心的文字描绘了一个先进国家坠入混乱深渊的过程，以及这场混乱带来的惨痛损失。金先生对这场失败政变做出了精彩的叙述，其中亦可窥见一众恶人的嘴脸，日后他们的罪恶将笼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华尔街日报》

几近逐分逐秒的叙述扣人心弦……《审判希特勒》的研究工作无懈可击，文笔动人，成功地将这充满忧虑与混乱的事件呈现了出来。

——罗杰·摩尔豪斯（Roger Moorhouse），《泰晤士报》

1923年11月8日傍晚，34岁的阿道夫·希特勒冲进慕尼黑一家啤酒馆，朝天鸣枪，宣布发动革命。17个小时后，他的这番壮举就只剩下了一连串的毁灭。被警方追捕的希特勒出逃。他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到了尽头。

《审判希特勒》讲述了此后这场事关重大的刑事审判的真相，希特勒和另外9名嫌疑人在本案中被告重大叛国罪。远至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各国记者蜂拥来到慕尼黑，见证一场持续四周的首动奇观。到最后，希特勒得以将啤酒馆政变的惨败转化为一场大胜，令刚刚成立不久的纳粹党大为受益。正是这场审判给了希特勒崭露头角的机会，为他的煽动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助他不可思议地走上了一条通往权力的路。

那一刻，希特勒从小丑变成元首……天下奇闻。

——安娜·阿贝拉（Anna Abella），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晨报》

金用充满活力的节奏详述了1923年那场失败的政变，以及此后的审判。希特勒走入法庭时是个可怜虫，出来时却已经顶着领袖的光环……金的文字中间响着普里莫·莱维和汉娜·阿伦特的声音。这三位作者，在当下都是值得一读的。

——路易斯·马乌利（Luis Mauri），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晨报》

一般的历史研究爱好者可能会觉得，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切，他的崛起与垮塌，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但是……现在对“元首”的研究又有新进展。

——罗宾·艾特金（Robin Aitken），《天主教先驱报》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 92.00元



R
THORN BIRD
索·恩

FRITZ STERN
季大方 / 译

[美]

弗里茨·斯特恩

著

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我的五个德国

—— 历史与回忆 ——

历史学家的人生
深深嵌于“五个德国”的
复杂历史之中

既是
一段充满深情的私人回忆
也是
一部严谨的公共历史记录

A History & Memoi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弗里茨·斯特恩 (Fritz Stern) / 作者简介

1926年出生于德国(现属波兰)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是当代致力于德国史研究的著名德裔美国历史学家, 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德、美两国学术界都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代表作有《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梦想与妄想: 德国历史剧》《金与铁: 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等。

李大方 / 译者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教授,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访问学者, 曾多次参与世界银行等投资工程项目翻译工作, 已出版专著《英国文学评论》, 译著《决策中的伦理》《卧底中情局》《中国一九四五》《南京一九三七》《罪行与沉默》等。

既是
一段充满深情的
私人回忆
也是
一部严谨的
公共历史记录

弗里茨·斯特恩
我的五个德国

—— 著

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Fritz Stern
历史与回忆

——

A History & Memoir

李大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策划人



联合创立

视觉设计师

历史学家的人生深深嵌于“五个德国”的

复杂历史之中

既是一段充满深情的私人回忆

也是一部严谨的公共历史记录

FRITZ STERN

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by Fritz Stern

Copyright© 2006 by Fritz Ster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我的五个德国

历史与回忆

本书获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美国人和德国人而言，斯特恩是一位活着的国宝、一位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杰作彰显了德国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复杂和扭曲的灵魂。作为一个出生于德国的美国人，他总结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并通过自己的故事，用深深打动人的个人光芒照亮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他在这两个国家里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标记。此书是一部重要的回忆录，无疑将成为经典之作。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美国前驻德国大使

弗里茨·斯特恩撰写了一本可被称为“学者回忆录”的著作，其将学术的客观性、思想的严谨性与回忆录的温情高度融于一体。

——罗杰·K. 米勒，《巴尔的摩太阳报》

这是一部令人着迷的书卷……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回忆录，也深刻地揭示了斯特恩笔下的“五个德国”的复杂历史。

——《外交事务》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为困难时期的幸福生活提供了有历史价值的文献。

——亚当·基尔希，《纽约太阳报》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融合了斯特恩的经历和学识……个人和历史就像一辆精心调校过的奔驰车，在嗡嗡声中一路向前飞驰。

——弗朗辛·基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这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所记录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在目睹德国和欧洲的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沉思。《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一书充满了洞察力、戏剧性和智慧。

——小亚瑟·M. 施莱辛格

这是一本精彩的书，是健在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现代德国的解读，也是充分理解自己经历的人所撰写的一部罕见的20世纪生活回忆录，值得每一个人认真阅读。

——托尼·朱特，著有《战后欧洲史》

这是一本理性的日记，记录了作者不受感情左右的对自由的信念，这种自由脱胎于残忍暴行并由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培育。弗里茨·斯特恩向德国和美国提出了富有学识且更具针对性的呼吁，希望各自能展现出其更好的一面，并以此不断地丰富着这两个国家。

——马克斯·弗兰克尔

这种精彩而富有洞察力的回忆和分析是当代历史教师和学生的宝贵财富。

——埃利·维瑟尔

从出生并成长在一个消失了的德国，到成为艾伦·金斯伯格的大学辩论队队友，再到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生活经历非同凡响。能读到这本书非常幸运，因为作者没有听从年轻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他的忠告：研究医学，而不是历史。

——亚当·霍赫希尔德，著有《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贪婪、恐惧、英雄主义与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

此书再一次表明，弗里茨·斯特恩是当代德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是德国文化和政治演变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同时也是一位迷人的叙述者，他讲述了自己生活经历中涉及学术和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

——索尔·弗里德伦德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教授

这是一位具有卓越品质的学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充满智慧，深刻动人，亦可作为对过去75年德国历史的精细的导读。

——路易斯·贝格利

弗里茨·斯特恩的其他著作

《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

Einstein's German World

《梦想与妄想：德国历史剧》

Dreams and Delusions

The Drama of German History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Gold and Iron

Bismarck, Bleichröder,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German Empire

《反自由主义的失败：现代德国政治文化论文集》

The Failure of Illiberalism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odern Germany

《文化绝望的政治：对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权力的责任：纪念豪约·霍尔本历史论文集》（参编）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Historical Essays in Honor of Hajo Holborn (coeditor)

《历史的变体：从伏尔泰到现在》（主编）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editor)

于是，里厄大夫决定撰写到此结束的这部纪事，以免跻身沉默者的行列，旨在挺身做证，为鼠疫的受害者说话，至少给后世留下他们受到不公正和粗暴待遇的这段记忆，也旨在扼要谈一谈在这场灾难中学到什么，即人身上值得赞美的长处多于可鄙视的弱点。

.....

.....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不会永远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1]

阿尔贝·加缪《鼠疫》

^[1] 引自（法）阿尔贝·加缪《鼠疫》，李玉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第280—281页。——译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标明为译者注外，其余均为作者注）

- [引言](#)
- [第一章 祖传的德国](#)
- [第二章 魏玛](#)
- [第三章 第三帝国](#)
- [第四章 来自远方的恐怖](#)
- [第五章 当德国不存在时](#)
- [第六章 联邦共和国：新的开端](#)
- [第七章 第四个且被遗忘的德国](#)
- [第八章 外国人口中的德国话题](#)
- [第九章 重提德国问题](#)
- [第十章 统一的德国：第二次机会？](#)
- [尾声](#)
- [致谢](#)
- [对照表](#)

引言

1944—1945年的冬季，当夏尔·戴高乐将军首次访问苏联时，他去了斯大林格勒，这是德国军队涉足最远也是败得最惨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凡尔登与德国人作战时受伤并被囚禁两年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成为抵抗德国人的自由法国阵线的领袖。在颇为逼真的传说中，戴高乐将军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间，对一位助手低声说道：“*Quel peuple!*”（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啊！）翻译询问道：“您是指苏联人？”“不，”戴高乐回答说，“是指德国人。”

戴高乐将军在这块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所做出的简洁精准的判断很好地描述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充满戏剧性的德国事件，这一点他有清晰的把握。他所提及的“人民”曾经在1870—1939年三次攻击了他的国家，德国人破坏并几乎摧毁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他们犯下了在欧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种族灭绝罪。但是他也知道，德国人民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对于战后欧洲的复苏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他掌握了围绕在德国伟大之上深奥的晦涩之处。

本书记录了我这一代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我出生在戴高乐能充分理解的德国的艰难时期。我记得在我年幼时父母对魏玛共和国的缓慢灭亡以及随后迅速建立起来的纳粹暴政的惊愕及沮丧：这种纳粹暴政被如此多的人接受，反对者却如此之少。我记得他们那些身为勇敢的民主捍卫者的朋友，个个面临失败的厄运，其中有些人

被谋杀，有些人被监禁，还有人遭到流放。尽管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控制下的德国只生活了五年，但在那段短暂的时期我想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了整个职业生涯来试图回答：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潜在的邪恶为什么且怎么会在德国成了现实？

数十年的研究和经验使我确信，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通往穷途末路的德国道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深蒂固，然而其发展原本是可以被遏制的。我所出生的这个世界，当时正处于一个可避免的灾难的风口浪尖上。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打压一切异端的伪宗教运动的诱惑，例如德国所屈从的那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受其影响。自由的脆弱是我生活和工作中所获得的最简单、最深刻的教训。当一幅过去岁月的未加掩饰的画面——那是永远不可或缺的——初看上去难以看懂时，我就会想起恩斯特·罗伊特于1913年发表的伟大信念：“民主的命运取决于对历史的信仰。”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战后的工作中，我只是间歇性地意识到我的生活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历史学者的工作中时，我知道虽然克利俄^[1]允许效劳于她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所有这些方式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超脱——合乎希望的是，借助于移情作用和缜密的想象，趋于活跃且富有生气。我以美国人的眼光研究并为美国学生和读者讲授德国的过去。但我的美国生活经历最终有了一个重要的德国成分，因为作为一个美国的德国史学者，我被卷入了有关德国的过去的纷争之中，这些争论把一个失败了的和分裂了的国家搅得动荡不安，其本身就成为了冷战的主要战场。也许我没有预料到，当一个人完全经历了他个人所处的时代的剧变——破坏和独特的建设轮流交替——之后，此人会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看待过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历史的教训与今天的美

国具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相关性。渐渐地，我又获取了另一种德国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平行并从属于我的美国生活。我逐步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并从两者中获取了知识。非黑即白的思想残余消退了，过去变成了一方不断变换色彩的织物。

慢慢地，我了解到一些关于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德国的情况——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寻常的民主制度伴随着争议得到了发展；在苏联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运气和对公民行动的倾向使我成为“一个积极介入的观察者”，此处借用的这个说法来自雷蒙·阿隆的自称，对此他是名副其实的。我被时断时续地从书房里和课堂上吸引到德国和美国这两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并且自认为很幸运地能够看到并回应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正在塑造与美国产生了新的关系的新的欧洲。我仍然将此看作历史的公共事业。

数十年来，我一直回避去写我的个人经历：我想在我的专业和个人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然而，就在我第一次返回我的故乡——当年德国的布雷斯劳，如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之后不久，我为我的孩子们写了一篇个人返乡记，我把它称为“1979返乡记”。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完全意识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具有讽刺意味，甚至可能有自欺欺人的性质：所谓“返乡”实质上并非真正的返乡。我是怀着最深切的好奇心去弗罗茨瓦夫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意识到那次旅程是一种探索，不知出于何因，我想要去看看我那已经被摧毁了的家乡，我那已经不复存在的养育了我的国家。我的失落感被一种无处不在的感恩之情覆盖，感谢我们在美国找到了第二个更美好的家园。但这篇短文确实是我第一次动笔写有关回到我的诞生之地的情景，我将它附在下面，作为我最早的回忆印象的记录。

我们开车去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我们走的东北路线非常奇怪，对此我们一点都不熟悉。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一直被吸引前往南部，去

捷克-波希米亚山脉，或前往西部，去柏林及其他地区。东北部——波兰人于1918年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曾经看上去是一片遥远的、似乎充满敌意的土地。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波兰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令人感觉困惑的对象，最糟糕的看法则是只能对其加以蔑视。

波兰的路标显示我们已经接近弗罗茨瓦夫；我们无从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穿越了旧时的波德边界的。1945年，在波兰遭受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性战争（以及德国人和苏联人各自对波兰的精英阶层策划的清算）之后，苏联吞并了该国的东部地区，将其纳入乌克兰的版图；同盟国同意作为赔偿，波兰人应“管理”奥得-尼斯线^[2]以东的德国领土，其中包括西里西亚及其首府布雷斯劳。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从他们的东部省份被逐出之后，不得已只能向西迁徙。他们“清理”了原先属于大约300万德国人的一片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每一个前德国人的标记都被一丝不苟地抹得一干二净。

在布雷斯劳，我的内心承受了太多的折磨，既为这座城市已经被转手给了新的主人而感到遗憾，又对被从中驱逐出去的德国人感到同情。对于我来说，我的家族近乎灭绝，以至于我对不明身份的德国人难以表示同情，不论是已经亡故的还是被驱逐出境的。战后，我的基本回应是这个样子：是怎样就怎样吧，驱逐他人者最终也被他人驱逐。但是，难以抹去的还是对这个地方的好奇心，以及对过去的领土完整性的某种缺乏理智的、顽固的忠诚。

我查阅过布雷斯劳在1944—1945年的命运，但是看到它的结局给人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随着德军在东部的撤退，希特勒下令将布雷斯劳打造成一座堡垒城市，以此来阻挡苏联军队的前进步伐。1945年1月，该城的党卫军指挥官下令立即撤离，迫使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最寒冷的冬季离开家园，并在这座陷入绝境的城市里迫害了不计其数的人。布雷斯劳经受了苏联人45天的围困，其间伴随着残酷的逐门逐户的争夺战和苏军不间断的炮击，以及由德军指挥官发动的可怕的破坏行动。在围困期间，以及在野蛮的破坏达到狂热的程度时，希特勒的下属下令在该市的中心修建一条简易跑道，也许是为了让补充物资能够运进城内——这是以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非德国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并且破坏了整个街区的面貌。当布雷斯劳最终投降时，希特勒已经死了，柏林也已经被攻陷了。布雷斯劳的这种倔强的抵抗转变为针对自己的疯狂，当不再有其他受害者可

供屠戮时，取而代之的是一场自我谋杀。在那几个可怕的月里，到处是盲目的牺牲：最后一道防线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作为对希特勒毫不质疑地顺从，这种盲从已经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噩梦。

弗罗茨瓦夫同时展现出战时遭受到的破坏和战后单调的社会主义重建的迹象。我已经什么都无法辨认出来了，直到我们来到城镇的中心，遇到了阻碍我们前往酒店的多条复杂的单向街道时，我才一瞬间识别出——由此也能立即确定我的方位——那栋用红砖建成的市警察局

（Polizeipräsidium）大楼。这栋大楼一直作为一座堡垒矗立在那里。1933年初，纳粹冲锋队的突击队员在那里杀害了我父亲的病人同时也是朋友恩斯特·埃克斯坦；1938年，我和父母为准备移民于早上8时在那里参加了“一场面试”。此时它仍然是警察局总部，只不过是波兰的警察局总部。

在莫诺普尔酒店——布雷斯劳的古老酒店中最好的一家，但现在已经变得过时且衰败了——他们告诉我没有双人间，只有一间套房。事实上，这是这家酒店最好的套房，有一个巨大的阳台对着街对面的老城区剧院。社会名流（Prominenz）或那些上年纪的精英以前通常住在这个套间里。当1938年7月希特勒访问布雷斯劳时，他是否曾下榻这个套房呢？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本地出生的男孩子来说，这是多么奇怪的一次返乡啊！别具风格的是，随行的是一位美国妻子，并且是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给订的房——我却没有一个回来要探访的人。在这座曾经是我的故乡的城市里，现在街道上却是波兰的名称，耳边回响的也都是波兰语，这使我感到自己与这座城市已经格格不入了。

那天晚上，我们搭乘古老的8路有轨电车，沿着我每天上学放学必经的路线，前往我们家的公寓房所在的位置。我原以为这是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走路的话太远了；事实上，坐电车才只有四站路。这条路线经过的街道上曾经有布雷斯劳最好的商店和高雅的公寓房与别墅；现在，在那些陈旧的楼房之间有大量闲置的空间，一路上还夹杂着一些单调的新建筑物——煤渣砖砌成的建筑物，毫无色彩，缺乏形态，四四方方，肮脏又丑陋。

位于角落的我们家的公寓房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坐落在宽阔的街道对面的那栋宏伟的办公大楼却幸存了下来。我们在1930年搬到这条街上，直到1936年，当时我十岁，这条街一直叫作恺撒威廉大街，然而在希特勒于1934年对冲锋队的首脑清洗后不久（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包括令人

憎恨的当地冲锋队领导人埃德蒙·海因斯），这条街便被更名为冲锋队大街，每次提到它时，我都会特别注意。

我们继续前行，前往位于一条小街上的我父亲的小诊所；那栋楼房也幸存了下来，现在成了一家养老院。我们通过了一个是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那里有一个邮局，小时候我常常到那里去寄信，因为当时我们全家在设法移民，信就是写给国外相关人士的——那些年里移民国外是全家人的迫切愿望。然后我在一条平行的街道上，去寻找一家犹太人医院

（Israelitisches Krankenhaus），离我们家原先住的地方大约十分钟路程，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个出生时就受过洗礼的犹太人，所以他只能在那家医院担任顾问，而不是作为正规的医护人员。因为属于一个群体而受到迫害，而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也拒绝接受你，这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这家我们小时候称之为I. K. 的医院仍然在那儿，医院有很大的红砖楼房，后面的那些红楼显然还是医院。我们最终发现了凿刻在墙上的一个日期（1902）和字母I. K. ——这是这家德国医院遥远的过去唯一幸存下来的标识，告诉人们这家诊所是当年布雷斯劳兴盛的犹太人开的。

第二天早上，我尝试着从酒店出发前往舍尼希区。舍尼希区在小城的东部，夹在一条河流和一个巨大的老公园之间。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寻找之后（所有靠近市中心的旧地标都消失了），我看到了一座熟悉的桥梁，记忆中还有一座桥，然后就直接朝玛丽亚·马格达莱纳文理中学走去，1936—1938年我在那里上学。就像我记忆中的那样，学校还矗立在那里，只是陈旧了一些，外表有点褪色，但是其魏玛后期的设计仍然不乏“现代”因素。我们走了进去——同样的石头阶梯，同样的楼层，上了锁的教室和校长办公室。

瓦尔丹大街13号是我祖母家的房子，距离我的学校大约三分钟路程。这栋房子也幸免于难，但留下了四十年来磨损的痕迹。两个年轻人让我们进了屋后面的花园：花园面积减少了，其中一部分给了邻居，以及被附近的社区作为运动场，但里面仍然有同样美味可口的醋栗，同样的草莓苗圃，同样的楼梯弯曲着直通房子的主楼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父亲的姐姐洛特和理查德·科布拉克就是在这个花园里举行的婚礼。他们后来死在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我拍摄了很多照片，也放开肚子吃了许多醋栗——好像是在伸张我的权利，不是针对这个花园，也不是针对这栋房子，而是针对我的过去——当我们即将离去时，一位老先生下了楼，然后走出前门，跟随他的妻子朝

他们的车走去。我赶上去问他——我们用法语交流——我们是否可以到楼上去一趟，我解释说我的祖母曾经住在这里，我想再次去看看。他善意地答应让我们进去，一到楼上，我一眼就认出了一切。他带我们进了祖母的客厅，现在是他的客厅。墙上挂满了油画、素描和复制画——在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些画作的意义时，此人掀开衬衫，给我们展示了他胸部上方的文身标记。他解释说，他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和布痕瓦尔德度过了五年，这些图片反映的都是身穿囚服的他、集中营里的儿童以及其他集中营的场景。在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科尔贝神父木制雕像，这位神父曾在集中营里自愿牺牲以换取另一个人的生存。这位老先生名叫切斯瓦夫·奥斯坦科维奇，他说他是一位作家，他给了我妻子佩吉一本他写的有关集中营经历的书，他把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称为“anus mundi”（“世界肛门”）。

此时此刻，我的感觉回来了。眼前这位波兰前骑兵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意我的德国人以及犹太人身份——现在就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他遭受的苦难经历几乎就是我和我父母侥幸逃脱的经历。我祖母家曾经非常气派，现在住在这里的是位健壮、给人印象深刻的先生，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请求再看一眼相邻的一间房间，那是我姑妈格蕾特住过的，房间有个巨大的阳台，可以俯瞰花园；我们朝阳台走去，佩吉拍下了我和他在那里握手的照片——这象征着一种所有权的转移，由我由衷并快乐地予以执行，突然之间，就是一个片刻，仿佛所有纠结的过去都变得有意义了。我告诉他，他住在这里我很高兴。这样的接受是突如其来的，也是令人愉悦的：在那个疯狂的世界里，总算有些歪打正着的事情。看到我姑妈美丽的地毯仍然铺在房间里，我的感情没有受到丝毫的干扰。然后我们离开了，这对于他妻子的耐心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这一篇章就此结束。

我们继续开车行驶在周围一些毗连的街道上，去看看邻近的房屋，然后返回我的学校，又去了格蕾特姑妈搬进我祖母家之前住过的街道。恰好就在我的母校对面，我看到了一块街道指示牌，表明这条街道现在叫“ulica Rosenbergow”（罗森堡夫妇路）。我曾因为是个犹太人而在这条街道上遭到殴打，现在这条街却以两个美国犹太人的名字来命名，他们因被审判、定罪和处决而成为欧洲左翼的烈士！也许这是弗罗茨瓦夫唯一以犹太人名字命名的大街。

不知怎的，尽管有如此多的变化，我仍然对布雷斯劳的某些角落有种占有欲，虽然回到一个建立在否定过去之上的城市，会比接受我自己的消失的过去更加容易些。我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回到一个波兰的城市要比它仍然属于德国容易得多；在布雷斯劳的德国人，住在那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这是会引起怨恨的。事实上，我对此毫无怨言，只是对波兰人抹去了这座城市的（还有我的）所有过去的德国痕迹偶尔会有点恼火——仿佛那时他们本可以做些其他什么事情！

离开以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命名的大街后，在返回的路上，我们驾车沿着舍尼希公园前行，然后再次穿过奥得河，到我记忆中的大学诊所的所在地。那些楼房依然矗立着——19世纪的红砖楼房，同我记忆中的孩提时代的一模一样，那时我们就住在附近。或许最令我兴奋的就是看到那些房子了——这里是我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我的父亲曾在这里工作，如果命运没有把我打发到别处的话，我很可能也会在这里工作。佩吉问道：为什么布雷斯劳有这么一所杰出的医学院，那里的犹太人还特别优秀？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完全知道，但布雷斯劳医院残留下来的东西和医生们住过的别墅并没有对曾经的幸福生活激起任何不愉快的想象，那时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在成就和奖励之间，在希望与满足之间，大体上是协调的。

因为我在本书中试图记述的内容多种多样，所以我有许多次目的不同的返乡之行。我在欧洲的工作同我在美国的一样，经常（也许太过频繁）会脱离轨迹，朝计划之外的方向发展，但其中一些会转向家乡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兴趣就会把我带回已经发生变化的童年时代的老地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从远方观察到弗罗茨瓦夫取得了一个新的重要意义：它成了团结工会的大本营，这个波兰运动引领了东欧自我解放的道路，并且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我的第五个德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一个有偏好的人生回忆录，这个人生是由一个用五种不同的政治化身为它的灵魂及和解而奋斗的国家塑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引领着我踏上了意想不到的、我所偏好的回乡之路。

生活和学习已经让我相信历史的开放性。历史是没有必然性的。去思考一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原本会发生的事情，是理解确实发生了的事情的一个必要元素。如果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个人的正派和有勇气的行为能够起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就需要被记录下来并永垂青史。我们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论怎样受到先前存在的条件的制约，未来都是开放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公民参与也就成为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这一点也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当然，我在美国写作和教学的大部分经历受到了过去我的德国背景的影响。尽管此处我主要关注的是五个德国，但也写了一些我个人的美国经历，虽然省略了其中对我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许多事情——我的发现和失望，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欢乐，以及我的悲伤。这是因为越来越担心这个国家慷慨的自由精神，尽管其本身也需要更新和修正，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受到攻击。我反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从那以后，我注意到伪保守派和宗教激进主义者破坏了国家对理性和宽容的著名承诺。

我在历史领域的工作中，记录下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是如何在19世纪开始，并且在几十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达到高潮的。在做这项工作时，我试图探究理性和魔性这两方面因素的一些渊源，这些因素将德国的高尚同其兽性的爆发联系在一起。红衣主教纽曼

(Newman) 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自由主义“现在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党派；它是受过教育的世俗世界……丝毫无异于那种深刻的、貌似可信的怀疑主义，我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发展，正如由自然人实际上付诸实践的那样”。纽曼笔下的宽容、质疑的精神几乎总是会煽动起左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仇恨。

此处，只要将我所了解的五个德国的历史，与我在专业上研究过的几个德国、我的个人经历，以及我自己常常无意识的情绪联系在一

起时，我就是在试图融合记忆和历史——那些遥远的孪生体，相互支持又彼此破坏。众所周知，记忆是容易出差错的，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它都会倾向于适合我们意志的、自私的变形体，这一点令我们非常苦恼。我知道还存在一种所谓的诚实的（和健康的）遗忘。然而，尽管存在缺陷和扭曲，但确实能回忆起过去的戏剧性情景，并暗示一些掩盖了事实的感受。借助于我家三代人以书信形式保存的文字记忆宝库（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讶），我在这里提供一些关于重建过去的专业知识；我自己也有五十多年的日记，以及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大事记。我们都在寻找过去的真实的痕迹，这种吸引力是我们无法抗拒的，而且试图用生命来加以填充。我们希望在分散的遗迹中和过去的各种文件中发现其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希望我可以这样说，接下来的是一种“诗意与真理”的混合体——我只能希望两者在其中会有所包含。

在写作这本关于历史和回忆的书时，我很快就从专业和个人的角度对历史学者的真实面貌产生了一种看法。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卡普蒂瓦岛的短暂假期中，我观察到一群鸕鹚潜在一条有着丰富鱼类的水道中捕鱼；它们漂浮在水道湍急的河流上顺流而下，但坚定不移地面向后方，然后，当水道扩大成一个潟湖，水流速度减缓时，它们飞回水道的源头并再次潜入水中。它们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个动作。这些鸕鹚就像史学家，我沉思着。我们也是生活在时代的潮流中，飞速前进，但也回溯过去，我们的观点随着每一朵浪花而变化，一路上都在寻求养分。只是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的旅程，我们无法从头开始。

我所认识的几个德国，尽管是不完全的也是一时的，但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归的历史性欧洲的终结，并且赋予了这个大陆一个更加谦逊、更加团结、更加和平的时代的开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欧洲看到了奇妙而不可思议的和解，其本身也许就暗示着部分回归。因此，这五个德国的历史，可以将其视为一本关于政治和道德

课程的教科书，或者是一个充满恐惧和希望的剧本。对于沦落在20世纪这个有组织的兽行的地狱中的受害者，我们欠他们一座不朽的、充满敬畏的纪念碑：请保持谨慎的警惕——须知杀死他们的鼠疫杆菌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加缪是对的。

[1] Clio, 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之一。——译者注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同盟国制定的波兰与德国的边界线。——译者注

第一章 祖传的德国

自1926年出生以来，我知道已经存在过五个德国，但我认为其中我了解最透彻的，正是那个我不熟悉的德国，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岁月里的德国。那个德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研究对象，在时间上与我有一定的距离，从而使我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脱感。只是到了开始动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发现我父母的数千封信件，那是我们在1938年移民到美国时他们带来的。一捆捆信件或被整齐地包裹着，或被放置在木箱中，这些信件自被带到这里以后，就从未被打开过，其中有些出自我家前几代人，也有些来自我父母的朋友和同事，大都是在德国的和平时期写的家信，还有一批是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与家中的通信。这些信件都是关于日常的或不同寻常的事件的会话。虽未言明，但这些信里的事件都发生在早前的那段时间里。信件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其中的内容或确认或放大或改变了我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他们说话的口吻特别直接，甚至他们的沉默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习惯。我现在认识到，其中大多数信件会对我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仅能作为我早期工作的说明性附注，还能引发我重新思考。

作为德国东部西里西亚首府的布雷斯劳，至少曾经是我家中四代人的家乡。这座城市拥有过不同的主人，也有过有争议的历史。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其发展得益于坐落在流入波罗的海的奥得河河畔这一得天独厚的位置。几个世纪前，这里是一座名为弗罗茨瓦夫的波兰城市——德国人后来往往有意忘记这一事实。我在那里长大，我了解到它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741年的一天，

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后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从玛丽亚·特蕾莎女皇手中夺取了被称为“奥地利帝国的珍宝”的西里西亚全部领土，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代表普鲁士王国惊人的崛起。1871年后，布雷斯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实行联邦制，其成员国享有部分权力，并允许诸如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伟大的德意志古王国保留其君主制。普鲁士凭借其规模和传统在帝国中占有优势地位，普鲁士君主兼任帝国皇帝，这一双重身份就是这个事实的象征。

布雷斯劳的市民有多重公民身份：他们是西里西亚人，有自己的方言；他们又是普鲁士人，守着简朴的传统；他们也是德国人，传承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布雷斯劳是普鲁士第二大城市。在19世纪，布雷斯劳的许多市民是为实现统一和自由这个双重目标而进行斗争的坚定支持者——也就是说，为了一个现代宪法所保证的拥有基本公民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国家。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的自由梦想破灭了。普鲁士国王于1850年颁布了一部宪法，保留了君主的执政权（仍然被视为神权），尽管它规定立法机构有一定的预算权力，这个立法机构是由（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选举人根据三级投票系统（取决于所支付的直接税税额）选举出来的。跳过那些细节，人们需要记住，这是一个公然的富豪制度——当然它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经历了十年的反攻和镇压之后，这期间德国经济有了显著增长，西里西亚和其他地方富裕的资产阶级向普鲁士议会派出了构成其多数的自由派人士。

面对这种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国王自然要竭尽全力维护他的君主权力，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是一位热情但不依惯例出牌的君主主义者，他与自由派进行斗争并分裂了他们——通过满足他们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仅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打赢了三场战争，在1871年以战胜法国而达到顶点，同时建立了

一个统一的德国，其联邦结构为成员国保留了重要权力。虽然普鲁士旧贵族阶层和军队努力维持其政治统治地位，但俾斯麦仍然建立了一个德国议会——德意志帝国国会——由男性普选产生。他之所以采用这一革命性的普选原则（为此还常常被贴上“白色革命者”的标签），是因为他认为保守的农民会在人数上超过可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社会——不断膨胀的无产阶级淹没了萎缩中的农民阶级，并且把他们自己信奉社会主义的代表送进了国会大厦。

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从事脑力劳动的德国人非常高兴，最终国家获得了统一——他们乐意面对或接受一个在国内将法治与君主专制秩序相结合、在国外权力不断获得增长的国家。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俾斯麦本人开始将社会主义者和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天主教徒称为“帝国的敌人”——被各种惊人增长的权力以及看到德国崛起成为欧洲支配力量而产生的强烈自豪感掩盖。左派自由主义者恪守承诺，主张民众主权和宽容，在帝国内部却成了正处于下滑状态的少数派；日益保守且决意保存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的普鲁士议会与日益进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之间的矛盾，预示着一个最终的冲突。但只有极少数同时代人才认识到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与一个抱残守缺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这一矛盾，这个体制的标志是重叠的精英人物组成的联盟——东德的地主（容克）、强大的实业家、军队和高级公务员。换句话说，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经济上正在衰退的农业贵族在拼命地紧紧抓住权力不放，而一度追求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感觉被夹在旧日的统治者和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作为德国工业化的政治副产品，社会民主党正在不断扩大其势力。有许多德国人已经认识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根深蒂固的权势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我的祖先身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的成功和矛盾。在他们眼里，“德国问题”似乎在1871年之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绝大部分专心于其他事情，而不是国家政治。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后，他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实际上出现了一种赞颂“强大的领导者”的迷信，我的部分家人也屈从于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然而，城市政治是不同的：在城市地方事务中，投票制度依然有利于繁荣的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碰巧是自由主义的。

我的曾祖父母和他们的后代都参与了布雷斯劳这个城市的建设。布雷斯劳凭借广袤的农业腹地和东南部丰富的煤矿资源，扩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日益繁荣，声名远扬。其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861—1910年人口翻了两番，从12.8万人增加到了50万人，其中60%为新教徒，35%为天主教徒，约5%为犹太人。布雷斯劳有充满活力、值得自豪的市民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德国的城市在文化独特性上争先恐后，他们的资产阶级父辈在为复辟他们的阶级和时代而竭尽全力，这正是以往君主朝廷做过的事情。

布雷斯劳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构是西里西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其现代形式的建立是在1811年，即在普鲁士改革时代，这是对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力量做出的回应，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所大学取代了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于1702年建立的一所天主教大学，它是普鲁士第一所非教派大学，拥有天主教和新教两种神学院。在经历了四十多年平庸无奇且缺乏建树的发展之后，这所大学突然间声名显赫——在医学领域更加出类拔萃，并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国家大力支持这所大学，而市政府的要员们则促进了布雷斯劳的文化生活——这一点在剧院和音乐及其艺术学院方面表现很明显，由此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人才。虽然布雷斯劳不能与柏林或慕尼黑或维也纳相媲美，但它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是成功的。

鉴于其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以博尔西希工程制造厂为例，布雷斯劳的无产阶级也在壮大。19世纪60年代初期，费迪南德·拉萨尔，一个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一个布雷斯劳商人的儿子，成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一位领导人，一个非革命性的马克思。几十年来，布雷斯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派和不少左倾激进团体。

同德国土地上的任何犹太人社区一样，布雷斯劳的犹太人社区是形形色色的。自1744年犹太人第一次被重新接纳进这个城市以来，一些犹太人家庭就一直住在这里；受布雷斯劳城市里的机遇的吸引，其他人也从乡村小镇迁移到了这里。有些人来自更远的东部，被称为东方犹太人（Ostjuden），他们把普鲁士视为一个有希望的避风港。布雷斯劳的犹太人有富有穷；有信仰东正教的，也有信仰更正教的；有传统主义的，也有被完全同化了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些犹太男人过着丰富的市民生活，而妇女则在社会工作和社区责任上担当先驱。在某些领域，如军队，犹太人是被禁止进入的；在其他一些领域，如公务员，犹太人则受到阻碍。因此，犹太人只能过度集中在贸易及其他行业，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达到了公共教育的最高层次。此外，他们十分富有，换言之，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和慈善家。

在很多方面，我的祖先们——追溯到我的曾祖父母辈，他们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例证了这种共性和多样性。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还有我的父亲，都是内科医生，他们的成功和挫折体现了他们阶级的特点——至少在1914年之前，他们一帆风顺，并且在专业上卓越超群、独具创新，具有独特的气质。

我的四位祖父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们中我只见过外祖母海德薇格·布瑞格，1939年她在皇后区我们的小公寓里去世；她的丈夫奥斯卡早在1914年就去世了。我的祖父理查德·斯特恩于1911年去世，

一年后他的遗孀丢下了时年十七岁的我的父亲鲁道夫也辞世了，成了孤儿的父亲，与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

斯特恩夫妇和布瑞格夫妇都属于我们后来所称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即拥有一定财产的资产阶级公民，他们珍视的是他们这个阶级的所有德国人所珍视的东西——教育

（Bildung），这是自我塑造和教育的目标，这个目标部分源于对伟大的文化作品、诗歌和音乐经典以及艺术作品的通晓与陶醉。人们认为，这种文化遗产或继承物塑造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即一个人所宣称并试图依循的价值观。许多德国人默默地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其他人穿上这身文化外衣则不免显得过分招摇，到1873年，当时尚不出名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为他们杜撰了一个术语Bildungsphilister（受过教育的市侩）。到19世纪后期，这种文化遗产越来越融合在对科学和进步的热忱信仰之中。德语中的Wissenschaft（科学）一词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的光环，它既包含有序和可验证的知识体系，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Wissenschaft还具有道德品质，隐含着彻底的严肃性。对于许多人来说，Bildung和Wissenschaft成了一对孪生神祇，是被不断进步的科学强化的一种信仰，成为一种改变生命的现象，而科学家所坚持的严谨的精神使其更加吸引人。歌德用自己常常援引的格言给这个观点提供了证明：“拥有艺术和科学的人拥有宗教信仰；缺乏艺术和科学的人需要宗教信仰。”在那些年代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仍然是无罪的，它是一种解放力量，与基督教教会的恐吓性观念恰恰相反。

我祖母的父亲名叫西吉斯蒙德·阿希，出生于1825年，是布雷斯劳的一位传奇人物。1848年，他刚刚成为一名医生，就领头参加了当年的革命运动。当时，在米兰起义和巴黎起义的激励之下，德国人走上街头，堆筑路障，虽然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但共同点是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和公民自由。阿希添加了他自己的激进的社会目标，因

为他对现存的不公正和贫穷感到十分愤慨（他是在下层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并充满民主的热情；在演讲中，他要求取消间接税和10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最激进的观点。阿希经常提到发生在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那是早期针对资本主义势力和个体工匠剥削的抗议。1892年上演的格哈特·豪普特曼的著名戏剧《纺织工》，揭露了导致纺织工人奋起反抗的恶劣工作条件，虽然他们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报纸报道了这位高挑精瘦的年轻医生的行为，他在各种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的修辞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848年9月，在又一次威胁要摧毁布雷斯劳皇室住宅并由此引发了革命分子与武装士兵之间的战斗的示威活动中，阿希毫不畏缩，勇敢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警告对方不得使用暴力。他不断地大声疾呼，士兵们是“黑暗反动势力不情愿的工具”，伤害他们将是“最大的不公”，因为他们受制于镇压抗议示威者的命令，并且他们应该得到“尊重”。那次抗议活动以及其他抗议活动都保持了和平的方式。然而，到了1848年12月，因为对盟友的不宽容和对激进主义感到失望，阿希离开了民主联盟。当只不过略有改良的旧秩序卷土重来时，他早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由于他曾参与制作标语牌，抨击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皇家奢侈品巨额花费，当局指控阿希冒犯君主。经过一阵子司法拖延之后，他于1851年5月被判处在特别苛刻的条件下监禁一年。在被释放之后，他与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此后专注于医疗实践，并因在黎明时分给贫困患者医治而获得关注。他对富有的病人收费较高，由此就能够免费为穷人诊治，并且还经常在贫穷病患的家中悄悄留下钱，以便让他们能够购买他所开处方的药品。1863年，他当选为市议员，或叫作市议会代表，他在这个职位上足足待了十六年，为改善城市和公共卫生等各种事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他成为一名有声望的人物，他的事迹光荣地成为各种戏剧的主题，并因其家庭与全德国进步

运动的关系而闻名。他的嫂子，名叫莉娜·摩根斯坦——娘家名为莉娜·鲍尔——是早期的女权主义领袖。

阿希有三个孩子。一个叫贝蒂，十四岁时皈依了新教。一个叫托妮，嫁给了一位年轻的医生——理查德·斯特恩，就是我的祖父。阿希于1901年去世，在他生前居住的城市中他被亲切地称为“阿希老爹”，人们公开哀悼他并将他埋葬在犹太人墓地里。他的儿子罗伯特也是一名医生，在我出生时曾经是我母亲的产科医生。我一直为有这么一位民主的祖先而自豪！^[1]

阿希老爹可能亲眼见到了他的革命希望的落空，但他能够在医疗实践以及参与自由主义改革工作中寻求满足。而他的孩子们，面对不同的条件，却感到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参与政治活动。他们的公共生活围绕着他们的工作而展开；他们的私人生活则是以家庭和朋友为核心，但是悄悄地影响着他们的，不是“德国”问题，而是“犹太人”问题的一个新阶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犹太性构成了众多最深层的困境，如此之深以至于无人愿意谈论它们。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被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隔开。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各种不利条件之下，并且因他们习以为常的沿街兜售和货币兑换行当、奇特且排他的正统性，以及对一种原始的神圣的宗教体系的依附而遭到鄙视，而非犹太人相信此类体系只能在基督教之中得到实现。区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是他们共同的上帝。但是，就在德国思想界百花齐放的重大时期，巨大的变革不期而至——这是可媲美于德国启蒙运动和古典主义的伟大的理想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莱辛、赫尔德、康德、歌德和席勒改变了德国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些德国犹太人开始感受到解放了的欧洲生活的吸引力，并开始希望所谓的同化甚至整合。到18世纪末，一些德国的邦政府颁布了部分解放犹太人的法令；1812年普鲁士紧随其后。

随后的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审判、胜利和最终的悲剧——在世界历史上始终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性，为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家庭的生活提供了不断变化的背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思考这个话题并就此进行写作，这里最简单明了的总结就足以说明问题。

18世纪后期，犹太人首次在德国的知识分子生活中崭露头角。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于1743年来到柏林，1754年遇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这两位哲学家都是启蒙运动思想和相关的神学问题的诠释者，他们成了好朋友。莱辛是一位哲学家和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智者纳旦》被认为是宽容所有宗教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门德尔松有六个孩子，其中两个皈依了新教，两个女儿皈依了天主教；他的孙子费利克斯是一个天才作曲家，在音乐中赞美了基督教宗教改革。

由此，在德国犹太人现代阶段的开始时期，出现了皈依基督教的趋势，并成为德国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个主题。其动机自然因人而异：海因里希·海涅是在1825年皈依基督教的，如他所言，他是考虑到洗礼已经成为欧洲文化的入场券。皈依基督教变得越来越普遍，直到纳粹时期；但所有居住在德国土地上的犹太人，皈依者仍然只占极少数。

合法地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解放行动是分阶段展开的，该行动始于1812年普鲁士颁布的法令，该法令消除了绝大多数对公民权益的剥夺。到1869年，犹太人拥有德国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和义务被得到承认。尽管非常短暂，这条从犹太人聚居区和排斥走向合法平等和物质机会均等的道路却一直是令人痛苦不安且充满危险的。合法的平等并没有消除过时的偏见，在新时代，犹太人仍然被心照不宣地禁止担任握有政治权力的职务，事实上被禁止拥有所有明显有权力的身份；在1871年后统一的德国中，至圣所的大门对他们关闭的。在德国，

几乎与犹太人共存的每个方面都存在某种不对称。尽管犹太人在某些领域受到限制，但他们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自由职业中，犹太人在法律、医学和新闻领域的成就尤其突出；他们在贸易和银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富裕程度也超过了其他人，他们的孩子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成功也非常显著。19世纪末，德国犹太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卓越成就，在这些领域，日耳曼人和犹太人相互补充，并在一个完全可以被称为非凡天才的熔炉中进行合作。但是，由传统所灌输的追求卓越的需要却是由敌意所培育的。

回顾往事，德国犹太人的崛起构成了欧洲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社会进步，但也成功孕育了怨恨。19世纪70年代初，当巨大的经济泡沫破碎，从而暴露了许多腐败丑闻时，这种怨恨被再次激化。犹太金融家被卷入一些丑闻之中，一场仇恨运动开始把犹太人归为腐败的全能代理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德国时事评论员杜撰了反犹太主义这个词。这些攻击，其中一部分出现在权威期刊和请愿书中，要求至少部分撤销给予犹太人的平等的公民权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但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仍在继续，其形式并不是稳定的、不可阻挡的，而是起伏不定的，尽管明确表述的、潜在的且连续存在的偏见是罕见的，就像在每个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在另外一些国家，情况甚至可能比德国更严重，那里的犹太人遇到的善意和敌意是平等的。因此，难怪德国犹太人的认同感是不稳定的，他们普遍拥有一种矛盾心理——然而，德国人通常在他们的身份识别上存在困难，正如海涅所说的那样，犹太人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一样的，只是更加突出。

对于许多德国犹太人来说，犹太性是一种个人情感，对此他们极少加以评论。然而犹太性却给他们的生活打上了烙印。在欧洲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礼仪是极其重要的，任何人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性和金钱等话题。某些犹太人认为他们对犹太性的

内心感受也值得默默地传承下去。不过，犹太人也是这种礼仪的极大的干扰者：海涅是日耳曼民族多愁善感的杰出讽刺者，马克思是货币和资本的力量的分析家，弗洛伊德则是性的探索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

一位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允许自己——不论是不是开玩笑地——表达被严格禁止的心理真相。由此海涅承认道：“我的性情是最平和的。我的愿望是：有一间屋顶覆盖茅草的简陋小屋，但必须有一张舒适的床铺，还有可口的食物以及最新鲜的牛奶和黄油，在我的窗前要有鲜花，门前要有几棵好看的树。如果上帝想让我的幸福足够完美，他会赐给我这样的喜悦：我能亲眼见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死在那些树上。在我死前，从心底里深受感动的我，将原谅他们一生中对我犯下的所有错误。真的，任何人必须原谅他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在他们被绞死之前。”

尽管如此，许多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环境中感觉到他们如同在自己家中，这种感受是那么真切，他们对德国文化又是那么热爱，以至于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希望之中：恰恰是因为其前现代的根源，反犹太主义将会消失在他们的新的、光明的、现世的和科学的世界之中。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一起生存，尽管多半是分开的，但在规定的领域，如学校、义务兵役、商业、市政事务以及许多自愿或专业组织、会所和业余爱好，他们是在一起的。但是在任何领域，犹太人都不能像内科医生那样亲密地进入非犹太人的生活之中——在心理治疗前的那些日子里，医生就像知己密友和安慰者一样。在德意志帝国，内科医生的白大褂象征着尊严，犹太人对此可能梦寐以求，一旦穿上白大褂，他们就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充满感激的信任。

我的祖父母，两位医生和他们的妻子，以及由他们的朋友、同事和助手组成的那个圈子，就是对一个曾充满诱惑和敌意的世界做出广泛回应的例证。在一个教育和科学深刻地改变了许多宗教的传统观念的文化环境中，犹太人面临非常特殊的困境。人们如何调和古老的仪式和禁忌与盛行的后达尔文世俗科学观之间的关系呢？如同许多受过

教育的新教徒，我的祖父母也形成了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将基督教伦理的升华与理性的戒律和民族情绪融合在一起，并将其整个包裹在一种适当的敬畏意识之中。对于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来说，朝整合迈出的另一步就是对德国的“民族”宗教——新教路德宗——的皈依。事实上，因为那时宗教在神学上已经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并且与现代生活、资本主义精神和科学和平共处，所以迈出这一步变得相对容易（这与教宗庇护九世所规定的严格的天主教义大相径庭，他依照教规对现代生活做出了谴责）。

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完全共享了这种文化宗教，这使他们与非犹太人拥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性。我猜想，他们对德语抒情诗作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希伯来语诗篇的熟悉程度（如果他们了解这些诗篇的话）；他们感到与犹太人的仪式和习俗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疏远。而这种转变发生得如此迅速！不过是两三代人，德国犹太人便失去了他们独特的方言，一种意第绪语或犹太德语的形式，并且完全被德语化了；尽管当无法以其他任何方式来表述某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偶尔会求助于一些意第绪语词语。他们乐于使用德语这种语言，凭借努力，通过阅读散文和诗歌，轻松地、优雅地掌握了这门语言。虽然如此，他们依旧保留着对过去遭到隔离的记忆。我认为他们把犹太性既看作耻辱，也看作特性。

许多犹太人的家庭，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家庭，如果 they 与流行的改良形式，即自由派犹太教，更加和谐相容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沉湎于这种公民-文化宗教之中，而与正统派犹太教的要求则相距甚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希望进一步打破与其祖先的联系，而皈依基督教。在19世纪初期迈出的主要作为哲理-情感的一步，现在逐渐获取了极其实用的外观。这种多数人所称的信仰改变，以及其他人口中的叛教，缓解了大多数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问题——俾斯麦的一些大臣就

是有着犹太血统的新教徒——因此，信仰改变毫无疑问有许多不同动机，即使最纯粹的理由也带有机会主义。

细想我祖父母的一位朋友，弗里茨·哈伯（1868—1934），他的生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位具有卓越天赋和极大抱负的化学家，他于1892年改变了信仰——这令他父亲非常沮丧。信仰改变无疑使弗里茨的学术生涯变得更加顺畅，使他终于成为德国科学界的一个杰出人物，并摘取了诺贝尔奖桂冠作为最终的认可。哈伯曾经渴望在大学里得到一个职位，但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遭到拒绝。这就是为什么非犹太人导师会要求他们的研究生学生改变信仰，尽管自尊、孝顺或自重阻止了許多人迈出这一步，比如哈伯最亲密的朋友理夏德·维尔施泰特和著名的实业家兼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同其他许多人一样，这两人认为采取这一精神上的举措是不光彩的，尽管这样做会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许多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仍然感觉与他们以前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之间有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密切关系，但是在一两代人之后，有些犹太人的后裔甚至连他们源自《旧约圣经》的根都不知道了。他们开始觉得他们属于“福音派”（或者在极少数情况下属于“天主教”），这是他们的身份证上所标明的。他们成为基督徒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并且往往还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信仰。

至少在第一代人身上，皈依者经常被新老相同宗教信仰人士怀疑。但是——这一点现在常常被人遗忘——在第三帝国时期，通过宣布种族而不是宗教作为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价值的决定因素，犹太血统的基督徒被重新定义为“非雅利安人”，并且与犹太人一样成为遭受迫害的对象。因此，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犹太人。在这方面，希特勒是成功的。今天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费利克斯·门德尔松或者弗里茨·哈伯是犹太人，尽管在德国，这并不是他们一生中的身份（以色列人也将这些“叛教者”视为犹太人，尤其是如果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或者在其他方面出人头地的话）。

我的祖父母——理查德·斯特恩和他的妻子托妮，娘家姓阿希——是在成年后改变信仰的，并且让他们的孩子在出生时就接受洗礼：最大的孩子洛特出生在1893年，我父亲是两年后出生的，马尔加是1900年出生的。我的外祖父母——奥斯卡·布瑞格和他的妻子海德薇格，娘家姓利翁——从未改变过信仰。然而，大量的通信却清晰地表明他们对基督教的倾向，并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时为他们施洗，其中我母亲凯特排行老二，她出生于1894年。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外祖母海德薇格认为她自己是基督徒。换句话说，改变了信仰的斯特恩夫妇比起未改变信仰的布瑞格夫妇能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犹太性。

几十年来，这两个家庭一直是特别亲密的朋友。双方的父亲是同事，多年来这两个家庭实际上还是邻居。他们主要的朋友都是志同道合的改变信仰者，是能够宽容和理解他们受洗的犹太人。犹太人和改变信仰者之间通婚，后者可能更多地与犹太人通婚，而不是与真正的基督教徒通婚，尽管在这三个群体之中存在亲密的友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家庭经常一起出门去度假，他们的孩子也上同一所学校，甚至一起参加同一个非常正式的舞蹈班，这些舞蹈班中混合了各种信仰或无信仰的年轻人。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给予他们的基督徒患者和犹太人患者同样的护理和关照，并在工作上与基督徒同事和睦相处。两家都有基督徒护士和佣人，他们数十年来一直留在这两家，之间的关系即使不平等也是可信赖的。在这一切之中，这两个家庭似乎对我们称为身份的东西保持沉默，既没有公开吹嘘他们的德国的和基督教的归属，也没有公开否认他们的犹太人根源。他们采纳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一种明确的精神气质，其中大部分是不言而喻的和习惯性的。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与他们的同事有一种“使命感”（德语是Beruf），这是他们生活中的核心，这种家长式的使命感在家庭中占有

支配地位。在诸如医学、法律和神职人员这类具有伟大的使命的领域中，医学可能是最受尊重的，它融合了福利、牺牲和科学。我们知道大量的德国犹太人跻身于医学这个行业；在19世纪末，布雷斯劳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或犹太人后裔。我的直系男性祖先都是医生，这一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父权制模式的有效性，追随父亲的脚步是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或者是后继有人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含义：到19世纪末，古代的医术变得更加吸引人，因为它现在也是一门科学，并且医学上的发现证明了生命的转变。

我从医的祖先是一代临床医生的直接继承人，他们致力于为医学创造并扩大其科学基础。他们着手去发现疾病的微生物来源，并通过免疫学和化学寻求治疗方法。在此期间，专业组织和期刊大量增加，医学研究也成为一项国际性事业。这些德国医师的先驱之一是伯恩哈德·瑙宁，他的座右铭是：“医学将是一门科学，否则便一无是处。”对于瑙宁及其所有追随者而言，科学——也就是在实验室里不断地工作——是对医生的直觉及其对病人的不懈关怀不可或缺的补充。在病人的床边，信任和人文关怀这一医生的古老美德永远占上风：最好的医学依然是一门艺术和一门科学。即使在医学变得越来越“科学化”时，我的祖先也是忠诚的临床医生。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的通信中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责任感，他们的后代延续了这一传统。这两个人在诊所和医学界合作，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科学的世界中。在他们最随性的通信中也可以看清这一点。例如，1896年哈伯在一张明信片上用潦草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给“尊敬的斯特恩”（用了熟悉的您），回答了一个有关化学的复杂的问题。保罗·埃尔利希，这位化疗的创始人，最终成为布雷斯劳最伟大的科学名人，就科学上的问题分别写信给我的两位祖父，感谢他们为他的实验提供了临床材料的样本。在理查德·斯特恩去世后，埃尔利希向斯特恩的遗孀寄出了一封他手写的吊唁信：“我可以告诉您，我一直以最

高程度的尊重和热爱对待这位突然逝去的人——不论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名人，或是作为科学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同等地掌握了理论研究和临床责任，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这封信是埃尔利希用他独特的拼字法书写的，没有大写字母，这样就节省了时间。科学是一种信念、一种纽带、一种职业。我祖父布瑞格的讣告是由他的首席助理撰写的，其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工作对他来说……不只是责任，也是生活的需要（Lebensbedürfnis），在他眼里，这是一种乐趣。”

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工作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如何的重要。它赋予生命以意义，也能维系健康，即使过度努力会给健康造成损伤。他们是能够理解托尔斯泰所赞美的所谓的劳动疗法（Arbeitskur）的那一代人。那时的从业者认为这种理念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我们尊重。我想，身为这个享有特权的也是充满冲突的阶级的后代，我会感到一定程度的真诚，也会具有习惯上的矛盾心理。我不得不问自己，我对他们的精神气质极端的崇拜是不是一种补偿性的姿态。我的崇拜可能是补偿性的，但他们对自己的使命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的妻子在文化水平上通常与他们不相上下，而在审美问题上就可能优于他们了。她们选择了她们自己所负的责任——不仅在家中，而且在外面，在社区和教育工作中——她们也有使命感，体现在为全家购买食品和杂物以及操持家务上，并确保孩子们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我的主张女权主义的寡言少语的祖母肯定不符合针对德国女性的老一套观点，依照这种观念，女性被局限于KKK（Kinder, Küche, Kirche, 即孩子、厨房、教堂）之中。我还记得，在布雷斯劳，我的外祖母分担了当时相当普通的一家企业的责任：一家托儿所（Kinderhort），专职照顾贫困儿童。

在我的家中，不论男女，对待职业选择都是极其认真的。我的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写给他父亲海因里希的一封没有标明日期的信件，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海因里希享有卓越的声望；1862年，德国最著名的一位内科医生特奥多尔·弗雷里希——曾经是布雷斯劳的一名教授并短暂地担任过俾斯麦的医生——他亲自出面为年轻的斯特恩推荐职位，给出的推荐理由是作为“一个在全圣医院尽心尽责的熟练助手以及穷人的医生”，斯特恩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位父亲曾建议儿子去研究医学或法律，但儿子决心去学习数学和物理学。

“在选择职业生涯时，”他写道，“每个人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物质条件和该职业可能提供的内心幸福。无视前者意味着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狂热分子（Schwärmer），而忽略后者则是一个肤浅的愤世嫉俗者。”

这个当儿子的要想发现自己是否具有天赋去追求自己的选择，最好是在一所小规模的大学里，因为在那样的大学里他可能最终会得到一份助教工作，从而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医学，他补充说，引起了他的厌恶，而学法律的话，除了缺乏法律所要求的修辞天赋之外，他还能预见到一种无聊的生活。事实上，这封信是家庭中保存下来的极少数早期信件之一，之所以被保存下来，很可能是出于偶然原因，但更可能是因为它堪称典范。这封信肯定能够证明我祖父严格的律己精神和抱负，以及他对自主权所押下的一种恭敬的赌注。我不知道我的祖父在他转向医学之前是否探索过这些早期的兴趣，而在医学领域，正如我们所知，他是出类拔萃的。

这些家信表明了某种天性的东西以及所期望的家庭纽带的亲密。它们给我们描绘了祖先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或者执笔者所希望的生活方式；它们表达了那些理所当然的东西，以及那些看起来古怪或异常的事物。父母和他们的朋友提供了建议和告诫，肯定了基本的行为

准则。信中还有丰富的文学典故，轻松或幽默的笔触使苛刻的说教或严肃的语调变得温和且易接受。

我手头有外祖父奥斯卡·布瑞格每日写给他未婚妻海德薇格的信件，这些信件从1889年开始，平均篇幅为6—8页。他当时在维也纳和哈雷，攻读耳鼻喉科这一新领域的专业，这是主治耳朵、鼻子和咽喉疾病的专科。（他的父亲是上西里西亚科塞尔的一位医生；而她的父亲利翁博士，是布雷斯劳的一位医生，并且是一家自由主义日报的共同拥有者。）他们的情书写得非常坦诚，除了炽热的爱情之外，也包含了关于生活的反思。6月，奥斯卡从哈雷寄出的信中写下了他对萨克森方言的极端厌恶，这种方言令他作呕并“心情忧郁”。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我变成了一个热情的犹太人的朋友……我在街上看到每一个典型的勾鼻子都难以置信地感到兴奋。这让我想起了布雷斯劳。当然，在这种反犹太人的肮脏场所，所能见到的就只有令人厌烦的金发，还有那些肿大的啤酒脸，上面装饰着决斗留下的伤痕。”因为他本人是一头金发，所以他被认为是个基督徒，由此听到了各种反犹太人的奇谈怪论。

这些信件中经常提到的另一个话题是理查德·斯特恩。1889年，奥斯卡暗示道，理查德的行为伤害了托妮·阿希——一位闻名遐迩的美女，出身于一个地位显要的家庭——并且如果他现在胆怯地放弃她，她将被迫永久地过一种独身生活。究竟理查德如何冒犯了托妮，这一点并不清晰，但间接的证据表明，他曾经公开宣示他的爱意，但后来被证实他的态度是优柔寡断的。他以某种方式违反了当时的道德规范——虽然他不太可能给她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况且奥斯卡也不会原谅这种行为；无论如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理查德与托妮结了婚，他们的关系依然完好无损、亲密无间，尽管几十年来感情稳定，但多愁善感的布瑞格夫妇常常会嘲笑令人啼笑皆非且易发脾气的斯特恩夫妇。对此我可以做证。

社会习俗能决定性地影响礼貌，即道德的外在形式。道德教育和正确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被期待着去遵守着装、言语和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规范，更不用提爱情、婚姻、真诚和忠实等更为严肃的问题了。违反行为规范会反映在全家人身上。父母随意给出的告诫可以在其中一些信件中找到。因此，托妮·斯特恩在写给她十四岁的儿子鲁道夫的信中，重申了在其他家庭做客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嘱咐他要关心妹妹，在他离家期间，妹妹将独自待在家里，留给可信赖的保姆照料。他不需要带她去糕点铺：“在自己身上不断地聚集善意，培养乐意助人的精神，这对她来说更有价值，对你来说也更为困难。通过给她树立良好的榜样，你能给她更深刻的教育，这比任何形式的说教和不断的告诫更有用。你偶然目睹的一些超越自我的例子，难道不比你接受的所有冠冕堂皇的指示更能有效地影响自己的行为吗？”鲁道夫在学校里不优秀的功课也被提及，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假期后他会有所改进。鲁道夫的父亲在信的底部特别添加了两行话，给他“最亲爱的鲁迪”，确认他完全赞同鲁道夫母亲的嘱咐。

还有一次，鲁道夫的母亲解释说，她已经理所当然地把这封写给孩子的密信给他父亲看过了，他应该珍惜他父亲的看法，而且必须明白，“夫妻之间是不能有秘密的，尤其是在关于他们亲爱的孩子的事情上”。此外，他终究会在他父亲身上感受到同样的“无条件的信任”，就像他早已在他母亲身上感受到的那样。一个小孩子与母亲的自然依赖会发展成两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但同样自然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人在必须踏上一条充满危险和斗争的人生道路的同时，也应该向成功人士——他的父亲——寻求忠告和支持；父亲有过这一切经历，而且与母亲的经历完全不同”。“你很幸运，”她补充说，“能同时拥有你的父亲和母亲，而许多贫穷的孩子必须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这些告诫和嘱咐似乎听起来很老套，但它们表达了几代人之间一种强烈的隐含的纽带：这种直率的忠告是父母为子女的教育所能尽的责任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个世俗和理性的世界的一种表现，其中道德教育的责任落在了父母身上，尽管很明显其他声音也是存在的。（例如，我刚好知道，有一位名叫瓦克纳格尔的牧师主持的查经班给我的父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父母的确定性——其本身反映了一个有序世界的普遍意义——影响着年轻人的观点。和睦与反抗是共存的：在德国人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父子冲突是一大主题，一般是公开处理；每个人都知道，最终的惩罚不外乎解除父子关系或剥夺继承权。这种纠纷所造成的痛苦是无限的，但这也是他们道德上的严肃性的一个标志，与之后的时代里父母缺乏自信是大不相同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我的祖父母对生活应该如何活下去有一种确定的看法，并认为应该将此传递下去。他们所借助的就是生活中与描写主人公成长过程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e）相似的例子，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德国人就是靠这类小说长大成人的。书籍在这两个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每一个孩子都是从在家中阅读经典开始，然后到学校继续求学（在我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里，他用希腊语引用了荷马的话）；到了青春期，每一个孩子都被期待着能超越所指定的角色，就是说，要活在伟大的小说和戏剧中。席勒称剧院是一种道德机构，斯特恩和布瑞格这两个家庭中的孩子们都追随他们的长辈，对伟大的戏剧或表演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尽管不一定是出自他们自己的喜好。

我父亲的藏书室堪称一座德国文化的宝库，我将其与他的巨大医学图书馆里的一部分继承了下来。他的藏书室里收藏了歌德和海涅的作品，还有需要集中精力去阅读的哲学和宗教书籍，书中都夹着藏书标签，标签上的图案是田园诗般的冰雪覆盖的村庄，还有购买该书的日期（通常是在1912年，即他父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他母亲去世

的前一年)。我特别喜爱这样的—一个世界，其中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种活生生的表现形式，这可能是我的专业偏见 (*dé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也许这种对书籍的热爱并没有使那几代人比他们的后代更加聪敏或更具吸引力，也许这就鼓励了某种阶级的自豪感，一种典型的优越性——其中的严肃性和确定性是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当然，也可能存在一种过度的被埋葬的精神以及屈服于教育庸俗化 (*Bildungsphilistertum*) 的危险。

在服完兵役之后，奥斯卡·布瑞格完成了他在耳鼻喉科这一新领域的医学学习；他在二十岁时，就成为布雷斯劳首屈一指的市立医院——全圣医院——耳鼻喉科的第一任主任，并于1907年成为教授。他发表的论文范围很广，不久他被吸收进了德国耳科学会理事会，并在该领域创办了一份国际期刊，还促进了私人诊所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理查德·斯特恩——他很可能是一位极其雄心勃勃和简朴的人，但我相信他也是一个脆弱和犹豫不决的人——成了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和杰出的诊断专家，在X射线还未被应用到医疗的那些日子里，比起我们现在用试验装备起来的世界，诊断需要更多的直觉天赋。他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他不仅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临床医生，也是一位研究员，1896年，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现有的国际文献，发表了一项关于内科疾病创伤起因的开创性研究。当时工业事故非常普遍，自俾斯麦进步的社会立法规定了对工人的赔偿之后，医生必须确定身体上的（甚至精神上的）创伤是否可能造成内脏器官衰弱甚至致命的疾病。理查德写的书成为国际上法医学的工作标准，这是因为该书出自一个充当了社会保障实验室的国家。他在法庭案件中成为专家证人，常常被聘请去证实某一特定的创伤是否会导致随后的疾病或死亡。在这类案件中提出医学意见在科学上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受害者或其家庭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同样对于国家及其财政责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此项备受推崇的开拓性工作之外，理查德·斯特恩在临床细菌学和疾病的细菌病因学方面都有重大发现，从而跻身医学科学的前沿。1900年，他成为布雷斯劳大学的副教授，该大学本身就在医学领域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他被任命为大学的门诊部（Poliklinik）主任，这个职务所负的责任是相当重要的。他还被任命为全圣医院的内科主任，布瑞格则在这家医院的耳鼻喉科任主任。他获得的最高的职称是正教授（Ordinarius），这个职称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难得到的，对于具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1909年，位于德国北部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授予了理查德·斯特恩这个职称，大学位于靠近波罗的海的一个城市，该市没有任何布雷斯劳的文化优势，到那里去意味着他要去接替奥斯卡·闵可夫斯基——一位极其出色的内科医生。闵可夫斯基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的时候，就在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糖尿病的病因，这是数年后发现胰岛素^[2]的关键。闵可夫斯基曾经是瑙宁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但作为一名犹太人，他一直被拒于门外。最终他收到并接受了布雷斯劳大学授予的正教授职称。

理查德被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吸引——毕竟它赋予了其重要的教学责任和高度的声望。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准备在当年秋季搬家。但是，理查德显然陷入了一种忧郁的迟疑不决的状态之中，他先是接受然后又拒绝了这项提议。1910年6月，他写信给朋友弗里茨·哈伯，感谢后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并说他正在缓慢地从前一年秋天来势汹汹但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但“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仍然想得太多”。被他婉拒的机遇不断困扰着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加剧了他的忧郁性情，并使他陷入了沮丧之中，而他本来是希望能从中完全康复的。他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他计划去北海度假，并询问哈伯是否还对圣莫里茨附近田园诗般的阿尔卑斯山村蓬特雷西纳情有独钟。但是一年后，他突然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我所找到的关于理查德·斯特恩死因的报道，给出了他所患疾病长期或

短期的不同说法。（作为一个孩子，我总是被告知他是死于流感。）他被葬在布雷斯劳的玛丽亚·马格达莱纳公墓。医学期刊上的许多讣告强调了他的科学研究、卓越的临床表现，以及以特别热情的笔触赞美了他作为教师和导师的素质。

1911年他的逝世影响了我半个世纪后的生活。1962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不得不决定是留在哥伦比亚大学还是接受邀请去其他地方教书。我的父母认为，这个决定至少并不像在布雷斯劳和格赖夫斯瓦尔德之间的选择那么难。几年之后，我的亲戚及好朋友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偶然提到了我祖父的自杀。我大吃一惊，立刻问母亲祖父究竟因何去世。面对我的疑问，她特别诚实地承认我祖父死于服用过量的安眠药；事实上，正是她的父亲被叫到理查德临终时的床前，签署了死亡证明书。我对父母在这件事情上的隐瞒颇为生气，并且对他们的欺骗感到遗憾，尽管我意识到父亲在失去我祖父时内心的痛苦有多大，但随后隐瞒真相更加剧了他的痛苦。

也许理查德·斯特恩是因为做出了比较容易的选择而感到极度痛苦，毕竟布雷斯劳是他熟悉的地盘，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杰出的人物，既是同事，又是精英。在他最亲近的人中，不仅有布瑞格夫妇，还有保罗·埃尔利希和皮肤科医生阿尔伯特·奈塞尔。奈塞尔是淋病的发现者，也是一位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医生的儿子。1909年，奈塞尔被聘为皮肤病学教授，这是德国在这一领域设立的第一个职位。据大家所说，阿尔伯特和托妮·奈塞尔在布雷斯劳享有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拥有精心设计、装饰豪华的别墅和花园，他们的家成了艺术家和作家相聚的著名沙龙，经常来此做客的有格哈特·霍普特曼、建筑师汉斯·珀尔茨希、画家弗里茨·厄勒尔以及音乐家阿道夫·布施和阿图尔·施纳贝尔。阿尔伯特的兄弟古斯塔夫是一位律师，他在各种企业担任法律顾问，还是一个自由派市议员，也是斯特恩和布瑞格家族几代人的密友。阿尔伯特·奈塞尔于1916年去世。（他在大学里的后

继者是约瑟夫·雅达松，此人后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皮肤科医生”。早在19世纪90年代，雅达松就已经是布瑞格和斯特恩家族的朋友了，我们称他为泽普或普叔叔，在他1936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他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还有些朋友和同事是非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杰出的精神病学家卡尔·朋霍费尔，他们的孩子们和我的父母一起去舞蹈学校上课。几十年来，与朋霍费尔一家的关系一直很紧密。听说另一个精神病系的教员是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他观察并描述了老年性痴呆的症状，并且是第一个将其与大脑中的病理变化联系起来的人。1890年，约翰·米库利兹被聘为外科学教授，他是维也纳无与伦比的特奥多尔·比尔罗特的学生，并做过约瑟夫·李斯特的助理；他以在无菌条件下开展的新的手术技术而享誉全球；他的学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又让鲁道夫·尼森担任他的明星助手，鲁道夫·尼森是我父亲和我的终生朋友。

布雷斯劳大学医学院最近的一段历史记录显示，许多外国游客和学生涌入该大学，其中包括美国医生，如神经外科医生哈维·库欣（1869—1939）和梅奥兄弟，他们于1889年回到明尼苏达州家乡开设了著名的诊所。难怪他们会来到布雷斯劳：此地确实拥有一大群声名显赫的医生！

布瑞格和斯特恩两家人与其他三个家庭在一个名叫卡尔帕奇的小村庄度过了许多个暑假，这个村庄在布雷斯劳南部的山区，位于与波希米亚接壤的西里西亚边界。孩子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其拥有自己的领导人和章程，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编写和演出戏剧，为他们自己和赏识他们的大人创作娱乐节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活动复制了布雷斯劳的一个成人俱乐部——Akademisch-Literarischer Verein（学术-文学俱乐部），这是一个犹太人学生组

织，成立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替代把犹太人排除在外的非犹太人大学联谊会。这个俱乐部由校友和学生组成，其中有一项可供成年男女参与的代际活动，伴随讲座和充满诗意与诙谐的演讲。俱乐部常常举行丰盛的宴会。多年来，古斯塔夫·奈塞尔一直是俱乐部的领导。

出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在克服了偏见并从当时的科学和物质进步中受益的同时，逐渐成长并功成名就。他们开始过上了舒适、受人尊重的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某个时候，奥斯卡·布瑞格为布雷斯劳艺术学院院长汉斯·珀尔茨希做了治疗。汉斯·珀尔茨希早已是一位知名建筑师，而且注定将更加出名。家族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为了感谢布瑞格挽救了他的生命，珀尔茨希提议为布瑞格全家在国王广场（Königsplatz）宽敞的新住宅设计全套家具，这套住宅既是家又是诊所。我相信珀尔茨希善意的行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套家具也拥有自己的历史。

我的印象是，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我父母那一代人，比起他们的父母，有着更为轻松的童年和更光明的前景。他们在一段平静又顺利的航程中开始了生活——只不过遭遇了一场暴力的狂风骤雨，这是他们的长辈甚至都未曾想到的。也许早年的这种幸福和严苛的混合体给了他们一些心理上的承受力，从而能应付晚年的恐惧。

这两代人都不怎么关心国家政治，尽管做妻子的以及姐妹们试图解决当时所谓的“社会问题”，比如，希望改善贫困儿童的命运，而男人们却习惯于一个在国际科学界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国家偏见的世界里，他们都是爱国者。有些是自由派人士，还有一些是保守派人士，但他们都认为法治（Rechtsstaat）是公民存在的不容置疑的基石。他们目睹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女婿腓特烈三世的统治以及德国自由主义希望的体现，他在1888年登基时就因食道癌而无法开口说话，经历了三个月的痛苦之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则

有着不同的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傲慢、反动、极其严肃且不知进退的人物，尽管他也以自己的方式对科学和技术创新持开放态度。我的家人中多数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年轻君主感到不解，甚至对他表示谴责。但是他们逐渐意识到政治可能威胁或摧毁他们的生命，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这种情况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会出现。1907年，我十二岁的父亲开始创办“一份报纸”，但留存下来的只有其中的“第一期”。在那一期报纸上，他满意地提到，在那一年的选举中，民主党派没有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他的这种受到阶级约束的政治观点肯定受到了他父母的影响。

对于这群安静地享有特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私人生活——家庭、职业和友谊。外部世界可能看起来遥不可及且一成不变，然而德国社会却丝毫都不稳定：其中，一个日益增长的、有组织的、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被灌输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希望，对统治着一个半独裁的君主国家的旧式精英分子提出了挑战。到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拥有最多的代表人数，其权力虽受限制但确实在不断扩大。在激进的改革或革命最终危及社会秩序之前，我们究竟还有多长时间呢？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虽然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现代社会，却有着陈旧过时的政治秩序。正如瓦尔特·拉特瑙在1907年所写的那样：“什么样的文化标准能够证明德国比几乎所有其他文明国家更加绝对地得到了治理？……我们无法为自己永远保持一种独特的气候。”

那么德国在世界上的冒险角色，比如，其被大肆吹捧的对世界事务的插手、用来挑战英国权威而建立的深海舰队，它的帝国野心及其触犯了其他大国权益的追名逐誉的政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威廉二世的傲慢与普遍的焦虑混合在一起，人们担心德国强大的邻国正在“包围”德国，试图遏制其合法的发展。德国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中心，

与其交界的邻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德国的领土是欧洲的铁砧；然而新的德国却是锤子。

我的印象是，我的祖先属于那些成功的德国人，他们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是给予断断续续的关注。他们了解那些重要的文化创新者，如豪普特曼和珀尔茨希——德国现代主义的早期代表。但他们是否意识到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好年代里的伟大的文化和解放运动？很可能不会。毕竟德国没有因一桩德雷福斯事件^[3]而分裂（在德国可能不会有德雷福斯，因为在德国总参谋部有一名犹太军官是不可想象的），也没有像英国的爱尔兰问题那样遭到定时炸弹的威胁。自信的爱国主义是成功的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当地的慈善活动是公民的关注焦点。

当然，年轻人要考虑的还有些其他事项。我的父母是在布雷斯劳接受的教育；我的母亲凯特·布瑞格在开始几年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后来去了一所女子公立学校，洛特·斯特恩是她在那里的同学，也是她最好的朋友。这所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那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女子文理中学（gymnasia）——提供的是一种实用的较高层次的教育形式，强调现代语言、数学和科学。高中会考文凭（Abitur）允许中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大学；凯特于1912年5月通过了毕业考试，随后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选择这两个专业学习是罕见的——就女性的职业生涯来说，这个选择整体上仍然令人怀疑。但她父亲对她的抱负持积极的态度，温柔地鼓励她选择这条道路；她父亲充满自信的期望激励了她的整个人生。

我父亲上的学校是约翰内斯文理中学，这所学校成立于1872年，德国和布雷斯劳的公民自由主义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其明确目标是要成为宗教宽容的堡垒。这所文理中学是布雷斯劳唯一拥有犹太教师

的学校，截至19世纪末，学校的教职工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普鲁士国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所学校，但市议会内强大的自由派则对它表示珍惜。我父亲于1913年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然后在那年春天进入布雷斯劳大学开始了医学专业学习；下一个学期他是在慕尼黑度过的一一接连在几所大学求学是德国的一种学术惯例。

1912年我父亲成为孤儿。他的两个姐妹既是他的安慰又是他的责任，他父亲的妹妹格蕾特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我记得她是一个有点缺乏幽默感的人，她曾尝试投身学术研究却又放弃了，但保持了在文学和科学上的兴趣。）这个家庭有着维持代际友谊的传统，在他们的朋友中，布瑞格夫妇成了他们父母的替代者，例如，他们邀请我父亲和他们一同到瑞士蓬特雷西纳度假，哈伯也在那里度假。阿尔伯特和古斯塔夫·奈塞尔也一直关照着父亲——在他刚刚进入的医学界，许多内科医生能认出他的名字。正是在他父母去世后的那些年里，他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他和书相依为命。

书籍是生活中严肃的一面，他的家庭认为书籍是道德教育的一部分。家中的长者传递下来的忠告也是如此。在祝贺我母亲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时，托妮·奈塞尔传递了一种有影响力的精神，她用一串珠玑般的语言来修饰她的忠告：“我今天非常想要告诉你，在我看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能积极向上，能摒弃所恶，能感受快乐，能吃苦耐劳，能爱所爱，能钦佩所敬之人事。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完成你的学业，你就能说你的生命是高尚的（herrlich）。”这确实是对生活所规定的态度，尽管它没有减少尤其是我母亲所能享有的快乐。

托妮·奈塞尔绝非随口说说而已，而是紧紧抓住了她那一代人所认为正确的道理，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同的：在一个充满舒适和享乐的世界里，懂得什么时候该放弃，懂得如何在缺乏必要条件下也能

达到目的，这是非常被看重的。人们担心的是骄奢淫逸、炫耀卖弄、过度安逸，所有这些都具有衰落和颓废的危险。对这种自我放纵的批评并不是像实用的忠告（担心天下雨）那样的道德原则，而是属于现在已经世俗化，但曾经是基督教的——更具体的是加尔文教派的——信仰的一部分。它是对谦虚和节俭这些美德的一种世俗的顺从。我回想起二十六岁的托马斯·曼在1916年出版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此书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衰落。曼的笔触史诗般地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恐惧，即财富和奢侈标志着走向毁灭的道路——更不用提他对炫耀财富所持的同等程度的蔑视了。他是我父亲最喜欢的现代作家。“体面”人物也害怕耻辱；德·阿尔特·阿希为那些失败者开了一个颇有几分尖锐的处方：给他们一把左轮手枪或指出一条逃往美国的通道，这对于冒险家或者歹徒来说是最最终的解脱。

日常节俭能给家庭庆祝和节日增加乐趣，节日大餐是这些重要场合的标志，反过来也能够证明举止的恰当。我不知道前几代人是什么时候停止纪念犹太人的宗教节日的，但我确实知道，从我父母那时候开始，基督教的节日就得到了广泛的庆祝——复活节；降临节主日；圣尼古拉斯节，伴随着手持鞭子的可怕角色；还有圣诞节，伴随着圣诞树及点燃的蜡烛、颂歌、礼物和特别的美食。

与平凡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年的休假，带上孩子或偶尔不带孩子，携带着沉重的行李去海边或高山旅游，能让自己在习惯性的过度劳累后有一段恢复健康的时间；也可以把假日时间用在阅读上，去与朋友见面或结交新朋友；休假时间还往往会被用在去意大利或法国的文化朝圣上，用在去庞大的奥匈帝国享受传说中的水疗或去简朴的乡村原始旅舍品味地道的乡情上。毕竟边疆地区都是开放的，很少需要签证，而现行的金本位制被作为一种共同货币也十分方便。

这些经过压缩的我家人的生活写照，来源于我持有的家信和照片，也有少量出自口耳相传。我曾经试图去聆听当时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也知道那些声音可能听上去像田园诗一般令人难以置信，当它们在纸上被保存下来时可能早已经被净化或“拔高”了。当然，他们描述的场景与之后所揭示的相比似乎是田园诗般的。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些场景是不能够——或者不应该——被他们看成田园诗般的，因为那时太贫困，疾病太多，人的寿命太短。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没有遭遇过致命的疾病——结核病、梅毒、白喉——许多人承受过最惨烈的痛苦：婴儿的死亡。医生们的家人知道所有的详情。到处是不断提醒人们死亡的标志，那种公开表达的私人的悲痛：哀悼中的妇女按规定至少要穿一年黑色孝服，男人手臂上要佩戴黑臂纱。死亡被公开承认，而生命的来临——怀孕——却被隐藏起来，或仅仅用有礼貌的委婉表述提及。

当然，外部世界总是对这些私人生活产生影响——有时是急剧的，就像在1871年德国统一时那样；有时又是渐进的，就如德国的工业化以及日益加剧的政治纷争一样。偶尔还有炸弹投掷者，大多数是无政府主义者针对皇室成员和其他令人厌恶的阶层的代表发泄他们的愤怒。但是我怀疑许多德国人——或者实际上是欧洲人——是否充分衡量了大国之间尖锐对抗的后果。诚然，世界上突如其来的危机——1905年的俄国革命，奥匈帝国于1908年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等——威胁到了各盟国，还有越来越庞大的军事开支，但鉴于《海牙公约》和第二国际反对一切战争的承诺，可以推定总的趋势还是持续的和平，甚至可能强化国际谅解。也许和平、进步和繁荣是能够持续下去的。

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1914年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了，一开始很少有人意识到该事件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威胁。据推测，这次暗杀是塞尔维亚地下组织的人

员干的，是反对奥匈帝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者愤怒的表现。几乎用了一个月时间，人们才意识到欧洲正处于战争的边缘。7月28日，正在忙于大学学业的凯特·布瑞格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对战争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一直在全方位地讨论这个话题，而且得不到任何乐趣。简而言之，我希望这次我们仍然能找到一条和平的出路。”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德国领导人的鼓励下，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也动员了起来。三天后，德国向俄国宣战，然后向法国宣战，并开始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这反过来导致英国向德国开战。

大多数德国人听信官方的立场和谎言，相信这是一场“防御性”战争，目的是保护受到威胁的祖国。他们以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对宗教的虔诚去迎接战争。至少德国的精英们，特别是大学教授们是这样做的，他们给予战争的是道德和宗教上的祝福，他们假定一个伟大的牺牲将净化这个国家，并结束道德败坏的和使人萎靡不振的和平。神职人员也加入了民族主义者的大合唱：上帝已经将这种道德考验施加给了一个民族，他们必须再次把握住牺牲和死亡的高尚品德，去捍卫一个正义和濒临灭亡的国家。甚至社会民主党人也加入进来，他们放弃了几十年来作为和平主义者对所有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并接受了祖国正处于危险之中的官方立场。来自外部的威胁最终统一了德国并超越了所有政治上的分歧。一种怯懦的单调乏味的生存方式，一种自我满足的放纵和金钱崇拜，终于被解除了。一个民族的重生将出自这个伟大的考验。许多德国人很快就对得意洋洋的“8月里的日子”大唱赞歌了——只有极少数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意识到欧洲陷入了一场耗费巨大的灾难。没有人，哪怕是最有先见之明的怀疑论者，能够想象到随之而来的大屠杀。

德国人的反应类似于民族主义狂欢，是一种道德上令人振奋的超爱国主义和宗教激情的混合物。其他交战国家则经历了程度上轻微许多的这种疯狂，但德国人似乎特别容易受到这种神秘的狂热的影响。

这种新精神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吃惊的例子是1914年9月的“93人宣言”，这是一份致“文明世界”的声明，由德国大多数最知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签署，其中有我祖父母的朋友和知识分子。“宣言”否认了德国对战争爆发所应负的责任，为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而辩护，并公开宣布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德国文化的同一性。“宣言”激怒了那些原本被期望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中立国家中制造舆论的精英分子。这是因战争而加重的政治自闭症的标志吗？

十九岁的鲁道夫·斯特恩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立即表示愿意服兵役。他本可以继续医学学习，或者在军队中从事医疗服务，就像他的许多朋友和同学一样。相反，他选择了军队，也许这是一种更勇敢的选择，因为他也被那种普遍的想法迷惑，即战争不过是赢得胜利的一段短途行军。他把姐姐洛特和妹妹马尔加留在了家中，对于姐姐他是非常珍惜和钦佩的，对于妹妹他则感觉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

有两种制服在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具有绝境中的生命的特征：士兵的军服和集中营囚犯的囚服。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荣誉的象征，但它也揭示出一种生活的中止：穿着者现在属于另一个世界，在空间和精神上被连根拔起，生存在一种强迫性的友情状态之中，但几乎总是在某一时刻必须目睹或经历非自然的死亡。后者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遭遇囚禁的受害者，面临的是酷刑和死亡。我看到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遥远的联系：士兵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野蛮兽行可能已经为一个宽恕了集中营暴行的世界做好了准备。

鲁道夫于1915年3月抵达西部前线，最初被分配到一个炮兵团。无论是在密集的炮火中，还是在相对平静的战斗间隙，炮兵的日子总是在防空洞和战壕中度过的，有时也会在某个后方阵地得到短期修整，也会有非常难得的探亲假。随着士兵情绪和营地的变化，烦恼和恐惧交替出现。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在别人的指挥之下，而这些上司往往被

认为是低劣的。但是，一个人的内心生活是自由的，鲁道夫在这种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中经受了强烈的、焦虑的自我审视，充满了对未来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思考。正如弗洛伊德和其他人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始终存在的死亡威胁增强了生命的意识。这一点对于许多留在家中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为正在前方作战的亲属担忧，越来越担心预期中的悲痛会来临。

我父亲的战时通信有好几组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包括他和他的好朋友凯特·布瑞格之间的许多书信——他们俩在信中的语气并不像两个要结婚的人，还有来自他的教父（我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他自己指定的）古斯塔夫·奈塞尔的信，以及他的姐妹和朋友的信。

第一批被相互交换的消息中有的是灾难性的：凯特的父亲奥斯卡出于纯粹的爱国主义，自愿在一家军队医院服务（他还要求他的女儿凯特和他未来的儿媳妇凯特·弗雷登塔尔——一个来自有着犹太血统且富裕的布雷斯劳家族的女孩，到他所在的科室担任护士，从东部前线下来的伤员挤满了他的科室）。1914年10月20日，他因两次大面积中风而突然死去。他一直在照顾士兵和平民，为处于紧急状况的伤员做手术，没给自己留片刻休息时间。阿尔伯特·奈塞尔在写给奥斯卡的长子恩斯特——他早已在西部前线为军队医疗效力——的慰问信中称，尸检结果显示了严重的动脉硬化；令人欣慰的是，他从未恢复知觉，从而幸免于“临死前唯一真正可怕的时刻——告别”（这句话表明奈塞尔的担心或者他希望让这个当儿子的宽心，后者不应该因父亲去世时不在场而更加痛苦）。奈塞尔告诫年轻的布瑞格要以他的父亲为榜样，他父亲是一个“永远只为他人生活和工作的人”，他将永远珍视和他父亲的友谊。

各种各样的证据告诉我们，奥斯卡·布瑞格是一位格外亲切、慷慨的人，他具有天生的魅力，并且在作为全圣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的

二十五年间，表现出了与许多人建立友谊的巨大能力。他的主要助手戈尔克博士有一次在治疗我痛苦的中耳感染时，怀着令人难忘的热爱与我谈起了我的祖父。我父亲一直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布瑞格夫妇是一对幸福的伴侣，同时布瑞格也是一位备受崇拜的父亲。他的突然死亡使家人陷入了最深切的悲痛之中。

我的祖母现在不得不照顾两个最小的男孩，他们还在上学，但已经接近被征召入伍的年龄。她在抚养孩子的同时，很快承担起了她丈夫的一些责任，以及给她在前线的最亲近的人写慰问信。一封由恩斯特在1915年春从法国朗斯写给他母亲的回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完全平静了下来。在如此明显的靠近最激烈的战斗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绝对的安静？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这并不惊奇。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战争与和平令人难以置信的共存显得更加难以置信。”他母亲的生活因死亡和悲伤，不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变得混乱不堪。她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实际挑战，更不用说不确定的经济收入了，还有因英国的封锁而不断恶化的食物供给。她的信件透露了有时候她会设法去抢一些奢侈品，这样她就可以把东西送到前线或者留给休假回家的男人。我们知道，像她这样相对富裕的人能得到比普通人的定量更多的东西：事实上这就是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分裂的主要根源。

鲁道夫的大部分信件有一个共同之处：对凯特的沉默表示遗憾或责备。他渴望获得消息，渴望与被她留在身后的世界接触，曾经是如此接近，如今却如此遥远。他们交流了各自家庭的消息，并叙述了各自的经历——鲁道夫有时会说几句讽刺话，凯特则一直是友好的，有时也会戏弄性地责备几句。鲁道夫的姐姐洛特与理查德·科布拉克订了婚，这令她的兄弟感到几分懊恼——他曾希望有一个更有前途和更可爱的伙伴——短暂的交流似乎排除了他和凯特采取类似的步骤。

科布拉克家族是斯特恩-布瑞格朋友圈子的外围部分。理查德是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犹太人，但并非其所有家庭成员都改变了信仰。奈塞尔在一封信中称弗里茨·科布拉克即将加入野战炮兵，“但先承诺会加入体面的国教”。这封涉及宗教主题的信因其接下来的话而变得更加奇怪：“因为犹太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幸。”洛特和理查德的一张婚礼照片显示，他们站在我祖母的花园里，身边一些参加聚会的男人穿着华丽的制服。

因此，鲁道夫和凯特之间继续以兄弟般的方式通信。除了通信这个事实本身之外，他们之间更深层次感情的唯一迹象就是不断重复的和令人遗憾的误解。他们经常讨论文学，包括古典和当代作品。鲁道夫在信中和凯特讨论书籍时，会流露一种略带嘲讽甚至居高临下的语气（虽然他在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特定问题上会向她寻求帮助）。他们的兴趣与天主教徒的一样，经常会提到康德和歌德、叔本华和尼采。1916年，作为一支新空军部队的成员，鲁道夫要坐在气球上到空中观察战线后面的敌人活动，有时候他会随身带上叔本华和尼采写的书：这才是真正的高空阅读！

1916年7月，当协约国的攻势在索姆河边展开时，他写道：“我必须说，我的阵地未必就一定被视为人寿保险，有几次全靠我特殊的运气。同样在军事方面，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见到过我们的步兵向前推进，同伴们都笑了，我也笑得流出了眼泪。当然还有些其他情况，但我们仍然是值得尊重的。”

1917年的某个时候，他自愿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空军部队，特别是作为一个观察兵从气球上观察敌人的阵地。偶尔能发现一页他的私密笔记，1917年11月，在奉命转到另一支气球部队的时候，他经过布鲁塞尔并在那里购物：“但那时我的理想主义被唤起，就匆忙赶去画廊，在那里……我一直待到下午5时……晚上，我真是个白痴，我赶到

了前线。第二天中午，我极其顺从地去科卢夫特7号（气球部队的指挥部）报到，但实际上为时过早，我原本可以在布鲁塞尔逗留更长时间的。”

经过两年的战争，其他想法也悄悄地进入了他的脑海。从1916年至1918年，他一再徒劳地努力请到一个长假，以便可以参加医科考试（Physikum），这是在一个人的医学学习过程中规定必须要参加的考试。其他人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假期，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中断他们的学业，而是在短时期内考完了试，之后才去军队的医疗部门服役。气球部队一再拒绝鲁道夫的请求，如果不是因为他不可或缺，他本来是可以请到假的。

随着战争的持续，凯特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各个成功的阶段。在她父亲去世后，她重新回到了物理学学习上，这是她父亲的心愿。她还短暂地给文理中学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科学这门课，她的学生只比她小几岁。1918年，她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她的关于晶体结构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根据马克斯·冯·劳厄最新的实验撰写的。然后，她凭借所获得的博士学位，开始了一个新的职业生涯，这在当时对女性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她给鲁道夫解释说她更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的工作：

“去寻找一份不涉及仪器而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特别是同你能给予帮助的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其中不会有可能威胁到我的才能的破坏性障碍，总之，不会有身处无尽的深渊边上却还玩弄手腕的无聊之徒——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工作不是工作，而是乐趣。” 1918年的春天，她在各个城市举办了一些关于女性选举权的讲座，并在上西里西亚城市卡托维兹做了同样的事。

我父亲的信中较少提到前线的情况。我认为，这不是出于对审查的担心，因为他非常自由地提到过他曾经驻扎的地方，他去过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城镇与乡村，以及他骑马去拜访凯特的兄弟时到过的城

镇。他还描写了一些地方的风景，以及几次月光下的骑行，这使他想起了家乡，触动了各种伤感的心思。

他在1916年至1917年短时间内写下的一本日记，透露了他最深刻的反省，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他先前的生活就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坍塌了。就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他一直被束缚在对他父亲的怀念中，尤其是希望实现他父亲那样的卓越成就。他回忆说，他在1910年经历了一场宗教危机（那是他和凯特确认关系后的一年），并最终逐渐接受了他的怀疑。他的战时通信充斥着他对前线神职人员所抱幻想破灭的议论。他认为他需要人，但人们并不需要他，因为他是一个不友好的人。像许多士兵一样，他发现战争是一种向外和向内的旅程，既是去发现一个全然不熟悉的外部世界，偶尔也会寻觅制服下面的自我。

1915年春天，古斯塔夫·奈塞尔——我们称这位博学又慈善的朋友为古斯特尔叔叔——写信给我父亲，信中没有对父亲的礼物和关心表示感谢，只承认他平静的心灵（Seelenruhe）已经枯萎：“可是甚至为你担忧也能丰富我的生活，而且我也不想不为你担心或对你的命运漠不关心。究竟身处怎样的环境中，现在你必须找到你自己！！事实上，从自己身上去观察一个紧张和受过培养的人回归最原始的（ursprünglichsten）生活形式，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但我非常希望这些对你来说崇高的经历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补充说，他认为它们不会的，因为“老哈伯（弗里茨的父亲）昨天轻声告诉我”，他儿子的秘密发现正在经受实际检验。这里提到的是弗里茨·哈伯在生产毒气武器上的狂热实验——事实上这种武器是在1915年4月被首次使用的。奈塞尔以讽刺的口吻结束了这封信：“为哈伯和兴登堡欢呼！”（兴登堡是陆军最高指挥官——将他们两人这样连在一起会让哈伯感到高兴，而那位陆军元帅却未必。）

奈塞尔捕捉到了战时生存的陌生感，意识到野外生活的原始性，引发了对“正常的”文明生活的反思。他肯定一直很关心自己的儿子汉斯，他也是军队中的一员。他觉察到疲惫和劳累、危险和放松的不断循环在如何影响着士兵。他也知道战争将来自不同阶级、地区和宗教信仰的最多样化和最意想不到的背景的士兵聚集在一起。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次民主化的经历。我父亲有一位来自东普鲁士的上司——冯·哈滕少校，父亲与他逐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和平时期是绝不可能的。

我父亲在西部前线时，就已经被提升为士官，并在1915年底荣获了一枚二等铁十字勋章；再晚些时候，他因特别勇敢而被授予一等铁十字勋章，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奖章。在恐怖的伊普尔和索姆河战役中幸存下来之后，他自愿去正在扩大的空军部队服役，特别是作为一名气球观察兵。作为一个孩子，我最喜欢听他坐在气球上升到空中去观察敌人活动的故事。气球通常是用绳索拴在地上的，一阵机枪火力就足以点燃气球，使其坠毁到地面上。到1918年，协约国已经拥有明显的空中优势。但在此之前，古斯塔夫·奈塞尔就已经警告过我的父亲：“难道这样一个大梨子（气球的形状）不会成为英国人的绝佳目标吗？”尽管如此，这项新的任务仍值得冒险。他可以离开战壕，而且在两次飞行之间，可以远离前线，在营房里过几天更舒服的日子。到1917年5月，他已经被提升为预备队的中尉，这个职位有新的职责，如为这支刚建立的空军部队培训新兵，并得到了新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勤务兵的服务。

我父亲从古斯特尔叔叔那儿收到的信对当时的政治氛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评论，因为奈塞尔在柏林被委以各种各样的半官方职责，并且在各地都有极好的关系。毫无疑问，他也认为战争将在短时间内获胜，因为在敌人的领土上德国军队无处不在，只是胜利在躲避他们。但逐渐地，奈塞尔的评论反映出一个压倒一切的担忧：结束恐怖。他

在有关政治操纵的谣言以及军事问题上的坦率直言非常引人注目，多年来，他变得越来越“失败”，然后毫不含糊地批评德国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条奈塞尔的政治评论都足以使受到失败主义指控的人被判处死刑。

奈塞尔关于家人和朋友的叙述经常插入一些政治性的内容。他属于能够进入统治阶层的有产阶级精英，但他也抓住了他们的罪责。他写道，作为德国爱国者，他觉得自己是——而且仅仅是逐渐地意识到，那些嘈杂、自封的超级爱国者代表着对德国最严重的威胁。在1915年初，他对德国的胜利感到高兴，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加速战争的结束。他指出，哈伯的毒气武器为伊普尔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然而只字不提这种新武器的恐怖性，或者该武器的使用违反了国际条约这个事实。4月，就在伊普尔战役之后，他报道了有关与英国的谈判正在进行的传闻，以及高层人士想知道英国是否需要支付150亿马克或200亿马克的赔偿金。（他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德国领导人认为被击败的协约国将支付给德国战争期间产生的债务。协约国赔偿的先例是俾斯麦在1871年强加给法国人的50亿法郎的赔偿。）

信中还有奇怪的轻松言论，我父亲找不到奈塞尔想要的书，但是“一旦你进入巴黎并开始抢劫卢浮宫，就继续想想我”。但在同一封信中他又变得很严肃，并且想知道二十年来人们对这样的事实会说些什么：六个月来，欧洲人一直在争夺当地某个战略要点，而日本人却“一言不发地吞噬了亚洲最大的一片地区”。他还提到了我们现在所知但事实上毫无根据的消息——与法国的和平即将来临，德国准备放弃阿尔萨斯-洛林的部分地区，让英国和俄国为战争付出代价。

1915年6月，奈塞尔再次报道了和平的传言——他本人并不相信——但指出官方媒体已经降低了其仇恨论调，而“享有特权的战争爱好者则逐步升级了他们的愤怒”。至此，他开始相信，对于这场战争

德国是负有大部分责任的。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提出建立一支深海舰队，这一宏伟计划对英国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奈塞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头脑中，提尔皮茨是一种“不幸”，是一种毫无理性的强大力量。奈塞尔报道了德国领导层内部的许多分歧：他蔑视将提尔皮茨视为英雄的极端主义者，支持平民出身的首相特奥多尔·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这位首相顽强地试图保持温和的路线，据理反对宣布无限制的潜艇战。当他在1917年2月惨遭失败时，可预见的结果便是美国的参战。奈塞尔沮丧地回忆起早期德国人企图“掌控全世界的疯狂”，他们未能理解英国是不可战胜的。在残酷的索姆河战斗的高潮期间——我父亲近距离经历过——奈塞尔写道，他希望德国人吃些败仗，因为只有“痛苦的教训”才能够使兼并主义者知难而退。随着战争持续，奈塞尔的语气变得更加苦涩。德国人为何而战？国家的战争目标是什么？战时的保密制隐瞒了细节，但人们逐渐了解到，军事领导权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兴登堡及其名义上的下属但实际上的上司——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手中，其支持者有工业巨头和职业性的右翼沙文主义者，他们制定了最极端的战争目标，旨在确保德国在欧洲的永久霸权地位。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是一位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事实上，他在这个职位上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给那些极端分子打掩护而已。

尽管如此，奈塞尔的信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亲密的口吻以及不那么恭敬的语气。他曾经提出他可以更频繁地写信，如果鲁道夫承诺这些信件永远不会被公开，即使他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实际上晋升是不太可能的，他补充道，因为他不会放弃他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之所以有此观点，是因为即便是社会民主党，也成了妥协主义者。至于用笔写在纸上留下的风险，他重复了德意志帝国议会副议长海因里希·德夫告诉他的一则逸事，说的是在他家乡罗加森认识的一位拉比曾经对他说：“我无钱无物，不能给我的孩子们留下什么，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终身受益的教训。”德夫要求得到

类似的礼物，拉比告诉他，“千万不要在纸上写下任何文字”。在自相矛盾的犹太人的智慧中寻找乐趣是很常见的，这个特殊的例子在随后的信件和战后的谈话中成了大家的谈资。

我父亲对来自奈塞尔的消息有一种不能满足的渴望，他曾经写道，这些信件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粮。1915年9月，奈塞尔解释了他偶尔的沉默：“只有急性战争精神病才会瘫痪我的思维表达。对于我们注定要经历的巨大的疯狂，我是完全绝望了，以至于不知道该给你或其他人写些什么。”这确实成了他最深刻的信念，与当时传统意义上的说教截然不同，甚至可能与收信人的观点也有所不同，收信人在很长的时间里都相信战争的必要性。

到1916年底，形势变得很明朗了，帝国议会中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分裂在即，来自左右两翼的杰出领导人，因他们顺从的同事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而义愤填膺，由此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并成立了一个激进的反对派团体，名叫独立社会党。即使是温和派人士也认识到，如果战争要顺利地打下去的话，就必须进行内部改革。普鲁士保守派变得非常激进，他们动员了他们的所有力量来反对这些改革以及争取理性和平的任何努力。1916年，奈塞尔受邀成为“德意志协会1914”

(Deutsche Gesellschaft 1914)的成员，这是一个由德国精英组成的自成一体的俱乐部，参与者有保守派人士，也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士，且包括一些著名的犹太人——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伟大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也在其中。成员们互相讨论政治问题，有些成员利用俱乐部来提出合理的政策。奈塞尔显然支持政治上的温和派，如哲学家和神学家恩斯特·特罗尔奇，他要求走改革主义的道路。至此，奈塞尔认识到德国的超级爱国者是最大的内部危险分子。我相信，他在西部前线的儿子汉斯分享了他父亲的幻想的破灭，但是我父亲则用了更长时间才丧失该信念。

1918年3月，在鲁道夫二十四岁生日那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对自己延迟了的职业生涯和不确定的生活充满了疑虑。他一直对战争感到厌倦，并写信给凯特，“我为牺牲所做的准备也是有时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的欲望也浮出水面了”。他对他的上司非常恼火，他觉得他的上司“残忍、虚伪、愚不可及”，令人恶心。凯特可能因这些言论而责备过他，因为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做出了这样的答辩：“你们这些人对战争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某些类型的卑鄙有时真的会使人失去平衡。”

在这一点上，鲁道夫很明显同每个人一样有很高的期望，即鲁登道夫对西部战线上协约国阵地的大规模进攻将获得成功，因为列宁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接受了德国的和平条约，由此获得了从东部前线解脱出来的另外100万人的支援，他们都是迦太基人。德国军队确实突破了协约国军队的战线，但是攻占巴黎这一巨大的战绩，却与他们失之交臂，部分原因是普遍的疲惫。这种疲劳令鲁道夫难以摆脱。他很容易地就陷入了忧郁的沉思——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情感上的软弱之中。3月下旬，他不得不下令拔掉八棵果树，为气球升降整理出一块平台。“所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消失殆尽，我感到对我的童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渴望，想要一个不错的显微镜……”然后他对和平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了。他在4月底提到，他打算读一些书，“我的伙伴们在第一个三十年战争中有过非常不错的生活”，虽然“所谓的家属发现，即使与我们的面包和肉类配给相比，这种生活也是相当令人不愉快的，尤其是如果他们属于第三种宗教（忏悔）”。（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含蓄的评论，说1914—1918年是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开始时，我吃了一惊；在看到这封信之前的几十年里，我自己就用过“第二个三十年战争”这种说法来指代1914—1945年那个时期。第一个三十年战争，1618—1648，曾经蹂躏了德国的国土，人民遭受了可怕的暴力、饥饿和掠夺，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战争中死亡，由此，战争的记忆困扰了德国人好几个世纪，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父亲的信件中，“第三种宗教”是一种典型的隐晦且非常罕见的对犹太教的表述。然而我们知道，在国内后方，反犹太主义在战争中变得愈来愈恶毒。1916年，战争部下令对德国武装部队中犹太人的数量进行秘密调查，这是对广泛流传的犹太人是逃避责任者这一谣言的回应。直到战后才公开的结果反驳了这种恶意指控，但是这样一种调查的成立表明了认为犹太人是可疑的异类的程度。1917年，祖国党以其疯狂的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计划大获全胜。1918年3月，鲁道夫向他妹妹询问了打击反犹太主义联盟的地址。

1918年7月中旬，德国军队接近巴黎，但随后协约国在美军的增援下开始成功反攻，迫使德国人不断撤退。9月底，事实上的独裁者鲁登道夫将军突然失去了勇气，担心德军可能随时崩溃。因此，他要求德国皇帝立即任命一个议会制政府，包括民主党派的代表在内，这样做可能会让德国立即吁请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停止战争。这是一个聪明的、讽刺性的策略，可以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政治上的责任：军队是胜利之父，而平民以及民主人士应该承担失败的责任以及对战败的清算。威尔逊和德国政府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好几周；与此同时，罢工和持续的战斗与死亡所引发的巨大愤怒困扰着整个德国。然而，到10月下旬，形势变得很明朗了，只有停战——尽管条件极其苛刻——才能最终结束战争带来的杀戮。

奈塞尔意识到等待德国的是巨大的困难，他坚决否认因预见到灾难而幸灾乐祸。然而，他写道，年轻人应该振作精神，因为一个新的世界将要诞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要和平。现在，很多人睁开了双眼，因此，在黑暗中操纵的权力将不能够很快再次为非作歹，置人于死地。”他反思了他的政治经历；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生活已经变了样子：

生活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新的辉煌而重新开始了，此后我们所经历的，就只有衰落。最广泛的中产阶级（Bürgertum）与旧势力相结合，参与进

对物质利益的最残酷的追求，从而破坏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每一项努力。虚伪和缺乏内在自由在各地取得了胜利，年复一年，有产阶级和崛起中的第四阶层（即新闻界）之间的裂缝在扩大。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呢？这个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的一项研究课题。我们正处于最低点，内在的更新即将开始，这不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会发生在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里。

他可能不会活着看到这个新世界，他写道，但也许会像摩西一样，至少可以获准看一眼这片应许之地。但即便这个要求也没有实现：1918年12月中旬他突然死去，成了流感疫情的一个受害者。他没能活着去见证过去的邪恶势力如何以更加强烈的报复性仇恨和虚伪来毒害这片“应许之地”。

奈塞尔政治观的演变——这里不过是简要地总结了一番——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是怎样揭开谎言的面纱，发现事情真相的。到1918年，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和平，有些人甚至要求和平与社会正义。但是，奈塞尔没有提及的主题也同样值得注意：他的笔下很少触及针对民主改革的激烈的政治斗争，尽管他对这些斗争的看法绝对是很明确的，至于始于1917年，之后急速加剧的狂热的政治反犹太主义，他也只字未提。

奈塞尔的判断与令人钦佩的温和派有共同之处。在1918年至1919年，恩斯特·特罗尔奇写了几篇匿名文章，阐述了对帝国政权的类似判断。1918年，拉特瑙发表了一篇对德国青年的呼吁书，谴责了“发生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可耻和最非日耳曼的事情……大量毫不顾忌、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没有什么会像这种长期的自吹自擂一样，能促使这个国家的道德衰落和对法律的蔑视……”（一年前，他曾警告鲁登道夫不要继续欺骗德国人民。）许多德国人在私底下和他们的信中表达了这些观点，但在公开场合则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担心德国人公开认罪会助长协约国的报复心理；他们可能无法想象，沉默会助长国内

民族主义者的虚伪，而且所谓的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被人在背后捅刀子的错误神话会得到鼓励。

到了1918年8月，战争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德国的战线，这加剧了鲁登道夫对可能的崩溃的担忧。鲁道夫经历了那些可怕的秋日的痛苦和士气的急剧下降。9月28日，也就是鲁登道夫要求德国皇帝任命一个民主政府的那一天，鲁道夫写信给凯特，“在过去的三天里，我又一次看到了如此大量的苦难和悲惨景象，甚至连我这个已经铁血心肠的人都无法正视”。他希望凯特在冬天能做一些舒适的工作，尤其是在他将不得不去承担一项永无休止的苦活之时。他被要求去打击“军队中的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宣传。是的，如果你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或者说如果我有你的十分之一的勇气、年轻的精力和乐观主义，但是适合我的是掘墓人那样的角色，去充当一个人寿保险代理人”。

直到10月中旬，他仍然坚持着自己对这个事业的信心，对那些支持“失败主义”的人非常生气。他看到了“在德国的广泛领域里，凝聚力正在”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自私自利，对此他感到十分痛苦。他讽刺了这样一种看法：“如果阿尔萨斯完蛋了，这有啥关系呢，甚至整个德意志帝国都垮掉了，也与我无关，在我眼里最主要的是要让我吃饱肚子。”他认为，德国青年是在“愚蠢的爱国主义的欢呼声”中接受教育，但丝毫不知“一个国家的真实本质及其公民的地位”。他严厉地指责了一些朋友和亲戚，他们站在左派以及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开始对德国事业持批评态度，虽然他也承认，不言而喻，德国人“因为愚蠢、恶意和妄想而犯下了许多罪恶”。“在这个流氓无赖的时代，真的很难知道一个人究竟应该做什么”，他补充说，当然，他也会满意的，“只要我活跃的战友们（Kameraden）和那些希望以此形象出现的人认为我是一个不可靠的战士（Kantonist）和红色的失败主义者，而我的朋友们……古斯特尔叔叔等，把我看作

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受到泛德主义污染的勉强的军事家就行”。几天后，凯特写道，她和其他许多人认为德国本可以在1916年取得更好的和平，“许多生命被白白地牺牲了”。

直到1918年秋末，鲁道夫试图在忠诚和责任这种主导意识和“情感软弱”的间歇性高潮之间寻求保持一种内在的平衡。“我父亲在十二年前曾告诉我，”他写道，“针对悲观厌世（Weltschmerz）的最佳武器就是工作。他说，即使在他去世之后，我也应该记住这一点。正是父亲的这一遗训，让我对那次谈话记忆犹新，并且父亲的遗训也已经被反复证明是具有恢复性疗效的。”工作所具有的愈合或净化能力（Arbeitskur）的信念，可能对德国犹太人有特殊的吸引力。

但是，随着我父亲逐渐意识到德国战时领导人的虚伪和阶级利己主义毫无意义地延长了人民的苦难，他对他们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当他从战争中走出来时，当然清除了身上所有民族主义的观点，代之以对德国政治的幻灭和愤世嫉俗的态度。他后来很少谈及战时在战壕中的经历，尽管他还比较愿意讲述他在气球部队时的故事，而作为一个德国小孩子，我默默地为他的服役、军衔和奖章感到骄傲。但是，一旦德国不再是一个家园——就是说，当希特勒上台后——我认为他过去是在为错误的一方而战斗，后来当我成为一个美国少年时，我甚至对他的参战经历感到尴尬。

到10月底，鲁道夫不仅饱尝了因国家失败而带来的创伤，对毫无意义的四年战争感到愤怒，而且忍受着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的折磨。7月中旬，他患上了黄疸病，直到8月初才康复；到了9月，他回到了气球部队；但在10月下旬，他又感染上了流感而被匆匆送往一家军队医院——这场流感引发了全球性的瘟疫，造成了1000多万人死亡。主治医生注意到他高烧不退，宣布他已病危，并嘱咐立即通知他的家人，也许还可以见上最后一面。

我父亲在病床上听到了这个诊断，他坚决反对这样的宣判。他知道高烧会给心脏造成最大危险，需要给心脏增加刺激来对抗，他派他的勤务兵找了两瓶香槟酒和一些浓咖啡。他喝下了这种“药”，并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个故事现在当然成了家中的一个传奇，尽管它可能缺乏医学上的合理性，但足以证明用香槟来庆祝美好时刻的确是一个家庭乐趣。在战时最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乱况是，他的亲戚和布瑞格一家先是收到电报表明他已经脱离危险，然后才接到去看临终前最后一眼的通知。

我手头还有一些其他信件。在听到病危诊断后，我父亲当时并不完全相信自己会康复，于是在10月25日给凯特写了一封告别信。面对死神，他承认了在过去四年里他从未提到过的感受和期望：“我必须感谢你，因为自从我成年以来我所拥有的每一次真正的幸福经历都归功于你……今天你要相信我，如果能以最神圣的严肃态度的话，我向你保证，同我在一起你不会很幸福，比起你已经给我的幸福，你也不会给我更多。因此，振作起来，要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去争取你的幸福，因为你拥有获得幸福所必需的东西，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晚安，一如既往爱你的，鲁迪。”

[1] 我的第二个表兄，诗人达格玛·尼克，写了一本有关我们共同的祖先阿希的传记，书中详细记录了他的生平，书名为《布雷斯劳犹太人的成就》（*Jüdisches Wirken in Breslau*, 1998）。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赫斯特制药公司创立了每年一度的闵可夫斯基奖，颁发给40岁以下最具创新性的糖尿病研究人员。

[3] 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诬陷犹太裔军官的轰动世界的反犹事件。——译者注

第二章 魏玛

1918年11月9日，这一天是德国皇帝耻辱退位的日子，也是德意志共和国临时宣布成立的日子。我父亲在这一天离开一家野战医院后，差点落入协约国军队之手，他不得不自行组织撤离。前一天，主治医生拒绝让他出院，因为他的身体仍然太虚弱。他加入军队以及离开军队生活的过程颇有几分象征意义：他是在1914年健康又满怀自信地自愿参军的；然而现在的他却是身心疲惫，未老先衰，所有幻想也几乎破灭。他的这种经历正是当时成千上万人的写照。

在我父亲艰苦跋涉返回家乡的途中，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在被打败之后处于革命的混乱状态之中。弗莱堡是他返回德国途中的第一站，在那里他佩戴的军官肩章被人从肩膀上撕掉了，因为愤怒的群体（整个德国有许多此类群体）力图消除所有代表旧秩序的象征，该有人对这四年毫无意义的战争负责。火车拥挤不堪，上车毫无指望。他掏出了身上最后一块金币买通了一名车长，将他抬起来从火车窗口塞进了车厢。

战前能得到国家保护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公共事件曾经被视为遥不可及，现在这样的感觉也已荡然无存。像大多数德国人那样，我父亲也发现，政治或戏剧般的公共事务对私人生活有不可避免的掌控力。以往确定无疑的感觉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和自我的忧虑和不安。

鲁道夫回到了布雷斯劳，虽然因战争而疲惫不堪，因流感而耗尽体力，然而经过几周的恢复之后，他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在最初的那几个星期里，凯特每天都去看望他，坐在他的床边，在他清醒时念书报给他听。他终于恢复了，但是死里逃生的经历以及对眼前一切事物的不知所措使他的情绪难以平复；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情绪在怀疑或犹豫不决中可能已经得到了平复。

圣诞节到了，他和凯特订了婚，并在大学里恢复了他的医学研究。他们于1919年4月结了婚，先在布雷斯劳举行了一次世俗婚礼，然后在卡尔帕奇附近的一个小教堂里又举行了一次宗教婚礼仪式，战前他们在那里的小山村度过了许多无忧无虑的夏季。我怀疑，如果没有他们的战时分离，没有他们的独立成长和共同经历的危险，我的父母可能无法克服他们巨大的气质差异引起的犹豫和感情阻力。我觉得，我的存在应归功于我父亲在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中幸存了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一个世界大战的孩子。

虚弱的鲁道夫·斯特恩在布雷斯劳这座变化极大的城市中休养着，也许此时他没有那份内心的平静来清理自己对德国命运的感受。10月，他仍然坚持对旧秩序持怀疑态度的信念，而对那些遵循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要求立即无条件结束战争的士兵和平民则毫无同情之心。因为那些撕掉他的肩章的人侮辱过他，我认为，说他在11月就接受了他后来的激进观点，去反对阶级驱动的盲目性或更糟的德国统治者，这是绝无可能的。（比我父亲年长的那些温和派并非没有立即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卓越的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10月下旬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敌人的粗野和贪婪”的仇恨，但是“对于德国玩弄权术的政客，他们傲慢且愚蠢地把我们推进了战争深渊，我的怒火和愤慨是同等激烈的”，绝大多数“值得尊敬的”德国人是不会同意的——尤其是历史学家！）但是我的父亲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未能把握住所发生的情况，因为四年来往他们耳中灌输的，就只有大肆

吹嘘的德国人的优势和必然的胜利。就在几个月前，苏维埃俄国已接受了迦太基式的和平^[1]，德国人也几乎成功攻打了巴黎，这些似乎为新的乐观提供了保证。

多年的战争狂热和数十年来对国家权威的信任使德国人民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命运逆转毫无准备。德国的崩溃发生得如此迅速，这使他们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做出虚假的解释。与此同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双重革命——既来自上面，又来自下面：旧的统治者将政治权力强加到平民头上，其中有以前对帝国政权的批评者，此时数百万厌倦了战争且饥肠辘辘的民众走上街头，激化他们的是对战争目的的怀疑。他们捍卫的不是属于他们的利益，而是其他阶级的利益；他们大声疾呼，要求和平，要求结束公然的不平等和政治上的奴役。当基尔港的水手发动兵变拒绝服从命令在紧急关头同英国海军打一场很可能是自杀式的战斗时，当巴伐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革命者推翻了王位时，一个曾经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突然分崩离析了。

左右两翼的极端主义者拥有一个共同的令人吃惊的想法：最真实、最直接的敌人现在就在国内。士兵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这样的名字让人联想起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大量涌现，当他们提出的让倒霉的皇帝退位这个最直接的要求被忽视之后，大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变得更具挑衅性，最终迫使极不情愿的社会民主党于11月9日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正是我父亲回家的日子。皇帝逃往荷兰，德国的文官政府将权力移交给了迟疑不决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更加激进、更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兄弟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新政府称自己为人民代表议会——这个名称再次引起了有产阶级和特权阶层心中的恐惧。

到此时，绝大多数德国人渴望和平——他们推测威尔逊总统的理性将胜过英法两国的复仇。但他们很快就醒悟了：德国的文职领导人不得不签署一份停战协议，而这份停战协议实际上使德国毫无防御之能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的希望破灭了。尽管如此，11月11日上午11点，枪声沉寂了，屠杀结束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此欢欣鼓舞。饥肠辘辘的德国人——英国的封锁仍然有效——至少感到有些宽慰。但他们没有经验的新统治者面临艰巨的任务：维护秩序、组织德国军队撤离敌方领土、遣散军队、养活人民、维持自己的权力以及准备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也许11月出现的这种革命形势部分阻碍了走向全面革命的动力。那些新的“议会代表”实际上都是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害怕激进分子会像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那样试图夺取权力，他们担心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俄国的军事失败模式可能会重演。的确，苏俄特工正在暗中鼓励他们的德国同志，但是这种危险被夸大了。（我们今天对所谓的“红色危险”以及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同伴有了足够的了解，但我们对精心操纵的反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得到充分资助的右翼利用民众忧虑的历史却知之甚少。）当年可能有数百万德国人渴望消除阶级障碍，而想要布尔什维克体制的人也许只有几千人而已。

当时德国人一直不知道也无法知道的是，新的人民代表议会的主席，厌恶“社会革命就像厌恶罪行一样”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11月9日那天晚上，与留在德国的唯一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陆军，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只要新政权把国家引向一个非革命的民主制度，那么后者就承诺忠于这个政权。社会党多数派的“议会代表”是破产政权的改革派受益者，拥有日耳曼气质的他们想要的是秩序和变革——在此秩序中的变革。他们希望通过早期的民众投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并拒绝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即利用士兵和工人委员会去实施激进的社会变革，削弱他们的死敌，其中包括容克和其他商业

巨头。因此事实证明，“革命”使那些老资格精英受到了惊吓，但并没有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社会民主党人对后者的担心要比对他们的激进的左翼敌人更少，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激进派控制街道的直接危险，而他们的长期敌人——旧资本主义-军事秩序的守护者，却暂时是安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多数派选择了民主道路，并且对人民的信任要远远超过他们的右翼敌人，因为前者决心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以便合法地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为此，历史学家给予他们的评价是严厉的。

但是，由于社会党多数派与独立派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这一新政权未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支在思想和组织方面都支持共和的军队。因此，艾伯特的人依靠旧军队来维持新秩序。匆忙成立的由右翼退伍军人组成的自由兵团被派去镇压许多地方发生的叛乱，并于1919年1月中旬杀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是阶级斗争的激进支持者，至今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对于左派来说，她是一个烈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者。我认为，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假如她还活着，她将成为对列宁统治的最有力批评者，或许还是对手。

这四年战争所造成的差异是多么巨大呀！1914年8月的精神，加上对民族团结的颂扬，其本身已经升华为一个强大的神话，被最深刻的争执和猜疑取代。战争期间已经成熟的敌意现在爆发出全面的意识，因为新的分裂成了这个被击败的国家的标志。更令人无比惊讶的是，在1919年1月中旬的全国大选中，四分之三的选民（妇女也首次包括在内）投票赞成支持民主议会制度的三方（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即使他们在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剩下的四分之一选民是支持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党的，他们带有激烈或愠怒的心情，在数量上处于劣势。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从动荡的激进的柏林迁至魏玛，其任务是起草新宪法。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选举艾伯特为新的共和

国的第一任总统。这个出身低下的男人——工人阶级出身，成长为一个改革派的社会民主党官员，谦虚、谨慎、真正的爱国（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一个儿子）——在许多方面与德国皇帝完全相反。

布雷斯劳也发生了动乱。当激进团体走上街头示威时，有产阶级受到了惊吓，因而组织了自卫队（Bürgerwehr），由武装起来的志愿者保护财产和维持公共秩序。我相信布瑞格家族和科布拉克家族的一些人也参与了进去，而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则属于士兵和工人委员会。1918年11月底，当时处于革命骚乱的高峰期，我母亲受妇女福祉俱乐部（Frauenwohl）邀请就妇女的选举权和妇女的政治责任做演讲，这肯定是因为她作为进步人士的声誉。我怀疑她是否真的去做了演讲，因为她正在全身心地照顾刚返回家乡的鲁道夫。

布雷斯劳因其地理位置，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些民族的不满。1918年10月波兰国家恢复后，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这使人们感到不安；同样还有南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成立，其境内尚有约300万德国人。布雷斯劳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危险之中的边境小镇。一些自由兵团的队伍试图来保护东部地区，布雷斯劳也拥有了这种有武装的临时住客。同样，1月举行的选举产生了极其出人意料的结果，布雷斯劳被置于主流的左翼：几乎一半的选民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另外有15%投票给了民主党，投票给天主教中央党的占21%。魏玛联盟看来似乎非常强大。虽然我的父母可能投票给了民主党，但我的祖母布瑞格非常有可能把票投给了魏玛联盟中的右翼政党。

我记得祖母海德薇格，人们都叫她老奶奶，她性格保守，遇事果断，讲究实际，为人慷慨。1915年，她买下了一栋漂亮的大别墅，毗邻布雷斯劳一个著名的公园和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坐落在瓦尔丹大街的这栋房子有两层楼高，对于她、她的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来说非常

舒适，还有一个地下室可供园丁和勤杂工居住。房后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果树和无与伦比的醋栗；屋里的珀尔齐希款家具是她从国王广场的旧房子带来的。她是一位女家长：家人和家族朋友是第一位的，就像她特别亲近她的母亲一样，我的母亲也特别亲近她。这栋别墅几十年来一直是全家人的住宅（即使在后来的几年里，她把一楼租了出去）。房子位于小巷的尽头，路在那里终结——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当我的父母在1919年春天结婚时，他们的感受和期望会是什么呢？我只能猜测。鲁道夫和凯特结合，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朋友，以及面对巨大的破坏建立新的生活这一共同的愿望。鲁道夫赢得了一位身体强壮、有女人味、第六感很强的妻子，她和她母亲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那位母亲长期以来就是成了孤儿的鲁道夫的朋友和代理母亲。所以鲁道夫在一个熟悉的、充满感情的家中获得了新生。他同凯特的哥哥恩斯特尤其亲近，恩斯特是一位医生，是一个强壮、安静、能自力更生的人。（布瑞格和斯特恩这两家人很明显各有所长——前者更温和、更随和、更保守；后者更热情、更有雄心、更脆弱。偶尔的家庭摩擦是不能够动摇他们深厚的信任与和谐的。）双方都想要一个精神上的，也就是说一个宗教仪式来纪念他们开始在一起生活，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而卡尔帕奇的小教堂在战争间断期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内心的连续。他们选择了《约翰福音》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婚誓言，他们在十六岁的坚信礼上也用了相同的文字。婚礼结束后是欢乐的晚宴，晚宴上必不可少的诗歌和短剧大部分是由恩斯特写的。（恩斯特在战争期间娶了一位来自布雷斯劳著名家族的女儿，这个家族也是由犹太教皈依天主教的。）

起初，我的父母住在瓦尔丹大街最近去世的凯特祖母的房间里。这不是最吉利的婚姻开端，但鉴于普遍的住宅短缺，这应该是非常实际的了。（我最近发现了一份殷实的嫁妆参考说明——这在谈话中是

从未暗示过的。无论如何，大通胀即将彻底毁掉我父母的所有资产。）在布雷斯劳大学，鲁道夫很快就通过了他在战争期间无法参加的医学考试，然后于1920年7月完成了学业，成绩属于“非常好”一档，有资格去申请一个大致相当于第一年住院医生的职位。他造访了柏林，去求教当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茨·哈伯，哈伯也是他和凯特两人父亲的密友。他还向伟大的精神病学家-神经专家卡尔·朋霍费尔当面求教，朋霍费尔已经从布雷斯劳迁居到了首都。鲁道夫正在寻找一个其他城市里有前景的正式助理职位。我猜想他是怀着急切的抱负，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最终，他被聘任为布雷斯劳的奥斯卡·闵可夫斯基诊所的助理。1920年2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了。为了纪念鲁道夫的母亲，她受了洗，并取名为托妮。托妮是一个聪明且早熟的孩子，在宠爱她的父母（和一名保姆）的照看下健康成长；在这个世界里，她是快乐的源泉，尽管这个世界本身不提供这二者，反而充满了暴力和怨恨。

到1919年6月，协约国之间就将与战败国德国签订的和平条款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并且将德国人排除在它们的商议之外），向德国政府提交了该条约。条约中规定了最后期限——6月28日，在此日期之前，相关各国将在凡尔赛宫中的镜厅签署该条约。1871年，胜利的普鲁士人就是在那个大厅里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非常清楚这段历史的协约国是存心这样规定的。它们排除了德国人，因为1814—1815年于维也纳召开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和平会议上，被打败的法国的代表塔列朗曾经在那里成功地分裂了协约国；它们之所以定下6月28日这个日期，是因为那天是萨拉热窝事件发生五周年；现在德国将接受早先普鲁士人在镜厅的傲慢所带来的报应。）德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条款；条款引起了几乎所有德国人的愤怒和最深切的怨恨。

《凡尔赛条约》的本意就是要苛刻地对待德国，但更糟的是，在风格和实质上，该条约都是羞辱性的。德国在东部的领土损失——

包括为新波兰提供一条出海口的“波兰走廊”，并在帝国和东普鲁士之间插入一片波兰土地——是最令人愤恨的，尽管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所有海外殖民地同样令人愤怒。德国的军事力量已降至可笑的最低水平（尽管其他国家承诺这是为全面裁军做准备——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条约中有关条款规定德国要为德国侵略对协约国造成的所有损害承担无限赔偿的责任，对此，德国人在道义上感到愤怒。有些德国人敦促拒绝签署该条约并采取最后的英雄般的立场，但军方否定了这种徒劳的英雄主义，谨慎占了上风。魏玛的政治家们被迫签署了条约，而对德国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却因此诋毁他们。该条约被视为歪曲了威尔逊要“让世界为民主而变得更安全”的愿望，抑或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19年，人们对于建立民主所需的心理和经济上的先决条件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如三十年或七十年之后的人们。

德国人在表达他们的愤怒上几乎是一致的。在11月到次年6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躲进了“停战的梦境”之中，就像恩斯特·特罗尔奇所说的那样，那段时间是在1918年11月之后，当时他们都相信威尔逊总统会给予他们民族自决，这是他慷慨地承诺的。然而现实带来的震惊是毁灭性的。甚至在协约国成员中，也有些人对条约表示怀疑，但没有人能比凯恩斯勋爵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表述的更雄辩或更有力。从骄傲到卑贱，从感觉强大到无能为力，这样的沦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艰难的，但德国人可能会因为他们间歇性自我怀疑的长期发作而遭受特别严重的痛苦。

魏玛的民主人士不得不通过签署条约为他们的帝国前辈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而反对他们的顽固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因不用承担责任而扬扬得意，转而给旧政权倒霉的继承者打上卖国贼的标记。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不得不为这一脆弱的新奇事物制定一部宪法。魏玛宪法体现了妥协：德国的联邦和经济结构保留了下来，私有财产仍然

不受侵犯，国家也仍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集体所有权、国有化和工人权利等问题上也摆出了一定姿态。无产阶级对社会共和国的希望仍未实现，但至少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而议会制度则由一位民选的总统来平衡，该总统被赋予巨大的紧急权力，因为人们认为，即使在1914年以前德国人渴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现在也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旧政权的公务员，更糟糕的还有法官，都可以留在他们的岗位上，只要他们表示接受这个新政权就行。这对于保留权力来说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代价——事实上，大多数法官蔑视共和党的命令，并且以表示蔑视的不忠行为来回报其懦弱。魏玛时期最杰出的民主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理解许多左派人士谴责的是什么：德国的法院在政治审判中执行了有阶级差异的公正。

如此一来，德国确实在没有真正革命的情况下经历了彻底的政府更迭——除了在形式上之外。一部宪法不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社会，而德国在1919年是一个分裂严重的国家，处于政治派别两端的力量与自由民主制不可调和地对立。在左边，大量的人渴望一个社会共和国；在右边，军官团、公务员、贵族地主以及农业和工业巨头、基督教神职人员、教授——简言之，旧政权的特权精英——感到被以某种方式剥夺了财产和继承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逐渐与魏玛政权和平相处，但是也有许多人隐藏起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怀疑，然后等待时机，直到他们能再次将自己的力量依附在国家机器的巨大力量（包裹在伟大国家的高贵庇护斗篷）之中。

在凡尔赛和谈前后，政治运动继续震撼全国：共产党起义被粉碎了，即使最初他们赢得过胜利；右翼团体谋杀了许多共和党人或左翼领导人。德国处于潜在的内战状态，被疯狂的煽动激怒。

在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动荡中，德国犹太人同时经历了成功与痛苦。当然，他们突出地表现了自己，并且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首次

亮相。在战争期间，一些犹太人——如拉特瑙和哈伯——也担任过重要但不太明显的职务，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犹太人在民主和激进党派中表现活跃，他们占据了政府职位，其中一些人为起草新宪法做出了重大贡献。重要的是，他们在新闻和出版、法律和专门行业以及魏玛时期文化创新的大爆发中都有代表。

1917年的祖国党已经将普遍的、潜在的反犹太主义提升到一个明确的政治平台之上；在德国战败和犹太人赢得公众瞩目之后——它们几乎受到了同等程度的接受和诋毁——反犹太主义成为右翼思想和宣传的一个主题。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主题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和魏玛共和国的蔑视者，指责犹太人是德国所有弊病的根源。战前对犹太人的反感——他们被认为是冲动的、狡猾的、贪婪的，而且太过强大——已经普遍存在，但从未被成功地列入一份政治纲领之中。所有这一切在魏玛时期更纵容、充满仇恨的氛围中发生了变化。障碍物被清除了，随着犹太人和德国人比以前交往更加密切，对前者的攻击也愈演愈烈。他们是怎样理解他们的新地位的呢？他们中的许多人热切地相信新的民主德国，并认为反犹太主义会先上升然后衰落。一个小得多的团体转向了犹太复国主义。但那时候大多数德国人不得不忍受不确定性，处于这种状况的犹太人也许更多。

托马斯·曼并没有摆脱对某些犹太人或所谓的“犹太人”特征一定程度的嫌恶，尽管或许是因为他的妻子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家庭。他在著作中有一些关于富有、颓废的犹太人的描述，并在战争期间写下了反西方的《对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一文，这是对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秘密抨击，海因里希的世界主义令他厌恶。对于托马斯·曼来说，海因里希代表了西方颓废的文明生活，而德国人则培育了一种文明生活，是内心世界（Innerlichkeit）的绝对自由。但恰恰是因为他沉浸在这个充满怨恨的日耳曼人的社会中，他很早就认识到右翼的政治危险，并于1922年宣称他对德意志共和国的信

仰。他恳求，特别是对年轻人，不要再把他们国家的新秩序看作由“犹太男孩”掌管。

我的姐姐特别受父母的宠爱，也许是为了弥补外界的动荡。在她出生后的几周，民族主义势力发动了令人担心的反革命政变，在柏林夺取了政权，并迫使民主政府逃亡。退伍军人组成了发动这次政变的步兵，这支队伍以其无能的平民领袖沃尔夫冈·卡普命名。在暴动发生后的几天里，布雷斯劳被掌握在叛乱分子手中，自由兵团杀害了伯恩哈德·肖特兰德，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犹太家庭，并已成为独立社会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由所有工人——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会的成员——参加的大罢工最终导致了政变的崩溃，尽管老资格的精英和一些工业巨头对政变分子表示同情；他们意识到实际推翻现有政权会立即引发法国的干预。在政变中持“中立”立场的正规军——魏玛国防军（Reichswehr），因未支持反叛分子而感到自豪，但也不愿采取积极措施来保卫合法政府。因此，正是工人以及外国干涉的潜在威胁拯救了共和国。

但共和国未能给其国内支持者以回报。更加诡异的是，在1920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魏玛联盟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此后好几年，最大的党派社民党退出了权力中心，如此一来，魏玛就不得不在不断变化的成分中沿政治中心招募联合政府。作为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党（我怀疑我的父母仍在投票支持它），其影响力急剧下降。在布雷斯劳，该党的得票率从1919年的15%下降到1920年6月的6%。出于对《凡尔赛条约》的愤怒，德国的资产阶级向右转变，对民主形式持蔑视态度。然而，在普鲁士这个德意志帝国最大的邦国中，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魏玛政党手中。事实上，在那些留给各城邦的事务中——尤其是教育和公共管理——普鲁士将成为进步主义的灯塔，与其过去的独裁专制截然相反。

鲁道夫完成了实习期，但事实证明他想要找到一个医疗助手的职位是非常困难的。这时运气帮了忙。1921年1月，我父母在施赖伯豪碰巧遇到了弗里茨·哈伯，那是在布雷斯劳西南对利森山区

(Riesengebirge) 的一个冬季度假地，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简朴的旅馆住了下来，他们不知道的是，哈伯正在附近的疗养院疗养，而且健康状况不佳。哈伯在战时的责任是令人头疼的，也是耗时耗力的——他作为军队科技组织者的地位与下一次战争中J. 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美军中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他的权力高峰期，他受到了私人方面的打击：他的妻子（用他的军用左轮手枪）自杀了，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对丈夫在毒气方面的工作感到绝望。他所做的努力是徒劳的。德国的战败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甚至在1920年获得的诺贝尔化学奖也没能恢复他的精神，更糟的是，德国之外的许多科学家反对这一奖项，他们认为哈伯在战时的工作败坏了他早期从空气中提取氮气这一成就。自签署《凡尔赛条约》以来，他担心协约国将他定为战争罪犯。由于生性多变，他抑郁的原因就更多了，不知何故，他甚至把国家的失败看作自己的失败。哈伯很孤独，因此求助于我的父母，寻求他们的陪伴。我父亲注意到了他身心两方面的症状，陪他下棋并一起谈论政治，哈伯逐渐开始减少对自己身体的抱怨。而我母亲静静地在旁边陪同。哈伯评论道，他从未见过一个做妻子的能如此心满意足地沉默着坐这么长时间。（他曾在1913年在蓬特雷西纳见过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并用亲切的笔触把我的母亲写得像他的养女。）他们分享了对侦探故事以及对该类型作品的英国大师奥斯卡·华莱士和菲利普·奥本海姆的喜爱。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导师，哈伯感到遗憾，因为她放弃了在物理科学上一个很有希望的开端，尽管后来在促进她的教学工作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从那时起，他对我的父母怀着一种父母般的关心。

鲁道夫在闵可夫斯基的诊所里把临床诊断和科学工作结合在一起，对异硫氰酸胍的毒性作用进行研究。当这项工作于1921年结束

时，哈伯给他在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究所提供了一个职位，自1911年研究所成立以来，他一直在那里指导科学研究。一开始我父亲在生物化学家卡尔·纽伯格手下做一名无报酬的助理，然后很快转到了赫伯特·弗伦德里希的胶原化学室担任有报酬的助理。我相信我的父亲在物理科学领域只有一个学医的学生的基本知识，但哈伯认为我的母亲肯定能够从理论上为他的研究提供帮助。我父亲发表了有关血液病和胆固醇作用的研究论文；在他后来的医学生涯中，这些实验被证明是很有用的。

我母亲离开布雷斯劳和她的母亲是很不开心的，但她知道这是从外围到中心的一个变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心啊！哈伯——一如既往，发现工作能暂时摆脱疾病的折磨——再次成为德国科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不仅作为他的研究所的所长，还是科学政策的一个主要创新者；1921年，他帮助成立了德国科学紧急状态委员会，以便支持年轻科学家，这是一个由政府和公司资金支持的捐款基金会。他认为科学成就是德国实力留下的唯一物质支柱，他还希望能够恢复实际上已经被战争破坏的国际关系。（协约国禁止与德国科学家见面，反过来许多德国科学家也希望抵制协约国的会议。）基于他的努力和美国对德国的慷慨，我父亲在柏林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还获得了一项西班牙奖，奖金达500比塞塔——在德国货币突然贬值的时候，这笔钱可用来支付一个假期的费用了。

一位杰出的、傲慢的生物化学家埃尔文·查戈夫后来回忆说，哈伯的“奇妙的苏格拉底式技巧”使柏林成为“科学的天堂”。但科学的辉煌与物质上的匮乏同时存在。由于住房稀缺，我父母的第一个住处是与布瑞格的亲戚一起住在城里蒂尔加滕区的一个小阁楼里。与哈伯日益深厚的友谊是真正的回报。

哈伯有很多朋友，他的圈子里除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外，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理夏德·维尔施泰特，奥本海姆家的沙龙和传说中的艺术收藏品，《自然科学》期刊的编辑阿诺德·贝利纳，以及维夏德·冯·默伦多夫——瓦尔特·拉特瑙在战争期间的助手，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一位业余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哈伯还是那些毫无保留地团结起来支持新生共和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之一。他与民主党以及魏玛的许多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在研究所里，特别是在国内，他仍然是那个威权的德国教授，但在政治上他已经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在柏林感觉非常自由自在。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那段时间是非常令人头痛且折磨人的。我的父亲必须服从两个要求严格的上司——哈伯和弗伦德里希，前者因严格和脾气暴躁而出名。哈伯不顾自己的健康和家庭，全身心投入科研，并且期望他的合作者同样如此。但是，当我的父亲感染了伤寒时，市政府的住房管理部门最终分配给我父母一套公寓，他们终于可以逃离令人几乎无法容忍的阁楼了。

柏林也标志着我母亲新的职业生涯的开始。有些家长要求她根据达克罗兹教学法教他们三岁到六岁的孩子韵律游戏，她曾短期学过这种方法。她追随自己对儿童教育的兴趣，转而去研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理念。蒙台梭利1870年出生于意大利，她开发了渐进教育的早期版本，作为一种矫正方法替代当时愚蠢的、压抑智力的方法。她是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大胆追求独立——为自己非婚生子而自豪——但变得越来越推崇专制主义。她与弗洛伊德保持着联系，并且希望像他一样，有一个致力于传播其思想的国际组织。她在美国和西欧很有名气，1922年她首次来到柏林，我怀疑我的母亲是否真的出席了蒙台梭利在那里的唯一一次演讲，她演讲中不合时宜的内容得到了冷冰冰的反应——她说，德国的孩子们被视为财产，被家人和学校奴役——但她有关解放的内容符合魏玛时期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就：一种摆脱束缚

不断进步的教育趋势。我母亲学习了蒙台梭利的方法，经过适当授权，于1923年在柏林开设了自己的蒙台梭利幼儿园。这是她在教育学领域职业生涯的开端；她比蒙台梭利更讲究实际，比专业心理学家少几分学究气，她的学习偏重于实效，我相信，她得益于一个无法估量的天赋：一瞬间孩子们就会信任她。（我曾经告诉她，我认为她的教学原则与她同孩子们之间的这种即时融洽关系相比是次要的；她很在意我的这句话，不过是以一种愉快地认可事实的方式表达的。）此时对她来说，柏林也标志着她在这个临时起意的职业生涯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她找到了适合她自己并能发挥她聪明才智的职业。

但是，没有人能够逃脱政治风暴、战争失败带来的后遗症和即将到来的新灾难。《凡尔赛条约》未解决的问题包括上西里西亚的命运，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既有德国人也有波兰人。1921年3月，国际联盟监督了一次公民投票，在那次投票中，大多数人支持留在德国。一年之后，仍然将德国排除在外的国际联盟决定分割该地区，把最富裕的有丰富煤矿资源的部分划给波兰。德国人对此非常愤怒，但西里西亚人更加愤怒，因为“失去”这块土地的德国人在他们中间找到了避难所。德国人很蔑视国际联盟，更不用提他们对波兰人的鄙夷了，他们认为波兰人根本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整个事件被视为西方背信弃义的进一步证据，加强了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的现有怨恨。

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当协约国最终在1921年提出赔偿方案时，赔款数额达到了惊人的1320亿金马克，赔款将在几十年内支付。对德国人来说，这进一步证实了协约国决心粉碎他们的国家并将其束缚在永久的贫困之中。违约的诱惑是巨大的，但后果必然是协约国占领德国的其他部分，如鲁尔区。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进步的信奉天主教的总理与德国最著名的金融家和政治梦想家瓦尔特·拉特瑙进行了接触，首先任命他为复兴部部长，然后在1922年任命他为外交部长。

拉特瑙是犹太人，他对这种遗产怀着极度矛盾的心理——耻辱毒害了自豪；他也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与外部世界保持着特殊的联系。他的母亲和他的朋友，包括爱因斯坦，都告诫他不要接受这个职位：一个犹太人怎么能出现在俾斯麦神圣的办公室里，出现在一个有着特殊光环、传统上为德国贵族保留的政府部门中？在野心和爱国主义的驱使下，他还是接受了。以前（或以后）从来没有哪个犹太人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如此高的职位。

拉特瑙同意了总理的观点，即在短期内，德国必须满足协约国的要求，以避免受威胁的德国领土被法国占领。从长远来看，他希望一个协调一致的欧洲复苏计划能结束德国的孤立局面。但他最令人惊叹的也是意想不到的成就是与苏俄达成了一项协议，在意大利拉帕洛签署，由此建立了正常的德苏外交关系，同时暗示了两国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前景。这项条约的实际成果很少，但长期以来“拉帕洛”保留着一个不祥之兆，暗示着德国的冒险在东方不受欢迎。

就在拉特瑙继续忙于处理赔偿问题的同时，德国的右派却仍旧在诋毁他。1922年6月，德国国家人民党领导人在德国国民议会的讲话中指责他犯叛国罪。几天后，拉特瑙乘坐一辆敞篷车去办公室途中被一个资金充足的地下组织的杀手射杀。整个国家为之震惊，因为许多人凭直觉发现了我们后来所发现的情况：谋杀是扼杀共和国战略的一部分。德国总理约瑟夫·维尔特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一句著名且正确的宣言：“敌人站在右边。”即刻得到的回应是对共和国的肯定，政府也通过了反对诽谤的紧急法令；数百万工人参加游行哀悼这位被杀害的实业家。拉特瑙的一生例证了德国犹太人的成功是遭遇偏见的、充满冲突的，他的被杀表达了这个国家肆虐的激情。

第二年，即1923年，共和国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之中。1月，协约国宣布德国未支付赔偿金，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出兵占领了鲁尔区。德

国政府颁布了消极抵抗令，命令在这个工业中心地区的工人不要进入矿区并承担这种行动的所有相关费用。

往届德国政府早已允许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现在随着政府印制的钞票越来越多，价值损失越来越大，通货膨胀率飙升到离谱的数值。（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束时，1美元可买入4.2万亿马克。）德国的纸币泛滥成灾，其价值的下跌以天以小时计。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府正在批准自己所属阶级的破产，当他们的大部分储蓄被蒸发一空时，一个曾经相信储蓄的民族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财产了。这是又一个难以理解的创伤，意识到物质和道德在同时贬值，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了。罪恶和腐败甚嚣尘上，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平民落入可怕的贫困和不确定性的深渊。人们知道，有一些乘人之危的奸商，其中有些是犹太人。对于那些政治上的右派人士来说，所有的奸商都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奸商。当然，事实上，犹太人遭受的苦难不亚于其他人：少数人成功了，如某些从残骸中建立起工业帝国的德国巨头以及某些以贬值货币偿还债务的大地主。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一样，大部分的钱损失在通货膨胀中。在哈伯的研究所里，鲁道夫除了科研工作之外，还担负起了一些行政责任，包括工资和薪金的发放。当时，早上发放的工资到了下午就几乎买不起生活必需品了。德国人得以再一次看到，公共事件是如何严重地破坏私人生活和传统价值观的。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创伤，几乎比战争更糟糕，而且似乎是自我造成的。

1923年还出现了其他情况：共产党政府在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的短暂出现威胁到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直到魏玛国防军残忍地恢复了秩序。当阿道夫·希特勒首次在国人面前亮相时，更为严重的破坏在慕尼黑发生了。

希特勒曾是战前维也纳的一名失意艺术家，还在德国军队中服役过；1918年之后，他成为最黑暗的右翼地下组织的代表之一，并加入了一个民族主义党派，其凭借独特的修辞才华，成功地升为党魁。这个仍然是奥地利公民的天才煽动者，在巴伐利亚啤酒馆中大肆攻击“十一月的罪犯”——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投入了敌人的阵营，这激起了观众的狂热和兴奋。他目睹了1919年巴伐利亚的革命和反革命运动，看到过犹太人短暂拥有权力的时刻，他开始逐步相信，他是注定要将德国从犹太人这个“祸害”中拯救出来的人。11月，他在他的纳粹冲锋队（简称SA，并以褐色衬衫和纳粹袖标为标识）与过去的军事偶像特别是鲁登道夫将军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盟，并呼吁结束在柏林的犹太人共和国。慕尼黑的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正规军向试图夺取权力的示威者开了枪；少数死者成为纳粹自称的“运动”的第一批烈士。希特勒本人逃跑了，但很快遭到逮捕，并被指控发动叛乱。在随后进行的一次滑稽可笑的审判中，希特勒狡猾的挑衅使他在国家平台上第一次大获全胜。给他的判决只是轻微的，这是反动的审判工作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证。面对伴随着反犹太主义强烈信息的民族主义阴谋的大爆发，人们是否会感到更加震惊，抑或对其迅速的崩溃而感到放心呢？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德国的创伤和屈辱的真正受益者是民族主义右派中暴徒般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共和国的死敌，他们渴望并承诺民族的救赎。

共和国在多重危机中幸存了下来。1923年8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成为总理。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广泛的联盟，包括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在内。他在战争期间一直是一个热情的兼并主义者，被称为鲁登道夫的“年轻人”，但在战后作为一个接近工业利益的中间偏右政党的领导者，他开始逐步接受共和国。就任总理后，他决心通过和平方式恢复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他的政府结束了消极抵抗，并迅速结束了当时的金融混乱——这对一个并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在那年底，一种新的货币出台了，1万亿旧马克可以兑换新的1马克。

新货币之所以在短期内就获得了合法性，部分是由于政府大力裁减开支，并且在几个月内，美国贷款为德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

1923年10月，在通货膨胀的高峰期，鲁道夫和凯特回到了布雷斯劳；柏林之行犹如一场冒险，而布雷斯劳则是家之所在。鲁道夫被任命为闵可夫斯基的助手，在他的大学诊所里，鲁道夫开始了内科医学实践，同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各种生化过程的医学意义。1925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内容有关在血清和胆囊中发现胆固醇的临床意义。他现在成了一名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由此在学术阶梯上踏上了第一梯级，并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他将通常的三重职责结合在一起，即临床医生、教师和研究员，其中第一项是真正能积聚他的热情的。在当时对他的推荐信中，推荐者适当地列举了他的各种品质，但没有什么职位会比哈伯以及闵可夫斯基选择他作为医生助理对他更为重要。与此同时，在很高兴地与母亲团聚后，凯特在布雷斯劳开设了一所蒙台梭利私立幼儿园。幼教已经成为她的职业，在幼教中寻找新的方法是她面对的特殊挑战。鉴于经济前景不明朗，她还从事低年级的教学工作，以期能得到正式的教师证书。

凯特集一位要求严格的丈夫的妻子、母亲、女儿、教师以及准备参加重要考试的学生等身份于一身，并且有孕在身。我出生于1926年2月2日，也就是在我母亲最后一门教师资格考试的前两周。我是以弗里茨·哈伯的名字命名的，他同意做我的教父；我的另外两个名字是理查德和奥斯卡，为的是纪念我的两位祖父。^[2]名字里有哈伯这两个字意味着我的一生将承载着某样东西：是礼物，也是负担。此外，我的名和姓表明了不同的起源：毕竟弗里茨完全属于日耳曼人，而斯特恩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

我出生后没几天就受了洗；哈伯原本打算前来布雷斯劳参加仪式，以便承诺接受责任，但突然发作的痛风让他无法出席。（只是到

了现在我才开始怀疑我父母的好心的选择：考虑到哈伯的年纪，一旦遇到麻烦，他可以照顾我吗？而且鉴于他彻底的世俗观念，为什么选他呢？转念一想，也许他的缺席预示着后来我对自己的宗教身份的怀疑。）

回想往事，我意识到自己出现在一个肯定被看作非常幸运的时刻：我的父母刚刚获得成功，国家也走上了稳定的正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美国贷款的涌入！前一年，施特雷泽曼参与了《洛迦诺公约》的谈判，承诺德国接受其西部边界（但不是其东部边界）；他努力实现法德和解，并于1926年使德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这是一个短暂的、幸运的时刻——这一时刻延续了整整四年。

我找到了1926年6月哈伯对来访的美国医生发表的讲话的单行本，里面有深情题写的一行字：“致凯特的儿子的父亲。”他提醒美国人注意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你们生活在一个个人自由是最伟大的政治利益的国家中……你们的国家以服务其公民而存在……但在我们过去的岁月中，最高的政治利益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公民秩序……我们的国家不为其公民服务，而是公民服务于国家。”他解释说，德意志共和国负担沉重，不仅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持续三十年的阶级斗争，现在还受到外国的支配，并且所有财富遭到破坏。三年前，他补充说，来访者会认为德国处于崩溃的边缘，也许面临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无论哪个政府掌权，都必须听取大多数人维持和平的愿望，接受法治，并强调工作精神：“工作是精神上和物质上遭受痛苦的人的避难所。”

这段话把公与私结合得多么完美无缺！然后哈伯全面介绍了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在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更紧密合作的前景，以及恢复国际科学界的必要性：“但学者们（Gelehrte）似乎发现，

比起人民自己，更难克服的是战时的对抗。在和解开始时，以前的敌意却在四处泛滥。在战争时期，科学家属于他的国家，但在和平时他们属于人类。”哈伯呼吁美国人为和解事业效力，他本人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国外不可调和的势力和国内邪恶的顽固分子做斗争。1902年，他在美国待了十六周。他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和非凡的活力。美国使他着迷，就像当时有那么多人人为之倾倒。

的确，以英美为首的世界在支持魏玛走向和解的道路。英国外交已经为洛迦诺铺平了道路——英国对于让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首屈一指的强国并不感兴趣。而美国则对德国的对立阵营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企业家们研究了美国的流水线生产，这种方式为消费主义提供了更大、更巧妙的推动力；各种各样的进步使美国文化迅速发展，其表现形式为电影、大胆的生活方式、爵士乐、现实作家等——简言之，它具有现代性和表面上的自由。爱好这种文化的在魏玛也大有人在，他们中有不少人十年后移民去了美国，丰富了美国的文化生活。

尽管美国提供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的，因此具有潜在的风险，但是这些贷款为魏玛共和国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提供了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使德国有能力支付战争赔偿金，反过来又能使法国和英国偿还它们欠美国的债务。这种三角“贸易”使少数国家受益，最终却伤害了多数国家，这也说明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经济上的无知。与此同时，哈伯有自己的补充德国国库的方案：在从空气中提取了氮气之后，他现在寻求从海洋中提取黄金。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为此配备了一个浮动实验室，这是一个具有独创性但也疯狂的想法，因为海水中的含金量被证明低得几乎不存在。

在我父母的生活中，哈伯变得越来越重要。1926年，他邀请我父亲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作为朋友和医生陪伴他去蒙特卡罗，只要我父亲可以从诊所和家请到假的话。这又是一个可证实大家都会接受丈夫

的职业优先的例子，哈伯以他一贯亲切幽默的风格从蒙特卡洛几乎每天给我母亲寄几首诗歌，从而缓解了他内心任何微弱的内疚感。那年早些时候，我父亲的妹妹马尔加嫁给了哈伯的长子赫尔曼，对于这个结合，哈伯和我父亲出于不同原因都试图劝阻过。（后来，这对年轻的哈伯夫妇和我父母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亲密和挚爱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婚姻适时地又增加了一条纽带，即使哈伯与他第二任妻子离婚使他更加依赖于朋友和他“收养”的侄子和侄女。）

1926年，闵可夫斯基从布雷斯劳大学退休，他的继任者是内科医生威廉·施特普，我父亲与此人相处得不太好。因此，我父亲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职位，或者申请一项洛克菲勒奖学金，以便去美国学习一年。1928年，哈伯敦促柏林-达勒姆区市长任命鲁道夫担任“我们的”医院的内科主任。哈伯的长信涵盖了他对医学的看法：“我知道足够多的……医生写出了最精彩的科学作品，但他们不能正确诊断或治疗疾病，也不具备除专业知识之外所必须具备的人文素质。上帝保佑我患病时不会接受这一类某个著名的医学研究人员的治疗。”因此，他信赖斯特恩，并告诉医院，如果能拥有这样一个人，他具有“诊断专家和临床医师所应具备的专门的特殊才能，并能把真正的医生的心与灵相结合”，那将是十分幸运的。鲁道夫没能得到这个职位，但哈伯给他写的那封信的副本也许减轻了他的失望。哈伯还向普鲁士卫生部询问有关施特普的情况，暗示反犹太主义可能是他推迟斯特恩升为副教授的一个因素。^[3]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鲁道夫在其他方面也经历了一些失望，哈伯给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人在医学上只是个编外讲师，却有犹太人的祖父母和强烈的左派信念，那么这个人就不得不忍受在寻找医院工作时的徒劳无功，而且如果此人能在第十次尝试中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不应该灰心丧气。有耐心的人才会成功，但只有耐心是不够的。当然，假如你满足于在偏远乡村医院工作，能容忍只有十二张病床而没

有实验室，那就另当别论！”^[4]我认为当时许多犹太人都有与哈伯相同的看法：偏见会造成延误，但真正的成就最终还是会获得认可的。我父亲是个什么样的“左派”呢？我猜想，在1928年之前或更早，他已经开始给社会民主党投票了——很难说这是一个激进的选择，他也没有成为一个党员。我感觉这不是一个投不投票的问题，而是他的政治倾向问题。鲁道夫已经变成了进步的和平主义者，那时他已经确信德意志帝国沙文主义精英们致命地误导了这个国家。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遭到那些权力崇拜者的背叛后的痛苦感觉，以及他们给国家、他们自己和他人造成的无尽伤害。

我父亲非常喜欢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对德国（和犹太人）资产阶级生活精彩且入木三分的讽刺，以及乔治·格罗茨对德国社会无情的嘲讽。我知道他贪婪地阅读了阿诺德·茨威格和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伟大的反战小说，他们的作品证实了其对战争的清晰看法。他还阅读了激进的周刊《世界舞台》和《日记》，它们的反军国主义立场和对魏玛统治下普遍的“阶级正义”的曝光也对他很有吸引力。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创作的《三便士歌剧》中引人入胜的曲调和颠覆性的台词伴随我长大，这是一部玩世不恭的杰作，嘲弄了一个腐败的社会和虚伪的教会所谓的虔诚。

我父亲逐步接受魏玛文化的过程可能不是非典型的。他相信一个理性的、现代的、科学的世界，并且由于他越来越怀疑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腐败，因此能坚持他的观念。他担心魏玛国防军的权力，这支新的职业军队具有反民主的倾向和日益增长的政治野心。他有智慧和一定程度的不敬倾向。但我怀疑，鉴于他与左翼中大多数“温和派”的友谊，他是否真的会同许多魏玛知识分子一样那么愤世嫉俗。这些困惑的人没有意识到或希望意识到的是，他们对共和国的玩世不恭帮助了右翼的敌人，他们已经从愤世嫉俗发展到了好斗的狂热盲信。

“魏玛”让人联想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有着辉煌文化的时期，现代主义在所有艺术形式中获得成功，知识领域充满了重大的创新，反资产阶级行为大行其道；其二则是现代民主在痛苦挣扎的现实。这两种看法在有形无形中联系在一起：魏玛的政治敌人发动了文化战争，反对所谓的“堕落的”或颓废的艺术，而今天对魏玛文化的庆祝往往错过了这些相互关联的要点。魏玛文化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战前德国的先锋派艺术中得到了体现，当时德国艺术家对一个正在分解中的世界、对某种即将来临的灾难有一种直觉，他们知道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和欺诈，在一个看似稳定的世界里他们实际上是叛逆者。所以表现主义者预见到了魏玛精神的许多方面。魏玛在其他领域也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如城市规划、教育、妇女权利和医疗保健等。有一位伟大的创新者——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建筑师和包豪斯建筑学派的创始人，承认他自己有过这样的战时经历：在一栋被炮弹摧毁的房屋下埋了三天之后，他完成了“从扫罗到保罗”的转变^[5]，并使他确信艺术家必须找到集体再生的方法。简言之，与战前德国相比，魏玛外观不同，构造不同，衣着和谈话也不同——其辉煌的创新激起了愤怒、不解和野蛮的怨恨，而这些又被民族主义煽动者巧妙地利用了。

我对魏玛的知识分子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几十年过去了，现在魏玛常常被描绘成某种失乐园，我的这种感情就越发浓厚。但其实他们是一群浅薄之人，有说教式的政治和往往是乌托邦式的简单化的观点，时而虔诚，时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是愤世嫉俗的，就像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在谈起他自己的时候告诉我的那样，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可以变得多么美丽”。他们依赖旧秩序的破产为生并着迷于对手的粗鲁，他们傲慢地忽视一些论点，而反对者为了拒绝自由主义原则并要求新的权威主义却非常成功地调动了这些论点。即使在那些日子里，像卡尔·施密特和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这样的作家和政论家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

尽管如此，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和国看起来似乎更加安全了：到1928年，德国经济已经达到战前水平，在当年的全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使他们八年来第一次敢于要求得到总理职位。有理性的保守主义者也站到了共和国一边：1925年，右翼政党成功地选举了保罗·冯·兴登堡担任总统，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元帅——在第一个任期内，他就依照宪法免除了自己的部分职责而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这就证实了有关他不忠诚的记录。施特雷泽曼仍留任外交部长，以便着手进行旨在减少德国赔偿金的谈判，即延长支付期，以及争取让协约国军队提前从莱茵兰地区撤军。这些是在经济复苏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共和国缺乏自我戏剧化的能力，未曾将其自信以任何有说服力的方式表现出来。魏玛的光辉，它对文化创造力无法抑制的创新，在政治-公共领域是无可媲美的，这个领域是一个黯淡的世界，充斥其中的只有偶发的丑闻和争议性的诽谤。

我最早的记忆仍然能触及魏玛的最后一缕光辉和我父母在其中的生活情景。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29年有一次探访弗里茨叔叔在维茨曼的农场的部分情景，那是在博登湖附近符腾堡的一个庄园。我所记得的是马厩——之前我从未见过——和敞篷车（一辆传说中的霍希，意思是“听”——今天著名的奥迪是其后来生产的车的拉丁化、更国际化的名字）以及优雅的司机埃瓦尔德。我还记得——虽然我的记忆可能与后来无数类似时刻的场景重叠——我被期望要举止得体，最重要的是，由于哈伯患有持续不断、极度痛苦的失眠症，我必须在早晨保持绝对的安静。早上没有声音——其实我在家里就已经习惯了这个生活规则。我的父亲也有同样的痛苦，而且我被教导说父亲的睡眠是极其重要的，我母亲更是告知我和姐姐要把他的失眠（以及偶尔爆发的愤怒）看作战争中受到折磨的后遗症。^[6]我记得维茨曼——半个世纪之后，在爱因斯坦的档案里，我偶然看到了一封哈伯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邀请他于1929年夏天去他的农场做客，在那里，除了其他客人

之外，还有一位来自布雷斯劳的年轻编外讲师和他的妻子，“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她就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我认为哈伯之所以钦佩凯特，是因为她的为人及其言行，他还注意到她不断扩展的工作。她是一位热心的读者，沉迷于德国人称为浏览（schmökern）的阅读方式，通常是快乐地浏览轻松的读物。她很早就喜欢阅读各个国家的童话故事。她的文学品位反映了她的风格：在可能的情况下，她都保持着一种愉快、俏皮的态度，在必要时，具有分析能力和固执的现实主义。在我的双亲中，她更有直觉，意志坚强、性情平和，甚至能确保自己满足于承担次要角色，喜欢不露锋芒。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除了幼儿园之外，我母亲还开办了一个儿童俱乐部。对于已经在校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往往出于职业原因希望他们接受课后培训，这样就可以在下午送孩子去儿童俱乐部。其重点还是让儿童通过特殊的游戏学会各种技能，然后自己去发现事物。孩子们将在自由和自学的纪律氛围中成长。这些原则可以追溯到卢梭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身上，这与德国传统的死记硬背方法不一致。唯一实施的惩罚——一种微妙的严厉惩罚——是被临时驱逐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去。

幼儿园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闲暇（Leisestunde），在一段绝对安静的时间，孩子们需要专注于外面的声音——风的沙沙声、鸟类或昆虫的声音等。从两岁或三岁开始，我就进了这所幼儿园，作为园长的儿子，我想我被期待能起到模范作用。我唯一的成就来自第一天。当全体孩子被告知“肃静”已经开始时，据说我猛地用拳头砸在桌上并说道，“不”。我的家人能理解这片刻的抗争，我猜想因为这是突然的和罕见的，我是从来不会轻易说不能的。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的蒙台梭利教育协会分裂成两个派系，一派忠于在罗马的有着新的神秘思想的大师，另一派则在为建立一种更自由的方法而奋斗。我母亲活跃在后一派中，在哈伯的帮助下，争取到了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维夏德·冯·默伦多夫来领导这个非正统的协会。1930年，哈伯敦促普鲁士教育部长支持蒙台梭利协会的新分会，从而促进了具有独特好处的学前教育。与此同时，我母亲在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并且，主要是在哈伯的要求下，开始写两本关于学前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实践的书。这两本书在1932—1933年分别出版，并恰当地表明了是献给哈伯的，因为哈伯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地——敦促她的写作工作。他还劝告我的父亲要体谅妻子的工作，并提醒我父亲妻子的工作在各方面都与他的工作一样重要。

相对稳定的魏玛时代在1929年秋天宣告结束。10月，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魏玛这位有能力的政治家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在魏玛，我注意过，考虑到其他英年早逝的骨干以及年龄越来越大的反对者，死神本身就是反共和政体的。）在施特雷泽曼任外交部长的六年里，他逐渐恢复了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虽然他在国外取得了成功，但在国内他的现实政策遭到了来自右派的极大反对。他与自己党派内部右翼的斗争是一场无休止的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希望通过与协约国达成关于支付赔偿金的新协议来给他的外交成就最后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美国银行家欧文·扬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项计划，被称为“杨格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德国将减少年度付款，但延长支付期。同时，施特雷泽曼说服了协约国提前结束对莱茵兰的占领；《凡尔赛条约》规定1935年为结束日期，但协约国同意在1930年撤军，从而恢复德国的全部国家主权；这是施特雷泽曼最后的成就。他下一步计划的详情还只能去猜想，但其中肯定包括在东部以波兰为代价通过修正方式获得收益，而且将设法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从本质上讲，他一直是一个德国民族主

义者，但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理性并负责任的人。仅此一点，他的对手就很憎恨他。

即使仍在谈判阶段，“杨格计划”也引发了激进的右翼对施特雷泽曼和共和国新一轮的攻击。身为德国最强大的“媒体沙皇”和德国国家人民党新任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其主要成分是右翼政党和组织，要求针对“杨格计划”进行公民投票，理由是它延长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束缚”，签署它无异于重犯叛国罪。胡根贝格这一卑鄙的阴谋集团包括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们的联盟最终给希特勒以尊重。尽管这场运动中途失去了动力，但仍有足够多的德国人要求举行公民投票，而且当它被作为“自由法”——这个词被滥用的次数太多了！——提交给选民时，几乎有600万德国人投票支持。虽然获得通过所需要的票数要多得多，但这场运动本身标志着德国政治的激进化以及早期魏玛时代那种愤怒情绪的复苏，这是令人惊恐的。

施特雷泽曼去世后的几天里，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了——这是对魏玛有理性的共和党人双重但互不相关的打击。华尔街的恐慌导致美国从对德投资中匆匆撤离，引发了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崩溃，其后我们称之为大萧条。受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各自的失业率都大幅飙升。在饱受创伤的德国，大萧条引发了绝望，反过来又煽动了政治极端主义。

甚至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就在国家选举和大多数德国大学的学生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希特勒在慕尼黑暴动之后利用短暂的囚禁时间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并决定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权力，此时他已经认识到在现代国家里暴动是不会成功的。因此，他的政党将使用它可以使用的一切民主手段，这意味着首先依据故意过分简化的和虚假的主题对选民进行无休止的宣传轰

炸。希特勒告诉它的组织者，任何弥天大谎，只要无休止地重复，就会说服人们去相信：他坚信他们都很愚蠢，需要在精神和政治上给他们灌输热情。在魏玛遭受苦难的随后几年中，希特勒成为唯一的策略天才，一个狡猾无情的天才。纳粹的承诺是，它将结束《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奴役，结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十一月的罪犯”的统治，将德国人从犹太人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纳粹和其他一些政党一样组织了武装部队：身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SA）和身着黑色制服的纳粹党卫军（SS）。他们渲染内战即将爆发的气氛，并且确实利用人们对内战的恐惧来争取所有阶级的支持。毕竟，他们承诺了超越现有阶级划分的一种大众社会。希特勒实际上认为上帝选择了他作为国家的救星，并且纳粹党对他的举荐结合了军事和教会的仪式。在一个不稳定的世俗化社会中，特别是在新教徒中，这种伪宗教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德国学生蜂拥去加入这个党，他们要求“日耳曼式”的教育和未来以及立即解雇犹太人。他们的许多长辈很鄙视这些学生的粗鲁举止，但认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在为德国过去伟大的民族价值观而战。开始未被注意的一个邪恶联盟，在一些精英阶层的要人，首先是教授，以及战争一代的无父孩子们之间突然出现了。到了这个时候，一群新的“保守派革命者”认为自由主义是国家最大的敌人，并且拒绝帝国的过去的作家们，要求建立一个由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不是分裂的政党统治的威权政府——简言之，他们所谓的第三帝国的到来。我的父亲曾经目睹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离奇序幕：在布雷斯劳的医院礼堂里，当医生正在讲解一名精神病患者的病例时，这名病人突然开口滔滔不绝地大谈起民族主义者观点，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其他罪犯的疯狂攻击——而聚集起来的学生和一些医生竟然开始鼓掌。

但是在私人领域，我的家庭还是挺成功的，哪怕为时不长。到1930年，我父亲完成了他父亲的著作《内科疾病的创伤起源》的全面修订；这本书很受欢迎。^[7]同年，他成为大学综合医院的副教授，院长是亚历山大·比托夫——一个等得有点不耐烦的梦想终于成真了。“教授”这个头衔颇具分量和声望，可以使普通医生请他参加会诊。我父亲仍然希望成为一所大学的大型医院的医学负责人。与此同时，他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且很快兴旺起来。诊所接纳了各种信仰的人，病人有自费的，也有走公共保险报销的。大量来自上西里西亚乡村的病人使他终日忙碌不停：他们的乡村方言会逗乐他，他们偶尔赠送的猎物和香肠会让我们大家开心。

他已经实现了他父亲和岳父在他之前取得的成就。他父亲的朋友和同事一路上也都帮助了他，比如哈伯、闵可夫斯基和雅达松。他成了他们所有人的医生。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尽管在战争中失去了多年时间，他仍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我认为，这比他期望中的要少。

鉴于最近的成就，那个夏季的假期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全家人去了席尔瓦普拉纳的一个简朴的乡村酒店，这里是一个山村，靠近美得惊人的疗养胜地圣莫里茨，位于瑞士田园诗般的恩加丁山谷，对于我父母来说，这里承载着他们难忘的记忆。恩加丁的湖泊和山峰是阿尔卑斯山的荣耀，这里原始、空气特别纯净，是一个毫不媚俗的童话般的世界，到19世纪末，它已成为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犹太人的度假胜地。19世纪80年代，尼采在席尔瓦普拉纳旁边的村庄西尔斯·玛利亚找到了他所需要的神圣孤独，他说——或许是根据报道——这里是“天堂的前厅”。我绝不会忘记那壮丽的景观。我父母告诉我，他们问我最喜欢那个地方的什么，我就会回答，“大山和果酱”。这表明我们在布雷斯劳的日常饮食相当节俭，所以在这个大受欢迎的假期时刻可以特别庆祝。对于我父母而言，在席尔瓦普拉纳的那几个星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假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平静和充满

希望的前景。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领略阿尔卑斯山的壮丽，几十年后，在远离欧洲几年后，我选择了西尔斯·玛利亚作为我的安家之地，这个说德语的家的替代之处寄托着难以忘怀的回忆。

对于我的父母以及他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来说，当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达到某种安定状态时，公共领域却变得越来越黑暗，这是非常艰难的。1930年3月，第一次由社会民主党把持十年之久的德国内阁垮台了；在失业率上升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问题的情况下，包括魏玛国防军头目在内的右翼团体下决心要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最好是一个基本上不受议会控制的政府。魏玛已经习惯了长期的内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出现了一位长期以来得到右翼支持的新总理，此人就是中间派人士海因里希·布吕宁。他计划用通货紧缩的政策来应对经济萧条，在需求增加的时候削减政府开支。他也对议会政府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且在他内心深处，他是一位君主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对他进行的一次长时间的采访中，他解释说，他作为总理的希望是在政治领域重新塑造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机枪队长在战壕里战斗时，他就发现这种精神非常有效并且能打动人心。我很惊讶地听到他这样证实了批评他的人一直所说的：本质上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与政治无关的世界里。严肃、死板、不受人怀疑，他认定人们会接受规定的艰苦；不久，共产党人给他贴上了一个“饥饿总理”的标签。一生都是一位战士的兴登堡总统，授予布吕宁使用紧急状态法令来实施他的经济政策；议会予以阻止但被解散。

1930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是一场灾难，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两年还只是一个微小的分裂出来的党派，现在却作为第二大党回到了议会。在布雷斯劳，该党在1928年的选举中只赢得了1%的选票；在1930年，它却赢得了24%（全国平均水平为18%）的选票。新教徒选民已经从传统的右翼政党转向了这个自我标榜为非党派的党派，转向了

这个穿制服的运动，该党有着蛊惑人心的党魁并承诺使国家复兴。至于它对犹太人的立场，人们经常争辩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在推动反犹太主义方面比在其民意调查中有效协助反犹太主义更有效。在整个国家里，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在农村新教地区支持率很高，在各地的上层阶级中获得了全面支持。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一个符合宪法的联合政府仍然可以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但这种联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魏玛，妥协是一个肮脏的词，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之间任何形式的合作都是不可能了，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同其工人阶级支持者早已受到共产主义竞争对手的强烈攻击，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右翼政党则致力于他们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以及目空一切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魏玛国防军凭借其于兴登堡的特殊关系，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看作转向一种更为自信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手段，借助一支重新振作起来的军队，就像希特勒一直承诺的那样，就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失业率在持续上升，伴随的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布吕宁所追求的经济处方适合于经济衰退期间，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崩溃期。他把希望寄托在可能的外交成功上——例如，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或者战争赔偿的正式结束，但这些也都弃他而去。包括哈伯在内的一些人都明白，1930年的选举标志着德国人生活的根本转变；然而，大多数人仍然囿于早先的假定和信仰。例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绝望和固执的资本家的产物，专心于寻找操纵公众的手段。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明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出色地组织起来的伪宗教的感召力。

无论我父亲的认知是怎么样的——而且他倾向于政治上的悲观——他现在重新安排了他的生活。我父母在城里一处繁华的地方找到了一套有七个漂亮房间的公寓，足够供家人居住和我父亲行医接诊：餐厅兼作候诊室，我父亲的书房兼作检查室，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摆放

着大型X射线机和实验设备。但新公寓也必须得配上适当的家具，我祖母给了我们一些珀尔齐希款风格的家具，而其他一些杂物就必须另行购买了。搬到新公寓后，我的记忆变得更加清晰了；我父母聘请了赫克特先生，我们现在称呼他为室内设计师。我记得他是一个不怎么吸引人的人，他驾驶着一辆带边斗的时髦摩托车，曾带我坐过。有一个房间被隔成两间，较大的一半给我姐姐住，前半间就给我住。这小小的房间有着巨大的优势——拥有一个极小的阳台，从那里可以将下面宽阔的绿荫大道尽收眼底。

我确实常临街观察。不知怎的，摩托车和阳台在我脑海中同街上人们的形象融为一体：熙熙攘攘的人群，因截肢而戴着奇怪装置的男人，面部丑陋的或带着黄色臂章（失明的标志）的男人。对我来说，街道是现代产品的奇怪混合物，到处是摩托车、汽车和电车，同时在不断提醒我一些早期的悲剧。那个二楼的阳台和我的那张现代床——就像一张墨菲床，白天可以折叠存放——我认为这是一张野外便携床：这两件“财产”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幻想！我可以向下面的人群发表演说，我可以梦想英雄般的生活，比如拿破仑统帅那种——当时我正在读拿破仑的传记。

赫克特先生还带来了三张包豪斯桌子——就像后来一样，感激不尽的病人会给我父亲送来包豪斯设计的礼物。尽管公寓里摆着那么多传统家具，如我父亲书房里的木制书橱和厚重的真皮扶手椅，但仍具有现代风格：明亮开放，有一些魏玛风格以及魏玛精神。

我们的新朋友是这种精神的使者。私人诊所的开张使我父母的朋友圈变得更大更活跃；病人成了我们的朋友，朋友也是我们的病人。与恩斯特·汗布格尔和他的妻子（开始是朋友，然后是病人）建立起来的友谊是最持久的。汗布格尔比我父母年长几岁，是个犹太人，曾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战前教过中学生。他很有魅力，和蔼可亲，

尽管生气的时候有点急躁，还有点摆老师架子。他是一名中间派社会民主党人，致力于各种社会改革，务实，不会空想。当我父母认识他时，他已经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人物；布雷斯劳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他的选区，从1925年开始，他就是普鲁士议会的成员，在整个魏玛统治时期，议会都受到社会民主党和中间派人士联盟的控制。这个联盟的杰出领导人是奥托·布劳恩，平民出身，来自东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是魏玛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现在基本上被遗忘了。汗布格尔与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因此也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汗布格尔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个死敌，1928年后，德国共产党开始了一场斯大林主义运动，将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他则成为反对纳粹的一个不屈不挠的竞选者。因为原先当过教师，他对教育特别感兴趣，同许多魏玛的进步人士一样，他很早就对我母亲的工作产生兴趣。在随后的噩梦中，这两个家庭走得特别近，在关键时刻相互帮助，以求生存。

另一位朋友是赫尔曼·吕德曼，他是下西里西亚省热情激昂的社会民主党省长，有着普通的雅利安血统。另外，齐格弗里德·马克也是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魏玛初期就成为布雷斯劳大学的哲学教授。马克是一位专门研究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偶尔为左翼期刊撰写文章，对于右翼同事和学生来说，他尤其是一个眼中钉。他的妻子克莱尔——我从童年以及后来从纽约开始都记得她——是魏玛的一位“新女性”，她的外表和思想都是现代的，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在布雷斯劳，有人示意她，她的独立和冒险是危险的。还有一个朋友是恩斯特·埃克斯坦，他是一个新分裂出来的党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当地领导人，这个党派要求的是一个真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反对僵化的、官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并认为自己能积极地取代屈从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作为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埃克斯坦是一个民众领袖，能对一些工人产生巨大影响的演说家。他的妻子是我父亲的长期病人，埃克斯坦本人则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我拥有一本乔治·

勃兰兑斯写的《伏尔泰》，是埃克斯坦题了字送给我父亲的，以表示感恩的友谊和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

经常向我父亲咨询的普通医生，就像他的病人一样，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尽管布雷斯劳的犹太医生比例仍然很高。许多犹太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如雅达松的继任者马克斯·耶斯纳，以及汉斯·比贝尔施泰因，他也是一位皮肤科医生（他当医生的妻子埃纳，是皈依和殉难的加尔默罗修会修女伊迪丝·施泰因的妹妹，这位修女后来受到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册封）。他还有一个经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圈子，除了阅读之外，打牌是他主要的消遣方式。他们打得最多的是斯卡特，一种三人玩的德国纸牌游戏，有时候也会四个人玩。当我父亲和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加布里尔（约翰内斯文理中学的自由主义派校长）以及两名律师劳特巴赫和卡尔·哈克斯一起打牌时，尽管赌注很少，但他们的情绪很高。这些牌友都是基督徒，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们成为“雅利安人”，这个事实并不重要。他们继续聚在一起打牌，直到那个最后的关头。

我怀疑我父母明显的、自由的世俗脾气是魏玛这种特定环境的特征。在专业的犹太人士和新教圈子里，宗教往往是私事。当然，对犹太人的偏见不仅存在于非犹太人之中，毕竟还有许多犹太人的自我批评，不论是以严苛的或开玩笑的形式出现。反犹太主义就是这种偏见的恶毒形式，它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通常是在人事聘任方面。当然，我父母了解反犹太主义对爱因斯坦的攻击，以及因为排犹阴谋，理夏德·维尔施泰特愤而辞去慕尼黑大学的职务。他们遇到的反犹太主义有着各式各样的伪装，留下了无数逸事。我已故的朋友费利克斯·吉尔伯特——20世纪20年代一位具有特别洞察力的见证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保守派和反动势力以其傲慢态度和侵略性开始主宰学术界”。那些势力打击魏玛的任何支持者——如果支持者是犹太人，打击就会更加猛烈。

反犹太主义的形式有很多，其中最恶劣的形式是民族主义右翼的主题，而且人们对反犹太主义太掉以轻心，以为它只是一种肮脏的政治，粗俗而令人十分厌恶，太容易认为它是暂时的。与此同时，犹太人在大多数公共生活领域崭露头角。他们曾经被禁止进入的领域，尤其是军官队伍，其公共重要性已经降低了，因为不再采取征兵制，军队成了国中之国，与平民生活分离。左派可能实在太急于去嘲笑和诋毁军队——过去国家的命令给了他们很多无端的伤害。

在许多领域，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一起工作。我怀疑，虽然有许多非犹太人医生会打电话向我父亲咨询，但有些人也会犹豫不决。同样的情况，即使程度较小，在社会领域也是存在的。我父亲与内科医生莫蒂默·冯·法尔肯豪森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向我们讲述了关于乔治·夸贝的故事，他是布雷斯劳一位著名的律师、作家，也是一位病人，有着压抑不住的机智和真正保守的观点，他在一本大不敬的书里哀叹道：在德国政治中没有真正的保守党了。

无论他们怀有何种无声的偏见，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社交中混杂在一起。我怀疑，大多数人，尤其是上层阶层的人，都会意识到人们正式的或放弃的宗教身份；每个人都知道谁是谁——谁是基督徒，甚至谁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谁是信徒，谁不是，谁又是犹太人或犹太血统的基督徒。但有意识并不意味着要分离；专业合作程度仍然很高，社会混合度也是如此。参考布雷斯劳的一个例子：保罗·埃尔利希的女儿施特凡妮，人们叫她施戴法，嫁给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布雷斯劳纱厂老板恩斯特·施韦林。这对谨慎的犹太夫妇有一个沙龙——类似于上一代奈塞尔的沙龙，他们的常客包括托马斯·曼、格哈特·豪普特曼、默伦多夫、阿道夫·布施和其他来访艺术家。（施韦林夫妇是否在慕尼黑访问过托马斯·曼？在他们的熟人中是否存在那种互惠？但是，沙龙举办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通常是不平等的。我父亲最喜欢的名人逸事之一——他喜欢听笑话并擅长讲故事——是关于布施四重

奏组受邀去一个富人家中为一个正式场合演奏。一切准备就绪，包括1000马克的费用，主人有点尴尬地补充说，四重奏将在晚餐前演奏，并且如果他们没有被邀请留下来用餐的话，请他们予以理解。布施的回答是：“哦，在那种情况下，500马克就可以了。”）我母亲家与施韦林家有关系，她和施戴法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我第一次遇到政治上的不愉快，甚至某种默许的恐吓，是在1931年，当时全家人在度假。我们和汉斯·奈塞尔一起在北海的阿姆鲁姆岛，他的年龄与我大致相仿，父亲是古斯塔夫，有个儿子叫迪克·奈塞尔。在海滩的入口处，站着一个人身穿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士兵在叫卖纳粹报纸。毫无疑问，父母的厌恶影响了我的第一反应，但那个家伙散发出敌意，并且他的橡皮警棍也暗示着暴力，这幅景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激起了恐惧，我想还有某种病态的蛊惑。回到布雷斯劳后，我看到了很多这种穿制服的暴徒，独自或举着旗帜唱着歌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行。我学会了避开他们。

他们仍然算是一种不幸的精神失常。现实存在于其他地方，1931年我舅舅的婚姻就是一个例子。他叫彼得·布瑞格，是布雷斯劳大学教艺术史的编外讲师，长相英俊，颇有魅力，有点冷漠。他娶了一个学生，美丽并具有非凡自制力的芭芭拉·里特，是一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克里斯蒂安·汉堡家族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德国最大的哈巴格航运公司的经理。精心准备的婚礼在汉堡举行，我母亲为此安排了婚礼必备的表演节目，都是有关新婚夫妇的完美的戏谑和调侃，大胆但适度，诗句配上了当前流行的曲调，包括《三便士歌剧》中最著名的曲调，以供整个婚礼宴会演出，新娘和新郎的父母都出席了婚礼。

未说出口的看法是什么呢？我的祖母是否觉得里特家族以无可挑剔的祖先渊源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她自己的家庭，因为她的家庭中只有孩子们受过洗。（布瑞格家最年轻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是布雷

斯劳大学教遗传学的编外讲师，有才华但缺乏魅力，有点像害群之马，早些时候娶了一个出身于基督徒海军军官家庭的妻子。）或者她只是因为彼得娶了一个出身于“好人家”的妻子而感到高兴。大约六十年后，在20世纪90年代，我问芭芭拉当初她的家人对她所选择的新郎的反应。她以她快人快语、直截了当的性格回答我，她记得她母亲曾对她说：“我觉得好像你把几滴污水放进了一杯干净的水中。”这是一个挺吸引人的比喻，带着些许奇怪的性暗示，而且也许不是一个不寻常的回应。然而，这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里特父母支持他们的女儿在爱情上的坚贞，在形势必要的时候，与丈夫一起移民国外——甚至在他们永久离开时还帮她将一幅诺尔德的油画和一幅巴拉赫的素描偷运出德国。

还有一次度假回忆，1932年夏天在北海的坎彭，同行的有恩斯特·汗布格尔和他的家人，彼得和芭芭拉·布瑞格夫妇以及芭芭拉的弟弟约布斯特。这里的海滩反映了德国生活中愈演愈烈的政治化。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柳条沙滩椅，周围是精心打造的沙墙，这些堡垒大多数插着一面旗帜：有的有着共和党的色彩，有的是民族主义者的帝国旗帜，或者是纳粹标志。快成年的约布斯特为了给我的姐姐和汗布格尔的女儿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怎的，突然把我抛向空中，当我落在坚硬的沙滩上时，我的右手腕断了，结果我被送去了当地医院，我因骨折需要在那里动手术治疗。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当时的恐惧，我戴上了一个乙醚面罩，一边被要求大声数数，一边担心自己会窒息。

（我感觉到在手术室里父亲离我很近，这还是很有帮助的。）回到家后，我的手臂被固定在石膏夹中，母亲定期带我去诊所，在那里，我的被石膏套住的手腕要放在一个简单的机器中，轻轻摇晃，转着圈子活动：不断的运动会带来剧烈的痛苦，但据说有助于手腕恢复灵活性。我把每次去就诊称为“恐惧经历”（Angstweg）——这成了一个频繁被引用的术语。未来的几年里，生活中的大部分将由“恐惧经历”组成。那么，是所有的药物对疼痛都如此没有功效，还是我过早

体验了当时仍然流行的一种德国迷信：痛苦是一种高尚的经历？那次事故也有一个好处：由于手腕受伤，我几乎不能写字，便得到了一台破旧的打字机。在以后的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沉迷于用打字机写作。

但是，在1932年，所有德国人不得不忍受更多更为严重的“恐惧经历”——我也品尝到了些许。恶性通货膨胀后不到十年，德国在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遭受了高失业率的困扰；到了1932年秋天，大约有600万人失业，还有很多人在从事短期工作。失业者及其家人面临饥饿、绝望和羞耻。大多数人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状态，像往常一样对政治感到绝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必然证明了自己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获利者，这似乎证实了列宁主义的预言。共产党在选举中的成功引发了恐惧，使保守的中产阶级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寻求保护——如此针锋相对的极端分子却在互相帮助！甚至富裕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于反动的观点。

这段时期经历了四次全国选举。1932年春天，刚刚成为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两次总统选举中与兴登堡成为对手——此时，兴登堡这位陆军元帅是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两党的候选人。共产党人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对于左派和天主教选民来说，八十来岁的新教徒兴登堡看起来罪恶较小。在他们的支持下兴登堡重新当选，然后就马上解除了布吕宁的职务，而布吕宁一直是兴登堡获胜的推动者，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旧时亲信，被轻蔑地称为卡玛利拉（智囊团），他们被授予总统的法令权利。兴登堡下决心阉割议会制度。此时，兴登堡在东普鲁士的一些地主朋友被怀疑涉嫌各种物质诈骗。捍卫特权和贪婪加速了魏玛的灭亡。

新任总理弗朗茨·冯·帕彭成为一个轻率的掘墓人，葬送了所剩无几的德国民主。到目前为止，魏玛国防军大体上已成为德国政治生

活中躲在幕后的主导力量，凭借这支部队的支持，帕彭清算了普鲁士的奥托·布劳恩政权，这是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民主堡垒，有着共和党警察部队和大部分忠诚的公务员队伍。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变。社会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屈服了，觉得自己太弱，不能号召抵抗，但他们自己队伍中的激进分子对他们认为是致命的愚蠢行为感到震惊。帕彭为普鲁士政变找的借口是公共秩序全面崩溃。1932年夏天，血腥冲突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产党之间，或者也可以称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帝国战旗的成员之间。帝国战旗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阵营；我很欣赏帝国战旗三支箭的标志，代表法国大革命的三位一体。

尽管许多德国人受到希特勒的蒙骗或者对其意识形态承诺深信不疑，但还是有足够多的人知道妄图篡夺权力的纳粹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年轻且极有前途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库尔特·舒马赫说得好：“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对猪的永久吸引力。”就在1932年那一年，身为民主党议员和杰出作家的特奥多尔·豪斯警告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旦执政，将创造一个“极权国家”。这种声音是永远不会缺乏的。

7月又举行了一次议会选举，我父母租了一台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还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忧郁，因为选举结果比他们的噩梦还要糟糕。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赢得了37%的选票，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前景，只是因为兴登堡拒绝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除非他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才能带来部分光明。谈判毫无结果。即使希特勒取得了如此大的胜利，许多人仍然低估了他和他的摩尼教演讲词的成功。纳粹主义的盛况，一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盛况，是教会和军队仪式的一种世俗混合物，继续吸引着被打败了的、被剥夺了权益的、自我鞭挞的人们。笃信暴力的希特勒，在修辞上将政治复杂性融

进了纯与不纯、日耳曼英雄和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叛徒之间的一场瓦格纳^[8]式战争之中。

8月，在上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五名纳粹冲锋队员当着一名共产党工人母亲的面杀死了这名工人；当这五人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时，希特勒给他们拍了封电报，称赞他们坚定不移的忠诚。对于民主党人或仅仅是对于正派人士而言，希特勒对暴力的嗜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同情者为这种过度行为制造了减轻罪责的借口，正如许多人在纳粹上台后所做的那样，但也许还有一种未公开承认的对武力、对进行中的恶魔行为的崇拜。言论和行为中的暴力有其自身的魅力，就像观看斗牛的观众或好莱坞电影的观众所知道的那样。

1932年秋天，暴力在德国随处可见，政治集会经常被迫中断，街头冲突每天都在发生。那年秋天的某个时刻，一枚炸弹扔进了恩斯特·埃克斯坦家的起居室，奇迹般地没有伤到任何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很害怕，我知道是谁投掷了炸弹——是纳粹干的——尽管我不认为我知道婴儿来自哪里。（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视为早熟青年，但是性话题仍然是禁忌。）大致就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将汗布格尔和埃克斯坦一起请进他的书房，希望他们的两个政党——尽管力量不平等——能够超越分歧，携手共进。但这未能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党派利益胜过了对付希特勒的共同阵线的需要：这是普遍失明的一个缩影。

下一次选举定于11月举行。在星期天这个选举日里，我父亲被请到一个乡间小镇去参加紧急会诊。他雇了一辆车（我们没有车），并希望我陪他前去。我母亲出于对暴力的害怕和对我的过度保护，反对我同他一起去——但反对无效。这辆车的挡风玻璃破了一块，我父亲半开玩笑地指出这一残缺，因为他不想之后为此付钱。司机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补充说，在选举日，有很多车窗会被砸，所以他要等一

等，选举过后再来修复这块破损。我知道，邻近的城镇里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但我们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后来还就此开玩笑；我想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整个经历让我充满忧虑。

11月的选举记录下了纳粹得票率的第一次下降，从37%直接跌到了33%（在布雷斯劳是从43%下降到了40%），足以使该党的反对者欢呼喝彩了，他们希望这场运动能够大获全胜。已经是第三大党的共产党的票数增加了，他们的实力进一步震惊了社会民主党和反动派。但到目前为止，议会已完全被边缘化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被任命为总理；他制订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计划，用以减少失业，以及最终在左翼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和右翼工会之间建立联盟，而魏玛国防军则可以作为一个威权政权的最终担保者。但在几周之内，他成了针对他的宫廷阴谋的受害者。这纯属发生在那几个月的轻率之举！

我的生活仍然受到庇护。1932年4月，我到我们家附近的一所名为维因霍尔德的小型私立学校就读；那里的老师被称为“阿姨”。^[9]上学路上，我要经过父亲安置了一些病人的诊所，还要经过邮局，后来那里变得非常重要。我的第一张成绩单上写着，我的行为“愚蠢且不守规矩”。这句话后来在家里经常被引用，主要是用来开玩笑，但我现在想知道学校里偶尔的顽皮是否会取代家中公开的蔑视。我正在成为一个被宠坏的因此并不快乐的孩子，笼罩在舒适的特权和父母的吹捧之中。我很想知道，假如生活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话，我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1933年1月30日——我七岁生日的前三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听到报童们在大声叫卖号外，标题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我拿了一张报纸单页带回家给我父亲。他下午一般在患者到来之前会休息一阵，我把号外给了他，我知道这是坏消息，他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天下午，我听到街上传来隆隆声，从我的小阳台上我看到一连串散乱的衣衫褴褛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红色横幅后面行进着，有节奏地呼喊“饥饿，饥饿”。这是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游行——我猜想，这是在布雷斯劳的最后一次游行。我是完完全全同情示威者的，他们后面很快就跟上了一群纳粹分子，沿着街道中间行进，举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纳粹旗，还挥舞着警棍和匕首。即使在今天，对我来说在大街上上演的这种赤裸裸的威吓戏剧也是一个异常清晰的惊人场景。六年后，在另一个国家里，当我读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我都会感到震惊：这是对早期童年错觉的残酷修正。我想，如果这些场景不是一场全方位灾难的前奏的话，我原本是会忘记它们的。

在魏玛即将寿终正寝时，我才真正了解它——而这也是后人对它的看法。半个多世纪以来，魏玛已成为政治失败的代名词；只要有一个民主制度即将沦陷或一种政治体系处于危机之中，人们很快就会称之为“魏玛”，似乎它是一种衰竭性政治疾病的通用名称。

或者，魏玛将被作为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而名垂青史，它当然是的。在大众的想象中，超越极限的野蛮可能也有它的一个特殊位置。德国在艺术、建筑、电影，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惊人创造力和创新标志着一场新的有时不和谐的高潮，所涉及的正是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文化上做出的承诺。但是，在战争和失败的挑战之后，这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却使数百万德国人感到不舒服，他们感觉受到现代性的威胁。他们没有读过图霍尔斯基的著作，甚至可能连托马斯·曼写的书都没有看过；他们不会对爵士乐和《三便士歌剧》亵渎神明的剧本感到兴奋，不会惊叹于包豪斯建筑物的屋顶平台和绚丽采光，也不会认真思考保罗·克利的幽默的抽象艺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难以理解但广为人知的相对论中看到了一个犹太人的欺骗行为。他们认为所有革命性的实验都是对旧习俗的破坏，是外星人、世界主义者和犹太操纵者的无神论作品。他们在一个领域遭受了文化冲击，在另一

个领域又遭受了金融灾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此屈服于纳粹种族言论中的怀旧声音，并相信他们所承诺的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回归真实、统一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痛恨并最终禁止了魏玛文化中真正属于德国和欧洲的东西：在思想和生活中大胆地迈向现代化。

由于出身和家庭倾向所赐予的机会，我目睹了魏玛勇敢的政治捍卫者，不论男女，他们立下志向，要致力于实现以往的启蒙运动的理想。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德国艰难地经历了连续的、可怕的、令人麻木的创伤：失败、卑贱、恶性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崩溃——所有这一切被压缩进了十四个年头里。在这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坚持了议会政府，意大利却放弃了民主转而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东欧（马萨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则采纳了专制政权。面对来自自封的爱国者和支持他们的物质利益的无情代表的野蛮反对，德国人对待民主只给予一种冷漠的往往缺乏想象力的辩护，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民主的捍卫。

在魏玛结束时，我也一眼瞥见了它开始时的希望——它的结束恰好是我的政治教育的开端。我的所见所闻足以了解到德国的男男女女确实在与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做殊死斗争，它的崛起并非不可避免。魏玛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1] 对败者苛刻的和平协定。——译者注

[2] 在我出生前几周，哈伯写信给我父亲，他的感情促使他使用了非正式的称呼“你”（du）：“你和你的妻子将不得不忍受与我交谈的困难，并且对待我就好像我真的是你们父亲的兄弟，如果你们觉得尴尬，我是完全能给予体谅或同情的。”也许一开始情况确实如此，但很快他就成了“弗里茨伯伯”——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他。

[3] 1926年，在闵可夫斯基七十岁生日那一天，施特普发表了一份令人惊叹的长达十三页的献词。他记录了闵可夫斯基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非常感人地回

忆起他作为教师、导师和临床医生的人文素质，称赞他为布雷斯劳所做的一切，包括完美地扩建了医院以及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礼堂。“今天（这个礼堂）装饰的闵可夫斯基的半身像，是他的学生和朋友置放在那里的。”施特普一直留在布雷斯劳，直到1934年，他被指派去慕尼黑接任一个更有声望的职位，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到1945年。那项任命证实了在我家中所听到的传言：甚至在1933年之前，施特普就是一个希特勒的同情者——当那个荣耀的半身像在1933年被移除时，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没做！

[4] 闵可夫斯基在进步道路上曾经困难重重，尽管他的老师瑙宁认为他是所有助手中最好的。闵可夫斯基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这就足以延缓他的进步了。1924年，瑙宁发表了自传，为闵可夫斯基遇到的艰辛表示惋惜，但既不承认其中的真正原因，也不承认他自己不愿意助他一臂之力。

[5] 扫罗是保罗的原名，经耶稣点化，从迫害耶稣者转变为耶稣门徒。——译者注

[6] 我很介意我父亲发脾气，他几乎总是针对我母亲发脾气。有一次，当时我只有四岁，我走到电话机前，假装拨电话给动物园，要求和狮子先生说话，并请他过来吃掉我父亲。这个故事经常出现在我童年时代的记忆里，直到今天我姐姐还记得这个故事。

[7] 从1926年到1933年，他同他父亲一样作为一名法医专家参与庭审案件，经常涉及退伍军人的诉求。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战时服役之前或在工业事故发生之前是健康的，之后得了冠状动脉疾病，那么这个人也许就有权利获得赔偿，因为特殊的压力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疾病。

[8] 瓦格纳是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是德意志精神的代名词，其音乐剧能制造出集体癫狂。——译者注

[9] 近年来，维因霍尔德学校的一些同学写信给我；大多数男生在战争中丧生了。一个“雅利安”女孩提醒我，我们的大多数同学或是犹太人或者出身于贵族家庭（包括一个真的疯掉了的俾斯麦人，我记得他从街上捡起马粪然后放进嘴里）。另一个同学名叫蕾娜特·哈普雷希特·拉斯克，她还记得，当她和她的妹妹作为奴隶劳工不得不佩戴一颗黄色星星符号时，那些贵族孩子后来表现得最为正派。因为她的妹妹是一位有天赋的大提琴演奏家，被选入集中营内的管弦乐队，所以她才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生存下来——她妹妹的事迹还成为一部著名电影的主题。蕾娜特与克劳斯·哈普雷希特结了婚，克劳斯一度是德国总理维利·

勃兰特的亲密顾问，并且是一位多产的德国作家。他们生活在蔚蓝海岸边上的一个法国小村庄里。

第三章 第三帝国

第三帝国在胜利和欺骗中登场。1933年1月30日晚——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纳粹夺权（Machtergreifung）纪念日——一群身穿制服的纳粹突击队员举着火炬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绕柏林总理府游行的闹剧，聚集起来的势力和对武力的颂扬暗示着他们压抑已久的对暴力和报复的渴望。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自信的青年人迈着正步发出的声音，在全国广播中尽职尽责地播放之后，可能会令人回想起1914年8月的那些日子，当时德国人民曾纵情于团结和牺牲。但这只是新政权的一个方面。

在非纳粹大众中——他们在德国人中仍占大多数——特别是在“不关心政治”的人群中，许多人可能感到宽慰的是，政治权威可怕的不确定性似乎已经结束，某种布尔什维克政变或左翼卷土重来的威胁已被解除。当他们说服老迈的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一个只有三名纳粹分子和九名保守派组成的政府的总理时，他们可能已经相信了右派阴谋家所相信的东西。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了新政府意味着对民粹主义和凶残的煽动者进行了保守派的驯化，希特勒成了其所负责的利益的俘虏。“凡众神欲毁之人，必先致其哑然无语”，在这种情况下，老派精英们有意的视而不见首先摧毁的是那些无辜者。

但即便是敌人和怀疑者也不可能像亨利·詹姆斯所说的去做出“灾难的想象”，预见纳粹主义的全部恐怖行为，更不用说预测纳粹党获得全部权力的速度了。毕竟兴登堡还在台上，他可以作为某种基

本的脸面的守护者，宪法也是如此。在原先的专制政权下就存在的法治国家（Rechtstaat）也肯定会坚持下去。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厄勒尔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成了“他们自己脸面的牺牲品”；尽管纳粹暴力体现在其言论和行为上，但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即将来临的纳粹党徒彻底的人性丧失。然而，恐惧依然存在，难道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独裁统治的开端吗？纳粹自己也不确定，但事实证明他们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即兴演员，在走向绝对权力的道路上堪称杰出而无情的战术家，向其国内外的敌人发动了战争。他们绝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德国人在他们面前兴高采烈，奴颜婢膝。

在对待任何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时，我们必须牢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段历史并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我们的任务是努力重新塑造当时人们可能的希望和忧虑，我们还必须记住那些以前所未有的迅捷速度发生的事件：一些人在新政权的最初几天可能相信或希望相信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在什么时候，如果有的话，国内外的人们才会看穿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呢？这个问题至今仍然萦绕于人们的心头。

在纳粹政权一开始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家人可能比其他许多人更加“幸运地”接近灾难。别人很快就看到了，也很早就放下了他们的疑虑，特别是对我父亲的担忧；与我情感上坚强但不关心政治的母亲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能适应。我母亲则性格开朗，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并且擅长处理冲突和危机，尽管善良的她宁愿避免它们。而现在，鉴于外部的政治威胁，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是对我而言。

1933年2月中旬，哈伯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对她的第二卷作品表达了谢意，并补充道：“鲁迪信件中出现的对于政治状况的焦虑，以及不那么明确但并非不那么清晰的来自你的信件中的忧虑，只有在你

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东西之后，才能加以克服。在法西斯主义掌握了权力的那一刻，去抵制特定的变化，特别是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成为一种痛苦的受罪，这是没有用的。”但在几周之后，他自己的生活会变得难以忍受。

即使在回顾往事时，纳粹对德国所向披靡的征服仍然令人震惊。在当时，人们就对此惊叹不已。大部分人可能对新的权威表示欢迎，而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有时隐秘的目无法纪的行为会如此迅速地扎下根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用了三年才做成的事，希特勒在德国只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新政府要求在3月5日举行议会选举（不到一年内的第五次全国大选），接着在随后的几周里，纳粹分子控制了街头和媒体，尽管反对派的报纸和集会仍然获得允许，但经常受到骚扰。然后，在2月27日，国会大厦被人纵火烧了，纳粹立即指责共产党人应对此罪行负责，声称这是他们起义计划的第一个信号，只有最严厉的措施才能加以阻止或镇压。共产党人所犯罪责的证据是什么呢？据称在燃烧的大楼里发现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荷兰人，他与共产党人有一些假定的联系。几个小时之内，希特勒政府说服了兴登堡，相信国家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后者尽职地签署了迅速制定的紧急法令，暂停了宪法中所包含的所有公民基本权利，例如，允许不经起诉或剥夺求助法律顾问的权利，直接逮捕任何“受到怀疑的”人。这些法令为随后所有恐怖和镇压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国会纵火案对纳粹和共产党人都大有裨益——对前者有利是因为他们有了借口从而能够“合法”废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后者有益是因为在对荷兰人及其所谓“共犯”的公开审判中，被指控纵火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引人注目地把矛头指向了纳粹头子和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谴责他为肇事者——这一勇敢反抗的姿态把季米特洛夫造就成反法西斯主义的英雄，共产党人因此被合理地视为纳粹主义最勇敢的敌人。历史

学家对纵火案真正实施者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一些可靠的专家坚持认为，个别荷兰人完全可以独自行动并且也可能做到了。我逐渐赞同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但当然，在迅速利用不可预见的机会上，纳粹证明了自己是个高手。

大选在一周之后举行，纳粹获得了43%的选票，在布雷斯劳是50%，加上其民族主义盟友，纳粹勉强地过了半数，但不足以修改魏玛宪法中遗留下来的条款。公开的戏剧性表演和私下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擅长营造壮观场面的纳粹大师们为他们所谓的波茨坦日做好了准备：希特勒身穿黑色燕尾服，头戴大礼帽，向年迈的总统鞠躬致敬，而这位总统却穿着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元帅的制服，佩戴着所有勋章，由旧帝国军队的主要高官簇拥着。这是旧的传统和新的承诺的和解，普鲁士的陆军元帅将他的祝福赐予奥地利下士用纪律约束起来的乌合之众。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普鲁士是何时不复存在的；在道德上，我相信，那一天就是它的末日。

希特勒需要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才能获得他所渴望的四年独裁政权的法律依据。他以最相称的政治家风度向国民议会呼吁，要求授权他依法令来治理，并恢复全民的福祉。在议会大厅里面，相应的礼仪得到了遵守，但在外面，报复的威胁却随之而来，纳粹突击队包围大楼，强烈要求新的法律，“否则的话……”除了一个党之外，其他所有政党都屈服了，最具破坏性的是天主教中央党也屈服了。共产党的议员或被捕或被阻止参加议会。只有社会民主党——97名议员全部到场——在一个充满勇气、令人难忘的时刻站出来反对该法律。投票结束后，真实的、残暴的希特勒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即兴演讲，把他的仇恨发泄在社会民主党头上。那次投票是德国议会制历史上最黯淡的时刻，也是往往太过顺从的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时刻。

尽管取得了胜利，尽管民众逆来顺受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新政权仍身处窘境。纳粹突击队渴望一场真正的革命，渴望人头落地的时刻，渴望更多的暴力。但政府不安地注意到国外对纳粹统治的敌对态度，并对犹太人赞助的针对新德国的“仇恨运动”以愤怒的指责。为了满足国内的暴徒并吓唬海外的反对者，纳粹对犹太企业实施了正式的抵制：4月1日，纳粹冲锋队被派驻在犹太商店和专业机构前面，当然也包括医疗机构，警告德国人——此处该说“雅利安人”——不准光顾犹太人的企业；在一些地方，个别犹太人遭到追捕。抵制的目的是向外界发出通告，如果有外国批评或联合抵制，德国犹太人将成为人质，成为报复的对象。

然而，这一广为人知的纳粹行动远未取得普遍的成功，仅在一天之后就夭折了。该政权又回归到了首选模式，即具有假惺惺的合法门面的“国民革命”。门面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一切看似“合法”并体现在政府法令中，无数的官员和公务员就会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他们的合作是该政权绝对需要的。引人注目的是，由于生存或升迁，德国的精英们或出于热情或出于妄想而屈从于新政权，完全履行了他们对罪恶的统治者的职责，只有少数例外情况。

4月7日，新政权颁布了一道关于“恢复公职服务”的法令；这是一种讽刺性的委婉说法，实则是一项清除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被定义为拥有一名犹太祖父母的人，退伍军人可作为例外）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公民担任公职的行动。这项法律将所有犹太人从所有公职、学术界、医院和诊所以及司法界清除了出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予以辞退。许多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或被驱逐或主动辞去了职务。学生们嘲笑并在身体上虐待他们的老师，而同事们则以第三帝国统治下德国生活中那种特定的姿态，故意朝另一边看，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如此一来，德国犹太人从未感到自在的解放进程就此遭遇了残酷的结局。纳粹的宗旨是将犹太人和有犹太血统的人驱逐出帝国。有

一段时间，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犹太人，例如那些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仍然显耀的犹太人，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尽管针对他们的骚扰和排斥也越来越多。

公开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犹太教授，如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和神学家保罗·蒂利希，也被立即停职或解雇。到1933年5月，工会被取缔，它们的财产被没收；其他所有政党遭到取缔或自行解散；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被置于纳粹控制之下。

在90天之内，一个一党制国家建立起来了，人们被剥夺了西方世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如人身保护。但德国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该政权也依赖于它在一开始就制定的双轨制：一方面国家的法律仍然适用，特别是在财产方面；另一方面纳粹党可以遵循自己的意图。该政权的第一个受害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犹太人的话，他们将受到特别凶残的对待）——没有任何实际的抵抗手段。一些社会主义者，甚至一些犹太人，预计将重新回到旧的被排斥和被镇压的制度上，也许不会比之前的情况更糟糕了。截至3月，已有超过一万名男女被捕，并且在慕尼黑郊区建立了第一个集中营，就是臭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

那些根据立场和自己的评估而归属于国家法律和道德的守护者的德国人却保持沉默。他们的顺从，也许是奴性或迫切的共谋，锁定了第一批受害者的命运，最终也锁定了国家的命运。一个现代的、受过教育的、自豪的文明阶级却如此轻易地抛弃、出卖并且背叛了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这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是恐惧吗？是心甘情愿地默许和共谋？还是冷漠？这些问题仍困扰着我们，没有现成的简单的答案。

我的父亲，一名有着左倾倾向和朋友的犹太医生，很早就预感到了恐怖。纳粹分子几乎立刻逮捕了恩斯特·埃克斯坦，并将他单独监禁；5月初，据说他已经死在纳粹监狱中——有人猜测，他不是死于谋杀，就是因酷刑而被迫自杀。官方给出的解释是死于肺病。我父母告诉我他已死亡，我们家里充满了忧郁和恐惧。这只是纳粹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政治对手的一个例子，几天内他们就被拖到纳粹冲锋队的地下室，遭到毒打、辱骂和折磨。布雷斯劳的工人们在埃克斯坦的棺材后面游行，以此作为最后一个挑衅性的反击。（在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告诉我，他经过痛苦的思考，最后决定不参加葬礼游行；他担心可能会发生暴力冲突，也担心会被拍照。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也许他感觉到一个“资产阶级”医生可能不会被悲伤的工人接受。）此后不久，一位名叫赫尔曼·吕德曼的朋友，被套上一身小丑服装，然后被拖着经过布雷斯劳的街道送往附近杜尔戈伊的一个集中营，旁观者大声嘲笑并朝他吐口水。甚至他的折磨者也对他坚强的忍耐力印象深刻。3月，报纸上刊登了关在达豪集中营的囚犯的照片，讽刺地谈到他们的“再教育”。^[1]

我父亲的另一位“雅利安人”朋友和病人——阿尔伯特·瓦格纳，是个民主党人和高级公务员，他在2月被解职，此后不久被连续关押在不同的集中营里。他被释放后来看我们，他的性情大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政治犯都被警告说，如果被释放后谈起他们所见到的或所遭受的折磨，他们将被抓回去。^[2]当局希望人们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不想让人知道其中发生的恐怖事件。我父亲用明确无误但掩饰过的措辞，警告恩斯特·汗布格尔不要再返回德国，他恰好在那个春天出国旅行去了。这个警告也许挽救了他的生命。

恐惧很快就来到了。我记得有一天，我父亲把那些“危险”的书——库尔特·图霍尔斯基写的书，或者热情的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耶茨基写的书，也许还有阿诺德·茨威格写的书以及雷马克写的

《西线无战事》——从他的开放式书架上转移到前排书籍背后不那么明显的地方。人们在打电话时开始变得小心谨慎，以免被窃听，而且人们知道邮件有可能会被截获。我们学会了只在家里或与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时才畅所欲言。生活变得越来越受控制。

人们常常会忘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是其国内的政敌，曾经参加过战斗并且在之前的选举中有时击败了纳粹的勇敢人士；“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都遭到围捕，后者无疑受到了特殊的虐待。我们只需要回忆一下几位首批受害者的名字，如恩斯特·罗伊特、库尔特·舒马赫和古斯塔夫·达伦多夫等社会民主党代表。

（记录这些纳粹主义早期受害者在集中营中的“生活”的书在国外匿名出版了，这本书是《沼泽战士》，源于囚犯们谱写的一首歌，我是在随家人的一次国外旅行中看到的。）这些男人和女人被正式置于“保护性的监护”——这个词恰好证明了该政权带着讽刺的冷笑——之中，他们发现自己已远离正义，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抗议这些对权利和法律的侵犯。我一直认为，对未来德国行为的第一次考验是去评估德国人会如何对待德国人：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对自己的同胞都毫不顾忌地施加酷刑，那么他们对所谓的“次等人”和日耳曼种族的死敌犯下更加卑劣的恶行还会让人惊讶吗？

这些暴行的目的就是恐吓，事实上，非纳粹和反纳粹者都意识到他们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下，他们怀疑监视无处不在，更不用说被邻居或不满者出卖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陶醉于公共秩序。街道是安全的，并且开放给身穿制服、欢呼雀跃的男女进行聚会游行。人们不时听到元首狂热的呐喊声，带着一种清晰、尖锐的语调，他的仆从们从上到下都在试图效仿。很容易欺骗自己相信秩序是新政权的本质。或者寻找安慰，或者寻找借口，以便解释并减轻对某些事件的一些疑虑：为了制作蛋卷，首先需要打碎鸡蛋。一些过头的事情很快就会消失——毕竟迟钝的兴登堡是不赞成他们的，也许元首

本人也对这些事件一无所知。极权主义政权知道该如何动员他们的臣民，激起他们的热情，假装参与公共生活，同时掩盖并放纵他们实际上的无能。当然也有无数的例外，公开的默许与私下强烈的自我反省共同存在，人们求助于德国人所谓的“内心移民”，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反对以及从公共领域中完全退出。

在1933年3月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我父母去了投票站并投票支持社会民主党。此后不久，他们离开德国去意大利旅行，这是他们很早就计划好的（我相信，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他们去了佛罗伦萨、罗马和西西里岛。^[3]我姐姐和我留在家里，由我们的保姆和隔了一段距离的祖母来照料。我父母的旅行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当时模棱两可之处，我们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纳粹政权只攻击政敌，而“度假”已经涉及逃跑计划了：在国外，他们计划与我父亲的妹妹一起度过即将来临的秋天，她现在嫁给了哈伯的儿子，住在巴黎。到了巴黎后，他们会在那里寻找一个移民的地方。这是一个明确而且现实的计划。当他们在4月下旬返回时，反犹太法律和精神的影晌已经非常明显了。这道清洗行政机构的法律给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做出了规定。我父亲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可以避免该项法律的直接影响，但他停止了学术讲座，改在家里会见一些大学生。我父亲的诊所业务仍在扩大，尽管一些公共保险机构已经将犹太医生从他们的名单中剔除，迫使那些希望留在父亲身边就医的病人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父亲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参加会诊，全科医生会把他请到病人的病床前征求他的意见。大多数雅利安医生可能不再请他参加会诊，但是，非雅利安同行在布雷斯劳所有医生中几乎占了一半。

作为一个专业团体，德国的医生是早期狂热的纳粹分子，与特别受欢迎的犹太医生的竞争一直困扰着他们。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曾经和他一起上医学院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却大摇大摆地穿过马路，不与他打招呼。我父亲很痛苦，甚至可能感到害怕——否则他根本不会提起

这件事，而我也不会记得。即使这个男人感到有些羞耻，他也只是遵循着当时一种普遍存在的德国习惯：人们选择不去看，从而没有看见，也不想知道。Zivilcourage——意思是公民的勇气，这是一个极好的德文词语，却不是德国人的一种做法——变得越来越罕见了。

我母亲写的书刚出版就被束之高阁。她放弃了自己的幼儿园，在家里研究算术教学方法。她的三个兄弟或失去了职位或丧失了未来可能的前景。老大恩斯特曾在布雷斯劳附近管理一个治疗结核病患者创新型国立康复中心，现在他在英格兰的一家类似机构里找到了一个职位。两个弟弟都去了伦敦：美术史学家彼得在考陶尔德学院找到了一个临时职位，后来受聘于多伦多大学；最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最终去了巴西，在圣保罗附近的皮拉西卡巴担任首席植物学家，专事研究兰花——有一个杂交品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是哈伯出面协调的。两兄弟都由他们的基督徒妻子陪伴，她们可以不受惩罚地返回德国进行短暂的家庭探访。这两对夫妇很年轻，完全可以在新的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属于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人之一，作为新法律的直接受害者，“被迫寻找自由”，被迫离开家园。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这一切显得更为困难，我的家人从弗里茨·哈伯的命运中可以最深刻地看到他们的痛苦。作为德国科学界的一根支柱，自1911年柏林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哈伯一直担任所长，身为一名退伍军人，他也幸免于“净化”文职人员的政策，留给他的选择有二：保留他的职位，但以解雇他的犹太同事为代价，或是辞职。（5月，因为担心不知道什么灾难会降临到他和他的孩子头上，他向他的战时合作者赫尔曼·盖尔少将求助；少将写了一封信，证明哈伯在前线的勇敢和宝贵的服务，但这无济于事。）像其他少数人一样，例如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和奥托·斯特恩，哈伯选择辞职，尽管他认为他太老了，不能再重新开始。他曾经为科学和他的国

家而活，现在他成了一个绝望之人。权利被剥夺，生活上潦倒，导致其产生了绝望。“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他在6月给我父母的信中写道。他离开了德国，前往欧洲各个国家，最后在剑桥“定居”下来，威廉·波普爵士和剑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实验室职位，但没有工资。（因此，欢迎他的邀请信只是来自最了解哈伯所发明的毒气武器的人。）他在给朋友爱因斯坦的信中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是个犹太人。”

在最后遭受重创的几个月中，哈伯找到了一位朋友和帮手，此人名叫哈依姆·魏茨曼，是位化学家同行，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他的视野和个性令哈伯着迷，尽管哈伯从未对犹太复国主义表示过同情。他于1934年1月向魏茨曼透露，他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坚定地依附于德国国家的德国犹太人将对犹太复国主义无动于衷。在同一个月，他从他的流亡地英格兰给我父亲写了封信，信中说：“那些不是在德国这个国家里长大并且现在也不在那里成长的人是幸运的。但是，远在莱茵河另一端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正在欠下一笔反人类的债务，其偿还的难度远比他们想象的大；与我们从我们祖先的福祉那里得到的好处相比，你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将从他们父母的苦难中获益更多。”

作为基督教皈依者，哈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犹太人根源，并且不知何故，他能够将一种名义上的基督教与公民宗教，即德国性，以及私下的犹太身份融合在一起。用他的科学语言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保持其稳定解的化合物，但不知怎的，他已经设法做成功了，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或在出生时受过洗礼，或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决定改变自己的信仰——直到希特勒政权以种族取代宗教来定义一个人。尽管种族思想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渗透进欧洲文化中，但只有纳粹德国借助法令让“种族”取代了宗教，使“血统”而不是洗礼成为决定性因素。

在1933年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我们犹太人的根源。但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在我与姐姐的一次口角中，我想出了一些反犹太的绰号来攻击她。我立即被唤到父亲的书房里，这本身就是一件罕见的事。我希望我能完全记住他对我说的话，但我知道当我离开他的书房时，我已经很清楚我们的犹太血统了，而且对以那种方式辱骂我姐姐感到羞耻，我父亲的严厉谴责也是一个惊人的启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才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之前对纳粹的恐惧只是来自我将他们与暴力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毕竟即使是一个孩子也可以凭直觉判断，任何一个正派人士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这个人并不一定是犹太人。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只有七岁，我就开始——至少部分地——有幸得到了启迪。我开始对自己是谁有了初步意识，而且渐渐地，我还知道了自己不属于哪个阶层。

我的父亲和母亲有一些不同的倾向。我母亲能真正感受到基督徒眼中的降临节、圣诞节和复活节的重要性，或者至少她发现新教徒的仪式是表达她宗教情感的唯一方式；我认为她就像一个基督教的自然神论信仰者。但是，我父亲在魏玛时代变得更具挑战性地世俗化了，他对教会公然提倡反犹太主义感到震惊，他热衷于犹太人的笑话，那些笑话以同样的热情嘲弄了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虚荣做作。对我来说，这些令人难以忘怀，它们使我对事物的感觉更加鲜明。下面是我从童年时代就牢记的一个例子。

两个在意大利度假的德国人在他们订的普通酒店相遇了，发现有共同的兴趣，一起长时间虔诚地漫步——简言之，彼此喜欢上了对方的陪伴。在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用一瓶佳酿葡萄酒庆祝他们的偶然相遇。其中一人说：“这太特别了！我现在想要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一件事：我是犹太人。”另一人是个基督徒，他回答说：“我也想要同样坦诚地对你说：我是一个驼背。”^[4]

现在我已经知道我不是雅利安人了，这个词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在某些时候，我可能把雅利安人与基督徒等同起来，认为两者都是我不属于的类别。为了回应我现在在周围所看到的一切，我开始觉得我不是德国人。套用今天的语言，人们会说我对自己的身份还不确定。我生活在一种含糊不清的状态中，就像一个被正式定义为负面的人，也就是非雅利安人。因此整个世界都在密谋让我特别意识到我对家庭的依恋和责任，这既是一种幸事，又是一种负担，然后总是想着飞往幻想中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想象其他可依恋的事物了。与此同时，我的大多数表兄弟仍然对他们的犹太“血统”一无所知，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产生了一个荒诞的想法，即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之所以被迫离开德国，是因为他们的姨妈凯特——我的母亲——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医生。

作为一个小孩子，我被教导要在晚上做祈祷，我读过儿童版的旧约和新约。我们所庆祝的节日一直是基督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它们的世俗魅力而不是宗教虔诚，还有基督降临节，有很多花环和蜡烛，以及圣尼古拉斯节。有一两次，一个盛装打扮的圣尼古拉斯闯进孩子们的房间，粗声粗气地问我姐姐和我是否表现良好，然后从他的大口袋里掏出坚果和苹果给我们。到了平安夜，客厅里会摆上圣诞树，然后全家人一起装饰它，用巧克力圆饼、苹果，当然还有蜡烛；奶奶，常常还有汉娜·朗曼——彼得叔叔的一位“雅利安人”前女友，也会来参加。（依据我的看法，汉娜·朗曼过于虔诚，但在我们离开之后，非雅利安人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她表现得非常出色。）

圣诞节前的庆祝活动到了这个环节，客厅里的圣诞树被点亮，桌上摆满了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在托妮和我未被允许进入之前，父亲会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并念书给我听，最难忘的是海涅的诗歌。他会给我朗读《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中他最喜欢的片段，那是海涅的一

段抒情且充满嘲讽的描述，这个受过洗礼在法国流亡的犹太人，带着他对德国和德语的热爱，以及他对普鲁士压迫的诙谐的谴责，短暂地回到德国的家乡。应我的要求，父亲会一遍又一遍地朗读《两个掷弹兵》，这是一首关于拿破仑失败后他的忠实士兵的诗。其中的一些诗行我牢记在心，现在仍然记得。在其他时候，父亲和我会一起读一本古老的家庭圣经，这是一本美丽的19世纪中期的《旧约圣经》，其中附有古斯塔夫·多雷画的生动的插图，有一幅参孙拆毁圣殿的插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读了特奥多尔·冯塔纳写的歌谣和康拉德·费迪南德·梅耶尔写的抒情诗。

在这个非基督徒的男性的插曲之后，我父亲嘲笑了一番德国的事情，接着就会重新加入其他成年人，一起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只是在这个时候，姐姐和我才会被叫进去。我们围着圣诞树唱传统的圣诞颂歌。然后，姐姐和我被牵着手带到桌子旁边，桌上放着给我们的礼物：一两个玩具、一本书、一盘糖果，其中包括十分珍贵的杏仁蛋白奶糖。我们当然也为父母准备了礼物，主要是我们自己制作的东西，简单的编织品或剪纸装饰品。在仔细查看过所有礼物后（我想它们没有被包起来），就会去吹灭蜡烛（圣诞树旁边总是放着一桶水），然后所有人进入餐厅享用平安夜晚餐——虽然是过节，但相对来说还是不算丰盛：一盘必不可少的鲤鱼，通常还有果冻甜点。第二天会有圣诞节吃的鹅，还有罂粟籽饼以及Zitronencreme，一种柠檬慕斯。有一次，在感激不尽的病人（包括同事，不论他们自己生病还是家人生病，我父亲通常会出于同事友谊予以治疗）送的圣诞礼物中，有一只鹿，我们不得不将这只鹿放在阳台上，然后鹿肉便取代了鹅肉。

现在，这种愉快又矛盾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父母整日忧心忡忡，下决心要移居国外。9月，我父亲收到了一封笔迹有点僵硬的信，是他战时的上司哈迪纳克·冯·哈滕上尉写的。哈滕回忆说，他在1916年7月索姆河战役开始时成为斯特恩的指挥官，直到1917年9月，

斯特恩一直在那支部队服役，“因为在索姆河战役中他（斯特恩）凭借堪称楷模的勇气和尽职尽责，被提升为预备役中尉；在1917年春天的阿拉斯战役之后，我成功地推荐他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真希望德国军队中的每一名士兵都能像中尉那样在最重要的岗位上忠诚而勇敢地去履行他对祖国的责任。1916—1917年在我的指挥下斯特恩做到了，我们本可以免去过去十四年的耻辱的”，他写道。哈滕想不出任何会不把魏玛（或战后时代）视为“耻辱”（这个词就是标准的纳粹说法）的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父亲和我一次又一次地引用这句话，非常看重其中讽刺性的不恰当之处。我父亲是否要求过这个证词呢？这很有可能。但同样可能的是，哈滕自己相信，他的证言可以作为对他的中尉的一种预先保护。这是一种尊重的态度——在德国还是有正派的德国人的，正如在德国还有许多犹太人，他们相信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服役会保护他们。

在这一个月，我父母离开德国去巴黎，同赫尔曼·哈伯及其家人住在一起。现在人们常常忘记当时法国对希特勒的难民特别热情友好；法国政府延续了给予政治流亡者庇护的传统，这激起了情感上广泛的呼应。（但很快，法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父亲曾受到鼓励寄希望于在北非，尤其是突尼斯，找到一个医生职位。弗里茨·哈伯曾经告诉他，在6月，哈依姆·魏茨曼与法国教育部长阿纳托利·德·蒙西讨论过犹太医生在德国被解雇后加入法国在突尼斯的医疗体系的可能性。（在哈伯离开柏林过上流亡生活之后，他和魏茨曼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对哈伯的自我批判现实主义和魏茨曼的宽宏大量的敬意。）10月6日，应魏茨曼的请求，蒙西接待了我的父亲和赫尔曼·哈伯，向他们保证在突尼斯得到这样一个职位看起来“非常有希望”。同一天，马尔加·哈伯写信给魏茨曼，说她对这个消息感到喜出望外，我父亲也附上了一段感激的话：“当人类的卑鄙和残忍暴行正在庆祝它们最大的狂欢时，我们感受到的真正的人性和仁慈的努力具有特别的力量。如果将来某个时候我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我的感激

之情，我会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在等待实现突尼斯的承诺的同时，我父亲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古老又著名的主宫医院担任志愿医生。

我姐姐和我被留在布雷斯劳，由我们的祖母和保姆照顾。在一次普通的流行性感冒后，我感染上了一种严重的肾炎，我父亲的一位儿科医生同事来照料我。我记得自己躺在病床上，被宠坏了，也阅读了很多书，包括一本有插图的儿童版旧约和新约。我逐渐喜欢上了一个特定的出版商出版的书籍，我还记得那些书散发的令人愉快的香气。普·雅达松叔叔曾多次来看我，通过教我他所谓的镜像书写^[5]的方式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但随后我的病突然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表明我的肾脏功能几乎丧失了。我父母及时得到通知后，立即返回，到家已经半夜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父亲很快就给我输了他自己的血，然后嘱咐我严格禁食几天，这是别的医生不愿意强行实施的。几天后，我被迫喝了好几壶清茶。（这种治疗步骤被称为沃尔德促动法，以其发明者、著名的内科医生的名字命名；他的名字将重复出现。）我的肾脏功能开始恢复。渐渐地，我康复了。我患上严重的疾病，被我作为医生的父亲挽救，这种经历可能是我极度崇拜白大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身穿白大褂的人的原因所在。但是，这段经历也可能造成我对疾病的过度焦虑，父亲的担忧更是增强了这一点。

我的疾病也产生了一个有益的、改变了生活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我们乘上了北线卧铺快车从柏林去巴黎，父亲和我共处一个包厢，我们在巴黎北站下车。当经过布鲁塞尔时，我们突然唱起了《马赛曲》和《国际歌》——后者在成为共产主义的战歌之前一直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歌。我们同哈伯一家住在塞纳河畔的讷伊，这是一片舒适的郊区，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仍然躺在床上，但很高兴。我喜欢和三个表兄弟一起玩游戏；我重拾了一些法语，可以用不错的法国

口音说一些废话了。我学会了一种法国纸牌游戏，其中速度是关键，我还记得，因为我出牌很快很成功，有位法国朋友称我为“cochon（猪）”，这使我很兴奋。我尤其记得赫尔曼切长棍面包时发出的尖锐声音，这是每日三次家庭聚餐的前奏。我父母逐渐认识了几个哈伯的朋友，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工程师、发明家让·梅西耶一家和工业化学家约瑟夫·布卢门菲尔德一家，约瑟夫的妻子出生于苏联，是哈依姆·魏茨曼的小姨子。几年后，梅西耶一家和布卢门菲尔德一家成为我们一家亲密的朋友——在美国。

对于我父母来说，客居巴黎是艰苦的，因为在主宫医院的工作是短暂的，而突尼斯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确定。12月中旬，我父亲的姐姐向魏茨曼说道，各种友好人士向她建议，只有法国外交部的干预才能在突尼斯产生有利的回应，因此她向他寻求帮助。她补充说，不然的话，她的兄弟将不得不“回到那个可怕的国家……我认为这会危及他的生命”。魏茨曼动用了他的影响力，但最终蒙西回答说，在突尼斯的法国医生反对难民医生在他们中间蜂拥而至。我相信有三四个德国犹太医生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了。

1934年1月下旬，我父母和年轻的哈伯夫妇从巴黎前往巴塞尔去探望弗里茨·哈伯；哈伯从不幸福的流亡地剑桥来见他们，以便讨论每个人对未来的计划。到了这个时候，由于他对同化的幻灭，以及他与化学家同行魏茨曼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还有他对魏茨曼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的信心，哈伯正计划到巴勒斯坦去一趟。他们聚在一起谈话，哈伯还同每个人进行了单独会谈，然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他呼唤我的父亲；一次心脏病的突然发作结束了他的生命——一年前几乎同一天，希特勒登上了权力宝座。

葬礼在巴塞尔举行，哈伯最好的朋友理夏德·维尔施泰特在墓地发表了讲话。德国媒体几乎没有提及哈伯的逝世，但消息传得很快，

维夏德·冯·默伦多夫立即给我母亲写了一封吊唁信，因为他和她都特别亲近哈伯。他认为哈伯的离世是一种良性的解放。如此伟大的人竟然无法生存下去，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在所有的尊严全面崩溃之中，他不得不失去镇定，而我们这些他曾经的朋友甚至现在看到他……绝望地蹒跚而行。无法看到他……成了自己本性遭到肢解的囚犯。作为其中一个，我觉得他值得完全失去意识的安宁”。我最近发现了一封爱因斯坦致他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的未发表过的信，信中提到他当然知道哈伯的死讯：“柏林的那群猪是如何奖励他的成就的。当然，在战争期间，他们可以利用他。”在给赫尔曼和马尔加的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哈伯是知识上最渊博、最能激励人，也是最愿意帮助他人的人。”

甚至在全家人从巴塞尔返回之前，我姐姐和我都听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弗里茨伯伯曾经在我的小宇宙中是一个中心人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保护人，我知道这对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我的父母失去了一位父亲般的朋友、顾问和保护者，我们陷入了阴郁的境地。此时此刻，所有的希望破灭了，父母沮丧地决定我们应该回到布雷斯劳去。（我知道在1934年另外有一些德国犹太人从流亡地返回，他们以为最坏的情况已经结束了。但我父母并不这样认为，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临时步骤。）

在我们离开巴黎之前，也许是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父亲结束了为了让我彻底康复而对我实施的“软禁”，带我参观了巴黎：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拿破仑的坟墓、巴黎圣母院等。早些时候，我收到了一本精彩的少儿图书——《小朋友眼中的拿破仑大帝》。我很高兴地读完了，现在还很珍惜这本书。我对拿破仑传奇以及法国的迷恋就是从此书开始的。

2月6日，我们仍然在巴黎。这一天，右翼团体利用公众对所谓的斯塔维斯基丑闻的愤怒——丑闻涉及一名与中间派政客暗中勾搭的犹太移民贪污犯——而走上街头，引发了一场发生在下议院前河对岸协和广场上的血腥对抗，死了好多人，有1500人受伤。协和广场上被推翻的公交车和骚乱景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法兰西共和国仍幸免于难。2月下旬，在我们离开法国返回布雷斯劳之后，当我仍然深陷过度亲法的状态而不能自拔时，我写下了第一份政治信件，信中表达了我們想留在那个伟大而美丽的国家的请求。可叹的是，这封信寄给了一位名叫皮埃尔·拉瓦尔的政府成员。本意是正确的，但收信人是错误的——不必说，这封信从来就没有被投递过。（我父母确实把信寄给了汗布格尔家，他已经定居在巴黎。）

我们一回来就面临公共秩序和私下隐忧之间的巨大反差。德国弥漫着一种和谐的常态气氛：政治上的反对派被投入监狱而缄默不语，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每一次成功都被作为公众的胜利而大肆庆祝。纳粹已经建立了为期一年的Arbeitsdienst，或叫作强制劳动服务，即刻减少了失业人数并提升了民族意识。（这个主意曾经由瓦尔特·拉特瑙提起，而施莱谢尔在一年前付诸实践。）我们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这个说法，其意思是强制整合；更有可能的是，许多人，尤其是“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松了口气，为自己做出了决定，自由地去适应新政权——至于其他人，则交头接耳地说着关于纳粹头子的笑话：肥胖的、挂着奖章的赫尔曼·戈林和足部畸形、滥交的约瑟夫·戈培尔。我记得那些笑话，但我更清楚地记得在家里和朋友之间不同程度的不安和忧郁。

在我们回国几周后，我母亲收到了理夏德·维尔施泰特的一封信，信中很好地表达了对德国状况的一些不同反应。他很高兴我们全家妥善地安顿了下来：“今天，我们成了在自己家乡（Heimat）的外国人，就像在外国土地上我们真的是外国人一样。但是在家乡我们还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可能被轻易地剥夺的。”维尔施泰特相信，我父亲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奉献精神，将会或应该成为一种幸福和全身心的投入，这是对所失去的东西的一种补偿。他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以避免染上“国家和时代的疾病”，在他的“布雷斯劳的职业中”去发现“比外国任何新鲜事物更有价值和更充实的东西”。维尔施泰特自己的研究比过去多年来的研究进展得更好、更快乐。然后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在许多地方，例如纽伦堡、曼海姆和法兰克福，犹太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处理事务很糟糕；他们的生活丰裕、富足，却常常不谦恭，以至于经常变得软弱可欺。人们必须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也有其好的一面。”（一年后，他在其他事情上再次写信给我的母亲，并补充说他很高兴她通过了驾照考试，现在家里也有一辆车了，“这对你来说绝不是奢侈品，比起所有雅利安人，我更愿意你拥有它”。）

在缺席半年之后，我再回到学校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困难之处。我猜想老师们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延长在国外的逗留期。在早前几个月里，许多德国犹太人（不论什么信仰！）纷纷离开德国；有些人像我们一样回来了。父亲的诊所恢复得相当迅速，就像以前一样，既有雅利安病人，也有非雅利安患者，只是与雅利安医生的接触要少得多。非常奇怪的是，我父亲的一些临床医学论文能够继续发表在主要的医学期刊上。那年春天，他被邀请就内科疾病的创伤起源的某些方面向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医学大会提交论文。（在离开德国领土后，德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很有礼貌地对待他。）我母亲也接受邀请将她的算术教学法论文提交给在伯尔尼召开的学术会议。每一次涉足海外都会提高全家人的情绪；但在精神上，我们早已生活在流亡之中了。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得到了两只兔子，由我来照管。我把兔子放在我们公寓楼后院的一个板条箱里。一天，我发现箱子上潦草地涂

写着纳粹符号。我心烦意乱，于是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兔子不应该生活在纳粹符号下，因此兔子就被安全地送到我祖母家的花园里去了。回想起来，我把这看作对我父母的一种无意识的、不那么微妙的预示。

公共秩序和严格的审查制度掩盖了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冲突。把希特勒送上权力宝座的保守派人士，特别是现任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及其朋友，对于该政权进一步激进化的前景感到越来越担忧。帕彭用隐晦的语言公开警告不要再进行第二次革命——但这正是数百万纳粹冲锋队员所渴望的目标。他们寻求更多的权力，希望兼并国防军，而后者则反过来拼命反对任何削弱其权力的努力。

6月30日，公众了解到了希特勒的“解决方案”。在“长刀之夜”中，希姆莱的纳粹党卫军——纳粹的精英卫兵——清算了纳粹冲锋队的最高领导层。希特勒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声称，正如他就国会纵火案所说的那样，他把国家从一个大阴谋中拯救了出来。他还处死了冯·施莱歇尔将军（以及他的妻子）和冯·布雷多将军。其他各类非政治人物，包括犹太人在内，也被随意谋杀了。^[6]几天之内，某些残留的体面的担保人、非常受人尊敬但过分软弱的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果断行动表示了感谢。国防军的统帅部付出了他们表面上胜利的代价——他们有两人被谋杀，这在军队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支军队认为自己是荣誉的化身，但一次又一次地践踏了这种荣誉。

通过用行动来反对他自己的圣骑士，希特勒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展现出他的冷血无情和获取全部权力的野心。他适时地得到了奖励。8月2日，兴登堡去世了，享年八十七岁，之后军队对元首和总理进行了效忠宣誓。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宣誓，已经在道德上破产的军队领导层妄图凭借此宣誓来坚持到最后。兴登堡的葬礼是一场对过去荣耀的精彩演绎。纳粹的壮观场面令人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里的兴奋之情和对纳粹冲锋队领导人的清算，包括布雷斯劳的纳粹警察局长埃德蒙·海因斯，那是一个特别野蛮和可恶的男人，我们为他的死而感到欣喜。（我母亲试图把报纸藏起来不给我看，以免我偶然发现一些事情真相，即一些被杀害的头领是在同性恋放纵的时刻被抓住的。）我们和许多外国人一样，认为这次所谓的大清洗是纳粹政权虚弱的迹象。但事实恰恰相反：已经有100万名步兵服从希姆莱纳粹党卫军里纪律严明的狂热分子。（在其无穷无尽的冷嘲热讽中，布雷斯劳政府不久后重新命名了我们的街道，叫作冲锋队大街。对于失去了领导人和权力的冲锋队的信徒而言，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赔偿！）

我们现在知道，就在那一时刻，斯大林完全认可了希特勒恶魔般的性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是一位非常敏感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当时已在流亡之中，他为一份奥地利报纸匿名写了一篇关于他于1934年夏天在德国故地重游的文章：“我不知道还能用其他什么词来表述，但实际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开始失去‘他的灵魂’。”这是一个使人悲伤的诊断：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正在发生的情况；其他人内心充满了厌恶，拒绝了存在这样一个灵魂的观念。我认为吉尔伯特完全抓住了我的家人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度。

那年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10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前往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马赛下船时遭到谋杀。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杜不幸也意外中了枪，并在随后的混乱中流血而死，横尸街头。巴尔杜是一位有着无可挑剔的保守派信念的人士，他深刻把握了新德国的威胁，并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对这种威胁的东欧联盟，其中包括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像他这样有洞察力的保守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的死对法西斯事业而言是件大好事。他应该被列入那些人们可能进行推测的男女名单之中：假如他们生活在……

我很早就开始了解历史的偶然性，目睹了那些为纳粹攫取更大权力铺平道路的意外事件。我父亲鼓励我去适应公共戏剧事件，因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兴奋。当然，我有正常的私下的担忧，但它们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淡化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朋友的生活的政治戏剧占了主导地位。我过早地生活在成人世界的门槛边上。即使在我受到庇护的私立学校里，我们也被要求在特殊的日子收听广播，如1935年1月，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萨尔州人不得不投票决定是留在国际联盟控制之下还是回归德国。电台大吹大擂地报道有90%的人选择回归德国，即接受纳粹统治。我记得当时我感到很难过，尽管在公共场合中我不得不隐藏起这种反应。

每一次像这样的成功都使希特勒更加胆大妄为，并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萨尔州的公民投票是他最后一次“合法的”胜利，他只是从中摘取了先前国际协议的成果。两个月后，他在国会大厦发表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布德国将无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重新启动征兵制度；作为理由，他声称最近签署的法苏条约违反了《洛迦诺公约》。同时，他提出了各种和平建议，但这一朝向打开重新武装大门的决定性步骤应该是明白无误的。德国的军事准备变得显而易见：我能够看到军队的探照灯划亮了夜空，在为未来伴随着空袭的战争进行训练。早些时候又会有灯火管制。每个人都必须是睁眼瞎，不能去看战争活动的迹象，虽然大多数人也不想看到。（有个笑话准确地捕捉住了这一时刻：学校里有一个班在进行防空演练，当教师发出预先安排好的信号时，所有学生要蹲在讲台和课桌下面。在信号发出后，除了一个名叫莫里茨的犹太孩子之外，其他学生都按照指令做了。怒不可遏的老师质问莫里茨为什么不服从，他的回答是：“我想告诉你，即使在犹太人中也还是有英雄的。”）

碰巧，我父母计划在1935年春天去瑞士奥尔塞利纳度假，这是一个位于洛迦诺上方的山村，可以俯瞰马焦雷湖，我父亲的一个瑞士同

事在那里有一家好客的疗养院。沿着湖，就在意大利边界以南，是斯特雷萨，4月中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洛迦诺公约》的签署国——在那里就如何应对希特勒的挑战进行了讨论。我听到湖对岸传来欢迎的呼声，标志着几位领导人的到来——但当时被称为伟大的“斯特雷萨阵线”只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抗议，仅仅在德国的手腕上拍打了一下来作为对暴力的回应。法国人和英国人希望墨索里尼能够被征召去牵制他在北方的意识形态上的产物，但在那年秋天，他却着手实施了他计划已久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民主国家对意大利实施了温和的经济制裁，希望在阻止这种侵略的同时试图安抚墨索里尼。海尔·塞拉西皇帝这个有尊严但倒霉的人物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向自身难保的国际联盟请求帮助。

政治侵入了每一个领域。那年春天回到德国后，我们这个经受过不可避免的紧张和可能过多的姐弟冲突的结合紧密的家庭，却因我姐姐希望参加坚信礼课程并接受坚信礼而起了波澜。托妮当时十五岁，有着强烈的宗教渴望，她所知道的唯一传统就是基督教，尽管我知道她不会经常去教堂。通常这可能是件私事，但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到政治形势，私人和公众之间的界限就很难划分清楚。她希望接受坚信礼，这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基督教教会和纳粹政权之间非常真实的（也可能是有限的）冲突，纳粹政权早些时候已经下令基督教教会必须遵守公职服务法中非雅利安部分的内容。这项歧视犹太基督徒的纳粹命令是现政权与新教教会不间断的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新教教会就如何应对国家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存在分歧。官方新教一直对魏玛共和国持敌视态度，它的许多神职人员一直坚守着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对魏玛的“不信神文化”的仇恨使其变得更加恶毒。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新教教会中已经出现了自称“德国基督徒”的派别，致力于一种极端的种族信仰，强烈要求从教会的教义中删除《旧约圣经》，并禁止任何对基督教的犹太起源的承认。（这种明显荒谬的教义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在一些新教神学家的言论之中。）随

着希特勒的掌权，德国基督徒的自我定义说明了一切：他们现在自称“耶稣基督的纳粹冲锋队”。希特勒希望德国基督徒能够夺取全部新教教徒的机构。这种努力失败了，其他牧师认识到，尽管他们可能会钦佩纳粹的一些特点，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能妥协的神学和教会自主的问题。

在马丁·尼默勒——柏林富裕的郊区达勒姆的一个牧师——成立了一个新教牧师紧急联盟，即认信教会的前身之后，纳粹政权与相当数量的其他新教牧师之间的冲突开始公开化。新教在西里西亚特别强大，它的成员拒绝遵守非雅利安人的禁令。（当时有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寓言：有个布雷斯劳牧师要求所有非雅利安人离开，以此开始他的周日布道；他重复了三次这个要求，就在此时，十字架上的人物消失了。这些反政权的故事有一种短暂的麻醉效果，它们是世外桃源般的避难所。）像尼默勒那样的牧师和纳粹之间的斗争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进展而变得越发激烈。尼默勒本人对犹太人以及教会在该州的地位有着矛盾的感情，他被关在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在那些年里，成千上万的天主教牧师和新教牧师被投入监狱，他们的立场为纳粹政权的批评者带来了希望。

我母亲对我姐姐的意愿做出了回应并表示强烈支持，她找到了一个认信教会的成员——施罗特牧师，他热切地欢迎托妮参加他的坚信礼课程。（事实上，在第一次上课之前和在她到来之前，施罗特牧师告诉大家，有个非雅利安人会加入他们，对此有个人回应说：“那我们必须要对她好点。”）我父母参加了托妮的坚信礼仪式，但我反对并拒绝去，尽管我家人都恳求我去。施罗特牧师因公然蔑视纳粹政权的命令而多次被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甚至奚落那些来听他布道的盖世太保人员。当我听说施罗特牧师通过在墙上敲打莫尔斯电码来与隔壁牢房的囚犯进行沟通时，我充满了孩子气的兴奋。这些

生动的故事加强了我对异议者和抵抗者的钦佩——我从未丧失过这种钦佩。

但是对于姐姐的行为，我是一个不友好的、不谅解的观察者。我本能地觉得这是错误的一步，是“堕落”进一个我认为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机构。我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对任何被德国基督徒生活同化的努力感到难堪。回想起来，我可以理解她的相反的冲动：她渴望找到一个社区和一个信仰——并且就像她当时的笔记所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她的孩子们最近把她的笔记给了我），她特别感谢施罗特牧师对她的接纳。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出她的感受——或许多非雅利安基督徒的感受——由于纳粹的政策而拒绝一个人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就是对种族教条的投降。

我的家人继续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在这种节庆场合有许多熟悉的习俗，我却过得很不自在。但到了1935年，应该不是在此之前，我感到自己与任何“正式”的基督徒疏远了，并明显与犹太人的身份更加一致，虽然我不知道犹太人的仪式。我常常去看望住在我们家附近的犹太朋友们，去借阅他们的犹太报纸，在纳粹政权下这些报纸仍然得到出版许可。但这些报纸主要是宣告犹太人的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是刊登有关移民地点的信息。

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之外，其他家庭庆祝活动也变得非常重要。在新年前夕，托妮和我几乎总是会背诵我们父母写的诗歌或者为他们背诵诗歌，表演母亲为我们（有时也为我们的表兄弟）创作的戏剧，并且还有一顿特别的晚餐。有着这种节目的节日——我母亲对活跃这种场合的气氛有着特别的天赋——常常被外部世界投下不祥且冷酷的阴影。也许这个威胁到公众的时代增强了重新确认私人幸福的必要性。

书籍变得越来越重要，A. A. 米恩写的《小熊维尼》在我们家里具有重要地位。我坚持认为这本书清楚地描绘了我们的家庭：我母亲显然是维尼，我父亲是兔子，我姐姐是跳跳虎，而我则是小猪。这些名字在家庭和朋友中被接受了，我母亲经常被称为维尼熊，我父亲则被叫作“卡”，来自Kaninchen（兔子）一词，在给国外的朋友写或多或少编了码的邮件时，这便是一个有用的术语。我母亲与米恩通了信，主动提出将他的一些诗歌翻译成德语。

我还记得一本关于一个在纽约的年轻人的儿童小说，这个年轻人从在大街上卖报纸开始直到成为一个大亨。我读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写的《昆丁·达沃德》以及关于拿破仑和克里孟梭的书——我仍然有这些书。我的阅读辅以大量的对话：在无数次散步时，我父亲会谈论起一些医疗危机或治疗方法，并且往往会涉及历史或政治话题。

1935年的主题不是宗教，而是移民。从在巴黎的那个夏天开始，我父母的意图就已经很明确了，他们还在继续探索——而且还被鼓励去探索——所有可能的途径。他们询问了美国方面。1934年3月，援助流离失所的外国医生紧急委员会给出了间接答复：“我们已将斯特恩博士的证件存档，他的名字已引起本国医疗机构的注意。”一有机会，该委员会将立即通知他；如果他想移民执业，他必须按照德国移民配额进入并通过必要的考试。

美国看来似乎非常遥远。告别你的家、你的语言、你在德国的过去，一切都很难解决。我父亲希望在欧洲，或者在一个比美国更靠近欧洲的国家寻找一个临床医生职位。他同另一个协助德国学者的紧急委员会进行了协商，这个位于苏黎世的委员会由弗里茨·德穆特负责。由德穆特亲自去寻找的下一个可能的前景，是德黑兰的一个教授职位。雅达松已经举家迁居苏黎世，并由他在监督这些努力，他生病的妻子一直依赖于我父亲的书面建议。7月，他写道，我父亲过去的老

师埃里希·弗兰克——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曾经告诉他有关他在那里的合同安排；那些信息可以作为与德黑兰商讨的基础。他反复让我们放心，“从气候的角度来看，德黑兰是不错的，除了水之外”。后来的一封信承认德黑兰的卫生状况相当糟糕，但“道路很好”。我父亲拿出了地图集，给我看了一幅波斯地图，然后指出了德黑兰附近的群山。普叔叔以他精练如报文的方式继续说道：“我们完全理解做出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有多困难，但是没有人可以代你去做这个决定。”我认为我父亲并没有全力以赴地追求这种可能性。9月，雅达松再次写道：“我对德黑兰的出局并不感到丝毫遗憾。依据我的原则，我从未赞同或反对过它，但我确信它不适合你。”

下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在安卡拉。伟大的土耳其现代化主义统治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早就决定从希特勒的驱逐政策中渔利，并聘请了最重要的德国移民到土耳其担任一些关键职务。伊斯坦布尔不仅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德国经济学家圈子，还有伟大的医生，包括埃里希·弗兰克和我父亲的老朋友鲁道夫·尼森，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搬到安卡拉。最终这些磋商也失败了。我父亲后来也考虑过在意大利比萨和中国上海的职位。

移民不仅是我父亲的主要话题，也是他的许多同事的主要话题。接着出现了父亲的大批朋友和同事不断离开，奔向不同的目的地。因此，我对世界之浩瀚的第一印象应归因于我们正在试图离开的恐怖氛围。当承认命运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可疑的礼物时，或任何其他不可能且具有讽刺意味的祝福时，我父亲和我都会援引我们在施工现场或在其他平凡的奇观处所看到的纳粹标语：“Das verdanken wir dem Führer!（我们将此归功于元首！）”

长期以来，以充满无限机会的土地著称的美国，现在又被难民们誉为充满“无偿机会”的土地。在经历了突尼斯、波斯和土耳其等地

的失望，以及与列支敦士登王子就管理当地一些政府疗养院所进行的认真谈判的短暂插曲之后，我们有关移民到美国的想法就愈加强烈了。1936年1月，理夏德的美国嫂子佛罗伦斯·维尔施泰特给我们发了一份宣誓书。雅达松也提供了帮助，并指出“除了纽约之外，美国还有很多其他城市，不像纽约人满为患”。他在信中还写了在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被讨论过的选择，随着纳粹政府迫切地想摆脱犹太人，在移民去哪里这个问题上是可以做出额外让步的。

政府中仍然存在一些“保守派”，最著名的是担任经济部长的阿尔马·沙赫特，他试图平衡政府中激进分子的要求，激进分子希望对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发起最后的猛攻，而保守派则警告说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仍然举足轻重，公开的暴力将在国外引起不愉快的反响。

（世界犹太人复仇的幽灵！）1935年5月，据犹太信仰德国公民中心联盟估计，有45万“完全的”——未改变信仰的——犹太人还留在德国，同时留在德国的还有5万名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那一年9月召开的纳粹年度党代会上——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意志的胜利》中出色地捕捉到了那一主要的场面——纳粹政权选择了一个解决这50万犹太德国人问题的“合法解决方案”，宣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令》，将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德国公民身份之外，另行分配给他们“国家臣民”的身份。《纽伦堡法令》是对犹太人的进一步打击，究竟谁是犹太人的定义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该政权及其潜在的受害者：另一部叫作《德意志血统和荣誉保护法》的法律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所有性关系；凡涉及“种族污辱”的违法行为均受到严厉惩罚，并禁止犹太家庭雇用任何年龄小于45岁的雅利安妇女。（随后几年里对盖世太保的最大谴责就涉及“种族污辱”的指控。一旦这种指控被证实，涉事的犹太人受到的惩罚比他们的雅利安伙伴要严厉得多。）

《纽伦堡法令》的意图和效果都很复杂。纳粹政权希望满足激进的反犹太人的要求，同时又阻止个人的暴力行为，例如之前所发生的那样。这项法律当然是为了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将他们逐出德国的民族社区。此外，由于兴登堡已经去世，成千上万的犹太退伍军人就不再享有豁免权了。

禁止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不仅禁止了通婚，而且对犹太男人具有诱惑德国妇女的天生冲动这种粗俗诽谤施加了官方制裁，甚至在纳粹掌权之前，这已经是流行的德国反犹太主义的普遍现象。这也是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色情周报《冲锋队员》的淫秽主题，这份小报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漫画和耸人听闻的故事。《冲锋队员》在许多街角有自己的展示柜，通常靠近学校。

因此，这项新的法律使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定义更加紧迫和困难。在几年内，生存或死亡取决于新规定的细微区别，即谁具有一半或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而且，证明纯雅利安人血统的需求也催生了一项专门的行业。批评这项新要求，更不用说嘲讽，都会暗示对元首的信仰不够坚定，以及对种族决定论的有效性有所怀疑。

我认识到新法律的第一部分明确标志着进一步的歧视。我当时并不知道“二等公民”一词——实际上犹太人甚至连这种地位都没有，尽管他们可能认为他们是有的——但我意识到我们是濒临灭绝的被抛弃者。我不记得我的母亲在对女佣的年龄要求上有过什么掩饰，但幸运的是我们的两个家庭佣工——其中一个是在半天班的接待员，帮助接待我父亲的病人——都超过了四十五岁。我们的女佣奥古斯塔是一个友善的女人，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公寓的地下室里，我偶尔会隔着她家有栏杆的窗户与她打招呼，她会给我一些我们家里没有的有插图的旧报刊。（早些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打了一个年

轻女佣，我不仅立刻感到懊悔和害怕被告发，而且担心我可能会连累我的父母。）

对我们这些被放逐者而言，生活也在正常和迫害之间交替着。1935年，我父亲的表妹凯特·尼克和她的雅利安指挥家丈夫离开了布雷斯劳，他希望能在柏林找一个工作，因为他有一个非雅利安人的妻子，他就像一个残疾人一样。（他们的女儿达格玛提醒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她的父母互相保护着对方：只要他还活着，她就不会被驱逐出境，只要她还活着，纳粹的规则就认定他没有资格在国防军中服役；事实上他被征召入伍过几天，但最终被丢人地送回了家。）尼克一家在布雷斯劳附近一座不太高的山的山坡上拥有一栋小型度假屋；那时候我们买了一辆二手车，就租了那个地方过周末。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开车穿过了五六个村庄，每个村庄在入口处的牌匾上都写了反犹太人的顺口溜。我忘不掉其中的一些口号：“不要相信绿色荒野上的狐狸，也不要相信犹太人赌咒发誓。”为什么这么肮脏的垃圾还会留在我脑海里？

在返回布雷斯劳途中的一个晚上，我们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结果翻入了一条沟里。错误是我们犯下的，因为我们的车一直在错误的一侧，而对方那辆车是由一名穿着便服的党卫军军官驾驶的，所以我们又一次倒了霉。在交换了相关证件后，就由律师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留在沟里。一辆公共汽车从旁经过并停了下来，一群身穿制服的男子把车抬了出来，再推回到路上。他们是一个名叫战士俱乐部的退伍军人组织的成员，刚郊游回来，他们很乐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我父亲的行医生涯中不断发生各种不太可能的情况。从各方面来看，他的病人依然是混杂的：既有雅利安人又有犹太人，既有富人也有穷人。许多病人家在乡村，通过口耳相传，慕名而来。这些老实、

简朴的村民有时会用实物作为诊金，例如鸡蛋或家禽，或那种圣诞鹿。针对一位富裕但病情危重的犹太患者，我父亲聘请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内科医生沃尔德教授进行会诊，在一次正常但例外的场合中，沃尔德教授留在我们家中与我们共进午餐。

另一个病例涉及一位叫冯·勒贝恩夫人的病人，我们偶尔会被邀请去拜访她所居住的乡村庄园。她突然患上了非常折磨人的头痛病。我父亲怀疑她患了脑瘤，经诊断得到确诊，她唯一的生存机会是要经受一次最精细、最危险的手术。有几位外科医生都拒绝为她做手术，但一位非常优秀的犹太外科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同意做这台手术。她的女婿是布雷斯劳的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他身穿便装来询问我父亲，手术是否确属必要，外科医生的选择是不是当然人选。他接受了我父亲的建议。手术当天他们全家人的紧张情绪是显而易见的，但手术很成功。（几天后，我父亲想到了一个主意，由我去医院探望冯·勒贝恩夫人，以便让她振作起来。我怀疑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结结巴巴地出现在病床前，但看到她完全被绷带缠住的头部，我联想起把一个人的头骨钻洞打开后肯定会出现的清晰画面，这种可怕的想法让我哑口无言。）^[7]

作为1935年的圣诞节礼物，住在巴黎的赫尔曼·哈伯给了我们一台收音机，是用他们只能在德国境内使用的账户中的钱付的款。就在那天晚上，当我摆弄收音机上的旋钮时，我偶然收到了斯特拉斯堡广播电台的德语广播。我甚至发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也用德语播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接着播放的是《国际歌》。这些广播必须秘密收听，而且只能偶尔收听——早就采取措施来干扰收听外国广播了——我只能在反抗和逃避的过程中需要支持的时刻去听。我们继续过着这种双重生活，无意识地去接受它，就好像这种生活是正常的一样。

1936年，纳粹的宣传机器——从回忆录中人们可以看到，那台机器的运作非常狡猾且现代化——为人们精心准备了某个重大的全国性事件。其结果便是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对国民议会——这是对议会的拙劣模仿——的演讲。我收听了这个长篇大论：首先是关于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错误做法；其次是对最近缔结的法苏联盟的攻击，称此联盟涉嫌违反《洛迦诺公约》；最后他令人不寒而栗地宣布，就在此时此刻，德国军队正在进入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希特勒的风格旨在表现出其戏剧化的果断性：单边即时的掌控与沉闷的谈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演讲虽然令人恐惧，却很大胆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包括他从傀儡代表那里得到的歇斯底里的欢呼声。希特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和平建议，但其作用很明显，就是对德国权力的激烈的主张，大多数德国人为之欢呼喝彩。希特勒信守了他的承诺，《凡尔赛条约》的最后一条“锁链”被抛弃了。

那天晚上或第二天晚上，我收听了斯特拉斯堡广播电台（它的德语广播时间是晚上9点），其新闻报道称法国的枪炮已经调动到位。我们是多么希望法国和英国能做出决定性的回应啊！毕竟希特勒的举动是对西方列强最明显的蔑视，并且具有深远的军事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将德国军队派往法国-比利时边境这一决定是希特勒这边下的最大赌注，有些将军确信协约国会以最后通牒或者武力来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准备废黜希特勒）。但是法国人不愿意在没有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而英国人则在拖延时间——政府中有些人还在对《凡尔赛条约》的严厉程度感到内疚，有些人受到“我们不应该野蛮地对待德国人”这种观点的影响，有些人则不知为何转而认为德国人毕竟只是“走进了他们自己的后院”。也许，当希特勒声称这是他的“最后的要求”时，有些人信以为真。简而言之，他们自己想要上当受骗。最后一次在没有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制止希特勒，并对他正在打造的战争巨人喊停的机会就这样错过

了。同时，希特勒的权力在国内得到了确认，在欧洲也得到了确立。他的胜利为欧洲的灾难铺平了道路。

那年春天，当德国成功地以穷兵黩武的方式蔑视外部世界，同时吸引外国人来参加柏林奥运会时，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阶段。十岁时，我在舒适的私立学校上学的日子结束了，这所学校离家很近，走路就能到达。法律和习俗规定我要进入文理中学，这是一条通向德国人文教育一度神圣并享有特权的途径。我姐姐已经入读一所女子文理中学，我怀疑父母是否认真地考虑过把我送到犹太文理中学，无论如何这所学校是不可能接受我的。我母亲很中意布雷斯劳的一所最古老的学校，名叫玛丽亚·马格达莱纳文理中学，她的兄弟们曾经在这所学校上学，比我大一些的表哥恩斯特在移居英格兰之前也在这里上学，学校校长康拉德·林德博士过去对人一直很友善。（费迪南德·拉萨尔和保罗·埃尔利希——在当时当然是“遭到冷落的人士”——都是该校的杰出校友。）

由于学校位于城里另一端的繁华街区，我必须换乘两辆有轨电车然后再步行一段距离才能到达那里，单程至少需要40分钟，但距离我祖母的别墅只有3分钟路程。早上8点开始上课。当我第一次长途跋涉到那所新学校时，我产生了正常的焦虑情绪。学校是一栋大型砖结构大楼，屋顶是平的，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设计，但我不知道等着我的将会有什么样的不愉快。学校逐渐占据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我的经历中建立了一片领域，与我父母的经历区分开来。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是一条通往独立的道路。

这所学校的精神是由传统的专制纪律所设定的，又不断地被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服从性。每个班级人数相对较少，大概有25个男生，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礼貌规矩非常正式。年龄最小的男孩和十八九岁的最高年级的男孩之间的关系是冷淡的或好斗的，前者非常敬畏后

者。白天有好几次我们不得不从一个教室赶到另一个教室，课程安排中会有定时的休息，休息时学生们就去操场玩耍或吃从家里带来的零食。我们经常在教室里举行全校集会，纳粹主题在每次集会中都占主导地位。

课程很传统，第一年学拉丁语，第三年学希腊语，同时还有德语、地理、历史、音乐和体育。教师们鱼龙混杂，拉丁语老师埃克特先生是一位脾气暴躁、极其敬业的老师，非常严格又令人兴奋，他所以在整个学校享有盛名，是因为他会在课堂上响亮地扇学生耳光，为的是一些极小的违纪——行为不当，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指甲肮脏。实施这种惩罚是不分种族的，我最高兴的一次记忆是他抽了我一个同学的耳光，因为这个同学故意把我所有的书扔在地板上，最让我伤心的是有一本珍贵的地图集。我对那一巴掌感到很满意。我也挨过一下，但是身体上挨打比数学老师穆特先生在课堂上讲反犹太主义言论所受到的伤害要少。“如果三个犹太人抢劫了一家银行，并且每个人都根据年龄得到了应得的赃物（详细信息已提供），每个人能得到多少钱？”埃克特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保守派，他对我和其他一些非雅利安同学的行为是正确的、无可挑剔的。而身材矮小的穆特先生，在魏玛时代是个脾气温和的人，或者我听说是那样的，因此现在不得不超级顺从。

从1936年4月开始，我在玛丽亚·马格达莱纳文理中学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每过一个学期，学校就变得越来越令人不愉快，我的排斥感也越来越强烈。我的大多数同学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在特殊的日子（例如元首的生日），他们就会穿着制服出现。即使不穿制服，他们对那些日耳曼和纳粹物品的骄傲以及对团体归属感的喜悦也是切实可见的。有时候，我是他们言语攻击的目标，在校园里，则是人身攻击的目标。有一次我予以反击，打了班上喜欢欺负他人的那个男

孩。（为此我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份礼物。）学校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求非常严格，再加上排挤和危险，它变得更加糟糕。

我已经忘记了，也许是压抑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与后来其他恐怖事件相比较，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我确实记得那些被灌输的东西，那些庆祝集会，我既不能也不愿说的“嗨，希特勒”，那些可恨的歌曲，那些纳粹党的说教。每周六天——星期六我们上半天课——我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思想并保持一种无声的对抗。我偶尔会发现自己在嫉妒其他同学，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从而可以非常明确地融合在一起，如此明显地陶醉在他们穿着制服的情谊之中。我却不得不独自度过遭到排斥的时刻，特别是当整个班级为强化体魄而进行为期一周的远足的时候——一些与纳粹党有关的活动会将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外。即使没有课上，我也可以选择去上学，但是作为替代，我被安排在那个星期里去给我父亲的堂兄当学徒，他在布雷斯劳附近有一个苗圃。他是一个严格的独裁主义者，很适合担任监工。

我在那里每一天都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我永久的收获是，我学会了如何在看到白色的尖端冒出来时就去割断芦笋。不幸的是，这种技巧在以后的生活中几乎毫无用处。至于表哥奥托，在1938年11月大屠杀之夜被捕和被他的雅利安妻子遗弃之后，他来到美国，发明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植物肥料，叫作美乐棵（Miracle-Gro）。

学校远远没有提供一个家庭之外的空间和一条独立之路，校园生活是如此令人不愉快，以至于加强了与我所知道的唯一安全的地方的联系，那就是我自己的家。与同龄孩子在一起，我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害羞，但在与成年人相伴中，我获得了训练有素的乐趣。例如，他们的纸牌游戏，我很早就掌握了。但是，对我来说，某种心理倾向、家庭动态和无情的外部压力的混合物结合在一起，给了家一个特

殊的中心地位。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我确实有过玩伴，我也有书，还有一套非常开发智力的建筑玩具可玩（在乐高之前的乐高玩具）。在我得到一辆自行车后，我有机会四处闲逛——有时我会把父母的信件交给收件人，赚取一些额外的零用钱。有一天，当我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家附近的一条安静街道的人行道上时，一些纳粹冲锋队队员拦住我，问我的名字，并表示知道我父亲是谁，威胁说第二天会去我的学校，要求校方对我的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指责。我逃了一天学，但我不得不忍受永远存在的危险的暗示和挥之不去的恐惧，即使没有实际的迫害。

1936年的夏天因柏林奥运会而被人们留在记忆之中，莱尼·里芬斯塔尔又一次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的体育和政治纪录。看到德国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外国人无不对德国井然的秩序、繁荣的经济以及接连不断的胜利印象深刻。德国再一次处于优势地位，充满了机械化的能量，而此时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却仍然处于衰退时期或因阶级冲突而四分五裂。每一次成功都成为另一个庆祝活动或公共假日的原因。布雷斯拉经常彩旗招展，届时纳粹党的各个单位——冲锋队、党卫队、劳工阵线和希特勒青年团——会举行大规模游行，伴随着军乐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到处张贴着日耳曼人满脸笑容、享受着“快乐的力量”^[8]假期的图片。政治成为一项伟大的观赏性运动，被巧妙地与虚假的参与和牺牲的要求混合在一起，例如强制性的冬季援助活动，在冬季月份，每隔一个星期的周日，按规定家中只做一锅饭，节省下的食物由党收集起来提供给穷人。

面包、马戏团和群众动员给予大多数德国人一种确定感，对现在和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眼中的元首是一位得到神启的统帅。假如希特勒在1936年的那个夏天去世了，或者确实在战争爆发之前去世了，那么在今天的德国，他很可能仍然会被作为英雄而受到赞美——一个谋害了成千上万人的凶手，是的，但又是数百万人的“救世主”；一

个压迫者，也是一个恶魔般的天才。那年夏天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对于政治上幼稚的人来说，德国变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波将金村^[9]，武装起来的恶意被隐藏了起来。这个虚假的德国引起了其他地方富裕的保守派人士的大量同情。

作为短暂的逃避，我和家人到海外自由国家生活了一段时间。1936年的夏天，我们去了丹麦。海边度假在任何情况下都令人兴奋无比，但我们此行还有额外的兴奋点：办理过境手续。火车从德国一边——有着令人讨厌的制服的一边，开到另一边——友好的一边，那里的制服散发出一种保护性的权威。我们首先去了哥本哈根，到达后，我把车停在尼尔斯·玻尔研究所的花园里，我父母在研究所里向詹姆斯·弗兰克咨询有关移民的计划。他们和弗兰克一起回到了花园，弗兰克非常和善地问我多大了。“十岁”，我回答说。“多么不幸的年龄，”他同情地说道，“太年轻了，今晚就别和你的父母一起到我家，而你的年纪又足够大，可以独自留在酒店里了。”我很喜欢这个物理学家的精确性。接下来，我们乘火车和渡轮前往法诺岛（此地因两年前作为新教牧师世界大会所在地而出名，会上纳粹政策的庇护者和批评者做出了妥协，从而至少通过了一项支持认信教会的决议）。在北海海水中游泳，由焦虑的父母细心监督着，是一种快乐；阅读遭到查禁的德文报刊——《新苏黎世报》、《巴斯勒民族报》以及德国人的流亡报刊——是一种更大的刺激。我们沉迷于一些被查禁的、鼓舞人心的文章，例如托马斯·曼对波恩大学取消其荣誉学位所做出的极具讽刺性的回应。每次度假，汗布格尔一家人都会加入我们，看起来他们在巴黎的流亡生活很安全，两家人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政治和移民。

1937年夏天，我们前往荷兰海岸边的诺德韦克，这里长期以来都是德国和德国犹太上流社会最喜欢的度假胜地，我们住在一家不起眼的酒店，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从来就没有富足过（这也是父母不和谐的

主要原因)。巴黎代表队——汗布格尔一家和赫尔曼以及马尔加·哈伯——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和蔼可亲的赫尔曼，看似漫不经心，带来了一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迷人的雪铁龙汽车，他秘密地答应带我随他们一起回巴黎，然后到巴黎去上学；他会在离别那天告诉我父母。但哈伯一家没有带我离开；他从来就不是认真的，我感到受了欺骗，非常生气。尽管如此，去荷兰旅行还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父母带我去海牙参观了伟大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在那里我被伦勃朗的画作《解剖课》吸引。这是活人的紧张凝视和尸体的可怕精确之间鲜明的对照吗？画作和画家都铭记在我脑海里；在后面的参观中，伦勃朗的《扫罗和大卫》更加使我激动不已，年轻的竞争对手在试图安慰一位陷入忧郁的国王。

在诺德韦克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又在英格兰度过了一周。我们乘船从荷兰角港到哈维奇港，在暴风雨中横穿大西洋，在此期间我不停地晕船。旅行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次冒险，但都成了宝贵的回忆。在伦敦，我们探望了我母亲的兄弟彼得，他是一位艺术历史学家，从多伦多的教授职位上来到了英格兰。我们去了一栋15世纪的教区长住宅，位于剑桥附近一个名叫考尔德科特的小村庄。在那里，我母亲的兄弟欧内斯特（他的英国化名字）定居在一所很大但很杂乱的房子里，即使在夏天也很冷，但精神上是暖洋洋的。他在附近的帕普沃思找到了一个职位，这里是结核病患者的一個主要的康复中心。欧内斯特舅舅与布瑞格家族的其他大多数成员明显不同：他一家人独居一隅，自力更生，自得其乐，已经深深植根于新的和原始的环境中；他在花园里以及一大片土地上养了山羊，他的非常能干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还在这块地上种植了各种水果和蔬菜。欧内斯特根据自己的陀螺仪行事——在小事上固执，习惯性地迟到，有时令他的家人感到烦恼，但他是一个聪明而善良的舅舅。在最严重的危机后期，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战前我还去过一次考尔德科特，此后又去过多次：它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家。

但这些外国避风港仅仅在一定时期内是好客的，永久居留权或移民是得不到批准的。不可避免地，假期和他们的双重自由感随着回归熟悉的恐惧、回归德国真正的不愉快和潜在的恐怖而告终。最终，我成了学校里唯一的“非雅利安人”，并且感觉越来越受排斥。我能完成学业，但总感到不舒服，从来不知道下一次侮辱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德国的学校从来就不会被人认为是“温和的”；受苦本身被认为是有好处的。我的一些同学是否想通过加重我的痛苦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一直到我在那个学校的日子结束的时候，那个认信教会的牧师邦策尔的儿子们始终关注着我，或多或少不明显地在我附近徘徊，至少给我提供了一些心理保护。我母亲可能寻求过这种帮助——我后来这么想的——但这几个男孩子本身都对我很好。

当然也有轻松放心的地方。在家里，我的母亲非常开朗、自信、谦虚且善于保护家人、足智多谋，能制造出许多令人愉快、平和的插曲。有一次，她带着威武的维夏德·冯·默伦多夫到校园里来看我。然后我在奶奶家的别墅里度过了快乐的几个小时，离学校那么近。我的父亲非常镇定，始终非常关心他的病人，但在家里就容易上火；我学会了避开他发脾气的时候，有几次甚至抗议他对我母亲说的一些暴躁的话。大多数时候，他把我当作一个朋友或一个远远超过我实际年龄的知己。因此，我也逐渐开始分担他的一些负担，以及他的一些事出有因的恐惧。

1937年，纳粹开始实施一项更为激进的政策，剥夺犹太人的财产，将所有财产“雅利安化”。那年冬天，富裕的布雷斯劳实业家恩斯特·施韦林——保罗·埃尔利希的女婿——和他的妻子施戴法不得不连夜逃离德国。一个忠实的会计告诉他，虽然财政部没有在他的生意中发现任何异常，但盖世太保即将逮捕他。当时的策略是抓住一个人，把他关进集中营，然后在他同意以某个低得可笑的价格处置他的

财产后再释放他。刚听说施韦林连夜逃离的消息时，无人不感到震惊，但很快这种故事就越来越多，屡见不鲜了。

到处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关注着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带有偏见的报道，针对法西斯对西班牙共和国的进攻，民主国家的反应是微弱的，它们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遭到了法西斯国家的肆意践踏——意大利派出了军队，德国人则拿他们羽翼渐丰的纳粹空军来练兵。佛朗哥继续取得进展，以至于在1937年春天，德国报纸也不得不报道意大利在瓜达拉哈拉的战败——这令我高兴万分。1937年5月，德国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坠毁在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时，我也私下里为此感到高兴，我过的是一种多么反常的生活呀！任何看似只胜不败的纳粹的失败都会给我们带来欢呼。他们毒辣的仇恨让我感染了一种针锋相对的仇恨，这是生活在如此不人道的政权下所付出的道德和智慧上的代价。

另一种逃避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捷克边境距离布雷斯劳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1936年，我们在布拉格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中世纪的犹太人墓地，有拥挤、破碎、歪歪斜斜的墓碑。我遵循古老的传统，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愿望并将它压在一块墓碑的一片鹅卵石下。我的愿望很清晰：给我们一个逃离这个可怕的机会吧。相比之下，捷克斯洛伐克是托马斯·马萨里克的自由民主国家。我读过卡佩克与马萨里克的谈话，并深受感动，以至于想去看看布拉格的哈诺德卡尼城堡，想象着这座城堡显示的政治权力也可能是良性的。一天晚上，我父母坚持要我和他们一起去歌剧院，我拒绝了，并希望留在酒店，阅读一整套旧版的《布拉格日报》，这是一份有着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因为轻歌剧《蝙蝠》的序幕已经开演，所以我被送到一个更有理智、更幸福的世界里去了——这是一份永久的收获。

我们在布拉格有朋友，保罗和格雷特·库贝尔卡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纳粹分子将库贝尔卡夫妇归类为雅利安人；他们属于捷克斯洛伐克300万讲德语的公民，完全忠于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年轻的哈伯夫妇的朋友：一对充满活力、可爱的情侣，是快乐自信的人。我很喜欢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性格反映了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在巨人山的捷克一侧一个名叫什平德莱鲁夫姆林的著名度假村里与他们多次见面，那个地方说德语。夏天我们在那里徒步旅行，冬天则滑雪或玩雪橇。（在20世纪70年代，该地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波兰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秘密会晤场所。）

我们计划在1938年1月底再次去什平德莱鲁夫姆林，但是在最后一刻，我父亲决定留在一个危重病人身边，让我姐姐和我一起去。我们在1月29日寒假开始的时候越过边界——我仍然保留着我姐姐盖了印记的护照。我沉浸在《布拉格日报》中，报纸报道了纳粹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军队高级指挥部发生了重大改组，希特勒自封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与此同时，剩余的“保守派”部长，尽管他们的默从已经练习到位了，但仍然在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超级忠诚的纳粹分子。因此，外界观察者正确地认为，这是一个预兆，表明了纳粹政策的暴力激进化。

库贝尔卡夫妇和我一起滑雪（那时候的滑雪是多么原始啊！）并聊天，我们制订了一个快乐的计划。从那年夏天开始，我前来和他们一起住在布拉格，在那里的一所法语文理中学念书。事实上，他们十四岁的女儿汉娜是一个安静且十分美丽的女孩，这可能也是一个吸引力；毫无疑问，这促使我更加渴望离开德国。几十年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个计划都会特别高兴，有时这会让我怀疑记忆在捉弄我。1977年，我再次见到了汉娜·库贝尔卡，此时她已经成为巴西的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我问她对我们的计划是否还有点印象，她的瞬间反应

是：“但计划已经完成了！你是要来和我们一起住在布拉格的！”计划是正确的，但地方错了。

回到布雷斯劳和我讨厌的学校后，我对父母提出了去布拉格的计划。我相信这加速了他们移民美国的决定，但政治事件当然增加了紧迫感。几个星期之内，在3月初，希特勒对奥地利提出了戏剧性的要求，当时奥地利在一个专制的天主教政权统治下，该政权试图把那里非法但强大的纳粹党吸收在内。这场戏结果愈演愈烈，在最后一刻，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蔑视纳粹并且突然要求就奥地利是否应该保持“自由和独立”举行公民投票。我听了他的演讲——面对希特勒的要求他回敬以明显的蔑视——并给我父母写了一张纸条，那天晚上他们碰巧出去了，我在纸条上告诉他们演讲是多么打动人心。对于我的夸张言辞他们付之一笑。

希特勒被许士尼格激怒了。三天后，3月12日，德国军队侵入了奥地利；希特勒宣称奥地利“回归”了德意志帝国。纳粹在奥地利受到疯狂的迎接不可能是伪造的，希特勒在林兹和维也纳受到了几乎同等歇斯底里的欢迎。（希特勒坚持认为他正在履行上帝的旨意，他是上帝意志的一种天意工具。）不，这是一次真正的、完全自发的奥地利人的大爆发，比1933年在德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更加壮观，就像在维也纳发生的对犹太人虐待狂一般的攻击远远超过了此前在德国发生的任何事件。在那时，希特勒暴虐凶残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但必须还要加上一句，这也是纳粹政权的成功。纳粹逮捕了许士尼格，当时我听说他被关押在集中营时，还被迫不停地去听希特勒对他咆哮怒斥的录音。大多数德国人像奥地利人一样兴奋不已，中欧的地缘政治平衡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德国的力量现在几乎包围了捷克共和国。

与此同时，反犹太人的措施在帝国内部升级。3月，犹太人的护照要么被没收，要么就像我父亲的情况一样，被标记为“仅在国内有

效”（这是一种恐吓行为，人们必须重新申请以便解除限制）。4月底，德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形式的犹太人财产都需要登记。在这两个日期之间，4月的某个时候，我父母去了美国，目的是考察我父亲在美国行医和谋生的可能性。^[10]他们在纽约逗留，向同行和议会咨询有关难民援助的事务。马尔加·哈伯给她兄弟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敦促他留在美国以逃避危险，并建议我母亲独自返回以准备家人的移民。但是他们俩都回来了——现在我们要做好准备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离开。

在这几十年间，我经常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父母等到如此危险的关头才做出决定。早在1933年春天，他们就是最先认识到需要移民的那批人之一。然后他们就一些有把握的职位进行商谈，从突尼斯开始，当所有这些都失败后，他们仔细查找了其他可能性，但是前景变得越来越暗淡，因为大多数欧洲国家限制移民，就像瑞士所干的丑行那样，声称“船已经装满了”。我父母内心深处可能已经被撕裂，失望可能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丢下所有你熟悉的一切，然后去面对一些诸如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身无分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和语言中生活等如此不确定的情况，这是极其困难的。另外，他们的朋友和亲戚已经带了头，在德国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们也知道我不开心，在德国无论如何都没有未来。

他们一从美国返回，就尽可能快地行动了起来。一切的先决条件是美国的移民签证，获得那份宝贵的文件也变得一年比一年难。美国仍在努力摆脱令各行各业趋于瘫痪的经济萧条，美国驻外领事馆接到指示要特别警惕最终可能沦为公众负担的申请人。我们早已收到了佛洛伦斯·维尔施泰特于1936年代表我们签署的宣誓书——尽管夏德·维尔施泰特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劝告我的父母不要移民。1938年2月1日，他写信告诉我母亲，去美国考察一次无疑是一个好主意，“但你会发现，对我们来说，纽约令人难以忍受，波士顿稍好一些……旅行

结束后，在离开布雷斯劳之前，你们要反复斟酌一百次”。一年后，他写信告诉她，他差点被捕，最后终于逃到了瑞士。我父亲的第二个堂兄，物理学家奥托·斯特恩，已经在卡内基理工学院找到了一个职位，他给了我们一份补充宣誓书。

一笔现金保证金也是需要的，涉及金额为3500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数目，显然德国政府不会允许使用自己的货币。在巴黎的哈伯夫妇是唯一拥有这项必要资源的人，但是赫尔曼——他在法国入籍的努力刚刚失败——很不情愿，尽管很明显这只是一笔短期贷款而已。他断然拒绝了他的妻子和已成为亲密朋友的恩斯特·汗布格的所有请求；最后恩斯特叔叔从考尔德科特前往巴黎，这个温和的经常有点超脱的人告诉赫尔曼，继续拒绝帮助斯特恩一家将会使他们之间特别密切的关系完全破裂。赫尔曼心软了。当恩斯特从英格兰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碰巧是当时唯一在家的人，他用一种伊索式的语言告诉我他在巴黎的成功。我高兴极了。

仍然有一些其他障碍。首先，我父亲需要一本新护照。我和我母亲把他送到警察总局，在那里他不得不自己去面对盖世太保。这又是非常紧张的一天。纳粹想要摆脱犹太人，但又在他们努力离开过程中刁难他们。财政部的官员必须要对我们打算带走的财物的价值进行评估，然后我们必须向国家支付一笔相应的金额，即所谓的帝国飞行税（Reichsfluchtsteuer）。一旦这笔税款缴清，剩下的就是为海上航行、为我们和我们的财产去筹钱了。

这时美国驻柏林领事馆突然出现延误：我们的申请文件被“遗失”了或被放错地方了。我母亲设法约见了美国领事雷蒙德·盖斯特——我们现在知道，他对德国犹太人绝望困境的了解远比他在国务院的上级清楚。母亲请求恢复我们的文件，她很自然地流下了恳求的眼泪。她成功了，然而在最后一刻我又成了一个潜在的障碍：我感染上

了水痘，美国当局禁止患有传染病的人进入本国。9月，当我们驱车前往柏林进行最后体检时，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一半，一位友好的领事馆医生对着我身上留下的斑点眨了眨眼睛。9月16日，我们收到了移民签证，我的编号为757。从柏林到布雷斯劳的行程是多么快乐呀！

我还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夏天：欧洲处于战争的边缘，我们正在与所有这些障碍做斗争，但也有一些亮点，即期待中的快乐的时刻。6月23日，在我去上学的路上，我听说乔·路易斯不到两分钟就击败了德国纯种拳击宠儿马克斯·施梅林！我很高兴。一个同学挑衅地对我说：“你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我低声发出一种虚假的否认的声音——这是另一个被强制说出的谎言。我绝不想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我猜想我的脸太容易被人看懂了。

到了7月底，我的学校因为一年一度的暑假即将关闭——因此，我在这个已经变得可怕的地方的最后一天来临了。我母亲已经和学校校长谈过，他们同意不会有任何人提到我要离开学校这件事。但是穆特先生，那个软弱不幸的人，一定要与他的学生分享这个好消息，所以我在玛丽亚·马格达莱纳文理中学最后一天的数学课的黑板上留下了一行粉笔字：斯特恩要去巴勒斯坦了！我的许多同学明显感到很高兴，因为最后一个纯血统的非雅利安人要走了。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去找校长林德先生道别。对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希望你知道我一直在努力让你在这里的生活尽可能地好”，我回答说，“不，我没有注意到”。在那简短的交流中，所有以前没有说出口的话，所有被压抑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全涌了出来。我带着极大的宽慰、一些惊喜和一点满足感离开了。

与此同时，德国的反犹太运动越来越激烈。7月，法令规定，到9月底，犹太医生的执照将被吊销（虽然有些医生被允许以不同的名义去照料犹太病人）。律师同样被边缘化了。纳粹现在决心没收所有犹

太人的财产，并把他们完全排除在德国生活之外，就好像正在建立一个看不见的犹太人区，但他们的目标仍然是大规模的排挤。纳粹分子推断，迫使穷困潦倒的犹太人进入其他国家会煽动其他地方已有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在那个时候，要找到一个避难场所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在整个夏天，德国的宣传机器发动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恶毒攻击，因为据称苏台德的德国人遭受了虐待，他们中有许多人加入了由卑鄙的康拉德·亨莱因领导的纳粹卫星党。但其中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主人士，如库贝尔卡夫妇和许多犹太人。希特勒——因过去的胜利而兴高采烈，蔑视所有对手，并且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受一种无意识的感觉驱使，即他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完成他的天命——想要发动一场战争以得到苏台德地区。捷克政府在5月已经下令全面动员以应对希特勒闪电般的威胁，因这种意外的蔑视而感到愤怒的希特勒，决心粉碎这个国家。就在此刻，德国军队内部有一个反对派小集团，在贝克将军的领导下联合了起来，如果希特勒发动一场战争，就决心赶他下台。法国受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项军事援助协议（该协议又涉及苏联）的约束，向英国寻求指导和支持，但英国已经开始实行绥靖政策。

这种绥靖政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任何新战争的合乎情理的恐惧，以及对《凡尔赛条约》的疑虑，还有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但到了1938年，希特勒的大规模重新武装以及他对欧洲霸权的不懈追求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了——许多政治家，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在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近来，“绥靖”一词经常被有害地用于轻率的辩论中，好像控制冲突的任何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都类似于怯懦或背叛。无论如何，9月15日，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飞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上贝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鹰巢，寻求一种能满足希特勒的大部分要求但不是全部要求的妥协。接

下来的几天充满了战争的谣言，而英国和法国则迫使捷克人放弃有争议的领土，以换取国际上对其剩余几个州的保证。紧张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9月22日，张伯伦重返德国，却发现希特勒提高了要求。张伯伦觉得这是不可接受的，此时所有迹象指向了战争。

与此同时，我们在等待前往美国的移民签证，我们已经预定了9月30日离开鹿特丹港的一艘荷兰轮船的船票。9月16日，我们带着附有美国签证的护照从柏林返回。现在的计划是收拾行装——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还必须尽快完成，从而能及时登上停泊在鹿特丹港的“SS史特丹号”邮轮。一天晚上，9点左右——我现在认为是9月19日或20日——门铃响了，我去开门，站在门口的是埃德加·冯·泽博尼少校，他是我父亲的一位病人的丈夫。他是不请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把他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小心翼翼地听着，不去睡觉，直到我听明白他们的全部讲话内容。冯·泽博尼先生来我家说，虽然他总是建议我父亲不要移民——希特勒时代会过去的，而他的妻子由于肾功能失常离不开她的医生——现在意识到我们就要离开，他却敦促我们立即离开，他的现役同僚告诉他，希特勒决心在必要时通过战争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如果战争来临，你将被征召进入军医部门，那样的话你就无法脱身了”，他告诉我的父亲。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姿态，他的这种正派行为是由一个关于纳粹的仁慈幻想所引起的：一个雅利安军官前来告诉他的犹太医生立即离开，以免被征召进德国国防军！

我们听从了泽博尼的警告。我们的计划是立即离开布雷斯劳，去考尔德科特度过“SS史特丹号”邮轮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几天前，我母亲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将我祖母送去了英国；现在我父母要同他们剩下的亲戚和许多朋友道别了。我父亲决定第二天晚上就和我去柏林，因为如果情况紧急，那里更容易立刻离开德国。第二天我们用来收集他的文件并打包，那天晚上我帮助清空他的桌子。在做这项

工作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在1918年那天晚上写给他姐姐马尔加的告别信，当时他以为他快要死了。他恳求她不要因过度哀伤而毁了她的生活，要好好活下去，“让别人快乐，并且尽全力使自己变得快乐”。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这个身为我父亲的男人许多年前曾如此接近死亡，这使我感到震撼。我从来没有拿我苦恼的发现去与他对质。我知道他患过流感以及他给自己开的处方，但不知何故，看到他面对死亡的沉思——何况就在我们离开德国前的那一刻——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信息顺序。就在午夜之前，我们乘出租车去了车站，然后乘坐卧铺火车连夜赶往柏林。当火车驶离布雷斯劳时，我注意到我父亲眼里饱含泪水。他是在向所有他曾经珍视的人告别，向他一生中的所有希望和梦想告别。而我却丝毫不后悔，我只感到快乐。

在柏林，父亲和我一起住在他姐姐洛特的家中。洛特是一个坚强且极其慷慨的人，她嫁给了理查德·科布拉克，一个退了休的公务员，还是战争中受过伤的老兵，他相信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我们等了几天，直到我母亲和姐姐收拾好了行装（处理掉了一些带不走的设备，比如X光机，价格低得令人发笑）。他们于9月22日与我们会合，这一天内维尔·张伯伦第二次也是灾难性地与希特勒会面，希特勒拒绝了英法两国要求德国交还苏台德地区的提议。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9月24日早晨，洛特姑姑陪同我们前往滕珀尔霍夫机场，机场周围环绕着一圈高射炮。当我们经过最后一个德国岗哨时，我感到一阵绝望的紧张，然后当我第一次坐上飞机开始了我通往自由的航程时，我全身充满了亢奋。这架飞机应该是直接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但飞机突然降落，未按计划停在汉诺威——由于柏林当局正在囤积物资，飞机要重新加油，我们再一次落在德国土地上，我感到非常焦虑不安。最终航班恢复了，我们到达荷兰史基浦机场。乘车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我们感到了一种无穷的欢乐。（第二天，当我们飞往英格兰时，发

现我们误订了汉莎航空公司的航班，这样我们又一次当了臣民——但是最后一次——德意志主权下的臣民。）我们降落在克里登，我们在伦敦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我有时间去看海德公园里的防空洞，然后继续前往考尔德科特，在那里我们整天守在收音机旁。

战争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了。我们回到荷兰，9月30日，我们从鹿特丹港登上了“SS史特丹号”邮轮。就在这一天，《慕尼黑协定》签署了，法国和英国做出了让步，同意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从而使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无法自卫。战争被避免了，希特勒可以庆祝一场伟大的胜利——但他感到愤愤不平，他想要的是一场战争。

当船驶离后，我在远洋客轮上所有的感觉就只是轻松的欢乐和奇妙的兴奋，尽管我意识到父母对我们不确定的未来有些忧虑。我不懂英语，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似乎为我在美国的新生活做了些糟糕的准备。对于这个为希特勒如痴如醉并欢呼喝彩的德国，我充满了厌恶，毫不留情地离开了。只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才明白，在第三帝国的成长给了我政治教育上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很久之后，在海涅完美的墓志铭中我才找到了我所获得的东西——“对自由的爱，”他写道，“是一朵监狱中的花。”此外，我开始意识到，在我生命的这一定型——毫无疑问，同时也是变形——阶段中，最幸福的时刻是在欧洲——在法国、瑞士、丹麦、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英格兰，所以我成为一个将欧洲置于一切之先的人。如果说我付出的代价是任何类似于真正的情感教育的东西的话，我所得到的还是不少。我非常高兴终于摆脱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政权所带来的痛苦。我感受过恐怖的刺痛；在我们逃离德国的几周内，这种全面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开始减退了。我对意外的生存和命运的善意仍然感到惊讶。

[1]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不了解20世纪30年代达豪和其他一些集中营，你必定是一个乡下白痴，有些德国人对此感到不安。因此，不久

前我很感兴趣地读到著名的小提琴家阿道夫·布施在1933年7月写给他的兄弟指挥家弗里茨的信，信中写道：德国人现在祈祷着“Lieber Gott, mach mich stumm, dass ich nicht nach Dachau kumm（主啊，让我装聋作哑吧，那样我就不会被送到达豪去了）”。

[2] 我想起了哈姆雷特见到的鬼魂：

若不是因为我不能违犯禁令，
泄露我在狱中的秘密，
我可以告诉你一桩事，
最轻微的几句话，
都可以使你魂飞魄散，
使你年轻的血液凝冻成冰……

[3] 当时，民主人士将意大利——南方的一个美丽和文化的天堂，一个不涉及政治的旅游胜地，还有仁慈的人民——同其法西斯统治者区分开来。但坚定果断的墨索里尼深深吸引了各种各样的人，当然大多数是右派。著名的德国犹太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写了一篇讨好他的人物特写（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对反犹太主义毫无用处），甚至温斯顿·丘吉尔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只是在墨索里尼于1935年对埃塞俄比亚发动攻击以及一年后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大规模干预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非人道性。

[4] 另一个经典的例子也涉及一个假日故事。一位牧师和一位拉比是老朋友，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假期。其中有个假期是在山区度过的，当黑暗降临时，他们迷失了方向，跌跌撞撞地走着，终于看到了一处发出光亮的农家小屋。他们敲门进入后，向欢迎他们的农妇解释了他们的困境。她叹着气解释说，除了鱼之外，没什么可提供给他们吃的。很快她就端上了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两条鳟鱼，一条又大又肥腻，一条又小又瘦瘠。牧师和拉比轮流推让，都不想先下手，最后拉比拿了那条大的。牧师说：“你知道，我身上没有一块骨头是反犹太人的，但是我们俩原本都不能那样做的。”拉比问道：“不能做什么？”牧师说：“吃那条大的鱼。”“那么你会怎样做呢？”拉比问道。“当然吃那条较小的”，牧师说道。“可是你不就是吃了那条小的鱼吗！”拉比回答道。

[5] 倒着书写，从而形成了正常书写的镜像。——译者注

[6] 不知何故，当时我获悉在慕尼黑有一位名叫维利·施密德的音乐老师被无辜杀害了，他被误认为是一个同名的反纳粹记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伟大

的物理学家维克多·魏斯科普夫的极有魅力的遗孀给我发了一份她的回忆录：原来她就是那个被误杀的女人的女儿！

[7] 古特曼医生遭受了德国犹太人所遭受过的所有耻辱，他一直在犹太医院照顾病人，直到1939年3月移居英格兰。1966年，他因为受伤的英国士兵治疗以及在截瘫病人康复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而被封为爵士。

[8] Strength-Through-Joy是纳粹德国时期一个大型的国营休闲组织。

[9] 俄军高官波将金为了使俄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女皇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了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

[10] 我父亲请几位著名的医生为他写了与此行有关的推荐信。德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写了一封信，日期为3月1日，信中介绍了我父亲发表的论文以及他们共同治疗过的患者，“因此我可以说在内科领域，我的同行斯特恩是一位知名的且非常受人尊敬的医生”，作为闵可夫斯基的学生，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封正式信件盖着他的办公印章，上面还有一个纳粹标记。这样写是一种谨慎体面的行为，但是他或其他同事是否添加了几句表示同情或遗憾的话，我就不得而知了。战后，一些医生同事“羡慕”我们家的好运，逃避了战争期间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四章 来自远方的恐怖

从鹿特丹到纽约的海上航程是一段奇怪的——在某种程度上令人焦虑的——插曲，我们为此支付的仍然是德国货币，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笔钱。我父亲坐在一张躺椅上，拿着一本英文常用语手册在苦苦记着，我母亲通过阅读小说家P. G. 伍德豪斯的作品来复习她的英语，而我却沉迷于一些船上的娱乐活动，如乒乓球、圆盘游戏，或无休止地凝视着大海。我感觉从我父母身上流露出的担忧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迫在眉睫的担心是埃利斯岛——我只是从名字上知道这是纽约的一部分！我们曾经被告知，那里的美国移民官员可以文件可疑为由扣留船上乘客，无人知悉在他们身上究竟会发生什么。即使是正常的移民签证，就像我们持有的那样，也不能确保免受不愉快的扣留。

当轮船靠近纽约港时，移民官员登上船，并在餐厅摆好桌子，像我们这样的乘客便在他们面前排起队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通过了，但是因为排队被困，我错过了去看进入纽约时的壮观景象，尽管通过舷窗我还是看了一眼自由女神像。无论如何，我知道此时我们很安全，我也知道，就在几个星期之前，美国东部沿海地区遭受了20世纪最严重飓风的破坏。我们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我们是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刚刚遭受自然灾害之后抵达的，并且在被称为“水晶之夜”的人类悲剧发生之前离开了德国。

10月9日，在霍博肯，一位彬彬有礼、善良的美国人前来迎接我们，他名叫伯恩哈德·海勒，是佛罗伦斯·维尔施泰特的兄弟。在码

头上，感受到无拘无束的我也想起了几分责任，我绕着巨大的抵达大厅跑开了，试图找到我们的行李箱和手提箱，因为它们不仅被堆放在标有姓氏首字母S的行李堆中，而且会被堆在其他不同的姓氏下面。我父母后来告诉我，海勒先生对我去找齐我们财物的行为印象深刻，但这项任务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这是否就是我扮演家庭共同保护者这一新角色的开始呢？

海勒先生带我们去了曼哈顿。曼哈顿凭借其令人敬畏的摩天大楼，看上去真的就像一个压倒一切的新世界——但摆脱了过去的恐怖。他已经为我们的第一晚住宿做了安排，就住在华盛顿酒店（这个名字好听，但地方一般），酒店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的列克星敦大道上，托妮和我住一个小房间。从高楼往窗外看，我突然感到迷失了方向，有些害怕。“这就是纽约”，我对她说。我想象过它会更热情或更熟悉吗？

最初那些孤独、焦虑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已所剩无几。我父母总是整天在外，无数次地去联系和做出安排。我记得，因为托妮会讲一些英语，她就会陪伴母亲或去拜访朋友的朋友。他们每天给我留下1美元，他们不在的时候就让我自己买东西吃。我在酒店附近闲逛，尽管不习惯街头的节奏，但感觉非常安全。对我而言，最大、最明显的恐惧就是语言：我能学会英语吗？我喜欢霍恩和哈达特自动售货机，因为你不必说话就可以买到东西，靠着墙壁是一排方形的窗式隔间，每样食物都会在里面展示一份样品。你往一个小槽里塞进一枚5美分硬币或1角硬币，就会出来一个三明治或一块馅饼。我在街边摊上买了一些水果，只要指着想要的东西就行，我惊讶于农产品的品种繁多且价廉物美。在我们到的第一个星期里，有一天，海勒先生带我参观了纽约，包括在弗朗西斯酒馆享用了一顿午餐，这是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的地方。（我保留了一份我的感谢信的副本，是在那家酒店里写的，用的是在1932年给我的一台用得很旧的打字机，信里解释了我

独自在那里守电话以及等候来自德国的家信。其中我还设法写了几句英语。)

我父亲当时希望能够获得一年的资助，以便在他参加获得行医执照必需的考试时能帮助我们度过那段困难时期。他携带着德国医生为他慷慨写的推荐信拜访了一些著名的纽约医生。那时，他还收到了一笔最初的资助金额。已经有许多难民医生来到了纽约，其中有些人是我父亲认识的，其他一些关系很近的医生朋友也很快来了，他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各种难民援助组织的帮助，其中有些是专门帮助医生的。最亲密的朋友是古斯特尔叔叔的儿子汉斯·奈塞尔，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后来留在“流亡大学”^[1]。在纽约我们还有些远房亲戚，他们几十年前就来到了美国。艺术史学家彼得·布瑞格——我母亲的兄弟，已移居多伦多，他也来看望我们。

与此同时，我母亲在朋友的建议下，四处寻找一个我们能负担得起且大体中意的住处，包括华盛顿高地，那地方因为聚集了大批德国难民，被戏称为“第四帝国”。她喜欢比曼哈顿有更多“绿意”的地方，最后我们定居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这是纽约市一个更加枝繁叶茂的市区。此地宁静安逸，很有吸引力，属于中层或中下层社区，我们的有三间半房间的公寓还享有“一个特许权”，即第一个月可以免交租金，须知当时美国仍然处于1937年的经济衰退期。在宽阔干净的街道两旁，有一些古老的私人住宅，也有一些六层楼的新公寓，但没有更高的楼了。

我们不得不在华盛顿酒店再住上约两个星期，直到我们从布雷斯劳运来的所有财物都送达为止，我记得是由一家专门从事难民搬家的德国辛克货运公司承运的。然后，在皇后区，我们从集装箱里卸下了从布雷斯劳运来的东西：我们的珀尔齐希款家具现在放在客厅里显得特别大，我们的床、书、瓷器、玻璃器皿和地毯，我的自行车，还有

一台新买的德国冰箱，由于电源功率和美国不同，而且公寓里已经有了一个，因此这台冰箱现在变得无用了。就这样我们搬进了拥挤的新家，这个新家看上去仍然是地道的德国人的家。

我仍然记得获得自由的激动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巨大的不安全感。在以政治恐怖换来的经济贫困这笔交易中，我们的幸运是难以想象的，但毕竟后者是真实的。我们依靠哈伯夫妇借给我们用于签证的钱过日子，眼前还没有明确的有收入的前景，但不管怎样，我的发展轨迹是很明确的：上学，学好英语，去适应完全不同的课程安排。我姐姐的前程则不太明晰，因为她的英语很不错，来自国外的朋友建议她去当保姆，这将有助于我们家摆脱困境；但就在几个星期内，一些别的情况发生了。

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一个十二岁的小难民眼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特别清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民主领袖，一个有着非凡自信和勇气的人——富兰克林·D. 罗斯福；纽约州的州长是睿智且富有仁爱之心的赫伯特·莱曼，一个有着德国背景的富裕的犹太人，他在政府治理上精明能干、精力充沛；管理纽约市的是一位火热的、有着英雄色彩的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他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一半犹太人血统，但是一个美国人。我怎么可能没有希望呢？在我们搬到杰克逊高地居住的最初的日子里，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寻找纽约公共图书馆在当地的分馆，这是另一个新奇事物，结果我迷失了方向。我向一位警察打听了回家的路。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身穿制服的男人对我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对象，但是这位纽约警察听懂了我蹩脚的语言，友好地用依地语和德语构成的不完整句子回答了我。

到了11月初，我开始在附近的皇后区第152公立学校上学，因为我英语较差，就被安排在比我年龄小的孩子的年级里。我在学校里的第

一天是另一个令人担心之事，只是在程度上比较轻微。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开放、友好、乐于助人——与我在那个国家里的早期学校经历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我们仍然摆脱不了那个国家带给我们的一直存在的、更为可怕的恐怖。控制着德国政权的野蛮的纳粹主宰了我们的意识，并且这两者越来越难以区分。还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就听说了西方列强在慕尼黑屈从于希特勒的细节，它们放弃了一度是中欧唯一的自由民主国家，从捷克斯洛伐克割裂出来的苏台德地区现在变成了隶属于柏林独裁政权的一个州。西方民主国家在节节败退。在西班牙，它们所坚持的不干预政策，只不过是它们消极被动的一种托词，从而使佛朗哥能够稳步获利。我当然是同情保皇派一方的，我在1939年的小记事本中记录了共和党的失败，还有我画的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草图。（我仍然保留着这个记事本。）这样的一出戏在欧洲继续上演着，我们的许多朋友和亲戚还留在那里。

在我们抵达美国的一周内，我一直在用我的打字机给留在那个旧世界的亲朋好友写信（并保留了信件副本）。从我得到那台打字机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用它写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同分散在各地的亲戚保持着联系——在巴黎的哈伯夫妇，在柏林的科布拉克夫妇，在德国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在英国的恩斯特叔叔一家，以及在多伦多的彼得叔叔——还有很多朋友，更不用说我们在纽约的新朋友了，比如海勒先生。（我发现，这位善良的人竟然仇视罗斯福。）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我可能意识到我的父母没有时间去处理来往信件，而我却有，但就我自己而言，我渴望发布和接收消息，给非德国人写一些有关政治的情况。我想我可能并不想失去与欧洲或我自己的过去的联系。我肯定担心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学校，其他孩子可能对我的看法（我是班上唯一的难民，也许是全校唯一的难民）——但是写信的欲望出自不受约束、不经审查的内心冲动。我对

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都是陌生的。我正在承受着一种双重生活：德国的过去，一直存在，一直不祥；美国的现在，直接，不确定，但前途无量。依据需要和心理倾向，我就这样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希特勒对慕尼黑颇感失望，甚至因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被拒绝而感到愤怒，他的怒气很快就转嫁到他最早的、最无防备的目标——犹太人身上。11月9日，戈培尔和希特勒利用一名德国外交官在巴黎被暗杀的事件——此人被一名疯狂的波兰犹太青年射杀，起因是犹太青年的父母被驱逐出德国又被拒绝进入波兰而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备受煎熬——决定采纳在他们与犹太人的斗争中最激进、最明显的方式：一场精心组织的、被伪装成众怒引发的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德国所有的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大约3万名超过十五岁或十六岁的犹太男性被赶进集中营，随即遭到羞辱，然后饱受纳粹训练有素的摧残。“水晶之夜”所引起的震惊是显而易见的。在纽约，我们很快就听说了那些侵入私人住宅的纳粹分子的暴行和蛮横的破坏，以及一些纳粹冲锋队员在执行任务时那种虐待狂般的快乐。这只是随之而来的有组织的暴行的一场序幕。

11月11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以下列文字为开场白：“今天，一股……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这是自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以及欧洲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所未见的。针对恩斯特·冯·拉特被一名年轻的波兰犹太人谋杀这一事件，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徒展开了一场目标为犹太人商店、办公楼和犹太教堂的大规模报复……”媒体也正确地报道说，这种针对财产和个人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德国人民的不同反应，目睹这场精心策划的报复大爆发，他们无法避免那种“由衷的”愤怒。一些人可能提出异议，有些人因批评纳粹的野蛮行为而受到惩罚；但是，比如说在面对神圣的地方遭到破坏时，基督教会却保持沉默，以及普遍的漠不关心或屈从，表达了一种完全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上的破产。当然，这种甚至对最基本道德的极端蔑视

也是与在慕尼黑发生的情况相关的，希特勒认为民主国家已经屈服于它们自己的衰弱；它们可能会抗议他的行为，但是他知道他的反犹太主义在国外也获得了同情，许多国家对接收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越来越持有敌意。^[2]

这是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政策中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其目的是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并在此过程中窃取他们的财产。犹太人的资产在几个月前已经被精心登记，现在被以种种方式没收。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们被逐渐释放了——但必须先宣布放弃他们的财产或证明他们将在某个确定的较早的日期离开德国。然而，到目前为止，移民这个大家迫切想要实现的欲望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目标了。

我们很快收到航空邮来的信件，信中说我们的朋友或亲戚都“离开”了，这是一种婉转说法，意思是他们要么安全地藏匿了起来，要么就被关押在集中营里。我母亲的表兄海因茨于11月13日在柏林写道：“在这些日子收到我的来信肯定会使你们感兴趣……（原文中的省略号）我和我的朋友Br.坐在一起，他要求我陪他一起过夜……理查德（科布拉克）前天来看我，他也在路上。”在这两个例子中，雅利安人一直在庇护这些人，直到逃脱了11月10日大逮捕的非雅利安人不会再被逮捕。也许一种互相矛盾的民众反应促成了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所有信件的主题始终是移民，伴随这一主题的是请求提供信息和帮助。尽管如此，我们的德国亲戚和朋友为我们在美国度过第一个斯巴达式的（清苦的）圣诞节寄来了糖果和其他礼物。

1939年1月初，仍在慕尼黑的理夏德·维尔施泰特写信给我母亲。“我要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不会后悔的。我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牢狱之灾。我不得不放弃我的家和所有资产。我在耐心地试图拿到我的护照，以便去瑞士，不是去某个大学城，而是去某个偏远的角

落，我会满足于过去度过的许多富足的岁月，沉溺在美好的回忆之中。”这么一位六十七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此退隐山林，这就是纳粹干的好事！几个星期后，他在试图非法越过瑞士边境时被捕，但最终他的瑞士朋友和前助手亚瑟·斯托尔想了办法让他越过了边界。^[3]

“水晶之夜”标志着针对犹太人的更为激进和暴力的政策的开始，德国政府和公民加速了进一步剥夺犹太人财产来增加自己财富的进程。赫尔曼·戈林对犹太人社区征收了10亿马克的特别罚款，犹太学生被驱逐出德国的学校包括大学，法律条文中不断增加排除犹太人的条款。然而，已退休的或被除名的公务员仍然能收到他们的退休金，相对富裕的犹太人也只是在逐渐步入贫困。

美国媒体一直在忠实地报道这一切，一位受害者的真实遭遇使我们进一步对纳粹恐怖感同身受。1939年1月初，一位住在布雷斯劳我们原先公寓里的年轻邻居来我们的纽约家中探望我们。他的头发被剃光了，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每一个新受害者在被关入集中营时必然要经过这一道无情的侮辱。他的行为举止也完全改变了，长时间的折磨使他有点神志不清，突然变得衰老了。摩西先生告诉我们，他被拖出家门，同其他无数布雷斯劳犹太人一起被扔进卡车，接着又被推上火车，然后被带到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后来发现该地原来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近经扩建以期容纳大量新囚犯。他告诉我们，纳粹暴徒曾经冲上楼到我们已经空荡荡的公寓里寻找我的父亲，事实上还去过他的几个雅利安病人的家中搜寻他。摩西先生本人通过保证会立即移民从而得以从布痕瓦尔德被释放出来，但只要他稍一耽搁就意味着立即重新被捕。他告诉了我们其他一些朋友的消息，有些人的命运与他相同，还有些人则被纳粹分子从床上拖下来，甚至是病床上，经一番侮辱折磨后，因太虚弱而被遗弃在他们自己的家中。

我们可真是虎口脱险！只要在德国再滞留六个星期，同样的事情就可能——必定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假如我看到父亲遭受虐待然后被带走，假如我经历了数周或数月的担惊受怕以及我母亲绝望地四处努力以求得他的释放，假如我发现父亲性情大变，身体上受到虐待，精神上受到羞辱——假如我有过此种经历，它会让我永远像中了毒一样去仇恨德国的一切，令我义无反顾地去切断与后来的德国的任何接触。事实上，有关来自远方的恐怖报道加剧了我的仇恨，以及我对留在德国的朋友的关注。

然而，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的纳粹大屠杀却给我们家带来了直接的、反常的好处。在纳粹暴行发生后的一周内，布林莫尔学院的校方、教工和学生决定募集资金，用以支持来自德国的两三名难民学生。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长期以来倡导并部分启动了一些类似项目，这些项目是专门为犹太人和非雅利安基督教学生设计的。布林莫尔学院立刻为两名学生募捐，免除他们的学费和住宿费。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和布林莫尔学院双方与一个叫赫莎·克劳斯的人有密切联系，赫莎·克劳斯是学院里的一个难民学者，在希特勒掌管科隆的公共福利之前以及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她就与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合作设法为德国儿童提供食物。她很了解我的母亲，这种关系可能帮助了我姐姐于1938年感恩节后被接纳为布林莫尔学院的难民学生之一。^[4]

在我们家庭遭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我姐姐离开了布林莫尔学院。我父亲正在准备他的英语语言考试，这是朝着参加医疗协会组织的专业考试迈出的第一步，最终能让他有资格在纽约行医；他很担心自己能否在美国谋生，所以拼命地学习。我母亲则更坚强也更开朗，她慢慢地在新泽西市内或附近的几所私立学校找到了辅导孩子的工作，并将她的算术教学方法结合了进去。他们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家，每日的购物都由我负责，大多数情况下往往由我来准备我们相当简单的晚餐。我们家是如此缺钱，以至于我买第一条长裤都成了家中的一件

大事，这条裤子是在第十四大街花了1美元买的。我姐姐离开后的某一天，我们家接纳了一个付房租的房客，是一个朋友的儿子，这样一来我们的公寓变得更加狭小了。随着我的英语水平的提高，甚至没多久就超过了我的父母，我对他们的依赖程度也降低了一些，并由此感到要对他们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家里，我们继续说德语，因为用有缺陷的英语说话似乎不那么自然；写信我用的也是德语；偶尔我还阅读德文书籍——尽管我已经有了移民的体验，希望能尽可能快、尽可能完全地融入美国社会。1940年前后，当我试图改变我最初的两个名字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小插曲，我偶然在一封信上署上了理查德这个名字。但我很快又放弃了这个主意——一部分是出于对哈伯这个名字的骄傲，部分是出于固执。在涉及我是谁、我现在的“身份”该怎么表达这些方面，我遇到过很多麻烦，我也不想做出改变。当时那个沉甸甸的身份用词还没有成为时尚！（我母亲将她的名字改为凯瑟琳，发表文章时也以此名字署名，但朋友们，甚至美国朋友们，都继续称她凯特。）

对于欧洲正在加速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仅从媒体上获知，亲戚朋友的来信也是一个渠道，如柏林的洛特·科布拉克、巴黎的马尔加·哈伯和在布雷斯劳的姑妈格蕾特。就在“水晶之夜”之前，巴黎的恩斯特·汗布格尔叙述了法国不断低落的士气和不断高涨的沙文主义，那里公众的情绪变得令人厌恶，德国流亡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尽管法国曾经是如此热情好客。（1937年，赫尔曼·哈伯的法国入籍申请被拒绝了——已经过了两年的等待期。）我给他们所有人写信——给那些留在德国的人写信是出于深情的关心，给那些在自由国家的人写信则是出于好奇。与此同时，面对我的美国同学我仍然感到有些腼腆，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是一个陌生人。我如饥似渴地去阅读来自欧洲的新闻，以至于恩斯特·汗布格尔告诫我要少花些时间在日常事件上，有时间要多看看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的东西。（他的话太

对了，正如我几年后自己所发现的那样，也正如每隔一段时间我不断重新发现的那样。）

1939年2月初，我写信给在布林莫尔学院上学的姐姐，告诉她希特勒1月30日在德国国会大厦演讲中威胁说，如果全世界犹太人能够成功地发动另一场战争，那么欧洲的犹太人面临的将是彻底灭亡。这是我转给她的唯一一条消息。希特勒说的话我是会严肃对待的。几个星期之后，我在断断续续的日记中记下了教宗庇护十一世去世，驻柏林的前任罗马教廷大使红衣主教帕切利继位，这位新教宗通常被认为对德国的事务有特殊的了解，这点是真的。（汗布格尔告诉了我们一个流传在巴黎的有趣的谣言，当这位新教宗被问及有关他亲法情绪的报道是否正确时，他回答说：“我在德国度过了十年，而你却认为我还没有成为法国的朋友？”）当他也接受绥靖主义——而且更糟糕时，对他的失望那就更大了。

灾难的步伐加重也加快了。3月中旬，纳粹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摧毁，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德国的“保护国”，并承认斯洛伐克（在其自己的冒充法西斯主义的天主教领袖领导之下）为傀儡国。德军进入布拉格的新闻图片——其中有一张表现的是一个在人行道上哭泣的捷克男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公众尚未领教过大批量这类影像所造成的冲击力。

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继续迅速地交融在一起。与库贝尔卡一家的通信中断了，我对欧洲的非雅利安朋友的担忧变得更加急迫。一个月后，佛朗哥完成了对西班牙的征服，成千上万共和党的士兵最终成为法国不受欢迎的难民。仅采用绥靖政策就能为法西斯统治欧洲铺平道路？抑或在希特勒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后，内维尔·张伯伦突然变得强硬是否构成了一个转折点？最后他似乎认清了希特勒无法满足的侵略意图。他的政府不仅向波兰——最有可能的希特勒的下一

个入侵对象——提供军事保障，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和平时期的征兵制度。

给波兰提供的保障意在警告希特勒，对该国的袭击会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但该保障对波兰的军事价值接近于零。当英国和法国最终开始与苏联探讨对德国进行共同防御的可能性时，他们所进行的却是典型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因为在“真实的”张伯伦身上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当然他就成了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我担心他会发现一些什么新的理由来安抚希特勒，就波兰发生的针对生活在波兰的德国少数民族的恐怖事件上，希特勒早就在大放厥词了。在法国，去询问一个人是否愿意“为波兰但泽市献身”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问题，能反映出如果不情愿最终以自杀性方式去使用武力来阻止希特勒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年春天，还留在柏林的科布拉克表兄弟们终于离开了德国前往英国，他们是自己设法成行的，但因年纪偏大，无法加入儿童难民救援运动，该运动是为成千上万的犹太和非雅利安儿童在英国家庭中寻求庇护。洛特寄来的信中充满了对我们的最亲密的关怀，她很想知道我们在美国这段艰难的早期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她的丈夫理查德不知何故总是比我的父母更像德国人，他与牧师海因里希·格吕贝尔共事，在牧师的办公室里帮助非雅利安人新教徒，1938年11月9日大屠杀之前，他一直没有意识到移民的紧迫性。格吕贝尔属于认信教会，该教会狭隘地将其反对对象限制于纳粹化了的新教教会，其官员们就像古罗马犹太总督彼拉多一样，已经洗过了他们作为基督徒的双手，然而纳粹法律却把他们重新定义为非雅利安人，并和犹太人一样受制于相同的歧视性法律。格吕贝尔一直在试图帮助那些无处可去的人，一开始，纳粹当局还承认他的组织，因为除了给那些人提供物质帮助并为他们的孩子建立一所学校之外，格吕贝尔还帮助他们寻找移民的方法。而排挤犹太人依然是纳粹的政策。

1939年1月，我的父母说服了汉斯·奈塞尔为科布拉克一家出具了一份担保书。那时，要想获得美国签证已经十分困难了：分配给德国人的美国移民配额已被超额用完，甚至连申请签证的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理查德在5月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道，他现在明白了做出“一项转变”（Umschichtung）的必要性，“尽管我早已经把乞丐这门职业视为一个圣职”。因此眼前面临的的就是移民——但是到哪儿去呢？我父亲敦促要加快速度，7月下旬，理查德再次来信写道：“西方世界的衰落正在如此迅速地逼近，使得所有此类反思毫无益处，但对于这种可能性，我将置若罔闻。”

8月下旬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把一份刊载了这个消息的报纸带回了家，报纸的通栏标题是德国和苏联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的整个错误的世界观崩溃了：我们以往相信，正如纳粹和共产党人十多年来一直喋喋不休地所灌输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主要敌人是（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而苏联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共产党人将其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具恐怖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形式。1935年，当苏联放弃了反对社会民主的运动并宣布支持由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法西斯主义派别参加的法国人民阵线政权时，他们似乎已经证实了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承诺，在西班牙和莱昂·布鲁姆为法国新政所做的努力中都能看到这一点。

那时我们的思想意识非常简单，并且就像所有思想意识一样都是自私的。最能立见分晓的检验方法就是看一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纳粹主义。是否有人将纳粹主义视为唯一最大、最可怕的威胁呢？如果苏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正如它声称的那样，并且似乎与其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承诺一致的话，那么人们就需要它，把它作为盟友，从而“左翼没有敌人”这种论调也似乎是可信的。但有关苏联大清洗和其他暴行的报道令人震惊，也许这些报道是法西斯授意的或者是反动的

夸张之词。1939年初，我们一直相信苏联总会不可避免地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论其内部出现什么劣迹或发生什么罪行。这方面的不祥之兆其实还是有的，我曾经注意到了这些迹象：斯大林于5月撤换了他的犹太人外交部长和集体安全的鼓吹者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并且警告说苏联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何况，难道苏联人不理解，一个被纳粹德国控制的欧洲将是一个可怕的威胁吗？去反对这样的一种结果，按照现实政治的定义，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但今年8月的新闻报道，以及所配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微笑的斯大林看着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那项条约的照片，就像一记闷棍击碎了这些猜测。而我们对条约的秘密附件却一无所知！对我（同样也对其他许多人）而言，这种幻想的破灭后来被证实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抵御沉迷于亲苏幻想的诱惑。

就在德苏条约签署的那一天，理查德·科布拉克又写了封信：“我担心，几天之后就会看到欧洲的命运。”他随后写来的信件愈加绝望，同时我们从报刊上得知德国的犹太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夺和羞辱。只要美国保持中立，邮寄业务就是被允许的。但是，在德国的犹太人必须亲自到邮局去邮寄发往国外的信件，并将他们的名字填写在信封上；那时，他们还被要求添加“伊斯雷尔”或“萨拉”作为他们的中间名。到了1941年9月，他们还不得不佩戴黄色星型标志。我们多数使用普通平信邮件，在信封上注明该封信搭乘哪艘轮船；这样，跨越大西洋的邮件要花上一周或十天到达。不久之后我们的朋友就请求发送航空邮件，但由于费用增加，我父亲一直不太愿意；美国的海路信件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德国，有时干脆收不到——由于英国的封锁！而从德国发往美国的信件则途经西伯利亚和日本。

两周后，即1939年9月1日，布雷斯劳附近的一家广播电台上演了一出波兰人对德国的滑稽可笑的嘲讽攻击，随后德国军队入侵了波兰。其后四十八小时，英国向德国宣战，法国也随之在五小时内对德

宣战。我们感到了宽慰，只有武力才可能终结希特勒政权的滔天罪恶，当然，同盟国将占上风。拥有“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的法国人和拥有战无不胜的海军的英国人无疑要比德国人强大得多；军事专家如此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也不允许有其他任何想法。

与此同时，德国对波兰的迅速征服以其所有的残暴行为继续着，与其同流合污的是最终的、意想不到的背信弃义：苏联对波兰东部地区的占领。在18世纪，波兰的邻国曾三次瓜分这个国家，最后一次干脆将其彻底灭亡了。那么，此次便是第四次对波兰的瓜分。伟大的英国漫画家大卫·罗在他有关英国的愚蠢和轴心国的罪恶的诙谐但绝对可靠的记录中描绘了这个可怕的时刻，他画的一幅素描，表现的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越过一个匍匐着的波兰互相问候致意，就像利文斯通和史丹利一样^[5]。希特勒对斯大林说：“我想你就是地球上的渣滓？”斯大林回答道：“我猜你就是双手沾满工人鲜血的凶手？”

战争的爆发危及我们在法国的家人和朋友，法国当局害怕“第五纵队”（这是几年前由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当时他们错误地预测他们即将攻陷马德里，凭借的就是城外有他们的四支纵队，城内还有一支“第五纵队”），从而即刻拘禁了大多数德国难民，尽管这些人事实上是反纳粹主义的真正的力量。来自洛特·汗布格尔和马尔加·哈伯的信件透露着绝望的情绪；恩斯特·汗布格尔在几周内被释放了，而赫尔曼·哈伯则面临在被继续拘禁和加入外籍军团两者之间的选择，最终他选择了后者。但他们现在都在考虑移居美国。与此同时，仍然留在德国与我们保持通信的亲朋好友在信中被迫保持镇定，因为他们必须牢记，他们写的每一个字都会经过盖世太保审查。（我仍然保留着一张来自洛特姑妈的明信片，上面盖着德国国防军集团军司令部的纳粹印记。）

在德国野蛮地征服了波兰之后，欧洲的交战各方逐渐习惯于“非实战状态”，几个月过去了，任何一方都没有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开始实施恐怖统治，但是在开始时我们对他们的暴行知之甚少，尽管我们很想知道法国和英国是否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我们现在知道，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罗斯福总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同胞——已经把纳粹德国视为对美国的实际威胁。）尽管在1939年至1940年的那个冬天，移民到美国仍然非常困难，但携带着必要文件的德国犹太人还是能够逃脱在不断收紧的绞索。正如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哈依姆·魏茨曼在1936年宣布的那样，对于中欧东部的600万犹太人来说，“世界被划分为不同的地区，有些地区不允许他们居住，有些地区则可能不让他们进入”。但是，拯救个人的努力仍在继续——有时也获得了成功。

灾难的步伐继续加快。11月，红军袭击了芬兰，勇敢的芬兰人对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衰弱的主宰进行了短暂的抵抗。然后，在1940年4月，德国人恢复了他们夺取欧洲霸权的进军步伐。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德国国防军占领了丹麦并攻击了挪威，在那里遇到了更大的抵抗。但是，即使得到了盟国的帮助，挪威也无法阻止最后的失败：在广泛宣传的第五纵队和本国的法西斯通敌者的帮助下，挪威最终被踏在德国的铁蹄之下。那些法西斯帮凶成立了一个以维德孔·吉斯林为首的傀儡政府，他的名字为我们的政治语言和意识形态取向增添了一个关键词。

5月10日，德国人同时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发动了三路进攻。在德国人对鹿特丹实施了野蛮轰炸，旨在展示他们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并在比利时和法国平民中散布了失败主义之后，荷兰迅速投降了。日复一日，有关同盟国败退的消息大量涌入，德国军队从侧翼攻破了马其诺防线，于6月初打到了英吉利海峡边。已经进入比利时且主要由英国军队构成的盟军现在陷入了德国人的陷阱——仅仅是因为

“敦刻尔克奇迹”，大约25万名盟军从这个著名海滩成功撤离，挽救了他们。我们的希望落在了最终成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身上，正如德国在西部开始进攻时那样。他试图团结法国人，甚至提议建立一个英法政治联盟，然后当法国准备单独停战时，他发誓说英国将独自继续战斗——尽管困难重重。在5月和6月播出的他的广播讲话令人振奋，他以著名的口才表明了决心，他以对法西斯的蔑视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钦佩：“我们永远不会投降。”我听了他的所有演讲，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会短暂地影响我周末从附近的市场购买杂物的工作。

这个世界惨遭破坏，而且所有的破坏发生在几周之内。德国人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所建立起来的统治权超过了拿破仑权力的高峰期。6月中旬的一天，当德国军队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进军的时候，我哭了——而且留在家中没去上学。只有丘吉尔的英国在对抗貌似无敌的希特勒，我们都下意识地停止了怀疑，转而相信丘吉尔。不知怎的，我们无法去想象德国将最终获胜，所以我们说服自己，无论形势如何绝望，正义的事业都不是没有希望的，从长远来看，在其帝国的支持下，英国将最终获胜——当然，倘若美国能出手相助的话。美国是最后最大的希望——尽管其本身四分五裂，但无论如何都是希望之所在。

德国人的进攻刚开始时，在法国的大多数德国政治难民被关押在法国难民营中，条件极其恶劣，骇人听闻；达豪集中营的老囚徒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臭名昭著的地狱还要糟糕。有些难民被征召加入法国军队的非战斗部队。恩斯特·汗布格尔于5月14日写信告诉我们，他估计第二天会遭到拘禁。当混乱笼罩着一个国家、笼罩着一个世界时，一切都处于极度惊慌的状态，每天收到的邮件中都是绝望的笔调。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个人再次代表家人投身于书信工作中。5月18日，我写信给纽约的法国信息中心，以令人尴尬的伤感（日耳曼人的？）表

达了我对法国的热爱。我说，一名在魏玛共和国担任过民主党议员的德国难民在战争刚爆发就被法国监禁起来，“只是在患有急性心脏病之后，这名五十岁的男子才被释放”。新闻报道表明这些人已经再次被捕，是否有办法帮助他们解脱呢？“我知道法国正处于战败的边缘，可你要明白我是在担心我最好的朋友，他就像我一样热爱法国。”该中心一位名叫M. 勒·布朗许的主任于6月4日回答说：“几周前法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德国国籍的男女采取新的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与此同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签署了死刑令，并建立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新的独裁政府，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将法国划分为由德国或意大利军队占领的地区、无人占领地区以及直接服从贝当维希政府的地区（法国南部的三分之一）。（停战协议的签署延续了法国和德国相互强加于对方的象征性伤害的悠久历史：和法国曾迫使德国人在德国于1871年宣布成立帝国的镜厅接受惩罚性的《凡尔赛条约》一样，此刻希特勒在同一个地方，即1918年11月德国被迫签署停战协议的贡皮埃涅市，征用了当年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节火车车厢。）

停战协议中有一条不好的条款，迫使“法国政府……按要求交出”德国政府所列名单上的德国人（或非法国人），其直接目标显然是德国政治难民。五天后，洛特·汗布格尔从法国的自由区给我们写信说，她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是在5月14日；或许，她补充说，她再也见不到他了。7月1日，我再次写信给法国信息中心的M. 勒·布朗许，询问他是否还有办法让一个处于危险之中的政治难民离开法国。如果这个人被送到德国人那里，我写道，“他就会被残酷的盖世太保处死”。我们知道那些被移交给德国人的杰出的魏玛政治家都被谋杀了，最著名的例子是汗布格尔的一位社会民主党朋友、前任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

马尔加·哈伯带着她的三个女儿逃到多尔多涅省的多姆，她不确定她的丈夫是否还在阿尔及利亚的外籍军团。7月9日，我向法国信息中心询问多姆是否在自由区，回答是“是的”。一切都处于混乱和恐惧之中，唯恐这些人落入德国人手中。我们现在知道德国人在要求交出他们这件事情上进行得非常缓慢；而另一方面，维希政府却不用德国人督促，几乎立刻就开始自行制订一项反犹太人的计划。

就在德法签署停战协议的当天，一个紧急救援委员会在纽约成立了，发起人中包括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乔治·舒斯特和其他一些对德国民主有浓厚兴趣的人士。在纽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其中一些是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一些是我父亲认识的——动员了美国工会和犹太劳工委员会来拯救他们在法国的同胞。这些团体汇编了一份急需救援者的名单，包括著名的持反纳粹观点的作家和艺术家。到了8月，紧急救援委员会已经派遣一名勇敢的年轻美国人，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瓦里安·弗莱，前往马赛组织一场营救任务，还包括去获取特别提供的美国签证；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是这些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8月初，我们得到了汗布格爾的消息，在近三个月的军队生活之后，他又和他的家庭团聚了；很可能他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支援部队。美国驻马赛领事得到了他的住址，给他签发了签证，但他还需要一份法国出境签证，而法国的官僚机构办事非常谨慎。同其他有声望的难民一样，汗布格爾夫妇决定利用非法途径离开法国，他们沿着一条危险的路线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这是瓦里安·弗莱和他年轻的同事阿尔伯特·赫希曼为他们在地图上标出的——背着能够携带的所有物品。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几乎在同一时间也走了同一条路线，但在西班牙领土上的第一站，波尔特·博乌由于担心他可能被迫返回法国，结果于9月27日自杀了。

在西班牙，佛朗哥当局很大度地允许汗布格尔一家借道里斯本，这令人感到非常惊讶。（一位西班牙的美国历史学家最近告诉我，佛朗哥的仁慈反映出他希望富裕的西班牙系犹太人能带着他们的银行账户从法国和荷兰返回西班牙。佛朗哥也喜欢“在小事上对希特勒嗤之以鼻”。在希特勒动手消灭犹太人之前的几个月里，佛朗哥出于贪婪而采取了这些措施，这真是一个出色的主意！）从那里，汗布格尔告诉我们，他们一家已经预定了9月28日离开里斯本前往纽约的一艘希腊轮船的船票：“当我回忆起在我退役后于7月30日与我的家庭团聚，并且两个月后有希望到达纽约，这一切似乎是一个奇迹，而你恰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新希腊号”轮船于10月13日上午9点抵达霍博肯时，我代表家人去迎接汗布格尔夫妇。码头上挤满了紧张焦虑的人——毕竟这是运送来自被占欧洲的难民最早到达的轮船之一——都在等待船员放下跳板。我发现了托马斯·曼，他很容易辨认出来。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下了船，托马斯·曼走上前去迎接他；这两人以一种最微妙和迟疑的方式拥抱在一起。此人是他流亡法国的兄弟海因里希，也是一位作家和反纳粹活跃分子，与托马斯有最复杂、最有竞争性的关系。（我当时不知道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也在同一艘船上。）其他一些名人相继出现了，其中包括著名小说家弗朗兹·韦尔弗和他的妻子阿尔玛。韦尔弗写了一本阐述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作品——《穆萨达四十日》，我是带着一腔激情读完这本书的。《纽约时报》第二天报道说，韦尔弗拒绝解释他是如何从法国南部前往里斯本的：“谈论这件事情非常危险。我的许多朋友仍然在（法国的）集中营里。”我把汗布格尔一家带到七十九西大街的临时住所，我感觉非常高兴，因为我们两家从此可以互相帮助，美国成了我们共同的避风港。

把哈伯一家从法国解救出难度要大很多。我父亲设法将他们的名字列入了危急名单，在1940年7月中旬，美国驻马赛领事得到指示为他们签发签证。但是直到9月底，赫尔曼才退役，得以重新与他的家人团聚。不久之后，马尔加写道，前往马赛需要得到法国当局的安全通行证，这份证件很不容易获得，并且美国领事馆也不会给他们发放入境签证，除非他们一家得到了法国出境签证——然而法国的出境签证必须依据美国的入境签证才能签发。这简直是一场噩梦！马尔加需要经人引荐给“弗雷先生，根据大家的说法，此人是解决所有困难的关键人物”。几天之后的信中提到：“谁是弗雷先生？他在马赛被称为‘无所不能者’。”战前很早就来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四次不同的场合中代表哈伯夫妇给美国领事或我父亲发来了信件。此时必须筹集一笔资金以便支付他们的船票费用，虽然很安全但并不富裕的理夏德·维尔施泰特主动出手相助。1941年4月，哈伯一家终于能够“合法地”离开法国，但他们所乘坐的船离开里斯本后遭到英国人的拦截，船上乘客被短暂地拘禁在特立尼达岛上；他们于6月才在纽约登陆。

1940年，伊冯·梅西耶和她的三个孩子乘坐泛美公司的一艘快船来到了纽约，我在公布的抵达者名单上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我们作为哈伯夫妇的朋友于1933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久别之后再次相见，伊冯·梅西耶，一个活泼、美艳、精明的有着英法血统的女人对我父亲说：“啊哈，现在我们又不用担心生病了！”夏天，我和梅西耶一家一起度过了一些日子，她的大儿子雅克同我年龄相仿。不久之后，更多的哈伯的朋友也来了，包括约瑟夫·布卢门菲尔德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出生于苏联的法国公民。我频繁地参与这个新欧洲团体的活动，门票便是我在打桥牌上的技巧。我甚至在打牌上还赢了一些钱，但真正的报酬是激烈的政治对话以及布卢门菲尔德的友谊。我很看重奥辛卡，大家都这么称呼他，因为他有着带了几分忧郁的智慧，更像苏联人而不是法国人。这些新来的人员加入了在纽约的大部分是德国

难民的圈子，这个圈子提供了增加凝聚力和友谊的场所，也是大家争论的地方。不论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巴黎，还是在一个世纪后的纽约，流亡生活中充满了和谐融洽，但也少不了针锋相对。

经过不懈的学习，1938年12月，我父亲在到美国仅仅两个月之后，就通过了以外国人为对象的英语考试。对于接下来的医疗委员会的考试，他不得不努力重新学习各种细节（他抱怨在经过近二十年的内科从业之后，现在还得去记住足部的骨骼结构），但他在第一次尝试时就顺利通过了考试，然后在1940年的夏天在曼哈顿开了一间诊所。病人逐渐找上门来了，一开始大多是难民同胞，同行医生也介绍了他们的病人和朋友前来。与此同时，我父亲还辅导其他准备参加医疗委员会考试的德国医生。最终美国患者也来了，但我父亲正处于一段困难时期——而且一直没有经济保障。近十年来不断的过度紧张正对他的健康造成影响，他患了胃炎，伴随其他轻微的痛苦。由于是我为家人采购并偶尔准备晚餐，于是我把他的胃病看作一种对我的指责。

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和森林山（这两地的社会地位更高）也住了一部分难民，这些难民也成了我父亲的病人。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也鼓动自己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去找我父亲看病，其中一个人把这层关系戏称为“布雷斯劳圈子”，确实如此，几乎每一个医学专业都能在纽约找到来自布雷斯劳的杰出的执业医生。布雷斯劳圈子还包括外科医生鲁道夫·尼森，他于1939年离开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职位，经波士顿来到纽约。尼森曾经是绍尔布鲁赫的首席助手，但实际上他本人也许是更伟大的医生。他建立了一所一流的私人诊所，并在布鲁克林犹太医院担任了一个职务，即便如此，他仍没有得到他该得到的临床医学上的任命。对于我父亲来说，尼森从青春时期就是好友，这次和妻子一起来到纽约，自然是一桩乐事。尼森的妻子露丝是一个美丽

迷人的“雅利安人”基督徒，她毫不犹豫地陪同丈夫跋山涉水前往伊斯坦布尔。

尼森（就像我父亲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对当时在医生中仍然流行的酬金分润的做法表示遗憾并公开指责。（该体系很简单，全科医生将患者介绍给专科医生，后者则将就诊费中的一部分分给介绍者。）尼森还是一位颇有激情的骑手，我记得我在中央公园看到过他潇洒地骑在一匹黑马上飞驰而过。对我来说，尼森也很特别，虽然我会不时地同他开玩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妻子把我看作他们的养子，即使他于1952年离开纽约去巴塞尔担任教授，在那里他度过了离开柏林之后的第一段幸福时光，我们依然是好朋友。当我去他的现代化的、安谧的家中探望他时，他对德国的许多事物，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直言不讳，并嗤之以鼻。

因此，在纽约的最初几年中，我们主要还是生活在一个德国-欧洲的世界里，尽管我们正在与美国人建立联系并发展新的友谊。鉴于我父母工作的性质，我想，我们比很多人更容易同化。我们当然试图在我们生活的两个世界中都能跟上潮流。讲德语的纽约人有他们自己的周报——《结构》，这份报纸报道了有关难民的艰苦生活以及那些仍然在德国控制之下过着更加糟糕生活的人的重要新闻。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个人必须保持幽默感；我父亲储存了大量精彩的笑话故事，通常是自我批评的。其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希特勒被推翻了，尊严得到了恢复，米勒和施密特两位德国好市民在柏林的一个街角见了面，两人都很高兴地告诉对方，现在各自的犹太医生以及犹太律师都已经回来了，重新有好医生和好律师来照料自己的健康和法律事务，这种感觉太好了；但米勒沮丧地加了一句，“假如他们不在街道上大声说英语就更好了”。

家里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难，父母都在辛勤工作，我不得不将学校作业——尽管不熟悉但不太难——与大部分家务活结合起来。当多伦多的彼得舅舅给我们寄来一张数额不大的支票以便我们能够在圣诞节买一些特别的東西时，他把支票直接寄给了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家庭预算的负责人”。1939年7月，我的外祖母布瑞格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她先从英格兰去了多伦多，但现在彼得舅舅正在修理房子，住在考尔德科特，所以她来到了纽约。我不得不睡在客厅里。她帮我做日常家务事。1939年9月，随着战争的爆发，我们之间发生了唯一一次激烈的争论：受到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她的愿望是保持和平，而我的愿望是希特勒的扩张主义恐怖必须被阻止，这意味着要借助武力，武力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我母亲当时同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马克斯·韦特海默在一起工作，兼任辅导员，他对我母亲的算术教学材料（这些教学材料在1940年获得了一项美国专利）很感兴趣。令他惊讶的是，他认为这些材料是基于格式塔理论的，而凭直觉和实用开发了这种材料的我的母亲却对这种理论几乎一无所知！韦特海默现在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明星之一，他希望她成为他的助手，从而能够学习她的实践背后的理论知识。然而，1939年11月，她因胆囊炎发作而病倒，只能在新学院中处理一些最重要的事项，大多数时间不得不卧病在床上。

几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家，发现外祖母也感觉身体不适；多年来她患有高血压，那天下午突然呼吸困难。家里就我们两个人，直到我父亲在傍晚时分回到家中，然后我母亲也回来了——她非常痛苦——我父亲把她扶到了床上。他竭尽所能来帮助外祖母，但几个小时后她去世了，我们不得不告知母亲。母亲和外祖母一直是形影不离的，她的悲伤因为她无比的平静和坚忍而更加感人，这是她试图按照她母亲的愿望行事而表现出来的。几天后，我父亲和我孤独地坐在河滨纪念教堂里出席一场犹太葬礼，在我们面前，摆放着一副典型的朴

素的犹太松木棺材，没有鲜花。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我的祖先中最虔诚的“基督徒”。我父亲哭了——我认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哭泣。我母亲病得太重了，无法和我们一起出席葬礼，只好留在家里，但仍在忙碌，更换床单，重新整理房间，默默地做着她母亲希望她做的事情。这年的圣诞节过得很伤心、很压抑。

在新年前夕的下午，我出门去骑自行车，回到家后，我向父亲提到我有轻微的胃痛。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做了检查，但按照他的惯例，没有告诉我母亲可能的坏消息，她仍然因胆囊炎而躺在床上，父亲只是告诉她说他必须进城，并由我陪他去曼哈顿。医院里的一次快速血液检查证实了他对急性阑尾炎的怀疑。一位“布雷斯劳”医生给我动了手术，我从医院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我很好，没有阑尾了。（应我的要求，那节浸泡在甲醛中的阑尾被装在小瓶子里还给了我。我把它作为纪念品带去了学校。）

这最后一次危机的回报对我来说是无法估量的。十天来，也是自我来到美国后第一次身处一个全部是美国的环境中，除了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英语口语之外，几乎听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照顾我的是和善的护士们——我记得，负责看护我的是一位漂亮的护士长，她在护士制服外面套了一件令人难忘的红色毛衣。同样令人难忘的是，隔壁病床上的病人有一台收音机，碰巧他在1月8日听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发表杰克逊纪念日的讲话。我被总统充满魅力的声音和热情吸引；我永远不会忘记演讲的开头，他嘲笑共和党人缺席了“这场盛大的宴会”，并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在那里。他说，这让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位老师问班上的学生“有多少人想去天堂。班上每个小男孩一边眨着眼睛想着这个问题，一边纷纷举起了手——除了一个人之外。‘老师，’他说道，‘我当然想去天堂，但是，’他用手指着教室里其他男孩，‘不是同那一群人一起去’”。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政治上如此活泼的演讲词，它让我如痴如醉。

我有了新的美国男女英雄形象。一位是伟大的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一提起希特勒，他总是义愤填膺，口诛笔伐。关于1939年世博会的计划，他曾经说当然应该包括一个德国展馆，即为“正在威胁世界和平的那个身穿褐色衬衫的狂热分子”设置一个“恐怖屋”。1939年4月，我听到一则广播，称拉·瓜迪亚正在考虑不再竞选公职，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恳求他再次参加竞选，并为我糟糕的英语道歉。他的回复是：“谢谢你4月11日的来信。我很高兴你在纽约，我认为你的英语很不错。”

我继续给亲朋好友写信。1940年8月，我写信给艾丽卡·曼，她的《野蛮人学校》（1938年）是一本关于德国教育的书，我刚读过，感谢她为“我们难民”所做的一切，并回忆起我在德国学校的日子：“我特别清楚地记得，那个信仰新教的教师两年多来一次都没有提到过《旧约圣经》的存在。”在我的学校经历中，我“感受颇深的只有两件事，对纳粹的强烈蔑视和仇恨以及作为一个非雅利安人我是如何自豪”。她的回复反映了当时的大部分情绪：“我们的回忆非常相似。你可以确信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愿望和希望。”^[6]

1940年夏天，随着不列颠空战的加剧，我们需要的不再仅仅是希望。美国社会继续深深地陷入分裂，一边是干涉主义者，一边是孤立主义者，一边的人理解作为一种自卫，美国应该支持缺乏战争资源的英国，而另一边的人则反对所有这些努力，认为美国不应该纠缠于这场欧洲的冲突之中。对于一些孤立主义者来说，其他动机也在起作用，其中有些人在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浪潮”，有些人同情他的反犹太主义，即使他们发现有点过分。罗斯福了解德国的危险，但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选年，他不得不以政治上的谨慎来中和他帮助英国的愿望。

8月中旬，威廉·C. 布利特在美国哲学学会赞助下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他曾经出任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然后担任驻法大使，并刚从巴黎回来。他的这篇讲话是论述法国沦陷的第一手权威的报告，他指责法国毫无准备，指责法国人不愿及时看到德国的危险；他描述了德国战术的恐怖，但最重要的是他强调德国间谍和特工的狡猾的行动。演讲的目的是向美国吹响号角，警告美国它也受到了威胁，美国是受英国海军保护的，一旦英国海军被摧毁，“将是我们大西洋马其诺防线的转折点……‘马其诺防线’这几个令人宽心的字眼，对法国来说不啻是死亡催眠曲的叠句”。他警告要警惕隐藏在美国的纳粹和共产党的特工和间谍，更为直接的是，他要求作为应对危险的第一步，美国应引入征兵制——这是一项闻所未闻的和平时期的措施。他要求有志愿者加入“反对已经在我们国家内部的敌人”的斗争并做出牺牲，最后呼吁“写信给我，我会亲自让你联系上那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知道你可以怎样在自己住的地方给他们提供帮助。^[7]

当然我立刻就写了封信，一周之内布利特就回了信，信中说他告诉了民主理事会与我联系。这个设在纽约的理事会的领导人是很受大众欢迎的广播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该理事会的目标是“向美国人灌输民主的意义、价值和可行性……当整个世界都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时”。理事会中一位名叫玛丽·弗里兰的工作人员写信给我，我和她保持了一年左右的联系。她交代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侦听外语（德语）电台并就任何颠覆性广播提交报告”。1941年2月，我如期汇报说我没有听到任何“令人反感的”东西，尽管我注意到有些广播“非常强烈地建议，所有德国人应该在某一天到这家或那家小酒馆去——究竟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随后，我被要求给出那些小酒馆的名字和会议的日期。回想起来，我对所做的这些工作感到有点不安，但当时正是德美同盟非常活跃的时候。

1940年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第三次连任。（10月，在学校里的选举辩论中，我被选中为罗斯福代言，而一名高年级学生则为罗斯福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辩护，那位名叫哈罗德·伊克斯的高年级学生将温德尔·威尔基称为“来自华尔街的赤脚男孩”。这位高年级学生是一个女孩，我非常崇拜她——但只能从远处，因为我对女孩极其腼腆。不过至少我赢得了辩论，并且罗斯福也赢得了选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罗斯福证明了民主领导的真正力量：他和丘吉尔是整个20世纪最有效率的民主领袖，而这个世纪目睹了太多的民主的脆弱。

尽管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之间存在深刻分歧，但罗斯福在帮助英国反对德国方面起到了微妙而坚定的推动作用——首先宣布美国是“民主力量的武器库”，紧接着，1941年3月《租借法案》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一个创立于1940年5月的强大团体，其名称是为保卫美国而援助盟国委员会，大力支持这些努力；对我来说，它仍然是组织良好的公民赢得成功的一个模式。1941年7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威尔士亲王号”战舰上进行了一次戏剧性的会晤，并公布了《大西洋宪章》。那年秋天，由于英国海上损失增加和一艘美国驱逐舰沉没，罗斯福下令美国舰艇“一见面即可开火”。面对美国越来越公开的卷入，希特勒的表现出人意料，非常被动。

在1940年和1941年两年期间，我们都能够与柏林的科布拉克夫妇保持通信，他们现在急于移民，希望全寄托于美国。但自1938年以来，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分配给各地的配额，并且筹措用以支付旅费的足够的美元也是一个大难题。我父亲给柏林的美国领事馆提供了各种保证，证明科布拉克夫妇会在美国获得足够的支持，绝不会成为公共救助的负担。这些不同的任务都由我父亲负责，他还向理查德·科布拉克的兄弟弗里茨求助。弗里茨是波兰但泽的一位富有的商人，他及时发现了危险信号，此刻已身处阿根廷。我认为

他是一个有着德国风格、被人们称为“与政治不相干”的人，一心想远离令人痛苦的消息。1940年4月，在回答我父亲的初期询问时，他就评论说，如果同盟国获胜，他们将强加给德国另一个《凡尔赛条约》，随后将又是一场三十年战争。（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竟然还做出这种类比！）当年5月下旬，他告诉我们，抵达阿根廷的难民声称“在德国的生活尽管不是一种乐趣，但仍然远胜于地狱”。1941年2月，我父亲指出：“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并非仅限于巴登……而且几乎等同于判处死刑。”

理查德·科布拉克继续在牧师格吕贝尔的办公室工作，但到那时，正如我父亲告诉弗里茨·科布拉克的那样，格吕贝尔已被逮捕，他的办公室已于1月被查封。^[8]然后，在4月，科布拉克夫妇终于在赫莎·克劳斯的帮助下获得了美国领事馆的注册号，他们承诺会得到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资助。但是，还剩下交通费这个难题，需要600—800美元。9月，洛特·科布拉克写信说，他们听说纽约有人能以400美元的价格得到古巴签证，另外需要1300美元作为保证金；10月下旬，科布拉克夫妇发电报给我父亲和哈伯夫妇，说他们拿到了古巴签证，但现在需要1000美元购买船票。在纽约和阿根廷的各家是否就如何筹集这笔钱有过争论呢？我没找到相关记录，但每一天都很重要。

与此同时，我继续与我父亲这边的格蕾特姑妈（大家都叫她姑妈）通信，在越来越绝望的情况下她还留在布雷斯劳。1941年9月，洛特告诉我们，早些时候已经搬到一间公寓去的格蕾特姑妈被命令再次搬家，这次是搬进一间屋子。（从那年9月开始，纳粹决定将所有犹太人赶到更狭窄的地方居住，要求他们定点定时在商店购物，并强迫他们佩戴黄星标记。）搬家前的那天晚上，姑妈让一位朋友帮她收拾东西，给每个人写下了告别信（我们从未见过这些信），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洛特的最后一封信中——至少我没有找到其他信件——她提到她和理查德也不得不搬到一个单间房去住，他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些家具，在那里购物也比较容易，阳台没有取暖设备，但阳光充沛，可以当作一间额外的房间利用。这封信是11月初写的，信中的笔迹还是那么轻柔、那么精确，自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给她弟弟写信以来，她的笔迹没有丝毫改变。在洛特的信中没有一丝抱怨的语调。相反，她的语气是让人放心的，她一再对我父母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对我们的生活表示关心。她是一位充满爱心、慷慨大度的女人，性格坚强，天生丽质。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心碎。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与德国的所有联系都中断了。我们再也不知道科布拉克夫妇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似乎已经到了需要解救的地步。我们和他们在英格兰的孩子保持着联系。战后——我似乎已经压缩了战争结束的时间和原因——我们获悉科布拉克夫妇已经被放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位于波希米亚的犹太人集中营，那里关押着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或者其他一些“特殊”人士，在饥饿、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下过着被囚禁的监狱生活。我们以某种方式了解到，我的洛特姑妈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是一个无穷尽的安慰的来源，她一直照顾着境况比她和我的姑父更差的人，并始终保持着尊严。当鞋带不得不用普通绳子来代替时，她将她的鞋带浸入墨水中。成千上万的人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还有很多人被从那里“朝东”送往死亡集中营，这也就是我的姑妈和姑父的结局。（几十年后，我收到了以色列的大屠杀烈士和英雄纪念主管部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确认，他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杀害了。）我的家人经常谈起洛特，回忆起她年轻时的日子以及她的勇敢。我经常想起她，在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瞬间，我的心中会突然充满她和理查德姑父令人恐惧的结局，每次看到德国的牛车就会让我有这样的联想。其余的都是我私下的想法。

在格蕾特姑妈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谈到她很高兴看到我姐姐和我成了好朋友。确实，托妮和我——尽管我们现在天各一方，她在布林莫尔学院——出于对父母共同的关心，我们之间还是比较亲近的。我仍然以为在整个美国环境中她是非常有特权的，而这种环境对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我没能充分理解她的困难。她正在攻读心理学和哲学，没有精力与我分享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兴趣。当她把一个德国男友带回家时，我毫不客气地发了脾气。但是，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依赖彼此。

紧张关系当然与家庭动态交织在一起。托妮遗传了我父亲的急性子，所以他们俩之间经常会关系紧张，而我母亲因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威，往往会（过度地？）护着托妮。就我而言，我会尽量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既作为使父亲高兴的知己，也珍惜与母亲默契的关系。出于无数公开的和私下的原因，我同父母二人特别亲近，在受到他们保护的同时也爱护他们。

1941年春天，我所在学校的全班同学——前一年秋天我进了曼哈顿的一所名叫本特利的私立高中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前往马萨诸塞州诺斯菲尔德进行实地考察，我们住在当地的青年旅馆。我们返程时恰好是在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之后，途中我写信给民主理事会的弗蕾兰夫人，告诉她在我们的旅行中有一个老师公开宣扬共产主义观点：“她否认在美国这个国家里有任何称得上民主的东西，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我们。”我曾经慷慨激昂地与这位年轻的实习教师争论美国对英国的援助问题，在她看来，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应该置身事外。我对这些左派新敌人感到异常愤怒，他们的观点太险恶了。这只是我与那些假装圣洁的旅友的许多争论中的一次，在他们眼里，帝国主义英国与法西斯德国之间毫无区别，还暗示在英德两国之间存在道德上的等同性，同时他们认为我们是“干涉主义者”，

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工具。我们的老师在这点上保持沉默，于是我向弗蕾兰夫人求教，询问我能做些什么。

几个星期后，本特利中学的校长召我到她的办公室，就我信中的内容当面与我对质，直截了当地提醒我，我拿的是一年一度的全额奖学金。到了7月，我向弗蕾兰女士汇报说，这个学年顺利地结束了，我们学校本身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缩微民主体制”。当时我感到非常羞愧——现在我仍然很尴尬，都是因为我对一个老师打小报告，随后我竭尽全力对我的轻率行为进行纠正。至少这个事件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

当然，随着德国入侵苏联，巨大的变化在1941年6月发生了。原本是一场帝国主义暴行的战争在几小时内变成了一项神圣的民主事业，实在是神乎其神。然而，此时此刻，如果德国战胜苏联，那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激烈的反共主义者丘吉尔立即认识到需要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德国军队正在突破苏联人的防线，到9月时，已经在向莫斯科进军了。那年秋天，苏联首都的保卫战成功了，12月初，苏联发动的反攻也获得了胜利，我们为此兴奋不已，包围这座城市的德国人终于被赶跑了（事实上，德国人已经推进到离克里姆林宫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我们当时推测，如果4月没有发生南斯拉夫对希特勒的突然蔑视的话——这种蔑视迫使德国人借道巴尔干半岛，将矛头转向希腊——对苏联的攻击可能会提前实施，按照德国的计划，德国人很可能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征服了莫斯科。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侵入苏联的德国人对此无丝毫准备。1941年的整个夏秋两季，来自苏联和北非战场的消息使其他所有新闻黯然失色。

在学校组织的去诺斯菲尔德远足的途中，我遇到了一个年纪比我稍大一点的男孩，名叫戈达德·温特伯顿，他编辑了一份油印周报，共有85位订阅者。他要我写一些有关海外形势的文章投稿给他。（那

时，我是本特利中学校报的编辑。)他给我的稿件每篇支付25美分，更重要的是，他给了我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我的稿子写得非常认真，甚至有点令人尴尬，当然还是强烈反德的。在1940年秋天的校报上，我试图提醒同学们注意我们濒临危险的民主的优点：“极权主义国家……想要统治世界，假如有人表示不满……集中营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我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描写的都是想象中的欧洲抵抗运动的英雄。我对间谍之类的活动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对想象中的他们在与可恶的德国人及其帮凶（即卖国贼和维希分子）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十分景仰——他们一旦被捕，就将面临酷刑拷打。我非常害怕遭受酷刑，所以我对那些抵抗者无限钦佩——而且我一直保持着对他们的崇拜：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依据的仍然是我认为此人是否会接待夜间敲门求助的抵抗者；我仍然坚持认为，在那个年代里，那些在黑暗的恐怖之夜证明了他们高尚品德的人是应该被永远记住并受到尊重的。

关于这一点，我经常会与我们的朋友梅西耶夫人争得面红耳赤，还有安德列·莫鲁瓦，在纽约过着流亡生活的著名的法国作家（也是犹太人），我为校报采访过他。他们两人都提到了夏尔·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在伦敦的“真相”——法国与希特勒刚签署停战协议，他就立刻去了那里——实际上维希政权是与他相互配合的，是剑与盾的关系！莫鲁瓦希望我相信贝当元帅（他赞助或支持了莫鲁瓦入选法兰西学院）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他们的论点违背了我最初的观点：你要么支持希特勒，要么反对希特勒。当时的世界似乎就是那么黑白分明。当然，法国的情况实际上极其复杂，要辨明通敌和抵抗之间的界限最为棘手。（路易·马勒的电影《吕西安·拉孔布》非常传神地描绘了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偶然性，马塞尔·奥菲尔斯的电影《悲哀和怜悯》也是如此。）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下午，我正用收音机收听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会，突然被一则插进来的公告打断了，公告宣布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第二天，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最终把美国卷入了与日本的战争，另外，美国早就已经悄悄地在与德国打着一场未经宣布的战争。“干预主义者们”感到了宽慰，还有忧虑，生怕愤怒的公众要求只对日本发动战争；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都确信德国是邪恶力量聚集的大本营。但是希特勒夺取了先机，他迈出了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感到困惑的一步，立即向美国宣战。此时罗斯福能够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悄然采取了“欧洲优先”的战略。丘吉尔在圣诞节期间访问了美国，并在国会两院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我再一次逃避了给当地市场送货的任务，留在家里，守着收音机寸步不离。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个伟人一起表达了对盟军最终会胜利的信心，给“联合国”灌输了信仰和希望，罗斯福将这个名词用来称呼与柏林-东京轴心国进行战斗的同盟国。

一夜之间，我们斯特恩一家变成了“外国敌人”，面临一系列新施加的限制，最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也受限。（每次去拜访住在长岛大颈区的梅西耶夫妇，我都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新学校的校长阿尔文·约翰逊和马克斯·韦特海默签署了一份文件，说明我母亲“被指定担任他（原文如此）目前的职务，是在经过彻底的调查之后，我们能够确信，她过去的经历是清白的，她对民主原则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她是守法的，并忠于美国宪法”，但是，“外国敌人”这个词太伤人了。我们再一次被抛弃了，并且同样毫无理由：难道我们不是反对希特勒的战斗最热烈的支持者吗？当然，与在法国和英国的“外国敌人”相比，或者与日裔美国人相比，我们所受到的对待要宽容得多。[18个月前，在英国，德国国籍的男性难民遭到围捕和拘留，有些被用船运往加拿大。其中有我最喜欢的堂兄弟欧内斯特·布瑞格（他已经将他的名字改为英国人的名字了），他从剑桥的雷斯中

学被抓走，并被送往加拿大的一个集中营。直到1940年的圣诞节，我才与他联系上了，并获准寄给他一个小包裹。]

最严重的伤害是我们无能为力也无法改变的：我们与欧洲的亲朋好友的联系被完全中断了。（在瑞士的理夏德·维尔施泰特偶尔会在信中提到朋友们的情况，但他于1942年8月去世了。）我们有心无力，只能完全依赖公共新闻对战争的报道。1942年春天，形势变得格外严峻：德国人包围了列宁格勒，离莫斯科依然很近，并正在向斯大林格勒进军；6月中旬，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为援救被英国人打败的意大利残兵败将曾于1941年涉足的北非，德国人重新占领了利比亚的托布鲁克，只有被击败的英国第八集团军还驻守在隆美尔将军和埃及亚历山大港之间。如果德国人在埃及取得成功，那么他们是否会发动巨大的钳形攻势，南路横扫高加索，北路从埃及起兵，然后在巴勒斯坦和盛产石油的中东会师呢？

1943年5月，我父亲应邀去卡茨基尔区的格罗辛格酒店为哈依姆·魏茨曼患病的妻子薇拉·魏茨曼做检查。（向魏茨曼推荐我父亲的是约瑟夫·布卢门菲尔德，他记得我父亲是哈伯的朋友和医生；我打电话给布卢门菲尔德，为我父亲这次出行充当司机而征求他的许可。）当我们到达格罗辛格酒店时，我被安排在魏茨曼的客厅等候，我父亲则进去为魏茨曼夫人做检查。在那里我遇到了年轻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他新近来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此时他正在同魏茨曼的助手迈耶·魏斯盖尔交谈，此人是个话痨。第二天，魏茨曼博士，一个浑身散发道德和知识威力的温和的人，带着我在花园里散步，对我谈论着他对巴勒斯坦的愿景。他挥一挥手，指着路边的鲜花说道：“内盖夫沙漠也将鲜花盛开！”听魏茨曼谈论他一生的梦想，这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魏茨曼令我感到敬畏，当时他正在与更激进的犹太人和顽固的英国人进行最艰难的政治斗争。

我们很清楚德国的暴行。1942年6月，捷克一个名叫利迪策的村庄遭到血洗，这是纳粹实施的报复，起因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暗杀，此人是盖世太保的副首领，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追随者之一。这次屠杀成为德国暴行的持久象征（如同1944年6月发生在法国小镇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的大屠杀一样）。我们也知道1943年华沙犹太区的英勇起义以及德国人就此展开的难以形容的清算。这些公开的野蛮的恐怖主义行为旨在消除欧洲对纳粹占领的抵抗。其中最严重的罪行——对犹太人的斩尽杀绝——是在“夜色和迷雾”的掩盖下更为秘密地进行的。当然，这方面的消息也被泄露了出去，最初是1942年8月格哈特·里格纳向世界犹太人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内容是有关消灭所有欧洲犹太人的纳粹计划。这些信息足以让同盟国在1942年12月发表声明，“在所有被占领的国家里，处于骇人的恐怖和野蛮的状况下的犹太人，都被押往东欧。所有被赶走的犹太人从此再无音信”。然而，除了根据以前发生的情况——流放和集中营——所做出的推断之外，绝大多数人没有或无法进行更多的想象。我们可以想象到集中营中凶恶的残忍，但想象不到邪恶的毒气室。借用一下战后德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们在纽约“不了解”奥斯威辛集中营或大规模屠杀，也许出于某种原因我们不想相信谣言，也许我们不想知道。我们可能始终有一种保护自己、远离最坏情况的倾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以及能够知道的，都足以令我们痛苦、愤恨、忧虑不安。

哪些政府和组织知道这些暴行，它们又是何时知道这些暴行的？这个问题理所应当地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同盟国各国的公众都知道些什么？是什么东西渗透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我们最大的恐惧是德国的胜利，由此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战争本身，因为只有希特勒的失败才能给我们带来解脱。我们当然担心西欧犹太人的生命，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我们能够想象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是多么恐怖，但我们对于东方数百万陷入战争并且几乎完全束手待

毙的人是否有同样的敏感呢？我们是否认识到他们是出生于西方、出生于德国却无辜地陷入疯狂的反犹太人浪潮中的受害者呢？这些最深刻的问题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们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带给我痛苦的思考。

在令人绝望的战时状况和狂热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到处弥漫着逃避繁华、返璞归真或为不可宽恕之事寻找借口的强烈愿望。1943年3月，斯大林下令杀害了两名波兰犹太劳工领袖亨利克·埃里奇和维克多·奥尔特，这两人原本已经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取道苏联前往美国的安全通行证。这一罪行被揭露之后，美国的劳工领袖，特别是身为俄裔犹太人的国际女士服装工人工会负责人大卫·杜宾斯基，在纽约市中心会场组织了一次抗议纪念会。我的热诚的反共朋友恩斯特·汗布格尔给了我一张票，以便让我参加该集会。（汗布格尔把自己的名字也英语化了。）

这种情况在继续着，与此同时，美国的舆论受到鼓励，要把苏联看作一个重要的盟友，只能以最好的措辞来赞美。《生活》杂志于1943年3月出了一期苏联特刊，封面刊登的是斯大林的照片，其社论还配了一张慈祥的列宁的照片，题为《现代俄国之父》，文章开头如下：“也许现代最伟大的人物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是一个平凡而又明智的人，全身心地致力于拯救1.4亿人民，去摆脱残酷和无能的暴政。他做成了他打算做的事情……他使革命变得更有意义，并且挽救了革命，使其免遭法国大革命所遭遇的那种很大程度上愚蠢的失败。”那篇社论也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苏联人……生活在一个信息被国家严密控制的体制之下。但也许对此不应该采取过于激动的态度。当我们考虑到苏联在其存在的二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是能够宽容其某些不足之处的，无论那些缺陷是多么令人震惊。”我藏匿了学校图书馆里的那一期杂志，因为我认为这

样做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我不太可能为此道歉，但也不能放弃它；我现在仍然留有这本杂志。

纪念埃里奇和奥尔特的集会是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这两个被暗杀的劳工领袖的巨幅画像作为背景被悬挂在讲台的两侧。工会领导人纷纷对谋杀行为进行谴责，然后（这年是选举年）我们的难以征服的市长拉·瓜迪亚出现了，他跳到讲台上，向死者致哀，并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演讲：“我要告诉乔大叔，‘不要再这么干了！’”即便是在当时，他的这种开朗且似非而是的天真也深深打动了我。

但是，我也很容易受到《生活》杂志的观点的影响。一个月后的4月，德国人宣布发现了数千名波兰军官的坟墓——他们说是苏联人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谋杀”的。由于当时我们知道红军正承受着同纳粹作战的最沉重的负担，而且要继续战斗下去，至少要到在西部开辟“第二战场”的那一天，因此很多人愿意相信苏联对德国指控的反击，即波兰军官是被德国人谋杀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毕竟对我而言，“谋杀”这两个字是带有德国标签的，我不想去相信那些吵着要进行独立调查的职业反苏人士。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我才接受了关于苏联在卡廷所犯罪行的真相——那时才义愤填膺。

那年6月，我高中毕业（高二我跳了一级，所以比其他同学要年轻一点），接着在7月进了哥伦比亚学院，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内一个规模较小的男生本科学院，当时的院长仍然是杰出的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此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国际主义者，私底下也是一个反犹分子。我获得了奖学金，并且在整个大学期间，我都住在皇后区的家里，到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来回都是坐公交车——一方面这肯定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我在心理上倾向于尽量靠近家里，或者是我母亲将幼雏推出巢穴的母性本能发育不良。

哥伦比亚大学那时有许多犹太学生——它对犹太学生一直比其他常春藤盟校开放——但几乎找不出一个犹太教师。入学第一天，在排队注册的时候，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紧紧抓着一份PM，这是纽约左翼自由派的午报，随后我们开始交谈。他名叫艾伦·金斯伯格，我们在大一期间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他会到皇后区来拜访我的父母，声称我母亲比我父亲更具原创性，并且通常都很坦诚，令人耳目一新，不那么因循守旧，有点离谱——却又亲切可人，言谈中充满了诗意警句；他已经成为一位认真的诗人，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在1944年共同主持了一个支持罗斯福竞选总统的俱乐部。

与金斯伯格的友谊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当他第一次与学院发生严重的冲突，尤其是他在宿舍肮脏的窗玻璃上写了些淫秽的文字时，我试图说服副院长原谅他的“天真”，请求他放弃处罚。艾伦与学院的几次冲突很快被传开了，结果他被停学一年左右，但我们保持着联系，我看到他与“垮掉的一代”的领军人物在一起——酗酒作乐，放浪形骸。（他在我们的一个派对上醉倒了，是我把他带回家去的。）1947年，当艾伦在商船队工作时，他经常给我写信——都是些令人捧腹、非常离谱的信件，其中包括满满一页给资产阶级分子下的非常精彩的定义（肯定是我要求他写的）：“社会中的一个患了便秘症、缺乏想象力的成员……他特别相信……在政治、艺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绝对真理，任何偏离他的想象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他相信幸福是邪恶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快乐就是罪。所以他不赞成任性的（卢梭似的）生活，厌恶性、饮酒、冲突和暴力、吸毒、赌博、反驳父母和权威、爱情（除了美国那种混蛋形式之外）、艺术……”我们还未完全脱离稚气，眼前活脱脱就是一个当代的福楼拜！

当我们还在大学里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接受挑战，与美国西点军校进行辩论赛，当时我是

学院辩论队的队长，我选择了艾伦作为同伴。在1944年5月就“迎刃而解：最能为世界和平效力的是一支国际警察部队”这一主题进行辩论时，金斯伯格和斯特恩出场，我不记得最终是哪一方赢得了辩论，但我确实记得我俩组成的辩论队表现出色，虽然可能在西点军校的眼里有点异国情调；最令我难忘的是这样一个画面，艾伦站在一处崖壁上，俯瞰着脚下的哈德逊河，口中背诵着华兹华斯的《丁登寺》中的诗句。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起初学的是医学预科课程，准备继承我德国祖先的衣钵，但从一开始，我就被哥伦比亚大学必修的历史和文学课程吸引，当时这些课程仍然完全以欧洲为中心。我们学习正遭受德国威胁的文明的历史和经典，德国人从精神上否定了西方所代表的一切，尽管他们已经实质上掌握了西方的科技进步。我的运气好得不可思议，找到并且此后就紧紧跟随两位伟大的老师和文体学大师：雅克·巴尔赞，一个传统法国教育的产物，以及莱昂尼尔·特里林，他比我之前（或许之后）见过的任何人更了解欧洲文学。正是金斯伯格给了我一个提示，让我去听特里林上的英国浪漫主义课程；当时特里林还不具有他后来所有的名望，事实上，在一个伟大的院系里面，他的光辉被其他人掩盖了。那样的经历和特里林的其他课程使人谦恭并改变人生。巴尔赞和特里林不仅教给我们指定的科目，还教我们写作，就我们的努力做出非常贴切的、灾难性的往往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由于我缺乏对自然科学的天赋和热情，而在历史和文学上却感受到直接的诱惑，因此我在医学预科上的兴趣逐渐消失了。

1944年4月，当时是我在大学里的第三个学期（战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实施的是一年三学期的连续课程安排），我必须就我的专业做出决定——有一阵子我左右为难。当时使我陷入困境之中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对成为一名医生怀有真正的兴趣，但是否准备好放弃特里林——我正在同他一起发现经典名著的重大问题和欧洲过去的复杂性

——而代之以有机化学？我对文学的迷恋，我想因我对正在发生的世界危机的热切关注而得到了强化，这使我希望转向学习历史，且最终有望执教。就这个问题我同巴尔赞谈了好几次。起初，他力劝我继续学医，同时保留历史作为毕生的“情人”，但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当我坦承我仍然希望将历史作为我的专业后，他进一步追问我今后的确切打算。“教书”，我回答说。然后他又询问道我是否想在劳伦斯维尔学校任教，他有朋友在那里。当我说了“是”之后，他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鼓舞人心的话。我一直很感激他给我的微妙的测试：你的兴趣是否真实，抑或你对大学生涯心存幻想？

就在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我得到了最权威的忠告。1944年4月，我陪母亲去普林斯顿梅塞大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家中去看望他，母亲要给他展示她的算术教材。我在他的（非常德国化的）客厅里等候，并对他的家充满敬畏，当他从书房出来时我越发敬畏了。他让我母亲放心，她的方法是可靠的，很有价值。然后，他以最简单、最体贴的方式问我正在做什么——语气是如此亲切，以至于我认为自己有些紧张，很少有人能使我变成那样。我承认了自己在职业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他回答说：“这很简单，医学是一门科学，而历史不是，因此，选医学。”但我还是遵循了我的直觉，选择了历史，毕竟历史也是具有科学元素的，同时对白大褂保留了我的终生敬畏，相信医学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科学。我父亲感到很失望，而且很担心我是否能够闯出一条路子来。

在大学校园里，我继续写作或谈论时事；我甚至在柯蒂斯演讲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主题为未来欧洲的召唤。（一等奖未颁发！）我定期在校园广播中发表政治评论。我想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想把失败的民主制度的教训传递给我的美国同龄人，我担心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要么发现自由受到了美国式的污染。我以激励的语言阐述了民主的独特价值，知道战后的美国将不得不改变其缺

陷，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和在吉姆·克劳^[9]身上所犯下的罪行。我认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参与政治的激情正是源于我在德国的经历，感觉是美国式的。

那种德国经历也可能扭曲判断并加深偏见。在那些日子里，作为一个“左翼自由派”几乎自然而然地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我读过关于“强盗贵族”的描述，并确信富人倾向于支持威权主义，甚至可能是法西斯主义；他们肯定是反罗斯福的。但就我而言，在所有广义的犯罪行为中，纳粹政权始终是最大的威胁和最恶毒的敌人，而红军的英雄主义则弱化了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怀疑。在理智上，我试图将德国和纳粹区分开来，但在情感上，我怀疑我是否能做到。与包括丘吉尔在内的许多人一样，我认为1944年7月20日试图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实施者，不过只是老式的容克或普鲁士军官，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利益。

到目前为止，尽管我是敌国侨民，但我觉得我完全是个美国人；我甚至提出了美国过去的主张，写下了“我们的”祖先和他们在福吉谷所受到的苦难。我相信我就是美国人，从来没有对这种信念有任何冒犯或违背，尽管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不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1947年刚满二十一岁时，我就在第一时间合法地申请了公民身份。由于我是民主理事会的成员，我的公民身份听证会被搁置了——也许有个名字相似的组织被列在司法部的亲共组织名单上。我第一次提前尝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滋味！布利特向我保证他会出手相助，如果需要的话，并补充说：“1940年，当我向你推荐理事会时，它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其中的主要推动者是亨利·R. 鲁斯先生。”最终，我没要布利特的帮助，他在他的1940年演讲之后不久就变成了对罗斯福政策的激烈批评者。

在学习欧洲历史和文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不能单纯用民族的眼光去看待欧洲过去，而应看作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组成部分。这让我摆脱了一些轻率的偏见。阅读尼采的著作则会得到一种不同的启示：我认为他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心理学家，也是一位对俗气、平庸和民主的苛刻批评者。对于大多数人的暴政，尼采是一个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更尖锐、无情的批评者，因此成了一个能加深别人政治设想的批评家。（那时我开始构建我的“温和的尼采”的概念，例如，把有关超人的夸夸其谈解释为对自我超越的一种恳求。）那时把尼采视为纳粹主义先驱的观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事实上，这让我意识到去探究纳粹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多么复杂。有关德国不可避免的“从路德到希特勒”的道路的所有书和口号似乎都是幼稚的和执迷不悟的。

在大学之外，我仍然活动在我父母的欧洲和德国圈子里。在他们之中犹如在他们之外一样，人们在看待一个被击败的德意志帝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坚信一个民主德国的可能性并准备为之效力。1943年，我父亲的老朋友，现在在芝加哥教书的哲学教授齐格弗里德·马克，与人合著了一本名为《德国：生存与毁灭》的书，书中坚持认为德国具有民主复兴的潜力，纳粹主义对德国民主人士最为苛刻，且对犹太人的迫害只是纳粹大规模犯罪的一部分。魏玛是被许多势力摧毁的，马克指出，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因此允许苏联在战后德国建立“极权主义”制度将是灾难性的。战后占领军会发现，德国的市政当局拥有比该国其他任何政治机构更长久的民主传统。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提示。他的书呼应了“德国自由之美国朋友”这个组织的想法和希望，这个组织帮助建立了紧急救援委员会，其中包括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和托马斯·曼。

在另一边则是摩根索计划^[10]的支持者，他们持“现实主义”观点，相信只有一个去工业化的农耕的德国才能从精神和事实上解除其武装。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有许多持相同理念的同僚，如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范斯塔特，他们认为德国人无可救药，天性具有攻击性，穷兵黩武，倾向于犯罪。范斯塔特主义的一个特殊版本出现在由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雷克斯·斯托特领导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委员会”中，参与这个委员会的还有马克·范·道伦、艾伦·内文斯和威廉·夏伊勒。在该团体的赞助下，由T. H. 特滕斯（一位德国流亡者）撰写的一本名为《了解你的敌人！》的书于1944年面世了，此书由传记作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作序——我在孩提时代就读过他写的《七月十四日》。特滕斯认为德国人的性格是一成不变的：“德国人民已经证明他们随时准备支持他们政府的罪恶政策，并且为实现他们征服世界的泛德计划而奋斗到底。”因此，这个国家应该完全被肢解，其人民应该在欧洲国家中被视为永久的贱民。针对那本书我写了一篇尖锐的评论，嘲笑特滕斯的观点，即所有德国民主人士只不过是总参谋部手中的工具。那本书犯下了“伪造历史”之罪，是一个“如何肆意涂抹历史文献的例子”。我认为，仇恨不是建立和平的基础，我记得埃米尔·路德维希撰写过一本高度颂扬墨索里尼的传记。

在美国的一些德国人圈子里，所有德国流亡者都赞成并成功地传播着对待一个被打败的德国所应实施的一项惩罚性政策，这已成为一个战后神话。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大声喧嚣的路德维希似的人物。也许，爱因斯坦是同情这种苛刻的观点的，尽管他基本上保持沉默。但在那些身居要职的人士中，占上风的是一种具有更加细微差别的观点。

与此同时，当我们于1945年在纽约终于看到纳粹暴政的终结时——一个在短短的十二年里就摧毁了世界的暴政——那种无限的宽慰

感是与仇恨交织在一起的。就在那些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被盟军解放时，我们目睹了纳粹大规模屠杀和残暴兽行的毫不含糊的铁证，那些铁证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坏的想象，令最坚强的战士也不禁流下了泪水。从红军于1月27日解放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英国军队于4月15日解放的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从美国军队于4月29日解放的达豪集中营，所传来的照片和报道远远超出了我们最深沉的恐惧。那些饥饿的幸存者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被迫去埋葬同样受尽苦难的受害者——每一帧图片、每一篇报道都构成了对德国人民的强烈控诉。事实上，即使在此之前，我们中间并没有多少人对1943年汉堡遭受狂轰滥炸或1945年2月德累斯顿爆炸事件中的德国受害者产生过多少同情。丧失人性的德国暴力也传染给了德国的敌人，这正是我们逐渐视之为特别邪恶的另一方面。

[1] 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美国人阿尔文·约翰逊创办了“流亡大学”，专门接收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科学家。——译者注

[2] 美国在谴责纳粹暴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力量。在国会选举中他的政府遭到反对后的几天里，罗斯福总统在国务院撰写的一篇讲话稿中加强了语气，宣称，“我个人几乎难以相信在20世纪的文明中居然发生这种事情”，并召回了美国驻柏林大使。拉·瓜迪亚市长和其他官员使用了更强烈的语言。另外，这个国家也是有分歧的。一些强大的团体支持由曾经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倡导的孤立主义；反犹太主义盛行，也许是在隐匿性地增长；在德裔美国人中有一个强大的亲纳粹团体，即当地领袖弗里茨·库恩领导的所谓的德裔美国同盟，他们四处传播纳粹毒液，当然包括攻击罗斯福及其支持者，更不用说上层社会中同情国家社会主义的那么多代表了。罗斯福派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成为一名超级绥靖主义者，他声称能“理解”纳粹与犹太人的问题。商人们对德国的经济活力印象深刻，而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则被不断招惹麻烦的工会搞得杂乱无章。

[3] 维尔施泰特和他的结局证明了德国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些尖锐的矛盾之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于1942年5月给慕尼黑的一位物理学家朋友的信中写道：“就维尔施泰特而言……我一直去看望他，只是最后一次我没能成行。但我会留意他的，几周前的一封信告诉我，他的情况要比以前好很多，而且危险也不

大。”绍尔布鲁赫对希特勒政权做出了可悲的妥协，但也承担了些许风险去帮助有名望的犹太朋友：为他们寻找公共住宿，保留短暂的私人体面等。他还为遭遇纳粹迫害的其他受害者提供过短期保护。维尔施泰特于1942年8月初在瑞士流亡期间去世。

[4] 到1939年3月，其他美国大学总计提供了200多个类似这样的奖学金，但一直未发完。它们寄希望于那些合格的候选人，其中许多人仍在德国，还有些人在英格兰，能够获得特别签证。有个资助难民学生校际委员会聘请了罗斯福夫人担任名誉主席。今天有些人知道有哪些人没有给在欧洲遭受到迫害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例如，国务院中来自布雷肯里奇·朗的卑鄙狭隘、反犹太主义的阻挠，但他们同样也应该了解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组织所自发做出的努力。

[5] 19世纪60年代，美国记者史丹利被派往非洲去寻找失踪的传教士利文斯通。两人见面时，史丹利说了一句相当著名的话：“我想你就是利文斯通博士。”

[6] 几个月后，我的父亲给她的父亲托马斯·曼写了封信，他对《洛特在魏玛》一书赞不绝口，但也指出了其中两个可能的错误。在曼手写的回信中，他猜测是否会出德文版的第二版，以便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这取决于战争的结果，就像许多更大的事情一样。想到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英国人也在为洛特而战，这未免令人感觉奇怪。”

[7] 这篇演讲词包含了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或许不太得当的，用于更加著名的呼吁中的先例：“我们什么时候能对他们（我们的立法者）说，我们不想再听到我们能从我们的国家得到什么，我们真正想听到的是我们能给我们的国家贡献什么。”希奥多·索伦森和约翰·F.肯尼迪是否听到或看到了这篇演讲词？他还问道：“美国人，为什么我们还要长眠不醒？”

[8] 格吕贝尔被囚禁在位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中并受到粗暴对待，1943年获释。战后，他在东德政权下曾短暂地拥有一个正式的新教职位。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有关格吕贝尔的相互矛盾的说法，但没有人对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工作表示过怀疑。

[9] 对黑人的蔑称。——译者注

[10] 摩根索计划是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中，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一个二战后处置德国的计划。——译者注

第五章 当德国不存在时

1945年5月8日是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德国这个国家不复存在了。在德国最终被打败之后，德国威胁变成了德国问题：这个国家现在成了盟军胜利者的牢笼，将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国家的人民将如何理解其过去并为其未来做好准备呢？英美两国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议，在当时这样做似乎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吸取的一个恰当的教训，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后沉溺于一个有害的神话，即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是被“左派叛徒”和犹太人从后面猛刺一刀而失败的。这一次，问题得到了解决，德国政府和军队必须承担责任。西方同盟国的要求也意味着向苏联保证，他们与德国的单独媾和将被绝对排除。这些论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正当的，比起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会激励德国人继续战斗并因此延长战争的说法更加具有说服力。无论如何，5月8日是一个该庆幸的获得拯救的日子：纳粹的残酷暴政，尽管直到最后仍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还是被一个只有希特勒的疯狂野心才能锻造出来的联盟打垮了。只有希特勒的狂妄和德国的侵略，才能将美国和苏联的军队引到欧洲的心脏——出乎意料的是，它们在那里驻扎了半个世纪。

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失，但德国人民仍然存在，他们身处残垣断壁、饥寒交迫、忧伤痛苦和凄凉无助之中，大约有700万德国人丧失了性命或仍然流落在异国他乡；交通和通信几近瘫痪。家庭都被撕裂了，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散落在被遗弃的乡村里；不久，从东方返回的数百万人涌入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盟军占领者

已经将其分裂成几块。德国人被炸弹炸怕了，当他们开始清除门前的碎砖断瓦时，他们似乎只是模糊地意识到降落在他们头上的道德毁灭。仅仅用了十二年时间，他们和他们的纳粹领袖就破坏了整个世界，给他们自己留下了无法逃避的负罪感和责任感。在1940年一年内，他们及其欧洲仆从成了欧洲大陆的主宰和剥削者；然而五年之后，他们就一败涂地，茫然失措，漂泊不定，遭人白眼。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中大多数人仍坚信，他们幸运的元首是能够创造出又一个奇迹来的。在此之前，从没有人能预知这种彻底的失败和耻辱。

身处境外，我们中大多数人一直相信同盟国会最终获胜——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希望，凭丘吉尔的口才和英国的毅力而神奇地得到了加强，其根源在于我们不相信这种邪恶能够在欧洲获胜。当德国于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屈膝投降以及1944年6月盟军攻入法国之后，这种希望逐渐获得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即使在那个时刻德国人仍然有能力开发新的武器并发动新的进攻。但到了1944年至1945年的冬天，苏联红军从东面无情地推进，同时英美军队在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支持下，从西面打到了德国本土，最终敌人被粉碎了。^[1]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在盟国之间是如此不均等！

在战争远未结束之前，同盟国就已经开始策划如何最终处置战败的德国了。它们先是同意划分三个占领区，然后在丘吉尔的敦促下，达到四个，增加了一个法国占领区。苏联占领区将纳粹首都柏林围绕在其中，但这座城市将拥有自己的特殊地位，被一分为四，每个战胜国各占一块，由四方军事指挥官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将设在此地，该委员会将为四个占领区制定并执行共同的经济政策。

在1945年7月召开的美、英、苏三巨头波茨坦会议上，同盟国做出了进一步的决定，其中包括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建立位于德国领土之上的波兰和苏维埃“临时”行政机构：康德的哥尼斯堡划归了苏

联，但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和包括布雷斯劳在内的所有西里西亚都划归了波兰。数百万德国人被驱逐出自古以来的德国土地，捷克斯洛伐克从苏台德地区驱逐了300万德国人。

德国的失败也导致了德国的野蛮暴行被彻底曝光于世，我们所看到的获得解救的集中营的照片，不仅使拍摄的士兵眼眶里充满泪水，也令我们所有人感到义愤填膺。我们还不知道针对犹太人的系统的灭绝计划，但我们所知道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我来说——足以使我们对战争期间和战后德国人遭遇的痛苦无动于衷。的确，这个国家正处于废墟和绝望之中，政权被摧毁了，道德上破产了；我们知道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假定许多德国人仍然坚持纳粹信仰，接着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确信自己是无辜的，内心充满自怨自艾。在德国之外，普遍存在憎恨和不信任。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的惩罚决定，以及随后从东方被驱逐的大约1000万德国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引起丝毫同情心。用今天的说法来讲，在东欧开始实施“种族清洗”计划的，正是德国人自己；捷克和苏联的举动似乎都是对它的回应。德国人也常常是希特勒疯狂施虐发泄的无辜受害者，这一点我们只是后来才予以承认。

在恐怖的岁月里，我对德国的布雷斯劳变成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在情感上很少或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毕竟，我和我的家人已被驱离此地。在战争期间，我一直对这个城市的命运漠不关心，它的实际存在已经毁于希特勒的一道命令——到1944年为止，布雷斯劳一直有充足兵力驻守，最后被红军包围——而命令的内容是必须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现在它的未来掌握在波兰人手中，因波兰东部的乌克兰领土归属苏联，从而将其划给波兰作为补偿领土的一部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布雷斯劳是我生命中不可泯灭的一部分，我对其归属感的恢复是在我人生旅程的后半部分。每当不关心政治的母亲谈起故乡时，她常

常把它称为德国的布雷斯劳，她指的只是已被埋葬的过去的事实，当然没有表达对未来变化的任何希望。

对我们身在纽约的人来说，德国的情况突然变得遥不可及。在我眼里，就像1945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去世使得两周后希特勒的自杀黯然失色一样，在广岛上空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同样也盖住了欧洲胜利日的光芒，并留下了更为深刻的记忆。我知道一个全新的、可怕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此前的某个时候，我的叔叔奥托·斯特恩（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告诉我，威力巨大的新武器正在制造中，未来的战争将远远比现在的战争更具灾难性。（他可能是第一个在1944年12月就提醒爱因斯坦注意原子武器开发的人。）当我听到广岛的消息时，我立即回想起奥托叔叔未指明的警告。当时，我认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使用是必要且正当的手段，以便防止在延长的战争中导致无数美国人的死伤；但我对落在长崎的第二颗原子弹就感到疑惑了——不久之后，我便与一部分人持同样的看法，他们质疑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是否仍不足以说服日本人投降。

在很快就被称为原子时代的那个年代，保留战时联盟的必要看来似乎非常关键，其可行性则成为激烈争议的主题。我毫不怀疑与苏联继续结盟的可取性，尽管我意识到可能的利益冲突和苏联的挑衅，我对美国的政策也并不是不加批判的。在战争期间，美国和苏联试图将意识形态冲突淹没在与共同敌人的殊死斗争中。随着那个敌人的消亡，它们各自在意识形态上的恐惧和对对立制度的厌恶找到了好斗的政治上的表达：在野心和恐惧驱使之下，西方和东方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对抗之中。

到1944年至1945年的冬天，波兰的未来已经成为造成分裂的主要问题。波兰家乡军在1944年夏天针对德国人的起义被纳粹镇压，而苏联红军则在附近维斯瓦河对岸的阵地上袖手旁观；现在，苏联人则决

心在这个老牌反苏国家里建立一个亲苏政府。我每天都在写有关当时政治事件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许多苏联对要求民主的波兰人的敌意，口头上承诺的民主都被弃之脑后。例如，在1944年12月30日，我写道：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同盟之间将会出现麻烦”。1945年4月，在一个定期由学生就时事展开辩论的名为《美国空中论坛》的广播节目中，我恳求维护同盟国的团结，但指出了苏联违反了它们对波兰的承诺。我们现在知道，早在1945年5月，丘吉尔就用“铁幕”这个词来形容红军将东欧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的后果。他的预感是否既加强又削弱了他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抵制呢？

对德国军队和政党领导人进行的审判于1945年11月在纽伦堡开始了，他们被指控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项审判似乎证明了组织起诉的同盟国的凝聚力。当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会使英美两国的法官与安德烈·维辛斯基及其他战前曾参与苏联大清洗的著名人物并肩工作感到难堪的困境，我也没有预见到有些德国人会将这个精心准备的审判视为“胜利者的正义”而予以排斥——似乎只有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法庭，才能够被公平地或迅速地组织起来。毫无疑问，苏联承受了战争的最大负担，红军的英勇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从重创中恢复及其向柏林的进军给了它一种道德资本；我们不愿意去相信突然冒出来的有关苏联人在攻入德国时所犯暴行的故事，我们也不想去知道。

我也没有注意到，德国的消失——作为一个威胁主体暂时的也是可喜的消亡——在时间上恰好与我在美国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相重合。正是在1945年至1949年，我成了一个美国公民、一位教师、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并形成了一个我最亲密的美国朋友圈，与此同时，我在职业上和内心的自我中，对我继承的欧洲传统开始有更清醒的认识，当然，这种传承并不专属德国。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在大致相同的时

间里，许多德国人开始发现他们的欧洲身份，并成为—一个共同的欧洲的支持者。

到1945年，我父母在纽约过上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活。我父亲的诊所发展得不错，现在有了更多的美国患者。母亲的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过去几年里，她一直在各种学校里介绍她的算术教学方法；在马克斯·韦特海默的鼓励下，她正在准备撰写一本关于这种教学方法的书。1943年，我姐姐在银行街教育学院的学业已经完成了一年，她把她的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巴塞特的同学介绍给我母亲，这个同学颇有教师天赋，她发现这种教学方法能立即使人产生兴趣。她成了我母亲的助手，并于1944年在她父亲的贷款支持下，在曼哈顿建立了一所幼儿园，我母亲能够在这所幼儿园里将她的教育原则和游戏付诸实践。我母亲在那所学校里——以及我母亲、姐姐和佩吉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我母亲去世——完成了各种书的写作。第一本书是《孩子们探索算术》，于1949年出版，该书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认可，亲自证明她的方法“对于算术教学具有实际价值”。这些书和我母亲的算术教具对美国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回想起来，我能够看出，结构算术是德国思想在美国发展和繁荣的一个例子，这个移植的实例结合了来自两国的见解和美德。这所幼儿园尽管资金微薄，却吸引了一群热心的父母，他们给一些特别出众的孩子报了名，我记得其中有约翰尼·拉法基和摄影师黛安·阿勃丝的女儿杜恩。我母亲在美国开辟了一条新的职业道路。

与此同时，我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主修的是历史和政治理论；父母认为我的优等生身份是我美国化的特别象征。1946年6月毕业后的一个月，因我从大四开始一直担任助教，我被任命为当代文明这门课的讲师，并被指定去药学院讲授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一科目上著名的核心课程。也许该系的系主任在突然需要一位老师的时候，估算出我可能造成的伤害如果加在未来的药剂师身上将不会比加在普通学生身上

更严重。因此，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了，虽然只是处于可笑的低水平。对我来说特别幸运的是，这项工作于我不仅在学术上的生存和经济上的自足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使我的内在得以提升。我非常幸运地开始了教师生涯，但即使在那时，学术的界限也是被一种内心的欲望超越的。在希特勒之后，公民的被动性不再是一种精神上的可能性。

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我模糊的生活的另一种形式，因为我所附属的系也正是我在其中即将开始研究生学习的系，所以我马上变得既独立又依赖。无论如何，我非常喜欢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西方文明这门传说中的“核心”课程，而且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即使是边干边学。在我眼里，我所教的历史课就是一部戏剧，一部伴随着伟大的历史进程的思想和人物剧，并且当我开始教这门课的时候，正是西方文明刚刚战胜欲将其毁灭的危险的时候。对我自己我还不能确定，但对这门课程绝非如此：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它会变得枯燥乏味。

佩吉·巴塞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而且独立的女性，比我年长几岁，在许多方面，她都与众不同，高雅迷人，热爱自然，富有艺术品位，慷慨雅量，并且起初对政治漠不关心，是个安静的人，既讲究实际，又快乐天真。她生活在一个非常传统的美国家庭里，在父亲身边享受着慈爱的庇护，她父亲有着很强的清教徒道德观念。我们开始彼此关注，不久便坠入爱河，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1947年，早恋使我们步入了婚姻殿堂。

巴塞特家族向我父母表达了信任和友谊。巴塞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在战争期间担任一家企业的高管，他对我母亲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是在美国正在消失的那类人，一个“有主见的人”（战时曾为他工作的大卫·理斯曼这样描绘他），事实上，

他是一位陀螺仪专家——他凭借着自身的陀螺仪行事。他避开了他所处阶级的社交生活，他在业余时间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业余艺术家、工匠或一个有天赋的美国古董收藏家，他收藏的文物展示了这个国家历史跨度上各个时期的工艺。我非常尊重这位非凡的人物。在我们最初正式见面时，他很想知道眼前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将如何谋生。“靠教书和写作”，我回答说——在我今后的人生中，这就是我试图做的事情。

在大多数政治问题上，我们意见相左，我们讨论了我们的分歧。在某些方面，这是一种民主教育：诚实的分歧经坦诚的讨论，有助于澄清和加强自己的立场。我想有时我会尝试让他相信我的理解；我怀疑我能有多少成功。他并没有试图改变我，我很欣赏我们能分享许多价值观——一点就透，无须多言。

1948年，佩吉和我结婚一年后，我们的儿子弗雷德出生了；三年后，又生了女儿凯瑟琳。那时，我们所处的中产阶级世界和周围环境充满了抚养孩子的各种主意和规矩。佩吉和我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很简单，多少要归因于卢梭的《爱弥儿》，这是我很珍惜的一本书。我的母亲有她自己的方法，其中有些我认为是过于人为的，有一次同她在一个决定性的问题上争论，我宣称我们要抚养我们自己的孩子；她尊重这一点——虽然带点遗憾，我想。毫无疑问，我们犯了错误，也许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孰先孰后上，我偏向了后者，不过我想我不得不去寻找些不便说出口的、习惯性的辩护理由，认为最终家人会从我的努力中受益。我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相当“欧洲化”的丈夫，因为我把大部分家务活留给了妻子。（我辩解说——只是半开玩笑地——在青春期之前的阶段我就干过烹饪的活了）。但是，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我对孩子们的关爱都是最重要的，是快乐之源。

即使在我的美国新家的生活中，德国往事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影响。佩吉与我父母的亲密关系促进了我的孩子们对他们的依恋，所以他们长大后对四个祖父母都有强烈的感情，当然还对我父母的“欧洲性”情有独钟。在他们童年时代的初期，我带他们去过欧洲，希望他们在那里能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过了很长时间，人们还会问我，我的孩子们是否会说德语。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丝毫没有欲望要促使他们去学习曾经驱逐了我的国家的语言，这种语言对我来说是轻松和自然的，但对他们来说就不可能像我这样了。不过，我希望他们掌握法语，并且要比我说得更好，从而与欧洲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不存在烦恼的关系。他们的法语都比我好，他们与欧洲有着他们自己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凯瑟琳成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这令我感到无比高兴。）

我父母和我对德国的态度在战后初期依然保持不变，如果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也是因纽伦堡审判所揭露出来的真相而变得态度更加强硬：对一个接受了纳粹主义的国家，我们充满了夹杂着几分遗憾的疑心和愤恨，对其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对以不同方式也成了受害者的朋友则表示关心。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和这个人的传统之间的难以阐明的区别仍然存在：我们在家里讲德语，我还在继续阅读我最喜欢的书——海涅和尼采的作品——德文版的。

与我开始通信的第一位欧洲朋友是我们布拉格朋友的儿子维尔纳·库贝尔卡，他和他的妹妹一起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他的母亲死于艰苦跋涉，他的父亲则由捷克当局颁发了忠诚证明而仍然留在布拉格。现年十九岁的维尔纳写信告诉我，他曾经被德国国防军征募，然后又被除名了，最终到达哥廷根。我们密集的通信常常辅以由我寄出的装有咖啡、香烟和罐装食品的包裹。在他最初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被驱赶出德国，即使你原本出生在那里，而我们尽管从未在

德国生活过，却被赶到了那里。”总而言之，这就是中欧的疯狂——同他相处我怎么能没有一种亲近感呢？

他在每一封信中都表达了对一个新家园的渴望，用了大量崇高的词语，比对家乡的回忆更加动人心弦。他想要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有钱的生活，一种在美国的生活。1946年底，他父亲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担心当局随时可能恢复他的捷克公民身份，然后就会阻止他离开。现在父子俩正计划一起离开欧洲——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经历。1948年8月，他们设法抵达日内瓦，“从长达十年的噩梦中醒来，现在再次回到了美丽的世界中”。那年年底，他们辗转到了里约热内卢，那里的朋友帮助他们开始了新生活。很快维尔纳就和一位巴西妻子迁往温哥华。

我的父母恢复了与德国朋友、同事和以前患者的联系，他们在历经苦难中保持了自己坚定不移的尊严。1946年8月，冯·泽博尼少校给我父亲写了一封长书信，描述了布雷斯劳遭到毁灭的详情，大部分破坏是纳粹党卫军下令执行的，目的是不给苏联人留下任何东西。“我们的家乡”，泽博尼写道，80%—90%被摧毁了。我父亲早早就流下了眼泪——但他保存了这封信。我母亲向帮助过我们亲属的女性朋友邮寄了许多表示感谢的爱心包裹；我父亲给柏林的精神病医生卡尔·朋霍费尔寄去了包裹，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婿都被纳粹处决了。（另一个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朋霍费尔，弗里茨·哈伯忠实的学生，是战后第一批来探望我们的德国人之一。）他还给一个原先的同学和同事——莫蒂默·冯·法尔肯豪森——寄过包裹，此人是一个保守的德国爱国者，其家人包括被占领的比利时的德军指挥官以及纳粹分子和反纳粹斗士。1948年2月，法尔肯豪森写信给我父亲：“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是，无数德国人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心甘情愿地沦为可怕的犯罪行为的帮凶，成为凶残的谋杀犯和掠夺者，还自认为这一切十分正常。这会像该隐的标记^[2]一样始终黏附在德国人身上，由此你会

理解我所感到的羞耻，尤其是因为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朝正面方向的进展而越发令人羞愧。”但是否很多德国人都有这种羞耻之心呢？我们不得而知。何况我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法尔肯豪森支持一些德国人为扰乱那种普遍的自怨自艾而做出的努力。

已发表的和私下的报道毫无疑问地表明，绝大多数德国人忧郁地或轻蔑地保留了他们的无辜和受到伤害的感觉。他们声称他们不知道“极少数位居顶层的恶棍犯下的”罪行，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幸和现在由占领国施加的艰辛。一些德国最杰出的公民，如在纳粹时期将个人的尊严与公众的一致性相结合的奥托·哈恩，写信给那些不得不逃离第三帝国的朋友，说盟军的占领不见得比德国在东方实施的占领政策好上几分！我记得奥托叔叔（他所荣获的194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实际上是在一年之后才颁发给他的，在同一个颁奖仪式上哈恩接受了授予他的诺贝尔化学奖），他对这种认同战后德国人所坚持的无罪主张而感到震惊；他嘲笑他称为传奇的说法，即出于“道德的原因”，德国科学家未曾想过去制造原子弹。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后来，德国科学家们痛惜德国因纳粹统治而失去了众多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这种情况似乎变得非常普遍，但在当时，德国的科学院所为了让流亡海外的教授们回归故土所做出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而那些教授本身也是意见不一的。他们中极少人愿意接受德国的职位，稍多一些的人访问了德国故土或接受了德国的荣誉，但许多人则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最严重的伤害。最伟大的流亡名人之一托马斯·曼在短暂地栖居美国之后回到了欧洲，并从此定居在瑞士。

然而1945—1949年，对我来说可能是一段对德国的事情比较淡化的时期，我对欧洲的依恋在增长。我们的法国朋友离开纽约回国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请我们去拜访他们的最迫切的邀请。我们发展了一些微小但心理上很重要的关系：我节省下了不少零钱去支持西班牙难民援助项目，即帮助流亡的西班牙共和党人；佩吉和我还成了一个西

西里儿童的“养父母”，后来我们又收留了一个希腊儿童，我们给他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并定期和他们交换简单的信件。我想，欧洲是一种怀旧的浪漫，而美国则是绝对令人信服的现实。

1945—1950年，在同盟国发生巨大逆转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和谐的威胁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西方秩序，这一时期标志着世界政治的转变。苏联人逐渐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东欧国家，在那里红军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另外，美国在1945年底开始遣散其常规部队，并从欧洲撤出大部分军队。欧洲的西方民主国家正试图重建；在法国和意大利，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依靠其在战争期间抵抗德国侵略的记录，几乎赢得了权力。它们代表着苏联政策的“和平”手段。冷战正在缓慢但不容置疑地展开。在我的情感和政治生活中，英国有一席特殊之地，因为起初只有它才能抵抗纳粹的侵略，并且在法国沦陷之后以及在其城市遭遇猛烈的闪电战之后，仍然抵制了在和平问题上的劝诱。更令人兴奋的是1945年7月的英国大选，当时伟大的战时英雄丘吉尔按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回到了牧场，而工党却获得了惊人的胜利。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政府不得不应对连续的经济危机和从英帝国影响力中的缓慢撤退，但与斯堪的纳维亚一样，它也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

回想起来，我认为有三个伟大的计划在塑造战后欧洲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附带说一句，当政治家们下意识地努力向过去学习时，他们也在这样做，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英国，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旨在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以减少在战前就导致国家实力遭到削弱的阶级冲突。1947年出台的马歇尔计划最初是对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西欧国家且包括被占领的德国的三个西部地区开放的，该计划明确表明美国把欧洲的复苏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必须，并且是朝欧洲一体化迈出的一步。（苏联人在表现出最初的兴趣之后，拒绝参与该计划，并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效仿他们。）这种前所未有的利

己主义的慷慨行为对巩固美欧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关系在1949年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创立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一个西方的联盟，北约旨在协调其成员国的军事和政治战略。第三个则是1950年的舒曼计划，该计划在法国和西德之间建立了一个煤钢联营，目的在于联手解决由来已久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对抗。这三个计划表达了战后初期的最大希望，大体上来说它们都被证明是成功的。

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冷战从一开始就聚焦在德国，在那里的盟军肩负的责任原本应该是趋同的，但越来越各行其是。这种分道扬镳的外在迹象是1946年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实际终结。西方和苏联控制地区变得越来越分离，德国人在认同西方列强（它们本身就是德国舆论的一个巨大的智力上的逆转）和坚持民族团结的希望之间难以抉择。

盟国管制委员会于1947年2月27日颁布的第46号法令是盟国最后共同做出的决定之一，法令宣布“普鲁士国家……历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作风的支柱……现予以废除”。当然，在那时，普鲁士早已不复存在，其大部分领土现在属于波兰，但这是正式的废除。历史学家们拿这个问题来开玩笑，普鲁士亡于何时？有些人辩称普鲁士亡于1871年第二帝国成立之时，那时日耳曼人（用尼采的话说）变成了德意志国人，普鲁士人的传统美德如朴素和正直似乎都失去了力量，工业资本主义迎来了不同的道德观念。某些普鲁士人的推论继续存在于德意志帝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魏玛共和国，普鲁士被证明是民主的堡垒。

美国对德国的政策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946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就表达了美国对德国蒙受的苦难的同情和促进其复苏的意愿。事实上，美国政治家们有理由厌倦关于德国问题的多次无果而终的同盟国外长会议，他们开始推出他们自己的主动行动。鉴于德国人在苏联造成的破坏，一个主要问题就涉及苏联对被占领的德国

所有地区提出的赔偿要求，这似乎是合理的。但过度的榨取导致了德国的贫困化，这反过来又对三个西方大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三个西方大国担心没有食物或失去希望的德国人可能会屈服于共产主义。

同盟国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解除了武装的、非卡特尔化的和去纳粹化的德国，针对此目标的实际政策一开始由每个占领区单独负责。美国占领区在卢修斯·克莱将军的指挥下，最初采取了严厉的做法，最具象征性的是禁止交朋结友（这道禁令很快就被打破）。然而，美国在去纳粹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运气不佳。一些纳粹官员被起诉或被免职，但司法过程进展缓慢，遭到许多德国人的嘲笑和诽谤。数百万公民被要求填写有关他们过去的冗长的调查问卷，真正无辜的德国人试图通过签署所谓的去纳粹化证明（Persilscheine）这种政治健康廉洁保证书，来保护受到牵连且面临盟军调查的朋友。其他人则向盟军当局告发他们的同胞：卑鄙虚伪，心怀恶意，这在第三帝国颇为常见，却并没有随之消亡。

美国人也有过令人钦佩但过分天真的“再教育”理念。他们想给德国教育加入民主的实质，在德国各个城市建立起来的美国之家（Amerika-Häuser）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让当地人们了解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我们最有效的努力可能是许多游客项目，这些项目允许德国人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从智力和科学方面来说，美国在这一点上是无可匹敌的。许多后来的西德领导人都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学习过，他们吸收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国家所具有的随时承认自身需要改进之处的精神。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友善——就如许多香烟礼品盒上所表达的那样——可能比公民教育课程更有说服力，但是美国对建立一个民主德国的无可置疑的承诺也是一项具有政治利益的指令，与前者对欧洲民主（因此很可能是亲美的）政府的支持是一致的。

四个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允许在其领地上恢复政治生活，另外在西方占领的地区，一家自由（获得许可的）媒体被允许表达政治诉求。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不同利益和风格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政策，而苏联在其占领区搞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开始在德国乡村引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最激进的苏联的政治创新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党，其目的正如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要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但这个新政党很快就陷入了斯大林模式。在西方占领区，社会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这一努力，同时地方自由选举最终组成了议会，这样的议会具有古老的德意志实体形式。德国拥有民主的过去和法治传统，即使这些都被纳粹镇压过，但这一事实缓解了恢复当地德国统治的任务。

有两个政党在西方占领区脱颖而出，一是以库尔特·舒马赫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此人性格火热，具有超凡魅力，曾经在集中营被纳粹监禁了十年。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德国的统一，他反对每一次会进一步导致德国分裂的行为。他的政党的目标是传统性的：一个民主政体、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基础工业国有化。舒马赫强硬地坚持将民族团结置于首要地位（反对与西方民主国家一体化），他的这一立场有很多动机，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在德国的爱国主义中独占鳌头：他很清楚地记得魏玛以及之前的右翼政党将他们的物质利益隐藏在一种拙劣的民族主义言论之中，这种言论将“赤色分子”贬低为不够爱国。我一直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自始至终都是真正的爱国者，无论有时候他们是多么怯懦和缺乏创见，他们始终捍卫着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国家。他们一直是魏玛民主的坚定捍卫者，也一贯反对纳粹——这一遗产在1945年之后他们似乎不愿意再颂扬了。他们是否认为这应该是选举人的责任？

同时一个新的政党出现了，即基督教民主联盟，其纲领类似于战后法国和意大利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一个非教

派政党，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旧的天主教中央党，所以它现在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天主教徒不再是西方占领区中的少数派。该党代表着德国中产阶级的残余，但也试图吸引年轻的中产阶级和来自失陷领土仍然无家可归的被驱逐者。基督教民主联盟由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主要的中间派政治家并出任科隆市长。1933年纳粹将他罢免后，他进入了被德国人称为“内部移民”的状态，完全退出了公共生活，他在内心深处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他不断地遭到监禁，尽管时间不长，有时他会藏在修道院里。他在担任新角色时已经七十五岁左右了，正如他所说，他把退休生活置之脑后。他是一个有气质和信念的威权主义者，在许多德国人的眼里，这个严厉且有些不可思议的人展现出一种老父亲的形象。凭他出生于莱茵河畔和他的个人取向，阿登纳是一个“西方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战后职业生涯早期还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他试图控制他的政党内部持不同意见的左右各翼，有些人观点极右，还因以前有过纳粹身份而污迹斑斑，其他人则有更加进步的纲领。在实际可行的经济战略问题上，他依赖的是路德维希·艾哈德，此人被称为一个真正创新的独立的经济学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设计师，以某种方式在最大经济自由和公平的社会责任基础之间取得平衡。回想起来，我会将其称为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同盟国在表面上依然维持着团结，关于最后的和平条约的谈判也依然进行着，就如德国人对统一的希望一样。但也存在棘手的问题。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演讲中非常深刻地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当时这位曾正确地警告希特勒威胁的英国首相宣告了又一种来自苏联的新的可怕的威胁，凭借其新近赢得的帝国，隐藏在“铁幕”背后，下定决心要扩大其势力。这种威胁需要加强英美合作予以应对。那时，我匆匆地在日记中写道：“在听丘吉尔的演讲时，我觉得好像有个幽灵从他的坟墓中出来，并警告我们地下的世界。嗨，可是那个幽灵的力量如此之大，眼界却如此之小。”我错得多么

离谱！因为丘吉尔不仅提供了诊断还提供了处方，那年9月在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再次震惊了世界，“重建欧洲大家庭的第一步必须实现法国与德国的伙伴关系”。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历史上的敌意的人都清楚，这是一个最大胆的愿景。这两个演讲是互补的，即使后面这种情况当时还不是很清楚：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丘吉尔仍然认为这种关系是非常伟大的；另一方面是欧洲大陆的联盟，这个联盟至少能让西欧有机会复苏，也许有机会强大。

随着同盟国的团结越来越明显地变为同盟国之间的对抗和交锋，各方开始更加热情地拉拢德国人民。西方盟国软化了它们的政策，并且出于某种原因提出它们的三个占领区可以最终合并成一个政治体。为了一个统一的德国，它们想以整个国家的自由选举为代价，这一过程将显示出德国人对苏联体制的拒绝。反过来，苏联人根据他们对统一的、非军事化的德国的最初设想来鼓吹德国统一，他们希望，他们最终可以控制或者至少可以从西方控制中夺取德国最富裕的部分，如鲁尔区。

德国人立刻成为冷战的受害者同时又是获利者。他们恢复国家统一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一个与西方紧密相连的新的德国政体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清晰，并且受到欢迎。毕竟西方在很多方面那么诱人，许多德国人已经克服了他们长期持有的反西方情绪。当时，我还遇到了一些德国人，他们走得更远，居然荒谬地提出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存在一种早期的亲密关系，说德国1941年对苏联的攻击是早就预见美国的利益，德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联手推动一场新的反共运动。与此同时，在西方各占领区的有责任心的德国人提出警告，反对采取任何军国主义的举措，最重要的是，要求德国人明确表示永远放弃所有核武器。

在世界政治和德国政治中的冲突是真实的，而且充满讽刺意味。美国人坚持德国非军事化，对此毫不放松，以至于一些德国人成为美国军国主义的批评者。在所有这些不确定性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前盟国之间面临崩溃的团结做出了建设性的回应：在不愿意无限期等待斯大林改变立场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也打算建立一种西方秩序——但并不关闭与苏联妥协的大门。美国的任务并不轻松。即使它的盟友也有不同意见：正当美国处于其权力的顶峰时，法国人却在与他们1940年失败造成的许多后果做斗争，希望成为一个强国，然而又对任何一点德国复兴的迹象心存恐惧。1947年初，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寒冷的冬天之后，英国人尽管自己也在勤俭节约，还未摆脱困境，却开始帮助英国占领区的德国人，“这是我们给德国人的赔偿”，他们自嘲道。

美国人在1945年之后欢迎军队复员，但两年后，他们被要求承担新的使命。1947年，杜鲁门主义承诺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这些国家是英国再也无力保卫的，而且人们认为它们都处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国会和整个国家仍然存在一种强烈的孤立主义的压力：美国决心要抵制各地的共产主义，这种新的决定将耗费巨大，为了赢得国内的支持，共产主义的危险被以耸人听闻的语调夸大了极致。政府用强硬的言辞来为新的承诺辩解；蛊惑民心的政客开始追捕那些他们声称也是国内敌人的人士——那些被怀疑与共产主义者有联系的人，那些可以被指控为“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人（例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保皇派的支持者）。在美国存在美国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是“反美”活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现在或过去的对同路人和共产党员展开的大规模调查已经成为常规；教科书全受到审查，到处在疑神疑鬼，正如我在1947年入籍听证会上发现的那样。这种过度的热心其本身也可能是反美的吧。对于那些经常批评美国国内外政策的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

时期，因为他们既是右翼分子怀疑的目标，又是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情者无耻辱骂的对象。

我对这种充满激情的意识形态斗争有自己的经验。一项我也基本同意的外交政策在美国竟然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影响，这令我感到震惊。举例说，在1947年至1948年的某个时候，我拜访了一位年纪稍大、非常聪明的英国历史学家，我曾在他那里读研究生，现在他在一所著名的新英格兰大学里有一个很好的教学岗位。有一次在他家，夜深人静时分，我们再次陷入激烈的政治讨论，其间我为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他则谴责那是一项挑衅性的反苏政策。突然，他离开了房间，返回时拿着他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拍摄的令人恐怖的照片：

“这就是你的观点所导致的！”他愤愤地说道。直到那时，我都是习惯了来自所谓的左派的攻击，而这种荒谬而残忍的言论为我概括了当时意识形态上的冷酷和混乱。

自身尚且不安全的苏联是否可能会放弃其侵略性的路线并试图妥协？对此我曾经有一种挥之不去、摇摆不定的希望，但这种希望于1948年2月终结了，在此期间，苏共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直到那时，这个国家都在试图既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又保留自己的民主。扬·马萨里克，这位在如今已被推翻的非共产党政府中曾显赫一时的外交部长，也是备受尊敬的捷克共和国之父的儿子，突然死于非命，或许是他自己从办公室窗户跳楼，或许是被推出窗外——这始终是一个谜，并且令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对此愤恨不平。即使排除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感依恋，在布拉格发生的共产主义政变也从此锁定了我的看法，即苏联人倾向于强化其帝国主义政策。

几个月后，西方列强在它们的德国占领区推出了一项迫切需要的货币改革，用一种新的货币——德国马克——来取代几乎毫无价值的旧货币。随着配给制度的结束，新货币的推出消除了黑市，并引发了

经济复苏，这不仅震惊了德国人自己，而且随后震惊了全世界。但是，在将新货币引入柏林的三个西方占领区时，由于这三个占领区享有的自由具有挑战性，而该城市的东部地区一直受到苏联的严格控制，这就引发了苏联激烈的反击。几天之后，苏联人封锁了整个城市，切断了从西部各占领区到该首都的所有地面路线，并向全世界证明柏林是处于红色海洋中的一块飞地，似乎完全受苏维埃政权的支配。苏联人的最大希望是阻止在德国西部建立一个国家，或者至少迫使西方军队撤出“他们的”柏林。

在1948年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西柏林人的自由和西方决心的信誉受到了威胁，危机预示着战争。美国占领区的克莱将军敦促派遣一列武装火车前往柏林，通过让苏联人在军事摊牌或外交挫败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来对其进行测试。但有着更加冷静头脑的人还是占了上风，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援下，一场迅速组织起来的美国空运为300万西柏林人提供了未来十个月的生活必需品。负责接收空运物资的是西柏林市长恩斯特·罗伊特，他是一位爱国者和热心的民主党人，号召市民团结起来，接受暂时的贫困，从而保卫他们的自由。罗伊特成为战后第一位在美国广受欢迎的德国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他曾是一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明星人物，1933年他被纳粹投入监狱，释放后移居安卡拉，战后一旦条件允许，出于爱国他即刻返回德国。苏联人于1949年5月结束了他们的封锁，空运取得了成功，极好地显示了美国（和英国）的机智和谨慎。

1948年夏天，西方盟国授权建立了一个由西方占领区各州议会代表组成的德国议会理事会，由其负责为新的国家西德制定宪法。许多理事会成员在魏玛时代一直活跃在政坛上，并且对第一届民主政权的缺陷耿耿于怀。具有相等代表性的两个主要政党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分裂党派：站在左翼的是共产党人，其他则大多在右翼，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派别，代表被放逐国外而满腹怨恨的民族

主义者。由阿登纳担任主席的该委员会在审议宪法上旷日持久，这些新兴政治家的能力由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样，魏玛时期的失败所留下的回忆在这项事业中也成功地对现在起到了警示作用。

议会理事会反映出针对任何可能导致延长或加深德国分裂的事情，西德都持反对态度。其是否因为一种可以理解的民族凝聚力或出于对苏联占领区的德国人的特别关注而有此感受呢？我怀疑当是前者，此外还有早期对东部地区德国人的无视和不尊重。由于大多数理事会成员担心他们的工作可能会使他们国家的分裂状态封存下去，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最终定稿应该标记为“基本法”而不是“宪法”，以便强调新政体的这一临时框架。（他们忘记了那句精妙的法国谚语的真正含义：“只有临时的东西才能永久流传。”）事实上，这一“基本法”持续的时间远比期望的要长得多，所赢得的尊重也远胜于以往任何德国宪法，并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在1990年德国最终统一的时候，该“基本法”还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法”中包含了以往德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中行文安排的要素，从而确立了议会民主。原先的德国联邦制传统得到了保留，各州或联邦州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美国支持这种联邦式架构，基民盟也举双手赞成，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倾向于采用一种更加统一的形式。鉴于纳粹主义的恐怖，该律法必须首先阐明德国公民所享有的广泛且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也被引以为鉴：首次创立了宪法法院，借鉴美国宪法的安排，宪法法院不仅进行司法审查，而且作为一个权威机构能够（并且确实）取缔被判定危害民主的政党或行动。与魏玛时期的惯例不同的是，新共和国的总统将由间接选举产生，因此无法宣称获得民众授权，并且被剥夺了紧急权力。这样的总统更像一个无党派的名誉领袖，更像一个现代的英国君主，而不是一个国家的行政人员、一个大家所希望的道德权威。另外，总

理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此外还包括各种条款，以保护这个新共和国避免政治上的不稳定，魏玛就是因政治不稳定而被削弱的。

最积极推动在德国的这块半壁江山上建立一个半主权国家的当属美国。1949年4月，三个西方盟国商定了一份“占领法规”，这份法规将被提交给任何一个新成立的西德政府。根据该法规，盟军将继续留在德国境内，那里的盟军军政府将结束其使命；三名同盟国高级专员将取代军事指挥官并监督这个新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他们将保留一项重要权利：在特定的不太可能的条件下，恢复对以前的占领区的控制权。到1949年5月8日——正好是德国无条件投降四年之后——一部切实可行的临时宪法被制定出来了，并获得了西方盟国的批准。这部“基本法”本身并不是成功的保证。德国人会接受这部新的基本法吗？他们会依照“基本法”中的规则行事并学会实行民主吗？是否会出现某种能维持一个自由国家的政治文化？

但西方盟国（法国是最值得怀疑的）和西德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在短短的四年内，尽管存在经济困难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新诞生的德国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然而没有人为此怀有胜利心态，因为民族分裂的伤口使人寝食难安。

把欧洲从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之后，另一类饱受痛苦折磨的人又出现在战后最初几年人们的大规模迁移之中。他们被称为流离失所者，其中有许多波兰人和其他非德国犹太人，他们经历了各种战争恐怖，侥幸活了下来，现在被凄惨地安置在德国各地的难民营中。

他们中有许多人渴望前往巴勒斯坦，根据1917年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中的承诺，那里将是犹太人的家园，但尚未建立起来。作为国际联盟授权处理巴勒斯坦事务的大国，英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对犹太移民施加了严格限制，即使纳粹大屠杀使建立这样的家园成为道德上和实际上的必须时，情况依然如此。现在，这些丧失了国籍、命运多

舛的幸存者，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向往但常常遭受欺骗的希望提供了巨大的新的支持。自由派也支持这些希望，这些希望已经成为建立历史性正义的一个强大的不朽事业，但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延续了英国的亲阿拉伯政策。已经身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激怒了，有些人越来越多地诉诸暴力。（也许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1946年7月，当时犹太恐怖分子摧毁了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的英军指挥部，杀死了100名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我的堂兄恩斯特·布莱克，别名布瑞格，当时是驻扎在巴勒斯坦的女王皇家军团的一名上尉，仅仅相差几分钟时间，逃脱了被炸死的厄运。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截然不同。）因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关键的、导致分裂的问题，当然美国也包括在内。英国人已随时准备放弃他们在中东的授权使命，这个一度是他们眼中充满异域风情的快乐天堂，现在却充斥着暴力；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新兴的联合国。

与哈依姆·魏茨曼的见面可能增强了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兴趣；他的西方自由主义观念让我觉得他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而绝非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者。我的世界观由此变得过度简单：凡是在以色列的未来这个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看法的我就认同，而对好战的犹太人的力量则予以漠视。魏茨曼谴责犹太人的恐怖主义，他认为恐怖主义否定了他的工作。1947年4月，他写信给一名犹太恐怖分子的拥护者：“他们选择了左轮手枪和炸弹作为现在的救赎手段……我承认，我怀疑在听到炸药的声音时，弥赛亚是否会现身。”同年1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巴勒斯坦的朋友：“我们无能为力，这是非常糟糕的；但是假如我们有权力的话，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

父亲和我继续通过偶然事件与魏茨曼一家保持联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诞生，美国立即予以承认。我带着父亲的心电图仪到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魏茨曼博士的房间去，当父亲正在为魏茨曼做检查时，从特拉维夫打来了一个电话，通知说魏茨曼已经当选为这

个新的国家的总统。一个月后，杜鲁门总统邀请魏茨曼赴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因魏茨曼当时身体欠佳，我父亲便陪同他前往。

同许多人一样，我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这个词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还在孩提时代，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被当作犹太人而受到迫害，这个人就成了犹太人，与犹太人毫无二致，而犹太人的命运则控制着即时的忠诚——尽管在那些日子里，批评犹太人的行为或其领导人并不构成不忠。我想到了巴勒斯坦，然后是以色列，这两地对于受害者而言都可作为避风港；社会主义者的基布兹梦想有其自身的吸引力，而东正教犹太少数派似乎被边缘化了。当我意识到我是属于随家人一起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少数派时，我是否会时不时地感到尴尬甚至不舒服？是的。我是否会介意自己不了解犹太人的仪式和节日？是的。但是我并不适应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宗教，因此我从未想过要“解除皈依”。魏茨曼选择我父亲作为他的医生，并且他忽略了他在自传中称为“叛教”的内容，那是弗里茨·哈伯在他们家介绍的，这再次使我感到放心。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认定我就是犹太人，不然的话我们家为什么要逃离德国呢？奇怪的是，不论是在战后的德国还是在美国，人们都没有意识到还存在一种“犹太人”基督徒。当然，我在美国也遇到过隐秘的反犹太主义，但对我伤害更大的是，由于我出生于一个皈依的家庭，偶尔会因此遭到美国犹太人的嘲讽。

在我的内在和外在一身份之间，我感觉存在一种绝非容易的大致上的对等性。每当我想到希特勒使我成了一个犹太人，废除了我祖父母对基督教的承诺，这似乎是无法容忍的，即使我意识到让我有犹太血缘关系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很多年以后，以及在第二段婚姻中，即使以色列的梦想逐渐淡化了，我作为犹太人的感觉却变得更加强烈，这是因为最后一个伟大的20世纪的乌托邦受到了自我背叛的威胁。以赛亚·伯林曾经对我说，如果一个人对国家的政府行为感到羞耻的话，

他就可以知道自己怀有一颗忠诚之心。当我脑子里萦绕着他的想法，一边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丝毫不怀疑我是一个美国人，同时还是一个犹太人。

在1948年的选举中我第一次有了投票权。民主党十六年的统治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尽管偶尔我会有些许疑虑，但我还是认为杜鲁门的外交政策，借助他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出色的执行，彰显出创造性的负责的领导，始终能赢得两党的支持。然而，我对杜鲁门的此次竞选活动感到不安，因为竞选活动攻击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无所作为”的国会，这让我感到这种蛊惑人心的手段有点过度。他的主要对手是托马斯·杜威，一个死板、毫无魅力的共和党人，围绕着他的是一些更加缺少吸引力的顾问，以及一些自以为是的支持者，他们支持一项迫使苏维埃政权“倒退”的政策。对于我的许多朋友来说，诱惑极大的是罗斯福早先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直到1948年，他一直是执政方针的无情批评者，暗中还是一位苏联的辩护人，为此他得到了同道者和左倾人士的支持，他们认为冷战主要是美国的一个发明。我认为华莱士是一个危险的妄想型公仆。但杜威的表现令人恐惧，尽管根据民意调查和专家的说法，他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杜鲁门无论如何都会失败的话，我可以随意投票支持一项高尚但没有希望的事业：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惯常的总统候选人。我在朋友家中见过托马斯，并对他的个人风度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既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美国核政策的批评者。然而在选举之夜，我很高兴地看到多数选民表现出比我更好的判断力，我陶醉在杜鲁门的颠覆性的胜利之中。也许，在正式的公民生活刚开始的时候，犯一个这样的错误也是难能可贵的。

回想起来，我相信美国政治家的才能在那些年里表现得最具建设性和最有远见卓识。当时，我对战时联盟的逐渐解体表示遗憾，但是苏联在恐惧和野心推动下所策划的扩张主义，使得西方集体防御成为

当务之急。套一句迪安·艾奇逊的著名的话来说，我们正在“参与创造”，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正处于后来被称为光荣的战后三十年的初期。在此期间，已经非常接近某种一体化形式的西欧，也在设法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平等的社会。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很早就看到了另一个理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纳粹的种族灭绝和纽伦堡审判清楚地表明，世界需要这样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在1947年至1948年，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正在准备一份这样的文件。起草该文件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鲍里斯·米尔金·格耶茨维奇，战时这位法国律师曾在纽约一所名为新学院的大学避难。我们的朋友汗布格尔是他的合作者，他还给我讲解了联合国的重要性——我想他是希望我最终能在那里工作，他还解释了委员会内部的冲突。

同时，我从远处也对美国的占领政策进行了一番了解，这些政策被描述为三个非——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和非卡特尔化，凭借的是在德国再教育上充满自信的努力——我自己的经历实质上是微不足道的，但对我的教育来说是有用的。1948年，库尔特·哈恩来到美国，寻求美国的基金会对再教育德国人的支持。哈恩在魏玛共和国有过一段杰出的职业生涯，魏玛初期他曾担任马克斯·冯·巴登王子的顾问，后来出任塞伦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贵族和富裕犹太人经常光顾的学校。哈恩曾警告保守派不要信任希特勒。根据纳粹的法律，他是一名犹太人，因此曾短暂地遭到监禁；之后他移居英国，到那里后在苏格兰的戈登斯顿建立了一所著名的学校，这所学校有个获奖学生名叫菲利普·蒙巴顿，那一年他成为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作为一个风云人物，哈恩于1946年恢复了在塞伦的那所学校。现在，他希望美国支持创建更多的塞伦式学校，从而进一步推动德国再教育事业。保罗·埃尔利希的孙子君特·施韦林是塞伦学校的毕业生，他告诉哈恩，为他起草必要的备忘录，我是最佳人选。

我们见面了，哈恩给我概述了他的基本教学理念和实践，这似乎是对一个民主选择的精英的要求；教育的任务是培养领导干部。第一项要求，即性格的自由发展，最好是通过最严格的方案来实现，重点强调身体耐力和艰苦的自力更生的训练（如后来的拓展训练计划）。他坚持认为冷水浴（和其他磨炼方式）能够抑制或者升华男性青年更多的感官欲望，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3]当我告别哈恩的时候，我答应在第二天会起草一份提案，同时我又问道我是否应该提及菲利普亲王在戈登斯顿的学习经历。哈恩吩咐我再次坐下来，为我提了一个如此庸俗、如此“美国化”的问题而指责了我一番。他以为我理解了他；当然，答案是否定的。

我用了一晚上写好了这份报告（为此我得到了报酬，我记得是100美元——我用这笔钱买了第一副滑雪板），第二天早上交了稿，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我在打字稿中漏掉了一行。我赶紧回去，要求给个机会纠正错误，但被告知已经太晚了。我坚持要改。最后，哈恩的秘书拿出了用我的报告作为主要文本制作的一本漂亮的皮面装订的相册——我在相册首页看到的是菲利普·蒙巴顿在戈登斯顿玩马球的一张照片。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一次深刻理解。几年之后，在我最初写的一些文章中，我杜撰了庸俗理想主义（Vulgäridealismus）这个术语——这是取自针对列宁主义的一个绰号庸俗马克思主义（Vulgärmarxismus）的一个变体——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哈恩有关。我发现他有一种傲慢的虚伪，表现得那么认真，以至于令人反感。尽管有名人校友以及我的报告，美国的那个基金会还是拒绝了资助开办新的塞伦学校以作为对德国的救赎。也许我过去以及现在对哈恩并不公正，也许这本相册并不是他的主意；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他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道德典范。但是，这种高尚的立场掩盖了狡猾的私利——这是我逐渐认识到的一种混合物，并不仅仅存在于德国。

在那些年里，我的欧洲历史课程仍然非常紧张，幸亏德国问题没有同时出现。我在大学高年级时参加了巴尔赞和特里林共同执教的专题讲座，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们都会见面，就一本指定的书展开讨论，然后我们十二个左右学生——包括像约瑟夫·克拉夫特和拜伦·多贝尔这样令人生畏的同学——每个学期要写三篇论文，巴尔赞和特里林会分别审阅我们的文章，根据的是风格和内容不可分割这一不容置疑的原则，他们的严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课程安排始于威廉·布莱克、卢梭和《浮士德》，终于弗洛伊德：这些大师留给世人的是现代欧洲思想的伟大杰作。两位执教的导师风格迥异，但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都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给人们的道德生活带来启迪。只要读了伯克、托克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著作，就不难理解重新思考一些过分简单化的真理的必要，在约翰·杜威这样的民主乐观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类东西。我相信，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宗教大法官》中的隐喻给我留下了令我心绪不宁的直接影响，它加深了我对极权主义的沉思。“有三种力量，且只有这三种力量，能够征服并永久俘获这些无能为力的反叛者的良心，为的是他们的幸福——这三种力量就是奇迹、神秘和权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教会我更好地去理解民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以及政治生活中非理性的地方。对于巴尔赞和特里林来说，文学和历史显然是不可分割的，无法分开解释，更不用说理论，理论是一种额外的奢侈品。我希望我听从了他们的教导。

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欧洲历史和政治理论，当我开始这一领域的学业时，上述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跌宕起伏。对研究生的主要要求是写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我在论文的选题上后证明是幸运的。我选择了一位德国作家作为研究课题——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除了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写过一本颇有影响力的《第三帝国》外，我对他所知不多，他这本书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有着明显的联系。我研究了他的生平和事业，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祖先

以及他们极端的“反西方”情绪，他们拒绝1789年的思想和启蒙运动。他激烈的反自由主义立场与一种伟大的日耳曼命运的理念掺杂在一起。他属于某些批评家所谓的“保守派革命”的行列，这种革命要求一种更严厉的新的专制主义，但是并不等同于战前旧的资产阶级政权。我发现了这种思想的真正来源，以及它如何成为某种欧洲现象的德国变体。我学会了如何结合背景以及个人的私下和公开的经历来关注某种观点。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内涵丰富的主题，具有内在的历史重要性，但又具有局部性，因为它有助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

1948年秋天，我遇到了新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聘任的亨利·罗伯茨，他刚刚结束了以罗德学者身份在牛津大学为期两年的研究，在此之前，他在战略情报局中的研究和分析部门服务，该机构便是中情局在战时的前身，这给我转向欧洲和德国历史的研究增加了更多好运。1944年9月罗马尼亚与盟军签订停战协议之后，亨利·罗伯茨被派往那里；第二年3月，他目睹了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政变，政变是安德烈·维辛斯基一手操纵的。亨利曾在耶鲁大学学习德国历史，师从哈乔·霍尔本。

亨利比我年长十岁，我们成了好朋友，双方的家人也来往密切；有段时间，我们甚至共享一间办公室。在我曾经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学者中，他是思维最敏锐的历史哲学思想家之一，他的身上奇妙地融合了道德上的正直、惊人的智慧和闪闪发光的机智。他的战时经历，以及战后与英国东欧历史学家休·塞顿-沃森在这一被忽视的领域里的合作，都令我兴奋不已；他于1951年出版的对罗马尼亚的研究，至今仍然是分析叙事的典范。

不久，我遇到了亨利一些来自战略情报局的同事，有男有女，既有他的同代人，也有后来成为我们大学战后欧洲主义者领军人物的年

长者，如伦纳德·克里格尔、H. 斯图亚特·休斯、卡尔·休斯克、弗朗茨·诺依曼、费利克斯·吉尔伯特以及哈乔·霍尔本，他们都是知识渊博、深度关注政治并擅长分析的专家；后三位是德国移民，对德国的过去及其不确定的未来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诠释虽然并不一致，但是有一种看法是相同的，即对德国过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是历史调查和道德理解的必要条件。在我人生观的形成时刻，能遇到这群杰出的学者，真是上苍赐予我增长智慧的礼物；凭借战时情报人员的经历，就给定事件的复杂性做出即刻分析的磨炼，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在政治现实中潜心研究，聪敏睿智远超常人。有时候我会这么说，我希望“有一个和平时期的等同于战略情报局”的组织——这种提法可参阅我最喜欢的论文之一，威廉·詹姆斯的《道义战争》，这是1906年美国的一篇精彩文章，文章认为现代战争是自杀性的，由战争动员起来的公民和人类美德需要被用于和平时期的集体追求之中。

1948年，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当时他三十二岁，刚刚完成了一本名为《美国政治传统》的著作，该书对美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是批判性的，所做分析是严谨的，至今仍是一部经典。他成了我的密友、导师和典范。他本能地认为，历史学家也必须是众多读者的作者、引路者或译者，绝不能与其周围的知识界隔绝。对于霍夫斯塔特来说，就像对当时几乎所有学者一样，魏玛共和国的沦落以及纳粹主义残忍无情的恐怖所留下的记忆，构成了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道德背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我们的兴趣交织得更加密切了，当时霍夫斯塔特组织了一项关于美国激进右派的重大研究，这是一项由共和国基金支持的项目，该基金是福特基金会有一个分支。迪克和我定期交换手稿，以便相互获取对方的批评意见，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做法，我从阅读他写的书稿中获益巨大，他写书不仅速度快，而且极有深度。与亨利和迪克的友谊延伸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实上延伸到了三代人之间，这是因为罗伯茨一家和霍夫斯塔特一家

生病都找我父亲看，并且还成了我父母的朋友，当我们的孩子们来到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很亲密。我们实在太幸运了。

当时，我以为我想成为一名欧洲文化历史学者，关注的重点是德国，特别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历史”，这种文化历史融合了欧洲的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我经历过德国恐怖的一小部分，但足以感受并认识到它的集中性；现在，我和美国人文学者一起生活，一起做研究，他们自己也是自由社会的捍卫者。在许多方面，我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开始交织在一起，在这两者之中，欧洲始终优先于德国。我的政治观念属于批评性的自由主义者范畴，生活和文学使他们确信，自由乃最大的善，公民的参与既是义务又是特权。我的生活完全是在美国，但我对欧洲的依恋和好奇始终是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只是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才理解，正是在那些德国不复存在的岁月里，我做好了准备，去面对未来岁月中涉及德国的一种不同的生活。

[1] 就在德国投降之前，有一个笑话。两名德国士兵在幻想战争结束后去做什么。一个士兵只想回家，家中有干净的床，还可享用他母亲烹饪的饭菜。另一个士兵说他需要从军旅生活的无情压力中恢复过来——他想要弄辆自行车去野外，一路上沿着德国边境骑行。然后第一个士兵问他：“那你下午去做什么呢？”

[2]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由于妒忌而杀害了弟弟，因此背负杀人标记。——译者注

[3] 在他1986年的自传中，既是塞伦学校的校友，同时也是哈恩的终身崇拜者的戈洛·曼，针对哈恩教育学中最严重的错误写下了这么几句话：“库尔特·哈恩对性和性教育几乎一无所知。原因是：他从道德上否定在他本人身上的那种倾向，那种同性恋的倾向，他以不可思议的意志力将其抑制在自己的体内。”

第六章 联邦共和国：新的开端

当德国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新的国家身份于1949年10月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它不仅享有有限的主权，而且被认为是临时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行处于严格的“占领法”（被仁慈地加以解释）和西德人制定的“基本法”之下。为了强调这个新国家温和的亲西方特色，莱茵河畔的小镇波恩成了首都。不同于魏玛辉煌的死亡之舞和第三帝国歇斯底里的邪恶，逐渐为世人所知的波恩共和国，在许多年里因地处偏远，生活烦闷无趣，一直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地方。这个国家之所以存在，其本意就是要忍辱负重，直到德意志民族的和平“统一”能够以某种方式实现。

联邦共和国是冷战的产物，被认为是造成同盟国之间的团结分崩离析的唯一可能答案，1946—1947年以来，这一点越发明显。它的创立应归功于美国的政治手腕、西德的建设性反应以及斯大林的顽固态度。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德国的建立，苏联占领区摇身一变，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个几乎对苏联卑躬屈膝的卫星国。这两个德意志国家互相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并且凭借它们的存在以及互不相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复制了西方和东方之间巨大的分歧。这两个规模和力量并不相等的国家很快融入了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虽然社会主义者反对波恩融入西方，但也存在与之对抗的力量：一个对社会负责的自由市场体系产生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伴随着美国的巨大吸引力——美国这个国家在胜利之后戏剧性地撤出了欧洲大陆，然后又回来了，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并在柏林空运中展现出它的意志和力

量。苏占区的德国人则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这个所谓的“保护人”仍然在吞噬东德经济所留下的东西，尽管这个新的国家已经被贴上了苏维埃制度的所有标签：一个有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政体。波恩还有一张王牌，即自由选举带来的合法性，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可以吹嘘自己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清除了被认为陷国家于灾难之中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

当时，我把联邦共和国看作一个大胆的美式结构，而且我仍然对德国的政治成熟度和可靠性完全不信任；也许比起阿登纳本人，我的怀疑也毫不逊色。我从来就未想到过或梦想过这个新的临时性的国家会对我的的人生产生永久性的影响，我仍然深深地厌恶这个几乎一切都充斥着德国味的国家。我表达这种不信任和厌恶的方式很简单，例如，有人要买一辆德国造的汽车，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匪夷所思的。我在1948年购买了第一辆车，这辆车便是一辆英国生产的奥斯汀，小巧且省钱。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我父母和他们的大多数朋友从未有过返回德国的想法：我们不是流亡人士，我们是移民，我们在适宜的土壤中扎下了新的根。我全身心地关注我在美国的生活和事业，尽管我也渴望回到欧洲，这也许是出于我的理想化，即使我以某种方式妖魔化了这个驱逐了我的国家。

联邦共和国面临的任务是巨大的，要建立一个可行的民主政体，要清除战争遗留下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废墟，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要在继续充当西方的防护盾的同时保护和促进德国的利益。大约还有50万德国士兵仍然作为战俘留在苏联，而联邦德国却与之没有外交关系。在不损害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希望的情况下，它与西方的融合能达到何种深度？当众多德国人沉溺于某种形式的集体健忘症时，它将如何处理去纳粹化的问题？它将如何克服在如此众多的人的心目中只要一提起“德国”两字就会引起的深深猜疑和厌恶？

但是西德也拥有重要的资产。它的人口约为5000万人，其巨大的工业潜力有着与之相配的富饶的土地，刚进入1950年——尽管其城市中的废墟尚未清除，其资源的开发还受到部分限制——全国的经济就已经处于复苏的顶端了：德国马克和自由市场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创新；一支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刺激了生产。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实施了一项自由经济政策，并制定了一项担负起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计划，有时这项计划甚至被称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人们开始对西德的经济进步感到惊奇，当然这种进步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帮助，并且也得到了来自东方的数百万难民的进一步推动，在重建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也在帮助重建西德。不久，人们开始谈论起Wirtschaftswunder，一个经济奇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传统智慧普遍认为战后时代将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即使不是崩溃的话。当然，在经济希望和满足感之上，民主之花能开得更加灿烂，但在魏玛时期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

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我所看到的政治奇迹。新的波恩共和国最大的运气来自它的新的领导人，因为在各级政府中，承担起政治责任的，都是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的公民。诚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往往也会有受到纳粹主义玷污的公民，或者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趋炎附势者，但他们设定了一种能激励海外人士信心的基调。

波恩的第一任总统是特奥多尔·豪斯，他是一位和蔼可亲、脚踏实地的斯瓦比亚人，言谈中略带一丝讽刺，这是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美德。我逐渐把他视为德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带来好运的人物（Glücksfall），完全出自好运。他曾经是魏玛国会的一名自由派成员，属于倒霉的民主党，这个党在1919年以后的每次选举中得票率一直在缩水。1933年，这个在国会中由五名（！）成员组成的党投票赞成建立起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授权法。（这五个人之间原本意见不一，但一致投了赞成票。）此后，他逐渐退出政界，转向非政治领域，偶

尔发表一些不那么循规蹈矩的文章，无伤大雅，足以通过审查，但对于那些能够读懂字里行间隐含之意的志趣相投者而言，他的文章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他还写了一本汉斯·珀尔茨希的传记。

议会几乎全票选举康拉德·阿登纳为第一任总理，所缺的只是他自己的一票。他在七十多岁高龄时出任该职务，从外表看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他的性格和信念决定了他是一个权利主义者，甚至丝毫不受自我怀疑的影响。他对自己的人民缺乏信心，对极端民族主义者却怀有强烈的合乎情理的恐惧，特别是那些在被驱逐者中的极端分子，其中许多人构成了他所在的政党的右翼。相对于纳粹帝国的言论攻击，阿登纳的沉默寡言被证明是一种财富。批评者抱怨他只认识两百个单词，对此，有人机智地回答说，如果他认识更多单词的话，他就会更加聪明，以至于再也不使用它们了。

作为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共产党的主要敌人，库尔特·舒马赫在魏玛时代末期是他所在党内为数不多的新星之一，在纳粹时期他曾被关在集中营里受尽了折磨。恩斯特·罗伊特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另一位此类明星人物，但他于1953年去世，因此联邦德国少了一位最具吸引力的公众人物。他当时推荐了另一位曾经的流亡者——维利·勃兰特。毫不奇怪，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外，在西德的公共生活中，人们还看到了其他一些缺少魅力但报复心很重的人物；这种人物一直是大量存在的。

也许比“基本法”的条款或领导人的品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新的政体拥有其大多数前身所缺乏的东西，即古人所谓的福尔图娜（命运女神），这个运气存在于其历史背景之中，也存在于其宗主国的智慧之中。对苏联侵略的恐惧加速了西方一体化的进程，并使西德与西方联盟的联系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曾经因远

离德国而兴高采烈，现在对德国执行的是一种友好的鼓励政策，而德国的众多邻国则对德国的过去耿耿于怀，始终持怀疑态度。

不可避免的是，波恩背负着因纳粹的过去所引发的问题，纳粹的全部恐怖罪行只能是逐步地被揭露。有些问题是特别实际、不留情面的，波恩该如何处理数百万前纳粹分子？在惩罚纳粹罪犯或向受害者提供赔偿这些方面能走多远？隐藏在这些实际的政治问题背后的是德国所犯罪行的深层次的道德问题。联邦共和国当然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与其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则相距甚远。将一切归零，然后重新开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联邦共和国早期的公民受到的心灵创伤仍然没有抚平，他们还生活在扭曲的和不安的记忆之中，其中既有个人的悲伤，也有历史性的损失。他们经历了一系列剧变，其强度和痛苦都是刻骨铭心的，所有这一切又与走马灯似变幻着的胜利和失败紧密相关。在其外部——在德国原先的敌人之间以及难民之间——仍然存在一些连续性，所连续的，有愤怒，有反感，也有不信任，还可能有一些希望，希望德国人生活中已落败的行为准则能重获新生，希望那自以为是、凶残好斗的攻击性最终会灰飞烟灭。

道德上的和智力上的问题可以被压制，但实际的政治上的问题是无法压制的。首先是德国人的集体失忆，也被称为“负面记忆”。少数领导人，比如罗伊特市长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阿登纳本人提到过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但是，一旦面对过去，似乎就没有人能够做到敞开心扉。然而，德国人在理解过去并处理其法律后果时所用的方式，恰恰也会被用来塑造这个新的国家的未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盟军将去纳粹化的工作转交给了德国人自己，然而这项任务却葬送在波恩共和国手中：由于与美国的政策相关的一些令人遗憾的情况，大多数原先的纳粹分子——包括政府官僚、法官、教师和教授在内——毫发无损地逃过了这一劫，并继续从事着他们原先的工作。这些令人沮丧的不加清算而全盘继承的情况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被披露。^[1]

人们有理由认为，如果真正进行清算，彻底地予以清洗，将会使数百万德国人成为新民主政体的贱民和敌人。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对阿登纳的宽恕政策提供强烈的支持。这种做法似乎是成功的，作为最敏锐的德国事件观察者之一，具有社会民主党倾向的流亡者弗朗茨·诺依曼在1950年写道，“尽管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不少卡珊德拉^[2]，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西方迄今为止已经赢得了德国之战”。胜利是必须付出一定代价的。

事实上，波恩政权的这些早期岁月恰好也是我开始教德国历史这门课程并写作博士学位论文的那几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威廉明妮和魏玛时期德国的文化知识环境的方方面面，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正是得益于这些环境。这种德国的过去——首先就意味着一个令人倍觉困扰的问题：一个有着传统公民权利保障支撑的民主国家，怎么能够在数周之内变成一个得到数百万人热情支持的野蛮但成功的暴力政权——能够对处于危险之中的民主国家的公民起到告诫的作用。魏玛的结局在当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记忆，德语也变成了一门政治死亡的语言，或许现在依然如此。

德国的过去注定会影响现在我在美国的生活，不仅在我的课堂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而且会提醒我作为一个国家和大学的公民的责任。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每当决定性的和危险的时刻来临时，有关德国公民被动地沦为共犯的记忆就会促使我采取行动。德国的过去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公民精神如何成为一项个人的必备素质——所有这一切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更加清晰了。我现在也明白，这是一个代际问题。1996年，（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在谈到柏林出版商时说：“沃尔夫·约布斯特·席德勒属于年轻时候的于尔根·哈贝马斯、约阿希姆·费斯特、拉尔夫·达伦多夫和弗里茨·斯特恩那一代人，但是非常有意识地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德国的灾难，后来

作为知识分子、公共学者，其人生的辉煌体现在又一次试图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这种经历进行诠释。”

我于1950年夏天首次访问了联邦共和国，实现了长达五年之久的重返欧洲的愿望。为我的论文做研究只是一个借口，西欧是我魂牵梦绕的激情所在。我们乘坐一艘名为“德格拉斯号”的法国轮船横渡大西洋，这艘船速度很慢，船上免费提供各种我梦寐以求的葡萄酒和奶酪——同行的乘客也令人难忘。黑人指挥家迪恩·迪克森正坐船前往他在巴黎的家，他解释说，在巴黎他可以和他的白人妻子一起散步而不必忍受怀有恶意的目光。佩吉和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发现他对美国人的偏见做出的平静的反思非常切中要害。我与法国文学教授让·布吕诺成了好朋友，他的精力非常旺盛，喜欢和船上的女人调情，在船长举办晚宴的那天晚上，他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一枚象征抵抗力量的玫瑰形饰物；这是抵抗运动的最高荣誉，他向那些一无所知的朋友们解释道。（布吕诺曾经被关在达豪集中营达一年之久。）我同著名的德国古典学者渥纳尔·加格尔进行了谈话，他现在在哈佛大学，此刻乘坐头等舱出门旅行。

在我的美国妻子和两岁的儿子陪同下去重新发现欧洲，这种经历令我激动万分。欧洲有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在英格兰度过了第一个星期，参观了位于考尔德科特古老教区的家庭农场，我们发现那里的节俭风气很有吸引力（那里仍然实行配给制）。法国仍然更加自由，尽管有严格的货币控制。回到巴黎我感到非常高兴，更加使我兴奋的是，我还带着一项专业使命。一位法国的德国文学专家，名叫埃德蒙·韦尔梅依，正在准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一部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起源的书，他请我写一篇关于莫勒·范登布鲁克的文章，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以他为主题的。韦尔梅依没有采用我的文章，但我们在巴黎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能看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更是一个极好的奖励。

佩吉和我们的儿子弗雷德回到了考尔德科特，而我则独自前往德国，当我第一次穿越国境线进入德国领土时，我对穿制服的德国人的蔑视立刻飙升了起来，但也许我是在把纳粹的面孔叠加在无辜的人身上。在我获得前往三个同盟国占领区的签证的同时，我被警告说，我的签证“从陆路前往柏林是无效的……盟国最高委员会和占领国对于任何经过苏联占领区可能需要的文件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我随身携带大量咖啡和香烟，必要时可作为礼物，我觉得假如能够超越他们的法定限制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小小的、令人愉快的胜利。

我选择了慕尼黑这座我不熟悉的城市作为我研究工作的最佳地点，我认为我留在那里是可以忍受的，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库贝尔卡表兄弟就住在附近，自从1938年2月在捷克山区度过令人难忘的假期以来，我还没有见过他们。而在达豪，这个地名听起来那么可怕又那么熟悉，还住着我父母的“雅利安”朋友卡尔和埃莉·哈克斯夫妇。卡尔是一名律师，在魏玛晚期，他还是一名激进的德国社会工人党成员；埃莉是我母亲在布雷斯劳幼儿园的助手。这个家庭在纳粹时代表现得无可挑剔。我给他们的儿子彼得写了一封信，他的年龄比我略小一点。

我住在一间廉价的出租房里，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度过的，尽管我有工作以及这些朋友，我仍然感到孤独和无家可归。在这个曾经是我的祖国的国家里，难道我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吗？这座城市仍然到处是残砖碎瓦和毁坏过半的建筑物，美国军人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我丝毫不感到同情，也许甚至觉得有一阵阵的满足感，毕竟德国人是自食其果！也许我这样想有点冷酷无情，是我依然怀有很强烈的仇恨的一种表现。随意找些陌生人聊聊天也帮助不大，他们都是满嘴的自怨自艾，并且经常喋喋不休地反对美国人。

我在慕尼黑的短暂停留给了我一个持久的收获，我遇见了在大学教现代史这门课的主要教授弗朗茨·施纳贝尔。身为天主教徒的施纳贝尔，在气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在意识形态上则不是，在魏玛时代，他写过一部关于1848年之前德国历史的四卷巨著，这部著作在范围和观点上都是非正统的，对此我非常钦佩。这部出自天主教徒南部德国人的著作也是对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雷齐克的著作的回应，特雷齐克是个热情的普鲁士人，崇尚军国主义，并且排斥犹太人。施纳贝尔一直是魏玛有保留的支持者，他意识到民主的公民身份赋予了历史学家极大的责任，鉴于德国中产阶级的软弱，易于接受物质上的成功和政治上的被动，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在魏玛时期爆发的最后一次大危机中，总理帕彭在1932年罢免了普鲁士的民主政府，施纳贝尔谴责了这一行为，“即使全民大讨论应该终结，将来的一切应该由德意志祖国（从高层）做出决定，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仍然有责任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针对先前已经发布的决定，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有心无力”，但每个人仍然必须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当然，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恰恰在这一点上没有能够做到。

我去听了他的讲课——一个小个子男人，脸色严肃、忧郁，使用一种冷静的语调给数百名学生讲述16世纪的宗教战争。我向他做了自我介绍；他邀请我去他的小公寓做客——我是第一个轻松地接受正式邀请的，他的妹妹为我们准备了咖啡和蛋糕。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加以鼓励，然后回忆起了他的人生。他认为信天主教的教师过于自由，而新教徒教师又过于像天主教徒，因此他在自己的家乡，崇尚自由的巴登，以一位中学教师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升职进入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直到1936年纳粹分子完全禁止他走上讲台，他的书也成了禁书，并且不允许他继续完成计划中的第五卷著作。他带着略有几分讽刺意味的自豪告诉我，他经历了两场战争和两次革命，然后才在一所正规的大学里获得了教授职位。^[3]

当时，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是狭隘保守的，或者是反动的，因此，作为一种明显向善的力量，施纳贝尔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或者可以说是被边缘化了。他心胸开阔，身上只是略微有些传统上的德国教授的派头，对德国人在19世纪中失去信仰而深感遗憾，对启蒙思想及其“机械论的”遗产持怀疑态度，并且也不能免俗地受到美国优势的困扰，当时，美国这个国家似乎在其公共理想中最能体现启蒙运动的光辉。他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一个类比来揶揄我，美国就像欧洲雅典人眼中的罗马一样——我觉得这种扬扬得意的自负是一种冒犯，完全偏离了这个雅典在道德和物质上已经破产的事实。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施纳贝尔向我抱怨分配给他和他妹妹的住房过分狭窄，住房在慕尼黑仍然是非常稀缺的。难道我不能敦促美国当局给他一处更大一些的居所吗？巴伐利亚的教育部长阿洛伊斯·洪德哈默尔曾经是一名纳粹囚徒，现在却持反动的宗教观点，他把施纳贝尔当作敌人看待。施纳贝尔对我的能量估计过高——这是一种经常发生但并不总是快乐的经历——对于揭示德国内部不间断的激烈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在帮助他改善住房条件上我无能为力，但我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

机会引导我结识了另一位历史学家，并由此有了一段伴随一生的热烈的感情。离开慕尼黑之后，我前往瑞士，希望在席尔瓦普拉纳停留三天，1930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假期，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但我没有去那里，而是留在苏黎世，我碰巧找到了一本《我的历史之路》，这是杰出的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写的一本薄薄的书。躺在少女峰下一块阳光明媚的高山草甸上，我读了他的文章，文章中散发着文学和美学的真知灼见。他用以解读过去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学术方法，以及提供“一种鲜明的生动的叙述”这一最大的愿望，都使我欣喜若狂。那时，我还不知道德国人在1940年一度坚持要求莱顿大学驱逐其犹太成员，而赫伊津哈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反

对德国占领当局这一行为。这位令人钦佩的历史学家成了我又一个远方的典范。在我眼里，这类理想的或理想化的人物一直起着鞭策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他们的持续力量。

在同一次旅行中，我买了一本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陷》，现在已经破烂不堪了，我经常会想到被他称为存在于群体“心理上的痛苦”之中的迫在眉睫的威胁，“社会亲和力主要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认同作用组成的，而领导者中的个体却没有获得他们在群体形成过程中应该获得的重要作用时，这种危险是最具有威胁性的”。

佩吉、弗雷德和我在8月中旬离开了欧洲，几乎就是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我没有认识到这次攻击的巨大意义，并且我还认为杜鲁门对此做出的反应有些过度从而感到困扰，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向性格温和的莱昂尼尔·特里林提到了我的担忧，结果遭到了他的激烈斥责。我很快意识到，朝鲜半岛影响了整个世界，并将对我们所有人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我从这个重大的误判中吸取了教训。

前一年苏联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加剧了美国领导人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担忧，此时朝鲜半岛的形势更是极大地增强了这种恐惧。或许，朝鲜的行动是一个信号，预示着苏联即将针对欧洲最脆弱的目标展开行动：西柏林或者联邦德国本身。一场关于重新武装德国的可能性的公开讨论马上展开了——我说是公开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阿登纳的心中，以及在一些美国人之间，早就已经萌发了这样的想法。[\[4\]](#)

永久解除德国的武装曾经是盟军的一个信条，德国的邻国显然都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复兴，它们对德国的侵略仍然记忆犹新，心中充满仇恨。那么德国人自己将如何应对盟国在这项政策上的逆转呢？五年来，他们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再得到信任去拥有任何种类的军队或武器，他们再也不能拥有这些曾经对他们意义重大的

力量的象征，然而现在他们是否就应该急匆匆地赶去参军呢？一支重新恢复的军队是否可能再次对民主造成威胁，再次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呢？一支西德的军队难道不会成为魂牵梦绕的德国统一的障碍吗？但是朝鲜激起了美国的决心，一定要找出一种方式去组建一支值得信赖的、安全的西德军队。这个想法在任何地方都很难推销出去，尤其是在自由派人士中，更不用说法国人了。关于是否建立一支西德军队以及如何将其融入西方盟军的辩论在务实和情感与道德之间摇摆不定。无论如何，人们再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德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在1950年到1951年的冬天里，我被告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资格将在6月结束。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在那年夏天出生，并且我担心我现在的无能将会导致又一次驱逐。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家，一个增进友谊的生活场所。然后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我的论文尚未完成，康奈尔大学却给了我为期一年的“代理助理教授职位”。我要给那里的大约300名本科生介绍我自己编写的西方文明这门课程。此外，作为改变人生的一笔额外红利，我还被指定去给研究生上现代德国历史这门课程。

我作为一名德国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这样或多或少出乎意料地开始了——然而有两件事情同时凸显而出：首先是我自己从未研究过德国历史，因此毫无准备；其次是有关德国的历史著作少而又少，特别是英语著作。尽管还有一些传统的教材和狭隘的专著，但这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开发——当时这给我造成了不便，但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实在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当时，A. J. P. 泰勒所著的《德国历史进程》（1951年）是最受欢迎的一本综述德国历史的书，书中非常生动地叙述了德国在侵略他国时的成功和政治上的失败。喜欢恶作剧的泰勒，非常擅长使用发人深

省的警句隽语，每件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每件事情最终都通向灾难。与他的著作进行辩论是一种令人振奋的练习，我当然会这样做，我会去反对他的可以被称为历史的必然性的观点。泰勒出色的导师——路易斯·纳米尔爵士，也曾撰写有关德国的著作，他强调的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恶毒的反斯拉夫情绪。更早出版的还有托尔斯滕·维布伦所著的《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其中的分析诡诈怪异，堪称杰作，作者强调的是现代化的经济和封建的、军国主义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差异。还有许多较为次要的著作是“从路德到希特勒”这一主题的变体，暗示希特勒是古老的日耳曼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的顶峰。（我一直认为，这是国家社会主义教义的负面版本，该教义宣称希特勒是德意志传统美德的救星，是德国历史的巅峰。）

弗朗茨·诺依曼在1942年写了一本比较难以理解的论述第三帝国结构的著作《巨兽》，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但该书几乎毫不关注德国生活中的文化或心理因素。1951年末，哈乔·霍尔本出版了《欧洲政治的崩溃》一书，该书的及时面世使我有时间将其消化之后再用于我的教学之中。他对德意志帝国政策所做的苛刻的判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他对现代政治家的职责和局限的认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一年之后，他的论述德国政治思想和实践与西方进程分歧的文章认为，这个分歧始于18世纪后期德国文化发展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在解释德国历史时，这个关键问题具有当代意味：联邦共和国在政治结盟上和精神上是如何“西化”的？

在康奈尔大学的日子非常艰难，我要讲授四门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为了学术上的生存，我还必须完成我的论文，我的论文涉及三位德国作家，他们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读来令人伤心的文章涵盖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漫长时期，在德国民众和受过教育的精英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种反对现代性的悲叹在其他欧洲国家随

处可见，但它们在德国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地方。我正在研究的内容，后来被我称为“日耳曼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强烈地反西方的、反自由主义的、反现代的，并且最主要的是反犹太的，所渴望的是德意志国家的重生，以及新的信仰、新的社会，还有新的领导者。

在1953年5月我的论文答辩之前的几个星期，哥伦比亚大学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如果我的答辩进展顺利的话，我可能会得到这份工作。当哥伦比亚大学答应录用我时——给我的薪水要低于康奈尔大学提出的标准，并且没有像康奈尔大学那样保证我将来可以晋升到终身教职——我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在康奈尔大学两年富有成效的工作给我留下了颇有启发性的回忆。我之所以受聘是为了替代一个休假的同事，而历史系则希望我为这位教授精心安排的“西方文明”课程引入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理所当然，他会从远处憎恨我。在我的第一学年即将结束时，在一次社交聚会上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可你听起来不像是个纳粹分子呀。”我惊呆了，显然，那位缺席的教授天生就仇视德国人，他说过我描述我的学位论文的方式听起来我像个纳粹的辩护士！这是从同事中获得的一个主要教训！

1952年秋天，就是我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第二年期间，我成了反对艾森豪威尔、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的一个狂热分子，但我认为我的论文以及教学要求我必须在政治上有所约束。尼克松的“跳棋”演讲^[5]中令人震惊的煽动性让我感到恐慌，因此我组织当地志愿者在康奈尔大学成立了一个史蒂文森竞选分部。因为我在校园中完全是无名人士，所以我需要一些有良好声誉的同事来充当这个分部的负责人，同时我答应所有的工作由我来做——我们设法发布了一封由康奈尔大学132名教师签名的支持史蒂文森的公开信，其中包括

汉斯·A. 贝特、马克斯·布莱克和马里奥·埃诺迪。我筹集了1000多美元，足以让当地的民主党要求从中分去一大块；我表示反对，但我们还是妥协了。由此，我经常想到，这次与党派演习的小摩擦终结了我还未开始的政治生涯。

我从未后悔过做出返回哥伦比亚大学的决定，回去后我继续给学生上德国历史这门课。一些新的重要的著作陆续面世了：1952年，有艾伦·布洛克的杰作《希特勒》；几年后，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出了一本论述魏玛瓦解的书，这本书在事实和方法上堪称典范，尽管有些德国历史学家批评它，由于它不符合当时流行的肤浅的风气；1959年，沃尔夫冈·蒙森出了一部令人惊叹的研究马克斯·韦伯和德国政治的著作，这个德国历史学家当时仅仅二十九岁——他注定成为杰出的新一代学者的领军人物。

在美国这段艰难的时期内，伴随着仍在积聚力量的麦卡锡主义，很多关于魏玛的言论出现了。许多左派谈到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并将艾森豪威尔比作兴登堡，将麦卡锡比作希特勒。我想，这些都是危险的废话，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所做的错误比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一场不负责任的政治迫害正在惩罚左翼事业有罪的和无罪的党派人士，并营造出一种恐惧和恫吓的气氛。很多人，特别是在学术界，表现得非常怯懦。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保守派共和党人，如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出面为基本的尊严辩护；还有一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名叫爱德华·R. 默罗，制作了一部关于麦卡锡的电视纪录片，加速了这个参议员的自我毁灭。（我为这部片子的反复播放筹集了资金。）我们现在知道苏联的间谍活动事实上是无孔不入的，但是美国在思想控制上的反共努力，强加给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宣誓，以及其他为消除“颠覆分子”或“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所使用

的策略都让我感到震惊，反而使我觉得他们才配得上麦卡锡之流用来攻击他们的对手的那个名字——反美分子。

回归哥伦比亚大学令人兴奋，因为这所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了，这反映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新的地位。大量来自联邦和基金会的资金使学校有能力创建一个国际事务学院和各种区域性研究所，并且举办了一个关于欧洲政治的特别研讨会，参与的学者有哥伦比亚大学本校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弗朗茨·诺依曼和亨利·罗伯茨属于研讨会的哥伦比亚大学代表队；哈乔·霍尔本、费利克斯·吉尔伯特、赫伯特·马尔库塞、伦纳德·克里格尔、H. 斯图亚特·休斯和卡尔·休斯克都来自外部。我很幸运地被任命为书记员。这些战时曾经在战略情报局服役的人士分析当代政治的风格和方式令我感到震惊。我还参加了一个历史研讨会，其特点是相互间碰撞出火花的激烈争论，最出名的有受过黑格尔训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诺依曼；受过德国训练的历史学家霍尔本，他善于将深刻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现实主义和哲学的谨慎相结合；还有罗伯茨，始终发出理智的、怀疑的、务实的美国人的声音。这两场研讨会充满了人性艺术和政治启迪，是“隐居的”学者认真着手去对待外部世界的极好例子。德国问题经常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方面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似乎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毕竟当各种形式的冷战正在许多方面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德国仍然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场。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东柏林的工人紧接着在6月进行反抗，他们走上街头抗议新的劳动“规范”，仅仅几个小时，示威活动就传播到了东德的其他城市。示威者们提出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其中交织了争取自由选举的请愿，冷战的基本问题——正在欧洲的核心地区显现——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苏联坦克很快就结束了发生在其卫星国的对其统治的第一次挑战。

接任美国驻波恩高级专员一职的是约翰·J. 麦克洛伊和詹姆斯·科南特，他们两个一直致力于加强西德的民主发展，慢慢地西德人开始改变对美国的看法，从而放弃了以往把美国人视为天真的牛仔占领者这一刻板的观念，转而将他们看作模范社会的代表，新一代的德国人蜂拥而至，向他们求教。教育对于民主建设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那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在1947年至1948年创办的柏林自由大学，这是对一些学者被驱逐出位于苏占区的柏林大学的直接回应。来自东方的其他学生和一些教师反对顺从共产党，从而迁到了西柏林，然后在美国的帮助下，创建了这所自由大学。德国历史上的元老，现年八十多岁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被劝说出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校长——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几乎立刻就同意哥伦比亚大学“收养”这所新学校。

诺依曼成为美国援助自由大学以及维系两所大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总设计师。自由大学得到了（西）柏林市和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支持，诺依曼也敦促福特基金会给予支持。福特提供了100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以建造一所图书馆、一个大型演讲厅和一个学生自助餐厅供学生使用——尤其是大约占学生总数的40%——他们冒着相当大的个人风险，每天坐公交从东柏林来上学。诺依曼还说服了福特建立一项教师交流计划，允许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去柏林授课，同时柏林的教授来哥伦比亚大学授课。福特的大量投资反映出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冷战也必须在文化层面上进行。

到1954年，联邦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相当强大了，被称为“民主总理”的阿登纳的治理赋予了波恩一种魏玛时期从未有过的稳定。他一方面为了西方一体化而努力奋斗，另一方面为了他的国家精心地去寻求道德上的修复。1952年，他与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达成了一项协议，承诺将30亿德国马克作为给犹太人的赔款，这笔赔款在今后的十二年内分期支付。这些资金满足了以色列最迫切的军

事需求。在这段时期内，美国和阿登纳试图设计一些方案以便将德国的人力以某种形式加入西欧的防御中去。人们就各种各样的将西德包括在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进行了辩论——事实上，这些计划往往在国际会议议程上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发展势头带来的威胁促使斯大林在1952年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提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建议，这个统一的德国将保持中立，摆脱所有占领军，并在中欧形成一种真空。经过激烈的或许短暂的讨论之后，得到阿登纳大力支持的西方列强拒绝了苏联为阻止西德与西方进一步融合而做出的最后的努力。由此，这个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得到了再次确认。1953年西德举行的选举表明阿登纳得到了坚定的支持，但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也略有增加。

美国因为需要阿登纳而向他做出了让步，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允许提前释放在纽伦堡法庭上因战争罪而被判入狱的实业家。西德正在将盟国的（已经存在严重缺陷的）去纳粹化政策转变为一种官方的宽大政策。例如，根据盟国的规定，有53000名公务员作为纳粹分子被剥夺了职位，到目前为止，除了其中1071个人之外，其他人已经复职了。法官和教授们回到了他们的岗位上，阿登纳甚至允许一些突出的前纳粹分子在他的内阁任职。有些批评者轻蔑地指责说这是一种“复辟”。东德政权特别高兴地将波恩描绘成纳粹分子和“复仇主义者”的巢穴。回想起来，我想说，阿登纳允许了原本不被许可的人员延续性，其目的是在西德政治中推进一个全新的亲西方的导向。当然，他也有他自己狭隘的政治利益，但他的立场也表明了他不信任自己人民的成熟度，不论是否得到了净化。

诺依曼让我和他一起在1954年夏季学期去自由大学任教，我很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前往欧洲。我们再次乘坐一艘法国船横渡大西洋，这艘船名叫“自由号”。（这艘船的前身是一艘伟大的德国船，

船名是“欧罗巴号”，作为赔偿法国人予以接管并重新命名，而且清除了船上每一处表明其德国身份的标志。)在航行途中，我拿了一些蓝皮答题册来打分，每当我完成一本答题册的评分后，我就将它扔在甲板上。不知何故，这种做法非常符合我在船上的快乐心情；我的儿子多年后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那样兴高采烈。在船上，我们听到了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上的一致裁决，隔离教育是违宪的。对于那些即将向德国人传授美国民主美德的人来说，这是一份非常光荣的礼物！

在巴黎短暂而愉快地停留之后，我们乘坐火车前往美国陆军总部所在地法兰克福。由于我是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我们获得了驻德高级专员公署颁发的公务旅行凭证，这种凭证是用英语和俄语两种文字签署的，可用于乘坐每日从法兰克福到柏林的军用列车。我们提前一天到达，因此这些凭证要在第二天晚上才能生效。我匆忙赶到陆军总部——原先的法本化学公司大楼，设计者是汉斯·珀尔茨希，大楼未遭到盟军的轰炸，因此最终被盟军所用——在那里，好心的布朗上尉给我们分配了一处军用营房，并帮我们将美元兑换成占领区临时购物凭证，我们的交易中更多的是仁慈而不是合法性。^[6]他给我兑换的购物凭证超出了我的需要，他还为我介绍了苏联的威胁，对此，如果需要的话，美国有大型武器库可用来武装德国人；如果苏联人采取实际行动的话，我们将会提前七十二小时得到警报！

乘坐夜间火车前往柏林的经历令人难忘。苏联法规要求，一旦进入仍然处于苏联军队“保护”之下的东德领土，车厢的窗帘就必须拉上。黎明时分，我透过一条缝隙发现了一名苏联士兵，肩膀上扛着枪，站在欧洲的中部：这是多么奇特的一个场景啊！火车一大清早在一个地方临时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出于好奇，我们谨慎地打开了窗帘：我们的火车停在马格德堡火车站的一条侧线上，距离柏林约50英里。在我们对面，有一大群乘客正在等火车；他们朝我三岁的女儿挥

手致意，当我们的火车再次启动时，我女儿喊道：“拜，拜！”东德人也齐声回应。

自由大学在达勒姆的一处别墅为我们提供了住处，此地靠近所有分散在四处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大学的组成部分。达勒姆绿树成荫的郊区也是美国在西柏林存在的中心，这里像一个小美国，包括军营、士兵营房以及一栋名叫杜鲁门会堂的中心大楼，其中有电影院和商店。布朗上尉已经把我们的到来告知了驻德高级专员公署的文化处，从一开始我就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曾经是——但现在不是——我自己的国家里有一个美国身份的庇护所，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意义。

来到柏林，我百感交集。这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因为我从未在柏林生活过，即使在童年时代，我了解更多的也是伦敦和巴黎。我不得不让自己去适应许多新的方面，尤其是我所遇到的人——无论是我们有着几分上层阶级势利的女房东，还是当地的某种人。在我身上，怀疑和先入为主的敌意占了上风：同我见面的这个人十年前做过些什么？他，或者她，是否曾经是个纳粹，抑或更糟？在前往柏林的途中，我遇到了剑桥大学的捷克哲学家保罗·鲁比切克，他现在也在自由大学教书，就这个主题给我讲了一则奇闻逸事。1946年，当火车在英国占领区恢复运行时，一名英国军官进入一节包厢，里面已经坐了三个德国人。过了一会儿，他向第一个德国人敬了礼，然后问道：

“你曾经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吗？”德国人愤怒地回答，他当然不是纳粹党员；事实上很少人曾经是——只是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才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过了一会儿，那位军官向第二个德国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此人更加愤怒地回答说，问这样的问题是对他的冒犯，“你们英国人正在这里试图教我们民主，然而你却跑到这里来四处打听别人的政治观点”，不管怎么样，不是，他没当过纳粹党员。当第三个德国人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时，他回答说：“1937年，

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我的工作取决于我是否加入那个党，所以我加入了。”英国军官向他行了个礼，然后回答说：“谢谢你。我正想去餐车用餐，所以在找一个可以看管我的行李的人，你愿意吗？”在柏林第一次参加晚宴时，我天真地讲述了这个故事，结果发现这个故事就像一块完美的试金石，有些德国人听了后会付之一笑，但大多数人闷闷不乐，以沉默来做回应。

我一次又一次地听人讲到有关盟军占领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故事，有些是关于德国人向盟军当局告发其他德国人的，或者虽然比较少提到但也许更为常见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德国人虚假地彼此证明对方政治上的纯洁，由此使这种大规模的连续性得以成立。令人讨厌的机会主义——第三帝国的一种生活中的特性——似乎仍然盛行在与我交谈的德国人之间！

早些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谈话中用“德国人”这个词是不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如此巨大。他们的民族身份实际上是否比一个老年人的身份还要薄弱？是否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受制于激进的沙文主义和深刻的自我怀疑之间的这些改变？这一点是否与德国后来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分歧和创伤有关？我不可避免地也是无意识地将我的直接印象与历史推测联系在一起，在我现在所看到的和对过去的回忆之间穿梭。在美国的帮助下，西德至少还是会拯救自己的，这样的希望仍然存在。要实现这一点，人们将不得不抛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虚假的和自私的简单化，从而去了解有关历史的复杂性和他们自己的罪责。

我在自由大学上的课程是“1890—1950年的欧洲危机，特别关注美国的角色”。学生们似乎并不熟悉国内外冲突之间的影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起的作用及引发的后果，对我的讲解也是如此——比如反美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经

济上繁荣与萧条大起大落的时期，但是对美国的反感与那个时期真实的美国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强调了德国人投射在美国身上的对现代化的恐惧——往往还有非常强烈的对犹太人的恐惧。学生们以认真的赞同的态度看待这些对德国历史不寻常的解释；也许他们是德国第一代没有受到沙文主义或军国主义毒害的学生。

学生们愿意面对他们的过去的复杂性，并探索德国与西方之间出现麻烦的关系，这与当时盛行的大多数公共话语保持沉默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年长的德国人，对他们的过去持有一种扭曲的、多为自我辩解和自欺欺人的看法。他们将1918年后德国的失败归咎于《凡尔赛条约》，或者经济大萧条，抑或其他一些外部机构；1945年之后，则一切都是美国的过错，包括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出卖”，在这一点上，他们指的是西方同盟国在与德国联手对抗苏联的共同事业中出现的“令人惊讶的”失败。这些仍然生活在战争废墟中的人们很少会公开谈论战时对他们自己国家的轰炸所带来的恐怖：是否由于普遍存在的证据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德国人强加给华沙和鹿特丹的罪行，因此他们的记忆受到了压制？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德国作家才开始谈论起盟军空袭造成的惨不忍睹的破坏，以及100多万人的死亡和伤残。对早先的沉默进行解释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推测后来突然爆发的情绪可能加强了德国现今的和平主义倾向，这倒还是相对容易的。

正如我在第一次返回德国时所注意到的那样，自怨自艾是许多对话中潜在的台词，同样还有德国人彼此之间的猜疑。西柏林人哀叹他们的西德同胞的物质主义。有人提醒我，德国人经常抱怨德国人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在弗雷德游玩过的一个公共游乐场，我注意到在沙箱那边有未加抑制的好斗情绪，孩子们之间相互嘲弄，充满敌意，父母和孩子们之间也存在不可理解的苛刻。我是不是

在寻找不和谐的迹象，抑或是先前的经历和历史兴趣提醒了我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忽略的东西？

柏林是德国生活中最深刻的分歧存在的地方和象征，有两个德国国家之间的边界，虽然有警察的严格看守，但至今仍然常常被渗透。前占领国的公民可以在几个指定的过境点进入东柏林，我却期待着能有一次访问苏占区的经历。第一次，我只待了十分钟。墙壁上贴满了党的标语，当我第一次看到东德警察时，那种脸面和苏联制服的结合令我不寒而栗。我不知不觉地重温了我年轻时的一部分经历，把警察的严峻表情误以为是纳粹的脸。但这种不安是真实的。

巧合的是，第二天是自由大学亨利·福特大楼举行落成典礼的日子。有很多人发表了演讲，但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哈佛大学前校长、现任驻波恩高级专员、非常严肃的詹姆斯·科南特的演讲。当我被介绍给他时，我提到了我曾经非常短暂地去了一趟东柏林，但已经没有再去的愿望了。他立即责备我：“你别忘记你是一个历史学家！你有责任去做见证，去观察那里可見到的一切！”我把他的责备铭记于心，立即将其视为一种保证和劝诫——一位历史学家的工作也要对现在有清醒的意识。

在我看来，那年夏天的一个亮点是参加纪念1944年7月20日密谋刺杀希特勒十周年的仪式，但大多数德国人基本上保持沉默，他们对于纪念推翻纳粹政权这一惊人壮举普遍感到不安。许多人仍然把参与密谋的军官视为叛徒，而诸如《士兵报》这类极端主义报纸则贬低所有纪念他们的努力。公开的纪念仪式在自由大学新落成的大礼堂内举行。当时，我写道：“观众们默默地坐着，就像在葬礼上一样，当豪斯和阿登纳顺着过道走过时……或者当《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消失时，都没有人鼓掌。豪斯……平静而迅速地说着话，没有悲伤，他回顾了那些英雄的痛苦，他们甘愿充当刺杀杀人凶手的

谋杀者，并且为他们的勇敢接受酷刑和付出死亡的代价……他总结道：‘我们欠他们的情义还有待偿还。’”

7月20日下午，另一场纪念仪式被安排在战争部的院子里举行，这座建筑物被称为班德勒街大厦，一些主要的同谋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然后被杀害的。纪念仪式的主讲人是我们家在布雷斯劳的朋友赫尔曼·吕德曼。当他在集中营获释后，就在柏林开了一家电影院，并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小组，这个小组与7月20日的主要策划者、能够接触到希特勒的军官有联系；政变后政府中的同谋者和预定的领导人将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政变失败后，吕德曼再次被投入集中营。他幸免于难，然后于1946年成为英国占领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第一位州政府总理。我想和他见面，于是就去了班德勒街，但我没有意识到参加这次活动是需要邀请信的。我在大门口的恳求无济于事，警察把我打发走了。我一冲动，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我跑到一家文具店，买了一张纸和一个信封，潦草地给吕德曼写了一张便条；如此武装起来之后，我跑了回去，气喘吁吁地要求一个警察将这封急信转交给（前任）总理，然后又自告奋勇提出自己去送——就这样我被允许进入小院子里，里面挤满了被杀害的英雄们的遗孀和孩子们，以及西德现政府的许多成员。

吕德曼雄辩的演讲结束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警告，“受害者为之献出生命的目标是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国家里，德国人民能够和平地、自由地生活，享受幸福”，这个目标仍然必须要实现。然后，因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被赋予了首要地位而被激怒的阿登纳出乎意料地站起来说话，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那些“为了挽救德国人民的荣誉”而献出生命的人。他的这种表现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地媒体没有提到阿登纳说过这句话，在我看来，这是继续冷漠和尴尬地对待1944年的弑君行动的一个象征。）

当我扫视院子里的人群的时候——其中有年长的，有身份的，既伤心又自豪的，穿着丧服的，面孔因痛苦而变得僵硬和谦卑的——我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德国人而感到羞耻。我随即写信给莱昂尼尔·特里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打动人的，甚至净化心灵的经历……令我感到悲伤的是，7月20日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拯救和统一的象征，除了今天和少数几天之外，这一天已经被遗忘了，甚至遭到污蔑和中伤。豪斯自己都觉得受到约束，无法去证明究竟应该纪念些什么。不同于德国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这种绝望的行为……涉及可以被称为社会中每一个成分的‘善良的德国人’——牧师、士兵、公务员、学生，他们所有人仅仅是出于良心的指令而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诚然，有点为时过晚”。

此时此刻，他们聚集在班德勒街，他们是原先德国精英阶层的各种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是通过灾难才从无情的地方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仍然是精英。他们及其被杀害的同事曾经超越了政治上的被动甚至共谋，进而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希特勒，不管为时是否过晚。如果对他们的怀念能够得到珍惜的话，战后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将会是多么的不同！或者，如果7月20日的政变成功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又将会是多么的不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证实了历史的开放性和意外事件在其中的作用，这个例子我将永远留存下去。

在纪念仪式上，我把我写的便条和电话号码给了吕德曼；他打来电话，我们见了面。他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当时六十多岁，个子很高，有点憔悴，还有一头蓬乱的白发。在询问了各种私人情况之后，我们谈起了当前的形势。他说，阿登纳是一个无赖（Schuft），他迎合了德国人民的卑鄙态度，这使社会民主党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对他的支持恶化了社民党的困境。我以为我能在吕德曼身上找到一些所期待的特殊光环或高尚品质，事实上他缺乏这些东西，但是能见到这位从我童年时代就仰慕的处境艰难的历史人物，总归是一件好事。^[7]

7月20日纪念活动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是柏林的福音派主教奥托·迪贝柳斯发出的，他在第一次仪式上主持了主要的布道。他赞美了上帝的仁慈，即使在德国人遭受最可怕的苦难的日子里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并且他明确地提到被驱逐出东部领土的德国人。就在那一天，我写信给他：“我感到很吃惊，甚至受到伤害，你的布道……只强调了德国人民的痛苦经历，对此他们早已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但是，你一次都没有提到那些完全无辜的人的痛苦经历，一次都没有提到那遍布世界各地被德国人夺去了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的数百万人，难道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适宜吗？难道你们的权威没有事先做出规定吗？”他很快就做出了回复，他的回复不仅未受我的指责影响，还坚持说他提到过“数百万未能生存下来的人，对于他们，我们不应该忘记。由此，我还想到了那些因德国的罪行而丧生的人”。我对他的迟钝感到惊讶，他“想到了”那些人，却没有谈到他们——真是一种可悲的沉默。（我后来才知道，他很早就表态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公开承认反犹太人，所以支持纳粹对他来说就很容易做到。）

几天后，我拜访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历史学家齐格弗里德·科勒。他忠实于他的保守的精英主义的观点，与纳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无疑是对他们的粗俗品质表示遗憾。我向他提到那次纪念活动令我非常感动，特别是吕德曼的讲话。“那个无赖！”（又用了“Schuft”这个词）他说道。“怎么会这样？”我问他。他提到吕德曼耽于女色。我提出异议：一个曾经被监禁，然后自愿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并最终被第二次投入集中营的人，似乎没有理由这样贬低他。科勒丝毫不担心地回应道：“我们不可能都获得集中营的入场券。”听到他这种惊人的评论，我简直目瞪口呆，就迅速离开了。（我又是后来才了解到，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之后，科勒马上就写信给他的儿子：“如果大学继续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保存、捍卫并传播真实的德国，反对由民主的犹太宣传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伪善已经挑起的诽谤行为。”）

然而，我也遇到了许多默默的富有同情心的令人钦佩的德国人。我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名叫汉斯·弗雷赫尔·冯·克雷斯，是一位慈祥仁厚的医生，他在后来他称为“我们的罪恶时代”开始的时候，就放弃了有着各种可能性的学术生涯，回家开办私人诊所，悄悄地帮助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当他担任自由大学的校长时，我们再次见面了。还有东欧问题专家维尔纳·菲利普，同他在一起立即就能感受到谦逊的道德上的诚挚和庄重，一种世代相传的深厚友谊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在柏林的最后几天里，我遇到了年轻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他刚刚完成了他论述魏玛的终结的一本书。（他娶了多萝特·施莱谢尔，他的岳父是卡尔·朋霍费尔的女婿，曾经参与反希特勒的密谋并因此被纳粹杀害。）与这些没有污点的德国人保持接触是我继续参与德国事务的一座必要的桥梁。我知道他们已经承受过一次考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人则得以幸免。（这并不能使我习惯于偶尔听到的评论，祝贺我幸运地“及时”离开了德国，而对话者和其他人则不得不忍受战争、饥饿和失败。）

在自由大学里，我还参加了一个博士研讨班，给这个班共同执教的有：弗朗茨·诺依曼；恩斯特·弗兰克尔，一位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德国然后又返回德国的政治学家；奥托·祖尔，一位社民党政治家，后来出任西柏林市长。那年夏天我常常看到诺依曼。在政治上，他会以那种毫不留情、毫不妥协的方式表现得非常离谱，但他也可以变得非常可爱——或者至少在那个夏天他就是那个样子。

诺依曼左右着这个研讨班，他的方式教条、尖锐且粗暴。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才智超群，瞧不起大多数学生，只是偶尔会透露他深深的忧郁和焦虑。就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他的“皮肤里面”（内心）并不快乐。但是在回应自由大学所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他做了一次关于“忧虑与政治”的正式讲座。他的讲座

令人非常激动。就我而言，这次讲座深深扎根于过去的伟大文本，是对诺依曼先前所持观点的一次令人震惊的和彻底的修正。

这次讲座也有一个隐秘的私下的根源。诺依曼是带着一位德国情人来到柏林的，这个名叫海尔格·普罗斯的年轻学者非常有魅力。传言他可能就此完全回归德国——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通常的政治变形中的一种特殊的恶性形式，而不是一种独特的德国现象，他的观点会使他的这种过渡变得更加容易，就像同他的伴侣在一起那种明显的幸福也会使他的过渡变得容易一样。回归会给予他一个政治论坛，以及一种帮助建立德国民主的方式。但是在9月2日，当他同一个朋友驾车行驶在瑞士的时候，年仅五十五岁的诺依曼在车祸中遇难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

在柏林度过的那年夏天刚结束，我就有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反共产主义”的经历。由于在这个分裂的首都的经历让我感到非常激动，于是我很快接受了《评论》杂志的邀请，写一篇叙述我的经历的文章，当时这是一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期刊。我把文章交给了执行主编罗伯特·沃肖，他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天才，道德上令人叹服，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委托我给恩斯特·冯·所罗门写的有倾向性的华而不实的《问卷调查》一书写一篇书评，该书嘲笑了当时著名的美国的调查问卷，数百万德国人不得不填写这样的一份问卷，此项程序是战后公民就业的先决条件。我写了一篇书评，但是沃肖突然去世了，于是文章被其他人返还给我——以长条校样形式，为时已晚，无法改动。各种各样的政治编辑平白无故地在我对纳粹主义的讨论中加入了反共评论。当我拒绝在我的名下出现如此面目全非的文章时，《评论》杂志传奇般的编辑艾略特·科恩在电话里对我大喊大叫。我只是一个难民，我的行为是“反美的”，只要我合情合理，他就有能力在公共生活中“助我成功”。这种掺杂着许诺的恐吓对我没

有吸引力，我坚持我的意见。后来他向我道歉，但这种脾气暴躁的攻击让我见识了偏执的反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遭遇了不同类型的“自由的”反共产主义。1954年5月，我被告知我已经被选为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会员。该委员会是一个强大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组织的美国分支机构，这个国际组织中的美国成员构成实质上相当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一个名人录，非美国成员包括雷蒙·阿隆、丹尼斯·德·鲁热蒙、伊尼亚齐奥·西洛内和W.H. 奥登，名誉主席是卡尔·雅斯贝尔斯和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后来我才得知给我提名的是黛安娜·特里林。）我向同事们募集资金，以便让委员会尽力去团结“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人做负责任的和严肃的斗争”。然后委员会的执行理事请求我为一本计划中的书提供帮助，这本书的书名是《党的路线》，内容涉及共产党人在美国“操纵舆论”的努力，重点放在六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例证”上，首先是西班牙内战，其次是转变“米哈伊洛维奇（原文如此）和铁托的角色”的运动，最后以核间谍埃塞尔和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的辩护结束。该书的大纲首先声称有必要就“政治上不成熟的人道主义者和公民自由主义者的敏感性”进行调查。我回信说，我认识到这种研究的潜力，但对大纲有“严重疑虑”，大纲通过理所当然地设定所研究的目的，从而提出了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和非学术性的程序”。在我的详细批评的结尾，我提出如果这个我从未听说过的项目实际上已经“掌控了全体成员（如其所声称的那样）持续时间最长的热情的话，那么也许我离开这个委员会将会更好些”。我的信确认被收到了，但除了邀请我参加下一次会员大会之外，其他一字未提。于是我便辞职了。

遏制苏联的要求是非常实际的——重新武装西德仍然是美国的迫切需要，并继续成为西方同盟国之间和联邦共和国内部艰难谈判的一个主题。尽管如此，到1955年初，协议已经达成，规定联邦共和国加

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北约内部建立一支军队（受到一些限制），以及结束“占领法令”。正好在德国完全失败的十年后，阿登纳的目标实现了：联邦共和国已经是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并稳稳地融入了西方。但他从未放弃统一这个最终目标——事实上，他承诺联邦共和国将占据“一个实力地位”，从而能在某个时刻迫使苏联放弃其卫星国。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承诺，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波恩善意的谎言（Lebenslüge），一种生活所依赖的谎言。但是此时此刻阿登纳的政策和美国的计划都获得了成功。

新成立的军队经过了精心筹备，以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德国军国主义。这支军队将置于严格的文官控制之下，绝不再是一个国内之国，并且以普遍的军事征兵制度为基础。用当时恰当的措辞来说，士兵们是“穿着制服的公民”，能意识到盲目服从（Kadavergehorsam）的危险。在检阅最早建立的军队中的一个营时，豪斯总统——一个进入领导核心的平民，一个新时代的完美象征——温和地、略带戏谑地敦促士兵们，“现在跑起来吧，去夺取胜利”。这种轻松的话语在军队中是难以想象的。

阿登纳逐渐建立起他的新的势力。1955年，他前往莫斯科，争取到释放被关在苏联战俘营中剩余的德国战俘，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他的心灵和思想都在西方。1957年，他与法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罗伯特·舒曼以及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了《罗马条约》，该条约为这三个国家再加上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创建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市场。这是朝欧洲一体化和西德复兴迈出的重要一步，是欧洲统一的倡导者的胜利，其中包括这一愿景的最重要支持者让·莫内，尤其还得到了一位很有眼力的法国人罗贝尔·马若兰的帮助。自马歇尔计划实施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这种欧洲一体化，由此产生了真正的热情。老一代人从欧洲两次内战的灾难中汲取了正确的教训，许多年轻一代对一种超国家的身份以及

一个新国家的理念表示欢迎。从现在开始，波恩将不得不在其欧洲政策和对美国的依赖之间保持平衡——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我对这个新的欧洲私下充满了热情，我把它看作一个世界和历史的开端。

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试图摆脱苏联的控制，与此同时，在埃及总统贾迈勒·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英、法、以色列三国考虑不周地图谋推翻他，鉴于这些灾难性事件，西德所取得的成就更受欢迎了。（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反绥靖主义者，一门心思地认为纳赛尔是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只有武力才能阻止他。）苏联进军布达佩斯。与此同时，英法远征可悲地失败了，这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我们将其视为武装的欧洲帝国主义的最终喘息。

我的朋友们大都卷入了东欧正在发生的事件之中，他们也将我拉进去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福特基金会国际事务主任谢泼德·斯通很快认识到，逃往奥地利的数千名匈牙利人不仅需要帮助，而且构成了了解苏联统治的独特情报来源。他多次前往奥地利——根据传闻，他用手提箱装着来自基金会的美元。（福特甚至贡献了一辆推土机，用以帮助难民越过雪山进入奥地利。）然后，当他不得不为将在1957年初召开的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写一篇关于德国统一的文章时——这是个不会消失的主题，他请我为他准备一份草稿，我答应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借此可以澄清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要承认一个分裂的德国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来源，然而很难想象将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的统一的德国会是一个稳定的小国家，就像自得其乐的瑞士那样。但在政治上随波逐流的中立的德国，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屈服于苏联的劝诱（例如以牺牲固执的波兰为代价接受领土上的“调整”）。我认为联邦共和国必须继续与西方保持一体化，但是同盟国应该就伴随着重新统一而产生的巨大的德国内部问

题着手进行研究。“格莱斯顿的反思，”我总结道，“即我们没有权利指望政治问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甚至比制造这些问题所花的时间还更短，这种理念可能会使我们感到烦躁和难堪。但西方可以鼓起勇气……吸取人们自发的追求自由的意志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给匈牙利带来了荣耀和不幸。”

不过，就目前而言，波恩还拥有福尔图娜（命运女神），最明显的就是它令人震惊的经济复苏。（事实上，德国遭受的破坏并不像最初其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大；它在1945年的工业水平要比1939年更高；冷战带来的经济后果极大地帮助并加快了它的重建；它的这种分裂有利于西方的经济。）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取代了早期的阶级分化：共识，而不是阶级冲突，似乎成了主流模式。然而，艾哈德的自由化经济带来了在财富分配上的快速增长的不平等，尽管在一些大型工业企业中，已经采纳了工人共同决策这一措施，这是朝工业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小的姿态。相对繁荣带来的新乐趣也可能有利于一种道德上的失忆，有些西德最好的作家，如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描绘了一个善于集体否认的自鸣得意的社会。

在处理纳粹过去的实际遗产这个问题上，不可避免地涉及最深刻的道德问题，阿登纳设计了一种精明的含蓄的妥协。一方面，他坚持立法确认前纳粹分子享有继续保持原有职务和养老金的权利——充其量是一种几乎无法辩护的务实安排；而另一方面，在已经与以色列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他同样坚持要求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做出某种赔偿。例如，因纳粹法令而中断或终止的职业生涯有资格获得有追溯力的赔偿。在我看来，这是对政治道德的一种最低要求。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阿登纳的政策直接影响了我父母的生活。我父亲的几位同事做证说，考虑到他作为临床医生、教师和科学家的记录，他最终应是正教授。1957年，波恩内政部认定他可以享受那个级

别的待遇，从1939年开始算起，因此根据公务员条款，他被补偿相应的各种福利。（代表我父亲做出赔偿要求的纽约律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为我中断的学业提出赔偿要求。1960年，他告诉我一个令我感到惊讶的消息，他已经为我争取到了1000美元的赔款承诺。我感觉很不安，想要拒绝接受，但为了不冒犯我父亲的朋友，还是接受了这笔钱，然后转交给了我父亲。我不想让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被人用物质方式来估价，也不想让我同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承受这种没来由的姿态。除此之外，我确信，在教育方面，通过移民我最终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我被剥夺的利益）。

与此同时，我父亲代表纳粹的前囚犯做的证词获得认可，他们的医疗赔偿要求曾经遭到拒绝。德国医生几乎常规性地否认一个人的集中营监禁经历和随后的身体疾病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但内科疾病的创伤起源是我父亲的研究课题，并且到目前为止，他和其他人的诊断一直被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的相关部门接受——尽管可能比较勉强，这些老兵证明了战斗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堑壕战造成的持续恐惧能够诱发内科疾病，由此，否认纳粹受害者享有同样的保护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我父亲以极具说服力的论证与德国法医的医疗蒙昧主义和道德冷漠进行了斗争，他们可能因他们对公共节俭原则的忠诚感到骄傲，但也许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身上始终存在的偏见的力量。

1954年，我从欧洲返回美国后，教学和专业上的杂事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我很高兴地推迟了本来应该是我接下来完成的一个任务：将我的学位论文改编成一本书，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步骤。取而代之的是，我在追求一个古老的梦想。在与一位新认识的平装书出版商偶然的谈话中，我向他建议出一本论文选集，展示现代历史学家的代表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的，这本书将揭示现代史学的

发展。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无意识地想暂时逃避一下纳粹的过去，重新回到我对欧洲的热爱中去呢？

我曾经给一个研讨班讲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马基雅维利等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是那些与我们最近的前辈历史学家，甚至我们的同时代人，那些当历史正在变成西方民族文化的中心，并且在义务教育中占首要地位的时候还在写作的男人和女人又怎么样呢？在19世纪初，历史也曾经成为一门学科；有些人称之为科学，或者像德国人那样，称之为“Wissenschaft”，一门有案可稽的知识体系。

那段历史是我所知的政治上和职业上的战场：历史一度是一种政治武器；所有伟大的事业都试图宣称过去赋予了其当前地位的合法化，就像在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这一问题上相互对立的解释中所能见到的那样，或者在有关法国大革命无休止的争论中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如我在《历史的变体：从伏尔泰到现在》一书的引言中所写的那样：“德国极权主义政权摧毁了探究历史的自由……历史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历史学家则是‘历史战线’上的战士。”我想在书中加入德国和苏联的正统说法的例子，于是我选择了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学家F. W. 梅特兰的一句题词：“正统历史在我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有许多呼声证实了历史的力量，但没有谁能比尼采说的话更加直截了当：

但是，曾经学过在历史的势力面前弯曲膝盖并低头鞠躬的人，最终都对各种势力点头称“是”，就像一个中国的玩偶一样，不论这种势力是政府、舆论还是数字上的多数；当某种力量拉动绳子时，他的四肢就会正确地动起来。如果每一次成功都来自“理性的必然性”，并且每一个事件都显示出逻辑或“思想”的胜利，那么——立刻跪下来，让成功阶梯上的每一梯级都有其尊严。你说，现在已经不再有鲜活的神话了？宗教现在已经

气息奄奄了？那么请看看历史力量的宗教，以及思想神话的教士，他们的膝盖上疤痕累累。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只是做了他们所做事情，并且认为他们的工作是能够自我辩白的。只有少数人承认了他们的前提、教学意图或哲学上的关注。

我贪婪地阅读着，直到我的结实的桌子被我正在梳理的书堆压垮为止。但渐渐地，我能够把从伏尔泰开始的历史学者的文选汇编在一起了，他们所有人尽管可能在许多事情上有不同意见，但都知道在一个新的、基本上是世俗的世界里，人们期待历史能够为最深层的有关生存的问题提供指导。我开始编纂这本选集，并把这项工作当作心甘情愿的事，作为一种自我指导和启迪的工作，我几乎迷失在实践中的历史学家的所有矛盾的但往往令人兴奋的自白之中——无论是严格的菲斯泰尔·德·古郎士，要求在追求他所认为的新科学时应消灭自我，还是热情洋溢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他确信掌握文学可以创作一个广泛重建的过去的戏剧，或是一位政治英雄让·饶勒斯令人震惊的陈述，他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中写道：“我不会忘记，正如马克思自己永远不会忘记那样……经济力量在人类身上起作用。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激情和想法；人类生活的几乎是无限的复杂性不能被残忍地和机械地简化为经济公式。”或者任何其他公式，我可以补充一句。

当我在19世纪60年代利奥波德·冯·兰克文集的第五十四卷中发现了一个几乎被人忽视的片段时，最大的惊喜降临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相互追随并互为条件的事件。如果我说‘条件’，我当然不是指绝对必要的条件。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的自由使其本身随处可见，而历史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处理的是自由的场景。”兰克在他二十九岁时就已经为历史学家的目的创造出了最著名的定义——他必须说明“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实际情况是

怎样的)——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就像后来的历史学家把他归类的那样。他教导说，过去的重建必须依据真实的原始资源，历史学家应该致力于将特定情况与普遍情况联系起来，将个别事件与最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假如德国人——历史这门新学科的主要实践者——能够记得兰克对自由和通史的告诫，那该多好啊！复杂性和背景仍然是我们的先决条件。

我花了两年时间寻找和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翻译其中的一些文章，为每篇文章写说明，并为整本选集写一篇全面介绍。这是一项令人却步的工作，但它让我能够将历史学家置于他们恰当的欧美背景之下，并确定我对克利俄^[9]及其门徒的忠诚。它也让我放纵自己的钦佩之情：对一个人的祖先的狂热崇拜能交替地激发和抑制情感，引起对自我的长期不满，偶尔也会起到鞭策作用。当我的手稿完成后，我的朋友亨利·罗伯茨评论道：“我原本会想到，做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快结束时，而不是开始时。”这条评论当初是打击性的，但是五十年后，我想申明，现在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勇气再去做这样的项目。

《历史的变体：从伏尔泰到现在》于1956年面世，在1972年出了增补版。美国和欧洲的学者纷纷予以好评——此书一直在使用并不断再版印刷！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它变成了一个原始文本，同时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性。我在这本书上付出的精力让我对我所认为的历史的开放性有了强烈的认识：在历史进程中没有必然性，没有预定的路线；意外事件——或者用兰克的话说，自由——是始终存在的。直白地说，过去孕育了许多未来的种子。过去也对不断变化的解释持开放态度，依据其特有的价值，它很容易被盜和曲解，它对最暴力的扭曲也是开放的。我们知道，正如兰克所做的那样，他理想中的“客观的”过去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我们的论述都是通过主观经验过滤的。

但是，以最大可能的精确度去努力重构过去，尽可能多地倾听其多种多样的声音，仍然是我们的目标。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的变体：从伏尔泰到现在》在我未来的所有工作中一直是一个沉默的伙伴。这本书加深了我对历史学家的使命感的理解。如果过去是开放的，那么现在也是如此。对过去的研究应该鼓励历史学家在当下的活动，鼓励公民参与，这对我们的许多前辈来说丰富了他们对过去的理解。这本书验证了我私下的、难以言喻的倾向：生活在几个世界中，成为一个积极参与的公民。

接下来我在德国历史上的努力是类型非常不同的两项研究，一项强调历史上的偶然性，另一项则是关于连续性的推测性努力。两者都是论文，这是一种我特别喜欢的形式：它们允许使用一种试探性的语气；它们甚至可能会增加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说的“历史的思辨丰富性”。

第一项是微型研究，试图在众所周知的沙粒中捕获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在重温一本获得授权的康拉德·阿登纳的传记时，我偶然发现书中简要地提到，阿登纳在1926年是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一个重要候选人。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对于阿登纳——德国当前这幕戏中的关键人物——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位来自莱茵河畔、信仰天主教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在兴登堡总统这位普鲁士新教徒领导下成为总理的话，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研究了导致前一届政府倒台的内阁危机，这在魏玛时期是经常发生的。其直接原因与象征性政治有关，即共和党对帝国旗帜的问题，但魏玛还出现了其他一些令人苦恼的事，如右翼阴谋的危险。阿登纳提出了一个基础广泛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提供某种稳定的承诺；他赞成一个明确的“西方的”外交政策，反对施特雷泽曼试图拿苏联与西德的关系来平衡西方的调和。施特雷泽曼是魏玛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外交部长和卓越的政治人物，他对

阿登纳的候选人资格持怀疑态度，这一点是在他的文章中发现的，这些文章现在保存在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里（作为美国从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阿登纳领会了这些困难，然后迅速回到了科隆市长这个手握重权的职位上去了。

我的关于阿登纳候选人资格的文章结合了仔细的文献研究，这样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文章还加上了通常的对魏玛的推测性评论，以及将政治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考虑的必要性。然后是偶然性问题：阿登纳是否可能已经克服了魏玛体制的障碍，并使它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度过大萧条时期并在右翼激进的愤怒中生存下来？

“人们是否能够假定阿登纳是个合适的人选？人们是否能够从早些年中读出眼前的阿登纳所具有的成熟、活跃，甚至好战的政治智慧？”也许我有点过分激动，但是我认为阿登纳在1926年获得候选人资格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我提出了德国的灾难是否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其他历史转折点上都有可能——我仍然这样认为。

似乎是为了平衡在偶然性和微观历史上的初次涉足，我接下来转向反思德国社会中一些长期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能有助于为最终的灾难铺平道路。（为我提供这个反思的场合是1957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海岸分会所做的一次主题演讲。）我想弄明白“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的政治后果”是什么，我反对当时仍然流行的观念，即永远有两种德国：一种是好的德国，体现在“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这个自我定义中；与之相对的是坏的德国，是给我们带来了希特勒的军国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德国。相反，我认为，19世纪德国社会中教育的大幅度提升，实际上是富有成效的，有助于对政治的忽视，甚至轻蔑地退出，这种政治允许逐渐地通常是半清醒地去接受政治上的幼稚，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知识分子呆板的反西方针论以及魏玛最后几年暴力反民主的骚动所表明的那样。如此众多的知识精英

和有道德意向的人怎么能去忍受帝国浮躁的威权主义、魏玛的分裂和希特勒的暴政呢？

德国人对文化的近乎神圣化（看似与马修·阿诺德对文化的定义很接近，但实际上截然不同）掩盖了德国新教无处不在的世俗化。对艺术的崇拜加上对国家的狂热或许潜意识地为宗教信仰起到了替代作用。我谈到了高尚的公民（Bürger）对只不过是实用和物质的Vulgäridealismus [庸俗理想主义，与常见的德语术语Vulgärmarxismus（庸俗马克思主义）或Vulgärliberalismus（庸俗自由主义）形成对照]的蔑视。由于对文化上没有财产、没有头衔之士存在阶级蔑视，这种情况只会加深国家的政治分裂，提供一种势利的形而上学。这也允许德国人利用他们最大的成就——他们的文化，去增加并原谅他们最大的失败——他们的政治。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一种更务实、更现实的态度获得了支持：“如此众多的德国人如此长时间惧怕并抨击的——德国文化的美国化——似乎正在断断续续地、悄然地发生，但显然令德国人感到快乐，并且可能令他们尚未经受过考验的民主政权获益。”近来的学术研究表明，19世纪的德国公民在地方政治中比我想象的要更积极、更自由，但是托马斯·曼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推崇为真正的德国人，这正是德国传统的一个例证，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

我是在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撰写那篇文章的。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由福特基金会建立起来的，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一个避风港，目的在于通过一种自发的、轻松组织起来的跨学科、年龄、等级和国籍的合作来充实个人的工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无拘无束的年份——身处各年龄段的优秀同事之中，畅享海湾地区的奇妙景色。1957—1958年，经济学家在该中心占据主导地位，乔治·斯蒂格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肯尼斯·阿罗以及出色的罗伯特·索洛，都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能激发灵感的

人，并且都是在学术上非常友好的人。（事实上，让弗里德曼评论我的那篇文章是一种严格的、令人兴奋的经历。）经济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也在那里。还有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他正在写作关于依恋和失落的三部曲，他身上充满了人文智慧，当我在写这些文字时，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身边。

那一年我结交了许多朋友，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一个像年轻的德国人拉尔夫·达伦多夫那样能改变人生。他只有二十七岁，可能是该中心最年轻的人。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便很快告诉我他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年龄最小的一个分部（他还没有告诉我他被关在集中营的时间），我也同样坦率地告诉他我出生在布雷斯劳，并且不介意我的故乡现在在波兰人手中。初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达伦多夫是一个神童，他很轻松地掌握了德国教育，很早就以经典作品获得博士学位证实了这一点；随后，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又证明他掌握了英美实证的和解析的社会思想观。除此之外，他对德国政治充满热情；他的父亲是曾两次遭到纳粹监禁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他对待生活如疾风暴雨，不断穿越田野和边界，但在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上则深思熟虑。他从不安宁，充满活力，不断探索，眼光挑剔。

初次见面一周后，我邀请他来家里吃午饭，同时收听西德第三次议会选举的广播结果。阿登纳是很有可能获胜的，但基督教民主党以50.2%的差额赢得了选举，大大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在德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由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这个结果非常令人沮丧。人民把票投给了体现在备受吹嘘的经济奇迹中的日益繁荣，以及一种“未经试验”的外交政策。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他们投票选的是一位有权威的领导人，这让拉尔夫和我感到不安。“德国问题”困扰着我们。几年后，拉尔夫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德国社会与民主》，他宣称

“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尽管我试图利用信息和理性来过滤掉感情”。

与德国人的友谊已经成为我更深层次的重新参与德国生活的一座桥梁。拉尔夫是一个我能在任何地方与其分享无休止的对话的朋友，我们的话题涉及两个大洲。我在斯坦福大学早已知道，这个有天赋的人，专注、奋发努力、乐于冒险并喜欢游览美景，注定会有辉煌的人生。

在研究中心，我开始对我的学位论文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最终在1961年成书，书名为《文化绝望的政治：对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书中核心部分是对三位有影响力的德国评论家的人生和作品的详细研究，这三位评论家跨越了三代人：保罗·德·拉加德，1827—1891；尤利乌斯·朗贝，1851—1907；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1876—1924。拉加德认为驱逐犹太人是德国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而1923年出版的莫勒·范登布鲁克的著作《第三帝国》，普及了希特勒将要给他的新政权命名的这个名词。这三个人都憎恨他们所处时代的德国。他们描述了“一种新的文化不满……他们的写作直接出自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经历，因此他们的传记的精神层面与他们的工作非常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写作的这三个人，都紧紧抓住了一个罪恶根源：自由主义。他们攻击自由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是现代社会的 premise，他们所害怕的一切无不缘于此：资产阶级生活、曼彻斯特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唯物主义、议会和政党以及政治领导的缺乏。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他们内心痛苦的根源。“他们的痛苦是对孤独的怨恨；他们的愿望是建立一个新的信仰，一个新的信徒群体，一个具有固定标准和毫无疑问的世界，一个能将所有德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新的民族宗教。”他们的思想触及并反映了这个时

代的宗教信仰丧失，这种丧失并不像在法国那样，由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斗争作为标志，“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我写道，更加倾向于“坠入不信之中”。我研究的这三位评论家都得到过伟大的文雅的德国人的称赞，那是因为他们都对现代性进行了“理想主义者”的攻击，他们培养了一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预示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成：对现代德国文化的“腐败”进行的攻击以及对一种伟大的民族的（völkisch）未来的美好承诺。在题为“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的结论中，我写道：“在共和党人的德国，1000名从小就读过并崇拜过拉加德或朗贝的教师，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言，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公认的希特勒从德国企业界大亨那里筹集的数百万马克。”

我试图将这三位思想家置于德国思想和政治史的背景之下，但我也强调，在每一个关键点上，这种针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特殊仇恨是一种欧洲现象，这种思想和渴望的投射可以在其他作家身上找到，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穆勒在德国为他组织了有倾向性的宣传）。我正在对付欧洲一种主要观点的变体，只有在德国该变体才影响了一场政治群众运动。我对这些思想家充满敌意，这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理念是令人厌恶的，也是国家社会主义成功的一支序曲，但也许还因为我同情他们对现代文化感到的不安，由此就更加被他们对改革的轻率、危险的建议激怒。我想我发现这三个人的志趣是极其不相投的。

但我认为我不是在描述一些在过去是安全的事情：“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这种对现代性的反叛潜伏在西方社会中，而其混乱的、奇妙的程序，其非理性和非政治性的言论，体现出了愿望和真诚，尽管不像体现在其他更熟悉的改革运动中的愿望那么慷慨或有形。文化悲观主义在今天的美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从这本书的写作中，我学到了一些关于非理性的力量，关于现代性所引起的各种形式的痛苦，关于世俗化的精神后果和政治上的伪宗

教的诱惑，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欧洲成分这些方面的知识。作为一名学者，我很幸运，因为我正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处女地。

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书很受欢迎并不断被印刷。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是，它仍然具有相关性。对“西方”的反感伴随着与霸权主义的傲慢相结合的公认的唯物主义和精神空虚，已经发展起来了，鼓励并纵容了各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言论和恐怖行为。

20世纪50年代以一场联邦共和国内部的历史性变革而结束。1959年，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并为新的领导人做好了准备。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党一直游走在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和对渐进主义的政治民主做出的一种“修正主义”承诺之间；在联邦共和国的早期，该党坚持走库尔特·舒马赫设定的路线，坚持基础工业的国有化。虽然它赢得了重要的地方和州一级的选举，但在每次全国大选中均告失利。舒马赫于1952年去世七年后，该党采纳了一个名为《哥德斯堡纲领》的新纲领。该党最终抛弃了旧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包括固有的阶级冲突的概念，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党，不再是专属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现在也接受了北约和西方一体化。正在被推出作为社民党领袖的人是维利·勃兰特，他在四十六岁时踏入了政界，浑身散发着青春、希望和活力。

就在此时，机会引导我去研究俾斯麦时代。他在19世纪60年代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十年后，作为统一后的德国的第一任总理，他抨击社会主义者是不爱国的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在这个错误的诅咒之下，社会主义者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苦难。从1862年至1890年，俾斯麦统治了普鲁士和后来的德国，逐渐成为欧洲的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兰德斯是一位研究19世纪国际

金融的专家，他曾经被要求写一本关于柏林银行历史的书，银行的拥有者犹太人格尔森·布莱希罗德经常被称为“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三十多年来，布莱希罗德一直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兰德斯得到了三十三个纸箱，里面装的是在漫长的俾斯麦时代布莱希罗德与德国和其他欧洲名人的一部分来往信函；在纳粹夺取政权后，布莱希罗德银行的一个合伙人将这些档案带到了纽约。兰德斯建议我们一起写一本有关布莱希罗德的篇幅不长的书。

我匆匆看了一眼这些材料，想从中捕捉一些有用的线索，偶然发现了一封俾斯麦的一个密友于1888年写的信，信中警告布莱希罗德俄国军队正在朝奥地利边境移动，因此当时给予俄国的任何经济援助都将具有战争贷款的性质。我知道，与此同时俾斯麦却在告诉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与俄国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消息。我迷惑了。尽管关于俾斯麦的研究成果成千上万，但没有一篇涉及他和他的犹太银行家以及知己密友。我接受了兰德斯的合作提议，并试图完成其他的任务。（那时我还在给一个博士研讨班上课，在这个班的第一个学年里，我有一些获奖学生：伊什特万·迪克、彼得·诺威克和哈罗德·普尔。他们正在写的学位论文是我的学生发表的三十多篇论文中的第一批，我也特别珍惜我的这部分教学工作。）

我们知道布莱希罗德与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本人就是一位传奇人物。大卫已经获得了进入巴黎罗斯柴尔德档案馆的许可，所以我们决定在1960年至1961年在那里度过一个休假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提供的一笔资金帮助了佩吉、弗雷德、凯瑟琳和我再次乘船去巴黎，在法国生活一年的前景使我非常兴奋，即使在那里的实际停留不可避免地会有难关。（在我们到达巴黎后的最初几天里，我的朋友兼同事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带我去让·穆兰俱乐部。在那里，我心中的一位政治英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发表了讲话。我能完全理解他的演讲，这减轻了我对语言上不熟练的恐

惧。但第二天早上我不得不把车开到一家维修店——结果什么也听不懂。）

大卫和我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尘埃覆盖的阁楼里开始了我们的工作，这座阁楼在拉菲特街银行最初的大厦内，大厦入口处沉重的大门很可能是早期用来保护大厦免遭革命群众破坏的。我们翻阅了几十年的通信，这些信件中夹杂着无数的汇票（现代支票的先驱）。我肯定看了成千上万张这种纸条。早些时候，我看到了一张汇票，这张汇票以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为付款人，开给布莱希罗德银行，受益人和签收人为柯西玛·冯·比洛，娘家姓为李斯特。柯西玛——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孩子们的母亲，他的妻子——是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推动者，现在是最不喜欢的19世纪的女人之一——我竟然发现了她在和犹太人做金融交易！没有哪张汇票能与此媲美，现在这张汇票配上了镜框挂在我们家的大厅里——这是我唯一一次顺手牵羊！

银行界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但兰德斯是一个完美的导师，他对人性有着清晰独到的见解，还有一双小说家的眼睛，善于捕捉人们的怪癖和动机。当我惊奇地注意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必须向获胜的德国人支付一大笔钱时，他也感到很开心。从你的国家的苦难不幸中获利？兰德斯指责了我：我是一个天真的新手。写作的回报是学到新的知识。

庞大的几乎未曾利用的罗斯柴尔德档案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开端。布莱希罗德-罗斯柴尔德-俾斯麦这个三角触及了欧洲政治诸多关键节点，因此可以引领我们去发现更多的资源，其中大部分是从未被使用过的。出于一时冲动，我去了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所在地）有着特殊的氛围，非常安静，井井有条。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也公布了1914年以前的外交报告，但是我想仔细复核一下圣瓦利埃伯爵的手写报告，他是法国驻

柏林大使，并且是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密友。我发现他提交的关于德国国内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同俾斯麦的秘密谈话的报告都尚未对外公布。我找到了涉及1878年至1882年这个关键年代的一个无价的资源；俾斯麦显然醉心于向这个聪明的对话者吐露心声，此人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是值得他信赖的。他对俾斯麦的恭维则非常轻率随意！

布莱希罗德的文件中包含了大量给他的私信；但他的回信则大部分不见踪影——必须找到他的原始笔迹。俾斯麦档案是一个关键的收藏点，他的档案收藏在位于汉堡附近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俾斯麦庄园内，现在掌握在这位前总理的孙子手里，其孙子奥托是西德联邦议院中的一个基民盟成员。（后来我发现了俾斯麦伯爵曾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的记录。）那么如何才能接触到这些档案呢？我请一位名叫彼得·拉索的德国同事写了一封给俾斯麦伯爵的介绍信，这位同事曾经是布雷斯劳的一位历史学者，一位完美无缺的保守派人士。有了如此装备，我便向伯爵预约见面时间；他安排了见面但又多次毁约。最后，我直接去了他在波恩的办公室并恳求他的秘书。“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她喊道，“伯爵无意见到你，他讨厌历史学家。”但她提议，在伯爵下一次（罕见的）访问波恩时，她打电话到巴黎通知我，以便我可以突然出现在他那边的办公室里。简言之，她同我合谋来针对她的老板，我想，她这种快乐的不忠是一个新德国的好兆头。

这个计划奏效了。我藏身在他的办公室里，因此他无法避开我。我被授意称呼他为“Durchlaucht”（平静的殿下），我照此做了，然后迅速地为我的这本书做了解释。我说，如果我告诉读者，唯一不向作者开放的档案室就是俾斯麦档案室，这将是令人尴尬的。（我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是借鉴来的：兰德斯给我提供了这个建议。）他随即否认有任何困难；他说，是的，有一包布莱希罗德的信件。我们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笔交易，他将这些文件委托给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然后通过外交邮袋将其寄往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这事就这样成功了。

对我来说，在巴黎度过的这一年是辉煌的一年，我沉浸在我所做出的激动人心的努力中，这些努力既复兴了过去，也见证了现在——而且不仅仅是欧洲的现状。1960年11月约翰·肯尼迪的当选是值得庆祝的好事。这是我第一次把票投给了获胜者，肯尼迪的就职演说也使我非常激动，我大声地把他的演讲词朗读给我的家人听；他所说的“文明不是软弱的标志”这句话，在我们中间经常被引用。

当时法国政治舞台正上演一场剧情非常激烈的好戏：戴高乐总统为结束残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做的努力遭到了阿尔及利亚法语区的支持者的激烈反对，法国陷入了混乱。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残忍地动用酷刑已为世人所知，到1961年春天，战争蔓延到法国本土，在巴黎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使用可塑炸弹（爆炸物）进行的恐怖袭击，发动袭击的是穆斯林，法国人用这个称呼来指阿拉伯人。我很同情戴高乐，就像他们自1940年以来一样（即使他在1958年5月重新掌权的方式曾经让我感到沮丧）。他正在致力于一项谨慎但坚定的事业，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希望能逐渐结束冲突，并以一种模糊的说法去赢得法国本土的支持。他曾经在同样模糊的说法的启发下，对阿尔及利亚的侨民说：“我理解你们。”

巴黎也给我提供了一些短暂的经历，我称之为政治旅游，但这些经历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可以作为活生生的政治史的经验。例如，一个与文化自由大会相关的团体，以一位曾参加抵抗组织的法国诗人皮埃尔·埃马纽埃尔为首，在西班牙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欧洲的理念”——这是第一次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组织此类活动——以至于即使成为一个与西班牙知识分子有联系的群体中最沉默的成员也是令人兴奋的，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在预期的向后佛朗哥政权过渡的过程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何况还在马德里！我询问了我们在会议讨论（用法语进行）时的相对自由——不会有告密者在场吧？西班牙人微笑着指着前排的一位老人，说道：“他是警方派来的，他

听不懂法语。”我把这种情况看作一个独裁统治正在衰落的极好的迹象——在一个极有希望的时刻，因为一个共同的欧洲市场的形成表明“欧洲的理念”正在（部分地）变为现实。

那一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和我经常见面——那时我的来自斯坦福的朋友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去探索在德国的过去出现的问题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周围的环境仍然是如此的保守和沉默。通过达伦多夫和我自己的努力，我与德国人的接触在不断增加：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成了通往历史学家、银行家甚至政治家的一座桥梁。渐渐地，我意识到布莱希罗德的故事只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的课题中的一个开篇章节：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始于希望却以包罗万象的恐怖告终的关系的整个历史。

德国问题在那年夏天的世界舞台上再次爆发，当时的情况受到从上面来的威胁，由于尼基塔·赫鲁晓夫一再好战地认为，要在四大国没有拿出解决方案的情况下由苏联与东德达成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因此威胁到盟国在柏林的权利。东德公民逃离他们的国家去西德这种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标志着一种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威胁。这确实是一场真正的危机。8月13日凌晨，东德警察和士兵开始建造一座高高的混凝土墙，将东柏林和西柏林隔离开来。

西德人，特别是西柏林人，对盟国在应对这次非法挑衅时所做出的谨慎反应感到失望，西方的反应主要包括外交谴责和加强盟军在该市的军事存在，然而这堵墙随即给许多德国家庭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困难——还不仅是柏林人。但两年后肯尼迪总统的那次成功之行，以及他的激动人心的“*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演讲，重新点燃了西柏林对美国的忠诚。

那时我已经恢复了在美国的全职工作，如果要我明确自己的责任，我会借用那句令人厌恶的口号：工作、家庭、国家（这三个词在

维希政权时代取代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个词：自由、平等、博爱）。我重新开始教本科生和研究生——前者学习心切但顽皮，后者则面对职业生涯不同层次的严格要求，这两类学生我都喜欢。我曾经说，一种文化必须知道如何“诱导人才出成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正在定义在教学中什么是我的主要乐趣和抱负，这是能让单调烦闷的工作变得有价值的一种理想。

虽然教学是我的主要责任，但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关于欧洲事务的写作和演讲。在各种场合下，我都曾经为在一个新欧洲的初期签订的《罗马条约》高唱赞歌。小亚瑟·M. 施莱辛格邀请我到华盛顿他的白宫办公室汇报我对德国的印象。我也越来越活跃于外交关系委员会，在那里，欧洲事务是我的主要关注点。1962年，我还在委员会里开始了作为西欧外交书籍审查员的长达三十年的工作。每年都在阅读，甚至仅仅细读三十本或四十本书，并且给每一本书写下简短但理想的话、精辟的评论，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教益的。

1962年，当我从一次欧洲之旅回来后，我发现父亲的身体处于危险状况之中，他自己诊断为患有严重高血压。然而，他仍旧继续从医，那时他的病人中包括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和同事。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尽管他自己的心脏病有过几次轻微的发作，可他还是接了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夜间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他妻子很明显是心脏病发作。我父亲带着便携式心电图仪，爬了四段楼梯到达这对夫妇住的公寓，结果发现这位年轻的女士只是患有严重的肠胃不适。几天后——11月9日——父亲被送往医院，我一下课就赶紧去看他：起初他说感觉好些了，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他轻声地说道，“我听到了死前的喉鸣声（esröchelt）”。这是他做出的最后一次诊断。临终前我一直陪着他。

我的悲伤是巨大的，此时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至关重要。并且，虽然我知道父亲的死亡发生在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历史性日期（1918年德国皇帝退位，1923年希特勒未成功的政变，1938年“水晶之夜”）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仍然感到有些怪异。（怪异的还有，哈依姆·魏茨曼也在那天去世了。）我的物理学家叔叔奥托写信给我的母亲，说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几乎有一个小时都无法思维”。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损失——还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我父亲那一代人，经历了从相对压抑和前民主时代到相对开放和民主时代的这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在德国文化中标志着一个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时刻，但这一代人的特征几乎消失殆尽。

弗雷德和凯瑟琳就像佩吉一样，默默地怀着同情心，非常体贴地支持着我。佩吉还继续与我母亲一起工作，在我们和托妮的帮助下，我母亲渐渐地建立起了新的生活。但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我父亲的去世使他幸免于一年后发生的悲剧。1963年11月，我在纽约担任陪审员，午饭后我回到陪审团的那个大房间，这时候我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地挤在几个晶体管收音机周围，注意力全集中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个消息上。不久之后，肯尼迪便死去了。人们开始哭泣，其他人则惊慌失措，我的感觉是大吃一惊、无法相信的悲伤，还有忧虑。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曾经着迷于肯尼迪的风格和机智，以及他的新边疆政策团队，我也对他（以及他兄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方式感到敬畏，最重要的是，在前一年的4月，我为他的美国大学演讲欢呼过，当时，为避免全美国的耀武扬威，他呼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我觉得肯尼迪的死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整个世界为之哀悼。刺杀肯尼迪引起了对美国的普遍认同——特别是在德国人中，最热诚的莫过于柏林人。这种自发的感情的流露直到2001年9月11日才再一次出现。

许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动荡不安，但我特别意识到在西德和美国，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冲突愈演愈烈——其中一些具有分裂我们的国家的潜能。在联邦共和国，纳粹的过去终于成为当今不可避免的一场拷问道德的好戏，而在美国，肯尼迪的遇刺迎来了一个充满暴力同时也充满希望的世界，因为民权运动正在聚集力量，而且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力量也在迅速增加。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大学生们对乏味的顺从和看似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感到愤怒，他们团结起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曾经被宣告已经结束的意识形态，突然又成了一张王牌，是充满义愤的一代人所共有的。

西德的公众从其普遍存在的长期培养的失忆症中惊醒了过来，因为内部和解以及前纳粹分子悄悄地重新融入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直面德国罪行的时刻已经来临。人们已经从他们并非自以为是的睡眠中醒来了。纽伦堡审判常常被斥为“胜利者的正义”或者作为迄今为止已经足够的最终判决：最高级的罪犯已经被处置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另一方面，1961年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扣人心弦的审判使得大屠杀成为世界集体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在德国，一系列进一步的战争罪行审判更加改变了公众的情绪，最显著的是由黑森州的州检察官（纳粹时期的流亡者）弗里茨·鲍尔精心准备的漫长的审判，他决心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并且将纵容纳粹犯罪行为的共谋昭示天下。这场审判于1963年在法兰克福最大的大厅里当着众多的观众拉开了帷幕，审判记录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发生的全部恐怖罪行。

1963年，当时不为人知的德国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写的一部戏剧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这部名为《见证人》的剧作描绘并揭发了教宗在犹太人面临灭绝前的沉默，而教宗本人是第一批被告知的人之一。这部全部在西方制作的戏剧即刻引起了无休止的抗议，尽管如此，它还是成功地开启了一场关于“旁观者”的辩论，甚至处于道德力量和

责任的顶峰。（在纽约的一次激烈交锋的会议上，我为剧作家的意图做了辩护，但仍然批评他对教宗过于片面的负面描述。）如此遭受戏剧性历史启示轰炸的德国人，开始意识到未充分审查的过去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风险，这种过去不仅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意味着广泛的现代德国历史的进程。来自敌对的东德国家的宣传，在吹嘘自己的纯洁的同时，指出西德在粉饰法西斯的过去，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西德的“觉醒”。

出乎意料的是，我参与了德国人重新思考其历史的一些努力。1963年，位于布伦瑞克的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所长格奥尔格·埃克特邀请我去参加一次西德和美国共同主办的会议，会议议程涉及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教科书。（詹姆斯·科南特参加了我们的会议，他于1961年8月回到西德，以便为教育改革提供建议。）我们审查了现有的德国和美国的教科书，并起草了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修订版。我专注于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对当时仍然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即欧洲列强已经“滑入”（这是英国战时领导人大卫·劳埃德·乔治用过的词）了冲突之中，因此不能为此承担特殊的责任。德国历史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因为它说明《凡尔赛条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是不符合实际的，该条款特别指出了德国的侵略。我推动了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的更具批判性的评估，并呼吁更加关注国内外政策之间的联系。民族的历史，我说道，应该是在欧洲背景下写成的，正如兰克在他的工作中所做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教科书以及史学界总体上开始去适应有关关键问题的新的国际共识。（当我从布伦瑞克返回后，亨利·罗伯茨偶然做了一个评论，说我能够在德国人关于过去的辩论中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这种说法使我很震惊。我根本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我完全是无意被卷入充当这个角色的。）

但是出于私人和专业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终是最感兴趣的主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既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恐怖，

也因为它是后来极权主义犯罪行为的先决条件。即使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了解过这场战争，阅读过相关书籍，并且在布雷斯劳同我父亲一起散步时也谈论过它。现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历史协会正就德国对战争爆发和战争的持续应负的责任这一问题进行最激烈、最有分歧的辩论。196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颇刺激的书，即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争夺世界之强》，英文版则有一个无伤大雅的标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作者是弗里茨·费舍尔，汉堡的一位历史学家，原先因对19世纪新教的研究而出名。（费舍尔曾在1951年冬天来康奈尔拜访过我。我记得他是一个有点不谙世故、非常敏感、神神秘秘的德国人，对世界持一种阴谋的看法，相当愿意保护第三帝国。我当时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只是在五十年后，在参加他的追悼会时，才得知他曾短暂地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为纳粹化的研究所的成员。）根据他在当时位于东德的旧档案馆里发现的新材料，费舍尔坚持认为，德国的帝国领导人从1912年起就开始策划一场战争，他们担心时间对他们不利，而且俄国不断增长的工业力量是一个不断增加的威胁，然后他们在1914年7月选择了一条激进的路线——或者使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包围”协议在外交上遭受失败，从而破坏这项协议，或者去冒战争的风险，如果是后者，那么从一开始，战争的目的就是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德国对欧洲大陆的霸权。费舍尔还暗示，有一条连续线将这种疯狂的扩张主义野心与希特勒联系起来。

当时的德国历史学家仍然由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占主导地位——其中许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所有人是在捍卫德国反对“战争罪”指控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中没有人想把纳粹的过去仅仅描绘成可怕的反常现象。他们感到非常愤怒，既有曾经拒绝纳粹主义的真正的保守派人士，例如格哈德·里特尔，也有更年轻的、原则性不那么强的人，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曾亲自参与“反常”行为，并且还希望别人不会发现。一种类似于代际冲突的东西正在形成，年长者想要保

护并且发扬光大对德国历史的一种未受玷污的观点——这个历史排除了纳粹主义，而年轻人则对守旧者持谨慎的批评态度。

德国人在费舍尔的观点上的争斗蔓延到了美国。我们这一群人，包括耶鲁的哈乔·霍尔本、伯克利的汉斯·罗森伯格和布朗的克劳斯·爱泼斯坦在内，于1964年3月为他准备了一次演讲旅行，和往常一样，这类旅行由西德外交部的文化部门提供资助。但是在2月，外交部未加解释就取消了这次旅行。现在轮到我們义愤填膺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原本会更加愤怒——是里特尔写信给外交部长格哈特·施罗德（与后来的总理不是同一个人）的，警告他不要同意那次计划中的行程。“我们德国历史学家最担心的是，费舍尔先生可能会在外交部的间接赞助下在美国宣传他那种完全不成熟的论点。我毫不犹豫地将此视为国家的不幸。”

我们很快就采取了行动。我为费舍尔的出行争取到了一笔替代资金，我们还向《时代周报》发出了一封联名信，抗议外交部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官僚主义的傲慢、误解的国家原因和在对待国外反应上的自闭症（Instinktlosigkeit）不幸地混合在一起”。德国人试图让费舍尔保持沉默，这反而使我们在他到来后更加同情地去倾听他的观点。与此同时，在德国，他被公开指责为一个搞脏自己的家的人。德国人往往讨厌弄脏并清理自己的家。阴谋和含沙射影迅速超越了争论，很快我们就会在实践中仔细观察到反自由主义的行径了。费舍尔后来写信告诉我生活在“我的同事们的冷酷敌意”之中的感受，“我几乎从未经历过一个比我这群最亲密的同事更加卑鄙的社会”。我怀疑他试图掩饰他的蔑视，我认为他很喜欢夸大他的受迫害感。

那年夏天，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邀请我参加10月在柏林举行的三年一次的协会大会，接着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关于战争目标的小组讨论（这是用来指代费舍尔争议的一个代号），

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举行。我很快就为想象中的学术讨论做好了准备；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写下来的那样，会议改在自由大学的大礼堂进行，面对的是1000多名充满激情的观众，他们的嘘声和喝彩声给这个场合增添了更多戏剧性。

费舍尔最具活力和最杰出的敌人，包括里特尔在内，赢得了很高的分数，他们成功地攻击了费舍尔的“作案手法”，包括误导性使用证据。费舍尔和他的两名助手似乎处于防守状态，将细枝末节和恶言恶语混淆在一起。最后，两位在场的外国人说话了，索邦大学的雅克·德罗兹和I. 德罗兹，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和一位法国抵抗运动的杰出成员，对这场争议做出了审慎明智的基本上亲费舍尔的论述。我则强调了费舍尔的研究工作的新颖性，并暗示每一篇新的史学论文在第一次提交时，其表述都过于尖锐和过于片面。我引用了里特尔的话，他曾经在1914年7月写下了“一个接近于盲目无知的（德国人的）错误估计”这样一句话。我补充说：

这种长期的盲目，这种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估计，需要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德国帝国主义的风格显示出一种罕见的焦虑、傲慢以及——在评估非德意志世界时——政治上的无知和缺乏安全感的组合……也许费舍尔教授滥用了连续性论点，但是假定20世纪德国政策的所有错误估计和脱轨都是职业性事故，这样的反对意见是更加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是否存在这种可能：虽然一系列事故发生了，但不会去猜测整个企业可能出现了问题？

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表述，是的——但是我没想到迎接它的是学生雷鸣般的掌声。这群情激昂的场面改变了整个会议气氛，以至于费舍尔的对手在会议结束后都夸张地避免和我说话。

我大获全胜，《明镜周刊》（未经授权）发表了 my 演讲。我在德国一举成名并赢得了新朋友和新对手，这真是一次令人陶醉的经历。不久之后，我去拜访了牛津大学的莱昂尼尔·特里林，并告诉他

所发生的情况。他叹了口气，“在纽约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在1999年，当被问及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决定性时刻时，自由派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提到了他的“有关1964年历史学家会议的生动记忆……当时在‘战争罪责问题’上打响了一场解放战斗（Befreiungsschlacht）。弗里茨·费舍尔和格哈德·里特尔是对手，而弗里茨·斯特恩则是为弗里茨·费舍尔赢得胜利的人”。

费舍尔论战激烈地攻击了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有权势的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当埃德曼从贝特曼最亲密的知己库尔特·里兹勒的日记中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首次公开发表后，人们就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贝特曼和他的政策了。贝特曼和里兹勒有着一种奇怪的、亲密的关系：一位是1908年至1917年的德国总理；另一位是有才气的年轻学者、训练有素的古典学者、哲学家和道德家，娶了德国伟大的犹太画家马克斯·利伯曼的女儿。意识到里兹勒的日记还存在于世，历史学家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对此虎视眈眈，但是埃德曼声称拥有所有权，并且拒绝给别人全文阅读的机会。里兹勒后来带着他的日记离开了纳粹德国，前往纽约；最后我向里兹勒的女儿玛丽亚·怀特要一份副本，她给了我一份，并给了我引用它的许可。（埃德曼反对我的这个程序，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公开争吵。只是在他1990年去世后，我们才知道，他年轻时也曾为纳粹事业效劳。）在我当时正在写的关于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战争的一篇文章中我使用了这些材料，这篇文章是我为哈乔·霍尔本的纪念文集所写的。

性格忧郁的贝特曼是德国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但在战争期间，他越来越受到德国军队将领的困扰，里兹勒的日记中充满了对这些将领的愤怒：“这些身穿制服有权有势的无能之辈，他们盲目、野蛮地迷信武力……”在不知不觉中，贝特曼成了他所厌恶的武装力量的掩护者。在德国战败之后，他写了些自我检讨的回忆录，宽恕了在军队中

他的无法和解的敌人，特别是提尔皮茨，以及那些野蛮的兼并主义者。他的少言寡语尽管可以理解，但促成了他所谴责的激情的第二次且更糟糕的胜利。

不管怎样，我一直在致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研究课题。冲动和充满激情的兴趣让我自愿为埃利·阿莱维的《暴政时代》的新译本做介绍性的说明，其中包括杰出的历史学家罗德斯1929年关于战争的演讲。自我作为一名学生阅读了这些演讲稿以来，我一直认为它们是一种解释模式，比以前大多数建立在外交文件之上的解释战争复杂性的无效努力更有希望。阿莱维做得与众不同；他着手去研究“地震本身。我将试图阐明集体力量、集体感受和舆论运动，在20世纪初期，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冲突”。他分析了欧洲在战争和革命中达到高潮的压力和紧张，非常重要地认识到，对外和对内的政策是紧密相连的。我强调了我所认为的阿莱维的教学意图：强化公民道德。我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和革命不是由少数领导人或教派所造成的，而是由大量被动的公民造成的，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我很喜欢写有关阿莱维的文章，他自己也是宏伟的多卷本《英国人民史》的作者，我不仅尊重他的作品，也尊重他这个人：他是一个道德家，一个能使人想起托克维尔的美德的作家，还是雷蒙·阿隆的导师。）

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我全力以赴，用我的全部身心在写作，我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灾难又造成了随后的灾难，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则暗示着可怕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主题与越南悲剧的相关性使我感到震惊：“军事妄想，宣传的升级，战争对国内的影响……”然而我不认为我能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我的生活是怎样注入我的工作中去的，我的工作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想我根本就无法将激情置于职责之下（也就是说，仅仅抓住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不放）。我想过写一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史，甚至与迈克尔·霍

华德谈过好几次，这位军事历史学家是非常卓越的，我们相互鼓励对方写一本这样的书。他做到了，我却没能做到，但取而代之的是，在1965年，我给本科生开了一门关于战争的课程。这个班上有一名非常出色的学生，名叫杰伊·温特，他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奉献给了这一主题。战争和偶然事件的许多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如果两列火车没有离开它们的车站该怎么办？假使1914年6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待在外面没回去将会怎么样？再者，假如1917年3月列宁没有进入那趟开往圣彼得堡的德国火车那节密封的车厢又将会怎么样？很久以后，有一两次我告诉德国学生我改编的兰克的伟大格言，“多么不幸啊，它没有发生”。

很可能是费舍尔引起的骚动鼓励了其他德国人去促进历史政治问题的公开传播。1965年，纽伦堡的社会民主党文化委员赫尔曼·格拉泽组织了一系列公开对话中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Nürnberger Gespräche）。因为他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确信德国人还没有去面对他们的过去中的有害元素，虔诚的神话、伤感的德意志精神，正是这些元素为希特勒铺平了道路。他认为他的城市，考虑到它的过去，是举办这类讨论会的合适的地方。在为期四天的会议里，我们阅读并讨论了准备好的文章，然后聚在一起吃饭，并且交谈到深夜。

格拉泽的团队代表了广泛的知情人士，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聚集在一起是要去解决迄今为止被轻视或逃避的问题。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年轻的基民盟政治学家，他很快成了西德联邦议院的代表，他的名字叫伯恩哈德·沃格尔；还有一位专注的政治学家和教育改革家，名叫瓦尔德玛·贝森，他同达伦多夫一起正在康斯坦茨筹建一所新的改革大学。奥斯威辛审判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就“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德国人的好人’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发表了非常严厉的评论。来自主要政党的作家、记者和政治家参加了会议。我们之间看法各不相同，但一种改革派的、自由派的冲动占据了主导地

位。在德国作家中有一位对过去的不良行为特别敏锐的分析师，名叫汉斯·施韦特，他是亚琛大学著名教授，后来出任校长。几年前，一名记者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汉斯·施奈德，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密合作者！回想起来，我会说他也属于联邦共和国的一批有代表性的德国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联邦共和国逐渐发现阿登纳之后仍然具有生命。考虑再三，阿登纳于1963年提出辞职，路德维希·艾哈德这位共和国自由市场经济的友好支持者及经济奇迹公认的设计师当上了总理。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是个软弱、无趣的人，他与纳粹过去的关系使他特别脆弱。在好几年里，我都会参加纽伦堡学术讨论会，这样就能够得到德国政治的消息。在艾哈德的统治下，德国政治变得不那么稳定，并且非常显著的是，美国的越南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反美主义的残余在哪里都是永远存在的——在左翼这边，反对的是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好战分子的冷战以及我们的种族问题；在右翼这边，则对美国的“物质主义”、文化的缺乏以及习惯于在德国人面前对他们国家不光彩的过去指手画脚等持怀疑态度。

我与欧洲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加强。在1966年至1967年我的第二次年假期间，我接受了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的邀请，到那里度过这一年。可以与这么多朋友和重要的学者交谈，我怎么能拒绝这种诱惑呢？我期待着与詹姆斯·乔尔的见面，他是圣安东尼学院的副院长，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将最宽宏大量的气质与严谨的判断结合于一身。用欧洲的语言来说，他是一个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和进步社会政策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关系，直到他过早去世。

我的意图是高尚的：继续研究布莱希罗德。但是，正如我常常做的那样，我会让自己分心，这不是因为牛津大学里的一些乐事，而是

由于出乎意料的挑战。艾伦·布洛克——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始人兼大师，正在以一系列讲座的方式庆祝学院里一座新的礼堂落成，讲座主题为“19世纪的作家和艺术家”。他邀请我担任其中一次的主讲，同时还有以赛亚·伯林论述托尔斯泰和布洛克论述瓦格纳。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荣誉，用卡尔·克劳斯的话来说，这消息使我高兴得发抖。我建议将特奥多尔·冯塔纳作为我的讲座主题，我正在津津有味、如饥似渴地看他的小说，因为我在布莱希罗德身上的研究工作涉及他。布洛克不同意，他说牛津没有人听说过冯塔纳。所以我选择用尼采取代冯塔纳，至少提出我的见解，把尼采看作“文雅的”德国文化的非德国批评者和无与伦比的欧洲心理学家，而不是当时流行的观点，即把他看作“超人”的先知和“金发碧眼的野兽”，无疑会给我带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乐趣。

另一件事也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社会哲学家查尔斯·弗兰克尔，当时担任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希望请三位学者“去非正式地调查西欧新一代精英的态度以及……他们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他让我去西德进行为期两周的密集访谈，然后提交一份关于德国青年以及美国文化项目在联邦共和国所取得的成效的报告。我同意了，并且当面接受了弗兰克尔本人在巴黎的指示，他当时在那里担任美国派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然后，我前往德国开展了一次旋风之旅。此刻，那里正处于一个特别动荡的时节。

1966年11月，在路德维希·艾哈德政府解体后，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一个“大联盟”——终结了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支配地位，这也是社会党人第一次加入波恩政府。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出任总理，维利·勃兰特担任副总理。但是，无论基辛格有什么样的优点，他的过去都给他带来了瑕疵：1933年，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加入了纳粹党。在组成新政

府的谈判期间，君特·格拉斯写了两封公开信，一封是给维利·勃兰特的，警告他要反对这个联盟：“我们国家的年轻人肯定会背弃这个国家及其宪法：一旦这个卑鄙的联合确定之后，它就会在误导之下偏向左翼或右翼。”如果必须要有一个大联盟的话，那么至少不能处于基辛格领导之下，格拉斯的第二封信就是直接写给他的：“如果你——当时的一个追随者（Mitläufer）——敢于决定今天的政治指导方针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纪念被折磨和被杀害的抵抗战士、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的死者呢？”格拉斯是一个自我认定的无所畏惧的国家的良心——当我们在判断他后来的政治时，这一点是需要记住的，他后期的政治与不负责任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的。西德的年轻人确实进一步向右靠拢或进一步向左靠拢，尤其是后者，而新的纳粹党——国家民主党（NPD），继续在各州和地方选举中获益。确实，议会中首次没有了有力的反对派，但是大联盟让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层面上“受到尊重”，作为外交部长的维利·勃兰特向西德版的缓和迈出了第一步——东方政策（Ostpolitik）。

我发现，西德人对美国的自发认同现在已经淡化了，可是在肯尼迪遇刺时是那么的明显。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内部的交流计划，特别是慷慨的法德青年交流计划变得越发重要，尽管作为阿登纳时代标志的对欧洲的巨大激情也已经告终。年轻的西德人很快就抓住了美国理想与美国现实之间的差异，指出我们的种族问题和持续的贫困。越南战争是最普遍的攻击目标。左派谴责它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右翼则将其看作美国优柔寡断地追求其自身目标的一个例子。我向弗兰克尔报告说，英国文化协会和法国研究所管理的项目比美国的项目获得的评价更高，这是因为它们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一位英国官员对我说：“你们似乎确实在填鸭似的往他们的喉咙里灌输宣传。”我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坦率和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坦诚地讨论战争，承认在国内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建议，为美国学者推荐德国大学的教授职位，希望他们能帮助纠正德国人对美国的普遍无知。

我也给弗兰克尔提出了一些私人的、批评性的评论意见，他很赞赏“一针见血的和实用的批评意见”，并且希望立即将我的一些建议付诸实践。但是，他补充道：“桑塔亚那曾经把一个狂热分子定义为一个忘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又重新加倍付出努力的人。恐怕他并不知道。他也是在描述我们非常认真的官僚机构，而且在它处于最有效状态时。”我怀疑我的努力能否起到一些作用，但我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有一天，在牛津大学，一位名叫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的德国同事寄来一张诱人的明信片，让我尽快赶到科隆；他写道，他有布萊希罗德的重要信息。作为生活在仍然是专制的环境中的一个激烈的自由派历史学家，韦勒尔注定成为他这一代人中最高产的历史学家。他告诉我，在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俾斯麦庄园，一包包布萊希罗德的信件和账簿被存放在马厩上方的阁楼里。他补充说，王子永远不会允许我看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宝藏，所以要想得到它的话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勾引那位秘书，要么在夜晚的掩护下，按照他为我画的地图，用梯子爬过栅栏再进入阁楼。这两种办法我都不相信，这是在为克里俄（繆斯）服务中遇到的不寻常的考验，我请求联邦议院中俾斯麦党的一个同事伯恩哈德·沃格尔代我干预此事。

奥托王子在弗里德里希斯鲁接待了我，他为我因此事通过一个中间人来找他而感到困惑，毕竟我总是受到欢迎的。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唉，他补充说，档案中没什么东西值得我去找的，但是我可以随意去看看。我问他如果“没什么东西”结果变成了有什么东西的话，我是否可以把它带回我的酒店去阅读。他勉强同意了，然后指示他最可亲可爱的秘书带我去马厩。令她惊讶的是，我立刻就找到了包

裹，她就嘱咐用王子的车把我送回酒店。我花了一夜时间用录音机录下了我的口述。第二天早上，王子打来电话，要求知道我找到了什么。考虑到他最不想听到的事情是我找到了布莱希罗德为“铁血首相”所做交易的完整财务记录，于是我就说了实话，我对布莱希罗德的私人信件特别感兴趣，这些信件往往涉及政治问题。“你的意思是布莱希罗德给我的祖父提建议？”他带着怀疑惊呼道，要求我必须马上回去见他。我表示反对，说我不想打扰他，并含糊地表明我自己的时间也受到限制；最终他让步了，因为他第二天要去西班牙。然后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把一些材料拍摄成微缩胶卷。他没有拒绝，所以我掌握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我的那本关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就是这样来的。对我们来说，需要归功于偶然的见面和朋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10\]](#)

牛津大学的那年晚春全被来自中东的消息占据了，我记得在学院里那些关于以色列的情绪激动、偶尔有些怨恨的讨论，以色列的安全似乎越来越受到战争的威胁。5月，埃及总统纳赛尔要求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西奈半岛（维和部队当时在那里），并威胁要关闭蒂朗海峡，禁止以色列船舶通过。埃及与叙利亚结盟，并希望把不幸的约旦也争取过去。危机在升级，有报道说埃及部队在西奈集结，同时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政府或公开或秘密地在做准备以防止战争。以色列鹰派看到了危险，也看到了机遇。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在几个小时内就消灭了埃及的空军。很明显，整个欧洲对被视作弱者的以色列抱有同情之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因不确定而处于焦虑之中，接着迎来了令人震惊的结局。首先听到的是一位BBC记者的报道，“一战即胜”，以色列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据报道，作为一种额外的人情味，温斯顿·丘吉尔，英国首相的孙子，在以色列的阵地上方飞过，晃动机翼向他们致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获悉大卫击败了阿拉伯军队的歌利亚[\[11\]](#)，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并对以色列掌握的战略和战术感到惊讶和敬畏。在那一刻，美国人说，没有

什么能比成功更加成功了，当以色列的鲜花绽放时，也意味着西方在圣经的土壤上获得了胜利——即使真正的和平仍然遥远，人们对以色列将如何处置在西岸和西奈夺取的阵地感到不安。

西方似乎对以色列的胜利感到兴奋不已；但我认为，在德国人眼里，犹太人最不该去打胜仗。他们的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仅次于美国，而东德政权则抨击波恩勾勾搭搭，在被他们称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中狼狈为奸。事实证明，德国的右派比极端左派更加亲以色列，那些极端左派人士越来越同情巴勒斯坦人，而对以色列成为殖民大国则越来越感到沮丧。

1967年仲夏我回到美国时，很吃惊地看到两个看似截然不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态发展过程——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以及遍及西方世界日益严重的学生骚乱，这预示着危险。总体上，我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生活，完全凭着早些时候所产生的冲动行事。换句话说，我在以并不习惯的稳健来应对某些危机。也许在我的脑海里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想法和狂热的非理性驱动的运动；我怀疑我是否真的回忆起了我早已评论过的关于“从理想主义到虚无主义”的沦落。但是欧洲的灾难是如此深刻地嵌入我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这是我没有意识到的，而且并不总是有利的。亨利·罗伯茨曾对我说：“你身上的警钟响得很早。”也许我确实有类似于“灾难幻觉”这样的东西，出于交替着的短期的优势和长期的痛苦。

回家也意味着与罗伯茨和霍夫斯塔特等家庭恢复原先密切的联系，这些友谊涉及我们这些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亨利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的负责人，肩负着繁重的职责，这个研究所是我们所有地区性研究所中的瑰宝。他继续将学问、公共事务和充满家庭、朋友和诗意冥想的私人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在我返回的那一刻，

霍夫斯塔特的新书面世了，书名是《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他在其中警告不要假定“偏执风格”就是美国的特点：“现代历史中的一个案例可以说明，这种偏执风格的圆满胜利并非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德国。”迪克和我都对20世纪60年代最显著的非理性的爆发怀有历史和政治上的兴趣。

在1967年这一学年结束时，亨利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卸下了在那里承受的巨大负担，和他的家人一起迁往他们在佛蒙特州的新居，并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书。这是一个损失，其中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佩吉和我在佛蒙特州继承了一块古老的巴塞特家族的宅基地，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候，罗伯茨夫妇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我的父母每年夏天也都会来罗切斯特，并且觉得这里就是“家”，就像我父亲去世时我所想起的那样。这块地方视野很好，能看到青山山脉的美景，亨利根据当地特色将其称为“原始山脉”，因为每个外来游客都认为此地的景色使他们回想起了自己过去体验的某种田园风光。至少，如果我在哥伦比亚失去了作为同事的亨利，我知道我还会在佛蒙特州继续享受与罗伯茨夫妇做伴的乐趣。

1965年，在去牛津大学之前，我对美国政治的激进化感到震惊，于是设法寻找加入关于越南战争的辩论的方式，以便有效地表达我对学生动乱的担忧，如果被忽视，骚乱就可能升级为严重的麻烦。1964年林登·约翰逊对鹰派巴里·戈德华特的压倒性胜利可以令人放心，但很快就变得很明显，由于越南战争，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可能因遭到恶意忽视而告终。在1964年8月东京湾决议[\[12\]](#)通过之后，随着美国稳步深入地卷入战争，我对约翰逊的坦率和政策的怀疑也在逐步增加。对一些人来说，战争对于继续遏制共产主义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共产主义将蔓延至整个东南亚，这便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对其他人来说，美国的参与是对腐败的南越政府的危险承诺，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与中国发

生战争。而对我来说，美国的政策似乎是愚蠢地升级战争的一场噩梦，它能使人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规模较小的大屠杀，因为“再发动一次攻势”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于是士兵们就被派往前线送死。战争所需的人力和政治代价在国内使我们意见不一，也疏远了我们与国外盟友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消极被动或私下悲伤的时候，我认为“温和派”需要采取行动。（几十年后，我开始对一群德国爱国者感兴趣，他们在1916年悄悄地关注军国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结果发现自己不仅被超级爱国者而且被和平主义者疏远了。他们中有杰出的神学家、哲学家恩斯特·特罗尔奇，他对“温和派”的命运深表不满。）

1966年2月，我去拜访了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他是美国卷入越南政策的最负责任的批评者，刚刚主持了参议院关于战争的听证会；我想组织一个学术团体做出反对战争的公开呼吁，他鼓励了我的这一想法。在同一天——为寻求另一种意见，我又拜访了哥伦比亚学院前任院长，现在任职于华盛顿原子能委员会的约翰·帕弗瑞。帕弗瑞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智力非凡，思维独特，还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爱国者。我告诉他我心中的想法，难道他不认为战争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吗？“见鬼，是的，”他回答道，“我们可以在西班牙丢一枚氢弹，但是由于战争，我们却无法让白宫的任何人对此感兴趣。”（几个星期前，携带了四枚氢弹的一架B-52轰炸机在西班牙坠毁；四枚炸弹中，有三枚坠落在帕洛马尔村子附近，第四枚沉没在海岸附近的海水里——直到4月初才被发现。）在得到双重鼓励后，我返身回家。但在机场，我无意中碰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政治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我在斯坦福大学时就和他认识了。他问我来华盛顿干什么，我告诉了他我对战争的疑虑。他突然脱口而出：“但越南是我们有史以来所有的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他希望我去他那里，亲眼看看他的同事们正在从事的那些伟大的社会工程项目。我明白社会科学家确实对越南各种各样的“土地改革”想法充满热情，但是，在越来

越浓重的恐怖面前那种麻木不仁的冷漠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心里更加坚定了应该去做些什么。

我写信给十二位同事，我推测他们会同我一样“对战争感到不安”，就请他们参加我组织的一次会议。我认为集体的努力会更有效，而且我们发现，合作能提升我们的精神。作为迄今为止对战争几乎或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的公民，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一下为辩论做出点贡献。我缺乏专业知识，但是“作为一名欧洲历史学家，我知道温和派的被动性可能是有害的”，我解释道。这个群体——包括霍夫斯塔特、威廉·洛克滕堡、亨利·罗伯茨、大卫·杜鲁门、亚历山大·达林和丹尼尔·贝尔在内——在那个月晚些时候见了面。（伊西多·伊萨克·拉比寄来了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很愿意参加未来的会议，假如有可能的话。你们关心的正是我和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政府内外人士所关心的。”）

首先，我们计划发表一份公开声明，但随后我们决定写一封给约翰逊总统的私信，我们知道他对公开的质问会愤怒地不予理睬。我们在这封信的内容和格式上反复斟酌，费了不少功夫。霍夫斯塔特写信给我说：“……整件事情应该被置于一个普适的框架之内，强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政府管理工作上的困难……并且用一句话将签名者与那些把自己等同于越共的人分开来。”5月，我们把信寄了出去，信中署名者又增加了罗伯特·默顿和沃尔夫冈·弗里德曼，后者曾是一位德国难民，现在是国际法教授。我们这封长达五页的信件提出了战争时期最困难的事情：“重新审视行动方案。”美国开始时有严格限制的目标，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危险的政策，我们的承诺似乎是无限的，我们的立场是孤立的，我们的动机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我们担心“这场战争对美国人心灵的影响”，并表明对越南的旷日持久的承诺肯定会让人感到沮丧，“这将不仅危害我们的自由，还会鼓励那些反对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反对承诺“在全

世界各个角落为消灭敌对意识形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信中还提出了九项具体建议：不要在海防港布雷；不要继续在亚洲增加美国作战部队；不要加剧空战，而是表示愿意与越共谈判；为忠于我们的越南人提供庇护；制订经济援助亚洲的计划；等等。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会是建立学者与政府之间联系的第一步。

但是军事升级还在继续，随之而来的还有夸张的言论。那些为我们不断强化的干预政策辩护的人经常援引“慕尼黑”的例子，并将战争的反对者贴上绥靖主义者的标签。6月，我写信给《纽约时报》，指出“这种类比……是非常不恰当的，而且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已经相信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担忧的”。1938年，希特勒的德国，尽管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有着扩张主义和毫无顾忌地违反国际法和人类尊严的记录，仍然向苏台德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这块土地是自由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战略意义的组成部分；同意希特勒的要求，就像在慕尼黑所做的那样，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但是越南与之前的情况毫无相似之处。可叹的是，美国的“鹰派”仍然想要唤起人们对欧洲经历过的苦难时刻的痛苦回忆，目的是证明他们危险或鲁莽的政策是正当的。

6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回复——篇幅相当！——出自约翰逊总统本人。他基本上重申了他自己的立场：美国必须支持南越的努力，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受北越干涉。他说，他已经做了一些我们所敦促做的事情，并且建议我们要保持“耐心和宽容”。他赞赏我们在尊重隐私上做出的努力：“能听到绅士们的意见总是件好事。”但是他没有给出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如果你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存在问题，那我只能建议你们等到下一轮了。”

这正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8月初，我们中的七人又联名给约翰逊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他的回复，如随后对河内和海防的油

库进行轰炸，表明了危险的战争升级政策。“我们谴责这样的政策已经造成的可预测的结果：我们的承诺仍然是无限的，我们的立场变得更加孤立，我们的动机甚至遭到了比以前更加广泛的抨击。”至少我们有案可稽，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抗议形式。

我一直在观察发生在美国国内和联邦共和国国内的学生运动，在这两个国家中，一种新的情绪正在浮出水面：安静的或持怀疑态度的那一代人已经如明日黄花，而新一代学生则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其中一些人针对所有权威做出了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西德学生们发现了他们的大学曾经是如何的纳粹化，老一辈人曾经是如何的喜欢否认真相，被扭曲的过去使他们充满了愤怒和怀疑。在美国，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一种不那么新颖的批评与一种简单的把所有政治罪恶归于法西斯主义的公式混在一起。越南战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证明——激起了学生的抗议活动，这种在世界各地不断爆发的抗议活动还有其直接的目标。例如，在柏林，右翼新闻界巨头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被选中成为敌人；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要求“能听到任何人在校园任何开放区域在任何时间就任何话题所做的演讲”。

这两座城市成了激进的学生与他们眼中腐败的当权派做斗争的主战场。就所有地方差异而言，这两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最初在柏林的场景更加暴力。1967年6月，在柏林的一次示威游行中，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神学生，名叫本诺·欧内索格。冲突从大街转向校园，再从校园转向大街：学生们在校园里使用了强制战术；大街上的警察集结了不同的力量。自由大学的反叛学生们的“大师们”（包括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前同事雅各布·陶伯斯和赫伯特·马尔库塞）向学生大规模集会发表了演讲，鼓励学生抵制已经在道德上破产了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将所有错误的东西糅合在现代世界里的就是美国。马

尔库塞这个名不副实的“镇压性宽容”的曝光者，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个为他提供了安全避风港的国家偏狭的侵略性而感到不安。

1965年，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学院院长优秀政治学家大卫·杜鲁门邀请我向即将到校的学生做一次传统的开学演讲。我和他们谈到了当前骚乱的背景，并总结了他们出生之前的各种灾难，我称之为从1914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恐怖链，甚至比第一次三十年战争更可怕，其登峰造极之处在于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我告诉他们，过去应该让他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我们文明的永久性以及不稳定性，更好地了解你自己的不满意和不满足，更好地实现你自己的历史角色和责任”。我能理解，他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代学生有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新的爆炸性的急躁情绪，因为前几代人未能“提出关于人的尊严，现代生活中美的可能性，将现代生活转变为美好生活等根本性的问题”。由此他们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挑战惯例，但要有宽容。我非常刻意地回忆起“像罗莎·卢森堡那样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在就义前几周大声疾呼，‘自由永远是与你意见不同者的自由’”，并以此来结束我的演讲。我试图吸引他们中间潜在的激进分子，并让他们的年长者们做好准备去应对我所期待的一场严肃的对抗，其中文明和自由的原则和实践将要经受检验。

从牛津回来后，我重新召集了我们原先的越南团队。由于私下与总统接触的方法现在已经徒劳无益，我建议我们准备一本关于越南战争的人力成本和政治成本的小册子——以乔治·萧伯纳的《知识女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为样本（我在思考1914年之前英国费边社的效能），这份文件将简要地陈诉为什么战争损害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为什么政府应该寻求通过谈判得来的和平，首先是立即停止轰炸。我们的希望是这样合理的声明可以引起已经厌倦战争的人们的注意，并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实情。在1968年初，我说服了一家

主要的出版商来出版我们的小册子，他们预计最初的印刷量会达到10万本。

与此同时，我们的校园与其他大学一样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1967年春天，格雷森·柯克请我当学院的院长，接替大卫·杜鲁门，他在一次总体改组中被任命为教务长。我受到了诱惑，因为我对哥伦比亚有一种责任感，但是我还未完成的书让我犹豫不决，最后我还是谢绝了。然而，我警告柯克，不断升级的学生抗议活动是一个关键问题。柯克感到困惑，也许他甚至松了一口气，某个有如此扭曲的兴趣的人将不会加入他认为是一所宁静大学的内部委员会了。

我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杰拉尔德·弗罗因德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为周末在基金会田园诗般的中心举行的会议得到一些关于西方历史写作危机的忠告，这个中心的所在地是科莫湖畔普林尼的隐居处塞尔贝罗尼别墅。我告诉他，我并没有看到这场危机，但国际上的学生骚乱是“一种严重的、普遍的、迄今为止解释过于狭隘的现象”，值得紧急关注。他的回答像柯克一样，完全不相信。强权者的自鸣得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反感的，但在暴风雨来临时它预示着灾难。在这种时候需要的是意识和改革；相反，大多数管理人员会坚持旧的惯例和傲慢的冷漠。

有些学生和老师对大学与“军工联合体”同流合污感到愤怒，对越南战争本身也是如此。1968年2月，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给柯克写了一封信，指出中央情报局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有关机密研究的长期联系，这种机密研究最近才被揭露，并“引起了最深切的关注……在同事们之间……在其他国家内部”。由于这损害了我们的工作和效率，“我们恭敬地要求你切断目前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不必费太大的力气就能够意识到美国的校园对“照常营业”越来越不耐烦了。

3月29日，在进行了大量工作之后，我分发了关于越南的小册子的第二稿。两天后，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我们兴高采烈，我就“我们的瞬间淘汰”向我们这支团队表示了祝贺。我们决定对文本加以修改而不是放弃，因为离出版商的截止日期没几天了。

但随后哥伦比亚大学陷入了危机。4月4日，小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令全国上下感到震惊和悲痛。牧师约翰·坎农于4月9日在教堂组织了一次追思会，柯克和杜鲁门都出席了，哈莱姆区圣菲利普教堂的牧师在追思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说。正当杜鲁门讲话的时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SDS）当地分会的负责人马克·拉德冲上讲台，抓住麦克风，谴责这个庄重的仪式是“淫秽的行为，因为大学里种族主义盛行”。在仪式结束时，坎农坚持说，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无论人们怎么想，在他的这座教堂里，任何希望“以真理的精神”说话的人都会随时欢迎。他对拉德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事实上，他所说的似乎不仅宽恕了拉德的行为，还鼓励了同样的行为。对此我很震惊。大学的半官方校史回忆道，我赶上了正在离开的拉德并告诉他，他在教堂里的所作所为类似于纳粹在魏玛德国时期强行控制社会主义者会议的行径。坎农的行为让我更加感到不安，我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警告，大多数煽动者，包括希特勒在内，总是声称并且可能相信他们是在“以真理的精神”说话。我没有得到答复。我认为，这种提前的纵容只会让学生更加胆大妄为：少数激进的学生已经认为大学是无限制地“可推动的”，他们决心要让大学屈服。

我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有其特殊的缺陷和弱点，部分是由我们处于哈莱姆区边缘的位置决定的。在当时我们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部分选举出来的机构大学理事会里，我警告大学不要继续实施在莫宁赛德公园中建造体育馆的计划，这似乎是对公共空间的私人侵犯，并且体育馆的建造也是对我们哈莱姆区周围邻居的有意冒犯。但校董事会的董事们坚持要建，我开始担心，他们以及一些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特权

世界里的学校管理者，对他们周围的变化完全视而不见。体育馆计划一宣布，就严重激怒了黑人学生，并给了受到拉德挑唆的激进白人学生一个抗议的焦点。

当我在欧洲参加纽伦堡学术讨论会时，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骚乱。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弗雷德打电话告诉我，说学生们已经占据了大学的主楼。我马上飞回来了。校园一半成了嘉年华，一半成了战场——那些忙着去占据其他大楼的学生，身穿奇装异服，满口暴力和淫秽的语言，而反对抗议者也团结了起来。这些激进分子组织得很好，用列宁主义者的话来说，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种时刻还最适合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真的以为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弟兄们一起成了革命的先锋，毕竟学生的暴力抗议活动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巴黎和柏林正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哥伦比亚成了吸引年轻激进分子的一块磁铁，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不断有新的建筑物被占用，连校长办公室也被占用了。有些学生领导人希望联合哈莱姆社区，请他们也加入抗议活动。学生们的暴力所激发的热情和他们的破坏能力使我震惊，那些凭借“理想主义”意图就似乎要赦免暴力手段的同事们更让我目瞪口呆。

此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处于混乱状态之中，其正常生活完全中断了。课堂教学被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会议，到处充斥着还将发生更大的暴力的可怕谣言。人们不论白天或黑夜，整天和朋友们挤在一起。我与迪克·霍夫斯塔特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因为我们的担忧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担心我们的大学执意要走上一条冲突和自我毁灭的道路。本身意见也不一致的学校当局必须要尽可能和平地结束占领，动用警察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有个教师委员会试图进行调解，其中一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认为，大学的守护者——无论他们如何被误导——与占领建筑物的学生们之间存在一种道德上的对等关系。我被要求加入那个团体，但几天之后就被排除在外，因为我被认

为不是亲学生的。学生领袖们坚持他们的要求，以“大赦”作为他们（任性）的先决条件，并且要终结禁止在大学建筑物内示威的禁令。我相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希望最终与警察发生对抗，这将会激怒整个校园。

在经历了几天的混乱以及教师的调解宣告失败之后，校方不仅受到董事们的逼迫，还有来自其他大学的压力，他们担心如果哥伦比亚大学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也意识到巨大的负面宣传——如果要求纽约市警察在校园清场的话。（警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利用警察来对付我们的学生，这种想法是对传统的严重侵害，尽管到那时我们还不愿意接受来自外部并加入学生之中的“革命分子”。4月30日凌晨，警察清理了所有五座大楼并逮捕了占领者；紧接着，警察失去对一群旁观者的控制，随后发生了更多的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大约有700人被捕，14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受伤（伤势最严重的是一名警察）。激进的学生领袖当然希望被“逮捕”；他们认为，在这种混战中，警方会从他们反动的敌人的脸上撕下“自由主义的面具”。要革命就会有“烈士”。“警察暴行”会给激进分子带来巨大的宣传效果，并为他们赢得新的支持者。

有些教授现在公开站在学生们一边，梦想着这是一道新时代的曙光，或许还感觉到青春的一阵冲动，就像在“天堂”一般。我还发现那些“领奖学金的革命者”毫无吸引力，这个名称是我用来专指研究生中的反叛者的，支持他们的教师则更难以理解。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空虚在折磨着这些享有终身职位的教师，究竟有什么样的不满和愤怒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翻腾起伏。

到了上午，校园里已是一派劫后惨相，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呼吁罢课，发誓要让大学陷入停顿状态。有人召开了一次教师会议，手头要处理的唯一业务就是来自之前那个教师团体的一项动议，呼吁所

有教师加入罢课。有1000多名教师挤进麦克米兰大礼堂，去提供或听取有关警察暴力行为的目击者报告。大多数对当局感到愤怒的教授赞成罢课的提议，也有一些人不同意。我站出来反对这项动议，说我谴责校园里的暴力事件，但是之前就看到过“理想主义”的学生成功地破坏了大学的秩序。纳粹学生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就已经在德国的大学里干过这样的事。（其他一些像我这样有过欧洲经历的来自别的大学的教授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比如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隆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马丁·史瓦西。）教师们不应该支持在校园里胁迫他人的少数学生，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的革命目的能证明他们的手段正当一样。我的话结束后，暂时休会；复会后，支持罢课的动议被撤回了。[\[13\]](#)

那时，我正在给一个本科生班上20世纪欧洲史这门课程，班上有100多名学生。在第一天课堂上，我谈到了研究近现代历史的潜在风险和优势。优势包括图片的可用性，例如，当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在执导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时，他正坐在真实的俄国皇家宝座上抽烟，这样的一张照片就抓住了革命解放的轻率性。5月，《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听了我那门课程的一个名叫大卫·夏皮罗的学生照片，照片上他坐在柯克的椅子上，摆着与爱森斯坦一样挑衅的姿态，抽着柯克的雪茄。这就是象征性政治！在任何情况下，我与大多数学生的关系很好，我能理解那些政治上和道德上参与其中的人的愤怒或困惑，以及那些反对让少数人破坏他们的学业的人的苦恼。我的鄙视是留给某些同事的，我担心，他们几乎是在迎合学生。

当罢课组织者禁止学生去教室，要求教师在校外与学生见面时，我仍然在平时上课的教室里继续上课，也许只有一半的学生露了面。有一群学生在外边等，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想来上课，我不能离开校园吗？我提议由我在校外把我上的课再重复一遍，但学生们既不想强加给我双重工作量，也不想破坏罢课。我又提议在每个班级宣布，来上

我的课并不构成破坏罢课，这种虚假的做法在一段时间内还起到了作用，但使我的更“进步”的同事们感到烦恼。

这些日子特别艰难。令我非常感激的是，我记得与哲学家西德尼·摩根贝沙的一次偶然相遇，他是站在我的“对立面”的，但他问我：“弗里茨，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生气？”（那些似乎在心理上与激进的学生捆绑在一起的同事们确实惹恼了我。）我把摩根贝沙的话记在心里，将其看作一种友好的对理性的恳求——而且总的来说，虽然同事关系会暂时破裂，但文明不久就会恢复。我看到有些人在两边讨好，既不希望危害大学，也不想抛弃他们的学生。特里林在学期结束时对我说：“我每隔一天会更加同意你的看法。”

校园继续像受到武装保护的嘉年华一样，骚乱也还没有完全消失。5月2日，我看到了艾伦·金斯伯格，在母校发生危机的时刻他回来给一个学生集会发表演说，他用一句“柯克可能得走了”来结束演讲。这句话很可能暗示了金斯伯格仁慈的不确定性，这与流行的教条主义者不同。后来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吟唱起他的印度教圣歌，然后和我一起走回附近的我的公寓，他的手臂友善地搭在我的肩膀上。这个景象可能使那些认为我的反动或不合时宜已经无可救药的学生和同事感到困惑。

我们的越南项目也成了校园革命的牺牲品。曾经那么和谐共处的学者们，现在却拒绝在同一文本上签名；曾经在越南问题上那么慷慨激昂地表达相同的观点，现在却在校园问题上同样慷慨激昂地相互争执，这个群体就此解体了。这是自由主义立场不稳定的又一个迹象，很容易成为激进派和反动派的一个共同目标，最终陷在反应迟钝的权威和不负责的反叛之间难以自拔。

我很快聚集了另一群教师，有点类似于在越南问题上的那个小组，只是在思想上更加保守一些。哥伦比亚大学将进行“改组”，并

且必须要说服董事们和保守的校友们相信改革迫在眉睫；另外，必须要告诫教师们不要屈从于学生在权力上的过度要求。有利于学生参与大学决策的口号是“参与式民主”，我预计这种口号将以“参与式无聊”告终。（在这一点上我并非全错。）我们这个群体基本上要求的是责任与和平，因此当一位朋友将我们称为“斯特恩帮派”时，听起来就很有讽刺意味，好像我们是以色列国诞生之前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个犹太恐怖组织。

哥伦比亚大学步履蹒跚地走到了学期结束，中途偶尔也有几次中断。5月21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的学生第二次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那天晚上警察再次被叫到校园里去。我和大卫·杜鲁门一起在他位于洛氏图书馆的教务长办公室里度过了一夜，我不希望他独自在那里；在某一时刻，当砖块从窗外被人扔进来时，我们俩一起蜷缩在桌子底下；玻璃破碎的声音令人十分恐惧。在执行第二次“逮捕”时，警察表现得非常谨慎；不管怎样，大多数学生反对的是他们所认为的自我放纵的、白费力气的努力。明智的忠告在霍夫斯塔特身上起了作用，由他出面来做了当年的毕业演讲，这在传统上是大学校长的特权。（在表达当时困扰着某些人的恐惧时，黛安娜·特里林警告我，因为鼓励霍夫斯塔特发表演讲，我使我的朋友陷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的生命将受到威胁。）他发表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演讲，他的特有的风度象征着他平静的口才：教师就是大学，是我们的文明必不可少的一个自由的机构。

到目前为止，即使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学生们的不满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先是征求了我的意见，然后指定由我安排一次在这个主题上的最佳人选的集会，以便在随后的秋天去塞尔贝罗尼别墅参加一次会议。我说，学生们的焦虑产生于对大学治理的正当的抱怨，并且正在对一种新的激进思想做出回应；大学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一个替代，它的开放性和脆弱性使其成为理想的目标。我接

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任务，争取到了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院院长，同为历史学家的富兰克林·福特作为协办方，并请艾伦·布洛克和拉尔夫·达伦多夫担任欧洲顾问。聚会可以促进我们相互学习。^[14]我们这个群体将在1968年的感恩节见面，其中包括来自耶鲁大学的金曼·布鲁斯特和芝加哥大学的汉娜·格雷（几年后布鲁斯特写信给我，感谢我“在塞尔贝罗尼为他做的介绍！”那时，汉娜已是耶鲁大学的教务长）、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和肯尼斯·凯尼斯通，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杰·海恩斯等人。我强调了学生骚乱分散的背景以及只有多种原因的融合才能造成如此有力和普遍的爆发这个事实。三天来，我们从许多不同的立场出发进行了争论。我认为，我们讨论时的性情反映了伯克式的格言：保存和改革。

但是在1968年灾难性的夏天里，保存和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他极有希望的总统竞选活动中遇刺，发生在南方和北方的种族骚乱，不断增长的暴力，民主党大会期间发生在芝加哥的血腥冲突——所有这一切令人心碎。而来自欧洲的消息则更加糟糕：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发起了一项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计划，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1956年匈牙利争取自由的一个新的和更谨慎的版本，然而在8月这项改革运动就遭到扼杀。勃列日涅夫宣称苏联有权干涉其社会主义原则受到威胁的国家。（至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还存在不同意见，意大利共产党谴责了这种侵略行为。）

在我看来，个人的忧伤更加剧了公众的悲观情绪。就在那段时间，我接连失去了两位亲密的朋友——哈乔·霍尔本和鲁道夫·尼森，他俩是慈父般的导师，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待我如养子。还有迪克·霍夫斯塔特，在面对哥伦比亚大学日益严重的麻烦时，我同他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甚至在他被诊断为患有致命的白血病之前。在他住院的最后两周，我每天都和他在一起；

他于1970年去世。每一项损失都会缩减一个人的生命，并以某种方式加倍增加一个人的责任。在生命结束前，霍夫斯塔特一直在研究美国暴力史。他的研究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中：“这个国家似乎在无精打采地向着不确定的未来走去，就像某种巨大的口齿不清的野兽一样，过多的伤痛和疾病使其辉煌不再，但依然足够强壮和拥有丰富的资源，不至于被轻易地压垮。”

1969年3月，考虑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遭遇的持续麻烦，我们这个“斯特恩帮派”起草了一份声明，题为《大学是学术自由的神圣殿堂》，声明坚决主张，虽然改革是必要的，但武力与改革的实现背道而驰。我们在校园里收集了800个签名，签名者代表了广泛的意见；这份声明以整版广告的形式发布在《纽约时报》上。在声明登出后几天里，有个学生警告我，我已经被挑出来了，作为一个打击目标，他还恳请我把我办公室里的有价值的文件清理走。其他人则受到了更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的校园正在经历某种欧洲程度上的暴力。世界各地的激进学生在互相学习，不是通过某种秘密阴谋，而是通过简单的传染或模仿。我写信给伯恩哈德·沃格尔：“哥伦比亚的学生必须向窗户和警察投掷砖块，以此表明他们的革命性丝毫不亚于他们在巴黎和柏林的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我甚至片刻都不愿意离开校园，但那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派我到各个校友团体去，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作为对我的国内服务的奖励，到欧洲甚至到伊斯坦布尔去，给校友们解释去年春天发生的事情，并且让减少了几分忠诚的校友相信，他们的母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和更值得得到帮助。此外，还必须要去说服愤怒的保守派，学生运动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左派阴谋。我从每次旅行中都学到了一些东西。我的朋友雅克·德罗兹最初是支持抗议学生的，后来却被左派分子赶出了巴黎大学的樊尚校园；他认为革命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革命正在吞噬自己的保护者。艾伦·布洛克

是一个理性和韧性的典范，他说这是他人生的第三场战争：第一场是对纳粹；第二场是在冷战中对抗共产党人；而这第三场，发生在校园内，是“最阴险的，因为它是一场内战”。

在联邦共和国，恐怖故事比比皆是：在大多数大学里，恐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他们针对校园对手的受过训练的行动中，激进分子叫嚣着原先法西斯的威胁：“我们将毁了你。”恐怖行动以常规方式在升级，破坏和占领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下流的人身攻击，最后也是最令人厌恶的——直接威胁教职工的孩子们。君特·格拉斯根本算不上是权威人士，他眼中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是可笑的；他认为，激进的学生是腐败的，很容易被拉拢。但当然，自由主义者是每个人最喜欢的目标，他们被看成介于左翼、强制性乌托邦主义者和右翼偏执之间。当德国学生攻击改革派对手为“Scheissliberale”（狗屁自由主义者）时，我把他们看作一长串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诽谤者中的一分子；我对他们就像他们对我这样的人一样，毫无同理之心。

在一篇名为《国际学生运动》的文章中，我提出了我视为国际叛乱的一些共同来源，尽管我也认识到形成个别突发事件的民族问题和传统，必须对此做出区别。我回顾了1962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在休伦港创立时其成立声明中提出的人道理想，声明还呼吁采取新的激进民主形式。我注意到非常勉强地表达出来的对资产阶级生活、对无聊、对传统惯例、对“一百种郊区生活方式，有两辆车但没有人生意义，还有作为额外负担的道德伪善”等的愤怒。这些批评值得同情与关注，即使这些年轻人给出的答案是天真的，他们的策略是自我毁灭的。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理想和希望常常被激进言论的残忍无情和强制手段的不断升级掩盖。但他们的长者既不理解他们的不满，也没有对他们的补救措施提出告诫，他们也是应受谴责的。“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这类口号标志着代际冲突，这是德国人生活中的一个

古老的主题。“在希腊、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们英勇的抵抗与西方的运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那里，学生们正在为传统的自由而斗争，而我们的学生却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粗心大意地将它们置于危险境地。”我应该还要加上墨西哥的学生。

我认为，老一辈掌权者的傲慢与“大师们”的傲慢非常匹配，这些大师热切地鼓励学生们，他们以自己对历史进程的卓越洞察力而自豪，他们鼓励并煽动年轻人立即提出要求，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已经很“客观地”在一个法西斯国家中，并且，宽容——作为几个世纪以来宝贵的和不稳定的成就——是“压制性的”。（此时，我特别想到赫伯特·马尔库塞，他在1967年很荣幸地成为柏林学生激进分子的偶像，被看作有纳粹冲锋队战术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其他模范：1968年6月，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学生抗议者的一位早期支持者，警告要反对“左翼法西斯主义”。

我想，驱使某些教师采取行动的是他们的内疚感——对他们早先的消极被动感到愧疚，或许对他们享有特权的资产阶级生活感到愧疚，对在没有革命经验的情况下变老而感到愧疚。我引用了一句巴黎的口号：“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纳粹受害者公认的被动性是否被一些扭曲的逻辑作为攻击大学的理由？美国的激进学生（其中许多来自富裕家庭，通常是犹太家庭）即将开始从事有物质承诺的职业，但是他们受到了一些愚蠢的教授的影响，那些教授鼓励他们在穷人（和女性）中去发现被指定的无产阶级的替代者，所以他们装出一副贫困和受害者的样子。

我对大学里喜气洋洋地亵渎神圣非常生气，并担心我们在背叛我们的文化遗产。^[15]作为教师我们被委以重托去传承一些古老而珍贵的东西，然而却听任这些东西被肆意践踏。那些激进的年轻人正陶醉在他们自己的言论之中，被暴力获得的初步成功迷惑，并深信他们作

为偶像破坏者的历史作用，我对他们十分担心。我不喜欢他们经常信口开河发出的粗暴的反美言论，也反对他们在一个偏离正道的美国和纳粹的极权主义之间做出错误的类比。我认为他们是改革的不知情的破坏者，这种改革是我们许多人不仅想象而且试图付诸实施的。他们的破坏并不是不需成本的，我担心会出现一种大规模的强烈抵制，一种保守的野蛮人的反应，他们会认为他们有正当理由去偏执地仇视自由的（和昂贵的）学校机构。

或许我反应过度了，正如我的一些同事所指责的那样；或许我心中始终对欧洲过去耿耿于怀，所以我看待事情太过苛刻。当同事听到不同意见的嘀咕声时，我却可能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暴徒的脚步声。最终，根本没有暴徒的脚步声，但是无论如何，在美国还有一个资金充足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胜利，他们把理查德·尼克松选上了台，伴随他的是他熟悉的主题“法律和秩序”。尼克松和所有年龄段的激进分子适时地以他们的玩世不恭和偏执相互证实了对方。正如优秀的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最近所写的那样：“无论激进政治看起来是如何主宰了1968年的公众面貌，那个关键年份里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右派的崛起……从那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就一直在政治荒野中游荡。”

要为学生运动制定一张资产负债表是不可能的。在所有这些错位和骚乱之后，美国大学的治理可能会有所改善；问责制和社会责任成为公认的目标。事实证明，我们的机构比欧洲的机构更具弹性，但我们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欧洲大陆，1968年产生了矛盾的后果：许多进步的改革派学者转向了右翼，学生们没头脑的攻击给他们造成了永久的伤害。即使是现在，保守派仍将大学和社会中出现的大多数问题归咎于德国人所谓的“六八年那些人”。另外，我的许多欧洲朋友和同事，尤其是德国

人，把大部分道德觉醒归因于那一年，他们相信，学生们的反抗导致了与德国的过去的长期对峙。1968年这个神话般的一年被有些人视为不可饶恕的暴力的一年而铭刻在心，在其他人眼里，正是在这一年内，那些顽固不化的大学最终遭到了藐视，虚伪和不可饶恕的沉默暴露无遗。这两种判断都有一定道理。

幸运完全是偶然的邂逅，经常被无意识的倾向转化为某种改变人生和提高人生价值的东西。1970年1月，我在波恩出席第六次德美年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政府、商界、媒体界和学术界的“领先”人士，国际政治和德美关系的老手，他们评估了跨大西洋政治。会议的第二天上午，主要议题是国际学生运动，我的文章被作为引导性的文本。

我忘了所说的话了，但是我仍然保存着那天上午会议中途传给我的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如果你没有别的计划的话，我们共进午餐好吗？”落款是玛里恩·登霍夫。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并且谈了很多事情，包括我的文章，她觉得我的文章过于保守。当时，我是否意识到这次见面将会带来一种友谊，并且这种友谊会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与我的祖国的关系？

当时，玛里恩·登霍夫伯爵夫人是西德最重要的周报《时代周报》的出版商，该报的定位可以从其清晰的左派自由主义的声音得知——事实上，这就是她的声音。我读过她的文章，并且知道她的文章是对新的东方政策的一种热情的、理性的恳求，最重要的是恳求同波兰的和解。作为美国和许多美国人的朋友，她对僵化的冷战几乎毫无用处。

她是一个言行谨慎的女性，有非传统的美，她的脸极富表现力，反映出内心的光芒，笑容十分灿烂。她的身高不高，穿着低调但时尚，她的谦逊完美无缺。“Schlicht”（朴实无华）是我看到她时即

刻想到的一个德语单词：简朴、典雅与强烈的炫耀或德国人的自负完全相反。她有极大的魅力，然而她的姿态不仅暗示着要与其保持距离，还能激起他人的尊重，如果不是敬畏的话。在报纸上，她总是被称为伯爵夫人（Gräfin）。她散发着年轻的活力，她的判断力却又如此成熟！（她六十岁，我四十五岁。）我很钦佩她的身份和她所代表的一切，随之而来的是深厚的感情。她将普鲁士人的严厉与人类的温情结合于一身，赫尔穆特·施密特在2002年3月给她写的悼词中引用了我的这句话。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伯爵夫人的兴趣强烈而广泛，既涉及政治又涵盖个人。她能毫无差错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有记者追求事实的欲望和道德主义者的深度——对世界知识的掌握也令人吃惊。我当时并不了解她早年生活的全部故事，只知道她出生于一个东普鲁士的旧贵族家庭，在斯巴达式的奢侈生活里长大，那个古老的世界中的特权也规定了责任。其余情况我是适时地获知的。

在第一次见面后不久，她给我寄了一本1945年（！）私人印刷的小册子《深切怀念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遇难的朋友们》。这是一本简要地纪念她曾经的朋友的小册子，那些朋友7月20日参与了谋杀希特勒，但政变失败后惨被纳粹杀害。她事先知道策划中的密谋，她也知道一些被指定在后希特勒政权中任职的人。位于东普鲁士的登霍夫庄园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方便的聚会场所，尽管盖世太保审问了她，却无法得到她参与其中的证据。在午餐后不久，我们第一次一起散步，结果发现此地竟然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度假胜地——景色美妙的西尔斯·玛利亚，就在恩加丁，并且离我年轻时常去的席尔瓦普拉纳非常近。接着，我们又聊起了那次未遂政变。我告诉她，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事件没有被写成一部伟大的戏剧，没有席勒似的人物能配得上这个任务，于是我们决定一起来写这样一部戏剧——只要时间（和才能）允许的话！鉴于我对这些英雄和他们的家人热情的尊

重，伯爵夫人和我立刻就有了一个约定，但是和谐并不总是轻易有的：她对英国人始终耿耿于怀，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这些德国的爱国者在英国人面前曾屡屡碰壁，而我则认为他们的不信任有其历史原因。在细节上我们有不同意见，但在根本性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想我知道她独自艰苦跋涉的过去。1945年1月，她骑上她心爱的马，从弗里德里希施泰因，登霍夫家族在东德普鲁士的祖先的家，一路行至位于威斯特伐利亚的梅特涅家。这段700英里的旅程花了她七个星期。她恰恰是在红军来到之前离开的，红军烧毁了她的家宏伟的庄园宅邸，废墟还在苏联人手中。我记不起我们是否谈起过我们被赶出家园的共同经历，尽管我们肯定会谈到我们完全不同的过去，但是那些未说出口的，那些无意识的话也会编织出其本身的特殊纽带。只是1992年在柏林时，我们才在一次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公开会议上讨论了“失落的家园”。

关于学生运动，她的观点比我的观点怀有更多的希望。在激进的学生和故步自封的大学中迂腐的教授这两者之间，她更加同情前者。她相信，大学需要振作起来，更加开放，并要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当我向她道别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会面对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

那次德美会议是在波恩刚刚经历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之后召开的，这场转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开端”。作为社会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的领袖，维利·勃兰特刚刚就任总理一职。在1969年的秋季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近43%的选票，这是该党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好的成绩；而自由民主党，一个内部分裂的摇摆不定的党，已经失去了不少选票，但这个党现在仍然被牢牢地掌握在自由派手中。这两个党决定组建一个政府，因为它们可以在议会中占据微弱多数。自由民主

党领导人瓦尔特·谢尔同样也是新东方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出任外交部长。这一变化被誉为联邦共和国的“第二次诞生”。

勃兰特升任总理表明德国历史上的一次激进的转变，它标志着联邦共和国二十年来政党权力的第一次转换。他不仅是近四十年来第一位社会民主党总理，他的人生也是由他与纳粹主义的斗争所塑造的。正如他对一些外国记者所说的，他认为自己登上权力顶峰标志着希特勒的最终失败，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次德美会议最精彩的部分是晚宴，晚宴上我有机会见到了勃兰特，我发现他最吸引人之处是他的简朴、体贴，甚至沉思的方式。他谈到了他的计划和希望，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日程安排，甚至丝毫不带扬扬得意或党派的狭隘。我从远处对他表示钦佩，现在我被他完全征服了。

勃兰特出生于1913年，是一个非婚生子女（这个事实曾经被阿登纳无耻地用来反对他），他在二十岁左右时加入了魏玛时期的激进左翼政党德国社会工人党，该党反对温和的并且在其看来软弱的社会民主党。（后来当我们相互了解时，我向勃兰特询问了布雷斯劳的社会工人党领导人恩斯特·埃克斯坦。他的眼睛一亮，然后回忆道：“我们有一项纪念他的专门基金，我还帮助筹款呢。”）当纳粹上台时，二十岁的勃兰特逃到了挪威，积极地参与了被称为“新起点”（New Beginnings）的德国社会工人党的一个国际激进分支的活动。他短暂地担任过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的交通员，并且直到1945年仍然流亡海外，首先在挪威，然后在瑞典。他在德国的流亡政治圈中是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这一代不仅反对希特勒，而且承认德国和欧洲左派的失败为纳粹主义扫平了道路。他所经历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成功的和渐进的，清除了他更为激进的革命观点。

战争结束后，勃兰特回到了他满目疮痍的祖国，首先是作为一名挪威军队的记者。然后，在重新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之后，他加入了

社民党并被选入联邦议院。他进入了柏林政界，其中令人难忘的恩斯特·洛伊特是他的伟大的导师，洛伊特曾经也是一个流亡者。1957年，勃兰特接替洛伊特担任（西）柏林市长，并且就像洛伊特在1948年至1949年经受了柏林封锁的考验一样，勃兰特也经受了下一轮重大危机的考验，即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尽管一开始肯尼迪总统对苏联这种挑衅的谨慎回应激怒了勃兰特，但他逐步把肯尼迪视为一个榜样，此后不久，勃兰特本人也成为一个人物了。他可能是为数不多的特别尊重肯尼迪和戴高乐的欧洲政治家之一——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

虽然勃兰特之前两度成为失利的总理候选人，然而他的第三次竞选活动有美国的格调和德国的核心。尽管充满活力的能量和忧郁的倦怠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但他始终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活动家，散发着青春和自信。君特·格拉斯和其他知名作家和艺术家组织了巨大的支持力量。勃兰特的就职演说重申了他的竞选承诺——“敢于更加民主”，包括国内的社会改革和国外的和解。

勃兰特多年来一直属于社民党中亲西方的一派，他接受阿登纳的西方一体化政策，并且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联邦共和国必须依赖于盟军的保护，这点在柏林最为明显；他从不动摇他对大西洋联盟的承诺。但他也下决心要加强他作为外交部长时在基辛格领导下就已开始的政策，一项旨在减少波恩与苏联集团之间紧张关系从而促进德国特色的缓和的新东方政策。他已经准备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迫使自己的人民摆脱幻想：失去的领土和统一的前景。现在是时候让西德人以不同的方式与东德打交道并接受现有的边界了，这样做可以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放心，他们对波恩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东方集团喋喋不休地反对“西德复仇主义”只不过是苏联的宣传战略而已。

勃兰特政府立即着手将其新东方政策付诸实施，由此开创了西德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的动态的阶段。新东方政策首先意味着放弃武力和承认现有边界，这本身就是迈向和平的两个重要步骤。一个大胆行动的时代开始了，涉及多个目标、策略改变以及将戏剧性的可见性与后台外交的所有细微差别结合起来。在这里，我只能就这场逐渐展开的戏剧性事件提供一份简短的说明。

勃兰特最亲密的顾问，敏捷的战略家埃贡·巴尔，一直在他身边，但目标都是勃兰特制定的，风格和道德勇气也是如此。他希望通过实施一项“和解带来改变”的政策改善在隔离墙两侧的德国人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互补的先决条件就是与苏联和波兰建立更好的关系。

政府决心要制定一项更好的与东德的临时协定，这需要与勃兰特的基民盟前任们分道扬镳。二十年来，基民盟及其盟友一直坚持西德不与东德打交道，实际上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苏联除外）。光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字就造成了麻烦：保守的报纸和政客坚持称其为“地区”，或者在提到它的时候称“所谓的民主德国”。

1970年3月，勃兰特首先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他安排与东德政府首脑维利·斯多夫会面，并为此前往位于东德腹地的爱尔福特，此地曾经是（现在又是）图林根州的首府。这次旅行让他穿过了这个“宗教改革”国家的核心地带，并经过了哥达和艾森纳赫等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德国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标志。爱尔福特的公民视他为英雄，给了他盛大的欢迎，人们突破警察的安全线，高喊道：“维利，维利！”勃兰特以他简单的存在，以他毫不夸大的言辞令人们对他着迷。东道主对他的反应并不满意，而且斯多夫更加坚持，他的政府不可让步的要求是西德对他的国家完全的外交承认，尽管这相当于暗示

将放弃对德国统一的任何最终希望。勃兰特对德国的现状下的定义是一个民族的两个国家，而东德则说的是在德国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就勃兰特而言，爱尔福特之旅在情感上令人激动，但在政治上令人不寒而栗。两个月后，作为回访，斯多夫去了一趟卡塞尔，但那里没有大批人欢迎他。他只是重申了东德的立场。

勃兰特毫不气馁。在莫斯科，他与苏联经谈判达成了一项不侵犯条约，并规定所有现有边界都不可侵犯，这是西德对现实的一种彻底的接受。苏联人接受了一项书信补充，重申德国人能够通过自决权实现统一。条约意味着一种互惠的收获；苏联不得不放弃其字斟句酌的宣传指控，即联邦共和国是要复仇的，意图赢回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失去的领土；勃兰特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后者在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反过来欢迎与波恩建立更好的关系。（苏中两国之间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

波兰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联邦共和国从未承认过奥得-尼斯边界的定局，因此波兰一直放心不下——除了历史在两国人民中培育出的相互敌意之外——德国可能想要收回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领土。勃兰特现在把他对边界不可侵犯的相同保证也适用到了波兰，这一点成为德国-波兰条约的核心。

勃兰特邀请玛里恩·登霍夫加入将于1970年12月前往华沙签署该条约的官方代表团。她接受了，然后在最后一刻又退出了；即使对她来说，她也无法想象去为正式割让她的祖先的家园而干杯，这实在是太难了。在一封亲笔信中，勃兰特告诉她，他能理解，在准备条约的最终文件时，他自己也为之“哭泣”过。他去了华沙，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犹太人1943年起义纪念碑前自发地跪了下来，低垂着头，这也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表达真正的政治忏悔的最令人沉痛的姿态——这样的道歉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绝不是传统惯例或政治投机主义。正如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我想到了数百万被杀害的人。”当时的一位记者写道：“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跪下了，是为了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因为他们不敢来，或者是不能来，或者是不敢跪下来。”

勃兰特的象征性姿态以及他的政策在西德引起了强烈反对。在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中，48%的西德人认为勃兰特的下跪是过度的，只有41%的人认可这样做。而对于这些需要议会批准的条约的反对力量也是来势汹汹。国外也有人持怀疑态度；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一个谨慎的观察者，而他的上司理查德·尼克松则对勃兰特及其政策有一种偏执的恐惧。基辛格认为，新东方政策能够终止德国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这是奇谈怪论，原因在于该政策的起点就是放弃。其他美国政治家，包括迪安·艾奇逊，也对该政策或是怀疑或是怀有敌意。他们担心联邦共和国可能会偏离美国一方，但当时我倒是认为美国正处于偏离自己的危险之中。

当时勃兰特既拥有强大的对手，也拥有强大的支持者。在后者中，也许没有人能比玛里恩·登霍夫更具权威性，她在文章和演讲中高度赞扬勃兰特的新政策。她早先曾坚持认为与波兰的和解是部分缓和政策中的首要目标，并且需要德国放弃其东部领土，她在几年前以平静、宽宏大量的方式表达了对此的感受：“我不相信仇恨那些接管了自己家园的人会表现出对家园的热爱。每当我想到东普鲁士的森林和湖泊，那宽广的草原和古老的林荫大道，我就会相信它们仍然像属于我的家园时那样无比可爱。也许爱的最高形式就是爱而不图占有。”

1971年10月，玛里恩·登霍夫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她利用这一高度公开的事件来为最近的条约所取得的成就欢呼喝彩。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是一个陈旧的刻板的时期的结束，在这

种旧时期内，双方坚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准则。她是缓和政策大声疾呼的支持者，只是部分接受她的朋友基辛格表达的观点，即“缓和是减缓对手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培养友谊”。她走得更远些，希望能逐渐改善对抗气氛；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她仍然伸手去迎接跨越边界的理解和友谊。

在勃兰特团队的推动下，四个前盟国之间最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71年9月达成了一项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大国协议，各方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西柏林被认为不属于联邦共和国，但西柏林人可以携带西德护照。各方都明白，这项新的协议使柏林不再是暴力危机一触即发的热点。

1972年11月，勃兰特的团队取得了惊人的选举胜利，然后在12月，两个德国签署了一项基本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双方放弃在他们的关系中使用武力，承认边界是不可侵犯的，并承认对方的独立性。这为两国一起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消除了障碍，并使东德承诺尊重《联合国宪章》所界定的人权。但它没能给予东德全面的外交承认：从此时开始，在东柏林和波恩将会有“常驻代表团”，但不是常规的大使馆。两个德国之间的旅行限制有所松弛，柏林墙两侧的德国人的生活普遍变得更好了。这一直就是勃兰特的核心目标。

然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盟友继续保持极端抗争。他们指责勃兰特损害了国家利益，忽视了统一的希望。尽管如此，那几个条约仍然得到了批准，基民盟则投了弃权票。但反勃兰特的活动还是产生了影响。1972年1月，他同意了一项法令（Radikalenerlass），该法令禁止激进分子（或被界定为颠覆团体的成员）担任公务员职位。根据悠久的传统，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被认定为公务员行列，因此该措施影响了数百万人。勃兰特认为他这样做是让我的批评者放心，他们经常提及魏玛的敌人滥用民主权利的方式，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反

对这种新的德国“专制主义”的善意的但有偏见的抗议活动。这项法令招致了刻意曲解，在某些人眼里，它使勃兰特的成功黯然失色，并在左翼重新唤起了反德情绪。勃兰特本人也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1971年12月，当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项最高荣誉时，外部世界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位前流亡者作为欧洲政治家回到了奥斯陆，在那里他雄辩地发表演说，称战争不再是“最终手段”，而是“最不该诉诸的手段”，和平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政治。

勃兰特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国人。魏玛时期修复德法两国关系的调解人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是第一个获奖者（与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并列）；和平主义活动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是第二位获奖者，1935年入选时仍旧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勃兰特曾为他获奖出过力）；而现在则是勃兰特。就这三个人而言，可以说他们都在国外获得了荣誉，在国内却受到了恶毒攻击：对自我标榜的爱国者的盲目和卑鄙给出的令人不快的评论。

新东方政策和缓和政策的效果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争论不止的话题。十年之后，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我强烈反对将捍卫人权置于假定的捍卫缓和之下，但我怀疑新东方政策是否注定了后来的立场。无论如何，在1971年的春天，我写道，“勃兰特政府——以其集体智慧和政治善意来衡量——可能是德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政府”，我会用证据来证实这个早期的判断的。

国内也不太平。尼克松总统曾经承诺逐步使战争“越南化”，伴随的是美国军队的撤离，但这个国家仍然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总统受各种批评者的偏执和怀疑所逼迫，以至于认为他们是伪共产主义者或自由派弱者，甚至可能是应该受到监视的潜在的叛徒。掌权者患上了妄想症就会使每个人感到紧张。1970年4月30日，无论有过何种

短暂的平静，尼克松的幻想破灭了，在一次特别令人厌恶的演讲中，他宣布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这是一个美国军队迄今从未染指过的国家。对于许多公民而言，这似乎全然违背了他的承诺，由此重新燃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和几乎所有校园的反战怒火。那天，我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的开始。”如同珍珠港事件之前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一样，整个国家再次陷入了分裂。

我呼吁朋友们提出我们的抗议。5月6日，一些历史学家，包括费利克斯·吉尔伯特、C. 范恩·伍德沃德、戈登·赖特、霍夫斯塔特、洛克滕堡和我，给《纽约时报》发出了一封长信（在那些日子里，该报每天都会刊登一些长而具有实质性的信件，而不像今天的报纸总是刊登许多片段）。我们把总统的行动称作“战争的灾难性和无可辩驳的再次升级……自1968年以来美国政策的一次灾难性逆转，我们谴责他不顾一切地无视他在海外徒劳的政策对我们在国内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我们呼吁志同道合的公民一起表达他们的谴责：“时间紧迫，国家面临极大的危险。”我们的努力可能没有或只有很小的影响，但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种对公众舆论的呼吁确实很重要。当时，我希望建立一个温和的两党委员会，由前北约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领导，这可能为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军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实例。

我还私下向基辛格提出了抗议。他和我在20世纪60年代相遇，并一再让我在哈佛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言。我们曾是亲切的同事。我怀疑1958年我为他的一本论述梅特涅、卡斯尔雷和维也纳会议的书所写的一篇非常有利的评论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回忆。我钦佩他的智慧、洞察力和机智，他的成就也令人印象深刻。他与尼克松的关系我认为是非常独特的，离奇而且复杂。

在开始谈论入侵柬埔寨问题时，我说俾斯麦和戴高乐都不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些政治家是基辛格眼中真正的英雄，而不是梅特

涅。他略微提到了尼克松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谈到了哈佛大学的教授来找他公开表达抗议，尽管许多人私下向他保证支持他；这只会加深他对自由派学者的蔑视。他说他很欣赏我的私下拜访，并且听说过我对尼克松政策带来的国内后果表示担心。当我离开时，我仍在批评尼克松，这时他说了句令人惊讶的话。“别忘记，”他说，“他不是我的总统。”我猜想，这可以联系到他早先对尼克松的政敌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的忠诚。多么令人崇敬的不忠！

很少有大学能幸免于这些年来的动乱和破坏，因此我加入了一些国际团体，试图为校园带来秩序，但是我很沮丧地发现很多自由派学者或评论家变成了独裁主义者。即便是最偏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激情冲突的震撼——包括在康斯坦茨新成立的大学，位于康斯坦茨湖边。这所大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当时担任巴登-符腾堡州总理的基民盟的库尔特·基辛格创建，达伦多夫以及他的同事瓦尔德玛·贝松被视为这所大学的知识之父，学校原本打算成为一所小型的改革大学（没有传统的法学院和医学院），这样就可以强调跨学科的研究工作。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小巧就是美丽。学校的规模、位置和特色给康斯坦茨带来了实现卓越的好机会。该校有一项创新是从国外招聘“永久性访问教授”，他们每三年至少要教一个学期的课。1966年，我接到了这样一个聘约并接受了这种奇妙的矛盾的位置：永久性的临时岗位。哥伦比亚大学很勉强地同意了，知道我会把它放在第一位，而且确实我很多年没有接受康斯坦茨大学的安排。尽管如此，与两位备受赞赏的同事合作的前景让我感到高兴，此外还能在欧洲拥有一个潜在的根据地，距离瑞士只有一步之遥。

1971年5月，我第一次前往康斯坦茨，当时只待了一个多月。佩吉和我被安置在湖边一座仿造的城堡中狭窄的住房里，这座城堡由一位日耳曼诗人威廉·冯·舒尔茨的怪异的寡妇拥有，她对丈夫的记忆始终非常强烈。花园里有一条长凳，上面标记着“诗人的板凳”。有一

次，或是故意或是意外，我坐到了这条板凳上面，这让她感到很沮丧，因为我这样做似乎亵渎了神灵。

此时，达伦多夫在外交部担任瓦尔特·谢尔的国务秘书，所以我在该大学最亲密的同事是瓦尔德玛·贝松，他是一位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政治学家。贝松充满活力，身材魁伟，精力充沛，机智敏捷，才华横溢，讲话富有煽动性，并且不屈不挠。他属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德国学者，他们惊人的能力似乎决心要弥补上一代有缺陷或缺失的工作。贝松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位伯克派自由主义者，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由主义气质和保守主义原则的综合体。他强烈反对偏狭的学生激进主义，甚至在康斯坦茨也有他们的一种喧闹的代表。（有一天，贝松收到了一个大包裹，上面写着“反动派肥猪”收；他没有打开它。）他一方面竭尽全力地致力于德国人在国内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在国外代表着谨慎的现实政治。

在6月初的一天，他和我一起沿着湖岸散步，探讨国家、世界和我们的前景。他以他特有的热情鼓励我在湖边买一套住宅——当时还负担得起——从而将康斯坦茨视为一个半永久的基地。这是一个诱人的提议。两天后，他突发肾结石；在痛苦中扭动着的他，被人问到是否对青霉素过敏，他嘟哝着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回答。接着他被注射了一针青霉素，作为一种常规的预防措施，结果数小时后他就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损失，但对联邦共和国的公共生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康斯坦茨大学的校长请我在第一次贝松追思会上做演讲，我给讲稿加的标题是“迈向新的德国的过去”，暗指贝松计划写的现代德国史。（奇怪的是，在我用德语写这第一篇长文时，我没有觉得写作是件容易的事。但不知怎么仍然有一种力量吸引着我去写；我的德语带着些美国腔，稍微自由些，也许是有点淘气。）我辩称，德国历史不

可能永远只从1933年或1945年的角度去看待，并警告说，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德国历史的高潮是错误的，是去接受纳粹主义的必胜信念。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欧洲的或比较的方式去对待德国的过去：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应该被置于欧洲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为什么希特勒出在德国”这个问题应该辅以“为什么希特勒出在西方世界”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对极权主义模糊的适应性也应该加以研究，因为诱惑无处不在，同政治上的脆弱性、人类的怯懦、不安全、叛国和不人道一样。我恳请大家关注在过去问题上的象征和狡辩，我们应理性地审视非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演讲很受欢迎——我在日记中写道，达伦多夫称我的演讲“气势宏大”（grossartig），这样的鼓励在当时意义重大。当这篇讲话稿在1972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时，我给伯爵夫人寄了一本，之后的所有作品我也会寄给她；她成为我为之写作的极少数人之一，并且她的反应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作家需要一些经验老到的读者。我认为她给我提供了进一步的激励，促使我去为普通的读者写作。

在康斯坦茨大学的逗留是我密集参与西德教育体系的一道和平的序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一个非常有效的机构，也是马歇尔计划的遗产，由23个“发达的”工业国家组成，旨在制定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政策——邀请我同其他四位“专家”一起去审查德国的教育实践，涵盖从学前班到大学的所有内容。接受委托所撰写的审查报告——其中包括对成员国实施改革的建议——是经合组织的一项主要的也是得到极高评价的任务。在那个时刻选择了联邦共和国可能是一个行政管理上的巧合，但它的到来正好是教育成了西德一个亟待解决的紧要问题的时候，当时不仅有大学骚乱的背景，还有勃兰特提出的很多民主倡议可供借鉴。

我被迷住了。关于教育的抽象辩论总是让我觉得无聊，但是在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大学的命运已成为一种吸引人的兴趣所在。我接受了经合组织的邀请，再次屈服于合理的诱惑，而牺牲我在学术研究上的专注。写一本大部头作品是延迟满足的一种长期练习，而我却可能经常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者更有可能的是，我会假设我可以同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由此就会无意识地选择一种不断为之奔波的生活，从而将反思和学习作为代价。尼采的警告一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指南：“你们所有这些热衷于艰苦劳动，喜爱一切新奇、陌生事物的人，你们很难忍受自己，你们的勤劳只是一种逃避，只是自我遗忘的意志。如果你们更多地相信生命，那你们就不该拜倒在这短暂片刻的脚下。但是你们却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下去，甚至连偷懒的能力都没有。”

我们这个审查团队成分比较复杂，主席是阿兰·佩雷菲特，一个严峻、孤傲的人。作为一位著名的戴高乐主义者和教育部前部长，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也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一——就德语而言——却是我们中间知识最少的成员。杰克·恩布林是英国教育和科学部的副部长，他是一位典型的公务员，镇定自若，持怀疑态度，聪敏好问。瑞典人托尔斯滕·胡森是一个撰写经合组织报告的老手，还有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哈罗德·挪亚，他们都是职业教育家。我将专注于大学的办学条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成堆的各种机构最近准备的报告，然后在1971年夏天，我们开始了对六个西德城市精心计划的考察之旅，在这些城市里我们与各种各样的人讨论教育，从部长到教师再到学生。我有时会逃离一些正式会议，去进行自己的非正式访谈——对我来说，逃离时刻往往是最具启发性的。

根据传统和波恩的“基本法”，教育是每一个地方政府的责任，尽管联邦政府当时正在资助更广泛的联邦协调计划。达伦多夫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联邦共和国教育缺陷的很有影响力的书，书中一些

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是正确的：“现代化”在德国的教育体系中简直少得可怜，盟国所希望的“民主化”完全没有实现。德国的专业人士始终拒绝改变“教育失败主义”的观点，并抵制改革。

当我们飞往西柏林时，我对佩雷菲特说我们在这里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放在自由大学上；他同意了，以为这个名字意味着学生可以不必交学费，尽管所有德国的大学都是这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仍然是）。在我们到达时，一位我很熟悉的大学管理者给了我一封密信，告诉我，我们与一些独立人士的约谈，包括前校长汉斯·冯·克雷克斯，都被刻意阻止了。代替他们的是，安排了一次与自由大学副校长乌韦·韦泽尔的会谈，此人是一位有强烈左翼同情心的法学教授，他试图向我们保证大学里一切井井有条。他临时代表三十岁的校长罗尔夫·克里比奇，一位同情学生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根据一项新的大学法律，校长必须由大学的所有成员选举产生，而克里比奇在与前任校长和资深法学教授的竞争中获胜，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被选入德国大学管理层的教师。年长的资深教师和大多数柏林政客为此感到沮丧。

我们这个团队里有一位经合组织的顾问，名叫巴里·海沃德，他和我偷偷溜出了会场，跟着我们的还有赫尔穆特·贝克尔，他是马克斯·普朗克教育与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现在在自由大学里扬扬自得地讲述着生命。然后我们按照事先安排，出发去拜访君特·格拉斯，他住在柏林一栋古老的房子里，家中非常整洁，也很宽敞，我们的谈话很自由，对各种主角进行了一番积极的评论。海沃德对格拉斯友好的反对偶像崇拜的信念感到很激动。在以前的场合中，我曾经见过和我同时代的格拉斯（他曾经在一家家庭晚宴上准备了野猪肉）。我对他非常钦佩，不仅因为他的两部杰作《铁皮鼓》和《狗年月》——在纳粹糟蹋了语言之后，他的这两部小说又恢复了德语散文的优美和力量——还因为他的政治参与，包括他在1969年勃兰特竞选活动中所做

的工作。（后来我们也常见面，但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联系逐渐减少了，这是因为他尖锐的和非原创的反美主义变得更强烈了。）

我在自由大学的一位知己警告我，我们这个小组正在听取的都是些官样文章，他们在一个私人住宅里组织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同恩布林一起去参加那次会议，会场弥漫着一种地下抵抗者的气氛。这所大学里一些最著名的教授，其中许多人拥有无可挑剔的自由主义者资格，包括奥托·冯·西姆森，艺术史学家和曾经的纳粹主义的难民，他们描绘了一幅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恐怖和仇恨的画面，几乎破坏了常规教育的可能性。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满腔愤怒要倾吐。我永远不会忘记恩布林坐在回程车里的评论，他原先不相信我之前关于动乱的描述，但现在他明白了。他咕哝着：“嗨，仇恨！在大学里怎么会用上这么一个出格的词！”

在法兰克福，我同于尔根·哈贝马斯进行了交谈，然后留在他家和他的妻子一起共进晚餐，他的妻子非常热情好客。我认为他是一个改革者的典范，他曾经同情学生们的早期要求，理解彻底改革的必要性，但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无论他对改革大学的想法有多激进，他在我们分别时说的话更加打动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心仍然属于原先的大学。”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挽救它，并使它在一个改变了的社会中仍然具有生命力。

那年秋天，我们的报告撰写完了，然后提交给了经合组织，同时转给了两名指定的德国的“调查对象”，我们将于11月在巴黎与他们举行通常的“对质会”。那两位都是我的朋友：伯恩哈德·沃格尔，当时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基民盟的教育部长，以及希尔德加德·哈姆·布鲁赫，联邦教育和科学部的国务秘书，他是一位真正开明的自由民主党的成员。

我们的报告强调了西德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备受吹捧的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与其教育落后之间的不平衡。旧德国体制中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对劳动阶级的儿童、妇女和天主教徒存在歧视。大约有90%的孩子没有希望就读任何一所大学，大学录取令人震惊地倾向于有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阶级。在这方面，我们支持达伦多夫和其他人已经证实的情况，并且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比较材料：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歧视性要小得多。

报告中一个较短的论述大学的部分是我帮助撰写的，这部分强调了旧的教育体制是不合时宜的、不能接受的，在这种体制中，全职教授几乎拥有全部权力，完全掌控了大学政策，更糟糕的是，掌控了年轻同事、助教和学生的命运。正如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的那样，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入学政策改革和治理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列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但警告要防止“教育学乌托邦主义”，我们注意到在某些地方“大学生活已接近完全中断”，由于激进团体非常讽刺地使用强制手段，正试图“将大学转变为练兵场，去培养一个……革命型的社会”。学生对提供更好的教学的合理要求不应导致忽视研究，将后者转移到非大学研究所——例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数量在稳步增加——是有害的。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由“除了大学本身以外的各行各业的男女组成”，然后让这个委员会编写一份报告，作为实际改革的基础。

在巴黎华丽的夏悠宫举行的非常正式的“对质会”上，我们的两位德国受访者也是非常正式的，来自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约30名专家陪同我们的两位德国调查对象参加了会议。我不确定联邦共和国最终能从我们的报告中获得什么好处，这份报告在联邦议院遭到了攻击，也有人对此辩护，然后很可能就会淹没在教育学备忘录的大海不为人知。但教育在德国仍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通常也是一个政治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2年公布了国际学生评估计划

(PISA) 研究的结果，该研究基于对32个国家265000名高中生的测试，芬兰在阅读识字方面做得最好，日本和韩国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做得最好，而德国的综合水平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这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自我反省；教育在2002年竞选活动中成了一个主要话题；最近，社民党的部长们——在所有人中！——呼吁创建“精英大学”，因此私立大学也首次登台亮相。正如在德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压倒一切的不是改革而是相互指责。

我们的努力带来的效益可能不太显著，但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我遇到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员，佩雷菲特和我继续见面并交换书籍，沃格尔和哈姆·布鲁赫成了我的朋友并且至今都是：两位自由主义精神的拥护者，两位在道德上最强烈地关注勿忘过去的恐怖的政治家。

在我对当时西德学生中的暴力压力感到沮丧之时，我可能对激起他们采取暴力行为的原因考虑得太少：学术结构的僵化和享有特权的专制的教授职位所带来的根深蒂固的自身利益。然而我们并不知道的是令人震惊的纳粹时代的连续性：大学里面充斥着年龄大得足以在纳粹时期教过书的人，还有些年轻人则曾经在种族“研究”和人口安置计划这类臭名昭著的领域内为纳粹政权效劳。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各种著名历史学家与纳粹主义的纠葛才被揭露。这些教授的学生，其中有些人还成了下一代中的自由派历史学家，并没有问过他们当医生的父亲：“你在第三帝国做了些什么？”那些年纪大的人不愿去说，而大多数年轻人则不敢去问——我的论点的另一个例子则是，20世纪的情绪可以用“他们不想知道”这句话来概括。

我一直纠结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关系中，我的教学和未完成的论述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书使我一直停留在过去。在大多数夏天里，我会出门到我们在佛蒙特州的住宅里去继续写书，在那里我会一头钻

进建在一个旧的牛棚角落里的书房。我记得有时候我会突然结束写给我儿子的信，解释说：“我必须回到我的牢房去完成我的刑期。”在很多情况下，一句话真实的或在此处双重的含义只是在后期我才会搞清楚。但是写一本未完成的书确实感觉是在服刑——而且期限未定。^[16]我在佛蒙特州通常非常忙碌，我母亲也往往来此居住；凯瑟琳白天管理马匹，晚上照顾她的祖母：一个理想的教育家的养成阶段！

多年来，我一直在查询档案并阅读二次文献，并且已经起草了许多章节。但我失去了我的鼓动者和合作者——大卫·兰德斯不得不放弃布莱希罗德去完成其他任务，如此一来，我只能单枪匹马完成了。此时，大部分零件已经组装好了，但整座大厦尚待搭建。我需要不间断的时间，最好能远离哥伦比亚大学，但要有良好的图书馆设施和一些文书工作方面的帮助。机遇和运气再次帮助了我。在1972年至1973年，新成立的荷兰高等研究院（NIAS）为我提供了奖学金。

仅仅是来到荷兰就是一种快乐：我们又可以尽情享受跨大西洋航行的盛大乐趣，最理想的是乘坐法国轮船，享受在海上生活的日子，观赏眼前不断变化的色彩和不停运动的海洋，去感受同时存在的梦幻和美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因此不得不抛弃许多原先的舒适。

荷兰高等研究院坐落在繁华的海牙西北郊，由警察营房改建而成，距离北海的沙丘和海滩仅有几步之遥。对于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而言，此地就是一个避风港：真正的出自人类同情和求知欲的跨学科，而不是硬性搭配。那一年，在我的同事们中，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几位荷兰政治学家，以及一位挪威语言学家——朗纳·罗米维特，他向我介绍了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格言，“过日子要向前看，但理解生活则要向后看”。有些时候，诙谐、聪明的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一位居住在以色列的世界主义社会学家，会带着他慷

慨的妻子也出现在那里。我变得非常喜欢荷兰，这是一个真正宽容的国家——国土如此狭小，天才如此之多，历史如此惊人。我心想，如果我的专业能重新选择，我会专门去研究荷兰历史。

在这里，每个晚上的讨论都少不了提到一些关于战争岁月的悲惨故事，因为那个年代仍然相距很近。荷兰高等研究院的实际管理者是一位女性，名叫埃尔丝·格拉斯特拉·凡·隆，曾经是荷兰地下组织的一位主要人物。我注意到，她和许多在战争期间冒着极大风险、表现令人钦佩的人一样，很少谈及她的战斗经历。她说，最初的一步是一种直接的冲动，产生于一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感觉，随后投身于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则需要慎重、秘密的规划和策划。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不知名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行为表现出被我称为“活跃的尊严”，然而，他们的故事是欧洲在德国统治期间灾难性衰退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尊重。

我遇到了一位荷兰精神分析学家——大卫·德·莱维塔，他是一个犹太孩子，曾经藏身在一个荷兰农民家庭，而这户农民的儿子则加入了党卫军。这些都是战时的复杂性，往往被简化和忽视。他在爱利克·埃里克森的启发下写了一本关于身份的书，这个主题远非当时的主流，但有助于我对布莱希罗德的理解，后来他专门收治幸存者的孩子，因他们父母的经历而受到心灵创伤的“第二代受害者”。他和他的妻子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常常谈起有关被驱离家园、连根清除的最令人费解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那个时代共同的痛苦。

当我待在荷兰高等研究院的时候，恰逢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出版公司出版我的一本论文集，为了这本《反自由主义的失败：现代德国政治文化论文集》，我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欧洲的书籍。我承认我偏爱论说文的探讨性语气，并阐述了我的观点，即“情绪、情感和观念确实能改变世界。但它们如何改变世界，并结合其他什么环境和利益

来改变，则是历史学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反自由主义是一种在危险突发时刻所有人民和个人共同的心态，但是，我写道：“德国社会远非压制反自由的冲动，而是培养并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反应……上层阶级在恐惧中束手无策，同时被其利己主义约束，没能抓住改革和合作的机会。他们不但没有去修建桥梁，反而挖了壕沟。”不断加深的内部冲突促使德国形成了顽固、自闭的外交政策，并为最终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我还争辩说，德国的过去带来的教训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联，德国因此陷入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的冲突和暴力之中。我反对越南战争的支持者通过提及慕尼黑和绥靖政策来诋毁其批评者的方式，然而在政治派别的另一端，我也反对为了诋毁政府和大学，不惜拿法西斯主义者或盖世太保来做同样轻率、错误的类比。美国曾经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救世主；它的批评者现在却认为它是“那个世界的恐怖……

（美国）正在步履蹒跚地走上一条权力和责任的道路，这条路没有任何国家能全身而退，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走上这条道路所面临的条件更加危险也更加关键，美国最大的资产可能就是它的自由主义传统，尽管它的表现并不完美，尽管它还经常受到挑战”。

这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是关于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的那本书的初步构思。为了捕捉他们那个时代的精神，我转而求助于小说和戏剧。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论述了1877年出版的易卜生的《社会支柱》，这部剧作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虚伪和实际罪行，我把它看作对《共产党宣言》做出的戏剧性的评论，但该剧没有提供社会革命将在一个新的良好的社会中创造出一个新人这种令人欣慰的希望。在第二篇文章中，我提出工业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迅速胜利在德国社会中造成的变革比1871年的国家统一还大。我把19世纪70年代恶毒的反犹太主义的突然爆发与那个十年的经济大萧条联系在一起，这样便揭露了作为个体的犹太人受到牵连的普遍的腐败现象。由此，对犹太人

的贪婪和权力的攻击成为德国违法行为的托词，这种攻击可以表现为德国理想主义的公开声明。我试图强调，反犹太主义可能会突然成为德国或个人清白无罪的一个诱人的主张。“所有这一切难以记录下来，然而很容易被夸大，但是在一个富裕的和文化上焦虑的时代，偏执的政治黑社会是不容忽视的。”

对我这本书的回应中有四篇评论对我来说尤其重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一位研究中世纪欧洲的英国历史学家，正确地看出我是站在韦勒尔和科卡这些年轻的德国历史学家一边的，但是错误地颇具讽刺意味地把我看作我的一位导师哈乔·霍尔本的对手，他错误地认为哈乔·霍尔本是一位扬扬自得的自由主义老学派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因为我的前提是挑战一切自由。著名的研究德国思想的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指出，在针对德国的反自由主义时，我没有对自由主义的缺点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是对我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一些话出自C. 范恩·伍德沃德给我的一封信，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霍夫斯塔特的密友。学术专业化的本质就是令人厌倦，我与美国历史学者见面和共事的机会是少之又少，所以伍德沃德的来信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让我感觉有点受宠若惊，同时也令我放心：“到目前为止，我只阅读了引言部分，但从中我能获知在许多方面我可以向你学习，比如历史学家在他所撰写的历史中的亲自参与，这种参与所能激发的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参与所能唤醒的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这一部分给了我们一个美丽动人的陈述。”过了一段时间后，伍德沃德与我逐步合作，一起致力于捍卫美国的自由主义，反对高高在上的、强大的敌人。

我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给我的慷慨的评论，我认为我没有意识到我的“亲自参与”——当然，我正在写的有关犹太银行家的书和德国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竟是如此费力地从那么多零碎资料——还

有我自己的生活——中去收集所需要的素材。我尚未完稿的书的第三部分标题为“同化的痛苦”。然而，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我的导师，它帮助我理解了我自己的世界，并加深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关注，从中我还学到了一些关于经济力量的中心地位、关于物质力量的普遍性的知识。

荷兰高等研究院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完成关于布莱希罗德的那本书的初稿——差不多快完成了。但是对美国形势的担忧又耽误了我的进程。确实，尼克松正在逐渐结束越南战争，即使水门事件的阴影落在了他的政府头上，因为在那个春天，对尼克松卷入了犯罪阴谋的怀疑在不断增加。我的荷兰朋友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不明白美国公众的道德观念怎么会如此强、如此挑剔，以至于想到去攻击，更不用说去弹劾一位在外交政策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总统，譬如他戏剧性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欧洲人认为我们是天真的道德主义者——难道政治不总是会有一个有污点的阴暗面吗？可笑的是，他们误判了尼克松的自我毁灭性偏执狂倾向，并低估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合乎宪法的诚信的尊重。

但是个人受到的冲击往往是最深重的。在荷兰高等研究院的这一年我因私人的悲痛而低落，因为在那年初秋，亨利·罗伯茨死于胰腺癌。我飞了回去，并在佛蒙特的一个乡村教堂举行的葬礼上讲了话。几个月后，我母亲中风了，在她去世前几天我又回到了美国。给我的感觉是仿佛所有的不幸突然间全降临了：首先是霍夫斯塔特，然后是罗伯茨，他们两个是我刚到美国时的精神支柱，现在又是我的母亲，她已经如此彻底地适应了她的这个新的国家，这是因为她是如此深深地扎根在她对自己祖国的怀念之中。失去自己最亲密的仍然年轻的朋友给我带来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曾经拥有他们我又是多么幸运啊！对我的家人来说，这些也是可怕的损失，因为他们的支持是能够维持生命的。

仍然受到医疗知识的束缚——我想这是从我过度焦虑的父亲那里继承的，我开始担心起我的健康。我从荷兰去看我的朋友，伦敦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去寻求慰藉和智慧。在他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家中，他带我进入他那间昏暗的书房，试图帮助我理解父母或朋友的死亡造成的不仅是心理上的痛苦，还有身体上的冲击，它对躯体的影响就像是一条腿或一只手臂被切断了一样。同所有伟大的真理一样，这也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相。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也有机会将鲍尔比的智慧传递给哀悼中的家人和朋友。过了好几个月后，我的悲伤终于也能让我有一些感恩的回忆了。

我在荷兰高等研究院的逗留允许我经常前往联邦共和国。1973年3月，我第一次到玛里恩·登霍夫在布兰克内瑟的家做客，那地方是汉堡的一个繁华的安静的郊区，由别墅和林地构成，离易北河河口相当近，船只在这条河上往返于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间。

她家不大的住宅的一楼是一间大房间，兼作书房、客厅和餐厅。墙上挂着一个美丽的歌白林双面挂毯，这是来自她的过去的为数不多的珍宝之一，还有柯克纳、诺尔德和柯林斯的风景画以及奥地利画家百水先生的大量画作。她的书都放在这里——经典的和当代的作品，还有她的唱片，她的有点混乱的文件，以及她的书桌。书桌在房间的中央，面对一扇朝向花园的大窗户，桌上摆着她的故乡弗里德里希施泰因和她最喜欢的表哥海因里希·冯·莱恩多夫的照片，她的表哥在7月20日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失败后被纳粹杀害了。就在那张桌子上，手中握着铅笔，她用清晰的、观点鲜明的散文体写下了专栏文章和著作。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永恒的房间。她在不引人注目的美丽中散发着快乐，她将工作与生活合二为一。

我们谈着谈着——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谈了政治和历史，谈了朋友和执迷不悟的人，谈了公共事务，也谈了私事。我们谈

到了未来的计划和对过去的回忆。我们会带着她的长毛腊肠犬去遛狗，这条狗是她唯一允许甚至鼓励可以顽皮捣蛋的生物，也许这条狗表达了一种在她身上受到抑制却也不喜欢在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挑战精神。她认为“意外事件”在塑造她的人生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她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她很高兴地回忆起以前的一个故事，她曾经问基辛格和我，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话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亨利说他会在他的家乡菲尔特当一名高中老师，我说我会在布雷斯劳当一个医生。然而，包括伯爵夫人在内，我们都没有问起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话她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她的兄弟们会接管弗里德里希施泰因吗？她会留在那里，还是会去另一个城市，成为一名伟大的记者，一个道德权威，一个支持民主的贵族？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充满了偶然的意外的变化。

她了解那种后果非常严重的事件，并认为她有一个保护她的“Schutzengel”，一个守护天使。她在对待疾病方面肯定有一种随意性。有一次，当她被迟迟不愈的咳嗽困扰时，我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回答说：“当然没去，我不相信他们。”那么，她发烧了吗？“我连温度计都没有……疾病是针对忧郁症患者的”，她说道。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无数次地去过她的家，她的朋友也逐渐成了我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我也得到了很多乐趣，她的不加虚饰的旧的文化，她对新事物和年轻人的探究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在短短几年后，她就建议我们可以互相直呼名字。然后，我记得是在我们相识二十年之后，她提议我们改用更亲密的“du”（你）相互称呼，根据德国的习俗，一旦采用这个称呼就会涉及一个复杂的手势，手臂交叉，各自端一杯酒在庆贺某事之前轻轻干一杯。此后，往酒杯里倒上适量的香槟或葡萄酒然后干一杯已经成为我们见面时的一种例行规定了，不论是在汉堡，还是在纽约，在西尔斯·玛利亚，或是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次会议上。我和她的大家庭的其他成员也见了面，首先从她最

喜欢的侄子赫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开始，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座宏伟的城堡和树木繁茂的庄园的继承人。但最美好的时光是她家的那种正式的非正式性。如果说在德国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再次感觉像家一样，那就是在她的家里并且在她的陪伴下，无论她说了或者没说，我们都心有灵犀。我与伯爵夫人的友谊也是“一个新的开端”。

当我说我对友谊充满信心——这个人生的礼物是我从小就学到的，并且不可估量地丰富了我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我坚持感情横溢的，特别是德国那种对友谊的崇拜。但我确实珍惜与某些男人和女人之间稳重的信任感和情感上的亲密感，这种关系产生于初次见面时立刻引起的喜悦之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并值得特别的关注和庆祝。友谊能使一个人变得更强大，但也会使人更脆弱：因死亡，或在极少的情况下因决裂而导致的友谊的丧失是很难接受的。

我的欧洲友谊发展得很快，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国。我母亲去世之后，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佩吉和我在普林斯顿买了一套房子用来过周末——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抵达那里，而且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很近，我的朋友兼导师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是该研究院的永久成员。费利克斯的名字来源于他的祖先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他自己曾是柏林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的学生；1933年他离开了德国并最终辗转来到美国，战争期间他在战略情报局的中欧处工作，后来逐渐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一位无论是字面上还是隐喻上都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一个有着最机灵的心理和政治敏锐度的人。费利克斯是一名卓越的人才发掘者，他帮助研究所选拔享受一年奖学金的外国学者。因此，正是在普林斯顿，我逐渐认识了一些优秀的欧洲人：于尔根·科卡（他的妻子来自布雷斯拉夫），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和他的妻子，托马斯·尼佩代夫妇，以及著名的历史学家双胞胎汉斯和沃尔夫冈·蒙森。我早就认识成果惊人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还有鲁道夫·冯·阿尔贝蒂尼，他是一位瑞士历史

学家，住在库尔附近一座古老的家族城堡里，并在苏黎世任教。凭借所有这些联系和我自己的本土倾向，欧洲逐渐成为我的第二个家。

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有成为一名“介入型观察者”（这个词是雷蒙·阿隆用在他自己身上的）的倾向，但这种趋势直到在荷兰的那一年才得到完全发展。我现在能比先前更清楚地理解伍德沃德对我的那本论文集的回应了。正如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巴特尔德·尼布尔在19世纪20年代后期所写的那样：“当一位历史学家在复原以前的时代时，他以滴血的或欣喜的心情所见证的事件越大，他对那个时代的兴趣和同情就会更深。”此外，尼布尔还承认存在甚至更加深刻的影响：“亲爱的朋友的存在和联系会产生一种热情；这也是一种直接的影响，借此缪斯女神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唤醒我们内心的快乐和力量，并使我们的视野更加明亮：我的一生和我身上最好的一切应归功于这种影响。”

我在历史学上的研究工作凸显出我在专业、政治和个人这三方面兴趣的交织，而且在荷兰生活的这一年中，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对以色列的关注。多年来，我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斗争——当然，是从我小时候遇到哈依姆·魏茨曼时开始的，也是从巴勒斯坦成为我家移民的一个遥不可及的选择时开始的。然而现在，在1972年，我一到荷兰高等研究院，就发生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一场可怕的悲剧。在我整个留在荷兰的一年期间，发生在中东的事件一直在吸引着我。

直到1971年我才去了一趟以色列，我的朋友也是曾经的学生杰伊·温特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书，他充当了我们的向导，带我们不仅参观了古代的荣耀，还走访了最近的过去。一开始，就在我们到达的第一天晚上，他带着佩吉和我漫步在月光下的耶路撒冷，一切是那么神

秘，那么令人心动。他带我们去看了最近打仗的战场，我们还去参观了一个早期的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我一直认为，在原始的、和平的社会主义社区中创造出“新的男人”和“新的女人”这个梦想是20世纪伟大的且部分成功的乌托邦之一。我们从他那里了解到1948年以色列过度的行为和暴行，他们大规模驱逐巴勒斯坦人（当时这并不是常识）。伴随着以色列国的建立，这种在严酷事实面前的“无意识”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关心“遗忘”的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的合法性取决于1948年的战争是否被完全视为一场防卫战。一种复杂的对以色列的认同感在我身上逐渐增加了：当然它不是我的国家，希伯来语也不是我的语言，但我对这个避难之国、希望之国、遭受破坏后的抗争之国怀有一种亲近感，感觉自己是一个部分属于它的陌生人。杰伊带我们穿过犹太人的旷野，这片神秘的荒凉之地令人敬畏，然后到达马察达，此地是一个精心培育的象征，象征着犹太人的坚定信念，但不是毫不妥协。

在以色列1967年获胜之后的几年里，恐怖主义这种古老的武器得到了大规模的复兴。这在中东或其他地方并不新鲜：在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犹太地下组织就曾采取这种行动。但是现在，虽然以色列人始终坚持不妥协的政策，但伴随着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袭击——满足恐怖主义的要求就相当于鼓励恐怖行为并屈服于其逻辑——恐怖主义无论如何仍在增长，或者是出于狂热主义，或者是出于只有暴力才会带来政治结果这种观念，而且越致命越有效。也许并非巧合，恐怖主义也在西欧出现了。

我于7月离开荷兰高等研究院后，马上就被工作和担心占据了。197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赎罪日，我们听到了无线电传来的公报：由苏联武装起来的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胜利的突然袭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以色列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直到——在美国的

帮助下——这场失败的威胁转变成了另一个以色列的胜利，即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色列军队在把大部分埃及军队围困在苏伊士运河之后，一路打到了开罗的大门口。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下令对美国（以及曾帮助过以色列的荷兰）实施石油禁运。最后，两个超级大国迫使交战各方停火，尽管以色列很不愿意放弃其独特的有利地位。战斗于10月28日结束，这一天，被称为“以色列隆美尔”的塔勒将军与他的埃及对手坐下来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

赎罪日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濒危的以色列的唯一武器供应国，而西德则对使用其港口来运输军需物资颇有怨言——没有经过协商且完全是在大白天进行。基辛格毫不掩饰他对这些欧洲吹毛求疵者的蔑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维利·勃兰特曾独自（可能是违宪的）做出了一个决定，即刻安排交付以色列空军迫切需要的高科技电子武器。当时占优势的情况仍然是一个被动的欧洲勉强同意了阿拉伯的要求，拒绝给美国提供必要的基地。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谈到阿拉伯人的袭击事件时说：“难道试图回家也必定是无法预料的侵略吗？”而欧洲的新左派则攻击以色列为美国用来实施犯罪的小卒子。当石油价格翻了两番并且“石油危机”使欧洲经济复苏和世界经济处于危险之中时，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路径也就出现分歧了。

这显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危机。我认为这场战争及其副作用结束了一个时代，并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危险时期，同时，由于美国被日益严峻的水门事件丑闻震撼，这种情况更加糟糕了：赎罪日战争的高潮恰好与“星期六之夜大屠杀”^[17]同时发生。当时尼克松解雇了他的特别检察官，因为他敢于将宪法责任置于总统的疯狂命令之上。由此，这个国家面临总统遭到弹劾的可能。

在这样一个有着不祥预兆的时期去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是痛苦的：我需要表达我的忧虑。几个星期后，我起草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完，像往常一样感觉不够确定，于是就去向一位导师征求意见。我请莱昂尼尔·特里林看了一遍，他看完后称文章“极其了不起”。有了底气之后，我把文章寄给了《评论》杂志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当时他还没有变成后来的鹰派新保守主义者。4月，作为最重要的开篇文章，他发表了 my 《战后时代的终结》一文，由此再次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并且对我来说改变了人生的后果。

在这篇文章的开始，我引用了尼采的警告：“一场伟大的胜利就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比起失败，胜利会更令人类本性难以承受，甚至看起来，赢得这样一种胜利比从中产生一场更沉重的失败更为容易。”这是他对德国在1870年战胜法国的回应，他担心德国人会因此而狂妄自大、趾高气扬，实际上他们还真就是那样。我担心以色列的胜利也可能产生危险的幻想。我们需要认识到，从1948年至1949年开始的那个时代，有着马歇尔计划并诞生了以色列、北约和联邦共和国的那个时代——这个时期“很可能标志着我们的文明必须记录在案的最不期望的也是最有希望的跃进”——现在已经结束了。欧洲必须意识到，自20世纪初以来，当然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一直在打一场阻止其自身衰退的后卫战。西欧人已经开始认为他们的经济奇迹是永久性的，就像以色列人可能将他们的军事奇迹当作神话一样，但这些自以为是的推定都是危险的。以色列是在欧洲的犹太人接近灭绝之后才成立的，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显得在道德上难以抗拒。

但现在许多欧洲人对以色列横加指责，以至于它反过来又完全依赖于美国。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和好战也不会轻易消失，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48年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难民后，就一直在被迫遭受苦难，而原因正是欧洲人对他们的犹太人犯下的作为与不

作为罪”。以色列人承受着反美主义的负担，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承受着对犹太人力量的潜在怀疑。西欧本身面临失去立足点的危险，一方面与美国发生争执，另一方面受到阿拉伯经济实力的威胁，这都可能使它遭受危害其政治稳定的社会经济压力。在一个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鸣的句子中，我写道：“收缩中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和政治怪物，就像扩张中的资本主义有成为奇迹的趋势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了纠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欧洲已经为社会民主做好了准备。但是布尔什维克不经意地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通过分裂欧洲的劳工，通过为保守派提供一个挑战和一个方便且真实的祸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所希望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欧洲资本主义的崩溃——实际上在他们的帮助下被阻止了”，带着一丝历史的夸张，我总结道。但是像往常一样，我试图强调危险的紧迫性及其背景，以便组织起一支集体防御力量。我希望，西欧人“在面对他们新发现的脆弱性时”，不会“屈从于‘一种闷闷不乐的中立主义’，一种意志的崩溃，一种‘欧洲的佛教’，这些正是尼采很久以前就预见到的虚无主义的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

这种像历史-政治分析一般发出的大声疾呼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4月，就在文章发表几天之后，麦克乔治·邦迪的办公室打来了电话；他想见我，同我讨论我的文章。我把邦迪看作美国生活中一个令人敬畏的极其了不起的存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任院长、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现在的福特基金会主席，他是一位聪明睿智、知识渊博、机智自信的人。他在午餐时对我提出的质疑令我胆战心惊，在场的包括福特基金会的其他人员：大卫·贝尔，负责发展援助的一位经济学家；弗兰克·萨顿和克劳福德·古德温，负责欧洲和国际事务；还有贝尔部门的两名项目官员。我的文章被放在桌子中间，邦迪不时地抓起它，阅读其中的一段，然后要求我做出说明。贝尔问我：“欧洲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可能更多的是激情而不是精确性。当时的气氛融合了谈话的激烈和面试的紧

张：也许面试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既令人激动万分，又需要挖空心思寻找答案。最后，邦迪称这篇文章“十分精彩，不同凡响”。伊沃·莱德勒，福特基金会国际事务部的一位历史学家兼项目专员，带我去坐电梯，他对我说，“麦克真的对这篇文章感到很兴奋”，还说如果我想从福特基金会得到什么东西的话，我就应该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尤其是在我即将完成我在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两人身上的工作并且已经在考虑下一个重要任务的时候。我以后肯定会对这个开放性的邀请采取后续行动的，这样的行动将使我远远超出德国的局限，给我的政治教育打开新的世界。

在联邦共和国诞生两年后，巨大的变革震撼着这个国家。1974年5月，勃兰特突然辞职，此前他的一名主要助手被发现是能获得绝密文件的东德特工。整个事件一直是模糊不清的：为什么西德的反间谍部门会遭遇如此失败？勃兰特的随行人员中是否有人反对他？

勃兰特继续担任社民党主席，而赫尔穆特·施密特则立即接替他担任总理。施密特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坚决果断，精力充沛，他在汉堡担任第一个政治职位时就已经证明了自己。1953年，他成为联邦议院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凭借自己的多才多艺，他迅速崛起成为社民党议会党团的高层，并在勃兰特手下担任重要内阁职务。迅速的成功并没有抑制他最重要的自信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不会耐着性子去与蠢人打交道，并且在他们表现糟糕时也绝不隐瞒他自己的观点。尽管他被看作一个聪明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有天赋和兴趣广泛的人，他还是一位熟练的钢琴家，他的信念体现在他对有效的民主领导的可能性上。作为一个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上台的中间派，正当国家试图应对石油冲击的影响时，他不得不通过减缓国家在福利上的扩大，结果使自己的政党失望。（他经常被称为基督教民主党拥有过的最好的总理，这句话虽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有几分道理。这种嘲笑本意是指他在经济上过分审慎而在风

格上颇为专断，但这也是对阿登纳之后两任基民盟总理的品质做出的恰当评论。）

施密特继续奉行勃兰特的外交政策，并通过与法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他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个人友谊来加以扩大。施密特曾写道，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是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友谊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他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也有这样的关系——时至今日，这种友谊一直在延续。此类关系缓解了施密特在世界舞台上的决定性作用，正如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结束其为期两年的审议，通过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所表明的那样：没有缓和与西德的东方政策，这本来是不可想象的。它对东西方主要利益的均等承认，几乎接近于欧洲达成了一项最终的和平解决方案。

现在取代了欧安会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通过了三项基本协议，简称三个“篮子”：第一项协议保证欧洲边界不可侵犯，默认苏联在1945年之后强加的变革；第二项协议是承诺更大的贸易便利，这一条款也有利于苏联；第三项协议是所有签约国承诺“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知、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并促进这些权利的“有效行使”，包括更广泛的旅行自由。第三个“篮子”建立了一项没有执法手段的原则，起初西方低估了这项原则所具有的爆炸性的重要意义。

麦克乔治的兄弟威廉·邦迪是一位资深外交官，他写道，《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或许是由一群相关的国家签署的最具有理想主义的文件”。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很对。苏联领导人对前两项协议感到很满意，但在第三项协议上产生了分歧，有些人有理由担心，他们精心构建的与外部隔离的世界可能因此打开一扇会招来外国影响的大门，其他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对资产阶级虚伪所做出的让步。

事实上，接受这项协议导致他们噩梦缠身。苏联及其卫星国中的异议人士很快就抓住了西方人心目中可能仅仅被看作善行的隐含的承诺。

对于生活在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人来说，有关人权的规定是赋予生命的依据，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提供了一些希望。早在1977年1月，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内的三名捷克知识分子签署并发布了《七七宪章》，该宪章承诺促进和保护“我们自己国家的公民权和人权”。波兰和苏联的异议人士可以诉诸这些被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接受了的原则。

几十年来，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其他许多人已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了西方。我读过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的《对抗希望的希望》——一本令人赞叹不已的书，给人留下一种具有奉献精神的谦逊。

当然，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国情都不一样；鉴于西德的力量和邻近的距离，东德政权感到特别易受攻击，因此动辄予以镇压。在与西方接触中得到谨慎鼓励的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则奉行模糊的、间歇性宽大的政策。

对苏维埃势力做出的那种早期的断定也对我1975年的生活产生了一些较小的影响。1960年，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1965年于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我做了发言；然后我期待着1970年计划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这是一个与朋友和同行会面的好机会，并且，在可想而知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去看看我从未去过的苏联。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遭遇入侵后，我取消了那次行程。下一次大会定于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当时苏联代表团被指定在大会第一天主持开幕式，那天会议的主题是“历史与社会”，我在那次会上的身份是美国评论员。我的正式任务是让苏联历史学家们参与一项严肃的专业论证，而我的非正式任务则是参与西方为了受迫

害的同行而做出的努力。当我在研究苏联历史学的最新趋势时，我的心思都放在了另一项任务上。

在1968年后的捷克，那些做了真正的研究工作，并与西方同行建立了联系的历史学家遭到了追捕。（例如，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他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促进知识自由政策的一位支持者，并且是一位德国文学专家，特别青睐卡夫卡的作品，他的著作在苏联被禁止。作为“布拉格之春”的一位领导者，他不得不在苏联入侵后逃离祖国。当我于20世纪90年代在布拉格遇见他时，他告诉我，勃列日涅夫在与杜布切克见面摊牌时，特意挑出戈尔德施蒂克作为主要敌人，对此他觉得很自豪。）

西方历史学家们在埃伯哈德·耶克尔和H. A. 温克勒率领下决定代表这些捷克人在旧金山会议上发出精心策划的诉求。耶克尔已经为他们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过话了，并且在1973年5月请求与他关系密切的勃兰特总理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他们的困境；也许勃兰特可以引用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布拉格已经成为“精神上的这个比亚法拉^[18]”。耶克尔准备了一份被驱逐的历史学家的名单，并说服一名德国出版商印刷了6000本小册子。这本以多种语言印刷的小册子被运往美国，并由我们负责在大会上散发，出席大会的有近1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耶克尔、温克勒、荷兰历史学家马腾·布兰兹和亨克·韦塞林，以及美国同行大卫·舍恩鲍姆和我一起，代表我们那些受驱逐的同行收集了向捷克政府请愿的签名。8月28日，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我宣布我们已经收集了160个签名，其中包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阿尔伯特·索布尔。我并不认为我们中有任何人在当时表达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上一代历史学家未能为第三帝国的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毕竟我们自己没有承受任何风险。

这个协会当时由一位苏联人担任主席，这一事实标志着缓和精神是时代的主流。茹科夫先生的开幕词充满了关于“和平共处”的各种关切；苏联人准备了一份长达96页、题为《历史与社会》的文件，阐述了苏联的历史理念。我对这份文件做出了评论。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上，我的意图是与这些人进行学术辩论，但很快我们就重复了以前的政治冲突。

苏联人的文件用了一条政治评论作为结尾，要求阻止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所以我结束讲话时坚持道：“任何政权只要侵犯知识自由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威胁。”我还引用了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的说法，要大力捍卫文化自由，“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我还提醒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教师职位，并被置于极大的物质困境之中。对于在世界各地遭受这种迫害的同行，我们应团结一致，强烈地给予支持”。

那天下午，苏联文件的作者之一西瓦切夫（他曾经在霍夫斯塔特的指导下学习）回答了我们的一些批评，我们还就季米特洛夫对法西斯主义的陈旧、危险又不恰当的定义进行了辩论，然而苏联人坚持己见。当我强调苏联阵营内部也存在争议并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在1971年2月10日对此做出的谴责时，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19\]](#)

在另一次小组讨论会上，优秀的英国历史学家D. C. 瓦特担任主讲，我对苏联的一个主张提出质疑，即“和平共处”一直是苏联的信条，我回顾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显然曾经预料到与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将一决胜负。会议结束之后，瓦特对我说：“我不介意你踢中他们的要害，但还要踢第三次吗？”在有关这次大会的一篇总结报道中，我相信是登在苏联报纸《共产党人》上，我被称为“一个北约的历史学家”。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称号，尽管更令我高兴的是乔治·凯南给

我的一封信：“我从未见过有更好的针对苏联历史学会的声明了——你的发言精彩无比，无法争辩……如此一个挑战居然在苏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是疯狂而又美妙的。”在信中他写道：“虽然这种影响往往被推迟了，但确实产生了。在这方面他们那里是有很多人站在我们这边的，其中有些人会知道如何利用这样的陈述。”

把那些人物的事迹写下来并表达对他们的合乎情理的钦佩，就像我们在旧金山为纪念我们的捷克同行所做的那样，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愿意用笔去记录那些例外。

旧金山会议几周之后，我很幸运地被邀请去承担一项使命，恰好就是一个练手的机会。1976年春天，《恩斯特·罗伊特论文选集》的第四卷也是最后一卷即将出版，这是为纪念1948年苏联封锁柏林期间的这位柏林市长而进行的一次盛大的出版活动的高潮。出版商是沃尔夫·约布斯特·席德勒——战后德国最好的一位出版商；他有着强烈的自由主义的保守原则，他自己也潜心于历史研究之中，为他的普鲁士根源以及普鲁士的过去所拥有的富有创造性的和高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他也非常适应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德国现实。（年轻时因从事颠覆活动，他曾被纳粹分子投入监狱。）现在，他邀请我在市政府为庆祝罗伊特的书信和演讲稿遗著的最终出版而举办的庆典上担任主要发言人。施密特总理将作为最后的发言人。除了他担任市长期间那段英雄般的经历之外，我对恩斯特·罗伊特知之甚少。正如我经常遇到的那样，我在准备过程中面对的是一门大有收获的速成课程。

恩斯特·罗伊特出生于1890年，他是在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社会阶层四分五裂，虽管理有序但治理不善的德意志国家里长大成人的。1909年，一位德国法学家评论说，只有一点在那里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在德国令人吃惊地缺乏形象伟大的政治领袖”。年轻的罗伊特发现，德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令人非常震惊。1913年他二十三岁时写

信给父母说，沉浸在严格的路德教教义和传统的爱国主义之中，“我不禁成了一名社会主义者……这是对我的同志（Volksgenossen）以及对我逐渐认识到的一切正确的东西的一种充满激情的炽热的爱”。他的父母不能宽恕儿子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社会正义之路的信仰，但他向父母重复了路德的著名格言：“我别无他法。”

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罗伊特遇到了他的国家后来将要面对的一些政治力量，例如在他父母的意识中，社会主义是对他们的道德世界的一种攻击。与之相反的是，他自己却对德国领导人的帝国主义欲望感到震惊。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战俘营的一个囚犯，罗伊特学会了俄语，并短暂地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承诺。但是，他也不得不发现，每一波新的同行者都必须闯出一条自己的路。罗伊特在1921年与共产主义决裂了。

1913年，他说过“民主的命运取决于对历史的信心”，这是他对工人教育所做承诺的一句口头禅，他的这种精神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圈子的精神是相似的，就像英国的R. H. 托尼和法国的让·饶勒斯所做出的努力一样。他以堪称楷模的勇气与国家社会主义做斗争，但在他们获胜后，他遭到了折磨；最终他在土耳其找到了避难所，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战争年代。1945年之后，罗伊特渴望回到德国，以便帮助在德国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他知道这需要对深深扎根在帝国的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做出真正的解释。他谴责了德国人的奴性，正是这种奴性使纳粹的成功成为可能。魏玛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犯下了许多作为与不作为的罪行，特别是不作为，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应该得到比德国资产阶级愿意给予他们的或者他们自己所要求的更多的历史信誉。罗伊特憎恨阿登纳对社会民主党的轻蔑对待，阿登纳用“缺乏爱国主义”这种老调子来玷污他们。在他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罗伊特一直是公民勇敢的典范；德国人需要这样的模范人物——但我想到，有很多人因这些模范人物而感到不舒服。（让·饶勒斯是被葬在巴黎

的先贤祠的；德国没有先贤祠，如果有的话，我认为罗伊特不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随着柏林的庆祝活动的开始，我也投入我的演说之中，赫尔穆特·施密特坐在前排，忙着为他的总结发言记下要点。当我谈到罗伊特在城市政治的生涯时——作为马格德堡市长，他曾于1929年正式访问过纽约市——我突然想起了施密特最近指责福特总统对当时即将破产的纽约市漠不关心以及他对这个城市的建设性建议，便即兴补充道：“联邦总理先生，我为您带来了美国最后一块殖民地纽约市对您充满感激之情的问候。”当我们一起走出会场时，我说我希望他不要介意我的唐突，他的反应很强烈：“我喜欢主动提出的忠告。”施密特告诉我，1953年9月当他前往波恩就任联邦议院新当选的议员时，听到了罗伊特突然去世的消息，他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对他来说，罗伊特一直是个典范。在那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社会民主党遭受了沉重打击，罗伊特劝告党内领导人要评估自己对选举失败该承担的责任。施密特对社民党也持同样坦率的态度。

但是在一次对于我来说比较苛刻的场合中，也出现了轻松且颇有启发性的一面。在庆祝活动前，席德勒曾邀请施密特和他的可敬的妻子洛姬同我共进午餐。午餐期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一名在太空中停留时间比其他任何人都长的苏联宇航员返回了地球。他在克里姆林宫受到盛大欢迎，然后勃列日涅夫将他带到一边，问他在太空长时间逗留期间是否见到了上帝。宇航员回答，“是的”。勃列日涅夫要他发誓保密，说如果这样的事情泄露的话，他将不得不去做人们期望社会主义领导人所去做的事情。宇航员凯旋之旅的下一站是去拜访教宗，教宗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已经接受了正式指示的宇航员回答说，“没有”。教宗说他一直对此忧心忡忡，但也要求宇航员保持沉默。接下来一站是波恩，德国总理勃兰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感到困惑的宇航员说：“是的，见到了。”然后勃兰特又问道：“他是否看上去

像我一样？”听到这里，施密特大声笑起来，这个笑话说出了一些他当时对勃兰特的看法，尽管他们后来对彼此间的友谊是真正确定的。无论如何，他们都对罗伊特怀有真正的热情。

在那次场合中，我还遇见了罗伊特的儿子埃查德，他是在土耳其长大的，大概是我的同龄人。我告诉他，如果我的人生与现在有所不同的话，如果我的父亲在安卡拉获得了那个职位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在一起长大，成为“年轻的土耳其人”。就在此时此地，我也与德国公共生活中的这位非凡人物开始了一段友谊，这位社会民主党人随后在企业界脱颖而出，成为戴姆勒-奔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在我公开演讲几周后，现任联邦共和国总统瓦尔特·谢尔授予我一枚西德联邦十字勋章。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德国总领事为我佩戴了这枚勋章。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出席的既有老朋友——汗布格尔夫妇代表着过去，还有我的家人、美国朋友以及同事。在回应总领事关于我为德国和美国之间“加深理解而做出了贡献”的评价时，我谈到了我的父母，尽管他们非常痛苦地对德国感到失望，却帮助我维系了与德国、与德国的语言以及文化的联系。

我自己的人际交往可能变得越来越密切，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1977年变得越来越困难。在两国的顶层，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异议：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和杰拉尔德·福特关系很紧密，但是他与新当选的吉米·卡特之间的个人关系顶多是冷漠的。也许风格甚至比实质更易引起分歧：施密特非常自信，毫不掩饰他对国际舞台上新人的轻视，而且他对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不信任甚至更加公开，认为他应该对卡特政策上的波动负责。在卡特为苏联国内的人权所做出的努力上，施密特也几乎毫无用处，他还认为这样做最终会适得其反。他们在缓和的愿望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在缓和的培育手段上意见不一。

施密特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和红军派^[20]等团伙展开的一波恐怖活动，其成员谋杀了实业家和银行家、法官和警察，并对国家构成了直接威胁。最严重的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转飞摩加迪沙，并威胁要杀死所有乘客，除非被监禁的恐怖分子同伙得到释放。对于施密特来说，他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施密特派出西德边防部队的特别小队向这架飞机发起进攻；他们取得了成功，施密特的声望高涨。联邦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在遭受这些攻击之后仍然保留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施密特的领导能力。最终暴力事件得到平息，而一场主要是非暴力的抗议活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很快蜕变成绿党。

1976年夏天，我完成了《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一书的手稿——从头到尾，耗去了我生命中的十六年！尽管有许多疑惑和担忧，我仍然可以说将时间投入其中得到的回报是非常大的，当然这是我学术生涯中唯一一次最好的学习经历，因为我试图重建迄今为止俾斯麦这位容克和布莱希罗德这位犹太银行家之间被忽视的长达三十年的联系。我一点一点地发现，布莱希罗德不仅监管了俾斯麦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投资，而且深入参与了政治和国际金融。他还断断续续地担任俾斯麦的秘密代理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这是一个主要的神秘莫测又容易遭人诽谤的存在——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给他一个脚注。俾斯麦本人在他的三卷本回忆录中，也只有一次提到了布莱希罗德，是作为别人的信使。既然如此，那德国历史学家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对他们来说这种让人幻灭的故事呢？那位铁血宰相不光对金钱感兴趣，还委托一个犹太人去照管金钱的增值，最终还以“朋友”（在俾斯麦的人生中，朋友是一个寥寥无几的类别）相称？正是俾斯麦说服了国王赐予布莱希罗德世袭贵族的地位，这是第一位未皈依的普鲁士犹太人获得如此殊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布莱希罗德——由于他与俾斯麦的关系——怎么会如此深入地卷进欧洲和犹太人的生活，而当时这个统一

的德国已经上升到权力的顶峰，并且犹太人也获得了一段并不稳定的地位突出的时期？在我的工作即将结束时，我逐渐明白，我如此精心重构的这种关系是德国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幕戏。我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莱希罗德是德国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布莱希罗德既搜集情报又提供情报。他的工作例证了政治与高级金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为俾斯麦与新闻界的交往提供了帮助。他扮演了顾问、说客，甚至国王拥立者的角色，对于在一个日益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为了在经济上生存下去而不断进行残酷的往往是隐蔽的斗争的普鲁士封建精英来说，他是一个谨慎的银行家和贷款人。作为一个能够接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国际银行家，布莱希罗德参与了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渗透——从墨西哥和美国（俾斯麦买进卖出美国的债券）到刚果和萨摩亚。银行家都是穿便衣的外交官。我不得不去追溯所有这些冒险经历，包括19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犹太人所做出的非常复杂的努力（我注意到类似的事情仍然存在，或在特殊情况下会产生），去说服欧洲列强迫使新兴的罗马尼亚国家给予犹太人平等的权利。我的书可能是唯一使用了俾斯麦的私人档案和巴黎犹太人联盟档案的一本书！

布莱希罗德本人的辉煌崛起似乎印证了我引用的海涅的一句格言：“金钱是我们时代的神灵，罗斯柴尔德是他的先知。”布莱希罗德身上集中体现了我所说的“同化的痛苦”：爱国的新贵，德国最富有的人，一个从未成功的野心家，他被接受的可悲努力使他成为幕后恶意的对象，他在人们眼中拥有的权力使他成为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反犹太主义的理想目标。他被精英们悄悄地嘲笑，还常常遭到下层民众嘈杂的、错误的诋毁。在一个对犹太人既充满敌意又殷勤好客的奇怪的社会里，他怯懦而又自豪地获得了成功。在故事的结尾，他的两个孙子向纳粹内政部长提出上诉，要求赦免他们佩戴证明犹太人身份的黄星，这个恳求遭到了阿道夫·艾希曼的拒绝。

所有这些事情在开始时我都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在写作的最后阶段，我担心我提供的这些资料可能有损布莱希罗德进而有损德国犹太富豪的形象。他独特的成功，一旦被醒目地、精彩地展示出来，会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即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反犹太者也不可能虚构出这样一个人物，如此强大，同时又如此脆弱”，我写道。他本可以以托马斯·曼笔下无情描绘的（只要伪装一下）一个富有的德国犹太人形象出现（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喜欢炫耀钱包”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我是否处于促进或认可反犹太主义的危险之中？我记得，我与哥伦比亚大学犹太历史大师萨洛·巴伦就此有过一番交谈，他明白这本书可能会伤害犹太人，但“真相是会有帮助的”。

回想起来，此书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在欧洲许多地方发掘档案，既是一份苦差事，又令人兴奋！在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的档案室工作，走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的走廊里——这是给予饥饿的想象力的一个多么难得的礼物呀！去迪斯雷利的家乡休恩登庄园阅读他的信件，去争取许可获得存放在俾斯麦庄园的档案，去发现当俾斯麦向被打败的法国人授严苛、不祥的条款时，布莱希罗德恰恰就在凡尔赛宫——一千个超越兴趣的细节！所有这些也许足以弥补在干涸或令人失望的洞中枯燥乏味的钻研，更不用说引导了这一切工作的那一批档案：装满三十三个纸箱的布莱希罗德的材料。我曾经随身携带装了几千封关键书信和文件的几个箱子去了巴黎、牛津和荷兰的瓦森纳。我知道这些资料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但是在1971年当它们的拥有者将它们作为一笔价值52250美元（部分只是签名所值）的礼物转让给哈佛大学时，回想起来真让我大吃一惊——它们曾经陪伴我三次越过大洋，并且在佛蒙特州我的牛棚里度过了许多个夏天！

我在写作这本书上付出的所有成本——未曾走过的那些道路——大部分已经忘记了，但回报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深入探究这一往事

引导我接触到了生活在目前一个相似世界中的人们，比如吉尔伯特·德·波顿（20世纪70年代任苏黎世罗斯柴尔德银行行长）、乔治·索罗斯、詹姆斯·沃尔芬森、西格蒙德·华宝爵士和纽约阿恩霍尔德与S. 布莱希罗德银行的亨利·阿恩霍尔德等人。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许多学术领域之外的人士，他们成了我的朋友，从而丰富了我的生活，更不用说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学者，他们给了我所需要的合作与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响令我震惊。我所钦佩的历史学家都善意地给予好评，美国和英国的评论家也都不吝赞誉之词。戈洛·曼在我最喜欢的一份报纸《新苏黎世报》上登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一开始就说：“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在作者的笔下，这部作品集质疑、思想、观点和叙事于一身，作者绝少深化为理论，更偏重的是宝贵的生命之树而不是概念。”他赞扬了其他许多人所批评的一个关键要点，我的判断是政治考虑在当时的许多决定中超过了经济因素。当《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这本书类似于19世纪伟大的小说”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而《听众》杂志将这本书与《布登勃洛克家族》进行比较，认为从这部“非虚构形式的……惊心动魄的杰作”中可获得极大的教训。

还有很多个人信件！例如，来自威廉·兰格和艾伦·布洛克的信。有一封来自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信函使我颇感意外：“一本令人崇敬的书——带着极其可怕的结局。比起这些年来我所读过的任何著作，我更加希望这本书是我写的。但是此书也有一些种族方面的问题。没有哪个苏格兰人有可能做成这件事。”然而，有些信也令人失望。A. J. P. 泰勒写了一篇长文登在《纽约书评》上，极好地重述了这本书的内容，但看起来好像其中的事实一直是为人所知的，而我却非常细致地为他的许多作品写过好评。有一位我在机场偶然遇到的美国同事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他只阅读了引言部

分，但这已经足以让他认为，“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以至于我都无法相信”。《近代史杂志》刊登了一篇长达四页的指责性评论，抱怨说：“首先，这是一本非常老套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学模式写的……斯特恩坚决地抛弃了任何系统的情境上的讨论……他未曾意识到他的主题潜力……几乎没有从他的描述中提取出最完整的意义。”通过描绘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迁就主义，我希望“将自由民主奉为历史进程的内在目的，即资产阶级的天定命运，然而在德国的情况中不知何故被疏远了”。被人如此丑化确实令人烦恼，但回想起来，这似乎很滑稽可笑。

沃尔夫·约布斯特·席德勒托人将其译成德语（后来这本书也有了法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版本），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使对于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不得不回过头来提供我千辛万苦翻译成英文的无数引自档案中的德国原件。评论非常多，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很多人就德国历史学家曾经追随俾斯麦去压制布莱希罗德这一点做出了评论。也有许多评论家注意到，我对当时几乎风行一时的对理论和结构分析的坚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叙事史学的贬低持批评立场。我很高兴有一则评论是出自东德的恩斯特·恩格尔伯格，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中，他有一种相对自由的精神。他提出了各种客观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批评，但承认我充分展示了新资本主义时代的丑陋阴暗面。他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工人运动，这些做出了许多牺牲的工人运动是反对俾斯麦政权的运动获得胜利的主导……这种对有组织的战斗着的工人阶级的无视在科学上是不可接受的，在道德上也是无礼的”。然而，他说，尽管有不少缺陷，这本书仍然“很有价值，的确不可或缺”。

此书的德语版很快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而且似乎引起了政治阶层的关注，尽管政治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问题，但双方都被书中揭示的过去和现在吸引。报纸刊登了一张瓦尔特·谢尔在度假时阅

读这本书的照片；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回应议员关于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抱怨时，说他知道他们都想要“一个布莱希罗德”。赫尔穆特·科尔读了这本书。据媒体报道，他的继任者格哈德·施罗德在度假期间也读了这本书，随后将他的那本书借给了一位荷兰作家，作为了解德国历史的最佳指南。

这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巴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四位负责人邀请我到位于拉菲特街的银行总部共进午餐。那时，银行大厦已经装饰一新，完全现代化了，阿兰男爵问我对新大楼有何看法。我承认我还是更喜欢正宗的19世纪的古老建筑。他叹了口气，“啊，19世纪！那是你仍然可以赚钱的时代！”

一个契机让我的研究转向了后来的更崇高的——而且同样复杂的——德国犹太人典范。1978年，阿斯彭研究所的管理者、精力充沛的活动家盖尔·波特打电话给我：阿斯彭研究所将共同发起定于1979年3月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百年纪念研讨会，以纪念爱因斯坦的诞辰。该计划邀请科学家去分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中的独特地位，并邀请人文学者——包括爱利克·埃里克森和以赛亚·伯林——将爱因斯坦作为一个私下的和公共的人物这一角度去考虑。波特希望我也作为一个演讲者在会上发表演说，而我即时的反应是断然的怀疑：我对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甚至他所推翻的旧科学几乎一无所知，我怎么能够在那种场合去谈论他呢？即使我要谈的话，那该谈什么主题呢？

保持沉默固然有正当理由，但是一种对新事物的欲望，伴随着回想起来我会称之为在知识和政治领域探索的癖好，再加上在新的档案中工作的诱惑，这两者在我身上展开了拉锯战。最终促使我接受邀请的是我回忆起十年前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看到过爱因斯坦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引人入胜的信件，其中包括涉及我家人的信件。然后在1976年，作为芝加哥大学新图书馆开馆仪式上的演讲者，我纯属

偶然地闯入了一个相邻的、不相干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的论文展，他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且也是一个流亡者，结果在那里发现了他和爱因斯坦之间在1945年的交流：这对老朋友以日耳曼的严肃性就德国人的性格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流。所以我接受了波特的邀请，我认为爱因斯坦与德国深刻的、矛盾的关系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可能的焦点。我成了一个新的领域里的陌生人，虽然步履蹒跚，但内心充满渴望。我从未想到过在德国犹太人的历史上爱因斯坦会令人震惊地以一种补救的方式弥补了布莱希罗德的不足。这两个人都攀登到了成就的巅峰，但爱因斯坦对富有的犹太超级爱国者有一种几乎发自内心的厌恶。

工作中最令人愉快的部分是重返档案馆，去尽可能多地搜索必要的资料，去发掘过去未知的有用信息，去感受发现新的证据时的那种惊喜。而且在档案馆工作时，我可以正当地推迟实际创作时令人却步的任务。尽管如此，档案工作还是会突然间给我提示，促使我产生新的见解或联想，我会迅速地将其记下来。我会用我常用的四色铅笔来区分我的想法和各种不同的引文或解释。

爱因斯坦曾立下遗嘱把他的论文转交给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据我发现，他与之并无稳定的和谐关系），但是在海伦·杜卡斯亲切又专制的管理下，这些论文仍被锁在普林斯顿研究院阁楼的大文件柜里。从1927年开始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海伦一直是他的秘书兼管家。^[21]在那个档案馆里，我遇到了出生在荷兰的物理学家亚伯拉罕·派斯，在德国占领期间他被一个非常勇敢的“雅利安”家庭所救，他自己也正在准备他的第一部有关爱因斯坦的重要著作，他在普林斯顿同爱因斯坦相识并一起工作过；派斯也认识我的叔叔奥托。他时而熠熠生辉，时而变得非常复杂，时而快活热情，时而又伤感、讥讽。我很感激他给我的鼓励。

沉浸在数量庞大的爱因斯坦档案之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素材，特别是在爱因斯坦和弗里茨·哈伯之间的通信中，哈伯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爱因斯坦的兄弟般的对立面：他们既是好朋友，但又有几乎是对立的风格和政见。我能听到爱因斯坦真实声音的回声，表达了他的观点并暗示了他们的情感来源。在其他方面，我深入研究了爱因斯坦已发表的文献，这些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集中在他的科学上。“普通的”历史学家（或其他现代科学家）还没有把爱因斯坦视为重要的公众人物。一些爱因斯坦论述政治道德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一些传记也已经出版了。但是爱因斯坦“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主题。我再次幸运地偶然发现了一个非常丰富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未开发的领域。

与同事和朋友的对话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我叔叔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西多·伊萨克·拉比，他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拉比是一个有非凡才能和敏锐判断力的杰出人才。而且，和派斯一样，他也鼓励我，尽管我在科学上是那么无知。但是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我仍然感到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给自己分配的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曾经有很多恐慌的时刻，我现在仍然可以回想起普林斯顿研究院附近的确切地点，在那里我第一次想到临时去自杀也可能是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

我给我的演讲加的题目是《爱因斯坦的德国》，意思是如实存在过的德国和爱因斯坦经历过并想象过的德国。我开始意识到，爱因斯坦一方面受到德国的吸引，另一方面又极度厌恶德国——吸引他的是德国独特的意气相投的科学界和德国文化的亲和力，厌恶则产生于德国社会的专制风格和军国主义，这种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放纵，以至于给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十几岁时，爱因斯坦就离开了德国，1905年二十五岁左右时，他在伯尔尼的专利办公室里写出了五篇论文，由此彻底改变了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当时德国杰出的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是第一个识别出这位不知名职员的天才的人。1912年，普朗克与弗里茨·哈伯一起试图以前所未有的慷慨提议邀请爱因斯坦来柏林——当时理论物理学领域的麦加。他接受了。（几年后，我发现他与他的妻子疏远了，然后和他的表妹，也是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发生了秘密恋情，这一点在他返回德国问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回到德国三个月后，战争爆发了。他难以置信地目睹了民族主义者的狂暴，并且非常震惊地看到他的同事们把战争誉为某种神圣的考验，是一条通往净化和拯救的道路。他认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罪恶大屠杀。1915年11月，在被问到他的观点时，他解释了他对战争的反对，并总结道：“如果我能用一句话就表达一切的话，又何必要说那么多话呢，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适合我这样的犹太人的句子：要尊重你的主耶稣基督，不要用言语和赞美，而应首先通过你的行为。”

战争证明他是对的；这个国家朝着疯狂的泛日耳曼主义狂热地大步迈进，随后的失败留给它的只是震惊和饥饿，1914年的统一破灭了，并且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阴影下，内战的威胁太过真实。但爱因斯坦很快就聚集在新近宣布的、临时组成的魏玛共和国周围，同时警告反对革命的极端主义。

战争结束几个月后，一支观察了日食的英国探险队宣布，爱因斯坦针对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几乎在一夜之间，爱因斯坦成了一位有名望的英雄——一个科学天才，未受战争玷污……新的英雄出现了，好像是通过神圣的设计，就在旧的英雄被埋葬在战争的废墟中的那一刻。”爱因斯坦的一举成名激怒了他的一些同事和许多国

人，由于他现在公开支持反魏玛的精英所排斥的一些事业——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他不满的人就越发多了。当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时，他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萨迪纳，他此后再未回到德国。对他来说，希特勒就是德国。

德国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是爱因斯坦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当他在柏林享受大学的好客时，他也亲身体验过敌意，他对犹太人同胞遭受的歧视表示愤恨。在处理这种基督徒与犹太人关系的主题时，我有了修正轻率的笼统性的空间。例如，当时通行的“对德国犹太人，对他们的公认的自我屈从、他们的懦弱或他们的机会主义的简易判决。这些判决……很可能对过去和未来造成破坏：昨天的自我屈从的神话可能会助长明天的不妥协的妄想”。我还引用了爱因斯坦本人说过的话，这位著名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29年当阿拉伯人袭击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时，警告哈依姆·魏茨曼要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强硬政策，反对犹太人的“普鲁士民族主义”。“如果我们找不到与阿拉伯人诚实合作和诚实谈判的道路，那么我们就没有从我们两千年的苦难史中吸取任何教训，我们就应该去接受即将落在我们身上的命运。”^[22]

最后我以一份显然是私人的笔记来做结尾：“打着任何幌子的伟大，今天都已不再流行，不论在我的学科中还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即使对赋予伟大的虚华辞藻感到很不舒服，这种辞藻也已经像往常那样贬值了。我只是想说，我发现仰望伟大的山峰是令人振奋的，就像从一个阿尔卑斯山的小村庄去看那样，然后去注视远处的山脉——那么寒冷，那么令人敬畏，无人到达过也高不可攀，而且那么神秘。”这是我对伟大的信念的一个比喻，也是私下对西尔斯·玛利亚的一个鞠躬——而这两者实际上可能是相关的。

1979年3月，就在我去耶路撒冷参加爱因斯坦研讨会之前不久，雷蒙·阿隆和我走去参观西柏林的一个纪念爱因斯坦、马克斯·冯·劳厄、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一百周年诞辰的展览。在这个曾经引以为荣的首都，我们一边穿过被炸毁的广场和破烂陈旧的大厦，一边谈起了早先大量的天才。阿隆在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停了下来，转向我，说道：“这个世纪原本会是德国的世纪。”这个世纪确实是德国的世纪，但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而它的失败正是阿隆和我的政治教育的开始。这个德国的世纪的终结还给我们带来了柏林墙，我们此时就行走在柏林墙的阴影之下。

[1] 举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战后，汉娜·阿伦特的德国人编辑是汉斯·勒斯纳，此人原先是纳粹党卫军的一个大队长，现在受雇于一家著名的德国出版社。纽伦堡的判决已经宣称纳粹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阿伦特是个居住在美国的德国犹太人哲学家，她丝毫不知道与她打交道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当我把我写的一部有关俾斯麦及其犹太银行家的早期不完整的书稿交给勒斯纳时，他却以最阿谀奉承的方式拒绝了，声称这种主题的书籍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

[2] Cassandra，无人相信的凶事预言者，源自希腊神话。——译者注

[3] 我从那时起才知道，他也曾向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做出在意识形态上和解的姿态，同时又试图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寻找一个职位，甚至不合情理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后来他被聘为美国历史协会的荣誉外籍会员。

[4] 几十年后，在与卢修斯·克莱将军面谈历史事件时，我和同事们向他询问了在1950年那些特定的日子里发送给华盛顿的关于重新武装西德的电文的确切意图或背景情况。大多数情况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当我问起他在何时何地第一次想到要重新武装德国时，他回答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想到了，当时他正在视察一支德国边防部队（Grenzpolizei），他曾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的天，他们会成为极好的战士！”

[5] “跳棋”演讲是政治家利用电视媒体直接向选民发出吁请的一个早期典型例子，该词也成为政治家所发表的煽情演说的代名词。——译者注

[6] 当我在办理旅行证件的时候，我把我的家人留在了火车站，以为我会很快返回。孩子们吃了一些冰激凌，但佩吉没有钱；服务生大声地坚持要求付款。时年六岁的弗雷德跳上桌子，说出了我教给他的仅有的两句德语：“Ich bin Amerikaner! Wo ist die Polizei?”（我是美国人！警察在哪里？）

[7] 2001年，在回答我对吕德曼的一些论文的询问时，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只寄了他的一封信给我——战后他写给我们的朋友恩斯特·汗布格尔的第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可怕经历，并询问了现在住在纽约的朋友的情况。“斯特恩是否像他以前用德语讲笑话一样也在用英语讲笑话？”

[8] 在维诺那（Venona，由西方军事部门领导的用于收集苏联情报机构信息的一个计划的代号）档案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在战争期间从美国向莫斯科发回报告，指出诺依曼是一个把美国战略情报局报告泄露给苏联的人。我同意亚瑟·施莱辛格的观点，他曾经和诺依曼一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他认为“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诺依曼总是激烈地批评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

[9] 希腊神话中的缪斯之一。——译者注

[10] 一次短暂的令人难忘的假期也会有其历史性的时刻：1967年3月，我决定带全家去希腊旅行，从雅典开始，到斯皮特塞岛结束（在那里我完成了一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这是一次精彩的旅行，也是一次略嫌短暂的修业之旅，我们碰巧在雅典遇到了3月25日希腊的独立日。我注意到坦克在主要广场上发出隆隆声，是在为庆典活动做准备，我对家人说，在我看来，好像军方正在为一场政变进行演习。一个月后，“希腊的校官们”确实推翻了帕潘德里欧政府，建立起了他们残忍的统治。我后来发现，他们确实曾利用独立日进行演习。

[11] 歌利亚是《圣经》中记载的被大卫杀死的巨人。——译者注

[12] 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对北越使用武力的决议案。——译者注

[13] 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本叙述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史的书是由杰瑞·埃冯、保罗·斯塔尔和其他校园记者写的《常青藤墙内的奋起反抗》（纽约：斯克里布诺出版社，1968），该书的内容具有“客观的”即时性优势：“弗里茨·斯特恩，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从座位上站起来表达了他的观点，他的话是对大会决议的致命一击。斯特恩之前去了德国……并于4月23日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在看到过德国的激进分子之后，他更加偏爱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了。在他返回后的几天里，他受邀在特设教员指导委员会任职，然后，当威斯汀（该组织的联合主席）感到他对于该组织而言过于保守时，他被

要求离职。当斯特恩开始讲话时，教师们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抬头看着他。坐在斯特恩旁边的是莱昂尼尔·特里林，他对身边这位同事所讲的每个观点点头称是。斯特恩用一种平稳但有力的语调说：‘我完全摆脱了你们的思想和情绪，我对你们决议中的目的和内容都表示反对……我记得仅仅就在十二个小时之前贝尔教授明确表示过，学校行政管理部门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决议中的各个要点，而不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你们现在站出来谴责它，但我未听到谴责另一方的任何类似的声明。’”

[14] 我希望哥伦比亚的经历可以成为其他大学引以为戒的一个教训。那年夏天，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率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哥伦比亚大学骚乱事件。我请求他弄明白哥伦比亚大学的错误远比他和他的委员会发现的要多，绝不仅是宿舍里臭名昭著的裸露的灯泡这类琐事，并且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发生的事件很可能也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他的报告应该确保哥伦比亚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负面的教训。他不停地说这样的事件永远不会在哈佛大学发生。但确实发生了，而且仅仅是一年之后。

[15] 我也对想要完全退出的年轻人感到生气。我曾经用一句极其侮辱人的话来结束与一个自我放纵的嬉皮士亲戚的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讨论：“你甚至连一个公民都不是。”

[16] 1975年7月，乔治·凯南对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刚刚看完了他写的论述法俄联盟的书稿并做出了评论。他似乎能理解我的心情：“历史是一门孤独的事业……还有鼓励我完成这本书的一些话……自我见到你以来，我或是在公共档案馆或是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的斯拉夫语馆藏部寻找资料，在这两种情况中，我都只发现了低级矿石，但并非一点金属不含。”

[17]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寻找替罪羊，一夜之间解雇三名检察官和司法部长，因此被称为“星期六之夜大屠杀”。——译者注

[18] Biafra，尼日利亚东南部一个由分离主义者建立的曾经得到不少国家支持的短命国家。——译者注

[19] 只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我才了解到格夫特非凡的勇气：1968年，他在历史研究所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投票之前示威性地走了出去。

[20] 两者均为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德左翼恐怖组织。——译者注

[2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集》的出版计划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启动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项主要的学术编辑项目。1984年，我加入了该论文集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从那时起一直与该项目及其有时候动荡不安的历史紧密相关。计划中的二十五卷或三十卷中的第一卷已经在1987年出版了。

[22] 当我把我的耶路撒冷演讲稿的一份副本寄给大卫·兰德斯时，他在回复中附上了20世纪20年代向阿拉伯人恳求更多合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有趣评论：他们是“最爱阿拉伯人但是最不了解他们”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听阿拉伯人正在说的话，他们说的是：‘犹太人，滚回家去。’问题是，家在哪里？”

第七章 第四个且被遗忘的德国

我对那道可恶的高墙另一边的生活略有所知。事实上，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了解开始加深了，甚至许多西德人不如我知道的多，尽管对于这第四个德国我的迷恋程度是极低的。我从远处关注着它，在1954年曾经乘坐密闭的军用火车穿过它，并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前和之后在这个国家里面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民主德国给人的诱惑既有被禁止的一面，也有熟悉的一面：被禁止是因为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给予承认，其反美政策是有步骤、有计划的；熟悉是因为它是德国的，尤其使人感到熟悉是因为它是一个警察国家。在那边的家里我会有一种怪诞的感觉，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的母语之国的敌人了。在许多方面，它让人回想起我小时候的经历。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44年，当时同盟国同意将被击败的德国划分为四个盟军占领区，苏联占领区包括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古老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北边有农业用地，中部有工业中心，还有莱比锡和被战争摧毁了的德累斯顿。在红军有效控制下的这块占领区，苏联扩展到了中欧的核心地带。1949年10月，作为对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回应，苏占区也正式成为一个国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与西德一样，东德从其诞生开始，就是一个主权非常有限的国家。而且与苏联其他所有卫星国不同，它不被西方列强承认，因此缺乏一定的合法性；更糟糕的是，它是唯一一个边界可以被渗透的国

家。对于来自铁幕后面的所有国家的人们来说，柏林就是一个逃生出口，苏联在那里紧紧把控着。因此，东德政权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与苏联的永恒友谊。苏联人不得不给予回报，然而在战后初期，他们一直在大声要求以一种不同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德国问题：一个统一的、解除武装的、潜在亲苏的德国国家。1952年著名的斯大林“备忘录”提议举行自由的全德选举以便建立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这是该政策最后一次官方的喘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是阿登纳还是他的西方伙伴，都没有准备好为这场赌博牺牲掉联邦德国与西方的一体化。

从德国被占初期开始，苏联人就吹捧斯大林的战时声明：“希特勒之流来了又去，但德国人民和国家依然存在。”通过坚持他们是德国团结的真正支持者，苏联人希望赢得“他们的”德国人的支持，但与此同时，必需性和报复决定了他们采纳索取德国赔偿的政策，包括拆除工业厂房并将其运往苏联。这意味着东德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当时假设的要复杂得多。在民主德国于1990年瓦解之后，我们就比以前更加了解其结构和政策了，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政权——尽管我们试图通过公开的报道和个人的印象来了解它。

民主德国参照德国的纳粹历史来定义自己。该政权的主要口号和合法性主张是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其可信的公认证据是它的第一批领导人本身就都曾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许多新的官员也被纳粹监禁过：东德的实际首脑沃尔特·乌布利希是魏玛时期共产党的一名冷漠的老将，他最后十年的流亡生活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许多留在那里的德国同志死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的“大清洗”）；甚至在苏联人夺取柏林之前，他们就用飞机把乌布利希和其他一些年轻的同志一起送回了德国。回到德国后，他的使命是要把那些忠诚的人，即希特勒之前共产主义的老兵都组织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德国集中营中受尽了折磨。

乌布利希在原则上和性格上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在自己的党内也是一个无情的统治者，尽管明显地不受欢迎，他还是精心规定了“个人崇拜”。他和许多伙伴认为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追随者，是为社会主义未来而进行最终斗争的战士。乌布利希的主要目标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以至于完全不考虑人力成本。即使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之后，他仍然继续执行这项政策，而且毫不顾忌此时斯大林的继任者给他的警告，让他不要采取过于无情的做法，那只会鼓励已经成规模的大量人员逃离民主德国。东德失去了许多有技术的人才，但至少摆脱了潜在的不满现状者或反对者。

乌布利希和他的共产党人伙伴很早就使一些在苏联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党。“反法西斯主义”是强制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合的基本理由，尽管在魏玛时期，这两个政党曾经是对手，甚至是敌人，它们的分歧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这一论点表面上看似合理，并且充斥着历史遗忘症，其主张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将永远阻止令人担忧的法西斯的复活。尽管遭到在西方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但是在苏联巨大的压力之下，东德社民党在奥托·格罗特沃尔的领导下于1946年4月同意加入共产党。（当我在1957年第一次见到拉尔夫·达伦多夫时，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古斯塔夫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当这一合并于1945年首次被提出来时，他在柏林坚决反对这个尝试。他的立场激怒了苏联人，使他和他的家人立即陷于危险之中。盟军军官鼓励他们逃出西柏林，来到了西方占领区的安全处所，脱离了企图绑架的苏联人的手掌。）新的统一社会党（SED）有各种补充成分：反法西斯群众组织，甚至半独立的政治集团或政党，乔装打扮一番后都变成了东柏林新政权的仆人；他们的虚幻的自由只不过是想要为该政权的民主主张提供实质内容。但是，原先所承诺的在统一社会党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的平等很快就被废除了；乌布利希创建并领导的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占领区对我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我在东德没有朋友，与之没有直接接触，但是我对这个政权的应急体制是很清楚的，否则为什么1947年位于苏占区的柏林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要争取并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在西柏林建立一所“自由大学”呢？

我们许多人对过去战争年代的同盟国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感到遗憾，对其后果也能予以理解。我们需要记住我们应该如何感恩英勇的红军。反法西斯主义仍然有其自身的吸引力和重要性：我们曾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法西斯威胁做斗争，但幸存的敌人仍然藏身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一些南美独裁国家里，同那里的纳粹流亡分子沆瀣一气。在苏联占领区，“反法西斯”既是一个道德上的常识，也是一个或多或少隐秘的政治纲领：为了消除据称滋生了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有必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并将重工业国有化。

奇怪的是，左右两派都迅速清空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历史意义。在左派这边，不仅是在民主德国，这个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来诋毁所有的敌人，用来妖魔化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西德被认为正在向法西斯主义倒退。而在右派这边，至少在美国，它也被用于类似的目的，就像被麦卡锡主义者贴上的标签“不成熟的反法西斯者”那样——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可以合理合法地亲法西斯似的！将法西斯主义狭隘地降为一句口号会搞乱民主思想和实践。反法西斯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最初意味着要反对法西斯主义去破坏所有的法律和尊严。

意外事件引发了我对东德发展的第一次研究。当我还未执教于康奈尔大学，仍然待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哥伦比亚大学当时的新任校长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组织了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智库大会，杰出的美国领导人在会上见面，讨论当前的重大问题，希望他们的审议意见会被“转达给政府和公众”。即将成为纽约州州长的百万富翁外交官

埃夫里尔·哈里曼，把他宏伟的家族宅邸——位于纽约以北约50英里的雅顿庄园，赠送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召开这一非常有价值的大会的豪华会场。

这次大会的首日会议于1951年5月举行，会议专门审视了美国与西欧的关系，这是战后美国为此激烈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朝鲜战争使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紧迫。大多数共和党人是孤立主义者，他们迫切要求某种类似于美国堡垒的东西——一道空中和海上保卫美洲大陆的防线，只留极少量的陆军驻守在国外——而其他人则敦促美国应该主要关注亚洲；大多数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特别是备受吹捧的“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坚持认为西欧的防御是构成美国自身防御的一部分。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欧洲北约部队的最高指挥官，这是美国决心维护西方联盟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1951年2月，艾森豪威尔短暂回到美国，与总统和国会进行了磋商，并以一种在今天可以引起共鸣的方式向全国发出呼吁：“我在欧洲接受的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除非我知道大部分人的意见，即美国绝大部分的公众舆论支持我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否则我的工作将无法进行。”

艾森豪威尔计划从欧洲返回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但杜鲁门于1951年4月决定解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指挥权，因为他“在与其公务有关的事项上无法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这使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此项免职被看成由文官控制军队的胜利，因而激怒了美国的右翼，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宣称杜鲁门的行动“导致全世界相信我们正在朝着绥靖主义的方向前进”。参议院对解职事件展开了调查。因此艾森豪威尔此时回国不是一个好时机。他会去国会山回答有关麦克阿瑟被解职的问题吗？沉默是更可取的。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人承担起了为大会准备背景资料的工作：亨利·罗伯茨被要求起草一份关于美欧关系主要问题的分析，而我则要准备一份按时间顺序描述我们与西欧和苏联战后关系中的事件和计划的文件。和亨利一起工作是非常美妙的，他有着历史学家极其罕见的天赋，他对过去的复杂性的了解使他对现在的看法更加清晰。他特别温和、明智且很有见地，是一位语言风格上的典范，也是一位默默的要求很严的导师。1945年他目睹了苏联在罗马尼亚发动的政变，这让他对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有了初步的认识；虽然他坚持认为苏联可能不是按照固定的蓝图行事，而是根据他们对西方政策的感知而临时做出反应，但他还是看到出现了总体上的支配模式。然而他拒绝接受冲突或战争不可避免的理念。我与亨利合作很密切，我还记得，在很多个下午结束时，我会去他家进行一次我们所谓的快速“思考”，计划中的十分钟往往因不过瘾而变得更长。他的妻子黛博拉是一位极具智慧、充满道德激情的女性，且热情好客。她也在战略情报局服务过，但从未透露她做过的具体工作。我确实相信她对1943年西西里下水道的了解比普通法国文学研究生所知道的要多。

最后，我做出了一个类似于战后六年的小型调查，这六年改变了我们的观念，也改变了世界，这六年充满了风风雨雨、艰难曲折！我们曾经和昔日的苏联盟友一起庆祝对纳粹主义的共同胜利，然而现在却有理由担心，苏联人所推行的扩张政策可能会爆发甚至比上次战争更糟糕的冲突。我试图传达一种对未来的开放的感觉，但相信避免灾难的最佳方法是要意识到这种威胁。

我从这项工作中吸取到的最明显的教训是去看东德在全面冷战的背景下的发展。我写道，“雅尔塔精神”几乎立即就被打破了，主要是被苏联采取的行动打破。雅尔塔协议曾经呼吁在东欧建立民主政权，但是苏联希望在它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国家中建立“友好的”政府，当它发现自由选举产生了独立的、潜在的敌对政权时，就会采

取措施。这完全无视了苏联早期对真正的民主统治的承诺。既然在德国的苏占区一切都是如此，因此人们自然就会对苏联支持德国统一的官方路线产生怀疑。在最低限度上，苏联想要的是一个屈从于它的掌控的东德；最大的目标则是最终能被吸引到它这边来的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

这种在巩固苏维埃政权上所采取的坚定做法在南斯拉夫遭遇了挑战，铁托元帅成功地摆脱了苏联的控制。

我们的背景文件汇编之后分发给了大会，大会于5月21日至25日举行。参会者是一个杰出的团体，其中包括哈维·邦迪、约翰·考尔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大卫·李林塔尔、亨利·鲁斯、雅各布·波托夫斯基、奥格登·里德夫人、亚瑟·苏兹伯格和托马斯·沃森。发表主题演讲的有路易斯·W.道格拉斯，美国前驻英国大使；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杜鲁门欧洲政策的捍卫者；还有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他就孤立主义立场提出了异议，然而，他补充道，“苏联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构成的威胁要比德国曾经的威胁更大”，并警告，“要使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完全准备好去打一场迅速展开的战争……就要完全终止此国国内的所有自由”。

之后，大会分小组开圆桌会议，每个小组各有一位主持人和记录员。作为由哈佛大学法国历史学家唐纳德·麦凯主持的圆桌会议的记录员，我必须准备会议的摘要。亨利·鲁斯在上一次会议上强烈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麦凯嘱咐我从另一个圆桌请来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纳撒尼尔·佩弗，他大声疾呼，支持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府。接下来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意外事件。（美国又花了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个小组就政府在苏联危险背景下的欧洲政策是否明智进行了辩论，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压倒一切的，但也讨论了其他问题，特别是在

可能的北约扩张中将联邦德国包括进去，以及与东亚相比，西欧拥有公认的首要地位，应是我们重点投入的地区。我们的小组承认“苏联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危险，因此西欧必须受到保护。“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可能会导致现代文明的破坏”，但对这种战争的恐惧不应该使我们偏离方向，不去捍卫自由。其他小组也有类似的不乐观的评估。

在我列出的年表中，我描绘了两个德国不同的发展主线，但特别关注民主德国，我们对其知之甚少。苏联正在加强对东欧所有卫星国的控制，东德是其中的重点。后者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是集体主义的又充满了失范行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煽动进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政治狂热状态，情绪被动员起来之后紧接着的却是强制的无能为力行动。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和集会的权利不过是形同虚设，而且不论以前留下了什么异议，全遭到正统观念的压制，无论是在宗教界、新闻界还是教育界。也许有人曾经以为，德国的苏联保护者认识到德国的传统和条件，会允许出现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但到此时，在1948年的捷克政变和新一轮针对“离经叛道的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的大清洗之后，很明显，莫斯科打算更加无情地强化其统治，由或多或少被驯服了的当地的仆从来传递其统一的政策。当时，我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清洗所隐含的反犹太主义扩展到了民主德国，然而那里潜在的种族主义是非常弱小的——这种沉默是由纳粹时代的记忆所决定的。我们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乌布利希和他的副手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表现的那样完全唯命是从，他们也试图维护一定程度的独立，往往希望采取比莫斯科规定的更加激进的措施。乌布利希把他的偏执以及对残酷镇压的偏爱带进了政策。

冷战密集的文化宣传与实际上的冲突在同时升级。西方的努力是特别针对德国的，对欧洲则是笼统的，但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已经长期植入了对共产党像“纳粹”一样企图统治世界的指责，这就减轻了

麦卡锡参议员蛊惑人心的负担（使他绝非独自在利用这个主题）。另外，苏联人发誓要揭露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法西斯的、帝国主义的西方。苏联人原本真的认为，战争的结束会带来另一场资本主义大萧条，随之而来的是高失业率和新成员加入共产主义。但现实变得完全不同。西方经济体变得更加强大了，部分原因在于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之后理解了他们在1918年之后未能掌握的东西：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新的民主国家是很难在经济困难时期得到发展的。

民主德国从未停止过宣传其主要的观点：充斥着前纳粹分子的联邦德国是一股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其对民主德国构成了持续的和严重的威胁。前纳粹分子在联邦德国担任重要职务，这是给左派评论家的礼物。例如，阿登纳的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布克曾经为希特勒的《纽伦堡法令》写过评注。当时，我们不知道在反法西斯的东德有多少前纳粹分子也在活跃着。这两个德国陷入了它们自己的微型冷战之中，彼此肆意诽谤并展开各种形式的间谍活动。

然而与此同时，在德国的这两个地区里最初都存在统一的期望——一开始是真正的感想，认为这种分裂不能够也不应该持续下去，后来则成了一种仪式般的对团结的祈祷。这两个德国彼此展开竞争，西德从一开始就更为强势，其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社会相对自由，边界也对民众开放。相比之下，东德则与外界隔绝，其计划经济面向资本生产而不是消费品，其生活水平——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功的计量尺——远低于联邦共和国。东德的所有东西必须面向东方，其经济融入经互会（苏联集团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其政治处于莫斯科的密切监视之下。东德以各种形式没收和驱逐私营企业的行为催生了一些愤怒和不满的公民，他们中有许多人逃到了联邦德国。这种有事业心的人才的到来是联邦德国的收获，也是其经济奇迹的一个推动力。

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一段时间之后开始的东德自身的经济发展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也被赞为经济奇迹。在苏联的卫星国中，它成了经济引领者。东德人越是吹嘘自己的成功，他们的社会主义邻居就越不喜欢这种德国的新的傲慢态度。在华沙，波恩比东柏林更受欢迎（也更重要）。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就乌布利希而言，在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面前盛气凌人也还是为时过早，但是德国人优于斯拉夫人的习惯再次冒头了。我们现在知道，乌布利希想让民主德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典范的野心触怒了克里姆林宫的执政者。统一社会党领导者知道如何假装顺从，但实际上他似乎已经发展了一种旧的日耳曼风格的新版本：奴性与傲慢融为一体。对此他增加了一项保证，毕竟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产品。除此之外，他是一个僵硬死板的人，缺少幽默感，武断教条。

所以这两个德国逐渐分道扬镳了。德国备受吹捧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保留大部分共同身份的地步。许多西德人在忙着摆脱他们的民族主义激情，转而去拥抱一个新的西欧身份；对东德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未公开承认的漠视，而东德的宣传机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攻击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者，它们被看作在无休止地试图破坏东德，阻碍建立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平等的社会。东德可能落后于有着消费主义的贪婪、追求“物质享乐主义”的西方，但其艰苦朴素的作风显示出道德上的优越性。

在联邦德国内部当然也有关注“两德”问题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也是有宣传倾向的。西德的新教和天主教教会都与民主德国境内受到困扰的和贫困的兄弟们保持着联系，在这个国家里，无神论者按照规定对所有基督徒提出了挑战。在这里，还能发现与纳粹时代有一定的连续性，尽管纳粹党人曾经掩饰他们的无神论倾向，但伪装或接近无宗教信仰的基督徒曾经争先恐后地赶去支持他们。东德政权组织了如

同基督教的圣礼之类的喧嚣的党务活动。顽固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人会受到惩罚——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曾经的宗教改革核心区域。

发生在1953年6月17日的工人事件撼动了这个满怀自信的无神论政权，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乌布利希的政策——这种政策有利于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创造而不利于消费品生产——催生了不满。（几周之前，政府已经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定额，这样做是无视苏联的警告：制订更大的需求计划是有风险的。）这个政权不得不请求苏联帮助平息这一次公开的挑战，尽管在东欧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抗争，在东德这是1989年之前唯一的一次。6月17日发生的事件是战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它有时在西德被政治利用，但这个事件确实意义重大。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写下了自己讽刺性的看法，暗示这个人民感到失望的政府应该予以解散，并选出新人。

我第一次在民主德国的直接体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其首都，发生在一年之后的1954年夏天，当时我正在自由大学任教，匆忙中初次涉足东柏林，因此高级专员科南特还怪我去得太仓促。此后，我还去东柏林拜访过一些与我的工作有关的人士，佩吉和我借此机会去东柏林颇有传奇色彩的剧院观看社会主义戏剧。我看了席勒的《唐·卡洛斯》这部戏剧；剧中大审判官死人一般的面孔与阿登纳憔悴的面貌明显相似。

我还多次前往位于斯大林大道上的宏伟宽敞的卡尔·马克思书店，人们在那家书店可以买到廉价版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可接受的外国作品的译本。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出版企业出版了大量低价出售的授权书籍，以此希望不会留下任何掉队的同志。在出售二手书的部门，人们可以找到传统经典著作的“资产阶级”版本，价格十分低廉。我买了一套旧版四卷本赫尔德的《作品集》，发现扉页上盖了一个现代的印章——贫民区图书馆，没有标明具体地点。这真是一个冷

酷的讽刺：一个启蒙运动哲学家的著作出自贫民区，也许那里就是他曾经本着古老的精神读书的地方。

我还购买了一本大部头书，书名是《德国》，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这本书的编辑于尔根·库钦斯基和沃尔夫冈·施泰尼茨指出，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全面的科学著作”在其1950年版中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当代历史的写作问题，书中指出：“在苏联摧毁了希特勒的德国之后，德国历史学家在自由的科学研究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视角……然而，反动思想在西德的历史学中再次盛行，这是因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实施了一个分裂德国的政策，以便在西德恢复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斯大林大道是东德最自豪的象征，原来的法兰克福大街被盟军炸弹摧毁，在其原址上重建起一排排豪华艳丽的住房，供“工人阶级”居住。在破旧的午餐地点，我遇到了一些“新型的人”，就是苏联“新人”的东德版，我发现他们有些盲目的敌意。我是不是太苛求了？是不是对一个政权的童年记忆和对新政权的厌恶固定了我的印象？我模糊地意识到了危险。

我最初的反应现在给我带来了麻烦，也许这是受到了传统冷战观念的过度影响，将我以前的反日耳曼主义无意识地转移到这种新的变形之上了。也许我只看到了我计划要去看的內容。当然，东柏林的公共基调是浮夸的也是压抑的，但我当时是否意识到东德的经济紧缩与西德的奢侈消费之间差异的心理影响呢？我还有些其他相互冲突的想法，我乘坐一辆美国军车去参观了位于东柏林的巨大的苏联战争纪念碑，一座高耸入云的雕像，其风格堪称世界一流，刻画的是一名苏联士兵，一手紧抱一个苏联小孩，另一只手持一柄剑砸碎了纳粹党党徽，我对此怀有一些崇敬的心情。我是否对一些政治上的怀旧做出了让步呢？当然，如果没有苏联，希特勒很可能会赢得这场战争。纪念

馆里的铭文，以及无名士兵的棺材，都使人回忆起反对“法西斯暴徒们”的斗争，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又将我唤回到了眼前。这座高大的纪念碑纪念的不仅是俄罗斯死者，还有破灭的希望和幻想。

早期的民主德国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诱惑，最后又成了一个承诺：会有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德国。我在1954年的那个夏天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在慕尼黑与我童年的熟人彼得·哈克斯几乎争论了整整一晚上，他现在是个剧作家，计划要搬到东柏林去。他确信东方比西方更自由，他想实现社会主义梦想并与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合作。他说，布莱希特在1947年从美国流亡地逃到东柏林以逃避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这就是美国不自由的明证。我试图劝阻他，但是我慷慨激昂的反驳毫无成效，他还是移民到东柏林去了。看起来，乌布利希政权似乎确实知道如何把艺术捧为反对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并且慷慨地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支持，当然，条件是他们必须是拥护者。^[1]与哈克斯在一起的那天晚上让我有种挫败感，也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坚信美国咄咄逼人的右翼反共主义运动正在帮助它的敌人——无论它还在做什么。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虽然近年来这种观点在美国知识界已经变得不合时宜。^[2]无论如何，哈克斯在1955年付诸行动，布莱希特于一年后去世，于是哈克斯成为民主德国最著名的剧作家——在现政权的宣传者及批评者这两种不同角色之间不可预测地切换着。他的历史剧在西德也成功上演（其中一部是在纽约制作的，乌塔·哈根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他是一位天才作家，也很喜欢写一些机智的很有教育意义的儿童故事，足足写了十五卷之多！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对两个德国都失去了信心，认为这两个德国已经蜕化为文化领域的蛮荒之地。他于2004年去世，直到最后都是一个愤世嫉俗、充满争议的人物。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与东德没有任何联系，尽管我对东欧其他卫星国家的兴趣在继续稳定增长。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所做的秘密报告令人兴奋，报告批判了斯大林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虽然从未在苏联公开过，但是1956年6月国务院发表了这份报告的译本，就此为世人所知——随后的一年迎来了短暂的欢乐，却也有长久的忧虑：就在那年秋天，红军粉碎了匈牙利的反抗，并且波兰人民为解放做出的努力也失败了。

亨利·罗伯茨和他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在一本名为《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反抗》的书中展示了那段时期的一些文件。我永远不会忘记亚当·韦兹克写的那首《给成年人的诗》，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也经常用这首诗来结束我的课，这首诗是1955年在波兰发表的，诗中大胆地要求真理：

学生们被封闭在教科书中没有窗户，
叨啄着我们大脑的秃鹰是那么专注……
我们对这个地球提出诉求，
为此我们没有去掷骰子，
为此百万人丧生于战斗：
为了一个明确的真理，
为了自由的面包，
为了燃烧的理由，
为了燃烧的理由。
我们每天都提出这些要求
我们通过党来提这些要求。

我试图向我的学生解释，被剥夺了自由的人，往往能更好地理解自由，而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或者拥有自由却因为贬低它而不珍惜自

由的人，就未必能理解自由的重要性，他们会认为（像马尔库塞那样）西方自由意味着“压制下的宽容”。

作为坚定的强硬路线者，乌布利希对后斯大林时期的实验表示怀疑，例如赫鲁晓夫在苏联的“解冻”，以及20世纪50年代动摇了东欧其他地区的骚乱。一位著名的德国持不同政见者沃尔夫冈·哈里希受到审判并被关押，其他人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但是恐吓加剧了另一种形式的抗议，表现在东德人通过柏林不断逃往西德。这是反对乌布利希政权的有效证据。

苏联人认识到这种不断的人员外流给民主德国带来的危险，乌布利希也大声疾呼要求结束将西柏林作为通往自由的桥梁。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了最后通牒，要么同盟国同意签署一项和平条约来解决柏林问题，要么苏联与民主德国签署一项单边和平协议，这样就有了取消盟军在西柏林的权利的手段。他这是在虚张声势呢，还是愿意冒在柏林引起战争的风险？

我的1960—1961年度的学术假期是在巴黎度过的。在此期间，我一边写作有关布莱希罗德的那本书，一边近距离地观看在德国上演的这幕戏剧。大卫·兰德斯和我需要使用德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极其重要的资料，然而这个档案馆现在在民主德国境内。美国学者极少，如果有的话，能够获得使用这个档案馆的许可。而且如果去那里的话，还需要多个许可证，包括东德的签证。在去巴黎之前，我向国务院东欧部门负责人核实过，他向我表明：“你进不去的，但如果你非要去的话，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从巴黎写了封信给德国档案馆馆长勒兹克博士，请求允许使用他们的档案。六个星期后，他回复说他已经将我的询问信转交给了内政部的档案部门。这一切令人非常沮丧，所以兰德斯和我去拜访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斯·卡斯泰兰，他已经成了（有同情心的）东德

问题专家。他住在一套完美的公寓里，当时许多著名的左派是如此享受生活的。卡斯泰兰是把我们看作“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来认识的，但他认为东德政府没有理由禁止我们。他将我们介绍给一个法德交流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叫罗兰·勒努瓦。（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仅指东德。）几个月之后，也幸亏有了他，我们获得了使用档案馆的两个权限。

我知道这次旅行的收获将会超过预期，因为我将在一个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国家度过一段时间，首次去访问一个苏联的卫星国。

（到东柏林去是不同的，毕竟柏林仍然处于某种盟国的治理之下。）兰德斯和我于1961年4月17日抵达西柏林的泰格尔机场。我们的东德联系人——维尔纳·里希特博士和他的妻子来机场接我们。里希特的年龄与我们相仿，身材不高，比较胖，是个活泼的家伙，很警觉、外向，也很幽默。当时他在洪堡大学担任高级职务（现在被称为柏林大学），因此有车有司机。（我想他带着他的妻子是因为虽然越境前往西柏林很容易，但他们没有勇气，而这一次是因公务，就给了她一个难得的机会来看看这个地方。）他带我们参观了东柏林的中心地带——靠近威廉大街，过去的权力中心，我们可以见到布莱希罗德银行的遗址。里希特给了我们一些东德的货币，拿走了我们的护照以便为我们办理签证，然后把我们安顿在HO饭店柏林酒吧。由于电梯无法运行，我们只好带着行李走了三段楼梯。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注意到有很多老人和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则几乎就是由我们来代表了，后来我被告知在民主德国七十五岁的男人和四十二岁的男人一样多，年轻点的因战争和移民而大幅度减少了。

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每一个细节都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我们有些与众不同：在这里美国人是“稀有物种”。我尽可能多地向巴黎的佩吉做了汇报，尽管我知道信件检查员可能会读到这些信件。我故意使用了一些带有几分嘲弄的赞美之词，如果把某样东西用“精

彩”来描述，这时我的意思其实是“可怜”。大卫和我在档案馆中找到了过去的痕迹，但令我着迷的反而是怪异的、经常难以辨认的现在，每一个细节都是一幅镶嵌画的一部分，既古老又非常现代。

第二天早上，里希特带我们去了波茨坦的档案馆，通常情况下只是一小段车程，直接穿过城市西部就行。但为了避免在各个边境管制站耽搁太久，他选择了一条绕过西柏林的路线，旅途较长，但方便我们进行有益的交谈。（回程路上，兰德斯和我改坐了火车，火车走的也是一条类似的绕道的线路；这条火车线路用时太长，以至于压抑不住的东柏林人风趣地称它为“人造卫星”，指的是四年前苏联人的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成功地绕地球轨道运行。）波茨坦是一座古老的要塞城市，腓特烈大帝的宫殿无忧宫就坐落在此地，但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曾经的荣耀化成了一个幽灵，似乎凝结在时光之中，古老的鹅卵石街道上没有几辆汽车，倒是偶尔有几辆拉货的马车驶过，其庄严宏伟的别墅群处于衰败之中。这里已经是一座孤城，驻扎着一支数量庞大的苏联卫戍部队。

里希特把我们介绍给了勒兹克博士，当我为我们能获准在那里工作而感谢他时，他似乎被逗乐了或者有些尴尬（显然他本人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就一种我们将要进行的运作方式达成了一致：我们不仅要在几个档案馆工作，还要订购我们所需要的缩微胶片；作为回报，我们将从我们自己的布莱希罗德档案中送出一部分档案的缩微胶卷。一些年轻的档案工作者非常乐于助人；我和其中的布雷特博士保持了好几年的通信来往（最近又恢复了联系），而且我们之间的每次谈话几乎都是具有启示性的。首先，人们想交谈，而我这种人则很罕见，我能说他们的语言，知道他们的过去，但对他们大多数不同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大卫和我在寒冷的阅览室里疯狂而富有成效地工作着，那里的工作人员用托盘给我们送来文件，其中一些文件提供了一些暗示，结果证明这些暗示对我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不能确定他们所承诺的缩微胶片是否可靠，所以我还是用我可信赖的四色铅笔做了大量笔记。眼前的景象是非常奇特的：在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俾斯麦时代生活的线索，而在外面看到的线索指向的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半封闭的现在。

第一次同馆长在他办公室里见面时，我注意到有一位女士也在场，默默地很警觉，表现得也不友好。我以为她是党的代表。事实证明，她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力，并且在第二天，她给我们安排了在波茨坦的住宿，这是一种罕见的特权。因此，我们就从东柏林酒店搬到了一家著名的为将军的寡妇提供服务的公寓式旅馆。看门人是被从波美拉尼亚驱逐出来的，她痛苦地抱怨生活的艰难：你找不到帮手，也就是说佣人，如果你确实找到了的话，你必须付给他们很多钱，而且他们还得同你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她是一个思想守旧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姿势都符合她的阶级和年龄，她对德国人遭受的痛苦充满了怜悯。她允许我打电话给巴黎。（接线员询问了我打电话的目的和我的国籍；听到我的国籍后，她惊讶地喊道：“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吗？”）当我们说再见时，女房东问我离开德国的时候有多大年纪。“十二岁”，我说道。“哦，那样的话在这儿的时间太短了。”我回答说：“这已经足够了。”

在那个星期的周末，布雷特博士和我一起步行了三个小时。我们参观了无忧宫——里面有腓特烈大帝的书房！——以及它的破旧的花园。在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在一些木制栅栏后面，我突然发现了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著名的腓特烈大帝骑马雕像，这是战前柏林的一个重要纪念物。其他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的青铜雕像也散落在周围，或多或少被遗弃在杂草和未修剪的草丛中。我想道，原来你

们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过去的，把它抛到一边，丢在看不见的地方，纯粹作为已经被消灭了的“封建”历史的残余。我记得埃德蒙·伯克对法国人的劝诫：“尊重你们的祖先，你们就会学会尊重自己。”

（几年之后，民主德国也开始宣称拥有一些古老的普鲁士遗产了。）

彼得·哈克斯写了一些关于那段历史的作品——他最著名的戏剧之一就是与腓特烈大帝有关的，因为他想利用历史事件来达到戏剧教育人的目的，他的灵感不亚于莎士比亚和歌德。我到远离东柏林市中心的他的一所小公寓里去见他。自我恳求他不要移民到民主德国之后，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一番亲切的相互问候之后，我们便专心投入激烈的交锋之中。这时他已经经历了东德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变幻莫测，有成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我相信，比起在东德，他的作品在西方能够出版更多，报酬肯定也能更多。（布莱希特已经指明了方向。）但是他将个人失望与政治原则区分开来：对他以及他的更加好斗的妻子来说，世界被“客观地”分为两个阵营——反动阵营和革命阵营，而且这种敌对决定了其他一切。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是根本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优越性和最终的历史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衍生物。为了那个特定的未来，你忍受着今天的贫困。他承认，民主德国的生活很乏味，但仍然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

哈克斯是一位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虽然有时候也会对该政权提出批评，但大多数时候是其支持者。他了解西方的缺陷与不足，但不了解其长处与美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哪怕是片刻。他非常固执地坚持到最后：1990年，他对一个统一的德国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其实质就是联邦德国吞并了民主德国。把世界分成两个阵营，一个好，一个坏，这种观念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消亡。那些支配着唯一剩下的超级大国的思想家，还在利用这个观念来塑造他们的言论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甚至遇到了更加令人称奇的教条主义者。兰德斯与于尔根·库钦斯基保持着友好的物物交换关系：兰德斯给这位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多产经济历史学家寄送美国侦探故事书，这是他的爱好，以换取有关经济史的著作。库钦斯基的人生是一个有才华的仆人和幸存者的令人着迷的故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访问过美国和苏联，到处汲取高雅的文化。他在193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197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宣称在入党后，他没有做过任何未经党批准的事情：“在我看来，放弃党无异于放弃生命、放弃人性。”1936年他逃到英国，在那里继续撰写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状况的书，这是他的很有名望的父亲早已着手的一个项目；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聘请他帮助调查“法西斯”的军工生产。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尽快被派往德国，这样他就可以开始“为党”工作了。为了党，他继续写出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其中很多是从学术的角度阐述德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1982年出版的第四卷中，前九段引文都出自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且完全一致。）1990年以后，他设法去适应新政权，并至少以书面形式承认先前所犯下的各种错误。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在九十五岁高龄时离世了。

在我们品尝了当地所有的美食之后，能吃到一顿德国人的自助餐真是一种味觉享受，这是库钦斯基夫妇在他们家为招待我们特意准备的，他们在柏林的一栋古老的大楼里面有一套宽敞的公寓。晚餐后，在堆满书籍的起居室里，我对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个世纪中的苦难做了一些平庸的评论。库钦斯基夫人放下手中在编织的衣物，然后宣称战争是一件好事，毕竟它带来了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终结。我连忙换了一个中性的话题，真心地赞赏他们收藏的大量书。

“这是我丈夫的第三个图书室”，她挑衅地说道。我陷入了陷阱，就询问起前两个的情况。“第一个被纳粹偷走了”，她解释说；战争结束后，当她和丈夫离开牛津时，英国人又占有了第二个。我对第二个故事持怀疑态度，于是就问了她的第一个图书室的故事。她解释说，那

个图书室最有价值，收藏有19世纪60年代国际工人联盟第一次会议的手写章程。她自告奋勇地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这些宝藏在哪里：纳粹分子将它们存放在东部地区，现在已经落入波兰人的手中。我天真地问道，是否有些交换无法实现。“我们怎么能够去要求可怜的波兰同志归还这些物品呢，他们毕竟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我认为那些“可怜的波兰同志”可能会愉快地用一些德国文件来交换其他作品或档案，但我保持沉默，然后她又开始织起毛衣来了，就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中的德发日夫人^[3]一样。也许她正在把我的名字加在那些该上断头台的人里面。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很少说话，尽管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很有趣的人。我认为他在困难时刻颇具长者风范，善于应对，堪称完美典范。他知道如何校正自己的政治言论，而她却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没有什么可以动摇她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信仰，以及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很久以后，我听到了一些可信的传言，她在牛津时曾经是个苏联间谍。

兰德斯和我是在猪湾入侵事件发生当天抵达东德的。头条新闻都在叫嚣着美国的侵略；支持卡斯特罗的海报比比皆是，“自发的”群众集会到处在进行。“不要干涉古巴！”这样的标语是最温和的攻击形式了。我们现在知道，肯尼迪是在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的推动下，极其勉强地陷入这个不幸事件中去的。当时的官方版本是古巴自由战士在没有美国介入的情况下在古巴登陆了，但是真相很快水落石出，于是肯尼迪恰当地为他对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信任表示后悔。这是一次很明显的失败，非常令人尴尬，对于我们碰巧置身其中的敌人来说是一种福音。“古巴”成了所有私下谈话的主题。

我们的下一站是梅泽堡，一个靠近哈雷的偏僻小镇，纳粹分子曾经从此地撤出大量被他们占有的资产，即普鲁士国家档案，现在位于一座古老的保险大楼内。在火车上和一些车站里，我们看到了大批苏联士兵；在东柏林却难觅他们的踪迹。在梅泽堡也明显有苏联人的存

在，火车站与尤里·加加林广场相邻，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1961年4月宇航员的第一次太空之旅。这个小镇是洛伊纳化工厂的所在地，它是民主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尽管战时遭到破坏并且部分被苏联拆除，尽管核心人员遭受重大损失），这家企业继承了纳粹的一家生产合成燃料的工厂。^[4]笼罩在城市上空的褐煤的气味，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甚至在我们前往档案馆途中所见到的盛开的丁香花也是这种气味。兰德斯和我被安置在一家名叫金色阳光的酒店里，实际上既没有金色也没有阳光，只是一栋建筑物的废墟；我们房间的水池必须用水勺舀到一个桶里去。

在档案馆中，我们得到了极大的礼遇。我们要求的资料会立即提交给我们，但一次只能给我们五份文件。有一天，来了一个苏联历史学家，一堆文件立即被放在他的桌子上，很显然，他的工作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我们在洛伊纳化工厂的食堂吃了午餐，在那里，档案管理员的负责人和经理以及大量的工人混在一起。土豆上面的酱汁很浓，配了少量的香肠，没有沙拉，当然也没有水果——这是一幅德国餐的漫画，价格低得令人发笑。我最终在镇上的一家商店里找到了罐装的保加利亚樱桃，这是唯一可买到的水果，一拿回房间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尽管看上去大家都在平等地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却是一一或者声称是一一东欧国家中最高的。有一次兰德斯和我被邀请到馆长家去品尝周日下午的咖啡和蛋糕，兰德斯谈到了我们的西方世界，包括股票市场，而韦尔奇博士对炒股的机会感到惊讶。他只知道资本主义是敌人，其唯一的特征是剥削；我们把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印象复杂化了。

档案馆的档案非常丰富，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也是一种磨炼。当我们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连续工作时，一些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将军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反对戴高乐及其通过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来结束残酷战争的政策。当他们威胁要将叛乱发展到巴黎去时，东德

的报纸报道说，叛乱分子已经占领了科西嘉岛，巴黎担心会发生伞降入侵。我想要回到巴黎——出于对正在演变的历史的极大好奇，但兰德斯对我想开小差的念头感到震惊；他的职业道德是无可置疑的。所以我留了下来。

当这些重大变化正在发生时，我们却被隔离在东德内部，与西方的消息来源也被切断了，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里没有办法获得直接的消息，在大城市的主要酒店里，人们至少还可以买到一些外国报纸，虽然通常要隔上几天，但在梅泽堡是无法做到的。我只能偶尔打电话给我在瑞士的表弟，从而可以得到继续在发展的局势的细节。最后我听说了戴高乐对法国民众和法国军队发表了讲话，说到“四个退役将军……（他们）拥有一定的敏捷和有限的本事”，他们必须被打垮。“我禁止任何法国人……去执行他们的任何命令……法国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请帮助我。”这个精彩的演讲几乎立刻取得了成功：政变崩溃了，一些将军也投降了，还有一些人则转入了地下。（在我返回巴黎时，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一位法国作家，也是熟人，想立即见到我，他是科西嘉人，与那里还保持着联系，思想上持右翼观点。我们在双偶咖啡馆会面，他告诉我相关“内幕”，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细节：这个阴谋是中情局策划的。不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中情局是最强大的邪恶力量，处于所有阴谋的核心。）

我的东德旅行签证仅限于柏林、波茨坦和哈雷三个地区。（民主德国废除了古老的联邦州，例如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这是与过去的另一个决裂。）但是就在允许的地区之外，靠近梅泽堡，还有一个瑙姆堡，那里有13世纪早期的哥特式大教堂和著名的十二个真人大小的圣徒与当地统治者的石头雕像，最奇妙的是华丽的乌特夫人，带着幸福、神秘的微笑。我渴望去参观大教堂，并参观著名的普夫达学校，尼采曾经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上学。当时尼采在瑙姆堡的存在并没有得到很多承认，尽管有一所尼采家庭博物馆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决定不理睬我的旅行限制而去瑙姆堡，结果发现大教堂因维修而关闭了。我最终找到了管理人的家并恳求他，说我是跑了3000英里路来看大教堂和乌特夫人的；他让步了，破例允许我参观。现在乌特夫人的一张照片还挂在我的卧室里。

当我看完了我想在瑙姆堡看的所有东西时，天已经黑了，我登上火车回梅泽堡。我独自坐在火车车厢的隔间里——牵引火车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就和我二十五年前见过的那种一样——凝视着窗外偶尔经过村庄或小镇时出现的昏暗的灯光。外面的乡村全是老一套，非常破旧，气氛阴郁，早期的标记都已经褪掉了色彩；一切事物的节奏都更缓慢，也更适意。夜间坐火车行驶在这块被禁止的、被遗弃的土地上，我是在做什么呢？在中欧这块对我来说比美国化的西德更为熟悉然而又如此陌生的土地上，我又是在做什么呢？

库钦斯基夫妇和其他忠诚者谈到了下一个伟大的任务——“让农民工业化”，进一步推动集体化，消灭个体农民的思维方式以及解除农民对土地和他们自己的工作的依赖。里希特博士谈到了进入控制论时代的必要性，以弥补技术上的落后。许多人抱怨物质条件明显是低于西方标准的，但大量的海报在吹嘘“大跃进”和集体企业大大超过了生产定额。东德人对“敌人”有着天然粗俗的看法，但对“外国人”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这里没有人对国家社会主义感兴趣，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事实上，这个词是出于明显的原因而被加以避免的。

我在梅泽堡的一个路德派教堂外面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字让我感到震惊：“教堂：有望成为博物馆吗？不，继续存在下去！”我听到了从教堂里面传来唱诗班的挑战的声音，他们在吟唱着路德伟大的赞美诗《坚固保障歌》。这座教堂看上去像一个不提供住宿和避难的地方，与原先在纳粹统治下的情形完全不同。我知道民主德国已经

开始进行激烈的反教会活动，在我迫切想找到抵抗的迹象时，我可能把一个例外误认为是规则了，因为民主德国的教会大多是因循守旧的，有些牧师还可能相信当局的口号“社会主义的教会”，即一个接受社会主义原则和实践的教会。东德的教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真正成为和平运动和异议的避难所。

反对这个政权是危险的，而逃亡则会涉及一笔隐含的、苛刻的交易：一个人要牺牲家庭和所有与家相关联的东西去交换自由和经济改善的机会。常识告诉我们，年轻人和冒险者是第一批离开的人，而其他人则出于各种原因留了下来。潜在的政治对手也离开了，波兰人或匈牙利人却几乎无法做到。因此，留在民主德国的东德人就悄悄地倾向于默认这个政权，或者去求助于早期德国人的“内心移民”的模式，将外在的顺从与内心的冷漠相结合。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保持温顺的德国人实在太多了，相对而言，人们几乎可以将波兰的历史归于英勇的有时是无效的抵抗之列。

民主德国的人民必须为自己做出安排；有些人可能真的受到了政府承诺的激励；大多数人可能抱怨过，但对生活水平的缓慢提高而感激不尽。除此之外，人们可以感谢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医疗保健、充分就业、教育机会，特别是为贫困阶层的人提供的服务。东德大肆宣扬的平均主义是看得见的——为职业母亲提供的食堂、幼儿园、便宜（尽管难以买到）的汽车等。该政权还提供了方便的文化生活：廉价版本的德国经典，剧院和音乐会的廉价门票等。同苏联一样，该党会不时地允许突然爆发出来的更大的自由，但在任何时候，隐秘的和公开的审查都会设置严格的限制。处于逆境中的刺痛给民主德国的文化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兴奋。

东德政权在思想灌输上不遗余力，这方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模式的：苏联非常强调宣传的重要性。西德和东德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

东德的孩子们入学年龄较早（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母亲要工作），党的忠诚者和工人的子女能够有比较大的机会上大学。阶级差异淡化了，工人们能够得到公共假期的奖励，为了奖励取得的成就，或许为了加强竞争激情，该政权颁发了大量的奖章和勋章。苏联是这一切的典范，尽管有不少会提醒你纳粹的行为是很难忽视掉的。我特别注意出自苏联制度的另一个明显的复制品——资金丰富的科学院，其院士享有特权（汽车和司机！）和比大学教授更好的工作条件。民主德国在优秀人才上的投资方式还可以在其往往涉及腐败的对体育运动的支持上得到例证。

尽管我听到不少对缺点的抱怨，但我极少听到有人表达对自由的渴望，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我认为有一小批骨干官员和真正的信徒，然后就是大多数其他人了。这些人一边口出怨言，一边与政权和平相处，被动地希望条件能得到改善。我也没有感觉到任何对德国统一的渴望。民主德国正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存在，在道德上和物质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胜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凭借这样的福音，这时候还会有谁想要统一呢？人们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已经放弃了统一，统一成为一种幻想，或者淘气点说，他们已经把统一的希望私有化了：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实现统一做出了他们私下的安排，即越境进入另一个德国。

当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于1961年6月初在维也纳会面时，后者错误地认为他已经发现了对方的弱点，因为美国人最近由于在古巴猪湾的失败行动而受到极大的羞辱，所以他在柏林问题上咄咄逼人地采取了行动。6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了他之前给肯尼迪的备忘录，重申1958年的最后通牒，威胁要在苏联与民主德国之间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这将自动危害或终止盟军在西柏林的权利——三年来这项最后通牒一直没有付诸实践。肯尼迪理解这场新的柏林危机的严重性，并私下揣测可能会建起一道墙来。他还认为如果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话，那么战争将会从柏林开始，因为他看到东德人的大规模外流威胁着民主德国的存在，这对该政权及其苏维埃保护者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前景。他也知道，除了在国内正等着他的政治后果之外，在西柏林的自由或盟军的权利上做出让步将是对美国的势力和威望的不可接受的伤害。但是核战争将是灾难性的。总而言之，柏林在军事上变得无法防守，在政治上却是不可或缺的。

那年夏天在我回家的路上，由于柏林突变的时局，我被邀请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做各种讲座。其中一次是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约翰·布莱梅尼茨主持的研讨会上，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听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民主德国陷于贫困的评论，他不禁笑了起来。我警告不要忽视在东德所发生的事情，不能相信如一位作家所说的那样，东德是“正在消失的一颗卫星”。9月，我在夏天度假的家里——佛蒙特州罗切斯特的一次教堂晚宴上再次谈到了这一点。在我演讲之后的讨论中，有一个陌生人自称来自佛蒙特州的大城市伯灵顿，他激烈地反对我对这两个德国所说的一切：波恩的外交部现有的纳粹分子比在第三帝国期间更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的结论是，共产党在佛蒙特州的支部派了一名成员来诘问我，对此我觉得很荣幸。

（但这个话题并不是一件小事：2005年春天，当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让我帮助组建一个历史学家委员会，以便对战后德国外交部门中存在前纳粹分子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

1961年夏天，每过一周，局势就更紧张。许多东德人在离开，这是当局强加的经济紧缩政策造成的，其他人则出于不安而逃离，这是一种对逃生舱门可能很快被关闭的担心。我写信给哈乔·霍尔本，我担心柏林危机会导致一场核战争：难道已经没有某种可协商解决的可能性了吗？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希望美国避免一场军事对抗，但也许我在回避使柏林毁于战火的想法。7月下旬，肯尼迪发表了精辟的演

讲，表示愿意进行谈判，然而他补充说：“但是，如果他们对我们使用武力，我们也必须以武力进行抵抗。”

两周后，在苏联不情愿的支持下，东德人挑衅地亮出了他们的替代选项——8月13日，他们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建起了第一道障碍。这是一道高达13英尺的墙，在墙前面有一条布满地雷的死亡带，站在瞭望塔上的东德士兵奉命可以随时射击。（我们现在知道乌布利希一直在无情地迫使苏联人采取行动。2003年霍普·哈里森出版了一本著作——《把苏联人赶上墙》，这个标题就表达了书中的论点。）

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已经“解决”了柏林问题，但不是按照原来的条件；肯尼迪不激化矛盾的坚定性使世界免于了一场核噩梦，但当时西柏林人处于极端恐惧之中，而且一开始美国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舒缓这种恐惧。维利·勃兰特被激怒了。难道这道可怕的墙，隔离了家庭并终止了城内所有的联系，仅仅是一系列毁灭他们自由的步骤中的第一步？美国向西柏林增派了兵力；10月，美苏双方就美国军事人员进入东柏林的权利发生了冲突；美国和苏联的坦克在查理检查站前发生了对峙。但很显然，苏联人比东德人要谨慎得多，而西柏林人则对美国人的坚定信念感到放心。美国重申了它的承诺，两年后，肯尼迪在柏林的出现引发了一阵亲美的热潮，这种热潮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

到了1962年夏天，我知道我需要再次返回民主德国的档案馆工作，但我争取获得续签的直接努力不见成效。8月，我去巴黎找法德委员会的M. 勒努瓦，再次请求他给予帮助。他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东柏林的有关部门，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一份宣传小册子——《柏林问题》。当他打完电话时，我提出由我来支付电话费；他说这是对方付费电话，但也许我会想买这本小册子，只要500个前法郎（约1美元）。我想出于礼貌，这样的要求实在不算什么。他拿着钞票，笑

着说：“我只想告诉你，我们两边都拿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并且应我的要求，他甚至给我安排住在洛伊纳豪华的沃尔特·乌布利希宾馆。

9月我抵达民主德国，这一次我的签证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东德。在梅泽堡，我再次感受到了年轻的档案工作者想要帮助和与我交谈的渴望。有个人解释说，他和其他人之所以选择了档案工作，是为了避免控制着历史学术工作的专制教条主义。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有位档案馆工作人员问道，晚上我们能否一起喝杯啤酒。我便邀请他来我的住处，最后有四个年轻人出现在沃尔特·乌布利希宾馆。我们坐在餐厅里，周围都是东德官员，有些还穿着制服。我的客人们大声地谈论着，对生活在民主德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批评指责，但我因很早就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就建议一同到外面去散步，从而避免让其他人听到。他们拒绝了这个主意，继续着他们的感叹。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感受到了一种略微不同的气氛，在经济状况恶化之时，东德的开放程度反而显得更大了：是否因为柏林墙上那夺命的“严禁通行”标志事实上排除了考虑逃亡的需要，结束了那颇有吸引力但又令人恐惧的诱惑？一旦被关在监狱里，有些人就不顾一切地去抓住新的机会，急于在其内部崛起；其他人则只能心怀不满地退让和顺从。柏林墙拯救了东德；原本被视为临时的东西现在却成永久性的了。这使某些事实不可避免地变得更为清晰，其中之一就是该政权非常不受欢迎。我经常评论道，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国家社会主义从未需要过隔离墙：普通的或是特殊的德国人从来没有过要离开第三帝国的激情。与此同时，这道已经切断了德国人之间大多数通信的隔离墙，进一步削弱了西德对另一个德国的兴趣。

在无忧宫橘园里的波茨坦档案馆内，我发现了1914年以前柏林的警方记录，包括布莱希罗德氏族的记录，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但我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接近那部分档案的，很快从中央档案部门派来了一个态度生硬的监护人，命令我立即离开，要我首先向位于波茨坦城内另一区域的州政府办公室申请许可。我拒绝了，说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必须结束我的工作。我没有动，他就拿了把椅子在小阅览室里坐在我旁边。我很早就结束了，因为结束得早，我就询问档案保管员，他们是否有现成的居特郭茨村的记录，布莱希罗德曾经在那里从著名的普鲁士陆军元帅冯·隆手中买下了很大一块地产。档案保管员查了一下，一无所获，但向我提供了附近一个小镇的情况；我说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人说道。战前，那里曾经是一家巨大且著名的汽车装配厂的所在地。我大声说道：“现在被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拆除了？”周围传来一片笑声。在档案馆闭馆的时候，我打量着我的“监护人”，他肯定有车，由于我不知道怎么去火车站，那么他可否送我去，从而确保我离开波茨坦？他做到了。

离开民主德国我感觉非常高兴，但这第二次旅行还是加深了我对这个既陌生又矛盾的地方的兴趣。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科南特认为我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它，他的坚持是完全正确的。我尝试着尽我所能去了解一切，去弄清许多给我留下短暂印象的事物背后的真相。我可能借助了不同的棱镜来观察事物：从表面上我看到的是古老的东西与普鲁士社会主义“不断积累”的铜锈之间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在另一个层面上，我感觉到在东柏林之外，其乡村似乎比现代化的西德更加有德国味，人们私下使用的是旧时的语言，鹅卵石街道上偶尔见到有车子驶过，并且速度很慢。

我没有时间或耐心去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德国历史的正统叙述，这与我在西德了解到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截然不同。很明显，民主德国声称德国历史上每一个激进的或革命的传统（一个相当贫乏的宝藏）都始于托马斯·闵采尔，一个激进的马丁·路德同代人，一个农民起义方面的煽动者，对此路德曾经予以谴责，闵采尔也为此而被绞

死。东德人被教导要尊敬闵采尔；另一个“英雄”是魏玛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他在1944年被纳粹杀害。反法西斯主义的标语和书籍比比皆是，但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在东德没有人研究，同样它的统治手段也没有人研究，之所以出现这种遗漏，其原因不言而喻。在战后初期，西德和东德的历史学家学会联合组织过会议，但是这个可能的资产阶级学术传播的来源早已被查禁了。这两个德国对它们的过去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我对这个政权产生了兴趣，在这个政权的统治下，如此多的德国人不得不以此为家。在我第一次到此地后，我去了布达佩斯，到那里的国家图书馆做一些补充研究，我立刻感觉到那里有着不同的、更自由的氛围！在一个拥挤的城市公园里，我和一位匈牙利诗人进行了交谈，他谴责了卡达尔政权。

我回到了纽约，带回的更多是好奇心而不是知识。我意识到任何把苏联集团看成铁板一块的观点都需要修改，因为区别仍然存在，其中一些是与民族传统保持一致的。我急不可耐地去探索我所遇到的问题。然而，我的西德朋友和同事很少或根本没有兴趣去听取或谈论民主德国的事情。他们在这方面缺乏兴趣恰好表明了这种未公开承认的隔阂有多么深刻。东德大肆宣扬对西方的恐惧和憎恨，然而在西方，公民们似乎对“另一个德国”漠不关心。

那年夏天，白宫的亚瑟·施莱辛格要求我提供一份关于东德的报告，我写了一篇关于东德“农业部门的实质崩溃”的文章，我曾被告知，这是缘于农民对进一步集体化的抵制。我提到了我听说的许多抱怨——既有来自共产党人的，也有来自政府的批评者的——都是关于与波兰和匈牙利相比，甚至和苏联相比，民主德国在政治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停滞的。尤其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设计了相对来说更加开放、更有生活价值的制度形式。事实上，匈牙利人担心他们政权

的改革主义策略可能只会鼓励乌布利希去实施他的强硬政策，这反过来可能会招致某种更大规模的民众动乱，从而使苏联更加坚持对他们这些国家采取更为压制性的政策。（后来，情况变得很清楚，东德政权总是在敦促莫斯科采取最严厉的做法。这或许是出于担心在建立一个更加放松、更加自由的制度上所付出的努力会危及其统治，或许也是出于德国古老的限制言行自由的传统。）我写道，东德人已经放弃了统一的前景。“他们意识到，与其他任何欧洲卫星国相比，他们更加孤立，更加与外部世界隔绝。对此，他们深恶痛绝。”这种部分的自卑感贯穿民主德国的历史，即使在它取得了可以在卫星国家中吹嘘的经济优越性之后也仍然存在。

我很想知道东德政权对国际承认的渴望是否可能会提供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同盟国承认东德这个国家以换取切实的让步，例如一条通往柏林的陆路走廊？实际上，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乌布利希永远不会做出这种让步，而阿登纳则执拗地坚持由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人。

那年秋季我在美国举办的讲座中提到虽然柏林墙阻碍了西德人对墙那边的人民的兴趣，但观看西德电视台的东德人每天晚上都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西半部是如何繁荣昌盛的，并且处于西方拥抱的光芒之中。（我本人曾在1961年夏天观看过戴高乐穿越西德的胜利之旅，当时他向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表示了敬意。没有哪位负责任的德国领导人敢于以这种方式向这个最近刚被贬低、被打败和被分裂的民族发表如此演讲。似乎戴高乐是为了巩固正式的法德和解而表达了历史性的宽恕。）东德人必须意识到联邦共和国正在日益融入西方，而他们自己则不被允许去巴黎或佛罗伦萨，并且不得不与布达佩斯或列宁格勒去打交道，然而即使在那些地方，总的来说，他们也遇到了蔑视和不信任，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东德肩负着积累起来的全部反德情绪的负担。然而，西德人则因为有可能会受到苏联集团的政府的攻

击，并且没有人将他们指定为“兄弟”，反而受到了友好的尊重（德国马克也起到了帮助作用）。民主德国的公民则成了“丑陋的德国人”。

因此，我敦促人们与东德人建立更多的联系，这样做可能有助于逐步减少对他们的镇压和孤立。他们的政府建造了一道实体的墙，但人们应该阻止再建一道类似的墙去困住其人民内心的愿望。我尽力保持着自己的联系，继续与我遇到的两位年轻的档案工作者以及梅泽堡档案馆中那位年长的服务人员保持通信来往，我会寄书给前者并与之交换信息，后者则是一个热心的集邮者。

1964年1月，我收到其中一位档案工作者写来的关于肯尼迪被暗杀的一封信：“暗杀事件在这里造成的震惊特别大、特别持久。”他告诉我他一直在读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和托马斯·沃尔夫的著作。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新的规定，他和他的家人在圣诞节能够有一天的时间去西柏林探望他的岳母，让她见见刚出生的外孙。他写道，在这种自由带来的喜悦之后，东柏林在他眼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他认为这些情绪会产生政治后果。几个月之后，他写道，在未经有关部门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允许从外部寄书。他对我的教学颇感兴趣：“我们这里对你们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有的只是那些统治阶级怎样垄断教育的陈词滥调。事实上是怎样的呢？”他读到了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报道，说失业者达500万之多，但不可理解的是，经济还在增长：“我们这里一个失业者都没有，相反还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却丝毫不令人满意。”他还写了一些别的直言不讳的信件，有一次提到了“攻击传统观念的人”最近破坏了波茨坦的古代王宫。（就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这位与我通信的人的同事那里也收到一封信，信中严厉地指责了此人，暗示此人已经变成了斯塔西的告密者，并且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在柏林购买了一栋别墅。

我的另一位通信者要求我帮他一个小忙，问我能否确保在信封上的地址一栏表明他的身份是“养老金领取者”，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可以不用为我寄给他的东西纳税了。他抱怨他的退休金太低了，以至于不得不继续工作。“早先的慷慨的养老金再也不存在了。”

我与我的几个联系人继续保持联系，然后，1966年，我在牛津大学休学术假，当时我想给我的家人看看我在欧洲童年生活的一些场景，我们又看到了东德的一些东西。波兰拒绝给我签证，因为我的护照将德国列为出生国，将布雷斯劳（现为弗罗茨瓦夫）列为我的出生城市。（让我宣布波兰是我的祖国这让我觉得既违背史实又非常荒谬：我出生在德国，并且一句波兰语都没有说过。我向波兰大使馆提出上诉：难道一个波兰人出生在战前的利沃夫，1945年被苏联吞并，他就要在他的波兰护照上注明他是出生在苏联？没人给我回复。）

如此一来到弗罗茨瓦夫去的打算只得放弃了，但我们可以从柏林开车经过民主德国去捷克的山区。然而，我们的东德签证只允许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过境，不能绕道而行。我在通往德累斯顿的出口匝道上开车下了高速公路，心想至少要在远处眺望一下那座曾经非常壮观的城市，此时汽车却抛锚了；当错误明显是我犯下的时候，我很害怕不得不与敌对的当局打交道，但此时车子又恢复正常了。尽管如此，像这样轻微的无助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几个小时后，当我们到达民主德国和捷克交界的边境时，德国的边防警察几乎将汽车翻了个底朝天，试图找出可能藏匿在车子里的某个可怜的东德人。搜查花了很长时间，当所有地方都搜了一遍之后，有人又将一块绑在一根长棍上的镜子推到汽车底下做最后一次检查。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没有得到回答，我对自己说这是要检查汽车是否清洁。

相比之下穿越捷克斯洛伐克让我觉得几乎是自由的——又来到了一个童年记忆中的地方。我注意到在曾经是苏台德地区的熟悉的村庄

里，每一处可能会让人想起德国人的过去的印记都被抹掉或凿除了，只留下了打磨的痕迹。我能理解这样做的动机，但对此怀有复杂的感想。我的记忆是不可磨灭的。我们驱车前往布拉格，在那里我指给我的孩子们看我曾经祈祷逃离纳粹的那座古老的犹太教堂。

在这同一次欧洲之行中，以及返回柏林时，我带着儿子一起越过边界前往东柏林。在我们离开东柏林返回时，东德边防警卫想要没收弗雷德的相机，因为他在入境时没有申报。我坚持说那里没有这样的指令，那个警卫反驳说可能只是“措辞不够清晰”。我冲他喊道：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措辞！”我们平安无事地出来了，并且带着相机。这些都是轻微的，轻微的冲突，但我认为，每一次这样的交锋都令我高兴，因为这样的交锋可以被看成对现政权的攻击——以纪念先前的政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没有理由再返回民主德国；我只是跟踪新闻报道，然后有规律地访问东柏林。我忙碌地注视着法国和西德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在东德没有产生任何反响。当东德军队在1968年帮助粉碎了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努力时，我对这个政权的反感加深了。杜布切克的计划对于乌布利希而言不啻为一种诅咒，所以他是针对捷克改革采取军事行动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

尽管如此，乌布利希仍然不受克里姆林宫的宠爱，苏联人很快就厌倦了他的傲慢和他提出的强硬对抗“阶级敌人”的要求。1971年春天，勃列日涅夫催促统一社会党迫使乌布利希退休。比他小十九岁的埃里希·昂纳克成为继任者，此人在魏玛时期快结束时在共产党内崛起，并被纳粹监禁了十年之久；1945年之后，他在统一社会党内稳步上升。

昂纳克一开始就采取了一项有限宽松的国内政策，这是迟到的赫鲁晓夫“解冻”政策的一个翻版。一段时期内，艺术家和作家多少获

得了更大的许可。有关民主德国现实生活的令人吃惊的描述也出现了，最著名的作家是克里斯塔·沃尔夫，他的《分裂的天堂》——一本敏感、坦诚的小说，描述了发生在分裂的国家里的爱情——于1963年问世。总而言之，人们可以看到在东德有令人震惊的人才，尽管其中大部分遭到镇压或被驱逐了。他们的书面和口头的语言（非政党术语）是一种纯粹的甚至旧式的德语，完全没有悄悄进入西德人言语中的那种英式腔调。这个明确的判断出自杰出的小说家乌韦·约翰森，他自愿离弃了民主德国，他的作品主要探讨的是两个德国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在纽约遇到过他，他选择在英国定居。）

然而，与此同时，昂纳克呼吁在国内充分实现共产主义的正统观念，并几乎消除了私营企业的残余。到1973年——在1972年基本条约签署之后，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获得早期成功之后，也是在民主德国政权最终获得一些国际地位之后——他宣称东德已经实现了“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种说法迅速引来了嘲笑并且经常被引用。东德政策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国家不得不放弃或至少缓和曾经最喜欢攻击的目标，即“复仇主义加帝国主义的”西德，因为西德现在在为其提供急需的物质帮助，但东德热爱和平的人民也不得不“屏蔽”与西方的联系。东德的宣传机器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与西德的苦难和资本主义的胡作非为进行了对比。

新近获得承认的民主德国开始索要更多的德国遗产了：统一社会党劝告历史学家们要认真对待德国历史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革命运动中的英雄。

东德的历史经常被改来改去，但是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历史领域内也承担了一种特殊的负担，这是由于东德历

史学家必须与西德的同行进行竞争，他们在方法和政治观点上也存在分歧。在这两个德国里面，你可以发现许多对立的德国历史。

东德有一类特殊的可信赖的“Reisekader”，即巡视干部，他们被认为是坚定可靠的。如果出于职业原因他们接到怀有敌意的国家的访问邀请，他们是可以接受邀请的，条件是他们的家人绝不可以同行。1975年，我的朋友大卫·卡莱奥邀请了一位东德历史学家弗里茨·克莱因到位于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访问一个学期。我了解克莱因和他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的研究工作，因为我们都是弗里茨·费舍尔观点的关键的辩护者，所以我也邀请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做演讲，他是第一位在那里露面的东德学者。我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把他作为一个来自历史学家的天堂的人来欢迎他，并补充说我指的是民主德国的档案宝藏，我的学生们感到吃惊；同任何天堂一样，这个天堂也是“很难进入的”。克莱恩不动声色地谈论着东德在德国历史上的研究工作，重点集中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即希特勒的崛起，基本上重复了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下的定义：将垄断资本主义归咎于国家社会主义。

演讲结束后，我邀请他到我的家中，在喝着威士忌的同时，我埋怨他演讲中的部分内容。他说他在民主德国的行业协会中有一个特殊的职位，由此他能够相当自由地谈论一切，但1928年至1933年这段时期除外。这样坦率的承认是令人震惊的，但随后为了解释斯大林在那些年里坚持德国共产党应该把社会民主党（或者用他们邪恶的词语来表述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视为他们的主要敌人时，则变成极其机敏的诡辩。

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后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寿终正寝后出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克莱因自传中才获悉，他从这个政权诞生之日起就是党员，而且从国外一回来，就被要求汇报他在国外的所有活动。他

试图过上体面的生活，不得不做出让步，以避免出现更加可怕的情况。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表现在他劝告历史学家不要从先验模式中去了解过去，而是要将最严谨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原则相结合。克莱因也赞成对西德历史学家，特别是进步的历史学家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态度，毕竟反动历史学家会“暴露”他们自己的真正面貌。^[5]

虽然东德历史学家在处理国家社会主义问题时有所保留，但西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通往整个德国历史的一个门户。20世纪70年代，大屠杀开始在西方主导集体记忆和情感，在东方这个主题也受到了重视，人们热切地审视并研究这个问题，纯粹的陈词滥调继续被铺天盖地用来向“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共产主义的烈士、“抵抗英雄”以及犹太人表示敬意，但后者并没有被描述为一个受到专门法令规定的野蛮暴行和死亡对待的群体。民主德国的官员们把犹太人包括了进去，但同时也存在组织不严密的地下反犹太主义，在1948年对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审判中这一点昭然若揭。此处也不啻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尽管该政权冠冕堂皇地反对所有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但未经审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仍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古老的日耳曼反犹太主义也依然有势力。

在20世纪80年代，两个德国之间在官方和私人机构层面的联系大幅度地增加了。1983年，我对东德、西德双方联合庆祝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感到震惊。与此同时，施密特以及后来的科尔政府找到了各种方式在经济上帮助东德，同时还悄悄地做出了让东德人在旅行方面受益的让步。在民主德国，党的正统派宣布了一场“和平攻势”，最初该攻势表明是针对美国在德国境内部署核导弹的攻击，这也是一场搅乱了联邦德国的论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统一社会党年轻的党内领导人意识到，民主德国迫切需要改革，这个意识不仅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促成的，而

且受到苏联集团中其他国家不断增多的异议的刺激。与此同时，民主德国的一些团体还试图通过夺取和平的口号来促进改革倾向。

西德和东德在1987年9月迎来了双方之间最高层次的官方接触，当时科尔总理在波恩接待了率团进行国事访问的昂纳克。此时，来自所有西德各政党的政客都试图与民主德国当局建立联系，同时坚称他们没有放弃统一的希望。当时已经处于反对党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继承了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所称的“第二个东方政策”，意思是与统一社会党的密切接触，包括设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在1987年8月制定了一份联合文件，具体说明了他们共同的和不同的原则。艾哈德·埃普勒是西德代表团的负责人，率领东德代表团的则是奥托·莱因霍尔德。社民党代表团希望这份文件可以促进东德人权状况的改善，并对东德再次确认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原则给予过度的相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许多保守派人士）对这次社会民主党和统一社会党之间的合作感到震惊，声称它给共产党带来了额外和过度的合法性，却忽视了刚刚出现的反对派团体。在那段时期内，我多次遇到了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奥托·莱因霍尔德，他充分显露出一种理性。^[6]

其他人的做法如出一辙。1988年5月，赫尔曼·阿克森——魏玛时期的一个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现在是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的外交政策专家——应邀出席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我主持的。他也表达了民主德国的和平愿望，并且受到了美国官员的欢迎。（我当时用“友好的幸存者”这个词记下了这件事，但事实证明我用“友好的”这个词是错误的。）

我也遇到过一些民主德国的政府官员，他们在批评民主德国的现状时非常坦率和直言不讳。1988年在慕尼黑，东德公法研究院的院长

告诉我，民主德国“需要很大程度上的变革”。后来我与罗尔夫·瑞西格进行了多次交谈，他四十多岁，有着无产阶级背景，是一位想从理论分析转向实际改革的社会科学家。正统的共产党官员再次谴责他，这次是因为他与西方同行的接触。他曾经帮助起草了那份社会民主党和统一社会党的文件，他认为那份文件鼓励了政治局内的不同意见。在东德的短暂改革期间，他成为奥托·莱因霍尔德的继任者，担任了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后来成为他自己的研究所的负责人。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东德政权的矛盾处境，一方面在软化其对西方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下决心应对正在东方实践的改革。西德的政治阶层开始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整个东方：与苏联集团的贸易蓬勃发展，而与西方的贸易则不那么强劲。当时，我担心着，“唯恐西方的新冲突可能会颠覆战后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即西德融入西方的意愿。‘西方’这个词近来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些光彩”。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对我来说，西方代表一系列思想和制度，代表一定时期的历史，简单地说来就是代表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正如我在我的第一本书的主题中所试图说明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德国针对西方的长期局部战争的胜利。因此，我绝对相信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公开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决定“西方文明”的存亡。但到目前为止，西方之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个词不仅包括了美国和西欧，还强调了它们的基本原则的共性。减少对西方的承诺会使我深感危险。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担忧似乎是合理的。最令人痛心的一次发生在我一生中最幸运的遭遇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帮助波兰哲学家克齐斯茨托夫·米哈尔斯基在维也纳建立了一所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欧作家和思想家可以在这个“自由世界”中拥有一个临时的家并与西方同行会面。米哈尔斯基与另一位波兰哲学家卡迪纳尔·沃伊

蒂瓦有着密切的联系，1978年之后，我们意识到了他惊人的影响力。几年后，教宗约翰·保罗二世邀请米哈尔斯基到他位于冈多菲堡的夏季府邸组织一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其中第三个议题被谨慎地设定为“欧洲及其后果”。我受邀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德国和欧洲》，文中我简要叙述了德国文化的欧洲性，不论其政治生活如何不同。

那次会议是在1987年8月下旬举行的，恰逢炎热晴朗的天气。我们出席会议的这个群体相对较小，就下榻在教宗宫殿附近的一个前女修道院里，每个人都有一间小小的房间，小到令人感到压抑。冈多菲堡是个小镇，位于阿尔巴诺湖上游，景色如画，美丽的17世纪的教宗宫殿是小镇的主要建筑物，我们的会议就在其中举行。第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教宗从摇摇晃晃的楼梯上走下来，同我们共进晚餐，还坚持由他自己来调饮料。晚餐的气氛是轻松的、半正式的。有人就梵蒂冈的官僚机构询问教宗，他的回答很有分寸。我向他咨询了梵蒂冈的档案，这是历史学家们的宝藏，并提到了大量迄今为止不开放的材料，例如20世纪20年代红衣主教帕切利从德国提交的报告。（我故意没有提及后来更有争议的时期。）当然，我希望他会说：“周一去那里向他们咨询！”相反，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个话题。

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大都很精彩，教宗也积极参与了会上的讨论。他和众人分开坐，他的桌子没有与我们其他人围着坐的那张U形桌子连在一起，但是他对所有议程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切斯瓦夫·米沃什和莱谢克·克拉柯夫斯基都出席了会议，还有蒂莫西·加顿·阿什。维也纳的红衣主教柯尼希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给人印象深刻的人，并且一直是沃伊蒂瓦当选的幕后推手。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也在会上做了演讲，但他们的讨论都只局限于欧洲，而且“西方”这个词并没有出现，这意味着美国没有被包括在大家的对话之中。我对此表示反对，我想知道这个遗漏是不是“欧洲自满情绪的一种无意识的迹象”。欧洲人——此处

我指的是西欧人——在失去他们的全球政治统治地位之后，是否乐意以一个“被这些可怕的巨大的超级大国包围的美德之岛”的面貌出现？我补充说，我们正在出席的这次会议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是美国在战争中拯救了欧洲，美国的行为不仅是简单地出于地缘政治的利益，更是出于与欧洲的亲密关系，在谈论欧洲的时候却忽略美国所展示出的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似乎是错误的。在喝咖啡休息时，我向红衣主教柯尼希和教宗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并敦促召开一个研讨会，用来专门讨论与美国在西方的地位直接相关的主题。我觉得我有着强烈的意愿去这样做，以至于丝毫没有顾忌向教宗和红衣主教提出这样的要求所存在的不恰当性。他们聆听了我的意见——带着不置可否的善意。

教宗和我谈到了弗罗茨瓦夫，即布雷斯劳，这是一个他所熟悉的城市，我们在晚餐时再次进行了交谈。他邀请与会者同他一起参加三种不同语言的晚会，分别以德语、英语和波兰语进行。蒂姆后来告诉我，波兰语之夜是最有趣的。我坐在教宗附近（他的助手——一个波兰修女，坐在我们之间），当话题转向美国的教育时，我提到了在美国聪敏的亚洲学生的重要性。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所招收的学生中大约18%是亚洲人。教宗的葡萄酒令我放松，我补充道：“他们取代了犹太人的位置。”对此教宗回答说：“是的，但他们（犹太人）仍然控制着媒体和金融。”我惊呆了，他是否真的这么认为，或者他的话只是对过去通常的偏见的一个回应？

在为期三天的研讨会结束时，教宗向我们表示了感谢，并且高雅地总结了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在他说话时，面前一页提示都没有，而且他能够在最恰当的时刻精确地在德语、英语和法语这三种语言之间转换。这是一次令人感动的经历，有时候我会想起1979年我在华沙时听过的一个故事，有个忠诚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学生回家后谈起教宗时说：“他是那种能够让你表现更加出色的人。”

那些日子里有一种魔力：冈多菲堡的美景、古老的教宗宫殿、著名的欢快的瑞士卫兵、外部宏伟的大厦以及内部的经典简约。我清楚地记得，教宗的身体非常健康，体现出一种极其仁慈的牧师的仪态，只要看一眼就马上会被他的慈善和深切的同情打动。

与此同时，诡诈的历史又提供了一个人物，又一个被裹挟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的人物，他将对整个东欧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在莫斯科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些西方人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新型的苏联领导人——开明、机智、精明能干，是从一个不同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甚至在他当选之前，他就曾拜访过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并使她着迷。）作为一个现实的共产党人——如果这两者并不矛盾的话，他试图按照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有色镜片。戈尔巴乔夫用行动来落实他的“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承诺。1986年12月，他打电话给陷于困境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邀请他从流放地高尔基市返回莫斯科。萨哈罗夫——人权的捍卫者、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批评者——是西方人眼中的英雄，对于克格勃而言则是一个被诅咒者。“戈尔巴乔夫热”很快在西德和法国流传开来。西欧领导人赞赏戈尔巴乔夫的新奇做法并对此表示欢迎；昂纳克则只能不寒而栗，反过来，他的故步自封和对变革的畏惧激怒了苏联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体制的失败，意识到苏联亟须进行一场彻底的革新。在此刺激下，他实施了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计划。这项计划几乎就是“一场从上而下的革命”，尽管他并没有使用这种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国内，戈尔巴乔夫引用了列宁晚年的批判性著作，声称他的创新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

我一直感到很奇怪的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历史学家贬低了个人的作用，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无名的民众”的力量之上，仿佛列宁、甘地和尼赫鲁、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罗斯福以及丘吉尔都没有证实个人可能在世界舞台上产生巨大影响。而且此时还有戈尔巴乔夫、教宗和纳尔逊·曼德拉！我可能在另一方面犯下了错误。我有时可能会忽略这些“无名的民众的力量”，但是历史也是个人的戏剧，那些时代的产物塑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昂纳克和他的属下从一开始就对戈尔巴乔夫持怀疑态度。这些共产党官员也许是最不理解，更不用说去支持戈尔巴乔夫旨在挽救苏维埃制度的改革，以及他在变革上的冲动。东德的共产党官员发现，他们很难去支持改革开放的计划。民主德国的审查员及时地查禁了一份改革派的苏联杂志《伴侣》和一些新拍的苏联电影；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演讲进行了“编辑”。

东德人害怕了——他们的害怕是有充分原因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们的经济正在衰退并接近破产，但这一点尚未被揭示出来。他们意识到他们未能与西方的控制论革命相匹配。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充斥着整个东欧的动荡和蔓延中的异议。他们又气愤又害怕，然而仍然相信他们在独自保卫着圣杯。

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有访问民主德国时留下的伤感的一页，如同一种意外刻下的铭文，永远不会忘记。每次穿越东柏林都是有风险的。在查理检查站，检查程序非常烦琐，最令人不快的时刻是在检查站的窗口，在那里你得交上你的护照，然后护照消失在看不见的部门里，你只能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同时感觉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艾伦·布洛克、谢泼德·斯通和我去了那个检查站。（我们在那个地方放下了玛里恩·登霍夫去迎接来自西德的来

访者。)在通常的多次等待并通过了几处障碍物之后，我们以为已经完成了检查，此时从黑暗中出现了一个人民警察，拿着一个手电筒，要求我们打开汽车的储物箱。汽车的其他所有部分已经被检查过了，当他用手电筒照到储物箱里面时，大声吼道：“里面有武器、弹药或报纸吗？”

我想，这个问题就像一件送给某个人的礼物，这个人像我一样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海涅对搜查违禁品、珠宝首饰和禁书的普鲁士海关官员的嘲笑：“笨蛋，”他想到，“你们的搜查是徒劳的。我的违禁品就藏在我的头脑中，危险的想法和具有爆炸力的书刊在其中萦绕，当我打开这件行李时，它会对你们造成伤害。”一个多世纪之后，此刻在东柏林，我遇到了与旧时日耳曼人相同的对违反禁忌的思想的恐惧。海涅是对的，或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去证明他是对的。那个可怜的人民警察既是一个回应，也是一个预兆。

[1] 1949年是歌德诞生二百周年，托马斯·曼结束了他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并在瑞士舒适地安顿下来，对两个德国保持着同样不即不离的冷漠态度，但为了纪念歌德，他还是特地出现在位于东部的歌德的家乡魏玛市。但他再也不是民主德国的一位批评者了，就像当年批评希特勒的德国那样。

[2] 2001年11月，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彼得·哈克斯向我描述了他父亲的政治态度，“直到1933年，他才成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然后在希特勒之后成了一名失败的（gescheitert）托洛茨基分子”，并补充说他希望他的父亲帮助过民主德国的建设。这真是一句令人惊讶、语意不明的匹克威克式的话语：作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的父亲在民主德国是会遭到清洗的。

[3] 狄更斯笔下的德发日夫人是个革命者，不停地把贵族的暴行编织成不同的花纹，记录在围巾上，渴望复仇。——译者注

[4] 洛伊纳化工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茨·哈伯利用他的职位建造的，这真是非常奇怪的巧合，并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这家工厂就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化工厂了。当时它的官方名称是国营沃尔特·乌布利希洛伊纳化工厂，这

名字就表明了它的重要性。洛伊纳化工厂的污染程度是首屈一指的，我曾经读到有个被当局流放到梅泽堡的官员患上了哮喘病——额外增加了痛苦。

[5] 克莱因和我交换了我们各自的回忆。他回忆起演讲前在我们家吃晚饭时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他以前从未吃过洋葱，因此困惑于如何去对付它们，而我则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我完全忘记了那顿晚餐。但我记得讲座后我们之间坦率的谈话，可是他却已经忘记了。

[6] 1989年8月，莱因霍尔德寄给我一封他代表我写给民主德国档案馆的信件副本，要求他们支持我当时所做的有关爱因斯坦和弗里茨·哈伯的研究工作。信中的称呼一栏写的是“尊敬的同志们”，信的结尾是“致以社会主义的问候”。

第八章 外国人口中的德国话题

我一直对这个充满异议和抵抗的世界有着浓厚而直接的兴趣——我对德国历史的兴趣丝毫不亚于我对政治现状的兴趣。多年来，我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在这两者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对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并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与不断加剧的抗议活动有关，并使其蒙上阴影的，是不同的国际冲突造成的明显的威胁。在前者带来的危险的推动下，我非常幸运地对后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今的戏剧性场面促使我借助于历史来对它们进行思考，而我在国家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加剧了我在行动上的冲动。其余的动力则来自我的雄心和企盼。

世界政治出现了以赎罪日战争为标志的停顿，我将对此产生的忧虑和反思倾注到了我的文章《战后时代的终结》中去，这篇文章开启了我未曾预料过的冒险之旅，前往我从未涉足过的世界各地，在那些地方，新的印象和旧的主题交相辉映。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德国历史的教训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共鸣。在1977年到1981年，我间断性地周游各国，套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说，这促使我成了“一个忠诚的观众”（un spectateur engagé）。

我完成了《金与铁》——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内，我一直沉浸在欧洲政治和金融、德国的统一（1871年）和扩张、欧洲犹太人的崭露头角和对他们的新的敌意之中——我想着手尝试某种新的事物，以便改变一下我的口味。我回忆起麦克乔治·邦迪对我有关“战后时代”

的反思的兴趣，便向福特基金会提议就欧洲先前的依赖性与现今的欧洲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我想知道，在这个项目上，个人的印象和精心策划的访谈是否可以取代档案。我这个离经叛道的想法是否受到了我的朋友和博学的历史学家休·塞顿-沃森在他早期关于东欧的一本书中的文字鼓励呢？他承认：“我的素材来源主要是人。与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出身的男女对话，能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比文献研究更好的印象。” 身为一名眼光敏锐的观察者和鉴定人，休随时准备出发到任何地方去旅行，只要那个地方能提供特殊的观察鸟类和人类的机会：人类和兽类身上的异国情调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我一直坚持认为德国历史是“欧洲化的”，但在某些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过度地以欧洲为中心。我当然能够理解，尽管成立了欧洲共同体——这一历史性成就本身源于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我毁灭意识，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相对衰落了。面对苏联的威胁和“第三世界”的挑战，一半的欧洲大陆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美国。欧洲“正在度假”，我这样说道。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得到承认，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很不幸地在不断扩大。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77年要求维利·勃兰特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北方”和“南方”的主要代表国组成，以便提出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喜好议论时政的知识分子阶层”变得越来越机动灵活，他们飞往豪华酒店出席为期三天的国际会议，讨论当前的重大问题，如“东西方关系”等——我本人也参加了一些这类会议。

但我想由我自己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欧洲及其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以前与殖民国家有过深刻矛盾关系的人民是如何看待这点的呢？我对我不了解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在研究生院里，一些开拓性的课程就曾经吊起了我的胃口，例如“欧洲的海外扩张”，这是一门极具争议但又极其重要的课程，围绕这个课题引发了无数激烈的争

论。多年来在我自己的教学中，我曾经建议需要对欧洲海外统治的经历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其早期统治者的原始傲慢不应该简单地被反殖民主义或开明的内疚取代。欧洲人曾经的野蛮行径是无可比拟的，是用种族主义的谎言和虚伪包裹起来的，而恐怖和剥削就是帝国主义的印记；但是这些不应该被用来掩盖现在已经部分被忽视了的欧洲在世界上的存在所带来的有裨益的成就。我还想去看一看，在战后时代，非殖民化和西欧一体化这两个最近的世界历史进程是如何在逻辑和时间上重合的。

福特基金会使我的项目成为可能，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十八个月的无薪假期，从1977年1月开始——正是吉米·卡特政府接替了杰拉尔德·福特政府的时候。（即将卸任的国务卿基辛格和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慷慨地为我写了介绍信。）我很享受为这次旅行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一边深入探究新的课题，一边向朋友和专家请教。当我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面前提到了我拟定的行程时，他惊呼道：“你遗漏了那个最重要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我很快就加上了它。福特基金会不仅提供了物资和后勤支持，而且有一封邦迪的信，这封信为我打开了许多大门。其他人给了我大量的人名，包括在写作《金与铁》时我曾经遇到的一些银行家。（我把他们标记为穿便装的外交官。）

于是在4月，佩吉和我动身开始了我们的环球旅行，这次旅行始于阿尔及尔，终于东京；那年早些时候我们去了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对于我这个德语专家的工作来说，更重要的是随后的行程，在来自不同途径的赞助下，我们前往苏联、波兰和中国，就德国和欧洲关系这个主题听取意见并发表演讲。在我的行程的每一站，我都会收到常驻当地的福特基金会的代表（多么能干的一群人呀）和大使馆人员（有着各种不同的结果）发给我的初步的简报。我还会或正式或私下

里去与德国的代表见面。我过着一种类似于记者或外交官的生活，跑来奔去地好像在收集一些网点，有时甚至将它们连接起来。

我原以为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但最终使我最为关注的是诸如旧形式的压迫和新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类普遍的问题。我想我再次听到了童年的回声。几十年来，在我对一些人们不得不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之后，我的这种经历启动了一个互惠的过程：我用德国人的眼睛看到了这些国家，反过来，这些国家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德国的过去。

那是一段难得的好时光，根据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已经成立了，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捍卫人权的美国总统来说，欧安组织最重要的“第三个篮子”及其对人权的保障，变得尤其重要。现在，这个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在不断涌现，以便监督各国遵守新协议的情况；这些委员会对于持不同政见者而言有很大的帮助，当他们试图发出声音时就可以援引《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一些右翼美国人认为“人权”是用来对抗苏联的武器，同时他们对发生在“友好”国家里的罪行却视而不见。玛丽恩·登霍夫和其他一些欧洲朋友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双重标准和虚伪。自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禁止美国政府将最惠国地位扩大到剥夺其公民自由迁徙权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以来，美国一直在向苏联施加压力，要求苏联允许犹太人按照他们的意愿移居海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了以色列）。随着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执掌白宫大权，这一问题和其他人权问题在美国的政策中获得了新的价值。

为了满足我自己（以及福特基金会），我根据我的旅行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收获最大的是丰富的经历，这些经历充实了我的理解。我还保留了有关人和地点、新朋和旧友的珍贵回忆。在书报中读到世上的不平等是一回事，目睹问题的实际人格化是另一回事——在印度马

德拉斯儿童饿着肚子满街乞讨，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入侵感到愤怒，或者以色列人挑战性地决心生存并扩张——我与自我满足的威权主义的支持者进行了交谈，或者首要的是与那些冒着巨大风险反对恐吓和镇压的人进行交谈，无论是在德黑兰或是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莫斯科。我还发现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曲解：我造访了一些危险或存在压迫的地方，然而这些地方在我的童年时代曾经被认为可能是我们躲避纳粹主义的避风港。

我的半官方采访引导着我走进了权力的走廊，同时官方的款待让佩吉和我与外交界和金融界有了短暂的接触，但最有价值的还是我遇到了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当地政府的人。我很庆幸我能有机会短暂地涉足迄今为止完全陌生的领域，与作家、商人、记者、持不同政见者、在职的和不在职的或监狱外的政治家会面。我极有兴致地去聆听有权势的人带有几分克制的谈话，然而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担任重要职务）讲话则更加坦率。我遇到了一些“活档案”，他们是鲜活的信息来源。去见识一下无意中的一句评论会如何揭示迄今为止未曾想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冒险，而且友好的回忆掩盖了那些本来无聊的会面。

阿尔及利亚人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残酷斗争之后终于在1962年赢得了独立，于是我从阿尔及利亚开始行程，以便安静地向阿尔贝·加缪致敬并公开承认这个国家在第三世界中的特殊地位。法国本身因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四分五裂：法国武装部队习惯性地对被捕的怀疑是恐怖分子的阿尔及利亚人施加酷刑，这一事实的泄露在法国引发了日益激烈的抗议风暴。

这个潜在的富裕国家似乎在走下坡路，它就像东欧社会主义在地中海的一个翻版。然而，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甚至那些与法国有着密切的复杂关系的人，也认为恰恰是欧洲正在衰落和腐败，并且他们用

人口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点：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是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每个国家的出生率是相同的；因此，法国（以及西欧的大部分地区）成了吸引北非移民的一块磁石。如此一来，从长远来看就会看到一个老龄化的欧洲，尽管目前它仍然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作为一个博物馆来展示过去的伟大？我听说过“欧洲病”这种说法，这是一种富裕的、自我放纵的、颓废的文化的健康状况。

同时我也即刻面对阿尔及利亚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在经过审查的新闻报道中以及城墙上比比皆是的涂鸦和符号都表达了这一点。我想到了将这些仇恨与早先的恐怖联系在一起的相互缠绕的锁链：大屠杀促使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有一个犹太国家，一个以色列国，这在道义上是令人信服的，并且具有实际上的必要性，但是在1948年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也是其间接的有待确认的受害者。对欧洲大屠杀的回忆使一些以色列人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毫不妥协，特别是针对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后果激起了阿拉伯人的愤怒——尽管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听任巴勒斯坦难民陷于困境而几乎不管不顾。相互间不断强化的猜疑和仇恨充斥着整个北非和中东。

下一站便是开罗——在一个混乱的城市中我又遇到了一条急剧升降的学习曲线。那里的美国大使赫尔曼·艾尔特斯给了我一个初步的情况介绍。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几乎结束了埃及与苏联的密切联系，似乎转而开始了亲西方的进程。（我知道赫尔穆特·施密特非常尊重萨达特。）我怀疑，很可能除了埃及和以色列政府中最高级别的人之外，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测到在六个月之内萨达特会开始他的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耶路撒冷之行。在我的谈话中，没有任何暗示表明公众有意愿希望出现这种激进的转变。

在相当简陋的《金字塔报》报社办公室里，我同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见了面。他抨击了最让他恼火的东西——美国的霸权，他眼中的美国霸权不仅是其军事力量，还有非常令人向往的美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的主导地位。他对苏联几乎毫无兴趣。而富裕的沙特阿拉伯人和海湾阿拉伯人都是可鄙的，他们在里维埃拉拥有别墅，却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漠不关心。他对以色列不抱任何和平的希望。他也强调了人口上的现实：300万以色列人面对着6000万阿拉伯人，每年还有300万阿拉伯人出生。以色列人应该学会与他们的邻国交谈——用阿拉伯语；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被抛弃，就像被赶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定居者那样。与此同时，他认为埃及正在逐渐变成另一个孟加拉国。一种愤世嫉俗的压力减轻了他的忧郁，并使我回忆起巴黎知识分子时髦的左派观点，他曾经在那个圈子里生活。

我遇到的一些埃及作家和诗人曾经是纳赛尔的囚犯，被限制在他们称为集中营的地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担心宗教激进主义的崛起，这种宗教激进主义在阿尔及利亚早已存在，并且——以镜像犹太的形式——也存在于以色列。我的对话者包括塔辛·巴希尔——萨达特的前发言人（他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爱德华·萨义德的朋友），还有路易斯·阿瓦德——一位诗人和阿拉伯文学专家。

随后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度过了忙忙碌碌的十天，白天进行采访，紧接着晚上去看望朋友。发生在赎罪日的攻击仍然在影响着以色列，这是自1948年以来第三次也是代价最大的一次战争。（有一个到处流传的谣言提到了以色列的弱点：果尔达·梅厄总理被认为事先向她的军队指挥官询问以色列如何能打赢一场战争。她被告知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的方式，即借助于一个奇迹；或者是一种奇迹般的方式，而这又将借助于自然的手段。）我与一些政治家、将军和普通公民见了面——尽管在以色列存在职业流动性，相当多的人接连在这些领域内有过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见到了一个传奇人物，坦克指挥官

伊萨拉耶尔·塔尔，个子矮小，但非常健壮，他告诉了我他在1942年至1944年在埃及西部沙漠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经历。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说，现在欧洲的最大贡献将是“生存下去”。在他眼里，欧洲似乎也显得过于疲惫，甚至在石油危机之后变得懦弱了。他猛烈抨击欧洲单纯防御战略的“罪恶”，认为这只是一个优越的大国才能承受的奢侈品，其他国家则需要一个很明确的报复姿态。我们谈到了赎罪日战争。他戏剧性地拿出了一张他与埃及总参谋长加马西将军的合影照片，1973年11月1日摄于101公里标记处；他们直接的联合使命是安排给养并提供给被包围的埃及第三军，但是他们也谈到了战略和哲学，以及埃及社会和世界政治。加马西警告塔尔，以色列人可以占领开罗一百次，但仍然不能打败阿拉伯人，然后补充说埃及已经做好准备结束持续不断的敌对行动。

在一份官方报告中，塔尔曾写道，赎罪日战争使以色列陷入混乱之中，他们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被杀？”这个问题导致了分裂并且“威胁到我们军事优势的秘密——动机和士气”。他坚持认为阿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当我提到施密特总理曾经告诉我的朋友——一位荷兰工业家，他认为联邦德国国防军现在是世界上名列第二的军队，而以色列的军队则是首屈一指的军队时，他笑了起来。其中的讽刺意味是不容忽视的：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一直为他们的军事实力而自豪，对犹太人则是如此蔑视，仅仅将他们视为做买卖的砍价好手和懦夫，现在这种情况却发生了逆转。但我意识到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德国人和欧洲人，尤其是左翼人士，能够比以色列的国家力量更容易处理犹太人的受害者问题。

以色列正处于和平状态，但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且所揭露的各种丑闻打击了其自身的信心。塔尔将军是对的：这个国家第一次对其最终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分歧。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被孤立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对欧洲感到有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的人，几乎所有

与我交谈过的人都对欧洲徒劳无益地屈从于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而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讨厌欧洲人向他们指手画脚地讲述兼并主义的恶行，毕竟欧洲人一直是竞争性掠夺的大师。尽管如此，欧洲仍然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联邦共和国则是其最信任的支持者，仅次于美国。

对于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许多以色列人来说，阿拉伯人的最终目标似乎非常明确，毫不含糊：消灭以色列。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我认识他时他是一位过着平民生活的政治哲学家，对欧洲沦为一个“无能的、依附他人的和浅薄的道德主义的混合体”而表示遗憾。一位总理的顾问告诉我，他确信阿拉伯人所寻求的是以色列的毁灭，他同样也确信以色列继续占领约旦河西岸正在伤害以色列社会并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在私下的谈话中，鹰派与鸽派之间的深刻分歧证实了我的总体印象，即后者愿意谈论以色列的违法行为，但即使是仁慈的外国的批评也被置若罔闻，无人理睬。

我的最后一个谈话对象之前是一位将军，他坚信和平的可能性，但怀疑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有能力说服人民做出必要的让步。“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戴高乐，”他说道，“但是眼前一个都没有。”几个星期之内，这位将军和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就被梅纳赫姆·贝京接替。贝京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并且是恐怖组织伊尔贡的前任首脑，正是贝京在随后的11月欢迎了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但是让以色列拥有一个戴高乐这个梦想从未消失过——可是也从未实现过。

当我们离开时，机场的以色列安全人员感到困惑：这两个从开罗来又要去德黑兰的人是谁？我告别了还将生活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国家里的朋友，然后从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国家前往另一个有着辉煌的过去和令人恐惧的现在的国家，而且在这个国家里我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但事实上我们在伊朗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大卫·洛克菲勒是我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常常见到的朋友，他安排我去面见伊朗国王，国王则回报以让我们知悉：在我们的整个逗留期间，我们都将是他的客人。这令我感到惊愕。我拒绝接受伊朗国王的恩惠，但我们的大使馆坚持说，拒绝国王所提供的款待会被视为一种无礼。我提出了一种妥协方案，我会偶尔接受提供的公务车，从道德上讲，这已经让我“有点蒙恩了”。

国王在他巨大的宫殿里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召见了我们，但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很轻松，只有一个人在场做记录，而且这位领导者看上去非常坦率。他非常乐于谈论欧洲，并对当前政治实况中的细节了如指掌。他认为，欧洲已经患上顽疾，颓废衰弱，有着“一个纵容的社会”所具有的全部罪行，尽管他称赞了基督教文明，却同时暗示了其早期的剥削性质，并声称其大肆吹嘘的民主现在在加速其衰落。国王的话含蓄地证明了他自己的高压统治和庞大的军事力量的正当性。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坚定的专制主义者。他的父亲将土耳其的现代化主义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视为典范；他这个做儿子的可能有类似的倾向——一个为自己寻求显赫声望和为国家寻求强大势力的现代化主义者——但是当他沉浸在富有的西方人的陪伴中时，却对他自己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企业家们渴望得到他的恩赐。

一位美国商人对我深刻地描绘了美国在伊朗庞大的军事和商业存在，他本人也与之密切相关。卷入其中的大约有25000人，他们中多数人抱着“出来发一笔横财”的目的。他特别提到，在任何群体中都被视为冒犯性的对女性的放纵行为，在毛拉及其追随者眼中是尤其大逆不道的。

佩吉和我有时会抽空“逃避”一阵子，比如坐飞机前往伊斯法罕，这是一座宁静的有着众多古老而璀璨的清真寺的波斯古城，与伊朗现代首都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当我要求去看看我在孩提时代就听

说过的德黑兰北部山区的某些地方时，伊方给我们提供了一辆汽车以及司机，供我们短途考察。回来时，在一条狭窄且人迹罕至的路上，迎面快速驶来一辆汽车，这辆车突然转向我们这一侧，显然是想把我们逼下路面造成灾难。我们的司机在最后一刻转向避开了，他后来坚持说这是针对官方车辆的故意行为。

离开国王统治下令人感到压抑的伊朗，我松了一口气，然后期待着下一站印度，福特基金会安排我们住在基金会的新德里宾馆，位于洛迪公园附近的办公区内。当时的人们喜欢说，在印度独立的早期，在首都德里有四个大使馆，美国的、苏联的、中国的，还有福特基金会的，它们的代表们乘坐马车从洛迪公园前往政府大楼。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正在经受着对其自由的可怕的考验。1975年，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总理声称面临经济混乱的危险，从而实施了一项暂停所有宪法保障的《紧急状态法》；反对派领导人遭到逮捕，成千上万的公民未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但她下令在1977年6月举行大选，以为恐吓会为国大党带来胜利；在竞选期间，《紧急状态法》被暂停了。（甘地夫人的反对派赢得了选举——有60%的合格选民给他们投了票。到了1980年，腐败的强制性分子又重新掌权。）

十年前，一位印度社会学家克瓦尔·莫特瓦尼写信给我，说我的《文化绝望的政治》一书对他和他的国家特别有意义；他确认了我书中提供的数据。但是他说他们曾经诉诸一段可疑的过去，而“我所诉诸的过去是建立在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并幸存了七千年的印度的过去，而且这个国家诞生了一些令人景仰的人物，他们塑造了人类的命运，如摩奴、佛陀等。目前的状况让我感到彻底的绝望……而且由于印度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处于转型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在聚集

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腐败，那么，所（预期的）极权主义将会是纳粹或法西斯主义的类型吗？抑或会有温和的性质？”

我知道印度人难以忍受去屈尊俯就于美国，我曾在纽约听过道德讲座，我还曾经见到外交部长克里希南·梅农，他嘲笑了美国的“炫耀富裕”——这并非没有理由。印度人对苏联的生活持批评态度，当然他们的国家作为首要的不结盟国家享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尼赫鲁本人开创的一个角色。对于印度人来说，这两个超级大国同样令人反感，这一点不只是暗示——尽管他们还同等地寻求苏联和美国的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意识到苏联在向印度供应武器，于是开始秘密地支持巴基斯坦。（这是尼克松接触中国政策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在印度，我经常听到各种言简意赅的抱怨，“我们是身处穆斯林汪洋大海之中的囚犯”，这就进一步刺激了印度政府与以色列保持距离，并一直未承认这个国家。

印度似乎是一个奇妙的例子，活生生地展现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在可怕的贫穷和文盲的海洋中，却存在物质和知识的财富。头顶上能听到米格飞机的轰鸣，底下却是水牛在拉着割草机。在一个很多方面仍然处于原始状态和疾病缠身的社会中，工人们却在组装最精密的武器，我感觉这形成了一种疯狂的对照。但是印度现代化的变革中也有让人感到非常自豪的一面，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大使评论说，“在印度的腹地是一个现代化的法国”——也就是说，大约有5000万印度人早已在德里、孟买和其他城市生活在现代科技世界里了——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他确实是对的，因为印度在未来几十年中显示出了非凡的高端科技成就。

最使我感动的是对罗梅什·塔帕尔的拜访，他是一位印度作家、电影制片人和《研讨》杂志的出版人，这本杂志根据《紧急状态法》曾经被查禁，但在预选期间又被允许出版。我们谈到了最近对民主的

侵蚀，他在此中有第一手的经历。他告诉我，印度总理办公室已经警告过他，除非他服从法令，否则他将在康诺特广场被处以绞刑。早些时候，甘地夫人曾经是他的朋友；如今，《紧急状态法》实施前的朋友们在街头纷纷避开他。因此，他把在预选“放松”期间出版的第一期《研讨》杂志专门用来刊载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文章《症状》分析了法西斯主义者在欧洲崛起的原因，并强调了一个国家从早期法西斯主义思想滑向极权主义统治的可能的速度。“我们用这样的一期文章来恢复杂志的出版，但根据强制的预审查制度无法印刷……无耻地滥用权力且违反法律程序……监狱尚未释放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反对党也面临着骚扰。”他写道，这一切威胁到了印度的未来。多大的勇气啊！他将《文化绝望的政治》列为提供了证据的一本书，证实人们可以轻松接受法西斯主义；我很高兴看到我的书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塔帕尔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妹妹罗米拉·塔帕尔——一位著名的古印度历史学家，是20世纪90年代末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的无情敌人，她宣称：“这是1933年的德国在印度的重现。”这样的评论再次表明，德语仍然是一门政治灾难的语言。

佩吉和我是从马德拉斯离开印度的，这是一个极其潮湿、肮脏和污秽的城市，似乎充满了沿街乞讨的孩子。我立即感觉到，在这些孩子身上尊严正在被剥夺，我绝不会忘记那里的荒芜和贫穷。

我们参观了马德拉斯的东印度公司博物馆，馆中展出的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士兵和官员们所穿的厚重的羊毛制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并不仅仅体现在奢侈品上，还体现在主宰和腐蚀当地人上。无论某些动机是多么卑鄙，无论种族主义观点是多么有害，某些英国的帝国主义仆人还会把他们通常繁重的任务看作

一种自我牺牲的责任。印度是个引人入胜的国家。当然，这里是研究欧洲帝国主义的最重要、最神秘的地方。

我们的旅行是如此富有启发性，充满模糊的忧虑，其过于快速的节奏把我们带到了斯里兰卡和雅加达。在那里我被高烧和劳累压垮了，英国大使馆里一位非常善良、称职的印度尼西亚女医生为我进行了治疗；我把她看作女性解放所带来的普遍的有益效果的代表，这是我在西方世界长期以来所理解的。

接下来我们前往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到处能见到急剧变化中的表面现代化，由当地人以及外国人驱动着资本主义的引擎，一栋栋摩天大楼掩盖住了破旧的本土建筑。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当地人和他们的西方朋友坚持认为，在经济增长和“权威”之间有着某种必要的共生关系。

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中，我再次瞥见了这种新的威权主义。这些现代化的亚洲人嘲笑欧洲的“疾病”（特别是英国的“疾病”，因其工会组织正在阻碍着发展），他们声称这就导致欧洲愿意依赖美国。正是在亚洲此地，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某种类似于后来的撒切尔夫人的心态：尊崇勤奋和经济个人主义的美德，蔑视“溺爱”弱者的福利国家。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版本——如果经济上有效的話，那也是血腥的。

东京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日本的经济正处于顶峰，一方面去适应大规模的出口，另一方面又围绕国内市场建立起一道无形的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感到不够安全——因为它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并且非常孤立。美国远在天边并且令人费解，苏联和中国一衣带水但皆为宿敌，其他日本的近邻仍然因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暴行而耿耿于怀。出于一种担心受到孤立

的情绪，日本人谈到了回归自己的根源，谈到了要保留并加强他们文化中的日本的精髓。

1868年明治维新后，德国模式对日本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因此，柏林-东京轴心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尽管同德国保持着各方面的联系，日本也知道如何回避纳粹的要求。我被告知，这种表面上的关怀源于日本人对《锡安长老议定书》神话的信仰，归因于犹太人难以想象的神秘的力量。

但是当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已经“忘记”了他们战时与纳粹的合作以及他们自己版本的闪电战，也“忘记”了他们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其他被征服的土地上进行的卑鄙的恐怖行为。尽管如此，日本历史学家对德国历史仍有浓厚的兴趣，在宁静、美丽的京都，他们邀请我讲述德国的过去；在其后共进晚餐时，我们用德语这种双方最便利的语言进行了交流。

在长达十四周的旅行之后，我回到了纽约和佛蒙特州，我的思绪充满了第一印象和之后的反思：我学到了或体验了很多东西，但一切都发生在奔波途中。我试图搞清楚这一切，凝聚并诠释我的印象，于是我带着通常的痛苦转向了写作。在这一刻，我想起了应该是奥斯瓦尔德·维布伦说过的话：“在我写下来之前，我怎么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发现我对前欧洲统治者的仇恨比我预期的要少得多，也许反帝国主义在西方大学的演讲厅比起在印度人或印度尼西亚人的心中更为激烈。我遇到的许多“进步”人士希望欧洲降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带着令人遗憾的漫不经心，当我心里想着“西欧”的时候，写出来的却是“欧洲”，就像我们当时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无意识地也不合情理地忘记了东欧。）西德人在每个地方都是一种积极的经济和文化的存在，德国殖民历史的相对缺失对此既有帮助也有阻碍。但一般的

态度似乎是：过去的掠夺性强国要比现在的超级大国更好，不论其有仁慈的记录或是虚伪的假象。

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焦点问题。我担心以色列人会将来自国外的善意警告与懦夫行为或再度出现的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来自苦恼的朋友的批评值得以色列的关注，而不是轻蔑的摒弃。就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梅纳赫姆·贝京担任以色列的总理，以色列受到孤立的危险似乎更大了。我的担忧在第二年春天得到了证实，当时西格蒙德·华宝爵士——由德国难民转变成的伦敦著名银行家，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声明，表达了对贝京的立场的不同意见。华宝爵士私下向我解释说：“我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具有示范性的不墨守成规的人，全然不同于以色列国内外如此众多的犹太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可怕的沉默，尽管他们与贝京的观点相左，但是他们心存畏惧，如果公开表示反对贝京的话，他们会在犹太复国主义歇斯底里的社区遭遇批评。”

但我对逐渐加剧的威权主义的担忧是我的主题。在太多国家里，统治者认为现代化和镇压是互补的。我对“微笑的独裁统治”的理念嗤之以鼻，这种说法是对被这些政权监禁的受害者的侮辱。我想让世人知道，不仅是极权主义的独裁者，而且那些现代化的专制政权都在使用酷刑，还惯常地为这种最极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寻找解脱的理由。“我们关于人权的通常虔诚的概述需要在核心部分加上一条最基本条件的具体陈述，这个条件我们认为应该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例如废除酷刑”，我写道。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难以乐观。

我的文章经过具有天赋的编辑比尔·邦迪和外交部的詹姆斯·蔡斯适当修改之后，最终发表了。文章并不是不动声色的——我想我无法用那种模式去写论述当今事务的文章；邦迪写了一张便条给我，指出我的文章与那一期其他文章所提出的硬性思维是“对立的”，那篇

文章是奉献给“权力”的。我认为这是真的：我也对权力的场所感兴趣，但满足于与它们保持距离。

完成这篇文章之后，我就马上动身于1977年8月中旬去完成福特基金会资助我的第二阶段的冒险历程，这次是去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同以前一样，我的准备工作仍然是阅读和向同事咨询，尤其是阿尔伯特·赫希曼——论专业他是个经济学家，但论气质和智慧则是个哲学家，他认识拉丁美洲许多最热心的人士。他列出的一份联系人名单非常宝贵，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会产生神奇般的效果。

最近发生的既矛盾又相互关联的事件撼动了拉丁美洲和曾经统治过它的伊比利亚半岛。1973年，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遭到谋杀，这是美国纵容的一桩暗杀事件，由此皮诺切特将军得以建立起他的依靠残忍镇压来维持的政权，这个政权大规模地严重侵犯了人权。（基辛格似乎也无视人权，在智利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使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们两个人有相似的童年经历。）1976年，在阿根廷，军政府罢免了伊萨贝尔·庇隆并成立了一个特别残暴的政权，正如拉丁美洲的军官们所习惯做的那样。^[1]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于1970年去世，在一段艰难的过渡时期之后迎来了马里奥·苏亚雷斯，他率领社会党在1976年击败了他的共产党对手。在西班牙，转向民主的成功过渡在大元帅佛朗哥之后于1975年在恢复后的君主制下完成了，在信念和性格上都属于民主人士的胡安·卡洛斯成了第一任统治者。这对于那些内战创伤尚未得到承认更不用说治愈的人们来说，不啻一种赐福。西德政府为伊比利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在勃兰特和施密特的领导下，西德在这两个国家里都谨慎而果断地帮助了民主派。勃兰特与西班牙社会党领袖费利佩·冈萨雷斯的关系特别亲密，情同父子。这里存在历史性的正义：希特勒帮助佛朗哥掌了权，现在

勃兰特帮助冈萨雷斯将西班牙变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拉丁美洲人对这两种对立的模式非常敏感。

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的繁华令我感觉太像欧洲了，而且这座城市里充斥着恐惧和欺骗性的常态，这方面与欧洲也十分相近。潜在的非常富裕的阿根廷再次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情况立即加剧了阶级冲突，而此类冲突的根源在于拉丁美洲极为明显的可怕的不平等现象。左翼帮派一直在绑架和谋杀人民，新政权使用特别野蛮的手段来消灭这种恐怖主义及其推定的同情者。成千上万的嫌疑人“失踪”了——遭受酷刑、谋杀，或被简单地沉入大海。

在穿过五月广场应约去见经济部长何塞·马丁内斯·德·霍兹的途中，我看到全副武装的民兵正在驱散一群女人，她们要求知道她们“失踪”了的丈夫和孩子的下落。我认为，这反映了极权主义政权与残酷的独裁统治之间的差别，前者首先就永远不会允许抗议活动。我继续赶路去参加会见，同德·霍兹见面时他解释说，他的紧缩计划是将阿根廷的年通货膨胀率从700%降低到仅仅120%！阿根廷人把这种恐怖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指出未来的战争不会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他们之中。我被告知，阿根廷的游击队员都是富人的孩子，还有犹太人。这些享有特权的儿童是我们这个时代理想主义凶手的原型：聪明、机智、残忍无情，并且能够实施许多暴行。他们的对手同样凶悍，而且更加强大。军方的温和派坚持独裁统治，这样做反过来得到了大部分商界人士的支持，而阿根廷的“体面”人物则聘请暴徒在这场“肮脏战争”中保护他们。

有些军事指挥官十分激进，如同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将军一样。我买了一份阿根廷主要的右派激进报纸《卡比尔多》，报纸上的一篇特写颂扬了瑞士主教马塞尔·列斐伏尔，梵蒂冈很快就因为此人反动的极端主义而对他进行了处罚。报纸上还介绍了已故法国人查

尔斯·莫拉斯的著作，此人是信仰法西斯的思想家。莫拉斯对民主、犹太人和现代世界进行了恶毒攻击，令阿根廷好斗的右派大受鼓舞，这些右派的眼中到处是敌人，当然也包括外国的敌人（例如大赦国际，曾被认为是秘密共产主义组织）。左派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策划镇压叛乱，而官方的恐怖行动都是从北美那里学来的。

有人告诉我，最糟糕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结束了，但是创伤仍然存在。一位经济学家告诉我，夜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辆车在他家门前停下，他仍然会醒过来，仍然会担心可怕的敲门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成了剩下的主要目标，特别是精神分析师（主要是犹太人），他们被怀疑曾帮助或辅导游击队员。阿根廷的40万犹太人不得不做出决断：当地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究竟是一个熟悉但短暂的阶段，还是一个新的和致命的威胁。各种犹太组织的领导人告诉我，犹太人成功地向各层级的天主教寻求了保护，但是教会本身就是分裂的，其中进步的派系加上右翼分子混合构成了对杀害基督的凶手的传统仇恨，他们的仇恨是不敬神的，是世俗化的。我给一位富有的犹太实业家看了一段我在《金与铁》中引用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话：“弄清楚是否今天要离开，或者你是否还拥有直到明天才需要的那种智慧，凭借这种智慧你能够在几十年前就创作出不朽的杰作。”他很震惊，喃喃地说道：“但这确实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世界上那么多人，对他来说选择流亡是很困难的，被迫逃亡可能意味着得到拯救。

我和各种杰出的学者交谈过；阿根廷的大学曾经都遭到清洗，但重要的工作都是在私立学院进行的。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住在破旧的宿舍里，生活在政府的默许之下，并接受示范性的福特和其他美国基金会的支持——日常费用，偶尔还有油印机——更重要的是情感上的鼓励。总部位于阿根廷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伞式组织CLASCO（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的章程将其宗旨定义为找到“一个知识空间，自主的

也是自由的，尽管存在着当时的条件”，其隐晦地涉及了那些已经被关闭的中心，以及因为它们的政治观念而被囚禁、折磨甚至被杀害的同事。（在东欧，乔治·索罗斯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努力，为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和作家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我想到了这类研究人员和作家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他们的不确定的世界中，他们是被埋没的拉丁美洲学术界的英雄，能够见到他们是一种荣幸，同他们见面对他们来说是希望的来源。

我们离开已经褪去光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充满活力的丑陋的圣保罗，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我有着个人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巴西一直是德国流亡者的避风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蒂芬·茨威格。我母亲最小的弟弟弗里德里希是植物遗传学家，曾在圣保罗附近的皮拉西卡巴担任一个大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纽约，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之后。我曾经问他如何能够在实行酷刑的政权下生活，他愤怒地反击：我怀疑，我们的争论证实了我们之前对彼此的偏见；我很介意他的唐突和反动的政治；他可能把我看作一个天真的、无礼的左派。）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同他非常“雅利安”的妻子，一位海军上将的女儿，一起返回德国，但我希望看到我儿时来自布拉格的朋友汉娜·库贝尔卡，我和她一直有通信来往。

我知道巴西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在的财富与非常不稳定的和极端的历史，但其不平等的现象令人咂舌，在这个国家里，极少数富人面对着大多数贫困的往往是文盲的穷人。在20世纪30年代，它遭受了共产党人的起义和获得纳粹强烈支持的法西斯运动带来的动乱。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大多数拉美国家里有着强有力的同情者。然而，巴西却加入了对抗轴心国的战争，并且在文职政府领导下取得了虽然不平衡但惊人的经济增长，直到1964年军队推翻了政府——据其称，这是为了防止一场激进的接管或者是陷入混乱状态；美国对此一直持

同情态度。然而，到目前为止，有迹象表明巴西可能会和平地恢复文官统治。

我所遇见的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点是不满。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是一位著名的激进派社会学家，他曾被一所大学驱逐，但新近获得天主教大学的聘任，他据理反对纯粹的改良主义，认为赤裸裸的阶级制度会促进激进的变革。作为最糟糕政策（la politique du pire）的信徒，他让我感到震惊——这种妄想的政策认为，对于激进分子来说，更糟糕的事情会变得更好。我经常与这些自以为是的“破坏者”做斗争，他们很少意识到事情会变得多么糟糕，以至于无法挽回。

我在巴西所遇到的最具吸引力的人是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他是邀请我上门做客的赫希曼的经济学家朋友。1969年，他的大学职位被解除之后，他成了一家主要研究机构巴西计划分析研究中心的导师，在那里我遇到了他的一些同事；他们似乎擅长将美国社会科学和欧洲人对政治理论和反思的爱好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引起兴趣的混合物。这位有魅力的、低调卓越的思想家，在世界各地的学术界和政治界得到了认可，他摒弃了阿根廷和巴西是法西斯国家的流行的左派立场，赞同在法西斯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保持这种区别（无论多么模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后者毕竟允许变革的希望。卡多佐强调，巴西的局势比1964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好。他认为卡特总统对于人权的立场将对变革过程中的许多国家产生积极影响。他的理性的、自由的观点最具吸引力，当福特基金会的当地代表称他为我们的“皇冠上的宝石”时，我丝毫不感到惊讶。（福特基金会资助了巴西计划分析研究中心。）六年后，卡多佐居然当选巴西总统——我怀疑有很多人想到过这种可能，我自己则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借用赫希曼的一个标题，卡多佐的当选证实了“对希望的一种偏见”。

我们的大使馆要我在贝洛哈里桑塔的第四军总部做一次演讲。整个行程充满了异常现象，以至于我在军事基地的出现也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特别，但也许我这是有点自以为是；当然，我所选择的话题——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挑衅。

欧洲共产主义是一个主要源于拉丁的新奇事物，这个名字是1975年产生的，用以描述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联合声明（后来法国也加入了），宣布它们愿意与所有民主力量合作并接受多党政治制度：这是对列宁主义原则的摒弃，该原则将共产党奉为最高权威。（这三个政党也批评了勃列日涅夫强硬政权的某些政策。）欧洲共产主义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是一场噩梦，但我认为它应该得到认真的对待，而最终的判断则取决于实际行为。目前来看这种提法至少对苏联提出了挑战，呼吁尊重某些人权。我所希望做的只是就其重要性这个问题展开辩论，而不是立即就摒弃它。我的听众悄悄地持怀疑态度，毕竟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是与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做斗争。[\[2\]](#)

军官们很有礼貌地听着我的演讲，但里约热内卢的约瑟夫·布洛赫不以为然，他是那里的一个巨大的出版集团的领导。为了逃避共产主义，布洛赫的犹太家族于1922年从苏俄来到了巴西。他邀请我给他的“高层人士”做一次演讲，主题还是欧洲的共产主义。他极其自满和傲慢，凡是与他的麦卡锡式反共产主义的原始观点不同的东西，他一概嗤之以鼻。在午餐期间，他打趣道：“你很聪明，但我有经验。”在我的演讲结束后，他在拥挤的电梯里重复了这句话，我便回答说：“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我被引荐给了在巴西的德国人，首先是与新任德国驻圣保罗总领事哈特穆特·舒尔策-博伊森的一次会面。他同意我的看法，巴西的大企业和武装部队之间的联盟类似于战前德国企业对纳粹的支持。他知

道他在讲什么，他是反纳粹秘密组织“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哈罗·舒尔策-博伊森的弟弟，这个组织在战争初期给苏联人提供了军事情报；哈罗在1942年被纳粹处决了。哈特穆特·舒尔策-博伊森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并对人权强烈关注，还同反纳粹抵抗力量有联系，他不是一个人普普通通的外交官。

但是，只有当我看到大众汽车巴西分公司位于圣保罗郊外的大型工厂时，我才能真正理解令人震惊的德国在巴西的经济存在，管理这家公司的是沃尔夫冈·绍尔，一位非常自信的首席执行官。大众汽车于1952年建立了这家工厂，当时它担心一旦苏联接管西德，国内的工厂可能会被消灭。这家巴西的工厂雇用了4万名工人，其中只有80名是德国人。绍尔能说一口地道的葡萄牙语，他是新型的帝国建设者：一个有无限能量的人，同时具备良好的社会良知。他敏锐地意识到与他的超现代工厂毗邻的是山坡上的棚屋和贫民窟，这是巴西大部分地区普遍的贫困和文盲的证明。他为自己公司的创新型社会服务和培训工人的庞大的实习体制而感到自豪。大约有12万人通过了该系统的培训，他们是巴西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汽车是巴西最大的纳税人，也可能是最大的雇主，绍尔说，鉴于公司还有尚未利用的潜在的潜力。（他的竞争对手对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他的庞大企业发出的嗡嗡声让我想起了萧伯纳写的《巴巴拉少校》一剧中安德谢夫的武器工厂，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在会见结束时，绍尔建议我在巴西期间，应该去见一见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但此后不久德国恐怖分子就杀害了施莱尔。

在里约热内卢，我同汉娜·库贝尔卡见面的那一天开始时很奇怪。佩吉和我住在科帕卡巴纳海滩附近的一家酒店，清晨，当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海滩游泳时，两股强有力的波浪迅速而连续地把我冲倒了。我非常热爱在海洋里游泳，但在我一生的游泳经历中，这是我唯一一次感觉到了恐惧。我觉得好像有个朋友背叛了我。回到酒店后，

我去找汉娜，期待着1938年时美丽的汉娜会以稍微老一点的面貌出现。然后一个仪态高贵的中年女性出现在我面前——幻想被再次纠正了。黄昏时分，她带我们去了面包山下的一个地方，我们谈起了1938年我们在捷克山区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早上我在海边感到十分担心，晚上又回忆起了早年更糟糕的孩提时代的恐惧，我感觉这两次我都获救了。

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汉娜开车带我们去圣保罗郊外她的实验室。她谈到了她在国际上取得成功遇到的障碍，她说巴西是个“未来的国家，而且永远都是”。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我们的早期经历如何不同，它们都以某种方式使我们能从容应对一切。在我们分别的时候，我们发誓退休后要联手写一本关于我们共同的和不同的人生旅途的回忆录。我们断断续续地保持着通信，但这个计划并未完成，她于2001年去世了。

哥伦比亚——我行程的最后一站——肯定要比阿根廷和巴西更加自由，但是对暴力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首都波哥大就像一个武装营地，精英们住在上流社会时尚又安全的郊区，牵着狗的警卫在街上巡逻。我从罗德里格·博得罗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也是赫希曼的密友。（几年后，他成为维利·勃兰特南北委员会的成员。）拉丁美洲主教会议秘书长阿方索·洛佩兹·特鲁希略主教是一位典型的朴素的老派教会外交官，他教给我的知识远比他原先打算的要多得多。他坚持认为，教会内部的分裂——激进派和反动派之间，“解放神学”的追随者和坚定的反动分子之间——是无关紧要的。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和现代化是不重要的。（2005年4月，红衣主教特鲁希略是红衣主教拉辛格当选为约翰·保罗二世继任者的热心的和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一位新近来自智利圣地亚哥的年轻耶稣会牧师——可以说是来自前线——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在阿连德被谋杀的前几天，人们纷纷赶到教堂，希望可以阻止皮诺切特将军的改变。

这位年轻的牧师证实，一些教会成员——不仅在智利，还试图通过保护单独的抗议者和提出政治要求来捍卫人权。

在拉丁美洲经历了紧张的几个星期后，我写了另一份报告——《镇压与改革之间》，发表在1978年7月的《外交事务》上，并被《圣保罗州报》和其他巴西报纸转载。^[3]在文章中，我推测有可能会重新回到文官统治，并进行改革——结果确实发生了。鉴于拉丁美洲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了阶级对立，我很想知道民主统治将如何建立并维持。我问道，在向民主前进的路上，是否会有一个中转站，就像19世纪早期西欧自由宪政时期的一个阶段，一个以法治为特征的政体，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的承认？为了纠正不公正现象，并使更多的公民参与成为可能，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一个没有酷刑、没有统治者随意发出逮捕威胁的国家，是一个有着某种希望的国家。去问问任何一个囚犯，废除酷刑或任意逮捕是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改善，是否仅仅是一种‘正式的权利’。”今天，我们要有清醒的意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处于几分恐惧的情况下，民主政体是如何力图遏制或取消自由主义保障的，不论是忠诚抑或不去计算选票，这些保障仍然是一个公平社会最基本的要素。

“过去是陌生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做事方式不同。”这句奇妙的开场白来自L. P. 哈特利的小说《送信人》，也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引用，但我发现这句话颠倒过来也是正确的：外国也可以被用来说明过去。1977年秋天，我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去了解其他地方。哥伦比亚大学和我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校期间我会承担额外的责任，而大学则会满足我对负有使命的严肃的旅行的癖好。因此，在1979年春季学期里，我能够接受一项发出已久的邀请，作为埃利·阿莱维访问教授去访问巴黎政治学院，这所学院继承了1870年法国战败后建立的一所学校，旨在培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的共和国精英。1918年德国战败后，遵循这个模式，德国人也成立了他们的柏林

政治学院，学院得到卡内基的支持，并有一支杰出的教师队伍，他们的方向是自由和民主，与大学的定向不同。

阿莱维这个人给我的访问教授这个职务增添了乐趣，因为他是我在学术界崇拜的人。我的第一次演讲中包括了精心准备的对阿莱维的赞美之词，结果却发现学生们对他既不了解也不在意！尽管如此，成为巴黎政治学院的埃利·阿莱维教授是一个梦想，而且锦上添花的还有完美的住所。我用甜言蜜语哄得谢普·斯通将他位于花卉码头大街的豪华公寓租给了我们，紧挨着巴黎圣母院，对面是尚未受污染的圣路易岛，窗外的景色给人以无法逃避的诱惑。我认为谢普是对的，他以习惯性的谦虚声称他的公寓是全巴黎最美的公寓。所以我们就住在这个华丽的地方，然后非常高兴地走到巴黎政治学院去授课，我讲授的课程是“欧洲的法西斯主义，1914—1945”。此外我还就19世纪反资产阶级情绪做了一个讲座。

法国文学中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数量很少，而且大多难以令人满意。法国人还必须要认识到法西斯之前的思想和法西斯政治运动在他们的国家曾经特别强大，他们还没有真正地去认真对待维希政权。他们沉溺于令人欣慰的神话，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要比他们的德国同行少得多。我首先解释说，人们对新威权主义或恺撒主义的极端渴望在1914年以前就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出现了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与旧的保守的民族主义不同，因为它的目标是全民动员，并肯定和实践其对暴力的信仰；它的主要敌人是自由主义，但是它从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普遍并容易操控的恐惧中获得了决定性的好处。由于许多法国学者是左派分子，并且对苏联怀有一种含糊的同情感，因此我的关于斯大林未能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解释，以及他的政策确实间接地援助了法西斯这个事实，引起了愤怒的质疑。

巴黎政治学院中我的一位同行拉乌尔·吉拉德特的言行与众不同。他是研究法国军国主义的历史学家，朴素、保守、善良且令人敬畏。作为一名坚定的法国民族主义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接近抵抗运动，但是因为激烈反对戴高乐“抛弃”阿尔及利亚，按照他的说法，他曾经被投入监狱。我们一起给一些研讨班上过课，我从中了解到了更多关于法国保守主义的知识。当我有疑问或遇到麻烦时，我会向塞奇·胡蒂格求教——我认为他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他安排了我的访问，他是一个完美的主人。

巴黎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奇妙的刺激的地方，但同时又异常地令人感到孤独。我觉得这座城市的美丽让我有时还感到悲伤。同我一起谈论历史和政治的有弗朗索瓦·弗雷，国际问题评论家皮埃尔·哈斯纳、皮埃尔·诺拉，以及阿莱维的学生罗贝尔·马若兰，他是一个有着高卢人的矜持和魅力的经济学家兼管理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一任负责人）。和老朋友在一起并结交新朋友——所有这些特别能丰富我的知识。

我与雷蒙·阿隆见面大多是在柏林的会议上，较少在巴黎。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是一位古老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学派的自由主义者。在他身上闪耀着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忧郁和讽刺的光彩。我们谈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柏林的学习经历，在那里他目睹了希特勒登上权力的宝座；他将其称为政治教育的开端。他有一种强烈的独立性。在以色列赢得了六日战争之后，针对戴高乐给犹太人所下的臭名昭著的、故意含糊不清的定义——“一个有自信的且盛气凌人的民族”，作为一个并不虔诚的犹太教徒和以色列的关键支持者，他以精明的分析和抗议进行了反击。

在另一位历史学家朋友家中吃晚饭时，我遇到了外交部亚洲司的负责人。同以往一样，我们也谈起了以色列这个话题，自美国电视连

续剧《大屠杀》在法国和德国的电视台播出以来，这个主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位外交官想知道死亡集中营和毒气室是否确实存在，“证据在哪里？”他问道。也许所有关于大屠杀的谈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顿晚餐——客人环绕桌子而坐，主人的尴尬，我用不完美的、充满激情的法语表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还有我的内心冲突——是否应该离席。这是我与大屠杀否认者唯一一次在“社交”场合的遭遇，我怀疑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德国。第二天，主人打电话给我道了歉。

我在巴黎期间还被邀请在一个被推迟的纪念汉娜·阿伦特的座谈会上发言，她是在1975年去世的。我以前不是并且现在也不是阿伦特的仰慕者（因此我也对崇拜阿伦特持怀疑态度），但我曾多次见过她，并对她的形而上学的流畅性和欧洲人的傲慢态度印象深刻。在我的发言中，我把焦点集中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上，就她而言，写出这样一本书是很有胆量的。在这方面，我把她比作乔治·奥威尔，我认为这是对她的高度赞扬。我也曾读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但是就这本书来说，我一直感到困惑的是，书中坚持认为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是有罪的——纳粹恶棍是，犹太受害者也是，尽管程度上不相等——而我认为这种坚持有点过分。（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了解到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海德格尔是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中的反面人物。）所以我谈到她的时候，是把她看作一位道德学家，一位在卡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受到德国理想主义训练的文化批评家，然后她经历了被彻底地连根拔起，同时发现被剥夺生活、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和家庭的正常属性是多么容易。对她来说，政治是一种道德戏剧，但她接近政治的方式是拙劣的哲学方式，虽然有时候有点诗意，但很少是历史性的。

1979年3月，在我第三次访问以色列期间，我来到了耶路撒冷，此行是为了参加长期筹备的爱因斯坦百年庆祝活动。这座城市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空气清新芬芳，既有大胆的现代的一面，又体现出令人震惊的古老的传统，两者和谐共存。起初，我犹豫不决地在老城里徘徊，不愿成为一个在可能怀有敌意的阿拉伯人中的旅游者，但我不知不觉陷入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感受到的安全感，这是他们自己的一座城市，要由他们去保存其神秘和价值丰富的过去，并由他们去创建一些令人吃惊的新的事物。耶路撒冷既作为犹太人圣地又作为穆斯林圣地的这种地位及其作为基督教圣地的的重要性，都需要得到细微的关注，以色列政府认为它正在给予这种关注。但是，人们又怎么会没有察觉不那么隐秘的对各方的怨恨，以及在以色列人自身之间强烈的分歧呢？

阿斯彭研究所和希伯来大学计划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其核心是为期三天的研讨会，论述爱因斯坦科学研究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重要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都将受邀出席。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不安。一种熟悉的受欺骗的感觉在我身上涌动，比往常更强烈。我一直喜欢置身于比我更优秀的人之中，这样既会使我振奋，又会使我放下身段，是强化自我怀疑的理想选择，但在这种情况下，活动主题和我的同行似乎压倒了一切。就在开幕式之前，西德驻以色列大使克劳斯·舒茨悄悄地对我说，坐在我前排的格肖姆·肖勒姆告诉他人，刚刚出版的德文版《金与铁》中所有的德文引文都是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原文，这就大大增加了我的忧虑。这是一个令人愤慨和完全错误的指控，鉴于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为德语翻译提供了每一份原始文本，这就更加令人恼怒！但是我认为肖勒姆是把我的书看作一个令人反感的支持同化的论据，是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合作关系的一种辩护，是肖勒姆一生都与之做斗争的一种理念，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从柏林移居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对犹太神秘主义的研究给他带来了全世界的赞誉。

在肖勒姆主持的会议上，以色列学者和我的朋友乌里·塔尔还有我都发了言。肖勒姆首先发表了他冗长的演讲，介绍了塔尔并向我致意。这是一个不幸的开始，但我的论文很受欢迎，肖勒姆不得不劝告听众停止鼓掌。（爱利克·埃里克森认为，我在被他称为封圣的仪式上一直是一位出色的故意唱反调的人。）最后，肖勒姆通过“忘记”发给我每个发言者都能得到的爱因斯坦奖章而破坏了礼仪，但是因为奖章就搁在桌子上，非常显眼，于是我就直接把它拿走了。之后在肖勒姆家举行了招待会，提供了咖啡和糕点，我感到很好奇的是，肖勒姆家摆放浮士德式书橱的地方与很久以前德国学者的家非常相似，比起我在战后德国所见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有德国味”。由以色列总统伊扎克·纳冯主持的正式招待会则全然不同，他否认自己对爱因斯坦具有任何专业知识，并引用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就某个美国政客对本-古里安所做的评论——“他的无知存在差距”——他还说他希望这种情况在他身上也是如此。

我见到了一些以前与我交谈过的人。西蒙·佩雷斯是个不知疲倦的读者，在读完《金与铁》之后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真不幸！我们没有黄金，但对铁的需求是如此之高。”他感觉与欧洲有很强的亲缘关系，他对欧洲的政治家们做过十分独到的评价。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为犹太人做了很多事，但是佩雷斯认为，鉴于他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一旦他们为做了些什么事情后，很快在第二天早上就不得不予以撤销；另外，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安排萨达特访问上，是一位伟大的幕后帮手。佩雷斯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一个思想家，一个沉思者，也是一个选举中的输家。我想，他花时间去谈论民主型领导的近乎不可能性，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偶然的。

但这是和平吗？以色列与埃及的条约即将获得批准，但考虑到巴解组织的混乱结构，佩雷斯预见到西岸的恐怖主义将会越来越多。就在几周前，伊朗的革命力量推翻了伊朗国王，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并

羁押了使馆工作人员。我再次见到的塔尔将军并不认为这是和平；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萨达特就无法达成真正的和平。他认为世界现在把美国视为“一个瘫痪了的巨人”，正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对法国和英国的评估一样。他说，以色列应该归还1967年征服的所有领土，无论是出于审慎原因还是出于人口原因：一个扩大的以色列要么将不是一个平等的民主国家，要么将是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民主国家。而且完全不必担心被围在约旦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国。

塔尔将军是个坚强、现实、有先见之明且大胆的人。他给我看他在1976年写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警告：伊朗国王的政权不稳定；以色列应该准备接纳7万名伊朗犹太人；并且在未来的战争中，伊朗将成为以色列的敌人，而不是在伊朗国王统治下的立场。在我们见面的庞大的国防部里，他说他作为鸽派的一员在长期战略问题上相当孤独，但他在任何战术情况下都很强硬，他甚至可以想象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两年后，以色列轰炸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即使是和平主义的、在维也纳接受过教育的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也担心以色列的未来，并对其朋友的无端侮辱感到愤怒。据说在前往中东的途中，卡特总统说他将访问三个国家，并展示了这三个国家各自领导人的照片：萨达特、贝京和科勒克。而且他后来的感谢信上的地址写的也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泰迪·科勒克”，仿佛这个城市从以色列分离出来了一样。科勒克认为，这种“愚蠢行为”只会加强阿拉伯人的不妥协态度。

以赛亚·伯林曾邀请我到他的酒店去进行更多对话。以赛亚是一个奇迹：他的思维很活跃，与他谈话很流畅，他的想法不断地冒出来，他洞悉人类和历史的弱点！同他交谈是为了吸取蒸馏出来的香槟。但是我不能马上见到他，他先约的客人到了，我只能在旁等候。

最后，艾萨克·斯特恩出现了，以赛亚得意扬扬地授予我们堂兄弟关系，我们两个人在未来的岁月中一直拿这个虚构出来的关系开玩笑。以赛亚对我回忆起他在1945年前后与爱因斯坦的一次会面，当时爱因斯坦曾指责他是一名冷战分子。在那些日子里，误判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者，并将对暴政的自由主义敌意同使苏维埃帝国始终陷于困境的军国主义思想混为一谈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有一点他们是同意的：爱因斯坦曾经公开谴责贝京和犹太人的恐怖主义。以赛亚告诉我，在早些时候，他自己也曾拒绝与贝京握手。

临行前最后一个同我见面的是舒茨大使，他原先在柏林时是维利·勃兰特的至交，并且在他之后继任了市长。我们坐在位于城市高处的客西马尼花园的长凳上，欣赏着它的壮丽，但是又有几分担心。与埃及签署的条约不能给一个巨大的变化打上标记；由于以色列不想放弃西岸，即使建立起一个巴勒斯坦国，也无法容纳所有在难民营中苦苦挣扎的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美国驻特拉维夫领事馆的电话线路也越来越长，因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在考虑着一个曾经不可想象的新的命运：移民。

我们谈到了联邦共和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密切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以及特别的科学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起对他们德国出身的同胞，以色列人似乎对西德人更加宽容。优秀的小说家阿摩司·奥兹刚刚完成了一篇作品，抨击以色列社会并谴责那些希望“在纳哈里亚建立一个柏林复制品”的人。德国犹太人耶克斯几十年来一直是他人最喜欢讽刺和嘲笑的目标。可怜的耶克斯不仅受到纳粹的迫害，而且受到自己人民的嘲弄。奥兹谴责了以色列的堕落，与其早期定居者的希望大相径庭：“我们力图摆脱历史，是否只是为了在这里建立一个波兰或伊拉克的小资产阶级乡镇的可疑的仿制品？……难道我们的社会现在不是分裂为两类人了吗？最差的一类在偷窃和欺骗，最好的一类在竭尽全力去获得他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去给人留下他们并不真

正在乎的深刻印象。”也许奥兹的反资本主义抨击是一种预言式的夸张，但它肯定是一个正确的迹象，预示着一个社会的自我批评能力。

以色列人正在准备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要面对英国托管结束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问题，在独立战争时期，这些问题几乎还是私下悄悄谈论的。从一开始就已经过度了。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强烈的亲切感——对其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同时对他们持续处于战争状态感到悲伤。也许爱因斯坦在谈及他对宗族的忠诚时是对的。我感觉我也属于这个宗族——即使在我的祖父母失去或放弃了这个信仰之后。我很感激以色列朋友接待了我。在许多世界中这都是另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且，在每个世界中都不尽相同。

我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关于爱因斯坦的演讲引来了其他诱人的地方的邀请，也请我去做有关爱因斯坦的演讲，爱因斯坦本人在那些地方曾经有历史性的遭遇，而且我在那些地方还经常发现他生活中一些不熟悉的痕迹。我去了莱顿和位于柏林-达勒姆区的那个传奇般的大厅，爱因斯坦和哈伯曾经常常在那里见面。我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做了演讲。1936年，当我的父母向詹姆斯·弗兰克咨询他们的移民计划时，我被留在停在花园里的车上。这一次，我遇到了玻尔的儿子奥格，他也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还见到了玻尔的遗孀玛格丽特，一位美丽惊人的高挑女性，在困难时期她给众多科学家朋友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在斯德哥尔摩做演讲时我有机会再次与前总理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洛夫·帕尔梅进行交谈。帕尔梅提到了苏联人——当时正处于勃列日涅夫一成不变的老人统治的鼎盛时期——“不要太过猛烈地去推动他们，他们将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句话使我充满

希望，欧洲共产主义可能会动摇莫斯科在其自身一贯正确的教条上的坚持。（令人十分震惊的是，七年后，帕尔梅遭到谋杀。我所目睹的许多政治谋杀事件在不幸地提醒我们，伟大的希望是很容易被掐灭的。）

接着我去了罗马——欧洲共产主义辉煌的核心，并与主要政党的政治家和记者进行了一轮会谈。我感觉到在勃列日涅夫的统治风格与意大利人的策略和灵活性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更不用提意大利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人性，即使墨索里尼也无法将其彻底摧毁。我认为，意大利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在追求权力和真正的变革，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他们可能既伤害莫斯科，又可以使莫斯科受益；我明白他们的社会主义批评者可能比基督教民主党更加怀疑他们的诚意，并且在思考着在这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历史性妥协”的可能性。

我和安东尼奥·拉·佩尔戈拉进行了交谈，他是一位卓越的法官和新任命的意大利宪法法院的成员，我们就是在那里见的面。他担心，面对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仍然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仅仅在一年之前，“红色旅”就绑架了阿尔多·莫罗，将其扣为人质并杀害了他，这位前总理还是一位重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拉·佩尔戈拉赞成建立一个律师和法官的国际组织，以便让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知道自己属于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大家庭，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会觉得这个大家庭是会对他们负责的。（我想到，假如在20世纪30年代就存在这样的团体，当时德国和意大利的法官违反了他们宣誓效忠的法律，他们在面对国际谴责时，很可能会感到良心不安。）在这个问题上，拉·佩尔戈拉是个先锋，因为很快这类组织就蓬勃发展起来。他还成功地推动了欧盟在捍卫人权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我在巴黎的停留让我在身体上和智力上都更加接近了我原先几乎未见过的欧洲的另一半。我们这些欧洲历史学家当然很关心苏联的动荡的东欧卫星国，我们断断续续地听取了苏联政体研究者的意见。但总的来说，我们对东欧的关注是不够的，这样的忽视导致了1945年后的政治和苏联集团的自我保护变得更加容易。现在我决定去一趟俄罗斯和波兰——不是作为旅游者，而是以我的新的“福特模式”，作为一个被接受的对话者。我很想亲眼去看一看。巴黎是计划这样一次旅行的理想场所；这个城市充满了东欧流亡者，就像以往常见的那样。此外，我了解美国学者和苏联学者的许多联系网络^[4]，尤其是关注核问题的自然科学家的网络。

我认为是罗伯特·勒格沃尔德把我推荐给了阿尔巴托夫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这个研究莫斯科的智库的。勒格沃尔德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一个苏联事务的精明观察者，也是教师交流项目的推动者。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是苏联科学院院士，是一个担任要职的特权成员，在这个堡垒中享有美好的生活。来自该研究所的正式邀请是获得苏联签证的先决条件，但苏联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令人沮丧。这时，我的运气来了。在巴黎，我遇到了当时在我们的大使馆担任代表团副团长的沃伦·齐默尔曼，他是一位美国职业外交官，一位智慧惊人、机敏、彬彬有礼、快乐的高个子男人。（他的同样身材高挑的妻子，名字却是有着微小含义的缇妮“Teeny”，和她丈夫一样引人注目，非常活泼、直爽、坦诚。他们之前曾派驻莫斯科大使馆，后来我在莫斯科了解到缇妮非常成功地帮助了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们，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大多数美国外交官不太可能采取的，她把他们的手稿带到了外面的世界。）从这些旅行中我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我们的一些外交官员在智慧和承诺上是令人惊叹的模范，沃伦就是其中一个。他让我与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个资深官员尤里·鲁宾斯基取得联系，他是一个非常不守旧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也是一个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回归到苏联政治早期阶段的人，他帮助我摆脱了困境。5

月24日，我收到了阿尔巴托夫的研究所副所长维塔利·朱尔金签发的一封正式邀请函，我将作为其客人访问一周，届时我将与欧洲和国际事务专家见面：“我希望这样的意见交换将对我国大有裨益。”

我很清楚，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坎坷；因此，对于苏联来说，与西欧的关系就尤为重要。苏联人担心我们与中国明显变得更加密切的关系，而内部经常分裂的卡特政府担心的是苏联在非洲的冒险主义以及针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寻求移民的犹太人采取严厉的处理手段。对于将于1979年7月举行的针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卡特-勃列日涅夫峰会，美方进行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但总的来说，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缓和的关系已经有点趋于紧张了。

我知道阿尔巴托夫的研究所会为我提供正式的接待，但我当然特别热衷于同那些生活在被抛弃的阴暗世界中的人会面。许多法国知识分子非常关心他们的东欧同行，特别是波兰的同行，安妮特·拉博瑞管理着一个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组织，其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东欧（和伊比利亚）知识分子去西欧度过一段时光。罗杰·埃雷拉是一位热切关注人权问题的国务顾问，他给我提供了一份他的俄罗斯和波兰朋友的名单，就像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杰出的俄罗斯文学专家马克斯·海沃德一样，他也许是对俄罗斯形势了解最多的人，还有玛里恩·登霍夫，她有自己的密切的关系网。亚历山大·内克里奇是著名的流亡海外的俄罗斯历史学家，目前在哈佛大学，是《当权的乌托邦》一书的合著者，他给了我一份联系人名单，并补充说：“拜托，请不要在电话中提到我的名字，但是如果你私下遇到他们，请转达我最热烈的问候。”

关键人物是叶菲姆·埃特金，一个最近流亡的俄罗斯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原先是列宁格勒赫尔岑教育学院的文学教授，此时在索邦大学任教。他是一个完美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明智，带点

讽刺和忧郁，在他富有表现力的脸上记录下了痛苦和一点点恶作剧。作为一名退伍老兵和被学生敬爱的老师，他在勃列日涅夫风格的苏联的压制下吃了不少苦头。1964年，他在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审判中作为辩方证人，后来拒绝放弃辩护；他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朋友，并被指控为他保存了一本地下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他曾经写过一封信《致年轻的犹太人》，敦促他们从苏联移民海外——所有这些活动都在1974年提交给埃特金执教了二十三年的赫尔岑教育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作为使用“敌人的策略”的一个“反苏叛徒”的罪证。在一次讨论埃特金案件的会议上，有人读了他的辩护状：“我尽我所能激起我的学生对诗歌语言的热爱、对人文学科的兴趣和对真正的文化价值观的尊重。”但是，在克格勃特工莅临现场观看和倾听的情况下，学院里的教工猛烈地抨击他。^[5]通过无记名投票，他的同事们一致投票决定解雇他并取消他的头衔。他还被驱逐出了作家联盟，并在那一年离开了苏联。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埃特金解释了对他所做的一切，并指出对他不利的是他的犹太人身份，因为“反犹太主义的混浊洪水在我们的土地上再次泛滥成灾”。（我认为，这样的反抗在纳粹统治下是没有类似情况的。）他说，他同事的不当行为应该归因于“令人心寒的、令脑筋麻木的、使熟人噤声的、不能克服的、可耻和可怕的一一恐惧”。

埃特金来到我们在巴黎的家中，我对他可谓一见如故，由于他的表情和他谦虚的善意立刻让我想起了我青春期时在纽约的苏联朋友奥辛卡·布卢门菲尔德，这使我对他更有好感。他提议给我他的朋友们的名字，但只是在我获得签证之后。那时他生病了，于是派他美丽的女儿玛莎来看我；她添加了一些她在列宁格勒的朋友的名字，所以我拥有了两代人的有价值的联系人。^[6]

到6月中旬，佩吉和我的文件都准备就绪了，于是我们前往莫斯科。我感受到一种期待着的热切的矛盾心态，既憎恶又钦佩。转瞬即

逝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席卷而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似乎标志着解放和艺术自由，但最终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又变成了偏执的疯狂；令人大开眼界的对苏德协议的背叛；德国在1941年发起的野蛮袭击以及此后俄罗斯人民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为期两年的对列宁格勒的围困，切断了其数百万人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红军的力量，以绝望为代价击败了迄今为止未被击败过的纳粹国防军。我不久前刚如饥似渴地读了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写的《对抗希望的希望》，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我们都是是一样的：或者是自愿前往屠宰场的羊，或者是刽子手可敬的助手。”我想我的矛盾心理表明，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完全将这两种政权混为一谈。

在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我们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格尔雅·戈尔罗沙，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苏联国际旅行社导游兼陪同，被研究所派来为我们提供服务；至于她有无其他身份，我就只能猜测了。当她开车带我们去城里的时候，她指给我们看一个简单的纪念碑，标志着1941年12月德军前进部队被阻止在郊外的此地——距离红场才几英里。眼前实际景象比描述事件的文字更加令人难忘！假如德国人那时走得更远一些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将会完全不同。我们经过了传说中的文化和休息公园，随处可见革命的标志和列宁的图片，然后她带我们下榻在专为外国游客设计的阿卡迪米斯科酒店：酒店位于莫斯科郊区一个寒冷、古老但合乎要求的地方。

安顿下来之后，我马上想打电话给我的联系人，我知道该怎样做：只能用街上的公用付费电话打电话，并确保我没有被人监视。当然，格尔雅无法帮助我解决戈比短缺的问题，收集这些硬币需要一些小技巧。

我不知道在阿尔巴托夫研究所我会遇到什么情况，研究所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一座经过翻新的大厦里，就在加里宁大道后面，但我很快获悉我将与研究所的一些成员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话题广泛，从SALT谈判（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和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到诸如欧洲和冷战起源等问题。在第一天，我和阿尔巴托夫一起度过了九十分钟，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理性的人，带着一丝讽刺意味；他讲话用的是非意识形态的语言，避开了传统的陈词滥调。鉴于我对欧洲的兴趣，他说，我到这里来是对的：“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这也成了潜在的主题，但阿尔巴托夫一直暗示欧洲，此处他指的是法国和德国正在与美国渐行渐远：这无疑是苏联人所希望见到的，也是他们打算要利用的，但这也是淡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冲突不可避免这种教条观点的一种方式。对“我们是欧洲的一部分”坚持不懈的强调，是一种超越政治现实的愿望，也为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以名言“欧洲共同家园”庆贺与欧洲的缓和做了一个铺垫。

由于不同因素，阿尔巴托夫和我都是美苏缓和的坚定支持者，但我们也有争议和分歧。我对SALT的细节了解甚少，但在冷战的起源上，至少我有自己的观点。我坚持认为，斯大林在1945年至1947年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野蛮行为产生了他所担心的结果：一个敌对的决心重新武装的美国。然后冷战逐步升级了，每一方的每一举动都加剧了另一方的恐惧和不信任。任何一方都不是无可指责的，但苏联经常反复指责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试图破坏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和缓和，在我看来，这种指控未免过于简单化。

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我才知道阿尔巴托夫一直是个对“苏维埃制度”很警觉的批评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孤立状况感到不耐烦。显然，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内心的政治观点以及他对苏联的愚蠢行为的不满。（他1991年出版的自传解释说，他的童年是在德国度过的，目睹了纳粹夺权和反犹太主义的兴起。）我们现

在知道他也帮助保护了一些观点不受官员信任的合作者。该研究所有过兴衰，常常在僵化和自主之间进行周旋，但总的来说，它给共产党提供了缓和的建议。

我在研究所的第一天过得非常顺利。研究所里的美欧关系专家尤里·达维多夫是个非常友好的人，他也对美国声称的放弃缓和表示遗憾，这意味着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又出现了！——受益于好战。卡特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激怒了达维多夫，他说道：“美国更感兴趣的是让每一位苏联人在每个角落都能读到《纽约时报》，而不是解决核问题。”他的观点是，苏联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各自提供了一条不同的通往幸福之路：苏联可能有3000名持不同政见者，但我们在美国有600万失业者（这是另一个不变的主题）。他和他的同事基本上把苏联看作一个永久遭受损害的一方，几乎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一点似乎很清楚。随着这一天的结束，我计划约见一些人士，还要准备一个关于欧洲和美国政治的讲座。我的对话者似乎很了解情况，而且相对来说不太强调意识形态。我们的谈话观点很鲜明，语气很友好，虽然偶尔会有些刺耳的评论，或者是嘲讽——对此我可能比他们更有准备。

在我第一天对研究所的访问结束后，我去了我们住的酒店对面的一个运动场，在那里我将这一天的见闻口述录进了录音机。我知道我们受到监视。有一次，我们酒店房间里的一个灯泡不亮了，请求那个监管我们这层楼的女间谍帮忙，却不起作用，但佩吉和我在房间里相互大声抱怨则立刻产生了效果。被窃听还是有好处的。

我在莫斯科的日子可以被细分为访谈、观光和参观博物馆，然后还有格尔雅安排的晚上的一些专项娱乐活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请求免除这些令人疲劳或头痛的节目，因为晚上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去会见持不同政见者的时间，我们朋友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们都很

开放，非常信任我们。我首先会打电话给他们，试图以最小的风险向对方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旦安排好约会地点，佩吉和我就在夜晚乘坐出租车或城里著名的地铁在莫斯科市内穿行，然后漫步在昏暗的街道上。

我第一次拜访的是埃特金的一位朋友，名叫撒玛利·伊兹赖列维奇·维利考夫斯基，他是一个在劳工运动研究所工作的学法国文学和哲学的学生。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宏大画面主宰了他的微小的研究并传达了一个清晰、勇敢的信息。维利考夫斯基的研究所很少聘请犹太人，因为他们都有离开的倾向，即移民；他告诉我，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之后，一切都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知识分子被认为特别危险。他说，即使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多种伪装，那些持右翼观点的往往带有大量的反犹太主义。但那是一种古老的痛苦。他补充说，作为一名犹太人，他必须有两倍于其他人的天赋，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机会获得大学的工作。他说话很平静，是一个伤感但勇敢的人，毫无自怜之情：“一切都那么困难，可是还处于被孤立状态，似乎生活在流亡之中。”

更令人难忘的是埃特金的另一位朋友，小说家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我们摸索着找到了所给的地址，然后在阴湿、昏暗的楼梯脚下，一位上年纪的、醉醺醺的看门人试图阻止我们进她的公寓。我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冲上楼梯，将他丢在后面，这样我们就在他前面到了公寓门口。一进房门与丘科夫斯卡娅见了面，我们就听到那个看门人在敲门，喘着气大喊大叫。我感到内疚，生怕会连累她，但她向我保证，那人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敌人。

丘科夫斯卡娅是一个善良、坚强的女人，那时她七十出头，她很少提及她自己的生活 and 受过的苦难。但我知道她曾经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且是同道作家的一位不屈不挠的辩护者，

敢于迅速地发表公开言论，例如，她把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作家协会开除称为“国家的耻辱”。后来，她自己也被开除了。她想知道关于埃特金和外面世界的一切——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热烈地进行了交谈（我忘记是用什么语言了，可能是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大杂烩？），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了。人们已经忍受了这么多，而且仍然有很多人在斗争。同丘科夫斯卡娅的谈话与其他人一样，我们谈到了反犹太主义在苏联再次猖獗，尽管——或者因为——犹太人仍身处高位。犹太人痛苦地担心着流亡的利弊，他们知道即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一步也会立即遭到报复。

我访问了另一个智囊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像阿尔巴托夫的研究所一样，这个研究所也是苏联科学院的一部分，并且同样拥有宏伟的办公大楼，这样才适合一个为政府提供咨询的中心（显然比阿尔巴托夫的机构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符合）。那里的德国专家德米特里·梅尔尼科夫（他的妻子翻译了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最为人所知的西德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作品）吹嘘自己与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就像与我交谈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此处德国指的是联邦共和国；看起来“他们的”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个被恶意忽视的对象，除了作为一个经济伙伴之外，即使在经济上，西德也重要得多。西德驻莫斯科大使汉斯-乔治·维克是个历史学家同行，他也为我证实了这一点。在苏联人的心目中，将德国技术与苏联资源相结合的梦想仍然存在。与此同时，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步履蹒跚的勃列日涅夫还在相互进行友好访问。

转眼间，已经到了在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最后一天，可我还没有在那里完成我应该做的讲座。另外又安排了两次约见，其中一次要见的是安德烈·科科申，他只有二十四岁，他的坦率引人注目，他的愤世嫉俗令人感到畅快。我被告知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并以其自由的方式而出名。他在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有过一段

辉煌的职业生涯，并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到1991年，作为阿尔巴托夫培养的一个小青年，他升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后来成为叶利钦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尔巴托夫想培养一代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有朝一日可以成为“真正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国家的仆人，他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我他的社会学调查，其宗旨是去发现年轻的苏联人想要的是什么，并探讨苏联落后的原因和后果，也许以此作为所需改革的前奏。和其他人一样，他为西方对苏联的无知感到遗憾；他认为，我们认识的唯一的现代作家是索尔仁尼琴。我说我们把大多数后列宁主义艺术看作坐在拖拉机上微笑的人这一主题的各种变体。他笑了。然后我问道为什么，尽管我每天都在询问，但我的讲座一直在被推迟，而现在显然已被放弃了。

我最后一次谈话的对象是该研究所的另一位副主任。“您已经来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了。您认为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问我。

“失业”，我回答道。苏联人坚持认为失业完全是一种西方独有的现象，这确实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但是等待购买面包的长队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我说道。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你是对的。我们在分配方面确实存在问题”。就像我遇到的大多数研究所的人一样，他是一个认真的甚至友好争论的对手。

在莫斯科，我至少犯了两个错误。我的时间更多地花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更多地用在与人们的交谈上而不是用在俄罗斯的历史遗迹上，这本该是我去其教堂和博物馆中去挖掘出来的。而且我认为我太容易对人们进行分类，我把白天和我约谈的都假定为共产党的官员，不论其多么聪明，而夜间私下的谈话对象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但现实是更加微妙的：一些官员知识分子，在他们有一定特权的机构中，本身就是沉默的怀疑者或者平静的改革派，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政权的缺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有过早期的幻想，也有过同流合污的时刻，目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索尔仁尼琴著作中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反西方、反

犹太主义的压力表示同情。并非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敌人都是自由派，远非如此，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

在莫斯科待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将乘坐飞往列宁格勒的定期航班，但是格尔雅错误地带我们去了另一个莫斯科机场：这正是普遍效率低下的一个信号。无论如何，列宁格勒是一个天堂，我们来此是没有正式职责的，所以在当局眼里我们只是游客，被安排住进了高雅的列宁格勒酒店，对面就是“阿芙乐尔号”战舰，革命的第一炮就是在那里打响的。我们惊叹于这座城市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这里诞生了普希金，这里是彼得大帝为西方打开的一扇窗户，这里有涅瓦河及其典雅的桥梁、海军部大楼、冬宫、新荷兰运河、冬宫埃米塔什博物馆及其令人惊叹的画作。与莫斯科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一张印着著名的沙皇彼得骑马雕像的明信片上，我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两个人在这里有过梦想。其中一人留下了绝美的作品。”

我在列宁格勒确实有一个行程表，玛莎·埃特金给了我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她的朋友的名字，几乎在每个情况中，有“玛莎送给我们的”就足够了。（她毕竟是个非常美丽和活泼的女性。）人们告诉我们，文学世界如果没有埃特金夫妇的话将是黯淡的，总体情景也是如此。

列夫·科佩列夫这个名字出现在人们给我的每份名单之中，从玛丽恩·登霍夫的名单开始。作为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德国文学专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中的道德英雄，科佩列夫在战争中一直是勇猛的获得过勋章的军官，但他曾抗议红军在德国领土上的暴行，他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主义的荣誉。苏联政权认为他的抗议与苏联爱国主义不相称，因此他多次受审，然后被判处9年监禁关押在劳改营内。斯大林去世后他获得释放，他仍然是内部的批评者，仍然相信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想，并且随时准备反对他们的堕落，不懈地捍卫那些受到迫害的

人。他于1968年被开除出党，并于1977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他的电话被切断，现在他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未经许可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名叫科玛洛沃的一个作家聚居区内，靠近波罗的海。

玛莎的一个朋友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并为我们安排了一次探望，尽管我们的签证不允许我们到列宁格勒以外的地方去。虽然如此，一辆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汽车还是将我们带到了大海边，我们朝附近森林中科佩列夫居住的简陋的木屋走去。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的人，六十二岁，蓄着银白色的胡须，散发着旺盛的活力。他欢迎了我们，然后我们共进午餐。列夫和我不断地交谈着——用德语；他的妻子赖莎·奥洛娃同样令人敬畏，她也是一位作家，专门研究美国，说的是英语。

午饭后，列夫以友好的严肃态度将我们带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坟前——在附近树林的一块空地上。这位勇敢的诗人九十岁生日刚刚过去，她的坟上放满了鲜花；许多写着诗歌的纸条被压在鹅卵石下面。这里就是一块圣地，是对诗歌的颂扬，也是对一个将她归为“资产阶级颓废分子”的政权的抗议。俄罗斯诗人和作家对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的语言爱得多么深沉啊！由于他们的伤口是对俄罗斯本身造成的创伤，他们肯定会因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命运而受到双重伤害。

然后科佩列夫带我们穿过浓密的白桦树林回到火车站。他谈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在少年时代他是如何知道斯大林的恐怖的，他家失踪的朋友，以及在1941年6月22日当他听到德国袭击的消息时，他又是如何从阁楼冲进了他父母的房间，要求去参军，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俄罗斯！”他谈到了当前的情况：不错，反犹太主义还在增强，但它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旧的排犹神话已经改头换面，重新登台（在一本通俗流行的历史书中，拉斯普京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同谋，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了世界的主宰）。他认为卡特的

人权计划很有帮助，因为每一次呼吁或来信，每一次来自国外的号召，都会使我们感到有所不同。对于列夫来说，埃特金被开除之后留下了“可怕的空虚”。但是一些流亡者伤害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感情，比如“阿亚图拉·佛蒙斯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有这个绰号，他的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在列夫和赖莎帮助下出版的。（《第一圈》中列文这一角色是以科佩列夫为原型创作的。）他说他不能为年轻人提供是否移民的咨询。他只能告诉他们不该做的事情：不要背叛朋友，不要去做假证。太过简单？不。

列夫委托我给玛里恩·登霍夫和海因里希·伯尔带一个口信：他和赖莎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们的邀请到西德去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他希望能得到必要的文件，尽管这是一个困难且不可预测的手续。

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问他，如果他出国旅行，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会被允许返回苏联。“让我告诉你一个犹太人的笑话，”他回答道，“在过去的时代，有一个小镇，一位犹太人去拜访他的拉比，说他有个患了结核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他失业了，不能养家糊口，但他刚刚得到了一份工作，条件是必须得剃掉他的胡须。他应该怎么做呢？‘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是不会动他脸上的毛发的’，拉比回答说。两周后，在更加绝望的情况下，他又去找拉比。当他在走廊里等拉比时，他从一面镜子里看到拉比在修剪他的胡子！穷人重复了他的绝望的故事，而拉比则重复了原先给定的答案。恳求者迟疑地告诉拉比他几分钟前所看到的情况，拉比回应说：‘是的，我确实修剪了我的胡子，但至少我没有请求任何人的许可呀！’”科佩列夫不会去问他是否会被允许回国；他认为他会被允许。他对我说的告别话是：“比起我的斯大林主义的表弟，我感到同玛里恩·登霍夫更亲近。”他递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他的书的德文版——*And Created an Idol for Me*（《为我创造一个偶像》）；这本书是由美国密歇根的一家流亡者

出版社以俄文出版的，并被迅速翻译成德文。这本关于苏联生活的回忆录 [英文版书名是 *The Education of a True Believer* (《一个忠实信徒的教育》)]，是对早期的欢乐和后来的幻灭的惊人描述。他的书首页上的题词 (用德语写的) 是：“佩吉和弗里茨留念，以此纪念我们的相识，并希望能由相识转为友谊。”我们确实做到了。他从车站离开了，火车将从那里把我们送往芬兰站。(把列宁的火车从西边拉到这个著名的终点站的火车头在那里永久展出，与列宁在红场上防腐处理过的遗体交相呼应。)

我将列夫的口信带给了玛里恩，十八个月后，列夫和赖莎飞往法兰克福。他们有回程票并期待着使用它们，但苏联当局很快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身份。他们定居在科隆，在那里列夫成了一名文学教授，并准备撰写数个世纪以来德国文学邂逅俄罗斯文学的一套多卷本历史著作。

我们在苏联领土上的最后一刻清楚地表明了奉命行事的怀疑在支配着那里的日常生活。在机场的混乱中，排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被要求打开他带的好几个箱子的每一件物品；警卫找到了两封信并研究起它们来；他们搜查了一个石膏雕像看是否有隐藏的文件，这期间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在我们的包里找到列夫的书。但最终，我们轻松地通过了；朱尔金的邀请函让我们顺利地过了关，我们的包裹没有受到检查。当我们登上前往华沙的飞机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次访问给了我各种在逆境中的美和高尚的独特经历，但离开这座城市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我对波兰的看法比较简单：同情和惊奇。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有一部殉难史，往往因其鲁莽的政策，但是其中最艰难的时期几乎就是在四十年前开始的，当时它自古以来的敌人和极权主义邻国瓜分了它。这是在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波兰遭受的第四次瓜分。在

战争期间，德国占领者杀死了300万波兰人和300万波兰犹太人——几乎所有的波兰犹太人——而苏联人则造成了类似的恐怖，尽管规模较小。这两个占领者都试图通过谋杀其精英和压制其学校来阻止波兰未来的任何复兴。没有哪个国家遭受过如此巨大的苦难或者组织过更为强大的英勇抵抗——通过武力抵抗德国人，就像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中那样，以及通过秘密行动和上百个计策来反对战后强加给他们的政权。波兰的领土发生过变化，在苏联人把波兰东部大片领土吞并到乌克兰之后，数百万波兰人逃离家园，前往曾经是德国人的西部地区的新家园。这个新的波兰成为新生的苏联帝国的关键，正如北约的对手“华沙条约”这个名字所表明的那样。

波兰共产党人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德国“复仇主义”的威胁，唯恐西德人密谋重新夺回他们在波茨坦会议上失去的奥得-尼斯线以东的领土。他们似乎并不担心他们的“友好的社会主义邻居”东德，但他们确实担心联邦共和国，那里的前西里西亚人和其他被驱逐者煽动着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个原因，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才显得越发重要。而且我知道勃兰特曾经公开做的事情其他人也正在私底下做着——向波兰人伸手致意，与他们建立联系。长期以来，我认为德国与波兰的和解将特别困难，但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了。

或许比起其他民族，波兰人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想象的、神话化的历史来生存，他们的过去一直在早期的胜利和之后的惨败之间痛苦地交替。那么他们是如何解释最近的历史的呢？我认为他们现在生活在强制性的精神分裂症中：官方的教条规定苏联是波兰的解放者，并且仍然保持着它的保护模式，但波兰人知道卡廷谋杀是苏联人的罪行，而不是德国的罪行，他们也知道在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红军就在城外郊区安营扎寨，等着德国人把城市夷为平地并杀死其人民。当学校里传授的是虚假的知识时，年轻的波兰人是怎样了解到这个真相的

呢？这是我最初的问题之一，答案却几乎是一样的：教会是启蒙的源泉。

1979年是波兰天主教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年。“波兰人教宗”在当选一年后，刚刚访问了他的祖国。约有1300万波兰人见到了他，并在他为期一周的凯旋之旅中与他一起祈祷，他们聆听了他布道时提到的勇气、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尊严和上帝。他没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直接进行攻击，而是肯定了对基督教的信仰。一个真正的领袖出现了。他捕捉到了虔诚的和强烈的非虔诚的人的想象力，特别是年轻的波兰人的想象力。

另外，波兰的经济处于深度危机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发起了一项名为“大跃进”的计划，这是一种由大量西方（主要是西德）贷款资助的强制性工业现代化。工业产品优先于消费品供应，因此黑市蓬勃发展，美元几乎成了不可或缺的第二大货币。工人尽管是整个计划的支柱却很短缺，并且遭受了剥削。到处是死气沉沉的景象，人们表达出一种愠怒的不满。

然而，我立刻意识到波兰比苏联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当然，混合在一起的镇压和奖励也在不断变化着。但是，波兰政府的仆人们相当公开地和批判性地谈论身边的情况，而反对者则表达了他们对波兰在仍然有着明显恐怖的战争之后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华沙本身就是波兰挑战一切、坚持自我的象征。德国人已经将其夷为平地，随后新的房屋又出现了——狭窄拥挤，斯大林式的。然而，在彻底的废墟之中，波兰人立刻又在城市中心重建了皇家城堡，并在其周围建起了古老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区——一块石头挨着一块石头，一栋大楼接一栋大楼，全部保留了原始的和谐的风格。

在波兰我每日的安排很简单，这是因为我可以相对开放地与官员和个人见面。一到波兰，我就打电话给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杰出

社会学家斯特凡·诺瓦克，不需要任何托词。他来到酒店，我们就坐在主餐厅。他为我描绘了一幅严峻的画面：经济形势毫无希望，政党分裂，由此无法做出任何决议。他认为，教宗是一位非常聪明、很有魅力的领袖，教会对任何反自由的镇压都起到了一种威慑作用。这是对教会——波兰的教会！——正在为自由主义者提供保护这一不太可能的事实的早期暗示。他认为周边的卫星国情况更糟糕。

这座古老的城市既有铺着鹅卵石的狭窄街道，也有壮观的广场和重建的皇家城堡，在这里我进行了一些最难忘的访问。首先从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马开始，他是一位哲学家兼法学家，也是玛里恩最早的朋友之一。这位主人和他的家庭都很朴实守旧，很讨人喜欢。斯托马赞扬玛里恩在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和解上所做出的努力，他说，这也一直是他的愿望之一，即使在战争和冷战的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对于波兰人来说，我估计，与德国的和解是一项政治理性的决策，因为它提供了一条通往西方的文化经济生命线。他们最大的噩梦就是潜在的德苏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他们警觉地观察着这两个强国之间的交往。^[7]我想也许他们开始意识到1939年以前对这两个强大邻国的敌意政策都是一种自杀式的享受。他们中最有理性的人试图克服他们传统上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意识到另一个邻国——占领国才是直接的威胁。

斯托马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在克拉科夫的一个名为ZNAK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得到了政府的容忍，并获许在议会中有四个代表席位。1976年，他是唯一对波兰宪法修正案投弃权票的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对他们——尤其是明确指出统一工人党（共产党）是波兰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与其他著名的在俗世的天主教徒一样，他也反对1968年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该运动在清除波兰公共生活中剩余的犹太人时达到了高潮。他认为，教宗的来访改变了波兰的道德氛围。

美国大使馆希望我能去采访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的秘书达布罗夫斯基主教，但他隐居在华沙的郊外，试图从教宗访问的压力和疲劳中恢复过来。他的副手且与他同姓的耶日·达布罗夫斯基主教在主教宅邸接待了我——这是我看到的最干净、最高雅的宅邸。他是一个精明的、世俗的教士，被认为是教会管理层中的后起之秀。

达布罗夫斯基意识到我想谈论当前的政治问题，他马上就带我去花园散步，大概是想避开非自然的昆虫（窃听器）。我们谈到了教会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教宗庇护十二世，他认为这位教宗是一个神秘人物，教会很难去应对。他同意现代教会中激进分子的出现部分是为了否定庇护十二世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的“理解”。（后来我了解到，庇护十二世在获知战争期间德国人有计划、有步骤地要谋杀波兰人之后，没有为保护那里的信众说一句话。他的沉默应该与针对他在其他重大事件上的沉默的无休止争论是有关系的。）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党都有其内部纠纷，因为它们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些政党派别默默地欢迎有个强大的教会，可以作为抵制莫斯科严厉要求的武器。与此同时，教会也注重教授有关波兰历史的非党派版本。达布罗夫斯基认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不仅是一位“波兰人教宗”，还是一位“斯拉夫人教宗”，这就肯定了斯拉夫人的精神价值，同犹太人一样，他也曾一直被人瞧不起。

在我得到的每个联系人名单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名字——一个我最渴望看到的人——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他是一位研究近代早期法国的历史学家、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世纪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反对派的一位关键人物。他于1968年退了党，以此抗议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我当时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拉比，而且他的母亲曾被一个非犹太人家庭所救。）我在他位于老城主要广场边上的办公室里与他见了面，立即就发现他睿智、敏锐、慷慨、诙谐，非常有吸引力，最明显的是他谦逊庄重的举止，他的烟斗也为他的和蔼可亲起到

了锦上添花的效果。我们的共同语言是法语，他的法语更加完美——毫不奇怪，因为他在巴黎生活和工作了多年，对法国的情景非常熟悉。几分钟后，他建议我们去广场边上的一家咖啡馆，以便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谈话。几年后，他心不在焉地提到，我显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咖啡馆里也是受到监控的。

他告诉我，在科学院他所在的部门里的历史学家——共有十四位同事——在工作上可以不遵循意识形态要求，但现代历史会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我们谈到了当前的问题，在他眼里，波兰的经济形势是如此糟糕，党本身又如此分裂，以至于政府不敢采取行动，不论是在经济战线还是在反对派方面；在任何时候，一点小火花都能够引发一场大火，所以政府就只能踌躇不前。人民的经济苦难成了一项政治解决方案，这让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家米拉波在1789年之前所说的“国家的赤字是国家的财富”这句话。盖雷梅克同意这句话也适合用于波兰。

盖雷梅克认为，政府煽动起了反德情绪，因为这样做可以把人民统一起来。西德的选举将在赫尔穆特·施密特与有争议的基民盟-基社盟候选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进行一场竞争——如果后者获胜的话，东方政策将会淡出，对波兰共产党人来说那将是一件大好事。（施密特漂亮地赢得了这场选举。）我们谈的越多，时局看起来就越复杂。突然，我抓起一张纸，试图以图形方式表达我对所有这些复杂性的印象。我在一条线上画了五个相邻的圆圈，并对盖雷梅克说：“如果这个最左边的圆圈是反对派，而最右边的圆圈是党中央委员会，那么看起来通过这些中间的圆圈或团体，反对派与党的核心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盖雷梅克笑了笑，拿起笔，画了一条线，直接连接了那两个最边上的圆圈。“这也是有可能的，而且有时候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保存了那张纸。

最后，他提到了有种被称为“飞行大学”的事物，这是一个群体，会定期组织教师和学生不同地方——教堂地下室和住宅——召开秘密集会，就具体的往往是历史性的话题展开讨论。我很好奇，盖雷梅克问我是否愿意在那里做一次演讲。我认为这将是给我的一个特殊待遇，我甚至提出了一个主题：法西斯主义的诱惑。“很好，”盖雷梅克说，“我是这个项目的主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这里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可以兼任一所地下大学的项目主任！我记得玛里恩曾提到波兰的情况是超现实主义的。此处的情况确实如此。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去做演讲，但后来我了解到，这种飞行大学模仿了战争期间德国占领波兰时早期的秘密团体，当时除小学以外的所有教育都被禁止了——奴隶不需要接受更多教育。我成了盖雷梅克的热心支持者，他是一位集勇气、智慧和人性于一身的历史学家兼活跃分子。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但那时的我无法想象我们的生活还会有交集。

同一天，我在另一家小咖啡馆同亚当·米奇尼克见了面。由于他是反对派中一个特别“危险”的成员——作为差不多每个月会出一期的地下报纸的编辑，该报发行量为5000份，每期报纸大约有十个人阅读——我们的见面有一种密谋的气氛。他告诉我，他曾多次遭到囚禁；他的犹太人身份使他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目标。不久前，他被拘留了四十八个小时，因为警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不经审讯而合法地拘留一个人。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毕竟，他说，政治犯一般不会受到刑讯。他的知识分子的韧性和政治上的勇气与他身体上的脆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因他不流利的叙述显得越发辛酸。米奇尼克接受过历史学家的培训，并曾经在西欧生活了八个月；同许多波兰作家一样，他密切关注西方的书籍和辩论，在各方面对巴黎了如指掌。他现在正在飞行大学教授战后波兰历史，通常大约有100名学生来听他的课。

米奇尼克附和了盖雷梅克的许多主题；他们是朋友和同伴。他也认为恶化的条件将会导致政治动荡。他谈到了他与志同道合的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接触。所有反对派的努力都需要资金——也许自由欧洲电台可以给他们提供资金？他说，我应该向布热津斯基提及这一点。我认为更可取的是争取私人资金。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乔治·索罗斯在东欧开始提供谨慎的、重要的帮助。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兰的地下组织正在接受的帮助，既有来自教宗的，又有来自匈牙利流亡国外的金融家的。米奇尼克认为，缓和有利于东欧持不同政见者以及他们对于改革的希望。但是，在不激起苏联另一次镇压的情况下，改革究竟能走多远呢？

他提到比他大很多的哥哥在战争刚结束时在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效劳，就像许多犹太人一样。米奇尼克的敌人试图也把他描绘成一个斯大林分子，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努力，因为当时他才是个五岁的孩子。在战前的波兰，他说，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德国文化和俄罗斯文化感觉更为亲近，对波兰文化则感觉有些纡尊降贵或蔑视。反过来，波兰反犹太主义也有悠久的历史，他说，即使是现在，还有一份秘密的反犹太主义文件援引了《锡安长老议定书》作为长期存在的犹太阴谋的证据。在我们分别的时候，米奇尼克让他那位安静的女朋友悄悄塞给我最近一期他编辑的报纸，她巧妙地照办了。

在一个充满希望的不稳定的国家里的这两次见面，都有令人振奋的气氛，几乎把我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热爱波兰的人，似乎盖雷梅克和米奇尼克是典型的波兰人，似乎大多数波兰人具有相似的拥有公民勇气的素质！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浪漫的错觉，其本身就是一种波兰病。但我也知道，在波兰被瓜分并从地图上抹去的这一百五十年间，波兰人民在反抗上接受了深刻的教训。我所见到的这两个人性格都是那么温和，但在争取自由上都是那么不屈不挠，离开他们时我对他们充满钦佩，也许还有几分嫉妒。

随后我们的大使馆把我送到波兹南去进行演讲，这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这座近两个世纪以来都曾属于普鲁士的城市非常引人入胜，外表上仍然主要是德国风格（在战争中未被摧毁），但生活中已经是地道的波兰味了。从那里我租了一辆车，佩吉和我驾车沿着不熟悉的道路前往布雷斯劳，即现在的弗罗茨瓦夫——我第一次返回我的故乡，对于这次访问我已经有过描述。从弗罗茨瓦夫我们开车去苏台德山区，这是一次前往我的父母和我自己的过去的朝圣之行。我们住在布瑞格祖父母避暑的那个村子里，吃饭的地方在一间古老的德国山区小屋，现在这里颇有点像一个社会主义的霍华德·约翰逊酒店。往上面看能隐约看见山脉的最高峰诗尼坎普峰，那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标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与波兰持不同政见者秘密会面的地方。附近是我父母于1919年结婚的教堂。一位穿蓝色牛仔褲的年轻牧师请我们走进教堂，告诉我档案都完好无损，尽管我们没有时间去查阅那些档案。在教堂墓地里，死去的德国人的墓前仍然保留着墓碑：在大多数别的地方，墓碑都被打碎或污损了，这是早先进行的种族清洗，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我对祖先生活的地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现在这些地方却已经完全属于新人了。我对这里的乡村非常熟悉，却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面对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我成了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无论如何，我的情感依恋是在这片山区的捷克一侧，我曾经在那里短暂地享受过自由。

再次回到华沙，我遇到了一个与盖莱克关系密切的人，名叫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他是一份主要的政治周刊《政策》的编辑。他体格魁梧，衣着齐整，长着一颗引人注目的时髦的脑袋。他全身散发着自信，是一个熟知好几个世界的人，一个讲究美食及生活享受的社会主义者。他是德国人轻蔑地称为“灵狮”的那种人，活像那种随风向改变而狺狺狂吠的狗。作为每个人都喜欢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享有良好的声誉，像一只聪明的鸽子在向强硬的穴居人发动攻击。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能偏离太远，因此他与苏联大师们保持着密

切接触；作为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他珍视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玛丽恩·登霍夫的关系。他说，波兰政府已经使波兰的工业部门现代化了，但无法撼动人们陈旧的农业心态，因此存在着内在矛盾。他认为教会比世俗的反对派重要得多，这种受到容忍的反对派已经变得边缘化了，并且是可预测的。就德国问题而言，阿尔巴托夫已经暗示了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的可能性，拉科夫斯基对此表示疑虑：没有人能保证德国会保持中立。

我们在华沙停留期间恰逢美国大使馆举行7月4日美国独立日晚会，出席的有党内官员，也有反对派的代表。这里成了他们可以实际交谈的地方。这些反对派人物非常有趣。正如蒂莫西·加顿·阿什后来所写的那样：“到1979年，那时已经有工人、知识分子和教会三者之间联盟的萌芽，这是波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苏联集团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西方也是看不到的，这种联盟将发展成团结工会。”

波兰深深地打动了，因此，当大使馆要求我在1980年6月再来此地时我很高兴。一个雄心勃勃的安排已经计划好了，我将在华沙、索伦、克拉科夫和格但斯克四地分别举办讲座和演讲。在大使馆关于这些会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斯特恩的各种听众（其中有许多享有盛誉的知识界人士）反应非常强烈。斯特恩的演讲观点新颖，精彩迭出，与听众的交流激动人心。”

在华沙，我与拉科夫斯基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我们道别时，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波兰人，卢梭曾经这样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是这个月，也不是今年，”拉科夫斯基回答说，“但是就在这十年里。”我认为这非同寻常：这位聪明的分析师和半官方要员承认十年内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寻找卢梭这句话的出处，我引用的时候是从记忆中唤醒的；我一直没有找到，但我能肯定

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吗？）但是，仅仅两周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8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解雇一名女性老工人。他们列出的要求中首先就是组织自由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团结工会诞生了。

并且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莱赫·瓦文萨，罢工工人的领袖。一个早期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简称KOR，立即站出来支持罢工，而且有六十四名杰出的波兰知识分子公开要求一个不流血的解决方案：“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站在工人的一边。”其中两位签名者是盖雷梅克和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后者是一位勇敢的哲学家、知识分子，并且是一个自由天主教周刊的编辑；他们两人立即离开华沙前往格但斯克，就此成为瓦文萨不可或缺的顾问。工人与知识分子相结合——这是社会民主党一个长期的梦想！我很幸运地结识了团结工会的一些关键人物，这使我能够充满热情地去响应团结工会对于自由的革命性的呼唤。

团结工会很快成为一个拥有一千万成员的群众组织，随后它与执政党进行了谈判。有传言说苏联准备粉碎波兰的这次实验，就像他们曾经对付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那样。在十八个月里，局势始终非常不稳定；然后，1981年12月13日上午，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全国处于戒严状态。所有的抵抗都被镇压了。波兰人（有些过度地）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比德国人更糟糕。

我感到非常震惊！我认为美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应该支持他们的弟兄们释放被囚禁者的要求，而且美国政府也应该这样做，“西方国家的金融界同样应该这样做，仅仅是金融界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那个——可能已经惊慌失措的——正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波兰军政府”。

波兰电视台揭露了盖雷梅克的犹太血统，以及他“与国外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中心”的联系。法国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解放报》评论说，反犹太主义是雅鲁泽尔斯基唯一能够借助的意识形态上的幌子。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同从1975年以来的学术界老同志一起，再次在H. A. 温克勒领导下，为遭受迫害的波兰人提供食物帮助，并组织抗议活动。已经不在政府内的布热津斯基和我试图筹集资金用以支持受害者家属。在圣诞节前夕，布热津斯基打来了电话；他听说一个同监狱的囚犯看到米奇尼克从审讯室中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几乎无法辨认。我心急如焚。（这个传闻结果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危险始终存在。）我见到了盖雷梅克的一个儿子，他当时在布鲁克林；他的另一个儿子和他一起被暂时关在牢里。

1月初，我在西尔斯·玛利亚遇到了玛里恩。在那个美丽的地方，我们曾经发生了我们之间唯一一次激烈的争论，我还记得我们争论的原因：她为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辩护，理由是这样的行动阻止了苏联的干预，而苏联人的干预可能会对缓和局面造成破坏。我慷慨激昂地表示反对。我坚持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镇压波兰自由战士是正当的。我们的意见分歧后来使我们双方都非常生气。最终我们放弃了这个话题，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她对波兰人也总体上怀有深刻的依恋之情，波兰人逐渐理解了她不支持团结工会的原因。我认为她善意地抛弃团结工会反而使我更加坚定地去帮助它。

第二年春天，华沙大学校长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了一个慷慨的交流项目，我对此表示欢迎，条件是盖雷梅克将被指定为第一位交换教授。对话中断了，但我就同一问题向西德官员施加了压力。1981年8月，阿尔谢尼·罗津斯基，一位苏联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古拉格受害者之子，因使用伪造证件获取非法禁止他使用的档案而被捕。他真正的“罪行”是他编辑了一本地下杂志《回忆》，这本杂志收集了苏联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的证据，以此反对官方的歪曲和谎言。两位同

事和我一起写了一封信，投给《纽约时报》，以此抗议逮捕。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提醒苏联人他们有义务遵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我们这样做不是本着冷酷的勇士主义精神，而是本着对侵犯人权的愤怒。由于西方的人权记录在那个时代有理由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做出这些姿态。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被邀请加入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因此可以更加密切地关注这些问题。但我清楚地知道，同那些正派人士的痛苦经历相比，纽约的抗议活动几乎毫无意义。然而，至少我们表达了公众和私人的支持，这一点可能是有价值的。

我与科佩列夫、盖雷梅克以及那些有着平静的勇气和钢铁般的信仰的男男女女的相遇，大大地加深了我所理解的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与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接触不仅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特殊经历，而且使我适应了世界的那一部分地方。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德国问题专家以便为这种公民的抵抗而感到兴奋，但是我认为，成为一个这样的专家能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敏锐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对于这种肯定我们有着独特需求。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我还增加了一个行程，仍然围绕德国这个主题。1981年6月，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两个星期，去做演讲。这对我来说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拒绝承认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或者说拒绝承认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一个言辞激烈的“院外援华集团”坚持认为中国是由台湾岛上蒋介石政权建立的，蒋介石被打败之后就撤到了这个岛上。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个根深蒂固的假定，即一整块共产主义的磐石正在威胁我们，以至于美国的决策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之间发生论战时迟迟没有认识到两大共产党国家的决裂，因此缩手缩脚，未能利用这种分裂。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反对苏联上变得非常强硬，他们使用了霸权国家这样一个代名词来描述帝国主义苏联的特征，他们声称，在后斯大林时代，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已经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强大的右翼集团嘲讽着“谁弄丢了中国？”麦卡锡主义者则对了解中国所发生的巨变的杰出的美国外交官和学者进行迫害，这些进一步阻碍了做出符合现实的评估的努力。美国人的无知和敌意与“骄傲的中国人的孤立”并存。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克松总统批准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秘密接触，虽然他之前扩大了越南战争，他秉承的理念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现在的问题变成了谁能够“赢”回中国？凭借作为一名右翼反共分子的无懈可击的资格，尼克松能够在如此激进的一项冒险事业上一试身手。^[8]后面几届政府慢慢地增加了与中国的接触，然后卡特政府于1979年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定期的学术交流也逐步建立起来了。

就是在那一年，我本人在中国事务上的远距离参与开始了。在国务院关于未来美中关系的一次会议上，埃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宣称，我们的新中国政策是现政府外交政策中最成功的部分，而我则承担了撰写评论的任务，主要是关于这项政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尤其是对东西欧的影响。我敦促政府要“教育公众理解危险的友谊的复杂性”，并且强调需要向柬埔寨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应该推动欧洲人去做更多的事情。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苏联的中美会议上，我遇到了前外交官、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他建议我访问中国，六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的正式邀请，就欧洲历史去做演讲，“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奥托·冯·俾斯麦的评价”。在中国，我将成为社科院的客人；旅行费用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承担，该研究所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金用于在北京召开的会议。^[9]

我来到了北京，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官员似乎比苏联官员更加开放，但私人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中国人认为我在华盛顿有重要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

他们的错误，也是我的收获。也许我把礼貌和善意误以为是真正的开放。

从我们降落在北京的那一刻起，佩吉和我就受到了魅力十足和礼貌的欢迎。那位可敬的研究所所长在停机坪上带着一个会心的微笑对我说道：“我读过1975年你在旧金山历史大会上的演讲，那是对苏联人的讲话做出的回应。”即刻就提到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当我们被带到北京郊外巨大的友谊宾馆附近的一家大学旅馆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街道上挤满了大量穿着蓝色斜纹布制服的人，或者步行，或者骑着自行车，或者在拥挤的、陈旧的公共汽车上——民众身穿几乎一模一样的制服，有着似乎相同的目的。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虽然这些服饰都是斯大林化的，但人们的精神状态似乎比莫斯科官方的精神状态更加开放。一位名叫罗凤礼的历史学家同行被派来陪我们到中国各地旅行，包括长城，他使我有可能与普通人进行即兴对话（如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入口处装饰着四个英雄人物巨大的画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

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我的访问。就在我到达的那个晚上，我就得向社科院的很多显要人物，也许还有一小部分学生就指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话题做演讲。于是我谈到了希特勒的宣传和恐怖统治。译者在现场带着极大的热情为我翻译，听众非常激动。

我来到此地似乎恰逢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人们认为最可怕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他们多样化的评论和回忆往往是用相同的术语来表达的。

在北京、上海和西安，我不断遇到中国版本的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们指责苏联所背弃的信条。他们看起来似乎真的被我演

讲中提到的并且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实”震惊。我的一些解释明显是与他们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基本作用的信仰相矛盾的。他们对我的说法感到不安，因为我提到，假如让·饶勒斯和罗莎·卢森堡没有遇害的话，他们将会是列宁统治最严肃的反对者。我有时担心我的演讲会不会像是在嘲讽，但气氛一直是很热情友好的。苏联人显然永远不会放手让这么一个颠覆性的演说者去面对苏联听众——这是缘于文化和自信上的差异？

我对“犹太人问题”的出现频率和热情程度感到十分惊奇。我被问到，为什么在欧洲对犹太人有如此强烈的仇恨？为什么犹太人的抵抗如此之少，除了在华沙？我详细阐述了反犹太主义，并指出了那个苏联的悖论：许多早期的布尔什维克，当然包括那个大“坏蛋”托洛茨基，但还有季诺维也夫、拉杰克和加米涅夫，都是犹太人，然而斯大林却憎恨犹太人。我的话令中国人大为吃惊。他们的回应似乎结合了挥之不去的信仰和无拘无束的好奇心。

在上海，我被要求做一个关于俾斯麦的演讲，这就牵涉了一个关键问题：俾斯麦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我们不能用这种简单的分类来考虑问题，我说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灰色。也许我们还不够聪明，还难以区分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

张芝联，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法国史专家，他迈出了不同寻常的一步：邀请我到他家去。我们的向导很难找到他家，但最终我们找到了曾经是燕京大学一部分的一个四合院。张在20世纪20年代的这座住宅里有一个大房间，这个有着多种用途的房间里堆满了好几种语言的书籍，房间里装饰着周恩来的照片，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有鲁迅的照片，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作家其作品或许很少有人去读。房间很舒服但很简陋——尽管张拥有一部电话，这是一个主要的罕见的身份象征，其花费要比他的房租贵得多。

穿过大厅还有一间房间，他把这间房间给了他女儿和女婿。通常情况下，女儿往往会搬到她丈夫家里去住，但他女婿家里有三个儿子，就没有额外的空间了。在每周的工作日，他的外孙就留在城里的一所幼儿园里，而他的女儿和女婿在一家工厂上班；周末的时候孩子会回到家里。张说他喜欢这种安排。“我很高兴我的家庭不再有知识分子了。”这话说得很恰当，但真是这样吗？

张的父亲曾是一位官僚、政界要员、上海大学的创始人以及4万本书的所有者，这些书由这个家庭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和他的妻子被下放农村，在田野里耕作。他原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大学里去了，但现在他又有了一个特殊的职位；早些年他曾去过巴黎和美国；他曾在耶鲁大学与哈乔·霍尔本一起学习。他最大的心愿是再次访问美国，在那里他还有兄弟姐妹。

他认为，目前的宽松时期之后还会有许多曲折，进两步，退一步。后来我们分别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极其机灵的人，一个幸存者，一个表面上循规蹈矩的人，与我在莫斯科和华沙所钦佩的持不同政见者截然不同。几年后，他在纽约露了面。

作为一名德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我已经完成了所有行程，其他文化和政治制度丰富了我的知识，我带着拓宽的视野回到美国。我见到了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德国主题，心中仍然回荡着与他们的共鸣，然后我将重新面对德国的过去和现在。（有关德国的主题可能是颠覆性的。2005年，我的书《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被翻译成中文，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我强调了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爱因斯坦对经济不平等、军国主义和各种高压政治的仇恨，以及他对人权衷心的全力支持。）在我心中留下的是人类的启迪和公民的气度。在一个腐败和残酷的世界中，看到曾经有（并且现在仍然有）人甘冒一切风险去保护或复兴一定程度的自由和体面是既令人兴奋又令人谦卑的。

在每个国家，我都遇到了过去引起分歧的因素，这些因素仍然存在于现实之中。在一些国家，在诠释过去上展开的激烈争论是开放的；在其他国家，针对强加的谎言的斗争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在专制统治下，经过审查的过去无处不在，但毫无价值。因此，如果有机会，历史学家必须带着被遗弃的真理或问题闯入其中。我是怀着对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灾难的清醒意识来到这些国家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涉及政治危机的基本文本仍然是用德语写成的。德国的过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共鸣，尤其是在联邦共和国，即使它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

[1] 尽管我只有一次涉及阿根廷的经历，但那是一次非凡的经历。1950年，我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阿根廷研究小组的记录员，这个国家当时处于庇隆独裁统治之下。我的责任是提供一份尽可能忠实于会议记录的报告——主要专家之间的五次非正式讨论，他们之间存在重大的政治分歧；每份报告的报酬是10美元。在一次会议上，我们的驻阿根廷大使、令人敬畏的斯普鲁伊尔·布莱登描绘了阿根廷的严峻形势，指责统治着国家的“那个狗娘养的”造成了人民的苦难。在有着上层贵族氛围的委员会中，这样粗俗的称呼是几乎听不到的——当然这位可敬的大使也不会想让这个绰号记录在案，无论该记录如何保密。所以我把这个绰号“升级”为我所认为的欺诈的或恶毒的。几天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主任乔治·富兰克林——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布莱登因他的话被编辑过了而十分气愤。实质上，他是完全正确的：庇隆的民粹主义独裁统治，不仅有法西斯主义的行径，而且热情接待逃亡的纳粹分子，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怖政权。后来我获悉，庇隆派利用布莱登的敌意来支持独裁者的号召力：“要庇隆还是要布莱登。”布莱登回忆起1937年他从阿根廷发出的一份急件，“信中他表达了他的担心，阿根廷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自成一格的法西斯主义”。

[2] 当我回到纽约时，我发现了一封赫伯特·吕特在1977年8月中旬寄来的信，这封信是这位瑞士历史学家，也是最敏锐、最有先见之明的观察家在托斯卡纳度假时写的，当时他脑子里想的是欧洲共产主义：“我将毫不羞愧地承认这一点，我完全被意大利迷住了，就像一个浪漫的条顿人和欧洲的乐观主义者，在过去十五年里我从来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真的好像整个地中海世界随着其所有的安德烈奥蒂、贝林格、卡拉曼利斯、胡安·卡洛斯、苏亚雷斯（Suarez）以及苏亚

雷斯（Soares）涌进了我们这个古老的西方世界，令其充实、恢复活力并为之陶醉，我为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感到高兴，这一切就在那里表现出来了（但是要谨防过度欣喜，一切仍然有可能出错）。”

[3] 1981年，阿根廷出版商雅各布·蒂莫曼出版了其令人震撼的著作《无名的囚徒，无号的牢房》，他曾于1977年4月被捕，遭受酷刑，两年后被释放并被驱逐出阿根廷，然后逃往以色列。蒂莫曼认为他所经历的恐怖类似于纳粹的恐怖。他在访问纽约时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记者向他提到了我的文章，鉴于我在阿根廷度过的时间非常短暂，蒂莫曼认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来自墨尔本的克劳迪奥·韦利兹写信给我，称我的文章“对这些国家的现状的审视感觉最敏锐，思考最周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篇文章很可能是由一个局外人所发表的最好的文章之一”。但他这封信的真正价值在于对来自左翼的“对自由的压制”的长篇讨论，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主要实例，他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模仿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但受到阿连德政权有组织的骚扰。

[4] 我在一项重大的工作中担任一个小角色。20世纪50年代，保罗·克里斯特勒，著名的文艺复兴学者，一个德国培养的又从德国流亡的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节俭的人，所以他的这种姿态是前所未有的。他刚刚从苏联查阅档案回来，想传递给我一个信心：在列宁格勒，他低声说道，拿破仑的兄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杰罗姆的文件未被查阅过。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发现：难道我不想利用它们吗？噢，它们不太适合我那本关于俾斯麦的书，但是几年后，亨利·罗伯茨和当时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弗雷德里克·伯克哈特前往苏联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旨在建立学术交流。苏联人一度对两位学者查询档案的要求感到愤怒，说：“你们只想派人来窥探苏联事务。”亨利想起了我的故事，便反驳道：“什么？不是这样的，我们想让学者们有机会看到杰罗姆国王的文件这类珍藏。”于是，双方签了一份协议，伯克哈特向我保证，我已经赢得了一次我自己的旅行。至于杰罗姆国王的文件，我不知道结果怎样，但它们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5] 当我遇到埃特金时，他告诉了我一个额外的戏剧性细节。在那次会议开始之前，该学院的院长召来了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颇有名气的学院教师，告诉他在巴黎即将召开一次会议，并很愿意派他去出席。还有一件事，院长知道他和埃特金是好朋友，当然院长不会指望他去谴责一个朋友，但也许就这次即将举行的会议而言，他可能会简单地认清对院长对自己的最低期望吧。这位同事这样做了

——在贿赂之下背叛了朋友，埃特金失去了他的职位，这位同事则大概去了巴黎。

[6] 我最后一次见到埃特金是在1993年，在波茨坦的一次早餐时。他于1990年搬到了那里，住的地方离无忧宫很近；他在写一些关于腓特烈二世国王的诗歌。在那里，我还见到了他新婚的德国妻子，他们是在俄勒冈大学相遇的！他们有一个简朴、雅致的家，融合了俄罗斯和德国的情调。他们看上去是一对完美的伴侣，对此我十分惊叹。后来，我听说，他在医院里临终前的最后几天，都是依靠她来维系生命，她却向他隐瞒了她本人也是一名癌症患者——直到最后两人都非常勇敢。

[7] 我非常欣赏波兰严肃的政治幽默。例如，如果德国和俄国这两个邻国同时展开进攻的话，波兰人应该首先同谁交战？如何回答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呢？答案是：“首先是德国，然后是俄国。首先是工作，然后是娱乐。”或者是报纸在租赁栏目打出的小广告：“交换：很少使用过的领土主权，换取更好的地理位置。”

[8] 1971年，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不得不取消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的计划，但他还是在下榻酒店接待了一些来自该委员会的人士，包括我在内。有人问他，在刚刚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双方是否讨论过中国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不会代表总统讲话，但就我而言，中国是首要的。”

[9] 瑟韦林·比亚勒，一个出生于波兰的苏联政治学者，曾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他曾经告诉我他在波兰的童年以及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经历，战后他曾管理一所波兰共产党的培训学校，然后于1955年离开了波兰。有一段时间，他把我视为知己，我帮助他得到了长期支持，用于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莫斯科战役的一本书，他似乎是唯一有资格写作这样一本书的人。比亚勒接连完成了关于俄罗斯的三本重要著作的写作，他还是一位非常吃香的顾问。在他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有点令人生畏的品质，一种愤世嫉俗的倾向。

第九章 重提德国问题

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了，这十年变化巨大，并取得了意外的胜利。其新的重要性在1979年1月显现出来，当时在瓜德罗普举行了一次首脑会议，这样的峰会曾经是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三大西方巨头的舞台，现在已经包括以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代表的联邦共和国，施密特本人对自信已经毫不陌生。凭借繁荣的经济，联邦共和国经常被称为欧洲的“支付主管”，因为它对欧洲共同体的贡献巨大。但是，考虑到它现在是苏联以西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也是怨气最大的国家，一个分裂的国家，这种温和的角色将如何持续下去呢？

很显然，德国重新脱颖而出引发了人们的担忧。1979年，我听到欧洲人又在谈论“不安分的德国人”，这个词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用来表达对德国意图的焦虑和怀疑。“德国问题”——德国将何去何从？——重新出现在世界政治之中，也出现在德国人自己的脑海中。这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两个方面以最明显的方式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当德国人在思考未来时，邻居们却回忆起了过去。德国人会怎样逐步理解他们的过去将是衡量他们民族状况的一个尺度？

在国内，联邦共和国可以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案例，在许多方面是运气和谨慎的胜利。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和缺点，但它的社会比以前任何政权都更加稳定和繁荣（并且阶级分化也更少）。它的民主制度很强大，它的政治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适应西方。它组合了一

个复杂的对外关系网络：在国防事务中，它依赖于美国，支撑这种关系的是贸易和无数的私人友谊的纽带；在西欧，它与法国联系最紧密，其程度达到了欧洲的建设性运作都是在法德两国共管之下实现的，正如1979年引入欧洲货币体系所体现的那样；社民党的东方政策意味着与苏联和苏联集团的密切关系，与东方的更多和更大的经济联系，以及更灵活的两德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缓和气氛中，西德多重的并且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一直是可以控制的，原因之一就是西德人比许多美国人更加注重缓和，他们在这方面甚至超过了其他西欧人。但是，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使缓和政策处于危险之中。当时，在伊朗国王被推翻之后几天，又发生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事件，卡特政府虽然对此极度震惊，但仍然迅速做出反应，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并公开考虑其他措施。然而欧洲各大国却不愿放弃在其苏联事务中的轻松和舒适；虽然它们憎恨它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在营造自己可信赖的防御体系所需付出的高昂代价面前退缩了。无休止的关于责任分担的争论根本于事无补。我认为，欧洲因其自身的弱点而变得过于要强。

甚至在阿富汗遭受入侵之前，有关防御的紧急问题就已经列在议程上了。1977年，赫尔穆特·施密特就曾提出警告，苏联部署的SS-20导弹，其携带的多枚核弹头可以打击联邦德国境内任何目标以及更远的地方，北约需要就此做出回应，可以假定，他的意思是以欧洲为基地部署新的美国核武器。但是这种前景对于不断高涨的欧洲和平运动来说是一种阻碍。尽管如此，1979年12月，北约还是采纳了所谓的“双轨决定”，除非苏联撤回其先进的武器，否则就只能进行这样的美国武器部署。

在旅行期间以及在巴黎逗留的那一年，我就曾留意这些局势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隐秘转移。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倾注在《在半戴

高乐主义的欧洲中的德国》（1980年春天刊登在《外交事务》上）一文中，我就为什么德国问题重新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以及为什么跨大西洋关系如此令人困扰这些问题提出了我的看法。苏联的侵略和扩张主义——不仅仅在阿富汗——正在催生新的紧张局势。

1981年4月，玛里恩·登霍夫提出了一个她将在未来几年经常重复的主题——对于华盛顿来说，“缓和已成泡影”。此外她还担心西欧对美国磨刀霍霍的批评可能会引起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在转向中立主义的抱怨，反过来这又会助长欧洲的反美主义。这种逐步升级的不信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欧洲人对美国弱点的担心不亚于对美国实力的担心，在施密特于其温和时刻提出的“美国在财政领导或责任上放弃了权利”中，他们看到了这种弱点。欧洲人抱怨美国政策的不一致并质疑美国的可靠性。我发现某些这类吹毛求疵是危险的，但正如我所写的那样，事实上，美国必须恢复其信誉，“不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来衡量，而要通过实施一项不拘泥于修辞和细节的能源计划，通过采纳一项将产生根本性改革的经济战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内部强大的美国更能维系并有益于盟国了，没有什么能比一个衰弱的美国更能危及它了。信誉同样也始于国内”。

与此同时，德国问题也在困扰着德国人自身。他们正在向何处去？他们是否意识到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或者遵循什么样的道路，过去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控制的负担？德国人如何对待这种负担是测量德国意识的一种地震仪，是其未来的一个指示器。

各种各样的纪念仪式，如1983年希特勒上台五十周年和1985年希特勒灭亡与战胜德国四十周年，唤起了我们记忆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又分裂了现在。激烈的对立的记忆以前曾伤害德国政治，德国人选择记住他们造成的同时也遭受的创伤的方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他们也根本无法想象他们的争议是被国际公众舆论隔离的：当他

们激烈地争论过去的时候——以其缩小的版本，第三帝国——这个过去就变成了一个国际化论据的事实。我被许多关于德国过去的公开讨论吸引，我在恐怖和暴政的国家的经历无疑让我再次意识到“过去并没有消亡”，用福克纳的名言来说，“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过去”。

在美国的家中，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80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新任校长迈克尔·索文邀请我出任大学的教务长，主要负责艺术和科学类专业；他是一位聪明、果断的法律和政治学大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8年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对这项任命几乎毫无准备，有的只是对这项任命的热情以及教师应该参与学校管理的理智。承担这一新的责任是一个全面的投入——尽管同时我还设法保持并扩大我与欧洲的联系。

我以为我很了解哥伦比亚，但我很快发现我对其复杂性的无知。（当我在7月就职时，索文正在度假，所以一开始我就要负起全责，并且纯属偶然，我不得不去处理发生在我们医学院里的一场危机；在紧急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关系发展为亲密的友谊——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就敬畏白大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机会。）我很快就抓住了一个在我看来似未被承认的真理：人们把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类似的大学称为“私立”机构。当然，与大型公立机构相比它们是私立的，但鉴于这些私立机构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基金会日益密切的关系，我开始意识到传统的自负有其模糊性。

去了解预算的紧迫性——不停地奔波着——是最困难的，但某种混合了原则、直觉和不安的唬人的做法，再加上一些可靠的同事的建议，帮助我渡过了难关。我必须学会去对付官僚主义以及微小的挫折；在最令人恼怒的时刻，我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假定的身份。我对我应该预料到的事情感到惊讶：管理人员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哥伦比亚大学众多学院之间关于空间和资源的巨大冲突等。（如果他们拥有

核武器的话，我想，他们会使用的。）而且我也了解到了更多的学者的癖好——通常这是一种伪装起来的自身利益的委婉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一些关于学术生活的快乐的幻想。我把自己想象成全体教工的仆人，但我对大卫·理斯曼说，给那些不再懂得如何对待仆人的人当仆人实在是太难了。尽管如此，任何大学的核心都是其教职员工，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帮助哥伦比亚大学吸引新人才和留住老人才。

最让我感到愉快的任务是帮助哥伦比亚学院成为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这是一个迟迟未兑现的最理想的变革。当时，女性只能入读巴纳德学院，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内部的一个独立实体，并有其自己的教师——这是一所决心保留女性自身教育特权的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有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获得巴纳德学院的同意，或者单方面采取行动来吸引女学生。我们的谈判进行了一年多，我想到了一个交换条件，巴纳德可以通过这个交换条件在聘用自己的教师上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到1982年，在得到巴纳德学院的同意后，哥伦比亚学院终于接收了女生——这两所学院从此和谐共处。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忘记了这种单调乏味的例行公事和对我的教务长工作的失望，但我还记得我为能代表大学而感到的骄傲，尽管我的权力非常有限。在那些年里，玛里恩·登霍夫曾经到我在洛氏图书馆的办公室来看我（我在那里放了一些珀尔齐希款家具），当我们离开并穿过“我的”校园时，她说道：“你有一个普鲁士县长的责任和态度。”她的意思是以前普鲁士的地方政府，对其管辖下珍贵的土地拥有很大的权力。

作为一名教务长，我对美国学术生活新的参与，可能使我成为各种西德团体在它们想要听取美国声音时都愿意面对的一个更理想的人物。很早之前的一次遭遇留下了未曾预料的后果。1981年6月，我偶然

发现了《纽约时报》上登载的一则小小的公告，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赫斯特公司已投资7000万美元支持将在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开展的一项新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计划。我很惊讶，德国公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赞助国外的大规模研究的呢？几个星期后，西德中央科学基金会组织邀请我参加一个突然组织的政府、大学和工业界的科学家及行政人员出席的会议，来讨论促进科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最佳方法，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由于这个主题既关系到我的爱好，也关系到我的教务长工作，我便热切地接受了。然而其用心很快表露出来了，这场秘密会议旨在探讨为什么德国人不再处于科学研究的巅峰。

出席那次座谈会的德国人才可真不少！我们是在1981年9月相聚的，会议地点具有象征意义——修格尔庄园，这是在埃森举办的一次盛大的聚会，此地曾经是鲁尔区克虏伯帝国的中心。我们试图界定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成就，并同意最好的科学成就包括能给被认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以及那种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新视角的解决方法。西德人承认他们的国家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英国，我们讨论了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可能原因和扭转这种局面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当然，随着大学的大规模扩张而加深的官僚化程度会成为障碍。也许可提供给科研的资金是足够的，问题是这些资金应该如何以及由谁来分配。瑞士社会学家同时也是管理者的沃尔特·吕埃格（也是一位学生激进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良好的科学不仅可以通过提供经费，也可以通过拒绝平庸的项目来得到发展，减少资金实际上可能会带来有益的后果。我同意这一点，我经常想到应该为自愿放弃的项目创建一个奖项。

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康拉德·布洛赫是除我之外出席会议的美国人，他也是一名难民。这位极具吸引力和极其慷慨的人1912年出生在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奈塞，我的一些祖先也来自这里，此地还诞生了其他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包括鲁道夫·尼森。

布洛赫是我见过的许多自然科学家之一，他们完全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并且是艺术和文学的大师和爱好者。相比之下，许多人文学者的知识太有限了！他注意到“任何在文化和经济状态上具有可比性的社会都能产生比例大致相同的特殊的个人、本土人才和智慧人士”，他认为制度框架最有可能产生造诣上的差异。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知识自由和研究上的自由选择，但教师与学生之间最紧密、最公平的关系也至关重要。教学“不仅是信息传递……它还可以点燃火花，吸引善于接受的聪明才智去做出创造性的努力”。他含蓄地描绘了美国传统中最好的一面。

我能理解德国人怀念他们过去的伟大，并对现在相对缺乏可珍视的巅峰成就感到遗憾。有一次，布洛赫和我在无声的惊奇中互相看着对方，德国人难道看不出他们国家衰落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吗？你们恣意妄行，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驱逐出境，这难道就不会有影响吗？为什么在这些知识如此渊博的参与者之间存在这种沉默？这是一种惊人的不甘心和不愿意。也许这个话题太令人尴尬，也许这个观点太过明显，以至于难以启齿。布洛赫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虽然后来我们谈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我们没有提出来。

因为我参加了那次会议，所以我得到了其他邀请。由此我与许多团体建立了联系，除官方的联系之外，还有私人的联系，组织者是那些了解德美关系的中心性和不稳定性的人。对于美国人来说，与德国人的联系不同于与法国的那种旧式的、经常令人失望的“谈情说爱”，也不同于与英国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凭借相互的利益和古老的谦逊就可以得到保证。联邦共和国是不同的。从敌人转变为从属的盟友，甚至朋友，这样的转变实在过于迅速，虽然基本利益是共同的这个现实显而易见，并且常常提及，但是对于纳粹的过去那种独特且难以理解的邪恶一直存在有分歧的会造成分裂的回忆。

作为一名大西洋主义者，我深信欧美关系对我们的集体安全至关重要，这可以作为一条首要原则。但我也知道单凭军事手段是无法赢得冷战的，我赞成与苏联各种形式的接触，如赫尔辛基进程，以及所有军备控制上的努力。支持西德的自由民主是另一项承诺，反过来这又要求对德国的过去做出尽可能诚实的评价。个人愿望和公共福利恰好相吻合。

当时，我对我所得到的能深化我的跨大西洋联系的机会感到惊讶，但回想起来，可以看出我是如何轻易就成为“通常的嫌疑对象”之一的。1981年，我成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受托人，这是美国的一家基金会，源于维利·勃兰特纪念马歇尔计划的慷慨决定并旨在促进跨大西洋的项目。所有受托人构成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群体，包括沃尔特·海勒、卡尔·凯森和大卫·金斯伯格！两年后，谢泼德·斯通让我进入了柏林阿斯彭研究所的董事会，这是他为东西方接触而特地创建的聚会场所，他独特的、煽动性的、令人兴奋的温和性格使聚会格外生动。当然，玛里恩·登霍夫也是董事会成员，还有艾伦·布洛克、保罗·多提、埃查德·罗伊特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优秀国际主义者。谢普在柏林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我有一次给他敬酒时称他为“柏林的非常务市长”。德美关系的守护神是约翰·J. 麦克洛伊，他曾经是驻波恩的第一位美国高级专员。他是在纽约的美国对德协会的创始人，这是我偶尔去做演讲的另一个机构。

在所有这些群体中——尽管通常情况下都比较无聊——我不仅了解到了很多德国的情况，而且有机会或多或少自发地形成自己的观点，往往并没有考虑到将它们出版的可怕前景。后来我发现莱布尼茨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让我松了一口气：“单靠我自己我想不出多少东西，但当别人在说些什么的时候，我就能想到更好的主意。”

德国的美国团体只是快速发展的国际网络的一部分，这一网络由知名的国际主义者和新生代的年轻人组成。也许其中会有过多的高谈阔论和奢侈阔绰的生活——我常常默默地想到世界上一些伟大的酒店是靠着世界危机生存的，无论这种危机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但我现在注意到，在新的世纪里，这些为公众着想的努力的减少或许增加了国际的隔阂，而企业界则已经在奢侈的会议这一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以更高的成本服务于更狭隘的利益。

我与德国不断扩大个人联系的同时，与这些机构的联系也在加强。伯爵夫人仍然是我最亲密的德国朋友和偶尔的促进者。她的一些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与此同时，拉尔夫·达伦多夫已经迁居英国，尽管我们之间有关德国事务的交谈仍在继续。我逐渐认识了新的同事、记者和公众人物，不论男女，他们都在以某种方式在德国历史和活跃的政治交会点上效劳。会面的机会太多了！我现在意识到，我个人的愿望有多伟大：我生命中的两个部分——欧洲和美国——应该和睦相处。

出于对和谐的愿望，我成了一条寻找麻烦的松露猎犬^[1]，去察觉相对亲切友好的表面之下潜伏着的不和谐的情绪。此外，一些艰难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首先是北约1979年的双轨决定，允许部署能够达到苏联境内目标的美国中程核导弹。在西德包括许多社民党成员在内的和平运动发展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因为这个国家考虑到了在德国领土上出现更多核武器的前景。

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总统并没有使事态有所改善。欧洲的媒体充满了好奇，好莱坞的一个二流演员怎么能够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在这个看似天真无知的人的眼里，苏联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威胁和无情的对手，而是现代世界中所有“邪恶”的集中体现。对于里根来说，苏联展示出了当个人服从于国家并放弃所有道德时会发生的全

部情况。里根最初的冲动只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优越军事实力，他将增加国防开支作为对付他所谓的“邪恶帝国”的一项更严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相信缓和的欧洲人此刻十分焦虑，和平活动家视里根重启卡特总统放弃的研制中子弹计划为美国新军国主义的证据。这种武器应该能加强狭窄范围内的辐射，同时降低爆炸效果——针对坦克编队特别有效。批评者们很快将这种炸弹称为“资本家的武器”，对人会致命，但不会损害财产。

1981年3月举行了又一次两年一度的美德会议，这次会议在普林斯顿召开（德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包括玛里恩·登霍夫和两位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克劳斯·冯·多纳尼和霍斯特·耶姆克，以及其他代表不同意见的人），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评估新政府。我警告不要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军事安全上，要注重地面上的东西而不是深深扎在地底下的东西，即要关注人民对安全的渴望。我认为，里根主义具有强烈的文化因素——我早已对即将演化成的美国的“文化战争”感到不安。

会议结束几个月后，我写道：“我们（美国人）越强调军事力量，不同意见的声音就越多……对欧洲人而言，（美国的）过度杀伤能力的增加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是荒谬的；他们知道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去杀戮，并且可以反复杀上一百次。他们在本世纪的历史经验是野蛮无效的权势的经验，盲目地被耗费掉又盲目地去崇拜。”但我注意到，同样的欧洲经验可能会促进欧洲的平静。我并没有对欧洲这种趋势的一些早期迹象视而不见——我早已经谈到过欧洲“正在度假”，暂时放下了其历史责任，并有失去其命运感的危险，对其政治上的衰退和自身安全需要的忽视还心安理得。

与此同时，而且并非不相关的是，西欧国家建立了一个宏伟的福利体系，为其工人提供医疗保健、体面的工资和长期带薪休假——这

些远远超过了大多数美国工人所享有的或欧洲人所预期的福利。在联邦共和国，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常常可以期待长达六周的假期，即使是美国的经理人对此也是不敢想象的。在历史的假期和工作的假期之间是否有种微妙的联系呢？在法国人所谓的战后辉煌三十年中，西欧人在社会和平与和解上加大了投入，而这种历史上可以理解的趋势有时会让美国人觉得是在煽动一种绥靖倾向。几十年之内，很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慷慨的行为削弱了联邦共和国的经济竞争力，同时更深层次的在政治上退步的倾向助长了美国人对“旧欧洲的”优柔寡断和自我放纵的激烈争论。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在奚落欧洲人，指责欧洲人缺乏男子汉气概。我是否不该去写美国的一种威廉品质——某种类似于1914年以前德意志帝国国王的品质：军事上咄咄逼人，但政治上愚蠢无能？

在西德，和平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实力不断增强，苏联集团认为这将有助于破坏西方的联盟。抗议的浪潮此起彼伏：街头的和平游行，媒体上的争论，新教教堂内的祈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其可怕的激进分子现在成了反核运动的坚定支持者。1982年3月，在慕尼黑附近施塔恩贝格湖畔著名的国际会议举办地图青，福音学院在此举办了一次有关“通过裁军确保和平”的讨论会。我非常敬佩的熟人希尔德加德·哈姆·布鲁赫，此时担任外交部的国务秘书，主持了开幕式；参会者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国际阵容，其中包括美国驻布拉格大使威廉·吕尔斯，伦敦战略研究所的杰出所长克里斯托弗·伯特伦，还有一个苏联代表团，其中有列昂尼德·萨米亚丁和维塔利·朱尔金，都是我在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老熟人。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在开幕致辞中向三位听众——教会、苏联和美国——发出了一种权威性的呼吁。仅靠裁军是不会带来和平的，他说，因为对敌对国家的恐惧始终构成了威胁；到目前为止，只有令人畏惧的核武器才能维

持不稳定的和平。他给和平运动提供了合理的支持，但警告说，如果它最终削弱了北约，那么就将增加战争的风险。无论如何，第一项要求是从欧洲撤出所有中程核武器。“像许多欧洲人一样，”他说，“我对今天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深感不安。”他对所有主体所做的公正批评表明，持续的裁军努力是唯一直接的务实选择。

我被要求就苏联对外友协副会长尤金·伊万诺夫的发言做出回应，他谈到了舆论的作用，并认为和平运动是由美国重新启动并企图赢得的军备竞赛所引起的，这个运动将迫使各国政府采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他声称，在苏联，和平活动家获得了国家的支持，他回忆起列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颁布《和平法令》。

与苏联对和平的郑重声明相伴随的是苏联的侵略。为了反驳所有苏联一直是清白无辜的看法，我引用了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敌人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许多断言。此外，美国人也有和平与反核运动，完全符合这个国家的自我批评的民主传统。我引用了乔治·凯南最近一次演讲中的一句话，他呼吁“两个超级大国……立即全面削减50%的核武库”，并对“现在控制着双方政治家和宣传机构的行为和表述的在关于苏美关系上几乎完全军事化的思维和语言”提出了警告。凯南欢迎全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但他知道和平运动也会“吸引怪人和极端分子……（它们）会朝许多错误的方向偏离”。

我完全了解西方的缺陷和经常自以为是的好斗精神。在西方有相互抗衡的力量，有一些领袖人物，例如伟大的科学家汉斯·贝特，其对双方荒唐地发展核武库提出了警告。会后，我给当时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参赞沃伦·齐默尔曼写了一封信：“看到苏联人和美国人在吸引德国人的灵魂，这很有意思。我很高兴地向您汇报，我的发言是苏联人唯一没有鼓掌的发言。”

尽管在图青时有过一些意气相投的时刻，但对我而言并不比与魏茨泽克长时间的谈话更为重要，因为我对德国古老的文化悲观传统与现今和平运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所做的随意的评论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我给他寄了一本我写的关于文化绝望的书，很快就收到了他的一封不同寻常的回信，三页单行书写的纸集哲学理论和个人观点于一身。他恢复了我们早先的谈话，反驳了任何关于德国新左翼民族主义观念。他认为，民族主义——无论如何他都是无法接受的——在德国总是比在其他国家弱得多，纳粹时期是一个过度补偿的时期；1945年之后，任何人都不必害怕德国民族主义了。但他对和平运动的怀疑态度得到了我的证实，即它与德国文化悲观主义的一些主题是相呼应的。

他告诉我，他发现对美国和平运动的讨论很重要，正是因为这种讨论阐明了美国和欧洲态度之间的差异，后者表示希望被排除在“两个世界霸权候选人之间的致命冲突之外，作为一种生存的本能”。由于欧洲将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天然的战场”，显然，“一项积极的和平政策”是必要之选，但它需要现有联盟的稳定；德国或欧洲的中立主义“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梦想建构”。

魏茨泽克还就我的书写信给我，他告诉我，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读过我书中提到的三位作者——拉加德、朗贝和莫勒·范登布鲁克——的作品，但过了一会儿“发现他不可能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即使他没有理解这些人想要的是什么”。然而我的书却向他表明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德国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一段话让我感到震惊。虽然他从未对纳粹意识形态产生过一丝兴趣，魏茨泽克写道，“但是，我在1933年之后受到极大的诱惑，想以某种方式加入这场运动。这与那些人所拥有的思想无关，而只是一种针对1933年被称为假冒圣灵的倾注所做出的基本反应。如果我试图回顾性地分析一下当时影响了我的究竟是什么，没有影响我的又是什么，我……得出结论……纳

粹的观点是愚蠢的，但纳粹的崛起是他们自己都未曾理解的一种进程的征兆。我正在试图追查的正是这个进程”。和我一样，纳粹也不了解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个进程里，他们是最卑鄙的征兆。

他对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德国人对西方文化发展的拒绝为全民族的愚蠢专门铺了一条路——并指出，作为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四岁的孩子，他经历了这种发展的矛盾心态。是的，当然德国人想要将自己排除在西方发展之外是错误的，“但作为西方发展的批评者，德国人应该能凭直觉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很珍惜那封信。在随后的漫步和谈话中，我可以告诉他我自己也曾坚持认为关于现代性的德国问题是非常紧迫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出于某种非常特殊的原因，我正在再次思考处于未经承认的衰落之中的新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就在那一年，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以德国新教的“隐性世俗化”为题做了演讲，这个术语是我杜撰的，类似于对一种未被注意的心脏病发作做出的医学诊断：“隐性心脏病”。启蒙运动对往往被哲学家视为迷信的教会或信仰的攻击，并没有撼动德国的局势，但在19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远离宗教，同时怀着敬畏和尊重去对待世俗的禀赋——国家或科学或文化。我曾经暗示，国家社会主义在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它在做些什么的情况下，用虚假的宗教言论和仪式来迎合不安分的世俗之人。然而此时此刻，有一位备受尊敬的德国哲学家，承认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要素感动！对于1982年的这种坦诚的交往和随后的对话，我仍然感激不尽。

在西德的领土上部署潘兴导弹仍然是德国政治中最能引起分裂的问题。尽管在私下分享了和平运动对核武器的憎恶，施密特却并没有动摇对北约部署导弹的支持，但他在这个国家和党内遭到了极大的反

对。他警告社民党，如果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判断会产生对于所向往的情况的激情，那么政治灾难就会随之而来。但是施密特的结盟伙伴也变得焦躁不安，而且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信奉不受约束的市场的自由民主党右翼要求削减社会福利，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自由民主党的一些重要人士一直有改变伙伴与基民盟结盟这个心思，即使他们的选举授权暗示了对社会党-自由党联盟的明确承诺。施密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托·冯·兰布斯多夫伯爵于1982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晚宴上表示，他希望尽快结束联盟。（我和兰布斯多夫这位德国波罗的海贵族和热心的大西洋主义者有着密切的交往。他的妻子曾微笑着告诉我，她的婚前姓氏是奎斯托普；她知道我认出了这个姓氏，因为一百年前布莱希罗德不得不从复杂的破产中拯救她的祖先！）

1982年10月，施密特安排了一次失去议会信任的投票，因为他知道联盟解体的责任将落在自由民主党身上。自由民主党和基民盟的代表随后选举赫尔穆特·科尔作为他的继任者。希尔德加德·哈姆·布鲁赫，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这种变动的自由民主党领导人之一，他说，这样做“令人厌恶，有损宪法尊严……并且侵犯了道德”。社会党-自由党时代已经持续了十三年——几乎和整个魏玛共和国时代一样长。它的存在巩固了国内的民主并加强了联邦共和国在国外的地位。

随着施密特的离去，我想，正如我当时写的那样：“西方失去了它最有经验、最有效率，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政治家……他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卓越的战后总理……他的政府的结束标志着一段不稳定时期的开始。”我现在认为我对施密特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对未来的不稳定性的看法是错误的。赫尔穆特·科尔的新联盟将持续执政长达十六年。

赫尔穆特·科尔年轻时就加入了基民盟，在党内地位不断上升；他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我首先把他描绘成这样一个人，他的主要优点就是没有已知的恶习，但到他离任时，他的美德和恶习都变得明显了。我在纽约见过他；他对一位历史学家同行非常友好，但给我留下了守旧的印象。他非常亲美，在里根总统执政下新掌权的共和党人也支持像他这样的基民盟保守派。科尔加入了英国和美国的新的统治者行列——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成为英国令人敬畏的首相——我认为他们都是在保守派幌子下的激进思想家。科尔更接近于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即具有社会意识和务实。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向右转时，撒切尔和里根可以沉溺于“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或皇家海军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控制权这类超级爱国的颂扬之词，然而科尔总理却不得不在一个框架内运作，在这个框架内对过去的求助会激起愤怒的争议。

通过运用一个不寻常的宪法策略，科尔能够在1983年3月要求举行新的大选。西德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失业率很高。通过与先前的社会党-自由党政权背道而驰，并承诺“更多的市场，更多的流动性”，科尔为他的政党赢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对他竞选中的丑陋基调感到震惊：德国政治的风格，而不只是物质利益的实质或冲突，总是特别有趣的。基民盟领导人指责和平活动人士为“叛国”，并将社民党候选人汉斯-尧赫·沃格尔（伯恩哈德的兄弟）丑化为“安德罗波夫的候选人”——另一个保守派的例子暗示社会党人是共产党人的堂兄弟。有没有人试图评估共产党对右派获胜的贡献呢？

科尔的中-右派政府在3月获得了强有力的权威之后，被广泛称赞为构成了一次趋势反转（Tendenzwende），在政策和精神两方面的转变。11月，联邦议会批准在西德领土上部署潘兴导弹，尽管蔑视施密特的警告的社民党代表投了反对票，投反对票的还有议会中的一个新

团体——绿党。绿党最初是一群心怀不满、持不同政治观点的年轻活跃分子，但他们在强烈反对核武器和保护环境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被这个新的勇于反正统的非党派吸引。在着装和举止方面，他们似乎是六八年那一代人的继承者。我想知道其中有没有与我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类似的存在。绿党是否可能标志着德意志灵魂的一种政治重现，这种德意志灵魂在其最佳状态时给了我们“诗歌和真理”（歌德自传的标题），而在其最坏的情况下给了我们忧伤和悲剧？我认为，在某个时候，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将在领土层面结成联盟，但是它们对实业家的贪婪及其对大自然造成的毒害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也会使它们成为传统保守派的朋友。

在坚定的亲西方的基民盟中，有一些我认为优于赫尔穆特·科尔的杰出人物。（科尔可能已同意我的判断，因为他在党内把他们作为可能的竞争对手而无情地予以排斥。）伯恩哈德·沃格尔就是这样一位， he 现在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州政府总理，科尔也曾经担任这个职位。基民盟总书记库尔特·比登科普夫是一位具有广泛兴趣、精力充沛、抱负远大的人，他的优秀本质使科尔不得不尽量将其打发到权力的边缘。经过多年的友谊，我经常在我们双方的国家里见到这两个人；我们进行了持续的对话——几乎无话不谈。

我在大多数德国政党中有朋友，但由于历史因素和我对进步的自由主义的信仰，我对社会民主党怀有根本上的同情。我记得他们曾经勇敢地反对希特勒。在战后时期，这个党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但其最好的领袖——恩斯特·罗伊特、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都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典范。在潘兴导弹问题上，我可以理解勃兰特这派的反对意见，但又站在施密特一边，支持他对欧洲需求和联盟团结的现实评价。

我的教务长任期于1983年6月结束——非常有收获的整整三个年头。卸任后，在好几年的生活中我都遇到了困难，有专业上的也有私人的。我将转向什么样的主要工作？对我计划中的但经常被打断的关于欧洲的那本书我已经不敢确定是否还要写了。但是自我的关注焦点停留在德国后，早在1982年11月，即施密特卸任后一个月，我就对玛丽恩若有所思地提起过，或许我应该尝试去写本关于他的书，这看起来似乎并非不一致。几个月后，在纽约，我同施密特和他的夫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他的夫人有着一丝不苟的好奇心和宽宏大量的精神。同她丈夫的冷漠不一样，洛姬仅仅用几句话就可以传达出温暖和支持，她总是对我展示出不一般的友好态度。

我们的谈话开始于他的询问：《金与铁》已经售出多少本？然后他给我看了他计划中要写的书《遭遇》的写作大纲。我告诉他布尔克哈特用过这个书名。他想要写一些重要的同代人，包括艺术家和哲学家。他问我他是否需要一个文学代理人。我告诉他基辛格有一个，然后他反击说：“我无法想象有谁会在商业上比亨利更精明。”（他的书《同伴》出版于1996年。）

我向施密特承认，我对我的写作计划有过认真的考虑：写关于俾斯麦的那本书我花了十六年时间，我太老了，无法再去着手实施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此外，一个历史学家去写一个还活着的人是危险的：我们的视角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施密特把我说的这些话置之不顾，只是指出他有自己的档案，以及我可以采访许多同时代人。我们分手时约定我将在6月去拜访他，进一步讨论此事。

我们在那第一次长谈中有广泛的话题。他对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的评价非常严厉。他认为，美国是最慷慨和最重要的国家，但它失去了领导能力。他特别批评美国人在发展中国家问题上缺乏理解。当我们谈到他的部长生涯开始时恰逢美国陷于越南战争的困境，我马上意

识到了这一点。他似乎对美国国内政治毫无兴趣，因而也不知情：他对林登·约翰逊不屑一顾，但很钦佩尼克松能“打开”中国的大门；当然尼克松是个骗子，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欧洲观点。施密特不如在早先的场合中那么达观，但他的思维清晰度和判断力的确定性与之前一样惊人。也许他出名的粗暴是一种保护内心敏感的盾牌。

1983年6月，我从教务长办公室直接前往位于汉堡的玛里恩的家，这是我在施密特的档案室十天工作期间的基地。第一天，施密特在他简单而采光充足的现代住宅中接待了我。他曾经参与了这套住宅的设计工作，包括一个航海风格的吧台；我注意到了丰富的藏书，从经典到最现代的文学，以及引人注目的地毯和绘画。

从早些时候与他或关于他的谈话中，我已经获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名汉堡的学生，他就已经开始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了，当时这个政权宣称埃米尔·诺尔德是一位“颓废”的艺术家。在他的档案中，我找到了他在1968年写给他的作家朋友齐格弗里德·伦茨的一封信。信中说，十七岁的他，曾认为诺尔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艺术家，而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则是另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艺术家；因此，这两位“被放逐”的艺术家帮助了施密特免受纳粹主义的诱惑。奇怪的是，许多以他们接受过的教育为荣的德国人却没有同样的觉悟。

他曾经是国防军的一名军官，同时守住了他有一个犹太祖母的秘密，这是他申请结婚所需“雅利安人”认证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他很久以后才谈起这位祖母，而在波恩共和国，拥有一位犹太祖母被视为资产与之前被看作危险的负债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施密特非常喜欢音乐、绘画和文学，但对他接受的教育有点不以为然。我不得不起

魏玛最杰出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的受信任的助手经常从经典中寻求所需要的引文。

施密特曾经被人起了个绰号叫“大嘴巴施密特”或“大嘴唇施密特”，因为他在1958年对支持西德部署核武器的论点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反驳。他告诉我，他一直很喜欢这个绰号，把它作为一项荣誉。我想，他知道他敏捷的才智对于潜在的批评者，对于那些他认为塞满了这个世界的傻瓜（Dummköpfe）来说不啻一种威慑。在给玛里恩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在许多领域内，勃兰特似乎认为领导力是一种不礼貌的东西，当然也是不民主的”，但施密特本人认为权威并不来自办公室或选举，而是必须要去赢得并由自己维护。他非常钦佩强大而聪明的风云人物，例如安瓦尔·萨达特。

他把我带到他花园里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是为了存放他的档案而匆匆盖的。他给了我完全的自由去查阅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档案，其中大约有182份文档是他自己写的，还有至少200份其他文档。从现场检查来看，这些文档似乎是有些杂乱地收拢来的，涵盖了从1953年起他担任过的各种职务的办公档案，有些文档是按国家分类，其他的则是按主题分类，还有他每周在总理府的小屋同他最亲密的四位顾问讨论的记录，这样的讨论被冠名为“Kleeblatt（四叶草）”。全部档案数量十分庞大，但从一开始我就有这样的印象：档案远远谈不上完整，也没有档案管理员来帮助指导我。简言之，我认为这是一个总理的图书馆，不完整，很可能缺少一些机密材料，那是必须留在波恩的。然而，尽情翻阅档案是令人兴奋的——我相信我是他第一个允许这样做的历史学家——而且充满了悬念。施密特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也是一位喜欢写旁注的人，他在文件边上潦草地写下了批注，通常用的是他那种可识别的绿色墨水。时间很短暂，但我尽可能多地进行了探索性的尝试，凭的只是明智的预感和运气这种不可思议的、令

人不安的组合来指导此时的档案工作，而这样的组合是无法信任或对其有信心的。

起初我把重点放在施密特的信函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信函是按主题和年份排列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信函中，大多数是德国统一这个主题。施密特知道对于统一不存在一蹴而就的希望，因此，不同于党内的许多人，他支持重新武装西德和成为北约成员，这些是统一的短期障碍。他认为，北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靠山，但是绝不能忘记那些在彼岸的人，正如他在1961年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东德不应该被永久地指定去承担战败的责任。作为总理，他写道，统一不会是回归昨天的德国，而是向着不同的明天，向着无法想象的一个政体形式的统一国家迈进。我认为他在这个信念上绝不会动摇：这两个德国有朝一日会以某种方式重新和平统一。我们经常谈到波兰模式，“我们德国人应该学习波兰邻居这个例子”，他总是这样说道。波兰人花了120年的时间才恢复了他们全部的国家地位。

在玛里恩1974年10月写给施密特的一封私信中有一个异常地发现，此时是在他担任总理职位大约五个月之后。她以简洁的坦诚风格在信中提到了前一天晚上他们“圈子”里的一次会面，这个圈子包括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基民盟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施密特可能对魏茨泽克给予他和她的评价感兴趣，她说，因为“当一个人爬到最高领导层那个孤独的高度时，那里的天气越来越冷，责任越来越重，这个人就会被逐渐推入一个隔离室”；这种情况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从威廉皇帝到维利·勃兰特。“如果你的立场是悲观的，那就太糟糕了，但是怀疑和偶尔的焦虑是有益的，是很重要的，是反思和人性的先决条件。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并且可以做任何事情的人才能摆脱那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她补充说，几乎一切对他来说都很顺利。但是，成功“不仅要永远归功于功绩，而且要归功于恩典，无论是谁，只要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被众神毁灭”。她认为，正是由

于有了这种精神，罗马俱乐部才有其重要性。（该俱乐部是1968年由一个早期环保主义者国际团体成立的，于1972年凭借一篇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报告预测，如果对自然资源不加考虑地持续开发，就会引发灾难。）“成员们意识到我们危机的精神背景在于（我们的）不谦逊和妄自尊大。”巨大的物质财富产生了各种新的福利问题。她的结尾是：“这不是一封信，仅仅是一条批注！”

在施密特档案室工作的那十天是令人称奇的。我想到了鲍西娅的三个盒子^[2]。这几百份文档中我应该打开哪一个呢？最大的宝藏在哪里呢？我试图用战略进行挑选，但我经常感到失望，并且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继续追究突然的、有时令人激动不已的发现。勃兰特和施密特两人未充分报道的成就之一是他们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社会主义者的帮助，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我还发现了有关施密特与葡萄牙社会党领袖马里奥·苏亚雷斯谈话的报告，主要议题是如何获得金钱来帮助他们。另有一份与教宗保罗六世的会谈纪要，其中施密特强调了天主教的社会教义的一致性和1959年社民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而教宗则表达了他对德国人民的崇高敬意，认为德国人在精神上仍然是单一的实体（鉴于东德的无神论，这样的评论是很奇怪的）。比起每天有不一样的关注焦点的政治家，施密特指出，教会和教宗能给予他们更长时间的考虑。教宗回答说：“上帝保佑，一切本该如此！”我还发现了大量的施密特与他最中意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通信。如此充实的生活！

考虑到施密特对波兰人的特殊感受，我紧紧把握住涉及德国与波兰关系的那些非常吸引人但比较零碎的文档。我找到了一些重要会谈的备忘录，有关进行中的讨论的暗示，但没有连贯的记录，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心想，即使只是写一篇关于施密特与波兰关系的文章，这

些文件也是不充分的，而且所需要的其他许多材料大概是无法获取的。

然而这个想法真是太诱人了！作为总理，施密特与波兰党的领袖爱德华·盖莱克关系非常亲近，在盖莱克的治理下，波兰的债务已经翻了两番而生活水平却没有显著提高。在1972年至1980年，在盖莱克被免职后，这两人举行了官方的和私下的会晤，同时在较低的层面上进行了平行讨论，这些谈话并不局限于困难的双边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仍然生活在波兰的德国人，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和马祖里湖区：西德政府要求任何想要离开那里的人能够自由迁徙，并为希望留下的人提供德语教学）。波兰认为联邦共和国是其在布鲁塞尔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利益的最有可能的支持者。施密特警告说，苏联凭借其SS-20导弹在欧洲形成了战术核优势，这个核优势对波兰构成的威胁不亚于对西方的威胁，因为一个受到苏维埃政权威胁的联邦共和国对波兰不会有多大用处。^[3]

我还发现了1979年5月下旬施密特和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之间的谈话记录，他们的谈话大概是我在华沙见过拉科夫斯基之后。面对施密特，拉科夫斯基承认波兰的经济状况是极其糟糕的：“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深刻变革，我们就无法管理。”与此同时，教会形成了对波兰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反对力量，而且红衣主教沃伊蒂瓦当选为罗马教宗也给了波兰人新的自信心。盖莱克想要让教会和执政党和解。但是，施密特档案中有关从1980年团结工会开始到1981年12月颁布戒严令这一段最关键时期的文件很少。12月13日，正当施密特在东德与埃里希·昂纳克会晤时，他针对戒严令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声明，就施密特的这个可悲的失误我也没有找到任何记录。波兰官员已经警告他罢工者的要求是难以满足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也都在担心华沙条约组织干预的威胁，施密特肯定这种干预会对整个欧洲安全造成伤害。在戒严令实施后，拉科夫斯基再次出面“解释”其必要性，并警告西方

不要随意抗议或制裁。西方要求从监狱里释放亲团结工会的波兰人是徒劳的，他说，因为他们就是那些存心希望把波兰引入灾难之中的人——我认为，他的意思是那些人愿意去冒与苏联对抗的风险。就像玛里恩一样，施密特与团结工会保持着距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

我还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惊喜，那是偶然发现的一些小宝藏，比如1977年4月24日乔治·凯南写给玛里恩·登霍夫的一封信的副本：“但是我对华盛顿的现状一点都不高兴。冷战斗士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在国会和公众舆论中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更不用提那几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尤其是犹太人和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媒体和卡特先生会发现很难去反对他们。”我怀疑他指的是右翼共和党人，他们当时已经从新保守主义者的崛起中获益匪浅，新保守主义者是一群激烈的反苏作家、专家和理论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前托洛茨基分子，现在则是极其吹毛求疵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被右翼共和党人认为还不够反共），比如诺曼·波德霍雷茨和他的妻子米奇·迪克特，他们强烈要求美国拥有更大的军事力量去面对苏联，要求给犹太人更多的从苏联移居海外的自由，还要求给以色列更多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担忧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有一次施密特称贝京总理为一个充满仇恨的人，但他同时警告我不要去写关于和平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终结的文章：“这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再如，1980年6月，施密特和纳赫姆·戈德曼——世界犹太人大会前主席，被称为无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并于1951年与阿登纳一起参加首次德国向以色列提供赔款的谈判——曾见过面，并计划为戈德曼八十五岁生日筹备晚宴。我找到了他们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是由我的一位老熟人奥托·冯·德尔·加布伦茨整理的。除了筹划晚宴外，他们还谈到了政策，非常狡猾、颇有魅力的戈德曼认为西德应该向以色列支付4亿德国马克作为最后的赔偿——已经支付或承诺了800亿美元。他接着说，以色列一直受到内部弊病和腐败的困扰，很快就会不得不宣布破产，

极端正统派正在为内战做准备。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曾经对他说，他再也不相信中东的和平了，并警告说：“十年后以色列将不复存在。”戈德曼补充说，犹太人是“一个可以去钦佩但无法去爱的群体。当他们受到迫害时，他们是令人赞叹的。当他们有好日子过的时候，他们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然后他们的肆无忌惮就暴露无遗”。这种坦率太有心计了！施密特问他是否有哪位受人尊敬的以色列人对经济问题有所了解。戈德曼回答说，大学里有，但是贝京认为“教授对于世界而言是一种不幸”。对此施密特回答说：“这一次他是正确的。”

然而此时此刻的我就是一名教授，正在施密特的花园里工作，而且施密特待我非常热情。在最后的那几天里，他们来到档案室，施密特说他得出门旅行，施密特夫人说我完成工作后，可以去她家里喝一杯。我们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首要的是关于波兰的事情。我告诉她我曾经专注于有关波兰的文档，知道波兰对她丈夫工作的重要性。“那是出自内心的”，她说道。

在离开汉堡之后，我到西尔斯·玛利亚那里休息了一阵。在那里，在一个我最喜欢的山坡上，我草草记下了一些笔记，考虑着终究还是要写一篇关于施密特和波兰的文章，文章要强调施密特作为一个实干家或者一个经营者、一个坚忍不拔的身体力行者的声誉，而忽视他克制下的激情，他的广泛且有见识的兴趣，以及他的政治道德。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他的法国政策，他如何通过他与法国的关系使联邦德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声音，以及他如何继续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就是一项“德意志政策”。

但是我还有许多其他承诺并且有截止日期。更糟糕的是，我之前的怀疑又回来了。历史学家应该坚持过去，或者至少我应该坚持德国的过去，尤其是那个过去——纳粹的过去——再次成了如此突出并引

起分裂的问题。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德国及其争夺世界霸权的话，德国就不会分裂，以色列也不会被建立。所以我很勉强地放弃了有关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写作想法，并羞怯地告诉他我的退缩。他很有雅量，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

在20世纪80年代，对过去问题的缄默让位于争强好胜的纪念活动：逐年发生的事件使公众意识到过去的中心地位；在媒体的灌输下，集体记忆变得几乎痴迷不悟。国家社会主义崛起五十周年及其失败四十周年使公众的纪念活动成为一项自发的重大事件。恰好在这一时期，经历过纳粹“胜利”的那一代人面对出生于最终成为悲剧的年代或之后的一代人。激发公众记忆的盛大仪式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那个长期困扰我们中的一些人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发生呢？——现在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产生分裂。我对局势的变化感到焦虑不安，而各种邀请则让我有机会去解决新的问题。

1983年，东德和西德联手共同开展纪念活动，庆祝马丁·路德五百周年诞辰。我认为合作是改变态度的重要信号。在我看来，两个德国是在心照不宣地扮演着一个国家的角色。两边接受和平运动的牧师们都在努力，就新教对国家的益处，特别是在纳粹时期，如果不是加以否认的话，至少要做出补偿。路德既是革命的又是极其保守的，他的教会总是可以宣称他的“基督徒自由”这一教义涉及一种精神实质，同时又要求或允许无条件服从上帝所建立的世俗权威。现在这个无神论的东德国家在暂时与教会合作，共同纪念这位伟大的改革者，然而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却曾被诬蔑为公子王孙的仆人，是镇压1520年农民起义的同谋，是一个阶级敌人。但民主德国接受了路德生平和宗教改革历史的核心内容，它对路德的关注与其要求收回更多的德国和普鲁士遗产的努力是吻合的。令我颇感震惊的是，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承认了路德的深刻宗教性质，而东德政府则承认他的“客观的”进步作用：最终赢得了普遍认可！

同一年里，在美国召开了两个关于德美关系的秘密会议，其中一个是在庆祝1683年在宾夕法尼亚日耳曼敦这个新世界建立的第一块德国殖民地。尽管会议上弥漫着乐观气氛，但我提醒说早先的过度兴奋已经减弱；新的德美关系是一种清醒的关系，利益和观念在不断产生分歧，疑虑也越来越多。一些西德人认为里根总统的言论充其量是不谨慎和危险的，而一些美国人则抱怨说西德人是忘恩负义的、不忠诚的，在政治上是短视的。当会议文件发表后，联邦共和国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卡尔·卡斯滕斯来到美国庆祝这一时刻。里根总统为他举行了国宴，佩吉和我也获得邀请，这是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特殊待遇。^[4]

第二次会议是1983年9月由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詹姆斯·比林顿组织的，主题为“德美关系以及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和世界上的作用”。会议间隙发生的两起事件令我难以忘怀。在某人发言之后，米奇·迪克特站了起来，她的话语充满讽刺，提醒我们民主德国的存在，她相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由此忽视了对美国利益的一个巨大威胁。我记得她最近突然就成了德国问题专家。德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她在西德时在多数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陪伴下有过一次著名的“游览”（她的原话），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要去看“一所集中营”，她被带到达豪，在那里，她告诉大家，她发现了毒气室和烤箱。我的朋友告诉我，这群人的无知与他们的傲慢非常匹配。

我对这次与米奇·迪克特的相遇很感兴趣。三年前，就在里根当选之后，她曾邀请我加入一个刚成立的组织——自由世界委员会。该组织欲反对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不断扩散的“极权主义”，以及在民主国家内表达的极权主义思想。我对这个群体感到不安，尽管这个组织的一些倡导者是我所尊重的，比如布热津斯基；我担心他们的直接敌人是他们认为的自由主义者或左翼正统派。所以我给迪克特写了一封理由充分的回信，谢绝加入该组织，我解释说：“西班牙、葡萄

牙、希腊、波兰和匈牙利这些例子使我很难去接受一个声明，即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一个对其持续生存能力日益加重的威胁’。”

我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保守派是非自由主义的理论家，尤其是他们坚信他们在防御和缓和上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并且是唯一爱国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该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组织得到了理查德·梅隆·斯凯夫的大力资助，此人是激进右翼势力富有的赞助者。20世纪50年代，我在霍夫斯塔特家和特里林家中遇到过欧文·克里斯托——另一位有点吸引人的早期新保守派；迪克曾在20世纪60年代因他的非自由主义观点而斥责过他，欧文在十年后声称新保守主义者是“被现实打劫的”自由主义者。难道“被打劫”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城市中黑人小偷所犯罪行的说法吗？（我一直怀疑新保守派与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包含种族因素，他们对平权措施的攻击证实了这一点。）但如果现实曾经“打劫”了他们，那现实也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向财富和权力的进军值得请一个巴尔扎克来充当他们的编年史家了；他可以利用和蔼可亲的理查德·珀尔作为关键人物，将贪婪与锋芒毕露的道德“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美国的温和派很少去关注精心策划形成的新保守主义立场，而对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立场却过于自信，这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在比林顿组织的会议上，一个偶然事件让我得到了一项永久的收获。有一次喝咖啡休息时，我与一位“观察员”热情地交谈起来。这位“观察员”是一位非常活泼的女性，身材娇小，举止得体大方，是个研究现代文学的德裔美国学者，名叫欧内斯汀·施兰特。当我们在中心的前厅聊天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近她并拥抱她，此人是比尔·布拉德利，在向他的妻子致敬。这一次邂逅引发了新的政治联系。

1983年3月，里根通过宣布一项“战略防御计划”（俗称“星球大战”）进一步推进了他的军事计划，该计划将重点放在北美复杂的核防御上。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无懈可击的美国可能会忽视其对北约的承诺，从而忽视对联邦共和国国防的承诺呢？以前关于欧洲毫无准备的怀疑也同时在美国增长，怀疑西德会“忘恩负义”，以及德国会有“自我芬兰化”的危险，这是对一个公认是中立国家的不恰当的提法。在这个有许多纪念活动的十年中，很多公共事件不断涌现了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德国问题也继续成为辩论主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83年，西柏林——理查德·冯·魏茨泽克为市长——组织了一次为期三天的研讨会，在原先的德国国会大厦举行，主题为“德国通往独裁统治的途径”。魏茨泽克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弟弟，早已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哲学家赫尔曼·吕贝在一篇备受关注的论文中指出：战后去纳粹化的不完整是波恩民主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许多人所希望的彻底的去纳粹化将使数百万人遭到政治放逐，并从一开始就为新政权制造充满怨恨的魏玛式敌人。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修正，但不能成为在重要职位上收留罪犯这类恶劣分子的借口。

作为一个持有不同立场“对话者”，我呼吁更加关注德国精英对希特勒做出回应的方式——多数是对其有利的；人们需要研究德国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希特勒崛起的可能替代。已经公布的会议记录表明，我的一些言论引起了多达千名听众的乐趣（Heiterkeit）。也许我在原本比较沉闷的话语中注入了几分不同的语调、戏谑的试探性、玩笑和讽刺。我希望这种较为轻松的风格并没有掩盖我讲话的深度。

那年夏天，图宾根大学著名的福音派神学院写道，他们希望把他们学院的年度利奥波德·卢卡斯博士奖授予哲学家汉斯·乔纳斯和我，以表彰我们在神学和思想史上的杰出工作，这方面的成就也促进

了人们之间的理解。（乔纳斯于1934年发表了一项关于诺斯替主义的开创性研究，马丁·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很大；此后他作为难民分别在巴勒斯坦和加拿大生活过，最后定居美国，1979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论述我们这个技术时代的伦理学的论著。）利奥波德·卢卡斯曾经是一位圣经学者和拉比，后被放逐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于1943年去世；他的遗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谋杀。我要去接受这个奖吗？（之前的一位领奖人是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果，这位诗人兼哲学家曾经担任塞内加尔总统。）我对这封意外的信件感到很惊讶并非常感激地接受了。颁奖仪式定于1984年6月举行，但是神学院院长早就要我提供期待我做的正式演讲的题目。我想时间和场合要求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一些思考，这是一个适合市民和大学师生听众的概括性介绍；我突然想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这个题目，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回应我早期的反思——也许，在此情况下，这是我对魏茨泽克信件的反应。我现在理解到这个标题表明了一种挑衅，暗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强加给德国人的一个恐怖政权，就像许多德国人仍然喜欢相信的那样，也不是其成功都归因于德国人是先天的独裁主义者，就像其他人所争辩的那样。它还脱离了当时流行的一种理念：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极权主义”的地方性变体，一种使国家和历史特征最小化的范畴。

我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很有希望的标题，却不知如何下笔，要写的内容和论点在脑海中形成得很慢很痛苦，尤其是在用德语撰写这篇讲稿，这是我用母语所做的最初的主要努力之一。当然，我会说这门语言，并且还喜欢说，但是正式的训练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停止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这门语言，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说德语有自己的腔调：也许是我在古老的德语语调中加入了一种更轻松一些的美国腔。

内容当然是最主要的挑战。我首先寻找那个时代的声音，特别是在信件、日记和书籍中的不熟悉的声音，这些声音揭示了精英人士对希特勒上台前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看法和行为。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往往是以纯粹的物质或政治角度来加以解释的，但它确实具有强大的心理吸引力，这是我动笔的前提。国家社会主义的伪宗教装束，其对国家复兴的承诺，以及对一个由某个自称救世主领导的民族社会的承诺，这个救世主将通过消灭其“腐蚀者”——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及其对德国人生活的有害影响来拯救这个国家，这些都是关键因素。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种诱惑，《牛津英语词典》给这个词的第一条定义：受到邪恶的吸引。一个充满恐惧、经受过羞辱的人似乎愿意去相信他们所渴望的救赎之路必然要包括可怕的暴力手段。我经历过处于得意扬扬、担心、恐惧等疯狂状态下的德国，而童年时代难以清楚表达的记忆可能已经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信息，但是历史学家不信任主观的气质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相关的回忆没有在我准备那个演讲时回到脑海中，而只是在我写这本书时才姗姗来迟。我正在为一个最难以捉摸的主题寻找“过硬的”证据。尽管如此，我仍然注入了我个人的激情。

很容易看出，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混合体，其中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大声反对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而其中的虚无主义则一方面倾其仇恨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蔑视不起作用的自由主义者。它对古代军事美德和朴素力量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此众多的德国人怎么就会去相信纳粹的简单但不利的计划是通往民族复兴、道德清洗、创建人民的强大社会的途径呢？我对德国人在自愿选择纳粹主义时愿意去相信是恐怖行为完全征服了他们这一点很感兴趣，尽管我对这种想法感到非常不满。〔乔治·利希特海姆，当时最好的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之一，他在《二十世纪的欧洲》（1972年出版）一书中描述了纳粹对所有阶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农民的吸引力，但该书总结道：“尽管这样的新政

权不得被置于大规模的恐怖主义之下，谋杀或监禁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并且建立起一个无与伦比的秘密警察独裁统治。”] 当然，恐吓和恐怖是存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起作用，但同样存在并起作用的还有知识前提和心理需求及希望。这些东西正是我想要发掘出来的。

我有一些预感，魏茨泽克给我的信证实了我早期的忧虑，并为我指出了新的方向。例如，在他的日记中，托马斯·曼写道，希特勒是“一尊自命不凡的神像”，他已经“成了数百万人的宗教”，非理性地赢得了“在全国极度兴奋的状态下受到过度刺激的民众”。托马斯预见到这种恶毒和狂妄自大将以另一场战争收场。^[5]施特雷泽曼在1929年去世前不久，谈到了希特勒的“撒旦似的天才”。许多人被这个“自命不凡的神像”和“撒旦似的天才”迷惑，被信仰救赎吸引，作为某种从现有的痛苦和不确定性中得到的超然解脱，就像一个“救世主”所保证的那样，他说着一种方言却有众多追随者支持。希特勒蛊惑人心的力量和他在活动中的戏剧性做法都是关键所在，在这两者之中，伪宗教的因素是核心，是一种心理诱惑，并起到了允许暂停理性和判断的作用。（奇怪的是，我没有陷入希特勒歇斯底里的催眠式演讲之中，我童年时曾听过这种演讲，第三帝国官方演讲的基调就是希特勒本人强有力地塑造的。）

希特勒总是声称，是上帝把他从默默无闻中解脱出来，封他为他那个堕落的国家的救世主，他要使其摆脱不敬神的、阴险的外邦人，并引导其迈向一个无敌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准备恢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为雅利安民族占领不可缺少的生存空间。他呼吁他的人民为国家的伟大和骄傲随时做出牺牲。这种变形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伴随着其制服和旗帜、赞美诗和神圣的殉道者，为枯燥、分裂的资产阶级政治创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替代物。纳粹将自己定义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运动，但他们熟练的自我表现又与古老的教会和军队的仪式何其相似。征服的口号在他们精心筹划的大规模集会上响彻

云天：政治变成了大规模的精神错乱，将那些孤独、冷漠、对公共生活充满畏惧的个人运送到一个为最终的伟大而勇于献身的战士群体中去。

当然，“条件”有利于“盛世”转向，我回忆起战争失败、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所造成的已知的创伤，以及所有“理智的”先例，包括教会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和德国对西方长期以来的反感。尼采的格言似乎特别相关：“一种想要通过一次飞跃，一次致命的飞跃，来达到终极目标的厌世情绪，还有一种可怜的、愚昧的、对这个世界再无所求的厌世情绪，正是这些创造了众神和其他世界。”

然而，从一开始一些德国人就意识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恶魔般的危险。我想到了保罗·蒂利希，他是路德派哲学家、神学家，属于魏玛时期的“宗教社会主义者”圈子，并成为第一个在1933年春天被从学术岗位上解职的“雅利安人”。其他神学家讲话时也带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其中包括鲁道夫·布特曼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他们经过最深刻的反思后选择了抵抗并为此而殉道。

德国精英们自愿屈从于纳粹分子，这在当时可能感觉是一种拥抱，一种集体的欢乐，一种草率的团结的经历。国家社会主义代表着秩序、权威、决断力和光芒四射的自信：一种政治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一种瓦格纳式的转变，变为了一个在工作和精神上非常活跃的国家。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真正的热情，追求名利，抑或先发制人的怯懦——他们都被一种更加令人陶醉的狂热裹挟，这里我要赶快补充一句，有些信徒会从这种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甚至与国家社会主义一刀两断。

向新政权屈服或投降意味着完全放弃旧传统，接受或漠视国家恐怖。当然因为有即时的恐怖行为，实施的对象是成千上万的政治对手，如果对手是犹太人的话，则将受到特别残忍的对待。然而，除了

少数例外，比如说有些德国的教授，他们可耻地背叛了神圣的学术自治原则和他们的同事，转而接受从学术职位和其他所有公共机构解雇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做法。然而，虽然不顺从招致的风险多种多样，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需要的可能只是勇气；说出不同意见危险是极小的。我引用了一些著名要人的例子，他们在做出公开妥协的同时又摆出私人体面的姿态，表明在被操纵的歇斯底里盛行的时候，“拒绝说‘是’可不是一件小事”。

我试图证实在精英中的“诱惑”这个概念，这种向某种神秘而危险的引诱做出的非理性飞跃，并不是出自“*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的精神，因为宽恕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不是我的癖好。事实上，写这篇演讲稿就是在我身上挖掘并再度唤醒被深深的困惑掩盖的巨大的愤怒。我知道许多德国人在1933年饱受折磨、捉摸不定，也左右摇摆，我可以很容易地承认，我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表现，只知道我希望如何去表现。我很欣赏一种讽刺性的表述，凭借这种表述，我承认我之所以能幸免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靠的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美德，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纯血统的非雅利安人，而非雅利安人是被禁止实施诱惑的对象”。当我演讲时，听众们对我将纳粹的措辞与私人的自我怀疑混在一起的嘲讽，以及对我的回忆——“我的同学们对希特勒青年团如何着迷，这种集体体验是如何具有吸引力和约束力，被排除在外是多么的痛苦”——的反应明显是焦躁不安的。

在写讲稿时，我重新感受到我在经历国家社会主义的戏剧性场面时所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恐惧；它盛大的游行、激扬的音乐、昂首阔步的自信使我震惊，使我不寒而栗。我避开了诱惑，不仅是由于法令限制，还有良知和对纳粹谋杀及恐吓的恐惧，还有父母的榜样。然而，究竟是什么魔鬼般的伎俩，使我现在仍然能清楚地记得纳粹党的国歌

《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的歌词呢？我想，我对《马赛曲》和《国际歌》的歌词和曲调同样强烈的记忆是一种解毒剂。

那么那些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人，转入地下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7月20日密谋策划反对希特勒的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又是怎样的呢？也许人们可以根据少数人的英雄主义来审视许多人的共谋。前者姗姗来迟的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国家和欧洲从恐怖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意愿在德国历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我的观点可能会刺激左右两派人，右派仍然在怀疑叛国的抵抗，而左派则对过度关注一个非常不民主的精英感到不安。但德国特权精英的行为无论怎样被贬低，我都不认为他们是怪物。你不必因为支持了国家社会主义就非得成为一个怪物。

尽管如此，我认为我毫无疑问地明确表达了要求：对初期的暴政须立即予以抵制；当抵抗可能需要为此殉难或以徒劳无益而告终时，去等待一个成熟的时机是会致命的。我明白这个失误不仅是德国人的过错，在我最后印成文字的演讲文本中，我引用了C. 范恩·伍德沃德对美国南方的描述，在20世纪30年代，种族歧视仍然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大声说出来，那些确实说了的人在我看来说话的声音实在太过温和，原因在于他们生活在强大的压制之下。”

我完成了演讲，但即使是现在，大约二十年或更久之后，我仍然觉得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保留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而且它侵蚀了人们的专业及私人的良知。如此心胸狭窄、心肠恶毒的男人及其发起的运动怎么会以数百万人的救世主面貌出现呢？难道希特勒是上帝的代表？我想，不管怎样，大量的困惑总是会保留下去的。

这次演讲对我来说有一个后期效应，因为它可能会增强我在德国作为一个具有本土风格的外国历史学家和观察者的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并没有索求这种作用，但我期待着愈来愈频繁的接触和不断扩大的德国朋友圈。我愈来愈多地生活在这两个国家里——这样的进展能使生活更加充实，也使生活更加复杂化。

我没有想过要立刻发表这个演讲——对我来说，口头稿和书面稿之间的区别是令人敬畏的——但是图宾根大学神学院院长奥特弗里德·霍菲乌斯坚持要求立即发表我们的文稿，并授权给了《黑暗时代》。乔纳斯做了一个深刻而感人的演讲——奥斯威辛之后上帝的概念。霍菲乌斯阅读了我的手稿，他发挥编辑才能改进了文稿。他不喜欢我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结构，并且三次尝试做出修改，我只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要改。他回答说：“自路德时代以来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结构！”我告诉他，如果这种结构对路德来说是挺不错的话，那么对我来说也是挺不错的。在内心深处，我很开心，我少年时代的德文原来是受到路德感染的。

那时，“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是我愿意回溯往事进行探索的第一个课题：面对恐怖时人类行为的戏剧性，以及德国暴政的道德氛围。当我加以扩展以英文版发表时，我添加了一句引自埃德蒙·伯克的话：“没有哪种激情能像恐惧那样如此有效地剥夺大脑的所有行动和推理的能力。因为恐惧作为对痛苦或死亡的忧虑，它的运行方式类似于实际的痛苦。”因此，其中的观点为我后来的工作提供了信息，我也很高兴后来其他学者的研究工作引起了我的共鸣。由于我贡献了一定程度的不逊之言，或者更糟糕的是湮没无闻，因此在看到纳粹时代最重要的学者罗伯特·格拉特利在他的《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共识与胁迫》（2002）一书中的结论时，我非常满足。他写道：“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醒自己弗里茨·斯特恩在论述《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他指出，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德国人也能找到支持该制度的理由，而且他们所受到的管制、哄骗或强迫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得多。”

最近，作为一种政治宗教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非常流行，也许是过分流行，而谨慎的政治文化历史则成为代价。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是否还有其他人在涉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时候也引用了“诱惑”这个概念（尽管在1977年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诱惑》，这是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的一本关于当代欧洲亲斯大林主义挑起的论战的、火药味很浓的书），但这个词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我总是试图把德国这个实例放在欧洲的背景之下，所以很遗憾我很少提及国家社会主义的海外崇拜者，许多行业中的以及偶尔还有知识分子里的保守派，他们对纳粹充满活力的特性大为赞叹，“理解”其反犹太主义的努力，同时对其过度残暴的行为表示遗憾。在旅行途中，我曾经见到远不止德国人受到了诱惑——而且今天，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愚昧无知的、偷偷摸摸的关注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为普遍，在国外肯定比在德国境内还要强大。

当我在图宾根大学的时候，校长阿道夫·泰斯同我进行了几次私人谈话，他说过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个深远的印象，我提到了我观察到的情况，当今德国争取在世界政治中拥有更重要的地位，然而与1914年和1933年的早期努力不同，其所做努力几乎不为人所关注，这时他回应说，“这可能是我们的机会”。然后他邀请我回来，在特奥多尔·埃申堡八十岁生日的私人庆祝仪式上致辞，仪式将在一座古老的斯瓦比亚城堡乌拉赫举行。（埃申堡有非凡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图宾根大学担任一个右翼学生协会的主席，同时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关系密切；在第三帝国初期，出于不明原因，他精心策划加入然后又退出了纳粹党卫军；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图宾根大学的一名教授，正式讲授政治学，虽然根据他的兴趣爱好，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同时担任联邦德国各届政府的顾问兼评论家，经常给《时代周报》投稿，并且也是玛里恩·登霍夫的朋友。）

在图宾根大学第二次停留期间，我还去拜访了天主教神学家汉斯·孔，他对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教条主义的挑战使梵蒂冈对其大为恼怒；他已被从天主教教员中除名。我记得我们是在他的超现代豪宅的阳台上见的面，他穿着一套无可挑剔的白色佐特套装^[6]。我告诉他外交部的威廉·邦迪同意我的想法，请他提供一篇关于教宗的文章。孔即刻回答道：“好的，如果我能够将教宗和里根做一番比较的话。”

1984年，在诺曼底登陆四十周年纪念日，科尔总理提出了一个没有得到回应的愿望：允许西德加入战时同盟国为纪念诺曼底登陆而举行的庆祝仪式。然后，一年之后，就在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周年纪念日之前，他坚持要求里根总统和他共同参观位于比特堡的一座军人公墓；即使有人指出臭名昭著的武装党卫队成员也被埋葬在那里，他也不放弃这一要求。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劝告里根反对这一计划，但科尔宣称他的总理职位受到了威胁。很明显，他希望这位美国总统不仅公开承认许多人已经暗中感受到的如今的德国已经摆脱了其可怕的过去，而更重要的是，要为死者争取赦免。最终里根不受干扰地、非历史性地一路走来了，只是谢绝了科尔在现场正式握手的额外要求。如果需要证明象征性政治的重要性，那么这就是明证。比特堡是“德国问题”再次出现的另一个信号：纳粹的过去仍然给世界政治中的联邦共和国投下了阴影。

非德国人对德国意图的担忧因科尔继续保持对欧洲的忠诚而感到释怀，随着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恢复了他们被原先的独裁政权所否认的欧洲的遗产，现在的欧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建设阶段。欧洲显然比布鲁塞尔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所规定的内涵要更多，远不只有经济利益，而且这个“更多”是在历史和文化上得以正确定义的。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我愉快地谈到了欧洲共性的历史根源，这一点有时从远处要比身处某一欧洲国家之内看得更清楚。毕竟

在它成为一个政治专题之前，我就对欧洲有了亲身感受。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孩子也会很高兴，因为欧洲仍然是一个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光辉。我想当我在法国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露面时，我是不会失去那种意外的喜悦感的——更不必说在1985年，上了年纪的牛津大学副校长哈罗德·麦克米伦给我颁发荣誉学位时我的感受了。

比特堡也证实并加强了德国人对他们过去的总体看法，理所当然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大事。相关的研究强调了西德人转向西方的程度，不论是否包括美国和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戈登·克雷格或艾伦·布洛克是现代德国启蒙运动的标志——还是仅仅因为关键的辩论和对过去的争议有一个国际“演员”阵容。当然，真正的工作仍然得由一个人的独自研究来完成，也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练习，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所有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屁股赖着不动（Sitzfleisch）。

1984年5月当选为联邦共和国总统并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权威的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在比特堡分歧发生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于5月8日，即德国无条件投降四十周年纪念日，在庄严的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当他完成了这项任务时，他不仅对比特堡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含蓄的谴责，还发表了一些更为重要的评论：对德国的过去和现在做出了一种权威的清算。他的讲话具有一种平静的、犀利的庄严感，反映出结合了他的官方立场的道德权威。

“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标准，”他说道，“如果我们或其他人想避免触及我们的痛处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项任务中得到帮助。我们需要并且有这个实力去不偏不倚地看待事实真相——不修饰也不扭曲。”这一天要求我们记住战争和暴政造成的所有痛苦，“我们要特别记住在德国集中营中被谋杀的600万犹太人”，以及战争中所有人民遭受的苦难，“尤其是丧失了生命的无数苏联和波兰的公民”。只是

到了此时，魏茨泽克才提到了被杀的德国士兵、恐怖行为的德国受害者、空袭中丧生的平民、受伤的和残废了的德国人以及数百万无家可归者。“如果各民族能够在这种残暴和湮灭中幸存下来，那么首先要归功于女性”，他说道。

魏茨泽克坚持认为“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补充说，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目睹了犹太人的苦难。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面对的道德和物质上的毁灭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能将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分开。”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国家社会主义——“激起并利用了集体歇斯底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他知道大多数德国人不想面对这个真相，或者实际上任何真相都会提醒他们德国对战争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在援引犹太传统的同时，魏茨泽克坚持认为纪念是和解的唯一途径：“那些不想记住过去的非人性行为的人在新的危险扩散的时候将再次轻易受到伤害。”

年轻的德国人应该意识到自1945年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魏茨泽克还提到了当前充满希望的迹象，两个分开的德国国家有同一个民族，“在和平的意愿中有一致的感觉”。他注意到了戈尔巴乔夫和解的话语，并补充说，无论我们对苏联的人权问题有怎样的关注，我们都希望“与苏联人民建立并保持友谊”。

玛里恩和我在电视上看了演讲。魏茨泽克坚定的、雄辩的甚至有些安慰的话语是非凡的，这些话是德国人和非德国人都可以信赖的。他对过去的毫不留情的分析，他的道德基调以及他雄辩的口才赋予他的演讲强烈的情感力量。我们俩都认为这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一次演讲。这是对真正的保守派的一次彻底清算——在正确的时间和场合。

因为之前我寄了一份我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讲稿给魏茨泽克，几天后，他写信给我。信中写道：“你的演讲以一种严肃且令人放松的方式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这个演讲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还强调并警告了始终存在的危险，例如对新出现的并在缓慢增加的不满情绪持满不在乎的态度，以及或多或少非理性地为一个肤浅的不充分的政治现实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等。”在准备自己的演讲的同时，他说，他带着“最深厚的兴趣和感激”阅读了这份讲稿。

1985年的各种纪念活动引发了德国人对过去的新一轮反省。比特堡仪式不言而喻的意图，魏茨泽克坦率的表达，标志着这场新对抗的两极，而且给双方都投下了阴影。我于1985年3月参加了在图青举行的福音派学院的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恰好与另外一系列周年纪念日相吻合——德国无条件投降、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会议议程包括一项对“波茨坦之后四十年”的讨论，率先发言的是苏联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外交事务顾问尼古拉·波尔图加洛夫，他还是一位德国问题专家。他坚称，指控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违反了雅尔塔协议是歪曲历史。“苏联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强加于它的对抗不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对抗从一开始就意图修改战争的结果。”波尔图加洛夫辩解道，苏联尽管战时损失严重，但总是在要求德国统一，选择分裂的恰恰是西方。他指责美国“蛮横地阻止”缓和，并要求恢复赫尔辛基精神，当时欧洲人首先将他们的大陆理解为一个“共同的家园”。

我回答说，虽然美国在冷战的起源上并非无可指责，但它主要是对苏联将共产主义政权强加给东欧国家所做出的回应，这种发展趋势是雅尔塔会议未曾预见到的。波尔图加洛夫训诫我，说这些东欧政权是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结果。我指出了苏联强制行为的早期例子，例如维辛斯基于1945年2月抵达布加勒斯特，领导罗马尼亚政府进行了改

革。我回忆起罗斯福在雅尔塔之后向斯大林发出的严厉的照会，警告苏联不要在东欧实施扩张主义，针对这一点，我说道，苏联人赌光了在战争中赢得的巨大的同情。当然，在很多领域还存在历史不确定性，会引起争议，但苏联档案被密封这个事实，如同梵蒂冈档案一样，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另外，美国的档案则逐渐向历史学家开放，而这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在批评美国的政策。

另一个小组讨论了斯大林于1952年3月发布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备忘录，其中提出经自由选举产生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波尔图加洛夫坚持认为这是解决德国问题的一个“真正的”苏联解决方案，但被西方错误地摒弃了。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大多数西方人认为这个备忘录是一个骗局，是一种破坏联邦共和国与西方融合的策略。我争辩道，苏联决策的秘密性加强了我们对于斯大林备忘录的破坏性目的的怀疑。我们仍然不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方案。当被问及对未来的猜测时，波尔图加洛夫说他认为恢复到像1871年或1937年之后那样存在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我反驳说，只有被宗教信仰或物质信仰感动的人才会宣称某样东西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只是不太可能。我可以想象，随着思想上的敌意逐渐消退，这两个集团会在几十年里缓慢地消亡。

那天晚上，学院的院长坚持说波尔图加洛夫和我应该私下好好聊一聊，在我的记忆中，我仍然记得我们在短暂而紧张的时间里坐在一起的样子。波尔图加洛夫对德国文化非常熟悉，而且在私下里非常和蔼可亲，他谈到了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产生分歧的问题，并警告说，前者将永远不会容忍在欧洲进一步部署核武器。我告诉他我不相信美国会中止，除非苏联人撤回其在欧洲的导弹。他变得非常激动，最后大声说道：“如果你们把我们逼得太急了，我们就会发出另一份斯大林备忘录，只有这次它才会是真的。”他私下表述的与公开宣称的相矛盾，我被他的这种公然的直白逗乐了。为此，我告诉他，你们需要一

个大胆的年轻领袖，他即刻做出的反应是“我们会有一个”。一周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去世，就在几个小时之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党的总书记。波尔图加洛夫肯定知道戈尔巴乔夫即将崛起，但是我感到很震惊。瑟韦林·比亚勒在他优秀的著作《苏联悖论：外部扩张，内部衰退》（1986）中指出，在契尔年科的最后一年里，戈尔巴乔夫周围已经形成一种“小型的个人崇拜”，这是苏联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过早指定接班人。苏联的领导层多年来一直在缓慢地按部就班地交接，但戈尔巴乔夫是新的一代人，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拥有高智商和远见卓识的人。五年后，戈尔巴乔夫确实发出了“另一份备忘录”，但那是一份无人能够预料的备忘录。

一年之后，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德国最重要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述“永远不会消逝的过去”。他发起了另一场激烈的论战，错误地贴上一个历史学家论战的标签，但主要的角色并非历史学家。

诺尔特的文章实际上是复制了他为另一次研讨会准备的一篇演讲稿，那次研讨会取消了对他的邀请。他的论点很复杂，但动机很清楚：如果过去不会消逝，那么至少要让它看起来不那么黑暗。此外，只有国家社会主义的过去才没有被作为“历史”而寿终正寝。并且，坚持要保持其活力的背后是有着“利益”关系的——主要是年轻人想反抗他们父辈的欲望，以及那些受迫害的人或他们的后代想要保持他们特殊的和有特权的地位的欲望。

认为“利益”能够把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是现代历史上最大罪行的记忆活生生地保存下来，这是一种可怕的违反尊严和常识的认识。希特勒曾经读过俄国大屠杀和大规模流放的记载。因此诺尔特居心险恶的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是否仅仅因为认为自己和自己

的族群是潜在的或实际的受害者，而实施了这样一个‘亚洲’行动？由此来看，古拉格群岛是否比奥斯威辛更应该被称为始作俑者（ursprünglicher）呢？”他是在暗示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相对化”了，将其视为副本而不是原件，这就意味着其罪行要轻得多。这样做本身就是极其令人反感的。

诺尔特的履历给他狡猾伪装的辩解增加了分量。作为海德格尔的一名学生，诺尔特曾经学习过形而上学，随后又转向了历史，他后来在高级中学教过这门学科。因为一只手受了伤，他被豁免了战时服役。我非常熟悉他最初出版的书中的一本——《法西斯主义的三个方面》，我曾经为《现代史杂志》写了这本书的书评，将其哲学和历史思想的融合与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进行了比较。（法兰西运动是诺尔特的弱项，他的强项是对墨索里尼的研究，他对墨索里尼似乎很着迷，对希特勒的研究也很到位，但是我认为这本书不够平衡，并质疑他的中心论点，即法西斯主义控制了两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所有其他事件都以此为条件。他的书还有“方法上和风格上的严重缺陷”。我认为这本书“十分难读，并且需要很强的理解能力”。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对我们历史经验之中心方面做出了深刻的原创性分析”。）

我适时地认识了诺尔特，在马尔堡我去拜访过他，他在那里成了一名历史教授（马尔堡大学的师资包括部分在德国任教的少数自由左派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朋友，最著名的就是哈乔·霍尔本。诺尔特是一个比较冷漠、死板但有学识的人，他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保持着联系。1967年，我给他提供了帮助，使他得到了一个到美国做访问教授的机会。1969年，他向我抱怨极端主义者控制了国家文化部：“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打算在这种暴力教条主义面前屈膝投降，最终我也不相信国家仅仅在一些八十多岁老人的反感和许多年轻人的激进主义所驱动的攻击下就会崩溃。”对他来

说，1968年证实了他对左翼阴谋的所有怀疑，并且就像许多有妄想症的人感到自己受到攻击那样，他向他所认为的敌人实施了挑衅。1973年，他接受了柏林自由大学的邀请，然后在第一次参加这所最激进的左翼大学的研讨会时，选择了西班牙内战作为主题，这不是他的专长，但估计会引爆意识形态的炸弹。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动荡促使他陷入了更加反动的立场。

我一开始把他看作一个天真的学者——他有着那种墨守成规的德国哲学家的神态——有一段时间我错误地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更像是一个形而上学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接连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打消了我这种亲切的错觉，因为随着每一本书的面世，他都会让纳粹时期更加“相对化”，并将其视为一种适当的冷战模式，作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回应。后来他争辩道，哈依姆·魏茨曼在1939年战争爆发时发表声明，如果犹太人站在盟军一边，就必须被视为宣战，从而解释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战争。诺尔特在写给美国同事的愤怒的信件中抄袭了我写的东西，于是我逐渐停止了与他的联系。

诺尔特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风暴。于尔根·哈贝马斯被诺尔特的暗讽及其政治影响所激怒，做出了第一个强烈的回应。其他人也加入了争论，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声明和驳斥。不久，论战发展到了使用鄙俗的语调实施人身攻击，就各自的动机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立双方没有就证据进行辩论或提供新的信息；争论都集中在有关独特性和可比性的问题上——苏联的罪行或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罪行是否至少与纳粹的罪行一样令人发指？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是最活跃、最有见识的西德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这场争论是为了赦免，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德国的责任，这是科尔时代许多保守人士的愿望——除了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赞

美者或偶尔出现的完全边缘化了的大屠杀否认者之外（这种人在法国、英格兰和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比在联邦共和国更活跃，也更成功）。

就在诺尔特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给他写信说，“我对你的文章深感不安”。他想要详细的说明，因为他刚刚写过他怀疑他的批评者是否仍然能够正确地阅读或得出客观的评价；他不想这样看待我。他这样说很讨巧，但我正忙于其他工作，而且有期限要求，所以只好满足于从远处旁观我的历史学家朋友汉斯和沃尔夫冈·蒙森、科卡、埃伯哈德·耶克尔以及其他人去打一场漂亮的仗。他们堪称楷模的工作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去建立一个脆弱的自由主义的共识：如何去教并且如何与过去共处。过分关注第三帝国而以之前几个世纪的历史为代价是一种危险的扭曲，这仍然是一个微妙的平衡问题。

当魏茨泽克总统在1987年德国历史学家年会上发表演讲时，历史学家们的论战暂时告一段落。总统的讲话语气和缓，但在实质问题上毫不含糊。“奥斯威辛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他说道，“这是德国人以德国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这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也永远不会被遗忘。”他警告不要去搞“相对化”，不要忘记德国“曾经由罪犯领导并允许自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在德国，歪曲或消除这个简单事实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1986年，我间歇性的公共角色使我与《明镜周刊》一起体验了一次骚乱，这段经历让我同西德媒体一起一睹世间真相。4月初，据称来自利比亚的恐怖分子炸毁了西柏林的一座迪斯科舞厅，这是地理信息系统GIS上最受欢迎的一个场所。有两人被害，155人受伤，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人。卡扎菲上校的利比亚侵害美国的利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里根政府希望证明卡扎菲不过是只纸老虎。4月14日，里根总统宣布对利比亚实施空袭，进行“自卫……此项任务完全符合《联合

国宪章》第51条”。美国飞机从英格兰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轰炸了利比亚两个城市，杀死了包括卡扎菲女儿在内的30名平民。（法国拒绝了飞越领空的权利，当时法国与北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长期珍视的关系。）

美国的袭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和军备开支的稳步增长，这种“报复”似乎符合里根的风格。4月15日，瑞士电视台就整个事件采访了我，我批评这种“全球单边主义”，对随之而来的北约内部的压力表示遗憾，并表示里根主义的政治让人想起威廉明妮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我也就欧洲的被动和冷淡提出了警告。两天后，《明镜周刊》要对我进行采访。

（在此期间，我与国务院的专家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保证，除了国务卿舒尔茨之外，国务院中没有人会在轰炸问题上接受过咨询。）《明镜周刊》的记者和我立即就基本规则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一项承诺，我必须给最终供发表的采访文稿授权。

采访开始的第一个问题：这是自1945年以来盟国关系中最严重的危机吗？我不这样认为，尽管这个突发事件很严重。美国人的期望与欧洲的表现之间的差异正在增加：“实际上今天的欧洲已经足够强大，不能如此示弱。”欧洲人不满美国的简单化倾向，而且，我说道，里根就是简单化的一个特别例子。美国人害怕会出现另一个“慕尼黑”，尤其是那些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怀疑欧洲人有绥靖主义的心态。最好是对利比亚采取一项统一的盟国政策，实施严厉的制裁并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欧洲的被动性鼓励了里根的单边主义。我还评论说，美国在1917年并不情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之前从未有过一个民主的世界强国”。

《明镜周刊》的记者说，欧洲人认为美国把现实政治和理想主义混为一谈是危险和伪善的。的确如此，我同意：美国自诞生以来就是

一个共和国，这在一个古老的君主制世界中当然有其特殊的立场，美国一直在以传教士的热情追求其利益，并给其政策披上了一件宗教的外衣。^[7]《明镜周刊》的记者说波恩外交部担心里根可能比卡扎菲更难牵制，对此我以我自己的一个问题来作答：波恩是否只会担心和吹毛求疵，还是会在其欧洲伙伴之间促进一种更密切的关系？毕竟里根不想与利比亚或尼加拉瓜发生战争，他的言论远比他的行动更为好战，他想要显示出实力和韧性，这样世界就不会陷入另一场战争，他想要在不出现一个新的越南这种风险的情况下显示实力。

一切都按照约定进行着。我收到了一份誊录出来的访谈副本，做了一些小修改，然后在上面签了字。随之而来的是沉默。经过一段令人好奇的耽搁之后，我收到了发表了的版本。我随即发现了八处大的改动，其中最过分的一处是在最后一行，现在变成了我说里根总统想显示实力，甚至“敢冒另一个越南的风险”。大多数改动是出于政治动机，我确信，因为我对美国所做的积极评论和对欧洲的批评都被删除了。

我被激怒了，随即打电话给《明镜周刊》采访我的记者，他自己也对他称为“灾难性”的错误感到震惊，说我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应他的要求，我给他发了一份针对这些严重的“歪曲”我给编辑写的信的草稿。接下来，我同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的主任进行了交谈，他同意将我的原信或者将另一封我们双方都做了让步、措辞更为温和的修改后的信刊登出来。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我收到了《明镜周刊》的律师弗里德·冯·俾斯麦的一封信，他声称编辑们已经承认，“一连串无可否认的不幸的情况”导致了这些改动；《明镜周刊》不仅不想刊登我的信，反而还想刊登他们自己的更正，只涉及最后那一行。

此时我碰巧在欧洲，玛里恩·登霍夫也为我愤愤不平，她敦促我去咨询律师，并推荐了《时代周报》的塞夫特、克斯滕和施文恩律师

事务所。（我后来获悉，德国报纸有一个嗜好，喜欢抹黑彼此；我觉得玛里恩很喜欢这场可能的战斗。）与此同时，我从《明镜周刊》的一位编辑那里得知，负责此次采访的汉堡的编辑之前也犯过类似偏向性的错误。事情现在严重升级了。海因里希·塞夫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乐于助人打官司的律师，而且是一个对联邦德国的随波逐流持激进看法的批评者。他通知弗里德·冯·俾斯麦，我已经就《明镜周刊》未能履行与我的合同授权给了他——塞夫特，而他——塞夫特——想要在三天（！）之后知道是否启动诉讼程序。

到目前为止，塞夫特的执行效力远远超过了我，他告诉我对《明镜周刊》的这种威胁在其编辑部“产生了切尔诺贝利似的恐慌”，并且俾斯麦告诉他，俾斯麦发给我的那封信他既没有写也没有同意，仅仅是在压力下签了字。这个俾斯麦——当年那个宰相的侄孙——问塞夫特这件事是不是能够“用金钱”来解决。塞夫特愤慨地做了回应。我们意识到，对于《明镜周刊》来说，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如果在这个案子里他们的做法被公布于众的话，他们想要采访其他人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我在西尔斯·玛利亚度假。塞夫特警告我，传说中的《明镜周刊》杂志的创始人兼编辑鲁道夫·奥格斯坦会打电话给我；他担心奥格斯坦会利用他的传奇魅力，并利用“我那么和蔼可亲的礼貌”来欺骗我。我被预先警告过了。奥格斯坦确实打来了电话，他一开始就说：“斯特恩先生，你不知道我多么崇拜你。”我立刻照样回敬了他，并补充说彼此间的恭维于事无补。奥格斯坦承认《明镜周刊》错了，说杂志和我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是“不可想象的”，整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比对我更加糟糕。我们没有达成协议，然后案子又回到了令人敬畏的塞夫特手上。6月12日，他迫使他们承诺刊登我的原信，并负责所产生的费用，共计3万德国马克——全部金额汇入了他的公司，而我则得到了澄清！6月23日，《明镜周刊》刊载了我的原信，用很长的篇幅详细说明了在原始访谈稿上出现的所有遗漏和失真。整个事件持续了两个月，先是令人烦恼，后则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德国

的一些荒唐行为令人忍俊不禁，一切也都是有益的。打败《明镜周刊》是一次奇妙的经历。学会如何与被采访者打交道可以永久受益。

在历史学家论战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其他几个项目。（就像以赛亚·伯林形容他自己的那样，我就像一辆出租车，必须要有人招手雇我。）我已经接受了1986年10月在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究所（二战结束后，该研究所改名为弗里茨·哈伯研究所）七十五周年之际做一次主要演讲。我的教父哈伯的生平是规定的演讲主题，这需要我进行广泛的档案研究，但这也是一个节日庆典，将我意外地直接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暴。就在那个非常正式的场所之前几个小时，有人交给我一份由该研究所成员编写的具有挑衅性的小册子，攻击该研究所与军工企业沆瀣一气，并将哈伯视为最严重的罪犯，是1915年德国人用于西部战线的毒气的发明者。我准备好的讲稿承认了毒气战的恐怖，并提到了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在战后加深了与哈伯的友谊，但随后我插入了一些警告，反对无视所有历史背景的争论。之后，我感到震惊的是，哈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遭受辱骂，更恶劣的则来自右翼沙文主义者——现在，在他死后，他还在受自以为是的左翼和平主义者的抨击。^[8]哈伯的第二次婚姻中的两个孩子也在听众席中，这个公共场合之中也蕴含着几分私人的情调。

我在联邦共和国扮演的公共角色在不断增加。1986年2月，联邦议院社会民主党副主席霍斯特·耶姆克问我是否愿意在6月17日联邦议院年度会议上做一次演讲。阿登纳政府已将6月17日定为西德唯一的法定假日，以纪念1953年那一天在东柏林的起义。这个“民族团结日”的标志是联邦议院庄严的仪式，通常唤起团结的愿景。对于大多数西德人来说，6月17日只是一个春假，最初的目的几乎被忘得一干二净。

为什么把我选为演讲者？为什么由我作为第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向全国进行电视转播的会议中发言？当然，我受宠若

惊，但也感到困惑和不安。我向朋友咨询过。由于担心一个美国人在这种场合发表言论可能不恰当，我还询问了国务院的一些欧洲问题专家，他们想不出什么令人难忘的理由来表示强烈反对。另外，亨利·基辛格则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合适的，也是有用的；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他说道，美国没有理由反对德国的统一，而国务院的反对只是反映了一种恐惧，即我可能会对我们必须合作的共产主义政权说些不友好的话（这就是在美国国务院官僚机构中的典型的基辛格！）。德国的同事和朋友们都鼓励我；玛里恩·登霍夫最初持怀疑态度，后来也赞成了。于是我便接受了——结果发现这项邀请有些为时过早！按照惯例，演讲者由主要政党轮流邀请，那一年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在推动从其合作伙伴自由民主党内选出一名候选人，该党的选择是前总统瓦尔特·谢尔，他确实成为1986年的演讲者。

谢尔雄辩的演讲口才反映了宽松的前提和现实政治，德国人不再期望在短期内实现统一，他说，但统一的到来会是在一个新的和平的欧洲秩序框架内，有着开放的边界和对人权的尊重。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期待民主德国和东欧国家将“友善地采用我们的价值体系并放弃他们的价值体系？只有他们会改变他们的体制，而我们甚至都不用去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体制？”（他不可能想象到，五年以后这一切果然就发生了！）谢尔强烈要求新的和平秩序和新的团结，在那一年4月切尔诺贝利灾难发生后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当时乌克兰一个小镇上核电站的核反应堆爆炸起火，造成数十人死亡，成百上千人可能遭到辐射；这场悲剧让人类真实地感受到所面临的共同危险。

那年夏天，耶姆克再次写信给我，说给我的邀请现在已经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得以确定。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谢尔的讲话震惊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右翼。联邦议院的基民盟议长菲利普·耶宁格现在将给我的正式邀请顺延到1987年，对此，我顾不上担心，也顾不上其他的期限就接受了。

我陷入了一个困境，既要照顾到专职的教学工作和各种其他必须做的事情，又要准备一个重要的德语演讲。但有两件事情我是知道的。1953年6月17日应该被作为德国人争取自由的纪念日，而且德国人应该尊重这一运动及其受害者。我也希望与民主德国的公民取得联系；我知道在这两个实体之间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两个德国之间的联系正在成倍增加，还有在东德经济显著衰退的情况下，西德也不断给予东德援助，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遮遮掩掩的。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援助形式是，联邦共和国为在东德的政治犯赎买自由的政策；每个人的标价各不相同，现在的价格约为96000德国马克。总而言之，西德政府自愿为38000个东德囚犯支付的赎金总额达到了近35亿德国马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又令人沮丧的数字。

我查阅了先前各种公众人物在6月17日这天所做的演讲，并注意到，在谢尔之前，对里根所称的“邪恶帝国”进行抨击并对缓和表示怀疑已成惯例。但是我认为这类强硬的言论丝毫不能改善东德人民的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需要被告知“邪恶帝国”的存在，而那些需要被告知的人则会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宣传言论嗤之以鼻。（东德的官方态度是：1953年运动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西德的“破坏分子”的劣行。）

在我准备工作的早期，我偶然发现一个事实，费迪南德·弗赖利格拉斯，一位曾经很出名的德国诗人，因同情激进事业和无产阶级而被迫流亡多年，恰好出生于1810年6月17日这一天。我马上把握住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弗赖利格拉斯这个名字在西德会立刻被大家接受，尽管他的“阶级”诗歌在东德仍然有人在读。他可以作为我的论点的关键证据，即6月17日应该被理解为经常发生的德国人为自由而斗争的一部分。带着极大的欣慰，我沉迷在他的生平和背景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无意识地逃避了当前德国政治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到了6

月，我写好了一份文本，并请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看了一遍，那年春天拉尔夫·达伦多夫刚好在纽约，他为我的讲稿精心地做了编辑。

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飞往波恩。我被安顿在一家酒店内，房间里摆放着一束汉斯-尧赫·沃格尔给我的鲜花，然后我被带到了磨坊（Wassermühle），联邦议院临时的但金碧辉煌的所在地。那天晚上我是同卡尔·杜伊斯伯格——一位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职业外交官——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度过的，这是一对意气相投的夫妻，我早些时候见过他们。我发现杜伊斯伯格是一位化工实业家的孙子，这位化工实业家与弗里茨·哈伯有过密切但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杜伊斯伯格夫妇给了我需要的——安静的休息，体恤的、支持的和随和的陪伴。杜伊斯伯格夫人还用一种精致的罂粟籽饼（Mohnkuchen）来招待我，这是我唯一未曾品尝过的西里西亚特色点心。

第二天，耶宁格带领我进入立法厅，联邦议院的议员们坐在演讲者讲台和政府席的对面；科尔同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和大多数内阁成员一起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大多数上议院（联邦参议院）的议员。坐在右边的是基民盟和自民党的代表，坐在左边的是社民党的代表。（在1987年1月的选举中，基民盟失去了一些席位，现在持有的席位是223个；自民党赢得了一些席位，现在持有46个席位；而社会民主党拥有186个席位；绿党的斩获最为壮观，现在总数已达46个代表席位，但该党所有代表全缺席，他们早些时候已经认定，6月17日的仪式是出于民族主义保守派目的强加于人的一个活动。）会议一开始，有人正式宣布魏茨泽克总统已经在来宾席上就座。

当然我很紧张。我在面对任何公开演讲时都会感到紧张，此时此刻，我想我有些神思恍惚，当耶宁格宣称1953年6月17日标志着一场争取统一的反抗时，我都无法全神贯注地去聆听。我感到思绪不宁。我想起了我儿子在告别时说的话：“你的父母会怎么看待这种场合

呢？”然后，就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一旦开始张口说话，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感受了；我的心集中在讲稿上，我的眼睛偶尔盯着听众。然而，我是如此专心致志于讲稿，以至于没有像通常在非正式场合那样与听众互动。当然，听众就在我的面前，也许我偶尔还会瞥一眼政府席。但是在撰写演讲稿时，我的心中还有一些其他听众，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听众，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收看到西德电视台的节目。

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一纪念日定义为纪念德国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一个重要事例。我们对这场斗争的许多受害者的怀念“既不应该被遗忘，也不应该被滥用”。我提到了自己的经历和惊喜，一个当年被赶出布雷斯劳的小男孩，现在站在这间大厅里做演讲：“我有许多梦想和希望，但是我怀疑我曾经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向德国议会发表讲话……这是联邦共和国取得的卓越成就之一……今天，作为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一个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议会是一个自由政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得到了普遍接受……应你们的邀请我身临此地，但其中仍有许多未充分表达的意思；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想到了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个场合的先决条件。

有些观点我做了明确、清晰的表述，也有一些观点可能是暗示性的、间接的。“在德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节日是没有争议的”，我说道（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我引用了社民党领导人赫伯特·韦纳在1953年7月为设立这个节日而进行的辩论中所说的话：“我发现有一个反复呐喊的声音能深深地打动人心：我们是工人而不是奴隶。”对此我立即补充说：“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注意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比起他们更幸运的同胞要更为艰难。”也许——对我来说是更有希望而不是确定。

我声称，对正义的要求和对民众主权的要求是压不住的。“那一天的运动必须在德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人们抵制暴力和不人道的伟大时刻之一。这次运动也指向了未来，即使在事件发生后许多立即提供的解释具有误导性。这不是一场争取统一的运动。”

我还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德国人和针对德国人”所犯下的“残酷的罪行”。我提到了魏茨泽克总统在一年前5月8日的讲话，他的话“几乎所有国外人士都表示钦佩和赞赏。我们中许多人希望他是联邦共和国的真实代言人，甚至可能是超越政体的沉默的民族的代表人。在这一天，除了表达感谢之外，去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冒昧的，这个感谢也来自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失去近亲的人”。此时，掌声中断了，令我感到惊讶。我是否突然间飞快地意识到这不是一次仪式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谈话？另一阵掌声增添了戏剧性。我对魏茨泽克的提及有一个潜台词：国外的人曾希望他为联邦德国说话，但他说了吗？何况我的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表述，我认为，是对一个有争议的现实的非常寻常的承认。

在另一点上，我提到了显而易见的“德国的分裂”，然后我继续说，“我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再存在的德国”。我的家人在难以想象的强迫迁居开始时从布雷斯劳逃脱了——德国人在东部遭到驱逐，而波兰人同样流离失所，被迁到西边去居住在以前德国的领土上。为了借助背景来更好地说明所受到的痛苦，我补充了一句，或许有些唐突，“一个未曾分裂的德国给其他民族和自己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不幸”。我引用了早期做过类似判断的德国历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像认识到其他民族的苦难一样去认识德国人的苦难是很重要的，我对提到德国的责任的时候明显简略的做法表示遗憾。我坚持认为，被苏联坦克粉碎的6月17日的运动并非一次失败：东德的示威运动应该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而不仅仅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就

我们所有的危机感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比起以前，今天的欧洲有更多人生活在自由之中——而自由是非常诱人的”！

在“另一个德意志国家”中，我继续说道，那里有一些“悄悄地维系着6月17日的意义的人。他们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应该尊重来自另一个德意志国家的要求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明确、勇敢的声音。这些声音通常来自教会，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为教会所阐述的教义和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提醒着我们去牢记“另一场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德国抵抗运动的受害者们”。

在我的演讲中，有很大一部分比较任性的内容涉及弗赖利格拉斯，这位诗人与其说是因其杰出的文学天赋，不如说是因其献身于民主解放事业而受到广泛的纪念。1851年，因为满腔热情地为受蹂躏和受压迫者大声疾呼，弗赖利格拉斯不得不弃家逃亡，在流亡中他遇到了卡尔·马克思和海因里希·海涅，并与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常争论的友谊。我之所以引用弗赖利格拉斯，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一个共通的欧洲生活和文化这个历史事实，这就使他和像他这样的人能更容易度过几十年流亡生涯。在流亡中，正如海涅所理解的那样，能燃烧起真正的爱国主义激情，并增强对一个没有镇压、没有审查制度的家园的渴望。在我的直接或远程的听众中，并不是很多人会熟悉这些想法或经历，有些人也可能对我经常引用海涅的例子感到不安。

我的本意是把弗赖利格拉斯作为一个恰当的框架：我想赋予6月17日这个日子一个历史血统；这不仅是对贫困的勇敢的反抗，而且是在不断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的一个英勇的时刻。令弗赖利格拉斯充满生机的1848年的自由或激进的希望被打破了，当德国的统一最终得以实现时，它得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支持。德国人正在对付“一个越来越遥远，但不会逐渐消失，也不应该消失的过去”——我提及的是历史学

家论战中的一个说法。我提醒他们，这个世界把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过去视为“一种测量德国总体意识的地震仪”。

我简要地谈到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尽管不该由一个外国人来判断正在寻求更大的共性和更紧密关系的一种过程。“联邦德国永远不应该忘记，历史已经将它判为一个自由政体的典范：为了保护它自己，为了尊重过去的受害者，以及为了给另一个德国的人民带去希望。”它应该尽其所能“去减轻其他人的负担，去捍卫和加强人权”。在过去四十年里，对德国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内取得的成就的尊重得到了恢复，然而对西德的政治责任感的担忧仍然存在。我提醒西德人不要忘记早期欧洲的共性以及他们对另一个德国的责任，这另一个德国在地理上是如此近，但我担心，在心理上却是如此遥远。

我想，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存在一个潜台词，那是一个问题：当你们德国人梦想统一时，你们主要考虑的是团结还是自由，是一个没有用来分隔国家的墙壁的德国，抑或是所有公民的实际解放？在德国历史上，团结和自由经常作为共同的目标同时出现，但在关键时刻，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我想要向东德人保证，他们恳求自由的低沉的声音被我们听到了，他们也属于欧洲，我希望西德人能动用他们的物质杠杆使东德人能享有更大的旅行自由，并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怀疑西德人可能会倾向于重新思考世界政治的基本原则，“在对西方失望的时候，从东方吹来了一阵迷人的风”——我的心里一边想着来自东方的花言巧语，一边对美国感到不安。在演讲结束时，我继续强调德国人必须保持与西方的联系，而且必须要记住“西方共同的政治文化，其中自由和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在宪法上得到了保证”。

联邦议院听众们的直接反应令我感到十分诧异，据会议的官方文件记录，演讲被掌声中断了十三次，最后是“长时间的掌声”，媒体注意到，与往常不同，科尔总理也鼓了掌。我不记得当时我是否意识

到在某些时候来自左侧的掌声似乎更加热情，来自右侧的掌声则更迟疑一些；电视影片的回顾性观点让我意识到这种偶尔的不平衡。但是，这种中断给了这个场合一种政治言论的气氛，有点掩饰在诗意般的帷幔之中。

然后我们全体起立唱国歌，即“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这是对和平、自由和正义的赞歌。我浑身充满了抗争性的、转瞬即逝的情绪：这是一首学了之后曾经让我憎恶的赞美诗，我从没想过我会自愿地加入唱这首歌的行列。这首海顿的激动人心的乐曲，原本是为奥地利而创作的，却被德国人恶意滥用了，现在听起来可以被视为一首自豪与和平的歌。

之后，在耶宁格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周围的热情和骚动起初使我感到筋疲力尽，然后又使我有些头晕目眩。此时的氛围是非常政治化的，各党派的成员握着手，互相低声说着些客套话。我记得伯恩哈德·沃格爾的微笑和握手，他在友好的赞赏话里加了一句评论来修饰：“提到弗赖利格拉斯的次数有点多了。”（我知道他是对的。）耶宁格把我引到一个角落去和科尔及魏茨泽克交谈，他们两人对我的演讲做出了高度评价。（一个是喋喋不休的莱茵兰人，一个是寡言少语的斯瓦比亚人，这两人之间因此有一些不明确的距离，科尔主导着谈话，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在美国读大学的孩子们。如此不同的两类人！）魏茨泽克说：“你没有让你的听众感到轻松。”这句话我当时当作一句赞美话，但也许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含糊的！当一切宣告结束时，来波恩听我演讲的朋友赫尔曼·哈茨费尔特——玛里恩的外甥——开车接我去他在克罗托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堡，在那里我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放松一下。赫尔曼和我一边观看晚间新闻里我的演讲片段，一边用稀有的葡萄酒静静地庆祝这非凡的一天的结束。

第二天早上，整个世界似乎变了一个样：西德的保守派报纸就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和犹太难民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演讲中所犯下的“令人震惊的错误”纷纷做了报道，这些错误为大多数人所指出。“这个于1938年同父母一起逃离布雷斯劳的六十一岁的犹太人，在他引人注目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有人这么说。《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是“斯特恩的演讲遭遇批评”。“耶宁格纠正了他的运动不是为了统一的说法。”（嗨，岂不知耶宁格的讲话在先，他如何能“纠正”我的话！）

引起这场风暴的仅仅是我的两句话：一句是我说的1953年的运动是为了更好、更自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统一；另一句是一个未分裂的德国曾给德国人和全世界带来苦难。《世界报》的社论坚持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数人明白东德对严苛的工作条件提出抗议，紧随着就呼吁为“自由、民主和统一”而斗争。《法兰克福汇报》义愤填膺，其头版报道和评论认为今年的联邦议院演讲者，一位（未具名）美国人，试图“拼老命地让人们注意力脱离统一这个主题”，这是“可耻的”。这篇文章把焦点集中在我对德国的过去的批评之上，然而只字未提我所强调的德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我所认定的联邦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体，以及我对正在悄悄保留反抗精神的东德人的敬意。对我的指控是我“对俾斯麦的统一做出了完全否定的判断”，事实上我对德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但是，与下个月出现的读者来信相比，《法兰克福汇报》的声音几乎还是很克制的。

那些最早挑起事端的人中有一个人指责我所宣称的“不是为了统一”这个主题，说“这是错误的，并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记录下了他对历史的无知以及他的精心操控的反德意图”。还有人暗示了一种引发骚动的动机：我的（不充分的民族主义者的？）言论显然反映了邀请我的政党的观点。很明显，在对社民党的激烈攻击中，我是一个很方

便的中间目标。有位作者在提到科尔也鼓了掌时，指责说这表明联邦德国仍然是“一个（美国的）卫星国”。一位来自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会的代表，对我所说的关于一个“未分裂的德国”的危险表示十分愤慨。他强调，在和平的欧洲秩序中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对于整个欧洲，尤其是贫穷的东欧和苏联都将是“一件大好事”——“与弗里茨·斯特恩这类被驱逐的德国犹太人所期望的完全相反”。

公开的辩论仍在继续。一份左派自由报纸（《法兰克福评论报》）刊出了我的讲稿并加了一个副标题：“犹太历史学家F. S. 从今天的视角为纪念辩护”。这条简短的介绍性说明把我的身份标示为一个“美国历史教授”，所做演讲“在保守派圈子中”引起了批判性评论。非常正确！但为什么要特别描述为“犹太人”呢？我发现这很奇怪，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这个词，以此作为一种识别具有特殊背景的美国人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暗示，表明为什么保守派有特殊的理由要持批判态度；抑或此事事关自豪，以此来吹嘘联邦议院邀请了一位如此陌生、如此饱经沧桑但又如此熟悉的人来做演讲。面对这来自友好的政党的言论，我感觉非常费解：我怀疑《法兰克福评论报》认为我的犹太人身份决定了我的观点，对此这份报纸本身无论如何是不会反对的。也许这一切表明犹太人问题仍然是不可同化的。另外，在第二天午餐时，兰布斯多夫伯爵向我提到，根舍曾问他是否还有其他国家在国庆节日邀请过外国人发表演讲的。根舍这样问是对的。德国人是独一无二的，有着独特的过去，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独特的过去经常被外国人提出来而感到愤慨，尤其是这种外国人还令人不舒服地宣称有密切的关系。

在《法兰克福汇报》读者来信专栏中，大多为指责性的争论仍在继续着。7月13日，一名联邦议院议员抗议说，该报隐瞒演讲者的名字，将其略为“一个无名人士”，同时却不停地提到他演讲中“可耻的”内容：“我极少看到（除了在激进的右翼报纸上）一个德国血统

的犹太人被如此毫无保留地肆意贬低（abgemeiert）。”这位作者几乎听了过去十年中所有6月17日的演讲，然而“没有人能够像弗里茨·斯特恩那样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负面的来信仍在继续出现——很快，一本关于历史学家论战的书重复了他们的指控，称我对“Mitteldeutschland”（“中德”，此词为右派的一个暗语，专指民主德国，以此表示对其以东的德国领土的进一步要求）发生的反抗所做出的评论是歪曲历史，并两次认定我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某个人，而这所大学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场所”。因联想而获罪（或不应得到的称赞）？有好心人寄给我一份来自马尔堡学生联谊会的传单，传单的大标题是“德国比联邦德国更伟大”。传单声称针对6月17日扭曲历史的高潮是伴随着我的演讲而来的，并哀叹没有哪个国会议员离席抗议这种“诽谤”。就在这次演讲结束后，赫伯特·赫普卡，来自基民盟的右翼修正主义西里西亚被驱逐者联盟主席，邀请我参加他们即将举行的年会。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姿态：邀请我是把我作为一个前西里西亚人去接受庆贺呢，还是作为一个叛徒去接受诋毁呢？我谢绝了。

自由中间派《南德意志报》的直接评论是，这一演讲“为德国人提供了令人不快的真相”，而且“不是为了统一”这句话引起了不适，恰恰表明“久为人知的这种观点仍然没有渗透到所有基民盟政治家的思想中去”。最明显的支持来自刊登在《时代周报》头版的西奥·索默的文章，他认为对我的演讲的攻击表明西德人已“变得神经过敏”，并提醒读者，柏林工人们要求的是乌布利希下台，而不是请阿登纳前来：“为什么要剥夺反抗的尊严？它是争取自由而不是德国统一的灯塔。”

还有许多私下的称赞。一位朋友和同事在同一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赞扬了我的这一“不拘泥的、果断的演讲，整个议院为此鼓掌，来自各方的掌声几乎同样经久不衰，热烈有力。构成这一切的基础不

是民族和团结，而是自由、民主、西方和人权——这才是所传达的政治信息”。此话精确地表达了我的意图。还有很多人赞同我的演讲，认为我的演讲终结了对6月17日起源的“传奇之说”。

我今天仍然记得的是，我这位六十一岁的犹太人对这些曲解、这些迟到的来自历史学家论战的攻击感到十分吃惊。我很担心我给我的朋友们和社民党帮了倒忙，但是针对批评的权威的反驳让我放下心来。汉斯-尧赫·沃格尔给我写了一封充满赞美之情的信，我的基民盟朋友中似乎也没有哪个因争议而感到些微的不安。似乎铭记在人们心中的不是争议，而是我是6月17日唯一在联邦议院发表演讲的外国人。

我的演讲译稿最终刊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蒂莫西·加顿·阿什为此写了一篇介绍性文字，从他对东欧生活和异议的精细且无可匹敌的知识中我学到了很多。他同意我将1953年的事件与早期德国人对自由的要求相提并论，并且是东欧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个。他谈到了我在两个引起争议的句子中所表达的判断，“两者……都可能受到理性的质疑……然而，这些理性的反对意见几乎无法解释针对斯特恩教授观点的某些反应中的强烈以及——人们必然会说的——恶毒”。我认为我已经想让西德人牢牢记住自由是至善，还有保护人权是他们的特殊责任。我本应该进一步表达我的想法：1953年东德呼吁自由选举几乎肯定会结束斯大林的统治，最终达到某种形式的统一。

回想起来，我必须承认，我很惊讶在写这篇演讲稿时，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两句话有过怀疑。我主要关心的可能是不要让保守的德国人去挪用工人的或民主德国公民的英雄主义——好像他们想要的就只是统一。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发现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引用了我的争议性言论，他对德国历史具有最公平的观点，他指出我的这些言论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尽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无可置疑，或许

正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而政治家们不想由一位有资格说话的历史学家来说出这些实话”。

“爱国”的愤怒仍以惊人的规律和凶猛的方式爆发。举一个例子，2002年，亨宁·克勒出版了一本关于1890年以来德国历史的鸿篇巨制，书中他攻击了参与历史学家论战的哈贝马斯的左翼自由派追随者，声称他们强调了奥斯威辛的独特性，以便使德国的永久分裂合法化，将其视为对过去罪行的惩罚。在这一点上，他判定我就6月17日运动所做的解释“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判断失误”，显示出了一种重新解释历史的倾向，而且“完全否定了团结的意志”。他嘲笑了魏茨泽克5月8日的讲话，并把我和著名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一起提升到联邦共和国的“统一否认者”（Einheitsleugner）的地位。

我完全有理由对邀请我前往联邦议院表示感谢：这是一个充满启发性 and 特别感人的场合，即使对我持续攻击也是有益的。去亲耳聆听德国人辩论中相当恶劣的语调，去体验些许关于前德国犹太人的无名怨愤和潜在的关注，也会是一种启迪。有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说得好，“Viel Feinde, viel Ehre”（敌人越多越荣幸）。好吧，就此我便去收集德国的对手好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令我担忧的就不仅是德国问题了，还有以一种不祥形式再次出现的美国问题：美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力量在如何影响这个国家的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对国内议程的极端观点，尤其是我们的政治文化，我们的精神上的变化，是如何使我们的自由民主处于危险之中的？值得担心的事情有很多，但和往常一样，我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当阴险的危险威胁到共和国时，一个人就会变得更加美国化。

到了1986年，美国的政治因为里根政府被揭露曾经安排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而产生了混乱，从中所获利润都流向了尼加拉瓜的右翼反抗军，这支军队正在与解放派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作战。这桩伊朗-反抗军丑闻不仅涉及秘密交易，违反了国会的法案，还连累了政府的最高层：最接近总统的人士被判有罪，他们撒谎并在其辩护中声称爱国主义胜过真理和对法律的尊重。被戏称为“铁氟龙总统”^[9]的里根未受伤害，继续执政；他的和蔼可亲和朴实简单的作风保护了他。在许多方面，那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鲁莽时代。

正是里根总统使我转变成一个活跃分子。1988年8月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共和党大会期间，里根承诺尽全力支持乔治·H. W. 布什赢取共和党选票从而具有候选人资格，以打败民主党人。他指责民主党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假装只是为了援引那“可怕的三个‘自’字”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他的讲话是8月1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我从拿到报纸并阅读那篇文章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起草一篇回应——我仍然保留着那张我用铅笔做了笔记的报纸第一版。由总统亲自出马为自己的继任者担纲总统竞选，并攻击自由主义——在一个“自由主义者”早已成为新保守派知识分子所青睐的目标的时刻，这让我感觉非常危险。我的愤怒促使我把涂鸦之作变成了一篇专栏文章，于9月4日发表在星期日《纽约时报》上。自由主义——我坚持认为是“美国最崇高的传统”之一，现在经常被定义为一种心态——曾几何时“改变了世界……其最伟大的胜利就是美国大革命，其最伟大的声明就是《独立宣言》，其最伟大的保障就是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自由主义一直“代表着反对暴政的自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变革和进步的力量，寻求体面的制度保护。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受到阶级限制，或者说它将其精神的博大托付给了官僚权力的狭隘”。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前提下，这个世界已经目睹了“西方最好的承诺”。我质疑里根声称自己是保守主义的主角，“这一伟大而互补的传统一直坚持着某些原则，其中包括尊重法

律、国家和国际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尊重独立的司法制度，这样的司法制度是以最大的慎重、诚实的言论，最重要的是财政责任和审慎所选择的”。对于新的右翼激进主义来说，里根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军人物。我的希望是，在选举中人们要记住，“美国最优秀的公职人员一直既是自由派，又是保守派，或者是二者的轮替”，我们要以此传统为基础，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我将我所关心的每一方面都融入了这篇短文中。我研究了德国反自由主义的灾难，1968年我在美国和欧洲的左派中也曾经反对过那种相似的精神。我从自由主义的一些伟大的批评者身上，从尼采到莱昂尼尔·特里林，学到了很多知识，因此我很清楚某些形式的自由主义的缺陷和浅薄的乐观。我不是某项政治纲领的坚定支持者，而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信徒，为捍卫独特的历史遗产而发声。

我收到的回信令我十分惊喜，绝大多数信件表示了支持。另外，诺曼·波德霍雷茨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纠正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不知道自由主义者须到自己身上去寻找失去人气的原由，而原由就在于他们屈服于1968年的激进分子，放弃了早先对遏制共产主义的支持，从而有助于“对第三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者的普遍同情”，并支持反向歧视（即平权行动）。这是可悲的，但这种扭曲仍继续在美国为反自由主义精神提供营养，并带来可怕的后果，甚至新保守派都可能在某一天为他们的攻击而感到懊悔。

对我来说意义最大的回应来自C. 范恩·伍德沃德的一封意外的信件。在这里引用此信就是传递那个时代的一种雄辩且沉稳的声音：

“所有美国历史学家都应感到羞耻，他们竟然不得不等待一个欧洲史的同行人去奋起捍卫受到粗俗的反动派卑鄙攻击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事业。令我宽慰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能做得如此之

好……在学界，禁止使用这个词的仍然是左派的恐吓，而不是右派。正如你所说，在恐怖时代，威胁来自双方。”

我感到受宠若惊，但我很快写信去感谢他，从此我们便开始了通信往来，并且我提出了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的想法，“就只是‘自由主义’这个词及其历史和滥用此词的情况……或许不用公开支持任何一个候选人”。

我想到纽黑文去见范恩，他是一个有着谦逊的智慧和仁慈的人，充满讽刺、慷慨和力量的激情。他是迪克·霍夫斯塔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这使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一致同意广告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一篇广告词，重申了“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对总统的言论表示遗憾，他“带头诋毁我们最古老和最崇高的传统之一。我们对美国长期以来所珍视的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传统受到侵蚀和贬低深表关切。在过去和情况最好的时候，自由主义一直寻求体面的制度的保护……自由主义政策需要不断的审视，有时需要做出修改。然而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由、宽容和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是永恒的”。

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收集签名和资金！整版广告的花费是48000美元。在这两项努力上我花了六周时间，完全出于自愿参加实际工作。我们首先获得了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签名（后来斯坦福大学的唐纳德·肯尼迪也加入了）。肯尼迪政府的成员们——比尔和麦克乔治·邦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小亚瑟·M.施莱辛格和唐娜·沙拉拉也签了名，还有学术和公共领域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尽管我们排除了一些在位或寻求选任职位的人士。有些知名人士出于某些原因捐助了资金但不愿公开他们的名字，也有些人表示同情但未伸手相助。理查森·迪尔沃思，一位杰出的投资银行家，曾经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成

员，一位慈善家——而且是一位共和党人！——同意来瞧瞧我们想说些什么，我们就此事进行了交谈。“我同意你们所陈述的每一个字，但我不会给你们一分钱”，他说道。“为什么不呢？”“因为这样做起不到任何好的作用，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场大灾难。”我即刻回应说：“迪尔沃思先生，我就来自一个遭受过巨大灾难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事先采取行动会更好。”大约15%的签名者是从欧洲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的人。

与此同时，在竞选总统期间，乔治·H.W. 布什继续攻击他的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一位自由主义者——当时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自己定义为自由主义者。当我在10月下旬把广告发给《纽约时报》时，我们所交的资金略低于所需金额，但由于我们的信誉良好，于是广告在大选前一周的10月26日登出了。广告引起了轰动，被广泛转载，然后10月30日，杜卡基斯在竞选活动中首次宣布：“我就是继承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约翰·肯尼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很遗憾，这句话说得太迟也太弱了。

我们被告知，白宫感到了不安，但拒绝发表评论。老保守派以及新保守派都直言不讳地大发雷霆。在大选前一天，威廉·巴克利严词谴责了“四五十位知名人士，他们的政治倾向只能通过对其中三人的提名才有所了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乔治·F. 凯南和小亚瑟·M. 施莱辛格。此三人中，一人是社会主义者，一人追求单方面裁军，还有一人是对任何问题都盲目支持中间偏左立场的党派人士，除了任何肯尼迪都是持中间派立场的问题之外”。两天后，玛里恩·登霍夫在《时代周报》头版专栏登出的文章中说：“这种情况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在《纽约时报》上用整整一个版面对总统进行猛烈抨击，并由六十位与竞选活动没有直接联系的知名人士签名，其中包括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真是令人悲哀，如果西方世界的领袖必须要有人去提醒他那些赖以生存的基本原则的话——但是感谢上帝，这些

价值观的守护者并没有长眠不醒。”假如我们早一个星期准备妥当就好了！但是这一努力使我明白了是什么激起了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激情。德国的过去塑造了我；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拯救了我。

自由主义的诋毁者——乔治·H.W. 布什和丹·奎尔——赢得了1988年的大选，说得委婉一点，这使人非常失望，但是自由主义希望在东欧的重新抬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同步的发展，可以让遗憾转变为谨慎的欣喜。到1989年2月，波兰的共产党代表与团结工会的代表围绕后来成为和平革命象征的圆桌而坐。几个月后，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天主教爱国者和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成为总理，在他的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人。6月，在布达佩斯，1956年匈牙利反抗中被谋杀的英雄伊姆雷·纳吉被作为民族英雄重新得到正式的埋葬。

此后，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权做出了谨慎的退让，在事实和教义上都让出了权利。抗争的火花已成燎原之势，因为不满情绪具有传染性并跨越了国界。

在令人惊叹的1989年这一年里，所发生的剧烈变化的绝对速度令人震惊，人们不得不担心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我带着希望和忧虑去紧紧盯住每一个新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想亲临其境，去真实地目睹正在展开的戏剧性的革命，从远处观看是很难的。非同寻常的事件正在我童年的地方发生着；当年我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到的所有那些可悲的事件又在重演——但这次是不同的，这次有解放的承诺！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特别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个人，他代表着克里姆林宫里的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我希望，他的“欧洲共同家园”这一备受瞩目的愿景会使他在下令再一次实施镇压之前犹豫不决。

到了1989年5月，东德人通过出境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借道匈牙利，东德与匈牙利同是社会主义伙伴国家，所以进出匈牙利比较容易，而且匈牙利开放了与奥地利的边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遵守彼此的出境规则，因此匈牙利当局有义务遣返被抓住的试图逃到奥地利的东德人，但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人道主义，并且在联邦共和国的知情和默许支持下。越境的人流在稳步增加。当然，东德政权将这一切视为匈牙利人的背叛。

到了1989年秋天，大约有3万名东德人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到了西德；柏林墙失去了它的一些实用性。所有这一切引起了两个德国的警觉：没有一方会有兴趣看到东德这个国家沦落成某种依赖他人的养老院。在联邦共和国，有许多人更喜欢舒适的缓和，而不愿意冒解放或革命的风险，他们担心欧洲会失去“稳定”。然而，东德人出境的数量不断增加，这就鼓励了那些留下来的人去参加越来越多的抗议并提高他们的嗓门，同时民主德国的支持者们则陷入了分裂和混乱。我们正在目睹一种设定，阿尔伯特·赫希曼在他的伟大分析中将其称为“退出、呼吁和忠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几个月来，东德的教会一直在举行和平守夜活动——严格遵守东德政权的路线，东德人是和平的使徒，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莱比锡的尼古拉教堂首先开始这种行动，到了秋天，全国各地都在举行这种守夜活动，为和平而示威的人们在街头举行烛光游行。游行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以至于警察反复驱散他们。人们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大胆。

9月中旬，在波兰这个榜样的鼓励下，一些民主德国公民成立了一个名为新论坛（Neues Forum）的民间组织，要求与统一社会党进行公开对话，旨在确保自由和正义。令人钦佩的新的领导人脱颖而出，其

中包括分子生物学家延斯·赖希和他的医生妻子。公民组织成倍增加，到处在进行大规模示威。人民的抱怨非常多，对于当局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所掌握的权力，人民已经积聚了巨大的愤怒，在获知5月举行的地方选举是明显的欺诈行为之后，他们的愤怒被进一步激化了。

顽固坚持斯大林铁的纪律的埃里希·昂纳克下决心要保留他的强硬的指挥体系。但该党的年轻领导人明白需要立即进行改革，例如，德累斯顿的党的领导人汉斯·莫德罗以正直而闻名。因此，统一社会党被分裂为强硬派和现实派，强硬派视反对派为帝国主义煽动者的作为，须被武力镇压，而现实派则明白该政权在物质上和道德上已接近破产。

非常具有历史性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德国建立四十周年盛大的官方庆祝活动与自发的抗议活动同时发生：1989年10月7日，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举办了一场华而不实的庆典，与此同时，警察却在使用武力镇压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正在东柏林出席庆祝活动的戈尔巴乔夫私下证实，影响东德的政策是柏林制定的，而不是莫斯科。对于具有改革思想的东德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现在是个英雄人物，但克里姆林宫核心圈子以外没有人知道的是，他早在1986年就坚持认为苏联必须尊重东欧国家的不同经历。“认为我们能够去教每个人怎么做，”他曾经说过，“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给我们这个权利。”（谦虚永远值得牢记！）

10月9日，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计划在莱比锡举行，没有人知道示威者是否会遭到屠杀；极少有人知道，执政党已经向当地医院仓促提供了额外的血液供应，以防万一。但是，近10万名纪律严明的德国人，决心要避免暴力，以和平的形式进行示威。莱比锡交响乐团的指挥家库尔特·马祖尔争取到了德累斯顿市长沃尔夫冈·伯格霍夫等党政官员的支持，在最后一刻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帮助阻止了警察的

镇压。这些年轻的党员希望维持一个清除了人与自然造成的腐败的制度（该国已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最严重的生态灾区），并使其强大到足以干预和防止当地的流血事件，但他们离中央政权太远，难以挽救这个国家。

一周之后，政治局罢免了埃里希·昂纳克，他已经持续十六年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乏善可陈的埃贡·克伦茨，一个不那么教条主义的官员，总是言不由衷地念叨着含糊的改革观念。该党抛弃了他们的强硬派官员，并做出了让步，但让步太少且为时太晚。局势发展的速度是在大街上决定的：数百万东德人，时而有胆有识，时而义愤填膺，继续在大街上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同时数以千计的人逃往西德去了。

西德人带着几分忧虑在柏林墙的另一边关注着这种意外的骚乱，他们担心自己的正常生活可能会受到某种干扰。因此，许多西德人已经逐渐接受了所谓临时性的德国的分裂，并满足于看到东德人的命运得到改善，假如可能的话。但是，涌入的民主德国难民数量会继续增长吗？联邦德国将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变化？对于身处纽约的我来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自由是否真的能赢得，监狱是否真的能被清空——一切以不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秋天那紧张、充满激情的几周里，我两眼紧盯着新闻节目，完全陷入了时局的剧情发展之中。随着不寻常的事物变得日常化，看来政治奇迹也似乎将层出不穷。

运气迫使我尽力把这种剧情置于历史的角度之下去观察。10月下旬，我不得不为哥伦比亚大学11月1日举办的一次庆祝仪式准备演讲稿，作为标题，我选择了“欧洲大家庭：基于美国的视角”。在一个谨慎的、把握不定的喜庆日子里，我想要表明在看似单独的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欧洲，我以愉快的带点刺激的口吻开始演讲，“由于所著书籍读者很少的黑格尔在这些日子里很

受欢迎”——我脑子里想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我用他的术语是想说‘世界精神’在欧洲再次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家园”。东德人正在挑战他们的政权：“自从1848年以来，德国人就没有如此自发地、如此勇敢地，并且——就表面上来看——如此成功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希望人们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这些德国人“是为失败的战争付出了代价的人，他们是通过遭受剥夺和镇压，通过未减轻的单调乏味而付出代价的；他们遭受了苦难，而他们在另一个德国的富裕的堂兄弟们却享受着繁荣”。这是我的狭隘的观点，是我对民主德国公民第一次无差别的、对弱者充满了同情的总结性判断。我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这些抗议者代表了大部分人，就好像他们可以补救过去几十年习以为常的行为。我还警告说，西德人可能不会太渴望与他们失散多年的堂兄弟们分享自己的繁荣。

与此同时，西欧也焕发出新的活力。在东方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与西方新的生命力恰好吻合，正如改革后的欧洲共同体项目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地区有开放的边界且没有边防警卫。这些矛盾又协调的发展——在东方有民族主义的主张，在西方有超国家主义——有它们的模范人物，就像巨大的动荡发生时总会有的那样：波兰教宗、戈尔巴乔夫以及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戈尔巴乔夫模糊的术语“欧洲共同家园”夹杂着一种潜意识的和恶作剧的信息：美国被暗中排除在外，而原来的说法“西方”则包含在内。的确，戈尔巴乔夫就“来自大西洋彼岸‘大众文化’的入侵所产生的威胁”提出过明确的警告。我满怀希望，或许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为欧洲的复苏感到骄傲，但我最后以谨慎的挑战来结束我的演讲：“目前，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欧洲还没有共同的家园，而且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朋友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卡纳丁在听众席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纽约书评》杂志的罗伯特·西尔弗斯叙述了我的演讲。

西尔弗斯决定予以发布，他给了我一个11月9日的截止日期来完成供发表的讲话稿。那天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来做最后的修改。黄昏降临时，电话响了。来电话的是一家当地电视台，“柏林墙倒塌了”，一位记者告诉我。我目瞪口呆，百感交集，怀疑、忧虑又兴高采烈。我知道这个改变世界的大事件——一度是一个仁慈的惊喜——为历史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德国重新回到了全球议程之上。目前尚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此时此刻东德人正在柏林墙上手舞足蹈，通向自由的死亡地带已被清除。柏林墙两边自发的欢乐景象让我想起了贝多芬创作的歌剧《菲德里奥》的最后一幕，囚犯们被从牢房中解救出来，但这是一个面向自由的无与伦比且不可逆转的开端。

民主德国一位部长为东德公民出台一项限制较少的旅行政策之后，柏林墙无意间被打破了。但看似意外的事件具有创造历史的意义，当晚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如潮水般涌过边境，这赋予了意外事件以历史意义。维利·勃兰特为这个场合找到了最恰当的一句话：“原本属一体，终究成一体。”

我几乎立刻惊喜地意识到，这一神奇的令人兴奋的事件发生在11月9日，这个日期在德国承载着最沉重的历史记忆：1918年的这一天，数百万德国人走上街头，大声疾呼要求结束战争，要求一个更平等的未来，这一天德国皇帝匆忙出逃，这一天旧政权在破产中崩溃，一个共和国宣告成立；1923年的这一天，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未遂政变，并立即将这次失败转变成他的第一次盛大的当众作秀（在第三帝国，11月9日是一个假日，用以纪念在失败的叛乱中被杀害的纳粹分子，一种一年一度的纳粹党和异教徒的殉道仪式）；还有1938年的这一天，纳粹策划了“水晶之夜”，当大多数德国人在忙着自己的事时，他们却对犹太人发泄出他们虐待狂般的愤怒。德国历史上这唯一成功的、和平的革命也发生在这个无情的日子里，真是命运的捉弄啊！

11月9日也是我父亲的忌日。历史对于他这一代人是如此苛刻，但也许这个11月9日标志着以其空前的暴力开始的1914年以来的那个时代的结束；现在一场和平革命或许正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在短暂的狂喜之中，我想我的孙辈将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

[1] 寻找长在地下的松露必须借助的一种猎犬。

[2]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富家女鲍西娅凭金、银、铅三个盒子选亲的故事。——译者注

[3] 施密特与盖莱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年之后，他告诉我，尽管他现在已是一介平民，但如果他听说已经被软禁的盖莱克有任何危险的话，他就会飞往华沙并要求见他；如果被阻止，他会尽其所能使波兰政权难堪。

[4] 晚宴留下了一个有趣的余波：此后，不论是谁在任，白宫都会寄给我一张正式的圣诞贺卡，这是我与其他大约10万人共享的一项小特权。然后，在乔治·W. 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发出了100万张贺卡，而我则被从名单上删除了。我想知道，这些名单是谁编辑的，费用又是谁承担的？将我从名单中剔除比包括在里面更使我觉得荣幸。

[5] 我简单描绘一下托马斯·曼的政治历险记，从中可看出他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个日耳曼沙文主义者，但很快就改变并于1922年加入支持共和国的行列，他几乎立刻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中的黑暗势力，并且在国家社会主义获胜后，宁可选择住在国外，但不愿意和所谓的“移民”有任何瓜葛。尽管他蔑视国家社会主义并与其保持着距离，但有时也会怀疑：国家社会主义是否也有什么好的地方？这种想法他自己都觉得羞耻。只是在日记中有所吐露的托马斯的反思，是许多德国人矛盾心理的例证；追随者人数众多而反对者人数甚少，他们往往处于“内心移民”状态，但是也有不少人属于任何阵营，他们迟疑不决，根据时间和事件而变化，往往是外表顺从，但在道德上或出于审慎而感到不安。在1934年大清洗之后，托马斯成为反纳粹思想最始终如一和最权威性的声音。

[6] 一种非裔美国音乐家推崇的服饰。

[7] 我常常想起19世纪中叶的一桩名人逸事，当时法国和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法国大使来到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面前，说法国接受英国的要求。离开时，他请求允许发表个人评论：“我们法国人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事

实：你们英国人总是会从你们的大衣袖子里掏出一张王牌，但是我们不能习惯或不能接受的是，你们总是说是上帝把牌放在那里的。”

[8] 2005年，在纽约发生了一阵疾风暴雨似的对哈伯的新关注。哗众取宠的美国媒体的报道使他成为杀虫剂齐克隆-B的发明者，却忽视了他的其他所有方面。有本十分平庸的书，经出版商大肆炒作，率先夸张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滑稽人物，这一形象影响到了戏剧、电视、电影，甚至影响到了纽约的德国犹太历史优秀守护者——利奥·贝克研究所的出版物。

[9] 意为不粘锅，没有东西能黏住他。——译者注

第十章 统一的德国：第二次机会？

1989年这神奇的一年以胜利的音符宣告结束。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不久，捷克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脱离了波希米亚乡村软禁之地返回布拉格，帮助建立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名叫“公民论坛”。几天之内，他的团体就呼吁在捷克斯洛伐克终结旧的政权。哈维尔在他的作品中描写过有关无权无势的人们力量以及人们对“生活在真实世界之中”的渴望，此时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12月，受到惊吓的布拉格议会选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由他作为曾经出任首任总统并身兼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马萨里克的继承人，可谓众望所归。我童年时代的布拉格解放了，并且是在如此神奇和高尚的领导人的领导之下！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柏林，东德议会废除了赋予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宪法条款。圣诞节那天，在被拆除的柏林墙附近，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东德音乐家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及《欢乐颂》：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庆祝德国第一次成功的革命吗？

但是喜气洋洋、充满戏剧性的局势无法解决两个德国所面临的令人惊愕的问题。在它们身上会发生什么——并且，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建立在德国分裂之上的欧洲秩序来说又将发生什么？这两个国家将如何构建它们的新关系？民主德国会受到什么影响？在西方，我们一直被灌输着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第八或第十大工业经济体，却没有意识到

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靠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的补贴支撑着的。事实上，东德已经处于无可挽回的破产状态，它的公民感觉到了，所以他们继续向西方艰苦跋涉，每天超过1000人越过现在已经开放的边界。起初，欢迎他们的是张开的双臂和物质帮助。

11月下旬，按计划我应该在联邦德国各地去做各种演讲，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兴奋和困惑。当我第一次听到有些西德人在提到他们过去几十年时悲伤地说“感谢上帝有了这堵墙”，我真的非常震惊。以前生活非常简单，当时人们不必去直接面对民主德国的人道问题，当时对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有发自内心的感叹加上偶尔的圣诞礼包就足够了。我对慕尼黑听众提出了一个我特别关注的问题：鉴于两个德国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不平衡以及一方对另一方的明显依赖，我很担心，唯恐西德的监护会将东德人重新贬低至未成年期。我认为，后者的经验和希望也是很重要的。新的秩序，无论它是什么样的，都不应只包括西德的模式或支配，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才切实可行，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和心理上的观念。

11月底，我第一次有机会在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与奥托·莱因霍尔德和罗尔夫·瑞西格再次交谈，他们分别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更年轻的）副院长（事实上这是党的智囊团），我已经认识他们很多年了。反对派的代表和东德新教教会的领军人物维尔纳·克鲁舍也出席了会议。（这是在柏林举行的阿斯彭会议上。）讨论小规模地再现了民主德国的局势：在正式会议上，莱因霍尔德和瑞西格基本上意见一致——在党和反对派之间举行一次“圆桌会议”，前者放弃声称党拥有唯一的领导权，接受民主选举和媒体法律，并允许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特征，但作为一个极少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瑞西格私下告诉我需要更激进的改革，并邀请我去东柏林见他，以便讨论这些可能性。（我还不知道在11月初，他和他社科院的一些同事实际上就已经主张拆除柏林墙。很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

接受他的邀请。) 仅仅几周之后，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就要求莱因霍尔德辞职，而瑞西格成了他的继任者。(最终，东德社科院的所有研究所都关闭了，瑞西格便成立了他自己的研究所。)

在我们的会议进行中途，落下了一颗重磅炸弹：11月28日，科尔总理提出了“十点计划”。这令西德联邦议会感到震惊，该计划旨在逐步引领德国在一个新的“和平秩序”中实现统一。(我们现在知道尼古拉·波尔图加洛夫，我一度的争论对手和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德国问题专家，一周前曾告诉科尔的主要助手霍斯特·特尔切克，苏联——尽管仍然希望民主德国可以通过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得以挽救——肯定反对快速的统一；科尔认为他的逐步统一的计划可能由此更容易被接受。) 科尔提议进一步放宽两个德国之间的旅行规定，他承诺只要东德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采纳了根本性的和不可逆转的变革，就会向东德提供额外的经济援助：“我们不想去稳定那些已经变得难以维持的状况。”东德的自由选举将产生新的合作形式，产生联合的机构，并最终可能产生一个议会。所有这些必须纳入全欧洲协议和安全考虑之中。最终会出现一个国家，他说，但是没有人“今天就能知道一个统一的德国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尽管科尔的“十点计划”仍然含糊不清，但它清晰地并且第一次承认最终的目标是国家的统一。科尔本人认为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十年时间。

他的声明震撼了世界，尤其是“十点计划”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甚至没有预先告知外交部长根舍。科尔也没有通知他的外国盟友；乔治·H.W. 布什总统，他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伙伴，是唯一在发表讲话时获得通知的国家元首。科尔将政治家风度与无情的党派政治利益糅合在一起，因为他的眼睛在紧盯着1990年的大选。他冷酷无情地碾压既定的基民盟的竞争对手，并试图通过将社民党描绘为不够爱国来粉碎反对派。12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醒布什总统，他担心科尔的“国内政治利益在统一问题上导致他走得太远、太

快；他正在利用人们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一旦被调动起来就难以控制”。贝克是对的。在对德国和欧洲都至关重要的一个时刻，科尔屈从于他自己职业生涯的假定的重要性，从而轻视了这一时机。

科尔的计划显然需要与四个盟国进行谈判，这些盟国仍然拥有残存的权力，最重要的是，在德国领土上驻军；苏联在东德有50万士兵。对于这个成为“美国的德国”的国家，美国很高兴地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基本的信心，同时又采取更加放松的姿态，但是科尔正确地坚持即使德国统一了也要留在西方世界，这就加剧了苏联人的焦虑。然而欧洲国家，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德国的恐怖的国家，完全有理由对一个更大、更强的德国感到不安。考虑到它们不可避免的焦虑，我感到震惊的是，这“十点计划”丝毫没有提到如何保证波兰的西部边界不会再次改变，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后来，科尔蹩脚地声称，只有一个统一的德国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最终宣言。但事实上，他是不愿意去刺激在政治上有组织的西里西亚人和其他被驱逐者，他们起码想要承认他们失去了家园，也许还有赔偿。尽管如此，如果给予波兰最低限度的保证，重申德国将放弃任何形式的复仇，那么在政治上是谨慎的，尤其在波兰新领导人支持德国统一的情况下，而这种立场在他们的国家里实际上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虽然科尔的声明表明民主德国将逐渐解散，但其公民定下了一个更快的步调。大规模的人员外流仍在继续，而留下来的人在获知了他们的领导人是如何生活在舒适环境中——住在封闭的大院里，屋里有游泳池，出行乘坐沃尔沃，享用着西方的奢侈品，还有专门的医疗服务等——之后，他们的愤怒愈加难以压抑。1990年1月，人们袭击了国家安全局“斯塔西”在柏林的总部，这个令人憎恨的、无所不在的旧政权堡垒，他们开始毁坏其秘密记录，直到公民反对派的成员阻止他们，告诉他们这些记录是未来对该政权进行清算的必要材料。斯塔西很可能是世界上败坏一个民族的最完美机构——比曾经的盖世太保更

大，虽然没那么残酷，但更阴险。仍然留存下来的斯塔西档案长度超过100英里，展示了斯塔西的监视和恐吓手段，以及它从成千上万公民那里获得的帮助，这些人是被招募来监视朋友和家人的。随着愤怒和幻灭的蔓延，其士气在急剧下降。

在圆桌会议上，党和反对派正在就改革进行辩论，而统一社会党确实放弃了其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主张，取消了独裁结构，甚至采纳了一个更适宜的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它还找到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一位名叫格雷戈尔·吉西的柏林律师，早年曾经为一些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辩护。吉西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家庭的后裔，其外表和举止与早先的共产党官员截然相反，他不拘礼节、诙谐、随性且非常聪明，但往往聪明过头。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已经成为常态——有从上的也有从下的，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对持续不断的斯塔西行动的共同愤怒公开爆发，同时波恩和东柏林两个政权之间的微妙谈判在秘密进行着；代表西德的主要谈判者是科尔总理府的克劳斯·杜伊斯伯格，他表现得非常机智和坚定。

东德的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意在3月举行新的东德议会选举，自由选举本身就是一个新奇事物。民主社会主义党是为一个改革过但半独立的国家而竞选，而那些激发了公民运动的东德领导人则主张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西德，也不同于伪社会主义的东德的某种东西：一种将资本主义效率与更大的社会正义相结合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种更平等的结构。与此同时，西德的政党——基民盟、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组织并资助了他们在东德的类似组织，并专注于如何实现统一这个问题。

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规定了两种方式：新的州可以通过接受“基本法”立即加入，或者可以在新宪法通过后加入。科尔在东部建立了一个由几个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名为德国联盟，其实就是一个露

骨的基民盟组织，然后以快速路线为其竞选口号，并承诺在统一的德国“鲜花盛开的美景”将取代贫困的生态荒凉的灾区，即旧的民主德国。他没有给两个德国的公民提交一份实现这个梦想项目的法案，也没有号召他们做出任何牺牲。（赫尔穆特·施密特离开了办公室，突然去《时代周报》参加了一次会议，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是那家报纸的联合出版商，他发誓说：“现在已经到了发表一个像丘吉尔那种充满‘血、汗和泪水’的演讲的时候了！”）维利·勃兰特在为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助选时受到了热烈欢迎（不得不说，最有效的竞选活动家还是西部人），他督促采纳较慢的路线，因为这将允许东德人参与新国家的规划。参加竞选的库尔特·比登科普夫在大选前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达到这个“历史性时刻”的要求。他是对的。不论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还是社会民主党都没有利用这一时刻进行现实的清算：科尔渴望快速统一，但不知道民主德国的真实情况；社民党了解的更多，但错误地认为较慢的步子更为可行。

民意调查预测左翼会胜利，社民党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但是，超过90%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的结果却是预期的惊人逆转：科尔的“联盟”得到48%的选票，社民党22%，民主社会主义党16%，其他党派得到了剩下的选票，代表公民运动的联盟所得票数不到3%。简而言之，大多数东德人已经厌倦了前政权的承诺和实践，他们想要结束实验，他们想要他们所想象的另一个德国的人所拥有的一切。无产阶级想要资本主义的“成果”——并且立即就想要（虽然字面意思是“果实”，他们希望的是香蕉，富裕的西德人为此还嘲笑他们）。四十年的匮乏已经足够了。只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现状，只有被称为“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才能促使莱比锡工人们把票投给基民盟。他们抛弃了他们自己的真正改革者以及改变和复兴的道德支持者，这种命运也落到了东欧其他地方的改革者头上。改革者们已经清理了通往希望之乡的道路，但是“讲究实际”的政客们——拥有巨额竞选资金

——取代了他们。令人遗憾的是，改革者的早期失败预示着他们后来的边缘化，那时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存在原本是会产生重大影响的。

在3月大选之后，东德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上台了，洛塔尔·德·迈齐尔担任州政府总理。迈齐尔是柏林的一名谦逊的律师，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辩护者，也是新教教会中的一名积极分子，他参与政治更多的是出于责任而不是野心；他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小提琴手。与东德那段奄奄一息的日子里的许多其他政客一样，迈齐尔被指控与斯塔西有联系，但这些指控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名教会活动家，他一定会与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部门有一定的联系，但这就是全部。我认为这些卓越的政治人物出现在现场是另一个较小的政治奇迹，特别是迈齐尔和吉西——一位是胡格诺派的后裔，另一位是犹太人，他们俩成了两个少数民族的代表，但这两个少数民族曾经对旧普鲁士的繁荣产生巨大的、有益的影响。

随着德国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以及德国问题专家在各地成为“抢手货”，我的生活也开始有了变化——在情绪上和现状上。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去东德教书，去帮助学生克服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去挑战他们所继承的扭曲的单纯性。我本来希望去追随我的朋友比登科普夫，一听到库尔特·马祖尔的恳求“我们需要你”，他就即刻前往莱比锡兼职教法律。我可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赤字了解得不够，但是在历史知识领域内的赤字我确实是很了解的。我认为帮助东德学生掌握他们的历史复杂性将是令人激动的（并且是很有用的）。我还会了解到遗忘的过程！东德的自我形象是一种英雄例外论，是德国生活中所有进步元素的体现，这个神话必须得到纠正。尼采曾经说过，一个人必须要克服的羞耻感能增强获取知识的吸引力。苏联已经承认了在给过去重新排序上的困难：戈尔巴乔夫政权取消了苏联所有的历史考试，为期一年。比起用法令来中止，我无法再想出一种对历史的中心性程度更高的赞美了。

当时，我们中许多人在自问：“接下来要做什么？”1990年的春天，我与乔治·索罗斯用了很长时间吃了一顿晚餐，他告诉我他计划在布拉格筹建中欧大学，这是他的政治慈善事业的另一个大胆倡议，既实际，又令人钦佩。盖雷梅克和我6月在华沙讨论过类似的问题。他说得非常直白。我们需要历史学家，他说，因为我们需要真理。

客观情况使我必须整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但要做的还有很多。我敦促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董事会的同事们将东德人带到美国来参加一些项目，这些项目类似于那些在1945年后给西德人带来巨大机遇的项目。当然，经历会有所不同：较早的那批人是从一个饱受破坏和破产的国家来到一个胜利的和自信的美国。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几乎没有早期的乐观信仰，而民主德国公民现在是与纳粹幸存者不同的一代人，但仍然有必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幽灵困扰着许多人，特别是在欧洲，但当我被要求解释持续发展的剧情并猜测可能的结局时，我告诉人们，我认为东德的解放和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出现，只要它是坚定地扎根于欧洲和西方的，就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回想起来，令我惊喜的是，我的观点维持了一种乐观的平静的基调。

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那些亲身遭受过德国野蛮暴行的人，肯定了他们对一个新的民主德国的信任，并承担了实现与之和解的风险。1990年1月初，瓦茨拉夫·哈维尔说：“我们有责任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从我们国家）驱逐出境的德国人致歉。”他的共产党反对者对这个被称为非国家的或反国家的立场予以抨击，但是我要为其赞美，并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把它称为“一个宽宏大量的姿态”；东欧不仅要将其现在，而且要将其过去从苏联的正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将德国人从苏台德地区驱逐出去“常常是在残酷的条件下执行的”，它不仅伤害了纳粹分子，还伤害了反纳粹的德国

人。（我举了一个苏台德的德国朋友的例子，一位死于流放途中的希特勒反对者——格雷特·库贝尔卡。）“道歉对于一个新欧洲来说是必要的条件”，我想，我还提到了东德因为参加了1968年华沙条约针对“布拉格之春”的行动而做出的正式道歉，以及苏联于1989年承认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是非法的。为了创建一个新的更好的秩序，每个国家——我把美国包括在内——需要诚实地面对过去，既不屈从于夸大的罪行，也不沉溺于记忆缺失。1990年，道歉尚未成为例行公事和毫无意义的姿态，但是我因为那篇文章而收到了令人难忘的攻击信函。斯洛伐克人写信告诉我，所有捷克人都是“猪”，只有斯洛伐克人曾经反对过希特勒——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一位拉比被激怒了，我居然只提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苏台德德国妇女，难道我忘记了600万被杀害的犹太人？

几个星期后，我被召集参加一次讨论会——在评估德国的未来时德国历史的地位，并且惊讶地发现身处令人敬畏的同伴之中。1990年2月下旬，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询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撒切尔夫人的邀请前往首相别墅，按照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的说法，同一些专家进行“一次完全非正式的谈话”，话题是从德国历史中吸取的教训，这些教训将有助于处理当前德国的统一问题和未来统一后的德国问题，“以及我们将如何确保统一能加强欧洲的稳定和安全”。3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将被作为“绝对机密”来对待。

我接受了——我怎么可能拒绝与英国首相见面的机会，而且在首相别墅，英国首相们的传奇住宅，丘吉尔的休息寓所，英国的“戴维营”。与会者名单令人望而生畏：戈登·克雷格是另一位美国人，还有三位英国历史学家——戴克勋爵（休·特雷弗·罗珀）、诺曼·斯通和蒂莫西·加顿·阿什，以及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和前任台长——乔治·乌尔班。

当戈登·克雷格和我于3月23日在伦敦相遇时，鲍威尔给了我们有关第二天会议的备忘录。会议开始部分针对的是德国的过去：“关于讲德语的欧洲人的性格和行为，历史告诉了我们些什么？有无持久的民族特色？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年（或八十年或一百五十年）中是否有所改变？”首相将“为此吸取每个参与者的智慧”。会议第二部分将讨论“德国在欧洲的未来角色及其可能要求我们在外交中做出的变化”。

撒切尔夫人慷慨地招待了我们，午餐时我就坐在她的丈夫丹尼斯·撒切尔身边，他是个很难交谈的人。撒切尔夫人则刚好相反，她以一种俏皮的娇媚方式在全场光彩夺目，散发着魅力和无限的自我肯定。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和做记录的鲍威尔则表现出典型的矜持态度。

首相亲自主持了会议，要求我们每个人做一个开场陈述。我拿出便条写了我的第一个话题：“英德对抗：对20世纪的承诺造成的最大伤害”。我谈到了19世纪后期双方关系的对抗性逆转，当时德意志帝国超越了英国的工业实力并挑战其海军力量（主要是出于国内和声望上的原因），然后在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每个国家都把对方看作致命的敌人。数以百万计的死伤者留下了一笔造成分裂的遗产：对一些人来说，是“再也不要”发动战争的强烈愿望；对许多人来说，是一方面对英国的虚伪，另一方面对德国的野心和侵略的严重不信任。

我补充说，误解可能会加剧这种对抗。英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在接到英国于1914年8月4日的宣战，强调德国违反了比利时的中立时，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这导致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把条约仅仅看作一张废纸。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读：也许针对英国没有像德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保持中立并立即意识

到由此造成的灾难的严重程度，德国总理一直在用不适当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沮丧。也许，与其说这是对条约的判断，更不如说是一种悲叹，是对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评论的一种笨拙模仿，“整个欧洲的灯光都熄灭了；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将不会看到它们被再次点燃”。

当然，德国的过去是一个沉重的、不可避免的负担，但它与当前形势的关联是有限的，我们历史学家是这样认为。德国的过去导致了邻国对它的恐惧和德国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但德国人已经改变了，联邦共和国现在有了一个负责的、以西方为导向的政治阶层，而且其早期的迫切的侵略性特征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虽然统一会带来巨大的问题，但德国最终会把握住它们。

当我们发现首相对德国人的怀疑和厌恶的程度时，我们这些“专家”更加强调了这种观点。这位具有历史意识的铁娘子冷静地固执己见，她确信，德国人会利用他们新近获得的力量来控制欧洲共同体，并在东欧实现他们原先自封的使命。她对德国人何时再次向东进军的疑问源于她深刻的信念。德国人有各种各样的美德，她说，比如纪律和勤奋，但根据传统和品格，他们是很危险的。她的怀疑和不信任似乎是不可动摇的。（赫德的偶尔介入表明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思想：他是一个没有过度偏见的现实主义者。）

最后，首相用一个学校女生的姿势拍手向我们致谢，并略带戏谑地向我们保证：“我会对德国人很友好的！我会对德国人很友好的！”几天后，科尔将访问伦敦，我心想，这两位领导人都代表了他们自己更愿意称为民族特性的一些不那么吸引人的特征。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只能“变得友好”，但她一直在勉为其难。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承认，“如果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我所执行的外交政策遇到了毫不含糊的失败，那就是我对德国统一的政策”。

在一次喝茶休息时，我坐到了撒切尔夫人身边，稍稍远离其他人，因此我们简短地聊了一会天。我说，如果她对德国人的感觉同她实际表现的那样，我会认为她愿意试图恢复法国和英国之间某种古老的友好关系。她让我知道她对法国人的看法，法国人都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她说，然后她还插入了一句对意大利人的看法，认为他们是轻浮的、不可靠的，并补充道：“你唯一能信任的就是荷兰人。”我小心翼翼地说：“首相，这可能还远远不够。”

当我们离开并回到汽车上后——是在喝了一轮她自己调配的饮料，并且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她声称已经读过的我们写的书之后，我对蒂莫西·加顿·阿什说：“她就差德国佬这个词没有用了！”撒切尔夫人的反德情绪根深蒂固，她未说出口的看法很可能就是丘吉利的观点：德国佬总是卡在你的喉咙上或者跪在你的脚下。这些长期存在的偏见不受理性的影响。

撒切尔夫人无法像她希望的那样减缓德国统一的进程，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动力。但在欧洲，她的怀疑并不孤单。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同样不愿意看到一个更大、更强的德国作为邻居——他可能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观点一致，这位小说家有一句名言：他非常爱德国，以至于两个德国他都想要。但科尔与密特朗一起参与推动了一项名为“马斯特里赫特1992”的计划，该计划设想将欧洲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欧盟。科尔希望朝着更大程度的欧洲一体化迈进将减少德国统一的困难。

处理德国问题需要盟国的接受和两德之间的协议。为了防止出现谈判由盟国发号施令的情况，哪怕是一点苗头，有人发明了“2+4”的模式，这意味着两个德国将处理它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四个同盟国则在如何调解它们在柏林的剩余权利以及关于在德国期望自决的情况下它们的驻军问题这些方面达成协议。科尔显然是这两套谈判班子中的

关键角色，他当时提出的策略和表现出的稳健令人印象深刻。他不可或缺的盟友是布什总统，因为美国的利益在于一个持久地与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德国。

科尔还必须建立一种共同货币，他不顾德国央行的反对，决定在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之间以1：1的汇率进行大多数交易，从而大大高估了后者的价值，在这一方面他发现了一个政治上很方便的妥协。民主德国全面的经济崩溃可能还不明显，但人们已经感觉到，要把东德引入一个可行的统一的德国，并使其充分地繁荣以遏制进一步的移民，所要付出的物质代价将是巨大的。因此，事实证明，要想掩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实际上就是一种额外的精神上的代价。当时我对这些经济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担心的是人类或心理上的问题。饥饿是可以缓解的，我想，但羞辱造成的痛苦会更长久。我担心东德人会逐渐怀有一种失落感和怨恨感。

6月，我有了一个机会去迈齐尔在柏林的家与他见面，这反映出他谦逊朴素的风格。（我忘记了是谁安排的这次探访，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当我提到我认为统一的心理困难甚至比经济困难更大时，他立刻表示同意，“我不想把1700万心理不健康的人带进这个新的德国”，他说道。1993年12月，他告诉我在重新统一的那一刻，他曾带着他刻薄的机智对科尔说：“我很抱歉，我没有随身带来1600万婴儿。”这两种表述均表明迈齐尔感觉到西德人希望东德人在心理上要顺从和谦恭。

在这部戏剧中，这两位对比鲜明的演员身上有某种哀伤的象征性东西：科尔有着笨拙的仪表，巨大的自我满足感，以及莱茵河天主教徒温和敦厚的性情；而身体单薄、矮小的迈齐尔则是一个朴素甚至谦卑的新教徒。他们彼此不喜欢，而且迈齐尔对资本主义美德的怀疑使他难以同那位总理相处。

直言不讳反对统一的德国人也为数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君特·格拉斯。他坚持认为国家的分裂是一种历史性的惩罚，奥斯威辛集中营构成了统一的道德障碍，并且欧洲的和平取决于德国的永久分裂。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要为此买单呢？还有一类人，在西德和东德都有，他们想要一个联盟的德国，其中改革后的有着混合经济的民主德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显示出一种“第三条途径”，这样的德国也将会存在一段时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相似的不切实际的想法。民主德国已经错过了改革良机：人民已经失去了耐心。

在发生剧变的这几个月里，我接受邀请在许多不像首相别墅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的场合去做演讲，我的演讲内容在各地几乎如出一辙，只是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与非德国人谈话时是对统一做出自信的分析；在与西德人谈话时，就请他们以得体的态度和同情心来对待东德人。但我知道，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于一个扩大的德国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尽管如此，这些谈话和会面有时也允许“向掌权者说出真相”，如果我可以擅自使用这种陈词滥调来描述公民难有的机会去向那些将权力与知识混淆在一起的高端人士进言的话。在1990年4月于华盛顿举行的后来证明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的三边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上，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感叹道，每当哈维尔或瓦文萨说话，他都会失去两个师——欧洲共产主义威胁的减少会鼓励国会采取节俭政策。他是在试图引人发笑，但我还是要提出反对：哈维尔和瓦文萨的政治存在肯定是要费力对付的，但无论如何，安全不应该仅仅根据师团的数量来衡量。（我几乎不可能知道，在十几年里，切尼在做出政策决定时，依靠的仅仅是无情的且往往是不适当的武力。）

德国统一的前景给美国犹太人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其中一些人坚持对这个国家持一种坚决否定的看法，尽管多年来反德情绪已有所减弱。西德的官员做出了特别努力去接触美国犹太人，实际上是向

他们讨好，总的来说这种和解工作也已取得了进展。尽管如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德国还是被认为是个杀人犯众多的国家，就像爱因斯坦在1953年所标记的那样。1990年初，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负责人埃德加·布朗夫曼想要向联邦议院陈诉犹太人对统一的立场，并为此征求我的建议。我持怀疑态度，难道真的有犹太人的立场吗？我敦促他首先向纽约的犹太听众陈诉他对统一的有条件的认可。最后他确实在柏林向德国听众发表了讲话，但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共鸣。

那年晚些时候，我原先的一个博士生，纽约犹太神学院院长伊斯玛·朔尔施邀请我在神学院年度朋友聚会上就德国统一发表演讲，那一年纪念的是格申·凯克斯特，一位捐助者以及一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我犹豫了，这个话题适合这种活动吗？他是否知道我出生时受过洗？是的，他知道，他说道，而且我应该畅所欲言。

所以我再次谈到了1989—1990年这一时期的后果。我告诉他们，本-古里安在1957年做出的评论，“今天的德国不是昨天的德国”，在那几年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西德政治家和作家承认德国对纳粹野蛮行为负有责任，德国的必胜信念（就像美国的那种“赢得冷战”的必胜信念）是不存在的。过去的受害者必须被记住，我说，虽然他们从未被利用过，对他们的怀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添加了一个警示：把大屠杀作为最深刻的道德警告来理解是强制性的，但将其发展成为对未来德国后代的永久性的赔偿要求，或者让大屠杀的记忆去鼓励保持强硬态度，这听起来是一种危险的错误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罪行中有不可或缺的帮凶。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写下了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诗：“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这句诗的力量有时会让德国的外国帮凶被人遗忘了。

原本我预计会有不同意见，但不论是在此地，还是从其他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听众那里，我一直没有遇到过。碰巧，1990年我有三本

书在法国出版，另一本在荷兰出版，我也获邀去欧洲做演讲和采访。我在各个地方谈到了我们的忧虑，这些忧虑值得我们寄以希望；在一个不同的欧洲就有一个不同的德国。毕竟在1989年民族主义者已经显示出其杰纳斯^[1]的两面面孔：在东欧，他们在有力地、仁慈地激励着不同意见；然而在处于瓦解中的南斯拉夫，他们则露出了丑恶又好战的嘴脸。

1990年7月中旬，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戈尔巴乔夫的高加索度假地敲定了有关德国的最终协议。一个统一的德国最终将拥有完全的主权，由此可以自由选择其联盟（即留在北约）；苏联军队将在有限的时间内留在东德，在西柏林的盟军也一样。联邦德国国防军将被限制为一支35万人的军队，并且德国将放弃所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联邦共和国还授权立即向苏联提供50亿德国马克信贷——后来甚至批准了更多，为从东德军营返回的士兵在苏联建造住房所需费用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两个德国也达成了一项协议。事件发展的速度是由东德不断恶化的局势决定的：大批人员离境仍在继续，随着工业开始失去其出口东方的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活力，而共同的货币则允许东德人去购买他们长期渴望但被拒绝给予的西德商品。迈齐尔要求加快统一步伐。到10月3日，根据“基本法”第23条，民主德国成为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但是没有那种得意扬扬的心态。德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短暂且唯一的尝试（一度是一种本土产品！）变成了历史。在盟国的同意下实现统一标志着一项伟大的外交胜利，但我认为，要不是因为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和数百万走上街头的和平的东德公民，以及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坦克既不能也不应该保留对外国的统治，这一切原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德国的成功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来自英国的一种愤怒的抱怨声引起了短暂的骚动。1990年7月，英国贸易大臣尼古拉斯·雷德利——

撒切尔夫人内阁中最亲密的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盟友——在接受《旁观者杂志》采访时发表了一些冒犯性的反德言论，他暗示一个统一的德国将和平地获得希特勒借助武力为之奋斗的东西（插图是一幅留着希特勒式胡子的科尔的漫画）。雷德利被解职了，整个事件在德国并没有被认真对待，但它反映了英国亲欧洲和反欧洲两派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掌权的保守党人之间。

雷德利已经够糟糕了，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更糟糕。我们与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别墅会面的一份误导性纪要被泄露了（显然是出自英国驻波恩大使馆），这份纪要看上去好像她的“专家们”都在抨击德国。查尔斯·鲍威尔的会议议程——我们从未见到过——出现在《明镜周刊》上，然后出现在英国媒体上。这个议程读起来就像反德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记录，当然这是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它用一句话列出了一个已经讨论过的不具吸引力的德国特征的列表，始于恐惧和侵略性，终于多愁善感。我们所有人对这个报道造成的错误印象感到特别恼火，并且担心我们的德国朋友会相信它。

蒂莫西·加顿·阿什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人，他在一家英国报纸上指出，实际上“争论的重要影响力绝对是正面的”，我们所有人——他们绝不可能持有相同的观点——都强调联邦共和国确实代表着德国历史上一些全新的东西。“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弗里茨·斯特恩没有说任何他以前不会说的话——事实上，都已经说过了——在他著名的出版物中。”同样他也为自己做了辩解。我也添加了一个回应进行反驳，然后在给《法兰克福汇报》（在《华盛顿邮报》上转载）的一篇长篇文章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即鲍威尔总结的效果与我们的真实希望完全相反，我们的希望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新的形势，更好地理解一个截然不同的、最后西化的新德国。我写这篇文章时，恰好是在科尔成功地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会谈之后的几天，这实质上证实了西德对西方的依恋，但在风格上——例如，有些细节科尔

没有透露给布什——暗示了一种德苏双边主义。科尔是否必须在高加索宣布“在德国统一之日，所有盟军权利将自动停止”呢？事实上是正确的，但这样做是否明智呢？

我补充说，统一代表着给德国的第二次机会，这对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份难得的礼物。德国的第一次机会是在1914年之前，当时它正处于成为欧洲最重要力量的顶端，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德国有缺陷的政治结构和不断增加的沙文主义疯狂行为不可分割——破坏了这一机会。它的第二次机会将是建立在联邦共和国的成功基础之上——这一次是和平的和谨慎的。

“第二次机会”这个词非常引人瞩目。《法兰克福汇报》将它用作我的文章的标题，从那以后这个词经常被引用。有时候，德国人介绍我时干脆就把我称为“第二次机会”之人。我仍然认为这个词是恰当的，既是庆祝，也是劝告之意：这个国家已经被赐予一个伟大的礼物，就需要加以保护。过去应该成为一个教训。

我认为可以界定一段历史性时期的这个短语也为我概述了一段最深刻的个人经历。我本人也在伸手去抓住第二次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著名的图书编辑和出版商伊丽莎白·西弗顿寄给了我一本书的排版清样，让我写书评；我们建立了一种书信来往的友谊——在电子邮件面世之前的岁月里，信件是表达隐秘的思想和信心的工具——然后我们见了面。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富有魅力和生气勃勃的女性，在各方面具有天赋，从里到外透着美丽。她引人注目，充满活力，有着无止境的求知欲、天生的对生活和艺术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她是半个欧洲人，理解并鼓励我的欧洲导向，她的成长经历培养了她对政治的有力的承诺。她的母亲是个英国人，她已故的父亲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我特别钦佩他的书《美国历史的讽刺》——除了他对纳粹主义的憎恶和他给欧洲难民提

供的巨大帮助之外。我和伊丽莎白的兴趣和激情完全重合，并由此变成了一种激情绽放的爱情。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即便我们的脾气——以及环境的力量——偶尔会造成风暴。她是上苍赐予我的一个维系生命、提升生命品位的礼物：我的第二次机会。

我认为，我的潜意识最初是通过向我隐瞒公开表述与私人经历之间的联系为我提供服务的。如果我立刻认识到有关德国的第二次机会这种表述的起源与个人问题有关，那么我可能早就忍住了这种表述。历史学家经常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有关联的，但我们也被教导不要让前者介入后者。在任何情况下，我的私人生活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与佩吉离婚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最后的阶段一切都非常友好。分手或争论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1983年在我当教务长的最后几个月中，我的下背部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我试图通过锻炼来控制它。在1990年上半年结束时，我发现哪怕是走一小截路都会感到非常痛苦；经过多次检查，我被确诊为椎管狭窄，然后于1991年1月15日——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这一天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的日子——接受了椎板切除术。

我恢复得很快——快到那个夏天我可以去西尔斯·玛利亚并在那里做一些适当的徒步锻炼。（8月，沿着西尔斯湖散步时，我听到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被粉碎的消息！）长期以来，西尔斯在我生命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不仅因为它令人敬畏的美丽强化了我对父母和过去的回忆，在我童年时代我和他们一起住在阿尔卑斯山上，而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块地方，在这里我可以见到并结交朋友，还可以不受政治困扰地再次使用我的母语。在阿尔卑斯山上徒步旅行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热爱，而且去西尔斯有双重功效：我可以在那里休息和恢复，但是它也促使我必须努力工作，这是到具有独特修复功能的阿

尔卑斯山待上几周的物质先决条件。我的孩子们分享着我的感受，伊丽莎白和我的孙子们也是如此。它已成为我的第二个可选之家。

在西尔斯度假后不到一年，一天晚上，一阵胸痛催醒了我，而且——尽管我有自夸自大的医学基因——陷入了任性的幻想之中，认为我只是因为胃部不适而遭受痛苦。事实上，我是心脏病发作，到第二天快结束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疗中心。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一位名叫杰瑞·格利克里奇的心脏病专家照顾着我，这位医生1948年出生在弗罗茨瓦夫以西60英里的一个小镇上！这位出色的医生不仅成为我的医生，而且成为我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家！在他的照顾下，在伊丽莎白和我的孩子们了不起的支持下，我再次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我很高兴这两次危机发生的顺序是正确的：背部的手术使我能够进行心肌梗死发生后所需要的每日有规律的步行。

还躺在医院时，我想起了我父亲关注过高海拔对心脏病患者的影响，因此我对格利克里奇医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能再回西尔斯·玛利亚。他认为没问题，而且会相当快。我立刻就感觉好多了。事实上，在1992年的夏天，伊丽莎白和我在西尔斯度过了两个星期，快结束时——同我们的法国朋友罗杰·埃雷拉和他的妻子艾琳一起——我们设法完成了七个小时的徒步旅行，爬上了令人畏惧的顶峰，隆亨山口和塞普蒂默山口两条分水岭在此相交，然后沿着塞普蒂默山口一条石头路向下到达布雷加利亚山谷，这条山路是当年罗马人修建的，马丁·路德曾经走过。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新的德国的生活。较早的一次前往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旅行是在1991年5月，当时德国语言和文学学会安排在精心挑选的文化圣地魏玛小城相聚，我是在1988年当选为其成员的。我发现，一下子能够见到那么多德国历史上的不同层面，实在是太令

人震撼了：歌德故居和席勒博物馆；宁静古老的小城里铺着鹅卵石的小街小巷；原先民主德国破旧的楼房、撕毁的招贴，还有褐煤的气味（我还挺喜欢这种气味）；在小城中心，一条宽阔的街道两边都是新的商铺，出售着西方的商品。在城市的一端，人们可以参观古老的公爵宫殿，里面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是它的地面是荒芜的，在通往宫殿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很大的苏联的战争公墓。

学会的正式会议尽职尽责，专注学术，但同以往常见的那样，会议间隙偶然的对话和并肩散步使会议变得更有价值。学会还邀请了一些东德人参与讨论，但是西德人对他们所经历过的并且最终所赢得的一切几乎毫不关心。一位当地的牧师对我说：“我曾经觉得自己像一个解放者（Befreier），现在我却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Besiegter）。”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的是我独自前往布痕瓦尔德的一次旅行。布痕瓦尔德位于陡峭的山顶，离魏玛小城只有5英里；1938年在“水晶之夜”被捕的犹太人被强迫走上或跑上位于山上的集中营。我们在布雷斯劳的一个邻居，就像大多数布雷斯劳犹太人一样，曾经被押送到那里。我马上想到，这样的磨难如果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会怎么样，他的健康和精神早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损。我再一次意识到，如果他也不得不要忍受这种恐怖，那么相比德国的过去，我自己的人生就将是截然不同的。

送我去集中营的那辆出租车经过了大片苏军的营房，他们仍驻扎在那里。位于山顶上的集中营实际所在地周围环绕着山毛榉树林（布痕瓦尔德），俯瞰魏玛时感觉有一种梦幻般的景象，颇有几分“浪漫”：将他们的野蛮的毒瘤放在德国古典文化的圣杯旁边，这是纳粹居心险恶的恶魔般的伎俩。在集中营里，一座座小屋还留有共产党人的标记，突出了那些在那里成功组织了一个地下抵抗团体的共产党英

雄，并且还展示了一些纳粹文件，例如犹太囚犯的名单，附带着他们的职业头衔，医生或学者。（但是在1945年集中营被解放以后，我在那天晚些时候得知，苏联当局还用它来监禁其“敌人”，包括原先的社会民主党人。）

当我离开时，我因内心深受震撼而缄默不语，这时来了一辆旅游巴士，车里涌出来许多法国游客，包括一些也许是会讲法语的非洲人。我不禁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西方文明”呢？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告诉他那些令我心潮澎湃的情绪，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也都牵涉其中，他把我这次访问称为“朝圣”，也许还真的是：一次面对恐怖势力的“朝圣”，同时怀有深切的感恩之情，感谢我全家人能够得以逃亡，感谢在最不幸的时刻我们能够获得这难得的好运。

通往德国统一的道路上可能有陷阱，这一点似乎很明显。对于统一，东德人有不同的称呼，最好听的是融合，最难听的是吞并。我经常说，德国人对待德国人的方式，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这很可能被看成一个国家在海外行为的风向标。在统一后的德国，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繁荣的西德将如何对待较贫穷的新来者？反之亦然。未来看起来既更明亮，又更黑暗，既更自由，又更不安全。西德担负起了主要的经济工作，例如，让那些庞大的国营企业和经营不善的工业联合企业私有化。在原先的西德，我在好几次不同场合中谈到了美国的经历，谈到了林肯在可怕的内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但是没有提及战后这种宽宏大量是如何被北方唯利是图的投机者和南方的敌对抵抗力量背叛的。

科尔总理继续在掩盖统一带来的巨额开支。最后，1993年3月，联邦议院采纳了一项被称为团结协定的法案，征收新的税收以支付东部的重建费用，并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将约7%的国民生产总值转移到东部

各州，其中大部分用于新的道路和电信网络等切实可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现代社会这些重要方面的创造并不能弥补由于拆除过时的、有时人浮于事的工厂而导致的大规模失业。

必须要拆除的还有很多，甚至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其公务员、教师和司法系统——都必须经过审查。但应该由谁来做，根据什么法律来做？人们该如何判断，或甚至找出那些出于某种原因会在勾结可怕的政权和有时又行为正派这两者之间交替变化的人呢？直到现在，不论是在东部还是在西部，每个人才开始了解斯塔西的恶行，其普遍的监控以及腐败的全部程度。真正有罪的又到底是谁呢？

我怀疑在20世纪50年代曾宽容对待有“褐色”历史的纳粹同谋的那些西德人会对有“红色”历史的人更加苛刻，而且我预计去斯塔西化将比去纳粹化要来得更加彻底。另外，有相当多的没有污点、有能力又没有任何恶意的西德人现在能够并且确实在东部各州担任一定职务。我关注着两位老朋友，库尔特·比登科普夫和伯恩哈德·沃格尔分别担任了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总理的新职，并成为受到热烈赞誉的元勋。但是，东德人抱怨被“殖民”和被剥削也并不奇怪，同时西德人则抱怨东德人的自怜自艾和忘恩负义。（正如一位东德聪敏人士所讽刺的那样：“如果有什么东西比被剥削更糟糕的话，那就不是被剥削了。”）在西德人逐渐称为清算（Abwicklung）的许多领域内都需要用上策略，清算是个官方术语（曾经被纳粹多次使用过），用来表示去结束一个过程。我问过一位朋友，他主持着一个西德评估东德学术机构和人员的委员会，为什么不邀请中立人士——一个瑞士人或奥地利人——来帮助进行裁定。西德当局甚至想都没有这样想过。

1993年6月，一个新的名为德美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我也是其成员，与科尔总理进行了一次会面。在长时间的讨论即将结束时，我碰巧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是我常谈的一个问题：已经如此糟糕的经济

问题是不是可能不会比心理问题更加容易解决？科尔的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回答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的：“只有蠢人才会认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他们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立刻记下了这句话，并且想到，如果他在公开场合也能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该多好啊！这是最需要的一个基调，但这种基调基本上不存在，就像没有人在道德-政治教育上做出任何努力一样。

令我感到心情黯然的是，在短短几年内，幻想破灭正在取代过高的期望。一些德国人打趣说他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虽然在“新的”州里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荒凉的小镇或社区已经焕然一新；新刷上的油漆给人的视觉和嗅觉是令人兴奋的），我开始意识到东德人正屈服于一种社会的反常状态，而这种反常状态总是归因于那些遭受过严酷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痛苦的人。所谓东德情节（Ostalgie）的最初迹象显现了，这是对结合紧密的、熟悉的、破旧的民主德国，对其社会保障网络的模范象征等产生的一种怀旧情绪，一个例子就是其备受吹捧的儿童保育中心（Kinderkrippen），还有非常慷慨地允许母亲成为劳动大军的一部分。老一代人开始清理他们对民主德国不好的记忆，并心怀感激地记住其“社会主义”生活的地域隐私、缓慢节奏和可预测性——在许多方面比美国化的西德生活更加有“德国味”。在柏林，新论坛的一位负责人对我叹了口气，说道：“难道我们没有为这个新国家带来任何东西吗？难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认可吗？”

赫尔穆特·施密特希望建立一个私人的无党派基金会，即德意志民族基金会，以便促进在一个一体化欧洲内部的德国国内的和解；最初他资助了这个项目，后来又争取到了别的基金会的资助。他邀请我加入这个新组织的理事会，理事会由来自东部和西部的德国人以及三个外国人组成，其执行委员会包括比登科普夫、马祖尔、莱玛·勒斯特和施密特本人。这个基金会在国家建设中有了发言权，决心不让民

族情感再次成为被激进右派利用的一种激情。它的工作教会了我很多。但它的存在也证明了还有德国统一未解决的问题。^[2]

即使在古老的民主国家中，眼睛盯着下一次选举的政客们也更喜欢恭维公众而不是去对公众指手画脚。例如，我对美国为论证在1989年的事件上美国的必胜信念时所援引的简单历史感到沮丧。在199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总统宣称：“凭着上帝的恩典，美国赢得了冷战……（我们）是地球上最善良的国家……世界把权力托付给我们……他们相信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边。”难道真的是这样？！我当时写道。美国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因此其领导人有能力来承认东欧人自己在推翻旧政权这件事情上有显著的重要性。即使是对美国的力量和角色在语言上的夸大，在道德上也是令人厌恶的，在政治上更是危险的。我没有忘记布什在1988年的竞选活动中对自由主义的诽谤，我对这种统治的政治风格也感到不安：一个里根主义的世界创造了针对美国的伟大的一种歪曲看法和一种释放出来的贪婪的做法——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将其称为“野蛮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sauvage）。

因此，我对1992年比尔·克林顿的当选感到高兴。当瑞士电视台在选举后的早晨邀请我从华盛顿发表评论时，我并没有掩饰自己对民主党获胜的兴奋。在镜头前（采访是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总部的楼顶上进行的），我指着我身后的白宫说道：“这又是我们的了！”我还有一个短暂的庆祝时刻。

几个星期后，我有了一次把克林顿介绍给德国听众的机会。约施卡·菲舍尔，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红绿联盟中的第一个绿党人士，邀请我去波恩参加正在进行的系列讲座“德国：下一步怎么走”，我的演讲将注重新德国的外交政策。我之前见过菲舍尔，发现他是个完全不因循守旧、非常聪明的人。演讲之前当我坐在我的酒店房间里再

次浏览潦草写下的笔记时，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短信，魏茨泽克总统也计划来参加讲座：对我来说准备工作是很困难的，而这个消息使我更加心生畏惧。

尽管如此，要强调我的主要观点还是很容易做到的，我的主要观点就是克林顿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将继续保持他前任的美德之间的特殊关系。我提到了美国对德国在海湾战争期间提供的技术支持以及德国在波黑的联合国蓝盔部队中的存在感到满意。在国内，我说道，克林顿将不得不处理他继承的各种赤字；我提到布什总统对新近强大的基督教宗教激进主义团体的关心，并解释了他向最高法院提名克拉伦斯·托马斯一事的重要性。但是我还提到了德美关系中较早的一个刺激性因素：1991年12月，科尔不顾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意愿做出了一个草率的决定，承认克罗地亚独立。许多人担心这一举动会导致波黑也同样宣布独立，那样就将引发塞尔维亚人的攻击并使巴尔干地区陷入战争。（就在波恩采取这一行动的几天后，我碰巧见到了赛勒斯·万斯——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当时正在帮助联合国努力通过谈判实现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他告诉我，当外交部长根舍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你错了，你错了！”来回应他的批评时，他感到非常震惊。）美国人也因仇外暴力的爆发而感到沮丧，特别是在“新”的州里，尽管他们也知道有人组织了沉默的游行来抗议这种暴力。随后的讨论涉及德国政治阶层的一个很好的横截面。当令人尊敬的魏茨泽克，纯粹作为一个公民来出席讲座，在未系领带、穿着运动鞋的部长和我的陪同下走出会场时，我心想，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德国！

1993年6月8日清晨，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打电话给我，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刚刚告诉他克林顿总统想任命霍尔布鲁克为驻德国大使，霍尔布鲁克希望我马上知道这一点。（他曾经被告知会派他去日本，因为亚洲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并且能胜任那里的外交官，但最后还是派沃尔特·蒙代尔去了东京。）霍尔布鲁克向我求助，他最迫

切的问题是德国人会如何对任命一名东亚专家到波恩做出回应。让他们放心是很容易的，我说，如果他们有任何疑虑，那么可以告诉他们，克林顿选择具有全球知识的大使是对德国新的全球重要性的认可。此外，大使的价值可以通过他与总统的亲近程度来衡量，而霍尔布鲁克曾经是克林顿的竞选顾问。第二天，政府发言人在宣布该任命时列举了这两个原因！

霍尔布鲁克第一次和我见面是196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时他离开国务院休假来该校的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而我则在高等研究院。我们共同的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外交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理查德·乌尔曼，他为我们做了介绍；我立即对这位热情洋溢、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二十九岁年轻人产生了好感。霍尔布鲁克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门，他想在负责任的岗位上寻找方式来为国家效劳；他想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他思考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但他的梦想太理想化了。在他的远大抱负之中，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交融在一起的。如此年轻，如此精力充沛，如此聪明，如此渴望，并且迫不及待！“切入正题！”可以作为他的座右铭。我的资历更老，但他看起来更聪明。我们很快就在越南战争不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他去过越南并参加了1968年约翰逊政府和北越之间的巴黎谈判），我们一起去见克拉克·克利福德，共同商讨结束越南噩梦的方法。

在普林斯顿进修一年后，理查德要求担任驻摩洛哥的美国和平队的主任。在他许多颇具吸引力的优点之中，他还是一名亲法人士，尽管持有某种怀疑态度，他还希望能去法语国家提供服务。（我被告知，当他要求这份工作时，国务院官员仔细地向他核实了他一帆风顺的经历：大学、外交部门、越南、巴黎的越南谈判、普林斯顿——所有这些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的。“年轻人，”他说，“如果你想保持这种势头，就要悠着点。”）1970年圣诞节期间，我和我的家人去摩

洛哥看望了他。在那里，我看到在志愿者面前他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指导者。这个职位给人一种地方总督的感觉，或许这仅是我的想象：我一直对最后一位法国驻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的伟大的总督赫伯特·利奥泰元帅非常着迷。我注视着理查德后来的职业生涯：担任《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成了金融界的一个成功的新手，又担任卡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然后又回到了金融界。（能轻易地进出政府机构仍然是美国政治中一个显著的有时也是腐败的方面。）我们经常见到对方并相互交换著作和手稿。

在他打来电话几天后，霍尔布鲁克带着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再次打来电话：我应该和他一起去波恩，担任大使馆的“高级顾问”。我惊呆了，但非常高兴。抓住这个机会去我的祖籍国为美国政府服务？去了解外交工作的实际行为，并活跃于一个不同的世界之中？我对一位朋友说，这就像拥有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经历却没有经历过战争，而且是在职业生涯快结束的时候。但我咨询了有经验的朋友以便最后确定，曾经两次在巴黎大使馆工作的杰出的法国历史学家戈登·赖特爽快地总结道：“对美国有利，对德国有利，对你也有利。”刚刚因美国在南斯拉夫战争中的被动政策而从外交部门辞职的沃伦·齐默尔曼也给予了同样的鼓舞。但两人都警告说，使馆工作人员会把我——一个具有知识并与大使有特殊接触的侵入者——看成一个讨人嫌的人。德国的朋友们，特别是比登科普夫和伯恩哈德·沃格尔，都对此充满热情。

在实现这一令人兴奋的前景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负担，清除这些障碍只能由霍尔布鲁克亲自出马。霍尔布鲁克在国务院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他向官僚机构提出了某种前所未有的因此也不合情理的要求。我记得这个要求就是我会收到正式的住房和每日津贴，但不会出现在正式的工资单上。我还需要哥伦比亚大学批准一个学期的假期，霍尔布鲁克前去会见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乔治·鲁普，征求校长的

同意，他后来称之为“租借卓越教授的计划”。（不久他必须再来一趟，因为出任印度大使的弗兰克·威斯纳想遵循霍尔布鲁克-斯特恩的先例，聘请我的同事安斯利·恩布里担任他的顾问。）我还必须要通过忠诚调查。我被批准列入“达到并包括秘密在内的级别”。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其他麻烦事：当基辛格告诉他，一名基民盟的工作人员曾经警告他我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时，霍尔布鲁克感到有点不安。一位渴望得到这项任命的美国同事在一份全国性报纸上恶意地提出了与此相同的观点。然后，过了几天，基辛格告诉我，科尔对我的到来感到“欣喜若狂”，他自己也变得非常热心相助，最终他还告诉我其实整件事情都是出自他的想法。

一开始，我不得不在办公室的问题上做出选择，或者是要一间大的办公室，与大使的套房在同一楼层，或者是要一间小的办公室，就在大使的套房内。我选择了后者，结果证明选择这个办公室是非常正确的，此处也是极其有趣的。我谢绝了住在莱茵河边大使住宅的提议，尽管事实上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时间；我觉得霍尔布鲁克和我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我们两个人保留一些隐私。因此，我被安置在“小美国”的一套小公寓里，这块战后初期发展起来的美国殖民地地位于普利特斯多夫，既属于波恩郊区，又相对独立，有商店、一所学校、一个社交中心和一座教堂。伊丽莎白帮我搬了进来，然后不得不返回纽约去接受一份新工作；我设法由我自己来处理一切，虽然有时候有点孤独。普利特斯多夫脱离了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这使得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人过于依赖他们自己。位于巴特戈德堡的大使馆本身距离波恩就很远，在莱茵河上游几英里处，与住宅同在一栋巨大的综合楼里面，这座大楼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美国占领军总部建造的。我很快就发现了在大使馆和普利特斯多夫的公寓之间有一条美妙的小路，挨着繁忙的河边；每天来回走在这条路上是我外交旅居生活中最快乐的经历之一。

驻波恩大使馆是美国在欧洲最大的大使馆，成为其工作人员，无论多么短暂，无论级别多么含糊不清，都使我内心充满愉悦。也许这是第二次归化行为吗？这么快地被接受，然后属于这支美国的团队，这是一种多么伟大又神奇的感觉——即使在某些时候我的特殊身份也会被人排斥；而且能够代表美国——这个提供了马歇尔计划和实施了柏林空运的国家——是一种自豪的来源。在德国，人们仍然非常感激麦克洛伊和艾奇逊。另外，还有那么多工作有待完成！

霍尔布鲁克马上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不仅做好了领导大使馆的准备，而且要逐步了解德国政坛及其关键角色，以尽可能多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方面代表美国的利益。他给他的德国对话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詹姆斯·科南特时代或20世纪70年代亚瑟·伯恩斯时代以来，他们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如此有活力、知识如此渊博的大使。理查德几乎马不停蹄地与德国官员以及商界和媒体高层人士会面，与无数团体交谈，做着各种事情。我很喜欢看着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做出估计。他对德国生活中的一些僵化现象感到震惊，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他认为其经济受到太多限制性规则的阻滞。例如，私下里，他不厌其烦地嘲笑德国商店必须过早打烊的规定，这对于那些同时也是购物者的劳动人民来说极其不便，不论这些规定如何保护了商店员工。我把德国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告诉了他，其中包括具有社会保护和商业保护主义的特征。

从一开始霍尔布鲁克就意识到美国在德国的实际存在将永久性地萎缩。美国兵以及他们的家属在原先的联邦共和国很受欢迎，并且在几十年中一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因此商定的裁减美国军队以及从柏林完全撤出美军将留下巨大的真空。1990年，美国在德国的军力为24.7万人；到1994年底，这一数量将降至8.3万人。与此同时，国会也要求削减外交存在。出于这些原因，霍尔布鲁克尽一切努力加强两国之间的非政府关系。（抵达波恩后不久，没带妻子、没带

家人的他介绍了一个秘密武器——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出生在汉堡一个富裕的“非雅利安人”家庭，在20世纪30年代初移居海外。战后她经常前往欧洲旅行，但从未返回过德国。现在她回来了，德国人接受了她，她的存在凸显了霍尔布鲁克与这个地方的联系，就像在他住处显眼地展示的身穿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军服的祖父的照片一样。）

在这个即时通信的时代，大使的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着重于外交上，现在更多的是要去建立这些非政府联系，并为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塑造正面的形象。理查德在这两方面都非常擅长，我可以为他的努力提供帮助，把他介绍给德国公共生活和商业界以及学术界的朋友和熟人。或许我们是奇特的一对：他对媒体有充分的意识，而我对拍照机会和仪式场合的印象不深。但我们以不间断的速度愉快地在一起工作。

我在途中或远处见到过许多我们的大使馆，但我之前没有意识到大使馆是一个巨大的合成物，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不仅包括政治部门、经济部门和行政部门，当时还有美国新闻署和其他机构，每个部门都有很大的一套班子，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此外还有所谓的以“站”为名的单位，即情报小组。

霍尔布鲁克管理着一支效率很高的团队。他以一种能激发大家兴趣的方式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如果他在城里的话）。他的自信充满感染力，光芒四射，偶尔给使馆工作带来轻松愉悦的气氛。每个部门负责人都要就当务之急的问题做汇报，一直在逼视着的霍尔布鲁克很快就会提出表彰或斥责，有时是有效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你们关于萨克森州初选电报很好，但是你们在机场迎接X参议员时迟到了，这是不允许的，绝不能再发生。”

他想让工作人员形成更好的风气，想让外交人员队伍中的精英能做得更多更好，然而他倾向于无视一些落后者，私下里会嘲笑他们“没脑子”。他刚上任时，使馆政务工作人员给了他一份过分复杂的书面简报，开头是这么写的：“变革是你开始担任大使时最能体现德国及其政治特征的一个词。”他给这份文件加了用词尖锐的旁注，然后去寻找他可以找到的最聪明的人——活跃、精力充沛、有能力——告诉他更多情况。可以说他是一位有魅力的人，善于鼓动，抑或简单甚至粗暴，但他总是在关注实质问题和国家利益，关注着华盛顿及其政治。他坚持追求完美，但不以恐惧为治理手段；他不会无故乱发脾气。但只有傻瓜才注意不到他对你的看法：他不喜欢去容忍傻瓜。

我不得不边干边学，同时要试图避免重大失礼。霍尔布鲁克优秀的副手罗斯玛丽·鲍利常常让我了解在日常计划和目标上做出的频繁、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变化。大使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迟到的习惯，因此在期待中总会有一定程度的紧张——尽管在会议间隙，他知道如何在他的大办公室里放松自己：脱下鞋子，脚搁在桌上，耳边听着电话，眼睛看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同时在没完没了的电话之间提供加了些笑料的有关世界历史的反思。他非常擅长判断人，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错得离谱。当然，他非常关注总理科尔的办公室，那是政府决策的所在地，对于外交部则过分忽视。因为他紧盯着科尔本人，德国外交部不免有些介意；即使在波恩，霍尔布鲁克也不乏批评者。

在大使馆内，他有最青睐的人。“行政”官员唐纳德·海斯是一位寡言少语的魔术师，他可以处理任何物流和维护问题；他不得不在国会强加的严格削减成本的情况下开展业务，而这正是在大使馆计划迁址柏林的时候，耗资必然巨大。国会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应该支付这笔迁馆费——毕竟是我们帮助这个国家实现了统一。此外，海斯还负责劝说德国人为我们将要关闭的基地支付“附加值”，换言之，

他们要为我们即将放弃的安装在基地里的改进设备提供补偿。海斯能以相等的、高效的冷静去处理微妙的国家问题以及人力物力损耗这类难以对付的问题。

使馆里还有一个理查德特别关注的人，名叫米尔顿·比尔登，他的那张神秘的面孔和女巫般的言论令我着迷，即使在我知道他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之前。他的官方头衔是地区事务办公室参赞。他在给我的告别礼物上附了一张卡片，上面印有“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协调员和顾问敬赠”。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那个站的站长，就是大使馆内中情局的负责人。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特工，最近负责美国武装阿富汗人与苏联进行斗争。在波恩一年多的时间里，比尔登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张重要的联系网，其中一人是科尔情报部门一个派头十足的负责人，名叫贝恩德·施密德鲍尔，还有他的助手鲁道夫·多尔泽。（施密德鲍尔曾经是个生态学家，现在负责指挥广泛的情报活动，特别是在中东地区，他与伊朗情报部门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尔登非常精明，眼光敏锐，看上去很低调，有一位迷人的法国妻子。在我来到波恩的第一个星期里，有次晚餐时他告诉我斯塔西是如何从一开始就渗透进西德情报部门的；他认为德国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他的意思是德国在国际事务中还不是一个全面参与者。此后不久，霍尔布鲁克和我有一次在比尔登的住所共进午餐——我记得，他住得非常远。我是一个新手，渴望学习；每个人都知道中情局有着巨大且往往是邪恶的力量，但我收集了以前我不知道的实际细节。

我和站长谈论了德国的前景，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会议。我很感谢比尔登在我写这些回忆时和我进行的对话。当时，我不知道在霍尔布鲁克任职开始时，科尔非常生气，因为他想象到的是克林顿的手下正在手把手地教下次选举中他最可能的对手，例如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总理鲁道夫·沙尔平。认为反对派的竞选活动出自美国大使官邸的

这种偏执的观念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科尔的忧虑被传达给了比尔登，比尔登又转而向霍尔布鲁克提出了告诫，他建议霍尔布鲁克陪同德国总理对美国进行一次私人访问，去芝加哥观看世界杯比赛。与此同时，我与比登科普夫进行了一次对话，谈话中他高度评价了沙尔平，此人“打算告诉选民这个国家需要变革，这是一种有意识地模仿比尔·克林顿竞选的策略”。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联系是多么重要，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介入又是多么巨大呀！

围绕大使馆的事务，我扮演了一个多用途的角色。美国和德国的媒体暗示“那位常驻的历史学家”是在“提供有关过去历史的私人课程，以帮助霍尔布鲁克去读懂未来……（斯特恩的）人字斜纹软呢夹克和一头杂乱的白发，在大使馆走廊上衣着齐整的年轻外交官中特别显眼”。（这就是《纽约时报》对此事的看法。）在我们第一次“国家队”会议上，霍尔布鲁克把我介绍给了使馆工作人员，并且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征求了我的意见。幸运的是，之前的星期天，有个“文化”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其中具有隐藏的政治意义，尽管这个事件通常不会被那样解释。

这件事与选举魏茨泽克总统的继任者有关，他的任期将于1994年结束；科尔曾经提名史蒂芬·海特曼，他是东德基民盟的一位成员，因此显然是理想的候选人。但后来发现，海特曼来自一个不同的、原始民族主义的、反女权主义的世界。据说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来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教训。”那个星期天，我看了一场电视转播的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仪式。仪式上，弗里德里希·肖莱马——东德的一名牧师，因支持和平运动以及他咒语般的“铸剑为犁”的号召而闻名——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肖莱马以雄辩的坦率谈到了德国的过去，回顾了奥斯威辛，并就德国的现状发表了见解，同时希望允许东德人保留他们社会中的一些好的方面。我认为他的演讲是对海特曼的含蓄回应，我想，海特曼的候选资格已经完蛋

了。（最终，一位真正的自由-保守党派人士——罗曼·赫尔佐克，前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官，成为魏茨泽克的继任者。）

在后来的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我谨慎地做出了进一步的政治预测：如果1994年的议会选举没有产生明显的多数，那么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的联盟——在基民盟的议会领袖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领导下，我认为，因为社民党将同朔伊布勒这么一个强大的、才智超群的对对手合作，而不会与科尔合作。这些都是基于我听到过的随意的评论或几乎未被人注意过的事件所做出的猜测。我会坐在大使旁边发表这样的看法，大使也经常求助于我，就一些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征求我的意见。但更为常见的是，理查德会在私下向我请教。

刚刚进入10月，霍尔布鲁克就很快意识到科尔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约阿希姆·比特利希是一个关键联系人，他计划和此人一同前往莱比锡，参加纪念1813年10月“民族大会战”的一场特殊盛典，在这场战役中联军战胜了从莫斯科撤退途中的拿破仑的军队。这件事无关紧要，我大声提出质疑，一位新任驻德国大使去参加一个庆祝法国遭受决定性失败的庆典是不明智的，更重要的是，我提醒霍尔布鲁克不要去莱比锡这座东德的英雄城（Heldenstadt），以避免正式向这座城市在解放东方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敬意。他做到了。（比特利希的妻子是个法国人，因此他被认为更接近于法国立场而不是美国立场，所以霍尔布鲁克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偶尔也有一些重要的令人忧虑不安的事件，有一些我被卷入其中，还有一些我只是听说过。在我最初到任的那几天里突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柏林文献中心今后的命运，这是美国储存纳粹党成员个人档案的仓库——大约有1100万份！是盟军在1945年4月缴获的，这些文档为纽伦堡审判提供了重要信息。联邦议院曾大声疾呼要求将这个纳粹历史上独特的宝库归还到德国人手中，美国更是觉得有必要同意这么

做，因为大规模的盗窃行为就在美国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些档案显然包含仍然活跃在公共生活中的德国人的潜在爆炸性材料。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双方达成了转让协议，霍尔布鲁克希望我对这份协议进行审查——我后来发现，这正是最初令使馆政治处感到烦恼的事。

放弃这样一个宝库，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自然感到非常沮丧——数百万页啊！此外，我也对众所周知的德国档案馆的习惯持怀疑态度，他们总会找出一些理由（例如“隐私”限制）来推迟或妨碍获取敏感材料。尽管如此，该协议草案还是预想到了由美国来制作并保存所有文件的副本（尽管有些原件有不可复制的重要标记）。我敦促德国人应该遵循美国用户友好查阅政策，但在最后阶段很难再引入一些新的细小的条款，更不用说重新谈判了。后来，柏林文献中心主任大卫·马维尔带我参观了用来储存这些文件的巨大的建筑群，此地最初只是一栋楼，在戈林控制下用作监听中心。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珍贵的收藏品，我还看到人们在这个地方嗡嗡作响地拍摄缩微文档。

我当时不知道只是最近才得知的是，美国也可以获得涉及潜入西德的斯塔西特工的斯塔西文档，这些材料曾经掌握在苏联人手中，但如何又到了美国人手中这点并没有披露出来。关于这批材料的故事有个德国代号，叫作“Rosenholz”（红木），并且有个相同名称的网站可提供进一步的信息。与德国情报部门分享这些材料，美国人可以帮助识别前斯塔西特工，但科尔很担心美国会扣留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很可能在他指控像沙尔平这样的潜在对手时发挥作用。

我不断地与使馆所有部门保持着联系，当时我还告诉我的同事们，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在原先东德的存在，四十年来，反美主义在那里一直是教育和党的正统说教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官似乎意识缓慢，不能及时发现需要在那里做些什么，我则抓住一切机会去原先的东德做演讲和采访。我的演讲主要涉及德国的过去和美国的现在。

11月8日至9日在莱比锡，即柏林墙倒塌五周年之际，我受邀参加在尼古拉教堂举行的纪念“水晶之夜”的和平祈祷仪式。在祷告仪式结束后，先是烛光游行至原先的犹太教堂遗址，随后在圣多马教堂有一个纪念仪式，伴奏的是莱比锡的犹太教堂唱诗班。在那个犹太教堂，我们遇到了一群愤怒的“反法西斯”年轻人，不知为何他们试图给我们的游行打上亲法西斯的标记。晚餐的地点是在奥尔巴赫-凯勒，这是《浮士德》中狂欢的地方。过去和现在的印象扑朔迷离，如同万花筒一般！而这一切又恰逢我父亲的忌日。

现任图林根州总理的伯恩哈德·沃格尔邀请我为州总理府落成典礼主持一个系列讲座，这是坐落在首府爱尔福特的一栋巴洛克风格杰作，系列讲座的题目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从内部看德国”。爱尔福特是一座历史悠久、美妙绝伦的城市，我参观了马丁·路德曾经研习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见到了路德住过的小房间和修道院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我偶然发现了一些19世纪反犹太人的小册子（以及路德到罗马朝圣的一幅路线示意图，通过隆亨山口和卡斯塔塞格纳穿越阿尔卑斯山，这就是伊丽莎白和我最近走过的那条路线，以西尔斯·玛利亚为起点，这条路线是相当容易的）。我还去了波罗的海的旧港口罗斯托克，苏联人在那里修建的一些墙仍然阻挡住了城市通向大海的一些通道。对于我的每次访问，美国新闻署的当地办事处都会为我做好安排，行程都很紧凑，但许多非正式的联系使这一切非常值得。这是一个我为自己而学习同时又帮助他人“抛弃以前想法”的机会。

令人难忘的是对波茨坦当代历史研究中心的一次仓促的访问，我的朋友于尔根·科卡邀请我与他在那里的合作者进行一次非正式的交谈。该中心在财务上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任何外界的认可都可能会有所帮助。对于这次私下的会面，科卡期待着就第三帝国和东德做出一些即兴的反思，能含蓄地提出这两者之间令人困惑的比较，因为这个话题仍然不够成熟，所以往往会被避开不谈。抵达后，我发现了一群

优秀的学者和前民主德国的公民，包括延斯·赖希、弗里茨·克莱因和约阿希姆·高克在内，这个阵容与我所期待的完全不同。

我概述了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强调尽管国家社会主义确实深深地扎根于德国历史之中，但民主德国也不仅仅是外国强加的，在德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和魏玛的历史中也能找到它的根源。我知道东德人坚持认为他们的政权不必为发动战争或种族灭绝屠杀负责，这是正确的。此外，伴随私下的抱怨，还有许多人将公共设施与私人空间混为一谈——也许这是人类团结的行为。但是民主德国只能在第三帝国造成的后果上加以解释；没有苏联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一个德国的共产党政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大声地表示担心，斯塔西档案（现在高克是其官方管理人）会被偶尔且往往是非法地用于政治目的。高克确信所有斯塔西的合作者必须被追捕并受到起诉；他激烈地反对亚当·米奇尼克给波兰的建议——大赦，而不是失忆——这是玛丽恩所青睐的，而且我也能理解。

（高克后来来到纽约拜访过我一次，并把玛丽恩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称为“敌人”。）他激烈地辩解道，那些前共产党邻国羡慕德国人，因为德国人保留了档案可以识别那些有罪的人。

然后，当我突然想到问一下大家“作为一种诱惑的早期民主德国”这种提法是否有意义，就像我曾经提到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样，这下子把大家的火气全激发出来了。许多参会者纷纷谴责这一想法，并坚持认为东德政权一直被视为一个外国的毒瘤。还有一些人愤怒地逼问：为什么只提早期的民主德国？还有人一直相信平等主义的最终目标——一个公正的社会，对他们来说，诱惑就是相信这个遥远的目标需要做出当下的牺牲。我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在东德人和西德人的心目中是多么深刻、多么活跃，每一方都持相反的意见。我能够理

解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诱惑而堕落，但我的立场很明确：一个独裁统治就足够了。

在类似这样的场合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的讲话都是以历史学家或政治评论者的身份，丝毫没有外交官的幌子。我的基本文本是相同的，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我会给它不同的侧重点。我担心的是德国内部统一的进展，我看到了一些我对西方监护的担忧得到了证实，尤其是东部的失业率至少是西部的两倍。科尔承诺的那些“鲜花盛开的美景”在哪里呢？我表达了希望和担忧。德国的“第二次机会”的成败取决于相互理解和接纳，取决于内部和解的程度。

有时，霍尔布鲁克会指派我作为一名付诸行动的历史学家去参加一场“专场演出”。10月，来自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的一个大型代表团访问了德国，我相信这是第一次。（大使馆正在监督一项德国法律草案，该法律涉及归还原先因纳粹迫害而失去的东德的财产。犹太人对德国物质索赔联合会制定的草案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有根据的反对意见，并且进行游说以便做出改动。）在柏林他们举行的宴会上，我谈到有必要了解德国犹太人处于各种复杂矛盾心理状态的过去，在希特勒之前的年代里，他们有着丰富的创造力，那时德国犹太人在文化歧视的背景下仍然被允许在众多领域中脱颖而出；去阻碍德国目前正在做出的接受其各种过去的努力，这不符合美国或犹太人的利益。

然而，那些主要的发言者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他们紧紧抓住新纳粹分子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危险不放，他们的主题是“我们不会默不作声”。好吧！就让他们在那天晚上或其他场合不去默不作声吧！他们似乎在极其简单化地对德国的过去和现在妄加评论。我在日记中写下了“道德上的傲慢”这几个字。我担心我的反应也许反映了某种德国犹太人的屈从，对愤怒的德国非犹太人的危险的恐惧，抑或是对美国犹太人的立场是否会适得其反的合理担忧。几天后，我就

此与以赛亚·伯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也对官方的美国犹太人在德国的行为感到遗憾。在接下来的一个场合中，我问霍尔布鲁克，他是否能向这些官方团体建议，只是出于开明的自身利益，请他们采取更多的保留或得体的态度；他即刻果断地驳回了我的要求。私下里，我很想知道，在某些方面与德国人早期对想象出来的犹太人力量所怀的偏执的反犹太主义恐惧相关的大屠杀，最终是否通过赋予犹太人更大的道德权威和对批评的暂时豁免反而增强了犹太人的力量。

无论德国国内问题是如何引人入胜，我还必须评估德国人是如何在国际上运作的。把联邦国防军这支西欧最强大的军队用在“区域外”的行动中是受到宪法限制的，但在1994年，联邦宪法法院放宽了这些禁令，然后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德国军队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并且实施了在波黑上空的监视飞行。德国未来会以什么方式参与北约军事活动呢？作为一位深信不疑的欧洲人，科尔明白，努力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欧洲联盟可以平息由德国统一引起的恐慌。但是德国也有义务保护新解放的东欧国家，在它们寻求加入西方阵营时，充当它们事实上的协调者。科尔也是一位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而且和他的前任一样，必须以他基本上亲美的观点来平衡他的欧洲义务。他当之无愧地赢得了所有伙伴的尊重。

在大使馆内，我正在学习很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中有时会突然爆发的问题，而且我是在边干边学，每天都在把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有一次，当德国官员接待伊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时，美国和英国都非常生气，但德国人坚持认为维持与伊朗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以色列的一名士兵获释。对伊朗的政策是一个间歇性的争议点。

霍尔布鲁克和当时的副国务卿、拥有俄罗斯专业知识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在筹划另一个第一次——在波恩举行一次美、德、俄三方会议，旨在加强美、德在对俄罗斯和鲍里斯·叶利钦新政府的政策上

的协调。11月，塔尔博特来到波恩会见了比特利希和一个强大的德国代表团，以及俄罗斯副外长。在霍尔布鲁克的晚宴上，我对原先的敌人和原先的盟友可以摒弃前嫌握手言和表示庆贺：这是新时代的承诺。（我不认为这一倡议在霍尔布鲁克于1994年夏天离开时能幸存下来。）在那个场合以及后来的其他场合，我都强烈支持塔尔博特的观点，即那些因位于德国和俄罗斯之间而在地理位置上受到惩罚的国家需要得到特别的保护，即使一开始冒着俄罗斯反对的风险。美国已经与几个东欧国家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但我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华丽辞藻，对俄罗斯来说无论多么令其不悦，北约的成员资格都必须是最最终的解决方案。

北约东扩成为一个更加紧迫也更有争议的问题。塔尔博特承认“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来自学术界、新闻界和外交政策智库的人都反对”它。在我从波恩返回几年后的1996年10月，塔尔博特到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在之后的晚宴上，北约东扩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争论，尽管他在正式讲话中仅略微提及。当时已九十二岁的俄罗斯问题分析家乔治·凯南称克林顿的北约东扩计划是一个“潜在的空前巨大的战略失误”。其他人都加入了同一边，正如塔尔博特所回忆的那样：“只有一个参与者表示赞成……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这唯一的支持者其研究领域是中欧而不是苏联。此人就是弗里茨·斯特恩……为什么，他问道，波兰人、捷克人及匈牙利人就不应该和俄罗斯人一样得到安全和考虑，特别是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担心受到俄罗斯攻击而不是相反？”1997年1月，塔尔博特见到了科尔，他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相反，“科尔自己的版本……则从一个简单的对公平的要求开始……实际上，就是弗里茨·斯特恩在11月提出的论点”。

从不羞于打破习俗的霍尔布鲁克有了另一个想法：美国驻巴黎和波恩的大使馆应该有更紧密的联系。为此他设计了让一些驻波恩的大

使馆高级官员首次拜访他们的巴黎同行。（因为他的朋友帕梅拉·哈里曼在巴黎担任大使，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容易了。有一次理查德在解释德国的立场时，帕梅拉插话道：“你还没入乡随俗呢，迪克？”这真是一个频繁常见的专业变体词。）

在两个使馆的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开始时，我应该回顾一下当前的法德关系。一些美国外交官认为波恩-巴黎轴心过于接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但我认为恰恰相反，这表明经过几个世纪的间歇性敌意之后，1945年后的法德和解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我提到托马斯·尼佩代所著的权威的现代德国史，其开篇就是：“起初是拿破仑。”（比尔登后来告诉我，他经常引用这句话。）实际上，我是从黎塞留的国家至上（raison d'État）原则开始的，该原则建立了一个非宗教、非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的法国传统。然后我概述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的统治地位，从黎塞留时代到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出现的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国。我建议，只有牢记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恐怖记录，才能评估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德协约的巨大成就。虽然大多数使馆工作人员可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科尔和密特朗之间最近一次会晤的内容，但他们是很宽容的，甚至是很专心的，并且最后还不断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法德和解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但此处的环境对我来说很新奇：我还不习惯以雷诺阿和塞尚的画作为背景。霍尔布鲁克和我住在圣奥诺雷市郊路的大使官邸，即老罗斯柴尔德宫。在那个寒冷、灰蒙蒙的11月的周末，我感觉“宾至如归”，毕竟我已经同罗斯柴尔德家族打了多年交道！

然后，还有一个第一次：霍尔布鲁克在他位于波恩的住所安排了一次晚宴，并邀请了德国总理，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那天晚上，科尔占了主导地位（唯一胆敢打断他说话的人是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汉斯·蒂特迈耶），而作为贵宾的亨利·基辛格却非同寻常的少言寡语。科尔非常和蔼可亲、豪爽健谈，偶尔会提供揭示性的旁白——和蔼可

亲但不愿与人交往，相当轻视人，有明确的信念，那就是你永远不能指望人们会心存感激，偶尔还会做出粗鲁的性暗示。（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应科斯的命令，比特利希曾敦促把我从客人名单中剔除出去，大概是因为我对他做了一些批评性评论，尽管不是在我的大使馆之旅中。霍尔布鲁克拒绝了。）

出席晚宴的还有美国驻欧洲部队副司令查尔斯·博伊德将军和联邦国防军参谋长克劳斯·瑙曼将军，两人非同寻常：博伊德曾经是多年的越南战俘，全身散发着深厚的个人威严；而瑙曼是一个钢铁般的、聪明的、坦率的军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身穿制服的公民的缩影。

就像在波恩（以及在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那样，那天晚上的一个小插曲导致了一场完全不同的冒险。瑙曼将军在晚餐时递给我一张纸条，提醒我，我们曾经有过一次谈话，涉及他为纪念7月20日反希特勒政变五十周年筹办的一次展览，“如果您能帮助我们打开美国的大门，我将不胜感激”，他写道。几天后，我去国防部拜会了他（即使政府搬迁到柏林之后，波恩附近的大部分设施仍然留在那里，因为这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微笑着说他原本可以请他的朋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的，但考虑到沙利卡什维利有乌克兰背景，我可能是更好的中间人了。非常有趣！无论如何，我想助一臂之力，我认为由联邦国防军出面来纪念那些不惜违背誓言而试图拯救他们国家的人是合适的。这个展览地点位于班德勒大街上，就在施陶芬贝格和其他人被处决的地方，1954年我也曾经到那里参加纪念他们的仪式。我非常高兴能与瑙曼一起合作来安排在美国的展出，我的参与加深了我与这个标志性事件的关系，多年来这对我一直意义重大。^[3]瑙曼与我也建立了一种温馨的私人关系。

在波恩这段充满风风雨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自1938年离开以来，我在德国度过的最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非常充实，不论是在大使馆内外，在我的办公室和路上，抑或与理查德一起或独自一人。我觉得我似乎生活在我的两个国家里，并试图将它们连在一起，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我的脑海里。我喜欢我的双重角色。而且去同他人建立联系也是非常有用的，这些人后来作为朋友在美国与我重逢。例如，沃尔夫冈·伊申格尔，当时的外交部政治主任，他博学又富有同情心，还是我认识的唯一持有滑雪教练证的外交官。（后来他成为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还有一位外交官迪特尔·卡斯特鲁普，我是在一次外交官的晚宴上认识他的，那次晚宴既特别又有代表性。卡尔·杜伊斯伯格——科尔在两德关系方面的特别助理，同时也是我的老朋友——当时邀请了我和他在外交部的一些同事。在餐桌上的谈话暂停期间，卡斯特鲁普以一种我感觉略带挑衅和讽刺的语气尖锐地向我提问：“你在大使馆究竟做些什么？”我惊讶地回答道：“我告诉他们你们（德国人）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可能是什么。”在那次交锋之后，卡斯特鲁普和我成了关系密切的熟人，当他后来成为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我们经常在纽约见面。他是一位非常敏锐、令人印象深刻的观察者，他在帮助其失明的妻子时所表现出来的低调的优雅在我第一次与他们相遇时就深受触动。

我也逐渐认识了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并且我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在同他们的谈话中，他们会穿插一些历史类比来鼓励我谈论德国历史。因此，在那短暂的几个月里，我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每一个场合都略有不同，但所有这些场合充满生气。我有时觉得我要把这些愉快的场合都归因于我高估了我在大使馆的作用以及我对德国的了解，但是我很享受这些。

每当我想起我的老的还有新的德国熟人时，比如伊申格尔，我都会用英语称他们为“朋友”。但在德语中，这是冒昧的和误导性的。

美国人更容易迅速地将陌生人转变成朋友。在德语中则有许多不同层次，当你说起一个亲近的熟人时，德语是“ein guter Bekannter”，这比朋友要远一些，然后你才能说“mein Freund”（我的朋友），虽然现在直呼其名变得更加容易了。我对这两种习俗驾轻就熟：美国人更善于为一个自由政体服务，而德国人则喜欢表达一定的深度并为人类喜剧增添一个额外的音符。

德国人的亲密关系可以在日常交往中体现出进一步的差异，同一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用第二人称单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改用非正式的“du”（你）。伯爵夫人和我是多年的朋友，我们相互直呼名字，然后有一天她建议道：“为什么我们不用‘du’呢？”一旦挑明了并且为此碰了杯，感觉就很自然了。现在这种熟悉的模式在年轻的德国朋友中出现得更加频繁。（德国人也有或者曾经有与朋友“断交”的习俗，通过拒绝握手来表现友谊的终结。而德国人对友谊的崇拜，其热情洋溢的表述，很容易沦落为多愁善感。）

但无论习俗或语言如何不同，友谊都是巨大的财富。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考虑将他撰写的一本有关和他关系密切的人的书取名为《友谊》，但他还是选择了《同伴》这个名字。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自己关于友谊的想法包含其中，他认为友谊的一个标准就是诚实和真实，这是每个朋友都必须拥有的一种感觉，借此他可以信赖对方，从而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施密特在2004年1月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署上了“你的朋友”。

在差不多忙碌了五个月之后，我离开了大使馆（尽管已经做出安排，我与他们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还零星地保持着），霍尔布鲁克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晚会。几天前，魏茨泽克总统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致意：“你不受欢迎了……因为你要离开了！”——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表述。理查德在评价我的时候不吝赞美之词，作为回报，我

也表达了我的衷心感谢。在此种场合特有的高昂情绪中，特别是霍尔布鲁克也在场，我说道，我对这些出色的使馆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愿望：“如果总务主任唐·海斯能够每周切断大使的电话线路半小时，那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他们哄然大笑起来。米尔顿·比尔登给了我一个信封，并指示我回家之后才能打开，他的礼物是一份（已解密的）报告，是1955年7月情报研究办公室写的，涉及的问题是一个“重新统一的中立的德国”。他还写了一行话：“几乎快四十年了，但读起来很有趣。最诚挚的问候。”

在一次从大使馆单独步行回到公寓的路上，我沿着莱茵河边上的小路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河的对岸是七岭山脉连绵起伏的山峰（历史悠久的彼得斯贝格坐落在其中，现在那里是政府的宾馆）。莱茵河——如此生机勃勃，如此平静——河面上各个欧洲国家的驳船和轮船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突然一阵深深的满足感充斥我的全身：这就是德国的景色，宁静而美丽，我的父母曾经属于它。我以前从未感受过这种情景交融的满足感，现在看来我似乎能更好地了解我的父母了。我能感觉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失落，也许这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在短暂的一瞬间，我在这里代替了他们，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飞进了他们的世界。海涅的诗《罗蕾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首美丽的德国抒情诗即使是纳粹也无法将其抹去，从而不得不宣称其犹太作家为“佚名”。

不知道是什么困扰着我，
是什么整天让我心情难过，
一个古老的故事让我困惑，
一个咒语令我无法解脱。

在那个奇怪的兴高采烈的时刻，历史上许许多多不同的侧面全在我脑海中涌现。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待在德国是多么的特别，我的生命的两个部分在这里融合为一。它标志着和解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表面也在我内心深处。

在大使馆的生活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经历，它还表明历史学家在实际生活中也能发挥作用。但是经过四个月的奔波生活后，我很高兴又回到了“常态”，回到了纽约的生活中去，这个生活因伊丽莎白而变得格外丰富多彩——她曾经数次来到波恩并通过频繁的电话追踪那里的事态进展。然后我又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回到了这个经常惹人生气但那么多年我一直视为家的地方，而且对此地我感到既十分感激又负有责任。

也许可以凭借哥伦比亚大学出现麻烦（麻烦还不少）时我出于本能的出手相助来衡量我对它的依恋程度。多年来，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似乎变得更大了，不那么以学院为主了。但教学是我的使命、我的事业，也是一条指定的学习途径：在我为赶上我的专业进展和我的学生所做的努力中，除了马不停蹄之外，也充满欢欣鼓舞。

尽管如此，1996年，在我七十岁的时候，我决定要退休了。美国的大学已被迫放弃强制退休这一古老的习俗，我知道有人在担心，某些教授会永远坚持下去，这对年轻一代不利。我不想树立一个坏的典型——五十年的教学已经足够了。（事实上，我继续从教直到1998年初。）我肯定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介绍了现代欧洲史，即便到现在我还会遇到一些陌生人告诉我他们很久以前是我的学生。而帮助研究生应对威廉·詹姆斯所谓的章鱼博士学位对我来说更是具有特殊的、往往是很有回报的重要意义；我的许多研究生继续从事受人尊重的工作。

作，其中还有许多同我保持着朋友关系，这反过来也给了我各种帮助和支持。

在我最后给学生上德国历史这门课的时候，有一次我是这样开始讲课的，“原本就没有‘德国’史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煽动性的方式，用来坚持认为德国人的历史只能作为欧洲生活的一部分来加以把握。间歇性的民族主义谰妄可能已经掩盖了这一事实，但在任何时候，当然更加是在现代，德国人的生活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是持续不断地形成的：德国的政治、文化、科学和物质发展与欧洲是不可分割的——有时相互冲突，有时也在创造力上互利互惠，但总是在进行关键性的交流。我总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德国历史，所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如此晚地提出这种程序性辩护是很奇怪的。我的这种态度不是在政治上对布鲁塞尔卑躬屈膝，而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如实地说明历史），用兰克的指令来说，就是尽可能“按照真实情况”来描述过去。

即使在我退休之后，我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美国和国外学术界仍有联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我一个荣誉学位，我非常高兴那一年同时获得此荣誉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和好莱坞女星劳伦·巴考尔，这使我们成了“同学”。而且哥伦比亚大学将一直是我的“家”，即使在我辞世之后，因为我的论文（以及我父母的论文）将永远在那里。

甚至在退休之前，我就参与了霍尔布鲁克的一个梦想，即在柏林建立一个永久的文化存在，来取代半个世纪以来保护并丰富了这个城市的美国军队。他开始考虑在柏林设立一个美国科学院，有才华的美国人可以在那里从事长达一年的研究工作，并且通过他们的存在来增强在这个首都的德美两国的联系。我们曾经在大使馆谈过这个计划，我想起了一个德国的类似情景：在拿破仑大败普鲁士之后，哲学家兼

政治家威廉·冯·洪堡敦促国王成立柏林大学，并借此“用精神手段来取代身体上的损失”。

凭借其一贯的能力，霍尔布鲁克动员了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冯·魏茨泽克共同出任主席，在这两个国家筹集资金，并为此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家：坐落在柏林最豪华地段的一栋华丽的别墅，位于万塞湖上；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十年里，这栋别墅属于汉斯·阿恩霍尔德。在随后的过渡期间，这栋别墅被用于各种目的，但是阿恩霍尔德的女婿斯蒂芬·凯伦因他的妻子在那里度过了多年的童年生活而对此别墅怀有很强的私人兴趣。斯蒂芬现在是纽约的阿恩霍尔德和S. 布莱希罗德银行的总裁，我喜欢称该银行为“我的”银行，因为我写了有关它辉煌的开端那段历史。事实证明凯伦夫妇为霍尔布鲁克的计划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在成立了一个可靠的研究人员选拔委员会后，我也加入了董事会，并且亲眼看着学院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在增长——尤其是当两国官方关系恶化，原先被埋在钦佩和感激之情之下的德国人对美国潜意识的猜疑被乔治·W. 布什的华盛顿政府采取的傲慢的单边主义行为激化之时。该科学院的存在归功于许多捐助者，但一想到沃尔特·蒙代尔想去东京的愿望让霍尔布鲁克最后一次在德国的发明成为可能，再加上布莱希罗德在天之灵的祝福，就让人感到头晕目眩。一段意外被出色地利用之后便创造了历史！

应克林顿总统的要求，霍尔布鲁克于1994年返回华盛顿出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年后他成为结束南斯拉夫战争的首席谈判代表。由于要在俄亥俄州代顿为这些难以置信的艰难谈判加班加点工作，他不得不取消了在纽约为利奥·贝克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做一次重要演讲的承诺。在最后一刻，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我赞扬了他缺席的原因，并说“凭借他的智慧和精力，他的不屈不挠的现实主义，他的外交技巧和细致的理解能力（Fingerspitzengefühl）”，他是一个理想的和平使者。我沉迷于一个历史幻想之中：

他本来应该在1914年7月奥地利大公被谋杀之后就被派往贝尔格莱德。他本来可以告诉塞尔维亚人接受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然后再行欺骗之事。他本来可以穿梭到维也纳并告诉奥地利人，发动战争是疯狂的，德国人正在把他们推入这场冒险之中，而他们的帝国将因此不复存在。他本来可以去柏林并警告德国人，当欧洲的和平的绝对优势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之时，就奥地利大公事件诉诸战争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通过如此这般给最直接相关的国家提供明谏，他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匈牙利出生的妻子还有我就不会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了。

我自己也在不断加深我在第五个德国中的参与程度。在慕尼黑大学和美因茨大学的短暂访问和较长时间的停留为我提供了观看和处理德国事务的平台。德国人有一种快速改变情绪的天赋，但从1989年的狂喜到焦虑的幻灭这两者之间迅速的摆动令人感到惊愕。（德国人有一个难以翻译的短语，用于他们迅速变化的情绪，

“Himmelhochjauchzend, zu Tode betrübt”，字面意思是：欣喜若狂和悲痛欲绝。）这个国家正式统一了，但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忧郁和自怜之中。当西德人抱怨东德的重建花费过于巨大，以至于他们的兄弟都难以承受自己的负担时，许多东德人却感觉在继续被殖民化、被迫屈尊俯就和被剥削，一种愤怒的傲慢态度油然而生。当然，在原先的民主德国，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对一部分人而言，也可能对许多人而言；也许他们正在遭受我们所谓的提高期望值的革命带来的痛苦。

在政治方面，赫尔穆特·科尔在1994年赢得了另一场选举的胜利，尽管比起以前差额更小了。他以“统一”总理的身份参与竞选，同时暗示他的红、绿对手缺乏爱国主义。当他决定在1998年再次参选时，我认为这个正确地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对手的低估的人现在却高估了自己。他失败了，而且他的伟大成就因他卷入基民盟竞选财务丑闻的细节被揭露而受到玷污。他将作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一个他的国家的统一者而被历史铭记，但他仍然是一个造成不和的统一者。

格哈特·施罗德，一位务实的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成为红绿联盟的领袖，约施卡·菲舍尔出任外交部长。（想一想这位菲舍尔，1968年那个时代的一个暴力激进分子，现在成了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再想象一下，他在外交部那种历史悠久的古板正式的氛围中的样子应该是很怪异的。）新政府决定参与北约，阻止塞尔维亚的侵略并保护科索沃的人权。如果红党和绿党还是处于反对党位置的话，他们很可能出于对和平主义原则的忠诚，投票反对派遣德国士兵参加战争，但施罗德和菲舍尔有能力说服他们的政党，德国军队在巴尔干地区作为维和人员而不是残酷的征服者存在，是充分实现德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又一步骤。^[4]

亲眼见到和亲自参与这些德国事务使我一度被卷入各种多重和解的任务之中。德国人必须要和解，包括他们自己之间的和解，东西方之间的和解，与他们的邻国的和解，与他们过去暴行的所有受害者尤其是犹太人的和解，以及与他们自己一直有争议的过去的和解。根据职业，还根据性情，我认为我是一个以和解为加强民主的手段的信徒，我特别热衷于将德国-波兰的和解作为一种政治和道义上的迫切需要。（鉴于我的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的关系，这也有一丝私人的考虑。）德国人开始要求我在正式场合谈论我自己的过去，我以为，他们是希望我作为过去事件的见证人和解释者，在此过程中，比起从远处，我开始更清晰地看待我自己，有点意识到公开参与其中的私人原因。

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也是如此。结束大使馆工作之后，我回到了我计划中的弗里茨·哈伯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一双重传记的写作上，去写他们兄弟般的对立、他们不和谐的友谊以及德国犹太人内部巨大的紧张和诱惑的故事。我又回到了档案馆，回到了1914年之前被毒害了的德国的黄金时代，回到了德国的“第一次机会”中去，其灾难性的结局是哈伯和爱因斯坦共同经历过的。但是，我被互补性的短

程旅行分散了精力：我成了为其他伟大的德国科学家做巡回纪念演讲的人，这些科学家包括保罗·埃尔利希和马克斯·普朗克。当我接受邀请为马克斯·普朗克逝世五十周年官方纪念会做演讲时，它让我有机会去了解被私人 and 公共悲剧掩盖的另一种科学生活：普朗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埃尔文被作为7月20日密谋中一个假定的共犯而惨遭纳粹杀害。面对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德国权威人士，我在演讲结束时这样说道，因“德国人的精神错乱”，普朗克失去了两个儿子，他的被谋杀的儿子应该同他受尊敬的父亲一起被永远记住。但我也不得不处理普朗克的有关纳粹政权的内心冲突；要成为一个老式的德国爱国者，习惯于为国家服务，同时又保持一个人的尊严，这是非常困难的。我试图利用这些机会将在和解性的理解上做出的努力与毫不掩饰的警告结合起来，也许德国人在利用我来说那些仍然太痛苦或太微妙以至于他们自己难以去表达的东西。

我对哈伯-爱因斯坦那一代科学家的关系网络越来越感兴趣了。这些人的科学工作已经被研究过了，但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公共影响还没有人涉猎。接下来，当我在位于雷霍沃特的研究所举办的年度魏茨曼讲座做了演讲之后，我便将哈依姆·魏茨曼添加到了我要研究的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名单上。1994年伊丽莎白和我在以色列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在那个研究所宁静的庭院里花了一些时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学研究中心，其余时间就用于周游全国各地，包括西岸在内，在那里，大自然惊人的美丽和以色列占领下严酷的条件之间的冲突使我们再次受到强烈的震撼。

尽管如此，《奥斯陆协议》唤起了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希望，这一希望曾经在1995年遭到破坏，当时伊扎克·拉宾被一个狂热的犹太人刺杀，这个犹太人的卑鄙行为受到了无情的右翼诽谤的驱使，罪魁祸首是一名致力于这个和平的机会的将军。我立刻想起了1922年德国的犹太人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谋杀一案，民族主义

狂热分子在政治右派发起仇恨运动将其视为“叛徒”之后杀死了他——我写下了这两个悲剧的相似之处，都出自民族主义者的狂热，都产生了可怕的世界性的历史后果。一年之后，我受邀在特拉维夫的一个专题研讨会上做了有关这个相似性的发言，这个研讨会是为了庆祝一个以拉宾为名并致力于研究以色列历史的研究室的落成而举办的。为这个场合我所选择的话题是：“现代国家和政治暗杀”。

于是伊丽莎白和我又来到了以色列，这一次的旅程比上一次更加令人难受，但我们的朋友哲学家阿维沙伊和埃德娜·玛格里特努力使气氛活跃了起来。阿维沙伊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以色列学者和出席的公众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但只是在最后的小组讨论会上才公开爆发，小组会专门用来讨论拉宾遇刺给今天的以色列带来的后果。在充满激情的长串希伯来语中，我抓住了一个被反复使用的词，可勉强翻译为文化争端（Kulturkampf），指的是东正教、改革派和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德国历史的回声再次成为在其他文明国家引发政治死亡事件的一个原始文本。

我论述拉特瑙的文章重申了我对魏玛及发生在其存在时期的意外事件的忧思。1998年，在我最中意的安静的工作场所之一——荷兰高等研究院，我又接受了一项邀请，去出席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举办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社会经济史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言，主持研讨会的是艾玛·罗斯柴尔德和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多年来我一直非常钦佩艾玛，因此心中持有这样的自负：我的演讲的质量应该与主办者本身的著作的质量相匹配——或者更直白地说，因为我经常为某个特定人物写文章——我在为她的研讨会所准备的文章上下足了功夫，最后成了一篇关于“魏玛的死亡”的文章。在文章中，我探讨了魏玛初期有声有色的生活中的悲哀，当时死亡和残害是如此普遍。我也特别关注这么一个事实：一些魏玛共和国的关键保卫者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相继辞世了——拉特瑙本人，还有（出于自然缘故）马克斯·韦伯、恩斯

特·特罗尔奇、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而魏玛的敌人却活到了八九十岁高龄。我再一次探索了我对相互交叉的传记和历史的兴趣，而不是意外事件；当时我正在读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写的一本新书，其中作为一个主题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未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我立刻想到这在历史上也是如此。

1998年，我的书《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出版了，中心内容是关于哈伯和爱因斯坦两人交往的长篇故事。作为我的引言部分的题词，我摘录了莉泽·迈特纳1945年写给一位荷兰物理学家朋友的一封信中的话，这位出生于奥地利的物理学家曾经是奥托·哈恩的主要的（也是未公开承认的）合作者，直到她作为非雅利安人而被迫流亡，这句话是这样的：“你问我对德国的态度是怎样的……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做出最为恰当的表达：我感觉自己像个母亲，看到最喜欢的孩子已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我认为，这句话最简洁、最辛酸地表达出许多德国犹太人对他们以前的家园所怀有的感情。

当我于1993年至1994年在波恩工作时，我遇到了波兰驻德国大使雅努什·赖特尔，他曾经是一位年轻的波兰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地下反对派成员而逐渐成熟。（他曾是玛里恩·登霍夫的第一批“被发现的”波兰人之一，并被她带到《时代周报》工作了一段时间。）波兰革命把他推向了这一高位，他是一位具有语言天赋和历史意识的外交官，对西方观念和制度持批判性开放态度。欧洲解放后最令人兴奋的感受之一就是发现了许许多多像赖特尔这样的年轻男女，他们迅速提升到有职权的岗位，并在那些岗位上工作得如鱼得水。在波兰这个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加引人注目：他们的长辈要么是德国和俄国野蛮暴行的受害者，曾试图摧毁这个国家的精英，要么被某种形式的庇护和共谋玷污。然而，这个新一代似乎从早年暴政的记忆中得到的是激励，而不是挫败。（2005年，赖特尔成为波兰驻美国大使！）

赖特尔致力于为自己的国家和德国的许许多多曾经失去了家园的人寻找协调的方式。1995年夏天，他在柏林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来讨论“失落的家园”这个痛苦的问题。他请我把这个问题置于欧洲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虽然我有点怀疑他是否希望我回顾自己的经历。同我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包括玛里恩·登霍夫以及德国和波兰的内政部长，他们俩的家人，如伯爵夫人，和我一样都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碰巧的是，这两人还是在同一天出生的）。当然，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经历过驱逐和失败，尽管近代的事件特别暴力凶残。1933年以后，德国人轮流成为驱逐他人者和被他人驱逐者。遭受驱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在用来描述甚至程度更低的不幸损失的文字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乡愁、国破家亡、无家可归。我们大家都同意，在政治上利用私人的冤情会破坏那些暴行的恐怖，但我们也同意在不忘记过去的同时去重新开始，这样的经历是能够令人振奋的。

为了明确我所认为的会议应该具有的精神，我引用了玛里恩的信条，“爱的最高形式就是爱而不图占有”。我还提到了那位出色的瑞士历史学家赫伯特·吕特的话，他曾经写道，欧洲的一个新的和平秩序将要求人们“能够哀悼而不仇恨”。通过同时承认自己的和他人的痛苦，共同的和和谐的感觉就可能取代仇恨。在会议上，演讲者和听众似乎融合了激情和理智，共同体验到一种宽慰感，为这些问题可以在几十年来第一次公开地畅所欲言而兴奋不已。

第二天，赖特尔大使坚持要开车把伊丽莎白和我送往我的故乡，他知道那是我们的下一站。因此，我们就不必按原计划坐火车前往弗罗茨瓦夫，而是开车沿着希特勒的高速公路前往，我上一次开车走这条路还是在1938年8月，就在我父母、姐姐和我获得了美国移民签证之后。这是多么特别的一次回乡行程啊，由波兰大使（并且是我们的朋友）亲自带我们在旧政权结束之后第一次探访弗罗茨瓦夫，我可以带伊丽莎白去看看我快乐又痛苦的童年所在地。弗罗茨瓦夫仍然遍布着

我在1979年所看到的所有战争破坏的痕迹，但是为重建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仍然令人震惊。多么生机勃勃的一座城市啊！而且波兰人现在承认弗罗茨瓦夫曾经有几个世纪的德国生活，这是多么坦诚啊！他们对其早先的辉煌感到多么自豪啊！弗罗茨瓦夫正在恢复它的历史，我觉得我也是。

1996年春天，我们回到了弗罗茨瓦夫，我在那里获得了一年一度的西里西亚文化奖，这个奖项是在1989年之后设立的，用以表彰在西里西亚出生或居住过的人。奖金来自德国，庆祝活动由当地的波兰人举办，提名则由两个国家轮流进行。鉴于我亲波兰人的倾向，我特别高兴能被波兰人选中。庆祝活动在利奥波尔迪纳大学（布雷斯劳大学）美丽的巴洛克式的礼堂内举行，最大的惊喜是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来给庆祝活动致辞。

我的儿子弗雷德在此次旅行中加入了我们，我们一起参观了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弗雷德与我的父母特别亲近，并且是伴随着我母亲在布雷斯劳生活的许多故事成长的，因此他可以将现在的这个地方与那些快乐的回忆联系起来。在庆祝活动的正式午餐之后，他向赖特尔大使的助手透露，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知道我会想去附近的山村佐布滕，我父母有几年在那里分租了一栋房子过周末；大使助理动用了地区总监的车把我们带到了那里。我找不到我们昔日的房子了，但无论如何，在晴朗的天气里进行的这次旅行非常精彩。我们沿着小路漫步，穿过宁静的田野和牧场，惊叹于果园里果实累累的樱桃树。在我们漫步后回到车上时，发现司机为我摘了一堆樱桃，让我再回味童年时的味道。我难以忘记那友好的姿态和稍纵即逝的深深的满足感，眼前的善意与过去那部分美好的回忆交融在一起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我女儿凯瑟琳和她的家人同我一起又回到了弗罗茨瓦夫。凯瑟琳现在是我的一位历史学家同行，她与我的父母同

样非常亲近，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们现在也可以把她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与这个地方联系起来。她发现这座城市比她预期的更加宏伟，并且对它容纳两种文化的方式非常着迷。弗雷德和凯瑟琳都非常喜欢看到我们家在欧洲的生活部分消失的地方。他们能够理解。

那些年里几乎充满着欣喜的和解，大家都自发地寻求真理，向邻居伸出友谊之手，在德国长期推迟承认的与波兰共享的边界问题上双方表达了相同的情感。然后，逐渐地，双方的关系再次出现了裂痕，波兰人感到失望的是，德国在欧洲不再那么支持其事业了。重新回到古老的偏见，回到民族主义上去是那么容易——容易但极具破坏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人正面对关于他们的历史的新的争议。年轻的学者们无情地揭露了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普遍存在的罪责和共犯关系，这种对邪恶的道德上的冷漠往往源于野心和贪婪。其他国家的公民（只要考虑一下奥地利）表现得也如出一辙，这个事实并不能消除原始的污点：德国人一直是邪恶暴行的煽动作恶者。

美国政治学家丹尼尔·戈尔德哈根所著的《希特勒的自觉帮凶：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于1996年出版时立即引起了轰动。戈尔德哈根对“为什么会发生大屠杀？”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德国人的反犹太主义，由于德国人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接受了一种“消除异己的思维定式”，并且想要在行动中表现出来。那就是戈尔德哈根的“分析框架”，随后是一个“实证”部分，其中他重构了大屠杀的三个特定的、扣人心弦的片段，显示了“普通”德国人的兽性，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很少是纳粹分子。戈尔德哈根的推论是，其他德国人几乎可以取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这本书是对整个民族的控诉，就像在1945年之后常常出现的那样。美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中有许多人曾为揭露纳粹政权的特殊恐怖做了大量的工作——批评了戈尔

德哈根这种一概而论的笼统性，但这两个国家的民众还热情地购买他的这本书。

我发现戈尔德哈根对自由派德国历史学家中的他的批评者进行了侮辱性的攻击——这些历史学家自身也经常受到德国民族主义分子的指责——这太可恶了。于是我也加入了这场论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针对这本书的相当猛烈的批评文章，就这本书的推广，其优点和缺点做出了评论。我对这本书的道德和历史的还原论以及对背景和细微差别的漠视感到不安。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并不是以一种“消除异己”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它有自己的历史，有其自身的兴衰，这些都被戈尔德哈根省略了。即使是大屠杀也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人：它发生在有组织的兽性的漫长的黑夜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野蛮化最严重的时刻。我还注意到戈尔德哈根对他的批评者的非学术性攻击，举一个例子，他竟然试图让一个人闭嘴。我可能也怀有一种审慎的忧虑，担心他的原始主义可能挑动德国人对美国和犹太人的憎恶。我收到了一些作为回应的“砖块”，包括该作者的一篇长长的愤怒的答复，但也有不少令人愉快的赞扬。戈登·克雷格认为我的文章是“我读过的评论这本书和这场论战的最好的文章。我很高兴你能为德国历史学家们仗义执言，对于他们戈尔德哈根只是一味地蔑视”。

1999年，当我接受邀请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家乡巴塞尔做一次关于他的演讲时，我在不那么紧张的、更加愉快的环境中再次回到了这个主题上。（我被安排住进了有些陈旧的欧拉酒店，1934年1月，弗里茨·哈伯在同我的父母谈过他们的移民计划之后，就是在这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当晚我迟迟难以入睡。）我想要重新研究一下我之前就布克哈特对现代犹太人的批评观点所做的评论；我建议将我的演讲以“反犹太主义的用途与滥用”作为标题，很明显这是借鉴了尼采著名的论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个题目。布克哈特遗产的守护者

也是我的东道主对此吃了一惊，因此我提出改用不那么刺激的“布克哈特、尼采和反犹太主义的诱惑”。但是当我提到我原来的标题时，来听演讲的听众坐直了身子：反犹太主义已经有“用途”了；做一个19世纪批判犹太人的人是一种认同古代“美德”的方式，是在追求利润和庸俗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反对现代性和贬低真正的价值观。在布克哈特时代，“反犹太主义”——其本身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新词——涵盖了从温和的社会偏见到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和煽动民心，但脱离了犹太少数民族在西方和中欧惊人的崛起这样的背景，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去理解。犹太人的崛起是一个在欧洲历史上可能没有类似情况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在布克哈特和尼采两人之间做区分，布克哈特在其私人通信中表达了他对犹太人的批评性评论，而尼采则在他个人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当时最激烈的反犹太主义者并谴责他们所有人，他认识到他们的仇恨的力量，那是一种致命的毒药，尼采是最先理解到这一点的人之一。对于巴塞尔贵族而言，这是一个微妙的主题，随后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我与德国人有了更紧密和更经常的接触，部分是通过一系列特别的令人惊喜的事件。1994年，我被选入德国的勋章评选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四十位德国人和四十位外国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永久机构。我并不是唯一对这种荣誉感到惊讶和敬畏的人，大多数成员承认这一点。例如，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在他公开的入职仪式上说，想到他的前辈，他就自忖道：“我能在这里做什么？”我的感受就更不必说了。像所有新成员一样，在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我必须对我的人生和工作做一个非正式的陈述，我提到了特奥多尔·蒙森的警告，任何一个需要超过4小时睡眠的人都不适合以历史学为职业，还有兰克的观点，历史学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优秀。我希望我可以为他们的选择而辩护。在其他美国成员之中，还有乔治·凯南、戈登·克雷格和伟大的物理学家维克多·魏斯科普

夫，我很乐意去赞赏别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由发展良好的自我怀疑的痛苦所平衡的快乐——我对能身处他们之间而感到非常高兴。

勋章评选委员会邀请其成员以及合作伙伴参加半年一次的会议，在这些场合里，我们有机会就各种跨学科的主题进行非正式的聊天，其中点缀着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领域的男女之间轻松的玩笑和友情。如此一来，前往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旅行成倍地增加，每年6—8次跨大西洋的航行几乎成了常规。奇怪的是，我童年时代的德国经历让我变成了欧洲人，我晚年时代的德国经历又帮助我回到了欧洲。

1998年10月，多产的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我在勋章评选委员会的活动中多次见到过他，因为他也是其中一个成员。德国书业和平奖是1950年设立的一个著名奖项。（马丁·布伯、特奥多尔·豪斯、保罗·蒂利希以及最近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和乔治·塞姆朗，都是该奖的获得者。）颁奖仪式在法兰克福古老的圣保罗教堂举行，联邦共和国总统和许多政治家以及其他公众人物几乎悉数到场。这座教堂已不再是一座教堂，而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地标，是1848年德国第一个民主议会的所在地。瓦尔泽利用这个机会来解决记忆中的问题，他明确提到了大屠杀，由此隐约地涉及了计划中的柏林大屠杀纪念馆。

瓦尔泽暗示道，那些不断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他们的“耻辱”的作家，其所作所为部分是为了清除他们自己在邪恶历史中的帮凶行为，以此证明他们自己的清白或优越的道德判断，而且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伤害“全体德国人”。近几十年来，他说道，德国人每天都在被人提醒他们的“无法消除的耻辱”。难道那些以搬弄是非、挑剔苛求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在这样做的时候能够感觉自己得到了提升，能够远离作恶者而更接近受害者吗？（就像恩斯特·诺尔特一样，瓦尔泽通过反问、不列举姓名使他的讽刺不那么刺耳，

但是大多数人知道他心目中有谁——格拉斯、哈贝马斯和其他“批评家”。)没有人怀疑奥斯威辛的存在或其恐怖，他承认，但是不断地去面对它，并且把这种耻辱作为一种反复利用的手段，那就会令人反感。他承认他被迫“扭头看别处”。“壮着胆子在颤抖着”，他宣称奥斯威辛不应该被用来作为一种恐吓手段，也不应该被用来作为惩罚所有德国人的一根“道德大棒”。或许，他戏谑地问道：是否存在善意的平心静气？

对他的演讲的直接反应是积极的，但在几天内，指控和反诉占据了德国报纸的主要版面。德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伊格纳茨·布比斯愤怒地谴责瓦尔泽，其他一些评论家也是如此；论战迅速升级，收获的是恶意，失去的是实质，这在德国的公开辩论中是常有的事。瓦尔泽怒气冲冲地做出回应；布比斯称瓦尔泽的辩护人为反犹分子，即使是那些只是说了一句他有言论自由权的人。新当选的总理格哈特·施罗德最初对拟议中的柏林大屠杀纪念馆持批评态度，现在他宣布在瓦尔泽的演讲之后反对已是不可能的了。瓦尔泽的劝告所产生的意外后果是引人注目的。

我一开始以为瓦尔泽并不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尽管他确实意图激起争端，但这种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像他这样能巧妙运用语言并掌握语言细微差别的作家必须要意识到可能会出现反应。布比斯宣称，他一生的和解努力全白费了。聪明、可怕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是一位有着波兰犹太血统的文学评论家，他在德国作为一个“文化沙皇”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声称瓦尔泽的演讲证实了他的感觉，即犹太人再次成为公平的游戏。这种令人厌恶的狂热持续了好几个月。

当然，这个问题不会永久消失，但我认为瓦尔泽的演讲和随之而来的出于个人好恶的攻击是可悲的。与此同时，在柏林市中心，有争议的被杀害犹太人的纪念碑正在建造之中，这将永久性地提醒人们德

国人勾结其他人犯下的独特罪行。瓦尔泽的争议恰逢欧洲对以色列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左翼人士对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愤怒在日益增加；在激进的右翼这边，通常的反犹太主义的敌意也得到了加强。反过来，一些犹太人将针对阿里尔·沙龙的利库德政府的所有批评与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即使这种批评只不过重复了以色列批评者的观点而已。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是否会有一天德国人能够轻松地谈论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试图避免令人痛苦的事实绝不是一种选项。1999年，我做了一个题为《“微妙的”沉默及其后果》的演讲，这个题目出自尼采的一句话，他提到了歌德可能对德国人的看法以及通常属于德国人的“深沉”，“但他从未就他周围的许多事物发表过清晰的看法，在他的一生中他都擅于保持一种微妙的沉默，很可能他有充分的理由”。从这方面去说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太离经叛道了！

提出这样一个主题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同样在1999年，马克斯·普朗克协会会长休伯特·马克尔在协会五十周年纪念日上宣布：“有些人认为战争结束五十年后……已经过了（对于过去的行为）进行反省的时间……他们是被误导了。已经过去了的只是出于羞愧和无情的压抑而要保持沉默的时间，而保持沉默是为了不再受伤，以及战争刚结束后那个时代想要忘却的愿望。”到现在为止，尼采的话经常在辩论中被引用。（同年，我选择它作为我在德国发表的一本论文集的标题。）

很快，围绕瓦尔泽演讲产生的问题也直接触及了我。1999年春天，我出席了在魏玛市由德国国家基金会组织的一个公共论坛，旨在重新评估八十年前起草的魏玛宪法。（我认为这对民主社会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民主宪章；德国当时离民主距离尚远。）接下来是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一些瓦尔泽辩论中的主要参与者试图

听从施罗德要双方和解的恳求。（几个月后，布比斯在怨恨中去世了，按照他的指示，他被埋葬在以色列。）那天晚上我回到酒店时，被告知有人留言给我，要我不管时间早晚都要打电话给德国书商协会的乌尔默先生。他的问题是：我愿意接受1999年的和平奖吗？评奖委员会为此一致推荐了我。

我惊呆了。我对幻想并不陌生，但这种事情我从未想过；以前从未有历史学家被选中的情况。我打电话给伊丽莎白告诉她这个消息，但在得到正式宣布之前，不可以向其他人提及此事。我高兴极了，突然想起那天还是我父母结婚八十周年纪念日。

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这个奖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消息公开之后，很多人和作家认为这是对前一年瓦尔泽的挑衅做出的恰当回应。如果我是被作为一种他的解毒剂而当选的话，我不得不怀疑我的荣誉是否应该归功于瓦尔泽。我后来确信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短期内，我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乌尔默先生同一位历史学家同行兼评奖委员会成员埃伯哈德·耶克尔一起来纽约拜访了我，我们共同讨论了颁奖人的挑选，此人将介绍获奖者、解释并证明授奖的理由。乌尔默提出了两三个出色的德国人的名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的建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是我最心仪的还是我的朋友兼历史学家同行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现在的波兰外交部长。我以为他会同意的可能性很渺茫——当我听说他愿意接受时，我感到更加高兴了。除了我的私人感情之外，他的存在会体现出多重的和解。

瓦尔泽的争议显然更加引起了对我是否以及如何回应这场辩论的兴趣。我自己也想知道，并且我的获奖感言也被证明特别难以准备，我不得不将历史和个人融为一体，我觉得这将可能是我能有的表达我

的希望和忠告的最佳场合——而所有这一切局限在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段里面。

颁奖仪式于10月17日星期日举行，这样的场合本身就结合了兴奋和老友相聚的乐趣。盖雷梅克和我一起坐车前往圣保罗大教堂，那里被警察和摄影团队团团围住，因为在电视机前观看和平奖颁奖典礼的观众不仅包括出版商和作家，还包括政治人物。

长长的一队官员——以富有魅力的法兰克福基民盟市长佩特拉·罗特和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为首，最后是盖雷梅克和我——一起走进了大厅。乌尔默朗读了正式的授奖词，其中提到了我通过在不同时期和人民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来促进和平，公平地描述了“犹太人在德国……生活中始终有争议的历史存在”，并且规范性地试图解决有关德国当前的问题。接下来是罗特市长，她强调了文学可及性的重要性，并呼应了我对新的德国的一些希望和担忧。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她还引用了我曾经给“普鲁斯特调查问卷”的一个答案——这份调查问卷包括了非常著名的一系列有关价值观和经历的问题，为杂志编辑所青睐——我在答题时将自己最喜欢的活动描述为“在偶尔的亮光之下徒步旅行”（wander mit Einfällen）。我心中一直想念着西尔斯·玛利亚，但她极其慷慨地暗示我会经常在路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盖雷梅克的讲话为历史的作用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辩护，他认为历史可以作为抵制遗忘过去的诱惑的重要解毒剂。他首先引用了保罗·瓦莱利的话，历史是大脑的化学作用发明的最危险的毒药之一。其次他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和抵抗烈士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可以被比作一把刀，用这把刀既可以切面包也可以杀人，盖雷梅克以心意相通的精确度涵盖了我的研究工作的主题，并说我是在切面包。我对他下面的这个说法感到特别高兴：“弗里茨·斯特恩毫不犹豫地说出了

关于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真相，而且恰恰是这些真相对今天的德国人来说都是痛苦的，但对犹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在他值得接受的热烈欢呼声中，我们拥抱了，下面该轮到我要出场了。

在向组织者特别是盖雷梅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之后，我很高兴地提请大家注意盖雷梅克是自托克维尔以来成为外交部长的第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我认为这个奖项第一次授予一个历史学家是给予该学科本身的一项荣誉，也是对历史学家的责任的认可。我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听到被授予这个奖时是在4月，欧洲和美国正站在科索沃新型战争的边缘，这项政策体现了一个民主联盟不愿意容忍残酷非人道而做出的决策。“用武力捍卫人权是一个新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可能还会发生，对于这样的行动我们需要明确的指导方针：“责任不应该仅仅落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肩上。”

当我谈到新的德国要采取一项积极的、谨慎的外交政策时，我强调其先决条件仍然是内部和解这一紧迫的道德任务。然而，东西德之间的隔阂似乎在增长。“在这个德国之内不应该还有空间专门去容纳二等公民或那些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的人，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的二等公民了，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句话既是政治上的挑战，也是私人的表白，引起了第一阵打断了我演讲的掌声：我能感觉到大厅里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我特别提到，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露丝·德雷福斯最近呼吁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以正确的精神去对待过去，她承认每当想到她的国家，她都是怀着“感激和痛苦”的心情。如果一个瑞士公民都能正确地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其他人，特别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其真实性就更加毋庸置疑。

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不可避免地并且永远地”作为德国人野蛮残暴的象征而留存后世。在普里莫·莱维关于集中营生活的悲惨描述中，他写道，当他到达集中营时，他看到牢房窗外有一根冰柱，在极

端干渴的驱使下，他伸手去抓那根冰柱，但是一个“身材高大在外面来回走动的警卫突然伸手残忍地从我手边夺走了它。‘Warum（为什么）？’我用蹩脚的德语问他。‘Hier ist kein warum（这里没有为什么）’，他回答说，同时猛地把推了进去”。这就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说道。《圣经》中约伯问道：“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呢？”这种对“为什么”的拒绝是所有极权主义的真实表达，揭示了它的最深刻的含义，是对西方文明的否定。但它也应该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脆弱的民主国家里的人，权力绝不应该脱离责任。太多的德国人，太多的20世纪的人，都未能去问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的特征很可能就是“他们不想看到或者不想知道”。

最后，我试图解释我对德国的持续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我政治教育中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是在童年时代我看到过德国民主人士如何为自由而战并遭遇失败，也不仅是在1945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了建设一个不同的国家这个任务上来。我对德国的关注，原因在于朋友们，是他们给了我与德国的精神联系，我只提到了一个人，她就是能够代表所有人的伯爵夫人玛里恩·登霍夫，“她的友情之礼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解放作用”。（《法兰克福汇报》第二天刊出了我的整篇演讲稿，只是省略了这一句有关与他们有竞争关系的报纸编辑的话！玛里恩对此非常愤怒，并斥责了他们，而且在一篇关于我的简短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对更自由的文化冲突的希望便到此为止！）

德国人和美国人相互之间的理解对历史、政治和我的生活而言是一项原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我的爱属于同样濒临危险的两种语言，属于同样被忽视的一种共同的文化。我的感激之情属于我的孩子和孙辈可以在其中自由成长的国家。因为我如此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感激之情，并且经历了如此重大的友情之礼

遇，所以我感谢这个曾经迫使我流亡并最终与之建立了新型关系的国家。”

精疲力竭、茫然失措的我迎来了长达好几分钟的起立鼓掌，我无法回忆起那一刻的精确感受——谦卑、麻木、空虚。但伴随着老朋友和我儿子弗雷德的亲切问候，伴随着真正的节日气氛，我的精神陡然高涨。离开大厅后，当我们同朋友们和官员们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在午餐前边喝着香槟边聊天时，我放松了。伊丽莎白低声对我说道：“你快乐吗？”我随即回答：“此时不快乐，何时才快乐？”

[1] Janus，古罗马两面神。——译者注

[2] 这个基金会也证实了私人或企业基金会在新的德国国内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它们丰富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素养。这些基金会经常有意识地模仿卡内基、洛克菲勒和福特等美国社团的运作。

[3] 1994年夏天，我帮助将展览带到了美国，安排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展览第一天，在众多出席者中，克劳斯·冯·多纳尼，最令人钦佩的抵抗者之一的儿子，发表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悼词。然而，《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认为图书馆不是用来办此类展览的地方。随后，展览就迁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西点军校，在那里，我看到了学员们在面对为了服从更高的命令或需要而不惜违背誓言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极其严肃的态度。

[4] 2005年，当这个红绿联盟崩溃时，一个所谓的伟大联盟，基民盟-社民党取而代之，基督教民主党人安吉拉·默克尔成为德国首位女总理，而马蒂亚斯·普拉泽克则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默克尔和普拉泽克都是在原先的民主德国长大的，我认为他们在权力上的晋升是对被解放了的古老东方的人才一种含蓄的认可，如果予以正确的理解的话，这种情况应该有助于德国的真正统一。

尾声

2002年这一年进入了尾声，悲伤，最终愈合，这是一种生命循环的终结。就在元旦之前，玛里恩·登霍夫从克罗托夫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在那里和她的侄子赫尔曼一起过圣诞节。几年来，她的身体日渐衰弱，癌症反复发作——她坚强地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初冬时分我去汉堡探望过她，当我在一天晚上见到她时，香槟酒能使她现在已经麻痹的手臂上的痛楚变得迟钝一些，但第二天早上又恢复了极度的痛苦。现在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到欧洲。“3月”，我说道，“去华沙，我们的城市”，去参加一本书的推介会以及与盖雷梅克和米奇尼克的座谈会。“我想那时我会好一些，”她说，“我也会去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像往常一样经常给她打电话。2月，她在家中摔了一跤，陷入昏迷，失去知觉，被送往医院。两周后，她醒了过来，她意识到自己现在极度虚弱，就要求把她送回克罗托夫。当获悉这些情况后，我计划在我到达欧洲时就去那里看望她。在华沙会议结束后，我去了西尔斯，就在第二天，赫尔曼打来了电话。玛里恩那天清晨去世了。她意识到大限已经临近，就告诉夜班护士，“打电话给赫尔曼”，然后平静地离去了。

于是我现在去克罗托夫参加她的葬礼。当我到达那里时，赫尔曼想让我去和她说声再见，就把我引到城堡内的私人小教堂。在那里，她的简洁的棺木搁在一块木板上，上面覆盖着一些鲜花。在大厅进行的悼念仪式中，玛里恩的一个牧师朋友做了一个简短的布道，家人和

朋友们坐了三四排，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登霍夫家族和哈茨费尔特家族四代人、魏茨泽克、特德·索默、达伦多夫、基辛格以及来自东普鲁士的她的老朋友克丽丝塔·阿姆斯特朗。我们跟着灵车走到了村里的墓地，在登霍夫家族的墓园一角，她的一个兄弟也被葬在那里。此时乌云突然散开了，整个现场沐浴在一道灿烂的春日阳光之下：敞开的墓穴位于一棵椴树底下，鸟儿在歌唱，我们每个人——包括她执拗的管家，带着玛里恩淘气的达克斯猎狗——一个接一个地走近，鞠躬，在棺木上放下一枝鲜花并撒下一把土。在她出生地朴素的传统仪式中我们告别了她：这是一种宁静的人类礼仪，那么纯洁，那么自然。然后我们回到城堡吃了一顿便餐，饭间孩子们有些碍事，不少人在私下交谈。整个气氛平静又兴奋，也许这是她的朋友们和家人们的最后一次相聚了。

几天后，在汉堡最大的新教教堂内为她举行了国葬，玛里恩是这座城市的一位荣誉市民。赫尔曼请我代表玛里恩的朋友同其他三位贵宾一起在葬礼上致悼词；市政府的官员早早地来接我，有一阵子，我独自坐在前排预留的座位上，思绪在不安的现在和低沉的过去之间交替。其他人逐渐来到了座位上：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洛姬·施密特夫妇、施罗德总理和约翰内斯·劳总统（只有后者发言，因为德国礼仪禁止总理和总统在同一公共场合一起发言）。魏茨泽克先致悼词，然后是施密特，他代表《时代周报》，在他之后是我，我再次讲了我之前写的内容：“如果说德国有一个地方再次成了我的家，那就是她的家和她的陪伴，一切尽在言和不言之中。”当我回到我的座位上时，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夫人洛姬紧握着我的手，传达着无言的安慰。然而，我当时感到，并且现在也依然觉得，玛里恩一直稳定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伊丽莎白曾经偶然有一次称她为“你精神上的母亲”，这是一种新的想法，但非常恰当。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以我无法表达的方式，不仅接触到了我的那颗童心，还把我这个成年人视为朋友和知识伴侣。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更加频繁地想起我的童年，甚至我的身体也会提醒我。同年秋天，弗罗茨瓦夫大学^[1]将庆祝其建校三百周年，波兰当局希望将这个庆典办成一个真正的国际性活动。大学理事院认定这所大学是“许多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和进步的守护者”，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开放、宽容、和平与理解的理想，以及再次复兴的波兰共和国完全回归欧洲”——这些文字非常可嘉，但鉴于共产党时期波兰人否认了这座城市的德国历史，这些话还表达了一种新的精神。在策划其三百周年纪念日期间，这所大学得到了德国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之友协会的协助，这个协会是由汉堡的一个医生诺伯特·海希西创立的，他是布雷斯劳本地人。校方希望德国总统和波兰总统都能出席纪念活动。校方还邀请我在典礼上发言，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我建议以“欧洲的复苏”为我的演讲题目，我隐约地对这个题目所含的双重意义感到高兴，既可以指民族主义的过度凶残之后欧洲的观念得到了复苏，也可以指1945年后西欧物质复苏的现实。我的有点随意的选择帮助确定了庆祝活动的主题——“欧洲知识分子的团结”——鉴于目前关于欧盟扩大的争论，这个主题是合适的。就我而言，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人作为主要的演讲贵宾——显然是用英语这门新的世界性语言——这样的想法是奇妙的。

纪念活动按部就班地开始了。11月15日中午，也就是这所大学第一次开学整整三百年后，两位总统到达了，在肖邦伟大的《A大调波兰舞曲》的乐曲声中，一支盛大的学者游行队伍进入了美丽的巴洛克式大礼堂。举着大学校旗的旗手走在前面，随后是教职员、院长、校理事院成员、波兰其他大学来访的校长——所有人穿着貂皮装饰的天鹅绒礼服并戴着礼帽，每个学院都有不同的颜色——弗罗茨瓦夫大学的校长在末尾。当我们全聚在前面时，合唱团演唱了《让我们欢乐吧》这首18世纪的学生歌曲。没有哪所德国大学能如此庄严：1968年已经结束了这一切。

在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和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发表讲话之后，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的代表们纷纷赞颂了大学在一个新的和平的欧洲的使命。我也庆贺了这一场合的独特性：第一次提出在整个中欧实现和平的设想。尽管我们了解“暴力，上个世纪释放的虐待狂”，尽管“在空间上我们更接近奥斯威辛集中营，而不是伊曼努尔·康德的哥尼斯堡……但在精神上我知道情况恰恰相反”。

当然，我的讲话不仅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人，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告诉听众，即使欧洲人自己被分为敌对阵营并顽固地陷于民族狭隘之中，甚至民族差异比共享的过去历史还要重要，但美国历史学家也仍然能够理解欧洲历史的共性。我们就是那些教“西方文明”的人，“西方文明”这个词恰当地包括了欧洲最杰出的后代在那个新世界中的历史。但是现在我们所有人可以聚在一起庆祝一所自由的大学，我们要牢记从1933年到1989年，这所大学曾经在两个政权中效力并遭受苦难。我们仍然面对着失望和新的危险，“没有哪个国家，我自己的国家也重点包括在内，能摆脱宗教激进主义者的不宽容”。但是我们应该记住，非暴力是1989年的基本要素。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提到了甘地的遗产，并引用了他对他所认为的“西方文明”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他应该说过这样的话。因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要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去保存一个开明的欧洲的理想。我补充说，只要想一想我自己的国家，就可以明白一种谦逊的精神是适当的。

随后是热烈的讨论，两位政治家和我接受了其他人的提问，仪式结束时我们前往大学的教堂，那里飘荡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非常应景，并且还有三个波兰合唱团用德语演唱了《欢乐颂》，我为之哽咽不已。最后，我们朝河边走去，观看从奥得河另一边升起的最壮观的烟火表演，五彩缤纷，光芒闪烁，照亮了整个夜空。

第二天下午举行了第二个仪式，弗罗茨瓦夫大学授予我一个荣誉学位。当我沿着大厅走向校长办公室时，我注意到墙上悬挂着各种肖像和特色展示，其中包括早先的荣誉学位获得者的照片（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伟大的自由派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在其中），还有布雷斯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包括哈伯、埃尔利希和奥托·斯特恩。由此可见，这所大学的波兰主人们接受了这个地方古老的德国传统的荣誉。

校长办公室犹如一间18世纪的珍宝阁，房间里陈设的雕塑以及墙上挂着的油画美丽惊人。我遇到了我的官方学术东道主，这所大学资历最老的历史学家，他也是前任校长。之前我在访问弗罗茨瓦夫的时候见过他，而且当我获悉在苏联时期他曾经有一些可疑的——顺从的——记录时，我并不感到惊讶。现在他和我一起回忆起他作为校长的那个时期，并提到他曾经为另一位荣誉学位候选人提名，就是哲学家莱谢克·克拉柯夫斯基——但很困难，他说，因为克拉柯夫斯基曾经有“为五斗米折腰的经历”。此时提到克拉柯夫斯基从最初对苏联政权的依恋到随后早期的决裂是不是怀有恶意呢？这个形容词让我难以忘怀，这句话也很阴险。

我非常正式地穿上了黑色礼服并戴上了天鹅绒帽子，然后出发去加入同样的只是规模小一些的学者队伍，朝同一个辉煌的礼堂走去。我（有些摇晃地）走在队伍最后，就在校长前面，我非常喜欢这位校长，他是一位谦逊的、相当有智慧的化学家。为我指定的座椅位于三层讲台的一侧，前面有一个麦克风。没人给我介绍过仪式的程序，因此我感到有些孤独。身穿礼服的波兰学术界要人大多数坐在我身后，在我的前方，是座无虚席的大厅，心安神定的伊丽莎白坐在数百名德国人和波兰人中间。在一个女子合唱团演唱了《欢喜吧，波兰母亲》之后，校长严肃地宣布，根据历史和教育学院的建议，并经华沙大学理事会和波兹南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理事会积极的一致的评价，弗

罗茨瓦夫大学理事会决定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我尝试着用—个效果不佳的耳机去听这篇褒奖词断断续续的翻译，先是拉丁语，然后是波兰语，但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否听懂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我神思恍惚。只是又—阵音乐插曲才让我清醒过来，我再次想起了我的父母，他们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感受到他们生命中的痛苦甚至超过了欢乐，我迷失在思绪和画面的云彩中，感觉是那么深沉，但并不具体。这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我在—个黄色的便笺本上写下了一些感谢的话，我用这些话来解释为什么这项荣誉打动了我的内心。我看了一眼这些笔记，然而后来我用发自内心的话谈到了我对这个地方的复杂感受，“此地养育了我，然而此地又驱逐了我”。然后我念了—段我为孩子们写的1979年回到弗罗茨瓦夫的回忆录，当我走进我祖母的别墅时，当时的住户，—名前骑兵军官，让我看了我祖母的起居室，在那里——令我震惊的是——墙壁上贴着集中营囚犯画的画，而且，我还未来得及开口，他就解开衬衫让我看他身上被刺的图案，“在奥斯威辛、比克瑙和布痕瓦尔德被关了五年”，他解释道。在—张桌子上，靠近我祖母常常坐的地方，有—尊科尔贝神父的木制雕像，他在集中营里自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从而使另—个人幸免于难，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赋予了他特别的荣誉。在我童年时经常玩耍的可以俯瞰花园的阳台上，我们握了手。“这象征着—项所有权的转让，由我充满感激地、快乐地加以执行——突然之间，就是—个短暂的片刻，仿佛所有纠结的过去变得有意义了。我告诉他我很高兴他在那里……—瞬间我快乐地、充满感激地接受了这一切：在那个疯狂的世界里，总算也有些歪打正着的事情。”

在这个场合中，这种自发的某种东西回归了正道的感觉也充满了我的内心，这是—个和解的仪式。我祝愿这所大学在新的欧洲环境中好运连连并取得所有可能的成功；绚丽的烟花象征着学校师生们精彩

的想法，不论是旧的还是未来即将出现的。我转向这块荣誉之地：
“尊敬的校长，您把我过去的一部分还给了我，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您。”

游行队伍离开了，校长和我在队伍的最后面。当我们交谈时，他说他被我的话感动了；他的父亲曾被监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诺因加默（汉堡附近的一个恐怖营地）。他说，他希望我现在会认为自己是这所大学的一个成员——一个遥远的家？

他把我过去的一部分归还给了我。我一直希望能够得到公平，我也一直希望能够忠诚于我过去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在尚未被摧毁之前将我与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世界联系了起来，我还要尊重其中正确的东西并理解它遭受的破坏。我回到了我的生命来源之地，我触摸到了一个塑造了我的世界。当时的感觉真好，现在仍然如此。

[1] 这所大学是典型的中欧史的缩影。哈布斯堡皇帝利奥波德于1702年在布雷斯劳建立了一个耶稣会机构，这个时间一直被看作这所大学诞生的时间。1756年，腓特烈大帝征服了西里西亚，将这所大学置于普鲁士-新教徒的统治之下。而在1811年，普鲁士在面对拿破仑的新军团时惨遭失败，随后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和他的首席大臣威廉·冯·洪堡重建了这所大学，将其作为普鲁士改革时期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母曾经读的就是这所大学。1933年后，这所大学变得超级纳粹化。然后，在1945年11月，来自利沃夫大学（利沃夫这座城市合并给了苏联的乌克兰）的波兰学者和教授同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一样，不得不向西迁移数百英里，在弗罗茨瓦夫大学重建他们的学院。

致谢

这本书有其自身的历史，且始于欧洲。1998年，我在荷兰高等研究院度过了几个月，研究院院长、我的历史学家同行亨克·韦塞林决定让我在年终典礼上做一次演讲——话题不限。我说了我还有其他工作的托词，但他置之不理，只是给了我一个忠告：“要谈谈你的个人经历。”于是，我便说起了“我的五个德国”，荷兰高等研究院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稿。我以为，这一篇章就到此结束了。

回到美国，我给几位朋友看了这篇讲稿，其中有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公司的总裁罗杰·W.施特劳斯。罗杰把这篇讲稿看作一本书的萌芽，并建议由他来出版这本书。我原以为是个短期任务的项目，因此签下了合同，但这本书发展成了自己的长期目标。我欠下了罗杰一个人情，而且我很遗憾他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完成。

我很幸运由丽贝卡·塞尔坦作为我的第一任编辑，她很明智，善于劝告，直到她离开去另一家出版社担任新职。埃里克·钦斯基豪爽地承担起了繁重的未经消化的遗留任务，他文学上的敏锐和极好的教师般的幽默赋予了这个项目新的生命。读者和我都要十分感谢他的精简意识：现有的页面同已被删除的页面一样，都带有他半严半松的判断的印记。

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莱昂内尔·戈斯曼——一位文学普遍主义者——阅读了早期的章节，注意到了文体上的不适当之处，并发现了大

的但只是部分得到了扩展的主题。他能理解我的意图，这就提升了我的士气。当文稿快要完成时，我请了三位朋友和同事做一次批判性的阅读：拉尔夫·达伦多夫以其精辟的评论重新启动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传统，这个传统可追溯到近半个世纪之前；詹姆斯·希恩和于尔根·科卡的评论极有帮助地大大扩展了我们曾经的无数次对话。巴黎的罗杰·埃雷拉也给了我额外的建议和鼓励。几十年来，对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朋友，我已经累积欠下了一笔巨大的友情债务。我希望这本书是我一生中友谊的见证。

在整理家族文档以及相关杂务这类需要智慧的工作中，我得到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卡琳·勒佩尔在开始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乔斯林·维尔克耐心地整理了凌乱无序的文件，而乔纳森·谢宁则以良好的幽默感和专业知识为最终的手稿做了充分的准备。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孩子们的，他们的爱和支持是不可估量的礼物。他们牢牢扎根于美国，在我不时地涉足熟悉的外国土地时给了我精神上的维系。

我的妻子伊丽莎白·西弗顿自始至终在为我提升生活质量，她是欢乐无忧的，且富有判断力，这些在我的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她理解我与我的祖先的家园的新关系，并乐于与我分享。她一直在我身边为我提供深刻和有先见之明的帮助，她偶尔坦率的恼怒起到了急需的刺激作用。我对她的感激之情是无限的。

在为这本平装书做准备的过程中，我能够有机会纠正原版中的一些错误。我很感谢提醒我这些细节的朋友们和读者们。在准备这个版本时，助理编辑吉娜·哈姆肖同以前一样，始终尽最大的努力，在文稿和精神上迅速地给予我帮助。

对照表

A Mighty Fortress 《坚固保障歌》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

Aachen University 亚琛大学

Aage 奥格

Abraham Pais 亚伯拉罕·派斯

Action Française 法兰西运动

Ad Hoc Faculty steering committee 特设教员指导委员会

Adam Hochschild 亚当·霍赫希尔德

Adam Kirsch 亚当·基尔希

Adam Michnik 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

Adam Wazyk 亚当·韦兹克

Adlai Stevenson 阿德莱·史蒂文森

Admiralty 海军部

Adolf Busch 阿道夫·布施

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Hitler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Theis 阿道夫·泰斯

AFL-CIO 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

Ainslie Embree 安斯利·恩布里

Akademiske Hotel 阿卡迪米斯科酒店

Al-Ahram 《金字塔报》

Alain Peyrefitte 阿兰·佩雷菲特

Alan Brinkley 艾伦·布林克利

Alan Bullock 艾伦·布洛克

Albert Camus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阿尔伯特·加缪

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Hirschman 阿尔伯特·赫希曼

Albert Neisser 阿尔伯特·奈塞尔

Albert Soboul 阿尔伯特·索布尔

Albert Wagner 阿尔伯特·瓦格纳

Alcide De Gasperi 阿尔契·德·加斯贝利

Aldo Moro 阿尔多·莫罗

Aleksandr Nekrich 亚历山大·内克里奇

Alexander Bittorf 亚历山大·比托夫

Alexander Dallin 亚历山大·达林

Alexander Dubcek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Alexander Gabriel 亚历山大·加布里尔

Alexander Gerschenkron 亚历山大·格申克隆

Alexander Nevsky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Alfonso López Trujillo 阿方索·洛佩兹·特鲁希略

Alfred A. Knopf 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

Alfred Hugenberg 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西线无战事》

Allan Nevins 艾伦·内文斯

Allen Dulles 艾伦·杜勒斯

Allen Ginsberg 艾伦·金斯伯格

Allied Control Council 盟国管制委员会

Allied High Commission 盟国最高委员会

Alma 阿尔玛

Alois Alzheimer 阿洛伊斯·阿尔茨海默

Alois Hundhammer 阿洛伊斯·洪德哈默尔

Alsace-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Alvin Johnson 阿尔文·约翰逊

American Assembly 美国国内及外交政策智库大会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n Germany 美国对德协会

American Forum on the Air 《美国空中论坛》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美国历史协会

Amnesty International 大赦国际

Amos Oz 阿摩司·奥兹

Amrum 阿姆鲁姆岛

Anatole de Monzie 阿纳托利·德·蒙西

Anatomy Lesson 《解剖课》

André Maurois 安德列·莫鲁瓦

Andrei Kokoshin 安德烈·科科申

Andrei Sakharov 安德烈·萨哈罗夫

Andrei Vishinsky 安德烈·维辛斯基

Andreotti 安德烈奥蒂

Andropov 安德罗波夫

Angela Merkel 安吉拉·默克尔

Anna Akhmatova 安娜·阿赫玛托娃

Annette Labourey 安妮特·拉博瑞

Anthony Eden 安东尼·艾登

Antônio de Oliveira Salazar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

Antonio La Pergola 安东尼奥·拉·佩尔戈拉

Anwar Sadat 安瓦尔·萨达特

Arbatov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 and Canada 阿尔巴托夫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Archibald Cox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

Arden House 雅顿庄园

Ariel Sharon 阿里尔·沙龙

Arnold Berliner 阿诺德·贝利纳

Arnold Zweig 阿诺德·茨威格

Arras 阿拉斯

Arseny Roginsky 阿尔谢尼·罗津斯基

Arthur Burns 亚瑟·伯恩斯

Arthur M. Schlesinger 亚瑟·M.施莱辛格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亚瑟·莫勒·范登布鲁克

Arthur Stoll 亚瑟·斯托尔

Arthur Sulzberger 亚瑟·苏兹伯格

Artur Schnabel 阿图尔·施纳贝尔

Aspen Institute 阿斯彭研究所

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

Auden 奥登

Auerbach-Keller 奥尔巴赫-凯勒

Aufbau 《结构》

August 1968 《1968年8月》

Augusta 奥古斯塔

Aurora “阿芙乐尔号”

Auschwitz 奥斯威辛

Averell Harriman 埃夫里尔·哈里曼

Avishai 阿维沙伊

Axel Springer 阿克塞尔·斯普林格

Baader-Meinhof 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

Backing Hitler: 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 《支持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共识与胁迫》

Bad Godesberg 巴特戈德堡

Baden 巴登

Baden-Württemberg 巴登-符腾堡州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言》

Balkans 巴尔干地区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Balzac 巴尔扎克

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银行街教育学院

Barbara Ritter 芭芭拉·里特

Barlach 巴拉赫

Barnard College 巴纳德学院

Baron James de Rothschild 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

Barry Goldwater 巴里·戈德华特

Barry Hayward 巴里·海沃德

Barthold Niebuhr 巴特尔德·尼布尔

Barzun 巴尔赞

Basel 巴塞尔

Basler Nationalzeitung 《巴斯勒民族报》

Bauhaus 包豪斯建筑学派

Bavaria 巴伐利亚

Bay of Pigs 猪湾事件

Beck 贝克

Begegnungen 《遭遇》

Behemoth 《巨兽》

Belo Horizonte 贝洛哈里桑塔

Bendlerstrasse 班德勒大街

Benno Ohnesorg 本诺·欧内索格

Bentley 本特利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Bergen-Belsen 卑尔根-贝尔森

Berkeley 伯克利

Berlin-Dahlem 柏林-达勒姆区

Berliner Ensemble 柏林剧团

Berlinguer 贝林格

Bernd Schmidbauer 贝恩德·施密德鲍尔

Bernhard Heller 伯恩哈德·海勒

Bernhard Naunyn 伯恩哈德·瑙宁

Bernhard Schottländer 伯恩哈德·肖特兰德

Bernhard Vogel 伯恩哈德·沃格尔

Bern 伯尔尼

Bertolt Brecht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ethmann Hollweg 贝特曼·霍尔韦格

Betty 贝蒂

Between Repression and Reform 《镇压与改革之间》

Beveridge Report 贝弗里奇报告

Biafra 比亚法拉

Bill Bradley 比尔·布拉德利

Bill Bundy 比尔·邦迪

Bill Clinton 比尔·克林顿

Birkenau 比克瑙

Bismarck 俾斯麦

Bitburg 比特堡

Blankenese 布兰克内瑟

Bogotá 波哥大

Bohemia 波希米亚

Bonn 波恩

Boris Mirkine-Guetzevich 鲍里斯·米尔金-格耶茨维奇

Boris Yeltsin 鲍里斯·叶利钦

Borsig 博尔西希

Bosnia-Herzegovina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outros Boutros-Ghali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Brather 布雷特

Braunschweig 布伦瑞克

Breckenridge Long 布雷肯里奇·朗

Bredow 布雷多

BregagliaValley 布雷加利亚山谷

Breslau 布雷斯劳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Brezhnev 勃列日涅夫

Brieger 布瑞格

Bronislaw Geremek 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

Bruno Kreisky 布鲁诺·克赖斯基

Bryn Mawr College 布林莫尔学院

Buchenwald 布痕瓦尔德

Budden-brooks 《布登勃洛克家族》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ndestag 联邦议院

Bunzel 邦策尔

Burckhardt 布尔克哈特

Burke 伯克

Burlington 伯灵顿

Byron Dobell 拜伦·多贝尔

C. Vann Woodward C. 范恩·伍德沃德

Cabildo 《卡比尔多》

Cain 该隐

Cairo 开罗

Caldecote 考尔德科特

Calvinist 加尔文教派

Camarilla 卡玛利拉

Capek 卡佩克

Captiva Island 卡普蒂瓦岛

Cardinal Newman 红衣主教纽曼

Cardinal Wojtyla 红衣主教沃伊蒂瓦

Carl Duisberg 卡尔·杜伊斯伯格

Carl Kaysen 卡尔·凯森

Carl Neuberg 卡尔·纽伯格

Carl Schmitt 卡尔·施密特

Carl Schorske 卡尔·休斯克

Carl von Ossietzky 卡尔·冯·奥西耶茨基

Carleen Roeper 卡琳·勒佩尔

Carl-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

Cassandras 卡珊德拉

Castasegna 卡斯塔塞格纳

Castel Gandolfo 冈多菲堡

Castlereagh 卡斯尔雷

Castro 卡斯特罗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Catholic Center Party 天主教中央党

Catskills 卡茨基尔区

CDU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基督教民主联盟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

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Jewish Faith 犹太信仰德国公民中心联盟

Cé zanne 塞尚

Chaim Weizmann 哈依姆·魏茨曼

Charles Boyd 查尔斯·博伊德

Charles de Gaulle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Frankel 查尔斯·弗兰克尔

Charles Lindbergh 查尔斯·林德伯格

Charles Maurras 查尔斯·莫拉斯

Charles Powell 查尔斯·鲍威尔

Charter 77 《七七宪章》

Chatham House 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ernobyl 切尔诺贝利

Children Discover Arithmetic 《孩子们探索算术》

Christa Armstrong 克丽丝塔·阿姆斯特朗

Christa Wolf 克里斯塔·沃尔夫

Christian Daniel Rauch 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

Christian Hamburg 克里斯蒂安·汉堡

Christoph Bertram 克里斯托弗·伯特伦

Chur 库尔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文明及其缺陷》

Claire 克莱尔

Clarence Thomas 克拉伦斯·托马斯

Clark Clifford 克拉克·克利福德

CLASCO 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

Claudio Veliz 克劳迪奥·韦利兹

Claus Duisberg 克劳斯·杜伊斯堡

Clemenceau 克莱蒙梭

Clement Attlee 克莱门特·艾德礼

Clifford Geertz 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o 克利俄

Cologne 科隆

Comecon 经互会（苏联集团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Commentary 《评论》

Committee for the Free World 自由世界委员会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Compiègne 贡皮埃涅市

comte de St. Vallier 圣瓦利埃伯爵

Conference of Latin American Bishops 拉丁美洲主教会议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欧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

Congress Party 国大党

Connaught Square 康诺特广场

Conrad Ferdinand Meyer 康拉德·费迪南德·梅耶尔

Copacabana 科帕卡巴纳海滩

Corinth 柯林斯

Corsica 科西嘉岛

Cosima von Bülow 柯西玛·冯·比洛

Côte d' Azur 蔚蓝海岸

Council for Democracy 民主理事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rtauld Institute 考陶尔德学院

Craufurd Goodwin 克劳福德·古德温

Croatia 克罗地亚

Crottorf 克罗托夫

Croydon 克里登

CSU 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

Curtis Oratorical medal 柯蒂斯演讲大赛

Cyrus Vance 赛勒斯·万斯

Czeslaw Milosz 切斯瓦夫·米沃什

Czeslaw Ostankowicz 切斯瓦夫·奥斯坦科维奇

Dabrowski 达布罗夫斯基

Dagmar Nick 达格玛·尼克

Dahlem 达勒姆

Daimler-Benz 戴姆勒-奔驰

Dalcroze method 达克罗兹教学法

Dan Quayle 丹·奎尔

Daniel Bell 丹尼尔·贝尔

Daniel Goldhagen 丹尼尔·戈尔德哈根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zig 但泽市

Dark Times 《黑暗时代》

Dartmouth 达特茅斯

David Bell 大卫·贝尔

David Ben-Gurion 大卫·本-古里安

David Calleo 大卫·卡莱奥

David Cannadine 大卫·卡纳丁

David de Levita 大卫·德·莱维塔

David Dubinsky 大卫·杜宾斯基

David Ginsburg 大卫·金斯伯格

David Landes 大卫·兰德斯

David Lilienthal 大卫·李林塔尔

David Lloyd George 大卫·劳埃德·乔治

David Low 大卫·罗

David Marwell 大卫·马维尔

David Riesman 大卫·理斯曼

David Rockefeller 大卫·洛克菲勒

David Schoenbaum 大卫·舍恩鲍姆

David Shapiro 大卫·夏皮罗

David Truman 大卫·杜鲁门

Dayton 代顿

Dean Acheson 迪安·艾奇逊

Dean Dixon 迪恩·迪克森

Deborah 黛博拉

DeGrasse 德格拉斯

Denis de Rougemont 丹尼斯·德·鲁热蒙

Denis Thatcher 丹尼斯·撒切尔

der Alte Asch 德·阿尔特·阿希

Der Spiegel 《明镜周刊》

Der Stürmer 《冲锋队员》

Deutsche Gesellschaft 1914 德意志协会1914

Deutsche Nationalstiftung 德国国家基金会

Deutsche Nationalstiftung 德意志民族基金会

Deutschland 《德国》

Deux Magots 双偶咖啡馆

Diana Trilling 黛安娜·特里林

Diane Arbus 黛安·阿勃丝

Dick Hofstadter 迪克·霍夫斯塔特

Dick Neisser 迪克·奈塞尔

Die Fledermaus 《蝙蝠》

Die Moorsoldaten 《沼泽战士》

Die Welt 《世界报》

Die Zeit 《时代周报》

Dieter Kastrup 迪特尔·卡斯特鲁普

Dietrich Bonhoeffer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Disraeli 迪斯雷利

Divided Heaven 《分裂的天堂》

Dmitri Melnikov 德米特里·梅尔尼科夫

Dog Years 《狗年月》

Domme 多姆

Don Carlos 《唐·卡洛斯》

Donald Hays 唐纳德·海斯

Donald Kennedy 唐纳德·肯尼迪

Donald McKay 唐纳德·麦凯

Donald Rumsfeld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na Shalala 唐娜·沙拉拉

Doon 杜恩

Dordogne 多尔多涅

Dorothee Schleicher 多萝特·施莱谢尔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uglas Hurd 格拉斯·赫德

Douglas MacArthur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Dr 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ow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
夫妇

Dr. Leopold-Lucas Prize 利奥波德·卢卡斯博士奖

Dresden 德累斯顿

Dreyfus Affair 德雷福斯事件

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 《把苏联人赶上墙》

Dubcek 杜布切克

Dunkirk 敦刻尔克

Dwight D. Eisenhower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East Germany's Academy of Public Law 东德公法研究院

Eastern Establishment 美国东部权势集团

Eberhard Jaeckel 埃伯哈德·耶克尔

Eckert 埃克特

Edgar Bronfman 埃德加·布朗夫曼

Edgar von Zerboni 埃德加·冯·泽博尼

Edith Stein 伊迪丝·施泰因

Edmond Vermeil 埃德蒙·韦尔梅依

Edmund Burke 埃德蒙·伯克

Edmund Heines 埃德蒙·海因斯

Edna Margalit 埃德娜·玛格里特

Eduard Goldstücker 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

Edward Gierak 爱德华·盖莱克

Edward Grey 爱德华·格雷

Edward R. Murrow 爱德华·R.默罗

Edward Said 爱德华·萨义德

Edzard Reuter 埃查德·罗伊特

Efim Etkind 叶菲姆·埃特金

Egon Bahr 埃贡·巴尔

Egon Krenz 埃贡·克伦茨

Eichmann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instein's German World 《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

Einstein's Germany 《爱因斯坦的德国》

Eisenach 艾森纳赫

Eleanor Roosevelt 埃莉诺·罗斯福

élie Halévy 埃利·阿莱维

Elie Wiesel 埃利·维瑟尔

Elisabeth Sifton 伊丽莎白·西弗顿

Elli Hacks 埃莉·哈克斯

Elliot Cohen 艾略特·科恩

Ellis Island 埃利斯岛

Els Glastra van Loon 埃尔丝·格拉斯特拉·凡·隆

Emergency Committee for German Science 德国科学紧急状态委员会

Emergency Union of Protestant Pastors 新教牧师紧急联盟

Emil Ludwig 埃米尔·路德维希

Emil Nolde 埃米尔·诺尔德

Émile 《爱弥儿》

Emma Rothschild 艾玛·罗斯柴尔德

Emperor Friedrich 腓特烈三世

Engadine Valley 恩加丁山谷

Erfurt 爱尔福特

Erhard Eppler 艾哈德·埃普勒

Eric Chinski 埃里克·钦斯基

Eric Hobsbawm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h Frank 埃里希·弗兰克

Erich Honecker 埃里希·昂纳克

Erich Ludendorff 埃里希·鲁登道夫

Erich Maria Remarque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Erik Erikson 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a Mann 艾丽卡·曼

Erna 埃纳

Ernest 欧内斯特

Ernestine Schlant 欧内斯汀·施兰特

Ernst Barlach 恩斯特·巴拉赫

Ernst Eckstein 恩斯特·埃克斯坦

Ernst Engelberg 恩斯特·恩格尔伯格

Ernst Fraenkel 恩斯特·弗兰克尔

Ernst Hamburger 恩斯特·汗布格尔

Ernst Nolte 恩斯特·诺尔特

Ernst Reuter's Collected Papers 《恩斯特·罗伊特论文选集》

Ernst Reuter 恩斯特·罗伊特

Ernst Schwerin 恩斯特·施韦林

Ernst Thälmann 恩斯特·台尔曼

Ernst Troeltsch 恩斯特·特罗尔奇

Ernst vom Rath 恩斯特·冯·拉特

Ernst von Salomon 恩斯特·冯·所罗门

Erwin Chargaff 埃尔文·查戈夫

Erwin Rommel 埃尔温·隆美尔

Eugene Ivanov 尤金·伊万诺夫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二十世纪的欧洲》

European Commission 欧洲委员会

Ewald 埃瓦尔德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Fano island 法诺岛

Fatherland Party 祖国党

Faulkner 福克纳

Faust 《浮士德》

Faust 浮士德

FDP 自由民主党

Felipe González 费利佩·冈萨雷斯

Felix Frankfurter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

Felix Gilbert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

Felix Krull 弗利克斯·克鲁尔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

Ferdinand Freiligrath 费迪南德·弗赖利格拉斯

Ferdinand Lassalle 费迪南德·拉萨尔

Ferdinand Sauerbruch 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Fidelio 《菲德里奥》

Fiorello La Guardia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

Flaubert 福楼拜

Florence Willstätter 佛洛伦斯·维尔施泰特

Florence 佛罗伦萨

Florestan Fernandes 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

Fortuna 福尔图娜

Fragebogen 《问卷调查》

Francine Kiefer 弗朗辛·基弗

Francis Fukuyama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o 弗朗哥

François Furet 弗朗索瓦·弗雷

François Mauriac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François Mitterrand 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k Sutton 弗兰克·萨顿

Frank Wisner 弗兰克·威斯纳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法兰克福汇报》

Frankfurter Rundschau 《法兰克福评论报》

Frankfurt 法兰克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Franklin Ford 富兰克林·福特

Franz Ferdinand 弗朗茨·费迪南

Franz Joseph Strauss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Franz Neumann 弗朗茨·诺依曼

Franz Schnabel 弗朗茨·施纳贝尔

Franz von Papen 弗朗茨·冯·帕彭

Franz Werfel 弗朗兹·韦尔弗

Frau Ute 乌特夫人

Frauenwohl 妇女福祉俱乐部

Fraunces Tavern 弗朗西斯酒馆

Fray 弗雷

Frederick Burkhardt 弗雷德里克·伯克哈特

Frederick II, Prussian king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Fred 弗雷德

Free Corps 自由兵团

Free French 自由法国阵线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自由大学

Freiburg 弗莱堡

Freud 弗洛伊德

Fried von Bismarck 弗里德·冯·俾斯麦

Friedrich Ebert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Meinecke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

Friedrich Nietzsche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Schorlemmer 弗里德里希·肖莱马

Friedrichsruh 弗里德里希斯鲁

Friedrichstein 弗里德里希施泰因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

Fritz Bauer 弗里茨·鲍尔

Fritz Demuth 弗里茨·德穆特

Fritz Erler 弗里茨·厄勒尔

Fritz Fischer 弗里茨·费舍尔

Fritz Haber 弗里茨·哈伯

Fritz Klein 弗里茨·克莱因

Fritz Kuhn 弗里茨·库恩

Fritz Stern 弗里茨·斯特恩

Fulton 富尔顿

Fürth 菲尔特

Fustel de Coulanges 菲斯泰尔·德·古郎士

Gail Potter 盖尔·波特

Gamal Nasser 贾迈勒·纳赛尔

Gamassi 加马西

Garden of Gethsemane 客西马尼花园

Gareth Stedman-Jones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

Gaude, Mater Polonia 《欢喜吧，波兰母亲》

Gaudeamus igitur 《让我们欢乐吧》

Gaza 加沙

Gdansk 格但斯克

G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Gelya Gorelosa 格尔雅·戈尔罗沙

Gena Hamshaw 吉娜·哈姆肖

Geoffrey Barraclough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rg Brandes 乔治·勃兰兑斯

Georg Eckert 格奥尔格·埃克特

Georg Quabbe 乔治·夸贝

George Bernard Shaw 乔治·萧伯纳

George Franklin 乔治·富兰克林

George Grosz 乔治·格罗茨

George Kennan 乔治·凯南

George Lichtheim 乔治·利希特海姆

George Marshall 乔治·马歇尔

George Orwell 乔治·奥威尔

George Rupp 乔治·鲁普

George Shultz 乔治·舒尔茨

George Shuster 乔治·舒斯特

George Soros 乔治·索罗斯

George Stigler 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Urban 乔治·乌尔班

George W. Bush 乔治·W. 布什

Georges Castellan 乔治斯·卡斯泰兰

Georges Pompidou 乔治·蓬皮杜

Georgi Dimitrov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Georgyi Arbatov 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

Gerald Ford 杰拉尔德·福特

Gerald Freund 杰拉尔德·弗罗因德

Gerhard Ritter 格哈德·里特尔

Gerhard Schröder 格哈特·施罗德

Gerhart Hauptmann 格哈特·豪普特曼

Gerhart Riegner 格哈特·里格纳

German Academ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德国语言和文学
学会

German Nationalist Party 德国国家人民党

German Parliamentary-Council 德国议会理事会

Germantown 日耳曼敦

Germany in a Semi-Gaullist Europe 《在半戴高乐主义的欧洲
中的德国》

Germany: A Winter's Tale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Germany: To Be or Not to Be 《德国：生存与毁灭》

Gershom Scholem 格肖姆·肖勒姆

Gershon Kekst 格申·凯克斯特

Gerson Bleichröder 格尔森·布莱希罗德

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

Gestapo 盖世太保

Gilbert de Botton 吉尔伯特·德·波顿

Gladstone 格莱斯顿

Goddard Winterbottom 戈达德·温特伯顿

Godesberg Program 《哥德斯堡纲领》

Goerke 戈尔克

Goethe 歌德

Golda Meir 果尔达·梅厄

Golo Mann 戈洛·曼

Gordon Craig 戈登·克雷格

Gordon Wright 戈登·赖特

Gordonstoun 戈登斯顿

Gorky 高尔基市

Gospel of St. John 《约翰福音》

Gotha 哥达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Göttingen 哥廷根

Grand Inquisitor 《宗教大法官》

Grayson Kirk 格雷森·柯克

Great Neck 大颈区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苏联大百科全书》

Green Mountains 青山山脉

Gregor Gysi 格雷戈尔·吉西

Gret Kubelka 格雷特·库贝尔卡

Grete 格蕾特

Grossinger's Hotel 格罗辛格酒店

Guadalajara 瓜达拉哈拉

Guadeloupe 瓜德罗普

Gulag Archipelago 《古拉格群岛》

Günter Grass 君特·格拉斯

Günter Schwerin 君特·施韦林

Gustav Dahrendorf 古斯塔夫·达伦多夫

Gustav Doré 古斯塔夫·多雷

Gustav Neisser 古斯塔夫·奈塞尔

Gustav Radbruch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Gustav Stresemann 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Gustl 古斯特尔

Gütergotz 居特郭茨

Habsburg Empire 哈布斯堡帝国

Hague Convention 《海牙公约》

Hai Phongport 海防港

Haile Selassie 海尔·塞拉西

Hajo Holborn 哈乔·霍尔本

Halle 哈雷

Hampstead 汉普斯特德

Hanna Gray 汉娜·格雷

Hanna Landmann 汉娜·朗曼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

Hanne Kubelka 汉娜·库贝尔卡

Hanns-Martin Schleyer 汉斯-马丁·施莱尔

Hans A. Bethe 汉斯·A. 贝特

Hans Arnhold 汉斯·阿恩霍尔德

Hans Biberstein 汉斯·比贝尔施泰因

Hans Freiherr von Kress 汉斯·弗雷赫尔·冯·克雷斯

Hans Globke 汉斯·格洛布克

Hans Jonas 汉斯·乔纳斯

Hans Küng 汉斯·孔

Hans Modrow 汉斯·莫德罗

Hans Neisser 汉斯·奈塞尔

Hans Poelzig 汉斯·珀尔茨希

Hans Roessner 汉斯·勒斯纳

Hans Rosenberg 汉斯·罗森伯格

Hans Schneider 汉斯·施奈德

Hans Schwerte 汉斯·施韦特

Hans Tietmeyer 汉斯·蒂特迈耶

Hans-Dietrich Genscher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Georg Wieck 汉斯-乔治·维克

Hans-Jochen Vogel 汉斯-尧赫·沃格尔

Hans-Ulrich Wehler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尔

HAPAG shipping company 哈巴格航运公司

Hardinac von Hatten 哈迪纳克·冯·哈滕

Harold Ickes 哈罗德·伊克斯

Harold Macmillan 哈罗德·麦克米伦

Harold Noah 哈罗德·挪亚

Harold Poor 哈罗德·普尔

Harro Schulze-Boysen 哈罗·舒尔策-博伊森

Harry Truman 哈里·杜鲁门

Hartley 哈特利

Hartmut Schulze-Boysen 哈特穆特·舒尔策-博伊森

Harvey Bundy 哈维·邦迪

Harvey Cushing 哈维·库欣

Harwich 哈维奇

Hatten 哈滕

Haydn 海顿

Hedwig Brieger 海德薇格·布瑞格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Heinrich Böll 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rüning 海因里希·布吕宁

Heinrich Dove 海因里希·德夫

Heinrich Grüber 海因里希·格吕贝尔

Heinrich Heine 海因里希·海涅

Heinrich Himmler 海因里希·希姆莱

Heinrich Senfft 海因里希·塞夫特

Heinrich von Lehndorff 海因里希·冯·莱恩多夫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海因里希·冯·特雷齐克

Heinrich Lübke 海因里希·吕布克

Heisig 诺伯特·海希西

Helen Dukas 海伦·杜卡斯

Helge Pross 海尔格·普罗斯

Helmut Kohl 赫尔穆特·科尔

Helmut Schmidt 赫尔穆特·施密特

Helmuth Becker 赫尔穆特·贝克尔

Helsinki Final Act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

Helsinki Watch committee 赫尔辛基观察委员会

Henk Wesseling 亨克·韦塞林

Henning Köhler 亨宁·克勒

Henry Arnhold 亨利·阿恩霍尔德

Henry James 亨利·詹姆斯

Henry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

Henry Morgenthau 亨利·摩根索

Henry R. Luce 亨利·R. 鲁斯

Henry Roberts 亨利·罗伯茨

Henry Wallace 亨利·华莱士

Henryk Erlich 亨利克·埃里奇

Herbert Freundlich 赫伯特·弗伦德里希

Herbert Hupka 赫伯特·赫普卡

Herbert Lehmann 赫伯特·莱曼

Herbert Lüthy 赫伯特·吕特

Herbert Marcuse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Wehner 赫伯特·韦纳

Herder 赫尔德

Hermann Axen 赫尔曼·阿克森

Hermann Count Hatzfeldt 赫尔曼·哈茨费尔特伯爵

Hermann Eilts 赫尔曼·艾尔特斯

Hermann Geyer 赫尔曼·盖尔

Hermann Glaser 赫尔曼·格拉泽

Hermann Goering 赫尔曼·戈林

Hermann Haber 赫尔曼·哈伯

Hermann Hatzfeldt 赫尔曼·哈茨费尔特

Hermann Lübbe 赫尔曼·吕贝

Hermann Lüdemann 赫尔曼·吕德曼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err Hecht 赫克特先生

Hertha Kraus 赫莎·克劳斯

Herzen Pedagogical Institute 赫尔岑教育学院

Hesse 黑森

Hildegard Hamm-Brücher 希尔德加德·哈姆-布鲁赫

Himmler 希姆勒

Hindenburg 兴登堡

History and Society 《历史与社会》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英国人民史》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希特勒的自觉帮凶：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

Hjalmar Schacht 亚尔马·沙赫特

Hoboken 霍博肯

Hoechst pharmaceutical company 赫斯特制药公司

Holocaust 《大屠杀》

Hope Against Hope 《对抗希望的希望》

Hope Harrison 霍普·哈里森

Horst Ehmke 霍斯特·耶姆克

Horst Teltschik 霍斯特·特尔切克

Horst-Wessel 《霍斯特·威塞尔之歌》

Hôtel Dieu 主宫医院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Howard Johnson 霍华德·约翰逊

Hradcany 哈诺德卡尼城堡

Hubert Lyautey 赫伯特·利奥泰

Hugh Seton-Watson 休·塞顿-沃森

Hugh Trevor-Roper 休·特雷弗-罗珀

Hughenden Manor 休恩登庄园

Humboldt University 洪堡大学

Hundertwasser 百水先生

I. I. Rabi 伊西多·伊萨克·拉比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Ibsen 易卜生

IG Farben Building 法本化学公司大楼

Ignatz Bubis 伊格纳茨·布比斯

Ignazio Silone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

Ile St. Louis 圣路易岛

Immanuel Kant 伊曼努尔·康德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

Imre Nagy 伊姆雷·纳吉

In Memoriam. 20. Juli 1944. Den Freunden zum Gedächtnis
《深切怀念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遇难的朋友们》

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 独立社会党

Indira Gandhi 英迪拉·甘地

Institut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巴黎政治学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 《国际学生运动》

Internationale 《国际歌》

Irene 艾琳

Irgun 伊尔贡

Irving Kristol 欧文·克里斯托

Isaac Stern 艾萨克·施特恩

Isabel Peró n 伊萨贝尔·庇隆

Isaiah Berlin 以赛亚·伯林

Isfahan 伊斯法罕

Ismar Schorsch 伊斯玛·朔尔施

Israel Tal 伊萨拉耶尔·塔尔

Israel 伊斯雷尔

István Deák 伊什特万·迪克

Ithiel de Sola Pool 伊契尔·索勒·普尔

Ivan Denisovich 伊凡·杰尼索维奇

Ivo Lederer 伊沃·莱德勒

Jack Embling 杰克·恩布林

Jackson Heights 杰克逊高地

Jackson-Vanik Amendment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Jacob Burckhardt 雅各布·布克哈特

Jacob Potofsky 雅各布·波托夫斯基

Jacob Taubes 雅各布·陶伯斯

Jacobo Timerman 雅各布·蒂莫曼

Jacques Barzun 雅克·巴尔赞

Jacques Delors 雅克·德洛尔

Jacques Droz 雅克·德罗兹

James Baker 詹姆斯·贝克

James Billington 詹姆斯·比林顿

James Byrnes 詹姆斯·伯恩斯

James Chace 詹姆斯·蔡斯

James Conant 詹姆斯·科南特

James Franck 詹姆斯·弗兰克

James Joll 詹姆斯·乔尔

James Sheehan 詹姆斯·希恩

James Wolfensohn 詹姆斯·沃尔芬森

Jan Masaryk 扬·马萨里克

Janusz Reiter 雅努什·赖特尔

Janus 杰纳斯

Jay Winter 杰伊·温特

Jean Bruneau 让·布吕诺

Jean Jaurès 让·饶勒斯

Jean Mercier 让·梅西耶

Jean Monnet 让·莫内

Jean Moulin Club 让·穆兰俱乐部

Jean-François Revel 让-弗朗索瓦·勒维尔

Jeckes 耶克斯

Jens Reich 延斯·赖希

Jerome 杰罗姆

Jerry Avorn 杰瑞·埃冯

Jerry Gliklich 杰瑞·格利克里奇

Jerzy Dabrowski 耶日·达布罗夫斯基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纽约犹太神学院

Jimmy Carter 吉米·卡特

Joachim Bitterlich 约阿希姆·比特利希

Joachim Fest 约阿希姆·费斯特

Joachim Gauck 约阿希姆·高克

Jobst 约布斯特

Jocelyn Wilk 乔斯林·维尔克

Joe Louis 乔·路易斯

Johan Huizinga 约翰·赫伊津哈

Johann Mikulicz 约翰·米库利兹

Johannes Gymnasium 约翰内斯文理中学

Johannes Rau 约翰内斯·劳

John Bowlby 约翰·鲍尔比

John Cannon 约翰·坎农

John Cowles 约翰·考尔斯

John Dewey 约翰·杜威

John F. Kennedy 约翰·F. 肯尼迪

John J. McCloy 约翰·J. 麦克洛伊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Oakes 约翰·奥克斯

John Palfrey 约翰·帕弗瑞

John Plamenatz 约翰·布莱梅尼茨

John Shalikashvili 约翰·沙利卡什维利

John Stuart Mill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ny LaFarge 约翰尼·拉法基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nathan Shainin 乔纳森·谢宁

Jorge Semprun 乔治·塞姆朗

Joschka Fischer 约施卡·菲舍尔

Josef Goebbels 约瑟夫·戈培尔

José Martínez de Hoz 何塞·马丁内斯·德·霍兹

Joseph Bloch 约瑟夫·布洛赫

Joseph Blumenfeld 约瑟夫·布卢门菲尔德

Joseph Jadassohn 约瑟夫·雅达松

Joseph Kennedy 约瑟夫·肯尼迪

Joseph Kraft 约瑟夫·克拉夫特

Joseph Lister 约瑟夫·李斯特

Joseph Wirth 约瑟夫·维尔特

Juan Carlos 胡安·卡洛斯

Julius Langbehn 尤利乌斯·朗贝

Julius Streicher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

July' 14 《七月十四日》

Jungfrau 少女峰

Jürgen Habermas 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

Jürgen Kuczynski 于尔根·库钦斯基

Kadar 卡达尔

Kafka 卡夫卡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Physical Chemistry 威廉皇帝
物理化学研究所

Kaiser Wilhelm Strasse 恺撒威廉大街

Kalinin Prospekt 加里宁大道

Kamenev 加米涅夫

Kant 康德

Karamanlis 卡拉曼利斯

Karl Bonhoeffer 卡尔·朋霍费尔

Karl Carstens 卡尔·卡斯滕斯

Karl Hacks 卡尔·哈克斯

Karl Jaspers 卡尔·雅斯贝尔斯

Karl Kraus 卡尔·克劳斯

Karl Liebknecht 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 Marx 卡尔·马克思

Karl Popper 卡尔·波普尔

Karl-Dietrich Bracher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Karl-Dietrich Erdmann 卡尔-迪特里希·埃德曼

Karlsruhe 卡尔斯鲁厄

Kassel 卡塞尔

Käthe Friedenthal 凯特·弗雷登塔尔

Käthe Nick 凯特·尼克

Katherine 凯瑟琳

Kattowitz 卡托维兹

Katyn Forest 卡廷森林

Kemal Ataturk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Kenneth Arrow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Keniston 肯尼斯·凯尼斯通

Kewal Motwani 克瓦尔·莫特瓦尼

Keynes 凯恩斯

kibbutz 基布兹

Kiel 基尔港

Kierkegaard 克尔凯郭尔

Kingman Brewster 金曼·布鲁斯特

Kirchner 柯克纳

Klaus Epstein 克劳斯·爱泼斯坦

Klaus Harpprecht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Klaus Naumann 克劳斯·瑙曼

Klaus Schütz 克劳斯·舒茨

Klaus von Dohnanyi 克劳斯·冯·多纳尼

Know Your Enemy! 《了解你的敌人!》

Kofi Annan 科菲·安南

Kohl 科尔

Kolbe 科尔贝

Komarovo 科玛洛沃

Kommunist 《共产党人》

Königsberg 哥尼斯堡

König 柯尼希

Konrad Adenauer 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 Bloch 康拉德·布洛赫

Konrad Henlein 康拉德·亨莱因

Konrad Linder 康拉德·林德

Konstantin Chernenko 康斯坦丁·契尔年科

Konstanz 康斯坦茨

Kosel 科塞尔

Kraków 克拉科夫

Krishna Menon 克里希南·梅农

Kristallnacht 水晶之夜

Krummhübel 卡尔帕奇

Krzysztof Michalski 克齐斯茨托夫·米哈尔斯基

Kurt Biedenkopf 库尔特·比登科普夫

Kurt Georg Kiesinger 库尔特·乔治·基辛格

Kurt Kiesinger 库尔特·基辛格

Kurt Masur 库尔特·马祖尔

Kurt Riezler 库尔特·里兹勒

Kurt Schumacher 库尔特·舒马赫

Kurt Tucholsky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Kurt von Schleicher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

Kurt von Schuschnigg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

Kurt Weill 库尔特·魏尔

Kwaśniewski 克瓦希涅夫斯基

L' Unità 《团结报》

La Marseillaise 《马赛曲》

La Question de Berlin 《柏林问题》

Lacombe, Lucien 《吕西安·拉孔布》

Lake Albano 阿尔巴诺湖

Lake Como 科莫湖

Lake Konstanz 博登湖

Lake Maggiore 马焦雷湖

Lakehurst 莱克赫斯特

Lauren Bacall 劳伦·巴考尔

Lauris Norstad 劳里斯·诺斯塔德

Lauterbach 劳特巴赫

Lawrenceville School 劳伦斯维尔学校

Le Branchu 勒·布朗许

Le Chagrin et la Pitié 《悲哀和怜悯》

Le grand Napoléon des petits enfans 《小朋友眼中的拿破仑大帝》

le musulman 穆斯林

Lech Walesa 莱赫·瓦文萨

Lee Kuan Yew 李光耀

Leibniz 莱布尼茨

Leiden 莱顿

Leipzig 莱比锡

Lend-Lease Bill 《租借法案》

Leni Riefenstahl 莱尼·里芬斯塔尔

Leo Baeck Institute 利奥·贝克研究所

Léon Blum 莱昂·布鲁姆

Leonard Bernstein 伦纳德·伯恩斯坦

Leonard Krieger 伦纳德·克里格尔

Leonid Samyatin 列昂尼德·萨米亚丁

Léopold Sédar Senghor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果

Leopold von Ranke 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Emperor of Austria 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

Lessing 莱辛

Leszek Kolakowski 莱谢克·克拉柯夫斯基

Leunaworks 洛伊纳化工厂

Lev Kopelev 列夫·科佩列夫

Levin 列文

Lewis Namier, Sir 路易斯·纳米尔爵士

Lewis W. Douglas 路易斯·W.道格拉斯

Lexington Avenue 列克星敦大道

Leys School 雷斯中学

Libération 《解放报》

Lidice 利迪策

Life magazine 《生活》杂志

Likud 利库德集团

Lina Bauer 莉娜·鲍尔

Lina Morgenstern 莉娜·摩根斯坦

Linz 林兹

Lion 利翁

Lionel Gossman 莱昂内尔·戈斯曼

Lionel Trilling 莱昂尼尔·特里林

Lise Meitner 莉泽·迈特纳

Livingstone 利文斯通

Locarno agreements 《洛迦诺公约》

Lodi Park 洛迪公园

Loki Schmidt 洛姬·施密特

Lord Dacre 戴克勋爵

Loreley 《罗蕾莱》

Lothar de Maizière 洛塔尔·德·迈齐尔

Lotte in Weimar 《洛特在魏玛》

Lotte 洛特

Lötzke 勒兹克

Louis Aragon 路易·阿拉贡

Louis Awad 路易斯·阿瓦德

Louis Barthou 路易·巴尔杜

Louis Begley 路易斯·贝格利

Louis Malle 路易·马勒

Lucien Lacombe 吕西安·拉孔布

Lucius Clay 卢修斯·克莱

Ludwig Erhard 路德维希·艾哈德

Ludwig Guttman 路德维希·古特曼

Lufthansa 汉莎航空公司

Lunghin Pass 隆亨山口

Lutheran Protestantism 新教路德宗

Luther 路德

Lvov 利沃夫

Lydia Chukovskaya 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

Lyndon Johnson 林登·约翰逊

M. Ia. Gefter 米哈伊尔·格夫特

Maarten Brands 马腾·布兰兹

Maa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

Madras 马德拉斯

Magdeburg 马格德堡

Maginot Line 马其诺防线

Mainz 美因茨

Maitland 梅特兰

Major Barbara 《巴巴拉少校》

Manichean 摩尼教

Mannheim 曼海姆

Marburg 马尔堡

Marc Bloch 马克·布洛赫

Marcel Lefebvre 马塞尔·列斐伏尔

Marcel Ophuls 马塞尔·奥菲尔斯

Marcel Reich-Ranicki 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

Margaret Bassett 玛格丽特·巴塞特

Margaret Thatcher 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 马尔加

Maria Magdalena Gymnasium 玛丽亚·马格达莱纳文理中学

Maria Montessori 玛丽亚·蒙台梭利

Maria Theresa, Empress 玛丽亚·特蕾莎女皇

Maria White 玛丽亚·怀特

Mario Einaudi 马里奥·埃诺迪

Mario Soares 马里奥·苏亚雷斯

Marion Dönhoff 玛里恩·登霍夫

Mark Rudd 马克·拉德

Mark Van Doren 马克·范·道伦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

Martin Buber 马丁·布伯

Martin Heidegger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Jay 马丁·杰伊

Martin Luther King, Jr. 小马丁·路德·金

Martin Niemöller 马丁·尼默勒

Martin Schwarzschild 马丁·史瓦西

Martin Walser 马丁·瓦尔泽

Mary Vreeland 玛丽·弗里兰

Masada 马察达

Masaryk 马萨里克

Masha Etkind 玛莎·埃特金

Masurian lake 马祖里湖

Matthew Arnold 马修·阿诺德

Matthias Platzeck 马蒂亚斯·普拉泽克

Mauritshuis 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

Max Black 马克斯·布莱克

Max Frankel 马克斯·弗兰克尔

Max Hayward 马克斯·海沃德

Max Jessner 马克斯·耶斯纳

Max Liebermann 马克斯·利伯曼

Max Planck 马克斯·普朗克

Max Reinhardt 马克斯·莱因哈特

Max Schmeling 马克斯·施梅林

Max von Baden 马克斯·冯·巴登

Max von Laue 马克斯·冯·劳厄

Max Warburg 马克斯·沃伯格

Max Weber 马克斯·韦伯

Max Wertheimer 马克斯·韦特海默

Maxim Litvinov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Mayo 梅奥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

McGeorge Bundy 麦克乔治·邦迪

McMillan Theatre 麦克米兰大礼堂

Mecca 麦加

Meiji restoration 明治维新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Menachem Begin 梅纳赫姆·贝京

Mercer Street 梅塞大街

Merseburg 梅泽堡

Messiah 弥赛亚

Metternich 梅特涅

Meyer Weisgal 迈耶·魏斯盖尔

Michael Dukakis 迈克尔·杜卡基斯

Michael Howard 迈克尔·霍华德

Michael Sovern 迈克尔·索文

Michel Jobert 米歇尔·若贝尔

Midge Decter 米奇·迪克特

Mieczyslaw Rakowski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

Mihailovitch 米哈伊洛维奇

Mikhail Gorbachev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leva 米列娃

Milne 米恩

Milton Bearden 米尔顿·比尔登

Milton Friedman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ntz 敏兹

Mirabeau 米拉波

Mme. Defarge 德发日夫人

Moeller 穆勒

Mogadishu 摩加迪沙

Monte Carlo 蒙特卡罗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Moravia 摩拉维亚

Morgenthau Plan 摩根索计划

Moritz 莫里茨

Morningside Park 莫宁赛德公园

Mortimer von Falkenhausen 莫蒂默·冯·法尔肯豪森

Moses Mendelssohn 摩西·门德尔松

Mueller 米勒

Mussolini 墨索里尼

Müth 穆特

My Path to History 《我的历史之路》

Nadezhda Mandelstam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Nahariya 纳哈里亚

Nahum Goldmann 纳赫姆·戈德曼

Nasser 纳赛尔

Nathan the Wise 《智者纳旦》

Nathaniel Peffer 纳撒尼尔·佩弗

National Communism and Popular Revolt in Eastern Europe
《东欧的民族共产主义和民众反抗》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PD) 国家民主党

National Socialism as Temptation 《国家社会主义的诱惑》

National Socialism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Naturwissenschaften 《自然科学》

Naumburg 瑙姆堡

Negev desert 内盖夫沙漠

Nehru 尼赫鲁

Neissers 奈塞尔

Neisse 奈塞

Nelson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Rockefeller 纳尔逊·洛克菲勒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NIAS) 荷兰高等研究院

Neue Zürcher Zeitung 《新苏黎世报》

Neuengamme 诺因加默

Neuilly-sur-Seine 塞纳河畔讷伊

Neville Chamberlain 内维尔·张伯伦

New Haven 纽黑文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纽约书评》

Nicholas Murray Butler 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

Nicholas Ridley 尼古拉斯·雷德利

Niels Bohr Institute 尼尔斯·玻尔研究所

Nikita Khrushchev 尼基塔·赫鲁晓夫

Nikolai Bukharin 尼古拉·布哈林

Nikolai Portugalov 尼古拉·波尔图加洛夫

Nikolaikirche 尼古拉教堂

NKVD 内务人民委员会

Nolde 诺尔德

Norbert Heisig 诺伯特·海希西

Nordwijk 诺德韦克

Norman Mailer 诺曼·梅勒

Norman Podhoretz 诺曼·波德霍雷茨

Norman Stone 诺曼·斯通

Norman Thomas 诺曼·托马斯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orthfield 诺斯菲尔德

North-Rhine Westphalian Parliament 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议会

Notre Dame 巴黎圣母院

Nuffield College and St. Antony' s College in Oxford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和圣安东尼学院

Nürnberg laws 《纽伦堡法令》

Nürnberger Gespräche 纽伦堡学术讨论会

Nürnberg 纽伦堡

O Estado de São Paulo 《圣保罗州报》

Occupation Statute 占领法规

Oder-Neisse Line 奥得-尼斯线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战略情报局

Ogden Reid 奥格登·里德

Old Testament 《旧约圣经》

Olof Palme 奥洛夫·帕尔梅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Oradour-sur-Glane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

Orangerie 橘园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rselina 奥尔塞利纳

Oscar Wallace 奥斯卡·华莱士

Oskar Brieger 奥斯卡·布瑞格

Oskar Minkowski 奥斯卡·闵可夫斯基

Oslo Accords 《奥斯陆协议》

Ossinka Blumenfeld 奥辛卡·布卢门菲尔德

Oswald Veblen 奥斯瓦尔德·维布伦

Otfried Hofius 奥特弗里德·霍菲乌斯

Otto Braun 奥托·布劳恩

Otto Dibelius 奥托·迪贝柳斯

Otto Grotewohl 奥托·格罗特沃尔

Otto Hahn 奥托·哈恩

Otto Reinhold 奥托·莱因霍尔德

Otto Stern 奥托·斯特恩

Otto Suhr 奥托·祖尔

Otto von Bismarck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der Gablentz 奥托·冯·德尔·加布伦茨

Otto von Lamsdorff 奥托·冯·兰布斯多夫

Otto von Simson 奥托·冯·西姆森

Owen Young 欧文·扬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英语词典》

Pacelli 帕切利

Palais Chaillot 夏悠宫

Palmerston 帕默斯顿

Palomar 帕洛马尔

Pamela Harriman 帕梅拉·哈里曼

Papandreou 帕潘德里欧

Papworth 帕普沃思

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DS) 民主社会主义党

Pasadena 帕萨迪纳

Paul Celan 保罗·策兰

Paul de Lagarde 保罗·德·拉加德

Paul Doty 保罗·多提

Paul Douglas 保罗·道格拉斯

Paul Ehrlich 保罗·埃尔利希

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保
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Paul Klee 保罗·克利

Paul Kristeller 保罗·克里斯特勒

Paul Roubiczek 保罗·鲁比切克

Paul Starr 保罗·斯塔尔

Paul Tillich 保罗·蒂利希

Paul Valéry 保罗·瓦莱利

Paul von Hindenburg 保罗·冯·兴登堡

Paulus 保罗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 德国书业和平奖

Peggy Bassett 佩吉·巴塞特

People' s Commissars 人民代表议会

Pestalozzi 裴斯泰洛齐

Pétain 贝当元帅

Peter Brieger 彼得·布瑞格

Peter Hacks 彼得·哈克斯

Péter Ná das 彼得·纳达斯

Peter Novick 彼得·诺威克

Peter Rassow 彼得·拉索

Petra Roth 佩特拉·罗特

Pforta 普夫达学校

Philip Jenninger 菲利普·耶宁格

Philip Mountbatten 菲利普·蒙巴顿

Philip Oppenheim 菲利普·奥本海姆

Pierre Emmanuel 皮埃尔·埃马纽埃尔

Pierre Hassner 皮埃尔·哈斯纳

Pierre Laval 皮埃尔·拉瓦尔

Pierre Mendès-France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Pierre Nora 皮埃尔·诺拉

Pilate 彼拉多

Pillars of Society 《社会支柱》

Pinochet 皮诺切特

Piracicaba 皮拉西卡巴

Plaza de Mayo 五月广场

Pliny 普林尼

Plittersdorf 普利特斯多夫

PLO 巴解组织

Poelzig furniture 珀尔齐希款家具

Poem for Adults 《给成年人的诗》

Pol Pot 波尔布特

Polish home army 波兰家乡军

Polityka 《政策》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Pontresina 蓬特雷西纳

Pope John Paul II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

Pope Pius IX 教宗庇护九世

Port Bou 波尔特·博乌

Port Huron 休伦港

Portia 鲍西娅

Potemkin village 波将金村

Potsdam Conference 波茨坦会议

Poznan 波兹南

Prager Tageblatt 《布拉格日报》

Primo Levi 普里莫·莱维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国际
学生评估计划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锡安长老议定书》

Proust 普鲁斯特

Providence 上帝

Prussian Diet 普鲁士议会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

Qaddafi 卡扎菲

Quai aux Fleurs 花卉码头大街

Quai d'Orsay 奥赛码头

Quentin Durward 《昆丁·达沃德》

Quistorp 奎斯托普

Rabat 拉巴特

Radek 拉杰克

Ragnar Rommetveit 朗纳·罗米维特

Raisa Orlova 赖莎·奥洛娃

Ralf Dahrendorf 拉尔夫·达伦多夫

Ralph Flanders 拉尔夫·弗兰德斯

Raoul Girardet 拉乌尔·吉拉德特

Rapallo 拉帕洛

Rasputin 拉斯普京

Ratzinger 拉辛格

Raymond Aron 雷蒙·阿隆

Raymond Geist 雷蒙德·盖斯特

Raymond Gram Swing 雷蒙德·格拉姆·斯温

Rebecca Saletan 丽贝卡·塞尔坦

Reflections of an Unpolitical Man 《对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

Rehovot 雷霍沃特

Reichsbanner 帝国战旗

Reichstag 德意志帝国国会

Reichswehr 魏玛国防军

Reimar Lüst 莱玛·勒斯特

Reinhard Heydrich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Reinhold Niebuhr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Rembrandt 伦勃朗

Renate Harpprecht-Lasker 蕾娜特·哈普雷希特-拉斯克

Renoir 雷诺阿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国际动态研究所

Rex Stout 雷克斯·斯托特

Rhineland-Palatinate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Rhodes 罗德斯

Ribbentrop 里宾特洛甫

Richard Cheney 理查德·切尼

Richard Hofstadter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lbrooke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Kobrak 理查德·科布拉克

Richard Mellon Scaife 理查德·梅隆·斯凯夫

Richard Nixon 理查德·尼克森

Richard Perle 理查德·珀尔

Richard Stern 理查德·斯特恩

Richard Ullman 理查德·乌尔曼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理查德·冯·魏茨泽克

Richard Wagner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illstätter 理查德·维尔施泰特

Richardson Dilworth 理查森·迪尔沃思

Richelieu 黎塞留

Riesengebirge 对利森山区

Rieux, Dr. 李欧医生

River Elbe 易北河

River Neva 涅瓦河

River Oder 奥得河

Riviera 里维埃拉

Robert Gellately 罗伯特·格拉特利

Robert Kennedy 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Legvold 罗伯特·勒格沃尔德

Robert Marjolin 罗贝尔·马若兰

Robert McNamara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erton 罗伯特·默顿

Robert Oppenheimer 罗伯特·奥本海默

Robert Schuman 罗伯特·舒曼

Robert Silvers 罗伯特·西尔弗斯

Robert Solow 罗伯特·索洛

Robert Taft 罗伯特·塔夫脱

Robert Vansittart 罗伯特·范斯塔特

Robert Warshow 罗伯特·沃肖

Rochester 罗切斯特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会

Rodrigo Botero 罗德里格·博得罗

Roebern 勒贝恩

Rogasen 罗加森

Roger Errera 罗杰·埃雷拉

Roger Heyns 罗杰·海恩斯

Roger K. Miller 罗杰·K. 米勒

Roger W. Straus 罗杰·W. 施特劳斯

Roland Lenoir 罗兰·勒努瓦

Rolf Hochhuth 罗尔夫·霍赫胡特

Rolf Kreibich 罗尔夫·克里比奇

Rolf Reissig 罗尔夫·瑞西格

Roman Herzog 罗曼·赫尔佐克

Romesh Thapar 罗梅什·塔帕尔

Romila Thapar 罗米拉·塔帕尔

Rommel 隆美尔

Ronald Reagan 罗纳德·里根

Rosa Luxemburg 罗莎·卢森堡

Rosemarie Pauli 罗斯玛丽·鲍利

Rostock 罗斯托克

Rote Kapelle 红色乐队

Rotterdam 鹿特丹

Rousseau 卢梭

Rudi 鲁迪

Rudolf Augstein 鲁道夫·奥格斯坦

Rudolf Bultmann 鲁道夫·布特曼

Rudolf Dolzer 鲁道夫·多尔泽

Rudolf Hilferding 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Nissen 鲁道夫·尼森

Rudolf Scharping 鲁道夫·沙尔平

Rudolf Stern 鲁道夫·施特恩

Rudolf von Albertini 鲁道夫·冯·阿尔贝蒂尼

rue Laffitte 拉菲特街

Ruhr 鲁尔区

Ruth Dreyfuss 露丝·德雷福斯

SA (storm troopers) 纳粹冲锋队

Saarland 萨尔州

Salem 塞伦

Salo Baron 萨洛·巴伦

SALT II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Salvador Allende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marii Izrailevich Velikovsky 撒玛利·伊兹赖列维奇·维利考夫斯基

sanctum sanctorum 至圣所

Sandinistas 桑地诺解放阵线

Sans-Souci 无忧宫

Santayana 桑塔亚那

São Paulo 圣保罗

SAP 德国社会工人党

Sara 萨拉

Sarajevo 萨拉热窝

Saul and David 《扫罗和大卫》

Saul Friedländer 索尔·弗里德伦德

Saulus 扫罗

Saxony 萨克森

Scheitnig 舍尼希区

Schenker 辛克货运公司

Schiller 席勒

Schiphol 史基浦机场

Schleicher 施莱歇尔

Schleswig Holstein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Schmidt 施密特

Schneekoppe 诗尼坎普峰

School for Barbarians 《野蛮人学校》

Schopenhauer 叔本华

Schreiberhau 施赖伯豪

Schröter 施罗特

Schuman Plan 舒曼计划

Sebastian Haffner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Seminar 《研讨》

Senfft, Kersten and Schwenn law firm 塞夫特、克斯滕和施文恩律师事务所

Sepp 泽普

Septimer Pass 塞普蒂默山口

Serge Hurtig 塞奇·胡蒂格

Sergei Eisenstein 谢尔盖·爱森斯坦

Seweryn Bialer 瑟韦林·比亚勒

Seymour Martin Lipset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Shep Stone 谢普·斯通

Shepard Stone 谢泼德·斯通

Sheremetyevo Airport 谢列梅捷沃机场

Shimon Peres 西蒙·佩雷斯

Shmuel Eisenstadt 什穆埃尔·艾森斯塔特

Sidney Morgenbesser 西德尼·摩根贝沙

Siebengebirge 七岭山脉

Siegfried Kaehler 齐格弗里德·科勒

Siegfried Lenz 齐格弗里德·伦茨

Siegfried Marck 齐格弗里德·马克

Siegmund Warburg 西格蒙德·华宝

Sigismund Asch 西吉斯蒙德·阿希

Silesia 西里西亚

Sils Maria 西尔斯·玛利亚

Silvaplana 席尔瓦普拉纳

Simon Leys 西蒙·莱斯

Sinai Peninsula 西奈半岛

Sivachev 西瓦切夫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人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ist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

Socialist Unity Party (SED) 统一社会党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德国社会与民主》

Soldatenzeitung 《士兵报》

Solidarność 团结工会

Somme 索姆河

Sorbonne 索邦大学

SPD 社民党

Spetsai 斯皮特塞岛

Spindlermühle 什平德莱鲁夫姆林

Spruille Braden 斯普鲁伊尔·布莱登

Sputnik 《伴侣》

SS 纳粹党卫军

St. Moritz 圣莫里茨

Stalinallee 斯大林大道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Stanislaw Stomma 斯坦尼斯瓦夫·斯托马

Stanley 史丹利

Starnberger 施塔恩贝格湖

Stasi 斯塔西（东德国家安全局）

Stauffenberg 施陶芬贝格

Stavisky 斯塔维斯基

Stefan Nowak 斯特凡·诺瓦克

Stefan Zweig 斯蒂芬·茨威格

Steffa 施戴法

Steffen Heitmann 史蒂芬·海特曼

Stephanie 施特凡妮

Stephen Kellen 斯蒂芬·凯伦

Stresa 斯特雷萨

Strobe Talbott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

Stuart Hughes 斯图亚特·休斯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

Süddeutsche Zeitung 《南德意志报》

Sudeten 苏台德

Sugarloaf 面包山

Swabian 斯瓦比亚

Symptoms 《症状》

Tadeusz Mazowiecki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

Tagebuch 《日记》

Talleyrand 塔列朗

Tal 塔勒

Tante Grete 格蕾特姑妈

Tasheen Bashir 塔辛·巴希尔

Tawney 托尼

Taylor 泰勒

Ted Sommer 特德·索默

Teddy Kollek 泰迪·科勒克

Teeny 缇妮

Tegel Airport 泰格尔机场

Tempelhof Airport 滕珀尔霍夫机场

Tetens 特滕斯

The “Subtle” Silence and Its Consequences 《“微妙的”
沉默及其后果》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美国政治传统》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卡拉马佐夫兄弟》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论文集》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德国历史进程》

The Deputy 《见证人》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和平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st 《经济学家》

The 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Postwar Era 《战后时代的终结》

The Era of Tyrannies 《暴政时代》

The Father of Modern Russia 《现代俄国之父》

The First Circle 《第一圈》

The Forty Days of Musa Dagh 《穆萨达四十日》

The Go-Between 《送信人》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知识女性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美国历史的讽刺》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近代史杂志》

The Limits to Growth 《增长的极限》

The Listener 《听众》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道义战争》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新学院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的起源》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The Party Line 《党的路线》

The Political Collapse of Europe 《欧洲政治的崩溃》

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
《苏联悖论：外部扩张，内部衰退》

The Spectator 《旁观者杂志》

The Third Reich 《第三帝国》

The Three Faces o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的三个方面》

The Tin Drum 《铁皮鼓》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极权主义的诱惑》

The Traumatic Origins of Internal Diseases 《内科疾病的创伤起源》

The Two Grenadiers 《两个掷弹兵》

The University as a Sanctuary of Academic Freedom 《大学是学术自由的神圣殿堂》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 《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Theo Sommer 西奥·索默

Theodor Billroth 特奥多尔·比尔罗特

Theodor Eschenburg 特奥多尔·埃申堡

Theodor Fontane 特奥多尔·冯塔纳

Theodor Frerichs 特奥多尔·弗雷里希

Theodor Heuss 特奥多尔·豪斯

Theodor Mommsen 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von Bethmann Hollweg 特奥多尔·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Theodore Sorenson 希奥多·索伦森

Theresienstadt 特莱西恩施塔特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Thomas Dewey 托马斯·杜威

Thomas Mann 托马斯·曼

Thomas Masaryk 托马斯·马萨里克

Thomas Mü n tzer 托马斯·闵采尔

Thomas Nipperdeys 托马斯·尼佩代

Thomas Watson 托马斯·沃森

Thomas Wolfe 托马斯·沃尔夫

Thorsten Veblen 托尔斯滕·维布伦

Thorun 索伦

Three-Penny Opera 《三便士歌剧》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Thuringia 图林根州

Tiergarten 蒂尔加滕区

Times 《泰晤士报》

Timothy Garton Ash 蒂莫西·加顿·阿什

Tim 蒂姆

Tintern Abbey 《丁登寺》

Tiran 蒂朗

Tirpitz 提尔皮茨

Tito 铁托

To Young Jews 《致年轻的犹太人》

Tobruk 托布鲁克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Tolstoi 托尔斯泰

Toni Asch 托妮·阿希

Tonkin Gulf Resolution 东京湾决议

Tony Judt 托尼·朱特

Torsten Husén 托尔斯滕·胡森

Treaty of Rome 《罗马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条约》

Treblinka 特雷布林卡

Trinidad 特立尼达岛

Triumph of the Will 《意志的胜利》

Trotsky 托洛茨基

Tübingen 图宾根

Tuscany 托斯卡纳

Tutzing 图青

U.S. Information Agency 美国新闻署

U.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

UFA 乌发电影制片厂

Ulbricht 乌布利希

ulica Rosenbergow 罗森堡夫妇路

Ulmer 乌尔默

Undershaft 安德谢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Jewish Appeal 犹太联合募捐协会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United Workers Party 统一工人党

University Council 大学理事会

University in Exile 流亡大学

University of Greifswald 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图宾根大学

Up Against the Ivy Wall 《常青藤墙内的奋起反抗》

Urach 乌拉赫

Uri Tal 乌里·塔尔

Uta Hagen 乌塔·哈根

Utopia in Power 《当权的乌托邦》

Uwe Johnson 乌韦·约翰森

Uwe Wesel 乌韦·韦泽尔

Václav Havel 瓦茨拉夫·哈维尔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Valley Forge 福吉谷

Vann Woodward 范恩·伍德沃德

Varian Fry 瓦里安·弗莱

VEBLEuna Werke Walter Ulbricht 国营沃尔特·乌布利希洛伊纳
化工厂

Venona 维诺那计划

Verdun 凡尔登

Vermontski 佛蒙斯基

Vermont 佛蒙特州

Vichy government 维希政府

Victor Alter 维克多·奥尔特

Victor Weisskopf 维克多·魏斯科普夫

Vidkun Quisling 维德孔·吉斯林

Villa Hügel 修格尔庄园

Villa Serbelloni 塞尔贝罗尼别墅

Vincennes 樊尚

Vistula River 维斯瓦河

Vitali Zhurkin 维塔利·朱尔金

Vladimir Ilyich Ulyanov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Volhard Push 沃尔德促动法

Voltaire 伏尔泰

von Roon 冯·隆

Vretslaw 弗罗茨瓦夫

Vyacheslav Molotov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

Wackernagel 瓦克纳格尔

Wagnerian 瓦格纳

Waldemar Besson 瓦尔德玛·贝松

Waldorf-Astoria 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

Walter Benjamin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Gropius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Heller 沃尔特·海勒

Walter Mondale 沃尔特·蒙代尔

Walter Ruegg 沃尔特·吕埃格

Walter Scheel 沃尔特·谢尔

Walter Scott 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Ulbricht 沃尔特·乌布利希

Walther Rathenau 瓦尔特·拉特瑙

Wannsee 万塞湖

Wardeinstrasse 瓦尔丹大街

Warren Christopher 沃伦·克里斯托弗

Warren Zimmermann 沃伦·齐默尔曼

Warsaw 华沙

Wassenaar 瓦森纳

Watt 瓦特

Weavers 《纺织工》

Weggefährten 《同伴》

Weimar 魏玛共和国

Weinhold 维因霍尔德

Weltbühne 《世界舞台》

Weltsch 韦尔奇

Wendell Willkie 温德尔·威尔基

Werke 《作品集》

Werner Jaeger 渥纳尔·加格尔

Werner Krusche 维尔纳·克鲁舍

Werner Kubelka 维尔纳·库贝尔卡

Werner Philipp 维尔纳·菲利普

Werner Richter 维尔纳·里希特

Westin 威斯汀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Wichard von Moellendorff 维夏德·冯·默伦多夫

Wilhelm II 威廉二世

Wilhelm Stepp 威廉·施特普

Wilhelm von Humboldt 威廉·冯·洪堡

Wilhelm von Scholz 威廉·冯·舒尔茨

Wilhelmine 威廉明妮

Willi Stoph 维利·斯多夫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uckley 威廉·巴克利

William Bundy 威廉·邦迪

William C. Bullitt 威廉·C.布利特

William Fulbright 威廉·富布赖特

William James 威廉·詹姆斯

William Langer 威廉·兰格

William Leuchtenburg 威廉·洛克滕堡

William Luers 威廉·吕尔斯

William Pope 威廉·波普

William Shirer 威廉·夏伊勒

Willy Brandt 维利·勃兰特

Willy Schmid 维利·施密德

Wilson 威尔逊

Winnieth-Pooh 《小熊维尼》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

Without a Name, Cell Without a Number 《无名的囚徒，无号的牢房》

Witzmanns 维茨曼

Wodehouse 伍德豪斯

Wojciech Jaruzelski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Wolf Jobst Siedler 沃尔夫·约布斯特·席德勒

Wolfgang Berghofer 沃尔夫冈·伯格霍夫

Wolfgang Friedmann 沃尔夫冈·弗里德曼

Wolfgang Harich 沃尔夫冈·哈里希

Wolfgang Ischinger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

Wolfgang Kapp 沃尔夫冈·卡普

Wolfgang Mommsen 沃尔夫冈·蒙森

Wolfgang Sauer 沃尔夫冈·绍尔

Wolfgang Schäuble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Wolfgang Steinitz 沃尔夫冈·施泰尼茨

Woodrow Wilson 伍德罗·威尔逊

Wordsworth 华兹华斯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KOR 保卫工人委员会

World Jewish Council 世界犹太人委员会

Wrocław 弗罗茨瓦夫

Württemberg 符腾堡

Wyszynski 维辛斯基

Yeltsin 叶利钦

Yitzhak Navon 伊扎克·纳冯

Yitzhak Rabin 伊扎克·拉宾

Yom Kippur War 赎罪日战争

Young Plan 杨格计划

Ypres 伊普尔

Yuri Davydov 尤里·达维多夫

Yuri Gagarin 尤里·加加林

Yury Rubinsky 尤里·鲁宾斯基

Yvonne Mercier 伊冯·梅西耶

Zbigniew Brzezinski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inoviev 季诺维也夫

Zobten 佐布滕

Zyklon-B 齐克隆-B杀虫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著；季大方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10

书名原文：Five Germanys I Have Known: A History & Memoir

ISBN 978-7-5201-6295-1

I. ①我… II. ①弗…②季… III. ①德国-历史 IV. ①K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5787号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著者/〔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

译者/季大方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段其刚

责任编辑/周方茹

文稿编辑/李蓉蓉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6 字数: 551千字

版次/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95-1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8-7154号

定价/13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urther Readings

《审判希特勒：啤酒馆政变和纳粹德国的崛起》

《边境：行至欧洲边缘》

《掘墓人：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冬天》

《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犹太人的世纪》

德国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世界：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为什么会制造出西方历史上最大的恐惧？在这部回忆和历史交杂的著作中，著名学者弗里茨·斯特恩用自己的生活棱镜折射出了这一问题。他生于魏玛共和国，1938年被迫移民美国，后来成为一位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开启了认识过去的德国的新视角。

这既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回忆录，也深刻地揭示了斯特恩所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到两德统一的复杂历史，是一位历史学家目睹了发生在德国和欧洲的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沉思，他讲述了其人生经历中所涉及的学术和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本书充满了敏锐的洞察、戏剧性和智慧，可作为对德国历史的精细导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美国人和德国人而言，斯特恩是一位活着的国宝——一位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杰作阐明了德国问题，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复杂和深受折磨的灵魂。现在，他总结了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的德国人的人生经历，并用感人和私人化的方式阐述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里，他都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记。此书是一本重要的回忆录，无疑也将成为一本经典之作。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美国前驻德国大使

以家族的遭遇和本人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学术经历为依据，弗里茨·斯特恩的《我的五个德国》无疑是一部既非常个人化，又非常严谨的学术性著作。没人能像斯特恩这样清晰地阐明那些塑造了德国现代史的成就与灾难。

——詹姆斯·希恩，斯坦福大学

这是一本理性的日记，记录了不受感情左右的对自由的信念，这种自由脱胎于残忍暴行并由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培育。弗里茨·斯特恩向德国和美国提出了富有学识且更具针对性的呼吁，希望各自都能展现出其更好的一面，并以此不断地丰富着这两个国家。

——马克斯·弗兰克尔

第一章 / 祖传的德国 第二章 / 魏玛 第三章 / 第三帝国 第四章 / 来自远方的恐怖 第五章 / 当德国不存在时 第六章 / 联邦共和国：新的开端 第七章 / 第四个且被遗忘的德国 第八章 / 外国人口中的德国话题 第九章 / 重提德国问题 第十章 / 统一的德国：第二次机会？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138.00 元

R
RICHARD BIRD
索·恩

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威廉·E. 科尔比军事作家奖入围作品

作家 WRITER |
水手 SAILOR

Captivating. ... An important addition to the canon of one of America's foremost writers.
Reynolds's unique biography reads like an espionage thriller.

- *The Missourian*

Nicholas Reynolds's fascinating new research in *Writer, Sailor, Soldier, Spy* shows that
[Hemingway] was in fact working for both the Russians and the Americans.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士兵 | SOLDIER
间谍 SPY

An engrossing read for Hemingway buffs as well as casual readers. *Writer, Sailor, Soldier, Spy*
adds more fascinating details to a life that remains continually fascinating.

- *Minneapolis Star Tribune*

欧内斯特·海明威
的秘密历险

[美] 尼古拉斯·雷诺兹 / 著

马睿 / 译

记 by *Nicholas Reynolds*

1935-1961

[An] engrossing story of Hemingway's disillusionment with American politics, his sympathy with
communism, and his attraction to adventure and subversion.

- *Kirkus Reviews*

Reynolds looks among the shadows and finds a Hemingway not
seen before.

- *London Review of Book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尼古拉斯·雷诺兹 (Nicholas Reynolds) / 作者简介

毕业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军官和历史学家。近些年，他又作为中情局博物馆的历史学家，负责制订博物馆的战略计划，帮助人们把那些非凡的人工制品变成精彩的故事。他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副教授，并和妻子贝琪一起照顾救援巴哥犬。

马睿 / 译者简介


文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拥有 17 年专业翻译经验，曾长期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商业公司担任译员和术语编辑，在翻译技术和术语标准化国际合作中担任重要协调角色，出版过有 20 余本中英文译作。现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译员。

图书策划人



视觉设计师

联合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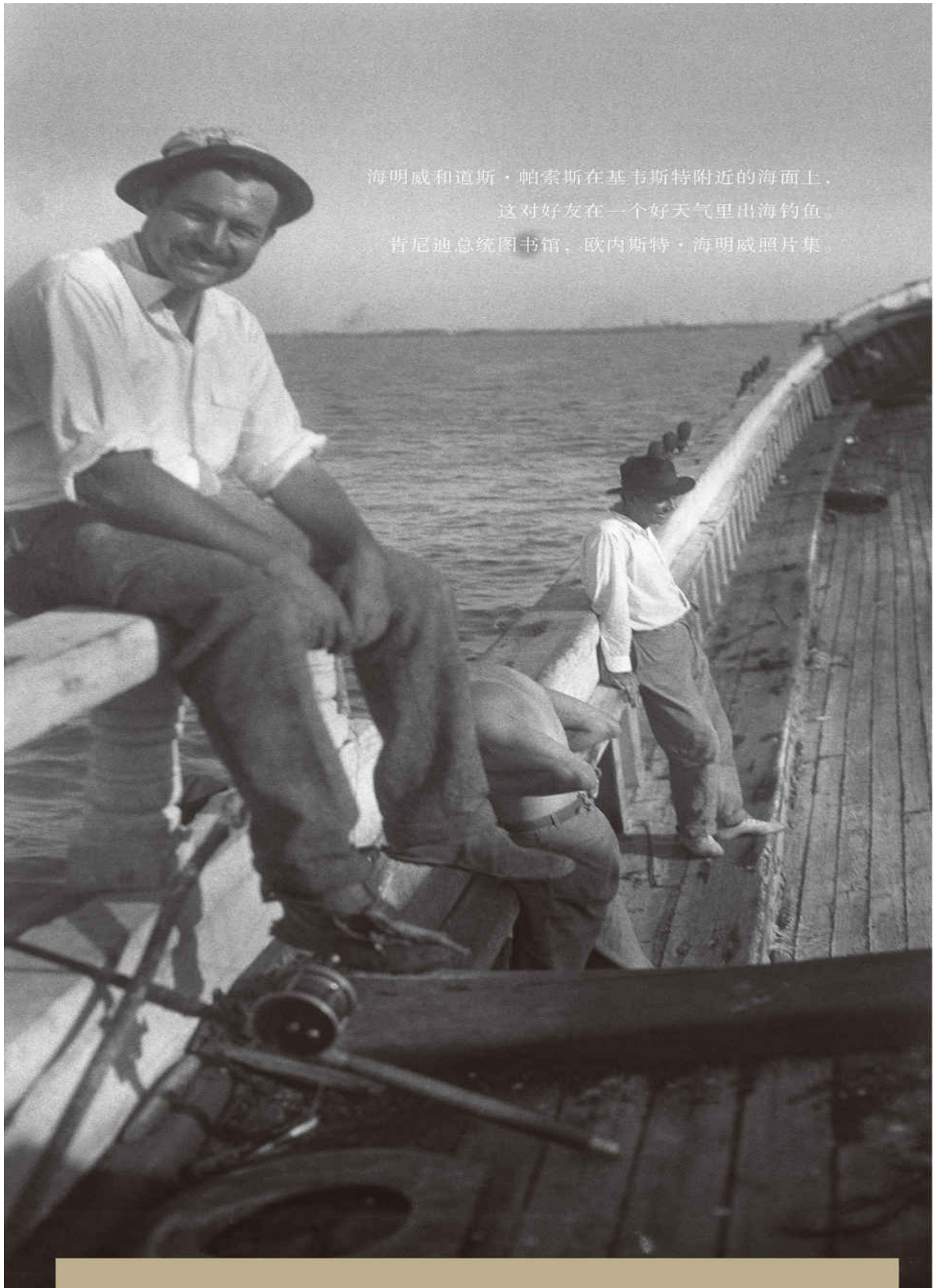
作家 WITER 水手 SAILOR 士兵 SOLDIER 间谍 SPY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1935-1961
by Nicholas Reynolds

〔美〕尼古拉斯·雷诺兹 / 著
马睿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国本土最像热带天堂的地方：海明威位于基韦斯特白头街的宅邸。
国会图书馆，纽约世界电讯报和太阳报照片集。



海明威和道斯·帕索斯在基韦斯特附近的海面上，
这对好友在一个好天气里出海钓鱼。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海明威和道斯·帕索斯在基韦斯特附近的海面上，这对好友在一个好天气里出海钓鱼。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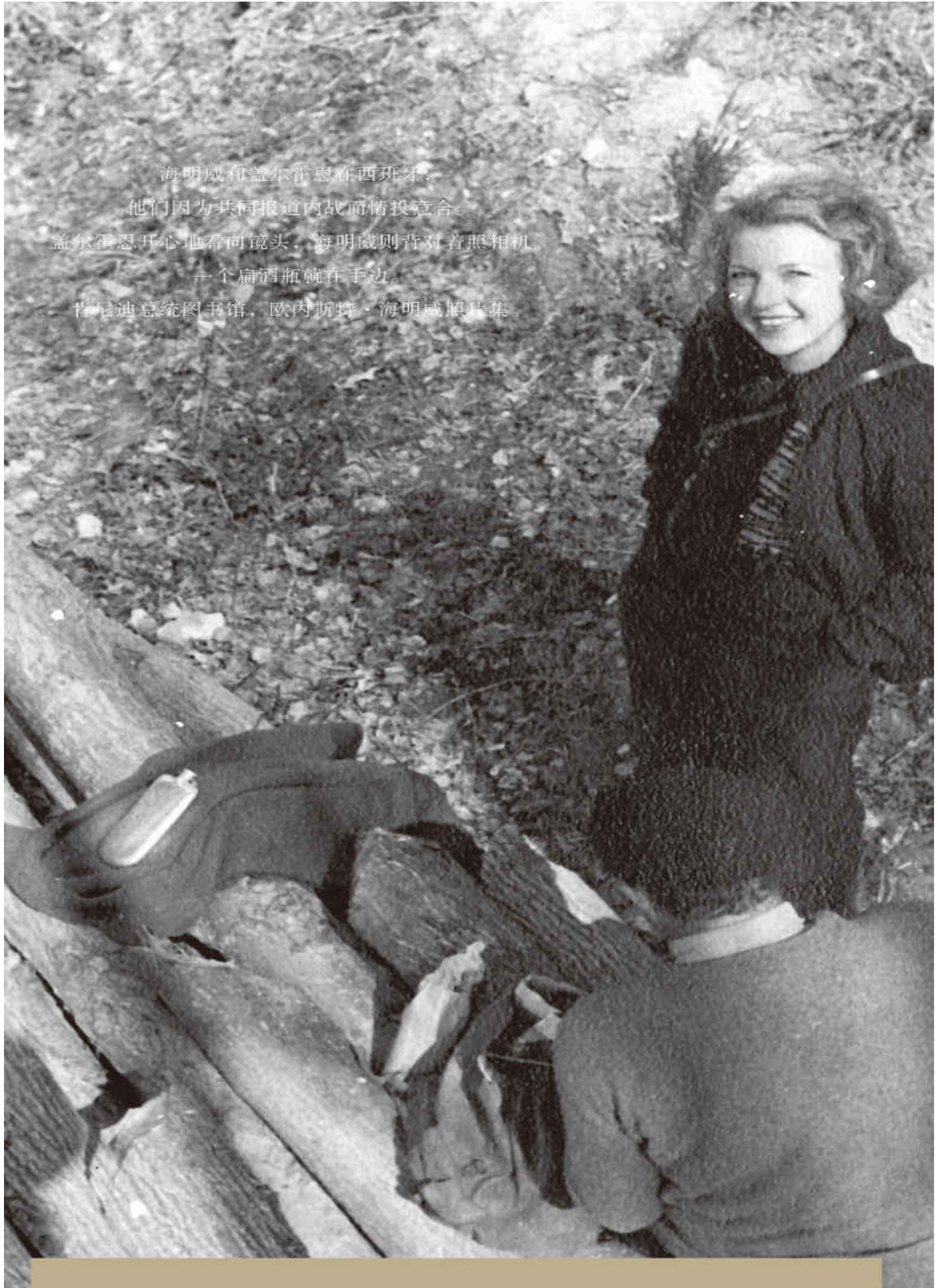
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海明威驾驶着“皮拉尔”号向北航行，1935年9月到达马泰坎伯礁岛 (Matecumbe Keys) 时看到的毁灭场景。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37 年春在一次空袭后幸存：作家和他未来的政委，荷兰共产主义者尤里斯·伊文思。

荷兰摄影博物馆，费恩霍特摄影集。



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西班牙，
他们因为共同报道内战而情投意合。
盖尔霍恩开心地看向镜头，海明威则背对着照相机。
一个扁酒瓶就在手边。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西班牙，他们因为共同报道内战而情投意合。

盖尔霍恩开心地看向镜头，海明威则背对着照相机。一个扁酒瓶就在手边。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海明威与德国共产主义者古斯塔夫·雷格勒，
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政委，
后来两人成为密友。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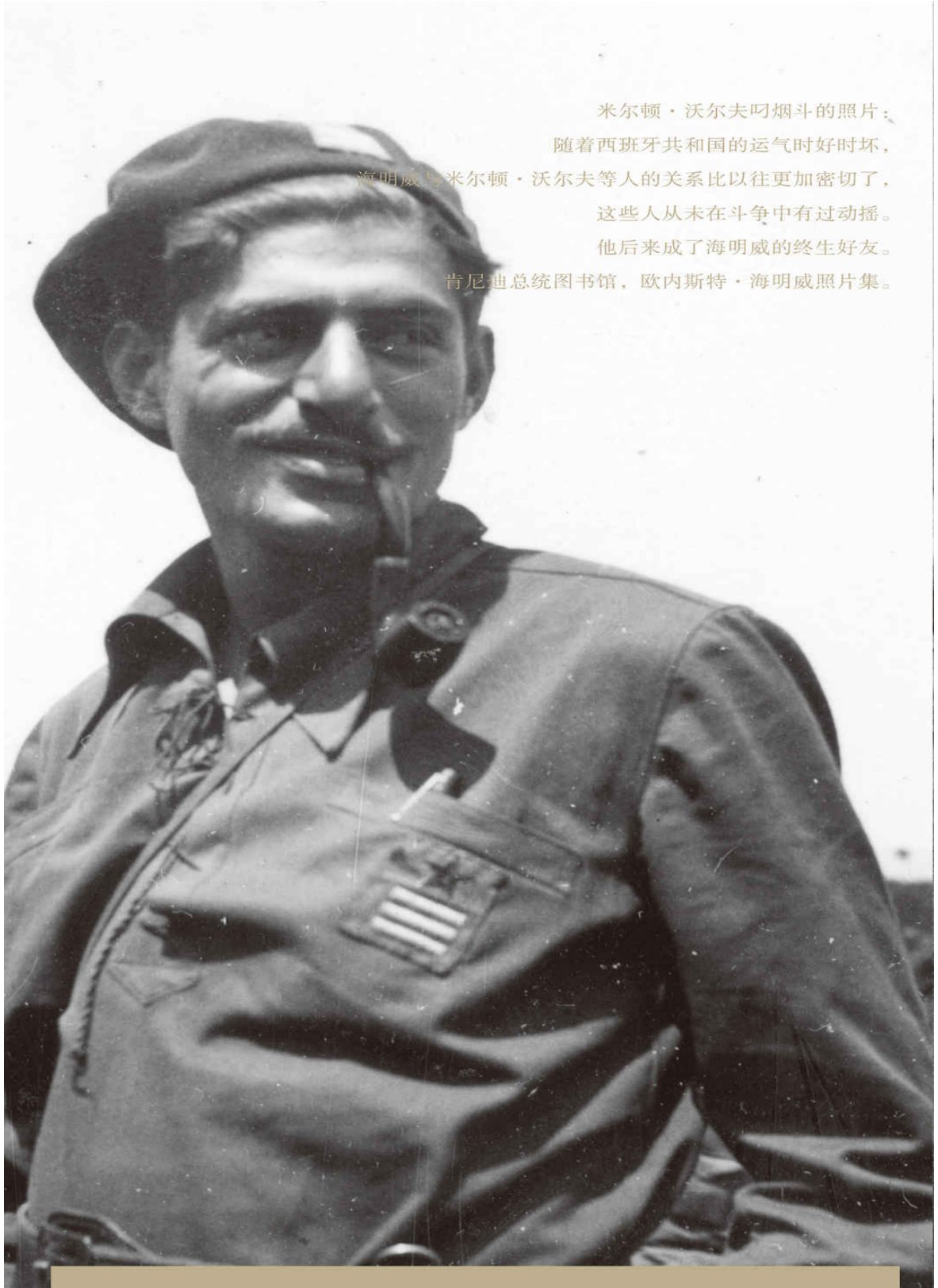
海明威与德国共产主义者古斯塔夫·雷格勒，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政委，后来两人成为密友。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内务部的站长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在西班牙为斯大林运作秘密战争，并抽出时间来取悦海明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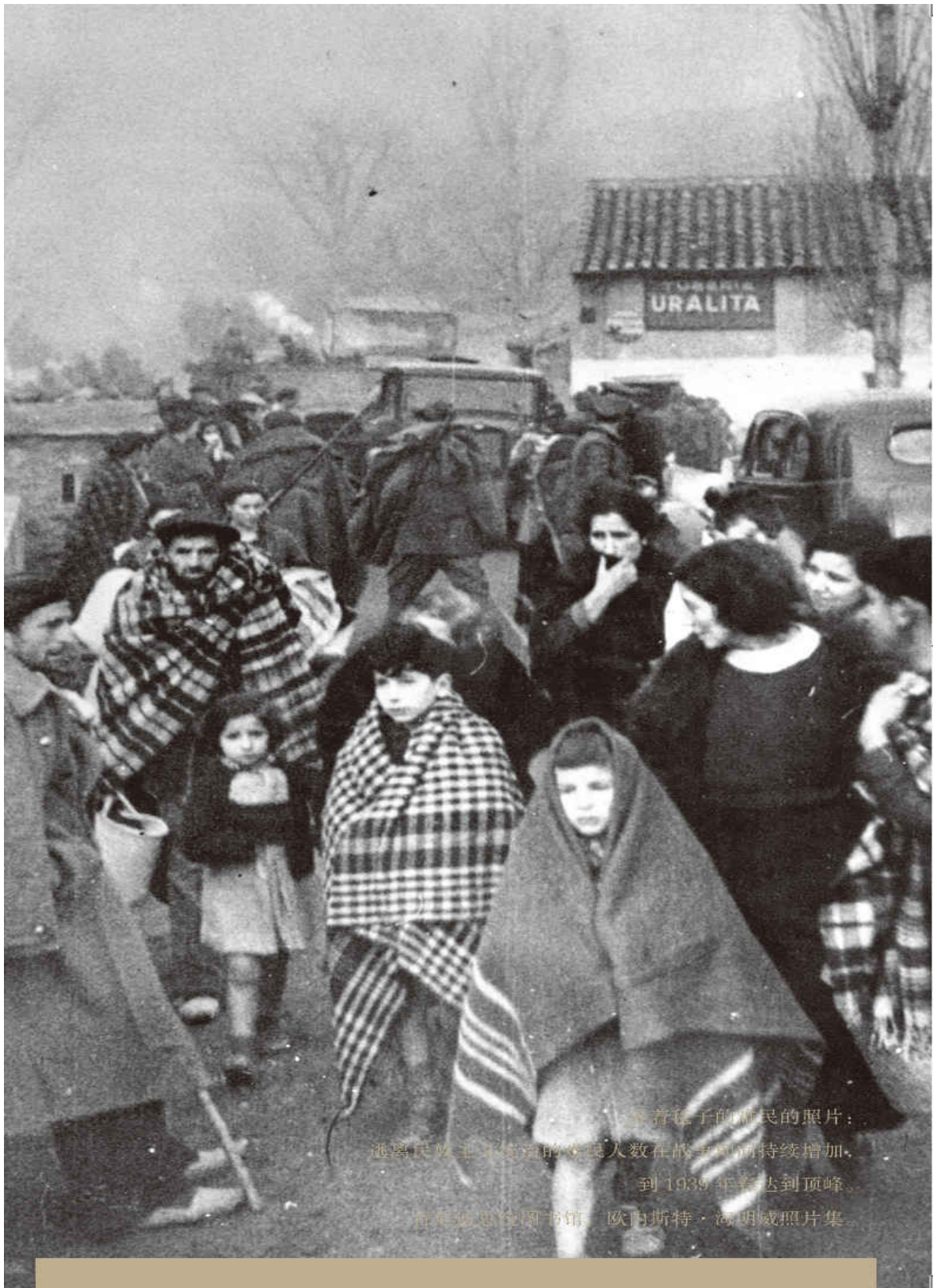
科利奇帕克，国家档案馆。



米尔顿·沃尔夫叼烟斗的照片：
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运气时好时坏，
海明威与米尔顿·沃尔夫等人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了，
这些人从未在斗争中有过动摇。
他后来成了海明威的终生好友。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米尔顿·沃尔夫叼烟斗的照片：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运气时好时坏，海明威与米尔顿·沃尔夫等人的关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了，这些人从未在斗争中有过动摇。他后来成了海明威的终生好友。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带着毯子的难民的照片：
逃离民权主义战争的平民人数在战争期间持续增加，
到1939年春达到顶峰。
看莫妮恩校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裹着毯子的难民的照片：逃离民族主义统治的难民人数在战争期间持续增加，到1939 年春达到顶峰。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雅各布·戈洛斯，招募海明威为内务部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



《新群众》编辑乔·诺思，
他曾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海明威的报道，
可能把后者介绍给了雅各布·戈洛斯。
塔米门特图书馆（Tamiment Library），亚伯拉罕·林肯藏品。

《新群众》编辑乔·诺思，他曾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海明威的报道，可能把后者介绍给了雅各布·戈洛斯。

塔米门特图书馆（Tamiment Library），亚伯拉罕·林肯藏品。



1941年在重庆，
海明威和盖尔霍恩与蒋介石夫人。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1年在重庆，海明威和盖尔霍恩与蒋介石夫人。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EH5561 玛莎·盖尔霍恩站在红砖房前：1941 年在中国，玛莎·盖尔霍恩正在听一位向导解释涂在一座房子侧面墙上的宣传语。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THOMASSON 海军军官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中国的冒险结束后，
来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少约翰 A. 托马森海军中校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
后者将在两个新战线上与海明威展开合作。
美国海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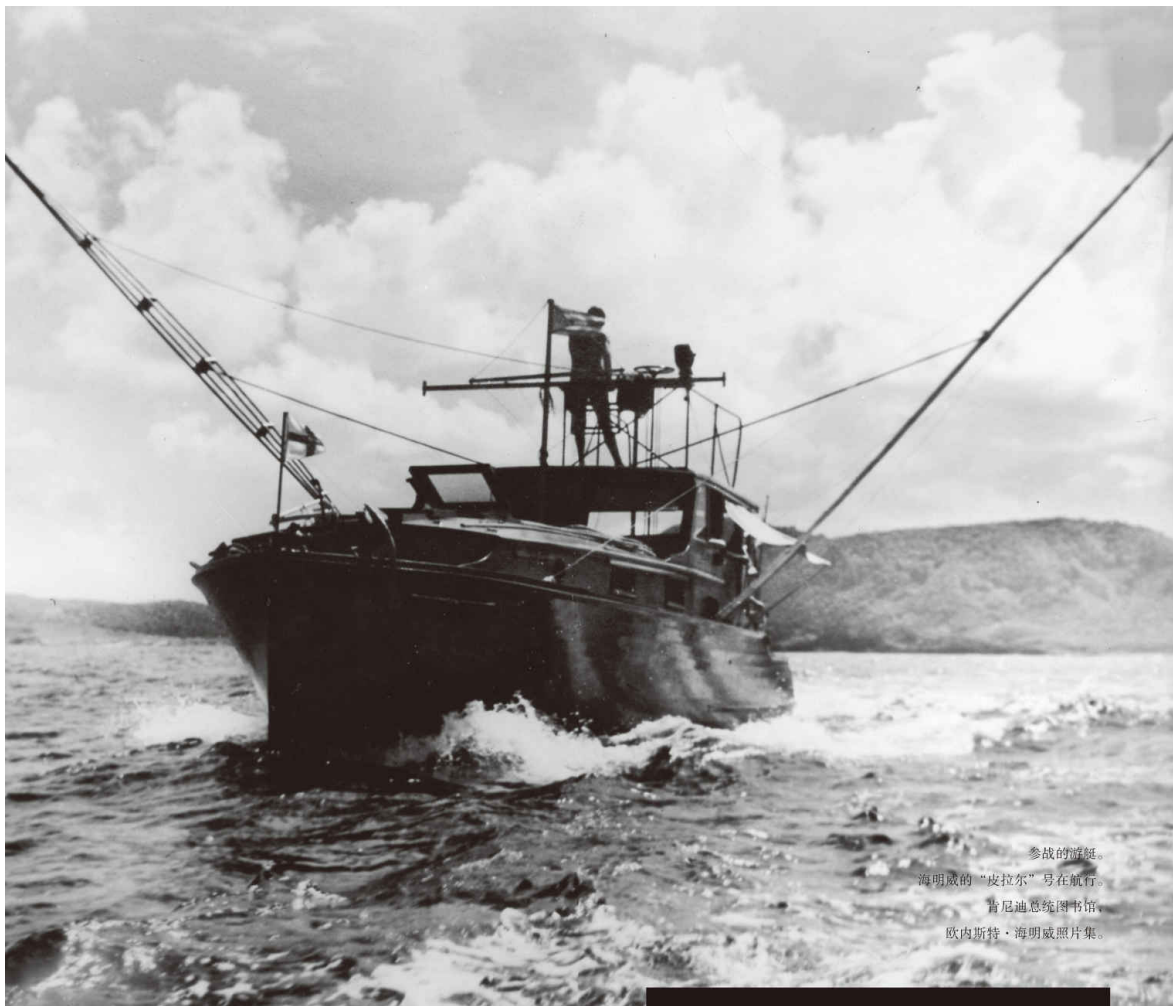
THOMASON 海军军官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中国的冒险结束后，来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小约翰A. 托马森海军中校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后者将在两个新战线上与海明威展开合作。

美国海军照片。



美国外交官罗伯特·乔伊斯或许是海明威在驻哈瓦那美国大使馆最好的朋友，摄于1941年前后。

科利奇帕克，国家档案馆。



参战的游艇。
海明威的“皮拉尔”号在航行。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参战的游艇。海明威的“皮拉尔”号在航行。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IN REPLY PLEASE
REFER TO:

OFFICE OF NAVAL ATTACHE AND ATTACHE FOR AIR
AMERICAN EMBASSY
HAVANA, CUBA

18 May 1943.

To Whom it may Concern:

While engaged in specimen fishing for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r. Ernest Hemingway, on his motor boat PILAR is making some experiments with radio apparatus which experiments are known to this Agregado Naval, and are known to be arreglado, and not subversive in any way.

Haynd D. Boyden

Haynd D. Boyden
Colonel, U.S. Marine Corps
Agregado Naval de Los Estados Unidos, Embajada Americana.

既非英语也非西班牙语海军随员为“无友行动”——即“皮拉尔”号的战争巡航——所写的介绍信。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¹⁸ EH4475 海明威坐在桌前打字：伦敦，多切斯特酒店，海明威反思了他在古巴的冒险，并为登陆日之后在欧洲开始新的冒险做好了准备。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4年，海明威和他的司机、二等兵阿奇·佩尔基在法国探险。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文·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4年，海明威和他的司机、二等兵阿奇·佩尔基在法国探险。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1年，海明威坐在桌前打字，伦敦，多切斯特酒店，海明威反思了他在古巴的冒险，并为登陆日之后在欧洲开始新的冒险做好了准备。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EH4475 海明威坐在桌前打字伦敦，多切斯特酒店，海明威反思了他在古巴的冒险，并为登陆日之后在欧洲开始新的冒险做好了准备。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CERTIFICATE OF IDENTITY OF NONCOMBATANT
(Para. 76, 94, and 100, FM 27-10)

APQ 887, 20 May 1944
(Place and date)

The bearer, **ERNEST M. HEMINGWAY**, whose signature appears below, is hereby certified to be **Accredited War Correspondent**.

attached to the Arm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 (~~European Command~~) and, as such, in event of capture by the enemy is entitled to be treated as a prisoner of war, and that he will be given the same treatment and afforded the same privileges as an officer (~~personnel~~) in the Arm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grade of **Captain**.

Ernest M. Hemingway
(Signature of holder)

ELMER F. POELKE, 1st Lt. AFJ
(Signature of issuing authority)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Age **45** Weight **220**


Height **6** ft. **-** in.

Color of hair **Brown**

Color of eyes **Brown**



FINGERPRINTS—RIGHT HAND, IF OBTAIN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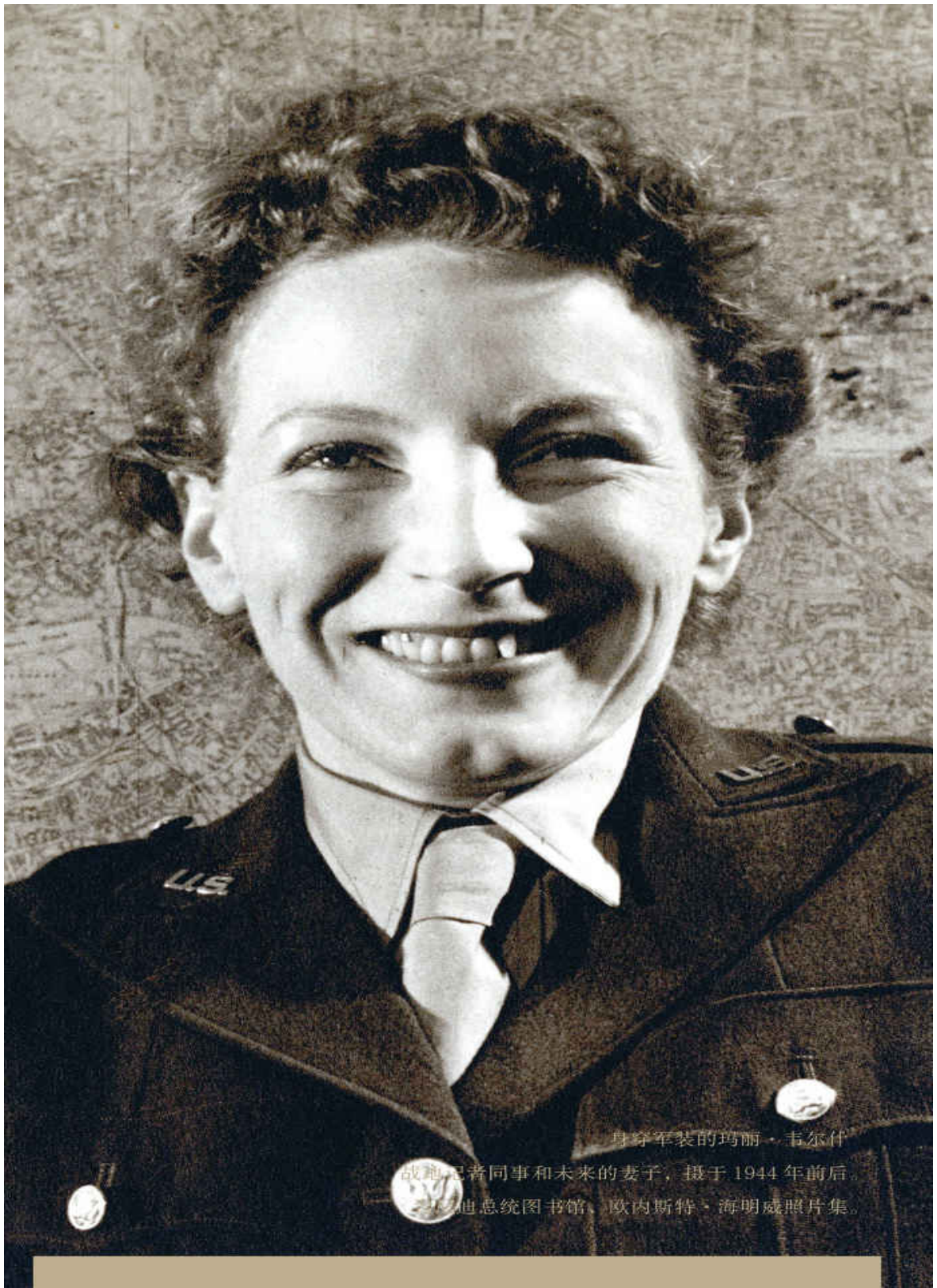


THUMB

Hq. 506. — 28-11-43/24w/19102 (44/5 39027)

官方认可的战地记者陆军1944 年签发的身份证。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身穿军装的玛丽·韦尔什
战地记者同事和未来的妻子，摄于1944年前后。
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身穿军装的玛丽·韦尔什战地记者同事和未来的妻子，摄于1944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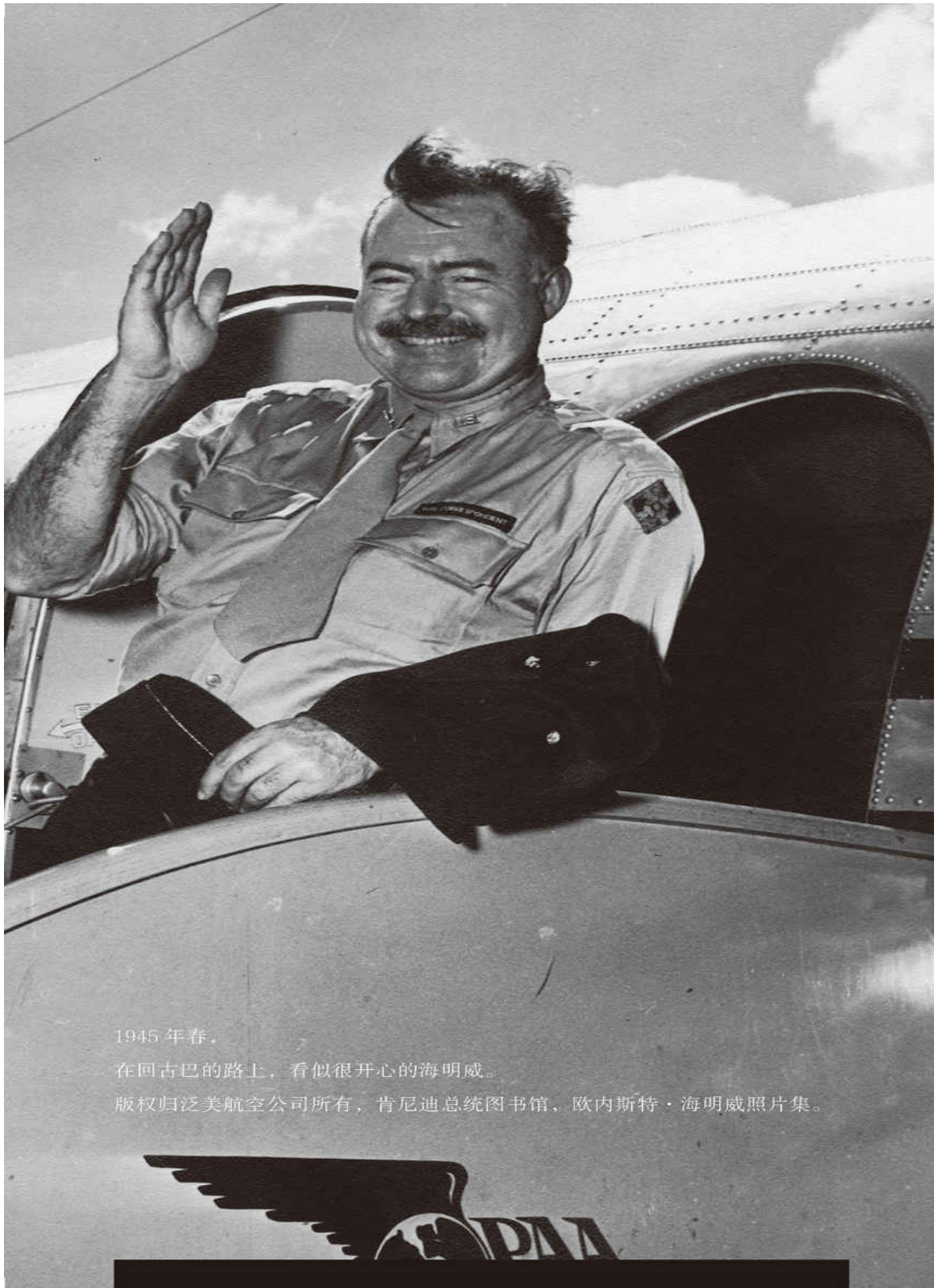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即将步入“亢奋期”
1944年8月，海明威与战情局的戴维·K. E. 布鲁斯上校，
以及法国抵抗运动的一名成员。
海明威系着一条缴获来的德国皮带，手拿酒杯，
旁边那个人手持酒瓶，看样子是他给海明威斟满了酒杯。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即将步入“亢奋期”1944年8月，海明威与战情局的戴维·K. E. 布鲁斯上校，以及法国抵抗运动的一名成员。

海明威系着一条缴获来的德国皮带，手拿酒杯，旁边那个人手持酒瓶，看样子是他给海明威斟满了酒杯。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5 年春，
在回古巴的路上，看似很开心的海明威。
版权归泛美航空公司所有，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1945 年春，在回古巴的路上，看似很开心的海明威。

版权归泛美航空公司所有，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终生好友1945 年9 月，海明威与巴克和玛丽·拉纳姆在瞭望庄园。

海明威腰上系的皮带就是他在1944 年的战斗中所系的那一条。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永不放弃
西班牙内战老兵和激进主义分子米尔顿·沃尔夫
1946年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讲话。
塔米门特图书馆，亚伯拉罕·林肯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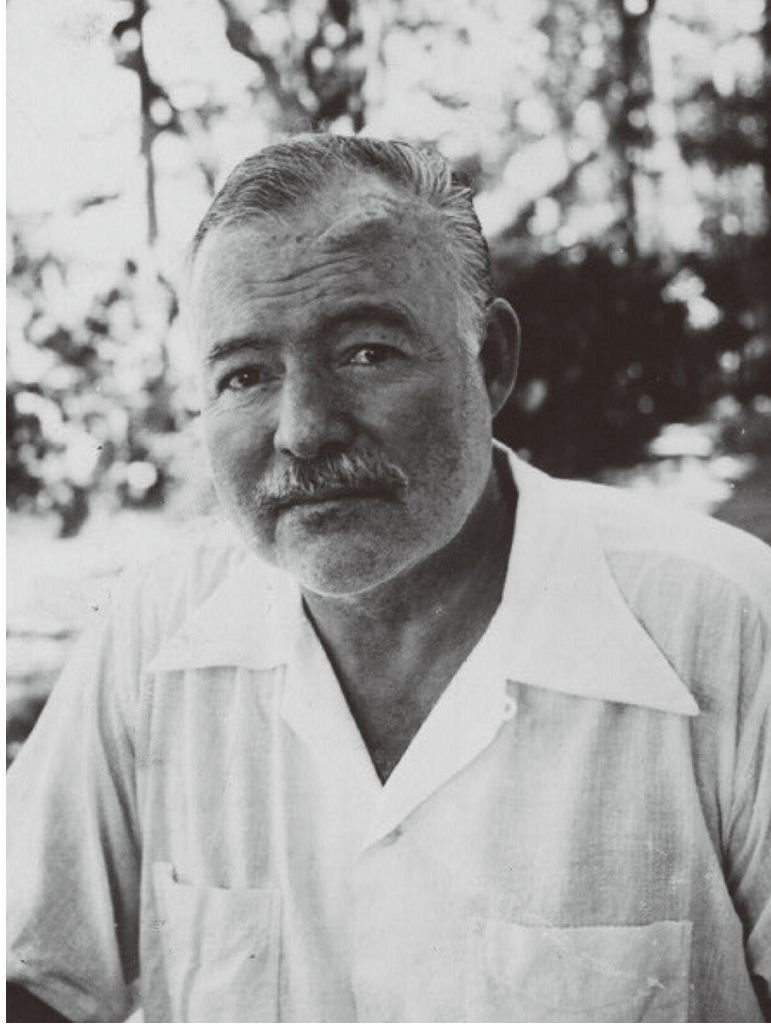
永不放弃西班牙内战老兵和激进主义分子米尔顿·沃尔夫1946年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讲话。

塔米门特图书馆，亚伯拉罕·林肯藏品。



对调查局、国会和新闻界道出了一切的红色间谍女王，这是1948年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

盖蒂图片社，托马斯·D·麦卡沃伊照片。



时间开始算总账了。《老人与海》面市之前的海明威。
纽约公共图书馆，李·萨缪尔斯摄影集。



十年的时光喜忧参半，这对夫妇也是一样。
在某个快乐的时光，海明威和玛丽在瞭望庄园外摆拍了这张照片。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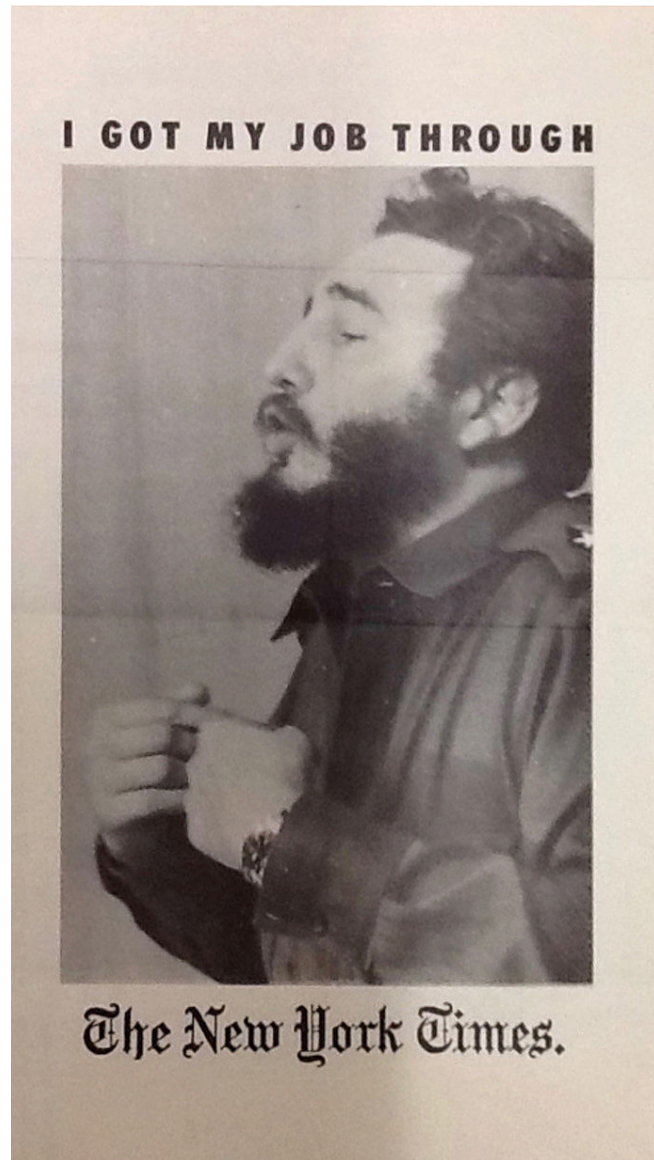
十年的时光喜忧参半，这对夫妇也是一样。在某个快乐的时光，海明威和玛丽在瞭望庄园外摆拍了这张照片。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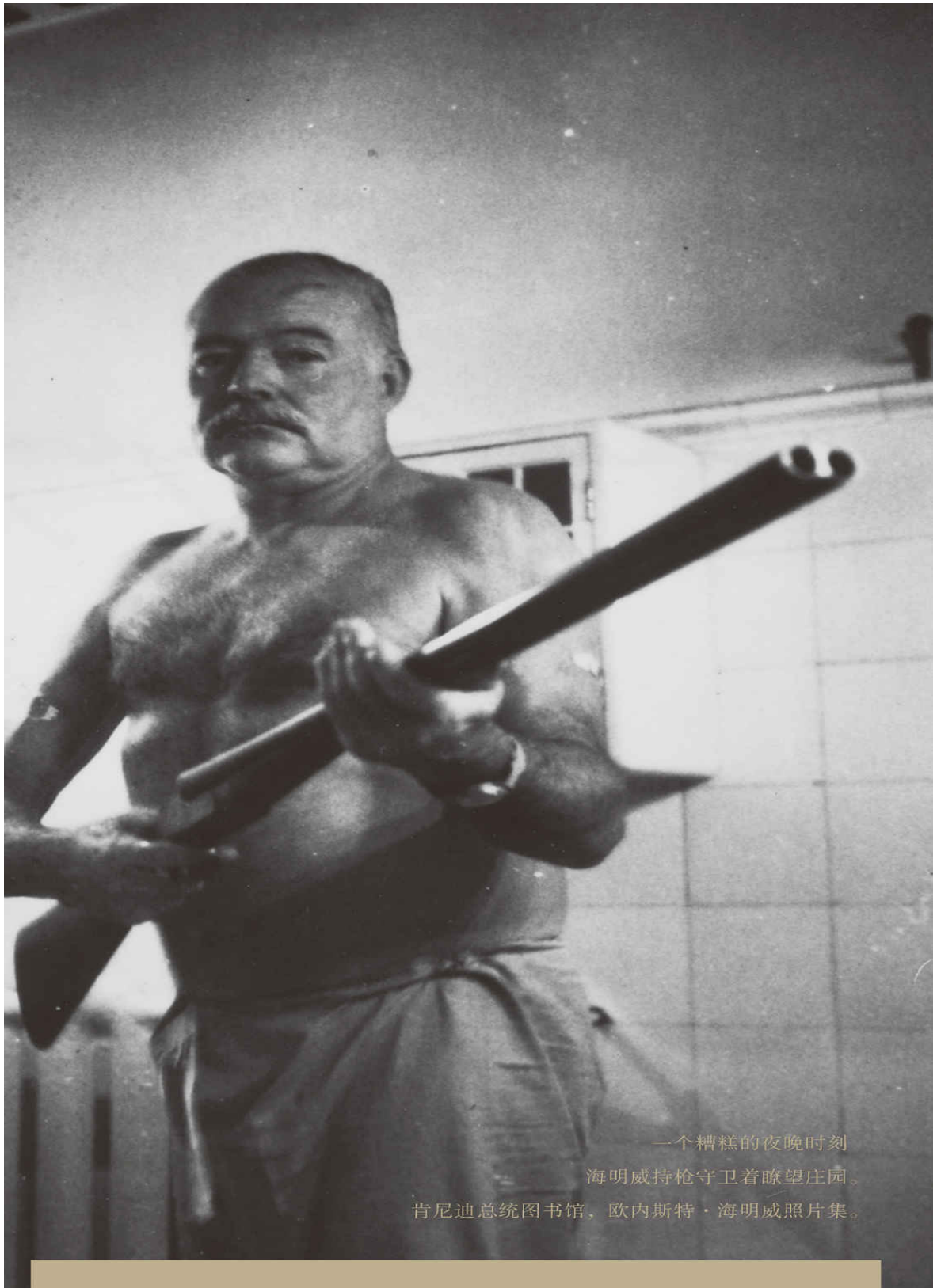
0554 《纽约时报》记者和编辑赫伯特L. 马修斯，海明威在欧美两个大陆上的朋友和知己，撰写了关于卡斯特罗革命的头条报道。

《纽约世界电讯报》和《太阳报》照片集。



卡斯特罗开始露出真面目后，一位《纽约时报》读者眼中的马修斯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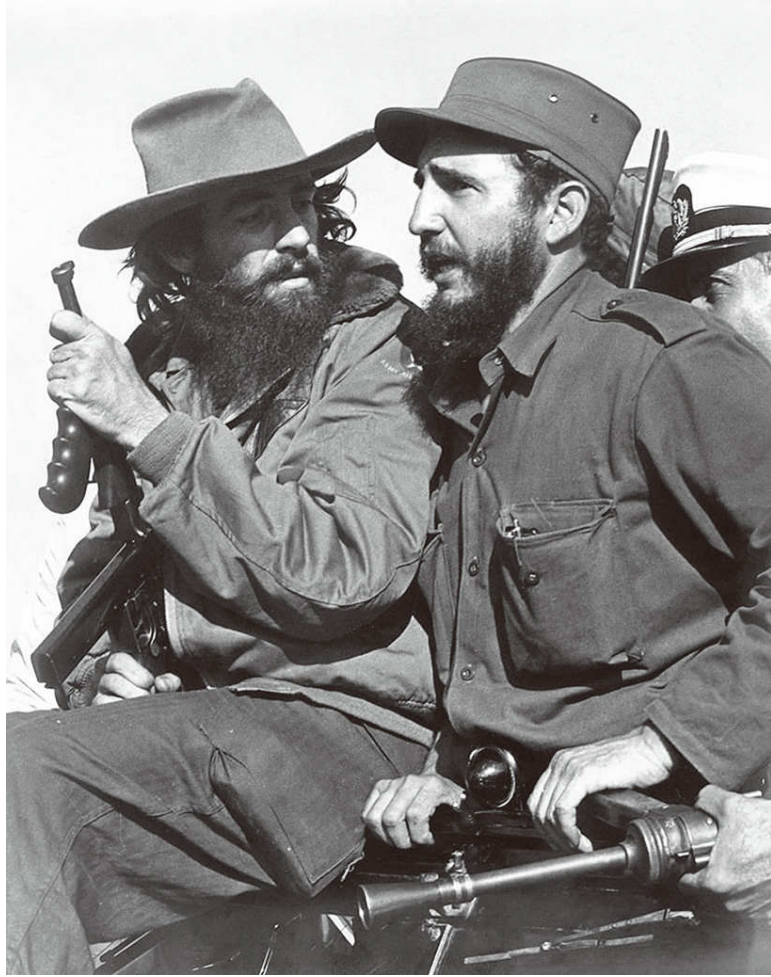
哥伦比亚大学，赫伯特·L. 马修斯文件。



一个糟糕的夜晚时刻
海明威持枪守卫着瞭望庄园。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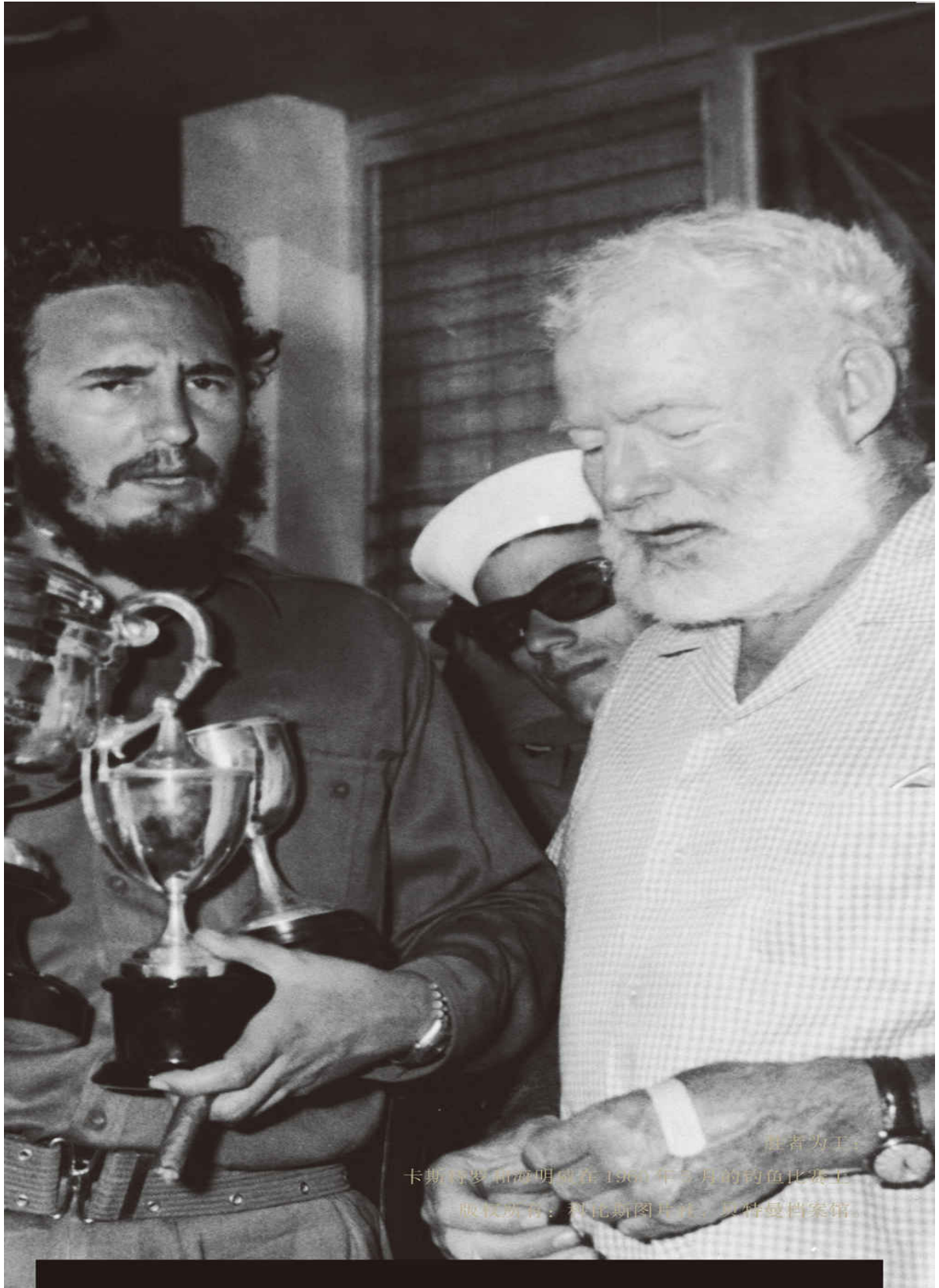
一个糟糕的夜晚时刻海明威持枪守卫着瞭望庄园。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



LUIS KORDA 路易斯·柯达 (Luis Korda) 拍摄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Camilo Cienfuegos) 1959 年1 月8 日胜利挺进哈瓦那的照片。“卡斯特罗和他的手下在巴蒂斯塔逃离古巴几天后，于1959 年1 月8 日胜利挺进哈瓦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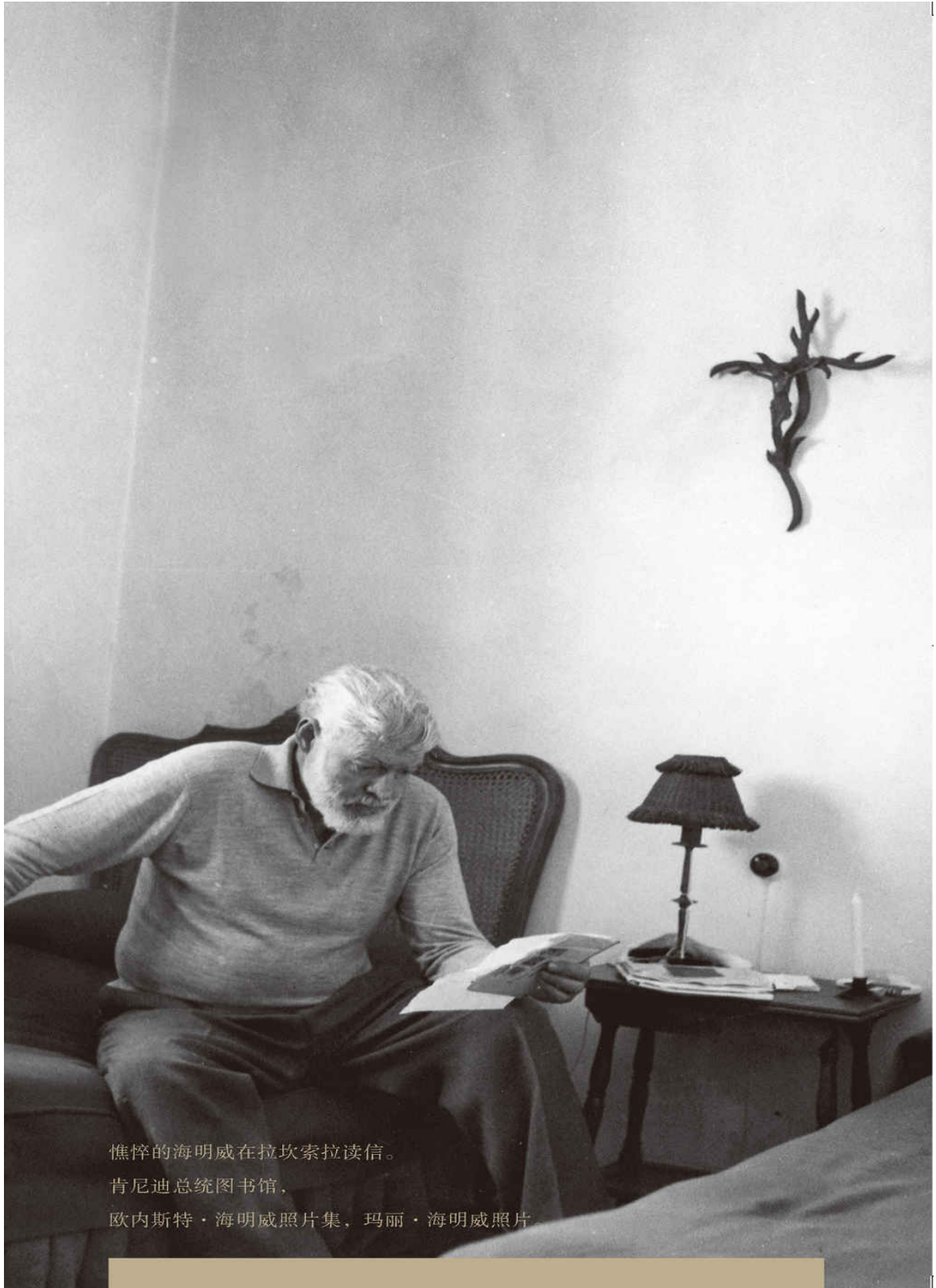
路易斯·柯达照片。



胜者为王：
卡斯特罗和海明威在1960年5月的钓鱼比赛上。
版权属于：利昆斯图片社，莫特曼档案馆。

胜者为王：卡斯特罗和海明威在1960年5月的钓鱼比赛上。

版权所有：科比斯图片社，贝特曼档案馆。



憔悴的海明威在拉坎索拉读信。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玛丽·海明威照片

憔悴的海明威在拉坎索拉读信。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照片集，玛丽·海明威照片。

本书荣誉

权威著作……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雷诺兹用史料证明，海明威害怕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隐瞒了20多年的一个龌龊的小秘密：1940年，他曾答应帮助苏联的外国情报机关——内务部。

——《华尔街日报》

引人入胜……关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本书为他的经典文库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雷诺兹独一无二的传记读来像一部侦探小说，充满悬疑。

——《密苏里人报》

尼古拉斯·雷诺兹在《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所做的精彩迷人的新研究表明，（海明威）事实上曾经为苏联人和美国人两方供职。

——《纽约书评》

雷诺兹在历史的暗影中发现了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海明威。

——《伦敦书评》

无论对热爱海明威的人们还是对一般读者来说，《作家、水手、士兵、间谍》都是一本有趣的书，对那个至今仍然令人着迷的作家，这本书为他的人生添加了更多迷人的细节。

——（《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

一本最新出版的书籍断言，美国著名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有过一段身为苏联间谍的惊心动魄的秘密生活。前中情局官员尼古拉斯·雷诺兹在《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揭示了这一惊人真相的诸多细节。

——《每日邮报》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揭示了一个前所未闻的迷人故事，展示了那段作为美国情报机关和苏联内务部双重间谍的秘密冒险如何影响了这位美国最著名作家的人生，精彩生动，是每一位海明威迷和侦探迷的必读书。

——威廉·多伊尔，著有PT109: An American Epic of War, Survival, and the Destiny of John F. Kennedy

这是一部深入细致、调查详尽、可读性强的记述，探讨了欧内斯特·海明威参与（美国和苏联的）间谍活动的经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是把海明威与苏联内务部的短暂关系放置在海明威一生的宏大背景中考察的第一本书。

——约翰·厄尔·海恩斯，合著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

（一部）迷人的书，写了海明威对美国政界的幻灭、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对冒险和颠覆的痴迷。

——《柯克斯书评》

雷诺兹利用自己在情报界的背景，挖掘出一批文件，直指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在1940年被内务部招募的史实。……雷诺兹出色地调查了海明威在二战期间的冒险。……精彩纷呈……强烈推荐。

——《图书馆杂志》

（一部）用详尽的研究探讨海明威的军事冒险精神的书籍。

——《出版商周刊》

尼古拉斯·雷诺兹把以前的传记作家们无法读到的、瓦西里耶夫揭示的那些秘密巧妙地揉进了海明威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海明威的读者……一定会为它着迷的。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伦敦）

内容精彩、节奏明快。……（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有趣的故事。

——《美国军事历史杂志》

海明威迷不能错过的好书。

——《美国航海杂志》

节奏惊心动魄，这也正是雷诺兹希望达到的效果，因为海明威的一生都是那样惊心动魄。

——《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 苏格兰）

文笔精炼，引人遐想……这是海明威生命中的一个很有争议却非常重要的片段。雷诺兹的每一个论断都有详细的研究考据，他以这段探索本身为那位伟大的美国作家辩护——在他悲壮地死去整整55年之后。

——《爱达荷政治家报》（Idaho Statesman）

本以为这是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对他的生平大概很难再有新奇的发现了，然而尼古拉斯·雷诺兹的新书却再度揭秘传奇。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揭开了一个秘密，一个从他人的人生中猎取秘密的作家对世人隐瞒的他自己人生中的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主动提出为苏联情报部门做间谍，并同时试图为美国从事间谍工作……我被迷住了。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周末版星期六》（Weekend Edition Saturday） 斯科特·西蒙（Scott Simon）

令人着迷。

——《哥伦布电讯报》（Columbus Dispatch）

前中情局博物馆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雷诺兹从研究资料中拼接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诺贝尔获奖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为好几个国际机构担任间谍。

——《萨克拉门托蜜蜂报》（Sacramento Bee）

一部研究透彻、文笔精到的传记作品……巨大的成就。

——书龙网 (Bookloons)

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战斗将是最洁净的生活方式。

——约瑟芬·赫布斯特致欧内斯特·海明威，

谈及西班牙内战，

1938年3月16日

人物介绍

雷蒙德·O. 巴顿 (Raymond O. Barton) ——美国陆军上将，曾指挥第四步兵师，并促成了海明威1944年在法国投入战地记者的工作。

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古巴的右翼独裁者，1959年1月1日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

伊丽莎白·本特利 (Elizabeth Bentley) ——瓦萨学院毕业生，1935年在纽约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一名苏联间谍。她还是雅各布·戈洛斯的情人，后者招募海明威为苏联秘密警察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 (NKVD) 工作。戈洛斯死后，她转投联邦调查局，出面指证前东主。

阿尔瓦·贝西 (Alvah Bessie) ——美国共产主义者，曾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并写下了畅销回忆录《战斗的人们》 (Men in Battle)。他成为“好莱坞十人”之一，也就是1947年以藐视国会罪被捕入狱的十位共产主义作家。

菲利普·W. 邦斯尔 (Philip W. Bonsal) ——1959年至1960年美国驻古巴大使，他与海明威交好，并试图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和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之间寻求妥协。

海恩·D. 博伊登 (Hayne D. Boyden) ——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曾在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担任海军随员，为海明威1942年和1943年的反潜艇战备侦察提供支持。

斯普鲁尔·布雷登 (Spruille Braden) ——1942年至1945年美国驻古巴大使，与下属博伊登和乔伊斯一起负责监督海明威的工作。

戴维·K. E. 布鲁斯 (David K. E. Bruce) ——战略情报局 (OSS) 高级官员，1944年在法国与海明威会面。两人一起为解放巴黎做出了贡献。战后，布鲁斯成为美国的资深外交官。

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古巴革命者，1959年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府，建立了左翼政权。

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皇家空军军官（未来的畅销书作家），与玛莎·盖尔霍恩交好，1944年帮助海明威来到欧洲。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海明威的同辈小说家，两人曾是朋友，后因帕索斯的朋友何塞·罗夫莱斯1937年在西班牙被共和主义者或苏联警察机构杀害而交恶。

古斯塔沃·杜兰（Gustavo Durán）——多才多艺的西班牙作曲家和战士，曾升任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某师指挥官；曾经是海明威的好友，两人在1943年闹翻；1950年代被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指控为共产党间谍。

周恩来——充满人格魅力的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人，曾于1941年接见过海明威和盖尔霍恩。

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前德国共产主义作曲家，1947年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调查。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1920年代与海明威齐名的小说家，两人也是密友。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西班牙将军和民族主义领导人，曾率领叛军推翻西班牙共和国。叛军胜利后，他成为西班牙的独裁者，直到1975年去世。

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美国共产主义作家，《新群众》编辑，海明威的熟人。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曾陪同他前往西班牙和中国，和他一起生活在古巴，并敦促他前往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

雅各布·戈洛斯（Jacob Golos）——狂热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移民美国，最终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纽约的行动人员；1940年

末或1941年初吸收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于1943年感恩节当天去世。

伊戈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苏联译电员，1945年在渥太华叛逃，随身携带着关于苏联在加拿大和美国部署间谍活动的一沓秘密文件。

温斯顿·盖斯特（Winston Guest）——美国社会名流和体育明星，曾在“骗子工厂”和战争期间“皮拉尔”号渔船出海时，在海明威手下工作。

格雷戈里·海明威（Gregory Hemingway）——海明威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

哈德莉·理查逊·海明威（Hadley Richardson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第一任妻子，约翰·海明威的母亲。

约翰·“邦比”·海明威（John “Bumby”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长子。

莱斯特·海明威（Leicester Hemingway）——欧内斯特的弟弟，曾于1940年在加勒比海航行，寻找德国潜水艇供给站。

玛丽·韦尔什·海明威（Mary Welsh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两人于1944年在伦敦相遇，1946年在古巴结婚。

帕特里克·海明威（Patrick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次子。

鲍莉娜·菲佛·海明威（Pauline Pfeiffer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第二任妻子，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格雷戈里和帕特里克·海明威的母亲。

瓦莱丽·丹比-史密斯·海明威（Valerie Danby-Smith Hemingway）——作家海明威的最后一任秘书，海明威死后，她成为海明威的小儿子格雷戈里的妻子。

约瑟芬（约希）·赫布斯特 [Josephine (Josie) Herbst]——美国左翼小说家，曾在巴黎、基韦斯特和西班牙与海明威为友。

何塞·路易斯·埃雷拉 [Jose´ Luis Herrera, 又名埃雷拉·索托隆戈 (Herrera Sotolongo)]——古巴共产主义者和西班牙内战老兵，曾经是海明威的私人医生和朋友。

约翰·埃尔曼 (John Herrmann) ——约希·赫布斯特的丈夫，小说家、共产主义的秘密特工。

J. 埃德加·胡佛 (J. Edgar Hoover) ——曾长期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

哈里·霍普金斯 (Harry Hopkins)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助手，曾任联邦紧急救援署 (FERA) 署长，这是1933年至1935年运作的“新政”机构。

A. E. 哈奇纳 (A. E. Hotchner) ——美国记者和作家，生于1920年，1948年前往哈瓦那采访海明威，成为后者的亲密伙伴。海明威自杀后，哈奇纳写了五部关于他的著作和许多文章。

尤里斯·伊文思 (Joris Ivens) ——荷兰共产主义电影导演和第三国际行动人员，曾与海明威合作过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

安东尼·詹金森爵士 (Sir Anthony Jenkinson) ——年轻的英国贵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和莱斯特·海明威联手调查加勒比海。

罗伯特·P. 乔伊斯 (Robert P. Joyce) ——美国派驻哈瓦那的外交官，曾与海明威交好，并敦促后者在1942~1943年从事陆地和海上的情报工作。

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人，领导国民党同时对抗日军和共产党的军队。他于1941年接见了海明威和盖尔霍恩。

伊凡·卡什金 (Ivan Kashkin) ——苏联文学人物，曾在翻译海明威的作品为俄文并将它们介绍给苏联读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匈牙利出生的记者和作家，曾在西班牙与威利·明岑贝格共事，后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写了反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午的黑暗》。

查尔斯·T. “巴克”·拉纳姆（Charles T. “Buck” Lanham）——美国军官，1944年曾在战场上与海明威结缘，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战后两人定期通信。

玛丽·“皮特”·拉纳姆（Mary “Pete” Lanham）——查尔斯·T. 拉纳姆的妻子。

约翰·霍华德·劳森（John Howard Lawson）——好莱坞编剧，坚定的共产主义者，1947年拒绝回答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关于党派从属的问题。

R. G. 莱迪（R. G. Leddy）——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调查局驻哈瓦那美国大使馆特工。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著名美国诗人和作家，曾参与海明威和伊文思共同拍摄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被罗斯福总统任命为国会图书馆馆长。

S. L. A. 马歇尔（S. L. A. Marshall）——美国军事史学家，1944年曾在巴黎解放期间与海明威共事。

安德列·马蒂（Andre´ Marty）——法国共产主义者，西班牙内战时期成为国际纵队的一名高级政委，因命令逮捕和枪决很多有不忠嫌疑的士兵而臭名昭著。

赫伯特·L. 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纽约时报》记者，在西班牙跟海明威交好并转而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政坛的崛起，写了一系列关于卡斯特罗及其运动的突破性文章。

约瑟夫·R. 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0年代初在华盛顿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共产主义者。

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美国财政部长，1941年海明威的中国之旅前后与其接触，想听听海明威关于亚洲局势的看法。

威利·明岑贝格 (Willi Münzenberg) ——德国共产主义者，天才地协调了1930年代第三国际在西欧的宣传活动。

乔·诺思 (Joe North) ——美国共产主义作家和编辑，他安排把海明威的文章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上，大概还曾把海明威介绍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招募人员戈洛斯。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Alexander Orlov) ——内务人民委员部主管，1936~1938年在西班牙与海明威交好，促成后者前往游击队训练营参观，后来他本人为躲避斯大林的其他亲信，逃往美国。

麦克斯威尔·珀金斯 (Maxwell Perkins) ——海明威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编辑，曾长期担任海明威的编辑（有时难免要长期忍耐这位作家的种种乖僻）。

古斯塔夫·雷格勒 (Gustav Regler) ——德国共产主义者，曾担任国际纵队派驻西班牙的政委，在那里与海明威结交。他后来反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流亡墨西哥。

阿尔弗雷德·赖斯 (Alfred Rice) ——海明威的律师，1948年后也是后者事实上的文学经纪人。

何塞·罗夫莱斯 (José Robles) ——西班牙学者，移民美国后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后来又返回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共和国服务。后来在可疑情形下被共和党人或苏联警察机构谋杀。

安迪·鲁尼 (Andy Rooney) ——《星条旗报》记者，1944年在法国战场上遇到海明威。

小约翰·W. 托马森 (John W. Thomason, Jr.) ——美国海军陆战队派驻美国首都华盛顿海军情报局的军官，他支持并促成了海明威1942年和1943年在古巴海域的反潜艇战备侦察，并与后者合作出版了一部关于战争的文集。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布尔什维克指挥官和苏联领导人，是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1920年代的主要政敌。后被迫流亡墨西哥，1940年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杀人员之手。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siliev）——克格勃特工，后转为新闻记者、研究人员和流亡者。1990年代初曾与对外情报局（SVR，冷战后俄罗斯的情报机构）签署协议阅读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档案，并撰写概要跟西方历史学家分享，该项目旨在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局养老基金筹钱。他读到的一份档案就是关于海明威的。

勒内·比利亚雷亚尔（Rene´ Villarreal）——海明威在古巴的管家，也被称为海明威的“古巴儿子”。

艾米特·沃森（Emmett Watson）——驻扎于西雅图的新闻记者，曾在1960年采访海明威，也是1961年发现海明威死于自杀的人。

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曾给海明威分派任务，让他1941年在中国搜集有关局势的情报。战后怀特被揭露为苏联间谍。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美国左翼文学评论家和作家。

米尔顿·沃尔夫（Milton Wolff）——美国左派人士，曾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继续为进步事业而战。

引言

2010年我在所谓的“前所未见的最佳博物馆”——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博物馆——担负历史学研究工作。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安全园区内矗立着一座幽僻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建筑，中情局博物馆就在建筑内那条弯弯曲曲的走廊尽头。当时我们正准备搭建一个关于战略情报局（OSS，以下简称“战情局”）的新展厅，战情局是美国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成立于1942年。我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收集关于该实验性机构的信息，包括调查该组织的花名册。

为与轴心国作战而仓促组建的战情局是个古怪的产物——既集合了来自美国东海岸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鬼才和创意人士，从华尔街律师到好莱坞电影导演，再到发战争财的海盗和雇佣兵，甚至包括未来的名厨朱莉亚·查尔德。在战情局，人们几乎能够从头到尾自行设计冒险计划。他们中很少有人对正规陆军和海军中那种包容性较差的文化感兴趣。

如此整日沉浸在调查研究中，没想到有一天，我的胡思乱想竟然领我来到了一片无人涉足的陌生领域。我记得曾经读到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战情局戴维·K. E. 布鲁斯上校的故事，1944年8月，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了巴黎丽兹酒店的酒吧。于是我想，那个故事说不定还有后续。海明威不会和战情局格格不入。他热爱秘密，也热爱它们带给他的优越感。他渴望战斗，只是不适合常规的军旅生活。他游走于各个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还常常越界。我暗想他的确跟我遇到或读到过的很多从事谍报事业之人有不少共同之处。那么，他是否曾以某种形式担任过战情局的间谍？海明威与二战情报界的真相内幕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查阅能找到的每一份资料。中情局的一份参考资料指向一份已经解密的战情局档案，目前存档于首都华盛顿以外、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的国家档案馆。¹档案馆的人从未找到过那份档案，这起初倒是让一切显得更神秘了，但也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无用功，在一间密室里跟那种老式三孔活页夹的检索工具纠缠不休。有几份资料甚至还用那种3×5英寸卡片编写索引呢，除我之外根本没人想看。最后，一位好心的海明威学者跟我分享了他在1983年找到的战情局档案的一

个副本。在此过程中，我在那些曾经保密的战情局、联邦调查局（FBI，以下简称“调查局”）和国务院档案中发现了其他一些诱人的线索。

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后，我的脑海中呈现出一个海明威肖像的轮廓，跟我以往知道的形象截然不同。1937年以后，无论二战前还是战争中，这位作家曾在两个大陆上从事过各种形式的间谍和战斗行动，我觉得他近乎痴迷于此。行动站点各不相同，通常是在海外：西班牙的战场、哈瓦那的小街，或是漂流在中国北江上的帆船。他似乎很倾慕那些在阴影中自主行事的男男女女。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曾经秘密劝说战情局将他纳入麾下。副局长和处长们考虑了她的请求，评估了他的潜力，在送文件的空白处坦率地写下了评估记录。

随后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他还曾与另一个情报机构签约，这个机构可一点儿也不符合关于海明威生平的传统叙事。那就是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下简称“内务部”），它在冷战期间纵横海内外，是更有名的克格勃（KGB）的前身。

在核实自己的调查是否漏掉了任何证据时，我偶然发现了内务部的那条线索。我往往会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去寻找关于海明威和情报界的一切资料。在那改变命运的一天，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2009年的书籍，作者之一是脱离了克格勃的前特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那本书中有一个分章，逐字记录了瓦西里耶夫偷运出俄罗斯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官方苏联档案摘要。瓦西里耶夫的证据确凿可靠。海明威与内务部的关系记录表明，一名苏联特工曾在1940年12月前后“基于意识形态理由”，招募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那时斯大林正以铁腕统治苏联，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跟希特勒结盟——更不要说始于1934年，仍在继续而看不到尽头的血腥清洗了。

作为海明威的终生崇拜者，当我读到他曾与内务部签约时，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怎么可能呢？他的确有过很多左派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赞成过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啊。他创造的文学人物体现了那么多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珍视的美国价值观：求真、英勇、独立、重压之下保持风度、维护弱者不受欺凌。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也是革命性的。他曾改变了1920年代美国文学的走向。就在1940年末跟内务部开启这段关系之前几周，他刚刚出版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小说之一——《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和斯大林的爪牙签约呢？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也就意味着对朋

友、家人和读者全都隐瞒了真相？要知道他最伟大的事业可是公开，而非隐瞒自己的人生经历啊。

我彻底被迷住了。完成了战情局布展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为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或许是翻译或誊写错误？要不，这怎么可能呢？这次招募的大背景是什么？它对海明威留给我们的遗产又意味着什么？

负责人都去世了——海明威的苏联招募者于1943年感恩节当天死于格林威治村（跟不少资产阶级敌人一样，他也在一顿大餐之后死于心脏病发作）；海明威本人1961年自杀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几乎都已离开人世。我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得依赖类似那份从未正式解密的苏联记录那样的印刷品，以及当初只写给某一个人看的私人文件和信件。我希望能从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找到足够的资料，帮助我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我开始日复一日地只身在全国各地的阅览室里发掘资料，从圣迭戈到西雅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起初我埋头研读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海明威资料。我在那里翻阅他的通信——他的信写得跟小说一样精彩——那个房间俯瞰波士顿港冰冷的海水，陈设却很像他在热带古巴那个住所的起居室，也有不少兽皮装饰，沙发旁的一张桌子上也有个大水瓶，用它倒水时，还真像海明威用的台克利酒瓶。

我一生热衷于揭秘幕后故事，在中情局工作之前就是这样。调查总是让我着迷。每去一次档案馆，必然会毫无悬念地再去一次，我对此感觉良好。那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鲜为人知的文字艰涩的书籍，我读起来永远没够。因此在其后三年里，我就依靠非同寻常的资料来源，为那幅海明威新肖像的轮廓补足了血肉，现在这些资料来源还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内一位内务部将军的私密文件、保存在华盛顿另一个档案馆内的他的调查局经手人员的秘密文件，以及他和律师之间的一次争吵的记录，乍看像是在争论版权问题，等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

的严厉目光下读完了一叠鲜为人知的海明威信件，一旦套入相关语境，它们竟有着惊人的启发性。

最终我得出结论，海明威与内务部的短暂关系，以及这背后的政治态度，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在此前都被人

们忽略了。它们左右了他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所做的许多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写作，以及如何行事。这一连串事件甚至间接导致了他在1961年自杀。很多戏剧化情节都是在他的头脑中上演的，因而难免被他夸大了。冷战的章节——赤色恐慌、古巴革命，以及他死前两个月发生的猪湾惨败事件——让他更不堪忍受。他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精通政治权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过高地估计了他掌控自己和他人，乃至改变历史的能力。最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终于得出了那个悲壮的结论：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讲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诺兹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第52任美国国务卿。他是冷战早期的重要人物，主张以强硬态度对抗苏联。

- [第一章 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
- [第二章 作家与政委：在西班牙参战](#)
- [第三章 重返西班牙：坚持到底](#)
- [第四章 丧钟为共和国而鸣：海明威见证了历史](#)
- [第五章 秘密档案：内务部在行动](#)
- [第六章 探还是不探：中国和战争的压力](#)
- [第七章 骗子工厂：一场秘密的陆战](#)
- [第八章 “皮拉尔”号与海战：我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
- [第九章 挺进巴黎：勇猛如野牛](#)
- [第十章 在前线：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
- [第十一章 “心里发毛”：既非战争，也非和平](#)
- [第十二章 冷战：不再豪言壮语](#)
- [第十三章 没有操纵空间：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古巴和凯彻姆](#)
- [尾声：计算隐秘的代价](#)

第一章 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

海明威可不光是去看的。1935年9月4日，他驾驶着自己新买的舱式游艇“皮拉尔”号，从基韦斯特^[1]向东北航行75英里，前往上礁岛加入救援行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飓风之一，行前，他决心尽一切努力帮助幸存者，在“皮拉尔”号上装载了足够的食物、水和各种供给物，希望能为那些无家可归者一解燃眉之急。然而他竟然找不到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服役以来，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状。劳动节^[2]那天，风暴呼啸着穿过一连串地势低洼的狭窄岛屿，造成的破坏不亚于接连几天的炮击。很多最大的树木，像牙买加栎木和红木，都被连根拔起，侧卧在地。只有几幢最坚固的建筑物仍然挺立着，其他的房屋此时都变成了一堆劈柴。在伊斯拉莫拉达（Islamorada）的小邮局附近，被派来撤离救援工作人员的火车被飓风吹得脱了轨，车厢四仰八叉地散落各处。最可怕的是看到死人，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夏日，他们的尸体在80度^[3]的高温下膨胀着。很多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而海水仍在经受着15英尺^[4]高的风暴浪的冲击，浑浊不清。常常能看到死去的人仍然死死攥住木码头，以防止被冲走，他们的身体在木桩子上被反复抽打。两个女人在一棵红树的枝杈上摇晃着，那棵树倒是没被狂风大浪击倒——死者试图爬上树自救么？还是海浪把她们抛进了那可怕的桎梏？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位伟大的作家唯一能帮助死者的，就是写下他们的故事，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谁又该为悲剧负责。他决定为他们作证的方式，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到1935年，也就是大飓风发生的那一年，海明威已经爬到了他写作事业的顶端。这位生于19世纪的最后一年，从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Oak Park）走出来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二十多岁便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他的两本畅销书，《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反映了他曾如何活过人生的前30年：19岁便因伤退伍，之后为《多伦

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做海外记者，成为“迷惘的一代”传奇天才作家群巴黎分支的一员。

海明威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精妙地解释了他作品的魅力：他的作品以他标志性的简洁和精准“忠实而勇敢地”再现了“时代的艰难风貌”。在写作时，他就是简洁的代表，要言不烦地向万千读者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海明威最重要的主题是个人的勇气：显现出他“天生崇拜每一个在暴力和死亡笼罩……的世界上孤军奋战的人”。¹

海明威的成功让他日益成为每一个美国作家的试金石，也成为不少美国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楷模。他们阅读海明威，引用他的言论，模仿他的行为，寻求他的建议。虽然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但他也是公认的全世界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能与他比肩的人寥寥无几。他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文学生来要为政治服务的苏联。苏联作家越来越无法自由地道出他们所见的真相，而不得不迎合政府。这对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海明威倒没有多大影响，但他的确很享受越来越多的苏联人阅读他的作品这一事实。

1935年8月19日，当美国评论界令海明威觉得他在国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时，他收到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包裹，里面是一本翻译成俄文的他的短篇小说集。寄送包裹的是著名的青年翻译家和文学人物伊凡·卡什金，他为在苏联推广海明威作品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起初只是在作家同行之间传看，后来也把它们推荐给其他读者，包括少数统治精英。² 海明威看到俄文版非常开心，包裹中还附有一篇卡什金赞誉这位美国作家的文章，因为“对同理心和共情的渴望”，他迫不及待地打开那篇文章阅读起来。³ 在（致“尊敬的先生，或海明威先生抑或亲爱的同志”的）附函中，卡什金告诉海明威，苏联读者几乎不加批判地欣然接受他的作品：“在我们国家，没有人不被您天才而轰动的成就所震惊，没有人会对您的缺点和局限冷嘲热讽。”⁴ 海明威立即致信感谢卡什金，信中说“让人了解你在写些什么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完全不像对待他素日打交道的那些纽约评论家。⁵ 这是两人通信的开始，他后来很长时间都很重视这位评论家和翻译家，给他写了很多毫无城府的长信。⁶

海明威希望卡什金务必了解，虽然拥有苏联读者让他很高兴，但他并不打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哪怕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面对左

倾压力，年纪轻轻便已成名的海明威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他在一封信中向卡什金解释说，他的朋友和评论家们都说过，如果不像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写作，他终将众叛亲离。但他不在乎。“一个作家”，他继续写道，“就像个不对任何政府效忠”，也“根本不喜欢他所在国家的政府”的“吉普赛人”。政府还是小一点儿好，大政府必然“不公正”。⁷

不管他如何自证清白，左派读者却渐渐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发现了阶级意识的蛛丝马迹，诸如美国政客们软弱无能、美国有钱人如何无视穷人的苦难。有些评论家提到他的短篇小说《一次远行》（“One Trip Across”），写一个船夫因为经济衰退走投无路而犯罪；还有人竟然从他的作品《非洲的青山》（*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中摘录出他评论美国国内形势的几句话断章取义，这真令人称奇，要知道那是一部关于富人打猎的游记啊。⁸

海明威即将为《新群众》（*New Masses*）撰写的报道会让不止一位左翼美国人感到惊喜，也会引起苏联对他的关注。由美国左派人士和共产主义者编辑的这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几乎是美国共产党（CPUSA）的机关刊物。1926年《新群众》首次发刊时，《时代》（*Time*）杂志曾把它描述为“一艘冒着黑烟的船，外观不雅但力道不小，剑状的船首上有赤色的涂鸦，看似乱七八糟的船身上也到处是赤色的印记”。⁹

希望在该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各类作家丝毫不在意船身是否乱七八糟，其中不乏举世闻名的作家，像萧伯纳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有只被左派视为指路明灯的无名之辈。只有一些是政治作品，大部分都不是。海明威发表的作品主题各异，写斗牛，也写死神在寒冬降临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覆盖的小屋里。在编辑们对他的中篇小说《春潮》（*Torrents of Spring*）发表了严苛批评后，他毫无顾忌地笔诛墨伐。他在写给老友埃兹拉·庞德的信中说，那些人革命只不过是为了建立一个视他们为“才子”的新秩序。¹⁰ 编辑们反唇相讥，说海明威太关注个人，看不到决定美国历史进程的强大经济力量。

那些经济力量在1929年凸显出来。那一年的股市崩盘带来了极度萧条，对美国梦的每一个设想都提出了质疑。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华尔街停摆了，无法再推动经济复苏。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估计有200万人来到铁道边，跳上过往的货运列车，到全国各地去找工

作。数百万人忍饥挨饿。一度业绩显赫的商人沿街贩卖铅笔或苹果，后来则跟失业的人一起在施粥场排起了长队。这个国家曾经繁荣的农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城市没钱购买那么多的肉和农产品了，大萧条也就蔓延到了农村。大平原地区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更是雪上加霜，一片片农田随风消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沙暴区。

1929年后，《新群众》的政治倾向更左了。编辑们决定跳上“风起云涌的历史舞台，时代的战斗正在那里打响”，杂志社派记者“前往罢工前线，……充满焦虑的农场，（以及）硝烟弥漫的南方”。¹¹他们想要获取一手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灾难丛生的经济和环境形势带来的多种苦难。如此产生的报道便会吸引那些如今愿意严肃思考一下资本主义诸多缺点的读者。

远在天边的苏联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苏联人在谈论着一个没有人会失业或挨饿的未来。那是一个公正的无阶级社会的迷人愿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似乎是为苏联量身定制的对立面。希特勒的演说为德国确定了基调。他紧握双拳，挥舞双手，声音渐入愤怒的高潮，把危机怪在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头上，虽然德国的萧条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严重。他提出了另一种走出萧条的解决方案：让你的敌人闭嘴，动员人民起来作战，把需要的东西从敌人那里抢过来。希特勒和他的独裁伙伴墨索里尼就用这种方式把许多美国艺术家推进了左派的怀抱，他们本来并没打算在左派道路上走得那么远。¹²

早在大萧条开始之前，海明威就和第二任妻子鲍莉娜·菲佛一起搬到了基韦斯特。他们在那里组建家庭，也让健壮而俊朗的运动爱好者海明威——他身高一米八三，肌肉结实，一头黑发，漆黑的双眼炯炯有神——维持部分户外生活或者至少能穿得像个户外活动者：光着脚，身上那件素色的衬衫通常有一半扣子敞着，短裤则用一条绳子勒在腰间。

基韦斯特位于美国本土的最南端，几乎是从佛罗里达伸进墨西哥湾的一连串小岛中的最后一个。1928年，那里是穷人的热带天堂，可以搭乘火车或坐船从大陆直接抵达。很多街道尚未铺就，许多建筑物还没有自来水管或通电。最像杂货铺的地方就是个贩售生活必需品的小仓库而已。

海滩近在眼前，海水永远温暖清澈。即便在15英尺深的地方，海底的白沙也像是触手可及。各种鱼类在沙子上方游弋，当地人手到擒来。深水区的渔获更佳。渔夫们把当日的鲜货出售给邻人或跟他们以物换物，当地人的一日三餐，就是这些鱼加上仓库里买来的米和豆子，配上从自家果园里采摘的水果。晚餐后，任何人都可以坐在城镇码头上看夕阳入海，然后去一家毫不讲究的酒吧找乐子，那家酒吧最初名叫“盲猪”，后改名“银拖鞋”，最后又叫“邈邈乔”。不管叫什么，那都是个“简陋将就，但有好友、有赌博，有15美分的威士忌，还有10美分的……杜松子酒”的地方，因为总有融化的冰块掉落，水泥地板永远是湿的。¹³

海明威起初是从同为小说家的约翰·道斯·帕索斯那里听说基韦斯特的，道斯·帕索斯这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知识分子高大、羞涩、渐秃，理智多于激情，样子像个教授。但他也喜欢户外，只不过喜欢的方式跟出色的渔夫加猎人海明威不大一样。道斯·帕索斯1924年沿礁岛群徒步旅行时发现了这个地方，在一封信中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海明威。海明威闻声来访，也一下子爱上了这里，最后在白头街一座结实的两层石灰石房子里安了家。那座房子建于1851年，看上去像某个江轮船长在新奥尔良那种地方建的住宅，高高的圆弧形门廊，装饰华丽的铁花格架，木质防风盖通常都漆成绿色。

到1930年，这座海岛城市也陷入大萧条。到1934年，基韦斯特彻底破产了，无法收取足够的税收应对支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联邦紧急救援署（FERA）佛罗里达分署介入并接管了这座城市。¹⁴ 海岛的诱人之处，部分就在于它远离大陆；现在一个国家机关抢在地方政府之前介入，力求存其精华。道斯·帕索斯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所谓的“救援勒索”正在把“一个独立渔夫和私酒贩子的城镇”变成“救济农场”。¹⁵海明威同意他的看法。罗斯福的“新政”，即总统让国家走出大萧条的方式，就像一群“天真的混蛋”在举行“某种基督教青年会式的表演”。海明威的世界观向来最看重艰苦的自力更生，因而在他看来，“新政”是鼓励人们放弃工作而靠救济生活。¹⁶ 救援计划的部分内容是把基韦斯特转变为一个旅游胜地，并让著名作家位于白头街的宅邸成为景点之一，但也于事无补。这会剥夺海明威和家人的隐私。即便如此，在1940年之前，他们还是会把这里看作自己的家。

在礁岛群，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亲近自然，对一个像海明威这样敏感地熟悉气象之人，感受风暴来临并非难事。1935年8月的最后一夜，黑云压顶，狂风肆虐，气压下降。查看报纸确认过自己的直觉之后，海明威立即开始行动，让自己的房子，特别是他的船，准备好应对风暴。他那艘橡木和红木打造的舱式游艇“皮拉尔”号就是严格按照他的规定苦心建造的，主要是为了钓鱼，但设计时也考虑了舒适的海上生活。这天夜里，它正停泊在海军船坞的潜艇码头附近，就在几个街区之外。海明威在那里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准备，想尽可能让它更好地应对这几天的恶劣天气。

最后，风暴与基韦斯特擦身而过，倒没造成太大的灾难，但它全力袭击了中礁岛和上礁岛，比人们记忆中的任何飓风都要强大得多。海明威一俟风暴结束就直奔东北航行，想探查飓风造成的破坏，看看他能帮着做些什么。他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片毁灭景象。枝叶看似被大火烧得荡然无存，陆地像是被海水颠倒了乾坤。¹⁷ 这些是他到达为一战老兵建造的海边营地之前看到的场景，老兵们在那里参与“新政”的工程建设。海边营地的毁灭更加彻底。那些原始的木头小屋本来就是用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材钉到一起的薄木板搭建起来的，上面搭块帆布就算屋顶，此时干脆彻底消失了。尸体像海上船难后的残骸和弃物一样到处都是。自1918年以后，海明威从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死人。他喜欢说因为参战早已习惯了死亡，那是身为战士必须接受的事实。但眼前这不是战争，这让人无法接受。

在写给他的编辑、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的一封长信中，海明威无法遏制对这一切的悲愤之情。¹⁸ 他所分享的那些关于半裸的尸体在烈日下腐烂的可怕细节是体面的纽约人——那些穿西装打领带、乘船去深海垂钓的人——所不愿直视的。海明威的结论是，那些老兵“事实上被谋杀了”。他认为责任应由总统和FERA的管理者——如今是罗斯福亲信的前社工哈里·霍普金斯承担。他们把“那些参加酬恤金游行^[5]的可怜人派到这里，就是为了干掉他们”，并且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干掉了他们”。¹⁹（这么说难免偏激，罗斯福政府只是给那些在华盛顿游行抗议的失业老兵提供了一个在礁岛群工作的机会。）在海明威看来，这个故事再次证明了大政府和新政的缺点。《新群众》的众多共产主义编辑之一乔·诺思发电报给海明威，请他撰写关于这场灾难的报道——此人日后将不定期地在海明威的生命中隐现。诺思正在寻找一篇否定新政的文章。当年共产主义的

名言是罗斯福政府跟胡佛政府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新总统把资本主义的凌厉政策藏在了那副笑容可掬的面孔之后。²⁰

诺思给了作家足够的发挥空间，让他尽情书写所见所闻，但他觉得海明威可能恰恰会写出他想要的那种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般倾向，即尽可能地利用大人物，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不需要党员资格，只要愿意写就行。²¹ 虽然《新群众》仍在批评海明威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往往批评得还挺激烈，但海明威仍然同意为诺思撰写报道。²² 毕竟他已经在致珀金斯的信中写了一部分，也欢迎另有一个宣泄强烈感情的出口。再说反正也没别人请他写。²³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海明威请他的朋友和通信者们相信，他并没有改变对《新群众》的编辑方针的不满。²⁴

1935年9月17日，该评论杂志把海明威的那篇被冠以《是谁谋杀了老兵？》（“Who Murdered the Vets？”）标题的报道刊登为封面文章，称它抨击了罗斯福政府为老兵制定的“失业、饥饿和死亡”政策。²⁵ 那是为《新群众》写的一篇非同寻常的报道。它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富人与老兵之间的阶级差别。海明威写道，像胡佛和罗斯福总统这样有钱的捕鱼人都知道，夏天光顾礁岛群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劳动节前后，天气变化无常，会对他们的财产造成威胁。然而老兵不是财产。海明威接着说，老兵们不过是些别无选择的“不成功人士”，于是在飓风季节被派到礁岛群去做“苦力工”。

接着海明威又换了一副调子，用第一页剩下的篇幅讨论他曾如何重视自己的物质财富，特别是他那艘定制的舱式游艇，跟读者讲述为了让游艇不受风暴摧毁，他不得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这一段富裕船主应如何对付飓风的入门读物，不知为何居然被编辑们放行刊出了。然后海明威再度转换笔调，在描述灾难的可怕细节时穿插了一连串责问。他想知道：是谁把老兵们派往礁岛群的？谁在飓风季节把他们留在了那里？谁没有妥善安排他们的撤离，实施这“唯一可能的保护”？他最后问道，该给这位过失杀人者怎样的惩罚。²⁶

《是谁谋杀了老兵？》的读者之众，大大超过了《新群众》相对较小的发行量。举例来说，《时代》杂志就在关于灾难的报道中提到了海明威的文章，该报道先是重点陈述了佛罗里达州检察官乔治·沃利（George Worley）的结论，即“没有谁该为未能在……（这场）……飓风之前撤离老兵，导致458人死亡而负责”。接着又用海明威的

文章反驳沃利的观点。《时代》并没有暗示海明威如今已经是一位左派革命家了，而是引用了海明威在文末提出的为什么会把老兵们留在那里等死的尖锐问题。²⁷《工人日报》（*Daily Worker*）这份自封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报纸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逐字刊登了原文，把海明威的名字登在了标题和副标题旁边，还加了一句大标语，“小说家看到了留在礁岛群等死之人的膨胀的尸体”。²⁸卡什金本人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发表在他自己的文艺报上，把它呈现给海明威与日俱增的苏联读者群。²⁹

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莫斯科另一个部门的注意。为苏联间谍提供简报服务的文员们盯上了这篇文章，很可能把它编辑成一份可供未来行动人员发掘的档案，并为它加了一条索引，可检索关于海明威的信息。³⁰他们大概想要密切注意他和其他同情工人阶级的外国人的动向，或许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这是被动的情报收集，有点像那种初级市场调查，列出销售前景较好的产品清单，也就是未来可能会信奉苏联路线之人的名单。这大概是内务部的人首次对海明威感兴趣。

此时，内务部已经是全世界最有经验也最有成就的特工部门之一了。内务部^[6]在更改了一连串名称之后，最终变形为更广为人知的克格勃（或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存在有着坚实的俄罗斯和布尔什维克传统。俄罗斯在帝国时代就有自己的秘密警察“暗探局”（Okhrana）。为了在一场对抗暗探局的革命运动中保存实力，布尔什维克们创建了一个秘密的、纪律严明的密谋政党。1917年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废除了暗探局，但保留并改善了其业务模式，创立了一个强大得多的组织来保护和扩张革命果实。在国内，它是一个控制工具。到1930年代，国家的秘密机关几乎触及苏联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触及的方式可算不得温柔。在国外它是招募间谍、收集情报和为年轻的苏联政权除掉对手的主要手段（别看它名称里有“内务”二字）。

内务部对海明威感兴趣的部门是它的外交部门，后者主要受第一总局（the First Chief Directorate）指挥，第一总局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常驻机构，也就是所谓的“情报站”（*rezidenturas*）。美国的情报站设在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除了监视美国共产党之外，它们的使命还包括盗取美国技术和了解，或许还试图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之后，最后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目的，内务部扩大范围，盯住了各个阶层的美国人，只要他

们有机会获得它想要的情报。1934年的目标包括像国务院通信和记录处长戴维·A. 萨蒙 (David A. Salmon) 这样的人，以及劳伦斯·达根 (Laurence Duggan)，这个年轻人曾在菲利普埃克塞特中学^[7]和哈佛大学就读，这样的教育背景和他在国家部门中的良好关系，都可以为之一用。³¹

早先，苏联人还只是收集那些将来可能会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帮助的个人的情报。³²领导人可能来自莫斯科中心 (Moscow Center)，也可能来自党在当地的忠实信徒，即所谓“兄弟同胞”（这么叫或许因为他们是仅次于苏联公民的人）。在美国，情报站与美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依赖《工人日报》和《新群众》等报刊，相信它们是当前政治现实的真实反映。

当内务部官员读到海明威的文章时，他们关注的是他“指责”体制的方式。海明威的文章暴露了“（佛罗里达）州的穷人和受压迫的人民不堪忍受的，不是飓风带来的破坏，而是任由政府宰割”。³³苏联间谍认为美国公众会对海明威的政治宣言“信以为真……因为……（他是）备受尊敬的著名作家”。³⁴他们的态度跟《新群众》别无二致：不管是否在苏联控制之下，像海明威这样的名人都是值得追逐的。这些名人有很多或许能用上的关系，他们本人或许有朝一日就能成为为苏联服务的中间人。

海明威就这样引起了内务部的注意。这时还不可能有任何招募他的计划，但苏联方面已经有意要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了。一旦机会出现，内务部或其代理机构将设计一个合适的方案，派合适的男女去试探海明威，看他愿意在这条路上走多远。

[1]基韦斯特 (Key West)，美国佛罗里达群岛最南的一个岛屿和城市，位于迈阿密西南207公里，古巴哈瓦那东北170公里。

[2]美国的劳动节 (Labor Day) 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联邦法定节假日，很多美国人把劳动节看成是夏季结束的标志。

[3]相当于26.6摄氏度。

[4]相当于4.57米。

[5]酬恤金游行 (bonus march) 是指1932年美国的一起示威事件，背景是两万多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退伍军人要求即时发放战时服役的薪饷，遭到美国政

府拒绝而发动人群集会逗留请愿，最后导致军方派兵介入，造成流血冲突。

[6]本书将一直使用“内务部”这个简称，而不反映该组织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次改名。——作者注

[7]菲利普埃克塞特中学（Phillips Exeter）是一所私立的美国寄宿中学，十校联盟成员之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镇，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

第二章 作家与政委：在西班牙参战

时间是1937年春，地点是西班牙。照片上有一辆曾经很漂亮的黑色轿车，有点像1934年款的四门道奇车，这时却已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发射子弹的很可能是一架路过的敌军战斗机。它严重损毁，前胎瘪了，挡风玻璃四分五裂，一个头灯耷拉在灯框外。汽车的发动机暴露在外面，车前盖躺在几英尺外，已经没用了。车门敞着，表明乘客及时逃了出来。乘客中的两人，海明威和荷兰共产主义者尤里斯·伊文思，站在相机和汽车残骸之间，居然奇迹般地毫发无伤。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海明威都喜欢游走边缘和冒险。但他的神色表明，至少这一次，他真的算是跟死神擦肩而过。他双唇紧闭，两手谨慎地插在黄褐色军用雨衣的口袋里，雨衣半敞着，领子竖起，在阴天里挡些寒气。一顶小贝雷帽紧扣在头上。作家的双眼看似半阖，但还是大致对着照相机的方向。而站在作家身边的伊文思却大睁着双眼，直接看向镜头。和海明威一样，他也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穿着御寒的大衣，不过他的大衣彻底敞着，左手随意地插在裤子的前口袋里。他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几乎像是满意的神情，好像虽然遭到袭击，世界还在按照他设想的方式正常运转。¹

海明威1937年来到西班牙，报道1936年夏天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战争的基本政治考量一目了然，至少起初如此：一个包括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内的反动将军组成的政治阴谋小集团，领导一群所谓的民族主义叛军，对抗合法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民主制度本来还算正常运作，但在佛朗哥之流看来，共和国有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它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二是它的很多支持者正在把国家推向过于左倾的道路。裂痕不久就演变成了20世纪上半叶的典型格局：大地主、军方和天主教会联合起来组成一方，另一方则由不同的左派群体拼凑而成，包括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每一群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议程，令人眼花缭乱。

三股外国势力介入之后，战争变得更加复杂了。西方民主国家袖手旁观，但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却跟佛朗哥一条战线，为他提供武器、顾问，甚至派兵支援。斯大林决定支持共和国，以改善他在欧洲左派中的名声，并把人们的目光从他下令在国内进行的血腥清洗中引开。因此在1936年秋，苏联人开始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样派送支援，只不过他们派送的设备和兵力较少，顾问和秘密警察较多。其中就有一个自称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人。²

奥尔洛夫是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伐洛夫这个次要人物的原型，他有着完美辉煌的布尔什维克战绩。他一生都在不屈不挠地为革命而奋斗。俄国内战期间，他参加过惨烈的战斗，对方是妄图颠覆新政权的白军游击队。1920年代，他成为即将成立的内务部，也就是未来的克格勃的早期成员之一。虽然教育背景是法学，但他是个天生的语言学家，在西欧和在苏联一样行动自如，这让他从一干同事中脱颖而出，他们许多人永远摆脱不掉那股子乡下气和俄国官员的腔调。现存的照片显示这是个矮小健壮的人，头发短而黑，胡子修剪齐整，甚至有点儿像希特勒那撇小胡子。他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感，也很少露出笑容。

1930年代，奥尔洛夫在西欧的工作卓有成效。最值得一提的成就是，他帮着建起了苏联的网络，其中就吸收了被称为“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的几名超级间谍，也就是金·菲尔比（Kim Philby）等五位英国上流社会成员，他们愿意利用自己的无瑕出身，渗透到国王陛下的政府最高层。³ 奥尔洛夫也曾在美国工作，还担任过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协调员，苏联的最高人事长官斯大林就是在那里认识他的。

1936年8月，内务部派奥尔洛夫带着明确的目标前往西班牙。首要任务是为共和国提供情报和准军事支持，将培训和雇用反法西斯游击队纳入议程。他协助扩大苏联在西班牙的势力，以及西班牙共产党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中越来越多的机构被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内务部还对当地的“托派分子”（那些跟斯大林的首要政敌、流亡的苏联革命领导人列夫·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西班牙，无论是谁，也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看似不可靠，或将来有可能不可靠，都会遭到内务部的迫害。迫害目标还可能是某个西班牙政治团体，像无政府主义组织或某个极左政党，这类团体有其各自的非斯大林式愿景。

遭到怀疑的人会面临一整套逮捕、审讯、酷刑和处决程序，往往就在情报站自己的机构内进行。英国雕塑家贾森·格尼（Jason Gurney）是一位左倾的理想主义者，本是前往西班牙去为共和国而战的，却在不久后就观察到“众所周知”的事实：几乎到处都有内务部的“监狱和审讯中心，近在咫尺”。一旦“被发现有颠覆破坏或‘托派主义’的蛛丝马迹，一个人可能就消失了，再也不会出现，很多罪名根本就是蛤蟆夜哭”。⁴ 这些设在西班牙的中心中至少有一个，内部即设有非常方便的焚尸炉。⁵ 内务部可能会诱骗某个托派分子前来赴约，然后审讯、杀害并火化尸体，让他灰飞烟灭。

如果说这类偏执做法有什么目标的话，短期目标就是通过在支持者中统一思想来加强共和国的力量；长期目标则是让西班牙成为苏联的附庸国。⁶

奥尔洛夫曾对他希望渺茫的遗稿保管人、一位名叫爱德华·P. 加佐尔（Edward P. Gazur）的调查局退休特工说，内务部策划了海明威的西班牙之行，让他成为共和国的代言人之一。“通过共和国政府的努力，北美报业联盟（NANA）跟海明威签署了一份合同，而那些都是苏联秘密动员他们做的……”⁷ 奥尔洛夫的言论很难证实，即便是实话，也只是他片面的说法。导致海明威前往西班牙的一连串事件有若干个孤立环节：他一生挚爱西班牙；又一场战争的召唤；一家愿意为他支付极高稿酬的新闻社；一次为共和国拍摄纪录片的机会；以及尤其值得一提的，克服美国国务院迟迟不给他签发前往西班牙的护照的障碍。他从纽约坐船出发之前，曾到华盛顿去见露丝·希普利（Ruth Shipley），这位权力很大的官僚掌控着护照事务，他拿出自己跟北美报业联盟签署的合同，跟她保证“不准备参与……冲突”。⁸

作家约瑟芬·赫布斯特是海明威自巴黎时代的好友，在基韦斯特和西班牙都曾再度出现，她对海明威的理解比奥尔洛夫深刻。她凭直觉知道海明威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经历某种转变”，而前往西班牙便是那一转变过程的一环。⁹ 她还知道，海明威想成为他那一代人中独一无二的战争作家；战争提供的答案是别处找不到的，哪怕是基韦斯特遭受塔彭飓风^[1]的袭击也不能。“在那里掩藏得最深的现实，会在这里以极端的形式出现。”¹⁰

赫布斯特关注过程的做法是对的，海明威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了转变。他起初不过是顺着自己的性情，支持共和国，反对法西斯。¹¹ 1936年12月，他写信给编辑珀金斯，说弗朗哥是“头号狗娘养的”。¹² 在几周后的另一封信中，他的语气有些模棱两可。两方都不正义，他准备谁也不支持。但他的确关心人类及其苦难，这就意味着他会同情那些耕种土地的人。¹³ 他还说他不怎么喜欢苏联政权，虽然它支持共和军：“俄国那个政权如今很龌龊，不过反正我也不喜欢任何政府。”

几天后，在写给妻子鲍莉娜的家人（他们是天主教徒，为此原因，更可能会同情弗朗哥和民族主义者）的信中，他承认“赤色分子跟他们说的一样坏”，但接着说这是他们的国家，不是缺席地主的国家，更不是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国家。¹⁴ 他还肯定地说，他想到西班牙去看看“一场不可避免的欧战彩排”，从而写出“反战的战争报道”，让美国远离战火。

还有就是海明威那位美艳夺人的新情人玛莎·盖尔霍恩，她比这位大作家年轻将近十岁。1936年12月的一天，她走进基韦斯特的邈邈乔酒吧，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她身材苗条，一头金发，活力四射，既有冒险的渴望，又对写作和左派事业充满激情。她和海明威说好要在西班牙见面，在那里一同报道战争，她为《科利尔》（*Collier's*）杂志撰文，他为北美报业联盟供稿。战争确立了他们的关系，他们毫不夸张地是在战火中结缘的。1940年，她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在他的四任妻子中，她算是最接近于跟他平起平坐的一位了。在这次战争中，她成了一名拥有鲜明观点的记者和小说家。他往往是赞许的，但有时也很反感她在事业上的雄心抱负。不过他确实注意到她在1930年代对普通人苦难生活的关注。海明威的西班牙生活有她陪伴，就更容易接受左派的影响了。

另一个指引他向左转的力量是同辈艺术家和作家们，其中很多都是多年好友，像介绍他来基韦斯特的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以及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诗人、未来的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海明威写道，麦克利什和道斯·帕索斯是仅有的两个他可以信任的文学好友。¹⁵ 这个阶段，麦克利什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多少有些悲观，而道斯·帕索斯则致力于社会公正。和海明威一样，麦克利什和道斯·帕索斯也有很多信奉共产主义的朋友和熟人。但这三位跟那些共产主义者往往意见不合，有时还争吵不休，所以对他们更准确的

称呼应该是左倾和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不是“同路人”，更不是完全效忠的共产主义者。¹⁶ 海明威与麦克利什和道斯·帕索斯一起创立了当代历史学家公司（Contemporary Historians Inc.），该组织的宗旨是拍摄关于西班牙共和国的纪录片。他们的目标是为共和国的挣扎求存争取舆论支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说动美国政府放弃中立政策。

历史学家公司未来制作的纪录片有《战火中的西班牙》（*Spain in Flames*），海明威在离开纽约之前就开始为这部纪录片做准备了；还有《西班牙土地》（*The Spanish Earth*），他参与了现场拍摄，后来又亲自为它录制了旁白。《战火中的西班牙》如今给人的印象是笨拙地把历史事实和意识形态宣传拼凑在一起。曾有一个广告高调宣传这部纪录片向世人展示了“法西斯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帮助下屠杀了成千上万人”，“妇女和儿童暴尸马德里街头”。同一个广告引用海明威的话，说无论政治信条或宗教信仰如何，没有谁在看到这部纪录片之后还能无动于衷。¹⁷ 《西班牙土地》的制作更加细致和艺术，也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纪录片导演，四海为家的尤里斯·伊文思，是到目前为止政治立场最坚定的历史学家公司成员。相对于同事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支持左派事业，他成年后一生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直到1989年苏联帝国崩溃。他在1930年代受共产国际的领导。¹⁸

共产国际名义上是共产主义政党的革命联合会，独立于内务部。但和内务部一样，它也是斯大林组织的延伸。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物包括德国人威利·明岑贝格，一个不知疲倦、不修边饰、充满创意和领袖魅力的人。明岑贝格曾一度因为多才多艺和精力充沛而被形容为“欧洲最有趣的五个人之一”，¹⁹ 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就认识了列宁。1920年代，是列宁本人请明岑贝格在俄国之外创立一个旨在煽动和宣传——不久便简称为“宣传鼓动”——的机构，为革命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明岑贝格是个绝佳选择，不久他便开始运作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欧洲宣传鼓动帝国，有时被称为“明岑贝格信托”。²⁰

首先是印刷文字：明岑贝格创办期刊和报纸跟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期刊隔空对峙。然后是戏剧、会议和多种文化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令人喘不过气……有十几个国际会议、群众集会和委员会”。²¹ 在苏联国内外制作了多部纪录片。共产国际对外声称有些是它自己的作品，也有些是通过大批外围组织来操作的。合作有些是你情我愿，也有些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心照不宣的座右铭是“一切为了党，但任何事都不能以党的名义进

行”。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一位专业电影导演，伊文思正是明岑贝格的团队所需要的人。²² 他不但忠诚、积极，还有创意，且行事谨慎。伊文思知道，只有看上去和听上去不像宣传的纪录片，才更有说服力。

伊文思没有对历史学家公司的各位隐瞒自己的政治归属，他们很清楚他的背景，对此欣然接受。麦克利什确信伊文思是那种“永远不会让共产主义成为自己工作的障碍的共产主义者”。²³ 麦克利什或许还是太宽厚了。

以德服人的伊文思似乎很快就进入了“欧内斯特的政委”的角色，将监督指导这位作家的政治教育。²⁴ 谁也不知道共产国际是否曾经命令伊文思跟海明威合作。在共产国际卷帙浩繁的现存档案中，找不到正式指派该任务的踪影。在五千多万个电子化的页面（他们都是热衷于记录的革命家）上，用计算机搜索查询“海明威”，也找不到任何结果。²⁵ 然而伊文思可能接受过某种非正式指令，以那种“看看你能做些什么”的方式，就像明岑贝格曾让当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阿瑟·库斯勒看看能否站在敌人的视角有所发现。库斯勒没有受过训练，也不擅长谍报工作，他径直前往佛朗哥的总部执行任务，因而被捕并险些丧命。²⁶ 也有可能，伊文思决定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开始利用这位伟大的作家。

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争取的作家不止海明威和库斯勒。另一个目标是芭芭拉·沃特海姆（Barbara Wertheim），也就是后来写出了引起约翰·F. 肯尼迪总统关注的畅销书《八月炮火》（*The Guns of August*）的著名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

²⁷ 沃特海姆是纽约名媛，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生，1937年以《国家》（*Nation*）杂志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在巴伦西亚和马德里逗留一段时间之后，她去了巴黎，在那里遇到明岑贝格的主要副手之一，老道风流、颇有手段的奥托·卡茨，后者试图招募她为共产国际工作。她不是共产主义者，因而拒绝被宣传洗脑。卡茨退而求其次，请她想办法写一本通过探索历史相似性来支持其进步事业的书籍。她答应了这一请求，写下了第一部关于19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的书，如她所说，该书“旨在说明英国政策一贯的首要原则便是让西班牙……摆脱大陆上的主要势力（当前是希特勒）的控制”。²⁸ 有趣的是，沃特海姆这本关于西班牙的鲜为人知的书成为海明威的私人收藏，直到2015年还安放在基韦斯特那间书房的书架上。²⁹

和卡茨一样，伊文思也会配合目标来调整方案。这个荷兰人比海明威大一岁，知道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敦促海明威加入共产国际，成为特工。伊文思会逐渐把海明威吸收进自己的组织，但不会强迫他。几十年后，在接受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威廉·B. 沃森（William B. Watson）采访时，伊文思极其坦诚，他回忆道：“我曾计划吸收海明威，而且我觉得我使用的战术也是对的。对这种人来说。我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也知道他不会叛变。”³⁰

伊文思让海明威亲自直接参与电影制作的一线工作，并确保他出现在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视野之内。海明威不是个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者，不会怀着明确的政治意识而来，他只是有些半成型的态度，像是帮助弱者、反抗法西斯，以及让美国远离又一场欧战。伊文思等海明威在1937年3月一到达欧洲，就着手改变这一切。“我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感”，他对沃森说，“他却没有……于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是让海明威理解反法西斯事业”。所谓理解不是别的，而正是以共产国际的方式来理解。³¹

伊文思先是建立了坚固的个人友谊。他可以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来建立友谊。既然海明威一心扑在纪录片拍摄上，他便处处提供协助，安排交通、携带设备、跟他分享自己的食物和饮料（通常是威士忌和生洋葱）。或许是为了考验自己——他也有近20年没有参加战斗了——他似乎很喜欢跟拍摄团队一起上前线。他们在前线，有时在两军之间的无人区工作，所冒的风险只有战斗老兵海明威能够充分了解。一天，一颗子弹射进伊文思头侧的墙里，海明威便让拍摄团队转移到一个隐蔽一些的位置。后来发现摄影师忘记了带摄影机，海明威手脚并用，匍匐着去找——敌军的狙击手沿着他的路径射击，子弹纷纷落在附近，险些击中他。能在这样的险境中死里逃生更加坚固了他们的友谊。用伊文思的话说，“如果你和一个人一起上前线……你会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西班牙的前两周，我们一直在一起互相了解……在前线，这样的准备工作进展神速”。³²

伊文思介绍海明威认识了一群“合适”的人：共产主义战士。由共产国际创立和指挥的为共和国而战的国际纵队就像是为此量身定做的一样。国际纵队中有的意志顽强、活泼有趣、受过教育的男人（还有少数女人），他们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让海明威很感兴趣。其中有些，像国际纵队中最有名的美国分队——亚伯拉罕·林肯营中的米尔顿·沃尔夫，后来成为海明威一生的好友。他们可不

光是耍耍笔杆子做白日梦，而是为信仰甘冒生命危险的人，是真正的信仰者。大多数人都遵守共产主义的严明纪律，愿意接受党或共产国际指派的任何任务。伊文思并不需要对海明威发表关于政治的长篇大论，只需把他带到前线，特别是国际纵队战斗的前线，让他自己去观察那些人的一言一行，耳濡目染。

几周后，伊文思认为海明威已经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跟战士们背后的人见面。他们是共产党指挥官、苏联官员，以及苏联记者。马德里的盖洛德旅馆距离前线不过几英里，是跟他们见面的最佳地点，苏联人把那里变成了他们驻西班牙大使馆的附属机构。那家低调的小旅馆位于两条中型街道的交叉路口，一点也不引人注目。灰色的外立面刻着几条未来主义的直线，让它看起来像个公寓楼，事实上却是个豪华旅馆，大理石走廊通向设施完善的房间。只有站在汽车棚旁边佩戴刺刀的警卫员才表明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士兵们在几英里之外的战壕里浴血奋战，而苏联人及其亲信却在盖洛德旅馆大吃大喝地过着豪奢的生活。那是首都内少有的几个食物和酒类，特别是伏特加和鱼子酱供给充足的机构之一。早先去那里时，海明威好像还带了两瓶宝贵的威士忌（是因为希望被他们接受吗？），后来那两瓶酒被放在一张公共餐桌上，那张桌子早被一条巨大的火腿压得咯吱作响了。³³

盖洛德让海明威念念不忘的是它高高在上：只有少数新闻记者能够进去，和里面那些决定战争走向的人谈笑风生。伊文思把这位作家介绍给了苏联日报《真理报》（*Pravda*）的首席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和其他共产党领袖。多年后，伊文思还记得“那给了他（海明威）一种优越感，他很看重这个”。³⁴

不久两人的友谊便足够坚固，伊文思可以给海明威指派任务了。即便在七十多年后再看他写给海明威的信，伊文思也是那种绝不放任的电影导演（或政委）；他的指令多到了让人厌烦的地步。他告诉海明威去见谁，去哪里，去拍什么，有时甚至还指令他说些什么。一封1937年4月26日的信件中就有一个编号任务清单，条目包括在一个西班牙村庄监督拍摄；预订交通工具；最迟5月3日发送进度报告；以及管着点儿道斯·帕索斯。³⁵稍后，伊文思又请海明威帮忙为《西班牙土地》的一份大纲定稿。³⁶

无论如何，海明威也没有事事听从伊文思的指挥。两人的关系更多的是影响而非指令。但伊文思执行着他为海明威首次西班牙之行制定的日程，让作家很少有时间再去做别的，哪怕是追求盖尔霍恩。随军的英国诗人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这样说道：海明威“一直被这位意志坚定、咄咄逼人的女郎追求着”。她“永远在找他”，但通常他都跟着伊文思一起上前线了。³⁷

伊文思表达出对道斯·帕索斯的担心并非偶然。教授当时正准备离队。一个深层原因或许是两位小说家之间的较量；但直接原因则是道斯·帕索斯的好友何塞·罗夫莱斯的遇害事件。罗夫莱斯原本来自一个“同情君主和反动派的家庭”，³⁸ 因而尽管他的政治征途偏向左翼，却并不极端。1920年代，他移民到美国，谋到一份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西班牙文学的工作。内战爆发时他恰好在马德里，便留下来为共和军服务。因为懂一点俄文，他在西班牙和苏联官员于战争部讨论国家机密时，担任双方的口译员。

1936年秋，共和军或苏联秘密警察逮捕了罗夫莱斯。时至今日，当时的细节仍然扑朔迷离。逮捕者很有可能把他关进了内务部在整个西班牙共和军地盘上建起的众多小监狱中的一座，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他没有被公开审问，也没有正式宣判。最后，留下他会成为一个大麻烦，于是1937年初，逮捕者们干脆处决了他，并把尸体处理掉了。³⁹

1937年春天，道斯·帕索斯一到西班牙就开始调查好友命运的真相。他拒绝接受罗夫莱斯是法西斯探子的说法，称那是“浪漫的美国共产主义同情者编造出来的”，借此讽刺海明威和他的共产主义朋友们。在道斯·帕索斯看来，罗夫莱斯的“案件被推至处决的极端，是因为俄国特工觉得罗夫莱斯对西班牙战争部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知道的太多了，因而从他们非常特殊的视角看来，他在政治上非常不可靠”。⁴⁰ 这个故事应该讲给国内的美国人听，因为它让人们得以“一瞥”在西班牙“被摧残的生命的血腥内幕”，能够弥补“我军必胜”这一片面的思维方式，或许有助于“让我们的头脑……摆脱……非黑即白的……党派偏见”。⁴¹

这样一来，从1937年到1940年，道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就开始分道扬镳了。海明威转变的一个表现是，他开始狂热追随共产主义战士和艺术家们，并越来越投身于保卫共和国免遭法西斯荼毒的事业。如

约希·赫布斯特所说，海明威“似乎天真地接受了当前意识形态的表象”，而道斯·帕索斯对政治的理解更加深刻，因而急于质疑它们。

42

伊文思希望阻止罗夫莱斯事件继续发酵，特别是不要让此事扩张到西班牙境外。他不想让道斯·帕索斯回国之后就对他的“朋友-翻译-法西斯分子”一事说三道四。⁴³ 在1937年4月26日致海明威的信中，伊文思表示希望“道斯明白，在这样艰难严峻的战时，一个人、一个同志别无选择”——也就是要顾全大局，而不要只考虑某个个体的命运，不久之后，海明威本人也附和这一说法。⁴⁴ 伊文思没有明确指令海明威该怎么做，而是以试探的口气结束了自己的一长串想法：“你觉得呢？”

海明威心服首肯。他担心道斯·帕索斯会让纪录片摄制组很难继续工作——他的疑问会“让大家陷入困境”。⁴⁵ 于是海明威自行承担起一个任务，确保道斯·帕索斯不会在离开西班牙之后破坏他们的工作。1937年5月11日，两人的冲突在巴黎达到高潮，那天道斯·帕索斯和妻子正准备乘火车前往勒阿弗尔港，从那里登上轮船，继续他们的跨大西洋远航。⁴⁶

圣拉扎尔车站是巴黎最大、最古老的火车站之一。19世纪风格的典雅外立面让它的外观像个博物馆，乃至它即便坐落在卢浮宫旁边，也不会显得突兀，但它的内部则是功能性的，站台和铁道上空都有棱角封面的玻璃钢顶棚。正午时分，阳光从云层背后喷射出来，有些光便透过顶棚洒在站台上，那里站着准备搭乘1时15分那列港口接驳列车的乘客。道斯·帕索斯和妻子凯蒂到晚了，正在费力地搬运多个行李包呢。几乎在列车员高喊“开车”并关上车门之前的最后一刻，海明威从送行祝福的亲友群中冲出来。但他可不是来送别好友的。他怒容满面，两人也没有什么愉快的寒暄。海明威强迫对方回答他几个重要的问题，现在就说。道斯·帕索斯到底准备就罗夫莱斯事件说些什么？或者就此而言，他又会对这场战争发表怎样的言论？道斯·帕索斯一贯思虑周全，注意分寸，回答说他会把他的故事讲给美国公众：如果一面为捍卫公民自由而战，一面又在破坏公民自由，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海明威反驳说：“公民自由，别扯淡了。你到底跟谁是一拨儿的？”道斯·帕索斯像教授在课堂上证明观点一样耸耸肩：他会听从自己的内心，有什么写什么。海明威在道斯·帕索斯面前挥舞着

一只握紧的拳头，说：“要是那么做，你就完了，毁了。纽约的评论家们一定会严惩你的。”⁴⁷

凯蒂·道斯·帕索斯（她本人也是海明威的多年密友）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一切。她对海明威说她“从没有听到过如此卑劣的投机言论”。海明威没有回答，火车最终准备开出站台时，他头也不回地走开了。⁴⁸

伊文思和海明威逐渐把道斯·帕索斯彻底从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排除出去。似乎道斯·帕索斯从未参加过当代历史学家公司，伊文思后来把公司重组为“今日历史公司”，借以排除异己。（如伊文思所说，新组织中不会有“道斯·帕索斯之流”。⁴⁹）1938年初，海明威会在通过法国远洋货轮巴黎大区远洋轮（Ile de France）寄送的一封非常愤怒的电报中旧事重提，几天后还会发一封信，愤怒语气只比前一封电报稍有减轻。电报指责道斯·帕索斯（此人往往入不敷出）“因为金钱”而变节，“比你更优秀的人仍在战斗”，也就是指责道斯·帕索斯出卖那些暴露共和军弱点的故事。⁵⁰

后面那封信则以道歉开头，但随后语气便越来越强硬。⁵¹ 有一句还算缓和的话也仍是指责，终将导致两人彻底反目：他（道斯·帕索斯）声称共产主义者在这场战争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的指控“恶毒而令人遗憾”。

在后来的很多年，海明威还会重述这个故事的多个版本，所有这些版本都对道斯·帕索斯不利。他会声称罗夫莱斯是在一场公正的审判之后被作为探子枪决的，或者干脆说“孩子们”杀死了那个“没用的翻译”。⁵² 1954年，海明威会说自己“愿意告诉道斯”关于罗夫莱斯事件的真相，只不过道斯·帕索斯“攻击我，仿佛是我本人杀了他（罗夫莱斯）一样”。⁵³

海明威对道斯·帕索斯的攻击反映出他后来所谓的“技术压力”，那场始于193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给他带来的压力持续了十年，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还会用那个压力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把矛头指向某些老友。⁵⁴ 但他从未否认过自己关于道斯·帕索斯或1937年春的西班牙所说和所写的话。

那年5月，巴塞罗那爆发了内战中的内战，在那个城市，极左派正在把它自己的未来愿景变成现实。起初，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看似占了上风。精致的饭馆变成了人民的咖啡厅——丽兹酒店的餐厅现在是“一号人民咖啡厅”。工厂被交给工人管理；神父消失了，教堂被关闭或挪作他用；一个修道院被改成了肺结核病童疗养院。⁵⁵ 这一切违背了共产主义或苏联的政策：革命需要等到战争结束再进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大家都要遵守中央政府的领导。

长期酝酿的冲突终于失控爆发，先是在电话中吵架，然后闹到街上，不久双方就用鹅卵石和推翻的汽车筑起了街垒。战斗打得不清不楚，有时还很激烈——即便在安静的日子，也时有“机枪和炮火的声音打破一片沉寂”。⁵⁶ 苏联在背后密谋，只要有机会就施加压力，共产主义者利用了这次危机，趁机更换了共和国总理。新政府行动起来反对巴塞罗那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它的总部关闭了，变成一个监狱，前线的作战组织解散了，中央委员会成员全体被捕。

6月，该党领导人安德烈斯·宁（Andre´s Nin）因为曾有一次支持托洛茨基和公开批评斯大林是“恶毒的独裁者”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⁵⁷ 内务部把宁带到它的一座秘密监狱，对他施以酷刑，逼他承认自己是法西斯探子。宁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力，他拒绝承认，挽救了朋友和同志们免于一死。苏联人及其代表们于是杀害了他，抛尸荒郊野岭。内务部的驻地间谍奥尔洛夫本人至少部分时间在场；可见这个案子对苏联人有多重要。⁵⁸ 共产主义的报纸发表了骇人听闻的（错误）报道，指控宁与法西斯沆瀣一气，作为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他们最终造谣说宁已经被法西斯分子营救，人好好地在了佛朗哥或希特勒手里呢。

海明威不可能了解宁遭遇的真相，也不可能知道奥尔洛夫曾参与其中，但他对谣言有所耳闻。他在1938年致道斯·帕索斯的信中提到了宁，后来又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复述了内务部那个怀疑论版本的宁之死。以苏联记者科利佐夫为原型塑造的卡可夫这个人物，轻描淡写地叙述了整个事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不切实际的异端；宁的确曾被监禁但从“我们的手里”逃走了。没有人知道海明威究竟是天真地相信了这个托词，还是为了保护共和国而故意掩盖了真相。⁵⁹

在巴塞罗那骚乱发生期间，伊文思和海明威身在美国。海明威从西班牙先是去了纽约，然后又去了基韦斯特，在那里带上妻子和儿子们一同出发前往巴哈马群岛的比米尼岛（Bimini），那年夏天他们全家都待在那里。6月初，伊文思南下跟他讨论纪录片，以及海明威即将发表的演说。⁶⁰

6月4日，这对好友飞往纽约，参加由美国作家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主办的第二届美国作家大会。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一面标榜这次大会是“各种政治归属的作家”的聚会，一面又大肆吹捧海明威即将发表的演说，“这位最‘不关心政治’的作家……刚刚从西班牙的血腥战场上回来”。⁶¹然而为大会制定议程的却是美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就有乏味无趣的斯大林主义者、该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海明威的朋友，后来信仰了共产主义的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唐纳德·奥顿·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以及伊文思本人，他当时还在进行《西班牙土地》最后的剪辑工作。

会场设在曼哈顿西57街的卡内基音乐厅。建于1891年的卡内基音乐厅当时已经像个旧式建筑，这个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有一层层镀金的包厢，俯视乐池和舞台。今晚，这里座无虚席，容纳了3500名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香烟的烟雾缭绕，加上湿热，空气几乎令人窒息。然而观众们却密切关注着台上的演讲者。伊文思第三个起身讲话，播放了纪录片的一些片段，那是在“我觉得每一位诚实的作者都应该亲自前往的前线”拍摄的。⁶²

海明威一贯不擅长当众讲话——有传言说他为了鼓足勇气，那天曾在曼哈顿中城的酒吧里一家一家喝过去⁶³——他从伊文思停下来的地方继续讲了下去。这位来自奥克帕克的作家忍受着夹克和领带的束缚，在燥热的大厅里挥汗如雨，用他单调的几乎带有鼻音的中西部口音讲话，连念稿都有困难。“每次念起来感觉不对时”，海明威似乎会对手里的稿子很恼火，“气急败坏地重复那些句子”。⁶⁴

那天为时17分钟的抨击法西斯的演讲，让人们宁肯相信共产主义是正义的一方。海明威告诉观众说，作家的问题在于“如何真诚地写作”。⁶⁵他接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府不会产生优秀的作家，那个体制就是法西斯”；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无法在法西斯体制下生活和工作的”。他没有说苏联作家的处境如何，在那里，作家们要

想生存，也被迫撒谎。观众看样子很喜欢那次演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而海明威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又是吹口哨又是跺脚，对海明威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⁶⁶ 几天后，麦克斯·珀金斯激动地说海明威关于写作的说法是“永恒的真理”。⁶⁷ 6月22日的《新群众》全文刊登了演讲。⁶⁸

卡内基音乐厅之后，当代历史学家公司遭遇了危机。大概是在6月底的某个时刻，伊文思称他还需要2500美元才能完成纪录片。海明威决定帮助伊文思，说伊文思是他绝对信任的人。他注意到包括麦克利什在内的各色人等都说他们无能为力，但他愿意为革命事业再做一次金钱上的牺牲，于是以6%的利息出借了2500美元，导致他自己的财务状况恶化，但解了伊文思的燃眉之急。⁶⁹

7月初，纪录片终于完成了。伊文思撰写、海明威编辑了一份脚本，把战争简化为一个简单的套路：⁷⁰

我们有权通过民主选举来耕种我们的土地。如今军事集团和缺席地主们攻击我们，要再次夺走我们的土地。但我们是为权利而战，是我们在灌溉和耕种这片西班牙土地，而权贵们只顾享乐，任由田园荒芜。

由海明威录制旁白的纪录片开头展示的是一个共和国村庄的生活，在那里，村民们共同劳动，为自己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然后纪录片转向一个人们为捍卫那种生活方式而战的连续镜头，有前线的场景，还有被战争蹂躏的马德里。盖尔霍恩很久以后还记得片中的炮击场景，女人们被浓烟窒息，揉着双眼，男人们“带着沉重的期待表情”慢慢地走向他们的敌人，准备进攻。⁷¹

7月8日，海明威、盖尔霍恩和伊文思为罗斯福总统及夫人放映了《西班牙土地》。盖尔霍恩联系了她的朋友埃莉诺^[2]，说服后者邀请电影制作者们来到白宫。起初海明威不怎么看重邀请他们的主人；他们见面时，总统“全身带着哈佛式的洒脱，毫不性感又娘娘腔”。⁷² 那天很热；总统把他们带到了一间没有空调的餐厅，晚餐也乏善可陈：稀薄无味的汤，韧如胶皮的乳鸽，水煮莴苣叶。不过晚餐后，罗斯福夫妇热心地观看了电影。总统坐在伊文思身边，从头到尾都在讨论，到电影结束时几乎让伊文思不胜其烦了。他提议，海明威和伊文思或许“应该在电影中加入更多的意识形态宣传”。⁷³

海明威和伊文思原计划请求终止美国因中立态度而出台的武器禁运。然而罗斯福滔滔不绝，让他们根本没机会提出这个建议。海明威能做的就是对罗斯福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说，共和国需要武器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此时他又声称自己喜欢这位总统亲信了。不管是纪录片本身还是这个小小的请求都没有让美国的政策发生任何变化，不过对两位艺术家来说，曾试图影响总统是个让他们飘飘然的经历。多年后，伊文思仍然记得当时的感觉：“我们尝试过了，我们很骄傲自己那么做了。”⁷⁴

第二天，罗斯福夫人在她的报纸专栏《我的一天》（“My Day”）中与读者聊到了来白宫参加晚餐的三位“很有趣的人”。⁷⁵荷兰人头发卷卷的，蓝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是“极有艺术气质的大无畏的电影制作人”。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如何用纪录片拍摄“那些男人和女人的面孔……有农民、士兵、演说家，还有村里的主妇，所有的人……都是有趣的类型，你觉得自己会想去研究他们”。

盖尔霍恩则写信给罗斯福夫人，“无限”感激她安排这次会面，并有些焦急地问道：“您真的喜欢这部纪录片，对吧？”她希望如此：“尤里斯和欧内斯特很高兴……他们很敬佩您和罗斯福先生说应该强调冲突的原因，让它的力度更强一些——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⁷⁶

7月中旬，在鲍莉娜而不是盖尔霍恩的陪同下，伊文思和海明威带着他们的纪录片来到好莱坞，希望找到一些能够和愿意开出大额支票的友好观众，历史学家公司想用那笔钱为共和国购买救护车。⁷⁷崇拜海明威的那些演员和制作人太开心了，根本无法坐在著名作家和他的导演朋友身旁看完全片，特别是为左翼事业制作的纪录片。先是在米高梅公司举办了餐会，由奥地利美人路易丝·赖纳^[3]主持，然后又是在另外两位巨星，弗雷德里克·马奇^[4]和罗伯特·本奇利^[5]各自的家中举办了盛大活动。在爱乐乐团演奏厅的电影放映票很快售罄。⁷⁸

在爱乐乐团演奏厅，伊文思发表了海明威式的讲话，他说“我知道钱很难筹到，但死亡也一样没那么容易”的样子，简直“比海明威还要海明威”。⁷⁹海明威也没有甘拜下风，振振有词地起身请求帮助。他谈到了他们的事业——法西斯的扩张必须止于西班牙，他热爱

的人们已经为这项事业献出了生命，随后又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80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受过伤……发生的那一刻……并没有很疼。……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震惊褪去，疼痛就开始了……要是救护车迟迟不来，你会真正感觉到什么是生不如死。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当天就坐在爱乐乐团演奏厅的观众席上，他觉得纪录片“令人赞叹不已”，并在他写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的麦克斯·珀金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两人的作品都是由他编辑出版的）的信中说，他在海明威的话里听出了“近乎宗教的东西”。⁸¹

好莱坞的盛大巡演终成为《西班牙土地》这部纪录片的高潮。在纽约55街剧院和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National Press Club）等地放映之后，纪录片获得的评论毁誉参半。电影艺术和政治宣传之间的矛盾让评论家们感觉很复杂。不久这部电影就无人问津了，成为电影史教学中的有趣案例。⁸²

随后伊文思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在西班牙的任务完成了。他即将关注一场新的战争，那场战争正在中国升级。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很难接受这突然的变故，不过这几乎肯定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从前线到白宫，他们跟荷兰人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现在团队就要解散了，一名成员要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盖尔霍恩记得她当时觉得伊文思和海明威献身的方式是不同的：⁸³

我们在纽约花了那么大力气宣传《西班牙土地》，就好像离了它地球就不转了一样。尤里斯没有重返西班牙之事始终让我惊愕不已。欧内斯特和我回去了，而他没有。我觉得他大概终归没有像我们那样，对那片土地投入了太多的感情。

海明威担心共产国际的注意力已经从西班牙转移至别处，在1937年夏天，这是他和盖尔霍恩无法想象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⁸⁴ 这位作家仍然在另一个方向前进，更加投身于共和国的事业了，这也让他和苏联人走得更近，在他看来，那是共和国最好的外国友人。在像伊文思这样忠诚的共产国际拥护者被重新调遣之后，海明威却加深了他

跟留在西班牙国内的苏联间谍的友谊，他的友好姿态自然令那些人大喜过望。

[1]塔彭飓风指1935年劳动节前后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飓风，得名自佛罗里达州西岸的塔彭斯普林斯（Tarpon Springs）地区。

[2]即罗斯福总统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3]路易丝·赖纳（Luise Rainer, 1910-2014），犹太裔美国电影女演员，少年时期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学习表演艺术。她主演的《歌舞大王齐格飞》（The Great Ziegfeld, 1936）和《大地》（The Good Earth, 1937）曾连续荣获第9届、第1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4]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 1897-1975），美国电影演员，曾凭借《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 1931）和《黄金时代》（The Best Years of Our Lives, 1946）两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5]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 1889-1945），美国幽默作家，以其新闻专栏作家和电影演员的身份而闻名。本奇利曾参演希区柯克的《海外特派员》（Foreign Correspondent, 1940）和歌舞片《好姑娘？》（Nice Girl? , 1941）。

第三章 重返西班牙：坚持到底

此次行程最艰难的部分之一，是说服修车库老板在那辆汽车几近完美的表面泼上油漆，以破坏它的外观。1937年夏末，海明威准备到西班牙的一个偏远角落去探访一个共和军游击队营地，出发前他希望能尽可能保护好自己免受敌军空袭，这种自制的土法迷彩总好过裸奔。在保险杠上捆好一两个备用的汽油桶之后，他从巴伦西亚出发，先是在地中海沿岸较为平坦的柏油路上行进，随后转上通向特鲁埃尔（Teruel）山脉的小路。山路本不适合军用卡车和指挥车行进，如今它们一辆辆驶过，必定留下了一路的坑坑洼洼。海明威的车，大概又是一辆据说有着推土机一样强大变速箱的道奇车，用了大约两个小时走了45英里，缓慢而稳健地绕过一个个急转弯。

海明威的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阿尔凡布拉（Alfambra）的小镇，它有股质朴的美，一条与小镇同名的小河环绕着贫瘠荒芜的丘陵，河边长着一圈植被。海明威在一个被改装成营房的简陋房子里见到了他要找的游击队指挥官，很快就明白那里的负责人、快人快语的波兰共产党员安东尼·赫罗斯特（Antoni Chrost）并不欢迎来访者，尤其不欢迎记者。海明威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欧内斯特拿出了中央军的通行证，上面盖满了显示签发机构权威的印章。通行证命令每一位共和军指挥官为持证人的工作提供协助，海明威总喜欢跟赫罗斯特这样的人说，他的工作性质更像作家而不是记者。

大概是通行证起了作用。赫罗斯特最终同意让作家三个星期之后回去参与一次破坏行动——虽然他会派人监视海明威，以防万一。第二次，海明威跟游击队员一起在营地和战场上奋战了四天。他们借给他一支左轮手枪，请他在前往目的地的15英里行军路上帮忙扛手榴弹和食物。

一支30人的队伍在黄昏出发，悄然穿过法西斯的战线，在一条公路附近（而不是在路上）前行，最终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爬到了希

洛卡河（Jiloca River）上一座小桥上的铁轨附近。不久他们听到远处有火车驶来，看到机车的火光点亮了夜空。火车的行进速度不快，给了爆破手足够的时间小心准备炸药，海明威则伸手到背包里去找自己的照相机。在赫罗斯特的迫切要求下，他关掉了闪光灯，但还是利用爆炸那一刻的火光拍下了袭击照片：桥在火车头到达河边的前一刻倒塌了，车厢脱轨，铁轮掘翻了土地，半天才消停下来，变成一堆无用的废金属。游击队员们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便立刻启程回营了。¹

尤里斯·伊文思去中国之后，海明威曾三次重返西班牙。荷兰导演会继续给他这位美国朋友写详细的长信，其中一封写于1938年1月28日的信长达20页，敦促海明威坚持到底。² 海明威应该像1937年时一样，继续用自己的作品为共和军辩护；他应该把自己的反法西斯戏剧《第五纵队》（*The Fifth Column*）搬上舞台乃至大银幕；他应该与运动的参与者保持联系，让他们为他解释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事件；一旦他准备好了，一旦有什么他“愿意与我们的领袖人物之一”协商之事，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行动”。最后，他应该来中国，这里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前线。

伊文思的大部分建议都被当成了耳旁风。海明威不想去中国工作，更不要说与共产国际结盟。他将继续伊文思为他打下基础的事业，好好利用苏联和共产党的新联络人。不过他会以自己的方式支持共和军。他要自任政委。他不仅仅是伊文思及其事业的宣传员。伊文思似乎不明白，海明威在西班牙也有自己的追求，他还是个人道主义者、军事顾问以及最重要的，一位作家。正如他曾试图对游击队员们解释的那样，作家跟记者不是一回事。记者想要报道事实，一旦审查获得通过，便将它们公之于众，作家则希望吸收和消化战时的经历和体验。

最能替代伊文思在海明威生活中的角色的人，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古斯塔夫·雷格勒，这是海明威在西班牙遇到的比较有趣，因而也很有魅力的人物之一。³ 此人如电影明星一般英俊，他曾在《西班牙土地》中出演配角就是证明；他有点像更加理性的加里·库珀。^[1] 雷格勒的战斗经历是他与海明威建立友谊的敲门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在战壕里为德国皇帝而战。战后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事业置生计乃至性命于不顾。他曾在1934年与伊文思合作拍摄了一部关于德国的宣传纪录片。那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觉得伊文思有点儿太花言巧语、太玩弄权术了。于是当他在西

班牙遇到伊文思和海明威在一起时，他想这位“笑面虎伊文思”大概正在弄“另一部自欺欺人的纪录片”呢。⁴

1936年雷格勒住在莫斯科，他带着怀疑、厌恶和恐惧参观了斯大林早期的一次审判秀：“我看到囚车停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后面。它们看上去跟沙皇警察用的那种厢式货车差不多……我（还）想起了在慕尼黑从我身旁过去，走向死亡的（一名囚徒）。”⁵ 在苏联遇害的人里有他的一位保护人，伟大的革命家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那年8月被审判并枪决。雷格勒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他，所以当共产国际同意他的请求派他前往西班牙时，他大松了一口气。在那里，他成为第十二国际纵队的一名政委。

有些政委会采取高压得多的手段，但雷格勒与他们不同，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一方面保持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与平民合作。1938年，他成功地保护一批价值连城的画作免遭蹂躏，把妇女和儿童从交战的村庄中安全转移出去。⁶ 他说政委有责任“停止两方面的……残酷行径”，这句话很可能是真诚的。再次为正义而战的感觉真好：在他看来，“英雄的西班牙”的风气正在吹散“莫斯科的恶臭”。⁷ 他眼看着“正义的俄国”登上历史舞台，却担心“邪恶的俄国”也许就在不远处。

如果说伊文思曾试图让海明威了解“正义的俄国”，以及它为反抗法西斯所做的一切，雷格勒则毫不犹豫地透露给美国人何为“邪恶的俄国”及其种种恶行。他给海明威讲了一个故事来阐释两者的不同。一个法国部队的士兵曾自愿请他们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两位法国士兵绝望崩溃，以为自己周围都是敌军，高喊着让大家赶紧跑。雷格勒让人逮捕了他们，后来认定他们犯了战斗疲劳症。他把他们送到一家疗养院，继而向国际纵队总政委、法国共产主义者安德列·马蒂报告了自己的做法。

马蒂还在法国海军当水手时就参加革命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组织了一场哗变，阻止他的军舰在战斗中向布尔什维克开炮，因此在共产主义圈子里闻名遐迩。20年后出现在西班牙时，他已经是一名高级军官了，这位壮汉有发胖的趋势，双下巴，发际线逐渐后退，总是戴一顶过大的贝雷帽盖着。好像他的黑色皮夹克和大号手枪的震慑力还不够似的，他动辄高声大叫，几乎看谁都像叛徒。⁸

拿到雷格勒的报告，马蒂说他知道该怎么做，便接手了案子。然后他命令“一支俄国枪决小队”向那两名士兵开枪。⁹ 雷格勒记得海明威听到这个故事，喊道“猪猡！”并朝地上吐了口唾沫。¹⁰ 这个举动让雷格勒跟海明威亲近起来，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的友谊，对美国人吐露心中所想：“我把曾亲眼见到过的行动和危机的内幕都告诉了他。我让他了解我们的损失，只要有可能，便让他预先知道一些资讯，我相信他真的懂得……”¹¹

就连雷格勒也没有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是他介绍海明威认识了残暴俄国的另一位代表，内务部情报站长奥尔洛夫。会面地点是盖洛德旅馆，时间大概是1937年春。奥尔洛夫并未以官方头衔跟海明威见面，但他猜想海明威知道他的身份。（对盖洛德的常客们来说，那几乎不是什么秘密。）首次会面没有太多内容。他们一边喝着伏特加和西班牙白兰地，一边用英语聊着他们对武器的共同兴趣，并没有谈及政治。盖尔霍恩来了，她的魅力让奥尔洛夫折服；他们聊到了两个人都喜爱的奥地利美食和音乐。¹²

1937年夏天，奥尔洛夫一直注意着新闻中报道的海明威在纽约和好莱坞的壮举。尤其是他通过内务部的渠道读到了关于在卡内基大厅举行的作家大会的报道：¹³

据各个来源报道，海明威的演说是大会的高潮。……他……猛烈攻击法西斯，用犀利的言辞把他们碾成齏粉。……海明威在公开场合……采取如此积极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让（内务部）大为惊喜。

基于海明威在纽约的英勇表现，奥尔洛夫决定内务部将赋予海明威以全权，给予他在西班牙期间所需或所想的任何官方协助。¹⁴ 1937年9月，海明威重返马德里，再次出现在盖洛德，告诉雷格勒他想更多地了解共和军游击队，据说那些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刚劲勇猛的作风。由于雷格勒可以随意出入内务部，他有机会亲自把海明威的需要告诉奥尔洛夫。奥尔洛夫曾在俄国内战期间有过与白军叛乱者战斗的经验，便想象自己是个游击队作战的专家，也乐意炫耀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虽然这么做违背了内务部高度保密的要求，但奥尔洛夫还是为海明威破了一次例，毕竟海明威对他们的事业充满同情，又是身在西班牙的最有威望的记者，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奥尔洛夫安排海明威前往贝尼玛米特（Benima`met），那是内务部地盘上的一个秘密游击队训练营。

海明威在贝尼玛米特的导游是奥尔洛夫的副手列昂尼德·埃廷贡（Leonid Eitington），这位胸肌发达的内务部军官管理着游击队的日常事务，给人老练精干的印象。从照片上看，奥尔洛夫是个很紧张的人，而埃廷贡的照片却显出他的坚韧和人格魅力，甚至还有些许幽默，这着实不寻常，要知道他的工作可是谋杀斯大林敌人。¹⁵ 在海明威探访期间，埃廷贡非常费力地讨好他，引领他参观的路线显然是事先精心计划好的。苏联人引他参观和了解营地训练的每一个阶段，那些粉刷一新的灰泥建筑物竖立在毫无特色的平原上，看上去有一种严肃正经的气势，让作家海明威印象深刻。

中午，奥尔洛夫招待海明威享用了一顿盛大的午餐，拿出了他专为特殊场合准备的上好法国葡萄酒。他还倒了一杯名为巴切夫斯基的波兰伏特加，这可是罕见的好东西，是他请一位驻维也纳的内务部同事定期运到西班牙供他享用的。午餐后，奥尔洛夫和海明威前往训练营的一个步枪射击场去用苏联武器射击。午餐时喝了那么多酒，海明威仍然展示了一流的枪法，让奥尔洛夫大吃一惊。参观快要结束时，奥尔洛夫送了海明威一瓶珍贵的巴切夫斯基让他带回旅馆。海明威对内务部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苏联人觉得他简直“大喜过望”。¹⁶

奥尔洛夫或许进而促成了海明威的阿尔凡布拉之行，1937年秋，他在那里与共产主义游击队共度了四天时光。他们还允许他旁观了袭击民族主义者火车的战斗，该场景后来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推动了情节发展。有些证据是间接的：贝尼玛米特和阿尔凡布拉两地相距约100英里；海明威大致是在同一时间探访两地的；奥尔洛夫或许对波兰指挥官安东尼·赫罗斯特及其属下施加了影响乃至下了命令，后者可能是在贝尼玛米特训练的。奥尔洛夫本人也曾暗示两地之间有联系，多年后他肯定地说“海明威书中写到的大部分情节”都源于他的贝尼玛米特之行，还说他很高兴在伐洛夫这个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¹⁷

几个月后，奥尔洛夫和海明威又见面了。这是1938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官方纪念日，也是胜利保卫马德里的两周年纪念日。整个西班牙共和军的领土上都在举办热烈的庆祝活动。¹⁸ 在盖洛德午餐期间，海明威滔滔不绝地讲起他的贝尼玛米特之行有多么愉快，还说他带回去的那瓶伏特加真是绝世珍品。几杯酒下肚，海明威开始侃侃而谈。他“激烈地抨击佛朗哥和民族主义者”，“高度赞扬”国际纵队和共和党人。后来证明，这是奥尔洛夫最后一次跟海明威面谈，但

这位精明的情报官员听说和阅读的内容已经足够他就这位美国作家得出结论了。奥尔洛夫记忆中的海明威不是苏联控制下的人，而是一个“坚毅的个人主义者，户外运动的高手，最重要的是在西班牙内战中，他是共和国事业真正的信仰者”。¹⁹

事实上，奥尔洛夫对像海明威这样的真正的信仰者是有所保留的。在工作中做决策时，奥尔洛夫既悲观又现实，并不受太多意识形态或信仰的驱使。多年后他会暗示说海明威因为被自己的信仰体系所困，显得进退失据：“那位作家，还有像他那样的人，是战争的主要激励因素，因为他们让世界舆论倒向共和军一边……这毫无必要地延长了那场战争。”²⁰

如果能听到这话，海明威大概会因为奥尔洛夫评价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而感到高兴。他一向自认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坚信他口中和笔下的西班牙是他人的行动基础。举例来说，年轻的共产主义作家阿尔瓦·贝西曾听说，海明威坚信贝西是听了他1937年6月那个炎热的夏天在纽约市对信仰者的讲话之后，受到激励，才前往西班牙并参加了亚伯拉罕·林肯营（在这个共产国际为共和国事业而组织的营队中，成员大多是美国人）的，这一说法让贝西大为吃惊。²¹ 在他的回忆录《战斗的人们》中，贝西引用了海明威的说法，说他知道“那次演说影响了很多孩子，激励他们来到这里”。²² 贝西接着说，这是“那人的自大狂又犯了……我在（听他的演说）之前很久就决定去西班牙了。这么做是为了走出自己的婚姻”。

在战场上，海明威仍然时而旁观，时而参与战斗。他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杰伊·艾伦（Jay Allen）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赫伯特·L. 马修斯两位同行记者一起行进了很长的里程，每当有共和政府拥护者需要他的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的记事本和笔。1937年12月，他先是向艾伦演示了空袭时如何在嘴里衔着一支铅笔，让嘴一直张着，以此来保护鼓膜，然后又请艾伦来帮忙推一门陷在泥里的大炮，艾伦拒绝了，声称自己受雇来写新闻稿，又不是来参加战斗的，这让海明威很生气。海明威也不赞同艾伦紧接着就战争法大放厥词，说什么记者没有合法权利持有辅助武器。²³

海明威在193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次投身战斗。那天他跟乔·诺思（《新群众》的那位著名编辑）和马修斯一起驾车行驶在

西班牙的一条山路上，他们前面那辆卡车上的年轻人高唱着共和国歌曲，用共和国的方式举起拳头向他们问候。他说那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但紧接着，卡车司机就转弯失误，翻了车。孩子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海明威从自己的车上跳出来施以急救，而马修斯却拿出笔记本开始对伤者提问。诺思记得他听见海明威对马修斯高喊，说他要是不滚开，他，海明威，就杀了他——那时诺思觉得他跟海明威比较性情相投。²⁴

到1938年春，不止一个中立观察家开始不再对共和国抱有希望。民族主义者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开始进攻南方，为的是进一步分割共和国余下的领土。3月底，就连海明威也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他跟另外两位记者一起，向法国和西班牙的美国使馆求助，请他们准备遣送仍然身陷战争中的美国人，特别是伤员。²⁵ 海明威再次表示愿意承担更多的筹资和组织工作。他主张严格保密，因为他不想让人觉得他已经丧失了对共和国的希望，几天后军事局势“不可思议地”稳定下来之后，他才大松了一口气。²⁶

海明威和马修斯四月初在战场上偶遇贝西时，他的表现又像个为共和国摇旗呐喊的人了。他们相遇的地点在托尔托萨（Tortosa）镇附近，面对法西斯强有力的进攻，亚伯拉罕·林肯营那些训练不足的步兵正在那里帮忙守住阵线。贝西不怎么喜欢马修斯，觉得此人“愤世嫉俗”“郁郁寡欢”“跟个苦行僧似的”。此外，高个子大块头、脸色发红的海明威却像是“你能见到的最高大的人物之一”，“急切得……像个大孩子”，就战斗情况问个不休。海明威不肯灰心丧气。他表扬共产主义者“树立了榜样，不停歇地鼓舞军心，无条件地忠于信仰”，这有助于建立一支统一的反法西斯军队。他最后说，战争会进入新的阶段，政府方面的抵抗会加倍，因为到处都是善良的人们，看到被法西斯冷血杀害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越多，他们只会越来越愤怒。²⁷

只要看到一丝胜利的机会，海明威关于战争的话语和文章基本上都是乐观向上、对共和国一方有利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他为北美新闻通讯社所写的文章读来更像是宣传而不是报道，更不要说他为苏联报纸《真理报》所写的文章了。²⁸ 他攻击法西斯，特别是他们轰炸平民目标的习惯，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杀人。他描述了共和军的艰难、隐忍和勇敢。听到有人指控亲政府部队犯下暴行时，他们为他们辩护，他呼吁民主国家放弃自己的不干涉政策。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海明威热切地坚信西班牙是终结法西斯之地。如果民主国家不行动起来而让法西斯取得了胜利，他们就要承担“命运带来的全部后果”。²⁹ 他对共和军一方的缺点不做任何探讨，也不想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报道这场战争。有人请他这么做时，他只有一次心不在焉地试图进入民族主义者的地盘。³⁰ 新近创立的《眼界》（*Ken*）杂志发表了两幅反共产主义漫画之后，海明威甚至打消了为该杂志做编辑的念头，因为他想，“给人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加以迫害”会破坏人民阵线。³¹

海明威1937年的戏剧《第五纵队》讲的就是抓捕间谍的事。³² 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菲利普·罗林兹的美国人，他和海明威一样，与金发女友一起住在马德里的佛罗里达旅馆，是齐科特酒吧的常客，常常有多余的食物分给比他运气差的人。但跟海明威不同的是，他的主业不是作家。罗林兹自称是个“警察”，是“反间谍”专家，在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他“已经报名要打到底了”。罗林兹有些不恰当的台词，诸如“我的时间就是党的时间”，以及“关于命令只有一个定义，必须遵守”。他已经在西班牙待了大约12个月，上司是名叫安东尼奥的鹰钩鼻安全官员。大多数学者认为，安东尼奥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佩佩·金塔尼利亚[Pepe Quintanilla，此人碰巧还是海明威在战前结交的艺术家路易·金塔尼利亚（Luis Quintanilla）的兄弟]，一个冷酷的秘密警察。罗林兹非常擅长抓捕间谍——“秘密的‘第五纵队’成员”，他在城中四处转悠时总是竖起耳朵打听这类信息，要么就是审问囚犯。他甚至还领导过一次袭击，目标是法西斯守卫的一个秘密炮队观察哨，抓住了下令炮击马德里平民目标的那些人。这部戏剧最终给读者留下的结论是，共和国要想继续下去，就需要像安东尼奥和罗林兹这样的人。

海明威的立场如何？十几年后再回首那段经历，他承认，在那场西班牙战争中，他变得“如此气急败坏地充满正义感”，以致他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恐怖”。³³ 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内战不仅是想要当战士的作家的一条出路，也不仅是他下一篇报道或下一本书的资料来源。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战场上还是战场下，海明威都在为共和国和反法西斯而战，不管那是否对他的事业有丝毫助益。他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事业。

海明威不止一次近乎宣称，在这场战争中，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和许多其他左派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深深爱上了反法西斯、

亲共和国的事业。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十年危机中，那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政治反应式：自由对压迫、民主对独裁、进步对反动、平民对寡头、生对死。那是思想者很可能会理想化的事业。伟大的英国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就在他关于西班牙的不朽诗篇中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问道：³⁴

你们想干什么？建立正义的城吗？好，我同意。或者立自杀公约，浪漫的死亡？

那也不错，我接受，因为

我是你们的选择和决定：我是西班牙。

在为吉姆·拉德纳（Jim Lardner）这位在国际纵队的最后几次战斗中牺牲的美国年轻人撰写的悼词中，海明威几乎呼应了奥登的理想主义和宿命论：³⁵

我们的死者现在已是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而西班牙的土地却永远不会死亡。每个冬天看起来它是死去了，但每个春天它会再活过来……从来没有谁比那些死在西班牙的人更庄严地埋入土地。……

1938年底，国际纵队解散，共和国的外国志愿者也被遣送回国，这一决定的官方理由，是安抚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该委员会是欧洲各国政府为限制外国势力干预西班牙内战而建立的。但他们的离境同时也再次标志着胜利的希望渺茫。10月底，政府急不可待地在巴塞罗那安排了一场送别游行，外国士兵们穿行在友好的民众中，那天估计有30万民众到场。民众朝士兵抛掷了无数鲜花，以至于游行队伍不得不在花海中曳地而行，所经之处，人们都高举着共和军领袖和斯大林的大幅照片。他们倾听着外号“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ñuri）的讲话，后者行为夸张，是个共产主义领袖和演说家，她告诉国际纵队队员，他们可以骄傲地踏上征程；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此刻他们已经归入历史，成为传奇。讲话之后，号手们为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外国人吹奏起《思念曲》（“Taps”），用一位见证者的（同情的）话说，“全巴塞罗那都脱帽饮泣”。³⁶

1938年11月初，当他在共和国首都巴伦西亚听说这一事件时，忠实信徒海明威的信仰动摇了。因为无法再对未来报以乐观情绪，他崩

溃了。一次空袭中，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下榻的旅馆里遇到一个外国人：曾经指挥过加里波第纵队（Garibaldi Brigade）的意大利人兰多尔福·帕恰尔迪（Randolfo Pacciardi）。他正准备离开西班牙，又无家可归（意大利已经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盖尔霍恩记得，他伤心欲绝、无家无国、不名一文，却丝毫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³⁷

见了帕恰尔迪之后，海明威和盖尔霍恩继续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不久她听到了欧内斯特的哭声。他在楼梯上，靠着墙，为帕恰尔迪而哭，他说：“他们不能这么干！他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勇敢的人。”³⁸ 盖尔霍恩写道，海明威痛哭的是政府随便敷衍说几句感谢的话便解散了国际纵队，让帕恰尔迪这样的人落寞而归，“没有……钱，没有证件，也看不到未来”。³⁹ 这是盖尔霍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到海明威哭泣，这让她更加深爱这个男人了。

海明威自己对他在巴伦西亚情绪崩溃的解释是，“如今活着的人中怕没有谁不曾在战争中哭泣，只要他参加战争的时间够长。……有时那是因为另一个人受到了极大的不公，有时是因为某个一起同甘共苦的兵团或部队解散了……再也不会重聚”。⁴⁰

和帕恰尔迪一样，很多外国人离开西班牙之后都命运叵测。英国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可以回国，但因为他们在共和国而战时跟军队中的许多共产主义者有染，也会受到官方的怀疑。苏联人及其盟国的人可以回到苏联，但许多人将死于新一轮毫无意义的斯大林主义大清洗。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无法回国，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庇护，而这么做往往是徒劳的。

大约与国际纵队撤离同时，海明威最后一次离开了西班牙。他知道，西班牙战争远没有结束。而他也远没有准备放弃为捍卫共和国价值观而战斗到底。和他笔下的人物罗林兹一样，他也喜欢说自己已经报名要打到底，并不止一次地宣誓要继续与法西斯作战，不管打败敌人需要多久，哪怕是持续五十年的不宣之战。⁴¹

[1]加里·库珀（Gary Cooper, 1901-1961），美国知名演员，曾五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两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一次获金球奖最佳男主角。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第四章 丧钟为共和国而鸣：海明威见证了历史

到1939年2月初，佛朗哥的军队占领巴塞罗那后，数万名共和军士兵、随军流民和同情者走在从北面 and 东面出城的公路上，避开正在城中为胜利狂歌痛饮的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只要看谁像共和国的人，就不由分说地开枪射击。那些双车道公路其实更像乡间小路，有尘土飞扬的路肩，路上挤满了难民，有的搭乘轿车和卡车，有的步行，还有的坐在驴背上。农妇们赶着鸡牵着羊；母亲们领着孩子，人群涌向法国的避难所。¹

几辆卡车载着法西斯的飞行员，这些是俘虏，不知为何仍在共和国空军的手里。那些飞行员和他们的敌人互相辱骂，发誓彼此不共戴天，诅咒对方下地狱。但大部分共和军士兵都安静有序地行军。在即将越境进入法国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最后一次整顿队形，继而由几位军官进行了一次小型阅兵仪式，军官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安德列·马蒂。随后，士兵们把自己的步枪扔在成堆的武器装备中，任其凌乱地散布在西法边境西班牙这边的石头地面上。有些留下来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国际纵队队员向前靠拢，唱着歌挺进法国。听到法国宪兵命令他们安静，喝道“禁止唱歌！”时，他们感到阵阵凉意。²

作家海明威在基韦斯特读到了共和国濒死挣扎的消息。他的心仍在西班牙，但已经接受了共和国末日将近的结局。他的态度就像第一个从战场归来的退伍老兵那样，听到自己的同志们仍然手持武器在战斗，感到既愤怒，又内疚。有些记者报道赤色分子的暴行，或者声称佛朗哥一方更加人道（这当然是歪曲事实，但不止一个知名记者这样报道），令他怒不可遏。在写给岳母（鲍莉娜·菲佛的母亲，海明威虽然已跟玛莎·盖尔霍恩浓情蜜意，但仍对鲍莉娜的母亲充满依赖）的信中，他说那些指控根本不是事实。³ 他见过“一个个城镇被炸成平地，居民横死，路上成群的难民一再遭到轰炸和机关枪扫射”。那

是“一种摧毁内心一切信念的谎言”。想到他的好友们还身处战火最炽之地，他简直无法忍受，早知今日，真不如和他们并肩待在一起。他接着说，他“整个战争期间，在西班牙的每晚都能安然入眠”，饥饿时时伴随，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最后说，“人的良心很奇怪，它既不受安全感的驱使，也不被死亡的威胁所控制”。⁴一天后他写信给麦克斯·珀金斯说他“每晚噩梦不断……那确实是些可怕的梦，可怖的细节清晰可见”。⁵这很奇怪，因为他在西班牙从未做过噩梦。

这些都没有改变他对政治的看法。他仍然因为民主国家袖手旁观、任共和国自生自灭而悲愤不已。西班牙“以不同的方式被出卖和背叛了十几次”。⁶在他看来，英国仍然是头号大恶人。他还在宣传他的戏剧《第五纵队》，该剧主旨就是为实现反法西斯的目的，可以动用残酷的手段。纽约的制作人们不急着上演这部戏，原因恐怕是“这场战争变质了”，但海明威仍希望把它搬上舞台。“哦天呐，我多么希望我当时把它写成小说”，他对珀金斯说。⁷然而当时身陷战局，他没有时间写小说。

几周后，战争终于在那年3月结束了。民族主义者进入马德里之后，实施了各种野蛮暴行，仿佛一切都按照共和军宣传员所写的剧本如期上演。先是寻欢作乐。为庆祝胜利，占领军的士兵放手掠夺、尽情吃喝。神父、民族主义警察和共和军保皇派穿上各自彰显立场的服装和制服，在公共场合耀武扬威。与庆祝活动同时进行的是全面镇压。大城市纷纷点燃了焚烧“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火堆。像在巴塞罗那一样，共和党人及其同情者被当作国家敌人清洗出去。他们遭遇的报复至少是失业和丢掉生意。成千上万的人径直被枪杀。谁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人被赶入临时建立的集中营——或许有几万乃至数十万。有些人被关押数月乃至数年；更多的人被判处长期劳改，有时这些判决就在临时军事法庭进行。⁸

那些成功逃离西班牙的共和党人的境遇也没有好多少。除墨西哥外，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欢迎难民。离得最近的民主国家法国很快就被难民潮淹没了，难民人数一超过20万，法国的态度就变得愈加矛盾。身在法国的大部分共和国难民就像进入了另一种集中营，食物糟糕，卫生条件恶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遮风挡雨。

在海明威和盖尔霍恩看来，民主国家的声望几乎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它们在西班牙的记录已经够糟了，如今又加上了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它们在慕尼黑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希特勒声称苏台德区（Sudetenland）是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合法”领土，为避免战争，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屈服了。希特勒得寸进尺，把那个国家剩下的领土也全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于1939年3月完成了吞并过程。和海明威一样，盖尔霍恩也把发生的一切归咎于英法两国，特别是英国，“张伯伦把欧洲拱手让给了独裁者”。⁹

现在是海明威收心工作的时候了。3月23日，他写信给苏联文学好友伊凡·卡什金说：“一旦战争开始，唯一的目标就是胜利——我们没有实现那一目标。现在，去他的战争吧……我没死在战场上，所以必须要工作了。”¹⁰ 他接着对卡什金说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已经写了15000字。他告诉卡什金，自己的心仍在西班牙，还痛斥那些没有出力捍卫共和国，而今却在攻击为共和国而战之人的败类。“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战斗，毫无私心”。两天后他在写给麦克斯·珀金斯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看到法国那样对待共和国，他觉得自己没有义务跟他们站在同一立场反对德国。不管怎么说，此时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写短篇小说和一部关于战争的长篇小说。¹¹

海明威已经写了五部关于战争的短篇小说，包括《蝴蝶与坦克》（“The Butterfly and the Tank”）、《告发》（“The Denunciation”）和《决战前夜》（“The Night before Battle”）。¹² 这三部都以不加掩饰（有时难免显得啰唆）的细节描述了他在共和国的战斗生活。那位阿尔瓦·贝西在战场上见到的乐观的海明威，如今变成了现实主义的海明威，愿意公开讨论共和国的缺点，但愿共和国的领袖们更能干一些就好了。《蝴蝶与坦克》定下了基调，讲的是一个人在一家名叫齐科特（就是现实中海明威常常光临的那家酒吧）的酒吧里恶作剧，愚蠢地为之送命的故事。就像蝴蝶遭遇了坦克，一个人的玩笑也会与战争的严肃性发生碰撞。《告发》是一个冷酷的故事，讲的是当看到一个法西斯军官出现在马德里他最喜欢的酒吧（不足为怪，自然又是齐科特酒吧）时，必须要告发他。问题在于这个法西斯军官现在穿的是共和军军装，还问了许多关于战事的问题。故事的两位主人公安排秘密警察来审问这位不请自来者，后将他带走，当作密探执行了枪决。在《决战前夜》中，一位美国共产主义战士确信他会死于第二天的一场不明智的战斗。他对共产主义事

业笃信不疑，也了解身为战士必将身处危险，却对那些下令战斗的领袖们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海明威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欧洲的局势继续恶化。欧洲大陆已经为近在咫尺的战争做好准备。西方同盟国开始与苏联谈判，探求是否有可能为对抗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但此举三心二意，自然毫无结果。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两国的外交部长宣布他们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承诺未来十年不彼此攻击。希特勒签订此条约是因为他想在西线放手一搏，斯大林则想在万事齐备之后再与希特勒开战。（他杀死了那么多优秀军官，因而需要更多时间为战争做准备。）两位独裁者还愉快地签署了一份瓜分东欧小国的秘密附录，第一个被祭出的就是波兰，不久它就会有一个德国区、一个苏联区了。两天后，英国签署了一份《英波互助协议》，正式成为波兰主权的早期担保国。

苏德条约成为一颗炸弹，粉碎了打响战争的最后障碍。¹³ 东翼一旦安全，希特勒的军队便把焦点放在了西面的法国和英国。共产主义苏联和纳粹德国结盟也改变了左翼政坛的图景。人民阵线，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反对法西斯的脆弱（且往往是神秘的）同盟，就此瓦解了；同时瓦解的还有共产国际，整个1930年代，它都在宣传人民阵线的反法西斯思想。对许多共产国际领导人来说，苏德条约就是一纸死刑判决书，他们终将死于看似不可避免的清洗。那些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为共和国而战的国际纵队成员们如今被召回莫斯科，被捕并遇害，原因是他们现在太过国际主义，因为曾生活在西欧而受到了污染。天才的威利·明岑贝格曾为共和国事业出生入死，如今却成了孤家寡人。1940年他的尸体出现在法国的一棵树下，多半是被内务部所杀。对左翼犹太人来说，党不再是他们对抗希特勒和反犹主义的安全的政治大本营。如果留在党内，他们就等于跟自己的仇敌希特勒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希特勒可毫不掩饰要彻底消灭他们的意图。

党的路线向来教条武断、自以为是，仿佛只有一种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从来没有为微妙情感或个人解读留有太多余地，但大多数党员都能够聚焦一两个投其所好的基本路线，例如反法西斯。如今，党突然推翻了这一核心教条，并要求忠诚者们捍卫这一变化。这样的逆转把诚实的男女变成了说谎的人。

对于四分之一的美国共产党员来说，这太过分了，他们彻底放弃了这项运动，再也没有回头。其中有些是文学人物，像曾担任《新群众》编辑的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他几乎迫不及待地以低调而知性的方式解释他何以离开组织。他被党的独裁宣言所震惊，觉得他们“完全丧失了清醒和逻辑……如果党的领袖们无法明智地捍卫苏联，就必然会以愚蠢的方式来捍卫这个国家”。¹⁴

另一个重要的叛逃者是海明威的朋友、人道主义的政委雷格勒。起初他无法相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份单独的协议。也许这只是一次不负责任的空穴来风？看到报纸后他才相信那居然是真的。和希克斯一样，雷格勒也无法坦然接受党如今的双重标准思想。曾有一位共产主义医生声称该条约阻止了“真正的战争的爆发”，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签署的¹⁵，雷格勒无法苟同，虽然那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坚强的行医者。

海明威怎么看待苏德条约？雷格勒的书中有几处暗示。西班牙内战之后，雷格勒和海明威仍是好友。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海明威在1939年和1940年尽其所能地帮助雷格勒，共和国崩溃之后，雷格勒成了难民，海明威一直往法国寄钱给他。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海明威又发动舆论将雷格勒从愚蠢的敌侨集中营中释放出来。¹⁶ 雷格勒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朋友，除了海明威，他的友谊坚如磐石。”¹⁷ 最后法国人终于释放了雷格勒，他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又到达墨西哥，他和妻子在那里靠绘画和写作勉强度日，他们的作品非常有趣，销路却不佳。他写作的书籍包括两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其中一部显然是自传。

《伟大的圣战》（*The Great Crusade*）出版于1940年，讲的是一个有良心的共产党员渐渐开始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要在两条战线上战斗：既要在战场上与法西斯作战，又要反对破坏共产主义事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小说篇幅很长，有时晦涩难懂，却是真情实意之作。其中一章有一个段落提到对忠诚的革命者而言，幻灭的过程何其痛苦。革命知识分子尼古拉·布哈林在1930年代的清洗中被迫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从此便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为何全身心地投入了一场逐渐变质的革命。但他的求索没有答案，只有“无尽黑暗的虚空”。¹⁸

海明威或许没有逐页阅读过那部小说，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它隐含的意义，就停下自己的小说，为这部关于“国际纵队的黄金时代”的小说撰写了序言。他对雷格勒和第十二国际纵队赞誉有加，雷格勒曾在第十二纵队服役，海明威也常常到访。海明威写道，战争期间，那是他心灵的归属。纵队的战士们非常勇敢，几乎始终充满欢乐，因为那时他们认为共和国必将胜利，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

海明威接着写道，在哈拉马河（Jarama River）附近的山坡上进行的“唯一一次十分愚蠢、计划和执行都毫无章法”的战斗令他愤愤不平，那次战斗大大削弱了该纵队的力量。计划和指挥战斗的那个人“后来在回到俄国后被枪决”，他对这一结局倒还满意。海明威没有提到那位指挥官的姓名，但那想必是共产主义战士亚诺什·加利茨（Ja'nos Ga'licz），海明威称他是一位厌恶新闻记者的匈牙利人，还说他“当时就该被枪毙”。海明威又一次让苏联人无功受赏，内务部不可能是因为加利茨无能而枪毙了他。相反，他之所以被枪毙，一定是因为他曾在西班牙服役，在斯大林偏执狂的观点看来，这足以把他变成一个可疑人物了。²⁰

在《伟大的圣战》的序言中，海明威还提到了苏德条约。他的观点与雷格勒大相径庭。德国人认为斯大林首先不该放弃西班牙共和国，更不该牺牲共产主义理想，跟希特勒签什么战术协议。海明威则相反，他愿意相信斯大林是好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时，苏联可没有跟希特勒签署任何条约。只有当他们（苏联人）丧失了对民主国家的信心，才产生了（苏德）盟约。”²¹ 海明威对条约的支持让读者们大跌眼镜，看似断章取义的误读。但这确实是他当时的典型思维方式。他因为斯大林曾在1936~1938年支持共和国和国际纵队而向后者致敬，并坚称在慕尼黑协定之后，苏联独裁者为了自保而别无选择，外人无权为此对他横加指责。²²

雷格勒似乎了解好友的想法，他说海明威基本上是个“不懂政治”的人。跟政治比起来，欧内斯特倒是更了解丛林法则。他更像个猎人而非政治家；他看待问题“黑白分明”，要么生，要么死。²³ 他不明白“现代独裁者哪怕对童军法则也没有丝毫尊重”。²⁴ 同样，雷格勒曾在西班牙对一位更有同情心的苏联人说，海明威也不拥护西方民主，他赞同的生活方式，是在像非洲的高山或基韦斯特海域那样的地方最充分地体验生命。²⁵

其后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令人眼花缭乱。9月，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向德国宣战，但对波兰的遭遇却无能为力；希特勒轻易便占领了倒霉的邻国，为斯大林根据两国的条约占领波兰东部铺平了道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许多虔诚的共产主义者目瞪口呆。11月，斯大林入侵邻近的民主小国芬兰。那是一种旧式的武力抢地，跟沙皇或罗马皇帝的做法如出一辙。芬兰人像大卫对战歌利亚一样反抗入侵，战斗一直持续到1940年3月。与此同时，英法两国在重兵把守的法德边界与德国开战了。这就是1939~1940年冬天的所谓“虚假战争”（Phony War），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1940年5月，当德军攻破了比利时境内林木茂密、看似难以逾越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时，虚假战争结束了。一队队坦克和机动部队包抄了边境的防御工事，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就突破了盟军的防线。希特勒用短短六周时间就占领了法国，把英国赶出了欧洲大陆。英国，这个因为没有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遭到海明威最多批评的国家，如今只能以一己之力对战轴心国，只能靠海外领地给予支持。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决心一战到底，但英国的前景却很糟糕。很多美国人怀疑它根本无法战胜希特勒，怀疑美国是否应该予以支持。盖尔霍恩就和许多人一样，认为“英国似乎总算要为西班牙和捷克、波兰和芬兰付出代价了”。²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最初几个月，海明威仍在聚精会神地写那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说，偶尔露面写几封信或关注一下盖尔霍恩。她在一封信中说她对待手稿“像一头动物”，要么把它紧抱在怀里，要么藏在抽屉里的其他文件下面。他从不愿意给任何人看，也不愿意谈论它。²⁷ 盖尔霍恩出发前往芬兰去报道苏联入侵时，海明威只是赞扬了她投身战争的过人胆识，却对苏联入侵邻国的行径只字不提，不止一位幻灭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颇有微词。²⁸ 当他再次转而关注西线时，也只是再次对英国口诛笔伐。例如在1940年5月，他提醒麦克斯·珀金斯注意英国人曾经多么堕落。在西班牙，“（就在）我们不计回报地为他们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战斗时，他们却让我们陷入最大的麻烦，要知道只要他们给我们一点点援助，我们就能无限期地牵制住法西斯，令其动弹不得”。他预言说他们会卷入他所谓的“英式滥交”——也就是说，他们会从战场上撤军，对同盟弃之不顾。²⁹

欧洲发生的灾难刺激了海明威曾经的好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后者公开反对美国的中立态度。在1940年春天的一系列谈话和文

章中，刚刚被任命为国会图书馆馆长的麦克利什悲叹道，居然有这么多美国年轻人对战争持怀疑态度，几乎到了绥靖主义的地步。他认为这要归咎于那些反战小说，比如海明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永别了，武器》。海明威愤怒地回击，说麦克利什搞错了。德国人了解战略战术，盟军却一无所知，这跟反战小说可没什么关系。麦克利什一定“心有不安”，而他海明威没有，他曾“在各条战线上与法西斯战斗”，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³⁰ 他建议麦克利什读一读《第五纵队》（他那部关于不惧亲力亲为的反间谍的戏剧），再去观看一次《西班牙土地》（他们一起制作的纪录片）。他还略带挖苦地说起西班牙的前线，他曾亲自前往，而麦克利什却没有。三周后，海明威还在对麦克斯·珀金斯抱怨麦克利什，写道：“如今人们又是绝望崩溃又是歇斯底里又是宣泄怨气，我可不想再写什么呐喊助威的东西了。”³¹

麦克利什选错了攻击目标。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伟大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事实上就是写全力以赴地面对战斗的。它与出版于1929年的《永别了，武器》全然不同。早期出版的那本书写的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爱情故事。战士弗里德里克·亨利把战争抛在脑后，因为一系列不幸的事件而被迫当了逃兵。他跟情人凯瑟琳·巴克莱一起逃往中立区瑞士。巴克莱怀孕了，世界缩小成为亨利和巴克莱周围的一个小圈子。孩子是死胎，巴克莱不久后也死于并发症。与之相反，关于西班牙那本书的书名就让读者去寻找故事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丧钟为谁而鸣”是约翰·多恩的诗句，那首诗开头第一句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

这部新小说以海明威与共产主义破坏分子打交道的经历为原型，讲述了一支在法西斯敌后行动的游击队为时四天的故事。他们的任务是在大进攻开始时炸掉一座桥，从而阻止法西斯的行动。美国游击队战士罗伯特·乔丹不但没有当逃兵，反而为反法西斯事业献出了生命。乔丹思想活跃，总是禁不住考虑自己怎么会如此沉迷于政治和战争。他知道战争为何而打，也知道该怎么打，跟海明威一样，他也相信共和国需要共产主义纪律，才能战胜法西斯。

在乔丹看来，共产主义纪律并非完美；只是它最符合当时的要求。乔丹自己也承认某些共产主义领袖凶残无能，他们的行为对战局的破坏不亚于法西斯探子。首恶就是法国人安德列·马蒂，也就是雷

格勒跟海明威说起过的那位国际纵队总政委。海明威对自己描述的场景确信不疑，甚至都懒得在小说中掩盖马蒂的真实身份。³²

对乔丹来说，法西斯实施暴行是已知的事实，他们曾经轮奸了他的爱人玛丽亚就是一例。乔丹还知道共和军的记录也绝非无瑕。他就听说过一次暴行，不亚于战争期间发生在一个名为隆达的地方的事件。³³ 在小说中，占领那座小镇之后，共和军决定迫使它那些德高望重的镇民（他们要么真的是，要么被怀疑是民族主义的同情者）从两排挥舞着木叉、连枷和镰刀的人中间走过。那些民族主义者全都或多或少带着些尊严而死，作者没有把他们大而化之地写成法西斯恶魔，而是着笔描述了个人的死亡。海明威对卡什金说，“我努力展现（战争）各个不同的侧面……让自己慢下来，诚实面对，从多个视角审视它”。³⁴

海明威不偏不倚的态度得到了很多评论家的赞赏。埃德蒙·威尔逊就赞美1937年那个“佛罗里达饭店的斯大林主义者”海明威死去了，“艺术家海明威（又回来了）……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回来了一样”。³⁵ 然而这样的公正态度又让他失去了左派的朋友。曾一度做过西班牙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Julio Alvarez del Vayo）在1940年底读到《丧钟为谁而鸣》时，替许多人说出了心里话，他写道，海明威的书让他这样的流亡者感到“悲愤”，在他们看来，该书根本就没有抓住那场战争“你死我活”的真正本质。³⁶ 美国共产党员阿尔瓦·贝西曾在战场上遇到海明威后将他引为知己，在他看来，此书不啻背叛，是对一项崇高事业的残忍曲解。贝西带着一丝遗憾为《新群众》撰文，称海明威本可以为这场人民战争写一本伟大的书，但他却掉入了个人主义的陷阱，以战争为背景写了“一部国际化的爱情故事”。³⁷

海明威把政委马蒂描写成“一个傻瓜、疯子和……杀人犯”³⁸ 尤其让贝西生气，攻击马蒂会让“我们共同的敌人”感到快意。贝西承认，海明威并非有意诽谤西班牙人民或苏联，但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方式却达到了那样的效果。“海明威表扬了单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主义英勇行为……（却）责难和中伤他们的领导能力、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³⁹ 其他评论家，如林肯营的指挥官、同是海明威好友的米尔顿·沃尔夫，责备这本书无视民族主义者犯下的暴行——就算说了也是轻描淡写，他强调，那些暴行是政策问题。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在

有组织地杀人，而红军并没有。⁴⁰（或者至少程度不同。如果对内务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异见分子的运动忽略不计的话，这倒是真的。）尤里斯·伊文思最终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但他没有愤怒声讨。他会提出温和的判断，说海明威在写这部小说时，“回到了他原来的（非政治）视角”。⁴¹

伊文思错了。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海明威。他曾经满怀激情地赞同共和国，反法西斯，而今仍然如此。1939年唯一的改变，是他不再为了保护共和国而自我审查和删减了。他现在能够道出自己所见的全部真相，这是雷格勒等某些前共和军成员鼓励他做的。⁴² 在战争中，雷格勒曾跟海明威分享过一些党的秘密，但作家没有利用那些材料，因为那时党还在为共和国而战，而共和国还有一线生机。⁴³ 只有当战争结束之后，他才可以尽情抨击那些破坏了革命事业的人。共产主义者们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浪费了时间：亚伯拉罕·林肯营乃至由此类推的其他国际纵队成员，都“太关注意识形态，没有足够的训练、纪律或武器装备”。⁴⁴ 他们总是被那些无能的指挥官无谓地牺牲。

雷格勒断定，无数读者会从海明威的小说中学到教训，那些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学习的。凭借着猎手对偷猎者的憎恶，作家描述了“间谍病那些可耻的、凶残而愚蠢的运作，那是苏俄的梅毒”。⁴⁵ 人道主义政委雷格勒知道，强化革命纪律的方式有很多。就像他比喻中的猎手一样，他不反对杀戮，但他反对无证杀戮，认为那是违法的。雷格勒理性地确信海明威跟他想的一样。不到两年后，这个德国人就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质疑海明威的判断了。

第五章 秘密档案：内务部在行动

1940年7月，热浪来袭的第11天，纽约的气温接近30摄氏度。那天海明威住在距离曼哈顿中城的大中央总站只有一个街区的巴克莱酒店套房里，客厅的窗户开着，茶几上的电扇搅动着湿热的空气。水桶里的冰块都化了。窗台和桌子上各放着几瓶白石啤酒，一瓶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苏格兰威士忌放在地板中央，哪位要是啤酒喝多了，想来一口更刺激的，伸手就能够到它。作家穿着睡衣接待来客，敞着胸，浓密的胸毛露在外面。说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朋友和熟人进进出出。这位是个律师，那位是有着骄人战绩的内战老兵。每隔几分钟，电话铃声就会响起，打断他们关于其他共和军士兵遭遇的谈话：那些士兵有的滞留在法国，有的被召回莫斯科枪毙了，有的正在某个纳粹集中营里经受百般折磨。

一位名叫鲍勃·范·格尔德（Bob Van Gelder）的《纽约时报》记者替读者捕捉到了忧虑与活力交加的海明威，当然最明显的还是作家脸上成功的喜悦。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分心，他很难不注意到，在采访海明威的过程中，时时有乐观活泼的情绪凸显出来。有一丛浓密的黑发从小说家的前额吹开，他“看起来跟一头大象一样高大强壮”。他很难克制自己，谈话时身体向前倾，把座下的椅子一点一点往听者那边蹭。他满脸洋溢着欣慰和满足，因为他刚刚把自己那部战争小说交给出版商斯克里布纳。

经过17个月的扎实工作，他凭直觉知道《丧钟为谁而鸣》会是一部杰作。然而来自欧洲的坏消息又让他无法满足于写作的桂冠。世界已爆发战争。弗朗哥的同盟正在进军；6月14日，希特勒占领了巴黎，如今已将大部分欧洲大陆握在掌心。海明威对范·格尔德说，那就意味着“西班牙的仗不得不再打一次了”。¹ 和以往一样，他可不打算错过这个机会。

到1940年夏，海明威已经在考虑如何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把精力投入到他曾坚定信仰的事业中。7月，他还住在纽约的巴克莱酒店时，欧内斯特就在信中对麦克斯·珀金斯说，他会继续与敌人战斗，不过这次是以他自己的方式。² 一种挑战法西斯的方式当然是写作和记录战斗，就像他的战时作品《第五纵队》和《西班牙土地》那样。他新近完成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也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写作当然不是唯一的战斗方式，他愿意探索其他的可能。他甚至愿意在此期间，让自己的公开形象保持低调。正如他后来在写给儿子杰克的一封信中所说，不管他决定在这场战争中做些什么，他都会“保持安静，不会高声宣扬”。³

早在1940年10月，海明威的个人生活还在经历改变时，他就已经开始寻找适当的战时工作了。跟第二任妻子鲍莉娜的离婚程序已接近尾声，他和盖尔霍恩正在规划着未来的新生活。那位永不停歇的准新娘正在寻找海外记者的工作，希望婚礼后不久就启程前往亚洲。海明威有一封写于10月21日的信中提到了他们有可能来一次亚洲之行，那时《丧钟为谁而鸣》刚刚在位于第五大道597号的斯克里布纳书店面世一周。⁴ 十天后的计划取消了，11月21日他们在怀俄明州的夏延

(Cheyenne) 举办婚礼之后不久，该计划又再次重启。⁵ 这对新婚夫妇从夏延开车前往纽约，在设施齐全、陈设讲究的巴克莱酒店度蜜月。

在纽约，盖尔霍恩巩固了她为《科利尔》报道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任务，那场发生在遥远大陆上的战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很长时间（首次小规模战斗可追溯至1931年），以至于很多西方人都把它忘记了。海明威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同意同行，并答应为好友拉尔夫·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新发行的左派小报《下午报》

（*PM*）做些报道。

海明威似乎还同意为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做些“调查”工作，他是罗斯福政府中强有力的人物，总喜欢给生活多姿多彩的环球旅行者海明威派点儿任务。⁶ 几个月后的1941年1月27日，摩根索在自己的内部会议上轻松地问起：“欧内斯特怎么样啊？”一位名叫哈里·D. 怀特的人回答了他的问题，跟部长说海明威还不错，“非常乐意（为我们）调查任何事”。⁷ 怀特是财政部的二号人物。他显然已代表摩根索接近海明威，跟后者保持联系，并安排他与部长会面。海

明威本人在1941年7月写给摩根索的信中解释，怀特曾请他研究“共产党-国民党的争议，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对您有用的情报”。⁸

怀特正在核查一个借款人的信用。财政部已经在向中国提供经济支持，正准备把那个国家列入《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根据该法案，只要是用于对抗法西斯，就可以按优惠的条件从美国购买武器。他和摩根索想让海明威履行一次事实调查任务，这是当时的普遍做法，有时也是为间谍工作打头阵。政府高官可能会请德高望重的国民或政治家前往海外，深入了解当地风物，汇报见闻感想。纽约顶尖律师和共和党国际主义者威廉·J. 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1940年曾前往英国，为海军部长和总统报告该国还有多少持久力与德国作战，也是为履行同样的任务。⁹ 多诺万走遍英国各地，会见了政治和军事精英人士，回国时详细汇报了情况，为自己1942年创立的情报机构——战情局——铺平了道路。摩根索希望海明威从事类似的活动，让海明威受宠若惊。这正是他渴望的那种认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不只是一个小说家或新闻记者：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深谙世故，且颇能利用自己的见识去影响事态的发展。¹⁰

这对新婚夫妇决定在瞭望庄园（Finca Vigía）过圣诞节，那是哈瓦那郊外他们先租后买的一处宅子。过了新年，他们会重返纽约，然后启程前往西岸。海明威会在纽约城里住一段时间，他有很多人要见，得一一安排。¹¹

一个名叫雅各布·戈洛斯的人迫切地想在海明威出发前往中国之前见他一面。戈洛斯是那种真正非同寻常的人，在谍报史上不时浮出水面。1890年，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那时乌克兰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土。他八岁时就因为散发反沙皇传单而第一次被捕，客气地说，这表明他的家庭是左倾的。¹²（很多俄国革命者都是犹太人，为的是反抗国家认可的反犹主义，以及因此而发的频率惊人的大屠杀。）

第一次被捕并没有浇灭戈洛斯的革命热情；他继续散发布尔什维克传单，后来还参与印制。第二次被捕之后，他声称自己倒地装死而逃过了一场集体处决。1907年第三次被捕时，17岁的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了，这次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两年之内，他一路向东逃了出来，步行到达中国，然后又经由日本到了美国。和在俄国一样，他在美国继续从事革命事业。先是在底特律，后来又来到

纽约，他融入那里的流亡群体，与侨居的秘密策划者打成一片，他们根本不喜欢美国，每时每刻都在焦虑不安地思考着故国的政治局势。

1915年，戈洛斯成为一位美国公民。1917年，革命终于爆发，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了政权。戈洛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且随着它的发展壮大而逐渐成为领袖人物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共产党频繁更名，也建立了不少分支，但有一点始终未变：它一直是莫斯科的驻美机构，也是苏联情报机构的职能部门。党员既可本人从事间谍工作，也可以起到支持配合的作用。不久，戈洛斯成长为一名卓越的辅助者，成为在苏联情报机构和美国社会之间搭建桥梁之人，但他只为苏联服务，不考虑美国的利益。

不管他在美国居住了很多年，戈洛斯的样貌和说话方式始终像个俄国革命家。他长得矮胖敦实，身高还不到一米六，蓝眼睛厚嘴唇，发际线已日渐后移。照片上显示他剩下的头发（据说是红色的）看来浓密厚实，仿佛自带光环。他从未改掉口音，衣着邋遢，鞋子也通常是磨坏的。这位革命家对物质享受不感兴趣。他的私人物品主要是党的装备和宣传册。但他非常自信，总是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内务部上司的判断。（从莫斯科的视角来看，这就像他在私藏情报及其来源。在情报界，这类似于爱上特工下属之罪，往往意味着组织者对特工和对任务一样重视。）他的行动判断绝非完美，但对一个外行来说已经够好。他孩童时期便加入的政党可是历史上最擅玩弄阴谋的政党之一，这培养了他对密谋策划的天然直觉。他还培养了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也颇擅于跟女士们周旋。（1920年代，有一次在苏联休假期间，一位情妇甚至称他是“俄罗斯最性感的男人”。¹³）持有美国公民身份，又对纽约了如指掌，则是额外的巨大优势。

最重要的是，戈洛斯是个真正的信仰者。他整个一生都在高举共产主义终将胜利的火炬，坚信那会为工人阶级开启一片天堂乐土。虽然其人颇擅弄权，但他真诚的革命热情往往会凸显出来，这提高了他招募间谍和与之合作的效率。他是那种能够招揽外国人，动员他们为他窃取机密的人。虽然很难把戈洛斯与海明威遇到过的其他共产党员相比，但他的独立和真诚却多少有点像雷格勒，也就是作家海明威会喜欢和信任的那种人。

1932年，戈洛斯成为世界旅游公司（World Tourists Inc.）的总经理，那是美国共产主义阵线的雏形。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旅行社，

推广它的主要旅行目的地苏联，但它的主要性质却是苏联情报界的辅助机构。起初内务部希望戈洛斯为它的特工采购如假包换的美国护照，他为此招募了一位身负赌债的美国护照职员，内务部可以利用他的赌债做文章。日久年深，戈洛斯承担了更多的行动任务，负责招募和运作间谍，甚至还承担起审查所有并非由他招募的新任美国间谍的责任。¹⁴

到1930年代末，由斯大林发起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独一无二的后果，使戈洛斯变得几乎无人能够取代。独裁者的清洗对美国情报站的影响跟那些欧洲情报站一样严重；英语流利、经验丰富的内务部官员纷纷以最不足信的借口被召回莫斯科。以斯大林偏执狂的观点看来，见多识广让他们成为高效的间谍，同时也让他们变得可疑，因而内务部清除了很多最优秀的特工，包括来自纽约的情报官员。与此同时，苏联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机密的胃口日增。工作量更大，而人员却减少了。戈洛斯便是剩下的工作人员之一。

他最终担起了三项要求严苛的工作：世界旅游公司的总经理、美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和内务部纽约情报站的支柱。有时他每天要见情报站人员三四次之多（对于秘密关系甚至谨慎关系而言，这样的会面次数高得惊人；冷战期间克格勃规定，与敏感的特工一年会面的次数也就三四次。）在1940年和1941年，据说被戈洛斯培养为秘密关系的美国人在10个到20个之间。他或许不是那种从党的干部中精挑细选出来，继而在莫斯科以外的机构接受培训和评估的专业情报官员，但他比大多数内务部的野心家更了解美国，因而也比他们更加高产。

当时，美国共产党内的美国人日渐增多，党不再需要那么严重地依赖流亡者了。这样的趋势自然意味着机遇。在本土出生的美国党员或同路人有机会渗透到流亡者无法接近的政府机构和行业中。随着这类间谍的人数剧增，也就需要更多的美国人来担任内务部官员和美国间谍的中间人（间谍行话也称之为“保险开关”）。举例来说，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女士如果有大学文凭，那么她去见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不会像如此俄派风格的戈洛斯那么引人注目。

伊丽莎白·本特利就是个这样的美国人，这位姿色平平的瓦萨学院毕业生在战后以“红色间谍女王”的名号出尽风头。本特利在大萧条期间的所见所闻让她良心不安，因而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参加各类会议，和其他同志共事减少了她的孤独感。戈洛斯发现了她的潜力，

逐渐招募她从事“特殊工作”。他把她变成了一个出色的“保险开关”。¹⁵

新闻记者也能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一位著名记者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就能成为一名中间人，同时还能自己收集情报，或找到有潜力的新人。如果众所周知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潜力就更大了。能够到美国境外旅行又是个加分项。海明威符合所有这些条件。在内务部看来，他既是个小说家，又是成就卓著且同情苏联的新闻记者。招募人员会利用存放在莫斯科的海明威档案中的情报，其中记录了他1935年在《新群众》杂志上抨击美国政体以及从西班牙发回的反法西斯/亲苏报道，更不用说1937年6月他在卡内基大厅发表的高调演说了。¹⁶

详细记录目前仍然被锁在莫斯科，但几乎可以肯定，内务部是在1940年10月到12月间决定接近海明威的。1990年代初，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曾在克格勃档案里读到过有关海明威的文本，他猜测说戈洛斯大概在《丧钟为谁而鸣》甫一出版就阅读了这部小说。与那些攻击这本书的教条主义左派分子不同，戈洛斯的目光显然没有停留在海明威对共和军过错的种种描述，而是越过那些，看到了他的间谍潜质。¹⁷或许戈洛斯知道，作家如此重申独立性，会让他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目标。书中还展现了他对发动游击战争的共产主义非正规军的赞赏。内务部甚至可能还知道他曾在雷格勒的书中为苏德条约辩护；在1940年秋发表的该书书评中，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干部处注意到，海明威为该书撰写了序言。¹⁸他仍然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斗士，且为此原因，仍然是亲苏的。他甚至愿意无视斯大林的罪行，反而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由此可见，海明威在诸多方面有着苏联想要的一切特质。

西方世界没有人知道是谁介绍戈洛斯和海明威认识的，但他们有不少共同的熟人。乔·诺思这位总是笑脸相迎的纽约共产主义者就曾为戈洛斯锁定其他潜在的新人。¹⁹诺思和海明威的人生轨迹已经不止一次有过交叉：他曾在1935年说服海明威为《新群众》写那篇文章，两人在西班牙又共同经历过激动人心的时刻。内战以后，诺思写了一部书赞美那些在亚伯拉罕·林肯营服役的美国反法西斯斗士，海明威为该书写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序言。²⁰他们上一次见面是1940年夏天，诺思在古巴报道一次西班牙难民大会。重逢给两人都带来了意外的喜

悦。海明威邀请诺思来哈瓦那旧城内他常光顾的佛罗里达酒吧跟他聚会，两位老兵舒服地坐在缓慢转动的吊扇下，聊了好几个小时。²¹

中间人也有可能是某位美国共产主义者，比如不怎么成功的小说家约翰·埃尔曼，他是海明威的多年好友，曾长期为美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²²（1926年到1940年，他还是约瑟芬·赫布斯特的丈夫，后者是海明威的好友甚至密友。）根据一份供述，埃尔曼曾从中周旋，至少促成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招募，即身处理想高位的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²³ 最后一个中间人可能是海明威的好友尤里斯·伊文思，这位电影导演在1939到1941年频繁出入纽约，不止一次鼓励海明威见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他曾试图发送一份含义隐晦的两行字的电报，看上去像是在安排一次秘密会面：“给你打电话但你下乡了……他们说（他们）想今天再跟你喝几杯。”²⁴

虽说介绍人是个未解之谜，但我们确切地知道戈洛斯是在1940年底的某个时间见到海明威的，很可能就在他与盖尔霍恩在纽约度蜜月期间。他们见面了，而且戈洛斯的目的是要招募海明威为内务部工作，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具体到他们见面的细节，我们就只能根据戈洛斯的历史和苏联一贯的做法来猜测了。

戈洛斯和中间人都知道，跟陌生电话相比，自我介绍更有希望开启一段秘密关系。中间人或许在巴克莱酒店接上海明威，开车把他送到下东区某个不为人知的小吃店，戈洛斯曾选择在那里跟其他人见面，比如他与本特利见面的第二大道那家安静的小饭馆。小店的装修和菜单都乏善可陈，它或许有一间里屋，或者至少有个安静的角落供他们谈话。光顾小店的工人阶级不大可能认出这位大作家。

中间人很可能把海明威送到那里就离开了，让二人自己相互认识，这是秘密关系的另一个前提。海明威或许点了些喝的东西。两人简短地寒暄，可能聊了聊新出版的那部小说，之后大概各自呈上资格证明，或许都难免夸大了自己的成就。美国人可能谈到了西班牙，声称自己曾是一名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苏联人或许暗示他一直在美国从事重要的特殊工作。戈洛斯或许就反法西斯主题进行了发挥，谈到苏联是阻挡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最后屏障。他几乎肯定恭维了海明威，说作家如果能跟苏联人合作反法西斯，一定能再创辉煌。对戈洛斯这么一位情报工作老手来说，大概不难猜到眼前这位身材魁梧、骄傲自负的美国人喜欢听什么。

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们首次见面前后，戈洛斯或许曾提示内务部的纽约情报站，他们有可能招募另一位著名记者从事间谍工作。考虑到海明威的声望和戈洛斯的经验，这不可能是一时兴起的、“听起来不错”那一类招募。共产国际的某一次行动大概会一时冲动，但内务部针对某个重要目标的行动则不大可能。共产国际也有其秘密，但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创造和扩大宣传，内务部则相反，它是专业的间谍机构。伊文思那样的人制作电影，戈洛斯这类人招募和安排间谍。他对莫斯科的某个总部负责，莫斯科可不喜欢惊喜，通常总是要尽可能地控制事态的方方面面。

如果苏联的间谍头子们按部就班行事，在戈洛斯向海明威提出招募邀约之前，纽约和莫斯科之间可能会发送多封电报就此案例进行讨论。电文中会描述与海明威的初次接触，以及情报站何以认为他有潜力成为一名间谍。莫斯科中心可能会在海明威档案中对相关信息加以总结，其中或许包括奥尔洛夫在西班牙会见海明威的回忆。在合适的时间，莫斯科会准许纽约方面继续其招募尝试。几乎可以肯定，它更希望戈洛斯不要过早地对海明威提出邀约，最好是等到两人熟悉彼此之后。这的确是事实；过程如下：作家先是同意帮助内务部，然后两人做出安排，决定保持联系。

现存且已向研究人员公开的记录表明，戈洛斯向莫斯科汇报了他招募海明威为间谍的工作。那些记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在瓦西里耶夫揭露的秘密档案中，关于海明威档案的一份总结报告。²⁵ 作家档案中的文件可能包括发自纽约的电报，根据那些文件，该总结报告是内部资料，根本不会向苏联保密系统之外的任何人开放阅读。这一事实让它拥有了很高的真实性。

该总结报告的时间可追溯至1948年，它写道：“在（海明威）出发前往中国之前，（戈洛斯）已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招募他加入我们的事业。”在情报语境中，这就意味着海明威接受了与苏联人建立秘密关系的建议。戈洛斯或许明确提到了内务部，又或者他只是谈到了苏联“特工”，这个简称对海明威应该没什么难懂的。提到“意识形态理由”就意味着他认同苏联的政纲（或至少部分认同），且他接受该邀约并非因为钱或者其他任何补偿。这也基本可以排除勒索或胁迫；没有谁会去胁迫一位政治思想一致的人成为新闻谍，何况还是像海明威这样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该秘密档案的记录没有提到戈洛斯有没有为海明威布置具体任务。戈洛斯或许十分高兴，哪怕目前看来海明威只是可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间谍，也就是能利用自己的广泛交际网为内务部服务的人。²⁶这对苏联人来说并不罕见，他们通常会利用一个预备期来测试某一位新招募的特工，看看他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海明威或许觉得他知道苏联人想要什么，鉴于他曾在西班牙跟他们的间谍有所接触，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描述了游击战，还在《第五纵队》中涉猎了反间谍的世界。或许内务部希望他扮演那部戏剧的男主角的角色，也就是秘密警察的一员，就他在酒吧中遇到的相关人士向上峰汇报——只不过现在他要汇报的信息范围远远扩大了，或许还应包括他在工作过程中从权贵那里搜集的情报。

作为一名优秀的招募人员，戈洛斯不可能略过一项任务不提，那就是为与其他人进行秘密会面做出安排。当时他已经因为超负荷工作和健康问题而深感力不从心，无法离家远行。如此一来，内务部该怎么与它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新招募的特工保持联系呢？海明威怎么知道应该信任谁？在一份呈交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戈洛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即内务部必须尝试在中国与海明威见面，或者如果他经由苏联前往中国的话，会面也可以在祖国进行。戈洛斯写道，他已经让海明威准备在美国境外与“我们的人”会面了。作家给了俄国人几张“邮票”，大概是像古巴邮票那种罕见的东西，也知道只有见面时拿出那些邮票的人才是信得过的。戈洛斯最后自信地预言道：“我相信他会与我们合作，并……尽其所能为我们做事。”²⁷

戈洛斯发这封信的邮戳日期是1941年，从若干方面来看，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信中的措辞确认了这样的结论，即早在海明威确定行程（该行程改了好几次）之前，他和戈洛斯就已经建立了某种关系；只有当他们保持着有效关系时，戈洛斯的报告才有意义，因为只有以此为凭，他才能说海明威会与苏联人合作。²⁸ 戈洛斯提到海明威时使用的是真名而非代号，这表明秘密关系刚刚建立不久；内务部直到1941年下半年才为他指定了一个代号，即“阿尔戈”（内务部通常会为招募的间谍指定一个代号。他们往往会选择适合该间谍的代号：受过大学教育的本特利的代号是“才女”，一个收受贿赂的国会议员的代号为“骗子”。内务部内部的某人颇有文学功底，很可能还知道海明威痴迷航海。在希腊神话中，阿尔戈是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出海冒险所乘船只的名字。）在苏联或中国与新招募的特工见面是个好

主意；这会是双方了解彼此而不必担心被调查局发现的好机会，自1939年开始，调查局就已经盯上戈洛斯了。

内务部接下来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收集一本《丧钟为谁而鸣》，1941年1月8日，有人通过邮包从纽约寄了一本给莫斯科。²⁹ 在读到海明威的档案时，瓦西里耶夫断定，在卢比扬卡（Lubyanka）的斯大林亲信们收到了这本书，算是为新招募的海明威建立了完整档案；卢比扬卡是他们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总部，在一座老旧的保险大楼里，楼上是办公室，地下室设有牢房。³⁰ 毕竟要想了解海明威关于反法西斯的看法，那部小说是有用的指南。

乍看之下，海明威被招募的故事显得浮泛无根，虚而不实。记录断断续续，现存的报文和备忘录之间有明显的分歧，所署日期也非常混乱。原件本身尚未开放，只有手写的副本和笔记。如果有内务部档案中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像1980年代调查局公布的传真件那样，整个事件就可信多了。³¹

根据调查局公布的传真文本，读者可以拼接出调查局认为自己所知的关于海明威的一切。故事从一连串简讯、备忘录和批注中一点点浮出水面，所有那些都只供内部阅读，大多是为某个具体的目的而写，如记录某个事件，更新某一早期报告，或请求批准某项行动。那些自然不同于写一个有头有尾、让广大读者看得懂的故事，不过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如此说来，“完整的”调查局档案与“不完整的”内务部档案差别不大，二者都是碎片信息的集合，有些信息还是错误或片面的。然而从碎片中可以看出规律，且正因为有瑕疵，反而让一切更加真实可信了。

这一事实曝光的背景也是一样。谁也编不出这么离奇的故事，也不可能是有谁在玩弄阴谋。³² 1991年苏联崩溃的剧变本身，恰是它当年创建那些秘密部门所力图避免的结局。内务部及其后继的克格勃充当着革命的矛和盾，它们会反过来保护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一旦苏联消失，克格勃的退役人员就像一家突然宣布破产的公司的雇员，而公司存续期间并没有给他们攒够退休金。他们只好自谋出路，面对经济和政治的混乱局面，更不要说公众现在有权公开指责他们了。不管是谁，该如何面对这一局面？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利用？间谍机构通常都是为窃取新机密而存在的，但或许他们还可以出售旧的机密，将出售所得用作退休基金。

兰登书屋（如今的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子公司皇冠出版集团（Crown Publishing Group）看到了商机，为在苏联崩溃后接管克格勃职能的俄罗斯新的对外情报局（SVR，以下简称“外情局”）提出了一份商业计划书。皇冠出版集团为该机构的退休基金提供大笔款项，作为回报，外情局将向皇冠的作者们提供关于克格勃行动的历史信息。这类故事不光是书籍的有趣素材，同时或许还有助于改善克格勃的公共形象，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过去曾为国家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外情局的高级管理层不顾许多克格勃传统派人士的反，满腔热情地同意了这项计划。

每本书至少应有一个俄罗斯研究人员参与，人选须由外情局亲自挑选。该研究人员会梳理克格勃的原始档案，亲手记录，然后利用自己的笔记对调查结果予以总结。在把最终的叙述分享给西方历史学家之前，须将其提交给一个外情局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他们的计划不是分享原始笔记，而只是利用它们撰写总结。只要其身份还没有曝光，谁也无法从那些总结中辨认出任何来源。最终结果并非将秘密和盘托出，而是写一本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光荣历史。³³

最先问世的是一本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传记，1936年到1938年，他担任内务部驻西班牙情报站站长，因此海明威曾于1937年在盖洛德旅馆见过他，苏联秘密警察经常会到那里去奢侈地放松一下。³⁴这本关于奥尔洛夫的书出版于1993年，看上去像是为将来的书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本。它表现了奥尔洛夫其人的复杂性，既没有回避争议，也没有力图掩饰他所从事事业的杀人本质。为取悦怀疑论者，书中还有几页从原始档案中摘取的传真文件。

同一系列中还有一本计划出版的书是关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外情局挑选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作为该书的俄罗斯研究人员。作为一名曾担任克格勃官员的新闻记者，他会以外人无法达到的准确性和深度来理解和总结那些档案。他1993年开始该项目，筛查了堆积成山的关于曾为苏联当过间谍的美国人档案，发现所涉人员数量之多，远超任何人的想象。他往往会把那些文件誊抄一遍，逐字记录下来。工作进度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开始撰写叙述总结提交官方审查，为西方历史学家写书铺平道路。

形势在1995年和1996年发生了变化。皇冠因为缺钱而取消了该出版项目。主张强硬派路线的人再次控制了外情局。他们坚信官方秘密

神圣不可侵犯，也没工夫考虑开放性这类自由主义观念。那些强硬派中有一个人对瓦西里耶夫说，待他们替换了新的管理层之后就“准备收拾他”。³⁵ 瓦西里耶夫觉得这是威胁，就逃到了西方。他后来安排人把他的研究笔记私运出来给他，其中包括他的原始手写笔记以及他抄写的部分海明威档案。

该原始材料从未打算公开，这一事实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海明威学者们现在可以读到关于该作家的原始苏联文件的抄本了，其中有些是在行动还未进行时撰写的。完美的资料来源自然是内务部的整套海明威原始档案，但在外情局于遥远的将来公开档案之前，西方研究人员只能依赖瓦西里耶夫，这位曾经代替我们阅读过那些档案的称职的见证者。³⁶

关于海明威成为间谍一事，是否只有片面之词？历史学家可以依赖不完整但真实的苏联记录，但海明威本人有没有就此事公开发表过任何评论？很可能没有。十年后，在写给最好朋友的信中，他会写到他当年曾在西班牙为苏联人做过“杂活儿”，且内战后一直和“毛子们”保持联系，他们跟他分享了一些秘密——但他没有细说是什么秘密。³⁷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对第三方说起过戈洛斯和内务部，哪怕对盖尔霍恩也没有，盖尔霍恩和他的很多政治观点一致，但在两人的婚姻中仍属于地位较低的一方。³⁸ 他与苏联间谍机构的关系是一个严肃的事业，不可以在喝酒时跟朋友随便聊几句或者付诸文字，不像西班牙内战和他在二战时参与的其他保密性较低的冒险，那些都被他写成了文章。他了解保密的必要，那是高超间谍技艺的基础之一。在艺不压身的海明威看来，从事间谍活动是他的又一项生活技能，这倒也没错。

1941年初，海明威向戈洛斯奉上邮票时，便在与苏联间谍的秘密交易中占据了主动。（邮票是信物，表明拿出它们的男人或女人可以信任，很像其他苏联间谍把果冻盒撕成不规则的两半，能够拿出另一半跟他们手里的那一半对上的，就是他们要找的间谍同事。）普通的日常交易没必要出示这类信物，它们只用于秘密行动。如果一段关系没有秘密可言，作家或接头者完全可以带上一封介绍信，像伊文思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海明威所写的那种。但对秘密关系而言，信物的效果就好得多。它本身没什么出奇的，真正的目的只有发起人知道。

从1938年11月奥尔洛夫听他讲述西班牙内战到1941年1月他跟戈洛斯打交道期间，海明威的变化不大。他反法西斯的决心仍然强烈，就连长期的共产主义者也暗自称奇，或许是因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过真正的战士了。海明威是基于意识形态理由加入的新人——戈洛斯的这一说法没有错，但他不像是坚信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信仰者”。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他“只是”加入了成果斐然的反法西斯队伍，或者至少他认为内务部颇有建树。他知道它是如何训练游击队、在法西斯敌后破坏铁路，并试图以纪律来约束西班牙共和国的。

虽然他跟许多基于意识形态理由加入组织的新人不同，但海明威和其他间谍也有不少共同点。招募过程是由某一事件触发的，该事件要么打破了未来间谍的情感平衡，要么彻底改变了他或她的世界观。对海明威而言，那是1935年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礁岛群的飓风，他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地抨击美国的政体，批判他们显然置一战老兵的生死于不顾，任由几百人惨死在那里。之后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全身心地支持共和国，对情报工作日渐着迷。现在他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他同意成为间谍，是因为保密生活能满足他的某种需要，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冒险令他兴奋异常。许多间谍是因为某种幻灭而有了那种需要的。在海明威这里，他已经尽一切努力与法西斯斗争，却未能让民主国家听从他的建议，尤其是他自己的国家。他现在准备诉诸其他的秘密方式了，就像一个配偶因为无法在婚姻关系中得到完全满足，而同他人开始一段私情（这种事海明威一生中倒是做过不止一次）。

他跟其他间谍的另一个共同点，是想当然地认为日常规则对他不适用。几十年来，海明威一直是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的。在文学中，那与他革命性的写作风格有关。他在1940年以一部伟大的政治小说实现了写作上的突破，此时又在准备新的突破了。他欢欣鼓舞、信心十足，随时准备投身新的冒险。在一封写给麦克利什的妻子埃达的信中，他说写出最优秀的作品，随后又看着自己的作品大卖，让他感觉“好极了”。他多希望“过去那些要去见世面的日子”能有这么多钱。不过他暗想，跨越千山万水前往中国或许会给“一个男人一点发挥作用的空间”。³⁹

海明威一直在政治和战争中寻找那种发挥作用的空间。他喜欢军事装备，也喜欢和士兵们在一起，但他不想加入任何人的军队。他更喜欢与非正规军人，特别是游击队，建立某种松散的联系，那让他觉

得自己参与了行动，却仍然保有随意来去的自由。他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同路人，但他愿意为共产国际制作电影，随后又乐于加入内务部共同与法西斯作战，反法西斯是他最重要的政治热情。

假如海明威在文章中提到与戈洛斯的见面，他或许会承认自己喜欢这位经验丰富的老革命，被他的提议吸引了。海明威同意第二次见面，随后便有了第三次和后面的若干次。最后到1941年1月，美国小说家同意与莫斯科合作。和许多间谍一样，海明威不会使用“招募”一词。虽然他清楚自己跟苏联间谍机构建立了某种秘密关系，他可能把那种关系看作是合作，而非在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之路上迈出了第一步。⁴⁰ 然而“招募”是苏联人使用的词汇。他们相信当海明威同意戈洛斯的提议之时，就是开启了一段他们打算影响和掌控的秘密关系。在他们的概念里，特工当然要服从莫斯科的命令。他会因此从内务部那里获得某种酬劳。酬劳的方式可能是钱，也可能是免于被敲诈的自由，保证家人的安全等。在海明威这里，没有证据表明他除了共同投身反法西斯战斗和对此关系保密之外接受过其他任何回报。但那就够了。

海明威大概不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他对“新政”没有多少好感，而且仍为罗斯福没有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愤怒不已。美国没有为打击希特勒出过什么力，让他很难遏制住自己的失望之情。1940年的一天，他照例阅读每日来信，其中往往会包括一些书迷和评论家的意外来信，其后他回了一封短信，那封信问他，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怎么能在外国买房子并定居在那里。他在电报中写道：如果问他是否打算成为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绝对是（对他的）褻渎”。他认同很多美国革命先辈，但“其中并无贝内迪克特·阿诺德^[1]之流”。⁴¹

司法部会同意他的说法吗？这算是叛国吗？海明威同意为内务部服务是否违反了任何法律？当时的美国间谍法还不完备，或许也不适用。海明威不是政府官员，他无从知晓任何可供泄露给对方的官方机密。他也没有为战时的敌国提供任何援助或慰问。美国没有参战，苏联也不是敌国。珍珠港事件之后两国甚至联手抗敌，直到战争结束。海明威最多可能违反了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FARA*），该法律要求任何人作为某一外国势力的“政治或准政治代理人”都须公开披露。⁴² 这当然包括附属于

某一外国间谍机构；如果当年有人起诉（包括戈洛斯在内的）苏联间谍，也当以该法案为依据。

尽管如此，海明威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与内务部的关系保密。即使在战前，美国官员对极左派都充满怀疑。调查局一直盯着美国共产党，西班牙内战老兵回国之后备受歧视。他本人就曾提交申请，后来存入国务院的海明威档案，其中包括他保证不会卷入西班牙的冲突。⁴³ 他可不想再给那份（或其他任何）档案增加内容，或者让它影响自己的工作。何况他一贯喜欢独立自由。他不止一次高调声称作家绝对不该依附于政府或政党。如他自己所说，那些拥护某一政治事业，为其服务，或信仰它的作家生前或许仍是作家，但他们死后怕会遗臭万年。⁴⁴ 海明威或许曾想象自己为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加入内务部，但他绝不想某一天打开报纸，看到这样的标题赫然在目：“海明威的红色间谍身份曝光。”这是他打算保守一生的秘密。

[1] 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重要军官。阿诺德起初为革命派作战，并且屡立战功，后来却变节投靠英国。他在美国至今仍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第六章 探还是不探：中国和战争的压力

1941年4月的一天，玛莎·盖尔霍恩独自一人来到中国重庆的集市上。她喜欢那里的喧嚣热闹，与之相比，她和海明威暂住的那片城区太乏味了。狭窄的巷子里奏着一曲生动的交响乐——“食物和香料、花香、烤栗子、熏香和鸦片的甜香”混着小贩们“如歌的”叫卖声，他们什么都卖，从木材到棉花到猫铃、小刀和挖耳勺。¹ 她意外地碰到一位高个子的欧洲女人，那个“头戴男式毡帽，长裤外面套着一条印花棉裙”的女人挤到她跟前，问她和海明威想不想见一见周恩来。² 那人让盖尔霍恩第二天跟丈夫一起回到集市，不过在此之前要四处走走逛逛，确保没有人跟踪他们。盖尔霍恩对周恩来一无所知，她问海明威时，他说周是他们自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好友、荷兰共产主义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熟人。他们得去会会他。在盖尔霍恩看来，“接下来的场景跟詹姆斯·邦德一模一样，但詹姆斯·邦德系列问世已是多年以后了”。³

头戴男式毡帽的女人领着这对夫妇来到盖尔霍恩前一天没有走到的巷子深处，那路线像迷宫一样弯弯曲曲的，然后她给两人戴上眼罩，让他们上了一辆人力车。到了目的地，眼罩被摘掉后，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间粉刷一新的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桌旁坐着的那位共产主义领袖将在1949年到1976年担任中国总理，那天他穿一件普通的敞领白衬衫，黑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凉鞋。

海明威和盖尔霍恩1941年的中国之行本可以成为两人的第二次蜜月，事实上她却称之为“超级恐怖之旅”。⁴ 海明威对跟新婚妻子一起去远东之事仍然心情矛盾。在她后来所写的那部还算温厚善意和有趣的回忆录《我和另一个人的游记》（*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中，她会称他为“不情愿的旅伴”，简称“U.C.”。[\[1\]](#)

就算撇开海明威的态度不谈，那也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旅行，早年间他们从据说中立的法国绕道西班牙就常常遇阻，有时还需冒险，这次却远比那时艰难得多。美国还没有参战，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是战火纷飞，就算对海明威这样的名人来说，船票也是一票难求。他们最后只好将就着乘坐一艘服役38年的轮船“梅森尼亚”号（Matsonia）。

这对夫妇早已习惯了跨大西洋航行的舒适惬意，没想到从旧金山到檀香山这一段航程上，太平洋居然波浪滔天。当他们1941年2月初到达夏威夷时，虽然有人列队欢迎，但海明威实在没什么好心情。他愤怒地高喊着他不喜欢脖子上被人挂上花环，要是再有一个用夏威夷语对他说句“你好！”，他就“啐他一脸”。⁵ 和盖尔霍恩一起去珍珠港的军事基地参观也没有让他心情转好。在那个遮风蔽日的热带海湾，他们看到美国的军舰和军机一排排列在那里。海明威对盖尔霍恩说，美国使用的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非常盛行，但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把一切装备和队伍都塞在一处，（可能会）……被彻底消灭。”⁶ 他知道要把损失降到最低，要保护他们免受日本人已经在谋划中的空袭，就要把装备和人分散开来。几周后的5月，他悲愤地表示，从1930年中期他和盖尔霍恩倾尽全力抗击法西斯时起，美国军队就一直在打盹儿，从未清醒过。⁷

行程继续。这对名人夫妇从夏威夷出发，乘坐泛美世界航空公司的波音“飞剪”号飞机跨越太平洋前往中国。那次飞行用了五天时间，先在大洋中的中途岛和威克岛，后来又在关岛和马尼拉岛降落停留，再飞最后一段航程到达香港。⁸ 那是国际航空旅行的全盛期。庞大的水上飞机就像是飞行的休息厅：舒适安逸、设施完备、服务上乘。“飞剪”号着陆补充燃料和新鲜补给时，乘客们可以在风光秀美的瀉湖游泳，或者在更舒服的环境中沐浴、用餐和睡觉。海明威不介意艰难困苦，特别是为他信仰的事业奋战时尤其如此，但他对奢侈享受也一向来者不拒。

2月22日，海明威和盖尔霍恩终于来到中国。那里可是玩弄密谋的绝佳场景。中国已经与日本交战多年，后者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一起组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那场残暴的战争似乎看不到尽头。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也就是原材料和领土——为达此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大批杀戮中国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根本不屑于为杀人找理由。侵略罪行罄竹难书，就连佛朗哥都难

望其项背。如果说，像海明威喜欢写的那样，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民族主义者是杀人犯的话，在中国的日本人简直就是杀人狂。即便如此，在外来威胁下，中国人也只做到了在表面上同仇敌忾。其下暗流汹涌的，是旧制度和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激烈冲突。

旧制度的代表是军阀蒋介石，此人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蒋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在毛泽东和他的副手周恩来的指挥下，共产主义者也拥有自己的军队，规模小得多（纪律也较严明）。双方为警惕地相互对峙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大致跟对付日本人一样多。苏联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都曾在不同时段为蒋介石及其军队提供过支持。有一次，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偶尔在一所中国军校的墙上看到他们间接用图片讲述了此事：那里的墙上并排陈列着罗斯福、张伯伦以及看样子似乎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肖像。⁹ 除此之外，中国境内和周边还有不少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地，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那些欧洲国家至今还坚信他们能在远东控制局面呢。

那些殖民统治地之一，就是英国的海外领土香港，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就是从那里进入中国内地的。1941年初，那里还算是世外桃源。在游记里，盖尔霍恩记录了当时的香港，那时它还远不是战后依山傍海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在它的正中心是山峦起伏的维多利亚岛，名为“山顶”的区域人烟极为稀少，俯瞰着熙熙攘攘的香港市。殖民统治者住在山上奢华的宅邸里，房主的地位越高，房子就越居高临下。山下海边的生活则相去万里。那里的人们住的窝棚简直就像用马口铁皮和木材临时搭建的。周围是喧嚣的闹市，到处拥挤着行人、人力车和自行车。¹⁰

虽然母国已经兵戈扰攘一年有余，日本军队也对殖民地形成了包围圈，但在香港，时间似乎凝滞了。海明威后来为拉尔夫·英格索尔的小报《下午报》报道说，这个城市的饭馆位列全世界最佳，人们还沉迷于和平时期的娱乐，像赛马、板球、英式橄榄球和英式足球等。¹¹ 海明威也贡献了自己的娱乐方式，他把自己的“血腥玛丽”招牌鸡尾酒介绍到当地，还用“远方的趣闻轶事”娱乐他的作家同行们，比如他曾在爱达荷州的一间酒吧里把挪威法西斯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揍了一顿。¹² 还有个夜晚，他和一位海军军官表演了“匕首短剑术”，展示如何不费力气地把一个人斩首。¹³

海明威拿出对英国人一贯的否定态度批评这种超现实氛围，他写道，“危险笼罩此地已经太久，人们都习以为常了”。¹⁴ 这座城市“非常欢愉”，“士气高昂”而“道德低下”，因为漂亮的中国女孩纷纷涌入香港和中国的富翁们泡在一起，按海明威的计算，大概有500个富翁目前住在此地。大作家看似愉快地报道说，英国的官方立场是，如今没有娼妓可管了。

关于英国，海明威还有话要说。他很有兴味地说起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中国将军想知道英国人到底怎么看待中国军队的。¹⁵ 美国作家模仿着曾经跟他聊过此事的英国军官的口吻说：“我们不怎么看好中国人，你知道……强尼（指中国人）还不错，是个好小伙儿……但你知道，他们打仗时一塌糊涂。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人打过仗。”中国军官说了个谜语作为回敬：为什么英国参谋官都戴着单片眼镜？答案是这样他们就可以对他们不懂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海明威的结论是，待日本人进攻殖民地时，驻港英人的下场会“像掉进陷阱的老鼠”。¹⁶ 后来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先知先觉，就和他对驻夏威夷的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样准确无误；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人的确占领了香港——他们偷袭珍珠港之后八小时，便火速攻入香港。

海明威不在乎英国是不是当时跟纳粹德国交战的唯一一个大国。它仍在欧洲为捍卫民主而孤军奋战。根据1939年8月签署的苏德条约，另一个反法西斯大国苏联仍然与德国和平共处，随后在1941年4月，斯大林又签署了第二个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次是跟德国的盟国日本。

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内的很多人看来，这是惊人的背叛之举。当时碰巧在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苏日条约就像“平地一声惊雷”。¹⁷ 当怀特把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海明威和盖尔霍恩时，他们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让他大感诧异。几个月后，海明威在另一篇写给《下午报》的文章中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用曾在西班牙用过的方法来测试第二个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说，他不去管政客们说了什么，而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苏联一直在为中国政府提供对日作战的援助。该援助是否仍未中断？苏联顾问是否仍在中国工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援助仍在继续。¹⁸ 既然如此，谁又能因为斯大林保护自己的东部边境不受打击而对他说道四呢？

海明威没有讨论该条约让双方军队从其他目标中腾出手来的说法。日本人的任务就是在华作战。换句话说，斯大林方便了日本人在华作战。讽刺的是除此之外，海明威在1941年中国之行期间的其他一切言论，目的都是支持中国对抗日本，正如当年在西班牙，他曾倾尽一切心力帮助他们打击法西斯。

虽然海明威在前往东方之初或许是盖尔霍恩“不情愿的旅伴”，但随着旅行继续，他们的角色互换了。盖尔霍恩挑剔又有洁癖，讲究得近乎吹毛求疵，越来越难以忍受中国恶劣的卫生条件和普遍失序。海明威几乎恰恰相反。他觉得没必要每天洗澡或把住的地方布置得一尘不染。一旦事情没有按原计划进行，他那个冒险家自我便跳将出来，反而乐在其中。何况冒险还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就更加好玩儿了。海明威通常很喜欢见到那些对他平等相待的政治领袖。

这对夫妇在重庆逗留了一周多时间，在盖尔霍恩看来，那是“灰暗、混乱、泥泞的”战时陪都。¹⁹ 他们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以及蒋手下的多位将军和官员。这位国民党最高军阀喜欢自称“委员长”，他和蒋夫人（盖尔霍恩觉得她“还是个美人，也是著名的妖妇”）专门招待海明威夫妇在他们的私宅享用午餐，那里让盖尔霍恩想起了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的一处朴素干净的房子。²⁰ 瘦削秃顶的蒋介石身穿一套普通的灰色军装——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lwell）曾因为他的头形怪异而给他起了个外名叫“花生米”。如果不戴假牙，他看上去就像个“防腐的僵尸”。蒋夫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把丈夫对共产党的高声抱怨翻译给他们听，还想方设法对来访者说毛的军队没有为对日作战做出任何重要的贡献。相反，国民党旗下为对抗日军而保留的60个师还要“监视着共产党的一举一动”。

蒋介石注意到，共产党也给美国记者们讲述了动人的故事，仿佛他们才是确保抗战胜利的主力。会面期间，就在蒋夫人准备用美色诱惑海明威时，盖尔霍恩问他们，为什么政府不照顾那些活下来的麻风病人，而让他们沿街乞讨呢？中国第一夫人反唇相讥，说她的同胞比西方人更加人道：中国人不愿意把麻风病人锁起来，让他们脱离社会。还有，她接着说，在盖尔霍恩的祖先还“住在树上，浑身涂满迷彩”时，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伟大的文化。²¹ 盖尔霍恩总结说，“这两位冷血的统治者一点儿也不关心他们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²²

盖尔霍恩认为，蒋氏夫妇与他们的对手周恩来形成了鲜明对比。30年后，盖尔霍恩已经不记得这位共产主义领袖在那个粉刷一新的房间里跟他们谈话的内容了，却仍然记得周给他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们觉得和中国人在一起很自在……我们认为周是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一个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典范的话，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²³ 会面几周之后，海明威形容周恩来是“一个魅力超群、才智过人的人，（他）有力兜售了共产主义的立场”。²⁴

安排这次会面的那个欧洲女人名叫王安娜（Anna Wong），是个嫁给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德国女人。她何以会接近盖尔霍恩，为我们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这是尤里斯·伊文思在千里之外操控的人吗？还是内务部间谍戈洛斯希望安排海明威在中国见面的秘密联络人？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有保留的否定。伊文思很久以前便离开中国，那时他已经回到美国，正四处找工作呢。如果他在中间促成了这次会面，很有可能只是极其随意地建议海明威或王安娜，如果两人碰巧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的话，不妨见上一面。如果戈洛斯推动了见面的安排，则这一事实可能会在海明威的内务部档案中有所反映。然而档案中并没有关于在中国的秘密会面的记录。相反，1948年审查档案的内务部办事员写下的记录是，“在中国没有与‘阿尔戈’（海明威的代号）再次联系”。²⁵ 就算海明威和戈洛斯为了准备在中国与某人秘密会面着实费了一番力气，还定下了接头暗号，最后也没在那里派上用场。

这次与周的会面，更可信的幕后故事是周恩来得知海明威来到重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要知道战时的重庆可是个很难保守秘密的城市。当时王安娜的工作类似于共产党的新闻官，就顺理成章地安排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在听完国民党的观点之后，听听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²⁶ 为了让周恩来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小喽啰的干扰，会面是私下进行的，更像个吹风会，而不是什么秘密联络。盖尔霍恩把它形容为邦德电影的场景并不十分准确。

海明威以新闻记者或政府特使的方式整理了他从蒋氏夫妇和周恩来那里听来的情报：撰写文章、编制报告。这些是当时通行的做法，也反映了他所支持的政策。他为《下午报》所写的报道情绪较为乐观，就像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报道一样。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说蒋介石的军队很重要，因为它在美国准备保卫其太平洋军事基地期间牵制了日本的兵力。²⁷ 他表扬共产党的军队“出色的战斗”作风。他

没有详细讲述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他不想自己的任何言行削弱当前头等大事，也就是打击法西斯。²⁸ 为此目的，他也没有公开发表对英国的负面评价或谈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前景，只是在跟几个朋友或熟人聊天时才说到这些。

仍然悬而未决的有趣问题是：海明威在东方逗留了那么长时间，原本计划的秘密会面怎么取消了？戈洛斯花了那么多精力安排的会面，为什么貌似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期间安排一次会面太困难了。海明威和盖尔霍恩自己都不知道他们下一个小时或者第二天会在哪里；交通和通讯极不可靠。盖尔霍恩的游记中通篇记述着各式各样的失联和危险，还有令人汗毛直竖的飞行或乘船旅行，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不过鉴于海明威夫妇见到了周恩来，这种海明威很难与内务部会面的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了。如果周恩来的人能够找到海明威并进行一次谨慎的会面，内务部在中国的行动人员有无可能如法炮制？海明威本人曾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型苏联军事顾问团有过一次友好的邂逅，他们不可能在没有内务部的监督下进行部署。当班的政委会报告上峰，说来了一位情绪激昂的外国人，让天性内敛的俄国人不得不注意他，因为他自己走上前来，跟其中一个他碰巧认识的军官漫不经心地打招呼：“最近怎么样啊，同志？”²⁹

还有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和许多间谍一样，海明威或许在跟外国势力签约之后便陷入了犹豫，即便他仍然对该政权心怀仰慕。一位研究间谍的心理医生曾称之为“宿醉期”，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几个月后。³⁰ 这有点像买主懊悔：在讨价还价后敲定了一个重要交易，然后又疑心自己是否以划算的价格买到了合适的东西。此时这位买主或许希望能跟卖家保持一点距离，有时干脆希望离后者远一点儿。

在1940年末，海明威还是比较容易说服自己相信跟内务部合作是得体行为的。他因为西班牙而对民主国家大失所望，以及他对苏联人的同情，打消了他的疑虑。《丧钟为谁而鸣》大获成功又让他充满能量。然而成为一名间谍仍然是朝着背离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很少有美国人会理解或原谅有人迈出这一步。海明威喜欢做一个了解内幕的人。建立一段秘密关系，处理各种机密情报，那些可都是令他痴迷的最为“真实的内幕”，给了他一种优越感。³¹ 然而

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他无法把自己了解的人事与他人分享，1941年，他多半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就已经看到极左派在美国是极少数，也非常不受欢迎。他知道他的许多朋友不过就是因为曾在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回国之后便遭到冷眼，就连受伤的老兵也往往受到排斥。1939年后，海明威一再表示愿意支持他们，当忠诚的古斯塔夫·雷格勒在西班牙内战之后无处可去时，是海明威慷慨地解囊相助。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作家能够轻易跨越雷池，毫无心理负担地成为间谍。

另一个解释是，海明威近乎躁狂的冲天干劲让他有点招架不住了。此前四年，他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人生大事，远超大多正常人的负荷：出轨、离婚、再婚；全身心地投入西班牙的失败事业；切断与基韦斯特的联系搬到古巴；写了一部470页的世界文学杰作；到一个未知世界去探访另一场战争。同意为苏联做间谍只是这一长串事件中的一项而已，对大多数被内务部雇用的美国人来说，那可是压力极大的计划。这一切构成了他后来在写给文学友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信中提到的所谓“从1936年到1946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技术压力”。³² 在随后的一封致麦克利什的妻子埃达的信中，他还说这“几十年”来，压力已经让他“不堪重负”了。³³

海明威离开中国时的言行也符合买主懊悔和疲惫的心态。这对新婚夫妇决定分头回国。她还要为《科利尔》做其他工作，就先行出发了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几天后又到了当时是荷兰属地的巴达维亚（Batavia，也就是后来的雅加达），在那里写完了她的报道。她那位“不情愿的旅伴”几乎在她离开的那一刻就开始想念她了，在回国途中写了好几封甜蜜又苦涩的信给她。没有她，在亚洲的旅行渐渐变得乐趣全无。一封来自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的信带来了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去世的消息，更让他陷入了苦闷。他焦虑地发现，作家们“显然正在成群地死去”。³⁴ 他和伍尔夫不熟，但他会想念安德森，1939年和1940年几位作家的相继去世就曾让他心碎，特别是他一度的密友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³⁵ 从香港启程分段向东飞行之后，他变得越来越阴沉暴躁，在水上的长途飞行期间他喝劣质的中国白酒，中途停留时总是对许多仰慕者不耐烦地咆哮。一位同行记者记得他“无礼而易怒”，如果有人问他到中国做什么去了，更会引得他暴跳如雷。³⁶

从5月6日到12日，这位不耐烦的旅人在菲律宾短暂停留，那时它还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这是距离美国本土最远、也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基地，不到一年之后就被日军占领了。在马尼拉，海明威来到G-2（陆军参谋部二部），那是美国的一个军事情报部门。他似乎跟他们分享了自己关于中国战局的印象，很可能还提到了自己关于日本的意图和能力的想法。几天后他在写给盖尔霍恩的信中说，他在马尼拉完成了“好几项G-2的差事”，与那些军官们共事，他们“似乎对（他提供）那些情报心怀感激”。³⁷不过他接着又说他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有限。他在下一行写道：“你和我都必须尽力摆脱眼前这场愚蠢的战争。”最终他们都将不得不投入其中，为赢得即将到来的战争出力，但眼下他们得为自己和他们的“崽子们（原文如此）和母亲还有圣鬼”专注于“写作的营生”了。³⁸

海明威写这封奇怪的信时，心里在想什么呢？他对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态度仍然十分矛盾，那是西班牙内战的后遗症。直到多年以后，他才终于不再因为民主国家无视西班牙共和国，没有早做准备打击法西斯而对它们充满愤恨。然而如今他对苏联似乎也有了一点厌倦的态度。几个月前，在完成了自己的畅销书《丧钟为谁而鸣》，又娶了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士之后，他乐意去冒更多的险。正是在那样的上升期，他接受了内务部的邀约，宣称自己愿意前往一个不熟悉的大陆去探访另一场战争。然而到旅行即将结束时，他开始变得萎靡不振，听上去又好像从西班牙回国之后那样避世离俗，至少过一阵子再重出江湖。

6月中旬，基韦斯特那家“邈邈乔”酒吧的主人，他一起钓鱼的同伴乔·拉塞尔（Joe Russell）突然离世，对他造成了更大的打击。（就算在写给摩根索的正式信件里，海明威也称拉塞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说他因为拉塞尔去世而取消了前往纽约和华盛顿的行程。³⁹）他再次利用这段时间休整康复和集中精力写作，因为不久他又要投入新的冒险：他相信，美国与轴心国之间的战争不久便会打响。无论是谁提出什么严肃要求，需要海明威投入时间和精力，都必须等一段时间，包括希望从这位潜力极大的新手这里有所收获的苏联情报官员。

与此同时，海明威仍然乐意阐述自己的观点，回应政治大人物的专门邀请。1941年6月，他再次来到纽约，接受拉尔夫·英格索尔为自己的日报《下午报》而对他进行的采访。那是一个经典的海明威式访

谈：一些大话，几个有趣的事实，一两个很有见解的观点，再加上很多大而化之的总结。⁴⁰ 他从纽约来到华盛顿，在那里至少与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了短暂的会谈，摩根索仍是他急于讨好的人。⁴¹ 会谈的细节已经无从考据，但可以肯定他对未来局势做了预测并慷慨地提了些建议。⁴²

几周后，海明威给部长写了一封长信。⁴³ 作家就他们上次会面没有谈到的一个话题，也就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摩擦，进行了深入阐述，他认为此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说都不过分。据他判断，内战爆发的风险极大。海明威言辞谦恭有礼，但并不羞于举荐一项政策：“要百分之百地确保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任何形式为内战提供援助。”⁴⁴ 换句话说，如果蒋介石要把枪口转向共产党，美国人应该撤销援助。

严格来讲，海明威在中国并没有从事间谍活动。他没有跟任何人秘密会面，没有谁让渡、偷盗或购买任何国家机密。但他和盖尔霍恩接受了私下谒见，也分享了一些机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利用他向美国公众和政府传达自己的观点，而财政部长也的确在他一从中国归来就会晤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从他那里获得了情况通报。跟1937年和1938年马德里盖洛德旅馆没有多大差别，海明威再次因作为局内人跟高官过从甚密而备感满足。

与摩根索的会面尤其让他高兴。蒋介石或周恩来与摩根索的区别在于，部长愿意倾听海明威的意见而不是给他传达意见。海明威与内务部打交道的部分动机，就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华盛顿方面根本不听从他的建议。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与政客们谈话或许不如间谍活动那样刺激，但对一个已经厌倦了国际阴谋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替代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海明威似乎没有在跟戈洛斯会面之后密切跟进；他现在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也收获了不小的成就感。

为他与摩根索牵线搭桥，从而让海明威除了给苏联人做间谍之外还另有事可做的那个人，本人就是美国政府内部“职位最高”的苏联间谍。⁴⁵ 摩根索的得力助手亨利·迪克特·怀特长期同情共产主义，一直在把保密消息秘密传递给苏联情报部门。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了解这么做的风险很大。从苏联角度来看，怀特的问题在于他不擅于接受指令。他跟海明威一样，是个坚信自己可以也应该按照

自己的外交政策行事的人。他自行决定给苏联人传递什么样的情报，以及如何与他们见面。

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指示他联系海明威，或怀特曾把海明威的资料传递给了苏联人。两人也不大可能怀疑对方与内务部有什么特殊关系。很难想象这两位城府很深的人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彼此交换情报。当怀特请海明威汇报自己的中国之行时，几乎可以肯定他代表的是财政部，而非莫斯科。

更深层意义上的讽刺是，中国之行顺利转变成为与另一个情报部门的关系，其对海明威的意义将远超过他与苏联人的关系。故事要从一个名叫查尔斯·斯威尼（Charles Sweeny）的雇佣兵说起，据说他曾是法国外籍军团的一名军官。自1920年代起，他和海明威就是好友，作家一直乐于接待斯威尼，特别是当有战事发生，他急于以他特有的激情兜售某种疯狂计划时，更是把斯威尼当成绝好的听众。斯威尼吸引的朋友都跟他本人一样，不适合任何特定的模板，这使得他很自然地把海明威介绍给了另一位美国人，美国海军中校小约翰·W. 托马森。

这位骄傲的得克萨斯人身穿笔挺合身的军装，短短的深棕色头发中分，行止庄严姿态完美。他是一战老兵，是1918年在战壕里艰苦作战的英雄。就算在当时喝酒成风的海军，他也算是个酒鬼，与此同时，他还是个颇有成就的素描画家和短篇小说作家。[他的海上故事，尤其是第一部著作《坚韧的刺刀》（*Fix Bayonets*）中收录的那些，正在成为未来几代海军崇拜的经典。]海明威和托马森早已听说过彼此，除了其他联系人外，二人的编辑都是可敬的麦克斯·珀金斯。⁴⁶

1941年夏，托马森在华盛顿海军情报局的“海军主楼”里，那座不起眼的混凝土办公楼是1918年盖起的海军临时总部。⁴⁷ 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那一大片广场上建起了一个杂乱的长方形“临时建筑群”，海军主楼就是其一。由于他们是从宪法大道上的那个门进入海军主楼的，海明威和盖尔霍恩或许没有注意到这座建筑唯一一个救赎的特质：它紧邻反思池而建，林肯曾经面池而立，沉思默想。相反，倒是那里的官僚体制让盖尔霍恩久久难忘；她后来回忆说她和海明威被“召集到那里……回答有关中国的问题”，两人“阴沉地”告诉“桌边的情报官员，这场战争后，共产党将接管中国”。⁴⁸

她说对了大部分，不过当天的气氛并不阴沉。会议的氛围相当积极乐观。托马森很赞赏她的分析头脑，曾带着一点点屈尊对珀金斯说“她看上去还是很独立的”——也就是说，她并不只是“非常聪明体面”的海明威的附属而已。⁴⁹ 总而言之，托马森很高兴终于见到了这位传奇作家，并希望日后有更多的见面机会。他会如愿以偿的。短短几个月后，世界大战的战火就会烧到美国人这里，而两位战士作家托马森和海明威，也将想方设法在加勒比地区共同对抗纳粹。

[1] “Unwilling Companion”，即“不情愿的旅伴”的首字母缩写。

第七章 骗子工厂：一场秘密的陆战

1942年，调查局特工R. G. 莱迪被派到古巴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坐落在优雅的普拉多大道上，普拉多大道连接着港口和国会大厦，是哈瓦那老城和新城的分界线。那条地势渐高的海滨大道两旁种着茂密的月桂树，两条车道中间有大理石凳为之增色。大使馆的所在是用有石柱的宅邸改建的办公处，原是前总统乔斯·米格尔·戈麦斯（Jose ´ Miguel Gomez）在20世纪初为他的家人建造的。

关于莱迪的生平和工作，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在古巴代表调查局，而海明威为此对他憎恶有加。那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们一起玩回力球——有点像壁球，不过用的是硬质球，能以危险的高速在球场上横冲直撞——海明威在向古巴朋友介绍莱迪时，说他是美国的盖世太保。海明威后来说那是开玩笑，但莱迪不信。作家不久再次露出真面目。海明威手下有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年轻美国运动员，名叫温斯顿·盖斯特。有一天哈瓦那警察盯上他，把他带到中央警察局里粗暴殴打。获释后，盖斯特驱车来到瞭望庄园向海明威汇报。

盖斯特的事情激怒了作家。他觉得此事是调查局从中作梗，认为他们是与古巴警察联手，意在针对他海明威。虽然时间早已过了午夜，海明威全然不顾盖斯特还穿着此前去赴宴的燕尾服和黑领带，把他塞进汽车，开车十英里，到了哈瓦那码头区一间朴素的小型公寓。那是美国外交官罗伯特·乔伊斯的家，此人一直在尽力协调调查局与海明威这类业余间谍的工作。乔伊斯打开门，看到通常悠闲随和的盖斯特委屈得快要哭出来了，而海明威“雷轰电怒”，让他平息怒火还真不容易呢。

乔伊斯这位诚实的和事佬只好叫来了莱迪，让他传话给古巴人别再为难盖斯特。在海明威的怒视下，莱迪“神色凝重地听完，”便“沉默地离开了”。乔伊斯的干预解决了眼前的危机，对长期关系却

没有改善。海明威对调查局的态度只会越来越差，这给他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后果。¹

海明威爱上了这个岛国，它距离基韦斯特只有90英里，却因为独特的热带景观、西班牙语腔调和放荡的生活方式而充满异国情调。海明威是在1932年那次惊心动魄的马林鱼垂钓之旅时被这片“深蓝色的大河”（他为古巴海域的墨西哥湾暖流所起的名字）吸引的。² 那年，两周的行程延长到两个月，开启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次爱恋。

墨西哥湾暖流紧邻古巴首都哈瓦那，距离莫罗城堡两百多码^[1]，那是16世纪建造的西班牙式大城堡，守卫着海湾入口。要塞的灯塔看守人可以在望向海面时看到暖流。如果他面朝另一个方向，越过一个小水湾，就能看到哈瓦那老城，看到那些教堂的尖顶，还有从海边开始绵延的粉色、黄色和蓝色联排住宅。国会大厦的穹顶令人过目难忘，据说是世上第三高的建筑。某些人会觉得，如此克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让它看上去不伦不类，跟周边景物也不协调，但或许正因为这样，它恰恰可以提醒人们，北方那个强大的邻国总喜欢保留其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力。

1932年后，海明威屡次返回古巴，通常都是为了去钓鱼。到1930年代末，他早已在这个岛国安家了。1940年，大概就是在他与内务部的招募人戈洛斯见面那段时间，他买下了Finca Vigía，意译为瞭望庄园，此名源于它坐落在哈瓦那郊外几英里的山坡上，远处隐约可以看到海。在瞭望庄园，13公顷的香蕉树、热带灌木丛和随意生长的花园环绕着一个破烂不堪但惹人心痒的单层灰泥宅邸，那是一位加泰罗尼亚建筑师在1886年建造的，通常被粉刷成白色调。一棵木棉古树在前门旁展现出茂密的枝叶，欢迎海明威和他历任妻子、他们的猫狗，尤其是书。大部分房间不久就会变成海明威书房里主图书馆的各个分馆。几乎每个看得见的平面上都高高堆起一沓沓书；到1961年，整座宅子里大约有7500册书。

美国作家喜欢这个岛国为富有侨民提供的多种选择和自由。古巴的生活要比国内更丰富多彩和刺激好玩。规则不同，甚至在很多方面，这里压根儿没有规则。钓鱼当然是最棒的，但是正如海明威对他远在大陆的读者所说，这里还有射击俱乐部，可以对着活鸽子射击，那要比打陶土盘子有趣多了；还有斗鸡，美国许多州已经把它定为非法了；以及古巴棒球，年长的叔叔站在击球位置，每次击中球，就示

意他年轻的侄子替他跑垒。叔侄二人是海明威热情的邻居，住在瞭望庄园对面的村庄圣方济各德保拉，他们是另一个吸引海明威在这里安家的因素。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海明威喜欢古巴凉爽安静的清晨，那是绝佳的写作环境，不亚于他所知的任何其他时间和地点。他喜欢破晓时分起床独自工作，起初是在城中心“两个世界”（Ambos Mundos）旅馆的专门工作室里，那是他初来哈瓦那时最喜欢的比较正规的欧式旅馆；1940年后他就在瞭望庄园那些凉风习习、阳光明媚的房间里工作了。他写作时几乎总有一只猫或一条狗蹑手蹑脚地潜入房间，在他脚下凉爽的黄色花砖上舒展地趴着。

古巴社会也很适合这位在循规蹈矩的芝加哥郊区长大的人，这里比美国社会随意得多。海明威愉快地注意到，男人进城只要穿上鞋子就可以了，就算是最特殊的场合，也只需要一套干净的白衬衫和长裤。美国驻古巴大使斯普鲁尔·布雷登第一次邀请海明威在自己的宅邸参加晚宴时，他发现这位侨居作家没有任何“赴宴服装”，不得不从朋友那里借来夹克和长袖衬衫。³（夹克还算合身，衬衫就没那么走运了，海明威不得不把黑色领带往上系一些，才能合上领口。）

布雷登称古巴的治理方式是“强盗行径”。⁴和许多曾经做过殖民地的国家一样，一小撮腐败的统治阶级过着舒适的特权生活，与下层社会壁垒分明，他们对此安之若素，甚至还冷漠残暴地剥削后者。海明威总说他反对右翼的古巴独裁制度，却又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游刃有余。他既能享受精英俱乐部的会员待遇，又能跟靠双手劳动的人你来我往。要是他们还有一项他看重的技能——通常是与钓鱼、划船或射击有关的技能，他就更乐意跟他们交朋友了。

海明威在造访中国之后就来到古巴，回到了岛上生活那令人愉快的节奏中。他看似还保留着多项选择，1941年8月他曾对朋友说，不要试图规划跟海明威一起做任何事，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在近期重返中国甚至前往苏联。⁵这反映出他和盖尔霍恩在1941年夏天的焦躁不安。对于两人来说，最迫在眉睫的问题都是——仍然是——他们将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扮演何种角色。盖尔霍恩仍然渴望到枪林弹雨中去报道那些大事件。海明威还想参与，但他采取了更加观望的态度。

苏联此时也卷入了战火。希特勒在1941年上半年已经准备好了侵略的战争机器。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掩人耳目的巨大工程，但斯大林固执任性地无视许多送上门来的警告。情报之一便来自出色的苏联间

谍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这位德国共产党员是被派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他假装成忠诚的纳粹分子，设法获得了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机密，屡次冒着生命危险把那些消息通过短波通信传递给莫斯科。⁶ 另一个警告来自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因为斯大林毫无反应而备感失望。丘吉尔后来描写苏联领导人“坐等着……恐怖的屠杀逼近俄国。此前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是自私的算计者。这一时期他们简直就是蠢货。若论及裁决者的战略、政策、远见和能力，斯大林和他的政委们在这一时刻证明，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全自投罗网的糊涂虫”。⁷

1941年6月22日，德国陆军和空军开始了对苏联的猛攻。大约145个师在从北到南绵延1000多英里的边境线上展开进攻。苏联那半是沼泽、半是毫无特色的平原的边境，瞬间就从原始的一潭死水变成了第一道防线，原本那里唯一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此时则成了数十万名士兵厮杀搏命的史诗级战场。

斯大林的数次清洗大大破坏了苏联红军的领导层，它对战斗毫无准备，因此德国人在战役的最初几个月节节胜利，不断向东推进（一度让斯大林陷入了紧张症状态，私下里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形势的判断有多糟糕）。1941年的第三和第四季度，超过2993000名红军战士死亡或在战斗中失踪，这还不算被德国人抓到的俘虏，单是战争前几周，俘虏人数就达到了40万。⁸

那年最后几个月，苏联人开始利用刚从远东调集的生力军反击，稳住了紧邻莫斯科以西的防线，为这场凶猛残暴的战争的后面三年半打下了基础。东线无疑是二战中人力和武器最集中的战场。它的规模令大多数其他战场相形见绌，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二战中德军的伤亡有80%~90%发生在这条战线上，也就是说大约有400万名德国士兵死于东线，而据估计苏联士兵的死亡人数达到1100万。⁹

如今再说苏联是首屈一指的反法西斯力量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道理。苏联人似乎是唯一蹈锋饮血、杀敌致果的人，应该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新群众》编辑约瑟夫·弗里曼[此人曾在1920年代与海明威见面，帮助把他的作品介绍给苏联人，他后来写的回忆录《美国的约书》（*American Testament*）出现在基韦斯特海明威家里的书架上]

就是这么想的。不可避免的对决终于发生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制度开始交战，它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的未来：¹⁰

纳粹制度必须被彻底消灭，世界才有可能继续前进，苏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是唯一最有能力对那个制度给予致命一击的。美国应该给红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便它能给我们一切所需的帮助。

当海明威1941年夏天提到有可能前往苏联或重返中国时，他或许在考虑再次从前线发回关于战争的报道。这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背景和他最近期的历史推知的。干吗不顺势继续他和盖尔霍恩已经在中国开始的系列报道呢？

还有一种可能。他或许还记得苏联人仍然想让他到海外从事间谍工作。几个月后的1941年11月，一份来自莫斯科中心的指示命令内务部纽约站“找机会让他（海明威）出国，到我们感兴趣的¹¹国家去”，想必是让他像在中国那样联络精英和收集情报。¹¹ 这条指示隐含着内务部总部的假设，即它的纽约站一直与海明威保持着联络，或者至少存在与他联络的秘密渠道。谁也无法从这样试探性的碎片信息中判断出纽约站是否执行了该指令。然而苏联人的确通过另一种方式联络到了海明威。

德国侵略开始后不久，海明威收到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一封电报，莫洛托夫是战前臭名昭著的苏德条约的设计师之一，这时他热情可亲地邀请海明威访问苏联。莫洛托夫说海明威的书在苏联出售的版税有一大笔卢布，可供海明威旅苏期间随意支配。¹² 由于卢布无法在西方交易，不能汇出或兑换成美元，苏联人无法寄支票给海明威，但可以邀请他们在他们的国家花费这笔钱。

我们很难不对这个提议产生怀疑。这不是体验苏联美好生活的好时机。那个国家的西半部都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无论哪一位苏联官员，一分钟也不会忘记德国的坦克集群正在逼近莫斯科及北部的文化之都列宁格勒。生死决战在即，难道乖戾的强硬派莫洛托夫或者获准代表他的某一位副手真有闲心去关心给一个外国人付版税的事？还是这个邀请其实是把海明威召来莫斯科的借口，以便内务部有时间深入了解他，把他变成一个卓有成效的间谍？苏联人急需朋友和物资。或许他们可以诱导海明威以某种方式向他经常见面的美国大人物说情。

至少，他曾说自己非常赞赏苏联军队，现在可以写一两篇有利于他们的报道。¹³ 这大概不是近乎全能的内务部第一次要求或命令外交部长代表它行动。看到德国人兵临都城之下，或许能让一个尚在观望的反法西斯间谍彻底皈依，就像四年前的保卫马德里之战曾把他推向左派一样。

海明威到底没去苏联。1941年12月7日那个周日的早晨，日本海军的飞机突袭了位于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战舰编队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约2000名美国军人死亡。袭击发生的第二天，战舰残骸上还在冒着黑烟时，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讲话，将12月7日定为历史上的“国耻日”，请求两会联席会议对日宣战。之后发生了多少令人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德国对美国宣战了。美国现在已在三个大洲进入交战状态，战火从地球的一端烧到了另一端。

那年秋天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和儿子们一起，在爱达荷州太阳谷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打猎时光，从广播上听到珍珠港的消息时，他正开车一路南行回古巴，刚刚跨越得克萨斯州的州界。他再次觉得自己的话得到了可怕的印证。他在1941年初参观珍珠港时就曾预言，美国军舰和飞机那样聚集在一处会极易受到攻击，果然一语成谶。四天后，在圣安东尼奥市宽街3617号的帕克汽车旅馆（那是得克萨斯州的第一批汽车旅馆之一），他写信给麦克斯·珀金斯，说“我们无敌海军的神话破灭了”。¹⁴

海明威为灾难开出的短期补救措施很直接：海军部长应在两个小时内被替换，“那些应对瓦胡岛事件负责的人……全都应该枪毙”。¹⁵ [由于美国和苏联体制不同，两位12月7日在珍珠港负责指挥的官员哈斯本·E. 金梅尔 (Husband E. Kimmel) 海军上将和沃尔特·C. 肖特 (Walter C. Short) 将军，倒没有为此送命。但他们另有悲惨结局，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官方调查对他们的能力和荣誉提出了质疑。]

第二天早晨5:45，海明威又开始不依不饶地写信给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 (Charles Scribner)，说因为他们的“懒惰、犯罪般的粗心大意和盲目自大，我们从这场战争的第一天起就被玩了个够，而现在到底还能不能、什么时候能赢得这场战争，还是得永远打下去，还真得到耶稣基督那儿去下一番苦功夫”。¹⁶ 他没有用同样的口气批评过战时的苏联领导层，后者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表现可以说比美国领导人差得多。

相反，到1942年3月他和盖尔霍恩去墨西哥城参观几个斗牛比赛并顺便访友时，他仍然明确表示出对苏联人的肯定态度。¹⁷ 那时，墨西哥是除西班牙外第二个挚爱斗牛的国家。很多墨西哥城市的市中心都有一个斗牛场，围绕着斗牛组织了好几个节日，就像因为海明威的早期大作《太阳照常升起》而举世闻名的潘普洛纳斗牛节一样。墨西哥还是仅有的少数几个欢迎左派政治难民的国家之一。最著名的难民就是斯大林的头号大敌列夫·托洛茨基，他死前的那些年就是在墨西哥城科约阿坎（Coyoacán）区中一个绿树成荫的安静街区度过的，那里距离他的前任情人、著名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住所的天蓝色房子不远。

托洛茨基的房子就远没有那么惬意友好了，它更像个小型的城堡，高墙铁门，还有武警在瞭望塔上俯视着街上发生的一切。托洛茨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内务部爪牙的攻击。本地党员攻击大革命，动用的手段可不光是贴大字报羞辱那么简单。1940年5月，内务部派遣了一整车的墨西哥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戴维·西凯罗斯^[2]，在开车路过时对着托洛茨基住宅的门窗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没有击中托洛茨基，但击中了他的孙子，还劫持了一位保镖，后来又把保镖杀害了。几个月后的8月，一个内务部的暗杀者假装成朋友，用那种登山者携带的冰斧打中托洛茨基的后脑，杀死了他。

海明威从西班牙内战时期以来的密友古斯塔夫·雷格勒住在城南一个名叫阿胡斯科（Ajusco）的不起眼的城区。前政委处境艰难。到此时，他已经公开宣称脱离组织了。“共产党发出了一条密令——‘雷格勒跟我们已经不在一条战线上了，因此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¹⁸ 这引发墨西哥一家报纸刊登恶意漫画，将他描绘成纳粹和托派分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荒谬可笑，但如果能煽动当地共产主义者搞破坏的话，其性质仍然不失为严肃。身份不明的年轻人开始监视雷格勒的住所。大作家来访时，他意识到了威胁的存在，但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只看到了人身危险，”德国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还给我钱，让我去买把左轮手枪”。¹⁹

海明威敦促好友不要理睬报纸上的攻击。或许在一次斗牛之后，海明威、雷格勒和雷格勒的妻子玛丽·路易斯（Marie Louise）一起去坦皮科俱乐部（Tampico Club）喝酒。那个饭馆坐落在墨西哥城的旧城区，周围一圈都是优雅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吸引了很多富人和艺术家光临。喝了几杯后，海明威不再有那么多政治顾忌，就像他当

年在西班牙跟奥尔洛夫一起喝伏特加，热心于共和国事业时一样。一走出俱乐部，海明威就无法控制自己了。他有重要的话要对雷格勒说。他“拍了拍”雷格勒的肩膀，“（把他）一把推到（饭馆的）大理石外墙上”。²⁰

海明威问道，“你为什么离开他们（共产党）？”玛丽·路易斯试图阻止，但海明威不肯松手放开好友，后者仍然因为曾在西班牙受伤、之后又在法国的简陋营地里耽搁而虚弱无力。海明威“陷入了惊人的情感混乱。‘你当年在西班牙为什么信（仰）他们？你知道必须要有一个组织，现在有了。回到他们中间去吧’！”海明威最后总算放开了雷格勒，但他还没说完。他情绪平静了一些，但语气仍然急切，他对雷格勒说，民主国家根本无力对抗纳粹。“美国完了，比法国好不到哪儿去……俄国人是唯一在战斗的。”²¹

在墨西哥的重逢，雷格勒和海明威两人都永生难忘。在1947年2月所写的一封个人风格鲜明的出色信件中，海明威哀叹他非常勇敢的好友在苏德条约签署之时离开了共产党。²² 海明威写道，雷格勒过去对共产主义“就像信徒……信仰宗教”。而1942年在墨西哥，雷格勒就“像一个被解除圣职的神父一样可悲”。他和朋友们说起来，好像内务部的酷刑监狱在西班牙内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对雷格勒来说就是那样。他只关注暴行了，显然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为共和国而战。海明威承认自己知道“我们（强调语气）在西班牙枪杀的人中，有很多死得很冤”，但那只是“整个事业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虽然他承认滥杀无辜，仍一心关注他自己认定的更大的善，即反法西斯斗争，和1936年一样，1942年，这一斗争仍然主要是由苏联推进的。

珍珠港改变了美国的生活。起初，袭击引发了一股排外主义潮流。许多十分诚实和爱国的公民如果碰巧跟日本或德国有联系，便会遭到怀疑或更糟的待遇。在太平洋沿岸各州，数万名日裔美国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被羁押，表面原因是为防范他们犯下叛国或间谍罪。在此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家园和营生。

古巴加入了美国抗击轴心国的战斗，岛国的局面也跟大陆没有多少区别。这里的人也在搜寻企图颠覆国家的敌侨。海明威和盖尔霍恩因为有西班牙内战的经验，自信了解威胁所在。正如盖尔霍恩几个月后写给她在《科利尔》的编辑查尔斯·科尔伯（Charles Colebaugh）的信中所说：“（当地的）西班牙人法西斯秘密社团中，有770个德国

人……30000个西班牙人。”²³ 他们可以组织一个第五纵队，一个秘密的行动人员队伍，颠覆政府。不该过高估计危险，但需要对此谨记在心。别的不说，美国大使就“始终非常担心当地的纳粹活动”。²⁴

盖尔霍恩知道，那些在别的事情上很理智的美国官员对各种离谱的故事听风就是雨，也总是会把这类故事上报给华盛顿。许多，或者说大多数这类报道都是八卦或谣言。例如，早在1939年9月，驻哈瓦那大使馆就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地西班牙商人中或许绝大多数都有亲希特勒情绪……不过（那些人）谨慎地不流露出真实情感”，这一定会让华盛顿的读者好奇，别人又怎么会知道那些“真情实感”是什么。²⁵ 另一个不得要领的报道是由调查局的一个秘密线人提供的，它被发到了华盛顿，在调查局和国务院的高层间传送，其中包括什么一个不知姓名、长着龅牙的意大利老绅士在“利卡”号（Recca）轮船上工作，他去探望一个名叫霍普的青年，给他带了一些山楂和其他新鲜水果之类的信息。²⁶ 很难解释这到底有什么值得怀疑或报告的。

与此同时，哈瓦那大使馆注意到了海明威，这位反法西斯斗士对该城市了如指掌，似乎也对神秘的情报技艺谙熟于心。海军武官、海军陆战队上校海恩·D. 博伊登向华盛顿汇报说，海明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碰到法西斯，都不怕与他们对峙。举例来说，有个案例事关一个名叫迈克尔·菲佛（Michael Pfeiffer）的人，他是“最招人讨厌又大放厥词的希特勒政权支持者之一……（他）不分场合地大发牢骚……（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害怕挨揍，他大概早就因为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资格问题跟欧内斯特·海明威拔拳相见了”。²⁷

大使馆内另一个与作家海明威维持着交情的人是耶鲁大学背景的外交官罗伯特·P. 乔伊斯。从官方照片上看，乔伊斯像个聪明人，或许还像个知识分子，是东岸社会精英的一员。他身穿讲究的深蓝色细条纹西装，带着一丝傲慢的眼神盯着照相机。所附照片上他的妻子简冷静、优雅、大方，看上去像是这个年轻人仕途道路上的完美补充。

海明威和乔伊斯的关系一开始并不好。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春夏之交，乔伊斯觉得海明威带着“一种轻微但还算客气的敌意，对未来再次见面根本没有兴趣。我很快发现，这种态度是他跟文职政府官员和一般当局打交道时一以贯之的反感和怀疑立场。（但）……

欧内斯特不久就知道，我是个不怎么守规矩、低效而缺乏热情的官僚”。²⁸

事实上，乔伊斯其人颇有些官僚手段，只不过他不是那种被规则束手束脚的人罢了。他的生活态度让两个人有可能成为朋友。乔伊斯成了瞭望庄园的常客，他和简常常是周日下午唯一在那里吃晚餐的客人，会跟海明威和盖尔霍恩边喝酒边聊天，一直待到热带的深夜才驱车回家。乔伊斯虽然“一点儿也不喜欢海明威热爱的那些户外活动……和平时打猎，战争期间杀人”，他们在一起却觉得非常自在。²⁹ 海明威以缓和的语气说出自己更加极端的观点，如此一来，两人会共同憎恶乔伊斯所谓的“希特勒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小资产阶级的从众”。³⁰

大概是在1942年初，作家首次告诉乔伊斯说他，海明威，可以在哈瓦那建立一个反间谍局，以自己的方式为战争做贡献。该局成员可以监视实际存在和潜在的轴心国同情者，就是盖尔霍恩写到的那些德国人和西班牙人。海明威解释说他1937年在马德里跟共和国反间谍机构共事时，学到了必要的技能。（他的戏剧《第五纵队》中暗示了他在西班牙发现法西斯间谍的能力。）他说他甚至愿意自己出资，在古巴进行类似的尝试。³¹

这个想法与为苏联人做间谍截然不同。海明威没有结束与苏联人的关系，但至少在那段时间，他想把时间投入到另一种情报行动中，一种他自己发起和控制的行动。在他的整个间谍生涯中，他始终希望能掌控局面。

海明威的想法值得跟乔伊斯的上司讨论一下，那是大使馆的另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斯普鲁尔·布雷登。布雷登大使有着那种海明威理解的气场；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年轻时曾是游泳和拳击高手。他仍然动作敏捷，从他充满活力又姿态优雅的探戈舞中，“根本看不出他有260磅”。³² 1942年夏天，大使同意在佛罗里达饭店见面，这彰显了他的灵活性。海明威常去的位于市中心的佛罗里蒂达，也就是常客们喜欢叫作“小佛罗里达”的地方，对大多数外交官来说太随意了。泥灰外墙通常刷成淡粉色；内墙主要是黑白瓷砖，长长的黄褐色吧台安置在一面大镜子前，四周有木制的廊柱围着。临街的入口有11个之多，客人们进进出出，方便海明威邀请某个激怒了他的人出去打一架。后来，侍者们就开始穿上稍带滑稽风格的红外套了。

虽然布雷登很谨慎地与海明威保持一定的距离，两人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海明威后来请大使跟他一起打拳击，年纪稍长的大使拒绝了，但握了握作家的双臂，发现它们“和普通人的大腿一样粗，像岩石一样坚硬”。³³）不过布雷登非常欣赏组建一个业余反间谍局的想法，以至于他后来声称那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当布雷登意识到海明威“与（哈瓦那的）三教九流都很熟络”，而大使馆可以利用他的朋友圈时，他有了他自己所谓的“一条妙计”。³⁴ 1942年8月，大使对他的手下说了自己想要招募海明威为之服务的计划。³⁵ 监视敌侨的行动事实上属于调查局的职权范围，它在大使馆派驻了几名特工，然而这样一来，法律参事办公室有几个月就要面临人手不足了。就在这时，海明威出现了。布雷登在大使馆召见作家时，宣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些西班牙人必须受到监视”，并请海明威来扛下这副担子。小说家兼间谍大师欣然同意，并着手组建他后来所谓的“骗子工厂”——大使馆为反间谍行动使用的官僚术语是“刑事部门”，海明威则称之为“骗子工厂”。

作为骗子工厂的头目，海明威向乔伊斯汇报工作，布雷登已为后者设置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职位：大使馆的情报处长。这就意味着这位不幸的外交官要陷入陆军、海军以及海明威和调查局多方的地盘之争。³⁶ 美国政府中似乎没有谁擅于协调；各个部门和机构各自为政简直臭名昭著，他们最擅长的是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布雷登的判断是准确的，海明威的确有能力动员大使记忆中的“一个奇怪群体……包括调酒师；……码头小偷；……潦倒的回力球球员和前斗牛士；……巴斯克神父；各式各样的流亡贵族；好几个（西班牙）亲共和国分子”。³⁷ 骗子工厂的成员总共有20到25人，少数几个是全职线人，其他都是兼职。1942年9月起，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开始了工作，每个月的预算大概是500美元。³⁸

乔伊斯喜欢讲述一个“富家花花公子”的故事，海明威为后者指定的代号是R-42，并把他派到距离哈瓦那30英里的马里埃尔（Mariel）去执行任务。海明威跟乔伊斯说他“让R-42在当地的一家妓院过夜，那是马里埃尔最好的住处了。那里既干净，供应的饭食又可口。老鸨是个退休的哈瓦那妓女；是我的朋友，一个很好的女人。（没任务时，为了消磨时间）我给了他一本（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3]让他读”。³⁹ 当乔伊斯问他这名特工怎么看待那部19世

纪的法国畅销书，其中把耶稣描写成一个普通的人而非神时，海明威回答说：“鲍勃，R-42对那本书可着迷了，看到一半他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了最后一章……想看看结局到底如何。”⁴⁰

如果只关注骗子工厂古怪的各色人物或把R-42写成一个富家花花公子——几乎可以肯定他就是海明威忠实而卓有成效的助手温斯顿·盖斯特——就太小瞧他们了。的确，海明威把一群三教九流的朋友都召来为他工作。的确，骗子工厂不是个专业的反间谍机构，并非通过监视或渗透，以系统的方式立案侦察。他们没有任何寻找目标的方针，特工们并不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是在实际看到时才会模糊地若有所思：或许某个外国商人站在佛罗里蒂达的弧形长吧台那儿问了太多关于海港轮船的问题，又或者某个打着黑色领带的社交名流在某个深夜晚餐会上对温斯顿·盖斯特说在这场战争中轴心国必胜。当特工们有事汇报时，他们会设法出城来到瞭望庄园，在海明威的书橱中间或那间50英尺长的客厅里柔软的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用随意夹杂的西班牙语和英语交谈。酒似乎永远喝不完，“参谋会议”往往一直延续到凌晨。

海明威的领导风格或许不合常规，但非常有效。他激励自己的工作团队以忠诚和热情投入工作。就算在酒后，海明威也要求特工关注细节，汇报完整。会后，他大概会整夜不睡奋笔疾书，写作和编辑报告，天亮后驱车12英里从瞭望庄园来到大使馆。他放着普拉多大道街面上那个头顶国徽的前门不走，更喜欢经由一个私密的侧门进入，把自己的工作所获交给乔伊斯。乔伊斯对海明威的勤奋非常景仰，直到战后，他还记得作家“提交了一大堆报告”。⁴¹

毫不奇怪，调查局对骗子工厂的工作不以为然；莱迪向华盛顿报告说它的工作成果毫无价值。⁴² 然而大使馆中最重要的顾客——大使本人——却觉得它们至少跟他桌上的其他报告一样有用。1942年11月，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说海明威“正在收集关于西班牙人活动的情报……（情报）准确、进行了精心核查和复查，事实证明很有价值”。⁴³ 换句话说，虽然骗子工厂没有发现任何法西斯间谍或让大使得以改变古巴的力量平衡，却的确报告了一个他感兴趣的课题。

乔伊斯和布雷登通常偏袒海明威的事实并未改善他与调查局的关系。当乔伊斯宣布大使馆计划使用海明威的服务时，莱迪“对乔伊斯先生指出，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海明威先生与调查局诸位代表的关系问

题”。⁴⁴莱迪记得海明威曾经在1940年签署过一封谴责调查局的公开信，因为他们以违反《中立法》（*Neutrality Act*）为由，在底特律逮捕了支持西班牙内战的活动家。为此原因，海明威“被指控同情共产主义，不过我们获知，他否认了且（继续）……坚决否认跟共产党有任何从属关系或对其有任何同情”。⁴⁵ 还有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回力球比赛上介绍莱迪的方式。乔伊斯试图向莱迪保证海明威没有针对调查局；作家总是在签署一个又一个请愿书，根本不管上面写了什么，而他把调查局比作盖世太保纯属开玩笑。⁴⁶

乔伊斯知道这并非实情。乔伊斯和海明威都在为影响听众，也为手头的工作以自己的方式阐释讯息。事实上正如乔伊斯后来所写的，“欧内斯特（通常）会对调查局及其工作和人员报以强烈的敌意”。⁴⁷ 一个原因是，他显然认为由于很多调查局特工碰巧是罗马天主教徒，他们一定是弗朗哥的同情者。他喜欢把调查局称作“弗朗哥的混账爱尔兰人”或“弗朗哥的铁骑士”。用乔伊斯的话说，海明威认为调查局“对战时复杂情报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在他看来，他们是一群没有海外经验的“头脑简单的拙劣警察”。他觉得他们非常业余，而因为有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他才是专业人士。⁴⁸

海明威指责调查局无力处理复杂情报就大错特错了。脱密公开的调查局记录显示了该机构对于他侵占该局地盘的微妙反应。至少有一名特工认为调查局应该与业余的海明威对峙，揭开他“冒牌货”的面具，J. 埃德加·胡佛本人介入，确保调查局谨慎行事。一方面，局长让他驻哈瓦那的代表“婉转地与布雷登大使讨论”让像海明威这样一个连政府官员都不是的人参与谍报工作的“弊端”。⁴⁹ 另一方面，胡佛又不想施加压力，因为海明威不但能获得大使的信任，在白宫也有些关系。（总统本人曾对胡佛说起过，海明威提议美国帮助被羁押在古巴的欧洲人，其中大多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而海明威也多次对哈瓦那的一名特工宣称，“调查局最好跟他搞好关系，因为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大着呢。”⁵⁰）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局长对于招募这位作家的态度。在胡佛看来，海明威是“最不适合……担任任何这类职责的人。他的判断力（可）不怎么好”，而他酗酒的记录则让他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变得更为“可疑”。⁵¹

海明威对情报工作的兴趣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他的间谍冒险则很短命。一种狂热情绪可能几周或几个月之后又会另有所好。骗子工厂

就是一例。不久，作家就准备进入另一场冒险了。乔伊斯猜想这是因为海明威开始忧虑骗子工厂占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由于这位业余间谍不想全然不顾创作，他开始想办法为自己的组织另找新的领导人。⁵²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海明威对乔伊斯说，他想把行动转给一个名叫古斯塔沃·杜兰的西班牙人负责，后者曾“和他（海明威）一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共和国一方从事情报工作”。⁵³ 杜兰是另一位时时出现在作家生命中的杰出人士。他有着棱角分明的英俊相貌，还多才多艺。用海明威的话说，杜兰是“拿破仑那种百年一见的军事和情报天才”。⁵⁴ 他最初是一位同情左翼的作曲家和艺术经理人。1936年，杜兰全身心地投入西班牙共和国事业。虽然他基本上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但凭借着直觉的战斗天赋，他升任师长，还曾短期担任过军事情报处（SIM）处长，主要受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指挥，也就是1937年与海明威交好的内务部头目。战后杜兰设法来到英国，在那里娶了美国名媛邦蒂·克朗普顿（Bontie Crompton）。⁵⁵ 大约就在这时，海明威把杜兰写进了《丧钟为谁而鸣》，他在其中以一位“好极了的将军”的形象出现，也就是好友罗伯特·乔丹在完成了炸桥任务之后渴望在盖洛德旅馆见到的人。

应海明威的请求，乔伊斯安排杜兰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好让他来古巴接管骗子工厂。⁵⁶ 到1942年秋，杜兰已经来到古巴，大部分时间都耗在瞭望庄园，处理骗子工厂的日常事务。没过多久他就宣称那些报告“都是些没有意义的琐碎信息”。⁵⁷ 更糟的是，他觉得海明威的那些预防措施——诸如把手枪放在五斗柜的衬衫底下——都是毫无必要的小儿科。⁵⁸ 到那年年底，他便把注意力转向大使馆，把自己变成了使馆的文化参赞和大使的讲演稿撰写人。

杜兰觉得比起管理骗子工厂，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这让海明威怒不可遏。因此海明威再次深夜出现在乔伊斯的门口，发泄他的失望之情。“鲍勃，我想向你报告古斯塔沃是个混蛋，我要解雇他，不让他做骗子工厂的主管了。”⁵⁹ 一段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同时结束的，是一个非同寻常、只在某种意义上有些成效的间谍组织，1942年到1943年的几个月里，它占用了海明威的很多时间和精力。他已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另一种间谍冒险上了，因而还是没有多少时间为苏联人做事。

[1] 约合200米。

[2] 戴维·西凯罗斯 (David Siqueiros, 1896-1974)，墨西哥油画家和壁画家，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也是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3] 《耶稣传》 (Life of Jesus, 1863年) 是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法国哲学家、作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 (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 的著作，该书宣扬种族观念，把种族概念融入神学和耶稣的人性之中，在当时广为流传。

第八章 “皮拉尔”号与海战：我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

1942年12月9日上午11:30，午餐时间，海明威把他的舱式游艇“皮拉尔”号停泊在古巴西北岸翁达湾市（Bahía Honda）附近的科罗拉多礁，登上舰桥高处，朝水面望去。那天天气晴好，海面平静，他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能看到，一缕黑烟从一艘轮船上升起。那艘轮船似乎正在朝他开过来。到中午，它还在几英里远，但通过10倍双筒望远镜望去，他现在可以分辨出它白色船身的右舷侧画着四面红金色的西班牙国旗，认出它是“科米拉斯马奎斯”号（*Marques de Comilla*）远洋班轮。

随后，12:10，他注意到另一艘船，“一条漆成灰色的船”，距离他六到八英里远，这一发现让他心跳加速。¹它看起来像是海岸警卫队快艇，拖着一个又长又矮的像油罐的东西，但它没有烟囱。到12:15，他决定出海查看，便以七节的中速朝西北偏北的方向驶去，对于一艘看似捕鱼而不是加速参与战斗的船只来说，这样的速度正好。

两艘船的距离接近三英里左右时，灰船扭身将舷侧对着“皮拉尔”号，在“皮拉尔”号又长又低的甲板上留下了其潜望塔的影子。“在全然无风的海面上威严地移动着”，²在海明威的朋友、如今在“皮拉尔”号战时巡逻舰上担任大副的温斯顿·盖斯特看来，它身形大得像一艘航空母舰。作家-水手的回答是：“不，沃尔菲，很遗憾它是一艘潜水艇，传话让大家做好准备靠近。”后来他在战后把这一段写进了自己的小说。³

每次船长带着他的舱式游艇和船员们开船越过防波堤进入湾流时，他便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毕竟他们为此训练已久了。他继续朝着可能是潜水艇的船只驶去，“口干舌燥但内心欢喜地”缩短距

离，渴望着一场战斗。⁴ 船员们拿出冲锋枪和手榴弹，把这些武器放在目标看不见的地方。海明威希望把自己的暴力计划隐藏起来；德国人最好只能看到“皮拉尔”号在努力捕鱼，等他们发现它的真实目标，就已经晚了。船身撞到了一条大梭鱼，进一步巩固了它只是一条渔船的印象。⁵

时间缓慢地流过了几分钟。下午1:25，潜水艇改变了航向，开始加速。“皮拉尔”号试图追赶，但目标这时的移动速度已经太快了。15分钟后潜水艇就驶出了他们的视线，把“皮拉尔”号孤身留在海上。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勇士海明威对此事件很失望；他后来写道，他和船员们全都已经准备好进入永恒的“英灵殿”了，“个个高兴得像山羊似的”。⁶

“皮拉尔”号是海明威战时海上冒险的核心所在。他称它为“轮船”，但这艘只有38英尺的船不过是条汽艇而已。它的船身呈黑色，在海里行驶的位置很低，即使在白天也很难被发现。它棱角分明，看上去有点儿像装饰派艺术作品。作家保罗·亨德里克森（Paul Hendrickson）曾写过一本关于“皮拉尔”号的专著，他认为这条船“有些鬼气森森”。⁷ 1942年和1943年，海明威把它用作间谍船，也算恰如其分。

海明威在维勒造船厂（Wheeler Shipyard）的产品目录上看到这条船时，他很喜欢桃心木和冷杉木的设计，当时船就停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东河（East River）岸边。他请船厂改造了基本船型，牺牲了一些舱式游艇的舒适度，增加了渔船的功能性，加了一个小型拖钓发动机、辅助油罐以及铜板内衬的鱼箱。海明威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经过改造，它变成了一条“极其适合钓鱼”的船。⁸它可以在大部分天气下出海，在船身长度的距离内即可转弯追捕一条鱼。它能用不到20加仑的油拖钓半天时间，几秒钟就可加速到16节。虽然功能齐全，它仍然很舒服，适合长期出海，有五个很大的床铺，还有宽敞的甲板。

从海明威把“皮拉尔”号带回基韦斯特起，这条船在海明威的生命中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1935年的大飓风发生前，他花在船上对它进行风浪测试的时间和他待在白石街家中的时间一样多，风暴过后，他正是驾驶着“皮拉尔”号向西北进发，全力救援。在上马泰坎伯礁岛和下马泰坎伯礁岛，他轻松驾驶它穿过砂砾，把它用作浮动的

救济站。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为《新群众》写出了那篇怒不可遏的文章，吸引了莫斯科间谍头子们的注意。⁹

1930年代末，海明威已经驾驶“皮拉尔”号穿越了从佛罗里达到古巴的海峡。在古巴海域，船和船主一起在湾流中安顿下来，连续多日，他会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拖钓深蓝色大海里的大鱼——马林鱼、金枪鱼和剑鱼。很少有什么事会让海明威像驾驶“皮拉尔”号出海那样深深着迷。

相比之下，在骗子工厂工作的诱惑就小多了。骗子工厂是海明威在珍珠港后首次涉足战时工作，虽然听起来非同寻常，但在战争初期，那也不能算是多么荒诞离奇的事。大使馆看到有一个需求，海明威满足了这个需求，并能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主张来行动。然而那个工作并没有他曾经希望的那样刺激或高效。早在骗子工厂全面运作之前，海明威已经找到了一条线索，可以追溯至他和盖尔霍恩1941年6月从中国回国时在华盛顿暂住的那一周。

正是在那时，这对夫妇在华盛顿广场上的老海军办公楼里见到了小约翰·W. 托马森海军中校。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与海明威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和兴趣：战争、文学和艺术，烈酒就更不要说了。海明威和托马森很快就建立了信任。在海明威看来，这位海军军官的话值得一听，是“我交谈过的人中头脑最聪明的”之一。¹⁰ 他们不久便开始寻求合作共事的方式。1942年春，他们开始合作一部文集，题为《战争中的人们：最佳战争故事汇编》（*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该书于那年下半年付梓。¹¹

海明威那年夏天在古巴为《战争中的人们》写了序言，其中毫不掩饰他的爱国豪情。他把这本合编的书题献给儿子们，这是他对扩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他会让美国的年轻人事先体味一下未来的命运。他一开头就口气严峻地写道，“这本书不会告诉你们如何去死，”¹² 但它会讲述很多关于战斗和死去的人们故事。“所以说读过这本书后，你会知道你将要经历的东西不会比前人经历的更糟。”他带着特有的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战士的赞美，挑选出其中写得最好的，那是一篇“必读”的夸张故事，作者是美国共产主义者（以及苏联间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¹³ 这位老中国通曾在香港见过海明威一面，她用华丽的辞藻写到了毛和周的八路军

中那些坚忍的战士，他们中有些只是孩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这场伟大的事业做出任何牺牲。

在这篇序言中，海明威通常对美国领导人的批评态度有所缓和。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轴心国曾经没有事先警告便袭击了苏联。¹⁴ 不过他接着说，他不准备深究谁该为这场灾难负责，只想警示人们不要低估我们的敌人，并提醒读者，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战。他曾在1930年代因为民主国家没有更多支援打击法西斯而毫不留情地批评它们，如今则截然不同，他对美国作战目标的描述堪比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官方稿。美国将为宪法权利和特权而战，“任何想要以任何方式把那些权利和特权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人，必将失败”。

15

海明威现在提议驾驶“皮拉尔”号在海上与敌作战。他乐意成为他所谓的“我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¹⁶ 准确地说，他想要成为托马森和海军情报局的远航特工，唯一一个身负秘密使命在古巴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人。那是个很浪漫的想法，把他对“皮拉尔”号和海洋的热爱融入一场可以写成文章发表在《户外生活》（*Outdoor Life*）杂志上的冒险中[这场冒险后来出现在他死后发表的小说《岛在湾流中》（*Islands in the Stream*）里]。他既可以不离开自己热爱的领海，又可以亲身参与战争，这样的工作要比为苏联人做间谍或为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做反间谍工作更强硬也更冒险。最重要的是，他可以在自己那艘轮船上做名副其实的船长了。

这一独立服役方式的基本概念，是海明威和他的船员们（很多都来自骗子工厂）驾驶“皮拉尔”号在古巴北部沿岸巡航，搜寻德国潜水艇——那种可怕的作战机器已经在大西洋的很多地方击沉了同盟国的船只。¹⁷ 理想的情况是，收到美国海军发来的报告可能有所发现的信号，海明威将把它记入工作流程。随后“皮拉尔”号将开始搜索入侵者，一旦找到，就报告其行踪。¹⁸ 计划的下一部分是由“皮拉尔”号击沉潜水艇，虽然后者的体量（可达到250英尺）、重量（可重达1000吨）和武器装备都要庞大得多，特别是它有10.5厘米甲板炮，只需一击，就能让“皮拉尔”号这艘小船灰飞烟灭。

德国人看到的，只是一条忙着打鱼的渔船。希望敌人能上前来买（或者抢）鲜鱼和淡水。而“皮拉尔”号的船员会准备好用巴祖卡火箭筒、机枪和手榴弹展开进攻。甚至还会有一个炸药包，“一个巨型

引爆装置，形状像个棺材，两端都有把手”。¹⁹ 海明威会雇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回力球员，他们都是在需要时投掷快球的高手，能把手榴弹抛掷在（最好）仍然毫无戒心的潜水艇敞开的舱口。哪怕只有一颗手榴弹在封闭的空间爆炸，结果都会是毁灭性的。如果可以用人力把它推至潜水艇的甲板上，那架令人厌恶的战争机器就彻底玩儿完了。

海明威本人后来也承认，整个行动计划如此荒诞不经，“根本不大可能”，谁也不会相信会发生这种事。²⁰ 那么它后来又如何了呢？

早在欧洲战争于1939年9月开始之时，美国人就开始担心德国潜水艇会出现在自己的领海上了。海明威之类的人是其中最突出的。1939年12月，欧内斯特跟他的弟弟莱斯特提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人，说他“有爵位、有银行账户，还有海军情报任务”。²¹ 这位高大俊朗，穿着讲究，或许还有点傲慢的年轻人就是安东尼·詹金森爵士——只有朋友们会称呼他“托尼”，他是个不错的作家，1940年已经署名出版了两部冒险游记。²²（后来海明威才在背后说托尼“不是块儿当战士的料，还是个糊涂的笨蛋”。²³）既然詹金森正在寻找“喜欢航海，可以导航又愿意冒险之人”²⁴——那无异于一份邀请，听上去跟其他很多战时招募情报人员的要约差不多，对欧内斯特和莱斯特这样的人很有吸引力。（典型的态度大概可以总结如下：“在你同意为我们做事之前，我们无法告诉你具体将做什么，但我们保证这份工作非常刺激。”）计划是让他们在西加勒比海附近航行，寻找“可能的和实际存在的”德国潜艇基地。欧内斯特帮忙为行动提供装备。

欧内斯特有时对比他年轻得多（出生于1915年）的莱斯特非常苛刻，批评起来尖刻严厉，建议也都是发号施令——但这一次，他“简直体贴入微”。²⁵ 他们曾在哈瓦那港拍摄的一张照片上显示着海明威兄弟和盖尔霍恩一起喝啤酒，当时他们正在建造12吨重的木制纵帆船，它看上去很小，最适合白天在陆地附近航行，而不适合穿越加勒比海长途航行。三个人的脸上都浮现着笑容。莱斯特和海明威长得很像，几乎可以做他的替身，但两人的身体语言却明确显示出这里谁说了算。莱斯特欠着欧内斯特的人情，他对此心知肚明——他后来曾写道他对欧内斯特给了他“数千（美元），以及金钱买不来（原文如此）的帮助感激不尽”。²⁶

装备纵帆船用了几天到几周时间，足够两兄弟“一起吃很多次晚餐”，也足够年轻的水手们帮助海明威取悦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科里布纳了。²⁷1940年初他们终于为出海做好了准备，莱斯特和詹金森制定了一条航线，会把“蓝湾”号（*Blue Stream*）带入几乎完全未知的水域。他们驶入安静的海湾和三角湾，在荒僻的海岛上登陆，两个年轻冒险家在那里遇到了走私者、投机商和各种不寻常的人，其中有些显然是从欧洲移居来的。

莱斯特和托尼出海后，欧内斯特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提供些零星的建议和鼓励。²⁸他们返航后，为《读者文摘》写了一篇文章，称他们“发现了纳粹特务、纳粹宣传，（还有）储存的柴油，等着纳粹的袭击者们来补充供给呢”。²⁹那篇文章最后说，他们亲眼看到了“中美洲海岸线附近为德国海军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³⁰

业余间谍们把自己的观察结果汇报给了海军情报局，那些至少是美国这一侧水域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并没有收到很好的反应或评价。海军少将T. J. 威尔金森（T. J. Wilkinson）经过仔细研究后写道，海军情报局（ONI）认为莱斯特没有任何可能收集到任何有用的“海军、水文及任何与破坏有关的情报”。³¹

少将的话只对了一半。托尼和莱斯特的结论的确牵强。德国人从未像两位年轻人说的那样，在加勒比海设立过任何有组织的海岸机构。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德国潜水艇都是由其他潜水艇进行再补给，而不是由海岸上的同情者进行的。然而威尔金森少将应该仁慈一些。他的话听起来仿佛托尼和莱斯特只是边缘的行动人员。事实上他们和欧内斯特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至少从1940年起，驻哈瓦那大使馆就开始跟他们一样担忧了。使团一开始就想了解莱斯特和托尼寻找的目标是什么。1940年7月，海明威从瞭望庄园向自己的母亲汇报说，“这里的美国政府对……（莱斯特的）工作很满意”。³²当初正是因为对间谍的恐惧才使他们成立了骗子工厂，而潜水艇魅影让这种恐惧有增无减。或许德国人把潜水艇上的间谍派上岸了呢？这就是海明威把R-42这类特工派驻在海岸线上，侦察有无潜水艇-海岸活动的目标之一。³³更不要说谣言经久不散，说什么沿岸的轴心国同情者群体为德国海军维护了许多秘密供给站了。³⁴

潜水艇威胁本身绝非编造。1942年初，美国海军或海岸警卫队都没有足够的船只和飞机在航线上巡逻。珍珠港事件后，年轻而好战的德国船长们开始充分利用他们在东岸所谓的“快乐时光”。其战果往往和北大西洋的战事一样丰硕，乐趣可要比后者大得多。他们可以驻扎在海岸航道以东较深的水上，等着一艘货船进入视线便对它发射鱼雷。有时在深夜，目标的背后是像迈阿密这样没有灯光管制的海滨城市，德国人简直就像是同时导演和观看了一场死亡灯光秀。

在较远的南方，局势没有这么恶劣，但在古巴海岸附近也有敌情和沉船事件发生，最高潮时，1942年春天一个月就发生了约15起沉船事件。几乎每天都有红着眼的幸存者在哈瓦那登陆，来到海明威昔日常去的市中心“两个世界”旅馆寻找容身之处，他们身上到处是燃油和糖蜜，那是很多从古巴出发的船只携带的货物。为了应对危机，哈瓦那大使馆想出的解决方案和美国海军在东岸所做的差不多。无力招架的海军曾召集平民水手们驾驶自己的船在大西洋航线上巡逻，注意监视水面上有无潜望镜或潜水艇。他们有任何发现都要报告，但无须打击敌人。这个半官方的动议在1943年第三季度一直在付诸实施，后来被称为“流氓海军”，是“一群杂七杂八的游艇主人和周日水手们，（他们）效率不高，但表现优异，心怀热忱”。³⁵ 开战后一个多月，哈瓦那的大使说他也想建立类似的组织。1942年1月，他写信给华盛顿说“潜水艇威胁……每天都在逼近”。³⁶ 他建议的解决方案是让海军接管某些舱式游艇，装备上一两件武器，把它们转交给古巴人用作巡逻艇。

至于海明威是如何，又是在何时形成了驾驶“皮拉尔”号以这种方式参战这一具体想法的，尚不可知。莱斯特的冒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海明威愿意承认，他弟弟在他所谓“你们的窥探航行”中做得不算太糟。他仍有进步空间，但他正在学习如何从事间谍工作（他使用的确切措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托尼和莱斯特的的工作“越来越不那么小儿科了”）。³⁷ 然而他又对他们没有“与敌人更加硬碰硬的接触”表示“失望”。³⁸ 在海明威看来，完美的任务应该始于谍报，终于歼敌。

1941年6月，约翰·托马森和海明威首次在华盛顿见面时，这一行动构想就开始成形了。海明威对托马森提到了莱斯特的冒险航程，他们讨论了可能的后续行动，这一次是在海军情报局的支持下进行的。

讨论结果是欧内斯特回去让莱斯特“理个发，好好洗把脸”，亲自去跟托马森面谈，还把“蓝湾”号及其船员都归他调遣。³⁹

几乎可以预测，在某一时间点，焦点就从莱斯特变成了海明威。“男爵”——欧内斯特喜欢这么称呼弟弟——最终在首都华盛顿找到了一份战时工作，两年没有重回海上。不过海明威本人倒有一条船可以归海军情报局调遣，托马森和海明威继而开始探索怎样用它来完成这项任务。

布雷登大使或许对这一背景全然无知，他后来声称该计划是在他哈瓦那的办公室里想出的，就像他曾声称骗子工厂是他的创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请海明威为领导骗子工厂的“爱国服务”索要一些补偿。照布雷登的说法，海明威说，“现在我想为所做的一切要点儿回报了”。⁴⁰ 布雷登问他想要什么回报，海明威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说“皮拉尔”号可以发现和击沉潜水艇，最后带着夸张的动作总结道：“只要你给我一个巴祖卡火箭筒让我在潜水艇的侧面打个洞，给我机枪让我杀光甲板上的人，给我手榴弹让我摧毁指挥塔，我自己就可以大干一场。”⁴¹

大使知道海明威想要的是“不按牌理出牌”。⁴² 但既然他已经在骗子工厂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布雷登愿意“放弃……牌理”，就同意了新的提议。海明威感谢大使提供支持，且在行动持续期间，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在“为大使服务”。⁴³ 来自适当人士的高层支持对他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942年春夏之交，大使馆采取了下一步行动，召集约翰·托马森来哈瓦那协商。⁴⁴ 这位海军陆战队军官来到位于普拉多大道上的大使馆办公处，身穿军装，佩戴着各色绶带，彰显着他一战期间在西线的战斗功勋。他和大使一起倾听作家概述他的惊天计划，一边把眼镜缠在黑丝绶带上，一边喝光了至少两大玻璃杯的酒。海明威引譬援类，解释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水面战舰假装成商船或帆船引诱毫无防备的敌人上前，后者一到射程之内就开火。托马森觉得这个计划并非不可能，“就是太疯狂”，最终欧内斯特可能“九死一生”。⁴⁵ 潜水艇只需发射一轮甲板火炮，“皮拉尔”号便化为乌有，船长也将葬身鱼腹。不过托马森承认，如果海明威真的能成功，倒是能大大提振盟军的士气。

这会是一次秘密的美国行动，在古巴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大使馆操作完成。⁴⁶ 海明威将通过大使馆的海军随员、一位名叫海恩·D. 博伊登的海军陆战队上校与大使馆展开合作。博伊登绰号“布谷”或“布谷鸟”（未必真实），看起来是个老练而无所顾忌的飞行员，曾在海地和尼加拉瓜的海军陆战队行动期间驾驶脆弱的飞机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飞行。博伊登的性情更适合飞行而非日常事务，这使得海明威成了两人中关注细节的那个人。他曾对大使馆的情报协调官、他的朋友鲍勃·乔伊斯说，他与上校的业务往来变得有点太“浮皮潦草”，让他觉得不舒服，请乔伊斯制订一个计划，用书面形式将两人各自负责的事务确定下来。⁴⁷

托马森和博伊登最终为海明威准备了军需品和无线电装备，均用于发送报告和发现敌人位置，此外还有一位名叫唐纳德·B. 萨克森（Donald B. Saxon）的海军陆战队准尉，据说他有着“无拘无束的可爱性格”，业余爱好就是酗酒和酒吧斗殴。⁴⁸ 萨克森会帮忙培训船员，然后登上“皮拉尔”号出海，负责维护设备。他们还找了更拙劣不足信的借口，说什么海明威正在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博伊登用官方信纸写了一张“消灾免难”卡让海明威随身携带。那封介绍信迷人地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请读者相信海明威在“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捕猎鱼类物种”期间，将使用官方无线电装备做试验。⁴⁹

海明威知道，该秘密行动能否成功，用他的话说，取决于“出奇制胜的策略和训练有素的船员”。⁵⁰ 他会尽全力保守“皮拉尔”号的秘密（特别是不让敌人获知）并让自己的手下做好战斗准备。冒什么风险和是否对轮船开战都将由他来决定，这正是他喜欢的行动方式。即便如此，为增加“皮拉尔”号的获胜概率，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正如海明威几年后回忆时所说，托马森最终的指示对这次任务进行了总结：“去吧，孩子，上帝保佑，愿上帝怜悯你。我只能保证我们不会处决你，英国人也不会。不过欧内斯特，你一定要随机应变。”⁵¹

1942年夏天，“皮拉尔”号的战争巡航开始了，起初的任务有试性性质，还在当地进行了训练演习。后来随着海明威越来越自信，也接收到了更多的设备，他开始出海去更远的地方。海明威记得有时他们离开哈瓦那，在古巴西北沿岸出海行动，有时又会从康菲茨岛（Cayo Confites）行动，那是老巴哈马海峡东端的一片荒芜的沙地，他的船员在那里搭建了一个临时帐篷。⁵² 1943年9月，他邀请一个人

来瞭望庄园午餐（此人碰巧是调查局的秘密线人），告诉客人说“一般程序”是假装打鱼，在海上巡航12个小时，而后在附近的船坞停靠过夜。⁵³ 海明威指挥的很多次巡航都持续数日，至少有两次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在漫长的航行中，船员们只有彼此相伴，还要忍受着各种恶劣的天气状况。或许是为了着力体现行动的艰难，海明威决定给这次行动取名“无友行动”，这曾是他养过的一只猫（他养过很多只猫）的名字，听来有些不祥。

玛莎·盖尔霍恩对“无友行动”的感情很复杂。她曾赞扬海明威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在他那条“漂浮的沙丁鱼盒子”上为祖国服役。⁵⁴ 然而有时她又说整个行动不过是“皮拉尔”号船长所使的诡计，为的是得到战时紧缺的汽油，以便驾船出海打鱼，与友痛饮。⁵⁵ 他不止一次给人那样的印象，比方说带着他未成年的儿子们一起参与“战争”巡航——1948年，有个朋友要撰写这次行动的历史时，他可没提这件事。⁵⁶ 不过总的来说，海明威对待这次任务是很严肃的，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皮拉尔”号没有近距离遭遇任何潜水艇完全是战时的好运气，不少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长们也在海上服役，勤勤恳恳地巡航，也没有机会主动与敌交战。但那也是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关于“无友行动”，我们所知的情况大多来自海明威本人、他后来对家人和朋友所说的，以及可以从他记录的航行日志中收集到的内容。航行日志写在一本旧的病史记录本上，不知谁把它带上了“皮拉尔”号。在碎片化的条目中间，偶尔穿插着在海上长时间打牌的输赢分数。那些条目读来像是匆匆忙忙写下的，但似乎也是宝贵的时评，都是在所描述事件发生之后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内记录的。1942年12月9日的条目，就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那天他们很可能发现了潜水艇，那是海明威孜孜以求的目标——当然也记录了灰色船只在“皮拉尔”号还没有驶近进攻时就慌忙启航了，海明威有多失望。

海明威并不是这次事件的唯一信息源。他用无线电向哈瓦那报告了12月9日的发现后，美国海军非常重视，把它转发给了海军舰队，并对海明威和他的船员们提出了小小的表扬：⁵⁷

哈瓦那报告潜水艇据信是德国740吨型时间1210到1340地点北纬22.58度西经83.26度X线人为两个可靠的美国人由四名古巴人陪同

布雷登大使更是对他们赞誉有加。他认为海明威对战事做出了重要贡献。“皮拉尔”号1943年夏天最后一次战时巡航后，加勒比海域的潜水艇威胁显然已经减弱，他给海明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为他在陆地和海上所提供的服务表示衷心感谢。大使表扬了水手-间谍不顾“始终存在的危险”，“挺身而出”：⁵⁸

您为这项工作……表现了高超的技艺、明智的判断和坚韧的毅力，机会渺茫也不放弃，忍受了对体力的长期考验。我还知道您个人为此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当前我只能向您的爱国精神和卓越成就致敬，一并献上我个人的钦佩之情和深情厚谊。

海明威几乎立即就回信了，在他个人专用的米色信笺纸，天头用雅致的红色字体印着“古巴，圣方济各德保拉，瞭望庄园”。对他来讲，那封信的辞藻算是华丽了。他说为国效力“只是应尽的义务……不值得表扬”。但能在布雷登手下效力也是为作家带来“极大喜悦”的“荣幸”。⁵⁹

海明威非常珍视布雷登那封信，有一段时间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不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战时为国效力是他应尽的义务。“无友行动”符合海明威的部分道德规范，即他自己这方面必须付出技艺、勇气和毅力。他虽然是行动指挥，却没有任何军衔。正如他在1943年5月写给好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信中所说，他一直在“尽可能地努力低调（工作）……领子上……既没有那个吃鱼的掠食者，也没有任何天空之星^[1]。”——而他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⁶⁰

1944年，海明威在伦敦与莱斯特见面时，身上仍然揣着大使的那封信。他们见面的地点是伦敦市最豪华的酒店之一——多尔切斯特酒店（Dorchester），距离海德公园只有几步路，几乎就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美国大使馆的拐角处。在灯光灰暗、镶嵌着木板的吧台，两人几乎一见面就忙不迭地把第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欧内斯特对弟弟说有个秘密要告诉他，只要他答应“不告诉别人……任何人，你知道的”。⁶¹ 然后欧内斯特伸手到内口袋里拿出了布雷登的信，信封都已经卷角了。读到那封信，莱斯特立即明白了海明威对自己在古巴从事的工作有多满意。⁶²

这样一来，又把内务部置于何地？那可是个记性很好的间谍机构。1943年，很可能在莫斯科中心，内务部中有人记起了作家曾在大

约三年前同意成为间谍，却迄今未曾实现他的潜能。就在“无友行动”逐步结束的同时，一名内务部“工作人员”——想必是一位苏联情报官——在古巴见到了海明威，想摸摸他从事间谍行动的底。⁶³

相关记录仍然非常零碎。很可能这位被派驻哈瓦那的人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问他关于海明威的情况。那个人，或者称之为“工作人员”，或许决定最好跟作家取得联系，而既然他们并没有交易什么重要机密，他便选择了直接的方式。或许这位苏联人决定“大隐隐于市”，干脆像很多其他想要见到作家的朋友和倾慕者一样，打电话到瞭望庄园去找海明威，请他到一家当地的饭馆一起坐坐。或许他向海明威出示了信物——海明威为了让某个接头人证明自己确实来自内务部，于1941年交出的那几张邮票。“工作人员”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两人很可能开始闲聊，苏联人温柔地刺探起海明威最近在做些什么。海明威或许聊起了“皮拉尔”号，那是他1943年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也谈到了战争，或许对那年初苏联在列宁格勒战役中大败纳粹大加赞赏。即便他不想做一名为他们服务的间谍，海明威仍然对苏联人及其反法西斯战功充满钦佩，在他看来，他们抗击法西斯的历史至少应该追溯到1937年的西班牙。⁶⁴

虽然海明威与一位名叫迈克尔·斯特雷特（Michael Straight）的人很可能从未谋面，但两人与内务部打交道的经历却非常相似。如果他们见面交换一下记录，就会意识到，苏联人知道如何对付勉为其难但社会地位较高的美国间谍。斯特雷特最终写了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描写了内务部如何温和但持久地对他施加压力。

斯特雷特是个富裕的美国人，母亲在他生父去世之后嫁给了一个英国人。1935年，他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录取，稀里糊涂地成了一名社会学家，后来又变成共产主义者，最终在1937年当了内务部的间谍。其间的过程包括他曾访问苏联，以及他的朋友、共产主义诗人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为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献出了生命。斯特雷特声称自己离开剑桥之后便对做间谍一事心存疑虑了，那是他的买主懊悔期。他横渡大西洋，利用自己的很多关系在华盛顿的国务院找到了一份工作，满心希望自己已经摆脱了内务部。然而1938年春的一天，当斯特雷特拿起电话，听到一个口音很重的声音说“您在剑桥的朋友问候您”⁶⁵时，一个自称迈克尔·格林的苏联人粉碎了他的希望。格林在附近的一家饭馆里等着斯特雷特，待他们点完了菜，女侍者离开后，便开始交谈。苏联人抱歉自己无法拿出识别信物。他费了

一番功夫才找到斯特雷特，曾有一张素描画被撕成两半，内务部保存的那部分已经丢了（斯特雷特想必保存着与之严丝合缝的另一半）。

这位友好随和的间谍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问及斯特雷特的工作，温和地建议说如果他看到任何有趣的文件，不妨把它们带回家研究一下。斯特雷特说谁也不会把任何重要文件传到他的办公桌上。格林点了点头，没有说下去。晚饭后，格林付了餐费，说他大约一个月后还会打电话来，看看斯特雷特在做些什么。年轻的美国人不想这样，但他又不能背弃剑桥好友，或干脆对那位低调的、并没有提出太多要求的内务部的人说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了。推迟对峙倒是容易些。再说，谁又知道一名间谍能否或如何洗手不干？最终，斯特雷特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格林的出现或许是斯特雷特想要逃避的“一场灾难”，然而正如他所写的，他们“和和气气地分手了”。⁶⁶

斯特雷特与那位自称格林之人的见面，就很像海明威初次在古巴遭遇内务部。两人的会面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苏联工作人员与美国作家并没有制订任何具体的计划。但正如斯特雷特和格林一样，他们分手时相当和气友好。在海明威1944年春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以前，苏联人随时可以再来，继续与他建立关系。内务部的档案明确记录有过第二次会面，暗示如果海明威仍在岛上，本来还会有第三次会面。⁶⁷ 苏联人不准备放弃，他们会另找时间和地点拜访这位同情他们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家。内务部仍然坚信他有潜力可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们需要一些知名的美国人来做间谍。

[1]这里的“吃鱼的掠食者”和“天空之星”分别指美国军队的“鹰章”和“星章”两种军功勋章。

第九章 挺进巴黎：勇猛如野牛

1944年8月，美国和法国军队与死守打开巴黎通道的德国人在法国乡下激战时，海明威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担任了几天非官方的情报处长，朗布依埃是个很小的城市，如果换个角度看，也许会觉得它不过是环绕着首都的古老森林中一片很大的林中空地。作家此时是一位战地记者，他和自己的司机阿奇·佩尔基（Archie Pelkey）正在侦察盟军可能会选择进入巴黎的路线，两人开着吉普车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遇到了一小股法国非正规军，除了两人之外，其他人都赤裸着上身。

那些法国人都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与海明威在西班牙认识的游击队员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跟这位身形魁梧的美国人立场一致，甚至推举他为领袖。他们一起向朗布依埃出发，终于在盟军和德军之间无人区的友军一侧找到了小城，便在一家可爱的乡村旅馆——大猎手旅馆——安顿下来，占了旅馆三十多个房间中的八间。海明威在那里创立了一个“很小但组织良好的总部”，像模像样地把标记有德军位置和危险较小的巡逻路线的大幅地图钉在墙上。¹

这位名义上的战地记者成了指挥，他说着英语、法语和磕磕绊绊的德语，不管说哪种语言都夹杂着脏话。他管理的队伍里包括“情报线人、来自巴黎的难民和德军的逃兵”，因而他有条不紊地搜集情报，撰写报告并传递给盟军情报处。² 为了搜集更多的情报，他还计划在无人区内巡逻。

他本人不止一次随队出去巡逻，在德国人回击的枪林弹雨中穿行。几天后他写信给新情妇玛丽·韦尔什（Mary Welsh）说，“我们某些巡逻的惊险程度不亚于《格林童话》”。³ 海明威忙到了没有时间整理堆在自己睡铺上的武器装备：“四角上各有一个柜子，各国的左轮手枪随意地堆在床上。浴缸里放的全是手榴弹……（洗脸）盆里

都是白兰地酒瓶，床底下贮存着军队配给的威士忌。”⁴ 不管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1943年夏天以后，古巴的战争就开始销声匿迹了。海明威曾希望留在岛上做些有用的事，这一愿望几乎实现了。他既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古巴岛四周海水里的德国潜水艇；也知道至少有一位真正的德国间谍曾来到哈瓦那，把秘密消息发回柏林。然而不管作家和他的同志们有多努力，他们能拿得出手的成果却越来越少了。如今，战争的焦点显然已经转移到大西洋的另一侧。

1942年底，美国将军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涌入西北非，继而向内陆进发，与长期艰苦作战的英国第八集团军连成一线。到1943年春，盟军把大约225000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包围在沿突尼斯海岸线的一小块地方。有爱开玩笑的德国人开始把那里叫作“突尼斯格勒”，让人想起德国人最近在苏联的斯大林格勒遭受的惨败，此时那里的战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5月，汉斯-约根·冯·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大将终于不堪忍受，曾经不可一世的非洲集团军及其附属军队举手投降。现在，西方盟军进入欧洲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

玛莎·盖尔霍恩一直渴望把欧洲的枪声当成前进的号角；她知道加勒比海充其量只是个次要战场。欧洲大陆的战争“消息越来越让人心痒难熬”。⁵ 她几乎没法在古巴澄思虑，安于那里的宁静生活了。于是她在加勒比海四处游历，但能够搜集到的情报大部分都只涉及隐形的威胁：一架B-17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在加勒比海上空尽职巡航，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可以汇报的；或者某个欧洲殖民地的一个安静的港口城市内可能有第五纵队的队员在活动。然而在北非和欧洲报道的，则是决定人类文明未来命运的堪称史诗级的战斗。于是在1943年9月，她离开了海明威和古巴，一个月后横跨大西洋，成为欧洲战场上绝无仅有的几位战地女记者之一。

虽然这一里程碑事件最终将导致她和海明威离婚，但盖尔霍恩决定前往欧洲报道战争本身却并非两人关系的终结。她写了一封封充满爱意的长信发回古巴，详细描述了她的生活和工作，并敦促海明威来这里跟她团聚。⁶ 军事行动的节奏眼看就要加快了；他要尽快赶来才是。海明威固执地拒绝了她，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无友行动”，还力劝她回古巴跟他做伴。她不想答应他的请求，但也没有准备离开他。

盖尔霍恩殚精竭虑，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甚至不惜与美国间谍有所牵连。玛莎旅欧期间见到了鲍勃·乔伊斯，她上次曾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见到过这位叛逆的外交官。如今他人在意大利的巴里，是战情局在当地的基地负责人。和许多人一样，乔伊斯也是为寻找刺激才加入了美国的第一家平民间谍机构。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国务院和驻外事务机构，对他这么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来说，那里的生活太沉闷迂腐了。⁷ 他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威廉·J. 多诺万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下，战情局里有许多全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这个年轻的机构在海外运作一整套情报行动，从搜索敌军情报到进行黑色宣传，甚至包括将蓄意破坏者渗透到敌后。乔伊斯认为这一改变解放了他的天性。因此，他正是盖尔霍恩要找的那种人。他了解海明威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如今也可以提供给海明威一个获准进入战情局的机会。

她明明白白地把家事向他摊牌：她正在记者事业上大踏步前进，而海明威却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当然准备听从“一家之主的吩咐”，但要放弃报道“大事件”的计划又让她感到忧伤。她认为，海明威正在计划着来欧洲做些工作，只是遇到了一些交通，又或许是护照方面的阻力。⁸

乔伊斯听了她的求助，便发电报给战情局总部。他建议自己的上司、世故老道的国际商人惠特尼·谢泼德森（Whitney Shepardson）考虑接近海明威，谢泼德森当时是战情局秘密情报处的处长。乔伊斯想让他招募海明威进入秘密情报处，这是战情局内专门运作经典间谍活动的部门，所谓经典间谍活动，就是与间谍和偷来的机密打交道。

这一消息在战情局内部传播时，军官们感到很为难。中东情报处长、海军少校特纳·麦克怀恩（Turner McWine）想不出，海明威究竟能为这个羽翼未丰的间谍机构做些什么呢？这位作家的盛名和性情会让他很难适应该机构的工作。⁹

大约一个月后，乔伊斯在一封写给谢泼德森的长信中回复了这类担忧。他列举了海明威的优点：他是西班牙问题的权威，他认识的反对弗朗哥的西班牙人“比任何其他美国人”都要多；他在古巴运作过情报行动；还有，自西班牙内战时期起，他获得了许多关于游击战争和特殊行动的第一手知识。面对军事情报处长、陆军少将乔治·V. 斯特朗（George V. Strong）等传统派的质疑，他为海明威辩护。斯特

朗一直是战情局内公开批评海明威的反对派，但他主要都是针对海明威的生活方式和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同情，而与他的能力无关。海明威结过三次婚又有什么关系呢？乔伊斯最后说，海明威是个“极为正直和忠诚”的人，要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或同路人，那概率跟美国大通国家银行行长差不多。乔伊斯再次提议谢泼德森邀请海明威来华盛顿，探讨一下能否在西班牙或意大利给他委派一个合适的任务。¹⁰

战情局总部派人仔细研究了该请求。谢泼德森征求了两位副局长，即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准将和G. 爱德华·巴克斯顿（G. Edward Buxton）的意见。和手下一样，马格鲁德对海明威的性情和政治左倾提出了保留意见，更何况乔伊斯本人还是个“极端聪明但情绪极不稳定的人，要是让他跟海明威合作，大概还会变本加厉”。¹¹ 巴克斯顿则提出，海明威或许更适合去战情局的黑色宣传分支、心理战活动部门（Morale Operations），而非秘密情报处。¹² 于是档案被转给了心理战活动部门，几天后，该部门的领导人得出结论，说就算让他来执行力图挫败敌人锐气、绝非常规的心理战行动任务（例如他们曾分发伪造的德国邮票，上面印着希特勒的骷髅照），海明威的个人主义也是一大障碍。¹³ 没有人认为44岁的海明威适合在战情局的准军事分支内任职，该分支的人员都像游击队员一样在敌后行动，就像海明威（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那种战争适合岁数小得多的年轻人，不是么？最后，谢泼德森在4月给乔伊斯回电报，说战情局“决定不雇用海明威。这一决定或许不智，但我们觉得虽然他无疑明显有能力担任此类工作，但他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不适合在军方监督下工作”。¹⁴

盖尔霍恩-乔伊斯的提议结局如何？乔伊斯有没有向盖尔霍恩通报这一坏消息？如果海明威和盖尔霍恩说起过她接近乔伊斯的事，海明威又做何反应？这些都无从得知。那年4月，盖尔霍恩和乔伊斯就断了联系，因战时审查，他也很难把这个消息写信通知她。那时，盖尔霍恩已经答应了海明威的请求，返回古巴跟他短暂团聚。

挑剔讲究的盖尔霍恩回到家里，发现丈夫比平日酗酒更厉害，也更不讲卫生了。他留着黑白相间的浓密胡子，胡子乱得能让老鼠在里面游戏（至少他自己在写给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的信中是这么说的¹⁵）。他每天喝几杯酒后就睡在地板上，那里到处堆着没有回复的信件。“皮拉尔”号的船员们当然淡然处之，海明威的5条狗和11只猫也不觉得有何不妥，他们可都是越脏乱、越舒服的。家庭内战的戏台搭

起来了。海明威谈论着加勒比海的潜水艇，盖尔霍恩则对欧洲即将到来的大战充满期待。海明威为自己的“无友行动”辩护，盖尔霍恩则攻击它毫无意义。海明威内心深处不是不知道盖尔霍恩说得没错，但他就是不想承认，尤其是对这么一个没有顺从地支持丈夫，而是在战时自己跑出去冒险的女人。把事业放在婚姻前面，可不是一个好妻子所为。¹⁶

哪怕海明威对她愤怒咆哮，甚至半夜把她叫醒，历数她有多疯狂、多任性、多自私，盖尔霍恩仍然没有放弃从盟军情报部门寻求帮助。¹⁷ 在意大利接近鲍勃·乔伊斯和战情局的同时，盖尔霍恩又向另一个朋友求助，请求他帮助海明威离开古巴，参与战争。这一次她利用了自己跟另一位战士-作家-间谍罗尔德·达尔的友谊。他曾是一名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因为在一次撞机事故中受伤，在高空中失去了意识，便无法再飞行了。他的官方头衔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助理空军武官。大多数武官都是穿军装的间谍，负责搜集关于东道国的情报。但达尔还不止于此，他在一个名为英国安全协调局（BSC）的组织还有另一个非官方的职务。该局的职责是影响美国的公众及其领导人——安全协调局希望能让他们支持英国的战争目标，相关任务就包括一些间谍工作，偶尔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士谨慎施压。¹⁸

达尔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写了一些战争小说和儿童幻想作品，其中一部甚至得到了沃特·迪斯尼的关注。达尔身高近两米，加上他颇有异国情调的军装和口音，使他成为华盛顿社交圈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更不要说他的战功和文学成就了。1943年10月，他曾应邀到白宫参加晚宴，在所谓的总统“私人电影院”观看了由《丧钟为谁而鸣》改编的电影。女主人是埃莉诺·罗斯福，达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她“喝了很多鸡尾酒”。同时应邀参加晚宴的宾客之一就是盖尔霍恩，她是“好样的”，“嘴里脏话不断，跟他丈夫书里写的一样多”。¹⁹

几个月后的1944年3月，达尔高兴地看到“马蒂·海明威上周（从）意大利回来了……带回了好多故事”。²⁰ 但她可不是专为讲故事来拜访达尔的。她想知道他能否让海明威横跨大西洋。飞行空间都是留给战事的，极其稀缺。空军武官掌控着乘坐皇家空军（RAF）的飞机飞往英国的旅程，达尔觉得有机会。如果海明威能够成为官方认可的战地记者，从皇家空军的视角来报道战争，他可以给海明威留一个

位置。²¹ 当盖尔霍恩把达尔的提议转告海明威时，他终于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同意了这个提议。盖尔霍恩感激涕零，为达尔“像天使一般鼎力相助”而对他致以无限敬意。²²

海明威不久就从古巴出发来到纽约，仍然炫耀一样地留着他在“无友行动”期间蓄起来的满脸胡子。他在曼哈顿联系了将委派他作为记者前往欧洲报道战事的《科利尔》杂志，还在乐石酒店（Hotel Gladstone）见到了达尔。两人喝着香槟、吃着鱼子酱，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盛鱼子酱那个大罐子足有2.2磅重，像个掏不空的聚宝盆，达尔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什么疯狂的拳击教练一类的”。²³ 启程前往伦敦之前，海明威对盖尔霍恩（撒谎）说英国飞机禁止女人登机，让她一个人乘坐一艘装有炸药的挪威货轮横跨大西洋。

盖尔霍恩虽然成功地让海明威来到了英国，却对他们的婚姻于事无补。一到伦敦，海明威就搬进了位于梅费尔公园路上的多切斯特酒店，那碰巧也是她最喜欢的酒店。酒店相对较新，1931年才开业，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伦敦人认为它既奢华又防弹。它仍然吸引着英国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之类的常客，但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前来寻求安全之所的新贵。（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曾说，在战争期间，它就像是跨大西洋奢华班轮上的一个昂贵的邈邈铺位，连那班轮现在怕也要被征用为运兵船了；在多切斯特酒店这样一个要塞，钱可以买来安全，但无力一直补偿战时的短缺，也无法保证同时用餐的都是极有品位的人。²⁴）

海明威虽然从未到过英国首都，但他在这里惊喜地遇到了一大群各式各样的朋友、家人和熟人，忙得不亦乐乎。1944年春，伦敦是同盟国宇宙的中心。看起来每件事、每个人的焦点都是即将到来的登陆欧洲北部。来自整个自由世界的大批海陆空三军士兵在街道上穿行，有的乘车、有的步行，有的落单、有的成群。好一些的饭馆和会所都被他们的军官占了。大家都预感到将有大事件发生，记者也纷纷涌来报道。海明威的弟弟莱斯特参加了某个军事电影小组，也在伦敦，海明威跟他吹嘘了自己的“无友行动”。盖尔霍恩终于到达伦敦时，海明威却没有时间跟她在一起了。两人的关系变得更糟，他们继续吵个不休，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尖刻无情地嘲讽她。更何况他这时已经被玛丽·韦尔什迷住了，简直雪上加霜。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战地记者玛丽·韦尔什曾与莱斯特共事，常跟他谈起他大哥。她身材娇小，只有

1.58米，一头深褐色头发，留着短短的卷发，笑容可掬。其他战地记者们都觉得她穿上军装和不戴胸罩穿套头衫一样漂亮。玛丽那时已经嫁给了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但她很快就成了海明威的情人。他跟盖尔霍恩离婚后，她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第四任妻子。

这些人中甚至还有几位间谍。其中一位就来自内务部，他正在寻找海明威。两人会面的记录很短，只说一位不具名的行动人员6月在伦敦见到了海明威。苏联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在哪里能找到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经过了一番勤勉调查。又或许上次在哈瓦那见面时，海明威告诉了那里的苏联“工作人员”在哪里找他。（酒店传说，多切斯特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五纵队队员们和各色间谍喜欢光临的地方。²⁵）苏联联络人和海明威或许甚至还商定了某种沟通计划，诸如他会在一周某一天的特定时间出现在某个特定地点。

内务部的档案显示，这次会面和海明威离开哈瓦那之前的那次会面差不多。同样是气氛友好，没有定论，苏联人追问海明威能否加入他们的组织并向其效忠，海明威语气友好，但并未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²⁶

我们与“阿尔戈”在伦敦和哈瓦那的会面的目的都是继续研究和确定他有多大潜力为我们服务。……“阿尔戈”没有给我们任何政治情报（原文如此），但屡次表达了帮助我们的愿望和决心。

过去四年，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位作家仍然对苏联和俄国人抱有同情，认为自始至终，他们都在反纳粹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然而今时不同往日，他自己的国家已经被动员起来加入了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谓的“欧洲的圣战”。美国兑现了自己作为民主兵工厂的承诺，出产了不计其数的轮船、飞机和坦克，把数百万战士武装起来。海明威本人已经骄傲地在陆地和海上为国效力。1944年春，美国陆军正准备在欧洲北部平原上与德国人决一死战。如今有新的、光荣的美国故事值得记录，为战争效力的机会很多，无须加入内务部。

就算盖尔霍恩没再继续跟他说教，海明威也知道，对美国来说，诺曼底登陆日便是欧战的转折点。他请人帮忙，让他尽可能到达距离登陆海滩最近的位置。1944年6月6日，海明威在一艘38英尺长的登陆舰上，眼见着历史在诺曼底附近的海面上一幕幕上演。他身旁和身后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舰队之一：“钻塔林立”的运输轮、像水虫一样“蔓延在海上”的小船，纷纷“向着法国徐徐前行”。²⁷“得克萨斯”号战列舰就在不远处；它的主炮组喷射着火焰，向俯瞰代号“奥马哈”海滩的悬崖上抛射足有小轿车那么大的炮弹。令人吃惊的是，居然还有德国人从轰炸中幸存，人数足够他们对着登陆军回击，在海边打出了一个杀戮区。就在海边陆地上，海明威看到两辆美军坦克被德军击中，火光冲天。

事实证明，奥马哈是盟军在登陆日遭遇的最大的挑战。区域计划在遇敌后未能进行下去，现场一片混乱。大多数被派往海滩的坦克都沉没在近岸水域，步兵小队找不到目标，德国守军待在地势较高的地堡和碉堡内，一直抵抗到上午。约有2000名美国士兵死在激浪中和礁石林立的海滩上。但在第一个24小时之内，许多幸存者设法集结起来，向内陆推进了一两公里。如此一来，他们就在陆地上建起了一个据点，让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能够在6月和7月一路厮杀穿过海滨各省的艰难地形，最终在8月向东挺进塞纳河和巴黎。

诺曼底登陆之后，海明威回到伦敦，总算能跟皇家空军一起飞行了。他虽已大腹便便，但还能把自己塞进一件英国军服，肩章上显示他是一名记者。他甚至在军服外扣上了一件救生衣和一个氧气面罩。6月底，他顶着V-1火箭的“嗡嗡”声飞行了多个架次，那种无人控制的火箭是德国人所谓的复仇武器，目标是英国各个城市。一天下午，海明威搭乘皇家空军的一架“暴风”（Tempest）战斗机，看到一个美国B-25轰炸机中队袭击法国德罗库尔（Droncourt）的发射场。几天后的6月29日，他乘坐皇家空军的蚊式（Mosquito）轰炸机飞越英格兰南岸，这是皇家空军的一种敏捷的木结构战机，执行击落正在飞行的火箭的危险任务。他在空袭过程中研究导航，因为他可不想成为战斗机中的“草包乘客”。他还是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开始喜欢了解空中作战知识，希望能延长与皇家空军在一起的“快乐时光”。²⁸至少在当时，他愿意对国王陛下的政府早在西班牙内战时所实施的政策不计前嫌。

事态并没有按照海明威的个人意愿发展，不久，陆地战争就成为绝对主力，使他不得不放弃了在伦敦的基地。《科利尔》杂志的编辑希望他能报道法国的地面战斗，那里的美国士兵们仍在为把德国人赶出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而鏖战。到7月中旬，他已经获得官方认可，成为美国陆军记者团的一员。一到欧洲大陆，他就会忠于他为自己制定的

战时标准。他有三个目标：为战斗部队做些有用的事、尽可能找到最好的报道素材，以及自己开展作战行动。海明威战时间谍生涯的高潮即将到来。

到达法国后，海明威与第四步兵师的指挥官雷蒙德·O. 巴顿陆军少将成为好友，巴顿将军是一位坚定的职业军人，不说废话，但并不乏味和闭塞。（举例而言，从西点军校时期开始，他在整个职业生涯都容忍了人们给他取的“胖水桶”的绰号。）巴顿愿意给海明威一辆吉普车和一个司机，让他自己去考察诺曼底，司机通常都由阿奇·佩尔基这位来自纽约上州、头发火红的二等兵担任。两人带着地图和双筒望远镜作为装备，手枪和手榴弹作为武器，探索了很大一片地方，像古老的小城维勒迪厄雷波埃勒（Villedieu-les-Poêles，意译为“上帝的平底锅之城”），海明威在那里冷静地观察德军和美军士兵之间的巷战；圣普瓦（St.-Pois）附近迷宫一般的乡间小道和土路，在那里，一次极度精确的德军88毫米反坦克炮伏击差点儿要了他的命；还有奇妙的圣米歇尔山（Mont-St.-Michel）潮汐岛，它那建造于12世纪、足有500英尺高的修道院仍然矗立在一片盐碱地中，遭到伏击之后，海明威在那里休养了几天。²⁹

从一开始，海明威就把他所了解和观察到的情报分享给美国陆军。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巴顿等人觉得有用的，它们可能是海明威从某个法国人那里搜集的，也可能是他自己注意到的。海明威对法国乡下轻车熟路，特别是他在1920年代与第一任妻子和长子一起住在巴黎时骑自行车去过的那些地方。他还很擅于观察哪些地形特点会对战斗产生影响。

巴顿患有溃疡，因为战斗压力大而时有加重。有一次，他一天下来筋疲力尽，需要躺下来休息时，海明威和他一起躺在一条毯子上，轻声谈论起德国人在哪里，“以及他们到底有没有离开，未来情况如何”。³⁰ 当盟军于8月中旬开始逼近巴黎时，巴顿知道第四师有极大的可能性参与解放巴黎这座海明威心爱的城市，因而给了作家一项侦察任务：带上你的吉普车和司机，去通往巴黎的路上探察一下军情吧。³¹

海明威欣然从命，从海边出发一路向东，离开诺曼底那些狭窄的矮树篱，向着沙特尔附近更开阔的地方出发了，那里的景观多是农田，间或有矮树林点缀其中。1944年8月19日，他遇到了两车赤裸上身

的法国游击队员，他们装备着各式各样的危险武器。³² 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组织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rançais, FTPF）的成员，是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中的极左派，“常常被指控缺乏纪律性或过于狂热”。³³

大家立即变得亲密融洽起来。那些法国非正规兵很喜欢这位精力充沛、还会说他们的语言的大个子美国人，很快就开始依附于他了。他也同样高兴把他们拢在麾下。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关系，而是那种在战场上自发形成的依赖。法国人对海明威深深着迷，以至于他们不久就开始学他“水手的熊步……（还和他一样）用各种各样的语言……从嘴角挤出简短的句子”。³⁴ 美国人继续从附近的友军那里白拿缴获的武器，从一辆遭到伏击之后被弃的美国陆军卡车中找来衣服和设备的边角废料来装备他手下的兵。没过多久，战士们就拥有了不错的衣服和武器，开心地在腰部和肩膀周围捆上一圈圈手榴弹。³⁵

海明威带着自己的人马前往朗布依埃，因为横跨从西南方向通往巴黎的道路，那里的战略地位如今变得尤为重要。德国驻军刚刚撤离，小城和敌军没有任何瓜葛，这就给海明威和他的人留下了一片真空地带。他本能地知道自己还需要找出最近的美国军队组织，报告他的行踪和一路所见。因此，1944年8月20日上午，海明威掉头向西驱车几英里，到新解放的沙特尔（Chartres）郊外第五师指挥部的情报处去报到，第五师驻扎在欧洲第三大哥特式教堂周围，它的方塔和高耸的城墙是这座古城和附近麦田中的主要景观。不过那天真正刺激着他们感官的，还是一路上看到的德国人和美国人肿胀的尸体，迄今还没有人有空掩埋那些尸体，让他们入土为安。

在指挥部，作家偶遇了战情局的西欧高级官员戴维·K. E. 布鲁斯。即便只穿着普通的军人战斗服，布鲁斯也一望便知是个领导人：头盔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身上的野战夹克干净整齐，陆军上校的鹰徽十分明显。他目光锐利，表情坦诚亲近，这些都表明他对人有着良好的判断。在沙特尔，布鲁斯完全被（用他自己的话说）“父亲一般的”海明威“迷住了”，“他的灰色大胡子和魁梧身材让他看上去很像米开朗琪罗所绘的上帝”，令布鲁斯神魂颠倒。³⁶ 如此一来，海明威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让他相信，朗布依埃或许是打开巴黎大门的关键。他们可以一起完成布鲁斯的一项任务，即了解德国人的实力和意图，特别是以向德军仍旧控制的地盘渗透间谍的方式来了解这一切。

那天下午，布鲁斯重走了海明威往返沙特尔的路线，前往朗布依埃。上校沿着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边缘驱车前行，君主制时期，那片森林曾是国王的狩猎区，那时旁边还建有一个童话般的小小城堡，灰泥外墙，四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塔楼，是法国统治者们离开首都小住的乡间别墅。布鲁斯在城市中央看到了一座“古老的旅馆，周围有浓密的树荫为它遮挡烈日”。³⁷ 大猎手旅馆有自己的花园，看上去像是另一个乡间别墅而非小旅馆。那座四层建筑的很多双扇门和窗户上都装有木制百叶窗，加上穿透房顶的屋顶窗，让旅馆有种宾至如归的氛围。大猎手旅馆虽然以国王的首席猎手（veneur）命名，但只要有钱来乡下放松，任何人都能入住。

一进旅馆，布鲁斯就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海明威和手下的游击队员们为他描绘的“亢奋期”中。³⁸ 海明威把行动中心设在自己的房间，已经为布鲁斯做了一些后者的分内之事，接下来的几天，两人便联手合作。他们派出去在朗布依埃和巴黎之间的乡下巡逻的队员们回来报告说，那里的守军人数很少，对正在挺进法国首都的盟军而言，这可是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在布鲁斯看来，海明威是个审讯专家和报告撰写人，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筛选收集来的情报。³⁹ 有一次，一名法国非正规军人向海明威和布鲁斯请假，要离开总部“15分钟，去杀一个平民叛徒”，在占领和解放之间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还可以算旧账，这种事时有发生。布鲁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同意了那名军人的请求，还借给他一把手枪。⁴⁰

布鲁斯让海明威维持大猎手旅馆的秩序，海明威便我行我素起来。据说他想出了一个新奇的点子，让他的德国俘虏们脱掉裤子（理论依据是人只要脱掉裤子就不大可能逃跑），然后派他们去旅馆厨房里剥土豆、洋葱和胡萝卜。晚餐时间，旅馆经理再落井下石，让俘虏们穿上花边外套伺候抓住他们的人用餐。⁴¹

当消息传出，说军队正在朗布依埃整顿，准备解放巴黎时，整个城市很快便“像新年晚会一样挤满了……没什么用处的庆祝人群”，其中包括一些战地记者同事，他们很好奇为什么看起来像是海明威在管理着城镇的日常运作。⁴² 他用双拳来维持秩序；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拳打在（一个记者的）脸上”，还把一个伞兵的手臂扭到背后，因为他“端着斯登冲锋枪威胁周围的人给他香槟喝”。⁴³ 未来的外交官布鲁斯后来跟作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低调地重述了那天的场景：“欧内斯特……不得不用手背把那几个人推

开，对他这么一个大力神来说，那实在是够温柔的啦。”⁴⁴ 不过就连布鲁斯也不得不承认，作家-间谍海明威要是饮酒过量，就会在朗布依埃愤怒地咆哮不已。⁴⁵

布鲁斯把他们搜集筛选的情报传给了正在进攻的盟军。有些报告被直接送达战地指挥官，还有些通过电报发送给战情局——布鲁斯有自己的加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发报员。布鲁斯、海明威和一位法国抵抗运动的高层成员一起，试图给某人介绍情况，此人将率领第一批盟军军队进入巴黎。法国军团指挥是个在位很久的军官，名叫菲利普·玛丽·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Philippe François Marie Leclerc de Hautecloque），他从1939年便一直与德军作战。布鲁斯喜欢这位贵族同辈：他“瘦高、英俊、不苟言笑……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⁴⁶ 海明威在他的一篇战时报道里就没那么慷慨了：他讲述了勒克莱尔不但对他们的工作丝毫不感恩，还用不堪入耳的话辱骂三位情报人员，让他们“滚开”。⁴⁷ 但这位将军自己的情报官后来跟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布鲁斯却给了他“一份详细的总结，概述了朗布依埃和巴黎之间各条路线上的德军实力，以及可能遭遇的障碍”。布鲁斯认为这些情报“对挺进巴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⁴⁸

布鲁斯非常看重海明威的贡献，以至于他提前安排了两人离开朗布依埃之后继续合作的事宜。勒克莱尔进军巴黎的前夜，这位战情局军官用铅笔在一张横格纸撕下的小纸片上写道，“尊敬的海明威先生”，他，布鲁斯，将在一早前往巴黎。海明威先生能否“安排……12位抵抗运动成员的交通，鉴于他们在此地的工作如此出色”？在布鲁斯看来，“必须将他们团结为一个整体，才能实现我现在能够预见到的未来的某种目的”。他最后用了正式的文体：“您真诚的DKE 布鲁斯上校，总务兵团行动处长，战略情报局欧洲战场行动处。”⁴⁹ 海明威像对待布雷登大使为他在古巴的工作所写的感谢信一样，一直小心地保存着这张纸条。

8月24日，布鲁斯和海明威加入了数列盟军卡车、吉普和坦克中的一列，开始缓慢地穿过森林，朝巴黎驶去。天公不作美，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离开朗布依埃不到一个小时，每个人就都湿透了，少数德军的残兵剩勇也拒不合作。敌人从六七个精挑细选的位置开火，或许在森林中还藏着一辆坦克，又或者一门仍有危险性的88毫米反坦克炮还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占据有利地位，海明威和他的私人军队不止一次要停下来躲避（可能还要回击）。

当时还是《星条旗报》的记者、未来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播音员安迪·鲁尼那天就在附近，他听到前方有炮火声，立即判断出那绝非友军炮火，赶紧跳出吉普车，想在路边找到一面墙，高度够他蹲下身躲在后面。同一面墙背后大约50英尺远的地方，他看到一个人正在高声叫喊：“我们要在这里躲一会儿！”那个身穿一件加拿大战斗服，头戴皮沿军官帽，正朝他爬过来的大个子就是海明威。作家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开始告诉鲁尼德国人在前面路上的哪个位置。鲁尼虽然对海明威这位暴戾的战地记者持保留态度，但他惊异于情报的准确无误，且对海明威给了他关于埋伏位置的警告心存感激。

50

到24日傍晚，海明威和布鲁斯已经到达城界以内，出现在流经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德军的小规模抵抗和欢呼雀跃的人群让他们的进度慢了下来。两军仍在交火，但街道上挤满了巴黎人，开心地向解放者的怀里塞各种水果、鲜花，当然塞得最多的还是酒。布鲁斯在日记中写道，“不可能拒绝（那些强塞给我们的礼物）……整个下午，我们喝了啤酒、苹果酒、波尔多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勃艮第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香槟酒、朗姆酒、威士忌、干邑白兰地、雅马邑白兰地和苹果白兰地”。⁵¹ 这么多酒混着喝，就连布鲁斯那结实的身体也受不了了，入夜之后，他和海明威决定在附近的一处房子里过夜。

8月25日，美国人一醒来，就看到窗外“阳光明媚”。⁵² 他们这一小队人用一上午收拾行装，于12:30出发壮游，看到了光之城^[1]内一些最为标志性的景观，从凯旋门到优雅的协和广场，他们开车穿过宽阔美丽的香榭丽舍大街。虽然那一片仍然时有狙击手的枪声响起，六名法国老兵站在那里，守卫着拱门下的无名战士墓。他们的班长允许美国人走上凯旋门，去观看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上面是无数的穹顶、屋顶和尖顶，下面的街道上坦克隆隆，枪炮声不绝于耳。

那天傍晚，布鲁斯和海明威又穿过此时已经空空荡荡的香榭丽舍大街，来到25号，也就是位于拉·佩瓦酒店（La Païva Mansion，该酒店以19世纪的交际花命名，也被称为“大视野酒店”）内的上流旅行者俱乐部所在地。俱乐部基本上已经人去楼空，但他们还是设法找到了总经理，跟他一起喝了一轮香槟酒。然后，他们又穿过在歌剧院广场上欢呼着、痛饮着、亲吻着的法国人群，逃到相对安静的丽兹酒店，这座奢华的酒店位于巴黎市中心，更像个城堡而非酒店，是海明威心目中的圣地。（海明威曾写道，“每当我梦到死后的世界，一切

总是发生在巴黎的丽兹酒店”。⁵³)在那里,他们和海明威的非正规兵、几个记者,还有布鲁斯的手下一起在酒吧坐下来,要了五十多杯马丁尼酒,颇有鉴赏力的布鲁斯说那些酒“不怎么样”。⁵⁴ 不过那天晚上与海明威和一位低阶随员一起吃的晚餐好极了:主厨把能用的几样原料用到极致,或许是为某一特殊场合留下的一块肉,加上丽兹酒店的一些战时主食如蔬菜汤、米饭和加了特制酱汁的奶油菠菜,还有一把用烈性甜酒腌制的覆盆子,配以世界上最好的酒窖之一(它经历了占领时期和解放而毫发无损)出品的葡萄酒。晚餐后,食客们在菜单卡上写上日期,后来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字。军事历史学家S. L. A. 马歇尔把那张卡片带回国,上面有一行说明文字:“我们觉得我们占领了巴黎。”⁵⁵

当然,在任何意义上讲,他们都没有“占领”巴黎。不过此时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先头部队,事实证明他们的报告是有用的,以确凿的证据汇报了敌人的情况和畅通的路线。⁵⁶ 那是他们为解放法国首都所做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很可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那是海明威间谍生涯最辉煌的时刻。与非正规军一起进行地面战斗很适合他,比海战还要适合,更不要说空战了。其他间谍活动,诸如运作骗子工厂或为内务部效劳,全都相形见绌。马歇尔曾在8月23日至25日数次看到海明威参与战斗,这位精于判断军事技能的人最后说,海明威像“野牛一般勇武,还是管理游击队的一把好手”。⁵⁷ 戴维·布鲁斯则说,海明威是“铤而走险和谨慎小心的罕见结合体,他的冒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机会。他是个天生的领袖,而且虽然他个性鲜明、人格独立……他还是个非常自律的人”。⁵⁸

马歇尔和布鲁斯都没错。海明威可以选择一支组织松散的队伍,成为它的领袖,带领它穿过战争的迷雾。但他不仅仅是个独立的游击队领袖。他与正规军审慎联系,还与布鲁斯这样的情报官员通力合作。海明威的司机对那些激进的法国游击队员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在1944年8月领导过他们的海明威本人。在“红发”二等兵佩尔奇看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团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团队。我得承认他们没有(军队)纪律。整天喝酒,这个也得承认。但是战斗力很棒”,只要有合适的领袖,这支队伍定能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⁵⁹

[1]光之城(City of Light),巴黎的别称。

第十章 在前线：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

1944年9月初，海明威和美国陆军军官查尔斯·T. 拉纳姆一起站在比利时的一座山丘上，俯视着脚下的乌法利兹城（Houffalize），城里那些灰白色的灰泥外墙房子整齐地聚集在乌尔特河（River Ourthe）远侧的城市广场周围。海明威所谓“穿过地势起伏、森林茂密的乡间……的亡命激战”已经接近尾声。¹ 盟军基本上把德国人赶出了法国，继而经由比利时的北部和东部把他们赶到了比德边境。美国人当然可以为他们自6月诺曼底登陆以来的战绩而自豪，但战争还没有结束。

这天，海明威和拉纳姆可以看到德国人正在过桥撤退，桥下的那条小河比水沟宽不了多少，此时却成了两军的分界。为把美国兵挡在一定距离之外，德国炮兵部队对着进城的道路开炮。海明威和拉纳姆打赌，看谁先到达城市广场。拉纳姆穿过树林的小路，海明威则沿大路出发，“他的”队伍分乘两辆吉普车——一辆车上是他麾下那股法国非正规兵，另一辆由二等兵佩尔基开车。路上的诡雷和倒下的树干使他被迫减速，因而海明威到达河边时，拉纳姆已经到了——不过两人都过不了河，因为德国人已经把桥炸了。

大约十天后，两人还在考验彼此。那天拉纳姆在一个古老的农舍里宴请海明威吃牛排晚餐。就在那时，一枚德国炮弹穿墙而入又穿墙而出，没有爆炸。大多数其他食客都仓皇四散寻找遮蔽，海明威却不为所动，继续切他的牛排。拉纳姆让他的客人赶紧离开座位，或者至少带上头盔，但海明威拒绝了，两人争论的过程中，又有炮弹接踵穿墙而过，但奇迹般地一枚也没有爆炸。拉纳姆不甘落后，也取下头盔，重新坐在桌前。其他食客——拉纳姆手下的军官们——在炮击逐渐停止之后才回到桌上继续用餐。他们中有人盛赞海明威和拉纳姆勇

气可嘉，有人则暗讽两人逞强。拉纳姆对此事的结论是：那是与命运争高下的莽撞行为。²

攻下巴黎后，海明威一半时间待在法国首都，一半时间去往前线。在城里，他与玛丽·韦尔什在丽兹酒店组建起小家庭，那年春天，他与盖尔霍恩的婚姻还没彻底破裂，就开始在伦敦追求这位美国战地记者了。韦尔什用了“鸿蒙初辟”一词来形容在伦敦一见钟情后，两人再次找到了相识相知的乐趣。³ 海明威说他们现在“非常相爱，每人只穿一件衬衫……根本没有矫饰、没有谎言、没有秘密，没有伪装”。⁴ 在此过程中，他们帮着其他客人一起喝光了酒店里贮存的巴黎之花香槟酒，最终迫使酒侍者不得不求助于较低级的酒店。不在玛丽身边时，海明威便跟着盟军队伍，看着他们把德国军队赶回老家。

他大部分时间都跟着自己最近中意的队伍，巴顿将军的第四步兵师第22美国步兵团。该团指挥官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查尔斯·T. 拉纳姆上校，朋友们都叫他“巴克”。海明威被这位勇士-作家深深吸引了，就像当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那么喜欢古斯塔沃·杜兰一样。拉纳姆喜欢战斗和关于战斗的写作；他甚至出版过几部关于行伍生涯的诗歌和短篇小说。从战时拍摄的照片上看，他比海明威个头稍矮一点儿，体重也远不及后者：玛丽·韦尔什形容他“活泼、易怒、机敏”。⁵ 戴眼镜让他看上去像个思虑缜密的人，但那并没有影响他在战斗中的高效。海明威战后还记得，“和这么一个文采好、口才好（又）勇敢善战的人在一起永远充满乐趣……（他在战斗中）绝对毫发无伤、聪明机智、幽默风趣，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友”。⁶

在乌法利兹城和农舍晚餐上的冒险都是两人结交的仪式。海明威和拉纳姆未能分出高低胜负，但它们为两人的友谊打下了基础，那友谊在战场上变得愈加深厚，继而维系了一生。每次在一天的紧张战斗之后总算可以放松下来，两人就会坐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到深夜。拉纳姆觉得能遇到美国文学的当代传奇并向他请教是个难得的机会，因而总想跟他讨论文学和自己的作品。海明威却对战场中的勇气更感兴趣，拉纳姆后来称之为“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之类的废话”。⁷ 拉纳姆对海明威说，勇气可不是“清醒的人在公开场合讨论的话题”。⁸ 即便如此，一个痴迷于战场的作家和一个醉心于写作的军人可以很好地互补，结成了海明威一生中最稳固的情感纽带。1948年，回首战争

岁月，海明威会对自己说，他从未“有过比巴克更亲密的朋友……也没有这么喜欢和欣赏过任何其他人”。⁹

10月，就在他一面与第22步兵团一起服役，一面与玛丽共浴爱河时，一项关于他在朗布依埃的行为的官方调查意外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海明威（以及像戴维·布鲁斯这样有着高度判断力的指挥官）仍然认为他在解放巴黎之路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海明威后来不止一次说，他找到了进入法国首都的最佳路线，也就是德国人没有重兵防守的路线，应该得到一枚勋章。他注意到一位战情局军官“因为我在朗布依埃所做的工作，安排好了一切，才让（法国将军菲利普·）勒克莱尔……只用十分之一的兵力就打进巴黎而……获颁了一枚卓越服役十字勋章（DSC）”。¹⁰相反，他却被传唤，要求解释他作为战地记者的失格行为。他被指控囤积武器、指挥部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指控方很可能就是他8月曾经在大猎手旅馆推来搡去的那些记者。这些指控都不是无中生有，违反了美国军方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指挥、被委以凌驾于军事人员之上的职责，也不得拥有武器装备”的规定。¹¹“故意违反这些……规定……可能导致……逮捕并等待遣返回国或军事法庭审判。”这些大多是美国战地记者的常识，不管是老手还是新人，但军方仍然要求每个人签署一份列出了所有细节的协议。

几周内，针对海明威的指控已经传开，足以引起官方的关注。它们毕竟事关一位名人，而提出指控的新闻记者们也知道该如何表达和发声。最后，第三军督察长觉得必须开展调查，就把海明威叫到了自己当时设在法国南锡市的总部。督察长获得了书面和口头供述。海明威本人宣誓后回答了一连串问题。他既没有公然撒谎，也没有道出实情，而是转弯抹角，避重就轻。正如他自己多年后所说，“我否认了，开着玩笑把（自己）摘了出来，对我感到自豪的一切破口大骂”。¹²

这件事伤害了他的感情。得不到自以为该得的荣誉是一回事，成了某项调查对象、还可能会出现在某战区的军事法庭则是另一回事，对海明威这么珍视自己在战火中勇敢作战的名声的人来说，显然是奇耻大辱。与此同时，该调查也表现出海明威对权威和法律的矛盾心理。他的最后一位传记作家迈克尔·S·雷诺兹（Michael S. Reynolds）曾把军方调查放入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论断说作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对法律、执法者和法庭都有一种深深的，几乎是非理性的

恐惧……他固然能拿自己的宣誓证言开玩笑……但（在督察长决定放弃调查之前）他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幽默”。¹³

（待续）11月，海明威回到第22步兵团。此时，该步兵团已经来到敌人在德比边境的主要防御线，即德国人所谓的“西墙”。该步兵团管制区在许特根森林（Hürtgen Forest），那里的地堡和碉堡网络与当地茂密的森林、险峻的峡谷和水道连成一体。虽然距离西北方向的德国边境城市亚琛只有几英里远，许特根森林却很难接近，更不要说穿行而过；几乎没有路，连小径都很少，1944年，很多小路又窄又难走。在进入森林的路上，海明威注意到一连串树木茂密的山丘，有些还有林中空地，可供战士观察下面的敌情。¹⁴ 1944年深秋，低温和冷雨使得22步兵团的行进和战斗变得更加艰难了。

在11月15日至12月4日的激战（这次战斗造成了该步兵团超过2700人伤亡）中，海明威在拉纳姆的指挥部和战场上跟着他实地考察，他对什么都虚心学习，偶尔提出一点儿建议。一天，他们去一个用泥土和圆木建造的地堡中拜访一位前线军营指挥官。这个指挥官是个上校，他没精打采的，拉纳姆对海明威说自己差点儿解了他的职。海明威回答说，拉纳姆没必要解那人的职，他身上有一股死亡的味道，很快就要死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人报告说上校死了，一颗榴弹穿透了他那座地堡的墙壁。¹⁵

海明威虽然不像在朗布依埃时那么积极了，但很多危机发生时，他仍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11月22日，德国步兵袭击22步兵团的指挥部时，海明威抓了一支汤普森冲锋枪便加入了战斗，帮助战士们驱赶攻击者。几天后，在凌晨4时左右的另一次反击中，德军坦克和步兵集结并穿越了步兵团的防线。拉响警报的军营指挥官一手开枪对德国人射击，一手拿着野战电话。这一回，海明威和拉纳姆没有并肩作战，但拉纳姆一边下达临时命令，一边呼唤他。海明威想都没想就回答说：“等着，我马上过来。”为了和拉纳姆并肩战斗，他冲过了一道很多人葬身其中的火障，一直守在上校身边，直到最终击退了德国人，逼得剩下的十几个人缴械投降。在拉纳姆看来，那是他们友谊的另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永生难忘。多年后他写道，那些天发生了那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事情，唯有那个夜晚的记忆却最为生动，历历在目。¹⁶

在拉纳姆和他的战士们眼中，海明威在许特根森林的表现堪称典范。首先，他是个很棒的战友，总是给众人分享威士忌，聊那些跟他有关的或有趣的话题：他的儿子杰克加入战情局，在法国敌占区跳伞空降啦，他那位不够格的妻子盖尔霍恩居然要跟他离婚啦，还有非洲狮子有什么交配习惯啦，等等。其次，虽然他的工作是报道战斗，但比起那些本职是战斗的人，他冒的风险一点儿也不小。他本来没必要如此靠近敌人，却总是和打仗的步兵一起深入前线。他在重压之下保持冷静，在必要之时愿意战斗，再次展现了自己的第六感，也就是德国人所谓的“指尖的感觉”，那是只有兵法大家才有的感觉。

12月4日，他在森林里的最后一天，就在步兵团里那些筋疲力尽的战士从战场上生还，迫切希望退回来休息一下时，海明威的第六感又救了他自己和朋友们的命。他和一个名叫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的记者同事一起开车走在一条泥泞的路上，地面的浓雾使得能见度只有几英尺。突然，他们听到一种撕裂的声响，只有海明威听出了那是什么，对沃尔顿和司机佩尔基高喊道“哦天呐，跳车！”把沃尔顿推到了路边的水沟里，挡住了他的身体，几秒钟后，德军战斗机就朝他们的吉普车发射了一连串子弹。飞机转头巡查一番，又朝着路中间开火，差几英尺就要击中水沟里的三个人了，面对扫射，他们的生还余地微乎其微。海明威平静地从皮带上取下一个小水壶，让沃尔顿喝一口预调的马丁尼。那酒有股子金属味道，但沃尔顿从未喝过那么好喝的酒。三人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土，步行走过了他们那辆正在路上燃烧的座驾。¹⁷

海明威最后一次跟部队一起欢呼，恰逢1944年12月下半月的突出部之役。希特勒用了总共三十几个师的德军坦克和步兵打击盟军前线防御薄弱的地方，就在拉纳姆和他的军团驻扎地以北几英里处。西线最后一场大战打响之时，海明威在巴黎与玛丽在一起。使命再度召唤；该师指挥官巴顿在电话里对海明威说这是“一场热闹的大戏”，错过就可惜了。¹⁸ 海明威觉得自己应该到前线去报道这场大战。

海明威到达前线时，汹涌的德军大潮已经开始减退，他对战斗的兴趣也没那么强烈了。战场有多刺激就有多累人，特别是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那是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之一，白天的气温低达零下10摄氏度。就算对这位伟大的作家-战士而言，这也是极限了，他接受了拉纳姆的邀请，搬进了后者的指挥部，那时指挥部设在小国卢森堡的罗当堡城附近一座舒服的宅子里。海明威和一位记者同事同睡一张

双人床（每人各一套被褥），同意让步兵团的军医来照顾他。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发烧，体温一度高达40摄氏度。他患上了支气管炎，就算裹着两件羊皮夹克还是觉得冷，需要安静地休息，服用医生给他的抗生素类磺胺药。¹⁹

到1945年1月，欧洲战争结束已指日可待，情况有点像1939年1月，那时佛朗哥的军队进军马德里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海明威早知道电影的结局，不必等演职员表在银幕上滚动。他需要离开剧院，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休养和写作。他太清楚自《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出版以来，他除了新闻报道外就没怎么写过东西，自然也没有多少收入。缺少新的收入来源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家产败光”了。²⁰

海明威开始找机会回家，这在1945年初并非易事。一直到3月初，他才总算弄到了一个飞机座位，可以横跨大西洋回家了。回到古巴后，他再次认真考虑战争年代对他意味着什么，以及该如何把这些生动精准地表现在一部小说中。

在瞭望庄园，海明威又恢复了往日的作息习惯，黎明即起，那时只有一只狗或猫跟他做伴，他要么坐在书桌前，要么站在齐胸的桌前，认真写几个小时，通常是手写，有时也用打字机。他或许在写一部新书，有时也会写信，对他来说，那是另一种修炼技艺的方式。晚些时候，或许在午饭或晚饭后，海明威会回到桌前写长信，在信中，他往往会放下戒备心，自由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比方说，1945年4月14日，他早晨写了七封信，傍晚又开始写信了。²¹

海明威给妻子们（甚至包括第一任妻子哈德莉）和情妇们写情书，给儿子们写充满趣味和爱意的信。在写给出版商和律师的信中，他不无尖刻地下达指示，还不止一次严厉指责他们。写短信对他似乎是件难事：有一封写给记者和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一开头就承诺简短，不止一次地收尾结束，但总是还有一件又一件事没说。最后这封信的篇幅足有四页打字纸，还有三页手写的附言。²² 他仿佛就是不想结束。总的来说，海明威这个时期所写的信件似乎反映出他很想跟外界联系，尤其想跟那些和他最亲密的人们联络感情。

分开没几天，海明威就开始给拉纳姆写信，说自己有多想念他。1945年4月2日，他写信给拉纳姆说他“对步兵团魂牵梦萦”，真是“倒霉催的”，这是他表达沮丧的说法。²³ 他还说他在战斗时从未觉

得沮丧，那时有仗要打，还有拉纳姆做伴。12天后，海明威再次对拉纳姆说他“很孤独，需要你和（那些）队员们”。²⁴ 在写给其他人的信中，他赞扬拉纳姆这位指挥官、作家，尤其是他的朋友：是“我的伙计和同伴”²⁵以及“我最好的朋友”，拉纳姆也回报以同样的深情厚谊。²⁶ 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海明威对麦克斯·珀金斯说，在“那以前所有的岁月加起来”，他所学到的东西都没有和巴克在一起那段日子学得多。²⁷ 对他这么重视充实人生和不断学习的人而言，这当是最高赞美。

海明威与拉纳姆的关系无关间谍。对这位作家-战士来说，战争，特别是地面战斗，是终极的生命体验。“这么说大概显得邪恶，但那确实是我最为……钟爱的事。”²⁸ 他在冒生命危险时情绪最为饱满，所有的感官都完全调动起来，充分利用自己长期培养的实战和军事技巧，因而杀死法西斯分子绝非偶然。海明威很享受在这方面做一个有用之才。他后来维系了一生的很多朋友都是在战场上结交的，要么是1930年代在西班牙，要么是1944年在法国，像共产主义导演伊文思、贵族间谍戴维·布鲁斯，还有思维缜密的战士拉纳姆。分享秘密以及冒险与内务部会面的确很刺激，在许多人看来，间谍工作是战斗的替代品。然而在海明威看来，它根本无法与真实的战斗媲美，穿越枪林弹雨、条件反射般快速做出决定——向左还是向右移动——能在瞬间决定生死。

内务部没有人像伊文思、布鲁斯和拉纳姆那样与海明威情投意合。那位衣衫破旧、带着乌龙情报员^[1]口音的矮个子俄国人、内务部招募人员雅各布·戈洛斯是那种海明威可能会产生依恋的人：他是个有热血、有人格的真正的信仰者，而当时海明威也是个真正的信仰者（虽然他信仰的是结盟反抗法西斯的事业，而不是强硬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海明威跟戈洛斯联系的时间很短，发生在1940年和1941年和平时期的纽约，而在戈洛斯之后联系到海明威的内务部行动人员都是无名之辈，是些编出一套自我介绍的“工作人员”，与作家见上一两面而没有太大进展，希望在下次见面时有更好的成果。海明威1945年从欧洲回到古巴之后，苏联人派了另一名内务部“工作人员”来见他，结果同样没有定论。但苏联的记录显示，在收到“离开那个国家的紧急召唤”之前，这位“工作人员”应该怀有希望，与“阿尔戈”建立合作关系。²⁹

即便苏联行动人员和海明威有时间建立融洽和谐的关系，与1940～1941年冬他因为母国旁观世界卷入战火而与内务部签署协议相比，海明威如今关心的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5年，他已经不再迫切需要寻找反抗法西斯的最佳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日本和德国基本上成了一片废墟。东方和西方的军队正在中欧的平原上警觉地对峙，两方中间的那条分界线横穿德国和奥地利。

[1] 乌龙情报员 (Boris-and-Natasha) 指拍摄于1992年的同名喜剧电影。

第十一章 “心里发毛”：既非战争，也非和平

1945年9月，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终于结束，巴克·拉纳姆可以接受海明威随时生效的邀请，“在任何一年任何一个月任何一个星期任何一天的任何时段”¹来古巴。多年来拉纳姆第一次脱下军装，跟妻子玛丽一起与暂时单身的作家小聚两周，在瞭望庄园泳池边的棕榈树下喝酒聊天、在附近猎人俱乐部射击陶土鸽子和活鸽子，驾驶着“皮拉尔”号去湾流里钓鱼。²

在热带的阳光下，拉纳姆站在晒成褐色、强壮结实的海明威身旁，显得有些苍白和呆板，为了照相，海明威收腹挺胸，身姿健硕。大概是因为拉纳姆的缘故，作家在短裤外系了一条战利品德国皮带，皮带扣上有“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的德语字样，1944年他在法国时就系着这条皮带。他们和以往一样享受着小聚的时光，一起回忆战争岁月，猜测未来局势，让两人的关系顺利地完成了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然而作家对玛丽·拉纳姆却没什么把握。他们天南海北地畅聊，从斗牛说到国际政治再说到性别，两人分别在心中品评着对方。玛丽难免注意到海明威敌视女性，尤其对他的前妻玛莎·盖尔霍恩恨入骨髓。

拉纳姆回家前一两天，在那间光照充足的小餐厅里，坐在朴素的木桌前，海明威和他们从傍晚聊到深夜。粉刷过的墙上挂着他打猎的战利品，在那些带角的鹿头和羚羊头的俯视下，海明威开始说起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应该跟苏联和平共处了。玛丽·拉纳姆的座位离主人有几英尺远，插话说他的话在她听起来是“彻头彻尾的绥靖”啊。³这让他想起1938年英国的政策，海明威心中亮起了红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先是没有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支持，其后又在慕尼黑向希特勒让步，令他恨之入骨。

海明威涨红了脸，怒目圆睁，猛然起身冲到玛丽身边，抬起手臂，准备把一杯葡萄酒泼在她的脸上。他总算在最后一刻克制住了，回到了自己的主位上。

他立即就跟她道歉，但覆水难收。玛丽·拉纳姆和海明威再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拉纳姆夫妇回家后，欧内斯特寄给巴克的那张照片中只有两个男人在佛罗里蒂达酒吧，题字也只写着给“巴克，无论何时，我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⁴

随着导致双方结盟的危机结束，苏联和西方开始重新定义彼此的关系。海明威参与了这一过程，为《自由世界的宝藏》（*The Treasury of the Free World*）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一部由许多名人合出的文集，他们大多是左派，主张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本着同样的精神，海明威呼吁美国人重新考虑自己在世界的位置。他提到美国现在是东西半球“最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如果我们不学着了解世界，意识到所有其他国家和人民拥有的权利、特权和义务，我们就很容易凭借手中的权力重蹈法西斯的覆辙”——他在1945年9月写下这些话时，或许就已经激怒了美国的某些爱国者，那时拉纳姆夫妇大概还没来看他呢。⁵

大约与此同时，一个身材瘦削、神经紧张的年轻人伊戈尔·古琴科正准备从加拿大渥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脱身。这位译电员一心想让自己和家人在西方世界过上更好的生活，决定用官方电报为自己建立信用。前几周，他每晚把几页秘密电文掖在衬衫里带出使馆，把它们藏在他位于萨默塞特街的公寓里，那里与加拿大首都的其他苏联人有一段安全距离。9月5日，他决定冒险一试，先是来到《渥太华日报》（*Ottawa Journal*）社，力图向他们解释报文内容。夜班编辑看到眼前这位苏联人焦躁不安，一遍遍不停地喊着：“这是战争，是战争，是俄国！”⁶一时被他弄得不知所措。

古琴科第二天又回到报社，但同样没什么结果，随后他又到皇家加拿大骑警（RCMP）那里去碰运气，那里虽设有一个情报局，但还是没什么人理他。下午，使馆的一名司机来到萨默塞特街，对着公寓的门猛敲了几分钟，大声喊着让古琴科开门。同情他的邻居们报了警，但警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邻居中有一位艾略特夫人好心让吓坏了的古琴科来自己家里避一避。午夜时分，内务部本地情报站站长本人带着三四个年轻官员出现了。古琴科从走廊对面的钥匙孔里看到他

们破门而入，把他的公寓翻得乱七八糟，寻找他本人和那些秘密文件。有人又报了警，让当地警察来跟这些寻衅的苏联人对峙。

警察最后总算明白了古琴科一家需要他们政府的保护。第二天上午，在他离开工作地点两天后，一位警察护送古琴科来到皇家骑警总部，他在那里开启了自己的叛国投诚生涯。加拿大人开始阅读电报，获知苏联人二战期间曾在他们的国家运作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还了解到该行动与美国的一个更为庞大的间谍网络连在一起，很像是跟海明威的生活有所瓜葛的那个间谍组织。

到1946年2月初，耸人听闻的故事开始一点点泄露出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发表了一个泛泛而谈的官方声明，试图制止消息进一步泄露传播。有人认为古琴科事件是冷战的开始。然而金仍把苏联人当作战时同盟，不愿意做出任何化友为敌的举动。尽管如此，到2月中旬，《纽约时报》还是获得了足够的消息，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苏联大使馆前任助手”的变节，涉及的科学家和公务员数目惊人，其中还有一位高级别内阁成员。⁷ 古琴科事件继续发酵，《纽约时报》的报道只是冰山一角，一直到3月末，每天都有更多的文章和分析见诸报端。⁸

消息传出时，海明威正在瞭望庄园奋笔疾书，写那部关于战争的小说呢。他停下手中的事转而关注古琴科，对此事形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解读。他在措辞中暗示加拿大人给苏联人设了一个陷阱。他在写给拉纳姆的信中说，虽然他“不是俄国人的专职爱好者，……加拿大人设的这个局”还是让他“心里发毛”。⁹ 他认为古琴科揭露的行动与一般外交武官所做的事情差不多，他本来就要负责搜集各式各样的军事情报。苏联一直都在挑衅地窥探其盟国——招募间谍从友邦盗取机密，而海明威居然做出了如此过分乐观的解读。（到3月，加拿大人将以间谍罪逮捕39位嫌疑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原子科学家到国会议员。）海明威继续辩解说，苏联的行为跟所有其他政府没有不同，包括美国政府。美国人假装被苏联的行为“吓坏了”实在是虚伪至极。

海明威在信的下半部分又重复了这一主题。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频繁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简直是家常便饭。因此，美国没有资格抱怨另一个大国干涉一个小国家的内政。此外，他接着说，把每一位

外国共产主义者的账都记在苏联头上也是不对的。何况如果英国和美国再这么恶意诽谤苏联，恐怕他们就要被迫重启共产国际来自卫了。

几周后，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直接否定了海明威的观点。他在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与哈里·杜鲁门总统同台，发表了第一个标志性的冷战演说，标志着西方世界从与苏联人同心协力转向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扩张：¹⁰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所有这些都……屈服于……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在所有这些……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现在）都……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

丘吉尔特意提到了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对苏联人的“深切同情和善意”，并宣称自己曾决心克服任何差异，建立长久的友谊。但是，既然苏联人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西方盟国就需要坚定而警觉地保护自己，1930年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威胁既有秩序时，他们没有做到的也恰恰是这一点。

海明威在写给一位苏联崇拜者的信中对这次演说的评价是，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人是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他写道，“只要我们能够彼此谅解，而不是去相信某一位丘吉尔的昔日重现”，美国和苏联人民就完全可以和平共处。那样一来，便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两国人民的友谊，他最后如是说。¹¹

十天后，他再次在信中写到苏联。6月30日，他觉得必须向拉纳姆解释他“因为在（过去）士气低落时了解他们，而对他们大有好感”。他认为每一位“差劲的老毛子……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权利”都应该和英国上流社会的任何人一样多。¹² 他提醒拉纳姆，世上仍有法西斯政权存在，佛朗哥就是一例，更不要提以“最糟糕的奴隶制度”统治国家的蒋介石了。

海明威再次重提西班牙内战，当时苏联人支持了西班牙共和国，那是他最为信仰的事业。英国人则袖手旁观，小心翼翼地生怕吃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和苏联领导世界打败了德国人和日本

人。在海明威看来，这表明胜利的果实是“我们的和他们的”，而不是旧殖民势力的，更不要说现在世上还有法西斯分子呢。¹³ 战后，他在1948年对拉纳姆说，他曾期待着看到世界“以合理而坚定冷静的方式”一分为二，一半属于苏联，一半属于美国；他愿意把“他们能够控制的整个欧洲”许给苏联人。¹⁴ 那总好过为保卫大英帝国或石油公司的权益而战吧。

就像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和其后所做的那样，在人们疑心苏联作恶时，海明威宁可信其无。他仍然对苏联领导人不加任何批评，并继续对斯大林的清洗轻描淡写或为之辩解。在1947年写给“克雷波小姐”的一封信关于西班牙和共产主义的信件的手写草稿中，他写道他“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都非常了解俄国人”，“（他）在那里……欣赏的人没有一个被处决”。这里的关键短语是“（他）欣赏的人没有一个”。他接着写道，他认识“并认为他们该杀”的“许多人（都）被枪决了”。他声称自己对1930年代苏联的清洗一无所知，但随后又说他读过库斯勒——“但也知道库斯勒一定不相信他，虽然（他的）书写的真不错。”¹⁵

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指前共产主义者阿瑟·库斯勒的经典小说《中午的黑暗》（出版于1940年），写的是他在西班牙与明岑伯格共事的那段经历。该书大为畅销，让许多人第一次了解了斯大林主义和清洗。故事的背景是1938年的莫斯科，讲的是一个名叫鲁巴乔夫的近卫军人把一生献给了革命，却被指控背叛了革命的故事。鲁巴乔夫和他的审讯者们都知道，指控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那些只是政治便利而已。高阶审讯人员是他的老朋友，他规劝鲁巴乔夫，说坦白从宽。低阶审讯员就没那么温柔了。当他最终屈服了命运的安排，坦白自己有罪之后，鲁巴乔夫发现这么做居然奇怪地给他带来了自由。这一经历改变了他。他不再是个真正的信仰者，遵守党的纪律，愿意接受党的路线的每一次曲折反复。相反，他“又成了一个人，一个有感情、有主观情感的人”。¹⁶

这本书戳中了党的要害，以至于党在自己的作品索引中严禁任何党员阅读、拥有或讨论这本书，哪怕在苏联境外也是一样。¹⁷

忠顺的共产主义者和天才编剧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后来曾吹嘘自己为阻止《中午的黑暗》被搬上银幕而发挥了重要作

用。¹⁸ 关于盖世太保及其受害者的故事不管有多少都可以拍成电影，但关于内务部及其受害者的故事却严禁探讨。

审判秀，也就是1930年代最明显的大清洗，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虽然斯大林的累累罪行——古拉格监狱及其数百万受害者——一直到多年后才完全曝光，但那些审判却是事实，在大西洋两岸众所周知。海明威很难说自己不知道。1937年的很长时间内，他在西班牙的那些共产主义朋友们每天谈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每天（他们）都……听说又有人被捕了，伴之以难以置信和令人心惊肉跳的指控……恐怖在整个俄罗斯蔓延，像大浪卷过，将一切淹没。”¹⁹ 他有时为其撰稿的共产主义报纸会描述那些审判极其可笑的细节，他床头柜上的美国大报则以较为温和的笔调报道同样的故事。例如，《工人日报》就曾把一次审判写成“直捣一名法西斯探子的老巢”，报道说红军指挥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元帅是盖世太保的间谍。²⁰ 几天后，《纽约时报》又在头版报道了同样的主题，以冷静清醒的分析质疑针对这位苏联军事领袖的指控令人难以置信（事实证明，那些指控全都是无中生有）。²¹

在给克雷波小姐写那封信一年之后，海明威在一封给拉纳姆的信中显得消息灵通一些了。他似乎总算承认了清洗的存在及其真实的目的，但仍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支持。他问道，如果面临同样的挑衅，“杜鲁门（又会）比斯大林好到哪里去呢？”他本人就会“糟得多”。“如果是为了我的国家好”，他自己会同样残酷无情。²² 海明威以此暗示，斯大林之所以无情，是为了保卫苏联免受希特勒等敌人的攻击。

海明威不是唯一一个持这种态度的人。因为苏联人是纳粹侵略的受害者，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回击纳粹并取得了胜利，人们在战时对苏联人持同情态度，此时却已逐渐减退了，但仍有人对我们曾经的同盟感同身受。1946年，很多美国公众人物都还没有打算对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警告予以关注。即便杜鲁门不情愿地承认了英国领导人可能所说属实，仍有其他人继续抵制丘吉尔的结论。其中就包括埃莉诺·罗斯福和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后者在1941年到1945年曾先于杜鲁门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1948年又作为第三党候选人与杜鲁门竞选美国总统。华莱士提出了某些跟海明威一样的见解：美国政府需要努力与苏联人和平共处；他们毕竟只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苏联有自己合理合法的需求和抱负。如果

我们对他们报以敌意，他们会针锋相对。在一年后写给华莱士的一封信中，海明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示了与华莱士所见略同，称后者听起来“不理性、不稳定，或许还有点傻；但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²³

问题在于，海明威和华莱士的观点都绝非主流。随着冷战紧张关系日益加深，美国的政治中心大大向右倾斜了。

从1932年开始，民主党就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他们的新政以今日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为类似于福利国家的制度打下了基础。1946年11月，钟摆开始朝另一个方向摇动。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上下两院，希望能重置平衡。他们的政治纲领足够直接：现在应该对罗斯福不知不觉缓慢进行的社会主义说“不”了，遑论共产主义和容忍这一切的自由派。

杜鲁门总统就这样被国外的形势和国内的共和党人推向了右派阵营。苏联人继续干预中欧乃至西欧，当英国宣称它再也无力支持希腊等传统盟国打击共产主义暴动时，总统决定美国应该承担起这一重担。1947年3月，他对国会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承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莫斯科或其代理人的）压力”。²⁴ 苏联在整个欧洲拉起的那道铁幕及其附属国网络的扩大，显然激发了总统发表宣言：“许多国家……近来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极权统治……（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操纵下的报纸和广播，内定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这一政策就成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几年后，又出台了一个忠诚调查计划，旨在将联邦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连根拔除。²⁵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以下简称“非美活动委员会”）就在这种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主要是由一群南方的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组成，前者包括一些无耻的种族主义者，后者中有一位聪明进取的年轻代表，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名叫理查德·尼克松。该委员会的章程是调查由外国政府支持的，旨在暗中破坏合众国的“颠覆性和非美国的宣传”。²⁶ 国会的各委员会通常都是为收集情报，以便国会草拟立法而设立的。非美活动

委员会违背了一般的规范，因为它同时还是个政治角斗场。在这里，证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合法权利。

到这时，联邦政府已经对苏联一直到二战结束时在美国部署的间谍活动有了详细的了解，情报来源主要是投诚者或解密的消息，因而很难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很多证据都是道听途说——一位老共产主义者透露了关于另一位共产主义者的情况——或者仍被认为是机密情报，无法提交给陪审团。政府要到很久以后才解密一个代号为“维诺娜”的最高机密计划，该计划截获了纽约的内务部情报站与莫斯科之间的成千上万份情报。²⁷ 许多情报暴露出罗斯福政府中安插的内务部间谍。因此，为国会和美国人民提供关于共产主义暗中破坏、包括所谓的“苏联间谍活动”的信息，就成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责任。²⁸

该委员会一开始就把好莱坞的共产主义者作为调查目标，是因为后者看似有条件通过自己的工作散播苏联的宣传。1947年秋，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了作曲家汉斯·艾斯勒，此人碰巧是犹太人，因逃离了德国而未落入希特勒的魔爪，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的好莱坞“为电影作曲”。²⁹ 艾斯勒身材矮胖，光头，说着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言行举止都不像个会威胁国家安全的人。他的问题是一堆连带责任——他有个兄弟是个德国共产主义者，曾经激怒过委员会——他自己的过去也不清白。即便他在好莱坞未曾做过什么颠覆活动，他也的确曾经是一位共产主义者，1920年代和1930年代，他曾与海明威的共产党朋友尤里斯·伊文思共事，并曾为共产主义的赞歌谱曲，那些歌在柏林或莫斯科听起来比在华盛顿好听多了：³⁰

我们冲锋陷阵……

我们和列宁肩并肩

为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冲向前。

艾斯勒9月出庭作证时，玛莎·盖尔霍恩碰巧在国会山的听众席上。据她记录，在宽敞豪华的集会大厅，那天除了几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外几乎没什么人，摄影师的灯光始终聚焦在不知所措的证人身上。³¹ 因为记性不好，英语又磕磕巴巴，艾斯勒被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律师罗伯特·E·斯特里普林（Robert E. Stripling）一击即溃，律师抓住了他的各种逻辑漏洞和前后矛盾，得出了他就是音乐界的卡尔

·马克思这样牵强的结论。³² 最后，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E. 兰金（John E. Rankin）做出判决，彻底改变了艾斯勒的人生轨迹，他谴责艾斯勒在“我们的孩子们为了让希特勒的铁蹄不再踹向他们的脖颈而前赴后继地牺牲”之时，来美国“煽动革命”。³³

几天后，联邦当局开始准备将艾斯勒驱逐出境，但随后允许他自己离境，条件是他答应不再回美国。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登上前往东欧的飞机之前，艾斯勒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表达自己的遗憾：

“1933年，当希特勒的强盗们悬赏要我的人头，将我赶出德国时，我完全理解。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罪恶，我为自己被赶出国土而自豪。但如今以这么荒谬的方式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国家，却让我心碎。”³⁴

接下来的一连串听证会在几周后的1947年10月举行，得到的关注远比艾斯勒的听证会多得多。“城里最热闹的大戏”已经拉开帷幕，这一次的主演可不是无助的作曲家，而是电影公司导演、电影明星和编剧这些大人物了。³⁵ 针对他们的诉讼将代替国际大事出现在各大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

听证会的第一天，当委员会主席在集会大厅宣布开会时，会场中座无虚席，许多旁听者不得不站在走廊上。灯光再次为现场的八九台新闻摄影机打开，因为灯光太亮，几位摄影师乃至一两位证人都不得不戴着墨镜出庭。当编剧们出庭作证，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允许共产主义者影响美国的电影内容时，重头戏开始了。³⁶ 这一群人的核心人物以“好莱坞十人”之称闻名遐迩，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或前共产主义者，包括海明威的熟人阿尔瓦·贝西和小瑞因·拉德纳（Ring Lardner, Jr.）。海明威和贝西是在西班牙的战场上相识的，也是在那里，他还结识了拉德纳的儿子吉姆，后者后来在战斗中牺牲，海明威为他写了感人的悼文。

比起颠覆国家的指控，十人在庭上的表现吸引了更多媒体关注。他们得到美国共产党的指示之后，搭建起了自己的政治舞台。³⁷ 他们的陈述和委员会的指控一样振振有词，也同样误导听众。海明威的另一个熟人约翰·霍华德·劳森引发了现场最大的骚乱。他长着一双明亮的棕色眼睛和“大鹰钩鼻”，身材矮小但充满活力，对“太阳底下的每一个话题都不乏极端有力的观点”。³⁸ 有些人记得他充满激情和

天分，但在大多数党员看来，他是一位自以为是的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纪律的古板执行者，毫无幽默感。³⁹

劳森引用美国宪法在证人席上发起了回击：⁴⁰

斯特里普林先生：请问您是电影编剧协会的成员吗？

劳森先生：在这里提出任何关于成员资格、政治信仰或归属的问题……

主席：……（您）是共产党员吗？

劳森先生：我只用一种方式来组织我的回答，任何美国公民在回答一个公然侵犯其权利的问题时，只能使用这种方式。

主席：也就是说您拒绝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对吗？……

劳森先生：……我将继续为捍卫《权利法案》而战，而您正在试图破坏它。

当主席命令他们“把这个人带走”时，国会大厦警卫把劳森带到了证人席。听众有人喝倒彩，还有人在鼓掌。

最后，一位制片人、一位导演和八位编剧拒绝回答关于他们共产党员身份的问题。为此，众议员以压倒多数的346：17票判他们藐视国会。虽然两党的很多代表并不赞成委员会恐吓证人的方式，却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容忍劳森和他的同志们在听证会上制造那种场面。结果，十人面临罚款和最多一年的监禁，出狱后则又上了所谓的黑名单，从1947年11月开始，电影公司老板们宣布他们将不会雇用十人中的任何一人，除非他们声明放弃共产主义。

海明威一直在关注和研读战后政治，因为他感觉到了与他利害攸关的东西。在瞭望庄园，他的每张桌子和书桌上都摆满了他每天阅读的报纸和杂志。他的书房里到处是关于外国和军政的书。这样的选择表明，他对苏联间谍和调查局特别感兴趣。⁴¹ 这一年，从杜鲁门3月在国会发表演说，到秋天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听证会，他每天都在阅读相关新闻，思考这些事件。它们让他深恶痛绝。关于战争和政治，他对拉纳姆倾诉的个人观点始终比其他任何人透露的都要多，在一封

写给拉纳姆的信中，海明威批评了杜鲁门主义，尤其是在美国的老对手大英帝国如今已无力维持其传统的影响范围时，美国要介入帮助它的做法，更让海明威觉得荒诞不经。⁴²

跟总统的外交政策相比，他的忠诚调查计划更让海明威厌恶。作家对拉纳姆说，该计划让他海明威也深陷危局，因为他也曾经是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看似玩笑，但并非戏言。⁴³如今，海明威预言说，“在当前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过程中”，所有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大概都要被送入“集中营”。⁴⁴接下来他又以同样的口气对拉纳姆说，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友谊让将军难堪，他可以“随时公开声讨”作家。（毕竟拉纳姆还是现役军官。总的来说他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观点；或许他比自己那些兄弟军官们更开明，但大致要比他最好的朋友更靠近中庸一些。1948年，他对海明威说他通常更喜欢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对华莱士其人没什么好感。⁴⁵）海明威讥讽地说，或许有一天谜底揭开，他结交拉纳姆和他的军团“是为了获取……机密……（并）传送到莫斯科（原文如此）呢”。他知道战前他一直被认为是个“危险的赤色分子”。战争期间他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因此被看成是个“还算可靠的人”。但是，他最后说，既然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服务获得任何官方认可，很可能他最终还是要遭到迫害。

海明威的头脑中既有事实，也有想象的成分。美国左派没有进集中营。好莱坞十人的确进了监狱，但那也是他们激怒委员会在先。美国参战之前，调查局的确记录了海明威同情左派这一事实。他对西班牙共和国事业的支持——如亚伯拉罕·林肯营和某个“援助西班牙民主的……共产主义委员会”——一直是该局的国内安全档案中记录的事项。⁴⁶珍珠港事件之后，哈瓦那大使馆的官员为他们利用海明威运作骗子工厂的计划而接近调查局，激起了该局对海明威的兴趣，因为他不停地招惹调查局的特工，对乔伊斯和布雷登抱怨他们，有一次还写了长达14页的长篇大论指控一位名叫诺布洛的特工同情法西斯。直到海明威试图把诺布洛驱逐出古巴之后，胡佛才命令他的人总结一下调查局获取的关于这位作家的情报。⁴⁷结果是一份事无巨细的总结材料，标注日期是1943年4月，其中包括关于作家的所有公开和保密信息，最终的结论是，该局“所获得的情报无法确切指向他（海明威）与共产党有联系，或表明他本人现在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⁴⁸

到这时，调查局已经建立了一套关于海明威的官方档案，编号为64-23312，其中包括他多年来被报道的事件，或者调查局某位代表碰巧在一份报告中包含的信息。⁴⁹ “64”这一类别是“外国杂项”，是包括古巴在内的一个笼统的类别。档案中很多信息都是关于骗子工厂与调查局在古巴争夺地盘，以及海明威是否有资格从事情报工作的。其他文件反映出该局担心海明威有可能在即将出版的某一本书中批评调查局——胡佛一直在努力避免这种事件发生。档案中有几份文件是其他文件的延伸，诸如关于亚伯拉罕·林肯营老兵的那一份，或者关于因为被指称同情共产主义而对古斯塔沃·杜兰的深入调查，在他们看来，那远比海明威的“自由主义”严重得多。

64-23312号档案不是反间谍或国内安全档案，其内容表明，调查局并没有以任何系统的方式监视海明威，或因怀疑他犯下了某种类似间谍的罪行而对他展开调查。⁵⁰ 数年后，在1955年7月，一位调查局雇员会查看回溯至1938年的一系列档案，结论是“调查局没有进行关于标题项下这位个人（海明威）……的任何调查”。⁵¹ 调查局的确从来都不怎么喜欢或信任海明威，但他早在1942年便声称美国政府因为质疑他的可信度而一直监视他，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⁵² 战时每个人的邮件和电话都要经过审查，他也一样，但没有人把他单独挑出来特别对待，也没有人在纽约或哈瓦那跟踪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947年6月，海明威来到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接受了一点对他战时服务的官方认可：来自美国军方的一枚铜星勋章。授勋仪式的照片显示，他那天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瓜亚贝拉衬衫，那是古巴人为出席正式场合穿的一种绣花的西装衬衫。一位陆军上校身穿A类军装——一件卡其外衣和领带，身披军功绶带——面带笑容地凑上前去，把勋章别在瓜亚贝拉衬衫上，很可能有一名随员刚刚宣读过嘉奖令，表彰这位战地记者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从7月20日到9月1日，以及随后的9月6日到12月6日在法国所做的工作，包括他在朗布依埃与戴维·布鲁斯在一起，以及攻下巴黎之后和22步兵团在前线的那段日子。⁵³ 嘉奖令表扬他“熟悉现代军事科学”并“在战区的枪炮下通行无阻”，只为让“读者获知关于前线战士们的艰难困境和凯旋的生动图景”。

然而这些赞词并没有让海明威高兴起来。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拘谨，似乎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对。他接受了勋章和适合装裱的嘉奖令，把它们和自己的私人文件一起保存在瞭望庄园，然后几乎立即写信给拉纳姆，对他说“铜星勋章这件事非常古怪”。他不知道背后有

什么内幕，谁在体制内促成了这件事或起草了嘉奖令——但他觉得那是“一篇很狡猾的文字”。⁵⁴ 部分问题在于，海明威想要一个更高级的嘉奖，能够反映他在战场上的卓越功绩，类似于卓越服役十字勋章，他常说某个战情局官员代替他在朗布依埃获颁了一枚该勋章。⁵⁵ 或许他觉得卓越服役十字勋章能够为他一雪前耻：这位曾经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不仅签署声明发表演讲，甚至还曾与内务部签过盟约。

没有卓越服役十字勋章，生活仍像往日那样继续。9月，他写信给拉纳姆说他再次感到“自己真是倒霉（沮丧），灰心丧气”，来自华盛顿的政治消息也“很悲观”。⁵⁶ 他说自己已经受够了战争，这是在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他不赞成杜鲁门政府针对苏联人采取的日益强硬的政策。⁵⁷

不到一个月后，他看到盖尔霍恩发表在10月6日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的谴责非美活动委员会针对德国作曲家艾斯勒的文章，他表扬了盖尔霍恩，宣称文章“写得很好……她最擅长为捍卫自己的信仰而战。……”⁵⁸

1947年11月，他为拉纳姆分析了好莱坞十人的听证会。他得出的常识性结论是，“整件事都很不体面……共产主义者和委员会都是胆小鬼”。⁵⁹ 他猜想他们大概心怀愧疚，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很“堕落（原文如此），没有尽全力好好写作”——也就是说，不好好创作小说而去写电影剧本——而后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信仰了共产主义。这是老调重弹，海明威常常会谴责作家们放弃人格独立和艺术良知，到好莱坞去把自己出卖给电影公司。

接着海明威话锋一转，说他自己如果被委员会召见又会怎么做。在否认了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之后，他会宣称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在我看来都是狗_种（原文如此），我会一字一顿地对着麦克风把这个词说出来”。⁶⁰ 他会在总结陈词里说他“深深地鄙视他们”，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也都会鄙视他们，在过去的三十年，他知道的诚实正派的国会议员只有四位。

委员会没有给海明威机会来华盛顿对峙。虽然非美活动委员会也保留了一份关于这位作家的档案，有点像那份调查局的档案（调查局

档案的部分内容被传给了非美活动委员会，因为这两个组织经常会展开合作）。那都是些关于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以及曾并肩战斗过的那些共产主义者的花絮。不过和调查局一样，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也根本未能证明海明威本人是个共产主义者，更不要说是苏联间谍了。很有可能因为这些，以及他的显赫名声，才保护他没有受到传唤。毕竟，欺负艾斯勒或者跟劳森这样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者正面冲突是一回事，而让海明威这么一个美国偶像站上证人席就是另一回事了。⁶¹

好莱坞十人也没有乖乖地安静退场。他们在证人席上的行为受到了好莱坞很多持温和观点之人的反感，但仍有其他人愿意代表他们提出抗议。⁶² 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提出买下整版报纸宣传他们，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著名作家都同意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宣传广告上。⁶³ 海明威的老朋友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公开批评委员会，反对它做出了貌似合法的判决而没有为受害人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最后还说这对自由的破坏“比地球上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要严重。⁶⁴

其他几位老朋友都极力劝说海明威伸张正义，最固执的当属米尔顿·沃尔夫。两人在西班牙相识时，沃尔夫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战斗老兵，即将指挥国际纵队的亚伯拉罕·林肯营。海明威喜欢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在文章里称赞沃尔夫“和林肯一样高大瘦削，和葛底斯堡那些战斗营里的任何战士一样勇敢善良”。⁶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加入了美国陆军，为战情局服务，传说他是一名“狂暴而激进的军官，是抑郁症和布鲁克林自由主义的产物……（还是）一个持不同意见者、不断制造麻烦的人”。⁶⁶ 战后，他继续反击西班牙残存的佛朗哥法西斯势力。⁶⁷ 他是个不知疲倦的组织者、写作者和演讲者，不止一次站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讲坛上。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本来完全可以加入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他都跟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也经常咨询党领袖的意见。如此积极活跃，他理所当然地在调查局和非美活动委员会保存的颠覆者名单上占据着重要位置。⁶⁸

沃尔夫和海明威的友谊时断时续。两人在西班牙曾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但两年后，沃尔夫加入了批评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书写共和军暴行的左派行列。海明威狠狠回击，说沃尔夫就是那把在背后刺向朋友的“尖刀”。⁶⁹ 几天后海明威道歉说他不该给这位比他小

得多的年轻人写“那么不留情面的一封信”。他想收回自己所说的话，并祝沃尔夫事事好运。⁷⁰ 一个说法是海明威后来还借了很大一笔钱给沃尔夫，后者立即发电报表示感谢，但接着说他仍然觉得海明威的那部新小说是“一本极糟的书”。⁷¹

1946年夏，沃尔夫先是来找海明威，请他支持即将召开的亚伯拉罕·林肯营十周年纪念大会，并提出给欧内斯特“主席职位”。⁷² 沃尔夫后来又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给海明威——在1946年，那可是个昂贵的提议——但他很失望，海明威总是在改变话题，更喜欢聊他1944年在法国的战场上如何发挥了威力。⁷³ 为确保沃尔夫了解了他的意见，海明威于7月26日把答案写在了信中：他忙着写小说，没时间担任“一个政治会议”的主席一职，也不准备在不是他本人起草的信件上签名。⁷⁴

海明威也让了一步，同意为沃尔夫录制他为吉姆·拉德纳所写悼词的录音。他于1947年初录制了那盘录音带，还加了几句话，说他因为曾与其他“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并肩战斗而备感自豪——因为曾前往西班牙，较早参与了反法西斯战斗，海明威等人被冠以这一名号。⁷⁵

然而除此之外，他现在不打算再介入此事了。1947年5月，沃尔夫发了一封电报给海明威，请后者参加9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一两次纪念活动：“我们需要（那些）跟西班牙人民的（那次）战斗联系最为亲密的人。请答应我们的请求。”⁷⁶ 没有记录表明海明威回应了这一请求。他没有参加任何一次活动，未来数年，他将跟美国大陆上的政治保持距离。⁷⁷

第十二章 冷战：不再豪言壮语

“金发女王揭秘赤色圈”：1948年7月21日，纽约小报纷纷冠以类似的通栏大标题，宣称一个神秘女人将尽其所知，揭秘美国的苏联间谍故事。¹ 几天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求这位“金发女王”到华盛顿出庭作证。

告密者就是瓦萨学院毕业生伊丽莎白·本特利。与小报编辑的想象不同，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虽然只有40岁，她已是一副主妇模样，两眼间距很宽，高额头，下巴肉嘟嘟的。她在听证会上穿着黑色套裙，里面是带花边的套头衫，还喜欢在脖子上戴一串很紧的珍珠项链。然而这位前共产主义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似乎对满屋子的听众无动于衷，更不要说被她指控为苏联间谍的那些男女名流们投来的敌意。四周每一个能立足的角落都有新闻记者站着或蹲着，“在照相机闪光灯的照耀下……在广播电视线路开播信号的闪烁中，本特利小姐从容地阔步走向证人席，宣誓之后，因为强弧光灯太热，她擦了擦眉毛上的汗，便开始讲述她的故事”。²

她指名道姓的美国间谍的数目触目惊心，他们的职位也一样——从白宫到财政部到国务院到司法部，甚至还有战时的间谍机构战情局。她对委员会说，多诺万将军的助手之一、一位名叫邓肯·李（Duncan Lee）的战情局官员，曾给过她一份情报，那是他放在将军的收文篮里的情报，知道给了她之后，它将被放入莫斯科的另一个收文篮里。

整个作证过程中她唯一显得不那么从容的一次，是有人问起她为之工作并狂热地深爱过的那位苏联间谍头子。那人就是雅各布·戈洛克斯，也就是曾在1940年到1941年冬天招募海明威的那位老布尔什维克。³

伊丽莎白·本特利是个“保险开关”，甚至是苏联人的代理谍报人员。也就是说，她代表内务部与美国间谍会面。她住在纽约，每隔两三周乘火车去一趟华盛顿，在整个城市的大小饭馆和公园里与她的联络人见面。几乎没有谁会注意到，更不会记得这位样貌平常的中年女人和——比方说吧——某一位社会地位突出的战情局官员或政府高官一起坐在威斯康星大道的马丁酒馆（Martin's Tavern）和乔治城N大街的某个凳子上。会面之后，她会把他们的秘密放进一个大号的手提包，有时如果文件较多，就会放进一个购物袋，带着这一切回纽约，转交给她的内务部联络人。从1941年一直到他1943年去世，她搜集到的一切情报都会传到雅各布·戈洛斯那里，他是苏联间谍活动在东岸的中流砥柱。

本特利不只为戈洛斯工作，还邀请他到自己位于纽约西村巴罗街58号那间简朴而舒适的公寓里，1941年，那个地址还远没有50年后那么诱人。这座红砖联排住宅的好处之一是它有个壁炉，可用于烧毁他们工作产生的那些文件纸张。戈洛斯是个很不错的间谍，但总会把加密的信息写在小纸片上放进口袋里，把秘密文件藏在世界旅游公司的一个保险柜里，也就是他和本特利共事的那家位于第五大道的旅行社。他告诉了她一些秘密，但并非全部。虽然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乃至有人开玩笑说那是“布尔乔亚的罪孽和列宁主义的福佑”，她在证词中说他会“守口如瓶”，只把自己认为她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她。⁴

由于她没有参与海明威行动，她不需要知道与海明威有关的事，可能也从未听戈洛斯提到过他。海明威大概也没有从本特利的证词中认出戈洛斯。的确，他认识戈洛斯时，他大概不叫那个名字（戈洛斯第一次见到本特利时自称“蒂米”）。当时这个俄国人的照片很少（现在也不多），而且本特利要到三年以后才会把他所有充满爱意的印象公之于众，说他是有一双蓝得惊人的眼睛和“火红色头发”、长相不凡的矮个男人。⁵ 不过海明威知道，她的证词表明当前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政治大环境，以及委员会有多迫不及待地揭秘苏联间谍，即便其中有些人从未出卖过任何官方机密。

7月28日，关于本特利的报道见诸报端后，海明威写信给拉纳姆说，他知道时代已经变了。“过去”，他海明威想要情报时，会随时去找“某个位高权重的老毛子”，苏联人也愿意跟他分享“保密”情报。⁶ 然而，他接着写道，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到一个老毛子

了”，此时他恐怕想起了1945年他从欧洲回来之后，那位在古巴跟他联系的苏联间谍。原因是美国人已经不再信任任何共产主义者。自从美国政府跟他们开始冷战以来，他也避免跟他们有“哪怕是社交联系”。海明威用辩解的语气再次谈起信任和忠诚这些熟悉的话题。他声称自己就像19世纪的登山探险者吉姆·柏瑞哲（Jim Bridger）一样，在印第安部落和入侵的殖民者之间调停。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柏瑞哲的忠诚；大家都信任他，因为他就代表着忠诚可靠。他海明威一生都努力让自己“忠诚可靠”，那是他“在世间最……希望获得的品质”。

接下来的几个月，海明威会重复这些话，他在一封信中对拉纳姆说，无论何时只要祖国召唤他拿起武器，他都会为捍卫它而战斗，这仍然是他唯一的信仰。⁷ 他后来用几个字对拉纳姆总结道，他，欧内斯特·海明威，“绝不是他妈的卖国贼”。⁸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表演仍在继续。本特利和另一位前共产主义间谍，《时代》杂志编辑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仍在指认曾为苏联人做过间谍的美国人，被指控者愤而回击，坚决否认这类会让他们失去工作乃至生命的指控。海明威从前在财政部的熟人、曾经促成他1941年中国之行的助理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于1948年8月13日出现在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说他“从来不是个共产主义者，那根本不可能”，还说他做人的原则“（让他）不可能做出任何不忠于国家的行为。……”⁹ 和劳森一样，他也援引了宪法和《权利法案》。他的信念是“美国的信念”：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新闻自由。……我认为这些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把它们看成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坚信它们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纸空文。……

三天后，怀特死于心脏病发作。他死后找到的文件显示，怀特毫无疑问不仅曾将美国官方机密传送给内务部，还试图在为建立战后财政体系做基础工作时，既促进美国的利益，同时也保护苏联的利益不受侵犯。他既是个活跃的间谍，也是个有影响力的特工。如有机会，他或许会在辩护词中对斯大林的罪行轻描淡写，并说苏联和美国必将携手并进走向未来。他或许还会辩称，他并没有听令于苏联人（至少没有听很多），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跟他们合作的。¹⁰

1948年秋天，关于自己与苏联人的关系，海明威对拉纳姆仍欲言又止。11月24日，他暗示因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共和国事业所做的某些“杂活儿”，现在有危险了，“那些工作中的任何一件如今都可能让你丧命，但我做任何一件事时，从没有一次对我自己的国家不忠……”¹¹ 他暗示有些“杂活儿”是为苏联人做的，而不仅是为共和国，他写道：“我跟老毛子的所有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从来没有隐瞒过你。”他再次重申，他从来没有不忠于国家，又说他知道“何为忠诚，何为背叛”。最近发生的事表明那些他所谓的“盘问者们”——想必是调查局，其中有些人是同情佛朗哥的罗马天主教徒，还有调查局的跟屁虫非美活动委员会——不大可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法西斯。他们不会透过表面看本质，了解他归根结底是个忠诚的美国人，“内心纯净”。为此原因，他得小心才是。

两天后，他再次写信给拉纳姆，这一次是关于对一个好友的忠诚调查，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说在那个时候，“关于谁知道些什么，再小心都不为过”。¹²几周后，海明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对拉纳姆说有些事他不想再写了，因为他“信不过任何邮件、电话或无线电”。¹³

海明威在信中有没有对拉纳姆道出实情？将军能否相信作家的话？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应是肯定的，但同时也很复杂。在西班牙，正如1944年的法国一样，他或许曾规避过几项规章制度，超出了外国记者的本分，但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即反法西斯，也获得了他所谓的“内幕”（true gen，皇家空军俚语，意为“事实真相”）。虽然他的政治观点让他显得边缘化，但在此过程中他从未对自己的国家不忠，这也确是事实。作家的确有些事情不愿告诉读者，但他无须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感到羞耻。

海明威省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没说，那就是他与苏联人会面不仅仅是为搜集情报。这不仅事关西班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后者无关。1940年到1941年的冬天，在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他同意与内务部携手对抗法西斯，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苏联间谍秘密会面。他是否故意对自己的国家不忠并不重要。他与内务部的关系是他根本无法解释清楚的，特别是对非美活动委员会或调查局，调查局不仅对他的政治观点念念不忘，还对他1942年和1943年在哈瓦那对该局特工的侮辱耿耿于怀。

归根结底，他顾虑多多，又心事重重。关于自己曾经是一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海明威可以对拉纳姆和其他一两个人说出他的顾虑。但他与内务部的关系这重心事只有他和苏联人知道，没法跟任何其他人分享。更糟的是，海明威不得不担心总有一天会有一个投诚者，另一位碰巧知道他的秘密的古琴科或本特利，会把这个秘密告诉调查局或非美活动委员会。他怀疑调查局监听他的电话、截获他的邮件，或总有一天会让他站在集会大厅的证人席上，被委员会成员纠缠不休，这些不是荒唐的想象。他想象自己像约翰·劳森和好莱坞十人那样反唇相讥，藐视国会，所有这一切会让他很难再回到自己的国家工作。

到19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会让人们安享和平的果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8月，苏联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颠覆了美国对超级武器的垄断地位。几个月后，中国大陆也落入共产党手中。毛和周掌握了政权，蒋被迫退到近海岛屿台湾去维持“统治”。1950年，斯大林主义的北朝鲜进入非共产主义的南朝鲜，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1953年。国内的赤色恐慌进一步加剧，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对共产主义者开始了莫须有的政治迫害，相形之下，连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工作都显得谨慎和专业多了。

麦卡锡似乎随意指控任何人，只要他始终占据头版头条，而根本不关心指控有没有切实的证据。1950年，这位参议员开始日益耸人听闻地指控，无休止的调查和听证会一直持续到1954年。1950年3月，他根据“官方的情报报告”，指控海明威曾经的密友古斯塔沃·杜兰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¹⁴ 这迫使杜兰雇用律师，用几个月的时间为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之前、期间和之后的记录辩护。几位共同的好友如斯普鲁尔·布雷登大使也宣誓为杜兰辩护，报道登上了《纽约时报》。虽然海明威究竟对此做何反应早已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这位老新闻记者一定密切关注过杜兰的厄运。¹⁵

1951年3月，两位美国共产党员朱利叶斯（Julius）和艾瑟尔·罗森堡（Ethel Rosenberg）因参与窃取美国原子弹机密并将其传递给内务部而在纽约出庭。在审判中，伊丽莎白·本特利出庭作证，说她的情人、海明威的招募人雅各布·戈洛斯曾经密会朱利叶斯。这不是关键事实，但它坐实了案子，特别是在她宣布美国共产党“只为莫斯科的利益服务，不管是宣传还是谍报还是颠覆活动”之后。¹⁶ 审判期间，本特利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麦考尔》（*McCall's*）杂志。那年

夏天，该杂志开始发表她的回忆录的长篇节选，其中有关于她与戈洛斯一起生活的轰动细节：她如何“加入地下组织”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他如何招募她从事“特殊工作”，她如何“被赤色间谍网利用”，他如何在1943年感恩节那天死在她的怀中。¹⁷ 如果海明威仍在阅读《麦考尔》，他很难不认出6月那期杂志的明星人物，那位红头发、蓝眼睛的苏联间谍。

讽刺的是，赤色恐慌到达顶峰时，苏联间谍的威胁已经逐渐减少。由于本特利这样的投诚者和美国政府破解苏联电码的能力增强，现在为内务部做间谍的美国人数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少。¹⁸ 苏联的间谍资源已日渐枯竭，以至于莫斯科中心开始考虑重新激活很久以前的间谍，包括海明威。

1948年以及之后的1950年，莫斯科中心与华盛顿情报站之间就代号“阿尔戈”的海明威有过频繁的信息往来。1948年6月8日，莫斯科第一次问起他，随后，显然因为华盛顿没有答复，于1950年7月3日又发送了一条消息：“请确定‘阿尔戈’的当前位置，我们之前曾就此通知过你方。……”¹⁹ 中心提出了重新联系的策略，又“提醒（华盛顿）……‘阿尔戈’基于意识形态理由……被‘声音’（戈洛斯）招募加入我们的事业，对他的研究很少，且从未在实际工作中验证”。莫斯科提出“如有需要”，就把海明威的信物寄到华盛顿。²⁰ 内务部知道海明威1940年给戈洛斯的那些邮票价值重大，一直小心地保存着；只要拿出这一信物，一个不明身份的苏联人也能证明自己是如假包换的内务部行动人员。

海明威不知道内务部正在考虑他。与苏联间谍机构重新取得联系几乎是他此时最不愿意做的事。他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与1947年和1948年时相同，他仍然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总是避免批评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对朝鲜战争的感情很复杂：那是自1918年以来他唯一没有参加的美国战争，让他多少有些遗憾，随后又对战争的策略和参战将军的人选提出了诸多质疑。当前主要威胁来自欧洲平原地区，在亚洲打一场陆战有何意义？但他向拉纳姆保证，如果欧洲战争爆发，他仍然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或许这次他可以作为一名敌后游击队员，就像他小说中的英雄罗伯特·乔丹那样。²¹

国内对共产主义者的搜捕让他颇为不安。海明威继续对拉纳姆说，他认为信任和忠诚是最重要的，这些是可以感知到的一个人的基

本品质。作家声称自己对任何关于“背叛、懦弱、暗算”的话题都极为敏感，也会密切关注足以抵消这些的“优秀品质”。²² 他接着把世界分成两部分：可以信任的人和无法信任的人。一方面，他和拉纳姆绝对毋庸置疑，两人曾经“太多次为我们的政府献身”。另一方面，又有各种不可靠的组织：共产主义者、耶稣会人士，以及许多（但不是全部的）调查局探员。他最后说，很遗憾华盛顿不认可他的可靠性。即便他曾经在战争期间无私地为美国政府从事“高度保密”的工作，但他从某个内部消息源获知，迈阿密的审查者们得到命令，每两周截留他所有的邮件。他生气地说他们这样回报他所做的贡献真是没有良心。

如今，为反法西斯那样的事业献身已经绝无可能了。他在西班牙战场上结识的朋友米尔顿·沃尔夫继续逼迫海明威现身，支持他们的活动。1950年春，沃尔夫请海明威来纽约，在一次集会（或许是反对美国的西班牙政策，佛朗哥仍在那里大权在握）上说“几句勇敢的话”。²³ 海明威仍然没有参加，他似乎一直等到活动结束后才回复。他写信给沃尔夫说他太忙了，爱莫能助。集会那天他订正了几百页校对稿，一直忙到深夜才算赶上了最后期限。²⁴ 完成了校对稿之后，他又在“皮拉尔”号的舰桥上滑倒了，当时他正用鱼叉（一种为大鱼使用的致命鱼钩）呢，又摔在了一条“大支梁板”上。结果是一次脑震荡，“跟焰火表演似的热闹”，鲜红的动脉血喷薄而出，还伤到了脊椎，立即就肿起来了。他对沃尔夫说他现在好些了，想让他知道自己仍然愿意在任何从西班牙回来的人遇到困境时帮助他们。他提到了林肯营的医生、因为拒绝回答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问题而入狱的艾迪·巴斯基（Eddie Barsky）。但他，海明威，已经划清界限，不再支持任何“事业”了。那些事业往往有自己的资源，不需要他的帮助。他接着说，无论如何，沃尔夫和他的同志们一直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可以说是求仁得仁。”他们“本来就必须坚强”，现在却又在右派敌人回击时抱怨不已。²⁵

沃尔夫忘不了那句求仁得仁的话让他多么愤怒。²⁶ 他拼命地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写信回击。集会很成功，但如果海明威的支持，他们的运动会强大得多。他有“那种鼓动许多困惑的、胆小的、质问‘这么做有啥用’的群众的本领”。²⁷ 但“你没有来，没有说话，真他妈糟糕”。沃尔夫还有件事想让海明威知道，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从来就知道做一个活跃分子有何风险。他没有抱怨过自己的行动带来的后果。“请不要认为我们振臂高呼是什么求‘仁’得仁。”他们

高声反对，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只是开始，如果任由其继续，必将导致美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十年后，沃尔夫重读那些信件时，他想到了在西班牙战争中“全身心地投入战斗”的海明威和1950年与他们保持距离、算计着自己该在哪些事情上鼎力相助、在哪些事情上袖手旁观的海明威是多么不同。这样的差异曾让沃尔夫“悲从中来”。²⁸ 沃尔夫不知道，海明威仍然赞成沃尔夫倡导的许多东西。作家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弗朗哥的看法，看到像麦卡锡这样到处给人扣赤色帽子的政治家把沃尔夫这样的好人逼入绝境，他深感难过。麦卡锡虽然不是美国的弗朗哥，但也够坏的了。

在写信给沃尔夫的第二天，海明威也想去惹点儿麻烦。他打了一封信给麦卡锡参议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加上一篇后记，再次签上自己的名字。²⁹ 信本身写得杂乱无章、脏话连篇，部分内容没什么意义。但主旨很清楚。海明威一开头便质疑麦卡锡的勇气和战绩。“我们中有些人见过死人（原文如此），数过有多少人牺牲在战场上，也数过有多少麦卡锡。（牺牲的）人很多，但你不是（其中）之一。……”他说麦卡锡是“一坨屎”，邀请他来古巴跟他打一场私人拳击比赛定胜负。麦卡锡应该来跟他打一架，而不是诉诸“传票”（原文如此），但他，麦卡锡，连“打兔子的勇气”也没有。

最终，海明威很可能没有寄出那封信；一份签名的副本仍然保留在他的文件里。³⁰ 阻止他的可能是这样一个信念：对他来说，继续写作要比做一个活动家更为重要，如果以活动家的身份上了某个黑名单，他的书就无法出版了。1948年，他曾宽慰出版商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不用担心他的作品“会被定性为颠覆”。他可以“随时”宣誓他不是，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³¹ 三年后，1951年，他向A. E. 哈奇纳解释说，这些事情很复杂——这位瘦瘦的、神情急躁的年轻作家和编辑1948年才首次出现在海明威的生活中。海明威不仅需要摆脱共产主义嫌疑，还必须避免写作任何看似颠覆性的作品。他写道，他1937年在马德里创作的反法西斯作品中，《第五纵队》如今就是“一部颠覆性戏剧”。³² 在写作时它没有任何颠覆性。他接着说，但是他不想成为“一个电视新闻人物”，必须对某个不肯相信他爱国且仍然愿意为之“随时随地打击所有敌人”的“某个委员会”解释一切。他还是把时间花在写作小说上吧，别出现在那些委员会面前了。

1950年至少有两次，海明威拒绝了戏剧公司演出《第五纵队》的请求。³³ 这部他在战火中的佛罗里达旅馆写作、向一位阻止法西斯探子获得西班牙共和国情报的共产主义反间谍工作者致敬的作品，显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之作，何况它还是写间谍的。如果海明威需要跟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避免涉及共产主义间谍的话题就尤为重要。他比任何人都清楚，1950年，解释他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尚非易事，遑论他在1940年代与内务部的联系。如果他的确需要在某个委员会面前做出解释，会有人让他说出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的名字，像米尔顿·沃尔夫和尤里斯·伊文思。正如他后来对自己的朋友彼得·菲特尔（Peter Viertel）所说的，他可没时间像那些背叛过自己旧日好友的好莱坞人物那样去做“卧底”。³⁴ 或许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当阿瑟·库斯勒请求他抗议斯大林压迫东欧艺术家时，他也没有答应。³⁵

1950年，海明威出版的书绝对与颠覆国家无关。《渡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的大部分场景设在威尼斯，讲的是一个退役的美国陆军军官最后几小时的故事。理查德·坎特韦尔筋疲力尽，已经准备好迎接死神的到来。他与《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精力充沛的罗伯特·乔丹不同，后者将为一个消灭了法西斯的世界战斗到底。相反，他似乎是1945年突出部之役后的巴克·拉纳姆和海明威本人的综合体，但仍然愿意尽自己的本分。坎特韦尔是个职业军人，致力于尽全力打击祖国的敌人，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自己的个人感情如何。小说中的这位上校某一时刻的话语很像是1945年海明威跟玛丽·拉纳姆说的话。坎特韦尔说俄国人“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因此作为军人我当然随时准备好打击他们。但我非常喜欢他们，从没有遇到过比他们更好、更像我们自己的人”。³⁶

海明威希望《渡河入林》和他上一本书一样大受欢迎。但评论好坏参半。最典型的评论出现在《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宣称这本书是“他（海明威）以前的作品中最糟糕部分的合成体……（因而他）未来的创作前景着实存疑”。³⁷ 《纽约客》的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说他很难过，“这么杰出和诚实的作家”怎么会“如此拙劣地表现自己”。《时代》杂志说这本书显示了海明威，这位从前受到人们欢呼的冠军，现在已经五十多岁，“即将败下阵来”。³⁸

暴怒的海明威在1939年的华纳病史日历（就像他在1941年和1942年用于为“无友行动”记日志的那种日历）上手写了一封长达几页的信，请《纽约客》的编辑转告“阿尔弗雷德·卡津姆（或卡津）先生……他可以把他那篇评论贴在自己的屁股上”，还说他愿意提供糨糊。手稿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句子，开头写道，“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并不丢人”，仿佛只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就能捐弃前嫌，抵消从拙劣写作到激进信仰等各种不当的行为。³⁹

华盛顿的苏联间谍们注意到《渡河入林》的出版，把许多让海明威愤怒的评论剪下来，1950年10月初把它们寄到了莫斯科，大概是为了更新“阿尔戈”/海明威档案。如果他们读了那本书，那么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有关坎特韦尔/海明威多喜欢俄国人的那个段落。相反，他们向莫斯科报告说，“据说 he 现在是托洛茨基（阵营）的人了”，还“在许多文章和宣传册中攻击……苏联”。⁴⁰

这些判断实在大谬不然。自从1940年内务部的暗杀者在墨西哥刺杀了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以来，托洛茨基派大多只存在于内务部的想象中，这个词本身仍然是对该政权的敌人的笼统标签。（在当时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者”也是这样的一个标签。）把海明威标记为托洛茨基派，无疑是为了扑灭对这位作家的兴趣。即便内务部中有人曾在1950年后考虑过海明威，也从未有过任何记录。没有证据表明内务部考虑再次与他取得联系，或者让他本人与另一位苏联间谍会面。⁴¹ 然而这位作家-间谍本人对西班牙、内务部和调查局的记忆却从未曾消逝。

第十三章 没有操纵空间：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古巴和凯彻姆

1958年春，海明威在一个天气糟糕的日子带玛丽从古巴北岸出海打鱼。这本身就很罕见：通常，海上惊涛骇浪时，他都会把“皮拉尔”号泊在锚地。玛丽看到守船人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Gregorio Fuentes）把“不怎么新鲜的鱼饵挂在鱼钩上”，就更惊讶了——那些都是过了保鲜期的鱼饵，这两位严肃的渔夫通常都会把这样的鱼饵扔掉的。尽管如此，支好了舷外托架，“皮拉尔”号看起来可以去打鱼了，海明威便驾船出了海，一直开到离岸约10英里看不到陆地的地方。¹ 他请玛丽掌一会儿舵，他和格雷戈里奥要“干点儿事”。

她看到他们走下去打开抽屉，“猛拉开铺位”，翻出各种各样的重炮、来福枪、短管猎枪、手榴弹、神秘的霰弹筒，还有成链的子弹——此前那么多次出海，她居然就睡在这些致命武器上面，幸亏她对此全然无知。这时它们全都被扔进海里。武器太多了，足足花了三十多分钟才把它们全都扔下船。

海明威没有告诉玛丽那些装备是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藏在“皮拉尔”号上。格雷戈里奥后来声称海明威让他把“为革命运动储备的武器”藏在“皮拉尔”号上。² 所以两人是在处理他们支持卡斯特罗的证据么？海明威当时只是告诉玛丽说那些隐藏起来的武器都是“过去留下的东西”，可能是1942年以后的任何时候，反正现在用不上了。³ 她自言自语说，这么一大堆武器怎么也得值“好几千块钱”，他眼神黯淡地回答说，“这是我对革命的贡献”，还说，“我们这么做，或许救了几条命呢”。⁴

他指的是曾经参与为卡斯特罗的运动筹资，还是为其购买武器？抑或他只是想一旦法律和秩序崩溃，不要让这些武器落入强盗之手？但他什么也没有解释，他这人喜欢秘密和阴谋，或许哪天又会在信中

说自己与革命的关系“很复杂”，他让玛丽发誓保密，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⁵

如果说《渡河入林》算不得颠覆国家，海明威出版的下一本书就更与颠覆无关了，遑论政治或战争。这本书在市场上也打了一个翻身仗。《老人与海》是一部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贫苦古巴渔夫独自为生存而战的故事。在自己那条小船上84天一无所获之后，他搏斗三天，终于捕获了一条马林鱼，却在带着这条大鱼回家的路上，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鲨鱼分食。到岸时，他只有一副马林鱼的骨架可以彰显自己的胜利。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圣地亚哥/海明威对读者说的那句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圣地亚哥打了一场胜仗，以优雅的风度面对苦厄，在精神上得以凯旋。

有几位评论家对这个寓言故事不以为然，认为它“空洞”而“煽情”⁶——但这一次这本书真的获了奖，它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文学奖。一年后，海明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他一生的文学成就，但在正式颁奖词中特别提到了《老人与海》。十多年前他曾险些获得普利策奖，但遭到了委员会主席、保守人士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否决，此人极不喜欢《丧钟为谁而鸣》。其后那些年，作家很不开心地看着不少竞争对手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有些人在北美根本没什么名气。1953年该奖项居然因其书籍和演讲而颁发给了温斯顿·丘吉尔；看到这位老朽的英帝国主义者获奖——还是文学奖！——海明威一定恨得咬牙切齿。然而现在，诺贝尔委员会终于选择了一位职业作家，因为“他精通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的影响”。⁷

诺贝尔奖无疑是最有威望的文学奖项，战胜了所有的评论家、怀疑者和竞争对手，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纷纷发来贺信。海明威保存了很多涌入瞭望庄园的信件。瑞典演员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写信说瑞典人明智地把奖颁给了海明威，“总还不算太蠢”，落款是“爱你的玛丽亚和英格丽”（英格丽曾在电影版的《丧钟为谁而鸣》中扮演罗伯特·乔丹的情人玛丽亚）。一个名叫比尔·艾伦（Bill Allen）的朋友赞扬海明威向大家展示了“真理的重要性”。伟大的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本人就是个性格多面而富有创意的怪人，他给海明威发了一封三个字的电报：“真棒，老爹，真棒！”⁸

但海明威并没有感觉很棒。他没有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而是寄了一篇获奖词，抒写了他奉献一生的职业的黑暗面。他在开头写道：“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也是孤寂的生涯。”⁹ “一个在稠人广众之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自然可以免除孤苦寂寥之虑，但他的作品往往流于平庸。”但他还是应该永远努力去创作“那些从未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东西”。

海明威对委员会说他因为健康问题无法旅行，这并没有夸张。他一直就很容易受伤，最近几年，他有好几次都伤着了头。1950年在“皮拉尔”号上的那次事故，就是他跟沃尔夫说起的那一次，比他透露的更加严重，那以前他在二战中至少有过两次严重的脑震荡。1954年1月，他在非洲，24小时之内经历了两次坠机。他包租的观光飞机先是在乌干达的默奇森瀑布附近茂密的灌木丛中强行着陆。海明威遭受了轻微的脑震荡。然后前来救援他和玛丽的飞机又莫名其妙地坠毁，在落地时燃烧起来。为了逃生，海明威生生用头撞开了机门，大大恶化了先前的那次脑震荡。3月的一次检查显示，他的身体状况还很糟。他对哈奇纳说，“肾脏破裂——肠道坏损——肝部重伤——严重脑震荡——双腿、腹部、右臂、左手、头部和嘴唇烧伤……（还有）右臂和肩膀脱臼了”。¹⁰

海明威再也没有从这些伤痛中完全康复。朋友和传记作家们会回望1954年，说从那以后，他开始走上了不可逆的下坡路，事故和意外加速了这一进程，各种疾病和深度抑郁雪上加霜。¹¹一想到他的作品每况愈下，他就整晚睡不着觉。当然还有他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暗示过的另一种恐惧：他作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过去总是困扰着他，还有，虽然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有朝一日调查局还是会找上门来。

至少在1957年前，古巴一直是海明威的避风港。每次艰难旅行之后，这位日益为盛名所累的小说家都会回到瞭望庄园那熟悉的日常状态中，过去那里一直是他休养身心之处。他仍然在上午写作，站在卧室窗前眺望窗外树木葱茏的青山，午饭后在泳池中游半英里，或者驾驶“皮拉尔”号出海，进入湾流去拖钓马林鱼。在天气不好、鱼不咬钩的日子，他还可以去射击俱乐部，或者偶尔去村里看看斗鸡。晚上，他会和交往很久的古巴朋友一起在晚饭时聊很长时间，也会去市中心的佛罗里达酒馆拜访美国人，古巴朋友们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佛罗里达酒馆如今装上了空调，在一道墙边的壁龛里竖起了一座它最有

名的常客的半身像。华盛顿和纽约发生的事件到底隔着大海，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不过他对古巴政治也并非完全不关心，到1950年代接近尾声时，这里需要他投入的关注越来越多了。

1952年3月，前古巴陆军中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夺取政权。他声称要建立一个“自律的民主国家”。这成了一个窃国政权的弄虚作假之词，政权的主要政策变成了巴蒂斯塔及其亲信中饱私囊的工具，同时安抚外国投资者。美国既是不错的同盟，也是主要贸易伙伴。不少美国公司在古巴岛上都有业务。黑手党也一样，他们经营的赌场和酒店让哈瓦那成为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胜地，颇让美国人向往。总之，但凡有任何民主或反帝纲领的左派，都把巴蒂斯塔当成首选目标。反对派团体不久就开始攻击他的政权了。

巴蒂斯塔攫取政权时，25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领袖了。这位激进的律师曾试过很多类型的激进活动。1947年，卡斯特罗卷入了时运不济的征程，目的是推翻附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右翼独裁者拉斐尔·特鲁希略（Rafael Trujillo）。虽然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直到1960年才首次见面，但他也支持那次远征，为其组织者提供建议，或许还提供过资金支持。他写信给拉纳姆说他原本还希望更多地参与，无奈他太忙了，要照顾重病的儿子帕特里克。¹²

卡斯特罗继续以民粹主义纲领在古巴竞选公职，甚至还曾对政权合法性提出质疑，直到最后，他确定推翻巴蒂斯塔的唯一方式只能是武装斗争。1953年，这一决定导致他对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兵营发动了著名的袭击，作战失败了，但卡斯特罗的神秘感却不减反增。在其后的审判中，卡斯特罗宣布总有一天历史会赦免他被指控的罪行，很快，那些话就变成了一种战斗口号。

巴蒂斯塔把卡斯特罗监禁到1955年，那年这位独裁者以为卡斯特罗不再对他构成威胁，就释放了他，铸成大错。卡斯特罗逃到墨西哥去谋划他的下一步行动。1956年底，他和一小队战士乘坐“格拉玛”号（Granma）二手美国舱式游艇在古巴海岸登陆，最终来到了奥连特省崎岖偏远的马埃斯特腊山区，位于哈瓦那东南几百英里处。在那里，卡斯特罗建立了自己的基地，组织了7月26日运动，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和他的队伍袭击蒙卡达兵营的日子。

起初的挫折险些让他丧命，随后卡斯特罗开始一点点建起自己的军队，一有机会就偷盗武器和弹药，在这里伏击敌人一个纵队，在那

里短暂地占领一个城镇。他不打算打阵地战，而是要摧毁政府军的信心。巴蒂斯塔落入了卡斯特罗的圈套，他动用常规部队回击，多半都小题大做了。他派遣空军轰炸怀疑有游击队营地的丛林，把一车又一车步兵派到山谷，试图把叛军围困在山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审查新闻。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谣言四起，例如1956年12月3日《纽约时报》就曾报道过卡斯特罗已死的消息。赫伯特·L. 马修斯这位曾经的外国记者如今就在该报位于时代广场的总部工作，他直觉卡斯特罗和他的运动都没有死，便给编辑施压，请求让他飞往古巴，亲自一探究竟。¹³

马修斯和海明威始于西班牙的友谊从未间断过。他们曾经一起从佛罗里达旅馆出发前往战场。《新群众》的乔·诺思曾经觉得这位前额高高的高瘦男子太超脱，太像个传统的记者，不像海明威投入的情感那么多。1938年5月发生在西班牙南部山路上的那次车祸中，诺思就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海明威跳下自己的车，抓起急救箱就开始救人生命，而马修斯则抓起记事本，慢腾腾地走到伤者跟前看看有谁可以接受采访。¹⁴

事实证明，诺思对马修斯的判断有误。他也为共和国倾尽了全力，只是做法稍有不同。这位记者只用写作的方式为共和国出力，但投入得也并不比他那位德高望重的朋友少。“只要有希望，我就会勇往直前，”他在战争结束时写道，“我觉得至少在写作中，我的战斗比战士们的更加激烈”。¹⁵ 和海明威一样，马修斯也为共和国战败而深感难过。他的心中留下了再也无法愈合的伤痛，对他其后几十年的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战后不久，马修斯写了一系列关于西班牙的著作，得到了海明威的赞赏。海明威在《两场战争与即将到来的战争》（*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的护封上贡献了极高的赞美：在他看来，马修斯是“如今还在写作的最坦白、最能干、最勇敢的战地记者”。¹⁶ 他们不仅是同事，两人在西班牙的共同经历铸成了马修斯所谓的“比回火钢还要坚固的纽带”。1952年首次拜访瞭望庄园时，马修斯觉得关于当地政治的“最佳信息”都可以从海明威那里了解到；后来那几年，他总会放心地来找这位老朋友，依靠他的帮助了解古巴的政局。¹⁷

1957年2月，马修斯再度在哈瓦那登陆时，这位57岁的老记者渴望着另一个伟大的故事，或许可以作为西班牙的续篇，最好能有个更美

好的结局。¹⁸ 他起初只是在首都四处走动，与杰出侨民和几个位高权重的古巴人会面，后来便偷偷进入了马埃斯特腊山脉。这是个危险的任务，由于政府军包围了该地区，马修斯不得不频繁交涉才能通过若干路障。但他的大胆获得了回报，最后，马修斯在一片森林空地中等待，终于见到了身材高大、“双眼炯炯有神”、长着一脸“乱七八糟的胡子”的卡斯特罗，后者阔步朝他走来，充满了领袖魅力。

新闻记者被卡斯特罗和他的未来愿景深深折服了。两人一边抽着大号雪茄，卡斯特罗一边描述着他的政治目标，他大谈自己对民主的热爱，淡化他与共产主义的联系，但并不避讳自己的反帝主张。马修斯知道自己斩获了一条大新闻。他狂喜地在会面记录中写下：“我是第一个。”当他从山里归来时，妻子南希看到他“疲惫不堪又肮脏邋遢”，但“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激动”。¹⁹

他们在古巴的最后几晚，大概是在2月18日晚上，马修斯和南希来到瞭望庄园和老朋友共进晚餐。²⁰ 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好友、海明威的家庭医生何塞·路易斯·埃雷拉，这位神经外科医生曾一度被描述为“一个（样貌）纤弱的小个子……一双手纤细修长，像音乐家的手”，他与这两位美国人有很多共同点。²¹ 事实上这位瘦小秃顶、戴着厚厚的黑色眼镜的男人绝对不纤弱。他是西班牙内战老兵，曾屡次为共和国甘冒生命和失去生计的危险。战后他回到古巴，继续行医，定期缴纳古巴共产党党费。早在学生时期，他就和邻居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友谊，那份友谊持续了一生。整个1950年代，埃雷拉一直向海明威通报卡斯特罗及其运动的进展情况。²²

那天在晚餐上，马修斯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他没有隐瞒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山区探险。他总算又有机会用自己的作品改变世界了——当年他和海明威在西班牙就怀着这样的远大抱负。只是这一次，正义的一方会获胜。几年后，埃雷拉对一个苏联调研人员讲述了他那晚听到马修斯对海明威所说的话。²³ 记者先是肯定地说卡斯特罗还活着，仍在山区的藏身处继续战斗。接着，马修斯赞扬卡斯特罗是个十分果断的人，一个能够牢牢把握住运动的人。他见多识广、饱读群书，正在对巴蒂斯塔的政权提出严峻挑战。卡斯特罗的政治观点是“很开明”的“左派”，马修斯报告说。²⁴

马修斯后来写道，他从海明威那里得到了“宝贵的鼓励”，“他永远给我以支持”。马修斯对小说家的支持感激不尽，因为关于卡斯

特罗的报道往往会让他“在美国编辑和记者中处于绝对孤立的状态”。²⁵ 海明威以这种方式影响了这位记者关于7月26日运动的观点，哪怕那时他还没有动笔写关于卡斯特罗的任何报道。

海明威本人还没有见过卡斯特罗，只是从他们共同的朋友（比如埃雷拉）那里听说过他。²⁶ 现在，他又从一家伟大报纸的经验丰富——且值得信任——的记者那里获得了实地调查的事实。对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投入反法西斯战斗的海明威来说，马修斯所描述的卡斯特罗可能已经深深吸引了他：一个与右翼独裁者势不两立的充满魅力的革命家，马修斯和海明威都对右翼独裁者深恶痛绝。卡斯特罗是个左派和反帝国主义者，但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很多政治言论都与海明威过去几年的言论不谋而合。他所进行的游击战争也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海明威曾深深痴迷的。

海明威不会知道他和卡斯特罗两人互相尊敬。卡斯特罗不仅阅读，还研究过《丧钟为谁而鸣》；他后来说，“我们把……（那本书）带到山区，它教会了我们怎么打游击战”。²⁷

一有可能，马修斯就跟南希一起飞回了纽约（南希把他的笔记藏在腰带里通过了哈瓦那机场的安检），写了几篇文章，第一篇出现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头版的明显位置。文章的副标题宣称：“卡斯特罗还活着，还在山区战斗。”²⁸ 第二篇文章淡化了共产主义者在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第三篇又旗帜鲜明起来，预言卡斯特罗的目标不光是要取代巴蒂斯塔，更是要带来彻底的社会变革。

该报道的直接影响是巨大的，余波一直持续到“数月乃至数年后”，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²⁹ 马修斯的文章把卡斯特罗的形象“从鲁莽的失败者变成了有着远大理想的侠盗”，俨然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³⁰ 一夜之间，这位新闻记者成了巴蒂斯塔的古巴反对者以及许多左派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由反法西斯战士转变为政治活动家的米尔顿·沃尔夫一直与马修斯和海明威保持着联系，他和很多人一样，写信给马修斯，说他的报道文章“让我们内心中长期压抑的渴望激动起来，那是再次为值得奋斗的理想而战的渴望”。³¹ 沃尔夫也一样，直觉地捕捉到1930年代的西班牙和1950年代的古巴之间的相似之处。

1957年，卡斯特罗巧妙利用了马修斯带给他的优势。他是个天生的宣传专家，将自己日益强大的神话形象与刚刚够格的真切事实混合起来，让他的运动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频繁的小规模袭击往往是小型炸弹，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但弄得政府及其支持者神经高度紧张。巴蒂斯塔阵营中变节的人数开始增加了。政府继续武断地下狠手回击，大量使用酷刑和杀戮。付出代价的往往是无辜者：巴蒂斯塔的士兵开始杀戮那些碰巧住在叛军袭击发生地附近的人，然后又把肢解后的受害者尸体公之于众，杀鸡儆猴。

海明威在8月中旬感受到了巴蒂斯塔的狠手。一天清晨，他的几条狗显得焦躁不安。³² 海明威的管家勒内·比利亚雷亚尔可以通过狗叫的方式感觉到它们并不欢迎来到瞭望庄园的访客。³³ 来者是八九个乡警组成的一个支队，穿着卡其装，挎着来福枪。他们满身酒气。海明威把前门开了个缝，问他们有何贵干。领头的中士说他在找“某个反对党人”。海明威说他的庄园里没有革命者，命令他们立即离开。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士兵们没有搜查便离开了。第二天早晨，作家的一条狗马查科斯死在了厨房台阶附近，头部受伤，可能就是用来福枪托打的。海明威立即前往当地卫兵驻地要求他们解释。不出所料，中士否认是他的人杀死了海明威的狗。接下来的那一周，海明威把这件事告诉了《纽约时报》，该报于8月22日报道了这个故事，让读者们了解1957年古巴生活的一丝苦楚。³⁴

为什么把矛头对准了海明威？埃雷拉医生认为，地方当局对海明威主持的许多聚会深感不安，一车又一车的古巴人经过本来很安静的圣方济各德保拉镇，前往瞭望庄园。美国人的许多客人都是左派。

（身为共产主义者的埃雷拉在海明威的朋友中并非典型；作家最喜欢的革命者和他自己一样，要更独立一些。）埃雷拉说，那些集会只有一点像政治集会，那就是大家“总是在谈论着（政治）局势……当时到处都是这样”。³⁵ 然而医生说，在大多数时候，海明威会给大家放映他从美国大使馆借来的电影，然后便和客人们坐下来聊天。埃雷拉参与的集会中至少有一次，乡警们觉得连这些也太过分了，便来到庄园与海明威对峙，后者平静地解释说他们无须担心——这里唯一的阴谋不过是喝点威士忌而已。³⁶

这些不愉快的事都在提醒作家，他在古巴的地位岌岌可危。稳妥的做法是与巴蒂斯塔保持距离，不去得罪政府，以免被引渡回国。同时，海明威又同情叛军，对他信任的人给予谨慎的支持——他向埃雷

拉提供资金支持运动，或许是为了帮助当地革命者购买和储存武器。他不想太高调地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还没有忘记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教训。

1958年，当《君子》（*Esquire*）杂志准备重新出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三部短篇小说，《告发》、《决战前夜》和《蝴蝶与坦克》时，关于那些教训的议论之声四起。这些短篇小说的主题和语言都反映了1930年代的反法西斯情绪，与1950年代的反共情绪不无冲突。（《告发》讲的是把一个熟人告发给秘密警察的故事，而《决战前夜》彰显了一个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美国人的政治思考。）海明威从古巴打电话给他在纽约的律师阿尔弗雷德·赖斯，命令他以《君子》（初版的出版商）只购买了一次性出版权为由，反对再版。³⁷ 作家强调说，他不想让赖斯“以任何政治理由”提出反对。³⁸

赖斯身为律师，从不回避战斗，一位海明威的传记作家曾说他“极为粗鲁好斗”，他于8月初在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阻止《君子》。³⁹ 他在法庭文件中提出，该杂志的行为将“对原告造成严重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⁴⁰ 赖斯力陈缘由：“时光的流逝可能对作家的作品造成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一个例子就是人们……对俄国的态度”，那是我们战时的同盟，如今“恐怕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赖斯呼应了海明威在1951年对哈奇纳所说的话：冷战开始之后，《第五纵队》已经变成一部“颠覆性”戏剧了。⁴¹

海明威愤怒地声称赖斯这是从背后给了他一击：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他对此有何评论时，他爆发了，说他后来称之为“提纯的（原文如此）猴精”的人把“把他的话安在了我的头上”。⁴² 作家跟赖斯划清界限，说他会撤销诉讼。“我的律师说的那些话，……我刚刚给他打电话，跟他大吵了一通。”⁴³ 政治恐惧促使他禁止《君子》再版的说法让他尤为不安：“如果有谁觉得我在担心任何人会在我的小说中读出什么政治内涵，那他就错了。”两周后，海明威写信感谢《纽约时报》记者为此事“一正”视听并让它见诸报端。⁴⁴ 否则，唯一留下记录的将只有赖斯的版本，那会经由美联社的报道传遍“全世界”，让读者们觉得他海明威是个“内奸，或好出风头，或两者兼有”。

并非每个人都对海明威的话信以为真。《纽约时报》的报道发表的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对海明威就没那么友善了。8月8日，该报

发表了一篇恶意戏仿之作，题目是《老人与钱》（“The Old Man and the Fee”）：⁴⁵

这位作家参加过多次战争，战功显赫，根本不关心人们如何看待他的政治观点。……说作家担心公众对俄国的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显然与事实不符。作家不关心这类琐事。

《华尔街日报》或许戳到了痛点。海明威在1950年代写给密友们的信已经表明，这是个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跟美国公众的意见保持一致的人。出于更加现实的原因，他还很在乎古巴当局如何看待他的政治观点。

那年春夏，巴蒂斯塔和卡斯特罗在古巴岛上的斗争让任何人都无法掉以轻心。卡斯特罗呼吁全民总罢工时，巴蒂斯塔授权公民开枪射杀罢工者。人们传说，卡斯特罗对此的反应是下令暗杀没有参与罢工的叛军领袖。结果，市民们纷纷远离公共场所；即便是在伍尔沃思这样的大商场，玛丽也只能看到几个顾客。⁴⁶ 海明威对近来的几起绑架美国人的案子有些担心，那是卡斯特罗的人“最近的（刚刚玩上瘾的）……游戏”。这位赫赫有名的侨民不快地开玩笑说，7月4日那天，估计卡斯特罗比美国大使更知道如何让美国人开心，他，海明威，会打电话给大使馆看看卡斯特罗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绑架调查局特工。⁴⁷ 他对玛丽说，当“整个国家没有法律”时，抢劫者们很可能会来瞭望庄园。⁴⁸ 如果再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突出他的政治形象，乡警们会不会回来彻底搜查？⁴⁹ 大概是出于这两个原因，他谨慎地扔掉了藏在“皮拉尔”号上的军火，家里只留了几件武器。⁵⁰

由于生活在古巴越来越累人，玛丽和海明威决定到爱达荷州去过秋冬。他们想念美国西部的开阔风景，觉得暂时变换一下环境会有利于身心健康。⁵¹ 8月，他们设法在凯彻姆（Ketchum）租房，10月就搬进去了。然而海明威心里始终还想着古巴。他关注着岛上的进展：暴力并没有减弱，也看不到什么和平美好的结局。11月，他一反常态地对每个人都充满厌烦。“两边都不对——都那么残暴——……事情没有好转，一切都是谋杀，”他写信给儿子帕特里克说，“我们大概会离开这里。未来前景黯淡。……”⁵²

几周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958年夏末和秋季，叛军节节胜利，使得古巴军队和警察的士气进一步消沉下去。巴蒂斯塔看到卡

斯特罗的胜利已不可避免，便决定趁现在还来得及，逃命要紧。1959年1月1日清晨，他和几位亲信在几架大型客机上装满非法所得，逃亡多米尼加共和国。拂晓时分，古巴陷入无政府状态，哈瓦那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法外之地。时而兴奋、时而愤怒的人群占领了街道。枪声四起，抢劫者们进入市中心的旅游酒店肆意破坏赌桌。在数百英里外的岛国的另一端，卡斯特罗通过广播呼吁民众冷静，他站在一辆坦克顶上，身边簇拥着十几个手下，开始向首都进发。在岛国正中央的那条大路上，欢呼的人群让他进城的速度慢了下来。当他到达首都时，庆典的规模让美国记者约翰·H. 汤普森想起了1944年巴黎解放的场景。⁵³ 然而卡斯特罗可不打算恢复原状；他计划彻底改变古巴社会。他宣布，“现在，革命开始了”。⁵⁴

斗争及与之相伴的混乱看似结束了。那些和海明威一样反对巴蒂斯塔而支持卡斯特罗的人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了。

各大通讯社追寻海明威到了爱达荷州，纠缠着要他发表讲话。玛丽在他开口讲话以前看到了他写在一张明信片背面的字：“我相信古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我对它的长远目标充满信心。”⁵⁵ 那年的玫瑰碗比赛期间，《纽约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玛丽听到海明威说，得知古巴的消息让他很“开心”。她立即责备了他；现在预测事态进展还为时过早。卡斯特罗或许已经安排好了行刑队。海明威反对她的说法，但这位在整个1950年代都要比以往更谨慎的人最终屈服了，打电话到《纽约时报》新闻室，要求把“开心”改成“怀有希望”。⁵⁶

私下里，海明威对革命的态度更加乐观。1959年1月7日，在一封写给他的意大利朋友詹弗兰科·伊万辛奇（Gianfranco Ivancich）的典型的海明威式信件中，他庆贺巴蒂斯塔离境，说要是能看到他走的样子就好了：“那个狗娘养的，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⁵⁷ 两周后，他很高兴地对一个在斯克里布纳公司的朋友报告说，“我们在古巴一切都（还）好”——瞭望庄园平安无事——他的一些朋友如今在政府机构任职。⁵⁸ 2月初，他在写给詹弗兰科的第二封信中更加乐观，宣称“一切来自古巴的消息（都是）好消息”。⁵⁹ 因为那800家在岛国投资的美国公司，新政府的日子会不好过；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搞垮卡斯特罗。但这是他的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不错的机会”，他祝愿卡斯特罗好运。

得知玛丽关于行刑队的预言应验了之后，海明威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几乎打一开始，革命者就开始处决敌人了。用一位内部人士的话说，“1月的那些天，每个人天天谈论的就是处决……战争罪犯”，大多是巴蒂斯塔警察部队或军队的老兵。⁶⁰ 独裁者逃走之后的那些天，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在圣地亚哥枪决了大约70个囚犯。两周内，政府在哈瓦那本地出台了一些更正式的程序。1月23日，在古巴居住多年的《纽约时报》的记者鲁比·菲利普斯（Ruby Phillips，她自称R. 哈特·菲利普斯，以便读者更加尊重她）报道了对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进行的首次审判秀，审讯在国家体育馆举行，有八千名热心群众出席。⁶¹

即便没有订阅《纽约时报》的人，也能从各个通讯社看到审讯的实况。在美国或英国社区附近的电影院里，人人都能看到一个为时一分半钟的新闻报道，显示了古巴那人头攒动的体育馆。第一个被指控的人是一位名叫赫苏斯·索萨·布兰科的少校，面对眼前那三位身穿士兵工作服、长着胡子的年轻法官，他平静地微笑着。一个光着脚的12岁男孩显然事先受过训练，指着索萨·布兰科说就是这个人杀死了他的父亲。男孩的话音未落，人群就高声叫嚷起来：“杀了他，杀了他！”⁶²

在3月初接受来自西雅图的专栏作家艾米特·沃森采访时，海明威为那些审判辩护。⁶³ 一个周六晚上，海明威和沃森在杜琴屋（Duchin Room）初次见面，那是太阳谷的一个很舒服的酒吧，从1930年代他第一次来爱达荷州开始，海明威就被那里的黑色镶板和深红色的装潢色调吸引了。那天沃森还在休假，正在一张桌上与其他作家喝酒闲聊呢，海明威就来到他跟前坐下了。沃森碰巧是海明威很喜欢的那种新闻记者：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很有勇气，曾经是职业棒球运动员，战争期间还在一家船坞工作过。何况两人还有几位共同的熟人，这位每天三包烟的人还懂威士忌。30分钟的闲聊非常轻松友好，但几乎没什么值得报道的。

两天后的午后，沃森又在太阳谷的一条人行道上碰见了海明威。⁶⁴ 海明威那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正打算放松一下，问沃森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太阳谷的另一家酒吧“拉姆”坐坐，喝一杯？同样是在熟悉的环境里，这一次的装潢风格是欧洲山区风格的，面对正在记录的记者，海明威很愿意聊聊卡斯特罗和古巴，获得这样的第一手新闻让沃森陷入狂喜——要知道在那以前，海明威拒绝了所有的采访。这位

侨居海外的作家一边啜饮一杯加青柠的威士忌，一边“专注地说起那个他深爱的国家”，说了一个多小时。⁶⁵

海明威直抒己见，说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仅仅是卫兵换岗。那些审判是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人们对一开始的处决潮不满，新政府下令公开审判，但仍然面临着批评：⁶⁶

外国人开始叫嚷，“这是马戏表演！”但政府必须这么做，表明它控制着时局，也让人们对法律和秩序有所敬畏。……如果政府不枪毙那些罪犯，他们也一样会被……复仇者杀死。那就糟糕了，非常糟糕。

海明威沿袭了卡斯特罗的观点，然后他说希望等到当前这一波审判和处决结束，古巴能够废除死刑。总的来说，未来是光明的。革命得到了古巴人民的支持。（他唯一担心的是，卡斯特罗大概不够强硬，无法让古巴社会恢复秩序——他请沃森不要把这句话登在报上。⁶⁷）古巴是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他期待着早日回到那个国家。

1959年3月29日，玛丽和海明威在哈瓦那国际机场降落时，有一大群来自瞭望庄园外的圣方济各德保拉镇的朋友们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到达瞭望庄园时，欣慰地看到他们“美丽的宅子毫发无损”。⁶⁸第二天，心花怒放的海明威口述了一封信给儿子杰克，重复了他对沃森说过的话：“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像我们（曾经）希望发生在西班牙的那种革命。”⁶⁹

从他们回家的那一天起，古巴革命的绝处逢生一直让海明威情绪高涨。不管在哪里，人们似乎都在纵情庆祝刚刚获得的自由。古巴“处处充满自由的热情；你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场真正的自主革命”，它独属于古巴，尚未反美或亲苏。⁷⁰海明威用心领会着这一切，每天听三次广播，阅读他能找到的每一份报纸，倾听卡斯特罗那看似没完没了的讲话（甚或乐在其中）——他一说就是几个小时，大多是关于政治形势的讲话，但一跑题，就天南海北无所不包了。⁷¹

数日后的4月初，海明威在佛罗里达饭店与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和英国电影和戏剧评论家肯尼思·泰南（Kenneth Tynan）一起，喝着“老爹的渔船”台克利鸡尾酒，聊了几个小时，两人碰巧来哈瓦那出差，目的是给《假日》（*Holiday*）杂志

撰稿。泰南记得，那天风扇风太大，弄得他很难点燃香烟。威廉斯（身穿有着银色纽扣的帆船运动服）和海明威（穿着白色T恤，头戴棒球帽）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泰南觉得东道主“状态好极了”。⁷² 其间，一位友好的新闻记者上前来，邀请泰南去莫罗城堡观看夜间露天行刑，莫罗城堡是海港旁的一座混乱而古老的西班牙式城堡。泰南婉拒了，他反对死刑，但威廉斯想接受邀请。他说，见证是作家的责任。后来泰南问海明威怎么看，后者的回答非常隐晦：“对我们而言，还是可以对某些事情说不的。”不过尽管如此，他接着便宣称卡斯特罗的革命是“一场很好的革命，一场诚实的革命”。⁷³

泰南和威廉斯不久就意识到他们采访卡斯特罗要迟到了，赶紧起身前往总统府，那里富丽堂皇的铁门如今由身穿橄榄绿士兵服的男孩子把守着。⁷⁴ 卡斯特罗因为接见两位外国作家而暂停了一次内阁会议。他们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卡斯特罗回到了当时的议题：他的首次半官方访美。他已经接受邀请，在华盛顿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讲话。卡斯特罗对美国的态度仍然很矛盾，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次访问将是他为自己的革命审判辩护的机会，或许能为良好的古美关系打下基础。

听说卡斯特罗的赴美邀请，海明威主动提出与这位古巴领导人会面，帮他事先准备好如何回答美国记者和政客可能会问的问题。他让好友埃雷拉转告这个消息，后者仍然每月来瞭望庄园吃几次晚餐。⁷⁵ 卡斯特罗本人没有接受邀请，但派了他的一位下属去听听海明威会说些什么。⁷⁶

一天深夜，埃雷拉开车带一位名叫欧克利德斯·巴斯克斯·坎德拉（Euclides Vázquez Candela）的记者从哈瓦那出城来到瞭望庄园，海明威在门口迎接他们时，口袋里还装着一把手枪，表明时局仍然不稳。巴斯克斯·坎德拉是一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不确定会从这位著名的扬基佬那里听到什么，但海明威很快就让来访者安下心来，甚至被主人迷住了。⁷⁷

海明威和客人们一起坐在瞭望庄园50英尺长的客厅里，在暄软的椅子周围，摆满了作家的著作、猎获和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背景音是轻柔的古典音乐。他们喝一种加冰的意大利白葡萄酒，用坚果佐酒。海明威拿出他准备好的笔记，开始解释美国新闻界的工作程序，应该当心谁，当前人们关心的问题有哪些。他暗示说，如果卡斯特罗

表现足够好，他可以从美国获得他想要的一切。海明威特别提到有必要解释“针对明显的叛徒的司法决定”，意即公开审判和处决，以及共产主义影响的问题。最后，在客人们离开客厅回到车里的路上，他请巴斯克斯·坎德拉向哈瓦那的那位大胡子转达他对他们的革命全心全意的支持。⁷⁸

古巴领导人的访问成为举世瞩目的公关胜利。⁷⁹ 这位33岁的革命者军服皱皱巴巴，胡子邈里邈邈，显得非常真诚可靠。卡斯特罗已经知道如何对观众施展魔力，他说话“笨拙而清晰”，有人称之为“菲德尔英语”。⁸⁰ 在美国，他主动亲近到他跟前来的任何人，平静地回答对他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他不提反帝的大话，巧妙地回避关于他的运动中有无共产主义者的问题。在中央公园乐队演奏台上的一次讲话中，卡斯特罗滔滔不绝，但对他的核心政治价值却语焉不详：人道主义和民主。唯一的不和谐音出现在他与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等官员会面时，他们上来就是一番说教，大谈共产主义有何危险。⁸¹

对海明威来说，1959年的另一个高潮是夏天的西班牙之旅。⁸² 作家和他那位不可谓不重要的随从一起观看了斗牛，他计划为《生活》杂志写一篇关于斗牛的文章。7月，他在“拉坎索拉”庆祝了自己的60岁生日，那是一座位于马拉加阳光海岸的奢华别墅，主人是狂热的斗牛爱好者、富有的美国侨民内森·“比尔”·戴维斯（Nathan “Bill” Davis）。⁸³ 那里的花园让海明威想起瞭望庄园，但那座1830年代为一位外交官而建的白色大房子则奢华得多，高高的天花板，两层都有优雅的全景阳台。

应玛丽的邀请，老朋友和家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这场长达几天的生日庆典；他们中有名人也有准名人，像巴克·拉纳姆和现在已经是大使的戴维·K. E. 布鲁斯，更不要说还有伟大的斗牛士安东尼奥·奥多涅斯（Antonio Ordoñez）及其追随者了。甚至还来了两位印度大君，一位来自库奇比哈尔（Cooch Behar），另一位来自斋浦尔（Jaipur）。小说家的私人医生和好友乔治·萨维耶斯（George Saviers）和他的妻子帕特也从凯彻姆赶来了。那次庆典苦乐参半，有歌舞、烟火、礼物和祝酒，戴维·布鲁斯还向作家致辞，赞美他“热心、刚毅而慷慨”。⁸⁴ 不过大家都要忍受（或者还要试图无视）海明威偶尔爆发，对着来宾发脾气，连他最好的朋友拉纳姆也未能幸免。玛丽简直无法忍受他当着众人的面，对她残忍地胡说八道，还有他坚持要请一些年轻女人来参加庆典，其间频频向她们投去关注的目光。

马拉加的闹剧过后三个多月，海明威去了纽约，继而回到古巴，那里的革命审判仍在继续。他再次在机场受到一大群人的欢迎，这一次不仅包括朋友和邻居，还有想让他发表讲话的新闻记者。海明威说，他不相信“外国报纸”上对革命的恶意中伤，仍然支持古巴新政府。⁸⁵ 根据古巴通讯社拉美社（Prensa Latina）的报道，“他希望古巴人不要把他看成扬基佬……而（看成）跟他们一样的古巴人”，然后就近拉过一面古巴国旗，亲吻了它。⁸⁶ 他动作太快，新闻摄影师们错过了这个动作，请他重复一次。他微笑地说自己是个作家，不是演员，便径直走了。大概20车的祝福者们一路陪他回家。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发急件向华盛顿报告这一事件，在“官方专用”栏中写道，很“遗憾”海明威这样德高望重之人“公开言明立场，显示出（1）对他自己的政府和国民的强烈批评，或（2）全然无视自今年第一天以来，古巴时局的发展”。⁸⁷

在爱达荷小住之后，海明威和玛丽于1960年1月回到了瞭望庄园。⁸⁸ 他的老朋友，《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把这解读为这位艺术家、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对革命表示支持的“刻意之举”。⁸⁹ 1月12日，海明威写信给拉纳姆说他仍然“坚信革命的……历史必然性”。⁹⁰ 他采取“长远眼光”，期待着有一天卡斯特罗能让古巴社会变得更好。为此原因，他对眼前“日复一日”的闹剧不感兴趣，那是任何人都无法佯装未见的：整个首都到处挂满了“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横幅，广播上夜以继日地谴责美国，说它是犬儒主义而凶残的“头号公敌”。⁹¹ 仿佛卡斯特罗读过乔治·奥威尔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喜欢这些集权主义的“新语”。

同样持同情态度的马修斯在3月初或中旬来到瞭望庄园午餐时，受到了热情欢迎。海明威“很高兴见到他……他们愉快地聊了一下午”。⁹² 这位记者越来越孤立，如今已经与美国的主流新闻界格格不入，但他仍对卡斯特罗充满希望，注意到后者正在推动医疗、教育和福利计划，75%的古巴人支持他。当时他所能预见的问题与其说是卡斯特罗在国内推行的政策，不如说是美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他。海明威这位曾经就如何应对美国媒体为卡斯特的助手提供过培训的人，自是点头同意。⁹³

1960年5月是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⁹⁴ 那一年一度的海明威钓鱼比赛，卡斯特罗看似从头到尾遵守

规则，捕获了当天最大的一条鱼，获得了第一名。海明威向他颁发奖杯（一个很大的银杯）时，两人聊了几分钟。卡斯特罗说自己非常喜欢《丧钟为谁而鸣》，也从中学到了很多。⁹⁵ 一个官方摄影师拍下一系列照片，捕捉到了这个时刻，照片中的两个人站得很近，低声说了几句话。卡斯特罗比海明威高几英寸，他穿着普通的绿色军装，头戴同色的帽子，几乎成了照片中最显眼的人物。海明威时而开心，时而忙着交谈，看上去像个老人，因为一绺绺白发和散乱的胡须而显得有些孱弱。他的左手上贴着一片创可贴。

第二天早上，一位送信人把一套冲印好的照片送到了瞭望庄园。海明威在其中一张照片上题了字，写着“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为了友谊”。卡斯特罗把那张照片挂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与父亲的一张照片并排挂了很多年。⁹⁶ 海明威选了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装在相框里，和其他难忘场景的纪念照一起放在瞭望庄园的一张桌子上。⁹⁷

钓鱼比赛大概要算是1960年古美关系的亮点。和马修斯一样，海明威也希望美国能选择相信古巴。相比哈瓦那，他们更倾向于希望华盛顿方面妥协。然而随着卡斯特罗日渐加大赌注，德怀特·E. 艾森豪威尔总统更是双倍下注。5月，美国中止了剩余的援助计划。海明威在瞭望庄园的助手、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勒内·比利亚雷亚尔听到了这个消息带来的大爆发：海明威“用尽了所有”侮辱的词汇斥责艾森豪威尔，说他的决定尽显“美国的独裁嘴脸”。⁹⁸ 玛丽不同意他的说法，两人生气地吵了几句，那晚便分房睡去了。

原糖进口配额的问题就更糟糕了，一直以来，那保证了古巴的主要出口商品可以在美国卖个好价钱。海明威“对耶稣”祈祷美国不会削减原糖进口配额。“那样就真的完蛋了，等于把古巴作为礼物送给了俄国人。”⁹⁹ 然而7月4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市中心举行了一次大型反美集会，当天是美国的国庆日，选择这个日子可不是巧合，两天后艾森豪威尔便削减了配额。那天，从早上六点钟开始，作家每半个小时听一次广播，简直像是希望广播过一会儿就能传来好消息。¹⁰⁰

海明威知道这是一个转折点。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也知道，他们开始建议古巴的美国公民离开这个国家。

大使亲自向海明威转达了这个建议。身材高大、出身贵族的邦斯尔也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此人做派非常传统，会在回忆录中称他的妻子为“菲利普·W. 邦斯尔夫人”，事实上他也是海明威随叫随到的老朋友了。他在进入国务院之前曾在哈瓦那的美国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工作。海明威1930年代常常跟邦斯尔一起去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度假，留下了美好的回忆。¹⁰¹ 1959年卡斯特罗当权后不久邦斯尔便成了大使，再续了他们的友谊。1960年春夏，他是瞭望庄园晚餐时的常客。

海明威年轻的爱尔兰秘书瓦莱丽·丹比-史密斯有一天跟作家和外交官一起用晚餐，听到邦斯尔转达华盛顿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但非正式的”消息。¹⁰² 他重提了大使馆在1959年11月发给华盛顿的那封急件的主题，劝说这位著名的侨民不要再替古巴革命说好话。¹⁰³ 两国的关系持续恶化。卡斯特罗似乎故意与美国政府作对，美国官员们对海明威仍然住在那里感到很不高兴。难道要他住在别的什么地方，公开反对古巴政权？海明威抗议道：瞭望庄园是他的家，古巴人是他的朋友和家人。他对邦斯尔说，他的职业是写作而非政治。除此之外，他已经一再证明了自己的忠心；没有人质疑过他对美国的忠诚。

104

邦斯尔没有退让。他用圆通而坚定的措辞重复道，他本人理解海明威的观点，但美国政府的其他人并不理解。“如果作家不准备作为公众人物言明立场的话，可能会有后果。”¹⁰⁵ 丹比-史密斯听到邦斯尔用了“卖国贼”一词。她还记得邦斯尔在接下来的那一周又来吃晚餐，再次告诉海明威“必须在国家与自己的小家之间做出公开选择了”。¹⁰⁶ 那晚接下来的谈话剑拔弩张；两位老朋友不得不强迫自己只是闲聊。两人分手时，瓦莱丽觉得她看到了海明威眼里闪着泪光。

邦斯尔让海明威在自己的小家与国家之间做出选择，还把“卖国贼”这个词抛到这位美国偶像面前，触及了海明威的敏感神经。此前几十年，海明威一直为忠诚的问题苦恼和挣扎，从西班牙内战，到那天在纽约同意成为苏联间谍，到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赤色恐慌，再到1951年他在写给巴克·拉纳姆的信中坚称，他，海明威，“不是他妈的卖国贼”。作家先是跟拉纳姆、后来又跟哈奇纳讨论这个让他困扰的话题时，用的很多词汇都跟邦斯尔的词汇一模一样。

他在古巴的确有很多好朋友，他住在瞭望庄园的时间也的确比他一生中在任何其他地方住的时间都要长，但那些不是全部。他已经把

自己对西班牙共和国未曾实现的希望转给了古巴革命。1936~1939年发生的事情仍然深深影响着他1952~1960年的思维方式；共和国成为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事业。支持卡斯特罗就等同于在西班牙反抗弗朗哥和希特勒。他的确没有像在西班牙那样亲自参与古巴的战斗，但不管他跟朋友或新闻媒体如何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远离古巴政界，他绝非袖手旁观。他的希望本来有很大的机会实现，而现在他自己国家的大使请他永远背弃那些希望。难怪瓦莱丽觉得看到了他的眼泪。

邦斯尔的劝告尤其难以抗拒，因为他是好朋友，还是试图与日益独裁的卡斯特罗找到共同语言但屡次失败的调停者。¹⁰⁷ 海明威不得不承认，大使的话不无道理。如今卡斯特罗的反美言辞过于夸张，也威胁着岛上的美国人和美国人的财产。他偶尔会在讲话中提到“像海明威这样的……美国人”的好话，说这些局外人是古巴革命的朋友。¹⁰⁸ 革命绝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¹⁰⁹ 据一位当时在古巴居住和工作的苏联学者说，卡斯特罗甚至还曾引用过作家为革命审判辩护的原话，¹¹⁰ 但这些都于事无补。

卡斯特罗的赞誉让海明威的处境很为难。他向哈奇纳倾吐说，卡斯特罗并没有骚扰过他本人，哈奇纳如今既是经常陪伴在他身边的人，也像个不拿薪水的助手。卡斯特罗可能会让海明威一直安然无虞地住在瞭望庄园。这位著名作家知道，他是卡斯特罗政权的优质宣传品。但不管他多么同情卡斯特罗，或是不管他多么希望古巴革命能弥补西班牙共和国失败的遗憾，他也不想成为受到卡斯特罗赞美的例外。当哈奇纳问他究竟为什么而烦恼时，他说看着其他美国人“被踢出去”，听着“他自己的国家（被）……诽谤中伤”，他无法安之若素。¹¹¹

1960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能加速了几年前开始的衰老。哈奇纳可以看到海明威体力渐消，那个喜欢打拳击的人瘦了，一度有力的臂膀“像被某个技艺不佳的削木工削去了一块”。¹¹² 他的肾病未愈，视力问题也很严重。或许最糟糕的是，写作也比素日费劲多了。那篇写给《生活》杂志的关于斗牛的文章越写越长，难以控制。¹¹³ 该杂志只要大概40页手稿，海明威疯狂地写了688页，哪一段都难以割舍。他不得不请哈奇纳从纽约南下到古巴来帮他，但又坚决抵制他的编辑，说出的理由让年轻作家无法信服。

7月25日，海明威、玛丽和瓦莱丽乘渡轮从哈瓦那出发来到基韦斯特。他们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离开古巴。相反，他们打算几个月后就回去，因而把很多值钱的东西都留在了瞭望庄园，也留了足够的人手看家。¹¹⁴ 海明威确保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离境，他不愿像11月那样引起关注。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他离境是为了公开反对卡斯特罗，他仍然支持卡斯特罗。¹¹⁵

在旅途的起点和终点，海明威都忧心忡忡，担心海关和移民局的手续问题。玛丽听到他嘟囔着“违法的严重后果”。¹¹⁶

海明威独自一人启程，又从基韦斯特飞到纽约，之后又在8月和9月飞到欧洲。他在西班牙的朋友们看到他过去一年居然憔悴了那么多，都大吃一惊。根据第一手调查获得的资料，海明威的首位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后来这样总结他几年后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的信息：他们都看到过作家“最消沉的时候，但从没有哪一次这么糟糕，……（出现了）极度神经崩溃的症状：恐惧、孤独、倦怠、怀疑他人的动机、失眠、内疚、悔恨和记忆减退”。¹¹⁷

8月15日，海明威写信给玛丽说他担心自己“致命的过度劳累会导致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¹¹⁸ 那个月他发了很多求助信给她，这只是其中之一。

接下来的一年，在崩溃症状慢慢显现的过程中，玛丽和忠诚的哈奇纳尽其所能地支持着海明威。哈奇纳听到西班牙传来的消息后吓了一跳，飞往欧洲陪伴他，并于10月8日护送他回到纽约。玛丽在那里接手，两人乘火车回到了凯彻姆。现在哈奇纳和玛丽知道，要照顾他们深爱的这个人，他俩的能力已远远不够，于是开始寻求专业帮助，先是到纽约咨询一位神经科医生，后来又听从了这位医生的建议，安排海明威到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梅奥诊所接受治疗。为避免公开，诊所建议他用化名登记，于是他就用了“乔治·萨维耶斯”（他在凯彻姆的医生）的名字住进了圣玛丽医院（梅奥的一家附属医院）的封闭病房，从1960年11月30日到1961年1月22日，他一直住在那里。

诊断的主要结论是抑郁，并伴有妄想症。海明威的神经科医生霍华德·罗姆（Howard Rome）医生提议电休克疗法，当时用该疗法治疗严重病例已不算罕见了。¹¹⁹ 无论是海明威本人还是玛丽签署了那份无法避免的同意书，他都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特别是在咨询过罗姆

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之后。治疗时，医生们会给海明威服用镇静剂，把他固定在一张手术台上，把两个电极片贴在他的太阳穴，让电流通过他的大脑。经过11到15次治疗，他的抑郁症似乎减轻了，但他确信这抹去了他的记忆（记忆丧失的确是一个常见的副作用）。这让这位从不需要记笔记的作家担忧起来。正如他对哈奇纳所说的，他的记忆就是他储存资本的地方；一旦资本耗尽，他就要失业了。¹²⁰

困扰还将一直继续。¹²¹ 有些是明摆的事实，就像他1959年11月从基韦斯特横穿美国去爱达荷州，买了多少加仑汽油、总共开了多少英里、时间和距离，他都一一记录下来。有些则是不折不扣的妄想。例如，海明威强迫症一般地担心瓦莱丽·丹比-史密斯的美国签证（好让她重新入境美国，在纽约学习），这继而导致他妄想美国移民归化局正在调查他，因为他担保了瓦莱丽。

还有些关于调查局的妄想。1960年10月他从欧洲回国后，一直觉得调查局在跟踪他；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没穿牛仔裤和牛仔靴，就都很可疑。（他想象调查局特工的衣着都跟他们去总部上班时一样：黑西装白衬衫。）11月，他和哈奇纳开车经过凯彻姆的一家银行，那时已经过了上班时间，银行的灯还亮着，他便确信联邦特工正在研读他的银行报告，寻找他的犯罪证据，至于那是什么罪，他从未言明。他还想象他们在他的医院病房和开的车上都装了窃听器；每次哈奇纳来明尼苏达的罗切斯特看他，他都要带着哈奇纳走到开阔的草地，才肯无所顾忌地说话，他解释说这么做是因为他写的那些“可疑的书”、他的朋友们的身份，以及他居住的地方——“全是古巴共产主义者”。¹²² 圣诞节期间，玛丽注意到他虽然不再坚持说浴室里藏着一个带着录音机的特工了，但仍然等着调查局来抓他，把他带回去审问。¹²³

他甚至担心调查局会追查他为什么化名住进了梅奥诊所。新年伊始，这促使海明威的医生采用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获得了调查局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驻地办公室的“授权”，告诉海明威调查局不关心他是否使用化名。¹²⁴ 一封标注日期是1961年1月13日、由驻地特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表明，收到医生的请求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的电报以明文发送，没有任何优先级别——不像是关于内部安全调查的电报。在原件中，档案编号为空；日期章表明那是11天后由华盛顿的一名文员加盖的。如果曾调查过“海明威案件”，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会标注档案编号的。

因为此事没什么风险，明尼阿波利斯的特工们便没有任何顾虑地回复罗姆医生，说他们对他的计划“没有异议”。¹²⁵ 他大概把消息转告给了海明威。但作家关于政府的妄想症仍然没有消失。1月中旬，他病态地写信给拉纳姆，说他那些年跟将军分享的那些“真事”（这里是指美国政治、忠诚以及苏联人的事）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了。¹²⁶

古巴仍然是1961年初时事新闻的关键词，海明威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心却从未远离古巴。1月2日，马修斯写信给海明威，哀叹岛上的局势。他谴责“革命的过激行为、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还有过分反美”。¹²⁷ 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场革命（中）有些宝贵的东西……不能丢掉”。艾森豪威尔政府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第二天就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如此造成的时局动荡让海明威十分痛苦。16日，他写信给拉纳姆说他和玛丽或许会“丧失在古巴的一切”，也许他们不会。¹²⁸ 他暗示说，或许苏联人会替他干预。不过就连这“也不适合写在信里，所以就把这些和那些我们记得的事情一块儿留在心底，但不要写出来”。¹²⁹

新年才刚刚开始，但谣言已经在古巴流亡者和美国新闻记者中传开了，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后者于1961年1月20日就职）正在计划着某种针对卡斯特罗的行动。马修斯担心海明威还没能消化他上一封信的内容——他文档的抄本上有“病得厉害，无法读信。HLM”的手写字样——因而于2月20日又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他“当然对古巴发生的很多事情觉得很难过”，想象着海明威和玛丽一定会比他更加不安。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希望中情局不要摧毁革命，他在这里再次使用了“宝贵”一词。即便中情局的行动成功了，“那也是抱薪救火”。¹³⁰

这时再叫停“萨帕特行动”几乎不可能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过去一年一直在酝酿这次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1961年4月17日清晨，一个由中情局装备和培训的古巴流亡者队伍在古巴南岸登陆了。到当天上午11点，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宣称“今天上午，古巴受到了一个由……美国（装备）的……雇佣兵队伍的侵略”。¹³¹ 有逾1400名登陆者勇敢作战，但还是被卡斯特罗迅速动员起来的部队打败了，卡斯特罗担心这次进攻已经有一段日子了。4月20日，卡斯特罗在古巴广播上宣布获胜。¹³² 《纽约时报》第二天全文刊登了他的宣言。

在所谓“猪湾入侵计划”持续的那一周，全美各地的报纸“用通常只为报道总统选举和全国性灾难的那种横跨版面的黑体大标题”报道这一事件。¹³³ 海明威和玛丽也在广播和电视新闻中得知了消息。玛丽记得他们两人对登陆点的选择“目瞪口呆”，那片沼泽地分明是捕鸭子的地方，哪能调动部队？除此之外，她只写道“我们自己的当务之急让我们没工夫去担心那场遥远的惨败”。¹³⁴

他们在担心什么？只是美国选择了这么一个糟糕的登陆点吗？还是卡斯特罗在古巴人中的支持率过高（玛丽和马修斯估计高达75%），行动根本无法成功？拉纳姆认为他知道一个答案。三周后，他写信给海明威说，他，巴克，知道对欧内斯特这么一个“参加过无数战斗的老兵”来说，读到“这么一场愚蠢的大败”有多痛苦，还说他很遗憾，原来卡斯特罗比巴蒂斯塔更坏。¹³⁵

拉纳姆似乎感觉到，事态发展让海明威满意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如果美国支持的入侵获得胜利，会让他不高兴；他曾批评美国的表现像个19世纪的“大国”，简直是拉丁美洲的坏邻居。那还有可能让古巴倒退回巴蒂斯塔时代。卡斯特罗获胜也好不到哪里去。卡斯特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反美，虽然海明威热爱古巴，他归根结底也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是他曾经一再面临的选择，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在二战期间及其后那苦涩的和平期。或许他在自己的头脑中重演了邦斯尔关于叛国的警告，又一次感觉到它所唤起的痛苦回忆。

玛丽暗示海明威内心的挣扎已经让他对那场入侵无感了。但时机表明，此二者或许是并行发生的。¹³⁶ 周二，也就是入侵的第二天，他起草了一封信给他的出版社，说他尽力了，但还是未能编辑好他关于1920年代巴黎生活的回忆录[就是后来名为《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的那部作品]；从明尼苏达回来之后，他尝试的每一件事都越干越糟。¹³⁷这不是暂时的抱怨，而是彻底认输了。他索性不能再做自己一直赖以谋生的工作了。猪湾那场“遥远的惨败”是另一场失败，带给他的痛苦几乎同样无法承受。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家，再也无法在木棉树下散步到瞭望庄园的前门，驾着“皮拉尔”号驶出海湾经过古老的西班牙城堡，抑或跟朋友一起在佛罗里蒂达喝着“老爹的渔船”消磨一个下午了。他再也没有力气支持某一场革命——在他看来，哪怕失败的革命，也是打败右翼的宝贵胜利。他珍视已久的古老梦境终结了，那个梦始于遥远的西班牙。

没有什么能些微地减轻这一切痛楚。4月21日星期五清晨，玛丽一下楼就发现海明威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他最喜欢的猎枪，两颗子弹放在窗台上他能轻易够到的地方。¹³⁸ 接下来那锥心的一个半小时，她轻柔地跟他聊起他们还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去墨西哥，重返巴黎，甚或还能去非洲再来一次游猎。当他们的老朋友、家庭医生萨维耶斯来给海明威量血压时，他们总算说服他放下了手里的武器。他们把他带到当地的医院，并尽可能快地安排他飞回梅奥诊所，在一间封闭的病房里进行另一轮痛苦的电击治疗。在路上，他曾两次企图自杀。在怀俄明州卡斯帕机场，他还试图走进一架飞机的飞速旋转的螺旋桨。

6月底，海明威在梅奥的医生确定他的病人可以出院了。¹³⁹ 玛丽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觉得她丈夫八成用计哄骗自己的神经科医生在出院文件上签了字。他仍然明确地暗示自己计划自杀，比如他在那个月早些时候写给自己的古巴“儿子”、正在瞭望庄园看家的勒内·比利亚雷亚尔的信。海明威写道，他几乎要“完蛋了”。他变成了过往的影子，沦落成一个次重量级的自我。他“甚至丧失了阅读的意志”，那是他一生“最爱”的试金石。他写道：“写作就更加困难了。”¹⁴⁰ 海明威请勒内照顾好他的猫和狗，还有他“心爱的瞭望庄园”，并向他保证，只要有可能，爸爸会记着他的。

玛丽虽然顾虑重重，但还是跟乔治·布朗一起来诊所接海明威，带着他一起驱车回到凯彻姆，来自纽约的拳击手布朗是他几十年的好友了。他们于6月30日周五回到了家。

7月1日星期六早晨，阳光明媚温度适中，海明威哄着布朗跟他一起在房子北边那个缓坡上走了很长时间，对穿着城里人鞋子的纽约人来说，这可是个小小的挑战。两人后来开车绕城一周，去拜访老朋友。他们拜访了医院办公室里的萨维耶斯，而猎人唐·安德森（Don Anderson）却不在他太阳谷的工作场所。另一位户外好手查克·阿特金森（Chuck Atkinson）在太阳落山前来到海明威的住处，跟他一起坐在前廊聊了一个小时。¹⁴¹ 玛丽后来对拉纳姆说，下午的某个时候，海明威重读了这位退伍将军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¹⁴² 巴克写信是为了跟他分享几位两人共同好友的消息，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告诉欧内斯特，他，巴克，有多担心这位手持武器的老战友，他多么希望欧内斯特身体好起来，快乐起来。¹⁴³

晚上，海明威请布朗和玛丽在熟悉的市中心克里斯提尼娅餐厅吃晚餐，他们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这样就能看到房间里还有哪些其他人了。吃饭时，海明威看了看邻桌，问女侍者坐在那里的两个人是谁。她觉得他们大概是来自附近特温福尔斯（Twin Falls）的推销员。

海明威反驳，“推销员周六来干嘛？”女侍者耸了耸肩，海明威低声解释道，“他们是调查局的”。¹⁴⁴

第二天清晨，玛丽被吵醒了，接连两声，像是谁在大力关抽屉。她起身去查看，在客厅的玄关处看到了海明威，就在她4月从他的手中拿走武器的地方。他起得比谁都早，蹑手蹑脚地走下楼，用一把双筒猎枪杀死了自己。那位曾勇敢地为信仰而奋战一生的伟大美国作家的残破躯体，就这样倒下了。

尾声：计算隐秘的代价

消息传开后，关于海明威之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¹除了少数知情人外，任谁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特别是在玛丽爆出海明威死于擦枪走火之后。他一生都在玩各种武器，冒险无数，曾在三场大战的前线历经烽火，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意外死亡？曾抢先报道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独家新闻的西雅图记者艾米特·沃森认为自己有责任寻找真相。

沃森到达凯彻姆时，觉得仿佛“地球上每个写字的人都已经在那儿”报道葬礼了。他和另一位记者一道，就像在自己家乡一样在凯彻姆走街串巷，避开那些名人市民，而采访了其他每个人，“从调酒师到……打猎同伴，到旅馆和饭馆的女服务员，到他的打字员”，发掘真相。²7月7日，《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刊登了题为《海明威之死是自杀》，以翔实的细节平息了人们的争论。³

然而沃森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位教导我们首先要忍受——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先学会忍受”——的人，会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的很多朋友和读者都开始查找事实，以求理解海明威的死因。难道他患了什么无法治愈的病，比如血色素沉着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有哪个战时的旧伤无法愈合？还是和玛丽发生了矛盾，或是财务上有麻烦了？会不会跟他失去了瞭望庄园有关？

多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共识：导致这位天才自杀的原因不止一个。⁴原因很复杂，也没那么强的说服力。抑郁症，也就是他所谓的“倒霉”，已经尾随他多年了并且越来越严重。喝酒本来是简单的快乐，后来却成为麻烦的根源之一，兴妖作怪。因为自1920年代起便发生过许多意外事故，衰老过早地来势汹汹。古巴革命起初令他精神为

之一振，后来则成为导致抑郁加重的另一个罪魁祸首；到1961年，他回到古巴生活的希望渺茫，甚至很可能再也看不到他心爱的瞭望庄园了。

他甚至无力保持自己的记忆力。到目前为止，记忆一直充斥着他的大脑，在他的长短篇小说里得到新生。然而在梅奥的电击治疗让他变得记忆模糊，连他闻名遐迩的清晰思维也离他远去了。没有了记忆，他怀疑自己再也无法动笔写作了。

2011年，海明威去世50周年，A. E. 哈奇纳重新开启了关于海明威之死的讨论。这位海明威的忘年至交曾见证了海明威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一系列事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即他所谓的“被调查局追踪纠缠的海明威”。⁵ 在对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进行综述之后，哈奇纳重点讨论了整个19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让作家深受其害的抑郁症和妄想症。哈奇纳写道，曾有传记作家把海明威对调查局难以释怀的担心描述为妄想，然后又写道1980年代为答复某一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的申请，调查局公布的一份档案。

哈奇纳说，该档案表明，海明威关于调查局一直在跟踪调查他的说法并非无凭无据。的确，第一条记录可追溯至1942年，事关骗子工厂和战时在古巴搜寻法西斯分子。然而，哈奇纳说，该局在战争结束之后也没有忘记海明威：“其后很多年，特务们一直在存档关于他的报告，窃听他的电话。监视一直持续到他住进圣玛丽医院。”⁶ 调查局或许就在他的病房外面监听他的电话呢。哈奇纳的结论是，海明威感觉自己受到监视，并且这一点“让他万分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自杀”。⁷

如今我们知道，哈奇纳很了解海明威的精神状态，但他对调查局的意图却不甚清楚。仔细阅读调查局关于他的档案就会发现，海明威从未被监视。⁸ 调查局并没有首先采取行动：档案建立的原因是大使决定利用海明威运作一个业余反间谍机构。大使馆宣布了计划，调查局做出了反应。起初胡佛想了解作家的背景，而后来，他首先想要避免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发生，以免这个他根据自己的想象而创立的组织遭遇尴尬。

其后那些年，该局不定期地继续搜集它碰巧获得的关于海明威的情报，有时从作家本人那里，有时是从政府其他机构，如国务院。一些记录来自各报纸。还有一两份报告来自保密的线人，他们在社交场合遇到海明威，秘密地把自己的印象汇报给胡佛的手下。他们报告的某些信息让局长担心海明威或许会在某一本书里写对他和手下的特工们不利的话。但他从未怀疑海明威犯罪，调查局也没有对后者的行为启动过任何正式调查。调查局的特工们没有监听他的电话、打开他的邮件，也没有跟踪过他。1961年，是海明威的医生请调查局参与到病人的病例中，而不是调查局主动参与的。⁹

调查局关于海明威的猜测一直没变，他不是个共产主义者，只是个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即便在他死后，玛丽还是想确保这一点没有反转。1964年，古巴邮局发行了一套纪念海明威的邮票，玛丽不计麻烦地请记者昆廷·雷诺兹（Quentin Reynolds）给胡佛带信。她希望后者明白，她的家里没有谁曾授权发行这套邮票，或支持过古巴革命。海明威确实曾因为卡斯特罗取代了右翼独裁者巴蒂斯塔而欢迎过他，但“他并不了解卡斯特罗。玛丽（说）他在一次钓鱼聚会上遇到过卡斯特罗，跟他聊了五分钟——如此而已”。¹⁰ 胡佛相信这个说法，为档案撰写并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目前所知的他关于此案的最后一句话是：“就我了解的海明威而言，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任何共产主义倾向。他是个粗犷彪悍的人，永远站在弱者一边。”¹¹

不管调查局对海明威有何看法，哈奇纳说海明威一直为调查局而焦虑，倒是没错。胡佛和他的特工们对作家过去从事的各种“颠覆”活动知之甚少，根本不知道他还跟内务部有过几次会面。他们没有对海明威纠缠至死，但海明威却至死没有忘记他曾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做过什么——特别是他自己的反法西斯标签和对卡斯特罗的支持——而且一直焦虑不安，担心那些行动已经让调查局盯上他了。他焦躁地担心被政府监视加重了他的抑郁，导致他最后病入膏肓。他始终无法心安，“知道”联邦特工们一定会来逮捕他，而罪名并非全是妄想。

这位一生叛逆的人讨厌他们所代表的权威。正如海明威始终站在弱者一边，他也始终反对任何（他认为）充当压迫工具的人。从1937年到他生命终结，他为反法西斯，特别是反对欧洲法西斯倾向的病毒性传播，倾尽了全力。那些倾向是最糟糕的权威，不仅压迫弱者，而且扼杀艺术。勇武的作家抨击美国和英国政客们跟他的目标不一致，在美国的一些机构，如调查局和非美活动委员会中，他更是看到了法

西斯的蛛丝马迹。在古巴，他激情澎湃地支持革命者推翻现有秩序，却再次发现他自己的政府的目标跟他的全然不同。

他尤其憎恶政府侵犯他的私人生活。从1942年以后，这位天生喜欢阴谋的人一直担心自己被监视。他只要认为调查局破坏他的骗子工厂的工作，就愤而回击，迈阿密的战时审查员查看他的信件则更让他怒不可遏。1944年，他几乎无法回答陆军督察长提出的关于为什么身为记者却在朗布依埃参加战斗的问题。他讨厌对自己的过去撒谎，他的确参与了军事行动，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的记者。

冷战初期，他更加担心政府究竟掌握了他哪些信息，以至于对写作和出版的内容也变得谨慎小心起来。这位曾在1930年代“忠实而勇敢地”再现了“时代的艰难风貌”的人，却在1950年代开始了对自己的政审。¹²

海明威说政府监视他，因为他曾经是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认为他不可靠。他从没有提到过政府可能不得不监视他的最佳理由：这位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曾与内务部结盟。他事实上从来没有为苏联人做过间谍，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在麦卡锡时代，良善之人常常会因为远比这微不足道的小事遭到各个委员会的传讯。他担心这些秘密会阻碍自己的写作事业绝不是杞人忧天。

海明威对诺贝尔委员会说，写作是孤寂的生涯。他或许可以再加一句，秘密让作家更加孤寂。他本可以跟亲友分享那些秘密，减轻自己的负担，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这样做。在写给他最信任的拉纳姆的信中他尚且欲言又止，对盖尔霍恩、玛丽和哈奇纳大概说得就更少了。对联邦政府或公众他自然未曾透露半分。把自己孤立起来——闭门思索那些可能会引起轰动的秘密——代价极其可怕；担忧最终变成了焦虑和妄想。

海明威传记的这一章节是否可能有个不同的结局？许多前共产主义者，像他认识的库斯勒，就曾公开背离了“那位失败的神”。¹³ 不止一个曾为内务部做过间谍的美国人就近走入了某个调查局办事处，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告诉了那里的特工，继而公开反对斯大林同志。对某些人来说那是情感宣泄，是摆脱孤立的好办法。但海明威无法谴责共产主义，因为他从来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他想不出怎样讲述自己与内务部建立关系这个复杂的故事，让它在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听来合乎

情理。此外，他的性格也让他很难背叛以前的同盟：他讨厌“探子”和“叛徒”。

1960年夏，邦斯尔大使为他指明了一条路：回美国，公开谴责卡斯特罗的过分行径。这会改善他在美国的形象。但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选择。海明威从未放弃过古巴革命。跟其他美国人相比，他对古巴的未来一直怀抱希望，也无法去谴责一位在背包里携带着一本《丧钟为谁而鸣》并推翻了右翼独裁者的游击队长。

他们最后一次在瞭望庄园见面时，海明威没有跟邦斯尔聊太多，他只是提到了自己对美国的爱和对古巴的依恋。虽然他知道大使的意思，却没有坚持说他仍打算按自己的规则生活——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那样过来的。正是因为按自己的规则生活，他才创作了一批开拓性的精彩文学作品。他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抒写自己所见所感的方式。

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让他的冒险并没有停留在写作中。从1937年到1960年，他一直深度参与政治和阴谋，先是为西班牙共和国，然后与苏联人结盟，继而又在二战中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冷战开始后，他放低了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姿态，但在1950年代古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很难说他只是个被动的看客。

从1935年在佛罗里达海滩看到横七竖八的老兵尸体的那天起，政治家海明威就和文学家海明威一样活跃，也一样独立。他基本上一直单打独斗，做自己认为必要的工作，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1940年与内务部的招募人戈洛斯见面就是一例。他觉得他可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成为间谍的权势人物一样，他也自以为可以掌控自己与苏联——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他只对了一半。他出人意料地颇为擅长这份第二职业，却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是个专家。这位最棒的职业作家，在政治权谋方面不过是个有点天分却过于自信的外行。直到最后时刻，他从未停止过考虑，终有一天他将为自己的秘密冒险付出怎样的代价。

参考文献

原始文件

FBI website

File Number 64-23312 (Ernest Hemingway), in
vault.fbi.gov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Henry Morgenthau, Jr., Diaries

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Ernest Hemingway Collection

Hoover Institution Library and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J. Arthur Duff Papers

Joseph Freeman Papers

Myers G. Low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 E. Hotchner Papers

Alexander Vassiliev Papers

Archibald MacLeish Paper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rchives

Philip W. Bonsal Papers

Marine Corps History Division, Quantico, VA

John W. Thomason, Jr., Personnel File

National Archives I, Washington, DC

HUAC Files, Record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G 233)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D

Alexander Orlov Paper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Records (RG 56)

FBI Records (RG 65)

OSS Records (RG 226)

U. S. Navy Records (RG 38)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RG 59)

National Archives, Kew, England

Gustav Regler Personal File, Records of the Security Servic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Hemingway Legal Fi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Firestone Library,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Carlos Baker Papers (C0365)

Charles T. Lanham Papers (C0305)

Lanham- Hemingway Papers (C0067)

Scribner' s Sons Archive (C0101)

Mudd Library,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Charles T. Lanham Papers (MC081)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Herbert L. Matthews Papers

Spruille Braden Papers

Roald Dahl Museum and Story Centre, Buckinghamshire,
England

Roald Dahl Correspondence

Special Collections, Georgetown University Library,
Washington, DC

Edward P. Gazur Papers

Tamiment Library, New York University

Milton Wolff Papers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outhworth Spanish Civil War Collection

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 Richmond

David K. E. Bruce Papers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Robert Joyce Papers

书和文章

Aaron, Daniel. *Writers on the Left*. New York: Avon, 1961.

Aldrich, Nelson W., ed. *George, Being Geor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Andrew, Christopher,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Baker, Carlos.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Scribner, 1969.

Baker, Carlos, ed.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New York: Macmillan, 1989.

Bentley, Elizabeth. *Out of Bondage*. New York: Ivy, 1988.

Bentley, Eric, ed.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Excerpts from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38 - 1968*.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71.

Bessie, Alvah. *Men in Battle*. New York: Chandler & Sharp, 1975.

Bessie, Dan, ed. *Alvah Bessie's Spanish Civil War Notebook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2.

Billingsley, Kenneth Lloyd. "Hollywood's Missing Movies: Why American Films Have Ignored Life Under

Communism.” *Reason*, June 2000.

Billingsley, Kenneth Lloyd. *Hollywood Party: How Communism Seduced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Roseville, CA: Forum, 2000.

Brack, Fred. “Emmett Watson Reminisces.”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October 21, 1981.

Braden, Spruille.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The Memoirs of Spruille Braden*.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1.

Bradley, Mark A. *A Very Principled Boy: The Life of Duncan Lee, Red Spy and Cold Warri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Brasch, James D. “Hemingway’s Doctor: José Luis Herrera Sotolongo Remembers Ernest Hemingwa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13, no.2 (July 1986) .

Brasch, James D., and Joseph Sigman. *Hemingway’s Library: A Composite Record*. Boston: JFK Library Electronic Edition, 2000.

Brian, Denis. *The True Gen*. New York: Grove, 1988.

Briggs, Ellis O. *Proud Servant: Memoirs of a Career Ambassado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riggs, Ellis O. *Shots Heard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Viking, 1957.

Brucoli, Matthew J., ed.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Jackson, MS,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Brucoli, Matthew J., ed. *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Capa, Robert, ed.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The Ernest Hemingway - Maxwell Perkins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96.

Capa, Robert. *Slightly Out of Foc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Carpenter, Iris. *No Woman's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Carr, Virginia S. *Dos Passos: A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84.

Carroll, Peter N., and James D. Fernandez, eds. *Facing Fascism: New York &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Carroll, Peter N. *The Odysse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Americ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stro, Fidel, and Ignacio Ramonet. *Fidel Castro: My Life: A Spoke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 2008.

Chamberlin, Brewster. *The Hemingway Log*.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5.

Charney, David L. "True Psychology of the Insider Spy." *Intelligencer* 18, no. 1 (Fall/Winter 2010).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59.

Cockburn, Claud. *I, Claud*. London: Penguin, 1967.

Conant, Jennet. *The Irregulars: Roald Dahl and the British Spy Ring in Wartime Washingt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Conquest, Rober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opeland, Miles. *The Game Player*. London: Aurum Press, 1989.

Costello, John, and Oleg Tsarev. *Deadly Illusions: The KGB Orlov Dossier*. New York: Crown Books, 1993.

Cowley, Malcolm. *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 Remembering the 1930s*. New York: Penguin, 1981.

Craig, R. Bruce. *Treasonable Doubt: The Harry Dexter White Spy Cas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DeFazio III, Albert J., ed. *“Dear Papa, Dear Hotch” : The Correspondence of Ernest Hemingway and A. E. Hotchne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5.

de la Mora, Constancia. *In Place of Splendo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9.

del Vayo, Julio Alvarez. *Give Me Combat: The Memoirs of Julio Alvarez del Vayo*.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DePalma, Anthony.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Castro, Cuba, and Herbert L. Matthew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Donaldson, Scott. *Archibald MacLeish: An American Lif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2.

Donovan, Robert J.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5 - 1948*. New York: Norton, 1971.

Dmytryk, Edward. *Odd Man Out: A Memoir of the Hollywood Te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Dubois, Jules. *Fidel Castro: Rebel, Liberator, or Dictator?*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59.

Eakin, Hugh. "Stalin's Reading Li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5.

Eby, Cecil B. *Comrades and Commissars: The Lincoln Battal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hrenburg, Ilya. *Memoirs: 1921 - 1941*. Cleveland and New York: World, 1964.

Fensch, Thomas.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Hemingway, Cuba, the FBI, and the Crook Factory*. New York: iUniverse, 2009.

Franqui, Carlos.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New York: Vintage, 1985.

Fuentes, Norberto. *Hemingway in Cuba*. 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84.

Fuller, Robert. "Hemingway at Rambouillet." *Hemingway Review* 33, no. 2 (Spring 2014).

Gazur, Edward P. *Alexander Orlov: The FBI's KGB General*.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1.

Gellhorn, Martha. "Cry Shame." *New Republic*, October 6, 1947.

Gellhorn, Martha.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Gerogiannis, Nicholas, ed. *Ernest Hemingway: 88 Poem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Gingrich, Arnold. *Nothing But People: The Early Days at Esquire*. New York: Crown, 1978.

Glantz, David M., and Jonathan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Goodman, Walter. *The Committee: The Extraordinary Career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68.

Grimes, Larry, and Bickford Sylvester, eds. *Hemingway, Cuba, and the Cuban Works*.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Groth, John. *Studio: Europe*. New York: Vanguard, 1945.

Gurney, Jason.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Haber Kern, E., and Arthur Lipow, eds. *Neither Capitalism nor Socialism: Theories of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Alameda, CA: Center for Socialist History, 2008.

Hailey, Jean R. "Maj. Gen. Charles Lanham Dies."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78.

Haines, Gerald K., and David A. Langbart. *Unlocking the Files of the FBI: A Guide to Its Record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3.

Haynes, John Earl, Harvey Klehr,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emingway, Ernest. *The Fifth Colum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Hemingway, Ernest. *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 New York: Scribner, 1935.

Hemingway, Ernest. “ ‘I Saw Murder Done in Spain’ — Hemingway’s Lost Report. ”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29, 1982.

Hemingway, Ernest, ed. *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 New York: Crown, 1942.

Hemingway, Ernest. “Who Killed the Vets? ” *New Masses*, September 17, 1935.

Hemingway, Ernest, et al. *Somebody Had to Do Something: A Memorial to James Phillips Lardner*. Los Angeles: James Lardner Memorial Fund, 1939.

Hemingway, Gregory H. *Papa: A Personal Memo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Hemingway, Leicester.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Sarasota, FL: Pineapple Press, 1996.

Hemingway, Leicester, and Anthony Jenkinson. “A Caribbean Snoop Cruise.” *Reader’s Digest* 37 (1940) .

Hemingway, Mary Welsh. *How It Was*. New York: Ballantine, 1977.

Hemingway, Valerie. *Running with the Bulls: My Years with the Hemingways*. New York: Ballantine, 2005.

Hendrickson, Paul. *Hemingway’s Boat: Everything He Loved in Life, and Lost*. New York: Knopf, 2011.

Herbst, Josephine. *The Starched Blue Sky of Spai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Hickam, Homer H., Jr. *Torpedo Junction: U-Boat War off America's East Coast, 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Hicks, Granville. *Where We Came Out*. New York: Viking, 1954.

Hochschild, Adam. *Spain in Our Hearts: Americ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 1939*. Houghton Mifflin, 2016.

Horne, Gerald. *The Final Victim of the Blacklist: John Howard Lawson, Dean of the Hollywood T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Hotchner, A. E. *Hemingway and His World*. New York and Paris: Vendome Press, 1989.

Hotchner, A. E. "Hemingway, Hounded by the Fed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2011.

Hotchner, A. E. *Hemingway in Love: His Own 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Hotchner, A. E. *Papa Hemingw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Isaacson, Walter, and 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Touchstone, 1986.

Jenkinson, Sir Anthony. *America Came My Way*. London: Arthur Barker, 1936.

Jenkinson, Sir Anthony. *Where Seldom a Gun Is Heard*. London: Arthur Barker, 1937.

Kale, Verna. *Ernest Hemingwa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6.

Kert, Bernice. *The Hemingway Women: Those Who Loved Him —The Wives and Others*. New York: Norton, 1983.

Kessler, Lauren. *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 the Spy Who Ushered in the McCarthy Era*. New York: Perennial, 2003.

Knight, Amy. *How the Cold War Began: The Igor Gouzenko Affair and the Hunt for Soviet Spies*.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6.

Knightley, Philip. *The Master Spy: The Story of Kim Philby*. New York: Knopf, 1989.

Koch, Stephen. *The Breaking Point: Hemingway, Dos Passos, and the Murder of José Robles*. New York: Counterpoint, 2005.

Koch, Stephen. *Double Lives: Spies and Writers in the Secret Soviet War of Ideas against the W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Koestler, Arthur. *Invisible Writing: The Second Volume of an Autobiography, 1932 - 1940*. New York: Stein & Day, 1984.

Koestler, Arthur. *Spanish Testament*. London: Gollancz, 1937.

Kowalski, Daniel. *Stali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Langer, Eleanor. *Josephine Herbst*.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

Lankford, Nelson.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The Biography of Ambassador David K. E. Bru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Lankford, Nelson, ed. *OSS Against the Reich: The World War II Diaries of Colonel David K. E. Bruc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Lash, Joseph P. *Eleanor: The Years Alone*. New York: Norton, 1972.

Leighton, Frances S. "Letters from Hemingway; Unadulterated, Uninhibited—and Unpublishable." *American Weekly*, May 12, 1963.

Levin, Elizabetha. "In Their Time: The Riddle behind the Epistolary Friendship between Ernest Hemingway and Ivan Kashkin." *Hemingway Review* 32, no. 2 (2013).

Luddington, Townsend, ed. *The 14th Chronicl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John Dos Passos*. New York: Gambit, 1973.

Lynn, Kenneth S. *Hemingw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shall, S. L. A. *Bringing Up the Rear*. San Francisco: Presidio Press, 1979.

Matthews, Herbert L. *Cast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Penguin, 1969.

Matthews, Herbert L. "Castro Is Still Alive and Still Fighting in the Mountain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957.

Matthews, Herbert L. *The Cuban Sto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1.

Matthews, Herbert L.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Matthews, Herbert L. *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 New York: Carrick & Evans, 1938.

Matthews, Herbert L. *A World in Revolution: A Newspaperman's Memoir*. New York: Scribner, 1971.

Matthews, Nancie. "Journey to Sierra Maestra: Wife's Version." *Times Talk* 10, no. 7 (March 1957).

McGilligan, Patrick, and Paul Buhle. *Tender Comrades: A Backstory of the Hollywood Blacklist*. New York: St. Martin's, 1971.

Mellow, James R. *Hemingway: A Life Without Consequen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Merriman, Marion, and Warren Lerude.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 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86.

Meyers, Jeffrey. *Hemingway: A Biography*. New York: DaCapo, 1999.

Meyers, Jeffrey. *Hemingway: Life into Art*. New York: Cooper Square, 2000.

Meyers, Jeffrey. "The Hemingways: An American Traged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99.

Mickelson, Erik D. "Seattle By and By: The Life and Times of Emmett Watson." M.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ontana, 2002.

Moorehead, Caroline. *Gellhorn: A Twentieth-Century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4.

Moorehead, Caroline, ed. *Selected Letters of Martha Gellhorn*.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Moreira, Peter.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His WWII Spy Mission with Martha Gellhorn*.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7.

Mort, Terry. *The Hemingway Patrols*. New York: Scribner, 2009.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Venona: Soviet Espionage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1939 - 1957*. Washington, DC: NSA and CIA, 1996.

North, Joseph. *No Men Are Strang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8.

Olmstead, Kathryn S. *Red Spy Queen: A Biography of Elizabeth Bentle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O' Rourke, Sean. *Grace Under Pressure: The Life of Evan Shipman*. Boston: Harvardwood, 2010.

Paporov, Yuri. *Hemingway en Cuba*. Mexico City and Madrid: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1993.

Phillips, R. Hart. *The Cuban Dilemma*. New York: Ivan Obolensky, 1962.

Pleshakov, Constantine. *Stalin's Foll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Preston, Paul. *We Saw Spain Die*. London: Constable, 2009.

Price, Ruth.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dosh, Ronald, Mary R. Habeck, and Grigory Sevostianov, eds. *Spain Betray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adosh, Ronald, and Allis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Rasenberger, Jim. *The Brilliant Disaster: JFK, Castro, and America's Doomed Invasion of Cuba's Bay of Pigs*. New York: Scribner, 2011.

Regler, Gustav. *Das grosse Beispiel*. 1940; reprint, Cologne, Germany: Kiepenhauer & Witsch, n.d.

Regler, Gustav. *Dokumente und Analysen*. Saarbrücken, Germany: Saarbrücker Druckerei und Verlag, 1985.

Regler, Gustav. *The Great Crusade*. New York: Longman, Green, 1940.

Regler, Gustav. *The Owl of Minerv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60.

Reynolds, Michael 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New York: Norton, 1999.

Reynolds, Nicholas. "A Spy Who Made His Own Way: Ernest Hemingway, Wartime Spy."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56, no. 2 Extracts (June 2012).

Robinson, Daniel. "'My True Occupation Is That of a Writer': Hemingway's Passport Correspondence." *Hemingway Review* 24, no. 2 (Fall 2005).

Romerstein, Herbert, and Eric Breindel. *The Venona Secrets: Exposing Soviet Espionage and America's Traitors*.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Rooney, Andy. *My Wa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0.

Sanders, David. "Ernest Hemingway's Spanish Civil War Experience." *American Quarterly* 12, no. 2 (1960).

Sbardellati, John. *J. Edgar Hoover Goes to the Movies: The FBI and the Origins of Hollywood's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Scammell, Michael. *Koestl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Schoonover, Thomas D. *Hitler's Man in Havan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8.

Schoots, Hans. *Living Dangerously: A Biography of Joris Ive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Scott, Phil. *Hemingway's Hurrican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Setlowe, Rick. "Hemingway and Hollywood: For Whom the Camera Rolled."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4, 1979.

Sigal, Clancy. *Hemingway Lives! Why Reading Ernest Hemingway Matters Today*. New York and London: OR Books, 2013.

Smedley, Agnes. *China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 Boston: Pandora, 1984.

Smith, Richard Harris.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Stein, Jacob A. "General Buck Lanham, Ernest Hemingway, and That Woman in Venice." *Washington Lawyer*, January 2003.

Stoneback, H. R. "Hemingway's Happiest Summer— 'The Wildest, Most Beautiful, Wonderful Time Ever Ever' o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Hemingway." *North Dakota Quarterly* 64, no.3 (Summer 1997).

Straight, Michael. *After Long Silence*. New York: Norton, 1983.

Sweet, Matthew. *The West End Front*. London: Faber & Faber, 2011.

Szurek, Alexander. *The Shattered Dream*.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9.

Tannenhau, Sam. *Whittaker Chambers: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Thomas, H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ised by the autho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Thompson, Hunter S. "What Lured Hemingway to Ketchum?" *National Observer*, May 25, 1964.

Tierney, Dominic. *FDR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Tuchman, Barbara W. *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81.

Turner, Martha Anne. *The World of John W. Thomason, USMC*. Austin, TX: Eakin Press, 1984.

Tynan, Kathleen, ed. *Kenneth Tynan Lett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Tynan, Kenneth. "A Visit to Havana." *Holiday* 27, no. 2 (February 1960) : 50 - 58.

Tynan, Kenneth. *Right & Left*. London: Longmans, 1967.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is Is Your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Vernon, Alex. *Hemingway's Second War: Bearing Witnes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Ames: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1.

Viertel, Peter. *Dangerous Friends: At Large with Huston and Hemingway in the 1950s*.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Villarreal, René, and Raúl Villarreal. *Hemingway's Cuban Son: Reflections on the Writer by His Longtime Majordomo*.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tson, Emmett. *My Life in Print*. Seattle: Lesser Seattle, 1993.

Watson, William B.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Novel." *North Dakota Quarterly* 60, no. 1 (Winter 1991).

Watson, William B.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Story." *North Dakota Quarterly* 59, no. 1 (Winter 1991).

Watson, William B.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Trip." *North Dakota Quarterly* 59, no. 3 (Summer 1991).

Watson, William B. "Joris Ivens and the Communists: Bringing Hemingway In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Hemingway Review* 18, no. 2 (Fall 1990).

Weinstein, Allen,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9.

Wheelock, John H., ed. *Editor to Author: The Letters of Maxwell E. Perki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0.

White, Theodore H. *In Search of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White, William, ed. *By-Line: 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 Touchstone, 1967.

Wilmers, Mary-Kay. *The Eitingons: A Twentieth-Century 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Wyden, Peter. *The Passionate War: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Zheng, Kaimei. "Hemingway in China." *North Dakota Quarterly* 70, no. 4 (2003).

致谢

1945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提醒我们，说写作是一种偶尔会被作家组织“淡化”的孤寂生涯。对于写小说的天才来说尤其如此。他仰仗自己的想象力和文字技巧，可说大半个职业生涯都有赖于头脑。对于并非天才、撰写非虚构类作品的某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孤寂事业。但有真相需要证实，发现真相又有很多地方需要走访，还有众多学者、档案管理员、图书馆员、编辑和其他研究者的支持。在这个旅程中，很多人与我同行，我很荣幸能感谢他们。

刚开始研究时，需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友和历史研究同行马克·布拉德利（Mark Bradley）。在他著述有关罗伯特·E. 李（Robert E. Lee）的后裔、曾为苏联人做过间谍的邓肯·李（Duncan Lee）时，我有幸是他的读者团队的一员。在这个过程中，我获益良多，既了解了这一主题，也学习了如何写作。我开始这个项目时，马克不只是投桃报李，我对他感激不尽。中情局博物馆主任托妮·希利（Toni Hiley）在我开始工作时容忍有加，还鼓励我研究下去。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位博物馆主任比她更值得为之效力了。“编辑标记”公司的吉尔·R. 休斯（Jill R. Hughes）在助我定稿本书前五章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得以借此营销此书。

2012年，我第一次参加了海明威协会在密歇根州皮托斯基市举行的会议，琼·耶斯佩森·巴塞洛缪（Jean Jespersen Bartholomew）和我在一个小组，我在那里公布了自己的第一批初步发现。我们开始对话，随后是电邮往来，最终成为文学上的合作伙伴。我很快便发现与她合作受益良多。她多年研究海明威，是个海明威的狂热发烧友，也是我无可替代的朋友、读者和编辑，我叫她“JMax”，以纪念海明威与麦克斯·珀金斯的友情。

其他学者也都愿意与我通信并分享资料：丹尼尔·鲁宾逊（Daniel Robinson）欣然给我寄来《信息自由法》（FOIA）的新闻稿副本，政府的人都找不到这种东西了；汉斯·朔茨（Hans Schoots）与我通信讨论尤里斯·伊文思；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与我共享了他对海明威律师的研究结果；乔尔·克里斯滕松（Joel Christenson）向我讲述了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历史。波士顿二战博物馆的创始人肯尼思·W. 伦德尔（Kenneth W. Rendell）给我寄来了一些信件藏品的副本，对我颇有帮助；在国会图书馆，约翰·海恩斯（John Haynes）详细说明了《间谍》（*Spies*）一书的参考文献，此书是他关于苏联人在美间谍活动的开创性著作，并向我指出有可能找到海明威资料的藏品方向。在国家档案馆，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是非美活动委员会档案的优秀向导。我的好友海登·皮克（Hayden Peake）自始至终都是关于情报研究的无价之宝。在华盛顿特区闹市的塔巴德旅馆，团团围坐在一张圆桌周围、自称“塔巴德人”的作家们，在过去两年里大大冲淡了我这个作家的孤寂感。我们阅读和批评彼此的作品，交换消息和参考资料，并给彼此打气。我衷心地感谢卡罗尔·迈耶斯（Carol Meyers）、丹妮尔·波伦（Danielle Polen）和金伯利·威尔逊（Kimberly Wilson）。在我不无沮丧地寻找文学代理人时，他们一直不离不弃——当时我遭到拒绝后都无力自拔。丹妮尔建议我去找位于特区的罗斯-尹公司，那里成了我的主场。安德鲁·西蒙（Andrew Simon）注意到我的手稿，与安娜·斯普劳尔-拉蒂默（Anna Sproul-Latimer）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霍华德·尹（Howard Yoon）对我有长远的期望。霍华德为他的作者们包办一切：治疗师、私人辅导、推销员、编辑、导师。理查德·班斯（Richard Bangs）和安东尼·芬奇（Anthony Vinci）这两位朋友耐心倾听我对本书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更新，还好心与我分享他们名片整理盒中的联系人。

好心的朋友们阅读并评价了我的全部或部分手稿，并指出了我遗漏或可改进的很多东西，拥有这样的朋友实属有幸。他们是：汤米·桑克顿（Tommy Sancton）、保罗·内文（Paul Nevin）、塞缪尔·库珀-沃尔（Samuel Cooper-Wall）、比尔·福斯特（Bill Foster）、安·托德（Ann Todd），以及我的姐姐玛丽·简·米尔特纳（Mary Jane Miltner）。萨姆和我共处一间办公室一年有余，他总是乐于提供咨询意见和明智的忠告。安和我集思广益，共同拟定了书名。阿比·拉斯明斯基（Abby Rasminsky）是个杰出的侨民/作家/编辑，她在本书最后最难的部分，即如何撰写引言部分，与我合作。

终稿落在威廉·莫罗（William Morrow）出版公司执行总编彼得·哈伯德（Peter Hubbard）的桌上，我对他在出版流程中对作者和手稿的耐心和专业指导永远感激不尽。因为他的稳健处理，以及副总编尼克·安夫利特（Nick Amphlett）、印制编辑戴维·帕尔默（David Palmer）和文字编辑汤姆·皮托尼亚克（Tom Pitoniak）的细致工作，此书的质量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媒体关系高级总监夏林·罗森布拉姆（Sharyn Rosenblum）与吉纳·兰齐（Gena Lanzi）一起，从我们相识的那天便热情地推动了这个项目。

2015年末，我的朋友克里斯蒂·米勒（Kristie Miller）邀请我一同参加华盛顿传记小组的一次会议，那是我慕名已久的一个才华横溢、彼此支援的团体。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的桑德拉·艾斯塔斯（Sandra Aistars）教授及其学生们也是如此，他们为作者们举办了一个讲习班。另一个后援团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合作咖啡馆”（CoworkCafe´），我在那里舒适的环境中，花了很多时间完成手稿。

拥有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同样为我提供了帮助。我到那里的第一天，汉娜·杰曼（Hannah German）就带我参观了海明威研究室（场地布置得就像他在古巴的起居室一样）和与之相关的藏品展览，使我的研究从一开始便走上了正轨。在随后的多次拜访中，那里的职员在中午耐心倾听我详细解释自己的想法，还提请我注意某些具体的资料。斯蒂芬·普洛特金（Stephen Plotkin）、迈克尔·德斯蒙德（Michael Desmond）、劳丽·奥斯汀（Laurie Austin）、杰茜卡·格林（Jessica Green）和康纳·安德森（Connor Anderson）都让我少走了弯路。

说到研究，没有谁能比得上玛丽·埃伦·科尔泰利尼（Mary Ellen Cortellini），她遨游互联网，寻找有用的趣闻，那些东西我可永远都找不到。同样，说到反复挖掘和提供海军陆战队的零碎信息，也没有谁能比得上海军陆战队历史部的安妮特·阿默曼（Annette Amerman）。我的好友尼克·韦尔奇（Nick Welch）好心替我在伦敦国家档案馆查找了一个线索，位于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的凯蒂（Katie）和佩姬·林赛（Peggy Lindsey）也一样帮忙。我的另一位老友塞缪尔·耶林·扎比茨基（Samuel Yelin Zabicky）博士帮助我查清了1942年墨西哥城的事实。

如果我忘记提到很多研究海明威的学者所做的基础工作，那就太疏忽大意了。第一本传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洛斯·贝克教授在记忆尚未模糊时，以他艰苦的全面研究为我们奠定了基础。贝克之后的传记作者中，我觉得杰弗里·迈耶斯和迈克尔·雷诺兹（可惜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著作尤其有用。我工作时总是把布鲁斯特·钱伯林（Brewster Chamberlin）非常全面的海明威年谱放在手边。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海明威评论》（*Hemingway Review*）中查阅一篇资料，在此向那些作者致敬。

海明威学会无论是在网上还是面对面都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国际摄影中心的人，特别是苏珊·卡尔森（Susan Carlson），把查询美妙的老照片变得既容易又有趣。泛美基金会理事道格·米勒（Doug Miller）也同样乐于助人；我与他通信交流过有关美国国旗航空公司的光辉岁月，这个过程让我很享受。

作为撰写关于情报的文章的中情局前雇员，我必须提交手稿，以便中情局审查其中有无任何保密内容。出版物审查委员会在此过程中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为此我想对他们致以谢意。委员会要求我加上如下的标准免责声明：

本（书）不构成中情局情报的正式发布。所有关于事实、观点或分析的陈述都是作者的陈述，并不反映中情局或任何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或观点。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解释为主张或暗示美国政府对情报的认证，或中情局认可作者的观点。本材料已经过保密级别的全部审查。

最后是家事。任何一本关于海明威的书都难免要谈及写作对于工作中的作家有何影响，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暂时性精神失常。我要向我的妻子贝姬脱帽，为她在整个过程中的乐观容忍而谦卑地鞠躬致敬。

最后一句话。本书中关于事实和解读的任何错误都是我犯下的，且只属于我一个人。

注释

引言

1 战情局的档案在华盛顿各处转移，从战情局转到中央情报局再转到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的故事见“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cord Group 226), About the Records,” archives.gov (2016年7月访问)。

2 John Earl Haynes, Harvey Klehr和Alexander Vassiliev, *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第一章 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

1 Anders Österling, 文学奖颁奖词,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4/press.html (2015年10月访问)。

2 Carlos Baker编辑,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New York: Scribner's, 1979), 420-21n。

3 Elizabetha Levin, “In Their Time: The Riddle behind the Epistolary Friendship between Ernest Hemingway and Ivan Kashkin,” *Hemingway Review* 32, no. 2 (2013): 95-108.

4 1935年7月25日Ivan Kashkin致海明威（EH），见波士顿市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

5 1935年8月19日EH致Ivan Kashkin，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17。

6 在1936年4月19日写给Max Perkins的信中，海明威表示在俄国备受欢迎一事令他十分开心。Matthew J. Bruccoli编辑，*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The Ernest Hemingway-Maxwell Perkins Correspondence* (New York: Scribner's, 1996), 242。1946年6月20日EH致Konstantin Simonov，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607-09，其中包括海明威对Kashkin的赞扬。

7 1935年8月15日EH致Ivan Kashkin，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418-19。

8 David Sanders, "Ernest Hemingway's Spanish Civil War Experience," *American Quarterly* 12, no. 2 (1960): 136, 讨论了这些段落。Bernice Kert, *The Hemingway Women* (New York: Norton, 1983), 273, 包括评论界对*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一书所获评论界反应的讨论，"One Trip Across" 于1934年首次发表于*Cosmopolitan*。

9 *Time*, April 26, 1926.

10 引文见James R. Mellow, *Hemingway: A Life without Consequenc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2), 473-74。

11 Joseph North, *No Men Are Strang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8), 110.

12 Daniel Aaron, *Writers on the Left* (New York: Avon, 1961), 特别是172-173页，提供了关于这些时期的充分描述。

13 佚名，"History of Sloppy Joe's," www.sloppyjoes.com (2015年10月访问)。

14 Phil Scott, *Hemingway's Hurricane*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2-3.

15 1935年3月27日John Dos Passos致Stewart Mitchell，见Townsend Luddington编辑，*The 14th Chronicle: Letters and Diaries of John Dos Passos* (New York: Gambit, 1973), 469。

16 EH, *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 (New York: Scribner's, 1935), 191.

17 1935年9月7日EH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21-22。

18 1935年9月7日EH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21-22。另见Bruccoli编辑,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226-27。

19 1935年9月7日EH致Maxwell Perkins。

20 相关讨论见Kenneth S. Lynn, *Hemingwa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454。

21 Aaron, *Writers on the Left*, 325.

22 Aaron; 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69), 615n.

23 Malcolm Cowley, *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 Remembering the 1930s* (1964; reprint, New York: Penguin, 1981), 292.

24 Baker, *Hemingway*, 279.

25 *New Masses*, September 17, 1935, 3和9-10。海明威后来声称原文的标题“Who Killed the Vets?”没有那么浓的火药味,是编辑们改动了标题。Baker, *Hemingway*, 615n。但既然他自己在致Perkins的信中使用了“谋杀”一词,既然文章本身就是充满火药味的,就很难指责编辑们添油加醋了。直到1937年他对那篇文章仍然十分满意,考虑把它收入自己的一部文集,还写信给Perkins说他想把它变成一本书。Bruccoli编辑, *The Only Thing That Counts*, 250-51。

26 *New Masses*, September 17, 1935, 10.

27 “Catastrophe: After the Storm,” *Time*, September 23, 1935, 23.

28 欧内斯特·海明威：“Who Killed Vets in Florida? Asks Hemingway,” *Daily Worker*, September 13, 1935.

29 Mellow, *Hemingway*, 482.

30 Edward P. Gazur, *Alexander Orlov: The FBI's KGB General*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1): “海明威在克格勃（内务部）和情报部眼里不是陌生人，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他的背景……海明威为极左派期刊*New Masses*撰写过一篇文章……”

31 这几个人，以及其他同类的案例综述，见Haynes等人，*Spies*, 196-245。

32 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可参见Daniel Kowalski, *Stali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33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4. 孤立地依赖记忆而没有原始文件证明的话，Orlov和Gazur并非关于过去最可信的见证者。Gazur报告说他自己跟Orlov的谈话（谈话发生在他们讨论的事件发生多年之后）做了大量笔记，并在写书时用到了那些笔记。不过把这一证词放入当时的背景，并把它跟其他的回忆录、事件和文件进行比照，Gazur的可信度就提高了。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不管内务部或共产国际或两者同时是否在1935年关注过海明威这样一个作家，想想Stephen Koch的结论，即共产国际早在192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两人（海明威和Dos Passos）的存在”了。Koch没有文件证据，但他所讨论的间接证据，特别是两位作家在巴黎的圈子，以及那个圈子跟苏联人的关联，都支持了Gazur的观点。Stephen Koch, *Double Lives: Spies and Writers in the Secret Soviet War of Ideas against the We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13-14. 关于这些观点，详情可参考第二章讨论Gazur和Orlov的文件的注释。

34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4. Orlov声称内务部当时在阅读外国报纸的事实与其他报道一致。“干部司（Cadre Department）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邪恶的分支……保存着关于重要的共产主义者的档案”并与内务部协调。1940年秋，该司注意到一本由Gustav Regler撰写的反斯大林主义的书籍“特别重要”，因为有海明威为它作序。Hugh Eakin, “Stalin's Reading Li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5, F19. 内务部后来还将得到一册《丧钟为谁而鸣》作为其关于海明威的档案资料，那时海明威已经跟苏联人并肩战斗了。见第五章。

第二章 作家与政委：在西班牙参战

1 Hans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A Biography of Joris Iven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7. 海明威曾在1938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留下过一份关于遭到炮轰的生动描述，写的或许就是这次炮轰，当敌机对着你的汽车开火，“你要快速转弯到路边，跳出车辆。平躺在地上……口干舌燥”。欧内斯特·海明威，“‘I Saw Murder Done in Spain’—Hemingway’s Lost Report”，*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29, 1982。

2 关于苏联在西班牙的角色的讨论，见Ronald Radosh, Mary R. Habeck和Grigory Sevostianov编辑，*Spain Betray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2001) 和Kowalski, *Stali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关于Orlov，最好的一般性传记是John Costello和Oleg Tsarev, *Deadly Illusions: The KGB Orlov Dossier* (New York: Crown Books, 1993)。

3 有一个读来非常有趣的对剑桥五杰的描写，见Philip Knightley, *The Master Spy: The Story of Kim Philby* (New York: Knopf, 1989)。

4 Jason Gurney, *Crusade in Spain*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183.

5 内务部在西班牙的暗杀者头目之一就是负责“建立一个……秘密焚尸炉，以便内务部可以随时处理受害者，让他们彻底消失，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Christopher Andrew和Vasil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74. 两位作者引用了多份资料来证明这个令人吃惊的说法。

6 Radosh等人, *Spain Betrayed*, xxiii和xxiii。

7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3-24.

8 J. Bell标注日期为1937年2月24日的边注，写在海明威同一日期的护照申请上。国务院根据《信息自由法》签发给作者。引文又见Daniel Robinson, “‘My True Occupation Is That of a Writer’: Hemingway’s Passport Correspondence,” *Hemingway Review* 24, no. 2 (2005): 87-94。又见海明威1938年10月28日致Perkins的信，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73-75。海明威在其中说明，有人提供给他一份在一支不具名的法国军队里担任“参谋长”的职位，但他以跟北美报业联盟的Jack Wheeler所签的合同，以及他承诺Pauline不再参加另一场战争为理由拒绝了。

9 Josephine Herbst, *The Starched Blue Sky of Spai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150.

10 Josephine Herbst, *The Starched Blue Sky of Spai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1), 150.。

11 在A. E.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197, 一份海明威访谈记录把重点放在了共和国：“……我亲眼见到人民书写自己的宪法。这是最后一个在欧洲本土启程的共和国，我相信它。”

12 1937年12月15日EH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55。

13 1937年12月15日EH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第456页。

14 1937年2月9日EH致Pfeiffer家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57。

15 6月28日EH致Archibald MacLeish (未标注年份, 但从上下文来看, 大约是1933年), 位于首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16 1941年3月18日Archibald MacLeish致Whittaker Chambers, 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http://library.sc.edu/spcoll/amlit/hemingway/images/spainflames.jpg> (2013年12月访问)。

18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特别是第71页。Ivens至少从1931年到1936年是荷兰共产党党员。他一生中或许还有其他时候党员身份失效,但他的政治立场从未改变。

19 Cowley, *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 233.

20 Ronald Radosh和Allis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1-2; Arthur Koestler, *Invisible Writing: The Second Volume of an Autobiography, 1932-1940* (New York: Stein & Day, 1984), 251, 381. Koch, *Double Lives*, 其中也有关于Munzenberg的生活和工作的概述。

21 Koestler, *Invisible Writing*, 251, 381.

22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47-48.

23 Scott Donaldson, *Archibald MacLeish: An American Life*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2), 264.

24 海明威的传记作家Baker发明了这个词。Baker, *Hemingway*, 307. 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家William B. Watson则更加激进,写道Ivens的作用多少相当于海明威的“案件承办人”,也就是承办某个间谍案件的情报专家。我虽借鉴了很多Watson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信赖他的说法,但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言过其实了。海明威的确受到Ivens的影响,但从来没有有什么案件承办人对他加以相应的控制。此外,Ivens是党宣人员,不是个间谍。William B. Watson, “Joris Ivens and the Communists: Bringing Hemingway In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Hemingway Review* 18, no. 2 (Fall 1990) .

25 这些档案都已开放查阅,是共产国际档案INCOMKA的一部分,可在国会图书馆欧洲阅览室的终端查阅,2013年10月访问。

26 描述见Koestler, *Invisible Writing*, 387等。

27 Wertheim的故事见Peter Wyden, *The Passionate War: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3), 405。Wyden的资料来源是对Tuchman的一次访谈。有趣的是海明威认识或者听说过Katz, 还说自己不喜欢他。Gustav Regler, *The Owl of Minerv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60), 357.

28 Barbara W. Tuchman, *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81), 6.

29 James D. Brasch和Joseph Sigman, *Hemingway's Library: A Composite Record* (Boston: JFK Library Electronic Edition, 2000), 372.

30 Watson, “Joris Ivens, ” 13.

31 Watson, “Joris Ivens, ”, 第12页。

32 Watson, “Joris Ivens, ”, 第12页。更广泛的阐述, 见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23-24。

33 Ilya Ehrenburg, *Memoirs: 1921-1941* (Cleveland and New York: World, 1963), 383.

34 Watson, “Joris Ivens, ” 13.

35 1937年4月25日Joris Ivens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

36 未标注日期, 大约是1937年Ivens致海明威的纸条碎片, 开头是“尤里斯口述, 汉娜打字”,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又见Baker, *Hemingway*, 313.

37 Denis Brian, *The True Gen* (New York: Grove, 1988), 111. Watson提出了类似观点, 认为因为Ivens的关系, 海明威首次西班牙之行遇到的人大部分似乎都是共产主义者。这是个有根据的猜测。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 海明威跟来自多个阶层的人打过交道。

Ivens记录的一个电影拍摄日志显示，海明威首次西班牙之行大部分时间都跟摄制组待在一起。但该日志没有解释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做些什么，即便是首次前往西班牙期间。没有现存的每天记录的日记或日历显示海明威当时在做什么。同样，因为缺乏详细的证据，很难赞成 Stephen Koch, *The Breaking Point: Hemingway, Dos Passos, and the Murder of José Robles* (New York: Counterpoint, 2005) 中提出的理论，该书推定海明威在西班牙受到了共产主义更多的控制和摆布。在Koch看来，海明威是“一个有用的白痴”，也就是说，一个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似懂非懂或稀里糊涂的合作者。在这本书中，Koch研究了在对Dos Passos谈及Robles之死这件事上，海明威和Herbst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一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38 Luddington编辑, *14th Chronicle*, 527。

39 Koch, *Two Lives*, 254-55.

40 Luddington编辑, *14th Chronicle*, 528。

41 Luddington编辑, *14th Chronicle*, 528。。

42 Herbst, *Starched Blue Sky*, 150-51.

43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27.

44 1937年4月26日Joris Ivens致EH。

45 引文见Virginia S. Carr, *Dos Passos: A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84), 368. 另见Herbst, *Starched Blue Sky*, 154。

46 Carr, *Dos Passos*, 372, 描写了火车站的场景，并引用了好几个有关这一事件的资料来源。Brewster 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5), 185, 认为两人最后对峙是在5月11日。我还查阅了1937年5月10、11、12和13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巴黎版的航运和天气新闻，其中提到了海明威此次旅行期间在巴黎的活动，并报道说他本人将在5月13日搭乘“诺曼底”号轮船回美国。

47 Luddington编辑, *14th Chronicle*, 496。我引用了海明威关于评论家们的话,意思是他们会严厉批评Dos Passos,因为一旦批评共和军,他就转为右派,偏离了他们支持的左派正统路线。

48 Luddington编辑, *14th Chronicle*, 第496页。

49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38.

50 电报报文见Paul Preston, *We Saw Spain Die* (London: Constable, 2009), 106。

51 1938年3月26日前后EH致Dos Passos, 发表于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63-64。

52 文章引文见Alex 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Bearing Witnes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Ames: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1), 165; 对MacLeish说的话见1943年12月25日EH致Archibald MacLeish, 存于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53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132-33.

54 1952年10月5日EH致Archibald MacLeish, 存于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55 Adam Hochschild, *Spain in Our Hearts: Americ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16), 特别是第四章, 对巴塞罗那的政治和社会气候进行了极好的说明。

56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经作者审校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639和680-86. Constancia de la Mora, *In Place of Splendo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9), 327, 说明了共和军的党派路线。Radosh等人, *Spain Betrayed*, 特别是171-178页, 对苏联在这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极好的讨论。

57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631.

58 Orlov个人在宁事件中的参与见上书，第684页，在Costello和Tsarev, *Deadly Illusions*, 特别是287-291页中也有详细说明。多年后，当对他所扮演角色的指责浮出水面，Orlov会对FBI讲述一个牵强的为自己寻找借口的版本。他坚称自己与宁之死无关。Gazur, *Alexander Orlov*, 340-46.

59 海明威在1938年3月26日致Dos Passos的信中提到了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63-64。

60 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187;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29.

61 “Writers Hear Browder at Congress, ” *Daily Worker*, June 5, 1935; “The Writers’ Congress an Outstanding Event, ” *Daily Worker*, June 4, 1935.

62 “Writers Hear Browder at Congress, ” *Daily Worker*, June 5, 1935; “The Writers’ Congress an Outstanding Event, ” *Daily Worker*, June 4, 1935, 第130页。

63 Joseph Freeman, “Death in the Morning, ” July 11, 1961, 65, 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Freeman文件。这是Freeman撰写的一篇长文的草稿，他记得自己那天晚上去找了海明威，为此他一家一家酒吧寻访过去，直到海明威出现。

64 Alvah Bessie, *Men in Battle* (New York: Chandler & Sharp, 1975), 113. 该书首次出版于1939年。

65 全文刊载于*New Masses*, June 22, 1937, 其中包括海明威指责法西斯势力肆意炮轰，杀死平民。

66 Baker, *Hemingway*, 314. 另见Amanda Vail, *Hotel Florid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2014), 202-3.

67 1937年6月17日Max Perkins致EH, 见Bruccoli编辑,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251.

68 *New Masses*, June 22, 1937.

69 1938年7月18日EH致Ralph M. Ingersoll, 存于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70 未标明日期, 大约是1937年Ivens致海明威的纸条, 开头是“尤里斯口述, 汉娜打字”,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又见Baker, *Hemingway*, 313.

71 1937年7月8日Martha Gellhorn致Eleanor Roosevelt, 见Caroline 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of Martha Gellhorn*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55.

72 1937年8月23日EH致Paul Pfeiffer夫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59-61。

73 1937年8月23日EH致Paul Pfeiffer夫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59-61。

74 引文见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30, 从原始资料中引用。Dominic Tierney, *FDR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Tierney把这次会面放在罗斯福政策的广泛背景中进行了研究。起初持中立态度的罗斯福最终开始同情那些认为有必要反对德国和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人。

75 Eleanor Roosevelt, “My Day,” *Atlanta Constitution*, July 12, 1937. Roosevelt注明的日期是7月9日星期五; 文章在接下来的那一周才出现在《宪章》上。

76 1937年7月8日Gellhorn致Roosevelt。

77 在1938年7月27日写给Ralph Ingersoll的信中, 海明威提到他支付了Pauline的旅费, 请她陪同到西海岸去放映电影。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78 Rick Setlowe, “Hemingway and Hollywood: For Whom the Camera Rolled,”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4, 1979.

79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31.

80 引文见Marion Merriman和Warren Lerude,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 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86), 201-2。

81 Baker, *Hemingway*, 316.

82 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特别是117和130页。

83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36. 他的资料来源是对Gellhorn的一次访谈。

84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第136页。

第三章 重返西班牙：坚持到底

1 麻省理工学院Watson 教授就这个故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精彩的讲述。William B. Watson,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Story,” *North Dakota Quarterly* 59, no. 1 (Winter 1991): 36-68;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Trip,” *North Dakota Quarterly* 59, no. 3 (Summer 1991): 79-95; and “Investigating Hemingway: The Novel,” *North Dakota Quarterly* 60, no. 1 (Winter 1991): 1-39. 又见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169-70。原始资料是Alexander Szurek, *The Shattered Dream*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89), 特别是143-151页。Hochschild, *Spain in Our Hearts*, 254-255, 引用了Gellhorn的日记, 写道第一次探访阿尔凡布拉是在九月。

2 1938年1月28日Joris Ivens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

3 可参见Hans Kohn, “Yesterday's Landmarks,” *New York Times*, March 20, 1960. 这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对Regler回忆录的好评, 很好地介绍了Regler的生活和工作。

4 Regler, *Owl of Minerva*, 203 and 291.

5 Regler, *Owl of Minerva*, 第263页。

6 “First-Hand Picture of Conflict in Spain Given by Volunteer Here, ” *Washington Post*, March 18, 1938.

7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5.

8 Gurney, *Crusade in Spain*, 54, 183-84是一个英国士兵对Marty的直接描述。

9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2.

10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2. 。

11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2. 。

12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6-28讲述了海明威与Orlov首次会面的故事。

13 Gazur, *Alexander Orlov*, 第129页。苏联人不大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New Masses*在1937年6月22日那一期发表了他的演说的一个版本。

14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9.

15 Mary-Kay Wilmers, *The Eitingons: A Twentieth-Century Story* (London: Faber & Faber, 2010), 275. Wilmers的书中有了一张Eitingon的全身照，后者将在1940年安排谋杀托洛茨基的事件。刺杀托洛茨基的就是一个西班牙人，最初是内务部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找到的。

16 Gazur, *Alexander Orlov*, 130-31.

17 Gazur, *Alexander Orlov*, 131和140页。

18 Dan Bessie编辑, *Alvah Bessie's Spanish Civil War Notebook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2), 133.

19 引自Gazur, *Alexander Orlov*原始手稿第23章第1页, 收藏于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特藏, Edward P. Gazur文件, 与印刷出版的版本稍有出入。说到真正的信仰者海明威, 著名作家Marjorie K. Rawlings也曾在1938年4月23日致他们共同的编辑Max Perkins的信中有过类似说法, 她忍不住“怀疑”海明威目前的工作, 因为后者“当前的情绪充满了暴烈的党派偏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UL) Carlos Baker文件第11箱, Rawlings文件夹。Orlov有意突出海明威的反法西斯心态, 而没有突出他的任何亲共情绪。不过Orlov所谓的“真正的信仰者”到底是指什么呢? 他的英语口语流利, 阅读也无障碍, 特别从1938年到1971年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后。当他说海明威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时, 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真正的信仰者”这个词最初是由“码头工人哲学家”Eric Hofer发明的, 1950年代在美国精通政治的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 其中必然包括Orlov。他阅读了大量关于政治的书籍, 特别是跟共产主义有关的书籍, 且每天仔细阅读*New York Times*, 该报纸的专栏作家们对“真正的信仰者”一词亦熟稔于心。(Orlov文件中收藏有大量剪报, 从中可看出他的阅读习惯。见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美国报业联盟II, Alexander Orlov文件。)在跟Gazur谈论海明威之前, 他有可能读过Hofer的资料, 甚至可能读过Hofer的同名书籍。由Hofer发明的这个词指代的是那种将自己的个人身份纳入某一政治运动, 如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或反共产主义或反法西斯主义, 且非常投入, 到了用情感替代理智的地步。

20 Gazur, *Alexander Orlov*, 138. 只关注海明威的作用是虚伪的。Orlov省略了苏联的角色, 后者显然很成问题: 先是为共和国提供物质支持, 继而又对极左派发动造成分裂的秘密内部战争, 最后又开始限制物资供应。

21 Brian, *True Gen*, 121; Baker, *Hemingway*, 335.

22 Brian, *True Gen*, 121.

23 Preston, *We Saw Spain Die*, 371.

24 North, *No Men are Strangers*, 169.

25 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39.

26 Bowers致国务卿, April 2, 1938, 见美国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8), 279。

27 Bessie, *Men in Battle*, 113-16. 另见Dan Bessie编辑, *Civil War Notebooks*, 25, 以及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44, 其中说明Bessie的回忆录与海明威的报道一致。

28 转载于Ernest Hemingway, “‘I Saw Murder Done in Spain’—Hemingway's Lost Report,”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29, 1982. 这篇文章的故事见William B. Watson, “A Surprise from the Archives,”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29, 1982. 其中使用的语言与海明威1937年6月在卡内基大厅演说时的语言类似。

29 我参照了David Sanders, “Ernest Hemingway's Spanish Civil War Experience,” *American Quarterly* 12, no. 2 (1960) 中的分析, 特别是第139-140页。他的文章的总目录发表在Ernest Hemingway, “Hemingway Reports Spain,” *New Republic*, 94, no. 1221 (April 27, 1938), 和95, no. 1227 (June 8, 1938); 以及Ernest Hemingway, *By-Line: Ernest Hemingwa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7)。

30 Vernon, *Hemingway's Second War*, p. 39. Vernon分析了海明威在战争期间的报道。

31 Lynn, *Hemingway*, 453.

32 Ernest Hemingway, *The Fifth Colum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该剧1940年在百老汇上演。

33 1952年10月5日EH致Ada MacLeish, 海明威通信, 1938-1958, 存于国会图书馆MacLeish文件10号箱。

34 W. H. Auden, “Spain 1937”,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333引用并讨论了这首诗。

35 Ernest Hemingway, “On the American Dead in Spain, ” 见Ernest Hemingway等人, *Somebody Had to Do Something: A Memorial to James Phillips Lardner* (Los Angeles: James Lardner Memorial Fund, 1939)。这是一本纪念册, 海明威文章的大部分转载于*New Masses*, February 14, 1939。

36 De la Mora, *In Place of Splendor*, 373.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830-31, 描述了撤离本身的情景。

37 (1950?) Martha Gellhorn致David Gurewitsch,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222.

38 (1950?) Martha Gellhorn致David Gurewitsch,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第222页。

39 (1950?) Martha Gellhorn致David Gurewitsch,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第222页。另见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05, 和Moorehead, *Gellhorn*, 153。

40 引文见Regler, *Owl of Minerva*, 298。

41 Ehrenburg, *Memoirs*, 387.

第四章 丧钟为共和国而鸣：海明威见证了历史

1 De la Mora, *In Place of Splendor*, 387.

2 Szurek, *The Shattered Dream*, 276-77.

3 1939年2月6日EH致Paul Pfeiffer夫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75-478。

4 1939年2月6日EH致Paul Pfeiffer夫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75-478。

5 1939年2月7日EH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78-79。

6 1939年2月6日EH致Paul Pfeiffer夫人。

7 1939年2月7日EH致Max Perkins。

8 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893-901, 包括关于战争的最后关头及其余波的讨论。

9 1938年10月22日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Colebaugh,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7-70。

10 1939年3月23日EH致Ivan Kashkin,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80-81。

11 1939年2月7日EH致Max Perkins。

12 有各种版本, 包括Ernest Hemingway, *The Fifth Column*和*Four Storie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13 这个协议又叫作《希特勒-斯大林条约》(Hitler-Stalin Pact)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

14 Aaron, *Writers on the Left*, 376. 大致相同的意思, 见Granville Hicks, *Where We Came Out* (New York: Viking, 1954), 49, 70-71, 80。

15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3-54.

16 1940年3月24日Jay Allen致Archibald MacLeish: “欧内斯特给他在巴黎存了一笔钱, 以维持他的生计并支付他的费用。”国会图书馆, Archibald MacLeish文件1号箱。Regler多年的反纳粹历史无关紧要, 他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则雪上加霜, 使得他在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内的各类机构监控名单中榜上有名, 该局注意到海明威为某个潜在的颠覆分子提供了财务支援。英格兰基尤国家档案馆, 安全局档案KV 2/3506, Gustav Regler博士个人档案。

17 Regler, *Owl of Minerva*, 316.

18 Gustav Regler, *The Great Crusade* (New York: Longman, Green, 1940), 18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本书是

Whittaker Chambers 从德语翻译而来的，他本人就是个理想幻灭的前共产主义者，在美国调查苏联间谍时是个突出的人物。Chambers和Regler看起来并不相识。

19 Gustav Regler, *The Great Crusade* (New York: Longman, Green, 1940), vii-xi。另见Regler, *Owl of Minerva*, 310-11。

20 可参见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09和409-412, Conquest在书中讨论了国际纵队人员的命运。大致相同的内容，见Thomas, *Spanish Civil War*, 926: “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名成员就像1919年在俄罗斯介入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一样糟糕。”

21 欧内斯特·海明威为Regler, *Great Crusade*作的序, ix. 本书德语原版的措辞更加清晰: 该条约是在“苏联对民主国家丧失了全部信心之后”签订的 (“*als die Sowjetunion jedes Vertrauen in die Demokratien verloren hatte*”)。Gustav Regler, *Das grosse Beispiel* (1940年; 重印版, Cologne, Germany: Kiepenhauer & Witsch, 日期不详), 13-14。

22 海明威不是唯一一个如此解读的人。思考缜密的共产主义者Granville Hicks 教授写道, 对于很多人而言, 慕尼黑协定与条约同属背叛, 表明斯大林无法依赖英法, 因此“他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收拾希特勒”。Hicks, *Where We Came Out*, 81。

23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7.

24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7。

25 Regler, *Owl of Minerva*, 第296页。

26 1940年5月17日Martha Gellhorn致Clara Spiege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2号箱, Spiegel文件夹。

27 1940年5月17日Martha Gellhorn致Hortense Flexner和Wyncie King,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90。

28 1939年12月8日EH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98。

29 1940年5月1日前后EH 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05。

30 “Writer’ s Influence, ” *Time*, June 24, 1940, 92. 另见Donaldson, *MacLeish: An American Life*, 334-35。

31 1940年7月13日EH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06。

32 1940年8月15日EH致Charles Scribner的信中有所讨论,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07-10。

33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131. Hotchner报告的是海明威告诉他的事情。

34 1939年3月23日EH致Ivan Kashkin,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80-81。

35 Edmund Wilson, “Return of Ernest Hemingway, ” 转载于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of the 1930s & 40s*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2007) , 885。

36 Julio Alvarez del Vayo, *Give Me Combat: The Memoirs of Julio Alvarez del Vayo*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 188.

37 Alvah Bessie, 对*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评论, 见*New Masses*, November 5, 1940, 25-29.

38 Alvah Bessie, 对*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评论, 见*New Masses*, November 5, 1940, 25-29。另见Cecil B. Eby, *Comrades and Commissars: The Lincoln Battal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34-35。

39 Bessie, 评论, 28-29.

40 Brian, *True Gen*, 122-25.

41 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40.

42 Regler, *Dokumente und Analysen*, 51. Regler和多才多艺的共和军师长Gustavo Dura ´n讨论是否应谈及共和军的缺点。Dura ´n说：“我们只有同样说出——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才能在未来获得担任……领导的权威。”

43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3.

44 1939年12月8日EH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98-99.

45 Regler, *Owl of Minerva*, 293.

第五章 秘密档案：内务部在行动

1 Robert van Gelder, “Ernest Hemingway Talks of Work and Wa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1940. 海明威的密友Arnold Gingrich在他写完小说后，也对他乐观到近乎疯狂的心态作出了评价。Arnold Gingrich, *Nothing but People: The Early Days at Esquire* (New York: Crown, 1971), 247.

2 1940年7月13日EH致Max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06.

3 1942年10月15日EH致John Hemingway,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4 1940年10月21日EH致Charles Scribne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19-20.

5 Martha Gellhorn致Hortense Flexner, October 30, 1940,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103-6. 她写道, “缅甸公路没希望了。《科利尔》杂志派别人去了, 另一个女孩”。*Selected Letters*, 106-107页, 内有后续情况的一条编辑评论。

6 达到“再借款上限”的记录，1941年，Henry Morgenthau, Jr. 的日记，第一辑：摩根索日记，第351，239-60卷，纽约州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7 达到“再借款上限”的记录，1941年，Henry Morgenthau, Jr. 的日记，第一辑：摩根索日记，第351，239-60卷，纽约州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另见Peter 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His WWII Spy Mission with Martha Gellhorn*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7), 14-20。关于此次旅行和怀特，Moreira发掘了很多有趣的真相。然而，他未能为他的论文提出充分可信的理由——比方说，海明威去中国进行间谍任务，此次任务激起了他对战时情报工作的痴迷。我在第六章更详细地探讨了主题。

8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外发信件”。此信也转载于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201-8。

9 例如参见Michael Warner,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Washington, DC: CIA, 2000), 3。

10 海明威的态度可以从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 的信中推断出来。

11 1940年12月26日EH致Hadley Mowrer，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520-21。海明威致Hadley的下一封信于1941年1月26日发自纽约。*Selected Letters*, 第521页。1月26日或27日，他与Harry Dexter White 谈话时，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纽约。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16和214n。

12 多部著作中都描述了Golos，其中包括Haynes等人，*Spies*，特别是496-500页；Lauren Kessler, *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 the Spy Who Ushered in the McCarthy Era* (New York: Perennial, 2003)；Elizabeth Bentley, *Out of Bondage* (New York: Ivy, 1988)，特别是65-73页；以及Herbert Romerstein和Eric Breindel, *The Venona Secrets: Exposing Soviet Espionage*

and America's Traitors (Washington, DC: Regnery, 2000), 145-50.

13 写在一张纸条上的话，注明日期为1928年11月20日，记录在调查局的一份标题为“Jacob Golos个人文件”的清单中，1948年10月13日，见Silvermaster档案，文件65-14603，第146卷，<http://education-research.org/PDFs/Silvermaster146.pdf>（2014年2月访问）。Golos的个人文件反映了他的兴趣和生活方式。

14 Alexander Vassiliev, “White Notebook,” 123和129页，见国会图书馆，Vassiliev文件。这些文件有很多版本：手写俄文、俄文打字，以及英文译文。手写的俄文文件是Vassiliev的1993年到1995年内务部/克格勃机密文件的抄本。我引用的是英文译文，所引的页码也是译文的页码（见于每页的右上角），而不是Vassiliev文本中所引用的页码。这些文件也偶尔在线提供。例如可见于“Vassiliev的笔记本”，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2015年10月访问），其中有对其来源的解释。Haynes等人，*Spies*，巨细靡遗地探讨了它们的来源和内容。

15 关于这一过程的描述，可见Kessler, *Clever Girl*, 55-89。

16 Gazur, *Alexander Orlov*, 124-29.

17 Alexander Vassiliev, “Operations in the U.S. in 1941-45”，既未注明日期也无页码，见国会图书馆，Alexander Vassiliev文件，“Summary Narratives”。这些记述是Vassiliev准备的，意在让俄罗斯情报官员审查可能会向某位西方历史学家公开的情报，后者随后会写下这段历史，并将部分收益与他的俄罗斯搭档分享（正如本章后文中所讨论的那样）。Kathryn S. Olmstead, *Red Spy Queen: A Biography of Elizabeth Bentle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23-26, 其中有Golos如何招募另一个间谍的精彩描述。

18 Hugh Eakin, “Stalin’s Reading List,”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2005, F19. 海明威的克格勃文件概要写于1948年6月，其中陈述了克格勃对他的评价。几乎一字不差地印于Haynes等人，*Spies*, 154。正如Vassiliev所抄录的那样，原件是“Report on ‘Argo’”，1948年6月8日，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19 Bentley, *Out of Bondage*, 107-8.

20 转载于Matthew J. Bruccoli编辑, *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6), 72。

21 1964年3月5日Douglas M. Jacobs致Carlos Baker,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Baker文件19号箱, 1940年文件夹。Jacobs见证了他们的重逢。

22 Haynes等人, *Spies*, 153。

23 Eleanor Langer, *Josephine Herbst*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9.

24 (1939年)1月10日Joris Ivens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25 “Report on ‘Argo’”, 1948年6月8日, 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26 Haynes等人, *Spies*, 145-46. *Spies*一书中关于“新闻间谍”的一章相当详细地探讨了主题, 并举例说明了内务部如何利用某些美国新闻记者当间谍, 进行诸如从其信源搜集情报, 以及作为内务部官员和间谍之间的“保险开关”。记者还可以撰写倾向于苏联政策的文章。但是, 这似乎并不符合内务部此时寻求美国记者的初衷。

27 Haynes等人, *Spies*, 145-46. *Spies*, 153和574n页。原件见Vassiliev, *White Notebook #1*, 29。至少在1941年1月23日, 海明威显然是在纽约的朗巴迪酒店。参见1941年1月23日EH致Milton Wolff的信, 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 Milton Wolff文件1号箱。

28 海明威和Gellhorn在安排旅游计划时遇到的困难通常可以解释为他们希望搭乘的席位或铺位短缺。但也可能他们想办法经由苏联前往中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13-14, 讨论了他们的旅行计划。

29 Vassiliev, “Operations in the U.S.” 纽约发给莫斯科的原始记录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90。

30 Vassiliev, “Operations in the U.S.”

31 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可在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阅读（2014年2月访问）。

32 Haynes等人, *Spies*, ix-xx和xxvii-liii分两部分讲述了这个故事。第一部分是Haynes和Klehr的序言；第二部分是Vassiliev的介绍, “How I Came to Write My Notebooks, Discover Alger Hiss, and Lose to His Lawyer.”

33 Allen Weinstein和Alexander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9) 一书使用了Vassiliev撰写的概述, 或多或少是根据外情局的计划。此书的细节和人名少于Haynes等人的*Spies*一书, 后者基于Vassiliev的原始笔记。*The Haunted Wood*一书顺便提到了海明威, 但没有提到他是内务部间谍。

34 Costello和Tsarev, *Deadly Illusions*。

35 Haynes等人, *Spies*, xlii。

36 我的分析一般遵从上书, ix-xx的论点。

37 见第12章。

38 Gellhorn 在书中没有提到这个主题, 这不能证明什么。我未能查阅波士顿大学戈特利布档案研究中心的Martha Gellhorn文件, 寻找关于这一主题的任何线索。档案管理员给我的回答是, 文件要到2023年她去世25年后才会解封（尽管某些作者已获准查阅那些资料）。

39 EH致Ada MacLeish, 日期不详, 见国会图书馆, MacLeish文件, 海明威通信1938-1958。内容表明, 海明威是在1940年12月或1941年1月写的这封信。

40 1948年, 他会暗示在自己与苏联人的秘密关系中, 局面是由他掌控的, 说他会去找“一个高层老毛子”, 问他想知道些什么, 而俄

罗斯人会知无不言。1948年7月28日EH致Charles T. Lanham,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另见第12章的讨论。

41 致“Walter”的电报草稿, 盖有“1940年”的附注,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1948年, 他会将自己与苏联人的往来和山里人Jim Bridger与印第安人在前线的交易相比较。1948年7月28日EH致Charles T. Lanham,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另见第12章的讨论。

42 这一法律仍然有效。参见www.fara.gov (2014年2月21日访问)。可能性更小的是违反了1940年的《史密斯法》, 该法认定, 鼓吹武装颠覆美国政府即为违法; 在美国参加二战之前, 武装颠覆美国政府一直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计划的一部分。

43 “海明威先生向希普利夫人出示了一份在西班牙从事常规报道的合同”, 并向她保证这就是他想要做的一切。1937年2月24日, J. Bell在EH当日签名的护照申请书上所加的边注。国务院根据《信息自由法》向作者公开。战后, 他会说政府因为他是个“不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认为他不值得信任。见第11-12章。

44 Ernest Hemingway, “Old Newsman Writes: A Letter from Cuba”, 1943年12月, 见White编辑, *By-Line*, 179-85。

第六章 探还是不探: 中国和战争的压力

1 关于战时重庆的精彩描述引自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8), 67-70, 特别是第69页。

2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51-52.

3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第52页。

4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第10页。

5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第11页。

6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New York: Penguin, 2001), 第12页。

7 EH致Martha Gellhorn, 未注明日期但有“1941年5月16日后”的记录,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8 引文见Bruccoli编辑, *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 138。

9 Gellhorn, *Travels*, 30.

10 Gellhorn, *Travels*, 第14页。

11 White编辑, *By-Line*, 306. 就连悲观的美国共产主义者Agnes Smedley都不得不承认, 1941年的香港还是个外国人休闲喝酒的好地方, 让他们忘记迫在眉睫的进攻。Agnes Smedley, *China Correspondent* (London and Boston: Pandora, 1984), 360.

12 1947年4月5日EH致Bernard Peyton,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1号箱, Peyton文件夹, 内有他的鸡尾酒配方和声明, 说这种配方和日本军队一样, 可以打垮殖民地。Smedley, *China Correspondent*, 361, 讲述了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

13 Smedley, *China Correspondent*, 361.

14 White编辑, *By-Line*, 305。

15 White编辑, *By-Line*, 第319页。

16 Baker, *Hemingway*, 364. 他告知公众, 香港“固若金汤”, 如果切断其食物供给就会脆弱不堪。White编辑, *By-Line*, 305。

17 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135.

18 White编辑, *By-Line*, 316。

19 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210-11. Gellhorn, *Travels*, 48, 报道说他们逗留了“数周”，此说不太可能。另见White编辑, *By-Line*, 308。

20 Gellhorn, *Travels*, 49. 海明威认识的另一个“委员长”当然就是弗朗哥了。

21 Gellhorn, *Travels*, 第51页。

22 Gellhorn, *Travels*, 第51页。

23 Gellhorn, *Travels*, 第52-53页。

24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转载于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201-8. 海明威的一位中国翻译说, 这个美国人赞扬周恩来“多才多艺, 敏于外交”, 尽管他“过分强调了共产党……在战争中的作用”。Kaimei Zheng, “Hemingway in China,” *North Dakota Quarterly* 70, no. 4 (2003): 184-85.

25 “Report on ‘Argo,’ ” 1948年6月8日, 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26 安排这次会面的欧洲人Anna Wong在回忆录中写道, 会面有一个小时左右, 对话以海明威为主, 而不是周, 这似乎不太可能。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130. 海明威知道该如何当一个好记者, 注意倾听他的消息提供者不吐不快的话。

27 White编辑, *By-Line*, 307.

28 引文见Moreira, *Hemingway on the China Front*, 207。

29 White编辑, *By-Line*, 317. 海明威没有说他是哪里以及如何第一次遇到这位官员的。

30 可见David L. Charney, “True Psychology of the Insider Spy,” *Intelligencer* 18, no. 1 (Fall/Winter 2010): 47-54, 考察了间谍工作的心理状态。

31 “The true gen”是英军俚语，指“真实情况”，意为“内幕”或“完整消息”。

32 1952年10月5日EH致Archibald MacLeish，国会图书馆，MacLeish 文件，第10箱，海明威通信1938-1958。海明威试图解释他所承担的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如何让他难以应付。1940年8月23日，Gellhorn做了类似的评价，她写道：“今年是重要的一年，要写一本书，要离婚，还要决定买一幢房子。……我相信E跟我一样筋疲力尽。”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Scribner，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斯科里布纳之子公司档案778号箱，Gellhorn文件夹。

33 1952年10月5日EH致Ada MacLeish，见国会图书馆，MacLeish 文件10号箱，海明威通信1938-1958。

34 1941年4月29日EH致Max Perkins，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522-23。

35 Baker, *Hemingway*, 364.

36 1966年5月11日William J. Lederer致Carlos Baker，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9号箱，远东之旅文件夹。

37 EH致Martha Gellhorn，未标注日期但有“1941年5月16日后”的记录，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外发信件”。另见Baker, *Hemingway*, 364-65.

38 EH致Martha Gellhorn，未标注日期但有“1941年5月16日后”的记录。

39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

40 White编辑，*By-Line*, 303-14。

41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提及此前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谈中“我们谈论过”，说明那次会谈相当短暂。早些时候，海明威转达了他的问候，并祝愿Morgenthau在“这些艰难时期”工作顺利，这说明他希望能取悦Morgenthau。1941年5月29日Harry Dexter White致Henry Morgenthau, Jr.，谈及“海明威和Bond对中国

交通的评价”，罗斯福总统图书馆，Morgenthau日记。财政部曾请求海明威考察中国的交通网络，海明威对此没多大兴趣，将此任务委托给一个名叫H. L. Bond的泛美航空公司官员。1966年4月15日H. L. Bond致Carlos Baker，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9号箱，远东之旅文件夹。

42 1966年4月15日H. L. Bond致Carlos Baker，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谈话主题以及海明威乐于提出建议。

43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两星期后，White向Morgenthau概述了此信。1941年8月14日Harry Dexter White致Henry Morgenthau, Jr.，罗斯福总统图书馆，Morgenthau日记，“海明威先生关于中国的信件摘要”。

44 1941年7月30日EH致Henry Morgenthau, Jr.。

45 Haynes等人，*Spies*, 258。该资料来源中有一篇关于White作为苏联间谍的活动证据的精彩总结（258-62）。R. Bruce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The Harry Dexter White Spy Case*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对于White的行为给出了善意的解释。

46 John H. Wheelock编辑，*Editor to Author: The Letters of Maxwell E. Perki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0)，包含Thomason早至1927年所收到的信件。1940年1月，Perkins巧遇Sweeny，认为他“相如其人”（153）。

47 Baker, *Hemingway*, 365。从1940年夏到1943年3月，Thomason在海军情报局供职，主要负责拉丁美洲。弗吉尼亚州匡提科市，海军陆战队历史部，军官资格记录，“Thomason, John W. Jr.记录”；Martha Anne Turner, *The World of John W. Thomason, USMC* (Austin, TX: Eakin Press, 1984)，311。

48 Gellhorn, *Travels*, 53.

49 1941年6月3日或4日John W. Thomason致Maxwell Perkins，见Carlos Baker文件19号箱，1941年文件夹。

第七章 骗子工厂：一场秘密的陆战

1 Leddy向华盛顿汇报了有关美国盖世太保的评论。1942年10月8日LegAtt致局长，转载于Thomas 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Hemingway, Cuba, the FBI, and the Crook Factory* (New York: iUniverse, 2009), 13-16。相同的文件载于调查局网站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4年7月访问)。Joyce在其未出版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次午夜遭遇。他没有点名Guest或Leddy, 但他的描述无疑表明了他们的身份。Robert Joyce回忆录见耶鲁大学图书馆, Robert Joyce文件 (MS 1901) 1号箱, 5、50文件夹。

2 海明威在某些报道中描述了古巴的湾流和生活, 其中包括“Marlin off the Morro: A Cuban Letter,” *Esquire*, 1933年秋; “Out in the Stream: A Cuban Letter,” *Esquire*, 1934年8月; 和 “On the Blue Water: A Gulf Stream Letter,” *Esquire*, 1936年4月。三个叙述均转载于White编辑, *By-Line*。

3 Spruille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The Memoirs of Spruille Braden* (New Rochelle, NY: Arlington House, 1971), 285.

4 1945年2月20日Braden致George Messersmith, 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 Spruille Braden文件, 1945年外交通信。

5 1941年8月14日海明威致Prudencio de Pereda,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26。

6 可参见Constantine Pleshakov, *Stalin's Foll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86-87。

7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59), vol. 1, 159. 这是其回忆录的精简版。

8 可参见David M. Glantz和Jonathan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特别是第53和292页。

9 可参见Mark A. Bradley, *A Very Principled Bo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24-25的讨论。比较起来, 美国人的二战死亡人数约为407000人。

10 Joseph Freeman, 1941年8月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无题文章, 见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Joseph Freeman文件111号箱, 4号文件夹。

11 1941年11月27日莫斯科中心致纽约, 引文见Vassiliev, *White Notebook*, 30。

12 耶鲁大学图书馆Joyce文件1号箱。海明威向Joyce出示电报时, Joyce未能记录, 但这可能发生在1941年夏到1943年中他们俩都在古巴之时。

13 可见上书, 55-56页中他的赞美之词, 和1946年6月20日EH致Konstantin Simonov,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07。

14 1941年12月11日Hemingway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31。

15 1941年12月11日Hemingway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31。

16 1941年12月12日海明威致Charles Scribne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432-33。Martha下一次致信Scribner是写在汽车旅馆的信纸上的。1941年12月13日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Scribner,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档案778号箱, Gellhorn文件夹, “欧内斯特·海明威相关通信”。

17 1942年3月5日Martha Gellhorn和EH致“Bill” Davis,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Gellhorn个人文件。自16世纪以来, 斗牛便是墨西哥常见的体育活动。墨西哥城迄今仍有一个活跃的斗牛场。

18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6-57.

19 Regler, *Owl of Minerva*, 第357页。Regler补充说海明威不信任的只有“我的众多诽谤者中的一位，此人……（在未来的）1953年被其所在的政党吊死在布拉格”。这里非常有趣地提到了Otto Katz，他是共产国际的特工，西班牙内战期间曾为Willi Mu¨nzenberg工作，并曾试图招募Barbara Wertheim（即后来的Barbara Tuchman）。海明威和Katz在哪里相遇，海明威又为何不信任他？

20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7. 正如一位研究海明威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次爆发与他1937年试图与Dos Passos恢复联络不无相似之处。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185.

21 Regler, *Owl of Minerva*, 357.

22 1947年2月13日EH致“Miss Craipeau”，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海明威藏品，“外发信件”。从海明威的信件中未能进一步确定“Miss Craipeau”的身份，看起来她给海明威寄了有关苏联的一篇文章和一本书，而他对两者都做出了评论。Craipeau很可能与法国托派分子Yvan Craipeau有关，后者是有关苏联的多本书籍的作者。例如，Yvan Craipeau在1937年的文章“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Russian Counterrevolution”，见E. Haberkern和Arthur Lipow编辑，*Neither Capitalism nor Socialism: Theories of Bureaucratic Collectivism* (Alameda, CA: Center for Socialist History, 2008)，25-39。

23 1941年7月17日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Colebaugh，见Moorehead编辑，*Selected Letters*, 112-13。

24 1941年7月17日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Colebaugh，见Moorehead编辑，*Selected Letters*, 112-13。

25 Ross E. Rowell, “Attache´ Report”，1939年9月25日，见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美国海军记录（RG 38），4号书架，29号隔层，第15排，370号堆区，27号箱。

26 1942年7月29日J. Edgar Hoover致Adolf Berle，见RG 38，1号书架，19号隔层，第14排，370号堆区，239号箱。

27 Hayne D. Boyden, 情报报告, 1940年8月6日, 见RG 38, 4号书架, 29号隔层, 第15排, 370号堆区, 27号箱。Gellhorn在一封信中转述了同样的事件: “他(纳粹)满口大放厥词, 直到E叫他(出去), 然后他就消失了。”1940年夏Martha Gellhorn致Charles Scribner,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斯克里布纳之子公司档案778号箱。

28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45号文件夹。

29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45号文件夹, 第46页。

30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45号文件夹。Joyce及其上司Braden大使甚至认为, 海明威是打压苏联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宣传热情的合适人选。Joyce给海明威的一个备注给人以这种印象, 日期不详(很可能在1942年夏),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另见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302-3。

31 Carlos Baker, “Information from Robert Joyce”, 1963年11月17日,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 1942年文件夹。

32 Ellis O. Briggs, *Proud Servant: Memoirs of a Career Ambassador*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4.

33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

34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

35 1942年10月8日LegAtt致局长,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3-16.

36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1、50号文件夹。

37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

38 1942年10月8日LegAtt致局长。

39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47-48号文件夹。R-42大概就是海明威在古巴的忠诚随从Winston Guest。

40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47-48号文件夹。R-42大概就是海明威在古巴的忠诚随从Winston Guest。

41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54号文件夹。

42 D. M. Ladd,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RE: Ernest Hemingway”, 1943年4月27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30。

43 1942年11月20日Braden致L. Duggan, 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国务院记录 (RG 59), 文件编号852.01。另见1944年3月7日Braden致Hemingway,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 Spruille Braden 文件: “你所从事的高度机密的情报活动……极有价值……你的背景、经验和能力让你有了独特的积累, 因而你的解读……可以协助我们评估某些事态的发展。”

44 1942年10月8日LegAtt致局长,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3-16。

45 D. M. Ladd,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RE: Ernest Hemingway”, 1942年12月17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21-23。

46 D. M. Ladd,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RE: Ernest Hemingway”, 1942年12月17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21-23, 以及Leddy, “Memorandum”, 1943年6月13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50。

47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第5、50号文件夹。

48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第5、50号文件夹, 第50页。海明威在大约同时期给他兄弟的信中展示了相似的态度, 他向这个年轻人讲解了情报和新闻之间的差别。1941年6月28日EH致Leicester Hemingway, 见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Sarasota, FL: Pineapple Press, 1996), 300-1。

49 J. Edgar Hoover, “RE: Ernest Hemingway”, 1942年12月17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25。

50 C.H. Carson, “Memorandum for Mr. Ladd R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Ernest Hemingway in Cuba”, 1943年6月13日, 以及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amm [and] Mr. Ladd”, 1942年12月19日, 两篇文章均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27和57页。

51 J. Edgar Hoover, “Memorandum for Mr. Tamm [and] Mr. Ladd”, 1942年12月19日。Hoover 1943年的一条备注命令其属下“给我有关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备忘录”, 证明了Hoover本人对作家的兴趣。局长办公室备忘录, 日期不详, 大概完成于1943年2月或3月, 见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4年7月访问)。当年早些时候, 海明威反对一位名叫Edward Knoblaugh的调查局特工, Hoover此举大概是对这个行动的回应。海明威通过一封冗长的详细备忘录, 历数那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有同情法西斯的嫌疑, 试图劝说 Braden大使把Knoblaugh从哈瓦那遣送回国。1943年2月10日EH致 Spruille Braden,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大使起初同意了, 随后却自食其言, 但显然是在海明威为自己的阶段性胜利而扬扬得意之后。Baker, *Hemingway*, 380-81; 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60。

52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54-55号文件夹。

53 1942年10月9日LegAtt致局长,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7-18。

54 引文见 C. H. Carson, “Memorandum for Mr. Ladd R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of Ernest Hemingway in Cuba”, 1943年6月13日,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51。

55 她的妹夫Michael Straight后来被揭穿是剑桥大学内务部间谍圈子中唯一的美国人, 第八章结尾处有所提及。苏联的间谍头子Orlov在那次行动中也发挥了作用。

56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54号文件夹。1942年10月9日LegAtt致局长, 重印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7-18, 报告说大使以海明威的名义向华盛顿方面说情, 以保证Durán的工作是“为了协助海明威先生这一特殊目的”。

57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54-55号文件夹。

58 Baker, “Information from Robert Joyce”, 1963年11月17日。

59 耶鲁大学图书馆, Joyce文件1号箱, 5、55号文件夹。据调查局说: “海明威的组织被解散了, 其工作于1943年4月1日终止。” 1943年4月21日LegAtt致局长,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28。

第八章 “皮拉尔”号与海战: 我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

1 *Pilar*航海日志,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其他资料”。亦转载于Terry Mort, *The Hemingway Patrols* (New York: Scribner, 2009), 185-88。

2 Gregory H. Hemingway, *Papa: A Personal Memoi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 88. Gregory声称在那个特定的日子, 他正在船上, 但这大概是道听途说。勤奋的年代考据者认为他当天在基韦斯特。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40。

3 1950年6月3日EH致Lillian Ross,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9号箱, 1942年文件夹。

4 见EH, “First Poem to Mary in London, ” Nicholas Gerogiannis编辑, *Ernest Hemingway, 88 Poe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104。

5 *Pilar*航海日志。

6 1949年1月5日EH致Charles T. Lanham (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7 Paul Hendrickson, *Hemingway's Boat: Everything He Loved in Life, and Lost* (New York: Knopf, 2011), 9.

8 Paul Hendrickson, *Hemingway's Boat: Everything He Loved in Life, and Lost* (New York: Knopf, 2011), 第74页。

9 见第一章。

10 1941年6月28日EH致Leicester Hemingway, 转载于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300-301。

11 Ernest Hemingway编辑, *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 (New York: Crown, 1942). Baker, *Hemingway*, 371, 描述了Crown如何请求海明威编辑这本书, 以及海明威如何计划“倚重(其朋友Perkins, Thomason 和Sweeny的)编辑和军事经验”。

12 EH编辑, *Men at War*, xi。

13 EH编辑, *Men at War*, xi, 第xxiii页。Smedley在回忆录里写了几段关于她与海明威会谈的情况。见第六章, 更笼统的情况见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EH编辑, *Men at War*, xx。

15 EH编辑, *Men at War*, 第xxvii页。

16 1948年4月9日EH致Malcolm Cowley,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17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84.

18 1948年12月15日EH致Alfred Rice,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54-56。

19 Gregory Hemingway, *Papa*, 70.

20 1948年6月28日EH致Malcolm Cowley,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21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23. 我无法记录Jenkinson的海军情报任务。那大概是在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的工作。欧内斯特·海明威与Jenkinson的第一次接触可能是1937年这个英国人访问基韦斯特之时。Jenkinson与Joris Ivens也有联系。1938年, Jenkinson在为*London Daily Sketch*报道新闻期间, 和Ivens在中国相遇, 并开始与海明威通信谈论远东的情况。见 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02。

22 Sir Anthony Jenkinson, *America Came My Way* (London: Arthur Barker, 1936), 以及*Where Seldom a Gun Is Heard* (London: Arthur Barker, 1937)。

23 1948年11月15日EH致Charles T. Lanham,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24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23.

25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23。

26 1940年3月19日Leicester Hemingway致EH, 见Norberto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Secaucus, NJ: Lyle Stuart, 1984), 316-18.

27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23.

28 可参见1940年5月1日EH致Anthony Jenkinson, 见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318-19。

29 Leicester Hemingway和Anthony Jenkinson, “A Caribbean Snoop Cruise, ” *Reader's Digest* 37 (1940): 128。

30 Leicester Hemingway和Anthony Jenkinson, “A Caribbean Snoop Cruise, ” *Reader’s Digest* 37 (1940): 128.

31 1942年3月24日T. J. Wilkinson致William J. Donovan, 见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战情局记录 (RG 226), 92号条目, 信息协调办公室/战情局中央文件, “Leicester Hemingway” 文件夹。

32 1940年7月 (日期不详) EH致Grace Hemingway, 见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97。海明威不是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对Leicester表示客气。他还在战后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赞扬了后者的工作。见1948年11月25日EH致Charles Lanham,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

33 见第七章。

34 可参见Ross E. Rowell, “Attache’ Report”, 1940年1月27日, 见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RG 38, 海军情报局文件, 第4排, 29号隔层, 第15排, 370号堆区, 27号箱, “专论型文件”。

35 Homer H. Hickam, Jr., *Torpedo Junction: U-Boat War off America’s East Coast, 1942*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159, 291.

36 1942年1月30日George S. Messersmith致Laurence Duggan,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国务院文件 (RG 59) 4649号箱, 国务院 (DoS) 标识符837.24。Messersmith是Braden的前任大使。两个月后的一个类似的情报提到古巴附近的一次沉船。1942年3月27日Ellis O. Briggs致Philip W. Bonsal,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DoS 文件3220号箱, DoS标识符800.20237。

37 1941年6月28日EH致Leicester Hemingway, 见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300。

38 1941年6月28日EH致Leicester Hemingway, 见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第224页。

39 1941年6月28日EH致Leicester Hemingway。

40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 Braden给人的印象是这段对话发生在骗子工厂关张之后；实际上，两次行动有相当长时间的重叠。

41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84页。

42 Brade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283-84页。

43 EH, “Notes 1935-1944”, 日期不详,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其他资料”。

44 Ellis Briggs, *Shots Heard Round the World: An Ambassador's Hunting Adventures on Four Continents* (New York: Viking 1957), 55-60. 1942年, Briggs是大使馆的一名高阶军官并参加了这次协商。另见1942年11月9日无名氏致EH,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 “加勒比海潜艇战”的一个备注, 提及了Thomason“与你在哈瓦那的谈话”。海明威本人在战后回信给Malcolm Cowley, 谈及了“无友行动”。见1948年4月9日和1948年6月28日EH致Malcolm Cowley,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45 Briggs, *Shots Heard Round the World*, 58-59.

46 1948年4月9日EH致Malcolm Cowley。

47 1942年11月9日EH致Robert Joyce,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另见1949年1月13日EH致Don Saxon,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1号箱。“布谷”或“布谷鸟”两种写法均出现在海明威的信中, 或许是Boyden作为海军飞行员的非正式但永久性的呼叫代号。

48 Briggs, *Shots Heard Round the World*, 59-60. 2014年8月18日, 来自海军陆战队历史部历史参考处的一份电子邮件提供了有关Saxon工作的基本信息。

49 1943年5月18日Hayne D. Boyden致有关人士，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EH博物馆藏品，“来信”。

50 1942年11月2日EH致Hayne D. Boyden，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外发信件”。

51 1948年6月28日EH致Malcolm Cowley。

52 1948年6月28日EH致Malcolm Cowley。

53 1943年9月21日法律专员办公室致调查局局长，见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87-89。该文件只提到了“保密线人……396号”，表明意在保护他的身份免为局外人所知。无论为了什么原因，海明威似乎对他跟396号说话的内容非常小心，不对他讲任何有争议的话。

54 1943年6月26日Martha Gellhorn致EH，见Moorehead编辑，*Selected Letters*, 145。

55 Baker, *Hemingway*, 381.

56 1948年6月28日EH致Malcolm Cowley。

57 1942年12月10日条目，二战日记，加勒比海前线，1942年4月至1943年12月，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RG 38，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记录。Michael 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New York: Norton, 1999), 72-81，引用了类似的信息并详细讲述了“无友行动”的故事。

58 1944年3月7日Spruille Braden致EH，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Spruille Braden文件，“分类通信”。战后，海明威提到他曾把该信件交给律师保管。1948年12月15日EH致Alfred Rice，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655。

59 1944年3月21日EH致Spruille Braden，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Spruille Braden文件，“分类通信”。

60 1943年5月5日前后EH致Archibald MacLeish，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544-46。几个月后，他致信Max Perkins，说他

“不会跟任何人交换（他）现在的工作”。1943年8月2日EH致Maxwell Perkins，见上书，547-48页。

61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229-30.

62 Leicester Hemingway, *My Brother, Ernest Hemingway*, 第230页。

63 Vassiliev 文件中1948年文件总结相关句子是：“在1943年9月，‘阿尔戈’还在哈瓦那时，有一幢乡间庄园，我们的员工接触了他，在他动身前往欧洲前只见了他两次。” 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64 可参见他关于苏联的战时评论，记录见耶鲁大学图书馆，Joyce文件1号箱，5、55-56号文件夹。

65 Michael Straight, *After Long Silence* (New York: Norton, 1983), 129-30.

66 Michael Straight, *After Long Silence* (New York: Norton, 1983), 129-30.

67 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第九章 挺进巴黎：勇猛如野牛

1 Nelson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The World War II Diaries of Colonel David K. E. Bruce*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0;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的附件，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另见Robert Fuller, “Hemingway at Rambouillet,” *Hemingway Review* 33, no. 2 (Spring 2014): 68-70.

2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0.

3 1944年8月27日EH致Mary Welsh (MW)，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64.

4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

5 1942年3月4日Martha Gellhorn致Clara Spiege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2号箱Spiegel文件夹。

6 Moorehead编辑，*Selected Letters*，149-60。

7 Joyce描述了他从外事处离职的情况，见耶鲁大学图书馆，Joyce文件1号箱，6、1号文件夹。他的战情局个人记录中还包括与他申请并服务于战情局有关材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战情局文件，Robert P. Joyce个人文件。

8 1944年3月16日Joyce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这封信中提到了1944年2月9日Joyce致Shepardson的早先信息的内容，该信息不在其他消息之中。这些信息后来被移交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的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我在那里无法找到它们。我在这份《信息自由法》公开资料中找到了该资料，此事显然发生在1983年2月，由学者Daniel Robinson提供。

9 1944年2月14日McBaine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

10 1944年3月16日Joyce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

11 1944年4月6日Magruder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

12 1944年4月6日Magruder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Buxton的备注与Magruder给Shepardson的备忘录在同一页上。

13 1944年4月21日Bigelow致Shepardson，中情局据《信息自由法》公开的信息。

14 1944年5月1日Shepardson致Joyce，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战情局文件，条目99，53号箱，“中东行动战场（METO）”

邮包审查”（1944年2月1日至5月27日）。这是现场收到的杂项通信概要，其中并不包括与海明威有关的其他信息。

15 Baker, *Hemingway*, 385.

16 Moorehead, *Gellhorn*, 212.

17 Kert, *The Hemingway Women*, 391-92.

18 Jennet Conant, *The Irregulars: Roald Dahl and the British Spy Ring in Wartime Washingt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8), 描述了他的工作。

19 1943年10月19日Roald Dahl致“亲爱的妈妈”，英格兰白金汉郡，罗尔德·达尔博物馆与故事中心（RDMS）。

20 1944年3月21日Roald Dahl致“亲爱的妈妈”，RDMS。

21 1965年7月28日Roald Dahl致一位不知姓名的收信人（大概是Carlos Baker）的信件草稿，RDMS。

22 1944年4月28日Martha Gellhorn致Eleanor Roosevelt, 见Moorehead编辑, *Selected Letters*, 160-61。

23 1965年7月28日Roald Dahl致一位不知姓名的收信人（大概是Carlos Baker）的信件草稿，RDMS。拳击手是George Brown。 Baker, *Hemingway*, 386.

24 Matthew Sweet, *The West End Front* (London: Faber & Faber, 2011), 91.

25 Matthew Sweet, *The West End Front* (London: Faber & Faber, 2011), 特别是82-92页。

26 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引文另见Haynes等人, *Spies*, 154。

27 EH, “Voyage to Victory”, 见White编辑, *By-Line*, 340-41。

28 1953年3月16日EH致Charles Poore,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1号箱; 1946年6月20日EH致Konstantin Simonov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07-9。

29 H. R. Stoneback, “Hemingway’s Happiest Summer— ‘The Wildest, Most Beautiful, Wonderful Time Ever’ o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Hemingway, ” *North Dakota Quarterly* 64, no. 3 (Summer 1997): 184-220, 是关于该主题的文学的一篇无出其右的评论, 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作品。我还有赖于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特别是101-9页。

30 引文见Baker, *Hemingway*, 404.

31 1953年3月16日EH致Charles Poore,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 Poore文件夹。

32 EH, “Battle for Paris”, 见White编辑, *By-Line*, 365. 另一个可靠的来源是1944年8月27日EH致MW,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33 Richard Harris Smith,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91.

34 Robert Capa, *Slightly Out of Foc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9), 179.

35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Bruce把他为“一位作家”(可能是Denis Brian或Malcolm Cowley)撰写的关于朗布依埃的回忆手稿附在信后。

36 引文见Nelson Lankford, *The Last American Aristocrat: The Biography of Ambassador David K. E. Bru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96), p. 155. 另见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0。

37 S. L. A. Marshall, *Bringing Up the Rear* (San Francisco: Presidio Press, 1979), 101. 本书转载了关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 该文章首次发表于1961年。

38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0。

39 1965年12月13日David Bruce致Carlos Baker, 见里士满市弗吉尼亚历史学会, David Bruce文件。

40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6。

41 Miles Copeland, *The Game Player* (London: Aurum Press, 1989), 55. Copeland是一名战情局军官, 他于8月21日抵达旅馆。海明威的略有不同的版本见EH, “Battle for Paris”, 见White编辑, *By-Line*, 369。

42 1948年11月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

43 1948年11月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

44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

45 1965年11月23日David Bruce致Carlos Baker, 见里士满市弗吉尼亚历史学会, David Bruce文件。“我……偶尔会见到他发狂, 特别是在他喝了太多酒以后。”

46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8。

47 EH, “How We Came to Paris”, 见White编辑, *By-Line*, 374。

48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69. 另见1953年3月16日EH致Charles Poore, 其中包括他找到了两条通向巴黎的备用路线的声明, “在那些路线上, 你们只需打两场仗”。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1号箱, Poore文件夹。

49 1944年8月23日David Bruce致EH，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

50 Andy Rooney, *My Wa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0), 205.

51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71。资料来源是Bruce的战时日记。

52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72-173页。Bruce并未特别声明海明威是否跟他一起登上了凯旋门，但从他的日记和其他资料来源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作家在他登凯旋门之前和之后都跟他在一起。

53 引文见A. E. Hotchner, *Hemingway and His World* (New York and Paris: Vendome Press, 1989), 162。

54 Lankford编辑, *OSS Against the Reich*, 174。

55 Marshall, *Bringing Up the Rear*, 95. Iris Carpenter, *No Woman's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6), 113, 描述了解放后丽兹酒店的食物。Mary Welsh Hemingway (MWH) 在*How It Was* (New York: Ballantine, 1977), 144中也做了同样的描述。

56 关于这一主题的精彩讨论，见Fuller, “Hemingway at Rambouillet,” 66-80。

57 Marshall, *Bringing Up the Rear*, 101. 这种野牛在亚洲很常见。

58 1955年6月12日David Bruce致EH。

59 EH, “Battle for Paris,” 383.

第十章 在前线：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

1 EH, “War in the Siegfried Line”，见White编辑, *By-Line*, 392。

2 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111-12, 很好地讲述了这些故事。

3 MWH, *How It Was*, 143.

4 1944年9月11日EH致MW,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06。

5 MWH, *How It Was*, 184.

6 1948年11月12日EH致Helen Kirkpatrick,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52。

7 Jacob A. Stein, “General Buck Lanham, Ernest Hemingway, and That Woman in Venice, ” *Washington Lawyer*, January 2003.

8 Jacob A. Stein, “General Buck Lanham, Ernest Hemingway, and That Woman in Venice, ” *Washington Lawyer*, January 2003。

9 1948年11月12日EH致Helen Kirkpatrick,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52。

10 1948年6月9日EH致Raymond O. Barton,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40. 另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222, 其中引用了海明威的声明, 说他三次被推荐获颁卓越服役十字勋章。

11 战争部, FM 30-26: 美国军队随军记者上战场的规定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战争部, 1942年), 2。

12 引文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116。

13 引文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116。

14 1944年9月13日EH致MW,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68。

15 Baker, *Hemingway*, 434.

16 Baker, *Hemingway*, 第438页。Lanham在战后写给海明威的信件中写到了这个事件。1954年11月6日和1960年3月9日CTL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

17 这一事件有各种版本: 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123; Stoneback, “Hemingway’s Happiest Summer,” 204; 和Baker, *Hemingway*, 438. Stoneback和Baker都依赖于Walton的第一手证词。

18 Baker, *Hemingway*, 439.

19 Baker, *Hemingway*, 439-440页。

20 1948年12月15日EH致Alfred Rice,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56。

21 1945年4月14日EH致MW,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84。

22 1948年4月9日和1948年4月13日EH致Malcolm Cowley,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海明威研究藏品, “外发信件”。

23 1945年4月2日EH致CTL,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78-581。海明威的沮丧或许是1944年战役的激烈经历后的一种创伤后压力综合征(PTSD)。在他致Lanham的另一封信里, 他描述了一种明显的PTSD症状: 在家醒来时, 不知身处何处, 还把Mary踢醒, 告诉她“这个破房子”守不住, 他们需要离开。1949年1月5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24 1945年4月14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25 1945年7月23日EH致Maxwell Perkins,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593-595。

26 EH致Konstantin Simonov,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08。1946年, Lanham写道, 海明威是世上理解他的两个人

之一，而他“除了通奸之外”得以放松的唯一方式就是给海明威写信。1946年7月15日CTL致EH，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

27 1945年7月23日EH致Maxwell Perkins，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594。

28 1953年5月23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拉纳姆-海明威文件，第1箱。在这个段落里，他写信给Lanham，说他喜欢“干掉德国佬的科学和实践”。

29 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9; 引文另见Haynes等人，*Spies*, 154。

第十一章 “心里发毛”：既非战争，也非和平

1 1945年10月10日Mary Lanham致EH，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

2 9月22日，Lanham夫妇再次来访。见1945年9月28日EH致MW，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601-3。

3 1964年6月1日Mary Lanham致Carlos Baker，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Baker文件20号箱，1945年文件夹。这是我关于本故事的主要资料来源。

4 照片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 通信1号箱。

5 引文见Brucoli编辑，*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 90。

6 这一叙述来自Amy Knight, *How the Cold War Began: The Igor Gouzenko Affair and the Hunt for Soviet Spies*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5)，特别是32-35页。

7 P. J. Philip, “Soviet Embassy Ex-Aide Gave Tip On Leak of Canada’s Science Dat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 1946.

8 可参见Walter Isaacson和Evan Thomas, *The Wise Men* (New York: Touchstone, 1986), 357。

9 1946年2月21日EH致CTL,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0 演说全文见Winston S. Churchill, “Mr. Churchill’s Address Calling for United Effort for World Peac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46。

11 1946年6月20日EH致Konstantin Simonov,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07-9。

12 1946年6月30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3 1946年6月30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4 1948年1月17日EH致CTL,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5 1947年2月13日Hemingway致“Miss Craipeau”,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Craipeau的名字不得而知, 显然给海明威寄了关于苏联的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或许还问了他的反应如何。另见第七章中关于这封信的讨论。

16 Harold Strauss, “The Riddle of Moscow’s Trials,”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41. 这是一片关于*Darkness at Noon*的评论。

17 Edward Dmytryk, *Odd Man Out: A Memoir of the Hollywood Te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15.

18 Kenneth L. Billingsley, “Hollywood’s Missing Movies: Why American Films Have Ignored Life Under Communism,” *Reason*, June 2000, 以及Billingsley, *Hollywood*

Party: How Communism Seduced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Roseville, CA: Forum, 2000)。

19 Koestler, *Invisible Writing*, 451. Koestler和海明威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20 “Smashing of Fascist Spy Nest,” *Daily Worker*, June 16, 1937.

21 Harold Denny, “Many Doubts Rise in Russia on Guilt of Eight General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1937. 如今, Tukhachevsky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他唯一的罪状只是功高震主, 身为优秀的军队领袖, 有朝一日会让斯大林黯然失色。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 美国有三种关于清洗的常见解读。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一些美国人——如前任驻苏联大使William Davis——愿意相信被指控的人有罪, 斯大林在对付真正的敌人。另一种看法是怀疑这些审判秀不过如此, 但承认美国对此无甚可为, 也不应有何作为。这在战争期间很合理; 苏联可以任意处置它自己的公民。第三种看法是支持丘吉尔, 保留谴责那位独裁者的权利, 他的过度嗜血与希特勒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参见Ronald Radosh和Allis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94-95中的讨论。

22 1948年1月17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23 1948年1月17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关于大背景, 可参见Joseph P. Lash, *Eleanor: The Years Alone* (New York: Norton, 1972), 82-89对于多少有些同情苏联人的自由主义者的讨论。当Wallace越来越无视苏联人的罪责, 就连Eleanor也不得不与他分道扬镳了。

24 Robert J. Donovan, *Conflict and Crisis: 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 Truman, 1945-1948* (New York: Norton, 1971), 284.

25 关于这一时期有很多讨论。我认为特别有帮助的是Bradley, *A Very Principled Boy*; Sam Tannenhaus, *Whittaker Chambers: A*

Biograph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 和Walter Goodman, *The Committee: The Extraordinary Career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68) 。

26 Eric Bentley编辑,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Excerpts from Hearings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1938-1968* (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71) , 57。纳粹同情者是战前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

27 此事发生在1996年。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 *Venona: Soviet Espionage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1939-1957* (Washington, DC: NSA and CIA, 1996) 。

28 美国众议院, *This Is Your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 17。

29 Goodman, *The Committee*, 204。

30 Bentley编辑,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84, 91-92。

31 Martha Gellhorn, “Cry Shame, ” *New Republic*, October 6, 1947.

32 Bentley编辑,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86。

33 Bentley编辑,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第106页。

34 Hanns Eisler, “Statement on Leaving the USA, ” March 27, 1948, 见www.eislermusic.com (2015年6月9日访问) 。

35 Dmytryk, *Odd Man Out*, 39。

36 John Sbardellati, *J. Edgar Hoover Goes to the Movies: The FBI and the Origins of Hollywood's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 特别是197-208页, 是对共产主义颠覆的恐惧, 以及适用于大多数平庸电影的标准精彩讨论。另见Billingsley, “Hollywood's Missing Movies” 和

Hollywood Party, 特别是282页。共产党希望通过好莱坞十人这样的党员来影响美国电影的内容。他们确实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只是与委员会想象的不一樣。除了少数例外, 好莱坞并没有拍摄美化共产主义或苏联的电影。好莱坞十人能做的是尽量让好莱坞不拍关于列宁或斯大林及其反人性罪行的严肃电影。1941~2015年, 好莱坞出品了第三帝国的无数电影, 让希特勒的可怕世界观历久弥新。但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十人的影响, 几乎没有描写斯大林及其凶残偏执狂的电影: 很少或几乎没有电影涉及他所导致的饥荒或他下令进行的清洗, 或是他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成群的集中营。

37 可参见Gerald Horne, *The Final Victim of the Blacklist: John Howard Lawson, Dean of the Hollywood T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95。

38 Gerald Horne, *The Final Victim of the Blacklist: John Howard Lawson, Dean of the Hollywood T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特别是35-36页。

39 Gerald Horne, *The Final Victim of the Blacklist: John Howard Lawson, Dean of the Hollywood T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特别是35-36页, 以及Dmytryk, *Odd Man Out*, 21。

40 Bentley编辑, *Thirty Years of Treason*, 154和158-59。

41 James D. Brasch和Joseph Sigman, *Hemingway's Library: A Composite Record* (Boston: JFK Library Electronic Edition, 2000)。作者们根据主题为书籍做了索引, 关于间谍活动的书籍在第403页; 战情局在第423页; 俄罗斯和苏联在第429页; 特务组织在第430页; 调查局在第435页。清单里至少有两本书是关注于Bentley和Chambers 揭发的高调间谍Alger Hiss的案件的。Bentley的书未列出, 而Chambers的著名回忆录*Witness*出现在瞭望庄园的书架上。

42 1947年3月2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1948年4月15日, 他以类似的观点评论说, 他不喜欢Truman和Forrestal的很多政策。1948年4月15日EH致CTL,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34。

43 好莱坞十人之的Edward Dmytryk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句话“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很久都被用作主要的忠诚调查指南。……这意味着在……（珍珠港之后）反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或希特勒的德国的任何人……都没有问题。但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反对同样政权的人就显然是极端和危险的左派人士，因为当时只有共产党人才会以官方立场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传播”。Dymtryk, *Odd Man Out*, 3.

44 1947年3月28日EH致CTL。

45 可参见（1）1946年6月19日和（2）1948年1月13日CTL致EH，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其中（1）Lanham为其对苏联人的忍耐设定了明确的界限，（2）谈及他的政治偏好。鉴于信件往还所需的时间，EH-CTL的通信往往看似杂乱无章，仿佛他们的信件本身乃至信件的内容都是相互交叉的。

46 可参见调查局，“North American Spanish Aid Committee, An Internal Security Case”，1941年3月12日，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调查局记录（RG 65）1176号箱，文件100-HQ-7058。

47 见“Memo from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未注明日期，见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2014年7月访问）。这段备忘录出现在1942年12月的条目之后，1943年4月的条目之前。备忘录中有备注“4/27/43 memo Dir”，表明备忘录是在Hoover的要求之下准备的。

48 D. M. Ladd,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Re: Ernest Hemingway,” April 27, 1943,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2014年7月访问），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30-31。

49 该档案可在调查局的网站上全文阅读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2015年8月访问）。随着文件或文件的部分内容的解密，调查局在其网站上偶尔还会添加内容，使它成为比Fensch的书*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更好的资源，Fensch的书转载了2009年可阅读的大部分文件。编号6423312的文件看起来是海明威的专属文件。见Gerald K. Haines和David A. Langbart, *Unlocking the Files of the FBI: A Guide to Its Record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3), 特别是第63页, 解释了类别64, 声称该类别包括“一个与欧内斯特·海明威有关的文件”。没有证据表明调查局为海明威开立了任何其他文件。相信我, 我查阅和咨询了很多次!

50 关于不同的观点, 见Jeffrey Meyers, *Hemingway: Life into Art* (New York: Cooper Square, 2000), 109, 以及本书后记中的讨论。

51 关于“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纸条备忘录, 1955年7月20日,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 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96-98。如果调查局调查过海明威, 那么它就会试图证明他犯了罪, 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文件编号。该文件会长得多。例如, Joris Ivens的调查局文件长达650页。Schoots, *Living Dangerously*, 169。多年以后, Hoover告诉他的属下, 说他并不认为海明威有任何共产主义倾向。在1964年1月6日Quentin Reynolds致J. Edgar Hoover的信中, Hoover手迹的边评见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换句话说, 调查局认为海明威偶尔是个讨厌鬼, 特别是1942年和1943年在古巴期间, 但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更不用提共产党间谍了。另见尾声中的讨论。

52 1949年1月5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Hemingway告诉Lanham, 从1942年到1944年, 他的消息来源是“一个当审查员的小孩”。

53 “铜星勋章嘉奖令”, 未标明日期,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其他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夹。

54 1947年7月1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55 1947年7月1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海明威后来说他的铜星勋章是“他们能给平民的最高级别的垃圾”。1948年12月15日EH致Alfred Rice,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56。

56 1947年9月3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1947年夏，George Kennan为了“美国针对苏联的政策成为有耐心却坚定的长期政策，谨慎遏制俄罗斯的扩张倾向”而发表了他的著名文章，国会也在讨论是否该根据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经济援助。

57 1948年4月15日EH致CTL，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634。

58 1947年10月29日EH致Charles Scribner，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630。

59 海明威对“chickenshit”一词的简写，他很喜欢这个名词或形容词。1947年11月27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60 海明威对“chickenshit”一词的简写，他很喜欢这个名词或形容词。1947年11月27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他在1949年7月22日EH致Charles Scribner的信中说了类似的话，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659。

61 见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众议院（RG 233）记录，非美活动委员会，291号箱，131号箱及头目姓名索引，个人姓名文件，海明威条目。非美活动委员会开始工作，从某种线索——或许是一篇新闻文章，或某个涉案公民，或政府的其他部门——一路追查下去。如果线索看上去很有希望，委员会就指定12个调查员中的一位或多位进行初步调查。调查员包括一些前特务和调查局特工，他们可以请求在职业生涯中建立起关系的联系人提供帮助。一旦搜集了足够的信息，调查员就会将其发现呈交主席，后者会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协商，并决定是否举行正式的听证会。关于这个过程描述，见美国众议院，*This Is Your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62 Radosh和Radosh，*Red Star over Hollywood*，203，205，216。

63 Radosh和Radosh，*Red Star over Hollywood*，第216页。

64 引文见Donaldson, *Archibald MacLeish*, 398。他后来公然反对McCarthy。 *Archibald MacLeish*, 426-429页。

65 引文见Peter N. Carroll, *The Odysse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America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73。

66 John A. Kneip, “Evaluation of Milton Wolff” (在表格2725上, 日期不详, 大约在1945年),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第二档案馆, Wolff个人文件。

67 1953年, 美国和西班牙签署一个协议, 联合反对苏联人。Franco直到1975年死后才放开手中的权力。

68 Carroll, *The Odysse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279-90, 是对Wolff战后活动的精彩描述。

69 1941年1月(日期不详)EH致Milton Wolff, 转载于Baker, *Hemingway*, 357。

70 1941年1月23日EH致Milton Wolff, 见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 Milton Wolff文件1号箱。

71 Peter Viertel, *Dangerous Friends: At Large with Huston and Hemingway in the 1950s*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11. Viertel声称是从海明威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

72 1946年7月26日EH致Milton Wolff。信件副本由私人收藏家提供。特别是在战后, “旅”一词取代了部队番号里原来的“营”一词。

73 海明威在致Wolff的信中提到了这个电话。1946年7月26日EH致Milton Wolff。信件副本由私人收藏家提供。特别是在战后, “旅”一词取代了部队番号里原来的“营”一词。Wolff也在致Carlos Baker的信中提到此事。1964年3月9日MW致Carlos Baker,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13号箱。

74 1946年7月26日EH致Milton Wolff。

75 Irving Fajans, 海明威的磁带录音, 1947年2月,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20号箱, 1947年文件夹。Wolff对这次交易的描述, 见Milton Wolff, “We Met in Spain,” *American Dialogue* 1, no. 2 (October–November 1964): 8–9。

76 1947年5月27日Milton Wolff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欧内斯特·海明威博物馆, “其他资料”。

77 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64–65, 认为海明威1947年9月在其他地方。

第十二章 冷战：不再豪言壮语

1 引文见Kessler, *Clever Girl*, 159。

2 C. P. Trussell, “Woman Links Spies to U.S. War Offices and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Times*, July 31, 1948.

3 Golos和Bentley的关系始于1938年。她记得是在1941年7月开始做中间人工作的。

4 美国众议院,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Second Session, 1948)* (Washington, DC: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1948), sec. 526. 另见Kessler, *Clever Girl*, 63–64。

5 Elizabeth Bentley, *Out of Bondage* (New York: Devin-Adair, 1951), 65. 本书在*McCall's*杂志的1951年5、6和7月号上连载。

6 1948年7月2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他后来写道, 他曾在西班牙与一个苏联高官对话, 后者为了让他能准确报告, 愿意向他展示“一切是如何运作的”。1952年10月14日EH致Bernard Berenson,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789。

7 1948年11月27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8 1951年1月8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9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276.

10 Ben Steil, “Red White: Why a Founding Father of Postwar Capitalism Spied for the Soviet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3, 提供了White案的精彩总结，于我而言，在大多数方面比Craig的*Treasonable Doubt*要令人信服。这本书是基于Vassiliev的内务部文件，得出的结论与Steil的一样。见Haynes等人，*Spies*, 258-62, 结论说“证据是压倒性的。……White在1930年代协助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从1943年到1945年协助克格勃，而在他本人的国会证词中做了伪证”。

11 1948年11月24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2 1948年11月26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3 1948年12月22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4 “M’Carthy’ s Charge Is Denied by Duran,”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50. McCarthy此次的指控有一些事实成分。Dura ´n从来不做任何极端之事，但他曾是个同路人，也曾短期担任过共和军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主要是在内务部的控制之下。他的连襟Michael Straight是苏联间谍一事恐怕更是雪上加霜。

15 “M’Carthy’ s Charge Is Denied by Duran,”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50. McCarthy此次的指控有一些事实成分。Dura ´n从来不做任何极端之事，但他曾是个同路人，也曾短期担任过共和军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该部门主要是在内务部的控制之下。他的连襟Michael Straight是苏联间谍一事恐怕更是雪上加霜。同一个故事中包含了Draden为Dura ´n 的辩护词。

16 引文见Kessler, *Clever Girl*, 211。

17 Elizabeth Bentley, “I Joined the Underground with the Man I Loved,” *McCall’s*, June 1951; Elizabeth Bentley, “How I Was Used by the Red Spy Ring,” *McCall’s*, July 1951; 和Elizabeth Bentley, “I Met Tragedy and Disillusion,” *McCall’s*, August 1951. 正如上文所述, 她的回忆录以书籍的形式于当年出版。Bentley, *Out of Bondage*.

18 可参见Haynes等人, *Spies*, 543。

19 “Operational Letter,” July 3, 1950, 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95。

20 “Operational Letter,” July 3, 1950, 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95。多年以后, 在内务部的秘密档案中, 研究者Vassiliev看到一个有关的“华盛顿情报站受命在1948-1950年再次接触的特工名单……(该名单中)包括‘阿尔戈’, ”其身份是“著名记者, 1941年招募”, “尚未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1和83页。

21 1951年1月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69。

22 1949年1月5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23 1950年8月8日Milton Wolff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美国的政策转向与佛朗哥合作, 反对苏联人。关于Wolff对这个政策的反应, 可参见Carroll, *The Odyssey of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293; Peter N. Carroll和James D. Fernandez, *Facing Fascism: New York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 NYU Press, 2007), 180-81。

24 1950年5月7日EH致Milton Wolff, 见纽约大学塔米门特图书馆, Milton Wolff文件。这次意外让海明威难以忘怀, 他还向Hotchner讲过此事。Hotchner, *Papa Hemingway*, 68。

25 1950年5月7日EH致Wolff。Evan Shipman是海明威支持个别老兵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他在1950年写信给海明威, 说他“非常孤独”

的政治立场是因为他曾在西班牙服役。当年晚些时候他生病后，海明威在古巴照顾了他。见Sean O'Rourke, *Grace Under Pressure: The Life of Evan Shipman* (Boston: Harvardwood, 2010), ch. 11。

26 Milton Wolff, "We Met in Spain," *American Dialog* 1, no. 2 (1964年10月至11月)。

27 1950年8月8日Milton Wolff致EH。

28 Wolff, "We Met in Spain."

29 1950年5月8日EH致Joseph McCarthy,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93。这不是海明威在1950年起草的唯一一封愤怒的信, 但很可能没有寄出。见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79中的讨论。

30 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93。

31 1948年6月29日EH致Charles Scribner, J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641。

32 1951年3月25日EH致A. E. Hotchner, 见Albert J. DeFazio III编辑, *"Dear Papa, Dear Hot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Ernest Hemingway and A. E. Hotchne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5), 119。学者Richard K. Sanderson对于*Men at War*的前言提出了类似的想法, 他分析了海明威观念的转变, 认为这与政治气候的变化一致。"Cold War Revisions of Hemingway's *Men at War*," *Hemingway Review* 20, no. 1 (Fall 2000): 29-60。

33 可参见1957年8月28日Alfred Rice致Vojtech Strnad, 见纽约公共图书馆, 海明威法律文件4号箱。

34 Viertel, *Dangerous Friends*, 252。

35 Koestler的倡议发生在1950年。Michael Scammell, *Koestl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372, 639n。

36 EH,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New York: Scribner, 1950), 70.

37 《星期六评论》和Kazin的评论引文见Hendrickson, *Hemingway's Boat*, 331-35.

38 “Books: On the Ropes,” *Time*, 1950年9月11日。

39 引文见Hendrickson, *Hemingway's Boat*, 334-35. Hendrickson大概是第一个发表海明威信件草稿的人。另见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79.

40 1950年10月1日华盛顿情报站致中心，见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96. 这条信息包含了一条有趣的注释，说海明威仍与如今在*Daily Worker*工作的Joe North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这位记者曾敦促海明威为*New Masses*写1935年飓风的文章，或许还把海明威介绍给了Golos。

41 Vassiliev, *Black Notebook*, 81, 提到了标明日期为1949年12月23日的一份名单，其中把海明威描述为1941年招募、尚未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著名特工。他是当时“重新取得联系”的特工之一。同一个信息来源的第83页上有一个类似的注释。

第十三章 没有操纵空间：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古巴和凯彻姆

1 MWH, *How It Was*, 569. 他的回忆录是这个段落的第一手资料。

2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3. 武器也有可能是留到将来某个时刻用的，或许甚至是留作二战使用的，而他保留着它们是因为他就爱收藏杂物，或是因为他不想一条道走到黑。但是，他大概在1947年被人怀疑支持反对Trujillo的远征军后，清除了他的战时军火库。

3 MWH, *How It Was*, 569.

4 MWH, *How It Was*, 569. Gregorio告诉Fuentes, 说他是Castro的长期支持者。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3.

5 引文见Larry Grimes和Bickford Sylvester编辑, *Hemingway, Cuba, and the Cuban Works*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9。

6 可参见Clancy Sigal, *Hemingway Lives! (Why Reading Ernest Hemingway Matters Today)* (New York and London: OR Books, 2013), ch. 13。

7 Anders Österling, 文学奖颁奖词。

8 来自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欧内斯特·海明威博物馆“2013号资料”。诺贝尔奖委员会里都是瑞典人和挪威人。

9 EH,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转载于Matthew J. Bruccoli编辑, *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Jackson, MS,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196。

10 引文见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93。

11 可参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特别是280页。

12 1947年10月24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向策划者提出了建议, 但他还是担心可能的后果, 因而逃到迈阿密去躲了几天, 直到情况明朗, 古巴政府不想再质疑他的作用为止。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66. Yuri Paporov采访在古巴的海明威密友, 见*Hemingway en Cuba* (Mexico City and Madrid: Siglo Veintiuno Editores, 1993), 87-105, 表明海明威的作用不止是提供建议和推荐而已。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53-54, 引用了Herrera 的声明, 说海明威“为此……提供了一笔资金”。

13 Anthony 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Castro, Cuba, and Herbert L. Matthews of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6); Herbert L. 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61) .

14 见第三章。

15 引文见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60。

16 引文见Bruccoli编辑, *Hemingway and the Mechanism of Fame*, 60。

17 1961年11月15日HLM致Carlos Baker,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Carlos Baker文件22号箱。另见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65; 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287; 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299。

18 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15-45, 描述了Matthews的探险, 另见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79-92. 引文见第80页和81页, 以及Matthews手迹的一幅插图。

19 De 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80; Nancie Matthews, “Journey to Sierra Maestra: Wife’s Version,” *Times Talk* 10, no. 7 (March 1957) .

20 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44. 另见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91。

21 引文见Hunter S. Thompson, “What Lured Hemingway to Ketchum?” *National Observer*, May 25, 1964。

22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2. James D. Brasch, “Hemingway’s Doctor: José Luis Herrera Sotolongo Remembers Ernest Hemingway,”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13, no. 2 (July 1986): 185-210, 提供了Herrera的一幅肖像。

23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0-91;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0. Paporov 和古巴学者Norberto Fuentes 两人都直接引用了Herrera 的原话。两本书的标题相似, 多少有些重叠, 但内容不尽相同。

24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1.

25 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299.

26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2, 引用了Herrera的证词。

27 引文见Kenneth Tynan, *Right & Left* (London: Longmans, 1967), 336。1959年, Tynan采访了Castro。古巴领导人声称自己至少读过四遍《丧钟为谁而鸣》。Fidel Castro和Ignacio Ramonet, *Fidel Castro: My Life: A Spoke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 2008), 209。

28 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99; Herbert L. Matthews, “Castro Is Still Alive and Still Fighting in the Mountains, ”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1957.

29 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109.

30 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第109页。

31 1957年4月4日Milton Wolff致Herbert L. Matthews, 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 Matthews文件1号箱。四天后, Matthews回复说: “我理解你想在彻底老糊涂以前做点什么的感受, 因为那正是我过去的想法, 现在也是如此。……” 1957年4月10日Matthews致Wolff, Matthews文件1号箱。

32 基于海明威本人当时提供的信息, 这个故事的最佳资料来源似乎是“Hemingway Dog Slain, ”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1957。

33 Rene ´ Villarreal和Rau ´ l Villarreal, *Hemingway’ s Cuban Son: Reflections on the Writer by His Longtime Majordomo*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3。

34 “Hemingway Dog Slain.” 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MWH, *How It Was*, 566, 其中提到“当晚有人开枪射击我们的狗Machakos”。Machakos是肯尼亚的一个地名, 是海明威的朋友、巨兽猎手Percival的家乡。

35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62.

36 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第62页。

37 1958年9月1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38 1958年8月23日EH致Laymond Robinson,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这是海明威手写编辑的一份打字稿。他还写信给Hotchner, 说Rice干了“我明令禁止的事情”, 还把“烂摊子”甩给了他的客户。1958年8月26日EH致A. E. Hotchner, 见DeFazio编辑, *Dear Papa, Dear Hotch*, 232。

39 Jeffrey Meyers, “The Hemingways: An American Traged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99, 273. Meyers讨论了海明威与Rice时好时坏的关系。

40 “Hemingway Would Bar Reprints,”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August 6, 1958.

41 1951年3月25日EH致A. E. Hotchner, 见DeFazio编辑, *Dear Papa, Dear Hotch*, 119。

42 关于Rice的描述见1958年9月18日EH致CTL, 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Lanham-Hemingway文件。与记者的对话见Laymond Robinson, “Hemingway Says He Will Drop Suit, Asserts That Political Fear Did Not Spur Attempt to Bar Reprint of Stories,”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1958. Rice认为*Esquire*实际上有权转载那些故事。见1957年7月30日Alfred Rice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有鉴于此, 他显然决定依靠政治言论, 也就是他在电话里听到的海明威的政治言论。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 见Meyers, *Hemingway*, 516。海明威声称Rice给了他意外一击有一定的误导性, 因为Rice在提交了法庭文件后, 给他发了一份简要的电报。Rice补充说, 听证会将于五天后举行。1958年8月1日Alfred Rice致E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来信”。

43 Robinson, “Hemingway Says He Will Drop Suit.”

44 1958年8月23日EH致Laymond Robinson。

45 “The Old Man and the Fee, ”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8, 1958, Arnold Gingrich, “Scott, Ernest, and Whoever, ” *Esquire*, December 1966, 324中也有所提及。Gingrich和Hemingway是多年好友，但Gingrich从未听海明威再度提及这次不幸。另见“Hemingway’s Suit, ” *Washington Star*, August 11, 1958: 这些故事反映了“他对那个时期的情感，但现在，即便他还仍怀有同样的情感，却显然唯愿自己当时能以不同的方式来写作那些故事”，一种可以“确保它们再也不会回来纠缠他”的方式。

46 MWH, *How It Was*, 568.

47 1958年7月1日EH致William D. Horne先生和夫人，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884. Matthews在他的报道中谴责了这种做法。见Herbert L. Matthews, “Castro’s Kidnapping Shows War Is Still On; But Methods He Uses Have Cost Him Support of Friends in US, ”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58.

48 MWH, *How It Was*, 569, 571.

49 这是我根据当时情况所做的解读，也是Michael Reynolds等学者的看法。可参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12, 以及Chamberlin, *The Hemingway Log*, 307。

50 MWH, *How It Was*, 569.

51 MWH, *How It Was*, 572-573页。

52 1958年11月24日EH致Patrick Hemingway，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888. “双方都残暴”的评价大概反映了他对Castro的手下进行政治绑架的看法。

53 Jules Dubois, *Fidel Castro: Rebel, Liberator, or Dictator* (New York: Bobbs-Merrill, 1959), 363.

54 DePalma, *The Man Who Invented Fidel*, 141-43, 是对这些事件的生动描述，我主要依赖于这些资料。

55 MWH, *How It Was*, 579. 他会在1960年写给Lanham的一封信中使用很多相同的话。见1960年1月12日EH致CTL,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899。

56 MWH, *How It Was*, 579. 尚不清楚*Times*是否引用了这句话。我努力查找过这句话的出处, 却空手而归。

57 1959年1月7日EH致Gianfranco Ivancich,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890。这是对拉丁语“sic transit gloria mundi”(世界荣耀不再)的戏仿。“hijo de puta”的一种翻译是“狗娘养的”。

58 1959年1月24日EH致L. H. Brague, J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891-92。类似的影响, 见John Crosby, “Peppery Radio Station Puts Zip into News,”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 February 9, 1959. Crosby说, 二月初, 他正“坐在家里一边想着心事, 一边听着纽约热闹的独立(电台)WNEW的广播, 播音员切进来播送了对作家和偶尔是革命家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采访录音。海明威被问到对古巴革命的看法……他说他对此非常高兴。……”

59 1959年2月2日EH致Gianfranco Ivancich, 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 “外发信件”。

60 Carlos 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New York: Vintage, 1985), 17.

61 R. Hart Philips, “Cuban Show Trial of Batista Aides Opens in Stadium,”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59.

62 可参见“Havana-Trials Make Roman Holiday,” February 2, 1959 (文件编号1567.21), 来自英国百代新闻社的档案(2015年7月和2016年9月分别访问了youtube.com)。

63 Fred Brack, “Emmett Watson Reminisces,”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October 21, 1981; Emmett Watson, *My Life in Print* (Seattle: Lesser Seattle, 1993), 66-68.

64 Watson, *My Life in Print*, 68-69. Watson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如何没在谈话过程中做记录，而是等谈话一结束便立即打字记录下来，他如何向海明威展示笔记（而后者拒绝核查），以及他如何从一个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海明威喜欢那篇文章，并对Watson准确引用了他的话“如释重负”。

65 Watson, *My Life in Print*, 第70页。

66 Emmett Watson, “Hemingway on Cuba and Castro,”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March 9, 1959, 转载于Watson, *My Life in Print*, 69-74。新闻通讯社选中了这个故事，它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有的是节选版。可参见Emmett Watson, “Hemingway Defends Cuban Trials,” *Milwaukee Sentinel*, March 11, 1959。关于对海明威的革命公正性观点（这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是变得略为保守）的早期思考，见1947年2月13日EH致“Miss Craipeau”，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外发信件”，讨论见第七章。

67 Watson, *My Life in Print*, 69.

68 1959年3月31日EH致William Seward，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2号箱。

69 1959年3月30日EH致Jack Hemingway，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22号箱。信件的笔迹是Mary的。

70 Tynan, *Right & Left*, 62.

71 这个段落基于Herrera 医生之子Robert Herrera 的证词，他曾在瞭望庄园干各种杂活。海明威一家回来时，他去机场接他们，并与海明威讨论了革命的情况。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6-97.

72 1959年4月30日Kenneth Tynan致Bill和Annie Davis，见Kathleen Tynan编辑，*Kenneth Tynan Lett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232-33。他从古巴归来后便写了这封信，并附上了对海明威赞扬Castro的评论。另见Kenneth Tynan, “A Visit to Havana,” *Holiday* 27, no. 2 (February 1960): 50-58。

73 Tynan, *Right & Left*, 334. 最后, 行刑中止了, 无人参加。这个故事的一个有些混乱不清的二手版本见Nelson W. Aldrich编辑, *George, Being Geor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45-46。

74 1959年4月11日Kenneth Tynan致Terence Kilmartin, 见Tynan, *Letters*, 231-32。对于当时情况的描述, 见Tynan, *Right & Left*, 335-36。

75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7.

76 Va´zquez Candela是报纸*Revolución*的编辑之一。他和Herrera两人的证词都被记录下来, 转载于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8-99。另见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5。他引用了关于这次会面的一篇文章: Euclides Va´zquez-Candela, “Hemingway Worried About Cuba and Fidel,” *Cuban Gazette* 2, no. 13 (February 13, 1963), 我未能找到这篇文章。

77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8.

78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第399页。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22-23, 是对同一次会面的精彩描写。Reynolds指出, 海明威为此次会面所准备的笔记就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他的档案文件之中。

79 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31-32, 是一个内部人士对这些事件的描述, 此人报告, Castro听取了他从一家美国公共关系公司那里买来的建议。

80 Franqui似乎创造了“菲德尔英语”一词。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第31页。“笨拙而清晰”之说来自Tynan。Tynan, *Right & Left*, 336。另见R. Hart Phillips, *The Cuban Dilemma* (New York: Ivan Obolensky, 1962), 72。

81 Franqui, *Family Portrait with Fidel*, 32。

82 我这一段文字的资料来源是Baker, *Hemingway*, 547-48。

83 1941年，Davis在墨西哥也曾接待过海明威，后者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斗牛并拜访了Gustav Regler。

84 MWH, *How It Was*, 598.

85 “Ernest Hemingway Again in Cuba Arrives, ” *Revolución*, November 5, 1959 (转载于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274)。另见“Hemingway Back in Cuba,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59: “海明威先生告诉新闻记者，他充分同情Fidel Castro首相的政权。”当数天后被问及详细的看法时，海明威无话可说。“Hemingways Plan Sun Valley Visit, ” *Washington Evening Star*, November 10, 1959.

86 引文见1959年11月6日哈瓦那大使馆致华盛顿国务院，现存于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中，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00-101。

87 引文见1959年11月6日哈瓦那大使馆致华盛顿国务院，现存于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中，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00-101。在给Buck Lanham的信中，他声称“扬基佬”一说是断章取义。“说你不是个扬基帝国主义者，而是个圣方济各德保拉小子，跟宣布放弃美国国籍不是一码事。”1960年1月12日EH致CTL，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899。他还很关心自己在美国的名声，以至于给八卦专栏作家Leonard Lyons寄去了一份“正确的”信息。引文见1959年11月6日哈瓦那大使馆致华盛顿国务院，现存于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中，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00-101。

88 海明威致信Lanham，说他们要在爱达荷度过飓风时期，其余的时间待在古巴。引文见1959年11月6日哈瓦那大使馆致华盛顿国务院，现存于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中，转载于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00-101。

89 Herbert L. Matthews, *Cast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Penguin 69), 156. Matthews特别提及，他在1960年3月之旅后写下的备忘录中记录了这种印象。此前，Mary曾致信Matthews，代表她自己和海明威赞扬了他“可靠的分析”以及“为革

命所作的辩护”。1960年1月27日MH致Herbert L. Matthews，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Matthews文件。

90 1960年1月12日EH致CTL，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899。Matthews后来阐明了类似的分析，他在1961年写给海明威的一封信里也称之为“长远眼光”。1961年1月2日Herbert L. Matthews致EH，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Matthews文件。Joseph Alsop，“Hemingway’s Guest at a Cockfight，”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Herald*，March 9，1960，描述了他访问哈瓦那时的气氛，在哈瓦那住了几十年的*Times* 通讯记者Ruby Phillips也是如此。见Phillips，*The Cuban Dilemma*，ch. 14。

91 1960年1月12日EH致CTL。

92 Valerie Hemingway，*Running with the Bulls: My Years with the Hemingways* (New York: Ballantine, 2005)，116，是这次会面的第一手资料。另见1960年3月16日Mary Hemingway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Mary叙述了Matthews的来访，并说尽管政权越来越处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危险境地，当地的风景却依然“迷人”。像海明威一样，她强调这不只是皇宫换岗，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会面大概发生在Matthews提议的3月8日。1960年2月1日Herbert L. Matthews致MWH，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Matthews文件2号箱。

93 谈话后，Matthews做了记录，说他和海明威继续就古巴政治达成一致的意见。引文见Fuentes，*Hemingway in Cuba*，428。另见1961年11月15日Herbert L. Matthews致Carlos Baker，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22号箱。

94 Castro说他在“革命的第一年”与海明威进行了“两次相当简短”的对话。Castro和Ramonet，*Fidel Castro: My Life*，592。

95 Valerie Hemingway，*Running with the Bulls*，119。

96 Castro和Ramonet，*Fidel Castro: My Life*，1。

97 Paporov，*Hemingway en Cuba*，402。

98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第402页。

99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235.

100 1960年7月6日EH致Charles Scribner, J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906. Bonsal在回忆录中赞许地引用了海明威反对削减配额的论点。Philip W. Bonsal,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1), 151.

101 1959年1月24日EH致L. H. Bague, Jr., 见Baker编辑, *Selected Letters*, 891-92. Matthews也觉得Bonsal平易近人, 哪怕两人的意见不总是一致。见1959年7月9日Herbert L. Matthews致Nancie Matthews, 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 Matthews文件2号箱。

102 Valerie Hemingway, *Running with the Bulls*, 106-7, 是这次会面和一周后另一次会面的第一手资料。她认为与Bonsal的这些谈话发生在四月, 并写道它们就发生在他被召回之前。然而, Bonsal最后一次被召回是在1960年10月, 当时海明威不在这个国家。Bonsal的回忆录中说, 大使馆从七月开始建议美国公民离开古巴, 此次会面更有可能发生在那个时候。Bonsal,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7. 另见Villarreal和Villarreal, *Hemingway's Cuban Son*, 133, 文中说美国外交人士施压让海明威离开古巴, 并暗示这几次会议均发生在夏季, Mary Hemingway也如此认为, 她在谈完六月的天气之后讨论了这个问题。MWH, *How It Was*, 613.

103 1959年11月6日哈瓦那大使馆致华盛顿国务院, 现存于海明威的调查局文件中, 转载见Fensch, *Behind Islands in the Stream*, 100-101。

104 Valerie Hemingway, *Running with the Bulls*, 106.

105 Valerie Hemingway, *Running with the Bulls*, 第107页。

106 Valerie Hemingway, *Running with the Bulls*, 第107页。

107 可参见Bonsal, *Cuba, Castro, and the United States*, 51: “我在哈瓦那的头几个星期, 努力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传达了善意, 并准备好了就该政权愿意提出的任何事项进行严肃的谈判。” 这个信息见国会图书馆Philip W. Bonsal文件1号箱, 同时也记录了他联系Castro的前期尝试。

108 Castro提到海明威的好话见Fidel Castro, “Statements, ” *Revolución*, July 9, 1960 (转载于Fuentes, *Hemingway in Cuba*, 427)。海明威把这份剪报保存在瞭望庄园的文件之中, 并在具体的语句下划线强调。

109 *New York Times*报道, Castro特别提及了海明威。R. Hart Phillips, “Havana Rejects Seizure Protest, ” *New York Times*, July 9, 1960.

110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399, 声称Castro引用了海明威接受Emmett Watson 采访时的话, 显然就是这一次或七月的另一次会面场合。Paporov的书里没有脚注, 我读遍了Castro当月全部讲话的乏味记录, 最终也未能确认他的话。

111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243.

112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第242页。

113 这篇文章既在1960年作为杂志文章发表, 也作为单行本出版了。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New York: Scribner, 1984) .

114 MWH, *How It Was*, 614.

115 Paporov, *Hemingway en Cuba*, 434, 引用了他的朋友Mario Menocal的话, 这位朋友陪同海明威去了机场。查找1960年7月的美国新闻, 会发现他成功离境古巴, 没有引起任何注意。1960年9月, 海明威致信Matthews, 澄清了“报道说他(海明威)对Fidel ‘不再抱有幻想’, 古巴革命一错再错”。Matthews, *The Cuban Story*, 299. Matthews所指的那封信大概就是1960年9月13日EH致Herbert L. Matthews, 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 Matthews文件2号箱。在那封信里, 海明威告诉Matthews, 说他不该听信对他的观点的二手

报道，而他，海明威，告诉*Saturday Review*的编辑，说Matthews才是最有资格报道古巴情况的人。

116 MWH, *How It Was*, 614.

117 Baker, *Hemingway*, 554.

118 Baker, *Hemingway*, 554.

119 Meyers, *Hemingway*, 546-50, 就海明威在梅奥诊所期间的情况进行了很好的讨论。A. E. Hotchner, *Hemingway in Love: His Own 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157-58, 反映了海明威对他的医生们的态度。Jeffrey Meyers, "The Hemingways: An American Traged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99, 267-79, 汇报了他的印象，Mary授权进行治疗，而海明威的医生们却没有将治疗的过程充分告知她。这与Gregory Hemingway所记录的他与梅奥诊所医生（大概是Rome大夫）的对话一致，后者几乎什么都没有告诉他。Gregory Hemingway, *Papa*, 115-16.

120 Hotchner, *Papa Hemingway*, 280.

121 这个段落我完全依靠上书，264-99页；Baker, *Hemingway*, 555-64；以及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17-59。

122 Hotchner, *Hemingway in Love*, 162.

123 MWH, "Christmas 1960 Note to Self," 引文见 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51。

124 1961年1月13日明尼阿波利斯负责特工致调查局局长，见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学者们认为调查局跟踪海明威到了梅奥诊所，这是他们“控制、嘲笑和诋毁他的失败尝试”的亮点之一。Meyers, *Hemingway*, 109. 正如我在别处提到的那样，我对此事的解读与他人不同。如果调查局跟踪了海明威，他的文件会远远长于124页——充满了详细的现场监视报告，以及“政府所在地”（Hoover喜欢如此称呼华盛顿）的指导。

125 1961年1月13日明尼阿波利斯负责特工致调查局局长。

126 1961年1月16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27 1961年1月2日Herbert L. Matthews致EH，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Matthews文件2号箱。

128 1961年1月16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

129 1961年1月16日E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Lanham-Hemingway文件1号箱。我只能推测这是指1960年2月苏联外交部长Anastas Mikoyan到瞭望庄园对海明威的礼节性拜访，说要支付苏联十年来欠海明威的版权费。1960年2月29日MWH致Clara Spiege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2号箱；1961年11月19日MWH致Alfred Rice，见纽约公共图书馆，海明威法律文件6号箱。其他的信件反映了他对古巴的困扰心情。1月16日，他对儿子Patrick评论说，古巴的事件“远比你读到的还要复杂得多”，翌日，他写信给鱼友Thomas Shevlin说，尽管瞭望庄园还完好无损，但“古巴前景渺茫”。1961年1月16日EH致Patrick Hemingway，见Baker编辑，*Selected Letters*, 911-12；1961年1月17日EH致Thomas Shevlin，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arlos Baker文件12号箱。

130 1961年2月20日Herbert L. Matthews致EH，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及手稿图书馆Matthews文件2号箱。

131 引文见Jim Rasenberger, *The Brilliant Disaster* (New York: Scribner, 2011), 252, 是关于此次入侵和当时局势的一篇最新的资料来源。

132 “Communique by Castro, ” April 21, 1961, *New York Times*.

133 Rasenberger, *Brilliant Disaster*, 313.

134 MWH, *How It Was*, 631. 她后来疑惑计划者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说服他们相信行动会成功的。是来自“第12杯双倍朗姆酒的杯

底吗？”1961年10月20日MWH致CTL，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Charles T. Lanham文件1号箱。

135 1961年5月9日CTL致EH，见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欧内斯特·海明威藏品，“来信”。

136 MWH, *How It Was*, 631. 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54, 认为海明威的精神状态与猪湾事件有关。Reynolds说第一个指出这一点的是海明威研究同行学者Susan Beegel。我做的年谱和他的略有不同。我关注的是地面战斗的日期，这部分的行动最广为人知。

137 描述见Reynolds, *Hemingway: The Final Years*, 354. 这些内容在他去世后以*A Moveable Feast*之名出版。

138 MWH, *How It Was*, 630对此有所描述。

139 MWH, *How It Was*, 第633页。

140 Villarreal和Villarreal, *Hemingway's Cuban Son*, 134. Villarreal在1961年6月底收到此信并将其默记心间。原件散佚。

141 MWH, *How It Was*, 635, 和Baker, *Hemingway*, 563, 是当天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142 据Lanham说，Mary告诉他，海明威在生命中的最后一个下午曾反复阅读他最近的来信，这个细节被一个细心的讣告作者写进了讣文里。Jean R. Hailey, “Maj. Gen. Charles Lanham Dies,”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78. 同样的说法也出现在Frances S. Leighton, “Letters from Hemingway; Unadulterated, Uninhibited—and Unpublishable,” *American Weekly*, May 12, 1963. 两个资料均无脚注，但这个说法相当可信。1961年夏，Mary和Lanham谈论并写了大量有关Lanham致信欧内斯特的内容。可参见1961年11月21日CTL致MH，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燧石图书馆Charles T. Lanham文件1号箱。

143 Lanham写给海明威的最后一批信件的副本，日期为1961年6月5日和6月28日，内容大致相同。第一封信寄到罗切斯特，第二封寄到

太阳谷。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燧石图书馆Charles T. Lanham文件3号箱。

144 MWH, *How It Was*, 635-36.

尾声：计算隐秘的代价

1 可参见Meyers, *Hemingway*, 565-66。

2 Watson, *My Life in Print*, 75.

3 转载于上书，第76-77页。

4 关于海明威与Mary的关系，以及他在梅奥诊所的治疗的深入研究，见Meyers, “The Hemingways: An American Tragedy,” 267-79。或是在众说纷纭中，见Gregory Hemingway, *Papa*, 特别是114-19页，以及Hotchner, *Papa Hemingway*, 特别是277-303页。

5 A. E. Hotchner, “Hemingway, Hounded by the Fed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2011.

6 A. E. Hotchner, “Hemingway, Hounded by the Fed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2011.

7 A. E. Hotchner, “Hemingway, Hounded by the Fed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ly 11, 2011.

8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这个段落概括了我在第11章对这份文件的讨论。

9 因为海明威是以George Saviers 之名在诊所登记的，他担心调查局或许想知道他究竟在隐藏什么。见第13章的讨论。

10 1964年1月6日Quentin Reynolds致J. Edgar Hoover, 见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杰出的记者Reynolds显然与Hoover关系很好，并乐于以Mary的名义写信。

11 1964年1月6日Quentin Reynolds致J. Edgar Hoover, 见 vault.fbi.gov/ernest-miller-hemingway (2015年8月访问)。杰出

的记者Reynolds显然与Hoover关系很好，并乐于以Mary的名义写信。Reynolds 信件里Hoover笔迹的边评。

12 这句话来自：Anders Österling，文学奖颁奖词。

13 Koestler一本书的标题。Arthur Koestler等人，*The God That Failed: A Confession*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49)。

索引

(索引页码为英文原书页码, 即本书边码)

Abraham Lincoln Battalion, 25, 46, 47 - 48, 66, 77, 204 - 5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219 - 20

African lions, 179

Afrika Korps, 152

Alfambra, 37, 44 - 45

Allen, Bill, 223

Allen, Jay, 46

Álvarez del Vayo, Julio, 65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City), 142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243

American Testament (Freeman), 114

Anderson, Don, 259

Anderson, Sherwood, 103

Ardennes Forest, 62

“Argo” (code name), 82, 99, 160, 184, 215

Arnim, Hans-Jürgen von, 152

Arnold, Benedict, 89

Atkinson, Chuck, 259

Attack on Pearl Harbor, 95, 116 - 17, 120, 135

Auden, W. H. , 49 - 50

Baker, Carlos, 252

Barclay Hotel (New York City) , 69, 70, 71

Barsky, Eddie, 216

Barton, Raymond O. , ix, 162 - 64

Batavia, 102 - 3

Batista, Fulgencio, ix, 226 - 28, 232 - 35, 237 - 38

Battle of the Bulge, 62, 180 - 81

Bay of Pigs Invasion, 256 - 58

Benchley, Robert, 35

Benimàmet, 43, 44 - 45

Bentley, Elizabeth, ix, 76, 207 - 10, 211, 214

Bergman, Ingrid, 223

Bessie, Alvah, ix, 45 - 46, 47 - 48, 57, 65 - 66, 197

Blanco, Jesus Sosa, 240

Blue Stream, 138

Bolshevik Revolution, 13, 22, 45

Bonsal, Philip W. , ix, 249 - 51, 266, 342*n*

Boyden, Hayne D. , ix, 121, 142

Braden, Spruille, ix, 112, 214, 313*n*

counter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t embassy, 123 - 24, 126, 127, 140 - 41, 145 - 46

Bridger, Jim, 209

Briggs, Ellis, 317*n*

British Eighth Army, 152

British Security Co-ordination (BSC) , 157

Bronze Star Medal, 200 - 202, 201

Browder, Earl, 32 Brown, George, 259

Bruce, David K. E. , ix, xvii, 165 - 71, 166, 183, 245, 322*n*

Bullfighting, 117, 244 - 45, 251

Butler, Nicholas Murray, 223

“Butterfly and the Tank, The, ” 57, 235 - 36

Buxton, G. Edward, 155

Cambridge Five, 17

Carnegie Hall (New York City) , 32 - 33

Castro, Fidel, x, 227 - 33, 237 - 51

American relations, 248 - 49, 257

Cuban Revolution, 237 - 43, 239, 250, 263 - 64

Hemingway' s meeting with, 246 - 48, 247

Hemingway' s support of, 221 - 22

Matthews' support of, 228 - 33

struggle between Batista and, 227 - 29, 237 - 38

Castro, Raúl, 240

Chamberlain, Neville, 56, 186

Chambers, Whittaker, 210, 301ⁿ

Champs-Élysées (Paris) , 170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10, 36, 70, 117, 138, 218

Chase National Bank, 155

Chiang Kai-shek, xii, 93 - 94, 97, 97 - 98, 213

Child, Julia, xvii China, 71 - 72, 91 - 102, 114 - 15, 213

Chou En-lai, x, 94, 97, 98, 99, 99 - 100, 101, 213

Chrost, Antoni, 37 - 38, 44 - 45

Churchill, Winston, 62, 113, 223

Cold War speech, 189 - 90, 193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 256

Class consciousness, 4

Colebaugh, Charles, 120

Collier's, 20, 71, 102 - 3, 120, 157 - 58, 162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22 - 24, 36, 39, 77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PUSA) , 4, 11, 14, 32, 58 - 59, 73, 76, 89, 197, 214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Inc. , 20 - 22, 29, 33

Cornford, John, 147 - 48

Cowley, Malcolm, 167 - 68, 182

Craipeau, Miss, 191, 192, 312_n, 325_n

Crompton, Bontë, 128

“Crook Factory, ” 124 - 29, 134, 199 - 200

Crown Publishing Group, 84 - 85, 315_n

Cuba, 120 - 23, 225 - 44, 255 - 58

Bay of Pigs Invasion, 256 - 58

counterintelligence activities, 120 - 29, 135 - 46

FBI and Leddy, 109 - 10, 126 - 27

Hemingway's move to, 110 - 12

Hemingway's post-war return to, 182 - 83

Cuban Revolution, 237 - 43, 250, 262, 263 - 64

Czechoslovakia, 56

Dahl, Roald, x, 156 - 57

Daily Worker (newspaper) , 12, 14, 32, 192

Daladier, Édouard, 56

Darkness at Noon (Koestler) , 191 - 92

Davis, Nathan “Bill, ” 244 - 45

“Denunciation, The, ” 57, 235 - 36

Depression of Hemingway, 182 - 83, 253, 254, 262, 264,
323*n*

Diplomats and Demagogues (Braden) , 140 - 41

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 (DSC) , 202

Donne, John, 64

Donovan, William J., 71 - 72, 153 - 54

Dorchester Hotel (London) , 146, 158, 159 - 60

Dos Passos, John, x, 6, 7, 9, 20, 27 - 30, 294 - 95*n*

Dos Passos, Katy, 29

Duggan, Laurence, 14

Dulles, John Foster, xx

Durán, Gustavo, x, 128 - 29, 214, 303*n*, 331*n*

Eastern Front, 114

Eisenhower, Dwight D. , 152, 160, 248, 255 - 56, 258

Eisler, Hanns, x, 195 - 96, 202

Eitingon, Leonid, 43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253 - 54

Esquire (magazine) , 235 - 37

Farewell to Arms, A, 2, 63, 64

Fascism, 19, 22, 24, 30, 32 - 33, 48, 86 - 87, 134 - 35

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 89, 262 - 65

File Number 64-23312, 83, 199 - 200, 262 - 65, 328_n, 343 - 44_n

Hemingway in Cuba, 109 - 10, 126 - 28, 199 - 200, 328 - 29_n

Hemingway' s paranoia about, 254 - 55, 262 - 65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 (FERA) , 7 - 8, 10 - 11

Fifth Column, The, 38 - 39, 48 - 49, 54, 63, 70, 81, 123, 218, 236

Finca Vigía, 72, 111, 121 - 22, 182 - 83, 185 - 86, 198, 234 - 35, 242, 243 - 44, 246, 250, 262

Finland, 61, 62

Fitzgerald, F. Scott, x, 35 - 36, 103

Fix Bayonets (Thomason) , 107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 89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xix, 17, 31, 44, 64 - 66, 70, 77, 82 - 83, 128 - 29, 181, 204, 231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film) , 157, 223

France, 61 - 62, 151 - 52, 161 - 71

Franco, Francisco, x, 16 - 17, 19, 216, 217

Franc-Tireurs et Partisans Français (FTP) , 164 - 65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62

Freeman, Joseph, x, 114

French Foreign Legion, 106

French Resistance, 164 - 65, 167, 168

Fuentes, Gregorio, 221 - 22

Gálicz, János, 60

Gare St.-Lazare (Paris) , 28 - 29

Garibaldi Brigade, 51 - 52

Gaylord Hotel (Madrid) , 25 - 26, 42, 45, 84

Gazur, Edward P. , 18 - 19, 291ⁿ, 299ⁿ

Gellhorn, Martha, x, 20, 56, 86, 120, 134, 185

in China, 91 - 92, 94, 96 - 101, 97, 105, 107, 306ⁿ

Dahl' s offer, 156 - 58

HUAC and Eisler, 195 - 96, 202

marital problems, 153, 158 - 59

in Mexico City, 117 - 18

Operation Friendless and, 143 - 44, 156

OSS and Joyce, xviii, 153 - 56

in Spain, 20, 21, 26 - 27, 34 - 35, 51 - 52, 54, 123

wedding and honeymoon, 70 - 71

World War II reporting, 112, 153 - 54

Germany, 5

declaration of war on U.S., 116

Hemingway' s U-boat patrols, 131 - 32, 136 - 39, 143 - 46

Hitler seizes power, 13 - 14

invasion of Soviet Union, 112 - 14, 115 - 16

Nazi-Soviet Pact, 57 - 61, 77, 95 - 96, 115

Phony War, 61 - 62

Gingrich, Arnold, 303*n*, 337*n*

Golos, Jacob, x, 72 - 82, 74

Bentley and, 208 - 9, 214

recruitment of Hemingway, 76 - 84, 86 - 87, 88 - 90, 183 - 84

Gorky, Maxim, 4

Gouzenko, Igor, xi, 186 - 89

Grand Veneur (Rambouillet) , 166 - 67, 176

Granma, 227

Great Britain, 17, 61 - 62, 94 - 96, 194

Great Crusade, The (Regler) , 59 - 61, 301*n*, 302*n*
Great Depression, 4 - 5, 7 - 8
Great Hurricane of 1935, 1 - 2, 8 - 10, 11 - 12, 266
Greece, 194
Green, Michael, 148
Green Hills of Africa, The, 4
Guest, Winston, xi, 109 - 10, 125, 131 - 32
Gulf Stream, 110, 133, 185, 310 - 11*n*
Guns of August, The (Tuchman) , 23 - 24
Gurney, Jason, 18
Havana, Cuba, 110
Hawaii, 92 - 93
Hemingway, Gregory, xi, 315*n*, 343*n*
Hemingway, Hadley Richardson, xi, 156, 182
Hemingway, Jack, 70, 179, 242
Hemingway, John "Bumby, " xi
Hemingway, Leicester, 137 - 40, 146, 158 - 59, 314*n*, 317*n*
Hemingway, Mary Welsh, xi, 175, 175
in Cuba, 226, 240, 245, 251 - 52, 256, 257, 263 - 64
death of Hemingway, 259 - 60, 261

dumping of supplies off Pilar, 221 - 22
in Idaho, 238, 239, 259 - 60
at Mayo Clinic, 252 - 53, 255, 258 - 59
in Paris, 159, 174, 180
Hemingway, Patrick, xi, 227, 238
Hemingway, Valerie Danby-Smith, xi, 249 - 50, 254
Hemingway International Billfish Tournament, 246 - 47
Hendrickson, Paul, 132
Herbst, Josephine "Josie, " xi, 19, 28, 78
Herrera, José Luis, xi, 230 - 31, 235, 243, 339*n*
Herrmann, John, xi, 77 - 78
Hicks, Granville, 59, 302*n*
Hiss, Alger, 78, 327*n*
History Today Inc., 29
Hitler, Adolf, xix, 13 - 14, 16 - 17, 56, 57 - 58, 60 - 61,
62
Hofer, Eric, 299*n*
Hollywood Ten, 196 - 98, 199, 202 - 4, 326 - 27*n*
Hong Kong, 94 - 95, 103
"Hooligan' s Navy, " 139 - 40
Hoover, Herbert, 11

Hoover, J. Edgar, xi, 127 - 28, 199, 200, 263 - 64, 314_n

Hopkins, Harry, xi, 10, 34

Hotchner, A. E., xii, 218, 225, 236, 250 - 55, 262 - 63, 264

Hôtel Ritz Paris, xvii - xviii, 170 - 71, 174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 194 - 99, 202 - 3, 207, 210 - 11, 213 - 14, 329_n

Hürtgen Forest, 178 - 80

Ibárruri, Dolores, 50

Idaho, 238, 239, 241, 259 - 60

Ile de France, 29

Ingersoll, Ralph, 71, 94, 104

International Brigades, 25 - 26, 41, 45, 50 - 53, 58, 60, 61, 64 - 65, 302_n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 249

Internment of Japanese Americans, 120

Islands in the Stream, 136

Ivancich, Gianfranco, 240

Ivens, Joris, xii, 16, 21 - 27, 31 - 36, 66

in China, 36, 38 - 39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emingway, 23 - 27

Robles and Dos Passos, 27 - 28, 29

The Spanish Earth, 15, 21 - 22, 24 - 25, 32, 33 - 36

support of communism, 21 - 22, 78 - 79, 195, 293*n*

Japan, 93 - 94, 96

Pearl Harbor attack, 116 - 17, 120, 135

Jenkinson, Anthony, xii, 137 - 40, 316*n*

Joyce, Robert P., xii, 110, 121 - 29, 122, 142, 153 - 56

Kahlo, Frida, 117

Kamenev, Lev, 40 - 41

Kashkin, Ivan, xii, 3, 12, 56, 65

Katz, Otto, 23, 24, 312*n*

Kazin, Alfred, 219 - 20

Ken (journal), 48

Kennedy, John F., 23, 256

Key West, 5 - 8, 133

KGB, 13, 17, 75, 77, 83 - 84

Kimmel, Husband E., 116 - 17

King, Mackenzie, 188

Knoblauch, E., 199 - 200, 314*n*

Koch, Stephen, 291*n*, 294 - 95*n*

Koestler, Arthur, xii, 23, 191 - 92, 219, 265

Koltsov, Mikhail, 26, 31

Korean War, 215

Labor Day hurricane of 1935, 1 - 2, 8 - 10, 11 - 12, 266

La Florida (Havana) , 77, 123, 225, 242 - 43

Lanham, Charles T. "Buck, " xii, 257

bond with Hemingway, 174 - 76, 183

Cuba visit, 185 - 86, 187

Hemingway correspondence, 182 - 83, 190, 198 - 99, 202, 209
- 10, 211 - 12, 215 - 16, 256, 327 - 28*n*

politics of, 199

war combat, 173 - 74, 178 - 79, 180

Lanham, Mary "Pete, " xii, 185 - 86, 187

Lardner, James "Jim, " 197, 206

Lardner, Jim (soldier) , 50

Lardner, Ring, Jr., 197

Lawson, John Howard, xii, 197, 198, 213

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 32 - 33

Leclerc, Phillipe, 168, 176

Leddy, R. G. , xii, 109 - 10, 126 - 27

Lee, Duncan, 208

Lend-Lease Program, 71 - 72

Lenin, Vladimir, 22

Life (magazine) , 244 - 45

McCall' s (magazine) , 214

McCarthy, Joseph R. , xiii, 213 - 14, 217 - 18

MacLeish, Ada, 87 - 88, 102

MacLeish, Archibald, xiii, 20, 22 - 23, 63 - 64, 146, 204

McWine, Turner, 154

Mafia, 226 - 27

Magruder, John, 155

Mann, Thomas, 204

Mao Tse-tung, 94, 213

March, Fredric, 35

Marqués de Comilla, 131

Marshall, S. L. A. , xiii, 171

Marty, André, xiii, 41 - 42, 53, 64 - 65

Marx, Karl, 196

Matsonia, 92

Matthews, Herbert L. , xiii, 228, 340 - 41*n*

bond with Hemingway, 229

in Cuba, 228 - 33, 246, 255 - 56

lunch at Finca, 246, 341*n*

in Spain, 46 - 47, 229

Wolff and, 233, 335 - 36*n*

Matthews, Nancie, 230, 232

Maugham, Somerset, 158

Mayo Clinic (Rochester) , 252 - 55, 258 - 59

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 134 - 35

Men in Battle (Bessie) , 46

Mexico City, 117 - 18

Mikoyan, Anastas, 344*n*

Miller, Arthur, 204

Molotov, Vyacheslav, xix, 115

Moncada Barracks (Cuba) , 227

Mont-St.-Michel, 163

Morale Operations (MO) , 155

Moreira, Peter, 303 - 4*n*, 308*n*

Morgenthau, Henry, Jr., xiii, 71 - 72, 104 - 5, 309*n*

Moscow Trials, 39 - 41, 192 - 93

Moveable Feast, A, 257 - 58

Münzenberg, Willi, xiii, 22, 23, 58

Murchison Falls, 224 - 25

Mussolini, Benito, 5, 17

National Archives, U.S., xx

Naval Intelligence, 107, 135 - 36, 138

Nazi-Soviet Pact, 57 - 61, 77, 95 - 96, 115

Neutrality Act, 126 - 27

New Deal, 7 - 8, 10 - 11, 88 - 89, 193

New Masses (magazine), 4, 5, 14, 33, 65, 114, 133

“Who Murdered the Vets?” , 11 - 13, 77, 290_n

New Republic, 202

New Yorker, 219 - 20

New York Times, 46, 192, 228, 232, 234 - 35, 239 - 40, 256

“Night Before Battle, The, ” 57, 235 - 36

Nin, Andrés, 31, 296_n 1984 (Orwell), 246

Nixon, Richard, 194, 244

NKVD (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xviii - xxi, 214 - 15, 265 - 67

Golos and, 73 - 82

Hemingway in China, 99 - 102

Hemingway in Cuba, 146 - 48

Hemingway in London, 159 - 60

Hemingway on radar of, 12 - 14

Hemingway' s meetings with Orlov, 42 - 46

Hemingway' s recruitment by Golos, 76 - 84, 86 - 87, 88 - 90

Hemingway' s relationship with, xviii - xxi, 212 - 13, 214 - 15, 220, 264, 265 - 67

Robles affair, 27 - 28

Spanish Civil War, 17 - 18, 31, 42 - 46

World War II operations, 115 - 16, 183 - 84, 212 - 13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2, 222 - 23, 265, 281

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 50

Normandy landings, 160 - 61

North, Joe, xiii, 46 - 47, 77, 78, 229, 333*n*

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 (NANA) , 18 - 19, 20

North Korea, 213

October Revolution, 41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ONI) , 107, 135 - 36, 138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 xvii - xviii, 72, 153 - 56

Okhrana, 13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222 - 23

Omaha Beach, 161

“One Trip Across, ” 4

Operation Friendless, 143 - 46, 153, 156

Operation Zapata, 256

Ordóñez, Antonio, 245

Orlov, Alexander, 44

Alexander Orlov (Gazur) , 84 - 85, 291*n*, 299*n*

background of, 17

Hemingway’ s visit to Benimàmet, 43, 44 - 45

meetings with Hemingway, 42 - 46, 299*n*

NKVD chief of station in Spain, 17 - 19, 31, 42 - 46, 299*n*

Orwell, George, 246

Ottawa Journal, 187

Outdoor Life (magazine) , 135 - 36

Pacciardi, Randolfo, 51 - 52

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 93

Paris, xvii - xviii, 169 - 71, 174

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POUM) , 30 - 31

Pearl Harbor, 92

Pearl Harbor attack, 95, 116 - 17, 120, 135

Pelkey, Archie, 163, 171, 179 - 80

Perkins, Maxwell, xiii, 33, 35 - 36, 70, 103, 107

Hemingway correspondence, 10, 11, 19, 54, 56, 62, 64, 116, 183

Pfeiffer, Michael, 121

Pfeiffer, Pauline, 5 - 6, 19, 35, 54, 70

Philby, Kim, 17

Philippines, 103

Phillips, Ruby, 240, 341*n*

Phony War, 61 - 62

Pilar (cabin cruiser) , 132 - 34, 133, 135 - 38, 140 - 46

concept of war operation, 140 - 43

cover letter for war operation, 142, 144

disposal of supplies, 221 - 22

Hemingway' s purchase, 132 - 33

Labor Day hurricane of 1935, 1 - 2, 8, 12, 133

outfitting for war, 137 - 38

war cruises, 131 - 32, 136 - 39, 143 - 46 PM (newspaper) , 71, 94 - 95, 100, 104

Poland, 57 - 58, 61

Popular Front, 48, 58

Pound, Ezra, 4

Pravda (newspaper) , 26, 48

Prensa Latina, 245

Pulitzer Prize, 222 - 23

Quisling, Vidkun, 95

R-42 (agent) , 125, 139

Rainer, Luise, 35

Rambouillet, 151 - 52, 165 - 69, 176 - 77

Rankin, John E. , 196

Rawlings, Marjorie K. , 299*n*

Reader' s Digest, 138

Recca, 121

Red Army, 113 - 15

Red Terror of 1939, 55 - 56

Regler, Gustav, xiv, 39 - 42, 40, 66 - 67, 301*n*

background of, 39

friendship with Hemingway, 41 - 42

The Great Crusade, 59 - 61, 301*n*, 302*n*

in Mexico City, 118 - 19, 119

in Moscow, 39 - 41

Regler, Marie Louise, 118

Renan, Ernest, 125

Reynolds, Michael S., 177

Reynolds, Quentin, 263 - 64

Rice, Alfred, xiv, 236 - 37, 336 - 37*n*

River Ourthe, 173 - 76

Robles, José, xiv, 27 - 30

Rome, Howard, 253 - 54, 255

Rooney, Andy, xiv, 169

Roosevelt, Eleanor, 34 - 35, 157, 193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7 - 8, 10 - 11, 34 - 35, 71, 88 - 89, 116, 127, 193, 297*n*

Rosenberg, Ethel, 214

Rosenberg, Julius, 214

Royal Air Force (RAF) , 157, 161 - 62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RCMP) , 187 - 88

Russell, Joe, 104

Russian Civil War, 17, 43

Salmon, David A., 14

Sanderson, Richard K., 333*n*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219

Saviers, George, 245, 258, 259

Saxon, Donald B., 142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261

Second Ame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32 - 33

Secret Intelligence (SI), 154

Shaw, George Bernard, 4

Shepardson, Whitney, 154 - 55

Shipley, Ruth, 19

Shipman, Evan, 332ⁿ

Short, Walter C., 116 - 17

Siqueiros, David, 117

Sloppy Joe's (Key West), 6, 20, 104

Smedley, Agnes, 135, 308ⁿ

Smith Act of 1940, 307ⁿ

Sorge, Richard, 113

South Korea, 213

Soviet - Japanese Neutrality Pact, 96

Soviet Union, 5

atomic bomb project, 213

Bolshevik Revolution, 13, 22, 45

Churchill' s Iron Curtain speech, 189 - 90, 193

German invasion of, 112 - 16

Hemingway readership in, 2 - 3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pying, 13 - 14. *See also* KGB; NKVD Moscow Trials, 39 - 41, 192 - 93

Nazi-Soviet Pact, 57 - 61, 77, 95 - 96, 115

Truman Doctrine and, 192 - 93, 194, 198 - 99

Spain in Flames (film) , 21

Spanish Civil War, 15, 16 - 20, 23, 24 - 27, 29 - 31, 33 - 39, 46 - 55, 62, 87, 102

Spanish Earth, The (film) , 21 - 22, 26, 32, 33 - 36, 63

Spender, Stephen, 26 - 27

Stalin, Joseph, xix, 17, 22, 57 - 58, 61, 96, 113, 192

Stalingrad, 147, 152

Stars and Stripes (newspaper) , 169

Stewart, Donald Ogden, 32

Stillwell, Joseph, 97 - 98

Straight, Michael, 147 - 48

Stripling, Robert E. , 196, 197

Strong, George V. , 154 - 55

Submarines, German, 136 - 40, 145

Sudetenland, 56

Sun Also Rises, The, 117

SVR (Sluzhba Vneshney Razvedki) , 84 - 85

Sweeny, Charles, 106 - 7

Tampico Club (Mexico City) , 118

Texas, USS, 161

Third Army Inspector General Interview of Hemingway, 176
- 77

Thomason, John W., Jr., xiv, 106 - 7, 134, 135, 141 - 42,
143

Thompson, John H., 238

Time (magazine) , 12

Toronto Daily Star, 2

Torrents of Spring, 4

“Traitor, ” 24, 210, 249 - 50

Travelers Club, 170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Gellhorn) , 92

Treasury of the Free World, The, 186 - 87

Trotsky, Leon, xiv, 18, 31, 117 - 18, 220

“True believers, ” 87, 183 - 84, 299_n

Trujillo, Rafael, 227

Truman, Harry, 189 - 90, 192, 193 - 94, 198 - 99, 202

Truman Doctrine, 194, 198 - 99

Trumbo, Dalton, 192

Tukhachevsky, Mikhail, 192, 325*n*

Tunisia, 152

22nd Infantry Regiment, U.S., 174 - 75, 178 - 80

26th of July Movement, 231

Two Wars and More to Come (Matthews), 229

Tynan, Kenneth, 242 - 43

U-boat patrols, 131 - 32, 136 - 39, 143 - 46

V-1 flying bombs, 161 - 62

Van Gelder, Bob, 69 - 70

Vassiliev, Alexander, xiv, xix - xx, 77, 85, 304*n*, 305*n*

Vázquez Candela, Euclides, 243 - 44

Viertel, Peter, 219

Villarreal, René, xiv, 233 - 34, 248, 258 - 59

Villedieu-les-Poêles, 162 - 63

Wallace, Henry, 193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4 - 5

Wall Street Journal, 237

Walton, William, 179 - 80

Watson, Emmett, xiv, 241 - 42, 261

Watson, William B. , 24, 293*n*

Wertheim, Barbara (Barbara Tuchman) , 23 - 24, 312*n*

Wheeler Shipyard, 132

White, Harry Dexter, xv, 71 - 72, 106, 210 - 11

White, Theodore, 96

Whitehead Street house, 6 - 7, 7*n*

“Who Murdered the Vets? ” , 11 - 13, 290*n*

Wilkinson, T. J. , 138

Williams, Tennessee, 242 - 43

Wolff, Milton, xv, 25, 66, 204 - 6, 205, 216 - 18, 224, 233

Wilson, Edmund, xv, 65

Wong, Anna, 98 - 99, 308*n*

Woolf, Virginia, 103

World Tourists Inc. , 75, 208 - 9

Worley, George, 12

Zhou En-lai. *See* Chou En-la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 (美) 尼古拉斯·雷诺兹 (Nicholas Reynolds) 著；马睿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书名原文：Writer, Sailor, Soldier, Spy: Ernest Hemingway's Secret Adventures, 1935-1961

ISBN 978-7-5201-3209-1

I. ①作… II. ①尼… ②马… III. ①海明威 (Hemingway, Ernest 1899-1961) -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4854号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原 著 / (美) 尼古拉斯·雷诺兹

译 者 / 马睿

出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周方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独立编辑工作室 (010) 593671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16.25 插页：1.25 字数：286千字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209-1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01-2017-6803号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德〕福尔克马·西古希 / 性欲和性行为：一种批判理论的 99 条断想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 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

〔德〕克里斯托弗·诺恩 / 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古代源头到 20 世纪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世界大战的时代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从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 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英〕卡丽·吉布森 / 帝国的十字路口：从哥伦布到现在的加勒比史

〔德〕雅恩·克诺普夫 /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

〔英〕亚当·查莫斯基 / 幻影恐惧：政治偏执狂与现代国家的创建

〔波兰〕安娜·比耶特 / 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日〕伊藤之雄 / 伊藤博文：创造近代日本的男人

〔美〕玛雅·贾萨诺夫 /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英〕罗伯特·欧文 / 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

〔美〕尼古拉斯·雷诺兹 /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

〔英〕理查德·伯克 / 帝国与革命：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涯

〔德〕沃尔弗拉姆·希曼 / 施特温：战略家、空想家

〔德〕约尔格·劳斯特 / 魔法的世界：基督教文化史

〔德〕沃尔夫冈·莱因哈德 / 世界的征服：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

〔美〕马克·劳伦斯·希拉德 / 伏特加政治：酒精、专制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美〕约翰·A.法雷尔 / 理查德·尼克松：人生

GO
扫码下单



忘掉地平线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010-59367109
装帧设计 / 宋涛

R
索·恩
THORN BIRD

[An] engrossing story of Hemingway's disillusionment with American politics, his sympathy with communism, and his attraction to adventure and subversion.

(Kirkus Reviews)

(一部)迷人的书，写了海明威对美国政界的幻灭、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对冒险和颠覆的痴迷。(柯克斯书评)

觉醒当海水把陆地搅得天翻地覆 | 作家与政委在西班牙参战 | 重返西班牙坚持到底 | 丧钟为共和国而鸣海明威见证了历史 | 秘密档案内务部在行动 | 探还是不探中国和战争的谜团 | 骗子工厂一场秘密的陆战 | “皮拉尔”号与海战我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 | 挺进巴黎勇猛如野牛 | 在 frontline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 | “心里发毛”既非战争，也非和平 | 冷战不再豪言壮语 | 没有操纵空间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古巴和凯彻姆 | 计算隐秘的代价

权威著作……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雷诺兹用史料证明，海明威害怕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隐瞒了 20 多年的一个龌龊的小秘密：1940 年，他曾答应帮助苏联的外国情报机关——内务部。——《华尔街邮报》

引人入胜……关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这本书为他的经典文库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雷诺兹独一无二的传记读来像一部侦探小说，充满悬疑。

——《密苏里人报》

尼古拉斯·雷诺兹在《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所做的精彩迷人的新研究表明，（海明威）事实上曾经为苏联人和美国人两方供职。

——《纽约书评》

雷诺兹在历史的暗影中发现了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海明威。

——《伦敦书评》

R
索·恩
THORN BIRD

忘掉地平线



索·恩官方微信



索·恩官方微博



定价：79.00 元